



春秋

原来是这样

姜狼◎作品

历史中国
白金升级版



中国断代史畅销读本
著名历史作家姜狼经典之作！

晋文公漂泊十九年的艰难上位称霸路
管仲凭什么“玩转”春秋，辅佐齐桓公称霸？
诗经是爱情作品，还是一种政治隐喻？
司马迁笔下的赵氏孤儿的传奇竟然是假的？

霸道既兴，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智计百出，纵横捭阖。
读春秋，你能读到一个别样的中国历史。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夏商周原来是这样

春秋原来是这样

战国原来是这样

秦朝原来是这样

魏晋原来是这样

南北朝原来是这样

五代十国原来是这样

宋朝原来是这样

清朝原来是这样

历史中国

• 第21章—第24章

夏商周

原来是这样

醉罢君山◎作品

太康失國 昭舜代夏

少康中兴，如何复仇夺国者。

开辟鸿茫 告别蛮荒

榮雖驅起，成康之治，烽火戢諸侯。

权力倒悬的时代，霸主铁腕，运筹天下

统治权柄，终落谁家？

深通间谍战与权谋术的大师伊尹，其真实面目

是贤相 还是叛臣？ 商五次迁都 几度兴衰？

潘世荣林 暴政天国 魔村是个「艺术家」？

拨开神话传说的迷雾，告诉你一个

最接近远古却更真实的传奇时代

—夏商周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夏商周原来是这样

醉罢君山 著

现代出版社

目录

- 一 远古时代的英雄
- 二 征服者轩辕
- 三 开辟鸿蒙，告别蛮荒
- 四 黄帝的子孙们
- 五 洪水滔天——帝尧时代
- 六 圣人还是阴谋家（上）
- 七 圣人还是阴谋家（下）
- 八 禅让还是夺权？（上）
- 九 禅让还是夺权？（下）
- 十 夏王朝的诞生
- 十一 窃国者（上）：后羿
- 十二 窃国者（下）：寒浞
- 十三 少康中兴（上）：复仇
- 十四 少康中兴（下）：复国
- 十五 失重的权柄
- 十六 夏桀干了什么坏事
- 十七 权谋大师伊尹
- 十八 夏台之囚
- 十九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 二十 贤相还是叛臣？
- 二十一 大迁徙：盘庚迁都
- 二十二 武丁大帝（上）：三年不语
- 二十三 武丁大帝（下）：运掌天下
- 二十四 岐周的兴起
- 二十五 山雨欲来风满楼
- 二十六 酒池肉林：暴君与“艺术家”

[二十七 我本梟雄：西伯与姜太公](#)

[二十八 殷商的灭亡（上）](#)

[二十九 殷商的灭亡（下）](#)

[三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三十一 管、蔡的叛乱（上）](#)

[三十二 管、蔡的叛乱（下）](#)

[三十三 周公的政治学](#)

[三十四 成康之治](#)

[三十五 从未来穿越到周朝？](#)

[三十六 周穆王的武功文治](#)

[三十七 衰落中的周王室](#)

[三十八 昙花一现的宣王中兴](#)

[三十九 骊山之变](#)

[四十 权力倒悬的时代](#)

[四十一 在霸主铁腕的庇护下](#)

[四十二 风刀霜剑严相逼](#)

[四十三 零落成泥碾作尘](#)

[夏商周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一 远古时代的英雄

很久很久以前，距今上万年，中国大地之上，仍是一派原始自然景象，天造草昧，荆榛未开。高山丘陵、平原高原、江湖沼泽，仍保持着原始的蛮荒模样。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充足的阳光与丰富的降水，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高大的树木夹杂着低矮的灌木，枝藤交错，野草丛生，点缀着形形色色的花朵随处可见。禽鸟虫蛇走兽，游荡其间，人类看上去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

然而凭借思想这一无敌利器，人类巧妙地利用种种工具，依靠团结与协作，渐渐脱颖而出，成为地球生物圈之主宰。

尽管如此，彼时之人，生存境况之恶劣，仍为今人所难想象。仅有简陋之居所，寒碜之衣物，窳（yǔ）劣之器具，夏与烈日争，冬与严霜争，与洪水争，与毒蛇猛兽争，非勇敢坚强者无以生存。华夏之文明，便是在此恶劣之环境下，初露熏光。

由于历史久远，史料缺失，要恢复远古历史的面貌，几乎是不可能。当然，中国有一些神话故事，只是与印度、埃及、巴比伦、希腊等文明古国相比，不仅神话故事少得可怜，也毫无系统可言。在这些神话中，包括中国人所熟知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神话故事产生的时间并不早，在早期历史文献中，极少被提及。可见华夏文明自一开始，就与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也是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古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大家都知道，孔子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孔子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就已是如此。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早期出现的神祇（qí），

都不是人格化的，而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上古时代的神，譬如天神、地神、河神、山神等，可以享受人的祭祀，却始终没有神的面貌，没有偶像崇拜。谁也不知道神长什么模样，似乎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个问题。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知道敬畏神，能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就足够了，没必要与神过分亲密。

不推崇鬼神，势必就要立起人世间的英雄。

华夏文明从一开始，就充满英雄崇拜的味道，英雄们的伟大业绩，总是激励着子孙后代，“祖先崇拜”的思想由此发端。

下面先说说对华夏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位英雄人物。

中国上古史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是哪三位呢？史料的说法五花八门。吕思勉先生写的《三皇五帝考》，罗列出六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天皇、地皇、人皇；第二种说法是天皇、地皇、泰皇；第三种说法是燧人、伏羲、神农；第四种说法是伏羲、神农、祝融；第五种说法是伏羲、女娲、神农；第六种说法是伏羲、神农、黄帝。

这里我选用第三种说法，即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有巢氏，他之所以没有在“三皇”之列，大约是因为年代过于久远。他是最早的一位英雄，用古人的说法，叫作“圣人”。

从这四位英雄的名字里，我们隐隐地发现，他们的英雄事迹并不在于武功，而在于开创了技术革命、开启了文明之光。

先来看看第一位英雄人物：有巢氏。

关于有巢氏，先秦《韩非子》一书中，有一段记录，文字并不深奥，我把原文引述如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能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严格地说，有巢氏不能叫名字，它与燧人氏、神农氏一样，都是称呼。为什么称呼他为“有巢氏”呢？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房产大亨，“巢”就是房子、巢室、居所。这个人的功绩可不得了，在他之前人类没有房屋的概念，那么他们都住在哪儿呢？要么露宿，要么住树上，要么住在洞穴里。我们可以想象那种艰难的生存状态，风吹雨淋日晒倒不是真正的威胁，当时大自然还没有被开发，到处都是毒蛇猛兽，试想晚上睡觉时，爬进几条蛇，或者来只猛虎狮子的，人就只能成为动物的美食。要是把现代人往原始丛林一扔，在那待几个晚上，与虫蛇为伴，恐怕没几天，都准得失眠症，谁能放心睡个安稳觉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有时在睡梦里，会梦到从某个高处跌下来，或者突然掉到什么地方，这时我们就会有身体反应，小腿会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有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对远古生活的一种回忆，当时住在树上，睡着时很容易掉下来。可能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腿突然被蛇咬上一口，引起条件反射。在风餐露宿的年代，这真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这个时候，有巢氏出现了。

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尝试改善居住环境，便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用木头建起了房屋。如果放在今天，这确实称不上一件难事，因为我们有了各式各样的工具，有斧头、锯子、铁钉。可是那个年代啥也没有，只有石器，光是要把一棵大树砍倒，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类的意志最终战胜了物资条件的匮乏，有巢氏用最简陋的工具，盖

起了最原始的房屋。那时房屋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太好想象，肯定是很难看的。不过没有关系，虎豹豺狼来了，被阻挡在房子外面，张牙舞爪却无可奈何。

房屋的出现，确实是人类一次巨大的革命，改造自然的步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按照韩非子的说法，有巢氏因而“王天下”。我想当时根本还没有“天下”的概念，顶多就是在有巢氏生活圈附近的人，纷纷跑来向他学习盖房子，他因此被推为首领。

统治的权柄，并不在于武力，而在于智慧。睡觉是件大事，有巢氏让大家睡上了安稳的觉，因此被尊为“圣人”，实际上就是英雄。他确实是一个英雄。有了房屋后，人类才有了安全的居所，这是获得与动物界战争优势的开始。人类社会，是从征服动物开始的。

征服动物界，是一场漫长的战争。

即便有了房屋作为防御性的居所，人类的生活环境仍然危机四伏。黑夜里隐藏着巨大的威胁，多数动物在夜晚的行动能力要远远超过人类。地球有一半时间在黑暗中，不能战胜黑暗，就不能战胜出没于黑暗中的凶猛动物。火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

严格说来，火并不是人类的发明，自然界早已存在。酷热会引发森林起火，雷击、火山喷发等都会产生火。然而自然之火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出现的机会很低。有没有办法人工取火呢？

在美国电影《荒岛余生》中，汤姆·汉克斯扮演的那个当代鲁滨孙，落难到了一个海岛上，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木取火，其间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一个当代人，在懂得钻木取火的原理后，要凭借原始的工具生起一堆火仍然是困难重重，更何况上古的人连这个原理都不晓得。

燧人氏的称号，与有巢氏一样，是以发明成就来命名，因为当时还没有姓名称谓。有巢氏就是有房子的家伙，而燧人氏就是能取火的家伙。燧人氏怎么知道钻木取火呢？我想在燧人氏之前，肯定已有很多人尝试过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钻木取火，可能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察，比如说石块猛地相击时，会有火花。只是这种稍纵即逝的火花，根本不可能保存下来。

有这么一种传说，燧人氏见到鸟啄树木，有时会有火花闪出，他由此受到启发，开始钻木取火的试验。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现代人用更好的工具钻木取火都十分不容易，更何况是久远之前的人。燧人氏的试验，一定失败了无数次，次数一定不会比爱迪生试验电灯泡少。他不断地打磨石头，试验各种木头，终于有一天，木头被点燃了。

可惜历史没有记下那一天的日期，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他成了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但并非是从天上盗火，而是在人间取火。

人工取火，是人类摆脱野蛮、迈向文明的关键，其意义比造房屋更大。在自然界中，不少动物也会营造巢穴，比如小鸟、蜜蜂都能筑巢，但只有人类做到了自主取火。正是这个原因，燧人氏被列入“三皇”之列，而有巢氏没有。从此，夜晚不再是一片漆黑，火光照亮了大地，光明不再只属于白昼。

火不仅仅用于照明，还有更深刻的意义。人工取火，使得人类在与动物界的战争中，获得了一个胜利的法宝，用火可以驱赶毒蛇猛兽，可以在夜晚作战，它本身就是战争的利器。

另外，火还为人类带来了两大变革。

其一，是带来健康的熟食，不再像动物那样吃生的。这点在《韩

非子》一书中也有提道：“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当时的人并不懂得病菌之类的名词，但他们已经发现，生食经常导致疾病，用火煮熟的食物则更为安全。火的出现，带来了饮食的革命，这点是动物界所无法做到的。

其二，使冶炼金属成为可能。从火的发明到冶炼金属的成功，应该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没有火，就无法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随着金属冶炼的成功，人类便成为地球生物的主宰者。

与有巢氏、燧人氏相比，伏羲的传说就更多了。

伏羲又称为庖牺氏或包牺氏，从这个名字来看，大致可以推断出他的主要贡献。“庖”字如果做动词解，就是“烹调”；如果做名词解，就是“厨房”。“牺”就是牲畜，是人工饲养的牲口。

在人类早期，食物的获取，无非两大途径：其一是采摘野果；其二是捕杀动物。在人口数量相当少的时候，食物并不紧缺，大自然有丰富的供给。随着人类不断地征服动物界，生存空间不断拓展，人口也变多了，这时食物就成问题了。

树上的果实，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不同，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供应是不稳定的。而对动物的捕杀，也使得动物的数量在减少，狩猎到的食物也变得不稳定。人工饲养因此成为稳定的食品来源，在这个过程中，伏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据说伏羲是个大发明家，除了畜牧之外，还发明结网打鱼的方法，用兽皮缝制衣服等。然而，他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在远古英雄中，伏羲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家。

《易经》是这样描写这位圣人的：“古者庖牺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他的眼界不仅仅局限在人自身，而“观象于天”、“观法于地”，探寻天理，探寻人与宇宙的关系。

伏羲是第一个用“数”与“图”的方法去理解宇宙万物的人，从这一点上说，他确实充满哲学家的气质。八卦就是八个卦相，每卦由三个爻（yáo）构成，“——”代表阳爻、“—”表示阴爻。八卦分别是乾、坤、震、巽（xùn）、坎、离、艮（gèn）、兑，分别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通俗一点说，这是一种朴素的宇宙模型。

在古代传说中，伏羲又被描述成人首蛇身的怪物，为什么会是这种形象呢？有一种说法十分合情合理，伏羲“人首蛇身”的形象，与一个字有关，这个字就是“道”。我们注意一下“道”字的写法，上面是“首”字，下面是“辶”，这个文字构成，像不像“人首蛇身”呢？伏羲是得道之人，古代的道，就是宇宙真理，他就是“道”的化身，因而后来居然被描绘成人首蛇身之形象，实在可笑至极。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也是对宇宙真相不断探索研究的发展史。没有哲学思想，就谈不上什么文化，因此伏羲对宇宙开创性的思索，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在中国的古文献中，像“有巢氏”、“燧人氏”、“庖牺氏”这些词，都包括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三位英雄的称谓，第二层意思就是他所在的氏族。伏羲的这一氏族，即“庖牺氏”兴起一段时间后，走向没落，原因很简单，其他氏族在文明上后来居上，进而取代了庖牺氏的地位。

取代庖牺氏的，是神农氏。

《易经》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

这里的神农氏，我的理解仍是两层意思：最初是一个人的称谓，后来是一个氏族的名。古代的族群能获得多大的影响力，与其拥有的技术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在伏羲的畜牧革命后，神农氏又引导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即种植业的革命。

讲到这里，我想说一个话题。

多数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多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各个王朝。事实上，自秦以后，中国文明进入了一个发展相当缓慢的阶段，巨大的技术变革、深刻的思想变革并不多。反倒是从上古时代到秦以前，中国文明充满了创造力，产生了无数技术与思想的奇迹。这是读史者不可不关注的一个问题。

种植业的出现，使得人类的粮食问题获得了最终的解决。事实上，直到今天，给我们提供粮食的，仍然主要是种植业。人工种植是不是神农氏的首创呢？应该不是。神农氏的农业革命，是耕种方法与农具的革命，使得大规模的种植成为可能。

在《淮南子》一书中，有这样的写法：“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堯（qiāo）高下。”在此之前，尽管有畜牧业作为补充，但人类的食物仍然严重依赖于野生的动植物资源，野果可能有毒、动物可能染上瘟疫，即便煮熟了，也会威胁人的生命安全。而五谷则是安全性很高的食物。神农氏何以使得大规模耕种成为可能呢？他认真地研究了地形、气候、土壤对种植物的影响，使得种植成功率大大提升。

除此之外，他还大力改进农业工具，据《易经》载，神农氏“斲木为耜（sì），揉木为耒（lěi）。耒耨（nòu）之利，以教天下”。耒耨是古代一种像犁的翻土工具，耜是用来起土，耒是耜上的木曲柄。

在古代，耒耜也泛指农具。

神农氏是第一流的植物专家，他不仅推广种植业，还是中医药之祖师。在自然界中，有许多植物具有解毒、治病的功效，在神农氏之前，可能草药的功效就被人所认识，但是并没有系统的发展。神农氏是第一个专心致志研究草药的人，古代很多文献都写到他“尝百草”的故事，为了试验草药的药性，他把自己当作试验品。这种尝试是十分危险的，他也因此多次中毒，据说有一次，在一天之内，就中毒达七十次。有一种说法，称神农氏是死于中毒，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中国的医药学，实际上也是奠基于神农氏。

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神农这一氏族，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因此成为众氏族的首领。神农氏族的领袖地位，维持了十七代之久。

在神农时代，由于文字还未产生，对此期发生的故事，我们仍然知之甚少。后世关于神农的文献，也不一定真实有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巨著《史记》中，对漫长的神农氏统治时代并未有详细记载，《史记》的开篇，实际上是从神农氏族最后一个领袖炎帝开始的。

二 征服者轩辕

到了炎帝时，神农部落已走向没落。

在神农氏族统治的十七代里，许多部落都是接受其家族的统治，那么，神农氏为什么会衰弱呢？推想其原因，大约和技术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神农氏所倡导的耕种法已经被各部落所掌握，这个家族的权威已是摇摇欲坠。更重要的是，金属冶炼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军事变革，在这一方面，神农部落已经落后于其他部落了。

武器的变革，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木制兵器、石制兵器与金属兵器。《太白金经》中有这样的说法：“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蚩尤的年代，正是神农氏部落统治的末期。

精良武器的出现，使得武力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一个混战时代出现了。

当神农氏族强有力的统治不再时，各部落之间的相互攻伐越来越多，每个部落都想扩张自己的力量。尽管神农氏新的首领炎帝幻想用武力重新夺回政治话语权，可是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有两个强有力的部落后来居上。这两个部落的首领，分别是蚩尤与轩辕（即后来的黄帝）。

蚩尤与轩辕两股新势力的崛起，印证了军事技术革命的深刻影响力。

轩辕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部落首领，他姓公孙，是少典氏族的首领。据说轩辕生下来才七十天就会说话了，比起王阳明五岁都不会讲话，他可以算是十分早慧。轩辕似乎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因为

他不仅智慧超群，辩才无碍，还见多识广，对事情有着敏锐而独到的判断力。

根据《管子》一书的记载，轩辕雄心勃勃，试图取代神农氏成为天下新的领袖。他曾经请教一位名叫伯高的智者：“我想要把天下融合为一家，有没有办法做到呢？”言下之意，是要统一诸部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权。

伯高回答说：“有办法的。”

轩辕问道：“您可以说来听听吗？”

伯高答道：“关键是要控制矿山。怎么知道哪里有矿石呢？有丹沙的山地，下面就埋有金矿；有慈石的山地，下面就有铜金矿；有陵石的山地，下面就有铅、锡、赤铜矿；有赭土的山地，下面就有铁矿。对于这些矿山，应当将它们封存起来，设立边界，不允许私人随意开采，如果有违令的，就处以死刑。”

这则对话让我们很吃惊，因为五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已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对当时的人来说，矿业就是新经济，谁掌握了新经济，谁就掌握了政治的话语权。从伯高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对金属矿产的认识已经颇多。这位智者敏锐地察觉到金属将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谁的金属武器更多、更先进，谁就可以称雄天下。为了把这些金属矿产收归公有，必须以严厉的刑罚制止私人随意开采，这样才能确保军队的武器供给。

轩辕听从了伯高的建议，大力探矿，并且牢牢地控制开采权。十年之后，一座大矿山被开发了，这座矿山名为葛庐之山，矿藏十分丰富。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轩辕却遭到闷头一击。这座大矿山被人夺走了！

夺走矿山的人，正是蚩尤。

蚩尤是九黎部落的首领，他的出身很成问题。据《大戴礼记》中孔子的说法：“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庶人，说明他的出身是低贱的，并没有贵族血统。出身低贱怎么能当上部落首领呢？孔子的话，实际上是暗示蚩尤的首领地位，可能并非来自继承，而是来自武力篡权。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蚩尤是一位奇才，他坚强而悍勇，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他的部落曾经臣服于轩辕，他可能为轩辕的崛起立下过汗马功劳。蚩尤是一个对武力十分着迷的人，十分热衷于新的武器技术，他自己可能就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他与轩辕同样认识到金属武器的革命性意义，因而也认识到金属矿产的重要性。以他高傲的个性，注定不可能长久地屈居他人之下，于是他密谋背叛轩辕，自立门户。

当葛庐之山的矿产被大规模开采后，蚩尤突然叛变了。

他用武力驱逐轩辕派往矿山的人员，将矿山据为己有。利用丰富的金属矿产，蚩尤制造出大量的武器，迅速使自己的部落成为诸部中的最强者。尽管金属武器的运用，不一定始自蚩尤，但在他之前，金属武器从来没有被如此大规模地运用过。

在中国兵器变革史上，蚩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金属武器重要性的人，轩辕、伯高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蚩尤捷足先登了。

对于蚩尤的背叛，轩辕有没有试图给予猛烈的还击呢？史书上没有明说，不过就算还击，也未必获得胜利。此时的外部环境对蚩尤是有利的，因为神农氏的没落，导致了诸部落的战争日益加剧，有心取代神农氏的轩辕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了对诸弱小部落的征伐上。在蚩尤

夺取葛庐之山的这一年，共有九个部落被兼并，其中多数应该是在被轩辕与蚩尤瓜分的。

蚩尤的实力还在不断地增强，在夺占葛庐之山后不久，他又开发了另一座大矿山，这座矿山名为雍狐之山。当时这座山的矿石被流水冲至山麓地带，因而发现了丰富的矿藏。蚩尤利用雍狐之山的金属矿，制造出雍狐之戟、芮戈等兵器，这些兵器在当时可能算是最先进的武器。这一年，又有二十个部落在战争中被兼并。部落战争的结果，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三足分别是炎帝的神农部落、轩辕的少典部落与蚩尤的九黎部落。

从三强的分布格局来看，炎帝的神农部落与轩辕的少典部落位于北部，蚩尤的部落位于南部。倘若只看武力，三强之中，蚩尤似乎最为强大。但是他有一大弱点，过于迷信武力，他四处征伐，扩张自己的势力，但论起政治眼光，却远远逊于轩辕。

在古史的记载里，蚩尤是以残暴者的形象出现的，他四处掠夺、破坏，其他部落畏惧他的威力，却不甘心屈服于他。相反，轩辕则更注重于军事打击与政治宣扬双管齐下，恩威并施，这种策略使他获得了多数部落的支持。

再来看看神农部落。

神农部落在诸部中的领袖地位已经延续了十七代之久，炎帝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天子”，尽管当时没有这样的称谓。可是神农部落威风不再，对于风起云涌的部落间争斗，炎帝根本无法制止，更谈不上征伐以维持天下秩序。在这个时候，明智的轩辕打着支持神农政权的旗帜，这有点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尊王”，对不服从炎帝的部落逐一征服。

韩非子曾经说过：“上古竞于道德。”那个时代总的来说，民风比较朴实，不像后世那么多尔虞我诈，比较率真。轩辕意识到，争取人心才是胜利的不二法宝，从这一点看，他比蚩尤徒有蛮夫之勇要更加高明。轩辕征服诸部落，却不滥施暴行，而是安抚民众，施行德政。他以武力手段制止各部落间无休止的争斗后，输出先进的种植技术，改善当地民生，并且训练他们的军队，以为自己所用。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轩辕实施德政的背后，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英雄人物，他打着“尊王”的旗帜扫荡不服从炎帝的部落，实际上并非是为了重振衰落的神农政权，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炎帝对轩辕的意图十分清楚，作为神农部落的最后统治者，他不甘心把统治诸部落的大权拱手让出。为了重树神农氏的权威，炎帝企图对各个部落采取更为严厉的控制，他试图以武力手段逼迫这些部落承认神农氏的统治权柄。可是诸部落宁可归附于新兴的轩辕势力，也不愿意接受炎帝的统治。

轩辕俨然成为诸部落拥护的新领袖，这样他与炎帝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我们中国人都自称为“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是华夏二祖，可有趣的是，在四千多年前，这两人却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战争中。

面对炎帝的步步紧逼，轩辕必须应战。尽管轩辕已经得到诸多部落的支持，可是他的形势还是不容乐观，因为他随时可能陷入与炎帝、蚩尤的两线作战之中。蚩尤的武力是恐怖的，炎帝凭借着十几代的积累，也有不容小觑的实力。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轩辕决定先对付炎帝的神农氏军队。

轩辕把军事力量集中于北面，与炎帝的军队多次交锋后，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特别是在阪泉一战中，炎帝的军队大败，战争的天平已是完全倾向轩辕一方。只要再给一点时间，轩辕便可以完全击败炎帝，用武力征服神农部落。就在这个时候，蚩尤卷到了这场大战之中，使得局势变得扑朔迷离。炎帝、轩辕、蚩尤三雄之战，究竟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此时的蚩尤征服了南方诸多部落，是无可质疑的南方霸主。轩辕与炎帝之间的战争，对他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只要轩辕与炎帝两败俱伤，到时他出动自己的精锐武装，必定可以一鼓作气消灭两大对手，成为天下至尊无上的战神。

蚩尤的参战，打乱了轩辕的部署，他被迫放弃对炎帝的深入打击，转而迎战蚩尤的部队。但是蚩尤确实有着项羽一般的骁勇，特别是他的部队在武器装备上占了上风。在交战中，轩辕被打败了，只得向北逃窜，一直退到了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大约在今天北京西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在五千年前，这几乎是中国的最北界，十分荒凉。

此时的轩辕十分狼狈，据《逸周书》所记：“蚩尤乃逐帝（黄帝），争于涿鹿之阿。”这里用了一个“逐”字，可以清晰地表明，蚩尤的军队是进攻的一方，来势汹汹，而轩辕的军队是被追得一路北逃。战场上的优势，已完全落入蚩尤一方。

据军事学家的估计，在轩辕与蚩尤大战的时候，战车已经有了，但数量是很少的，军队仍然以步兵为主。可以想象，倘若轩辕的军队继续后撤，势必要退到荒漠地带，而步兵要穿越荒漠，可想而知是凶多吉少的。因此涿鹿便成了轩辕与蚩尤决战的最后舞台，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历史的决战。

历史经常是很戏剧性的。

就如同后世战国时期晋国的内战，智瑶在与赵无恤战争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眼看胜利的果实就要到手，却由于魏、韩二氏的反戈，反而落了个身亡族灭的下场。蚩尤与轩辕的战争同样如此，蚩尤完全相信自己很快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帝王尊号加诸己身。

可是蚩尤的胜利却引起了中原诸部落的惊慌恐惧，部落的首领们都知道，倘若由这个残暴者来统治，他们的悲惨命运可以想象。甚至连神农部落的领袖炎帝也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与轩辕的战争中，神农部落已遭重创，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蚩尤的进攻。炎帝的神农部落与轩辕的少典部落代表着中原农业文明，而蚩尤的九黎部落则更多地带有野蛮的色彩。在共同文明的感召下，炎帝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决定联合轩辕，捍卫中原文明，抵制南方的蛮族军队。

《逸周书》中有这样的说法：“赤帝大慑，乃悦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赤帝就是炎帝，他与轩辕的联合，是扭转战局的关键所在。对于轩辕来说，他也不是坐以待毙，事实上，他已经发现了蚩尤的弱点所在。

尽管蚩尤可能对战局相当乐观，可是有一个风险始终存在：他过于孤军深入了。蚩尤的地盘究竟在哪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在长江流域，有的认为在淮河流域。不管怎么说，他的军队挺进到了华北平原的最北界，这种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大进军，发生在五千年前，而且是在车马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确实令人瞠目结舌。我们站在公正的眼光而不是古史偏颇的立场来看待蚩尤这个人，可以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奇才，胆力绝伦且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

在战术层面上，轩辕或许不如蚩尤，不管在武器装备还是勇猛上都较为逊色。可是在战略层面上，轩辕则成了一个巨人。作一个十分贴切的类比，轩辕类似刘邦，而蚩尤更类似项羽。蚩尤的败亡与项羽也有相似之处，战术上的胜利无法挽回战略上的失败。

轩辕一方面在涿鹿顽强地顶住蚩尤的攻势；另一方面，他把外交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凭借着多年来所建立的巨大威望，他不断地派人游说中原诸部落，召集他们的武装，开赴涿鹿战场。特别是在神农部落的炎帝转向支持轩辕后，诸部落更是踊跃参战。我怀疑炎帝之所以屈服于轩辕，也可能是轩辕外交活动的结果。

诸部落的参战，使得涿鹿战场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深入北地的蚩尤陷入了诸部落的包围之中，远离南方大本营的他，没办法增调后备武装以支援战场。

关于轩辕与蚩尤的决战，正史并没有详细描述其过程。但在许多近乎神话的传说中，则写得绘声绘色。在这些传说中，蚩尤与轩辕几乎都是仙魔一类的人物。比如说：蚩尤会呼风唤雨作雾，而黄帝则得到了上天的相助，上天派玄女帮他渡过难关等。此类故事，在许多文明古国的神话传说中也屡见不鲜，譬如古希腊奥林匹斯山的神祇们总是卷入人类的战争，而人类英雄身上也闪耀着神的光辉。

在神话中，蚩尤是一个法力颇高的魔头，他能“制五兵之器，变化云雾”，他施法“作大雾，弥三日”。制五兵之器是一个事实，《管子》一书中就有记述，这得益于蚩尤拥有葛庐与雍狐两座矿山，他的军队武器装备实现了金属化，即青铜武器。那么他为什么被描写成为一个可以“变化云雾”的魔头呢？笔者推测，在这场关系到中国历史命运的决战中，确实出现了云雾天气。云雾的出现，原本对双方军队都会产生影响，可是为什么神话故事中，似乎对轩辕一方产生更大的危害呢？原因恰恰在于蚩尤的军队更习惯于在云雾中行军作战，因为他们来自潮湿的南方，南方出现雾气的时间比北方要多，因而南方军队更能适应雾天的战争。

这些神话传说当然是后人牵强附会，但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这场

战争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即便得到炎帝及诸多部落的支持，轩辕仍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战胜蚩尤。神话虽然荒诞，可是详加考察，我们仍可理出若干可能的史实。

尽管有诸落部的协助，黄帝在这场战争中仍然打得十分艰辛。在神话故事里，黄帝“九战九不胜”，他只能“仰天而叹”。这个时候，“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这已经成了一场中国的“特洛伊战争”了，与荷马史诗所描写的那场英雄战争类似，中国的神仙们也纷纷插手尘世的争斗，这岂止是人间的战争，这是神魔之间的决斗。有了神女的相助，轩辕逆转了战局。

与所谓的“玄女下凡”传说相比，另一个传说可信度稍高。在这个传说中，黄帝轩辕逆转败局的法宝是指南车，这大概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指南针的记录。黄帝利用指南车，在云雾天气下，得以辨别方向，利用人多势众，一举击败了蚩尤。这就成了科技的胜利，而不是天神的胜利了，荣耀复归于人世英雄。

有一些军事史学家认为，轩辕之所以能在涿鹿之战中打败持有先进且精良武器的蚩尤，是因为他在战争中使了密集队形的弓箭部队。这种说法，恐怕难有确切的证据。影响历史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结果就是一路北上的蚩尤没能凯旋，而是有去无回，成为战争中失败的一方。

三 开辟鸿蒙，告别蛮荒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内战，以轩辕的胜利而告结束，各部落首领推举他为首领，也就是“天子”，尊称为黄帝。

大概在此之前，一种神秘的学说已经兴起，这种学说就是“五行说”。五行就是水、火、土、木、金，在古代被认为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五行说”不仅仅是一种宇宙物质观，同时也被运用于政治领域。比如炎帝的“炎”字，很明显是与“火”有关，代表“火德”。依照五行理论，土从火生，如今轩辕取代了神农部落的炎帝，意味着“土”取代了“火”，土德取代了火德。轩辕使用了“黄帝”这一尊号，是因为“黄”字总令人联想到土的颜色。

黄帝成了新的天子，而炎帝则失去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尽管从当时的情形看，炎帝是个失败者，但如果以更长久的目光来看，他却是一个胜利者。在炎帝、黄帝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民族，各个部落是比较分散的。在与蚩尤的战争之后，中原诸部落之间的联系、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些部落先后归附于炎帝与黄帝，在文明上趋于一致，一个民族的雏形产生了。炎、黄二帝成为华夏族的共同先祖，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与炎帝都是胜利者。

至于蚩尤，虽然战败身亡，但他的影响力犹存。

据说后来黄帝为了征服南方部落，特地画了蚩尤的像，威慑诸部。在民间，蚩尤更是被当作一个三头六臂的战神来看待。从这个侧面来看，古中国的文明还是显得相当宽容，因为官方似乎无意制止崇拜蚩尤的民间信仰。

司马迁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中有一篇《封禅书》，其中有谈到秦始皇曾经“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在秦统一中国时，中国民间

有所谓的八神，其中第三尊神就是“兵主蚩尤”，他排在“天主”与“地主”之后，主兵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战神”。司马迁特地记道：“八神将自古而有之。”可见蚩尤被当作战神加以崇拜，是古中国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而且他在诸神中的排名，仅次于天地，地位相当尊崇。

反动派蚩尤被击毙了，可是他却成为中国人的神，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官方文献一直把蚩尤刻画为一个残暴的反动派，站在公正的角度说，蚩尤对中国文化是有很大贡献的，特别是在军事技术的革新上。从蚩尤开始，中国才算进入大规模使用青铜武器的阶段，把他当作“兵主”或“战神”来看待，是不过分的。

当然，在上古三雄之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黄帝，从他开始，中国有了一个国家的雏形。

黄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征服者。

在黄帝之前，神农氏部落曾经十七代成为各部落的首领，这种领袖地位的获得，除了掌握农业技术之外，也不排除有几分武力的色彩。不过武力应该是第二位的，主要原因大约有两点：其一是人口数量仍然比较少；其二是各部落的组织形式仍然比较原始，并没有十分完善的行政系统。

黄帝的统治，带来了政治上的革命，他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机制，一个国家政权的雏形出现了。这种政府管理机制，想必是中原大混战之下的产物，战争迫使政府必须升级管理模式，原先那种带着浓厚原始部落色彩的简单管理模式，已不足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从黄帝与炎帝、蚩尤的战争中，可以看到作战的地域范围已经相当辽阔，从江淮流域一直延伸到了华北平原的最北界，战争波及的范围，恐怕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帝的胜利，

得益于其更有力、更高效的行政能力。

我们来看看史料中的一些记录。

根据《史记》的记载，黄帝对诸部落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手段，凡有不顺从者，他就前往征讨，平定叛乱后，也不停留，马上收兵离开。为了征伐这些部落，他的军队遇山开路，披荆斩棘。他的势力所及，东抵东海岸，西至崆峒山，南抵长江，北至涿鹿。他把都城安置于涿鹿平原，因为这里是他的福地。

中国古代，君主“坐北朝南”，归顺的一方“南面称臣”，这个习惯的由来，大约也是从黄帝开始的。他从称帝始，就把行政中心置于国家的最北端。这么一来，他的统治区，大致可以说是以涿鹿为中心向南展开的一个扇形区。在建都地址的选择上，黄帝一定是耗尽心思。他必须预防诸部落的反叛，如果把都城建在帝国中心，很容易遭到反叛部落的突袭，倒不如离得远一点，即便有变，也有充足的时间应对。

接下来黄帝必须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都城建在偏远的北方，如何对诸部进行有效的控制呢？

他摸索出三种控制手段：

第一，巡视。那个时代通信条件很差，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最保险的办法，莫过于亲自大驾光临了。黄帝是一个非常勤勉的君主，他不断地出巡，实际上也是在向诸部展示他的权威与武力。他似乎对诸部落的忠诚并不是特别放心，因为在出行途中，每到一个地方，他的住所周围都是手执戈戟、全副武装的战士。这种架势，自然会对诸部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这是他统治的一个手段。黄帝巡视诸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祭祀天地鬼神山川，搞封禅大典，表明自己的权柄并非来自人世，而是来自上天，正所谓“君权神授”也。据《史记》的记载，黄帝登过丸山、泰山、崆峒山、鸡头山、熊山、湘山等，这不全

是游玩，主要是搞祭祀，让山川之神庇佑自己的政权。

第二，召集诸部大会。黄帝曾经在釜山召集诸部首领开会，这个釜山当然不是现在韩国的釜山。在《史记》里已经使用“诸侯”这个名称，不过这似乎是把后世的称谓用于黄帝时代，当时应该还没有这种叫法，部落色彩仍然是很浓厚的。通过诸部会议，进一步确立了黄帝的统治权。

第三，他设立了两个机构，分别称为“左大监”与“右大监”，职责就是监察各部落。也就是说，黄帝派出特派员驻扎在各部落里，严密监视各部的一举一动，并直接向上级汇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中央政府的雏形出现了。通过这种方式，黄帝对诸部的控制力度，要远远超过神农氏统治的时代。

在“三皇五帝”的传说中，“三皇”的年代过于久远，可信度是比较低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并没有写“三皇”的事迹，而是以“五帝”开篇。五帝指的是黄帝、颡顼、帝誉、唐尧、虞舜五人，而黄帝则是五帝中的第一帝。

黄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把许多功劳都归之于他，把一个大活人变成了一个半仙，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先知。正是因为历史太久远、史料太缺少，才产生了一种朦胧美，后世仅仅是凭借着想象力去认识一个人，无论想得多完美都不过分。

说起来古人也算有福，换作现代，要保持完美的形象，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整个国家的言论都操纵在某个人手中。即便如此，操纵者也只能在自己所能操纵的范围内得意一时罢了，岂能骗得过全世界的眼睛呢？

除了若干个史实事迹外，黄帝的生平差不多就是一张白纸。正因为是白纸，可以随意画上几笔，所以后人拼命往他脸上贴金。他不仅是征服者，还成了文化巨人，在中国思想的两大源流儒家与道家中，黄帝通通吃香。

我们来看看孔子是怎么说黄帝的。

有一回，孔子的学生宰我问曰：“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黄帝三百年’。请问老师，这个黄帝究竟是不是人啊，他怎么能活三百年呢？”这是古代一种传闻，称黄帝统治了三百年，宰我是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这家伙不信邪，别说活三百年，活一百年都没见过呢，所以他拿这个棘手的问题来问老师。

孔子向来不语“怪力乱神”，当然也不能回答说，人家黄帝仙风道骨，活三百年有什么好奇怪的。他还是比较务实的，可是宰我的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刁钻，换作别人是很难解答的。但老夫子毕竟是圣人，没有两把刷子哪行，他见多识广，脑瓜灵敏，灵机一动答道：“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什么意思呢？孔子说，黄帝活着统治了一百年，死后精神又延续了一百年，然后他的那一套教化手段又施行了一百年，加起来三百年。您瞧瞧，老夫子确实有水平，用唯物史观科学解释了“黄帝三百年”的深刻内涵，没有怪力乱神的成分。一个人做出三百年的事业，这在儒家分子眼中，确实是伟大的事业。

黄帝不仅是儒家推崇的对象，也是道家的祖师爷。

在汉代兴起了一股“黄老之治”的风气，把黄帝、老子都当作无为而治天下的典范。老子讲“无为”是有证据的，而黄帝怎么也成为“无为之治”的鼓吹者，这点就奇了怪了，令人难以理解。黄帝夺取天下，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武力与征服，并非“无为之治”，他居然也成为道家

人物。倘若黄帝能从坟墓中爬出来，自己准认不得自己了。

之所以闹出这样的笑话，在于中国人喜欢“言必称古人”，后世许多书都假托黄帝之名，黄帝渐渐变成无所不能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些书里，最著名的当然是《黄帝内经》，比较有名的还有《素问》、《阴符经》。除此之外，后世方士、卜者为了提高自家学说的权威性，也都把著作挂到黄帝名下，比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黄帝龙首经》、《黄帝宅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等，五花八门，举不胜举。

黄帝时代，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造字。

据说创造汉字的人是黄帝时代的仓颉，实际在此之前，一些简单的语言符号就产生了。在很早之前，就有“结绳记事”的说法，就是结草绳做成各种符号，用来表示不同的事物。我们可以想象，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运用的符号越来越多，渐渐地形成了文字的基础。到了黄帝时，由于他统治的范围已经相当广阔，有必要把各类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统一为文字。在这个时候，仓颉应运而生了。

仓颉可能是黄帝的一名史官。有人会问，当时还没有统一的文字，史官是做什么的呢？其实那时的史官并不是要写史书，而是要懂得各种神秘文化，得会占卜、算卦之类的。文字的产生，在文明史上是一件大事，这也是一个国家政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要做的事，否则国家的命令怎么传达呢？

那么仓颉是怎么造字的呢？据说他是受到鸟儿的影响，看到鸟儿用爪子在地上乱扒而得到启示，所以创造出“鸟迹书”。今天的汉字是方块字，方方正正，以前则不是，歪歪扭扭的，一眼扫过去，还颇有鸟迹的模样。

另一个重要的发明，就是“干支”纪年体系。

这也是对后世产生至深至远影响的发明，所谓的“干支”，就是“天干地支”。“十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中国人又以阴阳的观念，把十天干分为五阳五阴，把十二地支分为六阳六阴，阳干对阳支，阴干对阴支，依次相配，得到六十个组合，称为六十甲子。古代便是用六十甲子循环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实际上是一种六十进制。

一直到20世纪采取西历公元纪年之前，这种干支体系一直是中国纪年主流，即便现在被边缘化了，在日历上仍然会标注出来。发明干支体系的人，据说名唤“大挠”，当然他也是在黄帝的命令之下，才捣鼓出来的，所以论起功劳，黄帝也有一份。

养蚕取丝，亦始自黄帝时代，发明者据说是黄帝之后嫫祖。这项技术后来不断被改进，蚕丝及丝织业，一直是古代中国技术的骄傲。在汉武帝时，中国丝绸经丝绸之路运到罗马帝国，大诗人维吉尔还下断言：这东西是从树上长出来的。而那时距黄帝时代，已过去两千多年矣。

除了以上几个重大发明之外，黄帝时代在天文学等领域也有很大进展，包括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历、隶首作算数等。黄帝还曾经用首山之铜铸大鼎，据说舟车也是这期间发明的，我的理解是改进了舟车的制作。不管以上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有一点是得到证明的，那就是黄帝时代的文明，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自古以来，黄帝一直被认为是中华始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从黄帝开始，民族、国家初步成形了，有了一个全国性的行政管理机制，有了文字历法。可以说，黄帝是“开辟鸿蒙，告别蛮

荒”的关键人物。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估计是在最后一次出巡的途中去世的，因为他的遗体埋葬于陕西北部的桥山。

黄帝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时代，他的继承者们又如何把他的事业发扬光大呢？

四 黄帝的子孙们

黄帝之后，谁继承了帝位呢？

根据《史记》的说法，黄帝的孙子高阳继承了帝位，称为帝颡顼（*zhuān xū*）。可是在其他一些古文献中，黄帝与颡顼之间，还有一帝，称为少昊（又称少皞，音 *hào*）。大概是因为司马迁认为少昊的功绩平平，没有资格入“五帝”之列，故而将他省略不提。

我们可以在《国语·楚语》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及少皞（即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到了少昊执政的晚期，南方的九黎部落，即以前蚩尤的部落，爆发了严重的叛乱。这次叛乱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原因，即南方九黎部落与北方中原政权在文化、信仰、宗教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北方中原文明虽然也是有神论者，但无论是天神、地神还是山神、水神，都不是人格化的神。更重要的是，与神沟通的权力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解释上天深奥难测的旨意。封禅大典、祭祀山川鬼神，这都不是普通人可以随随便便做的事情。

南方的九黎部落呢？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对于南方人来说，神从来不遥远，形形色色的神灵就在身边，而且几乎每家都可以通过祭祀、巫史与神沟通。这种多神宗教的存在，大大削弱了中原政权在南方的统治权威。对北方人来说，南方人不啻为一群异教徒。

这种宗教上的反叛，从一个侧面看出九黎部落挣脱北方统治的努力。此时距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仍不算遥远，显然九黎部落对于上一次

战争的失败耿耿于怀，他们把失败更多地归之于运气而非武力不济。多神宗教的兴起，实际上是为政治上的反叛奠定意识形态基础。只要他们坚信有众多神祇的庇佑，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勇气，去对抗少昊的政权。

少昊没能在有生之年平定九黎之乱，从这点上看，他确实算不上是一位优秀的君主。正因为如此，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中，才没有他的地位。

九黎叛乱这个烂摊子扔到了颡项手中。

颡项是“五帝”中的第二帝，他与祖父黄帝比较相似，既有雄心壮志又不乏统治的手腕。颡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他镇压了九黎族的叛乱，重新恢复了秩序。与武力征服相比，思想的征服更加困难。只要九黎部落的民众仍然迷信于神祇的力量，不服从于世俗的权威，叛乱将是永无休止的。

为此，颡项派出两位得力干将前往南方。这两名得力干将，一为南正重，一为火正黎。南正、火正都是官名，其中火正又称为北正。两名官员一个名叫“重”，一个名叫“黎”，都是学识渊博，对天文历法有深入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当时第一流的天文学家。南正重与火正黎被派往南方，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绝地天通”。

什么叫“绝地天通”呢？

地就是地上的生灵，天就是天上的神灵，“绝地天通”，就是要断绝尘世与上天的交流。套用西方的俗语来说，就是“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神去做神的事情，人去做人的事情。至于神人沟通这样的事，乃是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不能让普通百姓躲在家里与鬼神相通，绝对不行。

这是一次对异教徒的大扫荡。虽然史书上略去了扫荡的过程，但

可以想象，势必有一大批人倒了大霉。其中尸祝、巫士更是首当其冲，因为他们是人与神的媒介，只要清除掉这些人，自然就可以隔绝人神之间的联络。

这次扫荡的效果是显著的，就如《国语》所记录的：“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划清了神与人之间的界限，摧毁了异教徒的思想基础。不过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点，要征服人的思想，比征服人的肉体要难得多。在多年以后，从九黎族分化出来的三苗部落，在尧帝统治的时候，与鬼神相通的思想再次死灰复燃，这是后话。

颛顼大帝明确了一种传统：只有天子才有权与上天沟通。天学不是可以私家相授的学问，只有天子才能设立天学研究机构。这一观念影响中国达数千年之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历书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一个现象，读史者应当细察。中国历史上每有政权更迭时，都把颁布历书当作首要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历书的编制，需要有大量的天文学观测资料，而中国历朝历代，天学机构都是钦定的。颁布历书，实际上就是宣扬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就是取之于上天，君权是神授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历书不过是对天体运行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可是从黄帝开始，就把天文历法神秘化，变成王权、帝权、皇权的象征。奉行某政权的历法，就意味着对该政权的臣服与顺从。因为历法体现的，是君王与上天沟通的权力。

据说历法起源于黄帝，但是黄帝的历法是比较粗糙的，这与当时观测手段的落后有关。继承者少昊对历法的重视程度，比起黄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左传》中，记载有少昊政府的一些重要官职，其中

凤鸟氏主持历法编制，玄鸟氏“司分”，伯劳氏“司至”。

什么是“司分”与“司至”呢？

“分”就是“春分”与“秋分”，“至”就是“夏至”与“冬至”。在少昊时代，玄鸟氏是负责观测春分、秋分，而伯劳氏是观测夏至、冬至。学过天文学、地理学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回归年里，夏至日，太阳直射点在北回归线；冬至日，直射点在南回归线。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线移到赤道时，则是秋分日；从南回归线移到赤道时，则是春分日。这也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四个节气，是四季变化的重要标志。要编制一本很完善的历书，首先就必须确定“两至”、“两分”点，因此就有司至、司分这样的官员。

在平定九黎族异教徒的叛乱后，颛顼大帝派去南方的两名大员，即南正重与火正黎（即北正黎），随即展开了更精密的天文观测，并且重修历法，这个历法后来称为《颛顼历》。《颛顼历》影响的时间非常长，前后长达两千余年，后世的《夏历》、《殷历》、《周历》都延续了《颛顼历》的一般性原则。但是这本历法的原本，与其他几本古历，都在战国混战中毁于兵燹（xiǎn）。

到了秦汉之际，有好事者仿冒了包括《颛顼历》在内的几本古历，不过《汉书》已经指出这些古历只不过是冒牌货罢了。

关于颛顼大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他与共工的战争。

据《山海经》的记载，共工是炎帝的后人。共工的叛乱，想必也是少昊统治时期政治动荡的结果。共工幻想夺回先祖失去的帝号，遂发兵叛乱，颛顼大帝并没有给他机会，他在战争中败北，最后在不周山撞山而亡。

由于时代久远，后人编制了荒诞的故事，说不周山乃是顶着上天

的天柱，被共工一撞，给撞断了。看来共工也不是一个人，也是个像蚩尤一样的魔界人物，一头就把不周山给撞断了。这下子大事不好了，“天柱折，地维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天倾西北”，大地倾斜了，西北高、东南低。您瞧，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形走势，原来是共工这个老兄给撞出来的。这个颇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可以从侧面看出颛顼大帝在位的那些年，天下确实不太平，有九黎之乱、共工之乱，幸好这位大帝本领非凡，一一镇压叛乱，成为黄帝政权的中兴之君。

颛顼是一位十分勤勉的君主，他延续黄帝巡视天下的传统，北至幽陵（幽州），南至交趾，西至流沙（甘肃），东至蟠木（东海），行踪之广，大约有今天的半个中国。

令人不解的是，颛顼大帝的子孙并没有继承帝位，继承者是颛顼的堂侄高辛，也就是帝喾（kù）。

从新帝国的几位君主来看，后世“嫡长子继承权”的传统在此时并未形成，君主在考虑接班人时，更多的是考察他的能力与德行。那么帝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史记》中，他的形象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堪称人间帝王的表率：“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道德修养高得不得了，堪比佛教中的菩萨。

帝喾时代，帝国欣欣向荣，没有发生很大的灾难，国家政治比较清明。这一方面得益于帝喾本人的廉政，另一方面也是颛顼大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司马迁用这样的文字来总结他的政绩：“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本着对人性的理解，我们不太相信那是一个没有阴谋与欲望的年代。我更愿意这样认为，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后代史学家，刻意造

出“五帝”完美的形象，与其说是记录真实，不若说是借古代之事构想出一幅乌托邦的美丽画卷，写的实际上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

帝喾有四个儿子，分别由四位帝妃所生。究竟要由哪个儿子继承帝位呢？他在这个问题上迟疑不决，最后用占卜的方式来决定。卜者告诉他，他的四个儿子都有帝王的福相，有些人将成为帝王，有些则是子孙成为帝王。

这个预言后来成了现实。

在帝喾去世后，他的儿子挚继承帝位。挚并没有能力统治这么大的帝国，他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迫把帝位传给弟弟放勋，放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帝尧。至于其他的两个儿子，契与弃（稷），他们的后代分别成为商王朝与周王朝的开创者。

从帝尧开始，史料开始变得丰富，这显然与文字的普及、传播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古文献的增多，使我们可以对这个古代的大帝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五 洪水滔天——帝尧时代

帝尧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化天象观察，进一步完善历法。

这并非是帝尧有科学探索的精神，而是因为这件事关乎帝国的统治基础。天学与其说是研究天象变化、四季更替的规律，倒不如说是一种宗教，是认识上帝旨意的方式。与南方蛮族的“人神杂糅”不同，对于中原帝国来说，人与神之间是有界限的。就像颡顓大帝的做法，“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神的启示在于日月变化、天体运动之中，人对于神要“敬事之”，但并不能亲狎之，这与后来孔子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个人神界限是不能打破的，这样才能体现出宇宙的和諧。

帝尧时代对天文的观测，规模比颡顓时更大。他派出四位大臣主持天文历法，这四位大臣分别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属于羲、和两个家族。四人分居于东、南、西、北四地，这样使天文观测点增多了，得到的数据更加准确。他们的任务是通过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时间及对应的星象，进一步完善颡顓大帝的历法。

这些天文观测取得了重大进展，保留下来的观测资料对后世天文学的发展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羲、和二氏观测的结果是第一次确认了一年的长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年三百六十六天。我们现在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大约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帝尧时期的记录误差四分之三天。这个误差，可能只是古代文献记录简略所致，否则每四年就要出现三天的偏差，这么大的误差，一定会在实际观测中得到纠正。

我们从夏、商、周的史料记录反推帝尧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

23世纪，即公元前2200年左右。这个时间记录是否准确呢？帝尧时代的天文历法观测记录，为后世提供了推断历史年代的科学佐证。天文学研究表明，中国的历史记录是可靠的。

当时羲、和二氏所做的观测，不仅确定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时间，同时观测了“两分”“两至”时对应的星象。当时人们把天上星辰划分为二十八星宿：东方为青龙七宿；北方为玄武七宿；西方为白虎七宿；南方为朱雀七宿。据《尧典》所记，春分日，朱雀七宿在黄昏出现在正南方；夏至日，青龙七宿中的火星出现在正南方；秋分日，玄武七宿中的虚星出现在正南方；冬至时，白虎七宿中的昴星出现在正南方。用观察星体位置的方法，来辅助确认“两至”、“两分”点。

正是这个记载，给我们科学推断帝尧时代的年限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由于知识的局限性，上古时的人认为“两至”“两分”点对应的星宿是固定不变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后世的天文学家在观测时，发现“两至”“两分”日的星象实际上是不不断变化的。起初天文学家们对此问题十分困惑，存而不论。直到公元4世纪时，晋朝天文学家虞喜，根据自己的观测结果，参照《尧典》中“冬至日短星昴”的记录，大胆地提出存在“岁差”的理论，以天体为对照，冬至点每年都在西退（夏至、春分、秋分也如此），对应的天空中的星体就显得是东进了。虞喜的观测，当时冬至点已经偏离昴星宿五十多度，时间距帝尧时代已经过了二千七百年。据此，虞喜得到的岁差值是五十年退一度。

以现在的精密测算，岁差大概是七十一年退一度。虽然虞喜的测算值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我们必须肯定帝尧时代天文记录的价值。

《尧典》不仅间接导致了岁差理论的提出，还为今人用岁差工具去倒推尧的大致年代提供了依据。在19世纪到20世纪，有西方学者推算过帝尧的大致年代。只要计算出《尧典》中所记录的星宿，到今天偏移

了多少角度，每偏移一度是七十一年时间，就可以算出距离现在多少年。

推算的结果证实了尧的年代是在公元前23世纪，史料中天文学的记录给今天的科学家推算历史年代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历史记录确实非常完善。

帝尧的时代，政治上倒是没有出现太大的动荡，《尧典》是这样写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诸部之间多能友好和睦。不过，或许是气候反常的关系，从帝尧时代起，洪水泛滥成灾，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在先前的史料里，从黄帝一直到帝喾，都没有记载过洪水泛滥的情况。我们在许多古文明的传说中，都可以看到某一个时间段洪水滔天，最著名的有基督教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故事。那么这些古文明所描绘的洪灾，会不会与帝尧时代一致呢？如果是一致的，想必与整个地球的气候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宋代程颢、程颐在《二程语录》中这样说：“古者民少，居民各就高而处。中国虽有水，未必即为人害。尧之时，人数渐多，渐择平旷以居，水泛滥乃始为害。”程氏又特别指出：“非特尧时水为患也，盖已久矣。”程氏所说，也可视为一种见解，由于人口的增多与种植业的发展，民众大量迁移到平原地带，故而水患灾害成为不可回避之问题。

洪水泛滥，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这位贤明的君主决心要彻底解决洪灾。

帝尧召集诸部首领，讨论道：“如今滔滔的洪水危害人民，淹没了山冈，水势浩大，百姓都愁眉苦脸，有谁能治理洪水吗？”

诸部首领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推举出一个人：“鲧（gǔn）大概

可以治理吧。”

鲧就是后来以治水闻名天下的大禹的父亲，估计鲧家族曾经有过治水的经验，因此大家都举荐他。然而在帝尧看来，鲧并非善类，因为这个人很狂傲，不服从命令。这样的人能办成这件大事吗？帝尧是持怀疑态度的。

诸部首领纷纷劝谏说：“还是让他试试吧，要是实在不行就算了。”

既然诸部首领都这样说了，并不专横的帝尧只得同意，因为他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他语重心长地对鲧说：“去吧，不过要谨慎从事，不可马虎啊。”

那么鲧治水如何呢？

在古代，鲧经常被当作一个反面人物出现。其实很好理解，帝尧既然被当作圣人，时常抗命的鲧自然被当作反面人物。但这里有一个疑问，倘若鲧真的是个反面人物，为什么他能得到诸部的支持呢？我们且不论鲧的品行如何，单论他治水，究竟有没有功劳呢？

对此，《尧典》是否认鲧的功劳的：“九载，绩用弗成。”鲧治了九年水，一点效果也没有。可是在四千多年后，我们要为鲧说句公道话，就算他治水九年没有见效，也不能算过失，换成其他人，能成功吗？他肩负治水的重任，整整九年之久，至少表明他是敢担大任的，比起袖手旁观的人，难道不更让人尊敬吗？

鲧治水不成功，问题出在哪儿呢？

当然，他的方法是不完善的。对于洪水，他采用“堵”的办法。所谓的“堵”，按我的理解，应该是修筑堤坝，把洪水限制在河道之内。古代有一句话，叫“水来土掩”，这个办法，从理论上说，是符合当时治水的思维。问题在于用“堵”的办法，对付一般的洪水可以，倘若我

们前面的推测成立，帝尧时期的洪水乃是人类面临过的最大洪灾，那么洪水的冲击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人工土堤摧毁。

这里我还是要说，鲧仍然是有功绩的。因为他的治水实践，至少积累了失败的经验教训，没有失败的尝试，就不可能有后来大禹治水的成功。

鲧勇挑重任，最后以失败告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丧失了原有的威信。对于治水的失败，“帝乃震怒”（《尚书·洪范》），帝尧何以会震怒呢？《洪范》中道出原因，是因为鲧“汨（gǔ，意为扰乱）陈其五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胡乱使用五行，五行就是水火土木金，这里只是笼统的说法，我们从语意上推究，就是鲧为了治水，使用了大量的物资，包括木材、金属等，耗费国家大量的物力财力，当然也包括人力在内。眼看国家日益穷困，财政捉襟见肘，却毫无成效，难怪帝尧要震怒了。

鲧从此失势了，以致被流放诛杀，后文再说。

六 圣人还是阴谋家（上）

关于帝尧的传说，最有名的是他把帝位禅让给舜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多少真实性呢？背后是不是暗藏玄机呢？

我们先来看看《尧典》中的说法。

由于被洪水的灾害折腾得精疲力竭，加之年龄老迈，晚年的帝尧萌生退隐之心。谁能成为接班人呢？帝尧召集大臣讨论这个事情。

放齐推荐说：“您的儿子丹朱是个开明的人。”

帝尧回答说：“丹朱喜欢说大话，又喜欢跟人争吵，不是合适人选。”

灌兜推荐说：“共工这个人有本事，有号召力。”

帝尧摇摇头说：“共工巧言令色，阳奉阴违，表面谦恭，满脑袋却是坏点子。”这里说的共工，与颛顼时代那个触不周山而死的共工有什么关系吗？也许是那个共工的后人，也可能仅仅是同名罢了。如此古老的历史，也很难去弄得一清二楚。

儿子丹朱不行，共工也不行，帝尧把诸部首领招来，对他们说：“我已经老了，在位七十年，你们之中谁能顺应天命，继承我的帝位呢？”

诸部首领都谦虚地答道：“我等德行浅薄，难堪此任。”

帝尧提示说：“你们也可以推荐地位卑微的贤人。”

这时有人站出来说：“在民间有一个穷苦却有德行的人，他名叫虞舜。”

虞舜！帝尧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他虽然未尝见过虞舜本人，却对他的大名早有耳闻。一个地位低微的平民百姓，为什么会闻名天下呢？究竟虞舜有何过人之处呢？诸部首领是这样说的：“虞舜原本是乐官瞽叟的儿子，他的父母亲行为不正，弟弟是个傲慢奸邪之人。出生于这样的家庭里，他仍然能以孝悌之心来对待双亲、兄弟，用自己的言行感化他们。他德行高尚，出淤泥而不染，没沾上邪恶的边。”

说白了，虞舜的优点，就是他品德好。

韩非子后来曾经这样说：“上古竞于道德。”在华夏文明的开端，便有重视道德的传统。“修德”一直被视为顺应天命的象征，比如《史记》中记载黄帝“修德振兵”，颡顓大帝“有圣德焉”，帝喾“修身而天下服”，后来这演变为儒家所鼓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么虞舜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帝尧当然不能偏听偏信传闻，他想了一个办法，对诸部首领们说：“让我试探试探他吧。虞舜还是个单身汉，我打算把两个女儿嫁给他，通过女儿来观察他的德行。”

舜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先说说正史的观点，然后再说自己的看法。

在古史中，舜总是以一个圣人的面目出现。

据《史记》的记载，虞舜的六世祖是颡顓大帝，这样说起来，他也有高贵的血统。他的谱系是这样的：颡顓大帝—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虞舜，经历六代，到虞舜时，已经从贵族掉到平民百姓了。虞舜的父亲叫瞽叟，这个名字只是一个俗称，意思就是“瞎老头”。瞽叟最早娶了一个老婆，生下虞舜，但是她不久后就去世了。

后来瞎老头又娶了一个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象。

后妈的到来，让虞舜吃尽苦头。由于不是亲生的，后妈非常讨厌虞舜，经常给他小鞋穿、刁难他、虐待他。瞎老头眼睛看不到东西，新老婆又不断在他耳边说虞舜的坏话，久而久之，他也非常讨厌虞舜。与虞舜相反，象则是生活在父母的过度溺爱之中，从小开始，他处处占便宜，养成了他傲慢的性格，把哥哥视为下人。

只要有小小的过错，虞舜便要遭到父亲与后妈的毒打。这还不够，瞎老头受后妻的影响，甚至多次想杀掉自己的长子。面对这样的父亲、后妈与弟弟，虞舜是怎么做的呢？他不动声色，仍然对父母十分孝敬，对弟弟十分友爱。

稍年长后，虞舜就外出自力更生了。他干过各种活，曾在历山种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上制作陶器，除此之外，还学了不少其他手艺。大概在这个时候，他的孝名开始传开了，史书上记的是二十岁左右。在父亲与继母面前，他仍然是和颜悦色。

十年后，也就是虞舜三十岁左右，他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知名人物。诸部之长都听过他被父母虐待却又孝敬父母的故事，连帝尧也听到了。帝尧打算把两个女儿嫁给虞舜，通过她们二人来观察舜的德行。当然，舜在结婚后，表现得中规中矩，有模有样。两个女儿也向父亲汇报，说自己的丈夫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帝尧听后当然十分开心，便赏赐给虞舜衣服、牛马等，还给他盖了粮仓。

所有人都觉得舜这个人特别好，唯独舜的父亲、继母与弟弟始终与他为敌，势不两立。瞎父亲又捣鼓着怎么暗算大儿子，有一回，他叫虞舜到粮仓里面去修补穴隙，虞舜表现得很听话，拿着工具就进去了。这时瞎老头子就放火烧粮仓，虞舜拿着两个斗笠护住身体，逃了出来。

过了段时间，瞎老爹又吩咐虞舜去挖井。井挖得深了，趁虞舜在

井底，瞎老爹与舜的同父异母弟弟象一起往井里倒土，把井给填平了。可是没想到舜早有防备，他事先在井底下挖了一条秘密通道，借着这条通道，从另一个出口爬了出来。

瞎老头与弟弟都以为虞舜被活埋了，两人拍手相庆，并商量着瓜分舜的财产。象出主意说：“舜的两个妻子就归我了，他的牛羊、仓库就留给父母吧。”说完后，象就大摇大摆地走进舜的卧室里，室内有一把琴，这把琴也是帝尧送给虞舜的。正当象拨动琴弦时，舜走了进来，象一脸愕然，一时间不知要说什么，急中生智说：“我正想你呢。”舜听了后也没有怪他，只是呵呵一笑说：“这样就很好。”

这件事情后，舜仍然一如既往地孝敬瞎父亲、关心弟弟。这个事情传到帝尧的耳中，帝尧是赞叹不已，对舜的好感与日俱增。

如此看来，舜的德行真的是高得不能再高了，修养的功夫也算登峰造极，真正可称为圣人了。

可是这一切的可信度有多高呢？

舜的故事，真实性有多少呢？

很值得怀疑。

我们不妨先从瞎子父亲处心积虑要杀死虞舜这件事说起吧。这件事疑云重重，按照史料的说法，舜是一个感天动地的孝子，无论父母如何虐待自己，甚至想杀了自己，他都一笑置之，孝敬若旧。我们不禁要问，瞎子父亲为何数十年如一日地想杀死儿子，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

其一，一个父亲，数十年想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儿子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孝顺的人，这合情合理吗？

非常不合理。可是这则故事，几千年流传下来，没有人去质疑，

只是因为舜一直被认为是完美的圣人。如果瞎老头真的那么讨厌儿子，把他逐出家就是了，舜倘若真的那么听话，他会违背父亲的意愿吗？再者，杀死舜有什么好处吗？是担心舜会与弟弟象争夺家产吗？且不说瞎老头没有什么家产可言，就算有的话，他也完全可以指定象为财产继承人，这在古代完全是合法的。所以我们实在想不出，父亲对舜有什么深仇大恨，有非杀了他不可的理由。

其二，瞎子父亲谋害舜的故事，是怎么流传开的？

我们来设想一下，所谓的谋害过程，只有父亲、舜、象三个当事人在场。父亲与象会到处去宣扬说“我们要杀死舜可是没成功”吗？不可能！那么放出风声的人是谁呢？只有虞舜本人。如果虞舜不把这个事说出去，外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也就是说，所谓的“父亲杀子”的传闻，完全是虞舜放出去的风声，而且他一而再地重复着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难道这些故事，只是虞舜一手杜撰出来的吗？

其三，如果说虞舜有意抹黑自己的父亲，有充足的理由吗？

我认为，虞舜报复父亲，比父亲报复虞舜的理由要合理得多。因为瞎子父亲在虞舜的生母死后，又娶了个后老婆，而后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象。舜完全有理由恨自己的父亲，因为后妈与弟弟的存在，他失去了父爱，父亲更宠爱小老婆与小儿子。这件事，使得舜从小就开始恨自己的父亲、后妈与弟弟，他采取了一种可怕的报复，就是不断地给自己父亲脸上抹黑。从这点来看，他成功了，因为他的父亲成了历史上最坏的父亲，他的后妈成了历史上最坏的后妈，他的弟弟成了历史上最坏的弟弟，不仅生前背黑锅，而且一背就是几千年。尽管这是我的猜测，可是我们难道不应该深思这个问题吗？他让自己的父母背上万载骂名，这就是他所谓的“孝道”吗？这恰恰是最恶毒的不孝呢。

其四，有人会说，作者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圣人之腹，所以我要提

供更多的证据。

据《史记》载，虞舜在二十岁时，孝名开始传播。这个记载十分蹊跷。按照《史记》的说法，舜从小受虐待却不改孝心，怎么会在二十岁时孝名才开始流传开呢？根据史料，我们知道舜在青年时代，曾经到许多地方去打工，又是种田，又是捕鱼，又是制陶瓷。那我们推测，大约二十岁时，他就出去打工了。他出了家门后，孝名却广为流传，为什么呢？难道他在二十岁以前，同村的人就没有称赞他的孝行吗？我想所谓的“孝名”，都是虞舜一手打造的，他四处说自己的“悲惨故事”，由于他表面上为人勤勤恳恳，一副老实人的样子，他所说的，人们很难不相信。

其五，我们来看看这个父亲是怎么谋害儿子的。

他先是把儿子打发到仓库里去补墙，然后在外面放一把火。几千年来没有人质疑这个故事，因为舜的父亲是以一个恶毒者的面目出现。可是人们似乎忘了一件事，这个父亲可是一个瞎子！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犯罪现场吧。

父亲是怎么放火的呢？他不可能用火柴或打火机，因为古代没这个玩意儿，尽管当时人们会取火，可是取火估计还是很麻烦的。所以父亲得先在哪里弄个火堆，也许他先叫舜在仓库附近烧一堆火，等舜进去后，他冒着被火烧着的危险，拿了根木柴点了火，然后这个瞎子举着火柴摸黑前进，摸到了仓库前，点燃了仓库。作为一个瞎子玩火，随时可能被火烧死，他到底是烧别人还是烧自己啊？我们再退一步说吧，如果要放火，为什么不让舜的弟弟象去放呢？瞎子老爹为什么要亲自去冒这个险呢？

这故事背后的真实情况，我们在几千年后，根本无法还原，可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说两点供大家参考：第一点，如果瞎子父亲真的想杀舜，那背后一定有更深的理由，这才令他不惜铤而走险。什么原因

呢？大约是意识到了舜是个什么样的人，看清了舜的真实面目，表面诚实，内心阴险，道德挂在嘴上，狡诈藏于心窝。所以老头子抱着为民除害的念头，在两眼都瞎了的情况下，不惜以身犯险，摸黑点火。第二点，或许这个故事就是舜自己编造出来的，有父亲的恶行，才衬托得出他的“孝行”。

其六，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谋害的版本。

瞎子父亲打发舜去挖井，等舜下井后，他与象两人把井给填了。这则故事同样不靠谱。按照史书所说，父亲想方设法要杀死舜，之所以要想方设法，无非是要做到滴水不漏，至少要给外人造成是死于意外的印象，否则一刀捅死是最简单的办法。可是这个案件却显得拙劣无比，舜在井底，如果是制造出井壁崩塌，还能算是意外，而父亲与象两人却拙笨地用填土的办法，这不是公然要告诉别人，舜是被谋杀的吗？

更奇怪的事情是，象在填完土后，还跟父亲说：“舜的两个女人归我。”这更是荒谬绝伦。只有在蛮族，才有哥哥死了后，媳妇改嫁给弟弟的传统，华夏文明是没有这个传统的。再说了，舜的两个妻子是何许人也？是当今天子帝尧的女儿，象居然没有把天子放在眼中，不仅要杀死天子的女婿，还要霸占天子的女儿，这岂非荒诞？

可见这个故事，肯定与事实不符。

大家都知道，尧舜在古代被认为是旷世贤君，特别是尧舜禅让更成为千古美谈，他们也成为道德的标榜。可是我们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必须抱有一些警惕之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历史上成名的政治家，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发自于内心，而更多的是出于计谋。

笔者读的历史越多，越发现历史不等同于历史的记载，真实的历

史要远远比书本复杂得多，而人的内心更复杂。虞舜这个人，并非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纯朴憨厚，而是非常有心机的，这点我后面还会说到。

为什么作为一个平民百姓，虞舜的大名不仅为诸部首领所知，也为尧帝所知呢？在那个通信手段落后的年代里，他的名声何以能广为流传呢？说实话，像虞舜家里那么点小事，我很怀疑邻居有没有兴趣，更别提远在天边的人了。可是舜却搞得全天下的人知道了，我不得不佩服他有高超的宣传本领，他不断地制造出“新闻”，以吸引别人的眼球。从这点看，舜无疑是成功了。

七 圣人还是阴谋家（下）

我们可以怀疑舜与父亲的故事，可是不能怀疑舜的本领。

成为帝尧的女婿后，虞舜的政治前途变得一片光明。帝尧对舜的“孝行”大为赞赏，他开始让虞舜参与政事。虞舜十分明白自己出身于下层，虽然蹿到上位，可是缺乏根基。倘若要稳固自己的权力，必须要有自己的人马。于是他一口气起用了十六个人，这十六人是谁呢？

据《史记》所载，这十六人中，有八人是高阳氏的后人，称为“八恺”，有八人是高辛氏的后人，称为“八元”。高阳氏就是颡顼，高辛氏就是帝喾，而帝喾是帝尧的父亲。由于此时帝尧已经年老，故而“八元”很可能是帝尧的侄子。按司马迁的说法，这几个人都是德才兼备，可是在帝尧时代，却没有得到重用。这种说法实在颇令人狐疑，帝尧连像虞舜这样的乡村鄙夫都能任用，独独不用自己的亲戚侄子，实在难以体现圣君的风采。不管怎么说，虞舜提拔了这十几个人，总算有了一批自己的心腹。

接下来，便是尧把帝位禅让给舜的故事了。

尧是什么时候把帝位禅让给舜的呢？《尚书》与《史记》的说法是不同的。《尚书》称尧是在考察舜三年后，便让位给他，而《史记》则称是二十年后。尧让位给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被后世誉为“传贤不传亲”的德行典范。这两本书写到帝尧为何让位时，观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舜在参政、治理期间，政绩相当突出，加之品格高尚，故而帝尧决定让位于他。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在《说难》中有这么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这简直是惊天之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禅让”，在韩非子这里却成了“舜逼尧，禹逼舜”。若是属实，那么这种禅让的本质，与后来王莽、曹丕一流的人夺权模式如出一辙，王莽、曹丕等人不也是借着“禅让”的名义夺权吗？难道舜也是逼迫帝尧让位的吗？

我们都知道，韩非子的《说难》是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堪称其代表作，影响很广。可是他所提到的“舜逼尧”这种说法，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这是他杜撰出来的吗？或者他有秘密的资料来源，而这个资料是其他人没看到的？

没错。韩非子确实有内部资料。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一本神奇的史书，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把六国史书都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晋书》所记，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数十车的竹简，其中便包括这本非常珍贵的魏国史书。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的，故而称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冢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们看的，而是写给君主看的，这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竹书纪年》是如何记载舜取代尧的事情呢？有几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弃，他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被舜任命为后稷，后稷是主管农事的官名）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帝尧与儿子丹朱的联系，以此逼迫帝尧让位！

原来这竟然是“禅让”的真相。舜的手段，与后世的王莽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舜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却得到恶名。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史料中从五帝时代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留一份。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要知道韩非子原本是受业于儒学巨擘荀子，可最终却与儒学划清界限，原因正在于他发现儒家所鼓吹的三代，其实根本是二手货，真实的历史，远非想象的那么美好。

我们有理由相信，舜并非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表面上看，他温文儒雅，待人有礼而谦逊，乐于助人，满嘴仁义道德，可是实际上他却很有心机。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家虐”的受害者形象，博取世人的同情，并以此彰显自己的“孝行”，赢得了帝尧的信任。可是在提拔一批被帝尧冷落的贵族分子后，他营造了自己的势力，在羽翼丰满后，他开始向帝尧发难了。

据《尚书》的说法，帝尧在物色虞舜时，已经在位七十年，可以说他已经老态龙钟。虞舜当时才三十多岁，正当盛年。帝尧是否真的想把帝位传给虞舜呢？应该说，有这种可能性。舜虽然是一个平民百姓，但从血统上说，他是颛顼大帝的五世孙，现在又是帝尧的女婿，身份不一般。

如果说帝尧要传位于舜，那么舜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发动政变呢？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帝尧虽然年迈，可是他身体十分硬朗，以《尧典》的说法，他在舜称帝之后，还活了二十八年之久，死时已一百多岁了。其二，帝尧的儿子丹朱始终是帝位的有力争夺者，有许多部落首领是支持丹朱继承帝位的。其三，尽管虞舜伪装得十分巧妙，可是时间长了，一个人的本性终究会露出来，倘若帝尧发现他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完美人物，舜的继承权肯定会被取消的。

因此舜必须先下手为强，他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帝尧，并把他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儿子丹朱联系。

一旦大权在手，虞舜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对派，以武力手段镇压自己的对手。铲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有人去质疑所谓“四凶”的说法。现在我们摆脱了传统儒家史观的束缚，可以好好探讨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讙兜、三苗、鲧，其中共工、讙兜、鲧都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必须感谢先秦时代的书籍，因为那还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并不能一手遮天，所以我们可以依稀寻找到一些线索。

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之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这两则史料有一个不同之处，《吕氏春秋》称诛杀鲧的人是帝舜，而《韩非子》则称是帝尧。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此时正是舜逼迫尧传位的时候，尧应该已经被软禁，所以舜乃是以尧的名义，诛杀了共工与鲧。两人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相比之下，被儒学奉为经典的《尚书》对“四凶”被杀或被流放的原因几乎忽略，只是写了结果：“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显然，《尚书》是避重就轻。“殛”的本意是“杀死”，以文义来看，共工、讙兜、三苗是被流放了，而鲧则是被杀死。后来儒家学者把舜捧为圣人，圣人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所以把“殛”的意义曲解为“流放”。我们从《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两本书中已可看到，鲧根本不是被流放的，而是被杀死的。同样，共工也不仅仅是遭到流放，后来也同样被舜处死了。

鲧与共工是因为反对舜而被杀死，这已经有明确的证据。那么灌兜呢？灌兜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为他与共工关系密切，他曾经在帝尧面前称赞共工的业绩。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诛，

兜自然被牵连，流放到崇山，据说后来投南海自杀。

至于三苗，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镇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有这么一句：“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四凶”、“四罪”，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舜称帝，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恰恰印证了“成王败寇”的说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败的人就是恶人，所以舜成为圣人，而鲧、共工、灌兜等则成为千年流传的恶人。

我们从记录帝尧生平事迹的《尚书·尧典》中可以看到，这几个所谓的恶人，是帝尧时代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其中鲧是大禹的父亲，治了九年水，不算功高，也算得上劳苦，可是他们全被舜给抹黑了。必须说，舜是一个高明的宣传家，他抹黑了鲧、共工、灌兜，也抹黑了自己的父亲、继母与弟弟，同时，也抹黑了帝尧。帝尧不是一代明君吗？可是舜说帝尧的几个得力干将都是恶人，是四凶，而舜提拔起来的十六个所谓德才兼备的人，却在帝尧时代被冷落了。这么看来，帝尧任用奸人，排斥贤人，岂有半点贤君的模样，简直算得上是昏君。

在我看来，尧不是圣人，舜也不是圣人。

为什么后世会把两人塑造成圣人呢？

这是因为后人以美化先人的方式，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他们宁可相信有纯洁无瑕的圣人，思虑精纯，一心奉公，品格高尚，毫无私心。后人用这种方式憧憬着一个乌托邦的社会存在，在遥不可及的

前世立起清明政治的标杆。于是尧、舜禅让的美谈就这样传颂开了，人们宁可信其有，只要真的存在过这样美好的社会，那么人的希望就一直存在。我们不可苛求古人，因为他们需要梦想，没有梦想，他们对前途会失去所有的信心。其实不仅是尧、舜的传说，在世界各国的古老传说中，哪个英雄不是道德与勇气的完美结合呢？在宗教世界中，哪个教主不是完美的代名词呢？

帝舜上台后，以雷霆手段迅速镇压异己势力，这与原先流传的那个逆来顺受的“孝子”形象大相径庭，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实际上，他的政治手段是极其高明的，虽然我不认为他是个圣人，但他绝对是一个堪称雄才大略的君主。

由于最主要的政敌已经被清除，政权的更迭已是水到渠成。舜在打击对手的同时，也以施与恩惠的手段收买人心。尧时代的几个大臣，包括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禹等，都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这对政权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上文引用《竹书纪年》时便提及，放逐帝尧之子丹朱的人正是后稷，他是帝尧的兄弟，但是他选择站在舜的一边。

有一个人我们必须注意，这个人便是禹，他是鲧的儿子。鲧因为叛乱被舜处死，舜却重用其子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尧典》中看到，鲧是很有势力的，当初诸部首领都一致要求由他治水，可见他的影响力。当时的政治体制并非后世皇权之下的中央集权制，而是相对松散的部落制（或以后世的称法为诸侯制），这些部落或诸侯是很有实力的，故而舜不可能像后世皇帝那样，对政敌采取株连九族的做法。舜很明智地拉拢禹，以减轻诸部落的敌对情绪，这对巩固其政权是相当有帮助的。

为了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舜从登位始，就做了种种宗教上的准备。在太庙接受帝尧的禅让后，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测天象，显然他要从天象中找到“君权神授”的证据。紧接着，他搞了盛大的祭天

仪式，同时祭祀山川诸神。在即位的第一年，他进行了四次长距离的巡视：东巡至东岳泰山，在这里他不仅祭祀诸神，还接受诸侯的朝见；南巡至南岳；西巡至西岳；北巡至北岳。每到一处，都免不了要搞些祭神活动，帝舜以四次巡视显示自己充沛的精力以及超强的自信力。

尽管我不认为帝舜是一个品行无可挑剔的圣人，可是不否认他是一位杰出的大帝。他以强有力的手腕建立起完善的帝国秩序。为了进一步约束诸侯或部落，他制定了诸侯朝见时的五种礼法，他颁发给诸侯五等圭玉作为权力的信符。每当诸侯朝见天子时，必须携带圭玉赴朝，朝廷考察诸侯没有犯过，才发还圭玉，允许其回到自己的领地。可以说，帝舜对诸部的控制力度，要比前几任大帝都强。

帝舜是一个十分勤政的天子，他每隔五年便要巡视四方一次。由于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东西南北各巡视一次就要花费大约一年的时间。在巡视期间，诸侯们要轮流朝见天子，当面述职，帝舜会花时间考察他们的政绩，对有功的诸侯给予赏赐。同时，帝舜还重新划分了行政区，把全国划分为十二个州，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向底层渗透。可以说，帝舜时代的改革，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呼之欲出。从神农氏到黄帝到帝尧，尽管有国家的雏形，可是仍然是有原始色彩的部落制，帝舜的改革，为后来的夏帝国奠定了基础。

舜时代最伟大的事业，乃是治水，而完成治水伟业的人，正是大禹。

八 禅让还是夺权？（上）

禹是鲧的儿子，后世尊称为“大禹”，意为“伟大的禹”。禹的伟大，在于治水之功。我们前面说过，面对自然界的洪水灾害，帝尧时代几乎束手无策。鲧用堵的办法，就是修水堤防洪水，可是在惊涛骇浪的威力下，收效甚微。

后来鲧由于反对舜称帝，被舜所诛杀，他的儿子禹成为部落的新首领。这时禹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帝舜是他的杀父仇人，另一方面这位强有力的天子又急需拉拢他。在这种情况下，禹要做何选择呢？他是同父亲一样，与舜战斗到底呢？还是屈服于舜的政权呢？禹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接受了舜的招抚，与中央政府和解。这一定是个艰难的选择，但禹深知自己不是舜的对手，无法与他抗衡，唯有隐忍才是上策。

舜真的对禹那么放心吗？

显然不是。

舜是很有心机的人，表面上拉拢禹，实则想找机会除掉禹。“大禹治水”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政治阴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史记》的一段话：“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从这里可以看出，舜在杀了鲧之后，对外宣称鲧的罪名是“治水无状”。这是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治水治不好就要杀头，谁还敢去治水呢？可是舜偏偏要让禹去治水，这不明摆着要借刀杀人吗？只要到时禹治水无功，照样扣上一个“治水无状”的罪名，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吗？

再来看看《尚书》的记录。

帝舜给禹下达了一个命令：“你去平定水土吧，要好好干啊。”

注意禹的回答，他没有答应，而是当即婉言拒绝道：“这件事还是交给契、伯益、皋陶等人吧。”为什么禹要拒绝？他看得太明白了，这是明摆着在我脖子上套上绳索，洪水那么好治理吗，搞不好脑袋搬家还要遗臭万年。

帝舜当然不同意了，一句话顶了回去：“还是你去完成这个任务吧。”

看来是没得商量了。治水这件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要失败，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禹只能背水一战了。

要怎样才能彻底解决水患呢？

禹认真地研究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经验，认定用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工具太有限了，没有钢筋混凝土，堤坝建成后，还是松松垮垮的，根本无法抵御洪水的冲击。要怎么办呢？既然用堵的办法不行，就用疏导的办法，把洪水分流，分流到水少的区域。这个办法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工具那么简陋的年代，要人工疏通河道，谈何容易！

再难也得去做，因为禹别无选择。

要怎么开始呢？首先要测量地形高低。因为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要是新开挖的河道比原河道还要高，洪水是无法流出去的。疏导洪水后，会不会殃及疏导区的居民呢？这也要有测量的数据才行。因此禹带着一批人，翻山越岭，拿着简单的测量工具，在山川地带测地形的高低，立起一根根标杆，计算从哪里开挖水道最合适。这个工程

量极其巨大，不要说古代，就是到今天，也算得上是巨大的工程。

由于责任重大，禹做事都是亲力亲为，他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在平地他乘马车；遇河流则搭船；在沼泽地带用橇拉；在陡峭的山地则穿上特制的鞋，这种鞋上山时前齿短后齿长，下山则前齿长后齿短。勘测完毕后，便是大规模的治水，整个治水过程共耗费了十三年，范围遍及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当然，当时还没这些地名。其间开挖了许多水道与陆路，长年以来危害百姓的洪水灾害终于得到了抑制。

在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先人的勇敢与坚强，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能做出如此伟大的事业，大禹不愧是“伟大的禹”。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治水功绩不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版图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大禹治水之前，中国的版图其实很模糊，当时也没有什么国界的概念。大禹治水，开水道、陆路，凡此开拓过之地，实际上都成为帝国版图之地，国家的概念更加明确了，难怪乎到了大禹的儿子时，一个崭新的国家形成了。

帝舜派禹去治水，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但是禹以自己的大智大勇化解了危机。根据史书的记载，大禹治水时，帝舜派了两个人去协助，一个是伯益，一个是后稷。我的看法是，这两个人是帝舜派去监督禹的，就是两个密探，任务就是要抓住禹的小尾巴。可是禹何尝不知道自己的险境，他表现得小心翼翼，无懈可击。

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所谓“三过家门”，是孟子的说法。《孟子》的原文是这样的：“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三过其门，不是说有三次路过家门，而是指多次。

为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呢？这个故事一直被后人所称道，认为大禹是大公忘私。可是我在这里要提出怀疑，路过家时进去看看老婆孩子，怎么就成了“有私”呢？这会影响到工作吗？就算有影响，也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吧。这个故事与瞽叟杀舜的故事一样，很不合常理，背后肯定还有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司马迁的《史记》是怎么写的：“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里注意一个细节，孟子写的是“三过其门而不入”，司马迁写的是“过家门不敢入”。

“不入”与“不敢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达。“不入”是我不进去，可能我很忙，我责任重大，所以我不进去了。“不敢入”是我想进去，可是我害怕，不敢进去。那么禹害怕什么呢？司马迁写了，“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原来他心里念叨着帝舜以“治水无状”为罪名杀了父亲鲧，他害怕自己要是也无功，免不了也遭到杀害的命运，所以“劳身焦思”，脑袋上面挂着一把斧头，所以他经过家门时不敢进去。

可是我要说，司马迁仍然没写到点子上。

禹不敢进家门是对的，但并不完全是司马迁所说的原因，还因为身边有两个帝舜安插的密探，时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两个人，就是伯益与后稷。后稷曾帮助帝舜囚禁帝尧的儿子丹朱，很明显是帝舜的亲信。伯益的政治立场相对中立，不过他也是被帝舜提拔起来的人。帝舜以协助治水为名，把伯益、后稷安插在禹身边，就是要监视他。

禹是一个十分明智、冷静的人，岂能不意识到自己周围杀机四伏呢？他绝不能让人抓住任何把柄，因此他在个人生活上，极其低调，近乎苛刻。

不与亲人联系，乃是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

说到禹的故事时，我经常想到刘秀的故事，两者确有一些共同

点。刘秀的哥哥刘縯也是死于政治斗争，被皇帝给杀了。当时，刘秀正是取得昆阳大捷的伟大胜利之时，可是他回到朝廷后，不为哥哥辩护，不述自己的功劳，关起门来，不见任何人，以求自保。刘秀的隐忍与禹是相类似的，禹也是如此，为了不让别人抓住把柄，他宁可不与亲人见面，做的事全是公事，没有一点私事，只有这样，才能让帝舜放心。

我这个说法，与正统史学的说法又完全不同，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我们应当从细节处去读史，读出文字的言外之意。

请看《尚书》中的《益稷》一篇的一段对话，是舜与禹的对话，原文不太好懂，我用白话文转述。

帝舜说：“禹啊，你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丹朱这个人，游手好闲，放纵淫逸，既骄傲又耽于嬉乐，整天只知道跟人家争吵，无事生非。他还家里与人淫乱，所以我惩罚他是应该的，也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在这里，帝舜既是为自己流放丹朱做辩护，同时也可视为威胁禹的话，说明自己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禹是怎么回答的呢？

禹说：“我娶了涂山氏的女儿为妻，结婚只四天就离家治水去了。儿子启生下来后，呱呱大哭时，我都没有照顾过他，全身心地想着治水的事情。”

谨慎是对的。

我们从帝舜的话里，着实看不出丹朱到底犯了什么罪，只是公子哥生活比较悠闲自在罢了。治水治不好是罪，游手好闲也是罪，大禹非但要治好水，而且不能有丝毫享受嬉乐，否则他的下场就与鲧、丹朱一样。若是禹没事往家里跑，岂非被扣上“耽于嬉乐”的帽子吗？所以他“过家门而不敢入”，明哲保身。不仅如此，《史记》说他“薄衣

食”、“卑宫室”，吃的穿的都很简单，住的也很简陋。我们当然可以说禹是“大公无私”，但这“大公无私”的背后，是为了保全自己，任你派多少人来监视，也抓不到我任何把柄。

美国当代思想家尼尔·沃尔什曾有一段关于历史的精辟说法：“你们教的根本不是历史，而是政治。历史本应对真正发生的事，做充分而精确的记载。政治却从来不在乎真正发生的事。政治总是关于所发生的事的某某人的观点。历史揭示事实，政治则将之正当化。历史揭发、说明一切；政治则掩盖，只说一面之词。”这段话说得非常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的历史。古文献的记录，并非真正的历史，而是变形后的政治。从理论上说，我们完全不可能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不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判断，离真相稍稍近些。

前面我曾引述韩非子的话：“舜逼尧，禹逼舜。”关于“舜逼尧”的说法，有《竹书纪年》可以佐证，但关于“禹逼舜”的说法，《竹书纪年》上也找不到证据。那么舜真的是把帝位禅让给了禹吗？

如果“舜逼尧”的说法为真，那么“禹逼舜”的说法应该也是真的。我们试想一下，舜为了得到帝位，囚禁尧、流放丹朱、镇压了所谓的“四凶”之乱，这个政权的得来，是充满阴谋与诡计的，难以想象舜会把辛辛苦苦得来的权力拱手让出，而且还是让给被自己杀死的政敌的儿子。

倘若如此，为何古文献中除了韩非子的这句话之外，就没有其他资料的佐证呢？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禹取代舜是比较顺利的，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禹的政变，很可能是与舜达成了某种协议，即保留舜的声名，让他以“禅让”的方式体面地下台。或者我们可以说，禹导演了一幕“光荣革命”。

为什么禹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呢？

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舜后期生活比较腐化。

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舜早年生活艰辛，登上帝位后，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很难保有早年勤俭的生活方式。在魏晋时，有一个名为皇甫谧的人写了一本《高士传》，收罗古代贤人的事迹，其中讲到虞舜时代的一个名为善卷的贤士，善卷曾对舜这样说过：“昔唐氏（指尧）之有天下也，不教而民从，不赏而民劝，民不知怨，亦不知喜。今子（指舜）盛为衣裳之服，以炫民目，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由此生矣！”

参照《尚书》，皇甫谧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舜是“礼法”的创造者，他规定了五等礼法，强化了等级秩序。礼法是与财富挂钩的，等级高的诸侯，献上的礼就要重一些，等级低的则轻一些。同理可知，等级高的人，享用的东西就要多一些，而等级低的人，享用的东西就要少一些。作为天子，舜肯定比尧要奢华，在他看来，这种奢华不仅是为了满足欲望，更是体现权威必不可少的象征。比如说舜所穿的衣服，上面要绘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下面要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fǔ）、黻（fú）、绶（chǐ）等图案，以此来强调自己尊贵的地位。

与此同时，禹的声名却是如日中天。治水的伟大功绩，造福于万千百姓，这无疑令禹拥有了别人不可企及的声望。同时他在品行上几乎无可指摘，穿简陋的衣服，吃简单的饭菜，住破房子，三过家门而不入，结婚四天就离家去治水，儿子出生他也顾不上看一眼。帝舜不得不称赞他：“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尚书·大禹谟》）

光有声望可不够，光有百姓的支持可不够，倘若禹要逼舜退位，

一定要有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帝舜时代最重要的几个人物，除了大禹之外，便是后稷、皋陶、伯益三人。这三人在帝尧时代便被任用，在位时间长，权势不可小觑。帝舜政变，后稷是有份的，他把帝尧的儿子丹朱给流放了，可以算得上是舜的亲信。这三个人里，后稷是死得最早的，剩下皋陶与伯益，这两人是大禹必须争取的关键人物。

九 禅让还是夺权？（下）

先来看看伯益。

当初伯益与后稷被派去协助大禹治水，治水功毕，大禹没有忘记在帝舜面前提起伯益与后稷两人的功劳。这无疑拉近了他与伯益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治水的事业，让伯益认识到了大禹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的行为无可非议，能力不容质疑，品格高尚，舍己为公。

在《尚书·大禹谟》中，有一段伯益对帝舜说的话，必须引起关注：“戒哉！儆（jǐng）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这是告诫帝舜的话，意思是说，您要小心啊，不要丧失法度，不要耽于游逸，不要沉溺于淫乐。这话听起来奇怪，让我们隐隐地察觉到伯益对帝舜有所不满，或许是此时的帝舜已经有“失法度”、“游于逸”、“淫于乐”的苗头。

我们接着看，伯益又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fú，意为违逆）百姓以从己之欲。”就是说，不要违背常道来求得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民众来顺从自己的私欲。虽然这是劝谏之词，可是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任贤勿贰”，似乎暗指舜对禹的态度，当时禹就是天下最贤之人。

我估计，此时伯益对帝舜的所作所为已有微言，这令他与禹走得更加近。

再来看看皋陶。

皋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甚至被后人与尧、舜、禹并列为“四圣”。舜称帝后，便把皋陶提拔为刑狱之官，掌握司法大权，可

以说是位高权重。

我们从《尚书》中可以看出，皋陶对大禹是十分赏识的，有好感。在《益稷》篇中，帝舜让大禹说说治水的经过，大禹简要地说自己怎么勘察山林，怎么疏通河道，怎么开通沟渠，怎么安抚百姓。皋陶听后十分感动，说道：“师汝昌言。”就是说，你所说的对我很有帮助，我得向你学习，以你为师。

另外还有一篇《皋陶谟》，整篇都是大禹与皋陶的对话。这篇对话意义重大，有一些细节仍然要引起关注。禹和皋陶在讨论古代之美德时，皋陶说了几点后，补充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便接着说：“要是这样子的话，帝舜也难做到啊。知人善任才算明智，这样做才能任用合适的官员。能安抚民众才算是仁慈，这样做民众都会怀念他。倘若能做到明智与仁慈，怎么会担心灌 兜呢？何必流放三苗呢？又何必害怕巧言令色的奸佞呢？”

禹能够跟皋陶说这些，证明此时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一般了，非常亲密。值得注意的是，大禹的话锋直指帝舜。首先，大禹认为帝舜没做到“知人”、“安民”这两点；其次，他委婉地批评舜流放灌 兜、流放三苗的做法。要知道，铲除“四凶”一直被认为是帝舜的一大功绩，“四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鲧。最后，我们要认真研究大禹的言外之意，在他看来，流放灌 兜、三苗这两件事，舜都是做得不对，因为他不够明智与仁慈。禹为什么偏偏没有提及自己父亲鲧以及共工呢？鲧与共工都是被处死的，既然流放都是错的，那么处死就更不必提了。

可见大禹对父亲被杀一事，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虽然皋陶并没有对大禹的说法做出回应，但可以料想是默认了，心照不宣。

我怀疑大禹与皋陶、伯益之间，有秘密的约定。根据史料记载，

大禹到晚年时，原本想让皋陶继承帝位，但皋陶比大禹死得早，这件事就作罢了，后来伯益便成了帝位的接班人。这种安排，会不会是事先的约定呢？正如韩非子所说的“禹逼舜”，要逼帝舜退位，不是大禹一个人能做得到的，没有皋陶、伯益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对皋陶与伯益的回报，大禹同意以后由两人继承帝位，真相会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但我把怀疑说出来让大家参考。

如果大禹真的是逼舜帝退位，他下手的机会吗？

有的。

我认为三苗之变是大禹夺位的最佳机会。

三苗部落是当初反对舜称帝的四股力量之一，在鲧、灌、兜、共工被铲除后，三苗部落被迫迁移，但他们对帝舜政府向来是不服从的。三苗部落是从九黎部落中分离出来的，前文说过，九黎部落曾经叛乱，遭到颛顼大帝的镇压。颛顼大帝试图从宗教思想入手，破除九黎部落的巫神思想，开展轰轰烈烈的“绝地天通”运动（详见前文）。到了帝尧时代，三苗部落的巫术又死灰复燃，与中原的宗教思想大相径庭，正因为有这种宗教思想支撑，三苗成为难以控制的一个部落。

大禹倘若想发动政变，从帝舜手中夺权，首先必须要掌握兵权。讨伐三苗，是掌握兵权的绝好时机。从《尚书·益稷》篇中可以看出，正是大禹向帝舜提出了三苗问题，引发了讨伐三苗之战。他对帝舜说：“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大意是说，三苗不服从统治，帝舜您得关注这件事。

起初帝舜并没有出兵讨伐三苗的念头，他只想使用思想武器，就是以德服人，用中原文明去教化蛮族，像颛顼大帝那样发动一场“绝地天通”的思想改造。

事实证明，要用思想武器征服三苗，实在不容易。

为了除去心腹之患，帝舜最后决定动用武力。大禹被任命为远征军统帅，这个职位的得来，恐怕是动用了各种关系。帝舜下达命令：“禹，那些三苗部众不服从我们，你前去征伐吧。”

大禹集合军队后，发布了一道命令：“济济有众，咸听朕命。”注意哦，这里的“朕”字并不是天子自谓，直到秦始皇以后，“朕”才成为皇帝专用称谓，先秦时代这个字只是第一人称“我”。大禹掌握兵权之后，便强调“咸听朕命”，你们所有的将士，都得听我的命令。誓师之后，大禹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往前线。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战事没有什么进展，令人怀疑大禹是按兵不动，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打着讨伐三苗的幌子，实际上却是想发动政变。

他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伯益。

伯益出现了，他被帝舜派去协助大禹。伯益说了一番话：“只有德行才能感动上天，无论多远都能归服。谦受益，满招损。天子以前在历山耕作时，日夜向上天哭泣，对于父母的恶行，自己充满内疚。每当见到父亲瞽叟时，总是敬重而庄严，后来终于感化了父亲。至诚之心都可以感动神灵，何况是三苗呢？”

这句话，实在暗藏玄机。

大家想想，大禹刚刚出兵，伯益就说对付三苗无须用兵，用德行就可以感动他们前来归附。于是乎便发生了一个荒诞而又离奇的故事。

帝舜对自己的德行向来十分得意，不管这种德行是修炼出来的，还是装出来的。他听了伯益的话，当然十分认同。要怎么用德行感化三苗呢？于是便有了一个十分滑稽的表演，叫“舞干羽于两阶”，干和羽都是舞蹈器具，文舞执羽，武舞执干。打仗不成，用舞蹈来征服敌

人，而且不是在敌人面前跳舞，不是在敌人的地盘上跳舞，不是在前线跳舞，而是在自己的宫廷里跳舞。跳舞能征服敌人吗？这是骗三岁小孩儿的故事嘛，您还别说，“七旬，有苗格”，大约过了七十天，三苗就前来投降了。

在宫中台阶上一跳舞，敌人就来投降了。

这真是神了，奇了。

举诸世界古往今来之历史，恐怕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了。

可是这种谎言竟然欺骗了中国人好几千年，不也是一种悲哀吗？

那么我们能从历史的迷雾中找出真相吗？在“舞干羽于两阶”的那七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大禹班师回朝了。

作为一个坚韧不拔的人，治水十三年从不言放弃，讨伐三苗仅仅三十天就放弃了，这不是大禹的性格。大禹打着讨伐三苗的幌子，其实根本一箭未发，他按兵不动，只是等待伯益的消息。当伯益带来消息，帝舜要取消对三苗的武力讨伐，改用“以德服人”的方法，大禹听罢后一定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第一，他借讨伐三苗之名，控制了军队；第二，伯益已说服帝舜放弃武力征服，他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班师回朝。

如果要搞一场政变，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吗？

在古代各种史料中，并没有把大禹继承帝位与三苗战争联系在一起，可是我认为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尚书》中的《大禹谟》，这篇文章时间顺序很清楚，从帝舜任用大禹一直写到帝舜把帝位禅让给大禹。帝舜给禹的最后指令就是征伐三苗，可见三苗战争与帝舜退位发生在同一年。更奇怪的是，依《大禹谟》的说法，舜是先把帝位让给禹，然后再命令禹去讨伐三苗。把帝位让给禹，禹就是天子，何以舜还能命令他呢？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最可能的解释是：帝舜命令大禹讨伐三苗时，确实还是天子，等到三苗归服时，他的帝位已经被大禹取代了。

在古代正统史学中，都盛赞舜把帝位“禅让”给禹的美德，并当作古代“任人唯贤”的美德。至于韩非子所说的“禹逼舜”的观点，显得十分没市场。我倾向于后一种说法，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探索历史真相。

如果“禹逼舜”是历史真实，有两个疑问必须解释：第一，大禹是如何夺权的？第二，三苗何以会归服？

通过《大禹谟》一文，明确了三苗战争与大禹登位时间点一致后，可以判断大禹之所以能成功夺权，是因为有军队作为后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讨伐三苗战争中不卖力，他的目标根本不是三苗，而是帝位。在夺位过程中，伯益显然是个重要人物，正是他的提议，才让帝舜收回武力征服三苗的决定。大禹名正言顺地班师回朝，在帝舜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举发动政变，将他拉下宝座。

由此我们可以解答第二个问题，即三苗为何会归服。我们不要再相信“舞干羽”的谎言了，单靠跳舞是不可能征服敌人的，何况跳舞时还没有邀请三苗之君前来观赏。三苗归服的真正原因，是帝舜的下台。当初三苗反对舜继承帝位，遭到镇压与迁徙流放，因而一直顽强地反对帝舜，成为帝舜时代的一大隐患。在禹和舜之间，无疑三苗是倾向禹的，因为禹的父亲也是舜的反对派，当年也可以算是同一条阵

线。如今禹把舜拉下台，不仅报了杀父之仇，也帮三苗复仇了。这才是三苗归服的真正原因！

“禅让”不过是传说罢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传说呢？首先，舜与禹都采取这种夺权模式，这与后世王莽、曹丕、赵匡胤取得政权的模式并无不同。只是舜、禹时代久远，历史记录简单，孔孟时代看舜禹，与我们看唐朝一样久远。后世儒者之所以相信有“禅让”的传说，不过是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罢了，他们宁可相信有这么个乌托邦存在，只要它存在，就可以超越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寄予信心。

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大禹逼舜退位，他为什么没有为父亲平反呢？为什么还要留下歌颂舜的文章呢？因为他不得不如此。他必须承认舜的美德，这才能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要是公开谴责舜是错误的、不义的，那么禹从舜那里得来的权力也将是不合法的，他就必须把权力交还给帝尧的儿子。只有把舜捧得高高的，所谓的“禅让”才是权力合法化的来源。

《尚书》所写的是政治，而不是历史真相。我不敢说自己复原了历史真相，但愿意把自己的思考、分析、判断与大家分享，至少我们可以从古书的细节之处，重新审视历史。但凡不合情理之处，一定要深思，就像“瞽叟杀舜”、“舞干羽”而服三苗这种很不合情理的事情，背后可能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十 夏王朝的诞生

夏王朝的诞生，乃是中国历史上一重大事件，标志着国家观念的成熟及民族观念的确立。在夏王朝之前，从黄帝到颡顓、帝啻、尧、舜、禹诸帝，尽管都有一个公认的首领以及具有约束诸部的中央政权，但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最明显的一点，这个大国家连一个名字也没有。

黄帝武力征服诸部，一个庞大的国家已初现模型。到了帝舜时，划分全国为十二州，并确定五等诸侯，中央政权对诸部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了。大禹登帝位后，把十二个州整合为九州，对国家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大夏帝国的奠基人，便是伟大的禹。那么禹有哪些伟大的构想呢？

大禹提出了“中邦”这个名词。在《尚书禹贡》中有“中邦锡土姓”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中引用这句话时，变成了“中国锡土姓”。“邦”与“国”意义是相同的，现在我们还使用“定国安邦”这样的词语。司马迁为什么要把“中邦”改为“中国”呢？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春秋战国时，“中国”这个叫法已经十分普遍了；其二，由于汉朝的缔造者是刘邦，把“邦”字改为“国”字，似乎也有避讳的味道。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大禹是第一个提出“中国”这个名称的人。

那么为什么叫“中邦”或“中国”呢？这就要说到大禹的政治版图构想了。

在神农氏乃至到黄帝，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央政权的概念，只有某个部落实力很强，其他部落必须听从该部落的命令，我把这种模式称为“诸部制”。到了舜的时候，“诸部制”开始向“诸侯制”转变，这也是

舜的一大变革。

诸部制与诸侯制有什么不同呢？部落有大小之分，但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等级，没有人为地把这个部落称为“一等”，把其他部落划分为“二等”、“三等”，帝舜把诸部改为诸侯，并且划为五等。到这个时候，就有了中央政权的雏形，诸侯们必须得到天子的确认，每次朝见天子时，要把象征诸侯权利的信符——圭玉，上交给天子，天子考核后，认为没有重大过失，才予发还。

如果我们套用当代观念，诸侯制近于联邦制或邦联制，天子这一级就是联邦政府，诸侯这一级就是地方政权。

伟大的禹对帝国的版图又有什么新的设想呢？

以十三年之功平水灾、征服自然的大禹自然是雄心勃勃，所以他的构想也是伟大的。在禹的构想中，帝国的统治，是由中心向四周辐射。位于中央的，就是天子的领地，或者称为“中央之国”，这是大帝国的中心。以帝国首都为中心，向四面延伸五百里，称为“甸服”，甸服就是天子的领地；甸服向外再延伸五百里，称为“侯服”，即诸侯的领地；侯服向外延伸五百里，称为“绥服”，“绥”就是绥靖安抚；绥服向外延伸五百里，称为“要服”，“要”就是羁縻；要服向外延伸五百里，称为“荒服”，这已经到了荒芜之地了。

这几乎是当时中国人所知道的“天下”了。

按照大禹构想的版图，从帝国中心出发，向东、南、西、北各延伸二千五百里，统治范围东西跨度五千里，南北跨度五千里。东到大海，西到沙漠，北到寒荒之地，南到热带丛林。我们不要忘了，这是距离现今四千年前，在交通那么落后的时代，中原强有力的政权触角已延伸到极限了。

当然，这样的划分显得不切实际。因为中国的地形条件很复杂，

单纯以里程来划分，无疑忽略了地理上的限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大禹伟大心脏的跳动，尽管有不合理的成分，但仍然充满智慧的光芒。中央政权对天下的统治力度，并非均等，从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从绥靖安抚到羁縻，是一个衰减的过程，距离帝国中心越近，则帝国的统治力越强，距离越远，则统治力越弱。但是中邦文明的教化必须传递到蛮荒之地，这乃是一种天职。这一点对大禹来讲是相当明确的，这显示了先进的中原文明的自信力，这种文明必须取得天下的统治权柄。

大禹继承帝位后不久，便指定皋陶为接班人，但皋陶比大禹死得早，终究与帝位无缘。皋陶去世后，大禹便把政事交给伯益，很显然，伯益成为内定的继承人。大禹最后一次东巡时，病死于会稽山，临终之前，把帝位传给伯益。

在儒学文化传统中，大禹把帝位让给伯益，是禅让制度的延续，是大禹高风亮节的体现。可是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话，尧、舜的禅让都只是政治斗争的遮羞布，那么大禹怎么会去重蹈覆辙呢？我有一个猜测，当年大禹为了联合皋陶、伯益推翻帝舜，三人有过秘密的约定，大禹当上天子后，皋陶成为第一继承人，伯益成为第二继承人。既然皋陶已经去世，伯益自然成为唯一的继承人。

伯益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他的帝位被大禹的儿子夏启夺走了。

夏启是如何夺位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儒学宗师孟子的说法。

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老师说：“我听别人说，到大禹的时候德行衰减了，所以他不传位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是不是这样呢？”

孟子回答说：“当然不是。帝禹驾崩后，他的儿子启服丧三年。三年后伯益放弃帝位，自己跑到箕山之南，以避开启。当时前来朝见

的诸侯以及诉讼打官司的人，都跑来见启，不到伯益那里，大家都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诗人歌者只歌颂启而不歌颂伯益。帝尧的儿子丹朱不贤明，帝舜的儿子也不贤明，而帝禹的儿子启却很贤明，能够继承大禹的道义德行。伯益虽然在大禹时主持政事，但时间不够长，并没有做许多恩泽百姓的事情。”

我们知道，孟子是“性善论”者，他非常相信尧、舜、禹这些圣人，一点私心都没有。在他眼中，那个年代没有政治斗争，只是有德者得天下，只有禅让，只有让贤，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刀光剑影。在他看来，启夺得帝位，一是因为伯益这个人识相，自己溜了；二是因为启有道德，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启取代伯益的过程中，仍然是和和气气的，不与任何阴谋沾边。

但是孟子的这段话，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漏洞。他把民众不支持伯益的原因，归结于伯益主持政事时间不够长，威望与恩德不够，这显然有悖史实。伯益在帝尧时便已为官，又经帝舜、帝禹两代，辅佐天子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尚书》中保存的伯益资料也不少，这足以说明伯益很早就是重臣，怎么可能威望不够呢？

《韩非子》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到大禹晚年时，“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

这个说法，有一个地方看似自相矛盾，要留意。既然禹想“令启自取之”，想让儿子启去夺取天下，何必又要大费周折，把帝位传给伯益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所以我认为禹之所以把帝位传给伯益，是因为事先有秘密约定，是当年结盟的条件。

在《韩非子》中，伯益可不是溜到山里躲起来，启也不是因为有德行得到民众支持才上台的，而是通过血腥的战争，才取得最后的胜

利。关于这一点，得到了《竹书纪年》的有力支持。《竹书纪年》是这样写的：“益干启位，启杀之”、“益为启所诛”。十分明确地指明伯益并不是自己溜到山里躲起来了，而是在帝位之争中败北，被大禹的儿子启所杀。

由于现存的《竹书纪年》已是残缺不全，对于伯益与启之间的斗争，写得十分简略。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可能见过更全本的《竹书纪年》，他在《楚辞通释》中写了这么一段话：“《竹书纪年》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这里伯益的形象与孟子所描述的那个跑到山里躲起来的让位者形象，完全是两个人。伯益不仅没有跑到山里躲起来，反而把启囚禁了，而启奋起反抗，最终颠覆了伯益政权。

这里，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吗？历史总是上演着罗生门式的闹剧，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书里，可以以黑白对立的面貌出现。因为我们所说的历史，更多的时候乃是政治，文字记载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

这里一个问题出来了。既然古书的说法都充满了政治色彩，我们到底要相信谁的说法呢？我的态度十分明确，以《竹书纪年》为是。为什么呢？因为《竹书纪年》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

这里有必要说说先秦的史书。

中国很早就开始有史官记录史事，他们记录的原则是如实记载事件，不置评论。当然，即便是史官，什么事该记，什么事不该记，也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但记录下来的事件，多数是可信的，因为这些记录是内参，不对外公开的。第一本公开的史书是《春秋》，鲁国的史书，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不是原汁原味的，而是被孔子改过的。孔子把历史变成了政治，他发明了“微言大义”的写法，实际上就是以自己的立场评论史事。其他的诸国史书，后来被秦始皇烧

掉，看不到了，直到汲冢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重见天日。

《竹书纪年》并没有使用孔子“微言大义”的艺术手法，只是朴实地记录发生过的历史事件。

作为魏国史书，为什么《竹书纪年》里记载了从五帝开始的历代历史呢？魏国的前身是晋国，晋在春秋时代，长期霸占霸主的地位，是诸侯之长，周王室完全是在其保护下才得以生存。晋国曾经出兵平定周王室的内乱，我估计从那个时候开始，周王室所藏的历代史书就被搬到了晋国收藏，所以从五帝以来历代的完整的史料，就保存在晋国。到了战国时，晋国一分为三，魏国最强大，继承晋国的衣钵，故而这些史料转移到了魏国。同样，韩国也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应该同样保留有一份史料，故而韩非子的说法，更接近于《竹书纪年》。

何以史官所记的史书比较可信呢？因为从设立史官始，中国就形成一种传统，即史官只对事件记录的真实性负责，只要记录可靠，君主一般不会太多干涉。当然也有例外，但大体的传统是这样的。

在春秋时代有两个著名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齐国爆发崔杼之乱，崔杼谋杀齐庄公，齐国太史如实记录在史书上。崔杼大怒，要求太史修改记录，太史不干，崔杼便把他杀了。可是接下来，太史的两个弟弟仍然不修改“崔杼弑君”的记录，同样被杀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然捍卫史官原则，只字不改，最后崔杼没辙了。与此同时，另一名史官已经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倘若太史的弟弟们被杀光，他将不惜以生命的代价，确保史书记录的真实可靠。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晋国，权臣赵盾指使赵穿杀死昏君晋灵公。太史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晋灵公是个很坏的君主，可是我们说过，史官的任务不是去判断一件事的对或错，而只是如实记录，故而董狐写下“赵盾弑其君”。赵盾当然不服，他前去理论，说明杀晋灵公

的人是赵穿，不是自己。董狐说：你是策划弑君的幕后主谋，不写你写谁呢？最后赵盾没办法，只得由他去写。

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史官的传统。像崔杼杀史官这种恶劣的事件，在春秋之前应该还是比较少的，即使如此，史官仍然以生命捍卫自己的职责，这是令人敬佩的。所以先秦时代史官所记的史书，事件的真实性、可信度比其他书要高。

不扯太远了，回到本书的内容吧。

在争夺帝位的内战中，启最后打败并杀死伯益，成为新的君主，这标志着夏王朝的建立。据说大禹曾封于夏，所以启的王朝便称为“夏”，后来人们便把启称为夏启。夏启夺取大权后，在尊号上做了些改动，除了使用“帝”这个尊号外，还使用“王”的称号。后世“帝”的称号，要比“王”的称号为尊。比如说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称王了，实力最强大的秦昭王觉得没意思，打算称“帝”，凌驾于诸王之上。不过在夏启时，“帝”与“王”的意思是一样的，夏启使用新的称号，只是为了显示自己超越前人的雄心。除了使用“帝”、“王”这两个尊号之外，还有另一个尊号“后”。在这里“后”的意思不是皇后，而是指君主。我们经常听到“皇天后土”这个词，“后”是与“皇”相近的概念，因而夏启也称为“后启”。

从这点来看，夏启颇为类似后世的秦始皇，改变尊号的背后，是这个王朝比起以往的年代有了更多新的改变。事实也是如此，夏启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中国的王朝实际上是从夏启开始的，他是第一个王朝的第一位君王。在夏启之前，帝舜与帝禹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加强了中央对诸侯、诸部的控制力度，这为夏王朝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启是以武力夺权的，在伯益败亡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有扈氏部落。

有扈氏与夏启的战争，打破了孟子的谎言，这场战争是权力斗争的继续。有扈氏反对接受夏启的统治，理由正是夏启违背了大禹的遗命，从伯益手中窃取了大权。面对反叛与不服从，夏启毫不犹豫地选择武力镇压，他亲率大军杀气腾腾地扑向有扈氏部落，在一个名为甘的地方，双方展开最后的决战。

《尚书》中有一份珍贵的文献，是夏启在大战之前向全体将士发表的演说，名为《甘誓》，大意如下：

“诸位将士，我在这里告诫你们：有扈氏轻视五行，抛弃三正，天理难容。上天要灭绝他们，今天我代上天对他们施行惩罚。战车左边的士兵要是不积极进攻，那就是不执行我的命令；战车右边的士兵要是不积极进攻，那就是不执行我的命令；战车中间的御者要是不好好驾驭马匹，那你们就是不执行我的命令。认真执行命令的人，我要在祖庙赏赐你们；不执行命令的人，我要在神社前杀了你们，还要把你们的妻子儿女变卖为奴隶，或者杀死。”

夏启给有扈氏扣的罪名是“轻视五行，抛弃三正”，说真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也看不明白。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便弄个含糊的说法就行了。

在这篇《甘誓》中，我们没发现夏启这个人德行的深浅，整篇文章杀气腾腾，对敌人如此，对自己人也是如此。对敌人要“灭绝”，对不听命的部下，不仅要杀掉，连妻子儿女都不能免于惩罚。夏启是用这种恐怖手段来约束部众。这不是孟子向我们展示的那个很有德行的夏启，而是一个迷信暴力手段的夏启。

关于甘之战的结局，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见于《吕氏春秋》，称夏启在甘之战并没有打败有扈氏，于是他又上演了修德那一套把戏，回去后粗茶淡饭，琴瑟也不弹，钟鼓也不听。这一修德，有扈氏自己找上门投降了。这种说法，

九成出于儒家学者之手，因为《吕氏春秋》一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作者繁杂，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对照《甘誓》，你相信夏启是个迷信道德之人吗？

第二种说法则是《史记》所载，“（启）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也就是说，甘之战，实际上就是夏启与有扈氏的最后一战，有扈氏被灭掉了。在《淮南子》一书中，也明确写到有扈氏是被灭的：“有扈氏为义而亡。”这是给予正面的评价，认为有扈氏是坚持正义才被灭的。为什么说有扈氏坚持正义呢？因为夏启根本不是合法的君主，是靠政变才上台的。

杀了伯益、灭了有扈氏后，夏启的政权总算稳固了。

夏政权的建立，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夏”既是国家的名称，也是民族的名称。“夏”后来又衍生出“华夏”一词，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华”字含有“大”的意思，又有“华美、华丽”的意思，夏王国显然对自己的器物文明非常得意，与四周蛮族相比，夏王国在屋宇、服饰、车马、器具等方面，都显得工艺精美，日常生活礼节优雅，夏人自然有一种自豪感。

在汉朝以前，以中原为中心的这个大民族被称为“华夏族”。在先秦之前，“夏”的叫法也很普遍，后来又形成一个新的名词称为“诸夏”，也就是中原的各个诸侯国，比如《左传》中所说的：“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可以说，正是夏王朝的建立，才进一步使得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这也算是夏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

十一 窃国者（上）：后羿

反抗夏启的代价是高昂的，伯益被杀与有扈氏被灭就是例子。夏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他的政权终于得到了诸部的认同。武力能钳制众人的反抗，却不见得能得人心。在夏启晚年，他还发兵征讨过西河的叛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西河发动叛乱的人，正是夏启的儿子武观（或称五观），倘若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夏王朝在开国不久后，就陷入深深的危机中了。据说夏启晚年生活骄奢淫逸，政治风气也随之败坏，武观在西河叛乱，估计与争夺继承权有关。

夏启死后，太康继位。

太康绝对是一个昏君，根本没有尽到一位国王的责任，不理朝政，终日游玩寻乐。他的百姓对他失去了信心，他的兄弟们对他深感失望，而有野心的诸侯则是觊觎他的王位。太康却对这些潜在的危险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他对打猎十分迷恋，已经不满足在帝都近郊狩猎，便跑到洛水南岸。这次打猎却让他终生失去了权力，实力派诸侯、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控制了政府，独揽大权。从此，太康沦为一名傀儡国王。

后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之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他窃取了大权，而是因为他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

我们搞不清楚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在民间传说中成了神话人物。后羿最有名的故事有两个：一个是后羿射日；一个是嫦娥奔月。

传说中后羿射日的故事，时间被前移到帝尧时代。关于这个故事，《淮南子》一书记得最详细。书上说帝尧时，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焦烤大地，庄稼都被晒死，农作物无法生长，连树木、绿草也枯萎了。不仅如此，还冒出了几头怪兽，危害人间。后羿是一位箭术高

手，武功十分了得，帝尧便派他把天上的九个太阳射落下来，同时又杀掉了那些怪兽，于是老百姓终于过上安稳的日子。

嫦娥奔月更是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据说后羿有一次在山中狩猎，在一棵月桂树下遇到嫦娥，两人一见钟情，就以月桂树为证，结为夫妻。后来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弄到了一粒不死神药，交给嫦娥保管。嫦娥把这粒药偷偷吃了，飞到了月宫。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有一个叫逢蒙的人，得知后羿有这么一粒不死神药，趁他不在时，潜入嫦娥房中要偷药，并打算加害于她。嫦娥情急之下，就把不死药吞入肚子里，结果成仙了，升天而去。然而嫦娥不忍心离开后羿，就滞留在月宫，她想要配制新药，以便重返人间与后羿团圆。当后羿得知爱妻吞服神药后飞天奔月，痛不欲生，月母被他的一片诚心所感动，便允许嫦娥在月圆之日下界与后羿在月桂树下，也就是两人相识初恋的地方相会。这真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据说中秋节与这个故事有关，所以中秋节又称为“团圆节”，原意就是嫦娥与后羿团圆的日子。

以上这两则故事，美则美矣，可惜这个后羿的形象，与历史中的后羿完全不搭边。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神话中的后羿与历史上的后羿，都是以善射而闻名。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历史上后羿的故事。后羿窃取大权后，并不敢冒冒失失地称王，他的地位并不稳固，还需要拿太康这个傀儡来当挡箭牌。过了若干年后，太康去世了，估计是失去权力后内心失落，郁郁而终。

太康死后，后羿立其弟仲康为王，自己仍独揽大权。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大事，不过就是发生了一次日食。可问题是，这次日食没有被准确地预测出来。日食的出现引发了社会的恐慌，“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倘

若是社会政治清明，即便是日食出现，也不至于引起恐慌。正是政治的动荡，这种自然现象的突发使得民心震动，担心是不是上天有什么预兆。

由于没能准确预测日食，负责天文观测的官员难辞其咎。当时是谁在负责此事呢？仍然是羲氏与和氏两大家族。羲、和二氏可以说是天官世家，他们从帝尧时代开始，就负责天文历法，世代相袭。我们必须说，古代天文学毕竟不是很完善，出现一次预测错误虽然很严重，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能料想得到，一次预测错误，竟然导致了一场战争。

仲康发动了一场讨伐羲、和二氏的战争。

这是不是过火了呢？

这场战争的背后，难道仅仅是因为天文预测失误吗？

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战争的命令由仲康发布，但是可以料想，背后的指使者乃是后羿。后羿为什么要讨伐羲、和二氏呢？据《史记》所载，“羲、和湮淫，废时乱日”，原来羲氏、和氏严重失职的原因是嗜酒废政。如果司马迁记录可靠的话，说明这个时候的政治确实非常腐败，连羲氏、和氏这样的天文学世家也败坏了。后羿当初正是因为民众不满太康的统治，才有机会夺权，可是他独揽大权后，政治依然没有起色，不消说民众的怨气很大，他正好以日食为借口，拿羲氏、和氏开刀，以平民怨。

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难道没有预测出日食，真的是因为羲氏与和氏喝酒误事吗？我想这根本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一直到清朝，对日食的预测也未能百分之百的准确，更何况是在夏代呢？要是每次日食未预测到便要发动讨伐，那中国历史上可能要多出好几次的

战争。因此这次战争，很可能是后羿铲除政治对手的一次行动，羲、和两大家族从帝尧始，历经数代，地位岿然不倒，如果他们反对后羿干政，势必是后羿的心腹之患。

夏王仲康委任胤侯为统帅，率领大军讨伐羲、和二氏。胤侯在出征前，发表了一次演说，记录在《胤征》一文中。胤侯先是批评羲、和二氏玩忽职守，贪酒忘政，导致天象昏乱，太阳被掩蚀，罪大恶极。然后他说：“现在我将率领诸将士，代上天惩罚恶人。你们诸位要同心戮力，辅佐王室，助我实施天子威严的命令。烈火焚烧山冈，玉石俱焚；身为天官却玩忽职守，危害比烈火更甚。奋勇作战吧，歼灭敌军魁首羲、和二氏，至于被迫追随羲、和二氏的人，免于惩治，要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次远征的结局并没有写在《胤征》一文中，料想是羲、和二氏战败被迫向后羿做出了必要的让步。由于羲、和二氏特殊的地位，使他们免于灭族的命运，因为他们是世袭的天文学家，对朝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从诸多的记录来看，夏朝的情形颇类似后世的晋朝，帝国在建立不久便被奢侈腐败的风气掏空了。君王与世袭贵族已经抛弃了先辈们奉行的道德原则，太康如此，仲康如此，羲、和二氏如此，另一个世袭贵族伯封也是如此。伯封的父亲是帝舜时代的乐正后夔，《左传》中称他为“贪婪无餍”之人，而这正好给了后羿消灭他的借口。后羿亲自率领一支军队，征讨伯封，并最终将他的家族一网打尽。

尽管后羿以腐败为由征伐羲、和二氏以及伯封，可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他试图把国家从腐败中拯救出来，代之以清明的政治。据《左传》记载，后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事实上，他与夏启一样，只迷信于武力手段。他是个十分勇武之人，以箭术闻名天下，大概正是

如此，后世才出现了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

仲康只不过是后羿控制的傀儡罢了，他的在位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七年，有的说十三年，有的说十八年。仲康死后，后羿又把仲康的儿子相推上王位，史称后相，也称为帝相。从后相时代开始，夏王国对外战争变得频繁。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人对朝政不满的注意力；其二，可能是蛮夷不愿意归服大夏政权，崇尚武力的后羿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

后相即位后，连续发动多场战争，讨伐淮夷、畎夷、风夷、黄夷。事实证明后羿控制下的夏王国在武力上仍然维持着一等的水平。到了后相七年，周围的蛮夷都前来朝见天子，夏王国又一次取得了对蛮夷的控制权。

此时的后羿实是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夏国王后相只是他手中的木偶，反对他的贵族被镇压了，四边的蛮夷也归顺了，他才是夏王国的真正统治者。

有一种说法，称后羿最终把帝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魏晋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这样说：“太康已来，夏政陵迟。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斟灌、斟寻氏，羿遂袭帝号，为羿帝。”就是说，夏王后相在后羿的逼迫之下，把国都迁往商丘（应为帝丘），这时后相基本上失去权力，只是在两个同姓诸侯（斟灌、斟寻）的庇护之下，才得以苟延残喘。后羿不一定废除了后相的王位，他自己没有使用“王”这个尊号，而是沿用“五帝”以来“帝”的尊号，自称为“羿帝”。

后羿为什么不杀掉后相呢？显然他认为毫无必要。从太康以来，王室的权力一落千丈，几个夏王都是庸碌之辈，既没有远大的理想，

也缺乏做大事的能力，不足道也。后羿不想落得个“弑君者”的骂名，作为一介武夫，只要自己利箭在手，有谁敢挑战他的权威呢？

此刻的后羿，头顶荣誉的光环，手握生杀之权柄，虎视九州，谁能与之相争呢？于是他又拿起手中的强弓，驰骋于田野，尽情地享受狩猎的快感。

可是谁能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只毒手正伸向伟大的后羿，一张巨大的罗网正在张开，一场惊天的阴谋正悄然酝酿着。

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是后羿居然一点也没察觉到。

一个阴谋家出现了，此人名叫寒浞（zhuó）。

十二 窃国者（下）：寒浞

《左传》中对寒浞有颇为详尽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

寒浞原本是伯明氏部落的子弟，他心术不正，喜欢挑拨是非。伯明氏部落的首领后寒还算头脑清醒，觉得这个人是个祸害，便把他驱逐出境。寒浞被赶出家园后，心有不甘，决定前去投靠实力最强大的后羿。凭着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他很快便得到了后羿的信任。

后羿控制国家后，并没有打算改革腐败的政治，而是与太康一样，热衷于狩猎。当时后羿有几个耿直的大臣，如武罗、伯困、熊髡（kūn）、龙（páng）圉（yǔ）等，时不时进谏。然而忠言逆耳，这位神射手大怒之下，把这几位大臣统统免职。八面玲珑的寒浞抓住这个机会，投后羿所爱，拍他的马屁，大获后羿的青睐，终于登上相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寒浞并不满足于此，他有更大的野心。

由于后羿不理政事，寒浞一方面以拍马屁的手段争取后羿的更大信任；另一方面采用贿赂手段收拢人心。渐渐地，众人只知有寒浞，而不知有后羿，因为后羿已经放心地把国家大权交给了这个阴谋家。在后羿看来，寒浞忠贞不贰，完全可靠，而且正是有了寒浞，他才可以心无旁骛地抛开政事，尽情享受。

在不知不觉之间，权柄已经悄然转移了。

正如后羿架空太康、仲康一样，寒浞也不动声色地架空后羿。当整个国家都拜倒在寒浞的权杖之下时，只有后羿一人还懵然不知。迷信武力的后羿显然不相信寒浞有虎狼野心，在他眼中，寒浞只是个会说话、忠诚的奴才罢了，根本不是一个勇武之人。没有勇武，哪儿来

的野心呢？

这是迷信武力者的悲哀。

后羿又一次出门狩猎，寒浞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这位神射手神采奕奕地扛着猎物从野外归来时，他不再是一个猎者，而是寒浞罗网中的一只猎物罢了。

早已被寒浞收买的家臣们趁后羿毫无防备时，一拥而上，把这位英武的君主擒杀。后羿的下场十分悲惨，尽管这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可是我们仍然不希望神话传说中的盖世英雄与铁骨柔情汉子，在现实中竟然死得毫无尊严。寒浞杀了后羿，把他的尸体扔入鼎中烹煮，并且逼迫他的儿子们吃下父亲的肉。

后羿的麻痹大意，非但葬送了自己，同时也葬送了他的家族。

当寒浞把后羿的尸体煮烂后端到后羿的儿子们面前时，这些可怜的人哪里咽得下去。冷酷无情的寒浞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全部杀死，并霸占了这位枭雄的每一件东西，包括他的土地、他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室。忠于后羿的大臣们也遭到了血腥清洗，只有少数几个人得以逃脱，其中就有一位名为伯靡的大臣，他逃往有鬲氏部落避难，后来成为“少康中兴”的重要人物。

寒浞之所以杀后羿，除了野心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与后羿妃有不可告人的亲密关系。

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有提到这件事，“浞娶纯狐，眩妻爰谋”。后羿妃就是纯狐氏，她应该是后羿晚年娶的妻子。但是英雄老矣，与后羿相比，寒浞还年轻力壮呢。由于寒浞权势熏天，得以自由出入宫禁，与后羿妃接触机会颇多。两人眉目传情，一来二去，很快便有了一腿。

快则快哉，然而寒浞岂能不明白，他这是在玩火。倘若此事曝

光，以后羿凶残的性格，这对小情人的小命哪里能保得住。就像后来吕布为了貂蝉一定要杀董卓，寒浞为了纯狐女也势必要杀掉后羿。在整个谋杀行动中，纯狐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有她作为内应，才使得谋杀行动十分顺利。我怀疑后世“狐狸精”这个词的由来，便是从纯狐女来的，她以媚术迷惑后羿、诱惑寒浞，可以说是史书中最早记录的一个狐狸精。

后来纯狐女为寒浞生了两个儿子，两人都成为寒浞的得力助手，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寒浞对这位女人的宠爱与信任。在中国历史上，女人与爱情，往往成为政变的导火索，只是后羿与寒浞的历史太过久远了，对于其中的许多细节，我们终究没有办法弄清楚。

我们不清楚寒浞有没有称帝，但毫无疑问，他实际上就是夏王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寒浞杀后羿之后的十几年里，夏王国倒是风平浪静，并没有出现太大动荡。这至少说明寒浞颇有几分本事。后羿意外身亡，本应是反对派势力重新抬头的大好时机，可是寒浞似乎并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后羿数十年的统治，早已令众诸侯俯首帖耳，谁也不愿为软弱且平庸的夏王后相以身犯险，去挑战杀死后羿的寒浞。

寒浞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投机客，并非一个武士，他的儿子寒浇却是天生的武士。寒浇是纯狐女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名为寒豷（yì）。说来也奇怪，寒浇与寒浞并没有太多相似点，反倒与后羿颇为相像，勇猛善战，有英武之气。这不由得令人怀疑，寒浇究竟是寒浞的儿子呢，还是后羿的儿子？

据一些史料的说法，后羿死于夏王相八年，这时寒浇尚未出世，十八年后（即夏王相二十六年），寒浇已经成为一名军事统帅。能够担任军事统帅，独当一面，最少也要十七八岁吧。从这个年龄判断，

寒浇应该是在后羿死后不久就出生了，不排除他是后羿遗腹子的可能性。

寒浇是天生统帅的料，这无疑令寒浞十分欣喜。弑君者寒浞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只是他在武力上缺乏后羿的自信，这才隐忍了十多年之久。对寒浞来说，夏王后相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个傀儡君王虽然没有实权，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号召力，并得到若干诸侯的鼎力支持。如果不尽早铲除心腹之患，终究会夜长梦多，难保哪一天自己在睡梦中醒来，夏王的军队就杀到眼前。

是时候出击了，把夏王的势力连根拔掉！

新一轮的内战爆发，对夏政权来说，这是一次生死之战。

寒浞把首个打击目标对准戈国。戈是一个小诸侯，我们不清楚戈国是不是夏王后相的拥护者，但显然戈国是拒绝服从寒浞的异己势力。寒浞牛刀小试，就把戈国从地图上轻轻抹去了。他把戈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寒豷，把过地封给另一个儿子寒浇，后来寒浇也被称为“过浇”。从伐戈之战开始，寒浞走上了穷兵黩武之路。这位野心家雄心勃勃，欲建立比后羿更伟大的业绩。

在接下去讨伐斟灌、斟寻的战争中，寒浞把年轻的寒浇推上统帅的位置，此时的寒浇年龄尚不满十八岁。寒浞并没有看走眼，寒浇在军事上确实有着罕见的天赋，他的勇武令敌人望而生畏。他如同后来的另一位天才名将霍去病，在别人尚处于乳臭未干的年龄时，便在战场上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

在击灭夏王后相的战争中，寒浇一鸣惊人。

在支持夏王后相的势力中，斟灌与斟寻是实力最强的两个诸侯。这两个诸侯是夏王的同姓诸侯，也是后相的两座靠山。在寒浇凶悍而有力的进攻下，斟灌与斟寻被打得溃不成军，先后灭亡。此时的夏王

后相已经形同孤家寡人，在寒浞强大武装的威慑下，其他诸侯国选择了沉默，眼睁睁地看着夏王跌入命运的深渊。夏王后相所在的帝丘，在防御力量上，比起斟灌、斟寻还要弱小，哪里顶得住寒浞的攻势。

城池终于沦陷了。得意洋洋的寒浞以征服者的身份，趾高气扬地踏入天子的地界，没有一丝仁慈与怜悯。这位曾经杀死主人后羿的阴谋家，并不在乎再来一次血腥的屠杀，从他无情的嘴里宣布了冷酷的命令：斩尽杀绝。于是士兵们如野兽般闯入王宫，把这里变作一座人间地狱，鲜血染红了碧草，尸体堆积成丘，连夏王后相也未能逃过一死。

直到这一刻，寒浞终于松了一口气。夏王这个绊脚石被清除了，从今往后，天下就是寒浞的天下了。这一刻，寒浞做着与秦始皇一样的美梦，寒浞帝国巍然屹立，直至千世万世矣。

可是天下事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寒浞终究是百密一疏，这一疏忽是致命的。数十年后，他将为这一疏忽付出惨重的代价。他并没做到斩草除根，有一个人逃脱了，她是夏王后相的王后，称为后缙。可是一个女流之辈，就算逃跑了，能掀起什么风浪吗？她难道能翻江倒海吗？

有一件事，却是寒浞始料不及的。

后缙逃跑时，肚子里已经怀有夏王后相的孩子了。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当寒浞的士兵血洗王宫时，后缙从王宫的地下水道逃了出去。这条秘密通道，大概是夏王后相事先为自己准备的，可是他没有机会逃走，而后缙则侥幸死里逃生。我们不清楚寒浞究竟有没有发现后缙逃走，不过就算他发现了，可能也只是置之一笑罢了。他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王冠戴在头上，接受诸侯们的朝见。

至此，由夏启所建立的夏王国实际上已经灭亡，寒浞成为王国新的统治者。大禹、夏启的子孙失去了国家，寒浞的军事政变并没有引起天下大乱，这是因为从太康开始，连续三代的夏王实际上只不过是权臣手中的傀儡。后羿的铁血统治已经令天下诸侯噤若寒蝉，寒浞继承后羿的政治势力，连续灭掉戈、斟灌及斟寻几个诸侯后，弑君自立，天下人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

寒浞并不能建立起一个长期政权，对夏王朝的历史来说，寒浞窃国只是一段插曲，而不是一个终止符。最终推倒寒浞政权的人，就是夏王后相与后缙的儿子少康。

那么，少康是如何从逆境中奋起呢？他又是如何以弱克强，完成复仇雪恨的使命，并使夏王国得以中兴呢？

十三 少康中兴（上）：复仇

对后缙来说，那一年成了永远无法抹平的痛苦回忆。丈夫夏王后相死了，土地被强占了，国家灭亡了，她成了一片飘落在空中的叶子。

从王宫大屠杀中死里逃生后，她几经艰辛磨难，回到了娘家有仍氏部落。她并没有全然绝望，因为她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呢？倘若是女孩儿的话，那么复仇的希望差不多就泡汤了。可是这回复仇之神关照了这位不幸的女人，她产下一个儿子，取名为少康。

这个小生命注定命途多舛，因为他身上流淌着王室的血脉，尽管这个王室已经被寒浞冷酷无情地抹去，只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碎片。母亲后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小生命身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躲避寒浞父子的迫害，她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少康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年龄稍长，母亲才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儿子，“杀父亡国”的刻骨仇恨，点燃了年轻人心中复仇的火焰。他发誓，终有一天要杀死寒浞父子，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

可是要怎么复仇呢？

看上去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当年父亲后相至少还有一块领地、几个诸侯的支持，在寒浞面前都不堪一击。如今少康却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而敌人寒浞则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家，把天下踩在脚下。表面上看，双方实力之悬

殊，就如蚂蚁对阵大象一样，随时可能被大象抬起的巨脚踩死。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乃是心灵的力量，乃是信仰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世界，化劣势为优势，变弱为强，让梦想有实现的一天。厄运造就了少康坚韧不拔的意志，他的勇气与雄心堪比祖上大禹、夏启，与父亲后相、祖父仲康的懦弱形象完全不同。

转眼之间，王宫大屠杀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少康也长大成了一个小小伙子，并在有仍部落里担任“牧正”，也就是主管畜牧业的官员。此时他的神秘身世，才渐渐为众人所知，消息很快传到了寒浞、寒浇父子的耳中。一向以勇武自命不凡的寒浇，当然不会把区区一个少康放在眼里。杀鸡焉用牛刀，无须自己亲自出马，只消派出一个使者传达自己的口谕，便可以把少康擒来。

于是一个名为椒的官员被派往有仍氏部落，目的就是要逼迫该部交出少康。可是这个消息走漏了风声，少康脚底一滑，一溜烟地逃走了。他逃往哪里，椒也查不出来，只好两手空空回去复命了。寒浇一听，少康不过就是个跑路的胆小鬼，这种人岂能撼动寒氏江山呢？遂也没有深究。

少康逃到哪儿了呢？

他逃到了有虞氏部落。有虞氏部落就是帝舜一族的部落，帝舜下台后，大禹及其后人对有虞氏部落都挺照顾的，让他们保有自己的地盘。也正因为如此，有虞氏部落首领伯思也感恩戴德，现在大禹的后人少康落难至此，便悄悄收留了他。伯思让少康担任庖正，也就是大厨，主管饮食的官员。看来少康不仅会牧马，还能煮一手好菜哩。后来伯思又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对少康来说，这是他得以崛起的一大关键。

此时的少康仍然落魄，他得提防寒浞、寒浇父子的迫害，但是有

仍氏与有虞氏两个部落，实际上已经成为他的支持者。有仍氏的首领是他的外祖父，有虞氏的首领是他的岳父，这层亲密的关系，使得少康不是一个人在对抗寒浞父子。成婚之后，有虞氏首领伯思又送给少康一块不大的土地以及几百号人，少康便在这个名为“纶”的地方安定下来，这里也成为他最早的根据地。

尽管有了一块小小的地盘，少康的实力仍然十分脆弱，打打游击还可以，要是想全面与寒浞父子对抗，那还差得远。

可是少康并没有泄气，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首先他注意修德，自从太康以来，无论是夏王或是窃权者后羿、寒浞等人，没有一个能以德治天下、以德服人，这是一个政治很败坏的时代。少康却重拾祖上大禹遗留下来的家训，大禹曾经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以德治国的根本。少康继承了大禹的政治思想，并付诸实行。

他很明白，得人心者得天下，以前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祖父之所以丧失夏王国的统治权，就是因为不得人心。现在，寒浞以武力威逼天下，更是不得人心，这是寒浞的软肋，只要少康能收服民心，一定有机会翻盘。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后羿的大臣伯靡。

说起来伯靡与少康本来不是一路人，少康乃是夏王系的，而伯靡则是窃国者后羿系的，但共同的敌人却使得两个人走到一起。

当年寒浞发动政变，杀死后羿，清除后羿的一帮臣僚，伯靡侥幸

逃跑了，他前往投奔有鬲氏。伯靡在有鬲氏待了三十多年，成为元老级的人物，拥有很大的权力。可是他仍然无法与寒浞的势力相抗衡，一来实力不够；二来他也缺乏号召力。

少康的出现让伯靡精神一振。

虽然少康还十分弱小，但是他却有伯靡没有的身份，他是夏王后相的唯一后人，是夏王国的合法继承人。伯靡十分敏锐地意识到机会降临了，只有联合少康，并且以少康的旗帜为号令，他才可能推倒寒浞。

在这个时候，有力的联盟是何等的重要。

少康虽然年轻，却有着政治家非凡的眼光，他没有把伯靡拒之门外，尽管这个人是窃国者后羿的大臣。

事实证明少康的决断是明智的，与伯靡的结盟，使他复兴夏王国的事业有了起色。伯靡蛰伏了三十多年，雄心不减，正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与少康联合，使他可以打着夏王国的旗帜，收罗被寒氏父子迫害的民众，加入反寒的队伍之中。

大家还记得吗？当年寒浞、寒浇发动政变时，有两个诸侯是站在夏王一边的，这两个诸侯分别是斟灌与斟寻。尽管斟灌与斟寻都被寒浇击破，可是人心并未屈服，只是没有人挺身而出，带领民众反对寒氏的暴政。现在，伯靡充当了反抗寒氏的旗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寒斗争也就此拉开序幕。

斟灌、斟寻两城率先倒戈，接受伯靡的指挥。这样，至少有五个诸侯或部落与寒浞政权决裂。这五个部落或诸侯分别是：有仍氏、有虞氏、有鬲氏、斟灌及斟寻。伯靡以斟灌、斟寻两地义军为主力，发动了讨伐寒浞的战争。

此时的寒浞一定有些懊悔，他一不留神，敌人就已经强大起来了。可是伯靡想要打败寒浞，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寒浞的儿子寒浇，几乎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战神。伯靡的攻势被阻止了，战争进入拉锯战的状态。从实力上说，寒浞、寒浇父子显然要比少康、伯靡高出一筹，可是这爷儿俩却都有一个毛病，生活放纵，贪爱女色，所以也不思进取。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曾有过这样的感慨：“浇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就是说寒浇身上穿着坚甲，整天纵欲无度，不能节制，只图享乐而忘乎所以。享乐过度，必定丧失进取心。

倘若寒浇能一鼓作气乘胜进军，那么少康、伯靡是否能抵挡得住，还真不好下断言。

看来要推倒寒氏政权，首先必须除掉寒浇。

可是寒浇之勇，堪比项羽，若要在战场上杀死他，那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怎么办呢？少康神机妙算，运用美人计，除去寒浇，这可以说是古代间谍史上的经典之作。

完成此艰巨任务的人，乃是中国间谍史上的第一人：女艾。

女艾堪称中国间谍史上的第一女间谍，可惜的是，史料对她的记载很简单，徒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

说到女间谍，我们可以想起川岛芳子、玛塔·哈丽、南希·韦克等，若论及成就，这些人都无法与女艾相比。女艾的作用远远胜过一支军队，少康的军队无法打败寒浇，但女艾却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胆识，最终铲除了这个大魔头。

女艾是少康一手培养起来的女谍。少康这个人，有了了不起的地方，他有深邃的战略眼光。从敌我双方态势来看，敌人在军事上远远居于优势，更可怕的是，寒浇的勇猛善战令人闻风丧胆。少康的军队以斟灌、斟寻两地义军为主力，但这些士兵对寒浇都有畏惧心理，当年两城被破时，寒浇才是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就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武，何况如今他正当盛年，暴虐更胜当年。

要挽回我方士气，打击敌人士气，关键就是除掉寒浇。

这件事，不能明着来，因为那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武圣关云长还未出世哩。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这就叫作“兵者诡道也”。

在少康之前，中国历史并没有间谍战的记载。

作为一位中兴君主，少康复国道路之艰难曲折，比起后世的勾践，有过之无不及。他能以弱胜强的一大关键，是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的谍报机构。在情报战领域，他远远领先于对手。甚至我们可以说，少康是中国情报战争的鼻祖。

要接近寒浇，就要洞悉他的种种癖好。寒浇的喜好与一般昏君并无不同，一是女人；二是美酒；三是打猎。这三样，是枭雄必备，同时也是枭雄丧命的原因所在。后羿因此而丧命，寒浇也将因此而丧命。

要迅速博取寒浇的信任并潜伏在他身边，这件任务只能由女人来完成。

这个女人，必须同时具备美貌、胆识、智慧、机敏、沉着、果断等优点于一身，要善于掩藏自己的思想，要能窥破对方的心理，更要能够把握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或许还需要一身深藏不露的武功。

这是理想中的女谍，可是现实中有这样的人吗？

有！

女艾便是。

我们找不到女艾当间谍前的资料，但是我想她一定是受到了严格的、特别的训练。若没有这种训练，想要在敌人内部长期潜伏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女艾究竟是如何潜伏在寒浣身边呢？

她又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些问题依然无解。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女艾充当寒浣的情人。寒浣好色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以女色手段，是最容易亲近他的。总之，女艾获得了寒浣的信任，得以及时掌握他的动向。可是女艾很快发现，要刺杀寒浣，绝非易事。寒浣本人一身钢筋铁骨、武艺高强，平日身披坚甲，身边有众多卫士，想要在宫中刺杀寒浣，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唯一能下手的机会，是寒浣外出且没带卫兵之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绝佳的机会出现了。

十四 少康中兴（下）：复 国

英雄难过美人关。

寒浇是英雄，从十几岁始便勇武绝伦。英雄的弱点是好色，之可以说是弱点，是因为“色”字头上一把刀，一把无影无形的刀。有弱点，就是给敌人有机可乘。

以寒浇的权势及地位，他根本用不着到外面去泡女人，自然有美女源源不断地送上门。然而，对一个英雄来说，如此容易到手的猎物，岂配得上他的盖世神武呢？难以到手的猎物，才能满足他征服世界的野心与欲望。

这个猎艳者眼中的猎物，正是自己的嫂嫂女歧。

原来寒浇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哥哥很早就死了，留下一个寡居的嫂嫂，这女子便是女歧。寒浇的品位果然与众不同，偷情偷得刺激，嫂嫂年轻貌美，风采神韵令英雄为之倾倒。不过，兄嫂毕竟是兄嫂，寒浇即便藐视天下苍生，也不得不有所顾忌。这事得暗着来，不能明着来。

为了把嫂嫂搞到手，寒浇还是花费了一些心血。首先是得找个理由上嫂嫂家，什么理由呢？就是上门找嫂嫂帮点小忙。于是某日寒浇动身去了嫂嫂女歧家中，“阳有所求”，有所求就有所求，为什么加一个“阳”字呢？就是表面上找嫂嫂帮忙，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女歧看不出寒浇的心思吗？那不可能。寒浇是什么样的人，她当

然知道得一清二楚。说实话，女歧对寒浇也有点意思，首先这个男人体格强壮，充满阳刚之气，非常有男人味，女人怎能不心动？再者，寡居这么多年，女歧心里也渴望得到男人的爱抚，渴望依偎在男人厚实的胸膛上。

两个人谁也不点破，但彼此心照不宣。

寒浇非但是战场的勇士，也是情场之高手，他故意不小心地钩破衣服，只听得“嘶”的一声，衣服裂开了。嫂嫂温柔地说，没事，你把衣服脱下来，我来给你补。这一缝补，不得了，从白天缝到天黑。既然天黑了还没缝好，寒浇只能“勉为其难”在这里留宿一晚了。

一切发展得那么自然，那么顺利。

既然寒浇没有回自己的住处，只能留宿嫂嫂家，而很不巧，嫂嫂家只有一张大床。这么冷的天，也该挤挤，互相拥抱取暖。于是叔嫂二人，在这温暖的床上，两个身体渐渐合成一个，缠绵在一起。

窗外风声呼呼。

寒浇没有想到，窗外除了风声，还有一把亮闪闪的刀。这把刀的使命，就是割走寒浇硕大的脑袋。

真正的刺客，总能把握住最佳的时机，一击致命。策划刺杀的人，正是旷世女谍女艾。寒浇犯下的致命错误，在于没有带上贴身侍卫。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既是去与嫂嫂幽会，谁会带上一群看客呢？况且寒浇自恃神勇无敌，根本不信有人胆敢来行刺。

夜已深。

微微月光下，一条黑影闪过。来人悄悄推开门，房里面黑乎乎一

片，只依稀看到一张大床，床头隐约看到一个人的脑袋。来人亮出刀，出手如电，只听得“嗖”的一声，那颗脑袋已是落地，哼都没哼出声。他用一个袋子迅速把脑袋装起来，飞一般地离去，身后依然是呼呼的风声。

这名刀客，就是女艾派出的专业刺客。

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砍下的并不是寒澆的脑袋，而是一颗女人的脑袋。那个女人，就是寒澆的嫂嫂女歧。

刺杀行动筹划得天衣无缝，岂料最后一刀竟然砍错人，女艾不禁要捶胸顿足。

何以会杀错人，成了历史之谜。

屈原在著名诗篇《天问》中也提及此事：“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为什么杀错人了呢？是寒澆发现有刺客行刺，故意让嫂嫂当替罪羊吗？或者刺客进入屋里时，寒澆已经离开啦？或者寒澆仅仅是睡得像死猪，对刺客一无所知，仅仅只是运气不错？

这一切谜团，已经没办法解开了。

总之，女艾此次的暗杀计划并没有成功，寒澆毫发未伤，还活得好好的。

到手的肥肉就这么溜了，这种机会可一不可再，往后寒澆再也不会一个人偷偷跑到外面找女人了。无疑，行刺难度将大大增加。女艾并不放弃，她继续侦察寒澆的弱点。除了女人之外，寒澆最大的乐趣就是狩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狩猎者往往也会沦为猎物。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狩猎场往往是政变与阴谋交织的战场。太康去打猎，国家被后羿给抢了；后羿去打猎，老巢被寒浞给端了。后世还有许多案例，比如春秋时代的齐襄公在外出打猎时被谋杀；汉初匈奴枭雄冒顿，乘父亲打猎时发动政变夺权。寒浞与后羿一样，酷爱狩猎，莽莽猎原，杀机四布，只要能抓住一次机会，就足以致寒浞于死地。

我们佩服女艾的耐心，也佩服她的智慧，更佩服她的胆量。

这个非凡的女人注定要创造奇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果然再度降临。

寒浞终于不耐寂寞，整天待在城里，不把他憋坏才怪。只有在猎杀场上，他才能找回生命的激情，于是他出城狩猎了。那个时代有马车，但骑马并不普遍，在马车上打猎受限比较多，寒浞索性跳下马车，迈开大步，奔跑在旷野之上。当他把其他人远远甩在身后时，只剩一个人还紧紧跟着。

这个人便是女艾。

女艾有一条猎犬，这不是普通的猎犬，而是经过专门训练，可以杀人的猎犬。

当行至一个偏僻之处时，女艾环顾四周无人，拍拍猎犬，猎犬心领神会，忽然猛地扑向寒浞。纵然寒浞神武盖世，也未对一条猎犬有防备之心，一下子被恶犬扑倒在地。寒浞是被当场咬死呢，还是咬成重伤，古书未有明确记录。就算猎犬没把他咬死，后面还有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艾，她的青葱玉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锋利的短刀，一道寒光闪过，一代枭雄寒浞的脑袋与身躯分离，鲜血喷涌如注。

旷世女谍女艾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铲除了少康最大的敌人。

不过，还有另一个版本，称寒浇是死于少康之手。

这个版本与前一个版本有相似之处，就是寒浇确实是在狩猎时被杀的，但并非死于女艾之手，而是死于少康的伏击。

屈原在《天问》中这样写道：“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少康放猎犬捕猎，就可以袭杀寒浇呢？《左传》中也提道：“少康灭浇于过。”不过《天问》与《左传》所说都是含糊其辞，女艾作为少康派出的间谍，她杀死寒浇，仍然可以归功于少康，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个版本并无矛盾之处。就算寒浇并非女艾亲手所杀，他前去狩猎的消息，也一定是女艾泄露给了少康。

因此，寒浇之死，女艾确实是第一功臣。

一代枭雄寒浇，就这样死于女谍之手。

女艾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间谍，能长期潜伏于敌人身边，强颜欢笑，从未暴露身份，可见她功力之深。特别是第一次刺杀失败后，没有慌乱，没有暴露，心理素质之强，着实令人佩服。

刺杀寒浇，是少康与寒氏战争中所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寒浇之死，不仅使得寒浞失去爱子与最得力的干将，且重创敌人的士气，寒氏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终结。

由于少康中兴的史料很匮乏，只是分散见于诸书，因此我们叙述起来很简略，基本上没有一个时间表。事实上，这场战争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我估计相持时间有十余年之久。因为到了战争后期，少康的儿子杼也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帅。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可以推断，此时的少康应该年近四十了，至少也有三十五岁左右。

没有准确的历史进程表，我们只得把时间概念抛在一边，大致说说故事的情节。寒浞之死，成为少康复位之战的转折点。

寒浞篡权数十年，之所以地位牢固，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寒浇据守过邑，寒豷据守戈邑，互为犄角。

值得注意的是，在少康与寒浞的战争中，多数诸侯国似乎只是保持观望的态度，明哲保身，坐山观虎斗，既不支持寒浞，也不支持少康，反正谁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就归附谁。

夏、商、周诸朝与后世的皇帝集权制有很大的不同，你是王也好，是帝也罢，其实就是联邦首领，并不具备皇帝那种无限的权力。王室兴盛时，对诸侯控制力度就比较大，王室自身难保时，对诸侯根本就没有控制力。寒浞虽然篡权数十年，但如今受到少康的攻击，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武力手段逼迫诸侯参战。就算这位阴谋家对诸侯的观望态度心怀不满，也只能先打败少康，然后才能回头算账。

寒浇一死，等于把寒浞的一只臂膀砍断了。寒浇的封地过邑已是群龙无首，尽管兵力不弱，但已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少康审时度势，果断用兵过邑。现在寒浇的人头挂在少康军队的旗杆之上，过邑的守军见了无不胆寒，连勇冠天下的寒浇都不免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遑论他人呢？从上至下，过邑军队毫无斗志可言，被少康攻下是顺理成章之事。

紧接着，少康派自己的儿子杼发兵攻打寒浇的弟弟寒豷，攻略戈邑。寒豷勇武远不及哥哥寒浇，而杼则是英雄出少年。杼虽然没有像父亲少康那样经历诸多磨难，但是毕竟从小开始，就随父亲躲避寒浞的迫害。他不是温室中长成的娇嫩花朵，也算是见识过风风雨雨。环境造人，杼身上有着父亲的许多优点，坚强果敢，敢担大任。此时的杼，应该也是不满二十岁，与当年的寒浇一样，都是少年统帅，内心

充满追求荣誉的渴望。在过邑沦陷后，寒豷已是独木难支，在杼的凌厉攻势下，戈邑的防御完全崩溃，寒豷只能紧随哥哥奔往黄泉之路了。

窃国者寒浞终于无法善终。

此时的寒浞估计已是相当年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估算。从寒浞杀后羿之后，有三代人陆续长大成人：第一代是寒澆，他是后羿被杀之后出生的，到夏帝后相被杀时，他已是年轻的统帅，这期间有十八年。第二代是少康，他是后相被杀之后出生的，到生下杼时，至少也十七八岁吧。第三代是杼，此时的杼也长大成人，成为戈邑之战的统帅，至少也十七八岁吧。由此推算，此时距寒浞杀后羿，已经过去了五十余年，即便当年他取代后羿时只有二十几岁，如今也七八十岁了。

与寒浞一样垂垂老矣的，还有伯靡。

说起来后羿也算幸运，在他死了五十年后，还有一个臣子不忘为他报仇雪恨。少康显然是个非常明智的君主，如今寒浞大势已去，要对付这么个老东西，易如反掌。可是他却把唾手可得大功的机会留给了伯靡。你想想，伯靡蛰伏了五十年，就是为了手刃寒浞，这位老臣在少康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今少康要回报他了。

伯靡率领军队，完成了最后的扫荡。

一代奸雄寒浞此时一定为自己的长寿而懊悔不已，倘若他早几年离世，还能带着荣耀躺进棺材，可是现在却死无葬身之地了。寒浞没能将荣耀维持到最后，他以一个罪犯的身份被处死。当权势灰飞烟灭之时，才蓦然发现，以前他宰割别人，如今风水转向了，他成为被宰割者。

寒浞是上古时代最大的权谋家，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他几乎令

夏朝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可是少康却奇迹般的卷土重来，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寒浞哪里想得到，一切的因果始自数十年前的那场王宫大屠杀，他终究没能对王室子弟斩尽杀绝，遗腹子少康竟然成了他命中的克星。

夏王朝政权在中断数十年后，终于在战争的烈焰中重生。

少康中兴夏室，这在古代是非常著名的故事，也是非常励志的传奇。不过今天的读者对少康这个名字都颇感陌生，更不用说知道他的故事。这主要是因为上古时代的故事十分简略，史料又多有矛盾之处，故事显得破碎不堪，提不起今天读者的兴趣。我把各种史料的碎片拼凑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少康中兴”故事，虽仍不完整，但也算是有助于读者了解大致的来龙去脉吧。

在内战中，多数诸侯都是旁观者。反正自己当不了王，谁当王都一样，谁有权我就倒向谁。现在寒浞败亡，少康归于夏邑，各路诸侯一看，结果出来了，自然个个振臂高呼，支持少康登基，拥他为天子。这种花哨的事情，还得争先恐后才行，来晚了，分不到一杯羹哩。

少康的故事，总令人联想到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

尽管两人并非同时代，但性格、经历上有许多相似点。少康与勾践都是在国家丧亡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成功翻盘，战胜强大的对手。两人在手段上又颇有类似之处，少康以女艾为谋刺杀寒浞，勾践以西施为谋媚惑吴王夫差。美人计、反间计成了弱者对付强者的强有力手段。

相比于勾践，少康复国更为不易。

春秋时代名将伍子胥曾劝谏吴王夫差杀勾践，他这样说过：“今

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勾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意思就是说，吴国的实力没有当年的过氏强大（这里的过氏就是寒浇，寒浇封于过，故而又称为过浇），而勾践的实力则比当年的少康要强大，若不杀勾践，对手势必会有翻盘的机会。

勾践是兵败亡国，但他至少还有一帮谋臣武将作为家底，也有自己的数万民众。而少康最初的全部家底只不过是“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也就是土地只有十平方公里，手下只有五百人，充其量算是一个大户人家罢了。他就是凭着这一丁点儿家底起步，以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与无所畏惧的勇气，最终打败寒浞，夺回大权，登上天子宝座。

故而以难易而言，少康复国，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艰难的一次翻盘。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即便少康重建夏政权，可是夏王室要恢复大禹、夏启时代的统治力已经是不可能了。经历了后羿与寒浞两位窃国者的破坏，夏帝国中央政府对诸侯的控制力已是大不如前了。

十五 失重的权柄

说到中国的权力制度，大家对秦以来的皇帝制度最为熟知。

可以说，皇帝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体现。

人类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专制，专制的升级也是需要时间的。最初所谓的天子，不过就是诸侯首领罢了，权力比其他部落头头儿要大一些，但没有绝对的权威。到了帝舜时，他大大地扩张了天子（中央政府）的权力，明确了中央对诸侯的监督权与管理权。中央的权力在大禹与夏启时得到强化，大禹曾经召开诸侯会议，防风氏姗姗来迟，竟然被处以死刑，可见此时中央政权是很强大的。

不过，中央并非一直是强大的。

夏启死后，太康的政权便被地方诸侯后羿所窃取，此时的中央政府已是名存实亡。后羿及寒浞尽管凭恃着强大的武力窃取大权，但对诸侯们的控制力，已经不如大禹、夏启的时代。我估计，后羿及寒浞即便把王冠戴在头上，恐怕也没有多少诸侯前去朝见。他们的帝王称号，似乎并没有得到诸侯们的认同。

当时真正的情形是这样的：无论是后羿还是寒浞，都算不上是号令诸侯的中央政权，他们只是霸主，没有权力对诸侯们发号施令，除非是以武力逼迫。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寒浞与少康的战争中，多数诸侯国都只是旁观看热闹，不卷入两派的争斗之中。少康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这点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以他的深谋远虑，也无法令王室重整旗鼓，重新控制各诸侯。

松弛太久的夏王国，已经失去高屋建瓴的势能。

从太康失政到少康中兴，所跨越的时间将近一百年，一百年里经历了四五代人，早期诸侯朝见天子的传统，早就被抛之脑后了。显然，少康已经无法去改变这种现状，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采取种种手段笼络诸侯，授予他们种种官职，提高他们的名气与声望。

动荡了一个世纪的夏王国终于迎来了风平浪静，在少康及其继任者杼统治的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太多故事，帝国进入一个安定而和平的时期。

这种平静对于历史读者来说，显得沉闷，不过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那是一种远离战争的幸福。

大史学家司马迁对少康以后的漫长历史，只是采用记流水账的方式：“帝少康崩，子帝予（杼）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jiōng）立。帝扃崩，子帝廑（jǐn）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少康之后一直到夏帝国覆亡，总共三四百年的时间，其间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

要知道这时的文字已经普及，为什么在尧、舜、禹时都能留下许多古文献，偏偏少康之后的史料却如凤毛麟角一般稀缺？对于历史作家来说，要在凌乱破碎的稀缺资源中整理出较为明确的史迹，确实不易。

夏代中期，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件事，便是殷商的崛起。

殷商的始祖是帝喾的儿子契（xiè），契的母亲是有娥氏之女简

狄，据说她是吞了一玄鸟蛋后产下契。所以有这么一句诗，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后来商人曾把鸟作为氏族的图腾。对于吞鸟蛋生儿子这种离奇的故事，我们不相信，宁可认为契乃是私生子。契在帝舜时代曾辅助大禹治水，功劳颇盛，故而后来被封于商丘，并担任司徒。

契的后人成为商部落的首领，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部落默默无闻，且多次迁移其住地。大约在少康去世后的半个世纪，商部落开始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畜牧养殖业的发展，是商部落兴盛的原因所在。

到了王亥的时候，史书对商的记录开始多起来了。

说到王亥这个人，我们不得不对他的名字做一番考察。

他的本名是叫“亥”或“子亥”，在《竹书纪年》里，有“殷王子亥”的提法。因此“王亥”这个名字，绝不是现在所说的姓“王”名“亥”，而是“国王子亥”的意思。这就不由得令人吃惊了，夏帝国已经有一个国王，怎么能同时并存另一个王呢？

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在少康死后，夏帝国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是越来越衰弱，以至于诸侯毫无畏惧地把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

由于这个时期的史料非常之少，我们不知道除了王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自称为王。可是王亥最后却死得有点莫名其妙，令人怀疑背后到底与夏政权有没有直接的关联。

那是夏帝泄上台后的第十二年。

这一年，王亥前往有易氏部落，大概是为了贩卖一批牛羊。有易氏部落的首领唤作绵臣，他热情地款待王亥。在接待的酒席上，王亥

喝了几杯酒后，心血来潮，站起身来，手持盾牌跳舞。这个舞是属于“武舞”，就是武夫跳的，手里持干（就是盾牌），雄赳赳气昂昂的。估计王亥也是个肌肉型的型男，这舞一跳，把一个女人完全迷住了。

这个女人是谁，古史里没记载，但一定是与有易氏首领绵臣有着亲密关系的女人，或者是他的妻子，或者是他的爱妾。

于是接下来，有伤风化的事情便发生了。

《竹书纪年》中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

中国人有一种很简单的观念，只要你是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管你们是不是真的相爱，一概斥为“淫夫荡妇”，只要是出轨，就可以称为“淫”。我们也不去管王亥与那个女人是不是真心相爱，反正与“淫”脱离不了干系。

王亥的奸情，被有易氏部落的一个牧羊人给撞见了。

这个牧羊人在打小报告上倒十分积极，立刻就汇报给了大首领绵臣。绵臣一听，心里无名火起，他咬牙切齿，欲置王亥于死地。他派人前去杀王亥，当时王亥还躺在床上。忽然几个凶神恶煞的人扑了进来，有一人手持武器往王亥身上砍，王亥猛地一跳，从床上跳下来，欲夺门而出。可是这里终究是人家的地盘，如何能逃得掉呢？

王亥最后为自己的异乡之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没能返回故里，毙命于有易氏。

尽管王亥死于非命，但他仍然被视为商部落兴起的关键人物，从他名字前冠以“王”号，就可知其人志不在小。后来商王朝取代夏王朝，王亥还被尊为“高祖”，肯定了他对商部落崛起的重大贡献。

我有点怀疑王亥之死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这里面会不会有夏帝势力的介入呢？王亥显然已经无视中央（天子）的权威，甚至颇有分庭抗礼的味道。对于王亥之死，夏帝就算没有参与其事，恐怕也要拍手称快。

王亥之死，并没有阻止商部落的继续强大。

继任商部落首领的人是王亥的儿子上甲微，上台伊始，他就矢志为父报仇。然而，商部落的军事力量仍然弱小，与有易氏部落的战争打了四年，也未能打胜。

四年以后（夏帝泄十六年），上甲微与河伯冯夷结盟。在中国古代，“伯”就是一方诸侯之长，有“霸”的意思，比如说“春秋五霸”，有时也称为“春秋五伯”。河伯冯夷就是一位诸侯霸主，他曾经与另一位霸主洛伯发生冲突，关于这两位霸主之间的争斗，史书上没有详细记录。我估计在这场二霸相斗中，商部落是坚定站在河伯冯夷一方的。

为了彻底打败有易氏部落，上甲微向河伯冯夷借兵。在河伯兵团的参战下，有易氏部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上甲微大获全胜，杀死了有易氏部落首领绵臣，为父亲报了血海深仇。这也是少康中兴之后，中原大地上爆发的一场重要战事。

据说商部落的兴盛与商业贸易紧密相关。

有些学者认为，“商业”、“商品”、“商人”等词汇的来源，都与商部落有关联。

为什么商部落会在贸易上领先于其他部落呢？

这大概与商部落多次迁徙有关。

据说从殷商第一代祖契开始，至第十三代孙汤止，至少有过八次迁居。频繁的迁居，每换个地方，势必有许多物品不能自给，必须从

其他部落购买，因此职业商人就出现了。

最早“商人”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商部落的人，因为这个部落几乎人人都从事贸易。渐渐地，大家就把从事贸易买卖的人都叫作“商人”。“商业”一词同样如此，就是商部落所从事的贸易行业；而“商品”则来源于商部落用于贸易交易的物品。

由此可见，商部落最初的兴盛，并非是军事上的兴盛，而是商业上的兴盛。王亥被杀事件，证明了一件事：光有财富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相应的武力。此时商部落的军事能力低下是毫无疑问的，上甲微兴兵为父报仇，还得向河伯借兵。讨伐有易氏的成功，是商部落迈向强藩的第一步。

大约又过了四十年，有一个名为皮氏的诸侯国出现内乱。

据一些史料的说法，皮氏政权的问题是：“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君主的权力被架空，整个国家陷于内乱之中。这种事情，本来作为天子的夏帝要出来解决，可事实上夏帝所能掌控的区域，只有帝国首都以及少数几个诸侯罢了，根本没有能力解决皮氏的内乱。对商部落来说，这可是良机，既然帝国政府不管，自己正好可以打着“讨伐不义”的旗号，拿下皮氏。商的军队攻入皮氏，皮氏灭亡。此时的商部落已经拥有不可低估的武力，与四十年前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

历史的列车穿梭于毫无风景的时间隧道，几个夏帝的影子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过，转眼之间，夏王朝的终点站已隐约可见。

我们先来说说夏帝孔甲，他是夏帝国倒数第四位王。

司马迁的《史记》给孔甲的评价是相当低、相当负面的：“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但是这些评

价，基本上都找不到证据支持。唯一与“好方鬼神”说法略为沾边儿的，是一个关于养龙的故事。

据说在夏帝孔甲时，发现了两条龙。你想想，这龙本来就是人想象出来的东西，到底什么样子，谁知道呢？恰好发现有两只跟传说中的龙有点类似的动物，就以为是真龙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两只恐龙顽强地生存到了孔甲时代。总之，发现了这两条龙后，夏帝孔甲很高兴。可是紧接着一个问题来了，要怎么饲养呢？

有一个名叫刘累的人高举双手说：“我会养。”他自称曾经向豢龙氏学习过养龙之术。可是刘累不过是个会吹牛的家伙罢了，他把一条龙给养死了，这是一条雌龙。这下子怎么办，他总不能把龙的尸体扛出去，他得瞒着才行。于是他想了个办法，把龙肉煮了后，献给夏帝孔甲吃。

孔甲一尝，咦，这肉羹的味道十分别致，很喜欢吃。不久后，夏帝孔甲派人来找刘累，想要再品尝品尝美食。这下子刘累害怕了，心想这事迟早要泄露，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脚底一滑，溜了，逃到鲁阳去了。夏帝孔甲也没有追究，刘累一族后来还人丁兴旺哩。

就养龙这件事来说，孔甲也算不上有劣行。我怀疑司马迁的说法比较主观，因为夏帝孔甲之后才传三代，夏帝国就灭亡了。这个事实很容易让人追溯前几任帝王的责任，并归咎于他们。在我看来，司马迁说的“德衰”，实际上正是孔甲想要改变现状，重新树立天子的权威。其中一个证据就是孔甲上台后不久，就废掉了豕韦氏。

豕韦氏曾经为“伯”，“伯”就是一方诸侯之长，影响力仅次于天子。这件事可视为王室对诸侯发出的挑战，难怪乎司马迁说“诸侯畔之”。其实诸侯谈不上反叛，因为就不曾真正被王室统治过。

孔甲死后，帝皋继位，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豕韦氏复国。新一任夏帝显然认为与诸侯对峙并非明智之举，还是维持以前的格局

最好：夏帝与诸侯名分上说是君与臣，实际上谁也不鸟谁。

帝皋的让步显然让中央与诸侯的矛盾稍稍缓解，但这位短命的天子在位仅仅三年就去世了。继任者帝发在位的时间也不够长，大约九年便去世了。末代夏帝粉墨登场，这个人，便是在历史上臭名远扬的夏桀。

那么，夏桀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十六 夏桀干了什么坏事

夏桀与商纣都被认为是暴君的代表，同时也是亡国之君。

司马迁在《史记》的《夏本纪》中是这样评价他的：“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在《殷本纪》中还说：“夏桀为虐政淫荒。”

这仍然是很含糊的说法，因为《史记》中并没有记录夏桀做的任何一件坏事。

我们读史时需极谨慎一点，中国历史多是成王败寇之论，只要是失败者，基本上都可以套上这些万能法宝：亡德啦、荒淫啦、残暴啦。其实这套在成功者头上，多数也是适用的，比如说夏帝国的开国者夏启，他岂不是以德得天下吗？他岂不是残暴之人吗？岂不是穷兵黩武者吗？

中国的史学虽然丰富，可是长期以来，史学只是被当作政治工具罢了，令历史真相完全失真。其实这种现象，古人就多有议论了。

《淮南子》一书曾明确指出：“三代之盛，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天下之积毁也。”三代就是指尧、舜、禹时代，之所以被认为是难以超越的完美时代，那只不过是后人拼命贴金的结果；同样，夏桀、商纣之所以遭到恶意攻击，只是天下人把坏事都加到他们头上，注意这里使用“谤”字，意为不符事实的攻击。

在《列子》一书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天下之善，归之尧舜；天下之恶，归之桀纣。”这是中国人很要命的简单逻辑，说某人好，就说得伟大光荣正确，一点缺点也没有；要整黑某人，就把全世界的恶行都套在他身上，让他百世不得翻身。

我敢说，倘若夏桀战胜商汤，那么遭万古骂名的人必是商汤，而夏桀将成为一代明君。那么，这里我们将讨论两件事情：其一，夏桀想做什么事业呢？其二，夏桀干了什么坏事呢？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夏桀想做什么事业呢？

我在前面说过，整个夏朝，除了开国者夏启之外，其他夏帝对诸侯的控制力都很弱，这种情况有点类似春秋时代的周王，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权。但是有一位夏帝力图改变这种局面，这个夏帝就是孔甲。他撤除了豕（shǐ）韦氏的封国，正式向诸侯要回统治的权柄。因此这位帝王后来被冠以“德衰”之名，其实用“德衰”来解释历史是很浅薄的方法。真相并不是谁的德行高，这里所涉及的完全是利益之争——夏帝想夺取更大的权力，而诸侯们却不想把权力拱手交出。

夏帝孔甲振兴王室理想固然远大，现实却不那么美好。当他刚刚去世，继任者就迫不及待地恢复了豕韦氏的权力，中央终于向诸侯妥协了。孔甲之后的两任帝王任期很短，在位时间加起来只有十二年，真正继承孔甲事业的人，就是帝桀，或称为夏桀。

夏桀是与后羿、寒浞之流相类似的人物，他身体强健，果敢而有力。荀子是这样评说的：“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这位儒学宗师认为夏桀乃是“天下之杰”，而且有“百人之敌”之勇武。

后世则说得更加离谱，比如《淮南子》说：“桀之力制牦申钩，索铁煇（xī）金。”活生生就是铁打的汉子。在这些夸张的说法背后，确实可以发现夏桀并非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而是一位像汉武帝那样精力充沛、志在削藩的君王。

登基十一年后，夏桀召开了一次诸侯大会。

这可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因为上一次的诸侯大会，还要追溯到大约四百年前的夏启时代。夏桀把会议地点选择在仍地，就是有仍氏部落的领地，当年的中兴明君少康正是出生于此。在这里召开诸侯会议，隐隐透露出夏桀效法少康以实现王室中兴的决心。

这次诸侯大会到底有多少诸侯前来参加呢？史料上并没有说。我估计并非所有的诸侯都来参加，而是夏王室所能控制的诸侯来了。显然，夏桀打算利用这次诸侯大会重振王室的威严。但是王室的威严受到了藐视，有缙氏的国君在会议中途溜走了，很可能他冒犯了夏桀，为了躲避责罚逃回自己的地盘内。

对夏桀来说，这是一次杀鸡吓猴的机会。他果断地诉诸武力，讨伐有缙氏，并将这个诸侯国彻底摧毁。

消灭有缙氏无疑令夏桀的威力震动天下，轻视王室的诸侯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年轻帝王的能力与雄心。夏桀十四年，他又发动了一场战争，派一位名为扁的大臣讨伐岷山。岷山君主打不赢，献上两名如花似玉的女儿，以求得夏桀的宽恕。这两个女人，一个名为琬，一个名为琰（yǎn），姐妹两人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美貌。

夏桀得到这两个女人后，宠爱得不得了。

当时他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名为苕华之玉，他就把姐妹两人的名字——琬和琰——刻在美玉上面，并说“苕”就是琬，“华”就是琰。后来人们也用“苕华”二字来形容美丽的女子。

这两战确实令王室声威大振，连实力派诸侯商部落也迁都到了亳，以避夏桀的锋芒。此时商的君主就是汤，商汤在夏桀伐岷山之后，派大臣伊尹前去朝见天子，以示归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夏桀并非是一个只知喝酒享乐的昏君，而是渴望实现中兴伟业的君主，只是他后来失败了，败给了比他更出色的商汤。

关于夏桀与商汤的较量，留待下章再说。

这里要先回答前面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夏桀都做了什么坏事呢？

古代一说到暴君、昏君，总会拿来与桀纣相比。桀就是夏桀，纣就是商纣，此二君在历史上可谓是臭名昭著。商纣我们后文再说，这里单说夏桀，夏桀究竟干过什么坏事，以至于遗臭万年呢？

我们且来看看比较原始的资料。

在《尚书》的《汤誓》中，商汤要讨伐夏桀，先宣布夏桀的罪状，大家注意看：“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意思是说：夏桀耗费民力，为害夏邑。这条罪状十分含糊，耗费民力，应该就是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为害夏邑，表明末代夏帝真正能指使的地盘，就是自己的城邑，对其他诸侯的领地，他是很难染指的。因此，即便夏桀是个很坏的帝王，他的恶行也远远没到“为害天下”的地步。

在另一篇《仲虺（huǐ）之诰》中，是这样说的：“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就是说：夏桀的罪过，是假托上天的旨意，发布命令欺骗百姓。这种说法更不靠谱，夏桀本来就是天子，还用得着“矫诬上天”吗？我们换个思路想，之所以指责夏桀“矫诬上天，布命于下”，正说明当时夏王室早就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夏桀竟然真把自己当天子，难怪乎会成为天下公敌。

再来看看《尚书》的《汤诰》篇，这是商汤灭掉夏朝后的一篇重要讲话，其中有一句：“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让我们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对夏桀罪行的揭露仍然十分笼统，用了“灭德作威”、“敷虐万方百姓”这样的说法。《尚书》固然保留着许多古代史料，但这本文献集不是历史书，而是政治书，政治书就存在各式各样

的目的。商政权取代夏政权，势必要给天下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把责任统统推给夏桀，是简单有效的方法。

再来看看《竹书纪年》的说法：“夏桀作倾宫、瑶台，殫百姓之财。”从这个记录里，夏桀干的坏事，是大兴土木，只管自己享乐，耗费百姓之财。这是不是坏事呢？当然是坏事。不过，这种大建宫殿的坏事，古代帝王至少有一半人干过。单凭这点，要把夏桀说成暴君的典型，显然有些牵强。

古老文献对夏桀的罪行都是语焉不详，那么夏桀有残暴的例子吗？有一个例子，他杀了忠臣关龙逢（páng）。关龙逢，又称为蒙龙逢，也有写成关龙逢，他因为时不时地进谏夏桀，最后招来杀身之祸。夏桀固然不是个好帝王，但也绝不是最坏的帝王，他之所以演变成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形象，是后世一代又一代人添枝加叶抹黑的结果！

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有一篇《桀纣事迹类比》，指出各种资料，夏桀与商纣的事迹有三十四件是雷同的。这说明什么呢？多是后人把各种恶行加诸两人身上的。事实上，这并非现代学者的新发现，古代学者已多有指出，譬如东汉应劭在《风俗通》就说：“世之毁誉，莫得其实。审形者多，随实者少，或至以有若无。故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就是说桀、纣的许多传闻根本就是不实的，只是后人牵强附会罢了。

从原始的资料来看，夏桀的恶行，除了大兴土木这一点比较明确之外，其他都说得含混不清。胜利者对失败者统统可以冠以“矫诬上天”或“灭德作威”这种没有实际内容的指责。宋代著名史学家罗泌写有一篇《桀纣事多失实论》，其中说道：“凡事出于千百年之上，不幸而不知其详，则宜疑以传疑，不得妄为之说。大抵书传所记，桀纣之

事，多出仿模。”其实就算说夏桀喜好女色、大兴土木，这又是哪个帝王没有的呢？整部帝王史，除了汉文帝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君主没有大兴土木之外，哪个帝王没有建几座宫殿呢？

夏桀的骄淫残暴，不会超过秦始皇与汉武帝。只是因为前者失败了，其缺点恶行就被无限放大；而后者成功了，他们的残暴独裁或许还被视为成功的基石呢。

这就是成王败寇的传统史观。

夏桀的失败，与其归因于他的暴行，不如归因于对手的聪明与强大。

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商汤。商汤，又称为成汤或成唐，在甲骨文中称为大乙。据《史记》的谱系，他是商部落的第十四位首领。商部落在王亥时开始兴起，先后灭了有易氏与皮氏，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部落。不过，关于商部落的历史同样破碎不堪，从灭掉皮氏到商汤迁居于亳，大约隔了七十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商部落经历了怎样的兴衰浮沉呢，这就没法考证了。

到了商汤时，商部落想必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此时夏桀雄心勃勃，企图以武力手段控制诸侯，恢复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们可以料想到，商的兴起已经引起夏桀的注意，商汤甚至可能上了他的黑名单。对于商汤来说，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夏桀的中央政权对抗，因此夹起尾巴做人，表面上对夏帝恭恭敬敬，做出一副臣服的低调模样。他做了两件事：第一，把部落迁移到亳，大约是为了避开夏桀的军事威胁；第二，派心腹伊尹朝见夏桀，以示臣服。

没有伊尹，就没有商汤的事业。

伊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十七 权谋大师伊尹

伊尹又叫伊摯，“尹”是官职名，相当于宰相。

关于伊尹的传说，也是五花八门。

先来看看孟子是怎么说的。孟子说：伊尹是个农夫，“耕于有莘（shēn）之野”，有莘就是有莘氏，是当时一个部落的名称。他虽是农夫，却是尧、舜的忠实信徒，“道义”二字常记心头。如果要他做不合道义的事情，就算许予高官厚禄，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算送他一千辆马车，他同样视若无睹。总之，在孟子眼中，伊尹天然就是个圣人，是与尧、舜一样的圣人，视金钱名利如粪土。后来商汤听说他很贤能，派人携重金请他出山。以清高自命的伊尹当然不肯为钱财而出山，他把来人给轰走了。商汤锲而不舍，像后世刘皇叔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一样，他也三次登门拜访，推心置腹，终于以诚心打动了伊尹。

不过对孟子讲的故事，我们一定要小心。

他是“性善论”的鼓吹者，喜欢把古代圣人塑造为“性善”的完美化身，一点瑕疵也没有，这恐怕只是他想象中的历史人物，充满理想的色彩，却远非真实的历史人物。

与孟子相比，《吕氏春秋》的说法比较靠谱。

《吕氏春秋》记：伊尹本来是个弃儿，刚出生时被丢到一片桑树林中，这个小生命，就算不被野兽吃掉，也会活活饿死。算命大，正好有一位采桑女路过，听到婴儿的哭泣声，便把他带回了部落，交给部落首领。首领见这个小婴孩颇为可爱，遂把他交给一个厨师抚养。在许多史料中，都提到伊尹的厨艺是相当棒的，从小跟着厨师混，没几手绝活哪行哦。

依《吕氏春秋》的说法，伊尹的身份不可能是孟子说的农夫，他的养父是部落大首领的厨师，他应该算是大首领的家臣或家仆。这个说法得到《墨子》一书的印证，《墨子》有这样的记载：“伊尹为莘氏女师仆。”莘氏就是有莘氏，是部落的名字；“莘氏女”就是有莘氏大首领的女儿，相当于公主；“师仆”是伊尹的身份，既是公主的老师，也是家仆，因为他是厨师收养的，地位低。

一个地位低的家仆，居然可以成为公主的老师，可见伊尹非常勤奋好学。作为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弃儿，伊尹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以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对于一个低贱的人，能成为公主的老师已是极大的成功。然而，伊尹的志向绝不只限于此，商汤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商汤与伊尹是如何相识的呢？

仍然有不同的说法。

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伊尹长大后很贤能，声名远扬，传到商汤耳中，商汤正图谋大计，遂亲自找上门来。伊尹自己也希望能成为商汤效力，岂料有莘氏部落却不肯放人。为了得到伊尹，商汤索性与有莘氏部落缔结政治联姻，娶了有莘氏公主。伊尹则作为公主陪嫁品送给商汤，这算是买一赠一了，伊尹就属于“赠品”。

不过这种说法仍有溢美之嫌。

大家想想，伊尹当时只是一名家仆，怎么可能会引起商汤的注意呢？我猜测商汤与有莘氏联姻，纯粹只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罢了，根本不是伊尹的缘故。至于得到伊尹这个“陪嫁品”，只不过是偶然罢了。

再来看看《韩非子》中的一段话：“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

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则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这段写的与《吕氏春秋》截然不同，意思是说：上古时代，商汤是个大圣人，而伊尹是个大智者。然而以伊尹的智慧，游说商汤七十次，商汤一次也没接受他。后来伊尹利用自己善于烹调的优点，煮好吃好喝的给商汤，用这个办法来亲近他，慢慢地混熟了，商汤才渐渐发现伊尹的才能。

韩非子的说法显然比较接近事实。伊尹确实有才华，然而他只不过是“陪嫁品”，商汤看不起他是很正常的，毕竟两人身份、地位差异巨大。伊尹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完全是自己努力争取的结果，而且是用尽心机。孟子版的“三顾茅庐”的故事，美则美矣，实则意淫成分太大。以我们的观察分析判断，伊尹的所作所为，并非孟子所认为的尧舜之道，也不是以道德的力量取胜，而是以权谋智术取胜，而这点，恰恰是商汤所看重的。

孟子对古代充满“情怀”，容易产生“厚古薄今”的思想；相比之下，韩非子则趋于现实主义，不会故意为古人脸上贴金，因而更接近于事实。

伊尹成为商汤的左膀右臂后，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首先，商汤派他去朝见夏桀，这是一项外交使命。这次出使应该是很成功的，具体内容我们并不清楚，但伊尹应该是消除了夏桀对商部落的敌视，他可能竭尽全力地表明商部落是完全服从夏帝的中央政权。如果不是取得成功，后来伊尹也不可能有四次前往帝都执行外交任务的机会。

从一个事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伊尹绝非孟子口中所说的道德家。伊尹前后五次代表商汤出使夏都，之所以大获成功，与一个人的帮助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夏桀的妃子妹（mò）喜。妹喜既然是夏

桀的妃子，又怎么会与伊尹扯上关系呢？

探讨上古史，遇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各种史料相互矛盾到了极点。

我们先来看看《国语·晋语》中所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夏桀讨伐有施部落，这件事大概是发生在征岷山之前。有施部落首领打了败仗，献上了一个名为妹喜（又叫末喜）的美女给夏桀。英雄难过美人关，夏桀与之前的寒浣一样，在女人问题上栽了个大跟头。

妹喜显然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所扮演的角色，与女艾、西施一样，是潜伏在夏桀身边的间谍。有施氏首领把妹喜献给夏桀，显然是安插一个耳目。不过光靠有施氏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夏桀的统治，他可能暗中联络了商汤，让妹喜暗中助伊尹一臂之力。妹喜受到夏桀的宠幸，地位非同寻常，说话有分量，能帮伊尹说好话。伊尹五次出使夏都，不辱使命，妹喜功不可没。

不过在《竹书纪年》中，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我们前面讲过，夏桀在讨伐岷山时，收获了两个美女：琬与琰。因此他移情别恋，把妹喜给冷落了。《竹书纪年》是这样记的：“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依这种说法，妹喜之所以与伊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乃是为了报复夏桀的绝情。

不管哪种说法属实，都可以证明伊尹充分地利用妹喜这个后宫资源，收集夏廷的情报，大施反间计，放烟幕弹，令夏桀失去敏锐的洞察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伊尹根本就不是孟子所鼓吹的纯粹道德主义者，而是一个深谙权谋的智者。

伊尹为商汤争取到了什么呢？

首先是确保了商汤的安全。

从商汤迁都以及五次派伊尹朝见夏桀来看，当时夏桀很可能是准备对商汤下手的。据说当时商汤拥有的地盘，只有方圆七十里，不过就是弹丸之地。倘若夏桀召集更多的诸侯以围剿商汤，商汤难逃一劫。对商汤来说，必须以时间换空间，他不惜对夏桀俯首称臣以消弭战争。

其次，伊尹可能为商汤争取到了征伐大权。

我们从现有的史料分析，在商汤向夏桀表示臣服之前，夏桀至少发动了三场针对诸侯的战争：讨伐有施氏之战、灭有缙氏之战以及讨伐岷山之战。之后就再没有看到夏桀发动新的战争，反而频频看到商汤的四处征伐。值得注意的是，商汤的频频征伐，基本上没有遭到夏桀的惩罚或指责，只有一次是例外的，后面会说到。

这似乎可以证明，商汤的征伐是得到了夏桀的授权，否则很难相信一个志在中兴夏室的帝王会放任商汤如此胡作非为。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夏桀之所以会掉入商汤设下的陷阱，完全是伊尹一手策划的，他通过妹喜等人为内应，给夏桀制造这样的印象：商汤是完全忠诚于夏王室，而且愿意为夏王室的复兴冲锋陷阵，打击那些阳奉阴违的诸侯们。

夏桀显然被伊尹忽悠了，商汤愿意为他充当打手，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夏桀完全错了。

商汤固然志在征伐，但不是要当活雷锋，不是要为夏帝分忧解愁，而只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与地盘。那么要找谁下手呢？

这里面就有大学问了。

要打着替天子征伐的旗帜，就得讲究师出有名，所征伐的诸侯，必须是所谓“不义之国”。商汤不仅要打武力牌，还要打政治牌，这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他的明智之处。此时的商汤力量仍然不够强大，他只有小小的一块地盘，因此他不能完全凭恃武力，更需要依赖谋略。

在伊尹的精心筹划下，商汤把第一个打击目标选定为邻近的葛部落。葛部落的首领称为葛伯，当时一个部落就像一个大家族，首领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祭祀先祖，这是中国人原始的信仰。葛伯是一个荒于政事的人，他懒得搞祭祀活动，这就给了商汤出兵的理由。

商汤便派人前去责备葛伯说：“为什么不祭祀呢？”

请大家注意，商汤不过是个诸侯，哪来的权力去责备另一个诸侯呢？可见他确实是打着天子的招牌。葛伯看不起商汤，而且这里本来是他的地盘，商汤不久前才迁来当邻居，有什么资格来居高临下质问他呢？

因此葛伯没好气地答说：“我没有供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

商汤回复说：“好吧，既然你没有，我商部落其他东西没有，就是长于放牧，牛羊多的是，我给你提供。”

一批牛羊送到葛部落，葛伯可不喜欢这个邻居指手画脚，故意跟商汤对着干，把他送来的牛羊宰了吃掉，偏偏不祭祀，看你奈我何。

过了段时间，商汤又派人前来问道：“为什么还不祭祀？”

葛伯又没好气地答道：“没有祭祀用的谷物。”

商汤回答说：“好吧，既然你没有谷物，我就让自己的部众去帮

你耕种。”于是商汤命令亳地的民众前去葛地种田，不能种田的老弱之人负责在亳与葛之间运送食物。

这下子葛伯发怒了，他娘的，这可是我的地盘，怎么轮到你们商人前来撒野呢？于是他率一帮人，手持武器，气势汹汹地前来，把商部落的民众给赶跑了，抢了他们的食物与酒，要是谁不把食物留下，格杀勿论。葛伯哪里晓得，他这么一折腾，正好掉入商汤所设的陷阱，给了商汤出兵的理由。

后来清代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在评论这段历史时，直言不讳这是商汤的“阴谋”。

龚自珍说：“亳众者何？往间（jiàn，窥探）者也，策为内应者也。老弱馈食者何？往来为间谍者也。”就是说，亳地的民众到葛地去种田，其实是前去刺探的，是去当内应的；老弱之人前去送食物，乃是充当间谍。那么你说葛伯会有什么反应呢？“强邻坚敌，旦夕虎视，发众千百人，入于其国，屯于其野，其能以无惧乎？”突然来了千把人，闯进他的国家，他能不害怕吗？所以葛伯“率其民以争之”，“乃杀其间谍者耳”。

在龚自珍看来，葛伯的做法并没有错。你商汤派一大堆人来当间谍，我把这些间谍杀了或者赶跑，保家卫国，怎么算错呢？

可是阴谋家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我既要捞得实利，又得装作一身凛然正气的样子。商汤早就布下迷局，装出一副乐于助人的样子，以道义为掩护，我帮你种田，你非但不领情，还杀我民众，我非得代天惩罚不可。

既有武力作为后盾，又有道义作为挡箭牌，商汤一举出兵消灭葛氏部落，迈出扩张的第一步。

十八 夏台之囚

灭掉葛氏部落后，商汤以“道义”为号召，讨伐“不义之国”，不断扩张自己的实力。

第二个被商汤吞并的诸侯是有洛氏。

有洛氏灭亡的原因，是其君主贪图享乐，觉得自己的住所不够气派，便大兴土木，修筑一座豪华的宫殿，这座宫殿拥有宽阔的池子、奢华的园林。为了赶工，有洛氏的百姓被迫一批又一批地派往建筑工地，以至于到了农忙时节，没有足够的人手收割庄稼，导致国家陷入饥荒之中，百姓叫苦连天。商汤便扛着“讨伐不义”的旗帜，发动了对有洛氏的战争，有洛氏的民众谁也不愿意为国君卖命，这个诸侯国很快便被商汤吞并。

商汤十分明白，他不仅要扩充实力，更要树立“仁义之师”的威名。

灭了有洛氏后，商汤废除其苛政，让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令他声名鹊起。那些深受国君暴政的诸侯国，其百姓都恨不得商汤的军队赶快来帮助他们消灭暴君。可以说，政治与军事的双管齐下，为商汤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收服荆部落是商汤政治攻势的一例。

荆部落首领为荆伯，这可能是一个南方蛮族部落，商汤曾经要求荆伯归顺，遭到荆伯的拒绝。在灭了葛与有洛氏后，商汤的武装力量更强大，他大兵压境，对荆部落实施武力威慑。据《越绝书》的记载，商汤并没有采取强攻手段，而是施予怀柔手段，他派人送给荆伯一头祭祀用的牛。这是什么用意呢？据我猜测，这是向荆伯发出一个

信号，表明他无意灭掉其国。因为一旦诉诸武力，彻底摧毁了荆部落，那么荆伯就永远失去了祭祀的权力。荆伯收到这头牛后，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他估计自己不是商汤铁血兵团的对手，现在人家给了他一个台阶下，投降归顺才是硬道理。

尽管那个时代战争的规模很小，军队最多估计也就是几千人，但商汤的兵团战斗力十分强，他平生共有过十一次征战，从无败绩。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差点令商汤前功尽弃。

在降服荆部落后的第二年，即夏桀二十二年，商汤入夏邑朝拜天子夏桀，险遭不测。商汤为什么到夏都去呢？史料上没有提到，我估计是夏桀对商汤产生了怀疑。

在数次征伐后，商汤声名鹊起，许多部落前来归附于他。这显然引起了夏桀的警惕与不安，到底商汤是不是真的忠诚于夏王室呢？我想商汤前去朝见夏桀，应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夏桀命令他进京。

此时商汤虽然有了很大起色，但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夏桀，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肯公然反抗夏桀的命令。

商汤一入夏邑，夏桀立即把他逮捕，囚禁于夏台。

一个堂堂实力派诸侯，竟然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着实令人震惊。很显然，夏桀对商汤已经不再信任，而且还把他当作最大的潜在敌人。

不过，商汤侥幸地逃过一劫。一年后，他被释放了。

夏桀为什么把商汤放了，史料同样没有给出解释。我能想到的理

由，就是伊尹动用了种种关系解救商汤，估计妹喜又帮了大忙。商汤与少康一样，能够以弹丸之地创造奇迹，必不可少地而且是熟练地使用间谍。妹喜究竟是不是一个间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伊尹充分利用她的关系，使得商汤一次次地化险为夷。

当然，我相信伊尹在夏桀身边安插的耳目，绝不仅仅妹喜一人，这位圣人的另一面，是商部落中情局的首领，是克格勃的头儿。后来兵学巨擘孙子著兵法时，写到《用间篇》时，只罗列了两位间谍战大师，一位是伊尹，另一位是姜子牙。

《孙子兵法》还写道：“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伊挚就是伊尹，殷商的兴起，与伊尹在夏都的间谍活动是分不开的，兵圣孙武目光如炬，一针见血。

经历“夏台之囚”后，商汤比以往更加低调，征伐少了，但并不意味着他全面退缩了。其实被囚一事，对他来说还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他得到了众诸侯的同情。

夏桀一直想要加强中央的话语权，作为帝王，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他的方法与手段过于僵硬。

这位夏朝末代帝王的想法很单纯，谁敢违抗我，我就打击谁。可是你想想，夏朝中央政权已经有三百多年无法控制诸侯了，要这些诸侯一夜之间交出权力，这有可能吗？就算诸侯不敢公然与中央政权对抗，内心也有深深的抵触心理。

同样是征伐，夏桀的征伐令诸侯恐惧，而商汤的征伐却令诸侯归心，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我们不能不佩服商汤，他的政治策略远远比夏桀要灵活、明智。

商汤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唯武力论者，而是把自己塑造成为仁义的化身。每次征伐，都讲究一个师出有名，尽管他有个人算盘，可

是表面看过去总是大义凛然。你这个君主不祭祀、荒废政事，我就去讨伐；你这个君主骄奢淫逸，盖大宫殿、劳民伤财，我就去讨伐。

看到没有，商汤高举道义的旗帜，这足以收买人心，足以收买诸侯之心。

商汤这么富有道义感，却被夏桀投入监狱，这件事无疑令夏桀又背上了恶名。

在商汤被释放后不久，居然有不少诸侯前来归附于他，这就叫作因祸得福。我们必须承认，在伊尹的协助下，即使没有了征伐，商汤的政治影响力仍然在扩大。商汤懂得制造故事，把自己神话化。

关于他的一个故事开始传开了。

据说有一次商汤出门，看到捕猎者从四面张开大罗网，口中念念有词说：“但愿四面八方的鸟兽都落入我的罗网里。”

商汤听到这里，叹道：“这样做太绝情了。”

于是他下令把罗网撤去三面，只留下一面罗网，并祷告说：“鸟兽啊鸟兽，要是想向左逃命，就往左去，要是想向右逃命，就往右去，不听我的话就自投罗网了。”

这件事，当然说明商汤有些同情心，但也就仅此而已，对小动物的同情心，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经过包装大师（莫非是伊尹？）的包装，不得了，把商汤的境界拔高到了九霄云端。

怎么说呢？

“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汤的道德水准真是没得说，到了极致，都惠及鸟兽了。对这样的记录，别太当真，政治宣传罢

了。

对于商汤来说，他的对手并不只有夏桀，还包括诸侯中的霸主昆吾氏。

与商部落相比，昆吾氏的势力可谓是根深叶茂。

关于昆吾氏，史书上有一些说法，我们来看看。《史记·楚世家》说：“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侯伯就是诸侯之长，就是霸主的意思。夏代多数时间里，中央政权软弱无力，这有点类似于春秋时代，故而霸主也由此而兴起。在《白虎通义》一书里，甚至把昆吾氏与春秋的齐桓公、晋文公等并列为古代的“五霸”。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夏王室积弱已久，何以夏桀能突然崛起，以至于以商汤之雄才，仍不免遭到囚禁的命运呢？想必夏桀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支持力量，这股力量应该就是作为侯伯的昆吾氏。

昆吾氏是颛顼大帝后代的一个分支，以“己”为姓，“己姓”部落共有五个，分别是昆吾氏、苏氏、顾氏、温氏、董氏，其中又以昆吾最强。如果夏桀没有得到昆吾氏的支持，很难想象他有能力压制其他诸侯。

因此，商汤最大的对手，与其说是夏桀，还不如说是昆吾氏。只要消灭了昆吾氏，就斩断了夏桀的左膀右臂。

自从被夏桀释放后，商汤一直利用自己“仁义”的招牌，招揽众诸侯，一个反对夏桀与昆吾的联盟组成了。显然多数诸侯国的君主认为，与其被夏桀与昆吾氏统治，还不如拥立商汤，商汤出色的政治才华与军事才能是得到公认的。虽然夏桀这个人并不如后世所说的那么残暴，可是与商汤相比，他的能力还是差了一大截。

除了昆吾氏之外，夏桀手中还有另一张王牌：九夷之师。

尽管夏王室自从太康之后，对诸侯的控制力很脆弱，但对诸夷，也就是华夏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控制力则较强。比如夏桀的父亲帝发继位时，“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在夏王室所控制的诸夷中，最重要的是九夷，即东方的九个少数民族部落，分别是吠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尽管诸夷并非很强大，但每个部落派几百人，九个部落也能拼凑起几千人的大军。

我想商汤不一定从一开始就有推翻夏桀的想法，最初他很可能只想自保罢了，保持部落的独立性。可是经历“夏台之囚”后，他显然意识到，如果他不推翻夏桀，最终可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商汤一方面暗中联络诸侯，扩充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评估夏桀所能掌控的力量。

在商汤被释放后的第二年，谍战大师伊尹精心策划了一个局以探测夏桀的实力。

伊尹对商汤说：“您先暂停对夏桀的进贡，观察一下他的动静。”

商汤依伊尹之计，故意不按期缴纳贡品给朝廷。夏桀果然暴怒了，征召九夷之师欲征讨商汤。

伊尹分析说：“现在夏桀还能够征召九夷之师，我们尚不能与之争锋，还是先服软吧。”

于是商汤派人上朝谢罪，并奉上贡品，这才打消了夏桀征讨的念头。

要削弱夏桀的力量，首先就要对九夷部落分化瓦解。商汤与伊尹暗地里破坏九夷与夏朝廷的关系，对于谍战大师伊尹来说，搞反间计最为内行，散布小道消息，拉拢九夷，令九夷部落对夏桀失去了信任。

过了一年后，又到缴纳贡品的时间。商汤又依伊尹之计，还是不肯缴纳。这下子可把夏桀给气坏了，他又一次征召九夷之师。可是他哪里知道，经过伊尹的破坏，九夷已经不愿意听从朝廷的指令了。这一回，九夷之师并没有奉旨前来。夏桀所凭恃的两大力量已失其一，伊尹对商汤说：“可以讨伐夏桀了。”

经过三年的精心准备，商汤已经拥有了众多的盟友，他已是羽翼丰满，完全可以与夏桀及昆吾氏一决高低。商汤在战略上非常有远见，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夏桀，而是对准了昆吾氏。他完全可以打出“清君侧”的口号，这将使他不至于在政治上陷入被动，毕竟夏桀仍然是名义上的天子，仍然拥有至尊的地位。

十九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商汤是在夏桀二十六年，发动了讨伐针对昆吾氏的战争。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先打弱敌，消灭昆吾氏控制的小喽啰。商汤的第一个目标，是温氏部落。温氏部落与昆吾氏一样，同属“己姓”诸侯，实力稍弱。作为霸主，昆吾氏所能控制的诸侯（部落），除了温氏之外，还有顾氏、韦氏等。

商汤的军事才能是不容质疑的，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消灭了温氏部落。此役标志着商与夏的战争拉开序幕，中原逐鹿的好戏开场了。温氏部落被灭，令霸主昆吾氏大怒，老虎的屁股是轻易摸得的吗？昆吾之君立即给予商汤强硬的反击。

夏桀二十八年，昆吾带着一帮喽啰发动讨伐商汤的战争，夏末的诸侯战争迅速升级为全面内战。这时的夏桀应该会黯然神伤地发现，商汤的势力远远出乎他的想象。面对昆吾氏的挑衅，商汤毫不退让，他在景亳召开了诸侯会议。

我们在前面说过，整个夏朝漫长的历史，在历史记录里，只有开国者夏启与亡国者夏桀曾经召开过诸侯会议，其他帝王包括中兴之主少康、一代霸主后羿、寒浞等都不曾召集天下诸侯，至少史书上没写。此时商汤仍然只是诸侯，却能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召开诸侯会议，可见他已经争取到多数诸侯的支持。

昆吾氏发动的这场伐商之战，结果怎么样呢？

史料中没有提到。但不外乎只有两种结果：其一是昆吾氏被打败了；其二是昆吾氏主动撤退了。商汤肯定不是失败的一方，因为他马上反击了，先是攻取韦氏部落，之后又消灭顾氏部落。昆吾氏讨伐商汤无功，自己阵营的小喽啰一个接一个被清洗，胜利的天平完全倒向

商汤一方。

到这个时候，很多人意识到，天下要巨变了。想凭借武力号令诸侯的夏桀，在昆吾氏集团连战连败的情况下，已是风雨飘摇、草木皆兵。

大量的叛逃事件开始出现。

夏帝国的太史令终古，从夏都出逃，投奔商汤。紧接着，原本归附于夏桀的费伯昌，率领自己的整个部落向商汤投诚。

决战的时刻到了。

如果只是商部落单打独斗，未必能打赢昆吾或夏桀，可是商汤显然十分懂得利用资源，此时的他不仅仅是商部落的首领，也是盟军的领袖。《史记·殷本纪》有明确的说法：“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史记》的记录，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商汤之所以敢挑战夏桀、昆吾，乃是因为他统率的是一支诸侯联军；其二，商汤亲自持着钺上战场。钺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类似大斧头的武器，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也就是说，商汤扛着一把钺，并不是要冲锋陷阵，而是代表他有节制诸侯的权力。从这一点看，商汤已经做好取代夏桀的准备，而诸侯们业已默认他的领袖地位。

以《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商汤先率诸侯讨伐昆吾氏。在诸侯联军的强大威力下，昆吾伯没有信心赢得胜利，于是向夏都方向退却，打算与夏桀会师，共同防御商汤的凶猛攻势。商汤得势不饶人，他立即挥师，向夏都进军。

在征讨夏桀之前，商汤发表了一番动员演说，这篇演说又称为

《汤誓》，大意如下：

“你们大家都仔细听好了：不是我小子胆敢犯上作乱，只是夏帝犯下罪行，惩罚他乃是上天的旨意。你们可能会说：‘我们的首领也太不体恤我们了，为什么让我们荒废农活去讨伐夏室呢？’我已经听到你们的话，但我告诉你们，夏帝确实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惩罚他。现在你们会问：‘夏帝犯了什么罪呢？’他耗尽民力，在都城为非作歹，民众都倦怠了，不想拥护他。他们都这样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呢？我宁愿与你一起灭亡。’这就是夏帝的德行，所以我决心要征伐。我希望大家帮助我，实施上帝对夏的惩罚，我将重重地奖赏你们。你们不要怀疑，我绝不会食言的。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还要把你们孩子一起惩罚，或沦为奴隶，或处以死刑，决不宽恕。”

这篇战前演说，怎么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对了，想起来了，夏启当年征讨有扈氏时，也发表过类似的演说，就是《甘誓》。这两篇演讲词结构十分相似，甚至我可以说，商汤有明显抄袭的痕迹，有侵犯版权的嫌疑。

第一部分都是讲出师的理由。要打仗，总要让将士们明白为何而战，这就叫政治动员。商汤说，这个夏桀太坏了，他虐待百姓，我们是革命军，要去解放劳苦大众。这个目标多正义、多高尚。所以后来叫“汤武革命”，商汤要推翻压迫人民的夏桀政权，也就成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家。

第二部分是讲奖惩。你们好好干，奖赏大大的，我说到做到。要是革命意志不坚定，那对不起，我要惩罚你，还要株连你的后代，让你永远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当然从这点看，商汤虽然是革命家，但到底不是代表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数百年前夏王朝的开国者夏启说的那一番话，被商汤剽窃过来攻

击他的后代夏桀，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这真是历史的嘲讽。倘若夏启地下有知，不知当做何感想。

据《史记》所载，商汤作完讲演后，当即宣布自立为王，显然他丝毫不怀疑自己将击败夏桀与昆吾氏，取而代之。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吾甚武”，我相当的威武，着实有几分英武豪迈之气，于是自称为“武王”。

在正义热情的驱使下，商汤的士兵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战场上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夏桀的反动派军队如何能抵挡呢？

首战爆发于有娥氏部落的地盘，此役夏军大败，估计昆吾伯也在此次战斗中身亡，因为后面的几次战役，再没出现他的名字。

末代帝王夏桀落荒而逃，逃到鸣条之野，好不容易收罗些残兵败将。他刚喘一口大气，商汤的军队就追上来了，夏桀孤注一掷，做垂死之搏。在鸣条之野的大战斗，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战，是第一次王朝更替之战。此役打得非常激烈，战斗是在雨天进行，天上雷电交加，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地上兵戈交错，血水与雨水融成一片，浇灌大地。仿佛不仅仅是人类在厮杀，天神也卷进来，以雷神之锤呐喊助威。

在那个雷雨之日，夏桀输掉了战争。

鸣条之战后，夏桀如惊弓之鸟，逃往三腰（zōng）。

据说他的儿子淳维逃往北方的大漠地带，他的残兵败将与当地人融合，后来演变形成了匈奴民族。商汤不愿去理会淳维的北逃，他把眼光死死盯住夏桀，发扬“追穷寇”的精神，克服连续作战所带来的疲惫，又率诸侯联军进逼三腰。夏桀再咽失败的苦果，他从宫中携带出

来的各种宝贝，也成为商汤的战利品。

不过，夏桀又一次逃脱了。

他从三腰逃到一个名为郕的地方，可就算他有金蝉脱壳的本领，也逃不过覆灭的命运。在没有赢得最后的胜利之前，商汤是绝不会止步的。郕之战成为商、夏之间最后一次战斗，夏军的残余力量全部覆灭，夏桀也在战斗中被擒获，沦为阶下囚。

这场夏亡商兴的战争，到此以商汤的胜利宣告结束。

要如何处置夏桀呢？

商汤并没有把夏桀杀死，而是流放到南巢。为什么商汤不杀夏桀呢？我估计他是怕背上“弑君”的恶名。

商汤之所以能由弱转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擅长政治宣传，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正义的代言人。这么一个正义的人，要是被说成“弑君”，恐怕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反正夏桀已经是废人一个了，活着与死了也没什么区别，不如显示一下自己的宽容与大度。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称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后，把他给饿死了。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就这样覆灭了，商王朝取而代之。

应该说，商汤是一位比夏桀要好得多的天子，也更有才干。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一点，夏桀倒台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他多么作恶多端，而是因为他企图强化中央的权力，结果事与愿违，逼使地方诸侯联合起来打倒他。

商汤是一位英雄级的人物，起初他仅有七十里的弹丸之地，并不

具备雄厚的资本，可是他的勇气、胆略、智谋弥补了物质上的不足。伊尹不仅扮演了智囊的角色，也是首屈一指的情报战大师，他与商汤两人组成最佳搭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商汤对自己的武力一直沾沾自喜，还说了“吾甚武”这样的牛话，可见他本质上与夏启一样，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人。

孟子曾说他“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总共有十一次的征战，《竹书纪年》则记为“九征”。我收罗一下，商汤指挥的十一次战役如下：

（1）灭葛之战；（2）灭有洛氏之战；（3）征荆之役；（4）灭温之战；（5）伐韦之战；（6）伐顾之战；（7）征昆吾之战；（8）有娥氏之战；（9）鸣条之战；（10）三腰之战；（11）郕之战。

由上可见，孟子说“十一征”是有道理的。这十一次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汤讨伐诸侯、扩张势力的战争，包括灭葛、灭有洛氏、征荆三次战役；第二个阶段是讨伐昆吾氏及其小喽啰，包括灭温、伐韦、伐顾、征昆吾四役；第三个阶段是讨伐夏桀，包括四次战役。

那么《竹书纪年》为什么记为“九征”呢？这是把有娥氏之战与鸣条之战合并为一次，两次战役其实是一个整体，可称为“伐桀之战”；同样，三腰之战与郕之战也可以合并为一个战例，可称为“擒桀之战”。

这些战役都是商汤亲自指挥的，且每战必胜，我们若是仔细研究这些战例，就可以发现他在《孙子兵法》出现之前一千年，就洞悉了战争的秘密。他能在战场上缔造不败的神话，原因是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战，只要出击，就必定有十足的把握，用后世孙子的话说，就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在与夏桀实力悬殊时，他选择隐忍，并密集使用外交战及间谍战，在削弱对手的同时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实力相当时，他仍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以计谋探测对手可动

员兵力的多寡，当他发现夏桀还可以动员九夷之师时，明智地放弃对抗，继续臣服。不战则已，战必克之，这就是商汤的兵法谋略。

流放夏桀后，有大约一千八百个诸侯或部落前来朝见，并且强烈要求商汤继承“天子”之号。商汤当然摆出谦虚的模样，辞让了三次，在诸侯、诸部的坚决拥护下，他勉强接受了天子的称号。这样，一个新的帝国产生了，这个帝国便是“商”。

二十 贤相还是叛臣？

商汤以武力推翻夏桀，成为新帝国的天子，可是在他内心深处，却有着某种不安。为什么不安呢？马上能得天下，马下未必能治天下。

以前商汤能打败夏桀，是因为夏桀得罪诸侯，所以诸侯们愿意站在商汤这一边，对抗天子。如今夏桀已经倒台，共同的敌人已经不存在了，商汤成了天子，他与诸侯的军事联盟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如何维持与诸侯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看一篇商汤的重要讲话。

这篇重要讲话名为《汤诰》，可是史料又跟我们开了个大玩笑，竟然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这足以让我们相信所谓的史料是何等的不可靠。但我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抛开史料，那历史就成为一张白纸了。因此，明知史料不可靠，我们还是要勉强参考，并从中找出更合乎真相的一面。

《汤诰》是商汤征夏成功后，回到亳都所发表的一篇诰文。

我们先来看看《史记》中是怎么写的：

“三月，王亲自到了东郊，向各诸侯国君宣布：‘你们不能不为民众谋立功业，要勤于政事，否则，我要对你们严厉惩罚，你们可不要怪罪我。以前大禹、皋陶长期奔劳在外，为民众建功立业，民众才得以安居乐业。那时他们治理了长江、济水、黄河、淮河的水患，百姓才有了安居的场所。后稷教导大家播种五谷，民众得以种植各种庄稼。这三位伟人都有功于人民，所以他们的后代都能立国。与此相

反，蚩尤和他的大臣们扰乱百姓，上帝也不赐福予他们。你们得用先王的教导来勉励自己。倘若谁违背了道义，就不允许回国继续当诸侯，到时你们可不要埋怨我。”

在这篇诰文中，商汤的语气是严厉的，天子是有无上权威的。可是其真实性却颇令人怀疑，商汤的中央政府真的那么有权柄吗？

这点很难想象，不要忘了他之所以能打败夏桀，靠的就是诸侯的力量，刚刚班师回朝，他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吗？

那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版本，《尚书》中的《汤诰》，这里我只节录一部分，大意如下：

“上天护佑民众，罪人夏桀终于被放逐。天命是不会有差错的，它让人类像草木一样得以繁衍，又让我得以安邦定国。只是我实在不知道有没有得罪天地神灵的地方，我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凡是在我帝国统治的范围内，不能没有法度，不可傲慢放纵，你们要各自遵守你们的典章律法，这样才能接受上天的恩赐。你们要是做了善事，我不敢掩盖隐瞒；要是我犯了过错，我也不敢宽赦自己。这一切上帝都会看得清清楚楚的。要是诸侯们犯了过错，那就是我一人的过错；要是我一个人犯了过错，绝不会推卸责任给各诸侯。呜呼！如果能做到至诚，大概可以善始善终吧。”

注意对比一下这两个版本，会发现存在重大的不同。

在第一个版本里，商汤威风凛凛，很有天子气派。他警告诸侯，你们要不好好干活，我就要惩罚你们。可是在第二个版本里，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商汤对诸侯们提出一些要求，但没有一个字说到惩罚，反倒是非常客气，你们有过错算我的，我有过错不推给你们。

那么哪个版本更符合真实情况呢？

我认为是第二个版本。

商汤虽然成为新帝国的天子，可是他对诸侯仍然没有真正的控制力，这与后世的皇帝是不同的。这是现实造成的。商汤是一个军事天才，生平十一征全无败绩。不过我们也要看清一个事实：商汤所打击的对象，除了夏桀之外，只有寥寥几个诸侯。而当时天下有多少诸侯（或部落）呢？估计有数千个之多。

没有用武力征服这些诸侯国，就谈不上拥有真正的无上权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拿后世的例子来对比，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开

始出现。之后的各个朝代，无不是通过武力征服全中国，也唯有如此，才有皇帝的无上权威。在夏、商、周诸代，帝王根本不可能真正统治所有诸侯，这是读史者所应注意的一点。

《尚书》的记录显然比《史记》更为可信，商汤既然是在诸侯的支持下推翻夏桀，那么他理所当然要做出回报，要给诸侯们更多的权力，而不是从他们手中收回权力，否则他只能得到夏桀那样的下场，这也是商汤的明智之处。

在讲到商代后面的故事时，我们还会一再地发现，天子的权力是很有限的。

我们讲到商汤的伟大事业，不能忘掉他背后的智囊与灵魂人物：伊尹。没有伊尹，就没有商汤的事业。

在古代，伊尹是一位圣人级的人物，被认为是名臣的典范。可是我们必须说，对伊尹这个人，其真实的面目仍然扑朔迷离。在《孙子兵法》的《用间篇》中，伊尹是间谍战的大师；在《说苑》的《权谋篇》中，伊尹是权谋术的大师。一个深谙谍战与权谋的人，其内心世界势必难以被外人所窥。简单地给他贴上“圣人”的标签，未免把复杂

的历史人物道德化了。

商汤成为天子后，伊尹实际上成为了帝国的第二号人物，位高权重。

在伊尹的辅佐下，商帝国很快走向繁荣稳定，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帝国并没有陷入新一轮的战乱中。可以说，伊尹与商汤都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伊尹的身份，既是商汤的首席大臣，也是帝王之师，远非其他臣僚所能相比。正因为如此，在商汤去世后，伊尹便成为辅佐下任帝王的顾命大臣。

商汤在位的时间，有的书说是十三年，有的书则说是二十九年。商汤死后，其子外丙继承王位，但仅仅三年便去世了。帝国的第三任帝王是外丙的弟弟中壬，中壬在位时间同样很短，四年后也去世了。七年之内死了三任帝王，这对一个新兴的帝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觊觎王位的大有人在。以伊尹的才干及深谋远虑，其他人自然难以窥视帝王的宝座，可是他自己有没有这个野心呢？

第四任帝王太甲是前太子太丁的儿子，据说刚登基时，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帝王。孟子是这样说的：“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司马迁在《史记》中则写道：“（太甲）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这时伊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把商王太甲给流放了。

伊尹的做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夏代的后羿。

这两件事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其一，都是发生在新王朝的初期。被后羿所逐的太康是夏朝第二任帝王，太甲则是商朝的第四代帝王，而他与第一代帝王商汤也仅仅只隔了七年时间。这说明无论是夏朝还是商朝，帝王的权力从一开始就不是固若金汤的。

其二，太康与太甲都被认为是“失德”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君王。

可是伊尹与后羿又有不同之处：后羿本身是诸侯，有自己的军队与地盘；伊尹只是商王室朝廷的重臣，他并不是诸侯。

可以说，伊尹流放太甲，风险比后羿还要大。后羿就算失败，也可以逃回自己的地盘，继续充当军阀，而伊尹却没有退路。那么伊尹是如何政变成功的呢？有没有军队的支持呢？诸侯国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这些史书上只字不提。但我们可以料想，伊尹在商王的地盘内，势力是无人可及的。他历经商汤、外丙、中壬、太甲四朝，既是第一重臣同时也是帝王之师，他地位的得来并非靠资历，而是靠真才实学，这就决定了他对朝廷有极强的控制力。

问题是，伊尹流放太甲，究竟要干什么呢？他有什么目的呢？

《史记》的说法是，他要对太甲进行思想改造，让他反思，改恶从善。他把太甲流放到桐地，在这段时间里，朝廷政事，自然由伊尹自己打点了。这个流放期长达三年，太甲狠狠地反思过错，“悔过自责”，最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伊尹十分欣慰，便亲自到桐地迎回太甲，又恭恭敬敬地把他抬上帝王宝座。

太甲见到伊尹后，叩头谢罪道：“我小子不懂得道德，品行不够端正，因贪欲而败坏法度，因放纵而败坏礼节，结果给自己招来了罪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huàn，逃避）。以前我没听老师您的教导，没有做到克己复礼。今后还要仰赖老师您匡扶救助，虽然我没能善始，希望能做到善终。”

伊尹跪拜还礼道：“修身克己，以诚信之心同臣下齐心协力，这才是明智的帝王。先王成汤施惠于穷苦百姓，因而民众都愿意听从他，没有不乐意的。征伐不义之国时，邻国的人都这样说：‘我们都愿意成汤来啊，他来了我们就不会受罪了。’所以大王您应该要劝勉德行，向祖先们看齐，切忌安逸懈怠。遵守先王之道，对臣下有恭谦之

心。能看到远处才叫目明，能听从善言才叫耳聪。要是做到这些，老臣将永远追随你的美德。”

就这样，太甲从一位昏君变成一位明君，“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这桩政变，最后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收场。

这桩故事，流传了千百年。

可是随着一堆古墓书卷的出土，原本清晰的故事陡然间变得模糊了。这册书卷，就是我前面多次提及的《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自从出土后，就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我们来看看《竹书纪年》中是如何写伊尹与太甲的故事的：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即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这与孟子、司马迁的说法截然不同。《竹书纪年》明确写道，伊尹流放太甲，乃是自立，乃是篡位夺权。更令人惊骇的是，太甲不仅不是伊尹迎回的，而是自己潜逃出来，返回帝都复辟，杀死伊尹。这段历史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让人难辨真假。

在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背后，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伊尹两张不同的面孔：一张面孔是圣人、道德家；另一张面孔是权谋家、谍战专家。本来这是一体两面，但后来的儒家学者们显然不愿意让圣人的形象与权谋沾边，于是一个伊尹被剖开成两个人。但是种种史料显示，伊尹确实是精于权谋，而恰恰是这一点，让《竹书纪年》中的说法有了合理的依据。

尽管《竹书纪年》的说法曾经轰动一时，可是由于只是孤证，在

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类似的观点，故而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是非常少的。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对《竹书纪年》的说法要重视，因为它的资料较其他更古老，也更可靠。

现在所见伊尹之史料，多为春秋战国以后，这个年代距离伊尹已经有一千多年，如同我们今天看唐、宋史事，不一定十分清晰可靠，以讹传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竹书纪年》中所保存的商代史料，可靠性要超过《史记》，这一点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证实。如果该书中商代绝大多数史料的准确性得到确证，却独独在这一重大事件（应该是商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不可信，这未免显得奇怪。当然，我不是要下结论说《竹书纪年》一定是对的，只是想分析一下，伊尹篡权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能，有没有证据呢？

说实话，伊尹流放太甲的做法，有一点确实令人不解。

按照传统史学的观点，伊尹是贤相，他流放太甲是为了让他面壁思过。可是这里我们产生一个问题：伊尹既然认为太甲是昏君，何不干脆换一个君主呢？

应该说，伊尹有足够大的选择空间。

我们知道，商汤的儿子中，外丙与中壬都当过帝王，也就是说，外丙的儿子与中壬的儿子，完全有资格成为帝王。如果伊尹觉得太甲没有德行，完全可以从外丙或中壬的儿子中选取一人，立为新帝。以伊尹的权力，这样做根本没有任何技术难度，他为什么不做呢？太甲被流放在外，整个国家三年没有君主，这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既然没有君主，此时的伊尹已经是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退一步说，倘若伊尹真的想要改造太甲，太甲要是一直不悔改呢，他该怎么办？按照孟子、司马迁的说法，太甲是三年后悔过自新

的。假设太甲十年、二十年都不悔改，那么伊尹岂不是要一直摄政下去吗？如果伊尹真的那么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可以改造一个人的思想，当初他为什么要拥护商汤称王呢？他为什么不在夏桀被流放的时候，等待这个帝王悔过自新呢？

按照这个思路分析，《竹书纪年》里关于伊尹篡权的说法，有其合理之所在。

后人否定《竹书纪年》的说法，大抵有两个理由：

其一，与其他史料不符。

但正如我上面所说，除非这些史料比《竹书纪年》更古老，否则即便《竹书纪年》只是孤证，仍然可能是真实的。有的朋友可能要问，那么《竹书纪年》里面所载的太甲杀伊尹的说法，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没有被学者们所引述呢？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本是魏国史书，由于魏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故而继承晋国史书。春秋战国的文化重心一直是在东方，无论是先前的晋国还是后来的魏国，都没出现过大学者，有的只是纵横家与法家，他们关注的事情，都是现实的事情，或者是变法，或者是连横合纵的外交，并不热心去整理、普及、传播古代的文献。因此，魏国史书虽有对古史的完整记录，却不为人所知。

其二，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伊尹篡权后，太甲从流放地逃回来，发动政变，杀死伊尹后，又让他的两个儿子继承其家业。这个说法，令后世学者觉得很荒唐。

比如唐朝学者孔颖达这样说：“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杀之。则伊尹死有余罪，义当污官灭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复立其子，还其田宅乎？”倘若伊尹是个篡权者，死有余辜，怎么太甲在杀了他

之后，还会让他的儿子继承其业呢？

可是我却以为孔颖达的这种说法并不严密。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杀其父而重用其子，这是有先例的。我们前面说帝舜杀了鯀，却重用其儿子大禹，这便是一例。后世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周武王推翻商纣后，仍然把纣王的儿子封为诸侯。这种现象在西周、春秋、战国时代是屡见不鲜的，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当时的传统，与后世有很大不同。

其次，由于《竹书纪年》的记录过于简略，或许有其他内情不为我们所知。我大胆地作一个假设，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呢？太甲之所以能够逃出囚禁地，正是伊尹的两个儿子相助。有的读者可能会跳起来，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儿子还害老爹不成？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个史实，王莽的儿子还真的干过这样的事情，只是他没有成功，后来被老爹给杀了。

最后，还有一些当代学者，从甲骨文的卜辞入手，表明伊尹死后还成了祭祀的对象。卜辞文字难懂，我是看不明白的，不过伊尹受到宗庙配享，这个是有许多资料可以佐证的。比如屈原的《天问》里就有：“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既然伊尹死后还得到那么高的待遇，那么他能是个篡权者吗？能是叛国者吗？

但我认为这种见解只是寻常人家的见解罢了，非政治家的见解。伊尹乃是商汤立国的第一功臣，其功绩无人出其右，就算他晚年真的有篡权之企图甚至有篡权之实，都改变不了开国功臣这个角色。在伊尹死后隆重祭祀他，正可以彰显君主不忘恩负义的美德呢。其实这种伎俩在后世常被使用。譬如清朝便有多例，张苍水一生抗清，被杀害之后，乾隆皇帝还给他修墓立碑，加谥“忠烈”，牌位入“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同样，郑成功也是一例，他是清朝的劲敌，死后清政府

也给他加了个“忠节”的谥号，“享俎豆于舜日尧天”。生前是敌人，死后就不一定还是敌人，政治家有自己的目的，这一点值得注意。

我并非认定《竹书纪年》的记录一定真实可信，对于如此久远年代的史事，实在是很难弄清真相了。然而，古代的历史一直只是被当作一种政治工具，越古老的历史，越容易被人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人迷信先人更甚于神祇，把古代的贤人拿来一包装，于是乎圣人一个个冒出来，完美无瑕。儒家讲“君君臣臣”，君得有个君样，臣得有个臣样，那是什么样子的呢？于是榜样就出来了，君就是尧、舜、禹、汤这样，臣就是皋陶、伊尹、周公这样。

古代圣人是儒家政治理论的一块大基石，可是正如杨衡之所说的：“人皆贵远贱近，以为当然。”为什么会“贵远贱近”呢？随着文字的普及，历史记录的日益详细，人的不完美就体现出来了，不再是凭空想象了。想象总比现实完美，因而宁可相信在很久很久以前，人是可以完美无缺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圣人多生活在上古时代，秦以后能称为圣人的，就少而又少了。

除非我们可以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三千多年前去窥探真相，否则伊尹之谜，可能永远也难以解开了。

二十一 大迁徙：盘庚迁都

伊尹之后，商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平淡无味的时期。史书里又是沉闷地记录历代商王的流水账，并没有很多故事，我在这里简明扼要提一下。

太甲在位时间共计十二年，他应该是个不错的君主，因此被尊为“太宗”。商代不像后世那么注意虚名，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有尊号或谥号，只有特别杰出的帝王才有，因此能被称为“宗”的人是很少的。太甲之后一直到盘庚，其间的帝王分别是沃丁、太庚（《竹书纪年》称为小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祖乙、外壬、河亶甲、祖辛、祖丁、沃甲（《竹书纪年》称为开甲）、南庚、阳甲，共计十四位帝王。我们看商代帝王的名字很有意思，都包含有十天干的一个字，而且是最后一个字。这种命名法，在夏代就出现了，比如夏帝中有胤甲、孔甲等，但并不普遍，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命名。

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代帝王以“天干”为名字，其实对应的是他的生日。古代以天干地支纪年纪日，生日这天对应的天干是什么，就拿来做名字的最后两个字。这样还不够，遇到同样“甲”日出生的，如何区别呢？因此前面还要加一字来区分。譬如都是“甲”日出生的，有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阳甲等，尽管我们读起来很乏味，但毕竟有些许差别了。

从太甲到阳甲，商帝国并非一帆风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第一，商帝国曾经几度中衰。

据《史记》载，到了商帝国第八任帝王雍己时，商帝国对诸侯的

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诸侯开始不来朝见。然而第九任帝王太戊重振雄风，恢复了帝国的威严。到了第十二位帝王河亶甲时，商帝国又一次衰弱，一直到第十四位帝王祖乙，又扭转局面，实现中兴。然而到了阳甲时，商帝国又一次衰败。

尽管史料含糊其辞，但我们大致对商帝国的历史有了个笼统的印象：几起几落，两度中兴。两位中兴之君分别是太戊与祖乙，他们也是商帝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两位帝王。我在前面说过，商代谥法制度刚刚兴起，但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有谥号，只有少数极其出色的帝王才有谥号。除了被尊为“太宗”的太甲之外，还有一位帝王被尊为“中宗”。中宗究竟是谁呢？

依《史记》的说法，中宗是第九任商王太戊，而后来出土的《竹书纪年》则明确地记录了第十四任商王祖乙才是中宗。究竟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谁也没法证明谁是谁非，直到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才彻底解开谜团。在一片刻有文字的龟甲上，写有“中宗祖乙牛吉”六字，在商代古文物前，真相浮出水面，祖乙才是真正的中宗！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错的，《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竹书纪年》在古史研究中具有其他书籍所不可企及的价值。

尽管在太戊与祖乙时有过两次短暂的中兴，但商帝国总体上在走下坡路，其中的原因在于内部争权逐利加剧。商帝国在继承人制度上，没有定法，经常弟弟继承哥哥的帝位，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又为争夺权力而大打出手，造成政治上的频频动荡。

第二，商帝国频繁迁都。

据《史记》所述，商最初的都城是亳，中丁时迁到隰，河亶甲时迁到相，祖乙时迁到邢。《竹书纪年》的说法与《史记》有不同之处，称中丁时迁到囂，河亶甲时迁到相，祖乙时迁到底，南庚时迁到

奄。

依《史记》，商帝国迁都三次；依《竹书纪年》，迁都四次。后来盘庚把首都迁到殷，在《尚书》中的《盘庚上》中，曾提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就是说，盘庚之前，商帝国已经建过五个都城了，初都亳，后来迁都四次，总计是五都。由是对比，又足以印证《竹书纪年》的记录较《史记》更为精确。

如此频繁的迁都，在中国历史上诸王朝中并不多见，一方面这可能跟政局多变有关；另一方面可能跟自然灾害的威胁有关。

盘庚是商帝国的第十九位王，也是商代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他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把商都城迁到殷，这是商帝国最后一次迁都，一直到商灭亡为止，共计二百七十三年，结束了商代频繁迁都的历史。第二，他实现了商帝国又一次复兴。第三，他留下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也就是《尚书》中的《盘庚》三篇（有的版本合并为一篇），这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据《史记》述，这份文献是盘庚去世后，大家为纪念他迁都之功而追记的，可视为盘庚的思想记录。

在盘庚之前，商帝国已经迁都四次，迁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令民众苦不堪言。当盘庚决心第五次迁都时，可以想象会招到多大的反对，那么他为什么执意要迁都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去分析。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极少数的资料里去寻找蛛丝马迹。

首先我们看看盘庚登基时的历史背景。

《史记》中写道：“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中丁开始，商帝国便频频陷入权力斗争，尽管其间祖乙曾有过短暂的中兴，但总体上内部政治混

乱，派系斗争激烈，也失去了诸侯国的支持。盘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帝位，可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先王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我们可以推测，刚刚上台的盘庚，地位并非安如泰山，一则要面对国内野心家的挑战，二则诸侯离心离德，这些诸侯曾是帝国的屏藩，保护中央政权免遭蛮族入侵。当诸侯拒绝效忠朝廷时，商王室不得不亲自组织军队抵御蛮族，中央政权表面上是天下至尊，实则孱弱。

还是回到原始文献《盘庚》三篇，看看盘庚本人是怎么回答迁都的问题的。

《盘庚》第一篇说到迁都的理由是：“重我民，无尽刘。”意思就是说，为了重视民众的生命，免得遭遇灭顶之灾。在第二篇中又说道：“殷降大虐。”就是说商帝国遭遇到巨大的灾难。

到底是什么灾难呢？史料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认为是水灾，毕竟黄河一直以来水患频频，首都遭到洪水的威胁，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是水灾，那么对于都城奄的百姓来说，应该是司空见惯，不可能到盘庚时才有水灾啊。那会是某种极厉害的传染病吗？显然不可能，如果有这种传染病存在，不用盘庚下命令，大家早就逃得远远的了。最可能出现的灾难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蛮族的威胁，特别是来自西部蛮族的威胁。

我们来看一则史料。

《今本竹书纪年》里记载：“（阳甲）三年，西征丹山戎。”《古本竹书纪年》则记为：“和甲西征，得一丹山。”和甲就是阳甲，他是盘庚的哥哥，也是前一任商王。我们对照《史记》中的记载：“帝阳

甲之时，殷衰。”也就是说，商帝国在衰败之时，阳甲仍然发动了一场西征，讨伐丹山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西部的戎人势力正在不断地增强，对商帝国的威胁越来越大。

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盘庚所面临的困境：西部蛮族的势力正迅猛扩张；原本拱卫中央的诸侯不再听从调遣；国内政局混乱，已经“比九世乱”（《史记》语）。我想这时盘庚实际能控制的，可能只有帝国首都及其附近的一小块地盘而已。我们不知道盘庚执政初期，西部蛮族有没有发动大举进攻，但是商帝国已经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却是事实。

此时盘庚的最佳选择，当然是把帝国首都迁移到东部，以避免西部蛮族的兵锋。但是倘若盘庚迁都仅仅只是退避，又谈何伟大呢？他的策略只是以退为进，先建立起一个稳固而牢靠的大后方，然后才能重振商帝国的雄风。我们从《盘庚》第一篇中可以看到这位新帝王的志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zhǐ，平定）绥四方。”

盘庚迁都的背后，是怀抱着伟大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复兴先王的伟大事业，安定四方。所谓安定四方，就是消除帝国内部的纷争，重新得到诸侯的支持，降伏蛮族部落，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业。

然而盘庚始料不及的是，迁都计划遭到民众的广泛抵制。

这是可以理解的，盘庚迁都之前，商帝国的都城奄使用年限是很短的。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南庚三年，商朝都城由庇迁到奄，三年后，南庚去世。接下来的帝王阳甲在位时间仅仅四年便去世，盘庚继位，盘庚十四年迁都于殷。如此算下来，奄城作为首都的时间只有二十一年，年限很短。

大家想想，当年从庇迁都到奄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民众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初修建奄都的那些人，多数应该尚在世，又要面临新一轮的迁都，新一轮的筑城，这不是折腾人吗？

此时民众的沮丧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这对盘庚可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不错，作为帝王，他有权发布命令，强迫民众迁都，然而这是有政治风险的。商帝国权力斗争的传统由来已久，觊觎王位者大有人在，若是他失却民心，可能会诱发政变的严重后果。怎么办呢？盘庚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迁都计划，又得说服民众，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可是盘庚不愧是一名伟大的领袖，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当时可没有电视广播这些东西，就算贴上布告，大家也未必看得懂，那个时代识字的人恐怕是稀有动物。他用了一个土办法，把王室亲戚、贵族们叫来，要他们上街向民众宣传迁都的必要性。可问题是，这些皇亲国戚中也有很多人不愿意迁都，叫他们出去宣传，他们会不会阳奉阴违呢？

盘庚对他们强调说：“你们不能把我规劝民众的话隐匿不讲。”

确实有一部分官员不仅没有向民众传达政府的政策，反而煽风点火，企图以民众的不满来阻止盘庚迁都。对此，盘庚愤怒了，他严厉地警告说：

“要是不把我的善言传达给百姓，那你们是自种祸根，干出祸害奸宄之事，是自取灭亡。若是诱导百姓做恶事，就得承担后果，到时你们追悔也来不及了。你们看看小民，他们还知道听从规劝的话，唯

恐祸从口出，何况我还掌握着你们的生杀大权。你们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而擅自用无稽之谈蛊惑民众？如果爆发了动乱，就会像大火燎原一样，连靠近都不行，怎么扑得灭呢？倘若如此，是你们咎由自取，不是我的过错。”

最后，盘庚告诫道：“你们要把我说的话相互传达，自今往后，做好本职工作，尽到自己的职责，不要信口雌黄。否则的话，惩罚就会降落到你们头上，后悔也没用了。”

从这些话里面，可以看出反对迁都力量的强大，更可看出盘庚坚定不移的信念与铁的手腕。在盘庚的严厉警告下，原本阳奉阴违的官员不敢不认真执行命令，不然说不定哪天脑袋就搬家了。

他们向民众宣传什么内容呢？

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第一，迁都是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免受巨大灾难的威胁。第二，占卜的结果显示旧都不适合居住，得迁新都。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占卜的结果，是因为商代乃是最为迷信的时代，什么事都得占卜。第三，援引商代迁都的历史，说明这是顺应天命。第四，只有迁都才能重振先王的伟大事业，才能安定四方。

在政府执着不懈的耐心劝导之下，多数民众最后还是服从盘庚的命令，陆续渡过黄河迁往新都殷城。

仍然有顽固者，拒绝迁徙。

看来还得盘庚亲自出马才行，他把反对者邀请到王宫。这些百姓平常估计也难得见帝王一面，进到王宫之内，大家都毕恭毕敬。盘庚以极其诚恳而又不失严厉的语气对他们说：

“如今殷商面临深重的危机，先王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安心

住在他们所建造的宫室里，而是只考虑百姓的福利，迁徙到更合适的地方。我现在所做的，正是先王们当年做的事。我是要保护你们，让你们生活更加安定，而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什么要惩罚你们。我呼吁你们都搬迁到新的都城，这是为了你们，只要努力，一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今我要求你们迁徙，是为了安邦定国。但你们却不能体恤我的苦心，不愿意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你们为什么不说出来，看能不能打动我的心呢？你们是自寻苦恼，这就好比乘船，你们把东西都搬上船了，却迟迟不渡河，岂不是要让这些东西发臭发烂吗？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们上了船，却不愿聚精会神，那么船就会被打翻而沉没。你们这样拖拖拉拉、延误时日，只知闷声生气，这样又有什么用呢？你们没有长远的打算，也不想去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们只顾现在，根本不考虑将来，这样还能指望上天救助你们吗？”

最后，盘庚说道：

“今天，我已经把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告诉你们，你们要体恤我的良苦用心，君臣之间不要因疏远而产生隔阂。你们应该同心同德跟随我，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干扰，在内心要有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至于那些为非作歹、放肆无礼、奸邪狡诈之人，我要视他们罪行的大小，施予劓刑乃至死刑，让他们断子绝孙，不让他们的后代在新的都城繁衍生长。到新的都城去吧，到那里开始新的生活。我现在就要带着你们迁徙，在那里将建立永久的家园。”

盘庚的这些话，先礼后刑、先恩后威。你想想，这些小民们进了王宫，原本就被帝王家的气势压矮了半截，现在盘庚大帝又这番苦口婆心外加大棒，大家还能说“不”吗？得了，看来不搬也得搬了。

在一片反对声中，迁都工作终于勉强完成了。对盘庚政府来说，

这是一次大考验，倘若没有广泛的动员工作，迁都有可能酿成一起巨大的灾难。只要商朝的都城出现动荡，各种政治力量就会卷入这场漩涡之中，搞不好可能造成帝国的垮台。但是盘庚像一个老舵手一样，以巧妙而高超的手腕，化解了危机，让帝国之舟得以平稳靠岸。

盘庚迁都，并不是整个新都城全部建好才迁居，而是边迁边建，这显然与人手不够有关系。从这点来看，证实了我的猜测，盘庚时代，帝王的权力仅限于都城一带，否则盘庚完全可以动员全国力量先筑好城、修好宫殿后再搬迁。事实上，盘庚迁到殷地时，这里的基础设施仍很薄弱。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早在夏朝帝芒时代，商部落就曾迁居于此，因此在这里有一定的基础。不过作为新的都城，殷都需要建造更多的房子以供居住，这是很大的工程，也十分艰巨。

可以料想，许多人内心还是满怀怨恨的，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盘庚不敢松懈，他还要继续宣传鼓动，因此他把民众召集在一起，又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

“你们不要懈怠，要全力以赴完成伟大的使命。现在，我敞开心胸，把自己的志向告诉你们，我的百姓。我不会惩罚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当然，你们也不要怒气冲冲地联合起来诽谤我。”

“我的先王为了开拓事业，曾经迁徙到山上，以消除灾难，振兴国家。如今我的百姓流离失所，没有一个永久的居住地。你们也许会责备我说，为什么要扰动万千民众来迁都呢？我必须明确地回答你们，这是因为上帝要重振我高祖的事业，恢复我家族的荣光。我抱着笃敬之心，顺天承命，要把这个新的都城建成永久的

居住地。我年轻，经验也不足，并不是我不听众人的意见，迁都这件事，是经过占卜的，我不敢违背占卜的结果，这是天命，我们理应将其发扬光大。”

“各位方伯、大臣、百官执事，你们可能还有若干不满藏在心里，但你们要以恭敬之心为百姓着想，在这件事情上我要考察你们。对于那些贪财之人，我绝不会任用；对那些能为生民谋利、为民众谋求安居乐业的人，将赢得我的尊敬与提拔。今天我已经把心里话都告知你们了，希望你们不要置若罔闻。不要总想着发财致富，利民厚生才是伟大的功业，对民众要施行德政，这一点要永远铭记在心。”

从盘庚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雄心壮志。迁都对他来说，是重振商帝国雄风的第一步。他曾多次强调，这次迁都乃是一劳永逸，这里将成为永久的居住地。事实也是如此，一直到殷商灭亡，帝国之都再也没有变更过。这说明盘庚的眼光远大，择都的选址确实非常理想，以此终结了商帝国频繁迁都的历史。这也使得政府有了更大的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解决各种危机与隐患。

根据《史记》的说法，盘庚迁都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继太戊与祖丁之后，盘庚实现了商帝国的第三次中兴，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各路诸侯又纷纷来朝。

盘庚在迁都之后，究竟做了哪些事，史料残缺。然而，商都东迁到殷，确实是商代的一大重要事件。正是因为政治中心稳固下来了，才有了商代后期灿烂的文明。

殷都位于河南安阳市的小屯村，中国历史上有众多都城，殷都是考古发现中确认证实的最古老的一座都城。殷墟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殷商的器物文明也浮出水面。在此之前，甚至有学者怀疑商朝是否真实存在过？殷墟的发现，揭开了历史神秘的面纱，在这里发现了商代大规模宫殿宗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上面所刻的文字有四千多个，现今能辨认的只有三分之

一左右。

出土的殷墟青铜器可谓是商代器物文明之代表作，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后来称为“后母戊鼎”），重800多公斤，几近一吨，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梁漱溟先生称中国之文明乃是早熟之文明，岂虚言哉？当世界多数地区的人还在茹毛饮血之时，殷商就已经步入高度文明的阶段。尽管殷墟出土的文物并不出自盘庚时代，但若没有盘庚一劳永逸之迁都，创造稳固之政治基地，岂能有商后期之灿烂文化？故而盘庚实有再造殷商之丰功伟绩。

二十二 武丁大帝（上）：

三年不语

我在前文中判断，盘庚迁都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异族侵犯之威胁，他把都城东迁乃是以退为进的策略。这一判断，似乎能从武丁大帝开拓四方的史实中得到印证。

盘庚在位二十八年后去世，把王位传给弟弟小辛。小辛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帝王，在他统治期间，殷商中央政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在古代各王朝，君主的能力与国势的强弱有着密切的联系。小辛去世后，又传位给弟弟小乙，武丁就是小乙的儿子。

在商代众多帝王中，武丁是非常特别的一人。他出身于高贵的帝王之家，却不愿成为一朵温室里的花朵。从年轻时代始，他就放弃了宫室里奢华的生活，长期生活在民间。据说这是父亲小乙有意安排的，显然是想让武丁多了解社会实情，为未来的接班做好准备。

武丁曾经在老师甘盘那里学习历代先王的统治术，后来他做过一次漫长的旅行，遁迹于荒野，“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就是说长期劳苦于外，认识了许多底层民众，了解民间疾苦。他的行程十分远，从荒野到黄河，又游历旧都亳城。后来他回顾这次旅行时，认为自己没能取得预期的进步，这里他所说的进步，可能是思想上的突飞猛进。但我们必须说，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才开拓了武丁的眼界，并让他有宽广的胸怀，而这正是伟大人物所不可或缺的。

小乙去世后，武丁继位，成为商帝国历史上的第二十二位帝王。居九五之尊，并没有让武丁开心，相反，他却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这种忧虑源于他内心深处所怀抱的雄心壮志，他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

的事业，可是千头万绪，却不知从哪里入手。尽管盘庚迁都为商帝国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只是开端罢了。虽然诸侯又陆续来朝，却并不见得真心拥护。前面说过，商汤开国是凭借诸侯的力量，因此中央政权对诸侯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罢了，只要哪个帝王暗弱，诸侯就不愿意来朝见。更大的问题是，周边蛮族的威胁在不断加剧，武丁必须好好思考国家的未来。

武丁以守丧为由，闭门谢客，在三年守丧期间，多数时间是一人独处，一句话也没说过，把国家政事都交给冢宰（宰相）处理，这就是“武丁三年不语”的故事。

我们不能不承认，武丁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三年时间像哑巴一样，一声不吭，这绝非常人所能做到。好不容易等到三年丧期满了，武丁仍不开口说话，这下子把大臣们急坏了，便纷纷劝谏道：“天子统治天下万邦，百官遵守法令。天子所说的话就是法令，您要是不吭声，臣下就无以从命了。”

武丁很有意思，他还是不开口，只是用文字的方式回复说：“我想做天下四方的表率，可是唯恐德行与地位不相配，所以不说话。我怀着恭敬之心，默默地思考治理国家的方法。我做了个梦，梦到上帝派遣一位良臣来辅佐我，他将代替我发言。”

有意思的是，武丁还画了一幅人像，画的就是梦里见到的那个贤臣，让臣子们去把这个人找出来。大臣们一听，都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几年不说话，把武丁的脑壳给憋坏了呢？梦就是梦，哪能当回事呢？找寻梦中人，岂不比海底捞针还难吗？大家面面相觑，私下里都认为武丁昏了头。可是既然是王的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还是好好找找吧。于是他们遍寻全国，您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一个跟画像颇相似的人，把他带回了王宫。

话说寻来的梦中人，名唤傅说（yuè），职业是一名泥水工，当时正在傅岩之野修筑城墙。有人会说，用做梦这种方式选拔人才，岂非奇葩吗？武丁乃是商朝漫长历史中最出色的一位君王，他的地位相当于汉朝的汉武帝，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大帝，难道他竟是个糊涂蛋吗？或是他在冥冥之中获得了某种神启的智慧呢？

是否真有神启，我们当然不知道，所以宁可不讨论这一点。结合武丁早年游历四方的经历，或许可以认为，武丁从茫茫人海中把泥水匠傅说选拔上来，并非是真的梦到什么神人，而是他早年游学时就可能认识傅说，至少曾听过他的贤名。我们发现武丁大帝喜欢玩深沉，先是三年不语，再是梦中求贤，真是把各位大臣搞得云里雾里，谁也看不清帝王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别人看不透，武丁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作为一个帝王，为什么要让别人看穿看破呢？只有搞些深沉的玩意儿，才能令人神秘莫测。不要忘了，武丁年轻时就跟专业老师学过帝王之术，帝王之术是什么玩意儿，我们从后世申不害、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可领略一二。譬如申不害曾这样说：“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权；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一位君王，应该要“设本”、“治要”、“操柄”，操柄就是操生杀之权柄。史学家钱穆把申不害理论归纳为：“所以教其上者，则在使其下无以窥我之所喜悦，以为深而不可测。夫而后使群下得以各竭所诚，而在上者乃因材而器使，见功而定赏焉。”这就是驾驭群臣之术。其实说到帝王术，申、商、韩都只是武丁大帝的学生，最厉害的人，不是把理论说出来的人，而是默不作声实践的人。

后世孟子曾说过一句话：“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掌也。”这位儒门圣哲一生推崇道德的力量，然而对武丁“运掌天下”的本领，他还是由衷地佩服。什么叫运掌天下，就是把天下捏在自己的掌心，随

自己搓弄。

一个如此有心机的帝王，做什么事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表面看过去，这个人很另类，试想想有谁能“三年不语”，当哑巴达三年之久呢？别人做不到，但武丁做到了，这就是他坚韧意志力的体现。我们宁可认为，武丁以一种极不同寻常的方式砥砺自己，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他为什么要三年不说话呢？我想乃是借这个机会，仔细观察大臣们的表现，但他发现身旁这些人多数没有真才实学，才决定从民间选拔人才。

泥水匠传说成了时代的幸运儿。

孟子曾经写过：“传说举于版筑之间。”版筑是泥水匠的两样工具，版就是墙版，筑就是杵。古代筑土墙，先用两片版相夹，往里面填泥，再用杵捣实，传说就是干这活儿的，属于社会底层平民。孟子对武丁从民间提拔贤人有着高度的评价，他肯定不相信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仅仅是因为一个梦而破格任用传说。

当传说被带到王宫大殿之上，所有人对武丁的做法都大吃一惊：商王居然让这名泥水匠担任相国！

三年不吭声的武丁终于开金口说话了，他对传说道：“您要早晚向我进言，帮助我推行德政。若是要打造青铜，您就是磨石；若是要渡河，您就是舟楫；若是逢大旱，您就是甘霖。开启您的心扉吧，用智慧灌溉我的心田。良药总有副作用，不然就治不好病；赤脚走路要是不留心看地板，就容易受伤。您和您的同僚，要同心协力匡正我的过失，让我遵循先王的教导，追随高祖成汤的道路，以安定天下万千万百姓。”

你想想，传说从一名泥水匠突然成为国家重臣，他能不尽心竭力吗？他不能辜负武丁大帝的重托，于是以坚定的语气答道：“木材用墨绳拉过就可以取正，君王能从谏如流就是圣明。君王圣明，臣下不

必等君王下命令就会自告奋勇进谏，若是君王的命令是正确的，谁敢不听呢？”

武丁的用人之术，果然不拘一格。

看上去很荒谬，实则不然。

说实话，我不相信传说的走运是因为武丁一个不可思议的梦。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人莫名其妙地福从天降，比如王莽篡汉时，为了迎合所谓的预言，从民间提拔过两个平民百姓，可是这两人没有才干的匹配，最后也只能默默无闻了。一个人伟大与否，并不在于他身居什么地位，而在于他拥有一颗怎样的心灵。武丁应该早就知道传说这个人，而且能把传说的人像画出来，应该是见过的，或许颇有交情。他之所以故意编了个梦的谎言，既是为了顺利提拔传说，同时也是故意搞些小动作，增加自己的神秘感。殷人迷信惯了，用这种小伎俩，更能够让臣民们瞠目结舌，这对统治是有利的。

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朝廷的官员那么多，何以武丁要煞费苦心从民间找来一个毫无背景的传说为相呢？

这就必须说到商代朝廷的政治斗争。

以现存史料分析，商代王权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稳固的王位继承人制度。与后世长子继承制不同，商代很多帝王是兄死弟承，这大约是考虑到年长者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以武丁之前的几个帝王为例，盘庚传位给弟弟小辛，小辛传位给弟弟小乙，小乙没传位给弟弟，或许他没弟弟了，就把王位传给了儿子武丁。问题来了：盘庚的儿子、小辛的儿子肯定对这种结果十分不满，同样是王的儿子，凭什么只有你武丁当王呢？武丁继承王位，朝廷之中的反对势力肯定暗流涌动。在这种情形下，他显然更希望由一个没有派系背

景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左右手，而泥水匠传说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史记》中说，传说的到来，令“殷国大治”，可见传说确实是一代名相，虽出身低微，人格与事业却是伟大的。

《尚书》中有三篇《说命》，记录了武丁与传说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广为流传的名言是出自传说之口。他曾说过：“惟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成语“有备无患”的出处，到今天这仍然是一句真理。他还说过：“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是非常有名的，中国哲学史上有过“知易行难”、“知行合一”、“知难行易”等关于知与行的思想主张，推其源头，也是始于传说。另外，传说对古代“德政”的思想也贡献颇多，显而易见，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泥水匠，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怀的泥水匠。一个平头百姓怎么会对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呢？我怀疑传说可能也在武丁的老师甘盘那里学习过政治学，倘若如此，他与武丁非但相识，还算得上是同学。

武丁曾心怀感激地对传说说：“您教导我立志。就好比制酒，您就是发酵用的酒曲；就好比味道鲜美的汤，您就是调味的盐醋。您教导我，不抛弃我，我定要遵您的教导去做。”

传说回答道：“大王，人之所以要博学广闻，乃是为了建功立业。学习古人的经验教训就会有收获，倘若做事情不重视古代的经验而能长治久安，这是我所没听说过的。只有不断学习，人才会谦虚，不断努力，人才会变得聪明，完美的人格就是这样来的。牢记这些东西，就可以不断地积累自己的道行。”

大家读《尚书》，看武丁与传说的对话，会发现武丁真的很了不起。他不想说话时，可以“三年不语”，然而他一开口说话，文字措辞是很优美的，用的比喻是十分形象的，显然有很深的文学修养。

二十三 武丁大帝（下）： 运掌天下

在商代历史上，武丁是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的伟大功绩就是全面发动了对蛮夷的反击战，捍卫了伟大的商代文明。武丁去世后，被尊为“高宗”。在商代四百多年的历史里，能获得如此尊号的只有四个人，开国之君成汤尊为“高祖”、太甲尊为“太宗”、祖乙尊为“中宗”、武丁尊为“高宗”。四百年就只有四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百年一遇的名君。

关于武丁的历史资料，仍是少得可怜。河南殷墟大量甲骨片的出土，给我们认识武丁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证据。在武丁之时，殷商不断地受到外族的袭扰，而且主要集中在西面。从这里我们更加意识到盘庚东迁殷都的重要意义，要是没有盘庚的东迁，商帝国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在商帝国的外患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鬼方与土方，其中鬼方是最强劲的对手。

征伐鬼方是武丁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鬼方是何方神圣呢？

鬼方是商代中期崛起的一个游牧部族，为什么叫鬼方呢？“方”就是“方国”，相当于部落或国家，“鬼”就是这个方国的名字。古代历史文献中，关于鬼方的记录含混不清，所以也搞不清这个部族究竟分布在哪里。即便是两千年前的汉代，对商周时代的鬼方也毫无概念。

《汉书》之《严助传》有这么一句：“鬼方，小蛮夷也。”实际上鬼方绝对不是小蛮夷，而是大蛮夷。

这个方国或者蛮夷部落的名字为什么叫“鬼”呢？古代“鬼”就是“归”的意思，《说文解字》说：“人所归为鬼。”就是人死了，灵魂去的那个地方。灵魂去了哪里？谁知道哦，天国也好，地狱也罢，就是很远的地方。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鬼方就是指很远的蛮族部落。很远是多远呢？鬼方在哪儿呢？

有的说在北方，写有《搜神记》的东晋文人干宝说：“鬼方，北方国也。”

有的说在西方，三国时代学者宋衷认为，鬼方就是汉代西部先零羌的前身。

有的说在南方，即荆楚之地，明代大儒王夫之别出心裁地认为，楚人尚鬼，故叫鬼方。

有的说在西南，明代学者杨慎说法比王夫之还不靠谱，他认为鬼方在贵州，因为当地夷人把贵州叫成“鬼州”。

各种说法互为矛盾，令人越看越糊涂。

殷墟考古大发现让我们对鬼方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从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可以明确肯定一点，鬼方绝不是遥远的国度，其距离殷商不远，频频扰边，甚至攻打过帝国的城邑，是商帝国之一大劲敌。另外还可以肯定一点，鬼方是位于殷商的西部。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记有“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在同一篇里，又有“西落鬼戎”的称法，因此我判断，鬼方乃是属于西戎的一个部落。

近代学者王国维写有一篇《鬼方考》，他结合史料与出土器物，认为：“鬼方之地，当在汧陇之间，或更在西，自无疑义。”汧就是汧水，陇就是陇山。同时，他认为鬼方并不是《汉书》中说的“小蛮夷”，而是一个“强国”，是西北之一大势力。

武丁大帝是雄才大略之君王，也是小心谨慎之人。他上台后并没有急于发动对鬼方的战争，而是把精力放在巩固权力、治理国政上。在傅说的协助下，商帝国重振雄风，“殷国大治”。不过，傅说仍然告诫武丁大帝，不可轻启战事。

在《尚书·说命》中，傅说对武丁如是说：“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兹。”就是告诉武丁，不要轻易兴甲兵、动干戈、发动战争。这是因为国家的政治还没有理顺，攘外要先安内，否则一旦开战，必有后顾之忧。鬼方与殷商的对峙，颇为类似后来匈奴与西汉的对峙，最初蛮族一方是占有优势的，但最后仍以华夏的胜利而告终。

当年盘庚迁都，很可能就是受到鬼方势力的逼迫，不得不向东迁移以避其锋芒。在之后数十年里，鬼方的势力在武丁时代达到鼎盛。为了彻底打垮鬼方，武丁还在隐忍。这位能够三年不语的君王，也能够三十年卧薪尝胆。隐忍是必要的，因为商帝国看上去仍然不够强大。盘庚刚刚把国家弄得有点起色，他的弟弟小辛又搞砸了。武丁以三十年的努力励精图治，终于扭转小辛以来商帝国的颓势，国家稳定了，武力更强大了。

武丁大帝磨刀霍霍，拔剑四顾，心中豪气冲天。他要以锋利无比的刀锋，证明自己乃是天下第一等勇士，他要在史册上留下自己不朽的名字与勋业。

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征伐鬼方之役始于武丁三十二年，终于三十四年，前后三年之久。这一说法得到《周易》的印证，《既济》爻辞这样写：“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现代学者通过对甲骨文卜辞的研究，认为讨伐鬼方的时间是在武丁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尽管与《竹书纪年》略有不同，有一点是明确的：武丁伐鬼方在执政大约三十年后，战争大约持续三年。

以今天的眼光看历史，三年的战争确实算不上什么，咱们光打小日本就花了八年。但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三千多年前的战争，当时的人力、物力、武器、补给等难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即便到了春秋时代，战争仍以短平快为主，绝少有一年以上的持久战。因此，武丁讨伐鬼方的战争，绝对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具体经过，我们很难还原，不过从保留下来的卜辞里，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以及激烈程度。卜辞中提到“伐鬼方”、“征鬼方”、“围鬼方”等字眼总计将近两百次，以三年战争为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年大约一千多天，平均五天就有一次跟伐鬼方有关的卜辞，这个频率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那么武丁大帝动员了多少兵力呢？卜辞中有“登人三千”、“登人五千”的记录，所谓的“登人”，就是召集军队。在讨伐鬼方时，召集军队最多的一次是五千人，一般情况下是三千人，总计召集两万三千人次。当然，这个数字未必是完整的。在殷商时代，战争的规模比起后世要小得多，一方面是人口数量少；另一方面军队越多，后勤负担也越重。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不可能一次动员数万或十几万人。武丁大帝征召军队的极限并不仅仅是五千人，事实上，他还曾经“登旅一万”，就是召集一万军队，不过那并不是征伐鬼方，而是讨伐羌方。

对于武丁大帝讨伐鬼方，后世有过一些评论。

由于对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史料甚少，故而古代以来对此战争的理解有颇多错误。《汉书》中称鬼方是小蛮夷，这是错的，实际上鬼方是蛮夷中的佼佼者，势力极强。唐朝的孔颖达曾说：“高宗德实文明，而势甚衰惫，不能即胜，三年乃克。”话中的含义，武丁大帝虽然文治不错，但武功其实平平，对付鬼方这种小蛮夷，居然也花了三

年的时间。这种说法有点想当然，主要是因为商代的史料里，对蛮族的兴起并没有详细的记录，给人造成一种商帝国本来就应该雄视天下的假象。实际上商帝国真正能控制的土地，并非很辽阔，而且在数百年间多次上演衰败——复兴——再衰败——再复兴的故事。如果没有武丁大帝的中兴武功，商帝国可能无法延续四百多年之久。

经过三年的血战，武丁大帝终于打败了鬼方，在之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鬼方元气大伤，无力挑战殷商帝国。不过这个游牧部落甚为坚强，到了殷商晚期，再度崛起，成为帝国的一大外患。

除了讨伐鬼方之外，武丁大帝也对其他一些外族部落发动进攻，其中比较大的部落有土方与羌方。在这些战事中，冒出一个非凡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子多次出现在战场上，指挥大军作战。在殷墟发现妇好的墓室，其中还有两件铸有“妇好”铭文的大铜钺，这在古代是武力与权力的象征。一个女人死后，居然用大铜钺来陪葬，可想她生前是何等的了得、何等的威武。

鬼方溃败后，西部的氐、羌部落纷纷归附殷商，此后，帝国的西部总算摆脱了战争的威胁。

武丁大帝的武功还不止于此。

《诗经》里有一首诗这样歌颂武丁：“挹彼殷武，奋伐荆楚。”殷武就是武丁大帝，他曾向南讨伐荆楚。到了武丁晚年时，他还灭掉了两个不服从的诸侯，一个是彭氏，一个是豕韦氏。豕韦氏被认为是古代霸主之一，与夏代的昆吾氏一样，是颇有实力的诸侯。在解决了蛮族的外患后，武丁大帝把刀锋对准诸侯，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前面说过，商帝国实际上对诸侯的控制力度是很弱的，我怀疑武丁讨伐鬼方时，并没有得到多少诸侯国的支持。他的想法实际上与当年的夏桀

如出一辙，就是要强化中央帝国对诸侯的领导。

后来孟子有一句评价：“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掌也。”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形容得很贴切。天下对于武丁来说，就像握在掌中一样。他完成了三个十分艰巨的任务：第一，振兴商帝国中央政权，就我们所知而言，他让帝国得以安定繁荣，在政治上也不残暴，推行仁政；第二，打败了最危险的敌人鬼方，确保国家的安全；第三，铲除了最强大的诸侯，对其他诸侯起到震慑的作用。

武丁在位时间五十九年，在商代诸中兴君主中，他的功业应该排在第一位。也可以说，殷商在武丁时代达到最强盛，这也是武丁被尊为“高宗”的原因所在，至少在殷人看来，他的地位已经直逼开国君主成汤了。

武丁去世后，他的儿子祖庚继位。

祖庚尚能继承武丁的遗志，据说他还写过一篇《高宗之训》，不敢忘记父亲武丁的教导，不过这篇文章已经失传。祖庚去世后，弟弟祖甲继位。祖甲早年生活与父亲武丁颇为相似，他并不是生活在宫中，而是到基层，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体验民间疾苦。我估计这是武丁有意安排的，显然武丁大帝认为这种锻炼是必要的，要是底层民众的需求都不了解，如何治理国家呢？武丁大帝在位期间能施行仁政，跟早年游历四方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当权力没有外在力量节制时，只能依靠自己的道德水平与自制力。祖甲上台伊始，尚能克制自己，用《尚书》里的说法，“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他知道小民们的需求，能保护百姓的利益，帮助鰥寡老幼。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祖甲渐渐脱离群众，越来越贪于享受，政治也从开明变得残暴。到他统治的晚期，各式各样的刑罚名目繁多，百姓怨声载道。

可以说，祖甲是殷商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他在位共计三十三年。《史记》称：“帝甲淫乱，殷复衰。”《国语》则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把后来殷商灭亡的源头追溯到了祖甲身上。

祖甲之后的两个帝王平淡无奇，分别是廩辛与康丁，在位时间都不长，不超过十年。到武乙称帝时，殷商的光荣与梦想已是渐行渐远了。而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个部落蒸蒸日上、崭露头角，这就是周部落。

二十四 岐周的兴起

据说周部落的先祖乃是五帝之一帝喾的儿子弃，那是夏代以前了，周部落的真正兴起，却是在商代后期。在周的历史上，古公亶（dǎn）父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我们先来说说“古公亶父”这四个字的含义。“古公”相当于“先公”，这是后世周天子对于先人的尊称，“亶父”应该是他的名字。古公亶父对周的贡献，如同盘庚对商的贡献，他把周人迁居到了岐山。周人原先居住在豳（bīn）地（陕西省旬邑县），到了康丁、武乙统治时，这里遭到戎、狄等外族势力的巨大威胁。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商帝国衰败的体现。在武丁大帝时，与鬼方血战三年，解决了西部之外患，然而后来几代帝王的无所作为，又使得蛮族势力得以卷土重来。

当时的豳地在古公亶父的治理之下，兴盛发达，成为一方乐土。对戎、狄等蛮族来说，这无异于一块大肥肉。蛮族战士时不时到豳地骚扰，勒索财物。古公亶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不喜欢战争，所以每次蛮族人一来，就给他们一些东西打发走。可是你想想，这种做法在那个恃强凌弱的年代有用吗？确实没用，因为蛮族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根本不会知足，要求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要什么呢？要土地与人民。

这下子所有人都愤怒了，大家想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古公亶父却不想用武力解决问题，他对大家说：“自古以来，民众拥立首领，就是为了能替他们谋求福利。现在戎狄想攻打我们，就是为了掠夺土地与人民。你们属于我或是属于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如果要你们为我而战斗，让父亲与儿子横尸沙场，我能心安理得地当首领吗？我不忍心这么做。”

我觉得古公亶父这个人，颇有点耶稣的精神，你要，我就给你，我不跟你动粗动武，我搬家还不行吗？他决定搬家了。当然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古公亶父发现自己的部落根本不是戎狄的对手，就算拼了老命也是白搭。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闪人，我躲远远的，这样总行吧？

当时的情况不同今天，以前地广人稀，找个没人的地方安个家是很容易的事情，既不用掏银子买地，也不用缴这个税那个税的，所以迁徙是很普遍的。古公亶父打点行装要走了，带着自己的亲族，至于民众嘛，他让他们自由选择去留。因为古公亶父这个人很公正、很善良，民众们都愿意跟着他走，谁也不愿意被戎、狄这些整天喊打喊杀的蛮人所统治。就这样，大家拖儿带女，背着锅碗瓢盆，扛着包裹行囊，风餐露宿，踏上征途。他们把死寂一般的豳邑留给了戎狄。一路上他们跋山涉水，渡过漆、沮两条河流，越过梁山，最终来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后来便称为岐周。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北靠岐山，南临渭水，气候宜人，土壤肥沃。也正是迁居于岐周，这才有了“周”这个称谓。

被迫迁徙，可看出周人部落在这个时候并不强大，只是个很小、很不起眼的部落罢了。古公亶父并不是一个挥舞刀锋的武士，他没有赫赫武功，但他有自己的本事。在他的领导下，其族人在岐周站稳脚跟，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附近地区的民众也仰慕他的为人，纷纷前来归附，该部落的人口增多了，影响力也大了。

先前周人由于受到戎狄部落的影响，在生活上有颇多蛮族的习俗，显得文明程度不高，故而颇受华夏族其他部众的轻视。为了融入先进的中原文化，古公亶父决定作一番改革，把戎狄那一套生活风俗习惯扔掉，向殷商文明看齐。其中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行政上的改革，古公亶父设立行政机构，置官分职，改变了以前酋长式的粗放管理，同时划分若干邑落，营建城郭。这么一来，周部落开始有了国家的雏形。

尽管新家园的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古公亶父却总是愁眉紧锁，究竟有什么事让这个可敬的老人家心烦意乱呢？

这时古公亶父已一天天地衰老，这份家业以后要传给谁呢？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幼子季历。说实话，这三个儿子各有长处，能力与品德都不错。可是古公亶父更器重幼子季历，有两个原因：第一，季历这个人比较勇武，有军事才干。古公亶父当年被戎狄逼得迁徙，心里明白倘若他的部族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势必难以生存。季历天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这点很合老爹的胃口，虽然古公亶父是一位和平主义者。第二，季历的儿子姬昌，深得爷爷的欢心。古公亶父曾经这样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就是说，我们这一族将有王者兴起，这大概就是姬昌吧。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古公亶父可能懂点预测术或相人术，但更可能的是他对这个孙子十分偏爱。

古公亶父想立季历为接班人，问题是长子太伯与次子虞仲也是贤才，让老大与老二屈居老三之下，当父亲的有点过意不去。时间长了，太伯与虞仲两人看出父亲的心思，这哥俩一商量，怎么办呢？既然老爹下不了决心，当儿子的绝不能为难父亲。哥俩打定主意，那咱们走吧，远走高飞，躲得远远的，这样老父亲就不必忧虑了，可以放心地把大权交给三弟季历。

于是太伯与虞仲两人不辞而别，为了不让父亲找到，他们没有去文明程度很高的殷商，而是南下荆楚，跟一群未开化的蛮人生活在一起。太伯、虞仲两人也很有本事，到了荆蛮地区后，他们把中原文明带到这里，使当地蛮人对哥俩十分仰慕，纷纷前来归附，总计有一千多家。太伯便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句吴”，这就是春秋时代产生过吴王阖闾、名将伍子胥、兵圣孙武等名人的吴国，太伯也被认为是吴国的创始人。

太伯、虞仲的出走，令老人家颇为伤心，同时也使季历接班不再成为问题。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在武乙二十一年，古公亶父去世，季历正式成为周部落的首领。从季历开始，周部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季历与父亲不同，他认为武力是必要的，不仅要反击敌人的侵略，也要先发制人。随着岐周的兴起，周围的一些诸侯及蛮族对这个地方政权虎视眈眈。季历可不想像父亲那样，人家一打来，就送财物打发或者干脆搬迁，就算你搬一千次，也总会有人要上门打劫，那你怎么办？因此从一上台始，季历就开始大力发展岐周的武装力量，并密切关注周边各部落的动向。

当时有一个部落，称为程氏，因盘踞于毕地，故而又称为毕程氏。毕程氏的首领是个昏君，他为了中饱私囊，盘剥底下官员的俸禄，卖官鬻爵。这些官员只好向下盘剥百姓，致使民不聊生。在季历看来，这可是下手的大好时机，当年的成汤不就是靠“讨伐不义”来扩张自己的实力吗？季历出动武装人员，牛刀小试，灭了毕程氏。这是岐周兴起后的第一次对外用兵。

数年后，又一个机会降临了，义渠部落爆发内乱。

义渠是西戎的一支，西戎一直是华夏诸国的劲敌。当时义渠部落酋长十分宠爱两名女子，这两个女子都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要立谁为接班人呢？义渠酋长也没主意，只得拖延时日。殊不料有一天酋长突然病倒，病况日益恶化。这时部落的权力斗争开始白热化，分为两派，每派各支持酋长的一个儿子，闹得不可开交。对季历来说，这真是好消息。想当年，自己的父亲古公亶父被戎人、狄人逼得迁移，如今戎人内乱，正好是报仇雪恨的良机。机不可失，季历当机立断，出兵讨伐义渠，大获成功，义渠酋长因病重来不及逃跑，成为周人的阶

下囚。

经此一役，周人扬眉吐气。此役的胜利，令岐周在诸侯、诸部中的声望大大提高，甚至引起了殷帝武乙的注意。

武乙三十四年，季历前往殷都，朝见殷帝。自从祖甲后期殷商衰弱后，前来朝见的诸侯越来越少，作为后起之秀的季历却在这个时候前来效忠，武乙当然十分高兴。为了表彰季历的忠心以及打败义渠的战果，殷帝赏赐给季历三十里土地、十匹良马以及若干玉器。看来季历的朝见是明智的，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捞到实惠。

从殷都返回后，季历又开始着手一次新的远征。

这次远征的对象不是其他，正是武丁大帝曾与之血战三年的鬼方。屈指一算，此时距武丁时代已过半个世纪，曾经落荒而逃的鬼方阴魂不散，曾经被磨平的爪子又长出来了。只是鬼方着实倒霉，去了一个武丁，来了一个季历，仍然不是对手。半个多世纪苦练出来的内功，又被季历的铁砂掌给废了。是役毁灭了鬼方复兴的梦想，光是被俘虏的狄王就有二十人之多。

看来古公亶父果然见识卓绝，把权力交给季历是没错的。季历的侵略性显然要胜过父亲许多，谁也别想来打家劫舍，我的地盘我做主，我是周人我做主。正当季历得意扬扬地班师回到岐周时，一个大消息传来：殷帝武乙被雷劈死了！

中国历史上，君王死法丰富多彩，一般死法就不说了，单说一些比较独特的死法。春秋时代霸主晋景公是蹲茅坑时掉到坑里给淹死的，这算是最窝囊的死法。战国时代秦武王，跟人家比赛扛大鼎，胫骨折断而死，这算是悲壮的死法。殷帝武乙的死法，估计也是绝无仅有了，他是被雷劈死的。

被雷劈死绝不是好事。遭雷劈带有诅咒的味道，因为我们时常听

到这种诅咒：你这个家伙如此缺德，会遭雷劈的！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当然应当批驳这种唯心论的观点，但倘若拿来解释殷帝武乙，恐怕大家会很信服地点头，因为他就是属于缺德鬼。

武乙爸爸的爷爷，或者说爷爷的爸爸，就是武丁大帝。从两位殷帝的名字来看，武乙似乎更有气势一些，甲乙丙丁，乙字还排在丁字之前。武丁伐鬼方、征大彭、灭豕韦，何其威风。可是在武乙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伟大的事业，只是小儿科，只不过是人中之王罢了，何足道哉！

我们不禁要惊讶了，人中之王，难道还不够气派吗？

是的。

只有战胜天神，那才是真正的豪杰，真正的英雄。

就冲着这份胆量与勇气，我们也得为武乙鼓上一点掌声，但同时有一个疑问产生了：要怎么战胜天神呢？是像堂吉诃德那样持一把长矛勇猛地攻击风车吗？还是像后羿那样射落天上的九个太阳？武乙自然有办法，堂吉诃德、后羿何足道哉，不过是赳赳武夫罢了，也配谈英雄吗？野蛮人罢了，文明人耻之。既然是文明人，就得与天神比智慧。

事到如今，真的越发玄妙了。

诸位看客，你们能想得出怎么个比法吗？怕是谁也想不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得佩服武乙大帝，人家是有智慧的。来分享一下君王的智慧吧。他先是立了一个偶像，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因为当时绝少偶像崇拜，不比现在大庙小庙里这个神那个佛的。武乙立了偶像，这尊木偶便是天神了。可是还颇令人狐疑，既是木偶一尊，何来比试智慧呢？这当然难不倒这位大帝，他指定一个下人，代替天神跟他玩下棋。原来天神是可以冒充的，冒牌天神的智力显然有点问题，很快

就被勇猛的武乙大帝杀得推枰认输。

愿赌服输，既然天神输了，那就得罚。

且看看人间之王如何惩罚天上之王。不是有一尊神像吗？在神像的脖子上系一个盛满鲜血的皮囊，武乙大帝在十几步或几十步之外，引弓便射，这叫啥呢？叫“射天”。一箭射破皮囊，天神浑身血淋淋，岂能不对人间之王俯首称臣？武乙春风得意，那一刻他真的感到无比的幸福，因为他打败了天神！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这话是言糙理不糙。在季历抡起拳头猛揍鬼方的时候，武乙大帝气定神闲地驱着车，扛着弓打猎去了，猎于河渭之间。天神都被他射得鲜血淋漓，小野兔小山鸡当然更不用说了。当他兴致勃勃地追逐着猎物时，天地变色，乌云遍野，雷声隆隆。忽然一声巨响，一道闪电劈开乌云，在炸雷的助威声中，疾驰而下，仿佛长了眼睛似的，猛扑向武乙大帝。巨响过后，其他人都没事，可是大家惊愕地发现，那位战胜天神的宇宙统治者，竟然被雷电给活活劈死了。

不久后，街头巷尾的人们交头接耳，用低低的声音说：“缺德，活该。”

二十五 山雨欲来风满楼

武乙大帝被雷劈死了，不过臣民们尽可放心，这个国家里，什么都可以缺，唯独大王是不会缺的。武乙的儿子太丁粉墨登场，说实话，商代的大王们在名字上也着实缺点创造力，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都被用光了，就不能换个名吗？不过我对太丁毫无兴致，他缺少武乙的娱乐精神，故事就显得沉闷，所以宁可继续说说季历讨伐戎狄的故事。

说实话，季历的手风一直很顺的，可是最近却有点背了，莫非这是受到武乙霉运的影响吗？打败鬼方之后，他的自信心越发高涨，斗志昂扬，报仇也报上瘾了。只要看到是戎人、狄人，管他三七二十一，统统是我族之敌人。趁着大刀还锋利，还是再猛砍几刀吧。

这一回，季历的大刀劈向了燕京之戎，不过这一刀粗粗看过去，就可以看出有几分凶险。岐周到燕京，这可不是一小段距离，跋涉那么远去与戎人交锋，不能不说是一次军事大冒险。虽说季历运气总是不错，可这回幸运女神打瞌睡了，并不垂青于他，他第一次被打败了，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逃回岐周。

但是没关系，知耻近乎勇。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两年后，季历又重整旗鼓。这次他的刀砍向余无之戎，看来季历就是非和戎人斗到底不可。这回幸运女神没睡着，周人大获全胜。刚上台不久的殷帝太丁也很高兴，褒夷有功，得给季历封赏一下，于是他金口一开，授予季历“牧师”之职。乍一看，我们还有点纳闷，牧师不是基督教的玩意儿吗？难不成太丁跟季历都赶时髦入了教？当然不是，耶稣还要过一千年才出世呢。牧师其实就是牧正，当年少康就曾

干过这个，管放牧的。不过这只是荣誉称号，挂个名不用去上班，只是表示朝廷的嘉奖罢了。

我有点怀疑季历打仗打上瘾了，不然的话，就是敌人太多，怎么杀也杀不完。太丁七年，季历又去与一支戎人拼命。这支戎人称为“始呼之戎”，在周人的围剿之下，终于溃败而去。精力充沛的季历毫不手软，四年后（太丁十一年），他的矛头刺向翳徒之戎，活擒三名长老级的敌酋，威震四方。

周人已不再是一头软弱可欺的绵羊，而是一头凶狠的猎犬。然而世事终究难料，季历一生南征北战，没有死在戎狄之手，却死于殷帝太丁之手。太丁为何痛下杀手以及如何下手，这乃是历史之谜，因为史料不书。以常理推之，季历之崛起，已威胁到殷商的统治基础。

《史记》中说得明白，诸侯多归附于周，这正是季历被杀的真正原因。诸侯不去归附殷商，而反归附岐周，对太丁来说，这不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吗？殷商中央政权为之胆寒，季历的事业，犹如武丁事业的翻版，在攘夷事业上，两人并驾齐驱，加上诸侯归心，俨然已是第二个中央政权，倘若不加以抑制，岂非殷商之劲敌吗？

我怀疑殷帝太丁杀季历乃是谋杀，最可能的情况，是太丁趁季历朝见时，诱而杀之。否则以周之实力，殷商要摧毁其武装并非易事。这里还有一个证明，几年之后，周人居然出兵讨伐殷商，显然是为季历复仇，这也证明周之武力并没有遭到太丁的打击。

周人伐商，记录于《竹书纪年》，时间是帝乙二年。此时太丁已死，姬昌也接替父亲的位置，成了岐周的首领。这是周与商的第一次冲突，但孰胜孰负，史料上也没有提。我估计此时周的势力，尚难与殷商全面抗衡。殷商政权虽然衰弱，但凭着武丁大帝留下的老本儿，仍然有不可小觑的威力。不过很快殷商帝国又出现新的危机，帝乙三

年，西部的昆夷成为帝国的一大外患，帝乙派遣大臣南仲筑城以抵御昆夷的进犯。

这一时段殷商与岐周的关系，乃是一个谜。

由于史料含糊，我只能在此作胡思乱想。我猜测岐周与殷商的关系并没有继续恶化，姬昌应该是选择了与帝乙和解，重新归附殷帝国。因为一个意外事件，几乎毁灭了岐周。这是发生在帝乙三年夏季的一次大地震，震中正是位于姬昌所在的岐周地区。即便到了今天，地震仍是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之一，其破坏力较其他自然灾害要大，只要回顾一下汶川的地震便不难认同这点。那么这起发生在三千年前的地震，一定让周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于情于理，姬昌也应该与殷商和解，以便致力于灾后重建。

对于殷帝帝乙，他肯定不愿意与岐周陷入长期战争之中，因为他还要面对昆夷的进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选择和解应该是理所当然之事。再说了，周乃是戎狄的克星，能利用姬昌的力量来阻挡西方的蛮族，对于衰落中的殷帝国来说，不啻为一个好消息。

大家知道，姬昌有一个“西伯”的头衔，这个头衔是什么时候得来的，史书没说。我估计是帝乙封给他的，因为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就被称为“西伯昌”。西伯便是西方之侯伯，即西部诸侯之长。用土一点的话说，就是西方霸主。

“西伯”这个名头是有用的，至少殷帝国默认了姬昌在西部的霸主地位。成为真正的霸主，并不完全凭恃武力，姬昌懂得统治的秘密。打从小时候起，他就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深得祖父古公亶父的喜爱。事实上，他身上兼有祖父与父亲的优点，既有宽厚深沉的一面，亦有勇武无畏的一面。与成汤的子孙相比，姬昌更能深得商朝开国大帝的衣钵真传。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尽管我们还很难肯

定这时的他有夺取天下的雄心。古公亶父与季历留给姬昌丰厚的政治资本，古公亶父以仁德安民，季历以攘夷保境，这正是诸多部落归附周的原因所在。

《史记》中用一个颇为有趣的话：“西伯阴行善。”行善便是行善，还加上一个“阴”字，看上去不那么光明正大，反倒像是偷偷摸摸。这“行善”背后果有阴谋吗？可以回答：是的。谁喜欢生活在暴政之中呢？谁不向往有一个公正、公平的政治环境呢？夏商时代，仍不是一个完全独裁的时代，天子充其量不过是诸多诸侯中最大的一个国家罢了，天子要是不“行善”，民众就投奔“行善”的诸侯，这就是人心所向。

西伯姬昌的声誉日隆，无论是真诚行善也好，是政治作秀也罢，他在别人眼中都是一个高尚的人。敬老慈幼，礼贤下士，勤于政事，不贪不逸，他打开大门，迎接天下的贤人志士。当时的社会名流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等人纷纷慕名而来，西伯的名声，几乎要盖过殷帝了。

再来看看殷商的情形吧。

自武丁大帝之后，殷商天子可谓是一代不如一代。帝乙上台后，殷商居然遭到姬昌的进攻，天子被诸侯围攻，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史记》干脆就只写一句话：“帝乙立，殷益衰。”本来就很衰了，现在更加衰。

帝乙没有能力重整旗鼓，只能寄希望在自己儿子身上。他的长子启是一个不错的人，宅心仁厚，是个理想的接班人，可是启并不是正室所生，只能算是庶子。在古代，嫡子与庶子身份有别，一般来说，只有嫡子才有继承权。帝乙虽然器重启，却不敢把帝位传给他，而是传给了嫡子受。受称帝后，称为受辛，后来天下人称他为“纣”。如此一想，“纣”字显然不是好字眼，据说中国博大精深的释义里，“纣”意

指“残忍捐义”，另外还有几种说法，比如“残义损善曰纣”。不过我认为这些意思，应该是在纣王以后才赋予的。

对中国人来说，纣几乎与暴君是同义词了，“助纣为虐”已成为被广为使用的成语，而纣王也早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正如夏桀一样，作为亡国之君，商纣也因为政治原因被大大丑化。关于商纣的种种传闻，许多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不过商纣比夏桀要残暴，这应该是事实。

儒家巨擘荀子曾称商纣“天下之杰也”，这位末代帝王并非庸庸之辈，实为有魄力之君主。他天资聪颖、辩才无碍、思维敏捷、行动果断，这是智慧方面；至于武力方面，他勇敢非凡、武艺高强、膂力惊人，竟然可以赤手空拳与猛兽格斗。这些优秀的品质不是笔者胡编乱造，而是出自《史记》的记载。

然而，正是这些优点，反倒成了他的缺点，这么说乍听来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他才智出众，故而目空一切，对他人的进谏充耳不闻，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他辩才无碍，口若悬河，故而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红的，把群臣驳得哑口无言；他的功夫天下第一，就算混在江湖，也坐得了第一把交椅。所以他对谁也看不起，是典型的自恋狂。

在商纣看来，天下尽在他的掌中，就像老祖宗武丁那样，“有天下，犹运掌也”。可是我们明明分析过，殷商的运势不断衰减，特别是商纣老爹时“益衰”，那么商纣哪来的自信心与底气呢？他凭借的，正是自己的智慧与勇气。

后来臭名昭著的纣王真的有智慧吗？真的有。

他与夏桀一样，做着同样的梦，便是要把诸侯全部捏在手中，建立帝国史上无上的功业。但两人做法不同，夏桀是试图以武力使诸侯屈服，商纣则显得更有智慧一些。

在商纣看来，对殷商威胁最大的人，当然是西伯姬昌。姬昌的“阴行善”，被视为拉帮结伙，不仅直接削弱殷商的统治力，也引起一些实力派诸侯的眼红。崇侯虎便是一位实力派诸侯，崇是其国名，虎是人名，因为被封为侯，故而称为崇侯虎。他跑去对纣王说：“西伯暗地里行善，诸侯们都心向着他，这对大王十分不利。”

纣王当然心知肚明，但是要怎么办呢？

出兵讨伐当然是下策，一则要打败西伯并不容易，二则出师也没有正当的理由。他果然是有几分聪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逮住西伯这条猛犬，我得先抛出几个肉包子。他把肉包子扔出去了，提拔周侯、九侯、鄂侯为三公，周侯就是西伯姬昌。

所谓三公，就是朝廷三大重臣，从地位上来说，仅次于帝王。三公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候指的是太师、太傅、太保，有时候指的是司马、司空、司徒。至于商纣时期的三公是什么，史书不载，我们也不必妄测。为什么要把西伯提拔为三公呢？这就是纣王的智慧了。夏、商、周诸代，经常从诸侯中选拔三公到朝廷任职，这本来是一种恩宠，但对纣王来说则是一个阴谋。只要把西伯姬昌调离自家地盘，不就是虎脱离山、龙脱离水了吗？还能有什么威风呢？

西伯姬昌当然晓得纣王的真实想法，可是他很难推掉三公头衔。不接受意味着对抗，而面对勇武过人、精明能干的纣王，对抗并不是聪明的办法。凡事都有利弊两面：从坏处上说，调往朝廷，就如同身陷虎穴，稍有不慎可能丢了小命；从好处上说，要是去了，纣王就自以为可以摆平天下诸侯，以他那种目空一切的性格，必然会对诸侯报以轻蔑之心，这样的话他的精力就会耗费在醇酒美人上，这岂非是削弱殷商的大好时机吗？

权衡利弊，西伯姬昌决心接受纣王旨令，入京当三公。高高在上的纣王脸上不禁露出得意的微笑，寡人略施小计，难以驯服的西伯便

入彀中，天下事尽在我掌握中了。

二十六 酒池肉林：暴君 与“艺术家”

商纣以威胁手段，迫使实力派诸侯周侯、九侯、鄂侯等人入京，这一手段着实高明。在他看来，只要把这几个人质握在手心，天下可太平矣。一向自恋的他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陶醉，他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美酒与女人，释放一个帝王无尽的欲望之火。

纣王的理念与西伯姬昌完全不同，他认为要别人屈服，靠的就是拳头，就是武力，就是血腥手段。于是他推出一项酷刑，这便是十分有名的炮烙之刑。

炮烙之刑是一种酷刑，又称炮烙，其行刑过程如下：“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就是先在一根大铜柱上抹油，然后下面置炭火烧热，让犯人在铜柱上行走。大家想想，这铜柱本来就是圆的，又抹了油，烧热后脚放上去，就像在锅里煎饼似的，这痛苦哪儿受得了呢，没走几步，这脚一疼、一滑，扑通就掉到炭火里去了，活活烧死。就算有人侥幸能通过铜柱，也成废人一个了。当然，我们必须说，历史上的酷刑很多，后世的许多酷刑可能比炮烙之刑更残忍，但从历史记录来看，商纣是开了酷刑的先河。

可是，总是一些人不太听话，比如说东夷。

夷人反反复复，时而归附，时而叛变，这已是见怪不怪了。纣王可不允许有人挑战他的尊严，为了唬住东夷部落，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大秀肌肉，展示自己强大的武装力量。本来只是心理威慑，不想夷人脑子不灵活，以为商纣即将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索性叛乱。纣王毫不客气，挥舞铁拳，捣碎夷人叛乱，让叛乱者尝了尝炮烙的厉

害。

镇压东夷叛乱后，商纣又惩罚一个不太听话的诸侯，他出兵讨伐有苏氏。有苏氏首领哪里是商纣的对手，很快败下阵来。有苏氏首领当然害怕了，要是商纣一怒，他就得尝尝炮烙的滋味。他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女儿妲己献给了纣王。

时值壮年的纣王最喜欢的，莫过于美酒与女人。作为帝王，他不缺的就是女人，可是妲己真的与其他女人不同，或者说她深谙狐媚之术，懂得心理学，懂得征服男人。很快，英勇盖世的纣王就被妲己征服了。他把妲己当作女神，对她言听计从，为了讨她的欢心，不惜与天下人为敌。

我们来看看纣王都做了些什么。

首先是修宫室，妲己到来后，纣王为她盖了一间琼室，立了一个玉门。琼室玉门，若从字面来理解，应该是全部用玉石砌成，这简直就是黄金屋，甚至比黄金屋还要华丽。其次是搜刮民财。盖琼室玉门的钱从哪里来呢？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来自民脂民膏了。宫廷的开销直线增长，除了营建宫室之外，还扩建园林楼台，从四处收罗狗马奇物，捕捉大量鸟兽，搞了个宫廷动物园，这些更少不了花销，只得从百姓那里榨取。

纣王精力充沛，满脑袋都是新奇的点子，光有美酒与女人还不够，还得有歌有舞才行。他让宫廷乐师创造靡靡之音，编排北里之舞（就是一种粗俗的舞蹈），这样还不够，他还有更绝妙的发明。不能不承认，纣王这个人有创新精神，先是发明了炮烙之刑，后又发明了酒池肉林。酒池肉林就是把酒倒在池子里，把肉挂起来一大片，看上去就是一片肉林。弄这个干什么呢？游戏呗。渴了就把池子里的酒舀起来喝，饿了就撕一块悬肉下肚。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纣王的回答是：“与人乐乐。”怎么能自己独自享用呢，不够壮观嘛。他招集一群男男女女一起来玩，与民同乐。怎么玩呢？当然要来点刺激的，这样才有感官享受嘛。一律赤身裸体，男的女的都一样，光着身子在酒池肉林之间追逐嬉戏，饮酒寻欢，通宵达旦，不知今夕何夕了。

显然，纣王把自己当作一位艺术家，除了他，谁能构想出如此汹涌澎湃的春宫戏呢？可是在王宫之内，有一个人却不欣赏他的艺术，不参加他的艺术活动。这个人是九侯的女儿，她的身份是纣王的一个妃子。纣王大怒之下，一刀把九侯的女儿杀了。

九侯可是三公之一，女儿这样莫名其妙被纣王所杀，自然悲愤难平。纣王一不做、二不休，你既有怨言，怕也留你不得！找了个借口，把九侯也杀了，剁成肉酱。这不是胡闹吗？堂堂三公，竟然说杀就杀。另一位三公鄂侯看不下去，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他显然低估了纣王的残暴，故而难逃一死，不同的是纣王没把他剁成肉酱，而是制成了肉干。

我估计九侯、鄂侯与西伯一样，都是纣王看不顺眼的诸侯，授予三公只不过是调虎离山，把他们软禁罢了。九侯成了一堆肉酱，鄂侯成了几片肉干，西伯姬昌看了能不心惊胆战吗？打从入朝以来，精明的姬昌行事低调，言行谨慎，唯恐一不小心被抓住小辫子。九侯被杀，他不敢强出头；鄂侯被杀，他也不敢吭声。不敢说话，偷偷叹息几声总可以吧。他躲在室内，偷偷叹息了几声。谁料到这几声叹息，差点要了他的命。

自甘沦为大内密探的崇侯虎一刻也没有放松过。特别是九侯、鄂侯一个个落马，他更是小人得意，巴不得顺手牵羊除掉西伯姬昌。姬昌叹息几声，岂知隔墙有耳，早有密探把这个“重大消息”报给了崇侯

虎。好啊，西伯呀西伯，今天可算你倒了霉运。崇侯虎三步并作两步走，猴儿急地入宫向纣王告密：大王诛杀九侯、鄂侯，天下贺之，可是西伯竟躲在室里叹息哩。

纣王一听，叹息就是心有怨言，得，抓起来关了。

有人因言而获罪，西伯却因为叹息而获罪，被关起来，囚禁在羑（yǒu）里（地名）。据说这一关就是七年之久，估计纣王都快把这个人给忘了。可是西伯是有势力的人，他的那些臣僚们可不是吃素的，想尽办法要解救姬昌。西伯手下有一个名唤闳夭的臣子，颇有智慧，认为要救西伯，就得投纣王所好。纣王所好者，声色犬马也，他便不断地献上美女、宝马、奇珍异宝。

纣王果然龙颜大悦，那天正好心血来潮，便下令释放姬昌。起初纣王还认为姬昌是个威胁，现在觉得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对手，老子随时可以玩死他。这时姬昌“三公”的头衔早被罢免了，“西伯”的称号也没了，纣王不认为他是潜在的威胁，便把他打发回岐周去了。

姬昌果然是个聪明人，他没忘了表示“谢主隆恩”，回到岐周后，便把洛西之地拱手献给了纣王，同时顺带提了一个小要求：废除炮烙之刑。

诸君想想，姬昌刚刚被释放回家，怎么就吃了豹子胆，胆敢提出废除炮烙之刑的建议呢？以我的猜测，喜欢艺术的纣王估计已经对炮烙之刑失去了兴趣，玩久了就不好玩了，没了新鲜感。大概因为如此，姬昌乘机建议废除炮烙之刑，既不忤逆纣王，又可以讨到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纣王既捞得一块洛西之地，心头高兴，也给了姬昌一个大大的面子，果真废了炮烙之刑。只是天下人，只为姬昌鼓掌，却无人人为纣王喝彩。

朝廷之上，敢说话的人死了，不敢说话只敢叹气的人也被关进大牢，掌权的人，自然落到小人手中。纣王底下有哼哈二将：一个叫费中，在溜须拍马上有独到的功力，无人可敌；另一个叫恶来，人如其名，只有恶的来，善的不来，此人在造谣诽谤上有极深的造诣，罕有对手。这哼哈二将，兴风作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殷人绝望，诸侯离心。可是没关系，有纣王撑腰，自然是政坛上的不倒翁。

在纣王眼中，百姓算个球？别碍着老子开心就好。至于诸侯，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比对付小民要难一点。当然，别看纣王声色犬马，他还是英武盖世的，只是叫他离开奢华的王宫，离开小淫娃妲己，他是不舍。要如何摆平诸侯与诸夷呢？费中与恶来这两个家伙肯定不顶用，谁来代朕征伐呢？当然啦，当时帝王还是没有自称“朕”的。

纣王左思右想，姬昌可以。他被关了七年，连叹气都不敢了，况且一释放回家，就知道献上一块地来孝敬君王，总算是调教乖了。纣王给了姬昌象征权力的弓矢斧钺，并把“西伯”的称号还给他，把征伐诸侯的权力交给他。说到这里，不佩服姬昌都不行，他献了一块地，捞到的东西远远比失去的东西要多。

西方霸主又回来了！

西伯姬昌很能卖乖，得到征伐大权后，他不失时机地表示效忠，率一大批诸侯入朝进贡。这真的给纣王挣足了面子。

可是有一个人却十分担忧。

这个人就是比干。

比干是殷商朝廷中为数不多的正直人士，在恶人当道的朝廷里，比干怎么就没事呢？原来他的身份不一般，他可是纣王的叔叔哩。比

干当然也知道帝国一片乌烟瘴气，但他毕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再怎么说也要力挽狂澜，要保住殷商帝国。

他对纣王说，你别被西伯骗了，西伯到处“阴修德行善”。注意这个“阴”字，这是有阴谋的。别看他带着一大帮诸侯前来进贡，其实那些诸侯早就被西伯收买了。

西伯已经坐大，殷帝已失权重矣！

纣王本来就对这个喜欢唠叨的叔叔很讨厌，在他看来，比干就是自以为聪明的家伙。要说到聪明，世界上还有谁比得上我纣王吗？你看殷商衰败了那么多代，一到我手里，中兴了，诸侯们都乖乖听我的了。

当然，这时的纣王，对叔父比干还有一点点尊敬，虽然不愿听他唠叨，却也不至于为难他。其他人就比较倒霉了。

比如说，有一个大臣名为商容，算是朝中稀有人物，是个贤臣，深受百姓爱戴，我估计他没有被迫害死，是有比干罩着他。纣王听了比干的唠叨，又要听商容唠叨，一怒之下，把商容的官帽摘了，就地免职。

其实比干说的一点都没错。

表面上诸侯跟着西伯一起来进贡，像是对朝廷忠心耿耿，其实只是摆摆架势罢了，实际上都心向着西伯。

这里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诸侯之间遇到纠纷，根本不去纣王那里仲裁，反倒都跑到西伯这里论理。

有一回，虞、芮两个诸侯国的百姓因为国界线附近的田产归属而争吵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既然这样，大家一想，西伯不是很公道吗？那就让西伯给评评理吧。于是两国民众各派

代表入周，各自认为必定会赢得诉讼。进入周境后，他们发现农民们的田地之间留了很大的距离，大家相互谦让，要把这块地让给对方。不仅如此，周人彬彬有礼，特别尊敬长者，大家相处都很和谐。这就是周人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摆花样，真有点礼仪之邦的模样。

看到这里，虞、芮两国民众代表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你看看周人相互谦让，我们却在为那点蝇头微利争吵不休，显得那么没修养。要是把争吵这事上诉到西伯那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想到这里，大家也不好意思去找西伯了，商量说：“我们所争的，是周人耻于取的。我们去西伯那里干吗呢？自取其辱罢了。”当即决定，对于两国有争议的那块地，双方都不要了。一件争论不休的事，就这样解决了。后来孔老夫子说过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想必与此故事有关。

这件事后来便传开了，这时有人开始散布一种说法：“西伯盖受命之君。”西伯大概要接受天命成为君王吧。

不过想要成为受命之君，还是任重道远的，有道义是一回事，还得看实力。西伯固然是个出色的首领，但其武功不及其父季历。如今他握有征伐之权，得找个懂军事、知谋略的帮手，就像当年商汤找了伊尹一样。无论什么时候，世上总有许多能人异士，关键要看你有没有认真地找寻。一个伟大人物浮出水面，此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姜尚姜子牙。

二十七 我本枭雄：西伯与姜太公

说到姜尚，我便想起今天尚有不少人家门上挂着“姜尚在此”的牌子，可降魔驱邪，消灾化难，可见此公之威力何等惊人。

然而作为历史人物，姜尚充满神秘感，令人恍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大史学家司马迁走南闯北，见闻多矣，对姜尚的记录也多是含混不清，在其传记中，用了许多“或”字，或是这样说，或是那样说，有的这么说，有的那么说，他都搞糊涂了，更别说我们。

准确地说，姜尚应该叫“吕尚”，姜是姓，吕是氏。

在春秋战国之前，姓与氏是分开的，一般名字从氏，而不从姓。只是后来姓与氏渐渐变得没分别了，才出现两种叫法，既可称“姜尚”，又可称“吕尚”。

既然现在都挂着“姜尚在此”的神牌，我自然也使用姜尚这个称呼。

此人的家世，我就不详细追溯了，早期生活比较平淡，曾经干过杀猪屠牛的行当，摆过地摊（“卖食”），当过宾馆服务生（“迎客之舍人”，也可理解为大户人家的迎宾员），还因为混得不好被老婆赶出家门（“逐夫”）。那么他是怎么发迹的呢？西伯姬昌是怎么找他当帮手的呢？光是《史记》里，就记有三种不同的传闻，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姜太公钓鱼”的故事。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为什么叫姜太公呢？因为他当时已经七老八十了，不仅老，而且穷困潦倒，好在古代人少资源多，填饱肚子

还不成问题。太公就到河边钓鱼，钓鱼本来不稀奇，稀奇的是《史记》的写法：“以渔奸周西伯。”诸君读《史记》时可要万分留神，西伯是“阴”，太公是“奸”，阴者，阴谋也，奸者，奸计也。一个老人家，钓鱼还搞奸计啊？

看来这个老人家着实不够纯朴。

他要什么花招呢？人家钓鱼用弯钩，他偏不，用直钩。直钩能钓得到鱼吗？说实话，这个我也不知道，不然怎么叫愿者上钩呢？与众不同就是一个标签，至少吸引眼球，有特立独行的范儿。这个老人家非常聪明，因为西伯姬昌不是号召“尊老”吗？他不仅老，还与众不同，只要坚持不懈，他准能被西伯注意到。

果不其然，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西伯出门打猎。殷商时代很迷信，做什么事都得占卜一下，这一占卜，大吉。卜者对西伯说：“这次出门打猎，不是收获飞禽走兽，而将收获一个能帮您成就霸王之业的帮手。”西伯当然心里痛快，边打猎边留意有什么能人异士。这时他可能听到别人提及姜太公，因为此翁常年在渭水河畔以奇特的方式钓鱼。这种新闻无疑令西伯很新奇，他决定前去看看，也算是发扬敬老的传统美德。

大家想想，要是姜太公不显得古怪，与常人无异，谁会去关注他呢？

他混了大半生，到晚年明白一个道理：人是需要炒作的。

这一见面，改变了姜尚的人生，这时他已是古稀之年。西伯找到这个古怪的老人，亲切交谈，姜太公岂能错过这个机会呢？他把一辈子揣摩出来的真知灼见，一股脑儿地说出来，令西伯大吃一惊。原本以为只是个乡村鄙夫罢了，岂知人不可貌相，姜还是老的辣。老姜一下子把西伯折服了，因为他不仅会说阳谋，也能道阴谋，谁能想到一

个潦倒一生的人，居然是个权谋大师。

此时西伯突然想起爷爷说的一句预言：“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

这个姜尚原本是东方人，不远千里跑来西周，这不正是爷爷说的“圣人”吗？西伯激动地对姜尚说：“我太公曾经说有个圣人要到岐周来，周将因此兴起。看来圣人真的是您啊。我家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原来钓鱼的姜尚就是西伯的太公（爷爷）盼望的人，所以后来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太公望。

就这样，西伯恭敬地把姜太公请上车，一起回都城去了，尊他为师。

不过还有两个版本，简单提一下。

第一个版本称姜尚以前曾在纣王手下办事，因为纣王无道，他便离开殷商，游说诸侯。只是众诸侯都害怕纣王，姜尚碰了一鼻子灰，最后他到了岐周，得到西伯姬昌的重用。这个版本与许多关于姜尚生平的记录都不同，有美化之嫌，故而不太可信。

第二个版本则称姜尚原本是隐士，隐居于海滨，与散宜生、闳夭等人是好朋友。后来散宜生、闳夭都投奔西伯，当时西伯又被纣王所囚禁。闳夭等人知道姜尚这个人有谋略，便请他出山，商量如何解救西伯。姜尚也认为西伯是明君，还尊老爱幼，有意要扶助他，便慨然答应。后来闳夭用了姜尚的计谋，献给纣王美女、宝马、奇珍异宝以赎回西伯。西伯得救之后，回到岐周，便重用姜尚，拜他为师。

以上三个版本虽然说法各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姜尚被重用 时，已是年迈，而且他是西伯的老师。

年到七十方得志，这大约可视为励志学的经典案例了。

有志不在年高，六十岁还一无所成的朋友不必灰心丧气，姜尚在此，给我们提供学习的范本。那么姜太公果真有翻江倒海的本领吗？请看《史记》所说：“周西伯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又是“阴”字。

“阴谋”、“阴权”，司马迁着笔也实在凶狠，姜太公权谋家的形象跃然纸上矣。

在殷则有伊尹，在周则有姜尚。其实伊尹与姜太公一样，都是权谋大师，何以司马迁把姜太公视为兵家及权谋家之鼻祖呢？因为有一本著名的兵法谋略书是挂在姜太公的名下，这本书便是《六韬》。

《六韬》又称为《太公兵法》，据说是姜太公所传，全书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的对话方式编成，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兵法书之一。当然，现在一般认为此书乃是后人假托姜太公之名写成的，但多多少少能体现姜太公的兵学思想。这本书在宋代时被编入《武经七书》之中，成为古代兵学的教科书，地位尊崇。

握有纣王授予的征伐大权，加上一个老谋深算的姜太公，西伯姬昌可以放开手大干一场了。

西伯把征伐目标首先对准犬戎。

犬戎是戎人的一支，也是华夏族的劲敌。打击犬戎，首先是保障岐周的安全，岐周与戎人相邻，不战斗无以拓展生存空间，西伯的父亲季历曾经与戎人血战七次，六胜一负，沉重地打击了戎人势力。但是后来西伯被召入朝，又被关了七年，在这段时间里，戎人再度转强，不仅威胁到周，同时也威胁到其他诸侯乃至殷商中央帝国，故而

伐戎势在必行。更重要的是，政治风险很小，根本不会引起纣王的怀疑。

西伯姬昌的策略，与当年的商汤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伐戎成功后，他把目标锁定在一些残暴的诸侯身上，他握有王命，可以讨伐这些“不义之国”。

西伯问姜太公：“我想讨伐暴君，应该先征服哪个国家呢？”

姜太公答道：“先征服密须。”

为什么是密须呢？密须是当时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诸侯，但是国君内则残暴，外则穷兵黩武，侵略阮国，名声不好。攻打密须，师出有名，也容易得到密须百姓的支持。

有人站出来反对道：“密须国君很厉害，不一定能打得赢。”

姜太公反驳道：“密须国君虐待民众，失去百姓的支持，就算再厉害，也不足为惧。”

西伯姬昌对姜太公言听计从，在攻打犬戎后的第二年，发兵讨伐密须。果然不出姜太公所料，周军出动后，密须百姓非但不支持国君，反倒秘密组织起来，发动暴动。周师尚未抵达，密须政府就被起义军推翻了，控制首都的起义军向西伯投降。就这样，周师兵不血刃，占领密须，并把都城迁到了程地。

一年后，周师讨伐耆国，再次大获全胜。

连续三年，西伯姬昌在姜太公的帮助下，三战三捷。这时有人开始对岐周的崛起忧心忡忡，纣王手下一个名为祖伊的大臣，认为西伯乃是借征伐为名，大肆扩张自己的实力，已是严重危及殷商的统治地

位。

与费中、恶来等人相比，祖伊算是有责任心的人，他跑去对纣王说：“上天已经终结我殷商的国运了。无论是卜者占卜或是用元龟占卜，都看不到好兆头。并非先王不肯保佑后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自绝于人民，所以上天抛弃我们，使我们寝食不安。您既不知天命，又不遵从先王法典。如今我国内百姓，都巴不得殷商灭亡，都说‘老天爷为什么不显示威力？毁灭殷商的天命怎么还没到来呢？’大王您究竟想要怎么办？”

祖伊的话说得十分重，斥责纣王的荒淫暴虐。说这些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祖伊把性命给豁出去了，冒死进谏。好在他运气还不坏，他并没有被杀死，可能当时纣王心情不错，就放他一马了。

有人可能会问，这个祖伊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为垂死的殷商以身犯险、冒死进谏呢？这个人也是有来头的，他家世代都是殷商的重臣，其家族曾有过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位是商汤时代的名臣仲虺（huǐ），一位是武丁时代的名臣祖己。可以说，这个家族数世沐王恩，祖伊当然不想看着殷商就此垮台。

可是纣王压根儿就懒得理他，甚至都懒得争辩，只是淡淡地回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我生来就是帝王，这就是天命，这就是上天赐给我的，谁也夺不走。听到这里，祖伊扭头走了，嘴角挤出一句话：“纣王不可谏矣。”

做臣子的，该说的说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

祖伊说得没错，西伯姬昌大有取代殷商之势。

伐耆战争后一年，西伯发动第四次征伐，吞并邠（yú）国。一年后的伐崇之战，可视为西伯与纣王决裂的开始。前面说过，崇侯虎是

一个小人，多次向纣王检举揭发西伯，并直接导致西伯坐了七年牢。西伯心里最痛恨的人，恐怕就是崇侯虎。我们从史料中并没有看到纣王有多器重崇侯虎，因为西伯发动伐崇之战，纣王似乎并没有加以干涉。为什么崇侯虎大拍马屁没有得到回报呢？我想以纣王勇武盖世的枭雄本色，恐怕打心眼儿里是瞧不起崇侯虎这样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

崇国终于没能顶得住周人的攻势，这个诸侯国被无情地从地图上抹去。

奇怪的是，纣王还是无动于衷。

这时他已经在位三十几年，岁月的侵蚀、醇酒、女人会一点一滴地消融一个男人的锋锐之气，哪怕他曾经是英明神武的。不要忘了，此时的纣王也已经年老，当荒淫且安逸的生活成为一种习惯，要把他再次投入血与火的战场，他也会陌生得手足无措。人不是永远都明智，也不是永远都勇敢无畏。

伐崇之役，西伯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倘若纣王能从醉酒中清醒，本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他还是有机会扭转局势。上天给了纣王最后一次机会。在伐崇之战后，突如其来的饥荒席卷了周的领地，西伯被迫把都城由岐下迁往刚刚从崇国占领来的丰邑。纣王倘若还有一点进取之心，此乃制服西伯的大好时机，但是他错过了。第二年，众诸侯前来周的新都丰邑朝见西伯，西伯俨然成为与殷纣分庭抗礼的帝王。

大饥荒过后，西伯派自己的儿子姬发经营镐邑，并修筑一座辟雍。辟雍是什么东西呢？辟雍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但还有特殊含义。《礼记》记载，天子所立的大学才叫“辟雍”，诸侯立的大学只能叫“泮（pàn）宫”。西伯还未称为天子，却修了辟雍，在礼制上是有僭越之嫌。

不仅如此，西伯还修筑了一座灵台。灵台就是天象观测台，这同样有僭越之嫌，因为古代天象观测的权力是集中在帝王之手的，其他人可不能随随便便搞一个天学机构。古代对天文历法的重视程度，不是停留在科学层面，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西伯已是做好“制正朔”的准备，换言之，他打算要革命了，革掉殷商的命。

令人深感不解的是，直到这个时候，纣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西伯的叛变只是时间问题。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其一，殷商大夫辛甲逃往周地，西伯公然接纳他；其二，西伯有一块美玉，纣王派人前去索取，姬昌断然拒绝。以上两例足以证明西伯已经不把殷商朝廷当一回事儿了，纣王的虎威不在矣。

只是西伯没有能够等到革命成功的那天，他已经垂垂老矣。自从他继承君位，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继续革命的重任只能交给儿子姬发。后世史家总把西伯姬昌当作周王朝的实际奠基人，故而尊他为“周文王”。

周文王或西伯姬昌是中国历史上一大重要人物，同时是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据说他在被囚禁期间，推演出《周易》。

《史记》记：“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就是易经，据说他写了《易经》六十四卦的卦辞与爻辞，内容很简略。后来经孔子等人的补充、解释与发扬光大，这部书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号称“群经之首”。

二十八 殷商的灭亡（上）

西伯姬昌去世后，他的儿子姬发继承君位。

姬发是姬昌的次子，他原本有一个长兄，名为伯邑考。有一种传闻，说伯邑考是被纣王害死的，并且把他煮成肉羹逼西伯姬昌吃下。看过小说《封神演义》的读者对此应当印象深刻，不过这种说法只是胡编乱造罢了。《史记》并没有写伯邑考的死因，只写他在姬发即位之前便去世，应该是属于正常死亡。

孟子曾经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周的兴起，便是在忧患之中兴起，证明了“多难兴邦”的古训。

从古公亶父始，周邦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外患，曾一度被戎狄逼得迁都，直到季历七战戎狄后才获得较安全的生存空间。然而一患未平，一患又起，先是太丁杀季历，后是殷纣囚西伯，然而挫折不过令周人更坚强勇敢罢了。从古公亶父到季历，从姬昌到姬发，连续四代明君，此乃忧患所赐。唯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才能勇挑重任，开拓进取。

姬发继位后，仍称为“西伯”。他的早年生活，我们知之甚少，不过可以推断他年轻时便是岐周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当年西伯入朝，遭囚禁七年，此时岐周主事者必是姬发。他的性格与其父颇似，宽宏大量，善隐忍且不失真正的勇气。父亲归来后，显然对儿子的所作所为颇为赞赏，遂让他经营镐邑，独当一面。

与目空一切、自高自大的商纣王相比，新西伯姬发要谦逊许多。他继承父亲“尊贤”的传统，尊姜太公为“太师”，并让才华横溢的弟弟姬旦作为自己的副手。有姜太公、姬旦为左膀右臂，姬发如虎添翼。

此时天下诸侯约有三分之二归向周政权，姬发已有实力与殷纣王全面对抗，可是他还是沉住气了。谁也不能小觑殷商政权，这个王朝已经传了二十九代，经历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沉沉浮浮后，帝国的大厦还未倒塌，足以证明此乃伟大的王朝。其间有多次衰败，而后又有多次复兴，殷商的生命力是顽强的。

要革命，就要一击致命，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倘若陷入持久战，对周政权是相当不利的。原因有二：第一，政治陷入被动。以诸侯讨伐国君，这叫以下犯上，叫造反作乱，在许多人看来是大逆不道之事。战事拖得越久，则政治上越不利。第二，不要忘了纣王是个有能量的人，是有本事的帝王，如果他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励精图治，则殷商不可图。

姬发继位后第九年，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习以毕邑为起点，以盟津为终点。当时天下有八百诸侯前往盟津参观演习，以前的诸侯都很小，实际上就是城邦制的小国，一个诸侯国大概就是一座小城及周边的地盘。

问题是，此时姬发在诸侯中的影响力远不及父亲，怎么办呢？他颇有心思，刻了一尊父亲的木像，用马车载着，置于中军。古代的三军与现在的三军不同，现在是陆军、海军、空军，古代则是中军、左军、右军。中军一般是统帅坐镇，姬发把父亲的神像置于中军，自己则不以国君自居，而称“太子发”。

扛出父亲的金字招牌，姬发这一手棋下得漂亮。首先是唤起诸侯们对老主的怀念，其次表明自己乃是继承父亲的遗命以征讨四方。老爹虽死，但他的英灵永远召唤后人继续奋斗。

军事演习前，他对臣僚、将士们说：“我本是愚钝无知的人，只

是先祖留给我有德的贤臣，才使我这个小子得以袭承先王的功业。对于这次军事演习，我们要设立赏罚制度，以便能圆满完成任务。”

说完之后，姬发下令，军事演习开始。

演习总指挥是太师姜尚姜太公，他发布命令：“集合你们所有的人员与你们的船只，最后到的人，斩！”

这是一次水陆军事演习。

姬发率先上船渡河，当船航行到河中间时，有一条白鱼跳到座船之上。姬发立即大做文章，认为这白鱼乃是吉兆，遂以之祭祀上天。渡过河后，又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团火焰忽上忽下地飞舞，最后停在姬发下榻处的屋顶上，忽然间变成一只红色的鸟飞走了。这叫什么话呢？分明是夸大其词，故作神秘。依我看来，那本来就是一只红鸟，上下飞舞，歇在屋顶上罢了。姬发故意说成是火焰在飞舞然后变成红色的鸟，把很平常的东西搞得神秘兮兮的，用这种手段神化自己，这也是政治家常用之手法。

这次军事演习乃是姬发耀武扬威之举，可视为对殷商的挑衅。

姬发与姜太公此举用意深远：其一是确定周邦在诸侯中的领袖地位；其二是借以观察殷商纣王的反应。

八百诸侯前来观摩军演，实际上已是承认姬发“西伯”的霸主地位。当时有不少诸侯提议道：“纣可伐矣。”老成持重的姬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他说：“还未知天命如何呢？现在尚不是时候。”

为什么还不是时候呢？

因为殷商尚有贤人在，还有微子、箕子与比干等人。

微子就是纣王的庶兄启。

作为纣王的长兄，微子曾多次直言进谏，纣王哪里听得进去呢？看到殷商沉沦，微子难掩心痛，一度想过要自杀，又没有这个勇气，心里犹豫不定，便找来太师、少师，对他们说：“想我先祖成汤以前做过许多伟大的事业，如今纣王却只是沉湎于酒色之中，轻信妇人之言，败德乱政。殷朝自上而下，作奸犯科，卿士百官藐视法律。真正有罪的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如今民众兴起，相互攻夺。殷商快完蛋了，就像一个人在水中找不到岸一样危险。殷商就要灭亡了，我该往何处去呢？我的家族能躲过灾难吗？你们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

太师叹气道：“唉，尊贵的王子（微子是帝乙的儿子，故称王子），老天要灭亡殷国了，纣王既不畏天，又不畏民，我们这帮老臣都不受重用了，殷商的百姓都背弃了神祇。如果现在能把国家治理好，就算死了也无憾。如果拼了老命，还于事无补，那不如离开，逃得远远的。”

这一番话，终于让微子下定决心，既然无法改变纣王的暴政，想自杀又没胆量，唯一可行的，便是逃了。他毫不留恋权力与地位，一走了之。

再来说说箕子。

殷商朝廷之上，敢于向纣王劝谏的人，都是王亲国戚，其他敢于直言不讳的人，不是死光了就是逃光了，剩下来的人，就算有良知，也一声不吭，保命要紧。箕子是纣王的叔叔，有人说他就是太师。有一回，他见到纣王用象牙制筷子，就发了一通牢骚，说：“今天想着象牙筷子，明天就想着玉器杯子，以后就想把远方的各种稀世珍宝都据为己有。宫廷的各种奢华就从这里开始了，国家肯定振兴不了。”

果然不出箕子的预料，纣王上台后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作为老

臣及长辈，箕子也多次进言劝谏，结果可想而知，纣王理都不理他。有人就对箕子说：“您还在这里干什么呢？可以离开了。”箕子答道：“作为人臣，进谏不被采纳，就离君主而去，这不明摆着去宣传君主的恶行吗？不是自命清高吗？我可不能这样做。”大家都知道，作为王亲国戚兼国家重臣，逃离朝廷，这当然会被视为君主的迫害。箕子不想把恶名留给纣王，毕竟自己是臣子，也是君王的叔叔。那怎么办呢？我呀，我就装疯好了。某日，箕子不上朝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殷都：他疯掉了！只见箕子披头散发，手舞足蹈，念念有词，甚至跑到别人家里当奴仆。后来纣王认为一个堂堂王叔如此疯疯癫癫，成何体统，便干脆把他抓起来关了。

别人真以为箕子是疯了，可是有一个人心里是明白的，他就是比干。

比干与箕子是兄弟，同样都是纣王的叔父。他是殷商帝国最有才干的大臣，也是最令西伯姬昌、姬发畏惧的人。当年西伯姬昌使花招儿，捞得征讨诸侯的大权，比干一眼就洞穿了西伯的阴谋，可是纣王对他的意见不理不睬。早年那个智慧过人的纣王，在权力与酒色面前已全然丧失了判断力与进取精神，殷商帝国之所以还不倒，正是有比干力挽狂澜。当时比干就是被尊为“圣人”级的人物，也正因为他的存在，百姓尚且对殷商存有一线希望。

箕子假装发疯，众人都信以为真，可是岂能瞒过比干那双锐利之眼呢？他知道箕子装疯乃是无奈之举，是对帝国完全丧失了信心。外人或许还以为殷商帝国是一头猛虎，身居显位的微子、箕子、比干等人心里再清楚不过，帝国只是一只病猫罢了。风雨飘摇，微子逃了，箕子疯了，比干又要做何选择呢？难道他也一走了之吗？说实话，眼不见心不烦，逃避是最省心的事情。可是殷商四百多年，难道就毁在这一代人手上了吗？强烈的责任感又迫使比干忍辱负重，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先王的基业就这样毁掉。

可是他能怎么办呢？名为王叔，却权力有限。纣王不悔改，就靠他一人，绝对无法拯救这个垂危中的国家。明知进谏毫无益处，但除了进谏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叫报国无门。明知忠言逆耳，再进逆耳之言，非但起不到作用，反倒只会让事情更糟。比干未必不知道这一点，但他没时间等了，他已经垂垂老矣，他只是抱着一点点的侥幸，如果能用自己的一死换来纣王的清醒，这就值了。

事与愿违。

纣王对比干越来越厌恶，这个老家伙每每冲淡他的好心情，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死呢？可是比干却如机器人一般，反复唠叨着翻来覆去毫无新意的说辞。纣王快疯了，这事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不然是纣王大呼一声“我受不了了”，自杀而死；要不然就是比干去死。纣王虽然不再年轻，可是他的青春不曾逝去，他内心阳光明媚，生活对他来说是无尽的享受，他怎么舍得被唠叨得去自杀呢？所以死的人只会是比干。要让这个老家伙闭嘴，最干脆的办法，就是——杀！

崇尚艺术的纣王虽然失去了进取心，可是还有想象力。比干不是被称为“圣人”吗？好，那我就看看圣人与凡人有什么不同。他冷笑中带着阴险：“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是不是真的呢？”这句话，冰冷且残酷，杀意已决！比干毫无怯意，生对他已无可眷恋，死何尝不是解脱。就算他如微子那样隐去，如箕子那样装疯，可是内心的折磨怎会有个尽头？这样倒好，他不必眼睁睁地看着殷商覆灭，不必掩起脸到黄泉之下见列祖列宗，因为他尽忠了，问心无愧了。面对纣王举起的屠刀，他淡然道：“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死到临头，还想着百姓，算是忠臣好官，只是死得可惜了。

我小时候读《封神演义》，总想着比干太傻，何必当一个陪葬品呢？及长，方知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原本不能功利化，不能以事功去衡量评判，他做了自己的选择，践行了自己的信念，这对他来说已经够了，价值不是由别人去定的，而是自己的体验。

比干死了，纣王果然剖出他的心脏，置于手心，仔细端详，忽然间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都说圣人之心有七窍，比干哪里是圣人，这颗心脏与凡人也没差别嘛。

箕子被囚，比干剖心，殷商帝国大厦的两根大柱子倒下了。

姬发与姜太公等的就是这一天。

商纣自毁长城，此时不兴兵灭殷，更待何时！

出兵之前，西伯姬发照例以龟甲占卜，大失所望，占卜的结果竟然是“不吉”。苦苦等了两年，明明时机已经成熟，可是占卜竟然通不过，怎么办？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的时候了，上天似乎为了营造不吉的兆头，暴风雨突至，电闪雷鸣，众人无不惊骇。以姬发之英明神武，亦不免犹豫踌躇。

此时只见一人挺身而出，体现出大无畏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殷商腐败，贤臣尽去，以正义之师伐不义之国，天理昭然，何惧不吉之卜辞乎？

问此人是谁？

姜尚在此！

管你是人间奸邪还是魔界妖孽，我姜尚照打。

龟甲怎么能左右历史呢？

在姜尚姜太公的坚持之下，姬发奋起武士之心，毅然下定决心，讨伐殷商，为天下除害。姬发把讨伐殷商的决定遍告诸侯：“殷有重

罪，不可以不伐。”此时周的兵力如下：有战车三百辆，虎贲（bēn）之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诸侯闻讯，莫不摩拳擦掌，纷纷前来会盟。一支讨伐殷商的诸侯联军迅速组建起来，联军的主力当然是周的军队，周的军队数十年来南征北战，已锤炼为钢铁之师矣。

二十九 殷商的灭亡（下）

这一年是姬发上台的第十一年，由于他后来称周武王，故而称为武王十一年。

十一月戊午这天，诸侯联军在盟津誓师。大家宣誓的口号是：“孳孳（zī）无怠。”就是说，要孜孜不倦，不要懈怠。宣誓完毕后，由姬发发表战前动员演说，这篇演说词又称为《泰誓》。在《史记》中，只记录一篇，且行文较短。在《古文尚书》中，《泰誓》共有三篇，也就是姬发前后有过三次演说，篇幅较长。

姬发都说了些什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列举纣王的种种恶行；其二是说明自己造反的理由；其三是鼓励全体将士奋勇杀敌。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首先是揭露纣王的暴行：

“商王纣对上天不敬，给人民带来灾难，他沉溺酒色，残忍暴虐，采用灭族的恐怖手段。生活奢侈，大兴土木，大造宫室楼榭，以盘剥百姓。以炮烙之刑炙杀忠良，以剖腹之法残害孕妇。”（《泰誓》上篇）

“如今商王拼命干坏事，抛弃老成持重的大臣，亲近奸佞小人，淫乱酗酒，放纵暴虐，致使朝廷朋党林立，互相攻伐。而无辜之人却只能呼天喊地，无处诉冤。”（《泰誓》中篇）

其次是说明自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上天要护佑万民，这才有了君主，才有了百官。君主要恭从天命，安抚、爱护四方之民。纣是有罪还是无罪，这由上天来决定，不

是我一个人敢自作主张的。纣有亿万臣民，就有亿万条心，不能同心同德；我就算只有三千臣民，也可以上下一心。殷商已是恶贯满盈，上天已经命令我诛杀之，我若不顺承天命，罪恶与纣相同。”（《泰誓》上篇）

在这里，什么是天命，姬发说得不清不楚。

他在第二篇演讲中，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把“天”与“民”结合起来，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姬发思想的一大突破。我估计他之前第一次演说，未能得到认同，特别是讲到天命时，凭什么说你知道天命呢？你是如何知道的呢？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讲清楚。他把不可捉摸的天意，与可以理解的民意视为一体，那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上天的意愿，就是人民的意愿，这是多高明的见解呀，神从天上回归到人间了。

最后是激励将士奋勇杀敌：

“我将率领你们诸将士，消灭仇敌。尔等应奋勇向前，以坚毅果敢之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功多者有厚赏，怯懦不前者杀无赦。”（《泰誓》下篇）

政治动员是必要的，战斗力的由来，在于明了为何而战。姬发强调此役乃是惩恶扬善，乃是除暴安良，救民于水火之中。

还有比这个更崇高的事业吗？

次年二月，诸侯联军抵达殷都郊外的牧野，兵力有所增强，据《史记》的说法，此时，联军的兵车已经有四千辆之多。那么纣王的兵力又有多少呢？《史记》给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七十万人。

以我的看法，这个数字很有水分。

在纣王之前，通过卜辞所查到的资料，在武丁大帝时代，我们看到一次征集的军队最多也就一万人。在当时，一万人就算得上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纣王孤注一掷，把能上战场的人都征入队伍，数量可能远不止一万人，但也不可能比武丁时代要多出七十倍。再说了，就算临时征召七十万人，哪来那么多武器配给呢？难不成赤手空拳上阵吗？因此，我猜想纣王所称的七十万人，只是虚张声势，能有二十万人就算很了不起了。

那么诸侯联军的兵力有多少呢？

这个不太好估算。

在联军中，周派出的兵力，共计有三百辆车，四万八千人，平均每车对应一百六十人。按照后来周的定制，每车应该配置七十五名战士，这说明姬发手中的战车数量不够，他必须从诸侯那里调来更多的战车。诸侯国提供了三千七百辆战车，但每车配置多少人，却是未知数。我想，周军至少占联军的一半兵力，如果没占到这个比例，指挥系统就会出现問題。倘若以此来推算，联军的数量，大约在八万人到九万人之间。

从数量上来说，诸侯联军远不及纣王的军队，但是武器上应该占有绝对优势，因为四千辆的战车，绝对不是小数目。中国战车发展的巅峰期是春秋时代，晋文公称霸之时，也只有战车七百辆。到了春秋晚期，当时最强大的两个诸侯：晋国与楚国，所拥有的战车，也不过是四千辆。

在军事思想上，殷商已是落后周了。

尽管战车很早之前便出现在战场，但是把战车变为一支“装甲集群”，那可就是破天荒的变革了。这种军事思想的变革，正是由姜太

公来完成的。在《六韬》中，可以看出姜太公对战车的重视程度：“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北走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在姜太公看来，战车足以摧毁敌人坚固的阵地，是以少胜多的利器。十辆战车可以打败一千名敌人，而百辆战车可以打败一万名敌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姬发要征集那么多的战车，因为他必须一击致命，终结殷商的历史。

双方决战的时间是在二月甲子。

地点：牧野。

决战是在黎明时打响的。

姬发派太师姜尚带着一百名勇士，前往殷商兵营前挑战。古代打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双方列阵而战，只消一天打下来，胜败立判。纣王仗着自己人多，接受挑战，把阵式排开。战车与步兵交错分布，大家手里操着戈戟或弓箭，排列齐整。在空旷的原野上，不时有风袭来，旌旗猎猎。

擅长鼓舞士气的姬发又一次发表战前演说，因为是在牧野前线，故而这篇演说又称为《牧誓》。只见姬发左手持着象征权力的大黄钺，右手挥舞着大旗，对众人说道：“路途多遥远啊，从西方来的人们！”演说的开篇就不落俗套。

“啊！来自友邦的诸位国君，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都是官名）、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鬛（máo）、徽、卢、彭、濮等诸部，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我就要宣誓了。

“古人曾这样说：‘母鸡不应该在清晨啼叫，如果母鸡啼叫了，这个家就要败落。’如今的殷商，就是母鸡在啼叫。商王受（即纣王）只

听妇人之言，抛弃对先祖的祭祀，抛弃同族兄弟，不肯任用。他不用贤人，却任用那些从四方逃来的罪犯，把他们提拔为大夫、卿士，尊崇他们、信任他们，而他们却是残暴地虐待人民。面对这种情况，我姬发只能恭行天罚，替天行道。对于今天即将面临的战斗，我有几个要求：每前进六七步，就要停下来整理好队形。进攻的时候，用武器刺击四五次或六七次后，就应该停下来重新整好队形。诸位将士，要努力啊，拿出勇敢精神，像虎豹熊罴那样凶狠，在殷都的郊野与敌人一决死战。注意不要杀死前来投降的人，这些人以后可以带回西方服劳役。如果你们不奋勇战斗，那么我告诉你们，将会带来杀身之祸的。”

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演说词。

周武王姬发的《牧誓》与夏启的《甘誓》、商汤的《汤誓》都是开国君主在战场上的讲演，《牧誓》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另两篇的特点，该文对行军布阵时的队列要求做了明确指示，无论是在前进时还是攻击时，都必须要保持队形的完整。为什么姬发要强调这一点呢？诸侯联军的力量是居于劣势的，要扭转这种劣势，就必须以严明的纪律约束，战士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进退。这显示了诸侯军队，特别是周军的军事素质是相当过硬的，这应该与姜太公的训练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年，纣王上台已经整整五十二年了。

已经看不到当年那个神勇无敌的纣王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老态龙钟的形象，比肉体衰老更为可悲的是，他的思想早在靡靡之音中变得萎靡不振了。但他似乎还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他拥有的军队更多，不过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很令人怀疑。很明显，数十万大军中的绝大多数只是临时拼凑而成，既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技能训练，更谈不上有

铁的纪律。

纣王把临时拼凑的杂牌军置于前，中央军则置于后。他的算盘是先让杂牌军胡乱抵挡一阵，占着人多消耗诸侯联军的实力。等到诸侯军精疲力竭之时，精锐的中央军再投入战场，必定可以大获全胜。这个想法固然很美，只是早已不理兵事的纣王哪里晓得世界军事地发展趋势，周的武装力量之强大，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联军的进攻有条不紊，战车部队发动进攻，四千辆战车，足以撕破敌方的防线。后续跟进的步兵，严格遵守姬发的命令，始终维持着进攻队形的整齐，步步为营，不急不缓地向前推进。反观殷商军队，那些被临时拖上战场当炮灰的人，哪里有什么士气可言，他们究竟为何而战斗呢？为了保护暴君、独夫、压迫者纣王吗？他压迫我，我却要保卫他，有这个道理吗？谁也不想打仗，看到诸侯军冲杀过来，殷商军队中就有人喊了：咱们为纣王拼啥命啊，干吗不加入联军一方，倒转枪头去对付暴君呢？

起来，不愿当炮灰的人民！

于是乎令人惊愕的一幕发生了：殷师的前军突然纷纷倒戈，反倒成为诸侯联军的前锋，攻打纣王的后军。这下子可乱了套，纣王哪里料得到有如此变故，他辛辛苦苦招来的数十万大军，却成了敌方的帮手，他就像给姬发打义工。

这仗没法打了。

商纣的中央军在诸侯联军及倒戈者的双重打击之下，伤亡惨重。

《尚书》的《武成》篇中记录牧野之战的惨烈场面时，用了一个词：“血流漂杵。”对于这个说法，后来孟子表示强烈的怀疑，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认为周武王姬发是“至仁”，而纣王是“至不仁”，

正义摧毁邪恶，理应是摧枯拉朽，哪来的血流成河？

这种说法实在太过于主观，太过于幼稚了。

姬发一战定江山，纣王狗急跳墙，不遗余力把所有家当都投入了，要是没点实力，他能坐得了五十年江山吗？即便是正义战胜邪恶，就像“二战”中同盟国打败法西斯一样，也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牧野之战是周与商的生死之战，血流漂杵的惨烈并不奇怪，但显然殷商人的血流得更多。

牧野之战，决定了殷商帝国的命运。

纣王战败了，他逃回殷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殷都的守备形同虚设，很快诸侯联军如潮水般涌入城内，谁都知道，一个旧王朝结束了，一个新王朝开始了。

诸侯联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入城，在队伍之中，有几辆华丽的马车，车上所坐的人，当然都是重要人物。殷都的百姓夹道观看，指指点点。混在人群中的人里，有一个著名人物，他名叫商容，曾经是殷商重臣，只是因得罪纣王而被罢官。

当第一辆马车驶过来时，一望便知是个地位极高之人，百姓们纷纷议论说：“这个人是不是新的君王呢？”商容笑道：“不是的。你们看这个人，看上去十分严肃，但脸上带着焦急的神情，这是遇到大事时表现出的敬畏之心，但他不是君王。”商容说得一点也没错，车上的这个人，便是姬发的左右手毕公。

第二辆马车驶过，大家又在猜测此人是不是君王。商容又评论道：“不是的。你们看这个人，坐在车上虎虎生威，又像雄鹰一样振翅欲飞，他若率领将士迎战强敌，一定会奋力向前，决不退缩。这个人也不是君王。”那是谁呢？太师姜尚姜子牙，看来此公是老当益

壮。

又一辆马车过来，这坐的是不是君王呢？商容又点评道：“不是的。此人温和宽厚而又悠然自得，他志在除贼，安定天下，但他不是天子，他应该是周的相国吧。”来者正是姬发最得力的副手，一代名臣周公旦（姬旦）。

此时第四辆马车迎面而来，大家想，这回总该是君王现身了吧。商容喝彩道：“是了。你们看这个人，有圣人的气象，为什么呢？他为海内征讨暴虐，可是无论是善或是恶都不会影响他内心的平静，你们看他外表，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喜怒的神色。所以我知道他就是新的君王。”这回，商容又猜对了，来人正是征服者姬发。

看来商容是懂得一点相人之术的。在他看来，前三人，即毕公、姜太公、周公旦三人，还未臻最高明的境界，他们或有焦急之相、或有威武之相、或有得意之相。而姬发则深沉如海，不动如山，真正有帝王之相。

倘说姬发不食人间烟火，却也未必，凡人之心，他皆有之，特别是复仇之心。如不是为了复仇，又哪来的兴师动众？

姬发、周公旦、姜子牙、毕公等人都进城了，这时候纣王躲哪去了呢？一生都自以为是的纣王，做梦也没想到，仅仅是一场战役，他就彻底输光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惜他没有时间去总结经验教训了。高傲的他当然不愿意向臣子缴械投降，再说了，投降能有活路吗？

关于纣王的结局，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称纣王自焚于鹿台，临死之际，他还不忘把所珍藏的珠玉戴在自己身上，是不是担心到了九泉之下成了一名穷鬼呢？这是《史记》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见于《竹书纪年》，称纣王乃是被周武王姬发所俘，他逃到一个名为南单之台时，被周军擒获，后来被处决。

不管哪种说法属实，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纣王最后死了。据说，姬发对着纣王的尸体射了三箭，并用一把名为“轻吕”的剑在他身上捅了几个窟窿，最后用大黄钺砍下他的脑袋。

清算完纣王后，紧接着是清算他的女人。史书上多次提到纣王听信妇人之言，至于他后宫的女人在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着实不容易搞清楚。妲己被视为“祸国殃民”的女人，自然难逃一死，她被处决后，与纣王一样被悬首示众。我估计到了商纣晚年，妲己也未必受宠，毕竟人老珠黄，而帝王后宫不缺的就是年轻美貌的女人。

真正受到纣王宠幸的两个妃子，自知没有活路，索性悬梁自尽。姬发为了报当年父亲被囚之仇，冲着这两个妃子的尸体各射三箭，然后用剑戳了几个窟窿，最后用玄钺砍下她们的脑袋，悬挂在小白旗上。

殷周之战，以周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商朝寿终正寝，自成汤到纣王，商代共计有二十九个王，四百九十六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长命王朝之一。

三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姬发东征，把纣王拉下马，为民除害，固然可拍手称快，但除害之后呢？是从殷商遗老中选立新帝，或者是取而代之？以诸侯的身份挑战帝王，这叫以下犯上，既已冒犯，就要一犯到底，推倒旧秩序，建起新秩序。

一个崭新的王朝破茧而出。

这便是周王朝。

纣王死后第二天，姬发正式称王。

这一天，在故殷商王宫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登基仪式。姬发乘坐一辆马车，拉车的是他弟弟叔振铎，周公旦手持大钺、毕公手持小钺分别站在他的两旁，大钺、小钺便是权力的象征。臣僚散宜生、太颠、闳夭等人手执宝剑，站在马车两旁，保护姬发的安全。

到祭祀上天时候，主持仪式的卜者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天皇上帝。”这是解释革命的合法性，宣布纣王的罪状。这时姬发向上天磕了两个响头，恭敬地接受天命：“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说完后又磕了两个响头。

这样，姬发成为周王朝的第一任天子，称为周武王。武王把父亲姬昌尊为周文王，姬昌虽然生前未称王，但周王朝的基业，实是由他奠定，他也是周王国的真正缔造者。文王的父亲季历被尊为王季，祖父古公亶父被尊为周太王。后世把周文王、周武王并列为最伟大的英雄，同尊为“圣人”。

有两个政治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革命；一个是维新。这两

个词，与周王朝都有关系。革命一词，出自《周易·革卦·彖（tuàn）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然，这个意义，与现在我们说的是有区别的。古代把成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推翻商纣称为革命，乃是仁政推翻暴政，仁君推翻暴君，上应天理，下合民心。可以说，汤、武革命，乃是文明进步之体现。维新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一个老诸侯，但其使命却是崭新的。

现在，周武王的革命成功了，接下来就是要做“维新”的事业。

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摆在周武王面前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殷商部众。

要如何处置战俘呢？

周武王想听听诸臣的意见。他首先询问姜太公：“要如何处置战俘呢？”

姜太公是兵法家，又是谋略家，当然颇有雷霆手段，他回答道：“臣听说爱一个人，连他房屋上的乌鸦也爱；恨一个人，也不会喜欢他身边的东西。大王与商纣有深仇大恨，对他手下的那帮人，应该斩尽杀绝，您看怎么样？”

周武王摇摇头，答了两个字：“不可。”然后他又询问召公奭（shì）同样的问题。

召公奭回答说：“把有罪的人杀掉，把无罪的人释放，怎么样？”

周武王还是摇摇头，不认同召公的意见。

下面要看看周公旦怎么回答，因为在所有弟弟中，周武王是最欣

赏周公旦，他的意见会不会跟自己相同呢？

周公旦回答说：“战争都已经结束，不如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耕作自己的田地。不论他是旧政府的臣民还是新政府的臣民，只要有仁义德行就能得到器重。如果百姓有什么过错，我作为政府的首辅，责任就由我一人承担吧。”

这一番话，让周武王大为赞赏，叹道：“你所说的话真是博大精深，可平天下矣。自古以来，士人君子之所以受到推崇，正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仁义道德。”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经常改朝换代，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每次政权交替之际，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残杀。但是这种大规模屠戮，在商取代夏、周取代商时却没有发生。中国早期文化传统中，“仁义”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这也使得华夏文明充满人道主义的色彩。

这种仁义的观念有其产生的土壤，在夏、商、周三代，所有的天子，不过是邦联制的首领，中央帝国对诸侯国并没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在军事上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光凭恃武力者，难以服人，必须要辅以道德仁义，充当公正的仲裁人。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是受到了诸侯们的权力制衡，有制衡的权力，自然不能为所欲为。而秦一统天下后，君王再也不受制于诸侯们的权力制衡，不受制衡的制度下，要帝王克己奉公当圣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周朝之后，帝王家再无圣人。

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接下来便是如何处置殷商王族。

在这方面，新兴王朝体现出罕见的宽宏大量。

除了纣王及其几个妃子外，殷室王族并未遭到大规模清洗。纣王死后，他的儿子禄父不仅未遭处决，还继续统治殷城，他也被称为武

庚，只不过不再是帝国之王，而降格为普通的诸侯。当然，监视是必要的。周武王把两个弟弟——管叔姬鲜、蔡叔姬度——留在殷地，表面上是辅佐禄父，实际上则是殷地的实际统治者。

纣王的庶兄微子原本已经逃得远远的，周武王攻克殷都后，他担心族人的安危，遂返回殷城。微子手持祭器，脱了上衣，把自己绑起来，左手牵着一只羊，右手拿着一束茅草，跪着走路，前去见武王。这什么意思呢？羊与茅都是祭祀时用的东西，表示我把家族的命运交给你了。周武王当即把微子释放，官复原职，确有大政治家的胸襟与风范。

以前装疯又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也得以重获自由。

箕子与比干都是纣王的叔父，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如今新朝草创，能马上得天下之人，未必能马下治天下。周武王求贤若渴，亲自登门拜访，向箕子讨教治国之道。箕子做了长篇回答，后来被整理成文，收入《尚书》，这就是著名的《洪范》。这篇文章在古代极受重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哲学、政治、卜筮等。在政治上，箕子推崇仁政与宽容，倡导王道，这些见解对周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可是箕子毕竟是殷商遗臣，不愿意当周的臣民，也不想居住在殷这个伤心之城。虽然这时他已经很老了，可是仍然怀揣着一个梦想。他带着一帮殷商旧民，朝着东北方向而去，最后到了朝鲜。箕子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箕子朝鲜”，把中原先进文明传播到了这里，这也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权。周武王把箕子的朝鲜国列为“不臣之国”，不必向周王朝称臣，表达对箕子的敬重。尽管如此，箕子也没有把自己的小国与周王国平起平坐。数年后，他前往周都朝见周武王，这也是对周武王宽宏大量的感谢。

除了善待前朝遗老之外，周武王也没有忽视殷民们的利益。以前

被纣王拘捕的百姓，都被释放。纣王在鹿台库藏的大量钱财，在钺桥囤积的大量粮食，都分发给百姓，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从百姓那儿搜刮来的。

武王还表彰了殷商几个已经去世的贤臣，他下令为名臣比干修建一座高大的坟墓，以示尊崇。另一位贤臣商容也得到褒扬。周武王在他家门前立了一块华表，以表彰其高尚的品德。这样做，无疑使殷民觉得光荣，脸上有光。

应该说，在处理殷商遗留问题上，周武王的做法是明智而谨慎的。正因为如此，避免了许多潜在的冲突，维护了前朝贵族与殷民的利益和面子。光凭这点来看，周武王便堪称伟大。因为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中，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能像周武王一样善待前朝的王室，并给予他们相当多的特权与自主权。

此时周武王的感受一定颇似于当年的商汤，帝国建立起来了，但这只是开始，远非终点。当年周与八百诸侯能团结一心，乃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当敌人不复存在时，关系便悄然发生变化，当初的盟友，随时都可能成为新的敌人。任重道远啊，当权者能不慎乎？武王西归后，总是闷闷不乐，有时独自一人登上山丘，遥望殷邑的方向，默不作声。到了晚上，又时常难以入睡，秉烛沉思。

一天，姬旦见哥哥的寝室仍烛光摇曳，便入室问道：“为什么不睡觉呢？”

武王看了弟弟一眼，若有所思地答道：“我告诉你吧，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纣王即位时，我还没有出生呢，从那时起，上天就抛弃殷商，到现在大概有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里，殷商朝廷之上，奸臣当道，正人君子却遭放逐。正是因为上天不眷顾殷人，我们才能推翻他们成就今天的事业。想当年殷商建朝时，任用的贤人有三百六

十人；可是后来，商王弃贤人不用，因此走向灭亡。现在我还没有完成天命，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哪有时间睡呢？”

谁说国君容易当呢？地位越尊崇，责任就越大。

姬旦听了哥哥这一番话后，非常佩服。这时武王又说道：“我要继续完成上天交给的使命，夜以继日地艰苦奋斗，以安定西土（即周的领地），把周所奉行的道义发扬光大。”

说实话，周武王是够勤政的，怪不得后世儒家人物都要对他竖起大拇指。既然要把德政进行到底，就必须做出表态：裁军！

要知道武王推翻商纣，武功盖世，现在他怎么要放弃“武力”呢？在他看来，“武”的含义，就是由“止”、“戈”两个字构成的，原来武力只是制止战争的手段。在伐纣之役中，武王的嫡系军队多达四万八千人，这当然不是常备军，而是为战争而征召的，如今殷商已灭亡，也不可能养着这么多军队。于是放战马于华山之南，放牛于桃林之野，把召集起来的临时军队解散，把干戈兵器藏入库中。

这是昭告天下：战争结束了，和平年代到来了。

从季历到文王再到武王，周的成长就是军事扩张的过程，如今天下初定，当务之急乃是休养生息。事实上，周武王并不过多忧虑军事问题，因为在伐纣之前，天下就有八百诸侯归附周，殷商灭亡后，周王室受到的外在威胁并不大。

他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迁都。

自古公亶父迁到岐下后，周有过两次迁都。第一次是西伯姬昌迁都于丰邑；第二次是武王迁都于镐京。但武王显然对镐京的地理位置不太满意，他要物色一块更适合的土地。为此，他考察了从三涂山到

太行山一带的地形，确定了一块理想之地，位于洛水与伊水之间。周武王开始在此地筑城，这就是后来的洛邑，又称为雒（luò）邑。他甚至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从殷邑迁往洛邑，可是迁都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在灭商后六年（周武王十七年），这位新王朝的缔造者便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四岁。

周武王缔造的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王朝，尽管人们对它的兴趣远不及汉朝或唐朝。它是古代最长命的王朝，而且中国古代之核心思想，均奠基于周代，特别是东周时代（春秋战国），更是古代思想文化之登峰造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流派，皆创于此期，自秦以降到清，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学术可以媲美于周代，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谓的“早熟的文明”。

三十一 管、蔡的叛乱

（上）

在政治制度上，周代仍然延续了夏、商以来的分封制，但有所创新，体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浓厚色彩。

为了使新政权深入人心，周武王不仅分封殷商王室族人，同时也没忘掉历代帝王的后人。神农氏（炎帝）的后人封于焦，黄帝的后人封于祝，帝尧的后人封于蓟，帝舜的后人封于陈，大禹的后人封于杞。这些都是所谓的“圣人”家族，尽管有些家族已经没落，但由于中国向来有祖先崇拜的传统，政治影响力尚存。在分封诸侯一事上，周武王堪称慷慨大方。

作为新王朝的缔造者，周武王不能不思考夏、商两朝中央政权存在的问题。在夏代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央政权并没有足够的权威，甚至有一段时间政权还落入野心家手中（后羿、寒浞），这是因为中央政权的直辖区太小，遇到强有力的诸侯时，中央帝国甚至不是其对手。商汤建立商王朝后，扩大了中央直辖区的范围，中央帝国无论在土地还是人口上，都要远远大过其他诸侯。后来商的覆灭，问题便是出在没有强有力的诸侯作为屏藩。

周王朝若要长治久安，非得有强大而且忠诚的诸侯拱卫不可。要诸侯对王室忠诚，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自家人才谈得上忠诚，当然，太师姜尚姜子牙也算得上一个。周武王如高明的棋手，在分封诸侯上足见他的远见卓识，我们且来看看他是如何做的。

武王封太师姜尚于营丘，国号为齐；封弟弟周公旦于曲阜，国号为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弟叔鲜于管；封弟弟叔度于蔡。以上这几

个人，是周帝国的核心人物。这里体现了怎样的政治智慧呢？周的势力原本乃是在岐下、丰邑一带，位于西方，在中部、北部、东部都缺乏影响力。武王分封诸侯的原则，便是把心腹安插在周势力薄弱的地带。在势力最薄弱的东方，安插姜太公的齐国与周王旦的鲁国；在北方则安插召公奭的燕国；在殷商旧地的中央地带，安插叔鲜的管国与叔度的蔡国。

这就如同围棋国手的布局，固然不可只争一隅之地，而必须放眼全局，把重要棋子置于四角乃至腹心。这种战略布局用意明显，只要有其他诸侯叛乱，帝国的捍卫者便可以从各个方向出击，绝不至于像殷商那么被动。在周武王之后，这个战略布局又被继承者做了改动，设两都，即西都与东都，分控西部与中部，又给予东方齐国征伐之权。如此一来，周王自西向东直到东海之滨，均取得了有力的控制权。

在这几个嫡系诸侯中，管、蔡两国负有特殊的使命，这两个诸侯国分布在殷邑附近，管叔鲜、蔡叔度的职责之一，便是监视殷商旧贵族，预防他们造反。周公旦虽然被封于鲁国，可是他并没有前往封国，周武王对这个弟弟的政治才华十分欣赏，把他留在朝廷，帮自己打点政务。因此经营东方的重任，实际上便落在姜子牙的身上。

姜子牙虽已年迈，却宝刀不老，在他的经营下，齐国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

周灭殷商，最大的功臣当属两代帝师姜尚姜子牙，他所得到的封赐也是最多的，封于营丘，国号为齐。周取代商，理所当然地接收了殷商遗留的政治资本，包括其领地与控制下的诸侯。只是殷商时代，对诸侯的控制力原本有限，周的权力触角还未远远地伸向东方，因而所谓的封国不过是画在纸上的大饼罢了，能否抢下这个大饼，还得看

本事如何。

武王封姜尚于齐，这只是给一个允诺，你可以到那里当诸侯，能否站得住脚，还得奋斗才行。正因为这块大饼不好下咽，而又不能不吞下，周武王才让最有智慧的姜子牙去经营，只有东部无虞，地处西方的朝廷才能高枕无忧。

据称，姜子牙本是东海上人，即今天的山东地区，受封于齐，对他来说，算得上是衣锦还乡。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姜子牙已经老朽了。倘若果真如史书所言，周文王姬昌找到姜子牙时，他已是古稀之年，那么此时应该八九十岁了。忙碌一生，岂不是该好好地安享晚年吗？姜子牙当真是抱了这种想法，奋斗了一辈子，终于当了诸侯，心里好不得意。尽管事业来得有点迟，可毕竟他还是奋勇地攀上了人生的高峰。

也许是时候歇歇了。

他带着一帮人马，向东进发，向着自己的封国而去。一路上，姜子牙气定神闲，不急赶路，白天赶路，晚上投宿酒馆，倒也十分惬意，沿途欣赏大好山川，流连忘返。

有门客急了，天下虽已初定，但东方并非太平，如此拖泥带水，恐怕局势有变。某天晚上住宿时，该门客对姜太公说：“我听说来之不易的东西，失去却是容易的，你这么安逸，睡得这么香，不像是急着赶到封国的人。”言下之意是说，你别以为封你为诸侯，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很多人都抢着要哩，你还不赶紧去接收？姜太公一听，如梦初醒，赶紧穿上衣服，连夜赶路，在黎明之时到达营丘。

也亏得那人提醒，姜太公要是晚到一天，就大事不妙了。

在营丘附近，有一个夷人国家，称为莱国。莱侯原本是听命于殷商，这时殷商覆灭了，周朝刚刚建立，东部尚未安定，莱侯便想浑水

摸鱼，乘机夺取营丘。所幸的是，姜子牙及时赶到封国，迅速组织防御，打退了莱人的进攻。

正因为周王朝对东部的控制力薄弱，周武王才让强有力的姜太公去治理此地，同时也给了他很多自主权。姜子牙不愧为出色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他一方面加强齐国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用心思考齐国的出路。

当时的齐地接近蛮夷，属于落后地区，姜子牙很有本事，他发现齐国拥有许多自然资源，特别是在渔业与盐业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若能因势利导，则必定可富甲诸侯。除了渔业、盐业之外，姜子牙还大力发展工商业，使得附近的居民纷纷前来投奔归附齐国，齐国很快就成为诸侯国中的后起之秀，成为一个大国。从开国者姜子牙开始，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齐国一直是诸侯国中的一等强国，这种光荣的历史，在各诸侯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当初周武王把自己的弟弟们分封在大帝国的几个战略要地，希望这些同姓诸侯能作为藩卫中央的强有力保障。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刚去世，几个兄弟就同室操戈，新兴的周王国陷入极其严峻的危机之中。

这件事的由来，得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周公旦。

周公旦就是姬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在周文王诸子中，姬发与姬旦是最出类拔萃的两个。据《史记》载：“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姬旦从小在孝行与仁德两方面，在诸兄弟中是最为突出的。周武王对这个弟弟最为器重，自从继位后，就把姬旦视为左右手，朝中许多政事都交由他处理。姬旦兢兢业业地辅佐哥哥，在推翻商纣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在周武王登基仪式上，姬旦执大钺站在其侧，地位可以说是在众人之

上。受封鲁国后，周武王并没有让他前往封国，而是留在自己身边，偏好之心，一目了然。

武王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谁是继承者呢？

倘若以殷商传统，兄死弟承，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是姬昌的第三子管叔鲜。姬昌共有十个嫡子（正妃太姒所生），分别是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与匡季载。其中长子伯邑考早死，武王姬发病逝，剩下来八个同母兄弟中，管叔鲜最为年长，继位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过，周与商的传统是不一样的。从古公亶父开始，接下来的季历、文王姬昌、武王姬发，都是世子继承制，并没有采用兄弟继承制。问题是，周武王的嫡子姬诵当时年龄尚幼。姬诵几岁呢？史书有不同说法。《史记》的《周本纪》只写他年少，未明几岁；《鲁周公世家》写他尚在襁褓之中；《孔子家语》则说他十三岁，十三岁很难说是在襁褓之中吧。总之，姬诵的年龄不会超过十三岁，还达不到亲政的年龄。

此时武王的几个兄弟都被分封在外，只有周公旦在朝中执掌大权。周公旦当然不愿意选择兄弟继承制，如果由弟弟继承哥哥的大位，只能是最年长的管叔鲜继承。因此周公旦果断地立周武王未成年的儿子姬诵为第二任周王，史称周成王。由于周成王年纪尚轻，未能亲政，周公旦自己为摄政王，成为周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此举令周公旦的诸兄弟勃然大怒。要知道周公旦一直得到周武王的器重，甚至不让他去封国而留在朝廷，这个恩典是其他兄弟都没有的。在周公旦的兄弟中，有些兄弟早就对他看不顺眼，认为是武王偏心，心里很不服气。如今周武王刚死，周公旦居然就当起摄政王，不把其他兄弟放在眼中了。

周公旦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是这样说的：“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担心天下诸侯听到武王去世的消息后发动叛乱，他不能把政权交给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摄政，以确保帝国之舟平稳航行。

然而周公旦这一解释实在无法令人满意，他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凭什么他有权力超越诸兄弟呢？凭什么他是摄政王，而不是其他兄弟呢？显然，这里就牵扯到权力斗争的问题。

在诸多兄弟中，又以管叔鲜最为不满，他愤愤不平，当年周武王把行政大权交给周公旦，而自己却只能在殷邑监视纣王的儿子，很明显是被剥夺了权力。管叔鲜纠集蔡叔度等人，共同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就是说，周公旦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辅佐年幼的周成王，而是想篡位称王。

有一个人的立场相当关键。

他就是召公奭。

召公奭与周公旦同为姬姓，两人很可能是堂兄弟。由于召公既是诸侯，又是朝廷三公，同时也是开国元勋，位高权重。他是朝廷第二号人物，实权仅次于周公，当时周领土划为两块，周公管理陕以东的地盘，召公管理陕以西的地盘。如果召公与管叔鲜、蔡叔度等联手，共同反对周公，周公势必难以招架。

周公旦对自己的行为难以自圆其说，不仅管、蔡等诸侯反对他，在朝廷中担任太保的召公奭也心有怀疑。所幸的是，召公只是心有怀疑，并没有明确表态。善于捕捉机会的周公旦立即写了一篇《君奭》的文章以表心迹，交给召公过目。召公对周公旦的解释仍然不满意，迟迟未答应与他合作。幸好周公旦博学多才，信手拈来前朝史

事：“商汤时有伊尹；太戊时，有伊陟、臣扈，还有巫咸治理朝政；祖乙时有巫贤；武丁时有甘般。这些大臣都有辅佐君王的功业，殷朝因此得到治理和安定。”

反复权衡利弊后，召公最终选择站在周公旦一边。他与管叔鲜、蔡叔度等人不同，虽然是同姓诸侯，却是姬姓分支，争夺王权根本没他的份儿。他很知道自己的轻重，若是他倒向周公旦，周公旦胜出的机会就大；若是倒向管叔鲜，管叔鲜胜出的机会也大。从个人私交来说，召公与周公长期共事，亲密程度要远远超过管叔鲜。若是他在周公旦、蔡叔度之争中只能二选一，最好还是押在周公旦身上。

召公的支持，避免了朝廷内部的分裂，而且周公旦还可以获得北方燕国（召公的封国）的支持。此时管叔鲜不断纠集反周公旦的部落联盟，这些同盟国多数来自朝廷鞭长莫及的东部及东南部，包括淮夷、徐戎诸部以及邻近齐、鲁的一个颇有实力的诸侯奄国。

面对管叔鲜的挑战，周公旦毫不退缩。

他秘密联络镇守东方的齐侯姜太公，对他说：“我之所以不避嫌而行摄政之事，是担心天下诸侯背叛周王室。倘若发生那样的事，我没法向太王（古公亶父）、王季（季历）、文王（姬昌）交代。三位先王长期艰苦创业，才有了天下。如今武王去世得早，成王年龄尚幼，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稳定周室罢了。”

在周公旦看来，齐侯姜子牙是必须争取的对象。一来姜子牙德高望重，是开国元勋，也是周文王、周武王两代帝王师，威信极高，影响力极大；二来齐国在姜子牙的治理下，经济实力超强，成为第一流的诸侯强国，雄视东方；三来姜子牙是异姓诸侯，周王室内部兄弟之争，对他来说并没有切身利益关系。

姜子牙显然愿意支持周公旦。周公旦在周武王时代便是国家的第二把手，周武王去世后，理所当然的是第一把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更重要的是，周公旦代表着朝廷，甚至可以说是代表周成王发号施令，在政治上握有绝对的主动权。姜子牙本来就是第一流的战略高手，焉能看不出周公旦的优势要远远强于管叔鲜、蔡叔度这些人。为了拉拢姜子牙，周公旦开出了让他心动的条件：“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授予姜氏齐国有征伐四方诸侯的大权。

这种条件，姜子牙焉能不接受呢？

在搞定召公奭与姜子牙后，周公旦又打出第三张牌。

周公旦不是受封于鲁国吗？可是长期以来他一直留在朝廷，根本没法去鲁国，鲁国虽有封国之名，却没有首领。在管叔鲜、蔡叔度磨刀霍霍之际，必须尽快派一个可靠的人去经营鲁国，增加自己的力量。

派谁去呢？

最可靠的人，当然是自己的儿子伯禽。

伯禽临出发前，周公旦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的地位也不算低了，可以说位极人臣。可是我却忙得没时间，经常洗一次头发的时间，就要三次接待来访的士人，手里只得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吃一顿饭，就要三次吐出咀嚼的食物，起身迎接贤人。我这样做，还时时担心失掉天下贤人。你到了鲁国后，千万不要因为有权有势而在别人面前显得骄傲怠慢。”伯禽听后，唯唯而去。

三张牌打出去后，周公旦全然高枕无忧了。

管叔鲜、蔡叔度的地盘是在殷商旧地，位于中国的中心地带。周

公旦以巧妙的布局，在战略上取得主动权，他亲自坐镇西部，掌控周帝国中央政府；东面有姜子牙的齐国、伯禽的鲁国。只要战事一起，周公旦就可以从东线、西线同时发动进攻，直捣叛军巢穴。

三十二 管、蔡的叛乱

（下）

与周公旦的巧妙布局相比，管叔鲜却处处被动。

首先，管叔鲜没能获得实力派人物的支持。支持他的，只有自己的弟弟蔡叔度、霍叔处，至于文王、武王时期的功臣们，都不支持他。召公奭、齐太公姜子牙则明确地表示支持周公旦的政府。从一开始，管叔鲜以地方诸侯反对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就居于下风。

其次，管叔鲜、蔡叔度地盘小，实力不强，不得不倚重于旧殷势力。他们把纣王的儿子武庚拉下水，同时拉拢了淮夷、徐戎等部落以及奄国。不过，管叔鲜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他所拉拢的诸侯或部落，均是以前商纣王麾下的打手，这就给外人造成一种印象：殷商要复辟了！这是管叔鲜最大的败笔，后来被周公旦巧妙加以利用。

玩弄政治，并非管叔鲜的强项；玩弄军事，他也没有这个本领。

我有点怀疑，周公旦的真实用意便是挑动管叔鲜的叛乱。对管叔鲜的质疑，周公旦除了给出一个牵强的解释之外，似乎就没有尝试作进一步的沟通，反而是做足了战争准备。周公旦与管叔鲜两人的矛盾势必由来已久，真正能够动摇周公权势的人，也只有管叔鲜，因为文王的嫡子中只有他比周公年长。

倘若管叔鲜只是口头抗议，周公旦也拿他没辙，毕竟自己的哥哥是很有分量的人。可是，只要管叔鲜举兵叛乱，周公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个唯一有威胁的人就地正法，一劳永逸地解除后患。

管叔鲜终于没能沉得住气，他率部叛乱了。

叛乱的人，包括管叔鲜和他的两个弟弟蔡叔度与霍叔处。这三个人，都是周公旦的亲兄弟，同父同母，如今却上演了一出同室操戈的悲剧。这场叛乱又称为“三监之乱”，所谓的“三监”，指的是管叔鲜、蔡叔度与霍叔处，他们三人的职责是监视殷商旧部，故而称为“三监”。参与叛乱的还有武庚的殷商旧部以及东方一些诸侯及蛮夷部落。

这是考验新王朝的时刻。

这是考验周公旦领导力的时刻。

我们在翻阅中国王朝史时，会发现一个规律，几乎所有王朝在建立初期都会出现政局动荡，一般发生在开国帝王去世之后。能挺得过来的，就可以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挺不过来的便亡国了。比如说，汉有“七国之乱”，明有“靖难之役”，清有“三藩之乱”，挺过来了，王朝存活两三百年；而秦、隋以及南北朝、五代时诸国等，都没能挺过来，就只是短命帝国。在周之前的夏、商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夏朝第二代帝王就失去权力，权力落入野心家后羿、寒浞手中；商代第二个帝王就被权臣伊尹给流放了。

如今周王朝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周成王刚刚上台，周公旦与几个兄弟就反目成仇，不得不兵戎相见。

由于后世儒家十分推崇周公旦，对于“三监之乱”，古代学者们自然都站在周公旦一边，周公旦成了正义的一方，而管、蔡等人则成了邪恶的一方。当然，也有一些微弱的声音为管叔鲜、蔡叔度辩解，比如名士嵇康写的《管蔡论》，认为此两人“服教殉义，忠诚自然”。依我之见，管叔鲜、蔡叔度谈不上什么“殉义”，周公旦也谈不上正义。兄弟之争，就是权力之争罢了。古人的思维模式，不过是“胜王败寇”，倘若战争的胜者是管叔鲜、蔡叔度，势必又要被吹捧为匡扶王室的英雄。

“三监之乱”迷雾重重。

首先，我要给管叔鲜发动的“叛乱”下一个定义。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这场所谓的“叛乱”，实质上是管叔鲜等人拒绝服从周公旦控制下的朝廷，顶多就是拥兵自重，没有证据表明管叔鲜纠集军队进攻周公旦。这一点判断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事实：第一，管叔鲜等人只是反对周公旦摄政独揽大权，并没有反对周成王；第二，管叔鲜拥兵自重，并没有自己称王；第三，管叔鲜并没有出兵进攻镐京，武力清君侧。

或者说，管叔鲜的做法，只是几个诸侯联合起来抵制周公旦的独裁。相比于周公旦自己行摄政权，管叔鲜等人的做法并不见得过分，因为周公旦的摄政权并不是周武王授予的，没有合法性，对于不合法的周公旦政府，他们拒绝承认。

管叔鲜等人企图以此对周公旦施压，可是他犯下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把商纣的儿子武庚拖下水。《管蔡世家》是这样写的：“管叔鲜、蔡叔度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由此可见武庚之所以卷入叛乱，完全是被管叔鲜与蔡叔度所胁迫的。管叔鲜与蔡叔度在这件事上考虑欠妥，他们以为多一个诸侯支持，便多一分声势，实则大谬。倘若他们拖其他人下水，倒不至于引起恐慌，偏偏拖了纣王的儿子，这不由得令人狐疑：莫非殷商要复辟？

你想想，周公旦是何等老练之人，他马上抓住了管叔鲜的致命弱点。大家都知道，殷商灭亡后，武庚名为诸侯，实际上头上顶着三座大山，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三个人监视他一个人，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在“三监之乱”中，他就是一个被胁迫的小角色罢了。可是到了周公旦那里，这位老辣的政客可不这样认为，他巧妙地把“三监之乱”定义为殷商残余的复辟。如此一来，本来是兄弟之间之争的“人民

内部矛盾”，变成了殷商势力反攻倒算的“敌我矛盾”。

我们不能不说，管叔鲜这一失误是致命的。周成王虽然年幼，却也没有糊涂到是非不辨。我们在《鲁周公世家》中看到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王亦未敢训周公。”“未敢”二字，实写出周成王对周公的畏惧心理，整个朝廷都把持在周公旦手里，他连个屁也不敢放。管叔鲜针对的只是周公旦一人，绝不可能针对周王叛变。

然而管叔鲜的政治智慧远不及周公旦，周公旦一旦窥察到管叔鲜的软肋，就毫不犹豫地反击。他以周成王的名义发布了一篇诰文，称为《大诰》，这篇诰文是以周成王的语气写的，实则出自周公旦之手。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么一句话：“我已得到吉利的卜兆，我要带着你们众诸侯去讨伐那些殷商的叛臣。”

写在这里，我也不免为周公旦的厚黑术喝彩。

殷王之子武庚虽也在叛乱者之列，实则是从犯，被“三监”胁迫不得已而为之。到了周公旦这里，他成为主谋者。要是武庚有充当主谋的实力，“三监”是白设了。周公旦耍了这个花招，着实称得上高明，在政治上化被动为主动。

大家想想，反对周公旦的都是什么人？都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么多兄弟一起反对他，可见他自己充当摄政王，那是犯了众怒。原本管叔鲜等人的逼宫令周公旦难以招架，在政治上完全陷入被动，他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苍白无力。可是他抓住武庚的辫子，大做文章，竟然出奇制胜，他极力向诸侯解释，这次叛乱乃是殷商势力的反攻倒算。要是殷商复辟，大家都得倒霉，不要忘了，当年灭纣王，八百诸侯都有份儿，现在人家儿子要复仇，你们看着办吧。

尽管周公旦使出的这招撒手锏十分厉害，但反对武力讨伐的人还

是很多，因为许多人根本不相信武庚是主谋。他们联合向周成王（其实是向周公旦）进言说：“如今时局艰难，百姓骚动，这件事要解决，在于王室与叛乱诸邦对话协商，我们大家反复考虑后认为，不可以兴师讨伐。”

周公旦代替周成王回答说：“我深思熟虑过这些问题了。唉，兴师征伐，确实会扰动天下鳏寡无依之人，实可哀也。可如今大灾难降临在我身上，我这个年轻的国王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安危荣辱。你们应该要劝谏我，去完成先王孜孜追求的事业。”

其实周成王也就是木偶一个。我想到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舞台上表演的双簧，一个人在前台比画，一个人躲起来帮他说话。这个用来形容周成王与周公旦，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周成王一声不吭，周公旦说话时也没忘掉他的身份，不时自称“年轻的国王”，俨然自己就是代言人。

在《大诰》一文末尾写道：“天惟丧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终朕亩？”意思是说，上天要灭亡殷商，我得完成上天的使命，就如同一个农夫得完成自己的农事一样。很明显，周公旦是铁了一条心，要铲平“三监之乱”。管叔鲜不除，周公旦的权力就面临挑战，他就寝食难安。

权力之下无亲情，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这种事历史上多了去了，秦有胡亥杀兄扶苏，隋有杨广弑父，唐有李世民杀兄杀弟，明有朱棣杀侄。对周公旦来说，管叔鲜必须得死，只有他是自己的哥哥，只要他死了，其他弟弟谁也镇不住自己。

其实所谓的“三监之乱”原本就是个谎言，管叔鲜顶多就是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他并没有诉诸武力，更没有出兵。反倒是周公旦大

打出手，他纠集周政府军队与众喽啰，杀气腾腾直扑“三监”地盘。我前面说过，管叔鲜这个人才能不济，在政治上因为拉武庚下水被周公旦抓住辫子，在军事上又全无战略可言。北面的燕国、东面的齐国、鲁国都效忠周公旦，从战争一开始，管叔鲜的势力便遭到三面包围，这注定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斗。

此时距离武王伐纣不过才七年的时间，周公旦的军队，都是参加过伐纣战争的旧部，作战经验丰富，堪称精锐之师。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本来兵力就有限，至于武庚，更不可能拥有多少武装，这如何是政府军的对手呢？

周公旦的军队势如破竹，连战连捷，这场实力完全不均等的战争很快便以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历史上周公旦一直被认为是圣人级的人物，那是儒家吹出来的。当年对待殷商战俘时，周公旦十分宽容，建议周武王把他们释放回家种田。可是对待自己的亲哥哥，周公旦却毫不留情，他坚持将管叔鲜送上断头台。一起被处死的，还有纣王的儿子武庚，明眼人都知道他并非真正的罪魁祸首，只是周、管政治斗争中的夹心肉馅罢了。

对于“三监”中的另两个巨头，即蔡叔度与霍叔处，周公旦留下了两人的小命，因为这位圣人不愿意让自己背上“嗜杀”的恶名。在他看来，蔡叔度与霍叔处的分量远远不及管叔鲜，这两个都是自己的弟弟，从长幼次序来看，他们也不可能与自己争夺权力。

蔡叔度最终被流放，周公旦还是给了他一点面子，安排给他十辆马车，另配七十名随从。不过蔡叔度似乎并不愿意认错，在忧愤之中死于流放地。蔡叔度死后，他的儿子姬胡认错态度良好，接受政府改造，这令周公旦很满意，正好可以拿来做宣传。周公旦先安排姬胡为鲁国卿士，鲁国就是周公旦的地盘，他儿子伯禽在那里统治，因此也

可视为是对姬胡的政治考察。考察一段时间后，周公旦认为姬胡思想改造不错，便又把蔡国封给他。

霍叔处没有被流放，但被贬为庶人。在“三监”中，霍叔处最年少，惩罚也轻一点。至于殷商旧部，在武庚死后，分为两部，分立为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宋国，一个是卫国。纣王的哥哥，年迈的微子启被请出来当宋国的君主，卫国则封给了周公旦的另一个弟弟康叔。

除此之外，周公旦的另几个弟弟分封如下：叔振铎封于曹，叔武封于成，季载封于匡。周公旦把这些弟弟全部遣回各自的封国，不留在朝廷任职。如此一来，周公旦独揽大权，再没有哪个兄弟敢挑战他的权威。

“三监之乱”的爆发，是周王朝建立后所遭遇的第一次危机，尽管这次所谓的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朝廷意识到有必要加强对诸侯诸部的控制。“三监之乱”得到了东部诸侯奄国、淮夷、徐戎等部落的支持，若不是周公旦事先在东部安插了齐、鲁两国作为棋子，东部的局势可能更糟。周兴起于西部的岐周，在东方的势力仍旧薄弱，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周公旦势必要把征伐的矛头对准不服从朝廷的东方诸部。

东方诸部中以奄国势力最强。商代曾迁都于奄，因此奄国与殷商关系十分紧密，故而史书上又称为“商奄”。其国范围在曲阜附近，也就是与鲁国相邻。不要忘了，鲁国乃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所居，于公于私，周公都必须消灭奄以确保鲁国的安全。

奄的实力不容低估，辛公甲建议周公旦，先击弱敌，后击强敌，“服众小以劫大”，先征服淮夷、徐戎诸小部落，再回头攻打奄国。周公旦接受了辛公甲的建议，遂攻打淮水、泗水一带的夷部，消灭了十七个部落。

在东部战争中，除了周政府军之外，齐国、鲁国应该都参加了。打败淮夷、徐戎之后，周公旦集中兵力攻奄，年轻的周成王御驾亲征，当然这只是摆摆样子。此时的奄国已经没有同盟军队的支持，孤军奋战，当然不是周师的对手，都城最终被攻破。

至此，东征之役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三十三 周公的政治学

管叔鲜与周公旦之争，如同后世李建成与李世民之争，同室操戈，何必戴着伪善的面具，无非争权夺利。本来也不必理会孰是孰非，可后世非得把正义之勋章授给周公，把邪恶之名扔给管叔鲜，这确实不公允。在权力的诱惑下，兄弟之情大概是所有亲情中最靠不住的，越亲的兄弟，利益的冲突就越大。骨肉相残，本为儒家所不耻，周公又何以能成为孔夫子眼中的圣人呢？重要的一点是，周公旦摄政七年后，终于还政于周成王。

先前管叔鲜等人的攻击点，便是周公旦有篡位的野心。如今流言不攻自破，周公旦恭恭敬敬地把权力交还给了周成王。

表面上看，周公旦果然信守诺言，他摄政只因为成王年少，如今成王既已长大成人，他便急流勇退。主动放权权力，这是何等高风亮节，但是我们要仔细考察这件事。也许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周成王真的亲政了吗？或者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不过是前台的傀儡？说实话，周成王的时代，政治完完全全烙上了周公的印记，看不到周成王的个性表演。周公旦放弃的只是摄政的名头，他的权力并未遭到削弱。

有一件事情，历来被史学家所忽视。

“三监之乱”后，周王朝的首要大事，便是依照周武王的遗嘱，在洛水、伊水间建立新的都城洛邑。这座新的都城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建成后，周成王并没有迁都到洛邑，这是为什么呢？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按道理说，既然洛邑是要用来当新都城，理应把旧都镐京或其他地方的周民迁移到这里。可是周公旦却有一个十分诡异的举动，他把

殷商顽民都迁徙至此。什么是殷商顽民呢？就是殷商遗民中，不愿归顺周室的顽固分子。前面说过，“三监之乱”后，武庚被杀，殷商旧地被一分为二，一为宋国，一为卫国。能够留在宋国与卫国的殷民，都属于良民，而顽民则被安置在洛邑。在顽民中，包括有牧野之战的战俘，“三监之乱”的战俘，殷商的官员，还有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的臣民。

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洛邑究竟是一座都城呢，还是战犯的流放地？

根据预先的规划，洛邑由两部分组成：以洛水的一条支流为界，东岸为成周，殷商顽民主要是安置于此；西岸为王城，王宫、宗庙以及其他宫殿修筑于此。按照新都规划，周王若迁都到此，就不得与一群潜在的危险者隔河相望。周公旦如此布置，是何居心？

我大胆猜测，周公旦从一开始，就没想让周成王迁都到洛邑。倘若不迁都，他为什么还要建洛邑呢？洛邑是当时所建造的最大城邑，据考古学者的研究，该城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2.8公里，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已经是大城了。后来洛邑成为诸侯们修筑都城的一个参考标准，大诸侯的都邑不能超过洛邑的三分之一，中等诸侯则是五分之一，小诸侯则为九分之一。换算起来，洛邑面积约9平方公里，大、中、小诸侯的都邑标准不超过3平方公里、1.8平方公里与1平方公里。洛邑不仅面积大，而且防卫能力很强，四周都筑有城墙。当然，倘若叛乱者占据该城，政府军也是不容易攻克的。

洛邑建成后，周成王前往视察。

在《尚书》中有一篇《洛诰》，便写到这次视察。时间是周成王七年，也就是周公旦还政的这一年。这次考察可能给周成王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因为这座城邑里的居民很不友好，多数是殷商的顽固派，其中不少人还曾参与过叛乱。周成王显然被吓坏了，待在这里他一点

安全感也没有。当周公旦提醒他迁都到洛邑时，周成王心里显然不痛快，这座城池充满敌意，岂是理想的都城？辛辛苦苦建成的新都，对周成王竟然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不仅如此，周成王还对周公旦如是说：“我就要回去了，在镐京亲政，请您留守洛邑。”

周成王确实是个聪明的帝王，他顺水推舟，把周公旦留在洛邑。这对双方都是好事。为什么这样说呢？

对周成王来说，当了七年的木偶，看到周公旦他心里就发慌。就算指手画脚的人是自己的亲爹，一个年轻人也决计是受不了的，况且周公旦只是叔父。把周公旦留在洛邑，省得天天诚惶诚恐地与他见面，这是个好主意。

对周公旦来说，留在洛邑也不失为好选择。有些资料说，周公旦还政给周成王之后，有人告他，他害怕了逃到荆楚去避难。这种说法，多半是胡说八道，把周公旦看作窝囊废一个了。周公旦与李世民的差别，仅仅在于一个称帝而另一个没有罢了，但同样是一代枭雄，岂是任人摆布的人。连哥哥都能杀的人，千万别相信他的单纯无邪。我是个喜欢怀疑的人，我怀疑的出发点是常识。我怀疑从一开始周公就想把洛邑当作自己的地盘，或者说，周王室的另一个朝廷。否则的话，他把殷商顽民迁往洛邑是什么意思，中国那么大，又不是没地方安置这批人，非得安置在天子脚下，这不明摆着是对周成王示威吗？

周成王倒也不笨，知道周公旦还政只是做给众人看罢了，国家大事，还是得他说了算。对周公来说，洛邑既是大城，防卫又强，没有比这里更舒服的地方了。原本给天子享用的，如今他周公享用了，这就叫没有天子之名，而有天子之实。

迁都这件事，以后就再没有人提起了。史料中再没有写周成王到洛邑去，他对耗时多年建成的大都邑竟然毫无半点兴趣，而当初兴建此城又是他亲自批准的。这难道不奇怪吗？如果看清了本质，就不会

觉得奇怪了。只有周成王自己最清楚，虽说自己是君主，大权还是在周公手里。

周公旦为了给周成王留点面子，特地把洛邑改名为“成周”，与之对应的镐京后来便称为“宗周”。我们说周公所在的洛邑成为国家第二个政治中心，并不过分，洛邑虽然不是首都，但被认为是帝国的陪都。由于镐京在西，又称“西都”，洛邑在东，称为“东都”。大家知道，周代分为两截，前半截称为“西周”，因为都城是西部的镐京；后半截称为“东周”，都城便是东部的洛邑。

周公在权力场上是一个胜利者，在文化史上则是一位巨人。

在春秋之前，周公是著述最多的一位学问家，而且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被儒家奉为“五经”之一的《尚书》，约有十来篇与周公有关，有些是出自周公之手，有些则是记录其言行。《诗经》中也有不少诗歌出自周公之笔，在现在保存的三百零五首诗歌中，有的学者认为至少有四十五首是周公写的。如此说来，他还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周公似乎对《周易》也有所补充，最初他父亲周文王被囚禁时，作卦辞与爻辞，十分简略，后世多有补充。与周公关系非常大的还有两本书，一为《周礼》；二为《礼仪》。这两本书不一定都出自周公之手，但肯定与他的思想密切相关，他所创立的典章制度，对周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本书与《礼记》合称为“三礼”，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之中，儒家许多经典都有周公思想的影子。

除此之外，周公对数学亦似有研究。在《周髀算经》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定理，就是勾股定理，在中国称为商高定理，据说就是数学家商高解答周公疑问时论述的。社会上还流传有“周公解梦”的说法，这倒并非毫不沾边儿，在《周礼》一书中，曾把梦分为六种：正梦、噩梦、思梦、寢梦、喜梦、惧梦。这也算是开了梦的解释的先

河。还有一本书也被归为周公名下，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本辞典《尔雅》。

周公究竟有没有如此多的著述，这一直有争议，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他的确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学，可以说，他是古代政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儒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儒学圣人孔子对周公十分推崇，在他看来，周公算得上是完美的人物。有一回他曾说：“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太久没梦到周公，竟然成了孔子的慨叹，斯可见他神交古人如此。在东周之前公认的几个圣人中，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人，周公最为特殊，原因有二：其一，只有他不是帝王，尽管周文王姬昌生前未称王，但其死后仍被列入帝王之列。周公充其量就是帝王师，而帝王师对孔孟儒学之徒来说，乃是人生至高的理想，故而对周公不遗余力地推崇。其二，在七大圣人中，周公著述最丰，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免对能舞文弄墨的圣人更觉亲切。

周公很提倡“礼”，“礼”是中国政治乃至哲学里的一个概念，狭义上说，是一套礼仪制度，广义上讲，是行为规范乃至行为准则。中国向来有礼仪之邦之说，尽管在帝舜时便制礼法，但“礼”的精神真正得以普及传播，还是在周代，在周公的努力下成为社会乃至政治的新思维。这种礼的思想，后来又得到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传承，成为儒学思想的一大基本范畴，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周成王与周公的关系，八成类似于汉宣帝与霍光，他既对周公十分尊敬，同时也有如坐针毡的畏惧。东、西两都的存在，倒是解决了实际问题，周成王仍然留在镐京，周公旦主要待在洛邑（即成周），保持适当距离，皆大欢喜。

此时周公旦没有过多干涉政治，但权威是在的，他以叔父兼帝王

师的身份，写了几篇文章告诫年轻的成王。在《无逸》中，他写道：“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告诫成王千万不要骄奢，并列举殷商几位名君的故事：中宗祖乙“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高宗武丁大帝“久劳于外”、“不敢荒宁”等。唠叨这些，主要是成王正值壮年，国家又安定，这种时候最容易被声色犬马所诱惑，不可不先打打预防针。

在《多士》中，周公总结了殷商的兴起与衰亡。从商汤开始，殷帝多“率祀明德”，因此才能享帝祚数百年；到了纣王时，荒淫放纵，“不顾天及民之从”，因此灭国了。周的兴起，文王“日中昃不暇食”，勤奋到这程度，才得以“纣国五十年”。

对于周公的教导，周成王当然唯唯诺诺，奉为神明。

到了晚年，周公的兴趣在于礼乐，著书立说。或许是出于叶落归根的想法，周公旦也不想待在东都成周，他回到丰邑，这是周的旧都，离现在的都城镐京只有二十里。到了丰邑之后，周公旦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他自知时日无多，立下遗嘱：“等我死了之后，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洛邑），以此来表明我至死也不会离开成王。”因为成周这座城邑是以周成王的王号来命名的，故而周公打算把自己的墓设在这里，以示忠诚。

周公旦直到临死前还如此表态，可见一直到这个时候，仍然有人质疑他当年以摄政为名独揽大权。我认为他真的非常明智，俗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死之前说的话，分量是很重的。就算周成王对周公旦有怎么样的不满，在这个时候恐怕也烟消云散了。

不久后，周公旦去世。周成王并没有遵他的遗嘱葬于成周，而是以更高的规格葬于毕。周文王姬昌的陵墓便是位于毕邑，周公旦死后极尽哀荣，葬礼规格堪比周文王。周成王是这样说的：“我小子不敢把周公当作臣子看待。”

我们可以给周公盖棺定论，他实际上就是无冕之王，连周成王都不敢把他视为臣子。纵观中国历史，权臣的下场多数不太好，即便自己得以善终，子孙后代也未必有好下场。典型的例子，比如霍光、张居正等人，在世时权倾朝野，死后家族即遭牵连，子孙不得善终。但周公旦显然政治智慧更高，他甚至在死后还留了一手。

在周王室内部档案室里，藏有一份绝密文件，由于藏在金滕之内，又称为金滕书。金滕就是外面用金属条封存的柜子，既然是封存的，当然不是外人随随便便可以看到的東西。那么周公旦留在金滕里的这份文件是什么内容呢？是一篇祈祷文。

这里有一个故事。

周武王推翻商纣，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年，由于积劳成疾病倒了，还病得不轻。由于周朝初立，大臣们都非常担心，当时医术水平还比较低，医生也无能为力，只能求助于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开国元勋姜太公与召公奭主张求助于占卜，求祖先的英灵庇佑。周公旦同意采用这种神秘的方法，不过他同时认为“不能让先王们为这件事担忧”，哥哥姬发是一国之君，他不能死，周公旦愿意以自己的命来换哥哥的命。

于是他设了三个祭坛，戴着玉璧，手执玉圭，向古公亶父、季历、文王三位先祖祈祷，并写了一篇祷文，内容是这样的：

“你们的子孙周武王姬发，积劳成疾。三位先王若是欠上天一个儿子，请用我姬旦换回王兄姬发吧。我姬旦心灵手巧，多才多艺，还懂得服侍鬼神之道；王兄姬发不如我多才多艺，也不懂得如何侍奉鬼神。所以把我献给上天，应该是合适的吧。王兄受命于天，佑护万方，让你们的子孙臣民能安居乐业，四方民众无不敬畏他，他不辜负上天的使命，也使先王们能永享奉祀。今天我用元龟占卜，三位先王

若是答应我的请求，我就献上玉璧玉圭，若是不同意，我就把玉璧玉圭收起来。”

占卜的结果，是吉，就是先祖的英灵同意了。周公旦把祷文收进金縢里，藏了起来，并交代看管的人，千万别对人提起。

您猜猜结果是怎样？据说，第二天周武王姬发的病就痊愈了。上天也没有拿周公旦的命去换周武王，他还是活得好好的。

这就是所谓的金縢之文的秘密。

在周公旦去世后的那一年的秋天，镐京一带的庄稼尚未收割，一场天灾突如其来。暴风夹杂着雷电，把庄稼都刮倒了，连大树也被连根拔起，周人大恐。这件事情与金縢之书会有什么关系呢？至少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关联，但不知为什么，金縢之书突然被想起来。周成王与朝中诸大夫打开金縢，才知道周公曾经为周武王祈祷，并打算以自己的性命来换回武王的性命。

看到金縢之书，周成王十分惊讶，便询问保管金縢的史官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史官回答说：“确有此事，但周公命令我们不许说出去。”周成王感动得泪流满面，他说：“今后不要笃信占卜了！周公为王室操劳，但我年幼不理解。现在上天降暴风雷电，是为了告诫我不能忘了周公之德。”于是周成王到郊外祭祀周公，这时天下起雨，风向反转，把刮倒的庄稼又扶正。庄稼不仅没有被破坏，反倒获得大丰收。

以上是史书中的记载，但有十分诡异之处。

诡异之一，周公旦真的为周武王祈祷过吗？这件事据说是他偷偷摸摸做的，连姜太公、召公奭都不知道，唯一能作证的只有保存资料的史官。同样，没有人可以证明，周武王病愈是周公旦祈祷的结果。

诡异之二，周公旦用金縢保管祈祷文做什么？我必须说，周公这

个人可不简单，至少是很有心机。倘若他真的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只要把祷文烧了就是，何必郑重其事地锁在金縢里那么多年？可见他是有目的的。那目的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是出于自保。周公有政敌，而且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周成王，帝王一旦不爽，反攻倒算，那么这个金縢书就是一张保命符，是他对王室忠诚的证明。

诡异之三，金縢书怎么跟一场暴风挂上钩的？金縢书重见天日的时间点真是太巧了，周公刚死，这份文件就意外“被发现”了。真的只是巧合吗？这场暴风确实挺严重，但比起火山地震来说，只能算小灾，被吹倒的庄稼还能被反向风吹正，说明灾害没那么大。史书上根本没有解释，何以这场灾害会导致周成王去寻找一个谁也不知它存在的金縢。所以我猜想，肯定是有人在一旁诱导周成王，最后让周成王意外发现周公留下的“金縢”。

以我的看法，金縢书并非是意外被周成王发现，而是周公旦临死前巧妙的安排，使得这份证明他忠诚于王室的文件在死后现身。周成王确实被感动了，于是他给了鲁国（周公旦的封国）特殊的待遇，可以行郊祭天和庙祭文王之礼，而这种礼原本是只属于周天子的。作为一代权臣，周公旦死后，其家族不仅安然无恙，还受到朝廷厚待，这就是周公旦的智慧。

三十四 成康之治

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有一些规律可循。

一般说来，王朝的建立者都是雄才伟略之人，王朝初期十分强大。紧接着，经常会出现一个动荡期，主要是权力斗争引起的，能否顺利度过这个动荡期十分关键，过不了关就迅速没落。秦、西晋、隋等王朝都是在这个时期被整垮的。能挺得过去的王朝一般比较长命，社会走向安定，所谓的“治世”、“盛世”就出现了，这个时间段一般发生在王朝的早中期，很少出现在晚后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有周之成康之治、西汉之文景之治、东汉之明章之治、唐之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清之康乾盛世等。

成康之治，乃是周成王与周康王之年代，这两位周王循先王之遗教，奋勉为政，于是“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当然，这两位王的事业，是周公旦打下的基础。在周公旦的铁腕之下，朝廷扫平“三监之乱”，避免了权力斗争的进一步加剧，同时征伐奄、徐戎、淮夷，使周王室对东方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周公旦还进一步削弱了殷商的势力，殷人主要被置于三地：宋、卫、成周，其中只有宋国是殷人治殷，其余两地全在周室的掌控之中。

西周帝国大厦的基石，与夏、商两代相比，更为稳固坚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广封亲族，以为周室屏藩。从周武王经周公旦到周成王，总计分封七十一国，其中姬姓国五十三国。也有另一种说法，称分封的诸侯之中，兄弟之国十五国，同姓之国有四十国，总的来说，姬姓诸侯多达五十余个，这是没问题的。

在众诸侯国中，除了姜太公的齐国、伯禽的鲁国、召公奭的燕国、微子启的宋国、康叔的卫国之外，在周成王时，还分封了楚、晋

两个诸侯，这两个诸侯到春秋时代成为南、北两大霸主。

楚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鬻（yù）熊，他曾经是周文王的手下，虽然谈不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忠于职守，靠一个“勤”字也打拼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鬻熊死得早，没能得到封赏。他的儿子熊丽与孙子熊狂都比较平淡。周成王亲政后，念及文王、武王创业之艰辛，没有众人扶助是不可能取得天下的，新政府不能忘掉这些人的功劳，于是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于丹阳，当时这里是南蛮地界，是为楚国。楚绎只是子爵，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算是低等的，级别不高。不过后来历代楚国君主发愤图强，终于将这个南方小国营造为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

晋的开国可以说是十分离奇。这个国家的出现，完全是一个意外，它只是游戏的产物。周武王去世后，西北的唐国爆发叛乱，很快被摄政者周公镇压下去。当时周成王还只是个小孩子，他与弟弟叔虞两人还未脱幼稚之气，在一次游戏之后，周成王拾起一片桐叶，用刀子裁成珪玉的形状，交给叔虞，开玩笑地说：“我用这个为信物来封你。”

过了一段时间，史官向周成王请求选择良辰吉日，分封叔虞。周成王说：“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的。”史官正色地说：“天子无戏言，话一出口史官就会记录下来的。”这是周朝的礼法制度，有点刻板，但是这句戏言却成真了。叔虞被封唐地，在黄河、汾河之东，方圆百里，这就是晋国的开端。当然，无论是周成王还是叔虞，都不会料想到晋国以后将成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大诸侯国，甚至是周王室的保护人。

周成王虽然开拓不足，却算得上是守成的君王，他的修养不错，勤于政事。此时的周王国内政清明，外有众诸侯拱卫，日子太平，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周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扣除前七年周公摄政，他亲政的时间长达三十年。但他并不算长寿，死时才五十岁左右。

成王临死前，把太保召公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等人召来，连同其他文武官员，嘱咐他们说：“我的病情很严重，十分危险，已到了弥留之际，今天我要把遗言详细地告诉你们。先君文王、武王颁布法令教化民众，以敬畏之心身体力行，故而才能伐灭殷商，完成上天的使命。我即位的时候年幼无知，但我能敬畏天威，遵守文王、武王的训导，不敢放纵自己。现在我已经病重不起了，你们要仔细听我的交代，辅佐太子钊，克服种种困难。要怀柔远方之国，亲近邻近之国，安抚大大小小的诸侯。人的修养来自礼法，你们要尽心辅佐，莫让太子钊有逾越礼法的行为。”

交代完后事，第二天周成王便去世，太子姬钊接任王位，是为周康王。

周康王即位后，东西方诸侯都前来镐京朝见。新国王作一篇诰词以申戒诸侯，这篇诰词又称为《康王之诰》，收录在《尚书》。

康王对众诸侯说：“文、武两位先王能做到公平公正，信义昭于天下，故而有熊黑之士、忠心之臣捍卫王室。先王分封诸侯以作为王室的屏藩，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子孙。你们的封国在王畿之外，内心却始终顾念着王室。要尽心辅佐王室，不要让我这个小子有辱先王之德。”

成康之治，颇为类似汉代的文景之治，鲜有创新之举，只是君主能约束自己的欲望，倡导节俭，不务奢华，任用贤臣，虚心纳谏。在古代，倘若能做到以上几点，也算得上是好君主了。只是权力越大，人越容易迷失在权力带来的种种享受之中，能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君王，如成王、康王等，算是凤毛麟角。

尽管成、康时代社会安定，外患仍然颇为严重，华夏之劲敌仍是鬼方。鬼方曾两次遭到华夏族的重创，一败于武丁大帝，再败于季

历。鬼方之所以能重整旗鼓，实得益于周殷战争。殷商覆亡后，新兴的周王朝要解决的事情很多，无暇顾及这个老对手，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原本衰弱的鬼方又变得强壮。

是该出手了。

周王朝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周王室直属中央军有六个师（军）的兵力，按定制一个师为一万两千五百人，六个师便有七万五千人。除中央军之外，还有地方诸侯的武装，大诸侯国可拥有三个师（军），编制为三万七千五百人；中诸侯国可拥有两个师（军），共计二万五千人；小诸侯国可拥有一个师（军），共计一万二千五百人。其实这种规定，更多的是体现礼法秩序的精神，无论是中央或诸侯，平时不可能养着这么庞大的军队，只是遇有战争时，才会临时征集。倘若全国动员，则可以征集一支数十万的军队。

周康王二十五年，伐鬼方之役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次战争虽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但规模肯定不小。鬼方又一次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了四千八百人，被俘一万三千人，还有三个首领被生擒，同时大量的车牛马羊为周军所掳获。经此一役，鬼方一蹶不振，对周王国的威胁不复存在。这也是周康王时代最大规模的一次征伐。

一年后，周康王去世，其子姬瑕继位，是为周昭王。

以《史记》的说法，周昭王“王道微缺”。此时帝国老臣们已经荡然无存，新一代生活于相对和平安定的年代，自然不如老一辈那么艰苦奋斗。尽管文王、武王、周公的训示仍被奉为圭臬，但帝国的整体道德水平已有所下滑。周昭王的生平，史书上轻描淡写，但他的死却十分离奇。

周昭王生平事迹中，最明确的一点便是他发动了对荆楚的战争。

荆楚在周代时，乃南方蛮族聚集区，与淮夷、徐戎等蛮族一样，时而依附周室，时而叛乱，并不好治理。西周自武王开国后，武力一直十分强大。武王的武功自不必说，成王也颇有征伐，康王有伐鬼方之功。昭王自然不愿意落伍，北方的鬼方已不再是威胁，南方的荆楚诸夷却仍骚动不安。

据《竹书纪年》载，昭王十六年时，周王御驾亲征，渡过汉水，对荆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有些人认为这里的荆楚指的是楚国，其实不然。楚国是周王室所封之国，而且只是一个国，自然不敢去背叛周室，这里的荆楚是泛指长江流域的中间地段。对精锐之周师来说，讨伐荆楚蛮族，自然是势如破竹。在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墙盘里有一段铭文，提到并肯定了周昭王南征荆楚之功。

三年后，即周昭王十九年，这位正值盛年的国王一心想建立更伟大的事业，他又一次率领六个军的兵力，二度南征。可是这一次，他却意外身亡。

这次远征本来是顺利的，周昭王带上两名心腹：一位是辛馀靡，又称为辛伯，他长得人高马大，孔武有力；另一位是祭公。问题出在回师途中，到汉水河畔时，周昭王在当地征用船夫与船只。当地人对周师频繁征伐深恶痛绝，便想出一个鬼点子。这个鬼点子不知是什么人想出来的，堪称一绝。他们在船上做了手脚，船的底板用胶粘上，称为“胶船”，使用的胶又是容易溶解于水中。也就是说，船底很容易开裂，特别是搭载的人越多，船体越受重，底板就越容易在压力的作用下破裂。

周昭王大意了，他根本没有派人去检查这些船有没有问题，这个疏忽导致了惨剧的发生。当“胶船”行至江中时，不堪受力的底板终于承受不住而爆裂开来，水很快涌入船舱，船只开始下沉。且不说周军多数士兵不懂水性，就算会游水，身上穿着笨重的甲衣，也施展不开。周昭王与祭公都不识水性，他的这艘船人员最多，又载了一些乱

七八糟的重东西，沉得更快。很快，船身被水淹没，周昭王四肢在水里瞎扑腾，身强力壮的辛馀靡眼看周王有难，奋力向他游去。

倘若这场灾难是发生在湖里或池子里，周昭王尚有获救的机会。可是这江河啊，水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流水很快把周昭王向下游方向卷去，辛馀靡使出吃奶的劲儿划向周王，好不容易追上，可是这时周昭王已经灌了一肚子水。等到划上岸后，天子已经不行了，他胸腔已经都进水了，救不活，两眼一翻，死了。这些船夫以智慧打败了强大的周军，周昭王淹死了，祭公淹死了，周军六个军的兵力也死了一大半。

这是周朝建立以来所遭遇到的最严重的挫折。

在《史记》里，对周昭王之死写得十分简略：“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也。”就是说，昭王到南方巡视没回来，死在汉江之上，他的死讯并没有告丧于诸侯，这是因为朝廷要隐瞒死因。说到底，这种事情说出去，中央政府的威信将荡然无存。堂堂天子，居然被暗算，淹死在水里，死得也太窝囊了吧。可以说，自从黄帝以来，就没有哪个天子死得如此窝囊。

周昭王之死，加剧了中原华夏族与南方荆楚蛮族之间的矛盾，对以后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受周王册封的楚国，由于受到南方蛮族文化的浸染，日益被中原华夏族视为异端。有趣的是，在周昭王死后三百年，这桩旧事还被重新提起。

那是在公元前656年，时间已经是春秋战国，正是齐桓公称霸的时代。当时齐桓公率领八个中原诸侯国，打算征伐南方强大的楚国。楚国特使见齐桓公说：“你们在北边，我们在南边，风马牛不相及，你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齐国宰相管仲说了两个理由，其中一个很雷人：“昭王南征不复，寡人是问。”自从周公旦开始，齐国便拥有代

天子征伐的大权，所以管仲便是拿周昭王之死来作为战争的借口，称军队前来是为了调查当年周昭王南征时死于汉水的原因。楚国特使当场被雷倒，这件事都过去三百多年了，居然还成为中原诸侯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也可以看出此乃是周王室一大伤心事。

国不可一日无主，尽管周室对周昭王之死表现得十分低调，立新君也是刻不容缓。周昭王之子姬满成为周朝的第五任君王，史称周穆王。他是周代一个非常特别的君主，充满了奇幻色彩。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神奇的天子。

三十五 从未来穿越到周朝？

周穆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我们先来看看史料里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古代说的“征”，有时并不是征伐，而是“巡狩”，就是出行。

这位天子走南闯北，行程超过七亿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地球赤道周长是八万里，相当于跑赤道九千圈。当然了，中国古代的“里”与现代的“里”在长度上是不同的，就算小一半吧，也跑赤道四千多圈，这有可能吗？

倘若上面的史料属实，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有人从未来穿越到了周朝，带来了比飞机还快的飞行器；其二，周穆王懂得某种神秘的神游术。

是不是有人从未来穿越到周朝呢？这个我们不好说，未来的科学技术是否能穿越时空，谁也不知道，至少现在还未实现。在道家经典《列子》里有一篇《汤问》，写了周穆王时一个神奇的故事：有一个名叫偃师的工匠，制作了一个舞女机器人，跟真人一模一样，能唱歌、跳舞、说话。这科技水平比今天的机器人还要先进，与电影《终结者》中的机器人有得一拼。如果这是真事的话，那么这个偃师很可能就是从未来穿越到周朝的。如果偃师来自未来，他带着周穆王乘坐飞行器绕赤道四千多圈，这倒有点可能。

再说另一种情况，周穆王是不是懂得神游术呢？

我们再来看看《列子》里的另一个说法。

《列子》里面有一篇《周穆王》，说了下面这么一个故事：

据说在周穆王时，从西方来了一位术师，懂得幻化之术，相当厉害。他能出入水火，穿越金属石器，能倒转山川，能移动城市，还能悬浮于空中等，法术相当高超。按我的分析，这位术师应该是来自印度。这位神奇的术师邀周穆王一同出游，穆王拉着他的衣袖，腾空而上，直飞到天上宫殿，从天上俯瞰大地，觉得人世间十分渺小。后来周穆王想回去，术师推了他一把，他好像跌落到了虚空之中。等他清醒过来时，问周围的人说：“我刚才是从哪里来的呢？”侍者答说：“大王不过是在这里静静待了一会儿罢了。”周穆王十分不解，便请教幻化术师，术师答道：“我与大王只是精神出去玩罢了，形体何尝有过移动呢？”

这就是所谓的“神游太虚”，指精神逃离肉体束缚的一种状态。倘若以这种方式游七亿里之地，这倒是有可能的。这种幻化术存不存在呢？苹果教主乔布斯生平最喜欢读的一本书《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这是印度瑜伽行者尤迦南达在1946年写的自传。在这本书里，他就写到了大量诸如此类的幻化术，与列子在《周穆王》中写到的十分相似。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对这种幻化术不了解，就否定其存在。

还是先把对穿越与神游的讨论放在一旁，回头说说周穆王的事。

周代前几位君主，都可以算是明君，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西周民富国强，奢侈的观念抬头并不奇怪。周穆王即位当年，便在南郑修筑了一座华丽的宫殿，称为祗（zhī）宫，又称为离宫。此时社会安定，外患不多，周穆王倒是过得逍遥自在、舒舒服服的。过了几年，他又筑一座春宫，阔绰豪奢。想当年晋侯筑宫殿过于华美，受到周康王的

点名批评，如今天子反倒整天忙着修宫殿。

作为一个天子，如果没有征服天下的感觉，毕竟只能算是个大富翁，无法让他体会到征服者的快感。再说了，前几代君王都有征伐之功，周穆王也不想错过建立伟大功业的机会。此时一个目标出现了：犬戎。

犬戎是戎人的一支，鬼方也是戎人的一支，因此鬼方有时也称为“鬼戎”。古时中国把四面的异族笼统称为“戎”、“狄”、“夷”、“蛮”，分布大体上是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但不是固定的。戎、狄一般是游牧民族，除分布西部、北部之外，在中原一些山区也有分布，称为山戎，势力与华夏族犬牙交错。“夷”在汉语中有“平坦”的意思，夷人就是分布于东部平原地区的民族部落。蛮人主要是南方丘陵地区诸部落，又称为群蛮。

我们把这四个字拆解一下，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

“戎”由一个“人”字与一个“戈”字组成，意为人肩上扛着一把大戈，注意哦，这把戈甚至比人还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戎人是非常厉害，非常崇尚武力。因此，华夏族兴起后，戎人是最强大的对手，一直到春秋战国都是如此。

“狄”字由“犛”与“火”构成，“犛”是兽，有兽有火，这是游牧民族狩猎的写照，正如宋代词人张孝祥所写“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把词中“猎”与“火”两字组合起来，岂不是“狄”字吗？因此古代的象征字是很形象的。

再看看“夷”字，拆解为“大”与“弓”两字，可以理解为背着大弓的人；“大”字又可拆为“一”和“人”，也可说是背着一张弓的人，这同样是尚武的象征。“蛮”字上面是山峦，下面是大虫，山峦之中猛虎出没，这是南方丘陵地带的写照。从文字取义来看，“戎”与“夷”相近，人或扛戈或持弓；“狄”与“蛮”相近，都有猛兽大虫出现。这是古代对

四境少数民族的笼统概括，中国的文字是很有味道的，须细细体会。

周文王（西伯）姬发曾经讨伐过犬戎。当时西北方诸戎人部落中，鬼戎最强，犬戎尚弱小。西周初期，犬戎时不时向周朝廷进贡，讨好王室。周康王发动驱逐鬼方的战役后，鬼方被打败，只得向北迁徙，犬戎乘虚而入，抢占地盘，及至穆王，其势力已经颇为强大了。

这时犬戎仍然对周王室毕恭毕敬，没有实质的军事威胁，也没有扰乱破坏边境，但周穆王认为戎狄狼子野心，与其坐待他们变得强大，不如先下手为强。

征伐犬戎的计划很快提到议事日程，然而此计划遭到一些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时任卿士的祭公谋父反对说：“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也。”周代的政策，对远方之异族，以怀柔政策为主，强调“以德服人”。然而观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诸人，并非只是“耀德不观兵”，而是采取双管齐下的原则，既强调道义，同时也凭恃武力。

周穆王十二年，天子亲自率领六师征伐犬戎，大获全胜，掳获五位名王，得四白鹿、四白狼。什么是“四白鹿”、“四白狼”呢？有人认为，白鹿、白狼并不是指动物，而是指犬戎的部落，其部众成为周军的俘虏。周穆王把这些犬戎人安置于太原，这里的太原并非今天山西太原，而是位于甘肃境内。

这次胜利大大刺激了周穆王开拓万里的雄心。第二年（周穆王十三年），他又一次发动西征，一直攻至三危山（甘肃敦煌东南）。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周穆王踌躇满志之时，一匹快马从首都宗周（即镐京）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东部徐国作乱，率九夷围攻宗周，都城形势严峻。

徐国究竟有何本事，居然敢于进攻周都呢？

徐国乃是徐戎所建之国。商周时戎人主要分布于西部，不过在北部、东部也有其势力，徐戎就是东部的一个戎人部落。“三监之乱”时，徐戎会同淮夷、奄国等，为管叔鲜、武庚等人造反呐喊助威。岂料管叔鲜等人只不过是泥菩萨，还没过河就沉了。周公旦毫不客气，在扫灭“三监”后，马不停蹄地扫荡东部，灭掉淮夷、徐戎的十七个部落。其余部落或诸侯当然识相地乖乖投降，徐国便是其中一个诸侯。徐国在五等爵位中，与楚国一样，都是属于子爵，因此其国君又称为徐子。

到了周穆王时，徐国在东方变得强大起来，其国君单名一个字“诞”，称为徐子诞。徐子诞估计是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对西周的兴起有一番研究。为什么西周能够降服、号令百千诸侯呢？他研究的结果是：行仁义，仁义无敌。于是他开始效法商汤、文王、武王的做法，估计是在国内外“阴行善”，果不其然，周边不少部落都前来归顺他。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徐子诞的声誉日隆，国家也越发强大。

周穆王六年，徐子诞前往周都镐京，朝见天子。天子龙颜大悦，表扬了他在东部所做的突出贡献，封他为侯伯，就是一方诸侯之长，实际上就是东方霸主。这么一来，徐子诞的势力扩张得更加厉害，他控制了淮水、泗水一带方圆五百里的地盘，有三十六国（其实就是部落，夏商周时都统称为国）都听他的命令。

徐子诞自恃实力不弱，遂公然举起王旗。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张朱弓彤矢，把它当作吉祥物，认为天降祥瑞，是要让他当天子，于是自称为“徐偃王”，摆出与周王分庭抗礼之势。以史书的说法，叫“欲霸上国”，就是想与周王国争雄斗霸。当徐偃王打听到周穆王率领六师西征时，他认为机会成熟了，于是动员手下的喽啰国，奔袭周都镐京。这些喽啰国多是夷族部落，故而称为“九夷”，这里“九”只是虚指，并非实指九个部落。

西周王畿之地，精锐六师悉数在外，城内只有少数守备部队，面对徐偃王的突袭，国人大震，形势岌岌可危。这时早有快马飞驰西去，追上西征大军，向周穆王汇报都城遭袭的消息。周穆王当机立断，命令大军停止西行，即刻返回京城。他自己则一马当先，狂奔回镐京。

据说周穆王有两辆超级马车，每辆马车配有四匹最上等的马匹。主马车所配的四匹宝马分别是：骅骝（liú）、绿耳、赤骥、白牺，副马车配备的四匹宝马是：渠黄、逾轮、盗骊、山子。这两辆马车，可日行千里，为周穆王驾驭的车手名为造父。

造父是当时天下最好的车手，他生活在周穆王时代可谓是幸运，因为这位天子不喜欢待在王宫，要么出门游玩，要么东征西讨，造父精湛的驾驭技术便有了用武之地，因而深受周穆王的信任。如今周都镐京形势危急，周穆王归心似箭，这也给了造父施展本事的良机，他从容驾车，四匹骏马狂奔却能协调一致，车速超快却不至于失控。他上演了一出“速度与激情”的好戏，仅仅用了一天的工夫，便安全地把周穆王送至镐京。

天子及时返回，给首都全体军民吃下一粒定心丸。此时六个师的大军也正在返途，几天后就能到达。镐京有高大的城墙，要守个三五天不在话下，附近的诸侯也正向首都驰援。徐偃王见状，情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攻破镐京，周穆王的及时返京，让他的偷袭计划破产，只能悻悻退兵，否则腹背受敌，就死得很难看了。

为了表彰造父的出色表现，周穆王把赵城赏赐给他。

无论是周穆王或是造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赏赐，对后世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造父成了赵氏的始祖，赵氏在战国时代建立了赵国；第二个影响，造父得周王厚遇，一人得道，鸡

犬升天，其亲族受益，后来侄孙非子受封于秦，成为秦国的先祖。战国时代最强大的两个诸侯国——秦国与赵国——其家族发迹史，都可以上溯到造父，两族本是同源，数百年后却成为你死我活的死对头。

关于造父，这里再扯一个事，为什么他的驾车本领那么高超呢？

造父学习驾车术，有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他的老师名叫泰豆氏，是一位驾车高手。造父想拜泰豆氏为师，就报名进了他的驾校。造父待了三年，每天挑水砍柴，这位老师的架子却大得很，什么驾驭术也不曾教。别的学徒受不了都逃了，造父留了下来，他毫不气馁，仍然恭恭敬敬地侍奉老师。泰豆氏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终于开始教他驾车技术。老师的教学果然与众不同，首先不是学驾车，而是走木桩，这有点类似武林高手练的梅花桩。为什么先练走木桩呢？我想主要是练习身体的平衡能力。马车是马拉的，不如汽车平稳，何况古代的道路也绝不比今天平坦。造父果然天赋极高，基本功相当扎实，仅仅用三天时间就在木桩上如履平地，令师父大为赞叹。造父勤奋好学，又有泰豆氏的悉心教导，驾车术越来越好，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天下第一御车高手。

三十六 周穆王的武功文治

我们继续来说周穆王的故事。

徐偃王偷袭镐京，惹怒了周天子。周穆王可不是省油的灯，他颇为类似汉代之汉武帝，是个精力充沛、闲不住的人，有开拓万里之雄心，没事他尚且四处征伐，何况徐偃王骑到自己头上拉屎，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天子没有亲自出马，在他看来，割鸡焉用牛刀，只要派出一员小将出马就可以把徐偃王手到擒来。讨伐徐国的任务，交给谁来做呢？

周穆王把征伐徐国的重任交给南方的楚国，驭车高手造父充当信使，驾着周穆王的马车飞奔到楚国，也只用一天时间，便把天子的旨意传达给了楚子。

对楚子来说，能帮朝廷扫平叛变，那是天子看得起咱，况且这还有油水可捞。他欣然领命，兴师大举进攻徐国。徐偃王虽有凭陵天下的雄心，只是才能稍欠，史书称他“文不达德，武不任力”，想学商汤、文武，却只学得了皮毛，未能深得精髓，无论是道德还是武力，都未臻上乘。这个评价十分中肯，想商汤之得天下，前后十一征，实力没到那份儿上时，还得向夏桀称臣。文王、武王亦然，文王不还被纣王关了七年吗？要推翻一个政权，绝不是仅仅靠一次突袭能胜利的，所以说徐偃王只是半桶水，胳膊还没有练粗就想打人，结果还不是被揍扁了。

楚子率大军伐徐，所谓“行仁义”的徐偃王不堪一击，国破身亡，为天下笑。战国著名思想家韩非子还以徐偃王为反面教材，论述“仁义用于古而不用用于今”的主张。其实偃王只是把“行仁义”当作一种政治手段，并不意味着他多仁慈善良。他并不是输在“行仁义”上，周室仍

十分强大，不仅拥有实力超强的中央军，亦有地方诸侯之拱卫，实不可图也。徐偃王不过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挑战中央，实不自量力也。

这场战争的最大收获者乃是楚国。楚国奉王命伐徐后，原先唯徐偃王马首是瞻的一帮小喽啰转而投靠楚国，楚国由是坐大，这也是其强盛的起点。徐偃王虽死，徐国还是保存下来了，这大概算是他“行仁义”的回报。周穆王封徐偃王的儿子徐宗为国君，号称徐子。

周穆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便是他到昆仑丘见西王母。

昆仑丘在什么地方，西王母又是什么人，谁都说得不清不楚。有的认为昆仑丘在青海，有的认为在新疆，有的认为在中亚，有的认为在西亚，还有的认为在东欧。就算周穆王去的地方是新疆，也已经够远了。新疆古代属于西域，根据正史的记载，汉代张骞始通西域，张骞时代的中原人对西域仍然是完全陌生的。如果周穆王真的到过新疆或更远的地方，那将比张骞通西域还要早一千多年。单从当时的交通条件及交通工具看，周穆王从镐京到西域，并非不可能。不过，天子不可能一个人跑去玩，肯定要带上一支军队。若有军队，那么粮食物资补给将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比如说，直到西汉武帝时代，大将李广利伐西域大宛，便因为补给问题大败而回，数万人去，数百人回来，几乎是不归路。

再说说西王母。

西王母应该是西方某国的女王，或者是某部落的女酋长，或者是某位王的母亲。她颇为热情地欢迎周穆王，在瑶池设宴款待，两人还诗歌相和，“其辞哀焉”，周穆王居然涌出一种莫名的悲伤，看来他是喜欢上这位异族的女子了。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周穆王从昆仑丘返回后，西王母曾有过一次回访，天子在昭宫接待她。这倒是既浪漫

又有异国情调的恋爱故事。西王母的形象后来经由文人改造，成了天上王母娘娘的原型。

周穆王的时代，乃是西周最强盛的时期，他也是战功赫赫之君主。穆王三十五年，难以驯服的荆蛮发动对徐国的战争。徐国自从徐偃王死后，国家虽保存下来，实力却大不如前，在荆蛮的猛攻之下，全无还手之力。想当年周穆王的父亲周昭王便是被荆人算计而死，如今荆人又袭击徐国，扰动天下，周穆王当然很生气，他派大臣毛伯迁率师讨伐荆蛮。毛伯不负所望，在洧（jǐ）地之战中大破荆蛮。

在华夏族的周围，蛮族、夷族广布，华夏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不断与蛮族交战的历史。当时位于荆蛮以东、淮夷以南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是越人的地盘，由于越人部落繁多，统称为“百越”。

周穆王三十七年，西周朝廷对越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竹书纪年》称“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动用了九个师的兵力，显然这场战争并不单纯是中央军参战，也包括地方诸侯武装。一个整编师是一万二千五百人，九个师的兵力就有十余万人，可见作战规模之大。

史料中有一个十分奇怪的写法，“架鼃鼃以为梁”，鼃鼃（yuán tuó）就是巨鳖和扬子鳄，拿这两种动物来当作桥梁，这个说法很古怪，不太可能。我想可能是桥梁的造型类似鼃鼃，故以此来命名。这里可以看出，在周昭王落水而亡后，周穆王显然是长了智慧，我宁可搭桥，也不愿到江边征用民船，免落得个船破人亡的下场。远征军步步进逼，一直打到一个名为纡的地方才罢手。经此一役，越人遭重创，周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到长江下游。

伐越之后，王师顺带讨伐荆蛮，荆人自忖不敌，主动要求纳贡请降。这也是周穆王生平最后一次征伐。两年后，他在涂山大会诸侯，

西周朝廷之势力，如日中天。

我在前面说过，周穆王与汉武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在位时间都很长，超过半个世纪；性格上也十分相像，富有浪漫主义的情怀，同时又贪于享乐，周穆王四处出游，行程超过七亿里（严重存疑），汉武帝则酷爱狩猎，力能搏虎黑；两人同样崇尚武力，都充满开疆拓土的激情，周穆王征犬戎、平徐乱、征越、伐荆，汉武帝战匈奴、平南越、灭朝鲜，开西域、拓西南，均布国威于万里之外。

周穆王晚年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修订新刑律。

这部新律法称为《吕刑》。自西周建立以来，到周穆王已有百年历史，承平之日已久，官员们也不如开朝初期那么清廉，各种腐败滋生，其中刑狱上的腐败尤其严重。执法者对上奉承，不敢秉公执法，对老百姓则勒索财物，贪赃枉法之事层出不穷，民怨极大。吕侯（一说为甫侯）进言天子，应该重修刑律，以正社会风气。周穆王把修订刑律之事交给吕侯去办，后来这部刑律被称为《吕刑》。

这部刑律现在已失传，不过在《尚书》里存有《吕刑》一篇，从中尚可看出个大概。新刑律的处罚条文共有三千条，在古代这算是一部十分详尽的刑法，共分为五种刑：墨刑、劓刑、剕（fèi）刑、宫刑、大辟。墨刑就是在脸上刺字，共有一千条；劓刑就是割鼻子，共有一千条；剕刑就是断足之刑，共有五百条；宫刑，男人割生殖器，女人幽闭，共三百条；大辟就是斩首，共二百条。

这部刑律比之前的刑律要宽松。根据《周礼·秋官·司刑》所记，每种刑罚的条文各五百条，总计二千五百条。而《吕刑》增加了较轻刑罚的条文，相对削减了重罪的条文。墨刑基本上属于耻辱性的处罚，对犯人伤害轻，增加五百条文；伤害较轻的劓刑也多了五百条文；宫刑虽然不致死，却与死差不多，减去二百条文；最重的大辟之

刑，减了三百条文。

除了重罪的条款大幅减少之外，还可以用钱赎罪。墨刑赎金为铜钱百镒（huán），一镒重六两，百镒即六百两；劓刑赎金二百镒，剕刑五百镒，宫刑六百镒，大辟之刑一千镒。这种罚金对于一般百姓来说，不一定支付得起，因此赎刑主要是为贵族、富家准备的。

除了刑法宽松之外，周穆王还要求官员们要做到公平公正，他说：“非佞（nìng）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意思就是说，不要凭巧言善辩断狱，而应当以良知断狱，令判决准确无误。天子还强调法律官员不可营私，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吕刑》制定后四年，周穆王去世，在位总共五十五年。

在历史上，周穆王得到的评价并不高，主要因为他性喜游乐，一反过去历史历代周王勤政奋勉的传统，甚至他被认为是西周由盛而衰的转折人物。但我以为周穆王开创了西周前所未有之盛世，是战功赫赫的君王。后世儒家传统不尚边功，故而对周穆王主动打击犬戎持否定的态度。不过，后来西周恰恰亡于犬戎之手，春秋时代，犬戎乃中原华夏之劲敌，若无周穆王的主动出击，犬戎的威胁还会更大，这也恰恰证明周穆王的远见卓识。

老子奋斗，儿子享福。

周穆王统治半个多世纪，东征西征，南征北征，几乎把周围的对手都打了个通关，接下来的周共王日子就十分舒坦了。

登基后不久，周共王闲来没事，想起父亲曾经出游那么多地方，自己老躲在王宫里也闷，便前往泾上巡游。泾上有一个诸侯国，名为密须国，这个诸侯国以前曾经颇为强大，西周兴起时，西伯姬昌听从姜子牙之计，讨伐密须，征服了这个国家。密须国君主是密康公，他

得知天子巡视至此，不敢怠慢，亲自陪同周共王游玩。正在游得起兴时，突然有三个妙龄女子蹦蹦跳跳从远处走来，个个花枝招展，把周共王与密康公两人看得直流口水。大君主也好，小君主也罢，统统是好色之徒。

周共王给密康公使了个眼色，暗示自己想得到这三位妙龄女子。密康公自己也正吞咽口水呢，咱的地盘咱做主啊，有美女当然咱得先享用啊。可是有一个人急了，谁呢？密康公的母亲，她看着儿子色眯眯的眼睛，心想这下要坏事了，便把他拉一旁悄悄说：“你还是把这三个女子献给天子吧。”可是密康公偏不，肥水哪能流到外人田呢？此时周共王脸色阴沉沉的，很难看，但密康公眼睛根本不往他这边瞧，差人把这三个女子带到自己的宫殿去了。

他娘的，周共王心里怒火中烧，拂袖而去。

得罪天子，后果很严重。一年后，周共王找了个借口，率领王师浩浩荡荡地杀向密须国。密康公如何抵挡得住王师的进攻呢，这个小国因为三个女子，被从地图上抹去了。至于那三位女子下落如何，史书倒没写，估计是被周共王带回镐京去了。

为三个女人而兴师动众，周共王算不上英雄人物。可是他运气不错，靠着老爹打下的基础，他在位时天下太平，既无内乱也无外患。在位十二年后，周共王去世，他的儿子姬囂（jiān）继位，是为周懿王。

西周真正由盛而衰，便是从周懿王开始。

三十七 衰落中的周王室

周懿王登基第一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竹书纪年》记道：“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什么叫“天再旦”呢？早上天亮了两次，太阳出了两次。乍一看，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胡扯，太阳怎么可能出来两次呢？然而，古之人不予欺也。这一天，真的发生了“天再旦”，刚出现的光明很快被黑暗吞没，直到太阳第二次出现。

只有一种答案：这天清晨，发生了极为罕见的日全食。太阳刚出来，就发生日全食，被运行在日、地中间的月球挡住，瞬间天地暗淡无光。等日全食过了，太阳又重新出现，所以叫“天再旦”。

这个记录十分有用，我们可以根据地球、月亮、太阳的运行规律，反推发生这次日全食的确切时间。我们在讲到夏商周时，总不敢使用公元纪年，就是因为时间推算混乱不清。只要能算出“天再旦”发生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纪年。经过后人大量的演算，推算出来的时间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这天清晨发生日全食，不过对这个结果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古书记录太简单，只写了“天再旦”三个字，究竟是不是日全食，或是日偏食，有没有受云雾影响等，都没提到。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个深奥的问题留给天文学家去解决吧，下面来说说周懿王是如何败家的。

说周懿王败家，他可能要从坟墓里爬出来喊冤——“不是我的错”。

确实，作为一个国王，他做得并不比父亲周共王差，但是运气就差远了。自从周穆王四处征伐后，周边蛮族个个像缩头乌龟一样，数

十年不敢吭声，但不吭声并不代表无所事事。西北及北方的戎、狄都是强横的民族，只要稍强大，就四处打家劫舍。以犬戎为代表的戎人躲在自己地盘上苦练内功，磨刀霍霍，古代政治的游戏法则就是弱肉强食，比的是谁的胳膊更粗壮有力。从周共王到周懿王，朝廷不用兵久矣，久没打仗，拿起刀枪来也觉生疏。一向嗅觉敏感的戎人知道机会来了，他们毫不客气地挥舞着刀戈冲上来。

周懿王七年，戎人大举出击，进攻西周都城镐京。谁说当年周穆王的伐戎是多此一举呢？对付劲敌，不在其尚未强大时征服，等到他们羽翼丰满时，就来不及了。当时，西周政府有一支数量不少的中央军，镐京的城防也十分坚固，守住都城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戎人大掠郊野，作为天子的周懿王岂不蒙羞。

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势力向来是此消彼长。你强了，对手自然就弱了，你弱了，对手自然就强了，这是一个规律。戎人势力卷土重来，这只是一个开始。西周开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我们不要忘了，周王国四周强敌环伺。王国强大时，周围的敌人看上去像绵羊，但当王国衰落时，绵羊却变成恶狼。在戎人围攻镐京后，西北的狄人也乘机跳出来再咬一口。周懿王十三年，狄人侵岐。岐是当年周室兴起的风水宝地，对西周政权来说是一块战略要地，如今也面临着狄人的严重威胁。

连天子脚下的土地都变得不安全，人心浮动，加剧了都城镐京的动荡。不要说平民百姓，就连周懿王本人，在沮丧的心态下，对胜利也没有信心。戎人与狄人轮番骚扰，他们的意图并非攻城略地，只是打家劫舍罢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种战术令西周政府十分头疼，都城不时发出战争警报，周懿王自己都心烦意乱。怎么办呢？天子想了个歪主意：我不待在镐京了，我搬家。

这一搬家，搬到了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

有的史书称之为迁都，有的史书认为不是迁都，只是暂时移居罢了。不管怎么说，周懿王算是落荒而逃。当然，作为堂堂大国天子，周懿王岂肯如此忍气吞声，他把讨伐犬戎的任务交给了虢公。

虢是西周的一个封国，立国于武王时期，由虢仲、虢叔兄弟俩共同拥有。虢位于今宝鸡虢镇，并扩展至岐山一带，故而戎狄入侵，虢国也是受害者之一。周懿王二十一年，虢公率师讨伐犬戎，不料出师不利，被打得大败而回。

后来《汉书》这样写道：“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戎、狄的入侵，是西周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西周政权走向衰落。

周懿王在位二十五年后去世，可能是因为他儿子尚幼，也可能是他对自己任期内的业绩十分惭愧，他没把王位传给儿子，而是让给了叔叔姬辟方，即周孝王。

周孝王上台后，便摆出强硬姿态，命令申侯讨伐西戎。

不可过高估计周孝王的攘夷决心，说是讨伐西戎，其实他是想以申侯为中介，与西戎和解。为什么是申侯呢？申国乃是西周的封国，这个封国居民以戎人为主，故而又称为“申戎”，又称为“姜氏之戎”。

说到申国，就得提到一个人，商末名士叔齐。叔齐曾投奔西伯姬昌，后来周武王欲伐纣，叔齐认为“以臣弑君”，大逆不道，坚决反对。殷商被推翻后，他与哥哥伯夷两人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后来叔齐的子孙西迁，到周穆王西征时，由于有功，受封于申，称为申侯。申国与楚国一样，虽然是周的封国，但由于当地居民多是蛮族，故而是个半蛮族国家，楚国与荆蛮、申国与西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申侯受命于周王，打着讨伐西戎的名义，实际上是谋求和解。周孝王五年，西戎向周王室献上良马。这表明申侯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西戎与周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周孝王时代，尽管与西戎的战争暂停，西周也没有大的起色。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非子受封于秦。

非子与周穆王时代驭车好手造父同出一族，他们的共同先祖是蜚廉。造父是蜚廉的四世孙，非子是蜚廉的六世孙，从辈分上说，非子算是造父的侄孙。造父善于驾马车，非子则善于养马。当时非子在犬丘养马，西周政府由于受到戎狄的威胁，也搬迁到犬丘。马匹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政府非常重视马匹的牧养。当时周孝王想找个养马能手管理牧场，有人就推荐说，非子这个人特别会养马。天子十分高兴，召见非子，派他去管理汧河、渭河之间的牧场。非子不负所望，在他的悉心管理下，牧场的马匹大量繁殖。考虑到非子为国家做出特别的贡献，周孝王封了一小块地给他，这块巴掌大的地就叫“秦”。数百年后秦国统一了中国。不过在周孝王时，秦国并不是一个诸侯国，只是西周的附庸国罢了。谁又能料想得到，毫不起眼的秦国，后来竟成为周王国的掘墓人呢？

周孝王死后，周懿王的儿子姬燮业已长大成人，大臣们与诸侯们便拥立他为天子，是为周夷王。别看他叫作天子，天子是要有实力的，若没有实力，诸侯们也瞧不上眼。以前诸侯觐见天子时，天子高高在上，诸侯毕恭毕敬地站在堂下。可是彼一时、此一时，经戎、狄多年骚扰后，周天子都逃到犬丘去了，谈何尊严呢？况且还是仗着虢、申等诸侯，才勉强过了几年安定的日子，周王室这种狼狈相，诸侯是看在眼里的。

那个时代，诸侯是很势利的，不像后世奉行“忠君”的传统，你天子有实力，我才臣服，没有实力，我自个称霸一方。前来朝觐的诸侯越来越少，天子只得放下架子，以前高高在上，现在不敢了。诸侯前

来，天子得走下堂迎接，不敢妄自尊大。一百多年来朝觐天子的礼仪，到周夷王时已不复存在了。

没办法，谁叫天子有求于诸侯呢？

所有诸侯中，虢国最为卖力，虢公也成为周天子的左膀右臂，他自告奋勇，充当马前卒。周夷王七年，虢公率领六个师的兵力，讨伐太原之戎。太原之戎原本是周穆王西征时所抓获的戎人俘虏，因安置于太原，故称为太原之戎。犬戎兴起后，原本归顺周室的太原之戎乘机叛变，为害一方。虢公率王师征伐，一直打到俞泉，俘获一千匹马，但并未能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

王室衰微的恶果开始显现，犬戎兴起于西北，楚国则开始崛起于南方。楚国君主熊渠乃是一代名君，他也是建楚后的第六位君主，在他强有力的统治下，楚国开始腾飞。自从周穆王时代楚国受王命讨伐徐偃王后，其便在南方诸侯中成为一枝独秀。熊渠有过人的才干，在江汉一带深得民心，他看到周室衰弱，乘机而起，欲独霸南方。

熊渠兴师动众，攻打庸国，大肆扩张地盘。之后他又把兵锋对准扬粤，扬粤即扬越，在今天湖南长沙以北至湖北沔阳一带，一路挺进到鄂地（今湖北鄂城）。熊渠志不在小，他一口气将三个儿子封为王：长子熊康为句亶王，次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显然他已经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你可以称王，老子也可以称王。自此，楚国雄踞江汉之地，周夷王虽然一肚子气，可是犬戎之患未平，他也无力在南方大打出手，只得忍气吞声。

连续几任周天子都无所作为，在风雨飘摇之中，周室迎来了新一位国王：周厉王。此人好勇斗狠，意志坚强，只是性情残暴，在政治上施行高压统治，终究成不了中兴之君。

南方楚国自立为王后，东方的淮夷也不再服从周室的约束。

周厉王三年，淮夷大举发兵，侵扰西周。厉王可不像父亲夷王那么好惹，他马上令虢公长父率军队东征淮夷。然而这次劳师远征并未能取得胜利，反而被淮夷打败，虢公灰溜溜地逃走了。几年后，周厉王亲自东征，以虢仲为大将，集六个师的兵力，浩浩荡荡杀向淮夷。周天子坐镇果然有效果，王师大破淮夷，总计征服大大小小淮夷国家或部落二十六个，大胜而归。是役的胜利，令周室的权威重振于东南，南方楚国熊渠亦不免震惊，担心周厉王在击破淮夷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自己，于是自动收起王号，又自称诸侯，继续效忠王室。

应该说，周厉王是有些本事的。在周室连续几代衰弱后，他还能取得东征的伟大胜利，不战而迫使楚国重新归顺，这并不容易。但周厉王只尚武功而不重文治，是一个唯武力论者，这种人往往没能有好下场。

作为一个天子，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周厉王非但没有做到爱民护民，反倒处处与民争利。他垄断山林川泽的开发权，禁止人民渔猎采樵。这个独断专行政策的背后，隐隐可见周王室财政紧张的困局。自从犬戎为乱以来，周王的领地屡遭戎、狄的劫掠，严重影响到王室的经济收入，再加上许多诸侯不朝、不纳贡，以及战争的巨额支出，可以想象周厉王时的财政已是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然而出台垄断自然资源开采权的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于是乎“下民胥怨”、“国人谤王”，民怨四起，大家纷纷暗地里骂周厉王。

这些怨声传到周厉王耳中，这位暴君压根就看不起小民，小民算什么呢。但还是有一些大臣良知未泯，召公就是其中之一，此召公乃是召穆公姬虎，是西周名臣召公奭的后代。他硬着头皮对周厉王说：“民不堪命矣。”

周厉王听了非但不改，反而十分愤怒，心想这帮小民四处散布怨言，寡人非得治治不可。怎么治呢？厉王听说卫国有个巫师很厉害，能通神灵，若有人说坏话必定知晓，便把他请来监视老百姓。老百姓

再也不敢吭声了，路上遇到时，虽然不吭声，可还是用眼神交流内心的不满。周厉王十分得意地对召公炫耀说：“吾能弭谤耳，乃不敢言。”

这种“弭谤”不过是以高压手段钳制言论罢了，召公回答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倘若河川堵塞了，最后必将决堤，到时杀伤力就大了。防民也是如此，最后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罢了。所以说，会治河的人，会开渠导水；会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让百姓有说话的机会。”召公所说的，是很高明的理论，得让民众有言论的自由，后世子产不毁乡校，就是继承了召公这种思想。

周厉王的觉悟可没那么高，他对召公说的这一套嗤之以鼻，不理不睬。但是他不明白，人民是有力量的，民众的怒火在不断地聚积，却无处发泄，最后就像一个只加热不喷气的高压锅一样炸开了。数年之后，国人暴动了！

三十八 昙花一现的宣王中兴

周代所说的“国人”，并不是全国人民，而是都城里面的人，“国人暴动”就是国都老百姓的暴动。有没有人组织这次暴动呢？依我的看法是没有的，可能是由某个事件诱发，最后导致国都全民暴动。

暴动的发生一点也不奇怪，政府不给活路，你周王把山林川泽都圈了，叫小民如何活。不仅如此，还弄来个巫师，整天派人监督，大家都不敢吭一声，吭一声准倒霉。愤怒的火山终于喷发了，起初只是少数人的小暴动，很快就演变成全民参加的大暴动。大家抄起家伙，自发联合起来，向王宫进军。

起初周厉王还气定神闲，不就是一群暴民嘛，我派军队一弹压，杀他一批人，看看谁敢造反。西周的兵制，军队多是临时征集，要打仗的时候百姓就成了兵，没仗打了，卸下军装就是民。你想想。百姓都暴动了，你往哪儿去征集军队啊？有一些识相的大臣，收拾细软跑了，当王宫的人跑了一大半时，周厉王这下子慌了。看这情形，寡人要是不跑，怕是要被分尸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得，寡人还是逃命要紧。

就这样，周厉王狼狈出逃，逃到了一个名彘（zhì）的地方（位于今山西霍县）。此时民众多年的怨气一股脑儿爆发了，大家奔进王宫里，洗劫一空，仍不解恨，因为罪魁祸首居然给跑了。不能这么便宜周厉王，他跑了，就让他儿子来顶罪。周厉王出逃时太匆忙，把太子姬靖留在了城里，姬靖被暴民们吓坏了，王宫肯定是不能待了，要往哪去呢？召公忠心耿耿，只能去投靠他了。

太子姬靖逃到召公家中，但很快就被查出来。暴动的国人又抄着家伙，把召公家给围住，要求交出太子。召穆公姬虎是个忠臣，有自己的原则，他暗下决心，豁出命也要保护太子。但他自己豁出老命也没用，暴民们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太子的命，怎么办呢？最后他想出了一个绝望的办法：用自己的儿子顶替太子。召公把自己的儿子交了出去，小民们反正也不认得太子长什么模样，看上去年岁差不多，便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腿，竟然把召公的儿子给活活打死了。

“国人暴动”后，整个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毫无秩序可言。过了些日子，老百姓们也感到不能这样下去了，没有国王，也得要有人出来主持政局才行。那么由谁来主持政局呢？史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由召公、周公（周公旦的后代）二人联合执政，号曰“共和”，故而这一年又称为“共和元年”。所谓“共和”，指的是“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因为这个时候国家处于没有君主的特殊时期。以这种说法，“共和”是一种执政方式，即公卿共同联合执政。后来我们把英文republic称为“共和”，即是此渊源。当然，周代的“共和”仅仅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第二种说法，由共伯和代行天子事。“共”指的是共国，“共伯”就是共国的君主，“和”是他的名字。按照这种说法，“共和”的意思就有别于第一种说法，指的是共伯和这个人。宋代学者王应麟是这样解释的：“古史，共伯和者，厉王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我们考察周之历史，周公、召公家族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共伯有那么高的威望代行天子事吗？

不管哪种说法正确，在国人暴动后十四年，周厉王始终窝在彘地，到死也不敢回都城，因为他终于见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

“国人暴动”与“共和”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准确公元纪年。在此之后，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都有非常准确且完备的历史纪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厉王终于死了。虽然他死的时候，仍然挂着“王”的头衔，可只不过是孤家寡人，有名无实。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人民推翻的国王，对他的死，百姓自然是拍手叫好。既然人人厌恶的厉王已死，共和的使命也结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要立谁为王呢？

在公卿的拥立下，躲在召公家里十几年的姬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继承了王位，史称周宣王。这时京城百姓才发现，当年杀错人了，只是时过境迁，大家的怒气也消了，没有起来继续造反。由于有老爹的前车之鉴，周宣王不敢对民众打击报复，再加上有召公、周公等贤臣的辅佐，周室倒颇有一番中兴气象。周宣王把被丢弃许久的文、武、成、康等先王的遗训教导又重新拾回来。这种做法颇得诸侯们的赞许，于是各方诸侯又纷纷前来朝觐，周王室的权力有所恢复。

我们看历史时，得注意王号里隐藏的含义。周宣王的谥号是“宣”，这个谥号一般是中兴明君才使用的，比如汉代的汉宣帝、唐代的唐宣宗等。所谓中兴，意味着之前是衰败的，这些中兴明君之所以能扭转困局，与他们的经历颇有关系。汉宣帝年幼时遭巫蛊之祸险些丧命，后又长期流落民间，成长经历与其他公子哥不同；唐宣宗据称还跑去当过和尚，经历也不一般；周宣王年轻时在国人暴动中差点没命，躲了十几年，也算是吃了不少苦头。吃苦头并非坏事，有磨炼人才能成长，才能苦其心志，增益其所不能。

据一些野史记载，周宣王早年锐意进取，志在中兴，与一个女人

分不开，这个女人就是他的正妻夫人姜王后，她是齐侯的女儿。周宣王刚即位时，权力、财富从天而降，这位曾经落难过的天子自然心驰荡漾，每天晚上拥妻抱妾，折腾精力，早上总是睡到很晚，懒得上朝。姜王后认为夫君如此慵懒，都是自己的过错，她脱了玉簪耳环，差人对周宣王说：“这都是臣妾的过失，臣妾淫欲之心过重，这才致使大王起不了床，上不了早朝，这样朝臣们会认为大王好色而忘德。倘若耽于美色，势必会穷奢极欲，祸乱就要来了。若是如此，那么臣妾就是祸乱的源头，请大王治臣妾之罪吧。”

听夫人这么一说，周宣王自己惭愧了，人家一个女流之辈尚且如此明理，何况自己是一国之君呢？他向夫人道歉说：“这都是寡人我自己失德，怎么会是夫人的过错呢？”从此之后，他生活上就比较节制，准时上朝，勤于政事。

当然了，要重振王室雄风，也不是光摆摆花拳绣腿就能办到的，说到底，要靠实力。

想重新领袖诸侯，首先就得打败戎狄，做出表率。

周室已衰弱四代，而这段时间，也是戎狄趋于强盛的时代。

周宣王有中兴之志，首先必须主动进取，讨伐西戎。

伐戎的重任落在大夫秦仲身上。秦仲是秦国的第四任君主，为什么周宣王会派他去讨伐西戎呢？因为秦仲与西戎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前面说过，秦国的第一位君主是非子，非子的父亲叫大骆，在周厉王时，大骆家族遭到犬戎的侵略，几遭灭顶之灾。秦仲一心想为亲族报仇雪恨，遂自告奋勇，讨伐西戎。

周宣王四年（公元前824年），秦仲率自己的族人攻打西戎。这时秦只是一个小国，军队也十分弱小，根本不是数百年后那支令人胆战心惊的铁血兵团，反而被西戎打得大败。宣王六年（公元前822

年），秦仲战死沙场。西戎斩杀秦仲之后，大兵压境。秦国本来就地少人稀，哪儿是强大西戎军队的对手，不久秦的领地落入西戎人之手。秦地沦陷之后，秦仲的五个儿子流亡到周王室领地，既无军队也无土地，就是光杆儿司令，想报仇也没实力。这个时候，周宣王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慷慨借出一支七千人组成的军队，这犹如雪中送炭，使秦国得以绝处逢生。秦仲长子继承君位，史称秦庄公，凭着七千人的王师，历经苦战，终于打败了西戎，收复国土。秦国之兴起，自秦庄公始。

除了犬戎，又一个对手出现了：北方的猃狁（xiǎn yǔn）。

猃狁这个名称大家比较陌生，它又称为狫（xiǎn）狁，是后来匈奴族的前身，典型的游牧民族。《淮南子》一书中曾这样说：“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到了汉代匈奴族时，也是如此，史书称为“畏壮侮老”，这个民俗特点，主要是因其好勇斗狠，一旦老了，体力不支，自然就受到轻视。

共和二年（公元前840年），即国人暴动后二年，猃狁就曾入侵周的西部边境。到宣王时，猃狁的入侵更加频繁，以至于周人“靡室靡家”，靡就是没有，没了家室，妻离子散。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为了抵御猃狁进犯，周宣王命大夫南仲筑城于朔方，又命尹吉甫率师讨伐，攻至太原一带。猃狁不敌，逃往北方。

北征刚刚告一段落，南征又如如火如荼地展开。

同样是周宣王五年，北征后两月，天子又命方叔率师讨伐南方的荆蛮。次年，辅佐大臣召穆公率军队征讨东部的淮夷；紧接着，周宣王亲征徐戎。当时的文学作品《诗经》中，有不少描写周宣王东征的诗歌，比如“王奋厥武”、“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等。

可以说，在周宣王上台后几年里，周师南征北战，几乎把周边的对手打了个通关。这一系列攻势，很大程度上重振周室声威，故而称为“中兴”。周宣王九年（公元前819年），天子在东都成周大会诸侯，一扫过去诸侯不朝的颓势。

史书对周宣王时代的四境战争记录还是有所缺失的，据出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载，在周宣王十二年时，虢国的季子白奉王命再伐玁狁，取得了斩首五百、俘虏五十的战绩，班师回朝时，又命属下率兵追击败退至洛水的玁狁，取得胜利。由于这次胜利，虢季子白受到了天子的嘉奖，周宣王赏赐他马匹、弓箭、彤矢和斧钺并赐予其征讨蛮夷的权力。

仅仅十余年的工夫，周宣王便取得征西戎、伐玁狁、讨淮夷、攻荆蛮、破徐戎的胜利，天子也不免沉浸在得意之中。过分得意就有点忘形了，不久后，周宣王干了一件颇不地道的事情。

这件事发生在周宣王十一年（公元前817年），当时东方诸侯鲁武公前往镐京（此时周的首都又迁回镐京了）朝见天子，他还带了两个儿子：太子姬括与少子姬戏。

鲁国太子姬括比较木讷，而姬戏则乖巧可爱，周宣王十分喜爱，便打算废了太子，改立姬戏。在夏商周三代，诸侯国虽然隶属于天子，但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司法机构、财政机构与军队，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一般来说，除非遇到十分特殊的情况，否则中央政府是不会干涉诸侯国内政的。可是周宣王仅仅凭着自己的喜恶，就想插手鲁国内政，这无疑是不合规矩的。况且周代以来，长子继承制度十分稳固，鲁国立长子姬括为太子，是遵循礼法精神的，岂能随便更改呢？

大夫樊仲站出来对周宣王说：“您要废长立幼，这不是教天下人

不遵循礼法吗？倘若鲁国顺从您的意思，那么其他国家也可纷纷效仿，到时长子继承制不就成了了一句空话吗？倘若鲁国不顺从，您就要把鲁国君主杀了，这不等于破坏自己立下的长子继承制吗？这样看来，不管鲁国是不是顺从，制度都要被破坏，您还是仔细考虑考虑。”

考虑个屁！周宣王不高兴了，老子是天子，立个诸侯国的太子有何不可。于是不管鲁武公与樊仲的反对，硬是把姬戏立为太子。

鲁武公一气之下病倒，回到鲁国后不久就死了。姬戏由于有周宣王的支持，取代哥哥姬括，成为新的鲁国国君，史称鲁懿公。可是这么一来，为鲁国的内乱埋下祸根。九年之后，废太子姬括去世，他儿子姬伯御心怀不满，便纠集一帮大臣，在民众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死鲁懿公，自立为君。此举令周宣王勃然大怒，后来终于出兵讨伐鲁国，姬伯御兵败被杀，鲁懿公的弟弟被天子立为新的君主。

一念之差，导致了鲁国二十年的混乱。

更糟的是，从此周宣王大失人心。据《史记》所载：“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越到晚年，周宣王越发固执，性情也变得更加残暴，政治失去早年的清明，先王的教导遗训又被抛弃掉。百姓越发失望，不愿意为王室效力。大家都知道，西周的土地制度为井田制，就是把田地分割为井字形，一块田分为九块，其中周围的八块为私田，中央一块为公田，归王室所有。宣王晚年政治上比较混乱，虽然没有像周厉王那么倒行逆施，但民众也心有怨言，不愿意“尽力于公田”，索性纷纷逃离周领地。

人都跑了，谁来耕地呢？

周宣王很恼火，下令搞人口普查。如果只是普通的人口普查，这

倒不是坏事，关键是周天子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通过这个来约束老百姓，把所有人记录在册，让你跑不掉。樊仲又跑出来反对，他对天子说：“您无缘无故搞人口普查，老天爷也不喜欢，对政事有害得紧呢。”周宣王不肯听，坚持要用行政手段来约束民众的逃亡。可是治标不治本，民众逃跑的原因是什么呢？还不是政策出了问题吗？不在政策上下功夫，只想用强迫手段来逼人民就范，只能激起更多的不满罢了。

自从周室中兴后，周宣王的权力越来越大，内心的道德约束又越来越少，别说老百姓，就是官员大夫也倒了霉。

杜伯是西周大夫，关于他的死，《太平广记》是这么写的：

周宣王有个爱妾名为女鸠，虽然受宠，可是天子毕竟年老了，满足不了她。她看杜伯年轻且帅，想跟他好，但杜伯是臣子，哪里敢与王妾私通呢？他一口就回绝了。女鸠这个人，有点像《圣经》里希律王的女儿莎乐美，求爱不成就心怀怨恨，打算致杜伯于死地。她跑到周宣王前，哭哭啼啼地说：“杜伯想强奸我。”老迈的周宣王轻信妇人之言，气不打一处来，下令把杜伯抓捕入狱。女鸠担心杜伯不死，哪天周宣王知道真相，自己定要倒霉，便怂恿宣王处死杜伯。

《墨子》一书对这个故事有所补充，大哲墨子是个鬼神论者，在《明鬼》篇中，杜伯临死前对周宣王说：“大王要杀我，可我是无辜的。倘若我死后没有知觉，那就算了；若是死后有知，不出三年，我定然会让大王知道我的冤情。”三年后，周宣王与众诸侯在野外狩猎，当时有马车数百辆，随从人员数千人，整个旷野上都是人。到了中午，死去的杜伯突然出现了，他驾着一辆白马素车，身穿红色的衣服，手上执着一把红色的弓，弓上有一支红色的箭。只见他追着周宣王，一箭射出，周宣王倒在车上，箭正射中后背脊梁处，周宣王当即毙命。当然，这个故事有点太离奇玄幻，大史学家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一书中采纳其说。

后世称周宣王时代为“中兴”，其实只说对一半。周宣王在位总共四十六年，在西周诸帝王中仅次于周穆王，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周室确实中兴了，只是后半段晚节不保。

兴衰的转折点始于周宣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797年。

这一年，周宣王再次对太原之戎用兵，可是好运不再，王师居然吃了败仗。五年后（公元前792年），周宣王再度发动对西戎的战争，派军队征讨条戎与奔戎，然而又一次战败。两度战败后，戎人的势力卷土重来，公元前790年（周宣王三十八年），戎人发动报复式的进攻，灭掉姜侯之邑。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令周宣王的老脸挂不住了。

所幸的是，作为诸侯的晋国为天子挽回了一点面子。

西周后期与戎人的战争导致了一个结果，即诸侯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国与晋国，这两个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春秋时代，成为最强大的两个诸侯国。公元前805年（周宣王二十三年），晋穆侯奉王命伐条戎；三年后（公元前802年），晋军与戎人战于千亩，再次赢得胜利。公元前790年，当戎人灭掉姜侯之邑后，晋军则在另一个战场汾隰击败了北戎。

周宣王当然不想让诸侯国喧宾夺主，他纠集了一些南方诸侯的军队，拼凑起一支联军，称为“南国之师”，讨伐申戎。联军旗开得胜，周宣王不免沾沾自喜，为了雪耻，他把目标锁定为姜氏之戎。岂料这支南国之师过于轻敌，他们挺进到千亩时，戎人早有防备，布下埋伏，这一役成了周宣王执政以来最大的败仗，南国之师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周宣王再也无力发动对西戎的新一轮的攻势，中兴事业就此结束。

中兴之君周宣王善始却未能善终，后世史家也颇为惋惜地评价“中兴之美未尽焉”。倘若他的后续者能吸取他的教训，锐意进取，则王室的事业还是可以期待的。只是接下来的这位周幽王，不仅在能力魄力上不及乃父，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君王之一，最后死于非命，成了末代君王。

三十九 骊山之变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去世。

关于他的死，前面说过，传言是杜伯的鬼魂前来索命。这个传言流传很广，包括《墨子》、《太平广记》等书都有提到，是不是真的，我们当然宁可相信只是老百姓出于怨恨编出来的故事，反正周宣王晚年不得人心，大家巴不得他死于非命。宣王的儿子名为姬宫涅，史称周幽王，他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昏君之一。

幽王上台之时，周王室的处境并不妙。宣王晚年，内政混乱，擅杀大臣，又干涉鲁国内政，导致诸侯离心，更要命的是，对外战争一败涂地。可以说，周宣王是扔了一个烂摊子给继承人。中国古代流传灾变说，总把天灾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幽王二年的大地震，无疑令国人对周室的命运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一年是公元前780年，西周的首都镐京爆发特大地震，至少七点八级。地震导致河流上游多处决堤，洪水涌向四周，泾水、渭水、洛水三川由于上游改道而出现断流干涸，岐山爆发山体崩裂、滑坡等灾害。一时间，“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给周王畿百姓造成重大的人员及财产损失。

在这种时候，周幽王没有把精力放在灾后重建上，反倒要讨伐戎狄，以重振周室威风。周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尚武的朝代，尽管一直遭到周边部落的侵扰，但总体上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大地震后一年（公元前779年），周幽王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命伯士率领六个师的兵力讨伐六济之戎。

我在前面说过，王六个师都是属于临时征召的，此时周人正忙于灾后重建家园，家都还未安顿好，哪里有心思去打仗呢？表面上看起

来，六个师的兵力也算是威武雄壮，只是士气低落，如何有战斗力呢？这场战役不仅大败而还，连统帅伯士都被戎人杀死。

这大概是周幽王雄心壮志的唯一一次表现了。征戎之役大败后，他灰心丧气，不想打点朝政了，把政事交给了卿士虢石父。长期以来，虢国为周王室鞍前马后，尽忠竭力，故而一直被周王视为左膀右臂。只是虢石父的品行确实欠佳，史称他“佞巧、善谀、好利”，就是个只会在君王面前拍马屁的人，背地里则四处搜刮民脂民膏，国人都十分痛恨他。周幽王不理朝政，那都做什么呢？喝酒泡妞去了。

一个重要人物粉墨登场了。

她就是褒姒。

关于褒姒，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传说。

这个故事还得从很早很早之前说起。

据说周王室藏有一件镇朝之宝，这个宝贝是用一个精美的木盒子装着，外面还加着一把锁。这是什么宝贝呢？说了恶心死你，装的是一口唾液。但您别小看它，这可不是一般人的唾液，而是龙的唾液，说文雅一点，叫作龙涎（chí）。龙是什么东西呢？今天的人都知道它的样子，可是你在动物园里看到过吗？在野外看到过吗？俗话说神龙见首不见尾，大家想必都跟我一样，连神龙的首也没见过呢。

显然，神龙就跟上帝一样，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着的。但还是有人见过的。那是夏代的时候，有一天，神龙跑到夏王的王宫里做客，不是一条，而是两条。夏人也是叶公好龙的类型，一旦见到真龙，不仅没有欢天喜地庆祝一番，反倒都被吓坏了。更可怕的是，神龙居然开口说话，自称是褒国两位先王的化身。夏王宫乱得像一锅粥，不知道要怎么办。还是夏王英明，想了个办法，还是由上天来决定吧，以占

卜定吉凶。若占卜为吉，就把神龙供起来，当神仙膜拜；若是占卜为凶，大伙就抄家伙上吧，把神龙乱刀砍死。

卜师占卜后，得出结论：这龙是神龙，杀不得，也养不得，最吉利的方法是向神龙求得一口唾液，供奉起来。夏王就准备了一个精美的盒子，恭恭敬敬地求得一口龙的唾液，封装起来。神龙消失之前，留下一个很神秘的预言，后世如果有君王开启木盒子，灾难将降临到他的朝廷。古代人是很迷信的，因此这个装有神龙口水的盒子保存了几百年，谁都没有开启过，即便是夏桀、商纣这等亡国之君也没开过。时间一长，盒子越发神秘，谁也未尝一睹其真实面目。

这个传说我们当然不太相信，但从历史记载看，龙不止出现过一次。前面我们曾说过夏帝孔甲曾养过两条龙，结果给养死了，不知道这个龙螭传说是否跟他有关。

数百年弹指一过，转眼间到了周厉王时代。有一天，周厉王穷极无聊，找不到什么东西玩，突然想起王宫里藏了这么个宝贝，心念一动，我何不打开来瞧瞧呢？他便差人把木盒子拿过来，解了锁要打开来瞧。这时一帮大臣纷纷反对，周厉王哪儿管三七二十一，给我打开。

盒子打开了。神龙果然是神龙，唾液几百年也不会干掉。但奇怪的事发生了，这唾液自己流出盒子，溅到了地板上。周厉王突然觉得有点恶心，唤人把这唾液给洗了。宫人们用尽办法，竟然洗不掉。这周厉王怪能折腾的，唤来巫师术士想办法，有个装模作样的“大师”提出一个意见：这龙的唾液乃是脏物，得让宫女们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围着脏物一起叫喊。我想这位大师一定是想借机看看活春宫图，才捣鼓出了这么个左道旁门的方法。周厉王不想那么多，叫宫女们把衣服都脱光了，一堆丰臀肥乳便围着龙螭乱喊乱叫，大师一边作法，一边时不时瞟上几眼，欣赏无边春色。

您还别说，有点用。龙的唾液突然化为一只蜥蜴，四处乱窜，怎么也捉不住，最后窜入后宫。正巧后宫有一个年仅七八岁的侍女，蜥蜴窜着窜着，便窜进她体内去了，消失无踪。等一下等一下，有些读者怕是要跳起来，你到底是讲历史还是编小说哪。诸位莫急，这可不是区区小子瞎编出来的故事，而是记载在太史公大名鼎鼎的《史记》里。

龙螭消失了，风波暂时平息下来，宫廷内又恢复往日的平静。

然而，龙螭带来灾害的预言却刚刚开始。

周厉王死后，周宣王继位。当年的侍女已经长大成人，没有婚嫁。奇怪的是，肚子却一天天地大起来，当年被那只怪兽钻进体内，在多年后竟然未婚而孕。以处女之身而怀孕，天哪，难道这是圣母马利亚吗？难道要产下一个圣婴吗？产圣婴那是人家《圣经》的事，跟咱无关，这名侍女产下的是女婴。未婚而孕，这种事情说不得，女婴也不能留在宫里，怎么办呢？年轻的妈妈只得狠心一咬牙，把女婴抛弃在路上，只希望有好心人捡到后能收养这苦命的女娃。

当时在周的首都镐京，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山桑弓啊，箕木的箭袋，它们要亡掉周的国家啊。”这童谣是什么意思呢？周宣王秘密派人去暗中调查，密探们发现京城里面，有一对夫妇，他们卖的东西正是山桑弓和箕木的箭袋。天子心念一动，莫非此二人有翻江倒海的本领，竟能颠覆周室吗？且不管童谣的预言准不准，有备无患，把这对夫妇杀了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不知为何捕杀令走漏了风声，这对夫妇心里纳闷，我们正当经营，又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怎么突然就大祸临头呢？反正没时间想，还是逃吧。两人卷铺盖走人，离开京城，踏上逃亡之路，正巧在路上发现了被遗弃的女婴。女婴正在啼哭，这对夫妇动了怜悯之

心，便将女婴轻轻抱起，心想自己膝下无子女，也算有缘，就带着她上路吧。他们逃着逃着，来到了褒国，隐姓埋名住下来。在他们的悉心照顾下，女婴一天天长大，由于居住褒国，她便被称为褒姒。

若干年后，褒姒长大成人，生得水灵灵的，如出水芙蓉，楚楚动人，可谓倾城倾国。在古代，美女注定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默默无闻地生活，总有王公贵族会找上门来。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她的人生。

当时褒国有个贵族在都城镐京犯了法，周宣王把他抓起来欲判罪。贵族赶紧说，褒国有一位绝世美女，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我愿意把她进献给大王。这就叫作交换。周宣王老年时也昏庸好色，有人要进献美女，自己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褒姒被褒国进献给周宣王。

褒姒刚被送到王宫不久，周宣王就被杜伯的鬼魂给害死，当时人是这样认为的。周宣王还没来得及享用褒国美女，被周幽王占了便宜。幽王风流成性，早就听过褒姒的美貌，本来就垂涎欲滴，上台后自然迫不及待把这位美女占为己有，并且倍加宠爱。

然而褒姒并不开心，她的脸上从未露出过笑容。这恐怕跟她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一出生便被抛弃在路上，后又作为褒国人的抵罪品送进王宫，一生的命运，都操之于人手，哪儿有自由可言？这导致她郁郁寡欢的性格。虽然如此，天生丽质也是女人最大的资本，凭借这一资本，她得到周幽王的呵护与宠爱。当宠爱变成取悦女人的时候，周幽王发现他的种种努力，竟无法博得美人一笑，对一个有着无上权力的男人，真是令人气馁的失败。男人在感情世界中的冒险天性，使得帝王亦不惜动用手中的权力，为博取美人一笑而努力。

于是便有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西周中后期，由于戎、狄等游牧民族频频入侵，首都镐京附近筑有许多烽火台。烽火台在古代起到军事预警的作用，每当有外敌入侵时，前哨的烽火台发现敌情后，就燃起狼烟，浓烟直冲云霄，这是告诉周边的烽火台：有战斗警报。邻近的烽火台见到警报后，也会燃起狼烟，把情报传递给下一个烽火台。当一座接一座的烽火台不断地做着接力时，场面之壮观，绝不亚于好莱坞充满想象力的巨片。

烽火台不仅向周王传递预警信号，同时也向诸侯国传递出求援的信号。古代这种消息传递方式拙笨却高效，烽火的警示越过高山峡谷，奔驰在平原河川，很快就能传达到各诸侯国的都城。恪尽职守的诸侯们从来不敢怠慢烽烟的警号，他们对周室的防卫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总是在第一时间赶赴京城，协防首都的安全。

可是在周幽王看来，烽火台还有一个功能——可以博美人欢心。

天子心想，褒姒郁郁不乐，就是在宫中待得太闷了，穷极无聊嘛。要是她能看到些热闹且滑稽的场景，肯定会开心。想到这里，周幽王玩起了“烽火戏诸侯”的游戏。他命令士兵在烽火台上点火，将士们很纳闷，明明没有敌情，点火干啥呢？幽王把脸一沉，废话少说，叫你点火就点火。士兵们也不敢怠慢，狼烟烧起来了。幽王与褒姒坐在城头上，欣赏狼烟四起的壮观景象。

首都燃起狼烟了！这可不得了，莫非西戎又来了？邻近的诸侯哪儿敢怠慢，当即备好战车，跃马扬鞭，率虎贲之士奔向京城。到了京城外，诸侯们却一脸茫然，敌人在哪儿呢？只见有狼烟，却不见有敌人的影子啊。抬头看时，只见周幽王坐在城头，乐得手舞足蹈，指着诸侯们的军队，对身边的美人说，你看这个好不好玩啊？

这真是一出滑稽的闹剧。

闹剧场面是如此之大，看到这些傻头傻脑又惊愕万分的将士们，褒姒禁不住轻轻一笑。为了这红颜一笑，周幽王不惜以他的王朝和生

命作为赌注。

原本为战争而建的烽火台，却悄悄地变成讨好美人的工具。从这一天起，烽火台便不时地燃起烽烟，一次又一次上当受骗的诸侯们，无不恼羞成怒。当“狼来了”的叫喊声成了欺骗的代名词时，没有人愿意再理会下一次是否真的狼来了。从今往后，泄气的诸侯们发誓再也不出兵拱卫王国的首都了。

可是狼真的来了。

引狼入室的却是自家人。

褒姒给国王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姬伯服。俗话说爱屋及乌，“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周幽王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废除王后（申后，申侯的女儿）及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姬伯服为太子。申后被废后，心里大为恼火，索性不辞而别，逃到父亲申侯所在的申国。

周幽王确实犯了大错了，他错在将王宫中的事当作家事。然而王家从来都是各方政治势力角逐的所在，特别是在西周王朝，诸侯表面上臣服于周王室，实际是非常独立的力量，拥有自己的政权与军队。被废的王后是申国的公主，申侯怒不可遏，他发誓要让周幽王付出代价。

一个迷恋于儿女情长的君王，往往在朝政上也是昏庸无能。周幽王将国家政事交给了奸邪狡诈的虢石父，朝纲不振，倒行逆施，朝内朝外，无不生怨。申侯是不好得罪的，前面说过，申侯是叔齐的后人，申国居民多戎人，故与西戎关系十分紧密。申侯多次为周、戎冲突充当调停人，他一直认为，周王室之所以能过上好日子，都是因为他坐镇西部，保卫西陲。岂料周幽王如此不识相，胆敢把自己的女儿

一脚踢开，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很快，申侯派人前往缙国与西戎，结为同盟，与周幽王分庭抗礼。

周幽王并不把申侯放在眼里，就你那点实力，能与我对抗吗？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天子在太室山召开诸侯大会，并做出大会决议：出兵讨伐申国。各诸侯国表面上举手赞成，内心里谁也不愿意，你把我们大家都当猴儿耍，还要我们出兵，门儿都没有。这次诸侯会议貌似一次盛会，其实一点实质成果也没有。

还没等周幽王出兵讨伐，申侯已经先下手为强了。公元前771年（幽王十一年），申侯发难，他联合缙国及犬戎，共同出兵进攻镐京。周幽王慌了，急忙下令，燃起狼烟，向诸侯们求援。烽火台上浓烟冲天。可是没有人出手相助，诸侯们可是有自尊心的，你天子戏弄我们，我们就吃闷亏，吃了闷亏我就学乖了，管你是不是真有敌情，我自岿然不动。居然没有一个诸侯国出兵，看来周幽王确实是寡人一个。

犬戎军队在申、缙两国的配合下，如入无人之境，直捣镐京。可怜的周幽王左顾右盼，前瞻后眺，望眼欲穿，希望远处地平线上突然冒出一支勤王的队伍，可这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无奈之下，他只能撒腿而逃，一路逃到骊山。

终于跑不动了。犬戎人如潮水般的涌来，包围了骊山。这个时候，曾被尊为神的天子，才发现自己在卸下王袍后，也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也只是一具血肉之躯罢了。犬戎人的兵戈，轻而易举地刺穿了他的胸膛。当他倒毙在死人堆时，人们会发现生前贫富贵贱的差别，在死后似乎一切变成平等，不过是一具尸骨与血水。

一代绝色美女褒姒被犬戎的军队掳走，最后结局如何，不得而知了。

犬戎军队暴露其野蛮的本性，西周精美华丽的器物成为蛮族人的战利品，他们在镐京烧杀抢掠，财物被抢光了，男男女女也像牲口一样成为野蛮者的猎物。

镐京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申侯出卖灵魂以换取报复的成功，他的外孙、前太子姬宜臼登上了周天子的王位，这就是周平王。首都镐京经历浩劫之后，已破败不堪，新的周王开始漫漫的东迁之路，从镐京迁都到了洛邑，这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代结束，东周时代开始，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

这是周王朝历史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周王室是天下之共尊，经骊山之役后，元气大伤的周王地位大降，完全丧失领袖的地位。原先躲于幕后的诸侯们则是群雄并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纵横捭阖，争雄斗霸。至时历史为之一变，天子成了配角，而诸侯成了主角，中国由是进入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时代。

由于春秋战国史料丰富，本系列丛书亦有单独分册，故而本书不宜全面讲述列国之争雄斗霸史，以避免内容之重叠。本书之东周部分，重点在于叙述周王室跌宕起伏的命运，完整展示周室之衰亡史，而这也是一般春秋战国史所忽略的部分。如此处理，应该会比较妥当的吧。

四十 权力倒悬的时代

周室东迁，象征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周平王是一个不幸的落魄君主，从他开始，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他虽然仍然保有“天下至尊”的王号，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权。不过，上天待他不薄，他在王位上待的时间竟然超过半个世纪之久，在位时间总计长达五十一年。

古语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帝王与臣子，就有由上而下的约束，这是一种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的先决条件，是帝王（中央）必须是强有力的，有能力约束诸侯的扩张与反叛。因此，西周政治制度对诸侯的城邑、军队有明确的约束。比如说，诸侯国的都城，不能超过王都的三分之一；周王可以拥有六个军（师）的兵力，诸侯国不能超过三个军（师）等。

然而，骊山之役，周王室的精锐武装被打残了，没有武力支撑的中央，又拿什么来吓唬地方诸侯呢？于是乎，诸侯们开始蠢蠢欲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中国进入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混战时代。东周的政治秩序出现转折，权力倒悬，诸侯打起霸业旗帜，周王沦为诸侯争霸的工具。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周平王在位的五十多年里，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郑国的强势崛起。

在护送平王东迁、再造周室一事上，郑国是出过力气的，因而郑武公、郑庄公两位君主均担任周朝廷卿士，即为实际执政者。近水楼

台先得月，在众诸侯国中，郑国率先发起兼并战争。郑武公先后灭掉东虢、郕国，郑庄公更是凭借朝廷卿士之身份，以“王命”为旗帜，屡屡征调王师，纵横中原，有称霸诸侯的雄心。周平王对郑庄公的飞扬跋扈既愤怒又无奈，他已垂垂老矣，与他同样老去的，还有孱弱不堪的朝廷。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病逝，周桓王继位。

年轻气盛的周桓王有梦想，梦想恢复西周时代王室的尊严。为了削夺郑庄公的权力，他起用西虢公，极力清除郑国对周王权的影响力。郑庄公对此勃然大怒，索性以牙还牙，在周桓王即位的这一年，给天子一个下马威，两次派遣军队，进入周王室的领地，割走了成熟的稻谷。周桓王气得直吹胡子，却也无可奈何。

不过，在郑庄公看来，周王室尽管衰微，周桓王毕竟是天子，“天子”就是一张王牌，把这张王牌握在手中，就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了与周王和解，公元前717年，郑庄公第一次装模作样地前往朝觐周天子。

这次朝觐并没有缓和周、郑之间的矛盾，因为周桓王在郑庄公面前摆出一副傲慢自大的臭架子，他还真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的天子。周公黑肩叹道：“周王室在骊山之变后，从镐京东迁到洛邑，郑国是有功劳的，应该对郑国以礼相待，这样以后其他诸侯国才会来朝见。现在周王用这种傲慢的态度，我看郑国不会再来。”

几年后，周桓王干了一件十分荒唐、不可理喻、大失体统的蠢事。

那是公元前712年（桓王八年），周天子突发奇想，提出跟郑国做一笔土地交易。周王室以十二块较小的土地，交换郑国四块较大的土地。看上去这是一笔公平的买卖，郑庄公盘算一下，觉得不吃亏，便答应下来。

可是谁料想得到，这居然是一场诈骗！原来周桓王用以交换的那十二块土地，并非周王室所有，而是属于曾担任周朝司寇的苏忿生家族。堂堂天子，竟然拿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去交换郑国土地，这可列为春秋时代最大的一起诈骗案。诈骗性交易的结果是，周桓王得到了郑国的土地，郑国却两手空空，精明的郑庄公可算栽了个大跟头。

郑庄公被激怒了。

周桓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诈骗诸侯，大耍小聪明，只知贪图小利，意气用事，机关用尽，最后只是自取其辱罢了。

周、郑关系持续恶化。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终于罢免郑庄公卿士之职，郑庄公也不再朝觐天子。蠢蛋往往自认为聪明，周桓王竟然异想天开，试图武力颠覆郑庄公，重新树立朝廷无上的权威。这简直是不自量力！自骊山之变后，周王的军队仅能自保，哪有四处征伐的实力呢？反观郑庄公，如一头中原雄狮，横扫中原——卫、宋、陈、蔡等国，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

周桓王挑战郑庄公，犹如绵羊挑战雄狮。

当然，周桓王有自己的优势，他有“天子”的招牌。他把招牌一竖，郑国的宿敌卫、蔡、陈诸国当然乐得响应，三国出动兵力，会同王师，组建一支讨逆军，浩浩荡荡杀向郑国。对周桓王来说，这是复兴周室的光荣一战，只要打败郑庄公，其他诸侯就要战栗地匍匐在他脚下。

只是周桓王忘了，讨逆军看上去威武雄壮，但卫、蔡、陈等国无一不是郑庄公的手下败将，能有多少胜算呢？

面对天子的挑战，郑庄公晒然一笑，他亲率郑国铁血兵团，屯兵繻葛，严阵以待。

这是王室与诸侯的大对决。倘若王室取胜，或许可重整旗鼓，号令天下；如果败了呢？恐怕为诸侯所耻笑，永无东山再起之日。

繻葛的天空布满阴云，空气凝重得几乎令人窒息。

一场影响东周历史的大决战就要打响了。

只见周桓王信心十足，他把军队编为三军：中军乃是周王室直辖的中央军，由天子亲自指挥；右军是蔡国与卫国的军队，由虢公林父指挥；左军是陈国军队，由周公黑肩指挥。三军品字排开，一时间尘土器扬，车辚马啸，煞是雄壮，大有一战而荡平郑国的气势。

战场的另一端，郑庄公表情冷峻，默不作声地观察敌人的动向，盘算着作战方案。周王的布阵特点是中央军实力较强，两翼的卫、陈、蔡的军队稍弱，特别这三个国家多次与郑国交锋，屡屡败北，自然有畏惧心理。

避强击弱是战争常用的法则，郑庄公决定把主力配置在左、右两翼，先集中力量击破卫、蔡、陈三国部队，而后周桓王的中央军势必陷入孤立无援之境。郑庄公还亮出一种全新的阵法，称为“鱼丽阵”，实际上是战车部队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具体如下：一种说法是战车在前，战车之后是步兵，步兵的位置是填充战车与战车之间的空隙；另一种说法是二十五辆战车为一排，每两辆战车之间有五名步兵。这种阵法的特点是步兵和战车之间可以互相支援，战车可以凭借其防御力和居高临下的优势，支援两边的步兵队伍；步兵在战车旁可以防止战车被敌军分割包围。

随着一通鼓声擂响，郑军率先发动进攻。公子姬忽率右翼兵团直

扑陈军；祭仲率左翼兵团进攻卫、蔡联军；郑庄公指挥中军，徐徐压上。在郑军两翼强大的攻击下，陈军与卫、蔡联军很快阵脚大乱，一哄而散，争先逃窜，完全顾不上坐镇中军的周桓王。

三军总指挥周桓王一下子没了两个军，三路郑军一拥而上，周军大败。周桓王的霉运还未到头，在混战中，他被郑军将领祝聃射中一箭，箭矢扎入肩膀，一阵剧痛，几乎掉下马车。周桓王虽是个窝囊废，仍表现得从容不迫，不失一个王者之尊严，居然忍住伤痛，镇定地指挥大军撤退。

祝聃见周桓王负伤逃走，正要驱车追去，郑庄公阻止道：“君子不能够逼人太甚，何况是欺凌周天子呢？我们只求自卫，能保住国家社稷，也就知足了。”当天晚上，郑庄公派人前往周军的驻地，探望并慰问周桓王。

这次大战中，郑庄公的表现有理有节。有理，郑国属自卫还击；有节，只击溃来犯的联军，并不实施歼灭战，战争的善后工作做得很好。反观周桓王，既师出无名，又不自量力，还挨了祝聃一箭，可以说名誉扫地。桓王之本意，幻想凭此一战，重树天下共主之形象，重操征伐诸侯之权柄。可惜事与愿违，自身形象一落千丈，正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徒增笑耳。

缙 葛之战是东周时代一场重要的战争。郑国的胜利，象征着一个诸侯争霸时代的来临。周王独尊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了，周王室从政治中心走向边缘化，虽然在此之后还不断有诸侯雄主提出“尊王”的口号，但那不过是玩弄政治的把戏，周王室的地位实质已经等同于诸侯国了。

此役彻底击碎了周桓王的雄心壮志，他日益消沉，复兴周室的梦想随风飘散。十年后，即公元前697年，在位二十三年的周桓王去世。

比起父亲周桓王，周庄王更加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周庄王在位的十五年，是春秋史上最混乱的十五年。此时一代霸主郑庄公已经去世，各诸侯群龙无首，混战、动乱、弑君、谋杀等充斥各国。这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时代，我们可以罗列一长串死于谋杀的君主：郑昭公、鲁桓公、齐襄公、宋闵公……这种谋杀之风甚至刮进周王宫，周庄王险些也成为刀下之鬼。

公元前694年，曾作为周桓王左膀右臂的周公黑肩企图策划政变，他计划干掉周庄王，扶立周桓王的另一个儿子姬克。然而阴谋尚未得逞，便遭到大夫辛伯的告发。周庄王抢先一步，擒杀周公黑肩，姬克闻讯后大恐，逃到南燕避难。

倘若周庄王能多活几年，或许还能风光一点。因为一种新型的霸业模式已是呼之欲出，这种霸业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尊王攘夷”，霸主主要带头“尊王”，谁还敢不尊呢？只是周庄王享受不到这种好处，公元前682年，他死了。

接下来的周釐王是个短命天子，只当了五年的天子就死了。在这五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便是齐桓公称霸。

齐桓公是在公元前685年登上齐国君主的宝座的，在名相管仲的辅佐下，齐国以巨龙之雄姿崛起于东方。齐国先后打败鲁国、宋国，吞并谭国、遂国等，成为东方不败，笑傲江湖。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在鄆（juàn）城主持诸侯峰会，与会者有宋、陈、卫、郑等国，这次会议确立了齐国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被认为是齐桓公称霸的开始。

然而，齐桓公忽视了周天子的价值，精明的郑厉公抓住机会，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差点威胁到齐国的霸主地位。郑厉公干的这件

事，便是帮助天子扫平叛变，再造周室。

话说周釐王去世后，周惠王继位。倘若说周王一代不如一代，这并不过分。周惠王与周桓王一样有贪小便宜的毛病，却缺少周桓王复兴王室的雄心。他干了一件十分不地道的事：抢走了手下五个大臣的菜园、房产、田地。天子与大臣争利，着实有些可笑。五大臣心怀怨恨，与周惠王的弟弟子颓勾结起来，打算发动政变，推翻周惠王。

公元前675年，在卫国与南燕国军队的协助下，子颓及五大臣发动政变，周惠王狼狈不堪，逃出首都洛邑，四处漂泊。这是继葛之战后，周王室又一次在天下人面前威风扫地。当时各诸侯国都袖手旁观，看天子的笑话。然而，目光远大的郑厉公洞察到天赐的良机，他果断介入周王室的内斗。

次年（公元前674年），郑厉公借口调解周王室内部纠纷，将参与发动政变的南燕国君仲父抓起来。紧接着，他将四处流浪的周惠王迎到郑国，并派人潜入周都洛邑，把传国宝物偷了出来，以向天下人表明，周惠王仍旧是合法的天子。

为了帮助周惠王复辟，郑厉公前往虢国，与虢公一起商议周惠王复辟的事宜。虢国一直是周王室的左膀右臂，虢公同意与郑厉公共同出兵讨伐子颓伪政府。公元前673年，郑、虢联军发动对子颓伪政府的军事打击。洛邑很快被攻破，子颓和叛乱的五大臣均被杀死。这场周王室内乱以叛乱者失败而告终，周惠王成功复辟。

郑厉公勤王再造周室，取得赫赫之功，郑国在国际上之声望几乎盖过齐国。倘若不是郑厉公不久后便病逝，齐桓公能否保住霸主地位实是可疑。

郑厉公成为周王复辟的第一功臣，郑国在默默无闻十数年后，再

次凭借惊人的功勋为各诸侯国所侧目，大大地提高了在国际上的声望与威名，也捞到了一些实惠。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令齐桓公意识到，周王室虽然衰落，但仍然有利用价值。此后他听取管仲之建议，高举“尊王”与“攘夷”两面大旗，将齐国的霸业推向巅峰。

在“尊王攘夷”的霸权时代，周天子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四十一 在霸主铁腕的庇护下

为什么要尊王呢？

周天子的至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但从名义上说，他仍是天下共主。齐桓公尽管是霸主，也只是诸侯成员之一，与其他诸侯地位相差不多，如何能令天下人听他的号令呢？要是他通过周天子传达号令，那意义就不同了。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周惠王落难时，齐桓公显然忽视了勤王的政治意义，被郑厉公抢得先机，如果不是郑厉公突然病逝，齐国的霸主地位将受到严峻的挑战。聪明的齐桓公不会再犯下第二次错误，“尊王”遂成为齐国坚持奉行的基本国策。

把周王这尊泥菩萨供养起来，就占据了政治上的话语权，有了天子的默许，齐桓公四处征伐的底气才会十足。威风扫地的周天子也渴望得到齐国的支持，因为齐国乃是诸侯中的最强者。气量狭小的周惠王还有个小算盘，他想借齐桓公之手报复卫国人。在周室内乱中，卫国充当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支持叛乱的一方，驱逐周天子。当年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大多落网，只有卫懿公仍逍遥法外，周惠王没实力报复，只能寄希望于齐桓公。

公元前667年，周惠王正式赐封齐桓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以天子身份承认其霸主地位。同时，周惠王以卫国助子颓叛乱为由，下达王命讨伐卫国。这么一来，齐桓公出兵卫国可谓师出有名。齐师深入敌境，势如破竹，卫国很快举白旗投降。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批评了卫懿公站错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卫懿公一面唯唯诺诺地听霸主的训斥，一面暗地里塞给其不少奇珍异宝。齐桓公既获得了“尊王”的政治资本，又捞了不少实惠，这可是一笔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在齐桓公强有力的武力庇护下，周天子总算稍稍恢复点尊严。

不过，倘若认为齐桓公的目的是要重振周室之权威，那就大错特错了。他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却绝不是无条件地遵从周王的政令。这从齐桓公干涉周王立太子一事可见一斑。

周代实行长子继承制，周惠王的长子姬郑早早被立为太子。然而，周惠王晚年时，王后宠爱小儿子姬带，鼓动惠王废掉太子姬郑，改立姬带。惠王经不起女人三番五次地请求，动了更换太子的念头。这事传到齐桓公耳中，他迅速召集各诸侯，商讨解决周王室内部问题。在没有周王代表参与的情况下，齐、鲁、宋、卫、陈、郑、许、曹八个国家达成共识，宣布拥护姬郑为太子。

诸侯干涉王政，这在周代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周惠王当然气急败坏，怎么办呢？他暗地里挑拨郑文公与齐桓公的矛盾，怂恿郑国背叛齐国。在周惠王的唆使下，郑文公最终退出八国同盟。在八国同盟中，郑国的实力仅次于齐国，郑文公的退出，令周王室继承人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公元前653年，周惠王在当了二十四年的天子后，终于一命呜呼。究竟谁才是合法继承人呢？周惠王去世时，只有宫里的人知道，太子姬郑决定秘不发丧，封锁周惠王的死讯。他派人快马加鞭前往齐国，请求齐桓公的支持。齐桓公闻讯后，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坚决拥护姬郑继承王位。同时，齐国照会宋、鲁、卫、许、曹等国，在洮地召开元首峰会，会议一致表决支持姬郑为天子。

顺利登上王位的姬郑对齐桓公心怀感激，他即是周襄王。

为了回报齐桓公，周襄王派遣特使参加齐桓公主持召开的葵丘会议（公元前651年），这是春秋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诸侯会议。特使送来了周天子祭祀周文王、周武王时所用的祭肉，作为对齐桓公的赏赐。今天我们对此没觉得有什么特殊性，不过是一盘肉嘛。然而，

在周代礼制中，赐祭肉乃是王恩浩荡的体现，是非同寻常的赏赐。

齐桓公恭恭敬敬地走下台阶，准备跪拜接受祭肉。周王特使赶紧说道：“天子有令：伯舅的年龄大了，且功勋卓著，爵加一等，不必下阶跪拜。”为什么周襄王管齐桓公叫“伯舅”呢？原来周礼中，周天子对于异姓诸侯的年长者，叫伯舅，如果是同姓诸侯，则叫伯父或叔父。周天子是姬姓，齐桓公是姜姓（姜子牙之后），故而属于异姓诸侯。

颇能作秀的齐桓公正色说道：“天威近在咫尺，我岂敢贪天子之命而不下拜呢？”说罢他跪倒在地，恭敬地接受祭肉。

齐桓公“尊王”的表态不仅令周襄王心里的石头落地，也为他本人捞足了政治上的声誉。

尽管有齐桓公的支持，周襄王的天子位暂保无虞，然而，周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未终结。周襄王的弟弟姬带（史称王子带）对失去王位耿耿于怀，他从小被宠惯了，焉甘心当哥哥的臣子。为了夺回权力，他不惜引戎人进攻都城洛邑。戎人一把火烧了东门。周襄王狼狈不堪，几乎要弃城而逃。幸而秦国、晋国及时出兵勤王，总算保住首都。为了防备戎人再度进攻，齐桓公也派出一支军队进入洛邑协防。

守住首都后，周襄王要清算姬带的罪行，姬带脚底抹油，一溜烟地逃到齐国避难去了。直到十年以后，时间冲淡了仇恨，周襄王才允许姬带返回京师。

齐桓公的“勤王”主张，使周天子在诸侯面前有了些面子。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64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年迈体衰，竟遭到一群小人暗算，活活饿死于宫中。齐桓公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争立，齐国陷入混乱不堪的内乱中，霸业戛然而止。

没有霸主的日子里，不仅是齐国，中原各诸侯国由于失去领导，各国之间又你争我斗，一时间遍地狼烟。如此乱哄哄的场面，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当然看不下去。他左瞅瞅，右瞧瞧，只见郑国与卫、滑两国正在械斗，赶紧前去调停。不料郑文公不吃这一套，呸！还真把自己当作天子了。作为郑庄公的后人，郑文公又令周王难堪，非但不接受调停，还把周王特使扣留下来。

周襄王涨红了脸，他的自尊心受伤害了。

只是那个高举“尊王”旗帜的齐桓公已经死了，谁能充当王室的打手呢？周襄王狗急跳墙，竟然想借助狄人之力量教训郑国。狄人正巴不得卷入中原战争以捞足好处，既然周襄王诚心相邀，他们闻风而动，直捣郑国。为了与狄人拉近感情，周襄王甚至娶了一名狄人之女，名为隗氏，立为王后。

然而，周襄王还是要蒙羞的。王后隗氏并不爱他，反倒爱上了跑路十年刚刚被允许回京的姬带。看来姬带命中注定是周襄王的死敌，不仅要夺他的位，还要夺他的女人。周襄王终于被激怒了，他迸发出男子汉的气概，把王后隗氏废掉了。姬带一看奸情败露，情知京城之内再无容身之地，为了跟情人厮守，老子还要跟你这天子干上一场。

姬带有张王牌，就是他的情人隗氏。隗氏找娘家狄人帮忙，围攻周襄王。周襄王发现自己就是个大蠢蛋，招来狄人，岂不是引狼入室吗？周王的政府军大败，天子被迫逃往郑国避难。

这一年是公元前636年。

此时的周襄王，惶惶如丧家之犬，羞愧难言。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他硬着头皮，分别向鲁国、晋国、秦国发出勤王令。勤王军会不会前来，他不知道，除了等，他还能做什么呢？

说起来周襄王运气不错。就在天子落难的同年，晋国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后，在秦国武力支持下，返回晋国登上君主宝座，他便是与齐桓公并列为“春秋五霸”的晋文公。在此之前，晋国内乱频繁，晋文公的上台，预示着晋国黄金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一个长期霸权的开始。

晋文公要扬名立万，机会就在眼前。只要帮助周襄王复辟，到时候就可以接过齐桓公的“尊王”大旗，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晋国号令天下的霸业。这个机会，只有目光远大的人能看得到。不仅是晋国，秦国也蠢蠢欲动，秦穆公迫不及待要渡过黄河前往勤王，然而地理劣势决定秦穆公的美梦蓝图化为泡影。原因很简单，晋文公要独吞勤王之功，晋国不借道，西方的秦国就无法挺进中原。

周襄王望眼欲穿，终于盼来勤王之师。晋文公亲自率军南下，兵分两路，一路包围姬带与隗氏所在的温地，这对情人早已公然同居；另一路则径直奔向郑国汜城，迎接周襄王。

叛军岂是晋军的对手，很快被打得丢盔弃甲，姬带在战斗中被俘，后被处死。晋文公亲自护送周襄王回到首都洛邑，落魄天子终于重见天日。不过，他很快就会明白，比起齐桓公，晋文公并不是那么恭敬谦和的。

晋文公再造周室，功劳可谓伟大矣。周襄王理所当然以最高规格款待晋文公，亲自敬酒。不料晋文公几杯烧酒下肚，狂气上来，居然干了一件让周襄王下不了台的事。他冒冒失失地提出一个请求：请求周天子允许他死后能享用天子的葬礼。

这话一出，所有人惊呆了。你晋文公要干什么？你想当天子吗？你想取代周室吗？这是非常严重的僭越无礼，是对天子权威地位的挑衅，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

周襄王十分不痛快，拂然道：“那是天子的礼仪，现在好像还没

有到取代周室、改朝换代的时候，如果叔父也以天子之礼安葬，岂不是有两个天子吗？那样大概叔父也不同意吧。”

当然，晋文公说的话乃是酒话，在这个诸侯林立、群雄争霸的年代，你想当天子岂不成众矢之的？“尊王”、“挟天子”才是最好的选择。

为了感谢晋文公勤王，周襄王不得不忍痛把阳樊、温、原、欒茅四座城市赏赐给晋国。所谓的“赏赐”，实际上是周王室处境窘迫艰难的表现。在周室衰微、诸侯崛起之际，周王室的领地已经越来越小。这次“赏赐”，实际上是周王室在晋国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做出的让步。显然，晋文公的“尊王”，比起齐桓公更显得虚情假意。

此时中国大地之上，逐渐形成两大军事联盟：一方是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联盟；一方是以楚国为首的南方联盟。

楚国本是周的封国，在五等爵中为“子爵”，地位是比较低的。不过，由于楚国地处南方蛮夷区，有极大的拓展空间，加上历代名君辈出，逐渐崛起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国家。到了东周时代，楚国已是南方霸主，国君熊通不满足“子爵”的称号，要求周桓王提高其爵位，封公爵或侯爵，不料却遭到天子的一口拒绝。熊通一怒之下，自立为王，称楚武王，与周王分庭抗礼。从楚武王到楚文王、楚成王，三代名君把楚国之势力扩张至中原，对晋国之霸业乃是一大威胁。

公元前632年，春秋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役爆发，此役便是城濮之战。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诸侯国大战，两大轴心国是晋国和楚国。晋国的同盟国有齐国、秦国、宋国；楚国的同盟国有鲁国、曹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总计十二个国家卷入战争。晋国成为最后的胜者，晋文公当之无愧成为新一代霸主。

晋文公没有忘记“尊王”，他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献俘”仪式。超过一千人的楚军俘虏，被押着穿过王城洛邑的主要街道，从周天子的检阅台前狼狈走过。除此之外，晋文公还献上了城濮之战的战利品：楚国的一百辆战车。

周襄王与晋文公假惺惺地上演一出早已预排好的戏：天子赏赐给晋文公一大堆东西，任命他为“侯伯”，即诸侯之长，相当于诸侯联席会议主席，其实就是“霸主”的另一叫法。周襄王当面表彰说：“阿叔啊，以后就靠你安抚天下诸侯，为周王室惩治叛乱。”

晋文公假装不敢接受，推辞三次，在周天子的坚持下，才“勉强”接受侯伯的任命。从此以后，晋国便成为天子的保护国，堂堂周王，已经沦落到受保护的地步。

四十二 风刀霜剑严相逼

自城濮之战后，春秋的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晋、楚争霸的时代，持续时间将近一百年。晋国与楚国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周天子的声音已经如蚊子般微弱，周王室的权力进一步被边缘化。

这是霸主至强的年代，晋、楚两大霸主引领北、南两大集团，武装对峙。有时晋国占上风，有时楚国占上风，总体上势均力敌。与晋、楚的风光相比，周王室似乎躲藏在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里，老的国王死了，新的国王又老了。从周襄王到周顷王到周匡王到周定王，转眼间几十年弹指过去，一向平静的周王室，忽然发现一头南方大鳄已经游到洛水之滨了。

这头南方大鳄，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

春秋五霸是哪五霸，有几种不同的版本，然而，不论是哪个版本，有三个人的名字是雷打不动的。他们就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楚庄王的光辉业绩堪媲美于齐桓公与晋文公，但有一点除外，他并没有“尊王”，因为他自己就是王，何必去尊别的王呢？

楚庄王上台后，连挫晋国及其喽啰国，势力直抵中原。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挥师进攻位于伊川的蛮族部落陆浑戎。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楚庄王的真实意图，不在消灭陆浑戎，而是窥视周之首都洛邑。楚军一路猛进，直抵洛水之滨，已经进入周王室的领地。这位南方霸主煞有其事地在洛水河畔举行盛大的阅兵，威武雄壮的方阵有条不紊地行进，喝声震天，数百辆战车卷起滚滚风尘，把河对岸的周定王看得胆战心惊。

周定王忐忑不安，这个所谓的天下共主，实则如同实力平平的诸

侯。来者不善，楚庄王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天子如坐针毡，决定派王孙满前往楚营一探虚实。

王孙满携带酒肉，以犒劳慰问为由，前往洛水之滨，求见楚庄王。

楚庄王一见王孙满，劈头就问：“周王室的传国之宝是九座铜鼎，此铜鼎据称是大禹王时所铸，九鼎象征九州。九鼎由夏而入商，由商而入周，可惜寡人一直未能亲眼见到，不知这九鼎的大小轻重如何？”

为什么要问鼎呢？

从大禹王开始，九鼎就象征至高无上的王权，只有至高无上的天子才能拥有。楚国自立为王，可是还是识相的，没敢自称为“天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封的“王”，得不到诸侯们的认可。你这个“王”不是合法得来的，你没有九鼎，没这个国之神器。楚庄王问鼎之轻重，无非是认为象征天下至尊的九鼎，只有放在楚国才合适，周王算老几，也配享有九鼎吗？

王孙满不动声色地答说：“传国之宝，在德而不在九鼎。”

楚庄王一听很不高兴：“呸！你不要恃着有九鼎，寡人且告诉你，楚国光是折断戈戟的尖端，用这些铜就足以来铸九鼎了。”

当时楚国在诸国中是产铜量最高的国家，拥有最大的铜矿产地：铜绿山，在今天湖北大冶西。可以说，楚庄王铸鼎之念头并非不现实，只要他愿意，完全有可能搞一套山寨版九鼎。问题是，山寨货就是山寨货，你造出来也没人认。

面对楚庄王的咆哮，王孙蛮沉得住气，不疾不徐地回答说：

“您的记性不好啊。在大禹王的时候，九州咸服，便从各地运来

青铜铸成大铜鼎九具，鼎上刻上山川物象，象征九州。可是到了夏桀时，君王荒淫无度，九鼎便从夏转移到殷商，历时六百年。后来商纣无道残暴，周室革命，九鼎又从商转移到周。天子有道，鼎虽小却重；天子无道，鼎虽大却轻，因此说在德不在鼎。周室今虽衰微，然而天命未改，这九鼎的大小轻重，您还是不可问哩。”

这一番话，把楚庄王听得一愣一愣的，半晌后总算有点明白，这九鼎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晋国近水楼台，都没敢把鼎扛回自己家里，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都还没有一统天下的实力与资格。没这个实力，你就算把鼎扛回家，别人会拜倒在你脚下吗？楚庄王虽然是一代枭雄，也算有自知之明，天命还未出现呢，不如打道回府吧。

周定王总算有惊无险地保住九鼎，没有丢先王的脸。他在位二十一年，于公元前586年去世，其子姬夷继承王位，称为周简王。

晋国继续充当王室保护人的角色。尽管楚庄王在位时，晋国被打得像缩头乌龟，甚至在邲之战中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但不要忘了，晋国毕竟是个伟大的国家，很快便励精图治，卷土重来。公元前593年，晋国扫灭赤狄部落，重现军事强国风采；公元前575年，晋国在鄢陵之役中大败楚军，一雪前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胜利后，晋国均在周都洛邑搞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向周天子报捷，以示“尊王”。然而，这并没有改善周王室日益尴尬的处境，除非有霸主的命令，否则连小诸侯也不会前来朝见天子。天子早已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周几乎被人遗忘了，仿佛是世外桃源，远离战争与尘嚣。

从周简王到周灵王，再到周景王上台，日历翻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平静的周王室终于有了一点波澜。那是周景王上台后二年（公元

前543年），宫廷爆发一起未遂的政变。景王的堂兄弟儋括企图推翻天子，改拥立潜夫（景王的弟弟）为周王。不过，政变失败，潜夫被处死，儋括及其党羽仓皇出逃，投奔晋国去了。

周室的势力不仅受到外部诸侯的挤压，自身也陷入内部纷争的危机之中。公元前520年，在位二十五年的周景王去世。他的死，导致了周王室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内乱。

周景王在位时，立儿子姬寿为太子，不过姬寿无福享受王位，早早就死了，另一位王子姬猛被立为太子，又称为王子猛。

王子猛既不是嫡子，在众庶子中也非长子，根据周代立储制度，他被立为太子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史书上没有写他何以被立为太子，据我推测，大概是得到了朝中两个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一个是单穆公（时任卿士），另一个是伯冼。

然而，周景王晚年时，却打算废掉王子猛，改传位给另一个儿子王子朝（姬朝）。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他能异军突起，得益于老师宾起，此人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深得周景王的信任。在宾起的鼓吹下，周景王动了废黜太子的念头。

卿士单穆公与大夫伯冼得悉消息后，打算先下手为强，杀掉王子朝与他的老师宾起，以绝后患。不料百密一疏，消息走漏，宾起马上把单穆公与伯冼的阴谋汇报给周景王。周景王以打猎为借口，要求高级官员随行，企图先下手为强，铲除单穆公与伯冼。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周景王竟然心脏病突然发作，一命呜呼。

周景王死的太不是时候了。

他要是晚死一两天，就不会出现以后的内乱。他的暴死让单穆公与伯冼死里逃生，两人马上拥立王子猛为周王，史称周悼王。一不

做、二不休，单穆公与伯盩乘胜出击，攻打宾起，宾起兵败被杀。然而，王子朝成了漏网之鱼，他逃出周都后，在周室旧官吏的支持下，占据了郊、要、钱三座城邑，拼凑一支军队，反攻洛邑。单穆公与伯盩抵挡不住，只得带着周悼王出逃。

至此，周王室的内战全面爆发。

单穆公一面抵抗叛军，一面向晋国政府紧急求援。

晋国需要天子的金字招牌，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出动大军干涉周室之内战。在晋军的支持下，周悼王卷土重来，把王子朝的叛军赶出洛邑，再登天子宝座。然而，这次叛乱不同过去，王子朝的支持者甚多，战争还远远望不到尽头。晋国军队撤退后，王子朝很快又杀回来，击溃单穆公与伯盩所指挥的政府军。

周悼王回到洛邑后不久便去世，死因不详。或许是积劳成疾，或许是死于叛军之手。有人为权力斗个你死我活，有人却幸运地捡便宜。周悼王的弟弟王子匄被立为天子，史称周敬王。

晋国只得再次出马，与王军联手对付叛军。叛军控制下的据点一个个被拔除，到公元前519年初，王军基本收复失地。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周敬王与单穆公却做出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周敬王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万一叛乱剿平，晋国人赖着不走怎么办？倒不如提前恭送他们出境。晋国的表现倒是中规中矩，好吧，你让我撤，我就撤。很快，晋军全部撤出周王领地。

然而，周敬王显然低估了叛军的力量。

应该说，叛军首领王子朝是个有能力、颇有名望的王子。就在他被晋军打得走投无路时，晋人居然撤走了。这简直是奇迹。他马上抓住机会，策反尹邑，诱杀拥护周敬王的刘佗，再次扯起叛乱旗帜。

掉以轻心的单穆公与伯鲋以为大局已定，兵分两路，进攻尹邑，幻想给叛军最后一击。不料尹邑一战，王师大败。这一战，成为周王室内乱的转折点。单穆公与伯鲋灰头土脸地逃回洛邑，如惊弓之鸟，草木皆兵，连守住首都的决心也没有，匆匆护送周敬王逃往刘邑。

王子朝趾高气扬地回到洛邑，住进王宫，自己加冕称王。这么一来，周王朝出现两王并立的局面。王子朝占据首都，对周敬王穷追猛打，很快控制了周王室的大部分地盘。

王室的内战，令诸侯国不知所措，中小诸侯都看晋国的态度。

晋国政府也迟疑不决了：究竟要认哪个周王呢？两个王都是周景王的儿子，从身份上说，都有继承大统之权，谁才算正统呢？这个有点难办。晋国政府决定派人前往周地考察，看看老百姓对两个王的态度如何。

公元前518年，晋国大夫士弥牟奉命前往调查。他向百姓询问对两个王的看法，发现民众普遍支持周敬王。在平民百姓眼里，周敬王才是合法的天子，王子朝不过是篡位夺权的野心家，这些年的战乱，都是这家伙挑动的。士弥牟将调查结果回报给晋国政府，晋顷公决定支持周敬王的政权，认定王子朝的政权为非法，拒绝接待王子朝派出的使臣。

晋国的这一立场，对流亡中的周敬王不啻为一粒定心丸。

第二年（公元前517年），晋国大夫赵鞅主持诸侯国会议，商量安定周室的事宜。在会议上，晋国方面提出两个主张：第一，各国政府必须向流亡的周敬王提供粮食；第二，计划次年出兵，武力护送周敬王重返都城。

这两大主张看上去光明正大，天子有难，诸侯齐心协力勤王，难

道不是天经地义吗？然而，赵鞅却碰钉子了。此时的周王早已经是形同虚设，对各诸侯国来说，周王只是象征性的存在，谁去理会他的死活呢？齐国拒绝参加这种无聊的会议，与齐国关系紧密的莒、郕、徐等国，也没有一个参加会议。

即便是参加会议的国家，也发出不和谐的声音。譬如宋国代表公然表示，不能向周敬王提供粮食援助，他的理由是：周王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只有主人请客人吃饭，哪有客人带上一席饭菜给主人呢？弦外之音是说，我们这些小诸侯被欺负的时候，周天子有帮助过我们吗？你是天下之主，我们有难，你不来帮忙，现在你有难了，反倒我们来帮忙，没门儿！

晋国大夫士弥牟气坏了，跳起来把宋国代表大骂一通，宋国这才被迫接受此协议。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多数诸侯国，根本无意去理会周室的内战。

不仅中小诸侯无动于衷，连晋国也消极怠工，出兵一事，一拖再拖。

在这段时间里，周敬王的流亡政府不断地遭到进攻，岌岌可危。单穆公急了，派人向晋国政府求援，可是望眼欲穿，迟迟未见晋军的影子。公元前516年7月间，在叛军的围攻下，周敬王被迫放弃流亡政府所在地刘邑。王子朝的军队占领刘邑后，将这座城池烧为灰烬。周敬王夺路而逃，一直逃到滑邑。

直到这个时候，晋国才不得不出兵。再不出兵，周敬王只能到地下去见列祖列宗了。晋国军队开进滑邑，迎接狼狈不堪的周敬王，并分兵驻守战略要地阙塞。大家想想，周之内战，不过是小打小闹，晋军才是无敌于天下的狠角色。有了晋军相助，周敬王底气十足，他集合流亡政府军，对叛军展开反扑。

叛军一看到晋军主力出动，早就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夺路而逃。原本效忠于王子朝的召伯盈本就是政治投机分子，一看大势不好，索性倒戈一击，把王子朝赶出洛都。王子朝情知大势已去，与一帮大臣狼狈地逃往楚国。

看上去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内战似乎要结束了，其实不然。

王子朝逃亡到楚国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周敬王政权的两个核心人物：单穆公与伯蚩，认为两人“搅乱天下，倒行逆施”。同时，他还批评晋国政府出兵协助他们，乃是放纵这些野心家无边的欲望。王子朝还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辩护，认为周朝的立储原则是：“如果王后没有嫡子，就选立年长的庶子，如果遇到庶子的年龄相同，则选立有德者。”周景王嫡子早夭，只能在庶子中选择接班人，王子朝作为庶长子，理所当然是王位的继承人。他甚至批评周景王在立嫡一事上存有私心，违背古制。

对这份声明，鲁国大夫闵子马评论说：“王子朝一心想当天子，既批评周景王，又得罪晋国，无礼到极点，就算文辞再精彩，又有什么用呢？”

周敬王政府开始清算叛党，逮捕并杀害了一批以前追随王子朝的官员。这次打击面太广，被处决的人除了顽固派外，还包括不少已经向政府投诚的官员，比如把王子朝驱逐出洛邑的召伯盈，也未能幸免于难。这种大屠杀不能不说十分短视，结果逼使王子朝的旧臣铤而走险，重新走上叛乱之路。不过，由于群龙无首，零星的叛乱终于不成气候，被一一击破。

王子朝亡命楚国十年。此时春秋已进入尾声，经过长达百年的对抗，晋、楚两霸都精疲力竭。与此同时，东南的吴国异军突起。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携伍子胥、孙武两大名将，发动对楚国的致命一

击。吴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楚国，攻破楚都，楚昭王落荒而逃。曾经雄霸南方的楚国，几乎亡于吴国人之手。

楚国的破败，给了周敬王一个天赐良机。此时楚国自身难保，谁还想着庇护流亡中的王子朝呢？王子朝不死，周敬王不得安眠。怎么干掉王子朝？周敬王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派军队到楚国杀人，只能采取偷偷摸摸的手段。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几名刺客悄悄潜入王子朝的宅院，不久后，人们发现王子朝陈尸室内，脑袋已不翼而飞。

王子朝死了。

周敬王终于可以长长喘一口气，那一夜他终于睡得很香很甜。他相信从今天始，可以高枕无忧了。谁也不会想到，王子朝的死，并不意味着叛乱的终结，周敬王很快就要再尝苦果。

公元前504年，王子朝的余党在儋翩的领导下，对周敬王政权发难。这次叛乱的爆发，得到了郑国政府的鼎力支持。随着晋、楚霸业式微，郑国蠢蠢欲动，企图通过扶植儋翩叛乱对周王领地鲸吞蚕食。郑国不仅支持王子朝余党在周室王畿制造动乱，还进攻周领地的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座城邑。

晋国不得不又一次出兵救援天子，此时的周敬王在叛军的进攻下，惶惶不安，仓促逃出京城，又一次开始流亡生涯。

儋翩的叛军在公元前503年初攻占仪栗后，成了强弩之末，晋国出兵是周王室反败为胜的关键因素。四月，单武公（单穆公的儿子）与刘桓公（伯盩的儿子）率政府军在穷谷一役中挫败叛军的进攻，此役成为周室内战的转折点。该年年末，在晋国军队的护送下，周敬王终于重新返回国都。

第二年（公元前502年），单武公攻克叛军控制的重要城邑谷城，紧接着又占领简城；刘桓公则收复仪栗，在孟邑再破叛军。至

此，周室内乱彻底结束。

这场内乱从公元前520年爆发，至公元前502年结束，时间跨度长达十九年，是周室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内乱。周王室已经彻底没落了，在中原的政治影响力，尚不及一个中等诸侯。尽管晋国仍然高举“尊王”的旗帜，可是谁都看得出来，晋国并不积极卖力，否则区区一场叛乱，何至于要用二十年解决。

没落中的周王室，究竟要走向何方呢？

四十三 零落成泥碾作尘

东周一般被分为两截，前半截是春秋，后半截是战国。春秋止于公元前476年，为什么以这一年作为春秋的结束、战国的开始呢？这年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吗？其实没有。只不过是周敬王在这年驾崩，他总共当了四十四年天子。

周敬王的儿子姬仁继位，史称周元王。

春秋战国之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吴越战争。周元王继位时，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公元前473年，一代枭雄越王勾践以卧薪尝胆之志，最终实现灭吴的梦想，成为无可争议的霸主。勾践灭吴后，学起齐桓公、晋文公的模样，致贡于周，以示“尊王”。周元王仿效前世天子，封勾践为伯，承认其霸主之地位与特权。

这大概是周天子最后一次风光了。

越国的霸业，随着勾践的去世飘散于风中。曾经强盛百年、笑傲江湖的晋国内患重重，晋国君主与周天子一样被架空，国家权力落入几个家族之手。公元前453年，晋国赵氏、魏氏、韩氏三家联手，消灭知氏，分割晋国。晋国走向分裂已是不可避免。

在晋国裂变的同时，周王室也悄悄酝酿着裂变。周元王只当七年天子就去世，其子周贞定王在位共计二十八年，于公元前441年去世。平静的宫廷再掀巨浪狂风，先是周贞定王长子姬去疾继位（史称周哀王），岂料仅仅三个月后，便被弟弟姬叔所杀。姬叔自立为王，史称周思王。窥视王位的可不止他一人，五个月后，其弟弟姬嵬发动政变，杀死周思王，登上天子宝座，史称周考王。

连续两次政变，都是弟弟杀死王兄。大概是这个原因，周考王未

雨绸缪，索性把弟弟姬揭封于王城。我们前面讲过，周公执政时期，把洛邑分为两个部分，洛水以东叫成周，洛水以西叫王城。由于王城在西，故而又称为“西周”，姬揭便是西周的第一任领主，称为西周桓公，又称西周君。

周考王把王城封给弟弟，避免了兄弟相残的悲剧继续上演，但天子在周领地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并为后来周室的分裂埋下伏笔。

周考王死于公元前426年，其子周威烈王立。

自晋文公始，晋国便成为超级强国，建立起长期霸权。晋国的繁荣得益于独特的六卿制，六卿实际上就是六大军事巨头，武人在晋国制度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六卿制也是晋国动荡之根源，到春秋后期，形成魏、赵、韩、知、范、中行六大家族轮流执政的传统。六卿之间争权夺利，或联合或倾轧，最后知、范、中行三家被消灭，魏、赵、韩三家瓜分晋国。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以天子之名，正式册封魏、赵、韩为诸侯，这就是所谓的“三家分晋”。

传统的儒家史学认为，赵、韩、魏三家身为臣子，竟然剖分晋国，君君臣臣的政治体系完全被破坏。在这种纲常散坏的情况下，周天子封三家为诸侯，承认他们瓜分晋国的合法性，使得君臣之礼完全崩溃。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心疾首地说：“君臣之礼即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靡灭几尽，岂不哀哉！”把战国时代的祸乱归结于周天子自毁纲纪。

其实司马光实在是夸大其词。按这位仁兄的看法，似乎周天子不承认三晋诸侯，魏、赵、韩就能被约束住。事实上，战国时代的周天

子，比起春秋时代更加羸弱，完全没有任何权力。所谓“册立诸侯”，无非是对既存事实的承认罢了。说白了，不是周天子给三晋面子，反倒是三晋给周天子面子。让你册封我们三家诸侯，是看得起你周王，是顾着你的面子。楚国称王了，吴、越称王了，他们有请示天子吗？所以说，司马光的评价，实是幼稚可笑。

三家分晋，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魏、赵、韩各自独立后，都拼命向外扩张以争夺生存空间，从此战国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史诗年代，周天子已经沦为战争看客，最后也势必成为牺牲品。

周威烈王之后，是周安王、周烈王，尽管天下汹汹，战争的火焰暂时还没有烧到天子脚下。然而，周显王上台后第二年（公元前367年），问题还是来了。

前文说过，周考王把弟弟封为西周桓公，居于王城。桓公去世后，威公继位。周显王上台不久，西周威公去世，谁将成为下一任西周君呢？姬朝是太子，法定继承人理应继位。不过，威公的小儿子姬根却得到了韩国与赵国的支持。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在韩、赵的武力支持下，姬根占据平阴、偃师、巩三城，称为东周；姬朝占据穀城、缑氏、王城，称为西周。此时王畿之地共有七座城池，所谓王畿之地，就是首都周围方圆千里之地。这七座城池，东周占了三城，西周占了三城，可怜的周天子只有洛阳（即成周）一城。由于东周有韩、赵撑腰，周显王只得依赖东周自保。

这还叫天子吗？充其量不过就是个县长罢了。

大家注意，在历史上，“东周”、“西周”是有两个含义的。其一是大家所熟悉的，以骊山之乱、周平王东迁为标志，周朝分为西周、东周两个阶段；其二就是周显王时，王畿之地分裂成两部分，一为西周，一为东周。在后文我们说到西周、东周时，基本上是后一种意

思。

韩、赵两国扶植东周，其实有自己的险恶用心。先让周室分裂，这样好一口一口吃掉。在周显王时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推行变法，很快后来居上，成为魏、韩、赵之劲敌。在秦国的打击下，韩国接二连三地丢失土地。这时韩国便把目光锁定在东周，于公元前353年发动对东周的进攻，夺取王畿外围的大片土地。

在春秋时代，周天子虽然没什么权力，但好歹有霸主“尊王”，王室的地盘，别人还是未敢覬覦的。眼下诸侯们非但要抢天子的地盘，还要抢“王”的称号。

公元前334年，即周显王三十五年，这是战国史上值得回味的一年。

这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齐魏徐州相王。什么意思呢？就是齐国与魏国互相承认对方的王号，齐国君主是齐威王，魏国君主是魏惠王。大家注意，魏国的前身是晋国，当年晋国与齐国都是高举“尊王”的旗帜，而现在这两国率先自立为王。还尊你周王个屁，老子也是王！以前叫某某公或者某某侯，现在不了，现在叫某某王。

此例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此后十余年，所有重要诸侯国全部称王。公元前325年，秦国称王；紧接着，韩国称王。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就是五个国家互相承认对方的王号，至此，满天下都是王了。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多王，究竟是哪个王的土呢？率土之滨，又是哪个王的臣呢？

从此之后，周王彻底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了。

五国相王后两年，在位长达四十八年的周显王去世。其后继位的分别是周慎靓王与周赧（nǎn）王。周赧王是周朝最后一位王，说起末代君王，我们总会想象其凄惨落魄的样子，然而周赧王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竟然在这个惊涛骇浪的大战争年代里，当了整整五十九年的王！

自西周、东周分裂后，连续几任周王都依附东周生存。不过后来东周遭韩国的鲸吞蚕食，实力大打折扣。周赧王上台后，他决定迁都王城，转而依附西周。我们不禁也要叹息，堂堂周王，看上去像是要饭的，像条寄生虫。

与周室的没落相比，秦国如夏日之日，暴烈的日光烤焦大地。

从秦孝公始，秦国亮出寒光闪闪的刀锋，刀锋所过之处，留下的是血海尸山。秦惠文王是秦国扩张史上最重要的君王之一，在秦之轮番打击下，三晋（魏、赵、韩）、楚国屡屡败北，秦已然成为天下至强。秦武王之崇尚武力，比秦惠文王有过之无不及。他早就有窥视周室的野心，他的理想是：“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

窥周室与通三川有什么关系呢？秦国与周王领地并不接壤，要窥周室，首先要攻占韩国的三川之地。为此，秦武王发动规模空前的宜阳之战。

公元前307年，经过一年的血战，秦军攻取宜阳，斩首六万。通往周室的道路已经打通。周室早已败落，有什么好窥的呢？无非是因为周室有象征权力的九鼎。倘若把九鼎扛回秦国，秦武王便是万王之王了。

秦武王先派右丞相樗里疾前往西周王城拜会周赧王，随行的车辆

有一百辆。樗里疾绰号“智囊”，是秦国最有谋略的将军之一，此番前来，别有用心。倘若西周王城无所戒备，他便可以顺手牵羊把西周给灭了，把九鼎扛回秦国。

周赧王岂能不知狼子野心，怎么办呢？他思前想后，想出了一条妙计。周天子派人前往欢迎樗里疾的到来，以保护秦使为借口，安排一队持戈的士兵走在秦国车队前面，又安排一队强弩手，走在秦国车队后面。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樗里疾想颠覆周政权可不太容易。不过，周政权之所以逃过一劫，乃是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秦武王与手下勇士比赛扛鼎时，发生意外，腿骨断裂而死。

秦武王死后，秦国诸公子为争夺权力而爆发内战，自然无暇顾及周室。周赧王长长喘了一口气，拭去额上的汗滴，又可以苟活几年了。

外患侥幸避开，内乱却躲不过。

自从春秋以来，周室的内乱已经爆发多次。尽管周室已经形同小诸侯，然而，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斗争，哪怕是个小小的鸡窝。自从周室分裂为西周、东周后，双方互相攻讦。公元前300年，东、西周爆发战争。东周力量稍强，西周抵挡不住，只得向韩国求援。韩国遂发兵救援西周，战争形势很快发生逆转，东周节节败退，不得不请求韩国停止军事行动。

就在两周热衷于窝里斗的同时，天下形势日益明朗化。

秦国在春秋时代无所为，原因是受晋国的压制。战国时期晋国一分为三，分裂后的三晋与秦血战百年，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秦人越战越勇，向东扩张之势已是不可阻挡。秦武王意外身死，令东方诸国稍稍有喘息之机，随着秦昭王上台与内乱的结束，秦国又开始了新一轮

的扩张。

秦武王死后十五年（公元前293年），夺取两周之地再次摆上秦国的议事日程。该年，秦以向寿为将，挥师东进，进攻东周。唇亡齿寒，魏、韩两国联合起来，干预秦国的军事行动。魏韩两国集结二十四万军队，开赴前线。秦军获悉魏、韩参战的消息后，从东周撤退至伊阙。秦国宰相魏冉果断起用白起为将，与魏、韩联军决一死战。伊阙之战，白起大放光芒，魏、韩联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

战神白起得胜不饶人，转而把刀锋对准西周。魏、韩的精兵猛将都抵挡不了秦军，周王室能独自抗击秦师吗？为了拯救王室于危急之中，只能寻求外援，此时唯一能遏制秦国的国家，只有赵国。赵国经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变革，一跃成为二号强国。可惜赵武灵王意外死于政变，国家大权落入权臣李兑之手。

周报王派大夫周最动身前往赵国求援，他向李兑分析：秦国所顾忌的只有赵国，倘若赵国出面调停，秦国担心赵国参战，势必要放弃攻打西周。赵国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坐收安定周室之功，到时必定在诸侯中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兑怦然心动，遂出面警告秦国，要求他们退出周室地盘。由于秦军刚刚在伊阙苦战一场，又颇惮忌赵国之实力，故而不得不接受赵国的调解，明智地从西周撤军。就这样，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周王室，又一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王一多，未免显得不值钱。

秦昭王已经不满足于王号，为了彰显秦国凌驾于众国之上，他捡起夏商时代的“帝”号。其实，在夏商时代，帝与王并无不同，都是天

子的代名词。只是如今“王”的含金量太低，只有“帝”的尊号才能显示出与众不同。此时秦国虽说是最强大的国家，毕竟还没强大到把所有国家打趴下，秦昭王对称帝尚信心不足，只是自称“西帝”，把“东帝”的头衔让给齐国。然而，这种文字游戏实在没有实际意义，故而几个月后，齐、秦两国都撤销帝号。

有野心的绝不止秦一国，齐国正筹划着一个规模空前的军事冒险计划。公元前286年，齐国发动灭宋之战，一举吞并实力仅次七雄的宋国。此役震动天下，鲁、卫、邹等小国无一例外向齐国称臣。齐湣王乘机席卷淮河，从楚国那儿夺走了淮北之地，击破淮河下游之淮夷，拓地七百里。在极短的时间内，齐国的土地几乎翻了一倍。齐湣王壮志凌云，打算一鼓作气吞并两周（西周、东周），自立为天子。

看到没有，周王室就是一群饿狼嘴边的肉罢了。

齐湣王想当天子？呸——各诸侯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很快，燕、赵、魏、韩、秦五个国家联合起来，尽管这五个国家互有矛盾，但在共同对付齐国这一问题上却坚定不移。公元前284年，五国展开联合军事行动，在燕国上将军乐毅的统领下，齐国几遭灭顶之灾，不可一世的齐湣王只当了半截霸主，死于非命。

风雨飘摇中的周王室又一次幸运地避免过早出局。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只要列国纷争还在，周王室总还能挤出一小块儿生存空间。九座象征权力的大鼎总是有人窥视，窥视的人多了，反倒成了一种平衡力量。周王室依靠这种平衡力量，在战国七雄的七颗鸡蛋上小心翼翼地行走。

随着齐国的衰落，华夏格局已经一览无余了：秦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强国，同出一源的赵国紧随其后，其余五个国家，只有当看客的份儿了。秦、赵的平衡若是打破，天下归一的趋势就不可逆转了。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

公元前262年，战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长平战役打响。这是秦与赵两国的总决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万，这是赌两国命运的大决战。三年血战，秦军最终棋高一着，战神白起再次上演冷酷无情的杀戮机器角色，赵国最精锐的四十万军队葬送于长平。此役决定了历史的未来走向，从此，秦军在这个世界上再无对手。

新的统治者呼之欲出，旧的统治者的末日之门已昭然若揭。

长平之战结束后六年（公元前256年），秦国以雷霆万钧之势，再掀战争狂潮，先攻韩国，斩首四万，再攻赵国，斩首九万。东方诸侯们在秦国人滴血的屠刀下惊恐万状，唯一能保命的路只有一条：合纵抗秦。

在参加合纵运动的诸国中，看到了西周君的影子。尽管西周的力量那么弱小，西周君仍然想着有一分光，就发一分热。只是他没料到，这分光、这分热，最终把他烤死了。西周军队跟在诸国屁股后面，挺进到伊阙，阻止秦军继续东进。

秦昭王愤怒地发现，小小的西周君怎么胆敢攻击秦国呢，难道以为我秦国的铁拳力道不够重、不够沉吗？战国时代的周王室从来未能拥有实际的权威，春秋时代的“尊王”思想已经荡然无存。甭说秦国，就是其他中小诸侯，也不把周王室放在眼中。当战国进入尾声时，周王室的命运早就注定了。秦国吞并二周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秦武王时，那位尚武君王便幻想着“车通三川，以窥周室”，如今西周君却不自量力，武力拒秦，这只能加速周王室的覆灭。

很快，西周君就明白什么叫“以鸡蛋碰石头”了。秦就是石头，西周就是鸡蛋。秦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捣西周，西周一弹丸之地，如何

抵挡？西周君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只能亲自前往秦国请降，献上三十六座城邑以及三万人口。仅仅拥有三万人口的西周，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秦国吞并了。秦昭王放逐了西周君，这位西周领主最后郁郁而终。

西周完蛋了，末代天子周赧王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自周赧王登基以来，就把都城迁往西周王城。他在位时间很长，总计有五十九年，可是终其一生，只是一个窝囊天子。周赧王不用说号令天下，就是在西周这一小块地盘里，也没有实权，仅仅是依靠西周君才得以勉强生存。这位周天子不仅没有权，也没有钱。据说他曾向别人借钱没还，结果债主追上门，天子为逃债躲在王宫内台。这件事成为一时的笑柄，后来人们把这座台称为“逃债台”。秦灭西周后，老朽的周赧王也一命呜呼，象征周室权力的九鼎落入秦人之手。

西周灭亡了，西周的百姓不愿意成为秦国的臣民，纷纷逃到东周。此时周赧王已死，东周君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不敢把王冠戴在头顶。从此之后，再无周天子，周王朝实际上也宣告结束。

唇亡齿寒，西周被秦国吞并后，东周君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自保，他只能联合东方诸侯对抗秦国。事实证明东方诸侯联盟向来是松散的，合纵同盟未能挽救东周的命运。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遣宰相吕不韦率军入侵东周。东周的命运与西周如出一辙，在秦军的打击下，很快瓦解了。东周君被放逐到一个叫阳人聚的地方，东周灭亡。

两周先后亡于秦国之手，这也宣告了周朝八百年历史的彻底结束。

其实，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从骊山之变始，曾号令天下的周王室就形同虚设，周王只是名义上的天子，在霸主们的保护下，象征性地存在着。及至战国，在“齐魏相王”及“五国相王”后，重要的诸侯全部自封为王。从这个时候开始，诸侯已经不需要“周王”这块招牌

了，周王室地位更是江河日下，灭亡只是迟早的问题。

长期以来，窥视周室的人不在少数，大家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并不是因为周王室有什么实力，而是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吞并周室，势必要成为天下公敌，倘若一个国家还没有达到一枝独秀、雄视天下的程度，那最好还是别打周室的算盘。故而以楚庄王之桀骜，欲窥鼎而不可得；以齐湣王之嚣张，幻想吞并二周，最终落得个国破身亡的下场。秦国直到天下无敌、笑傲江湖之时，才把残败的周室一口吞下，把象征天下权力的九鼎夺走。

一扇青铜大门缓缓关闭时间隧道的进口，一个曾经伟大的王朝永远被抛进历史的坟墓。人有生老病死，王朝也有兴盛衰亡。在东周灭亡二十八年后，秦国一统中国，结束了漫长的诸侯争战时代。

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这是历史的新陈代谢！

夏商周大事年表

前27世纪 黄帝、炎帝阪泉之战；黄帝、蚩尤涿鹿之战；炎黄文明之开始

前26—前24世纪 少昊、颛顼、帝喾时代

前23—前22世纪 帝尧、帝舜时代，一说尧禅让予舜，一说尧为舜所囚；大禹治水；一说舜让位于禹，一说舜为禹所放逐

前21世纪 夏启与伯益争夺王位，一说伯益让位于启，夏朝由是开端；夏启灭有扈氏

前20世纪 夏帝太康失位，后羿独揽大权；寒浞政变，杀后羿；寒浞杀夏帝后相，后相妻逃走，生子少康

前19世纪 少康以女谍女艾刺杀寒浞，灭寒浞，重立夏朝，史称“少康中兴”

前17世纪 夏帝孔甲好方术鬼神，诸侯多叛，夏国势渐衰

前16世纪 末代帝王夏桀无道；商汤十一征灭夏；伊尹流放太甲，一说太甲三年悔过，伊尹迎回之；一说伊尹为太甲为杀

前15世纪 商一度中衰，至商王太戊时复兴

前14世纪 商二度中衰，至商王祖乙二度复兴

前13世纪 盘庚迁都于殷，商朝曾五次迁都，此为最后之迁都。武丁大帝振兴殷室，以傅说为相，殷国大治；武丁征鬼方，三年克之；武丁南伐楚，东征夷，西击羌，此殷商武功之盛之时代

前12世纪 古公亶父迁民于岐山，岐周兴起；季历七伐戎狄，周崛起为军事之强邦；姬昌为西伯

前11世纪 商纣暴政，杀比干、囚西伯；西伯得姜尚辅佐，开疆拓地，奠定灭商之基础；周武王灭商，杀纣王；武王死，周公摄政，平管、蔡之乱；周成王、周康王尊先王之教，天下安宁，史称“成康之治”

前10世纪 周昭王南征荆楚，于汉水为荆人所暗算，舟沉而死；周穆王征犬戎伐徐，开疆拓土；吕侯作《吕刑》

前9世纪 周懿王时，王室衰微。

前841年 周厉王无道，国人暴动，周、召二公行政，称“共和”；自该年始，中国历史始有准确之纪年

前828年 周厉王死，周宣王继位，法文、武、成、康之制度

前823年 周宣王伐玁狁

前822年 周伐西戎、淮夷、徐方，国势复振，号为中兴

前789年 周宣王伐姜氏之戎，周军大败，尽丧南国之师

前782年 周宣王卒，周幽王立

前771年 幽王烽火戏诸侯；犬戎破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

前770年 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

前707年 周、郑繻葛之战，周军大败，周桓王负伤，王室颜面扫地

- 前675年 子颓政变，驱逐周惠王，自立为王
- 前673年 郑厉公伐子颓，周惠王复国
- 前667年 周惠王以齐桓公为侯伯，齐桓公尊王
- 前636年 王子带叛乱，驱周襄王
- 前635年 晋文公勤王，杀王子带，周襄王复辟
- 前606年 楚庄王兵抵洛水，窥视周之九鼎
- 前520年 王子朝与周悼王争位，周之内乱前后十数年
- 前502年 周之内乱平定
- 前367年 周室分裂为西周、东周
- 前256年 西周灭亡，末代周王周赧王卒
- 前249年 东周灭亡

姜狼·作品 | 李学勤·总顾问

历史上最权威的断代史·中华民族的记忆坐标
快乐接受中国史知识·全面揭开历史中国真相

快乐接受中国史知识·全面揭开历史中国真相



中国史学史上孙后代的传世之书
打造重印、再版率最高的历史书

打造重印、再版率最高的历史书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春秋原来是这样

姜 狼 作品

(前770—前476)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录

序

- 一 夏商周以来的点滴故事
- 二 西周之末，春秋之始
- 三 郑庄公和母亲武姜的恩怨情仇
- 四 郑庄公和东周王室的扯皮大战
- 五 石碏“大义灭亲”与祁奚的“举贤不避亲仇”
- 六 齐国文姜乱伦杀夫事件始末
- 七 一个西瓜引发的血案：齐国宫变
- 八 千古一相说管仲（上）
- 九 千古一相说管仲（中）
- 十 千古一相说管仲（下）
- 十一 齐桓公的贤臣们
- 十二 齐桓公的不世霸业
- 十三 性格决定命运：齐桓公的家庭悲剧
- 十四 仁者亦有敌：宋襄公的悲喜剧
- 十五 春秋小霸楚成王
- 十六 小三转正：曲沃代晋事件
- 十七 晋国内乱始末
- 十八 晋国兄弟之乱
- 十九 晋惠公的悲剧
- 二〇 晋文公周游列国（上）
- 二一 晋文公周游列国（下）
- 二二 龙战城濮：春秋争霸的巅峰之战
- 二三 秦穆公：拉开统一大幕第一人
- 二四 一鸣惊人楚庄王
- 二五 晋楚邲之战

- 二六 子产和晏婴：春秋两名相
- 二七 晋国执政赵盾
- 二八 赵氏孤儿真相
- 二九 春秋两兵圣之田穰苴和《司马法》
- 三〇 春秋两兵圣之孙武和《孙子兵法》
- 三一 吴楚柏举之战
- 三二 伍子胥复仇记
- 三三 春秋刺客列传
- 三四 勾践：千古第一忍者术
- 三五 聪明的范蠡和不聪明的文种
- 三六 季札和豫让
- 三七 孔子闪亮登场
- 三八 孔子绝世传奇（上）
- 三九 孔子绝世传奇（中）
- 四〇 孔子绝世传奇（下）
- 四一 孔子的七十二门徒
- 四二 侠儒子路
- 四三 千古一圣说老子（上）
- 四四 千古一圣说老子（下）
- 四五 春秋名嘴逸事
- 四六 三家分晋始末
- 四七 宫廷八卦：谁的绿帽子在飞
- 四八 春秋名女
- 四九 《诗经》的魅力（上）
- 五〇 《诗经》的魅力（下）
- [返回总目录](#)

序

在中国古代的文明发展史上，春秋战国是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特殊时代，就像说欧洲文明史不可能绕开古希腊一样。之所以说春秋战国时代特殊，是因为这个伟大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孕育期，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体系，就是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

成语所谓“釜底抽薪”，如果将春秋战国从历史上抹去，就好像大树被刨断了根，中华文明也就无从谈起。无法想象一个忘记管子、孔子、老子、孙子、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的中国文明史会是个什么样子。

无论是思想史，还是政治史，或者是经济史、文学史、军事史，哪怕是耻辱血泪史，都是历史有机结合的重要部分，割裂哪部分，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历史可以被批判，甚至可以被否定，但不能被割裂，更不能忘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注定没有未来。

都说春秋战国是个伟大的时代，那么春秋战国的伟大到底体现哪个层面？简单地说，主要体现在思想层面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界最大的特点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井喷而出，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

不过从政治角度或历史角度来说，春秋和战国又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春秋和战国的时代划分，比较流行的有以下几种划分法：

一、春秋从周平王姬宜臼东迁雒邑的那一年（即前770）开始，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战国开始。公元前403年这也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代，这个时间划分比较主流。

二、孔子修订《春秋》时的起始年代，即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结束，此后进入战国时代。

三、司马迁认为春秋始于公元前770年，止于周元王姬仁元年（前475），此后进入战国时代。

四、从周平王姬宜臼东迁雒邑（前770）开始，至周敬王姬勾崩的那一年（前476），春秋结束，此后进入战国时代。

五、《左传》始记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结束，此后进入战国时代。

六、从公元前770年开始，至齐国大夫田恒发动政变杀齐简公姜壬（即田氏代齐事件）的这一年，即公元前481年为止，此后进入战国时代。

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定为春秋的起点，这一点基本没有争议。但春秋和战国之间的年代起点向来是比较混乱的，争议也比较大。为了行文方便，决定另辟蹊径，以晋国六卿之一的智伯被晋国的另外三卿赵氏、韩氏、魏氏联合消灭的那一年，也就是周贞定王姬介十六年（前453）为春秋的年代下限。

史学界公认“三家分晋”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态向封建制社会形态转型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这一点，争议不是很多。不过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为春秋的年代下限，似乎略晚了些。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一般将铁器大规模取代青铜器作为春秋与战国的起始点，但这种划分并不严密，因为无法确定铁器大规模使用的具体年限。所以还是用政治史的角度来划分春秋与战国的起始点比较稳妥。

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作为春秋的结束年限，倒是一种比较方便简捷的划分法。但问题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只是走的一

个法律形式而已，实际上早在五十年前，赵氏、韩氏、魏氏三卿就已经淘汰掉了范氏、中行氏、智氏三卿，三家瓜分了晋国政权，魏、韩、赵三足鼎立的局面早已形成。

如果以“三家分晋”事件结束春秋时代，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三国曹魏正式开始于公元220年，而严格意义上来说曹魏始祖曹操应该算是东汉人。可是如果不将曹操算成三国人物，那整个三国历史都将全部改写，谁会接受一个没有曹操、吕布、袁绍、孙策、周瑜、关羽、鲁肃的三国呢？

曹操正式建立曹氏政权，是在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接受荀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迎接汉献帝刘协入许昌。也就是说，曹魏政权早在曹丕正式建立魏国前二十五年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综合来看，以智伯之死（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的年代下限，这个观点并没有超出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战国开始的时间概念，只是将这个时间概念朝前推进了52年。

其实从法统层面上来看，春秋和战国只是东周王朝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而已。在最正统的中国古代帝王世系表上，只有东周25位名不副实的周天子。当然严格来说，东周作为一个真正意义的王朝是不存在的，就像名存实亡的汉献帝刘协、魏元帝曹奂、晋安帝司马德宗、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一样，他们留给历史的，只有一段段莫名的悲伤和一声声无言的叹息，以及一堆堆华丽的历史碎片，东周也是如此。

史学界通常将东周和之前的西周合称为周朝，西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纪年的王朝，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而西周之前的夏朝和商朝给后人的感觉总像是在云山雾海里不停地若隐若现，看不真切。

元朝人郝经将夏、商、周列为前三代，汉、唐、宋列为后三代。古人提到周朝，一般是将西周和东周一起算进来的，最有名的一句，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借名士水镜先生的嘴吹捧诸葛亮：“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

周朝的八百年是从哪儿算到哪儿的呢？以前在提到西周建国的年代时，只是笼统地说始建于公元前11世纪，现在有了具体的年代，就是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灭商纣王的那一年。到了公元前771年，也就是周幽王姬宫涅十一年，申侯联合戎人攻破西周国都镐京，杀掉周幽王，西周就挂掉了。

东周就比较好算了，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开始，至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姬延被秦昭襄王灭掉结束。西周和东周合起来计算，国祚共有791年。如果要算上周文王和周武王（灭商之前）在关中地区的统治时间，姬姓建立的周朝在791年国祚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上近七十年，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八百年之姬周。

凡事有果必有因，要讲春秋，就必然从西周开始讲起。如果西周不是以超级荒谬、荒唐、荒诞的方式灭亡，周幽王平安坐天下，那也许历史上就不会出现春秋战国了。

我们这一代人有幸处在旧历史阶段的终点和新历史阶段的起点，曾经那一段段金戈铁马、庙堂谋略、儿女情长的故事，都被我们收揽眼底。“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历史是一个大课堂，我们能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站在浩荡奔流的历史长河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渺小，我们应该满怀敬畏地去回望历史。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也有许多角度和侧面，供我们切入，去寻找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感动。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那一段段精彩的片断，总会悄悄地走进我们的内心深处，继续上演他们的传奇。

一 夏商周以来的点滴故事

在中国的演义小说史上，商周之际的历史题材库比起东汉三国、隋唐之际毫不逊色，写东汉三国的野史小说有《三国演义》，写隋唐的野史小说有《说唐》。写商周兴亡的是哪部野史小说呢？说出来大名顶破天——《封神演义》。

就拿民间的传播度和知名度来说，《封神演义》可能要略逊于《三国演义》，但应该强过《说唐》，以及《明英烈》等演义小说。《封神演义》捧红的历史人物数不胜数：一代暴君商纣王、一代妖后妲己、崇侯虎、黄飞虎、两代贤君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及在民间的智慧之神姜子牙，他直钩钓鱼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管读没读过《史记·齐太公世家》，都应该知道这个超级有名的历史典故。

最有意思的是《封神演义》不仅捧红了真实的历史人物，甚至连太上老君、太白金星、元始天尊，还有什么通天教主、南极仙翁，昆仑十二仙，以及女娲娘娘，这些神话人物都跟着出尽了风头。

作为唯物论者，我们是不相信天上有这些神仙鬼怪的，天上除了看不到尽头的臭氧层子，什么也没有。而且即使是姜子牙这样的真实历史人物，也被《封神演义》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神话色彩，比罗贯中神话诸葛亮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那段历史离现在太过遥远，再加上《封神演义》的添油加醋，其本来的历史面貌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在这里有必要将商亡周

兴这段历史简单地讲一讲，正本清源，然后进入春秋正文。

如果单纯地从文字上的历史来看，中国公认的第一个出现等级制度的王朝是夏朝。夏朝的建立者是启，姓姁，姁启的父亲就是那位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在启建立夏朝之前，中国远古社会在权力传承上采取的是“推选制”，属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形态。

夏朝之前的国家形态其实是许多个不同的部落组成的联盟，联盟的大头领去世后，由各个部落公推公选一位大头领，尧、舜、禹的大头领地位都是这样产生的。尧、舜、禹其实都是后史的简称，真正的称谓是帝尧、帝舜、帝禹。按照这个制度，大禹死后，大头领的位置应该是东夷首领伯益。不要小看这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伯益，相传著名的《山海经》就是伯益写的。

但帝禹的儿子启是个野心家，他不甘心父亲大禹的江山被不相干的伯益捞走，发动了政变，联合诸侯搞掉了伯益，自己做了大头领，正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随后，姁启又灭掉了不服他统治的有扈氏，“天下咸朝”，各个部落见启如此彪悍，不敢惹这位爷，都俯首称臣。

从姁启开始，远古的“禅让制”被家族传承制完全取代，龙的儿子永远是龙，老鼠的儿子永远是老鼠，等级制度的根本其实就是权力的家族传承制。夏朝的存在时间相当长，大约从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将近五百年。

不算大禹的话，夏朝共有十七位天子，其中最具有知名度的那一位不是启，也不是启的儿子太康，以及那位喜欢养龙的孔甲，而是夏朝最后一位天子，也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暴君桀。桀和后世商朝的暴君纣，成为历代暴君的代名词，谁要是以暴力治天下，必被人骂成“桀纣再世”。

自从孔甲以来，夏朝的统治力就被明显削弱了，诸侯武装反叛事件不断发生。到了桀统治的时代，因为这位暴君宠幸妹喜，“不务德而武伤百姓”，被愤怒的各阶层联合起来打掉了，迎立商侯成汤，建立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殷商王朝。

商朝之所以也称为殷朝或殷商，是因为商朝第二十位天子盘庚在位时，将商朝国都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所以史称殷商。

相对于历史实物缺乏的夏朝来说，商朝出土的遗址文物相当丰富，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司母戊大方鼎，以及曾经震撼世界的殷墟甲骨文，都证明是商朝的文物遗存。如果说夏朝是奴隶制社会的磨合期，那商朝就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期，商朝的综合国力非常强大，是当时举世公认的东方霸主。

关于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定义，史学界向来是有争议的。被称为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都有平民，而夏、商、周之后的朝代，一直到清朝，都有奴隶。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其社会形态的形状都呈哑铃形，即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等级格局。

奴隶社会虽然有平民，但当时社会的主流形态是奴隶主与奴隶的阶级存在，一般来说，奴隶制社会的定义是在生产活动中大规模使用奴隶。而战国以后的封建社会虽然也有奴隶，但不是社会的主流形态，大多数人都是平民身份。从这个角度来讲，奴隶社会确实是存在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定义，争议更大，“封建”的本意是夏、商、周的“封疆土建诸侯”，就是权力分封制。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从夏商周到汉武帝下“推恩令”，这段历史都属于封建社会。从经济角度来讲，夏商周的封建领主制（有政治权和经济权）和秦汉之后的封建地主制（只有经济权），在经济权力的垄断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相对于云山雾海里的夏朝帝王来说，商朝有许多为后人所熟悉的

帝王，如灭夏的商汤、被废的太甲、迁都的盘庚、中兴的武丁，以及那位著名暴君——纣王。

商朝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辅佐商汤灭夏的贤相伊尹、辅佐武丁中兴的贤相傅说、商亡后“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除了这一堆男性外，商朝还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女人，一个是武丁的老婆，号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政治家、军事家的妇好，另一位就是纣王的妃子，“史上第一妖女”妲己，她之前的妹喜和她之后的褒姒的知名度都不如妲己。

“纣王”其实只是后人对他的泛称，他真正的名字叫子辛，“纣”是后人给他安的谥号，是个恶谥，和隋炀帝杨广的“炀”字谥号是一样的。商纣和杨广有很多相似之处，商纣和杨广都不是长子，他们都是文武全才，都是历史上的超级败家子，本来固若金汤的江山，没几年就被他们给折腾光了。

商纣和杨广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好大喜功、狂妄自大、总以为论文治武功，老子才是天下第一。明君治国，讲究的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虽然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但首先你要会烹饪。如果没这门手艺，别说小鲜了，就是条小虾米，也准给煮烂了。

要说商纣的治国能力还是有的，杨广也一样，只要他们端正态度，什么样的国家他们治理不好？最关键的问题恰恰就是他们的态度不端正，将一己私利置于天下万民之上。

虽然世袭制是家天下的核心价值所在，但百姓和私权之间有一个利益平衡点，只有百姓能吃上饭，活得有尊严，自己的私权才能稳如泰山。掌握不好这个点，军事力量再强大的王朝，也会分崩离析。当一个王朝触犯了社会上大多数阶层的利益时，统治基础必然瓦解。

不可否认商纣的私德很差，不过私德和能力之间往往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历史上的暴君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暴君都是亡国的。

商纣也贪酒好色，最有名的事件就是他纠集一大帮淫男浪女，在酒池子边脱光衣服，集体“练兵”。这是私德范畴，本来不算什么大事。但问题的关键不在私德差上面，而在于商纣打坏了商朝与统治内部其他利益集团（以及百姓）之间的利益平衡。

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地位，只要惹纣王不高兴了，商纣就将其抓来施以酷刑，杀人无数。商纣崇尚暴力治国术，掠夺别人的利益存在空间，必然会导致各阶层的群体反抗。

这时在商朝统治核心区域的西边，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关中附近，出现了一个诸侯国，就是西周。关于西周的起源，根据《史记》记载，周朝始祖是黄帝曾孙帝喾（即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一）的儿子后裔。在中国古代的法统传承上，凡是能和黄帝扯上亲戚关系的，都属于“根红苗正”的正统，当然都是字面意义上的。

周族早期一直在关中地区活动，到了商纣统治时期，周族的势力日益壮大，尤其是公季时代，周族在诸侯及百姓中的威望高涨，“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死后，儿子姬昌继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文王，不过当时的封号是西伯，时人称为西伯昌。

姬昌在历史上的受尊崇程度和汉文帝差不多，可以说没有姬昌，就没有日后威震天下的周朝。虽然这时的姬周地盘并不大，但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

到了姬昌统治晚期，周国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商朝，但姬昌似乎从来没有以武力灭商的计划。从法统角度来说，周国再强大，也只是商朝治下的一个方伯，与商纣有君臣名分。所以姬昌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在名义上对商纣称臣，至于推翻商朝的历史任务，准备交给儿子姬发。

姬昌在位时间很长，大约有五十年，公元前1056年，姬昌驾崩，

据说他活了九十六岁。商朝的历史坟墓，姬昌都给儿子姬发挖好了，周武王姬发唯一要做的，就是将商纣拽进这座坟墓，然后砌上最后一块砖头。

不过姬发做事比较稳重，他并没有急于伐商，而是在等待最合适的机会。虽然商纣残暴荒淫，得罪了周边方伯，但商朝内部的统治基础还很牢固，因为商纣身边还有一位著名的忠臣，就是太师比干。比干不死，姬发伐商就没有把握，所以姬发在和比干耗时间，看谁死在前头。

果然，两年后，比干因为劝商纣改邪归正，商纣非常恼火，把比干给杀掉了。比干是商朝统治集团健康力量的象征，比干被杀，商纣的名声就彻底臭了，这时的商朝只剩下一副华丽的空壳，是时候动手了。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姬发率甲士四万五千人东向伐纣，此役对姬发来说是命运大决战，一旦失败，九族俱毁。

残暴无比的商纣王也知道这场战役的重要性，他和姬发必将有一个下地狱。不过此时商朝的军事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商纣王抓耳挠腮，勉强纠合了七十万（一说是十七万）军队在牧野抵抗周军，企图欺骗历史，蒙混过关。

战争讲究的是兵贵精不贵众，更何况商纣派来的多是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奴隶百姓，哪里是周国正规军的对手？而且商朝的奴隶百姓早就对商纣的残暴无道恨之入骨，正愁没机会反戈一击呢，姬发来的正是时候。商军大多数人在阵上易帜倒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天上掉下来一块大肉饼，姬发当然笑纳。气势如虹的周朝军队迅速推进到了商朝国都朝歌城下，商纣被逼上了绝境，他没有选择投降，而是“悲壮”地抱着珠玉宝贝，在鹿台上自焚。冲天的火光无情向

历史宣告殷商王朝统治的彻底终结。

其实这场牧野之战在军事上没什么可讨论的，牧野之战的历史价值在政治层面，如果商纣能善待国人，至少不用那么极端的方式来对待国人，谁会在阵前倒戈？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作为最高统治者，一定要给阶级金字塔最底层的广大草根一条活路，至少要让草根们看到希望。统治者如果不顾百姓死活，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草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到底。

历史上有句名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商朝亡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新王朝的初期都吸取了前朝亡国的历史教训，在政治上相对都是比较开明的。周朝统治集团取代商朝统治天下后，立刻“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就是给贫苦的底层百姓生路，收买人心，稳定局势。

除了收买人心之外，还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的统治体系，巩固姬周天下。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周朝创造性地实行了“封建制”，所谓封建制，其实就是诸侯分封制，周朝统治集团将自己的宗族子弟和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用生理血缘关系和政治血缘关系，以“众星拱月”的政治模式来维持周朝的统治。

周朝号称分封了八百个诸侯，但因为周朝的地皮有限，所以各诸侯国的疆域大小不一，大的如晋、秦、楚、齐，踞城数十，拥甲数万。中等的卫、鲁、宋、吴、越，而有些小的诸侯国甚至只有现在乡镇大小。

这些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封地里可以为所欲为，周天子也懒得管他们，但事先都给诸侯们划了一条政治红线：不能造反，要听话。

周朝推翻商朝统治后的第一个天子就是周武王姬发，不过姬发在位时间很短，只有五年。姬发死后，他的弟弟周公姬旦辅佐年少的周

成王，开创了西周王朝近二百年的盛世。

西周如果从周武王开始算，共有十二位周天子。对后人来说，最熟悉的周王无非就是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穆王姬满，再加上两个活宝周厉王姬胡和他的孙子周幽王姬宫涅。周穆王之所以出名，因为他有一段传奇的“西游记”经历，传说姬满到西天极乐世界，并在瑶池见到了王母娘娘……

至于周厉王姬胡，也是个浑球儿，在位期间，他胡作非为，却在国内实行“钳口”政策，不让百姓说话，人们只能“道路以目”，引起众怒。大臣召公为了劝姬胡改邪归正，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如果连话都不让人说，那君子们就只有动手，来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

姬胡是个“良言劝不了的该死鬼”，依旧我行我素，最终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愤怒的百姓将姬胡赶跑了。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纪年的开始，史称共和元年。

姬胡被赶跑后，周朝并没有立太子姬静为天子，而是由周公和召公等贵族联合执政。直到十五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27年，被废黜的周厉王姬胡病死，太子姬静才正式继位，即周宣王。

姬静是个好大喜功的君主，在他在位的四十六年间，经常发动对外战争，对威胁周朝安全的狄、戎和淮夷等部落进行大规模围剿，并征服江淮地区强大的徐国。一时间，万方称臣，周朝的武功之盛，达到极点。

历史反复证明，对外扩张的同时不修内政，所谓的武功只是昙花一现，大风一吹就倒。后世的先不说，周宣王之前的商纣就是这么垮掉的。到了周宣王晚期，周朝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如果周朝能出一位贤君，也许还能力挽狂澜，苟延残喘几十年。可继周宣王上位的偏偏是个超级昏君，时也，命也！

二 西周之末，春秋之始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驾崩，继位的是太子姬宫涅，就是著名的昏君周幽王。

不知道周宣王有多少个儿子，不过周朝是嫡子继承制，讲的是“子以母贵”，姬宫涅不仅有一个好老爹，更有一个好老妈，所以姬宫涅没有任何悬念地当上了至尊无上的周天子。

由于西周距离现在时间过于久远，当时留下的史料极少，姬宫涅早期的活动于史无载，只知道他生于周宣王三十三年（前795），生母不详。

按照中国传统史家书史的惯例，开国帝王出生时，都会出现祥瑞，比如冲天的火光，乌龟兔子大麻雀们蜂拥上街庆贺。如果是末代帝王，他们出生前后总会莫名其妙地跳出几个怪兽，向人们预告剧情。

周幽王作为末代昏君，自然少不了这样的“待遇”。根据东晋人干宝《搜神记》的记载，周幽王出生的那一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突然有一匹马做了“变性手术”，一抹马脸，就变成了一头风骚妩媚的狐狸。

物种变异不太可能，但周幽王即位初期，周朝统治区域内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自然灾害，就是周幽王二年（前780），在今陕西关中一带发生的那场大地震。这场大地震给关中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关中三大河流——泾河、渭河、洛河的水位直线下降，几乎都能看到

河床。

就在关中大地震的同年，周朝的发源地岐山突然无故自崩，一连串的自然灾害给周朝统治高层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周朝大夫伯阳父精通阴阳八卦，他从这个角度对地震及山崩在政治上大做文章，伯阳父神秘秘地告诉身边人说：“天地阴阳皆有序，失其序则天下乱，民陷水火。现在三川枯竭，岐山崩摧，此阳气失序而阴气上升之故。三川无水，则民无以饮用，地无以浇灌，民必由此乏财，民生艰，必有乱作。昔日夏亡时，伊洛之水枯竭；商亡时，黄河之水枯竭。如今三川无水，不出十年，周朝必亡。”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伯阳父真有通晓古今的本事，果然在地震之后的第十年，周幽王很“配合”地把一座锦绣如画的大周朝搞得分崩离析。

伯阳父的这通感慨，后半段确实是实情。在任何时代，农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优质水源，西周的统治核心地区就在关中，现在关中几大河流都见了底，鱼虾们都躺在河床上晒太阳，西周的农业经济必然会遭受重创，百姓无粮，天下必乱。

伯阳父预言天下将乱时，姬宫涅只是当了两年的周天子，他的劣迹还没有来得及全面铺开，伯阳父怎么就知道姬宫涅将祸乱天下？当然，常言道：“三岁看老”，作为统治核心层的大臣，伯阳父在姬宫涅继位前就有机会接触他，所以从某些方面看透姬宫涅的恶劣人品完全是有可能的。

伯阳父的预感很准确，或者说伯阳父很幸运地猜对了骰子的大小，姬宫涅果然是个无道昏君，后世的秦二世嬴胡亥、北齐后主高纬、宋徽宗赵佶都是姬宫涅的徒子徒孙。

不过在这些亡国帝王中，有人是因为糊涂而亡，比如胡亥；有人因为残暴而亡，比如高纬；有人因为不务正业而亡，比如赵佶。但姬

宫涅亡国和他们都不一样，按传统史家的观点说，西周亡于“红颜祸水”。一个名叫褒姒的绝世美女，是西周亡国的头号罪人。

旧式史观有个很不好的传统，总是把一个政权的灭亡归罪于女人，动辄曰红颜亡国。这是典型的大男人主义，对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没有帝王宠爱女人，又怎么会有亡国惨祸？《国语·郑语》就指责周幽王“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但姬宫涅给褒姒当孝子贤孙，可不是褒姒逼他做的。

英明帝王之好色者亦非少见，魏武帝曹操、北齐神武帝高欢、唐太宗李世民都是有名的好色馋猫，可在他们治下的帝国如日中天，又当何解？

真正导致西周亡国的罪魁祸首，正是周幽王姬宫涅本人。不过从八卦的角度讲，谈到西周亡国，就不可能不讲远古时代的三大“红颜祸水”之一的褒姒，另外两个“红颜祸水”是著名的妹喜（夏桀宠之亡国）、妲己（商纣宠之亡国）。

褒姒是褒国人，褒国是西周时期罕见的与夏朝同姓的部落国家，位于现在陕西汉中附近。褒国和夏朝的关系，类似于另一个诸侯国——宋国与商朝的关系，属于遗民政权。在西周国势最强大的时期，褒国已经完全臣服于周朝的统治，就像南宋初建时，著名的“逃跑专家”赵构低眉顺眼地给女真人当侄子一样。

在姬宫涅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79年，褒国向周天子进献了一名绝世美女，算是褒国向周朝交的“保护费”。因为这个美女是褒国人，而褒国又姓姒，所以后世称其为褒姒。男人几乎没有不好女色的，面对如此绝色，姬宫涅的口水直流，当即就笑纳了如此厚礼。

此时周王朝的国势很像一千二百多年后的南朝陈，明显出现衰落的迹象，但整体实力还在，属于“百足之虫，死而未僵”。自姬宫涅和陈叔宝继位，两朝的国势开始不可逆转地向悬崖边滑去，与此同时，

在这两个昏君身边，各自出现了一位绝代美女，心甘情愿地替昏君丈夫背上了亡国的政治黑锅。

周幽王姬宫涅亡国和陈后主陈叔宝亡国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一、姬宫涅的父亲姬静和陈叔宝的父亲在军事上闹过很大的动静，东伐西讨、南征北战。

二、二人都是嫡出太子，最合法的王朝继承人。

三、二人是昏君，但都不是暴君。

四、姬宫涅和陈叔宝都有一个正妻，但都甩掉正妻，偏爱小老婆及她们的儿子。

五、姬宫涅和陈叔宝都废掉正妻所生之子的储君之位，改立小老婆生的儿子为太子。

六、他们的正妻娘家背景都非常显赫，都是当时的一流豪门。

陈叔宝废正妻黜嫡子，估计就是从姬宫涅那里取的歪经。姬宫涅自从得到了褒姒之后，不仅爱得魂飞魄散，连骨头都酥掉了，至于原来的正妻，姬宫涅已经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姬大王的王后姓申，是申国国君申侯的女儿。申国是西周王室的姻亲关系户，专门批发女儿嫁给周天子，周文王姬昌的祖母就是申国人。远的不说，周幽王的祖父，那位著名的昏君周厉王姬胡的王后也是申国人。

西周封建五等：公、侯、伯、子、男，春秋的楚国实力强大，但终归只是个子爵，而小小的申国却是侯爵，略低于鲁国，与齐国相等，可见申国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姬宫涅和申后的婚事，是周宣王姬静出于拉拢地方诸侯的政治考

虑给安排的，从一开始，姬宫涅就和申后不来电，只不过履行了夫妻间该有的一切手续，申后给薄情寡义的姬宫涅生下了一个王子，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姬宜臼。

姬宜臼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姬宫涅继位为周天子，在姬宜臼三岁之前，姬宫涅还给予他一定的父爱，但自从姬宫涅得到了沉渔落雁气死牛的褒姒后，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知道是在哪一年，姬宫涅最宠爱的小老婆褒姒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取名姬伯服（《左传》记为“伯盘”）。男人多是喜新厌旧的负心汉，疼爱小老婆生的儿子，姬宫涅也没有免这个俗。姬宫涅越看伯服越顺眼，再加上他对褒姒的爱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姬宫涅打算废掉申后和姬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姬伯服为太子。

陈叔宝敢想不敢做，以当时陈朝皇室的势力，根本无法撼动吴兴沈氏这棵大树。所以终陈叔宝的皇帝生涯，都没敢废掉皇后沈婺华，虽然张丽华所生的儿子陈琛当上了皇太子，但张丽华到死也只是个小老婆的名分。陈叔宝的段位远逊于姬宫涅，姬宫涅自恃国力强大，敢想敢做，根本没把老婆的娘家申国当盘菜。

在某年某月某日，薄情寡义的姬宫涅将发妻申后废黜出宫，姬宜臼也自然失去了太子位，跟着老妈回到了娘家申国，找申侯哭诉去了。申侯是个性烈如火的老头，看到女儿和外孙无端被废，申侯的老脸顿时挂不住了，因为这将影响到申国在诸侯国中的实际地位。只是周朝实力强大，申侯暂时还不便发作，但在心里记下了前女婿姬宫涅的这笔烂账。

老丈人报仇，十年不晚！

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姬宫涅如愿以偿地将褒姒和伯服扶正，成为名正言顺的女一号和未来的男一号。

虽然姬宫涅是货真价实的昏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褒姒的感情非常真挚，不掺一丝杂质，陈叔宝也是如此。为了讨褒姒的欢心，姬宫涅不惜和发妻嫡子决裂，冒着得罪申国等地方实力派的危险，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褒姒他所能给予的一切。

褒姒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自己侍奉的是天下身份最尊贵的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跟着这个大金主，褒姒不仅确保了自己一生的荣华富贵，还使用各种盘外招，替儿子姬伯服争来了太子位，将来周朝的天下就是伯服的，褒姒本人就是双料国母，褒姒的人生不可谓不成功。

但不知道为什么，褒姒已经挣来了她所能得到的一切，她却有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怪癖，成为姬宫涅心中最大的一块心病。原因很简单：自从褒姒来到宫里之后，无论姬宫涅用什么手段逗她，褒姒居然从来没有笑过！

姬宫涅无法理解，他几乎是把褒姒当老娘一样供着，享受人间最尊贵的生活，这小娘们为什么连个笑脸都不肯给他。这个问题纠结了姬宫涅很长时间，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褒姒开口一笑？姬宫涅每天茶饭不思，成天琢磨。

看到姬宫涅被褒姒不笑折磨得快不成人样了，西周史上著名的末代奸臣虢石父知道拍马屁上竿子的机会来了，精明过人的虢石父给幽王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虢石父的这个妙计，就是周朝史上著名典故“烽火戏诸侯”的由来。

烽火戏诸侯，严格来说，其实是“烽火戏诸‘猴’”。虢石父为了讨幽王的欢心，把在台下看热闹的地方诸侯们无端扯进来，诸侯们变成了一群猴子，在台上被姬宫涅当成猴子戏耍。

所谓“烽火”，实际上是指散建在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要道上的烽火台。自周宣王以来，周朝和关中附近的犬戎族经常大打出手，鸡

毛乱飞，关中地区岁无宁日。为了抵抗犬戎族对周王朝核心统治地区的军事进犯，周朝在各地兴建了许多烽火台，一旦发现犬戎武装进攻，就点燃烽火台上的柴木。冲天的大火迎风飘散，诸侯闻警，白日见烟，黑夜见火，知道周王有难，立刻率兵救驾勤王。

只要看到烽火台烟尘大起，诸侯就出兵勤王，这本是诸侯的分内事，并没有诸侯抱怨过。不过君子贵在诚信，只有受到犬戎军事侵犯时，周王才敢点燃烽火，平时谁敢拿自己的诚信开玩笑？

“狼来了”这个故事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讲的是一个道理：千万不要浪费自己的诚信储量！

人的诚信储量是有限的，做人一定要守诚信，以欺骗别人为生的，最终必将被命运所欺骗，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是铁律。不报及己身，必报及子孙！但是那个放羊的小孩子和周幽王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一个极小的目标，而以牺牲整体利益为代价，见过愚蠢的，没见过这么愚蠢的。

虽然《史记·周本纪》上并没有说“烽火戏诸侯”这个馊主意是虢石父出的，而说是姬宫涅本人想出的绝世妙计，虢石父只有建议权，没有拍板权。如果姬宫涅能分得清轻重缓急，也不会让虢石父之流的佞臣得逞。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先有昏君（有缝的蛋），后有佞臣（苍蝇），就是这个道理。

姬宫涅立刻让人蹕到各处烽火台上，嬉皮笑脸地点燃了柴火堆，然后他带着褒姒来到城墙上，等着耍“诸侯”的好戏。因为之前的周王在“燃烽”的问题上从来不弄虚作假，诚信度非常高，所以地方诸侯看到冲天的火光，不敢怠慢，立刻点齐兵马去镐京救驾。

远处烟尘大起，车马喧嚣，诸侯的军队以最快的速度冲刺，姬宫涅和褒姒在城墙上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到来。在离镐京不远处的时候，诸侯就已经发现有些不太对劲，往常犬戎来犯，镐京附近都是鸡飞狗

跳猫上吊，现在却异常安静，不符合常理啊。

诸侯揣着一肚子的疑问来到城下，拍拍身上的尘土，抖抖疲惫的精神，瞪着牛一般的大眼四处观察，犬戎在哪？

秋风吹过，一地鸡毛，诸侯变成了“诸猴”。

一阵阵粗鲁的骂娘声响彻镐京城外……

看到“诸猴”气急败坏，在城下吹胡子瞪眼，被姬宫涅强行拉到城头上的褒姒终于忍不住，仰天大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个游戏太有趣了。褒姒花一样的身躯不停地颤抖着，孝子贤孙姬宫涅见虢石父的妙计果然奏效，脸上顿时堆满了桃花状的笑容。难得有机会拍褒姒的马屁，姬大王跟着褒姒放肆地大笑。

看到天子和王后笑得前仰后合，城下的诸侯似乎察觉出他们被耍了，一个个怒气冲天。在城下等了大半天，也不见周天子出来给他们一个说法，这些倒霉的诸侯只好强忍着一肚皮的不快，打马回国。

虽然按礼数君尊臣卑，诸侯不敢强行找姬宫涅讨说法，但经过这么一折腾，周天子的威信在诸侯心中已经大打折扣。权力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统治者被统治者心中的威信指数，何况周朝中央朝廷和地方诸侯的权力从属关系是松散型的，诸侯只是把周天子当成实力最强的江湖老大，而不是可以主宰他们生死的主人。诸侯的实力如果单独和周朝相比，自然不成比例，如果这些被戏耍的诸侯联合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足以对抗周朝的力量。

作为一国之君，最忌讳的就是拿国家社稷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权力和威信是官场中人的吃饭家伙，没有人敢在这上面玩火。偏偏姬宫涅不知此中利害，他只管褒姒是否开心，并不在乎他这块周天子的金字招牌已经严重退色，更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一步步向他逼来。

褒姒笑完之后没多久，姬宫涅又故伎重施，再次点燃了烽火台的

柴火堆。在姬宫涅的想象中，那些彪乎乎的诸侯会马不停蹄地赶到镐京城下，接受周天子和周王后的再次戏耍。

结果秋风再次掠过，地上没有一根鸡毛，城下连个鬼影也没有。

《史记·周本纪》：“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姬宫涅本就不多的诚信储量终于消耗完了，这也意味着西周王朝在诸侯那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市场，威信处在濒临破产的边缘。诸侯已经达成默契，无论周天子发出什么指令，他们都集体拒绝。

周天子姬宫涅还在为诸侯不听他的号令而生气，但他忘记了在镐京不远的申国还有三个恨他入骨的人。申侯作为被废黜的申后的父亲，他无法容忍姬宫涅对女儿的背叛。

申侯对前女婿有了杀心，不仅是因为女儿被废，更重要的原因是姬宫涅昏庸无道，让申侯看到了除掉姬宫涅，立自己的外孙姬宜臼为王的希望。如果姬宜臼即周王位，申侯便可以以外戚身份执政。

凭申侯自己的力量还难以推翻姬宫涅，申侯一个人摘不了果子，那就叫来几个同样对果子垂涎三尺的围观者，比如缙国和犬戎人。虽然这场战争的发起者是申国，但实际上申国和缙国都是打酱油的。无论是《史记·周本纪》，还是《史记·郑世家》，都明确记载犬戎人才是真正的主力部队。

犬戎和西周久有过节，当年周穆王差点把犬戎一锅端掉，现在周朝危在旦夕，犬戎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周幽王十一年，即公元前771年，强悍的犬戎人怒吼着冲进了镐京。在得知犬戎人进攻的消息后，还在为褒姒不笑而愁眉苦脸的姬宫涅被逼得走投无路，幻想周边诸侯能勤王救驾。烽火台再次熊熊燃烧，但姬宫涅始终没有盼来一个救兵。

二百五十七年前，鹿台的冲天大火宣告一个时代的伟大终结。二百五十七年后，镐京附近的冲天大火再次宣告一个时代的伟大终结。唯一不同的是，商朝之亡，取而代之的是周朝更为稳固的统治，而西周之亡，则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春秋时代的大幕。

《史记·郑世家》：“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桓公就是周幽王的叔父郑桓公姬友，这位倒霉的国姓爷本来在郑国过得有滋有味，因为治政非常出色，被侄子姬宫涅调到京城做司徒。结果没做两年，姬友就遇到了犬戎之乱，命丧镐京。

至于“红颜祸水”褒姒，她的命运比张丽华略好一些，张丽华被隋朝重臣高颀斩于青溪桥，而褒姒则是被犬戎人当成战利品带回国，下落不明。但相信以褒姒的美色，足以打动犬戎的大首领，也许褒姒会开启新的美丽人生，并在不久后，忘记被犬戎人杀掉的前夫姬宫涅和儿子姬伯服。

申侯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姬伯服的死，造成了周朝天子继承的真空。唯一能填补这个真空的，只有申侯的外孙姬宜臼。但问题是镐京已经被犬戎人严重破坏，而且距离犬戎的势力范围太近，不再适宜做国都，只有向东迁徙。周朝的东都雒邑有幸被选中成为新的国都，在申侯、鲁公和许文公等诸侯的拥戴下，年轻的姬宜臼在雒邑即周天子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平王东迁”。

申侯的算盘打错了，他应该没有料到犬戎人对镐京的破坏会如此严重，周朝国都会东迁雒邑。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西周名义上统一天下，实际上不过是天下诸侯的领导者，对东方诸侯并没有予夺生死的权力。

东方诸侯敬畏周室，是因为周室实力强大，政治稳定。当西周灭亡，王室衰微之际，周室之于东方诸侯的实力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号令不出雒邑，还会有哪个诸侯继续把周王室当盘菜？

类似君弱臣强的局面在后世不断上演，比如汉末藩镇割据和唐末藩镇割据，都是趁中央权威衰落之际逞强自立。更极端的事例，是控制中央政权的原地方诸侯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废立帝王，有些实力强大的地方诸侯甚至也可以自己过把皇帝瘾，中央帝室的权威丧失殆尽。

东周新都雒邑并非周朝传统意义上的直系领地，数百年来，周室的根据地一直在以岐山为中心的关中。平王东迁，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三居室，跑到别人的二居室当免费房客，难怪房东不给好脸色看。有些野心勃勃的“房东”开始盘算能从落难的王室身上多拔下几根漂亮的羽毛……

我们都知道申侯等诸侯拥立姬宜臼做周天子，实际上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就在周平王即位的同时，虢国的君主姬翰在携（地名，实址未详，当在洛阳附近）另立周幽王姬宫涅的庶子姬余臣为周天子，史称周携王。

在至少十年的时间里，东周是二王并立，不过正史只承认申侯所立的周平王。这段历史很容易让人们想到了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另一段历史：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杀，唐公李渊占领长安后，立杨广之孙杨侑为过渡性的隋天子，史称隋恭帝。同时在洛阳，军阀王世充也立杨广的另一个孙子杨侗为隋天子，史称“皇泰主”。

其实不论是周平王，还是周携王，他们都不过是诸侯手上的提线木偶，后世的杨侑、杨侗兄弟几乎就是东周二王的翻版。帝王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们手上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失去了权力，他们将一无所有。

姬宜臼运气还算不错，至少他还继承了祖先留下来的政权法统。虽然这在野心勃勃的诸侯看来，不过是一块铝合金招牌，但在无形中保护了东周王室长达五百多年的存在。即使后来争霸如齐桓公者，依

然高举着“尊王”的大旗，不过这一切，并不是姬宜臼想要得到的。

中央政权的崩溃，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东周如此，汉末如此，唐末如此，乃至清末都是如此。《史记·周本纪》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汉灵帝刘宏祸乱天下，结果身后不久，东汉朝廷便土崩瓦解，各路军阀粉墨登场，最终演变成曹操、刘备、孙权的三足鼎立，其精彩程度让后世叹为观止，历史原来可以如此精彩！

周幽王姬宫涅的“历史贡献”也在于把本来铁桶一般的西周江山搞得支离破碎，各路英雄好汉蜂拥而出，骄傲地站在灯光闪耀的舞台上。甚至可以这么说，西周之后春秋时代的出现，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按现在的行话说，东周的建立，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盛世的终结，传统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往往意味着新的时代在孕育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必定涌现出代表新时代历史发展方向的杰出人物，也许后人会庆幸周幽王姬宫涅的昏庸无道。非如此，艳绝千古的春秋时代也许就胎死腹中，后人就无法领略到春秋风流人物的无限精彩。

三 郑庄公和母亲武姜的恩怨情仇

说到郑庄公姬寤生，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虽然他的功业无法和齐桓、晋文相提并论，但他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导致他在历史上的知名度非同一般。原因很简单，因为姬寤生是记录春秋历史最权威的史书《左传》中第一个出场亮相的主要演员。姬寤生在春秋的地位，和《水浒传》中第一个出场的九纹龙史进非常相似，姬寤生运气不错，一个不经意间的精彩亮相，就让历史牢牢记住了他。

在姬寤生不怎么波澜壮阔的人生中，他实际上只做了两件“大”事：

一、姬寤生和他的母亲武姜之间不可思议的恩怨情仇，并设计除掉了有夺位野心的弟弟。

二、姬寤生以诸侯的身份与周天子互换人质，并因为争夺领地最终大打出手，还射了周桓王一箭。

因为这两件事情，姬寤生在历史上的形象并不怎么光彩，有关他的评价也以负面居多。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批判姬寤生的私德上，对他的小霸之功基本上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春秋穀梁传·隐公元年》就对姬寤生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郑伯（即姬寤生）既为人君，有威怒之重，自为戎首，设赏罚之柄，故君师用命，战士争先。”这样的评价送给秦皇汉武同样合适，说明姬寤生混江湖的能力不可小视。不过现在先不讲郑庄公的宏图霸业，先讲一讲他和母亲武姜的恩怨情仇。

姬寤生出生在一个根红苗正的王室家庭，而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再怎么牛哄哄，也只是王室外姓。姬寤生的曾祖父非常著名，就是西周历史上头号大暴君，开创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周厉王姬胡，换言之，西周末代天子姬宫涅是姬寤生的堂叔。

姬寤生的祖父，实际上前文曾经提到过，即在镐京之乱中随同姬宫涅一起被杀的司徒、郑桓公姬友。姬友的知名度远低于他的孙子姬寤生，但姬友曾经和政治预言家——太史伯展开一场关于姬周国运的大讨论，此事详细记载于《国语·郑语》，且称之为《国运论》。

中国历史上有三部著名的政治预言读本，即《马前课》《推背图》《烧饼歌》。其实太史伯的《国运论》对姬周国运的推演相当神奇，特别是太史伯准确预言到姬姓晋国、姜姓齐国、嬴姓秦国、芈姓楚国必将随着周朝的国运衰落而崛起。

郑桓公是两周交替之际最为可惜的一位诸侯兼贤臣，他是西周末年少有的贤明宗室，他善于治国，勤政爱民，治理郑国三十年，“百姓皆便爱之”。随后入京任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悦，河雒之间，人便思之”。

如果周宣王姬静在临终之前把天子之位传给弟弟姬友，而不是荒唐的儿子姬宫涅，也许西周不会这么早退出历史舞台。姬静擅长武功，征伐天下，而姬友擅长文治，调和五行，是姬静最合适的政治继承人。姬静以天下为小私，不为小公，致使先祖辛苦打下来的大周天下一朝土崩，遂至瓦解。

姬友稀里糊涂为姬宫涅陪了葬，郑国的第二任国君是郑武公姬掘突。姬掘突在历史上没有太大的作为，他在历史上有那么一点知名度，完全是他那位喜欢多事的老婆给招惹出来的。

武公的夫人来自申国，因姓姜，又嫁给武公，所以后人称她为武姜。春秋时代的著名女人多被称为某姜，如武姜、庄姜、宣姜、文

姜、齐姜，“姜”代表着她们所在的姜姓诸侯国，比如姜姓齐国、姜姓申国、姜姓许国、姜姓吕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春秋历史的美女“名姜”的风流故事，以后会作重点介绍。

在武姜的人生中，做出的第一件“青史留名”的伟大事迹，就是在生长子姬寤生的时候突然难产，差点母子双亡。武姜为人非常迷信，因为长子的出生差点要了武姜的老命，武姜特别讨厌这个儿子。等到武姜再次怀孕生产时，次子共叔段的生特别顺利，所以武姜把她所有的母爱都给了共叔段。姬寤生在母亲武姜的眼中，不过是一个与她毫无关系的路人甲。

一般来说，在政治舞台上，性格强悍的女人特别容易涉足政治，武姜也没有例外。因为姬寤生是嫡长子，所以郑国太子的位置非他莫属，但武姜执意干政，逼老公姬掘突废长立幼。

共叔段的能力，姬掘突是清楚的。这位少爷是典型的权贵二代做派，仗着母亲的宠爱，“持宠骄恣”，姬掘突此时已经身染重病，没几天活头了，所以断然不敢把江山传给这个败家子。姬掘突拒绝了武姜的逼宫，姬寤生也有惊无险地继承了郑国的统治权。

武姜替幼子夺权行动的失败，在这个好强女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强大的幽怨之气，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总想着扳回一局。姬寤生做了郑伯又如何，她照样要把她不喜欢的长子拉下马来。

现在的问题是，姬寤生已经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权，并且姬寤生得到了许多朝中重臣的支持，用政变的办法似乎很难扳倒姬寤生。武姜为共叔段想到了“曲线夺位”的妙计，就是把共叔段封在外地的大邑，多置办兵马，待机会成熟，母子二人里应外合，拿下姬寤生。

据现有史料记载，武姜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企图废长子、立幼子的太后，后世的窦漪房不喜欢长子刘启、想立幼子刘武，所用的办法几乎就是从武姜这里抄袭过去的。

武姜想要得到什么，姬寤生心知肚明，这位新任郑国君主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首先拒绝了武姜为共叔段请封为制邑（即后世著名的虎牢关旧址）的请求，理由有两个：

一、制邑地处偏远，不易管理。

二、制邑曾经是东虢国的封地，后东虢国为郑所灭，把弟弟封在这里，恐为不祥。

除了制邑之外，姬寤生答应母亲选择其他封地，他都会接受。

姬寤生拒绝把制邑封给公叔段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因为制邑是东虢国旧都，北依黄河，南临汜水，地势险要，粮草充足，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把制邑封给共叔段，就等于放虎归山，再难控制。更重要的是，制邑距离郑国都新郑太远，一旦有变，姬寤生将鞭长莫及。

武姜应该察觉到姬寤生对她已经有了防备，但她又不好多说什么，只好退而求其次，为共叔段请到了京邑为封地，姬寤生微笑着答应了母亲的请求。京邑位于新郑东北方向，正处在新郑与制邑之间，而且京邑四周无险可守，以后姬寤生要通过军事手段拿下京邑要远比拿下制邑容易。

武姜把最喜欢的幼子送到了京邑，并让共叔段暗中招兵买马，成立嫡系部队，以便为日后的武装进攻做准备。对于武姜明目张胆的干涉政治，郑国的核心统治阶层非常不满，大夫祭仲非常不理解姬寤生为何放掉野心勃勃的共叔段，留在新郑就近监视岂不是更好？

姬寤生似乎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并没有告诉祭仲自己的长远计划，只是假模假样地说母命难违。祭仲一时没转过弯来，还继续发出善意的警告：“姜氏心怀诡诈，公岂不知？不如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等到彼等势力坐大之时，再欲除之，恐非易事。”

姬寤生本来是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想法，被祭仲逼急了，姬寤

生才慢吞吞回了一句，结果立刻成为千古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我都不急，你急个毛！慢慢等着吧，不久之后就有一场大片上映，你准备看热闹吧。

姬寤生的性格比较内敛阴鸷，他不会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这种性格的君主，往往给人的感觉比较阳光，做事坦荡，实际上一肚子坏水。唐朝第一奸臣李林甫，人称“笑里藏刀”，其实姬寤生的所作所为更符合“笑里藏刀”的标准。姬寤生和李林甫有一点不同，李林甫奸诈阴险是天生的，为了上位不择手段，而姬寤生的“坏”很大程度上是母亲武姜一碗水端不平给逼出来的。

祭仲的反对意见，姬寤生何尝不知？祭仲只看到了武姜对姬寤生的咄咄逼人，却忘记了一点，武姜再怎么可恶，她毕竟是姬寤生的亲生母亲。自从姬寤生懂事起，他就一直生活在母亲偏爱幼弟的阴影之中，这让他对武姜产生了深深的怨恨：难产的罪过怎么能推到我头上，我还不是你生的？

每次看到武姜宠爱共叔段的时候，姬寤生心里总会泛起难以克制的酸苦和忌恨。但无论武姜对姬寤生的态度有多刻薄，母子二人的矛盾有多深，姬寤生始终对武姜还抱有一丝幻想，他多么希望母亲能把她给予弟弟的母爱分出一部分给他，一点就足够了。

姬寤生一直在给武姜机会，但武姜对这个曾经让她受过惊吓的长子丝毫不感兴趣，她现在满脑子都在想什么时候帮助共叔段夺取郑国统治权。至于姬寤生的生死，武姜并不关心。

姬寤生的心态一直处在矛盾和纠结之中，一方面他必须打消母亲和弟弟对国君之位的窥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母亲能悬崖勒马。不过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武姜是打算一条道走到黑了。在武姜一意孤行的时候，姬寤生对她的态度明显是怨恨多于期望。

而且姬寤生已经得到情报，共叔段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势力范

围越来越大。这个消息更加激怒了姬寤生，他坚信共叔段的背后一定有母亲的支持。郑国的统治阶层对此坐立不安，都出面劝姬寤生不要再拖下去了，迟则生变，应该趁共叔段羽翼未丰之时果断拿下此贼。

姬寤生还是摇摇头拒绝了，他此时已经基本放弃了对母亲的幻想，但他的理由是：“不义不昵，厚将崩。”意思是说共叔段的所作所为公不合君臣大义，私不合兄弟亲情，失败是迟早的事情。

面对弟弟的得寸进尺，姬寤生不是选择以大义责之，矫正共叔段的错误做法。而是任由其胡作非为，并且挖坑引诱共叔段，这也是后世对姬寤生诟病最多的地方。

共叔段是姬寤生在政治上最大的敌人，姬寤生早就欲除之而后快，但他如果之前就动手，没有合法的理由，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等共叔段谋逆暴露之时再动手，罪过全都由共叔段和武姜背着，自己反倒落了一个好名声，为人奸雄如此，曹操也要望其项背。

明人冯梦龙在小说名著《东周列国志》中就评论姬寤生此举是“养成段恶，以塞姜氏之口，真千古奸雄也”。三国大奸雄曹操在姬寤生面前，也只是个小弟。曹操在江湖上设计坑人的桥段，有许多都是直接剽窃姬寤生的。

首先要承认姬寤生对共叔段独占母爱有强烈的吃醋心理，但如果没有武姜的存在，姬寤生是否就不会“陷害”共叔段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姬寤生恨弟弟是一方面，但弟弟随时有可能取代自己做郑国国君，这才是姬寤生给共叔段设套的主要原因。

在家天下时代，权力的性质从来都是属私的，特别是一个官场中的强势男人， he 可以和别人分享富贵，但绝对不会让别人分享自己的权力和女人。姬寤生制订了几近完美的除弟计划，导火索也应该是共叔段的为臣不忠、为弟不友，姬寤生的行为可以认定属于自卫性质。

从姬寤生即位那一年算起，武姜和共叔段已经骑在姬寤生头上擅作威福长达二十年。都说勾践隐忍二十年，终灭强吴，姬寤生的忍，从难度来说甚至可以说在勾践之上。

勾践面对的夫差只是外人，而姬寤生却要面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同胞弟弟，何况姬寤生并非冷血之人，他始终对母亲和弟弟的翻然悔悟抱有幻想。这种亲情上的痛苦纠结，不身处其境，是很难理解的。

由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这篇文章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实在太过响亮，许多正统的封建史家对姬寤生口诛笔伐，讥其教弟不严，却很少有指责武姜偏爱幼子的，这对姬寤生来说太不公平。

人非圣贤，曹操曾经对十几万手无寸铁的百姓痛下杀手，却得到了历史的原谅。姬寤生只不过是想要守住本就属于他的权力，并没有枉杀一人，不应该对他的这点毛病揪住不放。

从后来姬寤生对母亲的思念来看，他还是特别渴望得到那份本应该属于他的母爱的，所以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姬寤生始终采取比较文明理性的手段来对付母亲与弟弟。只是武姜和共叔段已经被贪婪冲昏了头脑，只想着夺嫡易位，不让他们撞下南墙，他们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姬寤生早已经布好了局，就等着共叔段起兵造反了，只有这样，姬寤生才能占据道义上的绝对优势。共叔段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兄长的阴险用心，还在努力“配合”兄长的“剿贼计划”。

表面上，共叔段在京邑招兵买马，但他的整体实力和姬寤生掌握的郑国精锐部队还是没法比，这也是姬寤生敢于放纵共叔段扩建私军的重要原因。

姬寤生从来没有把弟弟的这些虾米兵当回事，但最让姬寤生伤心的是，母亲武姜还是没能悬崖勒马，反而陷得越来越深。据内线的可

靠情报，武姜和共叔段的夺位计划已经到了实施阶段，具体方案是共叔段率兵南下进攻都城郑，武姜趁机打开城门，里应外合，一举除掉人嫌狗憎的姬寤生。

姬寤生一直没有把共叔段当回事，他更在意母亲的态度，但武姜最终的选择严重激怒了由失望变绝望，再由绝望变恨之入骨的姬寤生。该来的迟早会来，二十多年的恩怨情仇，是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

郑庄公在位第二十二年的夏五月，一场意料之中的兄弟夺位之战精彩上演。不过出乎武姜意料的是，战争的主攻方不是共叔段，而是姬寤生。姬寤生的实力非常强大，他拜叔父姬吕为将，一次就出手二百辆战车，浩荡北上。

春秋的兵制上承西周，军事实力多以“车”为计算单位，每辆战车由四马拉载，上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后勤兵二十五人，共计百人，此外还配有后勤牛十二头。二百辆战车，单论人数，就是两万人的兵力，在这春秋时期算是比较大规模的用兵了。

优势一直都在姬寤生这边，但还有个细节不太为后世所注意。当郑军北上的时候，共叔段营建多年的根据地京邑突然宣布脱离共叔段阵营，归降郑伯。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很简单，这是姬寤生给京邑的官员做过策反工作。如果京邑都是共叔段的人马，不至于仗还没打就投降了，甚至共叔段的嫡系部队中都有人可能被姬寤生提前收买了。

其实这场所谓的战争并没有打起来，共叔段安身立命的那支部队在郑军没到达之前就已经作鸟兽散了，一阵尖叫之后，共叔段成了孤家寡人。已经“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共叔段为了躲避兄长的追杀，一路向南逃到鄆（今河南鄆陵）。姬寤生当然不能让弟弟有喘息复苏的机会，共叔段不想成为兄长的阶下囚，更无脸面对失望的母亲。共叔段转折北上，逃到了共国，此后下落不明，也有一说是共叔段被姬寤生

的军队杀死了。

共叔段已经成为了历史，姬寤生可以当没有过这个弟弟，但他必须面对视他如仇人的母亲武姜。

除了郑庄公与母为仇外，还有两个著名的例子，一是秦始皇和他的母亲赵姬，二是辽兴宗耶律宗真和他的母亲萧耨斤。武姜、赵姬、萧耨斤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喜欢在位的大儿子，更喜欢小儿子，密谋发动兵变，结果都失败了。最巧合的是，她们三人都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关了禁闭，死不相见，但最终都和好如初，母子团圆。

不过此时的姬寤生，对武姜却只有恨，恨之入骨。他恨武姜的偏心，二十多年的屈辱涌上心头，几乎让姬寤生难以自制。姬寤生不想再见到这个薄情寡义的女人，只是厌恶的挥一挥手，让人把武姜强行押到了城颖（今河南临颖），距离郑约三百多里。

姬寤生托人给每日在城颖以泪洗面的武姜带了句狠话：“不及黄泉，不相见也。”这算是姬寤生对母亲的诀别之言，母子之间已经恩断情绝，自此便是陌路人，老死不再相见。

武姜在城颖的孤苦伶仃，姬寤生是知道的，他感觉非常解恨，这是这个薄情的女人应该得到的下场。但当姬寤生猛地看到殿外和煦阳光的时候，他的心突然被狠狠地刺痛了，他又想到了他从来没有得到的那件东西——母爱。

人生在世，不一定有子女，但一定有母亲，只是并非所有的母亲都会把母爱给予自己的孩子，姬寤生不幸尝到了这种痛苦的滋味。这些年所受到的屈辱，在姬寤生彻底取得胜利之后，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

但在发泄之后，姬寤生突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孤独感向他袭来，几乎把他击倒。直到这个时候，姬寤生才痛苦地发现，他从骨子里就

没有恨过母亲。

姬寤生对自己把母亲放逐到城颖并关了禁闭感觉到后悔，只是问题是他作为一国之君，不可戏言，狠话都说出去了，天下尽知。现在如果变卦，把母亲接回来，世人会笑骂他是个贱骨头，威望尽失，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混？

一方面是权力的诱惑，一方面是天生母子之情的召唤，但姬寤生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位英明的郑国君主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中不可自拔。

替姬寤生解决这个感情难题的，是郑国大夫颖考叔。

此时的颖考叔并不在郑，而是镇守颖谷，当他从侧面了解情况后，立刻动身来到郑，打着向国君进献礼物的名义见到了姬寤生。小弟来拜见老大，按惯例，老大自然要留小弟吃顿饭，好酒好肉是少不了的。

不过让姬寤生奇怪的是，明明案上摆着肉食，颖考叔却不动筷子，而是把肉轻轻放在一边，难道这货是个素食主义者？面对姬寤生的疑问，颖考叔带着善意的微笑，说臣不是不喜欢吃肉，而是家中有老母，臣要把肉带回家孝敬老娘。

颖考叔是故意这么说的，目的就要勾起姬寤生的思母之情，为他下面劝国君母子合好做铺垫。果然，姬寤生听完颖考叔的话，差点没哭出来，别人可以得到母亲的疼爱，自己却和母亲老死不相往来。

姬寤生强忍着心中的凄苦和悲凉，看着颖考叔，做羡慕状：“寡人真的非常羡慕先生，还有机会孝敬老母，寡人却孤苦一人，无母可敬。”姬寤生平素为人较为诡诈，但他的这句独白是发自肺腑的。世界上即使再邪恶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总会留有一个柔软的空间，何况姬寤生人品并不算太糟糕。

颖考叔当然知道姬寤生和武姜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明知故问，逼得姬寤生说出了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姬寤生不停地在颖考叔面前表达当初把母亲流放到外地的后悔之情。

颖考叔大笑，他此来就是为国君解决这事的。他知道姬寤生是一国之君，君无戏言，但他有个好办法，既让姬寤生保住面子，又能和母亲和好。“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这是颖考叔给姬寤生出的好主意。

姬寤生说过不及黄泉不相见，那就在地下挖出一眼黄泉出来，具体的办法就是挖一个能见到黄泉（应该是地下水）的隧道，让国君和武姜相见。而且颖考叔相信武姜一定会接纳国君，因为她在感情上已别无选择。

事实也证明了颖考叔的判断，当武姜听完了颖考叔的计划安排，突然泪流满面，她对颖考叔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武姜对自己的糊涂和绝情悔恨不已，几十年来，她视姬寤生如路人，却忘记了自己作为母亲的一种责任和担当。一对儿子的反目成仇，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她自己。

共叔段已经成为过眼烟云，她眼下只有姬寤生一个儿子，她甚至在想，只要姬寤生能原谅她，她愿意把失落的母爱加倍还给这个内心孤苦的儿子。现在机会来了，武姜内心的起伏是非常剧烈的，久久难以平静。

当姬寤生借着火把的照亮，流着泪走进隧道，激动地赋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他已经听到了隧道深处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武姜泪流满面地站在儿子面前，和着泪吟诵着她夹杂着太多悔恨的幸福：“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

姬寤生激动地给母亲行大礼，武姜情绪异常激动，直到今天，她才真正理解做母亲的含义和幸福。在武姜之前的潜意识中，生姬寤生

时难产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继而对姬寤生产生反感。可她却从来没有想过，姬寤生当时只是一个不谙人事的婴儿，他有何罪？

好在上天已经厌倦了这场人间悲剧，给了武姜一个赎罪的机会，还了姬寤生一个公道。

《左传·隐公元年》：“遂为母子如初。”

四 郑庄公和东周王室的扯皮大战

接着讲郑庄公姬寤生。

在颖考叔的妙计安排下，姬寤生既保住了面子，又和母亲和好如初。这是一则很温馨的家庭故事，姬寤生对母爱的渴望让人感动，这是人性中最本真的一面。

但话说回来，世界上每个人都具有人性的双重性，心中各有一个魔鬼和天使，这两种人性时刻处在一种矛盾和纠结的状态，姬寤生也不例外。当姬寤生放下个人感情，以郑国国君的身份出现在诸侯争霸的舞台上，他还有着另一张人性面孔：嚣张霸道，蛮横无理，以及他所谓的江湖义气。

姬寤生被称为春秋小霸，在历史上也算是大名鼎鼎，他平生做过两件“大”事，最受后人诟病。一是他设计除掉了弟弟共叔段，二是对东周王室的不敬。共叔段的悲剧已经讲过了，下面主要讲姬寤生与东周王室的扯皮大战。

在东方诸侯中，有许多姬姓诸侯国，比如晋、鲁、燕、卫，但这些诸侯与西周末、东周初的周天子的血缘关系非常疏远，有些类似刘备与汉献帝的关系。而要说与周平王血缘关系最近的姬姓国，首选郑国。

郑国之所以和东周王室血缘近，是因为郑国出现的太晚，郑国第一任君主郑桓公姬友是周厉王姬胡的儿子，而晋、鲁、燕、卫等国已经存在二百多年了。先把郑国与东周王室做个简表：

--	--

周厉王姬胡	
周宣王姬静	郑桓公姬友
周幽王姬宫涅	郑武公姬掘突
周平王姬宜臼	郑庄公姬寤生
太子姬泄父	
周桓王姬林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姬寤生是周平王姬宜臼未出五服的堂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曾祖，但姬宜臼比姬寤生大了二十五岁。

说到二人的关系，早期还是不错的，因为姬寤生的父亲姬掘突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周王左卿士。所谓卿士，其实就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与后世宰相不能世袭所不同，周朝的宰相是可以世袭的，姬掘突死后，姬寤生很自然地就接了老爹的位置。

可能是姬宜臼为了限制姬寤生的权力，准备由西虢国的国君姬忌父出任右卿士，从中制衡姬寤生，以免其坐大。姬寤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通过各种手段，打听到了这件事情。

宰相的位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近控制周王室，对姬寤生的争霸天下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该死的姬宜臼不让自己吃肉喝汤，姬寤生岂能答应？

姬寤生的做事风格向来比较高调，而且为人心狠手辣，连同胞弟弟都敢做掉的人，还会在乎八竿子打不着的堂兄吗？仗着郑国军事实力强大，姬寤生闯进大殿，吹胡子瞪眼地质问姬宜臼：“听说陛下要废掉臣，可有此事？”

姬宜臼虽然贵为周天子，但他所控制的“周朝”只有今河南、山西交界地区。郑国地大兵多，姬宜臼暂时惹不起姬寤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当场顶撞姬寤生，只能违心地说没有此事。

姬宜臼以天子的身份，向诸侯低三下四地自辩，并没有打动蛮横霸道的姬寤生，凭什么相信你？让我相信你的保证，那你就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

姬寤生步步紧逼，最后把姬宜臼逼到了墙角，姬宜臼才不得不做出一个严重违反君臣大义的荒唐决定：周王室与郑国互派人质。姬宜臼把自己的儿子姬狐打发到郑国，由姬寤生就近控制，这就是春秋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事件。

虽然表面上姬寤生也派自己的儿子姬忽到东周做人质，但姬忽有强大的郑国做后盾，姬宜臼根本不敢动姬忽一根汗毛。这笔买卖，姬寤生是稳赚不赔的。

对于姬寤生强迫天子送人质的做法，历代史家多有指责。左丘明就批评姬寤生的荒谬要求，他有一段极有见地的评语：“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意是周天子和郑庄公互相之间已经没有最基本的信任，互送人质也改变不了他们之间的尔虞我诈。

姬宜臼作为天下共主，却被一个小霸欺负成这样，心中的委屈窝囊可想而知。可以想象，如果汉献帝刘协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曹操做人质，刘协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不过对姬宜臼来说相对有利的是，虽然周王朝早已破败不堪，但周平王上承祖宗之德，他的威望在诸侯心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再说郑国再强，也不过是一个诸侯，同时存在的晋、齐、鲁、宋、楚等国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当然不会任由姬寤生骑在周天子头上擅作威福。正因为这一点，姬寤生对周平王的态度还算客气，没有把事情做绝，互相都留有余地。

周郑交质事件发生在周平王驾崩的当年，即公元前720年。没过多久，在位五十一年，六十二岁的周平王姬宜臼在委屈窝囊中含恨去

世。因为周太子姬泄父早死，所以周天子的位子交给了姬泄父的儿子姬林，也就是周桓王。

和祖父含垢忍辱不同，姬林正当少壮，年轻气盛，他早就看不惯姬寤生的飞扬跋扈。而且姬林应该深知一点，祖父平王是周幽王之子，好歹还能继承一点西周王朝的余威，但到了姬林这一辈，周王室的威望还剩下多少？

如果他对姬寤生的嚣张不闻不问，其他诸侯会如何看自己？摆不平横着走路的姬寤生，姬林的江湖威望无法树立，以后他也没法在江湖上混了。出于这种考虑，姬林一上台，就一改祖父偏于保守的外交政策，对外咄咄逼人，四处放火。

姬林点燃的第一支火把，果然就扔在了姬寤生的头上。

姬林初生牛犊不怕虎，做事情充满了年轻人应有的朝气和果敢，姬寤生哪里疼，他就专往哪里戳。姬寤生占着周王卿士的位置不肯撒手，姬林就对外宣布，他即将任命西虢公姬忌父为新任卿士。姬林以为此举能镇住张牙舞爪的姬寤生，让姬寤生畏服于王权，结果却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

周平王此前虽然有打算任命姬忌父，但慑于姬寤生的淫威，没敢对外承认，好歹保住了姬寤生的面子。现在姬林公然拿掉姬寤生，等于在江湖围观者面前狠狠抽了姬寤生一个响亮的耳光，如果姬寤生不做出强烈反应，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混？

按辈分，姬寤生是姬林的堂叔祖，相当于齐明帝萧鸾之于齐废帝萧昭业的关系。为了利益，父子可以反目成仇，更何况是血缘渐渐疏远的堂祖堂孙。既然姬林不给他面子，姬寤生也没打算给姬林面子。

姬林专戳姬寤生的痛处，那姬寤生就以牙还牙，专踢姬林的下三路。东周是个疆域并不大的“诸侯”国，经济实力有限，而东周赖以生

存的经济基础，说白了，就是河南的粮食。摸清了姬林的家底，事情就好办了。

姬寤生做事非常阴辣，在公元前720年的夏秋两季，姬寤生派大夫祭仲带着大队人马，窜到温县和雒阳两地，强行割取属于东周的麦子，然后打包回国。老话说：“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姬林的饭碗被姬寤生砸了，这位年轻的天子顿时火冒三丈，跳脚大骂姬寤生是个无耻的强盗。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姬林和姬寤生的关系算是闹翻了。祖孙二人撸胳膊挽袖子，互相指责对方虚伪无耻，场面非常搞笑，史称“周郑交恶。”

按封建礼法，姬寤生以诸侯冒犯天子，明显占不住理。姬寤生敢公开给周天子难堪，说穿了，还是强大的实力做后盾。真理在哪里？真理就在闪闪发亮的刺刀上面，有“力”走遍天下，人皆跪拜山呼；没“力”寸步难行，到处是白眼冷饭。

姬寤生虽然最终取得的霸业并不大，但他在历史上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标杆作用，就是打破了“理”与“力”的平衡关系。一千七百年后，北宋太祖赵匡胤公然践踏江湖道义，以君主国的身份欺负南唐，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实际上就是从姬寤生这里学来的本事。

姬寤生为了得到失去多年的母爱而激动，但对于他这样的枭雄来说，重情和重利是可以兼而有之的。再以赵匡胤为例，赵匡胤辜负周世宗柴荣托孤，兵变篡位，差点杀了柴荣的儿子，并毒死蜀后主孟昶，霸占花蕊夫人，可谓心狠手辣，可赵匡胤却事母极孝。

姬寤生眼里只有实力，不讲道义，信奉强人哲学：“打得过我，你就是爷爷；我打得过你，你就是我孙子。”强大的实力支撑着姬寤生的霸道蛮横，周天子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不

高兴就上前踹姬林两脚。

对于姬林来说，当众被姬寤生扇耳光，是件极没面子的事情，天子威严何在？换成周平王，姬宜臼能忍下这口恶气，但年轻气盛的姬林哪里能忍得住这种屈辱。

在公元前717年，姬寤生打着朝见天子的旗号窜到了洛阳，名义上是向天子汇报工作，实际上是来探姬林口风的。姬林恨透了这个假仁假义的堂叔祖，一看到姬寤生，气就不打一处来，对姬寤生也没有好脸色，赌气的话没少说。

倒是姬林身边的大臣姬黑肩在私下场合劝姬林不要意气用事，现在姬寤生自恃实力强大，不拿东周当盘菜，陛下能忍则忍。姬黑肩劝姬林在公开场合多给姬寤生留点面子，通过善待郑国对其他诸侯做好表率，争取更多诸侯对王室的支持。

姬黑肩的话其实并没有说透，他的潜台词是如果面对诸侯的不礼，周天子就咬牙切齿地记仇，会让诸侯觉得周天子胸怀太窄。周天子对郑国无礼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诸侯对于周天子人品的看法。虽然史料并没有记载姬林是否听进了姬黑肩的建议，但从后来姬林和姬寤生大打出手来推断，姬林对姬寤生只有恨，恨之入骨。

和握有强大军队的姬寤生相比，姬林手上的牌并不多，最值钱的只有“周天子”这块铝合金招牌了。姬寤生对天子不敬，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底线——只打不杀。

无论姬寤生如何抽天子的耳光，天子的人身安全是必须得到保证的，这倒不是姬寤生发善心，而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量。而这个底线恰恰是姬林得以自保的最大优势，如果姬寤生灭掉天下诸侯，姬林早不知道被踢到哪儿喝西北风去了。

姬寤生一边忙着与宋、陈、齐诸国争霸，一边要花心思对付满脑

袋仇恨的周天子。在春秋早期，秦、晋、齐等国还没有发展起来，虽然姬寤生在江湖上有不少仇家，但郑国是诸侯中当之无愧的大国，在江湖上影响甚大。

公元前706年，齐国受到北狄的进攻，姬寤生派太子姬忽出兵相救。齐僖公姜禄甫为了感谢郑国，不惜自降国格，以小弟的身份跟在姬寤生的后面，窜到洛阳，朝见周桓王。在江湖上，只要有姬寤生出没的地方，就一定能看到姜禄甫鞍前马后地跟着，可见姬寤生的势力之大。

姬寤生在事业上的成功并非偶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姬寤生善得人心。曹操还有一点非常类似姬寤生，就是二人在接人待物方面，有着浓厚的江湖习气。带有这种处世风格的领导者，往往蔑视礼法，轻儒尚侠，凝聚力强，麾下文武对他们的忠诚度非常高。

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大夫颖考叔曾经帮助姬寤生获得母爱，姬寤生视他如兄弟。颖考叔也知恩图报，对姬寤生忠心不二，每逢大战，颖考叔都要身先士卒，与敌人血战。在讨伐许国的战争中，颖考叔执旗登城，结果被妒忌心极强的庄公堂弟公孙子都暗箭射死。姬寤生得知噩耗后，痛不欲生，下令全军向天诅咒射死颖考叔的贼人。

姬寤生善用人，能得人死力，所以他的统治时期是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没有之一。姬黑肩反对周桓王姬林和姬寤生撕破脸皮，也是因为这一层的考虑。打，我们是打不过的，当不了大爷，那我们就得装孙子。

姬林很有血性，但他的这种血性严重脱离了现实，就像魏高贵乡公不满司马昭专权，带着几十个老苍头要找司马昭决斗，结果被司马昭轻松除掉一样。没有实力做后盾的血性之举，往往会酿成悲剧，成为敌人茶余饭后当谈资的笑柄。

姬林始终没有看透这一层，他也说服不了自己容忍姬寤生的嚣张跋扈。在姬林的潜意识中，他希望能用武力征服诸侯，恢复西周时的王权强盛局面。基于对恢复祖业的强烈渴望，姬林决定玩一把轮盘赌，武力解决人嫌狗憎的姬寤生。

在动武之前，姬林先在政治上打击姬寤生，罢了姬寤生的左卿士职务，把左卿士的职权交给右卿士姬忌父。姬林此举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激怒姬寤生，让姬寤生在冲动之下做出对王室不敬的举动，然后姬林可以打着讨伐不臣的旗号收拾姬寤生。

姬林的算盘不谓不精明，姬寤生果然被此举刺激到了，一怒之下，姬寤生再也不上朝了。虽然《左传》对姬寤生的态度一笔带过，但可以想见，以姬寤生的暴驴脾气，他不把姬林骂了个底朝天才怪。

姬寤生的无礼之举，正是姬林所需要的。在公元前707年的秋天，周天子姬林率江湖上反姬寤生的诸侯军，浩浩荡荡朝着新郑的方向杀来。周军来势汹汹，除了王师之外，还有虢、蔡、卫、陈等当时的中等诸侯国军，姬寤生当初和姬林撕破脸，就知道姬林会玩儿这一手，早就做好了军事准备。

这场发生在^繻葛（今河南长葛）的荒唐战争，实际上是姬林和姬寤生多年交恶后的必然结果。姬林要恢复祖业，姬寤生要争霸天下，双方的利益完全是不可调和的。这两位大爷互相给对方挖坑，使盘外招，迎风洒狗血，最终大打出手，鸡毛漫天飞舞，出尽了洋相，堪称春秋时代第一闹剧。

姬林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他恨不得在瞬间打垮郑军，砍下姬寤生的狗头。周天子亲自披挂上阵，自主中军，虢公姬忌父主右军，蔡、卫二诸侯军从之；周公姬黑肩主左军，陈军从之。三军并列，中军稍前，形成“品”字阵形。

周军的阵法很讲究，但郑国内部同样有高人，公子姬子元眼光非

常毒辣，他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在周天子的仆从国中，陈国正在内乱，陈桓公姊鲍死后，姊鲍的弟弟妫圉杀掉太子妫免，陈国的政治形势极度不稳。

在这种情况下，陈军的战斗力是值得怀疑的，姬子元认为先击溃陈军，让陈军的溃卒自行冲击周军联盟，然后郑乘隙攻之，必能大胜。姬寤生听从了他的建议，摆出了著名的“鱼丽阵”，以祭仲居左军，檀伯居右军，原繁和高渠弥随姬寤生居中军。

春秋战争主要是以车战为主，己方士兵站在战车上，拿着戈矛与敌军战车上的士兵交战，很少有步兵全副武装在地面上进行肉搏战。步兵战没有成为战争的主要方式，也是春秋以前战争规模较小的原因之一。

“鱼丽阵”虽然也没有改变车战的主流模式，但创造性地发明了即伤即补的后勤供应体系。具体战法是：在每一“偏”（即25辆战车）的后面，紧随着二十五名步兵。这些步兵的任务是跟在战车后面与敌人搏杀，一旦战车上出现战斗力减员，他们就上车补员。在面积相对狭小的作战区域内，与步兵相比，战车显得笨拙，不够灵活，而增加了步兵协同作战后，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随后的战事也证明了“鱼丽阵”的威力不是吹出来的，再加上陈国的军队是一群没有斗志的乌合之众，郑军号令严明，进退如一人，战局的优势很快就倒向了郑国一边。史称“蔡、卫、陈皆奔”，打掉了这三个打酱油的仆从军，姬林所率领的周王师光棍一般晾在了姬寤生统帅的强大郑军面前。

东周地少人寡，所能征用的兵力有限，而郑国的国力、军力都明显处在上升的阶段，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更要命的是，姬林只有一支中军，而姬寤生手上三军完好，可以有效地对周军进行钳形包围。

如果不算西周末年申侯联合犬戎杀周幽王的话，郑庄公姬寤生是历史上第一个敢与周天子出兵对攻的诸侯，而且他还是姬姓诸侯，典型的宗室内乱。姬寤生的胆量还绝不止向周天子开战，更在于他对天子权威的极度蔑视，在周王师已经大败的情况下，他还指使部下祝聃对准周天子放冷箭，一箭正中姬林的肩膀。不过姬林的伤势并不严重，没有危及性命，姬林还能强忍着继续指挥军队。

敢于当场践踏天子权威的枭雄，我们最熟悉的是曹操当着汉献帝刘协的面，派华歆虐杀伏皇后，扑杀二皇子。但曹操和姬寤生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曹操敢杀皇后、皇子，但终曹操之世，他对刘协本人始终敬奉臣礼，不敢少违。姬寤生做了曹操不敢做的事情，直接操刀上阵，与天子大打出手，甚至还故意伤害周天子。

但如果说姬寤生暗中放冷箭是想直取姬林性命的话，那也太小瞧姬寤生的政治智慧了。和曹操一样，无论对天子如何不敬，绝不会超越给自己划定的政治红线，天子只可欺不可杀，否则就要触雷，上面讲过这个问题。

出于这层考虑，姬寤生制止了莽撞的祝聃欲乘胜追击姬林的举动，因为他要考虑政治风险。要单论双方实力，姬寤生可以轻易灭掉周天子，但之后呢？正如曹操拿着孙权劝他称帝的信告诉文武：“是儿欲使我居火炉上耶！”姬寤生同样不会做傻事，别忘了，齐、晋、楚、宋等诸侯都等着姬寤生犯错。

姬寤生很聪明，他编了一个美丽的花环，然后戴在自己的脖子上。他告诉祝聃：“做人不能随意欺负人，更何况是至尊天子？这场战争我只不过想自卫图存，不敢与天子为敌。你擅自放箭，伤了天子，这已经是我天大的罪过。万一你用力过猛，致天子于死地，我岂不是弑君的逆贼！”

世人多说汉高祖刘邦深得厚黑学之真谛，实际上姬寤生的厚黑功

力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姬寤生这通鬼话，除了最后一句是真的，其余全是假话。姬寤生很善于洗白自己的丑行，两瓣嘴唇上下一碰，罪过全成别人的，自己落得一身干净，可谓“厚颜无耻”。

更绝的还在后面，就在姬林被射伤的当天晚上，姬寤生就派祭仲去周军大营，代他向天子请罪。祭仲说完一通言不由衷的鬼话，甩掉吹胡子瞪眼的姬林，和周朝大臣攀肩搭背，替姬寤生说好话，估计没少给这些大爷们喂银子。

祭仲此行，还有一个不能说出来的目的，就是向落败的周天子显示郑国的实力，警告姬林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再有下次，射中的可就不是你的肩膀，而是你的脑袋。

明人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对姬寤生的虚伪大加嘲讽，作诗一首：“漫夸神箭集王肩，不想君臣等地天。对垒公然全不让，却将虚礼媚王前。”这场战争虽然是姬林主动挑起来的，但导火索却是姬寤生对周天子的不敬和戏弄，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姬寤生身上。

是姬寤生的野心，导致了这场传为后世笑柄的周郑大战，天子挨箭，郑伯挨骂，一地鸡毛，全是荒唐。不过，还是要为姬寤生说句公道话，在当时周天子权威沦丧的情况下，即使姬寤生不出头，照样有其他什么枭雄冒出来。

春秋初期，宋国的实力也在中上，与郑国不分伯仲，只是宋与周之间夹着强大的郑国。如果把宋国和郑国的位置调过来，周天子可能要遭到比姬寤生更为残酷的打击，因为宋国是商朝王室的直系后人，和姬姓周朝有刻骨的灭国之恨！而姬寤生与周天子同宗，血脉关系是诸侯中最近的，姬寤生即使废掉周天子自立，姬姓血脉也不至于断送。

从这个角度讲，郑国的存在，实际上对东周王室起到了战略屏障作用，隔断了子姓宋国向西扩张的企图。当然，姬寤生对周天子的戏

弄是姬林一生都无法洗清的耻辱，不过两害相权从其轻，被同宗的堂叔祖戏耍，总比被仇人砍了自己的脑袋要划算得多。

五 石碣“大义灭亲”与 祁奚的“举贤不避亲仇”

周朝的爵位分为五等，周天子以外，以爵位高低排列，分别是公、侯、伯、子、男，即著名的五等爵位制度。

在泥腿子陈胜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前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王侯确实都是有“种”的，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从来没有人质疑过。

周朝的等级制度极为严格，凤凰生的儿子，天生就是凤凰，麻雀生的只能是麻雀。和诸侯有五等之分一样，官僚阶层也分为五等，即上大夫（也可单独称为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和诸侯的爵位高低要看与周王室的关系亲疏而定不同，诸侯辖下的官僚阶层并非铁板一块。能力出众的，又生逢其时，就可以挤进官僚统治集团，最典型的就是百里奚和孙叔敖。

在春秋诸侯的官僚体系中，二大夫的地位要高于三士，士是统治阶层的最低一级，再往下就是庶人（自由民），之下还有奴隶。虽然士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不高，却是权力金字塔的基座，人数最多。历代的官僚体系，都是以帝王（天子）为塔顶，高级官僚（大夫）为塔身，士人为塔基。

在周朝各级统治阶层的政治待遇名单中，士都列入其中，比如按制度，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一庙。再如统治集团所冠戴的冕旒，天子有十二旒，诸侯有九旒，上大夫有七旒，下大夫有五旒，士有三旒。这应该是上承夏商两朝的礼仪制度，可见早

在夏商之际，就已经有了士的存在。

大夫的政治待遇虽然比士要高一些，但都是领工资的打工仔，不过大夫算是金领，士算是白领。在春秋诸文献中，大夫和士被连称为“大夫士”，直到战国之后，逐渐演变成“士大夫”。不论是大夫士，还是士大夫，他们都有着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属于知识垄断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

“士大夫”的存在意义，大致从三个角度可以切入解读：

一是文化意义，这是士大夫的根基，没有文化便谈不上士大夫。

二是道德意义，在春秋以后的语境中，“士”和“君子”基本上是同义词，而这两种身份到了唐宋以后，基本实现合流为儒。在他们看来，士君子应当临危不苟免，行事磊落，坦荡无私。

三是政治意义，食君之禄，谋君之事，以天下之忧为己忧。

在这三重意义上，士大夫群体最看重的是第二种，即道德意义。《孔子家语·儒行解》中着重讲了士的道德标准，“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不求厚禄，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从道德层面解读儒家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洁身自好，不贪不佞。《孔子家语·儒行解》：“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惧；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能做到以上举的这两条标准，基本上就符合了儒家士大夫的行为规则。

儒家之士在社会人群中的存在，讲究的是以德服人，以仁义教人，如以上所举的“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春秋时代的卿大夫们多出身贵族，如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所举的臧文仲、子罕、吴季札等二十人，但后人从春秋的高级官僚身上已经看到明显的儒家行

为特质。

正如钱先生所说：“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专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之狭隘观念自限。”

虽然儒家思想因为孔子而发扬光大，实际上儒家真正的创始人是周公姬旦。孔子的儒家学说只是集大成而已。孔子平生最大的偶像就是周公，他曾经说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从西周开始，卿大夫们就开始积极地融入政治生活中，如反对周穆王穷兵黩武的祭公谋父、劝周厉王多听社会下层民意的邵公虎，以及和郑桓公姬友进行国运大讨论的太史伯等人。

“道德”一词，不仅为道家所用，也成为儒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只不过各方对“道德”的解读不尽相同。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开篇就讲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说明儒家思想在早期阶段就已经非常注重培养知识分子兼爱天下的普世情怀。

先贤的表率作用，也深深影响了春秋时代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士大夫们，促使他们坚持自己的道德及政治操守。今天讲两个故事，有两位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用实际行动完美阐释了“内称不避亲”和“外举不避怨”。

先来讲一下“内称不避亲”，代表人物是卫国的大夫石碣。

历史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成语“大义灭亲”，这个成语的创造者就是石碣。在讲述石碣的故事之前，先把卫国的世系简单地介绍一下。

在春秋前期，卫国是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处在晋、宋、齐、郑之间，统治区域大抵在今晋冀豫鲁四省交界之处。以与周朝王室的关系

系亲疏来说，卫国是正宗的龙子凤孙出身，卫国的第一任君主卫康叔是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弟，深受千古一相周公旦的喜爱。

卫国是姬姓诸侯国中比较严格遵从周公政治思想的国家，卫康叔是卫国最著名的贤明君主，能“和集百姓”，曾经被周成王通令表扬。卫卫国祚传到卫武公姬和时，已经是第九代了。

可以说姬和是小一号的卫康叔，他在位期间，奉行祖先康叔的仁政，史称“百姓和集”。卫国本来是侯爵，但在著名的幽王之乱时，姬和曾经出兵帮助周平王，所以平王很感激姬和，把卫国的爵位由侯升为公。姬和在位时间相当长，足有五十五年，公元前758年，姬和寿终正寝，太子姬扬即位，就是卫庄公。

姬扬在历史上没什么名气，但他有幸娶到了一位著名的美女，跟着老婆在历史上出了一把小名。这位美女就是庄姜，因为她出身姜齐，又嫁于卫庄公，所以称为庄姜。关于庄姜的爱情故事，以后会专门讲述。

除了庄姜，姬扬旗下还有两个女人替他生了儿子，一个是陈国宗室女，生下了公子姬完，还有一个无名妾室，生下了公子姬州吁。姬扬非常喜欢那个无名妾室及她所生的儿子姬州吁，虽然姬完是长子，又为夫人庄姜所养，按礼法有资格继承大位，但姬和却让姬州吁控制军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姬州吁有夺嫡的野心。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国君“嫡庶无别”的，就是上大夫卿石碏，他反对的理由非常明确，“庶子喜欢舞枪弄棒，掌握兵事，则置长子于何地？若国君立州吁，请即立之，如果不立州吁，则请罢州吁之兵，否则州吁持宠夺嫡，大乱将启。”

同时石碏还提出了六逆、六顺之说，六逆是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六顺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州吁之所以不入石碏的法眼，主要原因就在于州吁的身

份和行为不符合石碏坚持的以春秋礼法为内核的先儒思想。

石碏滔滔不绝、大义凛然讲完了，差点口吐白沫，结果姬扬全都当成了浮云，根本听不进去，继续听任姬州吁胡作非为。石碏实际上是希望国君能立长子姬完为太子的，但并没有达到目的。

更让石碏忧心的是，他的那个宝贝儿子石厚似乎已经看出姬州吁得宠，将来必能继承国君之位，成天和姬州吁在一起鬼混。石碏已经认定了姬州吁将来必成为作乱卫国的祸首，劝儿子不要上这条破船，石厚已经鬼迷心窍了，对于父亲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

卫国的二子争嫡，几乎就是之前郑国二子争嫡的翻版，只不过郑国有个偏心老妈，卫国有个偏心老爸。不过姬扬虽然疼爱幼子，但并没有易储，等姬扬去世后，姬完很顺利地继承了国位，史称卫桓公。

姬完为人忠厚，性格偏于怯懦，在气场上很难压制弟弟姬州吁。其实姬完也不是无能之辈，至少他已经看清了弟弟的野心，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说法，在姬完即位的第二年（前733），姬完以姬州吁为人骄纵不法为由，罢免了姬州吁的所有职务，轰出国都。

说来好笑的是，姬州吁虽然流落江湖，但他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外国朋友，就是同样被国君兄长打败，逃到国外的郑国京城大叔共叔段。共叔段的失败，深深刺激了姬州吁，如果自己不有所作为，下场可能还不如共叔段。

卫桓公十六年（前719）三月十六日，野心勃勃的姬州吁纠结大批流亡的卫国人，在卫国发动叛乱，杀掉了毫无防备的姬完，自立为卫公。姬州吁弑君夺位，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后世的宋元凶刘劭、后梁废帝朱友珪、金海陵王完颜亮，都是姬州吁的徒子徒孙。

从人生轨迹上来说，姬州吁和完颜亮的相似度极高，二人都是杀兄夺位，在位期间穷兵黩武，民不聊生，最终又为弟弟干掉。对于姬

州吁的为人，鲁国大夫众仲看得非常透彻，他和鲁隐公谈论姬州吁就说：“州吁为人刚忍，好弄兵，众叛亲离，无德无行，必将玩火自焚。”

事实也证明了众仲的判断，姬州吁杀兄夺位仅仅半年后，就被愤怒的卫人除掉了，迎立了州吁在邢国做人质的弟弟姬晋，是为卫宣公。而设计除掉姬州吁的，正是已经告老居家的上大夫石碏。

如前面所讲，姬州吁即位之前的所作所为就已经和石碏的政治理念相冲突，而州吁弑君杀兄，以暴治国，残虐百姓，更是突破了石碏政治理念所能容忍的底线。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让年迈的石碏挺身而出，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乱臣贼子姬州吁，以及他那个助纣为虐的儿子石厚，他要对历史负责。

石碏在江湖上闯荡久了，从政经验非常丰富，他并没有采取力取之计，就像东汉末年老太尉陈蕃那样，带着几百个学生，悲壮地要与太监集团决斗。双方实力悬殊，以力拼之，石碏未必是姬州吁的对手，只有智取。

石碏智取姬州吁计划的核心，就是“调虎离山”，想办法诱使姬州吁离开他的大本营卫国，去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一举擒之。至于把姬州吁骗到什么地方，石碏想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所在——陈国。

被弑的卫桓公姬完正是陈桓公妫鲍的外孙，姬州吁杀了自己的外孙，妫鲍对姬州吁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当然，姬州吁也不是不知道陈桓公对自己的态度，但最终他还是听从了石碏通过石厚转达的建议，带着石厚赴陈国转一圈。

姬州吁成功夺位，大权在握，威福自专，但他还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合法认证。根据制度，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否则就是非法夺位，政治上非常被动。石碏设计说，陈桓公是周桓王身边

的红人，“有宠于王”，只要陈桓公在周桓王面前美言几句，就能拿到合法执照。姬州吁为了得到天下的承认，只好硬着头皮去了陈国。

与此同时，石碏已经派出心腹之人，抢在姬州吁之前赶到陈国，把自己的除贼计划通告了妫鲍，由于利益一致，二人一拍即合。双方达成协议，只要姬州吁和石厚来到陈国，妫鲍就立刻拿下姬州吁。

石碏始终坚持自己的士大夫情操，为国为民，儒之大者。虽然石厚是他的亲生儿子，但由于石厚的“反动立场”，让石碏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由怨转恨。而且石碏在给妫鲍的请求中，明确指出，姬州吁和石厚二人合谋弑君。说明石厚在石碏的心中，父子之情已经断绝。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姬州吁和石厚刚到陈国，还没见过陈桓公，就被陈国的武士拿下，关进牢狱。妫鲍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处置权交还给石碏，虽然妫鲍知道石碏必杀此二人，但他还是想把脏水泼给石碏，自己落得一身干净。

接到妫鲍的请求后，石碏没有任何犹豫，派出官员右宰丑去陈国杀掉了姬州吁，同时，石碏派出自己的家臣儒羊肩杀石厚于陈。这个细微的用人区别显示了石碏的政治成熟，姬州吁是前国君，只能由卫国官员出面杀掉，而石厚是自己的儿子，可以家事处置。如果右宰丑和儒羊肩互换，那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不清楚石碏总共有几个儿子，也许就只有石厚这个独子，但在私爱与公器的选择中，石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大义灭亲”，是《春秋》对石碏以义灭子的肯定，“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评价不可谓不高。

到了宋朝，许多士大夫对石碏的大义灭亲高度赞赏，北宋人苏轼对石碏也称赞不已，在《论郇寄幸免》中，苏轼对石碏的杀子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石碏之子厚与州吁游，碏禁之不从，卒杀之。君子无所讥，曰大义灭亲。”

南宋人洪皓有诗：“恶吁及厚笃忠纯，大义无私遂灭亲。后代奸邪残骨肉，屡援斯言陷良臣。”石碣以义诛州吁和石厚，后世每逢帝王废嫡立庶，多以石碣事为史据，比如北魏孝文帝废太子元恂，唐高宗废太子李贤，但这并不是石碣的过错。明人徐三重在《授芹录》中也歌颂石碣的大义之行，“石碣以谗言杀州吁石厚弑逆之贼，春秋岂得非之哉！”

石碣杀子，并非石碣冷血无情，而是石碣拎得清私情与公器的轻重，想必石碣看到石厚的人头时，心里会非常悲酸，毕竟父子骨肉连心。明燕王朱棣攻进南京，以灭十族威胁一代大儒方孝孺，方孝孺眼睁睁看着亲人故旧一个个惨死在自己面前，却始终不降。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说明一点：真正人格独立的士大夫，往往轻名而重义，身可死，子可杀，但是他们的政治操守是不会动摇的。

前面讲的两个故事，郑庄公与母亲的恩怨情仇，石碣大义灭亲，因为被著名的古代散文选编《古文观止》收录，分列第一和第三篇，所以他们的故事为大众所熟知。

下面讲的晋国大夫祁奚，虽然他营救叔向的故事也被收录进《古文观止》，但此事是发生在祁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之后。祁奚以国事为重，先后推荐自己的仇人解狐和儿子祁午出任高级军职中军尉的故事，千载之下，仍然让人非常感动，所以接下来讲讲祁奚的坦荡胸怀。

祁奚，实际上应该称为姬奚，字黄羊，因为他的封地在祁地，所以世称为祁奚。祁奚出身非常高贵，他是晋献公姬诡诸的玄孙，正宗的金枝玉叶。严格意义来说，祁奚应该划为宗室贵族，不过士大夫阶层是开放式的，只要言行举止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都可以算进来。

当然，祁奚的政治起点远高于一些出身普通的大夫士，从史料中第一次出现祁奚的名字时，他就已经是晋国的中军尉了。春秋兵制，

天子六军，诸侯三军，分为上军、中军和下军，中军尉是中军的主将，也称为元尉。

祁奚有能力，有人品，懂得谦和让人，又兼是晋国公族（即宗室），所以很受晋悼公姬周的器重。不过祁奚却在任官N年后，突然向姬周请求辞掉中军尉的职务，回家养老。

按春秋礼制，人生七十岁而称老，这也是官员退休的年龄。可祁奚生于公元前620年，到此年，祁奚也只有五十岁，远没有致仕年龄。而上文提到的祁奚营救叔向，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祁奚辞官的具体原因已经于史无考，推测一下，最大的可能是祁奚已经厌倦了官场生活。在官场中混，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容易人红是非多，不如撂挑子，落得一身轻闲。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晋悼公姬周并没有挽留祁奚，但这并不能说明姬周轻视祁奚，因为接下来姬周给了祁奚一个巨大的荣誉。姬周把下一任中军尉的选择权交给了祁奚，只要祁奚说出人选，姬周一定会无条件答应。

不过当祁奚说出“解狐”这个名字时，却让姬周吃了一大惊，祁奚莫非疯了，怎么会选择解狐？晋国高层都知道，祁奚和解狐之间有很深的仇恨，具体什么仇恨不清楚，但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仇恨。

对祁奚推荐仇人解狐的这段历史，《左传》只用了一句话带过，语焉不详。其实这很好理解，国君让祁奚推荐的是下任中军尉的人选，这是国家用人大事，并非个人家事。祁奚公私分明，对解狐的痛恨并不影响祁奚对解狐能力的认可，仇人未必皆饭桶，亲人未必皆干才。

首先要承认，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当一个人走进官场，他的私人身份和官方身份是几近重叠的。官员犯罪，特别是贪污罪，往往是因为当事官员没有分清公利与私欲的边界，把官场

当成菜市场，摆摊做买卖，批零兼营，公器私用，大肥腰包。

祁奚很好地把握住了公利与私欲的边界标尺，祁奚是晋国公族，从这个角度讲，晋国的安危也事关祁奚本人的利益。所以他推选解狐，只是站在晋国的利益立场上看问题，和私人仇怨毫无关系。

古往今来，在官场上捞饭吃的官员无数，但真正能做到祁奚这样举贤不避仇的并不多。面对官场中的仇人，挖坑埋雷、落井下石的不可计数。人品稍好些的，也不过冷眼旁观，黄鹤楼上看翻船。

祁奚更为难得的一点，是他明知道他推荐解狐后，解狐有可能利用新获得的权力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祁奚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选择。不清楚解狐为人如何，但祁奚只在乎公器的利益，他相信解狐的能力可以于国家有所裨益。至于解狐会不会打击报复他，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祁奚克制住自己对解狐的私仇，为国家社稷着想，力荐解狐。早在春秋时，就有一种说法，认为祁奚推荐解狐出任中军尉，是想通过此举向解狐献媚，化解二人的私怨。以祁奚的行事风格来看，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左传》作者左丘明也称赞祁奚“称其仇，不为谄”。

剧情发展到这里，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应该结束了，实际上这才仅仅是个开始，精彩的还在后面。

极富戏剧性的是，解狐天生就没有当中军尉的命。晋悼公姬周被祁奚深深感动后，已经同意了让解狐出任中军尉，委任状刚发下来，解狐就突然去世了。当然，从阴谋论的角度看，甚至不排除祁奚故意推荐解狐，然后设计谋杀解狐，自己谋得千古美名。这个推演的情节实在太过离奇，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没人相信祁奚会这么做。

解狐死了，中军尉的职务再度空缺，晋悼公姬周在惋惜解狐薄命

的同时，再次让祁奚推荐合适的人选。之前祁奚推荐仇人解狐让姬周震惊，而这次的人选再次让姬周惊掉了下巴，因为祁奚力荐的第二位中军尉人选名叫祁午，是祁奚的亲生子。

官场上历来都有回避原则，推荐或安排自己的亲朋好友出任重要职务，很容易被人认为是结党营私。官场就是战场，身边没几个心腹帮手，就敢在官场上蹚浑水是非常危险的。祁奚的两次推荐人选让所有人感到莫名惊诧，祁奚在搞什么？先推荐仇人，后推荐儿子，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祁奚推荐儿子祁午出任中军尉，道理和推荐解狐一样。解狐因为有才干，虽然他是祁奚的仇人，祁奚以国事为重，推荐解狐，这就是祁奚的逻辑。同理，祁奚认为解狐能胜任中军尉，值得推荐，祁午同样可以胜任，所以祁奚不避嫌疑，推荐儿子。

很多人评价祁奚这两个举动时，都会突出解狐、祁午之于祁奚的关系，一个是仇人，一个是儿子。实际上祁奚在推荐二人时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关系，当他推荐人选时，解狐和祁午的身份只是国家公务人员，至于仇人和儿子，那都是私人感情问题，不会影响祁奚对国家大事的判断。

晋悼公让祁奚推荐中军尉的人选，是国家大事，虽然姬周知道解狐、祁午和祁奚的关系，但那都是私人问题。姬周只问公事，祁奚自然也要把自己的角色限定在公事范围内。

推荐仇人，祁奚可以给人留下胸怀豁达的印象，推荐儿子，却很容易抵消祁奚推荐解狐时获得的印象分。祁奚当然清楚其中的利害，但祁奚在这两次推荐时都坦坦荡荡，没有任何私心。

其实除了对祁午“举贤不避亲”之外，祁奚同时还推荐了已经病故的中军尉副官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接任其父的职务。祁奚的理由依然非常简单：羊舌赤能胜任中军尉副，这与他是羊舌职的儿子毫无关

系。如果因为单纯地回避制度，而造成高端人才的重大浪费，对政权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公职人员的自我身份界定，是对其政治品格的重要考量标准。多数人在进入官场中，经不起利益的诱惑，放弃自己的人格操守，徇私枉法、拉帮结派已成常态。在这种情况下，祁奚的坦荡胸怀尤其难能可贵。

六 齐国文姜乱伦杀夫 事件始末

前几篇主要讲了郑庄公姬寤生，以及卫国（石碣）、晋国（祁奚）的事情，接下来把镜头摇向地处黄海之滨的齐国。

西周建立后，对姬姓宗室子弟大行分封，天下诸侯半数姓姬，而且都封到了肥地。比如周武王弟姬旦（即周公）封在鲁国、弟姬鲜封在管国、弟姬度封在蔡国、弟姬封封在卫国，周武王子姬虞封在晋国，即使是姬姓旁支召公奭也封在燕国。

姬姓之外也有许多分封，但无论是楚之熊氏、秦之嬴氏，都封在当时远离中原文明的边荒地区，算不上是肥封。在外姓诸侯国中，唯一自西周创建以来就算得上大国的，只有齐国。

说起齐国的首位君主，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妇孺皆知，就是直钩钓来周文王，辅佐周武王灭商得天下的太公姜子牙！

姜子牙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不用多介绍，可以说有多少人知道诸葛亮，就会有多少人知道姜子牙。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诸葛亮的千秋盛名，一部《封神演义》也成就了姜子牙的万古不朽之名。

如果说诸葛亮是蜀汉建立的第一功臣，姜子牙就算得上是姬周灭商的第一功臣，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这一点都没有太大的争议。套用现在的政治语言，姜子牙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在西周王朝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事业进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基于此，武王灭商后，把姜子牙封在齐国，史称“齐太公”。这位齐太公将自己丰富的政治智慧运用到齐国的政权建设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从姜子牙到春秋初期，传了十三代齐侯，齐国几乎没有闹过太大的动静，但情况到了齐僖公姜禄甫（也称“齐釐公”）发生了变化。姜禄甫即位于公元前730年，卒于公元前698年。在姜禄甫统治时期，他经常跟着春秋小霸姬寤生在江湖上来回蹿，也混出了一些知名度。郑庄公姬寤生“春秋小霸”的盛名在外，实际上与姬寤生同时代的还有一个春秋小霸，就是齐僖公姜禄甫。

姜禄甫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后世记住他，不是因为他的所谓春秋霸业，而是他那几个成为“人中龙凤”的儿女。这几位活宝把本来好端端的春秋历史搞得乌烟瘴气，一地鸡毛，其荒唐、荒谬程度比周郑交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姜禄甫生有一个儿子，就是日后继承君位的齐襄公姜诸儿，以及两个女儿：宣姜、文姜。宣姜的故事特别精彩，先嫁给卫国太子姬伋子，但被在位的卫宣公姬晋看中，强行抢过儿媳妇，立为夫人。一千三百多年后的唐玄宗李隆基强抢儿媳妇杨玉环做情人，其实不过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因循故事而已。

宣姜抛弃丈夫，转投公公怀抱，后来又嫁给了宣公的儿子姬顽，生下一堆女儿，已经让人惊掉了下巴，但她的妹妹文姜的乱伦“事业”比她更上一层楼，“事迹”也更为惊人。宣姜乱伦只是在外姓父子，而文姜乱伦则是和自己的亲哥哥姜诸儿！

姜禄甫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分，两个宝贝女儿在嫁为人妇后，大搞乱伦八卦。说来奇怪，凡是姜氏诸侯国的宗女嫁到国外后，几乎都闹出过大动静。除了武姜没有乱伦及私通外，其他诸姜几乎都有，

比如宣姜和卫宣公父子、文姜和兄长齐襄公、哀姜和丈夫的兄长庆父、齐姜与晋献公父子。

关于哀姜的精彩故事，会在《春秋名女篇》中进行讲述，现在先讲一讲文姜的风流韵事。

我们都知道文姜后来嫁给了鲁桓公姬允，成为鲁国国母。实际上文姜在姬允之前，是许过婆家的，只是后来被准夫婿退了货，这才转了二手，去了鲁国。

文姜的准女婿名叫姬忽，姬忽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但姬忽的父亲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大人物，就是前几篇的主人公——郑庄公姬寤生。姜禄甫之所以要把女儿嫁给郑国公子，应该是他看到郑国国势如日中天，而姬忽将来会继承郑国君之位，所以想把女儿嫁给姬忽，提前在郑国内部插个钉子。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姬忽决定放弃这门亲事，理由是郑是小国，齐是大国，他高攀不上，这就是著名成语“齐大非偶”的由来。以当时齐郑两国的国力来看，郑国绝不逊于齐国，姬忽说齐强于郑不过是个借口。

推测一下，姬忽悔婚，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可能已经风闻到了文姜和其兄姜诸儿之间的“闺房秘事”。被扣了绿帽子的姬忽不想娶进这个扫把星，一怒之下放弃了文姜。

郑国退掉了婚事，总要给女儿寻个婆家，姜禄甫把主意打到了邻居鲁国的头上，鲁国君主就是鲁桓公姬允。这位鲁国第十五位君主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本是鲁隐公姬息姑的弟弟，为了夺得君位，与公子翬合谋，一刀做掉姬息姑后，姬允大模大样地继位。

文姜色艺双绝，却被退货，而姬允对文姜却非常中意，你不要，我要。公元前709年，姬允亲自跑到齐国，和姜禄甫在赢（今山东莱

芜附近)碰头，商量迎娶文姜过门事宜。

文姜和兄长姜诸儿暗中保持情人关系，作为父亲，姜禄甫应该是知道的，但家丑不可外扬，与其让齐公室蒙羞，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不如趁早拆散这对野鸳鸯。齐鲁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子翬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代表姬允去临淄迎娶文姜。

按当时礼制，国公的同生姐妹出嫁外国，应该由该国上大夫陪送，如果是国君之女，则由下大夫陪送。而文姜出嫁鲁国，却是由姜禄甫亲自陪送的，此举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姜禄甫和姬允都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能肯定的是，姜禄甫不会把儿女乱伦的事情告诉女婿，否则老脸往哪儿搁？

从历史记载来看，姬允是非常疼爱文姜的，夫妇二人和敬有礼，举案齐眉，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婚后的第四年（前706）九月，鲁公夫妇的第一个儿子来到人间。因为儿子和自己的出生日期相同，所以姬允给儿子起名为姬同，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鲁庄公。

如果生活能这样平淡而幸福地过下去，对文姜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她和兄长之间的那段感情太不正常，从姜诸儿那里，她能得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快感，但她不会感受到夫妇和敬的快乐。这段感情一直处在地下，会对文姜的性格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进而变得压抑，甚至发生扭曲。

自嫁到鲁国后，文姜就和兄长很少有机会接近了，时间会冲淡曾经的海誓山盟，文姜也应该断了对兄长的非分之想。但当鲁桓公十四年（前698）十二月二日，父亲姜禄甫去世、兄长诸儿即齐侯位的消息传到曲阜时，文姜仿佛感觉到了冥冥之中，她和兄长之间又将要发生什么。

爱情就像鸦片烟，一旦上瘾，根本拔不出来，文姜就是如此。她和兄长之间的“爱情”故事，经历了十多年的沉寂，文姜对乱伦的欲望

不但没有转淡，反而越来越强烈。恪守妇道十年，对文姜来说只是火山爆发前可怕的寂静。

鲁桓公十五年（前697），姬允和自己的大舅哥姜诸儿在艾（今山东莱芜东）举行齐鲁领袖级会谈，商谈的议题是如何平定许国之乱。史料并没有记载文姜是否跟着丈夫去见兄长，从后来鲁大夫申需的劝谏来看，文姜应该没有出行。但姜诸儿不会忘记这个和自己曾经有过一段不伦之恋的妹妹，与姬允的谈话中，姜诸儿有可能会向姬允询问妹妹的近况。

姜诸儿想妹妹想得眼都绿了，但礼法森严，春秋时规定“男女之别，国之大节”，姜诸儿也不敢轻易逾制。思念是一种无解毒药，越想越难受，简直如百爪挠心。如何能让姬允带着妹妹来见自己，这是摆在姜诸儿面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姜诸儿的刻意安排，在他即位后的第三年（前696），姜诸儿准备迎娶周庄王姬佗（周桓王姬林的长子）的妹妹做夫人。然后，姜诸儿以此事为借口，请鲁公姬允来齐国替他主婚。

如果是国家公事，姬允可以不带夫人前来，但这是个人私事，又是姬允的大舅哥结婚，于情于理都应该带上文姜。但从鲁国大臣强烈反对文姜赴齐的态度上来看，姬允本人似乎并不想带文姜去齐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大夫申^繻反对的理由非常明确：“女人嫁夫，男子娶妻，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不再有私相往来，这是礼法的规定。如果国君执意带夫人前去，必生祸乱。”细测申^繻的话，估计申^繻已经知道文姜和姜诸儿之间的精彩故事，就差直接把话挑明了。

姬允不是傻子，申^繻的话中话，他当然听得出来，但姬允最终还是带文姜去见姜诸儿。个中原因，《左传》没有交代，《公羊传》和

《穀梁传》对此事却有一些记载。从其中的蛛丝马迹不难看出，姬允此行，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被文姜“绑架”过去的。

如果按传统惯例，姬允偕夫人出行，应该写成“公与夫人姜氏如齐”，文姜的地位应该低于丈夫。而《公羊传》、《穀梁传》均记载为“公、夫人姜氏遂如齐。”把文姜放在此句记载的主体地位，与姬允并列，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个“遂”字用得很巧妙，“遂”的字面意思是“终于能”，姬允以鲁公身份去见齐侯很正常，用不着做什么努力，这只是说明特别想见姜诸儿的正是文姜本人。

《穀梁传·桓公十八年》还有这么一句话：“以夫人之伉，弗称数也。”意思是文姜处事霸道，对鲁公傲慢无礼。《穀梁传注疏》也记载“夫人骄伉”，说明姬允已经失去了对文姜的控制。文姜在私下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强迫老公带她去齐国，姬允应该是反对过，但没有成功。

姬允想必已经知道了文姜和姜诸儿那些拎不上桌面的风流故事，他明知道此行去见姜诸儿，难保文姜不会旧情复发，再和姜诸儿乱搞一腿。但来自文姜的压力又让姬允感到窝火，同时又无可奈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好去好回。

姬允与姜诸儿会面的地点在泺（今山东济南西北），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完全可以推想出，当姜诸儿和文姜见面的时候，二人的心中会激荡出怎样的浪花。这就好比妻子带上丈夫去见旧情人，妻子当着丈夫的面对旧情人投怀送抱，把一顶绿帽子扣在丈夫的脑袋上。丈夫成了电灯泡，燃烧自己，照亮情敌，这是多么让人尴尬和愤怒的事情。

当姬允意识到此行带文姜是个巨大的错误时，错误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应了那句老话，“该来的，迟早会来”，躲是躲不掉的。有

一次，文姜外出，虽然理由千奇百怪，但姬允知道她是去干什么的。果然兄妹二人一见面，干柴烈火一点就着，立刻宽衣解带，红绡帐中成了好事。

对于一个已婚男人来说，野男人和自己的老婆通奸，是件极伤尊严的事情，没有哪个正常的男人愿意戴绿帽子。姬允对文姜本来抱有希望的，他希望文姜能悬崖勒马，戒掉“毒”瘾，好好跟他过日子。

文姜带着双重满足回到姬允的驻地时，已经忍无可忍的姬允，对着坐在铜镜前自我欣赏的文姜大发雷霆，咆哮之声震动屋瓦。维系夫妻感情的重要纽带，就是忠诚，特别是在男权社会里高端女人对感情的背叛，必然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直接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

虽然姬允得国不正，但他对文姜的感情确实是非常真挚的，当年姬允接纳在江湖上几乎无人问津的文姜，从某种角度讲，是在拯救文姜。不过文姜从来没有这么认为，她甚至认为是姬允破坏了自己和兄长的甜蜜爱情。如果让文姜自己选择的话，她一定会选择留在齐国，与兄长长相厮守。

正是出于这种心态，文姜对姬允毫无好感，更多的是憎恶。在文姜的潜意识中，兄长才是她的丈夫，此生最可托付的人，姬允不过是个同床的路人。姬允冲着文姜发脾气，不但不能改变文姜的执迷不悟，反而激化了文姜对他的这种憎恶之情。对姬允怀恨在心的文姜在丈夫那里挨了骂，转身就去找她的姘头姜诸儿，把自己受的“委屈”全都倒了出来。

历史上还有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和自己的姑妈刘英媚之间的乱伦故事，刘子业为了长久霸占姑妈，毒死了姑父何迈。但刘英媚深爱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和侄子的乱伦深以为耻，只不过畏于强权，不敢反抗而已。

相比之下，文姜的行为尤为恶劣，这是一出红杏出墙被揭穿后，对受害者反攻倒算的人伦闹剧。为了捍卫她所谓的爱情，她不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酿出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变局。

话题再回到姜诸儿身上。老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文姜再怎么折腾，如果没有姜诸儿的配合，事情也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姜诸儿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堂弟公孙无知钩心斗角，最终导致齐国大乱，二公子争位，齐国差点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以姜诸儿的地位，什么样的女人他得不到？偏偏喜欢自己的同胞妹妹。以姜诸儿的本意，如果不是封建礼教所束缚，他都敢立文姜为夫人，这种事情他绝对能做得出来。

和文姜一样，姜诸儿对姬允也有一种莫名的憎恶，他始终把姬允当成自己不共戴天的情敌。正是在这种非理性情绪的推动下，再加上文姜的哭诉，让姜诸儿咬牙决定：做掉姬允，然后和文姜做一对长久的露水夫妻。

姜诸儿明知道杀掉姬允会引发不可预知的外交麻烦，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原因应该有二：

一、他深爱着自己的妹妹，不能容忍妹妹受“欺负”，虽然明明他勾搭人妻在前。

二、自持齐国实力强大，杀掉姬允，鲁国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特别是第二点，是姜诸儿敢于下黑手的主要原因，自古强权即真理，有了枪杆子，即使所有人骂自己，又能改变什么？郑庄公姬寤生与天子交恶，甚至箭伤天子，依然不影响郑国的小霸事业。

自古杀人有罪，但强者无罪，出于这种考虑，姜诸儿理直气壮地干起了这票杀人买卖。其实这个故事的情节很老套：淫妇不喜欢自己

的丈夫，和姘头密谋，杀死丈夫。

我们都知道名著《水浒传》中有西门庆和潘金莲谋杀武大郎的精彩故事，施耐庵以他的如花妙笔，把这段故事写得跌宕起伏，是《水浒》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对比一下，不难发现，西门庆、潘金莲谋杀武大郎，几乎就是全盘照抄姜诸儿、文姜做掉姬允的情节。唯一不同的是，在这两场情杀案中，文姜主动出手谋杀亲夫，而潘金莲则是被动地谋杀亲夫。潘金莲淫则淫矣，但未必毒辣，文姜则是“五毒俱全”。

西门庆很狡猾，他虽然策划谋杀，却是唆使潘金莲给武大郎灌下毒药，而姜诸儿干脆亲自披挂上阵，置亲夫姬允于死地。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94年四月十日，姜诸儿打着国宴的幌子，请姬允赴宴。

当时没有“鸿门宴”一说，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姬允此次赴宴，肯定与文姜乱伦一事有关系。不过姬允虽然想到了文姜会把自己发脾气的事情捅给姜诸儿，但他不相信姜诸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自己下毒手。

姬允对姜诸儿和文姜的性格都不是很了解，这对“奸夫淫妇”为了他们所谓的爱情，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而且姬允也忘记了当年自己是如何杀兄夺位的，他自己做事心狠手辣，却希望别人发善心，岂非荒唐。

这场“鸿门宴”的结局没有任何意外，姜诸儿先是用甜言蜜语打消姬允的戒防心理，然后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把姬允忽悠得找不着北。等姬允醉得不省人事时，姜诸儿给守候在旁边的大力士彭生递了个眼色。彭生心领神会，把如同一摊烂泥的姬允抱进了鲁国公的专用马车，在车上，彭生“拉杀”了姬允，就是折断肋骨，姬允惨叫吐血而亡。

奸夫姜诸儿一直在不远处等待着彭生的好消息，而淫妇应该不在

现场，但以她对姬允的刻骨仇恨，当她得知姬允的死讯时，可以想象得到她的庆祝方式是何等的夸张。

姬允的死，也就意味着姜诸儿可以和文姜长相厮守了，但来自鲁国强大的外交压力，也迫使姜诸儿不得不做出一些虚假的姿态，以缓解鲁国的愤怒。打手彭生为主人办完了事，还没来得及数赏钱，就被姜诸儿杀掉了。

杀彭生，是鲁国对齐国提出的唯一要求。鲁人知道桓公之死，是姜诸儿的杰作，但慑于齐国强大的实力，鲁国不敢提出“更过分”的要求，只好退而求其次，杀彭生泄愤。

鲁国突遭这种弥天大祸，而天下皆知桓公的死因，如果不对齐国施加一点压力，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混迹？这就是鲁人所说的“无所归咎，恶于诸侯”。

姜诸儿远比西门庆幸运，因为他是大国之君，鲁人奈何他不得。西门庆虽然在阳谷县势力大，但奈何武松是个愣头青，一刀就把他宰了。而文姜之所以没有落得潘金莲身首异处的下场，原因有二，一是她背后站着齐侯姜诸儿，二是因为她是新任鲁公姬同（即鲁庄公）的亲生母亲。

特别是第二个原因，虽然姬同痛恨自己的母亲，断绝了母子关系，但在文姜回到鲁国办事期间，姬同并没有加害母亲。估计是文姜受不了儿子的冷眼，在鲁庄公元年的三月，文姜裹着金银细软，乘车狼狈逃回齐国。

如果唯心一些讲，鲁桓公姬允的被杀，不过是在为当年他杀害隐公还冥债，也算得上“死有余辜”，但鲁国世系自桓公以下，皆是姬允的子孙。所以鲁国史家对文姜杀害桓公一案耿耿于怀，极力将文姜描绘成一个万恶不赦的淫妇。

《左传·庄公二年》记载文姜在槁（今山东长清西）幽会时，用了—个特别刺眼的“奸”字。《左传》作为—部正史，书中却记载了大量社会上流人物的八卦故事，如婚外恋、养小三、兄妹乱伦、公媳乱伦，甚至还有祖母和孙子的乱伦。

作为最有名的春秋八婆之—，文姜的“精彩故事”让后人惊叹，《左传》自然不肯放过这个绝好的题材。何况文姜和鲁国有世仇，自然会极尽丑化之能事。文姜和姜诸儿的每次幽会，《左传》都会记录在案。

从鲁桓公被杀，到姜诸儿后来在齐国内乱中被杀，前后相隔八年。在这八年中，《左传》共记录文姜和姜诸儿幽会五次，每次记载都笔带辛辣，极力挖苦。这—次记载文姜邀请姜诸儿共赴宴会，共享二人甜蜜世界，下—次记载文姜窜到齐国军队中见齐侯通奸。

历史是男人写的，特别是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春秋时期，文姜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当时人共同遵守的行为约束，她在史书被抹黑也就不足为怪。“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文姜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是她自找的，不值得同情。

路是自己走的，坑是自己跳的，怨不得别人。

七 一个西瓜引发的血案：齐国宫变

接着上一章，继续讲齐国的话题。

由于兄妹乱伦事件，让齐襄公姜诸儿在八卦史中出尽了风头，历史也牢牢记住了这位另类的齐国君主。在历史上，像姜诸儿以八卦花边闻名的帝王还有不少，比如明宪宗朱见深。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的政治作为，早已经淹没在发黄的旧纸堆中，但人们对他和万贞儿的爱情耳熟能详。

姜诸儿的人生和朱见深非常相似，总结起来有两点：

一、他们都是爱情世界的偏执狂，他们的另类爱情故事不为世人所理解。

二、他们在童年时都受到父辈不公平的对待。朱见深的父亲明英宗土木堡兵变被瓦剌俘虏，叔父朱祁钰即位，朱祁钰废掉朱见深的太子位，贬居冷宫。姜诸儿的叔父夷仲年早死，留下一个儿子姜无知，而姜诸儿的父亲姜禄甫特别疼爱姜无知，允许姜无知享受太子待遇，让姜诸儿在感情上受到了严重伤害。姜诸儿和朱见深的严重偏执症，应该是受到了童年阴影的影响。

不过，二人仔细比较的话，会发现朱见深接人待物的性格要比姜诸儿宽厚一些。叔父朱祁钰那么薄待他，他依然能以德报怨，给叔父上尊号，并给父亲英宗的“仇人”于谦平反洗冤。明朝有两个被隐藏的盛世，一个是明孝宗弘治盛世，一个就是明宪宗的成化盛世。

朱见深追求另类的爱情，但并没有乱伤无辜。而姜诸儿为了满足私欲，不惜大开杀戒，做掉了妹夫姬允，在历史上臭名远扬。都说童年的不幸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这话很有道理，姜诸儿在即位后，变得敏感而多疑，甚至是穷兵黩武，这正是内心没有安全感的外在表现。

虽然姜诸儿和妹妹乱伦的事情为世道所不容，但换个角度看，姜诸儿略显平庸的性格中却隐藏着一股刚狠强戾之气，他想做的事情，不惜代价也要做到。至少姜诸儿懂得一个道理，在乱世中混江湖，一定要明断果决，做事不要拖泥带水，快刀乱麻，一切OK。

在姜诸儿还在做太子的时候，堂弟姜无知因为受到僖公的宠爱，在官场上的地位急骤上升，严重威胁到姜诸儿的政治地位。如果任由姜无知在官场发展自己的势力，姜诸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薄情的父亲拿掉，立姜无知为太子。

从小一起长大，姜诸儿太了解姜无知的性格，这也是个睚眦必报的狠角儿。一旦让姜无知骑到自己头上拉屎撒尿，自己会死得很惨，对于这一点，他坚信不疑。

正因为如此，姜诸儿为了保住自己的太子地位，不得不和姜无知展开残酷的政治斗争。二姜之争，让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了历史上另外一例著名的夺嫡之争，就是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几乎见血透骨的政治决斗。

姜诸儿在失宠之后的悲凉心情，曹丕最有体会，作为最有资格继承大位的公子，却不得不接受来自弟弟的严重挑战。姜诸儿的性格和曹丕非常相似，都是表面波澜不惊，实则阴狠刚戾的人物。而姜无知和曹植自恃受到君主宠爱，根本不把兄长放在眼里，步步紧逼，步步惊心。

由于史料所限，姜诸儿即位前和姜无知的夺位之争几乎没有记

载，但从曹丕防守的惨烈程度上可以推想出姜诸儿当时的困难。曹丕之所以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原因不外三点：

一、曹丕做人低调，从不表现出对世子嫡位的渴求，一切随遇而安，这赢得了曹操的好感。

二、曹丕积极拉拢曹操身边能说得上话的大员，比如拉拢鬼才贾诩，贾诩果然替曹丕美言，几乎是贾诩一言之力，助曹丕上位。

三、曹植不断犯下让曹操愤怒的愚蠢错误。

曹丕一直不太受曹操的宠爱，姜诸儿同样如此。姜禄甫喜欢侄子姜无知的原因，不得而知，估计是姜无知平时接人待物嘴甜勤快，还有可能有些文学上的才华，这才压倒了堂兄姜诸儿，距离齐侯的大位仅一步之遥。

在夺位的竞赛中，姜无知已经将姜诸儿远远甩在身后，但当姜禄甫大限将至的时候，他还是把齐侯的位子传给了姜诸儿，姜无知空欢喜一场。究其原因，应该是有齐国的重臣劝说姜禄甫不要废子立侄，只是史料无载而已。

这个道理能说得通，侄子再亲，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如果姜无知继位，他会不会视姜禄甫如父都是个疑问，姜诸儿再不讨自己的欢心，总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将来传承自己这一脉的香火，还得靠姜诸儿。

五代吴国统治者徐温非常器重自己的养子徐知诰（即南唐先主李昇），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亲生儿子徐知训，只不过徐温死的不是时候，被徐知诰强行夺过位子，建立南唐。

姜诸儿有惊无险地得到了他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打击报复自己的政敌姜无知。不要说姜诸儿心胸狭窄，在任何时代，胜利者都有权利惩罚失败者，不过手段轻重而已。千古一

帝唐太宗杀兄屠弟之后，将十个侄子全部杀死，相比之下，姜诸儿的手段文明了许多。

姜诸儿对姜无知的报复，实际上只是剥夺了姜无知之前享受的太子待遇，严格来说，这算不上打击报复。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姜诸儿身为齐侯，不能再让国中出现另外一个统治中心，换了谁当统治者，都做不到这一点。

父位子承，齐侯的位置本来就是姜诸儿的，结果半路杀出个姜无知，差点抢走姜诸儿的蛋糕。从人性恶的角度讲，姜诸儿有无数个理由处死姜无知，而且也不存在技术手段问题，看看鲁桓公姬允和彭生是怎么死的就知道了。

姜诸儿具有典型的外狠内柔性格，对外人如冬天一般冷酷，对自己人如春天一般温暖。姜无知妄想得到本不属于他的东西，姜诸儿对他还讲些兄弟情面，没有大开杀戒。但即便如此，姜无知对自己失去特殊的政治待遇依然怀恨在心，在他的潜意识中，他既然无限接近了太子之位，那么他就有资格继承齐侯之位。

话是这么说，但当姜诸儿逐渐巩固统治时，姜无知没有任何机会下手夺权，只能心字头上一把刀——忍！自己窝在老鼠洞里，看着敌人风光无限，这种痛苦的煎熬滋味是用语言无法表述的。

从《史记·齐世家》的记载来看，姜无知出现在姜诸儿即位后的历史舞台上，主要有两个时间段。一是姜诸儿即位之初，二是姜诸儿即位的第十二年，也就是说，姜无知整整忍了十二年。虽然史料有限，不过从逻辑上判断，姜无知在这十二年中不会做出格的事情，他依然在忍，同时在等待报复的机会。

关于姜无知的性格，史无详载，但面对强势的敌人，一忍就是十二年，这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特别是襄公四年（前694），姜诸儿设计害死了鲁公姬允，但鲁国依然对姜诸儿毕恭毕敬，这一点应该对

姜无知产生了很大的刺激。男人有权有势有美女，杀人还不受追究，这正是姜无知所追求的人生。对姜诸儿的风光无限，姜无知只有羡慕、妒忌、恨。

同样是忍，姜无知和后世的勾践有所区别，勾践虽然给夫差当马奴，吃粪便，但后来勾践回到越国，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而姜无知什么都没有，无权无势，即使姜无知暗中和齐国官僚阶层往来，也不敢明目张胆。再者，对齐国官僚上层来说，跟着齐侯，富贵等身，谁会 and 受国君猜疑的落魄公子混在一起？此时的姜诸儿还没有犯下明显的错误，统治一如既往地稳固，让姜无知丝毫看不到翻身的希望。

姜诸儿的统治到了第十二年，突然出现了朝着姜无知有利的方向发展的转机。

姜诸儿不算是个明君，也不算是个十足的昏君，他更准确的历史定位是中庸之主。这类帝王在执政时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政治上基本不犯错，生活中小错不断。但话说回来，帝王的家事就是国事，私生活中的一些不太为人所注意的细节往往在历史的放大镜中被放大，直到酿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变局。

细节决定成败，这话说得很有道理，特别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平时都把精力放在大事上，所以他们最容易在一些小问题上犯下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

最典型的就是明世宗朱厚熜，朱厚熜守国有成，但性格过于偏执，好仗势凌人，下人经常被他责打，最终惹出骇人听闻的“壬寅宫变”，朱厚熜差点被愤怒的宫女用绳子勒死。

姜诸儿文治平庸，但武功还算不错，在江湖上拎刀乱砍，和郑、卫等国四处结盟拜把子。在姜诸儿治下，齐国国势虽不说是如日中天，也算得上是稳健发展。但姜诸儿没有朱厚熜那么幸运，同样是下人作乱，朱厚熜逃过一劫，姜诸儿却万劫不复。

姜诸儿被杀的原因，按这几年流行的文艺范说法，就是“一个西瓜引发的血案”。西瓜是不会杀人的，姜诸儿之死，是因为姜诸儿把瓜当成忽悠大臣的工具，结果大臣被他惹毛了，一怒之下，做掉姜诸儿。

被姜诸儿戏耍的大臣就是齐国大夫连称和管至父，在姜诸儿出事的前一年或前两年，他们被国君派到葵丘（今山东临淄西）驻守。虽然葵丘距离齐都临淄不远，但毕竟不如国都锦绣繁华，没人愿意去外面喝风受苦。

从《左传》所载相关资料的字面意义来推测，连称和管至父是不想驻外的，虽说君命难违，但他们应该向姜诸儿表达过自己的不满。为了平抚二人的不满，姜诸儿也做了妥协，与二人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

因为二人是在当年七月瓜熟时节被派驻葵丘的，姜诸儿做出承诺：你们只在葵丘驻守一年，等到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就把你们调回临淄。连称和管至父觉得一年很快就会过去，也就痛快地答应了。

老话说，“君无戏言”，周成王姬诵因为一句戏言要封弟弟姬叔虞，被史官逼着实封姬叔虞于晋。因为君主的权威，一言九鼎，让连称、管至父相信了姜诸儿的承诺。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瓜熟时节，连称、管至父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回临淄享福，谁愿意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喝凉风。但让二人失望的是，等了N天，齐侯的调防令始终没有发到他们手上。

作为臣下，是不能违抗国君命令的，没有姜诸儿的手令，他们不敢贸然回去。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醒齐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就如同甲借钱给乙，约定一年后归还，但时间到了，乙装聋作哑，甲只好“厚着脸皮”催促乙还钱。欠钱的趾高气扬，债主低三下四，连管二人窝囊兼憋屈的心态和债主甲是一样的。

连称、管至父催齐侯调他们回临淄，结果遭到了姜诸儿的拒绝，“请代，弗许”。欠债的成了大爷，借钱的倒成了孙子，没人能咽得下这口恶气。姜诸儿“欠钱不还”，自然让连称、管至父感觉到上当受骗，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二人“谋作乱”。

姜诸儿应该不是忘记了自己一年前的承诺，拒绝调防，而是另有隐情。推测一下，应该有三个原因：

一、据《左传》记载，连称有个妹妹，被送入宫，成为姜诸儿的姬妾，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姜诸儿不喜欢连称的妹妹，“无宠”。姜诸儿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恨屋及乌，所以对连称没有好感。

二、姜诸儿从一开始就没理由地讨厌连称。

三、连称或管至父曾经在不经意间得罪过姜诸儿，而他们自己没有察觉到。

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姜诸儿作为国君，言而无信，戏耍大臣，都理亏在先。更致命的是，姜诸儿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许多官场中人，而当这些失意者站在一起时，他们对姜诸儿的恨就会在瞬间爆发，比如姜无知、连称、管至父，以及连称那个因无宠而生恨的妹妹。

连称、管至父对姜诸儿严重不满，最高兴的莫过于苦苦等待复仇机会的姜无知了。姜无知已经忍了整整十二年，从现有史料上看，姜无知在齐国上层应该没有太硬的关系，否则他不会一忍就是这么多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且连称、管至父在军界人脉甚深，如果能把这二人拢在袖中，姜无知就有很大的胜算扳倒姜诸儿。郁闷了十二年，姜无知当年的雄心壮志也几被磨平，在他即将绝望地沉入水底时，突然发现眼前有一根救命稻草，可以想象姜无知内心的狂喜。

更让姜无知兴奋的是，连称和管至父密谋策划政变的借口，就是姜诸儿当年剥夺姜无知的太子待遇，他们要为姜无知讨还公道。天上掉下来一块大肉饼，不吃那是傻子。

几个政坛失败者聚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三人喝鸡血插草标，结成犯罪小团伙。连称、管至父同意杀死姜诸儿之后，就立姜无知为齐侯，大家共享富贵，作为交换条件，连称和管至父也得到了自己心仪的价码。更让连称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一个额外的红包，姜无知已经答应，事成之后，立连称的妹妹为齐国第一夫人，这还是姜无知当着连妹妹的面亲口说的。

不过姜无知等人暂时无法对姜诸儿下手，倒不是公室戒备森严，而是这几日，姜诸儿不在宫中。在当年的十一月，姜诸儿到临淄西北百余里地的贝丘打猎去了。要想下手，只能等姜诸儿回来再寻找机会，至于能不能成功夺权，“成败得失，非臣所能逆睹也”。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姜诸儿当然不会知道姜无知在暗地里都忙些什么，他的心思早就放在贝丘的田野上，因为这里有数不清的豺狼虎豹，可以让姜诸儿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地歌唱自己的美好生活。至于姜诸儿带没带“夫人”文姜，不得而知。

但让姜诸儿万没有料到的是，他在贝丘的田野中并没有发现狼豺虎豹的足迹，反而碰到了一头奇怪的猪。这头猪的体形非常庞大，这应该是一头野猪。

离奇的还在后面，姜诸儿身边有个侍从，看到这头大猪后，突然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国君请仔细看，这不是一头猪，这是彭生！”彭生，就是八年前受姜诸儿之命杀死鲁桓公姬允的大力士。侍者的话让姜诸儿毛骨悚然，彭生居然投胎变成了一头猪，来阳间找自己索命。

从道理上来讲，是姜诸儿命令彭生杀死姬允的，但为了推卸责任，姜诸儿又杀掉彭生，是姜诸儿负彭生在先。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姜诸儿居然理直气壮地大骂这头据说是彭生投胎的猪，说你这个畜生居然还有脸来见寡人，然后搭箭朝着“彭生”射去。当年姜诸儿杀彭生是杀人灭口，不让彭生把自己杀害姬允的罪恶阴谋捅出来，现在他要杀猪灭口，同样是这个原因。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彭生投胎变猪已经把姜诸儿吓个半死，更不可思议的是，当这头猪被箭射中后，猪突然前蹄离地，站了起来，并冲着姜诸儿发出凄厉的啼叫声。

姜诸儿虽然嘴里强硬，但心里是有鬼的，心虚见不得阳光，被猪这么一惊吓，姜诸儿顿时手足无措。一个不小心，姜诸儿从马车上栽了下来，摔了个狗啃屎，把脚给扭了，鞋子也丢了。

接下来的场面更加搞笑，姜诸儿光着臭脚丫子，被侍人强行架上马车，车夫不敢停留，挥鞭打马，狼狈逃回临淄。

对于治疗外伤，“伤筋动骨一百天”，至少要有几个月的安静休养。东汉末年，小霸王孙策被许贡门客射伤，医生说在治疗期间，不能乱发脾气。孙策不听，到处打人骂人，结果创伤崩裂，二十六岁就永垂不朽了。

姜诸儿也是如此，回到宫中后，他没有安心养伤，而是对身边人非打即骂。姜诸儿在贝丘丢了鞋子，就把怨气发泄在了主管齐侯衣服鞋帽的寺人费身上，赏了寺人费三百鞭子，打得浑身是血。姜诸儿大富大贵，并不缺少鞋子穿，打寺人费只是泄心中的无名火，纯属没事找事。

好在寺人费人品不错，对姜诸儿非常忠诚，即使差点被打死，寺人费也没有丝毫怨恨姜诸儿（奴性深重）。如果姜诸儿打的是杨金英之类的刺头，十个姜诸儿也被勒死了。

但吊诡的是，寺人费似乎非常神通，他提前预感到了姜无知等人会趁齐侯养伤的时候发动叛乱。寺人费咬牙忍着疼痛，前去宫门外等候叛军，虽然他力不能缚鸡，但至少可以通过一些策略，来拖延时间。

对于寺人费被打，姜无知并不知情，但姜诸儿坠车受伤的事他一定知道，否则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发动政变，和连管二人带着人马杀进宫中。《史记·齐世家》也记载：“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宫。”姜诸儿受伤，他的精力都集中在养伤上面，宫中戒备应该不如以前森严，肯定有空子可钻，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叛军杀进宫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准备投靠姜无知的寺人费。寺人费的出现把姜无知吓了一跳，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命令弟兄们把寺人费绑起来，不能让他逃回去通报姜诸儿。

五代安重荣造反，后晋派杜重威前去平叛，安重荣的部将赵彦之出城投降，结果杜重威误认为赵彦之是来挑战的，结果一顿乱殴，赵彦之稀里糊涂送命。寺人费运气要好过赵彦之，至少寺人费还有时间为自己辩解，在被绑的时候，寺人费大声呼冤，说我不是姜诸儿一伙的，我是来给你们带路的。

口说无凭，寺人费把自己的上衣撩开，露出背来，数十道血印证明了寺人费没有说谎，这才取得了姜无知的信任。这个故事情节，和《三国演义》中黄盖苦肉计诈骗曹操非常相似，但姜诸儿和寺人费似乎没有必要搞什么苦肉计，如果发现叛军进宫，姜诸儿早就被人背着跑了，不至于出此下策，从时间上来讲是说不通的。

寺人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花言巧语拖住姜无知进宫，给还蒙在鼓里的姜诸儿赢得逃跑的时间。寺人费拍着胸脯，说这事交给我了，我知道昏君藏在哪儿，公子稍等，我这就进宫，割下姜诸儿的人

头来献。

不得不承认姜无知、连称、管至父等人完全是一伙白痴，他们难道会相信此时的姜诸儿身边会一个侍人没有，能让寺人费轻易杀死姜诸儿？对姜无知来说，最稳妥的办法是让寺人费前头带路，叛军紧随其后，一举除掉姜诸儿。偏偏姜无知就相信了寺人费的鬼话，这伙白痴站在宫门外，让寺人费去取人头。

寺人费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如果自己耽搁的时间太久，很容易引起姜无知的怀疑，所以寺人费很麻利地做好了三件事情：

一、和其他寺人一起把脚部受伤的姜诸儿从床上抱起来，藏到了门后边避难。

二、如果叛军看到床上无人，会很自然地想到床下，所以需要一个人来冒充姜诸儿躺在床上送死。寺人孟阳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估计是孟阳的身材和姜诸儿非常相似，能起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孟阳穿上姜诸儿的衣服，从容上床，然后铺上被子闭眼等死。

三、把宫里所有的人员集合起来，冲出门和叛军决一死战，尽可能地阻止叛军进宫。

这个过程依然用时很长，《史记·齐世家》称“良久”，至少也应该在半个小时左右。这么长的时间，不可能不引起姜无知的怀疑，在宫外等了大半天，姜无知还没见寺人费拎着姜诸儿的人头出来，终于明白被寺人费给耍了。姜无知并不清楚宫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不明，益发引起姜无知的恐惧。

双方交战的地点是在宫门前，具体人数不详。《史记》虽然没有说寺人费带了多少人出去决斗，但留了这么一句“宫中与公之幸臣攻无知”，姜诸儿的幸臣人数应该不会太多，而“宫中”应该是指姜诸儿留在宫里的守卫部队，少说也有百余人。至于姜无知、连称等人的叛军

数量，从宫军被叛军悉数杀死来推断，叛军人数至少是宫军的两倍以上。

论知名度和地位，寺人费在历史上是一个连三线都算不上的小人物，而且他的努力最终也没有让姜诸儿逃过一劫，但他的忠诚和勇气让历史百般不得其解。在无端被暴打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愿意为丧心病狂的姜诸儿送死？

宫女杨金英等人因为不堪忍受明世宗朱厚熜所谓采阴补阳的变态行为，发动宫女暴动。无论成功与否，杨金英们都知道自己会惨死在政权机器之下，这恰说明杨金英们的刚烈，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寺人费以德报怨，固然可敬，但孔子说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寺人费最正确的做法是杀死姜诸儿，然后再和姜无知决斗。面对污辱和压迫，一味讲究以德报怨，是一种怯懦的表现，算不得真的勇士。

当然，寺人费在这场混乱的战斗中战死，至少不能认为寺人费是懦夫，只能说他对德与怨的理解有误，真正的懦夫不会为了别人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于寺人费，姜无知想必是充满了恨意，但姜无知更关心的是姜诸儿的下落。

一直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疑问，连称的妹妹得不到姜诸儿的宠爱，已经答应做姜无知的内应。但这场政变中，丝毫看不到连妹妹的身影，史家皆无着墨。当初姜无知告诉连妹妹，说你给我刺探姜诸儿的情况，事成之后封为夫人。

这是一笔明码标价的交易，连妹妹为了能当上齐侯夫人，肯定会使尽浑身解数，全程监控姜诸儿的动向，她也有这个便利条件。她身边应该有自己的心腹人，对外传达绝密消息并非难事，寺人费在宫内使诈，连妹妹没有任何反应，这一点非常奇怪。

不过当叛军闯进宫里，连妹妹之于姜无知的作用已经降至冰点，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内应，姜无知都已经基本控制宫内。宫中姜诸儿派系的人马被扫除干净，姜无知相信宫里只有姜诸儿一个人，躺在床上绝望地颤抖。

说姜无知是个白痴并没有冤枉他，他没有想过这一点，既然寺人费是姜诸儿的嫡系，寺人费肯定会把自己发动政变的消息通知姜诸儿，姜诸儿又怎么可能还平静地躺在床上等死？

当姜无知闯进寝室，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居然没有反应过来，真以为这个人是姜诸儿，挥刀一通猛砍。杀死孟阳的，极有可能就是姜无知本人，因为他太痛恨姜诸儿了。但快感过后，姜无知才发现上当了，姜诸儿根本没在床上，是孟阳替姜诸儿挨的刀。房间里没有发现姜诸儿的踪迹，姜无知几乎绝望，如果让姜诸儿逃到宫外，以齐侯身份号令天下勤王，胜负尚未可知。

话题再回到之前寺人费藏匿姜诸儿，寺人费对姜诸儿的忠诚没得说，但他缺少急智。有藏姜诸儿的时间，不如把姜诸儿背出宫，或者藏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藏在极易被发现的门板后面。

北朝的齐王高澄遇刺时，就是钻到了床下，虽然最终高澄也难逃一死，但总比藏在门后的安全系数相对高一些。更要命的是，姜诸儿的脚部有伤，根本不可能站立太长的时间，等姜诸儿坚持不住的时候，他的末日也就到了。

细心的姜无知果然发现了破绽，在门的后面露出一只没穿袜子的大脚，不问可知，姜诸儿就藏在门后。随着姜无知发出一声凄厉的指令，叛军乱刀齐下，姜诸儿呜呼毙命。

姜无知忍了十二年，终于手刃仇人，报了当年被贬的一箭之仇，心中的快意可想而知。齐国的天下，也很自然地落在了姜无知的手上，在一帮狐群狗党的欢呼声中，姜无知春风满面地即位。

虽然在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应该相信阴阳轮回之说，但有时在翻看历史书的时候，总能强烈地感觉到冥冥之中仿佛真有天意。直言之，就是“你用什么方式得到的东西，就会以什么方式失去”。姜诸儿因为薄待大臣，被连称、管至父纠结姜无知乱刀砍死，而让人大呼荒谬的是，姜无知居然丝毫不长记性，刚上台没多久，就走上了姜诸儿的老路。

姜无知只记得姜诸儿当年欺负自己，却忘记了自己在受欺负的同时，还在欺负别人。这个人就是葵丘大夫雍稟。姜无知欺负雍稟的时间和原因均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雍稟对姜无知的仇恨，远胜于姜无知对姜诸儿的仇恨。

人的本性是记仇不记恩，雍稟牢记姜无知曾经带给自己的耻辱，无时无刻不想报仇雪恨。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姜无知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虐过雍稟，他居然有胆量大摇大摆地跑到雍稟的地盘上撒野。公元前685年初，姜无知来到雍林打猎，结果刚到雍林，还没来得及射兔子，就被雍稟的人马突袭车驾，姜无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挂掉了。

历史有时很有趣，姬允杀死了姬息姑，姜诸儿为姬息姑报了仇；姜无知杀死了姜诸儿，为姬允报了仇；雍稟杀死了姜无知，又为姜诸儿报了仇。江湖的魅力就在于此：不知道自己是谁的终结者，谁又是自己的终结者。

自郑庄公姬寤生和周天子交恶以来，江湖上就属齐国发生的事情最热闹，先是兄妹乱伦，接着兄弟群殴，精彩桥段接连上演。姜诸儿、姜无知这对兄弟的恩怨情仇已经化为一缕烟云，消散在空中，但齐国兄弟之争的精彩故事还没有结束。

八 千古一相说管仲

（上）

说到千古一帝，我们在第一时间会想到谁？肯定是秦始皇嬴政。历代数百个皇帝，无论功业如何，都无法超越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因为嬴政是开天辟地第一帝，仅此足矣。

那么，千古一相呢？

有人会提名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的知名度最高，三岁小儿都知道诸葛亮。有人会提名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影响后世一千年。有人会提名张居正，因为张居正的铁腕改革几乎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当然，也会有人提名管仲。

管仲何人？集政治家、改革家、经济学家、军事家、战略家、阴谋家于一身的一代铁血枭雄！从某种意义上讲，管仲堪称春秋第一人，伟大如孔子，对管仲也是俯首膜拜。说春秋，道春秋，是不可能绕过管仲的。

自古英雄出乱世，曹操之所以垂名青史，建立不朽功业，和他所处的大分裂时代是分不开的。如果生在承平时代，曹操即使能位列三公，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名声震破天。

管仲同样如此，正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名著《双城记》开篇所讲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

一个风从虎、云从龙的伟大时代，风云际会之时，必有英雄横空出世，书写着属于他们、也属于历史的热血传奇。春秋初期，诸侯征伐，天下未定，霸主不知何在。强横如郑庄公姬寤生者，也不过是春秋一小霸，还不足以镇服天下。正是管仲的出现，才算拉开了春秋五霸轰轰烈烈的舞台大幕。

曹操的成功，有一部分功劳可以归于荀彧、郭嘉等超级谋士，但曹操本人就智计双绝，而且性格霸道，曹操要成不了大事，天理也不容。而管仲在本集团中所处的政治地位，更接近诸葛亮之于刘备。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刘备的乘龙上天；没有管仲，就没有齐桓公姜小白的不世霸业。

姜小白能力是有的，但他的性格过于随意好动，如果没有一个性格强硬的管家看着他，别说成霸业了，能活到哪天都不知道。历史上“君强相更强”的例子，除了姜小白与管仲，还有一对著名的君臣组合，就是五胡时前秦名相王猛和天王苻坚。

不比这两对君臣的功业，只说性格。王猛与苻坚的性格对比，简直就是管仲和姜小白的翻版，相似度高达99%。

管仲、王猛：性格霸道，做事果断，心思缜密，遇事稳重，绝不动摇地推行自己制定的政策，具有浓烈的枭雄气质，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铁血宰相。最不可思议的巧合是，他们在出任宰相之前都曾经做过小买卖糊口。

姜小白、苻坚：天生贵族，性格活泼好动，待人接物过于感性，自己主要负责对外战略，内政基本交由管仲、王猛处理。二人的自控能力较差，耳根子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容易犯战略性错误。

结局：管仲、王猛都死在君主之前，他们死后，姜小白、苻坚无人看管，任性胡为，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历史惨剧，姜小白破家，苻坚亡国。

从年龄上看，管仲应该比姜小白年长二十多岁，王猛比苻坚年长十三岁，可以算是父辈人物。实际上，姜小白一直尊称管仲为“仲父”，苻坚对王猛也几乎以父礼相待。从这个角度讲，管仲和王猛承担着政权的内政外交重任，同时也是自己君主的监护人。

如果说王猛是十六国时期最耀眼的政坛巨星，那么春秋早期最耀眼的政坛巨星，也只能是管仲。对后人来说应该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在不经意间选择了这个之前并不起眼的中年人，他却还给历史一段不可磨灭的江湖传说。

先讲一讲管仲的家世。

根据《史记》记载，管仲是颍上人。颍上就是今天的安徽省颍上县，颍上县在安徽中部的淮河北岸，与历史名城寿阳（今安徽淮南）一水之隔。对于这个改变春秋历史的伟大人物，史书上称为管仲，其实他的名字叫管夷吾，因为他死后的谥号是“敬仲”，所以后人就称他为管仲。

关于管仲的生年，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一般来说有两种说法，一是生于周平王四十八年（前723），一是生于周桓王四年（前716）。此时西周早已经滚进历史坟墓了，由郑庄公姬寤生开始，各路诸侯夹杂着周天子，红头涨脸地大打扯皮战，江湖上鸡毛乱飞。

三国人韦昭说管仲本姓姬，又出自管地，所以管仲极有可能是西周初年发动叛乱的管叔后裔。不过就算管仲是周天子的后人，也无法遮掩他的寒酸出身，汉末那位刘皇叔成天扛着“大汉孝景皇帝阁下玄孙、中山靖王之后”的铝合金招牌四处跑马拉赞助，也没见他捞到几文铜钱。

社会底层出身的人物，对权力的渴求度，远远高过出身高贵、有良好施政平台的官二代或官N代。但没有官场中的关系，想进入官场呼风唤雨，难度可想而知。

在春秋及以前的时代，社会阶级是固化的，奴隶主天生是奴隶主，奴隶天生是奴隶，只有中间的平民阶层，偶尔会打破这种权力垄断，挤进统治核心层。

管仲没有关系，没有背景，他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要出将入相，笑傲凌烟阁上，而是先活下来。和历史上那些草根英雄未发迹前做小生意糊口一样，管仲也做起了小买卖，刘备卖过草鞋、王猛卖过畚箕、刘裕卖过草席、柴荣卖过伞，而朱元璋干脆就是个叫花子。

管仲家贫如洗，身无分文，没本钱还做哪门子生意？好在朋友鲍叔牙很支持管仲，出资帮助管仲经商。不过在春秋时代，经商做买卖的多是出身平民阶层的人物，贵族是不屑于经商的。

管仲曾经给商人的社会地位定调，就是著名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士农工之后，说明当时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君子耻于言利，出身士人家庭的，甚至都有权利折辱商人，地位也只比奴隶高一些，属于社会下层人士。

春秋时代的商人，就相当于现在在市场上流动经营的小商贩，受欺负是免不了的。管仲在南阳（当是齐地，非今河南之南阳）做生意，就至少三次被当地的泼皮恶霸砸过摊子，同行的还有鲍叔牙。

汉人刘向所著的《说苑·尊贤》说管仲在南阳经商时，曾经做过“狗盗”，就是高级扒手，“身手”也应该十分了得，可见管仲当时的落魄。

管仲沦落到这种地步，足以让后人歉歉，刘备混不下去的时候都没这么惨。好在管仲并没有因此丧失生活的勇气，就像韩信一样，胯下之辱，天下笑骂，韩信依然豪情满怀。

管仲做生意赚到多少钱，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管仲经商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经商，管仲熟悉并掌握了经济原

理，为日后管仲伟大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再用王猛与管仲对比一下，二人都曾经在落魄时经过商，天南海北地跑，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了很深的了解。王猛执政后，对如一潭死水般的官场进行雷厉风行的大变法，特别是轰轰烈烈的经济变革，直接奠定了前秦统一北方的经济基础。

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出除王猛之外，人生轨迹、性格特质与管仲如此相似的铁腕人物。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二人不仅性格优点相似，他们的性格缺点也几乎如出一辙，就是贪婪权与钱。具体地说，王猛贪权，管仲贪钱。

前燕吴王慕容垂在国内受猜忌，西奔投奔苻坚，受到苻坚的重用，这引发了王猛强烈的嫉妒。王猛为了打倒慕容垂，玩了一把金刀计，虽然没有害死慕容垂，却直接断送了慕容家族日后复兴的希望——英明神武的慕容令。

管仲情况稍好一些，他没有因为贪权而害人，但他贪财的行为让人摇头。鲍叔牙每次外出经商都带着管仲，赚到钱后，兄弟二人准备分钱。也许是管仲穷怕了，见着钱就眼红，根本不顾鲍叔牙出的力比他大，独贪了大头。好在鲍叔牙大度，从来不以此事责怪管仲。

对于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一下子拥有这么多金钱，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不过管仲虽然贪钱，但他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知道他想要得到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管仲积累这么多财富，应该是准备用在官场疏通关系上。官场从来就是菜市场，按斤称金银，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管仲暗中存钱用在官场上，是可以说得通的。也许是鲍叔牙理解管仲这一点，所以他在金钱上不和管仲做这些计较。

春秋时代的官员仕进之途和魏晋非常相似，基本上靠血缘传承，

阶层基本固化。像管仲这样没有关系的底层人物，仅凭金钱也未必能爬到多高的位置，毕竟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管仲所能选择的职务范围非常狭窄。

管仲在官场上谋得的第一个职务，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管仲做公子姜纠的傅（相当于后来的诸王师傅），梁启超说这是“管子初入政界之始”。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管仲在跟着姜纠做事之前，曾经在官府中做过“弼马温”，应该是个养马的官，地位低下，为人所轻视。

不清楚管仲是通过什么门路和公子姜纠搭上关系的，不排除管仲为此花费了大把银子，有钱能使磨推鬼，历代都是如此。姜纠是齐僖公姜禄甫的次子，长子是上面讲到的齐襄公姜诸儿，幼子便是日后威震天下的齐桓公姜小白。姜禄甫应该只有这三个儿子，否则在姜诸儿死后，齐国大臣没必要等待身在异国的姜纠和姜小白回国即位。

虽然姜禄甫确定姜诸儿的继承人身份，即使姜无知有夺嫡的希望，但能傍上公子纠，说明管仲已经进入了齐国权力最高层的外围，一旦姜纠有机会乘龙上天，管仲就是现成的齐国宰相。另外说一点，给公子（王子）当先生，首先不可能是胸无点墨。这说明管仲在之前经商时肯定恶补过诗书，为日后进入官场做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管仲是和他的两位好友携风卷云杀进来的，一位就是鲍叔牙，另一位是召忽。“管鲍之交”感动千古，实际上确切地称呼是“管鲍召之交”，刘张关誓死不分，管鲍召同样如此，《吕氏春秋·不广》就说管鲍召“三人相善”，罗贯中写“桃园三结义”时，很可能就是受管鲍召之交的灵感。

姜禄甫似乎对管鲍召三人都非常欣赏，从现有史料上来看，管仲、召忽相姜纠，应该在鲍叔牙相公子姜小白之前。也就是说，管仲进入官场后，鲍叔牙可能还在做生意，但应该在官场有一定的知名度。

前文讲过，姜禄甫最喜欢的是侄子姜无知，三个儿子皆无宠。除了姜诸儿有惊无险地保住了太子位置，对于另外两个儿子，姜禄甫也没有特别安排，只是找来管仲等人给小哥俩当管家，别让这俩小子堕落成野孩子就行。

应该是得到了管仲、召忽的推荐，或是其他人力荐，姜禄甫准备请鲍叔牙出山，给姜小白当管家，没想到鲍叔牙却推辞了。这不仅让姜禄甫感到意外，管仲同样意外，不过召忽却支持鲍叔牙的决定。

召忽为人非常重情义，他不希望鲍叔牙辅佐姜小白，而是想把鲍叔牙拉到姜纠的旗下，兄弟三人一起谋富贵。召忽之所以如此看中姜纠，可能是因为姜纠在兄弟中排位仅次于姜诸儿，一旦姜诸儿有个三长两短，姜纠是最有希望继位的。至于姜小白，在召忽看来并没有特别之处，所以召忽把宝都压在了姜纠身上。

鲍叔牙不想给小白做傅的原因居然是和齐僖公怄气，鲍叔牙同样轻视姜小白，在他看来，姜小白只是一具政治僵尸。国君让他辅佐姜小白，分明是瞧不起他。

但召忽和鲍叔牙的决定遭到了管仲的强烈反对。管仲出任姜纠的师傅，看来并非他的本意，如果能自主选择，管仲宁可放弃姜纠，投身姜小白旗下。

在几乎所有人都轻视姜小白的情况下，管仲却慧眼识珠，一眼就看出姜小白虽然落魄，但绝非池中之物。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自姜诸儿以下，诸公子中最有希望继位的，除了姜纠，就是姜小白。即使姜小白劣势非常明显，谁又敢说姜小白一定不能继位？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多点投资，确保我们的利益。

二、姜纠虽然比姜小白在政治上更具优势，但姜纠的母亲是鲁国

人。齐人和鲁人恩怨甚深，所以恨屋及乌，并不喜欢姜纠，姜纠在国内没有民意基础。而姜小白的母亲是卫国人，曾经得到国君（齐僖公）的宠爱，小白之母早亡，齐人普遍同情这个孤儿。

三、姜纠能力一般，即使他获得齐侯之位，也未必守得住。如果姜纠守不住，上台的必然是姜小白。

综合以上考虑，管仲劝鲍叔牙去辅佐姜小白，也算是给我们兄弟三人留条后路。管仲已经把话点得非常明了：万一姜纠不成气候，姜小白上台，势必对姜纠的势力，比如管仲和召忽进行政治清洗，但如果有鲍叔牙在身边，管仲和召忽的人身安全就有了最起码的保障。反过来讲，如果姜小白倒台，则管仲、召忽也会尽全力保护鲍叔牙。

这就是管仲的过人之处，知道两边下注，旱涝保收。狡兔三窟，做事时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自己置之死地，马谡就是这么完蛋的。从后来姜小白要杀管仲泄愤，但被鲍叔牙死命相救来看，管仲布下这招闲棋冷子是何等的英明！

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管仲如此看中姜小白的政治能力，却劝说鲍叔牙一定要忠于姜小白，对姜纠不惜往死里整。而管仲对他所欣赏的姜小白同样是往死里打，半点情面和后路也不留。最经典的一幕，就是后来姜小白在路上与管仲狭路相逢，管仲恶狠狠的那一箭，差点射死姜小白。

至于管鲍召讨论鲍叔牙是否辅佐小白的的时间，应该在齐襄公姜诸儿继位之后，《韩非子·说林下》对此事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君（姜诸儿）乱甚矣，必失国。”而管仲、召忽奉姜纠，鲍叔牙奉姜小白为避齐国内乱，狼狈出逃国外，具体的时间，从《左传》记载来看，应该是在姜诸儿即位之初。也就是说，管仲在姜诸儿即位之后，劝鲍叔牙辅佐姜小白，就是在为出逃避难做长远打算。

按照管仲“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理论，姜纠和姜小白是分

开逃的，姜纠带着管仲、召忽逃到鲁国，这是姜纠的姥姥家，姜小白则去了莒国。二国距离齐国都不远，一旦姜诸儿出事，国内无主，也方便他们回国争位。

姜纠和姜小白残酷争位的“龟兔赛跑”故事，会在后文中详细解读，这里只说姜小白即位后，鲁国在姜小白的压力之下杀死姜纠，召忽绝望自杀后，管仲被押解回临淄见姜小白的情况。

从表面上看，管仲辅佐的姜纠彻底失败，管仲的政治生命也几告终结，但管仲并没有恐慌。原因其实很简单，管仲安排的“卧底”鲍叔牙是姜小白最信任的人，有鲍叔牙在，管仲虽置身虎口，却安如泰山。本质上，姜小白非常情绪化，容易记仇，如果不是鲍叔牙从中打圆场，愤怒的姜小白早就把仇人管仲撕得粉碎。

姜小白虽然自控能力差一些，但他是爱贤的。在鲍叔牙的反复劝导下，他已经接受了鲍叔牙的大度让贤，先把管仲从鲁国捞回来，然后出将入相，共图大业。当然管仲很聪明，姜小白对自己还是有些怨恨的，心里憋着一股无名火。不如因势利导，把小白的无名火引出来，年轻人心里有气会憋坏身子的。

管仲的演技很好，在见姜小白的时候，管仲让人拎着把大斧头站在自己身后，语态谦卑的请姜小白处死他。姜小白知道管仲在演戏，大家都是跑堂会的演员，在做作一番后，姜小白正式赦免了管仲的射君之罪，与管仲同乘一辆车，回到宫里。“礼之于庙，三酌而问为政”。正式拉开了历史上这一段热血传奇的序幕，历经漫漫严冬的刀侵霜逼，管仲的春天终于来了。

这一切其实皆在管仲的预想与掌控之中，先让鲍叔牙辅佐姜小白，等姜纠失败后，由鲍叔牙出面劝说姜小白重用自己。算盘打得如此精明，分毫无差，已经让人对管仲的战略水平无语凝噎了。算计人到了这种程度，在佩服的同时，也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历史上能在自己不得志时就把自己的未来算得如此精细的，除了管仲，也就是王猛了。王猛的过人之处，就是在苻生还在位的时候，就一眼看出苻坚是池中潜龙，通过各种关系慢慢接近苻坚，最终取得苻坚的信任，一飞冲天，立下不世功业。

像管仲、王猛这样的铁血人物，决定了他们的帝王级合作者在性格上不能和他们相同，否则性格上的矛盾是很难让这样的强强君臣组合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的。要说历史上君主与宰相皆是铁血人物的组合，只有五代周世宗柴荣和他那位性格刚硬的宰相王朴了。

姜小白为人孩子气，却有主见，骨子里是非常阴狠的，像这种性格，鲍叔牙就很难控制得了。鲍叔牙为人过于谦和，手腕不狠，他可以得到姜小白发自内心的尊重，但姜小白不怕他。而管仲不同，管仲阴狠霸道，做事刚硬，发起火来，天不怕地不怕，正好能在性格上压制住姜小白，这也为管仲日后施展才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性格平台。

九 千古一相说管仲

（中）

上面讲了，姜小白和管仲的携手是“珠联璧合”，就如同苻坚与王猛的“婚姻”一样，刘备与诸葛亮也是如此。管仲获得了他所希望得到的所有内部有利条件，姜小白买来了菜，鲍叔牙准备打下手，现在就看管仲如何切菜下锅了。

讲到管仲在齐国的全方面改革，就不得不提及管仲留给后世的那部震烁千古的政治巨著《管子》，先讲一讲《管子》一书的来龙去脉。

历代对《管子》是否为管仲所作，争议非常大，在疑古派阵营中，以宋人朱熹的意见最有代表性。朱熹在《朱子语类·战国汉唐诸子》中认为：“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绝不是闲工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大意是管仲作为齐国宰相，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著书立说。另外，作为法家的管仲，其《管子》书中夹杂着大量道家语言，有明显的老庄文风。

在先秦诸子中，《管子》号称最为难读。因为其他诸子之作多限于一种学术范围内，如《论语》讲仁义，《老子》讲哲学，《韩非子》讲法术，而《管子》什么都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哲学、外交、货币、全民道德，涵盖范围极广，可以说《管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

学术界普遍认为《管子》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管子学派的集晶

之作，这个观点倒也有道理，但问题是，清人章学诚针对众多疑古派对管仲著《管子》的问题说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

春秋时诸侯是有史官的，齐国史官会把管仲在公开场合谈论的话记录下来，然后最终由稷下学宫整理而成。清人孙星衍也说过：“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记录遗事，报其知遇。如《管》《晏》《吕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

不要说《管子》，就是《论语》，也是孔子的后人根据孔子的言论辑录而成。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结果弄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实在没有必要。所以《管子》所载的关于管仲的施政方针，是完全可信的。

管仲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之多，让人惊叹不已，而且各门类实现了全覆盖。从某种意义上讲，齐桓公姜小白只是一个管仲用来实现个人抱负的工具，换句话说，与其说春秋五霸第一霸是姜小白，不如说是管仲。

管仲留下了许多后人耳熟能详的传世名句，大致有以下几条：

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权修》

大者王，小者霸。——《五辅》

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枢言》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

——《国蓄》

匹夫为鰥，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揆度》

特别是前三条，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可见管仲思想之于后世的巨大影响。

《管子》洋洋洒洒八十六篇（现存七十六篇），数十万字，但关于管仲的施政纲领，在《小匡》中记载得最为详细。这也是齐桓公姜小白在与管仲一笑泯恩仇后，以学生之礼请问管仲何以治国时，管仲的回答。这段问答，姑且称为《君臣问对》。

在《君臣问对》中，管仲首先讲的是君王治人之术，具体怎么做，实际上就四个字，“赏罚分明”。管仲的原文是“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通过有效公正的赏罚制度，稳定人心，然后才能施政。

管仲是历史公认的法家鼻祖，他关于法术治国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历史，晚管仲三百多年的韩非就是管仲的忠实崇拜者，《韩非子·二柄》几乎就是管仲法术思想的后现代版解读。

姜小白问管仲：“何以御民？”管仲的回答强硬有力：“在于六秉，即杀、生；贵、贱；贫、富。”不过管仲没有韩非那么重的杀气，动辄喊打喊杀，《韩非子》一书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韩非更侧重于法术，而管仲则要考虑经济发展之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安定，这正是管仲所说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百姓都吃不上饭了，还讲什么以法治国，完全是空中楼阁。

关于管仲的经济思想，一言以蔽之：富民主义。

这是管仲比韩非看得更透的地方，特别是在《五辅篇》中，管仲

讲了一段极富人性哲理的谈话，原文是：“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社会安定与否，其实评判标准再简单不过，就是管仲所说的这个标准。

关于“欲”，儒家推崇仁义道德，强调个人对物欲的节制，而法家又推崇物质刺激，强调以利诱人，忽略了社会教化功能。管子是法家，但他的“法”属于轻法，因为管仲在强调人的动物性（追求物质）的同时，更注重人的社会性（仁义道德）。

儒家说性本善，法家说性本恶，都有道理，又都有偏颇之处，只看到了硬币的各一面。管仲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看到了硬币的两面。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是有物质欲望的，这是社会教化的基础。

《吕氏春秋·孟冬纪》对人性看得很清楚，“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荀子·国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物质是有限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对于人的本能欲望所形成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应该因势利导，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百姓的欲望，而不是一味打压，否则，是非常愚蠢和危险的。

只有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物质需要，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受官府统治，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教化，进而巩固统治。历代之所以兴，无不使民得其所欲；历代之所以亡，无不轻民欲，尽天下之财货以奉一人。

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各阶层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说是妥协。管仲所说的“民欲”，其实就是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对物质的合理追求。中下阶层是任何一个政权维护稳定的基础，满足了这部分人对物质的基本需求（活得有尊严），社会是乱不起来的。不要动辄指责老百姓仇富，老百姓只要满足了自己并不多的物质需求，对富裕阶层最多只是羡慕，

而不是嫉妒恨。

人的动物属性，决定了人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虽然百姓是被统治者，但他们可以决定一个政权是存在还是灭亡，即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如何才能实现强国富民，以安天下？管仲开出的药方是：

一、减轻对劳动者的压榨程度，即“薄赋敛”，让老百姓更多的获得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是让民致富最简单的办法。

二、减轻刑法，不论是肉刑还是死刑，都会减少青壮年劳动力，进一步影响国家的安全稳定。

三、建设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在乡间多设贤士，通过榜样的作用带动人心向善。

四、增加人口，这是执行第一、第二条政策后所产生的效果。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政府减少税收，财政怎么办？无论是政府开支，还是军事开支，以及社会教化，哪项不需要花钱？姜小白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反而要对民间征收房产税、树木税，甚至是六畜税，但都被管仲否决了。

姜小白有些不爽：“没钱，我吃什么？”

管仲笑了：“我们可以向大自然要效益。”管仲的原话是：“唯官山海为可耳。”

所谓山海，指的就是铁和盐。齐国地处渤海之滨、黄海之侧，有丰富的海盐资源，而且境内多山，铁资源丰富。管仲敏锐地发现了矿产资源之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向大自然攫取财富，不是直接从老百姓身上剪羊毛，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受到太大损害。既维护了社会稳

定，又扩展了政府财政，政治、经济皆得其利，可谓两全其美之上策。

当然，管仲提出的课盐铁之税，最终埋单的还是老百姓。特别是盐，盐与粮食一样，是人为了保持正常生存状态必须吃的，“无盐则肿”。而管仲的盐铁政策是官方绝对控制，垄断经营，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除非你想做白毛女或白毛男。

管仲给姜小白算了一笔账，一个成年男子每月吃五升半的盐，成年女人每月吃三升半，未成年人每月吃二升半。每升盐市价多收二钱，每月的国家收入能有二百万钱。一个千万人口的国家，每月的国家收入就能达到六千万钱。如果我们只征收税赋，那么征收范围只能限定在成年人，未成年人这块的收入我们就得不到了。向成年人征收税赋，每月我们只能收到三千万钱，比卖盐少了一半收入。如果要想通过税赋达到六千万的收入，就只能搜刮未成年人了，这势必引发百姓的不满，社会动荡。

不过，并不能因此就说管仲是绕着弯地搜刮民财，管仲这么做，实际上更体现他的爱民情怀。如果管仲贪百姓之财，大可以一方面加重百姓税赋，一方面再高价卖盐。反正无论提不提高税赋额度，老百姓都是要吃盐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说穿了，就是让老百姓手里有余钱买东西，这样才能刺激市场繁荣。如果老百姓的那点钱都被官府搜刮了去，或被套牢，拿不出钱买东西，市场只会进一步萎缩，进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

管仲的逻辑就是少征收税赋，让老百姓多积蓄，然后拿出一部分钱来购买国家专营的商品，如盐铁。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有了收入，老百姓手上还有大量余钱。老百姓手上了钱，会从政府设置的官商那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扩展生产规模，提高生活质量，形成一个良

性循环。

上面讲的是管仲的经济思想，但具体如何实施？管仲也给出了答案，就是著名的“士农工商，各行其业”，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社会生产体系进行细致分工的记载。

人不是万能的，总要有个专长，不可能既会写文章、种地，又会打铁、纺织、做生意，所以社会生产就有了明确的分工。管仲提出的社会分工理论，要求士、农、工、商各自形成一个圈子，互相之间不跨行，这样才能形成产业优势。

虽然士与农的地位排在工与商的前面，但齐国的经济支持产业是“工”，主要是纺织品。《汉书·地理志》对此有明确记载：“（自管仲经济改革之后，齐国的）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唐人颜师古在这一条后注释：“言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来自齐国的纺织品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这份功劳，主要是管仲的。

如果没有合理成熟的商贸运营体系，再好的商品也要烂掉。管仲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有意识地将商人出国经商置于自己的经济外交理论之下，通过经济战打垮诸国的经济体系，使之在经济上失去与齐国对抗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加速齐国的称霸事业。

管仲的对外贸易是有选择的，理论根据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敌国缺少什么商品，我们就大量制造这样的商品，实行价格垄断，逼着你出高价买我的商品。有哲人说过，控制敌国的政治，不如控制敌国的经济，一旦齐国的商品填满了各国的市场，天下尽在管仲掌中！

在鼓励本国商人出国经商的同时，管仲还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国商人来齐国进行贸易。管仲规定，凡外国商人，来齐国交易一车商品，齐国政府会给他提供饮食住需；拉三车商品，政府会给他

的马匹提供草料；拉五车商品，政府会提供五人的专门服务。看到来齐国经商有厚利可图，各国商人潮水般涌向齐国，“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国的商品贸易空前繁荣。

表面上看，管仲是个经济学家，把齐国经济搞得有声有色，实际上管仲是个为了齐国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家，经济只是管仲对外称霸的一个工具。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管仲通过鲁缙打垮鲁国的经济基础，迫使鲁国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归于齐国霸业之下。

春秋初期，鲁国算是中等强国，有能力给齐国制造大麻烦，比如著名的长勺之战。柯地会盟时，鲁人曹沫执刀劫持姜小白，逼迫姜小白吐出之前强抢的鲁国地盘。齐国霸业初建，羽翼未丰，很难用军事手段解决来自鲁国的威胁，那就只能在经济战线上给鲁国找找麻烦了。

管仲是打经济战的行家，具体的“作战”任务由管仲来安排。管仲深知要打垮鲁国的经济，首先要想办法使鲁国多种经济变成单一经济，而且是受制于齐国的单一经济。

在管仲的授意下，齐桓公姜小白突然下令，禁止齐人穿齐国生产的纨布衣服，而改穿鲁国生产的缙布。由于齐国的外贸大头就是纺织，此举对齐国纺织业的打击可想而知，民怨四起，但姜小白还是坚定地执行了管仲的计划。

天上掉下来一块喷香的大肉饼，鲁人都笑傻了，没有多想，就张嘴接住了。因为齐国人口非常多，所以鲁国生产的缙布供不应求，为了多从齐人身上拔毛，鲁庄公姬同发动国内所有的纺织作坊，没日没夜地赶制缙布。

看到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进鲁国，上至国公，下至百姓，兴奋得合不拢嘴。但鲁人很快发现有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鲁国的纺织业工人太少，跟不上齐国发来的订单。

鲁庄公估计是想趁此机会控制齐国的纺织品市场，下令让国内的农民都改行做纺织工，种地的收成微薄，不如改行织布，一来能赚钱，二来也能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何乐而不为？

鲁人一窝蜂地弃农从织，导致田地荒芜，鲁人的粮食问题日渐突出。等到姬同发现中了管仲的圈套时，已经来不及了。管仲下令，严禁齐国从鲁国进口缟布，同时立刻恢复齐国本国的纺织生产，齐人并不缺衣服穿，但鲁人因为得不到齐国的缟布订单，已经没粮食吃了。

齐国不但是纺织品大国，更是粮食生产大国，有足够的粮食销售到鲁国。但问题是，管仲“无耻”地提高齐国的粮食价格，鲁人没粮食吃，只能一边骂着管仲，一边出高价购买齐国的粮食。鲁人之前通过销售缟布从齐国赚来的银子，统统还给了齐国。更要命的是，鲁国的粮食命脉至少在一年时间内被齐国牢牢扼住，姬同实在没办法，只好向姜小白求饶，答应奉齐国为老大。

管仲的经济外交战之厉害，于此可见一二！不过并不能因为这件事责备管仲心肠恶毒，孟子曾曰，“春秋无义战”，大家屁股都不干净，谁也别指责谁装大尾巴狼。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维护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道德。姬同指使曹沫不顾道义地劫持姜小白，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管仲通过经济战戏耍姬同，不过一报还一报而已。

十 千古一相说管仲

（下）

管仲是齐国国相，他首先要为齐国统治集团以及齐人负责，他没有为其他国家利益负责的义务。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当时春秋虽然诸国林立，但有同一个宗主国——周朝。这一点也决定了各国除了“地方主义”之外，还兼有“天下主义”，而管仲正是如此。

除了要为齐国谋霸业，管仲肩上更承担着保护中原华夏文化不受外族侵犯的责任，正如《诗经》所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管仲所理解的“霸”，绝不只是齐国独为天下之尊，更要铁肩担道义，率诸国捍卫华夏文明。

自西周末年以来，中原地区承受着来自周边各民族强大的军事压力。特别是春秋的出现，诸国内战不断，实力此消彼长，间接地增加了诸边各民族的军事实力。东有夷，北有狄，西有戎，南有蛮，特别是北方诸狄戎部族，连年内犯。管仲曾经说过：“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

管仲本人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与姜小白，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强硬执行反击戎狄的战略，为捍卫华夏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如果任由戎狄从四面八方方向中原扑来，也许华夏文明早就夭折了。

先圣孔子对管仲的人品基本执否定态度，在《论语·八佾》对管仲的人格缺陷大加鞭挞，说“管仲之器小哉！”理由是管仲曾经有过“三归”的丑事。关于三归做何解，在历史上有一定争议，一种说法是管

仲结了三次婚，一种说法是管仲大治府第，花钱不心疼。孔子鄙视管仲的人品，是个不通情达理的野人，甚至还嘲讽管仲：“如果管仲懂礼，那世界上还有谁不懂礼！”语言之刻薄，很难想象这是出自“温良恭俭让”的孔老二之口。

不过孔子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事论事，功是功，过是过，有过则贬，有功则褒。对于管仲“尊王攘夷”的伟大功业，孔子极为推崇，称赞管仲是伟大的英雄。

孔子的学生子路认为管仲作为公子姜纠的相傅，姜纠之死，召忽随之，而管仲却典冗颜事姜小白，为人不仁。孔子当即反驳：“齐桓公九合诸侯，成就霸业，这就是管仲最大的仁德！管仲不仁，天下无仁矣。”

孔子另一个学生子贡也向老师发难，说管仲不忠于姜纠，即为不仁。孔子义正词严地告诉子贡：“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横空出世，拯救华夏文明，我们现在就要服从夷狄风俗，披散头发，穿夷狄服式，岂有今日！

历代评管仲者多矣，唯有孔子的这句赞语最具分量，一是由孔子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二是这句话高度概括了管仲之于历史的贡献。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最为关键的发展期，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只是在春秋战国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如果没有管仲，夷狄入主中原，之后中华文明的辉煌是不可想象的。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完全当得起，但孔子指责管仲不知礼，则有失偏颇。《左传·僖公十二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一年（前648），为了调解东周王室与戎狄的紧张关系，姜小白派管仲出使雒邑，周惠王姬阍接见了管仲。

姬阍知道管仲的分量，所以破例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遭到了管

仲的拒绝。管仲的理由是我只是齐国的下卿，按礼制，天子就应该以下卿之待我，齐国中有高、国二位上卿，如果他们来朝天子，到时天子又将用何种礼节接待他们？

虽然姬闾很欣赏管仲，甚至称呼管仲为舅父，坚持上卿之礼，但管仲半步不让，坚持尊卑有别的江湖规则，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称赞。《左传》就说管仲懂礼节，不犯上，他受到历代的推崇是理所应当的。以此事来看，管仲何处不讲礼？

孔子最重视人的自我修养，他在《论语·学而》中对弟子做出以下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而《管子·弟子职》中也有相同的内容：“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要求弟子要尊敬师长，友悌兄弟。

虽然《管子·弟子职》是战国时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学派所作，但不能因此认为这是稷下学宫抄袭儒家著作《论语》。当时的儒家还没什么社会地位，经常受到其他学派的批判，稷下学宫本就是百家争鸣之所，而且《弟子职》是当时稷下学宫的学则（校规），稷下诸先生不可能去拍儒家的马屁。

之所以出现《管子·弟子职》的思想接近于儒家的现象，最多只能说明管仲的思想与儒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巧合，甚至是不排除儒家借用了管仲关于人生自我修养的观点。

在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孔子开始被拔高，礼敬为圣人。实际上，如果要评出春秋时期的第一圣人，管仲比孔子更合适。不仅因为管仲比孔子早生一百多年，更重要的是管仲是全才，除了不会英语，几乎没有管仲不会的。

前面讲过，管仲有许多后人加上的头衔，比如政治家、战略家，其实管仲还应该有一个头衔，就是权术家，这往往是后世研究管仲时

所忽略的。说到权术，晋朝的创始人司马懿堪称三国第一权术大家，但司马懿和管仲比，还不太厚黑。

司马懿多多少少还受到礼教思维的约束，做事不敢放肆，至少不敢当着曹叡的面要官要权，但管仲就敢。姜小白已经接受了鲍叔牙的建议，赦免管仲之罪，并准备重用管仲。按道理讲，管仲应该假意推让一番，给自己涂上一层谦逊的脂粉，可管仲却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当着姜小白的面要官要权，不给还撒泼耍赖。脸皮如此之厚，可谓千古少见。

老话说，做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蹬鼻子上脸，管仲不吃这一套，他需要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在管仲的潜意识中，这些东西是他应该得到的，所以管仲理直气壮地张口索要。

《韩非子·难一》记载，就在姜小白和管仲的“君臣问对”之后，管仲就开始伸手要官了，他一脸委屈地告诉姜小白：“臣现在得到了国君的宠信，臣感激不尽，但臣现在的官职太卑微，请国君提高我的政治地位。”

此时的姜小白对管仲还不是特别了解，就像刘邦被萧何逼着拜韩信为大将军一样，不过是受人之托而已。管仲交浅言深，让姜小白很无语，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等不要脸的人。姜小白为了显示自己的豁达大度，对管仲做出了承诺，寡人一定要让先生位居国内大族高氏与国氏之上。

姜小白没想到管仲会得寸进尺，提高了他的政治待遇，他还不满意，又不满地告诉姜小白：“臣有地位了，但臣还是个穷光蛋，请国君提高我的经济待遇。”姜小白为了求贤，只好答应了管仲的请求，给管仲以其他大夫三倍的经济待遇。

更搞笑的还在后面，管仲不依不饶，说臣有权有钱了，但臣和国君的关系还比较疏远，请国君以后尊称我为仲父。估计姜小白看到管

仲一脸真诚的样子，差点没气吐血，鲍叔牙推荐的这都是什么人？姜小白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人选，只好咬牙尊管仲为仲父，姜小白的心里别提多别扭了。

管仲和姜小白刚刚和好，就向姜小白要这要那，是管仲不识好歹吗？当然不是，春秋时人霄略就为管仲的行为辩护，说管仲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管仲作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官，如果没有比其他人都高的政治、经济待遇，以及国君的尊重，他很难推行新政。霄略认为管仲这并不是贪婪，而是为了方便管理。

按霄略的说法，管仲这么做是很有道理的，位卑何以号令天下？既然姜小白已经同意让管仲做宰相，那就应该给管仲以宰相的权威，否则何以服人？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时，就授韩信一柄剑，敢不服大将军号令者可斩之，道理是一样的。

为管仲辩护的还不只是在历史上不知名的霄略，还有战国时伟大的思想家荀况。荀况在《荀子·仲尼篇》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荀况认为管仲的做法完全正确，没有足够的权威，如何推行新政？当然，荀况这么说是歌颂姜小白的大度，但也说明了管仲伸手要官要钱，并非出自私心。

上面说孔子指责管仲“器小”，实际上，管仲不但不“小器”，反而很“大器”，比如管仲的用人方面。如果管仲出于私心要官做，他一定会独揽大权，任人唯亲。可管仲获得执政权之后，却立刻提名齐国的几位贤人出任要职，曾经和姜小白一起出逃莒国的隰朋，因为善于辞令，辩才甚佳，所以管仲请隰朋出任“外交部长”。

《吕氏春秋·勿躬》记载了管仲向姜小白推荐五位贤人的事情，大意是：管仲说搞农业，我不如宁速；搞外交，我不如隰朋；搞纪检，我不如东郭牙（东郭牙应该就是鲍叔牙）；搞军事，我不如王子城父；搞法治，我不如弦章。

当然，管仲非常自负，在推荐完了五位贤人后，冷不丁地来了一句：“国君治国强兵，用五贤人足矣，国君欲称霸天下，有管夷吾在此！”单就这一点来说，管仲做得要比诸葛亮好，诸葛亮自负全才，事必躬亲，忽略了培养下一代治政人才。管仲很聪明，抓大放小，他只负责战略布局，具体事务由其他人去办。

对管仲的自负，姜小白鼓掌曰：“善！”

刚开始的时候，姜小白对管仲还有所怀疑，毕竟管仲还没有开始伸展自己的锦绣抱负，仅凭一张大嘴，谁知道你是英雄还是狗熊？但在管仲不可思议的天才表演后，生性狂妄的姜小白对管仲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时再称管仲为“仲父”，应该是姜小白发自内心的尊敬了。

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更接近于董事长与聘用的职业经理，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的地位还不如谋士法正。管仲则基本获得了齐国的最高统治权，也就是说管仲是齐国政策的制定者，姜小白只是执行者。

前面讲过，姜小白的性格过于随意任性，所以他需要一位严父来管教约束，管仲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随着霸业的不断推进，姜小白早就已经忘记当年管仲差点射死他的那段如烟往事，在他眼中，管仲就像一位慈爱而不失严厉的父亲。

从气质上说，管仲和姜小白都是不世的枭雄，属于腹黑一族，只不过管仲张扬霸道，姜小白内敛沉静。如果说结识鲍叔牙是管仲的幸运，那么能得管仲为相，则是姜小白的莫大幸运。

管仲性格外扬，但心思非常缜密，这是宰相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有一件小事情可以反映出管仲的心细到了什么程度。姜小白派人去鲁国，把管仲押回齐国，因为管仲已经知道姜小白准备重用他，所以管仲担心的不是见到姜小白，而是鲁国的施伯。施伯劝鲁庄公不要放管仲回齐，此人是天下奇才，如果不能效力鲁国，不如杀掉，以绝后患。

姬同迫于齐国的压力，没有同意，但管仲不敢保证姬同不会中途变卦。为了加快回齐的行程，管仲告诉拉囚车的衙役：“你们这样拉我实在太辛苦了，我给你们唱歌吧，这样你们就能心情愉悦地拉车了。”管仲放声高唱，衙役们听着悦耳的歌曲，也忘记了疲劳，速度也不断加快，最终赶在鲁人变卦之前回到齐国。

管仲不仅心细缜密，眼光更是出了名的毒辣，任何魑魅魍魉在管仲眼前一过，他立刻就能看穿对方。有一次姜小白和管仲在密室中商议讨伐卫国，结果这件事情让会察言观色的齐侯夫人发现了，因为她是卫国人，当然要想办法保护母国。在夫人的软硬兼施之下，姜小白对卫国的态度明显软化。

第二天上朝时，管仲当场打了姜小白的脸，“国君是不是要放弃对卫国的军事计划？”姜小白很惊讶，这老头怎么会知道？管仲大笑：“国君见着我，声音谦恭，面带愧色，所以我知道国君变卦了。”至于变卦的原因，管仲当然知道是卫姬从中作梗，只不过他不好意思当面揭穿。姜小白为了掩饰尴尬，也大笑说道：“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天下不足平也。”

管仲辅佐桓公四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世人皆知齐桓霸业是管仲一手促成。在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重，眼看着不行了，姜小白前来探视，并请管仲安排了下日后的人事。

姜小白首先推荐了鲍叔牙为国相，但被管仲坚决否定掉了。管仲的理由是鲍叔牙为人刚直，眼里揉不得沙子，疾恶如仇，不懂得权术平衡，不是做宰相的合适人选。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管仲和鲍叔牙都老了，当时的年龄至少在七十岁左右。而且在管仲即将咽气之前，鲍叔牙就已经去世了。

管仲在政治上把鲍叔牙说得一文不值，并不是恩将仇报，事实上管仲从来没有忘记鲍叔牙对自己的大恩大德，他只是就公事论公事而

已。鲍叔牙去世的消息传来，管仲失声痛哭，悲不自胜。管仲流着泪告诉身边的人：“当年我与鲍叔做生意，独贪大头，鲍叔知道我上有老母需要奉送，从来不以为我贪。我受困于鲁国，是鲍叔舍命救我，又推荐我于国君之前，才有今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才是真实的管仲，热血、敢担当、重情重义，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那个贪财小器的管仲。从时间上来看，管鲍之交至少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年一起迎风冒雨做买卖，然后一起为官，几乎天天见面，这种真挚的战友情，没有亲身经历过，是很难理解的。

戏曲小说里的包公铁面无私辨忠奸善恶，管仲同样有这个本事。姜小白身边有三个著名的宠臣——竖刁、易牙、姬开方，在姜小白后期，已经和这三个宠臣穿上一条裤子了。管仲一眼就看出这三个人不是好东西，将来必乱齐政。在临死前，管仲苦劝姜小白远离这些人。姜小白虽然按管仲的话做了，但管仲死后，姜小白又把三人召了回来，结果一年后，竖刁等人就将姜小白送上了西天。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一千年后，王猛死前劝苻坚除掉对前秦政权最危险的内部敌人姚萇和慕容垂。苻坚不信，结果淝水败后，慕容垂另立门户，而姚萇则亲手绞死了苻坚。老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管仲最擅长品鉴人物，也就是会相面，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简直不可思议。

管仲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通权达变，在形势不利时会用急智，化解危险。比如在著名的“曹沫劫齐桓公”事件中，管仲的急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帮助姜小白逃脱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公元前681年，齐鲁两国在柯（今山东东阿）会盟，齐桓公姜小白和鲁桓公姬同走上台之后，鲁人曹沫突然拔剑劫持姜小白。这场劫持事件是姬同之前计划好的，姬同用“同归于尽”来威胁姜小白：不答应我提出的“齐鲁以汶水分界”的要求，今天我们同死于此。

姜小白即位不久，年轻气盛，不想答应姬同的无礼要求。管仲与鲍叔牙执剑欲冲上台救驾未果后，管仲在台下劝姜小白：“只闻用土地来保卫君主，没听说过用君主来保持土地，国君先答应鲁人的要求，回来我们再做计较。”言下之意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保住命要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姜小白听从了管仲的建议，这才避免一场骇人听闻的悲剧的出现。

管仲是个有缺点的伟大人物，这样的人物才显得真实，而不像孔子被后世神话得不成样子，已经失去孔子原有的真我本色。人不是万能的，神才是万能的，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神的出现。管仲虽然能看透世间人情，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比如他对重臣甯戚提出的问题就始终没有想明白。

甯戚有次当着管仲的面说了三个字“浩浩乎！”管仲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甯戚想说什么，吃午饭的时候还在想“浩浩乎”到底是什么意思。倒是管仲身边的婢女博学聪慧，她一语点破甯戚的心思：“宁大夫是想成家了。”管仲不解，婢女笑着回答：“《诗》有云：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管仲这才恍然大悟。

管仲不是无所不能的先知，但他更像是一座散发着耀眼光芒的灯塔，照亮了初步摆脱蒙昧，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春秋战国时代，也照亮了整个中国历史。春秋战国诸子争鸣，学术成果之灿烂，历史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孔有儒家，老有道家，孙有兵家，韩有法家，管仲学派到底算是什么家？这在历史有很大的争议，甚至在有些学术先驱的评比中，居然没有管仲，实在不可理解。管仲的学说涵盖了儒、道、法、兵、形势、阴阳、纵横等各个学派，可以说管仲是诸子之父，天下第一家。

孔子的忠实门徒朱熹称赞孔子：“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站在儒家思想的阵营中，朱熹对孔子的称赞并不为过。至于管

仲，则应该站在天下万国的立场上称赞管仲：“天不生夷吾，则万古如长夜。”

这个评价并不过分，管仲完全当得起！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管夷吾。

十一 齐桓公的贤臣们

有句老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英雄拎着人头在江湖的腥风血雨中闯荡，身边总要有几个称心的帮手，单打独斗是成就不了大事的，如果没有张良、萧何、韩信，刘邦早被项羽干掉了。

一个利益集团的成功，不可能归功于一个人，这样的人造神话在历史上是从没有出现过的。没有法正，诸葛亮将困死荆州；没有李威，王猛如蛟龙睡沙滩；没有朱升，刘伯温也将无用武之地，管仲同样也不会例外。

在齐桓公姜小白震烁千古的霸业中，我们可以列出许多伟大的名字。虽然这些人不如管仲那么出名，但英雄的伟大与否，并不能看其出现在闪光灯下的次数，而要看他实实在在的历史功业。不可否认管仲在姜小白的霸业中贡献最大，但仅有管仲一人，是做不出什么事情的。今天就讲一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那些幕后英雄。

说到齐桓公时的贤臣，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鲍叔牙。如果只论人品之贤，即使把管仲算起来，依然排在鲍叔牙的后面。“管鲍之交”感动千古，但在“管鲍之交”中，主角却是鲍叔牙。地球人都知道，没有鲍叔牙的宽宏大度，管仲不死于姬同之手，必死于姜小白之手。和管仲出身帝王之家一样，鲍叔牙的出身也非常高贵，甚至比管仲的“级别”更高，因为鲍叔牙是夏朝始祖大禹的后裔，姒姓。人都是现实的，管仲是姬周之后又如何，家徒四壁，照样被人瞧不起。鲍叔牙虽然上距夏朝灭亡已经整整一千年，但鲍叔牙家境优越，标准的中产阶层出身，吃穿不愁。

鲍叔牙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管仲，二人外出做生意，本钱都是鲍叔牙出的，他知道管仲兜里没钱。如果用一个字来给鲍叔牙的人品盖棺论定的话，这个字毫无疑问是“贤”字，管仲能交上这样的朋友，不客气地说，是管仲积三代之德修来的造化。

管仲贪财的毛病，鲍叔牙是知道的，但他从来不当面指责管仲，反而替管仲辩解，换成心胸狭窄的，早就透恨了管仲。而当管仲被囚禁鲁国时，鲍叔牙几乎拼了老命，也要把管仲从魔爪下救出来，这更能体现鲍叔牙的胸怀宽阔。因为忠心侍奉自己，又共同外逃避难的缘故，姜小白对鲍叔牙非常信任，也有意用鲍叔牙为相。只要鲍叔牙点头，历史上将不会有属于管仲的传奇。如果鲍叔牙坐视鲁人杀掉管仲，那齐国宰相的位子非鲍叔牙莫属，这是一个让人很难抗拒的诱惑。

谁不想扬名立万，青史留名？但鲍叔牙考虑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齐国的国家利益，只要齐国能在管仲的治理下称霸天下，鲍叔牙给管仲当马夫，他都毫无怨言。

至于姜小白念念不忘管仲的一箭之恨，也是鲍叔牙苦口婆心劝姜小白以国事为重，重用管仲的。甚至为了保护管仲平安回到齐国，鲍叔牙亲自率领一支部队来到鲁国，名义上说是把管仲押回齐国处死，实际上是公开保护。更让人感动的是，鲍叔牙在鲁国殿上对着管仲放声痛哭，说归齐之后，兄弟之交就到此为止了，成功骗取了鲁人的信任，可见鲍叔牙的心思是非常缜密的。

唯一看出鲍叔牙在演戏的，是鲁国大夫施伯，鲍叔牙这边痛哭，施伯在那边大笑，说管仲必不死，必受齐重用。只是姬同已经完全被鲍叔牙的高超演技骗到了，施伯也无力挽回。

鲍叔牙心地善良，同时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治国之才远不如管仲，所以极力向姜小白推荐管仲。他告诉姜小白他不如管仲的

五点地方，分别是：一、宽惠爱民；二、以法治国；三、外结诸侯；四、匡范社会道德；五、带兵打仗。

此时的姜小白还没有忘记管仲的那一箭，恨恨地说：“管夷吾差点让寡人做鬼，寡人不计较也就算了，凭什么还要重用我的仇人？”鲍叔牙说当时管仲的主人是姜纠，他射国君一箭，是为了让姜纠即位，此为大忠。鲍叔牙几乎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姜小白重用管仲。

更为难得的是，管仲执政之后，鲍叔牙能心甘情愿地服从管仲的领导，全方位配合管仲，没有任何怨言，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管仲在齐国政坛不断被神话，幕后推手，实际上就是鲍叔牙。

真正封神的，不是威震天下的管仲，而是鲍叔牙。如果说管仲“千古第一相”的地位还存在争议，那么，鲍叔牙“千古第一友”的地位则没有什么争议。

朋友处到了这种程度，带来的已经不是感动，而是震撼。所以在春秋以来的士林圈中，士大夫对鲍叔牙更为推崇，《史记·管子列传》肉麻地歌颂鲍叔牙的仁友之情：“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多是称赞的意思。

鲍叔牙之于管仲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私人交情上，在工作中，鲍叔牙依然是管仲最为得力、也是最为信任的助手。鲍叔牙对管仲的内外政策基本上是认同的，管仲说一，鲍叔牙不说二。这不是说鲍叔牙胸无主见，恰恰相反，这正说明鲍叔牙有着不逊于管仲的政治才能。

姜小白和管仲在工作中也有理念不相同的地方，难免互起争议，每当这个时候，鲍叔牙都坚定地站在管仲一边。“信仲哥，得永生。”这是鲍叔牙的政治信条，仅在《管子·大匡》中，鲍叔牙就三次劝告姜小白对管仲言听计从，其中姜小白听信了两次。唯一没有听进去的那次，姜小白增加了关税和市场税，结果齐人不满。

管仲拜相，号令齐国，但他和姜小白的关系主要还是君臣关系，论与姜小白的私交，管仲是赶不上鲍叔牙的。所以在管仲与姜小白之间，鲍叔牙起到了润滑作用，如果没有鲍叔牙从中沟通，凭管仲和姜小白“宁进勿退”的霸道性格，翻脸是迟早的事情。

管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让鲍叔牙做了“大谏”，相当于后世的御史大夫。同样一句话，管仲说了，姜小白未必当回事，但从鲍叔牙嘴里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了。

鲍叔牙、管仲之于姜小白，和三国的法正、诸葛亮之于刘备非常的相似。诸葛亮是刘备聘用的总经理，但私交一般，刘备反而和法正打得火热。只要法正开口，没有刘备不答应的事情，诸葛亮只能“羡慕嫉妒恨”。

有一次，姜小白和管仲、鲍叔牙、甯戚等重臣饮酒谈心，等喝得五迷三道时，姜小白嬉皮笑脸地问鲍叔牙：“鲍叔何不敬寡人一杯酒，以为祝寿。”像这样戏谑的话，不是私交极好，是说不出口的。

看到姜小白没有个国君的体统，鲍叔牙举杯而起，满脸严肃地说道：“我祝国君不要忘记当年在莒国受的苦难。”同时，鲍叔牙也善意地警告管仲和甯戚不要忘记曾经那段屈辱的日子，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志就忘乎所以。无论是以大谏的身份，还是以老大哥的身份，这样的话由鲍叔牙来说，远比其他人说更合适。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鲍叔牙正是如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样胸怀宽广的君子，谁会不喜欢呢？

说完了著名的鲍叔牙，再来讲讲一位隐形的重臣。此人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知名度，他在齐国政坛上的地位却远在管仲之上，管仲这么牛叉的人物，见了此人都要毕恭毕敬。他就是齐国的顶级贵族、大夫高傒。

高傒其实姓姜，齐国宗室，他是周天子在齐国正式任命的两个监国上卿（另一个为国归父）。而管仲虽然统领齐国军政，但管仲只是个下卿。高傒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原因大致有两点：一、和齐侯同宗同脉，肥水不流外人田；二、没有他，姜小白就不可能做齐国之主。换句话说，高傒是姜小白的头号政治恩人。

短命的齐侯姜无知被雍廩所杀，齐国无主，公子姜纠和姜小白进行了惨烈的“龟兔赛跑”。姜小白技高一筹，骗过了鲁国和姜纠，抢先一步回到临淄，此时临时主持齐国国政的就是大夫高傒。

更为重要的是，高傒之前就和姜小白私交甚密，在小白回国的过程中，高傒和国归父发动自己的情报网，给姜小白通风报信，所以姜小白才能顺利回来。高傒和姜纠没什么交情，自然希望姜小白即位。既然姜小白回来了，高傒生怕夜长梦多，立刻奉姜小白为齐侯。先下手为强，姜小白即位后的第六天，姜纠就回来了，如果高傒再慢一步，到嘴的鸭子可能就飞走了。

政治交易和到菜市场买菜一样，价格公道，童叟无欺。高傒也不是活雷锋，他帮助姜小白即位，作为报答，姜小白是不会亏待他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高傒从姜小白那里获得多少丰厚的回报。

在管仲的建议下，姜小白把齐都临淄分为二十一个乡，相当于现在的市辖区。当时临淄人口为四万二千，每乡二千人，除了工、商共有六乡外，其他十五乡，姜小白和高傒、国归父各管理五乡，即各管辖一万人。

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居民，而是准军事化的民兵部队。《管子·小匡》对此有记载，“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通俗一点讲，齐国分为三军，姜小白自主中军，高傒领左军，国归父领右军。虽然姜小白给高傒开出了巨额支票，但高傒心安理得地接过了五乡的统治权，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回报。

高傒并不是那种每天饱食终日、大腹便便的饭桶型贵族，他本人的治政能力其实并不在管仲之下。至于鲍叔牙告诉姜小白：“我认为管仲之才当在高傒之上，请国君立管仲为相。”应该这么看，鲍叔牙和管仲是莫逆之交，和高傒没什么私交，所以在潜意识里，鲍叔牙还是想肥水不流外人田。

不过从姜小白的利益角度讲，他是不想，也不敢立高傒为相的。高傒世代为齐大夫，在齐国官场的势力盘根错节，如果使高傒为相，很容易形成臣强君弱的局面，姜小白可不想做傀儡。

北宋赵匡胤联合义社十兄弟，背叛了周世宗柴荣的托孤，夺位于孤儿寡母之后，立刻对义社兄弟下手。姜小白不敢立高傒为相，就如同赵匡胤不敢封石守信为殿前都点检一样。姜小白任管仲为相，不用承受高额政治风险，管仲在官场上无门无派，没有自己的势力，一旦姜小白对管仲不满意，随时可以拿掉。

像高傒这种级别的老臣，如果只是养着，实在太浪费了，应该让高傒发挥自己的余热。上面讲了，隰朋是齐国的“外交部长”，而高傒也从事外交工作，但他的政治身份应该是齐国特使全权大使，代表姜小白与诸国会盟。

公元前672年，齐国与鲁国在防地（今山东诸城西北）会盟，鲁国方面的最高代表是鲁庄公姬同，而齐国派出的最高外交代表就是高傒。能代表国君出席如此高级别的会议，管仲都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可见高傒在姜小白心中的地位。

高傒有时也参与军事工作，著名的鲁国庆父之乱，就是高傒率领精锐的南阳军平定的，随后高傒立鲁庄公幼子姬申为鲁公，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鲁僖公。鲁人对高傒立僖公非常感激，数代不忘其德，《春秋公羊传》称“鲁人至今以为美谈，曰犹望高子也”。

上面讲鲍叔牙是管仲与姜小白之间的润滑剂，其实高傒也能起到

这个作用。高傒有着鲍叔牙所没有的优势，就是高傒是齐国的三位大股东之一，管仲只是姜小白聘用的首席执行官。如果高傒看管仲不顺眼，凭他的通天能力，十个管仲也被扳倒了。

看到CEO管仲为齐国大把捞银子，大股东高傒自然乐得合不拢嘴，谁会把管仲这只会下金蛋的鸡赶走？除非疯了！不论高傒和管仲私交如何，他都会全力支持管仲，甘愿给管仲打下手，修个墙，补个锅什么的。

CEO不能世袭，但股东可以世袭，高傒出身高贵，有花不完的银子，自然要传给子孙。高傒手上的这只金饭碗一直传到他的曾孙高固，依然没有变色，高固世袭上卿，权势喧天，他可以逼迫齐惠公劫持鲁宣公姬伋，让姬伋把原齐昭公姜潘的夫人叔姬改嫁给他，并亲自去鲁国迎亲，齐国高氏的势力之大，让人咋舌。

齐国三大股东，高氏、国氏、吕氏（即齐国姜姓公族），在齐桓公执政的四十多年中，这三家大股东各有一个代表人物，跟着姜小白立了不朽功业。高氏的代表是高傒，国氏的代表是国归父，而吕氏的代表就是隰朋。

如果按辈分，隰朋是姜小白未出五服的堂侄，隰朋的曾祖父齐庄公姜购是姜小白的祖父。不过从年龄上看，隰朋和管仲、鲍叔牙是同一辈人，应该比姜小白大几岁。从派系上说，隰朋则是姜小白的贴身死党，是姜小白最信任的少数几个重臣之一。

早在姜小白还做公子的时候，隰朋就已经进入他的幕府，甚至比鲍叔牙进幕府更早一些。姜小白逃到莒国避难，隰朋、鲍叔牙、宾须无不离不弃，忠心无二，让姜小白非常感动。

等到姜小白即位时，自然要给兄弟们分蛋糕，在重要的岗位上，都会安排自己的嫡系人马，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齐国的权力分配很有意思，“总统”姜小白先任命管仲为“总理”，然后由管总理提名各部部

长人选，姜总统批准，内阁就算成立了。鲍叔牙的职务相当于第一副总理，而隰朋由于懂得外交礼仪，能言善辩，毫无意外地出任“外交部长”，这也是管仲提名的。管仲在提名隰朋时是这么评价隰朋的：“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大行就是外交部长。

隰朋出任外交部长，如鱼得水，这里才是他施展锦绣抱负的天空。在隰朋的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外交成就，就是公元前651年的平定晋国之乱。这一年，晋献公卒，嫡庶争位，晋国形势大乱，隰朋以齐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率领军队直入晋国，与秦军一起推立献公子姬夷吾为晋侯。而姬夷吾的兄长，就是春秋第二霸——晋文公姬重耳。

因为姬夷吾的地位需要获得周天子的承认，所以在第二年的四月，周天子的代表周公忌父、大夫王子党与隰朋共同举行仪式，正式册立姬夷吾。如果没有隰朋与秦国的及时出手，稳定住了晋国局势，任由这场空前的宗室之争闹下去，难说不会出现更可怕的后果。

姬夷吾即位，实际上是为十几年后，其兄姬重耳回国即位扫清了障碍。从这个角度看，隰朋为晋国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本来隰朋的名气不算大，但经过这件事情，隰朋在江湖上出尽了风头，各国都知道齐国的隰部长是个厉害人物。

隰朋活跃在外交战线上，是管仲称霸事业中最重要的一环，由于这个原因，隰朋和管仲走得非常近。许多史料都把隰朋与管仲并称，如《韩诗外传》称“齐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

管仲最感激的人，肯定是鲍叔牙，但管仲在工作上最器重的却是隰朋，管仲经常说上天生此隰朋，做我的舌头。隰朋在国际事务中的作为，完美地阐释了管仲的外交思想，可见隰朋在管仲心中的分量。

管仲临死前，姜小白问管仲：“鲍叔可继为相否？”立刻被管仲否

定掉了。姜小白让管仲提出下一任宰相的人选，管仲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隰朋的名字。姜小白问理由，管仲答：“隰朋为人谦和，对上不谄，对下不骄，在私不忘公，在公不忘私，对国君忠心耿耿。以仲来看，能称得起大仁的，只有隰朋。”

在管仲看来，鲍叔牙、宾须无、甯戚各有优势，但也各有劣势，只有隰朋在具备其他人优点的同时，并没有明显的弱点。宰相的职位决定了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定要有全才，通观全局，隰朋显然能胜任这个职务。

从历史记载来看，管仲死后的第十个月，隰朋也去世了，说明隰朋只做了十个月的宰相，都卒于公元前645年。历史就是这么无情，两年后，齐桓公被竖小所杀，齐国几近崩盘，如果隰朋多执政几年，完全可以避免这场塌天的政治灾难。

上面讲的三位贤臣鲍叔牙、高傒、隰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出身，非富即贵。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在齐桓公的肱股重臣中，还真有一位出身贫贱，甚至比管仲还要落魄，他就是甯戚。

管仲好歹跟着鲍叔牙做生意，也能混个小康，甯戚穷得四面光棍。不过甯戚很有农业方面的才能，但苦于没有门路和齐桓公搭上关系，情急之下，甯戚想出了一个办法接近姜小白。

甯戚先是跟着一支商队来到临淄，然后牵着一头牛站在门下，等姜小白的车队路过他身边时，甯戚突然猛敲牛角，放声歌唱，吸引姜小白的注意。甯戚的苦心果然得到了回报，姜小白听完歌后，大呼：“此人绝非凡品！”

激动的姜小白把甯戚带回宫，请甯戚教他治国之道。甯戚也不客气，穿着姜小白新赐的衣冠，坐在小白对面，抵掌而谈。第二天，姜小白再次接见甯戚，这次谈的是称霸天下之术，没想到甯戚也精于此

道，不逊于管仲，姜小白兴奋得大笑。

不过外交部长的位子已经有隰朋了，根据甯戚对农业的兴趣，加上管仲的提名，姜小白即日任命甯戚为“大司田”，即农业部长。管仲在提名甯戚时，是这样说的：“开荒垦田，修建城邑，向土地要效益，增加人口，我不如甯戚。”

在任何时代，农业都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更何况生产力不发达的两千多年前。没有农业收成，农民吃不饱饭，就会操起锄头造反。姜小白把事关国家命脉的农业交给甯戚，足见他对甯戚的信任。

也许是都出自社会底层，价值观相同，管仲和甯戚很能谈得来，私交不错。甚至甯戚没有老婆，也找管仲敲边鼓，就是《管仲下篇》提到的婢女解诗的故事。

除了鲍叔牙、高傒、隰朋、甯戚之外，齐国还有许多贤臣，比如司法部长宾须无、国防部长王子城父、人事部长晏子（不是晏婴）、宰相办公厅主任弗郑、科技部长皇子告敖，他们都为齐桓公的不世霸业做出了各自贡献，因为篇幅有限，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十二 齐桓公的不世霸业

讲完了管仲、鲍叔牙、隰朋等不世贤臣，再来讲一讲不世贤君姜小白。不得不承认管仲的伟大，但如果没有姜小白这棵梧桐树，管仲这只金凤凰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更遑论建立功业，青史垂名不朽了。正如唐人卢照邻所说：“如果不是遇到齐桓公，管仲只能去做阳城的上门女婿。”话虽刻薄，但也有几分道理。

在《管仲上篇》中，着重分析了管仲与王猛的相同之处，实际上姜小白和苻坚也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帝王，各方面相似度极高。如果把姜齐称霸、前秦统一北方的功劳都归于管仲和王猛，这对姜小白和苻坚来说是不公平的。

别的不说，姜小白对管仲的建议几乎言听计从，严格执行管仲制定的内外政策，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如果让管仲辅佐姜诸儿那样的荒唐君主，不出三年，管仲准被姜诸儿气死。

《吕氏春秋·任数》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有关部门来找姜小白，请他对某事做出批示，姜小白让他们去找管仲。有关部门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又向姜小白请示了两次，姜小白还让他们找管仲。有些人对姜小白当甩手大掌柜非常不满，当面嘲讽姜小白：“什么事都找管仲父，当国君实在太容易了。”姜小白的回答是：“在没有仲父之前，国势艰难，自得仲父之后，国势如日中天，仲父如此多能，我就不用掺和了。”

姜小白说这些话，其实只是给管仲脸上涂脂抹粉，增加管仲在官

场上的权威，方便管仲处理政务。姜小白从来不是任由管仲摆布的傀儡，他也有自己的主见。实际上姜小白和管仲在工作上有分工的，管仲主要处理国内政务，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姜小白主要负责国际战略，纵横杀伐，为齐国增强国力赢得良好的生存空间。

翻阅一下《管子》，就能发现一个问题，凡是《管子》一书涉及内政的内容，几乎找不到姜小白身影，而凡涉及齐国对外交往的篇章，比如《大匡》、《小匡》、《霸形》、《封禅》、《小问》，都有大量专于姜小白的记载，足以说明这一点。

姜小白的野心非常大，他应该知道郑庄公姬寤生的小霸故事，但姜小白显然瞧不上姬寤生的档次，他要做春秋大霸，一统江湖，万载尊代。但老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他初即位，管仲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全方位改革、提升国力的时候，姜小白就开始了他所谓的大霸之路。

姜小白时代的第一场争霸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勺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85年，也就是姜小白即位的第二年。当时齐强鲁弱，姜小白以为吃掉鲁国比吃口西瓜还容易，哪知道他的大牙磕在了核桃上。鲁国名将曹沫的“一鼓作气”，将毫无思想准备的姜小白打得满头开花，姜小白狼狈逃回。

第一次的失败，是成功之路最完美的开始，这话说得很精彩，姜小白被曹沫迎头棒喝后，才对齐国的综合实力有了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以现有的国力，守成是没有问题的，但要称霸天下，首先还是要积累内功，发展经济，培养人才，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人才运作机制。

四百多年后，楚人李斯上书秦王嬴政，即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认为秦应该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天下贤士，而不是搞地方保护主义。其实李斯所呼吁的用天下之才的机制，早在齐桓公时就已经运作得相当成熟了。

与秦朝被动地接纳外国人才相比，齐国是主动到国外发现并招揽人才的。姜小白派出一队队的伯乐，每队伯乐配备好车好马，带上足够的粮食和货币，游走于诸国，“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当然，这些伯乐还肩负着另外一样任务，就是做间谍，凡发现所在国朝局不稳、内乱渐弥者，立刻向临淄通报，以方便齐军对该国进行准确的军事打击。

按照管仲的称霸计划，执政三年之内不对外用兵，集中精力发展国力，第四年做准备工作，第五年铁血出击。诸葛亮应该就是汲取了齐伐鲁失败的教训，用了五年时间恢复国内经济，等到内和外通之际，诸葛亮高举兴复汉室的大旗，发动了震动天下的北伐。

姜小白也接受了这个教训，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前五年的时间里，姜小白口不言兵，一心发展经济。打仗，说白了，就是烧钱，兜里没钱，还打个鸡毛！姜小白初出江湖的第一枪，对准了刚刚经历过国内政治动荡的宋国。

宋湣公子捷因为在打猎时和大臣南宫万发生矛盾，被南宫万杀死在蒙泽，立公子子游为国君。不久后，宋国的反南宫势力联合起来，干掉了南宫万和子游，改立子捷的弟弟子御说，就是宋桓公，即宋襄公公子兹甫的父亲。

宋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但与宋为邻的齐桓公姜小白从中看到了无限“商机”，姜小白大笑：发财的机会来了。在公元前681年的春天，姜小白纠集了鲁、陈、蔡、邾等国，在齐国境内的北杏（今山东阿附近）召开了臭名昭著的“宋国之友大会”，当然，出席的还有当事国宋国。

姜小白的逻辑非常简单：宋国不能没有动乱，否则齐国就失去了称霸之路上的战略支撑点。为了齐国的利益，姜小白理直气壮地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赤裸裸地干涉宋国内政。

这次干涉宋国内政，姜小白的目的并不是推翻子御说，而是旨在建立以齐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姜小白明白无误地告诉子御说：“国际社会依然承认你是宋国合法的领导人，但是，你要听我的指挥。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宋国的整体实力要弱于齐国，而且子御说刚刚即位，统治基础还不太牢固。在这种情况下，子御说不敢当面对姜小白说“不”，只好忍气吞声地答应了姜小白的无理要求。

等到子御说回国后，越想越窝囊，大骂姜小白趁火打劫，做人太不地道。子御说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南宫万逃到陈国后，被陈人送回宋国，子御说亲手将南宫万剁成肉酱。这样的刺头人物，岂会心甘情愿地受姜小白摆布？就在北杏“宋国之友大会”结束后的当年年底，子御说就强硬地撕毁了与姜小白之前达成的各项协议，宋是宋，齐是齐，地位平等。

如果宋国不向齐国交保护费，齐国还拿什么称霸？更重要的是，子御说当着天下人的面，狠狠地抽了姜小白几个响亮的耳光，如果不狠狠教训宋国，以后姜小白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行走？他的所谓称霸事业只能沦为国际笑柄。即使姜小白顾忌宋国的强硬反击能力，至少也要做做表面文章。

公元前680年的春天，姜小白纠集陈、曹两个酱油国，三国联军浩浩荡荡地朝着宋国杀来。这次姜小白对宋国出手，也不是真打，主要还是对宋国进行武力恐吓。为了给自己的强盗行为披上一件人道主义干预的外衣，姜小白非常聪明地把周天子也拉进了这趟浑水。

春秋时代的中原，更像现在的地球村，村里住着二百多村民，村子里最大的领导就是村长，不过村长早就已经被架空了，大家各玩各的。等到有人需要利用村长的名义为自己谋利益时，就会把村长抬出来，指着被打的一方说：“看清楚，不是我要打你，是我奉村长之

命打你。”

新即位不久的周僖王姬胡齐为了多从财大腰粗的姜小白手上赚些活动经费，自然愿意跑场子。姬胡齐派单伯来到宋国，对宋国进行“劝解”，实际上是逼迫子御说接受姜小白制定的不平等条约。

具体的谈判内幕不太清楚，但子御说应该在周天子和齐国的强大压力下屈服了。当年年底，单伯代表周天子，齐、宋、卫、郑各国在卫国的鄆城（今山东鄆城北）举行第二次宋国之友会议，落实之前达成的一揽子协议。

在这场近乎闹剧般的外交活动中，姜小白最漂亮的一招就是得到了周天子的支持，这也是子御说不得不向姜小白示弱的重要原因。虽然这次会盟，齐国并没有得到实际利益，但最重要的是姜小白已经在国际社会中打出了自己的威望。

经过几年的发展，齐国整体国力不断上升，已经初具超级大国的雏形，所以姜小白才有底气突破国际道义约束，明目张胆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强权即公理，古往今来，莫不是如此。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一个国家的称霸，都需要披上一件仁义牌衬衣，一手拎根粗大棒子，一手捏着一把枣子，软硬兼施才是王道。跟着姜小白混江湖的那些酱油国很注意观察齐国的国家品质，看看姜小白是否具有江湖老大的宽宏大度。

管仲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发生了鲁宋柯之盟时曹沫劫持事件，事后，姜小白不想承认与鲁国的边界划定条约，被管仲及时劝住。管仲的理由是大国之君，应当言而有信，不能出尔反尔。管仲坚持按原定条约办事，其实是做给江湖上各路诸侯看的，让大家看到齐侯是个信人君子，为日后的齐国称霸铺平了道义道路。

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姜小白在江湖上的威望日益高涨，有枪杆子，有钱袋子，还满嘴仁义道德，这样的老大打着灯笼也难找。公元前679年春，各路诸侯再次在鄆城召开武林大会，会议的主题很清楚：尊齐国为诸侯长，相当于安理会唯一的常任理事国。齐国的争霸之路，至此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姜小白的做事风格充满了霸权主义的狡诈和贪婪，但他的本质还是不错的。至少他知道收了兄弟们的保护费，老大就要负责兄弟们的安全，保护费不是白拿的。什么叫老大？老大就是既为自己的利益插兄弟两刀，也为兄弟的利益插别人两刀。

第二次鄆城会盟的当年秋天，姜小白接到了他出任诸侯长以来的第一单买卖，附属于宋国的小邾国突然宣布脱离与宋国的臣属关系，举旗造反。小弟家中出了乱匪，姜小白作为老大，自然要拎刀上阵砍人。小邾国位于今山东滕州附近，距离齐国非常近，姜小白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树立老大威信的大好机会。

超级大国齐国带着一帮仆从国，凶神恶煞般地扑向小邾国，要为宋国讨说法。虽然史料记载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膀大腰圆的联军把和豆芽差不多大的小邾国揍得七荤八素，找不着北。

姜小白的风头还没有出完，在小邾国叛宋的同时，与宋堪称百年世仇的郑国趁机浑水摸鱼，赚了宋国一票。姜小白现在是宋国的带头大哥，小弟被人揩了油，岂有不出头替小弟讨公道的道理？公元前678年，姜小白带着仆从国军，大摇大摆地围着郑国一阵狂殴，郑厉公被打得吱哇乱叫。

随着齐国的国力不断增加，姜小白的贼手也越伸越长，只要是齐国能够得着的地方，都被姜小白看成需要被保护的齐国利益。哪个小弟受欺负了，姜小白拎刀上阵；哪个小弟家里出了乱子，姜小白都要出面摆平。比如著名的鲁国庆父之乱，就是姜小白派高傒出兵搞定

的。

姜小白有一点很聪明，他只欺负一些中等国家，却从来没有打算消灭对方。换句现代语言，就是齐国只注重在其他国家保护齐国的利益，却不会对某个国家提出领土要求。在政治上，姜小白要的是诸国服从于齐国权威之下；在经济上，姜小白要的是诸国开放本国市场，以便齐国的商品打开国际市场。

对于那些不服从于齐国霸业的小国，姜小白坚定不移地执行武力打压的政策，直到将对方打服为止。郑、宋、鲁这类的中等强国，以及卫、陈、蔡这样的偏小国家，接二连三地被齐国摁倒在地，一顿胖揍。姜小白的武林盟主地位基本上得到了确认，除了楚国之外。

楚国是长江流域新崛起的超级大国，其时在位的楚成王熊恽同样野心勃勃，而且论能力、手段均不逊于姜小白。熊恽不甘心做一个偏安君主，成天和一群“蛮貉”打交道，他更渴望做中原的霸主。熊恽即位以来，楚军像一台大马力的推土机一样，不断向北平推过去，所过之处，鸡飞狗跳猫上吊，江湖上一片惊呼。

当时的国际格局，北有晋，东有齐、鲁，西有秦，南有楚，中有郑、宋。特别是郑、宋二国，是中原地区防御楚国的最后一道战略屏障，一旦让楚国突破郑、宋防线，后果不堪设想。

公元前666年，熊恽派一代名将子元率战车六百乘北伐郑国，只要拿下郑国，熊恽就能初步实现称霸中原的计划。楚军的战斗力确实不是吹的，很快就杀到了新郑城下，甚至突进了郑内城。幸亏郑文公姬踀玩了一出空城计，子元怀疑城中有埋伏，没敢贸然进入，这就为诸侯救郑赢得了宝贵时间。

熊恽想称霸，先问问老牌霸主姜小白答不答应，如果蛋糕被熊恽吃了，姜小白只能喝西北风了。在诸侯联军的威胁下，楚军连夜撤军回国，一场新老霸主之间的战略决战往后推迟了三十年（即公元前

632年晋楚城濮之战)。

虽然大战没有打起来，但楚国这次伐郑，在姜小白看来，依然是对齐国霸主地位的严重挑衅行为，是姜小白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姜小白已经意识到楚国将来必是中原大患，如果不在楚国崛起之前打掉对方的嚣张气焰，以后中原就别想过安生日子。

公元前662年，姜小白向江湖遍发英雄帖，号召中原各门派联合起来，共同讨伐楚国，为郑国报仇。不过在当年年底，鲁庄公姬同病死，鲁国诸公子争位，形势大乱，姜小白只好将伐楚的事情搁置一边，先派上卿高傒去稳定鲁国局势。

直到七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56年，姜小白才准备和楚国熊恽摊牌。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年动手，原因是熊恽又对郑国动手动脚了。形势对联军不太有利，因为郑文公姬踀有些承受不住来自楚国的军事压力，准备向楚屈服。

还是大夫孔叔警告姬踀：齐国已经出兵来救我们，如果我们背叛姜小白，国君认为姜小白会放过我们吗？与其叛齐附楚，还不如维持现状，何况齐国加上联军的实力，赢面要远大于新兴的楚国。

这一次的伐楚动静非常大，不仅齐国主力尽出，再加上宋、鲁、陈、卫、许、曹，算上郑国，正好是“八国联军”，甚至管仲也来凑了一回热闹。联军先是急驰数百里，以疾风骤雨之势打爆了楚国的前线喽啰蔡国，然后尖刀直插楚国北线防御重镇陉邑（今河南鄆城）。

蔡军的崩溃，实际上对楚国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以楚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完全有能力与姜小白决一死战。但楚成王熊恽也要考虑战争成本问题，如果和姜小白拼个鱼死网破，自己能得到什么？

姜小白同样考虑过这个问题，姜小白此次大张旗鼓地伐楚，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军事行动逼迫楚国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

放眼天下，具有超级大国骨架的，只有齐、晋、楚三国。而晋国此时正发生破坏力空前的内耗，几十年内不会威胁到齐国的地位，只有楚国是齐国的心腹大患。即使用武力打败楚国，也注定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所以能不战而屈楚之兵，让楚国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对姜小白来说是最有利的。

形势正如姜小白所预料的那样，楚国的对齐之策是以强硬对强硬，熊恽亲自率军北上，来找姜小白要个说法。表面上，齐楚两国剑拔弩张，似乎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但其实双方都不想打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齐国由管仲出面，和熊恽面对面进行谈判。管仲指责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所以齐师来伐，实际上这是管仲给熊恽找台阶下，只要熊恽承认自己对周天子有失臣礼，齐国就有借口罢兵，然后各回各家，各拜各妈。

熊恽知道管仲的深意，自然也要成人之美，姜小白不就是想做霸主吗？那就成全他吧。熊恽也明白楚国暂时还不具备挑战齐国霸主地位的实力，不如暂且低头，日后再作计较。

当年夏天，齐楚两国在召陵（今河南漯河东）举行结盟大会，楚国方面的最高代表是大夫屈完。屈完虽然嘴硬，说如果齐军胆敢过汉江一步，楚军将与齐军决一死战，但他也看到了齐军的强大，乖乖地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正式承认齐国诸侯长的地位。

获得了新兴强国楚国的承认，姜小白的霸主地位再也无人可以撼动了，包括周天子也承认这一点。其实周惠王姬阍并不喜欢姜小白，因为姜小白自恃国力强大，粗暴干涉周朝的内政。

周襄王不喜欢太子姬郑，有意废掉姬郑，改立幼子姬带。姬郑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姬郑暗中和姜小白达成了有利于齐国的某种约定。姜小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控制下任周天子的绝佳

时机，对此事大肆炒作，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周天子姬阍对姜小白极为不满。

公元前655年，姜小白率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在首止（今河南睢县）公然会见姬郑，表达了对姬郑的支持。虽然姬阍暗中指使郑国背盟，但并不影响姜小白在诸侯中的威望，有了以齐国为首的“八国联军”的支持，姬郑的腰杆也硬了，最终顺利地即位，就是周襄王。

姬郑即位后，准备对弟弟姬带痛下杀手，姬带抢先一步逃到了齐国避难，随后姜小白就派管仲来雒都替姬带求情。姜小白收留姬带，原因很简单，留下姬带，就能威胁到姬郑的天子地位，可以从侧面控制住姬郑，以保证姬郑不会做出伤害齐国利益的事情。国际生存法则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法大理大，说到底利益最大。

被姜小白敲打后，姬郑终于老实了，他也摸清了姜小白的战略底线，从此再不敢对齐国有什么非分之想，只能乖乖地听从于姜小白的指挥。姬郑也知道姜小白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说穿了，就是需要姬郑以周天子的身份正式确认姜小白的霸主地位。

姜姓齐国历史上的最高潮终于到来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姜小白大会诸侯于葵丘（今山东曹县西）。出席大会的还有卫、郑、鲁和许、曹等卫星国，当然，这场大会的主角，其实是周天子姬郑派来的外交代表——太宰姬孔，他是来代表周天子向姜小白表示臣服的。

按当时的礼制，齐国是外姓诸侯国，所以没有资格获得天子赐的胙肉。但周天子这回破了例，赐齐桓公胙肉，这对姜小白来说是极高的政治礼遇。

另外，在感谢天子赐肉的仪式上，姜小白要给周天子遥拜，姬孔说天子有命，齐侯不必下拜，这一点也说明了周天子姬郑已经认可了

姜小白的地位。

天子都如此器重姜小白，那些混出场费的酱油国们自然也没意见。姜小白为之奋斗三十年的称霸大业，在葵丘会盟之时，达到了后人不可逾越的顶峰。后来晋楚相继称霸，但都没有达到姜小白的这个高度。

晋楚两国是继齐国之后，举世公认的两个超级强国，但问题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存在，互相制衡。而在姜小白时代，齐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楚国在楚成王时也只是地区性大国，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否认。

这场由齐国主导的葵丘会盟，诸国达成了五项协议，具体内容是：

一、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弑父者死，不许国君废嫡立庶，不许妻妾易位）。

二、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建立有效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鼓励民间的教育发展）。

三、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尊老爱幼，礼待客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反对基层权力世袭，不许国君杀害士大夫）。

五、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诸国之间要团结协作，互通有无，不许大家乱挖邻国的墙角）。

老大发话了，弟兄们谁敢不听，都唯唯拱手，肃然听命。

葵丘会盟，是春秋时代第一次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出现了以齐

国为诸侯长的国际新秩序。这就是做老大的好处，可以制定游戏规则，从古至今，真理永远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上，他的意志就是真理。

葵丘会盟，是一个人的舞台，江湖莫不仰视。须发皆白的姜小白以江湖盟主的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同时也是姜小白对国际社会发出的警告：世界和平协议已经签署，以后大家都要遵守这份协议，否则老大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虽然不知道姜小白确切的年龄，但在周公姬孔劝止姜小白给天子遥行大礼的时候，说“伯舅耄老，无须下拜”。耄是指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说明这一年（前651），即使姜小白没有七十岁，也应该六十多岁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半截身子埋进土，在人生的夕阳时分乘风入云，江湖中人山呼伏拜，姜小白此生无憾。

十三 性格决定命运：

齐桓公的家庭悲剧

和春秋小霸姬寤生充满笑料的人生相比，姜小白这一生几近完美。生在富贵之家，有这么多的贤臣辅佐，年少得志，老年称霸，身边妻妾如云，膝下儿孙满堂。这样的人生，谁不想拥有呢？

有时不得不承认姬寤生、姜小白等人的投胎技术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一生下来就顶着公子的头衔，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话说回来，收入与所付出的风险是成正比的，不能只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风光无限，也要看到他们在顶层官场上混迹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

生在大富大贵之家的孩子，长大后就必须面对财富与权力的分配问题。嫡庶之争，妻妾之争，拎着脑袋玩命，一旦失败，下场非常凄惨。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掉了一母同胞的兄、弟，十个侄子全部处死。其实这也不能怪李世民心狠手辣，如果李建成成功，李世民的儿孙们一个也活不了。

在家天下时代，君主的家事即国事，凤子龙孙一生下来，都会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姜小白自然也不能例外。官场之中充满了险恶，稍有一步不慎，粉身碎骨也没人怜惜。

李世民之所以以次子的身份敢于杀兄屠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并统一的过程中立下奇功，而李建成因为是嫡长子就平白占了太子的位置，让李世民如何服气？唐高祖李渊在立李建

成为太子的那一天起，兄弟仇杀的种子就已经埋下。

姜小白的情況要比李世民好多了，虽然姜小白的母亲卫姬深受父亲姜禄甫的宠爱，但据现有史料看，姜禄甫从来没有立姜小白做太子的打算。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保护了姜小白的安全，至少齐襄公姜诸儿不会猜忌这个异母弟弟。姜小白的堂兄姜无知因为威胁到姜诸儿的地位，差点没被姜诸儿整死，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姜诸儿能把心思都用在治国上，做一个守成的明君，姜小白至死也只是一个富贵终生的公子哥。就像周世宗柴荣多活十年，赵匡胤也会心甘情愿地在柴荣麾下做一个将军一样。

历史老人的安排让人无法琢磨，姜诸儿在执政后期突然变成了二百五，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大家都在给自己找后路，这才把没有心理准备的姜小白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此时的姜小白应该还没有做齐侯的野心，他逃到莒国的唯一目的，只是避难。

在之前的齐国政治舞台上，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姜小白，因为按长幼顺序，姜诸儿如果挂掉，继位的只能是姜诸儿的次弟姜纠。只有少数高层人士看准了姜小白，认为他必能成为一代明君，和姜小白走得很近，比如两位齐国上卿高傒和国归父。

说到姜小白从普通的公子一跃成为争夺国君之位的最热门人选，就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著名帝王，就是前面讲到的前秦皇帝苻坚。姜小白有许多和苻坚相似的地方，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他们都是时任君主的弟弟，姜小白的兄弟姜诸儿，苻坚的堂兄苻生。

二、他们的帝王兄长都荒唐得可以，姜诸儿乱伦杀妹夫，苻生以虐杀动物为乐。

三、他们在朝中都有大佬支持，高傒、国归父支持姜小白，梁平老和吕婆楼支持苻坚。

四、他们都有一个足以威胁到自己继位的哥哥，姜小白的哥哥姜纠，苻坚的同父兄长苻法。

五、他们都把一个江湖上的中等国家打造成一代铁血帝国，姜小白称霸天下，苻坚统一北方。

六、他们都得到一位旷世绝古的名相，姜小白有管仲，苻坚有王猛。

七、他们都非常好色，姜小白有几十个姬妾，苻坚霸占了慕容垂的夫人，一代美男慕容冲和他的姐姐清河公主。

八、他们都狂妄自负，滥施仁义，把最危险的敌人当朋友。

九、他们的性格都属于小白兔型的，外表纯洁，内心腹黑。

十、他们结果几乎相同，由于不听管仲、王猛临终前的劝告，姜小白和苻坚都被自己最亲近的人杀掉，沦为千古笑柄。

像姜小白、苻坚这样因为一时的用人之差而导致被臣下杀死的帝王，历史上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菩萨皇帝萧衍。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前半生异常英雄威武，如果他们各自早死一年，他们的人生都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苻坚在发动云龙门之变时，由于忌惮苻生的强悍，犹豫不敢动手，是苻法和梁平老等人率先冲进宫里，苻坚才壮胆杀掉苻生的。相比之下，姜小白比苻坚更有主见，做事果断，而且应变能力非常强。

姜诸儿被杀的消息分别传到鲁国和莒国，姜纠、姜小白看到了回国继位的希望，开始了惨烈的“龟兔赛跑”。鲁国希望自己的外甥姜纠能做齐侯，为了防止姜小白抢先一步入临淄，派管仲带着一队人马，在从莒国去临淄的要道上劫杀姜小白。

虽然管仲认为姜小白的能力更强，但此时各为其主，为了姜纠，管仲必须杀掉姜小白。就在姜小白没有对管仲有太多防备的时候，管仲突然放了一支冷箭，想置姜小白于死地。可管仲的箭法实在不怎么样，结果一箭射在姜小白佩带的钩子上。

如果此时被箭射中带钩的不是姜小白，那么这个人很可能会从钩子上把箭打掉，然后大骂管仲暗箭伤人太无耻。但如果管仲发现这一箭没有射死姜小白，他很可能会指挥鲁军包围姜小白，乱刀砍死，以绝后患。

姜小白的应变能力让人惊叹，在被箭射中带钩电光火石般的瞬间，他想到的却是利用这一箭来给自己争取回临淄的时间。姜小白假装被这一箭射中腹部，然后大叫一声，当场做毙命状，果然骗过了管仲。

管仲也粗心大意，没有上前察看真相，还以为姜小白已经倒地身亡，急匆匆地回曲阜复命。告诉鲁庄公姬同说姜小白已经死了，公子纠回临淄即位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姜纠也放松了警惕，慢悠悠地往临淄进发，结果比姜小白慢了六天，大好局面彻底葬送。

当然，管仲没有射死姜小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管仲早就看出姜小白非池中物，将来必能与他进行合作，成就一番霸业，所以有意留姜小白一条生路，然后回曲阜骗姜纠，让姜小白提前一步即位。至于姜小白会不会因为此箭记恨管仲，管仲应该没有这个担心，毕竟鲍叔牙在姜小白身边，足以劝止姜小白。

即使如此，姜小白能放弃对管仲的一箭之恨，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因为姜小白心里始终怀有一个称霸天下的梦想，鲍叔牙坚持欲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姜小白信人不疑，重用管仲，这绝非一般人能做到。李世民也对魏徵当初劝李建成杀掉自己而怀恨在心，但为了天下大业，李世民与魏徵亲密合作，最终成就了一段伟大的历史传奇。

姜小白和苻坚、李世民一样，都是极具个人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但苻坚的理想主义严重脱离实际，特别是王猛去世之后，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姜小白的情況好一些，为人理性沉稳的管仲死得较晚，所以管仲能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姜小白的浪漫病，姜小白在江湖上追求着他的理想主义，没有后顾之忧。

管仲并不是一个容易和他处朋友的人，但姜小白显然更喜欢结交朋友。姜小白有一个“朋友”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后来继姜小白之后称霸江湖的晋文公姬重耳。其实姜小白和姬重耳还有一层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姜小白的女儿齐姜就是姬重耳的异母兄长——太子姬申生的生母。

因为晋国内乱，申生被杀，姬重耳流落江湖，受尽了白眼。但当姬重耳来到齐国之后，受到了姜小白的热情接待，不但送给姬重耳大量财物，包括二十辆豪华马车，还把齐国的宗女嫁给了姬重耳，让姬重耳在异地他乡依然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姬重耳也是个非常重感情的男人，姜小白待他如亲生儿子，姬重耳非常感动。在他来到齐国的两年后，姜小白因为内乱被杀，姬重耳的处境相当危险，姬重耳依然不想离开齐国。还是他的齐国妻子苦苦相劝，姬重耳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齐国。

姜小白的浪漫理想主义还体现在一件事情上，姜小白听说齐国有个隐士，名叫小臣稷，姜小白很想见到这位隐士，就屈尊去找小臣

稷。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姜小白连去三次，都没找到小臣稷。侍从有些不耐烦，说国君已经尽到待贤之礼了，反正也找不到这个野人，国君就不要再去了。

姜小白当即反驳说：“即使是小臣稷故意不见寡人，也不是他的过错，士人视国君如粪土是理所应当的。”《吕氏春秋》对姜小白这个举动非常欣赏，评价姜小白“虽然齐桓公的私生活乱七八糟，但他对贤人如此，这正是他能成为霸主的主要原因”。

这个评价很准确，姜小白的霸业无人可及，但他的私生活实在乱得不成样子。上面讲到姜小白与苻坚的十点相似之处，但他们有一点不同的是，苻坚的失败不是因为家庭原因，而姜小白的最终悲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姜小白没有平衡好家庭成员的利益分配。在这一点上，姜小白和李世民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这两位伟大的君主都是好色之徒，李世民的好色是出了名的，姜小白也不遑多让。在姜小白的春宫中，就养着数百位美艳妇人，随时准备接受齐侯的临幸。

不过做姜小白的女人，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因为姜小白喜新厌旧的速度非常快，稍不满意，姜小白就会休掉她。有一次，姜小白和夫人蔡姬在湖里乘船游玩，蔡姬天生活泼，想和丈夫开个玩笑，她故意摇晃船桨，造成要翻船的假象。姜小白不会游泳，蔡姬这个玩笑差点没把姜小白吓死，一怒之下，姜小白休掉蔡姬，赶回了蔡国。

姜小白对蔡姬下如此重手，可能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蔡姬与他共同生活多年，却没能生下一个儿子。其实不止是蔡姬，蔡姬之前的两个夫人王姬和徐姬同样命中无子，这让姜小白如坐针毡。

在家天下时代，财富或权力的拥有者没有子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了生出儿子继承家业，姜小白在宫里塞进了上百个女人，实行“广种薄收”，不信生不出儿子。

姜小白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些女人中，有六位深受姜小白的宠爱，享受夫人的待遇。她们也很争气，各生下了一个儿子，分别是：大卫姬生姜武孟、小卫姬生姜元（即齐惠公）、葛嬴生姜潘（即齐昭公）、郑姬生姜昭（即齐孝公）、密姬生姜商人（即齐懿公）、宋华子生姜雍。

姜小白以为收获了六个龙子，哪知道却生出了一堆跳蚤。等跳蚤们长大后，对老爹的齐侯之位虎视眈眈。儿子们都想当太子，但姜小白最终打算让长子姜武孟做太子，虽然当时的太子是姜昭。个中原因，并不是因为姜武孟的母亲大卫姬受宠，其他姨娘都一样的受宠，而是姜武孟攀上了当时著名权臣易牙。

提到易牙，就很自然地扯出了姜小白最终悲剧的另一个原因——宠信佞臣。更加要命的是，姜小白不是宠信一个，而是和好几个人厮混在一起。这些人分别是：易牙、竖刁、姬开方、雍巫，这是姜小白旗下的四大佞臣。

论受宠程度，这四位大爷不相上下，但易牙和竖刁相比姬开方、雍巫更为知名，他们也成为后世佞臣的代名词。先说易牙，此君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但他有个别人不具备的特长——善于烹饪。可以这么说，易牙是春秋第一大厨，姜小白不为色迷，居然被易牙的美食迷倒，甚至得了美食依赖症。

易牙不仅善烹美食，而且为人机敏，善于察言观色，知道如何讨姜小白的欢心。有一次姜小白随口说了句：“寡人尝遍天下美食，唯独不知道人肉是什么滋味？”易牙为了能进一步取得姜小白的宠信，居然丧心病狂地杀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用儿子的肉做了一盘美食献给姜小白。

姜小白早已经没有年轻时打天下的英武和睿智，面对用人肉做的“美食”，姜小白不但不指责易牙丧失人伦底线，反而大快朵颐。易

牙会做人，姜小白很喜欢他，打算让易牙接替病重的管仲做宰相，但遭到了管仲的极力反对。管仲的理由很充分：对于这样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敢杀的人，还能指望这种人忠君爱国吗？

至于竖刁和姬开方，管仲对他们也极为反感，特别是竖刁，为了能得到姜小白的信任，他不惜自残身子，进宫做了宦官。姬开方虽然出身贵族，但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在卫国的父亲去世后，居然没有回国奔丧，这在讲究礼孝的春秋时代，是不能被社会主流舆论所容忍的。

管仲看人的眼光非常毒辣，这三个以阿谀拍马为能的小人在管仲眼前一过，就现出了原形。管仲行将就木之际，几乎是哭着劝姜小白：千万千万不要用这个佞臣，否则社稷危矣！

晚年的姜小白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去管仲的良言。虽然在管仲死后，姜小白遵照管仲的遗训，驱逐了三人，但不久后又把他们召回来，加倍重用。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说明姜小白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的判断能力，被佞臣玩弄于股掌之间。

《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论君子对小人如何规劝引导，小人追求利益的原始本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而在小人逐利的过程中，违背道义和良知是根本不可能避免的。姜小白以为他能用自己的仁爱感化易牙等人，实际上这只是姜小白的一相情愿。

易牙等人并没有感激姜小白对他们的再次重用，而是考虑一个问题：今天国君能废掉我们，明天同样也会这么做，不如趁早给自己谋条后路。所谓的谋后路，其实就是杀掉年老昏聩的姜小白，另立符合他们利益的新君。

至于如何做掉姜小白，其实非常容易，齐宫内外已经被易牙等人牢牢控制，姜小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具行将就木的死尸。此时的姜小白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锐气英武，年老多病的他躺在榻上静候死神的

召唤。

易牙指挥自己的心腹，在姜小白所居的寿宫外修建高墙，禁绝姜小白对外联系的一切通道，甚至连食物、水都不得送进去，坐看姜小白自生自灭。可怜一代枭雄姜小白困病于床，求食而不得，狂呼“嗒嗒”，羞病交加，死于冰冷的榻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也如烟消云散，时间是公元前643年十月十八日。

更可悲的是，在知道国君已经去世的情况下，无论是易牙、竖刁、姬开方，还是五位公子依然在为了获得最高权力而进行惨烈的争夺，甚至都没有去榻前看一眼已经死去的姜小白。直到六十七天后，姜小白的尸体才被人发现，可人们看到的却是一副让人恶心的场面：国君的尸体已经基本烂掉了，无数只尸虫顺着门缝往外爬……

同样是宠信奸臣，同样是年老饿死，梁武帝萧衍死后的待遇就比姜小白好多了，萧衍死后的当月，就被叛臣侯景以高规格下葬，至少落了个全尸。《南史》评价萧衍：“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这句评价，送给姜小白再合适不过了。

正如《说苑·尊贤篇》所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尸。”姜小白落得这么一个可悲可怜的下场，完全是他自找的，典型的自作孽不可活，苻坚也是如此。

在姜小白尸体腐烂变臭的这六十七天里，他的宠臣和儿子们正在为各自的利益大开杀戒。听说老爹死了，五位宝贝公子率自己的人马抱成团地撕咬，你咬我，我咬他，鸡毛漫天飞舞，史称：“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老爹死了不心疼，丢了国君位子才心疼。

宫外，五公子在临淄展开激烈的巷战；宫内，易牙、竖刁、姬开

方彻底铲除了异己，接下来就要按他们的利益需求来选定下一任国君了。在几位公子中，要数长公子姜武孟与易牙等人的关系最好，姜武孟的母亲大卫姬早就和易牙他们组成了内宫政治集团，共进共退。最关键的是，姜小白在生前就许诺立姜武孟为太子，有了这句话，易牙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姜武孟为齐侯了。

这些人以为立了姜武孟就万事大吉了，却忽略了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来自外国的干预。此时的齐国霸业衰落，整体国力大不如前，而齐国的邻居宋国在子兹甫（即大名鼎鼎的宋襄公）的治理下，国力蒸蒸日上，基本具备对外称霸所需要的硬件设施。

子兹甫野心勃勃，他渴望能成为第二个姜小白，但苦无机会对外下手。齐国发生内乱，正是子兹甫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绝佳时机，他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在子兹甫的强力干预下，齐人只好将即位三个月的姜武孟杀死，改立子兹甫心仪的人选姜昭为国君，就是著名的齐孝公。

关于宋襄公子兹甫的称霸事业，包括他对齐国国君人选的强力干预，接下来进行专门的讲述。

十四 仁者亦有敌：宋襄公的悲喜剧

关于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位君主，在《红颜祸水》篇中着重讲了，而在最流行的那份春秋五霸名单中，一般认为是齐桓公姜小白、晋文公姬重耳、楚庄王熊侣、秦穆公嬴任好，外加今天这篇的主人公——宋襄公子兹甫。因为子兹甫这个名字比较拗口，所以下面皆称为宋襄公。

嬴任好的霸主之位虽然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看法，但争议不是特别大，而宋襄公的“春秋霸业”，却往往引来后人无数的嘲笑声。

说到宋襄公的家世，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叉。论血统之高贵，姜小白、姬重耳、熊侣、嬴任好之流远远不能望其项背，因为宋国国君是商朝后裔。宋国的远祖微子开，就是史上著名暴君——商纣王子受辛同父异母的兄长！

在西周建立后分封的诸侯国中，宋国是最特殊的一个。宋国的特殊之处在哪儿？可以从《诗经》中找到答案，《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颂》只有西周王室才能享用，由于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所以特许进入。而在姬姓之外唯一有资格进入《颂》的，就是商朝的后裔宋国。其他强大的诸侯，如齐、晋、郑，只能在《风》中找到自己的座位。

宋国之所以能得到周朝如此高的礼遇，主要是微子开见纣王无道，弃暗投明，归顺了周朝。商朝灭亡后，是微子开代替自焚身亡的纣王向周军投降，“肉袒面缚”。因为微子开无罪，又如此识时务，所

以得到了周朝统治集团的普遍同情。分封诸国时，周朝把商朝故地（以河南商丘为中心的地区）划为微子开的封地，这就是宋国的起源。

宋襄公的父亲，就是在《齐桓称霸》篇讲到的那位敢当众戏耍齐桓公姜小白的宋桓公子御说。不过子御说敢于挑战强权的刚硬性格并没有对宋襄公的性格形成产生多少影响，相反，宋襄公的性格更接近于他的远祖（微仲）之兄微子开，“仁贤，殷人爱而戴之”。

不仅是宋襄公知书懂礼，谦让友爱，他的异母兄长子鱼同样仁且贤，兄弟二人互敬互爱，比姜小白那帮争风吃醋的宝贝儿子强多了。公元前652年冬，子御说病重，因为是嫡子身份，所以之前就被立为太子的宋襄公请求父亲改立兄长太子，理由是“长且仁”。

还没等子御说开口，子鱼就拒绝了弟弟的请求，说：“弟弟能想到把太子之位让给我，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仁德，说明他比我更有资格继位，何况我还是庶出。”

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看，宋襄公也有可能是故意让位，给自己脸上抹上一层道德的脂粉，实际上他根本不想让。或者是宋襄公想到了一个历史典故，远祖之兄微子开同样是庶兄，而作为嫡子继承人的子受辛却是一个千古暴君。当时天下，谈“纣”色变，宋襄公可不想做纣王第二。

不过宋襄公有一点做得要比纣王好，纣王即位，微子开没有进入统治核心层，而宋襄公在公元前651年即位时，就拜兄长子鱼为左师（相当于国相），兄弟二人齐心闯荡险恶而未知的江湖。

宋襄公即位后，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下葬，但还没等宋襄公操办父亲后事，江湖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就在宋桓公去世的当年夏天，齐桓公姜小白率诸侯在葵丘举行武林大会，周襄王姬郑正式承认姜小白的江湖霸主地位。作为中原重要的诸侯国，宋国自然也要

参加，而宋国外交代表团的团长，正是宋襄公本人。

宋襄公初出江湖时，在江湖上没什么名气，那些江湖老油子对他也不太了解。宋襄公只不过是臣服于齐国霸业的酱油国之一，姜小白也没有太在乎这个来自宋国的年轻君主。宋襄公在葵丘大会上能做的，就是遵照姜小白的意志，在《葵丘联合声明》中签字画押，承认齐国是天下霸主，然后领盒饭下场。

但作为一名群众演员，看到圈中一线大腕无限风光地走红地毯，拿小金人，心里不受触动是不可能的。姜小白在台上以武林盟主的身份宣读《葵丘联合声明》，在台下，宋襄公满脸的“羡慕嫉妒恨”，凭什么你能住豪宅，开豪车，我就只能吃盒饭，住笼屋？

其实宋襄公所想的，他的父亲子御说就曾经想过，只是苦于国力微弱，没有足够的实力在江湖上称霸，只能俯首甘做姜小白的仆从国。子御说的立国战略是先苦练内功，然后等天道有变，乘势取之。宋襄公继承了父亲这个比较稳妥的发展战略，他和兄长子鱼并肩作战，暂时不过问江湖上的事情，发展经济，积蓄军力。《左传·僖公九年》记载：“（宋襄公）使（子鱼）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

宋襄公手上有了足够的牌面，开始把战略重心向外转移，四处伸头探脑，看什么地方有喷香的肉饼。正好齐国发生内乱，五公子争位，让宋襄公看到了无限的财路。易牙等人扶持公子姜武孟即位，这是宋襄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就是齐国太子姜昭。

早在姜小白时代末期，名相管仲就已经看出了齐国内乱的苗头，为了能让太子姜昭日后顺利继位，管仲需要给姜昭找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外国靠山。宋国距离齐国较近，而且宋襄公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通过各层关系，管仲和宋襄公达成了共识，一旦姜昭的地位受威胁，宋襄公就出手相救。

正因为有这一层缘故，所以姜昭和宋襄公走得很近，如果姜昭即位，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宋国在齐国的战略利益。现在易牙这伙小人把姜武孟弄上台，明摆着是要断宋襄公的财路，换了谁也不能答应。

姜昭为了躲避易牙等人的追杀，卷起包裹逃到宋国避难，并请求宋襄公给予军事援助。自己在齐国的政治代理人受了委屈，作为未来的宗主国，宋襄公不能坐视不管。

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宋襄公通过某种渠道给齐国传达了自己的意愿：必须立姜昭为齐侯，否则我和你们没完。不要指责宋襄公粗暴干预别国内政，当年姜小白可没少干过这种事，春秋无义战，不讲什么仁义道德，只看谁的胳膊粗。

宋襄公的态度如此强硬，是基于宋国和齐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宋国国力虽不能说超过了齐国，但至少可以持平。来自宋国的强大军事压力，迫使易牙等人不得不做出违心的选择，杀掉倒霉鬼姜武孟，准备迎立宋襄国的政治代理人姜昭。

虽然易牙、竖刁、姬开方对宋襄公公开服软，但齐国的另几位夺位失败的公子坚决反对姜昭即位。蛋糕就这么一块，如果让姜昭一口吞掉了，弟兄们都去喝西北风？本来这几个鸟人互相撕咬，现在大敌当前，他们抱成团地反对姜昭。正由于几个公子的反对，立姜昭为齐侯的手续始终办不下来，大家就这么干耗，谁也别想私吞蛋糕。

宋襄公威胁齐国必须立姜昭，等于把自己置于无路可退的境地。一旦齐国四公子当场打脸，而宋襄公又不对齐国使用武力，宋襄公就将成为江湖上的笑柄，他在江湖上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威望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政治手段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用武力解决问题，用雪亮的刺刀来证明真理在自己这一边，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公元前642年正月，宋襄公纠集了曹、卫、邾等国，组成联军，带着姜昭，朝着临淄的方向杀来，要为姜昭讨个说法。不久后，鲁国也发现了这条财路，自然不肯落后，也挤进来入了股。这一年的五月十四日，以宋为首的“五国联军”与人心不稳的齐军在甗（位于山东济南）大打出手。

统治齐国的易牙集团和四公子这些人，迎风拍马搞阴谋是把手，但让他们冒充军事家，自然会穿帮露馅。当年的五月，乱哄哄的齐军被气势如虹的联军杀得惨败，连内裤都输掉了。

从《左传·僖公十八年》的记载“（宋襄公）立孝公而还”来推断，以宋襄公为首的联军应该至少杀到了临淄城下，迫使战败的齐国的饭桶集团迎接姜昭入临淄，即齐侯位。

背靠大树好乘凉，姜昭抱上了宋襄公的粗大腿，自然无人敢招惹。虽然四个弟弟对姜昭坐在齐侯的宝座上恨得牙根痒痒，但慑于宋国的武力，他们只能忍气吞声，看着姜昭吃香喝辣。

西方有个寓言故事，说有一只猴子看到火中有个香喷喷的栗子，就唆使旁边的猫帮忙把栗子捞出来，这只蠢猫用烫伤爪子的代价，把栗子捞出来给猴子吃，宋襄公就是这样的蠢猫。

姜昭即齐侯之位后，就开始疏远宋襄公，姜昭并不想做宋襄公的傀儡。齐国不像曹、邾、陈、蔡这样的酱油小国，能被大国武力慑服，齐国虽然内乱，但大国骨架还在，骨子里的大国基因是不可能消失的。姜昭借宋襄公的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宋襄公到头来白忙一场，别提多丢人了。

公元前641年的冬天，姜昭联合楚、陈、蔡、郑诸国在齐国召开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恢复齐桓公制定的国际旧格局，还在做霸主梦的宋襄公非常尴尬地被拒之门外。这次会议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实际上是各国建立反对宋国霸权的同盟。

宋襄公为人不明时务，自以为是，总认为齐桓公第一自己第二，沉迷在做中原霸主的黄粱大梦中不能自拔。看到宋襄公到处出洋相，左师子鱼劝弟弟有多少米吃多少饭，不要做超过国力承受范围之外的国际形象工程，得不偿失。

就在齐、楚、陈等国结盟之前，因为曹国拒绝承认宋国的霸主地位，宋襄公拎着菜刀砍上门，围着曹国一顿拳打脚踢。子鱼实在看不下去了，委婉指责宋襄公不修内德，不以德服人，成天妄想征服世界，迟早会栽跟头的。宋襄公满脑子霸权主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

公元前639年的春天，宋襄公对楚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外交攻势，与楚成王熊恽举行鹿上之盟，当面请求楚国支持宋国的称霸大业。让宋襄公惊喜的是，熊恽居然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作为新兴的超级大国，熊恽会心甘情愿地做宋襄公的小弟？别开玩笑，熊恽笑里藏刀，分明是在戏耍宋襄公。

宋襄公越来越狂热地追求霸业，他的兄长子鱼当头泼了弟弟一盆冰凉的洗脚水。子鱼说宋是小国，和楚国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上的，熊恽根本不可能放下身段屈服于宋，你别做春秋大梦了。宋襄公却鬼迷心窍，他不相信熊恽会出尔反尔，他现在唯一考虑的事情，就是接受熊恽在自己这位伟大霸主面前低眉顺眼。

当年的秋天，熊恽和几个酱油小国率兵来到宋境内的孟（今河南睢南西），说是要尊宋襄公为天下霸主。宋襄公得到消息后，笑得合不拢嘴，当即跳上高头大马拉的豪华车驾，猴子一般窜到了孟地。

但让宋襄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迎接他的不是肥肉和周天子派来的上卿，而是熊恽的反客为主和背信弃义。从字面上分析，熊恽带的楚兵人数应该远在宋襄公之上，所以当熊恽大笑着命人把宋襄公软禁的时候，宋兵没有丝毫反应。

.....

霸主？不好意思，这里没有霸主，只有一只被关在笼子里任人免费观赏的猴子。随后熊恽挟持着目瞪口呆的宋襄公，指挥楚军，风疾电掣般地杀向宋国本部，在宋国境内大巡游，搞得宋国人心惶惶。

熊恽搞突然袭击，原因并不难猜，宋襄公想做霸主，熊恽何尝不想？二十多年前，齐桓公姜小白逼迫熊恽向齐低头，熊恽憋着一股无名火，但好歹齐国是超级大国，暂时低头也就算了。宋国算哪根洋葱，也敢在老虎头上拔毛？

不过宋国好歹也是个中等强国，不是楚国一口就能吃掉的，熊恽囚禁宋襄公，只是想给这个妄想症患者一个警告。在鲁僖公姬申的调停下，当年冬天，熊恽在亳地（今山东曹县南）释放了宋襄公。

按道理讲，初出茅庐的江湖新锐受到这等羞辱后，应该对自己的张狂行为有所收敛，闭关苦练，十年后再来华山论剑。可宋襄公与众不同，他从这次羞辱事件中得出的结论不是宋国实力不如楚国，而是应该和楚国决一死战，以报此仇。

左师子鱼早就瞧出弟弟是个什么货色，别人撞了南墙就回头，他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子鱼私下对人说：“熊恽这么羞辱他，也改变不了他的本性，迟早要出更大的洋相。”

公元前638年的夏天，怒气冲天的宋襄公纠集了卫、许、滕等酱油国，集中优势兵力，对宋的邻国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之所以拿郑国开刀，是因为郑国在江湖上是公认的楚国小弟，如果能打垮郑国，对宋有两个好处，一是用武力逼迫郑国弃楚归宋，二是从北线压缩楚国向北发展的空间。

想法倒是不错，但问题是熊恽根本不可能坐视郑国被打，一则关乎脸面，二则关乎楚国的战略利益。熊恽也意识到不解决宋襄公这个

刺头，以后别想过安生日子。于是楚军大举北上，朝着商丘的方向杀来。

宋襄公非常期待这场复仇之战，拒绝了子鱼的劝告，把主力部队拉到了泓水（今河南惠济河）北岸，静待楚军前来送死。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在宋襄公即位之后，对子鱼提出的事后证明正确的建议一个也听不进去，子鱼劝他不要拿鸡蛋碰石头，再次被拒绝。

有一种可能是宋襄公的自大心理在作怪，如果事事都听你的，那还要我这个国君做什么？所以子鱼说打狗，他偏撵鸡，专和哥哥拧着干，让子鱼徒呼奈何。

最让子鱼窝心的是，在泓水之战时，楚军开始大规模地从河南岸涉水到北岸，子鱼提议乘楚军济水未半而击之。因为楚军渡河时，并没有作战时必要的阵形和思想准备，如果在此时对楚军发动猛攻，已经上岸的楚军必然溃乱，回头往河里挤，宋军必能大获全胜。这样一条几乎完美的作战建议，又被愚蠢自负的宋襄公拒绝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等楚军完全上了岸，还没有列好作战阵形时，子鱼认为不能再等了，这是我们取胜的最后一根稻草。楚宋实力差距太大，一旦让楚军列好阵形，被打哭的只能是我们。宋襄公还是没有同意，气得好好先生子鱼差点没爆粗口。

宋襄公和子鱼的兄弟情还是有的，他之所以屡次拒绝兄长的建议，主要还是出于他心中那份廉价的自信与仁义。至于宋襄公自己所谓君子不伤二毛之类的假话，实际上他自己也不信，最关键的核心在于，宋襄公想堂堂正正地用一场阵地战打败楚军。只有这样，他的霸主地位才比姜小白更有含金量，毕竟姜小白从来也没有打败过强大的楚军。

和偶像姜小白一样，宋襄公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姜小白的理想主义有深厚的现实土壤，而宋襄公的理想主义完全是在空想做梦，

严重脱离现实。自古兵不厌诈，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是最大的道德，宋襄公一味拘泥于道德的约束，屡失战机，他自以为能得到敌人的尊重，但现实狠狠嘲弄了这位崇尚假大空的滑稽君主。

宋襄公要仁义之名，但他的对手熊惲只要实实在在的胜利，在渡河未半和上岸后未排列好阵形时，他也担心宋军会搞突袭，结果却让他大呼意外。敌人的慷慨就是对自己最大的道德，那还客气什么。

楚军的实力本就在宋军之上，打大规模阵地战，齐军都不敢言必胜，何况这豆芽菜一般大小的宋军。等楚军做好了战斗准备，宋军才在宋襄公的率领上，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结果一口咬在了冰冷坚硬的石头上。

结果是不必多说的，是役，楚军大胜，宋军几乎被全歼。仁义的宋襄公在这场战役中身负重伤，被楚军的乱箭射中了大腿，倒在地上破口大骂，也不知道在骂谁。幸亏子鱼眼疾手快，拉着这个只会出国际洋相的弟弟狼狈逃回宋国，身后鸡毛漫天飞舞。

熊惲笑眯眯地回国数银子，而回到商丘的宋襄公则和愤怒的国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对于这场近乎闹剧般的战役，宋人气得直摇头。宋国怎么会有这样猪一般的国君，不但煮熟的鸭子飞了，还被鸭子反咬了一口。

宋襄公面对舆论炮轰，还在用所谓的战争道德来自我辩护，有两点：一、楚军中有不少老年人，我不忍心杀他们（不伤二毛）；二、楚军未布好阵形（不鼓不成列）就发起攻击，不是君子所为。

看来子鱼对这个弟弟已经忍够了，对宋襄公的谬论当面进行驳斥。《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了子鱼的原话，虽然说得洋洋洒洒，但不如《史记·宋世家》批判得更有力，也更能堵住宋襄公的臭嘴，原文是：“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自古兵不厌诈，取得胜利就是英雄，而不是像你这样成天君子曰，圣人云。对着镜子照照，你是个君子吗？如果你想做君子，那何必和楚人开战，不如去做楚人的奴隶，熊恽一定称赞你是个君子。”

子鱼不仅在政治上很有一套，从他对战局上的判断，说明子鱼具有相当高超的军事素养，称之为军事家并不为过。只可惜子鱼是庶出，不能继承宋子（宋国君的爵位）之位。如果子鱼做宋子，他的内政外交政策会根据宋国的国情来安排，而不是好高骛远地做什么武林盟主。

宋襄公称霸事业的惨败，正是由于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称霸构想已经远远超出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其实最符合宋襄公实际的，是做郑庄公姬寤生那样的小霸，而不是姜小白那样的大霸。

宋襄公没有自知之明，姜小白都不敢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他怎么就敢拎着菜刀上阵？熊恽是好惹的吗？被兄长不留情面地严厉斥责，宋襄公应该有所醒悟，但已经来不及了。第二年（前637）的五月，因为大腿的箭伤复发，“春秋霸主”宋襄公一命呜呼，带着遗恨去了天堂，却给人间留下了千古笑柄。

宋襄公有称霸的野心并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一没有自知，二不会知人。正如宋人苏轼在《宋襄公论》所说：“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而兴，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岂可同日而语哉。”宋襄公只看到姜小白最终称了霸，却从来没有思考过姜小白为什么能称霸。

成语东施效颦，用在宋襄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十五 春秋小霸楚成王

这场笑料百出的泓水之战，宋襄公输了一个底朝天，而所有的蛋糕都被他的对手楚成王熊恽吃掉了，今天就讲一讲熊恽的事情。

在春秋五霸的评选大会上，许多评委都把票投给了齐桓公姜小白、晋文公姬重耳、楚庄王熊侣、秦穆公嬴任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搞笑的宋襄公子兹甫也捞到不少选票，即使是小霸郑庄公姬寤生，也有自己的支持者。所有的镁光灯、话筒都对准他们，请他们发表获奖感言，却忽略了台下还坐着一位沉默的霸主候选人，他就是熊恽。

楚庄王熊侣的功业是历史公认的，响当当的春秋霸主，但熊侣赖以称霸的楚国超强的国力，却是他的祖父熊恽打造的。换句话说，楚国的称霸事业，实际上是从熊恽开始的。

在春秋战国的八百诸侯国中，可以说楚国是最特殊的一个。楚国的特殊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因为楚国的位置偏南，所以从民族心理上，楚国介于华夏与蛮夷之间。

二、严格来说，楚国不算是西周建立时分封的权贵封建系统，而是以家臣身份获得了对长江流域的统治权。

三、自楚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与周王室若即若离，甚至公然与周朝作对，也是诸侯中第一个称王的，虽然楚国的爵位只是子爵。

四、春秋时的楚国，与战国时的秦国非常类似，对领土扩张有着天然的冲动，都是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

熊恽的远祖鬻熊，不知道通过什么门路，在周文王姬昌手下当差。从《史记·楚世家》记载鬻熊“子事文王”来看，姬昌应该很欣赏鬻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鬻熊视为姬昌的干儿子。

从鬻熊往后三代，鬻熊之子熊丽、熊丽之子熊狂、熊狂之子熊绎，都在周王身边当差。也许是熊家侍奉君王有功，所以周成王姬诵念及他们的忠诚，把熊绎封在了荆蛮之地，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汉江流域。

在商周之际，汉江流域基本没有得到开发，典型的“蛮荒”之地。周朝把熊氏封在这里，也不算是什么厚封，只是看熊家事主有功，随便赏个仨瓜俩枣就打发了。

熊氏子孙骨子里的狂妄和冒险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在五代楚子尽力服从于周王室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个狂妄自大的君主，就是开楚国争霸先河的熊渠。

熊渠有文武才，能治民，“甚得江汉间民和”，开始对外扩张，灭掉许多小国，扩大地盘。熊渠在历史上留下的笔墨不多，他做得最威武的一件事情，就是公然与周厉王做对，自封为王，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虽然熊渠很快废除了王号，但熊氏对周天子的蔑视，却一辈辈传了下来。

熊氏楚国又往下传了几代，直到熊通杀掉侄子自立为楚子，又恢复了楚王的名号。更有意思的是，熊通想让周平王封他为王，遭到拒绝，熊通跳脚大骂周天子。

熊通甚至还公然污辱周天子的先祖，他的远祖鬻熊明明是周文王的家臣，却被熊通说成周文王的老师。反正熊通知道，东周王室日渐萎靡，无力南下，所以熊通自恃武力强大，视周天子如粪土。

楚成王熊恽，就是自大狂熊通的孙子。熊恽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的兄长庄敖看他不顺眼，准备杀掉他，没想到熊恽先下手为强，联合随国反客为主，干掉了兄长，自立为王。

和狂妄自大的祖父熊通相比，熊恽相对低调一些，也更为务实。虽然熊恽同样轻视周天子，但他知道周天子是一块可以利用的金字招牌，和周天子作对，容易招致其他诸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讨伐楚国，并不符合楚国的利益。

楚国虽然日渐强大，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让诸侯臣服的地步，所以熊恽的外交政策是“远交近攻”，修改被祖父破坏的对外政策。熊恽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同当时的主要诸侯国，如鲁、齐、郑互通有无，礼尚往来，为楚国赢得良好的外部生存环境。二是朝贡周天子，表示楚国尊重天子的威信，绝不做逆臣。

凭空掉下来了一个大忠臣，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余粮的周惠王姬阍喜出望外，这年头还有主动给他装孙子的。为了表彰熊恽，姬阍赏赐了熊恽一块腊猪肉（胙肉），这是齐桓公姜小白当年享受过的待遇。

姬阍还给熊恽留了一句话，或者说是一块金字招牌，“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周天子正式承认了楚国在南方的霸权，随便你在南方怎么折腾，别跑到中原砸场子就行。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交易，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不过姬阍应该不是只代表周王室说的这句话，而是代表中原的华夏诸国和熊恽进行谈判。中原诸国也经常大打出手，但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兄弟之间有个磕磕碰碰很正常。楚国与中原异俗，和中原诸国也玩不到一块去，不如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从周厉王开始，楚国就是江湖上公认的刺头，特别是东周分裂以来，楚人不断四处扩张，引起了中原诸国的警觉。虽然齐国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齐国地处东北，与楚国并不直接接壤，真正起到拱卫东周雒都的，是郑、许、陈、蔡等国。但这些都是小国，整体实力

根本无法与楚抗衡。宋国倒是有一定实力，可看了宋襄公那副招风耍宝的模样，周天子根本指望不上宋襄公。

为了换取楚国不对周王室做出不利的承诺，周襄王姬阍达成了利益分配协议：楚国不北上，其他地方随便拿。对楚成王熊恽来说，这是一份可以接受的协议，虽然暂时不能北上攻城略地，但周边还存在着许多周天子允许楚国侵占的小国。吃一个大饼能填饱肚子，吃十个小窝头同样可以吃饱。

《史记》记载，“（周襄王赐肉之后）于是楚地千里”，说明楚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但应该没向北扩张，所以楚国的扩地千里是在中原诸国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

楚国从西周时的“蛮荒”小国，发展到战国时“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超级大国，并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积累数十代艰苦开拓才形成的。

不妨拿楚国和清朝做一下对比，发现这两个相隔两千多年的政权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先祖都是臣服于大国，地理位置都比较偏远，经济落后，但民风都刚强尚武。

二、熊渠和努尔哈赤非常相似，二人都和原宗主国产生矛盾，直至刀兵相向。

三、熊通和皇太极很像，二人都在父祖基业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扩张，基本打造出大国骨架。

四、熊恽和康熙非常相似，他们都不是开国君主，但“名为守成，实同开创”，在他们治下，楚与清都成为当时天下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

五、熊恽之子熊商臣（楚穆王）与雍正非常相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甚至他们在位时间都相同。熊商臣在位十二年，雍正在位十三年。

六、熊侣和乾隆非常像，都是吃祖宗饭，熊侣成为公认的春秋霸主，乾隆又号称十全老人，天下大治。

七、自熊侣和乾隆之后，楚与清都出现了严重的滑坡。

如果没有康熙打的家底，雍正整肃内政，“乾隆盛世”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同理，楚庄王熊侣能称霸天下，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他的祖父熊恽给他留下这份偌大的家业。

由于各种原因，楚庄王熊侣的知名度远高于他的祖父熊恽，而春秋时代最伟大的一场战役——城濮之战的两大主角，一个是晋文公姬重耳，一个就是楚成王熊恽。因为这场著名战役的胜利，晋文公“大名垂宇宙”，而熊恽不幸沦为配角，连份盒饭也没捞到。

虽然城濮之战大败，不过并没有影响楚国作为新兴超级大国的江湖地位。而且城濮之战的失败，和熊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子玉等人头脑发热，不听熊恽的劝告，才中了埋伏。

说来巧合的是，熊恽最终没能挤进春秋五霸之中，但他和两位生活在传说中的超级霸主——姜小白、姬重耳都打过交道，只不过这两次让后世激动万分的双龙会，熊恽都是以配角的身份出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熊恽的知名度。

更为滑稽的是，虽然在泓水之战，熊恽是最终的胜利者，可惜历史只记住了失败者宋襄公，而胜利者熊恽再次不幸地沦为配角。连续三场万众瞩目的大戏，小金人都被别人捧走了，熊恽的运气可以说差到了极点。

赢得身后千古名，是每个英雄都渴望得到的，不过他们更看重的

是生前能建立多少功业，做到这一点，足为不朽。论知名度，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都是历史舞台的一线人物，但足以让熊恽骄傲的是，三位霸主对熊恽的态度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敬畏。

姜小白的霸业让天下震撼，却不包括楚国，熊恽向来没把姜小白当回事。熊恽对姜小白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一旦玩过界，熊恽会强硬地顶上去，这才是楚人的霸道风格。

有其君，必有其臣，熊恽性格强硬，他手下的文臣武将也多是这样的性格。公元前656年，因为楚国攻打郑国，姜小白作为江湖老大，自然不会坐视小弟被欺负，率“八国联军”来找熊恽讨说法。

熊恽以强凌弱，姜小白发兵问罪，熊恽反而理直气壮地派人质问姜小白为什么侵犯楚国利益。这段话很精彩：“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这就是著名成语“风马牛不相及”的出处。

其实熊恽心里明白，姜小白救郑只是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打压楚国，给楚国扣上一顶破坏世界和平的大帽子，扩展齐国的战略利益空间。管仲出面指责楚国要为几百年周昭王南征时不幸身亡负责，楚使立刻顶了上去：“昭王是怎么死的，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到江汉之滨，问问水神。”

熊恽不给姜小白面子，姜小白当众下不来台，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南下。熊恽向来不怵姜小白，你爱来不来，关我屁事？熊恽派大夫屈完去诸侯军的驻地召陵给姜小白上一堂思想教育课。

姜小白想吓唬屈完，大陈兵甲，然后拉着屈完到处参观，让屈完见识一下大齐雄师的威武。姜小白迎风说大话：“以我军的强大实力，普天之下，谁能御之？寡人要攻城，何城不能克？”

屈完虽然奉熊恽之命前来与齐人议和结盟，毕竟熊恽也不想和姜

小白拼个鱼死网破，但屈完的态度非常强硬。屈完面对姜小白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冷笑一声，他的回答铿锵有力：“国君如果以仁义布施天下，谁敢不服？如果国君对楚使用武力，你将什么也得不到。楚国以方城为盾，以汉水为城墙，众志成城，必以死战。齐军虽多，楚亦不惧。”

召陵之盟，与其说姜小白南下迫使熊恇放弃进攻郑国，不如说以齐国为首的中原诸国暂时阻止了楚国的强势北进。楚人集团敢当面对天下霸主姜小白连发呛声，还是基于楚国强大的实力，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个道理。

姜小白和熊恇的性格截然相反，姜小白似火般炽热，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而熊恇如水般沉静，他更专注于现实利益的得失。春秋第二霸姬重耳流浪到楚国，熊恇以诸侯之礼接待了姬重耳。熊恇这么做，不是因为姬重耳有多高的江湖声望，而是熊恇断定姬重耳必非凡品，将来极有可能回晋国继位。熊恇拉近与姬重耳的私交，方便楚国日后从姬重耳那里得到战略利益。

熊恇很会做生意，但他绝不是那种内心冰冷的、只讲利益不谈感情的腹黑政客。熊恇厚待姬重耳，却只能从姬重耳那里得到“如果楚晋相战，晋退避三舍以报楚子之德”的承诺，其他什么也没得到。

楚国大将子玉也看出姬重耳不是等闲人物，主张杀掉姬重耳，以绝后患。熊恇当然也看得出来，姬重耳不是个善茬儿，如果杀掉姬重耳，对楚国有利无害，但熊恇还是拒绝这么做。

看得出来，熊恇很欣赏姬重耳的贤德仁义，以及姬重耳身边的那几个贤佐。英雄惺惺相惜，即使曹操看出刘备将来必为大患，他也拒绝程昱杀掉刘备的建议，英雄是不能随便杀的。

熊恇和曹操都比较腹黑，但是他们的这种腹黑只用在政治上，在生活中，他们待人真挚，甚至还带着浓厚的孩子气。在姬重耳准备出

发去秦国时，熊恽替秦穆公嬴任好说好话，说秦君仁德，可付大事，然后熊恽厚赠姬重耳大量财物，挥泪而别。

这也是同样是腹黑帮成员，熊恽显得比勾践更有人情味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熊恽腹黑手不黑，勾践不但腹黑，而且手黑。即使在城濮战败后，熊恽也没有后悔当初放走姬重耳，反而称赞姬重耳是天命所归，非人力所能阻止，埋怨子玉不该无事生非。

熊恽喜欢结交诸国落难的公子，除了姬重耳之外，齐国五公子内乱之后，齐桓公的另外七个儿子为了避难，全都逃到楚国。由于齐国形势日趋稳定，熊恽收留七公子，在政治上是捞不到大便宜的，何况当年姜小白对熊恽非常蔑视，但熊恽还是大度地收留了他们，并封为大夫。

熊恽生性比较诙谐，特别是他戏耍“霸主”宋襄公，将宋襄公软禁起来，然后带着宋襄公满世界兜风耍宝，让人捧腹。如果换成秦昭襄王那样的虎狼暴君，十个宋襄公也别想回去。

当然，熊恽故意放回宋襄公，还有一层深意，体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宋襄公志大才疏，根本不是当霸主的料，而其兄子鱼文武双全，如果熊恽杀掉或永久软禁宋襄公，宋人必拥护子鱼继位，这是熊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宋国是楚国日后北上争霸中原的必经之地，子鱼控制下的宋国必然会成为楚国的劲敌，与其如此，还不如留下宋襄公。虽然不久后，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受重伤而亡，但宋人并没有立子鱼为君，想必熊恽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正因为如此，熊恽才敢大举伐宋，企图突破宋国防线，北上争霸。但让熊恽万分遗憾的是，他真正的对手不是宋成公子王臣，而是他曾经无比欣赏的晋侯姬重耳，这才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

齐桓公姜小白和晋文公姬重耳的称霸大业，严格来说，都是建立在成功阻止楚国强势北进的基础上，属于战略防御。从这个层面上讲，可以将楚国视为与齐、晋同等级别的超级大国。城濮战败，并没有对楚国伤筋动骨，楚国依然有能力给中原诸国制造强大的军事压力，就如同赤壁之败，曹操依然是江湖上的NO.1。

有句话说得好：再伟大的英雄也会被时间残忍地杀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熊恽的生年不详，但他杀兄即位时应该在二十岁左右，而城濮之败的那一年（前632），熊恽已经在位三十九年了，此时熊恽的年龄差不多六十岁。

岁月不饶人，当年意气风发、席卷江汉的那股霸气渐渐被岁月腐蚀殆尽，晚年的熊恽早没有了年少时的锐气，变得暮气沉沉，容易听进谗言。特别是在立储君的问题上，熊恽因为溺爱太子熊商臣，杀掉了贤臣子上，但随后又猜忌熊商臣，准备废长立幼，结果激怒熊商臣，把老爹干掉了。

因为子上不喜欢熊商臣，认为太子“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宜继承大位，熊商臣恨之入骨，欲除子上而后快。熊商臣把城濮战败的主要责任归罪于子上，诬陷子上是因为接受了姬重耳的贿赂，故意兵败，不杀子上，楚国无威。熊恽也不辨真伪，立刻杀死了子上，自剪羽翼，导致熊商臣的势力坐大，熊恽实际上成为儿子手上的人质。

更要命的是，熊恽丝毫没有发现这一点，还以为自己能牢牢控制权力。当熊恽看熊商臣不顺时，就想废掉商臣，另立商臣的庶弟熊职。本来这件事情是秘密运作的，但知情人之一、楚成王的妹妹江芊却被熊商臣的幕僚潘崇设计，把熊恽的真实想法抖了出来。

熊恽担心商臣不好驾驭，准备先杀熊商臣，再立熊职。当熊商臣听说后，愤怒可想而知，眼看到嘴的蛋糕不但要被老爹送人，而且自己吃饭的家伙都要被砸了，性格暴虐的熊商臣岂能答应？

楚成王四十六年，即公元前626年的十月，再也控制不住愤怒情绪的熊商臣率兵闯进宫里，逼迫老爹自杀谢罪。处在绝望之中的熊恽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告诉儿子想吃蒸熟的熊掌，想拖延时间，等待自己的人马勤王救驾。

熊商臣不是傻瓜，当然知道老爹想做什么，没有同意。不过熊商臣还算有一点“良心”，他没有亲自动手，而是扔给父亲一条白练，请大王找个房梁悬梁自尽吧。

《左传·文公元年》记载了一个略显诡异和夸张的故事，熊恽在被逼上吊自杀后，双目圆睁，脸上写满了愤怒和悔恨。至于原因，书上说是因为熊商臣给他定的谥号是“灵王”。

在谥法中，“灵”和“炀”、“厉”一样，都是著名的恶谥。熊恽生前威震天下，死后也不想做一个昏君，被人骂绝千古。熊商臣尽了最后一份“孝心”，把“灵”字改成了“成”，熊恽这才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

“安民立政曰成”，“成”字确实高度地概括了熊恽不平凡的政坛人生，但在死后争这个虚名，并无太大的意义。

十六 小三转正：曲沃代晋事件

上面重点讲了郑、齐、宋、楚称霸天下的大业，今天讲一讲晋国。晋国在春秋史上的地位，从某种角度上看，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秦、齐、楚等大国，特别是春秋第二霸晋文公姬重耳的横空出世，为晋国挣得了太多的印象分。

晋文公姬重耳作为春秋第二霸，青史留有大名，但实际上他并非晋国的大宗出身，而是出自不起眼的小宗，有些类似于明成祖朱棣推翻朱允炆，取代朱标一系统治明朝。

晋国的始祖是周成王姬诵的幼弟唐叔虞，因为姬诵的一句戏言，被周公姬旦逼着封唐叔虞为唐侯，统治今山西西南地区，《诗经·国风》其实讲的就是晋国。之所以国号由唐改晋，是因为唐国统治区域内有一条晋河，久而因之，也就换了招牌。

晋国建立初期，在江湖上并不太起眼，在西周时期，政治级别最高、曝光率最高的当属周公姬旦一系统治的鲁国。唐叔虞本人在历史上也没留下多少浓墨重彩，平平淡淡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从唐叔虞往下传了五代，历经晋侯姬燮、武侯姬宁族、成侯姬服人、厉侯姬福、靖侯姬宜臼（与周平王同名）的事迹都与史无考，直到晋靖侯十七年，才有了明确纪年，因为这一年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就在周厉王姬胡被国人暴动赶跑的第二年，公元前840年，晋靖侯去世，太子姬司徒即位，就是晋僖侯。其实这些流水账并没有什么

可说道的，直到姬司徒的孙子晋穆侯姬费王即位，“鸠占鹊巢”大戏的序幕才被历史老人轻轻地拉开。

先做一个晋国大宗与曲沃小宗的世系表：

穆侯姬费王

文侯姬仇 曲沃桓叔姬成师

* *

昭侯姬伯 曲沃庄伯姬鳝

* *

孝侯姬平 曲沃（晋）武公姬称

* *

鄂侯姬郤 晋献公姬诡诸

***** *****

哀侯姬光 晋侯姬缙 惠公姬夷吾 文公姬重耳

*

晋小子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来，晋穆侯有两个儿子：长子姬仇，少子姬成师。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晋国大夫师服一针见血地指出穆侯给两个公子取名时的荒谬。因为穆侯讨伐仇敌条国时，长子降生，所以取名为姬仇，次子降生时恰逢晋军攻取千亩时大胜，所以取名姬成

师。

姬仇作为嫡长子，将来是肯定要继承晋侯大位的，怎么取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而“成师”又是当时人普遍认同的美名，含有“成就大事”的意思。师服认为嫡庶取名倒置，将来晋国必有争位大祸。

虽然师服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谁也没想到师服居然一语成谶，晋穆侯去世后，晋国果然出现了庶子夺位的闹剧。说来好笑的是，鸠占鹊巢的不是姬成师，而是穆侯另外一个庶子殇叔。不过姬仇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想私吞属于我的蛋糕，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了。三年后，姬仇带着自己的嫡系人马，闯进宫里，杀掉了殇叔，自立为晋侯。

谥号同样是“文”，晋文公姬重耳的知名度远远强于晋文侯姬仇，但姬仇的功业其实并非微不足道，只不过被姬重耳耀眼的光芒给遮掩住了。我们都知道十三经之一的《尚书》，而晋国（包括曲沃小宗）的所有君主，能单独入选《尚书》的，只有晋文侯姬仇，这可不是一般的政治待遇。

晋文侯之所以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姬仇杀掉了与周平王同时自立为王姬余臣，替平王解决了心腹大患，这一年是公元前760年。姬宜臼非常感激姬仇的出手相助，所以当着天下人的面，给予了姬仇极高的评价。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晋文侯姬仇才是春秋第一霸，因为这一年，春秋小霸郑庄公姬寤生才刚继位不久，更遑论齐桓晋文了。

晋文侯辅佐周平王，“于是乎定天子”，也是晋国大宗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自晋文侯之后，晋国大宗出现了大问题。公元前746年，姬仇去世，太子姬伯即位。就在当年，姬伯把自己的叔叔，也就是姬成师封在了曲沃（今山西闻喜），号称曲沃桓叔，此年姬成师五十八岁。

对于姬伯为什么要封姬成师，史载不详，但倾向晋国大宗的晋统

治高层对姬伯的这个举止非常不满，认为姬伯这是在自掘坟墓。对于姬成师的评价，《史记》只留下了九个字，“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说明姬成师人品端正，行为举止以德为先，在晋国高层内部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人皆归附。

另外还有一点，晋国的国都在翼（今山西翼城），面积并不大，而姬成师受封的曲沃在当时却是个大城，“曲沃邑大于翼”。如果把姬成师留在翼城，无兵无势，姬成师也闹不出多大动静，但一旦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上有一个相似的例子，一千年后，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在宗室内部辈分、威望最高，“道化宣流，人望攸归，为日已久”。所以桓温废掉海西公司马奕之后，从众人所请，迎立司马昱。

曲沃桓叔姬成师的辈分、威望、地位和司马昱差不多，引起晋国大宗的惊恐是很正常的。有人就放出风声，说：“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未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这位“君子”的唯物主义判断，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虽然姬成师年近六旬，但野心勃勃，想推翻侄子姬伯，自己做晋侯。由此可见，姬成师这个人也是王莽、司马昱之流的伪君子，打着仁德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

司马昱虽然想当皇帝，但在侄孙司马奕被废的政治事件中，司马昱并没有多掺和，那都是桓温干的好事。姬成师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冬虫夏草，为了做晋侯，他暗中和自己的嫡系潘父密谋于室，由潘父出手做掉姬伯，然后迎姬成师入翼城即位。

计划很完美，公元前739年，潘父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杀死了姬伯，然后派人去曲沃通知姬成师率兵入翼。潘父和姬成师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晋国大宗的势力并没有因为姬伯被杀而有所减弱，特别是晋国大宗控制的军事力量。

姬成师打点好行装，兴冲冲地去翼城，准备做晋侯，没想到迎头被晋国大宗敲了一棒。晋军应该是在路上设了埋伏，等姬成师的人马过来时，下山打兔子，结果毫无准备的姬成师被打得找不着北，狼狈逃回曲沃骂娘。

晋国的天下，还是属于大宗的，随后，晋人立姬伯的儿子姬平为晋侯，史称晋孝侯。姬平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杀父仇人潘父，铲除了姬成师安插在翼城的内鬼。

虽然史载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姬平从杀潘父开始，几乎将姬成师在翼城的势力连根拔起，彻底断绝了姬成师篡位的希望。八年后，即公元前732年，白发苍苍的姬成师含恨而死，其子姬鱄立，史称曲沃庄伯。

有趣的是，晋孝侯姬平和曲沃庄伯姬鱄都把杀害自己父亲的这笔血债算在了对方头上，叔伯兄弟成了斗眼鸡，无不欲除对方而后快。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晋国大宗与曲沃小宗的关系彻底破裂，双方成天打鸡毛战，谁也不后退半步。杀父之仇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还是争夺晋国的统治权，姬平想守住蛋糕，姬鱄要吃蛋糕。

从有限的历史记载来看，姬鱄的军事实力远在其父姬成师之上。姬成师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从侄子姬平身上拔下一根鸡毛，反而鸡飞蛋打，一地狼藉。而姬鱄却在公元前724年，率军攻进了翼城，杀掉了仇人姬平。不过姬鱄的目的只实现了一半，还没等他从篡晋侯之位的美梦中醒来，就被愤怒的晋国大宗赶出了翼城，哪来的就回哪去。

姬成师父子两次篡位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说明晋国大宗的实力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撼动的，但暂时的受挫并没有改变姬鱄的灭晋计划，他还在继续追逐在晋国大宗看来几成笑柄的梦想。

新即位的晋鄂侯姬郤在姬鱄看来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姬鱄

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公元前722年十月，姬螭再次发兵北上，如果能干掉姬郟，曲沃小宗就能实现弑杀晋侯的帽子戏法。晋国方面早有准备，姬螭刚出洞不久，晋国大夫公子万就率晋军主力顶了过来，姬螭被打得鼻青脸肿，随后又被晋国大夫荀叔轸礼送出境，损失惨重。

晋鄂侯姬郟也不是个善茬儿，他不能把战场放在自己的地盘内，砸烂了锅碗瓢盆，损失都是自己的。姬郟开始反击，让手下弟兄们带着火种闯进了曲沃境内，一把火烧掉了大片庄稼，烧掉姬螭的米袋子，差点没把姬螭气死。

姬螭以为姬郟是只软柿子，没想到是颗硬核桃，差点咯掉了姬螭的大门牙，但姬螭还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吃不到蛋糕已经很窝囊了，更窝囊的是还被吃的蛋糕狠狠地踹了一脚。姬螭烧了曲沃的粮食，几乎就端掉了姬螭的饭碗，姬螭岂能答应。

公元前718年，姬螭再次北伐翼城，不过这次姬螭学聪明了，他拉来了两个帮手和他一起做劫票的买卖。郑国和邢国也许是看到了伐晋的广阔商机，跟着姬螭拎刀抡棒子，去砸姬郟的场子。这位郑国的国君，就是那位到处煽风点火当小霸的郑庄公姬寤生。而姬寤生的仇人周桓王姬林也不甘寂寞，想在浑水中多摸几条大鱼，派大夫尹氏、武氏率军加入了姬螭的联军。

抛开当时实力强劲的郑国不谈，单是周天子出兵，就在政治上给予了姬螭极大的便利。姬螭可以光明正大地打着周天子的旗号暴打姬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春秋初期的晋国实力不算特别强，何况又从中分裂出一个曲沃国，整体实力甚至连一流都算不上。曲沃联合郑、邢，以及东周王师，实力自然在晋国之上。姬郟手上的牌面有限，自然不是联军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被赶出了翼地，往北逃到随地（今山西介休东

南) 躲避风头。

联军占领了翼城，表面上很风光，但问题很快就出来了——胜利果实归谁？应该是几个心怀鬼胎的侵略者分赃不均，结果导致姬鳢与周天子姬林的关系彻底破裂，双方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在江湖上传为笑柄。

更可笑的是，姬林与逃到随地的姬郤达成了和解，然后调转刀头，对着姬鳢的屁股就是一通猛砍。当年的秋天，周朝卿士姬忌父奉周天子之命，率军直扑姬鳢在曲沃的老巢。此时的姬鳢还在翼城，听说后院起火，姬鳢一边大骂姬林做人不地道，一边忍痛撤军回保曲沃。

到嘴的鸭子飞了，姬鳢的窝火可想而知，姬林这个滑头朝三暮四，生生坏掉了自己的大事。如果姬林不在这个时候捣乱，姬鳢有很大的把握吃掉晋国大宗，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姬鳢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积蓄实力，等待天时有变。不过姬郤死后，周天子立其子姬光为晋侯，姬鳢依然没有机会下嘴，只能在旁边着急跺脚。

折腾了大半生，姬鳢也累了，属于他的戏份演完了。两年后，公元前716年，姬鳢含恨而死，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姬称，也就是曲沃武公。姬称这个人在历史上没什么知名度，但他的出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姬称，姬重耳永远只能做曲沃小宗，不要说什么称霸天下了，因为姬称就是姬重耳的祖父。

也许是家族基因的遗传，姬成师、姬鳢、姬称祖孙三代都对取代大宗成为晋侯有着天然的冲动。虽然姬成师、姬鳢没有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但他们不停地挖晋国大宗墙脚，这些年曲沃对晋国的军事进攻，已经严重削弱了晋国的实力，为姬称最终完成代晋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曲沃小宗的三代人，和晋朝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

祖孙三代的努力非常相似，姬成师、司马懿种下树苗，姬鲡、司马师（昭）浇水除虫，最终由姬称、司马炎摘果子。

江湖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如果曲沃小宗不吃掉晋国大宗，晋国大宗必然会吃掉曲沃小宗，就像三国蜀不灭魏，魏必灭蜀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名分问题，曲沃政治地位较低。虽然曲沃的实力接近于中等诸侯国，但曲沃只是晋国内部的一个封国，没有算在周朝的诸侯系统内。说句糙话，曲沃就是一个小三，不挤掉大奶，小三只能在灰暗地带生存。

不过有一点对姬称不是很有利，就是曲沃与东周王室的关系早已破裂，现在也很难看到修复关系的迹象，所以姬称要时刻提防周天子姬林在他背上插刀。曲沃在江湖上的朋友本就不多，少了东周这个重要盟友，凭曲沃一国之力很难拿下晋国，于是姬称想到了距离晋国不远的胙廷。

胙廷位于今山西侯马市北郊，并非诸侯国，而是隶属于晋国的一个小邑。胙廷之所以对姬称的联合建议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胙廷经常受到晋国的武装侵犯，苦不堪言。为了自保，与曲沃的联手势在必行。

早在公元前710年，晋哀侯姬光就开始对胙廷动手动脚，还是用老办法，专割胙廷人的粮袋子，把胙廷人逼得直骂娘。忍无可忍的胙廷人为了报复晋人，经常和姬称勾搭在一起，密谋讨伐无耻的姬光。

胙廷的实力有限，他们所能给予姬称的帮助，就是开放自己的领地，给曲沃军提供更可能多的便利。姬称也意识到时间不等人，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还不知道谁先去见上帝。公元前709年的春天，姬称几乎是掏尽家底，大举北上，与晋军决一死战。

有了胙廷人的带路，姬称很快就率军来到汾水东岸，然后给姬光下帖子求战。对于这场战略大决战，姬称自信心爆棚，必灭此而朝

食。不过姬称也不敢大意，为了预防万一，他调大夫韩万亲自给自己驾车，大夫梁弘手执坚盾，立于自己右侧，防止姬光乱箭伤人。

看来姬光是接受了堂叔祖的挑战，东风吹，破鼓擂，这年头谁怕谁？姬光扛着一把大砍刀就去约定的场子练摊去了。这场汾水之战的过程不详，最终的结果还是姬称笑到了最后，姬光输得一塌糊涂，老本都搭进去了。

姬光强行杀出一条血路，沿着汾水东岸向北仓皇逃窜，姬称怎么可能放过他，率大队人马紧追不舍。如果按正常速度，姬称很难追上姬光，不过在姬光逃窜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个意外，导致姬光被俘。

这天夜里，姬光带着大臣栾叔，乘着他的四马座驾一路狂飙，但因为马车的外挂太多，被河边的树木给勾住了，半天也解不下来。等姬光好不容易解开外挂时痛苦地发现他已经被曲沃人马团团围住，姬称在火把的映照下放肆地大笑。

这场汾水之战，姬称只是俘虏了姬光，并没有拿下晋国国都翼城，不过作为翼城左侧的战略屏障阆廷已经被姬称控制，所以姬称基本完成了对翼城的战略包围。在姬光之子晋小子即位后的第二年，姬称就派韩万杀掉了姬光，这是对晋国的公然挑衅，但此时的曲沃与晋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晋国已经无力对姬称施加军事压力了，正如《史记·晋世宗》所说“曲沃益强，晋无如之何”。

晋小子是晋国大宗历代君主中唯一没有留下名字的，说明他在历史上并没有做出像样功业，而晋小子在历史舞台上的唯一一次亮相，就是公元前705年，晋小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被姬称诱骗出翼城，落在姬称的手上，随即被杀害。推测一下，应该是姬称用诈和的手段，对晋小子做出假让步，晋小子没有江湖经验，这才被姬称算计。

晋小子被杀后，周桓王姬林派大夫虢仲偷袭曲沃，迫使姬称兵回

曲沃，不过姬称在撤军时又立晋哀侯姬光的弟弟姬緡为晋侯。根据《史记》记载，姬称应该是回到曲沃后拥立姬緡的，说明姬称已经基本控制晋国，至少姬称立姬緡，而晋国大宗没有反抗，这很能说明问题。

姬緡的在位时间非常长，长达二十八年，换句话说，姬称做了二十八年的晋国“太上皇”。以姬称的野心，他应该不能容忍一个傀儡君主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么久，很可能是统治高层内部同情晋国大宗的势力反对姬称废主自立，双方在政治上进行博弈，最终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

做儿皇帝是要付出人格代价的，魏高贵乡公曹髦不堪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残酷折磨，率几百个老苍头去和权大势大的司马昭决战，结果可想而知。虽然不清楚姬緡是否这么做过，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公元前679年，“晋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緡，灭之”。很可能是姬緡反抗姬称的统治，起兵反抗，兵败被杀。这个推断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姬称早就想废掉姬緡，也用不着等待二十多年。

姬緡死后，再立晋国大宗已经毫无意义了，自晋文侯姬仇以下六任国君，有五任死于曲沃小宗之手。曲沃小宗用了六十多年时间，基本实现了控制晋国全境的目的，岂能把胜利果实拱手让人？

立国时间长达三百七十六年的晋国大宗破产后，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曲沃小宗欢天喜地地挂起“晋国大宗”的招牌，小宗取代大宗，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曲沃小宗篡权夺位，成为事实上的晋国统治者，但还需要周天子的加V认证，否则就是不合法。曲沃与东周王室曾经闹过别扭，也翻过脸，但周桓王姬林早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孙子姬胡齐（周僖王）。姬胡齐虽然碌碌无为，但还算聪明，不承认曲沃小宗又能如何，反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再加上姬称不停地给姬胡齐喂银子，

把晋国大宗所积蓄的值钱东西都送给姬胡齐，姬大王自然笑纳，伸手不打送礼人，这是江湖规矩。

有钱能使磨推鬼，发了笔横财的姬胡齐自然要投桃报李，摘掉姬称头上“小三”的帽子，给姬称转正。姬胡齐很快就以周天子的身份下诏，正式承认姬称是晋国国君，列于诸侯。从此以后，曲沃小宗名正言顺地以晋侯的身份行走于江湖，姬成师、姬伯的遗愿终于实现，这俩老家伙在地下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周天子的任命诏书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姬称摆平晋国境内的残余反抗力量，反我就是反天子，这顶政治帽子果然威力无比，“于是（姬称）尽并晋地而有之”，而这一年，是姬称即位的第三十七年。

如果姬称在没有灭掉晋国大宗之前挂掉，那么他的谥号将是不伦不类的“曲沃武公”，而现在他取代晋国大宗自立，他死后的谥号就是“晋武公”，这是不一样的政治待遇。

曲沃小宗取代晋国大宗，和田氏取代姜齐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后者是异姓相代，相当于曹魏代汉；而前者只是一个政权内部的权力更迭，相当于明永乐取代朱允炆，姬称依然是唐叔虞的孝子贤孙，唐叔虞在地下每年都能吃到一块冷猪肉。

姬称年龄不详，但他完成代晋之后，也应该白发满头了，不过姬称这辈子没白活，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77年，姬称含笑离世，太子姬诡诸即位，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晋献公。

姬称以为为子孙抢来了一块大蛋糕，子孙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美食。没想到就是他这个寄予很高期望的宝贝儿子姬诡诸因为好色，酿出一场骇人听闻的后宫夺嫡丑闻，差点毁掉曲沃小宗三代人的努力。

接下来，就细说比曲沃代晋更加惨烈、残酷和血腥，而且更加精彩刺激的后宫夺嫡事件。

十七 晋国内乱始末

唐朝著名诗人岑参有首《骊姬墓下作》的精彩诗篇，全诗如下：

骊姬北原上，闭骨已千秋。
浍水日东注，恶名终不流。
献公恣耽惑，视子如仇雠。
此事成蔓草，我来逢古丘。
蛾眉山月苦，蝉鬓野云愁。
欲吊二公子，横汾无轻舟。

这首诗所感慨的是春秋初期，晋献公姬诡诸宠爱“小三”骊姬，废长立幼，最终酿成一场宫廷残杀。

这场后宫大戏是春秋时代的经典剧目之一，凡是涉案其中的人物几乎都成了春秋的一线大腕。比如献公姬诡诸，妖女骊姬，太子姬申生，公子姬夷吾、姬重耳、姬奚齐，再加上姬重耳手下那几位贤臣，甚至太子申生的母亲齐姜，论知名度也算是一线，虽然齐姜死在这场内乱之前。

晋献公姬诡诸因为废长立幼，酿成大乱，留下了千古骂名。实际上姬诡诸放在整个春秋中考量，也算是有为之君，“假途伐虢”就是他的杰作之一。曲沃小宗代晋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如果没有姬诡诸的东征西讨，巩固小宗地位，晋国后来的累世霸业是不可想象的。

姬诡诸最大的问题是喜新厌旧的速度过快，前妻一死，他就忘记与前妻曾经的恩爱，甚至对前妻所生的儿子也横挑鼻子竖挑眼。唐玄宗李隆基可以说是晋献公再世，文治武功皆一流，但都毁在了对家庭问题的不当处理上。李隆基纵容武惠妃残害赵丽妃所生的太子李瑛，时任中书侍郎的张九龄就上书把此事与晋献公废长立幼的家庭悲剧相

提并论。

虽然李隆基的长子是李琮，但李琮没有当过皇太子，因为其母无宠。姬诡诸的长子姬申生，因为母亲齐姜曾经无限得宠，所以很快就确立了太子地位。姬诡诸和齐姜的关系，有些类似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这两对活宝都是庶母与庶子的关系，庶子勾搭上了庶母，生了个大胖儿子。

晋武公姬称晚年多病，不能和齐姜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所以姬诡诸乘虚而入，把庶母搞到手，齐姜很快就有身孕。齐姜是春秋第一霸齐桓公姜小白的女儿，姬诡诸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齐姜在晋国后宫自然是一把手。

只是齐姜福薄命短，应该在姬诡诸即位之初就去世了。此时姜小白霸业初成，不过姜小白对外孙姬申生似乎并不感冒，任由外孙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自生自灭，反而对姬重耳宠爱有加。

姬申生的处境，在父亲姬诡诸在位的前五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姬诡诸在此时去世，姬申生能很顺利地继承晋侯之位。但就在这一年（前672），晋国展开了一场军事行动，而姬申生的悲剧命运就此埋下伏笔。

姬诡诸因为要扩大生产规模，把刀头对准了位于晋国西南的骊戎（今陕西西安附近），率军去骊戎打劫。骊戎是个小国，地少兵寡，根本不是晋国的对手，骊戎男（骊戎国君，姓姬，男爵）打不过，只好向姬诡诸求饶。

按江湖规矩，战败方求和必须要付出代价，骊戎当地也没什么特产，骊戎男一狠心，把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送给了姬诡诸，算是战争赔款。姬诡诸本就是轻薄好色之徒，见到两个美女骨头都酥了，立刻同意撤军。

甚至可以这么猜测，姬诡诸此次讨伐骊戎，就是冲着大小骊姬去的。《三国演义》中的曹丞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起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欲收大小乔做小蜜，结果被周瑜一把火烧了回去。

姬诡诸收大小骊姬的目的，除了好色本能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原因，就是要给自己生儿子。姬诡诸的原配贾姬没有生儿子，齐姜已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申生，但姬诡诸不太喜欢申生，所以他希望骊姬能生出儿子，取代申生的太子地位。两位骊姬的肚皮很争气，几番云雨过后，大小骊姬各产下一子，大骊姬的儿子取名奚齐，小骊姬的儿子取名卓子。

姬诡诸始终把大小骊姬当成生产工具，但实际上这两个女人并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大骊姬（以下皆称为骊姬，其妹称为小骊姬），晋国内乱就是她一把火煽起来的。骊姬生了儿子，而且她本人也深得丈夫的宠爱，但她并没有满足，她还想要得到更多。

骊姬想要得到的礼物很简单，就是希望丈夫能废掉太子申生，立自己的儿子奚齐。做母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继承家业，这是人之常情，倒不足为责。问题的关键在于骊姬对申生用的手段太过卑劣下作，让人不齿，当年武姜欲立幼子共叔段，至少手段光明正大，不玩阴招。

骊姬野心勃勃，但当她真正去开始运作这件事情时，发现事情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综合来看，申生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他虽然不是嫡出，但是长子，春秋礼法，无嫡立长，所以申生的太子之位没有任何争议。

二、由于骊姬的强势介入，让非骊姬所生的几个儿子，如姬夷吾、姬重耳受到了强大的生存压力，兄弟几个抱成团对付那个恶毒的女人。

三、朝中高层支持申生的大有人在，比如里克等人。

骊姬也有自己的劣势，她最大的劣势是朝中无人，她的娘家骊戎国力较弱，在晋国高层中没有什么影响。而申生的外祖父就是齐桓公，一旦姜小白介入晋国夺嫡之争，申生有足够的力量打倒骊姬。

从目前局势来看，齐桓公姜小白正沉醉于自己的称霸大业，对外孙姬申生的困难处境不闻不问，骊姬可以不必担心外国势力施加的影响。她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从内部搞掉姬申生。

晋国当时最有势力的大臣，非里克莫属，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姬诡诸也要对里克礼敬三分。更让骊姬恼火的是，里克是姬申生的铁杆支持者，所以走里克这条门路根本行不通。

里克指望不上，骊姬就把主意打在姬诡诸的其他宠臣身上，比如大夫梁五和嬖五。这两个人都是能在姬诡诸面前说得上话的内臣，和姬诡诸私交甚好，走这条门路应该是可行的。

骊姬是个外来户，在晋国官场没什么人脉，要想办成事，自然要舍得砸银子，无利不起早，不给钱谁和你玩？骊姬应该是攒了不少的体己钱，撬开梁五和嬖五的大嘴，往嘴里使劲塞银子，求他们在晋侯那里说说奚齐的好话。

官场就是一个利益交换场所，认钱不认理，骊姬按市场价给他们开出这么高的薪水，梁五、嬖五（以下简称“二五”）自然笑纳。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二五要替事主上阵卖嘴，拱掉姬申生。

当然，二五还不敢贸然提出杀掉申生的请求，骊姬暂时也不敢这么放肆，现在对骊姬最有利的是把姬申生赶出晋国新都绛（今山西绛县），给奚齐腾出位子。二五劝姬诡诸把姬申生调到曲沃，理由非常动人，说曲沃是晋国的发家之本，一旦曲沃有失，必然会危及晋国社稷，不如派德高望重的太子去守曲沃。有太子坐镇，曲沃无恙，绛亦

无恙。

不过调姬申生去守曲沃，《史记·晋世家》却记载是姬诡诸本人的主意，二五并没有参与。姬诡诸这么做，目的就是要废掉姬申生，改立姬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

结合《左传》和《史记》来看，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骊姬事先把计划告诉了姬诡诸，然后再找到梁五和嬖五，让他们把计划捅出来，洗白姬诡诸的废立污行。

两书记载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姬诡诸对姬申生已经失去了兴趣，所以骊姬才敢公然谋求废立。南唐先主李昇对宠妃种氏提出要废掉太子李景通，立自己的儿子李景遂的请求当场拒绝，甚至还将种氏囚禁起来，避免了一场流血的兄弟之争。

李昇非常宠爱种氏和李景遂，但李昇是站在巩固南唐政权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所谓站得高，看得远，从而使南唐顺利渡过了权力更迭。而姬诡诸在明知废长立幼会引发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依然对姬申生下手，只能说明姬诡诸利令智昏。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姬诡诸能做到李昇的一半，骊姬也不敢如此放肆地谋求废立。

骊姬为了奚齐能继位，这次是真豁出去了，不仅是要把姬申生驱逐出权力高层，晋侯的其他几个儿子，特别是骊姬的眼中钉姬夷吾、姬重耳都要滚出绛城。姬诡诸看样子是已经全盘接受骊姬的请求，为了满足小三的私欲，不惜疏离自己的亲生骨肉。

公元前666年，姬诡诸将太子姬申生外放到曲沃，美其名曰替他守祖宗龙兴之地，实际上是将姬申生踢进活死人墓里。姬申生的待遇还算不错，曲沃在晋国的地位就相当于明朝永乐以后的南京，而姬夷吾和姬重耳则被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姬夷吾居屈地（今山西吉县），姬重耳被赶到了蒲地（今山西隰县北）。

姬重耳和姬夷吾是姨表兄弟，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而且二兄弟的后台非常硬，他们的祖父是戎国国君。值得一提的是，戎国也是姬姓，和曲沃小宗同一祖宗，都是唐叔虞的后人。按常理说，姬重耳兄弟有戎国做靠山，骊姬应该对他们有所顾忌，但姬诡诸却把他们贬到了老少边穷地区，可见姬诡诸为了满足骊姬的私欲，已经不计后果了。

重耳兄弟和姬申生虽然不同母，但他们之间的兄弟感情非常好，这正是骊姬最忌讳的地方。三兄弟的人品贤德方正，是江湖上少见的贤公子，在晋国官场上有着奚齐所不具备的人望，这是骊姬非常忌惮的，所以她一定要拆散这个铁三角。

也许是背后有高人指点，骊姬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置申生等三兄弟于死地，姬申生依然保留了太子的位置。不过明眼人都知道，作为国君合法继承人的太子出居外地，只有骊姬的儿子留在京城，这意味着奚齐被册为太子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史记·晋世家》说“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

把太子姬申生赶出京城，这只是骊姬废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骊姬要想达到目的，必须得到晋侯姬诡诸的支持，否则全是幻想。姬诡诸对姬申生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太子位置是肯定要拿下的，但姬诡诸还是要顾及朝中重臣的感受，慢刀子杀人，这种事情是急不得的。明神宗为了废掉长子朱常洛，改立最受宠的儿子朱常洵，与士大夫们斗法二十多年，最终功亏一篑。

太子位置明着废不掉，那就先玩阴的。公元前661年，晋国突然对周边三个小国霍、魏、耿发起攻击，由于晋国实力超强，姬诡诸很快就把三个小国揣在自己兜里。战争本身没有好讲述的，微妙之处在于太子姬申生在这场战争中的身份。

姬诡诸把晋国军队分为上下二军，他自己主上军，太子姬申生主

下军。表面上看，太子能掌握一部分兵权，是国君器重太子的表现，实则不然。

大臣士^芳就看出了此中猫腻，按江湖规矩，各国太子是不需要领兵打仗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准备继承国位。下军的最高统帅是卿，堂堂太子居然纡尊降贵出任卿大夫，这明显是在向天下暗示姬申生的太子位置已经保不住了。

还有一点让士^芳坚信自己的观点，就是姬诡诸以太子立功为借口，在曲沃给太子建了一座新城。姬诡诸嘴上没说，但此举实际上等于把姬申生的户口强行落在曲沃，回不到都城，还继哪门子江山？

看出猫腻的还有太子党大佬里克。第二年，姬诡诸再让姬申生统领下军，去讨伐东山皋落氏（今山西垣曲附近，狄人）。姬诡诸让姬申生不停地带军打仗，用意就是想坐实姬申生的卿大夫身份，进而给自己的废立寻找理论根据。甚至不排除姬诡诸在“借刀杀人”，希望敌人能替他干掉姬申生。

里克坚决反对让太子出征，好在姬申生头上的储君帽子还没摘掉，里克可以光明正大地替姬申生辩护。里克的观点非常明确：一、太子将来是要继承大位的，不宜在外打仗，枪刀无情，万一不慎，太子将有去无回。二、出兵打仗是卿大夫的事情，太子只需要向国君学习治国之道。

其实里克也不是傻子，姬诡诸不停地耍阴谋，目的就是要废申生、立奚齐。里克的劝谏，是在警告姬诡诸：惹出大麻烦，小心没人给你送终。姬诡诸被里克逼到了墙角，只好实话实说：“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

在姬申生还在位的情况下，姬诡诸把自己的底线都捅了出来：寡人这么做，就是要废掉太子。虽然姬诡诸没说是要立奚齐，但傻子也知道奚齐正眼巴巴等着做太子呢。史称里克“不对而退”，里克已经对

姬诡诸不报任何期望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姬诡诸已经公开表示了要废立太子的意思，这将导致晋国官场势力的重新洗牌，这是太子党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不过作为太子党的两位大佬，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并不相同，士^芳劝姬申生不如主动放弃太子之位，然后效法当年吴太伯云游四海，还能落了个好名声。

至于里克，他似乎对姬申生保住太子位还存有幻想，他的应对之策是以不变应万变，“修己而不责人”。意思是在“孝”字上面做文章，看能否让晋侯回心转意。如果实在不行，至少可以不用得罪骊姬那伙人，保住富贵是没问题的。

综合形势来看，士^芳之计实为上计，眼下的姬申生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不如出逃保命。而且士^芳应该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以姬申生的身份，对其他大国来说就是一件无价之宝，姬申生可以等国君死后，借外国之力杀回晋国。如果留在晋国，即使姬申生对骊姬低头服输，骊姬又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心腹大患。死灰复燃的道理，骊姬不可能不知道。

姬申生虽然有些迂腐，但场面上的事情，他还是能看得出来，父亲要换马了。至于换马之后，自己的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他完全没有把握，骊姬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是不清楚。

如果听士^芳的出逃建议，不用落在骊姬的魔掌里，可以逃到国外静观事变。只是如果出逃，正如里克所说，姬申生必然要背负“不孝”的罪名。在春秋时代，“孝”与“不孝”是官场中人品问题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一旦被认定“不孝”，政治生命和政治名誉也基本走到头了。

而且还有一点，一旦姬申生出逃，等奚齐继位之后，肯定会在骊姬的授意下，开动舆论机器，将姬申生描绘成不忠不孝的政治恶棍。偏偏姬申生又是个好名之人，他绝对不愿意背负“侍父不孝”的罪名，所以他直接拒绝了士^芳的建议。

从骊姬的角度看，自然不希望姬申生出逃，只要姬申生还留在晋国境内，她就有办法除掉姬申生。也许骊姬想到了一个历史典故，就是周幽王姬宫涅改立褒姒的儿子姬伯服为太子，原太子姬宜臼前往中国避难，结果犬戎之乱，姬伯服连同褒姒被杀，倒便宜了姬宜臼，在雒邑另建东周。

要论美色，褒姒和骊姬不相上下，但要论狠毒，褒姒远不如骊姬。褒姒只想把姬宜臼赶下台，并没有加害姬宜臼母子，骊姬则是想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从手段上来说，女皇武则天在夺位道路上的狠毒与阴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骊姬的启发。

骊姬深通官场厚黑学，如果直接拿刀砍人，那就不是厚黑，厚黑学的真谛就是不但要杀人于无形，而且还要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不但没有杀人，反而会尽全力保证受害者。骊姬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她自然知道该怎么对付姬申生。

虽然姬诡诸有意废掉姬申生，曾经私下和骊姬通了气。骊姬心里当然高兴，但绝不会把兴奋写在脸上，而且一定把废太子的行为和自己撇得一干二净，把自己打扮成道德高尚的人，以免被人抓到把柄。骊姬的表演非常精彩，她在姬诡诸面前痛哭流涕，说国君怎么可以因为我受宠爱就要废掉太子，这将让天下如何看臣妾？骊姬最绝的一招是“威胁”姬诡诸，如果国君一定要废立太子，那臣妾只有自杀谢罪，以清天下之谤。

指望骊姬发善心，就如同指望狼不吃羊一样，表演完后，骊姬就派人给百官通气，让自己的嫡系出马，在国君面前诋毁姬申生。骊姬通吃道德和利益两条船，厚颜无耻的程度，让人叹为观止。

骊姬很清楚一点，她直接杀掉姬申生，在政治上实在太冒险，一旦走漏风声，会置自己于极端被动的境地。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他人之手解决姬申生，由姬诡诸本人出面最合适。如何才能让姬诡诸对姬

申生彻底失望，并对姬申生采取手段，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栽赃嫁祸。

骊姬的罪恶计划堪称绝妙，她先是找到姬申生，假模假样地说国君梦到了申生的母亲齐姜，非常的怀念，所以命太子在曲沃祭祀齐姜。姬申生也是个傻帽儿，骊姬对他是怎样的态度，他难道不清楚？还能相信这个女人的连篇鬼话。

如果是姬诡诸当面对姬申生这么说，还有一定可信度。当然，姬申生是个孝子，母亲早亡，把他孤零零地丢在人间，思念母亲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他答应了这件事情，但这同时也说明了骊姬心肠之恶毒。

撺掇姬申生去祭齐姜并不是骊姬的最终目的，因为这反而能给姬申生在官场上增加不少印象分，骊姬的贼眼，盯在了祭祀时的胙肉上。按规矩，祭祀完毕，姬申生会把胙肉献给姬诡诸，这正是骊姬下手的最佳机会。

从《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来看，姬申生献肉的时候，姬诡诸并不在宫中，而是外出打猎，这肯定是骊姬掐算好时间，事先安排好的，让胙肉暂时离开姬诡诸的视线，以便从中动手脚。

姬诡诸虽然嘴上说要废掉太子，但一直没有太直接的行动，可能是姬诡诸还念及父子天性，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唯一能让姬诡诸下决心的，就只有制造姬申生要置父亲于死地的假象，机会就在那块肉上面，骊姬趁机在胙肉上抹了毒药。

不过骊姬也不敢大意，万一姬诡诸吃了毒肉就麻烦了，所以在姬诡诸回宫后，拿起胙肉准备吃的时候，骊姬突然拦住姬诡诸，说胙肉曾经离开国君的视线，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试一试肉有没有毒为好。骊姬寻来一只狗，让狗吃，结果狗中毒而死；让一个小臣吃，结果小臣也挂了。

姬诡诸当然不会想到毒是他最宠爱的骊姬下的，他唯一能怀疑的对象，只能是姬申生，骊姬早已经判断出这点，不过她还要坐实姬诡诸对太子的愤怒，又出了一招，在姬诡诸面前哭天抹泪，说太子何其残忍，连自己行将就木的老父亲都不放过。

如果只批判姬申生不孝，即使姬诡诸废掉姬申生，还不足以让奚齐当上太子，所以自己和奚齐必须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骊姬话锋一转，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说姬申生要毒死老父，无非是害怕奚齐影响到他的太子位置。为了不让国君父子失和，臣妾和奚齐只有自杀，免得太子继位后遭到迫害。

都说司马懿为人厚黑，堪称厚黑第一高手，女版的司马懿，自然非骊姬莫属。脸皮之厚，心肠之毒，手段之狠，比起吕雉有过之而无不及。姬诡诸是个老糊涂虫，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骊姬说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更进一步猜测，在胙肉下毒根本就是姬诡诸或其智囊团出的主意。《左传·僖公五年》就记载骊姬曾经和一个中大夫密谋，骗姬申生去祭祀齐姜，难说背后没有姬诡诸的鬼影。

姬诡诸确实对姬申生下了手，但不是杀姬申生，而是杀了姬申生的师傅杜原款。个中缘由，可能与姬诡诸的底线有关，骊姬的底线是杀掉姬申生，而姬诡诸即使参与胙肉下毒事件，也只是想利用这个借口废掉申生，并不想杀掉儿子，毕竟父子天性相连。

杀杜原款，明显是对姬申生暗示：我不忍杀你，你赶快离开晋国。这是一个明显的积极信号，姬申生身边的幕僚看了出来，劝姬申生入京自辩，或许还有机会翻盘。至于该幕僚如何知道骊姬在肉中下毒，很有可能是位高权重的里克把消息捅给了姬申生。

如果是里克有意走漏风声，说明形势朝着姬申生有利的方向发展。即使姬申生放弃太子位置，也可以去京城揭穿骊姬的老底，让奚齐的继位失去合理性，为自己日后的东山再起埋下伏笔。别看骊姬对

姬申生步步下狠手，但骊姬始终对里克无可奈何，连姬诡诸也动不了里克。有里克坐镇京城，姬申生还不至于一点机会都没有。

问题又出在姬申生的愚孝上面，他拒绝了幕僚的建议，理由是老父亲片刻也离不开骊姬，一旦打倒骊姬，父亲身边便无人侍奉。当然，姬申生不想去京城，也有可能是担心骊姬再下毒手，但有里克在，他的人身安全应该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上面讲了，姬申生能力不怎么样，但特别爱名。事到如今，姬申生唯一能做的就是逃出国外，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没想到这个保命的建议居然也被姬申生否决了，理由还是不想背上侍父不孝的恶名。姬申生已经给自己想好了归宿——自杀。

姬申生的弟弟姬重耳显然比兄长更懂得知进退，姬重耳同样是“背父”，但姬重耳从来不会为虚名所累，活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选择死亡，只能是便宜了骊姬和奚齐，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何况天下谁不知骊姬是什么样的女人。

说姬申生自私，并不过分，他只想给自己挣孝名，却忘记了他还有另外一层任务，就是保护两个弟弟夷吾和重耳。有姬申生在，就能挡在两个弟弟面前，承受来自骊姬的压力。他自己死了倒落得轻松，却把夷吾和重耳直接暴露在骊姬的魔掌之下，如果不是这两个弟弟跑得快，早做了骊姬的刀下鬼。

公元前656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晋国太子姬申生自缢于曲沃新城。

十八 晋国兄弟之乱

人死如灯灭，双眼一闭，万事不知，但姬夷吾和姬重耳果然被骊姬盯上了。道理很简单，夷吾和重耳都是著名的贤公子，在江湖上有些威望和势力，如果不铲除二人，将来奚齐的位置也坐不稳。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姬夷吾、姬重耳比姬申生更具威胁，骊姬之所以能顺利铲除姬申生，也是吃透了姬申生的迂腐性格，夷吾和重耳显然是实用主义者，一旦让二人逃了，骊姬是睡不安稳的。

二位公子平时并不在京城，姬夷吾居于屈，姬重耳居于蒲，但他们也经常进京看望父亲，并在朝中上下打点。骊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等二公子入朝后，骊姬突然在姬诡诸面前“揭发”二公子的罪行——当初姬申生在胙肉中下毒，姬夷吾和姬重耳知情不报，意图弑父夺权。

骊姬很恶毒，但她显然陷进了一个误区，就是她认为姬诡诸会完全听从于她的摆布，她想杀谁，姬诡诸就会杀谁。事实上并非如此，从现有史料上来看，并没有姬诡诸要杀掉三个儿子的记载。骊姬与其把杀害三公子的希望寄托在姬诡诸身上，还不如派马仔在二公子的茶饭里下毒，然后说二公子畏罪自杀，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在晋国政坛，骊姬并不是主流，她唯一的靠山也只有晋侯姬诡诸，以里克为代表的卿大夫集团不买她的账。特别是里克，如果是姬奚齐继位，骊姬必然干预朝政，自己就将靠边站。如果姬夷吾或姬重耳继位，必然会倚仗卿大夫集团，从个人利益角度上讲，里克当然会站在二公子这边。

骊姬应该是私密地在姬诡诸面前卖命地告黑状，可没过多久，姬夷吾和姬重耳就已经得到了内幕消息。不用问，这肯定是里克暗中捅

出消息，只有里克有这个能量。

姬夷吾和姬重耳可不像他们那个满脑袋豆腐渣的哥哥，对他们来说，死了也是白死，不如先逃出魔掌，等待机会翻身。二公子先逃回各自的暂住地，准备静观其变，只是让哥俩没想到的是，这次老爹真被骊姬说动了，发重兵分别进攻蒲与屈。

姬诡诸这次应该吸取了申生事件的教训，不能再留下活口，从姬诡诸逼迫姬重耳自尽来看，姬夷吾也应该“享受”这个待遇。至于姬诡诸没有逼姬申生自杀，可能是顾忌到姬申生的外公姜小白是霸主，还不敢授齐国以干涉晋国内政的口实。夷吾、重耳的娘家势力较弱，所以姬诡诸不怕得罪翟国。

姬夷吾和姬重耳是姨表兄弟，但论地位，姬夷吾应该在前，所以他的军事力量相对强一些。在姬重耳被赶出蒲邑之后，姬夷吾还咬牙坚持了一段时间，直到姬诡诸派出右行大夫贾华率主力部队赶来，姬夷吾的武装才被打散。

姬重耳逃到了娘家翟国，至少翟国会尽全力保护这个未来翟国在晋国的政治代言人。而姬夷吾可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无法及时逃到翟国，只能南走梁国。姬夷吾没有去投奔翟国，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按照“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理论”，如果兄弟二人都在翟国，很有可能是父亲一锅端掉。二是姬夷吾虽然比姬重耳年长，却是小姬所生，在翟国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不如姬重耳，与其这样，不如不去翟国。

第二个原因是假设，但第一个原因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晋世家》：大夫冀芮说：“重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翟，翟畏晋，祸且及。不如走梁，梁近于秦，秦强，吾君百岁后可以求入焉。”

冀芮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一旦姬夷吾去了翟国，极有可能与姬重耳同时被除掉，为了保全血脉，去梁国确实是上策。梁国位于现在的

陕西韩城南，黄河西岸，处于晋国与秦国之间。冀芮的方案其实就是背靠秦国，俟机还晋，毕竟秦国是大国，姬诡诸还不敢对秦国如何。有了秦国的支持，日后回晋继位并非做梦。

姬夷吾集团之所以如此有信心，关键还在于里克的存在。

这也是骊姬的一大心病，里克作为晋国首席重臣，在军政两界通吃，是骊姬的心腹大患，但以骊姬的实力，还无法吃掉里克。虽然在姬申生死后，里克更偏向于姬重耳，但至少在骊姬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里克和姬夷吾还是有共同利益的。

骊姬对里克的无可奈何，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姬诡诸对于里克的绝对信任，即使是姬诡诸明知里克和骊姬不和的情况下。姬诡诸在历史上响亮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晚年的诸子争位，这也是后世津津乐道的后宫八卦，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姬诡诸本人的雄才大略。

都说春秋五霸，实际上即使以齐桓公姜小白为标准，姬诡诸完全有资格挤进来，占有一席之地。《韩非子·难二》对此有明确记载，“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有二胜。”姬诡诸的霸业，比起姜小白来也不逊色。曲沃武公姬称以小宗代大宗，入主晋国，但两年后姬称便挂掉了，真正使曲沃小宗在晋国统治稳如铁桶的，正是姬诡诸。

关于姬诡诸，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就是“假途伐虢”。假途伐虢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成功范例，位列《三十六计》，可见在军事史上的影响。北宋太祖赵匡胤统一江南，最先使用的就是假途伐虢之计，打着讨伐湖南叛军的旗号，偷鸡摸狗般地窜进荆南，拉开了中原小统一的大幕。

假途伐虢之计，用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一箭双雕。晋国要消灭虢国，但晋与虢之间还有着同一个为姬姓的虞国，姬诡诸对外宣称想借虞国之道灭虢，并送给虞公厚礼——一对玉璧、一匹良马。实际上姬

诡诸早就想把虞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只要虞国同意借道，等晋灭虢后，顺道把虞国处理掉。

虞国大夫宫之奇一眼就看穿了姬诡诸的鬼把戏，极力劝阻虞侯不要贪小便宜，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强大的晋军进入虞国，局面就不是虞国所能控制得了的。虞国是个小国，能拿出手的宝贝不多，虞侯看到晋国送的两件宝贝，口水直流三千尺，白捡的便宜不要白不要，一口将诱饵吞下肚去。

事实很快就证明宫之奇的判断是正确的，等晋国从虞国境内通过，灭掉虢国之后，顺道就把还沉浸在美梦中的虞侯给请到绛都喝茶去了。姬诡诸之前送出的玉璧和马，又被姬诡诸收了回来。姬诡诸没花一分钱就吃到两盘海鲜，做生意精明到了这个份上，不得不让后人叹为观止。

姬诡诸最为后世所诟病的，就是纵容骊姬废子立庶，酿出一场滔天大祸，险些葬送了晋国的百年霸业。晚年的姬诡诸貌似有些老糊涂，和唐玄宗李隆基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不过“假途伐虢”的事情就发生在姬诡诸出兵讨伐夷吾、重耳的同一年（前655），说明姬诡诸还是比较清醒的，废长立庶，主要还是姬诡诸的意见起作用，骊姬只是推波助澜。如果姬诡诸不同意这么做，骊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过姬诡诸这一关。

其实就废长立庶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姬诡诸和骊姬在朝中都属于少数派，正如他自己所说：“奚齐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绝大多数朝中要员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唯一和姬诡诸穿一条裤子的，只有重臣荀息。在晋国政坛，荀息算是一支可以与里克抗衡的重要力量，姬诡诸只能把奚齐托付给荀息，拜荀息为国相。

荀息并非佞臣，但他还是接受国君的托孤，原因大致有两个：一、他对国君忠心不二；二、利用奚齐来平衡与里克的权力布局。荀

息大包大揽，说自己一定能保护好奚齐，估计这样的吹牛大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里克是吃素的吗？

对于里克这样的超级重臣来说，国君不听他的建议，执意要立奚齐，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里克和骊姬早就翻了脸，如今奚齐即位，骊姬会给自己好果子吃吗？即使是为了自保，里克也要想办法扳倒奚齐。

公元前651年九月，久病缠身的晋侯姬诡诸留下了一个官场烂摊子，撒手西归，十四岁的奚齐在一片凄风苦雨中继位。相对来说，里克的权臣派实力要强于后宫派，但至少也要卖给国君一个面子，按兵不动。现在国君做鬼去了，里克也就没有了最后一丝顾忌，无论是荀息还是骊姬，都不是他的对手。

当然，里克也知道，如果和后宫派大打出手，自己会损失多少利益还未可知。为了和平解决争端，里克想和荀息做一笔政治交易，他和荀息坐在谈判桌前。

里克要求荀息放弃奚齐，改立他最中意的二公子姬重耳。并威胁荀息，如果不答应，三位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晋国的残余势力会在外国势力的干涉下进行反扑，后果你自负。

荀息为人比较强直，和姬申生非常相似，一个愚孝，一个愚忠。荀息和骊姬没有什么私交，但荀息不会有负姬诡诸死前的托孤，委婉地拒绝了里克，理由是“吾不可负先君言”。

谈判破裂，意味着里克和荀息即将展开生死决斗，决定谁最终有资格影响晋国的发展方向。荀息是典型的文官，手上没有枪杆子，而里克横跨军政两界，所以这场政治角逐，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里克将笑到最后。

十月的某一天，里克率领心腹闯进晋献公姬诡诸的灵房，将还在

披麻戴孝的候任国君姬奚齐乱刀砍死。其实姬奚齐只是母亲骊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就像西周最后一任太子姬伯服一样。姬奚齐只是骊姬手上的牵线木偶，杀姬奚齐不是里克最终的目标，那个乱政祸国的女人，才是里克最想除掉的。

至于骊姬的死因，西汉人刘向在《列女传》中说得很清楚，里克将失势的骊姬五花大绑，押到街头，用鞭子活活打死。骊姬好容易扳倒了对奚齐即位最具威胁的三位公子，却死在了她认为最危险的敌人里克之手。骊姬的死，在姬诡诸去世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骊姬在军方没有任何背景，里克除掉她易如反掌。

骊姬的惨死，说明了枪杆子对于谋求政治利益的极端重要性，这也是骊姬夺权路上的最大缺点。骊姬当初攻击的重点不应该是姬申生等公子，而是里克这样的军方实力派，如果骊姬能说服姬诡诸拿掉里克，并进一步掌控军队，即使姬申生等人上台，也不过是骊姬的盘中餐。

姬奚齐和骊姬相继被杀，等于里克狠狠抽了荀息一个响亮的耳光。以荀息的士大夫做派，他自然不会在乎妖女骊姬的死，但他很难接受奚齐被杀，因为奚齐是姬诡诸托孤给他抚养的。荀息百年为鬼后，如何去地下见先君献公？

在姬奚齐被杀后，荀息完全可以和里克做一笔交易，接受里克提出的立姬重耳为君的条件，至少可以换来里克对自己一定程度上的尊重。荀息没有选择妥协，而是继续和里克死扛到底，在幕僚的建议下，晋国相荀息立小骊姬的儿子姬卓子为国君。

这是荀息和里克权力斗争中最大的败招，荀息只想出一口恶气，却忽略了他这么做，等于把姬卓子送入虎口。里克达不到自己立姬重耳为君的目的，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何况里克已经完全控制局面。

荀息以为里克杀了姬奚齐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再对姬卓子

动手，但让荀息意外的是，里克的巴掌再次重重地掴在了他的脸上。姬卓子即位仅仅一个月，又被里克干掉了。而且更为过分的是，里克动手的地点在朝堂之上，“弑卓子于朝”，这等于当着天下人的面让荀息下不来台。

姬奚齐被杀，荀息就有了自杀殉主的念头，说明荀息很重视名节，但他坚持立姬卓子，在逻辑上确实有些突兀。不排除有一种可能：荀息和里克在演双簧！荀息演红脸，里克扮黑脸，干掉姬卓子，来为姬重耳的继位铲除障碍。姬卓子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荀息真是出于保护姬卓子起见，完全可以接受姬重耳为君，条件是善待姬卓子，而不是把姬卓子往虎口里送。

里克在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取得完胜，荀息在姬卓子被杀没几天后，抹脖子升天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迎立二公子姬重耳。里克和邰郑派人去翟国，请避难于此的姬重耳回绛即位。天上掉下来一块大肉饼，傻子都知道张嘴接着，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姬重耳居然拒绝了。

姬重耳傻吗？他可是百年不世出的人精，自然知道当国君意味着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史记·晋世家》说，是姬重耳直接拒绝里克的使者，但《国语·晋语二》却记载建议姬重耳拒绝里克的是舅犯（即名臣狐偃）。

里克派人来接姬重耳回国继位的消息，在跟随姬重耳逃亡的幕僚团里应该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尤其狐偃坚决反对姬重耳回国，他的理由是“坚树在始，始不固本，终必稿落”。意思很明确，现在里克当政，朝中皆是里克党羽，公子即位，无权无兵，只能受里克摆布。与其当傀儡，不如暂时不去，静观其变。

狐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姬奚齐、姬卓子相继惨死后，姬重耳就欢天喜地地去即位，这等于承认二公子之死和自己有关，是代里克

受天下之谤。姬重耳接受了狐偃的建议，委婉地谢绝了里克来使，说小子无德无能，还是另选贤人吧。

这是一个让里克意外的结果，但姬重耳躲在翟国不肯回来，里克也没有办法，只能另选他人。实际上里克已经没有了选择，唯一合适的人选，只有在梁国避难的三公子姬夷吾。

十九 晋惠公的悲剧

接着上篇讲姬夷吾的话题。

在晋献公姬诡诸的八个儿子中，姬夷吾是个异数。即使放在“三贤”之中，姬夷吾和另外二贤姬申生、姬重耳也有明显的不同。

姬申生和姬重耳身上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姬夷吾则满身铜臭味，只讲利益不讲道德。和“儒商”姬重耳相比，姬夷吾是典型的奸商。但真正的奸商是不会让人看出来的，总会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圣人，然后再穿上一件华丽的道德外衣，去做龌龊无耻的勾当。

奸商经常会说自己重义轻利，但当本不属于自己的大肉饼放在嘴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吞下肚去。不过在接受里克邀请回国即位这件事情上，姬夷吾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姬重耳自己不要，他只不过是捡了个便宜而已，送到嘴边的肉饼不吃白不吃。

姬夷吾在江湖上的名望不如二哥姬重耳，他本人和里克的私交很一般，他也知道里克找他即位是退而求其次。虽然姬夷吾也知道里克是什么样的人，能杀奚齐、卓子，但只要自己能顺利即位，慢慢稳定局面，在和里克的博弈中未必没有胜算。姬夷吾决定接受里克的邀请。

此时的姬夷吾已经在梁国安家，并娶了梁伯的女儿，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取名姬圉，女儿取名姬妾。但他在梁国只办理了外来人口暂住证，并不打算在梁国长期住下来，现在回国的机会来了，姬夷吾立刻和自己身边的幕僚团开会，讨论回国的利弊得失，最大限度地规避政治风险。

幕僚们给姬夷吾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这样光杆司令般回国肯定

不行，必须要找一个强大的靠山。姬重耳不想即位，很有可能就是出于他所在的翟国力量太过弱小，无法对里克集团形成外交压力。

两大幕僚吕省和卻芮提议不如和秦国拉近关系，扔给秦穆公嬴任好几块肉饼，让秦国给里克制造强大的外交压力，这样就能从侧面保证姬夷吾集团的人身安全。

姬夷吾的人品很成问题，但他做生意很有一套，知道通过借鸡生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至于得到鸡蛋之后，还不还人家鸡，到时候再说，呵呵。

要想拉嬴任好下水，自然要给他一点好处。老话说无利不起早，不图名不图利，谁愿意做雷锋？姬夷吾给嬴任好开出的价码是只要秦国支持他回晋即位，他就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

嬴任好是个生意人，盘算了一下，觉得这买卖很划算，就和姬夷吾达成了合作协议。嬴任好承诺派重兵护送姬夷吾集团回晋，基本解决了姬夷吾的后顾之忧。

但此时又现出了一个问题，姬夷吾不是里克中意的人选，万一里克不把来自秦国的压力当回事，依然有很大的可能把姬夷吾弄成奚齐第二。在这种情况下，姬夷吾集团必须想办法让里克接受自己，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对里克进行让步，并让里克相信姬夷吾即位之后不会侵犯里克的利益。

姬夷吾给里克写了一封信，和里克谈了条件，只要里克不反对自己即位，他就将汾阳附近的百万亩地送给里克做食邑。这个条件足以显现姬夷吾的诚意，而里克最终答应姬夷吾，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除了秦国已经明确表示要助姬夷吾还晋即位，前太子姬申生的外祖父、齐侯姜小白也趁机往晋国插了一脚，率诸侯大举入晋，准备浑水摸鱼。时间不等人，如果不把姬夷吾早些拉回晋国即位，很容易给

秦、齐等国干涉晋国内政的借口。

秦国和齐国都是大国，里克也没有实力同时与秦、齐交恶，只能和秦、齐两国达到利益均沾。在秦、齐等国的协作下，公子姬夷吾在绛正式即位，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惠公。

嬴任好和里克以为做了一笔好买卖，哪知道都被姬夷吾给耍了。姬夷吾从来不讲信义，指望他能信守承诺，母猪都能上树。姬夷吾刚刚即位，屁股还没坐热，就公然违背当初的承诺，嬴任好还眼巴巴等着晋国割让河西之地，结果姬夷吾说河西是先君土地，不敢轻易予以外人，这事就到此为止吧。

直到这时，嬴任好才发现上了当，后悔当初不听大夫公孙枝的劝告，白白给姬夷吾当枪使了。嬴任好可不是省油的灯，平白被耍，他岂能善罢甘休，虽然暂时没有对晋国采取行动，但从此与晋国翻脸。

姬夷吾对秦国背信弃义，是他外交战线上最大的失策，等于白送给秦国武装干涉晋国的借口。秦国固然不能吃掉晋国，但足以给姬夷吾制造强大的军事压力，甚至重新选择符合秦国利益的晋君人选。

姬夷吾敢和嬴任好翻脸，追求的是短期效益，而且他也认为秦国没有能力消灭晋国，但里克就难说了。里克能杀奚齐和卓子，照样能杀姬夷吾，姬夷吾对里克下手很正常。问题是如果没有绝对的胜算，姬夷吾敢拿里克开刀吗？

《史记·晋世家》记载“（姬夷吾）而夺（里克）之权”，以姬夷吾的能力，很难凭空夺里克之权，最大的可能是姬夷吾争取到了朝中反里克的实力派支持，这才敢对里克下手。

里克丧失了权力，成了一头没有牙的老虎，但姬夷吾从来没有把这头没牙老虎关进笼子的打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权力场上，如果有能力置对手于死地，那就快刀砍乱麻，千

万不要学夫差那样滥发善心。

姬夷吾人品不如重耳，有一点却值得赞赏，就是他的坦率，真话假话都放在桌面上。他这么对里克说的：“没有你，寡人不会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我知道奚齐、卓子，还有荀息都死在你的手上，以今日之事观之，做你的国君，不亦难乎？”

姬夷吾话中夹枪带棒，逼里克自杀，里克当然听得出来，但此时他已经没有和姬夷吾博弈的本钱。姬夷吾请他自裁，是给他面子，这总比被人乱刀砍死要体面得多。里克在自杀之前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欲加之罪，其无辞？”

里克在伏剑自杀前，应该会后悔一件事情，晋献公有子八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还有另外三人，都在绛都，而且年龄都不大，如果立这三人之一，里克有很大的可能保住权力。姬夷吾的演技太出色了，经常以贤人的面目招摇于市，里克没有看穿姬夷吾的本质。里克本以为请来一位贤主，哪知道却请来了自己的催命大仙。

姬夷吾的发家轨迹，和一千年后的宋文帝刘义隆非常相似，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一、都在兄弟中排行老三。

二、父亲都算是开国君主，姬诡诸开创晋国霸业，刘裕打下宋朝江山。

三、他们都身在外地，被权臣请回国都即位。

四、权臣的存在严重危胁到他们的地位，反客为主，杀掉权臣独揽大权。

要说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应该是刘义隆没有依靠与宋朝对峙的北

魏政权的支持，完全是内部权力斗争。姬夷吾实际上是骗取了秦国的支持，才顺利即位的。姬夷吾出尔反尔，耍了秦穆公嬴任好，导致秦晋关系完全破裂，双方大打出手，这也是姬夷吾在位十三年间晋国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

用《红楼梦》中的一句名言评价姬夷吾得志后的丑行非常恰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姬夷吾即位后，负秦之约，大肆诛杀异己，还经常对外展示自己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即位后的第二年，东周卿士邵过和内史过来到晋国，颁布周襄王对新任晋侯的任命。按当时礼节，姬夷吾接受周天子的委任状后，应该执玉卑，伏地叩谢天恩。姬夷吾觉得自己是大国领袖，不想给傀儡天子行大礼，只拜不叩。

此时的姬夷吾已经完全控制晋国大权，这是他敢于藐视周天子的最大政治本钱，但他狂妄自大的性格缺点已经暴露无遗。内史过回到雒都后，告诉周襄王姬郑：“晋侯将来虽能保全善终，但其子孙必无后，权力终将易人。”姬郑问何故，内史过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但归结起来，只有一段话：“亹亹怵惕，保任戒惧，犹曰未也。若将广其心而远其邻，陵其民而卑其上，将何以固守？”

姬夷吾对内暴虐，“国人不附”；对外不讲诚信，到处得罪人，他能在风雨飘摇中在位十四年，已经是个奇迹。姬夷吾执政期间，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和秦国糟糕透顶的外交关系。

秦是天下大国，又与晋比邻而居，秦国的对晋关系如何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晋国的国家安全，也包括姬夷吾本人的安全。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姬夷吾戏耍秦国上了瘾，除了即位后给嬴任好在墙上画了一张大饼，又在粮食问题上宰了嬴任好一刀，惹出一场外交大麻烦。

这次粮食引发的秦晋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晋国缺

粮，姬夷吾厚着脸皮向秦国求救。虽然秦国国内对是否救晋争议很大，但嬴任好还是把粮食借给了晋国，解了姬夷吾的燃眉之急。

按道理说，嬴任好对姬夷吾已经仁至义尽，姬夷吾应该对嬴任好感恩戴德，至少应该借这个机会和秦国搞好关系。可姬夷吾做人根本没有底线，就在第二年，秦国发生了饥荒，嬴任好请求晋国帮助秦国渡过难关。

没有嬴任好，也就没有姬夷吾的今天，出于报恩原则，晋国应该借粮，这是一个做人的道德底线问题。姬夷吾做人非常阴毒，听从了舅舅驪射的建议，非但不向秦国借粮，反而出动军队攻打秦国，企图趁火打劫，捞上一票肥的。

嬴任好两次对晋国的投资都打了水漂，可以想象嬴任好的愤怒。姬夷吾三番两次戏耍嬴任好，最终彻底得罪秦国，逼得嬴任好出兵攻晋，姬夷吾本人也被秦军活捉。要不是秦穆公夫人是自己的妹妹，在嬴任好面前苦苦求情，姬夷吾的脑袋早搬家了。

关于姬夷吾戏耍嬴任好的事情，将在《秦穆公篇》中详细解读，这里只说一点，姬夷吾之所以敢两次伤害秦国，归根结底，还是他的性格问题。如果换成姬重耳在位，重耳是不太可能把事情做得如此过分的。在国与国的关系处理上，姬夷吾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过于高看晋国的军队实力，机械地运用“利敌之弊而攻之”，结果自己撞得满头包。

战败国是没有资格和战胜国谈条件的，嬴任好开出了两个停战条件，一是姬夷吾必须实现他当年做出的割让河西八城的承诺；二是姬夷吾的太子姬圉必须留在秦国做人质。

同样是战败，清德宗光绪在甲午惨败后，励精图治，积极变法图强，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至少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了。姬夷吾却从来没有把失败的责任算在自己的头上，依旧故我地在国内穷折腾。姬

夷吾可能是出于一种考虑，秦国虽然赢了这场战争，却没有能力消灭晋国，这应该是姬夷吾冥顽不化的主要原因。

对于姬夷吾的荒谬举动，大夫庆郑曾经在晋国高层就是否救秦的会议上当面批判过。庆郑给姬夷吾扣了四顶大帽子：一、背施无亲；二、幸灾不仁；三、贪爱不祥；四、怒邻不义。结合姬夷吾的所作所为，姬夷吾受之无愧。庆郑预言此次攻秦不得人心，必然会遭到可耻的失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老话说，家有诤子，不亡其家；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庆郑的批判是有些直接了，丝毫不给姬夷吾面子，但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姬夷吾能及时悔悟，也不至于被嬴任好当面羞辱。

姬夷吾倒是记住了庆郑，不过不是庆郑的逆耳忠言，而是记住了庆郑对自己的“羞辱”。在姬夷吾被嬴任好释放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掉庆郑。庆郑的死，使本就丧心病狂的姬夷吾失去了最后一位敢说真话的舆论监督员，身边多是庸碌小人，晋国混乱的政局在短时期内根本看不到好转的迹象。

姬夷吾敢在国内胡作非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本来可以制约姬夷吾的政治因素已经不复存在。比如晋国最有名的三位贤公子，除了姬夷吾这个假名牌，姬申生已死，姬重耳逃亡国外。如果姬重耳能留在晋国，可以对姬夷吾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

不清楚姬夷吾在即位后是否邀请过姬重耳回国，但以姬重耳对弟弟的了解，回来等于送死，不如流亡天涯，至少还能保命。以姬夷吾对权力的贪恋，他是绝不可能放过姬重耳的，就如同他不会容忍里克专权一样。

姬夷吾做人很虚伪，他即位后，对含恨而死的前太子姬申生以非常高的规格入殓下葬，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完人，却暗中准备对姬重耳下手。姬夷吾这么做，无非是姬申生已死，对死人厚葬，都是做给活

人看的。而姬重耳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姬夷吾心里就多一分做贼心虚的恐惧。

在诤臣庆郑被杀后不久，姬夷吾就准备派出江湖杀手，潜入翟国干掉姬重耳。在姬夷吾看来，只有死的重耳，才是他值得尊敬的好兄长，申生也是如此。幸亏姬重耳在晋国有很深的人脉，在姬夷吾动手之前就已经得到消息，提前离开翟国，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翟国距离晋国太近，姬重耳留在翟国，对姬夷吾是个巨大的威胁。虽然没有杀掉姬重耳，但能将他赶出翟国，也是一次胜利，至少在短期内，姬重耳不会有机会复返晋国。不过让姬夷吾没有想到的是，姬重耳在江湖上转了一圈，历经齐、曹、宋、郑、楚等国后，居然悄无声息地跑到了距离绛只有一河之隔的秦国，成了嬴任好的座上宾。

老话说得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姬夷吾终于尝到了被命运捉弄的滋味。这个位子本来就不是他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子，用句唯心主义的观点结束本篇，姬夷吾这是遭到了报应。

二〇 晋文公周游列国

（上）

说完了丧心病狂的姬夷吾，再来说说姬夷吾同父异母的兄长姬重耳。

姬重耳这个名字在历史上的使用率不高，但如果说到“晋文公”，在江湖上绝对是如雷贯耳，这是一个和齐桓公姜小白一样伟大的名字。他所开创的春秋霸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为春秋第一霸，因为晋国的霸业在春秋各霸中存在时间最长。姜小白虽然称霸天下，但后劲不足，姜小白死后，齐国迅速衰落，而晋国则自晋文公之后一直保持霸主地位，直到春秋后期三家分晋，才告别历史舞台。

“齐桓晋文”已经成为后世军阀们称霸的专用政治名词，战国时齐宣王田辟疆就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曹操也曾经做过“齐桓晋文”。前面讲过，无论春秋五霸的名单如何变化，齐桓公姜小白和晋文公姬重耳是绝对榜上有名的，和秦皇汉武一样，堪称春秋时代的样板国君。

作为齐名的两大春秋名君，姜小白和姬重耳有许多共同点，大致罗列了一下，有如下几点：

一、他们的父亲都是隐形霸主，姜小白的父亲齐僖公姜禄甫治下的齐国堪称春秋小霸，姬重耳的父亲姬诡诸也将晋国打造成天下强国之一。

二、他们的母亲都不是齐人，而是来自齐晋附近的小国。姜小白的娘家来自莒国，姬重耳的娘家来自翟国。

三、他们都有一个做太子的兄长，都非正常死亡。姜诸儿被杀，姬申生自杀。

四、国内发生政治动荡时，他们都流落国外避难，姜小白居于莒，姬重耳居于翟。

五、国内两大权臣都选择他们做新任国君。高傒相中了姜小白，里克相中了姬重耳，只不过姬重耳没有接受里克的邀请。

六、他们逃亡期间，身边都有一个贤士集团，姜小白身边有隰朋、鲍叔牙、宾须无等人，姬重耳身边有狐偃、赵衰、先轸、介子推等人。而鲍叔牙和介子推又都以让贤名垂青史。

从年龄上看，姬重耳算是姜小白的儿辈，姬重耳比姜小白只小二十岁。但如果从辈分上看，姬重耳同父异母的兄长姬申生是姜小白的外孙，姬重耳应该叫姜小白一声外公。有趣的是，这两位春秋时代最伟大的霸主，他们的人生曾经有过一次伟大的交集，虽然时间只有短暂的两年。

晚姬重耳三百多年的思想家孟子曾经说过一段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励志名言放在姬重耳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虽然姜小白曾躲在莒国避难，但时间不长，在回国的路上被管仲差点射死，也是有惊无险。此后姜小白一路顺风顺水，直登历史的顶峰。

姜小白经历的危险场面，姬重耳基本上都经历过，而且他所遭受的苦难时间更长，在外流浪长达十九年，尝尽了世态炎凉。更让姬重耳终生耿耿于怀的是，他的亲生父亲姬诡诸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姬夷吾，都派出杀手想结果他的性命。

不过在这场晋国历史上空前的宫廷内乱中，有一点是值得姬重耳

庆幸的，就是他不是父亲的嫡子。论年龄，姬重耳比姬申生要大得多，就在献公姬诡诸即位的那一年（前677），姬重耳就已经二十一岁了。

只是由于姬申生的母亲齐姜出身高贵，所以姬申生才有资格立为太子，但正因为如此，姬申生才成为骊姬这个恶毒后妈攻击的主要目标。直到姬申生被逼自杀后，骊姬才将屠刀架在姬重耳的脖子上，但此时的姬重耳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所以能顺利地拔脚溜掉。

在声名远著的“三贤公子”中，姬申生过于迂善，姬夷吾又过于狡诈。姬重耳在兄弟排行中年龄最长，政治经验丰富，又明显结合了两个弟弟的性格特点，所以晋国统治阶层对姬重耳的好感，远强于其他兄弟。

姬夷吾心胸狭窄，即位之后不仅对仇人打击报复，对恩人也经常以德报怨。姬重耳其实也有这个毛病，他流亡过程中受到卫、曹等国的轻视，即位后，以国家的名义对这些小国大打出手，心胸未必强过姬夷吾。

要说姬重耳最切齿痛恨的仇人，当属被晋献公姬诡诸派来刺杀重耳的寺人披（《史记》作“履鞮”）。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55年，寺人披奉了姬诡诸的命令，估计也私下得到了骊姬塞给的银子，所以出手非常重，差点置姬重耳于死地。

幸亏姬重耳反应机敏，跳墙而逃，只被寺人披砍掉了一只袖子。就是在被寺人披追杀之后，姬重耳才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这一走，就是十九年。后来在翟国避难，被姬夷吾派往翟国准备除掉姬重耳的，还是这个寺人披。

姬夷吾性格过于褊狭，而姬重耳之所以能胜过姬夷吾，原因在于姬重耳会把仇恨放在现实利益的天平上进行考量。如果仇人对自己的利益有帮助，他会一笑泯恩仇，这是姬夷吾所做不到的。后来姬重耳

返回晋国即位，姬夷吾的旧党吕省、郤芮欲发生叛乱，寺人披为了自保，私下给姬重耳通风报信，帮助姬重耳顺利铲除了姬夷吾的余部。

姬重耳会记住每一个仇人，但不会像姬夷吾那样对所有的政敌斩尽杀绝，姬重耳的所谓报仇，实际上只是一种情感发泄，让他骂上几句也就没事了。姬重耳逃亡郑国时，郑大夫叔詹得罪过姬重耳，等姬重耳即位后，出兵逼迫郑国交出叔詹，准备扔在油锅里烹死。

叔詹为自己辩护说当初劝郑国杀重耳是为了尽忠于郑君，何错之有？在被烹之前，叔詹攀住鼎耳，大声呼号：“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与詹同。”这句话果然打动了姬重耳，不但没杀叔詹，反而厚待并送叔詹回郑国。

汉初谋士蒯彻劝齐王韩信造反，韩信不听，后来韩信被杀，刘邦把蒯彻抓来，准备烹死，蒯彻自我辩护说为君尽忠是人臣本分，刘邦便厚赠蒯彻而去。实际上是天下文章两大抄，蒯彻在模仿叔詹，刘邦在冒充姬重耳，连剧情都一模一样，毫无新意。

另外，还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著名的曹共公姬襄偷窥姬重耳洗澡事件，非常无礼，让姬重耳恨得咬牙切齿。姬重耳即位后，出兵攻进了曹国都城，生擒姬襄，姬重耳指着姬襄的鼻子一顿臭骂，但也没杀姬襄，说明姬重耳是拎得清轻重的。

姬重耳还有一点要比姬夷吾做得好，就是他能审时度势，不像姬夷吾见着蛋糕就上前大咬一口，也不考虑蛋糕是否有毒。关于姬重耳善于审时度势，最著名的一次事件，就是里克在杀掉奚齐、卓子之后，派人来翟国请姬重耳回晋即位，却遭到了姬重耳的拒绝。这件事情在上文中详细讲过了，在此不再重复。

姬重耳不是伯夷、叔齐，他同样有政治野心，面对如此诱人的国君宝座，说不动心那是骗人。他之所以拒绝回国即位，除了顾忌到里克的强权地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姬重耳有可能在“待价而沽”。

姬重耳所在的翟国实力虽然不是特别差，还曾经和姬诡诸派出捉拿姬重耳的军队大打出手，不分胜负，但翟国的实力还没有大到足以成为姬重耳靠山的程度。姬重耳留在翟国，只是一种过渡，他还在观望形势。

姬夷吾回国即位，姬重耳是知情的，但让姬重耳没有想到的是，姬夷吾刚回国，就把里克干掉了，夺回君权。面对这个局面，难说姬重耳没有后悔过，自己虽然年纪尚轻，也经不住岁月的无情折磨，万一姬夷吾在位五十年，自己回国的希望就会越来越渺茫。

不过在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姬夷吾背信弃义，导致秦国大兵北上，俘虏了姬夷吾，直到三个月后，嬴任好才放姬夷吾回国。表面上看，这件事情与姬重耳没有关系，但从姬夷吾回国后立刻派人刺杀重耳来看，姬重耳应该对姬夷吾的位子有些想法，让姬夷吾看到姬重耳对自己的危险性。否则，姬夷吾在位前六年没有派刺客，偏偏在这个时间对姬重耳动手，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巧合。

姬夷吾没有成功刺杀姬重耳，但让姬重耳明显感觉到了留在翟国的危险系数，因为和自己一样，姬夷吾的娘家也在翟国。更为重要的是，姬夷吾的身份是晋侯，位高权重，而姬重耳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流浪汉，难说翟国不会屈从于姬夷吾的压力，把姬重耳交出去。只要姬重耳落在姬夷吾手上，必死无疑。

不是姬重耳生性多疑，而是人性真的过于残酷，在利益的诱惑面前，人性是最靠不住的。既然翟国待不下去了，姬重耳只能另选落脚点，而此时距离姬重耳来到翟国避难，已经十二年了。

姬重耳在翟国的寄居生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从被父亲派寺人披赶出蒲邑后，姬重耳在翟国居住了五年。第二个阶段是姬夷吾回国即位，姬重耳又待了七年，直到姬夷吾准备派人来翟国刺杀他，姬

重耳才决定离开他的第二祖国。

春秋时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凡是寄居于A国的B国公子，A国总会把本国的宗室女子嫁给B国公子。这是一种感情战略投资，借以和B国公子进行婚姻联盟，姬重耳也不例外，他寄居翟国十二年，和一个被翟国俘获的美女季隗结婚，生下两个儿子，长曰伯，次曰叔刘。姬重耳远赴东方诸侯国，不方便拖家带口，只能把妻儿留在翟国。

说起来非常巧合，凡是嫁给姬重耳的女子，个个都贤淑惠婉，通情达理，季隗就是如此。她非常支持丈夫，告诉姬重耳：我会一直等你，哪怕你白头如雪，我永远是你的女人。

春秋时有许多感人的爱情故事，但后人似乎很少注重到姬重耳和季隗的爱情，其实他们之间的灵魂拥抱很容易赚后人的眼泪。一对刚安定下来的夫妻面临着生死离别，此去经年，不知相见何时，《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录下了他们分手时的对话。

姬重耳：“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

季隗：“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

有时，爱情不是朝朝暮暮的执子之手，而是彼此在时空交错中的牵挂，人生难得是知己，更何况是曾经共榻而眠的红颜知己。二十五年，几乎占了一个人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旅程，等你二十五年，这是一个女人对爱情最质朴的宣言。

关于姬重耳的年龄，有必要多说几句。《史记·晋世家》说姬重耳出逃翟国避难时已经四十三岁，而《国语·晋语》则记载姬重耳此时的年龄只有十七岁，相差二十七岁。按《史记》的说法，姬重耳回国即位时已经六十二岁了。

客观地说，这个年龄有些偏大，因为姬重耳的外公狐突一直在他

身边，即使狐突十三岁生女儿，翟女又十三岁生姬重耳，狐突跟随姬重耳逃亡时已经七十岁了，似乎不太可能。

至于《国语》所说的十七岁，又感觉有些偏小，因为骊姬在诬陷姬申生时，经常提到“君（姬诡诸）老矣，且旦暮之人”，说明姬诡诸当时的年龄至少也在六十以上，比姬重耳大四十岁左右。

可以确定的是，姬重耳是姬夷吾的兄长，而前太子姬申生的妹妹又嫁给了秦穆公嬴任好。如果按《左传》的记载，姬诡诸是先和齐姜私通生下儿女后，才娶了大小狐姬，生下重耳和夷吾，说明重耳要比申生和秦穆夫人小一些。如果重耳出逃时四十三岁，秦穆夫人的年龄应该在五十以内，但问题是此时秦穆夫人嫁嬴任好没多久，国公的女儿四十多岁，在当时是不太可能的。

按古人的早婚习惯计算，姬诡诸和发妻贾姬结婚时年龄不会太大，而贾姬无子，姬诡诸不太可能在贾姬无子几十年后再去和其他女人生儿子。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姬重耳在离开翟国前，和妻子季隗做了一席长谈，说我去外流浪，你在翟国安心等我。姬重耳给出的时间是二十五年，如果我二十五年内还不回来，你就改嫁。

如果此时姬重耳四十八岁的话，再活二十五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姬重耳当年不过二十二岁，那么即使他二十五年内回来，也不过四十七岁，正是男人做事业的黄金时期。

虽然春秋时代，人们的寿命普遍不高，但由于贵族养尊处优，延长寿命是正常的。春秋数百国君中，仅在位四五十年的就十几个。从这一点上讲，《史记》和《国语》所记载姬重耳的年龄都似乎不太可靠，但相对来说，《国语》的十七岁说比较靠谱。

姬重耳出逃的第一站，是齐国，这是姬重耳的幕僚团精心选择的路线，建议是狐偃提出来的。选择投奔姜小白，狐偃给出的最大理由就是“齐侯长矣，而欲亲晋”。

以晋侯姬夷吾的胡作非为，专和恩人过不去，姜小白显然不会把齐国的利益寄在姬夷吾身上。而姬重耳性格恢廓大度，是公认的晋公子最贤者，如果能拉拢姬重耳，对姜小白来说有两个好处：一、用姬重耳牵制姬夷吾；二、善待姬重耳，如果姬重耳能回晋继位，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齐在晋的利益。

对姬重耳去齐国，《史记·晋世家》给出了另外一个比较新颖的解释：“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这话是姬重耳亲自说的，如果从字面上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姬重耳要去齐国顶替管仲的位置！

姜小白苦熬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摆脱了管仲的管教，怎么可能再给自己找一个爹（相父）。何况以姬重耳的尊贵身份和野心，他也不会低眉顺眼地给姜小白打工当奴才。姬重耳说这句话的真实用意，应该是去齐国搞好与姜小白的关系，然后借助齐国的力量回国即位。

齐国的实力天下第一，姜小白的江湖威望远高于有名无实的周天子，老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只要姜小白肯出头帮助自己，姬重耳是有很大希望扳掉无耻的姬夷吾的。

其实相比去齐国找姜小白，近在河西的秦国是姬重耳另一个比较方便的选择，嬴任好对姬夷吾出尔反尔非常不满，如果姬重耳和嬴任好合作，也许嬴任好会帮助姬重耳杀回晋国。

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姬重耳此时不去秦国，应该有一个重要的考量。万一姬夷吾与秦国达成妥协，用身在秦国的姬重耳交换河西之地，姬重耳到时连个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在江湖上闯荡，一个最好的告诫是：谁都不要相信，只相信你自己。

由于齐国和晋国相隔几百公里，相当于现在山西临汾到山东临淄，中间还隔着几个小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是卫国。所以姬重耳必须借路卫国才能抵达临淄，其时在位的卫国国君是姬毁。

有趣的是，姬毁不但和姬重耳同宗，而且爵位相等，都是侯爵。更巧合的还在后面，二人都是春秋有名的贤君，《史记》称姬毁“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所以姬毁得到的谥号与姬重耳一样，都是文公。

像姬重耳这样闻达于天下的贤公子，按道理讲，姬毁应该以隆重的礼节欢迎姬重耳，为自己捞把好名声，或进行潜在的政治投资。不过姬毁却以正在与邢国和狄国进行战争，无暇接待为由，拒绝礼待姬重耳，明明白白地告诉姬重耳：爷没工夫答理你这个落魄公子。

邢国的国力要弱于卫国，姬毁的话有一半是托词，可能是他看不出姬重耳有回晋即位的可能性。商人是讲利益的，得不到好处，傻子才会把钱扔到无底洞里。

姬毁“无礼”姬重耳，恐怕和狄国有关，因为这个狄国很可能就是姬重耳的娘家翟国。而翟国则是卫国的百年世仇，以好鹤闻名的卫懿公姬赤就是死在了翟国人手上。姬毁做人其实还算厚道，没把姬重耳活捉扔在祭坛上给姬赤烧冥币，就已经给足姬重耳面子了。

姬重耳对姬毁的“无礼”非常恼火，但他的目的是齐国，卫国接不接待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窝着一肚皮无名火的姬重耳和幕僚们迎着朝阳，脚量大地，朝着大海的方向蹒跚而去。

卫国距离齐国并不算远，姬重耳很快就抵达齐国国都临淄。早已经得到消息的齐侯姜小白已经布置好了接待任务，他要以非常高的外交规格接待他外孙（姬申生）的弟弟，这对齐国来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战略投资。

千古一相管仲已经在几年前就去世了，已经成就天下霸业的姜小白也垂垂老矣，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和年轻的姬重耳的相见，会书写春秋历史怎样一段让后人艳叹的传奇。

其实姜小白并不需要第二个管仲，姬重耳也不想当第二个管仲，他们应该在见面之前就达成了某种默契，姜小白需要礼贤的好名声，姬重耳需要一个能返晋为君的战略跳板。

但让姬重耳有些受宠若惊的是，姜小白不但给予自己很高的政治待遇，“甚善焉”，赐马二十乘（每乘四匹马，共八十匹马），还把一位美丽贤惠的齐国宗女嫁给了重耳，让姬重耳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说到姬重耳在齐国娶妻，不由得联想到另外一位落难枭雄刘备，他同样为了政治目的来到吴国，但被孙权往自己手上塞了一颗名叫孙尚香的定时炸弹。周瑜曾经给孙权出了一个主意，多置美女珍玩，消磨刘备的英雄之志，孙权出于战略考虑没有同意，放刘备回荆州。

刘备在东吴，并非像《三国演义》中所说那样沉迷酒色，不思归荆。作为刘备的江湖前辈，姬重耳面对美女的诱惑，却动了心，准备长居于齐，生为晋人，死为齐鬼。《国语》原文：“将死于齐而已矣，曰：‘民生安乐，谁知其他？’”

比较姬重耳主动留齐，与刘备主动离吴，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刘备虽然实力弱小，但也是一方诸侯，有自己的枪杆子和战略根据地，姬重耳什么都没有。在位国君姬夷吾年当盛壮，姬重耳无法预测姬夷吾还能在位多少年，也许是齐国女子的美丽与贤惠触动了姬重耳心中那根自卑而消极的感情之弦。

这些年来的政治斗争，让姬重耳已经感觉到身心厌倦，对回国即位不再抱有希望，不如死在异国，至少能落个全尸。从后来幕僚集团和姜氏设计将姬重耳逼出齐国来看，姬重耳不是在作秀，而是确实打算放弃了。

在东晋十六国时代，前燕德高望重的吴王慕容垂被权臣慕容评逼出燕国，逃往前秦避难。前秦天王苻坚待慕容垂如国士，在一定程度

上也消磨了慕容垂原来非常强烈的复国之志，但最终慕容垂还是借前秦淝水惨败之际成功复国。

姬重耳与慕容垂经历相似，都在外逃亡N年，但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慕容垂在前燕统治集团内部有极深的人脉关系，姬重耳在晋国高层内部已经没有什么支持者了。

当然，慕容垂之所以能成功复国，还要拜苻坚强行攻晋失败，导致前秦统治崩溃的混乱局面所赐，如果苻坚能稳定北方统治，慕容垂是完全可以接受给苻坚当一辈子奴才的。姬重耳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只要齐侯姜小白还活着，齐国的霸主地位就不会动摇，姬重耳就可以实现终老于齐的消极梦想。

形势很相似，慕容垂逃亡前秦十三年后，前秦崩溃，而姬重耳所面临齐国内乱的时间更短，只有两年。公元前643年，一代枭雄姜小白死于诸子争嫡的内乱之中，原来波澜不惊的齐国政坛立刻变成了一个被扔进一根火柴的大油桶，局面极度混乱。

齐国的局面已经彻底失控，到处杀人放火，姬重耳及其从属人员的人身安全已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面对如此混乱复杂的局面，姬重耳居然还在坚持他终老于齐的打算。

幕僚团不想留在齐国等死，说动了姬重耳的夫人姜氏，由姜氏出面，劝姬重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让所有人意外的是，任凭姜氏唾沫横飞，说得大义凛然，姬重耳是铁了心留在齐国。姬重耳回了一句：“吾不动矣，必死于此。”

在姬重耳第一次拒绝离齐之后，姜氏苦口婆心地再劝，其中有一句说得非常实际，“齐国之政败矣，晋国无道久矣，从者之谋忠矣，时日及矣，公子几矣。”大意是齐国不是久居之所，晋侯姬夷吾昏道误国，公子回晋即位的时机已经成熟。

见姬重耳没有反应，姜氏有些气急败坏，指着姬重耳的鼻子大骂：“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姜氏想用激将法说动姬重耳离齐，结果还是遭到了姬重耳的拒绝。

更为过分的是，见劝不动姬重耳，姜氏和赵衰等人合谋，把姬重耳用酒灌醉，然后趁着夜色，众人带着不省人事的姬重耳逃离齐国。而当姬重耳醒来后，居然大发驴脾气，操起一只戈追着舅舅狐偃乱打，扬言要杀掉狐偃。当狐偃悲壮地说出如果杀我能成就公子大事，我心无憾时，姬重耳居然回答：“这是你说的！如果事不成，我就生吃了你的肉。”表现得非常反常。

姜氏劝姬重耳离齐的动机可以理解，姬重耳是池中潜龙，将来是要做大事的，何况齐国已乱，等死何益。姬重耳宁死不离齐国的动机则有些费解，虽然史料无载，但分析一下，有一个最大的可能：姬重耳不是要给姜小白殉葬，而是等待机会，夺取齐国政权！

如果姬重耳真有这个想法的话，只能说姬重耳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性。姬重耳不过是一个寄居之客，他在齐国高层与民间没有任何人脉，姜姓在齐立国四百年，根基深厚，怎么可能轮到一个晋国的落难公子执掌齐国政权。如果姬重耳没有这个想法，那实在无法解释姬重耳为什么宁死不离齐。

不过既然从齐国逃了出去，姬重耳也不会再傻乎乎地回到齐国送死。在与幕僚们拌了几句嘴后，姬重耳还是叹息着上了路，继续寻找不确定的人生方向。

姬重耳不回齐国，可能是幕僚们给他上了一堂形势分析课，齐侯已死，诸侯皆叛，齐国这副烂摊子即使交给姬重耳，也未必能管理好。不如继续在江湖上寻找买家，天下之大，总有我们的容身之所。

二一 晋文公周游列国

（下）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齐国是此次东行过程中最偏北的国家，其他主要的诸侯国都在齐国南线，姬重耳只能向南行进，而南下的第一站，就是曹国。曹国位于山东定陶附近，是春秋著名的袖珍诸侯国，但因为曹国的远祖是姬周宗室，所以在江湖上名声很响。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齐国之南有两个地理位置几乎平行的姬姓诸侯国，即曹国和鲁国，但姬重耳的流浪团取道弱小的曹国，而不路过实力和名望都远强于曹国的鲁国。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释，姬重耳一行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寻找有力之强援，助他回晋即位。在姬重耳集团的外援名单上，齐、宋、郑、楚、秦都是有实力帮助姬重耳实现理想的诸侯，而姬重耳离开齐国之后，下一个去讨饭的就是宋国，要去宋国，取道曹国要比取道鲁国更便捷。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鲁国的立国之道在崇尚霸力的姬重耳看来过于柔弱，鲁国未必认同姬重耳的生存之道，与其互相嫌憎，不如不去。

曹国在姬重耳看来，只是一处歇脚喝茶的驿站，没想到在曹国却出了一个超级大洋相，让姬重耳终生引以为耻。问题出在曹国的国君曹共公姬襄身上，此公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爱好——偷看男人洗澡。特别是当姬襄听说姬重耳“骀胁”，更是激动得睡不着觉，不欣赏一下姬重耳的裸体，姬襄誓不罢休。

所谓骀胁，其实就是男人肘腋下的肋骨连成一片，这不算太大的

生理缺陷，最多只是生理性身体畸形，就像刘备长了一对招风耳一样。姬襄是个小国寡君，没见过什么世面，想到有这么一个大乐子玩耍，姬襄的口水流了一地.....

就在一丝不挂的姬重耳在曹国公室的公共浴室中搓洗自己的尘土时，烟雾氤氲之际，一个肥大的脑袋拱开厚重的帘布，嬉皮笑脸地欣赏着姬重耳健白的裸体，毫无心理准备的姬重耳吓得尖叫起来。

姬重耳虽然落魄逃难，但身份贵重，作为同姓诸侯，姬襄应该有最起码的外交礼貌，偷看人家洗澡算哪门子勾当？姬重耳的自尊心极强，何况是在落难的敏感时刻，姬襄的无礼深深刺痛了姬重耳已经脆弱至极的自尊心。

姬襄以为姬重耳不过是个要饭的叫花子，就是他也跳进浴桶里与姬重耳共浴，谅姬重耳也不敢对他如何。姬襄不把姬重耳当盘菜，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却很有战略投资眼光，她看出姬重耳不是凡品，甚至看出姬重耳恩怨分明。姬襄对姬重耳无礼，一旦姬重耳返晋即位，第一个敲打的就是曹国。与其到时给姬襄殉葬，不如抢先下手，巴结姬重耳，给自己买份保险。

在妻子的劝说下，僖负羁请姬重耳吃了一顿晚餐，并趁无人之际送了一对玉璧。僖负羁的心思，姬重耳当然明白，他虽然没有接受玉璧，但至少在他心中，僖负羁和人嫌狗憎的姬襄是不一样的，僖负羁很快就买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份保险。

经历了偷窥事件，姬重耳带上对姬襄的仇恨上了路，下一站是宋国。其时在位的宋襄公子兹甫的战略眼光要远强于喜欢偷窥男人洗澡的姬襄，宋襄公虽然不敢肯定姬重耳将来一定会返晋即位，但谁也不敢否定这种可能性，所以宋襄公提前进行战略投资。

宋襄公刚在与楚国的泓水之战败下阵来，还被楚人射了一箭，正在养伤。但听说姬重耳已经到了，宋襄公强忍伤痛，以最隆重的礼节

欢迎重耳公子莅宋，送给落魄中的姬重耳团队二十乘马，即八十匹好马。

人在落难时获得尊重和帮助，是最容易被感动的，伍子胥和韩信都是如此，姬重耳也不例外。对于宋襄公的国礼待遇，姬重耳感动得一塌糊涂，后来楚兵围宋，姬重耳就要报恩于宋国，“报施定霸，于今在矣”。

宋国国力有限，很难承受帮助姬重耳返晋即位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宋国司马公孙固告诉狐偃：“宋小国新困，无法更有力地帮助你们，你们还是去别国碰碰运气吧。”姬重耳带着对宋襄公的感恩戴德，离开了宋国，前往郑国寻求帮助。

郑国和宋国都是春秋时代的著名小霸，但此时的郑国早已没有郑庄公姬寤生的胆识和霸气，用曹操的话来说，郑文公姬踃就是“冢中枯骨”，毫无眼光和作为。姬重耳路过郑国时，作为同姓诸侯，姬踃居然对姬重耳的过郑不闻不问，“弗礼”，用仨枣俩窝头就想打发掉姬重耳，因为姬踃相信姬重耳就是一个穷要饭的命，慢待了你又如何，吃了寡人不成？

姬踃的弟弟叔詹劝兄长不要小瞧姬重耳，此人龙行虎步，兼部下从属皆有宰相之器，将来必有作为，何不趁其落魄之际厚金赠之，以结其心。姬踃怒了：“郑国不是招待所，南来北往的落难公子都要接待，我兜里没钱！”

不过叔詹提出了一个更毒的计划，既然国君不想结交姬重耳，不如一刀把姬重耳送上西天，除去后患。姬踃只是不想搭上姬重耳，并不想害他的性命，何况以姬重耳之贤，杀了他会在江湖上臭了自己的名声，所以再次拒绝了叔詹。

姬重耳恩怨分明，在郑国的屈辱遭遇让他耿耿于怀，八年之后，已经成为晋侯的姬重耳联合秦军讨伐郑国，对姬踃好一番羞辱，算是

出了一口恶气。更惨的是叔詹，如果他不提出杀重耳之议，重耳会视他为知己。但叔詹多说了一句话，却让姬重耳恨得咬牙切齿，兵临郑城，要求姬重耳把叔詹交出来，叔詹不堪重耳羞辱，当场自杀谢罪，死后，叔詹的尸体被送给姬重耳当发泄品，可见姬重耳性格之狠。

在姬重耳的逃亡旅程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值得注意。凡是小国国君，都对姬重耳非常冷淡，爱理不理，如卫、曹、郑；凡是大国国君，都对姬重耳表现出了十二分的热情，以最隆重的礼节接待姬重耳，如齐、宋、楚、秦。

究其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小国寡民，没什么战略眼光，只计较眼前的蝇头小利。大国厚待姬重耳，无非是在为本国的国际利益进行战略投资，比如接下来要讲的楚成王熊恽。

在卫文公、曹共公、郑文公眼中，姬重耳不过是一块被历史抛弃的破铜烂铁，远不如在位的姬夷吾更有价值。但在南霸天熊恽眼中，姬夷吾不过是具行尸走肉，将来有能力威胁到楚国在中原争霸的，必是眼前这个落难的晋国公子。

熊恽非常看重姬重耳的到来，之前接待过姬重耳的如齐桓公姜小白，也不过以寻常礼节见姬重耳，而熊恽干脆以诸侯礼接待。换句话说，姬重耳是以晋国国君的身份来到楚国的，熊恽此举给足了姬重耳面子，这对日后江湖上如何处理接待姬重耳的问题上提供了一次样板经验。

姬重耳在外漂泊十多年，看够了人情的阴晴冷暖，熊恽突然抬高他的政治待遇，姬重耳反而有些不敢接受，生怕其中有诈。还是大夫赵衰劝他不要犯傻，这正是我们在国际上树立自己名望的绝佳时机，岂能放过，姬重耳这才有些忐忑地接受了熊恽的好意。

实际上，姬重耳不想接受熊恽的超规格接待，可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熊恽是在利用对自己的厚待，将来在自己返晋即位的情况下，

对晋国提出太多的非分要求。出于这层考虑，姬重耳开始装傻，在会见熊惲时，姬重耳一副窝囊无能相，“甚卑”。

姬重耳不想让熊惲看出自己还有返晋即位的可能性，熊惲是个老江湖，姬重耳玩的这套把戏，他心里当然门清。熊惲为姬重耳举行了盛大的招待酒会，还没等姬重耳开口致谢，熊惲就把问题摆在姬重耳的面前。熊惲问姬重耳：如果公子返晋即位，何以报寡人之德？熊惲逼姬重耳提前签下割让土地的不公平条约，姬重耳岂会轻易上钩。

姬重耳和他的幕僚团早就想到熊惲会这么说，姬重耳的回答也应该是事先准备好的，姬重耳回答得很狡猾，说楚国万物齐备，晋小国寡物，不及楚国万一，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以报答楚王的。

在熊惲的再三逼问下，姬重耳还是没有松口，只是不疼不痒地说了句：“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这已经是姬重耳所能让步的底限，姬重耳不是姬夷吾，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人格国格统统不要了，姬重耳有自己的政治品格。

正因为如此，熊惲更加认定姬重耳有霸主之风，日后返晋继承大统的希望极大，所以熊惲依然以诸侯礼接待姬重耳。站在旁边的楚令尹成得臣认为姬重耳对楚王不敬，请杀之，熊惲当然不会同意，理由是重耳“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从者皆国器，此天意，不可杀”。

实际上，熊惲另有一层战略考虑。此时的天下只有四个大国，即晋、齐、楚、秦，从地缘政治上看，秦距离晋最近，一旦昏君姬夷吾在晋国的统治崩溃，秦就有利可图，到时楚鞭长莫及。

而楚距离晋较远，如果姬重耳这样的贤主在位，就能有效维护现有的四强格局，遏制秦、齐两大国对晋国的战略扩张，为楚国赢得足够的时间差。虽然熊惲也知道一旦重耳继位，必然会影响楚国的北上争霸，但两害相权从其轻。

至于熊恇说“秦晋接境，秦君贤”，并把姬重耳送到秦国，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利用秦穆公嬴任好与晋侯姬夷吾的矛盾，间接迫使嬴任好帮助姬重耳返晋继位。

熊恇想到的，嬴任好自然也想到了，本来嬴任好是想通过姬夷吾捞上一把的，哪知道此公是个白眼狼，给嬴任好添了许多恶心。对秦国来说，与其让姬夷吾在晋国胡闹，威胁到秦国的战略安全，不如扶持相对老实的姬重耳上位。

姬重耳还在楚国逗留时，嬴任好就已经派人来到郢都，和熊恇进行接洽，商量请姬重耳入秦的事宜。秦楚关系还算不错，在对姬夷吾的立场，秦楚比较一致，所以姬重耳入秦，是嬴任好、熊恇和姬重耳三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三赢。

带着熊恇赠送的大量金帛马器，姬重耳一行在秦国使者的带领下，先沿汉水西上，穿越蓝田关，再沿渭水南岸西行，一路风尘憔悴，来到了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对于姬重耳的到来，嬴任好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热情，姬重耳前脚刚到，嬴任好就往姬重耳怀里塞了五名美丽的秦国宗女。

姬重耳此时来到秦国非常的及时，其实姬重耳集团也清楚，秦国是他们辗转列国的最后一站，下一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晋国。而此时的晋国在姬夷吾的十四年荒唐治理下，已经濒临崩溃，姬夷吾本人也身患重病，命不久矣，其时是公元前637年九月。

秦伯嬴任好和以姬重耳为首的晋国影子政府已经达成了一揽子的双边合作协议，只等姬夷吾咽气，秦国会立刻出兵保护姬重耳还晋夺位。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秦国的探子已经打听清楚，姬夷吾于当年九月病死，其子姬圉在一片混乱中即位。嬴任好立刻启动早就准备好的方案，“乃发兵送内重耳”，秦国重兵西向渡河，嬴任好要对背

叛自己的姬夷吾父子给予最致命的一击。还是同一条西进路线，十四年前，嬴任好同样发重兵护送姬夷吾入晋继位，没想到十四年后，嬴任好第二次当上了护花使者。

对于嬴任好的慷慨解囊，姬重耳感激涕零，但他并没有对秦国做出有损于晋国利益的承诺。其实姬重耳只要不像姬夷吾那样对秦国恩将仇报，就是对嬴任好最好的报答，嬴任好实在是被莫名其妙的姬夷吾搞烦了。

对于这一天，姬重耳以及他的幕僚们足足等了十九年，他们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当然，也有人对即将成为晋侯的姬重耳不放心，认为他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忘恩负义的姬夷吾，此人就是姬重耳的绝对心腹——舅父狐偃。

姬重耳乘坐的大船在浩荡的黄河中乘风破浪，距离故乡越来越近，姬重耳本来极佳的心情却被狐偃一句没头脑的话坏了心情。狐偃在船上突然向重耳请辞，并把随身携带的一块玉璧还给了姬重耳，理由是我跟随你在外流浪十九年，让你每天都担惊受怕，所以我罪恶通天，请你允许我就此离开，算是对我的法外开恩。

狐偃的举动很好理解，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如上所说，狐偃担心姬重耳有可能学坏。

二、受赵衰、魏犢、先轸这些从龙老臣的委托，逼姬重耳表态，得志之后不冷落功臣。

三、狐偃把自己侍奉国君十九年的功劳都摆出来，在姬重耳面前邀功请赏，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狐偃突然来这么一手，姬重耳心知肚明，狐偃真要觉得惭愧，应该在曹国受辱的时候辞职，何必等到现在。在姬重耳的幕僚班子中，不论血缘还是政治立场，狐偃都是姬重耳最为倚重的心腹，他当然会

向老臣们表明心迹。

姬重耳举起玉璧，扔进了滚滚黄河里，然后告诉狐偃：“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这话实际上也是说给赵衰、介子推这些人。其实狐偃、赵衰等人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姬重耳在外流浪十九年，他所能依靠的心腹只有狐偃、赵衰这些人，得罪了这几个老臣，姬重耳在晋国官场上就是光棍，姬重耳没有傻到自剪羽翼的程度。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秦军渡过黄河后，保护姬重耳一路向北急进，在庐柳（今山西临猗）遇到了前来阻止姬重耳回晋的晋军。姬圉在晋国的统治面临崩盘，这支军队的斗志也早已经涣散，晋军来到前线似乎更像是迎接姬重耳还朝的。

不止是姬圉赖以生存的军队，晋国朝中大佬如栾枝和郤穀也早就暗中和姬重耳建立了团结战线，就是这两位大爷派人来到秦国见姬重耳，“劝重耳、赵衰等反国，为内应甚众”。而这个“为内应甚众”，显然也包括被栾枝等人策反了的晋军。因为有了内应，嬴任好才敢放心地送姬重耳还晋。

既然晋军就在眼前，嬴任好立刻派大夫公子絅趁月黑风高之际，窜进晋军大营，和晋军主要将领进行谈判，并最终约定迎接姬重耳入晋的具体时间。至于无德无望的姬圉，早已经被晋国各阶层冰冷地扔弃了。

为了表示对姬重耳入晋的诚意，晋军向东南角撤退数十里，并邀请秦国方面、姬重耳方面的代表在郇地（今山西临猗南，晋军驻地）进行三方谈判。谈判内容不详，但无非是商讨姬重耳入晋的具体细节，晋国君臣所能得到的政治利益，外加秦国在谈判桌上尽力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

三方会盟后的第二天，曾经被姬圉的父亲姬夷吾统治十四年的晋国军队宣布改旗易帜，得到消息的姬重耳立刻率本部人马驰入晋军，

正式接管晋军的指挥权。天下之大，枪杆子最大，姬重耳紧紧抓住了枪杆子，这也就意味着姬圉的末日即将到来。

四天后，新一任晋侯姬重耳来到晋国祖庙所在地曲沃，这里曾经是他先祖浴血奋斗过的地方，政治地位相当于清朝的盛京（今辽宁沈阳）。曲沃的武宫是晋武公姬称的宗庙，是曲沃小宗代晋之后的每位晋侯即位时都必须朝拜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

姬重耳在抵达曲沃的第二天就以极隆重的形式朝拜了武宫，政治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他已经晋国公认的晋侯，正式取代了名不副实的姬圉，这对晋国境内的亲姬圉力量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积极的政治信号，规劝自己的反对势力不要再做无用功。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只说姬重耳朝于武宫，而《史记·晋世家》则明明白白地记载：“（姬重耳）朝于武宫，即位为晋君，是为文公，群臣皆往。”《左传》的记载相对简略，但基本可以确定姬重耳就是在曲沃武宫举行的即位大典，这也就意味着，历经十九年的艰苦磨难，姬重耳终于苦尽甘来，成为晋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君主，千秋一霸晋文公的时代，已经呼之欲出。

至于实际上已经被晋人废黜的旧君姬圉，姬重耳是断然不会放过这个侄子的，只要姬圉还活着，姬重耳就会面临非法即位的指责。就在姬重耳在武宫即位的第二天，孤家寡人姬圉在逃到高梁（今山西临汾东北）避难不久，就被姬重耳派出的杀手做掉了。

晋国一人，其在重耳！

二二 龙战城濮：春秋 争霸的巅峰之战

春秋争霸三百年，重大战役多不胜数，比如齐鲁长勺之战（前684）、秦晋殽之战（前627）、晋楚邲之战（前597）、齐晋鞌之战（前589）、晋楚鄢陵之战（前575）、吴楚柏举之战（前506）。这些战役固然精彩刺激，历史意义也非常重大，但要说知名度，没有一个能超过堪称春秋第一名战的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的知名度如此响亮，主要原因只有一个，这场名战是春秋五霸为了争夺国际霸权的开山之战。虽然在城濮之战发生的六十年前，齐鲁之间也有一场著名的长勺之战，但这长勺之战只是鲁国抵抗齐国入侵的小规模战争，这也直接拉低了长勺之战的影响。

在城濮之战前，春秋的争霸战争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多以政治手段解决彼此间的冲突，比如到处开会演讲，今天和A国结盟，明天和B国喝鸡血拜把子。比如春秋第一霸齐桓公姜小白的武林盟主地位，就不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嘴皮子说出来的。

在春秋早期，能有资格争夺国际霸权的，无外乎齐、晋、秦、楚四国。其中晋国正陷于骊姬之乱，无暇外顾，秦国相对弱小，对已经称霸的齐桓公姜小白来说，楚国是齐国巩固国际霸权的最大威胁，楚成王熊恽实在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所谓确定齐国盟主地位的召陵之会，也是熊恽在权衡再三后，卖给姜小白一个天大的面子。否则齐楚如果真刀真枪地打一场，被打肿脸的极有可能是姜小白。

按主流的五霸划分法，齐国内乱之后，第二个霸主是宋襄公子兹甫。宋襄公早就对霸主的位子垂涎三尺，公元前639年，宋襄公想像姜小白以不战屈楚之兵，逼迫楚国同意宋国争霸武林，结果被熊恽戏耍了一番，关在囚车里满世界巡回展览，丢尽了面子。

一年后，强悍的熊恽在泓水岸边，给狂妄自大的宋襄公敬献了花圈，这一战也标志着熊恽霸业的最终确立。泓水之战的规模要略大于长勺之战，但也不算上大规模的战争，以宋襄公的实力，充其量只能算是准一线球员，所以不能称泓水之战为天王山战役。在春秋战争史上，真正算得上天王山战役的，只能是春秋第一场大规模阵地战的城濮之战。

争霸是春秋历史的主旋律，而且在春秋早期，霸主的主要考量标准是政治与外交。但话说回来，争霸固然需要嘴皮上的纵横功夫，外交同样是争霸的主战场，但如果没有火星四射的战争，争霸总会少了一些精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官渡、赤壁、夷陵三大战役，三国的历史会是个什么样子。

城濮之战的起因其实非常简单，楚国为了谋求中原霸权，北上扩张势力范围，但遭到了以晋国为首的国际反楚联盟的顽强反抗，最终在城濮大打出手。

作为春秋第一名战，城濮之战集中了经典战役所必备的所有要素：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小国的选边站队、双方谋臣的帷幄运筹，疆场上的壮怀激烈，以及两大霸主之间的旧情厚恩，种种因素错合在一起，城濮之战想不红都难。

熊恽没有列入春秋五霸的任何一个版本，但谁又能想得到，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楚国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大国，其实力之强悍，远胜春秋首霸齐国。

在当时的中原版图上，可以分为一超多强，一超自然是楚国，旗

下还有许多仆从国，如陈、蔡、郑、宋、卫、曹、许，甚至以礼乐传世的鲁国也和“蛮夷荆楚”拜了把子。多强是晋、齐、秦等传统强国，但此时的国力已经被楚国远远抛在身后。

对于楚国一超独霸的局面，江湖上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情绪，任由楚国北上扩张，大家早晚会被熊恽这个“蛮荆”没收了饭碗。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公元前637年，这一年发生了震动江湖的大事——晋国公子姬重耳返晋即位，成为新一任晋侯。

姬重耳的能力是举世公认的，所以姬重耳的继位，对饱受楚国欺凌之苦的诸侯来说，无异于久旱迎春雨，他们对楚国的恭顺态度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最先叛楚归晋的，是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力的宋成公子王臣。

宋成公之所以踢掉熊恽，按《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是宋襄公当初曾经帮助过落难的晋侯姬重耳，在感情上与晋更为亲近。宋有恩于晋，指的是姬重耳路过宋国时，宋襄公送给姬重耳二十乘马，这可是极高的礼遇。

实际上，宋有恩于晋，这只是归晋的原因，而宋叛楚的原因，则是宋与楚有杀父之仇。宋成公是宋襄公的儿子，宋襄公在泓水之战被楚人射伤致死，宋成公岂有不恨熊恽的道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叛楚归晋，是宋襄公在世时就制定好的外交政策，这也是宋襄公为什么要送姬重耳二十乘马的原因，只不过宋襄公战死，没来得及执行罢了。

公元前634年十二月五日，鲁国与楚、蔡、陈等国强行在宋地举行盟会，但宋国拒绝参加此次盟会，也表明了宋国和楚国的决裂态度。子王臣翅膀硬了要单飞，熊恽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以楚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蝗虫一般地扑向宋国。

宋国在被围攻的第一时间就派堂兄（或堂弟）公孙固如快马般闯进绛都，请求姬重耳立刻发军救宋。否则宋要垮了台，晋国东南方向就无险可守，大家一起完蛋。

唇亡齿寒的道理，晋国新任执政高层自然明白，晋国的下军佐先轸说得很清楚，救宋有两大好处，一是报宋赠马之恩，二是击楚争霸之路，“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关于如何救宋的战术安排，晋国勋臣狐偃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主意：围曹、卫以救宋，这其实就是战国孙臆成名作“围魏救赵”的春秋版。狐偃的理由是曹、卫皆是楚安插在中原的钉子，进攻曹、卫，则楚必弃宋以救曹、卫，如此，宋可解楚之围。

姬重耳接受了狐偃的建议，除了狐偃所说的理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初姬重耳流浪到曹国时，曹共公姬襄偷看姬重耳光屁股洗澡，被姬重耳视为奇耻大辱，所以这次要公报私仇。

此次讨伐曹国，晋军几乎是精英尽出，晋军的主将名单可以用星光灿烂来形容：

中军：主将郤穀，军副郤臻。

上军：主将狐毛，军副狐偃。

下军：主将栾枝，军副先轸。

晋侯姬重耳亲自带队，荀林父为御戎（为晋侯驾马），魏犇为御右。

从实力上来分析，讨伐曹国这样的弹丸小国，根本用不着如此大动干戈，派一大将足矣。姬重耳之所以牛刀杀鸡，其实还是冲着熊恇的楚军主力去的。姬重耳已经预料到了，晋军必将与楚军有一场轰动天下的恶战，攻曹只是拉开了晋楚大战的序幕而已。

另外，晋军以主力攻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警告聚在楚国名下的诸侯要认清形势，不要再跟着楚国一条道走到黑，弃暗投明才是上策。

形势的发展也不出晋国高层预料之外，晋军先是假道于卫时，将亲楚的卫成公姬郑擒获，并于公元前632年三月攻下了曹国。晋国征服曹、卫，受惊吓最大的就是曹卫的近邻鲁国，鲁僖公申很识时务地弃楚归晋。

从晋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上考虑，西线因为有相对强大的秦国，可以抵挡来自楚国的压力，南线有郑、宋，也基本为楚所得，这是晋军抵抗楚国北上扩张的主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东线就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次弃宋攻曹、卫的战略考量，就在于此。至于宋国，能救下更好，实在救不下，也不会影响到晋的南线战略防御，无非压力大一些罢了。

除此之外，姬重耳可能还有一层考虑，拿下曹、卫之后，用曹、卫来换楚国放弃对宋的围攻，避免过早地与楚国决战。楚军实力强大，凭晋一国之力，恐怕很难单独抗衡楚国，如果能把隔岸观火的齐、秦两国拉进这趟浑水，就增加了对抗楚国的胜算。

战略奇才先轸想出来一个让人惊叹的绝招：派人去宋国，让宋国不要再派人来晋国求救，而是改求齐、秦向楚国说情。同时晋国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分给宋人，因为曹、卫是楚的卫星国，熊惲是绝不会答应的，必然会拒绝齐、秦的请求。如此，楚就得罪了齐、秦，这就能迫使齐、秦亲晋而远楚。

晋国高层对即将到来的晋楚大战做好了一切准备，但可惜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楚王熊惲根本就没有和姬重耳大打出手的打算。听说晋军已经南下，身在申城的熊惲立刻发了一道命令，让前线大帅成得臣（即子玉）速撤宋之围，千万不要和晋军主力正面交锋。

晋步步紧逼，楚却步步退让，不是说熊恠害怕晋军，当年姜小白那么大的阵势，熊恠也没当盘菜。熊恠担心一点，姬重耳以破落户的身份忽登大位，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向江湖上最强大的楚国发起挑战，来抬高自己作为新人在江湖上的地位。

老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旦晋败了，姬重耳并没失去什么，一旦楚败了，熊恠有可能在江湖上丧失所有的威名。出于这种考虑，熊恠反对与晋决战，但楚军主帅成得臣想的却是，如果能打败江湖名望如日中天的姬重耳，成得臣就将一战成名天下知。

成得臣派斗越椒在熊恠面前软磨硬泡，最终把熊恠激怒了，只派出右军和东宫之卒，以及成得臣的家军六百人。熊恠不肯拔毛，让成得臣有些为难，兵力不足，很难和晋人刀兵相向，这可能就是熊恠的一层用意，故意不拨重兵，逼迫成得臣与晋人言和。成得臣也是按照这层设想去做的，他派出大夫宛春赴晋营求和，条件很简单：晋人复曹、卫之国，楚人撤宋之围。

晋、楚双方最高层对两大国之间的战争的态度完全不同，楚尽可能地避战，而晋则必须想办法激怒楚人。楚军主帅成得臣是个火暴脾气，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在先轸的建议下，姬重耳做了两件事情：

一、抢在楚国之前，复曹、卫之国。曹、卫都是小国，专在江湖上抱粗腿的，投楚与投晋没有本质区别。何况对曹、卫来说，楚远晋近，宁得罪于楚，不得罪于晋。先倒向晋，万一晋败于楚，曹、卫还可以再认楚当干爹，熊恠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曹、卫告绝于楚”。

二、强行扣下楚使宛春，并押往卫国看管。晋人这么做，无异于当着天下人的面抽成得臣的耳光。成得臣死要面子，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会尽起楚军北上攻晋。只要能把楚军主力引出来，晋人就有办法诱而歼之。

事情的发展都在晋国高层统治集团的预料之中，先轸往成得臣的

火药桶里扔了一根点燃的火柴，火药桶岂有不爆之理？特别是宛春被扣事件，弄得成得臣极没面子。讨回面子，是成得臣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楚王之前对他的反复告诫，早扔到爪哇国去了。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成得臣怒，从晋师。”为了赌回这口恶气，成得臣把围攻宋国的楚军主力全部调离北上，寻找晋军主力决一死战。

成得臣很听话地跳进了姬重耳给他挖的大土坑里，姬重耳之所以要调楚军北上，而不是率晋军南下挑战楚军，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晋军主力此时正驻扎在卫地城濮（今山东甄城西南），而楚军所在的商丘距离城濮约有二百里的路程，晋军如果奔波二百里至商丘，楚军就可以以逸待劳击溃远来之晋军。与其自己满世界瞎跑，不如让楚军长跑二百里，消耗楚军的体能储备。

至于楚军气喘吁吁地赶到城濮，晋军突然后撤三十里，有两个原因：

一、报当初熊惲厚待姬重耳之恩，熊惲曾经问姬重耳：“若君返国即位，何以报我？”姬重耳说如果晋楚交战，我当退避三舍，以报君恩，现在后撤，也算是报答了当年熊惲的厚待之恩，卸下了姬重耳的思想包袱，可以轻装上阵，和楚人大打出手。

二、成得臣为人向来狂妄自大，晋军向楚示弱，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成得臣对晋军的轻视。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敌人越轻视对手，越有可能遭到失败，这是历史不变的规律。

和楚军长途奔袭二百多里相比，晋军后撤三十里，基本不会消耗太多的体力，反而会拉开空当，有利于观察敌人平时不易暴露出的致命弱点。林冲在柴进庄上和洪教头打擂，就是先观察后一棒击之而胜。

姬重耳的花花大肠，楚军早已有人看了出来。而且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除了成得臣，几乎所有的楚军将士都反对部队北上急行去跳姬重耳挖的坑。但此时的成得臣已经被愤怒的情绪完全控制，他只想通过打败姬重耳找回面子，任何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

姬重耳一个小手段就能将成得臣玩弄于股掌之上，应该是他在楚国逗留时，研究过楚军大帅成得臣的性格，这对未来战胜这位易怒的将军将有所帮助。

姬重耳把战场选在城濮，还有一层考虑，城濮是卫地，距离晋国，以及晋的盟友宋、齐，新附晋的卫、曹、鲁都非常近，晋军的后勤完全没有问题，相当于本土作战。楚军北上围宋已经是孤军深入，此次再北上二百里，后勤补给越拉越长，非常不利于楚军的战斗力保持。

四月初一，姬重耳拉来的三支友军，宋成公子王臣、齐大夫国归父、秦伯公子小子憖各率本国精锐聚集城濮之下，这更增加了姬重耳战胜熊恽而霸的信心。至于姬重耳念念不忘当初熊恽对自己的好，不过是当着国际友人的面，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姬重耳非常重视在国际舆论面前树立自己仁德好义的形象，姜小白当年之所以能称霸江湖，与其说胜在军事上，不如说胜在政治与外交上。姜小白时时以仁德好义自处，打造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对收拢人心起到了关键作用，连强悍的熊恽都不得不暂时低头，可见政治外交对称霸的征用性，单凭枪杆子，是打不下来霸业的。

此次诸国高层云集，正是姬重耳自我表演的极佳舞台，虽然所谓的齐、秦、宋友军在城濮之战一矢不发，纯属公款旅游。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大舞台，各色影帝都在舞台中卖力地表演，姬重耳自然不会例外。

根据剧情安排，姬重耳扮红脸，念念不忘楚王当初对自己的厚

遇，说寡人实在不忍心与楚作战，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国舅狐偃和重臣栾枝扮黑脸，狐偃强烈要求主战，并留下了一个著名成语——表里山河。

栾枝走得更远，针对姬重耳所谓的“奈楚惠何”，栾枝把楚国灭掉汉江流域的姬姓小国的罪行全都抖了出来，说晋身为姬姓，就必须为汉阳诸姬讨个说法，岂能“思小惠而忘大耻”，这一仗必须打，谁不打谁孙子。

作为一名演员，演技固然很重要，但演戏都要有个限度，演过了就穿帮了。姬重耳翻江倒海的这通忽悠，基本洗白了自己的好战本质，反而把战争贩子的恶名扣到了楚人的脑袋上。成得臣派大夫斗勃来晋营请战，说要和晋人练练摊，此举正合姬重耳的意思，双方约定次日在城濮之下以武会友。

震惊天下的城濮之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实际上这是一场不均衡的战争，这从双方的重视态度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晋国对此战极为重视，国君亲率军界精英出场，晋军主力悉数上阵，包括由晋国公族子弟组成的中军。姬重耳从晋国带来了战车七百乘，每乘车有七十名步卒，合计五万两千五百人，这在参战人数并不多的春秋时代，已经是顶级配置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晋军的战马配置，堪称超级豪华，金兀术的拐子马披金挂甲，但晋军战马的装备和拐子马相比丝毫不逊色。晋军的战马皆披重甲，马背上的皮甲称为鞬（音显），马胸前的皮甲称为鞔，马腹上的皮甲称为鞞，马屁股的皮甲称为鞞，可见晋军装备之精良。

这场晋楚大战对于姬重耳来说，更像是一场命运的赌博，一战成名的机会就在眼前，姬重耳几乎是掏空了家底在玩命。姬重耳要对熊惲报恩，所以退避三舍，其实除了报恩，姬重耳也要报仇，仇家就是

成得臣。

前一篇讲到了姬重耳答应熊惲，若遇楚军当避三舍。站在熊惲旁边的成得臣感觉姬重耳将来必是楚军争霸天下的最大劲敌，劝熊惲杀重耳以绝后患，所以姬重耳恨成得臣入骨。姬重耳的求战欲望之所以如此强烈，一方面是因为称霸的诱惑，另一方面也因为楚军主帅是成得臣。

成得臣的脾气不好，动辄杀人，但成得臣所率的楚军战斗力非常强悍，是姬重耳不得不防的。晋军实力并不弱，但和楚军相比，似乎还处在劣势，至少在人数上如此。

史料中并没有提到楚军杀到城濮的有多少人，但成得臣率领的这支楚军，实际上是当初熊惲率诸侯围宋的原班人马，楚军加上陈、蔡等国的军队，人数当在十万左右，几乎是晋军的一倍。

成得臣的大腿比姬重耳的腰还粗，自恃兵多，所以成得臣根本不把姬重耳的五万晋军放在眼里。“今日必无晋矣！”因为熊惲不发兵增援，成得臣憋着一口窝囊气，如果能歼灭姬重耳，也算给自己补回面子。成得臣有两大弱点，一是过于自信，二是太爱面子，这也是他一步步被姬重耳牵着鼻子满世界乱窜，最后一头栽进坑里的重要原因。

楚军的布阵非常简单，成得臣将中军居其间，陈、蔡两军归编楚右军，由斗宜申（子西）为将；另有楚左军，以斗勃（子上）为将，三军旌旗十万，足壮成得臣之胆。春秋时的战争布阵一般是强对强、弱对弱，楚军最弱的是陈蔡混杂的右军，与之相对的是晋下军，副将胥臣领衔。

晋侯姬重耳身边有五大贤臣，一般观点认为这五人是赵衰、狐偃、介子推、魏犢和胥臣（有时也以贾佗取代胥臣），其中胥臣的星光最为黯淡，远不如前四位。在城濮之战前，胥臣唯一的亮相就是在秦国劝姬重耳娶晋怀公姬圉的夫人怀嬴。

此次城濮会战，本来也没有胥臣的出场安排，是因为晋原中军主将郤穀在战前突然病故，姬重耳调原下军军副先轸入主中军，空出来的下军军副就临时拉来胥臣充任。

姬重耳时代的晋国大腕如云，星光灿烂，没有人对星味不足的胥臣能在城濮之中发挥重大作用抱有太大的希望。但老话常说，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胥臣抓住了人生中唯一一根粗大的稻草，在城濮之战中一炮打红，让历史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成语——蒙马虎皮，就是给战马套上虎皮，假扮成老虎去吓唬斗志薄弱的敌军（战马），这个奇怪战术的发明者，就是胥臣。众所周知，马是最怕老虎的，当看到对方阵中清一色的老虎战车，仗还没打，马腿下面就已经尿流成河了。

对胥臣有利的是，他所面对的楚右军整体战斗力在楚三军中最弱，而且楚、陈、蔡之地很少见到老虎，对传说中青面獠牙的老虎有天生的敬畏。当蒙着虎皮的晋下军战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朝着楚右军扑来时，楚右军的弟兄们以及战马们已经吓傻了，几百头老虎……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右师溃。”一千五百多年后，北宋名将狄青在昆仑关大战侬智高时，就借鉴了胥臣的做法，蒙马兽皮，一战击溃侬智高。

从战略上讲，楚右师的存在对这场争霸战的影响并不大，但从战术上来说，楚右师的崩盘，彻底打乱了成得臣的战前部署。按成得臣的想法，以楚中对晋中，以楚上对晋上，以楚下对晋下。现在右师被晋军打散，等于将以成得臣为中心的楚中军直接暴露在晋三军面前。成得臣不能再安坐泰山，坐等晋军来攻了，他必须主动出击，打掉晋下军，避免被晋三军围而后歼。

对于成得臣的反应，晋军高层似乎早有预料，在楚右师溃败之

后，晋上军主将狐毛和下军主将栾枝联袂上演了一场诱敌深入的好戏。狐毛打着中军的旗帜，让成得臣误以为晋军主力已无恋战之心。栾枝把事先砍下的木柴拴在战车上，拖在车后满街跑，扬起尘土。一方面引楚中军咬钩，一方面模糊楚中军的视线，以便晋军其他部队乘烟尘四起之际围歼楚军。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安排，除了狐毛和栾枝引敌深入，中军新任主将先轸和军副郤臻率晋军的精锐部队埋伏在半路上，只等楚人一过，漫山遍野杀将出来……

不知道是否是《左传》记载有误，胥臣在蒙马虎皮击溃楚右军之后，应该是乘胜进击，而不是佯败后撤。如果晋军想诱楚军深入，应该是佯败于楚右军，又何必把楚右军打散？最离奇的是，以成得臣这样久经疆场的老将，居然也没有看出来晋军近乎弱智的诱敌计，果然步步紧追了上来。

当初晋人轻易地把楚军主力从商丘调往北上城濮，长途奔袭二百里，导致楚军非常无谓地消耗大量体能，成得臣依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现在晋人打溃了楚右军后就仓皇逃窜，根本不符合战争逻辑，成得臣却只想生擒姬重耳为自己正名。

楚国名臣孙叔敖的父亲^芈贾就曾经告诉楚前任令尹斗谷於菟（子文）：“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军，给他三百乘战车，则楚必败。”成得臣为人不谓不忠，但性格过于暴烈，不适合担任最高军事统帅，楚王熊恽出于维护权力平衡，以及不激怒斗氏家族的考虑，没有及时换掉成得臣，最终酿成大祸。

等到楚军发现中了晋军的埋伏后，成得臣再想从坑里爬出来，已经来不及了。晋军把最精锐的公族子弟兵团埋伏在路上，就是专门用来招待成得臣的楚中军。

“先轸、郤臻以中军公族横击之。”从这句记载来看，晋中军并没

有形成一个呈半圆形的口袋阵势，而是摆下了一字长蛇阵，从腰间截断了楚中军的前后联系，企图一举歼灭成得臣所部。

值得成得臣庆幸的是，他率领的楚中军是楚军的精锐王牌部队。楚中军的班底是之前熊惲围宋的精锐之师，再加上东宫直属甲兵，以及成得臣的私家劲卒六百人，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战斗力极为凶悍。晋军的最精锐部队采用了偷袭方式，也没有拿下楚中军，从史料记载上可以看得出，楚中军只是受到了一些袭扰，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斗宜申率领的楚左师就没有成得臣那么幸运了，楚左师应该是楚国的二线部队，抗击打能力自然不如楚中军。在追赶晋军的过程中，没想到二狐领衔的晋上军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将毫无准备的楚左师冲得七零八落，“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

楚左军的崩溃，导致成得臣率领的楚中军无援可倚，晋三军打的伏击战，体力消耗远小于楚三军，晋下军甚至都没有与楚右军短兵相接，用蒙马虎皮就吓跑了楚右师。晋三军合围楚中军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楚中军再是英雄了得，也难架破鼓万人捶。

眼前的形势很清楚，再打下去，楚国最精锐的楚中军极有可能被晋军全歼，纵使成得臣以身殉国，也丝毫不会有益于他在江湖上的英雄之名。与其如此，不如见机而收，把损失减到最低程度。

成得臣在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惨败的最后一刻，才表现出一位军事统帅应有的沉着。在晋军凌厉的攻击下，成得臣依然能够有条不紊地收拢左师败下来的残卒，补做中军外围，保护中军主力从容撤出晋人的埋伏圈，缓缓南撤回楚。

城濮之战，姬重耳笑到了最后。

如果从战争的惨烈程度上来看，此战并不算过于血腥，远比血流

成河的柏举之战小得多，但城濮之战最大的意义并不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和外交上。城濮之战宣告了一个属于楚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属于晋时代的开始，这才是战场赢家姬重耳在政治上最大的收获。

在城濮之战前，楚国北上扩张的势头极为明显，深处中原腹地的曹、鲁、卫、郑都成了楚国的马仔，严重威胁到了中原主流文明圈的生存。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取得完胜，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楚国元气大伤，再无余力北上，中原投楚的诸侯国转而臣服于属于中原文明圈的晋国。

最大的一棵墙头草就是郑国，此次大战，郑国把自己的所有部队都交给楚人指挥，编入楚左师，结果被二狐吃了个精光。手上已经没有牌面可打的郑文公姬捷只好低三下四地向曾经被自己调戏过的姬重耳求饶，请求和晋结盟。郑国地处天下要津，国力中等，郑国对各大的态度是大国称霸的政治风向标，郑国投晋，标志着姬重耳霸业的彻底完成。

毫无疑问，城濮之战最大的赢家就是姬重耳，无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军事角度自不必说，楚军已经被打残，短时期内难以恢复争霸。

从政治角度看，在晋国国内，姬重耳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晋国内部再无人敢掣重耳之纆；在中原文明圈内，晋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原先附楚的曹、鲁、卫、郑都拜在姬重耳膝下。

不过，要想成为名正言顺的霸主，还有一道手续要办，就是必须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否则就是野霸王。姬重耳自然知道其中轻重，五月十日，姬重耳把在城濮之战中俘获的楚军俘虏千人，带甲的战马百乘献给周襄王姬郑，在周天子的面子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姬重耳给足了姬郑面子。

政治买卖，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姬重耳需要一张由周天子亲自

盖章的称霸文书，吃人嘴短，姬郑自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两天后，姬郑以周天子的身份号令天下，策命晋侯姬重耳为侯伯，也就是天下的诸侯长。同时，天子赐晋侯大辂之服、戎辂之服，赤色弓一只、赤色箭百枝，黑色箭千支（象征晋侯可以代天子讨伐不臣），并虎贲甲士三百人。

最让姬重耳有面子的是，周天子按宗室辈分，当着天下人的面，叫了姬重耳一声叔父，“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即位之后，姬重耳在江湖上的名望还不算很高，所以行事说话都比较谨慎。自城濮大胜后，姬重耳的自信心迅速膨胀，特别是天子承认他是天下霸主之后。

这一年的冬天，狂妄自大的姬重耳竟然以诸侯的身份，召周天子参加由晋国主持的温（今河南温县）的诸侯盟会。姬郑当然知道这于礼不合，甚至连孔夫子知道这件事情后都指责姬重耳“以臣召臣，不可以训”，但现在姬重耳的拳头硬，姬郑不敢得罪这个叔父，只能低三下四地去给叔父撑脸面，不过至少还能捞点车马费。

姬重耳确实很狂妄，但他有资格这么做，在任何时代，枪杆子都是老大。

二三 秦穆公：拉开统 一大幕第一人

说到秦国，人们首先会想到“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实际上秦能灭六国统一，功劳并不是嬴政一个人的。如果往前推算，秦昭襄王嬴稷、秦惠王嬴驷、秦孝公嬴渠梁都为秦国后来的统一夯实了基础，但如果没有秦穆公嬴任好在春秋中期的奋发图强，将秦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几个档次，秦国最多也就像燕国那样打酱油，而嬴任好就是嬴政的第十九代祖宗。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由兄弟三人连续继承王位的奇观，一次是十六国时期的南凉，秃发乌孤传位弟利鹿孤，利鹿孤再传弟傉檀。一次就是秦德公传位儿子秦宣公，秦宣公传弟秦成公，秦成公传弟秦穆公嬴任好。而有史所载的秦国君主名字也是从嬴任好开始的。

嬴任好和秃发傉檀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他们都是三兄弟中的老幺，能力都非常出众，在位时间在兄弟中最长，而且地盘都地处陕甘交界处。秃发傉檀是十六国时期不可多见的明君胚子，可惜生逢多难，一朝被袭，便成千古遗恨。

南凉亡国之所以如此迅速，关键在于周边政权太多，强枭辈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相比之下，嬴任好情况略好一些，周分封诸国八百，而在潼关以西立国的，只有秦国。即使再算上西边的犬戎，对秦国也构不成战略性威胁，毕竟这已经不是当年马踏镐京时的犬戎了。

从地理位置来看，秦国与燕国极为相似，都处在中原文明区的边陲，属于“半夏半夷”，生存条件相对优越。燕国从周武王时就立国于

此，但七百年来燕国始终默默无闻，直到燕昭王横空出世。按老子的话讲，就是“小国寡民”，自得其乐。

在春秋前期，秦国在诸侯国中并不显山露水，实力也不过二流，远不如齐、晋等大国。如果嬴任好向燕国那样“无为而治”，过自己的小日子，未必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问题是嬴任好不甘心做一个土财主，往远了说，他想做晋献公姬诡诸第二，往近了说，他想做齐桓公第二。

说来很有意思，最公认的春秋五霸，即齐桓、晋文、宋襄、楚庄，再加上嬴任好几乎都生在同一时期，齐桓公姜小白略早，而庄王熊侣略晚。而在嬴任好于公元前659年即位时，东方霸主齐桓公已经在位二十七年了，也就是说，自嬴任好懂事开始，他就一直生活在姜小白传说的阴影之中。

特别是在嬴任好即位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56年，姜小白在召陵逼得楚国承认了齐国的诸侯首长地位，姜小白风风光光地接受诸侯伏拜，这对嬴任好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姜某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就做不到？

嬴任好的争霸事业在悄无声息中展开，此时的秦国就像是一个刚开张不久的乡镇企业，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要人才没人才。照这样发展下去，也只能打开低端市场，是不可能与专走高端市场的齐国大公司相抗衡的。

嬴任好的家底子薄，要想尽快把公司规模做大做强，引进人才是当务之急。市场竞争，说到底，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包括高新技术开发，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高端人才。和任何一个乱世的人才流通比较自由一样，春秋各国的人才流动性也比较大，比如著名的“楚材晋用”，再比如吴国的文相武将伍子胥和孙武，都是从楚国流过来的。

说到嬴任好用人，就不能不提秦朝一代雄相李斯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战国后期，各国人才云拥至秦，引发了秦国高层对外国间谍的担心，所以地方保护主义大滥其觞。当时还一文不名的李斯为此上书反对，在《谏逐客书》的开篇，李斯就提到了秦穆公吸纳外国高端人才的开放政策。

李斯提到了五个被嬴任好重用的外国人才，即戎人由余，虞人百里奚，宋人蹇叔，晋人丕豹、公孙支，“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为什么秦国始终处在世界食物链的最顶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开放的人才吸纳机制。嬴任好最终能成就一方霸业，没有这些高端人才是不可想象的。

嬴任好时代的秦国和嬴政时的秦国情况不大一样，在嬴政之前，秦国就在执行人才开放政策。比如秦昭襄王的两大名相，范雎是魏人，蔡泽是燕人。所以在当时的秦国上层看来，外国人才在秦国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不需要再继续引进外人。而春秋前期，秦国经济落后，地居偏西，高端人才非常少，嬴任好要充实自己的人才库，就只能挖别人的墙脚。

在嬴任好引进的五大高端人才中，百里奚是最著名的，就是脍炙人口的“五张羊皮”的典故。和其他“身在庐山人未识”的人才相比，百里奚早在N年前就已经成名在外，是虞国的名大夫。

在著名的“假途伐虢”事件中，晋献公用一匹马就骗了贪财的虞公，灭虢之后就顺手把虞国给灭了。因为姬诡诸的女儿嫁给了嬴任好，姬诡诸就把虞公和大夫井伯赏给了嬴任好的老婆秦穆姬当奴隶。本来百里奚也在黑名单上，但百里奚运气好，半路逃出生天，来到楚国隐居，没想到又被楚人活捉了。

对虞公这等饭桶来说，被送到秦国等于下了地狱，但对百里奚来说，这里才是他的天堂。嬴任好早就想得到这位贤臣，甚至姬诡诸送

虞国君臣入秦，也极有可能是嬴任好亲自下的订单，只是百里奚突然溜掉，对嬴任好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嬴任好听说百里奚落在楚人手上时，他毫不犹豫地给楚人开出了大价钱——五张上等羊皮，要求楚人把百里奚还给秦国，理由是百里奚本就是秦国的奴隶。楚国要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没什么用处，不如五张羊皮更实在，楚国当然愿意做这笔买卖。

百里奚对嬴任好并不了解，所以拒绝和秦国合作，嬴任好的脾气非常好，说他“厚德载物”可不是吹捧。换成其他人，你一个下等奴隶敢如此不识抬举，早就一刀砍翻了。嬴任好苦苦追求百里奚，就是看中了他的贤德干才，为了得贤不惜自降身段，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更能体现嬴任好人性化的一点是，嬴任好特别告诉百里奚，虞国之亡，是虞公贪财，非你之罪，彻底卸下了百里奚心中的沉重包袱。如果不把虞国之亡和百里奚切割出来，百里奚即使为秦效力，他在人格上也低嬴任好一头，毕竟他是亡国罪臣。百里奚被嬴任好的真诚所打动，心悦诚服地拜倒在殿下，做了秦国的首席内阁大臣，“授之国政”。

人才库储备建设其实就像是滚雪球，引来了第一只金凤凰，就会有第二只、第三只金凤凰飞到梧桐树上，蹇叔就是因为百里奚的极力推荐，被嬴任好用重金迎请来的，并拜为上大夫，参与军国大事。

五大名臣聚集在秦国的大旗下，给嬴任好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智力支持，这是秦国最大的非物质性财富，其重要性，和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分量是一样的。

和刘备天生的强枭性格不同，嬴任好的心存厚道是与生俱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仁君，而不像刘备的“仁君”头衔多半是表演出来的。如果秦始皇要给第十九世祖上一个庙号的话，“秦仁宗”是嬴任好受之

无愧的。

春秋时有一位著名的“仁君”，就是宋襄公子兹甫，但宋襄公的“仁”虽说不是装出来的，但过于迂腐，不能把“仁”与“势”结合起来，徒有仁名而不知用势，结果成为历史笑柄。

关于嬴任好的胸怀大度，《说苑·复恩》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小故事，嬴任好曾经丢过一匹他钟爱的上等好马，就亲自率人四处寻找，结果在岐山北面发现有一群野人已经把自己的马杀了，正在架锅烧柴煮马肉。

这些人这才知道他们杀掉了国君的马，吓得脸都紫了，叩头求饶。如果有人吃了卫懿公的鹤将军，卫懿公一定不会放过他，但嬴任好做人没那么刻薄，吃了就吃了吧，一匹马而已。

看到这些人干吃马肉不喝酒，说了句：“常听老人言，吃马肉不喝酒会死掉的，我有好酒，汝等与我共饮。”嬴任好很大方地坐在地上，与三百野人共啖马肉饮酒，毫无国君的臭架子，嬴任好的大度让这些吃马肉的馋鬼羞愧不已。

三年后（《吕氏春秋》说是一年后），嬴任好和晋惠公姬夷吾撕破脸皮，在韩原大打出手，秦军不利，嬴任好的战车被晋军重重包围。而三年前吃马肉的三百名馋鬼正好看到了这一幕，为了抱嬴任好大度不杀之恩，馋鬼们拼命从万军阵中捞出了嬴任好，并帮助秦军生擒姬夷吾，为秦国取得在政治上对晋国的绝对优势立下不世奇功。

嬴任好不杀吃马者而受人报恩，应该对楚庄王熊侣不杀调戏姬妾的将军产生了有益的启发，如果楚庄王杀了绝缨之人，危难时刻还有谁来救他出万重之围？底层多奇士，不要因为小事而大开杀戒，放人一条生路，也就是多给自己打开一扇逃生之门。

《吕氏春秋》对嬴任好的大度恕人大为赞赏，“行德爱人则民亲

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历史上赦人之罪而受人报恩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要小看社会底层人士的力量，在关键时刻，这些被士大夫所轻视的“小人”往往能做出让这些“君子”汗颜的丰功伟绩。

但就当时来说，嬴任好显然不会预见到将来他会有这一劫，所以他赦免吃他马的那些人是发自内心的宽厚，并非是有意显示宽大邀买人心。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更能说明这一点，晋惠公姬夷吾在晋国内乱时逃到秦国避难，还是在嬴任好的帮助下，姬夷吾才能回到晋国即位。在秦国避难时，姬夷吾和嬴任好做了一笔交易，等他回晋后就割让河西八城。

没想到姬夷吾刚回到晋国就翻脸不认人，还派大臣丕郑来到秦国胡搅蛮缠，拒不认账。做人如此不讲规矩，嬴任好有一万个理由记得姬夷吾的忘恩负义，但不久后，晋国发生大饥荒，嬴任好本应该稳坐黄鹤楼看翻船，笑看姬夷吾饿肚子。嬴任好不忍心晋国百姓受饥荒之苦，他说了句足以感动历史的名言：“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姬夷吾不是东西，但晋国遭的天谴不应由老百姓埋单。

可以肯定的是，嬴任好不是在演戏，他不需要这么做。如果嬴任好真是个铁血冰冷的人，他完全可以趁此机会，大举进攻晋国，灭掉姬夷吾后再收买人心更有现实意义。

面对做人没有底线的姬夷吾，嬴任好一让再让，除了他本性善良之外，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姬夷吾的姐姐秦穆姬从中游说。在原地之战，嬴任好生擒姬夷吾之后，准备杀之以祭上天，周天子和秦穆姬纷纷向嬴任好求情，放姬夷吾一条生路。

给不给周王的薄面，全看嬴任好的心情，但嬴任好受不了的是秦穆姬的眼泪。要想打败重感情的好男人，女人的眼泪是最好的武器，英雄皆怕柔情剑，就是这个道理。

秦穆姬可怜兮兮地跪在丈夫面前，哭求嬴任好法外开恩，让嬴任

好也跟着动了情，说了句：“夫人是忧。”姬夷吾做人太过无耻，幸亏他遇到的嬴任好是个好人脾气，换成勾践，十个姬夷吾脑袋也掉了，勾践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

嬴任好为人贤德好施，也是有人证的，就是楚成王熊恽。此时的姬重耳正流浪在楚国，享受着诸侯的待遇，吃香的喝辣的，却突然收到了嬴任好的来信，请姬重耳到秦国小住数月，交交朋友。姬重耳知道秦晋关系因为姬夷吾的胡折腾搞得不可收拾，似乎有些不愿意去，还是熊恽替嬴任好解了围，说嬴任好“秦君贤”，这才劝姬重耳上了路。

嬴任好在江湖上赢得贤名，是对他乐善好施的肯定，和美名在外的郢城宋押司有得一拼。还别说，还真有人把嬴任好比成江湖上的及时雨，这又是一个牛人，就是姬重耳本人。

虽然嬴任好请姬重耳入秦是出于秦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嬴任好对姬重耳的厚道让人挑不出半根刺来，比无礼的郑文公、曹共公之流高了几个档次。

因为晋惠公姬夷吾的儿子姬圉突然从秦国逃回晋国，秦国失去了可以对晋国施加重大影响的人质。为了保持对晋国的影响，嬴任好想到了流浪在外的姬重耳，在姬圉即位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嬴任好决定把宝压在姬重耳身上。

嬴任好出手非常大方，姬重耳刚到秦国，嬴任好就送了五名秦国美女给姬重耳当小老婆，甚至包括当初嬴任好送给姬圉的那位秦女。这不仅是嬴任好对姬重耳的器重，也是对姬圉的鄙视，有意羞辱姬圉。其实这也不能怪嬴任好玩腹黑，嬴任好对姬夷吾父子已经是恩重如山了，可这对活宝父子专干忘恩负义的丑事，实在太不地道。

在欢迎姬重耳的宴会上，嬴任好的心情非常好，“大欢”，估计和猴子一样上蹿下跳。在与姬重耳喝了交杯酒，嬴任好承诺要帮助姬

重耳回国继位，将姬圉扔进公共厕所里。

姬重耳和赵衰等人对嬴任好的大度，激动得连连下拜，说秦伯真乃当今的及时雨宋大哥，“如百谷之望时雨”。近两千年后，施耐庵和罗贯中合撰《水浒传》，一号男角宋江的身上，应该就有一些嬴任好的影子。宋江的绰号“及时雨”，可能就是直接抄用嬴任好的“望时雨”。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嬴任好的果断相助，姬重耳有可能永远回不了晋国，更无可能开创什么晋文霸业。嬴任好确实选对了人，姬重耳的回晋继位，是秦晋两国真正政治蜜月的开始。

送姬重耳入晋继位，是嬴任好人生中做得最为划算的一笔买卖，不但江湖名望急升，而且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战略利益。在嬴任好的称霸计划中，晋国始终是秦国绕不过去的坎，摆不平晋国，嬴任好只能大槐树国里称霸了。当时晋的实力强于秦，如果秦晋始终交恶，将严重影响秦国对中原主流文明区获取战略利益。

姬重耳为了表示对嬴任好的感谢，把嬴任好送给他的五名秦女悉数封为夫人，给足了嬴任好面子。更能体现秦国在晋国拥有特殊地位的是，晋国特别允许秦国派出三千名精锐“维和士兵”在晋国驻扎，一旦晋国再出现反对姬重耳的势力，三千虎狼秦军会立刻上前扑杀。

毋庸讳言，秦晋两国已经穿上了一条裤子，关系好得不得了，而且秦晋之间是签过正式盟约的，就是公元前636年二月，由狐偃出面，与秦国在郇地（今山西临猗南）签订的郇之盟。

姬重耳继位后的第二年（前635）二月，在赵衰的建议下，姬重耳抢在嬴任好的前面，平定了东周王室的王子带之乱，把周襄王安全护送回雒邑，并得到了周襄王的特别款待，并赐给晋国大片土地的统治权，一时间，姬重耳风光无限。

从表面上看，赵衰很敏锐地意识到尊王在政治上的极端重要性，问题是在此之前，秦军就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就等嬴任好一声令下，过河勤王。但秦军莫名其妙地在晋人的劝说下按兵不动，坐看晋人过河去捞大头，难道嬴任好的脑袋被驴踢了？

以嬴任好的国际战略分析能力，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勤王的政治好处？而晋国是与秦国同时得到周王室发生内乱的消息，何况姬重耳刚即位，国内一大摊子鸡毛事情，肯定不如嬴任好轻舟好扬帆。嬴任好的动作为什么还会落在姬重耳的后面？除了嬴任好有意让姬重耳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树立威信外，不太可能有更合理的解释。

嬴任好放弃勤王这块肥肉，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晋国虽然历经动乱，但整体实力要强于秦国，从某种程度上讲，晋可以无秦，但秦不可以无晋。

在秦国的东南方向，楚国已经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崛起，对秦国已经构成了战略威胁。如果嬴任好抢先一步勤王，嬴任好固然可以出尽风头，但问题是枪打露头鸟，楚国的战略尖刀很可能就会对准秦国。

在这种情况下，嬴任好把绝佳的出镜机会让给姬重耳，有两个好处：

一、姬重耳新即位，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威望，勤王可以让姬重耳很快地树立威信，对巩固秦国这个铁杆盟友在晋国的统治非常有利。

二、晋国大出风头，成为中原主流文明国家的准盟主，成为众矢之的。楚国就会把晋国当成楚国北上称霸最大的战略敌人，从而使秦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晋楚争霸，秦国作为两国最大的邻国，将成为晋楚两国竞相争取的超大砝码，嬴任好两边通吃，反而有利于秦国的战略生存。毕竟以秦国相对薄弱的国力，是根本不可能单独承受楚国的超强攻击的。

秦晋同盟是绝对不能出现问题的，对嬴任好来说，他必须做到“有秦必有晋，有晋必有秦”。其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了减轻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与中国组成松散的政治同盟一样。

在公元前635年的秋天，嬴任好就伙同姬重耳，两国联军进攻位于秦楚之间的楚国仆从国郤国（今河南淅川附近）。这场战役以秦国大胜而结束，不但郤国国都商密开门投降秦国，楚国的地方长官斗克和屈御寇也被秦军俘虏。姬重耳同样出兵南下，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应该是姬重耳利用此次机会对嬴任好报恩。

不排除嬴任好和姬重耳之间有钩心斗角的举动，但他们首先代表的是各自的国家利益，为了对抗超级大国楚国，秦晋协同合作，救晋就是救秦，救秦就是救晋。在春秋时代最著名的战略性大决战——城濮之战中，嬴任好就派出儿子小子慙率兵来到城濮，配合晋军的正面作战。

秦国与晋国结盟的九年时间里，是秦国战略生存空间最为舒适的九年，虽然秦国对外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但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嬴任好有充足的时间与空间积蓄国力。

不过嬴任好最大的战略短板是他的思维似乎有些跟不上形势的急躁变化，公元前628年，在位仅九年的晋文公姬重耳去世，性格强硬的晋襄公姬欢即位，而嬴任好依然沉浸在与姬重耳友好合作的迷梦中不能自拔。姬重耳对嬴任好感恩戴德，但姬欢对嬴任好并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姬欢急于在国内外立威，他不想活在嬴任好的阴影之中。

关于秦晋反目成仇，最典型的一次事件就是发生在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是役，秦军被晋军打得鼻青脸肿，秦军三大将孟明视（百里奚之子）、西乞术和白乙丙（皆蹇叔之子）被生擒活捉，秦军被全歼，一个也没逃出来，嬴任好在江湖上丢尽了脸面。

如果追究此战的责任，嬴任好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最大的问题就

在于嬴任好轻视姬欢，以为不过是个黄口小儿，就像五代十国的北汉皇帝刘崇轻视新即位的后周皇帝柴荣，结果在高平被打爆头。

事件的起因是嬴任好想趁晋文公去世之际，独吞郑国，在当年出重兵准备奇袭郑国。对于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百里奚和蹇叔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千里袭人，罕有得利者。

嬴任好急于灭郑，应该是对姬欢即位后的晋国外交政策不太放心，但嬴任好最大的失招还是他不应该在灭郑失败后顺手牵羊般地灭掉了晋国的属国滑国。这极大地激怒了姬欢，因为晋文公刚死没多久，棺材还没下地，嬴任好就突然来这一手，自然会被姬欢认为这是对他的冒犯。姬允急于在国内立威，而且来自晋国统治层的压力也迫使姬欢不得不对嬴任好展示强硬手段。

这场殽之战，是嬴任好自出道江湖后遭到的最大一次惨败，这也几乎终结了秦国向东发展的势头，有晋国在，嬴任好在东线已经没有扩张地盘的机会。

嬴任好身上有许多让人欣赏的优点，其中一个优点就是他知错能改，而且很大度地把殽之战败的责任都全揽到自己头上，并通过外交手段把孟明视等大将从晋国捞了回来，真诚地向他们道歉，并官复原职，在最大限度上挽回了嬴任好因为殽之战而在秦国国内有些下跌的人望。

嬴任好的军事能力，不客气地讲，在春秋时代只能算是中等，比刘备好不了多少，但他最擅长的却是在军队中搞思想政治工作。公元前624年，吃了三年苦胆的嬴任好率兵伐晋，以破釜沉舟之势杀入晋国腹地，将晋军打得落花流水，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不过最精彩的桥段还是在战胜后，嬴任好在殽山的旧战场为殽之战的秦军将士发丧招魂，并穿上丧服，痛哭三日。

可以说嬴任好这是在作秀，但至少他对秦军将士发表的公开检讨

是出自真诚的，赢任好泪流满面地站在将士们面前，对自己当初不听百里奚和蹇叔的良言导致穀之败表示非常后悔，以后要听人言吃饱饭，并立誓为证，有再犯者，天人不佑。

赢任好的自贬，不禁让人想到了一代雄主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以刘彻的强枭性格，能在晚年反思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有些帝王也假模假样地下诏罪己，但尽说些不疼不痒的屁话，逢场做戏而已，赢任好和刘彻都是发自肺腑地对自己进行反思，他们所考虑的不是所谓维护皇权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让天下公众监督自己，避免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

赢任好待人真诚，不掺杂私货，他的表态让士大夫们非常感动，“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更不用说心地纯真如明月的三军将士了。当然，赢任好知道此次认错，会在江湖上增加对他的印象分，有利于巩固统治，但不能说他是在表演。

孟明视是秦国的超大号重臣，以孟明视的能力，放在晋、楚等国都能找个铁饭碗。但赢任好不惜血本把孟明视从晋国救回来的举动，彻底征服了孟明视。

赢任好对高端人才爱护有加，不像《三国演义》中的刘皇叔摔孩子那么虚情假意，这是他用人的一贯思路。在孟明视回国后，秦国舆论都要求赢任好杀掉穀之败的头号罪人孟明视，赢任好主动揽过：“是孤之罪也！”为君如此，怎能不让人倾心竭力以死效忠？

如何才能用好人才？做好两点就可以了，一是给予人才充分的施展空间，不要疑人还用；二是勇于担当，替下属揽过。正如《左传·文公三年》称赞赢任好的那样：“赢任好用人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孟明视之所以尽忠于赢任好，是因为赢任好能反思自己的错误。”

三国大博弈的历史证明，在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刘备之所以能鼎

足三分天下，靠的就是“人和”，最大限度地巩固国内执政基础，这也是蜀汉能屹立五十年不倒的重要原因。

在春秋中前期，晋、楚、秦小三角格局中，晋类似曹操得天时，楚类似孙权得地利，秦类似刘备得人和。嬴任好深知这一点，秦国力偏弱，如果内部再乱七八糟，那干脆就别玩了。

秦国的发展战略和蜀汉非常相似，曹操得中原，孙权得江东，刘备只能朝西南方向发展，得南中，遂霸一方。嬴任好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向东有晋，向南有楚，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战略突破，嬴任好只能向西发展。

本篇开头讲过，秦国的西线只有犬戎等部落，由于还没有形成国家化，整体实力不如秦，所以嬴任好避开晋、楚之锋，主攻犬戎的战略是正确得当的。史称：“三十七年（前623），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

在灭戎之前，秦国的军事实力偏弱，这可能和秦人的农耕习惯有关系。但自灭戎之后，秦军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因为犬戎部落民风剽悍，作战勇猛，是冷兵器时代非常受欢迎的兵源之一。一百年后，吴国灭楚，楚臣申包胥哭求秦国出兵复楚，如果秦军没有融入犬戎兵的强悍作风，是很难想象能把当时最为剽悍的吴人打退的。

对于秦国由弱小变强大，史家多归功于秦惠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伐蜀，使秦国一跃成为一线强国，实际上嬴任好的“霸西戎”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只不过不为后世所重视。

秦国的统一之路，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由后往前说，分别是秦昭襄王百战削赵、魏，秦惠王用商鞅变法、伐蜀扩地，秦穆公向西辟地千里。从这层意义上讲，秦穆公才是秦国拉开统一大幕的第一人。

虽然嬴任好在公元前621年去世时，按照旧制杀了一百五十七人

陪葬，特别是三位贤臣奄息、仲行、鍼虎的殉葬，受到了历史的集中炮轰，当时人就作诗讽刺，就是《诗经·黄鸟》。

不过按西汉人匡衡的说法，这么多人给嬴任好殉葬是他们自愿的，“秦穆公贵信，而士多从死”。一般奴隶主挂掉后会杀奴隶陪葬，但匡衡所说的“士”显然不是指没有独立人格的奴隶，而是春秋时的士阶层。

再者，奄息等三人殉葬是因为他们在和嬴任好喝酒时，嬴任好说了句“生共此乐，死共此哀”，所以奄息等人许诺等公死后殉葬，并非强迫。清人赵翼评价这件事时说：“（三人）皆从死，则是出于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矣。”

退一万步讲，即使给嬴任好陪葬的是被强迫的奴隶，也不能一味炮轰嬴任好残忍好杀。杀奴隶殉葬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家都这么玩，最多是五十步笑百步，谁也不干净。

二四 一鸣惊人楚庄王

说春秋必论五霸，齐桓、晋文、宋襄、秦穆都讲过了，接下来讲讲最后一个霸主楚庄王熊侣。

由于“春秋五霸”的说法流行甚广，所以熊侣的历史知名度在春秋时也算是一线，比小霸郑庄公高了不止一个身位。实际上，后人对熊侣的了解，多半是通过几个脍炙人口的成语，而说到与熊侣有关的成语，个个都能震死牛，如下：

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二、灭烛绝纒

三、问鼎中原

单从数量上讲，熊侣的三个成语不算多，西汉战神韩信就拥有著名成语十几个，但巧合的是，熊侣仅有的三个成语，却能很巧妙地将熊侣波澜壮阔的争霸事业串联起来。

细分熊侣的精彩人生，确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夹着尾巴做人，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二个阶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即“灭烛绝纒”。第三个阶段——北上争霸，即“问鼎中原”。

辉煌的人生三部曲，熊侣一气呵成，如果以公元前597年，楚军北上围郑败晋为问鼎标准，熊侣只用了区区十七年，而一代霸主晋文公仅在国外流浪就用了十九年。

当然，有一点要首先说明，作为游离于中原主流文明区域之外的楚国争霸中原，实际上是不能从熊侣开始算起的，而是从熊侣的祖父

楚成王熊恽算起。春秋史上第一名战城濮之战，就是熊恽和姬重耳共同完成的梦幻大剧。

城濮之战的失败，从战略上讲暂时挫败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图谋，而且也影响了熊恽在国内的威信。熊侣的父亲熊商臣第一个不服老子，发动了宫廷政变，逼死了老爸熊恽，自称楚大王。

熊商臣“蜂目豺声，忍人也”，敢杀自己亲爹的，是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狂妄枭雄。熊商臣在位十二年，继承了成王的对外扩张政策，到处拎刀砍人，连灭江国（今河南罗山北）、六国（今安徽六安）、蓼国（今河南固始北），把楚国的北线防御体系继续向北推进，为日后熊侣的北上争霸创造了有利条件。

熊商臣经营十二年，给熊侣留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家底，但同时也给熊侣制造了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解决楚王室和权臣得势之家的权力分配。

权臣与公室（王室）的权力之争是春秋政治史的一条主线，楚国也不例外。要说起楚国的第一政治家族，除了王室熊氏之外，非斗氏莫属。楚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职务——令尹，基本上被斗氏家族给承包了，外人不得染指。

说起来，斗氏和熊氏是同宗，还是近亲，他们都是楚开国之君熊绎的后人，自楚君若敖之后分支单过，楚成王熊恽就是若敖的玄孙，斗氏先祖斗伯比是若敖的孙子。从斗伯比开始，斗谷於菟（子文）、斗班（班固的始祖）、子班相继在楚国执掌大权。特别是著名贤相子文深得楚成王信任，在楚成王争霸中原的过程中立下了不世奇勋。

像斗氏这样的功勋大族，在为国家建功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集中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王室对权力的控制。在成王、穆王时期，王室对权力的控制相对强一些，极力主张在城濮与晋军决战的令尹子玉（即成得臣，斗伯比的儿子）在城濮惨败后，被

愤怒的成王诛杀，以正法纪。

相比于在位四十多的祖父熊恽，熊侣即位时年龄不会太大，和八岁即位的清康熙差不多。而巧合的是，康熙在位初期，朝政由鳌拜等四大臣把持，熊侣也面临着相似的朝局。帮助熊商臣发动政变夺位的老太师潘崇还在位，令尹子孔，以及公子燮、斗克也是四大臣辅政。

斗克和公子燮是楚国官场有名的问题人物，症状是太不安分，野心比西瓜还大。斗克当初被秦穆公嬴任好活捉，因为殽之战秦败于晋，嬴任好把斗克放回楚国，请斗克撮合秦楚联盟。这是很正常的外交联络方式，斗克竟然把传话当成自己的功劳，结果秦楚结盟，斗克没分到一个枣子，心怀不满。而公子燮因为想做令尹被拒绝，所以这两位大爷密谋叛乱。

在公元前613年的八月，潘崇和子孔准备对外用兵，斗克和公子燮在暗杀子孔失败的情况下，劫持“幼弱”的楚庄王熊侣从郢都出逃，准备逃往斗克的根据地商密另立朝廷。好在封在庐地的大夫戡黎和副佐叔麋用计诱杀了斗克和公子燮，成功将熊侣从魔爪下救了回来。

对熊侣威胁最大的斗克被杀，但熊侣丝毫感觉不到轻松。斗克的死，并不意味着斗氏家族在官场势力的削弱，子文、子扬（子文的儿子，也称斗般）、子良都还处在权力最高层，再加上“狼子野心”的子良之子斗越椒，史称“若敖之族，自子文以来，世为令尹”。

熊侣身边非虎即狼（子文曾经喝过虎乳），他无法控制最高权力。而对王室忠诚度相对较高的子孔又在平定斗克叛乱的当年去世，进一步增加了熊侣的危险。

汉宣帝刘询初即位时，头号权臣霍光的势力如日中天，史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刘询毫无权力。刘询要想在霍光的阴影下活过来，只能给霍光装孙子，等待时机翻盘。

熊侣现在面临的形势，和刘询如出一辙，熊侣为了自保，是断然不能向汉质帝刘缵那样，敢当众指责大将军梁冀“此跋扈将军”。熊侣能做的，就是装傻充愣，表现出对国事的不感兴趣，让斗氏家族相信自己是个胸无大志的平庸君主，以减轻斗氏家族对自己的担心。

精彩的故事演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时间里，熊侣是一副标准的昏君模样。对于军国大事，熊侣一概不问，由当朝执政去处理，熊大王每天只做一件事情，“日夜为乐”。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吃酒耍钱嫖女人，堪称五毒俱全。

当然，对权大势大的斗氏家族来说，他们是管不着楚王吃喝嫖赌抽的，随便你怎么玩。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楚王对权力的态度，还好熊侣交出了一份让他们满意的答卷，“三年不出号令”。

斗氏家族应该没有看出来熊侣是在演戏，但熊侣为了演技更逼真，随后又下了一道死命令：“谁敢对寡人的寻欢作乐说三道四，死无赦！”熊侣很厚黑地玩出这一招，不但骗过了斗氏家族，还把忠于王室的大臣们骗了个底朝天。

第一个被骗的是大夫伍举，后来一代传奇伍子胥的祖父。从这场剧情的结果来看，伍举对熊侣出演装傻大片事先是不知情的，但伍举的忠直，对演戏上瘾的熊侣来说是最理想的群众演员。伍举对熊侣的荒淫好乐极为不满，堂堂国君怎么像个江湖混子？不知就理的伍举进宫劝熊侣好歹给英明的祖先留一点颜面。

熊侣为了不使演技穿帮，还特意增加了剧情和道具，当伍举进殿时，熊侣正“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这边亲一下，那边摸一下，可谓风声雨声浪叫声，声声入耳。

因为熊侣事先有令，敢谏者死，所以伍举隐讳地讽刺荒淫的楚王，“臣在三年前发现山上有一只鸟，这只笨鸟即不去外面捉虫吃，也不像其他鸟儿一样鸣叫，敢问大王，这是一只什么鸟？”

伍举拐弯抹角地劝熊侣要迷途知返，此时的熊侣自然不能说自己在演戏，只能同样隐讳地回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著名成语“一鸣惊人”的原始出处。

三年的表演生涯想必让熊侣非常痛苦，但从形势上看，楚国政局应该是朝着有利于熊侣的方向发展，至少三年的隐忍期差不多已经过去了，所以熊侣才有底气告诉伍举：属于我的时代即将到来，老夫子再忍忍吧。伍举听出了熊侣的弦外之音，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熊侣的装傻充愣，除了迷惑权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熊侣通过下敢谏者杀的命令来考查群臣对自己的忠诚度。在如此政治高压之下还敢冒死进谏的一定是忠臣，所谓“国有诤臣不败其国”。

为了再发掘忠直之臣，熊侣的火越烧越大，过了几个月后，熊侣的“荒淫指数”急速上升，史称“淫益甚”，不定能玩出什么花来。楚王的荒淫激起了大夫苏从的强烈反感，他冒死上书，在熊侣“敢谏者斩”的威慑之下，苏从大义凛然地表示自己的立场：“用臣一条命来换大王的浪子回头，臣认为是值得。”这句话深深感动了熊侣，而且熊侣很欣赏自己的演技，果然又钓上了一条大鱼。

熊侣应该是到了亲政的年龄，正好顺水推舟，“罢淫乐，听政”。熊侣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肃吏治，其实就是清洗异己，重新构架由自己绝对掌握的朝局。在此之前，楚国朝廷中大略有几百名官员，但这些人要么不是自己的心腹，要么庸庸无为，必须拿掉这些人，换上自己的人马或有志于朝政清明之臣。

不过这几百名官员再不符合熊侣的要求，也罪不至死，贬官即可，但熊侣把这几百名官员悉数诛杀，另选几百名中意的官员充数。谁都不会想到一个只知道吃酒耍钱嫖女人的君主会如此腹黑手辣，其实站在熊侣的立场上，这很好理解，这就是以杀立威，从而警告官场上所有的异己者，特别是斗氏家族，有不从寡人者，皆从此例！

直到此时，熊侣认为自己已经不用再表演了，摘下“荒淫”的面具，以刚硬霸道的面目公示天下，以贤臣伍举、苏从为执政，正式拉开了楚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霸业大幕。等熊侣的反对者醒悟过来，已经晚了，熊侣已经将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

权力是每一个政治人物的生命，特别是对名义上拥有至尊地位的人来说，没有权力也就失去了人生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权力就是政治人物生命的那个1，其他的都是0，失去了1，即使后面有一万个0也是无用功。所以对于熊侣来说，无论他有多么远大的志向，首先必须把权力收回来。

熊侣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阶段的资源原始积累，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即上面讲的“灭烛绝纓”，也就是凝聚人心，树立自己的威信。在熊侣收回权力时，楚国上下对于熊侣杀庸吏进能吏一致叫好，“国人大悦”，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明嘉靖皇帝新即位时，天下也是普遍拥护，歛歛向治，认为可以收拾正德留下的烂摊子，结果呢？比正德时还不如！熊侣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人心，收壮士为己用，将对楚国国势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熊侣收拢人心，《说苑·复恩》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很好地说明熊侣在收拢人心方面做的积极有效的工作。有一次熊侣在宫中设宴招待文武百官，为了表示对大家的尊重，熊侣特意把自己的爱姬叫出来陪酒，大家在一起开怀畅饮，向同僚讲述各自在宦海沉浮的苦与乐。

因为是傍晚开宴，所以天很快就黑了，侍者自然要点燃蜡烛。不知道是不是殿上起了大风，把殿上的蜡烛全部吹灭，大殿顿时变成了黑风山，伸手不见五指。

还没等熊侣下令重新点亮蜡烛，漆黑一片的大殿上突然传来一阵小小的骚动，间以一位美女的轻声呵斥声。等熊侣反应过来，坐在他

身边的许姬已经怒不可遏地向她的男人揭发在座的一位将军对她非礼。

事情过程很简单，许姬身旁坐着一位将军，据称名叫唐狡。唐狡可能是仰慕许姬的姿色，但平时他根本不敢对王的女人有非分之想。现在大殿烛光熄灭，唐狡突然来了邪念，趁乱揩了许姬的油水。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许姬有把子力气，双方在缠斗中，许姬一把扯下了唐狡头盔上的缨子。这就是物证，许姬也说了，只要大王点燃蜡烛，看看谁的帽子上没有缨子，谁就是大流氓。

熊侣坐的位置应该距离许姬与唐狡不远，二人之间的缠斗，熊侣听声音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熊侣已经辨认出来此人是谁。男人最恨别的男人给自己戴绿帽子，何况是自己的下属，此时的熊侣有一万个理由将这个淫贼揪出来，拉出去枪毙十次都不够解恨的。

熊侣做出了一个让许姬惊讶得合不上嘴的决定——他要求所有与会官员都把自己冠上的缨子摘下来，说谁再戴帽子饮酒，就是对寡人的不尊重。大王发了话，群臣都按要求摘掉缨子。当最后一个人摘掉缨子后，熊侣下令重新点燃烛火，大殿上光明温暖，大家继续饮酒作乐。

唐狡心里很清楚，这是楚王有意给他解围，虽然他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激动得无以名状。以他犯的这条淫乱大罪，就算楚王当众不予追究，以后他还有什么脸面在官场上混？

而且更重要的是，此人还不是熊侣的心腹人马，最多算是二线。熊侣突然发神经似的来这么一手，说到底，还是在片场上飙戏，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许姬和熊侣在演双簧，许姬扮黑脸，熊侣扮红脸，由许姬把这个色鬼引出来，然后由熊侣当众展示自己的大度。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楚庄王大度容色鬼的真正目的是拉拢军方人

士，急需在军界扩大自己的威望，只要攥紧了枪杆子，天就塌不下来。所以许姬告发唐狡无礼时，熊侣首先揽过：“这场宴会是寡人安排的，醉后非礼也是寡人的过错。”特别是熊侣后边紧跟了一句：“若察而罪之，显妇人之节，而伤国土之心。”这句话实际上是说给军界人物听的，这里的“士”主要还是指武人。

三年后，在楚国进攻郑国的战役中，唐狡拼了老命奋勇杀敌，为楚军大胜立下头功，熊侣问他为何如此拼命，唐狡回答：“当年臣对许姬非礼，蒙大王不杀，无以为报，是矣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

熊侣替下属掩过的目的也在于此，宋江强行把美女扈三娘许配给矮脚虎王英，也是这个道理。冯梦龙还煞有介事地写了一首诗称赞熊侣：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

如果说“一鸣惊人”的把戏是熊侣针对文官的拉拢，那“灭烛绝缨”则是熊侣专门收买武官的，这两步都非常关键。任何一个政权对外争霸，都首先必须做到内政清明，团结高效，而且要有一支分析判断能力强悍的智囊团，给君主提出智力支持。

比如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全国乏食，楚国周边的部落，如戎、庸、百濮接连造反，楚国上下人心惶惶。楚国高层都倾向于迁都，从而避开夷人锋芒。

面对朝野盛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司马^芳贾（孙叔敖之父）给予了严厉批判，说我们能逃到哪去？我们能去的，敌人就不会跟着去吗？现今之计，唯有与庸人一战，打退三敌中最强大的庸人，百濮将不战自退。

熊侣半信半疑地采用了^芳贾的计策，果然十五天后，百濮人就自行退兵。失去了百濮的支持，庸人陷入单兵作战的苦境，熊侣在政治

上采取“远交近攻”，联合秦、巴等国围剿庸人，在战术上采取“将取先予”，将庸人主力吸引出来，然后楚军分成两队，包抄其后，一战灭掉庸国。

这是熊侣为了争霸天下打响的第一枪，意义非常重大，但如果没有^芈贾的阻止，熊侣有可能像宋真宗赵恒那样，面对强大的契丹兵迁都南逃，一切就不可收拾了。

这是熊侣重视文官的好处，而在武官方面，虽然有关熊侣在军队思想工作方面的史料不多，但根据“灭烛绝纓”的故事可以推断出熊侣平时是如何养人用人的。一支强大的军队，要在上、下两方面下足工夫：上者，培养忠诚的军事干部；下者，训练精兵，做好这两篇文章，将无往而不胜。

文攻武备相继完成后，接下来就是等待国际时局的变化，强势出击，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毋庸讳言，自楚成王时代，楚国基本完成了超级大国的骨架，楚国北上争霸最大的敌人就是晋国。在晋、楚之间，夹杂着郑、宋、陈这些中小国家，其中郑是楚的铁杆同盟，宋则和晋穿一条裤子，而陈国则是墙头草，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

根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在熊侣即位的第六年（前608），楚军大举北上，将晋的同盟国宋打得鼻青脸肿，获兵车五百乘。这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胜利，在战略上讲，削弱宋国，等于砍掉了晋国的一条胳膊。

更让熊侣扬眉吐气的是，楚军的一部由^芈贾率领，在郑国的斐林（今郑州东南）大败前来援救郑国的晋军，生擒晋国的名大夫解扬，算是给城濮惨败报了一箭之仇。

虽然这场战役规模并不大，但此战之后，晋国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和楚国的竞争中略处下势，史称“不竞于楚”。情况有些类似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被苏联甩在身后。

此时的楚国能强悍到什么程度，有两个人可以出来做证，一是楚国令尹斗越椒，在第二年（前607），晋国执政赵盾率诸侯军进攻郑国，斗越椒奉熊侣之命北上救郑。在临行前，斗越椒说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要想得到诸侯的真心拥护，就首先要把他们打服，晋国也没什么好害怕的。”这是斗越椒针对国内某些人的畏难情绪说的，想必这也是熊侣的真实想法。

第二个人就是晋国执政赵盾本人，在听说斗越椒率楚军急驰北上时，他立刻解散了诸侯军，溜回晋国去了。虽然赵盾嘴上说有意撤军让斗越椒取得胜利，以骄其志，为楚国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埋下伏笔，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赵盾有战胜楚军的实力，他还有必要玩这一招败战计吗？

赵盾对楚国“退避三舍”，实际上等于承认楚国已经有资格与晋国争霸天下，而这又对熊侣巩固在楚国的统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至少在熊侣彻底铲除以斗越椒为代表的斗氏家族的过程中，赵盾无形中是“帮”了忙的。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05年七月九日，此前斗越椒和时任工正的^芳贾互相撕咬，斗越椒棋高一招，送^芳贾上了西天。在忍无可忍之下，熊侣发起了对骄横跋扈的斗越椒的总攻，交战的地点在皋浒（今湖北襄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熊侣还挨了斗越椒的两记冷箭，最终还是把斗越椒踢下地狱，灭若敖氏（即斗氏）之族。

这是一场权力内战，但其影响不可低估，因为在此之前，楚国的对外扩张是由熊侣和斗氏家族共同完成的，斗氏对于熊侣的威胁始终没有解除。现在除掉了斗氏，熊侣完全收回了最高权力，这可以使熊侣完全从内战中抽出身来，心无旁骛地经营他的争霸事业。

这场内战是^芳贾在熊侣面前构陷子扬，熊侣杀子扬而引起斗越椒恐慌情绪引起的。表面上看，熊侣要为此负一定责任，但这完全有可

能是熊侣暗中授意^芳贾出场扮黑脸，以此激反斗越椒。综合来看，这应该是熊侣密谋已久的夺权计划。

上面讲了斗克和公子燮的野心比西瓜还大，实际上熊侣的野心比冬瓜还大，如果说刚即位时还出于维稳权力考虑装装孙子，现在连面具都摘下来了，直接以野心家的身份窜到台上跳大神。

在杀斗越椒的前一年（前608），楚国北线扩张的力度越来越强，由熊侣亲自率军北上，讨伐位于今河南洛阳西南的陆浑戎。因为陆浑戎的地盘紧挨着东周雒邑，所以熊侣“凑巧经过”雒邑，在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耀武扬威，向天下宣示自己的强壮肌肉。

楚人北上示威，周王室不得不表示“欢迎”，周定王姬瑜派大夫王孙满出城“犒军”，熊侣并不讳言自己此来的目标，“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众所周知，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拥有象征天下至尊地位的鼎，楚王问鼎，其意不问可知！

王孙满说了两句自相矛盾的话，堵上了熊侣的刀子嘴。一句是“兴亡在德不在鼎”，一句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警告熊侣不要轻举妄动，熊侣很听话地结束了“观兵于周”，撤了回去。

表面上看，王孙满是胜利者，实际上熊侣根本就不可能有灭东周的任何计划，除非他疯了。周天子的铝合金招牌在当时还是非常有号召力的，即使狂悖如郑庄公射了天子一箭，还得乖乖地向天子认错。熊侣在天子面前耍大刀的目的还是政治性的，向天下宣告楚国将“问鼎中原”的战略企图，楚国有能力与晋国一争高下，让中小诸侯准备站队。

在争霸的过程中，熊侣仿效中原大国如齐、晋等，重视塑造本国的政治形象，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充满爱心的国际维和警察。齐桓公姜小白能当上武林盟主，不在于齐国的军事能力一超独大，而在于齐国政治上的正义性和正当性。

虽然春秋无义战，但各大国争霸时都要披着一件仁义道德的外衣，熊侣自然不能免俗。在公元前599年，楚的仆从国陈国政坛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的桃色丑闻，陈灵公和大夫孔宁、仪行父与陈国第一美女夏姬勾搭成奸，这三个无耻奸夫居然穿着夏姬的衣服在朝堂互相显摆。后来三个奸夫在大夫夏徵舒（夏姬的儿子）家喝酒时，因为三人拿夏徵舒开不恰当黄色玩笑，从而激怒了夏徵舒，一刀送母亲的奸夫陈灵公上了西天。

陈国内部的权力更迭，按常理说和楚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由于陈的地缘优势突出，一旦陈背楚归晋，楚则门户洞开。熊侣在陈国内乱后的第一时间就出兵北上，夏徵舒无兵无势，很快就被熊侣除掉。

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楚国准备废掉陈国的诸侯编制，改为楚国直辖的一个县。从地缘政治学上来看，熊侣此举无疑是正确的，楚军废陈为县，并驻军于陈，将有效地阻击晋军于楚国本部之外。

楚国大夫申叔时看到了隐藏在正确战略选择背后的问题，夏徵舒杀陈灵公，楚国杀夏徵舒为陈灵公报仇，本来是楚国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维护正义形象的绝佳机会。如果楚夷陈为县，就等于向天下承认楚国要逐一消灭所有中小诸侯国。这会使中小诸侯国对楚国产生恐惧心理，从而影响楚国整合国际战略资源，毕竟楚国还没有消灭天下诸侯的实力。

在申叔时的劝说下，熊侣恢复了陈国主权，并把逃到晋国的陈国太子妫午迎回来立为陈侯。熊侣顺应时代的举动引起了国际上一片叫好，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情，对熊侣大加赞赏：“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孔子估计是老糊涂了，熊侣什么时候也没轻过千乘之国，他放弃吞并陈国，实际上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胜利，熊侣什么也没失去。熊侣

没孔子那么迂腐，成天讲什么仁义道德，熊侣眼中只有利益，赤裸裸的利益。

熊侣放弃千乘之国陈国，其实是为了对付对楚国称霸最具威胁的万乘之国晋国，熊侣可以对陈国让步，但他绝不能对晋让步，如同美国和苏联都不会放弃属于自己的半块蛋糕。难以想象如果孔子坐在熊侣的位置上，楚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估计下场不会比宋襄公好多少。

宋襄公演技不错，但问题在于国力太弱，无法支撑起他的大国梦想。熊侣的运气较好，从祖、父手里接过了一个初具雏形的超霸，而且熊侣的演技绝对是影帝级别，所以熊侣的蛋糕做得比宋襄公大是很正常的。换言之，熊侣懂政治，而宋襄公只懂廉价的“仁义”。

熊侣精湛的演技还集中在另外一场大戏中，就是发生在公元前597年的著名的邲（今河南荥阳）之战。这场邲之战以楚国大获全胜而告终，也同时终结了晋国的五十年霸业，熊侣以征服者的姿态正式站在历史的前台，成为当时天下人心服口服的霸主！

熊侣能成为春秋五霸中铁打不动的三位之一，靠的就是这场震惊天下的邲之战。关于这场争霸战，将用单独一章篇幅讲解。这里只讲一个细节，就是楚军获胜者，大夫潘党劝熊侣把晋军的尸体聚成京观，向天下展示楚国超强的武力。

相比中原文明系统更成熟的晋、齐等国，楚国一直被所谓的“文明国家”视为不知仁义为何物的野蛮国家，到处杀人放火，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比较臭。熊侣刚刚通过“捉放陈”树立了一点江湖威信，如果这时侮辱晋军的尸体，必将激起中原文明区国家的强烈反弹，对楚国没有半点好处。

不知道是熊侣自己的政治见解，还是有江湖高人暗中点拨，熊侣拒绝了潘党的建议。熊侣也是个碎嘴子，洋洋洒洒地给潘党上了一堂

政治课，但简而言之，熊侣的理由是“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晋军虽然被杀，但他们忠君爱国，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聚为京观，是对死者的严重侮辱，这种缺德事我做不出来。

特别让后人钦佩的是，熊侣还给后人留下了一条关于军事的重要哲学解读，就是在江湖上经常被提到的“止戈为武”。熊侣认为武力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但不能迷信武力能解决所有问题。

熊侣赋予了“止戈为武”两重重大含义，一是“禁暴”，二是“安民”。在“无义战”的春秋时代，熊侣提出武力是“禁暴”手段的主张，无疑是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仅凭这一点，吹捧熊侣是军事思想家毫不为过。

晋楚邲之战的导火索是楚国进攻郑国，郑国不堪楚国重击，苦撑了三个月后，郑襄公姬坚肉袒牵羊出降。为了防止楚军对郑人施暴，姬坚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头上，说得非常悲情。

熊侣被姬坚的忍辱负重感动得一塌糊涂，当众称赞姬坚以国君的身份能忍受这份屈辱，足见姬坚平时是热爱郑人的。就凭这一点，熊侣决定不再对郑国提出非分的要求，甚至为此还拒绝楚国有功将士分功的请求。

熊侣懂得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他，在邲之战中，郑人感激熊侣的不杀，倾全国之力帮助楚军干掉了晋军。更重要的是，在邲之战后，楚国不但在军事上确定了霸主地位，从江湖道义上，楚国也树立了大国威信，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春秋无义战不假，但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义”的重要性。熊侣之所以能继齐桓、晋文之后真正意义上地称霸，说穿了，就是熊侣懂得如何去平衡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以慈悲为怀，以百姓为念，哪怕这种感情是装出来的，总比赤裸裸的暴力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后世之所以把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奉为最主流的春秋五霸，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标榜仁义，至少他们在这方面做得要比阖闾、勾践好。

阖闾和勾践论霸业，远在宋襄、秦穆之上，但他们的道德品质实在太差，阖闾弑兄篡位，当众强奸楚王夫人，勾践忘恩负义杀夫差和文种，所以从道德角度来看，阖闾、勾践不入五霸是有道理的。宋人苏辙有感而叹：“楚庄王克陈入郑，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风矣。”

二五 晋楚邲之战

作为三国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三场大战，袁曹官渡之战、曹孙刘赤壁之战、孙刘夷陵之战，打得荡气回肠，是三国战争史上的标志性战役，再加上罗贯中如花妙笔的渲染，知名度不用多说。

而作为春秋时代两大霸主晋国与楚国百年争霸史上的三大决定性战役，除了城濮之战的历史知名度勉强可以和三国三大战役相提并论之外，鄢陵之战多少还有些知名度，但作为标志楚国称霸中原的伟大战役，发生于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却鲜有人问津。

虽然《东周列国志》对邲之战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但《东周列国志》的普及率和影响远逊于《三国演义》，所以邲之战默默无闻很正常。就事论事，晋楚之间的三大战役，以城濮之战最有名，鄢陵之战次之，但从精彩程度上讲，邲之战似乎更胜一筹。

在邲之战中，晋楚最高层斗勇斗智，各自决策层的分歧不断，再加上各方名嘴闪亮登场，纵横捭阖，风云四起，都为这场战略决战平添了几抹亮丽的色彩，更不说邲之战具有深厚的戏剧性和喜剧性。即使放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中来衡量，邲之战也是一线名战，至少不应该被城濮之战比下去。

作为邲之战的失败者，看看晋国方面都有哪些人粉墨登场，就足以证明这场邲之战的含金量了。晋军高层配置是：

中军：荀林父为正、先穀为副，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

上军：士会为正、郤克为副，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

下军：赵朔为正、栾书为副，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

韩厥（韩献子）为司马。

从晋国的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晋国最顶层的权力精英几乎倾巢而出，这些风流人物放在整个春秋史上来衡量也都是一等一的。有人说拍戏是大制作还是上制作，关键看出场演员，如果都是顶薪大腕出场，这就是大制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邲之战就是春秋战争史上罕见的大制作。

上一章讲了，晋楚邲之战的起因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季，楚庄王熊侣亲提锐旅北上讨伐晋的同盟郑国。郑国夹在晋、楚之间，两头挨砖，受尽了夹板窝囊气。但总体来看，由于郑距离晋近，而离楚远，所以郑经常骑在晋国的墙头上观风景。

从地缘战略上看，郑正处在晋与楚的战略边缘地带，晋得郑，则晋可饮马汉江；楚得郑，则楚可饮马黄河，战略地位相当于南北朝时的徐州，极为重要。郑国倒戈晋国，就是楚国最大的威胁，而熊侣要北上争霸，就必须迈过郑国这道门槛。

郑国在军事上不是楚的对手，楚军仅用了三个月，就迫使郑襄公姬坚牵羊出降。郑国的投降，之于楚国的意义就相当于吴三桂以山海关投降清军，中原从此洞开。楚国以郑为战略跳板，随时可以杀过黄河北岸，这是晋国万万不能承受的巨大的战略代价。

对于楚国的战略野心和军事实力，晋国方面是心知肚明的，即使楚军不过黄河，仅在郑国驻军，就足以威胁到晋国的南线河防。为什么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饮马鸭绿江时，中国不得不出兵援救朝鲜，道理就在这里。

实际上，晋国并不是郑国降楚之后才决定出兵的，早在楚决定北上用兵于郑时，郑襄公就派人赴晋告急求救。晋国派出以荀林父为首的豪华阵容，战略目的也很清晰，就是将楚从郑国地盘上赶出去，帮助郑复国。

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晋军的行动似乎比较缓慢，等郑襄公苦撑了三个月降楚时，晋军居然没有丝毫动静。问题可能出在主帅荀林父身上，作为晋国头牌人物，他的战略大局观却经常出现短路。

比如在晋军得知郑已经降楚之后的前线军事会议上，荀林父居然动了撤军的心思，丝毫不顾及楚得郑后对于晋造成的战略威胁。他的理由是“姬坚投降了熊侣，我们还打个毛！不如等到楚从郑撤军后再尾袭楚军，必能得利”。

上军主帅、名将士会的脑袋也被驴踢了，非常认同荀林父的主张，随后摇头晃脑地说了一大通理由，无非是楚王熊侣得人心，善选贤才，百姓拥戴，人皆愿效死力，把熊侣吹上了天。

这两位大帅东拉西扯地找借口，看似理由充足，熊侣可不是善与之辈，谨慎行事自是兵家上道，但还是难逃怯战的嫌疑。分析起来，有两点原因是荀林父和士会没有考虑到的：

一、两位大帅可能忘记了当年秦伯嬴任好在帮助晋侯姬重耳返晋即位后，曾经派出三千精锐部队驻守晋国防叛的历史。此次楚军北上的目的是与晋争夺国际霸权，降郑只是第一步，熊侣下一步就准备饮马黄河，不会轻易撤军南返。退一步说话，即使楚军真的南返，也不是没有可能留下精锐驻守郑国。万一如此，晋国在战略上就非常的难受了。

二、在楚崛起争霸之前，晋国是天下公认的头号霸主，什么是霸主？按江湖上的说法，就是小弟有难，大哥得出来主持公道。郑国做了N年的晋国小弟，现在被楚人围攻，晋军却不发一矢，坐看郑国完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混？这对晋国的战略软实力是莫大的损害。能想象得出，如果苏联武力进攻日本，日本的盟友大哥美国会无动于衷吗？

大战在即，两大名将临场下了软蛋，这让血气方刚的中军副帅先

穀极为不满。作为军人，最大的天职不是服从命令，而是在战场上打败敌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再听话的军人也只是奴才。楚人得郑后，在晋国南线进一步压缩了晋国的战略生存空间，一旦楚人大举渡过黄河，后果是什么，谁都清楚。

先穀在会议上当场批驳荀林父和士会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说你们两个猪头畏敌怯战，临阵思逃，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还算个男子汉大丈夫吗？如果不对楚国进行强硬反击，任由你们胡搞下去，晋国的百年霸业就要毁于一旦，你们两个猪头怎么不去死！两个老爷们儿伪娘发嗲，老子可不陪你们玩变性游戏，你们在后边玩吧，老子过河杀敌去了。

说完，怒气冲天的先穀率领自己的本部人马，抢先渡过黄河，寻找楚军主力去了，甩下面面相觑的荀林父和士会。下军大夫荀首看到场面无法收拾，出来替先穀说了几句好话，并劝荀林父不要犯傻。不要说你不敢出战楚人将导致你个人声望的下跌，万一先穀所部有个三长两短，你身为大帅，下属却把你的话当放屁，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管理责任。在各方的压力之下，荀林父不得不违心做出了一个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决定——率军南渡黄河，与楚军决战。

不过让荀林父捶胸顿足的是，他已经得到可靠情报，晋国高层接连下软蛋，实际上楚国高层下的软蛋比之晋国只多不少。头一个下软蛋的就是楚国最高军事统帅——楚王熊侣，接下来跟着下软蛋的是楚国头号智囊孙叔敖。

楚国在逼郑投降之后，并没有过河与晋军决战的战略考量，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熊侣派出主力部队驻扎在郟（今河南郑州北），准备到黄河南岸转一圈后就返回楚国。最为搞笑的是，当听说晋军主力已经渡过黄河时，一向以铁血大王面目示人的熊侣居然吓得胆战心惊，卷起铺盖准备逃窜回国，贤相孙叔敖也持相同的观点。

倒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弄臣伍参，看到楚王这副熊样，不禁怒从胆边生，指着熊侣的鼻子一通臭骂，说大王临阵脱逃，将成为江湖上的笑柄，以后楚国颜面何存？

随后伍参给熊侣分析晋军的弱点，“其佐先穀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时正是楚国难得的歼灭晋国主力的绝佳机会。熊侣被伍参骂得下不来台，只好一咬牙，下令三军调头北向，准备与晋军决战。伍参是什么人？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孙子名叫伍奢，而他的曾孙就是伍子胥。

不知道伍参是如何得到晋军内部的绝密情报的，但他看准了荀林父在晋军中无法行使最高权力，晋军内部权力分配乱如鸡毛掸子，此时不击晋，更待何时。

伍参没有说错，晋军前线高层四分五裂，各说各话心思完全拧不到一处。就在晋军抵达敖、鄩两山之际，已经投降楚的郑国突然莫名其妙地派人来劝荀林父火速出击楚军，郑军在旁边协从，必能破楚。

关于是否听郑人的建议，晋军高层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先穀为首的主战派，赵括和赵同在后面摇旗呐喊；一派是以栾书为首的慎战派，荀首随后。

慎战派的思路还是立足于楚国政治清明、三军用命，对于郑使所谓楚师疲老无备的观点，栾书层层驳斥，形势对慎战派比较有利，甚至连主战派的赵朔都称赞栾书是智人君子。

实际上晋军主流观点是不想与楚军死战，楚军同样不想和晋军玩命，熊侣派出少宰赴晋营求和。熊侣明显放低了姿态，为楚伐郑做无罪辩护，“岂敢求罪于晋？”慎战派的士会对楚人的求和喜出望外，立刻答应愿意与楚讲和，大家各自回家玩泥巴。

但士会的“软弱”再次激怒了主战派大头领先穀，先穀瞧不起这些

损害国家尊严的软骨头，根本不把士会与楚人的和谈精神当个泡踩，强硬地指使赵括出见楚少宰，说我家士大帅吃错药了，他刚才和您说的话全是放屁，晋国为了保护郑小弟的利益，已经决定和楚决一死战，请楚大王准备后事吧。

也许正如先穀所说，士会确实吃错药了，还有那位荀大帅，手上有这么好的牌面，却不敢和楚人玩“斗地主”，难怪主战派不听他们的。此时的楚王熊侣已经做好了应战的所有准备，熊侣一边派人与晋军慎战派谈判，甚至连结盟时间都商定好了，一边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晋军主力，在晋军高层内部制造更大的分裂。

在某种程度上，晋军已经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战情绪所绑架，慎战派在军中已经明显失势，这其中也有用人不当的问题。比如晋军派往楚营议和的使臣魏锜和赵旃，这两位大爷，魏锜曾经争取过公族大夫的位置，赵旃想做上卿，均以失败告终。

虽然人事大权掌握在赵盾手上，和士会等人没有关系，但这魏赵二人却把火气撒到了前线晋军的头上，一心要晋军吃败仗。二人在楚营并不是议和，而是想方设法激怒楚人，什么难听的话都敢说出来。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晋军高层明明知道魏赵肯定会挟私报复，居然还派他们出使楚营，然后商议魏赵二人激怒楚人的后果，简直匪夷所思。卻克认为魏赵必定会做出对晋军不利的事情，他要求晋军做好后撤的准备。士会随即附和，说有备无患，实际上还是逃跑主义路线，早知道魏赵不可用，还用他们做什么？

虽然好战分子先穀依然反对缩头乌龟的战术，但慎战派的“有备无患”还是占了上风。为了防止晋军战败后，楚军对晋军的追杀，巩朔和韩穿在敖山上埋伏了七路伏兵，赵婴齐率本部撤回黄河南岸，准备船只，随时接纳败退的晋军。

这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葩！在明明知道会打败仗的情况下，一

边准备死战，一边准备逃生。更为夸张的是，魏锜和赵旃的表演严重出格，这二位大仙去楚营挑衅不是用嘴，而是用刀！

魏锜先带着一拨人去楚营宣战，被潘党率众追杀，为了逃命，魏锜居然还有心思射了一头鹿送给潘党，这才逃回来。赵旃比魏锜的胆子还要大，他自己席坐在楚营前，指挥小弟们去砸楚人的场子，被愤怒的熊侣率众轰了出来，赵旃还被楚人差点扒光了衣服，光着屁股逃走。

晋军已经得到魏赵二人被打出来的消息，立刻派出一股部队接应。而由于天色渐晚，楚军和晋军都没摸清对方到底有多少人，互相犯怵，特别是对楚营来说。楚王熊侣只带着三十辆战车追击赵旃，按每车有步卒七十二人计算，也不过两千多人，一旦熊侣中了晋人的埋伏，后果不堪设想。

曾经和熊侣联袂下软蛋的孙叔敖突然迸发出一道难得的血性，他下令军中：“宁我薄人，勿人薄我！”与其楚军被动地等晋军前来挑战，不如主动迎击，毕竟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楚王的人身安全。事已至此，楚人完全失去了退路，毕竟楚王的等级是荀林父等人无法相比的。

可以说这是一场意外的战役，楚与晋都没有约定作战时间，甚至在此之外还在努力促成和谈。不过从双方的备战情况来看，楚军显然准备得更充分，楚军在孙叔敖下令后，即整阵出击。当然，晋军也“准备”好了，只等楚军杀过来，晋军就调头北逃。

楚军担心熊侣在前线的安危，所以进军速度非常快，“遂疾进师，车驰，卒奔”，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架势，还没等晋军反应过来，楚军已经怒吼着杀到了晋军面前。

面对楚军的主动进攻，晋军大帅荀林父临危不乱，他手捻着山羊胡子，突然想到一招妙计。荀林父击鼓示众，指挥大家放下武器，立

刻向黄河南岸撤退，那里有赵婴齐的渡河部队。为了鼓励将士们临阵脱逃，荀大帅还下令，谁先抵达河南岸，就有重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听说逃跑还有赏钱，已经没有心思恋战的晋军一窝蜂似的挤到了黄河南岸。但因为船只有限，只有一小部分人幸运地上船逃回北岸，剩下的晋中、下两军将士不是被砍掉手指，就是被挤到黄河里喂鱼了。

晋军的三支主力部队，中、下两军已经报销，只有上军还坚守不动，这是士会等人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且更加危险的是，楚人已经发现了这支晋军，并且熊侣已经邀请到唐国军队助阵，再加上潘党的四十辆战车，气势汹汹地杀过来。

从军事力量对比上来看，原本晋军与楚军的实力相比，晋上中下三军如果合力杀敌，胜负尚难底定。但现在中、下两军烟消云散，仅有的上军是无论如何都撑不住楚军的超强攻击的。

中军大帅荀林父此时已经窜回黄河北岸晒太阳去了，上军的主将是士会，这也是一位著名的逃跑将军。荀林父跑了，士会当然也不甘示弱，当驹伯（卻克的儿子）问士大帅我们该怎么办时，士会毫不犹豫地再次祭起楚军无敌论。

“楚人现在士气正盛，彼之优势兵力对我之一部兵力，若与之战，我军必定完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逃跑本是件丢人的事情，却被嘴上跑马的士会发展成了一门艺术。让人喷饭的是士会逃跑找出的理由，为什么上军也要逃跑，因为我们要替荀林父的中军分担骂名！中军跑了，国人必定臭骂他们，我们都是兄弟，怎忍见兄弟受辱，所以我们也逃跑，替上军挨一部分骂。

.....

众将无不翘起大拇指，称赞大帅妙计安天下，不赔夫人不折兵！

士会不愧是当代名将，在他的合理调度之下，晋国上军有条不紊地向北后撤，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荀林父的逃跑艺术和士会相比，天上人间的区别。

想当初，晋军三线主力耀武扬威地走出绛都，高举着国际主义的大旗，开赴河南战场，准备给狂妄的熊侣致命一击，哪曾想会变成这样的鸡毛场面。楚国甚至都没怎么用力，就把晋国大军吓得尿了裤子，哭爹喊娘地满世界逃窜，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笑柄。

这场邲之战，楚国赢得不但轻松，而且充满了喜剧色彩。在楚军追击晋军的过程中，有几辆晋国战车突然一头栽进大坑里拔不出来了。按道理讲，楚军应该毫不客气地吃掉这些倒霉的晋车，但楚军弟兄们却非常热心地下车，帮助晋人修车，把晋车前的横木抽出来，大家一起使劲，这才把晋车从坑里拉出来。更为恶搞的是，晋军不但不感谢楚军，而且对楚军的帮助大加揶揄，说我们不像贵军有逃跑的经验，所以栽在了坑里，讽刺楚军以前经常被晋军打得抱头鼠窜。

楚军为什么要帮助晋军？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楚军已经不把此时的晋军当成对手了，这实际上是楚军对晋军最大的蔑视，由此可见楚人自信的大国心态。

晋国是和楚国并列的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但自晋襄公姬欢早逝之后，晋国的争霸势头明显放慢，主要原因还是出在内部。以赵盾为代表的卿权和以晋灵公姬夷皋为代表的君权展开了残酷的权力厮杀，虽然赵盾最终获胜，但君权和卿权的分裂已成事实。

等到晋景公姬獯即位以后，赵氏的势力虽然还有余威，但中军执政大权已经落入荀林父之手。各派山头争权夺利，比如赵氏和栾氏、郤氏向来不合拍。

这次邲之战，身为军执政的荀林父避免与楚决战，赵氏则极力要求开战，原因就在于荀林父担心万一败给楚国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地

位，而赵括、赵同则希望通过战胜强大的楚国来恢复赵氏的政治地位。

巨大的权力内耗肯定会严重影响到晋国的政治团结和对军队的指挥权，这次晋军在邲的惨败也说明了一个真理：一个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是不可能打败强大外敌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之所以对日本作战打得如此艰苦卓绝，抛开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中国内部没有形成一股力量是主要原因。

古人说，天无二日；近代人说，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稳定来说，权力越分散越安全，但对一个有争雄天下野心的国家来说，权力越集中越安全。反观楚国，自从灭掉严重威胁王权的斗氏家族后，楚王室对权力的控制明显加强，在对外的方针政策上，可以发出一个声音，这应该是楚国能战胜晋国在政治上的主要原因。

二六 子产和晏婴：春秋两名相

春秋三百年，君主成百上千，王公贵族更是数以万计，这些人钟鼎玉食，享受着人间最顶级的富贵，挥霍着属于他们的人生。不过正如曹沫所说“肉食者鄙”，这帮公子哥儿不过是投胎技术好，生在王公之家，天生就有富贵命，否则连个屁都不是。

当然并非所有的贵族子弟执政都会交白卷，李世民出身累世贵族却交给历史一份绚烂的答卷。春秋时代的执政精英以饭桶居多，但在这一堆肥头大耳的饭桶执政中，人们还是不经意间发现了两位足以震撼千古的名相，即郑相子产和齐相晏婴。先来说说子产。

春秋时代以公室身份入阁拜相的不计其数，但要论治政业绩和知名度，相信没有人能超越子产。我们都知道子产是郑国著名宰相，其实子产只是他的字，他的本名是姬侨，郑缪公姬兰的孙子、公子发的儿子。

作为郑国公族近亲，子产在政治上有天然的优势，这比像老鼠一样在底层艰难打拼的管仲强多了。据《史记》记载，子产登上郑国政治舞台的时间是郑简公姬嘉三年（前563），不过此时郑简公只有七岁，尚未成年，权力掌握在国相子驷手上，郑国政局非常混乱，诸公子之间互相撕咬，鸡毛乱飞，子产只能略显尴尬地在旁边观战。

因为郑简公年幼，所以子驷想取而代之，结果梦还没醒，就被同宗子孔一刀送上西天。本来子孔是想学习子驷好榜样，废幼主自立的，不过在子产的劝说下，子孔不再发神经，老老实实做了宰相。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子产是一名优秀的政治投资家（不是投机家），郑简公虽然年幼，但他已经能分辨黑白善恶，子产救了他一命，他自然会在合适的时机投桃报李。在公元前554年，十七岁的郑简公突然向专权十年的子孔发动袭击，“诛之”，两千多年后，十四岁的清康熙密谋擒鳌拜，应该就是受到了郑简公诛子孔的启发。

郑简公的亲政，意味着他需要一位没有篡位野心的直臣来辅政，而无论是讲亲疏、讲贤愚，子产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郑简公很自然地就把子产扶正，出任大卿。虽然子产上位，是由他的堂侄子皮（姬罕虎）推荐的，但首先是因为子产贤明，所以子皮才会推荐子产，子皮怎么不推荐其他人？

事实证明，子皮的推荐和郑简公的决定是无比英明正确的，春秋时代最伟大的名相之一诞生在郑国这个破落的前“中产阶级”，是郑国的莫大幸运，就像南斯拉夫拥有铁托这样的巨人一样。

说子产伟大并不是无聊的吹捧，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把子产与管仲并列为春秋两大名相，原因很简单，因为子产做了前人没有做过或很少有人去做的事情。

对历史来说，子产在郑国的执政是非常有开拓性的，子产执政时间可以和管仲相比，都在相位四十年，管仲的伟大不必多说，是公认的中国市场经济的鼻祖。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而子产则可以称为中国言论自由的鼻祖。

子产论言论自由，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原文大意是郑国存在着一种相当于现代政治俱乐部的组织，类似于明末的东林党，对朝政品头论足。郑国高层非常讨厌这些多嘴乌鸦，大夫然明劝子产封杀这些揭批政府的自由言论，言论自由也要有个底线，但被子产拒绝了。

子产反对封杀持异见者论坛的理由很简单，脑袋上长嘴除了吃

饭，就是用来说话的，面对政府施政的不足之处，在野者有权利发表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如果政府不让百姓说话，那么百姓就有可能不再说话，但会举起锄头，用暴力发表自己的意见。

子产不但不反对封杀在野言论，反而非常看重持异见者，“其善者，吾则行之；其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按现在的政治语言讲，就是人民是政府的监督者，真正为民服务的政府是敢于让人民说话的，只有不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会封杀言论。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

关于古代封杀言论自由的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周厉王止谤”，周厉王姬胡搞独裁专制，不让人民说话，结果人民“道路以目”，姬胡自以为得计，但很快他就遭到了报应——国人暴动，将姬胡赶下台。

总有一些当政者轻视人民的力量，把人民当成会说话的奴隶，正如召公劝姬胡的那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子产也认同召公的观点，“（封杀言论自由）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

子产的观点很明确，封不如疏，单纯封杀人民发表言论的自由，是极端愚蠢的政治自杀，不如给异见者留一个说话的渠道，让异见者有发泄怒火的渠道。这就如同在洪水积蓄的主河道旁开凿一条沟渠，引流洪水，确保主河道的安全，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子产不惧怕在野议论？很简单，子产身正不怕影子斜，他执政为民，老百姓也不会指责他。子产治国，《尸子》称子产“国无盗贼，道无饿人”，老百姓安居乐业，饱腹讴歌，谁会在吃饱饭的情况下放下筷子骂娘？

《吕氏春秋·乐成》也有相同的记载，子产治郑期间，因为多施善政，他在郑国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老百姓甚至公然宣称我们的好日子是子产给的，谁要陷害子产，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此得民心，说明

子产是执政为公的，他没有自己的私心，当然不惧怕言论风暴。

问题是自古以来，当官的没有几个是为人民的，所以他们心虚，害怕民间非议，所以疯狂压制言论自由。以为江山万年不倒，哪知道愤怒的农民扛起锄头愤怒一呼，所谓的铁桶江山土崩瓦解，对子产来说，周厉王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子产对言论自由的远见卓识，不仅感动了然明，他狂热地拍起子产的马屁，说郑国有子产，天下之幸，更感动了几十年后的孔子。孔子感叹道：“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其实孔子称赞子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自己开脱，孔子治政严猛，惹人非议，特别是杀少正卯一事，让孔子收到了不少烂砖头。巧合的是，子产治郑同样严猛，而且也杀了一位与少正卯一样开坛讲学的思想家邓析子。

按现在的政治语言讲，邓析子就是一个持异见者，不知道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邓析子坚持“一个凡是”不动摇，即凡是子产坚持的，他坚决反对。

邓析子除了大学教授的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郑国最著名的大律师，经常承办司法诉讼业务。如果说有些品行不好的律师被骂为讼棍，那邓析子就是不折不扣的郑国第一讼棍，专和子产唱对台戏。

邓析子不管是非曲直，谁出高额律师费，他就替谁说话，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结果导致“郑国大乱，民口喧哗”，被首席执政官子产定性为郑国头号捣乱分子，严重影响了郑国的社会稳定，所以子产不顾别人会指责他压制言论自由，强硬地杀掉了邓析子，“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实行刚猛之政，是子产治郑的最大风格特点，这倒不是子产生性

刚硬，而是他看到了执政宽仁是导致社会混乱的重要因素。诸葛亮治蜀，看到蜀政宽仁，豪强跋扈，所以诸葛亮痛下狠手，刚猛治蜀，结果蜀国大治。魏晋史的许多史学家都认为诸葛亮刚猛治蜀是子产治郑的三国版，比如袁准和陈寿。

子产治郑与诸葛亮治蜀还有一个巧合，就是他们身前身后各有一个反面例子，诸葛亮身前的例子是滥施宽仁导致蜀乱的刘璋，而子产身后的例子就是继子产执政的大叔。

子产知道自己执政过于强硬，会引发一些人的不满，但子产在临死前告诫下一任执政大叔：“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子产说得很清楚，政府监管是控制民心的有效手段，一味压制民心，民心就会大规模反弹，而一味放纵民心，民心就会散乱。等子产死后，大叔认为子产的刚猛之政对百姓过于严厉，于心不忍，便放宽了对社会的监管，结果有人钻空子，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强盗，郑国社会治安严重混乱。

社会上鸡毛乱飞，大叔这才理解了子产为什么要实行刚猛之治，对待百姓，宽严相济才是上策。大叔恢复了子产的严政，起兵围剿了那伙萑苻之盗，“盗少止”，社会恢复了子产时代的安定。

在很大程度上，孔子的治政思想与子产并无二致，所以孔子非常能理解子产，经常拍子产的马屁。当孔子知道子产的死讯后，痛哭流涕地称赞子产“古之遗爱也”。

诸葛亮曾经引用过一段孔子评价子产的名言：“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前秦名相王猛同样是奉子产为师，厉行刚猛之政。

虽然这三位名相都是典型的法家（虽然子产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法家的概念），行事严猛刚硬，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三人都向历史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郑、蜀、秦在他们治下，几乎实现了“和谐社会”，这就是他们敢于面对历史是非定评的底气。

在这三位名相中，除了王猛是标准的法家做派，子产和诸葛亮在相当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以周公为模版）走得更近，特别是子产。子产除了刚猛之治，还经常“德”不离口，每见到一个高官，子产都像唐僧一样，喋喋不休地劝人家“修德”。

郑定公四年（前526），子产出使晋国，见到晋国执政之一的韩宣子，子产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子产警告韩宣子，如果不修德爱民，早晚必遭报应。两年后，子产又揪起郑定公姬宁的耳朵大喊“不如修德”，差点没把郑定公的耳朵震聋。

有人说儒法不两立，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很多情况下，儒法在政治上是互补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治国之道，在于宽严相济；治人之道，在于赏罚公允。儒则宽、赏，法则严、罚，就相当于胡萝卜和大棒子的关系。

孔子深谙此道，所以他不遗余力地称赞子产，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的政治思想鼓与吹。对于一个有为的政治家，无论治政宽与严，其根本目的都是爱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孔子到处宣传子产的惠政，遭到了学生子游的质问，子游问孔子，老师为什么极力拍子产的马屁，孔子很严肃地回答：惠在爱民而已矣。

爱民，是子产政治生涯最显著的标签，古往今来，宰相如过江之鲫，有些人自私自利，祸国殃民，而有些人爱民惠民，比如子产。所以子产死后，郑人无论老少，痛哭流涕三月，“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更何况能让孔子这等级别的人物痛哭流涕的，会是一般人吗？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子产的历史意义慢慢由一个具体的人而衍化成公正的化身，后世歌颂的包青天、海青天，其实都是子产爱民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北宋名臣王质出知荆南府时，用自己的俸禄帮助贫苦百姓办理离婚手续，就被当地百姓称为子产再世，可见子产的影响力。

说完了子产，再来说说差不多与子产同时的另一位齐国名相晏婴。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以子产的江湖地位，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居然没有给子产立专传，只是将子产附在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循吏列传》中，也不过区区一百多字。相比之下，晏婴比子产幸运多了，至少他可以列入正传，更让人羡慕的是，晏婴和另外一位千古名相放在同一传记里，这个人名叫管仲。

晏婴的出身没有子产的龙子凤孙那么显赫，但也不是厕鼠出身，而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贵家公子，即人们经常说的官二代。晏婴的父亲晏弱曾任齐国的上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大员，而管仲是标准的穷二代出身，和晏婴是没法比的。

晏婴的老爹很争气，给儿子拼出了一个很不错的未来，晏婴的投胎技术确实让人羡慕不已，但晏婴能在江湖上扬名立万，靠的也是真才实学。有没有真本事，不是靠有没有金爹银妈来证明的。

晏婴约生于齐灵公四年（前578），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如果从公元前556年，晏桓子（即晏弱）去世，晏婴继承爵位算起，晏婴在齐国官场上纵横五十七年，历经腥风血雨而屹立不倒，没有两把刷子是办不到的。

不过有说法认为晏婴执政长达五十多年，实际上晏婴为相，至少要在齐景公三年（前545）之后。即使如此，晏婴也在相位四十六年，这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几乎就是终身宰相。

《史记·晏子列传》说晏婴“三世显名于诸侯”，是指晏婴效力过的三位齐侯，即齐灵公姜环、齐庄公姜光、齐景公姜杵臼父子三朝。在齐灵公时代，晏婴还处在官场的外围，当时执政的是著名权臣崔杼。等到了齐庄公即位后，齐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后宫八卦事件，就是齐庄公私通崔杼的老婆，结果被扣绿帽子的崔杼大怒，发动兵变，在自己家里杀掉了准备偷食吃的齐庄公。

当时的晏婴只有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崔杼弑君胆大妄为，彻底激怒了晏婴。身材比较“精华”的晏婴站在崔府门外将崔杼骂得狗血喷头，并要求崔杼开门放他进去，他要与国君一同赴难。晏婴说得大义凛然：“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崔杼铁青着脸把晏婴放进来，晏婴扑倒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号啕痛哭，连续三次行了君臣大礼，才泪流满面地离开。在庄公被杀之前，晏婴在齐国江湖的威望已经日渐高涨，而晏婴哭君，又为他挣得了许多来自朝野的印象分。所以有人劝崔杼杀掉晏婴，崔杼说我已经臭到家了，再杀晏婴，就臭不可闻了。

官场就是戏园子，在官场中混，没点演技是不行的。不排除晏婴抓住了崔杼性格中的某些人性化的“弱点”，冒着杀头的危险来哭庄公，为自己博取好名声，但这毕竟是拿生命赌博，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玩的，至少说明晏婴敢于担当。

其实晏婴做事非常谨慎，并不会轻易出风头，齐庄公在位时，因为好勇斗狠，晏婴经常给齐庄公上眼药，“今上无仁义之理，下无替罪诛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则诸侯行之以国危，匹夫行之以家残”。

晏婴的政治思想，和郑国子产非常相似，都注重修德，更多的接受了周公儒家思想的影响。晏婴曾经给齐景公提出了“亡国四不足”的警告，即“德不足以怀人，政不足以惠民，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

防非，亡国之行也”。

齐庄公不听晏婴的良言相劝，敢去勾搭权臣崔杼的女人，被杀也在情理之中，绿帽子是随便给人戴的吗？齐景公在这一点上要强于齐庄公，至少齐景公不会给人扣绿帽子。齐景公为人相对比较谨慎，在他即位初期，权力被崔杼和庆封控制，齐景公干脆袖手旁观，坐看崔杼和庆封互相撕咬，等到二人咬得两败俱伤，齐景公轻轻松松收拾了局面，基本维护了齐国公室的权威。

齐景公做事有时非常荒唐，但总体上不算是昏君，还是能听得进良言相劝的，这就给了晏婴更大的政治舞台。事实证明，齐景公拥有晏婴，是他和齐国的莫大幸运，自然也是历史的莫大幸运。

晏婴身材不高，据说只有一米四，比五短身材的曹操高不了多少，但有句名言道：浓缩的都是精华，外形不是衡量人物优秀的标准。能让历史记住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而不是外形或出身。

当时齐国的政坛格局是君弱臣强，田、鲍、高、栾四家势力过大，齐国公室相对弱一些。所以晏婴虽然身为齐相，却是典型的“弱相”，类似于三国东吴丞相顾雍，但晏婴相比于静默不言的顾雍，更多地承担了谏臣的责任。

一部洋洋洒洒的《晏子春秋》，其实就是晏婴对齐景公的谏言，从这个程度上讲，晏婴更接近于唐朝魏徵首席多嘴乌鸦的角色，因为魏徵也留下一部《魏郑公谏录》的多嘴集子。

魏徵以敢谏著称，而且字字句句皆能打动李世民，君臣同心，天下大治。齐景公远不如李世民，但晏婴还是晏婴，甚至魏徵可以被称为小晏婴，因为晏婴看问题看得太透彻了。

《晏子春秋》更像是一部晏婴与齐景公的逸事大全，也有不少晏婴作为外交名嘴在国外出使期间的嘴战记录，但在第三篇《内篇问

上》详细记载了晏婴规劝齐景公的治国之道，甚至可以说这是《晏子春秋》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齐景公曾经问晏婴：“为政何患？”统治者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晏婴从用人的角度回答：“患善恶不分。”有些帝王以为自己战战兢兢，节俭爱民，就足以守住天下，其实并非如此。

君主的个人品德非常注重，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用人制度，身边全是马屁精，在信息下情上达的方式极为落后的古代，君主和社会底层之间完全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隔离掉，奸臣们完全控制社会上下层的意见沟通，导致下言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传，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所以自古以来的政治，治人就是治吏，用人制度的好与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政权的稳定与否。

晏婴非常重视建设完善的用人制度，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齐景公所关心的，晏婴的回答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用好国君身边的人。”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注定了用人制度只能由上而下层层控制，国君用对了甲，甲就会用对了乙，乙也会用对丙，层层类推下去，直到统治结构的最低一级。

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老百姓恨贪官，真实最大的贪官往往就是帝王本人，为什么李世民时代没有贪官污吏，因为李世民反贪官，所以层层都没有贪官。帝王把好经念歪了，底下的人就会层层念歪。所以晏婴警告齐景公“审择左右，左右善，则善恶分”。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情，对晏婴大加赞赏，“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无由入矣。”孔子讲得很明白，善与恶、正与邪是严重对立的，有善则无恶，有邪则无正，善恶共处一室是不可能的。

好人进入统治机构，则坏人被拒之门外，反之亦然。北宋之所以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官僚系统包括军事系统已经彻底腐烂变质，北宋不亡，天理也不容。

齐景公有一次和晏婴讨论一百多年前齐桓公与管仲共同开创的齐国不世霸业，齐景公先拍了晏婴一通马屁，说晏卿是管仲再世，希望晏婴能辅佐自己实现齐国的二次称霸。

晏婴并没有接齐景公的话把子，而是把话题引向君主治国理政上面，晏婴认为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在于内政清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内政混乱而称霸天下的。晏婴提出了“六不”和“三无”，即在齐桓公时代，“贵不凌贱，富不傲贫，功不遗罢，佞不吐愚，举事不私，听狱不阿，内妾无羨食，外臣无羨禄，鰥寡无饥色”。

“六不”和“三无”，归根结底，还是回到了上面讲到的君主要以身作则上，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一种上行下效的心理暗示体制，君主的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臣民的思维定式，君主不贪不恶，则臣下不贪不恶，反过来也是一样。历代兴亡，百姓覆水翻舟，根子就出在帝王身上。

战国思想家墨子曾经提出“国有七患则必亡”的观点，而早在墨子之前一百多年，晏婴就率先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可以称之为“亡国五患”，即“一、厚取于民，而薄其施；二、多求于诸侯，而轻其礼；三、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诸侯；四、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五、君臣交恶，而政刑无常。”

第二、三条讲的是国家外交大政方针，第五条讲的是人事制度，第一、四条讲的是政府与百姓互依互存的关系，特别是第四条。如果政府只顾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而忽视了百姓的承受程度，只能导致“怨积于百姓”，最终迫使老百姓举起锄头造反。

晏婴非常担心政府的贪婪无厌，他警告齐景公，如果不爱民恤民，真把老百姓惹毛了，国君大臣们必将失去他们所得的一切，孰轻

孰重，国君自思之。

如果论权力和政绩，晏婴可能不如子产，但仅从二人所遗留的思想记载来看，子产更像是个实干家，晏婴更像一个思想启蒙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晏婴和孔子非常接近，孔子布道天下，但问津者寥寥，晏婴足够幸运，因为齐景公愿意给晏婴一个推销自己的舞台。

齐景公自然不如齐桓公，但放在整个齐国国君行列中也可以算是中等偏上，至少他能听得进逆耳忠言。晏婴进谏向来是不给国君面子的，但晏婴所说皆有利于国，所以齐景公还是能耐得住贪玩的性子，装模作样听进去的。

晏婴的思想比较繁杂，但归根结底，可以用《晏子春秋·内问篇》中的一句话来总结，“（国君）谋于上，不违天；谋于下，不违民。”所谓违天，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谓违民，就是与民争利。

晏婴曾经出使过晋国，晋大夫叔向问了晏婴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思想最伟大，什么样的行为最敦厚？晏婴回答得直截了当，“思想伟大莫过于热爱百姓，行为敦厚莫过于让百姓快乐”。

从宏观层面讲，历代国君谋臣，只要解决了这两个战略问题，甚至就能走出哲人所说的兴亡周期率，万年执政而不衰，至少从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后人知道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实晏婴相比于孔子，丝毫不逊色。

二七 晋国执政赵盾

说到晋国的赵氏家族，来头可不一般，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与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嬴氏出自同一祖先。赵氏的远祖之一就是周穆王时著名的养马专家造父，穆天子西幸用的八骏，据说就是造父献给穆王的。因为造父辅佐穆王有功，所以造父被封在赵城，以后便以赵为姓，也是赵姓的由来。

晋国赵氏之所以能成为晋国的顶级公卿，和造父已经没太大关系，而是应该感谢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从龙旧臣赵衰。可以这么讲，没有赵衰，也就没有赵氏的强盛中兴，更没有日后威震天下的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在中国历史上，赵盾是一个特殊人物，他既不是开国君主，也不是守成帝王；他开启了赵氏家族在晋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也因为大权独揽导致其他势力对赵氏家族的全面围剿，险些断子绝孙；他能力超群，却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连“皇太后”都要哭求于他；他对晋国公室忠心耿耿，却杀掉了由他亲自扶立上位的晋灵公姬夷皋。

毋庸讳言，没有赵衰就没有日后赵氏的兴盛，没有赵盾在执政时打下的雄厚基础，赵氏在下宫之难（即赵氏孤儿事件）的白色恐怖中就不可能保存血脉并最终逆转翻盘。赵衰类似于司马懿，而赵盾则是春秋版的司马师、司马昭，只是司马炎足够幸运，曹魏宗室的势力已经被铲除干净，而赵盾再手眼通天，也奈何不得晋国的其他军功豪门。

站在其他豪门的角度来看，赵盾是个权臣，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赵盾是春秋时代少有的能臣，没有赵盾执政，晋国继文公、襄公之后继续保持超级强国的地位几乎不可能。

当然，赵盾能混到晋国执政，首先还是因为他有个名爹。赵盾投胎技术好，傍了个好爹，生下来就是龙种。在公元前622年赵衰去世后，赵盾很顺利地接下老爹留下的家业，做了赵氏的少东家。

在赵盾袭父位之前六年，一代霸主晋文公撒手西去，其子姬欢继位，就是晋襄公。晋国的权力分配体系和春秋前期的其他大国，特别是齐国有很大的不同。齐国虽然也有世家大卿执政，但从总体上来说君强臣弱。晋国由于晋文公是在外流浪十九年后回国即位的，身边有一群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所以晋文公把这些兄弟都分封高位，大家一起吃肉。

诸卿共同执政，恰好给了晋文公平衡各方势力的机会，各方功劳都差不多大，谁也不服谁，晋文公很顺利地“分而治之”，从而保持了晋国长时期内的权力平衡。正如晁福林先生所说：“由于诸卿相互牵制，所以君权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强盛。”

在晋文公去世后至赵衰去世的这六年时间里，晋襄公姬欢巧妙地处理了君权与老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加上姬欢本人英武类似晋文公，所以老臣们也都服服帖帖，各上各的炕，各睡各的婆姨。

姬欢和东晋明帝司马绍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二人都英武明达；

二、二人都短命，司马绍在位三年，姬欢也不过在位七年。

三、两个晋国都是世家大卿联合执政，晋国有赵、栾、霍、狐诸大佬，东晋有王、庾、何等士族。

司马绍死后，幼子司马衍即位，各方势力为了最高权力展开残酷争夺，因为各方都没有鹤立鸡群的实力，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妥协。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兄长庾亮全权军国大事，但以王导、卞壺、郗鉴为首的北方世族，以司马宗为首的东晋宗室，以陆胤为首

的南方世族都分到了一碗粥，所以东晋的权力分配相对平衡。

晋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姬欢在位的前几年，身边的辅臣还都是当年跟着父亲文公流浪天下的老臣子。比如赵衰、狐偃这两位都是晋文公时代的两大公卿代表，已经远远甩开其他勋臣，史称“狐赵之勋”。

狐偃和赵衰私交不错，还能尽心尽力地辅佐襄公，但他们远不如王导等人幸运，在姬欢去世的前一年（前622），二位超级元老双双离世。同年离世的还有重臣栾枝、霍伯。

赵衰、狐偃的挂掉，表面上看没有什么稀奇，新陈代谢人之常情。问题在于，赵家和狐家的第二代完全没有父辈在险恶江湖上同舟共济的交情，作为在蜜罐子中泡大的官二代，他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远大于父辈。假设一下，如果赵衰和狐偃晚死几年，晋襄公死后，二人可以凭借旧交，在辅佐幼主晋灵公的权力分配中继续维持脆弱的平衡。

历史不能假设，两位重臣仓促离世的后果，就是逼得潜藏在暗流之中的两家的权力之争浮出水面。作为两家政治势力的代表，赵家公子赵盾和狐家公子狐射姑，为了争夺晋国的正卿位置展开了非常惨烈的斗争，两家老一辈打出来的交情基本上也断掉了。

事情的起因和晋襄公有一定关系，晋国的军事制度本来是六军制度，赵衰和狐偃死后，晋襄公为了巩固君权，又恢复了原来的三军建制。狐射姑和晋国同宗，都是唐叔虞之后，又是姑表亲，所以姬欢把中军主将的位置交给了狐射姑，赵盾出任副职。

姬欢的这一决定，彻底引爆了赵氏与狐氏的矛盾，在赵盾看来，狐射姑吃上了肉，自己就只能喝西北风去了。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但赵衰以前的心腹阳处父突然上书朝廷，极力拍赵盾的马屁，说狐射姑是个奸佞小人，而赵盾“贤”，如果不让赵盾出任正卿，晋国将乱。

阳处父此时窜出来，甩给狐家一记响亮的耳光，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公报私仇。阳处父早年曾经想投奔晋文公帐下，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狐偃始终瞧不上阳处父，不给阳处父接近晋文公的机会，阳处父用了整整三年也没爬上台。直到阳处父改变战略，改投赵衰，没想到赵衰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阳处父塞进了权力中枢。

换句话说，赵衰是阳处父的政治恩人，狐偃是阳处父的政治仇人，阳处父一想到狐偃就咬牙切齿。站在阳处父的利益立场上看，如果狐射姑独掌大权，以后还会有阳处父的好日子过吗？阳处父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只能力保赵盾，别无选择。

阳处父是晋国一线高官，在朝中很有影响，他既然发了话，姬欢也要考虑赵氏的势力对于公室的影响。狐家虽然血缘与公室亲近，但论起家族势力，赵氏反而略胜一筹。姬欢不想得罪赵氏，只好忍痛抽了自己一记耳光，将赵盾和狐射姑的位置调整了一下。因此，赵盾“于是乎始为国政”，成为晋国一号政治人物。

权力斗争向来都是零和游戏，你多吃多占，我就得喝西北风，换了谁也不会答应。一年后，姬欢病死，狐射姑就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和赵盾交了火，他主张立晋文公的庶子姬乐为君，只是他万没想到赵盾如此腹黑，派出一队杀手在姬乐从陈国返回晋国的路上将姬乐送上西天。晋国天下表面上是属于新立幼君姬夷皋（晋灵公），但实际上最高权力依然掌握在赵盾手上。

更为可笑的是，因为彻底闹翻了，赵盾和狐射姑索性撕破脸皮，互相给对方拆台。狐射姑把这笔烂账记在阳处父的头上，派出同宗狐鞠居刺杀了赵家马仔阳处父，赵盾也不是省油的灯，立刻捕拿了狐鞠居，砍下人头示众。狐射姑不堪其辱，一怒之下逃回了老家翟国避难，不陪赵盾玩了。

狐射姑是跑了，但赵盾在晋国官场上的宿敌还有很多，比如箕郑

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和蒯得这五位军界大员。之前晋襄公要立狐射姑为中军佐，实际上姬欢心目中最佳的中佐与副佐人选是箕郑父和先都，结果名将先轸之孙先克横插一腿，姬欢这才改任狐射姑和赵盾。而阳处父随后再跟着多嘴饶舌，赵盾这才得已上位。

箕郑父等人要拿下赵盾，首先必须干掉赵盾的马仔先克，扫清外围障碍，再一击置赵盾于死地。这些人恨赵盾鸠占鹊巢，更恨先克多嘴，而且蒯得和先克又有私仇，先克曾经仗势强夺了蒯得的田地。

先克现在是赵盾面前的大红人，如果要走正常程序，很难把先克敲打下来。明的不行，干脆就来暗的，在公元前618年的正月初二，一伙贼人突然闯入先克的豪宅中，将先克送上西天。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意外事件，但是哪些人会派人刺杀先克，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赵盾心知肚明。先克被刺杀，对赵盾来说是莫大的损失，但同时也是赵盾铲除政敌的绝佳机会，至少赵盾有足够的理由运用法律武器干掉箕郑父这伙野心家。

话说简短，根据《左传·文公九年》记载，“晋人杀先都、梁益耳”，过了三个月，“晋人杀箕郑父、士穀、蒯得”。所谓的“晋人”，实际上就是以赵盾为首的当权派。

在没有外力监督的权力体制下，权力的终极方向一定是独裁专制，晋国的政军一体，掌军权者必掌政权，这就给了军界一把手赵盾一手遮天的机会。对赵盾来说，能除掉的刺头都除掉了，权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赵盾之手，属于赵盾的专政时代正式开启。从此普天之下，再无人敢撻赵盾之须。

对于赵盾的为人处世，他曾经最大的对手狐射姑再清楚不过了，敌人往往是最了解自己的。狐射姑在翟国避难期间，翟国丞相酆舒向狐射姑打听赵衰、赵盾父子的性格特点，问二人谁更贤明。狐射姑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把赵大爷比作冬天里的太阳，给人以温

暖；而赵小爷则是夏天里的太阳，谁不听他的，这位赵小爷就把谁拉到太阳下暴晒.....

赵盾这种狠硬的行为作风，似乎又可以把他看成春秋版的雍正，做事雷厉风行，善于啃硬骨头，再大的阻力也不会影响他们改革的雄心。雍正因为强行经济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被骂成千古暴君，赵盾也享受到了这种待遇。在骂赵盾的那些人中，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指责赵盾尽坏周法的孔子。

孔子指责赵盾“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是严重践踏贵族统治贱民的法制精神，“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晋国之乱制也”！说的是公元前621年，赵盾刚执政时推行的改革九项措施，即著名的“夷蒐之法”。

“夷蒐之法”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制事典，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相当于现在的宪法。

二、正法罪，制定完整的刑法，“准所犯轻重，豫为之法，使在后依用之。”

三、辟狱刑，建立完善的司法审判体系，审理积压的旧案要案。

四、董逋逃，进行轰轰烈烈的严打专项斗争，加大搜捕在逃案犯（也包括逃亡奴隶），相当于现在的公安专项清网行动。

五、由质要，建立完善的民间经济契约制度。

六、治旧污，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发展，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七、本秩礼，“时有僭逾，贵贱相滥”，尊卑不分，所以有必要恢复旧有的尊卑等级制度，孔子并不反对这一点。

八、续常职，恢复旧有的公务员职位制度。

九、出滞淹，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庸者下，能者上，特别要在民间发现人才。

孔子实际上骂错了人，先不说从赵盾的改革九条来看，哪一条也没有超出孔子的政治容忍范围，而且赵盾改革还是在晋襄公在位时期，没有姬欢的支持，赵盾也搞不起来。再说孔子经常把“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挂在嘴上，杀少正卯的时候，也没见孔子否定过自己。孔子对赵盾的不满，主要还是第二条“正法罪”上，孔子是做不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以孔子的阶级立场，他对正法罪反感是很正常的。孔子主张以礼治人，刑罚只是辅助手段，“不教而杀谓之虐”，而赵盾则主张以法治人，虽然他也重视礼教之于社会的正面影响。

在赵盾推行改革九条之前的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姬重耳曾经颁布了著名的“被庐之法”，提出了“弃责薄敛、施舍分寡；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等缓解当时尖锐社会矛盾的利民政策。

不过最让孔子有认同感的，还是姬重耳提出的保护贵族利益的相关条款，即“尊贵宠”和“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阜隶食职，官宰食加（家主的食田）”，这和孔子宣扬的“君臣父子”在阶级立场上是一致的。

孔子是士大夫阶层，主张“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针对的应该就是赵盾改革的第五条“由质要”。赵盾要求规范民间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损害了权贵阶层剥削底层庶民的利益，孔子反对赵盾改革也是情理之中的。

严格来说，赵盾推行的这九条不能算是改革，只能算做在旧制度基础上的改良，并没有推翻旧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赵盾本人也没有背叛他所处的剥削阶级。如果一定要说赵盾改革有什么鲜明时代特色的

话，削弱君权也是这次改革的主要中心目标。

这一点比较好理解，赵盾作为异姓大卿，和晋国公室有很深的利益矛盾。赵盾假改革之名，趁机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是再正常不过的，这不是否定赵盾改革的理由。

赵盾不惜得罪权势公卿推行改革，于公于私都是有利的，于公巩固了晋国统治，于私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和人望。以至于江湖皆知晋国有赵盾，不知有晋侯（晋灵公姬夷皋），就如同时人皆知有诸葛亮，不知有刘禅一样。

除了没有皇帝名分，诸葛亮拥有皇帝的一切权力，赵盾也是如此。因为晋灵公年幼，所以赵盾理所当然地全权代理最高权力，甚至在只有国家元首才可以出席的国际会议上，赵盾也堂而皇之地坐在台上。以赵盾的首席执政身份，最多也就是个政府首脑，但世人也知道，晋灵公连个傀儡都不是。

最典型的一次政府首脑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席国际会议，发生在公元前620年，齐、宋、卫、陈、郑、许、曹诸国在扈举行元首峰会，赵盾代表晋国与诸国进行会盟。除了扈之盟，还有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之盟、公元前612年的第二次扈之盟、公元前610年的第三次扈之盟，赵盾均列席其中。

第一次扈之盟，晋灵公还是个娃娃，赵盾代为出席勉强有些道理。十年后的第三次扈之盟，晋灵公已经年长成人，赵盾依然越俎代庖，说明两点：一、在君臣尊卑有别的春秋时代，诸侯已经默许赵盾为晋国的实际统治者；二、赵盾也间接表明了自己不会把权力交给晋国公室的态度。

关于赵盾在天下诸侯中的威望达到了什么程度，《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公元前613年，东周王室内部发生了一场纠纷，周公姬阅和王孙姬苏争权夺利，大打出手，周匡王姬班站在周公姬阅一边，派

出卿士尹氏和大夫聃启去晋国找赵盾评理。赵盾很体面地解决了问题，各方都有台阶可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

众所周知，周天子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何况这次争端还发生在王室内部，可当周天子无力解决争端的时候，就请赵盾出面解决。这说明一点，晋国首席执政赵盾的天下霸主地位是得到周天子承认的，就如同现在的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美国是世界霸主一样，这对赵盾提高国内国际的威望是极为有利的。

情况有些类似于汉献帝之于曹操，刘协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生杀大权均在曹操手里，曹操才是真皇帝，赵盾也是如此。晋国的姬姓公族在赵盾执政期间的利益损失太大，自然对赵盾有诸多不满，更不用说已经成年的晋灵公。

刘协斗不过曹操，因为他手上没有任何武装，这一点还不如拥有几百老苍头的魏高贵乡公曹髦。姬夷皋有两点要比刘协情况稍好，一是晋灵公是赵盾所立，从这层意义上讲，赵盾是受晋襄公临死托孤的顾命大臣，而刘协只是曹操从半路抢来的，没有什么君臣大义。二是晋灵公身后还站着有些影响力的姬姓公室势力，以及对赵盾虎视眈眈的异姓卿士的势力，这不得不让赵盾有所顾忌，这是姬夷皋在相当程度上敢于向赵盾叫板的本钱。而刘协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上，身边没有任何可以倚仗的刘姓宗室势力。

姬夷皋长大了，收回最高权力是天经地义的，但赵盾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交权，一旦交了权，赵盾就会成为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赵盾知道官场上恨他的人实在太多了。其实姬夷皋同样有这样的担心，他手上没权，就是赵盾的刀上肉，不知道哪天就被赵盾给宰了。

姬夷皋幼年继位，在位十四年，他和赵盾发生冲突时的年龄不会太大，应该比被鳌拜欺压的康熙略大一些。这个年龄的男孩往往性格比较叛逆，做事激进不计后果，赵盾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国君收回

权力的压力。

对赵盾来说，晋灵公本来就不是他中意的人选，晋襄公去世后，姬夷皋的母亲穆嬴以“皇太后”之尊跪在赵盾面前恶狠狠地叩头，威胁赵盾说如果不立我的儿子，将来就和你没完。赵盾当时初掌执政，根基不深，还不想得罪穆嬴身后的势力，只好违心立了姬夷皋。

现在赵盾要拿掉姬夷皋，理由当然不能是从权力之争的角度来解释，否则赵盾的正面形象将破坏殆尽。稳妥的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拿着放大镜寻找姬夷皋的劣迹，值得赵盾庆幸的是，姬夷皋确实是劣迹斑斑，罪名找到了一大堆，如下：

一、在民间搜刮百姓钱财，修建宫室。

二、在台上拿弹弓射无辜的老百姓。

三、因为御厨没把熊掌蒸熟，被姬夷皋当场杀掉，并把尸体藏在畚箕里，让宫女背着畚箕在朝堂中大摇大摆地经过。

第二条可以忽略不计，第一条对赵盾来说也没有什么大危害，但第三条胡乱杀人引起了赵盾的警惕。这小子今天敢杀厨子，明天就敢杀执政大臣，何况姬夷皋有意让众人看到尸体，这是明显的对执政集团发出警告。

赵盾担心的还有另外一点，随着姬夷皋的年龄越来越大，朝中的反赵势力可以打着国君亲政的旗号要求赵盾交权。这就是为什么同治死了，慈禧立更年幼的光绪当皇帝，在最高权力的诱惑下，没人愿意松手。

赵盾虽然有了足以拿掉姬夷皋的合法理由，但朝中强大的反赵势力还是让赵盾不敢轻举妄动，赵盾的考虑是想等姬夷皋先动手，自己占据道义高地再进行反击。可以看出赵盾在废立上还是犹豫不决，赵盾下一步的动作是劝谏姬夷皋收敛，反正姬夷皋是听不进去的，赵盾

就能倒逼自己下最后的决心。

不过让赵盾大感意外的是，在这场君臣文斗的大戏中，姬夷皋首先破坏了游戏规则，文斗没有效果，那就进行武斗，用暴力解决赵盾。这场精彩的君臣斗发生在公元前607年的九月，姬夷皋突然邀请首辅赵盾来宫中饮酒，暗中早就布置好了武士，只等赵盾一来，当场干掉。

让人疑惑的是，以赵盾的政治智商，居然对这场阴谋没有任何反应，还是他手下的马车夫提弥明看穿了姬夷皋的鬼把戏。在赵盾喝完第三杯酒之后，就被提弥明拎下了殿，准备强行出宫。

赵盾光棍一般的进宫喝酒，是姬夷皋斩杀赵盾最合适的机会，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搞笑的是，接下来出场的姬夷皋的奇兵不是人，而是一只凶猛的大狼狗。在姬夷皋清脆地学了几声狗叫后，这只大狼狗汪汪窜了出来，准备扑咬赵盾。

这只大狼狗在历史老人面前卖力地表演着，其他群众演员也没闲着，姬夷皋的甲兵将赵盾包围起来，看起来赵盾已经毫无逃生的可能，而且提弥明已经战死，大殿上回荡着晋侯声嘶力竭的吼叫声：别让赵某跑了！

如果不是赵盾当初打猎时无意中救出一个饿倒山野的壮汉灵辄，而灵辄恰巧就是围堵赵盾的甲兵之一，灵辄为了报赵盾的一饭之恩，背叛姬夷皋，拼命将赵盾救出，赵盾早已死无葬身之地。

赵盾为人如夏日之阳，这次被姬夷皋差点算计，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反正他和姬夷皋已经撕破脸皮，再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在出宫之后，赵盾就发起了反击，不过老奸巨猾的赵盾不想背上弑君的恶名，赵盾假装成政治受害者，逃到边境上，然后暗中指使堂弟赵穿在桃园杀掉了已经无力反击的姬夷皋。等确认姬夷皋被干掉后，赵盾才扭扭捏捏地回到晋都，继续执政。

史籍上并没有记载是赵盾指使赵穿弑君，但晋国著名史官董狐却坚定地认为姬夷皋之死，赵盾就是背后黑手。董狐的强硬让历史为之感动，他在青简上刻上了“赵盾弑其君”，然后不避危险，将简书扔在朝堂上，当众抽了赵盾一记响亮的耳光。

赵盾此时还厚颜无耻地拒绝承认暗中指使赵穿弑君，并指责董狐血口喷人，“弑者赵穿，我无罪。”董狐不但骨头硬，嘴也尖刻，当即顶了赵盾一句：“你说你和赵穿弑君没有任何关系，那你身为晋国执政，为何不法办赵穿弑君之罪？”一句话驳得赵盾哑口无言，只能拉下面子自贬，弄得赵盾极为难堪。

孔子曾经为赵盾弑君辩诬，说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实际上是多此一举，即使赵盾承认是他暗中指使赵穿弑君，也并不影响赵盾在历史上的改革家地位。再者，春秋弑君之臣多如牛毛，只要大权在握，别人骂几句也少不了一根汗毛，魏晋时代有谁敢指责司马昭弑君，虽然曹髦是司马昭的手下马仔成济干掉的。

不过倒霉的成济被司马昭当成替罪羊扔了出去，被夷三族，赵穿不但没有因为弑君受到半点指责，反而受到赵盾的重用。新任晋侯姬黑臀（晋成公，襄公弟）就是赵穿奉赵盾之命，从东周雒邑给请回晋国即位的。

姬黑臀得到了国君的位子，但依然是赵盾手中的牵线木偶，眼睁睁看着赵盾扩大赵氏宗族的权力，连大气也不敢多喘一口，赵盾的刀可不是吃素的。赵盾应该是吸取了晋灵公的教训，对晋国公族相对放宽了管制，至少姬黑臀可以以晋侯的名义出现在外交舞台上。比如公元前600年九月，姬黑臀在扈地与宋、卫、郑、曹等国元首进行会晤，准备讨伐楚国的马仔陈国。

姬黑臀死在扈之盟会上，从现有史料上看，姬黑臀是得病死亡，和赵盾没有什么关系。但以赵氏家族的势力，姬黑臀再多活几年，也

无法摆脱赵盾的阴影。

如果从公元前622年算起，至姬黑臀去世，赵盾在晋国执政前后长达二十三年，先后克死了晋襄公姬欢、晋灵公姬夷皋、晋成公姬黑臀，可谓三朝不倒翁。

赵盾的年龄在姬黑臀去世时应该五十多岁，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赵氏的七姑八婆都被赵盾安插在晋国的要害部门，赵盾的离世不会影响到赵氏家族的权力控制。

作为晋国的第一权势家族，赵氏家大业大，内部枝叶太多，并非所有人都服赵盾。赵盾的母亲叔隗本不是赵衰的嫡妻，而赵衰的嫡妻应该是晋文公的女儿（即赵姬）。赵姬贤惠明达，把嫡妻的位子让给了狄女叔隗，自己生的三个儿子赵同、赵括、赵婴齐只好委屈做了庶子，让赵盾做了嫡子。

因为这层原因，赵盾的三个异母兄弟对此颇为不满，赵盾为了稳定赵家的内部秩序，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把赵家嫡宗的位置还给赵姬所生的儿子赵括。

嫡宗位置其实只是名义的尊贵，赵盾并没有把自己的正卿实权交给赵姬一脉，将来继承正卿的，只能是赵盾的儿子赵朔。但赵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收买了赵姬一脉，让赵姬一脉的兄弟子侄们以后能围在赵朔周围，共同维护赵氏家族的利益，在必要时，还可以让这些人做赵朔的外围替死鬼。

二八 赵氏孤儿真相

说到英国著名大文豪莎士比亚，人们会下意识地想到出自莎翁笔下的那部千秋悲剧名著《哈姆雷特》，也就是《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用过多介绍，可以说《哈姆雷特》是世界悲剧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其实，在中国的悲剧文学史上，也有一部足以与《哈姆雷特》相媲美的悲剧名作，就是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国的四大悲剧之一，另三部是《感天动地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

歌德们之所以如此垂青《赵氏孤儿》，是因为《赵氏孤儿》的离奇故事性、感人思想性，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人性的真实与痛苦的挣扎，在这部传奇悲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早歌颂赵氏孤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太史公在《史记·赵世家》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发生在春秋中期晋国惊心动魄的一场家族仇杀。故事的确很精彩，自从赵盾专权后，在朝中得罪了很多大员，等到赵盾之子赵朔袭位后，赵家的反对者们开始了残酷的反攻倒算。

春秋史上第一奸臣屠岸贾打响了反赵的头炮，因为屠岸贾是晋灵公的宠臣，赵盾弑君后，屠岸贾就怀恨在心，打着为晋灵公讨还血债的旗号要诛杀赵朔满门。晋景公三年（前597），屠岸贾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擅自率军围攻赵家的政治堡垒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制造了震惊天下、骇人听闻的下宫之难。

在这场血流成河的屠杀中，赵氏成年男子没有一人幸免，只有赵朔夫人赵庄姬趁乱躲在晋宫之中避难，侥幸捡回一条性命。确切地

说，是两条性命，因为赵庄姬的肚子里还有一个胎儿，这就是后来赵氏孤儿的男一号赵武。

虽然赵庄姬是晋成公的姐姐，但性情冷酷的屠岸贾一旦得知赵庄姬怀有身孕，必定要斩草除根，晋景公都很难保住这个还未出世的外甥。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赵家的一位门客挺身而出，决定救赵家少主于危难之中，以报赵朔当初厚待之恩。

这位大侠就是公孙杵臼，他看到赵朔的密友程婴在赵氏受难时没有丝毫表现，愤怒地指责程婴：你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程婴满脸委屈地说，我现在还不能死，要等到赵庄姬生完孩子再做决定。如果生女孩，我会选择以死报友，如果生男孩，我就把他养大成人，为父报仇。

不久后，赵庄姬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程婴激动得泪流满面，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线人捅给了屠岸贾。屠岸贾诛杀赵氏满门数百口，每天都在做噩梦，如果让这个赵家小子长大，屠岸贾还有活路吗？屠岸贾立刻率兵入宫索拿赵家男婴。

已经恐惧到极点的赵庄姬把婴儿放在襁褓里，向天祈祷：“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可能是天意不亡赵氏，这个男婴在乱兵搜拿时居然没有哭，侥幸逃过一劫。

但以屠岸贾的阴险多疑，不搜出男婴他是不会甘心的。公孙杵臼和程婴为报赵朔之德，这次也豁出去了，决定用李代桃僵之计，找个婴儿替赵武受死，以保赵家香火不灭。

公孙杵臼和程婴对赵家忠心不二，但对一户失去男婴的人家来说，他们就是恶魔再世。他们为赵家尽忠，何必拿别人的孩子当炮灰，于心何忍？《东周列国志》说这个婴儿是程婴的亲生儿子，这不过是冯梦龙为了美化程婴编造出来的善意谎言而已。

二人的分工非常明确，由公孙杵臼负责带着假赵家孤儿藏在山中，程婴则假装告密，引来官兵捕拿假孤儿。在这场戏的最高潮部分，公孙杵臼指着程婴的鼻子破口大骂：“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

公孙杵臼明知道官军不可能放过这个婴儿，他还假模假样地哀求官军放过这个婴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公孙杵臼和程婴配合得天衣无缝，官军果然相信了这个可怜的婴儿就是赵武，连同公孙杵臼一同做掉。

赵氏孤儿被杀，皆大欢喜，屠岸贾再无心腹之患，诸将也领到了千金的赏钱，程婴也如愿带着真正的赵家血脉逃往山中避难，开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复仇经历。

十三年后，身患重疾的晋景公突然问大夫韩厥：“赵尚有后子孙乎？”唯一知道赵武内情的韩厥突然大声呼冤，说当年赵武如何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帮助下逃出血海，请晋侯为赵家洗冤昭雪。

晋景公被这个悲壮的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立刻召已经长大成人的赵武进宫。景公授予赵武兵权，允许赵家对屠家反攻倒算，身怀血海深仇的赵武率兵围住屠岸贾的府第，好一通屠杀！“灭其族”，并完全收回了赵家原有的土地。

自赵武收复失地之后，晋国赵氏挺过了家族历史上最危险的一次劫难，从此走向了黄金铺就的康庄大道。特别是在赵武嫡孙赵鞅（大名鼎鼎的赵简子）和曾孙赵毋恤（赵襄子）的打理下，赵氏家族不断壮大，并最终联合韩、魏两家灭掉智伯，瓜分了晋国大权。“三家分晋”，为辉煌灿烂的春秋史画上了一个由鲜血灌注的句号。

因为赵氏孤儿的故事实在离奇感人，再加上司马迁的如花妙笔，所以历代文人歌颂不绝，甚至包括外国著名文豪，所以赵氏孤儿的名声越来越响。

只是可惜的是，这个故事是假的。

司马迁的文笔没有人怀疑，他对写史事业的坚持和坦荡也让后人感动。但有时人们分不清司马迁是在严肃地记录历史，还是天马行空般地虚构小说。

最早质疑司马迁编故事的，是为《春秋》作正义的唐朝大儒孔颖达，自此之后，历代学者十有八九是认同孔颖达观点的，清人赵翼曾经批评司马迁的胡编乱造，“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

众所周知，司马迁写史很注重故事性，比如《项羽本纪》就精彩得让人流鼻血。很少有人怀疑项羽的历史，但对于所谓的赵氏孤儿，后世学者铺天盖地的质疑，让司马迁在地下收到的砖头可以盖三间瓦房……

甚至可以这么讲，在如花似锦的《史记》中，《赵氏孤儿》这一章节是最大的败笔，因为逻辑漏洞实在太明显了，不知道太史公是不是在喝醉的情况下写《赵氏孤儿》的。

质疑《赵氏孤儿》造假，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

《史记·赵世家》说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97年，而《史记·晋世家》则说是公元前583年，出品时间更早的《左传》也记载是公元前583年。《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样记载为公元前583年。如果发生在公元前597年，那么赵氏子弟是绝无可能在此年后还活跃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下宫之难发生于公元前583年。

二、赵庄姬的身份问题。

《史记》说赵庄姬是晋文公姬重耳的女儿，但姬重耳死于公元前628年，距离公元前583年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如果此年赵庄姬至

少四十五岁，似乎不太可能。

如果赵庄姬是姬重耳的女儿，问题来了，赵朔祖父赵衰娶的也是姬重耳的女儿。赵朔娶自己的姨外祖母为妻，祖孙二人成为连襟，这在礼法森严的春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按晋人杜预的说法，赵庄姬应该是晋成公的女儿。

三、赵朔的卒年。

《史记·赵世家》说赵朔被屠岸贾于公元前597年所杀，实际上就在此年，晋楚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邲之战，赵朔作为下军主将参加了这场战役。《史记》没有说下宫之难发生在该年的几月，但邲之战发生在六月，晋军主力回国是在秋季。赵朔在回国后仅三个月就被族灭，也似乎不太可能，屠岸贾需要大量的准备时间。赵朔最后一次出现在史料上是晋齐鞌之战（前589），杜预也认为赵朔不可能活到公元前589年之后。

四、赵氏族灭。

这一条更为荒谬，司马迁说赵同、赵括、赵婴齐都死于下宫之难，可翻查《左传》，直到晋景公十五年（前585），赵同和赵括还闪亮登场。

五、晋景公的态度。

屠岸贾并非晋国大族，哪来的兵权？没有晋景公的支持，屠岸贾是不可能指挥晋军发动政变的。如果晋景公支持屠岸贾族灭赵家，问题来了，难道晋景公就不怕赵氏有后人，将来找自己复仇吗？

身怀六甲的赵庄姬逃进宫中，晋景公肯定是知情的，赵庄姬分娩诞子，时间至少要两三个月，晋景公有足够的时间通知屠岸贾。退一万步讲，晋景公也打算看赵庄姬所生婴儿的性别再决定是否决定杀婴，屠岸贾进宫搜捕时，晋景公完全有条件帮助屠岸贾搜出赵武，但

他并没有这么做。

更让人疑惑的是，从《史记》的记载来看，晋景公对赵庄姬生子并不知情，所以在十几年后，他问韩厥赵家是否有后人。在得到赵武长大后，立刻迎赵武入宫，并付与兵权诛杀屠岸贾。从晋景公的态度来看，他是反对屠岸贾诛灭赵家的。

六、杀死晋灵公的凶手赵穿。

虽然晋灵公是赵盾指使赵穿杀害的，但在屠岸贾拿灵公之死大做文章的情况下，赵穿是必须处死的，否则屠岸贾的这个借口就难以成立。而发生于下宫之难后二十多年，即公元前578年的晋秦麻隧之战中，赵穿的儿子赵旃是新军主将。既然屠岸贾能将赵氏满门抄斩，是绝不可能放过赵旃的。

七、屠岸贾此人究竟存不存在。

《史记》用很大的篇幅描写屠岸贾，但在更权威的春秋史料《左传》中，根本找不到屠岸贾这个人。如第五条所讲，在晋国的世家大族中，并没有屠家，正如孔颖达的质疑，“于时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得如此专恣”。

更离奇的是，无权无势的屠家居然可以在没有得到国君的屠杀令之前，“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屠岸贾哪来这么大的号召力？即使与赵氏不和的栾、荀等大族想灭赵氏，也不可能是由屠岸贾来领头杀人。

八、赵武的生年。

《史记》说下宫之难发生时，赵武还没有出生，即公元前583年。而《左传·成公八年》则记载此年赵武已经跟着母亲赵庄姬藏在晋景公宫中了。

再者，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记载，公元前542年，鲁国大夫穆叔在和孟孝伯的谈话中提到了赵武的年龄，“赵孟将死矣，且年未盈五十。”从此年往上推算，杜预认为赵武应该生于晋景公十一年（前589），时年四十七八岁。《史记》说赵武是遗腹子，纯粹是在编戏文。

以上种种质疑，基本可以判定《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所谓赵氏孤儿是个美丽的江湖传说，屠岸贾、公孙杵臼、程婴三位联合主演都是子虚乌有诸先生。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来自战国以后的野史传闻，喜欢讲故事的太史公自然如获至宝，在此基础上大加演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下宫之难多半属于虚妄，但晋国赵氏家族在晋景公执政时期确实遭到了一场塌天横祸。除了赵武之外，几乎所有的赵氏家族成员被杀，晋国六大卿之一的赵氏险些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晋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权力斗争中，找不到首恶屠岸贾的影子。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首恶，这个人选有些出乎意外，就是《史记·赵世家》中那位可怜的孕妇赵庄姬。

赵庄姬之所以能引爆赵氏家族的血腥内斗，直接的原因非常八卦——赵庄姬和小叔赵婴齐乱伦通奸。

根据《左传》的记载，赵庄姬和赵婴齐做了野鸳鸯，是在公元前587年。以赵庄姬丈夫赵朔的地位，如果赵朔还活着，借给赵婴齐熊心豹子胆，他也不敢给庶兄赵朔扣绿帽子，足以证明赵朔的卒年最晚不会超过公元前587年。

晋国有两个赵姬，一个是晋文公的女儿，嫁给了赵衰，一个是晋成公的女儿，嫁给了赵衰的孙子赵朔。

赵衰妻赵姬为人贤惠明达，自己贵为晋国公主，赵氏嫡妻，却主动把嫡妻的位子让给了赵衰的庶妻叔隗，也就是赵盾的生母，并以赵盾为嫡子。

而这位赵庄姬的脾气性格和姑母完全不同，姬公主水性杨花，对男人有天生的性冲动。在丈夫赵朔死后，赵庄姬不甘床头寂寞，四处找男人，最终，她盯上了死鬼丈夫的叔父赵婴齐。

赵婴齐相貌如何，史无明载，而且年纪也不大，在公元前587年，赵婴齐约四十岁上下。至于赵庄姬，年龄也不大，赵氏发生大难时，赵武时年七岁，按古人早婚的习惯，赵庄姬时年应该不到三十岁。郎有情，妾有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赵婴齐蹑手蹑脚地钻进了侄媳妇赵庄姬香气扑鼻的被窝……

赵家宅子本就不大，夫叔和侄媳通奸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赵庄姬另两位夫叔赵同和赵括的耳朵里，这引起了赵婴齐两位同母兄长的不满。赵同、赵括对赵婴齐早就是一肚子的牢骚，现在赵婴齐独自霸占侄媳妇，赵同、赵括吃不到葡萄，自然是醋火中烧。

赵家三兄弟之间的矛盾主要有两点：

一、当初邲之战时，赵婴齐率后军驻扎在黄河南岸准备船只，赵同、赵括则随晋军主力在前线作战，晋军战败后，赵婴齐不管前线败军，自己划着船逃回黄河北岸，却苦了两位兄长，他们差点做了楚人的俘虏。

二、三兄弟因为生母身份尊贵，所以算是赵氏的嫡子，后来赵盾让嫡时，却把赵氏宗主的位置给了老二赵括，这又让老三赵婴齐灌了一肚子的醋。

自从赵家头牌赵盾去世之后，虽然赵氏依然是晋国的顶级大卿，但势力已经有所削弱，特别是在官场上，赵氏的政敌多如牛毛，比如

已经执政的中军栾书。赵盾当年几乎吃掉了所有的权力大饼，让栾书等人只能啃树皮，现在赵盾已死，正是栾书等人对赵氏进行清洗的绝佳时机。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赵家最应该做的就是“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而不是为了一个女人互相拆台使绊子。但赵同和赵括都是鼠目寸光之徒，他们只考虑眼前的蝇头小利，根本不考虑整体的家族利益。

公元前586年，赵括以赵氏宗主的身份，联合长兄赵同，决定给三弟赵婴齐颁发一张驱逐令：晋国你是不能再待下去了，卷起铺盖去齐国定居吧。

二赵的这个决定让赵婴齐非常意外，在栾书随时准备血洗赵家的情况下，两位兄长怎么可以为了个人私利毁掉家族利益？赵婴齐不想离开晋国，理由是“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

赵婴齐的意思很明白，虽然自己与赵庄姬的通奸确实不合人伦礼法，但仅因为这点小事就要驱逐我，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后果？现在只有我才能镇得住栾书，使他不敢对赵家下黑手，你们把我踢掉，下一个被踢掉的肯定是你。

赵同和赵括是铁了心要扳倒在家族内部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三弟，根本不听赵婴齐的苦苦哀求。留晋无望的赵婴齐耍尽了花花肠子，还是没能说服二兄，只好灰头土脸地告别情妇赵庄姬，前往齐国避避风头。

成功挤走赵婴齐，二赵眉开眼笑，却忘记了一点，他们轰走了赵庄姬最心爱的男人，自己又不能取而代之，他们得到的只是赵庄姬刻骨的仇恨。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老娘要就砸了你们的饭碗。

公元前583年的夏季某日，赵庄姬在晋景公面前揭发赵氏宗主赵

括和其兄赵同欲谋反，“原（赵同的食邑）、屏（赵括的食邑）将为乱，请国君速拿此二贼，为国除害”。

虽然赵庄姬和晋景公是一父所出，但赵庄姬不敢保证弟弟就一定会上她的贼船。为了能最大限度地说服晋景公对赵氏动手，在见晋景公之前，赵庄姬就已经和朝中执政栾书，以及前执政卻克谈好了价钱，赵庄姬敲锣，栾书和卻克敲边鼓，这一次一定要置赵氏于死地而后快。

栾书和赵家兄弟素来不和，这在晋国官场是尽人皆知的。当年的邲之战，栾书主张慎战，不要掉进楚王熊侣挖的……赵同和赵括却主张早战、大战，当场和栾书吵翻天，弄得栾书很没面子。

不仅是栾书，卻氏、荀氏等姬姓大卿同样对赵氏不满，作为异姓大卿的赵盾在晋国执政二十年，把姬姓大卿都挤到了墙脚边，这自然引发了姬姓大卿们的不满。而赵盾死后，赵氏已经没有了主心骨，赵婴齐又逃到齐国，此时不除赵氏，更待何时？

赵庄姬正是吃透了这一点，才和栾氏、卻氏组成了倒赵联盟。赵庄姬在晋景公面前胡扯一通后，栾书和卻克大摇大摆地上场，说老臣愿意给赵庄姬作证。

实际上，栾书和卻克出不出场，都不会影响晋景公做出不利于赵同、赵括的决定，因为他同样对赵氏专权非常不满。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晋景公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侄子晋灵公是怎么死的，晋景公一清二楚。

晋景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赵盾能杀死晋灵公，赵同或赵括同样有可能对自己开杀戒。就凭这一点，晋景公也要拿下赵家，否则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迟早会把人逼疯。

赵庄姬、晋景公、栾书、卻克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却因为一个

共同的目标，鬼鬼祟祟地走在了一起。一切准备就绪后，公元前583年六月，“晋讨赵同、赵括”，这里的“晋”，实际上指的是晋景公和栾书、郤克们的联合势力。

赵盾死后，赵家在军界的影响日渐式微，手上基本无兵，这也是栾书们敢于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关键。虽然《左传》并没有交代这场反赵行动的具体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反赵派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赵同、赵括两支赵氏主脉被屠杀殆尽，一个活口也没有留下，二赵在被杀之前，一定后悔当初把三弟赵婴齐驱逐出境的决定。赵婴齐虽然被轰出了晋国，但祸兮福所倚，赵婴齐侥幸逃过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但赵氏所有的田产都被晋景公赏给了大卿们。

前执政赵盾共有四个儿子，赵同、赵括满门被灭，赵婴齐逃往齐国，还有一支就是赵朔家族。赵朔作为晋国的顶级大卿，家中亲眷少说也有百余口，《左传》没有说赵朔家眷是否在这场灾难中被杀，但从赵庄姬带着年幼的赵武逃进宫中避难来看，赵朔家族也没有避免被屠杀的厄运。

赵庄姬跟赵同、赵括有仇，晋景公等人屠灭二赵，赵庄姬应该是同意的。只是这个女人心肠再恶毒，也不会同意屠灭赵朔一系，毕竟这是她的宝贝儿子赵武的根脉所在。

只有一种可能，栾书们为了彻底消灭赵氏家族在晋国的势力，应该是表面答应了赵庄姬保全赵朔一脉的请求，但在实际行动中将赵朔一系连同赵同、赵括家族一起踢下地狱。

当初威风无限的晋国赵氏家族，现在只剩下赵武这孤零零的一根苗了，万一赵武再出现意外，赵氏就彻底烟消云散了。对于如何处理赵武，史无明载，想必晋景公和栾书、郤克等人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从人性角度看，栾书和卻克是希望杀掉小赵武的，天知道赵武长大后会不会向自己寻仇报复，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但对于晋景公来说，赵武是他的亲外甥，拐弯抹角带着血缘关系，赵庄姬岂能答应自己唯一的儿子被做掉？

另外还有一点，作为国君的晋景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朝中一臣独大的局面，他除赵氏是如此，他防备栾、卻也是如此。晋景公和赵氏素无太深的仇怨，而诛杀赵朔满门，很可能是栾书背着晋景公下的手。留下赵氏的根基，将来可以和栾、卻等大卿形成鼎足之势，什么样的权力才是最安全的，答案只有一个：平衡的权力才是最安全的。

出于这种考虑，在大夫韩厥的极力保全下，晋景公决定还赵氏一个公道，“立（赵）武，而返其田”。

赵武被“立”，有两种解释，一是赵武被立为赵朔一支的宗主，奉其父赵朔之后，二是赵武被立为赵氏的宗主，奉其曾祖赵衰之后。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应该是前者，晋景公只是为赵朔平反，不涉及赵同、赵括、赵婴齐。因为晋景公返还给赵武的田产只是原来挂在赵朔名下的产业，“其田”中的其字，只能是赵朔的田产，赵同三兄弟的田产不可能之前属于赵朔一系。

时年七岁的赵武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血腥的家族屠杀，但自小就在权力场上打滚，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宫廷幕影之下的窃窃私语，灯火照耀下一张张扭曲变形的面孔，这一切都对赵武的性格形成了重大影响。

在赵氏蒙难的三十六年后，即公元前548年，时年四十四岁的赵武正式出任晋国执政。赵武做晋国执政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八年，于公元前541年去世。

在这七年时间里，赵武并没有来得及做太多的事情，历史之所以

牢牢记住赵武，是因为两件事情，一是司马迁连篇累牍渲染的所谓赵氏孤儿，二是发生于公元前546年的春秋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国际大会——弭兵之会。

二九 春秋两兵圣之田 穰苴和《司马法》

说到诸子百家，人们很容易会想到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这些思想博大的风流名士，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各开门户，授徒讲学，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以上提到的这些学术门派，主要是靠笔写，靠嘴说，一代代传承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在诸子百家中，还有一种著名的学术门派，之所以能传承千古，并发扬光大，依靠的并不是纵横驳辩，而是冰冷的刀枪剑戟，通过千百家血与火的融合，才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兵家。

儒、道、法、墨等家争的是政治模式和人性的善恶，没有唯一答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兵家是诸家中唯一有客观答案的，不存在主观感性认知，只有一种冰冷的判断标准：要么胜利，要么失败。

兵家相对来说，是一门比较封闭的学科，儒、道、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主要根植在广阔的社会之中。兵家生存的土壤只有一块面积并不大的固定场所，这就是战场，一群男人为了杀死另一群男人的战场。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兵家，其实这个标准很简单，就像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可以各玩各的一样，有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才可称为兵家。战场上的名将未必是兵家，但兵家的思想理论一定会用在战场上，春秋时代战争频繁，可以称为名将的不在少数，但真正能称为兵家的，只有两个齐国人。

说到千古第一兵家，相信许多人会脱口而出：孙子！作为中国军事理论家的第一人，孙子在军事理论研究上的地位，堪比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不过，孙子并不是春秋时代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兵家，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就是孙子的老前辈，齐国第一名将司马穰苴。

孙子是中国最知名的军事理论家，几乎人人皆知，但在汉朝人看来，司马穰苴比孙子的分量更重，至少司马迁是这么认为的。在《史记》列传中，孙子和吴起挤在了一篇传记里，孙子传记的正文只有五百多字，司马穰苴则单独立传，正文字数是孙子正文字数的整整一倍。而且司马迁对司马穰苴的评价要高于对孙子的评价，司马穰苴虽然在后世的知名度不如孙子，但在当时的江湖地位，是孙子不可项背的。

司马迁推崇司马穰苴，并不是因为穰苴姓司马，穰苴本姓田，而且和孙子是同族，他们共同的祖先就是在公元前672年逃到齐国的陈国公子田完，即著名的田敬仲。田敬仲是齐国名臣，在齐国官场的势力盘根错节，特别是传到田釐子这一代。

田氏野心勃勃，为了收买民心，在收百姓赋税的时候，故意小斗进大斗出，赢得民心无数。齐景公是个老糊涂，对田釐子收买人心威胁齐国姜姓统治的做法视而不见，从而导致田氏势力不断坐大。贤相晏婴对此忧心忡忡，在齐景公面前劝了好几次，老头子一次也听不进去，气得晏婴跑到晋国诉苦：“齐国之政卒归于田氏矣。”

齐景公时代的齐国，虽然勉强保持一线大国的地位，但早已没有齐桓公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气，内忧外患非常严重。齐景公倒是很注重与周边大国的外交关系，但国力下滑，根本无法阻止周边国家对齐国的军事骚扰，特别是晋国。

晋国称霸江湖百年，名将如云，但齐国已经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名

将，经常被晋国一顿暴打，却无可奈何。晏婴给齐景公推荐了一个人选——田敬仲的后人田穰苴。

晏婴向来对田氏子孙保持警惕，想尽办法阻止田氏子孙坐大，但晏婴此次推荐田穰苴，完全是被齐国的衰落国势逼出来的。正如晏婴所说：“田穰苴虽然是田敬仲的庶孽子孙，国君不得不防，但田穰苴文能收揽英雄之心，武能威震强敌，是齐国栋梁大才，国势如此，现在只能重用田穰苴。”

齐景公已经被晋国的军事骚扰弄得焦头烂额，看样子他并不了解田穰苴的能力，只能死马权当活马医，把田穰苴请进宫里，当面测试田穰苴的军事能力。田穰苴没有辜负晏婴的期望，和齐景公一席长谈后，齐景公激动得差点抱住田穰苴大哭，这果然是个百年不遇的军事天才。“（齐景公）大说之，以（田穰苴）为将军”。

相似的场面，发生在二百多年后，困守汉中的汉王刘邦在听天才韩信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后，同样激动得不能自己。不过刘韩会谈是在拜将之后，而且要不是萧何几乎和刘邦撕破脸，逼得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刘邦才懒得搭理韩信这个胯下辱夫。从这一点上讲，刘邦还不如齐景公开明。

田穰苴此时的处境和韩信差不多，虽然都初掌军权，但都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是新人，在军队中没有威望。一个在军中没有威望的将军，是永远不会打赢战争的，田穰苴和韩信都明白这一点。

关于如何在军中立威，韩信采取了从上而下的模式，即在战略上说服刘邦，具体办法就是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果然让刘邦惊为天人。而田穰苴则采取了从下至上的模式，即在军纪上做文章，以违反军纪的名义杀掉国君身边的宠臣，来达到立威的目的。

在不知不觉中，田穰苴给齐景公挖了一个坑，这个老家伙稀里糊

涂就跳了进去。齐景公拜田穰苴为将，是因为西部的晋国和北部的燕国对齐国发起猛烈的进攻，现在是齐景公有求于田穰苴，所以田穰苴给齐景公提了一个要求。

田穰苴直截了当地告诉齐景公，说臣出身卑贱，在军中没有威望，以臣之名望，可能镇不住军队，请国君派出一位有地位的宠臣来做监军，通过这位监军发号施令。齐景公哪知道田穰苴肚里打的什么算盘，便派出他最宠信的大臣庄贾去给田穰苴站台摇旗。

田穰苴在辞别国君时，和庄贾约定，明日正午时分，我与大人在军营辕门前相见，不能迟到。田穰苴应该没有说迟到就军法从事，否则庄贾要是提前来了，田穰苴的戏就演不下去了。

庄贾平时骄纵惯了，并没有把田穰苴夹枪带棒的警告当回事，他不相信就算自己迟到了，田穰苴这个毛头小子敢把自己怎么着。当天晚上，庄贾和亲戚朋友们喝了个烂醉，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中午。

田穰苴当然希望庄贾来得越晚越好，只有这样，他才能杀庄贾以立威。等庄贾东倒西歪地闯进军营辕门的时候，田穰苴早已安排好了刀斧手，但田穰苴不能现在就动手，因为还要给庄贾定罪，动静一定要大，让所有人都看到，这才能起到宣传效果。

田穰苴先是厉声指责庄贾的迟到是严重违反军纪，然后给了庄贾自辩的机会，但这不过是田穰苴的欲擒故纵之计，庄贾说什么，田穰苴都要借他的人头立威。

这是田穰苴刻意安排的剧情，庄贾已经触犯了天条，神仙老子也救不了他。田穰苴有意要把事情弄大，他要让整支军队都看到他的强硬，只有这样，他才能立威，只有立威，军队才能在他的指挥下不断取得胜利。

田穰苴故意把军队司法官叫来，问按军纪规定，迟到者将处以何

种刑罚，军正答当斩，这正是田穰苴要的效果。庄贾虽然派人紧急回宫中向齐景公求援，但还没等齐景公反应过来，庄贾的人头已经悬在军门之上。不仅是庄贾因违反军纪被杀，就是齐景公派来捞人的使者，也因为在军营中驰马受到严惩，驾车的仆人被斩，这是田穰苴故意做给军队看的。

庄贾当着齐军将士的面被斩首示众，这对平时军纪散漫的齐军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这等于田穰苴借庄贾的人头告诉军人们：别说庄贾这样有背景的高官我敢杀，就是国君做错了事，我也照样不当个泡踩，何况你们！

田穰苴的强硬，为他赢得了军人对他的忌惮，从此不敢再军纪涣散。立威的目的是达到了，但立威只是将军赢得军队拥戴的鼎足之一，另外两足是立德、打胜仗。田穰苴深知一点，军纪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如果只强调军纪而忽视了人心的团结，是永远别想打胜仗的。

军队是冰冷的国家战争机器，但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田穰苴非常注重与普通军人拉近感情。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主将对下层军人体贴关心的军队，往往都是战无不胜的，比如岳家军、戚家军等。

战国名将吴起之所以百战百胜，原因就在于吴起与下层军人打成一片，不能说吴起的做法是抄袭田穰苴的，但至少田穰苴早在吴起之前就注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一般来说，主帅只要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就可以了，军中后勤自有专人负责，但田穰苴却直接干预后勤工作。比如军队在行进过程中需要修建营舍、寻找水井、架起炉灶，以及军队的饮食、医疗，都由田穰苴亲自安排，尽可能地让军人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这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效保证。

除此之外，主将还不能在军中搞特殊化，否则就不能服众，主将

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让普通军人相信你。田穰苴从来没把自己摆在普通士兵的对立面，而是和他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弟兄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田穰苴特别注重对老弱士兵的照顾，这一点赢得了很多人的感动。

赢得人心其实非常简单：你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其身正，不令则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田穰苴虽然不是从底层中走出来的，但最终回归了底层，而历史反复证明，往下看比往上看更容易得人心。得到人心，往往就意味着胜利。

田穰苴仅用了三天，就彻底征服了底层士兵，这只能说明齐军内部的等级制度森严是长久以来积累的严重问题，受压迫时间越长，受感动的时间就会越短，这是铁律。当田穰苴下达命令开赴前线时，几乎所有的齐国将士都含泪请战，包括老弱残兵，“争奋出为之赴战”。

齐军士气的空前提升，对企图浑水摸鱼的晋、燕两国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两国之所以敢对齐国动手动脚，就是吃准了齐军军纪混乱，战斗力不强，现在田穰苴突然来这么一手，让两国感觉到难以再占到齐国的便宜，只好仓皇撤军。之前被晋、燕两国抢占的齐国地盘，被田穰苴指挥齐军悉数收复。

这是田穰苴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当田穰苴率得胜之师返回临淄时，齐景公率文武百官亲自出城迎接并慰问犒赏为国立功的将士们。至于已经升为齐国第一名将的田穰苴，在职务上也进一步高升，由将军改任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大司马。田穰苴被后世称为司马穰苴，他所著的兵法被称为《司马法》，典故就源于此。

田穰苴凭军功谋取富贵，天经地义，齐景公并没有滥赏，但让齐景公没想到的是，他的这次封赏，却对日后的姜氏被田氏废黜产生了致命的副作用。

在田穰苴出场之前，田氏在齐国的势力就已经尾大不掉，而田穰

苴的横空出世，客观上不仅帮助田氏在齐国建立比之前更高的威望，更要命的是田氏在军界树立威信，为日后田氏代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不过田氏代齐是在百年之后，和田穰苴本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少田穰苴本人是忠于齐国的。而且田穰苴公私分明，眼里从不揉沙子，齐景公只要提出非分要求，田穰苴照样冷面拒绝。

有一天夜里，齐景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突然窜至田穰苴府邸门前，派人传话，说国君驾到，请大司马准备酒宴，陪国君喝酒。齐景公平时胡吃海喝，和佞臣梁丘据等人厮混在一起，他以为田穰苴是他一手提拔的，自然要上杆子拍他马屁，哪知道却撞到了南墙，碰得头破血流。

田穰苴平时和齐景公没有多少私交往来，基本上以国事为主，而且田穰苴对齐景公“老混子”的做派向来比较反感，他更不会自污其名，和齐景公在一起鬼混。听说齐景公要他接客，这事好办，田穰苴很快就准备好了。

齐景公还在门外伸头踮脚等待田穰苴出来迎接的时候，田穰苴已经全身披挂，扛着大戟，在火把的衬映下，站在大门前“欢迎”齐景公。还没等齐景公流着口水问大司马都为寡人准备了什么山珍海味，田穰苴就劈头盖脸狠抽了齐景公一顿。

田穰苴问齐景公为什么要来找臣，是因为有强敌侵犯边疆，还是有人企图发动军事叛乱？如果都不是，那么，国君找臣干吗来了？齐景公倒是痛快，直说想和将军饮酒取乐，“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将军乐之”。

已经口水直流的齐景公认为田穰苴怎么着也会卖给自己一个薄面，但让齐景公尴尬的是，连这点他认为不是要求的要求也被拒绝了。田穰苴当头砸了老馋猫一棒，而且语出讽刺，拐弯抹角地骂那些

宠臣。“国君喜欢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自然会有人能满足国君的要求，但臣没这个兴趣，国君请回吧。”

齐景公以国君的身份被大臣弄得如此下不来台，脸上自然挂不住，心里也应该记下了田穰苴的这笔“账”。不过此时齐景公还不敢和田穰苴硬顶，真把田大帅惹毛了，田穰苴手上的大戟可不是吃素的。

齐景公骂骂咧咧地离开田府，去找宠臣梁丘据，在梁丘据的府上胡吃海喝，醉得一塌糊涂。估计在席前，梁丘据也没少说田穰苴的坏话，而且齐景公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田穰苴如此不听话，会不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

要知道在春秋时代，大臣杀国君是家常便饭，何况田穰苴还是手握重兵的大帅。而且对齐景公来说，打倒田穰苴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解除田氏集团对姜氏公族的威胁。齐景公当初重用田穰苴，更多的是一种应急策略，对付燕晋侵犯。现在齐国基本渡过了危险期，再留下田穰苴就得不偿失了。

客观讲，齐景公不算是昏君，但也不是什么明君。他不过是齐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总代表，他最需要考虑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齐国的利益，更遑论百姓利益。

齐景公曾经立志要做齐桓公第二，而且他手上的牌面也是相当不错的，文有晏婴清吏治，武有田穰苴定天下。齐桓公时也不过只有一个管仲可堪大事，没有一流的武将，这也是齐桓霸业主要靠政治因素维持的重要原因。

齐景公已经在考虑废黜田穰苴的问题了，和他站在一条船上的，还有鲍牧、国惠子、高昭子这些顶级权贵。老话常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田穰苴不与权贵佞臣同流合污，共享富贵，那就必定会站在这些人的对立面。

鲍牧等人和齐景公之间存在着一个权力互不兼容的问题，但他们又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所以当田穰苴成为利益集团的敌人时，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打掉田穰苴。

撤掉田穰苴大司马的职务，是齐景公以官方文件形式下达的，但这同时也代表着利益集团的诉求，不过撤职命令并没有说是以何种名义。而这一命令对性格单纯的田穰苴来说，无疑是意外的打击，他根本没有想到齐景公会突然来这么一手。

田穰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渴望得到更大的舞台，比如帮助齐国二次称霸，而不仅仅是守住齐国的半壁河山。田穰苴生卒年不详，但他被解除职务的这一年，应该是齐景公三十年（前518），田穰苴此时的年龄应该在四十岁上下，他还有时间，但历史认为田穰苴的表演时间到了。历史，本来就是属于少数人的，任何一个企图闯进宴会分蛋糕的人，都会被愤怒地打倒，无论这个人是否代表更多人的利益。

田穰苴失去了所有权力，被废黜在家，没过多久，郁郁寡欢的司马穰苴含恨离世，一代将星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更耀眼的光芒，就带着遗恨划过天空，堕落在遥远的天际。

齐景公和权贵们以为除掉了田穰苴就能保住权力，可他们却忘记了田穰苴的死，直接导致他们和田氏家族彻底撕破脸皮。田氏家族的旗帜性人物田穰苴被陷害至死，对田家来说，这就是公族和鲍、国、高等族对田家下手的政治信号，他们岂能坐以待毙？

就在田穰苴死后的第三十七年（前481），田氏家族的强人田常通过政变夺得了齐国的最高统治权，并以为田穰苴报仇为名，诛杀田氏认为齐国公族中有能力威胁到田氏的人物，以及鲍、晏等大族，彻底控制了齐国局面，为日后田氏代齐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田氏后人为田穰苴报了一箭之恨，田穰苴可

以瞑目于九泉之下。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田穰苴生前所著的兵法，在一百年后，由战国霸主齐威王田因齐派人搜集整理成册，这就是军事史上有名的《司马法》。齐威王靠着一部《司马法》，以田忌为将，孙臆为军师，“围魏救赵”，大破魏军于马陵，成就了一番霸业，可见《司马法》的分量。

讲田穰苴而不讲《司马法》，就如同讲孙子不讲《孙子兵法》一样，田穰苴的一世英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传世的《司马法》带来的，下面用一定篇幅讲一讲《司马法》。

《司马法》，又称为《司马穰苴兵法》或《军礼司马法》，共五篇，是宋朝刊定的《武经七书》之一。这部兵法虽然是齐威王搜集编辑而成的，但田穰苴的遗稿成稿时间至少可以肯定在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之前，早于《孙子兵法》的出世，可以说《司马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理论支撑的军事理论著作。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司马法》的篇幅不断缩水，现在流行的通本是五篇，实际上在汉朝时，《司马法》共有一百五十五篇，到了唐朝初年，只剩下“数十篇”，遗失近一半。

而到了北宋末期，“数十篇”都不知去向，仅仅剩下了残存的三卷五篇，遗失数量达到了31:1。不过后人能看到《司马法》原稿的三十分之一，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有些古书连书名也没有留下来，湮没在历史的扑天黄尘之中。

论知名度，《司马法》无法和《孙子兵法》相提并论，但自古以来，许多名将和有志于军事研究的知识分子对《司马法》推崇备至，比如司马迁、唐朝名将李靖、明朝大儒邱濬，都是《司马法》的狂热崇拜者。

李靖曾说《司马法》是兵学之祖，邱濬则认为《司马法》的地位应该排在《孙子兵法》之前，而不是仅排在《武经七书》的第三位。

到了清朝，更有一位狂热的学者汪绂干脆从新排定《七书》次序，拿掉《孙子兵法》，将《司马法》排在第一。

《孙子兵法》是一部单纯的军事理论著作，为了打仗而打仗，更多的谈论战术细节，很少涉及政治和思想。《司马法》虽然字数不多，仅有三千四百字，但涉及门类极广，甚至包含了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精髓，其中有很大篇幅是谈论政治之于军事的重要性。

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对战争的理解往往是“慎战”，轻易不要开启战争，田穰苴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这么一句名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其实这句话就是出自《司马法·仁本篇》。

残存的《司马法》共分为五篇，分别是《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不清楚遗失的那些篇幅都是些什么内容，但从残本来看，《司马法》更像是一部政治军事研究，而不是单纯的作战法则。

从某种角度讲，《孙子兵法》讲的是军事战术，而《司马法》讲的则是军事战略。有些学者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其实就是田穰苴《司马法》的现代外国版，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这两部一古一今、一中一外的兵书，都是从宏观战略角度解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战争的最高目的是什么，相信绝大多数军事家会给出一个相同的答案：以战止战。“以战止战”同样是田穰苴首先提出来的军事政治思想，在《司马法》开篇，田穰苴就道出了战争的本质——用战争消灭战争。

春秋时代的兼并战争，是从来不讲什么道义的，所谓春秋无义战。《司马法》的整体军事思想相对有些“守旧”，体现的是西周时期的战争观，特别强调政治范畴的“仁”，即所谓非义兵不战。宋襄公子

兹甫就是死守着“非义兵不战”的军事教条，结果兵败身死，为天下笑柄。

实际上，田穰苴是最早提出战争分为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的军事理论家，他所说的义与不义的标准，是根据本方的利益立场，而不像宋襄公那样首先尊重别人的利益立场，这是非常愚蠢的。田穰苴所谓的以仁治军，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不是宋襄公那样眉毛胡子一把抓。

田穰苴对正义之战的理解就是杀少数人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包括对他国人民的保护，但对外作战，首先要符合本国的利益。再进一步延伸田穰苴的军事政治理论，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来代替，就是“人权高于主权”。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也不过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幌子罢了。

《司马法》的原文是：“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基础，早在两千五百多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

作为一部兵法，《司马法》谈论具体的作战战术其实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严位》和《用众》，而前三篇讲的都是政治军事，包括军队的思想建设、军纪完整，以及占领道义高地。

田穰苴特别强调“师出必有名”，在《定爵篇》中，田穰苴提出了作战“七政”，即“人、正、辞、巧、火、水、兵”。其中的“正”是指尊重“普世价值”，师出有名，“辞”是指军事宣传工作，要懂得给自己造势，把敌人抹黑成邪恶的反动派，把自己吹嘘成拯救人类的正义大兵。对于田穰苴的这种军事技巧，现代人并不陌生，比如美国就是这么玩的。

有种观点认为《司马法》和《孙子兵法》相比，弱在战术布置，而强在政治工作，并非没有道理。《司马法》反复强调主将重视对普通士兵的思想教育，要和士兵打成一片。

《司马法》的思想体系与儒家思想有相当程度上的重合，比如孔子常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田穰苴同样提出了“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

所谓与下畏法，就是包括主将在内的所有人员都要遵守军纪国法，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军纪国法之上。主将要普通士兵遵守军纪，自己首先要做到，起到表率作用。否则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到？

现在我们提到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会想到一句名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其实这种观点也是《司马法》最早提出的。在《严位篇》，田穰苴认为“三军一人，胜”。从将军到士兵，大家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不成功的。

如何才能做到“三军一人”，田穰苴给出了两条妙计：

一是“凡战胜，与众分善”，如果军队取得了胜利，主将不要贪功，要把功劳记在普通士兵头上，让大家都有蛋糕吃。

二是“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如果军队打了败仗，不管是谁的责任，主将都要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功劳是大家的，错误是自己的。

在《严位篇》的最后，田穰苴告诫军队主将：“让以和，人自洽；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只要主将能做到这两点，人心齐一，将无往而不胜。

三〇 春秋两兵圣之孙武和《孙子兵法》

说完了春秋两大兵圣之一的田穰苴，接下来讲讲另一位春秋兵圣孙子，以及他的千秋名著《孙子兵法》。

上一篇讲到了诸子百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那么兵家的代表人物只能是孙子，虽然田穰苴丝毫不比孙子逊色。

从时间上来看，田穰苴应该比孙子早出世近百年，而且他们是同族，都是田完的后人。孙子之所以姓孙，是因为孙子的祖父田书因功被齐景公这个老混子封在了乐安（今山东广饶），并赐姓为孙。

“孙子”，按现代人的语言习惯，有三种解释，一是儿子的儿子，一是骂人的脏话，一是春秋时代的兵圣孙子。孙子其实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就像孔丘被尊称为孔子，墨翟被尊称为墨子一样，他真正的名字应该姓孙，名武，字长卿。

虽然《史记》有一篇《孙武列传》，但对孙子早期的活动没有记载，不如《司马穰苴传》记载得详尽。关于孙子的出生年月，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据一些学者考证，孙子应该和孔子同时代，但比孔子略晚几年，出生时应该是在齐景公统治初期。

作为田氏子孙，和田穰苴一样，孙子也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公子，这一点，孙子要比韩信幸运，韩信生下来穷得四面不落地。孙子在童年时代享受着作为贵公子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孙子的知识基础应该就是在早期教育时打下的。

可惜好景不长，在齐景公十六年（前532），齐国爆发了著名的“四姓之乱”，齐国的四大贵族，即田氏和鲍氏的利益集团与栾氏、高氏的利益集团大打出手，栾氏和高氏在这场利益之争中战败，只好逃离齐国，去鲁国做了寓公，两家的财产被田氏和鲍氏瓜分。

按道理讲，孙子作为田家子孙，田氏的得势，对孙子在齐国的生存是非常有利的，但年轻的孙子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离开齐国。其实孙子的做法很好理解，田氏在齐国虽然树大根深，但政治斗争向来非常残酷，难说田氏就一定能笑到最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旦田氏栽了，孙子也肯定跟着吃刀头面，所以孙子离开齐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而孙子选择的人生下一站，则是南方新兴的超级大国——吴国，这也是孙子做出的明智选择。在齐国时的孙子，应该已经开始了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孙子渴望用世于江湖，青史留下不朽将名，这就需要一个形势相对平静、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

春秋中前期强盛的国家，除了齐国之外，晋、楚的政局都非常不稳定，各派势力来回厮杀，孙子可不想去当炮灰。至于鲁、宋、卫、燕等中等国家，要么自身实力不济，要么内政乱七八糟，都不是孙子理想的去处。

而选择吴国，大致的原因是吴王僚雄心勃勃，有横天下之志，旗下又有英明豁达的堂弟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夫差的爸爸）、谋算无差的超级谋臣伍子胥，国势蒸蒸日上，但还缺少一名军事主将。对孙子来说，这里就是一个铺满黄金的国家，随时都能找到发财的机会。

孙子南下入吴，对自己的人生至少有两方面的规划：

一、吴国地广人稀，孙子随便找个地方猫起来，都不会轻易被人

发现，这样有利于孙子撰写兵书。

二、等撰成兵书后，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自荐吴王阖闾，成就一番伟业。

由于吴国在春秋早期属于“不毛之地”，开发程度远逊于中原诸国，甚至还不如处长江流域的楚国，经济发展较慢，属于后发国家。吴国除了国都姑苏，实在没有像样的城市，所以孙子很轻易地“偷渡”到吴国，在一处深山老林里安下身，盖了几间茅草屋，没日没夜地研究兵法。

孙子在吴国具体的隐居时间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孙子兵法》就是成书于这段时间。这一点和韩信非常相似，只不过韩信中隐隐于市，成天跟着漂母混饭吃，而孙子则小隐隐于野，利用难得的清静撰写兵法。

据说韩信也撰写过兵法，后来遗失了，不过以韩信光棍般的生存状况，他没有条件拥有笔墨，更不要说能系统地进行军事理论研究。孙子是富家子弟，离开齐国时应该带有一笔不菲的银子，生活上完全没问题，这也应该是《孙子兵法》在他出山之前就能成型的主要原因。

孙子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即使兵法写得天花乱坠，如果得不到君主赏识，也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竹子。在孙子蛰伏吴国的这段时间，他应该没有渠道与吴王阖闾取得联系，阖闾也不知道自己治下有一个军事奇才。

即使孙子见到阖闾，阖闾对孙子也不了解，不会轻易拿吴国的前途命运冒险。韩信自信满满地去投奔项梁，结果只能当个普通卒子，后来又转投刘邦，刚开始也没受到重用。

要不是丞相萧何拼了老命推荐韩信，刘邦是不可能重用韩信的，

萧何在韩信拜将的过程中起到了吹喇叭的宣传作用。虽然是人才，但在与君主没有交情的情况下自荐和通过君主身边最亲信的大臣力荐，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孙子要想阖闾重用他，只能先认识阖闾身边的重臣，由这位重臣力荐入阁，这才是最有效的办法。阖闾身边有许多大臣，有两位是阁臣之首，一位是大夫伯嚭，一位就是伍子胥。伯嚭是佞臣，以溜须拍马为能事，孙子自然指望不上这种人，他只能通过伍子胥。

关于伍子胥是如何认识孙子的，没有史料记载。不清楚孙子是否像南朝刘勰那样，双手高举《文心雕龙》文稿，在夕阳如血的黄尘古道边，跪在宰相沈约的车马前，从而引起沈约对一代文才的惊叹。还是伍子胥在山中闲逛，发现一间草屋，一位书生正在用力削着竹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孙子在吴国隐居的时间相当长，孙子一个人把兵法十三篇削刻成书，没有几年的工夫是肯定做不到的。

伍子胥很注重人才梯队建设，他手下应该有一个专门寻找人才的机构，这些人四处撒网捕鱼，终于有人把孙子的情报搞到手，然后交给伍子胥。伍子胥亲自考察，发现孙子果然是军事奇才，和孙子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只是暂时没有将孙子推荐上去，所以对于孙子，“世人莫知其能”。

伍子胥将孙子隐藏起来，估计和当时的吴国政治局势有关，吴王僚虽然不是昏君，但和公子光相比，还是逊色了些。伍子胥最中意的吴王人选还是公子光，而且伍子胥和公子光私交非常好，早就暗中穿了一条裤子，密谋政变。所以伍子胥在公子光发动政变夺位之前，一直让孙子生活在真空中，几乎没有任何闲杂人等知道有孙武这个人，甚至连公子光也蒙在鼓里。

直到阖闾收买的刺客专诸在鱼中藏剑干掉了吴王僚后，逐渐巩固统治地位，伍子胥才开始运作孙子出山入阁的事情。阖闾和伍子胥的

搭配，非常类似于齐景公和晏婴的组合，国君大权独揽，而伍子胥和晏婴都是首席阁臣，但身边都缺少军事主将。晏婴主动向齐景公推荐了一代名将田穰苴，而伍子胥也在一个合适的场合，隆重向吴王推荐了孙子。

阖闾有意对外用兵，称霸天下，经常和伍子胥讨论兵家攻守。阖闾是军事外行，非专业人士，他非常迫切地想得到一名军事天才，就像齐景公得到田穰苴一样，伍子胥便趁机向阖闾推荐了孙子，以及孙子已经成型的《兵法》十三篇。具体时间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此事发生在阖闾即位的第六年（前509）之前。

伍子胥荐孙子，和萧何荐韩信非常相似，萧何在刘邦耳朵边絮叨了半天，刘邦也没听进去，阖闾也是一样，毕竟他不了解孙子。伍子胥几乎说得口干舌燥，口吐白沫，“七荐孙子”，阖闾还在认为伍子胥这是打着荐贤的旗号来捞取政治资本。

不过伍子胥毕竟是吴国首席重臣，他的面子一定要给，刘邦最后也是被差点翻脸的萧何逼到了墙脚，才勉强见韩信。阖闾答应了伍子胥的请求，对孙子进行实地考察，从这一点上看，阖闾还不如刘邦痛快，先拜将后考察，伍子胥的面子还是没有萧何的大。

孙子抱着一堆竹简，在伍子胥的小心指引下，走进了吴王宫的大殿，吴王要亲自对他面试，只要通过这一关，孙子就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关于孙子见阖闾，《史记·孙子列传》和《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载有些不同，前者并没有记载阖闾对孙子和《兵法》的态度，而后者则记载阖闾对孙子的称赞。

伍子胥此前应该读过孔子撰写的兵法，他对孙子的推荐也着重在兵法上，所以阖闾开门见山地“召孙子，问以兵法”。任何一支善于作战的伟大军队，都会有独立的军事理论支撑，相对于孙子本人，阖闾更看重他撰写的兵法。

孙子将撰写好的兵法呈给阖闾，阖闾则按顺序逐一阅读，阖闾看得非常认真仔细。据吴王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吴王每阅读一篇兵法，都会下意识地大声叫好，脸上写满了喜悦。阖闾已经认为，伍子胥推荐的齐人孙长卿，极有可能是他苦苦寻找的第二个田穰苴。

现在有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孙子的兵法，阖闾赞赏有加，但实战性如何还有待检验，毕竟再完善的理论也需要正确的社会实践来支撑。刘邦就是不相信给项羽看大门的韩信有经天纬地之才，才一再拒绝夏侯婴和萧何推荐韩信的，老话常讲，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

阖闾给孙子出了一个问题，在寡人的面前，你能不能演练一下你的神奇兵法，让寡人开开眼界？孙子敢出来见吴王，就已经做好了所有应试的准备，今天要不露几把刷子，阖闾也不会认他这根大葱。不过孙子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测试方法，就是用吴王宫中的宫女友情出演，让她们以士兵的身份听从他的指挥，大王可以管中窥豹，实地考察臣的军事能力。

阖闾答应了孙子的请求，抽调宫中美女三百人，分为两队，每队由一名吴王宠姬充当队长。既然是军事操练，就得化装换马甲，吴王让人抬出几百副军械盔甲，宫女们嬉笑着穿上盔甲，执剑执盾而立。阖闾告诉他的女人们，今天你们都要听孙大帅的指挥，违者踢到黑屋子里关禁闭.....

几百名宫女服侍一个男人，早就看够了阖闾的那张黑脸，宫中的生活缺乏乐趣，孙子突然来这么一出，宫女们都非常兴奋，难得有这样好玩的游戏。不过这些花枝招展的女人团队别说上阵观战了，就是盔甲剑盾，估计都没见过，在短时间内把她们培训成钢铁战士，这肯定是个笑话。阖闾同意让孙子操练宫女，其实就是想看孙子的笑话。

孙子训练宫女的根本目的，主要是想让阖闾认清军纪对于一个军

队的重要性，同时也是给阖闾一个警告：军纪不严，你就等着收尸吧。孙子“趣味训练”的第一步，就是当着宫女和阖闾的面，申明军纪，“（孙子）告以军法”，其实就是说给阖闾听的。而阖闾同意让孙子操练宫女，已经掉进了孙子事先挖好的坑里，他以为会看到一场喜剧，结果等待他的是一场悲剧。

孙子给宫女们下达了第一道命令：“我敲第一通鼓，你们要振作精神；敲第二通鼓，你们高声前进；第三通鼓，你们按我的要求列成军阵。”孙子口干舌燥地说完，迎接他的，是一阵娇滴滴的哄笑声。甚至孙子亲自擂鼓号令，宫女们依然笑成一团，因为这个游戏实在太好玩了。

孙子突然怒了，“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纓”，几乎是咆哮着喝令宫女们必须听从他的指挥，而孙子得到的，依然是嘲笑。宫女们的反应其实很正常，现在第一次参加军训的学生，也经常会在训练时发生笑场。孙子请求训练宫女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阴谋”，是孙子给自己立威的“牺牲品”，所以宫女们频频笑场，是孙子希望看到的场面。

果然，孙子大怒，问站在身边的军法官，三令五申而士兵不听话的，该受到何种处罚？孙子得到了他想听到的答案——斩！孙子的胆量确实让人佩服，他以一个新人的身份，居然敢对吴王最宠爱的两位宠姬队长开刀，因为这两位美女队长治军不严，所以当斩以镇服士卒。

等台上的阖闾发现中了孙子的诡计时，已经来不及了，阖闾看到地上两个血淋淋的人头，也顾不上爱贤的名声了，气得对孙子跳脚大骂，仿佛市井泼皮一般。不过孙子的反驳很有道理：我现在是将军，就有军纪执法权，对违反军纪的执行军法天经地义。“臣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

阖闾的愤怒还写在脸上，但操练场上的宫女们已经被血淋淋的人头吓住了，没有人敢再嬉皮笑脸，孙将军令旗所指，无不景然而从。“左右、是进退、回旋、规矩、不敢瞬目。二队寂然。无敢顾者”。孙子杀鸡给猴看的战术果然奏效，他连吴王的爱姬都敢当场宰掉，何况你们这群虾米！

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样，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孙子的兵法十三篇博大精深，但军纪是一支军队的灵魂。所以孙子操练宫女并不是演练自己的战术，而是向吴王说明军纪的重要性，这和田穰苴杀庄贾立威的效果是一样的。

阖闾还在为失去两位美女而愤怒，也懒得再看宫女操练了，勉强应承了孙子几句好话，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善用兵，可以称霸天下，但寡人现在对你没兴趣了。气得孙子差点指着阖闾的鼻子大骂：“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实。”

孙子操练宫女，以及和阖闾的争执，伍子胥应该是在场的。史料上没有记载伍子胥对孙子杀宫姬的态度，但以伍子胥的为人做派，他是非常支持孙子的，何况孙子能站在阖闾面前，本来就是伍子胥强力推荐的。想必伍子胥对阖闾说了不少孙子的好话，至于损失了两个宫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大王还缺少美女服侍吗？

这是一个辩证的逻辑问题，没有孙子为将，吴国对外扩张的势头必将受到强敌武力遏制，甚至有可能被强敌灭掉。两美女与天下霸业，孰重？

伍子胥已经警告过阖闾：“大王虔心思士，欲兴兵戈以诛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诸侯，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以阖闾的胸怀与智商，当然能拎得清利害轻重，所以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

吴国最高统治系统的三驾马车格局最终确立：阖闾为王，伍子胥

为相，孙武为将，天下莫能与之争胜！

不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史记·孙子列传》对孙子拜将后的事迹几乎是一笔带过，仅仅一句“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就把孙子给打发掉了。而《春秋左传》对阖闾兵变、争霸的事迹有大量记载，却很难找到孙子的名字。只有成书时间最晚的《吴越春秋》零星记载了孙子为将后的一些事迹。

《史记·孙子列传》所说的孙子“西破强楚，入吴”，实际上是指发生在公元前506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柏举之战，而这场春秋末期的著名战役，吴军之所以获得最终的胜利，孙子“与有力焉”。

这场战争的背景，是新兴的吴国与传统强国楚国对地缘战略空间的争夺，也就是抢地盘。楚国强大时，周边的小国如蔡、唐都对楚国奉行一边倒的政策，但吴国兴起后，不停地给楚国找麻烦，双方就此结下梁子，经常大打出手。

这场柏举之战，是春秋二百多年为数不多的名战之一，也是春秋争霸战中的倒数第二场，最后一场就是越王勾践灭吴。柏举之战的影响非常大，曾经威赫天下的楚国轰然倒塌，逼得忠臣申包胥哭倒于秦墙之下，贤愚之君，忠佞之臣，勇怯之将，悉数登场，双方用智用力，过程极为精彩，所以将单独列一篇详细解读。

至于随后申包胥哭墙七日，引来秦军助楚，吴军连败于秦军，但这不会影响孙子作为一代兵圣的光辉形象。吴军是在远离本土几千里之外的异国作战，有一个后勤保障的问题，而且吴军连战大捷，锐气已用尽，败几场并不丢人。正如伍子胥所说：吴虽败，于吴未有大损，没损失多少兵力，耻辱个毛？

孙子其实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伍子胥替孙子遮羞，孙子也知道如何下台阶。这两个伟大的男人互相吹喇叭拍马屁，孙子一方面给自己圆场，一方面吹捧伍子胥：“我们此次伐楚，战略目标就是杀进郢

都，赶跑楚王，并由伍大夫开发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做到这几点，我们不算失败。”

伍子胥更有趣，顺着孙子递的杆子往上爬，大言不惭地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大臣能屠戮国君的尸体，我做到了，然后一阵仰天狂笑。嗯，很不错，很和谐的局面。

在这场轰动天下的柏举之战后，孙子渐渐从史籍中消失了，死在哪里，卒于何年，史籍中没有记载。有一种说法认为孙子卒于公元前470年，即吴王夫差在位第二十七年。此时的伍子胥依然是吴国阁臣之首，而夫差又是出了名的好战，以孙子的军事天才，夫差不可能置孙子于高阁而不用。

孙子最有可能的下落，应该是归隐山林，无疾而终，在人间留下了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以及传诵千古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说，人生一世，能得其一就已经非常完美了，而孙子做到了立功、立言，此生无憾。

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定要在春秋时代挑出两个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孔子和孙子是最有资格入围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不必多言，《论语》几乎是人人皆知，而《孙子兵法》对历代战争的影响力又可谓空前绝后。

《孙子兵法》在北宋人编列的《武经七书》中名列榜首，成为军事研究人员的必读书籍。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兵法十三篇，是三国枭雄曹操重新整编过的，之前的《孙子兵法》也称为《吴孙子兵法》，以区别另一位孙子，即孙臆的兵法，共有八十二篇。

不知道是应该感谢曹操对《孙子兵法》的精彩点评，还是应该谴责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拙劣破坏，“数十万言”的孙武兵法被曹操连删带砍，只剩下了区区七千三百字。当然，以曹操的军事智慧，对《孙子兵法》删砍的标准自然是去其繁芜，取其精华，字字都是珠

玦。

不过由于在孙子之后百年又出现一位大军事家孙臆，而孙臆偏偏也自称孙子，而且也留有一部兵法，以至于后人经常为《孙子兵法》是孙武所作，还是孙臆所作争议不休。

一种最流行的反对声音是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列传》中已经明确提到孙子的兵法只有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却说有八十二篇，另外还有图九卷。

其实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即孙子最先创作的兵法确实是十三篇，而所谓八十二篇是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军事爱好者在十三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说到《孙子兵法》，就不得不讲《孙子兵法》和《司马法》的区别。在上一篇中讲过，《司马法》是多家学说的集萃，而且侧重于讲军事政治，《司马法》的核心是“慎战”，具体引导思想是“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孙子兵法》虽然在开篇也讲到了慎战的问题，《计篇》第一句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还有，孙子也说过“道、天、地、将、法”五事，即“经之以五”，这属于军事战略范畴，在《孙子兵法》中并不常见，当然这不是说孙子不重视政治之于军事的重要性。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孙子当然知道这一点。

如果用一句最简明扼要的话来高度概括《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只有四个字：兵不厌诈！即《孙子兵法·始计篇》提到的“兵者，诡道也”。

如果说《孙子兵法》对中国军事思想史的最大贡献，也莫过于“兵不厌诈”的提出。甚至肉麻地讲，“兵不厌诈”思想的出现，对中

国历史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一举打破上古至春秋中前期所谓仁义之战的思想束缚，虽然孙子本人并没有说出“兵不厌诈”这四个字。

孙子对“兵不厌诈”战术思想的具体理解是：“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说到春秋仁义之战，自然会想到宋襄公子慈甫在泓水之战时出的洋相。其实在春秋中前期已经出现了兵者诡道的军事思想，但宋襄公死守教条，自以为有仁义之战，天下可胜，结果成为千古笑柄。

受西周“儒家”思想的影响，春秋中前期还在恪守仁义教条。但春秋晚期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政治形态已经明显与中前期有所不同，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战争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礼崩乐坏”的进一步加剧，各国之间的战争也开始无所不用其及，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孙子“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开始逐渐占据军事理论界的主流。这种新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即使没有孙子，也会有其他军事家提出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

春秋时代的两大军事家，田穰苴受仁义思想影响较深，所以风格稍显老派，更注重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而孙子作为新锐军事家，思想风格比较新潮，更注重实际利益。孙子在《作战篇》提出了一个震古烁今的观点：“兵闻拙胜，未睹巧之久也！”

孙子明确告诉世人，战争要的是冰冷的结果，不是去享受精彩的过程，只有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才会这么做，比如宋襄公。老话常讲夜长梦多，拖得越久越不利，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争，才是兵家上策。

对于任何一场战争的参与方来说，都存在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

成本问题，孙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孙子的速胜论思想“兵贵胜，不贵久”，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讲的。

特别是打争霸战，战争成本非常高昂，比如“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等开销，就要“日费千金”。即使把战场放在国外，“因粮于敌”，巨大的战争消耗也不是超级大国所能承担得起的。

基于这一点，孙子明确指出：“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军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通过掠夺他国资源来弥补本国的战争消耗，否则一旦陷入战争泥潭，“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有人既要鱼也要熊掌，结果什么也得不到，而孙子的战争思想是：我不可能在猎杀熊的同时去河里钓鱼，与其得鱼（过程），不如得熊掌（结果）。

战争可以说是一场比赛，一支球队踢得比较浪漫激情，另一支球队踢得比较沉闷保守，但他们要的是同一个结果，就是胜利。田穰苴是浪漫主义者，孙子就一定是现实主义者，战争拼尽了国力民力，难道只是要一个绚烂多姿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君主或主将会这么做。

上面讲过，《孙子兵法》和《司马法》相比，更侧重战术运作，但孙子的战术思想还有另外一层范畴，就是谋略的运用。虽然是冷兵器时代，但一味拼力也是不可取的，高明的军事家会用智，包括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去谋取自己需要的结果。

综合来讲，就是《孙子兵法·谋攻篇》的千古名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所谓上兵伐谋，可以用孙子的另外一句震古烁今的金句来解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战争，不仅意味着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热兵器时代的火炮导弹，更包括政治战、经济战、外交战、心理战等不见硝烟的战争，以

使敌人屈服于自己的战略意志为最终目的。在目前已知的中外军事理论中，孙子是第一个提出战略威慑理念的军事家，即使是现代军事的战争理念，实际上也没有超过孙子军事思想的范畴。

因为篇幅的原因，博大精深的战争宝典《孙子兵法》就不多讲了。如同孔子凭借一部《论语》赢得万世师表的地位一样，孙武凭借一部《孙子兵法》，也赢得了中国军事学鼻祖的地位。

孙武的下落是一个历史之谜，但根据《史记》和《三国志》的记载，孙子有两位非常知名的后人。一是战国时最负盛名的军事理论家孙臆，一是守住三国鼎足天下，被陈寿称为有“勾践之奇”的吴主孙权。

三一 吴楚柏举之战

在前文中，曾经提到过孙子在吴国任将以来最为辉煌的一场战役，这场战争不仅奠定了吴国的东南霸业，也奠定了孙子千古名将的地位，这就是春秋史上有名的吴楚柏举之战。

说到吴国，虽然吴王在周王室内部的爵位排列仅仅是子爵，但要论起血统，却是齐、楚、秦等异姓诸侯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因为吴国始祖太伯是西周开国君主周文王姬昌的嫡亲伯父，吴太伯是周太王公亶父的长子，姬昌的父亲季历是太王幼子。

如果按嫡长继承制，吴太伯是应该继承太王权位的，但因为三子季历贤明，而且最要命的是，太王特别喜欢聪明可爱的孙子姬昌，早有打算把位子传给季历一系。

吴太伯知道自己没有希望继承父位，一赌气，和二弟仲雍离开岐山，前往东南方向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与当地的千余家荆蛮打成一片，荆蛮人“义之”，便拥戴吴太伯做了老大，号称句吴。

吴太伯是光棍一般去句吴的，所以他必须对荆蛮人表示自己的诚意，从荆蛮之俗，“文身断发”。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国的姬氏子姓与中原的姬周王室已经没有什么来往，中原人也以荆蛮视之。

吴太伯虽然建立了句吴国，但实际上吴国的王室子孙都是吴太伯的二弟，即仲雍的后人，因为太伯无子，所以仲雍继位称王。吴国地处偏远，经济非常落后，直至传到仲雍的第十九代孙姬寿梦，情况才有所改观。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为和重臣子反不和，绕道晋国来到吴国，帮助吴国训练军队，特别是战车部队的组建，使吴军的战斗力急速提升。

随后吴国开始和中原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晋国出于制衡楚国东翼的战略需要，也开始大规模援助吴国。吴国有了雄厚的本钱后，野心不断膨胀，开始对楚国动手动脚。在寿梦时代，吴国只是处在大国崛起的初期，还没有能力对楚国进行战略威胁。不过寿梦虽然在历史上没什么知名度，但他有一个名气非常大的儿子——挂剑践义的季节。

季节的侄子姬僚（即吴王僚）即位后，吴国已经初步具备了与楚国抗衡的实力。吴王僚的堂弟公子光兼具雄才大略，经常率兵伐楚，搞得楚国鸡飞狗跳。特别是与楚国有杀父之仇的楚臣伍子胥奔吴之后，被公子光当成活地图，吴国的伐楚之势日渐紧促。

楚国由于昏君楚平王在位，内政乱七八糟，对外基本没有作为，特别在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去世后，楚国更是一片混乱，吴王僚已经嗅到了肉饼的香味。不过他已经没机会张开大嘴吃肉饼了，他的堂弟公子光发动了著名的政变，刺杀吴王僚，自立为吴王。

阖闾虽然得位不正，但他还是继承了吴王僚开展战略生存空间的对外政策，对楚国大打出手。公元前512年，吴国大举伐楚，这也是孙子出山后的第一战，战果辉煌，在第二年，吴国再次从楚国身上咬下两块肥肉，“取六（今安徽六安）与濠（今安徽霍山）”。

楚昭王熊轸可以说是春秋时代楚国最悲剧的一位君主，成王、庄王时代的楚国与晋、齐争雄天下，何其霸气！而熊轸却每天都要面对吴人无休止的军事骚扰，弄得焦头烂额，史称“无岁不有吴师”。

吴国的三驾马车体系已经打磨完成，三人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国势蒸蒸日上，已经成为楚国新的噩梦的开始。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吴国要争霸中原，可以走淮河北上至宋鲁等国，没有必要对楚国动手动脚。

但老话常讲：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现在楚国日渐衰落，如果不及时打掉楚国，等到楚国中兴，就可能对吴国的西线战略安全构

成重大威胁。所以对吴国来讲，就是趁吴渐强、楚渐弱的有利时机打掉楚国复兴的希望。

公元前508年，在伍子胥“多方以误之（即孙子所说的十二条）”的建议下，吴国三巨头合力挖了一个大坑，指使舒鸠人（今安徽舒城附近部落）引诱楚国伐吴，将由大将囊瓦率领的楚国水师骗到豫章，趁楚师不备，将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并巧用声东击西之计，又从楚国身上割下一块大肥肉——占领了军事要塞——居巢（今安徽）。

居巢盘垣在楚、吴、蔡、唐等国之间，这就给吴国交通蔡、唐等国提供了便利。在春秋中前期，蔡国是公认的楚国附庸，毫无外交自主权。现在楚国要完蛋了，蔡国当然要另找一个墙头蹲着，吴国自然是不二人选。

阖闾已经意识到了蔡国的战略调整，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开始和蔡、唐等国进行战略合作。阖闾久有横平天下之志，要实现这个梦想，就必须首先征服楚国，而欲先平楚，必先平蔡、唐等楚国的战略外围。伍子胥和孙子都明确告诉阖闾：“现在楚国军事统帅囊瓦为人贪暴，蔡、唐皆不附，不如趁机伐楚，得蔡、唐而得楚。”

从寿梦时代，吴国就已经制定了从楚国夺取生存空间的大战略，历经数十年的苦战，吴国初步取得了对楚作战的战略先手，现在的形势明显对吴国有利。楚国权臣当道，朝政混乱，阖闾知道，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是时候对楚国发动战略总攻了。

公元前506年，也就是阖闾即位后的第九年，他召开了三巨头会议，与伍子胥、孙子商讨伐楚事宜。阖闾明确说明了他的战略意图：“吾欲复出击梦，奈何而有功？”红线已经划好了，只有怎么打的问题，没有打与不打的问题。

伍子胥和孙子联名提出了一个制楚战略，就是“远交近攻”，即联合蔡、唐两国共同讨伐楚国。吴国的情报系统已经查明情况，蔡、唐二国已经对楚国恨得咬牙切齿，就等着吴国出兵，二国将极力配合吴军的行动。

唐、蔡的宗主国其实是晋国，只是晋国远在中原，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吴国就在楚国东侧，也只有吴国有能力为他们报仇，所以二国很痛快地答应了吴国的条件，三国正式结盟。

在公元前506年的冬天，三国联军宣布对楚作战，不过蔡、唐都是打酱油的，主力还是吴军。这次对楚作战是战略性决战，阖闾也几乎掏出了自己全部家当，“悉兴师”，大致五万人左右，但和楚国的二十万军队相比，还是处在劣势。阖闾是在赌博，一旦输了，就将倾家荡产，对阖闾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零和游戏。

正因为双方实力有差距，所以吴国尽可能地缩小差距，吴军并没有单独在楚国东线与楚国决战，而让唐、蔡两军从楚国北线作战，以二国的那点虾米兵，如果单独与楚作战，还不够楚人塞牙缝的。

唐、蔡地处楚国偏北方向，处淮河之滨，吴军在邗沟（今江苏扬州）乘舟沿邗沟（今京杭大运河的苏中段）北上，然后在今江苏淮安进入淮河，再溯淮西进，与唐、蔡二军会合。

如果舍远求近，吴军也可以要求唐、蔡二军沿着吴军北上的水路顺行南下，在邗沟与吴军会合，再溯长江西上，抵达后来吴楚决战的柏举。吴军舍近求远，应该是吴国最高决策层考虑到了晋国的因素。

在此年的三月，晋国曾经召开了一场江湖武林大会，号召天下诸侯共起而诛楚，但晋国雷声大雨点小，一直没有实质动作。吴国不排除在吴国对楚作战后，晋国会改变战略，派兵与吴国联合作战。这只是一种可能，但吴国不会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晋国身上，指望别人，不如指望自己，这年头没有救世主。

三国军队会战的地点在豫章，也就是现在豫徽两省交界处的淮南山区，紧依大别山区，但这里并不是吴军预定的主战场，主战场在汉水东岸，距离豫章约有二百多公里。

不过吴军似乎并没有渡汉水而击郢都的打算，而只是夹汉水与楚军对峙，因为吴军并没有过河用的大型船只，却带来许多战车。吴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引诱楚军过河，寻找机会歼灭楚军主力。

需要说明的是，吴军从豫章直插至汉水东岸，采取的是跳跃行军方式，绕过三关（即大隧、直辕、襄阨，位于鄂豫两省交界东端），和解放战争中的神来之笔——千里跃进大别山有异曲同工之处。

吴军穿插行军，在战略上非常大胆，但在战术上，是要冒着被楚军穿插至吴国身后“关门打狗”的风险的。吴国三巨头欺楚军主师囊瓦贪暴无能，事实上楚国并非没有军事天才，比如提出对吴军“关门打狗”战术的左司马沈尹戌。

沈尹戌所处的时代，正值吴兴楚衰，以楚国的国力，根本无力阻止吴国的强势崛起，所以他是坚决反对对吴用兵的。公元前518年，楚昭王熊壬不顾国内的上昏下暴，民不聊生，轻率地“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戌就长叹：“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事实也证明了沈尹戌的判断，吴军将楚军打得找不着北，并吃掉了楚国的重镇巢、钟离。沈尹戌再一次作出预言：“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十二年后，吴国果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楚之战，而已经出任大司马的沈尹戌将再一次面对攻势凌厉的吴国。不过沈尹戌这次看清了吴军跳跃式大进军的弱点，就是单兵突进，“顾头不顾腩”，这是很容易被敌人“关门打狗”的。

沈尹戌对囊瓦提出了他的战术对策，即囊瓦率楚军主力在汉水西岸拖住吴军主力，他则率一支精锐部队北上方城（即楚长城，位于豫鄂两省交界处），将吴军停泊在淮河源头的的大量船只悉数烧毁，断绝

吴军归路，并直插大隧、直辕、寘阨三关。吴军被截断后路，军心必然大乱，囊瓦乘时济河伐之，沈尹戌从三关西进，两支楚军逐渐缩小包围圈，将吴军挤成夹心饼干，则吴必亡。

沈尹戌的这条计策非常恶毒，不亚于刘备伐蜀时，蜀从事郑度给刘璋献的“坚壁清野”之计。如果刘璋采纳郑度的毒计，一代枭雄刘备将死无葬身之地，同理，如果囊瓦听了沈尹戌的计策，阖闾、伍子胥、孙子将被一网打尽，所谓吴国三巨头将成为历史笑柄。

可惜沈尹戌一战成名天下知的机会，被两个人给无情破坏掉了。这两位大爷，一位名叫武城黑，一位名叫史皇，时任楚大夫。二人都反对沈尹戌的持久战，要求囊瓦速战速决，不过武城黑只是从战术角度反对，说吴军战车多是木制，而楚军战车多为皮革制成，耐久性差，我们没有与吴军打持久战的本钱。

和武城黑相比，史皇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警告囊瓦：你在楚国的威望本就不如沈尹戌，如果你按他的计策办，功劳全是他的，你被他卖了还替他数钱。大人如果不想替他人做嫁衣裳的话，现在就和吴军作战，不然到时可没地方哭鼻子去。

囊瓦本就不是好鸟，他当然不会坐视沈尹戌吃独食，自己则给沈尹戌看门放哨，傻子才会这么做。这一点，囊瓦远不如刘璋，刘璋只是不忍心百姓受苦，拒绝了郑度的毒计，囊瓦纯粹是出于私心。

现在的形势其实对楚国相对有利，吴军孤军深入，后勤补给非常有限，是最怕持久战的。从吴国的角度讲，楚军越早出战对吴国越有利，毕竟吴军现在士气正盛，一旦拖久了，等士气丧尽，很容易被楚国一锅端掉。

所以囊瓦率楚军强渡汉水，准备与吴军近距离交火，是正中阖闾下怀的。事实也证明了速胜论是错误的，楚军“自小别山至于大别山，三不利”，阖闾三记响亮的耳光抽在囊瓦的老脸上，火辣辣得

疼。

其实吴军放楚军过汉水，并不断向东北方向后撤，边撤边打，是有意让楚国的战斗部队和后勤补给脱节。囊瓦没有发现吴军的意图，反而被吴军牵着鼻子跑，却忽略了后勤补给线越来越长。当囊瓦连续三次被吴军揍得鼻青脸肿之后，囊瓦发现，他的军队已经来到了大别山脉东麓的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

这里就是吴楚两军的决战场，时间是公元前506年的十一月十八日。说是决战，其实战斗意志更为强烈的是吴国军队，之前的三战三捷极大地提升了吴军的士气，而楚军则萎靡不振，虽然人数相对多于吴军，但早已经成了一盘散沙。甚至连囊瓦本人都打算弃军逃跑，被史皇及时劝住了。

这场意料之中的吴楚决战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到来了，按道理讲，身处前线的吴国三巨头是最有条件创造历史的，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在这场决战中最出风头的，却是之前非常低调的阖闾的弟弟夫概王。

面对军心涣散的楚军，阖闾的应战策略是稳中求胜，不急于和楚军决战，相信这也是伍子胥和孙子的意思。不清楚楚军此时还有多少兵力，但从阖闾的稳妥来看，楚军总人数至少要比吴军多出一倍以上，因为这符合孙子兵法的“不若则能避之”。

吴国三巨头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所以为人处世相对沉稳保守，但对于年轻气盛的夫概王来说，楚军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战斗力，此时不灭楚，更待何时。夫概王对阖闾说得很清楚：“楚王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

夫概王敏锐地发现了楚军最大的问题：囊瓦在楚军中的威望已经丧失殆尽，吴军应该擒贼先擒王，只要拿下囊瓦，楚军余部将不战自溃。夫概王的担心应该还包括一点：如果楚国及时换掉没有人望的囊

瓦，改由人气高涨的沈尹戌为主将，吴军面对的可就不再是一块肥肉，而是一块硬骨头了。

当阖闾谨慎地拒绝了夫概王的请求后，夫概王对此十分不理解，哥哥的脑袋莫非被驴踢了，放着肥肉不吃，等着啃硬骨头？夫概王对阖闾的决定非常不服，他可能还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此时不战，等阖闾等人吃掉楚军后，自己将得不到任何功劳，这对夫概王在吴国内部树立威望是致命的打击。甚至不排除夫概王有将来取阖闾而代之以野心，而阖闾拒绝夫概王的请战，也不排除阖闾有这方面的考虑。

夫概王不想放弃这个一战成名的机会，他退出大帐后，和心腹人谈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夫概王当然不会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以免授人以柄，他打着君臣大义幌子，说什么今天就算我战死了，只要我军能灭楚，也是划算的买卖。实际上以楚军现在半死不活的情况，夫概王战死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夫概王在没有征得阖闾同意的情况下，私下率领本部五千精锐出营，风驰电掣般地闪击正乱成一团的楚军囊瓦本部。楚军现在完全没有了当年楚庄成横平天下时的霸气和强悍，在夫概王眼中，貌似强大的楚军只是一个泥足巨人，轻轻一戳，就倒了。

根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吴军是役大胜，赚得盆满钵溢，“子常（即囊瓦）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之前多嘴饶舌的狗头军师史皇死在乱军之中，而曾经威风八面的楚军大帅囊瓦被夫概王打成了光棍，鬼哭狼嚎般地逃往郑国避难去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将，囊瓦倒是拔脚溜了，而本就军心涣散的楚军成了一堆无头苍蝇。出于本能，数万楚军士兵乱轰轰地朝着东南方向的楚都郢溃逃，而对吴军来说，放在眼前的肥肉，傻子才不会去吃。

阖闾嗅到了一股浓厚的腥味，也顾不得责备夫概王擅自出兵，指挥剽悍的吴军跟在楚军后面连扑带咬，一路鸡毛乱飞。楚军在前面乱窜，吴军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清发水（今汉水支流涇水）的东岸。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在这场春秋军事史罕见的大追杀中，居然没有伍子胥和孙子的出场记录，而大出风头的，还是柏举之战的头号功臣夫概王。

阖闾的军事指挥艺术不如夫概王，阖闾只想着吃肉喝汤，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孙子兵法·军争篇》提到的“穷寇勿迫”，即穷寇勿追。楚军的指挥系统彻底崩溃，但不可忽视的是，楚人的剽悍性格，一旦吴军把楚人逼急了，楚人完全有可能反过来狠咬吴人一口，千万不要低估楚人的血性。

夫概王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劝止了阖闾准备对楚军发起总攻的命令，他的理由是：“困兽犹斗，况人乎！若（楚人）知不免而致，必败我。”楚军现在准备渡过清发水继续西逃，如果吴军逼人太甚，就有可能迫使楚人背水一战，会在瞬间迸发出强大的求生欲望，这对吴军是非常不利的。

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夫概王出了一条妙计，我们暂时不对楚军发起总攻，让楚人抢渡清发水，等到楚人“半渡”，前后两军拥在一起时，我们再收网捉鱼，必能获大利。

一百多年前著名的泓水之战，宋襄公面对正在渡河的楚军，死守所谓不伤二毛的迂腐教条，等楚军完全渡过泓河列好阵形，宋军再发起进攻，结果被楚军吃掉。夫概王应该知道这个典故，他的“半渡而击”之计，明显借鉴了宋襄公的教训。只不过泓水之战时楚军在渡河迎战，此时楚要渡河逃跑。

事实再一次证明，夫概王不仅是出色的战术大师，更是一位出色

的心理学家，他已经完全吃透楚国残兵的心思——无主恋战，趁早回家。所以结果也再一次让夫概王大出风头，等楚军乱哄哄抢渡清发水的时候，吴军突然在后面捅了楚军一刀，楚人死伤惨重。

最可笑的是，当楚军再次跑了一段距离，发现吴军没有追上时，气喘吁吁地埋锅造饭。可当饭香四溢时，突然发现吴军已经杀到眼前，可怜的楚军将士饿着肚子撒开脚丫四处逃窜，吴军弟兄们扔下刀戟，端起香喷喷的米饭，甩开腮帮子胡吃海喝……

胜负已经毫无悬念，楚军完全丧失了死战的勇气，接连被吴军追上暴打，“五战，及郢”，在不知不觉间，吴军已经杀到了楚郢都的城门之下。

楚军主力都被囊瓦糟蹋光了，郢都中不会有太多的守城力量，楚昭王熊珍已经没有任何可能阻止吴军进城。他现在有两条选择，要么投降，要么出逃。不过当熊珍听说伍子胥就在吴军阵中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因为熊珍知道父债子还的道理，父亲平王欠伍家的血债，当然要由他来偿还，如果落在变态的伍子胥手上，他会死得非常难看。

熊珍卷起金银细软，拉上两个妹妹以季芊、界我，窜上船，朝着睢水方向疯狂逃窜，这一天是公元前50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天，吴军耀武扬威地进入已经不设防的皇皇郢都。

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见，已经兴奋到极点的阖闾大王会在郢都的楚王宫中大设庆功筵席，君臣们喝得烂醉如泥，特别是伍子胥凄厉的哭喊声音。拿下郢都之后，吴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全境搜拿楚王熊珍，特别是伍子胥的意愿尤其强烈，虽然伍子胥在进城之后，就刨开了楚平王的坟头，将尸体拖出来，狠狠地抽了三百鞭子。

楚昭王熊珍为了躲避伍子胥的追杀，满世界乱窜，在云梦泽的泥沼地里还受到了一伙来历不明的强盗的攻击，差点丧命当场，最后勉

强逃到随国避难。

虽然阖闾派人来随国要求把熊珍交出来，但随国拒绝了吴国，理由是楚随两国曾经签订盟约，随有难，楚庇之；楚有难，则随庇之。今日之事，随宁可与吴死战，也绝不能背约，为天下不齿。阖闾也意识到，以吴国现有的国力，是很难鲸吞楚国的，甚至他已经预感到楚人的复国力量，与其和楚国死缠到底，不如卖个人情给随国，也就不再索要熊珍。

关于楚国复国，一个最精彩最感人的典故，就是楚臣申包胥哭倒秦墙之下，请来秦国救兵，打退士气正盛的吴师，成功挽救了当年横行天下的南霸天楚国。而此次吴破郢都，也是楚国历史上除了被秦始皇一举拿下之外，唯一一次亡国经历，教训可谓惨痛。

吴军被多管闲事的秦军敲打了一顿，称霸步伐有所放缓。但一个既成事实是，吴国已经成功取代了楚国，成为新一代南霸天，也奠定了吴国在未来几十年内的超级霸主地位。

不过有一点，吴国的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与吴国相对狭隘的胸怀有些不相匹配。有件事情阖闾做得比较过分，为了报复楚国曾经对吴国的打压，在占领郢都之后，吴国君臣对没有来得及逃出去的楚国君臣的夫人进行集体奸淫。

楚昭王的夫人被阖闾霸占，阖闾在这个女人身上尽情发泄征服的快感。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权臣囊瓦的老婆，以及沈尹戌的老婆，被伍子胥、孙子、伯嚭三人打包。三男两女在榻上尽情肉搏，真是无法想象，伍子胥和孙子这样等级的江湖精英会如此放荡。

三二 伍子胥复仇记

接着上一篇讲吴国的话题。

在柏举之战中，最出风头的是阖闾之弟夫概王，但这并没有改变吴国高层三驾马车的权力分配格局，即阖闾为君，孙子为将，伍子胥为相。

说到伍子胥，肉麻地讲，他是春秋历史上不世出的奇男子。伍子胥的传奇人生经历，举家遇害、仓皇逃难、历尽艰险、偶遇明主、策划政变、为父报仇、辅佐少主、含冤而死，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春秋三百年，风流人物不可计数，也找不出第二个伍子胥。

伍子胥在春秋史上的地位，有些类似王猛在十六国史上的地位，都是位居一人之下，一肚子的“阴谋诡计”，为他们的君主成就一方霸业立下不可替代的奇功。

如果单论家世，诸葛亮和伍子胥还有一拼，都是名士大夫之后，而王猛祖上八辈贫农。伍子胥祖上有史可考的，就是春秋霸主楚庄王身边的直臣伍举。

伍举不仅是楚庄王时代的名臣，在楚灵王时代，伍举依然敢于直谏，深得楚王赏识，史称“伍氏三世为楚忠臣”。由于伍举打下了坚实的底子，伍氏家族在楚国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伍子胥作为贵家子弟，在权力私有化的时代，是很容易在官场上捞到一个肥差的。伍子胥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就是伍尚，但伍尚为人“慈温仁信”，刻薄地讲，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而伍子胥在父亲伍奢眼里就是一块稀世珍宝，伍奢曾经当着楚平王的面称赞伍子胥：“胥为人，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治邦国，武定天下！”

更为重要的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太子熊建（以下皆称太子建）的师傅，私交非常好。可以想见，等太子建继位后，伍子胥肯定会坐直升机飞进官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只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太子建距离大位越来越远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场可怕的政治变故。不仅太子建的政治前途尽毁，还把伍家拉下了水，本来有机会成为楚国第一政治家族的伍家家破人亡。

问题出自太子建的少傅（排名次于伍奢的太子师傅）费无忌身上，费无忌是春秋时代著名的奸臣，和后来吴国的大奸臣伯嚭号称两大亡国祸水。

跟着太子建，费无忌自然有肉吃，但费无忌前面有一个伍奢挡道，太子建也是重伍轻费。也就是说，费无忌在将来的楚国政治格局中只能屈居伍奢之下，这是费无忌无法容忍的。

为了能在政坛上获得更高的位置，费无忌挖了一个政治陷阱，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太子建、伍奢父子一起推进坑里给活埋了，而且骂名还由楚平王背着。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费无忌利用在秦国给太子建物色老婆的机会，把本属于太子建的秦国美女送给了楚平王。太子建平白丢了老婆，自然对费无忌非常恼火，费无忌就趁机在楚平王面前煽阴风点鬼火，说太子建因为秦女被夺，对大王有怨恨之心，劝楚平王废掉太子建。

此时的太子建并不在郢都，而因为受到费无忌的谗言，再加上母亲蔡氏无宠，被贬到了城父（今河南宝丰东）居守。这又给费无忌构陷太子提供了机会，说太子建阴谋勾连诸侯，企图杀父自立。

其实费无忌真正的目标，不止是要除掉太子建，伍奢和他最贤明

的次子伍子胥，都上了费无忌的黑名单。在伍奢被陷害下狱后，楚平王威逼伍奢写信把伍尚、伍子胥召到郢都来，即可免死，被伍奢拒绝。楚平王够阴毒的，他派使者去找伍氏兄弟，说我已经赦免了你父亲，并给你们兄弟加官晋爵，快来郢都履新上任吧。

伍尚为人老实，没看透楚平王的花花大肠，以为天上掉馅饼，准备张嘴接饼。楚平王是个什么货色，伍子胥再清楚不过，他反对前去郢都送死。伍子胥说得很明白：父亲在楚王手上做了三年人质，之所以不动手，就是因为我们还落网。一旦我们去郢都，楚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必死。

人质的价值就在于绑匪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旦收到赎金，就有可能撕票灭口，也有个别善良的绑匪，但楚平王显然不在此列。在伍尚的坚持下，他决定在明知有去无回的情况下去郢都陪父亲受死，而伍子胥则选择逃亡。

在伍尚看来，唯一有能力在日后为伍家报仇的，只有伍子胥，而伍子胥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更要命的是，伍奢同样是这么认为的。在得知伍子胥已经逃亡的消息后，伍奢在刑场上幽幽地说了一句：“楚之君臣，且苦兵矣。”这话是说给楚平王、费无忌等人听的，放跑了伍子胥，你们以后就等着吃刀头面吧。

伍子胥性情刚烈如火，是典型的江湖豪侠性格，奉行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那一套，和三国头号蛊惑男法正是同一类人物。在父兄被杀后，伍子胥的人生目标就是复仇。伍子胥在长江边痛哭流涕：“楚王无道，杀吾父兄，愿吾因于诸侯以报讎矣。”因为太子建已经出逃，伍子胥决定去寻找太子建，在路上遇到了好友申包胥。伍子胥咬牙切齿地告诉申包胥：“父母之讎；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与同域壤壤；朋友之讎，不与邻共乡里，今吾将复楚辜，以雪父兄之耻！”

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楚平王废太子事件，几乎就是当年晋国骊姬之乱的翻版。只不过太子建并没有像姬申生那样自杀，而是学着姬重耳四处流浪，但太子建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应该相信晋顷公让他帮助灭郑然后把郑国分给他的鬼话。郑定公和宰相子产可不是省油的灯，在人家的地盘上想以客易主，谈何容易。

太子建不出意外地被干掉了，却把伍子胥给害苦了，想必太子建与晋顷公的密谋没有告诉伍子胥，但在郑定公和子产看来，伍子胥不可能洗脱干系。为了活下去，为了心中那个伟大的复仇理想，伍子胥背着太子建的幼子熊胜，狼狈逃离郑国。

至于伍子胥下一站避难所为何选在吴国，结合伍子胥说过要“因于诸侯以报讎矣”来看，应该是伍子胥认为吴国与楚是世仇，而且国势渐盛，至少吴王僚有意愿帮助自己灭楚复仇。

在去吴国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历史上著名的典故，就是“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其实所谓愁白头是后人美丽的传说，真实的情况是昭关（今安徽合山，当时属楚国）守城官员怀疑伍子胥的身份，派人紧追不舍，如果不是突然在江边出现了一位神秘的渔翁，搭船送伍子胥过江，伍子胥和熊胜早已经成了刀下之鬼。

伍子胥最让人尊敬的一点，就是恩怨分明。渔翁救了伍子胥一命，伍子胥感激涕零，把价值百金的佩剑送给渔翁，不过被渔翁婉言谢绝了。有人常说，捍卫社会道德底线的往往在民间，此言不虚，比如漂母用一饭救了韩信，并给了韩信奋发图强的勇气和自信。

有意思的是，伍子胥在逃亡的过程中，居然也遇到了一位“漂母”。事情发生在溧阳（今江苏溧阳北），此时的伍子胥已经身无分文，而且又病了一场，为了活下去，伍子胥只能沿街乞讨。

在溧水河边，饥肠辘辘的伍子胥发现有一位“漂母”在洗衣服，她身旁放着一个盛满饭食的篮子。伍子胥低声下气地哀求漂母施舍一点

饭给他填肚子，溧水漂母犹豫了很久，才勉强把篮子中的饭食分给伍子胥一部分。

我们常说春秋第一忍人是越王勾践，其实伍子胥的忍术和勾践相比丝毫不逊色。勾践为了复仇，甘当吴王夫差的奴隶，忍了二十年，才终报一仇。伍子胥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果不是强烈的复仇意识在强撑着伍子胥的人生，以伍子胥的刚烈性格，早就飞蛾扑火般地找楚平王复仇去了，而不是一忍就是十年。

换句话说，伍子胥和勾践都是厚黑道高手中的高手，勾践的那点花花肠子早就被伍子胥看穿了，勾践最终能战胜夫差，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勾践能忍，而是夫差太单纯，不相信伍子胥的忠告。

勾践在吴都姑苏当过三年的奴隶，而伍子胥同样在姑苏当过一段时间的疯子，勾践当奴隶是在演戏，伍子胥同样在表演。伍子胥每天披头散发，赤着脚走在姑苏的石板街道上，嘴里嘟嘟囔囔说着谁也听不懂的外语，双手摇来摇去。

伍子胥这么做的动机很简单，他在吴国人生地不熟，他是没有正常渠道接近吴国最高统治层的。伍子胥唯一的机会就是出现在公开场合，进行夸张的肢体表演，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伍子胥相信一点，在看他夸张表演的观众中，肯定有吴国高层散布在民间的耳目，而伍子胥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不是所有人在街头免费表演都能得到喝彩声的，伍子胥有别人不能相比的优势，他的外形实在太帅了！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身長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在唯心主义盛行的古代，这样的身体条件往往会被人视为奇异之人。

果然，有一位善于相面的吴国市场管理官员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伍子胥，并把伍子胥推荐给了吴王姬僚。伍子胥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在和吴王僚的会谈中，抵掌如神，侃侃而谈，伍子胥已经看出

来吴王僚对他的喜爱，他知道他将有机会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

其实伍子胥不仅吸引了吴王僚的注意，吴王僚的堂弟公子光早就盯上了“勇而且智”的伍子胥，想把伍子胥收拢袖中，留为己用。伍子胥眼光毒辣，一眼就看穿了公子光藏在内心深处不敢示人的秘密——杀僚自为吴王。

现在伍子胥面临两个选择：一、保僚杀光；二、保光杀僚。从伍子胥奔吴的目标来看，谁能替他报楚杀父之仇，他就会站在谁的船上。问题是吴王僚和公子光都有对外征服的雄心，所以伍子胥只能两利相权从其重，公子光比吴王僚的野心更大，能力更强，所以伍子胥还没有和吴王僚过完蜜月，就钻进了公子光的洞房。

只认目标不认人，更不谈所谓的感情，这是勾践和伍子胥的另一个共同点。文种为勾践灭吴立下不世奇功，结果勾践一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逼文种自杀。伍子胥做事也够狠辣，吴王僚对他有知遇之恩，结果伍子胥却在暗中帮助公子光密谋政变。

“专诸刺王僚”，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一场宫廷政变，钩心斗角、暗藏杀机、步步惊心、最终一箭穿心，成就了公子光称雄东南的不世霸业。号称春秋四大刺客之一的专诸，就是伍子胥从民间搜刮来的，并把专诸介绍给公子光，“欲以自媚”。

一个“媚”字用得恰到好处，说明伍子胥为了替父兄报仇是不顾一切的，在伍子胥看来，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正义，所以伍子胥并不会因为对吴王僚有什么负罪心理。也正因为这种褊狭但厚黑的性格，所以在吴越争霸后期，伍子胥才是勾践最大的死敌。

仇恨，已经占领了伍子胥的精神世界，他似乎就是为了报仇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公元前516年，当楚平王去世的消息传到姑苏时，伍子胥竟然号啕痛哭，他恶狠狠地告诉和他共患难的太子建之子熊胜：“你祖父死得太早了，可惜我的复仇

大业！不能亲手杀死你的祖父，恨！”已经长大成人的熊胜默然无语。

伍子胥非常狠辣，为了他的复仇计划，他可以背叛吴王僚，也可以出卖吴王僚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子庆忌。人们往往注意到伍子胥的吴国重臣身份，却忽略了伍子胥还有另外一个较为隐秘的身份，就是吴国特务暗杀小组组长。

这不是在诬蔑伍子胥，春秋时代有两大著名刺客，一是刺杀吴王僚的专诸，一是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的要离。这两位暗杀高手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伍子胥推荐给阖闾的。

老话常讲，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伍子胥这样的忍人推荐的，个个都不是善类。专诸情况还好些，知道在刺杀王僚之前把老母幼子托付给阖闾，而要离做得更过分，为了骗取庆忌的信任，要离居然让阖闾把自己的妻儿烧死在市。

伍子胥的豪侠仗义，倒是和《水浒传》中的江湖第一好汉武松非常相似，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但江湖气太重，不明事理，杀人如麻，伍子胥同样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大业，伍子胥不停地在正义和邪恶之间变脸，甚至阖闾在伍子胥眼里，也不过是个复仇工具。

阖闾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伍子胥只是把他当成实现复仇目标的水泥平台。不过阖闾也是个忍人，他为了自己的灭楚大计，同样可以做到忍人所不能忍。

伍子胥能卖掉吴王僚，将来未必就不会出卖自己，但阖闾知道伍子胥的重要性，他曾经下令：“无贵贱长少，有不听子胥之教者，犹不听寡人也，罪至死，不赦。”不客气地说，伍子胥和阖闾只是为了实现各自目标才走到一起的，二人之间没少互相利用，甚至互相算计。

伍子胥在阖闾的政治权力分配中，不仅扮演着宰相、军统局长的角色，同时他也是吴国的参谋总长，头号大幕僚。伍子胥的谋略能强悍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楚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是囊瓦（子常），但实际上楚昭王心目中的最佳统帅人选是子期。

子期用兵如神，一旦子期统帅楚军，伍子胥的复仇梦想就将成为泡影。所以伍子胥派出能接近楚国高层的超级间谍潜入郢都，散布子期无能论和囊瓦神武论，说用子期为帅，吴必能轻易杀之，但如果用囊瓦为帅，吴将罢兵不敢战。

愚蠢的楚昭王不辩贤愚，上了伍子胥的当，任用囊瓦为帅，结果楚军一败涂地，楚昭王悲剧地成为楚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敌国攻进国都的楚王，老婆被阖闾肆意奸污。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但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阖闾奸污过楚昭王夫人，伍子胥跟着插上一腿，通过玩弄楚王夫人宣泄自己的复仇快感。以伍子胥的性格，他是完全能够做出这种下作事情的。

伍子胥的复仇快感，在吴军士兵刨开楚平王陵、将楚平王还没有腐烂的尸体摆在伍子胥面前时，伍子胥积累十多年的屈辱、痛苦和悲愤，在他用力举起铁鞭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伍子胥对楚平王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他面对的是一具没有生命力的尸体，但在伍子胥看来，他屈辱的活下来，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即使是尸体，也是楚平王的！

伍子胥用了平生的力气，对着楚平王的尸体狠抽了三百铁鞭，将尸体打得腐烂如泥。即使如此，伍子胥依然不解恨，他扔掉铁鞭，左脚踩在尸体的肚子上，右手挖出尸体的眼睛，一边抠一边声嘶力竭地哭喊：“让你听信费无忌的谗言，害我父兄！”

仇报完了，伍子胥突然失去了人生的奋斗目标，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伍子胥的性格具有典型的双重性，一方面可以为了自己的个人目标而背叛道义，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在富贵之后寻找曾经施舍给他饭吃的漂母，在得知漂母投河自尽后，伍子胥将一百金扔到了河里。

这种性格的人，往往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正义与邪恶，每天在他的灵魂深处进行残酷的肉搏战，伍子胥也不知道哪一方会成为胜利者。但在公开场合，双重性格的人往往表现得非常自信，实际上他们总是在极力掩饰自己灵魂深处的惶恐与不安。

严格来说，伍子胥的一生中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投奔吴国，并最终依靠吴国的力量完成了自己的复仇大计；一件就是在吴国太子死后，伍子胥推荐了阖闾的次子夫差继任太子。

知子莫若父，夫差的为人，阖闾再清楚不过，按阖闾自己的话说，夫差性格太软，“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从夫差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阖闾的预见完全正确。

夫差想做太子想疯了，在得不到父亲肯定的情况下，他买通了伍子胥。夫差希望伍子胥能在父亲面前替他说句好话，伍子胥痛快地答应了。

伍子胥的自信膨胀到了顶点，吴王阖闾在伍子胥眼中，以前是个反楚复仇的政治工具，现在只是个证明伍子胥在吴国呼风唤雨的政治工具。伍子胥告诉夫差：“太子未有定，我入则决矣！”在伍子胥的强硬坚持下，阖闾有些无奈，只好违心地立夫差为太子。

这是伍子胥的自作聪明处，他以为他扶持夫差上位有功，即位后夫差会奉自己为大国师，把吴国玩弄于股掌之下。一千年后，隋朝太子杨勇被废，晋王杨广买通了第一权臣杨素这条线，暗中运作，果然成功登上大位。杨素也以为他能完全控制杨广，结果发现杨广对他处处紧逼。杨广希望杨素早点见阎王，主要原因是杨素对杨广当上皇帝有大功，每一次见到杨素，杨广都会产生一种负疚感，这对君主来说

是极痛苦的。

夫差对伍子胥的感觉同样如此，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新君都对托孤大臣产生反感，甚至刀兵相向，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力向来是排他的，但君主的最高权力是由大臣施舍的，这种屈辱感不是正常人能忍受得了的。

另外就是托孤大臣往往德高望重，权力过大，已经严重威胁到君主对天下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往往会削弱托孤大臣的权力，扶持江湖威望较低的大臣入阁主事。新阁臣正因为威望较低，权力又是君主赐予，所以在相当时间内不会威胁到君主的地位。

伍子胥一直没有看透这一层关系，还沉浸在拥立夫差的美梦中不能自醒。等到夫差不动声色地把同为楚人奔吴的伯嚭安插在伍子胥的身边，伍子胥才大呼上当，而此时，夫差已经继位十二年了，即公元前484年。

伯嚭和伍子胥是旧交，他的不幸遭遇几乎复制了伍子胥的人生路线图，伯嚭的祖父是楚国左尹白州犁，又是因为费无忌暗中捣鬼，白州犁被杀，伯嚭听说伍子胥在吴国当官，就跑到吴国混饭吃。

伍子胥常常看得清别人，比如勾践在姑苏上演的苦肉计，一眼就被伍子胥戳穿，但他往往看不清自己。伯嚭之所以能以火星般的速度在吴国官场蹿红，实际上是伍子胥自掘坟墓，挖了坑自己跳了进去。

吴国大夫被离看出伯嚭不是善类，“嚭之为人，鹰视虎步，专功擅杀之性，不可亲也”。劝伍子胥和伯嚭拉开距离。伍子胥只相信自己的感觉，他不听被离的劝告，说伯嚭与我同是楚人，又家遭横祸，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兄弟，伯嚭岂能害我？

事实却狠狠抽了伍子胥一记响亮的耳光，伯嚭不仅得到了阖间的信任，身居显要，夫差继位后，伯嚭迅速取代了伍子胥在夫差心中的

地位，虽然伍子胥在名义上还是第一阁臣。伯嚭曾经在私下场合拆伍子胥的台，他劝夫差要小心伍子胥，说伍子胥“为人强暴，大王最好离他远点”。夫差不住地点头：“寡人知之。”

当伍子胥有所醒悟时，他悲凉地发现，他身边全是敌人，包括夫差、伯嚭，以及在姑苏卖力表演的越王勾践以及范蠡，甚至还包括春秋第一美女间谍西施。

伍子胥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夫差的影响力，当他看破勾践的苦肉计，劝夫差杀掉勾践以绝后患时，夫差不听。当夫差准备放勾践回越时，伍子胥再劝，说：“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又被夫差拒绝。

伍子胥和夫差的政治决裂，给了伯嚭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伯嚭在夫差面前又捅了伍子胥一刀。《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彊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而这一次，夫差相信了。伯嚭的这句话就等于说伍子胥意图谋反，不要说夫差无法容忍，就是阖闾也容不下这样的伍子胥。

伍子胥当然不会谋反，但夫差对他的态度已经定性，夫差不会再听伍子胥的任何忠劝。伍子胥当年自作聪明地把夫差推向前台，现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夫差为了获得太子之位而对伍子胥低三下四，现在看来不过是伪装而已。

绝望的伍子胥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改变夫差，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后事，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伍子胥出使齐国期间，趁机把儿子交给了关系不错的齐国大夫鲍氏，算是给伍家留一条血脉，一如楚太子建把幼子熊胜交给伍子胥抚养。

而托子于齐，正是夫差与伍子胥矛盾的最高潮，夫差恶狠狠地说道：“伍员果欺寡人！”吴王的发怒，宣告着伍子胥传奇人生的终结，

夫差断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伍子胥。

伍子胥刚回到姑苏，就领了夫差赐他的一柄金镂剑，请大夫自裁吧。伍子胥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骄傲的伍子胥还是难以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他在做平生最后一次反抗。而这次反抗，是伍子胥自认为不公的命运。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对伍子胥自杀有详细的记载，如下：

吴王闻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赐属镂之剑。子胥受剑，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为汝父忠臣立吴，设谋破楚，南服劲越，威加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赐我剑。吾今日死，吴宫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争之，卒得汝之愿，公子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吴。今乃忘我定国之恩。反赐我死，岂不谬哉！”吴王闻之，大怒，曰：“汝不忠信，为寡人使齐，托汝子于齐鲍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见。”子胥把剑仰天叹曰：“自我死后，后世必以我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与龙逢、比干为友。”遂伏剑而死。

临死之前，伍子胥性格中的报复基因再次发作，他提出了一个要求，等死后，把眼睛挖出来，悬在姑苏东门之上，他要在另一个世界看着夫差死于勾践之手。

这个要求激怒了夫差，伍子胥的要求并没有得以满足，他死后，尸体被愤怒的夫差扔进了滚滚长江。伍子胥看不到勾践复仇成功的那一刻，但在他脖颈上的鲜血喷薄而出的时候，他依然坚信这一点：勾践一定会把夫差碾成泥土。

历史也证明了伍子胥准确的判断，可这一切已经和伍子胥没有什么关系了。

三三 春秋刺客列传

今天我们讲一讲春秋的著名刺客。

说到刺客，人们首先会想到《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那几位著名刺客，即在柯之盟上劫持齐桓公姜小白鲁将曹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舍身就义的豫让、白虹贯日的聂政，以及出名到爆的刺秦荆轲。

民间也盛传着中国暗杀史上的四大天王，即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号称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按民间的说法，还要增加一位著名刺客，就是刺杀吴公子庆忌的要离。

不过由于现在讲的是春秋史，所以战国时代的聂政和荆轲在此就不多讲了，下面讲一讲曹沫、专诸、要离的精彩暗杀人生。实际上，如果按曹沫的刺杀标准，大名鼎鼎的至圣先师孔子也应该厕列其中，在著名的夹谷之会上，孔子差点就拎刀砍下齐景公姜杵臼的人头……

说到曹沫，史学界一般认为他就是《左传·庄公十年》记载的那位在长勺之战大败齐桓公的鲁国名将曹沫，只有少数观点认为曹沫和曹沫是两个人。

曹沫的知名度不用多说，著名的《曹沫论战》早就写进了中学生的历史课本，想不出名都难。至于曹沫，人们对他远不如对专诸、荆轲熟悉，但司马迁把曹沫位居《史记·刺客列传》头把交椅，自有他的道理。

如果说曹沫就是曹沫的话，曹沫在长勺之战将初出江湖的姜小白打得鼻青脸肿，由此一战，曹沫一跃成为鲁国的一线名将。而曹沫也做过鲁国将军，结果对阵齐军三战三败，差点没把鲁庄公姬同吓出屁

来，还被迫献城向齐国求和，丢人丢到爪哇国了。

曹沫只需要一场战争就扬名立万，曹沫用了三次机会，结果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当将军的材料。姬同用将的标准也有问题，一般用将者，会选择大脑发达的，而不是四肢发达的，比如齐景公用田穰苴，阖闾用孙武。而曹沫恰恰是四肢发达，“以勇力事鲁庄公”，天生就是当马仔打群架的好料子。

曹沫的官场身份，更像是禁军统领，鲁公身边的头号大保镖。但著名的三战三败后不久，姬同再次用曹沫为将，原因不详，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鲁国没有可用之将，姬同不用曹沫，难道要请他老娘文姜披挂上阵吗？

从身份职务上讲，在春秋战国的刺客中，曹沫的地位是最高的。不过严格来说，曹沫不算是标准的刺客，别人都在搞暗杀，曹沫直接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

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姬同和姜小白在柯（今山东阿东南）举行双方元首会议。鲁国刚刚在与齐国的战争中被打爆，姬允被迫割让遂邑（今山东肥城南），姜小白此次来柯，是敦促姬同履行割地条约的。

齐国是鲁国最大的邻国，而且姜小白初即位，管仲初执政，锋芒毕露，专骑在姬同头上吃大户。再这样下去，姬同早晚会被舅舅姜小白（姬同母亲文姜是姜小白的异母姐姐）吃成穷光蛋。

姬同在考虑如何才能避免割地赔款，并给姜小白一点下马威。如果用武力，鲁国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想来想去，被逼无奈的姬同只能使一些盘外招了。姬同把自己的秘密计划暗中交代给曹沫，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曹沫阴险地笑了。

在柯之盟会上，姜小白让姬同快点签割让条约，否则齐国的刺刀

是不认你这个大外甥的。姬同的身边正站着曹沫，姜小白可能认为曹沫只是姬同的随行人员，哪知道这居然是个刺客。

还没等姜小白反应过来，身怀刺杀绝技的曹沫将军已经猫一样蹿到了姜小白眼前，一把亮晃晃的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架在了姜小白的脖子上。

站在一边的管仲应该没想到曹沫会来这一手，战战兢兢地问曹沫，你想干吗？曹沫倒是痛快，干吗？你们齐国连番侵占鲁国国土，你说我能干吗？今天你们必须把侵占的土地还给鲁国，如若不然，我一刀下去……

年轻气盛的姜小白已经成为曹沫手上的人质，但他依然展现出一个诸侯长才有的霸气，有本事给我一刀，让我还地，想都不要想！但对管仲来说，如果按曹沫的意思做，把地盘还给鲁国，齐国能在江湖上树立悲情的政治形象，同时也能搞臭鲁国。如果一味强硬，曹沫这个傻叉万一下手重了，要存折还是要命？你自己选择吧。

堂堂大齐国君，光天化日之下成了肉票，是非常没面子的事情，但姜小白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先让曹沫把匕首拿下来，万事好商量。姜小白答应曹沫愿意归还鲁地，曹沫笑了，收回匕首，准备回到鲁国的臣位上，欣赏由自己主导的这场伟大外交的胜利。

姜小白岂是省油的灯，曹沫刚坐下，姜小白就要下令武士上台，格杀曹沫！大不了鱼死网破。幸亏管仲眼疾手快，及时制止了姜小白的鲁莽，先忍下这口恶气，以后再找姬同算总账，好汉不吃眼前亏。

出于齐国称霸大业的考虑，姜小白强忍着屈辱，和一脸坏笑的姬同签订了新条约。新条约规定，齐国将全部归还之前三次暴打曹沫后侵占的鲁国地盘，曹沫在下边也得意地笑了。

表面上看，姬同和曹沫赢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几乎兵不血刃就实

现了自己的目的，但从战略上看，鲁国此次完败于齐国。齐占鲁地是再正常不过的国家间战争行为，只能怪鲁国实力弱。而曹沫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胁迫齐人还地，对鲁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柯之盟后，“桓公之信著乎天下”，《史记·齐世家》也记载：“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从此拉开了齐国称霸天下的大幕。鲁国用几乎是政治自杀的行为衬托出了齐国的高大形象，实在是愚不可及。从政治角度讲，曹沫的刺杀是完全失败的。

讲完了临时客串的刺客，下面讲一个真正的刺客，就是大名鼎鼎的专诸。

单从知名度上讲，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暗杀事件中，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荆轲刺秦王，排在第二位的一定是专诸刺王僚，要离、豫让都要逊专诸一筹，更不要说强盗曹沫了。

如果从故事的精彩程度上讲，专诸刺王僚和荆轲刺秦王的惊心动魄相比，毫不逊色，从阴谋杀僚到掘室藏兵，再到扮厨学鱼，鱼中藏剑，兄弟二人钩心斗角，最后由专诸从鱼中抽剑，一击杀僚的过程，让后人叹为观止。

而且这场著名宫廷政变涉及了春秋史上的一线人物，有阴谋策划者伍子胥、阴谋得利者公子光、阴谋受害者吴王僚，甚至还有天下第一大贤人季札。傍上了这么多名人，专诸想不出名都难。专诸，在《左传》中记载为鮒^转设诸，但这个名字太拗口难记，所以下文一直沿用专诸。

如果不是一个人的出现，专诸会一直生活在棠邑（今江苏六合），做一个职业斗殴者，专门以和地方上的猛男格斗为生，虽然辛苦，但也快乐，这个人就是楚国逃臣伍子胥。

伍子胥在逃亡入吴的路上，偶然发现了专诸正在和一群猛男打架，大块头的专诸很快就把那群猛男打得抱头鼠窜。而当专诸的老婆叫专诸回家吃饭时，专诸乖乖地跟在老婆后面。

伍子胥觉得非常奇怪，问专诸为什么怕一个女人？专诸瞪起牛眼说，你到底识不识货，我这不是怕老婆，而是屈一人之下，必居万人之上。伍子胥很惊讶地看着专诸，发现此人“碯颡深目，虎膺熊背”，是当今难得的勇士，伍子胥到了吴国发展，以后很有可能用得上专诸，就和专诸交了朋友。

等到伍子胥投靠公子光后，发现公子光要密谋除掉王僚，但苦无合适的人选。伍子胥突然想到了专诸，便暗中派人把专诸请到公子光府上。

专诸四肢发达，但头脑也不简单，他当然知道公子光请他来是做什么的，但见到公子光后，专诸装傻充愣。专诸说王僚继位是符合法定程序的，公子为何还要做掉他？公子光也不傻，立刻摆出一副苦大仇恨的模样，说我才是先君寿梦的嫡长孙，最有资格继位，而王僚的父亲夷昧只是庶出，他凭什么鸠占鹊巢？

公子光也懒得和专诸兜圈子，请专诸是来动手的，不是来磨嘴皮子的。公子光给专诸做出承诺，一旦事成，他就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上卿可了不得，再大的诸侯国也没有几个上卿，而专诸只是区区县底层百姓。如果儿子做了上卿，那就是一夜暴富，进入上流社会，这也是专诸答应接这单买卖的主要原因。

王僚可不是轻易能接触到的，为了能让专诸近距离接触到王僚，公子光决定在府上设一场“鸿门宴”，趁厨子上菜的时候，伺机动手。因为王僚最喜欢吃烤鱼，而专诸又不太会做鱼，一旦在宴会上穿帮，后果不堪设想。在公子光的建议下，专诸特地去了一趟太湖，在湖边

的渔家潜心学习三个月，果然学得一手好鱼技。

不过有一点值得怀疑，史料记载专诸学鱼的这一年是王僚九年（前518），而公子光准备刺杀王僚的时间是王僚十二年（前515），中间相隔整整四年！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公子光迟迟不动手，当然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但问题是，难道这四年间，专诸什么事也不做，天天在湖边练烤鱼吗？专诸也不怕倒了胃口。

动手的日子选在了王僚在位第十二年的四月丙子日，公子光事先在举行宴会的大厅下部挖了一个大洞，将几百名武士塞了进去，随时准备跳出来接应专诸。

公子光的计划很周密，但王僚对公子光突然举行莫名其妙的宴会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来问题在哪里。王僚的母亲是个老江湖，一眼就看穿了公子光的花花大肠，老娘劝儿子去赴宴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安保，千万别中了公子光的花招。

王僚为了防止公子光行刺，特意穿上一具由棠谿上等好铁制作的精制铠甲，几乎是武装到了牙齿，这才敢放心地赴宴。随同王僚前往的有大批精锐甲兵以及自己的贴身亲信，甲兵全部接管公子光府的安保工作，每人手执一杆大戟，戟尖交叉，将王僚严密保护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公子光的人马是绝无可能强突刺杀王僚的，好在他还有不要命的大侠专诸。专诸已经做出了味香色俱佳的烤鱼，就等着王僚传召，上这道天下绝无仅有的美味。

公子光借口说脚疼，需要到内室换履，溜回厨房，趁周边没人，附在一级大厨专诸耳边嘀咕了几句。公子光的妙计，大家都知道，就是让专诸把一柄寒雪见光的利剑放进烤鱼的肚子里，这就是著名的鱼肠剑。吴越的炼剑技术非常发达，公子光提供的这柄剑，极有可能是

专门打制，用来对付王僚的棠谿甲的。

按照礼节，作为身份低下的厨子，专诸必须跪在地上，捧着鱼盘膝行。正因为如此，专诸跪在地上的角度正好有利于他抽剑刺王僚，如果专诸站着端盘子，等抽出鱼肠剑再往下刺，角度和时间都有利于王僚更好地躲闪。

专诸膝行至王僚面前，虽然两边有武士执戟交差护卫，但毕竟还闪出一个不大但可以至少容纳专诸的缝隙，这就足够了。专诸假装调整鱼盘的方向，在电光火石之间，专诸突然把手伸进鱼里，抽出那把命运之剑，一跃而起，直插进王僚穿着三层铠甲的胸膛。

王僚惨叫一声，痛苦地倒在地上，眼角还死盯着地上那盘已经被专诸用手掏烂的烤鱼。等侍卫反应过来，用大戟刺死专诸时，一切都晚了。

专诸敢做这笔惊天的大买卖，就是求死不求活的，只要王僚死了，他就圆满完成任务了，他死不死无足轻重。何况公子光在地下室还有一支伏兵，趁厅上血光四溅时，公子光一打口哨，数百甲士破土而出，将王僚的人马一扫而光，“尽灭之”，也算为专诸报了仇。

王僚确实死不瞑目，他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公子光会在一个不知名的厨子身上动歪脑筋。而对专诸来说，以一条“烂命”换来至尊王者的生命，改变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同时又给自己的儿子挣来上卿的位置，这场以命易命的危险游戏，值得。新任吴王阖闾（即公子光）也没有食言，“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当初专诸豪情万丈地对伍子胥说：“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现在看来，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很幸运地把自己的名字铭记在历史深深的记忆之中，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专诸刺王僚，主要还是图名利，以一死换铭碑不朽，子为上卿。

而且从专诸怕老婆的细节看，专诸是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至少他爱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专诸性格的弱点并不影响他人生中散发着人性化的光辉。

而和专诸相比，另一位同时代的著名刺客要离就显得相当可怕了，要离为了所谓的君臣重义，替阖闾杀掉了王僚的儿子庆忌，居然用了死间计，让阖闾杀死自己的妻儿，以骗取庆忌的信任。

妻儿何罪？罹此大难！要离于心何忍，何况阖闾向来没有恩重于他。而且刺杀庆忌成功后，要离自杀殉妻儿，只求一名永垂不朽，不图利只图名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司马迁对要离的行为极不认同，在《刺客列传》中根本没有提到要离这个名字，甚至连庆忌都没有提到。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把庆忌的一些事情交代清楚，要离刺庆忌这个经典刺杀桥段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有人说确实发生过，有人说纯属江湖臆造。

不仅《史记》只字不提庆忌和要离，《左传》只在鲁昭公二十年提到过一次吴公子庆忌，这个庆忌在为夫差效力，因为庆忌劝谏夫差不听，庆忌逃到楚国避难，随后庆忌听说越王勾践伐吴，又回到吴国，不久被吴人所杀。

“要离刺庆忌”中的这个庆忌，出现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而且点明此庆忌就是王僚的儿子，最终被要离刺死。后人所熟知的这个刺杀故事，就是出自《吴越春秋》。综合来看，王僚之子庆忌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夫差同时出现的那个庆忌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要离刺庆忌，其实是专诸刺王僚的姊妹篇，王僚被刺身亡，阖闾夺位，开始对王僚的势力进行清洗，作为王僚最优秀的儿子，庆忌自然成了阖闾的眼中钉。庆忌的厉害，阖闾是亲眼见过的，用阖闾自己的话说，“庆忌之勇，世所闻也。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

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而最要命的是，庆忌躲过了阖闾的追杀，逃到了卫国，客观上对阖闾在吴国的统治构成了致命威胁。

如何才能除掉庆忌，这是一个让阖闾寝食难安的问题。如果出兵进攻卫国，要跨过诸侯地界不说，远离本土与卫军交战，胜算不大。阖闾把问题抛给专诸刺王僚事件的总编剧伍子胥，让他给出个主意。

伍子胥天生就是搞暗杀的，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再找一个像专诸那样的刺客，去卫国把庆忌灭了。阖闾是很认同这个办法的，聘请一个刺客花不了几个大头银子，总比劳师远征经济实惠。

问题是专诸已经死了，上哪去找不要命的刺客？伍子胥适时推出了专诸二代——要离。和专诸一样，要离也是一个打架不要命的主儿，当时江湖上盛传着要离当众羞辱第一勇士椒丘的传奇故事。至于伍子胥是如何认识要离的，估计也是入吴的路上结识的，然后结为好友，以备日后不时之用。

阖闾在王宫接见了要离，但阖闾很快就泄了气，要离瘦得跟火柴棒子似的，出门都不要坐车，一阵风就送到目的地了。要离事先应该是在伍子胥那里得到了他所要执行的任务，拍着胸脯告诉阖闾，把信任交给我，我把庆忌的人头交给你。

从阴谋刺杀王僚开始，到再次准备刺杀庆忌，阖闾（公子光）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而要离却非要把刺杀庆忌的行为上升到一个道德高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臣，说什么“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

要离所理解的忠义，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绿林江湖的小忠义范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忠义。且不说王僚在位期间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庆忌更是人中之龙，为人和善，刺杀这样的父子，去满足一个野心家的政治快感，看不出忠义何在。

更让人发指的是，要离为了践行他所谓的忠义，居然丧心病狂地提出一个要求，让阖闾把自己的妻儿杀死在闹市之中，焚骨扬灰。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庆忌相信要离，从而让要离接近庆忌，伺机下手。

阖闾无恩于要离，妻儿无仇于要离，要离害死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妻儿，却帮助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外人。除了变态，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要离。

阖闾不管你这些，只要你答应刺杀庆忌，反正烧死的又不是自己的妻儿，没人会心疼。要近距离接触庆忌，阖闾只能按这个路子去走。还有一点让阖闾放心的是，要赢得庆忌的信任，要离必须巧舌如簧。

要离不但能打架，而且嘴功极为了得，当初椒丘不服要离，来辱骂要离，结果被要离三句话轻松驳倒。要离有身手，有嘴功，是刺杀庆忌的不二人选，要离提出什么要求，阖闾都会答应。

但让阖闾抓破头皮也想不通的是，要离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只要求阖闾现在就烧死他的妻儿，并悬赏千金购买他的人头。天下还有免费的午餐，阖闾的嘴都笑歪了，你自己冒傻气，可别说我一毛不拔。

就在要离北上投奔庆忌的同时，他无辜的妻儿被阖闾烧死在闹市，扬骨弃灰。不过从要离和阖闾对话的字面意义上来解释，要离只是让阖闾先杀妻儿后扬灰，并没有要求直接烧死妻儿。

阖闾为了把戏演得更逼真一些，让庆忌彻底相信要离，这个阴冷的国王在要离离开后，私自更改剧本，将要离的妻儿烧死，可见阖闾为人之阴狠毒辣。这种心理极度阴暗的人物当权，实在是历史的莫大悲哀，一如以假仁假义欺骗历史三百年的赵匡胤。

要离同样无耻，他在路上散播谣言，说因为他得罪了吴王，阖闾

就烧死自己妻儿，以换取别人廉价的同情，庆忌自然也上当了。庆忌待人真诚，性格阳光，不像他堂叔阖闾那样阴暗龌龊，要离在庆忌面前哭诉阖闾的暴行：“阖闾无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于市，无罪见诛。吴国之事，吾知其情，愿因王子之勇，阖闾可得也。何不与我东之于吴？”

庆忌和阖闾有杀父之仇，要离和阖闾也有杀子之仇，所以要离的“悲惨遭遇”很容易拨动庆忌内心深处那根最柔软的同情之弦，引要离为心腹，“庆忌信其谋”。

这场暗杀计划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离必须得到庆忌的充分信任。要离用他的精湛表演艺术骗到了庆忌，接下来要做的，只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送出那致命的一刀。

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载，三个月后，庆忌组织了一支精锐的复仇军，杀回吴国找阖闾讨回血债。就在这支军队准备渡江的时候，要离与庆忌同坐在一条大船上，要离趁庆忌不备，抽剑刺向庆忌。

阖闾派要离来刺庆忌是非常冒险的，因为要离的身高不符合标准。庆忌高大威猛，要离费了很大的力气，几乎是原地弹跳，才将冰冷的长矛送进庆忌的胸膛。即使如此，庆忌还是把矛从体内拔了出来，强忍剧痛，把要离放倒在甲板上，把要离的小脑袋摆在水里，差点没把要离憋死。

但让要离惭愧的是，庆忌并没有杀他，而是坐在甲板上，把要离拎到自己的腿上，并告诉身边甲士：“此人是勇士，不可杀。”直到临死的那一刻，庆忌还称要离是勇士，这实在是高看要离了。专诸勉强还算半个勇士，要离不是，他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暗杀机器。

先不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为一名侠客，要有最起码的正义感和辨恶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要离所不具备的。要离不是不知道阖

间的厚黑无耻，还甘做阖间的走狗，这和忘恩负义的石守信之流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故事就这么结束，要离永远也不配称为勇士。但庆忌在人生最后时刻对要离的欣赏，却像一支点燃的火柴，温暖着要离依附于别人利益而存在的自我，要离灵魂深处的潜善意识开始复苏。

要离痛哭流涕地怀念被阖间烧死的妻儿，甚至开始怀念庆忌当初对自己的推心置腹。按《吕氏春秋·忠廉篇》的说法，要离回到姑苏后，阖间果然大悦，要封要离为一字并肩王，被要离拒绝。

要离的回答带有很强烈的忏悔，“杀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便事也，臣以为不仁。为故主杀新主，臣以为不义。淬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臣已为辱矣。不仁不义，又且已辱，不可以生”。遂伏剑而死。

吕不韦的门客说要离自杀是因为“临大利而易其义”，只说对了一半，在庆忌大度地饶恕要离之前，要离是不知义为何物的。真正的义，不是给强权者当走狗，是捍卫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我约束。

三四 勾践：千古第一 忍者术

元朝末年，一代大盐枭方国珍的儿子方行曾经写过一首咏怀伍子胥的诗《登子胥庙因观钱塘江潮》，如下：

吴越中分两岸开，怒涛千古响奔雷。
子胥不作忠臣死，勾践终非霸主材。
岁月消磨人自老，江山壮丽我重来。
鸱夷铁箭俱安在，目断洪波万里回。

这首诗写得很有诗骨，在咏古诗中算是上乘之作，特别是颔联两句，“子胥不作忠臣死，勾践终非霸主材”。从诗中可以看出，方行对逼死伍子胥的勾践非常轻视，直斥勾践不是做天下霸主的料子。在春秋五霸的评选中，勾践有时被请进来，有时被踢出去，但比勾践成为五伯长更让人们感兴趣的，是他的不可复制的传奇人生。

说不可复制，是因为自勾践之后，历史上再没有人能像勾践那样，把人性中的隐忍之怒做得那般极致。即使如江东枭雄孙权含垢忍辱地给曹丕装孙子，成就一方霸业，被陈寿称为“有勾践之奇”，也不过是勾践的模仿者相对较成功的一位。

勾践的身上有很多行为特质，但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勾践的绝世人生，这个字想必一定是个“忍”字。说到忍，三国有一位大忍人司马懿，演技一流，最终骗到傻瓜曹爽，夺取了司马家至尊天下。司马懿的成功，是建立厚黑心理学基础上的忍字功，其实司马懿的忍功相比于勾践，只是小巫见大巫。

试问，有谁可以面色从容地跪在曾经的死敌面前，一脸谄媚地品尝对方拉出来的新鲜粪便？有谁可以跪在死敌的面前当马凳，请死敌踩着自己的虎背上马？有谁可以心情愉悦地跪在地上，请死敌临幸自己的妻子？

同是忍界大腕，面对男人都无法承受的奇耻大辱，司马懿做不到，刘备做不到，孙权也没有做到。赵佞倒是做到了，但入金后的赵佞是为了活命而被迫接受金人的凌辱，而勾践则是主动要求死敌无情践踏自己的人格尊严。勾践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复仇！赵佞永远没有机会复仇，因为他不是勾践。

讲勾践感天地泣鬼神的励志故事，自然要讲到那个大名顶破天的成语——卧薪尝胆，实际上这个成语和勾践只有一半的关系。勾践尝苦胆是有的，但卧薪是北宋大牛人苏轼半开玩笑似的虚构出来的。

勾践实际上什么也没卧，他用的是一种辛辣的菜根，就是蓼菜，因为这种菜根非常辛辣，所以每当勾践为复仇而谋划困倦时，就用眼睛盯着蓼菜看，顿时睡意全无。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南宋宰相李纲曾经说勾践“勾践身入吴国，以为臣仆，仅得归国，枕戈尝胆，卒以报吴”。

无论勾践是卧薪以尝胆，还是枕戈以尝胆，勾践在从吴国饱受三年耻辱归来后的存在，都可视之为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存在。西楚霸王项羽在乌江的夕阳下自刎被普遍认为具有浓烈的美学意义，实际上相比于项羽的死，勾践的生在人性还具有知耻意识的情况下显得更为艰难。

对于读者来说，更欣赏项羽的死，悲壮而富有魅力。但于勾践来说，放弃人性知耻意识到极致的存在，也是一种伟大的美学存在，只不过这种美过于沉重，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一种窒息的压抑。

如果天生就是奴隶，那么在主人面前展现种种丑陋的媚态，在当

时的社会条件下都是无可厚非的，奴隶生杀自由主。而勾践的身份是一国之主，拥有属于他的天下臣民，甚至还战胜过他死敌夫差的父亲，曾经争霸中原的吴王阖闾。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勾践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为了实现人生的大逆转，勾践在众目睽睽之下尽情展示奴性的极致，这份压抑和隐忍，又岂是一般人所能理会？

其实在隐忍背后，还有勾践对他曾经战略决策失误的自我反省，也是对自己实施的惩罚。只是想不出除了勾践之外，还有谁会对自己的错误施加如此的严惩？

勾践之所以兵败会稽山，入吴为奴，尝尽人生耻辱，纯粹是自作孽不可活。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94年，勾践从父亲允常手上接过王位的第三年，而勾践的对手，就是他曾经的手下败将、吴王阖闾的儿子夫差。

勾践作为胜利者，夫差作为失败者，已经永载史册。但让人们所意外的是，就在这一年（前494），勾践更像是灭亡之前的夫差，而夫差更像是兵败之后枕戈尝胆的勾践，人生的戏剧性反转让人不胜感叹。

阖闾因为大意，以为勾践是孺子可欺，大发雄兵进攻越国，结果被勾践奇兵打败于携李，阖闾被勾践射了一箭，回国后不久就挂掉了。据说阖闾在死前拼尽最后一口气告诉夫差：“你要不为我找勾践寻仇，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夫差励精图治，“日夜勤兵，且以报越”。吴国在阖闾的治理下如日中天，夫差只需要理顺治国逻辑就可以了，而勾践之前战胜阖闾纯属意外，论国势，吴远在越之上。不知道是过于自信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勾践一直认为夫差不过是个庸才，不如趁夫差羽翼未丰时将其剪除。

勾践没有听大夫范蠡的良言苦劝，结果不出意料地在椒山被吴军暴打成猪头，以残兵五千人退保会稽山。此时的勾践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除了被吴军一口吃掉，勾践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反抗。

勾践的人生似乎即将走到尽头，但大夫范蠡提出的一个建议让勾践看到了他还有一丝光明的未来，只不过这种亦实亦幻的未来，必须要用他的人格代价来换取。按范蠡的话做了，不一定成功，但不按范蠡的话做，一定得死。

范蠡的建议很简单：说世界上最好听的话，送世界上最珍稀的宝贝，“卑辞厚礼”收买夫差，希望能借此让夫差罢兵，勾践就有一线生机。如果夫差瞧不上这些东西，那还有一个办法，不过比较冒险，就是勾践亲自去姑苏向夫差请罪，必要时牺牲个人的小尊严来换取越国的大尊严。

范蠡是千古不世出之奇人，他对人性的理解和对时局的把握，要远比同时代的对手伍子胥看得更为透彻。勾践的性格是什么样，范蠡再清楚不过，勾践对人格尊严看得比天还要大，范蠡敢于向勾践提出这样丧尽人格的建议，就是基于范蠡准确地把握住了夫差的性格弱点。只要勾践按范蠡说的去做，范蠡敢保证勾践至少有七成的把握活下来。

范蠡的话伤到勾践强烈的自尊心没有？肯定伤到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勾践灭吴之后对范蠡起了杀心的主要原因。可惜范蠡太精明，提前溜掉了，只有傻乎乎的文种还在等死。

勾践要杀范蠡和文种，并非是二人深谋远虑，有姜子牙之智，而在于二人曾经是勾践人生中奇耻大辱的见证者。勾践成功之后，二人每在勾践身边多待一天，勾践在吴国的耻辱经历就会痛彻骨髓，勾践在二人面前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有时人性就是这么悖谬，越是在乎尊严的，越能做出自我伤害尊

严的事情。有些人为了升官发财做尽了丧失人格的丑事，一旦得志，他会百倍千倍地洗刷自己曾经的耻辱。如果有人曾经见证过他的耻辱经历，那么他会用尽一切办法除掉此人。

勾践就是此类人，在勾践看来，如果他此时为了保住仅有的一点尊严自杀的话，那么椒山之败就永远成为他人人生中洗不掉的污点。要想洗刷椒山之败的耻辱，那必须以牺牲人格为代价来争取活下来的机会，慢慢再找夫差算总账。英雄自有气短之时，用一时的耻辱换来一世的荣耀，项羽做不到，但勾践一定能做到。

忍！心字头上一把刀，说得容易，做到不容易。虽然勾践接受了范蠡的建议，准备入吴为奴，但内心深处的激烈思想斗争是可想而知的。对于性格要强的人来说，尊严的意义远大于生命，就这么放弃？即使勾践以后能复仇雪耻，就像一只瓷碗被摔碎了，用胶粘上，依然能看到清晰的裂痕一样。

范蠡的自卑之计能骗得过单纯幼稚如项羽的夫差，但骗不过老奸巨猾如范增的伍子胥。即使越国使者文种用极为恭卑的语气请求吴王放小臣勾践一马，勾践为了表示对吴王宽恕的感谢，愿意“请为臣，妻为妾”。伍子胥一眼就看穿了勾践此举背后强烈的复仇意识，因为伍子胥本人就是一个极端的复仇者，所以伍子胥能摸清勾践的心态。

夫差有些犹豫，消息传回越国时，勾践顿时感觉到绝望，如果连这仅有的复仇机会都得不到，那么他只有自杀以谢先祖了。“勾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勾践杀妻灭子，散尽家产与夫差决一死战，其实这才是真实的勾践！

入吴为奴，是勾践为了实现人生大逆转不得不接受的残酷安排，但勾践的骨子里是一个至刚至硬之人。正如厚黑教祖李宗吾所言：“厚黑学博大精深，有志此道者，必须专心致志，学过一年，才能应用，学才三年，才能大成。”

梁山大头领宋江是真正意义上的厚黑人物，他在做吏期间养成了厚黑为人的好习惯，对谁都面带和气，这才是厚黑的上乘境界，刘邦也是如此。勾践进入厚黑界只是半路出家，在兵败椒山之前，找不到有关勾践含垢忍辱的记载，这和勾践的富贵出身有关，他不需要耍厚黑手段就能得到王位。

隐忍是一种功力，而厚黑则是另外一重境界，不能把隐忍和厚黑简单地混为一谈。隐忍更多的因素是不甘与坚持，正因为不甘失败，所以才坚持下去，这是对命运的顽强抵抗。

周文王为了打消商纣王对自己的怀疑，强忍悲痛吃下了儿子伯邑考的肉，勾践在吴期间，品尝夫差的粪便，给夫差当马奴，只是一种生存手段，与厚黑无关。

勾践花重金买通了吴国宠臣伯嚭，通过伯嚭说服夫差，携文种、范蠡入吴服侍吴王。越国群臣送别勾践于浙江之上，群臣设宴与勾践饯行，勾践先是仰头望天，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举起酒杯与群臣道别，热泪滚滚而下，一言不发。

勾践的泪水，实际上是对自己入吴自辱以复仇的否定。如果不是为了越国大业着想，勾践更愿意和夫差血战一场，即使战死，江湖上也会传颂英雄勾践的美名。

横剑一死并不难，只需忍受几分钟的痛苦，而跪伏在死敌面前忍辱负重以求咸鱼翻身，却要承担几年的痛苦。而这种心灵上的挫伤将会成为伴随一生的隐痛，随时可以发作，折磨自己早已疲惫不堪的灵魂。从这层角度上讲，勾践比项羽更有担当，项羽乌江一刎，看上去是英雄壮举，实际上是在逃避困难。

而且对勾践来说，前往吴都受辱，并非一定能换回复仇的机会，他最担心的是夫差听从伍子胥的挑拨，随便找个罪名把自己做掉。如果是这样，那么勾践将带着永远无法洗刷的屈辱下地狱，难道勾践入

吴是甘心受夫差奴役的吗？

在临别前与大臣的谈话中，勾践就流露出这种隐忧，“复反系获敌人之手，身为佣隶，妻为仆妾，往而不返，客死敌国”。不要说勾践是冷血的阴谋家，更不要说勾践是大脑里充满奴性的软骨头，这都不是真实的勾践。

但凡有自尊心的人，往往都特别重视名节，都会对曾经的“失节”而耿耿于怀。韩信从淮阴恶少的胯下爬过去，被天下人视为笑柄，韩信也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韩信也想过万一没有成功，他的胯下之辱将会被他带进坟墓里。同理，勾践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还有没有未来，一旦夫差变卦，他会不会后悔当初选择这条危险且屈辱的翻身之路？

不过对勾践来说相对有利的是，他身边还有范蠡这位超级谋士，可以临机决策，帮助勾践化险为夷。而且夫差为人又极为好名，有妇人之仁，只要勾践卑辞动之，就能打动夫差心中最柔软的那根感情之弦，不至于让夫差对自己起杀心。

勾践在见到夫差的那一刻，用的就是悲情法，勾践痛哭流涕地跪在夫差面前请罪，请宽厚仁慈的大王饶恕臣这条贱命。站在一旁的伍子胥知道勾践在演戏，劝夫差不要中了勾践的苦肉计，但夫差是个很容易受感动的人，在勾践的泪水面前，夫差选择了宽容，“诛降杀服，祸及三世”。

夫差和项羽都有妇人之仁，他们从不怕在战场上与敌人逆杀三百回合，但他们总是敌不过敌人的泪水和哀求，结果放敌人一条生路，却给自己留下一条死路。后人经常把勾践和刘邦作为反面典型，在批判他们“忘恩负义”的同时，歌颂夫差和项羽的宽仁。

项羽先破坏了楚怀王事先约定的由诸侯共同遵守的入关中者王之的条约，而且项羽死不肯过江东，不能算是刘邦的过错。勾践臣服于

夫差本就是在演戏，而非真心诚意地请求夫差宽恕他，这只能说夫差太傻，谁让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勾践的行为符合孙子兵法所说“兵者，诡道也”的求胜逻辑。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夫差待勾践不薄，可看看勾践在吴都的两年时间里都做了什么？勾践和妻子住在石洞里，每天穿着粗布衣裳，给吴王铡草喂马，扫马粪。

最经典的一幕就是有次夫差生病，勾践为了让夫差打消对自己的最后一丝疑虑，请求太宰伯嚭拎着盛着夫差恶臭粪便的尿盆子，然后勾践跪在地上用舌头舔尝粪便，然后说大王龙体可愈，夫差龙心大悦。

世界上有哪个男人愿意品尝另外一个男人的粪便，何况他们还是曾经的死敌，这种尊严的无限自贬，给夫差带来了心理上的极大愉悦，或者说是复仇的快感。从这个角度讲，夫差对勾践的所谓不杀之恩，勾践已经用包括吃大便、供妻子临幸在内的人格自我贬损偿还了，还能要求勾践怎么做？

伍子胥曾经警告夫差不要被勾践表面上的奴性所迷惑，一旦放虎归山，虎必噬人。夫差不同意伍子胥的观点，他说勾践有三种美德，一是义，二是慈，三是信。义者，勾践率越人归吴；慈者，勾践亲尝粪便，使妻为婢女服侍夫差；信者，勾践几乎掏空了越国国库，把大把的金银奉送给吴国。也就是说，夫差也认为勾践已经偿还完了他曾经欠自己的各种债务，恩怨两清了。

作为强势的一方，很容易忽略弱势一方在受辱时的心理感受。虽然夫差并没有逼迫勾践去做这些下三流的事情，但在勾践看来，夫差永远欠他一场羞辱。这很好理解，韩信在以楚王的身份回到淮阴后，重赏了曾经羞辱自己的屠家恶少，并称恶少是壮士，其实这也是韩信对恶少的报复，不过手段比较隐晦而已。

勾践在受辱时的心态和韩信是一致的，只不过因为他受到的耻辱更为严重，所以勾践的报复心理更为强烈。勾践在从吴返越后，召见群臣时说：“昔者越国遁弃宗庙，身为穷虏，耻闻天下，辱流诸侯，今寡人念吴，犹躅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视。”忘记历史，是对民族的背叛；忘记耻辱，是对尊严的背叛。

当年意气风发的越王勾践，新的身份是吴王的马奴，在姑苏众目睽睽之下，尽心尽责地服侍吴王，成为吴人茶余饭后的笑柄。这里没有勾践的亲人、兄弟，更没有在越国时专属于他的那份王者之尊，有的只是屈辱和对未来不确定的幻想。

夫差确实宽仁，没有难为勾践，而且勾践的种种媚举也不是夫差逼他的。但正因为如此，夫差越宽仁，勾践会觉得越屈辱，在自尊心强烈的弱势一方看来，强势一方对他越好，他灵魂深处的那种知耻意识就会无限放大。

勾践在姑苏忍了整整两年，虽然妻子和范蠡日夜陪伴在勾践身边，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勾践的孤独感，但在灵魂深处，勾践依然是一个孤独者。更何况范蠡每天都会亲睹勾践的马奴生涯，从这个角度讲，范蠡、文种和夫差一样，都是勾践不想再见到的人。

在众人的努力下，夫差已经完全被骗到了，认为放勾践回越不会影响到吴国的称霸，于公元前489年的三月将勾践放回越国。在越国君臣一行来到三津（今吴淞江下游）的时候，身边已没有一个吴人，勾践突然泪流满面，悲不自胜。

当初他入吴为奴，就是从三津取道北上，当时勾践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因为他看不到未来。而如今两年的受辱期已满，勾践恢复了自由，那些不堪回首的耻辱已经成为历史。

勾践并非后人传想中的冷血，他的感情世界非常丰富，他也会哭，也会慨叹命运。勾践在三津口的江水之上，品尝的不再是臭不可

闻的粪便，而是自己劫后逢生的喜悦泪水。勾践心潮起伏地告诉身边人：“我落难时，从三津经过，当时不知道还能否活着回来。”

等到船只即将抵达越国的水岸时，勾践看到无数百姓挤在岸边，欢迎他们的君主在饱经磨难后安然回来时，自椒山惨败入吴为奴后的几年时间内在勾践心中积郁的压抑，这时得到彻底释放。

勾践近乎是怒吼着哭出声来，“吾已绝望，永辞万民，岂料再还，重复乡国。”按《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的记载，勾践说完这句话后，“言竟掩面，涕泣阑干”。

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一般人受辱后，一旦和死敌强势易位，他们会把死敌整得很惨，用一种变态的心理去看待落难的死敌。有些人受辱后的心态容易变得扭曲，伍子胥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勾践并不是这样，这两年在吴都的受辱经历，是勾践用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挺过来的，勾践稍有些意志薄弱，随时可以选择自杀。

勾践有一万个理由仇恨夫差，在三千越甲吞吴后，夫差落到勾践的手上。如果勾践换成伍子胥，夫差会死得非常难看，但勾践并没有丝毫复仇的变态快感，他更同情走投无路的夫差，夫差现在所面对的，就是当初自己所经历的。

强者很容易同情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弱者，因为强者能从这样的弱者身上怀念属于自己的那段灰暗历史。从本质上来说，夫差和勾践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的血都是热的，而不像一些欺负旧主孤儿寡母的篡位帝王冰冷残酷，却披着仁厚的外衣在历史上招摇撞骗，相比之下，人品何其下作。

夫差哀求勾践念及当初他对勾践的不杀之恩，放吴国一条生路，夫差派大夫王孙骆来告命，言辞哀婉可怜，并承诺“若徼天之中得赦其大辟，则吴愿长为臣妾”。勾践对此的反应是“不忍其言，将许之成”，同意放虎归山。

勾践当然知道放虎归山的后果，夫差极有可能成为再版的勾践，而勾践则有可能沦为再版的夫差。但在王孙骆苦苦哀求的那一刻，勾践还是心软了，就像当年夫差的心软一样，差一点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幸亏被智算无遗的范蠡给拦住了。

范蠡的冷静分析让勾践放弃了迂腐的妇人之仁，必须在吴国的冷灶上浇下最后一盆凉水，但勾践还是坚持赦免夫差本人，并为夫差在甬东（今浙江宁波海中小岛）安置了居所，划拨三百家仆供夫差役使，被夫差拒绝了。

当然，从这一点上讲，夫差更有骨气，宁死不吃嗟来之食。可如果从励志的角度讲，夫差又不如勾践，在相同的人生困局下，勾践可以吃嗟来之食以图后举，夫差为何就不能？

这样的勾践，难道不可爱吗？

三五 聪明的范蠡和不聪明的文种

开创大汉天下的一代战神韩信被吕雉阴谋处死时，哀叹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这就是历史上两个著名的成语——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和韩信有关的成语数不胜数，但这两个成语的版权所有者却不是韩信，而是春秋末期的一代智圣，既传说中和美女西施泛舟五湖四海的陶朱公范蠡。

范蠡的一生非常传奇，即使是伍子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在范蠡面前都略显逊色。论功业和政治地位，伍子胥的分量并不低于范蠡，但伍子胥之所以死在已起杀心的主公夫差之手，而范蠡则从主公勾践的刀尖上溜掉，只有一个原因，伍子胥做人不够聪明。

范蠡有许多不同的身份，但与其说范蠡是智圣，是名臣，是大商人，不如说范蠡是个聪明人，参透了人性善恶的聪明人。什么是聪明？有人会说是智商，有人说是会做人，这些都是小聪明。真正的大聪明，正如老子所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做到这两点，就是世上绝顶的聪明人。

小聪明没有大智慧，但大智慧一定有大聪明，古今参透世事人心的哪个不是万里挑一的人精？伍子胥通透天下，却吃不透夫差的本性，被夫差灌了一碗迷魂汤，自以为是地说立太子的事包在我身上。结果如何？伍子胥以为扶夫差上台，就能保住自己的后半生富贵，谁知道伯嚭摘走了伍子胥树上的所有果子，最终由夫差亲手砍倒了伍子胥这棵参天大树。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伍子胥吃透了夫差的父亲阖闾，成功为伍家复了仇。但伍子胥一直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的阴影里，始终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此人就是范蠡。

说到伍子胥和范蠡之间的纠葛，这还要引出本篇的另一位主人公——越国大夫文种。说范蠡必说文种，这两个人不但是勾践灭吴的功臣，更是两种性格和两种人生观的对立。范蠡聪明的对面，就是文种的不聪明，如果没有文种悲剧性的反衬，范蠡也许就没有后来那么炫目的传奇色彩。

古人常说“楚材晋用”，实际上吴国和越国同样是接纳楚国人才的大户，吴国两大名臣伍子胥和伯嚭都是楚人，而越国两大复国功臣范蠡和文种也是楚人。都说范蠡和文种是越国两大样板名臣，实际上范蠡是文种“三顾茅庐”请出山的，这才成就了范蠡的不世传奇。

根据《越绝书》的记载，范蠡是楚国宛城（今河南南阳）人，家世不详，应该是士阶层出身，至少不是奴隶。范蠡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扬名宛城了，不过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经天纬地之才，而是街坊邻居都知道此地有个叫范蠡的疯子。

从字面上看，范蠡在幼时可能得过轻微的癫痫，“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精神病）”。有人常说：天才多半是疯子，范蠡也不例外，《越绝书》称他“独有圣贤之明”，这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评价。

范蠡成年后，却有意隐藏自己的“圣贤之明”，继续装疯卖傻，“佯狂”。范蠡这么做，应该是在藏锋卖拙，毕竟他所处的楚国正在第一昏君楚平王的统治之下，费无忌嫉贤妒能，如果让他知道有范蠡这号天才，费无忌很有可能做掉这个将来会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天才。

这就是范蠡的聪明，可以说是小聪明，也可以说是大智慧。范蠡胸怀锦绣之才，自然要寻找机会实现乘龙之志，但现在必须隐忍，就像韩信要想做大将军，必须从屠家恶少的胯下钻过去一样。

范蠡做人的聪明是一以贯之的，无论是出山，辅越灭吴，还是泛舟归隐，都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相反，作为越国仅次于勾践、范蠡的男三号，文种则始终缺少一种做人的智慧，为人太直，优柔寡断，最终以悲剧收场。

范蠡见文种这个桥段，在历史上没有诸葛亮三顾刘备知名，但故事的戏剧性要远强于三顾茅庐。时任楚国宛城令的文种爱贤心切，刚到宛城上任时，就听人说宛城有一位大贤人，但既不知其名，也不知长什么样。为了得到这位贤人，文种漫天撒网式地在城中四处寻找。

听说这位贤人有些疯疯癫癫，文种专在疯子中撒网捕鱼，发现疯子就拜，就这样一路拜下去，终于拜到了范蠡面前。范蠡对文种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见，文种的贤达，范蠡应该是了解的，但如果文种请范蠡出山为楚国效力，则是范蠡不敢接盘的。楚平王和费无忌是一对千古难寻的昏君佞臣，给他们效力？爷还没活够呢。

这可以说是范蠡的精明处，也可以说是范蠡的谨慎处，千万不要因为盛情难却而跳进泥沼地里，朋友不是这么交的。文种刚到的时候，范蠡继续装神经病，蹲在院墙的狗洞旁边学狗叫，企图蒙混过关。

文种一直参不透官场和人性的对比关系，他自始至终都是个清官忠臣做派，他虽然看穿了范蠡是在装傻演戏，但却没有看穿时局。文种有大智慧没有大聪明，他只知道想为国举贤，却不知道在君昏臣佞的时代，举贤何用？

范蠡到是出来见了文种，他知道文种是个善人，所以敢于在文县令面前展示自己的雄才大志，“蠡修衣冠，有顷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

什么是大聪明人？在做大事时，有两点要求：一、见机而动，二、适可而止。范蠡在功成名就后泛舟而去，做到了适可而止，而现

在一文不名的他需要做的，是随文种出山，做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不过范蠡从来没有考虑过为楚国效力，他真正的目标是开始出现争霸苗头的吴国或越国。无论是在位的吴王阖闾，还是越王勾践，都是不世出的英主，阖闾或勾践都有重用范蠡和文种的可能，为了争霸，他们需要高端人才。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吴国比越国距离楚国更近，所以范蠡和文种肯定要先去吴国投求职简历。以范蠡的经天纬地之才，他想要得到的职位是公司总经理，但到了姑苏才发现，吴国已经有了一位总经理，就是伍子胥。

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范蠡想做一个部门经理，阖闾还是可以接受的，但让阖闾拿下伍子胥，换上范蠡，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阖闾是铁打的吴国董事长，伍子胥是铁打的吴国总经理，阖闾曾经给国中下令：“无贵贱长少，有不听子胥之教者，犹不听寡人也，罪至死，不赦。”

现阶段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伍子胥的地位，但如果范蠡接受部门经理，屈居伍子胥之下，那就不是范蠡了。刚到吴国的时候，有人就劝范蠡和文种，不妨去投靠伍子胥，先在伍子胥门下找点事做，被范蠡当场拒绝。

后来与范蠡、文种同在勾践麾下做事的逢同也是楚人，而且他应该也是和范蠡一起弃楚归吴的。逢同的观点和范蠡一样，与其看着伍子胥吃肉喝汤，咱们不如另择高枝，有伍子胥在，咱们连汤都喝不上。

所谓另择高枝，除了越国，他们也无枝可依。去越国，对范蠡等人来说有几大好处：一、吴国在伍子胥的治理下，已经初具霸主规模，用得着范蠡的地方自然不多；二、越王勾践有争霸之志，但国势

弱小，相对吴国来说是一张白纸，范蠡更有施展才能的空间。

越王勾践是很羡慕阖闾的，因为阖闾有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伍子胥。但勾践和范蠡谈论了一整天之后，勾践已经忘记伍子胥是谁了，因为他有了同样无所不能的范蠡。

吴王阖闾和范蠡的人生几乎没有交集，但对于吴国二号人物伍子胥来说，范蠡的横空出世，几乎对伍子胥产生了致命的威胁。如果没有张良，范增可以称为楚汉第一谋士，甚至可以说范增间接死在了张良之手，伍子胥同样如此。

范蠡投奔勾践，是一场双赢的买卖，范蠡有了施展抱负的平台，勾践得到了范蠡殊绝无双的智力支持。此时的勾践刚刚启动他的争霸大业，正是用人之际，他不会也不敢对范蠡有什么阴毒的想法。

事实已经证明，正是因为范蠡的出现，才导致本来吴强越弱的天平开始朝着有利于越国的角度发生倾斜。越国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几乎都是出自范蠡和文种的建议，而越国的每次失利，几乎都是不听范蠡良言造成的恶果。

最典型的一次，就是发生于公元前494年的著名的椒山之战，勾践认为夫差志在报其父阖闾为越所伤致死之仇，不听范蠡的劝告，主动向吴国发起进攻，结果惨败。

在交战之前，范蠡反复劝勾践，吴国现在君臣和睦，内部团结一致，现在并不是我们对吴用兵的好时机，逆天必败。勾践刚继位，血气方刚，何况他刚打败了霸主阖闾，自然不把同样新即位的夫差放在眼里。

等到勾践兵败会稽山的时候，他才真正领悟到范蠡之于自己的价值，这是勾践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拒绝范蠡的建议，自此之后，勾践对范蠡言听计从。

接下来如何面对夫差，范蠡以他对夫差性格的了解，提出了“卑辞厚礼，委身于吴”的求和战略。夫差为人太过妇人之仁，很喜欢四处显摆自己的仁慈宽厚，范蠡很聪明地利用了夫差这一性格弱点，让勾践在夫差面前装可怜，博取夫差的同情心，然后俟机反攻倒算。

替勾践去吴国装可怜骗人的是大夫文种，如果单论做事而不论做人，文种其实也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如何打破僵局。在头次见夫差被撞得满头大包后，勾践急得要自杀，文种及时拦住了他，说我们在夫差身上占不了便宜，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

吴国大夫伯嚭深受夫差的宠爱，而且此人极贪财好色，“可诱以利”，正道走不通，咱就走歪门邪道。向来喜欢走下三路的勾践大喜，立刻准备大量宝器，以及两位超级美女，有可能就是西施和郑旦，交给文种去见伯嚭。

在越国的权力布局中，范蠡是总经理，主要负责内外政策的制定，但出面办事的多是外联办主任文种。文种巧舌如簧，在收买了伯嚭之后，三言两语就把夫差哄得眉开眼笑，同意了勾践来姑苏侍奉的请求，避免了越国的灭亡。

在陪同勾践入吴为奴的两年多时间内，文种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吴国内政，为将来越国的反攻做准备。这需要细致老辣的观察判断力，非智者不足以为此。回到吴国后，文种就给勾践分析吴国的优势和弱点：

吴之强：吴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刑法严密，军民遵纪守法，而且吴国全民皆兵，作战能力在越国之上。

吴之弱：权力斗争非常激烈，伍子胥和伯嚭已经水火不容。夫差喜听阿谀之言而恶忠直之言，亲小人远贤臣，败象已露。

文种所说的，勾践当然能看得出来，勾践想知道的是如何才能削

弱吴国的国力。表面看上去一副谦谦君子相的文种给勾践出了一个主意，“请余于吴”，就是向吴国借粮食。

越国其实并不缺粮，文种的算盘是从吴国借来粮食，主要是想通过粮食战来打乱吴国的战略部署。更阴毒的还在后面，一年后，越国按事先的约定偿还了借的吴粮种子，但当吴人把这些种子下地之后，苦等了一季，结果颗粒无收，严重扰乱了吴国的粮食市场秩序。这些粮种在送吴之前是专门用热锅炒过的，根本不能耕种，这正是文种的杰作！

当初借粮时，文种就吃定了夫差的妇人之仁，甚至都算定了伍子胥必然反对，而夫差必然驳斥伍子胥的反对意见。夫差急于在国际上树立霸名，就会利用一切机会展现自己的仁慈。正如夫差自己所
说：“勾践既服为臣，为我驾舍，却行马前，诸侯莫不闻知，今以越之饥，吾与之食，我知勾践必不敢反我。”

人在江湖上闯荡的最大悲哀，莫过于被人处处料定，最终一脚踏进别人事先挖好的坑里。文种做人不够聪明，但做事足够精明，勾践以三千越甲吞吴，文种起到的作用并不比范蠡小。

不过在勾践的心目中，范蠡的地位可能要略高于文种，虽然这种差距不是很大。打个比方，越国的三驾马车，有些类似于三国蜀汉的三巨头，勾践是刘备，范蠡是诸葛亮，文种是庞统。

同样作为谋士，文种和庞统走的是偏锋路线，都比较邪性，比如文种借吴粮，庞统密劝刘备袭杀刘璋。范蠡和诸葛亮走的基本上是阳谋路线，而且在勾践和刘备看来，范蠡和诸葛亮要比文种和庞统更重要，死了庞统不打紧，如果死了诸葛亮，刘备想死的心都有了。

关于范蠡之于勾践的重要性，有一件事情能很好地说明。范蠡在陪同勾践入吴的三个月后，夫差在宫中召见了他们，勾践跪着，范蠡站着。夫差是非常欣赏范蠡的，他甚至打算把范蠡收在麾下，牵制讨

人嫌的伍子胥。

当着勾践的面，夫差给范蠡做起了思想工作，“今越王无道，国已将亡，社稷坏崩，身死世绝，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为奴仆，来归于吴，岂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弃越归吴乎？”

当听完夫差这些刺心的话后，范蠡还没有回话，勾践就已经痛哭流涕不省人事了。勾践知道，他现在身处险境，唯一能帮助他脱险复仇的只有范蠡。一旦范蠡变心，勾践连回越国的机会都没有了，可见范蠡在与不在，对于勾践的命运是决定性的。

实际上勾践的忧虑是多余的，在眼下这个时局，只有傻瓜才会投靠夫差。站在范蠡的角度看问题，伍子胥固然有失圣眷，但余威犹在，此时范蠡要踏进这个火坑，未必就是伍子胥的对手，何况旁边还有一个贪财好色的奸臣伯嚭。退一万步讲，范蠡能将伍子胥和伯嚭一锅端掉，但之后呢？范蠡对夫差的性格也是吃透了的，躲都来不及，谁还敢进去掺和？

范蠡的选择和现代大学生求职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能直接进入超大型企业做管理，自然要比进入小微企业舒坦，之后呢？由于大企业的用人机制已经趋于完善，再往上爬又能爬到哪里？而如果进入小微企业，表面上看创业之路艰辛困苦，但一旦创业成功，那就是开国元勋，地位自然要强于超大企业的高级打工仔。诸葛亮不投东吴，就是不想做一个高级打工仔，范蠡同样也是做如是想。

一般来说，在一家大型利益（或经济或政治）集团中，一号人物是不能太厚黑的，真正厚黑的往往是二、三把手。一号人物玩厚黑，很容易让手下人产生难以自保的疑虑，二、三号人物玩厚黑，上不见疑，下不见猜，可以保全上下。

玩厚黑的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主公扮红脸，专玩正的，他们扮黑脸，专玩邪的。曹操有厚黑高手程晔，刘备有厚黑高手庞统，值得

勾践庆幸的是，范蠡和文种都是不出世的厚黑高手。没有这两大厚黑高手，勾践进得去姑苏，回不到会稽。

范蠡的厚黑，是人们很少提及的，但就凭一件事情，范蠡的厚黑指数当在文种之上。以前讲过勾践为了骗取夫差的信任，跪在地上品尝夫差的粪便，这个厚黑之极的阴险手段，其实并不是出自勾践，而是范蠡教勾践做的。

和文种一样，范蠡同样看穿了夫差的虚伪和妇人之仁，他非常肯定地告诉勾践：只要勾践“求其粪而尝之，观其颜色，当拜贺焉，言其不死，则大王何忧”？

勾践在吴都为奴的两年时间里，虽然夫差一直顶着伍子胥的压力，善待勾践，但对勾践还是有所怀疑的。当勾践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舔着夫差新鲜出肛的粪便，大声称赞粪便的美味时，男人征服男人的极度快感瞬间击垮了夫差。自此之后，夫差不再怀疑勾践，伍子胥说了一箩筐的危乎险哉，全成了无用功。

正因为范蠡对勾践有救命之恩，刚回到越国，勾践就痛哭流涕地给范蠡一个天大的承诺，“不谷（即寡人）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这是什么待遇？按戏文的说词，这就是一字并肩王！

如果是别人，对于勾践真心的报答，接了也就接了，但范蠡还是“巧颜令色”地拒绝了。范蠡拒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勾践对他已经起了杀心，他哪还敢往火坑里跳。

都说君主喜欢烹良犬，藏精弓，但烹犬藏弓的前提往往是权臣功高盖主，让君主产生了对失去权力深深的恐惧，韩信死在这上面，年羹尧同样如此。特别是在创业成功后，往往就是君主从创业功臣手上收回权力的时候，有些聪明人已经事前瞧破杀局，悄然隐退，比如张良，再比如小说里的邬思道。

都说刘邦敬张良如师，吹捧上了天，但这是在张良主动归隐之后，如果张良恋栈不去，刘邦早就把子房先生踢到牛棚里了。汉初三杰，刘邦最忌惮的就是张良与韩信，但即使是对刘邦威胁最小的萧何也不得不贪污以自保，可见功臣保全之难。

范蠡的考虑正是如此，等到灭吴之后，范蠡之于勾践来说就是功比天高的恩主。但如果他继续赖在位子上，会给勾践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会让勾践骨子里的自卑心态发作，更何况让人最羞于启齿的吃粪主意就是范蠡出的。

如果说范蠡刚入越效力时，对勾践的为人还不太了解，但当勾践坦然地接受吃粪时，想必范蠡暗中倒吸了一口凉气。满脸堆笑地吃另外一个男人的粪便，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是做不出来的。勾践为了复仇，连最基本的男人尊严都不要了，勾践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正是因为看到了勾践骨子里的戾狠，所以在成功灭吴后，范蠡铁了心要离开勾践。

人性有一个特点，经常在恩主离开之后感恩戴德，但很难容下恩主成天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因为这样容易给自己造成一种自卑感。为了勾践的面子，范蠡也必须离开，否则勾践会非常不自在，这对范蠡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在灭吴之后归国的路上，范蠡突然开了小差，没有跟随勾践回到会稽，而是写了一封辞职信。勾践有些不爽，问范蠡为什么要辞职，难道你认为寡人会杀了你？范蠡话说得虽然比较隐讳，但意思非常清楚：当初你受辱于夫差，我是见证人，就凭这一点，我必须离开。

在灭吴之前，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教训，可以与人共患难。但当大功告成之后，勾践猜忌刻薄的本性也就没有隐藏的必要性了，他在回信中威胁范蠡：“子听吾言，可以分国；不听吾言，妻子为戮！”

如果勾践不说这些鬼话，或许范蠡还心存侥幸地回来。但勾践这些发自肺腑的真话暴露了勾践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强横与残忍，让范蠡坚定了离开的决心。

为了躲避勾践的追杀，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在几经辗转之后，范蠡变易姓名来到了齐国，做起了买卖。不过范蠡并没有忘记他的知心好友文种，范蠡在抵齐之后，给文种写了一封信，劝文种认清勾践的霸道嘴脸，早点离开，早点脱险。

这封信非常有名，原文为：“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这三个著名成语，就出自这封信。

范蠡的意思非常明确：自古功高盖主而恋栈不去者，鲜有好下场，只有适可而止者，才能保全天命。当初范蠡选择辅佐勾践，只是借勾践这个平台来实现自己的男儿抱负，并非贪恋富贵。见机而进，辅越灭吴；适可而止，浩歌归去，这才是大智慧大聪明，如果范蠡有一丝犹豫，等待他的将是冰冷的铁剑。

让范蠡可惜的是，他的严重警告丝毫没有打动文种，“文种不信其言”，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由于文种没有看透勾践的真实性格，文种坚信勾践不会做出过河拆桥的卑劣勾当。

二、因为贪恋名利导致的心理不平衡。

关于第二点，文种拒绝范蠡的劝告，主要还是对十几年前范蠡一直压过自己一头的不满情绪的表达。众所周知，范蠡是被文种请出山的，但范蠡在越国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做了宰相，文种不过是跑腿打杂的。

在灭吴之前，越国的权力结构没有丝毫变化，这对自恃才力绝人的文种来说，甚至是一种人生的羞辱，虽然文种依然以国事为重，从来不在这上面找范蠡的麻烦。

但现在男一号范蠡主动离开了，空出的相国位置对男二号文种来说，是一种很难抗拒的诱惑。在越灭吴的过程中，文种的贡献不比范蠡小，但光芒都被范蠡遮掩住了，文种一直咽不下这口气，他急于扳回一局。

文种有治国安邦的大智慧，没有知进知退的大聪明，作为勾践受辱的见证人，文种一日恋栈，勾践就一日不自在。相比之下，范蠡聪明地适可而止，不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留在越国的妻儿。更重要的是，保全了勾践作为天下霸主的面子。

在范蠡离开之后，勾践长长松了一口气，此时的勾践不再记得他在吴宫吃粪便时，范蠡是否站在一旁，而只记得范蠡的种种好处。勾践做了两件事情：

一、勾践拨出重金，命工匠打铸一尊范蠡的金像，放在殿上王位旁边。勾践每日必朝拜，世世不忘范蠡大恩大德，同时命令文武大臣每十天朝拜一次。

二、勾践把会稽附近的三百里肥沃土地封给范蠡的妻儿，并下死命令，包括越王子孙在内，谁敢侵范府封地一寸，寡人就取他的狗头。

勾践最后对天发誓：“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其实范蠡当初敢于抛下妻儿远走他乡，就是看准了勾践这一性格特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范蠡能够保全所有人的面子，皆大欢喜。文种知己不知人，看不透人性最深处的恶，最终功亏一篑。

受勾践猜忌的不仅是恋栈不去的文种，还有功臣计然（范蠡的老

师)、大夫曳庸、扶同、皋如都成了勾践的眼中钉，这些人精子都在装疯卖傻，“不亲于朝”，勉强保住性命。

文种也察觉到了勾践对自己态度的转变，称病不朝，企图躲过勾践的猜忌，但已经来不及了。计然等人以前都是打杂的，对勾践的威胁程度远不如文种，纵使文种退避三舍，勾践也没打算放过他。

没过多久，就有人弹劾文种，说文种有谋逆之心，请大王察拿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所谓的“有人”是勾践安排跳出来打文种的马仔，无论如何，文种是必须死的，否则勾践寝不安枕！

当文种接过勾践赐死的独鹿宝剑时，仰天长叹：“嗟乎！吾闻大恩不报，大功不还，其谓斯乎？吾悔不随范蠡之谋，乃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恶。”

直到此时，文种才悟出那个道理：君主的秘密与尊严，不是人臣可以消受的。雍正即位之后，他的首席大秘邬思道立刻辞官归隐，就是因为他知道雍正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邬思道野服归去，肯定是受到了范蠡离而生、文种留而死的启发。

痛哭流涕之后，文种心有不甘地“伏剑而死”。

文种死后，痛哭流涕的还有勾践。勾践伏在文种的尸体上失声痛哭，一是哭失去了文种这位治国贤臣，更主要还是哭文种的不聪明。如果文种能学范蠡，君臣可以两全，也不至于让勾践背负杀忠臣的恶名。

勾践为了纪念贤臣文种，以极隆重的礼仪把文种葬在了会稽山上，仅送葬时就出去了楼船之卒三千人，修陵建墓置鼎，让后世子孙永远不忘文种的大恩大德。

不知道勾践在看着文种陵墓缓缓闭上石门的那一刻，是否想起了野服浩歌归去的陶朱公范蠡。

清朝大才人袁枚的孙女袁绶有一首《咏史》诗，歌颂范蠡的知机而退：亡虏归来思报复，卧薪尝胆是英雄。五湖一棹烟波阔，如此功臣竟善终。

诗仙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之十八》中写道：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说的应该是文种。

三六 季札和豫让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被一代鬼才金圣叹称为第五才子书的《水浒传》的核心价值观，这个字只能是“义”字，虽然大多数梁山好汉的所作所为和“义”字没有任何关系。

人在江湖上行走，必须遵守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义规矩——义，即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谁都不能越界，梁山如此，春秋也是如此。孟子常说春秋无义战，这恰从反面角度证明了春秋以仁义为基础的道德价值体系并没有完全崩塌，否则也就不存在义不义战了。

江湖中人都自诩义士，不过真正能“践义”的并不多，梁山好汉中也只有鲁智深、林冲数人而已。春秋风云人物如过江之鲫，但要么诡诈多奸，要么迂腐可笑，算来算去，真正可称义士的，而且又大名鼎鼎的，只有两位：吴国季札、晋国豫让。

之所以把季札和豫让单列出来讲“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季札和豫让截然相反的出身。季札出身于吴国王室之家，深得父王宠爱，天生就是混社会上层的，而豫让出身社会最底层，以做智伯之家客为生。

季札和豫让，一个高富帅，一个矮穷丑，却从两个社会极端层面完美地解释了人性中的“义”。具体来说，季札的义，更接近于“信”，豫让的义，更接近于“忠”，下面先讲季札。

说到季札，我们首先想到那个践行诺言的著名典故——季子挂剑。“义”的基础是“信”，无信则无义，季札因徐君一言，相赠宝剑，被传为千古美谈。唐人李白有首著名的诗篇——《陈情赠友人》，前八句写得非常动情，如下：

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懦夫感达节，壮士激青衿。

这个感动千古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4年，这一年春，季札奉吴王之命北上出使鲁、齐、郑、卫、晋，开始了这场著名的文化外交之旅。季札的第一站是鲁国，而从吴赴鲁，就必须经过徐国（今江苏泗洪附近）。

出于外交礼仪，徐国国君亲自设宴款待季札，在席间饮酒时，徐君看中了季札随身佩带的宝剑。徐君很有眼力，季札的这柄剑是吴国最上等的好剑，史称“吴之宝”。和季札不熟，徐君不好意思开口索剑，倒是季札看出来了，只是由于他有公事在身，外交场合须臾离不开佩剑，也就没说什么。

按季札的想法，等他处理完外交事务后，再路过徐国，把剑送给徐君。没想到等季札再次回到徐国时，徐君已经去世了。季札做出了一个很惊人的举动，把吴国的镇国之剑挂在徐君墓旁边的树上。

从人劝季札不要拿宝剑随便赠人，何况人都死了，还送给谁？难道送给树上的乌鸦吗？季札的回答让人很感动，“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伤心，廉者不为也”。做人不能欺心，欺心者必被天欺，这就是季札朴素的人生观。

因为信守承诺，挂剑而去，季札深深感动了历史，其实这只是季札“义”生中的一个经典镜头。季札的“义”，还体现在他对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恪守，绝不越政治雷池一步，保国保家，两得其美，被后人称赞伯夷再世。

“义”在季札身上体现为两层性，即个人大义和国家大义。挂剑赠徐君属于前者，以非嫡长子之由拒绝继位，属于后者。《后汉书·丁鸿传》对国家之义的理解是：“《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在这一点上，季札几乎是道德完人，鲁国圣人孔子对季札都佩服得五体投

地。

季札能在春秋绚烂的舞台上呼风唤雨，首选不得不承认他有一个好祖宗。这一点不能说不重要，谁不想有个金爹银妈？后天的拼命奋斗那都是被残酷的命运逼出来的。

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如果从辈分上讲，季札是吴王僚和阖闾的亲叔父，夫差的嫡亲叔祖。这一点决定了后来季札在吴国王室“族长”般的地位，有些类似北宋野史演义中那位著名的八贤王赵德芳。

季札之所以在王族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这和他以自己非嫡子为由拒绝继承王位有直接的关系。季札是个恪守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人，他知道自己身份只是庶四子，上头还有三个兄长，从来没有窥视过那个位子。

季札不是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为了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位子杀得头破血流，问题是老爹寿梦最喜欢季札，一再扬言要越次立季札为君。形势非常简单，只要季札点一下头，那个位子就是他的，长兄诸樊、次兄余祭、三兄夷昧都得靠边站，他们半点机会也没有。

其实在季札之前，庶子继承君位的例子并非没有，他完全可以不背这个心理负担。只是季札始终无法说服自己背叛心中的“大义”，正如他对父亲临终前要求他即位时所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

季札知道父亲疼他宠他，而且这个位子不是他要阴谋手段抢来的，坐上去也心安理得。但如果他坐上去了，置三个兄长于何地，特别是长兄诸樊。在季札的坚持下，寿梦不再为难他，改立长子诸樊为嗣。

讲到季札的义，就要讲一下他侄子阖闾的不义。在有史料所载的

吴国王室中，抛开阖闾的能力不谈，阖闾的人品是最有问题的，为了最高权力，阖闾耍尽了阴谋诡计，弑君杀兄，置春秋大义于不顾，和季札是没法比的。

阖闾的人品还不如他的父亲诸樊，当初季札坚辞让位，把诸樊感动得一塌糊涂。诸樊知道这个位子本来是属于四弟的，他如果坐上去，会觉得心有不安。在先王寿梦的葬礼结束后，诸樊就惴惴不安地要把王位还给季札，被季札拒绝。

以诸樊此时的身份，季札已经固让，他完全可以顺水推舟爬上高台。但让人感动的是，“吴人固立季札”，这个吴人，指的只能是诸樊。不能说诸樊是在演戏，因为他没有必要这么做，季札不接单，能有资格接单的只有诸樊。

季札的大义，体现在他对诸樊一根筋似的行为的反应。“季札弃其室而耕”，向诸樊以及国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是不会即位的。在万般无奈之下，诸樊只好心怀愧疚地做了吴王。

都说季札有大义，其实诸樊同样有大义，诸樊始终为自己的即位心感不安，他只有把位子传给季札，才能卸下这块心结。诸樊在临终时（前548）把王位传给二弟余祭时称赞季札有“义”，为了能让季札有机会即位，王位将兄终弟及。至于自己的儿子姬光，诸樊根本没有任何考虑。想必诸樊传位时，姬光就站在父亲身边，看到父亲舍子立弟，姬光心中肯定打翻了醋坛子。

十七年后，余祭病死，把位子传给三弟夷昧，为的就是将来夷昧死后把位子名正言顺地交给季札，了却父亲和长兄的遗愿。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527年，夷昧病死前请求季札接位，但季札铁了心要恪守传统，宁死不即位，“逃去”。

是季札对功名利禄没有兴趣吗？不是，他并没有退出官场，继续

做他锦衣玉食的延陵公子，同时又是吴国的外交部长，可谓位高权重，名满天下。

季札认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末，没有资格做吴王。让他做吴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三位兄长没有一个子嗣，在这种情况下，季札才有可能接位。仅仅因为他的排行不合旧制，坚持不以坏礼为代价，来博取个人名利。

后人对季札的义歌颂不绝，实际上包括诸樊在内的三兄弟让贤所体现出来的大义同样值得歌颂。兄弟和睦，不败其家，吴国在寿梦之后突然强势崛起不是偶然的，其内在推动力就是兄弟四人友爱礼让，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历史的真理。

季札的贤与义，不仅感动了历史，也给他那位野心比西瓜还大的侄子姬光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姬光在请专诸做刺客时，针对专诸的疑问，姬光就抬出了季札做挡箭牌，说天下本就不是王僚的，就算杀之，等季札出使诸国回吴后，也不会废掉我。

从姬光的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季札在吴人心目中的地位，姬光要想在舆论上处在有利的位置，就必须在政治上继续尊崇季札，丝毫不敢少礼。等姬光弑君后，因为季札已经回到姑苏了，所以姬光不敢造次即位，还假惺惺地，说要把王位还给季札。

季札不接受三位兄长的传位，自然更不会接姬光的盘子，季札说得很清楚，“尔杀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乱也。”你姬光杀人，却让我即位，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傻子才会接招。这个侄子是什么货色，季札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姬光礼待季札，但季札从心底是不认同姬光的。在季札拒绝姬光虚情假意的让位之后，季札就来到王僚的坟头痛哭一场，这分明是在否定姬光的弑君恶行。在此之后，季札并没有再次“逃去”，而是留在朝中，这让姬光很不自在，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对姬光的王位继承

进行否定。

从现在的眼光看，季札的选择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姬光通过非法手段上位，却实现了吴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灭楚，这是王僚没有做到的。季札应该以吴国大业为重，出山辅佐姬光。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总要有人出来维护，季札不捍卫传统，社会就少了一杆道德标尺，这才是季札心中最大的义，这也是后世老夫子们对季札赞不绝口的主要原因。

在季札死后，据说齐天大圣孔仲尼派学生子游去季札墓前，写下两个字，“君子”。孔子非常看重“义”，和季札一样，都在努力维护主流价值观念，从这层意义上讲，孔子和季札是同志，所以孔子称赞季札是再正常不过的。

司马迁在《史记·吴世家》卷尾史评中用了七十五个字，其中王僚、阖闾、夫差等大头王一字也未提及，却用了三十字称赞季札：“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众所周知，司马迁非常认同儒家的思想理论，实际上季札也是一个儒家，他传承的是自周公以来的旧儒，而孔子的新儒也是从周公旧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从年龄上来看，季札长孔子二十多岁，当季札于公元前544年来鲁国观乐时，孔子只有七岁。当孔子成名时，季札早已名满天下，是周公之后，孔子之前的旧儒家的代表人物。季札一生重“义”，以身作则，推行旧儒家的思想理念，这对孔子新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

讲完了季札，再来讲豫让。

豫让本来是应该放在《春秋刺客篇》中的，专诸、要离都是豫让

的前辈同志。之所以把豫让和季札同篇，主要是因为虽然三人同为刺客，但性质完全不同。

专诸是贪图姬光许给他的封其子为上卿的大富贵，他和姬光之间是典型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要离，纯粹是个神经病，什么都不图，用全家人的性命拼掉了和自己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庆忌，二人和“义”是扯不上关系的。

豫让行刺赵襄子赵毋恤，既非图名，也非图利，只是想为曾经对自己恩重如山的旧主智伯报仇，这才是大仁大义。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的那些刺客们，也只有豫让才有资格称为义士，其他人全是糊涂蛋子，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活。

司马迁在名篇《报任安书》中曾经提到一个著名成语，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实际上这句名言的版权所有权就是豫让，司马迁只是免费借用了一下。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几十载春秋轮回而已，总要留下一点什么，才不会觉得遗憾。有人给子孙留下了万贯家财，有人给后世留下了千古骂名，豫让留下的则是“义”。

豫让的义和季札的义不甚相同，季札维护的是主流精英为本位的社会价值观，而豫让则是在维护一种江湖中人特有的道德价值观。江湖最推崇的就是义，而不是仁，所以江湖中人拜把子，称为结义或义结金兰，没听说过结仁或仁结金兰的。

庙堂之上的义，讲究的是君君臣臣，天下社稷，万民安泰否。江湖草野的义，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个人化的正确价值观，做人要恩怨分明，受人一鹅毛，必以千金赠。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伍子胥和韩信在穷困落魄的时候受漂母一饭，他们发达后，立刻相赠千金，以报一饭之德。

豫让刺赵毋恤，本质和伍子胥、韩信一样，都是在报恩。不过略有不同的是，伍韩报恩是出于做人“以德报德”的道德本能，而豫让为

旧主寻仇则是出于他心中的江湖大义。因为受智伯恩惠的并不止豫让一人，而只有豫让选择了和赵毋恤血拼到底。

前面讲过，豫让出身于草根，但他的家世并不简单。我们都知道吴国有一位著名的奸臣伯嚭，间接导致了夫差的灭亡和勾践的称霸，伯嚭的祖父是楚国大夫伯州犁，而伯州犁本来是晋国大夫伯宗之子。伯宗在晋国得罪人太多了，为了保护好儿子，伯宗在民间得到了一位奇士毕阳，由毕阳保护伯州犁入楚，不久后，伯宗就在晋国内乱中被杀。而这个义士毕阳，就是豫让的祖父。

对于毕阳的生平，除了《国语·晋语五》卷尾提到了送伯州犁入楚，再无史料记载。但从豫让一直生活在晋国来看，毕阳送伯州犁入楚后，很可能又回到了晋国，豫让也有可能在小时候就生活在祖父身边。毕阳的义举，以及家庭的草根地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豫让价值观的形成。

豫让生活在春秋末期，此时距离春秋最后一位霸主勾践的去世（前465）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齐桓、晋文争霸的时代早如过眼烟云。

齐国自简公姜壬被杀后，姜氏的权力就落入权臣田常手上，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相比于齐国，晋国的形势更加混乱不堪，齐国是田常一人执政，晋国则是六卿执政，即著名的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晋国姬姓公室早已被架空。

六大家族的祖上都是晋国勋贵大臣，背景个个硬得很，平时为了争夺权力没少暗中拆墙使绊子。从实力上来看，知氏最强，赵魏韩次之，范、中行最弱。在公元前458年，知氏的家主知瑶（即大名鼎鼎的智伯）联合赵魏韩三家吃掉了相对弱小的范氏和中行氏，四家共同瓜分，利益均沾。

《史记·刺客列传》说豫让曾经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当过差，时间

都不太长，豫让接连炒掉范老板和中行老板，跳槽到了知氏公司当员工。豫让在智伯手下都做了什么事情，于名不详，可以肯定的是，智伯非常欣赏豫让，至少豫让在智伯那里得到了重用。而范氏和中行氏应该是对豫让不够尊重，豫让在他们手下看不到前途，才不得不改换门庭的。

蜀汉第一谋士法正曾经在益州牧刘璋门下做事，但不受重用，后来法正攀上了刘备这根高枝，并在刘备取代刘璋自为益州牧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奇功。后世一些人就以法正曾经给刘璋效力为借口，攻击法正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实际上法正和豫让是同一类人，恩怨分明，你投我以桃，我报你以李，都具有明显的江湖豪侠之风。刘璋不待法正以国士，法正又凭什么给刘璋卖命到死？豫让同样如此，范氏和中行氏待豫让如下人，豫让没有道理为这样的人物当一辈子小弟。

知瑶是晋国的正卿执政，没有两把刷子，他也爬不到这个位置。公元前472年六月，知瑶率晋师伐齐，在犁丘（今山东临邑）将齐军打得鼻青脸肿，生擒齐国大夫颜涿聚，可见知瑶的军事能力不是吹的。

豫让投奔知瑶麾下，并非是贪图知瑶的权势，否则在知氏被灭后，豫让有一万个理由拜在新执政的赵襄子门下，而不是去刺杀他。知瑶应该是知人善任的，豫让重情重义，能力想必也不会太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豫让）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能让文武兼备的晋国正卿宠爱有加，豫让岂是凡品？

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刘备在亲征汉中时，在阵前冒箭雨拼杀，法正也不避危险地陪在刘备身边。以法正恩怨分明的个性，刘备待他如路人，他是断然不会以死相报的。

不能说法正是在刻意模仿豫让，但豫让的大忠大义确实感动了历

史，故事的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公元前455年，野心已经极度膨胀、“欲尽并晋”的知瑶，以武力强迫魏桓子魏驹、韩康子韩虔，组成多国部队，向盘踞在晋阳，素来不服知瑶的赵襄子赵毋恤发起强族，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晋阳之战。

形势本来对知瑶非常有利，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多，赵毋恤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但在最关键的时刻，赵毋恤利用“唇亡齿寒”的心理，说服韩、魏两家，对知家反攻倒算，实现了人生大逆袭，一代大卿知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战国三雄赵魏韩崛起的垫脚石，知家的地盘被三家瓜分。

撇开魏、韩两家打酱油的不谈，赵毋恤和知瑶有不共戴天的死仇。当年知瑶率军攻郑，赵毋恤为副将，知瑶有次在帐中饮酒大醉，对赵毋恤强行灌酒，当场让赵毋恤难堪。

最过分的是知瑶企图参与赵家的废立大事，要求赵毋恤的父亲赵简子赵鞅废掉毋恤。赵鞅当然不会听知瑶的满口柴胡，但赵毋恤由此恨知瑶入骨。这次灭掉知瑶，赵毋恤的复仇快感可想而知，他在极度的兴奋中把知瑶的人头砍下来，做成酒器，在人群中四处炫耀。

赵毋恤是复了仇，可他对知瑶尸体的污辱却深深伤害了豫让，知瑶得罪赵毋恤，那是他们之间的恩怨，和豫让无关。豫让只知道知瑶待他如国士，如今恩主死后被辱，作为知家最受宠的臣子，豫让岂有坐视之理？为子死孝，为臣死忠，这是为人的本分。豫让唯一能做的，就是复仇，用赵毋恤的一条命来报答知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故事的过程很简单，豫让用易容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待罪的奴仆，怀揣一枚利刃，趁人不备，混进了赵毋恤家中正在装修的豪华厕所里。豫让假装在粉刷墙壁，等着赵毋恤自投罗网，没想到赵毋恤太敏感，一眼就看出这个奴仆有问题，让身边人拿下，果然搜出了一枚利刃。

豫让要以死殉义，尽人臣之忠，其实心存大义的，还有他的敌人赵毋恤。豫让刺杀自己，赵毋恤有一万个理由杀死豫让，赵家门人也劝家主除掉豫让，但赵毋恤很大度地赦豫让不死。理由是“彼义士也，知伯已死无后，而其臣至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士”。当然，不能排除赵毋恤以赦豫让树立自己仁慈形象的嫌疑，但反过来说，豫让刺杀赵毋恤，也不是图一个江湖忠义之名吗？

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赵毋恤释放豫让后，豫让并不感恩，反而用自残的方式折磨自己，改变自己的外形、声音，准备再次刺杀赵毋恤。豫让把全身涂满了黑漆，导致皮肤溃烂，甚至把烧红了的炭放在嘴里，造成声带嘶哑。

豫让的朋友看到后，问他何苦自残，知瑶已死，你为他报仇又有什么实际意义？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在赵毋恤门下，必能得到重用，做人不能不识时务。豫让说得斩钉截铁：我明知事必不成，但我受知伯厚恩，必以死报之，让后世那些食主之禄却背主求荣的小人们羞愧至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豫让已经不是在为知瑶报仇了，而是纯粹地追求一种人生的存在价值观，即他心中的大义。或者从人性私的角度来看，豫让这么做，是在求死，准确地说，是在求名。只是问题在于，如果心无大义，一般人不敢以死求这样的名，文天祥是以死求名，但这样的求名，又有几人敢做？

豫让再次刺杀赵毋恤于桥下，结果又被赵家门人活捉，激怒了曾经放他一马的赵毋恤。赵毋恤有些愠怒地责问豫让：“你当年也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做事，范氏和中行氏被知瑶所灭后，怎么不见你为他们报仇，偏偏要为知瑶报仇，何故？”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以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土遇臣，臣故以国土报之。”这是豫让对赵毋恤的回答，字

字滴血，感人肺腑。范、中行氏待豫让如路人，豫让当然不必为他们复仇，知瑶待豫让如兄弟，恩宠有加。豫让连番刺杀赵毋恤，就是要以死报答知瑶当年对他的知遇之恩。

豫让向赵毋恤提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他两次行刺赵襄子，论法当死，但如果不报于知伯，他死不瞑目。“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赵毋恤的回复同样感人，“义之”，赵毋恤是一代雄杰，如果这点度量都没有，干脆别在江湖上玩了。

豫让的忠诚感动了曾经对知瑶恨得咬牙切齿的赵毋恤，他脱下袍服，让侍从高高举起，权当是赵毋恤本人，请豫让举剑刺其衣，也算为九泉之下的知瑶报了仇。豫让泪流满面地挥舞着利剑，朝着袍服连刺三下，《战国策·赵策一》对豫让刺衣的桥段写得简洁而震撼人心，如下：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三七 孔子闪亮登场

在中国，可以不知道秦皇汉武是哪朝皇帝，萧何、曹参是哪朝宰相，但一定要知道孔子是谁。

研究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是绝不可能绕过孔子的，不谈孔子而谈中国历史，就如同讲三国而不讲诸葛亮一样，注定是荒谬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政治符号，其影响之大、之深，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谓空前绝后。甚至从某种角度讲，一部皇皇中国史，就是孔子不断被神话的过程。

从孔子的社会身份本身来讲，他只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勉强算是一个社会学家，但自从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已经逝去四百年的孔子不断地被后人戴上神圣的光环。

从西汉末年的“褒成宣尼公”，到北魏孝文帝时追封的“文圣尼父”，再到唐玄宗李隆基追尊为“文宣王”，直到公元1146年，西夏仁宗李仁孝无偿地给孔子扣上一顶“文宣帝”的大帽子。孔老夫子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却享尽“荣华富贵”，成为历代帝王的至圣先师，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想到的。

孔子在宋朝有一个忠实信徒，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子——朱熹，他在《朱子语类》第九十三卷中对他的先师孔子大吹特捧：“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在同卷，朱熹又给予孔子极高的政治评价：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虽然从语句来讲，朱熹的这句话大有毛病，在孔子出生之前的五百年里，中国历史极为辉煌，周武灭殷、周公执政、周室东迁、齐桓晋文相继称霸、管仲一圣照亮天下，又如何能当得起“天不生仲尼，

万古长如夜”？不过就汉武帝以后的这两千多年里，孔子之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朱熹的吹捧也不是没有道理。

世界总是相对的，有人爱，就会有人恨，正因为孔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到了近代，一部分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孔子学说，结果群情激愤，砸倒了孔家老店，孔子也成了“臭名昭著”的“孔老二”，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有人说孔子是至明至德的大圣人，也有人说孔子是招摇过市的文化骗子，真实的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下面用较长的篇幅全面介绍孔子传奇的一生，以及被后世奉为圭臬的儒家学说。

下面把孔子的家世传承简单地说一下：

微仲衍生宋公稽（宋国君），宋公稽生丁公申（宋国君），丁公申生共公湣，共公湣生弗父何（宋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奔鲁为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丘的父亲。

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时任宋国的大司马，处在宋国统治集团的最高层，与太宰华父督同朝为官，是宋穆公子和最为倚重的高官之一。孔父嘉为人忠直，《公羊传》称赞孔父嘉“义形于色”，所以在宋穆公死后，孔父嘉作为托孤大臣，与华父督一起辅佐宋穆公的侄子宋殇公子与夷。

作为两大先朝元老，孔父嘉和华父督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问题意外地出在了孔父嘉的妻子身上。公元前766年，华父督在郊外偶遇外出的孔妻，由于孔妻容貌绝艳，姿态万方，被好色的华父督盯上了。

华父督盯上的，除了美艳的孔妻之外，还有宋国“宰相”的位子。

至于华父督在谋反时先杀掉孔父嘉，霸占其妻，主要原因还在于削弱宋殇公的势力。宋殇公对华父督擅杀重臣极为愤怒，“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其实宋殇公怒不怒，华父督都要对他动手的。果然如人们所料，华父督连杀君臣，控制了宋国政权，立宋穆公之子冯於郑，就是宋庄公。

孔父嘉的权力被华父督篡夺，他的子孙自然逃不掉政治清算，孔父嘉一系的爵位被降为士。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为了躲避华父督的追杀，率家眷逃离宋国，来到宋的邻国鲁国安身。

不过在南宋末年失传的《世本》却说离宋入鲁的是孔子的曾祖孔防叔，从人性角度讲，孔父嘉被杀，他的子孙不太可能在隔了三世之后才逃往鲁国，所以《左传杜预注》说木金父逃鲁避难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木金父虽然是宋国公族之后，又是宋大司马孔嘉父的儿子，家世显赫，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所以木金父这一系在鲁国一直没有混出来。一直传到了木金父的玄孙，也就是叔梁纥这一代，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但叔梁纥曾经与臧畴、臧贾等人率甲士三百与齐军交过手，说明叔梁纥在鲁国军界有一定的地位。

关于叔梁纥的婚姻情况，《孔子家语》记载得比较详细，叔梁纥先娶了鲁国的施氏女子为妻，结果老婆不争气，一连生了九个女儿，就是不见儿子。叔梁纥特别想要儿子，又和自己身边的小妾练了几回摊，儿子倒是生出来了，就是孟皮，但孟皮天生残疾，有足疾。

叔梁纥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的家业，如果没有一个儿子继承，家业早晚会被划进别人的户头上。妻妾指望不上了，叔梁纥只好再另觅佳偶，经人介绍，叔梁纥娶了颜氏的女儿颜徵在。

颜氏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所以当得知叔梁纥要与他们通婚时，颜家老爹兴奋得直搓手，告诉旗下三个女儿：“叔梁纥是卿大夫，父祖

虽然只是鲁国之士，但他们可是先圣（商朝王室）的后人，血统纯正。我久知叔梁纥为人，身高十尺，武力绝伦，是人中之龙。虽然叔梁纥年龄有点老，脾气有点坏，但成功人士有几个不是满脸褶子、霸道蛮横？实话告诉你们姐仨，我就早想做他的老丈人了。现在人家主动找上门，是我们颜家的福分，你们现在给我表个态，谁愿意嫁给这个糟老头子？”

在三姐妹中，有两个沉默不语，叔梁纥那么老，还能活几天，嫁给他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沉默就是反对，只有颜徵在表示愿意从父之命，为颜家博得一个美好未来。颜家老爹大喜，称赞女儿：“我早看出来你是最合适的。”吹吹打打过门之后，年幼的颜徵在便成了叔梁纥的妻子。颜徵在，就是孔子的生母。

有趣的是，《史记·孔子世家》在介绍叔梁纥和颜徵在结合时，用了“野合”这两个字。如果单从字面上解释，野合，就是在野外的荒郊野地上嘿咻嘿咻，即所谓“野鸳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野合”是指叔梁纥与颜徵在的年龄差距实在太太大，当时叔梁纥72岁，而颜徵在还不满十五岁，典型的老牛吃嫩草。

叔梁纥求子心切，已经顾不得社会舆论的讽刺挖苦，生个大胖儿子给自己传宗接代才是最重要的。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随着一声婴儿清脆的啼哭，这对老夫少妻的爱情结晶终于降临人间。

孔子出生的地点在鲁国的陬邑，即今天的山东省曲阜、泗水、邹城三县市交界处，这里也是邾国第一个国都。陬邑位于沂水（今不存）上游北岸，往东不过二十里，就是沂水的发源地——尼丘山（今尼山）。孔子名丘字仲尼，就是源于这座风景秀丽的山丘。

按为《史记》作注的南宋文学家裴驷（裴松之之子）的说法，孔子并不是生在曲阜，而是生在邹城，长大后迁往曲阜。“夫子生在邹，长徙曲阜”。就像汉高祖刘邦也并非生在沛县，而是生在丰县，

长在沛县一样。无论是“邹生曲阜”，还是“丰生沛养”都改变不了他们对曲阜和沛县的热爱，不必为某个名人是否为自己本地所生而打笔墨官司。

接着讲孔子。

叔梁纥为有了儿子而兴奋，颜徵在也长长出了一口气，终于生下了儿子，万一生个女儿，老头子是不会放过她的。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个儿子，会对东方历史产生空前绝后的影响，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超级伟人。

套用一句网络名言：“天空一声巨响，孔夫子闪亮登场。”

关于孔子的出生年月日，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史记》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公羊传》则说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而《穀梁传》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如果换算成公历，孔子的生日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一说是公元前552年9月28日。

孔子姓什么？从字面上讲，自然姓孔，实际上孔子姓子。没错，孔子是商殷王朝的直系后人，宋国开国君主微子启的弟弟微仲衍，就是孔子的第十五世祖先，而微仲衍的长兄，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暴君商纣王子受辛。

关于孔子的名字，《史记·孔子世家》交代得很清楚：“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虽然孔子的正式名称是孔丘，或称孔仲尼，但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皆称孔子。

其实颜家两姐妹不愿嫁给叔梁纥是有道理的，叔梁纥实在是太老了。在物质生活水平不高的两千五百年前，能活到七十多岁已经是高寿了，但也快到终点站了。果然，在孔家小儿子刚满三岁的时候，七十五岁的叔梁纥就撒下年仅十八岁的少妻和正在牙牙学语的儿子，撒

手西去。

有句老话说得非常透彻，“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叔梁纥是家中的主心骨，而且他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很高，所以，叔梁纥的死，对孔家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孔家的经济来源成了很大的问题，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所以《史记》说孔子“贫且贱”。

不过相对有利的是，孔子上面有九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孟皮），年龄应该比孔子大很多，在孔子出生之时，她们应该都嫁出去了，孟皮也成家立业了。颜徵在的负担并不是很重，她只需要把丈夫的骨血抚养长大就可以了，虽然她的娘家也帮不上什么忙。

颜徵在没有改嫁，而是独自一个人抚养儿子，孤儿寡母过早地体会到了生存的艰难。对于颜徵在这个女人，历史着墨并不多，但从她对孔子的教育来看，她应该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准，至少有能力对孔子进行幼儿早期教育。或者她知道知识对人成长的重要性，让孔子从小就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

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地，学术氛围浓厚，被誉为“文献旧邦”，以至于“士大夫以及野老村童，皆习礼仪”，孔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对他日后成为一代学术伟人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有一个证明就是，在孔子六岁时，他经常做一种游戏，就是把家里摆放的俎豆（木制祭器）放在地上，年幼的孔子有模有样地对着俎豆做拜祭状。如果没有好的学习环境，很难像有些学者所说孔子陈俎豆是“好礼出于天性”。

后世有人指责孔子虚伪，特别是那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认为为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是仁之根本。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孝”是与“仁”并列的，无孝则无仁，孔子并非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孔子从小就失去了父爱，在他十七岁（一说是二十四岁）的时候，母亲颜徵在也耗尽了她的最后一滴心血，撒手西归。因为在叔梁纥去世的时候，颜徵在作为寡妇，没有参加葬礼，所以她不知道叔梁纥具体埋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埋在防山（今曲阜东二十五里）附近，也就没有告诉孔子。

父先死而母后亡，除非是特定的原因，是一定要将父母合葬的，否则便是不孝。孔子不敢把母亲的遗体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只能将遗柩停在路边，四处打听父亲的坟头。陬邑人^輓父的母亲知道叔梁纥葬在什么地方，把地址告诉孔子，孔子才风光体面地把母亲合葬在父亲身边。

当办完颜徵在的丧事后，有细心的人发现，腰间还系着孝麻的孔丘已经出落成一位标准的美男子。也许是基因遗传，叔梁纥身高十尺，孔子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孔子身高九尺二寸。

如果按春秋时的尺寸标准换算的话，孔子身高约有两米至两米一之间，这是一个让后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身高。这个身高在现在足可以在NBA捞饭吃了，所以孔子在江湖上有个绰号——长人。对于孔子的身高，《史记》说“人皆谓‘长人’而异之”，说明当时像叔梁纥、孔丘父子这样的身高是异数，不能作为春秋人都身高两米的依据。

孔子从没想到靠自己的身高吃饭，此时的孔子已经是闻名于乡间的学者。而且还有一点，自父亲叔梁纥死后，孔子家境一落千丈，不过孔子毕竟是圣人商汤之后，标准的贵族出身，加上叔梁纥在鲁国官场积累的一定人脉，所以孔子在江湖上还有一定的知名度。

虽然贵族身份暂时没有帮助孔子摆脱贫困，但至少可以在社会中下层找到自己的崇拜者，就像一个公务员在普通女孩的择偶标准中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孔子十九岁的时候，不清楚是通过什么渠

道，孔子认识了来自宋国的女人亓官氏，二人很快就办理了结婚手续。

亓官氏的身份背景，史料无考，只有《孔子家语·本姓解》有力无力地给了一句：“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这是亓官氏在史料上唯一一次出场，之后再也找不到有关这个神秘女人的任何踪迹。不过就在第二年，亓官氏为丈夫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就是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

关于孔鲤的名字，有必要多说几句。《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了鲁昭公姬给孔子的儿子赐名，但此事在历史上争议比较大，因为这涉及了孔子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鲁国官场的。孔鲤出生的这一年（前532），孔子二十岁，而高高在上的鲁昭公居然会给足孔子面子，送来一条大鲤鱼作为贺礼。出于对鲁昭公的尊敬，孔子给儿子起名叫孔鲤，字伯鱼。

问题就出在这里，鲁昭公为什么要给还没有进入官场的孔子送礼，能想象皇帝给秀才送礼吗？清人崔述就持这一观点。近人江竹虚在《孔子事迹考》中提出了比较另类的不同看法，江竹虚认为这条鲤鱼很有可能不是鲁昭公送的，而是孔子的亲友送的，是后人为了抬高孔子的身价，拉鲁昭公出场走秀的。

综合来看，鲁昭公给孔子送鱼，实际可能是存在的。有这么一个细节，孔子十七岁时，鲁国大夫孟釐子在病死前，经常给儿子孟懿子谈孔子，甚至对孔子的家世了如指掌，并让儿子拜孔子为师，“学礼”。

孟釐子是鲁国高官，他对孔子如此高看，是完全有可能在私下场合向鲁昭公推荐过孔子的，所以鲁昭公知道孔子其人是很正常的。另外还有一点，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襄公时代的武将，而昭公又是襄公之子，鲁昭公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叔梁纥，或听父亲襄公称赞过叔梁

纡。鲁国官场并不大，哪个大臣家中有什么情况，在官场上是掖不住的，鲁昭公器重孔子，赐鱼，是符合逻辑的。

鲁昭公给足了孔子面子，却没有给孔子任何有关仕途的承诺，至少孔子在官场上谋到的第一份差事不是鲁昭公给的，而是在鲁国大族季氏门下做了一名委吏。《孟子·万章下》对此事有记载，所谓委吏，其实就是季氏门下的粮草官，相当于仓库保管科长，替季家管钱粮的。

三八 孔子绝世传奇

（上）

接着讲孔子。

历史上有两个伟大人物曾经做过粮草官，一个是孔子，志在于学，一个就是韩信，志在于天下。历史安排他们从保管仓库做起，确实有些荒谬，他们岂是津津于如此琐碎事情的人。韩信一心要做大将军，对粮草官毫无兴趣，而孔子则脚踏实地，在这个岗位上混过一段时间。

孔子曾经总结过自己对仓库保管工作的心得：“干这一行，一定要心细如发，不能在数字上出问题。”之后孔子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弼马温”（司职吏），替季家管理牛羊。

孔子似乎对这样的基层工作很有兴趣，无论是做粮草官，还是做牛羊官，他都把自身的管理价值最大化。做委吏，“料量平”；做司职吏，“畜蕃息”。有后人指责孔子是个读死书的书呆子，不了解社会，不接地气，实际上这是误解。

正如孔子自己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正因为孔子年轻时家境贫寒，不得不在社会底层找工作谋生，这反而对孔子全面了解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做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只要工作努力，总会有升迁机会的，像韩信那样，只是特例。

由于《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早期的活动顺序记载得相当混乱，而且语焉不详，不清楚孔子是何时升任比“委吏”、“司职吏”更高级别的司空的。司空是周朝六官之一，管理范围非常大，包括农业、林

业、城建、交通，几乎掌管着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

不过以孔子的官场地位，不太可能从司职吏一跃成为大司空，这样的肥差，官老爷们早就自己霸占了，怎么会让刚在官场崭露头角的孔子来做？从逻辑上讲不通。后人猜测孔子可能确实在司空部门工作过，但不是经济主官，而是副职，即通常所说的小司空。

以上三个职务都是经济官员，但在此之外，孔子还做过文化官员，具体职务是在鲁国的太庙助祭。《论语·八佾》说孔子经常进入太庙活动，与别人进行业务探讨。太庙可不是等闲人物随便进入的，孔子有资格进太庙，说明孔子的工作和太庙有密切的关系。南宋朱熹在《论语集注》也提到这件事情，说：“此盖孔子始仕之时，入而助祭也。”

应该说，在文化教育部门工作是比较适合孔子的志向和性格的，孔子曾经说过：“吾十五志于学”，说明孔子很早就有了投身文化教育事业的想。而且孔子的性格并非后人所臆想的那般庸懦，而是性烈如火，品性刚直，他是看不惯迎来送往、点头哈腰的衙门作风的。

努力总会有回报，孔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在文化教育界打开了局面。“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在孔子三十岁（前522）前后，已经是名满齐鲁大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了，算是鲁国文化教育界擎大旗的人物。

孔子的知名度已经不限于鲁国，诸侯都知道鲁国有一个名叫孔丘的高级知识分子。公元前522年，一代名君齐景公姜杵臼和一代名相晏婴率庞大的代表团出访鲁国，增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按政治级别，孔子不会出现在鲁国接待齐国元首的名单中，但作为文化名人，孔子还是得到了姜杵臼的接见。

清人崔述怀疑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载的齐景公见孔子的故事有可能是造假，其实A国政要在出访B国时，会见B国的文化名流，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崔述也没有提出合理的质疑。

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国界开放时期，虽然诸国林立，但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人员进进出出，而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国均采用新闻放开政策，所以一国发生什么事件，其他国家很快就能知道，这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为日后中原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

孔子也受益于这种新闻开放，他虽然身居鲁，却对天下事了如指掌。许多鲁国之外的重要人物，比如管仲、姜小白、晏婴、赵盾、子产等人，都被孔子拿来品头论足。

其中孔子对管仲和子产的评价是极高的，对于管仲辅佐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从民族大义的角度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将被发左衽矣。”至于子产，孔子也不吝笔墨，把子产吹得天上有，地上无，一代治政楷模，不过子产都当之无愧。

孔子不仅能风闻各国顶尖人物，更重要的，他还有机会离开鲁国，去各国游历讲学，这也拜诸国实行开放政策所赐。孔子游历天下，见过许多人中龙凤，但其中有一个人物，其身后的社会影响丝毫不逊于孔子，也是中国少数的世界级名人，这个人就是老子（李耳）。因篇幅所限，孔子见老子的事情，将放在后文进行详解，在此略过。

这次孔子去东周见老子，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受鲁昭公差遣的半官方行为，具体推荐人是鲁国大夫南宫敬叔。孔子应该是以鲁国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去东周的，所以鲁昭公资助了孔子的路费，包括一乘车、两匹马，外加一个仆从。孔子并非一个人单独前往，而是带着几个学生，比如颜回、子路等人，算是一个小型的访问团。

鲁昭公对孔子是非常敬重的，如果从派系上来讲，孔子是鲁昭公的嫡系人马，但此时的鲁昭公已经无法对鲁国的权力进行有效控制

了。当时的鲁国官场有三大门派，史称“三桓”：季孙任司徒兼宗宰，叔孙任司马兼宗伯，孟孙任司空兼司寇，实行“三权分立”。特别是季孙家族，几乎控制着鲁国官场的半壁江山，鲁昭公已经被架空成了“精神领袖”，这也是孔子在官场上的地位迟迟得不到升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鲁昭公手上也有一支自己的部队，但整体实力远不如季孙氏，更何况季孙氏已经和另外两家结成了攻守同盟，鲁昭公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手下大臣劝鲁昭公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过程很华丽，结果很难看。

鲁昭公和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的性格很像，都不甘心最高权力被人所夺，准备对这些权臣动手。但鲁昭公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叔孙、孟孙是不会坐等季孙倒掉的，否则等着吃刀头面的就是他们两家。二是鲁昭公军队对国君的忠诚度。

事实证明鲁昭公在这两点上的疏忽导致了他除奸计划的惨败，叔孙的军队在鲁昭公背后狠插一刀，孟孙的军队也跑来打了两桶油。更让鲁昭公无法接受的是，自己的军队居然毫无斗志，面对强敌，一哄而散，大臣郈昭伯被孟孙所杀。

鲁国已经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鲁昭公唯一能逃亡避难的地方，只能是相近的齐国。齐景公对鲁昭公还算客气，以国礼待之，鲁昭公虽然失去了鲁公的尊贵地位，但至少可以在齐国当个寓公，总比被那三个贼人做掉要好。这一年是鲁昭公在位的第二十五年九月，也就是公元前517年，距离孔子离周还鲁，只有一年。

对孔子有知遇之恩的鲁昭公逃往齐国，孔子紧接着就要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他是留在鲁国当炮灰，还是跟着鲁昭公去齐国。留下来肯定是不行的，三家都是追名逐利之徒，孔子在这种人手下做事，别说做出一番事业，脑袋哪天被借走都不知道。

特别是季孙氏，僭用天子八佾舞，被孔子一顿臭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说的就是季孙氏。和季孙的梁子已经结下，留下来会有孔子的好果子吃吗？所以现在来看，追随鲁昭公入齐是比较划算的，如果鲁昭公有朝一日能回到鲁国执政，孔子作为扈从大臣，自然可以分到一块大饼。

鲁国在齐国之南，孔子从鲁至齐，就必须经过泰山，而孔子一行在泰山南侧的荒郊野地遇到了一位哭祭丈夫的妇人，从而引出了孔子一段著名的论断“苛政猛于虎”。两千五百多年前，泰山周围老虎成堆，所以老虎伤人事件层出不穷，这位妇人的舅舅、丈夫和儿子都是被老虎咬死的。

孔子派学生子贡问这个妇人：“既然老虎伤人，你何不离开泰山以避虎患？”妇人的回答让人心酸：“此地虽有虎，但无苛暴之政。”子贡回来告诉孔子，孔子叹道：“苛政猛于虎。”

虽然后人怀疑孔子在泰山说“苛政猛于虎”于史无据，因为只有《孔子家语·正论解》记载了这件事情，但这句话可以确定是孔子所说，这是最重要的。孔子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在基层工作过，接过地气，了解民间疾苦。虽然孔子是举世闻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实他还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周游列国的目的，一方面是传经授道，另一方面是进行社会调查，为自己的理论寻找现实依据。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孔子，一个是真实的、具有真性情的、悲天悯人、疾恶如仇，甚至有老顽童本色的可爱孔子，一个是面目庄严、呆板教条、供在庙里给人朝拜的孔子。前一个孔子是真的，后一个孔子其实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打造出来的人造偶像，和孔子本人没有关系。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能用公平与正义改变这个人吃人的世界，至少要有一定程度上的纠偏。但当孔子面对权贵集团

时，就像王安石变法时才发现所有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一样，他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王安石至少在朝中还有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孔子是逃避于异国，在齐国没有人脉交情，如何在齐国生存下来，对孔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不要指望鲁昭公，他自己也是寄人篱下，根本给不了孔子任何实惠。

为了活下来，孔子不惜自降身份，以堂堂著名社会学家的身份在齐国高昭子家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家臣。家臣，说好听些就是高昭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好的，就是家丁。

孔子为人豁达，能进能退，他并没有觉得给人做家臣是自己人生中的污点，但在后世，儒家的忠实信徒们却纷纷替孔子洗白，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这件事情是无中生有，降低了孔子作为先圣的尊贵身份，这就有些滑稽了。

其实孔子作为社会文化名流，虽然经济有些窘迫，但至少孔子还是有机会与齐国高层接触的，比如齐景公姜杵臼问政于孔子。《论语·颜渊》记载了姜杵臼与孔子之间的一段著名对话，原文如下：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是孔子留传下来的观点中，在后世遭到最严厉批判的名句之一，后人经常把孔子的这句名言理解为维护封建纲常，这样理解也未必有错。不过人们批判的主要是“君君臣臣”，而不是“父父子子”，君臣纲常是维持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作为一个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孔子自然是要维护这种社会等级体制的。

至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为轻，君次之”，也不是否定君主机制，而是要求君主要以民的利益诉求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孔子与孟子关于“仁”的内核是相通的，并不矛盾。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子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此时为齐景公执政晚期，内政混乱，君臣各怀鬼胎，儿子们密谋夺权。孔子实际上是在通过与齐景公的对话，警告齐国各派势力不要玩火，否则将再次上演齐桓公的悲剧。

对于齐国的经济政策，孔子也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孔子认为为政之道，除了君臣父子之外，更要注重“节财”。齐景公生活奢华，挥霍无度，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从而影响了齐国的社会稳定。

孔子在鲁国一直得不到重用，反而在齐国出尽了风头，几乎成了齐景公的大国师，凡事必咨询，而那位著名的齐国宰相晏婴似乎并不欢迎孔子的到来。至于原因，很好理解，没人欢迎一个来自国外的流浪汉抢自己的铁饭碗。

孔子在齐国政坛大放异彩，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准备重用孔子，把尼谿的肥田封给孔子。如果孔子能受封，这将意味着他在齐国站稳脚跟，这对晏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晏婴是贤相，但人总会有一点自私的，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换了谁也不会无动于衷，就像王猛看到苻坚重用慕容垂同样会吃醋一样。

不出意外，晏婴开始了对孔子的大肆攻击，他向齐景公指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犯有三条大罪：一、儒者倨傲自顺，不堪为人臣之下；二、儒者重死不重生，崇尚厚葬，破坏淳厚的社会风俗；三、儒者不务正业，满世界流窜，靠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混饭吃，破坏国家稳定。

晏子倒没有完全否定孔子，只是说孔子不适合从政，因为孔子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礼数，当个教育家没问题，当政治家差了点。其实晏婴说了这么多，最后一句才是晏婴的真实想法——将孔子踢出齐国政坛。

晏婴是齐景公的左膀右臂，少了晏婴，齐景公什么事也做不成，就相当管仲之于齐桓公。晏婴直吐酸泡泡，齐景公当然不会因为孔子这个外国学者而得罪晏婴，齐景公对孔子的态度也渐渐冷淡了下来，但还是给予了孔子一定的政治待遇，相当于鲁国的季孙之下，孟孙之上的待遇。

不过这可能是齐景公为了不背负“慢贤”的罪名而故意放出的烟幕弹，之后有位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被孔子告到齐景公处，想让齐景公给自己主持公道。没想到齐景公说什么“我已经老了，不能再重用夫子。”言下之意，齐国已经没有孔子的立足之地，而且你的人身安全我也无法保证，你自求多福吧。

孔子应该是有长期留在齐国从政的打算，但齐国突然来这么一手，孔子极为愤怒，对齐景公和晏婴破口大骂，而不是后人臆想中的逆来顺受，那并不是孔子真实的性格。《墨子·非儒篇》记载，孔子对齐景公、晏婴无礼行为的反应是“恚怒”，当场拂袖而去，回到鲁国。

关于孔子受辱于齐，《墨子》的记载最为详尽，但后世儒家普遍不相信《墨子》的记载，认为这是墨家对孔子的栽赃抹黑，不足采信。但司马迁并不是墨家，他是儒家，而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载了孔子受辱于齐的事情，只不过没有《墨子》那么详细，说明这件事情大致上还是可信的。

孔子失去了一次在齐国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孔子在政治上暂时受挫，却有利于孔子在另一个层面上成为圣人，就是孔子最喜欢、也最擅长的教育事业。

自鲁昭公被驱逐入齐之后，鲁国政坛混乱不堪，鸡毛乱飞，这根本不是一个合适的执政土壤。公元前510年，鲁昭公客死于齐地乾侯，鲁人立昭公的弟弟姬宋为国君，就是鲁定公。

鲁国的政治形势是君弱臣强，甚至可以说是主弱仆强。因为此时号称鲁国政坛第一人的，不仅不是鲁定公，居然也不是季孙氏，而是原季孙氏的家臣阳货（《史记》记为“阳虎”，也有一说是名虎，字货）。阳货趁季平子去世，幼主弱小的时候，阴谋篡夺了季氏权力，从而控制鲁国朝政。

以孔子的智商，他绝对不会选择这个时候重回政坛，高层正在为了权力进行血腥杀戮，孔子犯不着出头给人当替死鬼。阳货为了给自己的专权蒙上一层文化的面纱，就像袁世凯想拉章太炎入伙一样，三番五次想拉孔子入伙，但都被孔子谢绝了，不过孔子却收下了阳货送给他的一头蒸猪。

《论语·阳货篇》对孔子与阳货的这段纠缠有详细记载，孔子收下蒸猪后，既不想给外人留下他已经和阳货结盟的印象，又不想见到阳货，便趁阳货外出时去他家致谢。没想到在半路遇到了阳货，二人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对话。

阳货还是对孔子拒绝出山为他效力不死心，想再劝孔子入伙，但阳货比较了解孔子的性格，这个浑身炸刺的老头子顺毛捋不行，只能用激将法。阳货问了孔子两个问题，一是“身怀大才而坐看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说不仁；二是“夫子久有横平天下之志，却屡次放弃出仕的机会，可谓智乎？”孔子说不智。

看到孔子频频点头，阳货真以为孔子动了心，劝孔子迷途知返：“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夫子跟着我走吧。”结果被孔子当头一棒砸了回去，孔子挥一挥衣袖，曰：“走你！你说的都正确，但我已经下决心致仕了，你另找高人吧。”

孔子拒绝阳货，理由很充分，但为什么之前要收下阳货送来的蒸猪？孔子不是不知道，一旦阳货被打倒，如果孔子在官场上的敌人拿这件事情做文章，孔子跳进黄海也洗不清了。

孔子收下阳货送来的蒸猪，历来有许多解释，有一种比较靠谱的解释是，孔子还不想断绝与阳货的关系，至少不想彻底得罪手握生杀大权的阳货。孔子在鲁国讲学，就必须和权臣打好交道，否则阳货天天派马仔来学堂捣乱，孔子什么事都别想干了。

其实孔子并非趋炎附势之徒，他的品行非常高尚，只是人活在世上，不能为了清高而清高，总是要面对现实的。即使是桃李满天下的大学者，有时为了生存向强权低下头，也不会影响他在世人中的良好形象。

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但往往被后人忽略的是，孔子也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政治家，至少孔子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选择。在拒绝出山为阳货效力这件事上，孔子并没有做错，孔子的考虑主要有两点：

一、阳货本是季氏家臣，却废主自立，与孔子的政治理念严重冲突。如果孔子贪一时之小利上了阳货的贼船，这将是孔子一生中难以洗清的污点。

二、阳货得位不正，在官场上得罪人太多，难说阳货的专权能撑到什么时候。孔子如果和阳货绑在一起，阳货要是倒了，孔子还能在鲁国混下去吗？

阳货独吞整个蛋糕，官场中人没有不恨他的。更让大多数人愤怒的是，阳货不仅独吞蛋糕，甚至还要对威胁阳货地位的人斩尽杀绝，这就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底线。

事情的起因是阳货想杀掉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正牌后裔，改

立听命于阳货的庶子。这三家贵族虽然实力大减，但还是有一定自卫能力的，在公元前502年十月，以季孙氏为首，三家联合进攻阳货，将阳货逐出曲阜，阳货狼狈逃到曲阜东北的阳关避难。

阳货在鲁国专政，利益受损的不仅仅是三家贵族，还包括已经忍了八年的鲁定公姬宋。鲁定公一直在等待机会恢复公族的统治地位，现在阳货被三家打跑，正是鲁定公咸鱼翻身的绝佳机会。在第二年（前501）夏六月，鲁定公集结自己的军队，对躲在阳关的阳货发起总攻，阳货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被官军打得鼻青脸肿，逃到齐国避难去了。

阳货被打倒，三桓势力也日落西山，虽然鲁国依然面临着君弱臣强的问题，但鲁定公在一定程度上收复了最高权力，这对蛰伏已久的孔子是非常有利的。鲁定公本人很欣赏孔子，特别是孔子拒绝为阳货效力，让鲁定公看到了孔子对鲁国公室的忠诚度，这应该是鲁定公决定邀请孔子出山的重要原因。

当然，以孔子在文化界的特殊地位，把孔子拉在自己的旗下，有利于鲁定公提高自己的政治形象，这也是当初阳货想做而没有做到的。而孔子选择鲁定公，主要还是出于正统观念，阳货再强也只是陪臣，名不正言不顺，这有些类似于诸葛亮没有选择曹操而选择刘备，也是出于这层考虑。

三九 孔子绝世传奇

（中）

孔子做的第一个官是中都宰，时间是公元前500年，这一年孔子五十二岁。中都宰这个职务相当于两汉时期的司隶校尉，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市长，算是官场准一线人物。《孔子家语》第一篇《相鲁》，开篇讲的就是孔子出任中都宰后做出的政绩，成绩相当不错，这足以证明孔子并不是个酸文人，他的政治能力同样不能忽略。

在五十知天命之年，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已经基本成熟，他所需要的，是一块能推行自己政治思想的试验田，中都宰官位不算高，但有实权，是地方一把手，何况还有鲁定公的支持。鲁定公让孔子出任中都宰，大概也有让孔子进行改革试验的意思。

孔子在中都宰的任上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死得也有尊严，即制定“养生送死之节”。

二、制定老幼有别的饮食标准。

三、任人唯贤，能力强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即“强弱异任”。

四、男女授受不亲，这对维护封建道德体系来说非常重要。

五、提倡节俭，禁止在器物上雕琢华文。

六、禁止修建豪华墓地，并在墓地周边种树。

孔子在上任之初烧了六把火，政治影响非常大，在“六条新政”实行一年后，各国诸侯都对孔子新政大加赞赏，并在国内推行孔子新政。孔子在出仕之前是以文化教育闻名于诸国，在政治上，孔子并没有得到认可，而自各国推行孔子新政后，对孔子仕途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孔子在官场上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他自己也信心满怀，鲁定公曾经问他：“老夫子的新政，是否可以在鲁国全面推行？”孔子回答得很霸气：“在天下各国推行都不成问题，何况在鲁国！”

鲁定公之所以这么问孔子，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提拔孔子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孔子担任的中都宰属于地方官编制，相当于王安石在任鄞县令期间推行的变法试验，鲁定公要做的，就是把孔子上调至朝廷，就像宋神宗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搞变法一样。

第二年（前499），孔子从地方官变成了中央大员，出任司空，相当于主管农业的内阁副总理。孔子在司空任上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将鲁国的土地进行分类，即“五土之性”。

所谓五土，是指除了耕地之外的山林、丘陵、沼泽、川泽、高地，孔子将五种不同的土地形态严格区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即“物各所其所生之宜”。现在我们经常讲“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向大自然要效益，其实孔子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孔子在司空的位子上坐了一段时间，鲁定公很快又给孔子安排了新的工作——司寇，司寇主管司法工作，相当于现在主管政法口的内阁副总理。春秋时代的司寇分为大司寇和小司寇，而历代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孔子出任的是大司寇，司马迁即持此说。一种认为孔子出任的是小司寇，即没有副总理头衔的司法部长。

不过根据《孔子家语·始诛篇》的记载，孔子在出任司寇时，同时

还出任鲁国看守内阁的首相，“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司马迁认为孔子以大司寇入摄宰相事，是在几年之后的鲁定公十四年（前496）。从时间上来推断，孔子司寇的任期应该不会太短，两三年的时间应该是有的，这就能解释孔子直接从司空任上接任大司寇并摄宰相事。

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有误，而《春秋穀梁传·定公十年》则有这么一段记载，“夹谷之会，孔子相焉”。这个相并非宰相职务，而是在特定场合担任的鲁国全权代表。说明孔子在此时已经具备了代理宰相的实权，所以《始诛篇》所说的孔子任司寇并摄相事大致是可信的。

孔子在司寇任上，做了许多事情，下面只着重讲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一件是著名的齐鲁夹谷之会，孔子逼退齐人，力保鲁定公的人身安全，一件是极具争议的孔子杀少正卯事件，先讲夹谷之会。

夹谷之会发生于公元前500年，与会者有齐景公姜杵臼和鲁定公姬宋，地点位于今山东的莱芜与新泰之间。春秋时，各国君主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频繁会面，互结盟友，这是很正常的。鲁庄公也急于搞好与齐国的外交关系，收到邀请帖之后，鲁定公立刻轻车往从，却被孔子拦住了。

孔子很善意地提醒鲁定公，从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武事者必有文备，齐人诡诈，不可不防。我们应该带上甲兵，万一姜杵臼对我们起了歹心，我们也有个回旋的余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孔子对齐景公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此君一心要学齐桓公称霸天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其实孔子所不知道的是，这场夹谷之会，齐景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鲁定公，而是孔子本人。根据《史记·太公世家》的记载，孔子出任鲁国司寇，对齐国君臣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齐景公知道孔子的本事，一旦让孔子在鲁国全面执政，鲁必强而齐必弱，所以齐景公想打

掉孔子。

齐大夫犁鉏给齐景公出了一个馊主意：假借开会之名，把鲁定公和孔子都请过来，然后派出生性粗悍的莱夷登场跳舞，伺机拿下鲁定公，制造鲁国混乱，从而让孔子无用武之地，齐景公喜而从之。

说到这场充斥着阴谋的夹谷之会，就不能不提及战国时期那场著名的秦赵渑池之会，蔺相如几乎以一人之力，在虎狼秦兵的刀戟下捍卫赵国的国家尊严，将霸气的秦昭襄王逼得狼狈不堪，从而一举成名天下知。

孔子在夹谷之会前就已经名扬天下，但时人对孔子的了解主要是文化和政治方面，对孔子的性格却不甚了解。没人想得到，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孔夫子，骨子里却有一股刚狠之气，用几十年前的时髦话说：孔仲尼的肚子里装着一个钢铁公司。

如果没有孔子的及时安排，齐人的计划将会非常完美，等鲁定公一登坛，齐兵立刻拿下鲁君，一切就都结束了。齐景公可能也没想到鲁定公此来，会带这么多兵马，但齐景公还有第二招，就是暗令莱夷上场击鼓。这支所谓的齐国乐队打着旗子，头戴羽冠，身上围着皮裙，手中挥舞着矛戟剑刀，乱哄哄地抢上台，场面非常骇人。

这群“项庄”在台上舞剑，自然是冲着“刘邦”去的，而“刘邦”身边的樊哙，就是孔子。台上群魔乱舞，对鲁定公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孔子已经看出齐景公要做什么了，如果鲁定公被杀，鲁国必将大乱，到时自己的治国理想将无情地破灭。所以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孔子也必须站出来说话。

孔子懂得一个道理，如果让敌人听进去自己的话，就必须要有实力做后盾，否则谁听你的？孔子从鲁国带来的三百甲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孔子的强力指挥下，鲁国亲卫部队拥上坛子，强行拽走鲁定公，剩下孔子一人，站在坛上和齐人斗嘴，争取道义上的胜

利。

其实自鲁兵上坛之后，齐景公的劫持计划就已经失败，再加上被孔子好一顿数落，齐景公的脸上很挂不住。不过孔子还是给齐景公留了一点面子，没有戳穿他的阴谋，只是说两国国君会谈，用夷人为乐，于礼不当，请罢乐，齐景公理屈词穷，只好垂头丧气地照办。

齐景公估计是老糊涂了，眼前的形势已经对他非常不利了，他还是不死心，至少也要羞臊一下孔子，一舒心中的闷气。齐景公又做了一件事情——让从齐国带来的优伶侏儒们上台，在优哉游哉的齐国宫廷乐的伴奏下，这些戏子在孔子面前摇头晃屁股，美其名曰弘扬高雅艺术，实则丑态百出。

齐景公认为孔子骨子里只是个文人，面对这样的羞辱，最多也就是说几句不疼不痒的风凉话。但让齐景公，以及在场所有人意外的是，孔子只说了一句话：“匹夫而营惑诸侯者当诛，请命有司。”

还没等齐人反应过来，虎狼似的鲁兵已经冲上来，对着这群还沉浸在高雅艺术中的齐国艺术家一通乱砍，血肉横飞，估计鲜血溅了齐景公一脸，现场惨叫声如雷贯耳……

这就是孔子的手段！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如果换成别人站在台上，可能会指责齐景公对鲁国不敬，齐景公早就不要脸了，还在乎挨几句骂？但孔子突然来这么强硬的一手，却把齐景公镇住了，至少孔子有意无意地向齐景公发出警告：真要这么玩下去，今天我们谁都别想走，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现场的齐鲁兵力应该相差不多，真要进行火并，难说齐景公能全身而退。好汉不吃眼前亏，孔子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齐景公可不陪这个疯子一起完蛋。在孔子的“淫威”之下，齐景公只能服软，双方签

订了一个对齐国来说非常不平等的条约。

当年阳货逃入齐国，给齐景公带了一份见面礼，即将原属鲁国郛、讙、龟阴三地献给齐国。而此次齐鲁夹谷之会，应该就与此事有关，但以齐国的国力，在正常情况下，齐景公是不会将这三块肥肉吐出来的。只是经孔子这么一闹，齐景公手上已经没牌可打了，只好不甘心地将三地还给鲁国。

所有人原以为在这场夹谷之会中，齐景公和鲁定公是两大主角，结果被配角孔子抢尽了风头，独占戏份，两位国君倒成了跑龙套的群众演员。鲁定公本来就要重用孔子，孔子出风头，对他继续重用孔子提供了现实依据。

最亏的还是齐景公，好端端的一场大戏演砸了，齐国和他本人的形象被严重影响。其实还有一个人更是在孔子的间接对抗中惨败，就是给齐景公出主意的齐大夫犁鉏。犁鉏认定孔子“知礼而无勇”，所以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孔子的因素。结果孔子一个巴掌狠狠地扇在犁鉏的老脸上，犁鉏被抽得眼冒金星，想必齐景公回到临淄后，少不了臭骂犁大夫。

这次夹谷之会力屈齐景公，是孔子从政生涯中极为辉煌的一场大胜利，体现的是孔子的机智勇敢，说孔子是开钢铁公司的，并不是吹捧。但和蔺相如在渑池之会上力屈秦昭襄王的故事相比，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英雄行为还是不太为人所熟知，其实完全可以认定，蔺相如的勇敢是受到了孔子的启发，当然蔺相如的勇气是值得所有人敬佩的。

虽然有些学者质疑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英雄表现的真实性，理由也似乎很充分，但《左传》《穀梁传》《孔子家语》《史记》都详细记载了此事，不应该是虚构出来的。

孔子不是圣人，他的那些观点未必都正确，但孔子至少是一个英

雄。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其实是有脾气的，而不是被后人严重神化的那个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真实的孔子有缺点，但这样的孔子才值得后人尊敬。

讲完了孔子在夹谷之会力屈齐景公的事情，再来讲一讲另外一件轰动历史的大事件，即发生在公元前496年的孔子杀少正卯事件。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学家，自从归鲁之后，孔子一向以教育业为主，开馆授徒，场子铺得非常大。但话说回来，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竞争，而孔子在教育行业面临的最大对手，就是时任鲁国大夫的少正卯。换句话说，孔子是用最简单的暴力手段消灭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春秋时的孔子虽然也是一线名流，但还没有混到像后世那种唯我独尊的地位，至少孔子能做的，会做的，少正卯都在做，而且成绩与孔子相当。众所周知，孔子的经济条件一般，但自从开坛讲学后，孔子可以收学生交的学费，这几乎是孔子经济收入的大头。

孔子收学生，每人要收十条腊肉，孔子号称门徒三千，三万条腊肉……另外，孔子还有一个进钱的门路，就是对外接办白事。谁家要办丧事，都要找些社会名流来撑面子，孔子是鲁国文坛大宗师，能请来孔子，自然少不了要给孔子一些辛苦钱。

任何一个行业的经营者都希望自己垄断本行业，虽然嘴上不会这么说，但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孔子不是神，他也是有私心的，少正卯同样开坛讲学，对孔子来说有两方面的威胁：

一、经济上的威胁，因为孔子门下的这些学徒，也经常到少正卯的学校听课，估计没少给少正卯交学费。如果钱都让少正卯赚走了，让孔子喝西北风？

二，声望上的威胁，世人皆知孔子是鲁国第一大学者，但少正卯

的出现，已经严重威胁到孔子的社会地位。如果任由少正卯在文化界的势力发展下去，将来青史留名的，可能是少正卯，而不是他孔仲尼。

来自经济上的威胁，也许还不至于让孔子对少正卯起杀心，钱少赚点饿不死人，但来自声望上的威胁，是孔子绝难接受的。三千弟子，只有颜渊一人始终立于门下，其他二千九百九十九人皆分不出孔子与少正卯谁更贤达，这个威胁不除，几乎要了孔子的老命。

孔子应该很早就对少正卯起了杀心，但当时孔子手中无权，除非搞暗杀，但暗杀将会给孔子的声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只能以公权力除掉少正卯。直到孔子出任司寇，掌握了司法大权，孔子才有条件实施自己的计划。

从时间上来看，孔子杀少正卯，是在夹谷之会前，也就是孔子出任司寇的第七天，这个时间充分说明孔子杀少正卯是久有预谋的。少正卯只是鲁国两位文化大师之一，有声望但没有权力，而已经掌握相关权力的另一位文化大师孔子要对他下手，简直易如反掌。

杀少正卯的过程非常简单，根据记载此事最早的《荀子·宥坐篇》所说：“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手中有司法权，杀人自有他能公开拿出的借口，当门人问孔子为什么要杀少正卯这样的文化大师时，孔子给少正卯定了五项大罪，“一、心达而险；二、行辟而坚；三、言伪而辩；四、记丑而博；五、顺非而泽。”

这就是孔子所谓少正卯犯下的“五恶”，平心而论，除了第四、第五条属于文化理念上的差异外，前三条全是无中生有的扣帽子，欲加之罪，其无辞乎！所谓“心达而险，言伪而辩”，这也只是孔子自己的说辞，谁能证明少正卯心险、言伪？如果少正卯担任司寇，给孔子扣上“心险、言伪”的大帽子，孔子能接受吗？

除了以上“五恶”之外，孔子还大肆攻击少正卯，说少正卯“聚徒成

群”，是“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甚至还拿商汤诛尹谐、周公诛管叔正相提并论。众所周知，“聚徒成群”的可不只是少正卯，孔子的门徒不比少正卯少，按孔子这个逻辑，他也是小人之桀雄，不可不诛？

如果说夹谷之会，孔子展示了性格中的刚硬一面，那么可以说在诛少正卯的事件中，孔子性格中恶的一面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通俗地讲，孔子对少正卯是一肚子的“羡慕嫉妒恨”，原来伟大的孔老夫子也会忌妒人才，甚至为了私利而杀人。

后世儒者，特别是儒家思想已经严重异化的明清时代，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孔子的正直形象，一直极力否认孔子杀少正卯，认为这是穿凿附会，比如清人崔述。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太阳有黑子，并不影响太阳的光辉。

一代贤相王猛为了保住地位，非常恶毒地设金刀计，欲置慕容垂于死地，也并没有影响王猛的江湖地位。更何况首先记载孔子杀少正卯的，是儒家最正统的传人荀子，如果此事并不存在，荀子没有任何理由去黑自己的学术先祖，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宋朝学者一般都承认孔子杀少正卯，但认为孔子此举是正确的，比如苏洵和司马光。当然宋人承认此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孔子杀少正卯，来抹黑王安石变法，把王安石比作少正卯第二，“心达而险，言伪而辩”，对王安石以笔诛之而后快。

孔子杀少正卯，很明显是出于私心，但宋人却加以美化，说什么孔子杀少正卯是非大英雄、真豪杰所不能为，吹捧起来极为肉麻，丝毫不顾及持不同意见者的心理承受力。从哪个方面讲，孔子以权谋私，擅杀贤人，都是孔子伟大人生中永远抹不掉的最大污点。

人有一点私心很正常，但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解决问题，不过除了杀少正卯是出于私利外，孔子在任职期间基本上很出色地完成

了任务。孔子当了三个月的代理宰相，根据《史记》记载，鲁国“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这样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就像苻坚不会因为王猛出于私心要置慕容垂于死地，就冷落王猛一样，孔子杀少正卯，鲁定公并没有改变对孔子的态度，但孔子还是在不久之后离开了鲁国。具体原因，还是和之前夹谷之会上出尽洋相的齐景公和他的狗头军师犁鉏有关。

《韩非子·内储说下》对此事记载得比较详细，说齐景公已经领教了孔子治政的厉害，担心孔子继续在鲁国执政，会影响到齐国的争霸事业。犁鉏又出了一个馊主意，让齐景公送给鲁定公（《韩非子》误作为“鲁哀公”）一支美女乐队，让鲁定公整日沉浸在美色乐曲之中，自然也就无心听政了，孔子就无法继续在鲁国执政，齐患去矣。

齐景公此时已经行将就木，但还是满脑袋的争霸思想。为了虚幻缥缈的所谓霸业，齐景公用了犁鉏出的这个不入流的主意，派出一队“西施”入鲁，果然成功地迷惑住了鲁定公，孔子又被晾到了一边，没人管没人问了。

不过韩非子的说法也不太准确，韩非子说孔子离开鲁国去了楚国，实际上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是鲁国西北方向的卫国，时间应该是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

孔子离开鲁国，应该和鲁定公沉迷于女色有关，此年的孔子还不到六十岁，在政治上依然还有上升的空间。孔子是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不希望自己未来不太充裕的时间都浪费在和鲁定公的对峙上，他需要换个地方寻找梦想。

四〇 孔子绝世传奇

（下）

至于孔子为什么先去卫国，《论语·子路篇》给出了答案，“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这句话包含三层意思：

一、卫国和鲁国同出于姬周王室，卫国先祖卫康叔和鲁国先祖周公姬旦是兄弟，私交甚好。

二、在周朝分封的诸国中，鲁国和卫国是仅有的两个严格继承周朝礼法的诸侯国，这种政治上的血缘关系，至少不会让孔子产生政治上的疏离感。

三、卫国和鲁国一样，都处在一个内政混乱的敏感时期，国有君，朝无相，这对孔子来说是个机会。

不过让孔子以及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孔子到了卫国，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受到卫灵公姬元的重用，反而意外地卷入一场轰动历史的桃色丑闻之中，这场桃色丑闻的女主角，就是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这是孔子人生中唯一的八卦事件，历史上称为“孔子见南子”。

实际上并不是孔子好色，急巴巴地要一睹南子的美色，而是南子主动提出要见孔子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自从少正卯被杀之后，孔子就是天下文坛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学富五车，而且孔子又长得人高马大，虽然年过五旬，依然魅力如旧，无论孔子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贵族少女们的阵阵尖叫。

从年龄上看，南子应该比孔子小四十岁，此时南子还不到二十

岁，正是女人如花的时节。更为重要的一点，南子的夫妻生活并不如意，因为比她年长三十岁的丈夫卫灵公是一个同性恋者，卫灵公养的小白脸就是弥子瑕——春秋第一美男，著名的“分桃”典故，就是这对同性恋者的天才发明。

南子对孔子仰慕已久，作为粉丝，能见到自己崇拜的偶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问题是在男女大防的春秋时代，南子既想见到孔子，又不想授人以柄，便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南子派人来找孔子，说什么按照卫国的外交惯例，各国来的贤达名流想和卫国君交朋友的话，就必须先来见夫人。孔子来卫国是讨饭吃的，不是来撞桃花运的，孔子哪敢往这个桃花里跳，连连推辞。

估计是来说了一些威胁的话，逼得孔子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南子，毕竟如果得罪了南子，孔子在卫国是肯定吃不开的。至于南子派来的说客是什么人，《史记》没说，但《盐铁论·论儒》说是卫灵公的男友弥子瑕，存疑。

孔子不是一个人去见南子的，而是带上了学生子路，这应该是孔子出于避嫌的考虑，否则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其实南子见孔子，也不是想和孔子发生什么八卦故事，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看名闻天下的孔仲尼长得什么模样，仅此而已。

以南子和孔子的社会身份，他们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故事的，如果孔子来到卫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卫国国君扣一顶绿帽子，卫灵公能饶得了孔子？朱熹说古时有君子见小君（诸侯夫人）之礼，南子也是在公开的场合会见孔子，卫灵公对此事应该是知情的。

而且南子见孔子之后，卫灵公也亲切接见了孔子，并按孔子在鲁国的待遇，也给了孔子六万小斗粟，算是给孔子划拨的学术经费。待遇不算不优厚，但卫灵公并非想用孔子治国，而是借孔子的国际盛名来给自己装一点文化门面，孔子只在卫国待了十个月，就拂袖而去，

留下面色尴尬的卫灵公，以及还在幻想见到孔子的南子。

公元前495年，五十七岁的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来到了位于今河南周口附近的陈国，继续寻找自己的梦想。陈国是个小国，地不广，兵不强，君不明，臣不贤，在孔子去陈之前，陈国就已经沦为南方强大的楚国的附庸。此时楚国实力衰落，但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国又以极快的速度崛起，陈国经常被吴国踩来踩去。以陈国这样的破烂局面，是不可能给孔子提供施政空间的，但让人意外的是，孔子在陈国足足待了三年。

作为一个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小国，陈国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孔子来说早已失去留下来的意义，孔子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至于下一站，孔子的选择依然让人有些意外，孔子选择回到了卫国。

上面讲过，当时诸侯中，最适合让孔子推行施政思想的，除了鲁国，就是卫国。孔子曾经说过：“鲁卫之政，兄弟也。”在暂时无法回到鲁国的情况下，回到卫国等待机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卫灵公年迈不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如果上来的新君有志于强国，必然会重用孔子，这是孔子的如意算盘。孔子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他自负地告诉别人：“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只要给我机会，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有能力让旧貌换新颜，这是何等的自由豪迈！

孔子曾经和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子路有过一次谈话，内容是假想中的在卫国施政的预备纲领，这段谈话应该是在从陈国回到卫国的路上说的。子路问孔子，如果卫灵公重用老师，老师会如何治理卫国？孔子的回答非常干脆：“必先正名。”

这让子路产生了疑惑，治国为何先正名，孔子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说的“名”，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道德秩序，孔子重视“名”，不是乱放空炮，而是有现实政治原因的。卫国太子姬蒯聩和庶母南子不和，姬蒯聩不想在继位之后当傀儡，想除掉南子，结果被南子在卫灵公面前告发，姬蒯聩仓皇出逃宋国，南子基本上控制了局面，而且卫灵公也答应了立南子的儿子姬郢为太子。

春秋时代，各国内政普遍混乱，争嫡夺利的丑剧不断上演，南宋学者胡安国对孔子的这段话有非常精辟的评价：“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是任何一个时代末世大乱的典型社会特征，所以重正礼教，恢复西周时的社会道德秩序，是孔子现阶段施政的重点，只是他一直没有施政的机会。

虽然孔子回来的消息在卫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卫灵公亲自出城迎接孔子，这是很高的政治礼遇，但孔子需要的并不是这些虚与委蛇的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机会。遗憾的是，卫灵公“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他只想通过尊崇孔子来追求爱贤的名声，并没有打算重用孔子。所以《史记》说：“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

就在孔子去卫的当年（前493）夏天，卫灵公就伸腿瞪眼见阎王去了，因为太子姬郢拒绝继位，南子只好立原太子姬蒯聩的儿子姬辄。其时在晋国执政的赵鞅想利用原太子姬蒯聩大做文章，派兵护送姬蒯聩入卫，被卫人打退，卫国政局严重动荡，孔子也失去了留在卫国的意义。

屈指算来，孔子从鲁国出走，游历天下寻找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一晃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孔子除了换来一身的疲惫和灰尘，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孔子和晋文公姬重耳的在外游历很相似，不仅是在找自己的政治买家，更是一种人生的积累。

曾经的孔子，特别是在鲁国执政期间，有些锋芒毕露，杀少正卯

便是孔子性格中强硬刚狠的证明。但在外游历这么多年，吃了很多苦，反而能让孔子的性格沉淀下来，孔子的为人和政治思想体系也日益成熟。

有个小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孔子有次路过郑国，与学生们走散了，孔子满面尘垢，破衣烂衫，神情疲惫地站在城东门。而此时他的学生们也在寻找老师，有个郑人告诉子贡，说他在城东门发现一个非常落魄的老头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后来子贡找到孔子，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原以为孔子会大怒，没想到孔子朗声大笑，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只丧家之狗，郑人没有说错，这就是豁达的孔子。

历经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统治，孔子已经被严重神话，但同时孔子性格中可爱的一面也被后世一些儒者有意抹去，变得庄严却失去趣味。后世流传一句著名的话，即“以德报怨”，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是孔子说的，而是有人问孔子的原话。

《论语·宪问》中的原话是，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夫子以为如何？”孔子的反问非常精彩：“（如果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接着，孔子给出他认为正确的答案：“（面对仇恨），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得通俗些，就是孔子认为别人对你怎么样，你就对他怎么样。对方有恩于你，你就必须报恩，对方伤害了你，你就理直气壮地去伤害他，一报还一报，天经地义！

孔子这些年在海外流浪，一直得不到重用，实际上和他的火爆性格有很大关系。孔子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每到一国，都是当地庸猾官僚们的最大敌人，这很好理解，谁都不会欢迎一个来抢自己饭碗的洋和尚，所以都想办法阻止孔子受重用，否则自己只能喝西北风。

晋文公姬重耳游历诸国，但他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留在所

居国，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晋国即位的。孔子不一样，他是鲁国人，但为了实现理想，孔子是可以改换国籍的，这就注定了孔子的不受欢迎。孔子说自己是“丧家之狗”，半是戏谑，半是对现实的无奈。

世人很难想象，孔子这样名闻天下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居然会挨饿，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根据《吕氏春秋·任数》的记载，孔子在陈蔡游历时，曾经七天没有吃到米饭，饿得前心贴后背。

还是学生颜回在外面讨到了一点米，回来煮着吃，颜回已经饿得两眼发直，偷偷地吃了一点，然后捧给老师进食。以孔子这样的胸怀大度，在他偷看到颜回吃米时，都认为颜回是在偷吃东西，可见孔子已经饿成什么样了。

后来孔子游历楚国，也是跟叫花子似的，到处讨饭吃。有个渔父看孔子实在可怜，就送给孔子几条鱼，孔子碍于面子，坚辞不受。还是渔父说天气太热，距离市场太远，卖也没人要，扔了又太可惜，不如送给老夫子食用，也算一件功德，孔子这才勉强接受。

孔子的伟大之处恰恰就在这里，以孔子的特殊社会身份，只要他肯低头，与那班庸俗的官僚同流合污，什么样的富贵他得不到？但孔子的道德底线不容许他这么做，孔子是个好名之人，他曾经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孔子要做的是寒冬迎风而立的松柏，而不是秋风一过便黯然扑地的枯草。

孔子入卫、入陈、入蔡、入叶、入楚，游历了大半天，虽然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但至少可以说孔子是位出色的旅行家。历经风霜，黄尘扑面，车马劳顿，甚至有陈蔡之厄，饥于乏食，但枕于江涛之畔，观红日初升，望斜阳断雁，这样的人生，已经相当成功了。

在政治上，孔子已经不对中原诸国抱有什么奢想了，他甚至有“浮海而居九夷”的想法。所谓九夷，有一说是南方楚吴之南的夷族部落，但如果要去此地，是用不着坐船浮海的。《汉书》的解释比较

合理，九夷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需要坐船过去。

孔子欲去九夷，一方面是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建一个不被世俗所打扰的居所，另一方面，孔子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还是想做一个政治家。虽然孔子最终没有浮海去九夷，但他心中依然保留着一块乐土，那是属于他自己的。

孔子在卫国没有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机会，那他的下一站，只能是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至少回到鲁国，远比到处流浪更能得到机会。实际上此时的孔子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花甲老人了，即将到七十而随心所欲的年纪，政治上的伟大抱负，终究敌不过“叶落归根”的游子情怀。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六十八岁。当一行人乘坐的马车踏进鲁国国境的那一瞬间，想必胡须早已花白的孔子心中感慨万千，孔子也清楚，以他这个年龄，是不可能再周游列国了。如果能终老于鲁，叶落归根，葬于父母之侧，孔子此生不虚活矣。

孔子能回到鲁国，和他在鲁国做高级将领的学生冉求向执政的季康子推荐有关，但鲁国执政对孔子的态度非常明确——尊而不用，也不敢重用孔子，毕竟孔子的性格不是官场中人能吃得消的。

季康子给孔子安排了一个“从大夫后”的职位，相当于元老院顾问，享受老干部离休待遇。这么安排，既保全了孔子和鲁国执政的面子，又能保证孔子就鲁国施政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举两得。

季康子的施政理念比较激进，他是鲁国历史上少见的铁血执政，对加快春秋晚期奴隶制经济制度的瓦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改变“田赋”。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基础，如果这一政策加以推行，孔子的政治理想将完全破灭，所以孔子是极力反对的。季康子非常尊敬孔子，但从来没有把孔子当成神，他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下去，孔子对此也无可奈何。

孔子在政治上的保守是出了名的，学生冉求因为支持季康子的“土改”工作，被孔子好一顿臭骂，甚至还和冉求断绝了师生关系。为了表达对冉求等激进派的愤怒，孔子说：“求，非我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冉求的激进对保守的孔子带来多么大的感情伤害。

不过孔子也知道冉求在政治上是依附于执政季康子的，恨屋及乌，孔子对季康子也没有多少好感。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抓住机会，对季康子冷嘲热讽，下嘴非常刻薄，毫无政治家风范。

比如季康子问过孔子三个问题：一、如何治理国家；二、如何解决盗患；三、是否应该多杀坏人以正社会风气。孔子的回答只有一个：“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自己身正就不怕影子斜，你自己克己复礼，就不愁别人和你南辕北辙。

孔子对季康子破坏“先王之法”非常不满，但孔子在社会道德层面对季康子的劝谏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才能让士民尊重我，听我的指挥？”孔子答：“这个很简单，你尊重百姓，百姓就会尊重你；你当以孝为先，以慈爱为本，百姓自会对你忠心耿耿。选贤与能，给所有人上进的机会。”

孔子也同样和鲁哀公讨论过这个问题，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治国其实就是治吏，用贤与能，庸猾之辈就没有上升的空间，则百姓受益，反之，则百姓遭殃，历代兴亡都是遵行这条规律，没有例外。

当然，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待治民的问题，其实这并不奇怪。任何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岳飞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至少可以说孔子是开明的地主阶级。

纵使孔子有百般不是，但仅凭孔子与鲁哀公讨论中的一段话，就足以受到后人的爱敬。事出于《说苑·政理篇》，哀公问孔子有什么办

法可以增加老百姓的财政收入，孔子就说了三个字：“薄赋敛。”只要做到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老百姓自然就会富起来。

哀公有些不解，质问孔子：“如果大多数人都富了，我岂不是就穷了？”孔子劝他不要这么紧张，要相信老百姓的善良，“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只要老百姓富裕了，自然会有更多的余钱交税，而不是在老百姓还穷瘪瘪的时候就恶狠狠地抢老百姓的救命钱，相比之下，后世一些昏君还不如孔子。

《论语·颜渊篇》记载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如何才能使国库充盈，有若的办法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只要老百姓有钱了，国家自然也就有钱，如果百姓穷得喝西北风，君主一毛钱也收不上来。有若的经济思想和孔子是相通的，或者说有若是受到了孔子的影响。

孔子虽然能够对鲁国执政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毕竟孔子只有发言权而没有决定权，只能无限感伤地怀念他的政治偶像周公姬旦。都说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实际上真正开创儒家思想的，是周公旦。孔子曾经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只是将在春秋时尚未成熟的儒学打造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体系，地位有些类似于词史上的南唐后主李煜。

孔子老了，他曾经在梦中遇到周公，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者往往都会在梦中才能驰骋于江湖，求功名，不朽于万世。对于一个经历了太多风雨的老人来说，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儿孙绕膝，安度晚年。

只是让孔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唯一的一个儿子孔鲤却先孔子而去，只留了一个年幼的孙子子思（有一些学者认为子思是孔鲤的遗腹子）。人生三大至痛之一就是老年丧子，孔鲤的撒手西去，给孔子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多深，可想而知。

更让孔子揪心的是，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一旦自己不久于人世，嫡孙子思怎么办？最可行的办法，只有把子思交给自己的一位学生，

让他来代养子思，孔子最终选择的是他的高足曾参。实际上曾参虽然才学多博，但他在星光灿烂的孔子学生中并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星。最耀眼的那颗星星在孔鲤去世不久也离开了人世，他就是颜回，死于公元前481年。

相比于儿子孔鲤的去世，颜回的死，几乎导致孔子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虽然孔子拒绝了颜路要给颜回置办外棺的要求，因为孔子要平等地对待每个学生，但孔子对颜回的死还是痛不欲生，无法接受。

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一直把颜回当儿子一样，孔子不止一次“吹捧”过颜回，颜回是除孔鲤之外，孔子的另一根精神支柱。现在两根精神支柱相继倒塌，换了任何一位普通的父亲都难以承受，孔子再伟大，此时他也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

孔子在感情上受到的沉重打击还没有结束，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位得意门生，时任卫国蒲邑宰的子路，死于卫国孔悝之难。子路比孔子小十岁，和孔子是同代人，与孔子的关系亦师亦友，孔子非常器重子路。所以噩耗传来，孔子哭倒在地。

每个人都是坚强的，每个人又都是脆弱的，在心灵深处总会留有一片温柔的芳草地，但当命运之神残酷地在孔子的芳草地上来回践踏的时候，铁打的人，也会吃不消。一连串的打击，孔子终于一病不起。

孔子是个天性豁达的人，他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孔子曾经站在大江边，看着浩荡东流的江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这一辈子，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从起点回到起点，没有大阅历、大智慧、大胸怀的人，是难以承受的。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四月十八日（杜预认为有可能是五月十二日），心有不甘的孔仲尼溘然长逝，寿七十三岁。

如同诸葛亮的死震惊蜀汉一样，孔子的死，在鲁国引发了巨大的震撼。虽然孔子一直不受重用，但孔子作为鲁国的标志性人物的地位，是谁都撼动不了的。鲁哀公当然知道孔子的地位，在孔子死后，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写了一份祭孔子的祭文。以《左传》为准，祭文为：“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孔子死后的葬礼非常隆重，但这一切已经和孔子没有关系了，葬礼无论搞成什么规模，都是做给活人看的。

也许孔子生前并没有意识到，在他死后的四百年后，一个名叫董仲舒的学者向一位名叫刘彻的皇帝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并得到了实行，从而极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甚至从某种角度讲，自汉武帝刘彻以后的两千五百年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论语》被打开然后合上，然后再打开的历史。只是这一切，孔子已经看不到了。

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孔子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功过得失，自有后人评说。

四一 孔子的七十二门徒

说完了孔子，我们再来说说孔子的学生。

孔子的学生有多少？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出类拔萃者七十二人。这条史料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关于学生精英到底有多少人，同样是《史记》，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又给出了“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的答案，这还是孔子亲口认可的人数。实际上这七十七人，并非都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这其中又有四十二人是打酱油的，真正能称得上孔子嫡传弟子的只有三十五人。

如果说在孔子的这些学生中，最外围的两千九百多人是跑龙套的群众演员，内围外侧的四十二人是二线演员，这内侧的三十五人可以称为一线演员或准一线演员。其实这三十五人，打酱油的也不在少数，一般史学界认为孔子学生群体中最核心的精英，只有十几个人。

孔子曾经对他这些属于核心圈的学生进行过分类评价，在《论语·先进篇》中有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总共十个人，这个评价基本可以认定这十个人是得到孔子认可的精英分子，当然，还要加上没有进入这份名单的子路。讲孔子的学生不提子路，就等于讲刘备的五虎上将不讲赵云一样。

毫无疑问，这在十一个顶层精英中，孔子最器重的是颜回，从名单上颜回排在第一位就可以看得出来。何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他最看重的就是德行（仁义），孔子将颜回放在德行之首，也意味着孔子认可颜回是自己的开门大弟子。而汉高祖刘邦在祭孔子的时候，唯一有资格配享孔庙的就是颜回，号称七十二贤之首，进一步稳固了颜回在孔子学生中的大师兄地位。

颜回字子渊，所以后世也称他为颜渊，他和孔子一样，都是鲁国人，比孔子整整小了三十三岁（生于公元前521）。颜回刚出生时，孔子已经成为鲁国文坛的大腕，由于他们都生活在鲁国，而鲁国疆域并不大，所以颜回懂事时，就被孔子收为弟子，这一年，颜回十三岁。

颜回并不是孔子最早收的学生，子路等人早已经成名，但孔子似乎更喜欢性格温柔如水的颜回。子路、子贡诸君才学都不用多说，但性格过于刚硬，和孔子的关系更接近于同事或朋友，所以孔子很容易把“多余”的父爱放在颜回身上。

孔子一生都在修身养德，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颜回的“德行”又是公认的第一，孔子不止一次当着其他学生的面称赞颜回为人“仁”，也不知道子路他们吃过醋没有。

子夏曾经问过孔子，颜回为人如何，孔子的回答非常干脆：“回之仁，贤于丘也。”从孔子特殊的身份，以及他终生追求“仁”的努力来看，能说颜回的“仁”远强于自己，这不像是在恭维。对桃李满天下的孔子来说，他没有必要如此放下身段，去恭维一个学生。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如此之高，实际上是颜回的追求和孔子相一致，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这才是最重要的。孔子门下虽然有许多精英学生，但有些人或偏于辩论，或偏于政治，或偏于军事，这些都不是孔子价值观的核心，孔子价值观的核心只有一个“仁”字。

颜回的性格比较沉静，这一点深得孔子的认同，不像子路那伙强

人经常喊打喊杀，虽然孔子也非常欣赏他们。《韩诗外传》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个人在一起讨论如果被人欺负了该怎么办？

子路是强硬派，他的回答是：“人善我，我亦善人；人不善我，我必不善人。”不惹我，咱们没事，敢惹我，老爷直接拎大斧砍将过去，这就是子路的性格。子贡的性格相对比较内敛，如果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会“引之进退而已耳”。意思是说我惹不起你，可以躲得起你，我不和你玩，你能奈我何？

颜回的回答估计能让性格强硬的子路吐血，“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打我不还手，骂我不还口，真要把我逼急了，我就不理你了。这样的性格在子路看来，是典型的软骨头窝囊废，人家都骑在你头上拉屎撒尿，你还和他讲仁义道德，岂非滑稽？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颜回的看法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在民族主义普遍高涨的现在，颜回的观点是很难得到大范围认同的。但在两千五百年前，至少在孔子看来，颜回的“人不善我，我亦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

对于三个学生的观点，孔子逐一点评：“子路就知道喊打喊杀，是蛮夷人的做派，不可取。子贡的不善我则让，是朋友之言，比子路强多了。至于颜回，他所说的才是亲人之间应该奉行的交往准则。”

颜回深得孔子的喜爱，实际上颜回和孔老师的人生观是有一定区别的，具体来说，孔子积极入世，而颜回则渴望出世。根据《庄子·让王》的说法，颜回家境不算富裕，生活质量一般，孔子问颜回：“子渊经济拮据，住此陋室，何不出来做官，赚取更多的金钱？”

颜回很恬淡地回答：“我不想做官，我虽然家贫，然城外有五十亩田地，足够我饮食之资，城内有四十亩桑地，足够我读书抚琴。”孔子对此感叹道：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行修于内，即使不做

官，也会得到快乐。

如果《庄子》所载属实的话，家里有九十亩地，无论如何也算不上贫农，差不多是小资阶层的生活水准，颜回确实不需要靠做官来养活自己。但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颜回身上有庄子所向往的道家风骨，甚至孔子的赞叹都有一股浓烈的道家味道。其实儒家和道家的内核是相通的，儒家重“仁”，道家重“慈俭”，颜回甘于恬淡静默，是符合他一贯的精神追求的。

一般来说，具有道家风骨的人士，为人处世往往比较低调，颜回也是如此。孔子曾经把子路和颜回叫到面前，问他们的志向，子路是个现实主义者，他非常积极地入世博取功名，所以他的回答有些“俗气”，说我要当官发财云云。颜回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他回答：“我的理想是追求更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我不会在别人面前夸耀，我自己的痛苦也不想让别人分担。”

作为孔子旗下的两个样板徒弟，颜回和子路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子路更外向，激情如火，而颜回则相对内敛，温柔如水。而孔子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基本被颜回成功地粘贴复制过来，所以后世有人称颜回为小孔子，不是没有道理。

颜回的人生志趣，在《韩诗外传》中有记载，略云：“颜渊问于孔子曰：‘渊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乎？’”孔子经常教导别人“安贫乐道”，不求闻达于诸侯，而颜回则很忠实地奉行了孔子对外宣称的人生哲学。

对此，孔子极为赞赏，当面吹捧颜回：“善哉回也！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对于有强烈世俗进取心的子路，孔子有些不屑，虽然孔子本人成天幻想着宣麻拜相。

颜回不像他的老师那样，还怀有强烈的政治野心，颜回天生就是做隐士的，悠游林下，与仙鹤同舞，同花草同眠。以颜回的这种性

格，完全不适合在官场上混，官场上都是些四面不着地的老滑条，颜回进了官场也会被挤出来。

从个人理想角度看，孔子非常渴望在政坛大展拳脚，但在内心深处，孔子未必就不想做颜回那样的隐士，只是孔子的入世思想太强烈了，他自己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孔子不止一次地称赞过颜回，比如有一次，孔子又闲不住了，在学生们面前拍颜回的马屁：“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这就是颜回简单而真实的人生。颜回在追求“仁”的同时，实际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已经达到了道家常说的“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境界，或者说是“出世”，远离尘世喧嚣，追求无我境界。虽然这样的人生因为没有在政治上的轰轰烈烈而略显平淡，但能在铺天盖地的红尘欲念中达到无我之境，不能不说这是颜回人生的巨大成功。

据《史记》记载，颜回在二十九岁的时候，须发就已经全白，仙风道骨，仿佛神仙中人，难怪会得到孔子的喜爱。遗憾的是，这位孔子口中的贤人，后世儒家所尊奉的复圣，却死在了大圣至成先师孔子的前面，时间是公元前481年。

关于颜回去世的年龄，《孔子家语》说颜回死时是三十二岁，这显然是错误的。根据《论语·先进篇》的记载，颜回是死在孔子的儿子孔鲤之后，而此时的孔子已经七十岁了。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所以很容易得出颜回出生于鲁昭公二十年（前521），去世时年仅四十岁。

上一篇讲了，颜回的死，对年迈的孔子几乎造成了致命的感情打击，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时，也没见孔子这么悲痛，可见颜回在孔子心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当听说颜回去世的消息时，孔子当场晕倒于地，痛哭流涕，“天丧我也！天丧我也！”有人劝孔子不要再哭了，孔子一边老泪纵横，一边叹息：“颜渊之死，我失大才，我不为这样的人才哭，还能为谁哭？”相信子路等人都在孔子身边，听到孔子这么说，心里想必不是滋味，但孔子是性情中人，他心里怎么想，就会怎么做，不会考虑别人的看法。

孔子和颜回的师生感情非常深，甚至可以说在孔子的学生中，唯一能和孔子产生父子感情的，只有颜回。孔子离鲁游历天下，颜回鞍前马后地跟着，孔子在陈国挨饿，也是颜回打躬作揖，向别人讨了些米，捧回来煮粥给老师吃。

除了一些内心冰冷的政治人物，对共患难的朋友敢下刀子，比如勾践、赵匡胤、朱元璋之外，一般人是很难忘记曾经在风雨中前行的知己的，孔子自然也忘不掉。在颜回的葬礼上，孔子一定回想起在去陈国的路上所遭遇的匡人之难，当时因为形势较为混乱，孔子和颜回走散，随后颜回追了上来。当孔子看到颜回时，激动得老泪纵横，说：我以为你已经被害了。颜回则“嬉皮笑脸”地回答：有老师在，我怎么敢先走一步呢。

孔子对颜回的感情是深沉而真挚的，即使颜回已经不在人世，依然没有改变孔子对颜回的高度评价，在孔子心里，颜回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存在。

季康子（也有一说是鲁哀公）曾经问孔子，在您的学生中，您认为谁的学术成就最高，孔子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颜回的名字。“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孔子始终无法忘记颜回，就像曹操始终无法忘记郭嘉一样。

讲完了颜回，再来讲一下孔子的另一位著名高足——曾参。

如果从知名度上来讲，曾参并不弱于颜回，大名鼎鼎的宗圣，孔

子唯一的孙子子思的授业师傅，被朱熹称赞为“曾子传圣人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

曾参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不用过多介绍，但和光芒四射的超级明星颜回相比，曾参身上总感觉少了一点星味。不过星味和演技并非成正比的，偶像派和实力派的区别只在于站在镁光灯下的次数而已，真正的大腕向来是不显山露水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颜回是个花瓶角色，只是总感觉颜回更像是一个传道者，而曾参更像是一个布道者。从性格上来说，颜回和魏晋第一风流名士嵇康非常相似，恬淡而无为，有道家仙骨之风，而曾参和山涛都属于同一种性格，比较敦厚朴实，这也是曾参和山涛的星味不如颜回和嵇康的主要原因。

在孔子的众多子弟中，颜回像是一个新闻代言人，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孔子的形象，子路像是一个游侠，而在学术上最接近于孔子的，还是曾参。这也是孔子在临终前，为了给孙子子思找到一个好老师，特意让曾参做子思老师的重要原因，虽然颜回和子路死在孔子之前。

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有曾参的出现，孔子的学术生命才得以延续下去。孟子是儒家先圣，孟子师从于子思，从辈分上说，曾参是孟子的师爷，而子思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曾参。换句话说，曾参完全有资格与孔、孟并列，称为三圣。

我们所熟悉的四书，在春秋时成书的有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大学》中流传最广的名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大学》实际上就出自曾参之手，虽然《大学》是由孔子讲述，曾参笔记的。

不仅是《大学》，在儒家的葵花宝典《论语》中，也记载了大量曾参的谈话，而且传播率极高。比如：

《学而篇》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泰伯篇》，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颜渊篇》有“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等等。

孔子门下三大弟子，颜回可称为儒，子路可称为侠儒，曾参则可以称为道儒。所谓道儒，类似于北宋二程和南宋朱陆等人对理学的研究，可以这么讲，在孔子的三千学生中，曾参是真正继承了孔子的学术衣钵的，在某种程度也可以称曾参为小孔子。

曾参和孔子是老乡，都是鲁人，但不清楚曾参是何时拜孔子为师的，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孔子对曾参的“精学求道”是极为赏识的，曾经当着学生的面称赞曾参是“天下贤人”。

一般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贤人是不屑为官的，他们更在乎的是学术上的成就，更喜欢在山野涧畔结庐而居，读书著作。在这一点上，曾参和孔子不太相同，孔子有时难以抵抗名利的诱惑，成天想着要做大宰相，治国平天下。

因为曾参的家境不是特别好，为了养活家人，曾参经常和父亲曾皙下地种瓜以求自给。曾参因为兜里没有多少钱，买不起华丽的衣服，只能穿着破衣烂衫，一边耕地，一边刻苦研读。

鲁哀公姬将向来奉孔子如师，对曾参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有一次鲁哀公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派人来找曾参，想请曾参出山做官。当官就是铁饭碗，可以吃公家饭，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曾参不想做官，推了好几次，才推掉了这份差事。

有人不解，问曾参：你傻啊，放着铁饭碗不端，何况这是国君求

你做官，你也背不上贪恋富贵的恶名。曾参一本正经地告诉这位朋友：“我听说受人恩惠，必畏于人，我得了国君的好处，我就有把柄落在他手上，于我何利？而且赠人玫瑰者，多以慈善家自居，即使现在国君没有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我也摆脱不了贪利者的恶名。”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对曾参的表态非常欣赏，“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另外还有一次，齐国曾经扔给曾参一块别人无法拒绝的大肉饼，请曾参去齐国当官，位至于卿，但被曾参拒绝。理由是：“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当忧人之事，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

曾参之所以拒绝踏入官场，可能和孔子在官场上受到的挫折有关。官场上的黑暗人所共知，而且曾参本就无志于仕途，如果把精力都放在官场的钩心斗角上，以曾参这样的敦厚君子，哪里是那些官场油子们的对手。

再说以曾参的家世，他即使做官，又能爬到多高？与其如此，不如不去，安心致学，照样能成就一番后人敬仰的事业。记得贝多芬有句名言：“亲王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永远只有一个。”官场上的庸禄求利者成千上万，而曾参也只有一个。

在先秦诸子中，每一个“子”都有自己的性格与学术特色，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孔子求“仁”、老子求“道”、韩非子求“法”，而曾参则是求“孝”。曾参受儒家供奉两千多年，香火不衰，靠的就是一个“孝”字。

曾参为子孝，敬奉父母，传为历史佳话，而且十三经中的《孝经》就是孝子曾参的大手笔。曾参的“孝”，与孔子所追求的“仁”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曾参曾经问孔子：“圣人之德，加于孝乎？”孔子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西周以来的社会普遍道德规范，社会各界精英无不以“孝”为自我道德约束，曾参在这方面做得更为突出。

曾参年轻时曾经和父亲曾皙在田地里耕作，因为一不小心割断了瓜苗，脾气暴躁的曾皙抄起棍子对曾参一通暴打，差点没把曾参打死。等曾参苏醒后，他跪在父亲面前向父亲认错，说不应该惹父亲大人生气，这顿棍子挨得值！

曾皙首先做错了事，一根瓜苗难道有儿子的命值钱？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是儿子对父母最起码的孝顺标准，只不过曾参把“孝”引申到了极致。孔子对此批评曾参，说你不应该坐等父亲打你，这样父亲就背了不慈的恶名，你这样等于陷父亲于不义。

其实孔子从来没有否定过曾参的孝道，只是觉得曾参还可以做得更好。

更为极端的情况是，在曾皙死后，曾参再没有吃过一种名叫羊枣的枣子。对于此事，孟子的解释是曾皙最喜欢吃羊枣，所以曾参为了避讳而不吃羊枣。其实更合理的解释是因为父亲喜欢吃羊枣，所以曾参避吃羊枣是不想因此思念父亲而伤心。

曾皙死后，曾参侍母同样极孝，《搜神记》说曾参曾经跟从孔子赴楚游历，半路突然向孔子提出回家的要求，因为他想念母亲了。孔子对此大发感叹：“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到了战国时代，曾参的孝行基本成为社会对父母行孝的一种行为准则，孟子在《离娄章句上》告诉天下为人子者：“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没人否认曾参的“大牌”，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曾参只用了区区三十四个字！甚至还不如籍籍无名的宓不齐，宓不齐好歹还有七十七个字。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着墨最多的，是卫人子贡（即端木赐），字数铺张至两千字，而仲尼弟子之“首”颜回，也不过一百五十字。

和颜回、曾参这些孔子的正牌弟子相比，子贡的情况比较另类。子贡并不是一个专职的求道者，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就是大商人，这在孔子学生中是非常罕见的。

孔子曾经在《论语·先进篇》中评论颜回和子贡，说颜回在道德上几乎是完人，但就是物质条件比较差，经常饿着肚子谈经论道。子贡不信天命不求道，一门心思钻进钱眼里，而且市场行情预测能力超强，所以子贡做买卖从来没有赔本的。

孔子的本意是提醒子贡不要这么财迷，要向安贫乐道的颜回学习，不然离“道”越来越远，但从反面也证明了子贡的商业天才。其实孔子大可不必对子贡求全责备，百花齐放才是春，如果他的三千弟子都向颜回那样“安贫乐道”，不知道孔子如何筹集学术经费？

子贡在孔子身边学习的时间不长，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外面跑生意，买卖越做越大，嘴皮子自然也就越来越利索。在孔子的学生中，要说第一名嘴，首推子贡，史称“利口巧辞”，唐人孔颖达也称子贡是“言语之士”，专靠嘴皮子混饭吃。

除了能言善辩，子贡经商久了，眼头也活泛，从来不说得罪人的话。有次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优秀？子贡立刻拍起了颜回的马屁，我怎么能和颜回比呢，“颜回以一知十，我只能以一知二”。当然可以说子贡确实是推崇颜回，但从子贡的性格来看，他应该是不服颜回的，至少颜回过于“迂腐”的性格是子贡所不能认同的。

孔子带着三大弟子游农山，孔子问他们的志向选择，子路说要上疆场杀敌，颜回说要用礼仪教化人民，子贡回答得非常大气。“我希望齐、楚两军在疆场上互相厮杀，我穿白衣，戴高帽，站在两军阵中，凭我三寸不烂舌，向这些好斗公鸡阐述战争的危害，让他们罢兵和好。而且我相信只有我才能做到这一点，子路和颜回远不如我。”孔子当然相信子贡的自信，答：“辩哉！”

子贡的辩才是公认的天下第一，这世界上几乎没有子贡的利嘴攻不克的堡垒，比如孔子突然大发善心，想劝楚平王的弟弟、楚令尹子西做人不要沽名钓誉，但孔子没想好派谁去合适，子贡自告奋勇，“赐也能”。不久后，子西果然被子贡的连珠炮炸得七荤八素，“（子贡）乃导之，（子西）不复疑也”。

枪能杀人，嘴同样能杀人，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嘴的功能甚至可以改朝换代，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子贡的嘴能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所熟悉的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最终一举灭吴，复仇称霸，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始作俑者是谁，答案是子贡。

四二 侠儒子路

说完了颜回，再来讲讲性格上与颜回站在另一极的子路。

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必然会在意识形态或性格上形成对立的两种人，比如有人激进，有人温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鹰派和鸽派，或者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孔子的学生中，能有资格与颜回并立于性格硬币的两面的，也只有子路。子路其实是他的字，他本名仲由，也有一说叫季路，孔子喜欢称呼他的名字，但众多史料多称为子路，所以就不另起炉灶，本篇也称他为子路。

颜回比孔子小了三十岁，所以孔子可以把颜回当成儿子一样，但子路却只比孔子小十岁，生于公元前542年，和孔子名义上是师生，实际上就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在孔子的众多学生中，子路绝对是个另类，如果说颜回温柔如水，那可以说子路刚烈如火，颜回像一块玉，子路就像一块生铁。

孔子的学生多喜欢摇头晃脑地读书，卧于林下，饮泉笑谈儒者。子路不喜欢这些酸文假醋的做派，如果把子路关在屋子里面读书，不出一个时辰，子路准能把门踹开，他的性格和《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极为相似，天生就是个坐不住的人。

颜回好求仁，而子路最大的追求则是长剑，一柄长剑在手，腾云舞龙，好不自在。孔子曾经问子路，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子路很自豪地说，我最喜欢舞长剑。

子路的回答让孔子很不满意，这哪里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生，分明就是一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强人。孔子劝子路要多学习文化知识，“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君子不可以不学”。虽然子路最终接受了孔子的劝学，但一个人的性格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子路依

然不改自己的强人做派。子路和三国东吴名将吕蒙有些相似，吕蒙也是听了孙权的建议，开始读书，但骨子里的武夫基因是抹不掉的，子路同样如此。

孔子也知道子路的性格，所以孔子并没有要求子路全盘照抄颜回的价值观，这是不可能的，孔子只是希望子路能多一点温和的色彩，为人处世不要过于强硬。曾经有人问孔子：子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孔子的回答是：“勇人也！我不如子路。”《论语·子罕》记载的“勇而无惧”，应该指的就是子路。

孔子称赞子路为人“勇”，不仅是因为子路为人豪侠仗义，而是孔子曾经亲身领教过子路的粗暴。子路是典型的武夫粗人，所以司马迁说子路“性鄙”，性格直来直去，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当面骂人是家常便饭。子路热衷于打架斗殴，谁要是把子路惹毛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孔子和子路认识的时间应该比较早，但双方还没有确定师生关系，最多算是个熟人。孔子成天宣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遭到了子路的轻视。既然老夫子喜欢“人不善我，我亦善人”，子路自然要占点孔子的便宜，没少对孔子动手动脚，“陵暴孔子”。

孔子向来是不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他就像《大话西游》中的唐僧一样，在孙悟空面前念念叨叨，直到子路捂住耳朵投降为止。孔子成天在子路面前大讲仁义道德，“设礼稍诱子路”，子路这才“儒服委质”，拜在孔子门下，这充分显示了子路性格中坦率可爱的一面。

其实以子路的性格，他穿上儒服，照样是横着走路，背长剑，踏步如流星，性格豪爽开朗，天生就是一个适合在官场上捞饭吃的人物。子路很渴望功名，入世的心态非常积极，人都是需要有一点野心的，套用那句再“烂俗”不过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有一次，孔子带着颜回、子路、子贡三大样板学生去游农山，在山上，孔子让他们说出各自的理想志向。颜回的回答依然是老套路，仁义道德讲了一大堆，无非君明臣贤，爱民如子云云。

子路不像颜回那么“酸腐”，他的理想是骑着高大的战马在疆场上厮杀。子路并自信地告诉孔子，在孔子学生中，能上马横剑，擎旗冲杀，斩敌上将于万马阵中者，只有他仲由。“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旂旗缤纷，下蟠于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馘，唯由能之。”

但凡有点才华的人士，骨子里都或多或少有一点骄傲感，或者说做人非常自信，相信自己的才能，子路也不例外。还有一次，子路和曾皙、冉求、公西华陪着老师孔子聊天，孔子给学生们提了个假设，假如你们受到君主的重用，你们会怎么做。

子路第一个回答：“我希望能去一个拥有千辆战车的小国，这个小国夹在两个大国中间，外部有强敌压境，内部饥荒连年，国将不国。只要这个小国肯重用我，不出三年，我就有能力改造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有足够的力量称雄一世。”

在思想保守的古人看来，颜回远比子路更值得尊敬，而子路的性格更接近于崇尚个性自由的现代人。就如同《三国演义》的曹操在古代是反面人物，刘备是正面人物，但到了现代社会，曹操和刘备的形象却颠倒过来一样。现代人对子路的欣赏，不仅限于他的“勇”，更在于他的“侠”，是个可以在一起“鬼混”的哥们儿，而不是危襟正坐、无求无欲的颜回。

子路在道学先生们看来有些世俗，比如子路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名利的热爱，这不应该作为人的缺点而受到批判，这只能说明子路为人的真实。事实上，子路并不是一个为了追逐名利而放弃仁义道德的斤斤小人，从某种角度上讲，子路的人生追求比颜回更接近于“仁”。

子路具有很强烈的均富意识，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孔子曾经问子路最想做什么事情，子路很骄傲地回答：我想成为一个富人，拥有华丽的车马，美丽的服饰，和我的朋友一起享受荣华富贵。特别是“与朋友共”，这是很标准的梁山“土匪”做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洒脱可爱的性格，是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精神追求的。

子路是个率性的“莽撞人”，他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他从来不隐藏自己的观点。比如孔子去卫国求食，被卫国夫人南子强行邀见，虽然孔子是迫不得已，但还是被子路臭骂了一顿。子路是个直筒子性格，孔子是闻名天下的大学者，怎么可以见南子这个淫荡妇人？子路性格直爽，但本质是非常善良的。

实际上，后人对子路的印象多集中在他的“勇（有个性）”，却忽略了他的“孝”。孔子欣赏子路，不仅因为子路任侠豪爽，子路对父母的孝顺，也是孔子大加赞赏的。

《孔子家语·致思》记载了子路和孔子的一段对话，其中子路告诉孔子自己当年的生活，这应该是子路认识孔子以前发生的事情。子路的家境应该比较差，家里有一点好吃的东西，子路都要孝敬父母，他自己经常以野果充饥。子路的父母年纪应该比较大了，为了不让父母劳累，子路经常从一百多里的地方背米回家，孝养双亲。

老话常讲，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一个不热爱父母的人，很难想象他会热爱自己的国家。子路为人虽然有些莽撞，但心地善良，行侠仗义，孔子实际上是非常欣赏子路的。以子路这种锋芒外露的性格，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混的，官场一般容不下有个性的官员，孔子也曾经和季康子谈过这个问题。“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子路不从政，又不能做颜回那样的名士，总要做点事情，孔子给子路点明了方向——做将军。孟武伯问孔子：“子路仁乎？”孔子否定了子路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从性格上来说就不合适。孟武伯问子路

做什么合适，孔子给出了答案：“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

孔子认为子路适合在军队中工作，因为子路的性格比较刚狠强硬，能震得住人，这一点是颜回、子贡、冉求等人所不具备的。在众多学生中，子路是唯一敢和老师顶嘴拌蒜的，孔子困于陈蔡时，饿得两眼晕花，孔子还在摇头晃脑地给学生们讲课。子路最受不了孔子的“酸文假醋”，都快要饿死了，还读个鸟书！子路对孔子冷嘲热讽：“君子也有饿肚子的时候吗？”

孔子问子路，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子路又是一顿夹枪带棒的挖苦：“因为我们的仁德还不够，所以人家不给我们饭吃。因为我们智谋还不够，所以人家不放我们离开这鬼地方。”子路只顾过自己的嘴瘾，却气得孔子直翻白眼。

这种性格很讨一般人的喜欢，直爽不做作，是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但在官场上，这种人性格过于外露，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在子路离开孔子单飞，准备去卫国蒲邑做大夫时，孔子担心子路的直筒子脾气会招来麻烦，就耐心给子路上了一堂课。

蒲邑民风剽悍，好勇斗狠，满大街都是刺头，子路也是此道中人，正正得负，如果子路不收起他的火暴脾气，迟早会和蒲人干起来。孔子送给子路两条应对的办法：一、恭以敬；二、宽以正。待人谦恭低调，没事别撵鸡追狗，尽量不要得罪人。对人要胸怀宽广，持之公平，不要拉帮结伙，一碗水要端平。只要做到这两点，天下之事，无往不利。

子路来到卫国做官的时机并不算好，因为此时的卫国正陷入一场可怕的父子争位的内乱中不可自拔，刀枪无情，随时可以剥夺所有参与者的生命。关于卫国的政治危机，前面也曾经提到过，就是卫国夫人南子逼走了太子姬蒍聩，由于公子郢不想继位，所以南子只能选择姬蒍聩的儿子姬辄。

姬辄在位的时间不算短，能在政治混乱中屹立不倒十二年，说明姬辄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能力的。但他在官场上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姬蒍聃。姬蒍聃非常有野心，他并不甘心本来属于自己的位子让儿子霸占，时刻都在谋划回国即位。

卫国大夫孔恠是子路的上级，但子路所不知道的是，孔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前太子姬蒍聃的外甥。姬蒍聃的姐姐伯姬氏就是孔恠的生母，一个生性淫荡的贵妇人，孔恠的父亲死后，伯姬氏就和家臣浑良夫勾搭成奸了。

对于姬辄的即位，无论是他的父亲姬蒍聃、他的姑母伯姬氏，还是他的表兄孔恠都不满意，就孔恠母子来说，侄子和表弟的关系显然没有弟弟和娘舅的关系更亲近，所以这娘俩暗中操作，准备对姬辄下手。

子路不知道这些内情，他只有一个信念：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他拿姬辄发的工资，他就有义务为姬辄尽忠。所以当子路听说孔恠一伙把卫公姬辄赶到鲁国，迎立前太子姬蒍聃之后，子路的愤怒可想而知。

其实子路完全有机会远离卫国的宫廷斗争，谁做国君和子路没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跟谁不是一样打工？也有人劝子路，说国君已经出逃了，而且城门已经关闭，反正你也进不去城，何不就此离开卫国，何必蹚这个浑水，自取其祸？

别看子路平时吊儿郎当，性烈如火，但他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他受姬辄厚遇，就必须报答，即使面前是刀山火海，子路也要蹚下去。子路说得很悲壮，“食其食者，不避其难！”

子路知道姬辄并不在城中，而姬蒍聃和孔恠早已经勾搭在一起，为了权力，这伙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子路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回到鲁国，与孔子或姬辄团聚，要么进城送死。如果是孔子面临这样的

选择，以孔子的通权达变，他应该会选离开，而子路却义无反顾地进城送死。子路并不是一根筋撞南墙的人，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次，只是他当初答应姬辄要尽忠至死，所以他要践诺。

子路在城中的高台上见到了春风得意的姬蒍聃，旁边站着趾高气扬的孔悝，子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指孔悝，问姬蒍聃：“孔悝不忠不义，君为什么要重用这种不忠不义的小人，请君将此贼授臣，臣杀之，以正大义。”

姬蒍聃和孔悝既是近亲，又是铁杆盟友，任凭子路说得有理有据，大义凛然，姬蒍聃也不会动孔悝一根汗毛。此时的城中都是姬孔二人的人马，子路没有任何机会赢得他想要的结果，而且姬孔二人并没有对子路动手，子路完全可以在取得道义胜利的情况下全身而退。

子路并没有选择“聪明人”都会选择的做法，他没有丝毫后退，而是继续和命运抗争到底。子路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他堆起柴火，准备烧城，把该死的姬蒍聃和孔悝烧成烤鸭。子路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堆柴放火的，说明子路手下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但不会很多，所以他的胜算并不大。

其实从子路进城的那一刻，胜负早已经注定，用近代流行的话说，就是“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子路完全占据了道义高地，但笔杆子在枪杆子面前，什么都不是。姬蒍聃的人马很快就冲下台去，将子路团团围住，结果不用多说，子路寡不敌众，悲壮地践行了他当初对卫君姬辄的承诺。

子路不是傻子，力量的悬殊让他没有任何机会除掉两个奸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敢进城，就是准备慷慨赴死的。当敌人在乱战中砍断了子路的帽缨，子路怒喝敌人住手，留下了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君子可死，但不可无冠。”子路从容地系好帽缨，含笑就死。这一年是公元前480年，子路时年六十三岁。

子路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壮人生结局，而最早看出子路必将死于义的，就是他的老师兼朋友孔子。当孔子听说卫国内乱的消息时，以孔子对子路的深刻了解，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子路肯定要出事。果然不久后，噩耗传来，孔子哭倒在地。

孔子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极有性格的学生，也不仅失去一位知己朋友，确切地说，孔子失去的，是一位敢说真话的诤友。做朋友易，说些好听话就成，但做诤友不易，是很容易得罪朋友的。当着朋友的面说出对方的不足，是对朋友的爱护，这需要坦荡的胸怀，说话做事问心无愧。子路对孔子的批评向来是毫不留情的，挖苦讽刺也是家常便饭，但子路是真心赤诚的，孔子最痛惜子路的，就是子路性格中的刚直。

子路可能在小节上不太注意，说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别人揪住小辫子。但子路之所以是英雄，原因就在于他胸中存有大义，舍小节而取大义，这才是英雄所为。

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生活奢华，每宴必有歌伎侍奉，大吃大喝，典型的贵公子做派，但当蒙古大兵压境时，文天祥毁家纾难，不死不休。英雄往往都是有缺点的，没有缺点的圣人让普通人难以亲近，而子路身上浓烈的草莽英雄之气，是子路人生中最大的闪亮点。

除了颜回、子路之外，孔子还有许多优秀的学生，比如子贡、子夏、冉求等人，因为篇幅有限，所以就不多做介绍了。

四三 千古一圣说老子

（上）

谁是老子？简而言之，老子就是爸爸。

古往今来千万年，人类已经产生了数百亿个老子，只要能生娃，你就是老子。但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别人的爸爸，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伟大哲学家——老聃，又称李耳、李聃，中国所有老子中最伟大的那一个。

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至于儒家在中国唯我独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甚至到现在，全世界遍地都是孔子学院。就像一枚硬币，人们只看到了平放在地上的硬币的这一面，却忽略了硬币背后，还有精彩的那一面，这就是老子的道家思想。

不否认儒家的伟大，但我们更应该承认道家的伟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道家思想对中国历史潜意识的影响，任由儒家一家主宰中国人的脑袋，历史将变得极端而不可收拾。而道家思想的开创者，就是伟大的老子。

洋人曾经搞出了一个世界百位伟大人物排行榜，孔子因为知名度实在太大大而排在第五，老子——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排在第七十五。老子排名落后于孔子，完全是因为儒家思想之于官方的表面影响。

就如同世人皆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却很容易忽略古希腊思想史上的开山鼻祖泰勒士，而老子出生略晚于泰勒士。如果说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那老子就是中国的

泰勒士。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孔子的存在，却有不少中外学者质疑老子是否真有其人，比如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就认为老子是司马迁道听途说后捏造出来的虚构人物，但大多数学者相信老子的存在，此不多述。

关于老子的生年，已经于史无考，但有观点认为老子应该生于周灵王姬泄心即位前后，也就是公元前571年，比孔子大二十岁，算是孔子的父辈。而老子卒于周元王姬仁五年，即公元前471年，也就是说平庸的老子在庸凡的人世间逗留了一百年！

而关于老子的出生地，现在争议非常大，这很好理解，经济发展需要旅游投资来拉动，而如果本地能有一位千古名人，则事半功倍。为了诸葛亮的隆中高卧，南阳和襄阳各置一词，其实老子也一样，仅出生地就有好几个。

《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生于苦县厉乡曲仁里，具体位置不详，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指河南鹿邑县，一是指安徽涡阳县。老子学说最优秀的继承者庄子则说老子是沛人（今江苏沛县）。老子到底出生在什么地方，其实答案非常简单，老子出生在中国，是属于全中国的。

关于老子的家世，同样无考，但据学者考证，老子和孔子一样，都出身于没落的中下层官僚家庭，父祖几代都是诸侯国的史官，家庭物质条件相对充裕，这也为老子的早期教育打下了基础。这一点和司马迁非常相似，司马迁也是世家写史，所以司马迁有条件最终写出皇皇巨著《史记》。

有史可考的老子第一任老师是楚人商容，商容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教的老子，史无记载，但在《高士传》中留下了商容在病中与老子的一段关于“道”的谈话。老子最终形成以“道”为内核的哲学体系，和少年时商容给他灌输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

此时的商容年老力衰齿落尽，老子在榻前问疾，商容问老子一个问题：“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心里可能在想，这个老棺材瓢子尽说废话，没舌头你怎么说话？老子回答舌还在。商容又问老子一个问题：“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摇摇头，都掉光了。

商容神神叨叨地问老子，你现在知道我想要说什么了吧。年轻的老子有些不太自信地回答：老师莫非是在说刚强者必亡，而柔弱者能存的道理？商容大笑：孺子可教矣！老子《道德经》中一个最著名的观点：“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即柔弱胜刚强，就是吸收了商容和他这段谈话的精髓整理而成的。

上面讲了老子是中国的泰勒士，其实泰勒士的哲学思想和老子如出一辙，比如他们都从水的存在而悟到比人道更为博大深邃的天道（即哲学），老子说“上善若水”，泰勒士说“水是最好的”。如果说孔子追求的是人道，立足于社会，老子追求的就是天道，将人置于茫茫宇宙之中去探索人的存在价值，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水”又是“道”的内核，什么是“水”？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水”就是一种无为的存在，是所有力量的源泉，表面上看，水是柔弱的，但水的力量却是世界上最无坚不摧的利器，一滴水会被太阳吸干，但无数滴水能摧毁整个世界。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评价“上善若水”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副对联，即“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水”的美德，就如南怀瑾所说，“如水一样的至柔之中的至刚、至净、能容、能大的胸襟和器度。”

老子常讲，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强调无为处世，不要事事出风头，要以自己为本位，“自居（水的）下流，藏垢纳污而包容一切”。水以柔弱胜刚强，妙处在于水的静者自静、动者自动，做人也是如

此，要因时而动，不要逆天行事。

道家主张无为，但这并不是保守软弱，而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换成现在语言，就是做人要低调。南怀瑾曾经以水为例，研究了儒、佛、道三家对于“水”的不同的理解。儒家讲究“精进利生”，佛家讲究“圣净无生”，而道家讲的是“谦下养生”。

老子的“水”观，可以用南怀瑾提出的“七善”来总结，就是：

一、居善地，要善于自处，甘居人后。

二、心善渊，要有容纳百川大海的深沉静默。

三、与善仁，行为举止要学习水给予万物以生命的担当。

四、言善信，言语吐纳要像潮涨潮落一样定时，不要随便开口给人承诺。

五、正善治，立身处世要像水一样持平正衡，不要拉帮结派。

六、事善能，为人处世要圆柔如水。

七、动善时，把握机会，及时而动，像水一样随着动荡的形势而动，随着平静的形势而静。

特别是第七善，即“动善时”，其实就是老子经常挂在嘴边的“无为而无不为”。因为从表面上看，水有时也是静止不动的，但水从来没有停下自己探索未知的脚步，老子也是如此。而此时的老子，还不满十岁！这是一个思想上的神童，当然，不是所有的神童都能很早参加工作。

有人说，思想境界是与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大有关系的，这话很有道理。老子偏居草野一隅，再加上商容的知识储量也是有限的，商容为了不耽误这棵好苗子，可能是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把老子送到了

东周国都雒邑求学。这一年，老子约十五岁左右，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生。

老子和孔子这两位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开拓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十五而志于学”，只不过他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不同，孔子考上了鲁国大学的社会系，老子考上了东周大学的哲学系。

在这一点上，老子要比孔子幸运，因为他所在的“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相当于民国时期的中央国立大学。东周虽然国势衰落，但作为天下王都，却有条件保存丰富的古籍资料，这是地方诸侯大学所不如的，这也是后来孔子来雒邑求学于老子的主要原因。

由于史料稀少，只能略约推算出老子在雒邑的书院里整整待了十年，而按现在的学历算法，四年本科之后，再考研、硕博连续，差不多也是十年，也就是说，老子是戴着博士帽子，心事重重地走出十年寒窗苦读的教室。

不知道是托了什么门路，还是当时国立大学毕业生有安排工作的政策，二十五岁的老子谋到了一份周守藏室之史的差使。所谓守藏之史，也就是东周国家图书档案馆馆长，这是个副部长级待遇的职务。应该说这份工作是非常适合老子的，老子向往静谧如水的人生，而守藏史正可以满足老子的心意，正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春夏与秋冬。

老子平静而不庸凡的人生，已经和雒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司马迁说老子“居周久之”，实际上老子在雒邑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四十二年，即公元前557年至公元前516年。四十二个春夏秋冬，记载着老子从一个翩翩少年到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老年的点点滴滴，虽然此时老子还没有编撰《道德经》，但在雒邑担任守藏史的漫长岁月却是老子哲学思想形成的最关键时期。

国家图书档案馆是个清水衙门，平时没有多少油水可捞，老子也

不屑追逐那些浮名浮利，除了每天必要的公务应酬外，老子都潜于密室，整理文件资料，在或明或幽的烛光映照下，老子孤独地仰望着浩瀚无垠的星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道是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包括积极入世的儒者。老子眼中所看到的“道”，首先是一种哲学辩证的存在，用现在的角度来看，老子的三观是唯心主义的。

比如老子的唯心宇宙观，表现在《道德经》第七章，即“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宇宙是固定不变，自古就有的吗？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是一百五十亿年前出现的，也就是宇宙并非是“不自生”的。

但我们不能去苛责一位两千五百年前的哲学家，历史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现代人所取得的成就，哪样不是建立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牛顿被苹果砸了，发现了万有定律，而现在的中学生也能发现万有定律，但我们不能说牛顿还不如一个中学生。

老子所追求的道，并不是故弄玄虚，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的“道”，从来没有脱离社会去片面地研究所谓宇宙。或者可以这么说，老子研究“道”的核心是如何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无缝对接，即天人合一学说。比如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老子就把“天道”和“人道”放在一起讨论。

有些偏激的观点认为老子不过是个“神棍”，实在是荒谬透顶，更有甚者，因为历代皆独尊儒术，便有人认为道不如儒。其实宣扬道不如儒的，无法面对一个人对这种荒谬观点的否定，他就是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

在孔子辉煌灿烂的学术人生中，他的老师并不多，但任何否定道家思想的观点都绝无可能绕过孔子曾经问道于老子的那道历史铁门。

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流传千载，成为千古佳话。不过孔子见老子的时间、内容，历代争议非常大，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孔子卑礼于老子”，是道家门徒有意抬高老子地位的炒作。

另一种观点是孔子年少于老子，老子的生年具体无考，但应该比孔子大二十岁左右，老子成名要早于孔子，所以孔子向长者问道是非常正常的。二人相见的地点，没有什么争议，因为老子时任东周王室的藏室史，相当于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也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

孔子“适周”见老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当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对座而视的时候，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虽然孔子见老子的史料非常多，但对于二人相见的的时间则语焉不详，学界为此吵来吵去。

大致来说，孔子见老子的时间，分为几种观点：一、孔子十七岁时；二、孔子三十岁时；三、孔子三十五岁时；四、孔子五十一岁时。而第三种观点是老子最著名的学生庄子说的。其中孔子三十五岁时见老子，最为学界所认可，具体时间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五月初一，当天发生了日全食。

从鲁国曲阜到东周雒邑，约有五百公里的距离，而且烽火四起，路上并不太平。孔子之所以执意要远赴千里之外去求见老子，有两个目的，一是来东周观“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学习东周先进的政治礼法制度。第二个目的，就是孔子听子路说起东周有个守藏史老聃，博学通古，且舍下有书无数，孔子急于增长见识，便开始了他人生中最瑰丽的求学之路。

孔子见老子都说了些什么，《孔子家语·观周》和《庄子·天道》对此均有详细记载。《家语》记载孔子向老子问道，实际上是在向老子诉苦，说自己关于道德价值观的建议没有被当权者采纳，道行于今

世颇难，孔子指的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道德滑坡。

对孔子这个观点，老子用他一贯的哲学思维逻辑回答，“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意思是官场中人鬼话连篇，而且擅长花言巧语忽悠百姓，而听者又往往对事实的本相不了解，容易听信他们的空头承诺。

而在《庄子·天道》中，孔子和老子展开了一场关于“仁”的精彩辩论，事件的起因是孔子听说老子藏有许多图书，便来到东周找老子借书。老子并没有借书，而是要求孔子用一两个字来高度概括他所读过的书，孔子答曰：“仁义。”

“仁义”是儒家学说的精神内核，孔子一生致力于“仁义”，而“仁义”与老子所追求的“道”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仁义”侧重于社会人的精神层面，“道”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共存辩证关系，所以老子对孔子所追求的“仁义”似乎并不太认可，问孔子何为仁义。

孔子回答得也很干脆：“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孔子话音刚落，老子就对孔子的仁义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老子不认同仁义是人之本性的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孔子所谓兼爱无私，实则有私，孔子要爱天下所有人，实际上是希望所有人都爱他，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老子反对孔子的仁义论，并不代表老子反对仁义本身，只是道、儒二家对仁义的理解不同所致。老子的用世哲学还是“无为而无不为”，仁义也是如此，老子反对的是刻意赠与别人仁义，因为这违反了天道人性的。

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就明确提出道家的仁义观：“上仁为之而无以为”，真正的仁爱是天性流露，而不是化装表演舞会，戴上仁义的面具就能欺骗观众。儒家最喜欢宣扬仁义德政，而在老子的

用世哲学中，“不以德者自居，不以仁者自居”，才是德与仁的最高境界。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孔子在东周雒邑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他应该和老子进行多场学术上的切磋和辩论，老子以长者的身份多次告诫孔子，“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

从《史记·老子列传》记载的这段话来看，孔子的用世思想过于激进，恨不得一日变换城头大王旗，这是老子所反对的。在老子看来，孔子的世俗心太强，不是能和他谈天论道之人。

而根据近代大学者胡适的研究，老子和孔子都是儒家学者，只不过老子抱守旧儒，孔子推倡新儒。“孔子和老子本是一家，本无可疑。后来孔老的分家，也丝毫不足奇怪。老子代表儒的正统，而孔子早已超过了那正统的儒。老子仍旧代表那承顺取容的亡国遗民的心理，孔子早已怀抱着‘天下宗予’的东周建国的大雄心了。”

从某种角度来讲，胡适说得很有道理，比如老子的政治思想相对于孔子略为保守一些，甚至更进一步说，老子才是西周礼教宗法思想（即周公之儒）的正宗传人，孔儒不过是从周公之儒引申出来的新儒家学派。

不过胡适贬低性地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历史进步的绊脚石，企图将历史拉回到原始初民的社会状态，实在是有失公允，因为孔子要把社会拉回到西周礼不崩乐不坏时代的心情，比老子还要迫切。

老子是说过“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道德经》第三章）但这句话并不能成为老子开历史倒车的证据，否则儒家经常挂在嘴上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当何解？

老子说这句话的前提是统治者“不尚贤（钱财），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这里所说的“知”，指的是智慧，而不单纯

指的是知识。统治者首先要做到不贪利货，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全民不贪财货的道德价值标准体系。统治者贪婪，整个社会都会跟风。底层民众由于剥削制度的限制，得不到一块蛋糕，只能逼着他们去造反。

老子在第三章的最后还提到了“为无为，则无不为矣”，这里所说的“无为”，是劝告统治者不要贪婪，尽最大可能让利于民。你不希望子民做的事情，你自己首先就不要去做，否则上行下效，社会稳定是无从谈起的。

胡适把老子和孔子捆绑在一起销售，甚至让老子替孔子抵挡来自墨子批判儒家的枪子，实际上老子与孔子的三观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不能简单地将两位思想家混为一谈。孔子对老子发自内心的尊重，也是一些激进儒学者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等到孔子在老子处混了几顿饱饭后，要离开雒邑回鲁国了，老子在城门前送孔子返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老子对孔子的优缺点已经了如指掌，孔子年轻有为，但过于追求浮名浮利，在黑暗混沌的官场上是很容易得罪人的。

老子送给孔子几句发人深省的警言：“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老子教育孔子，做人要低调，不要以为地球是围着自己转的。

表面上讲，老子讲的是消极的为人处世，但其中包含着积极进取的因素，老子说过：“取天下常以无事，及有其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可从来没说过无为就是消极避世，只不过取天下各有道，道道不同而已。

孔子此次适周求道，收获颇丰，以至于他在离开雒邑时，深深地长拜老子，“敬奉教”，并把老子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称老子为“龙”，而龙，世界上只有一条。

孔子的伟大就在这里，对于不同于自己的学说有着出自本能的敬重，孔子并非完全接受老子的说教，但不能否认的是，老子的淡淡数语，对孔子思维的开拓有醍醐灌顶之感。《孔子家语》把孔子后来收了学生三千，归功于老子，“（孔子）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四四 千古一圣说老子

（下）

对老子来说，孔子只是他绚烂而如迷雾般的人生海洋中的一朵浪花，孔子继续寻找着自己的梦想，而老子还要在无数的史籍卷宗中追求着对一般人来说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的“道”。也许除了老子，没人说得清“道”到底是什么。

老子的“道”，并非某些人所贬低的不食人间五谷，脱离地气，更不是什么“神棍哲学”，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用世哲学，不能把出世的道家思想和追求有为结果的“道”本身简单地混为一谈。

老子不是天文学家，每天都在数星星，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每一个有用于世的哲学家或思想家都必须面对的。至圣如孔子，也对颜回说过：“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后世对老子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上，总在茫茫宇宙中寻找自己的答案，却往往忽略了老子的政治思想，其实老子也是站在地球的表面看待宇宙天象、人间万物的。

一部皇皇道家经典巨著《道德经》着重讲两个方面，一个是“天”，一个就是“人”。在老子看来，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人道如果再细分的话，可以分为抽象的人道与具体的人道（民道），而脱离了以民为本的人道，天道也就不复存在了。

和许多接地气的思想家一样，老子对人民大众的感情是真挚而朴素的。老子非常同情、理解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与对幸福的向往，并

经常警告统治者不要把老百姓的忍耐当成逆来顺受。

比如在《道德经》第七十二章，老子告诫君主：“民不畏威，大威至。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老百姓从来都是不怕死的，不迷信权威的，一旦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造反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老子并不反对君君臣臣的社会等级制度，但底线是统治者必须要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不要逼得老百姓没有房子住，不要逼得老百姓连一碗热饭都吃不上。维护稳定的根本在哪里？不在于高精尖的武器，而在于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做不到这一点，维护稳定只是个梦想。

民众和政府的关系是成正比的，政府爱民众，民众就会爱政府，反之也一样，这就是老子说的“夫唯（政府）不厌（百姓），是以（百姓）不厌（政府）”。为什么项羽拥有强大的军队却兵败如山倒，根本原因，就是项羽没有参透老子“唯不厌，是以不讨厌”的真理。

《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中有句话非常发人深省，值得当政者戒！“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翻译过来就是优秀的当政者从来不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底层人民，为他们服务。这样的当政者，他付出的越多，得到来自人民的拥戴就会越多。

为什么海瑞卒于任上时，当地百姓痛哭流涕，罢市为海瑞送葬，就是因为海瑞不谋私利，真正做到了“圣人不积”，而不像有些人嘴上高喊利国利民，实际上鼓动七姑八婆大发横财，这样的贪官，老百姓当然会毫不留情地痛骂。

政府要做到不让百姓讨厌，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做到老子所说的“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就行了。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有德的政权对

人民只有奉献没有索取，而无德的政权才反其正道而行之。而历代百姓造反，说到根子上，就是一些政权“无德司彻”。

民众普遍贫困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官富民贫的局面？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社会财富有一个相对总量，无论用什么美丽的语言进行包装，利益分配从来都是一个溅血的残酷过程。所谓官富，完全是建立在统治者剥削压迫百姓基础上的，与民争利，在把老百姓往绝路上逼的同时还在幻想社会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

老子反对用“大威”来压制底层民众，因为这是毫无效果的，民众没饭吃，就会想办法给自己找饭吃。官府积粮如山，饥饿的老百姓只好去扛着锄头到官府“借”粮了，顺便割下几个肥大的头颅来平息民愤。

枪杆子很重要，但如果把枪口对准本国平民百姓的枪杆子，就不那么重要了。自古而今的大量历史证明，统治者对本国百姓滥施淫威，以暴力阻止百姓追求幸福的，最终都将被愤怒的民众推翻。

统治者以为百姓怕死，却往往忽略了一点：当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时，生命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只有一条，那就是反抗到底。所以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四章阐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观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枪杆子并不能决定一切，凡是对内实行暴力镇压的政权，对外无一例外是软弱卖国的，而外部势力不断地压榨，会更进一步激发国内的阶级矛盾。有些帝王迷信暴力统治法则，以为枪声一响，天下太平，实际上这只是幻想。

《道德经》第七十五章说得很明白：“人之轻死，以其生求之厚，是以轻死。”老百姓为什么不怕死？就是因为统治者过于贪婪，不肯让利于民。历代亡国，归其原本，无非就是利益分配的不公导致

底层民众的大规模反抗，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统治者不爱民，却又想老百姓无条件服从于他们的统治，世界上没有这么充满奴性的老百姓。在《道德经》中，我们随处可见老子闪光的政治思想，孔子劳累大半生，奔波大半个中国，要的无非就是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实际上老子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我们通常会把老子称为哲学家、思想家，其实老子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理论家。《道德经》主要论天道，兼及人事，也论军事，虽然篇幅不是很多，却散发着高人一筹的军事智慧。

老子的军事思想在军事史上不是很有名，但寥寥数语却让后世兵家受益匪浅。大家都读过《孙子兵法·兵势篇》那句经典军事名句：“以正合，以奇胜。”提出了“兵不厌诈”的军事指导思想。实际上《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同样提出了在当时振聋发聩的军事思想——以奇用兵！

兵以诈立，在残酷的战争中，军事家追求的不应该是美丽的过程，而是冰冷的结果——胜利或者失败。老子应该知道宋襄公卖弄仁义而耻辱失败的历史典故，老子提出“以奇用兵”，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

从时间上看，《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差不多和《道德经》同时，但老子形成《道德经》腹稿的时间可能略早一些。所以，不妨委屈一下孙子，老子应该是提出兵不厌诈思想的第一人。

战争不是儿戏，所以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类似的观点，老子也有，比如在《道德经》第六十九章，老子告诫后世用兵者，“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在战略或战术上轻视敌人是极其危险的，历史上许多著名战役中的失败者，都是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惨败，究其原因，无非是轻敌二字，比如昆阳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

《道德经》不过区区五千言，但字字都是珠玑，同样是在第六十九章，老子给后人留下了三个脍炙人口的著名成语：反客为主、得寸进尺、哀兵必胜。全章如下：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

前两个成语不是老子发明的，却因为《道德经》而有幸流传下来，但我们对“哀兵必胜”这条著名的军事术语再熟悉不过了。这里所指的“哀”，不仅包含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破釜沉舟的气概，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政治思想建设对军队的影响，将决定士气的高低，而一支没有思想的军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和许多军事家，比如田穰苴、孙子一样，老子同样反对战争，主张谨慎用兵，轻易不开战端。在《道德经》第三十一章，老子就阐述了他对战争的理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远离战争）为上。”

一流的政治家是会不会用战争来实现自己对他国的政治目的的，自古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兵之上道，所以老子说“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认为战争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老子比田穰苴、孙子等人慎战的思想更进一步，就是反战。

“（战胜）不美，若美之，是乐杀人。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甚至不妨这样解释老子的这句话：主张战争的全是杀人犯！

从《道德经》和《司马法》、《孙子兵法》有关军事思想来看，三部书有许多共通之处，以田穰苴、孙子在军事史上的特殊地位，老子对军事的理解能和二位大军事家并列，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老子的军事能力非同一般。甚至可以假想一下，如果老子和田穰苴调换一下，老子同样有可能做出相同的业绩。

老子来到东周雒邑做守藏史，不仅仅是为了谋一个铁饭碗，更希望能依托周王室这个政治平台，来寻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理想总是那样美好，现实总是那样残酷，甚至可以这么讲，老子来雒邑寻找政治平台，就像诸葛亮去投奔张绣一样荒谬。

周王室自东迁雒邑以来，诸侯争霸，周王室只能尴尬地站在一边当观众。诸侯有给面子的，扔给王室仁葱俩窝头，有不给面子的，一毛不拔。从综合国力上讲，东周只相当于陈、蔡这样的酱油国，连宋、卫、郑这样的中等诸侯都敢理直气壮地欺负王室。

老子在雒邑出任守藏史的三十多年中，所侍奉的君主是周景王姬贵（前544—前520年在位），且不说周景王有什么能耐，只说东周王室的经济窘迫，如果周公姬旦地下有知，一定会心酸落泪的。

堂堂周天子为了王室的生计，不得不厚着脸问诸侯国讨要财物，没少受诸侯奚落。有一次晋国不给天子脸面，气得周景王破口大骂晋国“数典而忘其祖”。在这种尴尬的历史环境中，东周王室已经自身难保，哪里还能给志向远大的老子提供政治平台？

虽然司马迁说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但隐居于野，不代表在政治上没有理想。何况司马迁的下一句话是“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如果老子自甘无名，又何必见东周衰落而亡去？历代高隐之士很多都是政治思想破灭而遁入荒山野林的，老子也不会例外。

既然东周无法给老子提供施政空间，老子为何不学孔子那样周游列国，以老子在学术界的大宗师地位，并非没有机会求得一飞冲天的机会。究其原因，于史无考，但我们可以猜测一下，诸侯无论大小，卿相位置早就被贵族公子哥占满了，哪还有老子的位置？利益集团一旦抱成团，就是水泼不进的铜墙铁壁，与其四处碰运气，不如留在雒邑等机会。

只是可惜老子整整守了四十年，坐看青丝变白发，丝毫看不到彼岸，希望慢慢变成了绝望，当人在绝望的时候，往往是人生大彻大悟的时候。老子此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五十而知天命”，黄土已经埋到脖子了，再恋栈于此，最终什么都得不到。

在政治上，老子已经注定无所作为，但在学术上，老子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或者说老子还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就是他需要一处安静的所在，把他关于“道”的腹稿整理出来，就是影响历史两千多年的伟大哲学经籍《道德经》。

据学者考证，老子离开雒邑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516年，而此时正是东周王室为了争权夺利厮杀最为惨烈的时期。周景王于公元前520年死后，三位王子，即姬朝、姬猛、姬匄互相撕咬，而晋国又深度介入周王室权力之争，雒邑血光冲天。

在此之前，雒邑虽处天下之中，但少见兵火，老子可以大隐隐于朝。而诸子争位后，雒邑变得极不安全，刀兵无情，难免玉石俱焚，老子可不想陪这几个公子哥殉葬。以老子的智慧，他当然不会留在雒邑等死，所以就有了道教史上著名的传奇——老子骑牛入函谷关，紫气西去，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传说。

说到老子骑牛入函谷关，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就是前函谷关令尹喜。此人的姓名、生卒年已不可考，西汉学者刘向说“关尹子名喜，号关尹子，或曰关令子”。尹喜的从政经历不甚清楚，但尹喜有一点和老子相同，就是都看破了世事红尘，有了隐于山野的打算。后人多知老子是伟大的哲学家，其实尹喜的哲学思想同样博大精深，而尹喜之所以能得“道”，是因为老子的点拨。

老子骑牛西行，应该是去寻找一处远离尘世喧嚣的深山野林，至于老子为什么去西方，原因不详，分析起来大致有两个：

一、西方只有秦国，经济相对落后，名山大川人迹罕至，很适合

老子隐居求道。

二、秦国内政相对平稳，名君辈出，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排除老子去秦国寻找发展机会。

从雒邑去秦国，就必须经过著名的函谷关，所以事先得到消息的尹喜就在关下截住了骑牛的老子，拜老子为师，云游至终南山下归隐。关于老子见尹喜，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史记·老子列传》记载，尹喜截住老子后，用尽各种手段，强迫老子写书，就是后来的《道德经》。

二、晋人葛洪《抱朴子》所说，老子 and 尹喜相遇的地点是在散关，强迫老子写《道德经》一卷。

除了以上两种说法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神奇的传说，认为尹喜是前一年（前517）就已经辞官隐居终南山，尹喜于某天夜观星象，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缓缓而来，尹喜认为有圣人将路过函谷关，所以提前一步回到函谷关，迎到了老子。

老子崇尚“道”，但有史可考的学生几乎没有，要是论影响力，孔子算半个，但老子与孔子所追求的道并不一致，所以孔子化鹤而去。失一孔子，得一尹喜，其实更值得老子高兴。尹喜名望不如孔子，但尹喜追求的是“天道”，符合老子的三观，所以老子很自然地就和尹喜走到了一起，并相伴终生。

甚至单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尹喜的历史贡献要远大于孔子吸引传播道家学说的贡献，因为从某种角度讲，没有尹喜，就没有《道德经》。《道德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丝毫不逊于《论语》。

至于老子的下落，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学界普遍认为是归隐终南山，并倾终生之力，将五千言《道

德经》付之青简。自此之后，江湖上只存在有关周守藏史老聃的神秘传说。

二、有人说老子骑青牛，携尹喜，背《道德经》，消失在流河之西的时空之中。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在过函谷关（或散关）与尹喜相会之后，继续向西游走，最终在河西某地飞升，应该就是根据“俱之流沙之西”而推测出来的。

三、《后汉书·襄楷传》记载，东汉末年就有传说，认为老子“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去印度参拜释迦牟尼做了和尚。

第三条几乎不可信，且不说老子和释迦牟尼同时代，以当时的信息传输能力，老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西天还有个佛祖。何况老子本身就是得道之神，他追求的天道与佛教格格不入，而佛、儒两家有关“人道”的研究倒有些接近。孔子不能放弃儒家而归入道家，老子又怎么可能放弃道家而归入佛家？

老子消失在历史的茫茫迷雾之中，对后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这给了后人对老子这位至圣先师以无尽的遐想。神话中许多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神仙，他们在真实的历史中许多都是“下落不明”的，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态：越神秘，越好奇。

在中国的诸子百家中，唯一被后世各种传说拜为神仙的，数来数去，也只有老子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太上老君。诸子封神，是孔子都没享受到的“待遇”，当然历代儒学信徒对孔子的造神运动也足以让历史叹为观止。

虽然道教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影响可能略逊于儒家思想，这可能和道家的出世情结有关，但老子从来没有宣扬过避世，相反，老子的用世之心是非常积极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道家思想的始祖是老子，但道教的一些理论杂

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就如同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儒教和儒家思想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中国的宗教起源相对较晚，老子也不会知道他死后，会被后世信教尊奉为围着个炉子炼丹的太上老君，因为老子更在意的是他的思想能否教化传世。不过老子也应该明白一点，哲学不是人人都有兴趣学的，“天道”也不是人人都能看懂的，不像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儒学比较通俗易懂。

《道德经》的相当篇幅也是在讲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为什么自汉武帝以后，历代皆以儒为尊，即使是道教盛行的时代也是如此，比如北魏、唐、北宋末期。前面讲过，道家着重讲“天道”，儒家着重讲“人道”，其实道家也讲“人道”，只不过道家的“人道”对执行人的自身修养要求过高。

只要能经通世务便能参透儒家的“人道”，而道家要求执行人“致虚极，守静笃”，达到一种空灵而清虚的状态，这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的。换句话说，儒家需要社会学家来治理社会，而道家则需要哲学家来治理社会，地球上又会有几个哲学家？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认为道德缺失，礼崩乐坏，应该拾起《论语》，重新黏合人心。《论语》自然可以治病救人，但人们是否可以打开身边已经落满灰尘的《道德经》，用《道德经》的力量整肃残局，收拾旧山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抛开那些玄而又玄的哲学理论，《道德经》中随处可见做人的大智慧，老子社会意义上的伟大，多半是指这一点，即教会后世身处红尘欲海的人们如何做人，下面挑几条著名的警言讲一下。

一、《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有志。”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就是老子讲的。为什么有些人表面上非常风光，最终仍难免失败的命运，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弱点和敌人的优点，当进不进，当退不退。

真正取得成功的人，往往是既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也就是孙子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人们常说真正的强者能战胜自己，这即是老子所说的“自胜者强”。人生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战胜敌人未必能战胜自己，但战胜自己的一定能战胜敌人。

二、《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不可否认的是，人性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私的，所以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成了许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而由此引发的人间悲剧数不胜数。老子质问那些热衷名利而失节的人们：名利与生命哪个更重要？生命与财产哪个更重要？许多人都会言不由衷地回答：生命更重要，实际上一旦陷入名利是非圈，不经历大苦大痛是不会大彻大悟的。

老子善意地警告那些人：过于贪婪必定会付出比你所得到的更多的人生代价！在这一章中，老子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人性真理：你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就会越多（多藏必厚亡），任何意义的得失总是成正比的，有人不信老子的箴言，结果都在现实中的铜墙铁壁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几乎没有例外。做人不要太贪心，不要既得陇，复望蜀，“知足不辱”，足以为后世贪婪者戒！

三、《道德经》第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

什么样的人在生活中最容易招致失败？答案是患得患失的人，即想得到，又怕失去，结果将什么也得不到，到头来空空如也。

老子所谓宠辱皆惊，主要还是指当事人对物质的态度过于自卑，对人生的严重不自信。

古代有个人拎着瓶子打酱油，结果不小心把瓶子打碎了，但他继续昂首前行。有人不解，问他酱油瓶子碎了，你怎么也不低头看一下？他的回答是：我看不看，瓶子都已经碎了，那我何必再看？

得到的一定是属于我的，失去的一定就不属于我，即所谓得不足喜，失不足忧，这是一种淡定的境界。老子提倡宠辱不惊，前提是戒绝贪欲，患得患失，担心被打击报复，是因为想得到太多的物质利益，在利益江湖上，没有谁是干净的。

老子劝告那些贪婪的人们，“及我无身（身即“欲望”），吾有何患”，什么都不奢求，平平淡淡做人，就不怕招来灾难（天灾除外）。只是老子的循循善诱，却唤不起古往今来的物质追求者们，利字当头，谁愿意放弃？所以悲剧不断发生，但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老子断言的伟大。

四、《道德经》第三十六章：“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这一条既是军事术语，类似于《孙子兵法·兵势篇》所说的“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诱敌原则，也是饱含人生哲理的警句。

人们都知道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实际上老子同样提出了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相对论”。大自然有日有月、有阴有晴，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取有夺，任何一种事物的兴起衰亡都是一个相对作用力的过程，这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对手无处不在，我们要时刻观察他们的表现，特别是那些笑里藏刀的对手。这些人在做有损于他人利益的

事情时，往往会制造出一些假象迷惑人们，所以人们要从反方向去理解对手的行为，不要轻易上当。还有一些人在经济生活中为了骗取不义之财，往往会大张旗鼓地搞假排场，骗取别人的信任，这就符合老子说的“将欲弱之，必故强之”。

人们经常会把哲学看得高深而神秘，其实哲学并非“玄而又玄”，在普通的生活中也时刻闪耀着哲学的光辉，老子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如果说《论语》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那么《道德经》就是一部人生百科全书，教会人们掌握斗争的哲学。从这个层面上讲，《道德经》之于普通人的意义，就相当于《孙子兵法》之于军事家的意义。

因为篇幅有限，老子的事情就讲到这里。

四五 春秋名嘴逸事

老话常讲，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在江湖上行走，少不了三朋五友的帮衬，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地球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政权统治的时期，所以在同时并存的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国家层面的交往，归根结底还是维护各自政权的利益，正如西方名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胳膊肘朝外的那叫内鬼叛徒。

春秋时代有国数百，大国三五，中国七八，小国数百，挤在北至长城、西至渭水、南至长江，东至大海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互相的官方往来多如牛毛，从《左传》记载的密密麻麻的大小盟会上就能看出这一点。

为国家外交服务的人员被称为什么？当然是外交官了，用现在的时尚语言说，就是名嘴。一部中国外交史洋洋洒洒三千年，诞生了许多一线名嘴，最有名的就是战国两大嘴苏秦和张仪。和战国的外交名嘴相比，春秋名嘴从知名度上要稍逊于苏张二嘴，但在精彩程度上却丝毫不让苏秦。

因为这一篇讲的是外交战线上的名嘴，所以教育战线上的名嘴孔子和哲学界的名嘴老子就不在此列，管子、孙子统统靠边站。接下来要出场的第一位春秋名嘴，他的名字叫烛之武，郑国大夫，在危难时刻拯救郑国于刀兵水火的第一功臣。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0年的九月，晋文公姬重耳和秦穆公嬴任好突然宣布组成晋秦联合兵团，高调讨伐实力相对弱小的郑国。姬重耳在争霸之初之所以拿郑国开刀祭旗，有两个原因：

一、当年姬重耳流浪江湖，逃到郑国避难，结果郑文公姬踀不把

落魄的姬重耳当盘菜，“弗礼”，理由是郑国经济实力有限，不堪接待各国流亡公子的重负。

二、晋国的战略定位是称霸天下，而晋国战略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新兴的楚国，而郑国此时正跟着楚庄王混江湖，甚至在城濮之战时，郑国把军队都交给了楚国指挥，激怒了姬重耳。再由于郑国夹在晋、楚之间，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所以晋国此次伐郑，就是要打掉楚国北上的桥头堡，并将郑国改造成晋国南下的军事基地。

至于秦穆公跟着凑热闹，秦国并不希望楚国北上，挤压秦国在东线的战略空间，晋秦战略目标一致，所以两国穿上了一条大裤衩子。晋军携城濮大胜之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杀到郑国都新郑以北的涵陵，秦军从南线抄到汜水之南，截断了楚国救援郑国的通道。

被困在城中的姬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以郑国的实力是根本有可能挺过晋秦超强度攻击的，难道就这样当亡国之君？如何才能退掉晋秦联军，姬跖想得头都大了。大夫佚之狐向姬跖推荐了一个人，说国君只要派此人出城，必能劝退秦军。秦军和郑国没有私仇，是有可能在平衡利弊的情况下撤军的，而晋侯姬重耳和郑有私仇，是没有任何劝退可能的。

烛之武在郑国的工作履历不详，但从他拒绝姬跖的理由来看，早年的烛之武没有受到姬跖的重用，所以对姬跖一通抱怨：“臣年轻的时候才能不及中人，现在老了，更一无用处，国君另寻高人吧。”

烛之武的表态差点没让姬跖哭出来，他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这个老家伙了，烛之武不出，奈郑亡何！姬跖只好低三下四地进行自我批评，说我狗眼看人低，当初没发现你的才能，这是寡人的过错。但话说回来，如果你不出手救郑，郑国完了，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姬跖的最后一句话说得非常在理，烛之武只不过对姬跖有些不满，但他对郑国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正如大诗人艾青所言：“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再说郑国真被晋国灭了，烛之武所有的既得利益都将化为乌有。所以于公于私，烛之武都必须出马，他没有任何选择。年迈的烛之武在城墙上系了一根粗绳子，顺着绳子缒出了城，蹑手蹑脚地钻进了秦伯嬴任好的中军大帐。

烛之武此来的目的，就是要从利益角度离间晋、秦之间的联盟关系，那首先就要站在秦国的立场上看问题。烛之武确实会说话，他并没有直接反对秦对郑用武，因为这容易激起嬴任好的反感，我凭什么要听你这个糟老头子的？烛之武问了嬴任好一个问题：“二国此来，我知郑将亡矣，但请问秦伯，郑与秦之间并不接壤，而灭郑之后，秦国能否越过晋国的领土而统治郑国？”

烛之武的言下之意很明确，秦国是在为姬重耳火中取栗，秦做晋的帮凶灭了郑，到头来好处都落在了姬重耳手上，你秦国什么也得不到。“邻之厚，君之薄也”，堂堂大秦国主给当年在你门下要过饭的姬重耳当打手马仔，脑袋被驴踢了吧？

这一段是讲秦为什么不能灭郑，无利不起早，傻瓜才会不拿工资给人干活。接下来，烛之武又给嬴任好分析了秦国如果这次放过郑国一马，能得到什么好处。

烛之武出城前应该是得到了郑文公给秦国的许诺，说只要秦国给郑国一条生路，郑国愿意充当秦国在东方的战略补给站，即东道主，相当于海外军事基地。“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郑国可以包下秦国日后在东线军事外交的财政支出。秦国的经济也不富裕，在灭郑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情况下，郑国提出这些丰厚的条件，嬴任好是动了心的。

以上这两招还不是最狠的，烛之武要想挑拨晋秦之间的关系，用了一个更狠的办法——嬴任好哪儿疼，他就往哪儿狠狠地戳。当年晋

惠公姬夷吾将嬴任好当猴耍来耍去，嬴任好在江湖上颜面尽失，嬴任好恨透了姬夷吾。虽然姬重耳为人和善，做事大气，但谁也无法保证姬重耳为了晋国利益再次戏耍秦国。

史籍上没有记载嬴任好听完烛之武这段话后是什么反应，但从结果上来看，嬴任好显然又想起了晋国的种种无耻之举，对晋国的好感被烛之武几句话扇得无影无踪。

烛之武最后警告嬴任好：郑国若存，还能在西线对晋国进行战略牵制。一旦晋灭郑，东线无忧，晋秦联盟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以姬重耳的野心，必然会挥师西向，灭掉秦国，到时你还能笑得出来吗？这就是唇亡齿寒的道理，晋献公姬诡诸怎么吃掉虞国的把戏，你老兄不会没听说过吧？

烛之武的口才和智慧，在这场游说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先分析，后许诺，再翻旧账，最后严重警告，层层推进，思路非常清晰，让嬴任好无话可说。

嬴任好大悦，幸亏烛之武给他指点迷津，否则真成了天下第一大傻子了。嬴任好决定放弃与晋国的军事同盟，改和郑国结盟，并留下精锐部队守卫郑国，防止姬重耳狗急跳墙。

听说嬴任好不够意思地溜了，姬重耳也没兴趣再玩下去了，以晋国的实力，真要硬拼郑国的话，不是没有获胜的希望。姬重耳拉嬴任好入伙，就是想让嬴任好替他背黑锅，现在黑锅自己跑了，晋国单独灭郑容易招骂，姬重耳也不是傻子。

《三国演义》有一个桥段，就是蜀汉江州都督李严凭借旧交，一封书信退掉魏新城太守孟达的十万重兵。不过这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烛之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硬生生把郑国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一张嘴退十万师，这才是真本事。

外交官是靠嘴吃饭的，生就一副三寸不烂之舌，巧如莲花。不管自己有理无理，这些嘴子都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把责任一股脑儿全推给对方，噎得别人无话可说，自己仿佛成了受害者。能把无理说成有理的名嘴，想来想去，除了晋国大夫吕省，想不出第二个。说起来好笑的是，配合吕省演戏的又是堪成春秋第一黄金配角的秦穆公嬴任好。

当年晋国内乱，公子姬夷吾在嬴任好的帮助下回国即位，并允许割河西之地予秦，结果姬夷吾食言，把嬴任好气得半死。嬴任好做人真够意思，在晋国发生严重饥荒的时候出粮救晋，但姬夷吾根本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等到秦国大饥，嬴任好向晋求粮，被冷冰冰地拒绝。

嬴任好大怒，在公元前645年，秦军大举伐晋，一战生擒姬夷吾，晋军惨败。嬴任好对姬夷吾已经仁至义尽，看到这个白眼狼，嬴任好就恨得咬牙切齿，准备杀掉姬夷吾，用他的人头祭祀上天。幸亏姬夷吾的姐姐是嬴任好的夫人，苦苦哀求，姬夷吾才保住小命，被嬴任好踢到黑屋子里反省，暂时没有放人的打算。

国不可一日无君，应该是在晋国统治集团的授意下，大夫吕省来到王城（今陕西大荔东），与秦国签订条约。晋国的条件是无条件释放国君姬夷吾，至于晋国向秦国付出了什么代价，史载不详，但可以肯定嬴任好肯定会利用这次机会狠宰晋国一刀的。

从史籍内容上看，嬴任好并没有答应立刻放人，想再缓一缓，晋国方面同意了。但这里有个问题，姬夷吾被关禁闭，生活条件可能比较差，吕省在签约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和嬴任好纠缠，目的是让秦国保证姬夷吾的人身安全。

话题是嬴任好挑起的，他问吕省，晋国对于国君被俘有什么看法？嬴任好在试探吕省的口风，因为吕省的回答将影响秦国对姬夷吾

的态度，吕省也深知这一点。

嬴任好挖了一个大坑，请吕省往坑里跳，吕省如果回答国人对姬夷吾无动于衷，那等于承认姬夷吾对晋国并不重要，这岂不是自绝门户？如果回答国人希望姬夷吾早日归国，又等于增加了姬夷吾作为人质之于秦国的重要性，嬴任好可以挟此提出更苛刻的放人条件，这是晋国无法承受的。

吕省很聪明地把晋人的态度一分为二，即底层百姓和官僚士大夫阶层，巧妙地避开了嬴任好放的冷箭。吕省借晋国的普通百姓之口警告嬴任好最好不要打姬夷吾的主意，说晋国人民对国君被俘备感耻辱，永远不会忘记秦国对晋国的这次污辱，一定要以牙还牙。晋人已经准备好了向朝廷多交赋税，帮助晋国练兵复仇，甚至宁可向夷狄低头求助，也要尽全国之力与秦国血战到底。最让嬴任好心惊的是吕省其中的一句话：“我们已经做到了扶立新君的准备，晋侯之子姬圉随时准备即位。”

姬夷吾对嬴任好来说是张好牌，但前提是姬夷吾必须保住国君的身份，如果晋人改立姬圉为君，姬夷吾之于秦国的利用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这是嬴任好最担心的。不过对嬴任好有利的是，姬圉是姬夷吾的亲生子，即使姬圉即位，作为晋侯之父，嬴任好总能在姬夷吾身上榨出点油水的。

嬴任好为人太不厚黑，太讲江湖道义，他大可以先让姬圉即位，然后继续承认姬夷吾的晋侯身份，晋国一国两主，非乱不可，嬴任好就能趁火打劫。而这一点，恰恰是吕省最担心的，所以吕省在赏了嬴任好一通大棒子后，又扔给他一颗甜枣。

吕省提到了晋国官僚士大夫阶层对此事的看法，说晋国上层非常感激秦国不杀国君的做法，并承认姬夷吾当初对秦国的恩将仇报有失厚道，“我知罪矣”。晋国向嬴任好做出承诺，只要秦能安然无恙地放

姬夷吾回国，晋国就愿意尊秦为江湖霸主，“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称霸天下，对嬴任好来说是不可能拒绝的超级诱惑，而晋国又是秦国争霸的主要对手。如果晋向秦服软，则秦可以整合晋之力，集中力量对付北向争霸的楚。

任何一个政权（A国）都希望对立政权的统治集团（B国）的外交风格偏软，这有利于A维护本国在B国的利益，没人喜欢对方的强硬派。晋国上层放下身段向秦国服软，一来照顾了嬴任好之前被姬夷吾几次糟蹋的面子，二来让晋国欠了秦国一个天大的人情，嬴任好稳赚不赔。

嬴任好不想把晋国逼得走投无路，一旦晋与楚联合，将是秦的灭顶之灾。现在晋国主动给秦国送来台阶，嬴任好当然不能不识好歹，顺杆子往下滑是最明智的选择。嬴任好满脸堆笑，告诉吕省：“正合我意！”

通过与吕省的对话，嬴任好基本摸清了晋国各阶层对秦软禁姬夷吾的态度，而且也基本排除了晋人另立姬圉为君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嬴任好自然要养好血统最高贵的俘虏姬夷吾，在吕省离开之后，他立刻提高了姬夷吾的待遇。

之前姬夷吾可能住在臭气熏天的牛棚里，现在嬴任好把姬夷吾安排在五星级大酒店里，享受七牢的饮食待遇。七牢是指每一牢都有一头猪、一头羊、一斗牛，保证姬夷吾吃得好，喝得好，睡得稳，不尿炕。

在当年的十一月，吃得满嘴流油的姬夷吾拍拍鼓鼓的肚皮，在秦人的护送下，安然回到晋国，继续折腾。

春秋没有职业外交官，所以各国大夫经常担任出访大使，到处混饭吃，还有当朝宰相主管外交事务的，比如千古一相管仲和晏婴。管

仲曾经和楚国大夫屈完有过一次外交博弈，在前文中略有提及，下面讲讲另外一位名相晏婴的无敌嘴功。

管仲虽然铁齿铜牙能说会道，但他不以外交家著名，在外交圈中混是他的副业，而晏婴除了政治家的身份，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交家，经常奉齐侯之命出使列国，在国际外交圈中享有鼎鼎盛名。

对于晏婴的无敌嘴功，想必楚灵王熊虔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他曾经亲身领教过晏婴的厉害。晏婴上嘴唇碰下嘴唇，就把熊虔羞臊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过这不能怪晏婴仗嘴欺人，完全是熊虔故意给晏婴难堪，被晏婴巧妙还击而已。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或者晏婴曾经欠过熊虔五毛钱没还，当听说大名鼎鼎的晏婴要来楚国访问时，熊虔决定当众戏耍晏婴，这就引出了春秋外交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嘴战。

众所周知，晏婴身材短小，号称春秋版曹操，熊虔就在这方面打坏主意。以晏婴的政治身份，楚国应该以正卿礼节迎接齐国宰相，楚王宫的大门应该对晏婴开放。熊虔却给门卫下令，关掉正门，仅开放正门旁边的一道小门，而这道小门的高度正好能容纳晏婴进来。

傻瓜都看得出来这是楚王有意污辱晏婴，嘲笑晏婴是个矮冬瓜，晏婴堂堂齐相，江湖上有名有腕的，哪能受这种污辱？晏婴当即就回击：“我听人说过，出使狗国的时候，狗国会打开狗门放人进去，楚国是天下大国，怎么也有狗门？”

这话实在够狠，熊虔讽刺晏婴是个矮子，至少还把晏婴当人看，晏婴有种，直接把熊虔贬成了狗。不过此时熊虔还在殿上等着，而晏婴“狗论”的直接受害者是楚国礼宾人员，这些人红着脸打开了正门，请晏婴进来。

楚人突然给晏婴一个下马威，让晏婴警惕起来，熊虔不知道还会

捣鼓什么下流的花花肠子出来。果然等晏婴刚到殿下站稳，熊虔就高高在上地给晏婴泼了一桶洗脚水：“齐国无人耶！怎么会派你出使楚国？”

这句话是很污辱人的，熊虔是说堂堂大齐居然找不出一个身高合乎国际规范的使节，却让一个“三寸丁谷树皮”滥竽充数，这是对楚国的不尊重。晏婴笑了，他慢条斯理地告诉熊虔，齐国为什么派他出使楚国的原因。因为我们齐国有外交政策，只有贤明之士才有资格出访贤主，愚钝不肖之人只能出访愚钝不肖之主。因为我是个蠢人，所以齐侯就派我出使楚国了。

熊虔终于知道“自取其辱”四个字是怎么写的了，本欲辱人，却为人所辱。可以想象得到，刚才还自以为得计的熊虔，脸刷地一下就绿了。因为晏婴身材短小，熊虔从没把这个矮小子放在眼里，哪承想晏婴的嘴这么恶毒。

按照熊虔事先准备的剧本安排，接下来要举行招待宴会。晏婴正喝得五迷三道的时候，突然有两个楚国官员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犯人从殿前经过，熊虔装模作样地问这个犯人是干什么的，楚吏说这是一个齐国人，因为盗窃被抓。熊虔放下酒杯，不怀好意地问晏婴：“齐国人是不是都善于飞檐走壁偷东西？”

如果说前两次的戏弄只是针对晏婴个人，熊虔这次则是针对整个齐国，这是非常没有外交礼貌的。就算这个犯人真是齐国人，也不能说明所有的齐人都这样，楚人有偷盗者，就能说明楚人都有飞墙大盗？

对于熊虔放出的这一炮，晏婴很快就进行了反击，也引出了一个著名的八字成语：“在南为橘，在北为枳”。晏婴慢悠悠地回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行的风俗人情，以及道德建设标准，这个齐人之所以在齐国没有盗窃记录，反而在楚国练摊，原因是楚的风水有适宜盗窃

的土壤。

晏婴很巧妙地把这颗手雷扔了回去，“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熊虔怀里抱着这颗即将引爆的手雷，表情尴尬不已。熊虔要晏婴反思为什么齐人多盗贼，晏婴则要熊虔反思为什么好人到了楚国会做盗贼，一来一往，晏婴毫发无损，熊虔则被描成了大花脸。

熊虔步步紧逼，晏婴见招拆招，耳光一次比一次响亮，抽得熊虔眼冒金星找不着北。熊虔再没有力气和晏婴玩下去了，主动摇起小白旗认输：“我真是没事找抽型的，调戏圣人，自取其辱。”

晏婴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嘴，敢和晏婴硬碰硬的，没有一个不头破血流的，在楚王熊虔被打败之后，还有一位大王败在了晏婴手上，就是吴王阖闾。《晏子春秋》记载这位吴王是夫差，但晏婴卒于公元前500年，而夫差于公元前495年即位，所以这位吴王应该是阖闾。

不知道阖闾的脑袋断了哪根筋，当听说晏婴要来时，阖闾突然决定调戏晏婴一下。事情发生在吴宫大殿前，晏婴以齐国使者的身份等候吴王传唤入宫。没想到吴国礼宾人员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天子请大夫入内相见。”

外交常识：普天之下，只有周王才有资格称为天子。吴王虽然对外自称大王，但在周朝爵位体系只是区区子爵，上面还有公、侯、伯三等爵位，更遑论至尊至贵的天子了。

阖闾来这么一出，纯粹是想出晏婴的丑，甚至在外交上给齐国制造大麻烦，只要晏婴以天子礼对待阖闾，就是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晏婴何等精明的人物，阖闾这样的小把戏怎么可能让晏婴上钩？他自有对付的办法。

吴人高唱：“天子请见。”晏婴哭丧着脸，再唱“天子请见”，晏婴

差点没哭出来，好像他是来吴国吊唁吴王僚的。吴人不解，问夫子何故？晏婴号啕痛哭：“我奉齐侯之命来见吴王，没想到我老眼昏花，走错了路，跑到雒邑去了，这可如何是好。”

.....

想必闾閭已经在殿上看到晏婴的精彩表演了，以闾閭的本事，当然能看出晏婴这是在演戏给他看，晏婴闭着眼也不可能走错路。闾閭知道拿晏婴没办法了，只好放下臭架子，让人传：“吴王请见。”这才把尴尬掩饰过去。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理：千万不要轻视名嘴，名嘴杀人不用刀，鼓动巧簧之舌，就能把对手打得找不着北。做人还是低调些好，不要没事招惹那些口吐莲花的大仙们，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

四六 三家分晋始末

关于春秋时代的下限，在《序言》中曾经提到过，虽然分法有很多，但最主流的一种分法还是以发生于公元前403年的赵、韩、魏三家分晋为春秋与战国的年代界限。

这种分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一定问题。众所周知，三国时代正式出现的标志是公元220年，魏王曹丕在洛阳废汉称帝，随后刘备、孙权相继称帝。

问题在于，有谁会看没有吕布、关羽、孙策、周瑜、曹操、郭嘉，没有宛城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的三国？这些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事件都发生于公元220年之前。

三国鼎立的真正确立点是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曹操从此再无南下，孙权守住江东，刘备据荆图益，终成三分天下。同理，虽然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颁诏天下，正式承认赵、魏、韩三家诸侯，但之所以是这三家瓜分晋国，原因还在于公元前458年那场著名的晋阳之战。

《春秋左氏传》的最后一年是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但左丘明在正文结束之后突然插了一段四年后的后话，讲的就是晋阳之战的起因，可见《左传》实际上也认为晋阳之战是春秋的下限。

在不可思议的晋阳之战后，晋国第一大卿知氏的势力被赵、魏、韩三家瓜分，标志着曾经威震天下的晋国统治彻底崩溃，也意味着轰轰烈烈的战国七雄时代缓缓朝着历史的近处走来。

关于赵、魏、韩三家分晋并成为战国七雄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其实战国七雄本有可能成为战国五雄，赵、魏、韩三雄差点成为

历史上的酱油客。晋国的百年世家知氏本来最有可能取代晋国单独称雄，结果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实力最强的知氏家族突遭经典逆转，大好形势急转直下，笑到最后的是赵、魏、韩，知氏却成了悲摧的酱油客。

先把与晋阳之战有关的各方势力简要地介绍一下，也就是常说的晋国六卿。

知氏，首任宗主是荀首，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荀首出任下军大夫。因荀首的封地在智（今山西永济北），是第一任知伯，史称知庄子。现任宗主是荀瑶，也就是待豫让如国土的那位知伯（即知襄子），荀瑶是荀首的六世孙。

中行氏，首任宗主是荀林父（荀首之兄），邲之战中的晋军最高统帅。因为荀林父主持的晋中军后来被改为中行，所以以中行为氏，荀林父史称中行桓子。最后一任宗主是荀寅，即中行文子。

范氏，首任宗主是士会，邲之战中任晋上军主将，士会是士^芳的孙子。士会本来受封于随，后改封于范，所以世称范氏。最后一任宗主是范吉射，晋国名相士鞅之子。

魏氏，首任宗主是魏绛，魏绛即晋文公五贤臣之一的魏犇之孙。魏氏本来封于毕，魏绛时改封于魏，所以称为魏氏。时任宗主是魏驹，也称魏桓子。闲插一句，后来为报荀瑶国土之恩的豫让和魏驹是同宗兄弟。

赵氏，堪称晋国第一大卿，首任宗主便是文公五贤臣之一的赵衰，执政晋国二十年的赵盾即赵衰之子。现任宗主是赵毋恤，也称赵襄子，即被豫让到处寻仇的那位赵家大爷。赵氏世系是（皆为父子）：赵成子赵衰——赵宣子赵盾——赵庄子赵朔——赵文子赵武——赵景叔赵成（未为宗主）——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毋恤。

韩氏，正式的首任宗主是韩虎子，虽然韩氏就封很早，但政治地位较低，转折点是韩献子韩厥被赵衰收养，后来平步青云，成为晋国的执政大卿，标志韩氏正式成为晋国的顶尖豪门。时任宗主是韩康子韩虎。

除此之外，还有栾氏、先氏、原氏等一等大族，但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之下，这些曾经威赫一时的大族都无奈地躺在了历史长河的河床上，浮在河面上的，只有以上提到的六家。

之所以是这六家大卿主宰晋国政坛，一个重大标志是，从晋悼公3年至晋定公3年的五十八时间里，六家大卿轮流执政。

知氏：荀瑩，执政七年，从公元前566年至公元前560年。

中行氏：荀偃，执政七年，从公元前560年至公元前554年。

范氏：士匄，执政七年，从公元前554年至公元前548年。

赵氏：赵武，执政八年，从公元前548年至公元前541年。

韩氏：韩起，执政二十八年，从公元前541年至公元前514年。

魏氏：魏舒，执政六年，从公元前514年至公元前509年。

除了韩宣子韩起执政长达不可思议的二十八年之外，其他诸家执政均在七年左右，大家都有肉吃，保证了各自家族在一定时间内的权力垄断。

按不成文的规定，某家的执政期结束后必须让位于其他家族。魏舒死后，由范献子士鞅执政九年（前509—前501），但自知氏宗主荀跖执政之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荀跖执政九年（前501—前493）之后，由著名的赵简子赵鞅接位，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辉煌执政生涯。赵鞅在赵氏开国立基过程中

的作用极为重要，是他夯实了赵氏在晋国的独特地位，相当于西晋王朝的实际创建者司马懿。

赵鞅于公元前475年去世之后，晋国大卿的位子应该出自中行、韩、魏三家。但接替赵鞅执政的，依然出自知家，就是晋国最后一位不是出自赵、魏、韩三家的执政者——大名鼎鼎的知伯知瑶。

后人皆知赵、魏、韩三家分晋，但与其说三家分晋，不如说是三家分知。当历史的滚滚车轮碾过公元前6世纪的黄尘古道时，曾经威赫天下数百年之久的晋国早已经名存实亡，公族权力被知瑶牢牢控制。如果不是知瑶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正如上面所讲，战国将会出现五雄：秦、楚、齐、燕、知。

知瑶本有机会改写历史，只是让他本人意外的是，他及他家族的命运却被历史轻飘飘地翻了过去，从此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之中。知氏被三家瓜分之后，后人最为可惜的并不是知瑶，而是他那位本来可以做司马懿的祖父荀跖。

在晋国知氏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空前的政治危机，即公元前533年六月，晋下军佐荀盈在赴齐国迎娶齐国宗女后，在返回晋国时卒于戏阳（今河南内黄）。

此时的晋侯姬彪（晋平公）正在饮酒作乐，荀盈暴死的噩耗传到晋宫，姬彪兴奋得大呼小叫。姬彪之前和荀盈有些过节，打算趁荀盈之死，废掉自己横竖看不顺眼的知氏。

幸亏晋国的厨师长屠蒯替知氏说了几句公道话，姬彪这才取消废黜知氏的恶念，当年八月，封荀盈之子荀跖袭父位为晋下军佐。知氏这才转危为安，驶出险石林立的小河滩，从此在千里望不尽烟波的大江中自由航行。

荀跖为人沉默寡言，但并非没有主见，在他执政的九年时间里，

他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赵简子赵鞅扛住了范氏和中行氏的进攻。赵鞅对荀跖的拔刀相助感激涕零，在赵鞅于公元前493年执政之后，对知氏多加照顾，荀跖的儿子荀甲也在赵鞅的内阁中担任卿士，继续保持知氏在晋国政坛的高层地位。

公元前475年，赵鞅死后，晋国执政的位子落在了荀甲之子知瑶（应该称为荀瑶，为行文方便，以下皆称知瑶）手上，这应该和知氏与赵鞅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有关。

除了晋国执政大卿需要换人之外，知氏家族内部也面临着父死子继的问题，荀甲作为知氏宗主，有资格选择一个儿子做知氏的少东家。荀甲有两个儿子：嫡长子知瑶，庶次子知宵。按宗族礼法制度，荀甲没有任何意外的准备立知瑶为宗主，但遭到了与荀甲同族的大夫知果的强烈反对。

知果劝荀甲放弃知瑶为嗣，改立为人贪残的次子知宵，荀甲对此非常不解，知宵是典型的花花大少，而且长得就不像个好人，立他为嗣，岂不是要灭知氏百年宗族？

知果驳斥荀甲的观点：“知宵贪残，但不过是个寻花问柳的恶少，而知瑶为人美须髯，性贤明，又擅弓马、辩言辞，遇事明断，几乎是全才。但知瑶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面善心黑，别人一旦触及他的底线，他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知果在最后警告荀甲：“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很可惜，知果的先见之言被荀甲当成了耳旁风，荀甲甚至有理由怀疑知果居心不良，有篡位的野心，自然也就没有听知果的。

知果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误，既然荀甲不听良言，那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再踩在知氏的这条破船上一起沉到河里喂鱼，知果立刻带着自己的族人办理了脱离知氏家族的手续，改为辅氏，以避知瑶之祸。

知瑶并没有看错知瑶，知瑶万般都好，但就是人品太差，特别是恃强凌弱，这是犯官场大忌。知瑶从小生长的环境非常优越，没有经历过大苦大难，他对官场人生的理解就是一句话：权大一级压死人，只要自己混得好，就有资格欺侮人。

最早受知瑶欺侮的，是赵简子赵鞅的太子赵毋恤。按道理讲，赵鞅有恩于知氏，知瑶应该善待赵毋恤，而且赵毋恤将来铁定要成为赵氏宗主，搞好与赵氏的关系，对知氏在官场上的发展至关重要，可惜知瑶并没有看透这一层利害关系。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64年，知瑶为了在国际上给自己挣脸面，对南边的郑国发起了超强度的武装进攻。知瑶是晋国执政，作为晋国的二号人物，赵简子赵鞅要给足执政官面子，出兵相助，因为赵鞅身染重疾，只好派太子赵毋恤代父出征。

知瑶为什么讨厌赵毋恤，史载不详，但知瑶应该看在赵鞅的面子上，没有为难赵毋恤，而这位晋国执政大人却狂妄得简直无以复加。在一次军前酒会上，知瑶灌了一肚子猫尿，大脑不听使唤的知瑶开始强行劝赵毋恤喝酒，赵毋恤稍有不满，知瑶甚至举起酒杯之类的东西去砸赵毋恤。

赵毋恤是赵家的太子爷，身份同样贵重，在公开场合受这样的污辱，赵氏家臣们对知瑶的不知轻重极为不满，义愤填膺地要杀掉知瑶，替赵太子雪耻。

赵毋恤当然恨知瑶不给他面子，但此时是不能动晋国执政大臣的，否则会导致晋国目前相对平衡的权力格局的崩溃，这对赵氏来说是很利的。赵毋恤面色平静地告诉家臣们：“家主（赵鞅）之所以立我为赵氏嗣，就是因为我能忍！”

这句话应该是当着知瑶的面说的，所以这自然被知瑶视为赵毋恤对自己的挑衅。等到打败郑国，“取九邑”，回到绛都后，知瑶就跑到

赵鞅面前说赵毋恤的坏话，甚至极为无理地干涉赵氏家政，要求赵鞅废掉赵毋恤。赵鞅当然没听知瑶的胡说八道，毋恤是他最优秀的儿子，赵家的香火全指望着毋恤，傻瓜才会听知瑶的。

如果说赵毋恤之前对知瑶强行灌酒还只是心存不满的话，但知瑶这次要砸掉赵毋恤的饭碗，算是彻底得罪了赵毋恤。“毋恤由此怨知伯”，此次知、赵交恶，打下了十二年后知赵晋阳之战，并导致三家分晋的伏笔。

除了赵毋恤之外，另一家大族的宗主韩康子韩虎也是知瑶狂妄凌人的受害者。按《国语·晋语九》的说法，知瑶欺侮韩虎是在伐郑取九邑之后，具体原因不详，同时受辱的还有韩虎家臣段规。但《韩非子·十过篇》说是知瑶联合赵、魏、韩三家灭掉范氏、中行氏，瓜分其地之后的数年。

知氏确实参与了灭范与中行氏的战争，但知、赵、韩、魏联盟的盟主是赵简子赵鞅，何况当时在位的知氏家主是知瑶的祖父荀跖。公元前497年，魏襄子魏曼多和范昭子范吉射有私仇，二人已经极不相容，魏曼多联合荀跖、韩简子韩不信等人密谋废掉范吉射，改立范氏族人范皋夷。

当年十一月，荀跖联合韩不信、魏曼多，并与晋定公姬午结成小团伙，共同进攻范氏与中行氏。七七八八之后，势力稍显单薄的范氏与中行氏根本架不住这群杀红了眼的虎狼，范氏宗主范吉射和中行氏宗主荀寅被晋人打跑，逃到朝歌避难。

范氏和中行氏在晋国的失势，引发了一场国际上轰轰烈烈的营救范、中行的外交事件。春秋三大名君鲁定公姬宋、齐景公姜杵臼、卫灵公姬元，再加上屡被晋欺侮的郑声公姬胜，四国非常高调地组成反晋联盟，声言必救范氏与中行氏。

在反晋四国中，齐国和卫国闹得最欢，一面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

粮草，一面勾结晋国内部的范氏和中行氏的党羽，比如赵氏的别支邯郸氏，上蹿下跳，好不威风。但问题是晋国是百年大国，实力远强于齐、卫，任凭姜杵臼和姬元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也奈何晋人不得。最终，范氏和中行氏被知、赵、韩、魏联合吃掉，原来的晋国六卿格局，变成了四卿格局。

韩非子说知瑶与赵国等盟友灭范与中行氏，应该指的是公元前458年，四个赢家瓜分了原来属于范氏和中行氏的封地。在这场内部火并中，知瑶并没有出过什么大力，但因为知氏实力最强，所以分到的赃款最多。发了横财的知瑶胃口越来越大，他开始插手晋公室的君位继承问题。

因为晋出公姬凿对四家灭范、中行氏的行为极为不满，准备联合齐国和鲁国，讨伐不把晋公室当盘菜的四家大族。四卿虽然各有利益诉求，但大敌当前，他们还是组成了反晋联盟，将雄心万丈的姬凿踢出晋国，轰到齐国当寓公去了。

随后不久，又是由知瑶出面，改立晋昭公的曾孙姬骄为晋侯，就是晋哀公。此时的晋国，大局已完全被知瑶控制，《史记·晋世家》云：“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

知瑶作为官二代，人生中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挫折，事业顺风顺水，这在相当程度上吊起了知瑶的胃口。在免费得到了第一块蛋糕后，知瑶还想再得到更大的第二块蛋糕。

知瑶首先向韩虎提出了领土要求，韩虎手上也没多少闲地，当然不会割己肉以啖人，准备拒绝知瑶的无理要求，却被家臣段规劝住了。段规给韩虎分析了知瑶的为人：“好利而骜愎。彼来请地而弗与，则移兵于韩必矣。”如果韩氏拒绝知瑶，以知瑶的狂暴性格，必然发兵攻韩，韩弱而知强，胜负不问可知。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养肥知瑶的胃口，让知瑶去继续搜刮赵与魏的封地，赵与魏必不予地，知瑶必攻赵、魏，则韩可以观三家之变，从中渔利。

韩虎听进了段规的建议，把万家之县送给了知瑶，韩虎的退让果然让知瑶的自信心极度暴发。随后知瑶又向赵鞅要地，本来赵鞅也不是打算给知瑶面子的，家臣赵葭和段规一样狡猾，说韩氏给了地，如果我们不给，知瑶就会进攻我们，我们不能给韩虎当替死鬼。赵鞅暂时不想得罪知瑶，也给了知瑶一个万家之县。

既得陇、复望蜀，知瑶的胃口已经收不住了，没过多久，他又向赵氏提出了割让蔺（旧史多作“蔡”，误，地在今山西离石西）和皋狼（离石西北）的要求。此时的赵家宗主是赵毋恤，以赵毋恤的性格，加上知瑶曾经羞辱过赵毋恤，他岂肯当这个冤大头，当场拒绝了知瑶，弄得知瑶好没面子。

知瑶之所以连续向赵索地，主要是考虑到赵在三卿中实力最强，是知氏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知瑶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赵毋恤给地，则赵氏实力必然减弱，再徐图之；如果赵毋恤不给地，正好给了知瑶一个灭赵的借口，灭赵，再图韩、魏，最终统一晋国，实现代晋大业。

对于赵毋恤来说，他和知瑶已经闹翻了脸，给不给地，知瑶都不会放过自己。关于这一点，《战国策·赵策一》说得很清楚：“夫知伯之为人，阳亲而阴疏，三使韩、魏而寡人费与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与其不停地让地求和，不如赌一把大的。赵毋恤也知道赵氏与知氏的实力差距太大，他对能否战胜知瑶没有多少信心。

赵毋恤问家臣张孟谈有何计以自保，张孟谈只说了一句话：“退保晋阳。”理由是晋阳兵精甲足，有精铜高墙，府库充足，足以对付知瑶的军队。眼下的形势非常清楚，无论赵割不割地，知瑶对赵氏的

军事形势已经不可避免。知氏强而赵氏弱，赵毋恤如果能死守住晋阳，以待时机之变，未必就没有可能逆转取胜。

赵毋恤拒绝割地，果然激怒了脾气暴涨的知瑶。公元前455年，晋国头号大军阀知瑶联合韩、魏二家之兵北上进攻晋阳，对不听话的赵氏军事集团进行毁灭性打击。

如果知瑶灭赵，而知氏统一晋国的进程会大步提前，至于韩、魏为何跟着知瑶进攻赵氏？原因也很简单，韩虎和魏驹细胳膊拧不过粗大腿，韩、魏不听知瑶的，知瑶就首先灭掉比赵氏更弱的他们。与其如此，不如先让赵氏当炮灰，他们多活一天算一天。

韩、魏和知瑶本就不是一路人，此次与知氏联兵是被逼无奈才上了贼船，从各自利益考虑，韩虎和魏驹是绝不希望赵氏被知氏灭掉的。当初知瑶向魏索地，魏驹不想割地，家臣任章说得很清楚：只有割地给知瑶，才能长其骄恃之心，同时逼迫赵、韩、魏组成抗知联盟。韩魏虽然表面上与赵为敌，实际上他们是出工不出力的，甚至在暗中与赵毋恤勾勾搭搭。

韩虎和魏驹对知瑶的三心二意，知瑶竟然毫无察觉，他还在做着灭赵之后再兼并韩、魏的美梦。当初知瑶调戏韩虎和段规时，他的族兄知伯国就劝过他不要到处得罪人，“蝼蚁之毒，尚能害人，何况韩虎这样的实力派”。知瑶不但听不进去任何良言，反而极度狂妄地表示：只有我向别人发难的资格，没有别人向我发难的资格。

知瑶坚信这个世界是由实力物质组成的，谁的拳头硬谁代表着真理，即使没有韩、魏的支持，仅凭知氏一家的兵力，也绝对有能力把不听话的赵毋恤踢出由知瑶主宰的这个星球。

知瑶还是低估了赵毋恤的抵抗能力，赵毋恤依靠晋阳城的高墙深沟、粮秣精铜，任凭知家军连扑带咬三个月，晋阳城纹丝不动。知瑶虽然暂时没有攻下晋阳，但时间站在他这一边，因为他有足够的后勤

粮草运输保证自己在前线的供应，而赵毋恤在晋阳城中的粮草却是有限的，吃一天就少一天。

赵家军的作战意志不用怀疑，即使知瑶掘开汾河水浇灌晋阳，赵家军也咬牙挺了过来，但没有粮草，铁打的身躯也是坚持不下去的。晋阳城在交战之前的粮食储备应该是惊人的，至少可以保持一年之需，但知瑶已经铁了心要饿死赵毋恤，不見到赵毋恤饿殍的尸体，知瑶是不会退兵的。

关于赵毋恤在知瑶的饥饿战中到底挺了多久，各史说法不一。《战国策·赵策一》说赵毋恤坚持了整整三年，《史记·赵世家》则说是知家军包围了晋阳一年后才放水淹城。从字面上看，《赵策》的说法更为可靠，晋阳在知瑶的围攻下奇迹般地坚持了三年，真不知道赵毋恤是怎么度过这三年的。

当初赵简子赵鞅派家臣董安于守晋阳时，就是把晋阳当成赵氏的战略根据地来经营的，所以储备了上限可以支撑三年的大量粮草，没想到果然派上了用场。当赵家班人马在晋阳度过第三个新年时，城中已经是一片破败景象，粮草基本吃光，不用知瑶出兵攻城，赵家军已经倒死了一大片，史称“财食将尽，士卒病羸”。

在围城之初，对抵抗知瑶最有信心的是赵毋恤，但在三年之后，最先提出向知瑶认输的，还是赵毋恤。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心理上，赵毋恤都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他亲口承认：“粮食匱，城力尽，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

从保全晋阳城中士庶百姓的角度考虑，早投降早安生。但对于晋国的百年大族赵氏来说，一旦投降，赵氏的下场比范氏、中行氏还不如。因为就凭知瑶褊狭刚狠的性格，曾经得罪过知瑶的赵毋恤要是落入知瑶手上，是断然没有活路的。

在知瑶的强力包围下，赵毋恤已经看不到任何翻盘的希望，赵氏

家臣张孟谈却笑了，他嘲笑赵毋恤在看到知瑶致命软肋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刺出致命的那一剑。张孟谈所谓的知氏软肋，就是知氏盟军韩氏与魏氏的态度。

上面讲过，韩虎和魏驹是被知瑶胁迫着才参加对赵氏的围攻的，这一点就注定了韩魏二家是极有可能被赵氏说服反水的。只有赵氏活下来，韩、魏才同样可以活下来，否则大家一起完蛋。赤壁之战时，鲁肃坚决要求孙刘联盟抗曹，也是这个道理。

形势果如张孟谈分析的那样，韩虎、魏驹早就盼着赵毋恤派人与他们密洽反抗知瑶的大事。张孟谈亲自溜下晋阳城，蹑手蹑脚地钻进韩虎的大帐，先质问韩、魏为何助知为虐，赵氏被灭，下一个就是你们这俩傻瓜。韩、魏当然知道这一点，他们急需要做的是与赵氏约好日期，然后三家里应外合，灭掉知瑶，三家共分晋之天下。

张孟谈回城的当天晚上，赵、韩、魏三国联盟就已经做好了剿灭知氏的一切准备。赵毋恤派出一队精锐之兵，趁着茫茫夜色，溜到城外的汾水大堤上，还没等守堤的知军官吏叫出声，几十颗人头就已落地。

张孟谈的计策并不复杂，就是决水倒灌，利用知瑶挖好的坑，请知瑶跳进坑里。自古道水火无情，知瑶只看到了水的利己性，却没有看到同样一条河也有被敌人利用的可能性，当汾河的水势掌握在赵毋恤手中时，知瑶的狂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之前的汾河决水时，因为在城中有较高的地势，所以赵氏军队并没有受到大水多少影响。而当赵毋恤对城外放水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城外地势低平，没有建筑物抵挡汹涌而来的大水，知家军很快就被大水冲得七零八落，“知伯军救水而乱”。

知瑶可能已经意识到水权的丧失，但已经晚了。被大水冲得头昏脑涨的知瑶还没有擦干身上的水，就发现被困在晋阳三年的赵家军已

经呐喊着从城中杀了出来，带头的是赵家班主赵毋恤，“襄子将卒犯其前”。

这是赵毋恤对抗知瑶的最后一次机会，赵家军几乎是拼尽了最后一口力气，冲进了遍地是水的阵中，和已经溃不成军的知家军缠斗在一起。对知瑶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病羸”的赵家军，而是之前三年一直在晋阳城下养精蓄锐的韩、魏两支军队。

如果韩、魏两军站在知瑶这一边，赵毋恤必死无疑，但韩虎和魏驹现在最想做的就是亲手将知瑶送上西天。知家军本来实力强劲，但被大水冲乱，同时又被赵毋恤的哀兵捅了一刀，基本上没什么抵抗力了。

韩魏二军捡了一个现成便宜，“翼而击之”，韩虎攻知之左，魏驹攻知之右。再加上赵军，三支对知瑶怀有深仇大恨的军队在历史老人的见证下，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奇迹大逆转，最有可能代晋自立的知氏一朝覆灭，狂妄自信到极点的知瑶也死在乱军之中。

知氏的灭亡，意味着原来属于知氏的封地将被赵、韩、魏三家瓜分，三家分晋的格局正式形成。晋国早已经名存实亡，除了绛都和曲沃两地，其他晋国所有土地都不属于晋君所有。

由于赵家的实力最强，在这场晋阳之战中受损最大，所以赵毋恤理所当然获得了最肥的那块肉，甚至这场分赃大会也是赵毋恤本人主持的。史称“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

对韩、魏来说，赵毋恤吃到了大头，一强两弱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不过已经打破了之前一超三弱的局面。赵的实力还不足以吞并韩、魏，这就能让三家实力达到恐怖的平衡，而不是之前恐怖的不平衡。

最可惜的还是知瑶，他只差一步就可以取代姜齐的田和成为战国

第一个易姓诸侯。但知瑶的狂妄自大，导致他不能做出准确的战略判断，以及性格上的严重缺陷，生生断送了大好前程，正如《战国策·赵策一》的评价：“知伯身死、国亡、地分，为天下笑，此贪欲无厌也。”

知瑶之亡，实际上就是亡在一个“贪”字上。如果知瑶不是过于露骨地四处伸手抢地，也不至于把本来置身于知赵恩怨事外的韩、魏两家逼得走投无路，最终和赵联手灭知。西汉淮南王刘安对此发了一通感慨：“（知瑶）军败晋阳之下，身死高粱之东，头为饮器，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祸也。”

大好天下，从知瑶的手指缝中溜走，从此知氏甄没于发黄的旧纸堆中，再无重见天日之机，时也命也。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三晋赵魏韩三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即战国七雄之其三。

《资治通鉴》卷一开篇“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前403），（天子）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四七 宫廷八卦：谁的绿帽子在飞

战国时伟大的思想家告不害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食色，性也！”人生在世，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吃饭，上床。上床做什么？官方的解释是传宗接代，坊间的解释就是那个啥，反正很爽就是了。

随着时代的开放，人们已经不再讳谈“性”这个以前严禁在公开场合谈的话题。不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脱了裤子都是禽兽，穿上衣服才恢复人的社会性，而禽兽的本能就是与异性交配。

不过老话常讲：盗亦有道。同理，性亦有道，男女之间相处久了，擦枪走火是难免的，但要有个心理道德底线，什么样的床不能上，什么样的女人不能碰。

对于江湖中人来说，最不能碰的就是朋友之妻，这是犯江湖忌讳的。朋友妻不可欺，这是大多数人都遵守的性道德底线。但偏偏就有那么几个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超级大色狼，兔子专吃窝边草，嬉皮笑脸地给江湖朋友的脑袋上扣上一顶绿帽子。特别是在官场上，君王大臣们的偷嘴行为经常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动荡，甚至沦为历史笑柄。

如果给春秋时代的大色狼们弄一个桃色丑闻排行榜，前十名都是鼎鼎有名的后宫八卦事件，特别是乱伦事件层出不穷，这和春秋相对宽松的性道德有一定关系。不说前十，只说前三甲，考虑再三，将偷嘴界至高无上的“臭鸡蛋奖”授予如下事件：

一、齐襄公姜诸儿和妹妹文姜勾搭成奸，害死亲夫鲁桓公姬允。

二、陈灵公姊平国和大夫孔宁、仪行父拥有一个共同的情妇，就是大名鼎鼎的夏姬，四人经常聚众淫乱，甚至拿夏姬的儿子夏徵舒开黄色玩笑，最后被愤怒的夏徵舒送上了西天。

三、齐庄公私通执政大臣崔杼的老婆，导致杀身之祸。

关于齐襄公乱伦杀妹夫的丑事，在前文中讲过了，所以在此不再重复。不过姜诸儿和文姜的行为虽然严重不合礼法，但他们硬是红口白牙地说他们这是爱情，别人也拿他们没辙。

但排在第二位的陈国君臣聚众淫乱事件则是不折不扣的性丑闻，而且从知名度上讲，单是故事中的女主角夏姬就能秒杀文姜。所以将夏姬事件放在前面讲，至于第三名，如果说宋山阴公主刘楚玉是南北朝第一荡妇的话，那么夏姬当之无愧地会以高票当选春秋第一荡妇，夏姬自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明朝八卦大师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用极风骚的春秋笔法把夏姬的淫乱写得风生水起，让人拍案叫绝。

和宋山阴公主，唐高阳公主、太平公主等淫乱界著名御姐一样，夏姬也是出自这一群体，只不过当时没有公主这个叫法。夏姬的父亲是郑穆公姬兰，标准的龙子凤孙，长相自然也是绝色无双。

按冯梦龙的说法，夏姬“生得蛾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消魂丧魄，颠之倒之”。为了渲染夏姬的淫荡，冯梦龙还煞有介事地虚构了夏姬在十五岁时做的一场梦，说什么“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与人交接，曲尽其欢，就中采阳补阴，却老还少，名为素女采战之术”。淫荡如此，后世妖艳绝人如潘金莲，见着夏姬也要甘拜下风。

作为郑国公主，夏姬并没有按惯例嫁给诸侯国的太子，而是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这个夏御叔来历也不简单，据冯梦龙回忆，夏御

叔是陈定公之子少西的儿子，因为少西字子夏，所以以夏为姓。

关于夏姬的年龄，史无明载，但冯梦龙说夏姬在郑国守闺期间，和自己的庶兄公子蛮兄妹俩大搞乱伦，结果夏姬用力太猛，只用了三年就把公子蛮弄死了。夏姬在郑国待不下去了，才降价大甩卖，半卖半送来到夏御叔家里当大奶奶。

夏御叔估计是个糟老头子，床上的功夫肯定不会让夏姬满意。虽然夏姬此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但风韵犹存，是标准的熟女，这样的女人对男人是最有杀伤力的，老少通吃。不过嫁鸡就要随鸡，不能有半点逾越，只要夏御叔还有一口气，这个视性爱如生命的女人只能守着儿子夏徵舒在无趣的叹息声中混日子。

好在夏徵舒十二岁（有可能是公元前599）的时候，老夏头一命呜呼，夏姬又恢复了自由，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中意的男人。夏御叔的两个同僚渐渐进入了夏姬的视线，其中一位就是“身材长大，鼻准丰隆”的帅哥仪行父，另外一个相貌一般的孔宁。

冯梦龙为了突出戏剧性，硬生生在剧本安插了一个角色演员，就是夏姬的侍女荷华。孔宁为了勾搭上夏姬，重金收买了荷华，趁夏姬不备偷穿了夏姬的锦裆（内裤）。搞笑的是，孔宁穿着女人内裤到处显摆，正好让大色鬼仪行父看到了，仪行父口水直流，也打算弄一条夏姬的内裤穿穿。

不过幸运的是，在仪行父没有搞到夏姬的内裤之前，夏姬就已经相中了相貌堂堂的仪行父，女人哪个不爱帅哥？夏姬主动派荷华前来勾引仪行父，说我家女主人要请大人过去喝茶，仪行父激动得差点背过气去，这运气好得难以置信。

最夸张的还在后面，仪行父为了打垮主要竞争对手孔宁，暗中服用了大剂量的壮阳药，在和夏姬鱼水交欢的过程中，仪行父大发神威，把夏姬伺候得神魂颠倒。夏姬找野男人，当然要找能干活的，所

以仪行父很快就把孔宁给比下去了。当仪行父气喘吁吁向夏姬借内裤时，夏姬很豪爽地送给仪大夫一条碧罗襦。

当孔宁得知自己被冷落的原因后，气得跳脚大骂仪行父做人不地道。按江湖规矩，谁都不能吃独食，仪行父一人独吞蛋糕，孔宁当然是各种羡慕忌妒恨。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孔宁和夏姬渐行渐远，但他有办法让仪行父吃下同样的苦果，就是拉盟友前来助阵。

孔宁的所谓盟友，就是对夏姬早就垂涎三尺的大色鬼陈灵公。果然，在孔宁贼眉鼠眼地把和夏姬的一夜风流详细解读后，陈灵公的口水流了一地，恨不得现在就和夏姬大战三百回合。因为孔宁是卧底，所以陈灵公给孔宁开出了大价钱，“卿何策使寡人与夏姬一会？寡人誓不相负！”

其实不用孔宁想什么办法，只要做一回篋片朋友，安排个场合把陈灵公拉到夏姬面前就行。陈灵公比孔宁长得还寒碜，而且那个重要器官的功能远不如孔宁和仪行父，但他是陈国国主，手上有天大的权力。正如冯梦龙所说：“因他是一国之君，妇人家未免带三分势利。”

夏姬出来混江湖，当然知道权力比天还要大，傍上陈灵公，就等于拿到了永远豁免权。夏姬极力巴结陈灵公，使出种种妖媚手段，把陈灵公牢牢攥在手中。陈灵公为人豪爽大气，胸怀比太平洋还宽广，他不但不追究夏姬和孔宁、仪行父那些齷齪的丑事，还特许夏姬可以继续和他们往来。

有了这张经营许可证，夏姬就可以一方面从陈灵公这里得到安全保证，一方面又能从仪行父那里得到女人最本真的生理需要，可谓一箭双雕。为了感谢陈灵公，夏姬在和陈灵公鬼混一夜后，把自己贴身穿的一件汗衫送给了陈灵公。

得到美女贴身穿的汗衫，陈灵公兴奋得不知所以然。为了展示自己的胜利成果，在百官朝会散后，陈灵公把孔宁和仪行父叫上殿，拿

出穿在身上的汗衫，对二人说你们“虽曾入马，她偏有表记送我”。

看到汗衫，孔宁仰天大笑，说这算什么，我身上也有夏姬送的锦裆（实际上是偷来的）。话音未落，仪行父也笑着撩起衣服，露出一件体香袭人的碧罗襦，说臣也有一件。

这三个变态的男人一边把玩着另外两件夏姬的衣物，放肆地大笑，一边谈论着他们和夏姬床战的细节，浪荡的淫笑声在大殿上回响。陈灵公觉得他们三人单独和夏姬作战，不过瘾不刺激，于是又想到一个非常刺激的游戏。“异日同往株林，可作连床大会矣！”所谓的连床大会，就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滚床单，江湖戏称群飞。

就在三个浪男人嘴歪眼笑的时候，大夫泄治看不惯昏君佞臣的淫荡下作，冲上殿来，指着三人厉声痛骂：“你们这三个败家子做出如此下流的事情，不怕民风被你们带坏吗？长久以往，国将不国！”

陈灵公最恨有人跟他唱反调，寡人的私生活，你这个老棺材瓢子凭什么多嘴。在孔宁、仪行父的挑拨下，陈灵公派出刺客做掉了多嘴的泄治。泄治死了，再无人敢对陈灵公丰富的私生活说三道四，陈灵公开始准备他的“连床大会”。

按《史记·陈杞世家》的记载，在陈灵公即位后的第十五年（即前598），八卦江湖上期待已久的连床大会终于拉开了神秘的大幕。连床大会的举办地在一个叫株林的地方，这里应该是夏姬和三个野男人偷食吃的秘密窝点。

这应该是陈灵公第一次以国君的身份来到夏姬的住所，所以夏姬各方面都要有个安排，根据夏姬的指示，她唯一的宝贝儿子夏徵舒准备设宴款待君臣三人。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还正常，毕竟夏徵舒也是有身份的人，所以陈灵公等三个色鬼还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在地喝酒。

但等到三杯猫尿灌到肚里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开始没大没小，丝毫不顾及脸色有些铁青的夏徵舒，对公共情妇夏姬动手动脚，嘴里说着只有在床上才可以说的粗话。

朋友妻不可戏，朋友的老娘更不可戏，特别是公开场合，这要让面子的夏徵舒如何下得来台？更过分的是，这三个变态男人居然盯上了夏徵舒，开始讨论夏徵舒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

摘录《东周列国志》关于这段精彩绝伦的对话：

灵公谓仪行父曰：“徵舒躯干魁伟，有些像你，莫不是你生的？”仪行父笑曰：“徵舒两目炯炯，极像主公，还是主公所生。”孔宁从旁插嘴曰：“主公与仪大夫年纪小，生他不出，他的爹极多，是个杂种，便是夏夫人自家也记不起了！”三人拍掌大笑。

三人这段极为无耻下流的对话全是八卦艺术大师冯梦龙自己虚构出来的，历史上的孔宁并没有说过这句鬼话。《左传》的原话没《东周列国志》那么恶搞，但也不是什么好话。陈灵公说夏徵舒是仪行父生的，仪行父回嘴说也有可能是国公生的。

三个野男人说着不入流的粗话，可以想见夏姬的脸色已经紫成什么样了，更不要忘了，苦主夏徵舒就在眼前！老娘和三个淫贼鬼混，夏徵舒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陈灵公等人的黄色笑话却是对自己莫大的人格污辱。

夏徵舒也是有身份的人，如果这个笑话传到官场上，以后夏徵舒还怎么做人？老娘想当破鞋，自己可不想当野种。夏徵舒此时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上下，正是血性方刚要面子的年纪，他哪里忍受得了这种污辱。

一怒之下，夏徵舒纠集家丁在府上设了埋伏，等陈灵公等人醉醺醺起身，要离开株林回宫时，一场他们绝没想到的意外发生了。在夏徵舒的喝令下，夏府家丁对三条色狼进行了围攻，按《东周列国志》的写法，这场株林杀奸夫的过程充满了荒诞的喜剧色彩。

孔宁首先听到了喊杀声，说大事不好，夏徵舒要来捉拿我们这些淫贼，主公快逃。陈灵公先是被夏徵舒射了一箭，但被陈灵公躲了过来，为了躲避乱箭，陈灵公一头钻进不远处的马厩，结果不小心拍了马屁股，群马惊叫。夏徵舒大喝一声，一箭正中陈灵公要害，昏君呜呼毙命。

让人喷饭的是孔宁和仪行父，这俩大爷为了逃命，趁夏徵舒不备，一丝不挂地从旁边的狗洞里钻了出去，然后狂呼乱叫着跑到楚国避难去了。

由于这场事变来得太突然，陈灵公的太子姬午毫无准备，吓得当即逃往晋国，陈国出现了无主局面。从历史记载来看，夏徵舒杀奸夫应该是临时起意，但他在成功做掉奸夫后却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错误——自立为陈侯。

按江湖的普世价值，大臣杀国君立新君，最多背着弑君的恶名，但如果大臣自立为君，那就是大逆不道，为江湖所不容。果然，夏徵舒的鲁莽举动给早就对陈国虎视眈眈的楚庄王熊侣插手陈国事务提供了绝佳借口，而且孔宁、仪行父两个奸夫估计没少在熊侣面前添油加醋地埋汰夏徵舒。

夏徵舒在陈国官场没什么威望，根本控制不了局面，熊侣不费吹灰之力就斩了夏徵舒，全面控制了陈国。至于导致这场陈国巨变的淫妇夏姬，下落不明。

这场奸夫荡妇的荒诞闹剧被江湖上传为笑柄，各国的贵族们经常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晋国大夫叔向的母亲就曾经说：“子灵之妻

（夏姬）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

凑热闹的还有《诗经》中的一篇《陈风·株林》，诗如下：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夏徵舒的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三个奸夫和一个淫妇在荒郊野地互相调情取乐，结果被淫妇的儿子愤怒搅局，堪称春秋史上的第一宫闱丑闻，而第一女主角夏姬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春秋淫妇界的大姐大，遗臭万年，何苦来哉。

说完了春秋史上第一宫闱丑闻，趁着还有一些篇幅，再讲一讲另外一个著名的宫闱丑闻，就是齐庄公姜光私通崔杼妻棠姜惹来杀身之祸，这个故事同样大名鼎鼎。

春秋史上有两大著名的健在时被扣上绿帽子的衰男，一个是被齐襄公姜诸儿扣上绿帽子的鲁桓公姬允，一个就是被姜光扣上绿帽子的崔杼。不过姜诸儿至少还有点羞耻心，和妹妹乱伦开始时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姜光则是光天化日之下调戏人妻。所不同的是，姬允有冤无处喊，而崔杼则手刃奸夫，把绿帽子丢进了太平洋里。

说到齐庄公，有件事情非常可笑，他到外面偷食吃是有家族遗传基因的，就是他的母亲声孟子。声孟子在丈夫齐灵公死后，不甘寂寞，和大臣庆克暗中成了一对露水夫妻。有次庆克男扮女装，企图混进宫里和声孟子通奸，不幸被大夫鲍牵发现，引发一场激烈的后宫冲突，最终齐灵公还是干掉了奸夫庆克，摘掉了头上的绿帽子。

可能是由于父亲被扣绿帽子的影响，齐庄公对给人扣绿帽子特别感兴趣，如果他做到了，至少可以从某个角度给父亲出一口恶气。只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齐庄公下手的目标居然是崔杼的老婆棠姜。

棠姜其实也是一个二婚头，因为她姓姜，又嫁给了棠邑大夫（棠公），所以称为棠姜，另外她居住在东郭，也称东郭姜，棠姜和棠公

生有一个儿子棠无咎。棠公去世后，作为同僚，崔杼带着他的家臣东郭偃（棠姜之弟）来到棠家吊唁，正看到身穿丧服，梨花带雨的棠姜。

崔杼此时正在打着光棍，见识了棠姜的美丽，《列女传》称棠姜“美而有色”，崔杼立刻动了心。不过崔杼的人品总要比陈灵公好一些，至少崔杼没有暗中伸腿勾搭寡妇，而是想明媒正娶，崔杼派的媒嘴子，就是东郭偃。

东郭偃本想以崔、东郭同出于姜姓而拒绝，但在崔杼的真情打动下，棠姜也动了心。嫁给这样有权有势的男人，至少下半辈子有了依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杼）遂取之”。

但让崔杼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居然娶进来一个红颜扫把星。正因为这次有些仓促的婚姻，导致齐国政坛大乱，差点把崔杼的老命给搭进去。

崔杼娶了个美娇娘，而且崔家大宅就在公宫的旁边，齐庄公站在高大的城墙上，很自然地欣赏到了美而有色的棠姜。齐庄公也是个见着美女就流口水的吃货，他当时应该在想：见者有份，你能吃得，我同样能吃得。

不知道齐庄公用了什么手段，三来二去，居然成功地把棠姜搞到了手。根据八卦名著《东周列国志》的记载，齐庄公是在崔家举办的酒会上见到棠姜后，并重金买通了棠姜的弟弟东郭偃，暗中和棠姜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崔杼待棠姜不薄，棠姜为什么会红杏出墙？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崔杼在床上劳累过度，致使某些身体方面达不到女人对那种事情的渴望，棠姜为了满足欲望，才把齐庄公拉上了自己的床。

二人刚勾搭上时，崔杼还不知情，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崔杼

很快就发现自己头上被庄公扣了一顶鲜艳的绿头盔，崔杼的老脸都绿了。可能是出于爱面子，崔杼对此事没有任何过激的反应，只是责问棠姜为何红杏出墙。棠姜倒是聪明，把责任全都推给齐庄公，说是国君逼她就范的，她一个弱女子，不敢反抗国君，云云。

如果这对奸夫淫妇就此收手，崔杼应该不再会追究下去，井水不犯河水。为了保住崔家大奶奶的地位，棠姜也不想再和齐庄公有什么业务往来了，但齐庄公可不管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只要他自己爽，才不管别人要不要脸。

最过分的是，齐庄公把偷情这件事当成一种荣耀，四处显摆，唯恐天下不知。齐庄公甚至偷出了一顶崔杼的帽子，随便送给了身边的猫三狗四，不知道这顶帽子的颜色是不是绿的。

人要脸树要皮，齐庄公当众给苦主抽鞋底、扣绿帽，只要不是武大郎似的窝囊男人，没有不上火的，崔杼自然也不例外。崔杼已经警告棠姜不要再和那个奸夫往来，棠姜也答应了，但齐庄公偷嘴上了瘾，根本收不住。在光天化日之下，齐庄公借着公宫的高墙，溜到了崔府大院，准备偷食吃。

因为崔杼此时就在府上，棠姜哪敢和他再有身体上的接触，吓得逃进屋里，紧闭大门，说老头子在家，国君别自找麻烦。齐庄公色迷心窍，根本听不进去，要强行闯关，说什么你少唬我，老崔头病怏怏的快进棺材铺子了，哪有时间管爷的事情。

齐庄公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崔杼就在门内侧听着他这番豪言壮语。已经气爆头的崔杼本来就对昏君不满，有做掉昏君的意思，今天昏君要强行给自己扣绿头盔，那就一不做，二不休，趁此机会废立。

齐庄公还在傻头傻脑地砸门，同时还在高声朗诵诗歌：“室之幽兮，美所游兮。室之邃兮，美所会兮。不见美兮，忧心胡底兮！”崔杼已经和棠姜打开后窗溜了出来，立刻召集家兵，几百号人怒吼着杀

进院子，将齐庄公死死围住。

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崔杼已经不再隐瞒他的政治意图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这个昏君的周年，看箭吧！根据《左传》的说法，崔杼这次是有意让棠姜把齐庄公引到家里做掉，所以早就伏下了伏兵。更不可思议的是，齐庄公明知道崔杼在家，在崔府上就敢调戏棠姜，简直就是粪耙子摇头——找屎（死）。

齐庄公还有点力气，见势不妙，拼命爬墙逃走，但还没等他穿越成功，崔杼一箭就射中齐庄公的脚踝。奸夫惨叫一声，从墙上一头栽下来，崔杼的亲信贾举一句废话也没有，上前就是一刀，“遂弑之”。

杀戒既开，索性杀个痛快，把政治上的敌人都进行定点清除，为以后的专权打基础。与齐庄公同来崔府的八大佞臣，如州绰、邴师、公孙敖等人，一同被做掉，除此之外，高唐大夫祝佗父、齐国渔业部长申蒯、平阴大夫饴蔑（齐庄公的“同性”朋友）也都下了地狱。

就在齐庄公被杀的同时，后来的一代名相晏婴站在崔府外，厉声指责崔杼弑君不道，并要求进府哭丧。崔杼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一方面同意晏婴进府，同时又立齐庄公的异母弟姜杵臼即位，也就是著名的齐景公。

至于引发这场齐国官场巨变的“祸水”棠姜，在齐景公第二年（前546）发生的灭崔政变中被杀，包括棠姜与前夫生的儿子棠无咎，以及她和崔杼生的儿子崔明，一同罹难，崔杼本人也死在这场政变中。

究其原因，姜杵臼之所以下如此辣手，和崔杼的专权有很大关系，但也有为齐庄公复仇的因素，以一族之命偿还一人之命，齐庄公的这桩人肉买卖总算没有亏本。

四八 春秋名女

《诗经·周南·桃夭》有诗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这首诗是写女人的，按南宋大儒朱熹的说法，桃花盛开时，便是春秋时男女结婚登记的大好日子。“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

这个世界有一半是属于女人的，妇女确实能顶起半边天，没有女人的世界是没有生气的。之前讲了无数个春秋时代的顶级男人，下面该讲一讲春秋时代的顶级女人，正因为有了这些可爱可恨或可笑的女人，春秋的历史才变得生动有趣。

在春秋三百年的历史舞台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类型的女人，大致分列一下，有以下几类：

一、贤女或才女，代表人物庄姜和息夫人。

二、为了追求真爱不惜乱伦杀夫杀子，代表人物文姜和哀姜。

三、纯粹为了满足性欲而聚众淫乱，代表人物夏姬。

四、为了儿子登上国君之位不惜大开杀戒、祸乱朝纲，代表人物骊姬。

五、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献身，代表人物西施。

有些女人，前面已经着重讲过了，比如文姜、夏姬、骊姬，下面先讲讲号称春秋第一美女诗人的庄姜。

春秋时代的著名女人多被称为某姜，如武姜、庄姜、宣姜、文

姜、哀姜、齐姜，“姜”代表着她们所在的姜姓诸侯国，比如姜姓齐国、姜姓申国、姜姓许国、姜姓吕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春秋历史的“名姜”中，庄姜毫无疑问是最出色的那一个。

庄姜的美丽绝人，在《诗经》中是有明文记载的，就是那篇著名的《诗经·卫风·硕人》。庄姜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所以称为硕人。后人对美女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对照庄姜的美丽指数制定的，诗如下：

硕人其颀，衣锦褰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幘纚纚，翟裼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涉施^涉，鱣鮪发发，葭茨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诗的第一段介绍了庄姜的显赫家世：庄姜的父亲是齐庄公姜购，同母兄长是齐太子姜得臣，卫庄公姬扬是庄姜的丈夫，邢国国君是庄姜的姐夫，谭国国君是庄姜的妹夫。

庄姜之所以出名，并不仅因为她所接触的男人都是春秋的顶级贵族，这样的贵族女人还有许多，而是因为庄姜有着不可思议的美貌。《硕人》的第二段讲的是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女人如果都能长成庄姜这样的绝色，此生夫复何求？

特别是最后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还被《论语·八佾》无

偿使用了一把。孔子的学生子夏不知道从哪看到了这两句诗，不解其意，便求教于孔子。孔子摇头晃脑地扯了一通仁义礼智信，子夏似懂非懂。实际上庄姜的人生和孔子所解释的天道伦常相比，实在太过简单，就是从一个贵族家庭嫁到另一个贵族家庭的女人而已，并无承担推广封建礼教的义务。

有些人天生就是劳碌的命，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而有些人天生就是富贵命，如庄姜要貌有貌、要财有财、要势有势，人生几近完美。但和大多数游手好闲养白鸭的贵妇人不同，庄姜不仅貌美殊绝天下，更让人倾倒的是她的贤淑德惠，以及惊人的文学才华。

庄姜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但极有含金量，比如那篇感动千古的名篇《燕燕》。这是一首兄妹送别诗，当作于庄姜的出嫁车队起程前往卫国时，诗的男主人公应该就是与妹妹感情深厚的齐国太子姜得臣。

齐国有两对著名的兄妹，一对是齐襄公姜诸儿和其妹文姜，一对就是姜诸儿的伯父姜得臣和姑妈庄姜。庄姜和姜得臣之间是纯粹的兄妹亲情，眼见得要漂萍随风各西东，以后再见的机会越来越少，庄姜几乎是蘸着泪水，写下了这首《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寥寥数语，庄姜便把对兄长的不舍写得感人肺腑。庄姜心灵通透，感情非常丰富，不同于她那个为了乱伦不惜杀夫的侄女文姜。

文姜倒不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只不过她选择的爱情不为主流道德标准所容，而站在文姜道德叛逆对立面的，正是她的姑母庄姜。自古红颜多薄命，庄姜才色殊人，人品又好，对于庄姜的人品，《史记·卫世家》用了一个“好”字，但偏偏命中无子。

为了传宗接代的大业，庄姜的丈夫姬扬又到处续弦。在庄姜之后，又娶了陈国两位宗女为妾，大陈女厉嬀生子姬孝伯，小陈女戴嬀生子姬完。姬孝伯很早就夭折了，只剩下姬完这根独苗，不过戴嬀不

久后也去世了。善良的庄姜不忍心看到姬完成为孤儿，反正自己也无法生育，干脆就收姬完为养子。

除了姬完之外，姬扬还不知道从哪搜刮到了一位美女，史称“嬖妾”，生子州吁，就是后来被石碛用计在陈国除掉的那位伪君。庄姜并不喜欢州吁，原因倒不是州吁的母亲有夺嫡野心，而是州吁为人好舞枪弄棒，“有宠而好兵”。

庄姜担心州吁有朝一日会取代姬完成为卫国国君，毕竟姬完是自己的养子，感情深厚，不比州吁这个野孩子。大夫石碛也反对姬扬宠爱庶子州吁，认为这将对姬完的太子位置产生威胁，处理不好，必将引发大乱。

史籍中虽然不见庄姜在反对州吁的过程中有什么动静，不过庄姜作为姬完的养母，而且又极不认同州吁的行事做派，暗中应该没少给州吁绊马腿。庄姜反对州吁当然是出于对姬完的保护，但从州吁后来在卫国作乱来看，庄姜如果反对州吁为嗣无疑是正确的。

石碛坚决反对立州吁为嗣，并提出了“六逆说”，即贱不可以妨贵、少不可以陵少、远不可以间亲、新不可以间旧、小不可以加大、淫不可以破义，但已经老糊涂的姬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继续纵容州吁胡作非为。

不仅是石碛失宠，就是卫国第一夫人庄姜，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虽然碍于齐国的大国地位，姬扬还不敢对齐国公主庄姜怎么样，但场面上已经冷淡了许多，姬扬真正喜欢的还是州吁的生母。

以庄姜的政治地位，如果她要用暴力手段解决州吁对姬完的威胁，也不是做不到，一副毒药就可以送州吁上西天。只要庄姜愿意，完全可以像骊姬乱晋、万贞儿乱明那样，对丈夫和其他女人生的儿子大开杀戒，确保自己以及姬完的地位。

那个不知名的嬖妾无疑是幸运的，她所面对的是庄姜这样的贤淑女子，如果她碰上吕雉那样的雌虎，早就被吕雉碎尸万段了。吕雉对戚姬下手恶毒，这是吕雉自卑和不自信的表现，她只能通过虐杀戚姬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与虚弱。庄姜一来不需要通过杀嬖妾来保全自己的地位，二来庄姜的道德底线也约束自己不会滥杀无辜。

人心都是肉长的，庄姜的贤德让卫国人感动莫名，那篇《硕人》其实就是卫人对庄姜的歌颂。晋人杜预说得很明白，“《硕人》诗，义取庄姜美于色，贤于德，而不见答，终以无子，国人忧之。”庄姜长期无法生育，卫人引以为忧，对卫人来说，庄姜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卫人对善良正义的向往，说庄姜是卫国的自由女神并不为过。

说完了一代名姜庄姜，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名姜，就是一代风流艳后哀姜。

哀姜同样来自齐国姜姓，是齐襄公姜诸儿的宝贝千金，但肯定不是文姜和姜诸儿的爱情结晶。在齐国早期的三姜中，哀姜和文姜的关系更近一些，论血缘，文姜是哀姜的姑妈，但她们之间还有另外一层特殊的关系，即文姜还是哀姜的婆婆。

文姜和同母兄长姜诸儿的乱伦，最终导致鲁桓公姬允在这场三角恋中被杀的宫闱丑闻轰动天下，甚至在姬允被杀后，文姜还隔三差五地溜回齐国和姜诸儿鬼混。作为姬允和文姜的儿子，鲁庄公姬同的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历史上，鲁庄公姬同一向以贤君面目示人，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姬同居然还是一个超级大淫虫。而姬同淫乱的对象，正是他未来的老婆哀姜。

姬同和齐国的外交关系，并没有因为母亲文姜和舅舅姜诸儿的乱伦而受到太大的影响，该打照打，该和照和。姬同也经常以鲁公的身份去齐国公干，一来二去，姬同就认识了表妹哀姜，二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建立了亲密的肉体关系。说来滑稽的是，姬同和哀姜这对野鸳鸯的父母也是一对著名的野鸳鸯，姬同的母亲文姜和哀姜的父亲姜诸儿爱得死去活来，天崩地裂。

至于姬同和哀姜是谁勾搭上的谁，一向喜欢八卦的西汉学者刘向也搞不清楚，只好含糊记载，“初，哀姜未入（鲁）时，公（姬同）数如齐，与哀姜淫。”最让人发指的是，姬同居然一箭双雕，在搞定哀姜的同时，还和哀姜的妹妹叔姜有了一腿，三人经常鬼混在一张床上，切磋床头兵法。

姬同和哀姜勾搭上线的时间有些晚，在姬同即位的第二十四年（前670），姬同才和哀姜补办了结婚手续，姬同亲自赴齐，风风光光地把哀姜迎娶进门，同时嫁过来的还有姬同的盟友叔姜。

哀姜嫁给姬同，可能和姑妈文姜有一定关系，文姜死于公元前673年，一年后哀姜就嫁给了姬同。文姜对儿子姬同还是非常内疚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把淫荡成性的侄女塞给儿子，这个小丫头岂是省油的灯！

哀姜初到鲁国，就在鲁国官场扔了一颗炸弹。按春秋礼制，男娶女，虽然要互送礼物，但男尊女卑，男方礼物要重于女方礼物，女方只需要送一些榛子、枣子、肉干意思一下即可，但哀姜送的却是诸侯之礼，比如大者如玉帛、小者如禽鸟。男女同礼是当时大忌，由此可见哀姜根本不把封建礼教当盘菜，她在鲁国官场上胡作非为也是可以想象的。

哀姜对漂亮男人有天生的欲望，姬同在和哀姜鬼混的几年时间里，身上的油水估计都被哀姜榨干了。刚嫁到曲阜，哀姜一脚就踹飞了油尽灯枯的姬同，和姬同的二弟眉来眼去，勾搭成奸，这位皇弟，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公子庆父。

实际上，哀姜的业务往来非常多，除了庆父，姬同的三弟姬叔牙

也倒在了哀姜的石榴裙之下。只不过姬叔牙不如庆父更讨哀姜的欢心，估计没在床上切磋过几次业务，姬叔牙就被哀姜踹下床了。

哀姜和姑奶奶庄姜都是无子的命，但哀姜根本不在乎生儿子，每天和姬庆父行鱼水之欢，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最惨的是哀姜的妹妹叔姜，虽然叔姜给姬同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姬启（《史记》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名姬开），但姬同更喜欢大夫党氏的女儿孟任，准备立孟任所生的儿子姬斑为嗣。

姬同突然来这么一手，打得哀姜措手不及，道理很简单：姬启是哀姜的外甥，如果立姬启为嗣，哀姜就可以拿到长期饭票。立外人姬斑为嗣，认哀姜是哪根黄花菜？两千五百多年后，清同治帝驾崩，无子，慈禧力排众议，立自己的外甥光绪为帝，就是出于哀姜的这种政治考虑。

哀姜没有慈禧那样的通天大权，姬同也不听进去哀姜的苦苦央求，姬斑顺利地册封为太子。姬同之所以坚持立姬斑，应该是有意限制哀姜的权力，甚至姬同已经知道了哀姜和庆父之间的亲密关系。

姬同还是低估了哀姜的野心和决心，他以为把姬斑托付给四弟姬季友，然后姬季友把姬斑推上鲁公的位置就万事大吉。姬同想造成既定事实，但对哀姜来说，她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又岂肯善罢甘休！

公元前662年的八月，姬同成为鲁人供奉的祖宗。仅仅过了两个月，被季友强行推上位的新任鲁君姬斑就死于厨子犇之手，季友也逃到母国陈国避难。指使犇杀人的是公子庆父，但站在庆父背后指点江山的，毫无疑问，就是那个以淫为乐的女人哀姜。

姬启很顺利地登上了鲁君之位，但鲁人都知道，鲁国真正的统治者是庆父和哀姜。他们三人的关系有些类似清初顺治、孝庄和多尔衮，孝庄把自己的身子都给了多尔衮，多尔衮摄政清室，是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哀姜和庆父之所以要杀斑立启，主要还是为了他们行乐方便，在姬启即位的前两年，这对露水夫妻已经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淫益甚”。但二人在一起，夫妻不是夫妻，叔嫂不是叔嫂，时间久了，宫闱秘史传遍了曲阜的大街小巷。

要想名正言顺地生活在一起，只有一个办法——杀姬启立庆父。如果庆父做了鲁君，必然册封哀姜为夫人，二人补办了结婚证，就没人乱嚼舌头了。这对野鸳鸯下手真够快的，还没等姬启叫庆父一声姨父时，庆父派来的杀手卜齮就将姬启送上了西天。

两年之内，鲁国走马灯般地换了三任国君，而且多死于非命，这在鲁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著名成语典故“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的就是这两场弑君事件。

弑君已经是不可赦的大罪，何况是一杀再杀，庆父和哀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鲁人的普遍反对。庆父连自己的亲侄子姬斑和姬启都敢杀，天下还有什么人是庆父不敢杀的？站在鲁人的利益立场考虑，也确实是庆父不死，鲁难不已。

在鲁人愤怒的声讨中，庆父和哀姜在鲁国已经人人喊打，再无容身之地，出逃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不过庆父和哀姜并没有至死不分，而是分别逃往莒国和邾国。究其原因，估计是他们还在做着回鲁国的打算，暂时分开，避免被人一锅端掉。

鲁都空虚，权力很快就回到了庆父四弟季友的手中，姬四爷对庆父当初的发难依然耿耿于怀，派人去莒国要求引渡庆父回鲁受审。庆父倒是有骨气，见回鲁复位的梦想已成泡影，一咬牙，抹脖子自杀了。

庆父一死百了，最苦的还是庆父的姘头哀姜，因为哀姜在鲁国的胡作非为，引起了一个人的密切关注。而这个人的政治需求，决定了哀姜悲剧命运的不可逆转，他就是哀姜的叔父姜小白。

齐国和鲁国的特殊关系众所周知，时打时和，鲁国地处齐国腰侧，地缘战略非常重要，所以姜小白要实现称霸大业，就必须完成对鲁国的相对控制。在鲁庄公姬同时代，姜小白没能在鲁国占到什么便宜，反而在柯之盟会上，差点被姬同的马仔曹沫要了小命。现在姬同挂掉了，正是姜小白对鲁国施加影响的好机会。

姜小白在争夺鲁国权力的过程中慢了半拍，姬季友已经立姬同的少子姬申为国君（即鲁僖公）。为了尽可能地挽回不可逆之局，姜小白把目标对准了自己的侄女哀姜。哀姜身为齐国宗女，嫁到鲁国后兴风作浪，连弑二君，鲁人民愤极大，所以哀姜很不幸地成为叔父踩向鲁国的垫脚石。

《列女传·鲁庄哀姜》：“（姜小白）闻哀姜与庆父通以危鲁，乃召哀姜，酖而杀之。”

姜小白逼死侄女，固然是借别人的性命卖自己的人情，效果如何且不说，哀姜的悲剧性结局实际上并不值得同情。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正是因为哀姜玩得太过火，才使得姜小白有机可乘，自己授人以柄，不能怪姜小白心狠手辣。如果哀姜能像姑奶奶庄姜那样贤淑有德，姜小白也绝不会拿她开刀祭旗。

春秋的姜姓美女极多，除了上面曾经讲到的武姜、文姜、庄姜、哀姜之外，还有卫国宣姜、鲁国缪姜，都是祸乱家国的红颜祸水。如果范围仅限于春秋史，这些女人的名气并不算小，但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八卦史上，她们还很难算是一线人物。

其实春秋真有一个古今中外都为之倾倒的美女，历史影响之大，不仅春秋史上第一，就是三千华夏史而论，她也敢称第一，这就是名气大到不能再大的西施。春秋有一个最有名的男人，毫无疑问就是孔子，而春秋最有名的女人，自然就是西施。说春秋女人不说西施，等于说春秋不提孔子。

经过两千多年的地毯式轰炸，现在不知道西施的不多了，响当当的四大美女执牛耳者。貂蝉、王昭君、杨玉环知名度再大，和西施相比，似乎也要略逊一筹。

在四大美女中，除了杨玉环的事迹有正史所载，最为真切可信，西施、貂蝉、王昭君在正史中都没有多少字墨可寻，一直生活在真实与虚幻之间。

更为巧合的是，除了杨玉环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和前公爹李隆基爱得死去活来，前三位美女都为了各自所属政治集团的政治考虑而委身他人，典型的政治牺牲品。王昭君情况还好些，她嫁入匈奴之后富贵终身，貂蝉甚至连是否真有其人都在两可之间。

至于西施，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确有其人，只是不一定叫西施这个名字。西施，顾名思义，是许多姓施的人家住在一处，因为其中一家住在西边，所以称为西施。

大文豪苏轼说西施姓西名施，还煞有介事地写诗云：“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姓西”，惹来清朝考辨学者杭世骏好一通嘲笑。有西施，必有东施，东施效颦的典故流传千古，说明西施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民间传说越王勾践为了迷惑吴王夫差，精选了浣沙女西施，盛装入吴，给勾践输送情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美女间谍。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但西施入吴的主要任务是用身体迷惑夫差，让夫差沉迷于酒色，给勾践卧薪尝胆赢得一定的时间。

根据《越绝书》卷十二的记载，勾践回越之后，他为了让夫差疏于国政，以便从中渔利，在吃粪之后改行美人计。勾践并没有派自己的老婆上阵，估计在吴国羁留二年间，夫差早就对勾践的老婆下了手，已经提不起性趣了。

美人计是文种提出来的，勾践回国后，曾经问计于文种，文种献灭吴九计，其中第四计就是美人计，“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勾践费了很大的工夫，终于在越国寻到了可以瓦解夫差斗志的美女武器，实际上不止西施一人，此外还有一位郑旦。不过西施和郑旦并非野史传说中的浣沙女，而是苧萝山中砍柴夫的女儿。

西施虽然貌美如花，甚至让勾践都动了心，但此时的西施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没有进行深加工，不善歌舞，即使去了吴宫，估计几番云雨下来，夫差也会对西施失去兴趣。杨玉环之所以得李隆基宠爱，主要还是靠惊艳天人的《霓裳羽衣曲》，否则仅凭杨玉环的一身肥肉，也吸引不了李隆基。

勾践对培养西施几乎是下了血本，“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为了培养一个美女间谍，勾践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可见勾践对西施和郑旦抱有多大的期望。

一切准备就绪后，勾践派大夫文种护送西施和郑旦入吴，执行不可告人的阴谋。不过《吴越春秋》认为护送二美入吴的并不是文种，而是范蠡。

更有一种离谱的说法，认为范蠡和西施早就两情相悦，在护送西施的过程中，二人在御儿亭行男女苟且之事。不过这种说法遭到了杭世骏的痛斥，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以范蠡的政治品格，他是断然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相比之下，文种口才好，善辩给，最擅长这样的外交往来，所以文种执行护送的可能性更大。

文种确实很会说话，在见着夫差之后，文种代替勾践，很谦卑地说：“越国出了西施和郑旦这两位绝世美女，以勾践下贱的身份，是断然不敢纳二美于后宫的。当今之世，只有吴王才有资格纳二美，所以勾践派贱臣送二美于大王。”

夫差本就是个好色胚子，见着两位绝色美女，口水流了一地，自

然就笑纳了。并在姑苏城中修建著名的馆娃宫，以便西施和郑旦居住。

关于是否接受勾践的“好意”，夫差和伍子胥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辩。伍子胥认为这是勾践在使美人计，并说国家之亡，不亡于战，必亡于红颜祸水，比如殷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

夫差嗜色如命，再加上对伍子胥仕吴的动机早有怀疑，根本听不进伍子胥的任何良言，冷冰冰地拒绝了。按《越绝书》的说法，此事甚至成为夫差对伍子胥进行政治清洗的导火索。

虽然史料有限，但我们完全可以想到的是，西施入吴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协助夫差除掉人嫌狗憎的伍子胥。只有死掉的伍子胥，才是值得越王勾践尊敬的贤臣，有伍子胥在一日，勾践的阴谋绝无可能得逞。

上面讲的这些，已经是有关西施的所有史料了，不知道西施在暗中执行灭吴的计划时，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唯一能肯定的是，西施迷惑夫差耽误国政的过程起到了利于越而不利吴的作用。而对于西施误吴的重大事件，正统史籍《左传》、《国语》、《史记》均无一字记载。

虽然《管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诸书不止一次提到大美女西施，比如《管子·小称》提到过：“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但从时间上来看，这些名家所说的西施与由越入吴的西施并不是同一个人。

至于西施的人生结局如何，同成书于东汉的两大八卦野史《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互相拆台。《吴越春秋》说勾践灭吴之后，为了杀人灭口，派人将西施沉入了江中，一代美女，就此香消玉殒。不过《越绝书》的说法更符合文人的浪漫想象，勾践灭吴之后，意欲杀范蠡以除后患，范蠡知道勾践不可共富贵，提早一步逃出勾践魔掌，携

西施泛舟五湖四海，远离政治杀场的血腥与肮脏，共享二人甜蜜世界。后世许多的版本对于西施人生结局的描述，基本上都是以《越绝书》为模板的。

因为《越绝书》对西施人生结局的浪漫渲染，后人也更愿意相信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确实存在着能感动后世的浪漫爱情故事，以西施为题材的诗作层出不穷。特别是唐诗，喜欢八卦的唐人对西施的爱情题材极有兴趣，名篇迭出。

最后以诗仙李白的名篇《西施》结束此篇：

西施越溪女，出自苕萝山。
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
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
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
勾践征绝艳，扬蛾入吴关。
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
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四九 《诗经》的魅力

（上）

今天讲一讲文学。

每个时代都有其带有明显社会烙印的文学，这话很有道理，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元曲，春秋自然也不例外。说到春秋时代的文学作品，其中不用多作介绍，我们可以张口说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名字。

虽然《诗经》的出现，距离现代社会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了，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在生活中大量遇到与《诗经》有关的著名诗句，这也是《诗经》魅力长久不衰的明证。简单列一下家喻户晓的《诗经》名句：

《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句是《诗经》中最著名的。同出此诗的还有“辗转反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小雅·车辖》：高山仰止。

《国风·秦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邶风·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迁之喜”的出处）。

《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国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国风·桃夭》：桃之夭夭（“逃之夭夭”的出处）。

《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邶风·谷风》：新婚燕尔。

《邶风·北风》：携手同行。

《卫风·氓》：信誓旦旦。

《唐风·绸缪》：今夕何夕。

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诗经》并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春秋时人整理了从商周到春秋中叶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和，就像我们不能说诗是自唐朝才有的一样。因为《诗经》所载诗歌的来源比较复杂，有宫廷舞宴诗，有民间爱情诗，也有讽刺时政诗，所以《诗经》没有一个固定的作者。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经整理过《诗经》，最终将原来散落的《诗经》三千多篇删定为三百零五篇，也就是俗称的“诗三百”。不过这个说法遭到后人的大量质疑，认为孔子并没有删定过《诗经》，持此观点的，远有朱熹、叶适，近有胡适、钱玄同。该派学者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就是《诗经》创作时间最晚的《陈风·株林》的出现，比孔子出生那一年（前551）足足早了47年。

对后人来说，孔子是否删定过《诗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华夏先民给后世留下的这份无价的精神遗产。正如近代学

者顾颉刚所说：“我们要研究文学和史学都离不开《诗经》，它经过了两三千年，本质还没有损坏，这是何等可喜的事！我们承受了这份遗产，又应该何等的宝贵！”

孔子删定《诗经》，在史学界争议非常大，但西汉毛亨、毛萁修订《诗经》是确定无疑的，几乎没有争议。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其实就是二毛所编集的版本，所以自西汉以来，《诗经》也称为《毛诗》。

《诗经》现在所存三百零五篇，外加六篇笙诗。上面讲了，《诗经》是当时各阶层创作诗歌的总集子，体裁相当于《全唐诗》，存集了上至帝王、下至寒士的作品。

关于《诗经》的分类，宋人苏轼曾经对了一个下联，就是著名的“四诗风雅颂”。《诗经》分为三大块，分别是《风》、《雅》、《颂》，而《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所以称为四诗。

在三百零五篇中，《风》的篇幅最多，有一百六十首；其次是《小雅》七十四首；《大雅》三十一首，《颂》四十篇。其中《颂》和《大雅》主要是讲述商周贵族对自己祖先的歌功颂德，类似于后代王朝的庙舞，内容相当枯燥乏味。

比如《颂·执竞》篇：“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莞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这是肉食者吃得满嘴流油之后，歌颂自己的富贵生活，完全不接地气。

单纯从艺术上讲，《颂》和《大雅》不属于民间创作，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二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记载商周时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比如《大雅·文王之什·大明》提到了周武王姬发伐纣，战于牧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原彭彭。师维尚父，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描写了周军伐商

的浩大场面。

还有就是《大雅·文王之什·绵》，描写了周人从弱至强的发展过程，涵盖了政治制度、人事制度、经济制度，还有周人建设城市的场面，是研究周朝历史必须要用到的珍贵史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书名，就是取自《绵》篇的第二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讲述了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姬亶父率族人沿着渭水西行，来到岐山定居的历史。“水浒”，顾名思义，就是水边，《水浒传》书名的本义，就是水边发生的故事。

相对于《颂》和《大雅》，《小雅》具有明显的士大夫情怀，对下层的人文关怀更为强烈，视野往下看。而不是像《颂》那样高高在上，不管百姓死活。当然，《小雅》也有不少描写士大夫饮酒享乐的诗篇，但比那些描写肥头大耳的贵族篇章更有艺术气质。正如近代学者朱东润所说：“《小雅》多言人事，《大雅》多言祖宗。”

在享乐的同时兼顾对下层的关怀，这并不矛盾，历朝以来的士大夫都是如此，这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双重性所决定的。白居易一边和妙龄歌姬打情骂俏滚床单，一边痛骂贪官污吏，为底层百姓鼓与呼，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三国枭雄曹操有一首著名的《短歌行》，其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几句实际上并非曹操的原创，而是曹操全文照抄《诗经·小雅·鹿鸣》的原句。

这首著名的《鹿鸣》位列《小雅》第一篇，在文学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曹操就做了一回文抄公，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写了一篇《短歌行》，其中“呦呦游鹿，衔草鸣麇”一句，也是化用了《鹿鸣》的句子。

之所以说《小雅》中的诗篇要比《颂》更具有文学性和士大夫气质，主要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传播性有天壤之别。《颂》则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几乎没有名句流传下来，而《小雅》的名句数量，在《诗经》中仅次于《风》，而多于《大雅》和《颂》。

除了《鹿鸣》，《小雅》中脍炙人口的名篇还有：

《皇皇者华》（载驱载驰。）

《常棣》（兄弟阋于墙，而御其侮。）

《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菁菁者莪》（既见君子，我心且喜。）

《庭燎》（夜何其？夜未央。）

《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甫田》（万寿无疆。）

《白华》（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大家都知道，《诗经》里有许多歌颂爱情的篇什，多集中在《风》，其实《小雅》也有几篇爱情诗，其中上面提到的《菁菁者莪》最为特殊。说它特殊，不是因为这首诗的句子有什么与众不同，而在于它的朦胧意境，以及留给后人解读的广泛空间。

《菁菁者莪》和《小雅》中的另一篇爱情诗《隰桑》在文字结构

上非常相似，而且主题接近，都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女人在郁葱的山丘中遇到让她一见倾心的男子。

《隰桑》的叙事方法比较直白，如“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将少女敢于向心上人示爱的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菁菁者莪》则有些像李商隐那首著名的《无题》诗，欲说还休，既可以解释为君子之交，也可以理解成爱情诗，全诗如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见君子，我心则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

古人对这首诗的解读有一定分歧，《毛诗》将此诗解读为培养教育音乐人才，而朱熹却批评《毛诗》的观点是胡说八道，朱熹认为这是一种君子交往的诗篇。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近现代人们则更多地从爱情角度解读此诗，依然可以说得通。

近人胡适批判汉朝文人扭曲爱情诗的本意，“《诗经》里面描写的那些男女恋爱的事体，在那班道学先生看来，似乎不大雅观，于是对于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学不得不另种种附会的解释。明明是一首男女的恋歌，他们故意说是歌颂谁、讽刺谁的。”

就《菁菁者莪》所描写的内容，再结合逻辑的合理性来判断，一个男子在山间遇到另外一个修养、涵养俱佳的男子，心情激动，面色潮红，被解读为君子之交，实在太过勉强，也不符合诗中的意境。

《隰桑》中有“既见君子”，这里的“君子”是指令妙龄女郎心动的漂亮男生，《菁菁者莪》中的“我”不应该是男人，而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女孩。

在《小雅》七十四首诗中，爱情诗并非主流，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最多。如果说《颂》和《大雅》是“钟鼎烹食”，《风》的主色调是民间纯朴的情感抒发，《小雅》的主格调就是“悲天悯人”。这些历史上

无名的诗人，同情社会底层的蝼蚁百姓，以笔作戈，投向残暴腐朽的统治者，《小雅·大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诗篇。

《大东》创作于西周时期，作者是谭国（今山东济南附近）的卿大夫，姓名没有留传下来。这首诗反映的是西周王朝（极有可能是周幽王时期）对东方百姓的残暴压迫，可谓字字血泪，让人不忍卒读。

《大东》原诗共七段，每一段文字都充满了对西周贵族剥削百姓的极度痛恨，特别是第一段直入主题，底层人民的痛苦与心酸跃然纸上。这一段讲述西周贵族把从谭国抢夺来的财物装上车，向西快乐地驰行，而谭国百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他人所蚕食，转过身去，泪流满面。

第二段是怒斥西周掠夺百姓财物的强盗行径，造成百姓的极度贫穷。“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家里的织机都被恶如虎狼的地主们抢光了，只给穿着草鞋，冬天如何抵御霜寒冰刀？但地主老爷们依然向穷苦百姓征收苛捐杂税，毫不手软。

第三段以下是作者的大声疾呼，“契契寤叹，哀我惓人。哀我惓人，亦可息也。”作者希望周王朝的贵族能够稍微体谅民生艰难，减轻百姓负担。杜甫在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尾也作同样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诗人忧国忧民，却打动了贪婪残暴的统治阶层，不夺民利，这伙寄生虫就无法生存，所以这种痛彻心肝的呼吁在当时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抛开《大雅》和《颂》廉价的歌颂，其他诗篇的思想境界非常纯净博大，基本涵盖了社会道德层面的所有范畴，有爱，有恨，当然也有孝。

孝是什么，很简单，孝顺父母，礼敬长辈。在中国古代的道德体系中，“孝”本来是排在“忠”前面的，后来统治者为了治下万民对自己

卖命，变成了“忠孝”，甚至将“忠”与“孝”对立，说什么忠孝不能两全。

《孝经·三才章》开宗明义地讲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孔子说的。在《圣治章》中，孔子再次强调“孝”的重要性，“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对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五刑章》中，孔子奋声疾呼“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认为，世界上最罪大恶极的事情就是对父母不孝，特别是那些弑父弑母的人，更为法律人伦所不容。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一定有亲生子女，但一定有亲生父母。《孝经》大力宣扬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对中国历史影响极大，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孝者即为兽行，天可诛之，地可绝之。

五〇 《诗经》的魅力

（下）

《诗经》中多以民风诗为主，反映孝道的作品不多。但其中有一篇，论艺术感染力，论给人们带来的心灵震撼，论催人泪下的程度，在诗三百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就是《诗经·小雅·蓼莪》。

全诗如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谷，我独不卒！

《蓼莪》有一点特殊之处在于，虽然这首诗是孝子感念父母养育之恩，但该诗的立意主旨，却是控诉统治者的残暴。通过此诗来展现一个孝子浓浓的思亲之情，所以后世作注者多把此诗归入讽刺诗，比如《毛诗》就说《蓼莪》“刺幽王也”。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蓼莪》讲的是一个农家孩子被官府征兵

入伍，不得不离开父母，去异地服役。后来从家乡传来噩耗，父母已经亡故，士兵站在河边，看着随风摇荡的芦苇，哭诉着对父母的思念，以及未能在二老面前尽孝的自责。这首诗行文流畅，感情真挚，感人肺腑，非大手笔不能出此。

《蓼莪》没有用太多的情景铺垫，就直接切入思念父母的正题。前两段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生我劳瘁”。我们会联想到一个场景：白发苍苍的父母，腰弯背驼，在烟熏火燎之间品尝着生活的艰辛。

孩子长大后，会因为各种原因抱怨父母。我们总认为向父母索取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很容易忽略父母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是何等的不易。有句话说得好：“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等孩子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后，会更深刻地体谅父母的辛苦。

第三段是讲对父母离世的彻入骨髓的痛，“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接下来紧跟一句：“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看着让人心酸，父母都不在了，无依无靠的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

经过前面的铺垫，诗人的感情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激动，高潮即将到来。

第五段是《蓼莪》最精彩的段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这一段并没有用直白的感情抒发，而是客观描述士兵还在襁褓的时候，父母抱着他的场景，可谓字字深情，情感表达反而更加强烈。

如果换成白话文，就是“父亲生下我，母亲抚养我，你们爱我养我，抚养我长大，教我做人，出门抱我。”天下的父母之爱是相通的，不论古今中外。除了一些不幸的婴儿，大多数人都被母亲柔软温暖的身体抱过，能嗅到母亲身上那股深沉而博大的母爱。

当士兵流着眼泪讲完他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时，突然情绪失控，仰天哭喊“我想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可他们现在在哪里！苍天可恨！”虽然后面还有两段，但感情已经基本平复，算是给这首感情饱满真挚的孝亲诗实现了软着陆。

历代诗评家对《蓼莪》的评价极高，其中以清晚期的诗评家方润玉的评价最有代表性，方润玉在《诗经原始》卷十一中，称《蓼莪》是“千古孝思绝作，尽人能识”。甚至可以这么说，《蓼莪》在历代孝亲诗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三国演义》在通俗小说中的地位，当得起开山鼻祖。

一向提倡孝道的孔子对此诗极为推崇，说“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自此之后，“蓼莪”也成为孝子的别称，后世许多诗人都在自己的诗篇中用到了“蓼莪”一词，比如在曹植的五言诗名篇《灵芝篇》中就写道：“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退咏南风诗。洒泪满怀抱。”唐人牟融在《邵公母》中也饱含深情地歌颂母爱的伟大，“伤心独有黄堂客，几度临风咏蓼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著名孝子故事集《二十四孝》中，也有“蓼莪”孝子的一席之地，就是著名的“王裒闻雷泣墓”，排在《二十四孝》最后一位。

王裒是魏晋人，其父王仪是司马昭属下司马，因事被司马昭杀害。王裒痛恨司马昭，终生不为晋臣，在父亲墓前筑庐教书。每天早晨和傍晚，王裒都要给父亲扫墓，跪在墓前痛哭流涕，泪水淹湿了墓前的树木，树为之枯死。

后来母亲病故，因为母亲惧怕雷声，每次天空打雷，王裒都来到墓前对着天空大喊：“有儿在此，阿母莫惊。”因为思念父母过度，王裒每次读到《诗经·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时候，总会情绪失控，失声痛哭。学生们担心老师的身体，以后读书时就把《蓼

莪》删掉了，以免刺激到老师。

王裒的孝思是天生的，并非刻意做作，以至于连性命都不要了。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家族成员纷纷逃到江南避难，王裒不忍抛弃父亲墓舍，号啕不去。后来乱兵闯到墓前，王裒动了逃跑的心思，但最后还是坚定地留了下来，“遂为贼所害”。

除了《蓼莪》，《诗经》中还有一篇悲恋父母的孝亲诗，就是《国风·唐风·鸛羽》。《鸛羽》和《蓼莪》的结构形式大体相同，都是孝子在边疆服兵役，而且起句皆借物言志。士兵看到天上飞翔的鸛鸟，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在家无依无靠，泪如雨下，悲愤地痛斥统治者的贪婪残暴：“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情义真挚，同样感人至深，只不过《鸛羽》没有过多地铺开讲述孝子之思，从艺术感染力上比《蓼莪》弱了许多。

说完了《小雅》，我们接着讲《风》。

关于《风》与《雅》、《颂》在歌颂形式上的区别，宋人郑樵在《六经奥论》中认为“风土之音曰风”，而《雅》是朝廷音，《颂》是宗庙之音，换言之，《风》是属于民间的。

《风》的正式名称其实是《国风》，顾名思义，“国”就是周朝分封的诸侯，按朱熹的解释，“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这个解释和郑樵是相近的。

《国风》共分为十五个部分，即十五国之国风，为《周南》、《召南》、《邶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一百六十首诗。

还要讲两个问题，一是作为西周和春秋前期的重要国家，《国

风》中为何没有鲁风和宋风。其实鲁国和宋国并非没有作品入选《诗经》，而是都放在了《颂》的部分里，鲁歌称为《鲁颂》、宋歌称为《商颂》。

至于原因，其实很简单。宋国是商殷子姓后裔，受周朝礼待，可以用天子礼乐。鲁国是周公姬旦之后，王国维说鲁国“亲则同姓，尊则王朝”，所以鲁国和宋国的地位较高，得以进入《颂》，与《周颂》并列。这就相当于司马迁著《史记》，把项羽放进了本纪，把孔子放进了世家，以显示他们与众不同的历史地位。

第二个问题，《国风》为何没有楚风和晋风，而楚晋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实际上《唐风》就是《晋风》，因为晋国的开国始祖姬叔虞本来封在唐国，后改名为晋。

关于楚风，实际上就是《周南》和《召南》二篇，“二南”文学覆盖的范围大致在长江流域和汉水流域，和楚国的统治区域基本重叠，近人胡适就坚持这个观点。“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排在各篇之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关雎》就是《周南》第一篇。

《国风》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四诗中最高。《小雅》虽然尽可能地接了地气，但毕竟是用士大夫的眼光往下看，有时难免带有一丝清高，更侧重于写作技巧。

《国风》是民歌合集，从底层百姓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方面生活形态，真实、纯朴、质朴，没有过于精细的雕琢，更注重原生态的释放。《国风》堪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大百科全书，大致可以分为感情生活类、社会劳动类、讽刺官府类、歌颂英雄类。

感情生活类，这类在《国风》中的比重最大，相关诗章有《桃夭》（女子出嫁）、《汝坟》（思念远方的丈夫）、《女曰鸡鸣》（夫妻的和谐生活）、《野有死麋》（男女幽会）、《绿衣》（悼念亡妻）、《木瓜》（恋人互赠礼物）、《狡童》（恋人之间产生小矛

盾)、《风雨》(夫妻久别重逢),等等。

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维系着人类生存繁衍的重大使命,甚至有人说没有爱情的诗篇是灰暗的。打开这些情诗篇,扑面而来是的一股带有远古质朴气息的真实,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依然感觉那么的亲切。

《小雅》中有几篇爱情诗,但从影响力上讲,《国风》的爱情诗更胜一筹,有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关雎》就不用多介绍了,小学生都能张口即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面讲讲几首知名度不如《关雎》,但艺术魅力同样精彩的爱情诗篇。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日渐疏远,特别是婚姻,“七年之痒”,几乎成了夫妻谈虎色变的名词。其实婚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婚姻的不自信,只要双方相敬如宾,忠于对方,就不会出现什么危机。婚姻危机,往往都来自背叛。说到夫妻和睦,我们会想到东汉梁鸿和妻子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其实要说文学作品第一例反映夫妻生活和谐的,当属《诗经·郑风·女曰鸡鸣》。

与其说《女曰鸡鸣》是首诗,不如说它是一副动态的家庭生活组画,语言生动,画面感很强。《女曰鸡鸣》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对夫妻一天的幸福生活,恩爱礼敬,让后人赞叹不已。全诗如下: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鳬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诗的开头其实是夫妻刚睡醒的一段有趣对话,看到丈夫还在呼呼

大睡，妻子摇醒了丈夫，然后指着窗外说道：“该起床了，鸡都打鸣了。”丈夫似乎还没有睡醒，揉着惺忪的双眼，反驳妻子：“你胡说什么呀，没看到天上的启明星灿烂吗？再让我睡一会儿。”妻子很可爱，她在床上做了一个射箭的动作，然后撒起娇来：“早点起来吧，一会我们到外面打几只野鸭子，改善一下伙食。”

看来丈夫已经答应了妻子的请求，妻子依偎在丈夫怀里，用轻柔的声音告诉丈夫：“等你把野味打来后，我下厨做菜，再给你准备一壶好酒。我愿意和你共品美味，共享幸福人生。我弹琴，你鼓瑟，歌唱美好的生活，就这样我们一起牵着对方的手慢慢老去。”

这对夫妻家境并非大富大贵，丈夫的职业应该是以打猎为生，生活质量并不高，但幸福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更重要。我们可以想到这样一副场景：丈夫哼着小曲，拎着野鸭回家，妻子轻轻扑打丈夫衣服上的灰尘，然后把野味拿到厨房，丈夫在旁边打下手。夫妻有说有笑，什么叫幸福，这就是幸福。

讲完《郑风·鸡鸣》，再来讲一下《齐风·鸡鸣》。二者的结构基本相同，都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夫妻在床上的对话，但《女曰鸡鸣》洋溢着夫妻恩爱的幸福，《齐风·鸡鸣》重在讽刺贪吃好睡的丈夫，有很强的视觉笑果。

根据《毛诗·鸡鸣诂训传》的解释，这个好吃懒惰的家伙是齐哀公姜不辰，也有观点认为此诗是讽刺齐襄公姜诸儿的。《鸡鸣》和《女曰鸡鸣》中的女主人公，都非常善良贤惠，天要亮了，妻子有责任催促丈夫起床，去忙营生。

所不同的是，《女曰鸡鸣》中的丈夫知道男人肩上的责任，很顺从地起床去打猎，而《鸡鸣》中的丈夫，不但不听妻子的话，反而胡搅蛮缠，和妻子打嘴仗，场面非常有趣。

还是妻子先推醒沉睡的丈夫，说：“没听到鸡在打鸣吗？大臣们

都来了，你该起床上朝了。”同样遭到了丈夫的反驳，不过这位丈夫也许天生就是一个搞笑派，他的回答足以让人喷饭，把妻子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你听错了，哪有什么鸡打鸣的声音，明明是一群苍蝇在嗡嗡乱叫。丈夫慵懒地回答完，然后翻过身去，又想继续睡觉。妻子有些不高兴了，苍蝇的叫声怎么能和鸡鸣一样，一定是丈夫不想起床。她告诉丈夫天色已经大亮，结果丈夫又无厘头地回了一句：“你看错了，那不是天亮，那是月亮的余光。”

第三段是丈夫的“反击”，他似乎不满妻子对他的催促，反而想让妻子再陪他多睡一会儿。“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丈夫说苍蝇的嗡嗡声非常悦耳，可以起到催眠作用，夫妻二人同入好梦。

面对这个懒丈夫，妻子被彻底激怒了。虽然诗中没有动作描写，但可以想象一下：妻子满面怒气，一把掀开被子，或者干脆一脚把丈夫踢下床。然后妻子做河东狮吼状：“还睡个屁！大臣们等不到你，都下朝回家了！你再这样懒散，会招人骂的，不知内情的还以为我是个狐狸精，老娘可不想替你背这个黑锅！”

关于《鸡鸣》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历来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这对夫妻不是国公与妃，只是普通士人家庭，还有观点认为这对夫妻是一对偷情的野鸳鸯。其实这对夫妻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国君也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也和普通人一样，该懒的照样懒，该坏的照样坏。

《诗经》能被历代儒家奉为国学经典，不是没有道理的。《诗经》不仅是一部质量优上的文学作品，还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百态的史料集，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华夏先民的文学创作思路，对后世的文学、美术、音乐，乃至政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才是《诗经》留给后人最大的价值所在。

说到《诗经》对中国美术史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及一首极为著名

的诗篇，就是特别受文艺青年追捧的《诗经·秦风·蒹葭》。《蒹葭》是诗经中最富有“小资情调”的一首诗，意境之朦胧、视觉之丰富、感情之幽深，历代诗中无出其右者。有观点认为，《蒹葭》是中国朦胧诗的鼻祖，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对于《蒹葭》的解读，《毛诗》认为这是讽刺秦襄公嬴开不用贤人的，实在有些牵强。西汉的道学先生们从来不用爱情的视角来审读《诗经》，动辄讽刺这个国主，讽刺那个夫人，现代人看历史的角度与古人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更愿意从人性的角度来解读历史，对《蒹葭》同样如此。

《蒹葭》基本上被现代人看作一首让人动情的爱情诗篇，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这首诗的第一句就让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被带入一幅动态的水墨画中，随之悲，随之喜。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初冬的清晨，长满芦苇的河边，白露点点滴滴在芦苇的叶上，晨风轻拂，芦苇摇荡，河水轻轻地流淌。有一个男人站在岸边，透着河上泛起的轻薄雾气，痴情地望着对岸，他似乎发现了一个长发飘散、素衣轻盈的女子，漂在清澈的河水上，在雾气朦胧之中，看不真切。”

这已经不是一首诗了，这是一位画者在宣纸上尽情泼洒着墨香，几笔连下，遂成千古巨制，让人爱不释手。近人王国维对这首诗推崇备至，他在《人间词话·卷上》中说过：“《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以《蒹葭》笔下之美，当之无愧。

北宋词人晏殊那首著名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借用了《蒹葭》的意境，但按王国维的说法，《蝶恋花》意气悲壮，不如《蒹葭》洒落轻盈。

其实，要说意境与《蒹葭》最为相似的，并不是晏殊的《蝶恋

花》，而是三国第一才子曹植那篇感动千古的《洛神赋》。《洛神赋》之所以能打动人，大致有两点，一是曹植对甄洛割舍不下的感情，二是赋中缥缈朦胧的情景描写，读之仿佛置身于仙境中。河水中升腾的雾气，影衬着一位美丽女人的忧伤，打湿了诗人的心扉，也感动了读者。

虽然《蒹葭》是诗，《洛神赋》是赋，但二者的精神内核是相同的，充满了彷徨和忧伤，而且主场景都发生在河边。从曹植悲剧性的人生来推测，《蒹葭》的诗人也应该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士大夫，只能写诗以歌志。“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他们个人的不幸，恰恰成就了后世读者们的幸运。

历史中国

——前475—前221

战国

原来是这样

张枥◎作品

高光的主角背后，
谁在暗中操盘？
三个人的铁了心，
灭的就是你！
连横合纵，
大国博弈，
赵国打得起这仗这一仗吗？
拖不起的赵国，到底错在哪里？
秦国人，是来玩命的！
带你真实地走进一个跌宕起伏，
征伐血气的战国时代！
一有钱，一有人，楚齐一拍即合，
借他人之手，搬掉东边的大磨盘。
东西对峙，
齐秦争霸！
充满无限可能、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历史中国

——前475—前221

张颖◎作品

战国

原来是这样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录

- 一 春秋这样变成了战国
- 二 借壳上市，田氏代齐
- 三 韩国变法，为啥没能走向强大
- 四 春秋时代的小国，战国开始后都去哪了
- 五 要变法，学李悝
- 六 吴起的辉煌与失败
- 七 齐国“奸臣”，一代名相
- 八 最成功的只能是商鞅
- 九 连横合纵，大国博弈
- 十 楚国为啥会衰落
- 十一 华夏骑兵宗师
- 十二 谁能拯救长平
- 十三 东西对峙，齐秦争霸
- 十四 燕国改革，一场昙花一现改变战国历史
- 十五 最后的君子：信陵君
- 十六 最后一次合纵
- 十七 最后一个公子也走了
- 十八 韩赵魏的衰落
- 十九 就这样一统天下
- 二十 秦始皇错了多少
- 二十一 科技革命改写战国历史
- 二十二 战国商业：和战争一样热闹
- 二十三 要强大，修水利
- 二十四 没有战车的战国
- 二十五 法家宗师韩非子
- 二十六 最后的辩者：鲁仲连

[二十七 稷下学宫，东方的雅典学派](#)

[二十八 衣食住行说战国](#)

[二十九 墨子的神秘与强大](#)

[三十 被欧洲人追捧的农家](#)

[三十一 战国兵家那些事](#)

[三十二 战国的官职都怎么叫](#)

[战国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一 春秋这样变成了战国

我们这本讲战国历史的书，自然要从战国的起始年头说起。

可偏偏就是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在历史学界却充满着各种争议。作为东周列国时代中最高潮的一段，战国究竟起于哪一年，放在不同的史料里，却有好几种说法。

比较通用的说法，就是司马迁《史记》里的观点：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元王元年。之所以定在这一年，主要还是为了尊重周天子权威。

而宋朝人认同的说法，则是吕祖谦《大事记》里的说法：公元前481年。这是孔子作《春秋》的终结年份。在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封建社会，这一划分方法也十分流行。

当然宋朝的司马光并不同意，他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把公元前403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之前那么多折腾，都算在了春秋年间。直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了韩赵魏三国的诸侯身份，等于扒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才意味着战国的开始。

当然依照清朝许多学者的说法，公元前453年才是战国真正的开始：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确立了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标志着战国时代正式形成。

同一个时代，为啥被划分成不同的起点，只因在不同年代的史家眼中，战国与春秋之间，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前一代人看不懂的变革，着实太多太多。

但无论哪一种划分，一个真相无可争议：这是一个有别于春秋时代，几乎堪称全新的时代，中国历史将在一场剧烈的厮杀中，完成一次至关重要的浴火重生。

战国就是打

不管怎样划分，战国这个年代，最主要的标志就一个字：战！

而且和春秋年代最大的不同是，春秋虽然不乏战争，但列国诸侯名义上是都还是周天子的臣子，因此讲的是春秋礼数，哪怕是规模惊人的争霸战争，争的也主要是名分。

发展到战国年代，这条才是最大的不同。为什么很多史家眼里，韩赵魏瓜分了晋国，或者田氏取代了齐国，往往被看作战国的开始？那是因为在春秋年间，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春秋时代任何一个强大的霸王，都可以肆意凌辱周天子，但绝不可能取代周天子一样。从大国到小诸侯，春秋时代也没有一家权臣，可以名正言顺地取代原有国君。这基本的尊卑礼数关系，到了战国就彻底没有了。

自家国君，说废就废，自家国君的土地，说分就分。春秋时代大逆不道的事，却在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中，表现得毫无负担。照着教科书里通用的说法，这也就意味着，旧有的奴隶主贵族制度，正在走向瓦解中。

自家的争斗，都能如此地你死我活，国与国的争斗，自然更加凶狠惨烈。

其实“战国”这个称呼，在最初的中国史料里，并不是指这个年代，而是指这个年代七个主要争雄的大国。就如《战国策》里所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对这个年代，一开始《史记》上的称呼，

也只是叫“六国之时”，直到西汉《战国策》之后，才开始有了这个叫法。

从称呼国家，到指代这个年代，真正开始这一称呼，还是到了《汉书》上，有了“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一句。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史家论及这段历史，都开始以“战国”来指代。

战国者，正是此时热衷于兼并战争的七大强国：“秦楚齐燕韩赵魏。”

这段列国争霸的历史，论规模和惨烈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之前所未见，而如果再计算上人口与伤亡比率，它的剧烈规模，甚至要远远超过这以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乱世时期。

对比春秋时代，这个全新的战国年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对待战争的态度。以春秋时期的通用说法，国家的大事就两件：祀与戎。也就是祭祀和打仗，而到了战国年间，所有的大事，都是以战争为中心。列国的变法，用人，改革，为的只有一件事：打赢！

孟子的一句话，足以概括当时战争的凶残程度：“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如果再对照一下《史记》，就知道战国时代的战争，惨烈到何等的地步：比如大名鼎鼎的秦国名将白起，亲自指挥的四大战役，杀敌数量就在一百万以上。而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也不过两千万上下。

如果说春秋年代，列国间还有一层温情脉脉的礼节，那么在战国时代，这已彻底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厮杀。

厮杀的主角，正是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大强国。对比春秋年代来说，表面看这其中有熟脸，比如秦楚齐燕，也有生脸，比如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但事实上，无论生脸熟脸，比起春秋时期的他们，这时的七雄早已大不同。

以教科书的说法，这是中国奴隶制制度崩溃，新兴封建制度勃兴的时期。因此能在这历史时期存在下来的国家，都必然做出了巨大的改变，有的像秦国一样变法，有的像田家一样代齐，有的像韩赵魏一样分家。但无论怎样做，目的都是一样，就是要脱去旧日奴隶制制度的外壳，全力向着封建制度狂奔，只有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才有资格在这场角逐中角力。

而作为这个年代里的主角，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在这个热血时代开始初期，版图力量也都各自有了不同的变化。

首先从分完家的赵魏韩三国开始说起。

赵国分到的，是晋国当年北方的主要国土，包括山西吕梁山以西和山西北部与东南部，往南还占有了今天河南、山东、河北的部分领土。地理位置十分好，却摊上了好几位强悍的邻居，比如东北的中山，西北的楼烦和林胡，参考下西汉历史就知道，全是赫赫有名的强悍游牧民族，后来又崛起了强大的匈奴，一直不消停。

但这块地除了给赵国找麻烦，也送了个大礼物，例如北面的代地，不但是战国时代的良马产地，更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战马孵化地，堪称中国骑兵的摇篮。因此胡服骑射发生在赵国，丝毫不意外。

相比之下，魏国的运气表面要好一些，分到了陕西东部至河南河北的大片地区，全是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宝地，可战略位置就悲催了，号称“四战之地”，夹在齐赵秦楚四大强国中间，等于是被挤压住，极容易被包围痛打。

但对早年的魏国来说，这真不算个事，魏国自从分家之后，就是三家里最为自强的一家，首先启动了伟大的变法运动，率先实现了变法图强，坐上了早期战国列强里的头把交椅，且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几乎到了战无不胜的地步。四战之地？它不打别人就谢天谢地，这段光辉历史，后面会详细讲述。

而其中相对较弱的，就是韩国，韩国一开始分家，运气就十分不好，分到了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地区，不但国土狭长无险可守，国力也十分贫弱。所以在整个战国年代里，韩国都是最弱的一家，它不是挨打的对象，而是跟在人家后面做小弟。但韩国也吃柿子拣软的捏这一套，尤其是灭掉了郑国，奠定了自己的大国地位。

而这三家的老邻居，就是春秋晚期曾与晋国争霸的齐国。

齐国的特点是换了马甲，虽然还叫齐国，但已经由当年的姜氏齐国，变成了这时的田氏齐国。田氏继承的除了国君的名分，更有强大的家业，齐国资源丰富经济实力强大，国土在田氏代齐的演变中更加膨胀，领土包括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和今天河北的一部分，尤其是把春秋时期的大国鲁国，吞并得只剩下几个小城。它有地有技术有钱，这时候的齐国，正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在战国初期，其与新崛起的三晋国家，也开始了相爱相杀的历史。

而另一家与三晋关系密切的强国，就是西部的秦国。

在后人的印象里，秦国在战国早期，国力一直相对薄弱，直到商鞅变法，才真正实现了自强。

而事实上，商鞅变法以前的秦国，一点都不弱，国土的膨胀尤其厉害，战国早期已经占有了关中平原和甘肃部分地区，领土十分广袤，治下民族更十分复杂，以华夏族为主，却也兼有各类少数民族。

但秦国比起中原来，最弱的一条却是经济。虽然坐拥物产丰富的地区，但是经济技术和制度却严重落后，生产力更是极其不发达，反映到战场上，就是战争的支持能力极差，秦国在战国早期的战争剧本，就是一开始尚能取胜，但没赢几次，就粮草接济不上，然后就被入痛打，相似的狼狈，复制了好多回。

早期欺负秦国最厉害的，就是魏国，自从魏国强势崛起后，就把

秦国当作了提款机，隔三岔五就要来打一把，打得秦国完全丢掉了西河之地。也正是这般的狼狈，才逼得后来秦国痛定思痛，决心变法。

但要问从春秋到战国，有谁一直保持国土最大的纪录，答案就是楚国。

楚国对比当时北方各国，堪称是战国早期最为嚣张的超级大国。楚国的国土包括了今天河南南部和湖北全部，包括湖南、江西、安徽等部分地区，到了春秋战国之交，楚国更干脆吞并了吴越两国，实力扩展到今天的江南地区，以《史记》的说法，就是“南吞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可以说，当时的楚国，以国土面积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

而要问当时七国之中，谁的国土面积是最接近楚国的，答案恐怕出人意料，并非齐秦这样的传统强国，相反却是一个传统弱国：燕国。

燕国在整个战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被欺负的，但它的国土却十分广袤：既拥有包括今天北京在内的河北地区，更有辽宁西南部，与东胡部落接壤。就像楚国通过吞并百越扩展领土一样，燕国也曾经北击东胡，极大地扩展了自家的实力范围。

从这七个国家的实力说，我们不难看到能成为“七雄”的准入标准：国土面积至少得千顷以上，军队数量更要“带甲数十万”，像楚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更要有百万以上的兵力。战国轰轰烈烈的争霸，就在这七个战争魔兽之间展开了。

这些事情都变了

战国的主旋律就是打，但是对于主要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改变，

却不只是战争。

为了能在这弱肉强食的时代里生存下来，列国除了整军精武，就是要变法图强。不变法的国家，不是被推翻，就是被吞并，而变法的结果，却是让这些原本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外壳之下的各种制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有了解这些改变，才能更清楚地了解战国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各个国家的官僚制度。同一类国家，比如齐国秦国楚国，其主要官僚运转制度，从春秋到战国时代的变化，套老百姓的俗话说，真叫“老母鸡变鸭”。

在春秋以前，特别是西周时期，中国的主要官僚制度，就是世袭制。贵族永远是贵族，贵族的儿子生下来就是贵族，大小官职都是世袭继承，老爹过世儿子来，以文言文的说法，叫“世卿世禄”。

这样的制度的改变，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先是一些有实力的卿大夫，开始有了家臣，然后就是一些破落的贵族离开原先的家族，外出闯世界，凭借自身的才能获得任命。但在当时的年代里，这样的情景还是非主流。

而到了轰轰烈烈的战国变法年代，新型的用人制度更成了大潮，所谓的世卿世禄，更成了浮云。各国的主要人才，外来人才极多，其中草根出身的尤众，“举贤”的理念取代了往日的世袭，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才有了更多出头的机会，搅动了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而在各国掀起的变法狂潮中，大家殊途同归的一条，就是确立新的用人制度，废除往昔的世袭制度。以清朝历史学家赵翼的说法，战国时期诸如苏秦、张仪成功与否，商鞅这类人物，他们的功过是非有待评判，但公认的一条贡献，就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布衣为相”的先例。而比这些草根上位已属以往不能想象，而各国官僚制度的改变更

是更翻天覆地的。

首先直观的一件事，就是将相分立。最典型的代表，比如“将相和”的典故，老将廉颇向藁相如负荆请罪，留下千古美谈。但实际上这样的千古美谈，也就只能是自战国起才会有，因为之前的春秋时代，将相的职权，基本都是不分家的。

从战国开始，除了楚国之外的几个主要国家，政治制度都有一个类似改革：专门设置了负责行政事务的相和负责军事的将，这也就是“将相”关系的由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战国时代，相的称呼往往是叫“相邦”，直到西汉开国，为了避讳汉高祖刘邦，才改成叫“相国”。今天很多战国题材的电视剧，管吕不韦之流叫“相国”，分明就是要把刘邦穿越来的节奏。

随着这两个部门的分离，相关的新型配套部门，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比如秦国和赵国，就有了掌握财政的内史，赵国的都尉负责管理人事任免，韩国的少府，除了管理税收，还要负责武器铸造与研发。而在武将方面，将军之下也有各种尉职，用以辅佐军务，这类新型官职，对于两千年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影响都非常深远。

与新型官职相对应的，就是新型的官吏任免制度。

战国时期还没有科举，但这并不妨碍草根阶层的出头。国君选拔人才的方式，除了举荐还有招贤，比起春秋时代的世袭制度来，这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的任免权力，完全掌握在国君的手中，特别重要的一条是，国君通过授印来授予官员权力，因此从战国起至清末，官员倘若丢掉官印，都是几乎要掉脑袋的大事。

同样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俸禄制度。

战国时期的官员工资，通常都是用谷物来支付。各国的工资标准也不同，比如在魏国做相国，基本就是“食禄千钟”，标准高工资，齐

国相对更大气，齐宣王当年为了挖孟子，许了“万钟”的高工资，但还没留住人。

而除了这种直接支付外，还有一种福利，就是封地。战国有很多高官，在获得官职的时候也获得了封地。可和春秋时代不同的是，大多数官员，对于封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继承权，一旦任期到期下课，封地也大多要原样交回。以韩非子的说法，就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这个关系的改变，才是跨时代的。春秋时代的国君和大臣，虽说是上下级，但彼此却是一种世袭的关系。到了战国时代却不同了，国君和大臣已经是一种完全的雇佣关系。以前是吃祖宗的饭，现在要吃国君的饭。国君说话，比起春秋年代，真是胆大气粗。

而胆大气粗的国君，做另一件事也就得心应手：考核制度。

既然吃着国君的饭，那么就要被国君管，不再世袭的士大夫们，命运也从此被国君捏住。

而官员考核制度，也因此发生变法，掌握考核大权的，首先是相，也就是“相邦”，但除了少数几位权倾朝野的人物，绝大多数的相邦，都是直接对国君负责。以荀子的说法，列国每年都要由相邦主持，对官员进行考核，而考核的结果判定，则完全由国君来主持。这在春秋时期，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战国年代，对于地方官来说，这种考核也有一个名称：上计。“计”就是统计的簿册，上面记载着田产、人口、土地等事项，年初时做好规划，年终时由国君一一对照，进行考核。这样的考核模式，也沿用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

也正是从这样的改变里，我们不难看出战国时代战争扩大的重要原因。比起春秋时代的集体负责，话语权更大的战国国君们，自然可

以放开手脚，为争霸兼并大打出手，每个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指挥效率，比起春秋时期，可谓高速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高速运转中，战国时代轰轰烈烈的争霸大戏开场了。

而比起三家分晋之类的爆炸新闻，真正催动战国早期战争大戏的，却是另一个劲爆事件：田氏代齐。

二 借壳上市，田氏代齐

在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巨变下，最常见的景象，照教科书的说法，就是旧的奴隶主阶层崩溃，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把持各诸侯国大权。崩溃的方式，也五花八门，最惨烈的当属晋国，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家分晋。

所谓“三家分晋”，即在晋国国君有名无实的局面下，通过内战的方式，由韩赵魏三大家族联合灭掉了最强的智家，瓜分了晋国的土地。晋国，这个春秋时期一直作为南北争霸“两极”存在的大国，也因此不复存在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原本晋国的土地上，崛起了韩赵魏三个国家，在战国争霸的历史上，这三个国家都是“战国七雄”之一。

说起“分家”的过程，那是十分惨烈：一开始，是先分成了智韩赵魏四大家，可偏偏实力最强的智家掌舵者智伯瑶，继承的实力一流，但本人智商却未流，非要人心不足蛇吞象，要并吞其他三家领土。为了杀一儆百，智伯瑶先拿最不听话的赵襄子开刀，公元前455年，他带领其他两家组团围了赵襄子老窝晋阳。接下来的事情，就堪称惨绝人寰：晋阳被三家联军，足足围困了两年多，全城战死饿死无数。智伯瑶偏偏缺德到冒烟，还把晋水给决了，来了个水淹全城。但饶是这样，却非但没有逼降赵襄子，反把其他两家韩康子与魏恒子看得心惊肉跳：对他这么狠，接下来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

这样一心惊，立刻就心有灵犀，反而是韩赵魏三家背地联络上，一齐朝着智伯瑶反戈一击，不但把智伯瑶打得全军覆没，其领土更被尽数瓜分。而后的事情，就是趁热打铁，晋国其他的土地，陆续被这

哥仨瓜分完毕。到公元前403年，干脆派使者去见周威烈王，正式取得了册封，把春秋的老牌强国晋国，就这样变成了历史名词。

这番惊动列国的裂变，是无数次尸山血河的惨烈战争换来的。但比起如此惨烈的战斗，齐国的变化却相对温和，而且结果也比晋国更好。也是以旧国君被废黜为结果，却并没有出现如晋国这样的国家分裂局面，代春秋时代姜氏而起的田氏，不但顺利平定了齐国其他诸侯势力，抢班夺权成功，齐国的国土也并没有因此而分裂，统一的齐国，反而比春秋时代更为强大，一度成为与秦国争锋的两强之一。

相比于晋国的分裂，这种更特殊的抢班夺权方式，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

外来户田公子

要了解田氏代齐的来龙去脉，得从事件的主角——田氏家族说起。

对于齐国来说，田氏家族其实是个外来户，田氏家族本来姓陈，是春秋时期陈国国君的后人。因为陈国发生变乱，他们避难到了齐国，此后几经发展，成为齐国的重要宗族之一。

虽然田氏家族是难民，但在公元前672年，他们逃亡到齐国时，一个恐怖的流言，就曾让整个齐国惊悚。当时的田氏祖先，就是陈国公子陈完，早在陈完出生的时候，就有算命先生为他算过一卦，大体意思是说这个孩子的子孙将来要建立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会在陈国之外，按照卦象的指示，这个国家的诞生地，就是齐国。

但对于这个流言，当时齐国国君齐桓公，却表示毫无压力，且对陈完很器重，任命他为管理百工的公正。在这个职位上，传说中将闹

出大动静的陈完，表现得十分低调，一直夹起尾巴做人，工作兢兢业业，待人接物谦虚有礼，很快在齐国站住了脚。

但站住脚的陈完，这时也不过是个小人物，而真正确立他在齐国贵族地位的，则是靠娶媳妇——和齐国宗族懿仲的联姻。

作为齐国宗族的懿仲，之所以要把女儿嫁给这个低调的家伙，同样也因为一卦。这次他们请的算命先生，似乎比当年陈完家更专业，不但做出了相同的判断，连时间表都算出来了：这个陈完的子孙在五代之后就要昌盛发达，八代之后其在齐国的地位，无人可比。

如此震撼的卦象，彻底震撼了懿仲！嫁！

就这样，改为田姓的陈完家族，从此确立了和齐国王室的姻亲关系。

虽说有了贵族身份，但之后这家的几代人，也一直没有显山露水，因此日久天长，这个曾经被津津乐道的预言，也就成了笑话一件。可事实证明，这个卦是很靠谱的，到了陈完身后第五代，相关的事情开始应验了。

田完的五世孙田须无被齐庄公册封为正卿，这个家族也因此取得了在齐国国内和高、鲍等世家大族平等的高贵地位。田须无去世后，他的儿子田桓子继承了爵位，此人，正是田氏代齐过程中的一大关键人物。

田桓子继承爵位的时间，正是曾经强大的姜氏齐国，一段公认极乱的时期。当时的齐国，连续遭到内乱。先是国君齐庄公被权臣崔杼杀害，接着大权独揽的崔杼，嚣张了没几年，又被另一大权臣庆封杀掉。然后，就到了田桓子的表演时间，他与晏婴等人联合，推翻了庆封的专权，稳住了新国君齐景公的王位。

这之后的一段时期，是姜氏齐国最后风光辉煌的年代。齐景公任

用贤相晏婴，几十年来励精图治，意图重新恢复齐国的霸主地位，齐国的经济、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而比起对外称霸来，权力欲极强的齐景公，也十分重视对内的威权，在吸取了当年齐庄公被杀的教训后，他对齐国的传统豪门家族，一直保持极强的警惕，稍有风吹草动，立刻残酷打压！

要干这霸道事，仅靠他本人不行，于是根基极浅的田桓子，就成了齐景公一度最信任的打手：公元前532年，齐景公借田桓子之手驱逐了此时把持齐国大权的栾、高两大家族，并且迅速平定掉他们的残余势力，为齐景公立下头功，也踢开了田家夺权之路的第一块绊脚石。其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开始蒸蒸日上。

就这样，如同黑马一般蹿出的田桓子，就成了齐国国内炙手可热的新贵。

而比起这节节高升的权位，田桓子做得最成功的，还有生意。

齐景公在位时期的春秋时代，是弭兵之会结束后的暂时和平期，中原诸国的战乱大为减少，各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政和发展生产上，齐国尤其如此。

但田桓子最成功的，是极接地气，立刻采用了新兴封建制度的发展理念：采用减轻租税的方式，招募农民前来投奔，特别是在收租子的时候，他特意设计了一套新工具，采取“小斗进，大斗出”的方式，给老百姓以实惠，这和当时齐国旧贵族的残酷剥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齐国的老百姓们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一时间“归之如流水”，他的这些做法，一方面迅速增强了家族的实力，积累了后来颠覆齐国政权的本钱；另一方面大批的老百姓宁可逃亡，也要附身在田桓子的门下，这些老百姓，在当时叫作“隐民”，他们的逃亡，使得齐国能够缴纳赋税的老百姓数量大为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齐国

政府对财政的控制权，从此都大为削弱。

而比起一心苦心经营的田桓子，齐景公却显然放松了，他这时期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对外重树霸权上，公元前530年开始，齐景公首先通过外交手段，和晋国、楚国等国国君接触，公元前502年，齐景公在经过了几十年准备后，终于同晋国开战，齐国以猛虎下山之势，一举拔除了晋国重镇聊城，之后迫使晋国的盟友鲁国与齐国结盟，北方的局势，形成了齐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这之后的12年里，齐景公通过扶植晋国权臣傀儡，以及主动进攻的方式，数次发起对晋国的战争，虽然节节胜利，但仅仅加剧了晋国内部的分裂，始终没有彻底战胜晋国。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这位齐国国君在位的五十七年，前半段休养生息，最后十年大打出手。十分的霸气风光，但他不曾想到的，就是在这风光之下，田桓子一脉势力也在悄悄坐大。

虽然田桓子先于齐景公过世，但这样的疏忽，却还是立刻让齐国尝到苦果。田桓子的儿子田乞，是个精明能干不亚于他父亲的人物，齐景公尸骨未寒，田乞就联合士大夫发动政变，驱逐了齐国从齐桓公开始确立的两大宗族——国氏和高氏。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政变的成功，源自田氏得到了当时临淄“国人”的支持，田家几代收买人心的举动，这时候开始得到回报，不但诸多士大夫倒向他们一边，城中的百姓还自发地帮助他们。政变成功后，田乞拥戴齐悼公即位，自封为国相，从此把持了齐国的大权。

图穷匕首见

田乞成功夺权，拥戴齐悼公，是田氏代齐的开始，但是这时候的田氏，距离夺取政权，却还有一段路要走。

此时的齐国，齐悼公完全倚重于田乞。但是国内的旧宗族势力仍在，田氏虽然控制了军事、经济、政治大权，却还不能任意行事。特别是各种重大决策，虽说国君越发没存在感，可也要靠国内各宗族集体决定，各个家族间的钩心斗角，更是十分多。但田家的力量，却是蒸蒸日上。

当然这时期最不甘心的，还是已成傀儡的齐国国君们，但是他们的反抗，也是越来越有限。

齐悼公做了四年傀儡后，被鲍氏杀死了，而田乞也在同时期过世，田氏的下一个掌舵人，就是姜氏齐国的真正掘墓人——田常。

田常如何掘了姜齐的墓？还得从齐悼公过世后说起。这堪称齐景公去世后，姜氏国君最后一次权力反弹。

齐悼公过世后，即位的齐简公，是由当时的齐国宗族共同推举上去的，比起前任齐悼公来，齐简公的权力要大得多，这时候继承爵位的田常，被齐简公任命为右相，依然属于掌握大权的人物。可是担任左相掣肘他的，就是另一个官员监止，这时期的齐简公雄心勃勃，意图解决田氏尾大不掉的问题，而田氏多年来大权独揽，也引起了许多旧贵族的不满。一股反对田氏的暗流，正在形成。

更让齐简公感到惊喜的是，这位传说中强大的田常，似乎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举手投足都彬彬有礼，对自己更是尊敬有加，根据一些眼线的汇报，这人私底下更极度悲观，经常感叹自己恐怕熬不过去了啥的，宛如日薄西山。

不但齐简公这样看，很多旧贵族也是这个判断，在经过了多年风光后，已然成为众矢之的的田家，其风光之路似乎要走到头了。

但做这个判断的人，显然没有了解田常。田常何尝不知道此时局面的凶险，但就当时的发展来看，老天最眷顾田家的，就是这几代

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田常就是这样，齐简公登基后的四年里，一面延续了祖父收买人心的政策，继续通过减轻租税，在封地内实行仁政的做法，招揽大批百姓前来投靠。而比他祖父父亲两代做得更出色的，就是他加强田氏宗族内部的团结，整合田氏宗族的力量。对田氏宗族里的杰出人物，他也广泛招揽，委以重任，很快形成了一套更加强大的政治班底，如果说在他之前的田氏历代英杰们，都是通过联合旧贵族的方式一步步扩大权力的话，这时期的田氏家族，已经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了。

于是，就在田常表面的隐忍下，齐简公放松了警惕，诸多贵族们也把心放到肚子里，很多紧锣密鼓针对田家的阴谋，也就因此慢了半拍：既然田常如此颓废，不妨等他自然死亡。

正是这样的犹豫，让姜氏齐国错过了这最后哪怕理论上的救命机会，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惊天巨变。

公元前481年，图穷匕首见的时刻终于到了。

田常于是年夏天发动了政变，对齐简公展开了攻击，其实这时候田常完全属于“赌一把”。当时忠诚于齐简公的大臣以及军队还是很多的，只要齐简公能够当机立断，集合所有反对田氏的力量发起反扑，这时候的田氏还是无力对抗的。

齐简公的反应起初很果断，准备亲自主持镇压叛乱，宣布田氏的罪状，但临近行动的时候却犹豫了。毕竟田家树大根深，而且现在又是抱团决死一战，关键时刻，横的怕不要命的，田家这一刻正不要命，而齐简公却退缩了。

其实田常当时的态度，远没齐简公想的强硬，相反出人意料地^屎。当监止率领的政府军向他进攻时，田常抵抗不力，甚至想过逃命，

关键时刻他的族人田行拽住了他，要他千万不能优柔寡断。在田行的激励之下，田常索性决死一搏，带头率兵冲杀，一举击溃了监止。

其实监止的兵败，就当时的大局来说，也不过是小挫折，如果齐简公当时能整顿兵马，不说立刻击溃田常，形成相持局面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叛乱这种事情，兵贵神速最重要，时间永远是齐简公的朋友。这就好比中国足球经常碰到的局面：打平就出线。

可是齐简公的反应，却显得十分窝囊：闻听监止兵败，此时尚有力量抵抗的齐简公立刻吓破了胆，当场扔下随从们逃往滕县（今为山东省滕州市），却没逃掉，被抓了回来。田氏代齐的天王山战役，就在这样的偶然与必然中完成了。

杀掉齐简公的田常，此后又立齐简公的弟弟为齐平公，他自己以国相的身份继续掌握大权。但虽说如此，他却还没有废掉齐国国君的勇气，这事毕竟影响太大，不寻求外部支持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个时候，一个天然的朋友出现了：晋国新兴的韩赵魏三大家族。

为了赢得这哥仨的支持，田常也豁出去了，甚至连国家利益也顾不得，主动把齐国原先占有他们的土地归还给了他们。对南方正咄咄逼人的吴国，他也采取隐忍政策，主动遣使通好。

但这时候的中国，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并未完全消失，废除国君依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田常虽然大权独揽，但终其一生，也没敢走出这最后一步。

田常去世后，田氏掌握政权的局面，又持续了69年。他的儿子田盘拥立了齐宣公，孙子田和拥立了齐康公。这期间田氏的威权日益扩大，田家宗族的各类人物，已经陆续接替了齐国旧贵族地位，以新贵族的身份把持了国家大政，田氏的接班，已经是时间问题。

这个接班的时间，最终在公元前392年到来了。这一年田和将傀

傀儡国君齐康公迁移到了海边居住，随后通过与他一直要好的魏文侯向周天子上奏，要求按照三家瓜分晋国的例子，册封他为齐国的国君。公元前386年，田和正式成为齐国国君，田氏代齐就此彻底完成了。

在春秋到战国的过渡阶段，地主阶级抢班夺权的行动很多，但田氏代齐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三家瓜分晋国的行动，虽然开天辟地，但毕竟是三家权臣势力均衡的产物。以一家权臣独大的形势，最终完成一个国家从里到外的改朝换代，田氏代齐开了一个先例，它的成功，也标志着西周时期建立的宗法秩序彻底崩溃。那么，承认田氏代齐既定事实的周王室，不知是否预感到下一个事实：最终被取代的，就是周天子自己。

三 韩国变法，为啥没能走向强大

战国七雄之中，如果评选其中自始至终最弱的一家，当属韩国。比起齐国曾经战胜于诸侯，魏国曾经首霸，秦国更是后来居上，吞并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里，韩国的角色，却是自始至终未变：垫背。

最早魏国崛起的时候，它是魏国的垫背，跟在魏国后面，当了好多年小弟，占过不少便宜，也挨过不少欺负。后来齐国崛起，它们又曾是齐国的附庸，甚至书写下战国战争历史妙笔的“马陵之战”，事件的起因正是魏国攻韩，替齐国在整个战争期间生扛魏国，帮助齐国赢得出击时间的，也同样是韩国。后来秦国变法崛起，大肆向中原扩张，征服的首个对象，依然还是韩国，自从秦孝公起，就不断地把韩国当提款机，今天占地明天讹钱，好好地给秦国发展壮大买够了单。

因此说起这战国七雄里最弱的韩国，稍微熟悉战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基本除了屈辱，还是屈辱，燕国还曾有弱燕破强齐的闪光一幕，韩国却是从头到尾，基本找不到半点亮色。基本就是落后挨打。

这个贵为战国七雄之一的国家，真的就只有窝囊吗？

事实却不尽然，韩国虽然缺少横扫天下的豪迈武功，也没有齐国稷下学宫的百花齐放文化，却也同样是战国历史上，十分浓墨重彩的一环。

韩国并不弱

韩国的历史，同样也起于公元前456年，三家分晋成为既定事实时。

当时的韩国，经过了韩康子、韩武子、韩景侯几代人，基本都是惨淡经营。当初分家的时候，韩国看似国土分得不少，可是正好夹在秦楚赵魏之间，看看地图就知道，完全就是在夹缝之中生存，外部环境十分恶劣。

但更为恶劣的，却是内部斗争：特别是在公元前403年，韩景侯取得了周天子的册封，有了诸侯名分以后，韩国的建国成了既定事实，然而内部的争斗，却是愈演愈烈：既发生过相国侠累被刺杀事件，也发生过韩哀侯被儿子刺杀事件，内部就是这样各种乱。

外部条件恶劣，内部又各种乱，也就注定了韩国从开国初期，就免不了被人欺负，欺负韩国最为勤快的，当然还是秦国。虽说当时的秦国，离商鞅变法还有好些年头，还处于十分野蛮落后的阶段，而且动不动还要被魏国各种吊打，但是欺负韩国，却还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从韩哀侯在位时起，秦国对韩国的讨伐，就越发地变本加厉。公元前371年，秦国一口气就拿下了韩国六座城池，虽说韩国堤内损失堤外补，转过头来灭了郑国，还把国都迁到了新郑，但其实还是惹不起躲得起，躲躲风险再说。但是就是在韩哀侯的这段执政时期里，透过韩国年年窝囊挨打的悲惨现象，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韩国在很多地方的风光强大。

其中最拿得出手的业绩，就是韩国强大的手工业。

韩国的官营手工业，在列国里公认是极其强大的，特别是在韩国灭掉郑国，迁都新郑之后，得到的最丰厚的财富，就是郑国昔日强大

的手工业生产体系。韩国的官营手工业，涉及当时各个主要行业，最有名的就是兵器制造业，韩国的冷兵器特别是弓弩，性能和杀伤力都冠绝天下。今天出土的战国墓葬宝剑，尤其以韩国的宝剑最为锋锐。特别是后人说起秦国的强大时，最为羡慕的，就是秦国强大的弩兵，而事实上，秦国的弩正是脱胎于韩国，相当多的韩国工匠，在被秦国俘获后，直接帮助升级了秦弩的杀伤力。

而与手工业同样闻名天下的，就是韩国的商业。

被韩国灭掉的郑国，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商贸区，郑国地区的富商大贾云集，商贸活动十分红火热闹，这些红火场面，都成了战国早期韩国发展的最大本钱。尤其是回看战国历史，相当多有影响力的大商人，都是韩国人，最为著名的就是白圭，其商业经营理念，在两千年的儒商文化历史上，都有着重量级影响。

确切来说，地理优势非常恶劣的韩国，却在战国起家早期，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因此虽然一直挨打，令列国不可忽视的，正是它这强大的发展潜力。

而在韩昭侯即位后，韩国也开始了与几大国一样的选择：变法图强。

申不害变法

韩昭侯走上这条路，比起当时其他几个大国来，还是晚了很多年，但即使这样，也是被逼的，当时的韩国，已经到了不变法不行的地步。不但秦楚这样的大国，对韩国的欺负变本加厉，就连传统弱国宋国，竟然也加入欺负韩国的行列来，夺取了韩国的黄池地区。眼看再不变法，就是灭顶之灾，韩昭侯也就下定了决心：变！

战国早期的变法，基本模式都是一致：统治者下定了决心，然后找个靠谱的改革家。韩昭侯找到的人物，就是申不害。公元前354年，韩昭侯正式任命申不害为相，变法图强。

申不害，号称申子，新郑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样也是与商鞅、李悝、吴起齐名的顶级改革家。他的著作《申子》，更是法家思想上有着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代表著作。而且以《史记》的说法，这位奇人原先出身于道家学派，后来却成了法家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更是兼有道家 and 法家两者的精髓，因此自成一派，思想十分鲜明。而在获得韩昭侯重任后，一直锐意变法的申不害，也终于找到了大展拳脚的战场。

即使对于今天来说，申不害的一大别号，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法术士。其中的“法”，就是强调立法法制，即有完备的法律，确保变法的胜利进行。其中的术，则是指实现的手段，即用灵活的手腕，确保法的实行。这种手段与思想结合的理念，对于后来王安石、张居正等变法家，也是影响深远。

而放在当时，申不害的变法，首先也是从法律的修订和确立开始的。以申不害自己的话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也就是说国君行使权力，就好比用秤称重一样，法律就是秤，有了法律才能驾驭群臣。完备的立法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在这样的理念下，韩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修法运动，韩国的法令完备，哪怕比起商鞅变法来，也是毫不逊色的。

然而更可贵的是，除了立法完备，申不害更强调有法必依，法律重的不是条文，相反正是执行力。哪怕是国君，也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个人好恶玩弄法律条文，有法律就必须遵守，即使国君也不能违法。所谓“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翻译成白话，就是事实依据，法律准绳。在申不害看来，一个国家守不守法，正是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申不害的这几条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对国君权力的限制，这样的思想放在战国时期，可以说大逆不道。但为什么韩昭侯对于申不害，却是百分百地支持呢？因为在这些关于法律的坚决规定背后，更隐藏着申不害一个最讨国君欢心的思想：“术”。

所谓“术”，以堂皇的理由解释，就是实现法治的方式，但具体到申不害的思想上，其实就是指一件事：国君的专制独断。

强调法治的申不害，同时又是君主专制的绝对倡导者，在他的眼里，只有实现了国君的绝对权力，不受任何人干涉的绝对话语权，才有可能实现他理想中真正意义的法治。这个思想在他的《申子》中，被称为“独断”。也就是国君的威权，不受任何外力的挑战。所谓“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正是申不害一直在努力宣扬的“术”。

这样的思想，作为国君，谁都会百分百地欢迎。而更让韩昭侯感到高兴的，却是申不害的“术”，绝非一个空洞的宣言，相反更有实现这话语权的靠谱方式。

在申不害看来，一个国君想要说一不二，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在政治斗争中，时刻立于不败之地，归根结底，只要做好一件事：“无为”。

然而这个思想，才是申不害的变法思想中，最有别于其他任何一国的妙笔。列国的变法主张，都在为加强国君的话语权而努力，例如当时的两大强国齐国和秦国，都在以加强国君权威和职责的方式，来强化对变法的坚持，申不害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只有无为的国君，才是大有为的君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申不害解释说，一个国君最失败的地方，不是让大臣们觉得他很笨，相反恰恰是让大臣们觉得他很聪明。如果大臣们感到自己的国君

常年明察秋毫，那么他们的第一反应，就会挖空心思继续欺骗国君。只有国君摆出一副无为的面孔来，才能卸掉大臣们心头上的包袱，大臣们猜测不透国君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才会真正老老实实地为国君工作。而且和别家变法派不同的是，在“无为”这条上，申不害也确立了分工原则：每个官职都有自己的职责分内所在，大家各司其职，国君的工作不是要代替这些官员们干活，而是监督好他们，不让他们犯错误，这样整个国家的效率，才能够真正得到提升。

以《史记索隐》的作者司马贞的观点说，申不害的变法，无论成败与否，有一个效果无可非议：建立了一个封建王朝最为高效的行政运转体制，即“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而比起上层行政体制的设计来，申不害的另一个创举，就是“经济建设”。

战国时期的列国变法，经济领域的内容，基本都大差不差，几乎都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新兴的封建土地制度，纳入国家财政体系的轨道，给予保护和扶持，从而增加收入，振兴经济。

申不害的思想，也非常类似，但相对有所不同的是，他把农业生产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上，所谓“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贵土”，也就是土地是最珍贵的财富，而国家要想称霸天下，也必须“国富而粟多也”。因此在申不害当政时期，奖励农耕的政策极多，农业生产也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上。

而同样被申不害十分重视的，则是韩国的手工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韩国手工业的技术基础十分强大，而申不害的改革，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申不害的坚持下，韩国加重了官营手工业的职权，而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手工业考核体制，尤其影响后世的一件事是：每一件韩国出产的兵器，上面都标注了工匠的名字，哪个兵器出问题，立刻就追究工匠的责任，韩国的宝剑与弓弩，从此驰名天下，都是拜这严格管理所赐。

而比起李愔、商鞅等人，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话语权上，那也是相当大的，他共担任韩国国相十五年，其间文武大权独揽，除了负责行政事务，军事工作也是一把抓，他还主持了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改革，把贵族自家的私兵收归国有，和国家的兵马混搭训练，从此以后贵族没有了兵马特权，力量逐渐削弱，国君的威权大为加强。这件事当时在韩国引起的争议和阻力最大，但在申不害的灵活手腕和强硬动作下，到底办成了。

在这场痛苦的改革中，韩国的军事实力，也一度焕然升级。而申不害的个人声望，也在韩国军事改革完成后，一直如日中天。但风口浪尖上的申不害，自始至终保持的，就是对国君韩昭侯不贰的忠诚。

然而，作为申不害的领导，韩昭侯除了对申不害有百分百的信任外，更以其独特的驾驭手段，令申不害始终诚惶诚恐，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是：有段时间申不害也曾因为自己功劳不少，一度飘飘然。有一次竟然大模大样，要求韩昭侯封自己的一个堂兄做官。没想到韩昭侯却冷冷拒绝了，申不害开始还不解，甚至一脸的不情愿，但韩昭侯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吓得申不害全身冷汗：“您一直教育我不能被情绪左右，严格依法办事；您说今天这事，我要是听了您的，就违背了您的教育；要是不听您的，就让您不高兴，您说我该怎么办？”

就这一句话，申不害立刻面容改色，忙不迭地向韩昭侯请罪。从此也百分百知道，这位国君是个不容易糊弄的人物。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一直保持着对韩昭侯百分百的尊重，换得韩昭侯百分百推心置腹的信任。这个君臣同心的掌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美谈。

一肚子委屈的申不害

申不害对韩昭侯，一度底气十足，也来自于他底气十足的业绩。

以一个相国来论，申不害变法的成绩，可以说相当优秀，所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韩”，也就是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列国诸侯都不敢来欺负韩国。这十五年变法时代，也是韩国历史上难得的，不曾遭到外来侵扰的黄金时代，以业绩来说，十分的强大。

但比起同时期战国其他国家的变法来，韩国却显得弱多了。

作为三家分晋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韩国却不曾像赵国魏国那样，有过笑傲战国时代的风云岁月，最强大的表现，也不过是申不害变法时期那样，仅免于挨打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法家大师韩非子的观点，这个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申不害自己身上。

申不害改革的最重要环节，就是立法，但是其最大的漏洞，也是立法，申不害口口声声认为立法是国家重器，有法必须执行，但同样又把执行法律的关键，寄托在国君自身的威权上，这就带来一个极为矛盾的结果：为了实现国君的威权，所有严格的法律条文，都必须为国君服务，同样一句话的法律解释，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解释出不同的结果来。精心制定的法律，也就成了为国君专制服务，肆意被篡改的工具。

而更严重的后果是，申不害为了能够减小变法的阻力，并没有像商鞅、李悝那样大破大立。商鞅变法最典型，在确立新法的同时，对秦国旧有的法律基本都尽数废除；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也基本是踩着奴隶制旧规矩的尸首前进，唯独申不害弄起了平衡，他的“术”思维，漏洞就在这个地方：晋国时期的法律，在韩国都还有保留，申不害却又颁布新法，而且当新法和旧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完全就是以利益的需要，来选择偏于哪一方。这样的做法，减少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却也让阴魂不散的旧法，成了韩国进一步改革的最大负担。

然而最让申不害感到失败的是，他这样的权术，为的是减少变法

的阻力，但适得其反的是，就是这样的缩手缩脚，使本来应该成为变法保护的法律，反而在申不害过世之后，成了反对变法的最重要屏障。以韩非子的话说，当申不害活着的时候，可以按照他的意愿随意解释法律的条文，可是当申不害过世后，反对者们也有样学样，同样一条法律，今天可以支持变法，明天就可以废除变法，韩国的落后，也就在此。

但申不害对这个问题，也是一肚子委屈，以申不害自己的话说，绝不是他自己缩手缩脚，相反是对他一直毕恭毕敬的领导韩昭侯掉了链子。以韩昭侯自己的话说，就是“法度甚不易行也”。申不害一直寄希望国君可以乾纲独断，但最讽刺的事实是，恰恰是他的领导韩昭侯，是对于新法最游移不定的人物。以申不害著作里的话说，每次韩昭侯刚同意一件国策，却在左右的劝说下改弦更张，且没有了战争威胁后，韩昭侯也沉迷于享乐，变法的经济成果，基本都被他用来大兴土木，这样的韩国，可以在申不害时期保持国家安全，但距离走向富强，依然道路遥远。

四 春秋时代的小国，战国开始后都去哪了

如果把历史比作舞台，那么春秋时代的历史，就热闹得好似团体操。

虽说后人记住比较多的，还是那些诞生过春秋霸主的大国，或者齐桓公、晋文公这类风云人物，以及各种波澜壮阔的争霸场面。但如果细观历史就会发现，春秋每一个大人物的故事，甚至每一场吸引眼球的大事件，在高光的主角背后，龙套们的出镜率，也是相当高的。

比如宋国、陈国、蔡国这类的小国，这些我们看上去只是一个概念的名字，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国国君们，不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无暇注意，但只要细细注意春秋时期的历史演进，就会发现他们的戏份，实在是太过重要。就以争霸战争来说，每一次大国争霸，爆发点大多是小国惹事；每一次大国间博弈，都是先以小国间互掐为铺垫。甚至有些时候，小国们还会喧宾夺主，让大国好好吃个瘪，比如鲁国就曾打过齐国，宋国也曾生扛过楚国，让称霸天下的楚庄王都没了脾气。

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春秋历史好似团体操，那么战国时期，就是结结实实的对台戏。一直轮流唱主角的，都是几个主要大国，说起这段历史，哪怕最不熟的朋友，也张口就是“秦楚齐燕韩赵魏”，就好比电影大片，看的是主角光环。以前还抢个戏的龙套们，这下真成了人肉背景。

那么问题来了，战国开始之后，是不是真的就只剩下这七个国家，其他的小国都彻底没啦？

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在它们看似边缘化的历史中，却也深藏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了解它们的消失，也许更能理解这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越国去哪了

虽然说起战国初期的大国，我们习惯称之为“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但按照顾炎武《日知录》里的说法，应该是八个大国，除了前面七个大咖，还有一个实力足以比肩的超级强国：越国。

这个国家曾经的牛气与传奇，熟悉春秋晚期历史的朋友都了解，为了报血海深仇，那真是啥侮辱都能受，国王勾践睡过草席啃过苦胆，硬是华丽逆袭，把昔日强悍无比的死对头吴国打成了历史概念。甚至也因此有个说法：这个强悍的国家，也配得上位列春秋五霸，起码比争霸不成含恨而死的宋襄公有资格得多。

但是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在很多史料的描述里，特别是当代好些历史教材里，越国的故事就一笔带过了。曾经牛气如此，咋就说没就没啦？

其实在战国时代开始的时候，这个国家依然很牛很强大。

为什么牛？想想就知道，灭掉了传统老冤家吴国，打包全收其家当。而且越王勾践一代英主，更是打下一个雄霸天下的好家业。想不强大都难。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中原地区的大事件十分热闹，但越国的事情，虽然历史上记录少，却一样非常热闹。

勾践过世以后，越国相继传了六代君主，虽然“新闻”少了，国力却在这里摆着，和北方的齐国以及西边的楚国，既闹过摩擦，也常打交道。是中原七大豪门说起来都为之色变，从来不肯轻视的力量。

到了勾践的六世孙无疆在位的时候，也正是战国时候，几位风云人物的叱咤风云期。比如北方的齐国，正是齐威王一鸣惊人的时候，西边的楚国，也是楚威王长袖善舞的年头。七大强国各个憋足了劲，卖力求发展弄争霸，劲爆故事不断。但当时最劲爆的一件事，却正是这位越王无疆造就：公元前333年，越王无疆大举进兵，要攻打北方的齐国。

为啥要闹出这个大新闻？按照《史记》的说法，是因为越国国力日益衰弱，特别是被西边的楚国压制，空间日益缩小，于是堤内损失堤外补，悍然发动对齐国的进攻。但这时候的齐国，虽说是一代英主齐威王在位，可还正处在爬坡阶段，实在经不起这轮折腾，眼看越国是搏命而来，齐威王却灵机一动，来了一次祸水西引的妙笔。齐威王派使者劝说越王无疆：你的对头是楚国，你凭啥过来打我们，咱俩要是打得不可开交，楚国朝你扑过来就麻烦了。何况现在楚国也在对外用兵，正是你攻打楚国的好机会，打我干吗？

要说这越王无疆，也确实是志大才疏的类型，真的就掉转了枪口，冲着楚国就撞了过去，且不论到底打不打得过楚国，就这种朝夕改，胡乱拍板的军事决策胡乱调，就和后来宋徽宗联金灭辽有一拼，这种没头苍蝇一般的指挥，打得过也变打不过了。最后果然没打过，送上门去被楚国一顿暴虐，把江苏到浙江一大片土地都收入囊中。向北一直扩张到了徐州。白白给楚国送了大礼。

值得一说的是，楚国虐完了越国，便在长江边建了“金陵邑”，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而被虐完的越国，国王无疆被楚人杀死，土地被楚国大片吞并，只剩下一小块地勉强维持，就这残山剩水上，几个儿子还互相争斗自立为王，从此基本退出战国舞台。

但值得表扬的是，越国的家族们，虽说争斗不停，但扩张也不停，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他们也在南方建立了大大小小好些国家，比如闽越和百越，都是他们一系。华夏文明跨越长江界线，播撒在南中国大地，最早的军功，该记在他们身上。

不作不死的宋国

虽说连顾炎武都认为，战国七雄的划分不科学，一开始应该是“八雄”。但战国有个国家却曾认为，第八个强国根本轮不到越国，却应该是它自己。

这个国家的君王，就是宋康王。

作为春秋时代曾经举足轻重的大国，宋国的地位，自从宋襄公争霸不成身死后，基本就是打酱油，虽说也曾是夹在晋楚之间，被双方争取的力量，可到了战国年代，就连这点儿价值都一度没有了。

而且和战国时代的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一样，宋国也出了类似的折腾。史称“戴氏取宋”，也就是在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之间，宋国权臣司城子罕推翻宋桓公自立为王，从此也换了马甲。这类事情放在春秋年间，还算是个大新闻，但在战国时代，已经不稀罕了。所以流传下来，就连具体发生时间，都有不同的说法，十分不引人注目。

但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宋国最后一任国王：宋康王。作为司城子罕的弟弟，此人同样靠政变上台，把好哥哥打到了齐国去。而且比起耍阴谋的哥哥，这位宋康王却是个猛兽类型的人物，生得孔武有力，还有一身好武功，所谓“力能屈伸铁钩”，放今天参加世界大力士比赛，必然能为国争光。但放在当时，宋康王要的不是争光，而是争霸。上任之后就整顿军备，而且还开出高价，招揽了不少勇猛武士，外交手腕也鬼机灵，和秦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接受了秦国不少帮助，

成了秦国安插在中原的一枚棋子。

以秦国当时的打算，就类似狐假虎威，秦国做老虎，宋国借着秦国的威风，在中原招摇一下。没想到真执行起来才知道，宋康王可不甘心做狐狸，他要做豺狼。

从公元前318年宋康王自立为王起，这个国家就没消停过，而且出手就令中原六大国震惊了：先向东打败了齐国，夺了五座城池；接着向南打败了楚国，扩地三百里；又向西打败了魏国，几场胜利下来，天下震动。

这就好比武侠小说里，一个窝囊了很久的小子，一出手就接连打败下南帝北丐东邪西毒，江湖不震惊，肯定没天理。

但宋康王本人，却狂得更没天理，接下来出格的事情就来了：长鞭抽地，弓箭射天，还强迫着官民全喊万岁，号称自己就好像太阳一样灿烂光亮。雷人雷事不断，把周边国家鼻子都给气歪。还给了他一个绰号：桀宋。然而，宋康王自己不知道，他的强大，是建立在一个本钱上的：秦国的支持。列国对他退避三舍，不是因为他强大，而是不愿意招惹他背后的那个战争魔兽。如果他懂这个道理，至少还能把握个分寸，蹦跶的时间长一点，但遗憾的是，他不懂！

他真以为是自己天下无敌，才吓坏了列国君主们，于是扩张的速度也紧锣密鼓，挑衅的对象，竟变成了当时堪与强秦比肩的超级大国：齐国。

其实秦国扶持宋国，要的就是这目标：齐国已经成为秦国东进的最大对手，可两家偏偏又离得远，秦国也曾组织过远征，却被齐国给打回来，还叫齐国组织联军，反过头把函谷关拿下了，幸亏齐国国内当时矛盾重重，否则真险过剃头。所以为了对付这强大对手，就得在这强敌面前拴条狼狗，让它彻底分心，这样才好坐收渔翁之利，宋康王就是最好人选。

宋康王一天天地闹，齐国一次次地忍，终于等到惹了众怒忍够了，齐湣王霸气出手。公元前286年，齐国和魏国、楚国组成联军，大举进攻宋国，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宋康王，这才知道大国不是这么好当的，几下交手就被打得稀里哗啦，宋国的城池一座座沦陷，这下求和没用，割地赔款也没用，三个大国铁了心：灭的就是你。

这下宋国就惨大了，三大国的强军战车一起碾轧而来，眼看彻底顶不住了，宋康王也仓皇逃窜，逃也没逃掉，被齐国抓住后杀掉，作为周朝就建国的老牌国家，宋国就这样被瓜分了。

当然就战国历史的走向来说，宋国被灭的意义却极其重大，正是宋国的被灭，才拉长了齐国的战线，给了秦国、燕国乘虚而入的机会。宋国灭亡两年后，燕国秦国组织的五国联军伐齐，差点端掉齐国的江山。侥幸熬过一劫的齐国，也就彻底失去了与秦国争锋的实力。秦国东进中原的最大障碍就此搬开，而自大身死的宋康王，只是钓饵一颗。

昙花一现中山国

比起越国和宋国的风波，其他好些小国的灭国，却显得悄无声息。

作为周公封地的鲁国，虽说也曾在吴起的带领下，战国早年还曾让齐国吃过瘪，但总体说来，窝囊挨揍是主流，被齐国胖揍是家常事，连大本营曲阜都眼看保不住，出了曲阜以东，就是齐国的地盘，过得十分风雨飘摇。

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鲁国还是熬过了战国大部分年头，直到公元前256年，才被楚国所灭。

而另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小国，就是中山国。

这个小国在战国早期，曾是首霸魏国差点崩掉牙的硬骨头，后者狠拼硬打，才在公元前406年将其灭亡，谁知又是百足之虫一般，命着实太硬，公元前378年又复国成功。有了第二次生命的中山国，地盘在河北平山地区，也一度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国力出各地强盛，曾把邻居赵国折腾得苦不堪言。正是因为被中山国的铁骑打得太头疼，赵武灵王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胡服骑射！

在完成了这场震撼中国古代史的伟大军事改革后，一直强硬的中山国，就成了赵国胡服骑射的第一个试验品，被摧枯拉朽般地灭掉。公元前296年，中山国灭亡。这次，是真灭了。

而在春秋年间号称首霸的郑国，则是在战国时期，沦落于战国七雄里最弱的一位——韩国之手。

作为战国七雄里最弱者，韩国比较幸运处，就是摊上个还可以逮着欺负的邻居郑国。但偏偏郑国还不自量力，一开始瞧着韩国弱，竟抱着魏国的粗腿，想着先欺负欺负韩国，这下就招灾加速度。公元前408年，韩国拿下了郑国的重镇雍丘，公元前385年又拿下阳城，每次郑国耍威风，就会被韩国一顿暴打。

但当时郑国，却还有个安全条件：毕竟是魏国的小兄弟，打狗还要看主人面，所以每次只要韩国占了便宜，魏国就要干涉，一来二去，虽说郑国国土越来越小，却总算能勉强维持，但公元前375年，郑国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是年魏国与楚国展开了空前惨烈的大战，动用倾国之力的魏国，也实在难以再管这个小弟了，于是韩国乘虚而入，将郑国彻底吞并。

然而对韩国来说，灭亡郑国的最大意义，就是把国都迁到了郑，好好坐享了郑国的家业，也奠定了其在战国七雄里的位置。而位于山东境内的莒国和邹国，春秋时期就是小国，到了战国弱肉强食的年

代，更是彻底无法自保，相继灭亡在楚国之手。同样灭亡于楚国之手的，还有蔡国、杞国、倪国、曾国，这几个小国的灭国时间，史料五花八门，基本不可考。

但就在这样残酷的时代里，却也有个传奇小国生存了下来：卫国。

这个诞生了商鞅、吴起等一干杰出变法家的神奇国度，人杰地灵却国力奇弱，常年处于齐国、赵国、卫国的包围中，领土不断被蚕食，到了战国晚期，只剩下濮阳这个巴掌点儿大的地方。但幸运的是，由于魏国被秦国击败，少了一个传统威胁，卫国更顺利地攀上了秦国的高枝，成了其铁杆附庸，一直到秦始皇灭六国时，卫国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209年，秦朝都已经风雨飘摇时，这个国家才被秦二世所灭。

胡人国家变化多

除了这些传统诸侯国外，战国时期一度活跃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小国。

燕国的北方，就有东胡和肃慎，东胡活跃在今天辽宁西部，和燕国之间的战争极多，燕国的领土，也因此拓展到辽东地区，设立了渔阳、上谷、辽东、辽西四郡，这四个要地直到汉武帝年间，还是汉朝抗击匈奴的东线桥头堡。而与燕国时战时和的东胡，后来则被匈奴击败，一度成为匈奴附庸，后来更分裂成两个十分有名的民族：鲜卑和乌桓。

比起高调的东胡，肃慎却低调得多，但就中国历史来说，他们的影响显然更恒久，肃慎活跃在长白山以北，自周朝时就与中原有往来，但由于它们离得远，往来也极少，但他们却是后来靺鞨和女真的

祖先。因此清朝雅克萨大战前，康熙皇帝致书沙特的交涉国书里，就有掷地有声的一句话：肃慎，自古吾北土也！

和燕国一样，赵国的北面，也一直是蛮族环伺。比如林胡和楼烦，林胡这个部落，可能名声不太响亮，但后来的历史却极长，先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被赵国一顿猛打后屈服，等到匈奴崛起后，又转而投向了匈奴，它的名字也换作“丁零”，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还活跃在中国北方。

楼烦的名号，显然就更响亮了，同样是被赵国痛打，也同样后来投降了匈奴，再后来的汉匈战争中，他们更是充当急先锋，与汉朝铁骑血战了好几场，特别是著名的汉朝卫青收复河套的战役里，打败的正是已归属匈奴的楼烦部落。汉朝征战四方的荣光里，他们好好当了垫背。

而作为战国最强的秦国，除了要面对中原六国这些强敌，北方和西方，也同样麻烦不少。特别是西部，还有“大荔”“绵诸”“义渠”几个部落。而其中给秦国威胁最大的，当属义渠。哪怕是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已然雄视天下的秦惠文王时代，义渠依旧是秦国坐卧不安的强敌，尤其和其他部族不同的是，义渠十分重视外交，和中原国家关系很密切，特别是每次中原兴起联合抗秦的活动时，义渠也会热情参加，在秦国后背凶狠捅刀子。特别是东方五国合纵抗秦的时候，义渠也乘虚而入，在西线大肆攻打秦国，把秦国结结实实地惊出冷汗。

这个倔强的强敌，直到秦昭王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72年，秦国才彻底将其灭掉。至于其部族的下落，大多自然融入了华夏族，也有少部分西迁，成为羌族的一支。

然而对秦国来说，他们能够确立逐鹿天下的绝对优势，综合国力远远凌驾于中原六国里任何一国之上，更因为两个南方邻居送大礼：巴蜀。

在今天，巴蜀往往用来合称四川、重庆地区，但在战国时期，巴蜀却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建立于成都平原地区的蜀国，另一个是地盘包括今天重庆地区的巴国。从战国初年开始，秦国就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讨伐，直到公元前315年，才由名将司马错带兵，将这两个国家彻底灭掉，把四川大地收入囊中。

对于秦国后来一统天下的进程来说，巴蜀地区的获得，才是其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步：秦国获得了广袤的粮食产地，更以巴蜀当作重要的战略大后方，特别是著名的都江堰工程完工后，四川更成为粮食产量丰饶的天府之国。秦国几次重大战役，拼的就是粮草的战略支撑力，特别是著名的长平之战，正是巴蜀地区的粮食供应，才保障秦国以倾国之兵，打赢了这场惨烈的消耗战，搬掉了东进中原的最后一个强敌：赵国！

五 要变法，学李悝

在经过了三家分晋的厮杀和田氏代齐的折腾后，其他国家的地主阶级，也有样学样，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夺权之路。

但无论是分家还是借壳上市，过程都太血腥暴力，相对温和的方式，就是变法。无论是那些改变了国君宗族的诸侯，还是保留了国君名号的诸侯，在这个大变革时代要想生存下来，变法都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不变法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因此自从战国时代开始后，变法就成了各国间的时尚。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采取了各种变法的措施。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包括魏国和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

然而，在各类变法运动中，真正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并成为之后战国诸侯变法“范本”的，却是最早的魏国李悝变法。

魏国凭啥先变法？

李悝变法，起于战国时期的新兴国家魏国。

在瓜分晋国的三家里，魏国属于分家运气非常不好的一个。表面看来产业丰富，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工商业发达且农业繁荣，全是肥得流油的宝地。可看看地图就知道，这些个宝地，全夹在齐秦楚三大国之间。所谓“富得流油”，其实就是人家眼中案板上的肥肉。

它的地理劣势有多大？在战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下，地利上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魏国的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赵国，夹在中间的魏国，可以说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这样的局面下，要生存下来，环境是非常艰难的。

幸运的是，魏国的开国之君，是这时期各诸侯国里最杰出的君主魏文侯。在这个问题上，此人非常有觉悟：不但不能做肥肉，还要做吞并别家肥肉的魔兽。

要想做魔兽，就得变法！

虽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国的国君，才正式获得周天子的承认。但是其中的魏文侯，却已经早早名声在外。在当时的列国诸君中，魏文侯属于出名有见地的一位，不但善于发现人才，治理国家有方，身边更是明星荟萃。照着北宋历史学者司马光的点赞说：“魏文侯的雄才大略，简直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再世。”

而对比晋文公，魏文侯有一点极像的，就是麾下群英荟萃。比如子夏这样的儒家学者，吴起这样继孙武之后的杰出军事家，还有西门豹这样善于治理地方的英才。比起魏国劣势的地理条件，魏文侯的人才储备，却是绝对的优势。

但这其中，最著名的却是李悝。不仅仅对于魏国，即使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他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作为子夏的学生，在现存各类史料中，李悝都是十分默默无闻的一位，有关他的记录少之又少，甚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都没有他的传记，比起后来风光无比的各路战国精英们，可谓活得十分低调。

李悝之所以如此默默无闻，主要还是生的运气不好，魏国的霸业虽说辉煌，可是对照整个战国历史，堪称起了大早赶了晚集，在这段

辉煌的年代里，出镜率极高的人委实太多，包括吴起等人，各自都十分有话题。而后来商鞅变法的异军突起，完全盖过了他的锋芒。

但是所有这些交相辉映，却都掩盖不住一个公认的真相：李悝变法，它不但造就了一个强大的魏国，更造就了一个轰轰烈烈变法的时代；它奠定了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大变革的雏形，在这个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期，它是历史的先声。

而李悝比较幸运的，还有一件事：虽然后来变法成了时尚，但在李悝生活的年代里，这事只能发生在魏国。

比起其他国家奴隶制贵族还十分强大的局面，从晋国脱颖而出的韩赵魏三国，属于毫无压力的新兴国家，特别是在漫长的战乱中，先前所谓实力强大的旧贵族，基本上被一扫而光，掌舵的人从上到下，都是新兴地主阶层，变法的阻力极小。而且更幸运的是，所谓四战之地的魏国，当时的外部环境：齐国正在忙着田氏代齐，秦国也正在内耗，楚国正忙着对南方扩张，几个主要大国，这时正好都顾不上管它。如此黄金机遇，堪称机不可失。

当然更重要的因素却是魏文侯。在战国早期的统治者中，很难找到一个像魏文侯这样眼光超远，能够放手让臣下做事的国君。更何况，魏国此时面临的生存局面，比其他两个新兴国家都要严重得多，生存的压力，也使得魏国必须要选择变法图强的道路。而当时的魏国，在变法之前面临的局面，也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外部环境上，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益激烈，外部的军事压力亦日益增大；内部经济上，魏国本身就是晋国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富庶程度上，魏国不如韩国，在军力的强悍程度上，魏国又不如赵国。这样的压力下，魏国必须采取措施，走变法图强的道路。而李悝，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其实在魏国立国的早期，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他曾

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早年的李悝，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是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则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时弊。

在经过了多年惨淡经营后，魏文侯也终于确信，李悝，就是他要找的人才。于是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

李悝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项：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这条在魏国，当时还是最容易办到的，因为韩赵魏的旧贵族势力，本身就是最弱的，既得利益者极少。这条商鞅后来在秦国遭到极大阻力的改革内容，这时算是顺利推进。

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这个法律的名字就叫《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

第四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这四项措施，从表面上看，似乎平淡无奇，但真实的意义，却影响深远。

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度的最后颠覆。在经过了春秋末年的一系列动荡之后，传统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早已经日益萎缩，而西周时代传承下来的奴隶世袭制，就是他们最后一层遮羞布，凭借这个制度，他们在战国的早期，还能够保持表面尊崇的地位。世袭制的废除，使他们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彻底淡出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

与此同时，魏国用原本奉养这些社会寄生虫的开支，向各国招纳贤才，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把魏国作为建功立业的首选。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形成了英才荟萃的局面。

李悝变法的第二条，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度的最后颠覆。井田制度经过春秋时代的连续动荡，早已经名存实亡，也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护封建制度的一个口实。尽地利之教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是在此过程里完成的。

李悝变法的第三条，影响更加深远。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虽然其内容在今天已经失传，但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

第四条的作用，对于当时的魏国是最直接的。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这四条内容的实施，不但在当时成就了魏国的腾飞，也成为不久的将来，诸多变法家奔走列国，进行变法图强的内容范本。

强悍魏国横扫天下

作为战国时代最早的变法，李悝变法的效果是成功的。

在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以后，三国中最早走上扩张道路的，是赵国和韩国，两个国家都企图乘着国家初兴的机会趁热打铁，尽可能地扩展地盘。但现实是残酷的，当魏国埋头发展的时候，韩赵两国在对外战争中处处碰壁，赵国多次被秦国击败，韩国更受到了齐国和楚国的夹击，立国没有多久，生存局面却陡然艰难了起来。

外战打不好，韩赵两国还想内斗，都想着兼并掉对方的土地。在魏文侯埋头发展的时候，韩国和赵国都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找到魏文侯，提出和魏文侯合作，兼并掉对方的国土。对这些要求，魏文侯不但拒绝，更苦口婆心地劝说，提出现在三晋国家，当务之急不是内斗，而是集中力量，对外进行扩张。

从当时的局面看，魏文侯的眼光堪称长远：只要三家能够相互呼应，共同进退，就能在残酷的诸侯争霸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到了一千多年后的北宋年间，苏辙的《过秦论》中，也同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要韩赵魏三国是铁板一块，就足以挡住秦国东出的脚步，整个中国历史都要改写。

然而放在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不是韩赵魏三国要阻挡秦国东出，而是秦国哭着喊着，不能让魏国打进来。

公元前419年，魏国开始了扩张之路，他们的打击重点，就是西面的秦国。虽然晋国已经成为“过去式”，但继晋国后崛起的魏国，依然延续了晋国时代对秦国的挤压政策。对于像秦国这样一个尚武成风、战争潜力巨大的国家，必须牢牢地把它堵在关中平原之外。一旦让它突破了关中平原的阻碍，对于整个中原诸侯国来说，那都是如洪

水猛兽一样的灾难。

公元前419年，魏国首先在少梁筑城，和秦国边军拉锯，但出师不利，魏国虽然占领了少梁，却始终无法消灭秦军，和秦国之间形成了长期相持的局面。就在这关键时刻，魏文侯起用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将军——吴起。吴起因为当年在鲁国的“杀妻”事件，一直都是正人君子眼中不齿的小人，但魏文侯用人用其长，就看中了他能打仗的优点。这个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元前413年，吴起一举攻破了秦国的西河防线，击溃了秦国的西河守军，将整个西河尽数纳入魏国的版图中来。这场胜利在当时的意义非同小可，魏国占有了秦魏两国边境之间的战略要地，对秦国的战争主动权已经形成。对秦国而言，别说是东出进攻中原国家，只要魏国不来进攻，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西河的失去，引起了秦国上下的震动，咬牙切齿的秦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河，但光有决心是不够的，李悝变法多年以来的成果显现了出来，魏国凭借其远远优于秦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在战争中大打消耗战，借此来拖垮秦国。到了公元前408年，魏国不但占有了河西地区，更向北占领了陕西代郡，向南夺取了河南三门峡，秦国从关中进入中原的所有要道，至此完全被魏国堵死。秦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收复西河的打算，转而在边境修筑堡垒，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强秦弱的局面，成了战国初期双方实力对比的写照。

在压制秦国的同时，魏文侯也对南方的另一大强国楚国、东方的齐国进行了打击。公元前405年，趁齐国田氏宗族内部发生内乱的机会，魏文侯联合赵韩两国出兵，斩杀齐国军队3万人，占领了齐国物产丰富的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收复了齐景公当年占领的晋国重镇聊城。此战的胜利，使此时正在忙着“代齐”的田氏家族，再次选择了对魏国的暂时臣服。

齐国后来向周天子要求册立的文书，也是托魏文侯代呈的。而南方的“超级大国”楚国，也在和魏国的交锋里吃了亏，魏文侯不断南

下，攻掠江汉平原的小国，楚国虽然组织过几次北上，但后来都败北于魏国的手下。魏文侯在位的时期，原本是“四战之地”的魏国，却处在一个四面扬威的时期。归根结底，还是魏国率先进行变法尝到的甜头。

盛极为何衰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不但影响了魏国的历史，更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文侯时代魏国的李悝变法，其实就是整个战国时代变法的试验田，列国诸侯从魏国的强大过程里，看到了变法对于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

从此之后，列国的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时几乎所有开展变法的国家，都把魏文侯和他治理下的强大魏国，作为变法的楷模和目标。而魏国也同样是战国变法人才的“培训学校”，早期在其他国家主持变法的人才们，许多人都在李悝变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比如后来主持了楚国变法的吴起，早年就是魏国李悝变法的助手。而列国变法中最彻底的商鞅变法，也基本是以李悝变法为蓝本。这时期的各类变法中，唯一和李悝变法无关的变法行动，应该就是燕国的“复古”改革，这种历史倒退的做法，引发了燕国本国的一场内乱，险些沦亡于齐国之手。

作为战国诸侯中第一个吃变法“螃蟹”者，魏国的国势，在魏文侯在位的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在位的50年，是魏国称雄于诸侯的50年。西面的秦国被它打得服服帖帖，东面的齐国唯它马首是瞻，南方的楚国遭到它联合三晋势力的一次次沉重打击。虽然与北方的赵国发生过摩擦，但韩赵魏三国中，魏国却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而在当时整个战国大势中，它也是国力最强者。

但魏国这时期霸业的基础，仍然是脆弱的，因为它没有称霸的地

理优势，“四战之地”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魏国如果想长久地保持霸主地位，甚至想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局面，就必须要占据一个战略制高点，不是向北占有赵国，取得对六国诸侯坐北朝南的优势，就是要向西或者向东，占有秦国和齐国，取得得天独厚的地理屏障，否则，魏文侯所奠定的版图，势必是不能持久的。

魏文侯过世后，其子魏武侯即位，就在魏武侯登基后的第二年，为魏文侯设计变法大业的老臣李悝也病故了，但这时候的魏国，国力依然在持续上升。魏武侯在位的26年，是魏国对外战争比较多的一段时期。

公元前393年，魏国两线作战，分别在南线击败了郑国，西线击败了秦国，向南和向西都拓展了大片国土。之后，魏武侯与韩赵结成军事同盟，四处征战，先后击败了楚国、齐国、秦国，但是这以后，它和两位盟友赵国、韩国，也相继发生了矛盾，陷入了新的战争。这时期的魏国，整整26年来，对外战争几乎未尝一败，对四面的敌人连战连捷。

魏武侯比起其父亲来，虽有军事才能，但在政治眼光上却远远不及，总迷信武力能够解决一切。连战连捷的结果，就是魏国四面树敌。在之后的魏惠王时代，国力严重虚耗的魏国，虽然有庞涓屡败诸侯的辉煌，但最终在齐秦两大国的东西夹击下，实力日益萎靡，随着马陵之战魏军被齐军全歼，魏国的强大地位，最终不复存在。

六 吴起的辉煌与失败

说到战国早期推动了封建化进程的各路改革家，那是一个英杰荟萃的榜单。这些敢于向旧有奴隶制制度开刀的勇士们，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精准的思路，把握住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促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在中国走向封建社会的道路里，他们其实是发动机的角色。

但是这些发动机的命运却是悲惨的，其中大多都是以悲剧结尾，即使是秦国这样发动自上而下改革的国家，从变法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导演了变法事业的商鞅，最终也难逃被杀的命运。他们用自己的死亡，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托起者和一个旧时代的殉道者。

然而如果说其中最慷慨悲壮的人物，应当数曾经参与过魏国变法，后来又导演了楚国变法的吴起了。

奇人吴起的争议

说到吴起，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个称呼：战国变法家的第一奇人。因为在当时整个战国列国中，再也不能找到一个像吴起这样的通才人物：兵法读得好，武艺练得好，从治国到带兵，样样都有一套本事。无论文武，都是当时英杰中的翘楚。但就是这样一个牛气十足的人，却在列国之中，长期身败名裂，最重要一点，就是在很多老前辈眼中，这人是个毫无道德负担的人物。

吴起，山东定陶人，公元前440年生。定陶在当时属于战国中的

卫国——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国。出生在这里的吴起，小时候的运气还不错，他家是当地的富户，史载“家累千金”，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富阶层。关起门来安安稳稳过日子应该不错。

但老天似乎就要造就一个天生不安分的人，吴起从小就是这样，从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小时候总闯祸，长大了更是外出惹事，在那个连科举都没有的年代，想要活得轰轰烈烈，就得做一件事：砸钱。吴起多年以来遍访名师，家产糟蹋得差不多，先砸到了鲁国首都曲阜，投身于儒家学派门下，拜了当时著名的儒家学问家曾参为师，后来又师从于当时的另一个著名学问家子夏。这样论起来，他与李悝还是师兄弟。

在好些人眼里，这样一个不安生的人物，投身到儒家学派还是个好事儿，起码能修身养性收收心。儒家学说的内容，大多都是倡导和平，反对战争，最该让他学学。

可吴起却显然是个叛逆的学生，不但依然不消停，偏偏喜欢打仗，就连读书都读出了新觉悟。他喜欢将儒家学说举一反三，应用到战争之中。还特别喜欢和人探讨。因此他交了很多朋友，也十分招老师烦，其中最烦他的，就是恩师曾参。

吴起之所以招烦，除了因为这类不良表现，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前科：当初为了出人头地砸钱，砸得倾家荡产，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败家子，招来了不少风言不雨，放在一般人身上，也就忍忍算了，碰上韩信这类特别能忍的，没准还要再钻一次裤裆，但吴起却显然不是：立刻杀掉了说他坏话的乡邻三十多人，人命官司犯了，老家便待不下去，吴起和母亲告别，发誓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来，就这样，才来到了鲁国。

然而更叫老师同学受不了的，是吴起的脾气，连人都轻易杀的人，自然不会有啥好性格，特别让身边人抓狂的一个性格，就是睚

眦必报：最喜欢和别人较真，比如学堂里讨论问题，别人都是动动嘴皮子，他急了却能动手打人。日久天长，仇恨越来越多。

但这个不招大多数人喜欢的人，当时还是有人欣赏的。此时在齐国的大夫田居就是一个，大国的官员到底有眼光，就看出吴起不是一般人，他对吴起说，你将来一定是出将入相的人物，我们家将来就靠你照顾了。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事实证明，田大夫的话，前半句准得离谱，后半句却错得离谱。

当然这桩婚姻，毕竟还是改变了吴起的生活，对待姑爷，田大夫十分厚道，给了他大笔的嫁妆，足够吴起在鲁国生活。可是生活刚刚有改变，吴起很快又得罪了教授他儒学的老师曾参。

那时吴起的母亲死了，按照儒家的规矩，母亲去世，子女应该回家奔丧并且守孝，吴起这时候正一心忙着奔前程，哪里顾得了这个，干脆两脚一跺——不去！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孝道是儒家弟子们生活的基本准则，谁要敢违反那就是大逆不道，结果曾参大怒，立刻把吴起逐出师门。

吴起也不在乎，反正儒学里的思想，他也不感兴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干脆钻研起了兵书战策。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的人物。除了平时喜欢好勇斗狠外，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对战争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但凭借着几本兵书，外加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他将这些思想杂糅起来，竟然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兵家学说。

这时候的吴起，还经常在鲁国当地的学宫里参加各种辩论活动，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确切地说是越来越臭，一个不孝顺父母且嚣张跋扈的人，放在当时崇信儒家的齐国，是非常被人所不齿的，被人不齿，也就没有出头的机会，那时候的吴起，日常生活主要靠岳父家接济，不然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但就是在这样一边胡混一边挨骂的日子里，吴起于公元前410

年，等来了他人生里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那一年，齐国大举进攻鲁国，这时候的齐鲁两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差距已经空前悬殊了，一般只要齐国进攻，鲁国也就只有挨打的份。但鲁国不想挨打，想不挨打，就要抵抗，要抵抗就要有将领，要有将领，没人。

这个时候，鲁国国君鲁穆公想到了吴起。虽然他没有打过仗，但是毕竟名声在外，地球人都知道他研究兵法，而且讲起来头头是道，再说国内确实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可问题是，他老婆是齐国人，而且还是齐国掌权的田家的女儿，这层关系太微妙了，万一他把我的军队卖了……

消息传到吴起的耳朵里，吴起的反应很简单。这有什么，不就是怕我反悔，不相信我吗，我把老婆杀了，你总相信我了吧。一边是苦苦等待多年的建功立业的机会，一边是含辛茹苦、美丽温柔的老婆，吴起眼皮都不眨，手起刀落做出了选择：杀！血淋淋的人头告诉鲁穆公，我连老婆都杀了，该相信我了吧。

这还有什么话说，虽然崇尚儒学的鲁穆公吓得直哆嗦，但行不行的就是他了，打吧！30岁的吴起，第一次得到了统兵打仗的权力。

然而这时候的吴起，接过来的鲁国军队，却是个烂摊子。当时鲁国军队数次败给齐国，几乎被齐国人打怕了，心理上不发怵是不可能的，而且鲁国是小国，能动用的兵员有限，军队的规模根本不能和齐国相比。但是吴起有办法啊，他先是在军内大搞整顿，严明纪律，行军路上，吃住都和士兵们在一起，得到了他们的拥戴。而且他还有个本事就是能说，学了这么多年儒学，练就了一番好口才，讲起话来口若悬河，三言两语就能把部队激得嗷嗷叫，鲁国军队破天荒地嗷嗷叫了。吴起不但能说，更能耍诈。他故意假装要和齐国谈判，然后和齐国军队磨洋工，在齐国军队面前他也屡屡示弱，齐国人果然上当了，

当时齐国的军队，真以为吴起就是来谈判的。

吴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瞅准了齐国人不设防的机会，吴起就开始发动反击，全军突袭，自己冲在最前面，本来大得不得了的气势这下子更大了，鲁国军队嗷嗷叫地杀红了眼，破天荒地把齐国人打得大败，在精研了多年兵法之后，吴起初出茅庐的第一战就打得如此漂亮。

仗打得漂亮，吴起的形象却变得更糟糕了。鲁国本身就是一个崇尚儒家道德礼法的国家，吴起原本就是杀人犯出身，还离经叛道，老娘过世都不回家，早就是出了名的混账人物，这次为了当将领，竟然杀了老婆来求官。

这时候的鲁国人，全然不顾吴起击败齐国，拯救国家的大功，举国上下拧成一股绳，集体强烈声讨杀老婆求官的吴起，结果一场大战的胜利，反而让吴起在鲁国混不下去了，他在战后不久就被鲁穆公免除了职务。然而，上天在给他关上鲁国这扇门的时候，却给他开了另一扇门——魏国。此时魏国在位的魏文侯，正在锐意变法图强，四处招揽人才，而且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欢迎。吴起立刻感到人生有了新的希望，索性离开鲁国，投奔了魏国。

对于吴起，魏文侯早就有所耳闻，这时候的吴起，因为对齐国战争的胜利，已经是这时期战国战场上小有名气的人物。但对于吴起的为人，魏文侯还深感疑虑，他向丞相里克询问吴起是个什么样的人，里克的看法相当精准：“这个人又贪又好色，但要说打仗，恐怕春秋时代的兵家司马穰苴也不是他的对手。”就这句话让魏文侯下了决心：用人用其长，用！

秦国噩梦降临

吴起在魏国期间，正是魏国大张旗鼓，采取李悝变法，开始魏国封建化进程的时期。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魏国英才云集，既有当时最杰出的改革家李悝，也有此时战国时代最佳地方官西门豹，可谓是群星璀璨，能在这群星里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就是吴起此时的作用就一个——打仗。

在这件事上，吴起堪称是魏国最稀缺的人才。

当时魏国的主要对手，就是秦国。虽然这时的秦国，远不如后来商鞅变法后那般强悍善战，但也是公认的野蛮。而对魏国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个秦国还好对付，魏国南边偏还有个楚国，这又是个可以募集百万大军的强悍国家。外加东方的齐国，也是各国里最富庶的一个，打仗砸得起钱。想想当年没分家时，以晋国空前膨胀的综合国力，和这三家交手，也基本是互有胜负，如今换成一个魏国，胜利更谈何容易？

但是吴起的回答是：很容易。

吴起到魏国的时间，是公元前409年，就在他被魏文侯起用仅2个月，他就立刻给魏文侯送上了一份厚礼——西河。

所谓西河，就是今天黄河以西的地区，包括陕西澄城县等大片领土，在战国时代，这里是秦国和魏国之间的分界线，双方都只占有了一部分领土，长期东西相持。秦国如果得到整个西河，就意味着打开了东进的通道，他们就能够毫无阻拦地进入中原地区；而魏国如果得到西河，就可以控制对秦国战争的主动权，把秦国死死地摁在函谷关里。

西河的战略位置如此重要，因此自从春秋时期起，为抢这块地方，两家就一直打破头。所谓的秦晋之好，就是几百年的死仇。

而在三家分晋之前，这场犬牙交错的战争，就已经进入了新阶

段：魏桓子时候，就曾和秦国为了西河发生战争，到了魏文侯时期，这里更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多年以来双方互有攻守，都想多占一寸土地，但谁都寸步难行，形成了此时魏国西部战场上暂时的平衡，而这时候，打破平衡的人来了——吴起。

吴起到任之后，经过短暂的准备，便发动了对秦国的东征。公元前409年，吴起先夺取了当时秦国西河的重镇大荔，然后再接再厉，接连夺取了五座边城，他进攻很讲策略，基本上是循序渐进，打下一个城，就立刻重兵防御，待到站稳脚跟后，再继续进军下一个城池，就这样步步为营、滴水不漏，渐渐地推进到了整个西河地区。

对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招数，秦国一开始很不屑，总以为丢了还能打回来。但打过了才知道，这就是无招胜有招。

其间的秦国，多次组织反攻，皆被吴起打退，到了公元前408年，吴起已经占领了秦国的合阳、华县等地区，整个西河都被吴起收入囊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收复西河的战役中，魏文侯给予吴起的兵马，最多只有8万人，而对面秦国的兵马，一度曾经达到了20万，兵力差别如此悬殊之下，却能连战连胜，确实不易。

西河地区的获得，在战国早期的诸侯战争中有着重要意义，秦帝国东出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们不得不对魏国采取了消极防御政策，同时开始向魏国学习，积极地谋求变法。而对此时的魏文侯来说，魏国得到了西河，也就得到了当地的千里沃野、大量的人口、珍贵的战略要地，这样重要的地盘，当然也要可靠的人去把守，除了吴起，也就没有别人了。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设立西河郡，吴起被委任为西河郡守，这是他军事生涯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说这之前吴起夺取西河，秦国人还可以解释说，这是自己大意了，那么从此开始，他们将真正见识吴起的实力。吴起的军事思

想，比起之前历代兵家来，有一个十分具有现实意义，今天也振聋发聩的亮点：军事建设。

在他的军事理念里，临阵指挥固然重要，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却是准备情况与经济情况。所以在军队建设上，吴起采取了开发水利、储存军粮的措施，同时对于麾下的军队进行精简。他编选出了由精锐士兵组成的“武卒”，在战国早期，武卒是一支战斗力超级恐怖的步兵军团。

凡是被选入武卒的魏国士兵，都是可以拉20石强弩，并且具有高耐力奔跑能力的精兵，对他们不但免除全家的赋税，更给予优厚的国家补偿。所以在当时的魏国军队里，作为一个士兵能够入选武卒，不仅仅意味着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可以从此大变样，更意味着一种无上的荣誉。

从那时候起，魏国军队的士兵们开始苦练杀敌，上演士兵突击的励志故事，人人都为能够成为武卒而努力。与此同时，吴起非常重视边境的生产，多年以来他采取屯垦政策，命令士兵们战则为兵、归则为农，在当地积极发展生产。所以他到任没几年，西河当地就出现了仓储丰厚、经济富庶的局面。

正是这样的运作模式，不但造就了魏国的强大，而且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全盘学习吴起这一整套带兵模式的，正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当然，这是后话。

此时的秦国，非但还没有学习吴起的觉悟，相反正在眼红中：从吴起就任西河郡守之后，秦帝国就频繁地调集重兵，意图一举夺取西河。这时候的魏国，在西河地区很少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当时魏国的重兵，大都集中在东线，用于对齐国和楚国的作战，所以吴起基本得不到中央支援。

西河面临着极其巨大的战争压力，但是吴起不惧，他镇守西河的

时间长达27年，在这27年中，他和西北的秦帝国经历了大小战斗一共96场，其中76场取得了胜利，剩下的20场是平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不败将军”。

其间，秦帝国曾经几次不惜血本，发动举国兵力对西河地区进行东征，特别是在公元前389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阴晋之战。这一年秦国动用了举国50万大军，屯兵在山西阴晋，计划一举东进，拿下整个河西地区。

当时魏文侯已经去世，即位的魏武侯非常惊慌，身为西河郡守的吴起却不慌不忙。多年以来，他早就在当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比如设立军功奖励制度、激励士兵杀敌，而且每次战后，都要举行大规模的庆功活动，表彰战争中的死难者，所以每次有战争发生的时候，西河当地魏军，大都把打仗当成一种荣誉，甚至好多人连盔甲都来不及穿，就急急忙忙地要求投身战场。所以秦国人虽然多，在求战欲望高涨的魏国人眼里，也只不过是一盘肥肉而已。

吴起知道，要啃下这块肥肉不容易，为了保证能够一战必胜，吴起做足了文章，首先抓住了秦军人数虽多，但是军队部署分散，容易各个击破的弱点，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其次就是这次参战的士兵，除了少数老兵之外，大多数都是从来没有立过军功的新兵，这些人虽然作战经验不足，但是立功心切，求战欲望极其强烈，吴起本人也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军队冲在第一线。

他甚至颁布命令，做骑兵的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马匹，做战车兵的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战车，如果战后发现骑兵丢了马，战车兵丢了车，就算是建立了战功也不予表彰。然而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秦军人多，而魏国士兵作战经验有限，所以必须要保证从军令上限制士兵们的无意义作战，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战斗打响后，魏军各个以一当百，奋勇冲杀，结果秦军五十万大军全线崩溃，五万魏军一路掩杀，打得秦国军队尸横遍野。在战国的历史上，这是秦国军队遭到的最惨

痛失败之一。

吴起镇守西河的27年，是魏文侯改革后魏国的黄金27年，这27年的魏国，西边死死地摠住了秦国，南边痛打楚国，东方扫荡七国，同样属于三晋国家的赵国和韩国，也拜服在魏国的脚下。而镇守西河的吴起，也成了这个强大的吴国的西北屏障。

吴起是不满足做屏障的，他更想高升一步，特别是在魏武侯即位后，当时魏文侯改革时期的杰出人物，许多都已经去世了，而吴起本人也很卖力表现，除了屡次击败秦国之外，还曾经多次大胆进谏。作为一个名将，吴起却不主张轻率发动战争，甚至有一次魏武侯视察西河，赞叹魏国的大好河山时，他不但不应和，反而说出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国家的安危，在德不在险。”也就是说，在发动战争上，国家一定要慎重，国家的强大，靠的是“德”而不是险，从这些思想上可以发现，虽然已经是此时战国最杰出的武将，建功无数的吴起，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儒生。

魏国的政治，一直有“出将入相”的传统，外加当年吴起的“前岳父”田居也曾预言吴起将出将入相，现在出将实现了，吴起也就开始憧憬“入相”了。这时候机会也来了，当年曾经向魏文侯举荐吴起的丞相西客去世了，魏国的相国之位一下子出现了真空，按照吴起的想法，自己镇守西河27年，功劳苦劳一大把，就是排也该排到自己了，但是魏武侯却不是这么想的，最后继任相国职位的，却是在吴起眼里远不如自己的商文。

这个商文是当时的魏国贵族，在吴起看来，他不过是靠了裙带关系才当上丞相的，直到两人发生了一次对话。吴起在回京的时候，气势汹汹地质问商文，先问带兵打仗你比我强吗？又问治理地方你比我强吗？让士兵拥戴，并且誓死效力，你比我强吗？三声发问，商文都是好脾气，连着都说“我不如你”，吴起得了理，立刻嚷嚷起来，那你凭什么当相国？

商文只回答了一句话：“现在大王年轻，老百姓人心惶惶，你说你是你当相国合适还是我合适。”就这一句话，让杀气腾腾的吴起立刻哑巴了，想了半天说，还是你合适。

这就注定了吴起不可能在魏国当相国，不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相反恰恰是因为他太优秀了，作为国君，根本就不敢驾驭这样优秀的人。所以老成厚道的商文，也就成了魏武侯的首选。

丞相做不成，吴起任劳任怨，准备继续给魏国守边疆，但这时候边疆却也守不下去了。没几年商文就去世了，这时候继任丞相的是公叔痤，这个人性格猜忌褊狭，非常忌惮吴起的战功。他的背景也不简单，是魏国的驸马爷，他的妻子就是魏国的尚公主。当了丞相后，他就绞尽脑汁，非要赶走对他丞相职位有威胁的吴起，一个门客给他出了主意，可以搞一个非常麻烦的连环计。先假装给魏武侯说，吴起可能有反心，建议魏武侯试探他一下，可以假装说要把公主许配给他，如果吴起没有反心，那他理应高兴地接受这个婚事，如果他有反心，就肯定会推辞这个婚事。

于是，公叔痤便拉着自己的老婆，当着吴起的面演双簧，让老婆拼命地暴打他，性格刚硬的吴起，必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悍妇，只要他一推辞，谋反的罪就砸瓷实了。吴起万万没有想到，耍了一辈子兵家诡道的他，竟然就这么被人耍了，事情的整个过程，都在公叔痤的计划之中，吴起果然很“配合”，眼见公叔痤娶了公主后的“悲惨”情景，铁了心说什么也不娶公主。这下可伤了魏武侯的自尊，他当场气得拂袖而去，而政治嗅觉还算灵敏的吴起二话不说，跑路。

就这样，在魏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吴起，就这么不干了，当然以吴起的性格，如果如此退出江湖，那就不是吴起了，这时候的他已经名满天下，不愁没有饭碗。公元前383年，他找到了新饭碗——楚国。

殉难在楚国

吴起到楚国时，正好是楚悼王在位的时候，这时的楚国，也正好处于一个很微妙的时期。

虽然常年处于大国地位，但是战国早期的楚国，却一度国力不振，特别是在中原国家纷纷进行封建化改革的时候，楚国的进展却缓慢得很，主要原因还是楚国的整体经济水平与中原差距遥远。

楚国国内，其地主派势力和新贵族势力也凤毛麟角，根本没有能力对抗奴隶主贵族的卿大夫阶层。韩赵魏三国建立后，成了楚国的大敌，特别是强大起来的魏国，多次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连续多次战败楚国。

在这样的局面下，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楚悼王，也必须能效法中原各国，变法图强。所以此时到来的吴起，可以说是当时楚国最需要的紧缺型人才。吴起到来之后，楚悼王首先让他去担任楚国北方苑守，干的还是老本行打仗。吴起到任后一如既往，他继续推行安边持重的战略方针，这时候他的主要对手，却成了“老东家”魏国。

在吴起的指挥下，先前多次被魏国打败的楚军这次扬眉吐气了，他们多次击败魏国和韩国、赵国的联军，暂时遏制了魏国的南下势头。但是楚悼王知道，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的，不变法，就很有可能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这里要说说吴起的这个老板楚悼王，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出了名的英主。他本是在政变中被拥立上台的，之后励精图治，扭转了自春秋末期开始，楚国国君权力衰弱的局面，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但是在向北发展中，楚国却遭遇到了魏国的阻隔，楚国多次发动对魏国的战争，却皆被魏国击败，严酷的现实，也让他决定走魏国的强国之

路，而曾经参加过李悝变法，并且战功卓著的吴起，自然就成了他借以实行变法的最佳人选。

和其他国家一样，楚国也有抵抗变法的守旧势力，不一样的是，楚国变法，是战国时期所有变法中最难的。比如，商鞅变法时期，虽然秦国的旧贵族同样强大，但是秦国本身的机构就非常简单，自上而下的威权，可以很容易地推动，楚国这个时候的情况，却是旧贵族的势力盘根错节，且画地为牢，楚王很多时候都说了不算。

但吴起从小就是个不知道害怕的人，当年在魏国打仗的时候，5万打50万他都不怕，何况现在对付几个小小的拦路虎。和用兵一样，吴起是一个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人，他深知搞变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筹谋，吴起拿出了他的变法议案，一份和中原国家变法大不相同的方案。

吴起的变法方案，主要包括如下条文：一是取消世袭的贵族制度，凡是贵族传承了三代以上的，一律取消世袭，从此之后，子孙不能再继承爵位；王室的家族稍微宽松一些，传承了五辈的，一律都取消特权和俸禄，而且要迁移到边远的州县去，给予土地自食其力，他们原先的土地一律都要由国家没收。二是整顿政治机构，也就是机构精简，整个机构要裁撤冗赘官员，精选干吏，提高行政效率。三是要统一言论，整个国家不能有任何反对变法的言论，否则就要治重罪。四是吸取自己在魏国创办武卒的经验，在楚国也创办了独特的军事部队——厉甲兵，和当年在魏国一样的政策，厉甲兵也是精选出来并由国家直接掌控的国家精锐部队，有了这样的虎师，楚国的实力也就大大增强了。

吴起变法的内容，条条都触动了此时楚国的要害。楚国这时期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奴隶制度太过强大，尤其是贯穿楚国始终的百越之战。这些战争的结果，就是楚国每次都会收获大量的奴隶，成为奴隶主贵族的私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封建化也就大大不如中原

地区。

总的来说，这时候吴起的措施，主要还是以剥夺旧贵族势力为主，而且手段极其酷烈，不但有取消世袭特权的内容，还有要强制拆迁的内容，原先养尊处优的贵族们，这下都要给送到边远的地方干活去。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收回了大量的土地，释放了大批奴隶，更增加了社会的劳动力，让贵族们的实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整顿政治机构，名义上说改善统治效率，实际上，还是为了加强国君的威权，而统一国家言论，为的是要给变法扫清舆论的障碍。这几条的实施，除说明了吴起深沉的心机之外，也暴露了他变法上的漏洞。

吴起变法的实行，在当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公元前381年，经历过变法图强运动的楚国再次挥师北上，和当时北方最强大国家魏国再次大打出手。这次的楚国军队，拿出了他们的新式兵种——厉甲兵，结果，新组建的楚国王牌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魏军打得大败。楚国军队紧紧追杀，竟然直打到了黄河边上，魏军重演了春秋战国时期全军崩溃的局面，大批士兵溺死在水中。战后，楚国人饮马黄河，北方诸国大惊，春秋时期曾经把长江以南打得天翻地覆的楚人——回来了！

这时候的吴起变法，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吴起变法的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凸显出来。

说起吴起变法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到，在这场变法中，吴起既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也有师承别人的东西。但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是，吴起的改革措施，大多都是着眼于中央权威和富国强兵，对于楚国旧奴隶主贵族所生存的奴隶制经济制度，却没有做任何触及。所以，这也就注定了改革不会得到普通老百姓们的支持。甚至连实力虽然弱小但已经兴起的地主阶层，得到的好处也很有限。

比起更为成功的商鞅变法，我们不难看到，吴起所采取的堵塞言路、裁撤冗赘人员等内容，大都是在商鞅变法中所用过的，但后来商鞅颁布的时候，是在变法的第二阶段，即变法已经获得了全国百姓空前的拥护支持的时候，而吴起此时这么做，却已经操之过急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吴起变法的着眼点，还在于“富国强兵”上，给予楚国普通老百姓的好处太少，这一点，就决定了吴起的变法注定以悲剧收场。

公元前381年，一直支持吴起的楚悼王去世了，他的去世，就意味着吴起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就在楚国召开追悼会的那一天，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发生了叛乱，这是吴起变法的另一个失策，他虽然建立了中央直接掌握的军队，却没有收回旧贵族阶层对私人武装的控制权，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这次的严重后果被吴起自己承担了，反对派们的士兵疯狂地追杀吴起，吴起东躲西藏，最后躲进了楚悼王的灵堂里，杀红了眼的顽固派哪里管这个，一股脑儿地闯了进去。吴起见叛军们弯弓搭箭，密密麻麻地射向他，干脆用力一扑，扑到了已经过世的楚悼王身上，这对战国时期引导楚国走向强大的君臣，就这么被射成了刺猬，大家射得带劲，后果却很严重。

七 齐国“奸臣”，一代名相

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强国，是魏文侯改革后的魏国，但随着魏国的一蹶不振，相继取代魏国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同样也是拜变法所赐。它们的封建化改革，也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秦国的改革，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这是整个战国时代政策上最彻底、效果最显著的变法，秦国也从此走上了精兵尚武的扩张之路。

而就在商鞅变法图强的同时，东方的齐国也开始了相同的过程。与秦国拥有商鞅这样一个精干的改革家一样，齐国也拥有一位相似又相反的人才——邹忌。

说邹忌和商鞅相似，因为他们身份相似，都是卓越的改革家，成果也相似，都造就了其所在国的强大。说他们相反，一个是性格相反，商鞅为人坚毅果决，性格嚣张跋扈，做事说一不二，相比之下，邹忌却是一个很“委婉”的人，比如对国君的进谏，商鞅喜欢直来直去，邹忌却喜欢虚与委蛇的“讽谏”。如果说商鞅“至刚”的话，那么邹忌就是“至柔”。

两人的结局也截然相反，立下大功业的商鞅，在秦孝公过世后，难逃被清算的厄运，同样是改革家的邹忌，却封侯拜相，终生富贵。时至今日，“至刚”的商鞅，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著名改革家”；“至柔”的邹忌，名望比商鞅大大不如，身后非议颇多，有说是贤相的，也有说是奸臣、佞臣、弄臣的。比起耳熟能详的商鞅，毁誉参半的邹忌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齐国变法的总设计师

邹忌，史记上又称邹忌子，是齐国桓公（战国时代的齐桓公）时期的大臣，齐威王在位的时候担任相国。在齐国的封建化改革中，他是主要的设计者和执行者。

说到邹忌对齐国的贡献，不妨先说说田氏代齐后齐国的政治军事局面。

战国早期的齐国，在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多次和魏国发生战争，但几乎每战必败，甚至被打出了“恐魏症”。齐国的军队，到了齐威王早期，几乎到了遇到魏军就崩溃的地步。“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也正是在这时期流传开来的，虽然是形容魏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却也说明齐国这时期被打惨了。

田氏齐国立国初期，在战国历史上的记录相对较少，出场次数比较多的，往往都是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对魏国战争的失败。齐国在齐景公时代一度振作，夺取的晋国的大部分国土，在这时期几乎被魏国全数打包收回。魏国还曾多次联合韩赵两国，攻入到齐国的腹地，甚至兵临齐长城。而齐国的真正振作，却要从公元前356年齐威王田因齐即位开始。

齐威王登基初期，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人，他不靠谱的时间也很长，竟然长达九年。在这九年里，他日日沉迷于享乐，对外战争也屡战屡败，一开始还只是败北于魏国这样的大国，到后来，连鲁国这样不入流的小国都能欺负他。最严重的时候，齐国还落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即是个诸侯都要来打你两下，是个老百姓，就对你不抱任何信心。

在这样的局面下，身为大臣的邹忌脱颖而出。

和许多大臣一样，他也对齐威王进行了进谏，但比起大家的直来直去，邹忌的方法却很委婉，他假装要给齐威王弹琴演奏，引起齐威王的兴趣，然后借题发挥，大谈乐理，齐威王哪里懂这个，一边听一边劝邹忌快演奏，这时候邹忌正色说：“大王见我不演奏只说道理，就觉得不耐烦了，但是大王拿着齐国这张大琴，多年来也没有弹奏一下，大家也很不耐烦了。”只这一番话，九年来胡吃海喝的齐威王幡然振作了起来。从此之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心锐意进取，变法图强，田氏齐国的强大，其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邹忌与齐威王的这番对话，奠定了他一生里一个重要的做派：讽谏。

他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采取这种委婉的方式表达的，通过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旁征博引，用绕圈子的方式讲出大道理，在不得罪国君的情况下把事情办了。如果说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是一个强硬派，那么主持齐国变法的邹忌，就是一个温和派。

所以比起商鞅强硬的变法政策来，邹忌的各类政策，表面看起来，也似乎非常温和：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通过对自己相貌问题的阐述，向齐威王讲明了作为国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说服齐威王广开言路，号召老百姓主动向国君提意见，并且提前说明言论自由，提意见的人无罪。第二就是赏罚分明，任用贤能。通过各种渠道，面向各诸侯国招揽人才，同时对吏治进行整肃，实行“严刑重赏”的政策，重赏有政绩的官员，严惩有劣迹的官员，以赏罚分明，提升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第三条就是完善稷下学宫的建设。稷下学宫是齐国著名的文化圣地，最早创建于齐桓公时期，到了齐威王时代，它重新进行扩建和改革，成为齐国招揽各国人才的主要承载，邹忌为稷下学宫设立了三条原则，即“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鼓励来此的学者们自由发言，自由讨论。表面看，这似乎是三条很平常的政策。但是平常的外表下，却有不平常的真相。

鼓励老百姓进谏，要求国君虚心纳谏，只是第一步，后面却是真正要采纳大家的意见，从而推动齐国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正是在虚心纳谏的过程里，齐国清除了国家制度中最后的奴隶制残余政治，和魏国一样，废除了奴隶制的世袭政策，取消了奴隶主阶层享有的俸禄，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

齐国对吏治进行整肃，严刑重赏的同时，更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形成了封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而稷下学宫的设立，其影响恐怕连邹忌本人也始料不及，稷下学宫成为战国乱世学者们眼中的乐土，中国文化中自由讨论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学宫里形成，诸子百家的经典论著，也大多完成于这个小小的学宫，与这里有渊源的学问家，包括孟子、墨子、荀子等几乎所有的战国时代文化名人。

两千年风云之后，王侯霸业早成尘土，稷下学宫所衍生出的古老文化，却依然在为现代社会所传承。而即使在当时，稷下学宫也同样有着重要意义：魏国给予人才的，是优厚的俸禄和官位，齐国给予人才的，却是人格上的尊重与学问上的自由。

邹忌在担任齐国相国期间，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掘水利工程，在今天的淄博、济南等地，都有齐国水利工程的遗址，齐国的农业经济在这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邹忌在经济上的政策，是“恤民养战”四个字，这时期的齐国，延续了春秋时期就设立的寓兵于农的政策，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对于服兵役的家庭，政府给予经济上的补贴奖励，提高士兵作战的积极性。富裕的齐国，在齐威王的励精图治下，正在把其丰厚的经济能力，转化为强大的军事战斗力。

战场见真章

齐国的崛起道路，在齐威王在位的中后期逐渐变成了现实。

按照《战国策》的说法，虽然齐威王执政前期，通过广开言路的方法，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使得韩赵魏等国家纷纷派使者前来朝见，收到了“战胜于朝廷”的结果。但是国家的力量博弈，“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国年代是不现实的，强国的地位，还是要在沙场上见真章。

齐国这时期面临的主要对手是魏国，在齐威王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主要对手，是魏国的第三代君主魏惠王。这正是魏国的由盛转衰期。

魏惠王之前，魏国经过魏武侯长期的扩张，既四面树敌，又形成了其横扫天下的威武。公元前369年，魏惠王派兵与秦国激战，击败了进攻西河的秦军，但在这场战斗胜利之后，魏惠王改弦更张，并未乘胜追击攻灭秦国，相反主动迁都大梁，对西面的秦国，改为防守为主。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魏国当时严峻的外部形势。作为四战之地的魏国，其国力势必承受不起四面作战的消耗，要想巩固霸主的地位，就必须有的放矢，对其中的一面强敌采取防守政策，集中力量对付相对较弱的对手。

在魏惠王眼里，秦国虽然屡次败给魏国，但是其民风彪悍，战争潜力强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定的，所以抓住机会，先挑相对弱小的对手下手，才是最好的争霸手段。魏惠王眼中比较弱的对手，就是曾是魏国盟友的韩国和赵国。在魏惠王时期，原本韩赵魏三国的铁杆关系，早已经基本破裂。而魏惠王也把统一三晋大地，兼打压齐国作为这时期的战略重点。

这以后，魏惠王一度暂停了对外用兵，在西面修筑长城抵御秦国进犯，严守国门，在国内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积累力量。自魏武侯时期开始，魏国生产破坏严重、民力疲敝的局面得以改变，魏国的实力持续增强。在此期间，经过励精图治的齐威王，已经成了魏国最主要的敌人。

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较量，是以失败开始的。魏惠王东迁大梁后，和齐国发生了多次战争，这时候的齐国虽然经过了整顿军队，战斗力大为提升，却依旧不是魏国的对手，长期南征北战的魏军，在作战经验和战斗素质上远远高于齐国人，何况他们还有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庞涓。这样强悍的军队，除非有神人帮助，否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败的。而似乎老天爷也在眷顾齐威王，数次败北于魏国的齐国军队，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可以扭转他们命运的“神人”——孙武的后人孙臧。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兵家，孙臧今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和魏国统帅庞涓那段恩怨纠葛，也是后人恒久讨论的话题。孙臧和庞涓最早都师从于战国兵家鬼谷子，孙臧更得到了鬼谷子代为传授的祖先遗产——《孙子兵法》。作为孙臧师兄的庞涓，因为妒忌孙臧的才华，假意邀请孙臧来魏国发展，事后又翻脸诬陷孙臧通敌，结果害得孙臧被处以“臢刑”，挖去了膝盖骨，成了终身残疾。孙臧凭借他的隐忍，更靠着齐国使臣的帮助，终于逃到了齐国，在得到了齐威王赏识后，被委任为齐国的军师。所以说孙臧是扭转齐魏战争战局的关键人物，不只因为他的才能，更因为他的作战方式，恰恰切中了魏国的“死穴”。

在齐魏两国军队战斗力差距暂时不能拉开的情况下，战胜魏国的办法，也就只有一个：必须要用高出对手一筹的战略眼光，牵着对手鼻子走，想尽办法分散敌人兵力，集中自身优势打歼灭战。可魏国的主将不是莽夫，而是同样足智多谋的庞涓，这个狡猾的统帅外加这支彪悍的军队，也只有孙臧能够对付他。

孙臧到达齐国后，虽然成为军师，却很少抛头露面，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训练军队，提升军队战斗力上。这时期的魏国，在东面挫败齐国，西面阻遏强秦后，开始放心大胆地攻打周边的赵国和韩国。特别是对于赵国，他更志在必得，如果占有了位于中原北面的赵国，对中原诸侯，魏国就会形成“坐北朝南”的优势战略地位，当年的晋国就是

凭此称霸江北的。

公元前354年，魏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无奈之下向齐国求救，在经过了多年对魏国的隐忍后，这次齐威王决定出手还击了，他以田忌为大将军，孙臧为军师，率领8万精锐火速驰援。

就是在这一战中，孙臧拿出了他独特的“围魏救赵”战法，不去救援赵国被围困的都城，相反率军直扑魏国都城大梁，以攻其必救的战法牵着魏国鼻子走。魏国果然被牵了鼻子，近10万魏军撒丫子玩命赶，在赶到桂陵的时候，被以逸待劳的齐军包了饺子。士气高昂的齐军碰上人困马乏的魏军，自然猛虎下山，战斗没有了悬念，齐国大胜！

桂陵之战是齐国崛起道路上的重要一战，齐国通过此战酣畅淋漓的胜利，不但打破了自身多年的“恐魏症”，更向列国诸侯昭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但魏国的元气并没有因此遭到损耗。然而，就在桂陵之战结束两年后，以为魏国元气大伤的秦国、韩国、赵国、楚国组成联军，赵楚韩三国将魏国主力包围在襄陵，秦国主力大肆攻打魏国西河边城。战斗起初进行得很顺利，多线作战的魏军力不能支，陷入到苦战之中，而秦军在西线的进展也顺利，一路收复沦陷多年的西河失地。但绝境之下的魏军，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魏国先是在襄陵大破三国联军，接着火速西进，击退秦国的入侵，短短数日奔波南北，将两线的强敌打了个稀里哗啦。齐国魏国之间的争霸，这时还没有分出胜负。

在桂陵之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齐国和魏国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342年之前，魏国通过连续对外战争的胜利，再次确立了它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而齐国却在韬光养晦，静看魏国嚣张。

公元前342年，魏国又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齐威王火速出手，再次派遣田忌和孙臧为帅出兵救援，这次孙臧故技重演，再次故意进

攻大梁，迫使魏国回军，但庞涓也学乖了，他们并不急于追击，而是慢慢尾随在齐国军队身后，静静地等待着机会到来。

机会终于到来了，庞涓发现，齐国军队每天扎营后用的炉灶一天天减少，早习惯军旅生活的他立刻做出一个自信的判断：齐国人在崩溃，在逃跑。得到判断的庞涓火速行动，企图一举将齐国军队尽歼，他带领轻骑兵追杀到马陵道时，却发现再次上当了，这里埋伏着大批的齐国士兵，用弓箭不断地射杀魏国军队。痛悔无比的庞涓感叹：“没想到，我还是让孙臆这小子扬名于诸侯了。”感叹完毕后，他主动冲向齐军阵营，继而身中数箭，随即壮烈殉国。

经过桂陵、马陵两战，魏国陆续报销了10多万魏文侯改革后精心打造的精锐作战部队。而齐国的强大，此后与秦国并称为二帝，一度共享霸权，也是顺理成章。

非议在战后

在齐国本身的崛起过程里，身为“总理”的邹忌居功至伟，但也正在这个过程里，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太多非议。邹忌遭到非议最多的，就是他和田忌的交恶问题，按照《战国策》上的说法，这两位同是齐威王励精图治的股肱之臣，多年以来却“不相交”。

史料的说法是邹忌妒忌田忌和孙臆的大功劳，设计陷害。马陵之战后，田忌和孙臆班师凯旋，邹忌故意设套，假借占卜的名义栽赃陷害，诬陷田忌谋反，结果百口莫辩的田忌逃到了楚国，早就预料到邹忌不怀好意的孙臆，在事前劝说田忌无效后，也借故离开归隐了。拜邹忌所赐，齐国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一个算无遗策的军事家。

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在许多人眼中，邹忌立下的那些功劳，

也就不值一提了。但在许多史料里，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邹忌，一个胸襟宽广，效忠国君，匡扶社稷的邹忌。在齐国崛起的整个过程里，他其实是齐国各项国策的设计师，才能是毋庸置疑的。而陷害田忌的行为，与他诸多“善举”比起来，看似很矛盾，但其实也很正常。邹忌性格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阴柔”，凡事讲究兜圈子，正面不行侧面来，放在进谏上，这叫有智慧，放在整人上，这就是狡猾伪善。陷害田忌的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但比起刚烈的商鞅来，阴柔的邹忌，下场却好得多，他的阴柔，给国君留下了“尊重领导”的好印象，凡事给足了国君面子，又听话又能干活，这样的好干部自然哪个领导都喜欢。所以齐威王、齐宣王两代君主都对他信任有加，又升官又封侯。却也同样因为他的“阴柔”，齐国变法的效果也是阴柔的。和秦国比起来，齐国变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行政制度建设和司法建设上，比起商鞅变法来都差距甚远。这样的差别，决定了齐国的变法，只能依赖于国君个人的素质，而不是整个制度的制约。就是这个差距，决定了齐国不可能在战国逐鹿中笑到最后。

八 最成功的只能是商鞅

战国时代的变法不少，南北各诸侯国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其中公认最成功的，就是商鞅变法。

然而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史家也在追问一个问题：商鞅既不是最早主导变法的前辈，而秦国也并非首先开始变法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变法最成功的，只能是商鞅变法？甚至为什么只有秦国的变法能够保持恒久的强大，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将来，这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商鞅变法的整个经过，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场童话般的奇迹。

商鞅进入秦国以前，列国的变法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唯独秦国还是一片安静。有能力变法图强，开创大业的青年才俊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跨过函谷关，进入秦国这个神秘的国家。因为在所有人的眼里，在秦国实现变法，几乎是不可能的，秦国经济条件落后贫穷，奴隶制贵族势力强大，民风野蛮彪悍，在中原人眼里，同属华夏族的秦人，在当时却是不开化的野蛮人。

这就好比今天跑到一些蛮荒国家，上马诸如微软这样的高科技产业，听着就像天方夜谭。

但是商鞅却做到了：他勇敢地走了进来，最后虽然客死秦邦，但他的变法成功了，他缔造了强大的秦国，成就了秦国横扫六合、灭亡六国的辉煌，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他的这段人生，都被看作一段不可思议的奇迹。

可是，商鞅为什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呢？

秦国其实是张无负担的白纸

商鞅变法成功，一个重要的条件，却被长期忽略：秦国，是一个相对容易变法的国家，原因也很简单——它很落后。这就好比一个操场要装修，一开始是沙土地，要改柏油跑道，结果刚要弄好柏油，塑胶跑道又兴起了。好些战国国家的变法，比如齐国、楚国，都好比是先拆了柏油路，再铺塑胶，十分地折腾。但秦国却省了，可以直接在沙土地上铺塑胶，折腾相对少。在一个国家走向变革的关口，不开玩笑说，相对的落后，有时候也是一种财富，因为可以少掉很多的负担。

秦国在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时期的秦国，虽然农耕经济已经成为主要方式，但关中平原地广人稀，有五分之三的土地还没有被开发，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起中原六国来差距很大。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文明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国家。

在封建化程度上，秦国也同样落后得多，鲁国早在公元前594年就实行了封建化的税收政策——初亩税，秦国到公元前408年，才由彼时在位的秦简公推行了这个政策。比起中原诸国可以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改革，秦国的国君在权力上却有限得很，战国早期秦国国君的废立都由旧贵族操纵。这样的局面下，要想实现改革，何其难？

但是也同样是秦国的这些条件，让他具备了改革成功的天然优势。

首先，秦国没有中原诸侯国那样严密的奴隶制国家体系。比起中原各国的旧有奴隶制框架，它都差得很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但是比起整个行政体制的阻挠，旧

贵族个人的阻挠显然是更容易应付的。而秦国虽然生产组织机构松散，生产落后，但是秦国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关中平原土地富饶，只要能够改革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秦国生产的迅速腾飞，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会使改革早期的障碍变得一马平川。

秦国变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们的文化。

在中原人眼里，秦国人是不开化的“蛮夷”，因为是“蛮夷”，秦国的旧贵族，头脑中条条框框的旧观念要少得多。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旧体制上，推倒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显然要比在齐国这样一个有悠久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国家进行改革容易得多。

比如齐国的改革家邹忌，他之所以采取讽谏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且所有的改革内容表面上都不涉及齐国国家行政体制的转变，正是慑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体制压力。

秦国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纵观当时所有诸侯国的国君，几乎找不到一个像秦孝公一样，具有如此坚定改革决心的。他能够给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在其他国家，都无法得到的。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无可复制的信任，来自于秦孝公个人的性格，更来自于他独特的身世。

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他原本不是秦国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他的家族是秦国王室宗族中较偏的一支，秦孝公的父亲公子连，早年就因为主张改革，触动了国内旧贵族的利益，被赶出国境。后来公子连不屈不挠，利用秦国发生政变的机会突然回国，在经过苦战后夺取了国君之位。这次政变凶险万状，当时的守旧派已经部署了军队埋伏在边境，准备随时杀掉他，好在军队中支持他的军官临阵倒戈，这才有惊无险夺权成功。

公子连即秦国历史上的秦献公，他在位期间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制定了五家一伍的保甲制度，并且开始初步推广郡县制，在全国设立了四个县来试点。可惜他的运气很不好，这时候的秦国，东面面临着魏国的威胁。此时魏国正处于魏文侯改革后最强大的时期，秦国在对魏国的战争里，连战连败，丢失了整个西河地区。

改革时代的参与者们，大多没有长远眼光，对改革的看法一向都是功利的，秦献公对外战争的失败，也成为保守派质疑改革的理由。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在忧愤中死去，他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后来缔造了秦国变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虽然年轻，但是家族的传承，父亲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了然于心，而他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秦国的强大，更关系着父亲的遗愿。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后，连续多次发布了求贤告示，希望能招揽到推动改革的人才，他将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他很快就等到了这个人才——商鞅。

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商鞅，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

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人，在西奔秦国之前，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痤身边做谋士，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为相国的公叔痤，许多重要的谋略，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都得益于这段时光。

打个金庸小说里的比方说，商鞅就好比是少林寺烧火的火工头陀，多年来耳濡目染，竟融会贯通了一身绝世武功。

从师承上说，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对李悝的《法经》非常推崇，并且精心研究，在漫长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

的施政改革理念。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真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

然而商鞅来秦国之前，有两个偶然因素，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痤，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痤的推荐，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老糊涂了，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个意外，是老谋深算的公叔痤生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因此劝说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不用也不杀，任他自谋生路去了。

这两个偶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经过在公叔痤身边数年的锤炼，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早已做到料事如神，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第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听了公叔痤的话重用商鞅，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这时期的商鞅，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在当时的六国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齐国是宗族当道，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所以，秦国，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经过三天的攀谈，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循序渐进的改革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在变法令颁布之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讨论，结果引来了旧贵族们的集体反对，大臣甘龙等人极力阻挠商鞅变法，而商鞅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当场与甘龙等人展开了辩论，一番唇枪舌剑将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明火执仗的反对，就此变成了暗流，无数的明枪暗箭，在商鞅变法的路途上等着。

但商鞅不惧，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长年的沉浮，让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变法要成功，必须采取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斩乱麻。所以商鞅采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要变法，先变人。所谓变人，就是要树立改革者的绝对威望，让他获得大多数人的足够的信任。完成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你商鞅是谁？秦国有几个人认识你？难道还要一个接一个苦口婆心地劝说，或者是上大街上做报告？

商鞅的办法很简单，不用做报告，不用劝说，立一块木头就行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南门立木”事件。商鞅在乐阳城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挂出布告：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口，就给他10两黄金。这事在当时，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恭喜你中奖了”的手机短信一样，很难让人相信。木头不重，路又不远，凭什么奖10两黄金？木头立了一上午后，奖金已经翻了好几倍，涨到了50两黄金，这时候来了个傻小子，壮着胆吭哧吭哧地把木头扛走了。结果商鞅二话不说，当然兑现奖励。南门立木的典故就这样不胫而走，所有秦国人都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个商鞅，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的威望就这样树立起来了，然后他趁热打铁，出台了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事实证明，商鞅不但口号很响，胆子很大，做事更是

现实。他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都是最初级的改革，包括废除传统奴隶制的世袭制度，设立军功授爵制，奖励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实行编户制，建立封建制的基层农村制度，奖励耕作；鼓励小农经济发展，规定家庭里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另过，这样就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国家的税源也扩大了。

商鞅的这几条政策，是吴起、李悝等人施行过的，大多没有什么新意，其中的一些，还是对秦献公时期变法内容的补充，比如实行编户制、奖励耕种。但这样做却是很现实的，像秦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必须要立竿见影提升经济水平，才能真正收拢人心。

另一个原因是商鞅坚持要变法先变人，变人的第一步，是要树立个人的威权，第二步，就要把国家大多数的老百姓，牢牢地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旧贵族对变法的反对，才能成为空谈。变法就这样推行开来，作用也立竿见影，秦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高。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大量引进，秦国的农业、畜牧业也都迅速地发展起来，小农经济群体的扩大，更造成了大量贵族的破产和财产的萎缩，世袭制度的取消，为国家节约了开支，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之所以能立竿见影，另一个原因就是商鞅够狠，他在建立编户制的同时，规定了保甲连坐制度，即一人犯罪，多人受株连，用残暴的国家机器，来打压一切反对变法的力量。这是之前所有的改革家在变法过程中，都未曾使用的方式。一是他们不会得到这样强有力的支持，二是他们本人也不够狠。

商鞅却够狠，比如有一次在渭水河畔，他一次就杀掉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的旧贵族，这其中真正有破坏变法行为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被株连的亲族，甚至还有邻居，整个渭水清澈的水面，刹那间被滚滚鲜血染红。连秦孝公的儿子，商鞅也绝不姑息。当时太子的两个老师鼓动太子反对变法，诽谤商鞅，商鞅得知后，做主把两个老师处以酷刑，一个割鼻子，一个脸上刺字，如此一来，整个秦国都吓得

打哆嗦了。他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自然谁的面子也不会给了。没办法，老老实实跟着他混吧。

如日中天的商君

商鞅第一阶段的变法持续了七年，到了公元前352年，变法的成果已经非常显著，秦国上下出现了仓储丰厚的景象，老百姓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甚至出现了披星戴月劳动的情景。

在国家税收方面，大量自耕农的出现，使政府的收入大为增加，国库财大气粗，旧贵族势力遭到了残酷镇压，一时很难对变法形成威胁。变法带来的巨大实惠，也已经在秦国上下深入人心。

内政顺利的时候，秦国军队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奖励军功制度的出台，使原本彪悍尚武的秦国人，作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打仗不用动员。从商鞅变法的第三年开始，秦国就陆续地在河西地区发动攻势，多次击败魏军，原先秦国对魏国战争一边倒的惨败局面，这时候开始攻守易行。

原本对秦国采取攻势的魏国，也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强大起来的秦国以防守为主，转而把注意力转向东边的中原诸侯国。对于正在上升期的秦国来说，这一事件尤其重要，它使得正在蜕变的秦国，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获得了充足的成长空间，秦国收复西河失地，东进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商鞅变法的第二阶段，从这时期开始。公元前305年，商鞅再次颁布了变法令，因为变法的卓越成果，此时的商鞅已经成为手握秦国大权的大良造。在秦国国内，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原本明枪暗箭的反对派们，现在已经无人敢掣肘。

商鞅第二阶段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废除井田，开阡陌，这就彻底断绝了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命脉，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庄田的垄断，勤力垦荒的自耕农们，只要足够勤劳，就可以把原来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划到自己名下，国家法律会为他们提供绝对的保护。二是正式确立秦国的地方行政体系，即郡县制度，全国划分成41个县，县的长官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免，这样对地方的控制权，也牢牢地抓在了国君的手里，原本画地为牢的旧贵族们，从此彻底成了死老虎。三是统一度量衡，整合国民经济，建立国家对商业贸易的绝对管理权。度量衡的统一，使国家有了统一的税收标准，商业税的征收也更加制度化。四是编订《秦律》，这是继《法经》之后，中国又一部封建社会法律，《秦律》参考《法经》制定，内容比《法经》更细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的各个方面，目的是建立一个严格的官员督察体系，六国后来所羡慕的秦国官员之严谨、认真、高效，正是由此而形成的。

在这四项改革内容中，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目的，第一阶段的改革，是树立新法的影响力，建立新法的绝对权威；第二阶段，是要把新法的内容制度化，成为秦帝国牢不可动的国体，深深渗透进秦帝国的血液中去。即使商鞅会有粉身碎骨的一天，但是商鞅的变法，也成为秦帝国从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时候的秦帝国，还享受着商鞅变法的成果，国民经济效率大大提升，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政府扩大了税源，增加了税收，国库储备充裕，足够支持大型的战争。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步增强，这时期的秦国，已经迁都咸阳，定下了东进中原的国策，秦国的理想，也比中原诸国更加远大，他们不再谋求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霸主地位，他们的理想是把整个天下统一在自己的囊中。这是秦国国君的愿望，他们太盼望君临天下的辉煌了。这也是商鞅的愿望，他期待自己一生的呕心沥血，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典章制度。

这期间的秦国，东进的脚步已经不可遏制。在秦国迁都之前，秦

军已经陆续收复了安邑、元里等西河失地，称霸中原的魏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到了公元前343年，秦国已经成为诸侯眼中不能小觑的力量，连挂名的周天子都来向秦孝公朝贺，授予他霸主的身份。公元前340年，商鞅亲自率军击败魏国10万大军，俘虏魏国公子，魏国无奈之下，只得向秦国归还了所有的西河领土，几十年的国耻，就此一朝得雪。

然而，仅仅是洗雪耻辱，在秦孝公君臣眼里是远远不够的。收复失地不够，获得霸主的身份也不够，最重要的是要平定中原六国，一统天下。商鞅变法第二阶段的12年，正是秦国勃兴时期的关键12年。在这12年里，秦国和齐国两面夹攻，使魏国实力彻底萎靡，秦国打通东进道路的愿望从此彻底实现了。此后，彪悍的秦人第一次跨出了函谷关。雪亮的马刀，直指向富饶的中原大地，关东六国的灾难，中国的统一大业，脚步日益近了。

注定到来的悲情结局

商鞅人生的再次转折，发生在公元前338年。

这一年，一直不遗余力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了。即位的秦国国君，就是当年曾经和商鞅结下梁子的太子驪，这就是秦惠王。秦惠王上台后不久，对商鞅的清算就开始了，大批失去权力的旧贵族四处造谣，诬陷商鞅谋反，秦惠王派出军队，去商鞅的封地缉拿商鞅。商鞅闻讯后立刻逃跑，逃到边境时，却没有客栈主人肯收留他。

因为根据商鞅自己制定的律法，客栈如果收留没有“身份证”的客人，是要遭连坐大罪的。走投无路的商鞅，最终被秦国的追兵逮捕，处以车裂的刑罚。

商鞅之所以结局如此悲惨，原因有很多。

一是因为商鞅变法中的污点。商鞅变法的最大错误，就是矫枉过正，手段过于酷烈，在秦国建立了严刑峻法的统治，在街上吐一口痰都要治罪，至于连坐之罪，多年以来更是株连甚广。后来秦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的“暴政”，其根由也是商鞅变法开始后秦国日益严苛的法家思想。

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秦惠王自己的帝王心术，像商鞅这样一个功高震主的人，对王权的威胁是巨大的，不除掉是不可能的。战国历史上秦国的历代权臣，如果不知功成身退的道理，下场都很悲惨。比如李斯，比如吕不韦，能得善终的范雎等人，原因也在于见好就收。而以商鞅的性格，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商鞅走进函谷关的第一天起，他被车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注定要成为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殉道者。

九 连横合纵，大国博弈

自从公元前341年，魏国在著名的马陵之战中，几乎崩溃式地惨败给老对手齐国后，这个昔日战国的霸主国家，就真应了一句话：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魏国的悲惨情况，用《史记》中魏惠王给孟子诉苦的那句话，就可以完美概括：“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也就是墙倒众人推，被几个主要强国轮番吊打。昔日雄霸天下，这下水深火热。

不过为啥会如此水深火热呢？一是败得太惨，元气损伤太厉害。马陵这一战，魏国“覆十万之军”，以当时的人口条件，几乎堪比后来的赵国长平惨剧。更大的损失却是高层指挥人才，魏王长子申被俘虏，名将庞涓战死，魏国最杰出的军事团队，一战几乎一扫而空。当然比这更难以挽回的损失，却是昔日魏国横扫天下的最大本钱：魏武卒。

作为战国时代一支曾经百战百胜的恐怖力量，魏武卒在马陵之战中，遭受的几乎是灭顶之灾。而且这种“武卒”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漏洞。以荀子的说法：是以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

一个士兵即使再英勇善战，也最终难逃时间的磨砺，总有老去的一天。而魏武卒这种制度却决定了：好兵就是终身制，更缺少淘汰机制。老兵占据了位置，战斗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衰退，新兵替补不上，日久天长就青黄不接。在马陵之战中，魏武卒最后的精华几乎损失殆

尽。这支昔日强大的军队，再难恢复荣光。

如上种种，昔日强悍无比的魏国，宏图霸业，也就彻底成了落花流水。

落毛凤凰不如鸡，放在惨败后的魏国身上，真是一点也不假。马陵之战后的几年里，魏国基本就是被列国组团上门猛打。先是秦国、齐国、赵国三国联合伐魏，然后楚国也来凑热闹。曾经惹不起的魏国，一下成了个香喷喷的蛋糕，被周边邻居来回瓜分。上门瓜分得最狠的，倒还不是齐国，反而是趁火打劫的秦国。先是商鞅主持军事行动，一口气夺取了魏国西部大片领土。

这以后，秦国几乎连年东进，魏国几乎想尽办法，结果打仗打不过，讲和人家也不许，主动献上土地示好，更叫秦国得寸进尺，侵略脚步变本加厉，事实也再清楚不过：秦国要的不是霸主，而是天下，魏国却是一块跳板，所以一定要狠打到底。到公元前329年，秦国已经扩张到今天山西河津地区，魏国的生存环境，已经越发险恶。

然而在魏国的东西两边，两个新的巨人也先后崛起：齐国和秦国。这两大帝国东西对峙，文武动作不断，夹在中间的魏国，也就风雨飘摇，连年受夹板气。

就在魏国叫苦连天的时候，一个来自秦国的使者，却送来了意外的橄榄枝：公元前328年，得胜的秦国使团访魏，非但没有趁火打劫，反而来了一次慷慨大回馈，主动把秦国攻取魏国的蒲阳，慷慨还给了魏国。一连串意外惊喜，还没让魏国回过神来，又一个春天般的温暖上门——秦国公子繇，竟然也大张旗鼓，送到魏国来当人质。先前还把魏国摁在地上，肆意各种胖揍的秦国，竟然就这样转了性子，和魏国重归于好了？

导致这次转性的，正是这位送温暖的使者，战国杰出外交家张仪！

这场意外事件开启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友谊，而是战国一段波澜壮阔的外交史：连横合纵时代。

横空出世的张仪

张仪的名号，熟悉战国历史的朋友，基本都可如数家珍：他出身魏国公族，曾经是鬼谷子弟子，后来周游列国，却长期不得志，还曾在楚国被诬陷偷和氏璧，给打得死去活来，但心态始终特别的好，被楚国人打成一堆烂肉送回家，妻子哇哇哭，他还信心满满：只要我的舌头没烂，就是翻身的本钱。

事实证明，他这个信心，绝非胡乱自信。作为战国顶级的外交家，张仪所拥有的，不只是犀利的口才，更是长远的战略眼光。后来进入秦国，果然得到重用。而接下来对魏国的这一幕，就是其外交才能的生动写照。

秦国和魏国，虽说各种死仇，但以秦国取天下的战略目标来说，再强的秦国，也无法面对同时开战东方六大强国的后果，何况东方的齐国，也正蒸蒸日上，战略条件要比秦国好得多。要想真正步步为营，实现吞并天下的目标，必要的时候，就要吐出已经到嘴的肉，拉到自己的铁杆盟友，第一个对象，就是魏国。

这一次的魏国出使，效果也出乎意料的好，先狠狠地打了魏国一巴掌，然后再好好地揉一揉，果然把魏国揉得感激涕零，死心塌地表示要和秦国结成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且立刻就以行动表示了决心：魏国把上郡十五县全数送给了秦国。这个超重大礼，也立刻在秦国国内引来一阵惊呼，本来还遭到颇多反对声的张仪，这下身份扶摇直上，被秦惠文君任命为相邦。

然而更有面子的事，则在公元前325年发生了，做了多年国君的

秦惠文君，已经不满足“国君”这个称呼，眼看着东方齐楚大国的国君都称了王，自己也十分眼热，打算赶个潮流也称个王。其实以秦国的国家实力，早就有称王的资格，之所以秦孝公到死还是个“公”，秦惠文君威风这么多年还是个“君”，实在是难言苦衷：不是没实力，而是没朋友。

“称王”这种事，不是自家改个封号这么简单，这是一个重大的身份认定，谁要称王都是一次重大的典礼，但典礼好办，捧场必须要有，自封的王不算数，必须要有同盟小弟来捧场。这样的称王，才叫高端大气上档次，否则没人捧场，自己自称倒也可以，但放在列国中间，那就是个笑柄。

这时候的秦国，虽然实力强大，但还没有可以抛开一切白眼的能耐，既然要称王，小弟捧场很重要，可是多年以来，中原国家看秦国，一开始还是嫌他落后，等着商鞅变法实现自强后，却更嫌他野蛮，总之长期以来，都把秦国看作是虎狼之国。捧场？打死也不干。

但张仪这样几次慷慨大回馈，称王的问题却一下子解决了：魏国和韩国在秦国的大棒加安抚下，都死心塌地做了小弟。捧场自然不是问题。公元前325年4月，秦惠文君的称王大典霸气上演，魏国和韩国的国君不但亲自前来朝贺，更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一个十分惊愕的行为：两位国君当场为秦王驾着有王位标志的马车，在各国来宾中间招摇过市。消息传开，列国一下哗然。

这不但是确立了秦王的国王身份，更是确认了秦国对于韩国、魏国的霸国身份，从此以后，秦国吞并中原，终于有了可靠的小弟打手，它不再是一个人战斗。这时候的秦惠文君，也就更名为我们熟悉的秦惠王了。

这一系列荣光的实现，正来自于张仪的巧妙筹划，他的声望在列国之间，更是如日中天。可作为一个魏国人，身在秦国当官的他，遭

受的非议刁难一直也不少，人生事业越发展，身边就越发招来仇恨的目光，其中一位，就是公孙衍。

同样也是魏国人，同样也是在秦国实现了人生腾飞，享受高官厚禄，同样更都是著名外交家，但公孙衍对张仪的恨意，真是由来已久。

首先是个竞争问题，两人专业相同，籍贯相似，还都在一个国家奋斗，相互之间真个是针尖对麦芒，无奈老姜不敌新葱，当年作为前辈的公孙衍，自从遇到后辈张仪，人生就急转直下，昔日执掌大权的他，在秦国越发边缘化，终于彻底待不下去了，含恨出走跑去了魏国。

公孙衍去魏国的事，一开始张仪也没介意：秦国你都待不住，魏国你能翻起什么风浪？但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一次出走，改变了张仪亲自操盘，原先顺风顺水的连横政策。因为早就在暗地研究张仪的公孙衍，总结自己在秦国失败的教训后，终于做出了一个针尖对麦芒的选择：你连横，我合纵！

既然你的连横，就是到处拉盟友，建立秦国自己的联盟，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在列国之间奔走，呼吁中原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进攻！

当然，这个重要的战略，风险性也极大，初到魏国的公孙衍，虽然也立刻得到了魏国的重用，却也先暗自收起了锋芒，先没有对秦国发难，相反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烧向了赵国。

说起这件事，其实是身为魏国大臣的公孙衍和身为齐国将军的田盼，打算各自红脸白脸，说服自家国君拍板同意，一道出兵攻打赵国。公孙衍对这个大事，信心十足，上来就告诉田盼：回去给你家国王说，出兵五万人，保证把赵国打趴下。田盼惊得差点合不拢嘴：“五万人？您当齐国是你家开的呢，说得倒容易？”谁知公孙衍信

心十足：“就给你家齐王说要五万人，少一个人也不干！”为啥这么坚决，明知难还要狮子大开口？公孙衍解释说，您如果说得太简单了，国君们肯定不信，认定你是在忽悠人，只有把事情说得既充满诱惑力又困难，才能激得这些人下本钱。

事实果然证明，公孙衍对于国王们的心术揣摩，简直到了精准得恐怖的地步。田盼回去一学说，齐王眼皮子都不眨，当场就批了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赵国，这下齐魏合兵前后夹击，一口气拿下赵国的大片土地，齐国扩充了实力，魏国更补回了被秦国宰割的损失，却叫刚刚登上王位的一代英主赵武灵王，王位屁股还没坐热，就结结实实吃了个瘪。

当然比起国土的收获来，最大的收获却是在战场外：魏国彻底修复了和老对头齐国的关系，在和秦国修好的同时，也傍上了齐国这棵大树。生存环境一下大好。

公孙衍的名号，也一下子在中原大地响亮起来。然而远在秦国的张仪，阴冷的目光也投射过来。

作为这个时代顶级的外交家，张仪最不缺少的，就是嗅觉。公孙衍打赵国的事，放在一般人眼里，基本和秦国八竿子打不着，然而张仪却立刻洞察，这个老对头想干什么。

于是公孙衍刚烧了第一把火，张仪这边就一阵风暴袭来：公元前324年，张仪亲自率领秦军，大举进攻魏的领土陕地，消停没多久的秦魏关系，一下又战火重燃，结果魏国一如既往地不经打，不但国土很快沦陷，而且当地的老百姓，也被张仪驱赶，全都赶到了魏国。一时之间，整个魏国西部边境上，到处都是难民扎堆。

张仪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把陕地经营成军事要塞，作为秦国东进的另一个跳板。而更重要的目标，就是给魏国施加压力。几下子进攻手段轰轰烈烈，正把魏国烧得焦头烂额间，一个暗流也悄悄袭来：

约齐楚大臣在江苏沛县相会。

对于正在忙活合纵的公孙衍来说，这个暗招才叫釜底抽薪。公孙衍一直苦心经营的，就是以魏国为纽带，实现中原国家联合抗秦的合纵局面。结果被张仪一下子洞察到了，先朝其中最强大的齐国和楚国下手。只要这两个国家不上公孙衍的“贼船”，合纵基本就是废。

在张仪看来，自己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先以痛打魏国亮了肌肉，然后又施以恩惠，拉拢齐楚，高明的手段外加秦国强大的实力做底气，公孙衍你还能蹦跶起来？

谁知接下来的事，却给了得意没多久的张仪当头一棒：公孙衍面对张仪的拆解，竟然见招拆招，放出了一个大招：五国相王。

你秦国当初拉拢魏国，就是为了称王，那我也有样学样，你不过是拉来了韩国、魏国当小弟，我这里来个更大动作：五国相王。

这一招厉害在哪儿？虽然和秦王称王内容一样，可性质不同。秦王称王，要的是韩国、魏国来做人肉背景，但五国相王却不同，大家是互相称王，结成战略同盟，一起对抗秦国的进攻。

可这看上去很厉害的招数，真执行起来却出了问题：参加五国相王的国家，分别是赵国、韩国、魏国、燕国、中山国。前四个国家问题不大，偏偏中山国也掺和进来，立刻招来了不满声。其中最不满的，正是公孙衍一直在努力傍上的齐国。作为东方仅有的能抗衡秦国的力量，齐国眼珠子也高，看到小小的中山国也来称王，立刻深感丢不起人，竟然要联合魏国废掉中山王的王号，却也被魏国拒绝。结果一场本来抗秦主题的“相王”活动，啥事还没干，自己就先掐起来了。

闹剧打得如此厉害，秦国还没来得及掺和，另一个不该掺和的国家却又掺和了：楚国。借口干涉魏国的国君子嗣问题，大举出兵魏国，一口气拿下魏国八座城池。公孙衍苦心筹划的相王活动，这下连

连吃瘪。而几轮交手之后，公孙衍和张仪，这对老对手的差距也就暴露无遗。两人在战略眼光和心态拿捏上，都堪称顶级高手，但公孙衍与张仪的最大差距，却是做事的步骤手段，比起张仪步步为营经营来，贵族出身的公孙衍，却常是步子迈得太大。高手过招，丁点的差距，就是谬以千里的后果。

公孙衍的翻盘

公孙衍的合纵，连遭了好几次打击，而身在秦国的张仪，也跟着乘胜追击：公元前323年，秦国也连续攻取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时候的魏国，向西被秦国打，南方又被楚国打，好不容易拉上关系的齐国，也一下关系冰冷了。可谓要多失败，有多失败！

焦头烂额的魏惠王，一怒把丞相惠施撤职。身为魏将的公孙衍，也跟着靠边站。而身为秦国相国的张仪，却把自己当作一颗炸弹，紧接着扔过来：入魏。

这次张仪来魏国，不是出使，也不是恫吓，却是来求职。

说起来，张仪也是一肚子苦水，自己在秦国，多年来风光无限，建功不断。但是仇恨也拉得多，在秦国官场上，基本就是光杆一条，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秦王的支持。但历史的教训告诉张仪，这个依靠，才是最不靠谱的，前面商鞅的例子，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在秦国地位越高，功劳越大，风险也就越大。而且见好就收都没用，自己一旦退一步，接着就会被各种清算。

所以张仪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道妙计：与其在秦国过这种刀头舔血的生活，还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主动辞去相位离开秦国，既让秦国的这群仇人们称快，又能以退为进，继续变换战场，推行自己的连横政策。

他找到的第一个战场，就是魏国。

公元前323年，造访魏国的张仪，很快接替惠施，成为魏国的新相国，他就像一块秦国扔出去的胶水，一下就把魏国，牢牢绑在秦国的战车上。挂着魏国的相印，其实却还是秦国人，更深的战略目的，却是“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也就是把魏国变成秦国的小弟，给天下国家做一个表率。

照着张仪的这个盘算继续下去，接下来的步骤，就是秦国以魏国作为跳板，进攻自己的主要敌人。这样秦国出兵，魏国提供战场，两家配合默契，必能横扫中原，第一个进攻目标，就是秦国的最大强敌：齐国。

这时候的齐国，还是齐威王在位时期，也是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对于秦国的这场东进行动，齐威王也并不慌张，因为此时他正拥有一个孙臆之后，堪称东方军界第一人的将星：匡章。

匡章这个名字，今天知名度不高。但是在秦国这次进攻打响前，他的名号却很响亮，倒还不是军事成就，而是他的家庭纠纷。

当年匡章年幼时，其母亲被父亲杀死，这段掌故被齐威王得知后，战前齐威王特意鼓励说只要你打败了秦国，回来就风光厚葬你的母亲，没想到匡章毫不领情，说就算是死，也不能这么干，因为这等于侮辱了我的父亲。

对于匡章这个打脸，齐威王非但不生气，反而非常欣赏。因为先做孝子才能做忠臣，从匡章这番表现里，他看到的正是一个对父母忠孝、铁骨铮铮的汉子。因此齐威王高度信任他，给予他专断之权。

这是横扫东方的齐国军队，与已经声名鹊起，以强悍战斗力名满天下的秦军之间，一次火星撞地球般的碰撞。但没想到对决还没开打，齐国这边的新闻就不断传出，最爆炸的新闻，就是传说匡章已经

和秦国勾搭上，连什么时候投降都商量好了，各种消息满天飞，说得有鼻子有眼。

消息传来后，齐威王倒是十分淡定，相反秦国这边十分兴奋，竟真个以为匡章要变节了，于是在毫无防备下，匡章的齐军突然发起进攻，把得意洋洋的秦军杀得大败。这是自商鞅变法之后，一直无敌的秦国军队，第一次悲惨的失败。

得胜的齐国，也确立了他足以抗衡强秦的国家地位。但对张仪来说，最严重的后果却不是这个：本来想得很美满，把魏国好好拉住，然后一举打败齐国，秦国的东出大业，就可以一马平川，没想到上来就吃个瘪，被齐国好好教育了一顿。

教育的后果，更是局面大反转，最感灰头土脸的倒还不是秦国，反正齐国离得远，打不过就撤回本土而已。但魏惠王却不干了：自己的魏国，可在人家齐国眼皮子底下呢！本来指望着狐假虎威，借秦国的力量暴揍一顿齐国，还能捞些好处，这下好处没捞到，秦国军队拍拍屁股走人，齐国的刀尖子却顶到了自己脸上，这可如何是好？

气急败坏的魏惠王转过脸，正看到满脸懊丧的张仪：替罪羊这不是现成的吗？

这下张仪苦日子来了，先被魏惠王罢免了相国职务，罢免的可不只是一个相国，更是张仪多年以来苦心营造的魏国小弟身份。这下张仪被轰回了秦国，一直竭力为联合抗秦奔走的公孙衍，身份更扶摇直上，提拔成了魏国的相国。这也就意味着，张仪之前多年的连横苦心，经过这场秦国远征大败，一下子全部白费。忙活一场，终点又回到起点。公孙衍的合纵，这下又占据了上风。

两大巨头

张仪被轰走的同年，魏惠王也溘然长逝。已经是魏国国相的公孙衍，身份地位更如火箭速度般，一路地蹿升起来。他不但是魏国的重量级首脑，而且名声更传遍列国，得到了中原国家的支持。

志得意满的公孙衍，也决定趁热打铁：既然你张仪做初一，就别怪我公孙衍做十五，你能借道魏国来打齐国，我难道就不能联合中原国家来伐秦。

于是合纵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抗秦行动，终于在公元前318年上演：公孙衍纠结了韩赵魏燕楚五大国，组成联合军队，浩浩荡荡西进，朝着秦国杀来。

但比起张仪那次运气差，公孙衍这次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所谓“五国抗秦”，燕国只不过是观风景，表示一下道义上的支持，楚国倒是表现很积极，楚怀王还被推举成了纵约长，但等到要真正出兵的时候，楚国却反包了，一个兵都没有派。真正拉到战场上的，只有韩赵魏三国。这反映在战场上，效果也可想而知。韩赵魏三国当时并不是强国，虽说勉强凑齐了军队，但战斗力和如日中天的秦国相比，着实不是一个档次，部队拉到函谷关，立刻就被秦国打得稀里哗啦，不但没有报仇雪耻，反而被秦国一路反击，一直打到韩国的修鱼。

秦国对这次联合伐秦的态度很明确：要么不打，要打就往死里打，要各国好好看看跟秦国作对的下场。本着这样的目标，秦国不但疯狂掠夺三国土地，而且出手就是狠招。三国先后被秦国斩杀的士兵总数，保守估计就有82000多人，如此重大惨烈的伤亡，堪称战国开始以来所未见。秦国的残暴和其作战的凶悍，一下震惊天下。当然和后来长平之战比起来，这样的伤亡只能是小儿科。

但在当时，秦国这一通强硬，一下就把一盘散沙的合纵给吓坏了。五个国家纷纷撇清自己，退兵的退兵，示好的示好。眼看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合纵，就要以完败而告终时，公孙衍一招看似不经意的

杀招，却一下给中原国家找回了场子：“义渠”。

义渠，就是游牧在秦国西北的古老游牧部落，这个战斗力出名强悍的民族，常年是秦国北方的大患，公孙衍在进行这次合纵时，自然也没忘了这个恐怖杀星，主动派人联合。结果当秦国的军队在韩赵魏国土上大杀四方的时候，义渠的铁骑却在秦国的后方开始捣鬼了：义渠主动出击，在李帛地区大败秦军。

为啥这个凶悍的民族，这么听公孙衍的话呢？这实在还是公孙衍拿捏对手心术的本事太强。一开始和义渠谈判的时候，一句话就卡住了义渠的死穴：如果秦国不和中原国家开战，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消灭你，你自己看着办！

等到合纵开打的时候，秦国也不是没考虑到义渠的威胁，开打之前主动找到义渠，送上丝绸做礼物，本以为可以像以前一样把这帮蛮族稳住，没想到经过公孙衍教育，义渠已经不那么容易糊弄，秦国的礼物照收，该打却还是往死里打，背后一场突然袭击，让秦国结结实实挨了闷棍。

如此一来，这场失败的合纵，虽然没能收复国土，却也拜义渠的表现所赐，给合纵大业好好地找回了场子。而公孙衍的名声，也就一下子起来了。他和张仪这番连番斗智，更引得天下人侧目，以当时的名士景清的说法：公孙衍和张仪，就是当时的大丈夫，他们如果生气，天下人都害怕，他们如果消停，天下人都高兴。

其实真正让天下人高兴的，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人格魅力，而是他们所代表的两大外交博弈：连横对合纵。

张仪的最大挑战

公孙衍的合纵失败后，张仪又精神了。

精神抖擞的张仪，给秦惠王献上了一个堪称胆大包天的出击计划：趁热打铁进军韩国，然后搂草打兔子，把周王室给灭了，周天子也抓到咸阳来，从此把周天子捏在手里，号令天下谁敢不听。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妙笔，他要提前上演？

但如此大胆的计划，得到的却是秦惠王冰冷的回答：不行！

作为一个敢把商鞅送上法场的铁腕帝王，秦惠王在历史上的形象，一直比较负面。但是这次的选择却证明：在战略眼光的取舍上，他甚至比父亲秦孝公还要强。因为公孙衍的合纵，留给秦国的最血淋淋的教训，就是后院决不能起火。要想吞并中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稳定的大后方，每次进军中原，都要这么提心吊胆，不是怕粮食不够吃，就是怕义渠打闷棍，不被打死也要被烦死。

为了不再吃这个亏，秦惠王决定，放弃进军中原的大好机会，扩张的矛头，却要指向一片新国土：巴蜀！

为什么要吞巴蜀？一是巴蜀拿下，关中平原就少了侧面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巴蜀地区地广人稀，却是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如果好好开发，就会成为秦国的粮仓，可以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战事。

于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以司马错挂帅，发动了对巴蜀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当地的巴国和蜀国两个政权相继投降，包括今天四川盆地在内的大片领土，基本都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随后代代秦王，都致力于巴蜀地区的开发，大批的秦国农民移居巴蜀，终于把这个蛮荒之地，变成了秦国重要的产粮区，支撑起了秦国浩大的战争。但秦国选择这个战略，风险也是极大。如果中原国家借这个机会东进，秦国的局面可就困难了。

但对这个问题，秦国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中原国家并非铁板一

块。特别是五国合纵失败后，中原国家的彼此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魏国这边，贵为魏国相国的公孙衍，正逐渐失去魏国的信任，而且公孙衍致力于合纵，反而合在了自己身上，魏王信任齐国人田需，反而把公孙衍放在了一边。好在这位眼光敏锐的外交家，及时自救成功，拉来了齐国国相田婴支持，自己也转而担任了韩国相国。这样一来坏事变好事，齐国、韩国、魏国，被公孙衍巧妙经营成了一个联盟。

而此时秦国的相国，正是官复原职的张仪，对公孙衍这番动作，他又岂能坐视？而比起上一次来，张仪这次的应对，却是简单粗暴：公孙衍跑到哪里去，我就打哪里，就是这样认人不认国家。

如此一闹，韩国又倒霉了。秦国大军长驱直入，而公孙衍则把投奔对象选在了楚国，没想到楚怀王虚张声势，答应派救兵却一直看风景。结果在岸门大战上，孤军奋战的韩国被秦国打得大败，而最丢人的是，一直主持合纵的公孙衍，关键时刻非但没冲在前面，反而撒丫子跑掉，把忠心耿耿的士兵们扔给秦国虐杀。这样一番痛打，韩国可吃了大亏，除了丢人外，更丢掉了大片国土。公元前314年，韩国再次向秦国俯首称臣，而且比起上次还屈辱，亲秦国的韩国公子政，被立为了韩国太子，也就是不但这一代要做秦国小弟，下一代更要做。

秦国这次军事行动，不但打服了韩国，捎带也掠夺了魏国和赵国的大片国土。更以韩国为跳板，把赵国也跟着痛打了一番。这样一来，韩国和魏国重新倒向了秦国，张仪经过辛苦努力，再次建立起了与魏国、韩国之间的联盟。而且更叫中原国家震撼的是，秦国在这次用兵里，占据了一个重要战略要地：武关以东的商於之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淅川地区，这个地方就好似一个矛头，直接插入到了楚国边境，这也就意味着，秦国不但向东有了攻打齐国的跳板，向东南也有了攻打楚国的基地。原来还看上去很远的秦国，这下血淋淋摆在齐国

和楚国面前。

而张仪和他的连横，最大的挑战也就要到来了。

长期以来，公孙衍的合纵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他合纵最热心的，主要是韩赵魏这几个长期受秦国威胁的国家。而几个主要的大国，齐国、楚国，对这个事情的热心程度并不大。可是以韩赵魏三国的实力，就是捆绑在一起，当时也难做秦国的对手。

但是到了公元前313年，韩国和魏国先后臣服秦国后，楚国却坐不住了：秦国的威胁眼看上门，于是齐国和楚国，也就走到了一起。在齐国的支持下，楚国大举出兵商於之地，先拿下了曲沃，然而又兵临于中。就在这关键时刻，张仪再次出招了，他主动出使楚国，许下了最美好的心愿：只要楚国和齐国绝交，秦国就和楚国修好，而且把六百里商於之地，全数奉送给楚国。

只要看看当时的形势，就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秦国如果拱手相送商於之地，就等于把刀把子送到楚国手里来。这样的傻事谁能干？可偏偏楚怀王就这么傻傻地相信了。结果楚国一不做，二不休，和齐国当场断交，然后大摇大摆去接收商於之地，却被秦国给轰了回来。这才知道上当了。

楚怀王虽然在外交上单纯，却绝不是好脾气，知道真相后立刻大怒，公元前312年，楚国大军呼啸而来，而且先前吃亏的楚国，这次出兵却十分科学，一路由景翠率领，攻打已经倒向秦国的韩国；一路则由屈匄带兵，直扑商於之地。你不给我，我就自己来拿！

这是战国时期长期处于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的楚国，与战国时期新兴霸主秦国之间，一次重量级的交锋。上次在齐国面前吃了大亏的秦国，这次还会重蹈覆辙吗？

相比上次秦国的拙劣表现来，这次秦国从部署到用兵，都已经沉

稳成熟了很多。楚国既然两路打，那我就三路来，除了针锋相对两路迎战外，最关键的却是第三路：特别是中路军，由张仪慧眼选拔的名将魏章统率，在商於之地反击楚军，另外还有名将甘茂的一路大军，直接进入楚国汉水流域，把战火烧到楚国国土上去了。

结果魏章出手就震撼天下，在丹阳一战就斩杀楚国八万大军。号称兵源最多的楚国，在战斗力上距离秦国的差距，一下子尽显无疑。不但军队受到毁灭性打击，将领抓俘虏就抓了七十多人。更和甘茂部队会合，联手横扫楚国境内几百里，还给秦国多打了一个郡县：汉中郡。

更震撼的场面，却发生在中原。救援韩国的秦将樗里疾，不但把楚军打退，更是乘胜追击，在韩国和魏国境内纵横呼啸，一下打穿韩魏两国，直打到魏国的东北面。这场战国时期一次堪称“世界大战”的秦楚交锋，就这样展现了秦国强悍的战斗力。在之后的几年里，确立优势的秦国军队，一面稳住东边和楚国绝交的齐国，一面摠住楚国猛打，到公元前311年，秦国已经拿下了楚国的昭陵，这样一来，秦国的巴蜀、汉中这几个地方，完全就已经连成一片。仅以国土和人口来说，秦国已经完全超越了楚国，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大国。

在这段战争过程里，挨揍比较多的是楚国，但看热闹比较多的，却是齐国。齐国基本就是看风景，逮着机会就捡便宜。但没有想到的是，齐威王时代还和秦国旗鼓相当的齐国，已经正是在这时期与秦国拉开差距。虽然齐国国力也在上升，公认东方六国中的第一强国，却也失去了单独面对秦国的能力。

一个全身而退，一个功劳被占

如果照着张仪这时候的谋划进行下去，秦国一统天下的步伐，也许会更加提速。但是就在一切形势大好的时候，秦国自己却出了大问

题：公元前310年，秦惠王去世。这位一代英主的过世，却也害苦了他一直信任的张仪。

就如商鞅当年的遭遇一样，张仪也在新国王秦武王登基后，遭到了秦国举国的清算讨伐。但好在做人方面，张仪比商鞅拉的仇恨要少。而且局势比人强，一旦张仪死在秦国，真正受影响的却是秦国大业。于是权衡利弊下，张仪和心腹魏章，只是被解除了职务，离开了秦国。

张仪随后到了魏国，这位战国知名的外交家，再次担任了魏国的国相，而齐湣王得知情况后，一度也想出兵攻打魏国，借机会要张仪的命。但张仪却不慌张，反而派人告诉齐湣王：您要是真攻打魏国，那么等于替秦国分担了压力，秦国会趁机攻打韩国，直接就把周天子给端了，你就是给秦国做好事啊。果然说中了齐湣王要害，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躲过一劫的张仪，在做了一年魏国国相后，病故于魏国。

相比之下，公孙衍的结局，却是相对悲情：他在韩国受到排挤后，也回到了魏国，以《韩非子》的说法，又因为卷入了大臣田需和张寿的争权事件，被魏王杀掉，合纵的倡导者，落得如此下场。而拜《史记》里的错误记录所赐，这个可与连横媲美的外交妙笔，功劳竟记在了小字辈的苏秦身上。

但经过这场博弈之后，秦武王登基后的秦国，扩张也在继续。可是没有了张仪的谋划，仅仅经过三年时间，秦武王就在与大力士孟说比比举鼎时力竭而死。而遭受重创的楚国，却在楚怀王南吞百越之地后再度强大起来。而秦国的传统对手齐国，也经过齐宣王的休养生息，力量再度强大。这几个主要对手与秦国的较量，依然也在继续。

十 楚国为啥会衰落

在战国列强变法图强的热潮中，另一个曾经雄视天下的势力，就是南方的传统豪强楚国。

作为春秋时代灭国最多的国家，楚国一直到战国中期，都是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特别是在吞并了越国之后，其国土面积更达到了极盛，在与秦国的大规模战争之前，楚国的人口和土地，都是战国列强中最大的，其支持战争潜力的能力，更雄厚到恐怖的地步。

楚悼王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90年开始，本就国土辽阔潜力雄厚的楚国，在吴起变法的催动下，开始了破茧成蝶一般的蜕变。这也是吴起人生的最后一段辉煌——吴起变法时代。通过对魏国李悝变法的原样整体移植，吴起在楚国所掀起的，也堪称一场狂飙突进一般的变革。

吴起的变法，其内容和李悝变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比起李悝单纯的政治家身份，吴起更兼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双重角色，因此他带给楚国的，也是更加偏向军事化的强大变革：大批被废除了爵位的旧贵族，强制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南方大地上，华夏文明向南的传播，因此进入到了加速度的阶段。军事实力也全面升级，甚至在与战国当时第一强军：魏武卒的较量中，都屡战屡胜。

但吴起的变法，终于随着楚悼王的过世，而遭到残酷的清算，吴起自己被奴隶主贵族们杀害，并且引发了楚国高层一次大规模的贵族屠戮行动。但是和秦国不一样的是，秦国杀害了商鞅，却依然延续了

商鞅的变法，吴起死后的楚国，变法的进程却也原地踏步。旧贵族继续在楚国把持着大权。这个强大帝国也终于没有像秦国那样，完成最关键一步的蜕变。

可即使如此，楚国依然凭借着这一场及时跟进的变法运动，赶上了战国历史演进的潮流，更因其强大的战争支撑能力，成为整个战国时代里，都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秦国东进的主要对手。特别是在魏国衰落以后，楚国也多次趁火打劫，欺负魏国很多次，频繁地向中原地区进行扩张。这时候的楚国，在秦国东进的大背景下，已经成为少数可以抗衡的力量。而且比起秦国獠牙毕露的状态，楚国虽然在变法的彻底性上，比起秦国来有很多差距。但楚国毕竟与中原国家打交道久，而且在中原的人脉，更非秦国所能比。在齐秦两国进入到双雄对峙的阶段，综合国力堪称当时第三的楚国，本来有充足的机会，实现自己的霸业。为什么最后的结果，却是被秦国反复虐待呢？

这个，就要说说楚国的盛衰历史了。

楚国要休息

吴起殉难后的楚国，政治上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但其综合国力，依然蒸蒸日上。

继楚悼王后继位的楚肃王，一面大肆清算旧贵族，灭掉了七十多家。一面大力整军精武，虽然没有继续深化变法，但总算也没开历史的倒车。吴起变法打下的好家底，这时候更是开花结果，楚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在高速上涨。但楚肃王本人，却是尝到了没有吴起的苦果。楚国的北面，当时就是如日中天的魏国，没有了吴起这位超级军神，楚军也在与魏国的战争中，一度被打回到原形。从楚肃王六年起，魏国多次出兵讨伐楚国，一路拿下楚国在北方的重镇，楚魏之间

的边界，五年来一直朝着楚国这边猛缩。闹得楚肃王只能硬着头皮，除了修筑方城抵抗外，基本毫无办法，好不容易在吴起变法时代牛气了几年，这下又要走老路？

然而楚国的运气，确实不坏。而且其地广人多决定了，楚国的战争潜力极大，哪怕遭受巨大的战争伤亡，可是却有着非常好的作战纵深，广阔的长江流域就是楚国的大后方，除非是一鼓作气将楚国灭掉，否则如果拼相持战，没有哪个国家在当时，能是楚国的对手。

楚国和魏国的战争，情况就是这样，在魏国雄霸天下的年月里，对楚国的战争基本胜多负少。但是在楚国强大的战争潜力支持下，魏国终于还是没能突破楚国的防线。到了楚宣王时代，魏国两边崛起了齐国和秦国两大强国，楚国人也就惊喜地发现，一直似石头一样压在自己脑袋顶上的魏国，突然就被人搬开了。

这时候的魏国，与楚国的战争打得少，和齐国的战争却是白热化。正好也是齐国一代英主齐威王在位。新兴崛起的齐国和老牌霸主魏国，从此在中原进行了二十多年的鏖战。终于齐国在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中，彻底击败魏国主力，昔日雄霸天下的魏国，从此彻底一蹶不振。

在这场逐鹿中，身在南方的楚国，基本都是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特别是继楚肃王后登基的楚宣王在位时期，除了卖力求发展，就是忙里偷闲地跟着齐国打一下魏国，也趁机收复了不少失地。特别是齐国和魏国著名的桂陵之战中，楚国也同样趁火打劫，借着援助赵国的名义，夺取了睢水地区的不少土地，实力大大加强。

这段时间楚国的国策，被称为“休楚”，也就是尽可能地休养生息，静观中原地区的变化。三十年里严格执行这个政策的楚宣王，才是之后楚国纵横战国舞台，一度呼风唤雨的最重要功臣。

这个休楚的政策有多好，史料可以佐证：地方五千里，带甲百

万。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楚国，已经有了百万大军和五千里国土。从这两样数字来看，都已经是整个战国时代最为凶悍的力量。

然而积累了强大力量的楚国，更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会。随着马陵之战的结束，魏国已经彻底没有了东山再起的可能，反而成了一块案板上的弱肉，任凭两边的齐国和秦国宰割。楚国的机会，也就随之而来了。

休息好了就开打

楚威王在位时期，楚国开始结束“休楚”政策，大规模地介入中原纷争。

当时的魏国，已经被齐国打得遍体鳞伤，既然无力争霸，也就低头认输。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徐州相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其盟友们，在徐州朝拜齐威王，与齐威王互相承认了王位，这个著名事件，也宣告了当时齐国，几乎凌驾于东方各国之上的霸主地位。

当然这个浩大典礼，背后也是魏国另一个精明的打算：引楚国入局。

魏国知道，自己夹在齐国和秦国两大强国之间，国力又严重衰弱，随时都会成为人家宰割的鱼肉，一个秦国已经让自己焦头烂额，再加上一个齐国，更是疲于奔命。那么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再引入一个超级强国进来，和齐国乱斗，魏国才能从中获利，顺利保下自家的政权。而楚国，则是当时关东大地上，唯一一支能和齐国争雄的力量。

而是否要和齐国争雄，这个问题，楚威王同时也纠结了好几年。

以楚国开疆拓土的能力，这么多年引而不发，坚持不介入中原的

纷争，绝不是爱和平，而是楚国深知这几个强大对手的实力。自己和魏国互相乱斗了那么多年，基本都是被魏国压着打，而今又出来一个刚把魏国打趴下的齐国，楚国现在的实力如何，到底能否在与齐国的争斗中占据上风。当时的楚威王心里真是没有底。

但是徐州相王事件，却让楚威王下定了决心：不能再等了。

齐国已经迫使魏国臣服，秦国又离他们很远，那么他们下一个扩张的对象，自然就是楚国了。如果楚国不能先发制人，那么就很可能像魏国一样，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上。而且楚威王这个人的个性，也是非常强烈。按照史料的说法，就是“王之为人者，好用兵而甚务名”，也就是十分好战，而且在乎名分。特别是齐威王这个时候，正在徐州享受被列国尊奉的荣耀，在楚威王眼里，那更是羡慕嫉妒恨：你凭什么！

于是在齐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楚国的进攻猛然打响，精锐的楚国大军突然杀到了徐州地区，在泗水大战中把齐国打得大败，而齐国还没有回过神来，赵国、燕国这些国家也纷纷趁火打劫，把齐国一顿乱打，刚刚赢得马陵之战的齐国，就这样受了个挫折。这就是著名的徐州之战。

从损失上来说，徐州之战齐国的损失并不大，但是面子的损失却叫一个大。楚国反而得寸进尺，甚至趁着胜利的威风，威逼齐国撤掉自己的宰相田婴。虽说在齐国的巧妙劝说下作罢，但楚国的一鸣惊人，却是天下皆知。

以《战国策》的说法，就是：“郢（楚国）为强，临天下诸侯。”

春秋以后沉浸了很久的楚国，就这样以一场横挑齐国的胜利宣告：强大的楚国，王者归来。而在打败了齐国之后，楚国的扩张，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楚威王虽然好战，却也务实，知道现在齐国也是巅峰时期，可以让齐国知道厉害，但远没有到彻底撕破脸的时候。

候。所以其征战的对象，反而对准了另外一个邻居：越国。

说起楚国和越国之战，归根结底，还是楚国徐州之战的后遗症。

吃了楚国的大亏后，齐国是又气又急，想和楚国全面开战，但旁边还有个魏国，魏国西边还有秦国，真不是修理楚国的时候。于是就想了另一个毒招：派使者劝说楚国的邻居越国，说如果你不打败楚国，你怎么能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只要你能打楚国，齐国愿意全力帮助。

本来按照齐国的打算，只要越国和楚国开战，不管最后谁赢，肯定两败俱伤。只要打起来，占便宜的就是齐国。

没想到开战后的情况，却叫齐国吃了一惊：传说中十分强大的越国，碰上新崛起的楚国，却是十分不经打。公元前333年，楚国和越国开战，越国一触即溃，遇到精锐的楚军，几乎被打得败绩连连，先前嚣张的越王无疆更是一战毙命。一场齐国精心策划挑起的战争，反而给楚国送了大礼：楚国长驱直入，一口气吞并了大部分越国故地，实力大为膨胀。

楚国当时的版图，按照史料的说法：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楚国，版图甚至已经扩张到了今天的广西、贵州地区，可以说深入到西南腹地，而其军事经济实力，更是样样强大，不但是百万大军和精良战甲，粮食也可以支用十年。比起同时期的齐秦两大国，此时的楚国，确实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段齐秦争霸的早期阶段，其实可以说是齐秦楚三强鼎立。

巅峰楚怀王

楚国的争霸事业，在楚威王过世，楚怀王登基后，一度接近了顶峰。

楚怀王登基后，首先下手的目标，就是曾经长期欺负楚国的魏国。公元前323年，楚国大举讨伐魏国，在其令尹昭阳的率领下，一口气拿下魏国八个城池，势头十分强盛。而且眼看着魏国被打得缩手缩脚，昭阳竟然连打下去的兴趣都没有了，干脆掉转矛头，打算去攻打齐国。这下可把齐怀王吓得不轻，幸亏使者陈珍劝说，才让楚国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是楚国在整个战国历史上，最为风光嚣张的一刻：齐国和魏国两个中原传统强国，一个被楚国吓得十分紧张，一个被楚国打得满地找牙。登基才六年的楚怀王，俨然有了雄霸天下的模样。

这个强大的楚国，自然也吸引了秦国的注意。

就在楚国耀武扬威，打得魏国焦头烂额的这一年，秦国的国相张仪，也第一次悄然造访，在沛县约见了齐国和楚国的大臣。这也是这位后来和楚国渊源极深的外交家，和楚国打的第一次交道。

然而更加意识到楚国价值的，正是合纵的倡导者公孙衍。当合纵如火如荼开始后，公孙衍也就把楚国当作了重点拉拢对象。而当时另一个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齐国，在齐宣王时代，对抗秦国热情也不高。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楚怀王就成了合纵的实际主角。

而楚怀王人生里最风光的时刻，则是发生在公元前318年，也就是公孙衍操纵的第一次合纵攻秦时，韩赵魏燕楚五大国家结成盟约，相约组成联军讨伐秦国，楚怀王更是从中一枝独秀，成为五国合纵的纵约长。

但对这莫大的荣誉，楚怀王本人却兴趣不大。一开始的时候，楚国热情很高，但是经过张仪的外交斡旋，外加这时候的楚国，重点还

在于在南方扩张领土，因此认为和秦国冲突的时机并不成熟。于是众所周知，这一次的合纵，还是以韩赵魏三国为主力，作为领导人的楚怀王，却是半途而废，连部队都没有派，只是眼看着韩赵魏三国和秦国厮杀。而实力已经严重衰弱的韩赵魏，又怎是强秦的对手，结果被打得大败。然而随着韩赵魏等国家，遭到秦国的反复虐打，楚国也越发明白这个悲催的现实：与秦国之间，早晚会有一场较量。

在楚怀王在位的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17年的时候，秦国的扩张，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秦国打到了巴蜀地区，已经有了雄厚的大后方，向东南取得了商於之地，正好可以和楚国接壤。战争的威胁，已经打到楚国面前。而在楚国的北面，老邻居齐国的实力，也是蒸蒸日上，齐国主动和楚国修好，两家共同进退，发起对中原的扩张。楚国也借机扩大了不少地盘。

但现实对于楚国来说，也是十分清楚：齐国和秦国之间，楚国必须有所选择。

愚蠢拉仇恨

正如在连横合纵中所说的那样，由于对商於之地的垂涎，以及张仪的花言巧语，楚怀王错误地相信了秦国，抛弃了和齐国之间的联盟。

这次贪财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从此好几年间，在战场上被秦国暴打。虽然也是强国，但单枪匹马的楚国，以军事实力论，根本不具备单挑秦国的实力。因此几年下来，商於之地没有拿到，相反自家的河南和汉中地区，领土大面积丢失，和秦国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拉越大。而等到秦惠王过世前夕，楚国已经完全被秦国压制，张仪的权威，更是如日中天，就连他大摇大摆来到楚国，楚怀王都气得要杀掉这个两面三刀的人物，但权衡双方的实力对比，最后还是恨恨地作罢

了。

但就在这个关口，秦惠王的过世，成了楚国和秦国关系的转折点，同样也可以说，是楚国重新求生的一个机会。

秦惠王过世后，秦武王继位，秦国也重复了当年商鞅变法时候的闹剧：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在做太子时，秦武王就和张仪不和，这下反攻倒算，张仪虽然不至于像当年的商鞅一样被车裂，但在秦国也是待不下去了，仓皇逃到了魏国，做了魏国的相国，一年以后过世。而张仪当年一大政绩：压制楚国，也被秦武王彻底否定掉。秦武王在位时间虽然短，但是秦国和楚国的关系，却是大大改善。甚至秦武王即位的时候，楚国还专门派官员前来朝贺。

关系之所以要改善，因为双方都有苦衷，楚国方面，战场上吃了多次败仗，知道了自己的斤两，哪怕要找秦国报仇雪耻，却也是需要时间。这不是短期就可以实现的。关键是秦国方面，秦武王的决策，和之前的秦惠王决然不同。秦武王反而要实现长驱直入中原，甚至灭掉周天子的战略构想。因此秦国的打击重点，重新又转到了中原地区，楚国的战争压力相对减少。而且为了确保自己的战略目标，楚国又成了必需的拉拢对象。

但是秦国消停了，齐国又闹起来了。

随着秦武王的登基，一度被秦国压制的齐国，这时候也活跃了起来。眼看着楚国倒向了秦国，齐国自然知道严重后果，于是齐王亲自写信，苦口婆心地劝说楚怀王想清楚：秦国是你的仇人，而且一直在觊觎你的土地，只有和齐国联合，楚国才有胜利的可能。

在当时的楚国国内，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呼声，也是十分高涨。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屈原。齐国的来信，就好比催化剂一样，引得楚国国内热烈回应。楚怀王在经过抉择之后，终于做出选择：联合齐国。

从几次的反复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代国王，楚怀王不缺乏勇气和追求，但他最为缺乏的，就是坚持的精神，遇到事情优柔寡断，反复权衡。甚至为了眼前的一点儿小利益，就会改变既定的国策。正是他这样的左右摇摆，才在之前一次次和秦国的交锋中，被人牵着鼻子走，一次次葬送了楚国大好的战略机会。

就在楚怀王再次接受了齐国邀约，实现联合的时候，考验接着就来了：公元前307年，宜阳大战，秦国大举进攻韩国的宜阳，韩国猛打死磕，竟然让秦国吃了大亏。但楚怀王却做出了最丑陋的表现：先答应救援宜阳，谁知却一直看热闹，直到秦国付出巨大代价，攻克了宜阳之后，才大模大样地摆样子追过来。这样一番丑陋表演，以楚怀王自己的打算，就是既不得罪秦国，也不得罪齐国，但造成的后果，却是全都得罪。而且秦国获得宜阳的后果，对于整个中原国家来说，都是灾难的：秦国又拿到了一个东进的跳板，再次出兵的时候，其战略选择也就更加灵活。间接造成这个结果的楚怀王，也就拉足了仇恨。

但对这严重后果，楚怀王非但浑然不觉，相反还惊喜于另一个外交胜利：公元前304年，楚怀王与秦国新国王秦昭王在黄棘会面，史称黄棘之会。这是楚国与秦国的外交交锋里，难得大获全胜的一次：秦国归还了楚国的上庸。秦国和楚国的关系，再次进入到蜜月期。

秦国之所以如此示好，一个原因是秦国此时的掌权人宣太后，也就是著名的芈月，正是楚国人。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时候的秦国，主要的敌人还是齐国，正需要楚国的支持。有楚国在东方分散齐国的注意力，才有利于秦国下一步的行动。至于上庸，早晚还是秦国的。

结果就在这次会面第二年，楚国就招了打。齐国大举进攻楚国，由此拉开了另一场大战序幕：垂沙之战。

齐国之所以要打这一战，目标也很明确，决不允许在自己的眼皮

底下，出来一个亲秦国的楚国。而且对楚怀王这样的人，亲笔信都写过了，还是换不来他的诚信，那么只有用刀兵来教育了。可是真交上手，才知道不好教育。虽然楚国屡次败北于秦国，但对付齐国，还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比起当年的骄横来，这时候的楚国很识趣，战场在垂沙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襄城。楚国知道齐国战斗力强，干脆就严防死守，依托方城拼命抵抗，齐国一下子前进不得。这样的场面，当年齐桓公讨伐楚国时出现过，后来魏国进攻楚国时也出现过，基本都是无功而返。

但这次齐国领兵的，却是打败过秦国的名将匡章，对这个客观困难，匡章十分淡定，在经过了数次虚虚实实的引诱后，终于发动了深夜突袭，导演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规模极大的野战渡河突袭战，一举突破楚国防线，横扫了楚国的垂沙地区，楚国主帅唐昧也兵败身死。至此，昔日强大的楚国，先被秦国痛打，再被齐国痛打，在这场争霸战争里，已经越发地衰落下去。

当了替罪羊

垂沙之战失败后，楚国万万没想到的是，趁火打劫的竟然是秦国。眼看到齐国的崛起和强大实力后，秦国的新国王秦昭王，确立了先与齐国修好的方针。刚过了几天蜜月期的楚国，也就不幸又成了替罪羊。

以秦国的风格，就是不和齐国打，那么就和楚国打，于是和齐国修好没多久。公元前299年，秦国的攻击又来了：连续攻克了八个城池，正当楚国举国震惊时，秦国却又送来了橄榄枝：秦昭王主动邀请楚怀王访问秦国。

值得一说的是，秦国这封书信，写得相当感人，里面除了追忆友谊，更叙说革命家史，说起了两家之间的亲戚关系。而一直被暴打的

楚怀王，这次也被感动了，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他慨然拍板：去！

楚怀王之所以要去，也是因为历史经验，当年和秦昭王的会面，气氛非常热情友好，而且还得到了上庸。这次又是楚国最困难的时候，秦国也有向东的打算，可能真的想稳住楚国。不去的话，就给秦国口实，去的话，也许还有胜利的机会。

许多后人嘲笑楚怀王这个决定时，其实忽视的正是这一点：这时候的楚国，国力严重衰弱，已经没有和秦国谈条件的资格了。除了应约而去，还能如何？

结果正如好些大臣所预料的，楚怀王进了秦国境内后，接着就在章台被扣留。继而秦国以楚怀王做人质，向楚国勒索土地。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楚国早就做好了应对：楚国太子横从齐国回来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顷襄王，秦国欲挟持楚怀王勒索的目的落空了。

计划落空的秦国，再次发动了对楚国的进攻：公元前298年的武关之战上，楚国再次战败，数万将士被斩。十六座城池沦陷。而身在秦国的楚怀王，更在逃跑失败后，遭到秦国的囚禁，三年后客死秦国。

楚怀王的不幸遭遇，也使得秦国和楚国之间，成了真正的死仇。楚怀王本人，也得到了楚人的同情。楚汉农民战争时代，那位被拥立抗秦的楚王，也被命名为楚怀王，就是表达的对这位老楚怀王的怀念。但随着这场风波的尘埃落定，楚国叱咤风云的时代，也终于告一段落了。尽管楚国成了战国时期给予秦国重大打击的国家，但是从楚怀王被囚开始起，他们也就没有了和秦国争锋的能力。

十一 华夏骑兵宗师

在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中，大部分的变法运动，侧重点都在于经济制度和军事管理制度，即通过大张旗鼓的改革，以提高国家的税收，提升军事的战斗力。唯独有一个国家，将变法的重点，放在了军事作战思想的改革上。

这场改革的意义同样是划时代的，甚至比其他各国改革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当中原的战国时代成为历史，甚至秦王朝都昙花一现之后，这场纯粹的军事改革，却依然深远地影响着冷兵器时代的中原民族，使中原民族的军事理念出现了划时代的飞跃——这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

骑马的决心不好下

作为“三晋”之一的赵国，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战国初期就开始了。

赵国的封建化过程，大约是和魏国同步的，但发展的水准却远远不如魏国。因为赵国的地理位置实在太过特殊，它位于山西北部地区，北方面临游牧民族的骚扰，不只是中山、楼烦这些游牧部落，强大的匈奴民族已经染指中原汉区，而地处北方要冲的赵国、燕国受害最深。北方的农业生产，每年都要遭到很大的破坏。所以，有样学样的经济政治变法，根本不能解决赵国的致命问题。在国土面积狭小、生存环境恶劣、人口稀少的情况下，赵国的改革重点必须有的放矢，

要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上来。

这支军队的人数也许无法成为六国里最多的，但是作战素质和军事理念，必须成为六国里最强的。在当时，中原汉地的主要作战方式，还是战车配合步兵。战车的作用虽然日益缩小，却仍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迅猛的骑兵面前，传统的战车加步兵的作战方式，很容易成为敌人射杀的活靶子。

赵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就长期陷入两面作战中。对南方，要抵御中原诸国的军事打击；对北方，要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在两线作战下，拥有一支强大先进的军队格外重要，最先进的军队，自然就是当时新兴起的骑兵，所以学习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建立一支“胡服骑射”的精锐骑兵，就成了赵国的必然选择。

“胡服骑射”的倡导者，是公元前325年起在位的赵武灵王，他是赵国的第六任国王。在即位的最初20年里，他曾三次率军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屡屡遭到惨败。北方游牧民族迅烈的作战方式，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经过数年精心的研究后，身为军事家的赵武灵王，果断抛出了“胡服骑射”的主张。公元前302年，胡服骑射行动正式推行，主要内容就是赵武灵王带头穿胡服，全国上下的老百姓都穿胡服，然后引进战马，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骑兵部队。

此举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皇叔公子成等人竭力反对，许多大臣也想不开，好好的华夏族，却要穿蛮夷的衣服，这成何体统？但赵武灵王的决心异常坚定。他自己穿胡服，大臣、百姓都要跟着穿，不穿的，先辩论，后来辩论也没用，就直接治罪。

在这样强硬的政策下，胡服骑射在全国推广开来了。到了第二年，赵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随后赵国发动北征，击败了长期骚扰赵国边境的中山、楼烦、林胡等部落，把包括今天山西北部

以及内蒙古中部的大片国土收到了赵国的囊中。这片国土的获得，对赵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得到了宝贵的战马产地，从那以后一直到中国明朝时期，从属于“幽云十六州”的山西北部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重要的产马地带。

当时的赵国得到了打造一支强大铁骑的基础，之后骑兵力量迅速发展起来。虽然赵武灵王本人晚节不保，被他的儿子赵惠文王软禁在沙丘宫，最后活活饿死了，但赵国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赵惠文王在位的时期，是赵国铁骑啸傲中原、摧枯拉朽的26年，中原大地自己的杰出骑兵战将，也在这时期横空出世，成为横扫天下的强秦的最强对手，其中最杰出的，就是赵国的名将赵奢。

硬骨头的税务官

说到赵奢，在今天的知名度可能不算高，但说到他的宝贝儿子，知名度却相当的高——赵括。

赵括这个倒霉孩子，多年以来一直在做“纸上谈兵”的反面教材，但他的父亲赵奢，却是整个战国时代足够排进前五的名将。在中国冷兵器时代骑兵战术理念的发展中，赵奢是一个为历代兵家所敬仰的“正面教材”。

说到赵奢和骑兵的缘分，那是非常早的。早在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2年推行胡服骑射的时候，他就是这支骑兵部队中的一员。

按《战国策》上的记录，他应该参加过赵国骑兵部队早期的各类战斗，而在赵武灵王饿死沙丘宫后，赵武灵王的近臣们大都被定了“叛逆”罪，赵奢也因此流亡燕国。当时的燕国也饱受游牧民族侵扰，且实力弱小，对这种擅长骑兵作战的稀缺人才，自然是举双手欢迎。之后的赵奢在燕国带兵，做过燕国北方的重镇上谷的守将，和游

牧民族骑兵交手多次。但他思念故国，后来风声松了，就回到了赵国生活。

回到祖国的赵奢，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太多重用，只是被委派了一个收税小吏的差事。但赵奢是个认真的人，再不起眼的工作，也要干出个样子来。

赵奢一认真，结果干出娄子来了。

赵国权臣平原君仰仗权势，拖欠国家赋税，别人都不敢管，赵奢知道后二话不说，当场杀了平原君身边九个亲信。这可捅了马蜂窝了，平原君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君子之一，手下三千门客，更是赵国权臣，杀一个收税的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恼怒的平原君开始确实想“捏”赵奢，但赵奢不惧，反而微笑着辩解说：“你地位这么高贵，却带头犯法，难道想被天下人鄙视吗？”就这一句话，平原君当场就没词了。

平原君虽然经常犯法，但还是讲道理的，对赵奢不畏权贵的表现，反而大加赞赏。平原君一赞赏，赵奢的苦日子就熬出头了。在平原君的推荐下，赵奢先被提拔为全国税赋总管，成了赵国的账房先生。

到了公元前280年，赵奢重新和骑兵结缘了。这一年赵国出兵攻打齐国，赵奢被任命为将军。开战之后，赵奢率领属下部队一路狂飙，他身边的战士，都是他在很短时间里培养出来的，而且个个身手不凡，对他极为佩服，乐意为他殊死效力。经过一番拼杀，还没等赵国主力部队赶到，赵奢已经把齐国人打得稀里哗啦，顺利拿下了齐国的边城商河。商河是赵惠文王做梦都想得到的城市，之前曾经几次派人攻打，却劳而无功，不料却被赵奢狂飙突进的骑兵一举拿下。战斗结束后，赵惠文王在国都摆酒，庆贺这场大捷，赵奢沙场的第一场大战，出手就干得漂亮。

横挑强秦，一战成名

这时候的赵国，正是其胡服骑射后的黄金期，彼时在位的赵惠文王，正充分享受着老爹留给他的遗产。杰出的人才团队，强大的军队，蒸蒸日上的国势。这时期的赵国，向东击败了齐国，向西数次挫败秦国东进的企图。

在魏国势衰、齐国霸业昙花一现、楚国屡遭重创的局面下，赵国，已然成为整个中原唯一能对抗秦国的力量，俨然是此时战国七雄里的“老二”。赵国本国也是人才荟萃，文臣方面，不辱使命的蔺相如早已千古流芳，数次挫败秦国入侵的廉颇，是赵国此时的第一名将。初涉军旅的赵奢，虽然此时的岁数已经不小，却还是一个新兵蛋子。在商河之战十年后，这个“新兵蛋子”再次一鸣惊人，让横扫六国的强秦，见识到了他的厉害。

公元前270年，秦国举兵进入中原，围困赵国的西北重镇阼与。这是赵国抵抗秦国的重要屏障，一旦丢掉，赵国西北方就无险可守。可这个重镇也有问题，离赵国的大本营太远，很容易遭到围困，一旦救援，赵国劳师袭远，很容易被秦国以逸待劳。不救，会丧失战略要地，后果很严重；救，很可能全军覆没，把老本都赔上。赵国没秦国这么多的人口，军队精兵金贵，损失掉一个都心疼。

在这种局面下，赵国的大臣大都“两害相较取其轻”。赵惠文王先问久负盛名的抗秦名将廉颇，得到的答案是“路太远，不能救”。又问另一个名将乐乘，答案是“打赢的胜算不大，不如不救”。两个名将的话都是有道理的。最后又问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赵奢，赵奢的回答很干脆：“救！这就像两个人在洞里打架，狭路相逢勇者胜！”铮铮慨言，掷地有声！

见赵奢决心这么大，赵惠文王的胆子也粗了，你都勇敢，那咱就

勇敢一回！出兵以后的赵奢，一路却胆小得很，全在磨洋工，慢吞吞地走了28天，连阡与的影子都还见不着。赵奢的行动让秦国人纳闷了，要说救援，你磨洋工，要说不救，你来干吗？为了试探赵奢，秦军故意派间谍进来，却被赵奢好言好语地打发走了。虚虚实实下，秦国人最终做出了判断：这小子是个窝囊废，他就是来摆摆样子的。

这下秦国人放心了，但赵奢却牛气了，秦国间谍前脚刚走，赵奢立刻传令，命令全军火速集结，深夜向阡与开拔。第二天秦国人刚睁开眼，就发现连夜急行军的赵奢，已经出现在秦国人眼皮子底下了。之前所有的示弱，全都为了这一刻，赵国人精骑林立，马刀雪亮，逼人的军势告诉秦国人：傻瓜，你们上当了。

上当就上当吧，我们秦国人可不是吓大的，我们是打仗打大的，不就是打仗吗？什么兵法虚实，无非就是时间仓促点，地方偏点，有啥？照样打！在短暂的惊愕里清醒过来的秦国人，火速集结部队，准备迎战，一场大战就要打响。秦国人这时候还是很有自信的，你赵奢来得快不假，可你自己也玩大了，你们脱离辎重部队快速奔袭，粮草后勤全跟不上，如果不能在短时间里打败我们，全军覆没的可就是你了。

秦国人知道，赵奢更知道。战斗开始后，秦国人的对策很简单，全军结成重甲军阵，用长戈兵和弩兵护卫，以弓弩阻击赵国的骑兵，只要能顶住赵国的骑兵，拖个三五天，你赵奢就死定了。但开打之后，秦国人却又被“闪”了一把，没有什么骑兵冲锋，也没有马刀砍杀，一群赵兵只在对面摇旗呐喊，摆出全面进攻的架势，却连箭都不放一支。秦军晕了，要打你就打，不打你就滚，在这里耍什么二百五？

赵奢当然不是为了耍二百五，就在秦军一头雾水的时候，突然一个噩耗传来：北山让赵奢抢占了。

秦军这才明白：“又上当了！”

这一战秦军本来的战术，就是围点打援，却被赵奢算计了一把，忽悠了一下，无非是丢点脸。但脸可以丢，这个北山不能丢。北山是此战的绝对制高点，得到了北山，也就得到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秦国是步兵多，赵国是骑兵多，几万骑兵从高山上凭速度横冲下来，那阵仗，就跟今天轰炸机高空轰炸一般！

结果，秦国人被“炸”惨了，偷袭北山成功后，赵奢随即发动了总攻。精锐骑兵从高山上直冲秦军，迅烈的速度和精准的射杀，一下子就把秦国的弩箭重步兵军阵冲得稀烂，天下无敌的秦军，第一次体会到全线崩溃的滋味。赵国的战马在冲锋，赵国人的马刀在拼命砍杀，战无不胜的秦国人，却在崩溃，逃命……

阡与之战，是商鞅变法以来，天下无敌的秦国军队遭到的最惨重失败。在战局不利的局面下，临危受命的赵奢，以他精密的算计，虚虚实实的表演，一往无前的气概，坚决果敢的勇气，一步一步，将秦国人算计进了死地，然后聚而围歼。这一战秦国的伤亡数字，各类历史书上的记录都很模糊，有说几万，有说五万，但毫无疑问，这是秦国人遭受的最大伤亡。此战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原本目中无人的秦军，以后好像患上了“恐赵症”，多年以来一直不敢再度东进。

不打无准备之仗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赵奢也有自己的军事理念，他的军事理念归纳起来就是七个字：不打无准备之仗。

阡与之战，展现了赵奢比廉颇、乐胜等当时名将更果断的一面，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

他的原则是，没有必胜把握的战斗，坚决不打；所带的军队如果没有对敌人的绝对优势，也不能打。打仗的时候，要千方百计地消耗掉敌人的锐气，磨灭敌人的士气，把敌人拖得七荤八素之后，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后，以最小的代价，收到最大重创敌人的效果。

阼与之战，就是一场把赵奢的智慧、勇气发挥到水乳交融的战斗。在当时的赵国名将中，如果说廉颇是一个最出色的防御者，那么赵奢就是一个最出色的进攻者。此战对于秦国的另一大影响是：被赵国骑兵砍得七零八落的秦国人，从此也开始高度重视骑兵建设，他们利用关中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秦国人在畜牧方面的丰厚储备，很快拥有了一支足够和赵国争锋的骑兵部队。骑兵，这个战国时代中原军队的“舶来品”，从此在中原各路军队中更广泛地推广开来。

然而，在阼与之战之后，因其卓越战功，赵奢被赐封为马服君，成为与廉颇、乐胜等人齐名的赵国顶级战将。在此战结束之后，秦国因为伤亡惨重，一时不敢东进，赵国的边境也就消停了。没仗打的赵奢，人生中最后时光，主要就是教育孩子，他的宝贝儿子，就是后来被称作纸上谈兵的赵括。

但这人到底是不是真废，却要说说著名的长平之战！

十二 谁能拯救长平

如果要评选“老子英雄儿狗熊”的典型组合，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赵奢与赵括父子，必然榜上有名。

强大英雄的父亲赵奢，上面已经说完了，但公认狗熊的儿子赵括，是不是真有传说中那么菜呢？

这个被看作赵国罪人的将军，在之后的两千年里，一直被各种嘲笑。如果按照现有的一些说法，他“罪人”的身份，似乎是板上钉钉。梳理一下公认的长平之战的线索，似乎最大责任人就是他：本来前线的仗打得好好的，换他上场，张牙舞爪地一冲，把40万军队全冲到了敌人的陷阱里，最后落得活活被秦国坑杀的结局。更严重的战争后果是：赵国遭到了这样的惨重损失后，从此一蹶不振，原来的“老二”一落千丈，再也不是强秦的东进威胁，被秦国平灭甚至宰割的命运，似乎已经无可避免。许多人甚至说，他是一个毁了赵国前途命运的罪人。连赵括老爸，那位战国时期最杰出骑兵名将赵奢的话，都被人拿来佐证：“赵括这孩子，读书很好，头头是道，但都是纸上谈兵，将来却不堪大用。”所以许多人就有理了，人家赵奢都这么说了，可见赵括打仗多么愚蠢，犯的错误多么严重。

赵奢犯错误的地方，就是山西长平，他犯错误的那场战役，就是公元前262年至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

赵国打得起长平这一仗吗？

毫不夸张地说，长平之战，是一场决定秦国统一天下命运的战役。秦国击败了中原唯一能与它抗衡的赵国。通过歼灭赵国40万精锐的方式，让强盛一时的赵国从此奄奄一息，再也无力和秦国争雄。从此之后，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秦国再无对手。

长平之战，后人关注颇多，因为这场战役的结局让人扼腕。40万精锐的赵国军队，为什么在坚持了整整两年后，以被敌人诱入险地的方式，轻易地终结了自己的命运？主流的说法是，因为赵括纸上谈兵，轻敌冒进，导致大败亏输。难道，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

要解读长平之战的败因，或许还要从当时的战国大势说起。

公元前262年左右的战国形势，已经形成了秦国一家独大，楚国遭到严重削弱，唯独赵国可勉强抗衡的局面。赵国经过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两代君王的励精图治之后，实力同样蒸蒸日上，特别是赵国的骑兵，这时期独步天下，是六国军队中唯一可以在战斗力上与秦国抗衡，并且重创秦国的力量。

在阼与之战中，赵国的名将赵奢采取示弱于敌、骑兵高速突袭的方式，一举击破秦国精锐铁甲步兵，导致秦军损失上万。赵国骑兵的马刀，给秦国人留下的是噩梦一般的记忆。

到了阼之战结束八年后的公元前262年，当年缔造过阼之战辉煌的赵奢已经作古，励精图治的赵惠文王也已经过世，这时期赵国的国君，是他们的第八代国君赵孝成王。

此人的才略远不及之前的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但是廉颇、蔺相如等名臣依然还在，他本人又是个性格宽厚的守成之君，他刚刚上台，秦国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公元前266年，秦国人卷土重来发兵攻赵，连夺了赵国三座城池。赵国不得不用送王子给齐国做人质的办法，换来齐国的援军，这才平息了战祸。

这次赵国之所以如此狼狈，一是赵奢不在了，廉颇又是一个防御型将领，守卫国土还可以，主动出击却不能；二是此时赵国的北边，正发生大规模的胡虏入侵，赵国的精锐骑兵大都开赴边地守备，对东边的秦国实在是鞭长莫及。

赵孝成王虽然宽厚，却也是有血性的人，对于秦国送来的这份“上台大礼包”，他自然不能忍受。

秦国人在再次攻赵失败后，转换了思路，不再去碰赵国的硬钉子，开始猛揍赵国边上弱小的韩国。公元前262年，秦国人的攻击又开始了，这次他们的攻击点，选择在了韩国的北方重镇上党。上党是连接韩赵两国的门户，对于韩国来说，是抵抗秦国入侵的桥头堡，对于赵国来说，也是阻遏秦军入侵的缓冲地带，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秦国这次下了狠心，不惜血本要拿下上党。秦国大兵压境，断绝了上党与韩国本土的联系，大有不打下上党不撤兵的气势。事到如今，韩国国君也歇菜了。韩国君臣经过商议，准备把上党送给秦国，以求暂时苟安。但镇守上党的郡守冯亭够硬，尽管如此还是死战不降，弹尽粮绝之下，冯亭总算折中了一下：“要投降，也不能投降你们秦国，我要投降赵国。”

冯亭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赵国的军事力量，是六国里少有的能抗衡秦国的。以上党做厚礼献给赵国，可以使赵国前来援救上党，这样本来韩国和秦国的战争，就变成了赵国和秦国的战争，秦国这股入侵的“祸水”，就可以引到赵国的身上，不管两家谁胜谁败，韩国到底是安全了。

这样一来，赵国又面临了一个和当年阼与之战前类似的问题：当年是救还是不救，现在是要还是不要？

表面看，上党这个重镇战略地位重要，现在韩国人白送过来，等于是一个免费的大礼包，自然不要白不要。但消息传来，反对声还是

有的，比如当年主张不救阝与的廉颇，这次也主张不救上党，因为秦国人不是傻瓜，老子辛辛苦苦打了半天仗，怎么能让你赵国过来吃现成呢？

大臣蔺相如也持相同意见，认为接受上党，就会引火烧身。但年少气盛的赵孝成王不这么想，怕人家来打，就不敢要地盘啦？传出去我赵国的脸面何在？要！秦国敢来抢，就让他试试。

其实对于当时的赵国来说，要上党还是不要上党，都是有理由的。不要上党，可以暂时避免战祸，至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如果接受上党，就必须提前做好和秦国开战的准备。

赵孝成王偏偏走了一个“半路子”，接受了上党，却没有派遣重兵防御，只是派了一个小股部队来此交接。这不是分明无视秦军吗？秦军当然不干，立刻由王齕率军一通猛打，在秦国的猛烈攻势下，赵军迅速崩溃，上党活生生地丢了，赵国的残兵部队，败退到了长平一带。

事情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但秦军显然不罢休，敢抢我的口中食，活腻歪啦？打！还没等赵军喘过气来，秦国就大军压境了，秦国够怒，赵孝成王的反应也够快。秦国这次是要玩真格的了，那咱也就陪着打真格的。

随后，赵孝成王急命廉颇率领20万大军赶赴长平。廉颇到达之后，前锋部队和秦国接触，很快就溃败下来。

关键时刻，廉颇转攻为守，沿着长平一带的丹河布防，抵挡秦国的进攻。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廉颇带来的，大多是此时赵国国内用于城池防御的步兵，很少有最精锐的北边骑兵军团。秦国这边，一次性动用的军队不下20万，而且都是有丰富野战经验的老兵。这样的情景，要是敞开了玩对攻，赵国是没戏的。所以廉颇的打算很简单：就地组织阵地，严防死守，和他慢慢磨，把秦国人磨走了拉倒。

应该说这是廉颇的一个传统战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守，在阵地构筑和梯次配置上都颇有心得，是一个擅长打防御战的名将。以前就靠这种“磨”的战法，曾多次把秦国人磨走，这次他以为也一样，秦国人无非是想给赵国点颜色看看，现在颜色也给过了，也该拍屁股走人了。

但这次却真的不一样，廉颇够有耐心，秦国人更有耐心，你廉颇磨，我秦国人也陪着你磨。结果，从公元前262年夏天开始，双方沿着长平的丹阳河，开始了漫长的“静坐”战争，每天就是你吆喝两声，我回骂几句，对方的祖宗十八代全骂了个遍，可就是不动手开练。恐怕廉颇自己，乃至赵孝成王都绝对想不到，这一磨，就磨了整整三年。

在这三年里，围绕着长平这个小小的地方，秦赵双方大打消耗战，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运输到前线。

秦国动用的兵力，此时的说法各异，但以廉颇20万大军的数量，以及处于守势的地位，秦国投入进攻的兵力，应该不会少于30万，秦赵双方50多万大军，就这样天天在长平干耗着，50万人天天大眼瞪小眼地摆阵势，看着壮观，但吃喝拉撒消耗的全是钱。

这三年里，秦国除了不断增援长平外，还不断地派使者出使中原各诸侯国，警告各路诸侯国不要管闲事，同时驻扎在韩国边境，监视韩国军队的一举一动。但是在作为主战场的长平，秦国人始终无法前进一步。

拖不起的赵括

漫长的消耗战维持了整整三年，长平依然在赵国手里，20万赵国军队沿着战壕与丹阳河，天天和秦国人干耗。似乎廉颇的战术是成功

的，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这个理由老生常谈：秦国强，赵国弱，所以速决战对赵国是不利的，持久战对赵国是有利的，这理由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很正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认定这是不正确的。

到了三年后的公元前260年，连主持赵国大政的赵孝成王也认为这理由不正确。不正确的原因，按照《史记》的说法是秦国人使了反间计，散布说秦国人只怕赵括，只要赵括出马，一个顶俩，能把秦国人打得稀里哗啦。然后傻乎乎的赵孝成王就听了，接着任命赵括挂帅，行前赵括的母亲拼命反对，说马服君赵奢临终前有遗言，赵括这小子只会纸上谈兵，不能委以重任。可惜赵孝成王不听，赵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挂帅了，一起随他出征的，还有早已养精蓄锐多日，从北方边地调回来的精锐部队，一共20万人，赵国最精锐的骑兵军团，都在这支部队里了。

公元前260年，赵括抵达了长平前线，和廉颇完成了交接，闻听赵括到来后，秦国火速做出了决定，宣布国家进入总动员，命令国内16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从军，准备参加决战。同时将此时秦国最杰出的将领白起调了过去。以这样的动员规模，以及秦国足够募集百万大军的战争动员潜力，这时候身在长平前线的秦国军队，总数已经不下60万，双方都动了血本了。

赵括到任后，按照《史记》的记载，就是他变更了原本廉颇定下的稳固防守战略，引起赵国将士的不满。而他玩脑袋也玩不过白起，白起到任后，对赵括采取了诱敌之计，故意在第一条阵线上，布置了大批老弱残兵，给赵括以秦国人力不支的假象，终于让赵括下了决战的决心。之后赵军出击，赵括带来的20万北方精锐打头阵，一路势如破竹冲杀秦军，果然杀得秦军丢盔卸甲，赵括大喜之下，命令全军全线出击，企图一举扫平秦军。而陷阱就在这时候布下了，赵括一路追杀，没想到越打秦军越强，越杀秦军越多。等到他明白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陷重围了，怎么办？突围！

这40万赵军以决死一战的勇气发动突围，和秦军打得难解难分，可回头一望，赵国的阵营，也早被秦军派遣的两万精锐骑兵占领了，就这样，秦军端了赵括的老窝，卡断了赵括的后路，40万大军，就这样被秦国人包了饺子。

眼见败局已定，赵括却不屈不挠。之后40万赵军一直被秦军围困了46天，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士兵们甚至要靠着吃同伴的尸体来维持生命。

后来，赵括又先后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企图从秦军的包围圈里冲开一条口子，但是秦军也极其顽强，死战不退。这时候秦军的武器优势——弩，开始发挥出了威力，在四面的包围圈上，布满了秦军的弩箭阵，雨点般的弩箭，轻而易举地封锁了赵军的突围企图。

数次突围失败后，赵括最终拿出了他父亲“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率领饥寒交迫的赵军，向秦国人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冲锋，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秦国人的弩箭轻松地射穿了赵括的重甲，这位惯于“纸上谈兵”的将军就这么阵亡了。

就这样40万赵国压箱底的精锐部队，最终沦为了秦国的俘虏，之后为彻底削弱赵国，这支军队被秦国人全部杀死。一度足与秦国人争雄的赵国军团，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赵国到底错在哪儿

长平之战结束了，但对于长平之战的争论，后人们却众说纷纭。主流史书上无不说赵括纸上谈兵，志大才疏，最后误国误君，甚至到今天，他依然是“纸上谈兵”的反面典型。但仔细看整个长平战争的全过程，我们不得不负责地说，长平战败，赵括至少是不用负全部责任的。

在上党太守冯亭决定进献上党的时候，危机就已经向赵国人笼罩来了。赵国国内无论是国君还是大臣，尽管对是否接受上党意见不一，但几乎没有人看到这样的事实：秦国人，上来就是为了玩命的。

秦国这次对赵国的军事行动，绝不简单地是为了一个上党，更不是为了一个长平，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组织一场歼灭战，彻底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成为秦国进兵中原的障碍。从一开始秦国重兵压境，到后来陪着廉颇慢慢磨，磨了整整三年，再到最后征募全国16岁以上的青壮从军，组成规模巨大的增援部队驰援，以及最后赵国40万战俘被杀害的事实，所有的一切，都是秦国人苦心筹谋的一个过程。从一开始，他们就要和赵国打到底。

如果是这样的目的，那么早先廉颇采取的稳守战略，其实就成了一种“慢性死法”。因为廉颇的消磨战术，不仅仅在磨秦国，更在磨赵国，五六十万大军在前线对峙三年，物资军费的损耗是个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别说是春秋时代的小诸侯国，就是后来大一统的汉唐宋明等中原王朝，承担这样的军费开支也极其吃力。换句话说，如果秦国人决心倾家荡产，不惜一切代价和赵国磨到底，最先坚持不下去的，毫无疑问是赵国。

在这一点上，不但廉颇没有意识，就连赵国君臣上下也没有这个意识。如果有这个意识，赵孝成王就不会轻易地做出接受上党的许诺，这样不给秦国战争口实，这场大战至少还会晚一些发生；如果有这个意识，廉颇也不会采取这种磨洋工的方法；如果有这个意识，赵国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也许会先选择速决战解决问题。在人类战争史上，小国对大国的战争，采取这种相持战的手段，在人口、财富、国家战争潜力都远远不及的情况下，是注定要失败的。

正因为如此，赵孝成王最后换上赵括，就不难理解了。此时赵国的将领里，廉颇等老将都是以“持重”著称的。最擅长打速决战、歼灭战的，当属赵括的父亲马服君赵奢，但赵奢此时已经作古了，子承父

业的赵括，也就成了此时赵国军队中最需要的速决战类型将领。换赵括，很可能全军覆没，不换赵括，最后的结果也是被秦国拖死，很可能是整个国家筋疲力尽后的全军覆没。所以，在当时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发动对秦国的决死进攻，就成了赵国此时唯一可以做出的选择。

除此以外，赵国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其实赵国此战的真正悲剧，就是以一个小国的力量，去独自对付强大的秦国。赵国的国民经济储备，固然经受不住这样的消耗，但赵国可以与其他国家联盟，比如，向富庶的齐国等国借粮草，求救兵。但从当时的列国局面看，做到这一点，似乎比战胜秦国更难，这时期的秦国，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了调整，采取了范雎的“远交近攻”之计，对远离秦国的齐国等国，采取暂时通好的政策，但对邻近秦国的韩赵魏，则摠住了猛揍，即使不能灭掉它们，也要最大限度地削弱它们。

然而，在对赵国的这场决战开始之前，秦国已经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因素都考虑在内，其使臣反复穿梭于中原六国，向中原各国游说，威胁各国不要插手。除了赵国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秦国吓怕了，完全抱着看客的心态，来欣赏这一场其实关乎整个六国命运的战争。

在这场惨烈的大战中，秦国的损失也同样惨重。用《史记》里秦国主将白起自己的话说，参战的秦国军队，士兵死伤过半，经济消耗也同样巨大。《吕氏春秋》里说，秦国多年来的物资粮食储备，在这场战争中被消耗一空，整个秦国，都因为这场战争被拖得“士民倦”。在这场战争期间，除了赵国之外，如果能有一个国家有胆气一点，在秦赵这个相持不下的天平上轻推一把，整个战争的结局，在历史上恐怕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所以这正是赵括的悲剧，他在一个悲剧的时间，被推到一个悲剧的位置，完成一次悲剧的冲锋，哪怕挂帅的不是他，恐怕在那样的局

面下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如果说赵括一点责任没有，那也是不恰当的。整个战役的过程证明，虽然他是一个攻击型将领，但是在临阵指挥，兵团作战，战略预判上，他比他父亲确实差得远，更和对面的白起不是一个档次。

赵国虽然实力弱于秦国，但并非没有自己的优势，赵国最大的优势，就是骑兵的高速冲击，虽然在经济实力和总兵力上弱于秦军，但是中国历史上不乏发挥骑兵优势以弱胜强的战役，赵括的父亲赵奢所导演的阡与之战，就是这样的妙笔。如果赵括可以在临战时冷静一下，有他父亲一般的睿智，能够在扑朔迷离的局面下找到对手的弱点，打开胜利的突破口，反败为胜的机会不是没有。可惜他没有。

十三 东西对峙，齐秦争霸

公元前342年，应该是整个战国时代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一年里，齐国通过围魏救赵的战术，成功牵着强敌魏国的鼻子走，以减灶之计诱导魏国追击，最后在马陵之战中成功将魏军全歼，魏国元帅庞涓阵亡。

这一战的结果，标志着战国早期的中原最强国——魏国的彻底衰落。魏国在此战中失去了他们最精锐的“武卒”军队，最杰出的统帅庞涓，再也没有逐鹿中原的本钱了。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取得大捷的齐国，相反，却是在函谷关远远观望的秦国。

魏国的彻底衰落，使秦国少掉了东出函谷关的最大障碍，之后的两年里，秦国连续对魏国占有的西河地带用兵，成功收复西河，迫使魏国向秦国屈服。从那以后，秦国东出函谷关，逐鹿中原的通道，就彻底打通了。这是自春秋时代秦穆公以来秦人的梦想，之后的战国风云里，齐国并没有因为战胜魏国，而取得在诸侯中的独大地位，相反实力迅速膨胀起来的却是渔翁得利的秦国。

但在马陵之战的早期，齐国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强势地位和扩张势头。从公元前342年开始，到公元前284年的这58年里，齐国相继在位的君王，是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这58年是齐国在战国时代里最风光的58年，他们打败了魏国，之后又击败了楚国，压服了韩国、赵国，俨然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诸侯国，也一度是秦国东出的最大劲敌。而与之相对应的秦国，在位的国君，分别是秦孝公、秦惠王、

秦武王、秦昭王。这58年里，齐秦两国先后击败他们共同的对手——魏国。然后同时开始了扩张之路，一度成为诸侯中两大最强力量。那么，面对这个继魏国而起的最强对手，秦国又是怎样战而胜之的呢？

观念落后的齐国

在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结束后的早期，观齐秦两国的对外政策，几乎都是各忙各的，很少有交集存在。

秦国方面，在马陵之战结束后的两年，秦国发动了对西河的进攻，生擒了魏太子，歼灭了魏国10万大军。魏国最后一股有生力量就这样消耗殆尽，此后也无力继续逐鹿中原。

这时期的齐威王，也在中原风光了起来，公元前334年，齐威王与魏惠王共同会盟于徐州，魏惠王主动承认了齐威王的国王身份，齐威王也投桃报李，承认了魏惠王的国王身份，这件事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徐州相王”。在徐州相王的过程里，先前强大一时的魏惠王，对齐威王极其恭敬，此后魏王、韩王、赵王三王又在东阿拜见齐威王，对齐威王“北面事之”，这时候的齐威王，俨然已经成为中原诸侯里的最强者。

这时期齐国和秦国唯一的一次冲撞，发生在齐威王在位的晚期。当时的秦国东出函谷关，借道韩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结果却被齐国边军打败，事情最后以秦国遣使者谢罪而告终。但强秦的巨大威胁，已经隐隐地呈现在同样野心勃勃的齐威王面前。

与齐威王同时期在位的秦孝公，病逝于公元前338年，其子秦惠王即位。这位秦惠王上台后先搞反攻倒算，杀害了商鞅。现代人津津乐道秦惠王杀商鞅其人，用商鞅其法的冷静。其实在清算完商鞅的初期，秦惠王也曾想过逐渐取缔商鞅之法，不得施行的原因一是因为商

鞅变法在秦国百姓心中威望甚高，轻易搞推倒重来，势必引发变乱；二是军队方面，对商鞅的新法非常拥护，奖励耕战以及军功授爵的制度，给诸多军将以实惠，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现实，让秦惠王也不得不默认了既定事实。

但在在位的早期，秦惠王对商鞅新法的继承是很消极的，甚至因为怨恨商鞅，驱逐了各国来到秦国的人才。但在短暂的倒退之后，秦国的国力上涨之势，依然不可遏制。秦惠王在位的早期，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临近秦国的韩赵魏三国。

这时候的韩赵魏，实力已经日益削弱，在东面被齐国控制，西面又遭到强秦的威胁，实力日益削弱。秦惠王这时期的另一个大动作，就是南下巴蜀地区，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秦国平定了巴蜀，灭掉了当时的巴蜀政权，取得了以后进军中原的一个后方基地。这一举动使秦国真正获得了战国争霸中的战略纵深优势，物产丰富的巴蜀地区，成为日后秦国天然的大后方。

秦惠王在对商鞅进行了短暂清算后，很快又开始了锐意进取。在他即位的早期，曾经驱逐中原各国滞留在秦国的宾客，但他很快便意识到了错误，开始大量招揽六国里面的人才。

比起秦孝公只用了一个商鞅，这时期的秦惠王，身边是人才荟萃，外交家张仪、公孙衍；名将魏章、司马错、甘茂，都在这时期大放光彩。秦国在马陵之战后，趁着魏国衰弱的机会，也得以继续东进，夺取了魏国的上郡，上郡的夺取，使从关中平原进入中原的黄金通道，从此牢牢地抓在了秦国的手中。

比起这时期的秦惠王，晚年的齐威王要逊色了很多。齐威王虽然战胜了魏国，但是齐国的君臣似乎更满足于列国对齐国的尊奉，至于开疆拓土，获得战略要地这些事情，齐国人的兴趣不大。齐国君臣的观念，依然还停留在春秋时期的“争霸时代”上，认为只要获得大家表

面上尊重的霸主地位，就恢复祖先的荣光了。这种滞后的观念，成为齐国没有趁马陵之战的胜利，趁势崛起的一大关键要素。

从个人品德上说，开创齐国霸业的齐威王，与此时的两代秦国君主秦孝公、秦惠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信用人才。齐威王在位的时候，大量选拔贤才，利用稷下学宫招募英杰。

但是秦国的用人，却更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秦国与齐国最大的区别，就是秦国是一个新兴国家，没有道德上的观念束缚，更没有旧制度的束缚，所以在用人上，秦国可以不拘一格，广招人才。齐国在这一点上就差得远了，齐国毕竟是一个从旧奴隶制国家内部脱胎而出的封建制国家，这样的国家性质，导致他们在转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时代的种种痕迹，齐国人的宗族观念、门第观念，比起秦国人来是更重的。

如此种种，使得齐威王晚年享受霸主身份的荣耀期，成了齐秦两大国国力迅速拉大的重要时期。

公元前319年，齐威王病故，其子辟疆即位，就是历史上的齐宣王。就是在这个时候，齐国与秦国之间国力上的差距，已经显而易见了。而联合各诸侯国实力的合纵运动也已经兴起，齐宣王在位的第一年，六国就发起了合纵运动，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西进攻打秦国。但楚国和齐国对此都持观望态度。结果只有韩赵魏三家兵临函谷关，战斗的结果，是韩赵魏三国被杀得大败，仅遭斩首的就有82000多人，秦国强大的实力，让本来还沉迷在霸主身份中的齐宣王猛醒了，他必须要做出应对。

力图一战的齐国

在秦惠王第一次击败六国合纵之后，齐宣王终于开始意识到强秦

的威胁。此时的秦国，不再是在齐威王晚年被打得落荒而逃，不得不遣使谢罪的秦国，他们实力膨胀速度之快，是超出齐国人理解的。

然而，此时齐国也有自己的优势，齐国的优势是它“中原诸侯”的身份。对于中原诸侯来说，齐国要的不过是霸主的荣耀，秦国要的，却是你的国土和政权，这一点的差别，使当时大部分的诸侯国，在感情上都还是倒向齐国这一边的。齐宣王登基初期，还是延续了其父“会盟诸侯”的政策，经常和韩国、魏国、赵国举行会盟，接受它们的朝拜，其间和楚国以及魏国都发生过战争。但是秦国的强大，使齐宣王在公元前313年做出了联合楚国的重要决定。

这时期的楚国，在版图上也处于一个极盛时期，楚国此时已经完全占有了江东地区，吞并了越国故地，此时楚国地广人多，可以募集百万大军，而此时的齐国，又拥有富庶的经济条件，两家一个有人、一个有钱，自然一拍即合。

公元前313年，齐宣王和楚怀王举行会盟，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秦国。但这个如意算盘，却很快被秦惠王给打散了，秦惠王只派来了一个张仪，凭借巧舌如簧，以六百里土地做诱饵，就让楚怀王轻易背盟，撕毁了和齐国的盟约。恼怒之下的齐宣王，反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他主动联络秦国，提出结盟共同对付楚国，这个愿望在第二年就实现了。

楚国在撕毁了和齐国的协议后，才知道被秦国忽悠了，秦国许诺的所谓六百里土地，完全就是哄人玩的。盛怒之下的楚怀王发兵八万攻打秦国，在丹阳与秦国名将魏章部鏖战。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先的盟友齐国竟然也出现在秦国阵营里，和秦国一道将楚国杀得大败。

这下齐宣王出了气，但出气的后果却是严重的，齐国和楚国之间的联盟就此破裂，而两家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抗衡秦国，齐宣王和秦国

联合大败楚国的结果，就是秦国趁机夺取了楚国在蓝田境内的土地，齐宣王忙活一场，两手空空。

通过和秦国的接触，齐宣王真正意识到了秦国的强大，让他感慨万分的，就是六国的人才怎么都跑到秦国去了。为了能够招揽人才，齐宣王加大了对稷下学宫的投入，使得诸子百家的英杰在此荟萃，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的各路代表，都曾在稷下学宫游学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儒家杰出的思想家孟子。

孟子初到齐国时，曾经非常兴奋，他对外宣告说：“管仲只让齐国成为霸主，我要让齐国统一天下。”对于孟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齐宣王却不感兴趣，战国时代刀兵无情，儒家那一套是不吃香的。孟子在游学齐国几年后，最后黯然离开了。比起秦惠王招纳的实用型人才，齐宣王身边的英杰们，学者居多，文化人士居多，他自己也喜欢诗文唱和，但安邦定国的人才，却凤毛麟角。

齐宣王在位的初期，秦惠王完成了他人生中对外扩张的重要一步，于公元前312年彻底击败了匈奴义渠部落。义渠部落是匈奴的一支，在战国早期经常侵扰中原。在这一年，秦惠王决定解决义渠侵扰问题，消除东进中原的后顾之忧，秦国采取焦土政策，用层层推进的办法，最终重创义渠部落。

也正是在这一年，秦惠王和齐宣王还发生了两次“对话”，都以齐宣王的失败而告终。一次是秦国联合曾经尊奉齐国的韩国和魏国一道讨伐楚国，在击败了楚国，夺取了楚国江汉平原的大片国土之后，突然改弦易辙，向齐国发起了进攻，结果齐国在苏北地区的大片国土丢失，遭到了挫败。

另一次对话，是齐宣王自己挑起来的。趁燕国内乱的机会，齐宣王对燕国发动了闪电战，仅用了50天就打下了燕国的国都。可是燕国此时的易王后，是秦惠王的女儿，这正好给了秦惠王出兵的口实。结

果秦国两路大军，一路攻伐燕国本土，一路攻伐齐国，皆获得了胜利。齐军在短暂占领燕国后，不但被赶了出来，本国也遭到了秦国的侵扰。在这时期的齐秦争霸中，齐宣王是处于下风的。

对外他连年用兵，正是如火如荼，秦惠王本人于公元前311年英年早逝，年仅46岁。之后即位的秦武王，是一个赳赳武夫，天生神力，是个霸王角色。在做国君上，他粗中有细，暂时停止了对齐国的大规模用兵，转而开始对六国的分化瓦解政策。对魏王，他主动修好，拉拢魏国倒向秦国；对楚国，他扶植楚国治下的越国部落，掣肘楚国。

这时期的齐宣王，在经过了两次对秦国战争的失败后，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内政上，他在位的最后五年，对内发展生产，倡导文教，训练士卒，对外对魏国、韩国、赵国，采取或打或拉的政策，将其尽可能地拉在齐国一边。在齐宣王的晚年，秦武王英年早逝，秦昭襄王即位，他即位的早期，大权掌握在太后以及穰侯魏冉的手中。在齐宣王临终前两年，即公元前302年，在魏冉的奔走下，齐秦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时候的齐秦两国，暂时实现了“和谐”。

齐湣王的绝唱

公元前301年，齐宣王过世，其子齐湣王即位，这位齐王在位的17年，既是齐国霸业的最后绝唱，也是齐国衰落的开始。

经过齐宣王晚年的休养生息，早期的齐湣王拥有强大的实力。这时候“连横”“合纵”两大团队奔走于列国，要么联合抗秦，要么依附于秦，成为大多数诸侯必须做出选择的“二选一”难题，此时楚国屡败北于秦国，无力北上，魏国早已衰弱，“合纵”的大旗，也就被齐湣王扛了起来。

齐湣王即位初期，遇到了和秦昭襄王类似的形势，这时候齐国的大权，已经被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所掌握，锐意进取的孟尝君，开始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积极介入到各国的内部事务之中。

公元前301年，齐湣王先是介入到韩国的内部争位斗争中，凭借着齐国的军事力量，扶持韩国太子咎登基，使韩国成为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之后又动兵楚国，以楚国与秦国结盟，违反合纵协议为由，在垂沙与楚国交锋，双方沿着楚国的方城对峙六个月，最后齐国趁着江水退潮的机会，从浅滩处发动猛攻，一举击溃楚军，此战消灭楚军2万多人，杀楚将唐昧，一时之间，楚国很难再对齐国构成威胁。

齐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是为了大举进攻秦国做准备。经过在中原地区的扩张，齐国终于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反秦同盟。

公元前298年，齐国会同韩魏联军猛攻函谷关，秦国依托有利地形拼命抵抗，双方鏖战长达三年。结果，齐国主将匡章选派敢死队进行偷袭，终于在公元前296年占领函谷关。秦国的关中平原，已然在齐国面前一马平川。但在这关键时刻，齐国却再次见好就收，满足于秦国的谢罪，随即拔营东撤了。合纵联盟成立以来击败秦国的最好机会，就这样被齐国自己放弃了。

齐湣王显然不这么想，相反，他认为自己已经为父亲齐宣王雪耻。齐湣王主动放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战争主要是由此时主持齐国国政的孟尝君田文发动的，对于齐湣王来说，他不愿意看到田文通过这些战争来扩展势力，两人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为了对付田文，齐湣王重用从燕国投奔来的苏秦。

苏秦是合纵运动里的重要人物，最擅长舌辩，而且他在齐国没有根基，在齐湣王眼里是好控制的。但齐湣王不知道，苏秦来齐国，是为燕国做卧底的，燕国在齐宣王时代差点遭齐国灭国，这时期的燕

国，是燕昭王在位的时候，他一直在锐意复仇，苏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苏秦，齐国的内部矛盾、军事情况，源源不断地被燕国得知了。而且燕国同时和秦国也有姻亲，所以当齐湣王对秦国不断采取攻势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头上已经悬挂着一把凶器。

公元前294年，正锐意扩张的齐国发生了内讧。因为贵族田甲发动劫持齐湣王的事件，齐湣王趁机对齐国的田氏贵族进行打压，孟尝君田文的相国职务也被剥夺了。接替孟尝君职务的，就是苏秦。

和孟尝君拉拢东方六国，全力对付秦国的国策不同，苏秦为了完成燕昭王交付的卧底使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劝说齐湣王四处扩张，尤其是拿着自己的盟友下手。这时期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崛起的时期，之后的几年，苏秦竭力挑拨齐国和赵国的关系，让这两个铁杆盟友逐渐交恶，同时积极劝说齐湣王攻打韩国、宋国等国家。齐湣王一连串的军事征战的胜利，使秦国不得不对齐国侧目。

这时期是秦国处于守势，齐国咄咄逼人的时期，为了笼络齐国，秦昭襄王主动要求和齐国并称为帝，秦昭襄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这几乎就是春秋末年晋国楚国平分霸权的翻版。对平分霸权的要求，齐湣王很高兴，但苏秦知道，如果此举成功，齐国和秦国联手，其实力将更加强大。因此在苏秦的劝说下，齐湣王主动取消了帝号，把秦昭襄王结结实实地“闪”了一把，示好不成的秦国，与齐国的交恶也就成必然了。

公元前287年至286年，是齐湣王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时期。这期间，他通过对赵国和韩国的战争，把胡服骑射后军力日益强大的赵国打得落花流水，又进一步削弱了韩国，这其实是帮了秦国的忙。

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又灭掉了宋国，灭宋一事激起秦国大怒，宋国是秦国当时在中原的重要盟友，宋国被灭等于拔掉了秦国安插在中原的钉子。这时期齐湣王身边的邻居们，无论是北边的燕国、赵

国，还是西边的魏国、秦国，没有未被他打过的，盟友都得罪光了的齐湣王，很快招来了报应。

公元前286年，齐国刚刚灭掉宋国，秦国就在西线发动了进攻，借韩国的道路突袭齐国，将齐国打得大败，之后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五国联合伐齐，在济水边与齐国决战，经过连年征战，已经强弩之末的齐国大溃。之后齐湣王被楚将杀死，齐国70多个城市沦陷，虽然后来田单用火牛阵击退联军，拥戴齐襄王复国，但遭到这一轮灭顶之灾的齐国，也就彻底失去了争霸的资本。秦国，在与齐国经过58年的“两极格局”之后，终于借中原诸侯之手，搬掉了他们东进中原的最大障碍。

十四 燕国改革，一场昙花一现改变战国历史

战国七雄，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但它们几乎都有过风光的时候。就连这其中，从春秋到战国时代，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配角的燕国，也毫不例外。

燕国这个国家，从齐桓公春秋首霸起，就露脸极多，但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给其他的风光国家当背景，至于争霸之类的大事，长期与它无缘。而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燕国的配角地位，也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特别是当各国都开始轰轰烈烈的变法时，燕国这边却依然是死气沉沉的模样。以《战国策》里的说法，就是“凡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战国七雄里，就数他家没进步。

为啥没进步？原因也很多，但比较公认的一条是：这个国家的危机感比较差。

燕国的地理位置，位于整个战国七雄里最靠北。虽说常年同蛮族打交道，故受到的中原国家的威胁，相对也就比较少，要打燕国的主意，就要考虑爬冰窝雪的风险，战争的艰苦程度极大。由于成本很高，所以对这个国家，大家也是能不打主意，尽量就不打。所以从春秋年间起，燕国掺和的事情不少，国力也不算强，但是挨打的次数，相对也确实不多。

但是在进入战国年间的白热化阶段后，情况却不同了。

比起极讲究礼数的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的战争，已经完全是你死我活。而且科技手段不断进步，列国的战争水平越发上升，尤其上升的是战争的动员能力和支撑能力，山遥路远的燕国，也就难逃挨打的命运。

于是从燕国易王在位起，燕国的苦日子终于来了，南方的老邻居齐国，实力已经如滚雪球一般崛起，正是四处吞并疆土的时候，血淋淋的大口，也就第一时间咬向了燕国。一口气连吞了燕国十座城池，逼着燕易王忍气吞声求和，才算免了进一步痛打。

而这场冲突对于燕国来说，最大的刺激还不是惨烈的失败，而是几乎毫无悬念的失败过程，经历过变法图强的齐国，战斗力已经高速演进，遇到还坚持春秋传统打法的燕国，几乎就是轻松虐打，怎么打怎么赢，森严的城池更成了豆腐渣，被齐国几下子就轻松攻破。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燕国这下结结实实尝到了。

所谓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极有血性的燕国，又怎么能忍得了这样耻辱的结果。公元前320年，燕易王含恨而死，其子燕王哙继位，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国王，也决定顺应举国的呼声，实现一个姗姗来迟的壮举：变法图强！

燕国的变法开始了，但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从燕王哙到燕昭王两代人，先南辕北辙自取其辱，后又短暂自强的变法历程，却结结实实改变了战国历史的版图，说燕国的这一段动荡，是整个战国历史的分水岭，恐怕也毫不为过。

燕王有理想

初登基的燕王哙，是个很有理想的人。

他的变法，口号喊得很低，但事情做得极多，特别是在考核官员等事务上，大胆学习秦国等国家的经验，包括军功授爵等制度，样样有样学样，燕国上下的变法，都十分地热闹。

然而和其他国家一样，这样的大刀阔斧，不可能不招来反对。但幸运的是，燕王哙信用的相国子之，是一位非常干练的人物，做事说一不二，手段强硬简洁，轻松镇压了好几场旧贵族的反抗行动，里里外外的关系，都让他打理得特别好，就连燕王哙也深有体会：有困难，找子之。

从表面来看，燕王哙和子之的关系，十分类似秦孝公和商鞅那样，属于君臣鱼水情深的典范。但事实上，两者却截然不同：商鞅哪怕再嚣张，也绝不会动秦孝公的权柄。子之却恰恰相反，他的人生理想，绝不是做个名垂青史的改革家，相反打算像田氏齐国那样，借壳上市取得燕国的江山。

在燕王哙改革紧锣密鼓的时代，燕国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实力，也在蒸蒸日上。虽说依然不能和齐国、秦国、楚国这类大国相比，却也成就不小，在他登基的第三年，还参加了列国一起对秦国的讨伐，虽说无功而返，但燕国的大国地位，毕竟是上去了。

可毕竟没有打来胜仗，燕王哙忙活一顿后，心思也逐渐冷下来。而子之取而代之的劲头，却是越发地热。

话虽如此，但燕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国家。哪怕是当年田氏代齐，也是数代苦心经营，一代代杰出人物运筹帷幄，最后平安夺权。像子之这样的人物，虽说贵为高官，可论起工作才能，比商鞅、邹忌这类同时期的顶级人物，差距还是好远。要啥都没啥，哪有这么容易？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子之竟然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办到了。

当时燕国大臣苏代，也就是战国纵横家苏秦的族弟，出使齐国归来。正在渴望富国强兵的燕王哙，立刻叫来苏代询问，主要想问问齐国到底有多强，未曾想到这位苏代，同样也是子之的同党，正好借这个机会，把齐国从头到尾一顿贬，说齐宣王绝对没有明天，因为他不信用自己的大臣，大王您如果要振兴燕国，可不能学齐国啊。言下之意，就是必须重用子之。

这一顿香风一吹，立刻把燕王哙吹得茅塞顿开，他本身就是一个性格非常软弱的人，虽说拥有伟大理想，但确实缺少扛事的能力，自从苏代这一顿宣传后，燕王哙对待子之，更是各种信任有加，内政外交各类大事，都放手让子之去办。

要是说子之真没什么业绩，却也不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开创了战国时期的一大军事改革：骑兵改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前，子之就开始尝试组建新型的骑兵部队，另外燕国自身的封建化进程，也是在他当政的时候越发加快，比如废井田制、开阡陌、发展农业生产等国策，样样都全力推动，仅以工作成绩论，确实劳苦功高。

当然，其间办得最高明的，却还是子之个人实力的培养，在燕国这样一个弱国，比起齐、秦这样的传统强国来，权臣确实更容易取得成功，几番强力改革后，燕国从中央到地方，子之的亲信遍布，大小臣子们只知道有子之，不知道有燕王的情景，更是变得司空见惯。

这种情况发展了没两年，子之几乎就成了燕国的实际统治者，外加燕王哙本人也发现，自己对于学术问题，比治国的热情更高涨，最喜欢关起门来研究学问，至于治理国家这类的琐事，干脆交给子之做？而在子之的热心鼓噪下，燕国上下更形成一股全新热潮，集体强烈呼吁，让子之正式接替燕王哙的王位，做燕国的新国王。这种事要是放在齐、秦、楚这类国家，子之恐怕早就死上百次八次了，但放在燕王哙这里，这位国王却是毫不动怒：让就让！

为啥这么痛快，首先是燕王哙实在不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料，当了五年国王，每天各种焦头烂额，实在是干不动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就是在这五年时光里，燕国的内外大权，早就让子之牢牢把控住了，说句寒碜话，有没有燕王哙，其实都一个样，还不如名正言顺一点。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子之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所代表的，正是燕国正在崛起的新贵族们，这些人借着燕国改革的东风，权力扶摇直上，传统的燕国奴隶制老贵族们，要么被牢牢踩在脚下，要么就是乖乖靠边站，几年的改革，燕国国内权力版图的变化，动作要比燕国自家国力的上涨大得多，改革改了五年，终于到了革燕国国王命的地步。

于是，燕国的这一场热闹场面，很快从宫廷蔓延到了民间，从基层的百姓到各地的官员，几乎都在反复宣传，燕国要强大，必须子之当国王。所谓“举国意属子之”，结果也就顺水推舟，燕王哙主动放权，学着古代禅让这一套，痛快把王位让给了子之。战国历史上一场匪夷所思的权力交接，竟然就这样轻松完成。

但谁都没有想到，这场过程十分荒唐的高层变故，却是燕国一场大乱的开始。

个人能力差点事

按照今天一些学者的观点，子之的篡权，不但是他个人实现狼子野心，其实也是燕国新贵族们逼着奴隶主交权的一次行动，就其性质说，和田氏代齐差不多，但就结果说，却是差远了。

其中最大的一个差距，就是个人能力。

子之这个人，手腕非常强硬，做事非常高效，但是就政治家水平

来说，和同时期的诸多改革家相比，却远远不在一个档次上，在燕国做个国相，还算能勉强合格，但要说身为国王，统领一个大国，却是严重不合格。

因为国相需要的是权谋，而国王更需要的，却是气度和胸襟。

子之最不合格的，也就是这条，自从当上国王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大肆地排斥异己，甚至在燕国屡次兴起牢狱，大力抓捕所有的反对者们，昔日好些一党的心腹，也都纷纷和他翻脸。在位仅仅三年，结果就是“国大乱，百姓恫恐”，几乎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而一场夺权斗争，更把这风雨飘摇的燕国，闹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本身就对子之恨之入骨，这样的好机会哪里肯放过，他立刻联系了将军市被，一起合谋夺取王位。而这个秘密谋划，也很快被燕国的老邻居：齐宣王知晓。

虽说齐宣王家族，也是通过田氏代齐上来的，但对燕国这类似情况，齐宣王却十分仗义：子之这么做是不合法的，他窃取燕国王位的过程是卑鄙无耻的，他害得燕国民不聊生，罪行更是严重卑劣的。太子平你不用担心，齐国一定会要人给人，要兵给兵，全力帮你夺王位。

齐国的这番好意，对太子平来说，就好比是干旱中的春雨，双方立刻一拍即合。于是，在齐国的全力输血下，公元前314年，长满力量的太子平，终于向得意洋洋的子之砸出了重拳。先由市被包围王宫，没想到子之却早有准备，计划内的突袭一下子碰了钉子，连市被本人都叛变投降了子之。原先的篡位奇袭，这下变成了拉锯战，太子平和子之各自拉起队伍，在燕国大打出手，几万人的军队自相残杀，好几个月分不出胜负。所谓“死者万余，百姓恫恐”，参考下燕国的人口就知道，这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但燕国最大的灾难，这却才到来。

早就在一旁冷眼观看的齐国，突然在燕国自相残杀到最惨烈的时候，派遣大军悍然越过边境，大规模地向燕国杀来。正如儒家与孔子齐名的圣人，此时正是稷下学宫学士的孟子所谋划的那样：现在攻打燕国，这是类似周武王伐纣一样的黄金机会，绝对不可以错过。

于是，齐国的大军汹涌而来，而燕国的抵抗，却变得绵软无力，早就挣扎在内战旋涡里的燕国军民，已经毫无血性斗志，更烦透了战争，对于齐国的进攻，清一色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而且齐国的宣传攻势也做得好，一路打出的旗号，就是讨伐万恶的叛贼子之，这个口号一宣传出去，就是最好的作战动员，齐国大军所过之处，城池纷纷投降，热情的燕国百姓们载歌载舞，欢天喜地迎接齐国大军，就像见了亲人一样。

就在这样的热闹气氛里，“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国大军高歌猛进，比旅游还轻松地长驱直入，一下拿下燕国都城蓟。但令满怀期望的燕国官民万万想不到的是，在攻破燕国都城的那一刻，齐国血淋淋的屠刀，却也高高举了起来。

首先死在齐国刀下的，就是燕王哙，但万没想到的是，齐国拍胸脯保证支持的太子平，却同样也被抓来处死。而仓皇逃跑的子之，随后也落入了齐国手中，被齐国军队剁成了肉酱，整个燕国的最高层，在这场动乱闹剧中，几乎全被齐国人一窝端。

但让燕国百姓最为凉水浇头的是，齐国不但杀掉了燕国的国君王孙，更不拿燕国百姓当外人，想杀就杀想抓就抓，齐国军队在燕国土地上耀武扬威，更下定决心扎根不走，就准备吞并你了。

如果说之前的燕国，已经形同人间地狱的话，那么接下来齐国就让燕国人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地狱：无数的城池被毁，好些村庄被屠戮劫掠一空，燕国的仓库粮食，成批地往齐国拉，大批的燕国官员贵族，成日被拉出来处决。战乱中呻吟的燕国人，这下好好尝到了做亡

国奴的滋味。打着拯救燕国名义而来的齐国，才是一条真正的饿狼。

然而齐国“饿狼”这顿闹，却把血腥味到处传，周边的好些国家，这下都跑到燕国来趁火打劫。就连一直被赵国、魏国欺负够了的蕞尔小国中山国，这下竟然也跑来分一杯羹。一口气夺取了燕国数百里的土地，好好地令这个死里逃生的小国捡了便宜，而亡国的阴云，也正笼罩在这个传统大国的上空。

但幸运的是，燕国确实气数未尽。

虽说被齐国占了大便宜，但不幸中万幸的是，燕国先前基本都是不抵抗，虽然被齐国端了都城，但其军队的实力依然犹存，在认清楚了齐国的真面目后，燕国上下积攒的怒火，也终于如火山一样汹涌爆发了，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痛打齐军，闹得占据燕国的齐军，今天被打个闷棍，明天被打个埋伏，很快就焦头烂额了。

当然更幸运的是，燕国的王室并未绝嗣，燕公子一直在赵国做人质，而这个年头，也正好是经过胡服骑射的赵国强势崛起，开始挑战齐国东方霸主地位的年头，如此大好机会，刚刚成功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又怎会错过？立刻大摇大摆，派精锐骑兵护送燕公子回国。而一直在函谷关冷眼观望的秦国也掺和进来，表示绝不接受齐国灭燕的结果。事实也明摆在眼前：如果一意孤行吞并燕国，齐国就要承担独自与秦国、赵国两大强敌开战的后果，齐宣王权衡利弊后，终于吐出了到嘴的肉：撤退！

在狠狠地将燕国大地蹂躏一顿后，齐国大军撤了，留下的是在一片废墟中登上王位的燕昭王和一个饱受战火的燕国。

在齐宣王看来，这次燕国行动，虽然没能吞灭燕国，但已经最大限度地削弱了这个老邻居，而且还得到了大量的粮食财富，可以说赚个盆满钵满。但是其中一个后果，他却至死没有想到。

齐国这次蹂躏，重创了燕国也拉足了仇恨。受到耍弄和肆虐的燕国人，看齐国的眼睛，更充满着复仇的怒火。而幸运登基的燕昭王，更下定了一个奋斗终生的理想：要以正确的变法自强，更要让齐国血债血偿。

一代英主燕昭王

作为一位风雨飘摇中登位的国王，燕昭王的履历，却是极不简单。

他之前人生的大半岁月，都是在赵国度过的，赶上的又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现变法自强的年头。赵国的成功经验，别人都是道听途说，他却是每天耳濡目染。论理想与见识，之前的燕王哙至多是个书呆子，他却是远远高得多。

由于见得多想得多，因此真正主持起变法来，他的手段上来就专业：首先就大力求贤，不惜血本招揽人才，而且还用了一个与商鞅南门立木异曲同工的妙招：专门找来一个叫郭隗的名士，特意为他修造了豪华的住宅，更以隆重的礼节，专门拜他为老师，享受崇高的待遇。这就等于给了全天下一个模板：连郭隗这样的人，都能在燕国受到重用，你们还等什么？

这样的广告一打出去，收获立刻爆满：各国的顶级人才们成群结队，全都朝燕国跑来。而且好些还都是抢老对头齐国的生意，比如说邹衍，这是当时战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在稷下学宫非常受尊重的人才。这位老先生在稷下学宫里，不但享受高官厚禄，而且地位非常的尊贵，他到魏国访问时，魏惠王专门跑到郊外去迎接，跑到赵国时，赵国位高权重的平原君，侧着身子恭恭敬敬地过来迎接他。如此杰出的人物，燕国如果不拿出一些特殊手段，想要留住他是很难的。

但对燕昭王来说，这个却真不是难题，他只用了一招，竟然就让受惯了尊重的邹衍老先生感动不已：他亲自用衣袖裹着扫把，在前面为邹衍老先生带路，一边走一边把一路上的垃圾全扫掉，等于是手把手为邹衍老先生做清洁工。而且等到邹衍上课时，他更做出一个瞠目结舌的举动来，主动跑到学生位置上就座，以弟子的礼节聆听邹衍的教诲。这几个事迹传开，整个列国都哗然，人才们自然组团往燕国跑。

虽说尊重人才，但燕昭王的目的性，也同样非常强。燕国并不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收，除了富国强兵的人才，最需要的，则是能够帮他一雪前耻，打败齐国的人才。尤其是军事方面的人才，更是最为欢迎。在经过了长时期的筛选后，他终于物色到了一位堪比孙臆的杰出军事家：乐毅。

这位顶级军事人才，就是他攻破齐国，一雪前耻的利器。

乐毅的出身，可以说极其高贵，他是魏国人，祖先就是当年曾经为魏文侯血洗中山国，大拓领土的名将乐羊，乐羊子妻的典故，20世纪80年代，也曾是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里的熟脸。

有这样强大的祖先，乐毅自幼的家学传承，也就相当地好，但生不逢时的是，他的祖国魏国，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沦落成为战国年代里的酱油角色，再也不复昔日的勇猛。就连乐毅的故乡灵寿，这时也成了赵国的国土。于是，年轻时代的乐毅，也就改弦更张，去了正热火朝天实行变法图强的赵国。

在赵国的土地上，兵法才能出众的乐毅，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的军事才华甚至引起了平原君等权贵们的注意，一路被各种举荐，身份地位扶摇直上。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应该很快就会在赵军中独当一面，为赵国的事业开拓疆土。

但人生的意外，有时候就是这么突然。赵武灵王一生勇猛，没想

到临了却抓了瞎，闹出了被儿子困死沙丘宫的事件，偏偏身为普通官吏的乐毅，也被卷入其中，眼看就要被清算，于是乐毅当机立断：跑！先是逃到了祖先曾建功立业的魏国，凭着一身本领，也算发展得不错，甚至还作为使节，到处出国访问。但看看魏国的局面，乐毅的心里就瓦凉：这个传说中的战国首霸，非但没了昔日的荣光，相反还越活越窝囊，胸怀大志的乐毅，难道就要在这个国家窝囊一辈子吗。

就是这样的人生迷茫里，乐毅知道了燕昭王的求贤令，作为使者出使燕国，更亲眼看到了这位燕国新国王的气度与理想，一下就为之深深折服，出使任务还没有完成，就立刻做出了决定：留下来。然而对乐毅这个决定，正锐意图强的燕昭王，高兴得就像捡了宝，如果说以前优待郭隗，礼敬邹衍，都还有好些作秀的成分，那么这次对乐毅，却是实打实地托付：立刻任命他为亚卿，也就是执掌燕国军政大权的高官，仿佛一个毫不畏惧的硬汉，扛起了燕国的改革大业。

比起当年燕王哙重用子之来，燕昭王对乐毅的信任，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比起善于耍权谋的子之，乐毅却是个干实在事的人。临危受命之后，他立刻出手抓住了燕国改革的要害：首先是明奉法，审官断。也就是确立法律，有法必依，比起子之当年完全靠手腕来镇压群臣，乐毅却让燕国的管理法制化。然后是“查能而授官”，也就是设立官员考核制度，真正依照官员的才能和政绩来选派官职，杜绝一切亲贵当道的景象。最重要就是“施及阴隶”，也就是从中下层老百姓甚至奴隶当中选拔人才，特别是一切为军队大业服务，只要是战斗力强有战功的人才，都可以从军，都可以用军功来换取自己的自由身，只要打仗不怕死有功劳，人生改变绝不是梦。

乐毅的这三条变法，堪称深得商鞅变法的精髓，而且更奇特的是，虽然也遭到了阻力，但比起商鞅变法的惨烈来，乐毅遭到的阻力，却是小得多，相反举国上下一致拥护，变法很快就红红火火起来。

为啥这么顺利，首先是得到燕昭王的全力支持，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了燕王哙改革和子之之乱的燕国，虽说战争创痛厉害，但是以太子平为代表，反对变法图强的旧贵族，却也同样被一扫而空，整个变法基本就没有了阻力，所谓不破不立，正是这个道理。

也正是在这样的好条件下，燕国经过了二十八年的强大变法，国力蒸蒸日上，很快成为一方大国。而进步最大的，正是军队战斗力，在乐毅的苦心经营下，本就英勇善战的燕国士兵们，战斗力直线上涨，更满怀着一颗雪耻之心，就盼望着假以时日，报复齐国。

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以燕国和齐国的力量对比看，所谓报复齐国，依然是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事情。因为此时的齐国，力量正如日中天。

断送齐国霸业

燕国正卖力发展的时候，也正是齐国实力膨胀到顶峰时期。

此时的齐国，正是齐湣王在位时期，比起齐宣王时期雄霸中原的大国地位，这时的齐国却更进一步。齐湣王时代的齐国，向南打败了楚国，向西则一度攻克了函谷关，逼得素来骄横的秦国，也咬牙忍辱求和，在齐国的颐指气使下，退还了大批原先侵占韩赵魏等国家的国土，齐国的国家威望，一下子空前暴涨。

当时的情况，以《史记》的说法是：“诸侯皆欲背秦而服齐”，也就是把齐国，当作霸主国家一样臣服。而更叫燕国看起来绝望的是，一直和齐国你死我活互掐的秦国，这下也似乎认输了，秦昭襄王主动给齐湣王示好，提出两家互相称帝，齐湣王称东帝，秦昭襄王称西帝，也就是两家联手，一起瓜分天下。

这段时期，也是战国历史上的重要一段：齐国和秦国相互争霸时代，意图雄霸东方的齐国，成了旨在统一天下的秦国，东出函谷关的最大障碍。对这个障碍，多年来秦国挖空心思想办法，文的武的都用了，结果战场上互有胜负，战场下更针锋相对，几乎谁都占不到谁便宜。而且让秦国更加抓狂的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原大地上合纵大潮蜂起，中原六国连续组织了多次联合讨伐秦国的军事行动，虽说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让秦国惊恐的是，齐国已经开始借助这股力量和秦国为敌，特别是齐国曾经组织了三国联军，三年苦战攻克了函谷关，让秦国丢了一把大脸。照这样的场面持续下去，秦国一统天下，恐怕只能是梦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不利局面下，燕昭王却终于找到了战胜齐国的钥匙：既然可以合纵攻打秦国，难道就不能合纵攻打齐国？因为对于中原国家来说，秦国虽然是虎狼之国，但毕竟距离遥远，对于眼来说，实打实的真威胁，却是齐国。经过几代苦心经营，综合国力已经达到顶点的齐国，此时虽然具有雄视天下的实力，却不幸赶上了一位极其缺乏战略眼光的国王：齐湣王。

这位国王一辈子好勇斗狠，对待周边的邻居，基本就是不服就打，直到打服为止。而且还耳根子软，最爱偏听偏信。

眼光敏锐的燕昭王，一下抓住了这难得的机会，立刻紧锣密鼓行动，以乐毅的谋划就是“莫如与赵及楚魏”，也就是许诺分给楚国、魏国和赵国好处，让他们与燕国联合，一道讨伐无道的齐国。由于多年以来，齐国在中原拉够了仇恨，结果几大强国一拍即合：韩赵魏楚燕五国组成了联军，战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合纵战争就此爆发，对象却不是秦国，而是齐国。

公元前284年，著名的济水大战爆发，亲自坐镇指挥的齐湣王，被乐毅灵活的用兵打得溃败，齐军一败涂地，五国联军长驱直入。但出于对齐国的恐惧和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在占

了便宜拿到几个城池以后，也就见好就收了，然而真正咬住不放的还是乐毅，亲自率领燕国主力，一路长驱直入，连拿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这下的齐国，闹得比当年燕国还惨，齐湣王在混乱中被杀，整个齐国就剩下了即墨和莒两个小城，在燕国浩荡的兵威面前，几乎就剩下一口气了。

对这既得利益，燕国也十分珍惜，而且比起当年齐宣王的残暴来，燕国这次却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办法：严格规定纪律，废除齐国的残暴法令，所过之处收买人心，一心一意要把已经拿下的齐国城池，消化成燕国自己的土地。同时一口气册封了二十多个燕国宗室，用以巩固在齐国的统治。在燕昭王的谋划下，只要争取了齐国民心，稳定了上层基础，依托两个小城苟延残喘的齐国，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照着这个局面发展下去，那么战国的历史，必然会出现一个令人惊讶的走向：昔日强大的齐国一夜尽灭，领土财富被燕国打包全收，完成对齐国吞并消化的燕国，必然会一夜拔地而起，成为继齐国之后，又一个抗衡秦国东进的强大力量，甚至短期之内，中原国家也必然会拜服在燕国的脚下。如果历史照此发展下去，恐怕又是一派不一样的风光。

就在燕国吞并齐国的过程里，燕国的其他版图，也是滚雪球一般地疯涨，东北的辽东地区，已经尽数成为燕国国土。但就是在这黄金时代，燕昭王却突然病故了，新继位的燕惠王，却恰恰是乐毅的死对头。于是忠心耿耿的乐毅，很快就被燕惠王清算，交出前线指挥权后，仓皇逃到了赵国。这位书写了战国时代一场空前战争奇迹的名将，在赵国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被封于观津。

燕惠王得意地以为，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又搬掉了最大绊脚石，一切十分顺利，没有想到正是他这荒唐的行为，给老对手齐国续了命，一直坚持在即墨抗战的齐国名将田单，使出了著名的火牛阵，打败了接替乐毅的骑劫，竟然一路乘胜追击，终于光复了齐国国土，

把燕国军队赶出了齐国的土地。齐国最大的一次灭顶之灾，就这样幸运躲过。

然而最后的事实证明，这场争斗没有胜利者。败掉大好局面的燕惠王，也失去了燕国雄霸天下的机会，可笑的是，他还把责任归罪给跑去赵国的乐毅，气得乐毅写下了名篇《报燕惠王书》，既向天下人表白了自己的忠诚，更叫燕惠王这位败家子，成了列国的笑柄。

然而真正的胜利者，却是函谷关外一直旁观的秦国，在秦国一统六国的大业里，燕国和齐国的这场争斗，却好像是一块天降的馅饼。燕国打败了齐国，却没有巩固胜利果实，随着齐国的反扑，基本被打回了原形。而躲过灭顶之灾的齐国，也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复当年称霸东方的风采，秦国一直没办法的最强敌齐国，就这样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倒下了。燕国的这次昙花一现，却成了改变战国走向的最大意外事件。

十五 最后的君子：信陵君

君子是些什么人

到了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各国变法的完成，封建制度的确立，在许多国家里，出现了这样一群奇特的人。

这些人住着高大的宅院，家里财产丰厚，特权也多得很，国君们对他们客客气气，他们家里养的人也多，一些奇怪的人平时白吃白喝。但他们都不是一般人，不是精通武艺，就是擅长辩论，甚至还有人精通科学，都是怀有才能的人。这些住在他们家里的人，最多有好几千，叫作“门客”，但真遇到事情，却要卖命效力。

这些位高权重的人，当时被人叫作“公子”，而在后世，他们则被称为“君子”——各国享有特权，位高权重的新贵族们。

“君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原来，战国时期的主要国家，在经历过变法之后，那些新贵族们有了政治特权，财富迅速壮大。他们中有崇高名望和卓越能力的新贵族，就被称为“君子”，意思是仅次于国君的人。

而新贵族要想成为君子，只有地位势力财富门客，却还不够。另外重要的就是名望。整个战国时代，出过四个这样的君子，史称“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齐国孟尝君。

这四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很有钱，也都很有权，都养了很多门客，也都有好名声。身份也很特殊：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亲弟弟；赵国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孟尝君田文，则是齐宣王的侄儿，齐湣王的堂兄弟；春申君黄歇，家里是楚国世代公室大臣。他们都是各国国君的自家人。

在战国，有他们这样身世背景的人很多，但只有他们四个被称为君子，一是因为他们有神通广大的门客，二是他们的人格魅力。

这四位君子，都有很多神通广大的门客，比如魏王宠爱的妃子如姬，父亲被人杀害，魏王想尽办法，也没找到凶手，信陵君知道后下令门客帮忙，没多久就把凶手杀掉了。孟尝君的门客也很厉害，有次他被邀请到秦国，结果秦王图谋杀害他。孟尝君的一个门客学狗叫混入秦国仓库，偷来了孟尝君先前送给秦王的狐皮锦袍，贿赂秦王爱妃，在秦王爱妃的帮助下得以脱逃，在逃出关卡的时候，又碰上关卡以天黑为由拒绝放行，另一个门客学鸡打鸣，引得守关士兵误以为天亮了，果然开关放人，这才逃出险地。成语“鸡鸣狗盗”就是这么来的。

想要招来这些神通广大的门客，光靠钱是不够的，更要靠人格魅力。孟尝君对门客非常有礼，一次有门客嫌自己吃得差，结果孟尝君把自己碗里的饭给门客看，原来两人吃的都一样。门客羞惭无比，立刻自杀谢罪。平原君在赵国享有免税特权，一次有个新来的收税官上门收税，平原君不但不生气，还向赵王推荐这个税官，这个人，则是后来战国时期第一骑兵名将赵奢。他们能够招揽门客，除了财富地位外，就是靠辨别人才的眼光，包容人才的胸襟气度。

但要论起在国家大事的贡献，特别是危难时期承担责任的勇气和中流砥柱的价值，这四位君子中，最为杰出的，则当属魏国信陵君。

信陵君，名无忌，是魏昭王最小的儿子，兄长正是魏国国君魏安釐王。由于他以信陵为封地，因此才被叫作信陵君。而作为四君子中十分著名的一位，信陵君一样十分出名的成就，就是养士。

会养士的信陵君

战国年代的这些君子们，养士是个十分流行的风气。

就如前面所说，几位与信陵君齐名的人物，麾下基本都是人才荟萃，知名度特别高的，比如孟尝君，被强制请到秦国谈工作，眼看谈不好就要被扣留，却在几名门客的巧妙掩护下成功脱身，留下了“鸡鸣狗盗”的典故。又比如赵国的平原君，麾下一个不显山露水的毛遂，在后来的邯郸保卫战中，硬是似黑马一样闪耀了一把，凭借犀利的辩才，办到了他主人办不到的事：说动楚王发救兵。这段毛遂自荐的典故，也不知激励了多少奋斗中的年轻人。

但是就这件事的质量来说，这几位在后世，也没少了被吐槽。最有名的一个批评，来自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王安石的眼里，所谓养士三千的孟尝君，麾下基本就是混混儿，除了学鸡叫就是偷东西，干的全是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在，所以才闹得正经的人才没有了出路。

可要是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待信陵君，就不得不叫一声佩服，论养士的效果，信陵君毫无疑问是最强的。

首先最强的一条，就是成本。养士这件事，一般拼的就是钱。战国这个年代，士人的地位十分独特，精神地位独立且极有尊严，想要笼络住一个有才的士人，没钱通常是万万不能的。在这一条上，几位君子都是各自比着拼。比如平原君，除了给钱给东西，还额外发福利，上等门客的佩剑上都装饰有珠宝。春申君的门客，穿着的鞋子都

是用珠宝做成。至于孟尝君，养士花钱更是如流水，以至于家中开销常常捉襟见肘。

而比起这几位的拼来，信陵君却是用了另一种办法：尊重。

其实在战国年代，士人的人格都是出名独特的，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人物，他们看中的并非钱财，相反却是尊严。对于这个道理，信陵君十分了解。

了解这个的信陵君，就在养士问题上，采用了非常独特的方式：礼贤下士，只要是自己看中的人，他就放下面子，主动登门拜访，言谈举止恭恭敬敬，倾心结交。而且这人也有极高的情商，属于那种见面就给人如沐春风之感的人物，十分有亲和力。

而与其他几位更为不同的是，信陵君真正接触密切的士，基本都是社会下层人物扎堆。这条虽然孟尝君也类似，但是孟尝君所收拢的，基本都是有特殊才能的社会下层人物，而换到信陵君这边，却是更加普通，他的很多民间友人，基本都是不显山露水的一类，日常基本看不出啥特殊才能。

最有影响力的事情，就是信陵君结交了大梁城的守门人侯嬴，对这位传说中的贤人，旁观者眼中身份卑贱的草民，信陵君却是大动阵仗，专门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邀请这位人物去自己家赴宴，而且还亲自驾车邀请，并为他牵马驾车，一路恭恭敬敬，把大家都看呆了。

而且对信陵君的这番好意，侯嬴也表示毫无压力。不但大摇大摆地接受，更干出了一件让旁观者们抓狂的事情：路上遇到了好朋友屠户朱亥，侯嬴竟然就不管不顾，拉着朱屠户聊起了家常，两人一聊就是半天，却把一旁的信陵君晒在了那里，堪称嚣张到极点。对于这种十分没礼貌的行为，信陵君从始至终，都是十分的淡定，一直微笑并保持微笑，对侯嬴的行为十分的容忍。大庭广众之下，给足了侯嬴面

子。

这次遭遇在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故事中，属于十分普通的一个，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在战国四君子中，真正能够“以富贵下贫贱”的，唯独一个信陵君。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同为四君子，但在眼光和襟怀上，信陵君的水准，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三位。

但他最超过其他几位的，却是境界。

战国的这几位君子，理论上说，都是非常爱国的，但到底爱的程度如何，那就两说。比如孟尝君，一生都在和国王争权，也因此几起几落；平原君相对比较慨然，但也干过偷税漏税的事情。而其中最无私的，当属信陵君。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养士的态度，比起其他几位各种扩充自己势力的目的，信陵君的态度却很单纯：为国效力。

在这个问题上，其他人和他区别有多大，还是看看孟尝君就知道了。号称门下门客最多的孟尝君，门下门客的最主要工作，就是给他经营封地。而在后来自己与齐王闹翻，不得已远走他国后，翻过手来对齐国反手一击，更是毫无负担。他门下那些门客们，昔日跟着他怎样保卫齐国，后来又跟着他怎样反攻齐国。

而比起这样的行为，信陵君却堪称一个真正意义的爱国者。以明朝人王世贞的评语，就是“信陵君之好士也，以有魏也”。也就是说，没有信陵君以及他所招揽的人才们，魏国的命运，恐怕早就搭上了。

王世贞能够给他这样高的评价，正是因为信陵君人生里最灿烂的一笔：窃符救赵。

差点给历史改道

说起“窃符救赵”这件事，后人感慨最多的，就是信陵君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而事实上，在这段壮烈时刻之前，他就已经为国家忧愁很久了。

作为魏安釐王最小的弟弟，信陵君在魏国的身份地位，也是十分的尊贵。通常类似他这样背景的人物，要么借助权势经营下自己的产业，要么争个权力夺个位，总之只要够自私，不是能活得风光，就是能过得滋润。

但信陵君，却偏偏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为魏国的家国大业，抛头颅洒热血。

作为一个极有责任感的人，信陵君年轻时代就立下了志向，要以自己毕生的热血与努力，阻止虎狼秦国东进的脚步。因此多年以来不遗余力招揽门客，正是为了此事。

早在长平之战爆发前，信陵君的努力，就曾收到恐怖的效果：他部署的门客眼线，让他轻易获得了长平大战前后秦国的许多重要情报，其得悉情报的速度，要比赵国前线主帅们快得多。战局的走向，基本了然于心。而对他这个能耐，了解得最清楚的人，莫过于他的兄长魏安釐王。有一次魏安釐王正与信陵君下棋，正好有急报说边境有警，赵王正带着大队人马杀来，当场把魏安釐王的脸给吓白，没想到信陵君却不慌不忙，告诉哥哥一定要淡定，赵王只是来打猎，绝没有入侵的意思，事实证明，他真对了。

为啥能对？因为信陵君的情报网，甚至已经部署到了赵王的深宫里，照着文言文里的说法，就是“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

他的神通广大程度，让兄长魏安釐王汗颜，也不止这一次，甚至连魏安釐王办不到的事情，他居然都能办到：魏安釐王宠爱的如姬父亲被害，魏安釐王下定决心，三年来捉拿凶手，却连个汗毛都没抓到，还是信陵君出手解决问题，短短几天，就给嫂子报了仇。

但信陵君之所以做这类事，却绝非为了个人的威权，因为他心中最为念念不忘的，就是强秦的威胁。

所谓怕什么来什么。对信陵君的这个觉悟，不但魏国当时理解的人少，就连兄长魏安釐王，也是十分的无感。这位得过且过的魏国国王，早已经没有了先祖曾经反复虐打秦国的霸气，相反怕秦国怕得要命，几乎到了秦国打个喷嚏，他都要紧张一天的地步。平日就知道奢靡享乐，遇到秦国挑衅，就忙不迭地割地换太平。

这样无能的哥哥，也终于把信陵君彻底逼成了一个反对派，多年以来，他在朝堂上经常和哥哥争论，尤其为了该对秦国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更是反复争吵。以信陵君的说法，秦国“非尽亡海内天下，必不休”，也就是秦国的狼子野心，绝不是魏国割让土地就能满足的，这个国家的真实目的，是吞并一切可吞并的土地。

信陵君不但看到了秦国的野心，更为魏国的未来计，勾画了一个最好的蓝图，那就是联合韩国和楚国以及赵国，直接组成一道抗击秦国的屏障，只要这四个国家互相呼应，就一定可以把秦国阻挡在函谷关内。如果这个战略构想成型的话，那么秦国就算最终统一六国，时间恐怕也要迟得多。

但是在当时这个大家集体被秦国吓破了胆的年月里，信陵君的这个勾画，其实也很难实现。就连他的兄长魏安釐王，也多次感慨信陵君不切实际。但在接下来的窃符救赵事件中，信陵君将以他独特的表现，回击这样的轻视。

窃符救赵，发生于公元前257年，当时的赵国，在经过了长平之战的惨败后，立刻被秦国乘胜追击，都城邯郸也被团团围住，这个战国曾经仅次于秦国的强国，此时已经到了生死一线间。而赵国唯一的救命机会，就变成了向老邻居魏国求援，从任何理由看，魏国都是必须援助赵国的，可是魏安釐王早已经被秦国吓破了胆，外加秦国的恐

吓也来了，放话谁要敢救赵国，那么秦国料理了赵国后，下一个修理对象就是他！

这狠话一放出去，整个关东六国都^屎了，比如著名的毛遂自荐典故，赵国平原君带领的使团，苦口婆心地游说楚国，尽管有毛遂横空出世一顿痛骂，说得楚考烈王派来了援兵，但是楚国这支援军，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在一旁观风景，直到最后局势逆转，才像模像样地杀了一把，十分指望不上。

这都指望不上，魏国自然更是难指望。魏安釐王拒绝发兵，可另一个人却勇敢站了出来：信陵君。

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信陵君起初在绝望之中，做出了最悲壮的抉择：先是集合了自己所有的门客，大张旗鼓地杀向赵国，决心哪怕没有兵，就凭着这些门客，也要和赵国军民一起赴死。关键时刻，却还是昔日信陵君曾经礼遇的侯嬴和朱亥拦住了他，在侯嬴的巧妙筹谋下，信陵君借助如姬帮助，偷来了魏安釐王用来调兵的虎符，然后在前线，又在魏军主帅晋鄙拒绝执行命令的情况下，由朱亥将其打杀，成功获得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

而后的信陵君，就展示出了他磨炼已久的军事才能，面对战国时期堪称最强大的秦国精锐军团，信陵君毫不犹豫，先以一场昂扬的战前动员，激发了全军高涨的士气，然后又以巧妙的指挥，成功从秦军最薄弱的环节突破，一下打开了秦军的防线。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中，一直战无不胜的秦军，再次难得地吃到了悲惨的败仗。窃符救赵的光辉一笔，成了秦军战史上十分惨痛的一段记忆。

然而信陵君随后也以自己出色的表现证明，他打败秦国，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力，就在十年以后，信陵君又再次率领五国联军大战秦国，硬是打出秦国自长平之战后最悲惨的一幕，吓得秦军败退进入函谷关，竟不敢出关一战。自从齐湣王时代三国联军攻打函谷关后，一

直被秦国欺压的关东六国，还没有这样扬眉吐气过。

信陵君，就这样成了秦国挥之不去的噩梦。

但立下大功的信陵君，心头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救了赵国，却辜负了自己的祖国魏国，特别是老将军晋鄙的死，更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在窃符救赵之后，赵王本来要封赏给信陵君五座城池，信陵君却只是一个劲地劝酒，到最后硬没给赵王开口的机会。他在赵国整整待了十年，直到秦国大举进攻魏国，他在门下几位门客的劝说下，终于捐弃前嫌，回到了故国，并带领联军大破秦军。

然而对于秦国一统天下的大业来说，信陵君回到魏国，却是一个比战场失败更大的危机。在经过了窃符救赵的壮举后，信陵君的威名已经传遍了列国。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有条件，放手去执行四国屏障计划。一旦这个计划实现，恐怕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都要大大延长。

但是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帮了秦国一把的，竟然还是信陵君的兄长魏安釐王，这位嫉贤妒能的国王，对于信陵君的猜忌也始终未停，特别是当信陵君归来后大破秦军，魏国暂时解围后，他更是立刻剥夺了信陵君的兵权。

聪明的信陵君，自然知道了兄长的意思，他也就顺坡下驴，一直沉迷于酒色享乐里，直到四年后英年早逝。他的过世，也就意味着秦国东出的另一个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

十六 最后一次合纵

信陵君的去世，对于志在一统天下的秦国来说，毫无疑问是个大好事！

按照一些人对战国历史的理解，自从信陵君死后，秦国就过上了一马平川的日子，从此肆虐中原各国，秋风扫落叶一般吞疆并土，终于将六国全数扫平！

但只要参考一下年头就知道，这时候距离秦国彻底一统天下，还有22年时间，在秦国进入加速度模式之前，它必须要煎熬过最后一个考验：合纵！

合纵这件事，算是秦国自从商鞅变法后，长期打交道的老对手了，阵仗经常很大，人拉得经常很多，队伍拉得经常很壮，也不是没有险过剃头的时候，连函谷关都被齐国合纵拿下过，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阵仗拉得威风，一大就露馅，碰上白起这样的秦国战神，还常是一打就出惨案，比中国足球还不靠谱！

这种状况，还是由合纵的难度决定，虽说秦国是大家的对手，但列强还是一人一家一个心眼，又都知道秦国打仗狠，为了眼前利益，基本是能不招惹就不招惹，实在要去合纵，那也基本是摆个样子，见风向不对立刻跑。那就真没有成功的合纵？不是不能成功，就是难度太大，必须得是有名望的人统帅，而且还要正确筹谋，带领大家走上胜利的道路。这样的人物好似旗帜，实在太过少见。公元前243年信陵君去世，等如一杆大旗也倒了。合纵这事，似乎更没人干了！

然而，就是在合纵的旗帜人物信陵君去世两年后，一场突如其来

的合纵风暴，却再度向秦国汹涌扑来，原本看似一团散沙的赵楚燕魏，竟然组成了强悍的联军，杀气腾腾地扑向秦国，而且绝不是大多数合纵里那种出工不出力的摆样子，相反各路联军十分团结，打起仗来配合得井井有条，士气更高涨得爆棚，冲锋陷阵都不用动员，长期百战百胜的秦军与之交上手，一不留神竟真吃了亏，眼看就是杀气腾腾，朝着咸阳就真扑过来了！合纵，这次是真的。

怎么这次就这么真了？因为在合纵的旗帜人物信陵君去世后，另一个看似名不见经传的赵国人却默默站了过来，扛起了合纵这面大旗，并亲手导演了这一场剧烈的合纵风暴，成为秦国在高歌东进之前，最为剧烈的一场生死考验。

这个人，就是赵国名将庞煖。

在风云际会的战国年代里，庞煖看上去是个标准的小人物，虽说他官做得不低，家族也很显赫，战功也不少，但是在史料里的记录，却是少得可怜，基本是个熟脸，却从来不是主角，好些个重大历史事件，都会出来说点话办点事，但是想被大书特书一笔，确实很难！

但事实证明，如果要给秦国的敌人列一个排行榜，那么这位庞煖，绝对有资格排进前几名，就凭他在公元前241年，给秦国带来的这次沉重一击！

当然在这以前，他就活跃很久了，虽然是像黑马一样杀出来，但是在战国的舞台上，这时候的他，是绝对的老资格。虽然身世和出生年月都没有明确记录，但是庞煖在战国历史上的出场，却是相当早。早到什么时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

确切说来，距离这最后一次合纵6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99年左右，那时的庞煖，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兵家，有名气到可以和赵武灵王来论兵，正是那一次和赵武灵王的论兵里，庞煖留下了一句名垂青史的经典名言：“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

也！”

只要稍微脑补一下中国战争史就知道，庞煖这句话，在后来两千年的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被引用的频率有多高。好多次的重大战争或者重大的谈判场合，甚至很多名臣的奏折里，都反复引用过这段话。能说出这段话的庞煖，理论上应该很红才对，起码在当时，能给赵武灵王说出这番话，还不是要飞黄腾达？事实是，真没有，因为和他说话的，是即将饿死在沙丘宫的赵武灵王。

随着赵国发生国变，一代雄主赵武灵王悲催饿死在沙丘宫，留下这闪光豪言的庞煖，命运也立刻发生转变。确切地说，是立刻就消失了。最普遍的说法，就是他跟着他的老师，一道出去隐居了。他的老师是谁？又是个很低调的名字：鹞冠子。

鹞冠子，其实是一个别号，并不是确切的人名，这又是一个战国时期的神秘牛人，可惜真实姓名已经不为人知。仅有可知的史料是，他常戴着羽毛装饰的帽子，因此也被称为鹞冠子。但别看他行动古怪又神秘，这个人却是有真本事，他是战国道家的重要学者，思想更格外别致，认定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必须要学习这样的变化，才能不断地进步。他和他的门徒们，还编订有文集《鹞冠子》，内中的文字笔力雄浑，堪称先秦散文的经典代表，如此文采思想荟萃的牛人，教出来的徒弟，自然也不会差，庞煖就是其中一个！

在赵国国变之后，以最普遍的看法，就是庞煖跟着鹞冠子离开了赵国，来到了鹞冠子的祖国楚国，师徒找了一座深山隐居起来，然后就一道做学问，度过了漫长的时光，这段时日里，师徒两人除了钻研学问，还写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不单有军事思想，更包括战国时代许多闪光的自然科学思想，历史价值十分重大！

这样的时光，几乎占去了他人生里的大半，直到四十多年后，以相关史料的对比说，那时的庞煖，已经近80岁了，但是赵国，却突然

又想起他来了！

其实所谓突然又想起来，只是个客气说法，真实说法应该是：赵国，不得不想起他来。因为这时赵国，已经到了人才严重凋零，军事压力大到家，国家命运惨到家的地步！

具体有多惨？除了我们熟悉的长平之战，败北到了惨，还有个最大损失就是人口，40万精壮人口一下全丧，可以说最厚实的老底都给赔了进去。屋漏偏逢连阴雨，西边的秦国不停地进攻，北边的燕国也不停地捣蛋，就看准了赵国好欺负，隔三岔五地就来大举进攻！如此焦头烂额下，新登基的赵悼襄王急得直抓狂，就是这时候，有人给他推荐了这位隐藏的牛人：庞煖！

这个时候，距离当年庞煖离开赵国，真的已经是时过境迁，而今活跃在战国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几乎都是庞煖孙子辈的人，可接到赵悼襄王邀请后，庞煖没有半分犹豫，依然兴冲冲地赶到了赵国，而且别看他80多岁了，脑袋却依然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很快就叫赵悼襄王折服。这位半生隐居的强人，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这人生第一步，就是遇到了一位半世纪前的老朋友：燕国大臣剧辛。

话说这剧辛，也是个强人一枚，年岁和庞煖差不了几岁，名号却比庞煖大得多。早年的时候，他也是赵国的大臣，和庞煖一起共事过，后来沙丘之乱，他同样离开了赵国，不过没有像庞煖一样选择隐居，而是果断地改换了门庭，来到了燕国。那时的燕国，正是燕昭王求贤若渴的年月，广招天下贤人。剧辛，这位法家的名流人物，很快就脱颖而出！

当时的燕国，正是人才汇集的时候，名流人物十分多，比如有令后世的诸葛亮十分仰慕的军事家乐毅，也有战国不世出的天才科学家邹衍，但即使在这帮人当中，剧辛也是非常出众的一位。只说两件

事，就能证明这人的能力有多强：一，燕国和齐国开打前，正是剧辛走遍列国，一顿巧舌如簧的游说，才令诸多国家结成联盟，对齐国形成了包围态势！二，在乐毅一口气横扫齐国七十多城池的时候，突然大喊不要打的，依然还是剧辛，他义正词严地教育乐毅，齐国不是这么容易灭的，燕国最佳的选择，就是逼迫齐国服软，先交割部分城池，把现有的利益稳固住，参考这条说法，如果当时燕国真听了，最后田单火牛阵翻盘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低的。

因为这强大的能力，到了庞煖重新出山的时候，剧辛已经是燕国内重量级的人物，而这位强人，也迅速给燕国物色到下一个战略目标：攻打赵国！

燕国打赵国，这事也是有年头了，一直就想着趁赵国元气大伤的机会捞一票，上一次大张旗鼓出兵，结果被廉颇痛打，这时候听说赵国请来了庞煖，当时的燕王喜，也就动了心思，而剧辛更十分兴奋，他和庞煖早就认识，但就因为认识，他反而认为庞煖好对付，因此请战十分积极，果然被燕王任命为统帅，浩浩荡荡地杀奔赵国！

这场老朋友之间的对话，是80多岁的庞煖，第一次独立带兵，但出手就是大动作，打了一辈子仗的剧辛，碰上了修炼半辈子的庞煖，居然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结果一场交手，剧辛率领的燕军全军覆没，列国更是震惊一下了：赵国，怎么又多了这么一匹老黑马！

凭着迅速上涨的巨大影响力，庞煖趁热打铁，真的继续了合纵事业，而且与其说是他的威望影响，不如说这个时候，列国都感受到，这正是找秦国算账的大好机会。此时的秦国，刚好是一代枭雄吕不韦专权，当时的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正在做毛孩子的时候，好似一只魔兽正在打盹儿，正是痛打一场的时候。

大好机会加庞煖的名号，列国之间难得出现了一拍即合的景象，浩浩荡荡的联军很快组织起来了，除了刚被揍的燕国和已经胆小怕事

的昔日强国齐国没有参加，这次联军汇集了韩、赵、魏、楚四个大国，庞煖更是被任命为统帅，出手就是电光石火，一战就先拿下了秦国边境门户寿陵。正当秦国急忙部署防御的时候，叫秦国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庞煖根本没有像秦国人预料的那样，继续正面挺进函谷关，相反来了个大迂回妙笔，直接绕道山西永济，打算从背面袭击函谷关！

这个思路，体现了庞煖高超的战略思维，联军以战斗力论，比秦国还差得远，函谷关又是易守难攻的地方，也只有这个办法，才可以真正找到攻克函谷关的机会。这个办法确实也把秦国惊到了，但遗憾的是，秦国这个时候也是有能人的：吕不韦！

身为一代枭雄，吕不韦的才能自然强，这次的合纵风暴，他更亲自上来抵挡，亲自率军在陕西临潼北和庞煖相遇，这个时候从战局说，吕不韦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状况：秦军地利优势不明显，兵力更是有限，而且一旦有失，咸阳必然不保。

可是吕不韦，毕竟是吕不韦，面对这天才战略，他一个办法就破解：不和庞煖正面交锋，就抓住兵力最多的楚国军队下手，因为楚国军队看着多，其实是路途最远赶来，这个时候也最累，果然一场奇袭，楚国立刻崩溃，只这一下，就把合纵的大毛病打了出来：各国联军纷纷主张撤退，无奈之下，独木难支的庞煖只能咬牙点头，恨恨离开。战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合纵，就这样无奈地收场！

庞煖后来的遭际，已经不见于正式的史料，传说倒是留下了一箩筐。他的几个经典名篇，同样收入了《汉书》里，为历代军事家所推崇，可是战国此时的大势已经明了，天才的战略，也无法扭转！

十七 最后一个公子也走了

在庞煖合纵失败后，是不是六国里面，就真的没有哪个名流，可以威胁到秦国了？

理论上说，还是有一个的。

这个人，在庞煖的合纵事业上，就起了关键作用，列国能够再次聚起来，表面看是靠庞煖的战功，其实却是他的感召。而以知名度论，他和去世的信陵君，也是公认同等重量级，放在今天的好些古装剧里，更是标准的熟脸：不但能威胁到秦国，还能和秦国的太后，上演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这个正史野史都出名重量级的人物，就是战国四公子，至最后一次合纵时仅剩的一位：楚国的春申君黄歇。

从某种程度上说，春申君黄歇的“公子”称号，应该是最名不副实的，这倒不是说他能力不够，关键是身份不够。想要被称为公子，放在那个年代里，不是有钱有权就可以的，拼的更不是谁家的门客数量多，关键就是一条：生得好。必须得具有王室的血统，也能有公子的身份，就是这条，春申君黄歇不太够格！

看看其他三位就知道，孟尝君是齐国的王室，平原君是赵国的王室，信陵君是魏国的王室，唯独这春申君特殊，属于典型的庶民身份起家的。照着元朝人许衡的赞叹说：“战国之四君，其可称者，唯一春申耳。”也就是说春申君，是凭着真才实学获得这个地位的，至于其他三位？基本是拼爹！

虽然许衡这个说法，对其他三位不太公平，距离事实也比较夸大，但其中不夸大的，就是春申君的能力。可以说，他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楚国开始悲惨的时候，连旧日的国都都被秦国端了，昔日雄视天下的霸主地位，也遭到了极大的打击，而春申君能在这个年代脱颖而出，靠的就是过人的才干！

他首先崭露头角的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73年。当时的情况是，楚国已经狼狈迁了都，在河南淮阳重建了政府，但秦国却还不罢休，仍然不断用兵，非要生吞了楚国不可，也知道楚国太大，它一个国家吞不动，干脆又拉上了韩国和魏国，大家一起动手瓜分！

这时候的楚国，精锐军队几乎赔光，哪里还有力量来抵抗，楚顷襄王急得跳脚，这个时候的春申君，恰恰开始以口才闻名，于是担当了使命，慷慨来到秦国，执行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服秦昭王改主意。这就好比给一个面对肥肉流口水的猛兽，说你别吃肉改吃素。这看上去根本不可能。

可就这个艰难的任务，春申君只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竟然就完美做到了。

他给秦昭王上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毫无低声下气求和的意思，反而就是摆开了讲：你秦国实力强不假，可我楚国也差不了太多，咱俩就好比两只老虎在互掐，不管谁输了，赢的一方也是惨胜，利益最大的是谁？看热闹的，也就是你拉来的韩国和魏国！

这个话抓得很犀利，但能不能让秦昭王听进去，春申君轻松就抓住一个论据：你还记得当年吴越争霸的事情吧，当年的吴王夫差多牛，眼看就要把齐国灭了，结果呢，齐国没灭掉，却被越王勾践抄后路，您一个劲地想灭齐国，是不是也是想要韩国和魏国抄您的后路？

这话说出来，才叫秦昭王惊出一身汗，可秦昭王可不是吓唬大的，秦国的实力有多强他更知道，韩国和魏国抄秦国的后路？以这两

个国家当时的实力说，这个玩笑有些大！

但这一条，春申君也早就想到了，对付这如狼似虎的秦昭王，吓唬可是震惊他，但不可能彻底说服他，不过一番吓唬，预热已经做好了，接下来就该关键的了，春申君热情洋溢地说，您只要不打我们楚国了，管保你有好处——楚国和您修好了，就可以帮您逼韩国，韩国必然会臣服，魏国也会跟着，它俩臣服了，那么齐国赵国也要跟风，这样北方就都是你的了！

这话一说，才真是一个清醒剂，就算是春申君没这么好心，但这段时局分析，却是相当到位，秦国真想要一统天下，最先不该翻脸的，恰恰是楚国，必须要循序渐进才行，于是一场眼看要降临在楚国军民头上的灭顶之灾，就这样被春申君巧妙地化为无形！

这场精彩表现后，春申君果然在楚国火了。如果说这件事，是他给楚国国家立的大功劳，那么几年后另一个大事，功劳更是后来居上：营救被软禁在秦国的楚国太子！

当时的楚顷襄王，生命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但是最大的难题还没解决：太子在哪儿？太子一直被当作人质扣押在咸阳，想要政权平稳过渡，就先要把人要回来！

这个困难度，严格说比叫秦昭王撤军还大，没得到的楚国土地，是秦昭王眼前的肉，狠狠心还可以吐出来，但是此时身在咸阳的楚国太子熊完，却是秦昭王已经吞到嘴里的肉，哪里有这么容易吐？可是春申君还是有办法！

他先找到秦国此时位高权重的丞相范雎，为什么找他？因为他很明白范雎的国策，此君一向坚持的就是远交近攻策略，对眼前能拿利益的，拼了命地打，对有长远利益的，更是先拉住，楚国此时的情况就是后一类，以范雎的观点，这时候的秦国，恰恰应该和楚国保持好关系，才能真正执行一统天下的战略！

而在见到范雎后，春申君更用一个办法，就叫范雎真的拍案而起，过去游说秦王放人：我们楚国可不止太子一个人，现在楚王病重，您不放也就罢了，留着太子在这里吃喝玩乐，我们在国内再找一个太子不就完啦？但到那个时候，我们以前答应给秦国的的好处，那就不管用喽！

这个意思表达到位，范雎果然急了，当场连和楚国太子肝胆相照这类狠话都说出来，更是立刻行动，谁知这一次，铁了心的秦昭王，连范雎的面子也都不给了：想回家看看是吧，楚国国情有变法是吧，派人回去看看不就得了，楚国太子着什么急啊，在咸阳老实待着哪里也不许去，横竖就是不放人！

没想到春申君的决心更坚定，你不放？就算是骗，也要把楚国太子骗出去，真用了自己的法子，他留下来打掩护，楚国太子悄悄化装后逃走，真的顺利回到了楚国，而春申君这边就惨了，差点就被秦昭王给杀了，还是他侃侃而谈，一身正气看得秦国官员们十分惊讶！更叫秦昭王也刮目相看，范雎又趁机灌迷魂汤：现在这个楚国王子，不管有多少问题，怎么说还都是亲秦国的，如果真把楚国人逼急了，捧一个反秦国的人出来当国王，您真是哭都没地方哭去！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秦昭王，也是火气消了大半，真就不再追究了，反而彬彬有礼地把春申君送了回来。这下春申君更是人气火爆，声望节节攀高，更得到太子的诚心感恩。随着楚顷襄王过世，太子登上王位，是为楚考烈王，春申君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了楚国的令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获得了春申君的爵位！

这时的春申君，终于开始声名鹊起，成了和当时赵国平原君以及魏国信陵君比肩的人物，做派也是基本类似，都喜欢养门客。门下养了三千门客，但是论门客的技术含量的话，春申君这里非但不差，相反知识水平绝对重量级，最典型的的就是大思想家荀子，他不但投入到春申君的门下，一度还担任过兰陵令，十分受器重！

如此办事风格，加上位高权重后，门下各种人士纷至沓来，一个只属于他的强大团队，这时候终于建立起来了。而楚国也在春申君的治理下，虽然国土面积比强盛时代要小得多，但是军事实力和经济民生，都是高速复苏，最直观的一个后果是：著名的窃符救赵事件，还有一个左右胜负的大事，就是楚考列王派遣春申君在武关观望，最后胜利时也加入到了战团。春申君时代的楚国，国力之强盛，从中也可以看到！

而到了春申君这里，更是满满亮点。他亲手整顿的军队，战斗力脱胎换骨，几次战斗都打了胜仗，特别是公元前255年，正是春申君带兵，将北方著名的国家鲁国打得名存实亡，公元前241年，庞煖那场打到秦国家门口的壮烈战役，真正撑场面的还是春申君，正是春申君的严格管理，才叫列强团结到庞煖的身边来，给了秦国历史上一次少有的痛击！

但是，当这次合纵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时，春申君的败招，也就接二连三地开始了。先是回国之后，慌不迭地就给楚考列王做动员，大王您别生气，咱还得迁都，结果又把楚国的都城搬到了寿春，这次迁都一顿折腾，更叫列强看了笑话！

但最为悲催的，却是春申君做的另一个荒唐事：给楚考列王培养下一代。

培养下一代是好事，为什么说荒唐？那时的楚考列王，虽然对春申君信任有加，但是生命已经走到了尾声，偏偏膝下又没孩子，那该怎么办？有个投机小人李园跳出来了，先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春申君，果然把春申君迷住了，然后又给春申君吹枕边风，我现在有了您的骨肉，您不如把我献给大王，这样您的儿子以后就是楚国的国王，那不更权势滔天？

要说这主意够雷，可春申君信这个，他一直以来的风格，就是最

简单方法解决最难问题，真以为这是个好法子，果然这么做了：李园的妹妹果然被献出去，又如愿生下了男孩儿。在春申君眼里，自己真是一步到位，随着楚考列王病入膏肓，他开始憧憬以后的生活。

可是他的门客朱英，却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苦苦地劝说他，但是人有了权上了年岁，脑子就是晕，从前那个睿智精明的春申君不见了，此时只有个一意孤行的春申君。结果，楚考列王过世后，春申君就上了当。公元前338年，春申君在入朝的路上，被李园埋伏的杀手杀掉，满门受诛。这位战国四公子里的最后一位，就此谢幕！

而他的死，更是楚国命运的注脚：楚国最后一次可以崛起，与秦国分庭抗礼的机会，随着春申君的死，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之前的楚国，还可以做个绊脚石，与秦国讲条件，但现在，条件都没得讲了！

十八 韩赵魏的衰落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旧势力的瓦解，这里的旧势力，不仅包括奴隶主贵族阶层，更包括春秋时代，那些盛极一时的诸侯国们。

春秋时代的争霸，虽然霸主有五个，但真正作为主线的，是晋国和楚国的南北争霸。对于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势力秩序来说，晋国和楚国，就是这个秩序一南一北的天平两端。战国时代的统一过程，首先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瓦解和衰落的过程。

相比之下，晋国的瓦解更快，在战国的早期，就通过三家分晋的方式完成了韩赵魏三国的划分。这以后，这三个国家中的魏国和赵国，都曾在中原诸侯争霸中盛极一时。魏国是战国时代第一个通过变法图强强大起来的国家，而赵国的胡服骑射政策，使它一度成为整个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军事强国。其中最弱的韩国，也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这三个国家的衰落，最终都无可避免，其中的方式不同，结果却殊途同归——被秦国灭掉。

宋朝文学家苏洵在他的《六国论》里，对韩赵魏三个国家的衰亡痛心疾首，他认为这三个国家的存在和强大，就是阻止秦国吞并六国的关键所在，只要崤山以东的中原诸国，能够集中力量援救韩赵魏三国，让它们团结一致抵抗秦国，那么六国就会免于被灭亡的命运。苏辙说得容易，这个过程实施起来又何其难？且不说此时的六国，在无力对抗秦国的局面下，想得更多的是自保，即使是三个国家自身，最后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里，韩赵魏三国是遭受兵灾最多的国家，

从早期鄙视秦国，到后来被秦国打，再到最后被秦国打怕。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它们衰落的过程。

欺负至死的韩国

三国中最弱小的，是韩国。从始至终，它几乎都没有强大过。

韩国的疆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在早期瓜分晋国后的“分账”里，它就是实力最弱小的一家，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和赵魏两个国家相比。

三家瓜分晋国后，早期的韩国一度牛气了一把。公元前375年，当时的韩哀侯灭掉了郑国，将国都迁移到了郑（今河南省新郑市）。和早期的魏国、赵国一样，战国初期的韩国也进行了变法，不过比起其他诸国采纳了法家思想，韩国的变法却特殊。

韩国的变法，起于韩昭侯在位时期，他起用了申不害为相，开始了“修术行道”的变法过程。申不害的变法思想，虽然也有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君威权等积极内容，但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黄老学说，而且注重“术”，即国君需要用各种方式来统御群臣，强化权威，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

这样的改革比起魏国、齐国、秦国来，可以说是相当不彻底。申不害在韩国折腾了15年，虽然韩国一度振作，但他并没有建立一个封建化的国家制度，所以即使在变法推行最成功的时期，韩国也不是强国，反而在韩昭侯去世后，韩国陷入内乱，变法就此失败。但是，申不害的改革也是有效果的，也正是这15年的改革，使韩国也确立了其战国七雄的大国地位。当然，是最弱的一个“大国”。

韩国的发展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国家旧贵族力量强大，改革不

彻底；二是韩国所在的地区，处于魏国、秦国、齐国等国家的夹缝之间，生存环境非常艰难；三是韩国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诸如齐威王、秦孝公、魏文侯这样的强势君主，如此韩国，从建国开始，就注定它在战国历史上的弱者地位。

其实韩国也有比较好的条件，比如韩国的弩，是整个战国诸侯中射程最远的，秦国攻打韩国时，还专门搜集韩国的弩——拿回去自己研究着用。韩国在经过了短暂的鼎盛时期后，很快就陷入了衰弱，尤其是魏国和秦国相继崛起后，韩国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魏文侯称霸时，对韩国、赵国采取通好政策，成为韩国的保护国，但到了魏惠王在位时，打击的重要对象就是韩国。

魏惠王希望能得到韩国的国土，作为防备秦国东进的缓冲地带。但这时期同样强大的齐国，通过“攻其必救”的战术，在马陵重创魏国，总算救了韩国一命。在这一场战争开打前，为了尽可能地削弱魏国，齐国故意迟迟不救韩国，一直等到韩国打得弹尽粮绝了，并表态向自己效忠，这才大张旗鼓地出兵。魏国被打败了，但韩国也基本被打残了。

但韩国的苦日子，这时期才刚刚开始，因为西边的秦国也崛起了。秦孝公在位的时候，一面对魏国发动战争，收复西河失地，一面也大力攻打韩国。公元前359年，刚刚走上变法之路的秦国，在攻打魏国失利后，转而拿韩国开练，多次击败韩国。这时候在位的韩国国君，是韩共侯，他是个够硬的人，打不过秦国，就联合赵国、魏国等兄弟国家一起上。可倒霉的是，这时期魏国自己能对秦国保持军事优势，可每次和韩国联军，都被秦国打得大败亏输。

比如公元前366年，当时还没有变法的秦国，就在洛阳击败了韩国、魏国的联军，不久后魏国单独和秦国打，又把秦国打得狼狈逃窜。随着秦国变法力量的增强，魏国也保护不了韩国了，韩国就越发遭到秦国的欺凌，韩昭侯在位的晚期，正是信用申不害改革的时期，

他果断地参加了“合纵”阵营，意图联合中原诸侯共同对付秦国，但第一次就抬腿碰了满脚泥。

公元前318年，韩国参加了魏国、楚国、赵国、燕国组成的五国联军，企图攻打函谷关，但接着就被打了个稀里哗啦。韩国历史上对秦国的唯一胜利，是在公元前294年，韩国参加了齐国的伐秦联军，经过三年苦战，攻克了函谷关，迫使秦昭襄王归还了侵占韩国的国土，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齐国遭到五路讨伐，势力一蹶不振。秦国不但夺回了归还韩国的领土，还捎带着又占领了一大片。在战国时代开始以后，韩国是受秦国欺凌最多的国家，打打不过，躲躲不起。合纵没用，反抗没用，咋办？

经过了多次失败以后，韩国干脆想开了，不就是丧权辱国嘛，要丧也不是我一个人丧。在公元前275年，韩国被秦国白起大败，遭斩首四万人后，韩国也就彻底歇菜了，对秦国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政策。

秦国要打仗，还没打就立刻求和，秦国要钱要地，二话不说统统给，尤其是韩国倒数第二代国王韩桓惠王在位的36年，是对秦国最逆来顺受的36年。这期间秦国多次发兵攻打韩国，韩国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了。

特别是公元前262年，秦国攻打韩国的重镇上党，韩桓惠王不敢抵抗，竟然要求上党守军向秦国投降，之后，就有了韩国上党郡守冯亭向赵国投降，引爆了后来长平之战的导火线。在整场战斗里，韩国根本不敢插手，眼睁睁地看着赵国和秦国浴血厮杀，只图一时平安。

韩桓惠王在位的时代，也曾有过想法，他在位时期曾经重新推广申不害的改革，但是效果甚微。韩国国内此时已经处于国土严重萎缩，政令不通的局面下了。他干的另一件傻事，就是在公元前244年派工匠郑国进入秦国，假装忽悠秦国修郑国渠，企图想让秦国把庞大的军事力量都消耗在水利工程上。

但事与愿违，郑国渠的落成，让秦国从此收获了百年之利，灌溉了万亩良田，军事作战能力也大大增强。如此做法，只能是给秦国作嫁衣裳。这位一生有过想法却毫无建树的国君，却有一个杰出的好儿子，战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子。

公元前238年韩桓惠王去世后，即位的韩王安继续推行“割肉喂虎”的政策。每次秦国稍微有风吹草动，就忙不迭地割地，割了十几年，最后到了无地可割的地步。公元前231年，秦王嬴政派内史腾率领10万大军南渡黄河，灭亡了韩国，将韩国的国土划为秦国治下的颍川郡。战国七雄里最弱的韩国，就成了其中第一个亡国的。

铁血的赵国

三晋大地，对秦国抵抗最为剧烈的，就是赵国。

长平之战后，赵国40万精锐报销，在当时的秦国人眼里，这是最好的灭亡赵国的机会。公元前260年，挟长平之战的余威，秦国起初向赵国提出割地的苛刻条件。山穷水尽的赵国依然硬气，赵孝成王经过和群臣商议后，决定拒绝秦国的无理要求，宁可国人全都战死，也不能接受秦国的强盗条件。此事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大怒，决定乘胜追击，彻底灭亡赵国。

这个决定在当时却引起了反对，带头反对的，就是长平之战的总指挥白起。白起深知长平之战秦国只是惨胜，一场长平血战，秦国的精锐部队死伤过半，国家粮食储备消耗殆尽，如此局面，实在不是打仗的时候。结果反而触怒了秦昭襄王，像白起这种战功卓著的地位，本身就是危险的，后来白起被秦昭襄王杀掉，等于秦国自毁长城。

公元前259年6月，秦国动用50万大军，发动了旨在灭亡赵国的邯郸战役，赵国一反常态，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全国军民同仇敌

忤，采取依托城池防守、坚壁清野的方式，将秦国大军死死地拖在赵国的邯郸城下。为了这场战斗，赵国拼了血本，他们拒绝了秦国的割地要求，反而割让给齐国6个城池，请求齐国提供粮食，做好了粮食的储备，然后放弃了野战，和秦国打起了城池攻防战，兵力不足，就男女老少齐上阵，非要秦国血债血还不可。骄横的秦军再次在赵国身上尝到了苦头，廉颇再次发挥了他善于打城池防御战的优势，率领40万军民决死抵抗。曾经偷税漏税的赵国平原君，散尽家中的财产和粮食分给军民，把自己的妻妾也编入了军队中，和秦国人决死一拼。惨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年，秦军伤亡过半，却仍然不能冲进邯郸城，而这时候的赵国，也打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却还在苦苦支撑。

在这关键时刻，魏国公子信陵君上演了一场窃符救赵的故事，偷来了魏国调兵的虎符，调动了8万大军增援赵国，而平原君率领的使团，也从楚国处搬来了援军。在魏国、楚国援军的夹击下，师老兵疲的秦国终于崩溃了。赵国，凭借其坚韧的意志，顽强地抗争，在长平之战的绝境悬崖下，总算爬了上来。

长平和邯郸之战，是对赵国的极大削弱，赵国丧失掉了大量的人口和精锐部队，国力一落千丈。公元前251年，连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的燕国都趁火打劫。当时燕国的丞相栗腹出使赵国，借机察看赵国虚实，他认为赵国的壮丁，大多已经损失在了长平之战以及之后的邯郸之战中了，现在赵国剩下的大多都是孤儿寡妇，青壮年极少。如此局面，正是灭亡赵国的大好机会，不自量力的燕王动心了。公元前250年，燕国发动了对赵国的侵略战争，谁想一开战就败了个惨，赵将廉颇和乐胜两路出击，杀得燕军尸横遍野，最后竟然一路杀到了燕国境内，差点把燕国灭了国。之后的八年，赵国三次和燕国爆发战争，先后迫使燕国割让了十多座城池，在公元前243年的赵燕之战中，年轻的骑兵将领李牧脱颖而出。赵国在对燕国的战争里，既重新锻炼了军队，焕发了士气，又堤内损失堤外补，得到了燕国大量的人口和重镇，实力开始有所恢复。

赵孝成王过世后，赵悼襄王即位，他在位的早期，赵国的军事实力有所恢复，特别以李牧为代表的年轻将领开始成长起来。公元前244年，也就是赵悼襄王登基后的第一年，李牧就给了他一个开门红，战胜匈奴！

战国时代，不仅仅是中原诸侯纷乱争霸的英雄史，也是中国北地百姓饱受匈奴人肆虐的血泪史。列国的诸侯在中原战场上打得正欢，匈奴的骑手却在中国北方千里边塞上如入无人之境。伟岸的长城在草原骄子们的眼中不过是一堆粗笨的摆设，庄严的战车步兵方阵在胡人骑手的马刀下化成送肉上俎的砧板，与匈奴人的搏斗仿佛是与自己影子之间无望的追逐，成为一代又一代华夏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还好赵国拥有了李牧。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正处于童年成长时代的汉家骑兵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灌溉着战胜游牧骑兵的胜利之花。直到公元前244年，一个叫李牧的赵国将军亲手在雁门关外摘下那灿烂如血的果实。在这之前，他是赵国支撑国家安危的柱石；在这之前，他的赵国骑兵队是如日中天的秦国也惧怕三分的王者之师；在这之后，东西线到北线，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救火队员一样，奔波在赵国边境每一寸战火燃烧的土地上。北上雁门，是这位一生未尝一败的将军军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场挑战，他将面对一个中原骑兵从未曾战胜过的强敌。绵延数十年的北地烽火与杀戮，注定将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凝血的终点。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原骑兵并不具备与马背民族在大草原上争锋的实力，主动出击的结果势必是一场羊入虎口的自杀式攻击。李牧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沉默与忍耐，匈奴肆虐侵扰的时候他在忍，举国攻击他胆小怯懦的时候他也在忍，将士们满怀激昂地求战的时候他依然在忍，“不抵抗将军”的耻辱仿佛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一度压在他坚如钢铁的脊梁上。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李牧正是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漫长的忍耐不是怯懦的退缩，却是沉默中爆发的固有前奏。

反击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公元前244年的春天，大举南下的匈奴人第一次尝到了汉家刀锋掠过脖颈的痛苦滋味。诱敌深入，疲敌劳顿，重兵合围，在沉默中忍耐太久的李牧像计算精密的电脑程序一般完成了这孙子兵法的三部曲。步兵集团居中阻击，战车弩兵集团的远程射杀，骑兵军团两翼合围，训练有素的赵军仿佛是一架运转严整的机器，在转瞬间扼住10万匈奴骑兵命运的咽喉。两路包抄的1.3万名赵军骑手仿佛两把在青石上磨砺了太久的锋利砍刀，轻松地撕开匈奴人看似不可战胜的骑兵军阵。骄横的匈奴单于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鱼肉的痛苦滋味，一整天的会战很快演变成一场绝望的追歼屠杀。10万匈奴骑兵全军覆没，匈奴单于仅带了十几名随从仓皇逃窜。“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贾谊笔下统一的秦王朝倾国之力谋取的惨胜，在李牧的手中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神奇方式实现了。

此战的胜利，暂时解除了匈奴对赵国北方领土的威胁。而这位赵悼襄王，也是赵国末期最后一位大有为的君主。他锐意振奋，整顿武备，联合诸国对抗强秦，企图重振赵国的声威。之后的九年里，赵国向北打败燕国，削夺燕国的国土用以补充。在公元前238年，赵悼襄王还曾大败了秦国蒙骜10万人的进犯，之后，在大臣姚贾的运作下，成功说服了齐国、楚国、燕国三国，四国结成了抗击秦国的同盟。东方诸国迎来了长平之战后最好的联合抗秦局面，但此时天不佑赵，赵悼襄王在公元前234年去世，可谓壮志未酬。这位颇有作为的帝王，一生也做了几件错事。他宠信奸诈小人郭开，更在郭开的谗言下，废除了原太子，立不肖儿子赵迁做继承人，又赶走了功勋卓著的老将廉颇。这一切，都为后来赵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赵悼襄王过世后，赵王迁即位，这就是在位八年的赵幽缪王。他在位的时期，真正把顽强的赵国推向了灭亡的深渊。在他即位的头两年，秦国数次发动进攻，这时候因为郭开专权，杀害了促成齐、楚、燕、赵四国联合的能臣姚贾，联合抗秦的局面已不在。孤军作战的赵国被打得大溃，丧失大量人口土地，到了第三年，无奈的赵幽缪王把

李牧从北方边境调了回来，李牧果然争气，在肥之战中再次重创秦国军队。这场发生在公元前232年的大战，也是赵国给秦国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肥之战中立下战功的李牧，在战后却落得了“自毁长城”的悲剧。从中挑唆的，还是那个小人郭开。郭开受了秦国的贿赂，向赵幽缪王诬陷李牧造反，赵幽缪王果然上当。公元前229年，李牧被赵幽缪王杀害，仅仅三个月之后，秦国就势如破竹进入邯郸，赵幽缪王被俘，赵国宗室赵嘉逃到代地继续立国。公元前222年，赵嘉在山穷水尽之下降秦，三晋大地抵抗最剧烈的赵国，就这样灭亡了。

割地割亡的魏国

在三晋国家中，最先崛起的是魏国，战国早期最早进行变法的也是魏国，曾经欺负秦国欺负得最狠的，还是魏国。

在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之战中，魏国彻底失去了他强国的地位。公元前318年，晚年屡遭挫折的魏惠王过世，结束了他荣辱交织的一生。但魏国在中原的重要地位，却因为另一项运动而凸显出来：合纵。

在公孙衍发起的合纵运动中，继魏惠王登基的魏襄王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公元前318年，魏襄王任用公孙衍为相，使魏国成为“合纵”运动的发起国。魏襄王这个人还是很有志气的，意图重新恢复魏国的霸业。这时候的魏国，国家实力大为折损，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但魏襄王却采取了连年动兵的政策。在他登基的第一年，就参加合纵联军攻打秦国，结果反而被秦国重创。此人的立场也不坚定，受挫后立刻倒向了秦国一边，第二年干脆又作为秦国的小弟，对齐国发起了进攻，结果又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时的魏国，单独的国家力量根本无法和齐、秦两大国的任何一个抗衡，魏襄王的锐意进取，其实

是加速了魏国的衰败。

魏襄王在数次出兵碰壁之后，最后还是明确了立场。从公元前311年开始，他正式倒向了秦国，之后终其一生，魏国基本对秦国死心塌地。但与此同时，魏国又借着帮助秦国征讨其他国家的机会，开始对秦国讨价还价，在魏襄王的晚年，迫于齐国的威胁，当时的秦惠王为了拉住魏国，同意归还了侵占魏国的部分领土。魏国在遭到秦国数年的打击后，总算得到了一次外交上的胜利。

魏襄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魏昭王在位的19年，是魏国国力逐渐衰弱的一段时期。早期的魏昭王，改变了魏襄王联合秦国的国策，倒向了齐国。他即位的第二年，就主动发起了对秦国的战争，结果再次被击败。公元前293年，魏昭王遭受到了战国历史上仅次于长平之战的一场惨案，他和韩国联合进攻秦国，被秦将白起打得大败，一战被斩首了24万人，韩、魏两国的家底，几乎被白起一战杀光了。三年以后，魏昭王破天荒地做出决定，主动向秦国割地求和，换取暂时的安定。魏国，也就成了战国七雄中第一个通过割地向秦国请求和平的国家，这个坏头一开，后面就是各路诸侯有样学样了。

魏国的割地，不但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换来了秦国更惨烈的打击。就在魏国割地后的第二年，秦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一口气夺取了魏国61座城池。从此以后，魏国就再也不是一个大国了，其版图在魏昭王时期，几乎缩水了一多半。当然，魏昭王在位期间也不是没有“风光过”，他曾经参加讨伐齐国的联军，在济水击败齐湣王，但这一战的结果是，秦国扫除了他们东进中原的一大对手，对魏国未来的命运，可谓雪上加霜。

魏昭王去世之后，魏国更无法和秦国叫板，参加合纵的胆子也没有了。魏昭王身后的魏安釐王、魏景闵王，都把对秦国“土地换和平”当作基本的国策，和韩国一样，基本属于逆来顺受了。唯一牛气一把的事情，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但这件事情上，魏国国君早被秦

国吓破了胆子，不但不敢救援长平之战后依然血战抗秦的赵国，更在事后迁怒于信陵君。之后的几代君王们，就在一次次土地换和平中国土日益缩小。一直到公元前225年，魏国被秦国彻底灭亡。综观整个过程，或许苏洵的那句话最能概括：“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十九 就这样一统天下

春秋、战国漫长分裂的局面，终结于秦始皇平灭六国。平灭六国的起点，来自于秦孝公改革后的东出争雄。秦国从秦孝公开始，经过了秦惠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一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正式亲政。

这整整123年，是秦王朝吞疆并土的123年。秦惠王时代，秦国彻底收复了西河，打通了东进的道路，向南占领了巴蜀，拥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占领了楚国的关中地区，削弱了楚国的实力。

秦国形成了对六国诸侯的独大局面，打垮了原本是秦国东出劲敌的魏国，压制住了同样有吞并中原之心的楚国，占领了统一天下的制高点。之后的秦昭王时代，是另一个重要时代。这时代的秦国，相继解决了两个争天下的主要对手：齐国和赵国。对一度和秦国并称为最强国家的齐国，秦国以合纵之道还合纵之身，组织五国联军杀入齐国，使遭到重创的齐国再也无力和秦国争锋。之后秦国以必胜的决心，发动了对赵国的进攻，以动用全国青壮年男子参战的方法，在长平消灭了赵国40万精锐军队，一度是天下老二的赵国，从此彻底失去了和秦国叫板的本钱。

在这期间里，秦国一共八次击败中原诸侯组成的反秦联盟，累计消灭六国军队150万人。在当时全中国人口不过2000万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天文数字，它意味着中原六国的青壮年，在秦国的历次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损失。与此同时，秦国还占有了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五分之三的财富，这时候秦国的控制区域，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区。

公元前238年登基的秦王嬴政，仿佛是一个在球门前捕捉到战机的射手，他的前代君王们经过一轮轮配合，将皮球很顺利地送到了他的脚下，等待他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脚——统一天下。

说了不算的嬴政

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嬴政来说，要做到统一天下很不容易。因为这时候的他，说了不算。作为后来君临天下的秦始皇，这时期登基的嬴政，年龄只有13岁，国家大权掌握在太后以及相国吕不韦手中，尤其是把持朝政的吕不韦，是这时期秦国真正掌权的大人物。

吕不韦和秦王嬴政的关系，各类小说以及戏说的电视剧里总是津津乐道。许多影视作品都说，吕不韦其实是秦王嬴政的亲生父亲，这个说法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证明，但可以证明的是，对待少年登基的嬴政，吕不韦的表现比爹还亲。

吕不韦的发迹，起于秦庄襄王回国即位后。因为他对秦庄襄王有恩，所以被立为相国。秦庄襄王本人不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君主，这时期的秦国大政，都是由吕不韦来掌握，国家大事的处理都是由他做最后决定。秦庄襄王在位三年里，吕不韦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于公元前256年灭掉了东周，这等于是宣告了秦国继周天子之后的正统地位。之后他又在山西北部设立太原郡，重新攻占了当年导致长平浴血的上党郡。秦国全面进攻中原诸国的战略态势已经全面完成了。秦庄襄王仅在位三年就去世了，吕不韦以相国身份把持大权，这时期的他独揽大权，甚至国家大事的奏折都拿回到自己家里去批阅，根本不给嬴政处理政事的机会。与此同时，他又和嬴政的母亲——太后私通（两人本来就是夫妻，当年吕不韦为了巴结公子异人，将老婆送给了他，然后生下了嬴政）。他自己也非常贪婪，在洛阳等地设立垄断的商铺，垄断当地的货物贸易，从中大捞特捞，可以说是集权臣和官商

于一身。这样的人物，不招嬴政恨是不可能的。

吕不韦在嬴政亲政前做的另一个重要事情，就是编书。他找人编纂的《吕氏春秋》，是战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吕氏春秋》一书，全面阐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改革的思想，书中的许多思想，特别是“世易时移，变法亦宜”的思想，都成为后来嬴政执政的指导思想。比起战国时期的诸多权臣，吕不韦的行为其实不算过分，在嬴政面前也并不飞扬跋扈，但他真正引起嬴政猜忌的：一是他和太后之间的不清白关系，而且为了掩盖这个不清白，吕不韦反而越描越黑，介绍了一个假太监嫪毐入宫和太后私通，借此撇清自己和太后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二是他对六国的四君子有样学样，自己也招纳了三千门客，俨然一派独大势力，这样的局面，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吕不韦的命运，也就早早注定了。

公元前238年，嬴政正式亲政。而这时候的嫪毐，在和太后打得火热的同时，也生出了政治上的野心，他和太后生了两个儿子，企图串通太后发动政变，立自己的儿子当小皇帝。年轻的嬴政，属于少年老成的类型，嫪毐的一举一动早在他的监视之下，结果嫪毐还没有行动，就被嬴政逮捕了，借着嫪毐的案子，嬴政顺水推舟地宣布了吕不韦的罪状，解除了他丞相的职务，远迁他回四川。路上，吕不韦因担心嬴政追究，服毒自尽了。就这样，少年登基的嬴政，这才坐稳了秦国的王位。

然而嬴政说了不算的这段时期，也是秦帝国的对外扩张暂时停歇，甚至转入守势的时期。这段时期的赵国正好是赵悼襄王在位，此人很有些想法，在位的早期成功恢复了当年的合纵联盟，不但击败了秦国的进犯，甚至还带领着齐国、楚国、燕国、赵国四国联军攻打函谷关，惊出了秦国一身冷汗。幸运的是，赵悼襄王虽然有志向，但并非英主，看人眼光无能，宠信小人郭开，随着赵悼襄王的英年早逝，中原诸侯中，已经再没有人能够对秦国构成威胁了。

而韩惠文王这时期为了防止秦国东进，故意派韩国的工匠郑国来秦国，忽悠嬴政开凿郑国渠。嬴政起先上钩，后来查明了郑国的身份和来路，一怒之下想要治郑国的死罪，但是郑国的肺腑之言却让他改了主意：“这个水利工程，也许只能帮韩国多延续几年的国祚，却能让秦国收百年之利。”眼光长远的嬴政，也因此将这个水利工程继续了下去。但被忽悠的感觉总是不好的，嬴政一怒之下，就迁怒于那些生活在秦国的外来人们，这些人在当时叫作“客卿”。公元前236年，嬴政发布命令，要求那些滞留在秦国的客卿们，限期必须全都要离开秦国，消息一出就炸了锅，众客卿怨声载道，但你埋怨又有什么办法，秦国法律森严，不听话就要被严惩，还能咋办？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客卿站了出来，他大胆地抨击嬴政的政策，认为嬴政这样做是把人才都赶走，属于自己拆自己的台。这番大胆的上奏，反而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这个年轻的客卿，就是后来的秦国相国李斯。

在李斯进谏之后，嬴政收回了驱逐秦国客卿的命令，反而从中大力选拔人才。除了李斯之外，另一个得到嬴政重用的重臣，就是来自魏国的尉繚。这个尉繚的师承很有意思，他所在的学派叫作“为商鞅学”，这是因为当时商鞅变法成功，得到了许多法家人士的敬仰，所以许多人就自发地组成了这样一个研究商鞅变法的学派，尉繚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对尉繚，嬴政非常赏识，经常和他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有机会就拉着他攀谈。尉繚之所以这样被重用，因为他是一个很有长远眼光的人。他认定六国统一不难，关键是要循序渐进，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用远交近攻的方法完成大业。这时期的秦国，不缺李斯这样的文臣，也不缺少王翦这样能征善战的将军，真正稀缺的，却正是尉繚这样的，具有卓越战略眼光的统帅，所以嬴政把国尉的职务交给了他。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尉繚同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之一，他的兵法著作《尉繚子》，是和《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宝典。作为一个“兵家”，尉繚看人看事的眼光都很准，比如在对待赵国问题上，他曾经建议嬴政收买赵王身边的宠臣，施反间计害死李牧，李牧的含冤身死，尉繚其实是始作俑者。对嬴政的看法，尉繚更非常

精准，他认为嬴政“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得天下后会吞食天下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全被他不幸言中了。

先易后难，步步为营

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始于公元前230年。他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方式，打击的第一个目标，选择了当时苟延残喘的韩国。这一年，他派内史腾兵渡黄河，攻打韩国。然而这场出兵只不过是例行公事，韩国早已经没有了抵抗能力，只是和秦国稍微接触了几下，就立刻缴械投降，韩国就这样亡国了。

嬴政之所以第一步先打韩国，也不止是因为吃柿子挑软的。依照尉繚的设计，嬴政统一天下的路线图应该是这样的，先占领韩国作为跳板，然后灭掉韩国南北的两翼，最后灭掉极东的齐国，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战术，可以通过包围的态势，吞并掉各路诸侯国，更可以让秦国避免可能遭受到的夹击。

在初战告捷以后，秦国的第二步却碰到了小钉子，秦国的第二步是灭赵国。公元前229年秦国出兵，这次秦军再次受挫，又被李牧打败。眼见得武力无效，秦军搞起了反间计，收买赵王迁的宠臣郭开进谗言，结果李牧被害，秦国搬开了一个拦路虎，后面的事情就没有悬念了。赵王迁俯首称臣，赵国公子赵嘉逃跑到了代地，已经不成气候了。

赵国完了，下一个对手就是燕国，这次嬴政又碰上了一个“插曲”，这就是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燕国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假装觐见秦始皇，却趁机拔刀行刺，幸亏秦始皇反应够快，抢先砍断了荆轲的腿，这才捡回一条命。大难不死的嬴政立刻下令进攻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军占领了燕国的都城蓟，燕王杀了太子丹请降，随后逃到了辽东——为了一时的偏安，连亲儿子也不要了。秦将王贲在进攻

燕国的时候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盘踞代地的赵王嘉也给灭了。

早期的秦国灭六国战争，虽然出了一点小插曲，但总体上还是顺利的，秦军节节胜利，一路势如破竹。但太顺利了，却未必是好事，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就在眼前——楚国。

在战国的最后阶段，如果说哪个国家还能给秦国制造一些麻烦，那应该只有楚国了。这时期的楚国，国都郢早就被秦国占领了，他们迁都到了寿春地区。深知楚国巨大经济军事潜力的嬴政，决心一定要拔除这个大患。但他一开始并没有把楚国当盘菜，毕竟这是一个屡败于秦的国家，还能闹出多大的风浪，他请手下的将领估算一下，灭楚国需要多少兵马，结果老将王翦说是60万，年轻将领李信说是20万。嬴政一开始图方便，就听了李信的，结果20万大军杀到楚境，没多久就灰飞烟灭了。事实证明王翦的看法是正确的：楚国虽然屡遭重创，但是他们地广人多，民风彪悍，战争潜力非常巨大，轻视他们的结果，就是自己要吃苦头。

吃了苦头的嬴政，学乖也快。他立刻向王翦道歉，邀请王翦出马。王翦还是老样子，咬死了牙关不松口：60万大军，一个人也不能少，否则免谈。这次王翦要什么，嬴政就给什么。出发的时候，王翦的表现却很奇怪，他一会儿向嬴政要官，一会儿向嬴政要赏赐，走一路要一路，可谓狮子大开口。大家都觉得这老头儿是不是疯了，王翦也不争辩，他心里却明白嬴政根本不是一个胸襟宽广的人，大将领兵在外，不被人妒忌是不可能的，不被国君猜忌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摆出一副贪得无厌的样子，告诉嬴政，我不要权，只要钱。事实正如王翦所料，他的这些行动，嬴政不但没有生气，相反他却非常高兴。

王翦进入楚国边境后，就在楚国的边境要地驻扎，并不急于发动进攻。对面的楚国大将，就是同样拥兵几十万的楚国名将项燕，两军在边境相持了足足一年，项燕最终支持不住，全军撤退，王翦趁机追

杀，一举重创项燕部，楚国集结起的百万大军就此灰飞烟灭。这一战打得凶险无比，王翦劳师袭远，本身在补给供应等条件上就不如对方，这种相持战原本是对“主场”作战的项燕有利的，但问题是此时秦国的战争支持能力已经强大到了可怕，刚刚报销了20万军队，接着又派来60万，物资储备也足够丰厚，相比之下，失去了郢都的楚国，没有了传统的经济区，战争补给能力已经大大下降，王翦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放心大胆地和楚国人磨洋工的。秦国人磨得起，楚国人却磨不起。

之后王翦趁热打铁，不但打得项燕全军覆没，更一举拿下了楚国的都城寿春，楚国的国君也被王翦俘虏。春秋战国时代的超级大国楚国也亡国了。楚国的亡国，也意味着秦国灭六国的大局已经成为定局了。因为残存的齐国，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秦国的。

公元前221年，秦国由王贲率军，杀奔了最后一个目标齐国。这时候齐国的末代国君，是在位44年的齐王建。因为秦国长期搞“远交近攻”的政策，所以齐王建也一直错认为秦国是他的友好邻邦，多年以来，凡是找上门来，请求齐国伸出援手，抵抗强秦的，齐王建都一概不理，这下报应来了，所有的诸侯都灭亡了，谁还能救他？结果王贲兵不血刃地平定了齐国。就这样，中国历史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战乱分裂上百年的中国，终于重归一统了，不再是当年松散的诸侯国分封，而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

南平百越，大功告成

公元前221年，嬴政灭齐国，这一直被看作春秋、战国局面的结束，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事实上，在嬴政的眼里，统一尚未完全到来，因为还有一片国土需要划入大秦帝国的治下：南方百越地区。

所谓南方百越地区，就是楚国以南的广袤国土，包括今天东南的

福建、广东，西南的云南、广西。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生活着大大小小的越族部落，楚国之所以势力壮大，就是因为楚国世代代，都在吞并着南方的越族部落，从而可以获得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人口资源。作为他们北上争霸的本钱，等到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这时秦帝国的版图，向南包括了今天浙江、江西、湖南一部，更南方的领土，尚未在秦帝国的治下。

所以在嬴政灭楚国之后，秦军并没有刀枪入库，参加灭楚战争的60万秦军，就地在楚地整编，时刻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战争。公元前220年，在彻底平定了中原地区后，50万秦军挥师南下，开始了他们大规模对中国南部的征伐。秦军首先进入福建地区，灭掉了当地的闽越政权，在此地设立闽中郡，南方的福建省，第一次归附到中国的版图之中。与此同时，秦军又经湖南进入广东地区，灭掉了当地的南越各部落，将今天的广东、广西乃至海南岛，都统统划到秦帝国版图之中。

对于天下无敌的秦军来说，这个过程却是比平定六国更曲折。在早期的顺利进军后，秦军很快遭到了当地部落顽强抵抗。秦军的主将屠睢性格残暴，在当地滥杀无辜，激起了土著的剧烈反抗，许多地区都是平定了之后又叛乱。与此同时，常年生活在北方的秦军士兵，也不习惯南方潮湿的天气，许多士兵因此病倒了。瘟疫的流行，战局的不利，都让秦军这次南征陷入了胶着之中。

但嬴政的决心是坚定的，既然开弓就没有回头箭，经过了三年浴血奋战，秦军在撤换了主将屠睢之后，由任嚣、赵佗等人，在当地采取笼络百越的政策，终于争取到了当地越族部落的支持，诚心归附到秦帝国的统治之下。此后，秦帝国在当地设立南海、象郡、桂林三个郡县，这同样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中国东南的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各省，历史性地被收入到中华的版图之中，且从此连成一片。

在平定南越地区后，秦帝国在广西兴安县开凿灵渠。这条30公里长的运河，解决了当地秦国驻军的吃水和运输问题。其独特的水闸式河道，是人类运河开凿历史上的创举，西方国家一直到了19世纪开凿巴拿马运河时，才采用了类似的办法。

在修筑运河的同时，秦帝国更在今天广东、广西和湖南之间，开凿了四条驿道，这四条驿道一直可以延伸到秦帝国的国都咸阳。从此以后，中原和南方的交通开始连接了起来。对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这是一件和结束战国分裂同样有意义的“国家统一”事件。

在秦帝国成功平定南越之后，秦帝国的疆土也大体成型，北方包括了中原地区和辽东地区，向西抵达甘肃，向南抵达了海南岛和越南北部。这个领土版图，也是后世中国封建王朝的雏形版图。

二十 秦始皇错了多少

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换一个名号，天下一统了，诸侯都灭了，再当大王，恐怕也显得寒碜了。如此大的功业，也应该找一个比大王更显贵的称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们为自己提供封号，那些书呆子冥思苦想了许久，总算送上一个泰皇。解释说，这个称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来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还大。可嬴政还是不满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后面的皇字，然后自己开动脑筋，加了个帝字，这样一个新名词就诞生了——皇帝。嬴政很满意，就这么叫！好听！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国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他的名号，叫秦始皇。

秦始皇之所以选择皇帝这个词，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汉语的意思里有“大”的含义，至于“帝”，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统治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首。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这等于平白无故地告诉中国老百姓，我，嬴政，这个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你们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上天给予的，一万年也不会变。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时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

但是这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维持了区区15年的时间，就在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战争中毁灭了。当时的秦始皇，自己自称一世，他的儿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权能够绵延万万年，可惜，仅仅是15年。

说起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许多熟悉秦国历史的人都把原因归结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观点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以至于玩火自焚，国家衰亡。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秦朝的治国理念

在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过之前，必须要正视的，是秦始皇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秦始皇的国家政权，是在平定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可以用武力灭掉诸侯，统一全国。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秦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完全移植到六国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国的制度统治六国，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在最早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还有经济制度，六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也不一样。秦国的经济、文化、法律，是否适用于六国的其他地区，会不会因为推行不当引发变乱，这一切，也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秦始皇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切未知数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国，面对的是之前数百年未见的变局，国家走向一种全新的国体，这个国体应该怎么运作，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国内部，跟随秦始皇多年的官吏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经建议秦始皇将自己的儿子册封在齐楚故地，因为这是“祖制”，当时的大臣们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赞成这个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动摇，但李斯拿着春秋战国的动乱来做对比，使秦始皇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宣布，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国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团。

这个政策从稳定国家政权角度看是没错，但是在当时，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的齐国等地区。齐国是一个儒生众多的国家，这些儒生们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们眼里的秦始皇，就像是当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现在拿到天下了，却不想着分封，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况郡县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秦国委派为郡县地方官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于秦本国，贸然进入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官当得能舒坦吗？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东儒生淳于越在宴会上当场讽刺秦始皇，将秦始皇激怒。结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书之心，开始活埋不听他话的儒生，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数量上看，烧毁了大量珍贵典籍，并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可谓残暴之至，但这样的残暴，却不是无缘无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对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权谋霸道之术，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关系，他现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做出坑儒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给别人“下药”。早年就是由于他的缘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韩非子。这次他妒忌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改朝换代了，六国的人才，全都进了秦国的人才库，特别是儒生群体，以山东的儒生为核心，英杰荟萃，说不定哪天就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早做准备，能下药的就下把药，能轰走的就赶紧走。轰不走的，就往死里整，反正要把这些人对他的威胁降低到最小。

其实对于儒生的反对，淳于越的指责，都是小事，关键问题是，这时期的秦国，面临的重大威胁是什么？说起来就两条，一是外部面临匈奴的威胁，二是国民经济在战乱后的凋敝。

关于这两条，在秦国统一初期的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先说匈奴问题，这时期的匈奴势力，还没有后来汉朝时候强，却也已经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两支是大月氏和东胡），此时的匈奴正好占据了河套平原，正对着秦朝国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这个战略要地被他们拿在手里，整个中国北部就都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了，他们想打就打，想抢就抢，原先的赵国和燕国此时也已经灭国，当地虽然有秦军留守，却也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了，在这种局面下，不解决匈奴是不行的。

而国内经济问题也同样严峻，秦国连年用兵，花费巨大，自身的财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国经历过战乱，正是民力疲惫、经济困顿的时期，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六国地区的经济制度不一，新的国家财政体系，必须马上建立起来。国家要想振作，必须要通过经济体系的整合来掌握国家的税收，这样军队才有资本打仗，边防才能够巩固。

秦始皇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登基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两个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在新占领的领土上设立官衙，巩固统治。与此同时，秦国由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进，经过浴血奋战，从匈奴人手中收复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备匈奴的核心基地。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南方汉地的威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正是这一段时期。然而必须承认的是，秦始皇北击匈奴的一战，并非是穷兵黩武，如果当时不主动采取出击政策，任凭匈奴肆意劫掠，那么北方的汉地就永远无法安宁。而且在收复河南地后，秦始皇为了节省开支，命令蒙恬就地屯田，结果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还可以供应给其他周边军镇。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明智的。

在内政经济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全国分为46个郡，中央在地方确立了严格的集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黔首自实田”，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数量，然后上报中央，这就等于是彻底扫除了残存的井田制，使新的

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国迅速成型。这一条对于秦国统一后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关键意义的。在此基础上，秦王朝的土地赋税制度也建立起来，国家的赋税征收，分为口租、口赋和杂赋，这也基本是沿用秦国时代的土地税收政策。这其中，口租就是农业税，即田赋；口赋就是人头税；杂赋就是每年临时征调的赋税。秦朝的农业税，是交十分之一，人头税的数量，和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基本持平，大约120钱。这两样在当时，都算不上太重的税。至于杂赋，一般都是在遭遇战争的时候临时征调的，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负担，表面上看也不会太重。与此同时，货币、度量衡、文字，也都在这一时期统一了，秦国的法律《秦律》也颁布全国实行。分散的中原六国，渐渐被秦始皇捏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观察这些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早先的秦始皇，还是很有励精图治一面的，在捏合整个国家合力，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错。

暴政有多暴

秦国国事的恶化，通常的说法是“暴政”，暴政的内容，主要包括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筑秦始皇陵墓、阿房宫等。但真正最甚的，是三项重大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修筑国内的驿站道路；三是整治国内的河道。

这三项大工程，几乎都是前后脚展开的。秦始皇开凿运河，范围非常广。在平灭六国后的第二年，就曾经发动10万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沟，以及山东的济水运河。与此同时，秦始皇派30万大军收复河套平原后，又一口气征发了40万民夫整修长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再次征伐40万民夫，整顿国内的驿站，以关中平原为中心，修筑了连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驿站道路。这三项大工程，从作用上来说，都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修筑长城可以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后来作为封建王朝盛世的汉朝就从中受益颇深。开凿运河，有利于促进农业生

产，这也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修筑驿站，更可以促进国家交通，加强各地的联系，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三条从出发点上是好的，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里，秦始皇连续征调了90万民夫，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人口才不过2000万人。这90万民夫，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年，都被秦始皇拉出来干工程了。

这样的结果也就很简单，生产当然遭到破坏，老百姓家干活的，就剩下老弱了，生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生产能力打折了，国家的财富税收当然也要打折扣。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进行着征讨南方越族的战争，不断向南方越族地区征兵，打下地盘后，一面要修筑中原通向南方的驿站，一面又要修筑南越地区的水利工程。这样，原本刚刚在中原地区干完活的民夫，一下子又尽发到了南方地区。中国人从来都是恋家的，离乡背井永远是最痛苦的事情，怨声载道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开发越族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但这些后来的伟大意义，当时的人是没感觉的。士兵们只知道，他们被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作战，常年得不到休整。老百姓只知道，天下好不容易统一了，皇帝却又逼着我们干活，拿着我们当牲口使唤，对秦始皇的愤懑，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积攒起来了。

然而秦始皇最大的错误，不是在于他做了这些事。看看当时南北方的分布就知道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最初六年里，秦国30万大军压在北方对付匈奴，50万大军压在南方对付百越。这一南一北就是80万大军，等于两线作战，即使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两线作战也往往是兵家大忌，何况是一个立国不久、经济凋敝的新兴封建制国家。军队的事情还不算，民夫的使用却更触目惊心。在南方越族地区平定后，秦始皇陆续调动了40多万民夫南下开凿运河，打通驿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也就是说，秦国在立国之初，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却一直还在做着大动作，一直在折腾。这些原本没错的事，却偏偏超过了这时期中国的承受底线。

但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有说他好大喜功的，有说他不知下情的，有说他性格残暴的，然而从根本上，我们不得不说，秦始皇做这种事情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秦国国君的习惯。

看看战国时期秦国的历史就知道了，秦国在秦孝公改革后的130多年里，就一直处于折腾中。从秦孝公到嬴政，秦国除了有过短暂的罢兵外，几乎是无岁不征，年年打仗，但是秦国的国民经济不但没有拖垮，反而越来越强。秦国历代国君在使用民力上，从来都是不吝啬的，比如秦昭襄王时期，就曾下令全国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都从军，开赴长平战场，也因此一下子奠定了长平之战的胜利大局，这一场战争让秦国伤亡过半，但是仅仅一年后，秦国又以50万大军包围邯郸，却遭到了魏国、楚国的联合夹击，大败亏输。即使如此，秦国也很快地恢复过来，不管每次他们付出的牺牲有多大，伤亡多惨重，他们这种迅速的疗伤能力，是六国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及的。

秦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疗伤能力，不是因为秦国人觉悟高，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鞅变法后，经过两个阶段的持续推行变法，确立了秦国人对法律的绝对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制造了秦国令行禁止的特征，几乎所有出使秦国的六国使臣，都曾羡慕过秦国官员的严谨守法。但这样的条件，是无法短期内复制给其他诸侯国的。二是当时秦国有奖励军功的政策，发动战争，本来就是给草根们出头的机会，而秦国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们从来不惧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灭的六国，却不是这样的，拿着对秦国百姓的政策对待他们，只能说是找错了对象。

但秦始皇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当年，以秦国区区一二百万人口，就可以发动百万人的军事行动，七八十万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现在我手里有2000万人，又怎么能说滥用民力呢。但问题是他手里的2000万人，来自于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关中平原。在国家刚刚统一，人心思治的情况下，却依然继续在折腾，任谁也不会满意的。

当年秦国变法的实质，就是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树立严格的法律，建成一个高效率的专制国家。在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始皇也打算这么做，但是无论时机还是经济条件，都不成熟了。

偏偏秦始皇自我感觉好得很，折腾的事情越来越多，至于他这时期被人指摘的各类劣迹，比如修阿房宫、秦始皇陵，整日骄奢淫乐，其实这些都是做皇帝的“小节”问题。大节问题是，他没有搞清楚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次问题，需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且这不是他突然犯的错误，而是一个经常有的软肋。

秦始皇这个人，具有果敢的性格、顽强的精神、豪气干云的做派，确实是一个天生的王者。但是秦始皇的一大毛病，就是他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年在灭六国的时候，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顺序，他曾经辗转反侧，举棋不定，最后还是在尉繚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国家统一最后一步的钥匙。秦始皇具有坚决的执行能力，狂热的工作欲望和权力欲望，但是他最缺少的，恐怕就是有的放矢的素质。这一点素质的差别，使他演出了在登基之后的这一出闹剧。

秦始皇犯了错误，但更大的悲剧是，他的这个错误从他即位之后就一直在继续着，秦始皇从公元前220年起，就开始营造富丽堂皇的阿房宫，而在公元前218年起，他的骊山墓葬群也开始修筑，一个秦始皇陵，又调动了70万民夫。全天下的青壮年，都要绕着他来转。他忘记了一件事：六国灭亡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大工程、大面子，最需要的是要医疗战争的创伤。平定越族的战争，原本是可以暂缓的，秦始皇偏偏想几乎都要抓，既要恢复经济，又要上马工程项目，最后长城修起来了，秦朝却摇摇欲坠了。

秦始皇的错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相反还很是扬扬得意。在他登基之后，曾多次出去巡游，比如东巡、南巡，劳民伤财更是无数。但巡游同样也是有理由的，此时国家初定，各地人心惶惶，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稳定国家大局。理论上说是没

错，但中国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安安心心地过日子。秦始皇晚年的另一个搞笑事，就是他开始信任方士，到处求神仙，甚至还出了徐福东渡的典故。统一大业完成后的秦始皇，其表现做派，和他统一六国的征战时期判若云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像这种国家结束分裂后迅速陷入战乱的典故，不止秦朝这一家。比如西晋，比如隋朝。而且西晋和隋朝，都是经过了几十年休养生息后完成国家统一的，国家的财政储备和人口数量，都要远远好于这时候的秦朝。但即使如此，一旦使用民力不当，国家内外政策失调，就会立刻陷入分崩离析之中，无论是古代王朝还是现代文明国家，他的内外政策都好像是天平的两端，只有天平保持平衡，国家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而在秦始皇时期，他的政策是在天平的两端，都拼命地加砝码，结果就是整个天平的断裂。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其实所有关于秦始皇的评价中，或许有一个人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就是曾经在秦始皇手下做过国尉，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军事家：尉缭。

尉缭这个人，在辅佐秦始皇时期，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在确定灭六国的方案时，正是他制定出来正确的政策，保证了秦国顺利完成国家统一。然而尉缭却还有一个能力：看人的眼光。当年秦始皇还只是秦王的时候，他就一眼看穿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当时的秦始皇听到这个评价，反而对尉缭非常赏识，因为在他眼里，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缺点。

这正是秦始皇的悲剧所在，一个心似虎狼的人，也许在沙场上是一个出色的将军，但是在皇位上，却注定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同样和秦始皇一样有暴君称号的隋炀帝，当年也是一个出色的将军，可是

在成为皇帝之后，照样干得稀里糊涂，心似虎狼不要紧，缺少恩德也不要紧，中国历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好皇帝，心似虎狼的也不在少数。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就是尉繚那番评语里的最后一句“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这句话被尉繚不幸言中。说到底，秦始皇不懂得压制自己的欲望，一旦志得意满，就立刻露出了虎狼的面目。

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各地对秦始皇的反抗就开始了，秦始皇一生最不缺少，就是“被刺杀”。而且刺杀的次数日益增多，但是他自己却到死也不悟，之后四处巡游，耀武扬威，泰山封禅，炫耀荣光，秦国的气数，也在这股过程里日益被他透支干净了，同时被透支干净的，还是他个人的气数。到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东巡路上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抗暴运动，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走到尽头的法家

在秦始皇的悲剧中，似乎还藏着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后人关注不多的原因：秦国的法家传统。

众所周知的是，秦国的强大，来自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思想。在乱世争天下时期，通过严刑峻法，外加残酷的外在生存条件，只要树立起足够的国家威严，就可以确保国家迅速集结战斗力，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并且日益走向强大。但是当国家走向统一，开始和平建设的时候，法家思想却暴露出他致命的缺陷：至刚而无柔。

法家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严刑峻法，让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恐怖的刑罚监督中，用严苛的刑罚来镇压一切反对者。但是随着国家主要矛盾的转移，法家思想在休养生息时期，却完全失去了它本身的积极作用，相反成了消极作用。与此同时，法家常年压制所造成的怨

怒，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发生从民间的彻底反弹。引发巨大的抗暴动作，就像马背上打天下，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一样，法家思想可以打天下，但是法家思想却难以治天下，一个缺少温度，用冷漠和刑罚来约束的王朝，他的生命力也注定是僵硬的，即使强悍如秦军，即使气吞万里如秦始皇，都不能挽救它的衰亡。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法家思想在到达历史顶点之后，迅速走向衰亡的历史。事实证明，单纯的法家治国，在乱世或许立竿见影，但在太平盛世，反而会成为国家动乱与衰亡的催化剂。百家争鸣的各类思想中，法家注定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真正有资格成为中国之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传承的学说，是后来的儒家学说。那时候的法家，也只能将其核心要义化入儒家思想之中，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家思想在战国时代的风光，也只能留存在战国时代了。

二十一 科技革命改写战国历史

要说春秋和战国之间有什么不同？归根结底到一点上，却只是一件事：经济基础不同。

按照政治学的说法，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期，种种大变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最终还要落实到老百姓生活状态上的变化。综观从春秋到战国的所有变化，从根本上说，战国，改变的是中国人的生活。

且去看看，战国究竟改变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呢？

地主是这样来的

战国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一大方面，就是基层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果国家的经济体系是一个房屋的话，那么奴隶制的屋顶，是奴隶主，地板是奴隶，这也是春秋的社会关系。而在战国时代，这个关系随着变法的深入，各个国家的转型，奴隶制小国的被平灭，早已经不复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栋新房屋：封建社会关系。这个房子的屋顶，是地主；房子的地板，是佃农；房子的墙壁，是大大小小的自耕农。

在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家，纵横捭阖的国君们，挥斥方遒的将领，或许立场不同、阵营不同、观点不同、敌

友关系不同，却有一点身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百分百的地主阶级。

有关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问题，各类史料讲过很多，讲得比较少的却有一点：这个社会转型期的各类新阶层，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比如，地主是怎么来的？

战国时代的地主，是战国风云的绝对主角。在战国早期瓜分奴隶制国家的狂潮里，主角是地主；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子们，背后的利益团体，也大多是地主；在战国时代风云变幻的变法运动中，那些或刚硬或阴柔的改革家们，他们真实的身份还是地主。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主更不是一天冒出来的。战国时代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地主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过程。

战国时代的地主，主要来源于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原先的奴隶主贵族，他们的身份，很像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贵族。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里，他们的鼻子比较灵，嗅到的风向比较准，很早就主动转化了生活方式。本属于体制内的奴隶主，摇身一变重新做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里谋取了新的利益，成为新型生产方式的既得利益者。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族，取代了姜氏齐国的田氏家族。

这些“新贵族”的普遍特点，就是脑子很灵光，而且在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内部，也大多很不受待见。在旧体制下，他们虽然拥有封地，甚至和统治者有亲戚关系，但是他们不具备世家大族那样的特权，没有对军队、政权的掌握能力，他们最主要的权力，就是在封地里收取出产，保持富足的生活。

因为地位低，既得利益少，所以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期，他们的脑袋敢于转弯，比如在自己的封地里，主动改变了剥削的方式，变以前的奴隶关系，为后来的地主与农民关系，尽可能地给予各种政策，提

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个变革中，他们最早尝到了甜头。尝到了甜头，就要争取更多的甜头，所以他们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向旧的贵族抢班夺权，甚至执掌一个国家的政权。这部分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本身就是从旧体制内蜕变出来的，身上无法割裂与旧体制之间的联系，这也注定了他们进行的各类转型活动，发起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最终是不会彻底的。

战国时期齐国、魏国、赵国、韩国的国家政权，都属于这种情况，按照过去历史书的话说，它们最后的衰弱，也是因为“保留了大量奴隶制残余”。

在整个的春秋战国时代，“新贵族”们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君子。这里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说战国时代脱胎于旧贵族，又在新经济形势确立后，实力迅速壮大的新贵族群体。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个国家的王族宗室，他们的普遍特点，就是拥有大量的土地，其财富富可敌国。他们经营大量的新兴产业，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也放高利贷。他们自己的庄园里，也有一套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势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门客”。门客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千人，有时候甚至可以左右国家局势，在中央集权制度初建的战国时代，他们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权的“异类”。

这些人与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势力。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结束，门客盈门的盛况，也只能给后人徒增谈资。这些人里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君子”——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都是本国的骄傲，他们身后的几千年里，一直被后人看作传奇，但是真正完成统一大业的，却是改革最为彻底，没有君子的秦国。

地主阶层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战国时代的官僚阶层。他们取代了过去的旧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国家政权的执行者，成为国君中央集团的帮手，而他们成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功勋，得到国君的土地赏赐。

战国时代，国君对于臣下的最主要赏赐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晋地区的韩赵魏三国，当年曾经是商鞅主人的魏国丞相公叔痤，魏王一次性赏赐给他的土地，最高的时候就有100万亩。吴起当年因为守备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赏赐土地20万亩。这一类地主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旧贵族转化来的，出身比较高贵，比如公叔痤；有的却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过建立功业一步登天，吴起就是这一类型。

除了国君赏赐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资眼光。在这个时代里，他们喜欢把所得的俸禄用来购买土地，比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对土地的热爱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带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买下来。他母亲也因为这个，断定他没有带兵之能。而在当时，官僚阶层的这种情况很普遍，钱是容易贬值的，土地却是永远不会贬值的，有了土地，不只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经济的保障。

官僚地主阶层的扩大，也和战国各类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有关：奖励军功。这项政策最早实行在魏国，后来商鞅在秦国发扬光大。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土地作为奖励方式，授予那些在战场上立过功的人。这些通过军功、战功获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们往往是战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阶层的又一个类型，是很有“励志意义”的，那就是布衣地主。这一群体有两个类型，一种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种是从自耕农、手工业者，甚至奴隶转化而来的地主。他们获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买卖。这个群体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业者出身的地主阶层，战国时代一句流行语是：“以经商来发财，以土地来保财。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就是这一类型人物里的杰出代表。”

而更有励志意义的另一个群体是，许多自耕农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逐渐拥有了土地。这一群体主要分布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国、赵国地区。

当时的统治者，普遍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政策，国家给予垦荒者法律上的保护，并提供农具，特别是秦国，只要你敢创地，要什么支持国家就给你什么支持。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废井田，开阡陌”运动，更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许多早期的自耕农们通过锐意地耕作，占住了大量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层。在当时的中国，秦国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长，六国人口大量涌入，是因为那里是从自耕农变成地主难度最小的地方。

农民的生活

有了地主，自然对应着要有农民，作为被地主踩在脚下的群体，战国时期的农民，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三个群体。其中自耕农的来源，有两类：一是奴隶社会的平民阶层，但更多的却是奴隶社会的逃亡奴隶，那些早期摆脱奴隶主统治的逃亡奴隶们，通过积极的垦荒，流亡到新的地区开辟新土地，逐渐成为拥有合法财产的自耕农。这一类自耕农，普遍分布在当时的秦国和楚国以及吴国地区，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频繁，大批奴隶逃亡，他们开始往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今天的华东、关中、江汉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战国时期不同国家的变法，内容虽然不同，但其中一个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拼命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因为自耕农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可以收取税收的税源扩大，保证新兴的封建制国家建立完备的财政收支体系。

在这一点上，战国变法的宗师李悝曾经有过精辟的概括：农伤则国贫。但是对于各路诸侯国来说，自耕农的增加是最困难的，因为国

君下面的地主阶层，都在想方设法地隐瞒人口，把大量的人口变为自己的佃农。所以魏国变法的时候，采取的是国家提供农具和法律保护的方式，来增加自耕农数量，而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时候，却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措施，严苛到一户农家里，兄弟成人后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处罚，且大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

赵国名将赵奢早年做税官时，之所以开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为平原君故意隐瞒人口，逃避赋税。一个封建制国家勃兴的时期，势必是自耕农数量甚多的时期，而一个封建制国家衰落的主要起点，就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这个经济规律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

战国时期的自耕农，在富裕程度上，还不能和后来的汉唐宋明相比，那时候生产落后，土地产量低，一家自耕农的土地，在30亩左右。他们拥有种子、农具，也要承担繁重的赋税。

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税率不相同，以魏国强盛时期的魏文侯时代为例，当时的魏国改革家李悝曾经估算过，一家有30亩土地的自耕农，按5口人计算，每亩的粮食产量是3斗，他们需要承担的税赋，大约是十分之一。交完税的粮食除了自己吃以外，剩下能拿去卖钱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卖到的钱，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销，也就能勉强维持一个温饱。这还是普通的生产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灾害，自耕农破产就会成为普遍的事情。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非常重视水利的修筑，用以维持生产的稳定。即使如此，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贫困程度上，要远远大于后来统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国农民。

然而比自耕农更惨的，就是佃农。佃农，基本就是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转化而来的，比起奴隶们的悲惨生活，他们的境况显然要好得多，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农具。但是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给地主，同时还要承担土地的赋税，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维持温饱就更加困难了。佃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破产的自耕农，他

们遇到水旱灾害，无力承载国家的赋税，只好扔下土地逃亡，依附于地主家中。《吕氏春秋》里就曾记录过：“在秦赵长平之战时，由于秦国不断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来保证前方供应，造成大量自耕农逃亡，许多自耕农宁愿依附在地主家里做佃农。”

比起雇农来，佃农还算好的，因为雇农不但没有土地，更没有农具。他们有的给地主家做佣工，有的甚至在农忙时节，给富裕的自耕农帮佣。他们的生活水准，已经直追当年的奴隶，韩非子的书中曾说，三个雇农的经济收入，都不足以奉养一个老人，足见经济状况之悲惨。

战国时期同样是有奴隶的，当时大工商业地主家里，依然豢养着大批的奴隶，他们只有食物，没有收入，有的甚至和牛马一起放养。但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战国的主流。战国时期，是地主和农民这一对封建社会关系正式确立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已经在这时期奠定了。

拼的就是高科技

战国生产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生产水准的提升，确切地说，就是中国工农业生产科技的高速跃进。如果用横向对比来说的话，战国之前的中国，在生产水准上，与同时代的西方奴隶制国家是同步的，而战国之后的中国，却已经把当时的世界远远甩在了身后。

战国首先突飞猛进的生产进步，就是农业的进步。诸侯争霸，表面打的是军事力量，本质打的却是钱粮储备，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国，在农业技术改进上都不惜血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铁制农具的使用，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北到辽宁，南至广东，都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制农具出土。比如河南辉县的战国魏墓，曾经一次出土

铁器160件，其中农具有58件，铁农具和先前的石制、木制农具的最大区别：一是生产效率提升，二是可以完成深耕，原先无法被发展成耕地的荒地，因为铁农具的出现，完全可以被开垦成良田，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体自耕农，也可以因为铁农具的使用大力垦荒，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

而另一个推动战国农业发展的技术，就是牛耕。战国时期，牛耕已经作为一种普通耕作方式被大力推广，用牛耕作，就好比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耕作。不但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而且还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例。

在战国之前，诸国中公认的农业强国，当属中原的晋国和东方的齐国。然而在战国之后，西北的秦国一跃成为头号农业强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大力推行牛耕。然而，他们本身就有丰厚的畜牧业储备，耕牛的储量极其丰厚，所以推广牲畜耕作，也就比其他六国得天独厚。当时的秦国不但有牛耕，还有马耕，而且秦国还有“国家福利制度”，只要是开垦荒地的农户，国家就给予牛马补贴，即免费提供牛马等牲畜，这就使秦国的农业水准在短短几年内有了飞速发展。

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数次大战中获胜，特别是打赢诸如长平之战等相持战，其雄厚的国家钱粮储备成为重要原因。一种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版图出现了颠覆性变化。

战国农业的进步，另一个重要创举，就是在肥料上有了大的改变。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粪种”，即运用动物的骨头和麻子煮成汁搅拌，作为肥料来增加土地的产量。荀子在他的《富国篇》里也曾说过：“施粪肥田，这是农民该做的事情。当时的农业肥料，除了粪肥外，还有把野草烧成灰做成的绿肥。”

这两种肥料，之后一直不断发展，沿用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战

国时代著名的学派“农家”，对于农业的耕作技术，有非常详尽的总结和阐述，包括深耕技术、粪肥的培育，以及种子的识别和种植，这些在战国时期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秦始皇时期欲逐六国宾客，李斯就以水稻种植为例，劝谏秦始皇，他说“原本只在南方种植的水稻，都能够在秦国扎根，何况六国的人才呢”。这番话不但使秦始皇改变了“排外”的主意，更足见此时水稻在南方种植之广。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变化，我们从魏国名臣李悝的自述里就可看出一二，李悝认为战国初期的魏国，一亩土地的产量是一石半，而在使用铁器农具以及使用肥料后，产量最高可以提升四倍，最少也可以提升一倍。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一亩土地，产量最高当在三石到六石之间。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石半，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比起同时期的欧洲来，也至少要高一倍左右。

二十二 战国商业：和战争一样热闹

战国时代最吸引眼球的热闹事，莫过于战争。

千军万马的厮杀，奇招迭出的兵法，骑兵射箭的改革，战车的淡出，战争规模越来越多，战争之外的博弈越来越丰富，核心就一个字：战！

但如果仅以为战国的历史，就只在战场上，那其实就把战国看简单了。

这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既是对生产的严重破坏，但同样也是一种催生。列国为了打赢战争，都要卖力发展本国经济，生产技术和农业产量高速进步，带来的一个附带后果，就是有一件事情，居然变得和战争一样热闹：商业。

战国的商业有多热闹？我们看看《史记》里的一段话就知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而按照孟子的说法，这个变化更形象，在孟子的记录下，最早的商业贸易，都是官府操纵的，基本都是以物易物，价格也是官府说了算。就算有些人搞私人贸易，也只能到乡间去活动，这种人被孟子称为“贱丈夫”，也就是最初的商人。后来由于这种活动多了，贸易的地点，按照《公羊传》的说法，就被称为“市井”。

进入战国以后，生产已经高度发达，商品交易也越发热闹，原先被人看轻的私商们，非但不再被人瞧不起，相反却是名流充斥、富商云集，很多人的影响力，更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战国是战争的苦难时代，却也是商业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甚至可以这样说，左右战国命运乃至中国命运走向的，也有这些商人们活跃的身影。

商人赚钱门道多

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就有很多商人奔走于列国之间，靠倒买倒卖大发横财，但他们真正成为一種规模化的政治力量，却还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特别是春秋晚期范蠡经商的成功例子后，进入战国起，公卿大夫身份投身商业的人物，也是越来越多。最典型的就昰战国的白圭，这位魏惠王昔日的相国，更是中国商人中的祖师爷人物。以《史记》的赞叹说，他最擅长把握商机，懂得各种货物的需求情况，能够准确按照市场的要求买进卖出，转手就是暴利。特别经典的几次妙笔，有在丰年的时候用丝来换谷物，到了荒年时又出售谷物，一下子获得巨大收获。所谓“人弃我取，人去我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商业的黄金箴言。

当然商业的发达，也不可避免带来另一种商业现象兴起：信贷行业。

战国商业的一大流行景观，就是高利贷横行。比起普通商业可以各行业参加，这个行业却是硬标准，必须得是富豪甚至是政治权贵才可以。最典型的一位，就是号称“四君子”的孟尝君。

这位齐国的宗室贵族，战国时代有名的门客，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门下三千各怀绝技的门客，但相对不太出名的，却是他养门客的主要资金来源：放高利贷。他的封地薛地，就是他投放高利贷的主要市场，而且由于利益巨大，以至于每年到收钱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

都十分痛苦。因此也有了一段美谈：孟尝君的门客冯驩看到人们实在还不上钱，干脆灵机一动，假托孟尝君的名义，把所有的高利贷债券都烧了，结果老百姓高兴了，孟尝君气得跳脚，大骂我这三千门客吃什么。冯驩却不慌不忙说，你啥都不缺，就缺人心，我帮你免了债，是给你买人心。

后来的结果也正如冯驩所料，孟尝君垮台倒霉后，狼狈回到薛地，却见薛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热烈欢迎。孟尝君这才感叹说，您说的人心，我总算看到了。

两千年来，这个故事通常被很多人引用，不是用来说冯驩的聪明，就是用来夸奖孟尝君的大度，但从前因后果上可以看到，当时的高利贷生意，已经成了战国时代普遍的现象，甚至普通的耕作百姓，都要遭到这新兴生意的无情盘剥。孟尝君可以免了薛地的债务，但是更多的老百姓，恐怕还挣扎在这债务之下。

战国时代高利贷的流行，不但成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甚至就连某些国君，都为此遭了灾。最典型的就是周赧王，这位堂堂的周天子，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彻底成了摆设，如果说春秋时期还有些价值，那么战国时期就已经彻底被闲置，甚至连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王室的开支，就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谁知道一来二去就还不上，吓得惊慌失措的周天子，一度连王宫都不敢回，干脆造了一个高台，自己成天躲在里面战战兢兢，成语“债台高筑”就是这样来的。

这段啼笑皆非的故事，既说明了当时高利贷风气的流行，却也阐述了另一个无情事实：能放高利贷的，都绝对是当时惹不起的人物。

而这样的惹不起，也正是战国商业另一个现象的缩影，经商已经不再是下贱的行业，相反商人们更是每个国家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改变历史的人物，正是吕不韦。这位知名的土豪在邯郸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秦国公子异人，立刻就像找到投资项目一样，

与之热心结交，竟然就通过巧妙运作和大气砸钱，把这位亲爹不疼奶奶不爱的落魄王子，成功扶持成秦国国君，他自己也得以青云直上，成为执掌秦国大权的重臣。

说是商业影响了战国历史走向，毫不为过。

货币花样真难认

战国另一个商业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拜《封神榜》这类古装神话剧所赐，电视剧里凡是有买卖情节，基本都是黄金白银，以至于好些神话剧票友也认定：三四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有白银铜钱了。对照真实历史说，这实在是瞎掰。

虽然按照史料说法，中国铸造货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时候，但是考古出土的物证却证明，直到商周时代，中国人买卖东西的主要货币，依然还是贝币，也就是贝壳。用贝壳做货币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史上十分漫长，商朝周朝的文物出土中，各种五花八门的贝币极多。当然比起商朝来，周朝进步的有一点：商朝主要是天然贝，周朝却是人工铸造的贝币，主要是铜贝币。这种货币的生命力十分漫长，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彻底取消。

而在战国时期，货币的一大进步，就是出现了新的贵金属货币：黄金。

用黄金铸币，在战国时代十分的流行。而且十分标准化，每一种黄金币上，都有明确的铸造时间和地点。与黄金货币同时改变的，是战国时代有钱人的财富观，在战国之前，要形容一个人多有钱，一般都是看他有多少土地庄园和粮食，但到了战国时期，那就是百分百看钱。通常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文物遗址，都会发现有仓库储存大量的金

钱，以荀子的说法，人们之间攀比财富，也都是说自己有多少钱。这真正是个看钱的时代。

虽说货币发展了，一个问题却很严重：货币门类太多了。

春秋晚期的货币，就特别不规范，每个国家都有好多种货币，不但国家可以造币，一些富豪权贵，也有铸币特权，一个国家市面上流行的，通常有好多类型货币。有时候买东西，都不知道该用哪个好。

到了战国时期，这个问题总算有所解决，各国都把铸币权收归政府。但市场已经越发统一了，市面上流行的，却是各个国际不同的货币，如果罗列起来，也是千姿百态。

在北方三晋地区流行比较多的，当属铲形货币。即铲子形状的钱币。这种钱币在当时，叫作布币，又以形状不同，分为各种不同类型。比如有圆足类型的，也有尖足类型的，而且以流传范围说，更是战国各类货币里，流传范围最广的一种，往北在今天辽宁、吉林地区都有出土，往南在今天湖南、湖北地区都有发现，出土最多的地区，则是河北、河南地区，也就是以韩、赵、魏，三国为核心流动地区。就材料来说，今天出土的铲形货币，绝大多数都是铜质的，1974年在河南扶沟县也出土过银质的货币，不过数量也十分稀少。

这一时期贝形货币主要在楚国地区流传，也叫作“蚁鼻钱”。还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块形金版。这两类货币，主要都流行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四地，主要都是楚国的地盘。而在北方大地上，能与铲形货币分庭抗礼的，当属以齐国为代表的奇特货币：刀形货币。

作为战国时代东方最发达的商业国家，齐国的工商业独步中原大地，铸造钱币方面，更是遥遥领先。跟铲形货币比起来，刀形货币的岁数要更长，最早的刀形货币，竟然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期去，而且和其他类型的货币相比，刀形货币最大的优势，就是技术含量，从出土的货币看，其货币的铜锡含量比例，是同时期各类货币中最为合理

的。

更能证明刀形货币的实力的，却是这种货币在当时的购买力：一枚标准的齐国刀形货币，可以购买250斤粟米，也可以购买23斤食盐。按照一些战国史料笔记的说法，许多战国时代的有钱人，最好的储蓄财富的方法，就是把财富兑换成齐国刀形币。在战国大多数岁月里，刀形币就是这样信誉良好。

就流传范围来说，刀形币比起铲形货币来，好些流行区域都是重合的，就范围广度来说，不如铲形货币，可是出土量却令人震惊。比如在燕国旧地的河北承德地区，一次性就出土过4000多刀形货币，比起铲形货币的平民化来，刀形币更可以说是有钱人的游戏。

但是拜秦国一统天下所赐，前面这几种货币，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都成了历史的痕迹，真正一统天下，并且成为之后两千年中国钱币制式的，却是在战国时期，相对在中原不太流行的货币：环形币。

环形币，因为其圆形的形状，也被称为“圆钱”，这种钱币出现最晚，主要流行于秦国以及周天子的区域内。秦国的圆钱，主要以重量和“铢”来计算，这也成了后来汉朝起中国货币的计量规则。尤其值得说的是，环形币的制式，主要是圆形方孔，古人把财富称为“孔方兄”，最早来源就是这里。

从秦惠文王年间开始，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国力的上涨和扩张的加剧，秦国的环形货币，流通的区域也开始扩大。同时秦国有着战国时代最规范的军工生产体制，因此在铸造货币上，秦国虽然技术有所欠缺，规模化生产却十分强大。每次征服一个区域，货币的发行就紧锣密鼓，因此反映在考古发现上，秦国的环形币虽然从范围上无法和别的币种相比，但是每一次出土，年代都非常集中。基本上把出土环形钱的时间串联起来，就能把秦国一统天下的路线图画出来。

城市真热闹

与商业活动一样红火起来的，就是战国的城市。

不夸张地说，战国对于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它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成熟时期。之后的两千年中国古代史上，中国的城市规模和形状，都是以战国城市为蓝本发展。

在春秋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不能说没有发展，但实事求是地说，发展就如老太太走路。比如出土的西周的城市遗址，比起商朝的城市废墟来，无论从规模还是大小，都得拿着放大镜找进步。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城市在奴隶制时代，基本就是王公贵族的活动中心，就算是有平民百姓，好些也都要做农村的营生，所以从规模和热闹程度，都是十分有限。类似《封神榜》那样商朝都城里的热闹的场面，也只有小说家才能编造出来。另外一些硬规矩，更完全限制死了城市的发展：国都长宽不能超过900丈，卿大夫的封地，也必须只有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稍微大一点，就是僭越大罪。人口多一些的5000来人，少点的也只有几百人。基本就是这么寒碜。

但从春秋晚期起，情况就不同了，到了战国年间，更是翻天覆地。

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就好比一支兴奋剂，把好些原本小规模的城市，全都给打膨胀了。城市的规模越发扩大，人口日益增多，所谓的硬规矩，也早给抛在了九霄云外，再硬的规矩，也无法阻挡这个强大的历史规律。

于是，旧城市的规模越发扩大，新兴的城市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战国时期哪怕是大国里普通的城市，也比春秋时代国家的都城

要大得多，所谓“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才是最真实的写照。而且比起过去只有都城算得上城市的寒碜景象，只要数得上的大国，都是新兴城市林立。按照《盐铁论》里的说法，中原地区仅齐国、楚国、魏国这几个国家，叫得上名字，称得上商业贸易繁荣地区的城市，总数就有30个之多。放在之前的夏商周年代，这真是强大得不可想象。

更让前代不可想象的，则是城市的规模，比如齐国的都城临淄，史书上记载有7万户，而以已经出土的古城文物来估算规模，按照相关学者的保守估计，人口也要在35万以上。仅出土城墙的总长度，就有近42000米，总面积60平方华里，大小城门已发现10个，主干道宽8米，更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城市建设相当发达。

临淄城的繁荣程度，更是在当时天下闻名：集市上人挤人，抹一把汗就像下雨一样，车子挨着车子，而且城市里店铺林立，各种行业都有，天下各种奇珍异宝云集，场面十分热闹。甚至很多外国学者也来凑热闹：临淄的发达程度，放在同时期的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而更能证明临淄繁荣的，还要说其发达的娱乐业，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足球，当时叫蹴鞠，这是临淄知名的体育运动，并很快流传到列国，成为战国起非常知名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这一独家娱乐，国际足联也十分服气，2004年专门宣告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淄博（临淄）。

然而临淄的繁荣，也只是战国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七大强国的主要城市，不能说比肩临淄，也基本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不夸张地说，战国时代的中国，就是当时全世界经济最繁荣发达的区域。

而与城市繁荣同时发达的，就是交通。

各主要国家之间，除了军事道路外，更有了四通八达的商业交通要道。北方从齐国一直可以通到辽东地区的陆路，已经十分顺畅。南方楚国的商业贸易网络，已经可以连接到今天的印度地区，张骞通西

域的时候，从中亚的集市上，可以看到来自巴蜀的绸缎，照中亚商人的话说，这些物资都是楚人经四川贩运到印度，再转手倒卖到了中亚。比起汉朝开始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战国时代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产生得更早。

更值得一说的，却是海上贸易，作为东方最发达的商业地区，齐国的海上贸易，在战国就进入了黄金时代，今天山东的海阳地区，就是战国时代重要的贸易港口，以此为中转站，和辽东甚至吴越地区，都有商业贸易的联络。而在中原腹地，贸易网络更是四通八达，国力弱小的韩国，以及逐渐衰落的赵国和魏国，却成为战国时代中原贸易的集中地。以三晋国家为核心，贸易道路通向东南西北四地，各地的货物都云集。正是这样的交通演进，才为最后的天下一统，搭好了最厚实的戏台。

二十三 要强大，修水利

战国时代，列国之间的争霸十分热闹，尤其是以一统天下为目标后，相互的争斗，更是你死我活，文的武的，各种招数都有。

比较出名的招数，常规说来，就是战争，攻城略地的死招，打得动就打，打不动就谈，文明的说法叫连横合纵，也就是拉帮结派打对方，十分的热闹。背后的招数，也是花样百出，比较出名的有发展生产，奖励耕战，实现军功授爵，甚至更有经济战争，通过经济调控来扰乱对手。样样都看似隐蔽，其实杀伤力无穷。

但有一样看似明面上的招数，收获的却是暗招有时候也难以达到的效果：修水利。

战国风云变幻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如井喷一般涌现的年代。从早期的魏国，到中期的齐国，再到晚期的秦国，几乎主要的强国，都有其自己自豪无比的水利工程。战国的历史变幻无常，多少曾经风光一时的国家，都成了历史的遗迹，甚至连半点纪念的踪影都难以找寻，然而他们留下的水利工程，历经两千年风云的洗礼，却依然生机勃勃地存在，以其汹涌不息的波涛，继续惠泽着后世的炎黄子孙。

一部战国历史，同样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成熟史。

水利工程，在后人眼里，也许只是一个工程这样简单，但是在战国这个特殊的时代里，水利工程却承担着更多的战略意义，它就像后来的万里长城与大运河一样，不但是一个被后人纪念的样板，更是国家走向强大和维持安全的必需生命线。一个强大的水利工程，其发展

与命运，往往与一个帝国的命运休戚与共。

在这样的意义下，许多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水利工程，在战国时代中国古代科技革命的刺激下，相继蓬勃而出，成为一个时代最为伟岸的见证。

西门豹的力量

战国首先值得一说的水利工程，就是邺渠。

邺渠，又名漳水十二渠，位于今天河北临漳县，当年属于魏国境内。与这座伟大水利工程有关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曾经入选小学语文课本的一个故事——西门豹治河神：战国魏文侯时代，大臣西门豹临危受命，治理当时叫邺城的临漳县，没想到到了就被雷晕，当地不但水灾频繁，而且还流行着“河伯娶妇”的风俗，也就是当地官员和巫婆勾结，威胁老百姓选自家的女儿，扔进漳河里去伴河神，否则河神生气了就咆哮，然后就大发水灾，一年的收成基本都泡汤。于是恶性循环，老百姓家不知道扔了多少女儿，也不知道被巫婆贪官敲诈了多少钱，却是年年水灾依旧，人民流离失所。

而敢为天下先的西门豹，也就勇敢地承担了改变的重任，到任后首先以毒攻毒，既然巫婆们说漳河里有河神，那么你们就先下去告诉河神一声，今年哥不送姑娘了，你要是生气也别祸害老百姓，有本事就冲我来。就这一句话，原先坑蒙拐骗的巫婆，就给活活扔进了水里去，半天没见出来，立刻又给巫婆们的同党，那群地方官们说，你们下去催催巫婆，看看他们磨蹭啥，结果几位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也给齐刷刷扔到了河里去。

这位深藏不露的地方官，就用这以毒攻毒的办法，不但轻松扫平了当地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更给老百姓立了威，河神啥的都是忽悠

人的，想要致富过好日子，就要信我西门豹。

这则小学课文里曾经引用的故事，通常说到这里，对最后的结果就一笔带过，也就是西门豹取得大家信任后，带领大家开凿了新的水利工程，也就是邕渠，从此实现了五谷丰登，不把姑娘扔到河里喂河神，就能过上好日子。

但放在当时说，最为困难的恰恰不是斗河神，而正是修筑这个新水利工程。因为在当时，在漳河修水利工程，不是没人想过，但一直以来，都是一件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有多难做？看看地图就知道，临漳县的地理位置，位于漳河由太行山区进入华北平原的冲积扇上，地势陡峭且水流急，只要降雨量稍微大一点，立刻就容易引发水灾。至于兴修水利？那真是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知道有多难。不管堤坝修得多坚固，只要洪水一来，立刻就全数被冲垮。而且更加矛盾的事情是，临漳县当地的土地十分贫瘠，没有河水灌溉的话，收成基本没有保证，但如果要用河水灌溉，那基本就是水灾。所以不是水灾就是歉收，临漳老百姓的血泪史，一直就是这么多。

直到西门豹到来。

这位可以以毒攻毒制服巫婆的官员，最强的还不是这类官场手腕，相反却是实打实的科学水平：治水的水平。早在把巫婆往漳水里扔的时候，西门豹就有了全盘的治水计划：不治要淹，治水的话堵不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疏通河道，引水灌溉。

于是西门豹大着胆子，实现了这个前人想都不敢想的计划：直接沿着太行山脉，依靠地势的情况因势利导，开发十二条水渠，而这个巨大的贡献，也同样因为史料的匮乏，记录十分简略，直到今天很多人也都在感兴趣：这样强大的水利工程，西门豹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因为它的效果实在是太强大了！

不但是通过十二条水渠的开凿，实现了完美的水利灌溉，从此这个多灾多难的土地，彻底告别了旱灾的肆虐，最让人惊叹的是，大量的水利带来的泥沙，还改善了当地农田的土质，从此这个土地出名贫瘠的苦地，竟然成了土壤肥沃的乐土。

这个特殊贡献，在后来的各类文献里，满满都是赞。以《史记》的说法，这个水利工程造成的富庶，不只是这一个县，更是整个的太行山地区。而以晋朝左思的感叹说：魏国能够实现振兴，首先就是经济的提振，而经济的提振，就是从西门豹的这个工程开始的。

改变战国历史的都江堰

如果说一个邛渠，造就了魏国的首霸，那么另一个更浩大的水利工程，却是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了底：都江堰。

都江堰的大名，直到今天依然如雷贯耳，两千年来不但造福了四川大地，更扛住了多次强震，其强大的建筑水准，令国内外众多建筑史学者，无不叹为观止。而放在战国历史上，这个水利工程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但是给四川地区的水利系统改道，更是给战国的历史走向改道。

为啥这样说呢？这就要说说都江堰的修筑缘起。

话说秦国在东进六国之前，完成的另一个重大军事工程，就是征服了巴蜀地区。这场战争的过程，基本没费什么劲，强大的秦国军队似神兵天降，一下轻松降服。等到降服了之后，秦国却是一度连肠子都悔青了，这哪里是开疆拓土，分明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因为这个地方太多灾多难了。

巴蜀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地区，总被称为天府之国。但这个美好赞誉，基本都是都江堰落成之后的事情，之前的场面，简直就是天灾之国。当地的天灾，基本就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岷江自北向南，流入成都平原，由于水流变缓，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泥沙沉积。而且每到夏季雨季的时候，立刻就会各种灾害全来，水流泛滥还是最轻的，严重的情况甚至有山体塌陷，泥石流频发，好好的一个村，很可能说埋就埋了。

对这个严重情况，秦国以前的当地统治者，也不是没有重视。按照《华阳国志》的说法，为了治理这生态灾害，当时的蜀王在被秦国灭亡前，也是啥样的办法都用了，甚至还开山挖沟，但是该挖挖该闹闹，基本都成了无用功。等到秦国接管了这个地方，也就立刻尝到了厉害，从秦昭王开始，自然灾害就年年有，不但庄稼收不上来，而且还常要关中平原接济。

这个严重问题，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可以说是当头一棒。因为秦国的目标追求，本身就是要一统天下，商鞅变法以后的基本国策，就是奖励耕战，可是战斗容易打，话也容易说，唯独奖励这件事，却是长期都犯难。

秦国的人口一直直线上涨，战争打得也极多，需要奖励的人也多，每次奖励都要给出大片的土地，关中平原的土地根本不够奖，这才需要继续开疆拓土。物产丰富的巴蜀地区，也就担负了为秦国储备战略资源和消化人口的重任。大量的移民前去垦荒，大批的土地开始开垦，本指望着这片新开发的土地，能给秦国的征战大量补血，没想到接管没几年，却是让秦国大面积失血。

连续失了几次血之后，秦昭王终于坐不住了，得换个能造血的人，于是著名的李冰，走马上任为蜀守。而作为一位战国历史上杰出的水利学者，李冰新官上任后，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真相：想要蜀地补血，秦国必须要再次大放血一把：修水利！

于是，这个足以载入战国史册的水利工程，从此正式上马。修建水利工程主要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以都江堰鱼嘴为主，进行分水工程，在江心正中修筑一道鱼嘴形状的分水堤坝，也就是著名的“都江堰鱼嘴”，这是在之前中国水利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壮举。好比虎口拔牙，也只有这样的冒险，才能真正拔掉岷江这个“猛兽”的牙齿。“鱼嘴”修好后，岷江得以一分为二，同时内江上游岸边也有了一道保护江岸的堤坝，也就是“百丈堤”。整个的岷江水流，就这样被控制住了。

在成功锁住岷江后，都江堰的第二步紧锣密鼓：在岷江内江东安，打开玉垒山的石壁，从而引导江水东流，然后整个东流的江水，分成许多小的支渠，进入成都平原。从此成都平原的农民们，也就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江水灌溉。

但最为关键的，是其中的第三步：减淤工程。在岷江飞沙堰修筑起低堰，这个工程有奥妙，一旦洪水暴涨，他们将抵消掉洪水的流量，而一旦枯水的时候，它更可以挡水，让内江的水注入进去，以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旱涝保收。而这个特殊设计的水利工程，在完成之后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按照《水经·江水注》的赞誉说：“水旱之人，不知饥馑。”也就是从此无论水灾还是旱灾，对于巴蜀大地来说，基本都是无感，土地从此肥沃，旱涝从此保收，一直让秦国失血的巴蜀新国土，从此才真正华丽转身，成了秦国的粮仓。

那么这个水利工程的直接价值有多大？说个事就知道：秦国以其有限的国土和人口，却养活了几百万大军，特别是东进中原的征途上，一直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物资支持的，就是巴蜀大地。都江堰的功劳，可谓功不可没。

大礼包郑国渠

都江堰的完成，使志在一统的秦国，有了最足的底气，而一个天上掉馅饼般的水利工程，更叫秦国获得了最直接地掌控中原大局的操纵系统：郑国渠。

郑国渠，将今天陕西泾阳西北的泾水，引入到陕西礼泉县做渠口，然后沿着北山南路凿渠引水，利用西高东低的地理条件，把水向东流经三原、富平等地，整个水渠的长度，长达300里。看看它的流经区域就知道，这个水利工程，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关中地区，仅直接受益的良田，就多达4万多顷，在那个粮食比黄金还贵的战争年代，这个伟大的工程，说是让秦国一下子捞到了四万多顷地的金矿，都是毫不过分的。

但这样一个金矿，一开始其实是敌人白送给秦国的，干这个傻事的，就是长期被秦国欺负的韩国。

话说战国末年，当时的秦国，已经步步东进，一统天下已经成了时间问题。而首先遭殃的，就是韩国。为了免于灭顶之灾，急疯了的韩国国王，也就想到了这样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妙计：派最杰出的水利大师郑国进入秦国，说服秦国修筑这道水渠，使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无法东进。然而这个计划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看看这个工程的地理条件就知道，要修筑这样的水利工程，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根本就办不到，而最直接的劳动力，就是秦国的军队们。据一些野史的记载，秦国甚至为这个水利工程，投入了大约30万大军。看看战国的历史就知道，这段时间，也恰恰是横扫天下的强秦，一度被动挨打的时候，本该开疆拓土的军队，就在函谷关外烈烈喊杀声里，憋屈着在这里修水渠。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韩国这个“聪明”的计划却意外败露了。一起暴露的，自然就是正挥汗如雨的郑国先生的间谍身份。而当秦国准备一如既往，用酷刑来惩治郑国的时候，却听到了郑国掷地有声的疾呼：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而就在这样的疾呼中，这个

工程坚持下来了，而秦国也坚持了下来，并在这场工程胜利之后，取名为郑国渠。

这个工程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除灌溉了4万多良田外，更有一个超越历史的贡献：滚滚到来的泾水，带来的大量的泥沙，当地原先的盐碱地，从此彻底改变，原先一毛不生的庄稼地，彻底变成了良田沃土。这个伟大贡献，甚至超越了战国时代，惠泽了两千年来的代代乡民们。

二十四 没有战车的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内容，是诸侯争霸。诸侯争霸的主要方式，是漫长的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大变革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变革，不仅仅表现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更直观的是中国军队作战方式的变革。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传统战车作战的日益消失。

在周朝乃至春秋的大部分时间里，战车作战，一直是列国诸侯争霸战的主要方式。一个诸侯国有多少辆战车，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其大国地位的象征。比如春秋时代的传统大国晋国、齐国，就被称为千乘之国，成语“驷马难追”，也是以战车作为形容载体的。曾几何时，战车，是奴隶制时代中国战场决胜的最主要手段。战车实力的高低，对于列国诸侯的意义，不亚于今天高科技武器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

然而，当历史从春秋进入战国时代后，翻阅浩如烟海的战争史料，我们却不得不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战车日益消失了。虽然有关战车参战的记录，依然见诸各类战争中，但是它却越发不再以主流的身份出现，更不是战场决胜的关键武器。列国诸侯的争霸战争，不再以严密的队形、集团式的战车冲锋为主要方式，相反演变成“奇正结合”的多样化作战，兵者诡道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

春秋时代盛极一时的战车，究竟哪里去啦？

曾经霸道的战车

说到传统的中国战车，现代人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原因，是在有关春秋战国时代的影视剧和图画里经常看到，陌生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古战车的系统解读，可谓少之又少。

战车作战，兴盛于商周时期，到春秋早期，战车作战达到了极盛，无论从军事思想还是作战方式，都到达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这是当时最有杀伤力的高科技武器。春秋时代的战车，由4匹马来拉动，每辆战车上配属3个战士，一个负责驾车，一个负责射箭，一个负责持长戈和盾牌，能站在战车上的甲士，不是一般的士兵，而是贵族成员。每一辆战车都有严密的装甲保护，在广漠的中原大地冲荡起来，可谓锐不可当。与战车配合作战的是步兵，步兵的配合作战人数，从西周到春秋也日益增多。西周时期，配属一辆战车作战的士兵，大约有10名，到了春秋时期，配属一辆战车作战的士兵，却已经有了100多人。

对比同时期欧洲的战车，中国战车无论是在装备的精良程度，还是设计的精巧程度上，都远远强于这时期的欧洲人。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一辆装甲包裹的战车，具有高速的冲击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是整个战场上的最强武器。

与战车作战方式相对应的，就是中国人在战车作战中各类军事思想的日益成熟。春秋时代的战车作战，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攻防思想，包括战车的进攻防御队形、战车的扎营排列，都有非常严格的讲究。在早期的春秋争霸中，各国的军事家都在开动脑筋，考虑怎样增加战车的冲击力，比如晋国和楚国城濮之战的时候，晋国就故意用蒙上老虎皮的战车，向楚国军队发起冲击，一举冲垮了楚国的军阵，缔造了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从春秋中期开始，列国诸侯战车上的武器也日益更新换代。根据有关出土的文物和相关的历史记载，这时期已

经安装上了防护能力更好的甲冑。晋国人的战车上，在后来甚至装上了当时刚刚出现的远程弩。春秋时期许多著名的战役，都是大规模的战车决战，随着各国诸侯势力的强大，战车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战楚国时，晋国动用了全部兵力，却也只有700多辆。但到了春秋晚期，吴国与楚国在郢都外围交锋时，双方动用的战车数量，竟然高达2000多辆。曾几何时，战车，是列国诸侯争霸战场上最得宠的利器，攻城拔寨，无坚不摧。

然而，当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后，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在那些重大的战役中，战车的使用量越来越少，作用也越来越低，甚至在许多重大的战役中，完全不见战车的影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论原因，首先要从战车本身说起。战车确实是一种制胜的利器，但这种利器的使用条件太苛刻，必须要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哪怕地理优势稍微不利，出现陡坡或者丘陵，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即使在最能发挥战车优势的平原地区，在骑兵兴起之后，战车在野战中的劣势也凸显了出来。对比灵活机动的骑兵，战车的作战方式显得日益笨重了。尤其是在春秋早期，与窜犯中原的周边蛮族作战时，中原诸侯的战车部队，时常在游牧民族的骑兵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追不上人家，逃也逃不过别人，很多时候，都被人家当作骑射的靶子。

打仗毛病多不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够资格上战车的人，也越来越少。

有资格在战车上担任甲士的，不是一般的士兵，而是奴隶主阶级中的贵族，配合战车作战的步兵，多是临时征募的平民。这样的搭配方式，不只是一个军事问题，更是奴隶制度下的等级问题。但在春秋时代中国封建化的过程里，这个等级问题越发不复存在。奴隶主贵族数量的减少，使得战车的数量，也就相应地减少，平民地位的上升，也使原来作为战车仆人的步兵们，很难再听命于战车的调度支配。

然而这时期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更让乘战车冲锋越发成了找死。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在远程冷兵器研发上的突破成就，就是弩的成熟。从春秋晚期开始，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配备了精良的弩箭部队，在作战中“射住阵脚”，用杀伤力巨大的弩箭阻遏对手，成为许多军队的重要选择，而且这时期的弩箭，在射程和威力上都有了质的提升。电影《英雄》里的一幕或者虚构，但是战国早期韩国人制造的大型弩箭，就已经可以达到800米的射程。而且先前战车赖以保护的重甲，也不能阻挡杀伤力巨大的弩箭。这样的现实面前，想找死的人越来越少，战车也就越来越少了。

战车日益边缘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场的扩大。西周时期的战争，大多集中于黄河平原地区，那里是最适合使用战车的地方。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战场，已经由原先的单纯平原战斗，变成水战、山地战，各种作战条件并存。而且攻坚战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列国诸侯都把修筑城墙、堡垒工事，作为战争中越发重要的部分，在野战中更能发挥用场的古战车，自然变得无用。

越来越无用

战国与春秋相比，在军事上的最大区别，就是规模区别。

春秋时代，能动用上万人的战役，就是大规模战役，早期称霸诸侯的齐桓公，国内能动用的最多兵马，也没有超过6万人。但到了春秋末期，齐国、晋国这样的大国，已经有了常备军数十万人，秦国和楚国甚至更能募集百万大军。作战的方式也发生转变，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很单纯，大家把队伍拉到野地里打一场，谁输了活该。可到了战国时期，胜利方式就复杂多了，几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有时候更要通过漫长的消耗相持战。作战的内容，也更重视地利、堡垒、攻

坚，以及在运动战中通过“兵法”，分散敌人兵力，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在这样的局面下，传统战车的应用范围已经越来越窄，死抱着战车的人，只能越发迎接战败的命运。

公元前405年，韩赵魏联合攻齐一战，给了所有迷信战车的军事家以教训。韩赵魏三国的军队，是最早开始“毁车”的部队，这三家诸侯的作战方式，已经转向了步兵、骑兵、战车协同作战。而齐国却依然采取步兵护卫战车的作战手段，战斗的结果就是齐国3万人阵亡，2000辆战车覆没。战车，这个曾经的沙场利器，若用不好，反而会成为行军打仗的累赘。

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范围的扩大，使得诸侯们的军费开支也日益增大，财政负担更加沉重，原本的政府税收体系，早就不能满足战争的要求。几乎所有诸侯进行封建化改革的直接原因，都是要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提供战争的钱粮支持。《孙子兵法》里认为，如果一口气调动10万军队作战，每天的军费就要有千金；《战国策》里也曾说，一场万人规模的大战，无论是胜是败，仅损失的兵甲、马匹，就是“十年之田不能补偿也”。

然而与战车渐渐淡出战国擂台不同的是，战国时代，两种新的兵种地位日益重要——骑兵、弩兵。在战国后期的诸侯争霸中，实力上属于当时诸侯里“老大”“老二”的秦国与赵国，其实各自拥有其中一项兵种的优势，赵国的优势在于骑兵，秦国的优势在于弩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骑兵，但是在秦国先进的弩箭面前，赵国骑兵经常吃亏。华夏族的科技能力，在弩的研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使是列国诸侯中相对弱小的韩国，其弓弩的制作水准也是相当高的。韩国制造的大型弩，射程达到了800米。但在这方面，体系最完善的还是秦国，秦国弩的种类，平均射程、杀伤力，都是当时列国中最优秀的，秦国弩兵的射杀能力也远远强于其他诸侯国。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在历次征战中能够获胜，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新作战方式的产生，军事作战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秦国在军事作战理念上的创举，就是独创了弩兵射杀与轻骑兵快速突击相结合的战法。秦国军队临阵打仗，第一轮攻击往往采取弩箭发射的形式，用密集的弩雨压制住敌人。在敌人被射得阵脚大乱时，再发动最后的总攻。同时秦国的轻骑兵往往采取奔袭敌人后路，两翼夹击的方式，完成对敌人的合围。而胡服骑射后强大起来的赵国，也有自己独特的战法，拥有当时中原最强大骑兵的赵国人，往往采取用骑兵占领战场制高点，利用步兵牵制对手，骑兵居高临下发起冲锋的方式来冲垮对手。赵国和秦国两种不同的作战风格，反映到效果上，就是秦国常常做到成功包围对手，成建制地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赵国往往能做到用迅猛的打击击溃对手，迫使对手崩溃，但是很难成建制地消灭对方。

不同国家的军事战术，也是相互间学习的，比如秦国就是很善于学习的国家，秦军之所以强大，正在于他们不断地吸收别人的长处。比如秦孝公变法初期，与韩国发生了战争，缴获了韩国的劲弩之后，立刻自己研究，吸收其长处，开发出了威力更巨大的秦弩。在阼与之战中败北于赵国骑兵后，秦国也积极学习骑兵战术，但他们没有照搬赵国人利用气势冲锋击垮对手的作战方法，相反开发出了轻骑兵迂回的战法，即利用轻骑兵迂回包抄，切断敌人后路，形成对敌人的合围。在长平之战中，秦军的轻骑兵包抄合围战术，把赵国40万精锐送上了绝路。

战国时代的战争，不再以单纯地在野战中重创对手、确立强者地位为目的，战国时代的诸侯，追求更多的是要兼并对手的国土，实现自己的独大。所以在战国时期，城防战和攻坚战成为另一个重要作战方式，为了保障自己国土的安全，各国纷纷修筑坚固的堡垒，甚至是长城、壕沟作战，长城作战等防御手段纷纷盛行起来。为了打破对手的城防，各国也纷纷开发新的攻坚武器，比如可以击垮对手城墙的投石机，以及穿透对手重甲的重型弩，也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战车并没有消失

战国时代的军事革命，对中国之后王朝的影响，没有因为战国的结束而告终，相反更加深远。

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冷兵器时代的主战兵种，从过去的车兵变成了骑兵，特别是强大的王朝，其军队都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而原本作为主战武器的战车，其实并没有退出战争舞台，它很快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战国时代之后，战车的主要作用，往往体现在安营扎寨，架设杀伤力巨大的重型弩以及储存辎重物资。它成为一种合格的活动防御堡垒，而不再是进攻的坦克。而战国时代战争的演变，对于中国军事思想的另一个影响是：传统的“正战”，不再是战争决胜的唯一手段，相反谋略诡道兵法，却成为战争决胜的关键。中国人在战争方面的思想理解，更加成熟。战争成了一种活学活使的学问，而不再是单纯地拼蛮力。

二十五 法家宗师韩非子

公元前233年，秦国阴森森的监狱里，投进来一个特殊的犯人，他大约50岁上下，比起众多犯人入狱后的惊慌失措，他却异常平静，每天淡然地作息，甚至还跟狱卒索取竹简笔墨，时常写点东西。

这个人很奇怪，平日里话不多，偶尔一张口说话，就会把人逗得哈哈大笑，原来他竟然是个结巴。可每当有犯人取笑他的时候，狱卒们就会恶狠狠地上来，把取笑他的犯人暴打一顿。这样一来，也没人敢取笑他了，而狱卒们对他也很尊敬，饮食起居都照料得非常好，每天吃的，都是王室才享用的精美菜肴。

这个犯人就这样平静地住在监狱里，平静地写东西，平静地生活。直到有一天，秦国大臣李斯竟然亲自来看他。两人清退了牢中众人，神秘地谈着什么，犯人突然变得很激动，时而结结巴巴地申辩，时而不住地叹息。李斯却大多只是倾听，听到最后，却默默地把一瓶毒药拿出来，放在犯人眼前，摇摇头离开了。

犯人呆呆地坐在地上，许久才拿起这瓶毒药，反复端详后，终于悲愤地闭上眼，默默地喝了下去……

这个奇怪的犯人，就是战国学派法家的杰出代表，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韩非子怎么会到秦国的监狱中来呢？又为什么会被丞相李斯，逼得服毒自尽呢？

那就得说说这位在整个诸子百家群英中，名声响亮得振聋发聩的

人物。

韩非子，本名韩非，所谓“韩非子”，是当时人给他的尊称。他的出身很高贵，是韩桓惠王的儿子。教育背景也很好，老师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宗师荀子，在牢里给他送毒药的李斯，是荀子的另一个学生。他俩曾是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师兄弟。

说起他的成就，就必须先说说他的老师：荀子。

这位大师在当代教科书上，是个标准的熟脸。但是他的业绩到底有多大，大多数的教科书，却都没讲清楚。而不夸张地说，在整个中国儒家学说发展历史上，荀子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尤其重要的，就是思想的突破。虽然出身儒家，但荀子的思想，和其他儒家人物很不同，其中有“帝王之术”的观点，即怎样帮助国君建立强权的统治，驾驭文武大臣。

和其他儒家宗师人物比起来，荀子的这一思想，堪称十分另类：儒家在这件事上，最看重的是“礼”，也就是定规矩，只要人们自觉按照礼的要求去做，社会就能太平，世界就能繁荣。对这一点，荀子虽说同意，可却有一条补充——想要人人遵守礼，不能全靠自觉，关键是要靠管理！也就是“法”。也就是“礼”和“法”都要并重，所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正是荀子的真知灼见。

虽说荀子的这一主张，在百家争鸣时代，被很多儒家人物都曾批判过，但事实却证明了他的正确：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类变法运动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法”，每一个成功的变法，也都是彻底贯彻了法治的结果。仅从这条成就看，荀子已经把儒家的思想深度，完全提升了一个台阶，后来儒家思想可以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独尊的思想，对照下后来的学说就知道，好些都是荀子这时候打的底。而比这礼法更强大的，则是荀子的“天命”思想。如果说“法”这一条，还只是荀子对传统儒学的拓展，那么另一个重大思

想，却堪称儒学划时代的突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人定胜天。

综合来说，独具思考的荀子，以其无畏的勇气和特殊的视角，不但拓展了儒学的思想内容，更为这个学说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它的重大价值，在随后的两汉王朝中，会中国的儒学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放在当时，受他影响最深的，却是他两个最得意的学生：李斯和韩非。

对荀子的这门学问，韩非和李斯都很感兴趣。很快地，他们又对司法刑律等学问认真钻研，并系统学习了韩国法家学者申不害的思想。其学术流派，也逐渐变为法家。

在战国时期，法家学说是列国最受欢迎的学说，法家所倡导的建立君主集权统治，用严酷刑法治理国家的思想，很对各国君主的口味。而以强硬的法家思想来推动变法，更可以迅速实现国家富强，战国时期许多杰出的变法家，特别是促成秦国强大的商鞅，就是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但比起其他发家流派来，李斯和韩非又十分不同，由于受荀子的影响比较深，因此他们的思想，虽说也是以法家为主，却对儒家学说的相关理论，也吸纳利用极多。而且虽说思想相近，但学术贡献尤其大的，却当属韩非。

因为这哥俩的家庭条件，实在是太不同。韩非身为贵族，但并不得志。他的父亲韩桓惠王，对于法家学说并不感冒，捎带着李斯在韩国，也受到了很多排挤，苦熬了很多年，却依然不得志。心有不甘的李斯，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转道去秦国发展。

而和韩非比起来，李斯的最大特点，就是特别现实。这个性格，在他准备去秦国前，与恩师荀子的对话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去秦国，李斯的回答相当实在：人生在世，贫困就是最

大的悲哀，卑贱就是最大的耻辱，所以我要去秦国，一定要出人头地。比起那些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他就是这样现实。

但现实的李斯，在这条路上的决心，却异常坚定：这时的秦国，已经不是商鞅变法前急缺人才的年头了，相反是各国的人才蜂拥而至，竞争十分激烈。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斯不屈不挠，从最基层干起，先做了吕不韦麾下的一个小官，后来也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好不容易完成了几件漂亮的工作，官职眼看着要升，却不料爆发了著名的“郑国渠事件”。由于郑国打着修水渠名义来秦国搞破坏的阴谋败露，以至于气头上的秦王嬴政，做出了一个近乎无脑的举动：把所有在秦国的外来人全赶走！

对这种无脑行为，大多数的倒霉蛋，基本都是认命，但唯独不认命的还是李斯。反而捏住了秦王的心态，大着胆子做出了一次最后的努力，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把秦王这项无知的举动，从头到尾批了个遍，却果然批到了秦王的心坎里，不但成功完美逆转，说得秦王收回了这个错误决定，更是就此飞黄腾达，成了秦国炙手可热的权力人物。

当李斯在追求官位的时候，韩非却在追求学问。

虽说在韩国不得志，但韩非到底是个贵族，至少生活不成问题，不得志的状况，反而让他有闲时间，去进行深度的理论研究。如果说李斯好比一个正在权力场上厮杀的战士，那么韩非则更像一个认真的磨刀工匠，正数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学说打磨成熟，改造成这个年底最锋利的砍刀。

他的成果，就是独特的法家学术研究。

这正是韩非对于法家思想最重要的贡献，虽然在之前，法家学派早已风光无限，但所有的法家思想家，都是各有一套思想，韩非的作用，就是在博采众家之长后，开始对法家思想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

自己独特的观点。他的著作，总数有十多万字，包括《说难》《五蠹》《孤愤》等，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名作。

韩非虽然天生说话口吃，但他的文采，却好得惊人。他的作品通常气魄宏大，有奋发向上的精神，更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相反他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入手，潜移默化地阐述法家理念。

比如他的《孤愤》，是讲两种法家的精英人物，一种是有才智权谋的人，这种人能够明察秋毫，洞悉人心；一种是刚正执法的人，这种人执行力强，能够推行法律。韩非除了提醒统治者要善于选拔人才外，更提醒统治者要提防大臣，防止大臣专权乱国。

而他的《五蠹》，则把儒家学者、纵横家、贵族家门客、工商业者、游侠，称为五种危害社会安全的蛀虫，是需要统治者防范，并用法律来打压的。而《说难》，则是一篇法家的技术性文章，讲述怎样用技巧说服统治者，接受法家的政治主张，包括怎样揣摩统治者心理，了解统治者好恶等内容。此外，他还提出了法律面前平等、奖励耕战等主张，在当时也有进步意义。这些文章，大多收录在他的文集《韩非子》中，是先秦散文的杰出代表。

韩非的文章广为流传。连秦王嬴政都知道他了。看过他的文章后感叹说：“我如果能见到这个人，死也不遗憾了。”这时韩非的师弟李斯，也成了秦王嬴政的重臣，他给秦王嬴政献计，先大举攻打韩国，然后逼迫韩国派韩非来求和。

秦王嬴政立刻照办了，如李斯所料，不堪一击的韩国，果然把韩非派来觐见了。这是韩非人生里最重要的一场会面，他向秦王嬴政畅谈法家思想，虽然说话口吃，却依然得到了秦王嬴政的敬重。韩非也趁机向秦王嬴政表明了心迹：愿意把毕生的才学贡献给秦国，帮助秦国一统天下。

但对韩非的理想，秦王嬴政却很犹豫，还没等他拿定主意，李斯

却坐不住了。他虽然和韩非是师兄弟，但韩非出身才华，都远比他强，一旦韩非被重用，自己肯定要被冷落。偏巧这时候，韩非又得罪了秦国另一个重臣——外交家姚贾。这个姚贾曾多次游走列国，拆散各国抗秦联盟，但此人性情贪婪狠毒，他的身份是“纵横家”，也是韩非最厌恶的“五蠹”之一。于是，很自然地就结仇了。

李斯和姚贾一拍即合，开始造谣中伤韩非，先是姚贾劝秦王嬴政说：“韩非是韩国人，做事肯定要为韩国考虑，您要用他就坏事了。”就是在姚贾中伤后没多久，韩非果然建议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应该先消灭赵国，不该打弱小的韩国。这本是为秦国统一天下着想的深谋远虑，但生性猜疑的秦王嬴政却坐不住了，他反而下令把韩非投入监狱。含冤入狱的韩非，在狱中写了大段的自辩，渴望能面见秦王嬴政申冤，但李斯却不给他机会，他偷偷给韩非送去了毒药，申冤无望的韩非，只好自尽在狱中。可巧合的是，就在同时，秦王嬴政后悔了，他连忙派人去牢狱释放韩非，但已经晚了。

韩非的死，表面看是因为李斯等人的陷害，但归根结底，却还是因为他的身份，如他在著作中所说：“那些拥有超凡眼光和卓越能力的大臣，恰恰是君主需要提防的。”然而韩非自己，正是这样的人，又碰上性格猜忌的秦王嬴政，他的悲剧也已注定了。

二十六 最后的辩者：鲁仲连

战国时代有一个群英璀璨的群体，那就是游走在列国之间的辩士们。

这些人中有的气宇轩昂，有的却也其貌不扬，但却是清一色的能言善辩。从连横的张仪，到合纵的苏秦，乃至完璧归赵的蔺相如，都有太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流传。在之后的两千年间，深深激励了代代国人。

在有关他们的故事中，他们的风光辉煌，有时候显耀得近乎神话，总是云淡风轻几句，就能刹那间将杀机化为无形，甚至覆雨翻云，扭转乾坤，寥寥数语，就能奇迹般启动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如其中优秀人物张仪所说：只要舌头不烂，我就有翻身的本钱。

可伴随着战国历史的演进，这类风光的舌辩之士，出彩的机会却越发稀少。如果说在连横合纵的高潮年代，他们都是多次抢镜的明星人物，那么随着秦国强大地位的形成，特别是长平之战后，秦国统一天下的脚步进入了加速度阶段后，那些伶牙俐齿的辩士们，虽说也涌现出过毛遂自荐的奇迹，但真正的作用，却已逐渐弱化。这里面真正的原因，却并非人才断层，而是时代变了。当天下一统的脚步加速，列国之间最后的客套也已不复存在，赤裸裸的厮杀成了主旋律。所谓舌辩之士，用武之地也越发稀少。所以到了战国时代的尾声，昔日风光无比的辩士，早已沦为了打酱油的角色。更伴随着秦朝统一天下的

历史进程，沉默地埋入历史烟云中。比起当年连横合纵时期的星光灿烂，这时的辩士们，面孔早已大多普通。

但偏偏就是这个辩士行业十分萧条的时代，后来出名眼界奇高的唐朝大诗人李白，却独独对一个人，表达过由衷的赞美。在其名作《古风》中，以一句流传千古的佳句，抒发了对其无与伦比的敬重之情：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这位连李白都认定“高妙”的辩士，正是齐国舌辩家：鲁仲连。

齐国，这个曾经啸傲中原，甚至一度与强秦并肩的强大帝国，虽然自战国中后期起，就仿佛一颗迅速坠落的流星，不断地加速度堕落：国力越发地衰弱，昔日曾经能和秦国叫板的齐王，更彻底沦落为秦国的小弟，只知死心塌地听秦国的话，直到仿佛一块案板上的弱肉，被王赧的几十万秦军一举砍平。但如此悲催的亡国，依然无法掩住这位齐国辩士的风姿。在几百年后的李白眼中，正是他以坦荡的胸襟和侠义的风骨，为齐国这段悲情的沦亡，留下了一抹夕阳般的亮色。以至于多么苛刻的后人，在他的风采面前，依然由衷地赞叹。

一纸文书百万兵

鲁仲连，又名鲁连，战国时期齐国茌平人。尽管今天对他的记录，已经十分简略，就连他的生卒年，正史上只给我们说不详，野史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作为稷下学宫培养出的杰出辩士，他是最后更是最杰出的一代。而且以“出名要趁早”的标准看，生卒年不详的鲁仲连，却绝对符合这条。他名满天下的时候，还是个12岁的翩翩少年。他出名的方式，则是横挑当时享誉齐国的辩士老前辈：田巴。

田巴这个人，在今天不太出名，但在当时却十分有名，是当时享

誉东方六国的杰出辩士，素来以思想激进外加口才犀利著称，属于天生战斗型人才，只要上了辩场，火力就出名地生猛。

而且这人除了猛，还特别招恨，普天之下几乎就没他不敢骂的事，包括华夏民族素来信仰的三皇五帝，更是说骂就骂毫无负担，且还是变着花样地骂，尤其是当着几千人的面，火力生猛地来回骂，把一群人说得无言以对，憋着气看他表演。

这样的人物，放在哪样的年代，都是让人最想打的，可他的光辉大名，传到12岁的鲁仲连耳朵里，鲁仲连却十分兴奋，立刻自告奋勇赶来，要和这位出名辩士一战。

12岁毫无战绩的小朋友，挑战名声在外火力生猛的老前辈，不出意外的话，这是一场近乎没商量的惨案。因此本着同情或看热闹的心态，好些人都齐聚稷下学宫，打算亲眼目睹这预料中的凶残一幕，孰料，却看到了令他们终生难忘的景象。

少年老成的鲁仲连，落落大方地走到了田巴面前，既不摆造型撑场面，更不引经据典扯大道理，只是不紧不慢，说了一句和风细雨的话：现在楚国正兵临齐国的南方，燕国也正兵临齐国的北方聊城，十万火急的时刻，先生您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没办法的话，就请您这辈子里都别干这行了。

只这一句质问，就立刻制住了田巴的要害，当场就吓得田巴满身冷汗，吭哧半天说不出话来。这番意外冷门，当场就把现场观众全都看傻，但更逆天的场面，却还在后面：田巴当场表示，永远退出辩士这行当，终生不再开喷。

为啥这么逆天，因为和后世不同，那年头的辩士，都是务实的人才，所谓的辩论绝不是为了抢风头，相反却是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因此一旦落下只会耍嘴皮子的印象，那就干脆别干这行了。而田巴事后的表现更证明，他更有职业操守。事后非但不恨鲁仲连，相反在各

种场合，极力赞扬这位少年的惊天才华。特别是当着鲁仲连的老师徐劫的面，更是好一顿夸奖。

如此夸奖，也正是因为鲁仲连这看似不温不火的表现里，却透着一个惊天的能力：仅仅通过几下观察，就能轻松找出对手的弱点，并且在短短几句中，更可轻松捏住对方的心态。这份揣测心术的本事，几乎强大得逆天。

小小年纪就能猜人，等着年龄大了，这份本事更出落得青出于蓝，最强的一条，就是断事。也正是这个强大的本事，让他在那场事关齐国生死存亡的浩劫中崭露头角：齐燕大战。

当时的情况是，齐国一开始被燕国猛打，一气丢了70多座城池，后来总算在即墨大战中挺了过来，堪称再造齐国的名将田单虚虚实实来了个火牛阵，硬是把燕国又打了回去，随后齐国转守为攻，开始了轰轰烈烈收复失地的大反攻。对当时的形式，正在缔造拯救齐国历史的田单，自我感觉尤其好：当年凭借小小的即墨，就能灭掉燕国的倾国精锐，而今攻守易形，顺利收复国土，还不是摧枯拉朽？

谁知高歌猛进间，却骤然碰上了一个硬钉子：狄邑。

对这座志在必得的重镇，田单高度重视，以至于极度自信的他，战前还专门慕名拜访鲁仲连，美其名曰求教，其实却是炫耀：即墨我都救下来了，小小一个狄邑凭什么打不下来，求教你那是看得起你！但鲁仲连的反应，却是相当不识时务，面对自信满满的田单，他却反反复复，表现出一种让田单十分糟心的态度：打狄邑，你没戏！这下可把田单惹得不行，可是身为名将，架子还是要端着，因此忍下一口气憋屈着走了：你说没戏，我就打给你看看！

谁知后来的事情，却真个无情地验证了，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士气高涨的齐国大军猛打死冲，能用的招都用了，却是损失惨重，连狄邑的城砖都没敲下一块。计划内高歌猛进的大战，却一下栽了个大

跟斗！要说名将到底是名将，田单虽说起初态度很狂，但真碰得头破血流，却也算清醒，立刻拉下面皮，再次到鲁仲连处登门求教，鲁仲连这下继续不客气，直接把田单骂得狗血淋头：当年你守即墨的时候，几乎是身先士卒，激励得全军士气高涨，现在你地位变了，成了大功臣了，却是处处摆架子，举手投足傲慢无比，你自己说你的军队哪里还有啥士气？

这话一说，田单恍然大悟，紧接着第二天早晨，照着鲁仲连的谋划，只做了一件事，就重新激励起这支军队的铁血雄心：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身穿一身战甲巡视军营，且认真慰问士兵，特别是对伤兵嘘寒问暖，立刻激得全军再度信心满满。而后的齐军，立刻精神焕发，进攻仿佛洪水猛兽一般，把顽强抵抗的狄邑，立刻打得狼狈不堪，轻松顺利拿下！

经过这件事情的田单，对鲁仲连也敬佩得不行，可如果说打狄邑，只要靠激励士气就行，等碰到重镇聊城的时候，这招却也玩不转了。作为燕国军队负隅顽抗的最后一个重镇，聊城不但囤积有燕国的精锐，而且还有名将燕冲坐镇。这位继乐毅之后燕国又一位铁血将军，在这场绝望之战中，展示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整整一年的时间，令齐国一步不能前进。

面对如此强悍的敌人，田单再次想起了鲁仲连，专门把他请来。可比起上次的狄邑来，这次的困难，却简直堪称平方版。燕冲身为一代名将，立场和决心都十分坚定，率领的士兵们，也几乎把这一仗当成一场必死的绝望之战，杀伐都无所畏惧。对这群无欲则刚的强人，劝降没有，强打没戏，除了干耗，似乎别无办法。

鲁仲连有办法！

一直以来鲁仲连的风格，就是能把一个人的心思拿捏到极致。这次也一样，在接受这次艰难任务后，他就已经对燕冲此人，有了非常

深刻的了解，知道这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热血汉子，并非高官厚禄所能引诱的。因此对症下药，写了一封水平极高的信。

在这封信中，鲁仲连既高度赞扬了燕冲忠诚铁血的精神，但同时也给他指出一个无情的现实来：如果你继续坚持顽抗，那就是不义之战，但如果你开城投降，就是对燕国不忠，因此不管你投降还是打，不忠不义这两条，你都至少要占一条。而且也正是在这封信中，鲁仲连不但展现了自己犀利的词锋，更有挥洒的文采，整个书信写得感人肺腑，句句敲击心坎，以至燕冲边读边抹眼泪。可问题来了：尽管你写得再感人，可你到底感动完了，想要燕冲咋样？

事实是，鲁仲连早就判定，燕冲在被感动后，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果然在燕国三军士兵惊愕的注视下，刀光剑影面前从无退缩的燕冲将军，抹了一把滚烫的热泪后，立刻慨然拔出佩剑，然后在闪闪的寒光中，毫无惧色地往脖子上一抹，刹那之间，血红的颜色布满了将士们的眼帘，这位血战一年不曾退缩的热血汉子，就像一座轰然倒塌的铜像一般，壮烈地终结了自己钢铁般的生命！

聊城，这座绞肉机一般，洒下齐燕两国士兵多少血泪的顽固城池，就这样一封书信，轻松平定。而一封书信鼎定大局的鲁仲连，也至此彻底名满天下。

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怒喝

作为一位名满天下的辩士，鲁仲连另一个值得赞叹的地方，就是他的信仰。鲁仲连的最重要信仰，就是极度痛恨虎狼一般的秦国。特别是在战国晚期，那个列国人才争相投奔秦国的年代里，他依然保持着对秦国的厌恶。正是这种厌恶，令他在赵国，上演了一番几乎改变历史进程的痛骂表演。

公元前257年，参考下战国历史就知道，经历过长平之战的赵国，这年正是雪上加霜的时候，被秦国重兵围城，眼看就是要城破国灭的模样。当时的局面，万分地凶险，后人耳熟能详的典故，也是尤其地多，最有名的当属信陵君窃符救赵，仅次于这事的，还有毛遂自荐。

但是如果没有鲁仲连的那一声吼，这几件有名的事情，几乎都堪称无用功。因为就在信陵君等人，在为窃符救赵忙活的时候，秦国的一个阴谋，已经紧锣密鼓地计划着。客居邯郸的魏国将军新垣衍，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秦国的说客，出面劝说赵孝成王：何必要抵抗呢，秦国要的不过是个面子，你给个面子不就得了，尊称秦昭王为帝，这样秦国不就撤啦？

这个建议在早已灰心丧气的赵王心中，可以说是极有诱惑力：对啊，不就是个名分吗？总比继续打下去玉石俱焚要强。于是赵孝成王真个心动了：要不咱就这么办？

而这表明轻松的台阶，其实也正是秦国的大阴谋：倘若赵国和秦国，真的确立了这样的君臣关系，也就确立了秦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此之后，他们就完全可以以此为口实，继续肆无忌惮地侵占赵国的土地。以前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这下却成了耀武扬威的主子。算盘打得极精。可如此精明的算盘，就算大臣们看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关键一条是，魏国等主要国家，也都积极支持，邯郸打得水深火热，他们也是提心吊胆，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要赵国低头认了这^屎，秦国也就能消停个三年五载，至于以后呢？先应付眼前再说，哪里还管得了洪水滔天。

总之，倘若这件事办成，秦国就毫无疑问，又啃下了一块大肥肉，一统天下的步伐，必然就会加速度。

可就是在这个历史时刻：鲁仲连横空出世了。

他专门来到了朝堂上，就像当年舌战田巴一样，这次他的态度更加暴烈，在赵国的朝堂上，一件一件历数秦国欠下的各类血债，把秦国的虎狼性格，揭露得淋漓尽致不说，更掷地有声地扔下一个誓言：吾不忍为之民也！就是死，也绝不做强秦的百姓！

他的这番慷慨陈词，仿佛一阵响亮的耳光，顿时打醒了赵国君臣上下：是啊，他一个齐国人都如此激动，我们为什么要**屎**？

长平的血债历历在目，几乎每一个邯郸的家庭，都在对秦国的战斗中，失去过至亲和骨肉，承受过家人离散的痛苦，当长平大战的败报传来的时候，赵国上下家家号哭，那悲惨的景象难道就忘记了吗？

难道就这样认命，乖乖地引颈就戮，迎接秦国随后到来的征服和屠杀？难道就这样丧失掉最后抵抗的勇气，低三下四地接受做亡国奴的命运？要知道赵国，从来都是以铁血刚勇著称，当年一个小小的晋阳，都可以扛住智家的铁壁合围，当年在缺衣断粮，整个城池甚至被大水淹没的时候，都从来没有屈服过，难道今天，赵国人就要低下高贵的头颅？

在鲁仲连近乎残酷的痛骂中，所有的赵国人，心都似滚滚开水一般沸腾，先祖往昔铁血的勇气顿时复苏。整个邯郸城，在一片残破和血泪中，从百姓到士兵，每个人都几乎强忍着疼痛站立起来，血红的眼睛望向了凶神恶煞的秦兵：来吧！

满以为算盘如意的秦军，就这样看到了惊愕的一幕，在近乎绝境的邯郸城上，守城的军民们骤然爆发出了无比的勇气，和潮水般汹涌攻击的秦军，展开了最后也是最决死的大战。也正是这样惨烈的厮杀，极大地震撼了原本还在观望的魏军。那声声传来的喊杀声，更似一股疯狂传播的热流，瞬间激起了赵魏战士们共同澎湃的死战之心：窃符救赵的壮烈场面，就这样如闪电一般爆发，将气势汹汹的秦军，瞬间打回了原形！

在这场赵国灭顶之灾终于解围后，被鲁仲连激起血性勇气的赵国人，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位大师杰出的才华，但接下来令赵国人动容的，却还有他高贵的品质。

在赵国的庆功宴上，为了表达对鲁仲连的感激之情，平原君特意安排，使人送来了千两黄金。可面对这黄澄澄的财富，鲁仲连的脸皮都不眨一下，反而轻轻一笑，说出了一番闪光的豪言：对于天下士人来说，真正的价值是帮助世人解决苦难，而不是追求财富，否则我们不是和商人没有区别了吗？说罢，他拱手告辞，飘然远去，留给赵国人的，就是这最后高风亮节的神迹。

然而这样的行为，对于鲁仲连来说也是正常，更是他与苏秦、张仪等人最大的区别，当绝大多数的辩士，都在为建功立业的目标奋斗时，鲁仲连却有着更加飘然高远的追求，他所追求的，绝不是个人的荣耀辉煌，相反却是心中一直奋斗不息的信念。为了天下的大义，他可以甘冒险地，出生入死，又可以功成不居，飘然而去。

其实平原君哪里知道，早在当年辅佐田单时，鲁仲连真正出名的，就同样有这番高贵的精神，他的这两次主意，帮助齐国击退了外侮，如此惊天功劳，也令田单十分赞赏，更许诺了高官厚禄，可面对如此大好前途，鲁仲连更是眼皮子都不眨：早在田单攻打聊城的时候，他就因为鄙视田单屠城的行为，决定和他分道扬镳。因此当齐国度过危机后，他便不顾田单的挽留，执意归隐东海，留下一段轰动列国的传说。

扑朔迷离的结局

在《史记》的记录中，成功激起邯郸血战勇气的鲁仲连，在这次绝唱般的演出后，就选择了归隐。

他归隐的地方，叫作“东海”，根据《太平御览》等书的记录，应该是在山东桓台境内的马踏湖。而不管确切地点在哪里，归隐的鲁仲连，也留下了不少美丽的民间传说，曾有说他纵舟于湖上，也曾打鱼垂钓，生活十分悠闲快乐。但他生活的年代，却注定不是个悠闲快乐的时代，特别是他的祖国齐国，也很快就要迎来覆灭的命运。

然而在诸多关于鲁仲连的民间野史传说中，其中最为壮烈的一个结局，也和当年他在邯郸的那场表现有关。当时痛斥秦国的鲁仲连，留下了“义不帝秦”的豪言，宁死不会做秦国的顺民。在齐国覆灭的消息传来后，以很多野史的说法，隐居在桓台的鲁仲连，也选择用一种最壮烈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誓言：当场老泪纵横，继而仰天长啸，声称自己绝不辜负那个誓言，然后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跳入茫茫湖中。

这个在正史中未曾确认的结局，对比那个时代辩士们的命运，却更像一代理想主义者们的绝唱。

二十七 稷下学宫，东方的 雅典学派

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巨匠拉斐尔，曾有震撼世界的壁画力作《雅典学派》。

在这幅宽近8米的煌煌壁画上，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包括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50多位古希腊思想文化巨匠，他们或高谈阔论，或精心演算，或慷慨激昂演说，或群情兴奋鼓掌。整个古希腊时代风云际会的先哲人物，不同年代、不同流派的文化，就这样跃然于画上，仿若历史风云再现。其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与人物场景布局能力，引得一代代欧洲人叹为观止。

这幅构造精心、技法高超的壁画，仿佛一个历史废墟上拔地而起的舞台，把整个古希腊时代所有的明星人物生动呈现。一代代的观赏者们，无不流连忘返，惊奇不断。该给的赞美荣耀，几百年来都给了。

当然，与其说他们惊叹壁画，不如说他们犹如身临其境，惊叹那个诞生了欧洲文明的古希腊时代。

而相比之下，中国战国时代的文化荟萃，非但不逊色于这个欧洲人为之神往的时代，甚至好些方面的技术含量，包括思想的先进程度与科学文明的进步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诸子百家的激烈争鸣，各个流派独具特色的思想，不但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战国文化，甚至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深深震撼了欧洲。就连法国大革命

的宣言词，都引自儒家思想那句耳熟能详的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正如鸦片战争开战前，英国国会辩论里的一句话：古老中国的文明，他们的百家争鸣，其成就丝毫不在我们知道的古希腊文明之下。而作为足以比肩古希腊文明的战国文化，与《雅典学派》画卷中的虚拟场面相比，却有一个承载的真实舞台。在这个地方，不同学派的文化，得以自由辩论，激烈交锋，仿佛剧烈的化学反应一般，生动催进了中国历史的演变。

这个中国舞台，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

又一个齐桓公

稷下，本是齐国国都城门的名字。战国初年，田氏代齐后的第三代齐国国王田午，在此设立学宫，因此得名“稷下学宫”。

说起这位田午，名声并不太响亮，但说起他的尊号，却是赫赫有名：齐桓公。虽然和春秋时代雄霸天下的那位齐桓公比，此齐桓公没有这么霸气，但知名度却也毫不逊色，最出名的事件，当属“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里面那位讳疾忌医，有病不早治，病入膏肓追悔莫及的愚蠢国王“蔡桓公”，正是这位齐桓公——田午。

由于这段死得窝囊的经历，因此两千年来，此君一直被历代学者当作反面教材，“讳疾忌医”的名号流传得极广，特别到了言路通畅的宋明两朝，刚直敢言的臣子上书骂皇帝，都常拿他出来说事，翻翻各类慷慨激烈的奏折，此君的出镜率相当高。

就是在这样的口水纷纷里，他另一样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业——创建稷下学宫，却也被默默地掩盖。

这个业绩有多伟大？这不单单是世界上第一所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更是后来战国百家争鸣的土壤。战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流派，几乎都植根于此，开花结果繁衍生息。思想文明高度繁荣的战国时代，齐桓公正是最早的耕耘者。当然最初创办这高等学府的时候，齐桓公真没想得这么长远，也没太多伟大追求。他开创这历史创举，还是为了齐国自身统治考虑。

在战国七雄里，齐国王室的出身极为特殊，既不是韩赵魏这样的分家国家，更不是秦楚燕这样的春秋传统豪族。他们属于借着齐国的壳，建立了田家的统治，名分十分不正。那么为了证明自家统治合法性，除了要富国强兵，更得撑起思想大旗。

那咋证明呢？篡了齐国王位的田氏家族，出身于陈国。而道家创始人老子，同样也是陈国人。这下事情就好办了，高举起黄老学说的大旗，更把田家的祖先，追尊到黄帝，把老子的黄老思想，牢牢树立成齐国的国策，那就名正言顺了：我们田家秉承黄老思想，源流于黄帝，身份根正苗红，别说统治齐国，就是称雄天下，也是天经地义。

这个思想宣传，从田氏代齐的第一天起，齐国就一直在努力。而到了田午这一代，由于此君得位也不正，靠杀害其兄长齐废公田剡上位，登位之后更是四面风雨飘摇，这个传统宣传工作，更得进一步加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办学宫。弄个大学宫，召集各方名士，反复宣讲齐国思想，树立自己名正言顺的身份和伟大形象，岂不更加快速方便？

于是稷下学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当然最早的稷下学宫，还没有后来那么繁荣，主要都是黄老道家学说的舞台，这一类在学宫里讲学的学者们，也被称为稷下学派。他们主要的任务，除了阐述议论，就是整理春秋时代遗留的各类学说资料。学宫里的辩论，也基本都是秉承大王的意思，做一些大王喜欢的

研究，但比起后来的空前规模，还是相对冷清。但即使在这相对冷清的年月里，真正被齐国上下公认的，却是稷下学派无可争议的地位。能够成为其中一员的学者，都至少是在齐国声名显赫的人物，不但学问名望都是硬实力，身份受人尊重，待遇更是士大夫级别。其在政界的话语权，也是出名地大。

最典型的事件，例如曾经入选中学课本的《齐威王一鸣惊人》：初登位的齐威王，还是个不靠谱的浪荡公子，成天吃喝玩乐，眼看齐国的国事风雨飘摇，就要到被吊打虐打的节奏，却是稷下学派的名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循循善诱地给齐威王讲了个故事——有一只大鸟，本该威武雄壮，可是长大之后，却是九年都没叫唤一声，大王您说这是咋回事呢？齐威王立刻心领神会，从此幡然真做，造就了齐国强大。“一鸣惊人”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

多年以来，这个故事一直用来形容淳于髡的聪明，或是齐威王的胸怀，但其中透露最重要的真相是：作为战国新生事物的稷下学宫，从诞生早期起，就拥有这样强大的话语权，稷下学士们不但拥有崇高的地位，更有着让国王都肃然起敬的权威。

就在这样的尊重与发展中，早期的稷下学派欣欣向荣，很快从初生的小苗长成参天大树，成为齐国大国地位的生动招牌。

但是从齐宣王起，这个原本就光鲜的金字招牌，身份竟再次华丽转换，原先是棵招牌树，这时却变成了招纳各方“神鸟”的奇树；原先以齐国的黄老思想为主，学者也主要是老子学派人物，这下却成为诸子百家各个流派的聚焦地。一个学宫，竟这样成为诸子百家发展壮大的温床，仿佛一个聚拢了巨大能量的火山，喷涌出汹涌的战国文化烈焰。

这个角色转换，又是怎样来的呢？

齐宣王的妙笔

稷下学宫的角色变化，以《史记》里的说法是这样的，“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也就是说，在齐宣王的改革下，稷下学宫从此打破了学派的界限，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各个流派的名士。各路名流人物都给予崇高地位，享受上大夫的待遇，且权力还极大。所谓“不治而议论”，就是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但是要参政议政、建言国事。在这样的大力扶持下，稷下学宫进入了其黄金时代，最热闹的时候，规模已有了千人之多。

如此华丽的转身，自然不只是因为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更深的追求，则是齐国的大国梦想。

这时候的齐国，状况和当年田午时候已经大不相同，不但是田氏家族王位稳固，其综合国力更蒸蒸日上，到了齐宣王执政的时候，齐国已经从中原六国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原唯一一支可以和秦国争雄的力量。战国的争霸战争，也正进入到另一个白热化阶段：齐秦两强对峙时代。

在战国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一个国家如果要成为争霸的主角，那就需要抓两件事，众所周知的一件是战争，有了强大的军力才有超群的国家地位，但另一个与战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抓文化。

看战国时代的发展脉络就知道，每个时代称霸诸侯的国家，也同样是这个年代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国家，以最早实现变法自强的魏国来说，一个魏国所云集的，几乎包括了当时战国所有的精英人物，而等到秦国和齐国也通过变法自强，后来居上时，其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也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成就。

在这个问题上，齐宣王是深受过刺激的，在他与秦国的几次较量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什么六国的人才都往秦国跑。经过痛定思痛后，他把改革的对象，放在了稷下学宫上。这个已经有了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不能仅仅是个门面工程，它更应该成为齐国繁衍孕育人才的温床，吸纳列国优秀人才为齐国服务。

在这样的强大追求下，稷下学宫各方面的条件，骤然升级。首先是待遇提升，比起以往来，那更是强得不能再强。以齐威王之前的话说：人才就像珠宝一样珍贵，列国争霸的关键，就是“得士则昌，失士则亡”。所以稷下学宫能否招揽到名士，这不只是个面子问题，更是个国家兴亡的问题，下的本钱也自然要更大。

于是，稷下学宫的待遇，立刻优厚得令天下人眼热。以《史记》的形容是“高门大屋尊宠之”，也就是要钱给钱要房给房，具体到每位名流身上，更是各个一夜暴富：比如田骈，不但享受上大夫待遇，而且门下弟子上百，全由国家包养。孟子不但高官厚禄，连出门也特别风光，每次都是数十辆车马，外带数百人跟着，场面十分壮观。而且这样的待遇，也是分等级的，不同的学者根据其学派声望的不同，享受不同等级的待遇。也就是说，在稷下学宫能获得怎样的礼遇，不只是个生活问题，更是个身份认证问题。只要在稷下学宫有过风光日子，名满天下的身份，就算是确立了。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稷下学宫礼遇这些学士，也自然有其要求。而恰恰这一条，才是比待遇更吸引各路名流的原因。稷下学者的职责，同样照前文所说，就是“不治而议论”，也就是不负责具体的行政责任，但是需要为国家大事提供自己的思想和建言，这就等于既给了他们说话的权利，更给予了学者敢于说话的保护。包容，才是稷下学宫超越了战国时期其他国家之处。

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平台，接纳一切学派的思想，允许学者们畅所欲言，更给他们以准确的定位，在这里不仅有良好的待遇和崇高的

尊崇，还不用担心会如同在秦国这类国家那样，不幸卷入政治倾轧中。如果说同时期的秦国，给列国人才提供的地方是战场，那么稷下学宫，却是一个更加适合学问研究的世外桃源。当然，比起秦国这类国家政坛上的刀光血影，稷下学宫里也照样有战争，这里的战争，就是“吵架”，也就是辩论。

作为一个专业研究学问的机构，稷下学宫每天的日常工作，除了对于学术典籍资料的书写，就是不同思想之间的交锋争论，自从齐宣王时代，这个新兴学府实现华丽转身之后，这里就变成了诸子百家争锋的战场。在战国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任何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主张和治国的理念，但并不是每个学派，都有真正付诸实践的机会。那么一个学派如果要得到更多的认同，甚至得到一展抱负的平台，那么在稷下学宫取得话语权，就是必须要经历的磨炼。

由于这一特殊职能，稷下学宫自齐宣王时代起，就吸引了整个战国时代的眼光，不同的学派掌舵人不远万里而来，不只是艳羡这里良好的学问条件与宽松的环境，更是不能放弃这一展示自我的机会。

另一群渴望展示自我的人们，就是列国的政治家。

自从齐宣王时代起，战国历史进入了连横合纵相互交锋的阶段，作为仅有可以抗衡强秦的东方大国，齐国也自然成了两种不同思想交锋的战场。列国之间的出使活动里，齐国就是重要的焦点地区，而稷下学宫的辩论舞台，更成了两个不同学派之间的交锋场所，唇枪舌战的局面，几乎每天上演。

对这火药味十足的“战火”，齐国的统治者们却十分受用。而这一条，也是稷下学宫得以成功的一大条件，与强调专制的秦国不同，齐国一直有兼容并包的传统，尽管齐国自身的治国思想，偏重于黄老学说，但是这种思想传统决定了，齐国并不是一个用专制和强权压制言论的国家，恰恰相反，齐国行政的一大传统，就是擅长从不同思想的

交锋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学说理论，正是这样的目标，成了稷下学宫热闹的催化剂。

于是，在稷下学宫的黄金时代里，这里几乎云集了所有战国知名的学派：儒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而更有意思的是，不但是各个学派林立，而且很多学派更是派中有派；不但有学派之间的相互辩论，甚至同一个学派内部，也常有激烈的观点交锋，而且更常见的情况是，对于齐国当时的各种国策，凡是看不过去的地方，稷下学宫的学者们也都常大胆建言，“打脸”齐国国君的次数，也是相当多。

稷下学宫的辩论活动，主要以政治军事为主，但同样可贵的是，其他各行业的辩论，也都非常热闹。甚至包括天人道理、五行八卦等学问，科学活动也十分热闹，比如战国一些著名的天文数学成就，都是在稷下学宫里完成的研究工作。而在这一点上，齐国的统治者们同样也非常开通，凡是来到稷下学宫的学者，虽然要为齐国的政治服务，但并不强求学者们一定要按照齐国规定的路子研究，相反是自由发挥，擅长哪个学派，喜欢哪一种思想，哪怕和齐国统治者的思维冲突，也是尽可能地包容，允许学者们按照自己的思路，走自己的道路。

以《尸子·广泽》的说法：“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其学之相非也。”也就是说，诸子百家各有各的学问，而来到稷下学宫，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向去学，齐国统治者只是从中选择自己有益的地方学习，并不强硬打断。

如果说战国的诸子百家，好比百花齐放，那么稷下学宫，就是最好的土壤。

造就齐国强大

齐国的这番苦心，从稷下学宫的热闹场面来看，确实没有白费。

这些分属各个派系的稷下学者，思想主张不同，但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建功立业的追求，因此在稷下学宫这个特殊平台上，他们也牢牢抓住机会，展示不凡的自己。仔细看看稷下学宫时代，这些学派的不同思想，就更能发现其中的可贵：没有一个派别，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求，盲目地修正自己的思想，相反一直坚持独立的人格，并且在相互的辩论中学习——诸子十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

最典型的就是学者慎到，这位今天相对名气不及孔孟的杰出人物，却是在稷下学宫时代，提出了独特的“非忠”说，所谓“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君以为君”也，在两千年前封建制度初创时期，却已经有了如此振聋发聩的非君思想。这样的大胆，也只是稷下学宫自由开放风气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这个特殊园地里，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否定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质疑的，连三皇五帝都曾经被否定批判，齐国国君每天被骂，在这里更是常见的事。

对他们这种热闹辩论，齐国的国君们也很有兴趣，最典型的是齐宣王，经常饶有兴趣地跑来，出席稷下学宫的辩论活动。比起后世封建王朝，帝王每次出席儒学活动，各位儒生们立刻战战兢兢的样子，稷下学宫就从来不讲这一套，虽然身为国君，又是这些学者们的衣食父母，但来到稷下学宫，也得老老实实地做听众，去了不能享受特权摆架子，身为国君也是按照规矩老老实实听，各种国君们听了必然会不高兴的观点，当着他的面也会这样说。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齐宣王与稷下学宫学者田过的对话，两人为“君与父孰重”展开了争论。面对齐宣王的质疑，田过毫无惧色，侃侃而谈“君不如父”，也就是说国君比起父亲的分量要差远了，哪怕齐宣王非常不高兴，甚至与之激烈争论，田过也毫不怯场，硬是把齐宣王驳得哑口无言。

而比起胆大来，稷下学宫的另一大可贵之处，就是自由。这样一个平台，不可能让每个学派都满意，相反每个学派都会有很多的不满意，从认为自己不受重用到认为别人被偏袒，每天各学派间的纠纷也不停。而齐国统治者除了调解，另一个态度也非常明确：常年来去自由。每个学派都有随时来讲课的自由，更有随时可以走的权力。典型的如儒家圣人孟子，曾经在稷下学宫得到隆重的礼遇，但后来却深感自己的学说不被齐国接受，最后怅然离开。而从始至终，稷下学宫也依然给他隆重的尊崇。而以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战国思想牛人荀子的说法，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氛围下，各个不同的学派，才找到了自家的不足，自身的学问才得以丰富。以《荀子》里的说法，就是“以数具者，皆通之一遇也”。

在这个中国封建文化的初创成长期，特殊的稷下学宫，就成为一个成长的温床。中国文化的孕育和壮大，正是从此开始的。

二十八 衣食住行说战国

战国这一段著名的历史，各方面的内容，都说得很多，但有一件事情，却相对说得少：生活。

战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啥样？这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放在影视剧里，却是一个常闹笑话的大问题。很多有高收视率的战国题材影视剧，每次播出都闹笑话，基本都被观众追着吐槽，主人公举手投足说个话，甚至吃个饭喝个酒，都能闹出好些个硬伤来，闹得一些明星主创，也时常尴尬不已。

事实上，了解战国的衣食住行，当然不只看影视剧补课，作为中国文化一段重要的萌发期，战国的衣食住行风尚，其实也奠定了两千年华夏民族生活的雏形，了解战国的生活，也就是了解自己的根。

战国人吃什么

战国的生活，首先要从“吃”说起。

战国时期人们的食物，和今天区别还是极大的，诸如胡萝卜、菠菜、芹菜之类的常见蔬菜，战国年间统统都还是外来物种，中国没有。一些影视剧为此，都闹过不少笑话。而在粮食方面，战国和今天也是略有区别的，那个时期主要的农作物是粟米和水稻，其中北方是以粟米为主，南方则是以水稻为主。当然在黄河流域，水稻种植也非常普遍。比如《战国策》里就有典故：东周和西周为了争水种水稻，差点大打出手。这也就是说，今天黄河流域的河南地区，那个时候已

经开始种植水稻了。

当然就普及程度来说，水稻还是以南方为主，尤其是楚国。现存战国时期最大的粮仓，就是发现于江西地区，楚国经常豪言能招募百万兵的牛气，就是以这强大的农业生产作为底气。而比起东西周时代，战国农业中另一个突飞猛进的成果，就是畜牧业，六畜的养殖十分热闹，牛马羊鸡犬彘都很普遍。当然这六种家畜的角色也不同，特别是马，这个在战国时代，属于绝对重要的战略物资，主要用于服役。而牛羊更是不能随便宰杀的，这是极其珍贵的食材，通常是在祭天的时候才会宰杀。普通老百姓不要说吃，就是闻一闻肉香都是稀罕事。

猪和狗在战国农家，已经非常常见。当然两者的价值也有所不同，看看春秋战国时期的“计划生育”，就知道差别在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鼓励生育。谁家要生了女孩儿，就要奖一头猪和两壶酒，生男孩儿可就价码高了：一条狗外加两壶酒。猪狗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大。当然比起猪狗来，战国农家最常见的家禽却是鸡，以战国时期许多学者的游记和辩论说，自耕农家庭的农家，好些都养鸡，鸡肉的价格在当时的饭店里，也是肉类里最为便宜的。

而相比之下，战国饮食与今天差别相对大的，则是蔬菜。

既然我们今天很多的常见菜，都是西汉时期从西域引进的，那么战国老百姓常吃的，又是什么菜？战国的蔬菜，以文献里的记载，主要有葵、藿、葱、蒜、姜、萝卜这几类。而最为常见的，通常是葵和藿这两类菜，不仅当蔬菜吃，碰到饥荒年的时候，更是粮食的替代品。

至于酒醋，在战国的时候也基本都有了，战国的酿酒技术非常高。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中，竟还有两千多年前的两壶酒，打开

的时候喷香扑鼻，可见其技术之精。

当然这样好的饮食，老百姓家也是基本无缘的，放在战国时期，基本都是贵族的专利。而战国时期最令后人艳羡的，也正是贵族们极度奢靡的饮食生活。

贵族们的饮食有多讲究？不但有专门的属吏负责饮食，而且各种吃法都精益求精。就以我们熟悉的喝粥来说，贵族们喝的粥，就极其地精到：要把粮食加工成末，和肉类蔬菜甚至调味品一起加工出来，依战国纵横家张仪的辩论里说，在楚国仅仅为了给令尹昭阳大人准备一餐粥，就要三十多个人清晨起来忙活。

贵族们的饮食器具，更是精美得眼花缭乱，包括有青铜、金银、玉各种制式，花样极多，有鼎豆盘盂壶尊爵各类，吃法也十分讲究：每次宴会的时候，肉煮好后放在鼎里，依次列在来宾们面前，成语“列鼎而食”就是由此而来。而且当时的宴会，和今天也有区别，都是把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再陈列上各种食物。我们把宴会叫作“宴席”，也是来自于此。

当然不管怎样叫法，奢靡程度都是公认：列鼎里的肉按照一定规矩，分别盛给来宾食用。还有储存酒的盂，装酒用的尊和壶，喝酒的时候用斗勺装入爵里面然后端着饮用。酒菜饭的顺序，战国时代也和今天一脉相承。这样的吃法，食物自然特别丰富，以孟子的说法就是“食前方丈”，也就是每个人眼前堆的食物，基本都是一丈高。以当时人的饭量，每次宴会都要剩下不少。贵族们的宴会，就是这样浪费。

而比起贵族家的气派讲究来，普通老百姓家就差远了：别说吃肉吃菜，就是最普通的粟米，能吃饱就算是好日子了。同样以张仪的话说：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也就是粟米根本不够吃，要把豆子粟米还有藿掺和在一起吃，比起贵族家把粮食肉末弄一起熬粥的场面，

真是天壤之别。

战国人穿什么

与吃相关的，就是战国人的穿。

战国的穿戴，好些传统都绵延到了明清。比如头上的服饰，男子在儿童时期头部戴着一块布，也就是巾，二十岁的时候举行冠礼，从此开始戴冠。贵族家的男人们，通常从此戴上精美的冠，普通人家没这个条件，一般都是换一块葛巾，意义却是一样：从此你不再是男孩儿，而是一个担当责任的男人了。

头上戴什么，这在战国不只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地位问题。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冠，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界限。以《吕氏春秋》上的话说“庶人不冠弁”，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是不能戴冠的，而有资格戴冠的人才可以戴，卿大夫以上可以戴冕，其他人则不能戴，就算是身份等级类似，不同的场合，有些东西也不能随便戴。朝见国君的时候，就绝不能戴皮制的帽子，否则就是严重的大不敬。

衣服的规矩也同样多。战国的衣着制样，跟后来的汉唐宋明基本一样：上身总称为衣，长的叫袍，罩衣叫衫，而且单衣里还有夹衣，但和后来不一样的是，战国时期还没有棉花，只有芦花或者丝棉。当时的衣服，传统都是右衽。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将披发左衽矣。也就是没有管仲当年的“尊王攘夷”，华夏民族很可能已经亡于蛮族之手，堂堂孔圣人也要像蛮族一样，披头散发衣服左衽。

束发冠礼和右衽，就是这个特殊年代里，文明的华夏民族区别于野蛮民族的最大标尺。

当然同样也是身份财富的原因，富贵家庭与普通老百姓家，穿衣

服的区别也极大。王公贵族家庭，通常都是穿锦帛皮和精致麻布，扬着宽阔的深衣大袖子，腰以下更是一直到脚的深衣。腰间还有金玉做饰物的丝带。除了这些规定穿戴外，贵族们也有一些特殊的奢侈穿戴。比如说裘衣，也就是兽皮做的精美皮衣，基本就是贵族的身份标志，而且身份越名贵，穿着的裘衣就越珍奇。著名的“孟尝君过秦国”的典故里，名声在外的孟尝君被秦国扣押，生命危险时刻，正是其门客冒死偷来了秦王的白狐裘，转手献给了秦王最宠爱的王妃，这才骗得王妃说好话求情，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这才在秦国逃出生天。如此救命的奢侈品，可见其在战国的珍奇。

而对普通劳动者来说，这样的奢侈品，基本都是天上地下般地遥远。而且老百姓要耕作种地，这样的衣服自然也穿不着。老百姓下地干活，基本都是穿葛麻乱纺的粗布短衣，也叫“褐”，在战国年间，这是老百姓劳动时常见的工作服。比如战国的农家学派，他们的常见打扮，就是穿着“褐”在田间地头劳动。

至于鞋子，战国时候的叫法，就和后来不同，当时叫作“屨”，秦朝以后才改叫作“履”和“鞋”。战国老百姓穿的屨，基本都是用麻草编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草鞋。王公贵族们穿的鞋，则主要都是由皮子制成，当然也有做工精美的麻草鞋。

战国时期，还形成了和一个与穿鞋有关的风俗：进屋要把屨脱在外面，遇到重大的场合，连袜子也要脱掉，光着脚席地而坐，否则就是最大的失礼。这个古老习俗，今天在日本依然常见。

战国房子什么样

而比起吃穿来，战国与东周、西周相比，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住。

作为一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战国一大技术革命，就是在建筑业上。除了城墙工事的水平直线上涨外，居住条件更是大大改观。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代表中国传统建筑工艺的各类古建筑，特别是高大宽敞的楼台瓦房，基本都可以追溯到战国年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独特工艺，比如说斗拱，就是在战国发展起来的。

建筑材料的突破也很大，最典型的的就是瓦，虽说以考古的结果来看，早在西周年间就有了瓦，但是和战国时代的瓦比起来，西周的瓦还处于十分粗糙的阶段。像几个西周王宫的遗址，基本就是用瓦片盖住茅草，这种古代社会的新建筑材料，当时还是打酱油的角色。

而放在战国年间，瓦终于摇身一变，成了响当当的主角：首先是品种变得多了，不再是压茅草这么简单。在战国齐国、赵国、秦国的都城遗址，都出土过大量的瓦片，而且种类十分丰富，有板瓦、筒瓦等各种瓦当，不但是建筑中的必需材料，花样还十分丰富，好些瓦当上还刻有精美的图案。用瓦建房，这个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却是人类建筑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战国的房屋技术有多成熟，不只是瓦当了主角，更重要的是，瓦片反映出来的，是整个建筑工艺的完备。从瓦片种类也说，既有装饰性的瓦片，也有实用的建筑材料，还有铺地、砌墙、装饰等不同的瓦片种类。建筑的水平，也早已远远甩开东周、西周时代。

看看遗留到今天的战国时代建筑，就可知战国的住房水平，不但超越历史，更是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以孟子的形容来说，王公贵族们的居住房屋，台基通常都有1.6米高，屋檐也高达数尺，这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十分少见的。今天出土的好些战国器物，特别是器具图案上的房屋图纸，样样都是高楼大厦，都是笔直的大柱子，更有斗拱长廊，不但场面十分震撼，而且房屋的基本制式，也奠

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宫廷建筑的样式模板。

除了外观震撼外，战国建筑的内部装修，那更比西周时代考究得多。以《楚辞》的说法，楚国的宫殿里，基本都是雕梁画栋，有各种丰富多彩的图案墙壁，连门户和屋檐上，都有各种神奇的花纹，墙壁更是用平滑的石板砌成，十分坚固美观。房屋里还有彩色的屏风，满眼的绚丽多彩。这样的绚丽场面，也几乎存在于战国所有的贵族家庭里。

战国的座驾很强大

比起建筑业的高科技来，同样一个体现战国领先世界科技水平的环节，就是交通工具。

其中尤其缩影战国科技水平的，就是车。

战国时代，是战场上战车退出舞台的时候，而是也是各种类型的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战国时期贵族人家的出行，主要就是坐车，车不再是战场上的大杀器，而是已经成了一种重要的奢侈品。贵族家的车，互相之间攀比的，就是其豪华程度和舒适程度。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辉县市琉璃阁的战国贵族车马坑。

作为陪葬品的战国车架，比起春秋时期的出土文物来，技术水平已经远远升级：马车的分类更加细致，有了大小不同的型号。小型的马车，车厢长1.9米，宽1.2米，大型的长2.4米，宽1.5米，而且上面还有了篷盖，专用挡风遮雨，两端还有三角形席子，乘坐起来十分地舒适。这种体形的车辆，放在春秋时期却十分难找。类似的出土文物，在战国时期的墓葬群里，出土都是非常多。而且车辆的种类也更多，好多马车上还有精美的图案。

与车的进步相对应的，就是造船。

国外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造船业，在这个时期还是落后于西方的，比起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规模海战，战国时期的造船水平，还处于袖珍阶段。以中外很多学者的观点，中国造船业真正到达领先世界的水平，还是要等到两汉时期。

但是在战国时期，造船业却也体现出了后来居上的潜力。

以《战国策》的说法，当时战国已经出现了可以承载50人的大船。而出土的战国文物里，也有长11米的独木舟。船只不但早已经运用到战争上，而且还有了另一个独特作用：架设人工浮桥。这个首先突破的就是秦国，秦昭王时代，即公元前257年，秦国就在蒲州风陵渡架设军用浮桥，实现了军事作战的目的，这个军用浮桥，也是世界公认第一次将浮桥用于战争，意义十分重大。

中国封建社会的驿站制度，也在战国时期得以完善。在战国战争的刺激下，列国都把修筑开凿驿道和建设驿站，当作一个重要的环节，秦国得以统一天下，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对于驿道公路的修筑与维护。秦国早在灭亡巴蜀的时候，就开凿了巴蜀到汉中的古道，后来进军中原，更是走一路修一路，特别是著名的长平之战里，秦国与其说依靠了纸上谈兵的赵括贸然出击取胜，不如说是依靠了自己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最终拖垮了无力支撑战争的赵国。

而战国的驿站制度，也在战国历史结束后，被历代封建王朝沿袭下来。说战国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这类细节问题也同样是缩影。

二十九 墨子的神秘与强大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各种学说蜂拥，相互争锋不断，文化英杰和思想巨匠辈出。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流光溢彩的名字朗朗上口。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无一例外地影响到了后面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相比之下，这时期与他们齐名的一个人，在后人的眼里，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墨子。

凡是介绍历史名人，总要在他的前面加个身份，比如能当官的，那是政治家；能打仗的，那是军事家；文学才华高的，那是文学家；有科学发明的，是科学家。轮到墨子身上，却犯了难。因为他实在是个通才，在那个时代里，他似乎什么都是。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之交的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英杰之一。在哲学、科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独特的成就。春秋战国时代，他的学说和儒家学说一起，是知名度最高的两个学派，又叫显学。

有争议的墨子

墨子的身份，直到今天依然蒙着神秘的面纱，有关他的种种情况，史学界还存在着很多争议。

司马迁的《史记》说他是宋国人，这个说法曾一度得到认可。清朝人毕沅又说他是楚国人，甚至有印度学者也来凑热闹，考证说墨子

是印度人，原因是根据史料记录，墨子长得很黑，所以不一定是中国人，反倒有可能是从印度来的“外宾”。但所有的争议，都否认不了一个事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墨子所创立的学派，就是战国时期的“墨家”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思想，就是“兼爱”“非攻”，其信徒主要来自当时的中小地主、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和自耕农，在诸子百家之中，算是一个相对草根的阶层。

但墨子的核心门徒们，虽然多是草根，但都是精英。墨家一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自然科学上的独特造诣。墨家学派的门徒们，都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科研能力，他们熟悉手工技术，拥有一定的科学理论知识，甚至会制造各类精巧器械。墨子的思想内容，主要还是当时普通市民阶层以及手工业者的愿望，他们主张这个社会要兼爱，即互相帮助；非攻，即消除战争；节用，即反对浪费；非乐，即反对音乐；非命，即尊重生命。这些思想，普遍代表了当时饱受战乱的小人物的愿望。列国争霸旷日持久，老百姓灾难深重，没有人愿意打仗，所以要“非攻”；乱世之下，需要相互扶持帮助，所以要“兼爱”；老百姓生活困顿，贵族却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这是很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要“节用”；音乐是罪恶的，是扰乱人心智的，所以不能听，要“非乐”。在春秋战国的早期，墨子的思想一度非常流行，甚至被看作和儒家思想齐名的学说流派。

至于墨子本人，则是一个更加神秘的人，今天关于他的姓名、故里等问题，争论非常多。在正史中能查到的他的故事，最著名的当属“墨子破云梯”的典故了。当他知道楚国准备攻打宋国时，虽然此事和自己无关，但他依然不远万里跑到了楚国，阻止楚国发动战争。这时候的楚国志得意满，又有当时第一能工巧匠鲁班的帮助，鲁班当时为楚国设置了一种云梯，比一般的云梯要高，可以直接搭进城墙里。在劝说无效下，墨子提出现场和鲁班比试，两个人拿了根腰带做演示，都使出平生所学来斗法，结果鲁班输了，这场本来铁板钉钉的战

争，就这样搁浅了，宋国老百姓也得以继续享受一段和平的时光。

从这个真实而简单的小故事里，我们却不难看出墨子这位宗师的素质，这是一个坚韧、勇敢、临危不惧，且富有胸怀天下的责任心的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他才能够创立这般独特的学说。

墨子一生的行动，各类史料记录比较杂乱。他曾经做过官，也曾经为士大夫乃至国君上过课，但是他大多数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传道、讲学、收徒之中。他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开班上课，教授学生们自己的学说以及各种知识，每当有地方发生战争的时候，他就主动出面，带领学生们去制止战争。他过的生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布道者的生活。

与儒家的分歧

而墨子人生里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长期和儒家思想的辩论。

作为战国时代两大“显学”之一，墨家和儒家之间的分歧是明显的。两家治家最大的分歧，一是关于“天命”问题，墨家学说认为应该非命，不能相信命运，要相信自己的努力。儒家却主张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只是小分歧，更大的分歧是墨家主张尚贤，即由老百姓自由地选择他们心中的“贤”。墨子甚至大胆地主张，即使是诸侯国的国君，也应该由老百姓组织，通过选举来产生，诸侯国的各类官员，更应该让老百姓来投票选举，从国君到官员，他们应该主动地为老百姓负责，因为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墨家与儒家之间的分歧是很大的，比起儒家倡导的君主绝对权威，墨家的思想更加大胆。

而比起墨子所倡导的十大思想，墨子在哲学上的思想也同样大胆。在哲学上，墨子主张“三表”，即在认识事物时，要通过事物的“三

表”。所谓的表，就是判断事物的标准，墨子认定的标准包括三样，第一是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第二是老百姓的感觉；第三是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在认识事物的原则上，墨子更加注重感性的感觉以及直接的经验，这应该和他个人出身平民有关系，他的十大思想，也正是在三表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样因为他平民的出身，生活中的墨子，是一个绝对的苦行僧式的人物，他生活简朴，穿粗布草鞋，游走于列国之间。

墨子的思想主张里，有许多都是有进步意义的。比如他主张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准，主张要从直接经验上得到判断事物的依据，这些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他的十大思想里，虽然也有幻想鬼神的内容，但要求由老百姓选举国君和官员的思想，可称是中国最早期的民选思想。但是墨子同时又主张，学生对老师要无条件地服从，人民对于上级也要无条件地服从，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但是在奴隶社会即将崩溃的时期，他有这样超前的思想，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成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的同时，墨子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其科学成就，不但在当时的诸子百家中无人出其右，更远远地领先于当时的世界。

墨子科学思想的内容，涉及今天数学、物理、机械制造等各个方面。他是一个既具有理论归纳分析能力，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学者。在宇宙论上，墨子提出了“宇宙运动论”的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的。他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都是从这个整体中分离出来的。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墨子的说法也和道家维新思想针锋相对，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这是两千多年前极其难得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在数学方面，墨子是第一个把数学当成一种理论的人，墨子在自己的著作里，系统地阐述了十进制，并且对于数学中的正方形、三角形、开平方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尤其是他对于三角形

的理论阐述，和古希腊科学家欧几里得的一模一样。物理方面，墨子是人类第一个发现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学者，更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小孔成像实验。在早于阿基米德20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杠杆原理，我们总把杠杆原理叫作“阿基米德定理”，其实从版权角度讲，阿基米德确实“侵权”了。

墨子并不仅仅是个科学理论家，他在当时中国最出名的，还有他的机械制造造诣。在机械制造方面，他的名望甚至要强于当时的第一巧匠鲁班，两人当时为了宋国的问题斗了半天法，最后还是以墨子的胜利而告终。

墨子的机械制造成果，包括上了发条可以扑腾翅膀的木头鸟，还有一次能载重30石重量的马车。而一直主张兼爱、非攻的他，几乎熟悉一切兵器的制造。在他的著作《墨经》中，对于攻城武器、守城武器、弩，都有制造方法上的详细阐述。

无奈消失

一生建树颇多的墨子，注定是不幸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不会被统治者接受的学说。

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非攻、尚贤，其中“尚贤”这一条，是封建统治者所最厌恶的。皇帝说到底就是独裁者，有哪个独裁者愿意让老百姓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又有哪个官员愿意让老百姓来左右自己的前程？至于所谓的兼爱、非攻，这就更是笑话了，春秋战国就是要打仗的，你让我“非攻”，人家要是攻击我，那我该怎么办？

所以比起法家、儒家等各路学说，无论生前身后，墨家都注定是不会被接受的。墨子一生里大部分时光，都投入到了制止战争的奔波中，但除了有限的几次成功外，他大部分的行动都归于失败。有哪一

个统治者，愿意为了一个人的简单愿望，去改变自己争天下的既定战略呢？有谁会认真地弯下腰来，去聆听墨子的梦想呢？兼爱，笑话，春秋战国本身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能活下来的，不是能兼爱的，而是最残忍的，至于非攻，难道要等着人家来攻我吗？

墨子所建立的学派，叫作“墨家”，在战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组织。墨家的主要宗旨，就是“以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特别是在战国时期的各类战争中，他们都以扶持弱小为己任，经过不避死亡的危险，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担负起保卫城市、维护和平的重任，哪怕是与他们不相关的人，为了心中的理想，他们也愿意用生命去捍卫。这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崇高的理想、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的团队。在统治者不可能接受墨子理想的情形下，散落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孜孜不倦地开始了墨家的传道。

但墨家在战国时期的兴隆，随着战国的结束也日益衰微。晚期的墨家分为两支，一支以科学研究为主，包括物理、光学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支则成了社会上游侠群体的一部分。在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的时代，墨家遭到了残酷的打压，最终，隐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尘烟之中。

三十 被欧洲人追捧的农家

比起战国时期风光一时的墨家来，另一支被遗忘的学派——农家，在战国百家争鸣时代，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农家的主要思想，在今天大部分已经失传，主要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农家的经典著作大部分都被焚烧了。但从现在留存下来的资料看，农家的基本思想，就是农业平等，即要求统治者要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分配劳动果实，反对统治者对农民的过分压迫。农家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农业科学上，他们对农业生产的研究，特别是提高农田产量、改进农耕技术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这个学派的来源，在当时就众说纷纭，由于诸多有关资料被焚毁，农家学派的身份、源起，至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农家学派的成员，是上古时代神农氏的后裔；另一种说法，是古代周族后稷氏的后裔。而事实上，农家在战国时代的勃兴，正是战国时代自耕农群体增加，传统井田制制度瓦解的表现。农家的许多成员，本身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人，他们与农民阶层之间的关系，可谓血脉相连。

大家一起来种地

说到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就是许行。

和墨子一样，许行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按照有关资料的记

载，他是楚国人，应该是生活在楚宣王至楚怀王在位的时期，和儒家学派的大儒孟子是同时代人，对于许行最详细的记录，也正是出自孟子的《孟子·滕文公》。

许行人生里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带领着弟子们在江汉平原上开荒种地。他的主张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也就是说，即使是国君，也应该和老百姓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像地主们那样凭借着租税过日子，是一种可耻的不劳而获。孟子去滕国宣传儒家学说时，正好看到许行带领弟子们来拜见滕文公。他请求滕文公给他一块儿土地做试验田，他在这里劳动示范，并且希望滕文公能参加他们的劳动，滕文公答应了他的请求，亦给予了他一块儿土地。此后，许行带领着弟子们，在滕国辛勤劳动，很快获得了非常好的收成，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因此引起了许多学问家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儒家学派的宗师孟子。

孟子虽然赞叹农家的刻苦耐劳，但对农家学派的主张却不敢苟同，当许行的弟子陈相和孟子交谈时，就农家学派的许多问题，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比如说到滕文公，陈相感叹说，滕文公终究不是圣君。孟子问为什么？陈相说，滕文公自己不劳动，他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不是他的粮食他却享用，这是一种可耻的不劳而获。对此观点，孟子当然不能苟同，他和陈相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孟子拿许行带着的帽子做比喻说，你许行戴着的帽子，是用粮食换来的，也就是用你的劳动换来的，那么国君所吃的粮食，也是用他的脑力劳动换来的。一番话说完，陈相哪里是孟子的对手，立刻张口结舌，孟子反而又抛出了他的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虽然如此，农家学派却一直不改初衷，在其观念里，劳动是光荣的，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他们反对政府设立仓库，储存粮食，反对那些城市中人不参加农业生产却获得粮食吃，在农家学派眼里，这也是一种可耻的不劳而获。这种新学派的出现，在当时却不是偶然的。这个时代正是战国封建化形成的时期，普通自耕农地位提高，学术方面，也需要出现属于他们的代言人。而土地所有制的转换，也使农业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在这种局面下，普通的自耕农迫切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减少加在自己身上的赋税，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农民的身份感到骄傲。农家，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农家的核心思想，主要的一句话就是“劝农桑，以足衣食”，即希望建立一个大家一起种地、一起吃饭，全民务农的农业社会，最好能够不出现城市。农家学派的成员们，把农业视为他们自己的生命、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以自己是一个农民为荣，以自己从事农业生产为傲，并且热情地劝说诸多思想界的人物以及政治界的精英们，加入到他们的派别里来。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农家的市场还太小，真正理解他们的人并不多。在后来西汉刘向编纂《后汉书》的时候，农家被放在了九流之中，俨然是一个重要派别。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农家对于各路诸侯来说，却也是有利用价值的。因为礼遇农家，就意味着可以笼络住农家背后的农民，特别是自耕农们，如果给予农家适当的尊重，那么也势必能够对稳固统治有所帮助。抱着这样的目的，许多当时的诸侯对农家非常礼遇，当然这是表面上的礼遇，农家所宣传的取消仓库、取消城市的主张，是各路诸侯万万不能接受的。对于诸侯国来说，农家思想是一个很好的招牌，但是其主流的内容，是坚决不能用的。

吕不韦的成就

农家的思想内容，在战国时期，以许行为主，却也化成不同的派别。而在整个战国时代，农家思想开始系统整理出来，却是拜吕不韦所赐。

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期间，开始组织人手编纂著名的《吕氏春秋》。在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书中，也少不了农家学派的身影。《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鲜明提

出了重农的理论。在《上农》中，农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农民、优先发展农业的理论。《任地》一篇，则细致讲述了农业耕作之中，怎样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别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样改良土壤的质量。

《吕氏春秋》中的农家理论，是农家主体思想以及农业理念的浓缩。特别是《审时》之中，对于农业生产的农时，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分，对种子的品种质量，也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在当时的中国，简单的四篇文章，却可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宝典。

而另一本对农家思想记录非常详细的著作，就是齐国稷下学宫编纂的《管子》，其中《地员》一篇就是纯粹的农家著作，而在《五辅》《牧民》《八章》等章节之中，也详细阐述了农家思想的各类内容。《管子》对于农家思想的重要意义是，农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放在了其中有关“以民为本”的章节中，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体，农家所宣传的重农思想，其实也和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重农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正是这样的一种联系，使得《管子》中的农家思想，具有了许多超越农业本身的进步意义。

《管子》中的农家思想，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体现出了古代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管子》中，曾有这样的论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一思想，鲜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时期宣传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相比，农家思想显然对民更加重视，民在农家思想家眼里，成了政权存废的关键，这个比儒家思想中的“民为贵”，显得要更加大胆。

除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农家还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分不开。在亲身耕作中尝尽了靠天吃饭辛酸的农家学者们，其身上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在《管子》中，农家学者鲜明提出了“修饥谨，赈灾荒”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好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提高抗风险能力。

战国时期农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体现得很生动——重农抑商。农家学派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饭，军队保卫国家，也要靠军粮供应，因此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而商人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拿着别人的财富贱买贵卖，因此，商业活动其实是对国民经济的一种破坏。所以，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坚决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农家学者的重农抑商政策中，他们并不主张取缔商业活动，而是希望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打压手段，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将商业活动的利润大小范围，都能压缩到最小的规模，给予农业充足的发展空间。

如果对照后面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农家学者们的美好愿望，在经过秦末动荡之后，最终由汉王朝确立下来。此后重农抑商的政策，就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在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作为主流学派出现的农家，他们“民以食为天”的主张，却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根基。

中国热时代的意外收获

让农家学派的英杰们想不到的是，他们一生为之奔走的学问，在两千多年后，竟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欧洲。

在17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被翻译并传播到了西方，其中包括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记录了农家思想的《管子》，被当时的传教士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农家学派在西方社会，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动，17世纪时期兴起的法国重农学派，大力引进农家里有关商业活动的论述，抨击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的这场论战，其结果几乎决定了最终欧洲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于中国封建化早期的学说，对于启蒙世纪的欧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三十一 战国兵家那些事

战国年代，百家争鸣的场面，出奇的热闹。

相关的学派很多，牛人牛事很多，相互之间的争吵掐架更是非常多。流传到今天，好些景象也十分吸引眼球，几个主要学派，比如儒家、法家、墨家，影响都传承两千年，知名度更是十分高，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与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震撼。但如果要问那些学派里，有哪一家在战国时期，最受诸侯国欢迎，也最有知名度，恐怕后来我们熟悉的儒家、法家，都要靠边站，当时公认最高的，只有一家：兵家！

为什么高，看行业需求就知道，战国最焦点的事情，就是战争，诸侯国成天烧脑的大事，就是如何打赢，那么专门研究兵法战策的兵家，当然也最符合需求，因此自然火爆！

待到后来天下一统了，特别是汉代建立大一统国家，和平建设成了主流，战国时期十分火爆的兵家，当然也就靠边站了。但它的价值意义，却依然不可估量。战国的惨烈战场，兵家层出不穷的思维理念，好似剧烈的化学反应，迅速推进了中国古代军事的前进变革，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军事制度和战略理念，都是在这个年代的碰撞里，以无数战火生命为代价，痛苦地形成的。

串联在这惨烈过程里的，就是相关的代表学派牛人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一位传奇兵家强人，孙臆！

谜一样的孙臧

战国军事强人孙臧的大名，对每个战国迷来说，都是如雷贯耳。

按照相关的记录，此人身份很传奇，孙武的后人。成长也很传奇，拜到鬼谷子大师门下，还被师弟庞涓陷害，在魏国被挖去了膝盖骨。这样的悲剧人生里他依然不屈不挠，终于转投齐国，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击败师弟庞涓率领的魏国大军。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孙臧为军师的齐军，将庞涓的魏军打到全军覆没，庞涓悲情自尽。这场战争不但给孙臧自己报了仇，更是整个战国历史的分水岭：魏国从此衰落，结束称霸时代，齐秦争霸时代开始！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位大名鼎鼎的军事家，在战国历史走向上的地位，是重量级的。但如此重量级且家喻户晓的人物，却有一个问题，后世甚至一些史家们，都是长期迷糊：这么强的孙臧，军事思想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真不怪史家们外行，实在是造化太弄人，凝结孙臧一生心血的著名军事典籍《孙臧兵法》，曾在东汉末年遗失了。

我们今天说“孙子兵法”，基本都是一回事，但是在东汉以前，特别是两汉年代，“孙子兵法”却是两回事，除了孙武留下的那一部外，还有一部叫“齐孙子兵法”，即孙臧所著的《齐孙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孙臧兵法”。可这部同样强大的兵法典籍，却在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里，不幸地遗失了。为什么遗失？脑补一下东汉末年，董卓乱政起，中原大地的各种浩劫，长安洛阳烧成一片废墟的惨样，区区一部兵书，想不遗失确实难！

从此以后，有关《孙臧兵法》的内容，也就成了历代学者感兴趣的一大话题，这部兵书里写了什么？有什么伟大的思想，从东汉末至

明清，很多军事专家们都凑热闹，相关猜测的文献留了一堆！甚至也因为它的不幸遗失，连带孙臆本人的身份都被怀疑，特别是到了清朝中后期，经过乾隆皇帝打着修书旗号，毁坏各种文化。后来的清代学者们，也有好些人大胆假设，莫非历史上根本没有孙臆这个人？甚或连他的师父鬼谷子都是子虚乌有？

确实，在《孙臆兵法》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外加各种以讹传讹，就算孙臆活转过来，想证明他是孙臆，也是不容易的。还好，造化虽说弄人，却终归没让后人一直遗憾下去，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一个惊雷般的消息突然震惊世界：遗失近两千年的《孙臆兵法》出土了！这一堆蒙尘的竹简，共有440多枚，1.1万字左右，且内容相当齐全。上下两编里，不但有孙臆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更有孙臆日常做事以及和别人纵论兵法的桥段记录，每一句话，都是研究这位战国军事强人的珍贵线索。而且更大的收获是，由于这一卷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可以断定，这不只是孙臆手写的兵书，更包括了孙臆这一派兵家的基本思想，其弟子们的整理记录，如此厚重的内容，堪称填补史学空白。

也正是从这珍贵的发现里，神秘了两千多年的孙臆，终于揭开了蒙尘的面纱！特别清晰的，正是他的军事思想。比起孙武的军事思想，孙臆可谓是一个强大的传承者。对比《孙子兵法》，就可看到二人的差别在何处。孙子兵法之所以受欢迎，因为其内容十分纯粹，就是围绕如何战胜敌人，至于为什么打仗，打什么性质的仗，着墨十分少，基本走的是技术流。而在这件事上，孙臆除了有技术，更多了情怀！他与孙武的最大不同也就在此：战争，绝不是不问原因地瞎打，而是要有正义和邪恶之分，以其原话说：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如果发动的是不义战争，你就算打得赢，也守不住胜利果实！

千万别以为，孙臆这只是空谈情怀，谈情怀就是为了打胜仗，因为有情怀，所以打仗的注意事项也就多，典型如选将，在选将这条上，孙武就已经考虑得很全面，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标准，即“智信仁

勇严”，孙臆则来个锦上添花，这五条都是技术层面，还得加上情怀——忠！一个不忠的将领，另外五条越强大，必然越危险！

而且除了讲情怀，孙臆也很讲技术，在继承孙武思想的同时，也敢大胆否定，连孙武最著名的一大思想：其下攻城，他竟然都霸气修正，谁说攻城就一定“下策”？有七种情况下，必须果断攻城！为什么敢这么推翻？关键还是时代不同了，比起科技水平严重落后的春秋晚期，孙臆生活的战国年代，军事科技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攻城科技、投石机、弩箭的水平，早已远远甩开春秋时期。于是孙臆的观念，也就与时俱进。而有情怀有技术的孙臆，其兵法的另一大重要思想，就是如何看待战争的价值。以他的话说，战争的意义，在于“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即维护王权的尊严和天下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战争价值的军事家。

如果对照后来战争发展历史看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孙臆之前，战争虽然不少，但是对于战争的认识，还从未这样系统过。也正是从孙臆之后，战争的价值、操作、军事的建设，开始形成一套系统的模式。越是重大的战争，对于战争意义的阐述，也就更加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孙臆的军事理念，几乎得到了完整的传承，并未随着孙臆兵法的一度失踪而断代，重新出土的孙臆兵法，更见证了他真正的价值！

这群人竟也懂打仗

战国百家争鸣、学派纵横，但作为后人看来，经常感到犯愁的一件事：哪怕是个很熟悉的历史人物，他到底该属于哪派，也都不好划分。因为百家争鸣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样一个人，可能既属于儒家学派，但同时又学习过法家的思想，甚至与墨家也有渊源，简单粗暴地把一个人划为某个派系，基本就是闹笑话！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传统的一大特点，就是包容性。哪怕学问思想不同，但绝不盲目排斥，相反会在激烈的论辩里，一边针尖对麦芒地论辩，一边低下头来认真学习，取对方之长补自家之短。这样的精神，从战国时期起，在彻底闭关锁国前，曾经是我们两千年不朽的传承。正如明朝中后期，葡萄牙学者们对中国人的评语：他们（中国人）善于勇敢发现并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毫不犹豫地学习！

而在战国时期，这种毫不犹豫地学习，也是在激烈辩论外表下，各路学派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放在兵家身上，一些其他学派的名家，不但积极学习兵家的思想，而且其本人也成为兵家中的强大人物，比如一个最反对打仗的派别：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诞生于战国中期，传承老子道家思想，倡导清静无为。看这思想就知道，这学派有多反对战争，再看主要观点，那更是恨战争恨得不得了，以其原话说：兵者，不祥之器也！白话意思就是说：打仗，就是祸害！既然都当祸害了，那对战争，黄老学派是不是就是粗暴排斥？恰恰相反！痛恨战争的黄老学派，恰恰是兵家之中，十分强大的一类，很多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杰出的兵家，甚至他们对战争的专业研究水平，一些军界人士都要汗颜！

具体有多专业？说一件事就知道，别看黄老学派反对战争，可说起打仗来，他们的时间表规划，却是相当到位的。比如在黄老学派眼里，一个国家要想军事征服另一个国家，就必须学会制订时间表，哪怕要打大仗，也要按照时间表认真来。什么时间表呢？“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德，四年而发号令”，也就是说不但要有军事准备，还要有文化、思想的全面入侵，最后从军事和精神上全面征服对手。这个说法有没有用？其实现代战争也照样有用，不信看美国打伊拉克就知道，确实很管用！

黄老学派的这种征伐理论，其实也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相反越发细化，等到汉朝独尊儒术的年代，更是经过儒家的修正，成为

儒家“德政”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后来中原王朝经营边疆的谋略里，正是这脱胎黄老学派的治理思想，在汉唐宋明几个朝代里，都曾起过大作用，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真是有它的贡献。

同样强的，还有黄老学派的军事谋略，不夸张地说，反对战争的黄老学派，却为战争贡献了最为低成本的发动方式，更提供了最科学的战争控制理念。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一个国家怎样用最小的代价，赢得一场战争最大的利益，包括情报战的发动、对敌人方面的贿赂，还有对敌人核心力量的打击。黄老学派的《十大经》，更系统地提出了先弱而后发的理论。忍，就是为了爆发！

这个思想，在战国不出名，到了汉朝，起了大作用。西汉为什么在开国面临匈奴威胁的情况下，果断选择了和亲政策？正是因为当时的汉代，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因此选择暂时的忍耐，也就顺理成章。那为什么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朝可以果断采取反击策略？因为即使在隐忍的60年里，汉朝也不是单单在忍，更没有在富庶生活中磨灭应有的志气与血性。因为即使受黄老思想影响，也绝不是忘战，相反一直在进行战争的规划准备，后来汉朝横扫草原的强大骑兵，正是在黄老学说时代苦心建设出来的。

兵家成就了商鞅

战国年代，轰轰烈烈的一大热潮，就是变法。这热潮里比较悲情的一个群体，就是变法家。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造就了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然后又同样以热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这个时代的蓬勃向前！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鞅。

关于商鞅，这位亲手造就了秦国华丽转身——从蛮荒边鄙国家到

超级帝国——强大变法家，他的故事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喜欢战国的朋友，都知道他很强，强在精准的判断力，高效率的行动力，言必信、行必果的做事风格。但另一个能力，熟悉的却不多：强大的军事能力！

正如前面所说，战国时代的头等大事，就是打仗，哪怕一个改革家，想要在变法斗争中站稳脚跟，顺利推行自己的变法思想，也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来撑场。打得赢，一切都好说，一旦打不赢，后果就很严重。放在商鞅身上，正是如此。虽说对于他的军事能力，史家着墨得不多，但对于他的改革大业来说，这事却很重要。

而从身份说，商鞅，也同样是兵家之中十分强大的一位！

商鞅有多强？说一个事实就知道，《汉书》里的《兵书略》章节，收录商鞅的军事文章，就多达27篇，俨然战国兵家里的大家，不单汉朝人推崇，就连战国同时代人也推崇，以荀子的赞叹说，商鞅就是“世俗中擅用兵者”，也就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军事强人。

这评价过分不？这是有实打实的战绩做证的。当年商鞅变法期间，除了对内折腾改革，商鞅也没少对外折腾战事，多次亲自带兵出战，而且还填补了秦国历史的空白。在对魏国的西河战争中层层推进，多次打败魏军，连魏国公子也被他活捉。当然这件事，按照很多史料的说法，是他笑里藏刀耍诈，靠过去的交情把人骗了当俘虏，还是诡计制胜。但仔细看看商鞅的军事思想，就会发现这位一辈子办实在事的强人，打仗也十分实在，最讲究的就是战争的具体技战术，贡献最大的就是军事方面的革新，攻和守的战法，都创了好些新思路。尤其著名的一句话：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一个治安状况奇差，民间斗殴不断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外战特别^屌，被人随意欺负的国家。这句著名的断言，在后来的历史里，不断得到印证。而秦国军队强大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由此而来：秦国法律明文规定，民间禁止私斗。正是这严格法律的规范，造就了秦国人强悍的民风，从此横扫

六国。

在进攻战里，商鞅一直强调的另一个重大原则，就是正确认识敌我之间的力量，千万不能为情绪左右盲目发兵。发动一场战争，需要仔细评估自己的实力，更要认真了解战争的态势，而且在商鞅看来，一场战争发生，国家真正的隐患，不是那些担忧战争的人，恰恰相反，是那些盲目喊打的人，这些人不懂军事却瞎指挥，最后断送的，恰恰是可能会赢的战局。对比后来中国历史，看看北宋“靖康之耻”、明朝“甲申之变”，如果当政者能多读读商鞅的书，这些令国人至今痛彻心扉的悲剧，很有可能会平安避过。

苦心变法的商鞅，最终死在了秦惠文君手里，但商鞅的变法，并未因为他的死而中断，其实同样没有中断的，还有商鞅的另一个重大军事思想：四战之国贵守战。当一个国家面临四面受敌的状况时，首先一定要学会防守，而不是盲目进攻。

这个论断有多重要？看看后来的秦国就知道，当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隆隆开进的时候，秦国也曾多次面临着被六国联合针对的状况，即著名的“合纵”政策，可是为什么每次轰轰烈烈的合纵，最后不是被秦国打花，就是被秦国巧妙拆散，因为秦国除了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是正确的政策，每次总是分化瓦解，甚至是以守为攻，利用对手的矛盾，不断拆散其联盟，在整个战国中后期的军事历史上，秦国面临合纵的次数很多，但是真被人围殴，却是少之又少。

以这个贡献说，商鞅一个人改写了秦国历史，真是毫不夸张。

三十二 战国的官职都怎么叫

战国题材，让很多影视剧编导，常感到压力很大。不但是吃的用的穿的，一不留神就出错被人吐槽，就连最简单的一件事——官职称呼，都经常闹出天雷滚滚的笑话来。

比如20世纪一个讲屈原的电视剧，里面屈原一出场就被叫“御史”，后来还有个叫吕不韦的电视剧，吕不韦的称呼变成了“阁老”，简直就是各个朝代全来乱串，播出之后，自然招来骂声不断。

其实说句实在话，如果要找战国时期比较乱的事，除了眼花缭乱的战争，就应当是这官职称呼了。

不同的国家，各有一套制度习俗，具体到官职上，也是叫法不同，有时候还是生僻字扎堆，想不出错？别说是电视剧编导，就是一些专家，有时候也难免。

但战国另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这看上去容易犯错的事——战国的官职制度！

为什么有意义？因为战国的官职演变，奠定的正是未来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框架雏形。后面那些容易叫错，甚至电视剧里乱串的官职，基本都是由战国演变而来！

到了战国就变了

为什么东周战乱，从春秋到战国，被分成两个时代，因为这两个时代比起来，好些事真的变化快，尤其快的，就是官职制度！

为什么会变化快，就是因为统治背景不同了。

对比西周就知道，西周的分封制下，大小诸侯国林立，还算长期稳定，等到东周年间就不稳定了，各种战乱蜂起，而且不单是诸侯国之间打，国家内部打得也厉害，国家内部的权臣贵族们，打起来有时候比国家间的战争还热闹。比如春秋末年的齐国、楚国，国内都爆发过大规模内讧，还有更令人大跌眼镜的状况是，两个国家没有打，两个国家各自权臣的私家武装，居然打得比国家战争还热闹。就好比今天俄罗斯的总理拉上自家的保镖，和美国国务卿家的保镖开练，竟然阵仗比越战还狠，类似此类战争，春秋晚期很多。

打来打去，后果也很明显，原来强大的晋国，打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像原来姜家统治的齐国，变成了田家统治，总之不但是国家的版图轮廓打得变化了，连内部的政治制度，跟着也变了，自然地，官职秩序也要跟着变。

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国家生存的需要。

战国时期，如本书所说，生产井喷，经济高速发展，科技突飞猛进。具体到战争上，阵仗更比以前大得多，春秋时期打仗，几万人就是大规模，到了战国年间，几十万人都算是常规规模。发动一场几十万人的大型战争，依照原先的政治体制，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必须要有新的政治体制，与之对接配套。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官职设定，不但彼此之间不同，比起春秋时期，更是不同。但有一个核心内容，却是相同的，以《史记》

上评价说，国分文武，君之二术。中央集权制上，按照文武职能分配官职，改过去的松散管理为集中管理，方便集中人力物力，应对残酷考验，在这个战国年代生存下来——这是当时主要国家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这种选择下，战国国家的官职体制，也就基本类似：中央有负责行政的相国与负责战争的将军，分别统领相关官员。地方上建立郡县制度，由国君直接任命管理地方军政官员。大小官职仿佛都用绳索牵住，绳头牢牢抓在国君手里。各个国家的管理方式不同，但都是异曲同工。

在这个目标下，列国的主要官职都有哪些呢？又该怎么叫呢？

战国的这些官眼熟不

首先要说的，就是各国统揽行政大权的职务：相！

看过将相和的典故就知道，战功卓著的廉颇，可以为了蔺相如做相不服，差点闹出事端来，可见这个“相”，列国都是令人眼热职务！

其实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相”，但论地位，却是天上地下。春秋时期的相，只是小礼宾官而已，根本没什么实权，当时辅佐国君处理国家大事的，被称作“太宰”！但到了战国时期，“相”就翻身了，最早开始把“相”设为国君之下高官的，是春秋时期的齐国，战国时期继承这一设定的，则是最早雄霸列强的魏国，随后是韩、赵两国。魏国能够最早雄起，这个制度的优势，确实立竿见影！

至于后来变法崛起的秦国？虽说一些影视剧，都喊商鞅丞相，其实他刚入秦时，做的真不是丞相，而是“左庶长”，后来顺风顺水，做到了大良造，其实这就相当于“相”的角色，只是还没有名分。

秦国真正开始有了名副其实的“相”，则是在秦惠文王杀掉商鞅后，新得宠的张仪，他在秦惠文王十年（公元328年）官拜秦国相。而在称呼上，秦国也有了一个尊称：相邦。如果哪个电视剧上，吕不韦等秦国相，是被这样称呼的，必须赞一声，专业！而能与之相媲美的官职，就是总揽军事大权的将。将与相，这两个战国时期各国国家机器上的最高端官职，好比中央集权国王的左膀右臂。

然而比起“相”来，战国时期的“将军”，更是个新名词，最早有这个创新的，依然还是魏国。在魏文侯首霸诸侯的年代里，魏国除设置了“相”这个行政官职，还首创了文武分家，专门由军事人才来主持战事。乐羊子和吴起，这两位为魏国出生入死的名将，也可以说是战国时代最早的一代将军。

有了这个军事体制创新后，这种新型模式，也很快被列国效仿，比如齐国的田忌、燕国的乐毅，这些呼啸一时的名将，都是专职的将军，这在文武不分家的春秋年代，是很少可以看到的。但相对例外的，还是秦国。

作为战国长期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军事魔兽的秦国，其实在将的任命上，却是相当地保守。别看秦国一直军力强大，但在其他国家专职的将，放在秦国，却是个典型的临时工职务，一般都是有仗打了才随机委派，打完仗就收回权力。直到秦昭王时代，才有了第一位专职把持兵权的将军：穰侯魏冉！为什么偏偏他可以？当时秦昭王刚登基，王位都没坐稳，魏冉更是他的亲舅，不信他信谁？当然等到魏冉倒台，秦国又基本恢复了老样子了！

那么如此保守的秦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军令不通的情况呢？因为虽然将是临时的，但另一个军事职务却是固定的：国尉。

其实国尉这个职务，也是早在春秋时期就有，晋国的制度最成熟，但当时晋国担当这个职务的，也主要以文官为主。到了战国时

期，这个职务终于变成了完全的军事官职，负责全面的军事工作，正是因为有这个职务，秦国日常的军务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遇到重大战事，才能和临危受命的将军无缝对接。所以在战国各国里，秦国才最有国家军队的样子，强大在于管理和维护，并非只靠将领自己的能力、谋略带兵，而是无论谁带，都可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正是这种恐怖的战斗力、保持能力，才造就了秦国纵横天下的风光！

当然秦国的国尉，也是经过一个演变过程的。最早的时候，也只是大良造下的武官，属于给相打酱油的职务，比如我们熟悉的很多秦国名将，类似白起、甘茂，都曾经有过这样打酱油的工作经历，但等到秦国设相且取消大良造职务后，国尉，也就成了军事的最高长官。这种体制改革的过程，见证了秦国变法的逐步深入！而比起这几个官职来，另一个官职，应当是熟悉封建王朝的朋友，都格外地熟悉：御史！

单以“寿命”论，“御史”这个官职，堪称中国古代官职里的老寿星！商朝的时候就有，清末厘定新官制前依然在，结结实实的官场“老炮”，但事实上，别看“御史”一直在，但是它的身份到了战国时期才变的！

战国以后的御史，如我们熟悉的那样，主要都是做监察工作，但战国以前，并不是这个！

那最早的御史是干什么的？其实只要看看“秦赵渑池会”就知道，秦国、赵国斗智斗勇，蔺相如大展雄风，但旁边始终忙活的，却是御史们，秦赵两国国君出了什么状况，他们都要认真负责记录，哪怕被蔺相如吆来喝去，也不敢有半点怠慢。没错，他们那时候就干这个，就是领导身边的记录员，主要记录大事，特别是修史时，所有的现场情况，都要由他们记录！

这也就是说，后来从事司法监察工作的御史，在战国时期，还跟

这行当离得很远，但看上去很远，其实也很近，因为那时候御史们的一个职责，就是监督规劝国君们，国君们有哪些行为不像话，别人看不见，御史可看得见。而最早把御史往监督职能上拉的，还是秦国：秦国的御史，除了做记录，还要保管档案，秦国法律规定，每年廷尉都要找御史们去核对一年的档案记录。从单纯的秘书到专业监督，御史的转行，其实就是从此开始的。

既然御史当时只是秘书，那么战国时期，司法工作又是由谁负责？那正是孔圣人曾经从事过的工作：司寇。

到了战国时期，许多国家还是保留着司寇这个官职，但秦国却是个例外。秦国掌管司法的官职，正是上面说过的廷尉，而且对照汉朝就知道，汉朝的廷尉制度，正是从秦国沿袭而来，所谓汉承秦制，这个制度传承就是缩影！

上面这几个中央职务，基本都是战国列强共有的，而除此之外，各国也有一些独家官职设定。比如辅佐太子的官职，在齐国和燕国叫太傅，在秦国又分开，分别叫作师和傅。齐国和秦国还专门有博士，全是精通典籍的学者，专业给帝王当顾问。值得一提的还有司空这个官职，主要管工程营造，韩国和秦国都有，但事权又不一样，韩国的司空只管干工程，秦国的司空却还要管牢狱，原因也简单：秦国干工程的，主要是囚犯。

地方官职才是关键

如果说中央这些官职变迁，好些都给后人似曾相识之感，那么真正对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深远的，还是地方行政结构的变化。

社会的变化，关键就是从根子上变，放在战国年代，这个根基，正是地方的行政体制，这个变了，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这个转型期

——关键的环节已经完成。

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就是郡县制！

严格一点来说，郡县制也同样产生在春秋时代，但春秋时代不同的是，县的级别要远高于郡。公元前493年，晋国权臣赵鞅要讨伐范中兴氏，战前开动员会的时候就许愿：大功劳打完了给个县，小功劳给个郡。由此可见，当时县还在郡之上。

但什么时候，郡反而跑在前面了？依然还是战争需要，最早的郡为什么级别低？因为那时候郡只在边境有，后来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郡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给的实权也就越来越大。地盘也越来越大，相应地，国君的控制力也要加强，其地位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

因此，郡也就有了一套新的制度，长官叫作郡守，责任大权力也大，可以征发本地的士兵，但权力太大了控制不住怎么办？郡守下面还有郡尉，主抓军事工作，正好可以彼此牵制！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国家，地方建制都是叫郡，齐国就是叫都，但意思基本一样。

一开始的郡，地盘少编制也就少，后来郡越来越多，出于事权统一的需要，下面更要有层级机构，因此县也就正式作为下级机构，和郡形成了上下关系！

县的长官，叫作县令，这个称呼，也差不多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县令的下面，又有县丞、县尉，这个结构，之后也是一脉相承。中国古代号称皇权不下县，中央直属的官制，最低到县级，这种模式，也是从此开始！而郡与县的两级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郡县制，战国的列强里，谁推广这个制度最给力最彻底，也就意味着谁转型封建社会的速度最快。很显然，秦国走在了前面！

不过，要以为秦国是简单粗暴的郡县制，那就错了。任何一个国

家，任何一个年代，都需要按照自己的需求设计制度。再好用的制度，也不是生搬硬套来的。秦国在整个战国时代，最凌驾于列强之上的，就是强大的动员能力。其不但能动用近百万军队投入作战，更能长期保障战争供应，战争的支持能力，强大到如此恐怖，还与其一些附加制度有关，例如“道”！

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往往是在郡以下，与县是平级的机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协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更方便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这种模式帮助秦国稳定了内部的制度，是他们面对强大动员，依然可以稳定运转的基石！这样的制度模式，在后来的汉唐宋明几个朝代，也都有所参考，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时，历代都发挥了大作用！

战国时期，在县以下也有了两级的机构：乡和里，这是中国古代农村的传统机构制度，也同样是从战国开始，绵延两千多年。而且和中央直属管理郡县不同，乡和里两个层级，在管理上也有学问：乡是由乡主来管理，基本都是这一地方德高望重的人物，类似《汉书》里说的“三老”，里稍有不同，里的管理者叫里典。在秦国，里典通常选择勇武人物，也叫作“率嗷”。里中的居民叫“里人”，按照居住地来编伍，也叫作“四邻”。我们今天常说的街坊四邻，就是这么来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管理的缩影。

战国大事年表

公元前455年 原晋国韩赵魏三大家族，尽灭晋国大族智氏，至此，昔日春秋时代中原第一强国晋国，已基本被三大家族瓜分完毕

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册封韩赵魏三家大夫为诸侯，从此晋国正式成为历史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新兴国家：韩国、赵国、魏国

公元前397年 战国四大刺客之一的聂政刺韩相事件爆发

公元前389年 阴晋大战，战国初期著名以少胜多大战，名将吴起率10万魏军大败50万秦兵，魏武卒强悍威名流传天下

公元前388年 墨翟所著的战国科学宝典《墨经》问世

公元前386年 齐国田和放逐齐康公自立为国君，正式成为齐国新的统治者，是为“田氏代齐”

公元前375年 韩国攻灭郑国，将都城迁至原郑国都城新郑

公元前361年 魏国迁都大梁，确立了对西部秦国防御，全力东进的战略

公元前359年 卫鞅入秦，改变战国力量对比的商鞅变法即将开始

公元前355年 齐国邹忌改革，是为齐国崛起的重要一步，这个春秋时代的东方传统强国彻底复苏，开始争霸之路

公元前353年 齐魏桂陵大战，横扫中原的魏国遭到齐国痛击，霸业大为削减

公元前341年 齐魏马陵大战，书写围魏救赵妙笔，齐国重创魏国，从此成为关东最强国

公元前334年 齐国魏国徐州相王，至此，关东国家基本称王

公元前321年 秦国张仪兼相秦魏，连横政策大力推动

公元前318年 楚、赵、韩、魏、燕五国合纵讨伐秦国，在函谷关大败

公元前312年 秦楚丹阳大战，楚国8万人覆没，汉中600里土地丢失

公元前301年 齐楚垂沙大战，楚国再度战败，齐国确立了其关东六国的领袖地位

公元前296年 齐国牵头合纵，率领韩国、魏国攻克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

公元前294年 齐国田甲劫王事件发生，齐国孟尝君仓皇逃走，齐湣王大权独揽

公元前288年 齐国和秦国各称东帝、西帝，是为战国一时的两极格局

公元前286年 齐国攻灭宋国，引发秦国恐慌，燕国乘机策动五国伐齐

公元前284年 燕国率领五国联军横扫齐国，占领大片土地，齐国崩溃覆灭在即

公元前279年 齐国名将田单以火牛阵破燕军，齐国收复国土复国成功，但国力衰退，战国两极格局瓦解

公元前269年 赵国名将赵奢在阏与之战中击败秦国，赵国崛起

公元前260年 长平大战进入大决战，秦将白起斩杀赵国45万人，赵国遭到重创

公元前257年 邯郸大战，赵国绝地反击，信陵君窃符救赵，秦国大败

公元前255年 楚国灭鲁国

公元前249年 秦国灭东周，八百年周朝不复存在

公元前241年 韩、赵、魏、楚、燕五国最后一次合纵，一度威逼函谷关，最终失败

公元前237年 秦国权相吕不韦倒台，秦王嬴政亲政

公元前230年 秦国灭韩

公元前228年 秦国灭赵

公元前225年 秦国灭魏

公元前223年 秦国灭楚

公元前222年 秦国灭燕

公元前221年 秦国灭齐，战国时代结束，天下一统

历史中国

——前221—前206

秦朝

原来是这样

醉罢君山◎作品



从辅佐霸业到成就霸业
商鞅之法
两千年未变
统一之中华
肇始于斯
从璀璨盛极到轰然崩塌
统治无道
家国陨落竟快如流星
精彩的讲述 用故事串联历史，带你逃离历史课本的枯燥，
酣畅的点评 回到那个活生生的大秦帝国。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历史中国

——前221—前206

醉罢君山◎作品

秦朝

原来是这样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录

- 一 从亡国到复国
- 二 韩原之战：迈向大国之路
- 三 蜜月时代
- 四 殽山：挥不去的噩梦
- 五 东方不亮西方亮
- 六 沉闷的拉锯战
- 七 麻隧之战与迁延之役
- 八 在春秋与战国之间
- 九 雷神之锤
- 十 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 十一 时势造英雄：商鞅入秦
- 十二 史无前例的大变法
- 十三 改革家之死
- 十四 “屌丝”逆袭：张仪的励志故事
- 十五 新战略：连横VS合纵
- 十六 志在长远：秦灭巴蜀之役
- 十七 无节操的外交
- 十八 化险为夷：政坛不倒翁
- 十九 扛鼎而死的秦武王
- 二十 自投罗网：诱拘楚怀王
- 二一 千里伐秦：孟尝君的壮举
- 二二 伊阙：魏韩的伤心记忆
- 二三 日落东方：齐国的没落
- 二四 渑池：没有硝烟的战场
- 二五 横扫楚国：战神白起的表演
- 二六 割地事秦，犹抱薪救火

- 二七 阡与之战：两军相逢勇者胜
- 二八 土鸡变成金凤凰
- 二九 至强之矛与至强之盾
- 三十 从大决战到大屠杀
- 三一 邯郸：啃不下的硬骨头
- 三二 点石成金：“投资大师”的杰作
- 三三 吕不韦的时代
- 三四 杀无赦：嬴政的铁拳
- 三五 李斯与韩非
- 三六 硬实力与软实力
- 三七 统一的序幕
- 三八 风萧萧兮易水寒
- 三九 东方诸侯的覆亡
- 四十 始皇帝及其帝国
- 四一 开边与遇刺
- 四二 焚书坑儒：秦之暴政
- 四三 沙丘之变
- 四四 大泽乡起义
- 四五 陈胜之死
- 四六 绝代双骄：刘邦与项羽
- 四七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 四八 大秦帝国的谢幕

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一 从亡国到复国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是《老子》的一句话。

简洁，却充满真知灼见。

大帝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秦国亦然。从开国到一统天下，秦国花了将近七百年的时间，几多沉浮，几多曲折，几多坎坷，几多艰辛，唯一不变的是一脉相承的铁血文化，是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坚韧品质，是吞吐天地的无限雄心。

秦国的君主们把自己家族的谱系上溯到远古时代的颛顼大帝，他是黄帝的孙子，也是赫赫有名的“三皇五帝”之一。显赫的先祖背景固然令后人深感光荣，但细究其族谱，却又令人有几分狐疑。

一般说来，族谱都是以男丁相传，秦的族谱却不然。从颛顼大帝往下传了N代后，冒出个女子唤作女脩，女脩吞了一枚玄鸟蛋，生下儿子大业。这听起来像是东方版的圣母马利亚，未婚而先孕，带着某种神迹而孕。倘若以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大业才是秦的真正先祖，他的父亲是谁，没人知道，来路不明。

大业的儿子大费，在历史上也是个人物。他与大禹一同治水，后来大禹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便让他去管理山林鸟兽，大约是因为他总躲在树荫下，故而又被称为“柏翳”，后来又称为“伯益”。帝舜赐给大费“嬴”姓，后来的秦、赵两国都是属于嬴姓，大业、大费就是他们的共同祖先。大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夏启建立夏王朝，大费（伯益）在与夏启的斗争中败北，死于非命。

我们跳过夏、商两代漫长的历史，把时间快速推进到西周。

时间大约是公元前870年，正是周孝王当权的时代。在犬丘（甘肃天水西南），居住着一个名为非子的养马师，他是大费的后裔。这时的犬丘是周王朝的政治中心，西周已开国近两百年，正是由盛而衰的时期。周孝王上台前，西周多次遭到戎人的进攻，首都镐京多次岌岌可危，周王室不得不临时迁都到了犬丘。

由于战争频频，马匹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政府非常重视马匹的牧养。周孝王想找个养马能手管理牧场，有人就推荐说，非子这个人特别会养马。天子十分高兴，召见非子，派他去管理汧河、渭河之间的牧场。非子不负所望，在他悉心管理下，牧场的马匹大量繁殖。

鉴于非子为国家作出特别的贡献，周孝王封了一小块地给他，这块巴掌大的地就叫秦。数百年后秦国统一了中国，不过在周孝王时，秦国并不是一个诸侯国，只是西周的附庸国罢了。依照西周礼制，附庸国的面积，方圆不超过五十里。谁又能料想得到，毫不起眼的秦国，后来竟成为周王朝的掘墓人。

作为周王室的附庸国，秦国的任务之一是安抚西戎蛮族部落。

周孝王去世后，周夷王即位，随即对戎人发动大规模战争，缴获甚多。此役后，西北边疆略为安定，故而秦国与蛮族相安无事，颇为清闲。但好景不长，到了周厉王统治时期，政治混乱腐败，暴虐无道，激起诸侯的叛乱，西戎蛮族也乘机反叛，从此西方开始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蛮族人频频发动进攻，弱小的秦国，正是在与西戎蛮族不间断的战争中，铸就了铁血国魂，一步步迈向强大。

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即位。他是周朝历史上的一位中兴名君，力图重振周王室的辉煌。上台伊始，周宣王便频频用兵，先是讨伐北

方的狄（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戎狄部落），继而南征淮夷。

在伟大的周宣王的感召下，秦国第四任君主秦仲摩拳擦掌，主动请缨讨伐西戎。宣王大喜，任命秦仲为大夫，率自己的族人反击西戎。秦仲一腔热血，忠心可鉴，只是这时的秦国不过是个弱小的附庸国，军事力量远不能称强大。在如狼似虎的西戎人的反扑下，节节败退。

宣王六年（前822），这是秦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刻。西戎人反客为主，攻入秦国，秦仲拼死抵抗，最终还是寡不敌众，战死沙场，秦国沦陷。

刚刚立国五十年的秦国，就这样悲壮地灭亡了。

倘若不是秦仲有几个有出息的儿子，未来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秦国就不存在了。

在秦国沦陷后，有几辆马车向东疾驰，坐在车上的人是秦仲的五个儿子，他们面如土灰，神情沮丧，只有眼睛里还喷射着复仇的火焰。要怎么复仇呢？他们已是两手空空，甚至无家可归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伟大的周宣王。

马车驰入京城，来到一座层台高耸的宫殿前。在周宣王面前，秦仲的五个儿子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只有坚毅的目光，锋锐如剑。他们有长有幼，小的尚未成年，但国破家亡的遭遇让他们坚强，挺起胸膛，体现出男儿应有的勇气与决心。

那一刻，号称“中兴明君”的周宣王被深深打动了。他慷慨地拨出一支七千人的部队，交给秦仲长子，勉励道：从今天起，你便是秦的主人，去收复自己的家园吧。

没有周宣王的雪中送炭，就没有秦国的绝处逢生。

五兄弟叩首拜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发下誓言，誓死效忠周王，誓死扫灭西戎。

秦仲的长子，史称秦庄公。

此时的秦只是附庸国，不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内，根本够不上“公”的标准，那么他为什么被称为秦庄公呢？显然，这是秦国强大后，为纪念伟大的先祖而追赠的尊号。

秦庄公将用他余下的生命之烛，再造秦国。

凭着从周宣王那里借来的七千精锐部队，秦庄公把西戎人赶出秦地，收复故土，再建家园。现在，权力、地位、美女都有了，舒适的生活又回来了。倘若秦庄公就此收手，享受美妙的人生，他就不是伟大的君主了。西戎未灭，杀父之仇未报，他怎么能被美酒美女消磨意志呢？他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唯一的使命就是战争。

他是一架永无休止的战争机器。

他抛弃了一切，甚至把国家交给弟弟，自己宁可风餐露宿，率着一支虎狼之师奔驰于原野，随时与西戎人血腥杀戮。他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唤来，让他们庄严立下誓言：“西戎杀我的祖父，我若不手刃西戎之王，绝不归来。”

除了复仇，不知其他。

在秦庄公之前，秦国只是一个武力平平的小国，没有光荣的历史，没有赫赫的战功，没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是秦庄公给国家带来雄心，带来扩张的渴望，带来不可动摇的复仇观念。他那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为后世强秦树立了一个勇武的传统；他是秦国铁血兵团的缔造者和精神领袖；他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君主，也是一名伟大

的战士。

看上去这是一场以卵击石的决斗。

夏、商、西周三代千年历史，作为游牧部落的戎人始终是中原政权之大患，以中央朝廷号令天下的权势，尚且无法荡灭，区区一个毫不起眼的秦国却异想天开，岂非可笑至极？

在秦庄公眼里，没有可笑的字眼，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代不能实现的理想，还有子子孙孙去继承发扬。人心所至，愚公亦可移山！

岁月催人老。从青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转眼间，秦庄公已走过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时光侵蚀他的容颜，唯有战斗的心永不老。战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曾经不堪一击的秦人，在战火的洗礼中变得坚强，他们无所畏惧，为战斗而生，为战斗而死。秦庄公的浴血坚持，缔造出一支伟大的军队。

从此，秦人以悍勇顽强闻名天下。

而秦庄公就是秦国铁血精神的缔造者与独一无二的精神领袖。

他在位共计四十四年，没有时间去享受奢侈的生活，拒绝让荣华富贵消蚀万丈雄心。他宁愿选择在荒山野岭宿营，在疲倦不堪中行军作战。他坚忍不拔，充满斗志，并把这种坚忍的理念灌输到国人的精神理念之中。

秦襄公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复仇的旗帜仍迎风飘扬。

但是，不能低估西戎的力量。

此时周王朝与西戎的战争全面展开，号称“中兴之主”的周宣王开

足国家机器的马力，频频发动对西戎的打击，然而收效甚微。

周宣王三十一年（前797），西周大举讨伐盘踞在太原的戎人部落，兵败而还。五年后（前792），周宣王再度用兵，讨伐条戎、奔戎部落，又一次败绩。最惨的一次是公元前789年，周宣王动用南方诸侯的庞大力量，发动规模空前的伐戎之战，岂料遭遇最大的一次败仗，尽丧“南国之师”。后世史学家颇为惋惜地评价“中兴之美未尽焉”，周宣王毕竟只是半截英雄。

周宣王去世后，周幽王继位。幽王三年（前779），西周以伯士为统帅，再度发动对西戎战争，非但大败，连统帅伯士都死于非命。

秦襄公是在公元前778年上台，此期正是戎人势力最强的时期，整个周王朝都打不赢戎人，何况小小的秦国呢？可以想象秦庄公、秦襄公是在何等艰难的环境下，浴血生存。

西戎的军事力量如日中天，秦襄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襄公二年（前777），西戎人包围犬丘，迫近秦国。

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这个人便是秦庄公的长子，名唤世父。他请纓出战，率秦师与戎人大战于犬丘。可惜的是，他遇到史上最强大的戎人武装，不仅溃不成军，自己也成为戎人的阶下之囚。作为游牧部落，戎人崇尚武力，敬重勇士。世父虽兵败被俘，但他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气概，征服了戎人。戎人非但没杀他，反而礼待有加，后来还把他释放回秦国。

敌我实力悬殊，秦襄公不得不韬光养晦，苦练内功。

在秦襄公苦练内功的同时，西周王朝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周幽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宠幸褒姒，为博美人一笑，

不惜烽火戏诸侯，又废掉太子，改立褒姒的儿子为嫡。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最终众叛亲离，申侯勾结犬戎（戎人的一支）杀入镐京，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史称“骊山之乱”。

西周由是灭亡。

这一年是秦襄公七年（前771）。

周幽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宜臼被立为天子，是为周平王。由于镐京残破，只得东迁到了洛邑，这也是东周的开始。经骊山一役，周王室威风扫地，再难号令诸侯。而东方老牌诸侯国，如齐国、鲁国等，根本不理睬周平王，没有人愿意出兵相助。

小小的秦国却向周王伸出援手。

秦襄公还记得那一幕：五十几年前，父亲战死了，国家灭亡了，他与哥哥一路逃到镐京，是周宣王的慷慨相助，秦才有复国的机会。这个恩，他不能不报。此时的襄公不复年少，已然垂垂老矣，可强烈的责任心让他义无反顾地率一支部队，驰援周平王，直到把平王送到新首都洛邑。

周平王的心里泛起一阵暖意，时穷节乃现哪，那些受尽王室恩惠的大诸侯，没有一个靠得住，倒是没有封爵的秦襄公忠心耿耿。天子感动了，当即把秦襄公封为诸侯。从此，秦不再是一个附庸国，而是堂堂的诸侯国，与晋、齐、鲁等国平起平坐了。

给个诸侯的头衔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有名还得有实才行。

周代礼制，公侯者，封国面积方圆百里。在此之前，秦只是附庸国，土地面积方圆不超过五十里。现在周平王提升了秦襄公的政治地位，可是土地呢？他拿什么土地赏赐给秦国呢？

周平王满脸通红，他实在囊中羞涩，没有什么可拿得出手的。

天子毕竟是天子，没点智慧行吗？周平王脑筋动得蛮快的，给了秦襄公一个空头支票：岐山以西的周王室领地都落入犬戎人之手，只要秦襄公能把犬戎击败，夺回的土地就归秦国所有。

这算是赏赐吗？

不管怎么说，周平王保住了面子，秦襄公得到了一个承诺。

有了承诺，秦国就有了奋斗目标。

对秦襄公来说，这无异于天赐良机，国偏地瘠，这一直是秦之心痛，也大大限制了其发展，现在只要击败犬戎，就可以得到大片肥沃的土地。

为了得到岐山以西的土地，秦人与犬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争。

只是秦襄公已老迈，他再也无法看到梦想的实现。

公元前766年，秦军兵临岐山，秦襄公病逝于前线，在位时间共计十二年。

复国后的第一代领袖秦庄公、秦襄公先后病逝，第二代很快接过接力棒。襄公未竟的事业，由儿子秦文公继续完成。

经过十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到秦文公十六年（前750），秦国终于击败西戎，收复了被西戎人占领的周王室的土地，同时也占领了部分西戎人的土地。秦文公遵照与周王室的约定，岐山以西的土地归秦国所有，岐山以东的土地，秦国归还给周王室。当年周平王的承诺，是双赢的承诺。

夺取岐山的战争意义非凡，不仅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政治的胜利。

秦国被周王室封为诸侯国，急需军事上的胜利来作为与东方强国平起平坐的资本。当时周王室虽然威风不再，但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秦国为其夺回岐山以东被占领的地盘，提高周王室地位的同时，秦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从秦庄公经秦襄公到秦文公，历经三代共计七十二年的时间，秦国在这漫长的时间中由弱小变得强大。自秦文公之后到最后秦统一中国的数百年间，秦国一直保持着国力的强盛，是一等的强国。

秦在数十年与西戎的战争中，铸就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最初秦庄公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依靠着从周王室所借七千人起家，到了秦文公击败西戎，秦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在这场以蛮力对抗蛮力的长期战争中，秦人开始体现出其勇悍、顽强、好斗的性格，这个尚武之国显露其虎狼本质，日后这种凶狠拼命的作风，将令其他诸国闻风丧胆。

秦国在西方默默地奋斗着，并没有引起中原诸侯国的注意。这一时间段的史料，对秦国的记载如凤毛麟角，它似乎处于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与中原诸侯国也绝少往来。这种封闭性使得秦国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诸国，其政治充满野蛮的色彩。

直到秦文公十三年（前753），秦国才设史官以记录史事。七年后（前746），秦文公制定诛灭三族的法律。所谓三族，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父母、兄弟、妻子为三族；有的则认为是父族、母族、妻族。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比较文明的，秦国的诛三族制度强化了君主专制，开了一个坏头。

秦文公死于公元前716年，在位达五十年之久。

他够长寿的，自己还没死，被立为太子的长子先死了，只能把君

主宝座传给孙子。秦宪公上台时，年仅十岁，国家权力落入几位强臣手中。

秦宪公与祖父相反，二十二岁就早夭了。但是他在位的十二年里，秦国多次发动对西戎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随着秦国的强大，西戎蛮族已经无法抵挡秦人凶狠的进攻了。

宪公二年（前714），秦军大举进攻西戎蛮族大首领亳王所盘踞的荡社，并于次年铲平荡社。西戎军队被打得大败，亳王落荒而逃。

宪公十二年（前704），秦军进攻荡氏，消灭这支西戎部落。

秦国在西方的战斗，无形之中对捍卫中原文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骊山之变后，西戎崛起，对中原华夏族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不是秦国人以拼命三郎的勇气与战斗精神遏制并削弱西戎，西戎蛮族势力早已经渗透到中原地带了。

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时，秦宪公已是病入膏肓，眼看就要不行了。与此同时，看似平静的宫廷，实则暗流涌动。当时宪公的长子已被立为太子，权臣弗忌、三父等人则打算立其幼子出子。宪公一死，弗忌、三父马上发动政变，废掉太子，拥出子为君主。

不料几年后，弗忌、三父等人发现出子虽然年轻，却不愿意当他们手里的傀儡。这些权臣不禁在心里冷笑，我等既可立你，也可以杀你。公元前698年，三父等人派人假扮盗贼，把出子杀了。此时的出子年仅十一岁。

出子一死，国君的宝座又空出来。三父等人想来想去，有资格当国君的，也就只有出子的哥哥，以前被废掉的太子。没办法，只好又把太子扶上台，他就是秦武公。

秦武公也只是十几岁的小孩子，经历了被废的风波后，心智较他人更为成熟。他假意迎合三父等权臣，暗地里却策划诛杀权臣的计划。武公三年（前695），他以霹雳手段发动政变，把杀害弟弟的一帮权臣绳之以法，并处以夷灭三族的酷刑。

从武公的谥号可以看出，他乃是一代雄君，在武功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他初即位时（前697），便发动对彭戏氏（西戎的一支）的战争，一直追击到华山之下；十年后，秦武公重拳再度出击，讨伐戎人的分支邽戎、冀戎，逐一击破之。秦在与西戎的百年战争中，已是占尽优势。

不仅如此，秦武公还把目光盯在小诸侯身上。此时正是春秋时代初期，史无前例的大兼并战争已拉开帷幕，秦国自然不甘落后。公元前686年，秦国吞并了小虢国，迈向兼并诸侯的第一步。

从地缘来看，秦国在诸侯国中处于偏远地区、接近蛮夷。这本是地缘劣势，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劣势反倒成为优势。秦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有向外拓展的广阔空间，通过对西戎的鲸吞蚕食，秦国的土地不断延伸向西方。

武公在位时间二十年，于公元前678年去世，时年也不过三十多岁。武公死后，采用活人殉葬制度，陪葬的人多达六十六人。殉葬是商周时代一种丑陋的制度，王公贵族不仅生前要享受，死后还要享受，这才有殉葬的陋习。《墨子》一书曾写道：“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进入春秋战国后，儒、墨等显学都极力批判殉葬制度，这一丑陋的制度才慢慢被各诸侯国废除，文化落后的秦国废除得最晚，这后面再说。

由于秦武公死时，儿子尚年幼，他担心权臣一手遮天的历史重

演，没传位给儿子，而是传给同母弟弟，这就是秦德公。

秦德公只是个过渡人物，他三十三岁即位，两年后便死了，长子秦宣公立。

此时在秦国以东，一个伟大的国家正以火箭般的速度蹿起，这个国家便是晋国。晋国是春秋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也是秦国的克星。秦宣公四年（前672），晋献公大举讨伐骊戎（戎人的一支），灭其君，取得伟大的胜利。两个相邻的强国碰到一起，冲突不可避免。这一年，秦国与晋国爆发战争，双方战于河阳，凶狠的秦人占了上风。这也是两国的第一次交锋，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两国还有无数次的兵戎相见。

宣公当了十二年国君，死时大约也不到三十岁。他同样没把权力交给年幼的儿子，而是给了弟弟秦成公。

秦成公是个短命鬼，只当了四年国君便死了，君位传给弟弟，他便是秦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君主秦穆公。

二 韩原之战：迈向大国之路

在秦穆公之前，秦国的历史相当简略，甚至连君主叫什么名字，也无从考。尽管秦人以自己的坚强在西部杀出一片新天地，但中国文明的重心始终在中原。此期中原的史料已是相当丰富，秦国史料却几乎一片空白。直到秦穆公横空出世，在诸侯国中大放光芒，秦国的史料才丰富起来。有了这些珍贵的史料，我们才能对秦穆公的事业有更深刻的理解。

公元前659年，秦穆公正式即位。

这时距骊山之乱、西周灭亡已过百年。东周天子暗弱，早已失去领袖诸侯的能力，国内政治形势大变，大诸侯国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挥舞霸业的旗帜，其中的领军人物是第一代霸主齐桓公。齐桓公能称霸的原因，在于任用管仲为相，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建立新的国内秩序。

秦穆公深知秦国人民坚忍不拔、耐力超绝，然而文化上的落后，使得人才凋零，难以同东方诸侯一决雌雄。在国家小的时候，还比较好管理，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秦国急需政治上的人才，来管理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

人才引进，便成为秦穆公的基本国策。

穆公四年（前656），秦穆公迎娶晋献公的女儿，此举意在缓和两国紧张的关系。这个政治婚姻让秦穆公有意外的收获，在晋国公主的陪嫁奴仆中，竟然有一个大政治家，这个人便是百里奚。

一个政治家怎么会沦落到奴仆的地步呢？

这里有一段十分曲折的故事。

百里奚原本是虞国大夫。两年前（前658），晋献公向虞国借道攻伐虢国，百里奚力劝虞君，万万不可让晋军过境。收受贿赂的虞君根本不听百里奚的劝告，结果晋国攻占虢国后，顺手牵羊把虞国灭了。百里奚成了阶下之囚，后来被当作陪嫁奴仆，跟随公主到了秦国。

一个堂堂的虞国大夫，从高官变成奴仆，百里奚哪里忍受得了这种耻辱。入了秦国境内，他找机会逃跑了。这一逃，逃到了楚国。

不料他的运气实在差得很，跑到楚国后，被楚国人当作秦国间谍，又一次身陷囹圄。求贤若渴的秦穆公早听说百里奚的贤明，听到他逃走的消息后，心中郁郁不乐。后来打听到百里奚在楚国被抓走，秦穆公愁眉顿展，喜上心头。

怎么把百里奚弄回秦国呢？

起初秦穆公的想法是，开高价换回百里奚。不过他转念一想，这时楚国人只把百里奚当作间谍，不知他乃是高明的政治家，倘若秦国开价太高，反而会引起楚国人的怀疑。只有低贱的价格，才会令楚国人相信这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秦穆公开出的价格低得不能再低了：以五张羊皮换一个大活人。

据《史记》记载，此时百里奚已经年过七十，连干活的力气都没有，在楚国人眼中，连五张羊皮都不值，他们很乐意与秦国做交换。

这样，百里奚又被带回了秦国。

唉，难道自己一大把老骨头，竟然要以奴隶身份终其一生吗？

正当百里奚长嗟短叹时，命运女神却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前来迎接他的，不是手执皮鞭的管家，而是秦穆公本人。秦穆公

非但没把他当作奴仆，反而敬若上宾，谦虚地向他请教如何治国。老迈的百里奚不无感慨地说：“老夫不过是亡国臣子，哪有资格让国君亲自讨教哇。”

秦穆公以恭敬的语气说：“虞君不听您的劝告，才招致亡国的命运，并非您的过错。寡人虽然无才，却思贤若渴，希望您帮助寡人治理国家。”

命运果然鬼使神差，神妙莫测。自己曾在虞国久居高位，无奈忠言逆耳，以致亡国。今日身处异乡，地位卑贱，年纪老迈，不敢幻想未来。岂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枯木又逢春。上天把他流放到这片荒凉的土地，不正是要他成就一番丰功伟业吗？

百里奚与秦穆公相坐而谈，忘了吃忘了睡，竟整整谈了三天三夜。年轻的秦穆公不耻下问，年老的百里奚有问必答，君臣其乐融融。三天后，百里奚一跃成为掌管国政的大夫，因为他是以五张羊皮换来的，故而被称为“五羖大夫”。

峰回路转，百里奚并没有得意忘形。

他对秦穆公说：“我的才能比不上蹇叔，蹇叔十分贤明，只是世人不知道罢了。”

接着，他对秦穆公讲了蹇叔的故事。蹇叔是百里奚的好朋友。

与百里奚热衷功名利禄不同，蹇叔为人低调，深居简出，随遇而安，淡泊名利。百里奚年轻时曾经游历齐国，想混个一官半职，却落得个四处碰壁，以乞食为生。在落魄时，他认识了蹇叔，两人虽然性格很不同，但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遂成为好友。在蹇叔的支助下，百里奚度过了最艰辛的日子。

有一次，百里奚到了周王室领地，遇到周惠王的弟弟子穰发动政变（前675），驱走了周天子，自己登上王座。他听说子穰喜欢牛，自己在养牛上有一套办法，想以此来博取子穰的欢心。这时蹇叔出来阻止，认为子穰的政变不可能成功。过了不久，果然周惠王成功复辟，子穰的跟随者大多被诛杀，百里奚得蹇叔的阻止而幸免于难。

多年一事无成后，百里奚决定到虞国去碰碰运气，捞了一个官职，步步高升。蹇叔警告他说，虞君昏庸无道，听不进大臣的劝告，这样的君主不值得跟从。名利熏心的百里奚听不进蹇叔的劝告，结果虞国被晋国所灭，自己沦为阶下囚。

百里奚将自己的故事说给秦穆公听，极力推荐蹇叔：“每次我听蹇叔的建议，都可以化险为夷。只有一次没听他的话，就遭遇国破被囚的命运，由是可知蹇叔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秦穆公听了大喜过望，不久后，他以非常贵重的礼物诚恳地请来蹇叔，拜为上大夫。

百里奚与蹇叔成为秦穆公的左膀右臂，在内政治理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不仅如此，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与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后来都成为秦国重要的将领。秦穆公仅仅以五张羊皮的代价，换来四位杰出的人才，绝对是划算的投资。

在百里奚与蹇叔的协助下，秦穆公得以从繁忙的内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外交事务与军事扩张。

秦国地处西隅，向东之路被晋国所阻。秦晋两国，受周边蛮族的影响很深，与中原诸国相比，军国主义思想非常鼎盛，崇尚武力，民风勇悍，是棋逢对手的两个国家。如何处理与晋国的关系，成为秦穆公最关心的问题。

雄心勃勃的秦穆公，不想去招惹这个强大的邻居，他积极改善与

晋国的外交关系。

与秦国相比，晋国内部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

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宠幸的骊姬设了一个局，诬陷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夷吾三人欲陷害老爹。献公大怒，杀心顿起。太子申生自杀身亡，夷吾与重耳远走他乡避难。四年后，晋献公病逝，骊姬的儿子奚齐被立为国君。然而，对骊姬心怀不满的大臣们发动政变，杀死奚齐与骊姬。一时间，晋国的政局扑朔迷离。

晋国的内乱引起秦穆公的密切关注。

逃亡在外的晋国公子夷吾希望得到秦国的相助，他与秦穆公达成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的核心内容是：秦穆公帮助夷吾返回晋国当上国君，晋国将割让五座城邑给秦国作为酬谢。对秦国来说，这可真是太划算的买卖了。

秦穆公得到夷吾的许诺后，当机立断，派遣军队护送公子夷吾回国。在秦国的支持下，公子夷吾顺利返回晋国，登上国君宝座，史称晋惠公。

任务完成了，晋惠公该信守承诺了吧。

可是晋惠公翻脸不认账，拒绝割让土地。

这一刻，秦穆公感觉自己成了冤大头。

晋国与秦国的关系迅速恶化。

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晋惠公厚着脸皮派人到秦国，请求秦穆公将粮食卖给晋国。秦穆公还为晋惠公违约而愤愤不平，现在晋国人找上门，要不要提供粮食援助呢？

公孙枝对秦穆公说：“我看还是先给他们提供粮食援助，如果晋国人知恩图报，就会把约定的土地割让给我们；如果晋国国君再次忘恩负义，那么他的百姓必然离心，一旦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我们前去攻打，他们必败无疑。”

秦穆公心里很犹豫，又问百里奚：“要不要给晋国人提供援助？”

百里奚回答说：“天灾流行，这是各国都难免发生的事情，救灾恤邻，是符合道义的，多做善事，国家会有福报的。”

当时身在秦国的晋国流亡分子丕豹，他的父亲被晋惠公所杀，如今晋国饥荒，这是报复晋惠公的最好机会。他跑来对秦穆公说：“现在正是攻打晋国的时候。”秦国大臣都力主对晋国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丕豹却幸灾乐祸，这令秦穆公很不高兴，他正色说：“晋国国君着实可恶，但是人民却是无罪的。”

一个国君对敌国能有如此胸怀，秦穆公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

救急的粮食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从秦国运输到晋国灾区。这次大规模的粮食运输，又被称为“泛舟之役”。

晋惠公是否感恩戴德呢？

不。

他从来不是知恩图报的人。

风水轮流转。第二年，轮到秦国闹饥荒了。

秦穆公派人赶往晋国，请求晋惠公提供粮食援助。晋惠公是十足的地痞无赖，又一次忘恩负义，拒绝卖粮。

晋惠公的一意孤行，终于激怒了秦穆公。秦国人凭借自己的坚强，克服天灾，度过了最艰苦的饥年。第二年灾情缓和后，秦穆公要

报复了。

穆公十五年（前645），秦国大举发兵，越过边界，杀入晋国，三战三胜，渡过黄河，兵临韩原。

面对秦国人凶悍的攻势，晋惠公不甘示弱，决意亲征，与秦穆公一较高低。

晋惠公亲抵韩原，先派大将韩简去侦察秦军的虚实。

韩简回来后向晋惠公汇报说：“秦军的人数比我们要少，但斗士比我们多了一倍。”

晋惠公听了很纳闷，问道：“这话怎么讲？”

韩简答道：“秦国曾多次帮助晋国，晋国一次也没有报答，他们才兴师问罪。现在您不但不反省自己，与秦国和解，反倒倾国家之力迎战。我军士气低落，秦军士气高昂，这样看来，秦国的斗士何止比晋国多一倍呢？”

晋惠公听后怒气冲冲地说：“一个普通人都不能受人轻侮，何况是一个国家呢？”他让韩简充当先锋，向秦军挑战，并传话给秦穆公：“寡人不才，只能把军队集合起来，不能解散他们。您如果不退兵，将无处逃命。”

秦穆公听后不禁轻蔑一笑，派公孙枝答复道：“您还未返回晋国时，寡人为您忧惧；您地位尚未稳固时，寡人为您担心；现在您的地位稳固了，我岂敢不接受您挑战的命令呢？”

韩简知道秦军上下同仇敌忾，气势如虹，他回到兵营对左右说：“我们如果能活着当秦国人的俘虏，就已经是幸运了。”

连晋国大将都失去信心，更不用说一般的将士了。

九月十三日，秦、晋这两支最凶悍的军队在韩原展开巅峰对决。

秦军如饿狼扑食，晋军如猛虎下山；秦军的士气旺盛，晋军则人多势众。这是勇者的时代，两位国君亲自挥戈，各自在战车上参加战斗。晋军将领韩简的战术是擒贼先擒王，他的战车迅速插入秦军阵中，直扑秦穆公。

晋军人多势众，占据上风。秦穆公在战斗中负伤，形势很不乐观。正当此时，不知从哪冒出三百个野人，手执武器，力大无比，冲入晋军营中，把晋国人杀得人仰马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要说晋惠公看得两眼发愣，就连秦穆公也不知这支奇兵是何方神圣。

有果必有因。

原来在几年前，秦穆公乘坐的一匹好马走失了，被岐山下三百个野人宰了吃掉。后来这些野人被秦吏抓到，打算严惩。秦穆公摆摆手说：“算了。君子不能因为牲畜的缘故伤害人的性命。我听说光吃马肉不喝酒，是会伤身体的。”于是下令赐酒给三百个野人。这些野人虽没什么文化，却比晋惠公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他们听说秦穆公与晋惠公大战于韩原，遂抄起家伙赶来助阵。正好瞧见秦穆公为晋军围攻，还挂了彩，野人们便冲上去解围，救了秦穆公一命。

由是看来，做善事还是有善报的。

三百个野人参战，秦军反败为胜。

与秦穆公相比，晋惠公倒霉得多，他的战车陷入泥泞之中，动弹不得。秦军一拥而上，将晋惠公活捉了。国君被生擒，群龙无首，晋军被打得大败而逃，同时被俘虏的，还有不少晋国大夫与将领。

晋惠公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秦人恨之入骨，若是被押回秦都，恐怕小命难保。秦穆公放出这样的话：“我要拿这小子来祭祀上天。”

有一个人焦虑不安。

她就是秦穆公的夫人秦穆姬，也是晋惠公的异母姐姐。穆姬与弟弟不同，很有人情味，弟弟落难，她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怎么救？女人有女人的办法：以死相逼。

穆姬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登上高台，高台下堆满干柴。为了营造悲情效果，她光着脚，披着麻衣黑巾。

她派人秦穆公说：“天降灾难，使秦、晋两国兵戎相见。如果晋国君主白天被押进秦都，妾就在晚上自焚；如果晚上押进秦都，妾就在早晨自焚。这件事，请您好好考虑。”

秦穆公没有想到夫人来了这么一手，他叹气道：“俘虏晋国君主，我本以为可以凯旋而归，倘若好事变成丧事，抓了晋国君主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杀晋惠公者大有人在。

公子絷说道：“不如把晋君杀了，以免他回国后又与我们作对。”

公孙枝不同意，提出另一个方案：“不如有条件地释放晋国君主，条件就是让晋国太子到秦国来充当人质。晋是一个强国，我们无法消灭它，杀了晋君，只会加深两国的仇恨。”

秦穆公心里明白，晋国的实力绝不在秦国之下，韩原之战的胜利，实有侥幸成分。他兴师伐晋，只是为了给晋惠公一个教训，并非想杀了他。再加上夫人穆姬以死相威胁，这人更杀不得了。他认可公孙枝的方案，与晋国进行谈判。

晋惠公已是阶下之囚，当然没有资本谈判，只得委托国内执政大臣吕甥为全权谈判代表，前往秦国。

踌躇满志的秦穆公问吕甥：“对于和谈一事，晋国内部的观点一致吗？”

吕甥回答说：“不一致的。有些人以国君被俘为耻，为阵亡者悲伤，不怕征税赋、修兵革之苦，立太子圉为国君；他们说，宁可事奉戎狄，也要报仇。有些人爱戴国君，知道其过错，因此不惜征税赋、修兵革以待秦国释放国君的命令；他们说，必定报答秦国之恩，虽死无二心。所以说晋国民众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秦穆公点了点头，又问说：“晋国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君呢？”

吕甥回答说：“有些人表示担忧，认为国君很难幸免于难，他们说，我国得罪了秦国，秦国岂肯释放国君回国呢？有些人抱着宽恕之心，认为国君能安全返回，他们说，我们承认犯了过错，秦国必然会释放国君，这是天大的恩德，同时也是一种威严，秦国凭借此恩德与威严，可以称霸诸侯了。如果秦国废掉了晋侯，只会把以前的恩德变为怨恨，这样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

听了吕甥的回答，秦穆公肃然起敬，晋国有人才，晋国不可欺。

谈判的结果，秦国同意释放晋惠公以及其他俘虏；晋国割让河西之地，以及部分河东之地，同意遣太子入质秦国。

韩原之战，是秦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次战役。在此之前，秦国一直处于东周政治的边缘地带，凭此一役，秦国重创晋国，震动诸侯。从此，秦国开始为东方诸侯所关注，国内政治地位及影响力也不断提升，跻身于强国之列。秦穆公在战争前后的表现，实有大国君主的雍容气度，秦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由是开始。

三 蜜月时代

晋国太子圉被送到秦国当人质。

秦穆公并没把他当人质对待，还把女儿嫁给他。当然，穆公不是活雷锋，他有自己的政治算盘：太子圉是晋国未来的统治者，又是自己的女婿，只要他顺利继承君位，无疑秦国对晋国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太子圉根本就不领情。一个堂堂大国的太子，居然沦为战败国的人质，在秦国一待就是六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

公元前638年，晋惠公病重的消息传到秦国。

太子圉对自己的政治前景忧心忡忡，他入质秦国已六年之久，国内还有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对国君宝座虎视眈眈。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他不能及时回国，恐怕夜长梦多。他未必不知道强大的秦国就是自己最好的外援，但是多年近似囚犯的人质生涯，使他对秦国只有恶感，没有好感。他不想依靠秦穆公的力量上位，否则必受秦人的摆布。

于是不辞而别，秘密逃出秦国，返回晋国。

几个月后，晋惠公病逝，太子圉即位，史称晋怀公。

人质跑了，秦穆公的计划泡汤了。他雷霆震怒，想到晋惠公与晋怀公都是忘恩负义之人，只把秦国当猴耍，这口气，他再也咽不下去了。

一定要把晋怀公拉下马！怎么做呢？秦穆公想到了一个人：流亡

在外的晋国公子重耳。只要扶植重耳，把他送上晋国国君宝座，晋怀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晋国公子重耳在外漂泊十几年了。

起初他被骊姬陷害，不得不远走他乡，逃到狄国。晋献公死后，骊姬被大臣们所杀，那么重耳可以回到晋国了吧？继位的晋惠公是他的兄弟，非但不让他回国，反而把他当作对自己权力的威胁。晋惠公派出刺客，前往狄国刺杀重耳，重耳只得再度亡命天涯，逃到齐国。

在之后几年，重耳与他的随从们四处流浪，希望得到诸侯们的支助，返回晋国。只是他们所到之地，只遭人白眼，可谓尝尽人世辛酸。最后，他来到了楚国。此时的楚国是天下最强大的诸侯，当权者是武功赫赫的楚成王。楚成王对重耳优待有加，然而最终将他推上晋国君主宝座的人，却是秦穆公。

秦穆公向重耳抛出橄榄枝，重耳身边那些精明的谋士群，从中窥见回国的机会已趋成熟，秦穆公必定会以他强有力的手腕，助重耳一臂之力。

重耳入秦后，受到了秦穆公的热情接待。

为了拉拢重耳，秦穆公送给他五位美女，这位年过六十的晋国公子艳福非浅。在这五名女子中，竟有一人是穆公的女儿嬴氏，她是太子圉（晋怀公）的夫人，只是太子圉逃回晋国去了，婚姻也就到此为止。

不过重耳还蒙在鼓里，他不知此女乃穆公女儿，颇有怠慢之意。嬴氏大怒道：“秦与晋的地位差不多，你为什么要瞧不起我呢？”这时重耳才意识到这个女人身份绝非寻常。

秦穆公得知此事后，以抱歉的语气对重耳说：“我的女儿中，属她最有才能。当年太子圉作为人质时，我把女儿许配给了他，现在太

子圉跑回晋国，我心里最疼这个女儿，想将她许配给公子，又怕公子落得个坏名声，没敢举办盛大的婚礼。现在出了这件事，让公子受辱了，这都是我的过错，我女儿就听凭公子处置吧。”

重耳惊出一身冷汗，这个女人既是秦穆公的女儿，得罪不得，也惹不起，不如把这桩婚事推掉算了。然而，他的谋臣们都认为，迎娶秦国公主，就能得到秦穆公的有力支持，这个婚约，绝不能推。

就这样，重耳正式迎娶秦国公主，同时在名分上成了秦穆公的女婿。这是一桩政治婚姻，秦穆公现在有充足的理由，为女婿返回晋国夺权而大动干戈了。

公元前636年，新年刚过，秦穆公派遣大军护送重耳返回晋国。

秦军渡过黄河，进入晋国，随即展开军事行动，连续击败晋怀公的军队，攻占令狐、桑泉、臼衰三座城邑。

军队失利，令晋怀公大惊失色。他命令吕甥、郤芮率领军队驻扎在庐柳，与秦军对峙。秦穆公派公子絷与吕甥、郤芮谈判，谈判结果是晋军阵前易帜倒戈，宣誓效忠重耳。重耳接管这支军队后，晋国的局势陡然之间失衡，胜利的天平已倒向重耳一方。

很快，重耳与秦军联手，攻取重镇曲沃城，而后向首都绛城进军。

肝胆俱裂的晋怀公逃往高梁。重耳的大军兵不血刃占领都城，在大臣的拥护之下，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

一国不容二主。晋文公上台后，马上派人刺杀晋怀公。

看上去晋国的内乱已结束，秦穆公也大功告成。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先前投降晋文公的吕甥、郤芮阴谋发动政变，他们制订了一个暗杀计划，打算刺杀晋文公。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泄露了，晋文公大惊失色，他乔装打扮，不走大路，只走小道，秘密离开晋国，前往秦国求援。

秦穆公再度伸出援助之手。他派遣大军，陈兵于秦、晋边界，严阵以待。当吕甥、郤芮两人发现晋文公去向不明后，心知阴谋败露，方寸大失，无心恋战，纠集叛军，离开都城，逃往边境。秦穆公诱骗两人入秦军营地，就地处死。

晋国的这起政变，因为秦穆公的武装干涉，很快被平息了。秦穆公派遣三千名精兵，护送晋文公再度返回国内。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在国内根基并不扎实，他能迅速安定国家，凭借的就是秦穆公的武力支持。没有秦穆公，就不可能有晋文公的霸业。

秦穆公做了一件好事，结束了晋国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局面。

这里还有一个离奇的故事。

据说秦穆公刚即位时，得了一场大病，整整卧床五天才醒过来。醒来后，他说自己梦到仙帝了，仙帝要他平定晋国内乱。后世的人认为秦穆公不是做梦，而是神魂出窍，跑到天上游了一趟。

或许，这就是他的使命。

政治是利益的博弈。秦穆公费尽心思把晋文公扶上台，不是因为他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不是，根本不是。

他卷入晋国政治，只是为秦国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道路。中国政治的重心在中原，秦国地处西陲，虽称得上是军事强国，但在政治上影响力远远与其大国地位不相匹配。雄才大略的秦穆公要在中原有所作为，必定要跨越晋国的阻隔。鼎力资助晋文公，换取秦国通往中原之路，在秦穆公看来，值。

只是秦国要向东扩张，晋国同样也要向东扩张。

近水楼台先得月，晋国终究占了地缘上的便宜。

公元前636年，周王室再起内乱。周襄王被弟弟王子带打得落荒而逃，只得号召诸侯勤王。

早对中原虎视眈眈的秦穆公自然不肯放过“尊天子而令诸侯”的难得机会，他马上率军队东进到黄河，准备渡河，开赴中原勤王。只是黄河的对岸，却是晋国的地盘。以秦穆公对晋国的恩惠，难道晋文公会不让他渡河吗？

确实，秦、晋两国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亲近。但这种亲近并非是无间，摩擦还是存在的。事实证明，晋国人有厚黑的传统。

晋文公一面谢绝秦军东渡黄河，一面亲自率军勤王。叛军岂是精锐晋军的对手，很快被打得大败，王子带被俘虏并处死。晋文公把周襄王迎回首都洛邑，立下再造王室的伟大功业，掌握了“王令”这张王牌。晋国的霸业已呼之欲出了。

这个扬名立万的机会，竟然被晋文公给抢走了。秦穆公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无论是晋文公或秦穆公，都晓得现在不是翻脸的时机，“蜜月之旅”还要继续。当时天下最强大的诸侯国，不是晋国，也不是秦国，而是南方霸主楚国。楚国连续几代出明君，雄踞江汉之地，公开自称为“王”，与周王室分庭抗礼，可谓狂妄至极。晋文公与秦穆公都有霸主雄心，他们两人后来都被列入“春秋五霸”。但要当霸主，首先得打败强大的楚国，否则就是空话。

晋文公在“勤王”行动中已占了大便宜，现在得分点小利给秦穆公。

在“勤王”行动结束后，晋文公出兵协助秦穆公发动一场旨在针对楚国的军事打击，目标是楚国的“啰喽国”郢国。在这场战争中，秦国兵团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大破楚国援军，生擒楚军总司令斗克。

不过，真正改写历史的一战，却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春秋划时代的战役，是晋国走向霸业的起点。在这场中原大战中，秦穆公也派出精锐部队参战，但真正的主角却是晋国兵团。

在晋国名将先轸的指挥下，晋军大破楚军于城濮，改写了中原政治版图，奠定了晋国百年霸业的基础。秦国作为晋国的盟友，尽管成为胜利的一方，秦穆公非但没有兴奋，反倒有一种挫败感。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晋文公在这场关键的战争中出尽风头，还被周天子任命为诸侯盟主（侯伯），地位已在他之上。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曾经四处流浪、无家可归的晋国公子重耳，如今成为叱咤风云的晋文公。女婿成了主角，岳父秦穆公只能屈居于配角的角色，这预示着两国亲密的关系已出现不可弭合的裂痕。

公元前630年，挟霸主之威的晋文公发动对郑国的战争，秦穆公又一次充当配角。谁叫秦穆公不甘心在中原无所作为呢？要东进中原，他一定要与晋国合作。

在两大军事强国的夹击下，郑国已是岌岌可危。

某天夜里，秦军大营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乃是郑国“离职老干部”烛之武，他偷偷潜入秦军兵营，会晤秦穆公。

烛之武开门见山，对秦穆公说：“如果郑国灭亡，只会使晋国坐

大。秦在晋的西面，郑在晋的东面，秦与晋灭了郑国，晋国将独吞郑国土地，秦国只能坐视晋国的版图扩大。出了力气，却让邻国更加强大，得不到实际的好处。”

听到这些话，秦穆公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烛之武的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

烛之武估摸着秦穆公的心思，把更狠的话放出来：“晋国人多忘恩负义，当年您帮助晋惠公夺得政权，晋惠公答应要送给秦国河东之地，结果怎么样了？贵为国君，居然食言，不仅没有把地献上，甚至秦国闹饥荒时，拒绝施予援手。这些都是您经历过的，晋国人不守信用的。”

“老干部”烛之武此来的目的，就是挑拨秦穆公与晋文公的矛盾。

能被挑拨离间，说明秦、晋两国关系并非铁板一块。

是呀，凭什么寡人出了力，好处却让晋文公独吞呢？

与其让晋国独吞郑国，不如秦国自己独吞。

但如果与晋国撕破脸皮，秦国就难以东进中原了，岂不是只能退回荒凉的西陲？秦穆公毕竟智慧过人，他想到一个主意：我干脆就留一支军队，驻留在郑国，在中原安插这么一支军事力量，日后重返中原时，正好可以有个照应。

秦穆公明确答复烛之武：秦国退出战争，同时派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将军率部协助郑国守卫都城。

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秦国不仅不攻打郑国，还帮郑国守卫都城，烛之武仿佛有做梦的感觉。这不是梦。很快，秦穆公遵守诺言，率大军撤走了，留下一支部队入驻郑国都城。

这下轮到晋国人目瞪口呆了：秦穆公是在唱哪出戏呢？你不想打仗，自个撤兵就是了，还留下一支军队帮郑国人守备，这不是有意与我们为敌吗？

怒气冲冲的晋国将领们向晋文公提议：索性截击返回途中的秦穆公，一举消灭秦军主力部队。

晋文公摇摇头道：“秦国有恩于我，我不能像前任惠公、怀公那样恩将仇报。”为避免与秦为敌，他下令晋国大军撤出郑国，打道回府。

由于晋文公明智的策略，秦、晋两国关系暂不至于恶化。

然而，秦、晋的蜜月时代已一去不返了，该来的，终究会来。

两年后，大器晚成的一代霸主晋文公病逝。

晋文公的去世，使秦、晋的关系急转直下。继任者晋襄公刚刚上任，便迅速调整对秦的政策。山雨欲来风满楼，秦与晋这两大强国，将兵锋再起，究竟谁才是强者中的强者呢？

四 殽山：挥不去的噩梦

秦穆公是一匹狼，一匹西域之狼。

他贪婪的眼光，紧盯着中原这块大肥肉，可惜的是，中间横亘着一头巨虎，这头巨虎就是晋国。秦国的风光完全被晋国压制下去了，在几次中原战争中，秦国完全是跟在晋国屁股后面，捡一些残羹剩菜。

伟大的秦国，岂能当小混混儿的角色！

没有晋国的提携，难道秦国就无法在中原立足吗？

秦穆公不信邪。

三年前，他在郑国布下一颗棋子。他留下一支军队，帮助郑国人守卫都城。说是帮郑国人，其实秦穆公并没有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只是他阴险的计划，这支军队就是一颗地雷，有一天要把郑国人炸得粉身碎骨。

他开始策划夺取郑国的计划，只要郑国到手，秦国人的“魔爪”便可伸入中原，同时可从东、西两面夹击晋国。这个计划如此美妙，秦穆公不禁露出得意的笑容，似乎通往中原的大门打开了。

一支远征军组建起来，主将是孟明视将军，两位副将是西乞术与白乙丙。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则是蹇叔的儿子。

深谋远虑的蹇叔与百里奚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军事大冒险。

蹇叔说：“秦国距郑国那么远，出动庞大的军队进行偷袭，行踪一定会暴露。将士远征劳累不堪，郑国人以逸待劳，将出师不利。”

百里奚说：“从秦国到郑国要经过好几个国家，一支军队行进千里，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各国间谍活动频繁，这事情准没法保密。”

秦穆公不高兴，没理会两个老头儿的意见。

远征军出发那天，秦穆公亲自为将士送行，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突然传来很不和谐的声音——有人在哭泣。秦穆公很愤怒，回头一看，是蹇叔和百里奚这两个老家伙，正擦眼泪呢。

秦穆公怒喝道：你们哭啥呀？

蹇叔用长袖擦擦眼泪说：“我们的儿子都在出征的行列，我们都很老啦，恐怕他们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面了。”

秦穆公已经听出弦外之音了，他怒不可遏，说了一句古代最有名的诅咒：“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用现代文说就是：你咋知道，老家伙，要是你死得早点，坟头的大树已经可以两手合抱了。”

伴君如伴虎，蹇叔和百里奚不敢哭了，只是暗地对儿子说：“从秦国到郑国，要经过殽山。殽山地势险峻，容易设伏，现在秦晋关系恶化，如果晋国在殽山设下伏兵，就算是十倍的秦军也难逃厄运。至于晋国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就要听天由命了。”

秦国远征军出发了，为了绕开晋国，他们行军于荒无人烟的山林野地。

如果不是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远征郑国的计划几乎得逞。

当秦军行进到滑国时，与一位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不期而遇。弦高以商人特有的敏锐嗅觉，判断秦军意在突袭郑国。他一面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往国内，一面随机应变，献上四张牛皮与十二头

牛，对秦军统帅孟明视说：“我国君得知贵国军队前来，命我在此迎接将军，将军一路劳累，特献上一天的给养作为犒劳。”

孟明视被他天才的演技蒙骗了，以为自己的行踪已暴露。事实上，郑国对秦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当郑文公收到弦高带来的情报，他大惊失色，立即对留守郑国的秦军部队下达逐客令。

秦军失去偷袭的战机，又失去内应的部队，郑国已进入全面战备，想攻下已是不可能。奇袭郑国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就这样灰溜溜空手回去吗？要知道国家发动一次远征，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一箭未发就回去，脸上无光，对秦穆公又如何交代？

孟明视、西乞术等将军索性顺手牵羊，把小小的滑国给灭了。灭滑之战，不在原先计划之内，只是一场挽回军队面子的小战。然而，这次开战，却给秦国远征军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在晋国国都绛城，刚刚即位不久的晋襄公主持军事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要不要消灭这支秦国远征军。

晋军高层分为两派：一派坚持遵照晋文公生前对秦国的外交政策，把秦国视为盟友；另一派则力主利用秦军孤军深入的机会，打一场歼灭战，一举摧毁秦国的军事力量。

三军统帅、一代名将先轸是最坚决的主战派，他力排众议道：“国君刚刚过世，秦国人并没有表示哀悼，还借此机会东进奔袭郑国，并灭了滑国。滑国跟咱们一样是姬姓国，可见秦国是不讲道义的国家。对于不讲道义的国家，消灭他们的机会来了，这种机会不是经常有的，稍纵即逝，如果再争论下去，就没有机会了。上天要让他们的远征军栽在我们手中，我们是不可以违背上天的，放过敌人，就是留给自己灾患。我们是为子孙后代做打算，这是违背晋文公生前的意愿吗？”

先轸的意见获得大多数将领的支持，为全歼秦师，晋襄公决定不宣而战。

战场选择在殽山，这是秦军返回途中必经之地。

殽山，《读史方輿纪要》中记载：“自新安以西，历澠池、硤石、陕州、灵宝、阌乡而至于潼关，凡四百八十里。其北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约谷深委。终日走硤中，无方轨列骑处。”这是一个山高峰陡之地，以地势险峻而闻名，蹇叔曾经警告过，要特别注意晋国军队在殽山设伏。

先轸发布军事动员令，并邀请长于山地战的姜戎（戎人的一支）参加。晋军主力与姜戎部队陆续进入殽山区域，埋伏起来，等待秦军钻入预先设定的大口袋。鉴于这次会战对晋国未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晋襄公虽在守丧期间，仍然亲临前线，并把白色的丧服染成黑色。

四月十三日（前627），西行途中的秦国军队行进到殽山最险峻的地带。

秦军统帅孟明视想起蹇叔的忠告：晋军一定会在殽山设伏。然而忠告却不能使秦军有效摆脱遭受伏击的命运，从去年冬季远征军出发，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多月，将士们已是疲惫不堪，进入殽山后，险峻的山岭使行军变得更加困难。

突然间，两侧山岭旌旗飘扬，战鼓隆隆。

孟明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自己已是身陷绝境。

晋国战车已占据有利的地形，晋襄公亲自坐镇指挥。从开战的那一刻起，孟明视就明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晋国人以逸待劳，以众击

寡，更控制了险关隘口与制高点，国君戴孝坐镇。无论天时、地利还是人和，晋国人都占据上风，秦国人何以抵挡呢？

但秦国还是英勇反击，顽抗到底。这只是为尊严而战，这绝非势均力敌的战斗。挡在道前的是晋国精锐的战车部队，擅长山地战的姜戎人正沿着山坡向下猛冲，山顶上的箭矢如雨飘下，擂木滚石从天而降……

殽山之战，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全被俘虏。

这是秦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在漫长的秦晋争霸中，秦国第一次咽下冷涩的苦果。

秦穆公东进中原的美梦被彻底打碎！

晋襄公向世人证明，没有晋文公，晋国仍然是无可争议的霸主。

在善后事宜上，晋襄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晋文公夫人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想方设法营救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她对晋襄公说：“秦国与晋国原来关系很好，都是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个人，从中挑拨离间，使两国关系恶化。如今三人打了败仗，秦君恨之入骨，巴不得吃其肉喝其血。不如把他们交给秦国处置，既能让秦君杀之解恨，又可显示晋国的宽大，您看怎么样？”

晋襄公被文嬴一糊弄，糊里糊涂地答应了。

文嬴以最快的速度释放了孟明视等三人。

这么重大的决定，晋襄公居然没有跟总司令先轸元帅打招呼。当

先轸问起对孟明视等人的处置意见时，晋襄公不以为然地说：“因文嬴夫人强烈要求，寡人已经将三人释放，让秦国人去惩罚他们。”

先轸听罢暴跳如雷，开口便骂：“将士们在前线以生命相拼，才把这几个秦军将领活捉。现在凭那个婆娘几句话，就把他们给放走了，长敌人士气，灭自己威风，晋国离灭亡不远了。呸——！”他当着晋襄公的面吐口水，气呼呼地扬长而去。

晋襄公被他骂醒了，情知铸成大错，急派阳处父前去追赶，要在三位秦将还未离开国境之前把他们重新抓回来。阳处父还是迟了一步，他驾车疾驰到黄河边，三位秦国将领已经上了一条小船，悠然而去。

阳处父急中生智，高喊道：“三位将军且留步。我主公以为三位将军空手而返未免礼数不周，特令我前来赠送马匹。”

孟明视等三人，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恍如梦中一样，哪里会上阳处父的当。孟明视站在船尾，对阳处父抱拳道：“多谢贵国国君手下留情，没有用我们的血来染红战鼓，我等甘愿回国受惩罚。倘若国君处死我等，我等死而无悔；如若侥幸不死，三年之后，我等自然会前来报恩。”

一叶小舟，悠悠远去了。

秦穆公亲自到郊外迎接，孟明视等人面带惭色，跪倒在地，自求惩罚。秦穆公拉起三人，想着大军出征，竟只三人得以生还，禁不住老泪纵横：“这哪能怪你们啊。只怪寡人不听蹇叔的忠言，致使全军覆灭，还让你们遭受耻辱，责任全在寡人一人。你等勿自责。”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秦穆公遭遇殽山之耻，能痛定思痛，自我检讨，确有一代君主的风范。把过错归于自己，气量果真不同一般。孟明视等三人，一概官

复原职。

殽山之战进一步确定了晋国的霸权地位。

秦穆公向东扩张的激情被无情地遏制了。他知道，只要有晋国在，秦国断难向中原发展。只是殽山之仇不报，军队的士气、信心就无法重振。

两年后（前625），孟明视怀着一颗复仇的心，杀入晋国。决心很大，现实却很残酷，晋国又一次让秦人见识何为霸气。晋军反守为攻，攻入秦国，双方大战于彭衙。孟明视再尝败绩，复仇不成，又一次蒙羞。

屡战屡败，孟明视背上“常败将军”的恶名。但秦穆公仍坚定不移地信任他，这种信任，给了孟明视无穷的力量。为一雪前耻，他全身心投入到重建秦军战斗力的工作中。

不报殽山之仇，秦穆公绝不罢休。

公元前624年，秦穆公亲自率领大军，孟明视为总指挥，东渡黄河，进攻晋国。渡河之后，秦穆公下令将船舶全部烧毁，以示不胜绝不西归。君主尚且如此，将士无不奋力，一时士气高涨，慷慨激昂之气弥漫全军。

这是为荣誉而战，为尊严而战。

面对秦人来势汹汹的进攻，晋国作出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坚壁清野，只守不攻，避免与秦军决战。

秦军主力从茅津南渡黄河，进入殽山。大将孟明视到此，不由得一阵心酸，四年前殽山之战的惨败，历历在目。战场没有打扫，秦军将士的尸体早已腐败，只剩下一堆骨骼，终日风吹日晒，面目狰狞，

以及散乱在山谷中的车轮与生锈的兵戈。

阵亡将士的尸骨就地掩埋，堆成一个土丘，在土丘前立一个牌，作为标记。此举表明秦国政府没有忘记曾经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将士。这对于崇尚武力的秦人来说，无异是一剂强心针，驱动更多的人走上战场，为国家、为荣誉而战。

尽管这次出征，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军队在晋国境内纵横一番，又掩埋昔日战友的尸骸，也算有所收获，勉强算得上报复晋国一下了。

秦穆公心里明白，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晋国政权，已经振翅高飞，秦国已非其对手了。可是秦国不能就此沉沦，要对抗晋国，秦国还不够强大；然而在西方，却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当通往东方的一扇大门缓缓关闭时，另一扇大门开启了。

五 东方不亮西方亮

西戎一直是秦国的头号敌人。

秦穆公即位初年（前659），便发动讨伐茅津之戎的战争。秦穆公十一年（前649），戎人进攻周都洛邑，秦国与晋国联合出兵讨伐戎人，保卫周王室。后来秦穆公全力向中原扩张势力，与戎人的关系相对缓和，秦、戎一百多年的战争也告一段落，双方甚至互派使节往来。

殽山之战的惨败，把秦穆公的眼光从中原转移到了西方。

一个人的到来，对秦穆公称霸西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人，名叫由余。

公元前626年（殽山之战后第二年），西戎之王派遣使节团出使秦国，使节团首席代表便是由余。由余并非戎人，他的先祖是晋国人，因躲避内乱逃亡到西戎。他从小在西戎长大，博学多才，深得戎王信任。

秦穆公有意在由余面前炫耀秦国的富实，带他参观了壮丽的宫殿，堆积如山的财粮宝物。由余不露声色，只是淡淡地说：“秦国的宫殿，即使是鬼神来完成，也会觉得筋疲力尽，更何况是人力呢？这不过是劳民伤财罢了，算不上什么政绩。”

这一番话令秦穆公肃然起敬，不由得收起骄奢之气，恭敬地请教道：“请问先生，中国有先进的文化，以礼乐法度来治理国家、施行政事，还是免不了经常发生变乱。西戎没有中国的礼乐制度，如何治理国家与百姓，政事不是会更乱吗？”

由余回答道：“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变乱的原因所在。上古时期黄帝等先王创建礼乐法度，到了后世，君主们凭借这些法度约束百姓，自己却骄奢淫逸；百姓受到压制，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不禁要埋怨君主贵族。上下失信，纷争便起，人就失去淳朴的本性，热衷于篡权夺位，如此一来，不乱都不可以哩。”

秦穆公听后直点头，由余继续说：“西戎与华夏不同，民风质朴。在上位者待民以惠，在下位者报之以忠诚，国家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上下和谐，虽然没有繁复的礼乐制度，却是一个有机体，浑然天成。圣人治国，大约也只能到这样了。”

由余的一番话，着实让秦穆公茅塞顿开。

西戎有由余这样明智之人，岂非是秦国的心腹之患吗？秦穆公问内史廖：“我听说邻国若有圣人，一定是值得担忧的事。西戎有由余这等贤人，对我国始终是一个祸患，你看要怎么办呢？”

内史廖想了想说：“西戎地处偏远之地，民风质朴，生活简单，不如向西戎王进献女乐数人，美妙的音乐与迷人的舞蹈，一定会让西戎王心动。用女乐消磨西戎王的雄心壮志，乘机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就有机会策反由余。”

秦穆公拍手叫好，吩咐内史廖挑选十六名女乐，送往西戎。同时，他又以种种借口，把由余留在秦国。

西戎文化落后，哪里见识过如此美妙的音乐与舞蹈。很快，西戎王便沉迷于美女、歌舞之中。蛮族质朴的文化被浮华所摧毁，政事也开始荒废了。

由余迟迟没有归国，引起戎王的猜疑，多次催促后，秦穆公才不得不放行。当由余回到西戎后，发现西戎王仿佛变了个人，终日不理政事。他不断地向戎王进谏，劝导君王远离女乐，勤于政事。西戎王

哪里听得进去，反而嫌他碍手碍脚。君臣关系日益疏远，信任也降至冰点。

秦穆公不失时宜地拉拢由余。暗中派人前往西戎，游说由余归降秦国。由余本是正直之人，不愿背叛西戎王。然而，西戎王变本加厉，对由余的猜疑心越来越重，态度越来越冷淡。

由余在西戎已无立锥之地，无奈之下，他只得选择离去，投奔秦国。

秦穆公的离间计终于大获成功。他隆重欢迎由余的到来，亲自出城相迎，以上宾待之，并将西戎事务交给由余打点。

我们细数秦穆公时代军界政坛的重量级人物，百里奚、蹇叔、孟明视、西乞术以及由余，都不是秦国人。穆公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位君主，这也是他得以成就霸业的根本原因。由于穆公非凡的胸襟与气度，原本人才匮乏的秦国，一时之间人才济济。

征服西戎的战争，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西戎是一个笼统的称呼，由许多部落组成（当时也称之为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在穆公时代，西戎王名义上是诸部落的首领，其实并无实际权力，各部落的关系十分松散。

由余制订了一个计划，时不时派出军队开赴边界线，摆出进攻的架势。很快就有人报到西戎王那儿，说秦军要攻进来了。没过多久，秦军就从边界撤走了。如此几次后，当有人再报秦军入寇的消息，西戎王便勃然大怒，操起一把弓，冲着报信的人就是一箭。此后，没有人敢打扰西戎王喝酒赏歌舞的雅兴了。

雅过头了，灾难就降临了。

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秦军准备就绪。负责征讨西戎的总司令仍是孟明视将军，秦穆公对这名并不算优秀的将领不离不弃。与晋国元帅先轸相比，孟明视绝对不算天才，也缺乏高明的战略战术。不过他是属于苦干型的人，用来对付战略不太高明的戎人，就有用武之地了。

秦军倾巢而出，直取西戎王。这时西戎王在干什么呢？他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躺着呼呼大睡呢。等他睡醒时，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动弹不得，早已被杀进来的秦国士兵绑得结结实实了。

孟明视挟生擒西戎王之余威，横扫西戎。此役战果巨大，拓地千里，吞并多个西戎国（部落），使秦国成为西部名副其实的霸主。秦国究竟吞并了多少个西戎小国呢？史料有不同的说法。《史记》中的《秦本纪》记为“益国十二”，这个说法与《韩非子》一书的说法是一致的。但在《史记》的另几篇里，却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匈奴列传》中称“八国服秦”，《李斯列传》中称“并国二十”；《汉书》中的《韩安国传》则称“并国十四”。尽管记载不同，都可以看出秦国的赫赫战功。

凭借此役，秦国一扫数年前崤山惨败的颓势，其扩张之凶猛，令东方国家也为之震惊，周襄王也派召公前往祝贺秦穆公取得的丰硕攘夷战果。

称霸西戎，是秦穆公事业的顶点。后来，他被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其实，秦穆公本不应被尊为霸主。春秋时代的霸主，不仅要有傲视天下的武功，也必须具备号令诸侯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穆公是称不上霸主的。然而秦穆公得以入选，证明他的伟大成就得到世人的认可。在他之前，秦国默默无闻，甚至连史料都少得可怜。

正是从秦穆公开始，秦国才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大国。他任人唯贤，大力引进人才，吸收中原文明，使得秦国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他在韩原之战中大败晋国，开始为诸侯所侧目，扶立晋文公更大大加强秦国的政治影响力。他积极把秦国的势力扩张到中原，参与城濮会战，在国内舞台上声名鹊起。殽山惨败后，他卧薪尝胆，再鼓雄风，横扫西戎，再现强秦之风采。

无论从个人修为、涵养、气质、才能以及取得的成就诸方面说，秦穆公列为五霸之一，当之无愧。

后世大学问家孔子对秦穆公有一段评论。当齐景公问他说：“秦国国土面积小，地理位置偏僻，为什么秦穆公能称霸呢？”

孔子回答说：“秦国的国土虽小，但秦穆公有伟大的志向。地理位置虽偏，但秦穆公的所作所为公正有道义。以百里奚为例，穆公以五张羊皮换回他，仅仅谈话三天，就把国政交给他。从这点来看，穆公称王都可以，称霸还有点小呢。”

在百里奚落魄为奴时，他能礼贤下士；在忘恩负义的晋国遭遇饥荒时，他能不计前嫌，提供粮食援助；在重耳漂泊四方时，他能慷慨相助，安定晋国；在孟明视兵败殽山时，他能总揽责任，自我批评反省。这些事迹，足见其胸襟之广阔，实非他人所能及。

然而，善始者未必能善终。

这位伟大的君主死后，竟以一百七十七个活人陪葬，遂使秦国一代霸业凋零，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

公元前621年，统治秦国达三十九年之久的秦穆公去世。

他的葬礼极其隆重，下葬的不仅仅是秦穆公一人，还包括一百七

十七人组成的庞大的殉葬队伍。如此庞大的殉葬人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他之前的秦武公，殉葬人数也只有六十六人。

在这些陪葬者中，还包括秦国著名贤臣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三个人在民众中的口碑不错，被认为一时之贤人，可惜生在这种专制的年代，还没来得及展现自己的才华，就被列入陪葬的行列中，与秦穆公的尸体一起腐朽，沉入暗无天日的漆黑墓室。在专制社会中，人的生命是何等一文不值。

《诗经》中有一首诗，题为“黄鸟”，是时人痛惜于三位贤人之死而作，表达出无可奈何的遗憾之情：

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
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

谁从穆公？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百夫之御。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三位贤人还有人作诗以纪念，其他一百七十四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如果有朝一日，秦穆公的墓室得以重见天日，他们狰狞的尸骨，将会是对专制最好的控诉。

这时我们不禁要想个问题。

秦穆公一生爱才如命，死后却将有才之人陪葬，这究竟是出于秦穆公的本意呢，还是他的继任者秦康公借此来拔去眼中钉、除掉政敌呢？这些历史谜团，现在很难解开了。这次殉葬却给了秦国以深远的影响，使得欣欣向上的秦国发展迟滞甚至倒退了。

秦国本来是文化落后的国家，秦穆公之所以可以称霸，跟他引进外来人才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些国外人才，秦穆公无可作为。试问天下英才，有谁喜欢今天是座上客，明日是陪葬品呢？从此以后，国外的人才再也不愿意踏进秦国这片土地。秦国的发展势头被遏制，又回到缺乏政治人才的蒙昧年代，这一停滞，有二百多年之久。

不过，秦国赖以立国的军国主义传统始终没有断绝，尚武精神尚在，这使其在文化远远落后东方诸国的同时，仍然有实力保持军事大国的地位。

六 沉闷的拉锯战

秦穆公去世的同年，晋襄公也去世。

上一代的恩恩怨怨，随着两位君主去世而淡化了。

秦国太子瑩即位，史称秦康公。与秦国相比，晋国高层权力斗争太复杂，使得立君一事，一波三折。

晋国元帅赵盾有意改善与秦国的关系，决定立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有一个传统，为避免诸公子争权夺利，君主经常会让他们侨居国外。公子雍侨居秦国，若立他为国君，势必可缓和与秦国紧张的对立局面。

赵盾派士会出使秦国，秦康公当然乐意看到公子雍上台，便痛快答应派兵护送他回国。公子雍在秦国待了那么多年，算得上是半个秦国人，如果他顺利即位，秦晋两国的和平即将降临，这也是众望所归。

护送公子雍的秦国军队已跨过边界，进入晋国境内。谁想风云突变，节外生枝，赵盾忽然变卦了。原来晋襄公的夫人大闹朝廷，凭什么叫要立襄公的弟弟呢？父位子承，不是天经地义吗？应该立自己的儿子夷皋。这女人一闹事，连元帅赵盾也没了主意，只得让步，同意立夷皋为君主，即晋灵公。

这不是胡闹吗？

那边派人请秦国护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这边却突然立了新国君。一个国家怎么能有两个君主呢？

晋国人向来是不厚道的。赵盾一下狠心，索性出动大军，以武力

阻止公子雍返回都城。在令狐，公子雍与秦国军队遭到晋军的突袭，被杀得狼奔鼠窜，灰溜溜逃回秦国。

秦康公惊呆了。本想助人为乐，却被人当猴耍了。

出使秦国的士会惊呆了，自己也被晋国政治耍了，他索性不回国了，留在秦国。

赵盾的反复无常，葬送了秦、晋和平的机会，从此两国兵戎再起，杀得昏天黑地，望不到战争的尽头。

秦康公很生气。

一国之君生气，后果很严重，何况还是个军事大国。

康公二年（前619），秦国发动报复战，夺取晋国的武城。

一年后，晋国反咬一口，夺取秦国的少梁城。秦国不甘示弱，再度进攻晋国，夺得北徵。

双方你揍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来我往，却只是小打小闹。

不过，秦康公正酝酿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公元前615年，寒冬到来，秦康公顶着风雪，率领大军越过边境线，袭击晋国的羁马城，来势汹汹。晋国元帅赵盾紧急动员三军迎战，所谓的三军，不是今天的陆、海、空三军，而是上军、中军、下军。晋军进抵河曲，与秦军对垒。

晋国上军副将臾骈建议：“秦军远道而来，不利久战，我军可以深沟高垒，坚守阵地，以逸待劳，等他们撤退时再发起进攻。”赵盾深以为然，下令全军加强防御，不得出击。

以静制动，晋国这一招相当厉害。秦康公远道而来，利于速战速决，不利于持久作战，赵盾偏偏只守不攻，时间拖得越久，对秦军就越不利。

秦康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突然想起叛逃到秦国的士会。士会本是晋国杰出的战略专家，对晋军的底细自然非常了解，他对秦康公说：“这定是上军副将臾骈的计谋，只要拖下去，就能把秦军拖垮。”

“那如何是好？”秦康公又问。

“晋军有个弱点，赵穿是赵盾的族弟，又是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轻气盛，不学无术，狂妄自大。臾骈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却瞧不起臾骈，对其战术肯定嗤之以鼻。您只要派一支轻骑兵袭扰赵穿，他一定咽不下这口气，定会领兵出战。”

秦康公采纳士会的计谋，派出轻骑兵骚扰赵穿的部队。果不其然，赵穿沉不住气了，他命令军队集结，出营迎战。

只是秦国人并不与之交锋，虚晃一枪，掉头就跑，赵穿没能追上。

回到兵营后，赵穿恨恨地说：“我们准备了粮食与盔甲，就是为了跟敌人一决死战。现在敌人已经到了眼皮底下，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他手下的军吏回答道：“是为了等待最佳时机。”

赵穿狠狠地吐口水骂道：“我可不懂什么战术，我只知道敌人来了，就得出去打仗。”他自恃是晋襄公的女婿，又是赵盾的族弟，不把军令放在眼中，拉一队人马，私自出了兵营，准备找秦军较量。

这么一来，晋国的军事部署完全被打乱了。

赵盾非常担心赵穿的安全，对众将说：“如果赵穿战败被俘，我们国家的颜面全无，我如何向国君交代呢？”于是下令全体晋军，尾随出发。

事实证明，秦国的武力虽强大，还是不如晋国。两军一交战，晋国人便占了上风。秦康公见势不妙，赶紧鸣金收兵。

秦康公掂量了一下，自认为还不是晋军的对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还是先撤回国内再作打算。明明想撤退了，秦康公还是使了一个阴谋，他故意派人前去晋军大营下战书，并对赵盾说：“今天打得很不过瘾，我军士气高昂，我们明天战场上见。”

这个诡计并没有骗过舆骈。

秦国使者离开后，舆骈对赵盾说：“秦国使者的眼神与语气，都掩藏不了对我们的畏惧，看样子秦国人是想逃跑，我们可以出击了，只要追到黄河边，定可在秦军渡河前击败他们。”

论起用兵的谋略，秦国将领远远比不上晋国将领。

岂料又是赵穿坏了大事。他狗急跳墙般地跳出来阻挠道：“不行！现在我军战死的士兵尸体还没有掩埋，伤者还没有得到救治，丢下他们不管，有违仁义精神。秦军约我们明天再战，约期还没有到，就要将敌人逼到险境，这不是勇士所为。”

这个赵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的他极力反对下，赵盾放弃了对秦军发动进攻。

不出舆骈所料，当天夜里，秦军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撤退了。

晋国失去了一次重创秦国的机会。

经此一战，赵盾意识到有必要屯兵要塞，遏制秦国人无休止的骚扰。

桃林要塞成为防御秦国的核心堡垒，这一要塞位于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乃是秦国通向东方的咽喉要塞。这个要塞在未来的秦、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春秋时代，秦国人死死地被压制在桃林要塞以西，无法越雷池一步。

令赵盾深感担忧的，并不是秦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叛逃到秦国的士会。士会是晋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家，只要他待在秦国一天，对晋国就是巨大的威胁。

必须想办法让士会回到晋国。

这件事难度很大，秦康公怎么可能平白无故拱手送还士会呢？

为此，赵盾策划了一个绝密计划。

首先要派遣一个士会信得过的人前往秦国，还不能引起秦康公的疑心。赵盾找到一个人，此人名为魏寿馥，是个贵族，采邑在魏地，靠近秦国。为了迷惑秦国人，赵盾与魏寿馥上演了一出双簧。赵盾找了个借口，将魏寿馥的家人逮捕，囚禁起来。魏寿馥在黑夜的掩护下逃出晋国，前去投奔秦国。

见了秦康公后，魏寿馥大骂赵盾，并表示愿意把自己的采邑魏地送给秦国。

秦康公听了大喜，当即把群臣召集到大殿。

士会也来了。

魏寿秦装作不认识士会的样子，从身旁走过时，只是用眼神示意一下，又故意踩了他一脚。士会何等聪明，马上意识到魏寿馥不过是

假投降，此来另有用意，定是要迎自己回晋国。当初士会因为赵盾在立君的问题上反反复复，一怒之下离开晋国，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事过境迁，晋国毕竟是他的祖国，他岂有不怀念之理呢？

秦康公完全被蒙在鼓里，他满心欢喜，率着一支军队，会同士会、魏寿馥等人，前往接收魏地。一行人抵达黄河西岸，已经可以望到东岸的魏地。

魏寿馥对秦康公说：“请先派个人跟我渡河过去，最好是对河东情况熟悉的人，能够与当地官员打交道。”他把条件限定得这么窄，很显然，只有士会是合适人选。

秦康公没有怀疑，他对士会说：“有劳先生去一趟。”

士会故意推辞说：“不行。晋国人如虎狼一般，没有信誉可言，只怕我过去了，就会被他们杀死。到时您一怒之下，说不定会杀了我的妻儿子女。我不干！”

听士会这么一说，秦康公更放心了，安慰说：“你放心，如果晋国人背信弃义，不以魏地降秦，到时寡人肯定送还卿家的妻儿，你不必有任何疑虑，寡人愿对着滔滔黄河水发誓。”

不知不觉中，秦康公钻进了士会与魏寿馥设下的陷阱。

士会与魏寿馥上了船，摆渡过了黄河。此时东岸冒出许多人影，原来是赵盾派来接应的人，大家齐声喝彩，欢迎士会归来。

秦康公傻了眼，到这个时候他才如梦初醒，情知中计了。

这能怪谁呢？

士会早就说了，他可能一过河就回不来了。得了，怪来怪去，只能怪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如士会。与晋国人相比，秦国人的信用等级要

高得多。无论是秦穆公还是秦康公，都不会轻易违背自己的诺言，哪怕是上了别人的当。秦康公信守承诺，不仅没有杀死士会的家人，还把他们送还晋国。

不管怎么说，秦康公的表现十分大度得体，狡诈的晋国人也不能不表示钦佩。“士会事件”无形之间让两国关系趋于缓和。在秦康公在位的最后几年，秦、晋两国没有爆发战争。

公元前609年，秦康公去世，秦共公即位。

此时晋国的战略重心，是与南方的楚国争霸。为避免两线作战，晋国十分希望与秦国媾和。秦共公刚上台，这是谈判的良机。不料倔强的秦国人根本不愿意与晋国谈和，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晋国人比较阴险狡诈，忘恩负义，经常干落井下石之事；其二，秦国与楚国结为军事同盟，秦国曾出兵协助楚国灭了庸国。

谈判不成，晋国人想到一个馊主意：以武力手段逼迫秦国接受谈和。

出这个馊主意的人，正是眼高手低的赵穿。他对元帅赵盾说：“要与秦国和解，必须对其施加压力。不如我们先攻打秦的小喽啰崇国，以此为筹码，同秦国媾和。”

赵盾同意了。赵穿挥师进攻崇国，秦共公派出军队援救。进攻崇国不是目的，逼秦国谈判才是目的。可是赵穿想错了，秦国不是那么容易被人逼迫的，共公断然拒绝晋国的要求，毫不妥协。

赵穿的计划完全失败，并导致秦、晋战火重燃。

伐崇之战后一年，秦共公出兵包围焦邑，报复晋国的攻击。赵盾亲自率军救援，秦军遂撤围而去。

这次军事对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秦、晋两国都意识到，你打我一下，我报复一下，并不能实现真正压倒性的优势，既劳民伤财，又收效甚微，最终只是两败俱伤。出于固执，秦共公不愿意与晋国和解，但战争基本上停止了，这种冷战中的和平，对双方都有好处。

七 麻隧之战与迁延之役

秦共公在位五年去世，秦桓公即位。

此时秦国与晋国的国力相差更大了，晋国在中原呼风唤雨，而秦国只是小打小闹罢了。尽管两国已有多年没有兵戎相见，但间谍战却悄然兴起。

秦桓公三年（前601），晋国侦破一起秦国间谍案，间谍在晋都绛城被公开处决。这一事件，致使两国战火重燃。晋国联合白狄（狄人的一支）攻略秦国，宁静的边境线又一次战鼓隆隆。

与晋国对抗几十年，秦国已完全落入下风。穆公的伟大时代已渐行渐远，秦国人才凋零，一个名将也没有。反观晋国，则人才辈出，特别在军事领域，优秀的将军层出不穷。

为了打败晋国，秦桓公耐心等待时机。

公元前594年，晋国发动对赤狄（狄人最强的一支）的全面战争。晋军主力倾巢而出，扫灭赤狄。秦桓公乘机出兵，杀入晋国，兵抵辅氏（今陕西大荔东）。晋景公亲自率一支军队，由魏颗担任“前敌总指挥”，阻击秦军。辅氏一役，晋国并没有派出最强的兵力，仍然大获全胜。秦桓公只得仰天长叹，仓皇而逃。

在晋国的威慑下，秦桓公不敢再轻举妄动。

公元前580年，在宋国的斡旋下，晋楚两大国进行停战谈判，史称“第一次弭兵之会”。“国际和平运动”的兴起，促使秦、晋在对抗数十年后，第一次正式媾和。

两国约定谈判的地点设在晋国的令狐，届时晋国新任国君晋厉公

与秦国的秦桓公都将出席。到了和谈的日期，晋厉公抵达令狐，秦桓公到黄河西岸后，却犹豫不决了——狡诈的晋国人会不会搞什么阴谋呢？

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秦国的表现是令人称道的，历届政府的信誉都很好。虽然秦晋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但在晋景公病重的时候，秦桓公还是很义气地派了一位名医来为他治病。相反，从史书记载来看，晋国人一直反复无常，精于阴谋，不太讲信用。

秦桓公心里估摸一下：东渡黄河，踏上晋国的土地，难以保证人身安全。不行，不能自投罗网。他止步不前了，派了一个官员，名叫史颡，作为秦国代表渡河与晋厉公签约。秦桓公不到河东，晋厉公也不往河西，同样派代表郤犇过河与秦桓公缔约。

历史上把这次晋秦之会，称为夹河之盟。

这次最高级别的外交和谈，两国君主甚至连面都未见到。相互防备到这种程度，一纸和平协议怎么靠得住呢？

夹河之盟后一年（前579），晋国与楚国达成和平协定。

晋楚弭兵，对秦国绝不是好消息。在此之前，晋国的第一号敌人是楚国，正是因为楚国牵制晋国大量的兵力，才使得秦国没有遭遇到重大打击。如今晋楚媾和，晋国便可以全力对付秦国了。秦桓公对此深信不疑，他趁晋、楚两国谈判之机，暗地里怂恿白狄出兵入侵晋国。

强大的晋国以攻代守，在交刚一役中重创白狄。

晋厉公把矛头对准秦国，指责秦桓公背后支持白狄发动战争，违背两国盟约。他同时派出使者往返于中原各国，向各诸侯国发出照

会，共同出兵，打击秦国。

“弭兵之会”令中原盟主晋国的威望空前高涨，晋厉公振臂一呼，东方诸侯纷纷响应。齐国、鲁国、宋国、郑国、卫国、曹国、邾国、滕国八个国家都派出军队，协助晋国打击秦国。

中原烽火刚刚平息，西部的战鼓又要擂响了。

公元前578年，晋厉公派大夫吕相出使秦国，递交一份“绝秦书”。在这份绝秦书中，晋国历数自秦穆公以来，秦晋八十年的外交关系，将两国爆发战争的责任统统推卸到秦国人头上。吕相绝秦书，是春秋时期一份著名的战书，写得很有气势，如排山倒海，我们且来欣赏其中一些片段。

吕相把秦国历代君主的罪行都历数一番。写到秦穆公：“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写到秦康公：“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写到秦桓公：“入我河县，焚我箕郛，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

一言以蔽之，统统是秦国的错，晋国是无辜的受害者。

这封信，自然没有写秦穆公如何帮助晋惠公上台，晋惠公如何忘恩负义，秦国不计前嫌援助晋国度过灾年；也没有提到晋文公如何得到秦国一而再的帮助，没有秦穆公的支持，哪来晋国的霸业呢？秦国对晋国的恩惠，只被吕相轻描淡写地说成“不忘旧德”。显然，这封著名的战书所写的，不见得都是事实。

晋国派出最强阵容，动用全部四个军（上军、中军、下军、新军）的兵力，以栾书为元帅，倾巢而出。除此之外，还有齐、鲁、宋等八个国家的联军，军容浩大，令人望而生畏。

秦国即便想对“绝秦书”进行辩解，也没机会了。

没有一个中原诸侯国肯听从于秦国，秦桓公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与九国联军决一死战了。

秦军开进到麻隧，与以晋国为首的联军对峙。晋国原本实力就比秦国强，拥有多名天才级的将领，现在又有多国助阵，更是威不可当。秦军虽以悍勇而著称，但双拳不敌四手，哪里抵挡得住？溃不成军，大败而逃，秦军将领成差、护卫女父被晋军所俘虏。

晋军乘胜追击，渡过泾水，一路追击到侯丽才胜利班师。

麻隧之战，是晋国对秦国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在战争发动的时间上，充分利用晋楚弭兵之难得机遇。此亦可见晋国将军们对战争宏观面的把握十分精准，战略思想非常明确，通过外交手段，联合八个诸侯，形成绝对优势，这些都是麻隧之战胜利的原因。

麻隧之战令秦桓公颜面尽丧，他在忧愁中郁郁而亡，其子秦景公即位。

此役令秦国元气大伤，晋国则如日中天。继麻隧之战后，晋楚撕毁停战协定，在鄢陵之战中，晋国再度大败楚国，巩固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把晋国霸业推向高峰。晋国连续用兵，伐郑攻楚，迫使郑国臣服；同时晋国大力扶植东南吴国政权，开辟对楚战争的第二战场。晋楚争霸数十年，楚国已居下风。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楚国与秦国结盟，便成为不二的选择。

秦楚不但是盟友，也结为姻亲。秦景公的妹妹嫁给了楚共王，两国的关系亲上加亲。有了楚国人的支持，蛰居十几年的秦景公蠢蠢欲动了。

公元前564年，晋国爆发大饥荒。

秦景公想乘机捞一票，又怕自己不是晋国人的对手，便派人出使楚国，希望得到楚国的支持。楚共王求之不得，爽快答应。于是秦景公出兵攻入晋国，楚共王派军队驻于武城（河南南阳北），以威慑晋军。晋国人既要防楚军入侵，又没有足够的粮食，只得采取守势。秦军大掠一番后，扬长而去。

晋国岂是好惹的？灾年过去后，晋国元帅荀偃挥师入秦，同样蹂躏一番后才撤走。

又过了一年（公元前562年），晋悼公在郑国的萧鱼举行十三个诸侯国盟会，晋军主力部队与之同行。此时晋国国内守备薄弱，秦景公自然不会浪费这样的机会，他派庶长鲍、庶长武入侵晋国。留守晋国的士鲂对秦军的力量过于轻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疏于防守。秦军兵分两路，夹击士鲂，晋军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晋悼公匆匆忙忙地从萧鱼起程回国。

秦晋接壤，只要晋国有什么风吹草动，秦人便偷偷摸摸地杀来。那么晋国为什么没有想到把秦国灭了昵？

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上总体是比较小的，受制于当时的兵力及武器装备，想要灭掉一个大国，难度非常大。晋国拥有四个军的兵力，最多时有六个军，按照东周军事编制，一个军的兵力是一万两千五百人，四个军便是五万人，六个军是七万五千人。也就是说，晋国的总兵力约在五万人至七万人之间。以这些兵力要灭掉秦国，显然不够。

另一个原因，中原先进富饶，秦国落后贫瘠，称霸中原，对晋国利益多多，占据秦国，没有实际利益。因此晋国对秦国的打击，都是惩罚性的，而非灭绝性的。这是春秋战争与战国战争的区别。也正因

为如此，秦国虽屡屡战败，却能很快恢复元气。

不过，这次晋国真的被惹火了。

报复战如期打响，这一次，晋国出动的兵力可谓空前。

公元前559年夏季，晋国元帅荀偃率晋军主力以及十二个国家的联军，浩浩荡荡杀入秦国。然而刚到泾水边准备渡河时，他惊诧地发现，所有喽啰国的军队，都止步不前，不肯渡河。

对东方诸侯来说，秦国已经有七十年未涉足中原，对中原防务根本没有任何威胁。秦国只是与晋国有仇，让晋国自己去解决好了，干吗要兴师动众，把无关的人卷入战争的漩涡呢？

荀偃发布了渡河的命令，诸侯联军还是无动于衷，消极怠工，没有人吭声，一片沉默。与之前几位晋国元帅相比，荀偃魄力不足，给伐秦之战带来了隐患。大家都不肯渡河，他脸上挂不住，派叔向去游说鲁军统帅叔孙穆子。

叔孙穆子没办法，表示鲁国愿意为诸侯国做出表率，率先渡河。鲁国表态后，郑国也做出表率，郑国与楚国接壤，必须依靠晋国的保护，郑军统帅子蟜自告奋勇，游说卫、齐、宋、曹等联军将领，好歹说服众人渡河，继续向秦国挺进。

很快，麻烦事又来了。

联军渡过泾水后，在河边安营扎寨。早有防备的秦国人使出阴险的一计，在泾水上游投毒，联军士兵不少人喝了有毒的河水，毒发身亡。仗还没打，就出现大量的非战斗性伤亡，对士气打击甚大，大家又赖着不走。

荀偃真的很没面子，他这个“联军总司令”有名无实，不要说打

仗，就是行军都困难重重，他开始有点手足无措。所幸的是，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解围。

这个人，还是郑军统帅子蟜。

子蟜 对荀偃说：“我们郑国士兵愿意充当先锋。”郑国军队出发了，其他诸侯国没有办法，只好继续跟进。

就这样，这支多国部队拖拖拉拉地行军，抵达了栲林。

战争的最高艺术，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联军内部不团结，荀偃希望凭借人多势众的优势，不战而让秦国举旗投降。

然而秦国人不怕死。

秦景公断然拒绝晋国的施压，摆开架势，准备与联军一决死战。

既然如此，那就战场上决一生死吧。荀偃传令各军做好战斗准备，次日天亮前，套好马车，填井平灶，展开阵形与秦军决战。

晋国下军主将栾黶是前元帅栾书的儿子，为人霸道，敢于顶撞上级，对才能平平的荀偃根本不放在眼里。这天夜里，他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置主帅命令于不顾，拉着自己的队伍跑掉了。

栾黶都跑了，诸侯联军还待着干什么呢？大家二话不说，埋头整理行装，准备开溜。总司令两眼发愣，大家都跑光了，这仗还怎么打？没办法，只得打起退堂鼓，撤销对秦军发起进攻的命令，宣布全体撤退。

不过，晋国还是有勇士的。

有人不想撤退。

栾黶的弟弟栾鍼是积极的主战派，他对部下说：“大军出征是为了报仇，无功而返，是国家的耻辱。”他与士鞅各自带着自己的部队，拒绝撤退。

身为武士，战死也比逃跑光荣。

面对晋国为首的十三国联军，秦景公压力很大，他虽骄傲地拒绝投降，心里却忐忑不安，对击败晋国人实无信心。岂料天亮时，奇迹降临，晋国的大部队已消遁无踪，只剩下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立于风中。这支队伍，就是栾鍼与士鞅的部队。

秦军以疑惑的眼光看着这支人数不多的晋国军队发起自杀般的袭击，当他们发现真的只有这丁点人时，便不怀好意地冲了上去，把栾鍼等人围起来。栾鍼没有丝毫胆怯，视死如归，冲入敌营，结局不出人预料，他战死了。士鞅则杀出重围，逃回晋国去了。

这次的伐秦之战，虎头蛇尾，草草而终。

伐秦之战，战争的节奏非常慢，诸侯联军无心作战，每到一处就拖拖拉拉，故意耗时间。最后晋军内讧，对秦国的打击不了了之。

后来史家把这场战争叫作“迁延之役”。

“迁延之役”暴露了晋国内部诸多问题，可惜的是，一代雄君晋悼公在不久后便去世，没有时间来解决问题。之后，晋国诸卿家上演威逼君权、相互倾轧的血腥故事。晋国霸权由是开始衰落。

公元前550年，晋国爆发栾盈之乱，齐国乘机出兵袭扰。尽管晋国很快平定叛乱并击退齐国的进犯，但是其霸业已渐行渐远了。

正是在此背景下，晋国再度谋求与秦国和解。公元前549年，

晋、秦两国各派使臣互访，缔结盟约。在夹河之盟三十年后，这两个死对头又一次握手言和。

八 在春秋与战国之间

自秦穆公死后，秦国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在东方诸侯眼中，秦就是一个野蛮未开化的国度。故而此期的史料，对秦国的记载十分简略，主要集中在秦与晋的战争及外交上，对于秦国内政，几乎不提。

不能否认的是，秦国仍然是一个军事大国。

能够与天下霸主晋国对抗数十年，没有一点本事可不行。

秦景公在位共四十年，于公元前537年去世，秦哀公即位。由于晋国内乱不止，无暇理会秦国，两国倒是和平了几十年。晋国衰落的同时，南方霸主楚国也走向衰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方老大诸侯齐国以及新兴诸侯吴国强势崛起，特别是吴国，在一代雄君吴王阖间的统治下，腾飞于东南，成为楚国的劲敌。

公元前506年，吴国兵团在名将伍子胥、孙武等人的指挥下，千里大跃进，捣破楚国郢都，鞭尸楚平王，曾强大一时的楚国几遭灭亡的命运。

有一个人从楚国郢都逃了出来，他举目四望，天下之大，能拯救楚国的，只有秦国了。他怀抱着一颗复国之心，拖着疲惫之躯，坚毅前行。他日夜行走，脚板裂开了，咬牙坚持，膝盖骨磨损过度，撕下衣裳裹住，凭着顽强的意志力，来到了秦国。

他就是楚国名臣申包胥。

秦与楚是战略同盟，也有联姻。楚国有难，秦国理应出手相救。不过，秦与楚结盟只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晋国，如今秦晋关系缓和了，秦楚关系相对便疏远了。两国虽有联姻，但秦国却有难言之耻。

原来被伍子胥鞭尸的楚平王干过一件十分荒唐的事，让秦哀公蒙羞。二十年前，楚平王曾经派使者到秦国，为太子找个秦国老婆。秦哀公挑了一名漂亮的公室女子，送往楚国。楚平王一看这个未来的儿媳非常漂亮，竟然自己霸占了，儿媳变成妃子。这件事，不仅导致楚国太子叛逃，伍子胥出走，也让秦哀公相当没面子。

当申包胥哭诉楚国的遭遇时，秦哀公无动于衷，懒得理睬。

秦哀公假惺惺地安慰他几句，就退朝去了。申包胥还站在殿内，不肯退下。左右拉他，他也不走，没办法，只好任由他站在大殿上。申包胥靠着墙，越想越伤心，国破家亡，自己竟无能为力，心里一片茫然，最后禁不住大哭。

这一哭，不得了，哭了七天七夜。

不仅哭，还绝食，饭也不吃，觉也不睡。

您还别说，哭也是一大本事，有时能发挥巨大作用。

这宫殿本是君主办公之所，被申包胥霸占着，还哭个没完没了，还怎么办公？秦哀公没办法，又出来见申包胥。

这几天申包胥除了哭之外，心里也在琢磨一个事：要如何才能说动秦哀公呢？老是低三下四求人，人家也未必愿意帮忙。如今晋国国内乱得不得了，秦国高枕无忧，并不需要楚国帮忙，楚国就算灭亡了，对秦国有什么损失呢？很显然，要说服秦哀公出兵，就要点明其中的利与害。

想明白了这点，申包胥便对秦哀公说：“吴国乃是夷邦，贪婪无度，如果与贵国为邻，势必成为大患。趁现在吴国还未完全占领楚国，贵国若能出兵拯救，楚国将世代事奉秦君。”

秦国是要挑楚国为邻呢，还是要挑吴国为邻呢？楚国作为邻居，两国几十年来关系融洽，兵戈不舞。吴国呢？正处于疯狂扩张期，若吞并楚国，实力将超越晋国而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况且吴国拥有阖闾这样凶猛枭鸷的旷世雄君，有孙武这个千年不遇的军事奇才以及伍子胥这样谋略超群的名将。若吴灭楚，对秦国绝对是多了一个强横的对手。

秦哀公怦然心动。

只要楚国存在，吴国再厉害，也打不到秦国。

秦哀公思忖片刻，说道：“你且回去休息吧，容寡人考虑考虑。”

申包胥一听急了，叩首道：“国王流亡于草莽之间，没有安身之地，我作为臣子，哪敢安心地休息呢？”

秦哀公为之动容，不禁吟起《无衣》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意思很明显，秦国要出兵了。

没想到哇，被视为蛮夷的秦国人，居然也能附庸风雅。

申包胥一听，急忙跪倒在地，向秦哀公磕了九个响头，饿了七天七夜的他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再也挺不住了，晕倒在大厅之上……

秦哀公派大将子蒲、子虎率五百辆战车驰援楚国。

秦军入楚后，与楚国将领公子期的抵抗力量会师，进攻吴国人控制的沂地。

狡猾的秦国人还是耍了些心计，他们不愿意打头阵，便对公子期说：“我们不了解吴国人的战法。”公子期明白，秦国人把硬仗先留给楚国人，他没有怨言，毕竟这里是楚国，楚国人理所当然要为国家而浴血奋战。

公子期的军队率先对吴军发起进攻，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率军迎战，两支军队正杀得难解难分时，秦军参战了！以凶猛剽悍著称的秦国军队，突然出现在吴军的侧翼，五百辆战车掀起漫天尘埃。夫概大惊失色，这时吴军顶不住了，开始后撤。

秦、楚联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

倘若不是两个外在因素削弱了吴国的力量，秦军能否打败吴军收复楚地，是很有疑问的。

第一个因素，越国趁吴军主力在楚，突然出兵进攻吴国本土，后方吃紧，这对前线作战的吴国军队十分不利。

第二个因素，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见阖闾留楚不归吴国，就悄悄回到吴国，自立为王，举兵作乱。阖闾大为震惊，他将楚国的战事托付给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自己率主力杀回吴国。阖闾一走，滞留在楚国的吴军力量大大削弱了。

秦、楚联军乘机奔袭唐国。唐国是吴国的盟友，小国寡民，焉能抵挡得住虎狼之师，很快便被灭掉，吴国失去了一条臂膀。

唐国被灭后，秦、楚联军大举南下，直逼郢都，仍然是楚军打头阵，秦军做策应。伍子胥、孙武等人率军在雍澨迎战楚国军团，尽管吴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凭着伍子胥、孙武高超的指挥艺术，吴军还是赢得了一场胜利。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吴军被动的局面。

随后赶到的秦国兵团，兵强马壮，是一支生力军。即使兵圣在此，也无法扭转战局，吴军终于被打败了。

双方各败一场，旗鼓相当，仍在雍澨一线对峙。楚军将领子西采用火攻战术，逼近吴军。再往后退，就是楚都郢城了，是固守郢城，还是放弃呢？

伍子胥说：“楚国人虽然打败了我们，可是我实力并未受到重创。”

他仍想同秦、楚联军再决死战。

孙武反对说：“我们西破强楚，逐楚王，掘平王墓，割戮其尸，这已经足够了。”

敌强我弱，伍子胥沉思后说：“自有霸业以来，从来没有哪个臣子能够这样报仇雪恨，我们可以走了，没有什么遗憾了。”

吴军放弃固守郢城，撤退回国。

救援楚国一战，是秦国在春秋末期参加的最重要的一次战争。没有秦国人的慷慨相助，楚国的版图恐怕已经被吴王阖闾轻轻抹掉了。纵观整个春秋史，秦国尽管文化落后，但是比较朴实，讲信用、重承诺。从秦穆公扶助重耳到秦哀公救援楚国，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秦穆公之后的几个君主，还想着向东发展，只是被晋国教训几次后学乖了，老老实实待在自家地盘。再往后的君主，早把当年秦穆公的理想抛到九霄云外了。正好这时晋国、楚国都走向衰落，秦国也乐得享受和平的阳光。

公元前500年，秦哀公去世。接下来的两任君主，秦惠公与秦悼公，总计在位二十四年，无所事事，史料不留只言片语。

秦厉共公上台时，正是公元前476年，这一年也是春秋时代的结束，战国时代的大幕已缓缓拉开。

与前两任君主相比，秦厉共公是比较有作为的，他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四年，其间最大的成就便是继续讨伐戎人。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中原政权强有力，外部蛮族便归附，而当中原政权势力衰微时，蛮族便乘机兴起，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以晋国为霸主的中原政治体系崩溃后，戎人势力卷土重来。

秦厉共公十六年（前461），秦国沿着黄河修筑防御濠沟，出动两万人马，讨伐盘踞于大荔（陕西大荔）的戎人。秦军势如破竹，直捣其王城。

此役是华夏族与戎人新一轮战争的开始。在秦灭大荔后的四年（前457），秦国再攻绵诸（甘肃天水东）戎人。与此同时，晋国赵襄子灭代戎，吞并其地。秦厉共公三十三年（前444），秦国再度出兵进攻戎人中最强的义渠国，俘虏义渠王。同年，晋国韩、魏二氏共同消灭伊河、洛河之间的戎人。

在这场保卫华夏的战争中，秦、晋两国都取得骄人的战绩。长期与华夏为敌的戎人被迫远遁，自此中原不再有大的戎患。这也是秦国为保卫中原文明所作出的贡献。

秦厉共公在位期间，中国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便是三家分晋。晋国长期实行六卿制，到了春秋末期，由于内乱频频，各卿家互相倾轧仇杀，六卿制蜕变为四卿制。公元前453年，四卿中的赵、韩、魏三氏联合起来，消灭势力最强的知氏，瓜分其地。晋国君主已全然被架空，国家落入各自为政的三卿手中，便是后来赵、魏、韩三国的雏形。这一变局，对未来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晋国的分裂，对秦国既是喜，也是忧。

喜的是晋国一分为三，力量自然就分散了，不再是当年那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忧的是分裂后的赵、韩、魏三家，都迫不及待的要扩张自己的势力。特别是雄才大略的魏文侯，他野心勃勃，麾下谋臣云集，名将群星闪烁，早把进攻的目标锁定在秦国了。

秦国能否顶得住这雷霆霹雳一击呢？

九 雷神之锤

在整个春秋时代，东方诸侯政变频繁，被孔老夫子斥为“礼乐崩坏”的年代。然而西方秦国的君主制居然稳如泰山，一起政变也没有。不过到了战国时代，秦国也终于迎来一起政变。

秦厉共公去世后，其子秦躁公即位。秦躁公在位十四年，于公元前429年去世，传位给弟弟秦怀公。仅仅四年后，秦怀公便死于非命。秦国庶长晁伙同一帮大臣，围攻秦怀公，秦怀公在绝望中自杀身亡。这起政变，在史书上只是轻描淡写，我们无法了解更多的内幕。政变过后，秦怀公的孙子秦灵公即位。

政变总令国家元气大伤，这也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很快，秦灵公便遭当头一棒。

魏文侯正在释放战争的信号。

秦灵公六年（前419），一支魏军偷偷渡过黄河，在黄河西岸修筑起一座城堡，名为少梁城。很明显，魏文侯要以少梁城作为进攻秦国的桥头堡。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秦灵公趁魏兵尚未站稳脚跟，便率大军气势汹汹赶来，双方大战于少梁城下。这次战役的胜负，史书上没有明确记录。不过从次年魏文侯重修少梁城的记载来看，魏军是保住城池，但城邑受损严重。

这是秦魏战争的开始。

为了遏制魏人，秦灵公在少梁北部修筑两座城邑以为防备，一为

籍姑城，一为繁庞城，以威胁魏在黄河西岸的桥头堡。两城刚刚建成，秦灵公便去世，保卫家国的重任便落到秦简公身上。

不过，魏文侯很快就让秦国新君主蒙羞了。他派儿子魏击率领军队包围繁庞，一举击破，并把城里的秦国人赶出去。

魏文侯显然是吸取秦晋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春秋时代，晋国的军事力量要远强过秦国，为何不能重创对手呢？魏文侯认为晋国没有在黄河西岸修筑足够多的城堡，没有这些军事支撑点，就无法持久作战，因而打了胜仗后，也无法在河西长久立足。要彻底打败秦国，就必须尽量多地筑城，以堡垒战术蚕食秦国的土地。

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魏文侯于公元前409年，在少梁城以南约八十公里处筑临晋城，在少梁西南约五十公里处筑元里城。三个堡垒遥相呼应，全面夺取秦国河西之地的时机已成熟。

公元前408年，魏斯亲自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入侵秦国。在三座城池的策应下，把秦国势力完全驱逐，尽占河西之地，而后又筑洛阴、郃阳两城。

秦简公颜面扫地，只得全面退守洛水，并沿着洛水修筑防御工程。

令秦简公稍感安慰的是，魏文侯并没有继续向西深入，因为他把进攻的矛头转向北方与东方。在随后几年，魏文侯灭掉中山国，大破齐国，威震海内。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魏、韩、赵三家为诸侯。

魏国只是晋国分离出来的一个诸侯国，却足以把秦国打趴下了。在魏秦战争中，有一个人堪称是秦国之克星，他就是历史上与孙武齐名的大军事家吴起。

吴起本是卫国人，后来到了鲁国。适逢齐国入侵鲁国，他自告奋勇参战。他虽有不世之才华，却不擅长与人打交道，故而结仇甚多，处处受排挤。由于魏文侯礼贤下士，英雄归心，吴起遂离开鲁国，前往投奔魏国。

魏文侯知人善任，任命吴起为将，率领军队西击秦国。吴起一鸣惊人，在伐秦之战中，一口气攻下秦国五座城池，震动天下。魏文侯将其提拔为西河郡守，全权负责河西战区的军政。

西河郡就是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取的河西地带，也是秦、魏两国交锋最激烈的战场。在现存的《吴子》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载：“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在吴起生平指挥的七十六次战斗中，胜了六十四次，十二次打了个平手，无一败绩。这些战斗，绝大多数是与秦国的战斗。

吴起驻守西河，秦国人根本占不到便宜。

难道秦国就得被动挨打吗？秦简公的回答是：不！

魏国人把战火烧向秦国，在秦国的地盘上打仗，自然占便宜。秦简公暗地里策划了一个精彩的反击方案。这个方案是不与驻守西河的吴起正面交锋，绕一大圈，甚至绕过魏国都城安邑，突袭魏国后方。这个方案冒险却精彩绝伦。公元前401年，秦军迂回到魏国大后方，对阳狐城发起意想不到的进攻。

这一战大大鼓舞了秦军的士气，足以看出秦国人的韧性与勇敢。

不久后，秦简公与魏文侯相继去世，秦惠公与魏武侯接过战争大棒，继续对峙。

魏武侯视察西河郡，与吴起泛舟西河，行到中流，他望着险峻的群山、宽广的大河，不由得赞道：“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有此山河之险，魏国的西线无忧也。吴起答道：“在德不在险，

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山河之险是靠不住的，若没有道义，身边的人都可能是敌人。

君臣两人还时常探讨军事问题，特别是如何对付秦国。吴起分析说，秦国人性格倔强，国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秦政严厉，赏罚分明，士卒在战斗中有死斗之心。秦军士兵各自为战的能力很强，缺点是没有阵法，部署松散。击破秦军的方法是利以诱之，设置伏兵，在其阵势混乱后果断出击。

在吴起镇守西河的那段日子，秦惠公几度出击，都徒劳无功。

公元前393年，秦军出击洛水东岸的注城，被吴起的西河守军击败；公元前390年，秦、魏战于武城；公元前389年，秦、魏战于阴晋。由于史料残缺，这些战争的过程没被提及，武城之战与阴晋之战甚至谁胜谁负都没说。

在《吴子》一书中，保留有一个战例。

这个战例，或许便是史书中所记的阴晋之战。

据书中所载，秦国大举用兵，迫近西河。吴起请求魏武侯拨给五万名从未立过功的士兵，他说：“我率领五万名渴望立功的剽悍战士，如同五万名亡命之徒一样，敌人又岂能抵挡呢？”他以奖赏激励士兵，军队士气高涨，一举打败前来进犯的秦军。

当初魏文侯夺取河西之地后，就止步不前，这是因为魏国地处四战之地，周边都是敌人，不能集中力量消灭秦国。吴起却敏锐地发现秦国可怕的潜力，秦国不但民风强悍尚武，地理优势更是远远强过魏国。秦国在西、北、南三面都没有强敌，只要守住东线，国家即可确保无虞。魏国则不然，北有燕赵、东有齐国，南有韩楚，西有秦国，四面受敌。在吴起看来，必须灭掉秦国，否则魏国的军事优势很快就荡然无存。

吴起开始筹划一个大战略，计划以几年时间，灭掉秦国。倘若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就没有后来统一天下的大秦王朝了。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吴起在战场上光芒四射，所向披靡，但是政坛上却一败涂地。他终于被政敌暗算了，被迫离开魏国。当他行至西河时，心头一酸，泣下数行，叹息道：“主上倘若信任我，再给我几年时间，秦国必亡。如今主上听信谗人之言，不再信任我了，西河之地落入秦人之手的日子也不会远了，魏国大概从此就衰弱了吧。”

吴起离开魏国的时间是公元前387年。

他刚离开，秦惠公乘机出兵进犯武下。失去吴起的魏军像丢了魂的军队，被打得大败，一位大将被秦军俘虏。只是秦惠公还未能实现收复西河的使命，便于同年病逝，其子秦出公（又称出子）即位。

在秦、魏第一阶段的战事中，秦国是吃了大亏，让魏国尽占河西之地，国家安全遭到严重威胁。此中的原因，除了魏国强大之外，也有秦国自身的因素。进入战国时代后，秦国政坛动荡，爆发多起政变。公元前425年，秦怀公被大臣所逼自杀身亡；四十年后，即公元前385年，又一位秦国君主死于政变。

这位君主就是秦出公。

秦出公即位时只是个小孩子，大权落入其母（史称小主夫人）手中。小主夫人临朝，任用奸臣，于是“群贤不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秦出公的母亲，着实不得人心。当时侨居魏国的公子连（秦灵公的儿子）风闻消息后，打算乘机入秦，取代年幼的秦出公。时任庶长的菌改驻守边塞，暗地里与公子连相通，放他入塞。

小主夫人得知公子连回国，大惊失色，急急派军队前往截击。为了掩人耳目，士兵们得到的命令是：“有外敌入寇边关。”菌改暗中与

军队将领联系，当这支队伍行进到一半时，公开宣布拥立公子连。

形势不可思议地发生逆转了。

公子连非但毫发未损，反倒率领这支军队进军雍城。杀入城后，包围小主夫人的宫殿，小主夫人自杀，年幼的秦出公也糊里糊涂地被杀。

政变的结果，公子连登上国君宝座，史称秦献公。

这场内乱，又让魏国渔翁得利。

魏武侯不会浪费这个机会，果断出兵，把秦简公收复的部分河西之地又夺了回来。

表面上看，魏国人在秦国内乱中捞得些许便宜。但若把眼光放远点，秦国政变其实影响深远。秦献公是继秦穆公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君主，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君主。他一上台，就废除了秦国沿用三百年之久的殉葬制度，堪称是秦国制度的一次革命。

自秦穆公死后以良臣殉葬，中原谋士谁也不愿入秦。虽说那次殉葬只是例外，一般殉葬止于妻妾宫女奴仆，但是君主的脾气谁摸得准呢？只要殉葬制度存在，在上位者就可以轻而易举把政敌送入坟墓，无须理由。试问天下英雄，谁敢以身试之呢？人才不来，秦国的文化始终落后，有蛮力没智慧，成不了真正的大国。

秦献公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废除殉葬制度呢？显然，他是受到魏国文化的影响。他还是秦国公子时，侨居于魏国，公子出居他国，在春秋战国时非常普遍。当时正是魏文侯统治的年代，魏文侯颇崇尚儒学思想，他尊孔子高徒子夏为师，与著名学者田子方、段干木亦师亦友，田子方是孔子高徒子贡的学生。儒学不仅反对活人殉葬制度，甚至也反对以陶制人俑陪葬，孔子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正是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秦献公回国即位后，立即废除殉葬制度，为国

外人才前来投奔解除了后顾之忧。

紧接着，秦献公又做了第二件事：迁都。他把秦国的都城从雍城迁到栎阳。栎阳的地理位置靠东，迁都于此，显然是表示收复河西的决心。而后又设立蒲、蓝田、善明氏诸县，完善秦国的行政区划。

秦献公并不急于同魏国开战，他深知魏国的实力，特别是经过李悝变法后，魏国各方面制度都要比秦国完善。献公七年，秦国开始一项经济改革，称为“初行为市”，这是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增加国家的收入来源。献公十年（前375），秦国改革户籍制度，把五家划为一伍，实施集体化管理。

秦献公是有才干的君主，同时也是幸运的君主。

秦国最大的敌人是三晋，即魏、赵、韩。强大的晋国一分为三后，以魏国实力最强，魏文侯以大局为重，强调三晋一体的原则，与韩、赵两国亲同兄弟，共同对付秦国。不过，既然分裂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就难以长久维持。魏武侯只是半截明君，在他听信谗言逼走吴起后，魏国开始走向衰落，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魏、赵两国由团结走向战争。

公元前386年（吴起离魏后第二年），魏国干涉赵国内政，导致魏赵关系急剧恶化。公元前383年，赵国入侵卫国，卫国向魏武侯求援，魏国出兵大败赵师。次年，魏国夺取赵国河东之地。一年后（前381），魏、卫联手攻入赵国，赵国求助于楚，反客为主，侵入魏国。与此同时，被魏国灭亡的中山国复国，魏国的实力急剧下降。

秦献公想浑水摸鱼，他把目标锁定在三晋中实力稍弱的韩国。献公十一年（前374），秦国派胡苏为大将，率大军进攻韩国。不料秦国竟连韩国也打不过，韩军在统帅韩襄的指挥下，在酸水与秦军展开决战，秦军大败。

这一战，着实令秦献公感到郁闷。

既然打不赢魏国，打不赢韩国，索性打打赵国。

三年后（前371），秦、赵开战。你猜结果怎样，秦军在高安一战中，又被赵国打败了。

当年秦国打不赢晋国，现在晋国一分为三了，三个独立出来的国家，秦国连一个也打不赢。看来秦国与三晋军事力量上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所幸的是，三晋都没有把精力放在对付秦国上，魏、赵为争夺卫国而大打出手，韩国则乘机吞并郑国。倘若三晋联手，纵令秦献公有三头六臂，恐怕也阻止不了国破家亡的命运。

秦献公吓出一身冷汗。

要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字：等！

十 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很多年以后，当魏、赵、韩三国一一被秦国吞并时，他们定会痛心疾首：上天给了我们机会消灭秦国，我们却没有好好珍惜，倘若时光可以倒转，过去可以重来，我们一定会把秦国灭掉一万次。

只是追悔从来无济于事。

正当秦献公为自己奋斗十几年却不免在战场上连连受辱而灰心丧气之时，机会不期而至了：魏国内战爆发，继而演变成三晋大血战。

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

魏武侯没有立太子，他死后，公子魏与公子魏缓两人为争夺君位，大打出手，内战全面爆发。韩、赵两国为了争夺三晋老大的地位，卷入战争，魏国内战很快成了一场“国际大战”。

秦献公乐呵呵地坐山观虎斗。

这场大战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魏国内战之初，魏占据绝对的优势，屡战屡胜，眼看毫无悬念之时，韩、赵两国突然参战。

韩、赵两军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军，夹击魏。双方在浊泽展开大战，魏军大败。魏被韩、赵联军团团围困，危在旦夕。他就像案板上的鱼肉一样，只能等待别人的宰割了。

可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

韩、赵两国君主在如何处置魏国的意见上不和。赵成侯主张杀掉魏，立公子魏缓，迫使魏国割地；韩懿侯却主张把魏国一分为二，分别由魏、魏缓统治，分裂后的魏国将沦为二流国家，只能成为韩、赵

的小啰喽。两人看法相左，最后竟不欢而散，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撤军了。

大难不死的魏乘机重振旗鼓，一举消灭公子魏缓，自立为君主，他便是魏惠王。魏惠王很快还以颜色，先是在马陵击败了韩国军队，继而又在平阳之战中力挫韩、赵联军。

三晋战争，令参战三方都元气大伤，精锐部队损失殆尽。

魏惠王与韩懿侯坐下来谈判，两国损失这么大，得从哪里弄点补偿才行。两个君主一拍即合，找秦国揩点油。是的，魏、韩都以晋国继承者自居，不把秦国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对付秦国就足够了，何况两个一起上。

只是两人都忘了一件事：这几年的血战，早已让两国虚弱不堪了。

公元前366年，魏、韩两国联手，共同出兵。以逸待劳的秦军迎击于武都，貌合神离的魏韩联军被打败了。

既然从秦国那里没捞到任何便宜，魏惠王与韩懿侯再度撕破脸皮。魏国公子景贾率大军讨伐韩国，韩国兵团在阳地全力阻击，击溃了魏国兵团。曾经天下无敌的魏国，如今气力已大不如从前了。

冷眼旁观的秦献公要出手了。

在三晋斗得昏天暗地时，秦国却蓄势待发。此时秦献公已在位二十一年，经过二十年卧薪尝胆的改革，秦国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它的对手却在走下坡路。此长彼消，秦献公的信心高涨。

公元前364年，秦国兵团在大将章峤的统领下，杀入魏国。在此之前，秦国虽以武力剽悍而闻名于世，名将却寥寥。即便是秦穆公时

代的孟明视，也不足以称为名将，只能算苦力型的将领。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将星闪耀，而章峤可算是这些将星中的第一人。史料中几乎没有留下他的任何资料，只留下他伟大的勋绩。

石门一战，震惊天下。

章峤指挥秦国兵团大败魏师，取得斩首六万的空前胜利。这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奠定秦国超级军事强国的地位。当然，我们不能凭一场战役的胜负，就断定秦国的军力完全超越魏国。但是，它证明了秦国已具备与三晋全面抗衡的实力，一举扭转先前被动挨打的局面，大大刺激其军国主义思想的发展。

倘若不是赵国及时出兵救援，魏国的损失可能更大。

在此之前，赵国与魏国已交战多年，赵成侯之所以鼎力相助，并非出于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三晋再怎么互斗，其关系也要比秦国来得亲近。在对付秦国这一立场上，三晋都不含糊，可以暂时休兵，对付共同敌人。

早已被边缘化的周天子居然站出来庆贺秦军大获全胜，并给秦献公一个“方伯”的头衔，所谓方伯，就是一方之伯，即一方诸侯之长。按道理说，周天子本不宜在诸侯争战上站在偏向秦国的立场，只是他这些年被三晋压迫得喘不过气，看到有人教训不可一世的魏国，很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兴奋。

秦魏攻守格局已逆转，秦国开始了战略反攻。

石门之战次年（前363），秦军又一次大举出击，目标是黄河西岸军事重镇少梁城，意在拔除魏国设在河西的战略据点。在上一年战争中伤亡惨重的魏国再次向赵国求援，颇有义气的赵成侯又一次派人马渡过黄河，协助魏军挫败了秦国夺取少梁城的阴谋。

只是魏惠王与以前的晋国君主一样，着实缺少感恩之心。他非但

没有报答赵国的救命之恩，反倒恩将仇报，悍然发动对赵、韩的进攻，在浍水之战中大败赵、韩联军，并占领赵国的皮牢城。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像魏惠王这样不讲道义的人，终究恶有恶报。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再攻少梁城，这回赵国人再也不施援手了。秦国庶长国大破魏军，俘虏其统帅公孙痤，夺取繁庞城。这座城池是当年魏文侯从秦国手中夺取的，现在又回到秦国手中。秦国在与魏国的河西争夺战中，已经占据了上风。

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魏国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魏惠王作出两个重大决定：第一，在河西修筑长城；第二，将首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

这两大决定，实际上是对秦战略的重大调整。

修筑长城，很明显是防御手段而非进攻手段。对比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的战略思想严重倒退。当年吴起便强调“在德不在险”，高山大川尚且不能凭恃，何况是长城呢？打仗要靠民心士气，民心士气要靠政府的“德”来维系。魏惠王非但不能团结兄弟般的国家，反而恩将仇报，好战成性，哪来的“德”呢？从此，魏国便陷入被动挨打之中，绝少主动出击。

迁都在古代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一件大事，也可窥视政府的战略方向。秦献公迁都栎阳，靠近前线，以表明收复河西的决心。魏惠王迁都到大梁，表明魏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中原，西线对秦国的防御力量也就相应削减。从以后的历史看，这一决策是相当致命的。

正当秦国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时，在位二十三年的秦献公去

世了。

他是秦国得以复兴的关键人物，他的改革虽然没有后来商鞅变法那么全面深刻，却也有许多制度是开拓性的，其中又以废除殉葬制最为重要。他抓住三晋战争的良机，在石门之战中一举歼灭六万魏军，武功之显赫，即便秦穆公亦有所不逮。不过，他对秦国最大的贡献，大概是选对了接班人，继位者便是一代明君秦孝公。

秦孝公即位时，战国七雄的格局已明朗化。

经历了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七个大国对峙局面。这七个大国分别是：秦国、魏国、韩国、赵国、齐国、楚国、燕国，号称“七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中等国家：宋国与中山国，其余的都是小诸侯，主要集中在淮河、泗水之间。

在七雄中，秦国是最被瞧不起的。

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高度发展，诸子百家兴起，儒、道、墨、法诸家粉墨登场，文化群星闪耀。可是这些与秦国一点都不沾边，有哪个文化大师出自秦国呢？一个都没有。在这场影响至深、至远的文化革命中，秦国一点贡献也没有。自殽山之战后，秦国进入中原的道路被晋国阻断，也失去与中原诸侯会盟的机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毫无影响力。在中原诸侯眼中，秦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夷狄，四肢强壮，头脑简单，岂能不被蔑视？

一个堂堂军事大国，却被人蔑视，秦孝公这面子往哪搁呢？

明明是周天子册封的诸侯，却被视为蛮夷，这岂非耻辱？

更大的耻辱是，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迟迟未能收复，连领土都没收复，秦孝公敢自称为“强国”吗？

秦孝公日思夜想的就只有一件事：如何让秦国变得强大。

他年轻的肩膀上，扛着不能承受之重担，把他压得喘不过气。他有雄心壮志，却不知从何处下手。数百年的封闭，早养成秦人保守的习性，不愿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暮气颇重，毫无创新精神可言。靠这些人，收复失地尚有疑虑，谈何建立更伟大的事业呢？

知耻而后勇。

孝公上台后的第一年，他便发了一道破天荒的“求贤令”，以裂土为赏，求天下贤才。我们且来看看这道历史上十分珍贵的求贤令原文：

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国人宾客贤士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求贤令首先回顾当年秦穆公的丰功伟绩，主要有两项：东平晋乱，西霸戎狄。那是秦国最风光的一段日子，秦孝公用“甚光美”的字眼，表达对先祖伟大事业的向往之心。写完秦穆公，孝公笔锋一转，转而沉顿，“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蒙受两大耻辱：其一，三晋夺我河西地；其二，诸侯卑秦。这两大耻辱，“丑莫大焉”。只要有人可以令秦国强大，孝公愿意“与之分土”，裂土为侯。

孝公“强秦”的决心，可见一斑。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动荡的年代，最不缺的就是冒险家与投机家。

秦国“求贤令”一出，天下士人无不兴奋，疯狂涌入秦国。谁想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呢？孝公唯人才是举，不论国别，不论出身，不论贵贱，只要你有治国之才就够了。来的人五花八门，有政治投机家，有江湖骗子，有老学究，也有真才实学之人。但是能声震寰宇、名扬宇宙的，只有一个人。

他就是商鞅。

十一 时势造英雄：商鞅入秦

商鞅变法，非但是先秦时代最重要的一次变法，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变法。

作为变法的总设计师，商鞅毁誉参半。毁之者认为他刻薄寡恩，强化专制，限制民权，对中国专制制度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二千年之法，皆是秦法”，而秦法即是商鞅之法。誉之者认为他乃罕见的改革家，有魄力有胆识，富国强兵，使秦国迅速摆脱落后，崛起于七雄并最终完成一统中国的伟业。

时势造英雄。

正是战国纷争的时势，才给了商鞅得以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推行新法，革新政治，对保守势力毫不妥协。无论得或失，都不能不承认他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对中国历史深远的影响。

商鞅，又称为卫鞅或公孙鞅，出身于卫国公室家族。他从小勤奋好学，特别喜欢刑名之学，也就是法家的学问。在他之前，中国曾有过几个著名法家人物，包括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郑国名相子产，以及战国时代魏国著名的改革家李悝等。对商鞅影响最大的人，乃是魏国之李悝，李悝著有一册《法经》，成为商鞅囊中必备的书册。

卫国是周代一个老牌诸侯国，到了战国时代，国力衰微，屡屡遭到赵国的入侵。每当卫国有难时，魏国总是出手相援，卫国人对魏国抱有深深的好感，商鞅也不例外。卫国不仅外患频频，国内政局亦动荡不安，弑君事件时有发生。商鞅在自己的祖国无法实现政治抱负，遂前往魏国，进相国府当一名中庶子（官名，相当于相国的侍从官）。

相国公叔痤是魏国出类拔萃的人物，十分赏识商鞅的政治才华。只是商鞅到来的时机不对，此时正是魏惠王统治时期，魏国最迫切的事，并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魏国处于四战之地，在那一段时间，它几乎与周边的大国都交过手。对魏国来说，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望不到战争的尽头。西与秦战，北与赵战，南与韩战，东与齐战，有时还与楚战，战争机器停不下来，魏惠王压根儿没考虑过政治改革的事。

一腔热血的商鞅，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

几年后，连赏识他的相国公叔痤也死了。

公叔痤临死前，魏惠王前去探病。

望着相国瘦骨嶙峋的病躯，惠王悲伤地拉着他的手问道：“相国倘若有什么三长两短，国家以后要怎么办呢？”

老相国以苍老的语气答道：“我有一名侍从官，唤公孙鞅，虽然年纪轻轻，但有非凡的才能，希望主上能把国家大事交给他治理。”

公孙鞅？

魏惠王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相国在病重时居然推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魏惠王十分扫兴，沉默不语。公叔痤叹了口气，又说：“主上如果不愿意用公孙鞅，就杀了他吧，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

唉，看来相国是被病魔折腾得糊涂了。魏惠王心里觉得十分好笑，但他没笑出声来，为了表示对老臣的尊重，他一口答应公叔痤的请求。

魏惠王离去后，公叔痤差人唤来商鞅。

他对商鞅说：“你快逃吧，不然会遭殃的。”

“我为什么要逃？”商鞅莫名其妙，他又没干过什么非法勾当，怎么会遭殃呢？

“因为我要魏王杀了你。”公叔痤毫不隐瞒，把对魏惠王说过的话重述了一遍。

“本想推荐你为相国，可是我看得出主上不会同意的。这时我要把国家、君主放在首位，把臣下放在次位，所以我劝主上杀了你，你一旦去了别的国家，会成为魏国的心腹之患。我把自己的意见先说给主上听，尽到臣子的职责；可是我爱惜你的才华，所以叫你赶紧逃跑。你还是快点离开吧，否则就来不及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番话，推心置腹，既对得起国君，又对得起下属。

公叔痤可谓用心良苦。

那一刻，商鞅感动了。但他并不逃，他笑道：“主上如果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我呢？”

果不其然。

魏惠王回到宫中后，对左右的人说：“相国真是病得太厉害了。真可悲呀，他居然要寡人把国家交给公孙鞅治理，这岂不是太荒谬吗？”

过了不久，公叔痤死了，他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他说过的话很快被遗忘了。魏惠王既没有给商鞅一个官职，当然也没有杀他。

商鞅被遗忘了。

就在这时，秦孝公推出“求贤令”，广求天下贤人，能令秦国强大者，裂土为侯。

此令一出，改写了商鞅的人生。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商鞅怀揣一卷李悝的《法经》，离开魏国，动身前往秦国。

到了秦都栎阳，商鞅没有急着去见秦孝公，他还不了解秦孝公这个人。秦孝公改革的决心有多大呢？他的才能如何呢？是真心求贤，或者只是摆摆样子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商鞅毕竟是卫国贵族，对官场上的那套游戏自然心知肚明，要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只靠自己的才学是不够的，还得要有人举荐才行。

很快，商鞅找到一个人。此人名为景监，乃是秦孝公最宠幸的一个大臣。商鞅登门拜访，又送上礼物，托景监把自己引荐给秦孝公。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显然小心翼翼。游说君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后世韩非子曾写了一篇《说难》，专门论述此门学问。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没有洞悉君主真实内心想法之前，说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总是万无一失。

古代中国人有崇拜先祖的传统，言必称“三皇五帝”。其实三皇五帝时间久远，多是些传说故事，既是传说，越传越高大上，最后成了毫无缺点的完人。商鞅在秦孝公面前大谈三皇五帝的“帝道”，孝公听着听着，无精打采，中途有几次差点睡着了，最后听得不耐烦，没好气地把商鞅赶走了。

商鞅初战失利。

秦孝公批评景监说：“你所推荐的门客是什么人哪，哪里值得

用！”

景监挨了骂，把怒气倾泄在商鞅身上。

商鞅不慌不忙地说：“我今天跟主上说的乃是帝道，这个学问太深了，主上思想不开悟，与帝道无缘。”他请求再安排与秦孝公见面，也许是他那无与伦比的自信心征服了景监，这位宠臣答应再帮他一次。

五天后，商鞅第二度与秦孝公会晤。

这一次，他不说帝道，而是说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王禹、商王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先王政治理论，这些人都是被后世推为“圣人”，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大成就。这回秦孝公没有打瞌睡了，只是还有不满意之处，因为禹汤文武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人，生活的时代与今天迥然不同，把他们的政治理论放到今天用，牛头对不上马嘴。

诸位读者，商鞅不是研究刑名之学吗？他不跟秦孝公谈论刑名之学，却大谈帝道、王道之学，岂非奇怪吗？

其实不然。

刑名之学，向来上不了台面。华夏政治文明传统，都是讲求道德至上，即便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得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总之一句话，把“道德”二字挂在嘴边，保管不犯政治错误。商鞅在未知秦孝公底细之前，当然得小心谨慎，不能犯政治错误的。他先说了三皇五帝的帝道，又说了禹汤文武的王道，这些圣人都是历史上的英雄，秦孝公为什么不爱听呢？靠修德取天下，时间太长了。就说大禹吧，治水治了十几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如此辛苦，才积累些德行，容易吗？秦孝公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积德上，他要的是速效药。

通过两次面谈，商鞅摸清秦孝公的底了，自己的那套刑名理论，

不正是速效药吗？下次见面，必定可以征服孝公的心。

很快，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

商鞅不说帝道，不说王道，只说霸道。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经验，这里也包括孝公最推崇的先祖秦穆公。商鞅剖析霸业，入木三分。霸道之说，太合秦孝公口味了。春秋时代几位霸主，他们称霸的模式各有不同，但都是因势利导的结果。理论与时势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比如说第一代霸主齐桓公，当时周室衰微，诸侯争战，蛮夷威胁，他不失时宜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顺应天下民心，故能成就一代伟业。

秦孝公越听越兴奋，不住地点头。事后，他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门客很不错，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了。”

三次见面，商鞅的人生在此转折了。

秦孝公召见商鞅的次数越来越多。两人一熟，孝公也把心里话掏出来：“您最早说的五帝三王那些道道，用他们的方法来建功立业，花费时间太长，我等不了。贤明的君主，应该在位时就扬名天下，而不是默默无闻地等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业。”

商鞅答道：“要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在德行方面，就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了。”

儒家就是鼓吹德行，理想固然高远，可是实行起来，成功遥不可及。且不说后世儒生，就连鼻祖孔老夫子也混得不行，遑论他人？商鞅与秦孝公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要在活着时就名扬天下，而不是像孔子那样活着时如丧家之犬，死后却成了至圣先师。孔子是理想主义者，商鞅则是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注重今生而非来世。

秦孝公也是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道德家不是理想，他的理想是雪耻，是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改变中原诸侯把秦国当作蛮夷看待的“种族歧视”。

强国之路有吗？

有。

两个字：变法。

商鞅对孝公说：“秦国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制度法令，很多都不适宜当下了。要改变国家，首先要变法。”他侃侃而谈，把多年的心得一一道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秦孝公听得入神，不知不觉之间，他的身体不断向前挪，膝盖已挪动到座席前，还浑然不觉。

整个宫殿里，似乎只有商鞅慷慨激昂的话语在回荡，秦孝公仿佛看到了一幅美丽的图卷，他与他的国家高高在上，傲视群雄，所有人都匍匐在他脚下。被人瞧不起的秦国，果真可以实现号令诸侯的伟业吗？

他的身体突然颤抖了。

变法，意味着要把历代先王的法令制度推倒重来，摧毁传统。这得有多大的勇气。人有惰性，国家亦然，传统就是惰性。当一件事成为一种习惯，就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阻止其变化。

秦孝公忽然想起吴起。这位秦国克星离开魏国后，前往楚国，在楚悼王的全力支持下推行变法。岂料楚悼王刚死，尸骨未寒，一群顽固派便反攻倒算，将他射死在楚悼王的尸体之旁，楚国的变法半途而废。这就是变革的下场！秦国顽固派的势力，比起楚国一点也不逊色，秦国的变法，也会无疾而终吗？秦国的强大，会只是一场不切实

际的梦想吗？

想到这里，秦孝公焦躁不安了，吞吞吐吐地说：“我想变法，又怕天下人非议我。”

此时的秦孝公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即便他是君主，要以一人迎战一国之人，他信心瞬间崩溃。

商鞅也只有二十多岁，比起秦孝公，更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他慨然道：“优柔寡断者不会成名，迟疑不定者难以成功。真正高人的做法，必定超乎寻常人的见解；有独立见解的智者，必定遭众人的厌恶。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便能看到结果，愚蠢的人即便事情发生了也懵然不知。智慧的人少，愚蠢的人多，主上要做成一件事，不可与民众商量如何开始做，因为他们不过是鼠目寸光。您只需要在事成之后，让民众享用现成的果实即可。有高尚道德的人总是不合于习俗，建立大功业的人总是独断专行，不与众人共同商量。因此，只要可以强国，不必效法旧的规章制度；只要有利于民众，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要成就不世之伟业，就要有超越凡尘的雄心。

雄心战胜胆怯。

秦孝公决心留下商鞅，推行变法，扭转暮气沉沉的秦国政治。此议一出，一片反对声浪，这原本是预料中的事。

这是一场没有刀光剑影的战争，却杀机密布。商鞅要舌战群臣，为变法辩护。面对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他能顶得住吗？

老官僚甘龙率先跳出来反对道：“你简直胡说八道。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顺着民俗来教

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

说白了，像甘龙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最不喜欢改变现状，只要窝在旧的体制下，他的个人利益就不会受到冲击。

话音刚落，商鞅就给他当头一棒：“您所说的，不过是俗人的见解罢了。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学者们又拘泥于自己的见闻，不能突破常规。这两种人，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历代的礼法制度都是不断革新的，而非一成不变。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称霸诸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揭示真相：智者创建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

说到这里，商鞅用坚定的语气对秦孝公说：“受制于旧法者，不可与之谈变法；受制于旧礼者，不可与之谈政事。主上不要迟疑不决了。”

又一人跳了出来，杜挚喝道：“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变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

商鞅轻蔑地质问说：“您口口声声说要效法古制，请问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呢？又是遵循谁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教化却不诛杀；黄帝、尧、舜诛杀而不过分；周文王、武王时代法度、礼制又异于前代。事实上，治理天下绝不仅有一种方法，何必非要效法古代呢？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却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走向亡国。因此，循规蹈矩并非就是好，突破常规并非就是坏，关键是要顺应时势而定。”

“说得好。”秦孝公拍案而起，说道：“我听说居住在偏僻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只知道诡辩。愚者所嘲笑的事，正是智者所悲哀的。狂者所高兴的事，正是贤者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的言

论，真是不值得一提。寡人对变法一事不再怀疑了。”

没有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就没有震古烁金的商鞅变法。

很快，商鞅被提拔为左庶长，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十二 史无前例的大变法

变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目的是富国强兵。

固然，秦国并不弱，它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剽悍之师。但与其他诸侯相比，秦国也不强，否则沦陷数十年之久的河西之地，怎么迟迟没有收回呢？这是一个争雄天下的年代，战国七雄，无一弱者。要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只能比对手更强、更壮。

富国强兵不光是秦国的目标，也是诸侯们的目标。在此之前，各国的改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齐国以邹忌为相，广开言路，政治最为清明；韩国以申不害为相，以权术治国。然而，这些国家的改革，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不及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理论核心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投入到农耕与作战中。农业是本，商业是末，把农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富国之本，也是战争后勤的根本保证。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力量，采取赏与罚两手硬的手段。赏是要激起百姓的热情，罚是要用恐怖手段来控制他们，双管齐下，把生杀之权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国家就如同一台大机器，所有人只是其中的一个零件。

秦国开始朝着高度集权迈进。

在集权主义之下，个人的自由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新法的条文相当苛刻。比如连坐法是这样规定的：百姓每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一家犯了法，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

任，倘若知情不报，十家连坐。不告发罪犯者处以腰斩的酷刑，举报者得到的奖赏与战场杀敌相同。窝藏罪犯的惩罚与战场投降相同。

连坐法的危险在于，你不再是个自由汉，你没犯法，也可以因为别人犯法而遭株连。所以你除了当一个守法良民之外，还得随时充当暗探与告密者的角色。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别想置身事外。

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就两件：一是耕地，二是打仗。商鞅新法对农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是国家实力强大的根本，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本。秦人尚武，向来注重军功，却不注重农耕，商鞅把农耕的重要性与作战相提并论。要提高农耕的效率，就得压制商业，让商人无利可图，他们破产了，就只好去务农。国家要求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对游手好闲的懒人只有一种处置手段：把他们充为奴婢。

军事制度的变革更是变法的重中之重。建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是商鞅最大的努力方向，这同样需要使用赏罚作为手段。凡是在作战中立功的，按照功劳的大小受封爵禄。由于秦人尚武，民间私斗十分盛行，这必须要坚决清除，对私斗者要视情节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惩罚。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必须要成为有机体的一部分，要服从国家意志，不许自作主张。对于有军功的人，得给予显赫的声名，没有军功的人，就算富有也不光彩，公室宗族倘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贵族行列。

法令制定出来了，如何推广实施呢？如何让百姓了解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呢？倘若仅仅只是在城门张贴法令告谕民众，显然达不到目的。为此，商鞅精心构想一个立威、立信的方案。

他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约有三丈长的大木头，对围观的人群说：“有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大家觉得很奇

怪，扛这么根木头可以得到十金的奖赏，不可能吧？

大家不相信，没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商鞅站在台上高声说：“把木头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台下的人惊叫起来，议论纷纷，过了片刻，总算有一个人挤上前来道：“我来试试吧。”

此人扛起木头，从南门走街过巷，一路扛到北门。站在路边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想看看他是否能真的领到五十金的赏钱。那人把木头扛到目的地，商鞅绝不食言，当场发放五十金赏钱。众皆骇然，所有人都后悔了，早知如此，自己就应一马当先冲上前去扛木头。

整个都城轰动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事。商鞅徙木立信，花费五十金，值！这是给政府打广告，给变法打广告，向国人表明：政府是讲信用的，绝不欺骗百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紧接着商鞅公布了新法的各项细则，变法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法所招致的不满，如洪水般袭来。

秦国各地的官员百姓，都感受到了新法的威力，他们全被卷入到变革的旋涡之中，以往的生活习惯完全变样了。每个人的生活，全都打上政治的烙印，不能游手好闲，不能无所事事，不能只顾着自家，还得盯紧邻人，否则哪天被株连都不知道。当习惯刚刚受到外力的剧烈改变时，人通常会感到很不舒服，有强烈的抵触心理。于是乎数以千计的人从全国各地集中到都城，抗议新法，其中有的是个人行为，有的则是有人在背后操纵。

变法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来自底层的百姓，而是来自上层的贵族与官员，他们想方设法要中止改革，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商鞅必须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手段，杀鸡吓猴，让所有人都知晓，新法的威力绝对是不可抗拒的。

改革，就要有硬碰硬的勇气。

小官小吏容易搞定，大官大吏则不容易摆平。

阻力巨大，要突破阻力，势必与权贵周旋到底。

机会来了。

这次，触犯新法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家储君，当今秦国太子。

这时太子年龄还小，没遵守法令，也是底下人纵容的，太子党显然认为根本不受新法的约束。商鞅借这个机会，向太子党开刀。这真是疯狂，太子是未来的君主，其他人巴结都还来不及，怎么敢与之作对呢？然而商鞅真的豁出去了，只要太子党屈服了，还有谁敢对新法阳奉阴违呢？

商鞅谒见秦孝公，说道：“新法得不到强有力的执行，就是因为上面的人触犯了它。太子犯法，依法应当查办，只是太子作为国家储君，不能施刑，但太傅公子虔、太师公孙贾两人，作为太子的老师，其过不可恕，请允许我将此二人法办。”

对秦孝公来说，这是考验他变法决心的时刻。

刑不上大夫，这是那个时代官场的潜规则。商鞅公然挑战权贵，挑战传统，挑战潜规则。改革进入一个关键点，能否顶住压力，变法成败在此一举。令他欣慰的是，秦孝公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对年轻且雄心万丈的君主，富国强兵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为此，秦孝公不惜砸碎一切绊脚石，与一切反对者为敌。

在伟大秦孝公的支持下，嚣张的太子党遭到当头重击。太傅公子虔与太师公孙贾两人被依法惩罚，公孙贾被处以黥刑，就是在脑门上刺字，一辈子都得留下耻辱的烙印。全国震惊！谁也没想到新政府动真格的，拿权贵开刀问路。太师下场尚且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吏

岂敢再吭一声呢？

在商鞅霹雳般的一击下，所有反对新法者噤若寒蝉，无人敢抱怨了。所有人都知道商鞅背后有国君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固然，许多人心里怨恨商鞅，但商鞅毫不在意，我行我素，他充满使命的狂热，他才是创造历史的人，其他人只是庸庸碌碌的无名之辈。

新法推行的进程越来越顺，在短短几年里，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路不拾遗，山里没有盗贼——这是儒家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商鞅全做到了。他能做到，是因为手段不同，儒家强调教化之功，而商鞅则迷信强权的力量。人皆有恐惧怵惕之心，商鞅看清这点，采取恐怖、强制之手段，故而能收一时之效。当然，商鞅也明白，光以恐怖手段难以长久，怨恨久了，人心必如火山喷发。因此，还要利以诱之，只有让百姓尝到甜头，享受新法的好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新法带来什么好处呢？人人都丰衣足食，家家富裕，社会治安相当好。同时，私斗几乎绝迹了，国人怯于私斗，勇于为国家战斗，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强大了。只要秦国还能不断地从其他国家掠夺土地、财富，就可以转移百姓的注意力。当一个国家走向强大时，膨胀起来的爱国主义热情，能有效抵消对新法的抵触心理。

与变法同时进行的，是秦国一系列的军事扩张。

从秦孝公始，秦国开始崭露咄咄逼人的锋芒。

孝公元年（前361），秦军东攻魏国陕城，西伐戎人、斩獭王，亮出闪闪的刀锋。孝公三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韩国连战连败，秦军攻到怀地（河南武陟西南），在附近筑城，作为长期威胁韩国的堡垒。孝公四年，秦军再度攻韩国，在西山战役中再创敌军。

当秦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时，三晋之间仍热衷于战争。秦孝公八年（前354），赵国发动对卫国的战争，魏国出手阻止，以十万大军包围赵国首都邯郸。魏国重兵集结于东部，西部已露出大大的空当。秦孝公绝不浪费机会，再攻河西，大败魏军于元里，斩首七千，一鼓作气夺下河西重镇少梁城。尽管河西仍未全部光复，但秦国已经获得少梁城这座桥头堡，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攻魏国本土。

少梁城尘埃方定，秦孝公又把战火引向韩国。秦公子壮包围焦城，初战不利，转而攻略上枳、安陵、山氏诸地，在这些地方修筑城堡。秦人的势力，已如一把尖刀，插入魏、韩交界处。

魏国运气着实差劲。北线战场与赵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西线被秦国收复少梁城，此时齐国忽地从背后插入一把刀。齐威王围魏救赵，孙臆献计大破八万魏军于桂陵，生擒魏将庞涓。南方的楚国乘机浑水摸鱼，夺取魏国若干城池。魏国在东西南北四面受敌，狼狈不堪。

孝公十年（前352），商鞅被提拔为大良造，这也是秦国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国兼将军。

商鞅不当战争的看客，他也要过过战争瘾。

大家都知道商鞅是大政治家，他作为军事家的一面总被忽略。其实商鞅有很高的军事素养，曾钻研过兵学，写过《战法》《兵守》等文章，论述作战方法、防守手段等问题。他在新法中鼓吹战功，没有军功就不配享受爵禄。这条法令，对别人适用，对他也适用，他要以身作则，在实战中捞取军功。

在商鞅的指挥下，士气高昂的秦军东渡黄河，迅速向魏国境内挺进，包围安邑城。安邑是魏国旧都，重要性仅次于大梁城。只是魏国主力在北线战场与东线战场均陷入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如何还有兵力解安邑之围呢？安邑守军在孤城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向商鞅投降。

安邑对商鞅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在此生活许多年，始终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彼一时，此一时，当他再回到这座城市里，不再是当年落魄人，而是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与光荣。

一年后，商鞅再度带兵杀入魏国，兵围固阳城，迫使守军献城投降。

魏国西线频频告急，魏惠王不得不放弃吞并赵国的企图，与赵、齐等国陆续握手言和，集中力量对付秦国。魏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不可低估，魏惠王大举反扑，杀入秦国，兵围定阳。这次进攻，雷声大而雨点小。魏惠王的战略重心在中原，对秦国的反击，显然只是报复战。商鞅看清了这点，遂提议秦孝公与魏惠王议和。果然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赢了面子后，撤兵回国去了。

西线无战事。

商鞅利用这个时机，实施第二阶段变法。

第一阶段的变法，主要是变更法令，强化赏罚手段，限制民众自由，让他们服从于国家。在商鞅铁腕之下，变法取得极大成功，但仍不够深入。酝酿十年后，商鞅二次变法隆重推出。

二次变法，主要是完善、强化国家的行政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迁都咸阳。

秦国历史上曾数次迁都，秦献公二年迁都于栎阳。栎阳并不是十分理想的都城，更像是一个临时军事指挥中心，难以担当行政中心的职能。相较之下，咸阳的地理条件更好，四周有山河之险，易守难攻，扼东西、南北交通要冲。建都咸阳，中央政府对国内四境之地都

有很强的掌控力。另外，作为新都，咸阳的保守派势力绝对不像雍、栎阳这些旧都那么强大。

第二，完善行政区。

商鞅把秦国的小乡小邑、村落整合为县，全国总共有四十一个县。每个县都设置县令、县丞、县尉，分别掌管县的民政、军事。以上三个要职都由国君直接任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力度大大加强了。

第三，废井田，开阡陌，“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

农业是经济基础，是战争的坚实保障。秦国地广人稀，三晋地狭民贫，针对这种情况，商鞅从三晋引进劳动力，分给他们田地与住宅，允许三代人不用服兵役。这样做，既增加了秦国的劳动力，又削弱了魏、韩、赵三国的兵源后备力量，可谓是一箭双雕之计。商鞅又颁布法令，鼓励开荒，只要是力所能及，不限土地数量，任由百姓耕种。这一政策实施数年后，秦国一举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第四，统一度量衡制度。

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能异军突起，标准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兵器制造为例，统一度量衡后，有了标准的量器、容器，国家要打造一批兵器时，只要在设计图中标明规格，如大小、重量、尺寸等，无论在全国的哪个工场打造，出来的兵器规格都是相同的。除了秦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这点。

第五，革除戎狄陋习，禁父子兄弟同室而居。

秦国僻居西北，受戎狄风俗影响至深。中原诸侯看不起秦国是有道理的，中原礼法，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以“齐家”为本，秦国习俗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在中原人看来，不合礼制。商鞅变风俗，把中原家庭礼制引入秦国，给这个文化落后

的国家带来了文明的气象。

十三 改革家之死

变法令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周天子特地派人送祭肉给秦孝公。在周代，诸侯得到天子的祭肉，这是莫大的荣宠，只是如今周室衰微，所谓的荣宠也就有名无实了。不过既然天子表了态，其他诸侯也装模作样前来祝贺。如今秦孝公已完成一个心愿了，秦国不再被人瞧不起，他打心里感激商鞅，没有商鞅，就没有秦的光荣。

有一个人高兴不起来。

他就是魏惠王。

自从与赵国和解，魏国似乎恢复了些霸气。首先是入侵秦国，迫使秦孝公签订城下之盟；紧接着，魏惠王又发动对燕国与楚国战争，攻城略地；最令魏惠王得意的是，泗上十二诸侯全部尊他为老大，魏国仿佛又回到了魏文侯雄霸天下的时代。

然而，秦国的崛起又令魏惠王相当担忧，若不出手，恐怕夜长梦多。

秦孝公十八年（前344），魏惠王纠集十二个小诸侯，以朝天子为名，打算向西攻略秦国。怎么办？战或是不战？商鞅力主谈和。原因有二：其一，魏国挟十二诸侯之威，以多打少，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其二，虽然魏国的霸业回光返照，其世界老大的地位并不稳固，与赵、韩、齐、楚等国的矛盾依然很深，一个在地理上被诸强包围的国家，不扩张就会陷入死地，一扩张就会引来敌人的联合。秦国应该耐心等待机会，不应该与魏国硬碰硬。

魏惠王想开战，商鞅有办法避免战争吗？

有。

对魏惠王这个人，商鞅太了解了。这个人好大喜功，野心很大，但才能与其野心不相匹配，缺乏战略眼光。只要给他送上糖衣炮弹，就容易搞定了。

送什么呢？

王的头衔。

为了叙述方便，我把魏_罃 称为“魏惠王”，其实他现在还没有称王，而是称侯。在战国七雄中，只有楚国称王，其余六国仍是称为侯。商鞅打算给魏_罃 送上一顶王冠。他代表秦孝公出使魏国，先是赞扬魏_罃 的伟大功业，把他吹得晕乎乎的，然后又略为惋惜地说，有这么伟大的功业，却只能领导鲁、宋、卫这样的小国，实在与世界领袖的实力不相般配，不如称王，先有“王”的名号，然后可成“王”的事业。

商鞅信誓旦旦地说，秦国支持魏国称王。

魏_罃 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只要称王，便当之无愧成为世界领袖。既然秦国服软，还要尊他为王，他很快就把攻打秦国的计划抛之九霄云外。不久后，魏_罃 自称为夏王，在逢泽召开诸侯大会。只是去的都是小诸侯，六大强国中，只有秦国派公子少官出席会议，其余五国都不搭理魏国。

商鞅略施小计，不仅化解了一场战争，还激化了魏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可谓是一箭双雕。

被视为小弟的韩昭侯居然也不来参加大哥的盛会，魏惠王愤怒了，他出兵攻打韩国。这一冒失的举动，彻底葬送了魏国的未来。

齐国再度出手，军神孙臆在马陵之战中一举消灭十万魏兵，魏国太子申、大将庞涓都死于这场战役。

秦国的机会再度降临。

商鞅乘机对秦孝公说：“秦国与魏国就是死对头，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为什么这么说呢？魏国西部是险峻的山岭，跟秦国以黄河为界，独占殽山以东的地利，一有机会就能向西出击，侵略秦国，倘若没有机会，它还可以向东扩张。自从主上即位以来，赖主上圣明，国家强盛，多次打败魏国。如今魏国在马陵遭遇新败，太子申被俘，庞涓被杀，诸侯反叛，这是攻打魏国的良机。倘若我们能一举打败魏军，魏国必定放弃西部而全力谋求向东发展，这么一来，我们将占有黄河、殽山的险要地势，向东控制各路诸侯，这可是帝王的伟大事业。”

一支强大的远征军组建起来，由商鞅亲自率领，杀入魏国。“兵者，诡道也。”在这场战争中，商鞅极尽阴谋手段。镇守魏国西疆的公子卬是商鞅的老友故交，商鞅写了一封书信，差人送到魏军兵营。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欲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

这封信，写得极为诚恳。公子卬本是心胸坦荡之人，哪知老朋友一肚子坏主意呢？他还真信了商鞅的话，动身前往秦国兵营，打算罢兵会盟。可是他也不想想，倘若商鞅真的“不忍相攻”，带着这么多人马来干吗呢？

商鞅假惺惺地请公子卬喝酒，公子卬一点疑心也没有。正当公子卬喝得有点醉意时，事先安排埋伏在外的甲士突然杀出，将他生擒。统帅被俘虏，魏国军队群龙无首。商鞅果断地对魏军发动致命一击。

这一战，魏国人惨败，伏尸数里，血流成河。

此役对魏国的打击力度，堪比孙臆所指挥的马陵之战。这两大战役，使魏国在东、西两线全部遭到惨败，魏国的霸业就此泡汤。魏国的强盛始于魏文侯，经魏武侯而终结于魏惠王。后世学者雷学淇曾这

样评论说：“惠王之败于齐、秦，此盛衰一转关也。”此后，“齐威奋起于东夏，秦孝起于西陲”，天下重心，由魏国分移到齐国与秦国。

连遭惨败的魏惠王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迫切希望与秦国和谈。

商鞅狮子大开口，要求魏国必须割让河西之地。河西之地对秦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魏国修筑有坚固的长城，成为秦国向东扩张时不得不防的心腹之患，只有把这根楔子拔掉，才能解除后顾之忧。河西经魏国几代人耗费巨大财力物力经营，目的就是遏制秦国，如今已经无力压制了。除了忍痛割爱之外，魏国如何能换取和平呢？

谈判的结果是魏国割让一部分河西之地给秦国。虽然还有若干重要城池控制在魏国人手中，但已经不足以威胁秦国了，因为魏惠王耗费巨资所营造的河西长城防线已经支离破碎。秦军收复河西，只是时间问题。

自秦孝公上位，便把收复河西作为雪耻的第一目标，如今这一伟大事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一切成就，归功于伟大的商鞅。他非但是变法的总设计师与执行者，也是卓越的统帅，智擒公子卬、大败魏师、光复失地，这一连串的伟大胜利，把商鞅推向人生的巅峰。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兑现“分土”的承诺，把於、商封给商鞅，共计十五座城邑。商鞅把其地改名为“商”，故而后世不称他“卫鞅”或“公孙鞅”，而是叫“商鞅”。时人也不敢直呼其名，而是尊称为“商君”。

这一年，是商鞅入秦的第二十二个年头。

秦孝公与商鞅的合作，是双赢的选择。秦孝公得以复仇雪耻，只用二十余年的时间便赢得世人的尊敬，不复是被人嗤为蛮夷的君主，连续重创魏国后，河西之地虽未完全收复，业已看到希望的曙光。商鞅以秦国为政治实验田，大展宏图，实践其富国强兵的改革理念，最

终名利双收，裂土称孤，实人中之杰也。

然而，亢龙有悔，高处不胜寒。

在登上顶峰的那一刻，人生已没有上升的空间，四面却是悬崖峭壁，一个不小心，就可以摔得粉身碎骨。

许多双不怀好意的眼睛都紧盯着商鞅，特别是曾被他打倒的太子党，更是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反扑。

太子党有两大巨头，一为公孙贾，一为公子虔。从两人的名字来看，他们都是秦国公室成员，非但位高权重，背后还有庞大的家族势力撑腰。遇到商鞅，这两人倒霉到极点。先是公孙贾被施予黥刑，后来公子虔更惨，被施予劓刑。一个脸上被刺字，一个连鼻子都被割了，这怎么见人？公子虔躲在家里，八年不敢出门，但没有一天不想着手刃商鞅。

其实商鞅对这两人已经算手下留情了，其他人运气可没这么好。譬如一个名为祝懣的权贵，反对新法，被商鞅一刀“咔嚓”了。

商鞅摇身一变成为“商君”，春风得意，马蹄疾驰，一日览尽咸阳之花。迷信权力的人，常死于权力，因为他们往往低估了对手。反对商鞅的人，早已凝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之所以迟迟未动手，只是投鼠忌器，只要秦孝公还活着，他们就没有机会。

表面上威风八面的商君并没有意识到，权力是很空泛的概念，拥有它时，认为它是万能的神，失去它时，它就是脆弱的芦苇。表面上，商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他的权力只是来自于秦孝公的恩赐，没有这座强有力的靠山，他就什么也不是了。

有一个人提醒商鞅了。

这个人名叫赵良。

一天，商鞅颇得意地问赵良：“你觉得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强呢？”

赵良没正面回答，而是说：“要我说实话有个条件，你不要杀我。”

商鞅不由得一怔，随即满口答应。

赵良说：“五羖大夫百里奚执政时，没有车马随众，从不操持兵器，夏天时不张伞，劳累了也不坐车。他死的时候，秦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都为他流泪，小孩子也不唱歌，连舂米的人也不吆喝。这就是他的德行。而您呢？当年您能见到秦王，是靠宠臣景监的推荐，当了秦相之后，用严刑峻法来残害百姓，对太子师傅施刑，这不明摆着累积怨恨与祸患吗？您不断地树立自己的权威，老百姓几乎只知道您而不知道君主，这不是教化之道。可是您还不满足，还依靠旁门左道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自称寡人，用新的法度来压制秦国贵族。自从公子虔受劓刑后，八年不敢出门见人，您还杀了祝懽，对公孙贾施黥刑，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您每次出门时，前呼后拥，身后的车辆数以十计，车上满是全副武装的甲士，两旁还有两排卫队，手持长矛与戈戟，威风凛凛。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摆设，您绝对不出行。您这样做，大概也是害怕遭人暗算吧。恕我直言，您的生命就像清晨的露水，瞬息之间就可能消失无踪。如果能及时补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我建议您归还国君所赏赐的十五座城邑，在郊野灌溉田园，劝谏国君起用有才华的隐士，赡养老人，抚恤孤寡，敬重父兄，尊崇有德。倘若您还贪图财富与名位，增加百姓的怨恨，一旦国君有所不测，到时想要杀你的人难道还会少吗？您的死期不会远了。”

听完这些，商鞅两眼发愣，无言以对。

只是，他没有听赵良的劝告。要他拱手让出辛辛苦苦奋斗得来的

权力与土地，那还不如把他杀了。

不过，他没料到，他真的被杀了，而且是以最残酷的手段杀死的。

五个月后，秦孝公死了。

靠山倒了。

即位的正是当年被商鞅指责触犯新法的太子驪，史称秦惠王，又称秦惠文王。太子党得势了，被割掉鼻子的公子虔终于走出家门，他等这一天，等了八年了！秦孝公尸骨未寒，对商鞅的反攻倒算就开始了。公子虔迫不及待地在新君主面前诬告商鞅，罪名是：谋反！

商鞅意识到自己后台垮了，好日子结束了。现在坐在台上的是自己的仇家，留在秦国死路一条，只能跑路了。

他一路狂奔，一直跑到边关附近。

当时天色已暗，商鞅饥寒交迫，实在没有气力，得找个小店歇歇了。他连续找了几家旅店，店主要求出示证件。他拿不出证件，店主说：“那不能让你住宿，这是商君的命令。留宿没有证件的人，是要犯法的。”

商鞅不禁苦笑了。他本以为自己是制造法律的万能上帝，现在却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原本制造了一个大囚笼要把别人锁在里面，到头来发现囚笼造好之后，自己却被锁在里面了。

当一个人从山峰坠入谷底，那滋味绝对不好受。他早习惯了华丽的厅堂、众奴仆的服侍，如今连住个荒村小店竟也成为奢侈。无奈之下，他只得强打精神，步履蹒跚地向国境线奔去，终于逃出秦国，进入魏国境内。

问题是，魏国能收留他吗？

魏惠王对商鞅的痛恨程度，不亚于秦惠王与公子虔。想想这些年商鞅都干了多少落井下石之事：攻破魏国旧都安邑；表面奉承拍马魏惠王，背地里却捅一刀；施诡计以卑鄙手段生擒公子印；逼迫魏国割地求和……每一件事，都令魏国蒙受巨大损失，令魏惠王脸上无光。这样的人，魏惠王会收留吗？

不能怪别人，只能怪商鞅自己做事做得太绝了，不给别人留活路，别人岂会给他留活路呢？

魏惠王不怀好意地下一道命令：“商鞅是秦国的犯人。秦国强大，得罪不起，犯人逃到魏国，必须把他遣送回去。”把商鞅遣送回秦国，与杀了他有什么不同？魏惠王不必亲自动手，他要幸灾乐祸地看看秦国人如何处死自己的英雄与救星。

商鞅被逐出魏国。事到如今，他只能铤而走险了。

他秘密回到自己的封地，拼凑起一支军队，做最后一搏。

在此之前，秦惠王是否要杀商鞅呢？这尚有疑问。固然，他对商鞅是痛恨的，再加上公子虔等人煽风点火，商鞅倒台已是必然。不过，商鞅既是孝公重臣，又有大功于秦国，秦惠王未必真有决心杀他。若非如此，以秦国律法之严密，商鞅何以能逃得出秦国，又何以被驱逐出魏国后，还能从容回到自己的封地呢？可见秦惠王是有所犹豫。

如果说公子虔“谋反”的诬告只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那么商鞅一起兵，谋反的罪名便坐实了。秦惠王不必有所顾虑了，他马上调动大军，镇压商鞅的叛乱。

以区区十五座城邑与整个秦国对抗，岂非以鸡蛋碰石头。

以一群乌合之众，去对付一支百战雄师，无异于自杀。

双方在彤地展开决战，战斗结果完全不出人意料，商鞅全军覆没，自己也沦为阶下之囚。他曾经手握生杀之权柄，只有他决定别人的生死，今天他被捆得严严实实，成为刀下之鱼，俎上之肉，一点自由也没有了。

等待他的，将是残酷的车裂之刑。

车裂是古代最残酷的死刑之一。

因为太残酷了，在政治文明颇高的春秋战国时代，绝少使用此酷刑。车裂又称为“车轘”或者“轘”，就是把囚犯平放在刑台上，用绳子或皮带把躯体固定了，手脚张开呈一个“大”字形状，头与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行刑时，用马或牛从五个方向拉车，把人体撕裂为六块。由于人的四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拉断的，受刑过程是极其痛苦的，正因为此刑罚太过于残酷，所以只用在罪大恶极的人身上，比如弑君者。

春秋时有几个车裂行刑的例子，都是针对弑君者。譬如周庄王三年（前694），郑国大夫高渠弥因弑杀君主郑昭公，被齐襄公以车裂酷刑处死。又如周定王九年（前598年），陈国夏徵舒因弑杀陈灵公，被楚庄王处以车裂之刑。

商鞅并未弑君，只是被逼反。包括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当然心知肚明，可是他们对商鞅的仇恨委实太深了，特别是被割了鼻子的公子虔，被脸上刺字的公孙贾，如何能让商鞅死得舒舒服服呢？不，一定要用最残忍、最痛苦的刑罚，唯有如此，方可解心头之恨。

从极乐天堂到阿鼻地狱，其距几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远。

几个月前，他还是天神，几个月后，他是待宰的羔羊。

吴起的悲剧又在秦国重演，而且更悲，更惨。是商鞅把秦国从一个军事大国变成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是他让秦国在国内能抬头挺胸，以一个文明国而非野蛮国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是他令秦国从诸侯国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但等待他的，却是车裂的酷刑。

那一天，咸阳城万人空巷，齐聚刑场。

有人同情，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无动于衷……

商鞅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撕扯身体，支离破碎，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他的尸体被挂起来示众，血肉模糊……这样的下场，着实令人唏嘘，一个英雄，本不应当有如此之下场。

人生就是大赌局，不仅要赌输赢，也要赌生死。商鞅全身心投入到人生的赌局中，赌到最后一无所有。

但他并不全然是失败者。

他所创建的新法，比他的生命更长久。秦惠王恨商鞅这个人，却不恨他的法，也不废他的法，新法给秦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并结出丰硕之果，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再说了，商鞅新法立足点是加强君主权力，哪个君主会拒绝呢？

关于商鞅变法的争议却延续了两千年。

他被指责最多的是刻薄寡恩。

大史学家司马迁这样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

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则说：“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司马迁与贾谊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商鞅，事实上也是批判他违背仁义之反道德主义。

也许只有政治家才能了解政治家的苦衷与事业之艰难。后世为商鞅辩护之人，不少是有名的政治家。

为秦一统天下作出卓越贡献的李斯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

汉代著名的财政专家桑弘羊这样评价商鞅：“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宋代的王安石是古史中唯一能与商鞅媲美的改革家，他的说法颇有中肯之处：“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不论世人喜欢或厌恶商鞅，都不能否认他导演了历史上最深刻、最成功的变法，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秦国吞并天下的大门也由此开启。

十四 “屌丝”逆袭：张仪的励志故事

魏国的霸业凋零，秦国的霸业方兴。

有趣的是，打败魏国的正是魏国人。从春秋时代始，晋国就是人才辈出之地，三家分晋后，魏、赵、韩三国仍是人才鼎盛，其中又以魏国为最。当魏国最强盛时，各国人才纷纷涌入，吴起、孙臆、商鞅都是其中佼佼者。结果呢？吴起被陷害去了楚国；孙臆被砍掉膝盖去了齐国；商鞅郁郁不得志去了秦国。此后便出了怪事，在魏国混得没人样的人，到了秦国后却成了一条龙，魏国几乎成了秦国的人才培训基地。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即纵横）强秦者大抵三晋之人也。”

商鞅死后，又有两个大神级的人物，从魏国去了秦国。

这两位大神，一个是公孙衍，一个是张仪。

此二人，皆是战国纵横家之代表人物。

所谓纵横，即合纵与连横，韩非子释义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随着群雄兼并战争的加剧，外交活动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这给了纵横家脱颖而出的机会。一批权谋大师横空出世，令纵横术光芒四射，他们也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的英雄与偶像。

先说说公孙衍。

他是魏国阴晋人，早年生平不可考，只知道曾在魏国当过官。估计混得不好，他便离开魏国，到秦国去碰碰运气。此时秦国广纳贤

才，公孙衍如鱼得水，很快便声名鹊起。

秦惠王上台后，致力于全面收复河西之地。

公元前333年（商鞅被杀后五年），公孙衍率秦国兵团攻打魏国在河西的军事据点雕阴城，大败魏军。他不遗余力地攻打自己的祖国，秦惠王显然很满意，把他提拔为大良造。秦国如旭日初升，魏国却已暮气沉沉，老迈的魏惠王再无进取雄心，对付秦国虎狼般的进攻，他祭出的法宝是割地求和，把公孙衍的故乡阴晋城割让给了秦国，秦惠王将其更名为宁秦。

战争向来没有中庸之道，魏国退一步，秦国则进一步，此消则彼长。公元前331年，秦惠王派公子卬对河西发动史无前例的猛攻。魏军兵败如山倒，统帅龙贾被生擒，战死者不计其数。在《史记》一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见于《魏世家》，记为：“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秦本纪》则记为：“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前者为魏方的记录，后者为秦方的说法。不管哪种属实，都证明秦国大胜而魏国大败。

秦军乘胜而进，渡过黄河，攻入魏国，兵围焦、曲沃。

魏惠王再无继续战斗的勇气。他在位时间已经长达四十余年，或许是年龄的原因，或许是战场不断遭遇的惨败让他心灰意冷、自信全无，他再也牛不起来了。这一次，魏惠王将河西之地全部割给秦国，以换取和平。

自公元前419年魏文侯筑少梁城、经略河西以来，经过八十九年的反复争夺，魏国最终在河西战争中败北。全面收复河西，是秦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钉子已经拔除，通往中原的大门即将打开，灼人的烈焰很快就要烧向东方。

魏国老大地位不再，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在东方诸侯中，在“围魏救赵”及马陵之役中异军突起的齐国取代魏国成为老大。

公元前334年，齐、魏两国在徐州相互称王，此举意味着周天子的王号失去权威。此后，各诸侯相互称王。

公元前325年，秦惠王正式称王。几个月后，韩宣惠王称王。公元前323年，赵、燕、中山等国称王。至此，战国七雄全部称王，分别是齐威王、秦惠王、楚怀王、魏惠王、韩宣惠王、赵武灵王与燕易王。

仅仅十一年的时间，重要的诸侯国全部称王，宣告周王室“天子至尊”时代被彻底终结。春秋时代“尊王”的口号彻底被抛弃，各国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当然其间也有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但多数都是短暂性的。连横也好，合纵也罢，如何选择，都要视自己的利益而定。战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更加残酷的阶段，战争规模更大，也更血腥。

随着战争的全面推进，各国纷纷开辟第二战场，即外交战场。

这是辩士们纵横捭阖的黄金时代，连横与合纵成为最重要的外交战略，而一大批杰出的外交奇才也应运而生，张仪正是在此背景下来到秦国。

张仪是魏国人，与苏秦是同学，师从一位神秘的高人鬼谷子。在求学期间，他的聪明才智让苏秦自叹弗如，他才思敏捷，巧舌如簧，天生就是一块纵横家的料。不过刚出道那会儿，他却四处碰壁，狼狈不堪。

从鬼谷子那儿学成归来后，张仪自以为可以行走天下，开始他的游说生涯。此时魏国衰微，官场黑暗，张仪没有用武之地，他便动身去了楚国，成为楚相国府里的一名门客。岂料没过多久，他便遇上一

件倒霉的事。

有一回，相府丢失了一块玉璧，大家怀疑是张仪偷的。为什么呢？因为张仪家里很穷，大家对相爷说：“张仪家里贫穷，品行不好，准是他偷了玉璧。”就这样，张仪被抓起来，严刑拷打，遭鞭笞数百下，被打得遍体鳞伤。穷也是过错吗，为什么穷人就要被怀疑？张仪他咬紧牙关，死不承认。最后相爷也没辙了，毕竟空口无凭，只得把半死不活的张仪赶出相府。

回到家后，张仪卧病好一段时间。妻子看着体无完肤的丈夫，心疼地说：“唉，夫君您要是不读书，不学游说之术，怎么会蒙受这等冤屈与耻辱。”

张仪张大嘴巴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妻子笑着说：“还在。”

“这就够了。”张仪十分乐观地回答。

这时他打听到一个消息，自己的同学苏秦混得不错，在赵国挂了相印，便心念一动：为何不去找老同学呢？于是他打点行装，动身前往赵国。

到了赵国，张仪前往苏秦的府邸，求见老同学。苏秦知张仪有过人之才，有意要刺激他一下，以激发其雄心壮志，故意装作十分冷漠的样子，让他等了好几天后才接见。

张仪进了内堂，苏秦也不吭声，让他坐在堂下，令人端上几盘下人们吃的菜肴摆在他案前。正当张仪心里颇有怨气时，苏秦慢条斯理地说：“张仪呀，凭你的才能，竟然穷困潦倒到这个地步，我真为你感到羞耻。当然了，我可以在赵侯面前举荐你一下，让你富贵，只是你不值得我这样做。”

一个有血性的人，怎么能被这样侮辱呢？张仪双拳紧握，怒发冲冠。苏秦才不管他呢，像打发下人一样，把他打发走了。

耻辱，真是奇耻大辱。张仪恨恨地说，我定要出人头地，总有一天要回来雪耻！

魏国待不了，楚国待不了，如今赵国也没他容身之地。

要去哪呢？

当然是秦国了。

他打点行装，再不回头望苏秦相府一眼，向西而去。

张仪走后，苏秦才对一位门客说：“张仪是天下奇才，我比不上他。如今我侥幸被赵国任用，赵国最大的敌人是秦国，能够掌握秦国大权的人，只有张仪。只是张仪还没有时来运转，他现在穷困潦倒，很难有机会接近秦国君主。我怕他会贪图小利，以至于浪费成就大业的机会，所以故意羞辱他，就是为了激发他的斗志。如今他动身前往秦国了，一路上会遇到许多麻烦，您帮我在路上照应他。”

苏秦给了这位门客一包金币，配了一辆马车，让他跟踪张仪，暗中相助。门客依苏秦吩咐，有意接近张仪，与他住同一个旅舍，张仪缺什么，他就给什么。到了咸阳城后，门客又拿着金币四处打点，使得张仪有机会见到了秦惠王。张仪以为遇到好心人，内心十分感激。

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向秦惠王大谈远交近攻的连横战略。秦惠王听得意醉神迷，当即大腿一拍，给了张仪一个官职。

一路随行的门客见张仪已经在秦国站稳脚跟，便前来辞行。张仪一听急了，脱口说道：“我是靠着您才有今天的地位，正想要报答您

呢，您怎么就要离开呢？”

门客微笑道：“我跟您说实话吧。了解您的人不是我，是苏秦先生。苏先生担心秦国将攻打赵国，他认为除了您之外，没有谁能掌控秦国的政权，所以一心激您到秦国，又派我暗中提供财物相助。现在我完成任务了，要回去向苏先生交差了。”

这时张仪才明白真相，他动容道：“苏先生的激将法，正是老师鬼谷先生所传授，我却没能领悟，很明显我的水平不及苏先生。我刚刚被任用，岂能谋取赵国？请您一定要代我向苏先生致谢。苏先生在位执政时，我哪里敢说些什么，又哪里能做什么呢？”

张仪为人精明，辩才无碍，有真知灼见，很快取得秦惠王的信任。

有个人不高兴了。

他就是秦国大良造公孙衍。

既生瑜，何生亮！既然有了我公孙衍，怎又生出了一个比他更强的张仪？

一山不容二虎。

两人都来自魏国，都是纵横大师，都充满权力的渴望，明争暗斗不可避免。两人斗了好几年，最终张仪技高一筹，把公孙衍给挤掉了。公孙衍气急败坏，一怒之下离开秦国，返回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

秦惠王九年（前329），秦国以公孙衍叛逃为借口，大举出兵讨伐魏国。可怜的魏国已经想不到对付秦国的办法，汾阴、皮氏、焦、曲沃等城邑纷纷落入秦军之手。

秦国的进攻如疾风暴雨，令魏惠王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第二年（前328），秦军再次兵临城下，领兵打仗的，正是张仪。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秦惠王对张仪忠诚的考验，让他去屠杀自己的同胞。在今天看来，张仪可称为“魏奸”、叛国者。不过战国时代国家观念没那么发达，张仪的理论是，魏王不肯用我，我才跑到秦国效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出自鬼谷门下的张仪不仅懂得纵横术，也学过兵法。他还是有两下子的，很快攻占魏国城池蒲阳。

对张仪的表现，秦惠王相当满意。

不料张仪班师回朝后，给了秦惠王两个看似荒唐的建议：其一，把蒲阳归还魏国；其二，派一名公子入质魏国。

这是什么话？秦惠王拉了拉耳朵，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辛辛苦苦才把蒲阳攻下来，又要拱手让出，你唱的是哪出戏呢？要派人质，也应该是失败者送上人质，哪有胜利者送人质的道理？秦惠王不禁要怀疑，你张仪是不是魏国派来的奸细？

若是大家都看得明白的谋略，怎么算得上是奇谋妙略呢？张仪自然有自己的算盘。他本质上是一个赌徒，既然要下赌，就得有赌注。城池与人质就是他的赌注。赌什么呢？赌魏惠王的面子。

魏惠王是个好面子的人，你越不给他面子，他硬要死撑着。若是给他一点面子，他必定会变得慷慨大方。魏惠王正为蒲阳的丢失而垂头丧气时，张仪来了，把城池送还，还附带送来一个秦国公子当人质。看上去秦国是做了赔本的买卖，其实不然，张仪此来，是要做交易的。

老子不是说过：“将欲夺之，必固予之。”赠送是为索取更多。张仪见魏惠王乐呵呵的，便说：“秦国对魏国这么好，魏国总得意思意思吧。”

魏惠王不禁一愣，什么意思一下呢？

张仪早有方案。

去年秦国不是夺了魏国焦邑、曲沃数城吗？这些都是大城池，特别是曲沃，是晋国的发迹之地，历史名城。只要魏国拿些城池来交换，秦国将交还焦邑、曲沃。魏惠王已经当了四十二年的国君，垂垂老矣，早失去往昔的锐气与斗志，只是对虚名看得很重。能换回历史名城曲沃，自己面子上才过得去。他取来地图，大笔一挥，划了十五座城邑与张仪交换。

用蒲阳、焦邑、曲沃三座城池换回十五座城，秦国便宜占大了。张仪毕竟是魏国人，对魏惠王的心理摸得太准了，只要保全他的面子，准能捞到好处。是的，魏惠王自认为很有面子，秦国主动来求和，还送上人质，送还历史名城。只是秦惠王要在背后偷笑了，他只是用魏国的这块土地交换那块土地，自己分文未付呢！

张仪用一张利嘴，为秦国捞了十几座城。不必舞刀弄枪，三寸之舌功过十万雄师，果然是厉害角色。

秦惠王不能不服，他把张仪提拔为相国。

在此之前，秦国是不设相位的，最高官职是大良造，商鞅、公孙衍都当过大良造。秦设相国，是从张仪开始的。曾几何时，张仪四处碰壁，跑了半个中国也没混出个人样，如今“屌丝”逆袭，华丽转身为高富帅，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没有秦国开放的政治，就没有张仪的励志故事。由此看来，秦孝公当初求贤天下的政策，可谓是目光远大。

十五 新战略：连横VS合纵

“纵横术”是张仪的看家法宝。

纵横术包括合纵与连横，要使用哪种策略，得随机应变。若是在弱国，就得鼓吹合纵，譬如张仪的同学苏秦，跑到赵、燕这些较弱的国家，他得鼓动诸侯联合对抗强国；若是在强国，用法则不同，须鼓吹连横，远交近攻。

张仪的时代，天下形势明朗化。东部的齐国与西部的秦国崛起为两大超级强国；三晋没落，夹在两大强国之间；楚、燕两国各据南北，没有雄心壮志。

秦国欲席卷中原，势必要与三晋战斗到底。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谋略与外交，是军事的上乘之道。张仪深谙此理，他祭出“连横”法宝，在外交上积极拉拢齐国与楚国，打击魏、赵、韩三国。

公元前324年，张仪与齐、楚两国外交大臣会晤于鬲桑（江苏沛县西南），商讨合作事宜。一旦三国结盟，魏、赵、韩将陷入西、东、南三面的环形包围圈，到时就相当被动。但我们不要忘了，三晋是纵横家的大本营，人才还是有的，挺身而出的，正是张仪的老对手公孙衍。

公孙衍被张仪挤出秦国后，回到魏国，这位纵横大师着实本领不同一般，很快取得魏惠王的信任。针对张仪“三国结盟”的企图，公孙衍精心策划“五国合纵”，五国就是魏、韩、赵、燕、中山五个国家，以合纵战略对抗张仪的连横战略。

棋逢对手，公孙衍这一招，实在大大出乎张仪的意料。

一计不成，张仪再生一计。

不久后，一个消息震动天下：张仪被秦惠王免去相国之职！

天下无双的权谋大师张仪，难不成就这样丢了饭碗吗？

当然不是了。

张仪与秦惠王合演了一出双簧戏，一个愿挨，一个愿打。目的何在呢？张仪的目的是回到魏国，拆毁公孙衍苦心建立起来的“五国合纵”。他自告奋勇充当冤大头，只是为找一个返回魏国的理由。

魏惠王没那么讨厌张仪，因为张仪曾保住他的面子。对张仪的回归，他是欢迎的，希望这位纵横大师能给魏国带来新气象，重振雄风。

张仪对人性十分洞悉，知道魏惠王要什么。魏惠王打了几十年的仗，越打国家越衰弱，越打土地面积越小，他太需要胜利了。既然需要胜利，就不应该与强国为敌，而应该与弱国为敌才对。

他对魏惠王说，魏国不应与秦为敌，应与秦国联手进攻实力较弱的韩国，魏国出兵攻南阳，秦国出兵攻三川，韩国势必要割地求降。

魏惠王听罢眼睛不由得一亮。丢失了那么多土地后，他真的很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补偿。他对张仪提出的计策大加赞赏，甚至授予相位。张仪果然好本事，摇身一变，从秦国宰相变成魏国宰相。只是有一件事，魏惠王是始料不及的，张仪自始至终，都是秦国的奸细！

张仪的阴谋差一点得逞。

他可以忽悠魏惠王，却瞒不过一个人的法眼。

此人正是他的对手、纵横术的另一大师公孙衍。

公孙衍在秦国栽在张仪手上，回到魏国后，张仪又尾随而至，真乃不是冤家不碰头。张仪一来，又抢走了风头，轻松爬上相位。公孙衍苦心经营起来的五国合纵，眼看就要断送在张仪手中了。不行，绝不能让张仪得逞。

谋士之间的决斗，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智力上的搏斗。

如何整垮张仪呢？公孙衍老谋深算，既然张仪的目的是发兵侵略韩国，那他就先下手为强，游说韩国出让一部分权益给魏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又可保全五国合纵联盟。问题是韩国如何肯吃亏呢？

关键要说服韩国执政的韩公叔。公孙衍前往拜访韩公叔，告知张仪的阴谋，并说：“只要魏国与秦国联手侵韩，韩国必定要丧权失地。”韩公叔听得冷汗直流，这如何是好？公孙衍不急不慢地答道：“您为什么不把一些政事交给我来处理呢？如果我不用战争手段，却能让魏王得利，魏王定会抛弃张仪而重用我，这样做对韩国也是有利的。”

两权相害取其轻。韩国迫于压力，同意公孙衍的意见，出让部分国家权力，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公孙衍不战而捞足好处，比起张仪的建议更胜一筹。老迈的魏惠王在公孙衍的游说下，又一次摇摆到了“合纵”的立场，以公孙衍为相，灰头土脸的张仪跌下神坛。

秦惠王拆散五国合纵的阴谋破产，勃然大怒，发兵攻打魏国，连下曲沃、平周等地。张仪丢了相位，待在魏国，闭门不出。秦惠王没有忘记这位纵横术大师，悄悄派人前往魏国，给张仪送去了很多礼物。直到四年后，张仪才又离开魏国，前往秦国。

与后来的乱世不同，战国时代的特色是纵横家左右政局的发展。

在公孙衍的主持下，东方针对秦国的合纵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

公元前319年，在位长达五十年之久的魏惠王去世。魏襄王即位，力图重振魏国雄风。此时魏国风光不再，已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仅靠单枪匹马，难与秦国争锋。然而，魏国的政治影响力犹存，振臂一呼，仍有合纵诸国的能力。魏相公孙衍成为此期叱咤风云的人物，领导东方合纵运动以对抗崛起中的秦国与齐国。

在公孙衍的努力下，合纵运动取得了实质的进展。

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达成协议，共同出兵，组建一支多国部队，讨伐秦国。这次合纵运动表面上来势汹汹，五国联合，兵强马壮，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法领袖群伦，各诸侯各自心怀鬼胎。这些国家之间都有矛盾，互有戒心，谁也不肯全力以赴。你要保存实力，我要避敌精锐，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战胜精锐的秦师呢？

五国联军抵达函谷关（河南灵宝北），秦军出兵迎战。秦军同仇敌忾，气势逼人，联军只知扯嘴皮子，真到战场上，谁也不卖力。战争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多国联军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

不过公孙衍并非毫无所获。

在公孙衍的策反下，一直归顺秦国的义渠突然叛变，令秦惠王手忙脚乱。义渠是古戎国，与秦国关系错综复杂。下面我简单梳理下义渠与秦国之间的恩恩怨怨。

自秦庄公始，西戎便成为秦的死敌。经过数百年的战争，西戎基本上被秦所征服。义渠是戎人中最强的部落，公元前444年秦厉公大举征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十四年后，义渠卷土重来，进攻秦国，直抵渭水北岸。此后两国进入相持阶段，秦国的战略重点转向河西以防御魏国的进攻，与义渠的关系相对缓和。

公元前331年，义渠国内爆发动乱，给了秦惠王难得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投入重兵，派庶长操率领大军入侵义渠，义渠被迫臣服。四年后，公元前327年，秦惠王将义渠并入秦国，置为一县，纳入政府的管辖。

心怀不满的义渠王等待时机雪耻复仇，东方合纵运动兴起后，他潜往魏国朝见魏王。公孙衍对义渠王说：“若中原没有发生重大行动，秦国就要焚烧侵略您的国家；倘若中原诸侯们能联合起来，一致对秦，秦国就会用贿赂手段来讨好您的国家。义渠的命运与中原诸国息息相关，就看您如何选择了。”

义渠王当即表示，一定会与中原诸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只要东方有所行动，他将在西方发动起义，脱离秦国统治。

当公孙衍率五国联军杀奔函谷关时，秦国震动。谋士陈轸建议说：“义渠王是蛮夷部落中的贤者，如今东方有战事，义渠蠢蠢欲动，不如以重金贿赂他们，以免他们有叛志。”秦惠王遂以上等锦绣千匹、美女百人贿赂义渠王。

然而义渠王不为所动，他牢记公孙衍的警告，不接受秦的贿赂，毅然起兵反秦。此时秦国精兵猛将都调往东线，西线兵力不足，只得临时拼凑一支杂牌军迎战义渠，被打得大败而还。

义渠的胜利，令吃了败仗的公孙衍看到了希望。

他检讨何以五国联军一战即溃，得出的结论是同盟各国的积极性是不同的。燕国与秦国并不接壤，尽管出兵了，只是摆摆架子，没有死战之心；楚国虽惊恐于秦国的强大，但楚、秦向来和平相处，自然不可能成为反秦的急先锋。真正充满危机感的，还是魏、赵、韩三国。毕竟从历史关系来看，三晋的命运是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唇亡

则齿冷。

为了配合义渠对秦国的进攻，魏、赵、韩三国抛开燕、楚两国，再次组建联军，发动讨伐秦国之战。

然而，此役却成为三晋的伤心之战。

粉碎三晋反扑的英雄人物，是秦国名将、绰号“智囊”的樗里疾。

与商鞅、张仪等人不同，樗里疾是土生土长的秦国人。他是秦孝公的庶子、秦惠王的弟弟，单名一个“疾”字，因长年居住于樗里，故而人称樗里疾。汉语中的智囊一词，最早便是出自樗里疾，这是称赞他满脑袋都是锦囊妙计。他是秦国王室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能言善辩，足智多谋。

西有义渠之患，东有三晋大兵压境，此时的秦国两线受敌。两线作战向来是军事大忌，稍有不慎，满盘皆输。可以说，秦国面临的局面是很不乐观的。樗里疾临危受命，挑起反击三晋的重任。

樗里疾并没有匆匆上阵，战争是一门艺术，绝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拼杀。上兵伐谋，比厮杀更重要的，是谋略上的较量。他审时度势，在纷繁的天下乱局中整理出清晰的思路。要破三晋之合纵，就须与他国连横。当今天下，最强大的国家，西有秦国，东有齐国，要对付三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拉齐国入伙。

樗里疾遣使入齐，说服齐宣王，联手夹击三晋。齐宣王是齐国历史最有雄心与进取精神的君主，此时正是打败三晋、树立霸权的良机，他岂肯错失？

公元前317年，秦、齐两强与魏、韩、赵三晋的决战在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展开。“智囊”樗里疾于脩鱼迎战以韩国兵团为主力的三晋联军，取得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伟大胜利，斩首八万二千，另俘获韩国两员大将。与此同时，齐国不甘落后，在东线迎战魏、赵联军于观

泽，同样取得不俗的战绩，令魏、赵两国蒙羞。

这一战，把魏襄王的中兴美梦砸得粉碎。

自此之后，魏国再也没有挑战秦国的勇气了。

当魏国举国同悲之际，有一个人却幸灾乐祸。

此人便是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张仪。

魏国的失败，就是合纵运动的失败，就是公孙衍的失败。公孙衍是张仪的政敌，两次合纵运动，第一次止步于函谷关，第二次覆师于脩鱼、观泽。看到政敌失魂落魄的模样，张仪不怀好意地笑了。他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又要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来翻江倒海。

张仪游说魏襄王，内容大致有三方面：

其一，魏国的地理位置十分恶劣，是所谓“四分五裂”之地。张仪分析说，魏国方圆不过一千里，地势平坦，没有大山大川倚为天险，周围强敌环伺，乃是天然的战场，随时可能遭到周围列强的围攻。

其二，魏国的合纵战略是错误的。鼓吹合纵的人以天下为一体，诸侯约为兄弟，刑白马歃血为盟。然而，就算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也会为钱财而相互争夺，更何况是诸侯呢？参与合纵的诸侯，不过是想靠欺诈虚假的手段来牟取利益罢了。

其三，魏国最好的策略，是投靠秦国。只要投靠秦国，其他诸侯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没有外来的灾祸，便可以高枕无忧。秦国对楚国虎视眈眈，若魏国出兵相助，定可与秦联手瓜分楚国，这就叫转移祸害从而使国家获得安定。

比起魏惠王，魏襄王性格中更少了一份韧性。

两度合纵的失败，令他心灰意冷，很快就对现实妥协了。在张仪的忽悠下，魏国打起退堂鼓，率先退出合纵同盟。同时，魏襄王请张仪出马，作为魏国向秦国妥协的中间人。张仪离开魏国，返回秦国。

作为秦惠王安插在魏国的间谍，潜伏多年后，张仪终于不辱使命，成功地破坏了魏国与其他国家的合纵运动。不战而令魏国屈服，张仪的功劳可谓大矣。他仅凭一张利嘴取得的成果，与樗里疾斩首八万相比，也不见丝毫逊色。为了表彰张仪对秦国的巨大贡献，秦惠王第二度任命他为秦国宰相。

接下来，秦国要把打击目标放在哪个方向呢？

张仪认为首先要进攻韩国。一来韩国在前一年的脩鱼战役中惨败，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二来魏国已投靠秦国，韩国已不能指望得到魏国的协助；三是韩国与周王室相邻，打败韩国后，可直捣周王室，挟天子而令诸侯，掌握政治上的话语权。

正当张仪精心设计攻韩方案时，西南发生了一件大事，迫使征韩计划不得不推迟。

十六 志在长远：秦灭巴蜀之役

在张仪二度出任秦相的这一年（前316），中国西南两个蛮夷国家爆发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巴国，一个是蜀国。

巴国与蜀国位于今天的四川、重庆一带。巴国首都是巴，位于重庆嘉陵江北岸，是西南重要蛮夷国家，军队以强悍勇猛而著称。战国七雄先后称王，巴国君主也自立为王，称为巴王。此时巴国国力已经衰微，邻国蜀国崛起成为西南最有实力的国家。

蜀国是西南古国，立国时间大约是东周初。古代蜀国的文明已达一定规模，在三星堆出土的一系列蜀国青铜器、金器、玉石等证明了这点。特别是青铜器造型夸张、离奇，富有想象力，器形巨大，结构复杂，闻名天下。蜀国虽属蛮夷之国，但文明程度较高，在西南称雄一方，被称为“戎狄之长”。

由于蜀国地处富饶肥沃的成都平原，号为天府之国，秦国自然对之虎视眈眈。不过从秦入蜀的道路险阻难行，秦惠王迟迟未对其用兵。攻打蜀国的关键是要在崇山峻岭之中打通一条道路，难度可想而知。要如何修筑这条路呢？秦国人想出一个妙招。

蜀王是个贪财之人，人有了弱点便可以利用。秦国故意造出五头石牛，吹嘘说这石牛能拉出一粒粒的黄金粪便，称为“牛便金”。秦惠王放出风声，称若蜀国愿意与秦交好，便把这五头能下金的石牛送给蜀王。利令智昏的蜀王大喜，派使者前往秦国。秦惠王假戏真做，特地派一百人“养”这五头石牛。每天蜀国使者便收到几锭金子，据说是石牛拉出来的。蜀王闻讯大喜，当即向秦惠王请迎石牛。

秦惠王很“慷慨”地把石牛送给蜀王，不过石牛相当沉重，用人搬运到蜀国是不行，得用马车运送。有马车还不行，没有马车行驶的

路，得开一条路才行。蜀王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崎岖山岭中修了马车可以通行的道路。在他看来，只要石牛送到，每天拉几锭黄金出来，很快就能把开山修路的本钱收回来了。

路修好了，蜀王派五名大力士去秦国，把五头石牛拉回蜀国。只是石牛到了蜀国后，水土不服，愣是没拉出一小粒黄金。蜀王天天盯着牛屁股发呆，总算明白过来了：他就是个大傻帽儿，被秦国人骗了！

秦国人略施小计，只花了小小的代价，就骗得蜀国修了一条车马行走的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攻蜀时机的成熟。

公元前316年，机会不期而至。

蜀国发生内乱了。

这是兄弟窝里斗。

事情是这样的：蜀与巴两国本是宿敌，蜀王的弟弟苴侯偏偏与巴王交上朋友，老兄认为老弟勾结外敌，遂起兵讨伐。弟弟打不赢哥哥，逃到巴国，蜀王一鼓作气杀入巴国，两国战争爆发。

面对蜀军凌厉的进攻，巴王抵挡不住，只得派人前往秦国求援。

要不要救援巴国呢？

此时秦相张仪正推出征韩方案，当然不愿意临时变更计划，故而坚持己见：“应该先征韩。”

有一个人不同意张仪的看法，此人名唤司马错，他说：“应该先伐蜀。”

征韩还是伐蜀，秦惠王犹豫不决，只得举行公卿会议讨论。张仪与司马错在会上展开唇枪舌剑的较量。

张仪先发言，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征韩方略：

“如今魏国已投靠我们，只要再拉拢楚国，就可以进兵三川（韩国战略要地），封锁韩国重要交通要道。魏国出兵攻打南阳，楚国出兵威胁南郑，秦国军队猛攻新城与南阳，韩国势必无法阻挡。只要控制了韩国，就可以把二周（周王室分裂为东周与西周）控制在手心，周天子穷途末路，必定要献出国家宝藏、象征权力的九鼎。到时我们占据了九鼎，又可以得到周室所藏的全国地图、户籍资料，挟天子而号令天下，天下诸侯，谁敢不听从呢？这才是王者的事业！至于蜀国，不过是西部偏远的国度，又是戎狄蛮夷之地，就算兴师动众去攻打，也不可能赢得什么功名，得到那片荒凉的土地，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我听说争功名就得在朝廷争，争利益就得在市井，现在明摆着周室、韩国的地盘不去争，而去争蛮夷之地，这不是王者所做的事。”

征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消灭韩国，就可乘机夺取二周，抢夺政治制高点。

张仪的铁嘴是何等厉害，司马错并没被他吓倒，寸步不让：

“不是这样的。王者的事业，必须有三个坚实的基础：第一，要使国家富裕，必须要扩大国土面积；第二，要使军队强大，必须使百姓富有；第三，要称王就得广施恩惠。这三点做到了，王者的事业就具备条件了。

“现在秦国土地还不够大，百姓还不够富有，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这两件事。蜀国是西部偏远的国家，又是戎狄之长，国内面临危机，秦国如果能乘势发动进攻，就如同狼对羊群发动突袭一样，必定手到擒来。夺取蜀国的土地以扩大秦国的地盘，夺取蜀国的财富来充实秦国百姓的腰包，改善军队的装备。蜀国实力不强，我们不必付出

重大伤亡，就可以令他们举国投降。救援巴国，师出有名，灭掉蜀国，天下人也不会说我们残暴；捞足了好处，天下人也不会说我们贪婪；真是一举多得、名利双收。

“倘若攻打韩国、挟持天子，背上不义的恶名，未必能得到多少实际好处。为什么这样说呢，请听我的分析：周在名义上是天下诸侯共尊的王室，韩国与齐国是盟友。如果周王室面临丧失九鼎的危险，韩国面临丢失国土的困境，必会困兽犹斗，向齐国、赵国借兵，谋求与楚国、魏国和解。楚国一直觊觎周室的九鼎，若是周天子情急之下把九鼎送给楚国，楚国必定会一马当先出兵相救；魏国一直想得到韩国的三川之地，韩国迫于无奈之下，将三川之地拱手相送，魏国势必会与韩国联手对付秦国。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攻打韩国的战略，不如攻打蜀国来得圆满。”

司马错的看法是，秦国攻打韩国，必定会引来其他诸侯的围攻，未必能收到预料的战果。攻打蜀国，师出有名，中原诸侯也不会为一个蛮夷之邦而出手相救，可坐收全功。

对比两套方案，征韩显然急功近利，伐蜀则志在长远。

秦惠王拍板决定：伐蜀！

指挥伐蜀之役的秦国将领，包括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

秦惠王支持司马错，是因为他早有伐蜀之打算。他以坑蒙拐骗的方法，诱使蜀王开凿通道，便是为伐蜀做准备。若论军事力量，蜀国当然不是秦国的对手，伐蜀成功与否，关键看能否克服地形的障碍。

秦军入蜀所行的通道便是石牛道，又称为金牛道，就是蜀王开凿的道路。这条通路是蜀与秦的交通要道，大约是从今天陕西勉县向西南行，越过七盘岭，入四川境，经朝天驿趋剑门关，一路上有许多险

隘之处。道路虽已开通，却只是简陋的路，行几辆马车没问题，一支大部队要穿行就有许多困难了。且不说是战国，就是在一千年后的诗人李白眼中，蜀道仍是“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只要蜀王在沿途要隘险关布下重兵，凭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优势，秦军想顺利挺进就不是容易的事了。蜀王只想着灭巴国，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仪与司马错已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崇山峻岭了。

蜀王麻痹大意，因为历史上从未有一支大军能穿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只是历史总是不断被创造出来，旧例总会被打破。

当秦军入蜀的消息被证实后，蜀王面如土灰。他赶紧把军队从巴国调回，屯兵于葭萌，抗拒秦师。

司马错发动强攻。秦军武器精锐，训练有素，个个都是如狼似虎的斗士，蜀军士兵还没上阵就心胆俱裂了。这一战，蜀军大败。狼狈而逃的蜀王运气着实欠佳，逃到武阳，被秦军骑兵逮个正着，几刀捅过去，便倒在血泊之中。

蜀国太傅、宰相、太子等人率残兵败将退守逢乡。眼看不是秦军对手，连国王都死于非命，他们还能怎么办呢？这几人凑在一起商量，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向张仪、司马错投降。

号称“戎狄之长”的蜀国就这样灭亡了。

灭蜀之战是打着救援巴国的名义，蜀国灭了，巴国又如何呢？

俗话说，唇亡则齿寒。巴国与蜀国本是唇齿相依的两国，秦国灭了蜀，又怎么会独存一个巴国呢？

据《华阳国志》记载，吞并巴国是张仪的主意。打动张仪的，是

巴王与苴侯的财富。我们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古代巴蜀的富有，黄金面具就是其中一例。可以想象张仪那贪婪的眼光，既然干掉了蜀国，何不把巴国一同吞并呢？于是秦军继续深入，以雷霆万钧之势攻破巴国。

巴王灰头土脸地成了俘虏，秦国并没杀他，给他封了个“君长”的虚衔。

在春秋时代，秦国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国家，或者说风俗很淳朴。秦穆公曾以德报怨，在晋国粮荒时施予援手，曾助力晋文公上台；到了春秋末期，秦国又出兵帮助楚国复国，打败吴国的入侵；这些都堪称有信用、有道义。自从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朴实便荡然无存，东方的法家、纵横家把生机与活力带到秦国的同时，也把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带到秦国。商鞅计擒公子卬，张仪毁约灭巴国，宣告秦国“无节操”时代的到来。

秦国把蜀国收入囊中，置蜀郡。秦惠王封公子通为“蜀侯”，陈庄担任蜀相，张若担任蜀郡守。巴国也成为秦国的一个郡，即巴郡。后来秦国政府又从巴郡、蜀郡各划出一块土地，置汉中郡。

由于有义渠叛乱的前车之鉴，秦惠王认为蜀国虽然投降，但作为西南地区“戎狄之长”，蛮族的势力仍然不可低估，反叛随时可能发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大量向蜀地移民。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迁移开始了，秦政府动员上万个家庭移居到蜀地。这个移民政策改变了蜀地的面貌，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始在蜀地扎根。随着大量人口的涌进，蜀地的耕地得到更多的开发，“天府之国”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这里成为秦国的粮库，也是秦国能进取中原的强有力的后方保障。

巴、蜀这块土地毕竟受制于交通，秦国中央政府对其掌控力度比较有限，故而只要稍有风吹草动，难免会发生叛乱。下面简单地介绍

一下秦国政府所任命的几任蜀侯的命运。

在张仪、司马错伐蜀后五年，即公元前311年，蜀侯公子通与蜀相陈庄发生严重冲突，陈庄杀死了蜀侯，据蜀而反。秦惠王去世后，继位的秦武王派庶长甘茂连同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军队入蜀，杀死蜀相陈庄，平定叛乱。

陈庄死后，秦武王以公子恇为蜀侯。公子恇担任蜀侯共计七年，颇得秦王的信任。公元前301年，公子恇以蜀侯名义祭祀山川，把祭祀的食物献给秦昭王，岂料招来杀身之祸。公子恇的后妈故意在进献的食物里下毒，等秦昭王要吃时，阻拦说：“这些食物是从两千里外的蜀地送来的，吃之前要试一下。”秦昭王便把食物分予身边的人，结果那人一吃便毒发身死。秦昭王大怒，派司马错入蜀，赐一把剑给公子恇，勒令他自裁。公子恇情知被陷害，难逃此劫，遂与妻子一同自杀。

公子恇死后，秦昭王封其子公孙绾为第三任蜀侯。

几年后，公孙绾年长懂事，得知父亲被人陷害获诛，便查明真相，上报秦廷。在秦昭王的同意下，公孙绾把父亲公子恇的遗骸从城郊迁到城内，为他立祠纪念。可是公孙绾最终的结局竟然与父亲毫无二样，封侯十五年后，即公元前285年，多疑的秦昭王怀疑公孙绾有反叛之心，遂将他处死，从此撤销了封侯，只保留了蜀郡太守作为蜀地最高行政长官。

连续三任蜀侯都死于非命，这证明一件事：秦国政府宁可错杀，也不愿冒着丢失蜀地的风险。由此可见吞并巴蜀对于秦国的重要意义。在取得巴蜀这块富饶之地后，秦国变得更加强大，既稳定了大后方，又获得了大量的兵源。

如果说商鞅变法让秦国获得内在优势，那么吞并巴蜀则让秦国获得外在优势。秦国占据辽阔的西部，控制“天府之国”的粮仓，在陆地

则有高山峻岭为天然屏障，既能阻挡东方诸国的进攻，又能凭借居高临下的优越地理条件，不断向东方发动鲸吞蚕食。从水路上看，中国河流都是由西而东，秦国稳居上游，沿着水路正可顺流而下，对下游的东方诸国又取得另一个地理优势。占据巴蜀后，秦国获得了侧击楚国的机会，从此楚国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这样，秦国在地势上进可攻，退可守，据西河、殽山之险，控长江上游，居高临下，雄视东方，隐隐有窥视天下之势矣。

十七 无节操的外交

灭蜀之战，开启了秦国大扩张的序幕。

史书上写道：“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在张仪的游说下，魏襄王被迫低下高贵的头颅，臣服于秦国，三晋的另两个国家——赵国与韩国——便被推向风口浪尖。

公元前316年（是年秦灭巴蜀），秦发动对赵国的战争，夺取中都、西阳等城邑。

公元前314年，秦国以名将樗里疾讨伐韩国，双方会战于岸门，秦军大获全胜，斩首万余。面对秦军凶悍的进攻，韩宣惠王只得向魏国求援。已经臣服于秦国的魏襄王很想置身事外，但魏韩两国关系如同唇与齿，唇亡则齿寒，不能不救。魏襄王派公孙衍率军入援韩国，在岸门附近被秦军击败。

韩宣惠王信心全无，被迫以太子入质秦国，以换取和平。

魏襄王的背叛令秦惠王有攻打魏国的借口。樗里疾掉转马头，攻入魏国，略取曲沃城，占领该城后，把城内的魏国百姓逐出城。曲沃失陷后，另一座城邑焦城也举旗投降。

在一系列失利面前，魏襄王被迫再次与秦国签订城下之盟。秦国人不仅要蚕食魏国的土地，还要干涉魏国的政治。在秦惠王的干涉下，魏襄王不得不依秦国的意思，立公子政为太子。魏国的力量更加衰微，曾经的中原霸主如今沦为秦国的小喽啰。

公元前313年，樗里疾指挥大军攻赵，俘虏赵国大将赵庄，拔取蔺城。

曾经威风凛凛的三晋，已不是秦国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不过，秦国并非一枝独秀。

与秦国一样霸气外露的还有齐国。

此时的齐国正是齐宣王统治时期，他是战国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与秦灭巴蜀几乎同时，齐国也完成了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吞并七雄之一的燕国。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之机，大举发兵，以名将匡章为统帅，仅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便一举吞并燕国。齐国的疆域几乎扩张了一倍，足以与西方的秦国相媲美。

为了与齐国争雄斗霸，秦国必须加紧扩张的步伐。

秦惠王把目光盯在一块大肥肉上，这块肥肉就是楚国。

伐蜀之役的胜利，为秦国侧击楚国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春秋时代，楚国是与晋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强国，只是晚节不保，在春秋末期，吴王阖闾以孙武、伍子胥为将，席卷千里，击破楚都，鞭尸楚平王，楚国几乎灭亡。在秦国的相助下，楚国总算侥幸躲过一劫，只是从此江河日下，霸气荡然无存。楚悼王振衰起敝，任用吴起实施变法，楚国的变法随着悼王去世、吴起被杀而中止，终究未能像秦国那样东山再起。

在数百年时间里，秦、楚两国关系不错，时有通婚。商鞅变法后，秦国强势崛起，成为东方诸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遏制秦国的扩张，楚国与魏、韩、赵等合纵，兵进函谷关，与秦国对峙。楚国虽已衰微，然而其国土辽阔，军队数量多达百万，是秦国不可忽视的对手。

早在征蜀之前，秦将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曾向秦惠王进言：“从蜀国有水路通往楚国，加上巴国劲卒的配合，可以乘大船沿江而下，直取楚国，则楚地可得。得到蜀国后就可以得到楚国，楚国一旦灭亡，就可以吞并天下了。”

这个战略非常明确，楚国将成为秦国的下一个鲸吞蚕食的对象。

伐蜀战役结束后，司马错以巴、蜀两地的士兵为主力，纠集十万大军，造大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沿着涪水漂流而下，向东进攻楚国。这次作战大获全胜，秦军攻城略地，秦惠王把这块新得来的土地并入秦国。

面对秦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楚怀王慌了手脚。此时，东方超级强国齐国抛来橄榄枝，拉楚国入伙。齐宣王与楚怀王歃血为盟，共同对付秦国。

在齐国的撑腰下，楚怀王对秦国展开复仇战。楚军大举北进，攻克曲沃城。在秦惠王眼里，三晋（魏赵韩）已不足为惧，齐、楚联手却是可怕的对手。当务之急，是要开展外交战，拆散齐、楚同盟。这一外交重任，理所当然落在名嘴张仪身上。

秦相张仪出使楚国，一见到楚怀王，便开出一个令人心动的条件：“大王如果能对齐国闭关绝约，秦国将献上六百里的商於之地。”

天下有此等好事？

什么事都不要干，只是宣布与齐国断交，便可得到六百里的土地？都说天上会掉下大馅儿饼，这不，还真掉下来了。

楚怀王急急召集群臣，宣布这个好消息。群臣纷纷表示祝贺，能唾手得到六百里之地，与齐国断交又有什么关系！马屁精们的吹捧让

楚怀王飘飘欲仙，只听得有人喝道：“这事不值得祝贺，反倒值得担忧。”

谁这么不知趣呢？谋士陈轸。此人也是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

怒气冲冲的楚怀王黑着脸质问道：“寡人不动一刀一枪，唾手得到六百里的土地，你非但不高兴，还担忧什么呢？”

陈轸答道：“秦国重视楚国，是因为楚国有齐国作为盟友。张仪夸夸其谈，楚国却还没有得到六百里之地。没得到地，就与齐国绝交，楚国就孤立了；一旦孤立了，秦国又岂会看得起楚国呢？最好的办法是：表面上与齐国断绝关系，暗地里仍通好，然后派人跟着张仪到秦国。倘若秦王把六百里之地送给我们，再正式与齐国绝交也不算迟。若大王迫不及待与齐国绝交，再向张仪要地，一定要被他给蒙骗了。一旦大王觉得被欺骗，心生怨气，就不得不与秦国为敌。如此一来，楚国西面有秦国之患，北面与齐国为敌，岂不是失算吗？臣对此很担忧。”

还没等陈轸说完，楚怀王便暴跳起来，不怀好意地说：“你给我闭嘴，等着瞧吧，看我怎么得到六百里之地。”于是急急宣布与齐国断交，还以相印授张仪，就是封他为“名誉宰相”，并赏赐许多礼物。

这笔买卖，真是太划算了。

楚怀王很开心，心花怒放。

张仪亲自出马，很快就圆满完成外交使命，拆散齐、楚同盟。大功告成后，他告辞回秦国。楚怀王派了个使者一同入秦，接收六百里商於之地。

接收土地的事情一点也不顺，因为张仪“病倒”了。据说那天他酒喝多了，不省人事，从马车上掉下来，就卧病在床整整三个月。连张仪的影子都没瞧见，六百里地更是虚无缥缈了。楚使等了好久，发现

没有人提起交割土地的事，无奈之下，只得向楚怀王禀告。

楚怀王也看出这件事不妙，只是他三省吾身的功夫不错，反省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哪里让秦国不满意呢？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楚国虽与齐国断交，态度还不够强硬。若是再强硬点，秦国人满意了，才会交割土地。

如何强硬呢？

呆头呆脑的楚怀王想了一个馊主意，派人到齐国，当街骂齐宣王。这种泼妇的行径果然激怒了齐宣王，他转而向秦国示好，以孤立楚国，教训一下傲慢的楚王。

此情此景，只会令张仪躲在被窝里偷笑。既然楚国与齐国彻底撕破了脸皮，他也就不必再演戏了。张仪的“病”神奇般地好了，他穿好朝服，接见楚使。见到张仪终于露脸了，楚使心里石头总算落地，秦国该兑现承诺了吧。

果然，只见张仪让人取来一幅地图，装模作样地比画说：“为了回报楚国，秦国打算割地赠楚，从某地到某地，总计六里。”

六里？

不对吧。

明明说好是六百里的。

楚国使者张大嘴巴，一时间竟哑口无言，呆住了。

张仪冲着他喊道：“您怎么不前来接受赠地呢？”

使者怒不可遏地说：“我得到的命令是接收六百里之地，不是六里！”

张仪带着夸张的惊讶说：“您何出此言呢？我明明说的是六里呀。”

见过坑人的，没见过这么坑人的。

见过无节操的，没见过这么无节操的。

堂堂一个大国，竟然毫无信用可言，堂堂一国宰相，竟然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原来坑蒙拐骗并非小商小贩的专利，简直是张仪的代名词。

六百里土地就这样泡汤了。

土地没捞着，与齐国还结了怨。楚怀王里外不是人，他两眼发愣，呆呆望着天空，又羞又恼，又愤又怒。楚立国数百年了，还从来没被坑得这么惨。这让堂堂楚怀王情何以堪！一怒拔剑，凡是有血性的人就不能忍气吞声。楚怀王没经历什么挫折，血性还是有一点的，老子拼了命，也得要回面子！

楚国大举发兵，进攻秦国。

向来只有强者攻弱者，楚怀王要以弱者拼强者，岂非自寻死路？谋士陈轸反对这种无谓的冒险计划，别出心裁地提议：“与其攻打秦国，不如干脆再送给秦国一座城池，与秦国共同出兵，攻打齐国。既然与齐绝交，就铁下心来联合秦国攻齐，把楚国的损失从齐国人身上捞回来。”

楚怀王勃然大怒：老子被张仪羞辱得还不够吗？人家欺负我，我还要拿着地盘低声下气地送给他们？不行，定要攻秦！

楚国发兵十余万，由大将屈匄出任总司令，大举伐秦。

秦惠王求之不得，正好堂堂正正与楚国干上一场。如今魏国投靠秦国，齐国与楚国断交，楚怀王没有外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一搏。

“智囊”樗里疾再次光芒四射。他与魏章、甘茂等将领反击楚军，很快逆转战局，转守为攻，杀入楚国。双方在丹阳展开决战，秦军再次展示其天下无双的战斗力的，斩首八万，楚军总司令屈匄、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名将领悉数成为秦军的俘虏。

八万将士，横尸疆场。

楚怀王呆了，愣了，傻了。

这一天，楚国都城风雨声与哭泣声交织成一片……

六百里地没捞到，反倒损失了六百里。

楚怀王像赌红眼的赌徒，非但不知收敛，反倒孤注一掷，抱着侥幸的心理企图翻盘。他把所有筹码都押上了，全国总动员，要以举国之力与秦国决一死战。

奇迹没有出现。

蓝田一战，楚国拼光血本，再度被樗里疾打得大败而回。

屋漏偏逢连夜雨。

魏、韩两国也搅了进来，他们狐假虎威，要争几块肉骨头啃。两国乘机出兵，席卷楚国北疆，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

强敌环攻之下，楚怀王惊慌失措了。楚国无力再打下去，只能与秦国媾和，当然，少不了要割地。楚怀王忍痛割了两座城池给秦国，才换得停战的喘息之机。

这场由张仪导演的阴谋，令秦国获益匪浅。

对秦国来说，打垮楚国是不够的，必须要逼迫齐国把吞进肚子的肥肉吐出来，燕国必须复国，否则齐国终究是秦的大患。

此时齐国已同楚国断交，而魏、韩都已臣服于秦国，齐国尽管国力强大，在战国时期则比较孤立。秦惠王抓住机会，一方面支持燕国内部的复国势力，一方面动用武力干涉。

名将樗里疾再次临危受命，他指挥秦国、魏国联军，攻入齐国。此时齐军主力正全力围剿燕国的复国势力，国内守备较空虚，樗里疾在濮水之役中打败齐军，俘虏齐国将领声子。紧接着，秦、魏联手北略燕国，为燕国各地起义军助威。

在秦、魏武力干涉下，齐宣王被迫从燕国撤军，燕国得以复国。

这是齐、秦势力消长的一个关键点。

秦国在西南吞并巴、蜀，齐国在北面吞并燕国，双方势均力敌。唯一不同的是，秦对巴蜀的占领是长久性的，而齐对燕国的占领仅仅两年时间，最终功败垂成。

倘若齐宣王能吞并燕国，那么将使齐国的领土扩张一倍，重新取得与秦国的均势，但事与愿违，燕国只能是烫手的山芋，最后不得不完全放弃了。

齐国的失败，证明了其外交策略远远不及秦国。

秦国深知天下诸侯中，唯一能对其构成威胁的，只有齐国，绝不可以对齐国的扩张坐以观望，必须要采取武力遏制的手段。秦国打出的两张外交牌是其胜利的保证：其一是离间齐、楚联盟，其二是与魏国联合对付齐国。这两张外交牌令齐国在列国舞台上处处被动，成为孤家寡人，没有强国可作为盟友，因而失败在所难免。

至此，秦国的势力开始超越齐国。

双雄并峙的局面很快被秦国一枝独秀所取代。

十八 化险为夷：政坛不倒翁

相较其他诸侯，秦国有四大优势：

其一，地理优势。秦国地处关中，除了东面之外，在北、西、南三面均无强敌，加上黄河之险，殽、函之固，易守而难攻。

其二，军事优势。秦以勇武立国，从秦庄公始，秦人便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天下。及至战国，更是名将辈出，兵力雄厚，可以征战沙场的士卒在一百万人以上。

其三，政治优势。自商鞅变法后，秦国面貌焕然一新，法纪严明，人才政策灵活，重视农业。郡县制的推行，加强君主专制的权力，政府运作效率奇高。

其四，外交优势。三晋纵横家纷纷入秦，令秦国开启大外交时代。秦国的外交政策是大棒加胡萝卜，一面以军事手段恫吓，一面以利诱之。张仪的到来，深刻影响秦国的外交，开辟扩张的第二战场。

在秦惠王时代，秦国在外交战场上纵横捭阖，所向无敌，其中张仪最为光芒四射。他以一张利嘴，拆毁东方合纵联盟；他以满口谎言，计骗楚怀王与齐国绝交。我们可以鄙视其为人，却不能不佩服他的能耐。

且来看看张仪还有怎么样的表演。

自吞并巴蜀后，秦国对这个大后方十分重视，希望把隶属楚国的黔中合并过来，使巴蜀与黔中连为一片。秦惠王派人出使楚国，向楚怀王提出一个土地交换计划，打算以秦国的汉中交换楚国的黔中。

又是土地！

当初楚怀王不是在土地问题上被秦国给坑了吗？现在秦国又来说土地的事，他能不火冒三丈吗？

“要黔中也行，只要把张仪交出来，我就送上黔中。”楚怀王恶狠狠地说。

看来这笔买卖是做不成了。

大家都知道楚怀王对张仪恨之入骨，欲杀之而后快。秦国怎么可能用张仪去交换黔中地呢？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交易无法达成时，张仪自己跳出来说话了：“用我一个人换一块土地，何乐而不为呢？请让我到楚国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张仪的胆子也忒大了吧！

秦惠王瞪大眼睛，一脸困惑地说：“楚王没有得到商於六百里之地，对你恨之入骨，巴不得置你于死地。你前往楚国，不是找死吗？”

“楚王不敢对我动手的。”张仪胸有成竹地说。

“为什么？”秦惠王不解。

张仪答道：“从国力上说，秦国强盛，楚国弱小，楚王不能不有后顾之忧，这是其一。我与楚国大夫靳尚是好朋友，靳尚深得楚王夫人郑袖的信任，楚王最为宠幸郑袖，她所说的他都会听，只要我搞定靳尚、郑袖，楚王必不会害我，这是其二。再说了，我是奉秦王之命出使楚国，怎么说也是大国使者，楚王哪敢加害于我？这是其三。若楚王一意孤行，非得要杀了我，用我一条小命，换得黔中之地，也算是值了。”

分析固然有几分道理。道理毕竟只是道理。

人并不都是理性的人，特别是当一个人被愤怒冲昏头脑时，什么事做不出来？楚怀王若一心要杀张仪，谁又阻挡得住呢？因此张仪此行，风险巨大，没有几分视死如归的武士精神，断然不敢接下这项使命。

张仪又来了！

楚怀王大感意外，他从来不相信张仪会来，只有傻瓜才会来，张仪不是傻瓜，怎么会自投罗网呢？来了更好，楚王不禁冷笑了，既然来了，老子就整死你。

还没见到楚怀王，张仪就被抓起来，投入监狱。

进了监狱，离死期就不远了。

但张仪还是谈笑风生，神色自若，因为他有一张王牌。

靳尚开始活动了。他对楚王宠幸的妃子郑袖说：“夫人，您很快就会被大王冷落了，您知道吗？”

这话说得莫名其妙，郑袖搞不懂。

靳尚说：“楚王一心要报仇，想杀张仪解恨。秦王十分器重张仪，绝不想让他受到伤害，他打算用六座城贿赂楚国，再挑几个美女嫁给大王，陪嫁的还有宫廷里能歌善舞的宫女。出于对秦国的尊重，大王必定要宠幸秦女，夫人您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摸准女人的弱点，搞定女人原来这么简单。

郑袖有点慌了：“要怎么办呢？”

靳尚说：“只要您能说服楚王，把张仪放了，秦国就没必要使用美人计了。”

这套说辞，定是张仪教的。

郑袖轻而易举掉进陷阱，她对楚怀王说：“大王为什么把张仪抓起来呢？妾听说，臣子也是各为其主罢了。您说要用土地交换张仪一个人，土地还没给秦国，秦国就已经派张仪来了，可见人家是敬重大王的。大王不仅没有回礼，反倒要杀死张仪，秦王岂不是要雷霆大怒，到时必定攻打楚国。臣妾就不敢想象结局会怎么样，恳请大王让我们母子迁徙到江南去吧，以免被秦国人当作鱼肉任意宰割。”

说完后，郑袖掩面而哭。

女人哭的时候，更加楚楚可怜，男人怎么会不怜香惜玉呢？

女人的眼泪，浇灭男人内心愤怒的火焰，软化男人的意志，摧毁男人的斗志。楚怀王的杀意，随着飞扬的泪花飘散空中。

张仪又自由了。

他不仅被释放，还被楚怀王敬为上宾。在所有人认为他必定一败涂地之时，他奇迹般地逆转败局。这位史上最负盛名的纵横大师，果真有深不可测的本领，在鬼门关逛了一圈后，阎王爷也没敢收留他。

与张仪的刚强相比，楚怀王是软弱的；与张仪的诡诈相比，楚怀王是愚蠢的。

楚怀王遇到麻烦了。

他扬言，用张仪来换取黔中之地。现在，张仪来了，他岂非要丧失土地了？

不交出土地也行，但有一个条件：楚国要臣服于秦国！

张仪又要发挥铁齿铜牙的威力了，他说：

“天下强国，非秦即楚。秦国土地占了天下一半，兵力足以抵挡四个国家，背靠天险，有黄河为天堑，四面都是要塞，牢不可破。秦国有虎贲战士一百多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积粟如山。想用合纵的手段抗衡秦国，无异于驱赶羊群攻击猛虎，下场可想而知。大王不与猛虎交往，却与群羊往来，无疑是不明智的。倘若与秦国交恶，秦国就会挟持韩国与魏国进攻楚国，秦国攻打西部，韩、魏攻打北部，楚国就危险了。

“现在有一小撮人鼓吹合纵，集合一群弱小的国家去攻打最强大的国家，这是使国家陷于危亡的做法。明明兵力不如对方，就不要轻易挑衅；明明粮食比不上敌方，就不要打持久战。这都是简单的道理，主张合纵的人只会胡说八道，只挑着有利的一面说，却说不利的一面，一旦国家陷入祸害中，就后悔莫及了。我这些话，请大王仔细考虑。

“我给大王分析一下吧。秦国已经据有巴蜀，粮食充足，若沿着长江而下，只要十天的时间就可以打到楚国的扞关。同时，地面部队从武关出发，向南进攻，楚国北部的土地就会被切断。只需三个月的时间，楚国就要陷入危险之中，就算其他诸侯国想救援，恐怕也得等半年以后吧。等待弱国的救援，却忽视强秦的祸害，这使我不得不替大王您忧虑。秦国与楚国土地相接壤，本来就应该成为亲近的国家。大王如果听臣的意见，与秦国互换太子为人质，使秦、楚两国长久成为兄弟般的国家，世代互不侵犯，那才是高明的计策。”

这是给楚怀王灌迷魂汤，别指望以合纵手段对抗秦国，臣服秦国才是硬道理。

楚怀王是软弱的君主，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对未来的灾祸没有

丝毫洞察力。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服软，大夫屈原极力反对向秦国妥协，只是忠言逆耳，反对无效。楚怀王我行我素，同意了张仪的要求。

在张仪的外交攻势下，魏国、韩国、楚国都被迫臣服于秦国。东方六雄，已有三个被秦国控制，秦的实力已超越齐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

正当张仪春风得意时，坏消息来了。

秦惠王死了。

这的确是相当坏的消息。一朝君主一朝臣，帝王是权臣的靠山，帝王之死，总意味着权臣的失势。商鞅就是前车之鉴，秦孝公一死，他就落得个车裂身死的下场。张仪看到一双不友善的眼睛，即位的秦武王绝非友善之人。

秦武王好勇斗狠，崇尚武力。如果要给秦国历史上的君王来个排名，以武功华山论剑，秦武王无疑要排名第一。《史记》称“武王有力好戏”，他天生神力，武艺高强。迷信拳头的人，看不起油嘴滑舌的人。秦武王还是太子时，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张仪，鄙视他。我们看看秦武王身边都是些什么人，跟他最亲近的有任鄙、乌获、孟说等，这些人都是江湖高手，满脸横肉的力士。

政客们最擅长的事，就是落井下石。既然新君王不喜欢张仪，攻击张仪的奏折便如雪花般飘入宫中。一向强势的张仪豁然发现自己立于悬崖边上，随时可能坠入万丈深渊，他不得不收起尾巴，小心翼翼。

有人忧，就有人喜。

东方诸侯们终于可以喘上一口气了。在秦惠王时代，魏、楚、韩等国被强大的秦国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雕阴一战，魏国八万人授首；脩鱼之战，三晋八万将士丧命；丹阳一役，楚国男儿弃尸八万。无可奈何之下，魏、楚、韩不得不委曲求全，臣服秦国。现在秦惠王死了，张仪眼看也混不下去了，莫非秦国的好运不再了吗？三国颇有默契，纷纷叛离而去，又扯起“合纵”的大旗，幸灾乐祸地冷眼旁观秦武王与张仪的较量。

张仪毕竟是聪明人。

商鞅的下场历历在目，一个臣子要斗过君主，胜算太小了，不值得去尝试。尽管他小心翼翼，仍不免被政敌砸砖头，《史记》的说法是“群臣日夜恶张仪”，不分白天黑夜、轮番攻击。人言可畏。假的说多了就变成真，死的说久了都可以变活。张仪在秦国执掌大权十余年，得罪的人多了去了，现在许多人想要整死他。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三十六计，走为上。

逃跑也是一门艺术，商鞅不懂艺术，所以失败了。张仪若是落荒而逃，势必被人逮住口实，下场未必比商鞅强。他要离开秦国，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光明正大离开。天下没有能难倒他的事，他想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张仪对秦武王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计划，希望能试一下。”

秦武王道：“你说吧。”

张仪说：“东方若时局动荡，对秦国最有利，大王可以乘机得到更多的土地。齐国人一直想置我于死地，如果我去魏国，齐国必然出兵攻打魏国。只要齐、魏开战，大王便可进兵韩国，攻打三川，进逼周室。到时周朝必定要交出祭器，大王您挟天子而号令天下，同时得

到王室所藏的地图与户籍资料，可成就帝王的伟业！”

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就是要逃跑，永远离开秦国。

秦武王批准了，还派了三十辆精美的、裹有皮革的马车供张仪使用。张仪驱车回到自己的祖国，与秦国永别了。

当初张仪说服魏襄王投靠秦国，这些年魏国跟在秦国后面狐假虎威，攻楚伐齐，捞得不少便宜，故而魏襄王对张仪颇有好感，不仅接纳他，还拜他为魏相。

一年后，这位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数十年的纵横大师病逝，竟得善终。作为魏国人，他一生多数时间为秦国人效力，晚年叶落归根，还捞了高官厚禄，比商鞅要幸运得多了。

张仪是秦国扩张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以连横的战略破坏东方诸国的合纵，使得秦国牢牢占据外交的主动权。

在专制时代，个人对国家的强弱兴衰有很重要的影响。失去张仪的秦国会不会倒退呢？这是对秦武王统御力的巨大考验。这位年轻且朝气蓬勃的君王，身上流淌着先祖尚武的血液，他要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将秦国的扩张事业进行到底。

十九 扛鼎而死的秦武王

秦武王二年（前309），秦国首次设立双丞相制度，樗里疾出任右丞相，甘茂出任左丞相。

樗里疾是秦国历史上伟大的将领，一生从未败绩，战功赫赫。他南征北战，几乎与所有强国都交过手，有战必胜。他在脩鱼之战歼灭三晋联军八万人；在岸门之战大败韩军，斩首万余；在丹阳之战大破楚师，斩首八万；他还远征齐国，为燕国复国立下殊功。由他出任右丞相，可谓众望所归。

甘茂原是楚国人，博学多才，后来前往秦国，由于才干非凡，受到张仪与樗里疾的赏识，开始平步青云。甘茂曾追随樗里疾参加伐楚之战，蜀相陈庄叛乱后，他又跟随司马错入蜀，平定蜀乱。

秦武王之所以设立双丞相制度，乃是担心出现像商鞅或张仪这样权力太重的大臣，这是对君主的巨大威胁。右丞相樗里疾的地位比左丞相甘茂略高，但秦武王对甘茂更器重，因为樗里疾功劳太大，功高震主。秦武王对樗里疾有很强的防备心理，不想让他掌握兵权。

刚刚上台的秦武王雄心勃勃，他本是尚武之人，渴望建立不世之武功。在秦惠王死后，原本臣服的魏、韩、楚三国纷纷叛去，不教训一下不行。他手握雷神之锤，要先砸向谁呢？

韩国！

为什么是韩国呢？

秦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此时周王室已经风光不再，天子没权力了，但他有一样诸侯们没有的东西：象征权力的九鼎。

九鼎是什么呢？它有点类似后世的皇帝玉玺，是权力的象征。据说九鼎乃是大禹所铸，九鼎象征九州，象征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商汤灭夏桀后，九鼎由夏入商；武王灭商纣后，九鼎由商入周；九鼎在哪里，王权就在哪里。

如今战国七雄都自称为王，可是谁也没有九鼎，九鼎还在周天子手中。秦武王要超越之前的伟大君王，他要把九鼎夺过来。秦与周王室领地并不接壤，要窥周室，首先必须要通三川。三川就是宜阳，是韩国的一个县，境内有河（黄河）、洛（洛水）、伊（伊水）三条河，故而得名“三川”，是中原的腹地。

只要能够实现“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的理想，秦武王就可以“死而不朽”了。

要攻略宜阳（三川）并不是容易的事。宜阳是军事重镇，方圆百里，城池坚固，韩国在此驻扎十万最精锐的部队，城中储备的粮食可供数年之用。韩国军队虽不如秦国军队强悍，仍有自己的强项。据史书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镞弇心”。韩国的弓弩制造水平在诸国中最高，用于守城优势明显。

进攻韩国，樗里疾固然是最合适的人选，秦武王却要交给甘茂。

甘茂明白，樗里疾功勋盖世，秦武王不想看到他锦上添花。只是甘茂左右为难，樗里疾的地位不仅在自己之上，也是自己的恩人，怎么能把他冷落在一旁呢？他索性向秦王建议：不要攻打韩国。

秦武王大感意外，问道：“为什么？”

甘茂答道：“宜阳是韩国重镇，名义上是一个县，实际面积相当于一个郡。千里奔袭宜阳，难度极大。大王听说过曾母的故事吧，有人对曾母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一点也不相信；可是三个、五个人都

这样说，曾母就吓得翻墙逃跑了。人言可畏。大王对我的信任，比不上曾母对儿子的信任；怀疑我的人，又绝不止三五个。要攻打韩国宜阳，必定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不可能短时间内就取得成功。倘若在这段时间里，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大王您一定会怀疑我。如果因为这个原因，攻打宜阳半途而废，还不如不攻打。”

有一句话，甘茂没说出口。由他指挥攻打宜阳，樗里疾必定会骂他忘恩负义，到时定会干涉阻挠，若秦武王心志动摇，自己就里外不是人了。

秦武王一心要建立奇功伟业，怎么可能取消既定的计划呢？他安慰甘茂说：“你放心吧，寡人不会听他们的，我给你写一份保证书。”

秦武王三年（前308），宜阳会战打响。

这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

韩国不仅在宜阳驻屯十万精兵，还有二十万兵力作为后备力量，随时可作为后援。宜阳城高墙厚，固若金汤，秦军打得非常辛苦，却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

五个月过去了，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

这场战争，成为天下关注的焦点。

甘茂的处境不妙，一方面进攻宜阳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另一方面南方楚国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增援韩国。楚怀王派大将景翠屯兵于边界，静观其变。这位软弱的君主在援韩一事上举棋不定，坐失良机。

与前线不乐观的局势相比，后方的流言蜚语更有杀伤力。宜阳之战旷日持久，秦国内部反对声浪高涨，樗里疾、公孙奭等人都强烈要求退兵，攻击矛头直指甘茂。面对各方施加的压力，以尚武著称的秦

武王内心动摇，打起退堂鼓，想要放弃攻略宜阳。

这一切，早在甘茂预料之中。

甘茂派人快马奔驰回咸阳，对秦武王说：“大王的保证书还在这里。”秦武王想起来了，当初他就答应过，不论什么人反对，他都会无条件地支持甘茂。身为君主，一言九鼎，不能反悔。以秦武王直率刚强的性格，当然不会赖账，事到如今，他只能硬着头皮，顶住各方压力，把宜阳之战进行到底。

又有几批生力军投入宜阳战场，秦武王几乎把看家部队都用上了，倾全国之精兵，全力攻略宜阳。如此生猛的架势，把在旁窥视的楚怀王吓坏了，他终究没敢越过边界参战。

宜阳城之坚固，实是名不虚传。尽管甘茂获得生力军的支持，以钢铁般的意志对固若金汤的城池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仍然举步维艰。一向英勇的秦国兵团疲惫不堪，甚至厌战，听到战鼓声响，谁也不前进了。

甘茂对亲信说：“我作为一名客将，能在秦国担任丞相，是因为秦王想通过我占据宜阳。如不能攻克，樗里疾、公孙奭等人一定要排斥我，韩国一定会通缉我，天下之大，恐怕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为了攻克宜阳，甘茂悬赏重金组织一支敢死队。为提高赏金，他不惜将自己的钱财拿出来倒贴。他召集全军，下达死令说：“明日若不能一鼓作气攻下宜阳城，宜阳城郊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秦军固然疲惫不堪，宜阳城内的守军更是处境不妙，他们苦苦支撑，敌人却越来越多。甘茂深知，谁的意志力更胜一筹，谁就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最后一波进攻在疯狂中展开，敢死队拼了老命，奋勇登城。在甘茂的严令之下，后续部队紧紧跟上。秦人的决心最终占据上

风，宜阳守军全线崩溃。

宜阳沦陷，韩国军队战死六万人！

这是秦军继脩鱼、丹阳之战后取得的又一场伟大胜利。

甘茂如释重负，他意犹未尽，乘韩军大溃败之机，扩大战果，涉河夺取武遂。韩国再也无法抵抗了，宰相公仲侈亲自入秦请罪求和。韩国在此役战败，秦军的伤亡也绝不在少数，据《战国策》所载，“秦死伤者众”。甘茂指挥的秦国兵团业已是强弩之末，秦武王遂同意韩国的请和，秦韩战争结束。

宜阳之战令秦武王实现了“车通三川”的梦想，接下来便是“窥周室”。

进入战国后，周王室一蹶不振，分裂为二：一称为西周，一称为东周，天子周赧王居于西周王城。

秦武王派右丞相樗里疾率领一百辆战车进入西周，此行的目的，表面上是向天子献捷，实际上是想趁西周不备时，夺取九鼎。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周赧王岂能不知？他思前想后，想出了一条妙计，派人前往欢迎樗里疾的车队。天子安排一队持戈的士兵，走在车队前面；又安排一队强弩手，走在车队后面。名义上是保护樗里疾的安全，实际上是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说实话，倘若秦国必要抢走九鼎，周天子估计也无能为力。只是周王室命不该绝，秦武王竟在此时意外身亡，夺鼎行动便不了了之。

身体强壮的秦武王，怎么会意外身亡呢？

问题恰恰出在“尚武”二字。

眼看“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的梦想即将实现，秦武王心情大悦，为了显示自己的武力，他与大力士孟说举行一场扛鼎大赛，看看谁举的鼎更重，举得更久。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君王参加过这种比赛。秦武王要证明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勇士，他非常自信，只是自信过头了。一座大鼎重达数百斤，比赛终究是有风险的。很不幸，意外发生了。秦武王扛起大鼎，正想举起来绕行一周，岂料重心不稳，其中一条腿受力过猛，只听得“嘎”的一声，腿骨断裂。

一声惨叫后，秦武王已是身负重伤。

这个伤，是致命伤。

卖弄武力者，死于武力之下。

伤势恶化，这位好勇斗狠的秦国君王，竟英年早逝。

想要夺鼎，却死于鼎之下。这就是秦武王的宿命，他为鼎而生，也为鼎而死。

秦武王之死引发秦国政坛的动荡。

他死得太突然，膝下无儿，谁能成为下一任秦王呢？各方势力粉墨登场，争权逐利，最有实力问鼎王座的是武王的两个兄弟，一个是公子壮，一个是公子稷。

公子壮是秦武王的亲弟弟，秦惠王的嫡子，根正苗红，最有资格继承王位。他得到惠文王后与武王后的支持。

公子稷是秦惠王的庶子，当时入质燕国，远在天边，看上去即位可能性很小。然而，他的母亲芈八子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芈八子是

楚国人，工于心计，深得秦惠王宠幸。更重要的是，芈八子的两个弟弟在秦国政坛上是重量级的人物。

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魏冉，被封为穰侯；一个叫芈戎，被封为华阳君。有人会奇怪，既是兄弟二人，怎么姓氏不同呢？说来有趣，魏冉与姐姐是同一个妈生的，芈戎与姐姐是同一个爸生的。也就是说，魏冉与芈戎虽名为兄弟，既不是同一个爹，也不是同一个妈，两人没有丝毫血缘关系。

除此之外，秦国大夫向寿也是芈八子的外族亲戚。

芈八子果断刚强，她与弟弟魏冉秘密从燕国接回公子稷，立为秦王，他就是秦国史上著名的秦昭王。芈八子一跃成为太后，史称宣太后。不甘示弱的惠文王后、武王后也拥立公子壮为秦王，史称“季君”。

一个国家冒出两个国王，这怎么行？

有一个王必定要死。

内战无可避免。

宣太后把弟弟魏冉提拔为将军，镇守首都咸阳。先发制人的战略使她赢得了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主动权。为了得到军方的支持，宣太后留用名将樗里疾为丞相。

这是秦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内乱，史称“季君之乱”，内战整整持续了三年。在魏冉的铁腕下，昭王的军队彻底打垮了季君的军队。失败者的下场殊为可怜，政治斗争残酷无情。在宣太后的指示下，魏冉尽诛公子壮（即季君）、惠文后、昭王异母兄弟以及追随季君的大臣。只有一个人免于一死，她就是秦武王的王后，被逐回自己的娘家魏国。

由于秦昭王年龄尚幼，宣太后与魏冉遂专国政，威震秦国。

三年的内乱令秦国无暇东顾，齐国乘机主导中原政局。备受战争之苦的东方诸侯们终于有了一线喘息之机，他们能翻盘吗？

二十 自投罗网：诱拘楚怀王

自从张仪离开后，秦国强势外交大受挫折，在列国中形同孤家寡人。持续三年之久的“季君之乱”，令秦国对外扩张戛然而止。

内战结束后，执掌权柄的宣太后与魏冉再次把目光投向东方。要恢复强势外交，首先就得找盟友。宣太后与魏冉都是楚人，当然想把楚国拉入自己阵营。

齐宣王不能袖手旁观了。

当年楚怀王被张仪忽悠，与齐国断交，还派人咒骂齐宣王，摆出决裂的架势。只是楚国非但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倒被秦国打得元气大伤。齐宣王对楚怀王的行径当然耿耿于怀，只是他大人不计小人过，当务之急是要防止楚国再次投入秦国怀抱。

齐宣王给楚怀王写了一封信：“我听说楚国要事奉秦国。这样的话，魏国与韩国势必会担心，肯定也得倒向秦国；魏、韩倒向秦国，燕、赵必然也要追随其后。魏、韩、燕、赵四个国家争先要事奉秦国，楚国在秦人眼中，不过就是一个郡县罢了。大王何不与寡人结为联盟，齐心协力招揽魏、韩、燕、赵四国。六国合纵，共尊周室，可安兵息民，令行天下了。到时大王必定声名远扬，统率各路诸侯讨伐秦国，击破秦国是必然的。大王曾被张仪忽悠欺骗，丧失汉中地，兵败蓝田，天下人莫不替大王深感痛惜与愤怒。现在听说楚国想事奉秦国，这件事请大王要深思熟虑。”

要倒向秦国还是倒向齐国呢？

楚国大臣们认为国家蒙受奇耻大辱后，“必将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要报仇雪恨，就得与齐国结盟。楚怀王同意了，于

是齐、楚达成合纵同盟。不久后，在宜阳之战中损失六万精兵的韩国也加入同盟。

三国同盟的建立，令秦国大惊失色。

雷厉风行的魏冉马上策划阴谋，欲瓦解齐、楚联盟。为了达到目的，他采取三管齐下的方针：第一，以重金贿赂楚怀王及楚国重臣；第二，秦、楚通婚，楚怀王娶秦女，秦昭王娶楚女；第三，秦国将其占有的上庸归还给楚国。

楚怀王原本就是个贪小便宜的人，秦国给点小恩小惠，他又把奇耻大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就是一个呆子、傻瓜，又干了一件傻事，傻乎乎地与齐国断绝关系，把太子横送到秦国当人质。他忘了一件事：秦国只会顾及自己的利益，他们的任何做法，都是有阴谋的。

后来史书这样评论：“楚之祸自此始。”

这个不慎重的决定，是楚国无休止大灾难的开始。

正当楚怀王自以为找到一棵大树好乘凉时，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公元前302年，被送往秦国作为人质的楚国太子横，与一位秦国大夫发生口角，口角最后演变为一场斗殴。身强力壮的太子横在斗殴过程中，把秦国大夫给打死了。这可闯下大祸了，太子横不敢待在秦国，匆匆忙忙地逃回楚国去了。

堂堂的秦国大夫，竟然被楚国的人质给打死了，这简直是对秦国的羞辱！秦昭王暴怒之下，也顾不上与楚国所谓的“合婚之欢”，派遣庶长奭率领秦军攻入楚国。这下楚国惨了，不仅秦国人要算账，觑准了机会的齐宣王乘机纠集魏国、韩国，联合出兵攻打楚国。

楚怀王只得硬着头皮应战。他派昭睢抵御秦军，唐昧抵御齐、魏、韩联军。

以一敌四，楚国的下场可想而知。

西线战场，秦国大败昭睢，斩首两万。

东线战场，齐、魏、韩三国联军在名将匡章的指挥下，大破楚军于垂沙，楚国最精锐的部队损失殆尽，总司令唐昧被击毙，宛城、叶城以北的土地被魏、韩两国瓜分。

更可怕的是，楚怀王的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公元前300年，秦国丞相樗里疾去世，魏冉自任丞相，对外政策更加激进。

魏冉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遣弟弟华阳君平戎率领大军再度攻楚。在上一年刚遭重创的楚国显然还没有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面对秦军饿狼般的进攻，楚怀王任命景缺为大将，全权负责前线指挥。景缺的下场与唐昧相同，没有顶住秦军的强大攻势，战死沙场，楚军又有三万名将士阵亡。

楚怀王绝望了，他竟然把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只是鬼神没有现身，也没有保佑楚国。

万般无奈之下，楚怀王只得向齐国求助，并送太子横入齐当人质。

我们不禁要问，楚国在外交上究竟是何立场呢？在秦、齐之间不停地来回摇摆，最终结果，是两头不讨好。

倒向齐国的结果，是秦国的疯狂报复。

一年后（前299），秦军再次卷土重来，如入无人之地，连下八

城，兵锋之盛，楚军莫可抵挡。

怎么办？怎么办？

楚怀王焦头烂额，无计可施。

这时，秦国派使者来了，还带来一封秦昭王的书信。

信是这样写的：

“最初寡人与大王结为弟兄，在黄棘会盟，大王以太子为人质，两国关系十分融洽。不料太子盛气凌人，杀死寡人重臣，非但不认错，还不辞而别。寡人确实压抑不住怒火，这才派兵侵犯楚国边境。如今听说大王您竟然让太子作为人质送往齐国，以此向齐国求和。秦国与楚国的边境接壤，为了和平相处，这才有联姻之事，秦楚通婚已有数百年，历史久远。现在秦楚两国交恶，兵戎相见，无法号令天下诸侯。寡人希望能与大王在武关会晤，当面签订条约，重新结盟。这是我的心愿，冒昧把这个提议告诉您，希望您认真考虑。”

武关是秦国地盘，前往武关会晤秦昭王，风险很大，要不要去呢？

大夫昭雎、屈原等人都力主不能去，秦国向来无信用可言，岂能相信？楚怀王的儿子子兰却说：“秦王这么有诚意，岂能拒绝他的好意？”

最后，楚怀王下定决心，去！

这一去，羊入虎口，永无归期。

自商鞅、张仪以来，秦国外交以诡诈善变而著称。楚怀王吃过亏，上过当，可是他脑子不好使，抱着侥幸的心理。张仪死了，秦国人想必没那么厚黑吧。错！秦昭王与魏冉之厚黑，实不让张仪。

秦昭王说要与楚怀王会晤于武关，其实他压根儿就没去。当楚怀王风尘仆仆地赶到武关时，远远望见秦王的旗号。旗是秦王的旗，人却不是秦王本人。

有一位将军出关迎接楚怀王，楚怀王刚刚进城，城门就紧紧关闭了。

看这情形不对头，楚怀王忐忑地问：“秦王在哪里？”

没有人理睬他，只把他架上一辆马车，飞也似的奔向咸阳去了。

一路上车马劳顿，楚怀王身心俱疲，还没来得及睡上一觉，就被带进章台见秦昭王。以外交礼仪说，楚王与秦王地位相等，理应一同坐在上座。但秦人根本不理睬他，把他安排在下座，秦昭王则高高在上。

我堂堂一个楚王，怎么可以被当作囚徒使唤呢？楚怀王愤怒了。那一刻，他表现出王者应有的尊严，拒绝与秦王对话。

秦昭王大怒，你也不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还容你摆臭架子吗？他毫不客气地下令，把楚怀王软禁起来。

悲剧！楚怀王想后悔也来不及了。除了怪自己是个傻大个外，他还能怪谁呢？秦人的狡诈他又不是不知。当初张仪说的六百里之地，怎么变成六里的，他难道忘了吗？被骗一次不够，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这能怪谁呢？

秦昭王狮子大开口：要离开秦国可以，必须先割让巫郡与黔中郡。

这不明摆着是绑架、敲诈、勒索吗？天下最强大的秦国，竟是一个强盗般的国家，还有没有公理可言。秦昭王笑了，寡人只知强权，不知公理为何物。

身陷囹圄的楚怀王顽强地拒绝秦昭王的无理要求，只是冷冷地说：“寡人是来与秦国签订盟约的。”只是战败国有何资格讨价还价？秦昭王的回复是，先割地，再签约。

楚怀王不割地，秦昭王也不放人。

国不可一日无君。

楚怀王被绑架的消息传回国内，楚国陷入恐慌之中。大臣们只得从齐国迎回楚太子横，立为国王，史称楚顷襄王。

新楚王即位后，派人通告秦国政府，称“国有王矣”，你们囚禁楚怀王是没有用的，割地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秦昭王暴跳如雷，遣庶长奭统领大军，出武关讨伐楚国。楚军又一次惨败，阵亡五万人，析城等十六座城池沦陷。

既然楚国另立新君，楚怀王便成了无足轻重的废人一个，秦国人从他身上已经榨不出油水了。难道就这样被囚禁到死吗？楚怀王不肯向命运屈服，在穷途末路之时，他冒出一丝难得的勇气，决心要逃出秦国。

秦昭王十年（前297），被囚禁两年的楚怀王抓住一次难得的机会，成功逃出咸阳。他是怎么逃跑的，史书上也没写。秦昭王马上发令全国，封锁各条通往楚国的通道，严加盘查。楚怀王无法南逃，只得向北走，打算逃往赵国。当他餐风露宿、历经艰辛逃到赵国边境时，赵国政府不想得罪秦国，拒绝他入境。

饥肠辘辘的楚怀王只得改变逃亡路线，往魏国方向鼠窜。只是这次他运气没那么好，半途被秦国追兵抓住，再次成为阶下之囚，被押回咸阳。楚国乃是天下大国，堂堂国君如亡命之徒般孤身逃亡，已经

是莫大耻辱，何况二度被囚，耻上加耻。一向好面子的楚怀王悲愤与羞愧交加，终于病倒了。

第二年（前296），楚怀王病死于秦国。

作为一位大国君主客死异乡，令人怜悯的同时，不得不说这种悲惨结局，也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楚怀王死后，秦昭王把他的遗体送回楚国，楚国百姓十分同情怀王的遭遇，对秦国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怒。

楚南公说了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口号固然激励人心，只是楚国遭到秦、齐、魏、韩数国的围剿之后，在诸侯中地位一落千丈，还奢谈什么亡秦呢？

真正能与秦国一较高低的，只有齐国。

二一 千里伐秦：孟尝君的壮举

齐国的辉煌始于齐威王。齐威王大破魏国于马陵，一举取代魏国成为东方六国的老大；齐宣王继承其业，北破燕，南伐楚，合纵魏、韩，将齐国霸业推向巅峰。

由于秦国与齐国相距遥远，领土并不接壤，两国直接军事冲突不多，更多的交锋是在外交上。秦国最担心的事，莫过于齐国与楚国结盟，齐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楚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拆散齐、楚同盟，成为秦国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

公元前300年，秦国大举进攻楚国，斩首三万，楚怀王不得不把太子横送到齐国当人质，以换取齐国的支援。

此时齐宣王已去世，齐湣王即位。为了破坏齐、楚结盟，秦国再次施展外交手段，秦昭王不惜把自己的弟弟泾阳君送到齐国当人质。泾阳君到齐国后，没有直接去见齐湣王，而是先拜见齐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

在战国中后期，由于群雄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各国在网罗人才上不遗余力，“养士”之风盛行天下。不仅是各国君主，包括公子、贵族，竞相广招人才，礼贤下士。在这些公子中，以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最为有名，并称为“战国四公子”。在四公子中，最早成名的便是孟尝君。

孟尝君有门客三千，他为人慷慨好义，喜交朋友。各国怀才不遇者、冒险家、投机分子等蜂拥而至，纷纷前来投奔。久而久之，孟尝君名声远扬，风头盖过齐国君主。当臣子的，竟然比国王还神气，君王哪里受得了？齐湣王上台后，处处压制孟尝君，孟尝君心灰意冷，有怀才不遇的失落感。

就在这时，涇阳君来了。

涇阳君拜会孟尝君，大大吹捧一通，并对他没能得到齐王的重用表示遗憾，希望他前往秦国，秦国必定设高官厚爵以待之。

这一番话，令孟尝君怦然心动。

一年后（前299），秦国打败楚国，诱执楚怀王。涇阳君的使命完成了，打算返回秦国，齐湣王派孟尝君护送他回国。

齐国公子的风采神韵给秦昭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打算让孟尝君担任秦国丞相。有人反对说：“孟尝君才华横溢，又是齐国公子，如果当上秦相，他一定会先考虑齐国的利益，而后才考虑秦国的利益。这么一来，秦国岂不是危险了吗？”

此言一出，秦昭王不得不重新考虑。既然不能用孟尝君，不如把他扣押起来，否则始终是秦之祸患，或者干脆把他杀掉算了。这些年来，秦国干了多少无节操的事，连楚怀王都敢公然绑架，何况是一个齐国公子呢？

公子遇到流氓，没道理可言。

不过，孟尝君不像楚怀王那样傻，他是个精明人，更重要的是，他朋友遍天下。朋友多的好处是消息灵通，秦昭王的阴谋很快传到孟尝君耳中。与孟尝君同来的门客面面相觑，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羊入狼穴，如何逃生呢？

关键时候，还是孟尝君镇定自若。他贵为齐国公子，对宫廷之事知晓得多，国君虽握有生杀大权，却都有一个致命弱点：女人。能改变君主意志的人，只有女人。只要找君王最宠幸的女人帮忙，就可化险为夷。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门客自告奋勇前去游说秦昭王宠妃，宠妃没有拒绝，只是提了一个条件：“我想得到一件狐白裘衣。”

女人爱漂亮衣服，古今皆然。

这个条件，看似寻常，不就一件衣服嘛，孟尝君与门客们却面如土灰。

因为狐白裘衣，不是一般的衣服，是稀世珍品。

孟尝君有一件狐白裘衣，已作为礼物送给秦昭王。此裘衣以狐腋之毛制成，皮质纯白，做工精细，华丽高贵，价值千金，堪称天下无双。后宫女人无不露出爱慕与贪婪的眼光，裘衣只此一件，无论分给谁都是一人喜，众人怨，徒增宫心暗斗罢了。昭王干脆锁进王宫仓库，谁也甬想要。

别的女人死心，宠妃不死心。既然孟尝君要她帮忙，不正好可以勒索一件狐白裘衣吗？只是她哪里知道，孟尝君手上可没有库存。

怎么办？孟尝君又不是魔术师，能无中生有变出一件吗？

一个门客举手了，“我来试试吧。”

孟尝君一瞧，这个门客原是街头小混混，专干偷鸡摸狗之事，经常半夜三更翻墙到别人家“借”东西，练就一身猎狗般敏捷的身手。“我趁夜半三更时，翻墙入秦宫，从仓库里把狐白裘衣偷出来。”此话一说，大家都翘起大拇指，纷纷投以膜拜的眼光。

入夜后，此人翻墙进了王宫。他有一大本领，会学狗叫，王宫卫队听得有动静，想去查看，他便狗叫几声。卫队士兵一听，原来是只野狗跑进来，用不着担心。他乘机潜入仓库，把狐白裘衣偷出来。

裘衣到手后，孟尝君赶紧差人送给秦王宠妃。宠妃果然在秦昭王

面前为孟尝君求情，昭王喝了几杯酒，头脑发热，糊里糊涂听了她的话，发了张通行证，准许孟尝君一行人离开秦国。

拿到通行证后，孟尝君等人一刻也不敢停留，赶紧备了马车，飞驰离开咸阳城，一个劲地向东飞奔。谁晓得秦昭王会不会反悔呢，逃跑一定得快。果不其然，秦昭王酒醒后就后悔了，放孟尝君回去，等于放虎归山，得抓回来才行。一队快骑很快出发了，向东急追。

孟尝君是心思缜密之人，为了不留痕迹，他把通行证上的名字给改了。追兵一路追，一路盘查，没有发现孟尝君的踪影，难道这群人不翼而飞了吗？眼看前面就是函谷关，过了这关口，就出了秦国地界。

很不凑巧，孟尝君等人行至函谷关，已是后半夜，关口大门紧闭。按照规矩，得等到天亮雄鸡啼叫时，守关的士兵才会打开城门。夜长梦多，万一追兵追来怎么办？若不及时出关，可能前功尽弃。

大家心急如焚时，一个门客勇敢地站出来说：“我来试试吧。”他有什么本领呢？会学鸡叫！看来孟尝君手下能人可不少，鸡鸣狗盗之徒都有。这家伙学起鸡叫，他这一叫，附近的公鸡跟着啼叫起来。睡眠惺忪的士兵以为天亮了，揉揉眼睛，把关门打开。孟尝君递上通行证，顺利出了关。

他们刚走不久，追兵就到了，可是已经迟了，扑了个空，只得悻悻而回。

靠着这群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死里逃生，总算没落得楚怀王那样凄凉的下场。但是这次经历令孟尝君颜面尽失，倘若不报仇雪恨，自己何以在江湖上立足呢？出使秦国本是齐湣王指派，如今孟尝君差点丢了小命，为了补偿、安慰孟尝君，湣王任命他为齐相。手握大权

的孟尝君，马上筹划进攻秦国。

齐国乃是中原之领袖，与魏、韩两国有同盟协定。孟尝君照会魏襄王、韩襄王，三国共同发兵，讨伐秦国。

公元前298年，齐、魏、韩三国联手，由孟尝君担任统帅，进攻函谷关。

孟尝君在攻秦的时间选择上相当不错。这一年楚国立楚顷襄王，秦昭王大举用兵，连夺十六城，斩首五万。秦国最精锐的兵力都集结在楚国战场，函谷关一线兵力薄弱，根本不是三国联军的手，一战即溃。

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在战场上几乎无往而不胜，这次失败严重打击秦人膨胀已久的自信心。更要命的是，楚国战场的秦师一时间难以调回，倘若孟尝君攻破函谷关，长驱直入，咸阳未必保得住。

如何是好呢？只能割地求和。

割地求和是很没面子的事，秦昭王召集臣下商量，他说：“齐、魏、韩三国兵力强大，深入我国，寡人打算割让河东三城（武遂、封陵、齐城）请和，如何？”

公子池道：“大王割地求和，日后肯定要后悔的；如果不割地求和，也要后悔。”

秦昭王问：“这怎么说呢？”

公子池道：“大王如果割地讲和，三国捞到利益后，会心满意足收兵离去。到时大王会后悔：可惜呀，三国联军本来就要离开了，我却偏偏送给他们三座城邑。如果不割地谈和呢？若三国联军越过函谷关，进逼咸阳，秦都就危险了。到时大王又会后悔：哎呀，我怎么会

吝惜三座城邑而放弃与三国谈和呢？”

秦昭王拍板道：“两害相权取其轻者，我宁可因割让三城而后悔，也不愿因咸阳遭到危险而后悔。我决定了。”

问题是，孟尝君能同意秦国割地求和吗？

有一个名为韩庆的谋士对孟尝君说，攻秦对齐国没好处。为什么呢？他分析说，齐国与秦国相距遥远，就算攻城略地，也不可能把秦国的土地并为己有，能捞到好处的只有魏国与韩国。若是魏、韩两国坐大，齐国就要丢掉老大的地位。

孟尝君攻打秦国，只是为一雪耻辱，若劳师远征，却没捞到好处，不好交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韩庆说，有。

当时楚怀王还没死，被囚禁于秦国。韩庆认为，上策应该是以武力逼迫秦国释放楚怀王，然后要求楚国割让东部土地给齐国。这样做，齐国才能真正得到实惠，否则什么都是虚的。

孟尝君深以为然，不想继续向前挺进，而秦国也有意割地求和，双方一拍即合。孟尝君依韩庆之计，向秦国提出释放楚怀王的条件，秦昭王爽快答应了。就这样，齐、魏、韩三国联军从函谷关撤兵，第一次伐秦之战结束。

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只是孟尝君还是低估了秦国厚黑的传统。秦昭王答应释放楚怀王，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孟尝君撤走后，远征楚国的秦国兵团陆续返回国内，函谷关的兵力大大增强了，秦昭王悍然毁约，拒绝交出楚怀王。

不交出楚怀王，孟尝君就不可能从楚国捞到好处，最终只是竹篮子打水——空欢喜一场罢了。

秦国立国以来，从未像现在如此毫无信用。

春秋时代恪守的道德原则，已经被尔虞我诈的政治游戏所取代。

孟尝君气坏了，他被羞辱过一次，如今又被戏弄，旧仇加新恨。很快，他又着手准备第二次伐秦之战。这一次，联军更加强大，除了齐、魏、韩三国之外，又有两个诸侯国加入伐秦行列，这两个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宋国。

公元前296年，孟尝君率五国联军，再次杀向秦国。

这次秦国没有两线作战，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联军。只是五国打一国，孟尝君优势非常明显。特别是赵国的加盟，更是锦上添花。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下，赵国异军突起，成为秦、齐之后又一军事强国，拥有第一流的骑兵武装。

东方诸侯联军一路西进，连战连捷，攻至盐氏（山西运城）。秦昭王压力很大，只得再度祭起割地求和的法宝。秦国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狼狈不堪了，这也证明当年张仪以“连横”破坏东方的“合纵”战略，是何等深谋远虑。

恰好此时，被囚的楚怀王郁郁而死。孟尝君合纵诸侯攻秦，目的就是逼迫秦昭王释放楚怀王，再从楚国那儿捞取好处。楚怀王一死，孟尝君的计划落空了。就算他一路向西，攻到咸阳，秦国的土地又如何并入不接壤的齐国呢？只会让魏、赵、韩这些国家捡便宜罢了。

孟尝君接受秦昭王的割地求和。双方谈判的结果，秦国归还韩国河外之地及武遂，归还魏国河外之地及封陵。魏国与韩国收复失地，满心欢喜，出力最多的齐国，除了赢得好名声之外，并无其他收获。

土地交割完毕后，孟尝君从秦国撤军，第二次伐秦之役结束。

孟尝君两度伐秦，显示东方合纵战略的威力，这也是战国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合纵运动。秦国数十年来在东方鲸吞蚕食，疯狂扩张，不可一世，却遭到齐国的迎头痛击，不得不稍敛锋芒。宋代著名政治家王安石讥讽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这个评价不太客观。孟尝君能越数千里之地攻秦，其能力与胆识都非常人所能及。后世史学家黄世三评论说：“秦之强未有能抑之者，孟尝君有此豪举，非他人所能及也。”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伐秦之战，把齐国与秦国的对抗推向高潮。

只要齐国仍领袖东方，秦国想要向东扩张几乎不可能。只是世事难料，灾祸总是起于萧墙之内，一起齐国未遂的政变，令秦国有挺进中原的机会。

二二 伊阙：魏韩的伤心记忆

公元前294年，齐国发生了一起未遂的政变，大夫田甲劫持绑架齐湣王。这次政变并未成功，却导致严重的后果。

齐湣王怀疑政变背后的主谋是孟尝君。孟尝君两次合纵诸侯讨伐秦国，名扬天下，功高震主，诸侯只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湣王。身为君主，齐湣王早就对孟尝君看不顺眼，经历绑架惊魂后，更是对他处处提防。君相二人互不信任，双方剑拔弩张。齐国内斗，被秦国人看在眼里，铁血宰相魏冉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对东周的进攻。

夺取两周，一直是秦国的重点战略方向。

十五年前，秦武王发动宜阳战役，攻取韩国三川之地，欲直捣两周。不料秦武王意外扛鼎而死，计划泡汤。公元前293年，雄心勃勃的秦相魏冉派向寿为大将，挥师东进，打败东周的军队。周王室夹在魏、韩之间，魏昭王与韩僖王联手武力干预秦国入侵。

魏、韩两国集结了二十四万军队，魏军由犀武指挥，韩军由公孙喜指挥。秦军已嗅出大战的气味，遂从东周撤军，退至伊阙，与魏、韩联军对峙。

伊阙位于今天河南龙门，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就坐落于此。当时这里还是荒山野岭，宏伟壮观的佛像群还未有影子。伊阙的天空，战争的阴云密布。

面对魏韩数量庞大的兵团，秦国人忧心忡忡。

魏冉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向秦昭王推荐由白起担任秦军大将，取代原先的大将向寿。我们不能不佩服魏冉的眼光，他果断起用白起，是秦军取得胜利的保证。作为铁血宰相，魏冉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必须看到，魏冉提拔白起是有政治风险的，因为向寿是秦昭王由小玩到大的亲密朋友，用白起取代向寿，若不能出奇制胜，魏冉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结束。

白起是何许人也，为什么魏冉对他如此器重呢？

据后来秦始皇《追赠白起武安君诏》的说法，白起祖上本是楚国人，后来迁居到了秦国。他早年的军事生涯不可考，在伊阙之战前，史书仅有他的一次作战记录。那是前一年（前294），他指挥秦师攻克韩国重镇新城。此时的白起年仅二十几岁，已获得“左更”的军功爵，在秦二十等爵中位列十二等，属中上等爵位，可见他参加过很多战斗，而且战功很多。

知人善任的魏冉对白起的军事潜力深信不疑，大胆破格起用他为伊阙之战的秦军总司令。这一战，白起将震惊天下。

白起临危受命，当他抵达伊阙前线，发现形势很严峻，与魏、韩相比，他的兵力很单薄。据《战国策》所记：“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不能半之。”可见秦国兵力不到魏、韩联军的一半，在十万点左右。

从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白起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冷静地分析时局，后来他回忆道：“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为以锋。”也就是说，韩国拉上魏国一起作战，却想保存实力，要让魏国军队打头阵。魏国也心怀鬼胎，认为韩国军队是精锐之师，理应作为先锋部队，冲锋陷阵。大战临头，魏韩两国不能精诚团结，反而互相扯皮，谁也不愿意主动出击。

有了弱点，就容易搞定了。

白起的计划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他说：“二军争

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白起假装与韩军正面对峙，暗中却把大部队调走，出其不意地突袭魏军。

魏军主将犀武判断失误，以为秦军要先攻韩师，掉以轻心。白起攻其无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杀过来，阵斩犀武，大败魏军。首战告捷后，白起马不停蹄，对韩国兵团发动总攻。韩国主将公孙喜得悉魏军惨败的消息后，大为恐慌，仓皇撤退。秦军全线追击，生擒公孙喜。此时魏、韩联军总司令一死一俘，群龙无首，军队混乱不堪。秦军越战越勇，连拔五城。

在《史记》一书中，《秦本纪》《魏世家》《韩世家》《白起列传》诸篇都提到伊阙之战，说法稍有差别。

《秦本纪》与《白起列传》都记为：“秦昭王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

《魏世家》记：“魏昭王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

《韩世家》记：“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

秦国史料都称白起在此役中取得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魏、韩史料不是用“斩首”这个词，而是用“败”这个字。魏韩联军总计二十四万人，倘若依秦国说法，全军覆没，没有活口。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白起后来曾说：“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连他本人都用“败”“溃”这样的字眼，可见魏、韩联军是被击溃，而不是被歼灭。由此可见，魏、韩的说法比较准确，秦国史料则有夸大战功之嫌。

即便有夸大之嫌，白起以十万之师击破魏韩二十四万之众，无论

如何都是伟大的胜利。伊阙之战标志着秦军走出数年前两度败于孟尝君的阴影，对中原战局产生巨大影响，从此之后，魏、韩两国再无与秦抗衡的实力。

伊阙之战是白起指挥的第一场大战役，他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展示卓越的军事天才。他果断冷静，有精确的分析判断能力，善于把握战争大局。当回顾此役时，白起说：“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所谓计利形势，就是因势利导，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秦国的扩张，向来是武力与外交双管齐下。

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秦国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原因很简单，它的外交政策是典型的无节操榜样。拐骗楚怀王，企图绑架谋杀孟尝君，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手段阴险诡诈，自然诸侯离心。

不过，秦国自有手段，威慑与恫吓也足以唬住一些国家。

秦国集中力量对付魏、韩，自然不希望其他国家插手干预。齐国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孟尝君罢相下台，没精力去救援魏韩；赵国爆发内乱，一代雄主赵武灵王被弑，自顾不暇；燕国实力弱小，闭关自守；唯一可以救援魏、韩的，只有楚国。

为了唬住楚国，秦昭王写一封信给楚顷襄王，以挑衅的语气说：“楚背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日之命，愿王之飭士卒，得一乐战。”

伊阙之战中秦军的威力令诸侯闻风丧胆，楚国向来是秦国的手下败将，看到秦昭王的挑战信，楚顷襄王吓坏了。

关键时刻，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楚顷襄王的父亲楚怀王

被秦害死，国恨家仇，只要他有点血性，就绝不会屈服于仇敌的淫威之下。只是楚顷襄王的软弱与父亲如出一辙，他竟然向仇人低头。在利诱与威逼下，楚国与秦国联姻，楚顷襄王迎娶秦女为夫人。此举表明楚国又一次臣服于秦国。

楚国的绥靖政策，令秦国可以心无旁骛地攻略魏国与韩国。

魏、韩精锐在伊阙之战中损失殆尽，已经难以抵挡秦国的进攻。

战神白起再建奇功，渡过黄河，攻取安邑以西至乾河一带的韩国土地。一年之内，他从左更（军功爵第十二级）升为大良造（军功爵第十六级），连升四级。

公元前291年，秦国兵分两路，大举进攻魏国。

一路由伐蜀英雄司马错统率，攻破轹城；另一路由后起之秀白起指挥，略取垣城。两路人马得手后，转攻韩国，司马错攻占邓城，白起夺取宛城。攻城略地，魏、韩两国不要说还手，连招架之力也没有。

对魏、韩两国来说，苦难无尽头。

公元前290年，秦国铁血宰相魏冉亲自出马，讨伐魏国。魏昭王精神崩溃，如何抵挡？一打就败，一败就尸横遍野，几乎每家都要办丧事，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他索性举旗投降了。投降代价惊人，魏国割让河东四百里之地献秦。

扬扬得意的魏冉胃口大得惊人，得到魏国四百里地还不足，他又率兵杀入韩国。可怜的韩釐王只得步魏昭王后尘，割让武遂等二百里地献秦。孟尝君伐秦时魏、韩收复的土地，全部都还给秦国了，甚至更多。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这是宋代文豪苏洵对魏、韩割地事秦的评价。

以土地能换和平吗？

肉包子打狗，能填饱狗的肚子吗？

公元前289年，秦国又来了！

还是白起，还是司马错。秦军如秋风扫落叶，横扫魏国。羸弱的魏国毫无反击能力，连失六十一城！

伊阙之战推倒第一块骨牌后，引发多米诺效应，短短几年时间里，魏韩两国一溃千里，丧地无数。这两个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国家，已从猛虎变成小绵羊，哀号着任由秦国宰割。

秦王的野心与秦国的疆域一同膨胀。

他不满足于“王”的尊号，因为王太多了，不值钱。秦国雄视天下，笑傲江湖，应该给自己换一个更尊贵的称号。

新的尊号叫什么呢？一帮刀笔吏咬文嚼字，详斟细酌，最后挑出一个字——“帝”。

古代的字典《字汇》对此的释义是：“帝，上帝，天之神也。”先秦文献中，有“天帝”“上帝”这样的字眼，意指主宰天地万物的最高天神。上古的历史传说，有“五帝”的说法，指的是黄帝、炎帝等五位德高望重的君王。

称帝才能凸显秦王在诸侯中高人一等的地位。秦昭王想称帝，却

心有顾虑，因为秦国还有一个强大的对手，便是齐国。齐国绝不会容忍秦国的傲慢与自大，势必会号召诸侯群起而攻之。最好的办法，是把齐国拉下水，秦王称“西帝”，齐王称“东帝”，岂不是皆大欢喜？

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在宜阳正式称“西帝”，同时他派人前往齐国，给齐湣王送上一顶“东帝”的大帽子。

齐湣王心动了。

谋士苏代问道：“两帝并立，诸侯们会尊秦呢，还是尊齐？”

秦国比齐国更有侵略性，齐湣王诚实地答道：“肯定是尊秦。”

苏代又问：“放弃帝号，诸侯们愿意跟齐国交好呢，还是秦国？”

齐湣王答道：“当然是齐国，各国都讨厌秦国。”

苏代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表面上看是平等的。但诸侯们害怕秦国，尊秦而不尊齐；若放弃称帝，各国愿意与齐国亲近，与秦国疏远。您越表示谦卑，诸侯们越尊重您，这就是以卑为尊。”

齐湣王采纳苏代意见，公开表示放弃称帝。齐王拒绝称帝，秦昭王自封的“西帝”成了众矢之的。称帝无异于向天下宣布，秦国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岂不让各诸侯惶恐不安？狗急会跳墙，人被逼急了会拼命，一个国家不是秦国的对手，要是几个国家一起拼命，秦国吃得消吗？

秦昭王称帝刚两个月，就察觉苗头不对，东方六国反响强烈，反秦浪潮高涨，秦国在外交上已陷入完全被动局面。东方六雄，一个都还没被消灭，看来秦昭王操之过急了。算他识相，灰溜溜地宣布撤销帝号，恢复王号，这出称帝的闹剧才结束。

尽管取消帝号，秦国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东方诸侯再度密

谋合纵，共同对抗秦国。

二三 日落东方：齐国的没落

秦国势力疯狂东扩的同时，北方的赵国异军突起，跻身三强之列，成为秦国之劲敌。自从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国后，赵国实力平平，在与魏国的长期战争中居于下风，首都邯郸曾沦陷达三年之久。知耻而后勇，赵国如何发愤图强、后来居上呢？这要归功于伟大的君主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知耻而后勇，他力排众议，推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大力发展骑兵武装，为赵国强盛打下坚实的基础。赵武灵王统治时期，赵国走向大扩张时代，他避开战乱不断的中原，把矛头对准北方的蛮夷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战争，赵国灭掉中山国，中山是除战国七雄之外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一个狄人国家。吞并中山后赵国实力大增，已跃居最强诸侯行列。

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并不满足于此，他的理想是北略匈奴，南略秦国。他曾经假扮为使者，孤身一人前往秦国刺探军情，甚至跑到秦都咸阳见秦昭王，以一国之尊，深入狼穴，浑身是胆。

可惜的是，赵武灵王与秦国一决雌雄的理想还未付诸实现，便死于一场国内政变。在沙丘之乱中，赵国贵族李兑囚禁赵武灵王，一代雄主竟饿死于高墙之内，令人唏嘘长叹。赵武灵王死后，李兑成为赵国头号权臣，被封为奉阳君。

一个国家强大了，自然想在国际舞台上有所表现。

偏偏在这个时候，秦国不给赵国面子。秦昭王自立为“西帝”，把“东帝”头衔送给齐国，至于赵国嘛，秦国还真不当一回事。在诸侯们的反对声中，秦昭王仅仅过了两个月，就尴尬地宣布放弃称帝。东方诸侯对秦国的狼子野心保持高度戒备，一场针对秦国的合纵运动又

悄然兴起。

这次合纵运动的策划者，正是赵国奉阳君李兑。

在李兑主持下，赵、齐、魏、燕、韩五国组成合纵同盟。公元前286年，东方五国组成联军，进攻秦国。纵观东方合纵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成功的合纵必须要有一个深孚众望的政治家主导。整个战国史，只有两个人能成功领导合纵抗秦，一个是孟尝君，一个是信陵君，两人都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有能力、有威望，能约束、指挥合纵联合国。李兑虽是赵国权臣，对其他诸侯国却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这次合纵运动注定要失败。

伐秦之战，雷声大雨点小。各国虽想打击秦国，却相互猜忌，各自保存实力，只是虚张声势罢了，并不全力作战。西征最后无功而返，这是预料中的事。

李兑打着伐秦的旗号，实际上另有所图。

合纵联军伐秦草草而终，李兑却不解散五国部队，而是驻屯于成皋，按兵不动。他心里在打什么算盘？李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要凭这张合纵王牌，与秦国做一笔交易。他暗中派人与秦政府联络，要求与秦联手，突袭魏国！

一方面与魏国合纵抗秦，一方面却与秦国串通欲瓜分魏国，李兑的厚黑与无节操，比起秦昭王毫不逊色。

只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李兑想瞒天过海，纸却没包住火，这件事给捅出来，真相大白于天下。冤大头魏昭王气疯了！他断然与赵国决裂，投靠齐国。

倘若赵国与秦国结盟，对齐国是巨大的威胁。齐湣王不愿看到这

种结果，他必须出手阻止李兑的阴谋。

著名纵横家苏代作为齐湣王特使，前往游说李兑。苏代说：“您不遵守五国合纵盟约，单独与秦国媾和，五国合纵同盟必然瓦解。我想提醒您，秦国与齐国并非不可能联合，倘若秦、齐联合，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赵国处境最不利。另外，要是合纵同盟分裂，诸国臣服于秦国，秦国便可控制天下。一旦秦国控制天下，会用什么手段统治，您心知肚明。我希望您考虑清楚。”

这是对李兑施压。若是赵国与秦国联合瓜分魏国，那么齐国也可以与秦国联合瓜分赵国。合纵是对抗暴秦的法宝，若合纵失败，统统要成为秦人的奴隶。在苏代严厉的批评下，李兑悬崖勒马，中止与秦国交易，东方合纵同盟勉强维持下来。

齐湣王是活雷锋吗？

当然不是。

他有自己的目的。

齐国虽与秦国并称为东西双雄，秦昭王也给齐湣王送上“东帝”头衔以示尊敬。不过谁都知道，齐国已被秦国甩开几条马路远了。打破均势的转折点，是秦国吞并巴蜀成功，齐国吞并燕国失败。不必说秦国，就连赵国也后来居上，吞并中山后，赵国大有赶超齐国之势，所以权臣李兑才会那么嚣张狂妄。

要确保齐国在东方的优势，齐湣王只有一个选择：对外扩张！

往哪扩张呢？宋国！

战国的诸侯版图，可概括为七加二：七就是七个大国，即战国七雄；二就是两个中等国家，一个是中山，被赵国吞并了，另一个就是宋国。为了与秦、赵抗衡，齐国必须扩张，与之相邻的宋国自然成为

齐湣王案上的大肥肉。

齐湣王极力维护五国合纵同盟，是担心秦国干涉其灭宋计划。

倘若说天下有哪个国家可以阻止齐国的扩张，这个国家必定是秦国。当年齐国吞并燕国，正是在秦国的武力干涉下，不得不把到嘴的肥肉又吐出来。

为了与秦国妥协，齐湣王一连派了三名说客入秦。此三人分别是冷向、苏代与宋郭。

冷向对秦昭王说：“齐国消灭宋国，魏国就危险了，大王可唾手得到魏国的安邑城。只要秦齐结盟，燕、赵必恐惧，定要割地讨好秦国。齐国伐宋，对秦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苏代说：“齐国本来就很强大，若吞并宋国，楚国与魏国一定会害怕，为了自保，只能投靠秦国。秦国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令魏国割让安邑，这就是齐国送给您的礼物。”

从这里可以看出齐湣王绝非善辈。他一面维持东方五国合纵同盟，作为压制秦国的筹码；另一方面却打算牺牲同盟国的利益，以换取秦国对伐宋的支持。他的厚黑与无节操，不在李兑之下。冷向与苏代说辞虽有差异，中心思想是一样的：齐国伐宋，对齐、秦两国是双赢的选择。

秦昭王冷冷地问：“齐国政策反反复复，一会儿搞合纵，一会儿搞连衡，这怎么解释呢？”

合纵就是齐与东方四国联合伐秦，连横就是与秦国联合，出卖东方诸国的利益。齐湣王一边打着合纵的旗号，一边又暗自与秦国勾结。齐国的政策，究竟是反秦还是亲秦，着实让人看不懂。

苏代答道：“每个国家都有不对人言的秘密，齐国不能不做两手准备。齐王知道，若不与秦国连横，就算灭了宋国，也不可能安定。中原游说之士，竭力离间秦、齐关系。西入秦者，没有一人说齐国好话；东入齐者，没有一人说秦国好话。他们不愿看到秦齐结盟，若是三晋与楚联合，必定会进攻秦国与齐国；若秦国与齐国联合，同样会图谋三晋与楚国。大王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

言下之意，齐国的意图是与秦国联合，共同瓜分三晋、楚国。

秦昭王表态道：“宋王像夏桀一样残暴，像这样的国家，欺辱它不算逆天行事，消灭它不算结仇。我希望齐国不要跟宋国讲和，要不断地进攻，直到把它灭掉。”

这个回复，令齐湣王大喜过望。

然而，搞阴谋不是齐湣王的专利。齐湣王能背后搞小动作，秦昭王就不能搞吗？齐湣王为了夺取宋国，不惜出卖盟友，这也给了秦国可乘之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才是高明的战略。只要齐国吞并宋国，各路诸侯肯定坐不住，到时看齐湣王如何收拾残局。

公元前286年，齐国发动雷霆攻势，大军突入宋国，短短几个月时间，老牌诸侯国宋国便从地球上消失了，土地人口并入齐国。

灭宋之战，令齐国声威大振。周边小国，如鲁、卫、邹等，无一例外，全部向齐国称臣。齐湣王意犹未尽，他挟胜利之威，出兵占领楚国淮北之地。紧接着，齐国又把打击目标锁定在淮河下游的淮夷，武力征服，再夺取七百里之地。

此时齐国的领土几乎扩张一倍，疆域面积已经不逊于秦国。齐湣王野心勃勃，甚至想出兵吞并二周，自立为天子。

然而，齐湣王没有想到，灭宋之战，是齐国由鼎盛走向衰落的开始。

齐湣王灭宋国、取淮北、驱淮夷，开疆拓土，傲视天下，诸侯莫不震动。其中最为恐慌的国家，当属燕国。

燕国曾亡于齐国之手，后来在秦、魏等国的武装干涉下，齐国不得不撤兵，燕国得以复国。燕昭王是战国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矢志复仇雪耻。为了干掉齐国，他以名将乐毅主持军政，同时暗遣著名纵横家苏代入齐，安插在齐湣王身旁，随时掌握齐国的政治动向。

从军事实力上说，燕国远非齐国的对手，如何能打败齐国呢？

乐毅对燕昭王说：“齐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仅凭燕国之力是不行的，必须联合赵国、秦国、楚国、魏国，共同伐齐。”

无论是东方诸侯国还是秦国，都不想看到齐国的强大。在此之前，秦国吞并巴蜀、赵国吞并中山，都没有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为什么偏偏齐国吞并宋国，会引起诸国的敌视呢？当时中国的重心在中原，巴蜀、中山都是偏远地区的蛮夷国家，中原诸侯自然懒得理会。宋国则不同，宋国是殷商后裔，立国时间与周朝一样久远，地处中原，如今齐灭宋国，在中原地区一枝独秀，其他中原诸侯岂能不闻风色变？

为了对付暴发户齐国，东方诸侯甚至不惜与秦国合作。在乐毅等人的努力下，燕、秦、赵、魏、韩五国达成协议，共同对付齐国。

五打一，齐国在劫难逃。

公元前285年，乐毅的燕国兵团率先发起进攻，在间谍苏代的协助下，燕师两战两胜，斩首五万，齐军遭到迎头痛击。秦昭王派大将斯离、蒙齐率领一支远征军，与赵、魏、韩三晋部队会师后，杀入齐

国，攻城略地，夺取齐国河东九城。

作为军事强国，齐国是有人才的。齐军统帅触子是一名优秀将领，他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沿着济水构筑防线，恃险而守。只要把战争拖入持久战，内部矛盾重重的五国联军必然瓦解，到时必然作鸟兽散，齐军可乘机各个击破。只是齐湣王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严令触子出击。硬碰硬的结果，是人多的打垮人少的，齐师再度败绩。

五国联合伐齐，没有很明确的战略目的。济水之战后，各国将帅认为齐国军事力量已被大大削弱，剩下的事交给外交官去处理，便纷纷打道回府。秦、韩等国的军队撤走了，燕军统帅乐毅却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继续深入，直捣齐国首都临淄。

在之后五年时间里，燕国凭一己之力，横扫齐国。乐毅连下七十余城，曾经盛极一时的齐国几乎灭亡，只剩下两座孤零零的城池。好高骛远的齐湣王求救于楚国，先前保持中立的楚国并不仗义，以救援的名义出兵，却把齐湣王砍头了。

齐国并没有亡国。

两个原因。其一，雄才大略的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猜忌心强，解除乐毅兵权，乐毅投奔赵国；其二，齐国名将田单有神勇表现，先是以火牛阵大破燕师，解即墨之围，而后开始奇迹般的反扑，光复齐国全境。

然而，在废墟中重生的齐国，已威风不再，从一流强国滑落到二流国家，永远失去与秦国争雄天下的机会了。

齐国垮了，唯一可与秦国抗衡的，只有崛起中的赵国。

二四 渑池：没有硝烟的战场

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赵国国力蒸蒸日上，吞并中山及北部诸胡后，已成为北方一大强国。

在五国伐齐之战中，赵国一颗将星冉冉升起，此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将廉颇。公元前283年，廉颇率领赵国军队大败齐军，攻取昔阳（一说晋阳），此役有力地配合了乐毅对齐国诸城的扫荡，也使廉颇英勇善战的美名广为人知。战役结束后，赵惠文王将廉颇提拔为上卿。

在廉颇伐齐的这一年，赵惠文王得到了一个宝贝，便是著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美玉，据说是春秋时期楚人卞和所发现，故称为“和氏璧”，被认为是一件无价之宝。和氏璧如何从楚国辗转到了赵国，其中的缘由我们也弄不清楚。赵惠文王得此璧后，爱不释手，可是秦国人偏偏要来找麻烦。

秦昭王听说赵国有这么一块宝贝，便派使者入赵，开出一个令人心动的条件：以十五座城交换和氏璧。我们常说“价值连城”，和氏璧的价值不是一座城，而是十五座城。对一个国家来说，十五座城显然比一块美玉要更有价值，以璧换城，这是不吃亏的。问题是秦国的信用等级很低，收了和氏璧后，恐怕要翻脸不认人。秦人劣迹斑斑，天下人都知道，跟秦国打交道，一定得谨慎，否则一不小心就要落入其陷阱。

倘若拒绝秦国呢？

拒绝秦国就意味着有战争的风险。

怎么办呢？赵惠文王打算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派一个机警

且才智过人的使节前去与秦昭王周旋。这时，宦官令缪贤向赵惠文王推荐自己的门客蔺相如。

令缪贤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认为蔺相如有勇有智有谋，让他出使秦国，一定会不负所望的。”

赵惠文王召见蔺相如，问道：“秦王要用十五座城交换和氏璧，您看要不要给他呢？”

蔺相如答道：“秦强赵弱，秦国的要求合理，不能不给。”

赵惠文王又问：“要是秦王拿走了和氏璧，却不割让十五座城，怎么办？”

蔺相如答说：“秦国以十五城交换宝璧，如果我们不答应，就是理亏。反之，秦国得到宝璧，却不割让十五城，就是他们理亏。权衡利弊，宁可让秦国承担理亏的责任。”

赵惠文王点点头，又问：“依先生之见，何人可出使秦国？”

蔺相如说：“大王要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愿意亲自前往。如果秦国交出城池，和氏璧就留在秦国。倘若秦人毁约，我定会完璧归赵。”

赵惠文王便派遣蔺相如为赵国使节，捧着和氏璧前往秦国。

入了秦都咸阳，秦昭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这块宝璧果然是无价之宝，无论是玉的质量或做工，都堪称天下无双。秦昭王边欣赏边赞叹，又递给妃嫔与左右侍从观赏，大家都啧啧称赞。

秦昭王只玩弄宝璧，只字不提割城的事。蔺相如看出他并没有以

城换璧的诚意，便走上前说：“和氏璧上有一点瑕疵，请允许我指给大王看。”秦昭王没起疑心，把和氏璧交还给蔺相如。

不料蔺相如拿回璧后，后退了几步，把宝璧高高举起，背靠着一根大柱子，怒发冲冠，冲着秦昭王说：“大王想得到这块美玉，要用十五城来做交换。赵国君臣都认为，秦国只是仗着自己强大，想巧取豪夺罢了，根本不想用城池来交换，千万不能把和氏璧交给秦国。我却认为，普通老百姓尚且不肯相互欺骗，何况是秦这样的大国呢？为了一块玉璧与秦结怨，这是不合适的。赵王听了我的话，斋戒五日，派我前来献上玉璧，这是出于对秦国的尊重。今天大王没在朝堂以隆重的仪式接见我，而是在章台这种普通的宫殿，礼节上十分不到位。更有甚者，大王拿到和氏璧后，递给妃嫔、左右观赏，毫无恭敬之心，当我这个赵国使臣不存在，这是对我的侮辱戏弄。我看大王没有诚意用城池交换和氏璧，便把玉璧收回来。大王若要逼我的话，我就跟和氏璧同归于尽。”

说完后，蔺相如双手举起和氏璧，斜对着柱子，要把宝璧往柱子上砸下去。

秦昭王急了，赶紧喊“住手——”，然后走下殿堂，向蔺相如赔礼道歉。他装模作样地唤来掌管图籍的官员，取来地图，圈了十五座城池。蔺相如很细心，看出秦昭王只不过敷衍了事，这证实了他的判断：秦国根本无意用十五城来交换和氏璧，只是想强取豪夺罢了。

蔺相如没有交出和氏璧，而是说：“和氏璧乃是天下至宝。赵王欲献出此宝贝时，斋戒五日。大王也应该斋戒五日，并在朝堂之上，以隆重大礼接收宝璧。这样我才能放心献上和氏璧。”

秦昭王没办法，只得答应了。

蔺相如不相信秦国的诚意，他不等了，派亲信乔装打扮，怀揣着和氏璧，走小路回赵国去了。

五天后，秦昭王煞有其事在朝堂上大张旗鼓，迎接蔺相如。蔺相如来了，却没有抱着光彩夺目的和氏璧。他朗声说道：“自从秦穆公以来，秦国共有二十多位君主，没有一个曾信守盟约。我担心被大王蒙骗，派人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

此言一出，众皆骇然。

秦昭王脸色难看得要死，目露凶光。

蔺相如毫无惧色地说：“秦强赵弱，大王若先割让十五城给赵国，赵国敢不交出和氏璧吗？至于我，欺骗了大王，罪当处死。大王尽管用最残酷的烹刑杀我，我没有怨言。只是希望大王及诸位大臣好好考虑这件事。”

果然是不怕死的硬汉子。

秦昭王与诸大臣面面相觑。有人主张杀掉蔺相如，秦王还算有点理智，蔺相如只是个小角色，杀之何用！他只得无奈地说：“算了。今天就算杀了蔺相如，也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秦赵两国关系。还是以使节之礼招待他吧，放他回赵国去，赵王不会因为一块美璧而故意欺骗秦国吧？”

秦国最终没有把十五城割给赵国，赵国当然也没把和氏璧给秦国。

蔺相如以自己的大智大勇，不辱使命，完璧归赵，保住赵王的脸面。赵惠文王提拔他为上大夫，跻身重臣之列。

没能得到和氏璧，秦昭王心里很不爽快。

在之后数年，秦昭王多次发兵攻打赵国，以泄心头之恨。譬如公元前282年，白起伐赵，攻取两城；公元前281年，秦国再攻赵，取

离石城；公元前280年，白起复攻赵，斩首两万人，取光狼城。

跃居第二号强国后，赵国仍然不是秦国的对手。

不过，对秦国来说，最重要的敌人，并不是北方的赵国，而是南方的楚国。

在伊阙之战后，楚顷襄王迫于秦国的压力，被迫臣服。然而，秦、楚绝不可能长久相安无事，楚怀王被绑架并死于秦国，这是两国关系无法解开的结。就在秦国频频打击赵国时，楚国蠢蠢欲动。

有人对楚顷襄王说：“先王被秦国欺骗，客死他乡，没有比这个仇恨更大了。一个普通百姓有仇，尚且敢报复万乘之君，当年白公熊胜、伍子胥就是这样做。楚国土地面积方圆五千里，拥有甲兵百万，足以在疆场上纵横驰骋、耀武扬威。可是大王居然受困于此，实在为大王感到不值得。”

这一番话，道出多数楚国人的心声，也刺到了楚顷襄王内心的痛处，激起他复仇的欲望。楚与秦仇深似海，父仇不报也就算了，还臣服于秦国，是可忍孰不可忍？

楚顷襄王派人出使各诸侯国，打算与东方各国重新合纵，联合起来讨伐秦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秦国与楚国的一场大战已无可避免。

秦国必须先下手为强，在楚顷襄王合纵诸侯的计划未得逞之前，打垮楚国。要打击南面的楚国，就必须同北面的赵国和解，否则两线作战，对秦国十分不利。秦王派人出使赵国，希望两国化干戈为玉帛。他邀请赵惠文王前往渑池会晤，缔结和平条约。

这会不会是一场鸿门宴呢？

赵惠文王若贸然前去，会不会落得楚怀王的下场呢？

他召来廉颇与蔺相如，听取两人的意见。廉颇与蔺相如说：“大王不去的话，是示弱于秦国。”两人都认为，既然秦王要谋和，赵王应该前往渑池。赵惠文王便动身前往，智勇双全的蔺相如随行，廉颇则陈兵于国境线，严阵以待。

临行前，廉颇对赵惠文王说：“大王前去渑池，估计往返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天。倘若三十天过后还未返回，请允许暂且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人的阴谋。”这是最坏的打算，若秦昭王在会议过程中绑架赵王，赵国就另立新君，与秦国血战到底。

渑池之会，没有刀光剑影，只有口水战。

作为东道主，秦昭王设宴款待赵惠文王、蔺相如等人。酒兴正浓时，秦昭王提议说：“听说赵王十分喜好音乐，不如奏瑟一曲助兴吧。”瑟是古代的一种大型乐器，长约三米，规格有多种，从十六弦到五十弦不等，常见的是二十五弦。赵惠文王不知是计，当即奏瑟一曲。

岂料曲音刚落，秦国御史故意拔高声调，让左右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喝酒，命令赵王奏瑟一曲。”这是故意羞辱赵国。

出席酒宴的赵国随行人员听了非常生气，却毫无办法。这时蔺相如站起身，手持一个盆缶，走到秦昭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精通秦国音乐，请准许我献上盆缶，大王也露一手，相互娱乐一下。”缶就是装酒的瓦罐，秦人经常击缶而歌。

秦昭王沉着脸，不理睬蔺相如。

蔺相如不罢休，又走近几步，跪在秦王面前，高捧着缶，要求秦王击缶。秦王火了，怒发冲冠，目露凶光，蔺相如毫不退让，大声喝道：“我与大王仅五步之遥，大王不答应，蔺相如的鲜血就要溅到大王身上了。”言下之意，你要不击缶，我跟你玩命。

宴会厅快成战场了。

门外的卫兵冲了进来，操着戈戟，围住蔺相如。蔺相如虎目怒睁，似乎有火焰从眼睛喷射而出，所有卫兵怔住了，不由得后退几步，双手发抖。在蔺相如排山倒海的气势威逼下，秦昭王服软了，拿起竹筷，勉为其难地在缶上敲打一下，算是击缶了。

清脆的击缶声，余音绕梁。

蔺相如唤来赵国御史，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吩咐他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高傲的秦国人何时受过这等羞辱呢？

一位秦国大夫跳出来喊道：“请赵国用十五座城来为秦王贺寿。”

蔺相如轻蔑地瞟了他一眼，回应说：“请秦国用咸阳城给赵王献礼。”

全场鸦雀无声。

一向铁嘴铜牙的秦国辩士们已是哑口无言。

渑池之会，秦、赵两国角力于没有硝烟的战场，赖蔺相如光芒四射的表现，赵国捍卫了国家尊严，秦国则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尽管有些不愉快的经历，为了共同利益，两国仍然达成和平协议。

现在，秦国可以腾出手来，全力讨伐楚国了。

二五 横扫楚国：战神白起的表演

楚顷襄王要复仇雪耻，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在春秋时代，楚国曾是最富进取精神的国家，如今蜕变成最保守的国家。国家的运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楚国内政混乱，外交一塌糊涂，军队号称百万之众，实则不堪一击。凭什么报仇呢？

大夫庄辛是少数头脑清醒冷静的人之一，他对楚顷襄王的军事冒险计划持反对意见，批评说：“大王宠幸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这四个人都是花花公子。大王与他们一伙，淫逸侈靡，罔顾国政，不要说攻打秦国，恐怕连首都郢城都保不住。”

楚顷襄王大怒道：“你难不成把我看作是不祥之兆吗？”

庄辛答说：“臣下不敢，我只是看到事情的必然结果。大王若仍宠幸这四个人，楚国必定灭亡。”

忠言逆耳，楚顷襄王压根儿听不进去，我行我素，磨刀霍霍。

楚国还没动手，秦国先下手为强。

秦昭王与赵惠文王达成渑池协定，避免两线作战，已无后顾之忧。

公元前279年，战神白起挥师数万，攻入楚国。

白起对楚国的政治形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他说：“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国内政混乱，奸臣当道，

民心不附；更糟的是，嚷嚷复仇却武备不修，破旧不堪的城池也没加固修缮。难不成光靠激情就可以打赢一场战争吗？

从兵力对比看，白起不足十万人，兵力比伊阙之战还要少；楚国号称有一百万军队，虽然不可能全部上阵，动员二三十万还是行的。从楚怀王到楚顷襄王，楚国并未展现军事大国的风采，反倒屡屡遭到鲸吞蚕食的命运。这次，冷酷的白起来了，等待楚国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秦国兵团迅速南下，进攻楚国的鄢城（湖北宜城东南）。

鄢城是楚国别都，有重兵把守，虽不能称为固若金汤，想攻下也非易事。名将之所以成为名将，总是不按常理出牌，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战果，这是所有名将追求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将是艺术家，只是这种艺术血腥而残忍。要攻破一座坚城，有常规手段，也有非常规手段。常规手段是爬云梯攻城，使用冲车、撞车撞破城门，这种攻城手段，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白起没那么笨，他有一样绝杀武器：水。

水是柔的。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白起深谙老子所言之理，他把河流当作一支奇兵，决汉水以灌鄢城。秦国水利工程技术独冠天下，引水灌城不过是小菜一碟。多年未修缮的城墙轰然倒塌，洪水呼啸而入，冲决屋宇、吞噬生灵，鄢城一片汪洋，死者数十万人。

鄢城之战，震动天下。

楚国第二大城陷落后，士气凋零，白起一鼓作气，再下邓城、西陵。以区区数万人入敌国，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白起之功可谓大矣。他从来不是一个知足的人，他要用楚国人的鲜血铺就自己灿烂

的前程。向前，向前，直捣楚都郢城！

秦军渡河后，拆毁桥梁，焚毁船只。以寡击众，必须在勇气上压倒对手，不留半点后路，白起相信自己可以完成惊天伟业。两百多年前，楚都郢城也曾沦落，那是吴王阖闾的时代，是兵圣孙武的时代，是一代名将伍子胥的时代。吴国三位伟大英雄的不朽传奇，激励白起捣破郢都的决心。他孤军深入楚国腹地、没有补给，兵行险着，若非有过人的胆识，谁敢完成这样的军事冒险呢？

兵圣孙武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之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意思就是说，善于用兵的人，兵员不需要再次征调，粮食不需要再三转运。各种军用物资从国内取得后，粮草补给就在敌国解决。

孙武在两百多年前能做到的事，白起怎么不能做到呢？自从《孙子兵法》问世，没有一个人能像白起那样，把孙子的军事艺术思想实践得淋漓尽致。秦军的补给，完全不仰赖国内运输，而是掠夺楚地粮食。白起自己这样说“掠于郊野以足军食”，以这种近乎野蛮的手段，一路长驱直入，杀到郢城之下。

楚国很久没有打过像样的仗了。

在秦、齐的围猎之下，秦楚丹阳之战中，楚军被砍下八万颗脑袋；齐楚垂沙之战中，楚军全军覆没。即便败得那么惨，郢都也从未遭遇威胁，仍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一向远离战争的郢都百姓，两百年来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临近，整座城市一片混乱，陷入恐慌之中。

对于楚军的士气，白起评论说：“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楚国人多势众，只要能坚守一个月，白起就要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只是白起已敏锐判断，连败几仗后，楚军

已没有斗志了。

秦军的士气又如何呢？

白起说：“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战，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作为军国主义国家，军队就是士兵的家，将帅就是士兵的父母，一上战场，就有死不旋踵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楚国人所没有的。

两军相遇勇者胜。恐惧、害怕本是人之常情，但越恐惧、越害怕，所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越怕打败仗，就越会打败仗，越怕秦人杀入城，城就越保不住，这就是心理学的法则。

一方是嗜血的饿狼，一方是软弱的绵羊，还没开打，胜负已决。郢都甚至连像样的保卫战也没有，一战即溃，楚顷襄王狼狈而逃。白起没有费什么气力，便一鼓作气占领郢都。

首都轻而易举被端掉了，楚国有末日来临的恐慌。孔子说“知耻近乎勇”，倘若楚顷襄王有知耻之心，这些年就应该大力改革军政，但他没有。这位君王显然只是阿斗型的人物，他上台后非但没有矢志报父仇，反而在秦国威胁下臣服，实非英雄人物。如今抱着侥幸心理挑战强秦，只能输得精光。庄辛说的话——“淫逸侈靡，罔顾国政”，不要说攻打秦国，恐怕连首都郢城都保不住。不幸预言成真。

楚军一溃千里，白起数万人马竟然得以蹂躏楚国的核心地带，毁楚先王之庙，西烧夷陵（湖北宜昌东南），向东攻至竟陵（湖北潜江西北），而后向南挺进，攻到洞庭湖一带。秦军横冲直撞，所向无敌。

楚顷襄王逃哪去了呢？他一路狂奔逃往陈地（河南淮阳），迁都于此，远远避开秦军的兵锋。国家残破，君臣苟且偷安，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再也承受不住悲愤之情，他对国君竭忠尽力，岂料遭到

被流放的下场。心系国家君王，却被朝廷抛弃，想为国家效力，却报国无门，真是人生的悲哀。郢都沦陷后，他的心死寂了，无法承受国家沉沦之痛。爱之深，痛之切，痛到深处，唯有一死。屈原自沉于汨罗江，痛苦的灵魂终于解脱了。

这一战，“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楚顷襄王彻底丧失信心，楚国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鄢、郢之役是白起在伊阙之战后的又一军事杰作，他以寡击众，大胆深入，把大片的土地收入秦国囊中。秦国设南郡，楚旧都郢城并入秦国。

白起如一阵旋风席卷东方，韩、魏、赵、楚各国无不败在他手下，他是秦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将军。伐楚之后，秦昭王封白起为“武安君”。

苦难的日子还没结束。

两年后，即公元前277年，秦军卷土重来。还是令人胆战心惊的白起，他挥师进攻巫郡；与此同时，蜀郡太守张若进攻黔中郡。楚国人已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抱头鼠窜，两个郡又轻而易举地落入秦人之手。

要是以这种速度蚕食，恐怕用不了几年，楚国就要成为第一个出局的国家。楚国上下弥漫着悲观的气氛，没有谁知道苦难还要持续多久，所有人对国家前途一片迷惘。痛定思痛，楚顷襄王静下心来反思战败的原因。

有一个人早就预言楚国的失败，他就是庄辛。楚顷襄王不听其谏，庄辛遂离开楚国，远走赵国避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楚顷襄王不能不承认，庄辛是深谋远虑、老成持重的政治家。要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除了庄辛之外，再无第二人了。

楚顷襄王放下架子，派人前往赵国，召庄辛返回祖国，共商国策。这是君王委婉的认错，能认错的君王，还是有希望的。庄辛身在赵国、心在楚国，他归心似箭，马上启程，踏上返回故乡之路。到了楚临时都城，面带惭色的楚顷襄王出城相迎，诚恳地说：“寡人没有听先生的话，以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现在要怎么办呢？”

庄辛叹一口气道：“大王若能采纳我的建议，事情尚有转机；若是不听，情况还会更糟。”国家大厦将倾，就需要这样勇于任事、敢当大任之人。

楚国还有机会吗？连楚顷襄王都怀疑了。

庄辛以肯定的语气说：“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以前商汤、周武王仅凭借百里之地而崛起，夏桀、商纣拥有天下却走向灭亡。楚国的面积虽然大大缩水，仍方圆数千里，比起商汤、周武王的百里之地，还算是多的。我还要说说大王的事，大王身边有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四人，饭桌上吃的是封邑的粮食，车上载的是国库里的金帛。大王跟他们驾车在云梦泽一带驰骋玩乐，不把天下国家的事放在心上。可大王并不知道，秦国宰相魏冉正受命于秦王，打算吞并崑塞之内的土地，把您逐往崑塞之北。”

楚顷襄王面如土灰，浑身发抖。攻破鄢、郢，夺取巫、黔后，秦国意犹未尽，还要得寸进尺，他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四个吃喝玩乐的宠臣是靠不住了，能力挽狂澜的人，只有庄辛。

很快，庄辛被封为阳陵君，全权负责国家军政。

庄辛很快展示自己非凡的才干与超绝的胆识，他雷厉风行，整饬军队，重振士气。楚国军事力量虽遭重创，驻守东部的军队建制仍完整，庄辛把十几万精兵调往西线，为收复国土做准备。

鄢、郢、巫郡都是被白起攻破，驻扎有秦国精锐部队，难以争

锋。只有黔中郡的驻军是来自蜀郡的秦军，战斗力相对较弱，且位于长江之南，秦国救援难度较大。庄辛觑准敌人这个弱点，集结十几万大军，对江南黔中郡发动猛攻。在楚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秦军抵挡不住，只得撤向江北。庄辛一鼓作气，解放黔中郡十五座城池。这是楚国与秦国交战史上，难得的一次胜利。

这一战，令楚国转危为安。

秦国铁血宰相魏冉放弃继续攻打楚国的计划，有两个原因：其一，庄辛回归后，楚国军政有了起色，武力收复黔中郡，秦国不得不重新评估楚军的战斗力；其二，魏昭王刚刚去世，政权交替之时，也是一个国家的动荡期，容易钻空子。

魏冉很快调整战略，把进攻的矛头直指魏国。

二六 割地事秦，犹抱薪救火

齐国衰落后，秦国与赵国成为诸侯中实力最强者。

这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时代，只有扩张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

公元前277年，魏昭王去世，他的儿子魏圉即位，史称魏安釐王。在春秋时代，各诸侯还奉行“不伐有丧之国”的传统礼法精神，这种精神在战国已是荡然无存。与魏国相邻的赵国觑准机会，公元前276年，大将廉颇挥师南下，一举攻克魏国幾邑。早已衰弱的魏国本来就不是凶猛枭鸷赵国的对手，屋漏偏逢连夜雨，秦国人又卷了进来。

还是白起！

这位战无不胜的名将俨然是秦国的一面旗帜，无论他到哪里，都令人闻风胆丧。倘若要笔者罗列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白起无疑是排名第一。他的大名远胜千军万马，只要报上名号，敌人足以吓得腿软。白起不费吹灰之力，连下魏国两城。

只要被秦国人盯上，就是倒霉。

铁血宰相魏冉不想让白起一人抢尽风头，他要亲自出马。

公元前275年，魏冉亲征魏国，势如破竹，竟然一鼓作气杀到魏都大梁城。魏国震动，魏安釐王紧急向韩国求援。

韩国与魏国是难兄难弟，都是秦国蹂躏蚕食的对象，两国的关系，如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韩釐王不能坐视不管，尽管他知道秦国的厉害，仍派出老将暴鸢驰援魏国。魏冉围城打援，率主力部队在开封与韩军决战，韩军大败，暴鸢败走，损兵折将四万多人，几遭灭

顶之灾。

援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大梁城，魏安釐王呆若木鸡，六神无主。与魏昭王相比，魏安釐王有雄心壮志，只是大敌当前，雄心也要付诸流水。他不得不采用父亲惯用的手段：割地求和。

一割又是八座城池。

就算魏国的城邑再多，也承受不住一次次的割地献城。

“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事实就是如此。魏国割了八座城池，如肉包子打狗，只是让饿狗饱餐一顿罢了。问题是，饿狗吃完后还要吃，你有多少肉包呢？

魏冉的胃口比饿狗还大。不久后，他又卷土重来。魏安釐王一肚子苦水，瘟神难送，奈何奈何！没办法，只能拼了！

大将芒卯率军在宅阳（河南郑州北）阻击秦军，魏国精锐悉数上阵。魏冉冷笑了，米粒之珠，能放光华吗？纵兵出击，魏军大败，芒卯落荒而逃。

秦军再次包围大梁城。故事很沉闷，没有惊喜可言。魏安釐王又向韩国求援，仗义的韩釐王又一次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出兵相救，援兵又一次大败而还。只要大梁城被攻陷，魏国就完蛋了。难道还要割地求降吗？

大臣们众口一致，反对割地求和，纷纷慷慨陈词说：

“当年魏惠王以十万大军伐赵，拔取邯郸城，赵国坚决不肯割地求和，最终得以复国；齐宣王时，齐师伐燕，破燕都，燕国不肯割地求和，后来也复国了。赵、燕之所以能保住国家，没有被他国吞并，正是因为他们能禁受住艰难的考验，不轻易割让土地。秦国贪得无

厌，天下诸侯没有一个愿意与它亲近。魏国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土地，被秦人鲸吞蚕食得差不多了。魏国刚刚割让八座城池，交割尚未完成，秦军又出动了，大王试想想，秦人的胃口哪有满足的时候呢？”

事到如今，只能豁出去了。

无论如何，魏安釐王也得保住大梁。他下一道命令，全国一百多个县动员起来，招募士兵前往保卫首都。大梁城的兵力激增到三十万，摆开与秦军一决死战的架势。

架势是拉开了，魏安釐王仍寄希望于和平解决，派中大夫须贾会晤魏冉。

魏冉接见须贾，态度颇为傲慢。

须贾说：“《周书》说‘天无常命’，意思是说幸运不可能一而再地出现。您打败暴鸢的韩军，割魏国八城，并非兵力精锐，也非计谋高深，只是运气好罢了。如今您又挟兵前来，打败芒卯，拔取宅阳，围攻大梁，难道认为自己永远是上天的宠儿吗？聪明的人是不会这样认为的。魏国已经召集百余县的部队驻戍大梁城，兵力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的军队，守卫城墙高达十仞的都城，就算商汤、周武王复生，也不能轻易攻下。”

这是告诉魏冉，魏国定会血战到底，不会投降。

魏冉面色微变，须贾又说：“您不顾虑楚、赵的威胁，想越过十仞高的城墙，攻打三十万魏军，还自信满满、志在必得。自从天下分裂以来，从没有人能做得到。您进攻大梁却无法得手，旷日持久军队必疲惫不堪。若楚、赵乘虚而入，您一定前功尽弃，到时您的领地陶邑也将不保。请您仔细考虑，别冒险进攻大梁。”

听到这里，魏冉脸色大变。

秦国的实力固然比魏国要强，要攻破大梁城却非易事。大梁城在当时是最坚固的城池，堪称军事防御的杰作，城墙厚实，高十仞，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大约有十八点五米，比现在保存最完整的西安古城墙还要高三分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秦、魏军事力量更为悬殊，对大梁城仍久攻不破，最后采取水淹战术，大梁城仍顽强坚持三个月之久。

如果不能速战速决，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觊觎魏国的不只是秦国，在魏冉攻魏的同时，赵国大将廉颇再建功勋，连续攻下防陵、安阳两座魏城。倘若廉颇兵团突然发难，截断秦军后路，魏冉兵团岂非要被包饺子了？除了赵国之外，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楚国也有可能乘虚而入，到时魏冉麻烦就大了。

身为秦国丞相，魏冉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有一块封地，称为陶邑。陶邑原本是宋国的土地，宋国被齐国吞并后，五国出兵伐齐，齐国几遭灭国之祸，陶邑成为秦军的战利品，后来封给魏冉。陶邑与秦国并不接壤，孤悬于东方，是一块飞地。魏冉不满足当秦国丞相，他幻想以陶邑为基地，自立门户。若是赵、楚联手消灭这支秦军，下一步必然直取陶邑，魏冉自立为王的梦想就破灭了。

须贾的一番话起作用了，魏冉最终放弃进攻大梁城，魏国由是躲过一劫。

放弃攻打大梁，不等于秦国放弃蚕食战术。

一年后（前274），魏冉第三度杀入魏国，攻下四座城池，斩首四万人。

面对秦国疯狂的进攻，魏国如待宰羔羊，全无抵抗能力。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只有一个办法：寻找新的靠山。放眼天下，能与秦国抗衡的，只剩下一个国家：赵国。问题是，赵国也把魏国当作大肥

肉，时不时扑上来咬上几口。想投靠赵国，就得先交见面礼。不断丧失土地的魏国，当然不可能再献上几座城邑当作见面礼，怎么办呢？

魏安釐王不愧深得厚黑学之精髓：我就拿韩国当作见面礼。

韩与魏本是战略盟友，魏冉三度攻魏，韩釐王两次出兵相救，堪称义气。如今魏国为了自保，打算牺牲盟友，魏安釐王给赵惠文王开出的条件是：魏国协助赵国攻取韩国。既能得到一个小喽啰，又能抢别人的地盘，赵惠文王何乐不为呢？

赵、魏联手，进攻韩国华阳城。

魏国的背叛，令韩釐王大为震惊。韩釐王为盟友两肋插刀，岂知竟是这种结局。韩国在七雄中实力本来就弱，面对赵、魏虎狼之师，如何能抵挡？为了保全国家，韩釐王只得向秦国低头，他连续派出几批使节入秦，请求魏冉出兵相救。

要不要救韩国呢？魏冉迟疑不决。

原因很简单：秦国与赵国在渑池之会达成协议，双方罢战休兵。如果魏冉出兵救援华阳，等于撕毁渑池协议，向赵国正式宣战。这意味着秦国对外战略要推倒重来，魏冉不能不慎重考虑。

秦国迟迟不出兵，华阳城危在旦夕，韩釐王急了。他又派一名谋士入秦，此人名叫陈筮，是著名的纵横家。

陈筮入秦，拜见魏冉。

魏冉说：“韩国现在形势很危急吧，才派你来秦国。”

陈筮说：“不危急。”

魏冉十分不高兴，怒道：“你这样可以当韩王的特使吗？韩国使臣络绎前来，都说情形危急，你却说不急，这是为什么？”

陈筮说：“韩国请秦国相救，秦国迟迟不出兵。倘若十分危急，韩国早就投靠其他国家了，还能磨磨蹭蹭吗？正因为不急，才派我前来。”

这就是游说的艺术。

战国时代高明的纵横家十分精通心理学，游说各国权贵时，摆事实讲道理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便是强调有利可图。陈筮言下之意，韩国臣服对秦是有利的，秦若拒绝，韩国只能另觅东家，损失的只是秦国。

利字当头，魏冉很难拒绝。他对陈筮说：“您不必去见秦王了，我立即发兵救援韩国。”

秦国军队的效率天下第一，大规模的援救行动，只花八天的时间就全部准备完毕。武安君白起担任总司令，客卿胡阳为副手，率领最精锐的部队火线驰援韩国。

攻打华阳城的魏军总司令芒卯并非一流名将，他是魏冉的手下败将。白起的军事才华，远在魏冉之上，芒卯要面临灭顶之灾了。这些年，魏国连连丧失土地，已从大国变成小国，魏安釐王想从韩国那里捞回点本钱。只是魏军的战斗力太差，华阳城迟迟未能攻克。芒卯没料到韩国居然向秦国求援，这一疏忽，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白起的大军杀抵华阳城下，芒卯大骇，匆匆应战。魏国士兵向来对秦军心怀恐惧，何况对方总司令是战无不胜的白起。很快，战斗呈一边倒的格局，秦军越杀越勇，魏军大败，芒卯夺路而逃。与此同时，驻守华阳的韩国守军乘机杀出，里外夹击，魏军完全崩溃。

这一战，魏国兵团遭到空前惨败，横尸遍野，阵亡十五万人。

战神白起又一次创造令人瞠目结舌的辉煌战绩。

溃败的魏军逃回国内，白起乘胜追击，连下卷、蔡阳、长社三城，势如破竹。魏国投靠赵国后，自告奋勇打头阵，赵国军队则在后面压阵。魏军一败，赵军已成孤师。赵国兵团总司令并非英勇善战的廉颇，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贾偃。他根本不是白起的对手，双方在黄河畔展开大战，赵军大败，两万人在逃跑时溺死于黄河之中。秦军一鼓作气，占领观津。

与白起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将领，确是悲哀。

两战两胜后，白起已解华阳之围，韩国转危为安。救援任务已完成，秦军也该返回了吧？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形势总不断变化，如果魏军全师而退，白起也不会打魏国的主意。只是华阳一战，魏军被斩首十五万，这远非魏安釐王所能承受。绝不能让魏国有喘息之机，应该继续挺进，直捣大梁。

大梁又一次被包围。

短短几年时间，大梁三次被围，魏国的防御能力几乎不堪一击，任由秦军进进出出。当然，这次韩釐王没有出兵相救，而是幸灾乐祸地看魏安釐王的洋相。魏国那点家底，魏安釐王能不心知肚明吗？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其一，求救于外援；其二，割地请和。赵国与燕国都出兵救援大梁，只是魏安釐王一点信心也没有，他所面对的敌人是白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将军，赵、燕军队岂能突破秦军防线呢？

这时，魏国大将段干子提议：把南阳割给秦国，换取和平。

大将都没有信心，何况小兵。无奈之下，魏安釐王只得同意割地。

客居魏国的纵横术大师苏代警告说：“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

火，薪不尽，火不灭。”这句话后来被苏洵的《六国论》引用，成为一句名言。

魏安釐王沉默良久后，默然道：“您说的有道理，只是这件事已经开始做了，不能更改。”

战败者没有选择。秦昭王与魏冉同意魏国提出的割地请降，白起遂从大梁撤围，班师回国。

华阳之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首先，魏韩两国反目成仇，大大削弱东方诸侯合纵的可能性；其次，魏国在是役中损失十五万人，基本丧失与秦国对抗的能力；最后，秦国的出兵，宣告秦、赵和平相处蜜月期结束，两国转向全面对抗。

二七 阨与之战：两军相逢勇者胜

以“胡服骑射”改革而崛起的赵国，能阻止秦国疯狂的扩张势头吗？

从渑池之会到华阳之战，赵、秦两国维持六年的和平。这是一个乱世，和平总是短暂的，战争才是主旋律。

秦、赵两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王室有共同的祖先，同属嬴姓，都是大骆的后裔。两个国家都与蛮夷相邻，深受蛮夷尚武精神的影响。秦征服西戎，赵征服北狄；秦吞巴蜀，赵并中山，皆奉行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政策。两个虎狼国家，不可能相安无事，不是秦消灭赵，就是赵消灭秦。这一点，秦昭王与赵惠文王都心里有数。

在渑池之会前，秦国多次攻打赵国，夺取若干城邑。两国罢战休兵后，赵惠文王提出一个土地交换计划。赵国用焦邑、黎邑、牛狐交换被秦国占领的蔺邑、离石、祁邑，三城换三城，两不吃亏，秦国同意了。这下轮到赵国耍无赖，收回离石等三城后，迟迟不把另三城移交秦国。赵惠文王的想法，想必是此三城本就是赵国的，没的可换。

华阳之战爆发后，秦、赵交恶，赵国更不打算交出三城。

秦国岂肯吃哑巴亏？

很快，秦昭王派公子缙出使赵国，以强硬的语气要求赵国履行换地协议，将焦、黎、牛狐三城交给秦国。赵惠文王装作无辜的样子说：“寡人没有才能，连国家都不能顾及，哪里顾得上收复蔺、离石、祁三城呢？这是一些不听话的臣子私下干的事，我毫不知情。”堂堂一国之君，竟忽悠不知情，其厚黑也不让秦昭王了。

赵惠文王打起太极，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公子缙没脾气了，只

能干瞪眼，气呼呼地回国复命。秦昭王又不是吃素的，你赵国休想要赖，你不给，我抢也要抢回来。

公元前270年，秦国大举攻赵。

胡阳被任命为秦远征军总司令。他是秦国的一名客卿，所谓客卿就是外国籍的卿大夫，他本是卫国人，在华阳之战中，作为白起的副手指挥秦军大破魏、赵之师，战功卓著。战后他被授予中更军爵，在秦二十等爵中列第十三级，被视为军界后起之明星。为了直接攻打赵国腹地，胡阳设计出一条最短路线，此路线是借道韩国上党地区，直插赵国腹心。

赵惠文王对秦军入侵有心理准备，却未能料到胡阳竟假道韩国，直杀向赵国要害之地。猝不及防，胡阳绕过秦、赵边境线，把赵国在边境修筑的堡垒甩在一旁，进兵神速，包围阨与城。

消息传到邯郸城，赵惠文王大惊失色。阨与城建于地势险峻之处，一旦失守，胡阳将控制险关要隘，赵军想反扑就难上加难了。赵王召集文武大臣，商讨救援阨与城。

赵王问大将廉颇：“有什么办法救阨与城吗？”

廉颇面有难色道：“阨与城距邯郸遥远，道路险阻，不好救援哪。”

在赵国将军中，廉颇战功最为卓著，攻城野战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话音刚落，全体默然。要是连廉颇都说没法救援，恐怕没有人能做到。

赵王又问另一名大将乐乘，乐乘给出同样的答案：“难以救援。”

所有人都长嗟短叹，捶胸顿足。真的无法救援吗？赵王不信邪，他想起一个人，此人姓赵名奢。赵奢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国家有难

时，赵惠文王会想到他呢？

史书没有记下赵奢早年生活轨迹，他曾经在燕国混，任上谷守备军官。回到赵国后，担任田部吏，负责征收田赋。尽管官职不大，他尽忠职守、不畏强豪，展现其雷厉风行的一面。当时赵国最有权势的人，除了赵王外，就是赵王的弟弟平原君，他是著名“战国四公子”之一，养客三千，权倾朝野。有一回，赵奢到平原君家收税，几个管家仗着主人的权势，赖账不交，还恶语威胁。赵奢毫不客气把几个管家抓了砍头，完全不给平原君面子。

怒气冲冲的平原君逮捕赵奢，赵奢毫无惧色道：“您是赵国公子，地位尊贵，今天倘若我不征收您的田税，就是纵容您违法乱纪。公子带头违法乱纪，国法尊严何在呢？国法要是没人遵守了，国家势必衰弱，各诸侯国就会前来瓜分赵国了。”平原君深以为然，把他推荐给赵惠文王，负责管理全国赋税。在赵奢的努力下，赵国国库充实，百姓富裕，国力有明显的上升。

赵奢文武双全，公元前280年，他率兵进攻齐国，夺取麦丘，在战争中体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与敢担大任的勇气。如今阨与危急，赵惠文王自然想到这位沉勇有大略的战将。

廉颇、乐乘都反对救援阨与城，赵奢不以为然，他以坚定的语气说：“虽然阨与城路途遥远，道路险阻，然而，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争斗，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赵惠文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任命他为总司令，率部驰援被围困的阨与城。

对手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秦国兵团，这势必是场硬仗。高明的将领，必有高明的谋略。要打败秦军，就要充分利用其弱点。秦军有什么弱点呢？每战必胜，令秦军骄傲自满，不把任何一个对手放在眼里，胡阳刚在华阳之战中挫败赵师，对赵国军队实有轻视之心。既然

如此，不如将计就计，示弱于敌。

大军刚出邯郸城三十里，赵奢便下令安营扎寨，止步不前。此举令所有人大惑不解，总司令在赵王面前慷慨陈词，难道只是个吹牛英雄吗？军情十万火急，不昼夜疾行，反倒按兵不动，是何道理。有些将领进谏，赵奢发布一道独裁的命令：有敢进谏者，斩！

邯郸距阨与城二百七十里路，秦军总司令胡阳得悉赵国出动大军增援，迅速做出围城打援的部署，留下部分兵力监视阨与，自己亲率主力挺进到距离邯郸七十里的武安。武安是邯郸西部门户，胡阳令秦军摇旗呐喊，敲锣打鼓，摆开进攻的架势，企图吸引赵奢前来一决死战。

然而，赵奢仿佛当敌人不存在。秦军进逼武安，他不为所动，非但不驰援，反倒在营地四周增筑堡垒，当缩头乌龟。赵奢唱的是哪门子戏？胡阳一头雾水，对手的底细他一无所知，遂派人前往赵营刺探究竟。

赵奢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揭穿间谍的身份，反倒供吃供喝，让他行走于军中。统帅心里想的是什么，连赵国将士都懵然不知，间谍又岂能看得清？他看到士兵们挖战壕筑堡垒，挥汗如雨，甚至对统帅心怀不满，这一切似乎都表明，赵奢不过一庸将罢了。间谍心中窃喜，数日后，他向赵奢辞行，赵奢以好酒好菜饯行，兴尽而散。四十里外的武安危在旦夕，赵奢还有兴致大吃大喝，在经验丰富的间谍看来，这位将军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心上。返回后，间谍向胡阳禀报，赵奢乃怯懦无勇之辈，不足为虑。

眼睛所见者，并不都是实；耳朵所听者，并不都是真。

秦谍自以为摸清底细，然而他所见所闻者，不过是赵奢想让他见、想让他闻的部分。兵者，诡道也。决战不只在战场，觥筹交错之间，亦可决定战争的胜负。

战争，有时要赌。

赵奢赌胡阳远道而来，只是威慑性质的佯攻。以胡阳之兵力，想攻克固若金汤的邯郸绝无可能；不攻赵都，秦军势必不会攻邯郸门户武安。倘若赵奢仓猝应战，只会被胡阳牵着鼻子走，尽失战略主动权。这种事，赵奢决不会干，只有牢牢把握主动权，才能逆转战局。

不出赵奢所料，胡阳听了间谍回报后，不禁冷笑了：赵奢行军不过三十里便止步不前、修营筑垒，阝与城不复是赵国土地了。

秦军从武安城外撤退，全力进攻阝与城。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胡阳前脚刚走，赵奢立即下令拔营西进，全体战士卷起甲衣武器，跨上战马，火速驰援阝与。此时距赵奢出邯郸城已过去二十一天，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赵国将士早已铆足劲，只用两天一夜的时间，便急行军穿越难行的山地，出现在距阝与城五十里处，安营扎寨。

从邯郸到阝与，道路艰险难行，倘若胡阳事先预备几支奇兵守住险要之地，赵军便难以突破。只是赵奢伪装得太巧妙了，他瞒天过海，示弱于敌，骗过老辣的对手，出奇不意地出现在战场上。

天降神兵，胡阳大吃一惊，急调精锐部队阻击赵奢。赵国以武立国，不乏深谋远虑的人才。军士许历向总司令赵奢建议：秦兵来势汹汹，应集中兵力，加强阵地防御。他还提议，战斗成败的关键，在于谁先抢占北山这一制高点，先占据者胜，后到者败。赵奢对许历的建议非常欣赏，派一万人马抢在秦兵之前，夺取北山，赢得地形上的优势。

这次救援战，赵国动用多少兵力呢？

在《战国策》一书中，记录有赵奢与齐国名将田单探讨阨与之战的谈话，其中有透露此役赵军兵力的数目，大约是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于秦军的兵力，没有史料记载，估计比赵军要少。因为田单对赵奢说这样的话：“我不是看不上您的兵法谋略，但我不佩服您。为什么呢？将军您打仗投入太多的兵力了。”由是可以判断秦军兵力是不如赵军的。

然而，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这是战争的原则。战争从来不是公平的竞赛，不像拳击比赛时，对阵的拳手必须是同一重量级。秦军战斗力之强，冠绝天下，只有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才有胜利的可能。

赵军在兵力上已占有优势，在时机的把握上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部署，又先胜一着。更重要的是，秦军是侵略者，赵国将士在保家卫国使命的驱使下，士气旺盛，人人争先恐后，奋勇杀敌，秦军如何抵挡呢？

正如赵奢所说，两军相遇勇者胜。英勇的赵国将士挫败秦人的入侵，胡阳在阨与城外大败，率残兵败将狼狈逃回国去。这位秦军的后起之秀，军旅生涯就此结束。赵奢不辱使命，在其他将领都不敢救援阨与时，他勇挑重担，以自己的机智勇气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军在对外战争中，几乎百战百胜，只有少数几次失利，其中两次被孟尝君的远征军打败。孟尝君能力挫强秦，一方面是当时齐国国力强大；另一方面得益于合纵战略，集数个国家之力围攻秦国。与孟尝君相比，赵奢的胜利更为不易。赵国乃是以一己之力对抗秦国，秦国借道韩国攻赵，已是抢尽先机，倘若没有赵奢，阨与乃至赵国西部半壁江山，恐怕都保不住。

赵奢如何一步步化被动为主动呢？

其一，他利用秦军傲慢的心态，故意示弱于敌，营造胆怯畏战的假象；其二，采取反间计，成功地欺骗秦军总司令胡阳；其三，一旦下定作战决心，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乱敌军的军事部署；其四，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发扬勇敢精神，最终在一场狭路相逢的战斗中打败对手。

是役成就赵奢一代名将的美誉。战后，赵惠文王封他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平起平坐，成为赵国重臣。出谋划策的军士许历被破格提拔为国尉，以表彰他对阼与之役的贡献。

阼与之战见证了赵国的崛起，在齐国凋落后，赵国已成为秦国的头号劲敌。

二八 土鸡变成金凤凰

秦已成为天下第一强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作为秦国的君主，秦昭王应该踌躇满志了吧？

其实不然，他越来越有一种大权旁落的失落。有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是被人操纵着的木偶，他高高坐在王座之上，如坐针毡，因为背后站着几个人，几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秦国的政权。

原因很简单，他这个王位的得来，完全是仰仗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舅舅魏冉。秦武王意外举鼎而死，觊觎王座者大有人在，秦国陷入三年之久的“季君之乱”，正是在魏冉的铁腕下，血腥镇压政敌，才把秦昭王扶上王座。魏冉把持大权长达四十年之久，一方面是他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另一方面也是宣太后无条件的支持。除了魏冉外，宣太后的另一个弟弟穰戎在秦国也呼风唤雨，权倾朝野。

君臣权力倒悬，秦昭王的怨气日甚一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从魏国来到秦国，此人的到来，对秦昭王实在是莫大的福音。

此人便是范雎。

范雎是魏国人，从小深受纵横家思想的影响，学习辩论术，游说诸侯。他与张仪一样，胸怀大志，却因家境贫寒而受轻视，只得投奔魏国大夫须贾门下，当一名门客。有一次，他跟随须贾出使齐国，由于能言善辩，受到齐襄王的重视，赏赐他十斤黄金。妒贤忌能的须贾怀疑范雎向齐国出卖情报，魏国宰相魏齐大怒，把范雎抓起来往死里打。

可怜的范雎被打得不省人事，肋骨被打断了，牙齿被打掉了，用草席一裹扔到茅厕里。魏齐的几个门客上厕所时，还往他身上撒尿。

过了好一阵子，范雎苏醒了，他全身仿佛散架了，没法动弹，倘若不能及时得到治疗，定会死在这里。宰相府的厕所有个看门人，范雎决定赌上一把，用微弱的语气对看门人说，若是放他一条生路，定会以重金酬谢。看管厕所的人在相府中地位最卑，听后怦然心动，便前去禀报魏齐：范雎已经死了，不如把他的尸体抬出相府。魏齐喝得有点醉意，便一口答应了。

就这样，范雎死里逃生，躲到好友郑安平家中养伤，改用“张禄”这个假名。本想凭借自己外交才能混个前程，岂料差点死于非命，真是倒霉到了极点。换作一般人，早就心灰意冷，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但范雎决不轻易向命运投降。他要报仇雪恨，要让须贾、魏齐这些陷害他的人付出代价。

天地茫茫，他要去向何方呢？

正巧此时，他听说秦国大夫王稽出使魏国，这可是逃离魏国的天赐良机。

在好友郑安平的帮助下，范雎秘密会晤秦使王稽。王稽对范雎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便让他乔装打扮，混入秦国使团中，得以逃出魏国，前往秦国。

此时的秦国人才济济，范雎虽然才华横溢，想要出人头地却也困难。王稽向秦昭王推荐范雎，称赞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秦昭王懒得理会，这年头江湖骗子太多了，一个比一个能吹牛，却没几个有真本事的。秦昭王根本没有召见范雎的想法，范雎在咸阳待了一年多，连秦王的背影都没瞧见。

难道自己就这样被埋没吗？

不！只要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范雎没有沉沦，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冷眼旁观秦国政局，其敏锐的目光很快就发现强大的秦国实际上危机重重。秦昭王表面上是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形同傀儡，国家大权操于宣太后的两个弟弟——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手中，除此之外，秦昭王的两个弟弟泾阳君与高陵君由于受母亲宣太后的宠爱，地位尊崇。这四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秦昭王，其中又以魏冉的权势最重，财物最丰。

魏冉是著名的铁血宰相，他有一块封邑称为陶邑，孤悬东方，夹在齐、魏、韩三国之间，面积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且土地肥沃。野心勃勃的魏冉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幻想有朝一日，把陶邑变成自己的国家，过过君王瘾。为此，他出动大军，越过韩、魏两国，远征齐国，夺取两座城池，并入陶邑。

细心的范雎看出其中的猫腻儿。自商鞅、张仪以来，秦国对外战略向来是远交近攻，魏冉却反其道而行，舍近求远，攻打与秦国根本不接壤的齐国，此中原因，正在于他假公济私。魏冉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秦国的国家利益，只是他权倾朝野，其他人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即便是秦昭王本人，也毫无办法。

看清了这点，就看清秦昭王与魏冉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范雎看透秦国的权力格局，也看到了希望。若魏冉把持权柄，他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如今他正好可充分利用秦国高层内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问题是，他根本没机会面见秦王，如何是好？

求人不如求己。

范雎要赌上一把。他写了一封自荐信，大意是说：恳请大王拨出一丁点时间，听我当面说几句话，要是不中听，自己宁可受刀斧之刑。人生就是一场赌局，要赌输赢，也要赌生死。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秦昭王一看，那好吧，听听又何妨，便传范雎入宫。

入了宫后，太监在前面带路，直奔离宫，范雎在后面跟着。到了离宫时，秦王还没到，带路的太监在宫外等着，岂知范雎居然迈大步直奔后宫去了。太监大惊，急忙喝住他，恰巧此时秦昭王也到了宫外，太监便吆喝道：“秦王驾到。”范雎故作惊讶状说：“秦国哪有秦王，只有太后与穰侯魏冉罢了。”

这句话，秦昭王听出弦外之音。

入了离宫，秦昭王屏退左右，对范雎说：“寡人愚钝不聪明，恳请先生明示。”

范雎只是“嗯嗯”两声，便不吭声了。

秦昭王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好又说一遍：“有请先生赐教。”

范雎仍然“嗯嗯”两声，又不吭声了。

秦昭王一头雾水，第三次向范雎请教，范雎还是不答话。

秦昭王有点不高兴了，说：“先生难道不肯赐教吗？”

范雎这才缓缓说道：“我是外国臣子，与大王关系疏远，我想说的事情，牵扯到您的亲人。我虽然有愚忠之心，却不知晓大王的真实想法。大王上则畏惧太后的威严，下则被奸臣蒙骗，身居深宫之内，不离保姆之手，一辈子受迷惑，没法辨别奸邪。若任其发展，从大处说可能倾覆宗庙社稷，从小处说可能自身难保。”

秦昭王动容道：“寡人遇见先生，乃上天的恩赐，欲以保存先王的宗庙。不论什么事情，上至太后，下到大臣，先生尽管畅所欲言，

不要怀疑寡人的诚意。”

范雎跪拜说：“秦国四周有要塞、关隘、河流、山脉，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有军队百万人，战车千辆，这是霸业的基础。然而大王的臣下们不能尽职尽责，穰侯魏冉不热衷于为国家作贡献，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说到这里，范雎突然发现宫殿帷幕之外有动静，担心隔幕有耳，不敢再深入说秦国内政之事，只是委婉批评魏冉对外战略的失误：“穰侯魏冉越过魏国、韩国攻打齐国，魏、韩近，而齐国远，舍近求远，这不是好的战略。正确的做法是远交近攻，攻打近邻，得到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大王的。如今秦国却把近邻魏国、韩国晾在一旁，去攻打遥远的齐国，岂非太荒谬了？”

尽管范雎说得含蓄，矛头却对准把持大权的魏冉，他的话如一支利箭，刺入秦昭王的心痛处。当了木偶四十年后，秦昭王早对跋扈嚣张的魏冉忍无可忍，但他是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朝廷的每一个人表面上尊敬他，实则只听命魏冉。想推倒魏冉，就得有像范雎这样的人。

这次会晤改变范雎的人生，也改变秦昭王的人生。

很快，范雎被正式任命为客卿，在秦国政坛上崛起。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去，他仍使用“张禄”这个化名，以免被魏冉挖出他在魏国受辱的往事。

在范雎的协助下，秦昭王一步步削夺魏冉的权力。以往秦国对外战争，魏冉说了算，譬如华阳之战时，韩国使者向魏冉求援，魏冉无须经过秦王的同意便出兵。后来魏冉为了扩大自己封邑，悍然长途奔袭遥远的齐国。范雎坚持“远交近攻”的战略，魏冉的小算盘打不响，秦昭王乘机削其兵权，以范雎之计取魏国怀地、刑丘。范雎任客卿三

年，魏冉的权力大受限制，无法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

公元前266年，范雎认为除掉魏冉的时机已成熟，遂密禀秦昭王：“我在魏国时，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听说有秦王。如今太后随心所欲，不必顾及大王的意见；穰侯派人出使诸侯，可以不禀报大王；华阳君、泾阳君独断专行，没有任何忌讳；高陵君任用、罢免官员，不必事先请示。穰侯派使节出使各国，打着大王的名号以号令天下，同各诸侯国剖符缔约，挟武力四处征伐，没有谁敢不听从。如今秦国上下，从各级官员到大王身边的侍从，无不是穰侯的人。大王在朝廷孤立无援，我担心秦国以后不再是大王所有了。”

秦昭王听罢不寒而栗。

难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故事，又要在秦国上演吗？不！四十年的怨气一下子爆发了，秦昭王狠狠地拍案而起说：“好，得采取行动了。”

魏冉等人能为所欲为，是因为背后有太后撑腰。要扳倒魏冉，关键是要夺太后之权。宣太后是秦昭王的母亲，在权力面前，亲情总显得脆弱。

要如何废掉太后呢？

说起宣太后，却是先秦时代一个奇女子，思想开放得很，自夫君秦惠王去世后，她先后有许多情夫，淫乱内宫。她自以为是秦国的真正统治者，肆无忌惮，甚至在严肃的外交场合也毫不忌言，大谈床事，于是乎秦宫丑闻，早已在外头传得沸沸扬扬。秦昭王与范雎合谋，以此为理由，逼迫她退出权力舞台，取消太后尊号。

太前一倒，朝臣们纷纷见风使舵，与魏冉划清界线。魏冉、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权臣纷纷失势，被秦昭王逐出关外，从此彻底

退出政坛。魏冉离开秦国，回到封地陶邑，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财物统统装上车送往东方，运输的车辆竟然有一千辆之多，真可算富可敌国。

在秦国呼风唤雨四十年的魏冉下台了，秦昭王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知恩图报，任命范雎为相，封为应侯。

范雎的战略主张是远交近攻，矛头直指魏、韩两国。魏王对秦国充满侵略性的战略十分担心，派须贾出使秦国，拜会秦国新丞相。当时范雎仍使用“张禄”这个名字，须贾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要见的人，竟是往日的门客范雎。

当初若不是须贾诬告，范雎不会蒙冤，也不会差点被打死。这个仇，范雎是要报的。不过须贾曾是自己的老东家，也算有恩于己，范雎想先会他一会。

范雎穿了件破衣服，前往驿馆求见须贾。须贾本以为范雎已经被魏齐打死了，不想居然在秦国遇到，不禁脱口说道：“范叔原来还健在呀。”便招呼他留下来吃饭。看到范雎一身褴褛，须贾动容道：“范叔竟穷到这样的地步。”他让人取来一件上等袍子送给范雎。

一声范叔，一件袍子，救了须贾的命。

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这一刻，范雎内心涌出一股暖流。

他假称自己主人与秦国新宰相很熟，可代为引见，须贾大喜。范雎叫来一辆马车，亲自驾车，把须贾送到相国府。入了府内，范雎让须贾在车上等着，说自己先进去通报。起初须贾并没在意，岂知范雎一去不回，他心里十分纳闷，便问相府看门人：“范叔进去这么久，

怎么没出来呢？”

看门人不解地说：“这里没有一个叫范叔的人。”

须贾说：“就是与我一起来的那个人。”

看门人上下打量他，似乎遇到一个外星人似的：“那个人就是宰相张先生啊！”

须贾一听，魂飞魄散。他做梦都不曾想到，当年被自己陷害的范雎，就是当今权倾天下的秦国权相。冤家，真是冤家路窄！报应，真是报应！他上身袒露，以膝跪行，求见秦相范雎。

此时范雎已换上官服，一脸威严冷漠，坐在高堂之上，对须贾喝斥道：“你知自己犯什么罪吗？”

须贾面如土色，结结巴巴地说：“我，我的罪过太多了……”

“你犯了三条罪。”范雎想起往事，语气有点激动，“第一，你认为我私通齐国，在魏齐面前诬陷我；第二，魏齐对我用私刑，打得晕死过去，用席子卷起扔在厕所里，你并没有出面劝阻；第三，客人们喝醉酒往我身上撒尿，你却视而不见。我曾是你的门客，你何以忍心到这种地步？”

须贾无言以对，只是拼命磕头谢罪。

范雎说：“今天我不杀你。你之所以能不死，只是因为你见我衣衫褴褛，以袍子相送，总算还有一份情意在。”

死里逃生的须贾总算惊魂初定。然而，范雎可以不杀须贾，却不能不杀魏齐。他让须贾转话给魏王：送上魏齐人头，否则将血洗大梁城。

回到魏国后，魂不守舍的须贾马上入相府见魏齐，魏齐大恐，弃

了相印，投奔赵国去了。范雎的复仇行动得到秦昭王鼎力支持，秦王连续对赵国施压，要求交出魏齐。魏齐在赵国混不下去，又回到魏国，这位曾在魏国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竟然落得个无处安身的下场，在绝望之中自杀身亡。

赵孝成王向魏国索取魏齐首级，送至咸阳。当年在魏齐眼中，范雎只是阿猫阿狗式的小人物，就算误杀又何妨？上天不负有心人，范雎以自己坚忍不拔的精神，改写人生故事，再造复仇传奇，为先秦历史增添了一则血性故事。

二九 至强之矛与至强之盾

范雎相秦后，大力推行“远交近攻”战略，矛头直指历史上的老对手：三晋。三晋之中，以韩国最弱，自然成为秦国鲸吞的首个猎物。

老谋深算的范雎制定一个完美战略，核心是集中兵力攻略韩国太行山地带，切断北方上党地区与韩国政府的联系，到时可不战而吞并战略要地上党。这个战略的执行落到战神白起身上，有他出马，秦军无往而不胜。

公元前264年，白起伐韩，连陷九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再征韩国，略取南阳，切断太行山通道。公元前262年，白起三征韩国，攻取野王（今河南沁阳），断绝上党与韩国首都的联系。至此，韩国政府完全失去对上党的控制。

在白起的步步紧逼下，韩国政府被迫割让上党十七城给秦以换取暂时的和平。范雎的战略大获成功，他不禁露出得意的微笑。岂料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到嘴的肥肉飞走了。

出了什么事呢？

韩国政府要割地投降，上党军民不干！

上党郡守冯亭是个爱国者，他不愿沦为秦国人的奴隶，率军民奋起反抗，拒绝把上党拱手让给秦国。光凭上党十七城那么丁点地盘，如何与强大的秦国对抗呢？他思来想去，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赵国，毕竟韩、赵以前是一家人。

对赵孝成王来说，这简直是飞来横财，不要白不要。

与韩国相比，赵国的底气要足得多。放眼天下，能够与秦国相抗

衡的国家，也只有赵国了。在先前的阨与之战中，赵奢令秦国蒙羞，秦国军界后起之秀胡阳从此一蹶不振，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赵国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对接收上党十七城却心有疑虑。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儿饼，这十七城是韩国割给秦国的，赵国接收无异于与强大的秦国作对，绝非明智之举。

平阳君赵豹反对说：“平白无故得来的好处，怕是会惹来灾祸！韩国把上党献给赵国，是想嫁祸给我们。秦国卖力而赵国坐享其成，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吗？强国不能从弱国那里得到的土地，弱国却想从强国那里获得，这岂不是平白无故的好处吗？秦国的战略，是通过水路运粮，以武力蚕食韩国，分裂其土地。我们不可与秦国争锋，还是不要接受上党为好。”

赵孝成王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就算出动百万大军进攻他国，经年累月，也未必能得到一座城池。如今冯亭献十七城，这可是捡得了大便宜。”

谁都知道，把上党这块肥肉从饿狼秦国口中叼走，势必会成为点燃战争的导火索。赵孝成王不能不评估战争可能的结局，倘若秦国以战神白起为将，赵国谁可抵挡呢？

平原君赵胜分析说：“武安君白起为人勇敢，果于决断，判断洞察力很强，意志坚定。要与白起对抗，只能以持久战取胜，难以同他争锋相对。有一个人可以对付他，此人就是大将廉颇。廉颇勇猛枭鸷，爱护士兵，遇事不避艰难，能忍辱负重。要论野战，能力不如武安君，但论持久战，足以抵挡。”

赵孝成王大喜，遂派赵胜前往将上党十七城收入囊中。

秦国不战而取十七城的美梦顿时破灭，秦昭王勃然大怒，马上派

大军进攻上党。

长平之战拉开序幕。

这一年，是公元前262年。

赵国大将廉颇将主力驻扎于长平，长平是上党十七座城邑中的一座，位于今山西高平西北。廉颇乃赵国之名将，老成持重，他深知秦军凶悍善战，决不可与之争战于野，遂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他下令以长平为中枢，修筑漫长的壁垒防御线，采取“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只守不攻。

据《战国策》的记载，起初秦军主帅是白起，后来换成王龁。为什么战无不胜的白起被换掉呢？白起是战国时代最伟大的将领，他长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特别长于运动战，这在伊阙之战及鄢郢之战有淋漓尽致的体现。然而，在廉颇的铁桶阵加乌龟战术面前，白起的运动战天才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范雎遂将他调回，去攻打韩国了。

从军队的战斗力看，秦军占有优势。秦人凶猛好斗且作战经验丰富，赵军虽同样具备尚武精神，终究略逊一筹。然而，赵国有自己的优势：主场作战，上党军民有决死之心，后勤补给较秦军更为便利。廉颇意图十分明确，以时间换空间，持久作战，拖垮秦军，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战争的胜利。

王龁很快就意识到战争遥遥无期。

在廉颇精心主持下，长平防线固若金汤。秦军可以在局部攻击战中取得小胜，却始终无法与赵军决战。双方在战场上投入数十万军队，却看不到壮观的战争画面，只有沉闷的战斗，逐个据点的争夺。

廉颇坚壁清野，据险控要，决不轻易出击，对秦军的叫骂不理不睬。这种似拙实巧的战法，令王龁无懈可击，只能一步步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

天下的眼光，都集中到了长平这个弹丸之地。

这场战争，不仅仅关乎秦、赵两国的未来，也关乎东方诸侯的未来。在沉闷的战场上，秦军束手无策；然而，在外交战场上，秦国却是大赢家。

范雎之目光较他人更为长远。战争的奥秘之处，在于充满不可预知的变数，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秦国虽是天下至强，以倾国之兵的赌注押在长平，也算是旷世豪赌，赌的是其他诸侯国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震慑东方诸国，白起再舞刀戈，挥师进攻韩国，韩国岂能抵挡？很快缙氏、蔺两城沦陷，举旗投降。

这一战，可谓是杀鸡吓猴。

秦昭王此举用意深远，乃是向东方诸侯显示国家之实力，秦完全有能力同时发动两场战争，不怕死的尽管来吧。果不其然，原本想支援赵国的东方诸侯们无不骇然。

韩国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然谈不上救援赵国。齐、魏、楚三国则蠢蠢欲动，它们都知道，倘若赵国灭亡了，自己绝对无力阻止秦国兼并天下。范雎明确告诉秦昭王：若是齐、楚两国援赵，秦国必须退兵！

在援赵一事上，齐国的态度摇摆不定。齐国已不复当年之勇，且与秦国不相邻，危机感不如魏、楚那么强。眼看秦军一面围困长平，一面横扫韩国，齐王不由得打起退堂鼓。他非但不敢出兵相救，甚至当赵国使者前来借粮时，竟然一口拒绝了。

同样犹豫不决的还有楚国，楚考烈王在秦国的威胁下，最终不敢贸然出兵。魏国与赵国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援赵抗秦一事上，较齐、楚两国更为积极。为了牵制魏国，秦昭王利诱魏安釐王，欲割让

垣雍城，以换取魏国的中立。然而，秦王的诡计却被平都君识破，他力谏魏王联合赵国，共同抗击秦国。

在这个节骨眼上，赵孝成王却犯了一个大错。

赵孝成王对军事十分外行，他盼望廉颇能率赵国男儿取得辉煌的胜利，老将军却祭出乌龟战术，不硬拼，不决战。赵王心里焦急，这样拖下去，要打到驴年马月呀？他打算再集结一支军队开赴长平，与秦军一决死战。

大臣楼昌乘机提议说，不如派个使臣，前往秦国议和。

被战争搅得头昏脑涨的赵王想想也是，先试试议和，如果议和不成，再战不迟。

大夫虞卿赶紧劝阻，分析说：现在秦军兵临城下，我们跑去要求议和，只有被动挨宰的份儿。要议和，手上一定要有筹码才行。什么筹码呢？先派使臣前往魏国与楚国，摆开合纵的架势，这样秦国定然心虚，赵国就可以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这么好的建议，却被赵孝成王束之高阁了。

“弱国无外交”，尽管赵国也算是强国，与秦国相比还是弱了些，手中没有筹码却寄希望于谈和，不知不觉便陷入被动之中。

赵国使臣郑朱出使秦国，商议休兵事宜。范雎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宣扬秦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营造赵国“失败”的假象。魏、楚两国风闻消息后，更是胆战心惊，魏安釐王原本想出兵相援，现在也打起退堂鼓。

这是赵孝成王在长平之战中犯的第一件错事。这次和谈未获成功乃是意料中的事，还示弱于敌。

虞卿这样说：“魏国与楚国看到赵国主动求和，定会认为赵国没有信心抵抗秦国，它们更不可能出兵相救了。秦国看到诸侯都不肯救援赵国，赵国势孤力单，也不可能同意和谈。所以谈判绝无成功的希望。”真是一语中的。

没有东方诸侯的相助，赵国只能凭一己之力与秦国周旋了。

这场漫长的战争依然望不到尽头。

秦、赵两国都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长平这个弹丸之地，双方各集结了数十万精兵对峙。老成持重的廉颇不改乌龟战术，仍然慢条斯理地与王龁打太极。这样拖下去，对秦国显然不是好消息。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时间已到了公元前260年。

与赵国相比，秦国的后勤运输线更长，粮食、武器转运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秦昭王等得不耐烦了，不断向前线总司令王龁施压。王龁手握一支秦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再不卖力进攻，他这个总司令的头衔怕也要保不住了。

自长平战役开打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夏季攻势开始了。

农历四月始，秦军对长平防线发动史无前例的猛攻，取得了一定的战绩，袭杀一名赵军副将，士气大振。六月，王龁再度出击，连下两座赵国堡垒，俘虏四名军尉。廉颇精心营造的防线已被撕开一道口子。

廉颇没有慌了手脚，他马上又建成一道新防线。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该防线又被秦军突破，赵军两名军尉被俘。

长平防御体系包括西垒壁防线与东垒壁防线，王龁的夏季攻势，基本上摧毁了赵军的西垒壁防线。

秦军是否就此逆转战局呢？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王龁虽取得夏季攻势的胜利，这个胜利恐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依白起的说法，在整个长平之战中，“秦卒死者过半”，考虑到后期围歼赵军时秦军伤亡并不算严重，可以推断此番夏季攻势损兵折将不在少数。

其次，廉颇虽然丢失西垒壁防线，东垒壁防线仍然固若金汤。此时双方的对峙情形，在《水经注》一书中有段出自《上党记》的引文：“长平城在（上党）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可见廉颇的防御线是依托山河之险，易守难攻。

王龁希望赵军反击，只要廉颇出击，就可毕其功于一役。然而，廉颇这只老狐狸着实好性子，他仍然坚守不出。表面上看，秦军优势在手，其实不然。有一个人忧心忡忡，此人便是秦相范雎。

为了夺取上党，秦军几乎倾巢而出，战争业已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已有强弩之末之势。要是廉颇始终不主动出击，排出铁桶阵，战争恐怕还得拖上三年，到时秦国要不战而败了。

只要廉颇坐镇长平，秦国终究要功亏一篑。

怎么办？

范雎思前想后，一个方案在这位谋略大师脑子里形成了。既然在战场上无法打败廉颇，不如开辟第二战场，这便是情报战、谍战。

三十 从大决战到大屠杀

秦国最终能一统中国，靠的不仅仅是强大的武力，亦凭恃其高超的“谍报部门”。秦的“谍报”机构基本上由丞相负责，主要是收集国外情报，搞策反，搞反间。在先秦谍战史上，范雎堪称大师级的人物，他的代表作就是以反间计诱使赵孝成王撤了廉颇的职。

廉颇已成为秦国最难对付的对手，他的铁桶阵令骁勇善战的秦军发挥不出强大的战斗力。要赢得长平会战的胜利，只能把廉颇拉下马。作为赵国第一大将，唯一能把他撤职的人，只有赵孝成王。如何诱使赵孝成王中计呢？这显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从不向命运低头的范雎相信事在人为，把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可能。

首先，他通过种种手段打探赵国高层内幕，得到一条十分重要的情报：赵孝成王对廉颇的无所作为越来越不满。作为一名统治者，赵孝成王只能称为合格，不能算优秀，他对军事十分外行，长平之战拖了三年之久，赵国几乎被拖垮了，可是廉颇将军呢，还不打算发动反攻，这算哪门子道理？赵王不时抱怨廉颇，这种抱怨声，被范雎听到了。

于是范雎展开第二步行动，他派间谍携千金入赵，游说高层，制造流言。他放出风声说，廉颇根本就是个庸才，不值得一提，秦国人才只害怕赵奢的儿子赵括。

前面说过，赵奢在阼与之役中大破秦军，取得伟大的胜利。只是赵奢已经去世，留有一个儿子唤作赵括。对赵括这个人，范雎也把底细摸清了，就是个爱说大话、喜欢夸夸其谈的家伙。虽说是出身将

门，赵括却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他有点小聪明，对兵法倒背如流，口才特别好。以前他经常与老爹谈论兵事，老爹经常被他驳得无话可说。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赵奢私底下对妻子说：“行军打仗，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赵括把战争看得太简单了，似乎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对此我十分担心。赵国要是不任用他为将军也就算了，要是用他为将，军队必定要毁在他手里。”

说白了，赵括就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

范雎看明白了，他暗中策划，诱使赵孝成王换将。

秦国间谍在邯郸大做宣传，赵括的知名度突然蹿起。他有两方面优势：其一，他是名将之子。不都说龙生龙，凤生凤嘛，老爹有能耐，儿子想必也有出息。其二，他能吹，时不时引用孙吴兵法名句唬人，外行一下子就被镇住了。

赵孝成王就是这样的外行，他召赵括进宫商议大事。赵括以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大谈进攻战术，把廉颇的乌龟战术贬得一文不值。这些话太投赵王心意了，他听得眉开眼笑，不停点头称是。他对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有赵括这样的少年英才，还要廉颇那个老东西干吗呢？

很快，一道旨令下达，褫夺廉颇总司令之职，改由赵括担任。

命令下达那天，有一个人急了。

此人正是赵国名臣，廉颇的生死之交蔺相如。他以婉转的语气对赵孝成王说：“以我对赵括的了解，他只会读父亲留下来的兵书，还达不到随机应变的水平。”赵孝成王不以为然。

又有一人站出来反对，是赵括的老母。

老夫人把赵奢生前说的话告知赵王，不可任用赵括为大将。她还对比父子俩的不同：赵奢礼贤下士，为国忘家，清正廉洁；赵括爱摆威风，贪图财物，到处买田地，投资房产。说白了，赵括的修养比起老爹差远了，没有大将之才。

赵孝成王一听，老夫人说的都是些小节，只要能打败秦国，贪图点财物算什么大事呢？不当一回事。赵老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倘若一定要用赵括，如果他不能胜任，大王莫要降罪于臣妾。”赵王满口答应。日后赵括全军覆没，赵家没有被追责，正是因为有老夫人的这句话。

赵括抵达长平前线，便耍起威风，立马把廉颇那一套乌龟战术统统扔掉。在他看来，廉颇这个老古董军事思想太陈旧了，赶不上“国际先进水平”，无怪乎当了三年缩头乌龟，就没见过打胜仗。他推翻旧的战略，制定新的战略，重点在于进攻，而且是大规模的反攻。

这个新战略遭到廉颇旧将的极力反对，只有经历过残酷战争的人，才能明白廉颇将军的高明之处与良苦用心。赵括发出轻蔑的冷笑，他绝不容许有人挑战其权威，很快，反对者全部被免职。有八位军官以死相谏，然而他们白死了，赵括正幻想着大败秦军的激动场面呢，幻想着自己将成为赵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

他迫不及待要发动攻势了。

可是，他连对方的主帅是谁还不知道呢！

话说范雎成功施展反间计，廉颇被拉下马，换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很明显，赵军马上会反守为攻了，沉闷的阵地战将被波澜壮阔的运动战所取代。要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谁能比得上白起呢？

与赵国公然换将不同，秦国是秘密进行的。白起走马上任，奔赴长平，取代王龁出任秦军总司令。这件事，被秦国列为“绝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有泄露秘密者，杀无赦。前线秦军都蒙在鼓里，更何况是赵括。

仗还未打，赵括已先输一着了。

赵括对兵法烂熟于胸，倘若他能一点一滴积累战斗经验，或许有机会成为名将。书本毕竟是死的，人是活的，战争是一门艺术，千变而万化，光靠书本知识怎么行呢？白起自出道以来，百战百胜，自有人类以来，未有一人战绩超过他。愣头愣脑的赵括在他人生第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时便遇到白起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他的不幸了。

大反攻很快开始了。

这是赵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共计有四十五万人之多。此时秦国的兵力是多少呢？史书上没有明说，从双方对峙三年的情形分析，秦军兵力不会比赵国少，估计也有四五十万人。

信心满满的赵括还蒙在鼓里，他以为秦军总司令仍是王龁，故而进攻部署，乃是针对王龁的战法。王龁在夏季攻势中，采取积极而凶悍的主动进攻，赵括料想此番出击，敌人必定也会全力以赴，以一战定胜负。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对手竟然不是王龁，而是战争艺术家白起。

赵括的第一次反击便是大手笔，四十余万人倾巢而出，雄赳赳气昂昂，兵强马壮。谁能想得到，第一次出击，他就走上一条不归路了。不，不是他的不归路，而是所有人的不归路。这些赵国男儿们可曾会知道，他们悲惨的命运，在踏出营垒的那一刻便注定了。

只有白起才能构想出歼灭战的绝妙计划，一口气吞掉四十几万大军，秦国人的胃口受得了吗？别人想都不敢想，但白起敢，因为他深

邃的眼光超越众人之上。赵国来了“纸上谈兵”的主帅，这种机会白起怎么可能浪费呢？

歼灭战的原则之一，就是诱敌深入，让敌人掉入口袋中。怎么诱敌呢？佯装不敌！初次交锋，秦军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狽鼠窜。赵括更得意了：就说廉颇那老家伙不行，我一出马，秦军焉是敌手！

赵军上下洋溢着过度的乐观主义，一路向前挺进。

秦军没有出营迎战，而是固守壁垒。在赵括看来，秦国人被吓破胆了，只要猛攻几天，敌人将心胆俱裂。

然而，秦军营垒仿若铁壁铜墙。要知道这些营垒在长达三年的阵地战中反复加固，哪是那么容易攻破的？赵括的攻势在坚不可摧的秦垒前止步了。倘若赵括足够聪明，此时鸣金收兵返回大本营，本也可躲过一劫，可是他偏偏过于自信了，安营扎寨，打算啃下这根硬骨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善于捕捉战机的白起拖住赵括的主力后，立即出动奇兵偷袭后路。一支两万五千人的部队悄悄迂回后方以抄截赵军粮道，另一支五千人的骑兵则切断赵括与长平壁垒之间的联系。赵括还蒙在鼓里，白起却开始收紧口袋了。

完成对赵括的包围后，白起这才让赵国人见识秦军凶悍无比的战斗力。他派出轻骑兵出击，大败赵军。赵括不甘心失败，仍不想无功而返，这又白白错失可能突围的良机。他令全体将士就地修筑防御工事，以待休整后再战。然而，此时的秦国已是全国动员，秦昭王要毕其功于一役。

四十几万赵军不是小数字，想要一口吞下谈何容易！为了围歼赵军，秦昭王亲自出马，前往距离长平最近的河内郡。他抵达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大肆奖赏，郡内所有百姓，加爵一级。干吗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凡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派往长平战场，参加围歼战。

秦国的国力、秦王的意志、白起的智慧、秦兵的剽悍，在长平一役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赵括已成瓮中之鳖，在劫难逃了。

围歼战从七月到九月，持续了四十六天。赵军的粮道被切断，军中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饥荒成为更可怕的敌人。饥饿难忍的士兵甚至开始吃人肉，甚至为了填饱肚子杀死自己的同伴。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在赵军大营的上空，谁也不知道能否活着看到天明。

此时的赵括目光变得呆滞，他想不明白，以自己独步天下的军事知识，怎么会输得这么惨呢？此时不要说打败秦军了，能突围就是胜利。

粮食终于吃光了。

赵括必须孤注一掷突围。他把军队分成四队，冲击秦军的包围圈，试图突围。连续四五次的冲杀，都未能突破秦军钢铁般的防线。赵括绝望了，最后一次冲杀时，一支利箭从空中飞来，他应声倒地，死了。

总司令一死，赵军群龙无首，突围也没希望了，只能放下武器投降。

四十六天的战斗，赵军战死、饿死五万人，投降四十万人，全军覆没。

然而，悲剧还没结束。

在秦国战争史上，从未收降如此多的战俘。这四十万人如何处置呢？首先是吃饭的问题。为了长平之战，秦军苦战三年，后勤消耗巨大，哪里还有粮食来供给四十万人吃呢？其次，这四十万人都是战士，且赵人的尚武不亚于秦人，万一造反也是一件头疼的事。

怎么办？

白起想了许久，最后从嘴里挤出一句话：“赵国士兵反复无常，如果不杀掉，恐怕以后会出乱子。”

这是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幕。

中国向来是一个崇尚文明的国度，在春秋时代，战争虽残酷却也带着某种文明色彩，对敌人有着人性的尊重。战国时代虽比春秋略为野蛮，也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屠杀战俘之事，这种非人道的做法是为中原文明所唾弃的。但白起，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竟置人道与文明不顾，悍然下达屠杀令。

四十万手无寸铁的俘虏，成为一群无助的羔羊，被分批坑杀了。在所有俘虏中，只有二百四十人得以幸存，这些人都是未成年人，白起放他们一马。在此后两千年的时间里，人们不断地在这个古战场上挖掘出当年被坑杀的赵军士兵遗骸，还有散落在其间的兵戈钱币等等。这些无名的尸骨，无声地控诉着白起所犯下的滔天罪恶。

长平之战，乃是战国史上规模最大、意义最深远的一次大会战。这次会战秦、赵双方投入上百万的兵力，即便在人口爆炸的今天看来，也堪称惊人。这不仅是关系到秦、赵两国前途的会战，也是关系到东方诸侯命运的会战。大决战前后持续三年之久，双方都押上所有家底，最终的胜者是秦国。

在东方六雄中，唯一有实力与秦国抗衡的，只有赵国。赵国的失败，东方六国的灭亡已是隐约可见。当然，秦国也付出了惨重的伤

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死者过半”，“国内空”，也正因为如此，秦国要一统天下，尚需时日。

经此一役，赵国由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永远失去与秦国争雄斗霸的机会了。

三一 邯郸：啃不下的硬骨头

长平之战，赵国惨败，四十几万精锐部队灰飞烟灭，国家已是岌岌可危。

白起挟胜利之威，席卷赵国，势如破竹。他兵分两路，一路以王龁为将，攻略武安、皮牢；另一路以司马梗为将，攻略太原。赵国的天空暗淡，乌云蔽日，谁心里都明白，绝对无法挡住白起雷霆一击。难道曾雄视北方的赵国，竟会成为七雄中的第一个出局者吗？

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奇迹发生了。

秦昭王下令白起撤兵，班师回国。

这道命令着实蹊跷，明明形势大好，为何匆匆收兵呢？其中别有故事。在长平之战中，白起光芒四射，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人取得过如此伟大的军事成就，他的地位与权势自然水涨船高，直逼权臣范雎。

倘若白起直取邯郸，灭了赵国，那么他的功劳更是无人可及，到时范雎恐怕只能乖乖地把相位让出来了。范雎不是宽宏大量之人，他不甘心失去权势，便忽悠秦昭王说，长平一战，秦军伤亡很大，不能再战了，不如退兵。

此时的秦昭王对范雎言听计从，遂与赵国罢兵休战。赵孝成王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不仅未能捞到上党十七城，反倒割六城请和。

对于这种结局，白起心有不甘，明明有机会灭了赵国，却因范雎背后拆台而未得逞，不由得心怀怨恨。从此，白起与范雎便结下梁子，关系恶化了。

一年后，秦军已得到充分休整，补充新的兵源。秦昭王又想攻打赵国，此时范雎也没有理由阻挠。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次轮到白起反对伐赵。

白起病了，秦昭王前来探视。

“不可伐赵。”白起毫不含糊地说。

秦昭王不解地问：“去年与赵国决战时，国库空虚，百姓饥饿，将军不考虑百姓的负担能力，一味要求增调军粮以消灭赵国。如今寡人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积蓄粮食，提高军队的待遇，将士的薪俸比以前多了一倍。现在您却说不能伐赵，为什么？”

白起分析说，去年长平一战，赵军遭沉重一击，举国惶恐，只消一击便可将其消灭。如今赵国上下同心戮力，君臣同忧共惧，勤于政事，邯郸守卫力量较去年增加十倍，而且积极与东方诸侯交好。赵国国内殷实，外交成功，不可伐赵。

昭王一听不高兴，赵国精锐都死光光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不以为然地说：“寡人已经决定了，军队也要出发了。”

由于白起卧病，秦昭王遂任命王陵为大将，挥师进攻赵国。

在一般人看来，赵国死了那么多人，哪有力量抵抗秦师呢？

我们不要忘了，赵国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赵人之顽强不亚于秦人，赵武灵王留下的尚武精神是其国魂，他们知耻而后勇，利用两国休兵的一年时间，大力组建新军，重建国防力量。

果然不出白起所料，王陵的军队在邯郸城下遭遇到赵国人顽强的抵抗，进攻屡屡受挫。王陵立功心切，企图以疯狂的攻势摧毁邯郸防线，但事与愿违，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仅校尉级的军官便有五人战

死沙场。

秦昭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看来王陵水平不行，还是得让白起上阵，便差人把委任状送到白起府中。白起本是性格高傲之人，你秦王不听我的劝告，自作主张，现在打不赢要让我擦屁股，没门！他假称大病未愈，不肯受命。

白起不肯去，秦昭王没办法，派丞相范雎前往传话。若是派别人去，白起或许还会回心转意，偏偏是派与他有隙的范雎，这事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范雎到了白起家中，先是吹捧他一通，历数白起在伊阙、鄢郢、长平诸役中的伟大表现，最后说：“您以前以寡击众，有如神助，何况现在伐赵是以强击弱，以众击寡。”

此次伐赵之战，秦国动用多少兵力呢？以《战国策》的说法，兵力数倍于赵国。数倍是几倍，没说清楚，且以三倍来做个估算。我们假设赵国有十五万军队，那么秦国的兵力多达四十五万。应该说，秦国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出乎范雎意料的是，白起仍不肯奉命前往。

白起对范雎说，秦国已经失去灭赵的最佳时机，此时赵国内部团结，“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他还指出，赵国以弱击强，必定会以坚壁清野的战术对付秦军，倘若陷入持久战，东方诸侯国必定会出兵援救赵国，秦国定然无功而返。

应该说，白起确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不过，他之所以不愿奉命前去，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对范雎不满。倘若不是范雎从中破坏，他早在一年前就灭了赵国。一年前攻邯郸，如风卷残云，势必手到擒来；一年后的今天，形势已全然不同，王陵的部队在前线久战无功，范雎要让他出来擦屁股，门都没有！

范雎对白起一直有很强的防备心，怕他抢走自己的相位。如今白起既不愿前往，正好以此为口实，在秦昭王那儿添油加醋一番。秦昭王听了十分不悦，冷冷地说：“没有白起，难道我就灭不了赵国吗？”

看到秦昭王那张阴沉的脸，范雎心里偷着乐，他知道白起这家伙要倒霉了。

秦昭王不肯认输，秦国能征善战的大将多了去了，不差白起一人。他任命王龁为主帅，取代王陵。王龁是长平之战的副帅，对攻坚战深有研究，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不仅如此，秦昭王不惜血本，又增派大批部队入赵作战。

邯郸城风雨飘摇，赵国能否躲过一劫呢？

赵孝成王算不上雄才大略的君王，正因为他刚愎自用，才导致长平之战的惨败。不过此人也有优点：知错能改。这一次他不敢贸然出击，而是老老实实在地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只守不攻，打一场消耗战。

由于兵力不足，赵国只能把精锐集中在首都邯郸城，避免分散兵力。邯郸是战国时代一座名城，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当年魏、赵战争，魏惠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攻陷邯郸，后来赵国又重修工事，比以前更加坚固。

王龁包围邯郸九个月，仍无法越雷池一步，他与前任一样，无计可施。守城的赵军打法灵活多变，趁秦军不备，就出城偷袭，或以轻骑兵骚扰其后方，破坏其补给线。王龁头破血流，大伤脑筋。

听闻王龁的窘状，远在咸阳的白起发了一声冷笑：“当初不听我的建议，现在如何呢？”

这句话，传到秦昭王耳中，他勃然大怒，气冲冲地跑到白起家中。白起假装生病卧床不起，秦王恶狠狠地放话说：“你即便有病，也要为寡人出战。若立了功，寡人重赏你；若是不去，寡人跟你没完。”

哪承想到这个白起不是吃素的，竟然敢顶撞秦王，他说：“臣明知去了即便没功劳，也不会受惩罚；若是不去，无罪也可能获诛。但是请大王听我的建议，放弃攻打赵国。臣宁可伏诛受死，也不愿成为蒙受耻辱的败军之将。”

明知打不赢还去，我白起的一世英名不是毁了吗？我的不败金身不是破了吗？所谓荣誉高于生命，白起宁可抗命不从。

秦王听罢怒火攻心，他一言不发，拂袖而去，眼中充满怨恨与一丝杀气。秦昭王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之一，他在位前四十年，大权旁落，直到范雎到来后才翻盘。白起是魏冉一手提拔起来的名将，魏冉以前不把秦昭王放在眼里，昭王一直怀恨在心。如今白起竟然敢抗命，莫非想当第二个魏冉吗？

几天后，最后“通牒”下达，要么担总司令，要么滚蛋。

骄傲的白起仍拒绝奉命。秦昭王二话没说，把白起连降十八级，贬为普通一兵，发配阴密。不过秦昭王还是心存幻想，以白起生病为由，暂缓发配，仍闲居咸阳。

既然白起不肯出战，范雎想乘机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军队中。他推荐自己的恩人王稽出任河南郡守，好友郑安平为将军，参加邯郸之战。

邯郸被围困一年多，风雨飘摇。

赵国军民能否守住这座堡垒呢？他们最强大的力量来自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长平大屠杀的惨剧历历在目，不抵抗投降也是死路一条，只能拼了。不过，光凭精神可不够，只要秦国人锲而不舍地围困，邯郸终难逃沦陷的命运。要挽救赵国的命运，还得寻求“国际援助”。

能伸出援手的国家，只有魏、楚两国。这两个国家还有一定实力，而且在历史上老被秦国欺负。

出使楚国的任务，落在“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身上。平原君有一个不起眼的门客唤作毛遂，他自告奋勇追随前往。到了楚国后，楚考烈王对援赵一事迟迟不决，顾左右而言他。关键时刻，毛遂挺身而出，冲入王宫，手握剑柄，摆开与楚考烈王拼命的架势。楚王被吓坏了，毛遂历数楚国蒙受过的耻辱，一直说到白起以区区数万之众捣破郢都。楚王听罢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羞愧难当，遂答应与赵国歃血为盟。

搞定楚国后，平原君在魏国却碰了大钉子。

赵、魏两国的关系，较赵、楚两国更为亲密，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姐姐，亲上加亲，按理说，魏国应该更卖力才对。魏安釐王固然知道唇亡则齿冷的道理，他也派大将晋鄙率十万大军驻扎边境，密切关注邯郸战局。就在这时，秦昭王派人出使魏国，扬言倘若援助赵国，秦国灭了赵后，必定要灭掉魏国。魏王大恐，遂令晋鄙不得越境援赵。

平原君只得把希望寄托在魏公子信陵君身上。信陵君是魏王的弟弟，有门客三千，以慷慨义气而闻名天下。只是这件事，信陵君真的做不了主。

多次劝说魏王未果后，信陵君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窃符救赵！他想方设法盗走魏王的虎符，直奔魏国边境兵营，谎称得到魏王之

命，接管晋鄙的军队。晋鄙有所怀疑，不肯交出兵权，信陵君安排力士痛下杀手，结果晋鄙的性命，完全控制军队。

此时的邯郸城已岌岌可危。

经长年累月的围困，粮食紧缺，饥荒蔓延，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上演。为了阻击秦军，平原君赵胜散尽家财，招募三千敢死队，发动奋力一击，为援军到来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信陵君率八万精兵，日夜兼程奔赴邯郸。与此同时，赵国的盟友楚国也发兵相助，由春申君率领的楚兵团也抵达战场。魏、楚联手大举反击，大破秦师。秦军将领郑安平是范雎的亲信，他本非军人出身，打仗自然外行，只是想浑水摸鱼，捞点军功，岂料战场形势突然逆转，原本优势在手的秦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动作迟缓，没能及时逃跑，被信陵君的魏军包围，走投无路，只得放下武器，率部众两万多人投降。

在魏、楚联军的支援下，赵军大举反击，把入侵者驱逐出境。这场旷日持久的邯郸保卫战，终于以赵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邯郸之战，使赵国在长平惨败后，得以有苟延残喘的机会，也大大迟滞了秦国一统中国的时间。同时，这场战争对秦国政治也产生重要的影响，秦国军界、政界两大巨头，即白起与范雎都受到战争的牵连。

在此之前，白起已被秦昭王贬为普通一卒，只是由于还有利用价值，尚留在咸阳城内。由于白起始终不愿奉命，秦军在邯郸城下遭到空前失败，秦昭王更是把怨气发泄在他身上，遂执行发配令，把白起逐出咸阳。

与白起有隙的范雎乘机落井下石，诬陷说，白起被贬，心有怨

言。秦王大怒，他本来对白起抗命便十分恼怒，听说这家伙竟还敢发牢骚，遂心生杀意。

此时白起刚刚出了咸阳十里，到了一个名为杜邮的地方。秦王的使者很快抵达，带来一把剑。

看到这把剑，白起明白了，赐剑就是赐死，秦王是要逼他自裁。自他从军以来，已有四十个年头，他南征北战，破楚伐韩、攻魏屠赵，可谓横扫天下，从未失手。伊阙之战、鄢郢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哪一场大战算不上经典呢？他为秦国立下的军功，没有人可以超过。即便如此，他还是难免一死。原因很简单，他再无利用价值了。

“我有何罪！”接过剑的那一刻，白起有一种激愤之心。我们无法得悉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为什么他不愿意去赵国打仗呢？我猜在长平大屠杀后，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不想让自己的双手再沾上战争的鲜血了。这或者可以从他生平最后的一句话中看出，他在激愤过后，突然想起些什么，平静地说：“长平一战，赵国士兵投降数十万人，我骗了他们，把他们全坑杀了。就凭这个，我就该死了。”

这位战国时代最伟大的将军，在临死的那刻，有了一丝对无辜者的愧疚之意。

失去白起的秦国失去了一柄最锋利的战争利剑，对东方六国来说，无疑是值得拍手称快的福音。

白起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范雎虽挤掉白起，最终也没能保住相位。

在邯郸之战中，范雎推荐的郑安平竟然举部投降，令这个秦国宰相地位岌岌可危。按秦国法律，推荐某人时负有连带责任，若是所荐非人，推荐人也要遭到同样的惩罚。也就是说，郑安平犯了“叛国

罪”，范雎也得被扣上这个罪名。只是秦昭王网开一面，保住范雎，还让他继续当宰相。

也算范雎倒霉，过了两年，他举荐的王稽又出事了，被弹劾“私通外国”，他又一次卷入旋涡之中。秦昭王又一次撑起保护伞，不许追究范雎。说来秦王也算有情有义，当年范雎帮他夺权，他知恩图报。

只是经过这两桩事件后，范雎明显地意识到秦王对他的信任度已下降。在说客蔡泽的劝说下，范雎选择了急流勇退，递交辞呈，退出政治舞台。

范雎免相后四年，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六年的秦昭王去世，昭王时代结束。这是秦国扩张史上最重要的半个世纪，秦昭王在位期间，东方诸侯中实力最强的三国，即齐国、楚国、赵国均遭重创，失去与秦国争霸的机会。

统一中国的大幕，已徐徐开启了。

三二 点石成金：“投资大师”的杰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属于秦昭王、范雎、白起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谁能站在时代的潮头，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呢？一统中国的伟业，会在谁手里发扬光大呢？秦王嬴政与铁血宰相吕不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故事，要从秦昭王立太子一事说起。

秦昭王是一位长寿君王，在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他曾立公子悼为秦国太子，只是公子悼没能等到继承大统，便早于父亲去世。两年后，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太子，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太子有二十几个儿子，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只是正室华阳夫人却没有生育。

那时秦国与赵国尚未爆发大规模战争，两国仍有外交往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为了取信他国，经常会遣送公子去充当人质。秦国挑了安国君的一个儿子入质赵国，他名唤子楚，又唤异人。虽名为“异人”，实则与常人无异，他在安国君的诸多儿子中排行居中，母亲夏姬不得宠，这决定了他在诸公子中的地位是很低的。正因为他的存在毫不起眼，才被派去当人质。

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这个被人忽视的公子竟然登上秦国君主的宝座。丑小鸭怎么变成金凤凰呢？原来他在赵国得到一个高人的指点与帮助，这个高人就是大商人吕不韦。

吕不韦是卫国人，长年在魏、韩、赵等国经商，经营有方，积累

了一笔庞大的财富。不过他的志向并不是当一名大富翁，在那个时代，若没有权力，钱再多也不能任性。钱与权结合，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那个年头，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的人，第一选择都是秦国，不仅因为秦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因为秦有开放的人才政策。

很多纵横家挤破脑袋西行入秦，游说君王，希望博取功名。只是去的人多了，这条路就越走越窄。要出人头地，得不走寻常路，另辟蹊径。吕不韦以商人的眼光挖掘政治投机机会，公子子楚的到来，让他眼前一亮。

谁也没把子楚当作宝，倘若是宝，就不会是沦为人质的命运了。连子楚自己也时常长吁短叹，虽说生于公室之家，没地位不说，当人质可是有人头落地的风险。来到异国他乡，手头不宽裕，生活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形同被放逐的囚徒。

吕不韦却不这样看。

他看到了机会。

子楚的老爹安国君已被册立为太子，只要秦昭王一死，他就是秦国君主了。安国君正室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他百年之后，谁来继承王位呢？理论上说，二十几个儿子都有机会，子楚也不例外，身上有王家的血统。只是这件事听上去很好笑，子楚在诸公子中没地位，怎么可能成为安国君的继承人呢？在别人看来，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吕不韦有自己的看法。

他做了一个通盘研究，子楚能否成为接班人，最关键的一个人是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能认他当自己的亲儿子，岂非水到渠成吗？如此看来，子楚不仅是个宝，还是奇货可居。

这事，有机会，而且机会挺大的。

精明过人的吕不韦当然不肯错过良机。

吕不韦开始他人生最大的一笔投资。

他亲自登门拜访子楚，开门见山便说：“我可光大您的门庭。”子楚听罢晒然一笑，吹牛吹到这儿了，我好歹是秦国公子，你还当自己是救世主哇？吕不韦看出其意，微微一笑道：“您发达了，我才能跟着发达。”

言下之意，我助你上位，你给我荣华富贵。子楚一怔，马上明白过来，便屏退左右，引他上座。吕不韦说道：“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成了太子。我听说安国君最为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膝下无子，选立继承人的大权却握在她的手中。您有兄弟二十多人，排行居中，容易被忽视，况且长年在外当人质，更没优势。要是秦王死了，安国君即位，您有资格与其他兄弟争夺大权吗？”

子楚本来就挺自卑的，心里不想输给别人却又没主见，只是叹道：“您说得对，怎么办呢？”

吕不韦道：“公子在这里既无钱财又乏人脉，不能给父母、宾客献上厚礼，什么事也做不成。我吕不韦虽然谈不上很富有，但愿提供千金，为您打点上下，游说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您为接班人。”

当接班人，那岂不是未来的太子、国君？子楚内心狂喜，拜道：“要是能办到，我愿意把秦国的土地与先生共同分享。”

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的利益把两人捆绑在一辆马车上。

投资预算是一千金。这笔预算分两部分：其中五百金给子楚当日常开销，让他能多结交一些显贵达人，认识些朋友宾客，扩大知名度与影响力；另外的五百金则是要打通各种关节，贿赂华阳夫人。

吕不韦不认识华阳夫人，怎么贿赂她呢？

事关重大，吕不韦亲自出马。他先购置大量奇珍异宝，西行入秦。华阳夫人是太子妃，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见的，吕不韦一个大男人，跑到太子府见夫人那怎么行呢？要送上贿物，得有个中介才行。华阳夫人的姐姐就是最好的中介，这个女人收了吕不韦的财物后，便替他跑腿。很快，吕不韦带来的奇珍异宝经夫人姐姐之手，以子楚的名义送到华阳夫人那里，同时还传递了两条消息：第一，子楚在赵国混得很好，如鱼得水，结交诸侯，朋友如云，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第二，子楚把华阳夫人当亲娘对待，日夜思念，常常泪流满襟。

华阳夫人虽然没有生育，但母爱犹在，子楚的一片孝心感动了她。安国君的二十几个儿子，没有一个人像子楚那样，即便远在赵国仍不忘孝心。这时姐姐在一旁说：“女人有姿色时，男人喜欢，一旦容颜逝去，爱就不牢靠了。夫人深受太子宠爱，就是没有儿子，应该早作打算，从安国君的儿子中挑个贤能有孝之人，收为养子。这件事应趁早做，不然等到色衰爱弛，就来不及了。”

这一番话，令华阳夫人怦然心动。谁是贤能且有孝的人呢？那自然是子楚了。洞悉人性的吕不韦早料想到，子楚需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需要子楚，这非但关乎亲情，也关乎利益。

说白了，子楚就是要认华阳夫人为亲娘，华阳夫人也的确需要这么一个儿子。让子楚当继承人，她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华阳夫人积极为子楚谋利益。她时不时向安国君吹枕边风，称赞子楚的孝心与才能，时间长了，安国君对这个儿子的印象也全变了，越看越觉得顺眼。有一回，华阳夫人说到子楚时，突然哭了起来，一直很宠爱她的安国君一头雾水。华阳夫人便说：“臣妾有幸服伺太子，不幸没有得子，太子若能立子楚为接班人，臣妾以后也好有个依靠。”说罢泪眼汪汪。

哭乃是女人最强大的武器，安国君被她一哭，焉有不同意之理。

反正二十几个儿子都是庶子，立哪个不是一样，只要夫人高兴就行。就这样，他刻了个玉符当作信物，交给华阳夫人，算是正式承认子楚继承者的地位。

华阳夫人迫不及待地派人将消息告知赵国的子楚，并送去很多礼物，聘请吕不韦担任他的老师。

在吕不韦精心运作下，奇迹降临，从不被人看好的子楚华丽转身，居然成了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这意味着他有机会成为秦国君主。一切真是不可思议，在吕不韦的包装下，子楚成为秦国政坛最大的一匹黑马。水涨船高，吕不韦也一脚从商场踏入政坛。

由于人质期限未满，子楚仍然待在赵国邯郸，不过生活已是大大改善，有吃有穿还不够，还得要女人。

有一天，子楚到吕不韦家中喝酒，喝到酒酣时，歌女赵姬上台献舞，舞姿曼妙，仿若天仙。子楚一双醉迷迷的眼睛不禁看呆了，他摇摇晃晃站起身来，借着酒力，向吕不韦提出一个相当无礼的要求：把这个歌女送给他。

这个要求，令吕不韦露出不悦神情。

赵姬不是一般的歌女，她与吕不韦有一腿，实为他的情妇。吕不韦虽是豁达之人，也没豁达到送情妇给别人的地步，因此他心里不高兴。只是男人对权力的渴求往往超过对女人的渴求，吕不韦投下那么多血本，权力的大门已隐约可见，这个时候何必为一个女人与子楚闹翻脸呢？好吧，好人当到底，他牙一咬，答应了，把赵姬作为礼物送给子楚。

子楚大喜，回家后对赵姬百般宠爱。不久后，赵姬的肚子便一天天大起来，她怀孕了！一年后，孩子呱呱坠地，他便是后来成为一代

大帝的秦始皇嬴政。

这里我们说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秦始皇是不是叫嬴政呢？现在大家都这么叫，叫惯了就改不过来了。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没人这样叫的。秦国王室是嬴姓没错，但姓与名是从不合在一起用的。本书从秦国开国写起，有哪个人的名字里用了“嬴”字呢？一个也没有！名不与姓合用，只与氏合用。现在姓氏不分了，以前姓与氏是不同的，秦始皇出生于赵国，便以“赵”为氏，他的称呼应该是赵政而不是嬴政。不过本文若写“赵政”，恐怕读者不易接受，故仍保留“嬴政”的叫法。

第二，嬴政是谁的儿子？据《史记》的说法，赵姬在认识子楚前便有孕在身，她肚子里的孩子，乃是吕不韦的，也就是说，嬴政实是吕不韦之子，故而有些史学家也叫他“吕政”。大家想想，若赵姬怀孕在先，孩子出生时间必定提早，如此岂不会被子楚识破吗？《史记》给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答案：赵姬怀胎十二个月才生产，比一般人迟了两个月。这件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司马迁的记载，可能来自民间传言，毕竟秦始皇名声不好，百姓有心黑他的家史；其二，秦始皇真的是吕不韦的儿子，十二月怀胎虽极少见，却也是有的，就如秦始皇也是历史上极少见的一代大帝。

闲话休说，言归正传。

嬴政出生后，给子楚一家带来欢乐。然而，战国形势的变化，令子楚深陷政治旋涡之中。在嬴政出生的这一年（前259），秦国挟长平之战的余威，大举进攻邯郸。作为人质的子楚身陷危险之中，随时可能被赵国处死。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前257），邯郸城危在旦夕，子楚已无存在价值，赵王决定拿他开刀。关键时刻，吕不韦使出浑身解数，花重金买通邯郸守城官吏，子楚得以逃到秦军大营。赵姬、嬴政母子俩则被秘密转移，逃避赵国政府的追捕。

年少的嬴政在东躲西藏的生活中度过了六年童年时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赵国一直没有好感，后来他登基后，赵国成为第一批被灭掉的诸侯国。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病逝，安国君顺利即位，是为秦孝文王。在华阳夫人的努力下，子楚也得以被立为秦国太子。此时的赵国国力大衰，邻国燕国乘机发兵攻打，赵王有意与秦国缓和关系，避免陷入双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便把赵姬、嬴政母子二人送回秦国。

一年后，秦孝文王也死了，子楚即位，史称秦庄襄王。

当初子楚入质赵国时，没有谁看得上他，只有吕不韦慧眼识奇货，点石成金，以种种手段把他送上政坛最顶层。水涨船高，此时的吕不韦不再是商人的身份，而是有“定策”之功的大功臣。秦庄襄王自然感恩戴德，上台后便提拔吕不韦为秦国宰相，封文信侯，食邑十万户。

从商人到秦国宰相，吕不韦的投资终于获得巨大的回报。

倘若没有吕不韦，子楚充其量不过就是个秦国公子，而他的儿子嬴政也绝对成不了留名千古的秦始皇。从某种意义上，吕不韦改写了战国的历史，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三三 吕不韦的时代

秦庄襄王子楚虽然时来运转，当了秦国君主，只是没享福的命，仅仅三年后便一命呜呼了。嬴政即位，此时他还不能叫秦始皇，而称为秦王嬴政，这时他只有十三岁，还只是个小孩子，大权自然落到吕不韦手里。

吕不韦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能大权独揽，除了靠自己的本事外，还有赖一个女人的支持，这个女人便是他的老情人赵姬。此时赵姬还年轻，估摸也就三十来岁，她本是歌女出身，风月场出来的人，年轻便寡居，哪里忍受得了这个寂寞呢？从王后成了太后，她便是秦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就算出点轨，又有谁能管呢？于是她与老情人吕不韦又好上了，两人恋情重燃，巫山云雨，如胶似漆。

此时的吕不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秦王嬴政都恭恭敬敬地尊称他为“仲父”，权势之大，即便是商鞅、张仪、魏冉、范雎等权相亦有所不逮。

我们且来看看秦王嬴政即位前后的天下格局。

随着东方诸侯军事力量的削弱，秦国的扩张激情高涨。首当其冲的便是军事力量薄弱的周天子。此时的周王室分裂为西周与东周，公元前256年，秦军以泰山压顶之势进逼西周，人口仅三万的西周举旗投降。同年，周赧王去世，他是周朝八百年历史的最后一位国王。西周覆灭后，象征权力的九鼎落入秦国之手，这预示着秦国问鼎天下的时间已不远了。七年后（前249），秦相吕不韦率军攻入东周，东周灭亡。

再来看看其他诸侯国的情况。

自信陵君解邯郸之围后，赵国得以苟延残喘。公元前256年，秦国发动征韩之战，斩首四万；紧接着，秦军再攻赵国，斩首九万。这也是长平之战后，赵国又一次惨败。

秦国频频对韩、赵用兵，魏安釐王坐卧不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公元前254年，魏国果断出兵，矛头直指秦国孤悬于东方的陶邑，攻陷这块原本属于魏冉的封地。这无异于在老虎头上拔毛，此后，秦国连连发动对魏国的战争，魏安釐王被打得手足无措。

公元前247年，秦国大将蒙骜挥师进攻魏国，连克高都、汲城，魏国大恐。信陵君的好友毛公、薛公谏道：“公子在赵国受到礼遇，在诸侯中盛名远扬，可要是没有魏国，公子哪有今天的成就呢？如今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危急了，公子您却丝毫都不在意。要是秦国攻破了大梁，祖先的宗庙被夷平，到时您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呢？”信陵君大为震动，遂动身返回魏国。

信陵君是战国历史上为数不多能打败秦军的英雄。他回到魏国后，被魏王任命为上将军，全权指挥抗秦战争。信陵君充分利用自己的声望，合纵诸侯，赵、韩、燕、楚等国均出兵相助。这支五国联军在河外之战中大败秦军，并乘胜追击，一直反攻到函谷关。

可以说，信陵君是继赵奢、廉颇之后，又一名伟大的将领。

秦国的军事力量虽然雄冠天下，然而东方六国总兵力仍不下两百万人，倘若联合起来，秦国未必有胜算。可以说，秦国最担心的事，莫过于东方合纵运动。纵观东方合纵运动史，向来是雷声大、雨点小，诸国难以齐心协力。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便是缺少领袖人物。信陵君的合纵运动能大获成功，在于他得到各诸侯国的认可，他是那个时代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物，窃符救赵的传奇更为各国所景仰。

此时秦王嬴政刚刚即位，吕不韦从普通的商人一下子蹿居成为大权臣，自然有人不服，他必须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秦国的情报部门向来以高效著称，吕不韦本就精于谋略，更是把谍战推向极致。要摧毁东方合纵同盟，重点在于整垮合纵领袖人物信陵君。

要怎么办呢？

吕不韦分析了信陵君与魏安釐王之间的矛盾。两人本是兄弟，魏王是兄，信陵君是弟。由于信陵君招贤纳士，门客三千，慷慨好义，国际声望反在魏王之上。魏王即位后，处处提防信陵君，两人关系在救援邯郸一事上恶化了，信陵君盗走虎符，擅杀大将晋鄙，私自率八万人马救赵，这一切都是犯上作乱之事。只是魏国危难，魏安釐王才想召回信陵君以抗击秦国。兄弟两人虽暂时和解，但相互之间还是不太信任对方，这就给了吕不韦一个突破口。

虽说魏公子信陵君名满天下，却有一群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这些人便是晋鄙的门客。在他们看来，晋鄙只是忠于职守，并无过错，却被信陵君击杀，因而时刻想为主公复仇。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有非凡的眼光，他派人携万金入魏，秘密联络晋鄙门人，让他们在魏安釐王面前攻击信陵君。这些门客四处散布消息，称诸侯只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久而久之，魏安釐王对信陵君又多了一些戒备，这时他们乘机进谗说：“听说公子想要南面称王，诸侯们也都畏惧公子，打算共同拥立他。”言下之意，信陵君有反骨，想谋反。

反间计大获成功，众人的挑拨离间，魏安釐王对信陵君更是不信任，遂解除其上将军之职，收了兵权。

信陵君忧谗畏讥，激愤难平，便称病不进，不理国事，终日在家里与众宾客饮酒作乐，以酒消愁，纵情声色之中，以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慢性自杀。公元前243年，由于长期纵酒过度，信陵君与世长

辞。

吕不韦略施小计，便铲除信陵君这个秦国头号强敌，可谓是功劳赫赫。

在信陵君去世的同时，魏安釐王也病逝，其子魏景湣王上台。吕不韦乘魏国政权更迭之际，派蒙骜大举发兵攻打。魏军大败，丢失了酸枣、燕、虚、桃人等二十余城。至此，秦国的领土已经深入魏境，直抵齐国边境，犹如一把巨大的楔子插入东方，把东方诸国分隔为南北两部。

东方诸侯又一次陷入恐慌之中。

公元前241年，东方诸侯又一次合纵抗秦，楚考烈王为纵约长，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为联军指挥。楚、魏、赵、韩、燕、卫六国联军发起主动进攻，曾一度取得寿陵之战的胜利，然而当他们杀抵函谷关时，秦军出关迎战，联军很快便败下阵来。没有信陵君这位领袖人物，合纵诸国不能同心戮力。

这也是战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合纵运动。在之后的岁月里，东方诸侯曾试图发起新的合纵运动以抵制秦国，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从此，东方诸国各自为战，最后被秦国一一击破。

有两件事严重削弱东方诸侯的力量。

第一件是燕、赵战争。经历长平之战、邯郸之围后的赵国一落千丈，燕国想乘机捞一把，遂发动侵赵战争。赵孝成王重新任用廉颇，老将军以八万之劣势兵力，一举重创四十万燕军。此后，燕、赵两国爆发多次战争，前后历时达十五年之久。在秦国虎视眈眈的背景下，燕赵两国互斗，自毁长城。

第二件事是楚国内乱。楚国在整个战国时代，表现不尽如人意，楚考烈王即位后，任用春申君为相，国政略有起色。特别是在公元前255年时，楚国大举出兵，攻占鲁国，国力大增。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去世，政治投机分子乘机发动政变，刺杀春申君，遂使楚国中兴的事业戛然而止。

东方诸侯本来就实力不济，又陷入相互征伐以及内乱之中，与秦国的差距越来越远了。

此时的秦国，正是吕不韦呼风唤雨的时代。

吕不韦延续秦国扩张的传统，频频对外用兵，除了占领魏国大片土地外，还征服卫国。他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大师，秦国谍报人员广泛在东方活动，拆毁东方合纵联盟。除了武功外，吕不韦还有一点值得称道，他招集宾客门人编撰了一本《吕氏春秋》，成为先秦时代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年轻的秦王嬴政与当年的秦昭王一样，只不过是坐在王位上的木偶罢了，国家大事全由吕不韦决断。吕不韦仍与赵太后保持暧昧的关系，赵太后是个性欲极强的女人，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只知不断地赏赐自己的情人。在太后的关照下，吕不韦几乎富可敌国，就说他居住的宅院吧，仅仅家童便多达万人。

对一般人来说，混到这地步，也该知足了。但吕不韦是有雄心的人，天天让一个女人羁绊着，日子长了，他也有些烦，只是又不能在太后面前表现出来。怎么办呢？吕不韦心想，与其说太后爱她，不如说太后是需要男人。既然如此，何不给她找一个猛男呢？有了猛男，她就不会天天缠着他不放了。

想到这里，吕不韦开始留心寻找。

却说咸阳城内，有个地痞无赖，此人唤作嫪毐。这家伙没有别的本事，只是长着一根硕大无比的阳具。有一回，他喝醉酒心血来潮，居然在众人前表演一回绝技，用自己的阳具插在桐木车轮上，居然把车轮给抬起来了。吕不韦听说此事后，便故意在太后面前提起，太后果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几天后，吕不韦把嫪毐从市井带入相府，当了一名舍人。嫪毐本就是个无所事事的人，听说要入宫服侍太后，心里欢喜得不得了。吕不韦秘密把他送入宫中，在后宫与太后淫乱。这个嫪毐功夫果然了得，太后一下子就着迷了。此后，这个街头混混儿成为宫中的宠儿，日夜出入后宫，与太后宣淫不已。

可是您想想，后宫本是宫廷禁地，除了太监之外就没有别的男人，嫪毐在这里进进出出，难免会走露风声，到时怕要死得很难看。

看来要想一个万全之计。

吕不韦想了一个办法，他让人去告嫪毐，判处他宫刑。太后一听，这还了得？吕不韦只得对太后说，这只是掩人耳目，不动真格的。只须花点钱财，就搞定宫刑主刀人了，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嫪毐还是受了点罪，要当假太监也不容易，胡子一长出来就露了馅儿，所以必须把胡子全拔光掉。这个混混儿的胡子全被扯下来，疼得他杀猪般的号叫。只是富贵险中求，受点罪便可成为太后的宠臣，比起混街头要强上千万倍，嫪毐也只能忍受这酷刑了。

拔光胡子后，嫪毐换上一套宦官的衣服，摇身一变，成为宫中“太监”了，当然，这个太监只是假太监。有了正式的身份后，嫪毐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进宫，而是大摇大摆地走入太后的寝室，同床共枕。

吕不韦终于喘上一口气，他把太后这个包袱扔掉了，可以腾出手来搞他喜欢的政治。对于后宫之事，他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后宫之

外，都是吕不韦的地盘，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似乎他才是秦国的君主。

尽管吕不韦春风得意，然而没过几年，他本能地意识到威胁的临近。

第一个威胁便是嫪毐。吕不韦把他送到宫里时，只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小混混儿罢了，然而，小混混儿一旦有了一把权力的保护伞，野心同样会无限地膨胀。在赵太后的庇护之下，嫪毐的胆子越来越大，权力欲越来越强，甚至足以同吕不韦抗衡了。

第二个威胁便是秦王嬴政。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嬴政一天天长大，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乖巧听话，尽管他表面上仍然毕恭毕敬地尊称吕不韦为“仲父”，但是尊敬的背后，却隐隐露出不满的神情。

聪明过人的吕不韦，也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自从他在子楚身上投下巨资作为赌注，一路手气极顺，直跃上权力的巅峰。只是高处不胜寒。为了取悦太后，他瞒天过海，把嫪毐作为假太监淫乱后宫，这无疑是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旦这颗炸弹爆炸，吕不韦也会被炸得粉身碎骨。他玩弄权势，玩得过火了！

三四 杀无赦：嬴政的铁拳

刚刚登上秦王宝座时，嬴政才十三岁。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十三岁还是不懂事的年龄，但是嬴政已经远比其他同龄人成熟了。出身于王室之家，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嬴政出生于赵国邯郸，当他刚学会走路，还牙牙学语时，灾难降临了。由于秦攻邯郸，赵国政府决定对人质子楚痛下杀手。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子楚逃出邯郸，嬴政则跟随母亲度过六年东躲西藏的童年生活。他的童年不快乐，落难的日子让他变得早熟。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从小就学会提防任何人，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戒心。秦王嬴政身上那种冷酷的性格，追根溯源，可以说深受童年时代颠沛流离生活的影响。

在秦王嬴政的早年，吕不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吕不韦是不是嬴政的亲生父亲，千百年来争议不休，不可否认的是，没有吕不韦的关怀照顾，嬴政恐怕早就死得不明不白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嬴政即位后，对吕不韦仍然保持着一种敬畏，既尊敬，又害怕。

当时嬴政还只能算是小孩子，大权操诸吕不韦之手。吕不韦并不把嬴政当回事，在他看来，真正掌握大权的人是太后，因而他苦心积虑讨好太后，甚至把嫪毐送入宫中供太后淫乱。

这一切，秦王嬴政都被蒙在鼓里。

然而，吕不韦自以为聪明，却没想到麻烦事一件件出来了。

太后终日与嫪毐秽乱后宫，开心固然开心，没过多久，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发现自己的肚子大起来了。她慌了，堂堂秦国太后，居然怀上一个野种，野种的老爸是以前的街头混混儿，现在的宫廷“太监”！这事要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更要命的是，这件事

要是被儿子秦王嬴政发现了，她这个当娘的还有什么面子呢？

大家想想，秦王嬴政三天两头要去给太后请安，太后要是挺着大肚子，那就不打自招了。怎么办呢？不能待在咸阳城，必须要迁往他处。太后便谎称占卜不利，得换个清静的住所。很快，她迁往秦国旧都雍城，住进旧王宫，里外都安排自己的人。谁也不曾想到，这座旧的宫殿里，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太后产下一个儿子，嫪毐的儿子。

的确，这座神秘宫殿里的那些事儿，被锁在高墙大院之内。当然不是没有人知道，但谁也不敢说。蒙混过关后，太后与嫪毐更加肆无忌惮，很快她又怀上第二个孩子。两个新生儿，就是嫪毐权力的护身符，这个街头小混混儿刚入宫时，还不敢为所欲为。权力是毒品，刚尝时很新鲜，尝过后就欲罢不能了。

嫪毐搭上权力的火箭，一飞冲天。他的权势几乎与吕不韦可以相媲美，拥有庞大的宅第，童仆数千。大家虽然不知他是个假太监，却都知道这家伙能耐大，纷纷投其门下，食客数千，争相巴结。太后对情人的爱与日俱增，公元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赐山阳、河西、太原为他的封地。

对于这些，秦王嬴政难道就没有看法吗？当然不是了。他虽然当了几年的秦王，权力却操诸吕不韦之手，吕不韦为讨好太后，也只能尽量满足其要求。同时，嬴政也压根儿没想到母亲与嫪毐有苟且之事。

在嫪毐封侯的同年，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成蟜叛逃到赵国。

成蟜，又名盛桥，是秦庄襄王的儿子，秦王嬴政同父异母的弟弟，封长安君。堂堂秦国公子何以叛逃到赵国呢？这件事十分蹊跷，

内情扑朔迷离。在现存的史料中，对成蟜叛变的原因没有任何解释，只知道成蟜是带兵出征赵国时临阵倒戈。

后世小说家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构想了一个情节，认为秦王嬴政如《史记》所载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倘若事情曝光，嬴政将失去王位，而血统纯正的成蟜将成为秦王的不二人选。吕不韦借机把成蟜调离京城，派往前线与赵国作战，秦国大将樊於期把秦王身世告知成蟜，成蟜大恐，担心遭吕不韦毒手，遂临阵叛降。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成蟜叛变，肯定是卷入秦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当他率军挺进到屯留时，举部降赵。秦政府反应神速，立即出兵镇压叛军。据《秦始皇本纪》载：“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在这次镇压行动中，叛变的军队遭到集体屠杀。

镇压成蟜叛变，是秦王嬴政早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次残酷的镇压，究竟是出自嬴政的命令，还是吕不韦的命令呢？这个不好说。但是，这件事肯定对嬴政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兄弟竟然背叛自己了。兄弟都不可信，还有谁是可信的呢？这时的嬴政至少还相信自己的母亲，别人不可信，母亲绝不能不信。

几年后，他伤心地发现，母亲也不可信了。

从此，他不再信任何一个人。

转眼间已是公元前237年，即秦王嬴政九年。

这一年嬴政二十二岁，到了亲政的年龄。依照惯例，嬴政到旧都雍城行加冠礼。在吕不韦、嫪毐看来，这加冠礼也就是做做样子，当年的秦昭王，不也当了四十年的傀儡国王吗？

谁都没想到，这趟雍城之行，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咸阳文武百官随秦王到了雍城，这座旧时秦都顿时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酒宴不绝。有一次，嫪毐与一群大臣一起喝酒，这些大臣有些打心眼里瞧不起嫪毐，一个低贱的宦官竟然高高在上，心里不舒服。喝几杯后，借着酒兴，有些人就跟嫪毐有些口角冲突。嫪毐喝高了，怒道：“你们知道我嫪毐是什么人吗？告诉你们，我乃是秦王的假父，秦王都得叫我阿爹呢，你们怎么敢跟我争吵呢？”

嫪毐够嚣张，够猖狂。大家无不吓呆了，这个“太监”竟然敢说自己可是秦王的阿爹，莫非疯了头。嫪毐酒后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众人的酒不敢喝了，纷纷匆匆而去，大家有一种预感：要发生大事了！

很快，有人向秦王告发嫪毐的狂言。秦王嬴政不听则已，听罢是勃然大怒！呸！一个狗奴才，敢在寡人头上拉屎，寡人且看看狗奴才有什么能耐。一道令下，一支禁卫军火速前往嫪毐宅第，几脚踹开大门，却找不到嫪毐的影子。原来嫪毐酒醒后，发现自己祸从口出，吓得魂不守舍，甚至都没跟太后打招呼，便逃出雍城了。

一个天大的秘密浮出水面了。

嫪毐横行霸道时，谁也不敢把内宫的秘密吐露半字。如今他酒后失言，畏罪潜逃，纸包不住火了，终于有人向秦王嬴政全盘托出背后的真相：嫪毐非但不是太监，还与太后淫乱宫中，生了两个儿子。这已经足以让嬴政发狂了，岂料还没完，举报者还道出一个天大的阴谋：嫪毐与太后有约定，若嬴政死了，他们的私生子将继承王位。

嬴政的脑袋“轰”的一下，在那一刻几乎要爆炸了。

自己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被底下人戏弄到这等地步。在整件事中，牵扯到两个重要人物：太后与吕不韦。一个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是宰相、仲父，两个最亲近的人，居然都背地里搞出那么多丑事！

当务之急，是要把嫪毐捉拿归案。

嫪毐逃到哪去了呢？他逃回自己的封地。他知道闯了大祸，已是无路可退，唯有殊死一搏，尚有一丝希望。他假造了秦王的御玺以及太后的御玺，征调郡县的军队、卫队、官骑、戍人及自己的门客仆人，打算造反。当然，他的动作虽快，秦王嬴政更快，通缉令很快下达全国各郡县，故而响应嫪毐者寥寥无几。

困兽犹斗。嫪毐唯一的机会，便是趁秦王尚未返回咸阳时，攻下雍城，杀死嬴政，政变夺权。由于雍城是嫪毐经营多年的地盘，而朝中臣僚们多与这假宦官有些关系，嬴政对这些人统统不相信，他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禁卫军的指挥权交给两名客卿指挥。这两名客卿是来自楚国的昌平君与昌文君，正因为他们是外来人，不可能与嫪毐有牵扯。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嬴政是何等老练与狡猾。

禁卫军很快击溃叛军。嫪毐泡女人是一流高手，行军作战则是门外汉，他的一群乌合之众死了数百人，其余都缴械投降了。

反扑失败，嫪毐落荒而逃。秦王嬴政发悬赏令：擒嫪毐者，赏钱百万；杀嫪毐者，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嫪毐很快行踪败露，落入法网。

权力场上，向上蹿升可以是火箭级的速度，向下坠落则更快。嫪毐仅因一句酒后失言，便从权力的巅峰跌下，等待他的是车裂酷刑。其实，从他玩火的那一刻始，引火焚身的命运便隐隐可见了。

嬴政身上性格残酷的一面开始显现，他开始血腥地报复。其一是嫪毐家族集体遭殃，被夷灭三族；其二，嫪毐与太后私生的两个儿子，被装入大麻袋中，乱棍打死；其三，朝廷中与嫪毐有瓜葛的官员，包括卫尉、内史、中大夫等二十人，或枭首，或车裂，均被灭族；其四，嫪毐的门人家臣，罪行重的处死，轻的被判处服杂役；其五，受嫪毐事件株连的四千多家，被集体流放巴蜀。

至于母亲赵太后，当然不能杀了，幽禁于阳宫。为太后说情的二十七名谏者全部被杀，陈尸宫阙之下。

嫪毐叛变被屠、太后遭幽禁，吕不韦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没有吕不韦牵线搭桥，嫪毐这个烂人怎么可能混入宫中呢？虽然吕不韦并没参与叛变，但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直到嫪毐叛乱后的第二年，秦王嬴政才罢免吕不韦的相位。或许他还惦记吕不韦当年的救命之恩；或许他风闻吕不韦是自己生父的传言；更可能的，是他惮忌吕不韦的权势，等自己亲政后羽翼丰满了才最后清算。

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写道：“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不管嬴政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他叫“仲父”许多年了，还是有点感情的。

免职后的吕不韦并没有受到惩罚，他出居河南，倒也衣食无忧，生活逍遥。权力是一种瘾，上了瘾的人很难与权力一刀两断。别小看下野的政客，只要读读二十世纪的历史，袁世凯、蒋介石都曾下野，下野后仍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同样如此，他虽失去宰相头衔，各国宾客使节仍络绎不绝前来拜访，奉为神明。

嬴政本能察觉到威胁，吕不韦虽下台却阴魂不散，仍然有自己根基甚深的势力。在秦王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不安全感，从童年时的亡命天涯到成年后弟弟成蟜叛变、仲父把权、母后淫乱，连大烂人嫪毐都想政变夺权，只有独裁他才能有安全感，把权力牢牢捏在手心，只有操纵别人，才能避免被他人操纵。

秦王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以严厉的语气说：“君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享十万户食邑。君与秦王有何亲属关系？却号

称仲父。”

这一封信，给吕不韦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不久后，吕不韦的河南封地被悉数收回，全家流放蜀地。这位战国末年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曾以旷世豪赌赢得权力，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最后还是落得输个精光的下场。

一生残暴的秦王嬴政仍然给吕不韦留条生路，只是吕不韦的生命原本为政治而生，如今一无所有，他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他没有动身前往蜀地，而是选择了自杀，饮鸩而死。

年轻的嬴政在五年的时间里，先后铲除成蟜、嫪毐、吕不韦三大政治巨头，实现独裁统治，权力根基已然深不可拔。

三五 李斯与韩非

在吕不韦罢相的那年（前237），秦国破获一起间谍案。

在长平之战后，秦国已然天下无敌，收拾东方诸侯只是时间问题。与秦国接壤的韩国无疑是东方诸侯中实力最弱者，韩桓惠王终日惶恐不安，只要秦国大军一出，韩国必定灭亡。为了拖延秦国灭韩的时间，韩桓惠王想了一个主意，派著名水利学家郑国入秦，游说秦王修建水利工程，由于水利工程必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此举必可迟滞秦国的军事行动。

郑国肩负重任，以水利学家及间谍双重身份入秦，秦王嬴政果然听取其建议，在洛水、泾水大修水利工程以发展关中农业生产。韩王的计划取得一定成效，在此后几年，秦国果然腾不出手解决韩国。

岂料后来郑国的间谍身份被揭穿，秦王嬴政大怒，打算将其处死。生死关头，郑国在狱中上书，一方面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一方面也力陈兴修水利工程从长远的角度看，对秦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嬴政毕竟是胸怀大志的君主，让韩国苟延残喘几年有什么关系呢？兴修水利功在一时，利在千秋，便赦免郑国之罪，督他继续完成工程。这项水利工程，后来名为“郑国渠”，是中国水利史上经典之作。据史料所载，郑国渠修建完成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尽管郑国逃过一劫，这起间谍案仍然引起秦国高层的震惊。秦国政府开始反思历来引进东方人才的政策，过于开放的政策带来一个恶果便是东方的间谍广布，对秦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时秦国宗室大臣纷纷上书，声称：“外国人到秦国来，大多数都是搞间谍破坏活动，应该要把外国人驱逐出境。”于是秦王嬴政发

布“逐客令”，在秦国当官的外国人，一律在驱逐行列。

在这个逐客的名单里，有一个名字是“李斯”。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曾担任一名小吏。他胸有大志，在官场上却混不出个模样。这令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贤能，有些人卑劣？有些人混得好，而有些人混得差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的境遇发生变化呢？

有一天，他在一群老鼠身上找到答案。他上茅厕时，见到几只老鼠在脏兮兮的粪坑里找吃的，一见有人来便惊恐地四处逃去。蹲完茅坑后，李斯去检查粮仓，又看到老鼠出没。只是粮仓的老鼠与茅坑老鼠全然不同，见到人进来也不害怕，照样悠哉地吃着堆积如山的粮食。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事，别人都不会去留意，李斯却得到他人生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一个人是好是坏，就跟老鼠一样，关键看他是在什么环境。”

这叫环境决定论。

这一天，李斯找到了他的人生哲学。

要改变命运，首先要改变环境。要出人头地，就得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环境。

如何改变环境呢？若是没有两把刷子，如何能改变环境？李斯想到求学。拜谁为师呢？自然要找思想界的宗师人物。当时学界领袖荀子受春申君邀请入楚，李斯抓住这个机会，前往学习帝王之术。在他的同学里，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便是后来成为法家巨子的韩非。

完成学业后，李斯根据自己环境决定理论，决定前往诸侯中最强

大的秦国。到了秦国后，他又投奔最有权力的秦相吕不韦。他才识过人，自然引起吕不韦的注意，被提拔为郎官。李斯立志要当米仓的老鼠而不是茅坑的老鼠，吕不韦已经位高权重了，但还不够，要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引起秦王嬴政的注意。

李斯是善于抓住机会的人，他充分利用每次与秦王见面的机会，投其所好，大谈“扫灭诸侯，成就帝业，一统天下”，并强调必须不断给东方六国施压，以防东方合纵运动死灰复燃。秦王听后大悦，把李斯提拔为长史，负责对东方六国实施外交战、间谍战。李斯不愧是情报战专家，他一方面收买各国政要，一方面搞暗杀活动。由于他取得了卓越成绩，被任命为客卿。

正当李斯卖力地向上爬时，秦政府发布逐客令。身为客卿的李斯，理所当然在被逐之列。若是被逐出秦国，李斯就玩完了，只能去当茅厕的老鼠了。难道只能受命运的摆布吗？在李斯眼里，只有自己掌握命运，而非命运摆布自己。

要改变命运，就得主动出击。

他奋笔疾书，其实那时是用刀刻在竹片上，给秦王上了一道书，又称为《谏逐客书》，乃是先秦一篇重要文章：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

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驶，騊、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玕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者，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他以史为证，阐明“逐客令”是大错特错。秦国的强大，得益于客卿的贡献，秦穆公时代如此，秦孝公以后的时代也是如此。秦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如百里奚、由余、商鞅、张仪、范雎等，莫不来自东方。逐客令的实施，只能“以资敌国”，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最后倒退回秦孝公改革之前的蛮荒年代。

这道上书令秦王嬴政幡然省悟，终于废除逐客令，恢复李斯的官职。从此之后，李斯成为秦国政坛的新星，步步高升，后来被提拔为廷尉，掌秦国刑狱之事。

李斯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同窗韩非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公子，可惜生不逢时。在他生活的时代，韩国早在秦国的不断蚕食下成为一只病猫，韩王没有进取心，只要些小手段，派郑国入秦修水利，幻想以此迟滞秦国灭韩的时间。韩非与李斯同在荀子门下受业，他的学术功底较李斯更扎实。李斯求学的目的是想当官，韩非则更有学者的气质。不过，韩非有一个弱点，他文章写得行云流水，说话却结结巴巴，有口吃的毛病。

毕竟是书生。韩非想有一番政治作为，无奈韩国君臣毫无进取心，得过且过，他一腔孤愤，只能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写了十数万言的文章，后被编为《韩非子》一书。他的文章在当时便流传甚广，甚至传到秦王嬴政手中。

有一天，嬴政读到《孤愤》一文，这篇文章剖析了权臣如何惑主，如何攫取权力，君主应当如何善用权术，控制臣下。他读完不禁眼睛一亮，这些话都说到他心里头去了，不由得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在嬴政看来，作者堪称是他的知己，这位没有朋友的君主，内心深处渴望能有这么个知心朋友，虽死无憾。

李斯告诉秦王，文章作者便是自己的同学韩非。秦王眼中露出了光芒，他迫不及待地要会一会这位当世高人。只是他邀请的手段也太过于另类了，不是派人去请，更不是三顾茅庐，而是发兵攻打韩国，

勒令韩王派遣韩非到秦国。

公元前233年，韩非入秦。

他与李斯不同，不是主动入秦，而是迫不得已。秦王嬴政很开心，心情大悦。然而，两人注定无法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敌对阵营，一个是欲吞并天下的秦王，一个是欲保全国家的韩国公子，怎么可能倾心相交呢？

一个有才华的人，既然不能为自己所用，当然也不能放虎归山。反正养一个人并非难事，秦王嬴政索性把韩非扣留在秦国，软禁起来。

不久后，韩非卷入一个事件，竟然丧命于异国他乡。

韩非的死，与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个是他的同学李斯，另一个是秦国大夫姚贾。他入秦后不久，东方诸国为了对抗秦国，又策划一次合纵运动。姚贾自告奋勇，愿前往东方诸国游说，瓦解合纵同盟。为了完成这项使命，姚贾向秦王提出需要马车百辆，黄金千斤。秦王嬴政二话没说，当即就批了。

姚贾以贿赂加恐吓的手段，不战而令东方合纵运动胎死腹中，未能给秦国构成任何威胁。回国后，他自然身价猛涨，官拜上卿，封千户。岂料韩非竟然跳出来攻击姚贾：一来挖他的老底，说姚贾出身低贱，在魏国当过小偷，在赵国曾被驱逐出境，品行不佳；二来攻击姚贾游说东方，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

秦王嬴政听罢大怒，召姚贾前来对质。姚贾逐一批驳：千斤黄金乃是用于贿赂诸国政要，否则如何拆散合纵同盟？至于出身的问题，历史上的名臣，如姜子牙、管仲、百里奚等，都曾声名狼藉，最终都成为安邦定国的一代伟人。

自作聪明的韩非阴沟里翻船，攻击姚贾，大概是对他拆散东方合纵表示不满。只是韩非攻击的方向错了，他认为姚贾既然有过小偷小摸的劣迹，千斤黄金在手，不可能没有任何经济问题。但他没想到，姚贾不仅没有被查出经济问题，反倒把他驳得无以言对。

这件事后，秦王嬴政对韩非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尽管他赏识韩非的才学，却也看出韩非只会维护东方的利益，有机会还会离间秦国君臣之间的关系。

一心想报复的姚贾趁机拉上李斯，两人一起上言秦王，称韩非乃韩国公子，终究不可能为秦国效力，留在秦国没有用处，释放回韩国又留下祸患，最好的处置办法，就是杀了他。

秦国法令苛严，韩非诽谤上卿姚贾，离间君臣关系，这在秦国足以构成死罪。秦王嬴政沉默良久后，终于下令将韩非逮捕入狱。要不要杀韩非呢？秦王心里仍犹豫不决，因为他打心底实在太欣赏韩非的才华了。

嬴政尚在迟疑，李斯已经快刀斩乱麻了。

按理说，李斯与韩非本是荀子门下同学，好歹也有点同窗之谊吧，何至于非要置韩非于死地呢？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李斯嫉妒韩非的才华，这个笔者不认同。李斯虽在学术上不同韩非，在政坛上却混得更好，他的志向在于从政而不在于学问，有什么好嫉妒的呢？笔者以为李斯欲杀韩非，是因为韩非对出身低贱的人有一种蔑视的心态，而李斯便是出身寒微。你这个公子哥一直以来瞧不起我出身，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后果多严重。

李斯擅作主张，把毒药送进监狱，勒令韩非自杀。韩非自认为冤枉，遂请求面见秦王，或是写信给秦王为自己辩解。李斯面无表情，一口拒绝韩非的要求。绝望的韩非只能以颤抖的手抓起毒药，一把塞进口中……

此时秦王嬴政尚不知晓韩非的死讯，一种强烈的惜才之心又油然而生，他终于下达赦免令。只是当使者持令抵达监狱时，韩非已经七窍流血，倒毙于地了。

韩非虽然死了，但他的思想对秦王嬴政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其帝王权术的思想，更成为这位暴君统治天下的利器与法宝。

此时的秦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已经具备一统天下的实力，剩下来的，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三六 硬实力与软实力

我们且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来评价秦国的优势。

（一）政治优势

李斯与韩非的老师、一代儒学巨匠荀子曾经游历秦国，写下这么一段文字：“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桡，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私事也。不朋党，不比周，倜然莫不通阴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治之至矣，秦类之矣。”

后世儒家学者多对秦政持批评意见，而那个时代的荀子则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他看来，秦国风俗淳朴，吏治井然有序，卿家士大夫一心奉公，他甚至把秦国的政治称为“治之至矣”，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那么秦国的政治与其他诸侯国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是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制。

秦的中央集权，较他国更典型。在春秋时代，东方诸侯譬如晋、齐、鲁、郑、宋等，国家权力并非君主把持，而是由贵族把持，秦国则自始至终属于君主独裁制，尽管在若干时期君主的权力也受到贵族的挑战。进入战国后，秦国实施商鞅变法，更把集权制推向极致。

今天我们说到集权制，无不产生反感心态。但是必须看到，在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战争不断，中央高度集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

有限的资源，国家约束民众自由以全力发动对外战争，其产生的爆发力是非常强大的。

其次，秦国拥有完善的地方行政机构。

地方行政机构的变革仍始于商鞅，起初是中央—县二级制，后来发展为中央—郡—县三级制，并成为秦国行政区之定制。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与土地的膨胀，秦国的地方行政机构愈加严密。比如说，最早县级行政区只有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员，后来分工愈密，在这些官职下又设史、秩等，还有专司各种职务的官职。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将朝廷政令下达到最基层的组织。

最后，秦国有完善的法律制度。

法律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秦国法律之严密，任何一个东方国家都比不上。在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共计有十八种法律文书，一百二十五条条文。散见于其他史料的法律文献目录，尚有十余种之多。这些法律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是比较广泛的，而且执行力度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制定法律的商鞅，在落难时由于不能提供身份证明，偏远的小旅馆都不敢接纳他，说明法网甚为严密。

上面所引用荀子的话中有一句：“甚畏有司而顺。”其实秦国所谓的民风淳朴，与儒家所提倡的并不一样。儒家靠的是教化，秦国靠的则是严刑峻法。我们必须说，秦国的政治某些表面现象与儒家类似，譬如说尊卑等级秩序，譬如说表面上的社会和谐，但骨子里的思想则大相径庭。秦国以严刑峻法，可收一时之效，却难以长久，故而秦国一统天下后没多久就崩溃了。

（二）经济上的优势

随着国土面积的扩大与人口增加，秦国在经济上取得压倒性的优

势。秦国西吞巴蜀，东面则占领大量魏、赵、韩、楚的土地，拥有更多的农业资源与耕作人口。在所占地盘中，不少属于经济发达区。在其占领地中，巴蜀是“天府之国”，郾、郢是楚国首都地区，宜阳是韩国重镇，安邑是魏国旧都等等，这些地盘归入秦国，无疑助推其经济的迅猛发展。

抛开开疆拓土不谈，秦国经济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秦国的农田水利工程。

除了郑国主持开通的“郑国渠”之外，秦国还兴修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这便是至今犹存的都江堰。

攻取巴蜀是秦国扩张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为秦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成都平原是巴蜀重要的农耕区，面积将近三千平方公里，这里有平整的地形，肥沃的土壤，自然条件相当好，但饱受水灾与旱灾之害。问题出在岷江这条河流。由于巴蜀是盆地地形，四周高而中间低，当雨季到来时，岷江的水位暴涨，由上游奔腾而下，来势凶猛，往往酿成水灾。故而如何解决岷江灾害，关系到成都平原的经济民生。

为了解决岷江水患，秦昭王任命精通水利的李冰为蜀郡太守，主持水利工程建设。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李冰与他的儿子多次前往察看地形，研究各种方案。经过反复推敲后，李冰决定采用分流的方法。

他把工程地址选择在灌县一带，这里正好是岷江从山区流向平原的交界地带。具体的做法是在岷江河道内修一分水建筑工程（称为鱼嘴），江水流至此便一分为二，一条称为内江，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另一条称为外江，是岷江的主河道。在内江河道，开凿一个人工口道称为宝瓶口，河水经此流向灌溉区。那么，如何保证洪水时，大部分的水从外江泄洪而不至于引起内江水患呢？李冰别出心裁，他在

分鱼嘴与宝瓶口之间修了一条飞沙堰，这道堰的作用是内江水位过高时，便漫过飞沙堰泻入外江，以确保内江水位保持在安全的水平。

都江堰的构思巧夺天工，堪称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代表作。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超过三百万亩的农田得到灌溉。在水灾时，泻洪于外江，在旱灾时，引导水流向内江，保障农业用水。长期以来困扰农业生产的水、旱灾害，由此大大缓解。有了李冰的都江堰，巴蜀才能真正成为天府之国。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都江堰从修建到现在，历时两千多年，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生命力超越了时代，李冰父子早已长眠地下，而他们的伟大杰作，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都江堰见证了秦国的科技实力与强大的生产力，故而秦国能夺取天下，靠的不全是武力，更有武力之外的文化因素。

秦国水利的发达，与重农思想密不可分，“农”与“战”的重要性是等同的，这也是商鞅变法中的一个基本思想。

秦在农业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战国策》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话：“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把秦国无敌归结为四个方面：农业发达，水运发达，士卒强悍，政令严格。其中农业发达的象征便是“牛田”，即大规模使用牛耕，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另外，铁制农具的使用也相当普遍。在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几篇专门论述农业的文章，基本上可视为当时农学的最高水平。在先秦，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部分，哪个国家在农业上领先，就在经济上领先于对方。

经济实力支撑着秦国庞大的军事开销。在战国晚期，秦与赵的长平之战，秦与赵的邯郸之战都旷日持久，经年累月。远离国门作战的秦军，对后勤补给的需求巨大，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这种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秦国对付东方诸国的另一法宝，便是以大量金钱

搞间谍战，秦国的情报部门之所以捷报频传，不只因为效率高，也是因为财大气粗。

（三）军事上的优势

为什么秦国能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呢？战国七雄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在军事上都有过鼎盛的时代，何以秦国能笑到最后呢？

魏、赵、韩三国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在春秋时代，秦国基本上不是晋国的对手。甚至到了晋国分裂后，一个魏国也把秦国打得丧权辱国。楚国是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实力也比秦国强，齐国在威王、宣王时代实力也不逊于秦国。秦人虽然悍勇，但仅仅从悍勇这方面看，显然支撑不住一个军事大国的重量。

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分不开的。从战国史来看，秦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始于秦献公。在秦献公之前，秦国政局动荡，秦怀公、秦出公均死于政变。从秦献公到秦王嬴政，秦国政局虽有小波澜，但总体上是很稳定的，这也给秦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土壤。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自秦献公始，历代秦国君主都很有作为，没有出现一个昏君，这是很重要的。

相比之下，东方诸侯的政局较乱，昏君较多。譬如魏国，魏惠王与公子魏缓的争位战，差点遭遇灭国之灾；齐湣王与楚怀王都可列入昏君之列；赵武灵王死于政变，遂使赵国军事改革戛然而止。诸如此类，在同期的秦国都没有发生过，而这类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一个国家由盛而衰的转折。从这点看，秦国是幸运的。

除了政局稳定外，秦国军事制度较他国完善。

在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兵力一直维持在一百万以上，如此雄厚的

兵力，放在今天也不可小觑。在诸国中，只有楚国的兵力能与秦国媲美。为了保证兵源的充足，秦国实行征兵制。按照规定，男子二十三岁以后就要服兵役。不过，由于秦国不断对外发动战争，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征兵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比如在长平之战的最后阶段，为了完成对赵军的合围，“年十五以上悉发”，把参军的年龄从二十三岁降至十五岁。

秦军战斗力之强，勇冠天下。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在战场上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为数不多的败仗中，有几次是输给赵国，赵国名将赵奢、李牧都曾打败秦军；还有几次是输给东方合纵盟军，包括孟尝君、信陵君领导的几次合纵运动。真正能与秦国较量的国家，只有赵国。这两个国家都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只是赵国在战略大决战中损失四十几万军队，遂一蹶不振。

在秦国历史上，“军功爵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军功爵制是一种奖赏制度，以军功定爵禄，确保军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秦国的军功爵共有二十级，分别是：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此项制度由商鞅创制，只重军功而不重视门第出身。即便是宗室贵族，未立军功者也不得拥有爵位。这项制度，在秦国得到有力的执行。我们看到秦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例如商鞅（大良造，当时未设相）、张仪、魏冉、范雎等，都不是纯粹的文臣，他们都曾经带兵出征，没有军功，他们也不得封侯。

军功爵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对士兵来说是一种激励手段，只要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国家是不会亏待他们的，还可以一级一

级地往上升迁。其次，这也是为国家选拔将领的参考。秦国名将辈出，基本上没有出现断层，因为这些将领都是在实战中脱颖而出的。反观其他国家，任用将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楚国，国家重要将领几乎都出自几大家族，讲究的是出身，而非能力，故而虽有百万大军，战斗力却十分低下。再如赵国，长平之战失利的原因，便是赵王把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派上场，遭到全军覆灭的命运。这种情况在秦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个没有建立军功的人，怎么可以充当总司令呢？

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秦国的强大。到了秦王嬴政时，秦国一统天下的伟业已是指日可待了。

三七 统一的序幕

秦国势力横穿韩魏，直抵齐国边境，如楔子插入东方，东方合纵运动就此终结，诸国只能各自为战了。摧毁赵国的力量，便成为秦国的首要战略目标。

赵国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经历长平之战与邯郸之围后，这个国家仍有不可小觑的军事实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赵军在廉颇、乐乘等将领的统领下，打败了六十万燕军的入侵。在廉颇之后，李牧如同一颗明星冉冉升起。这位赵国传奇名将缔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他以一支北疆偏师，几乎全歼十多万匈奴骑兵。凭此石破天惊的一战，李牧成为赵国抵抗秦国的希望。

秦王嬴政十三年（前234），秦国大将桓率军大举进攻赵国，围平阳、武城。赵王急令大将扈辄前往救援。桓反戈一击，大破扈辄，杀十万赵军将士。这对赵国可谓是沉重一击，国家已到生死存亡之关头。赵王紧急从北疆召回李牧，把阻击桓的重任交给他。

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李牧又一次光芒四射。

公元前233年，桓挟胜利之威，深入赵境。他采取大包抄战术，先扫荡邯郸北部的赵军据点，实施迂回，围攻赤丽、宜安两城（河北石家庄东南）。倘若赤丽、宜安二城失守，秦军将实现对赵国首都邯郸的合围，届时赵国危矣。

李牧临危受命，纠集了一支军队，驻扎在赤丽、宜安东部的肥城（河北晋州市）。这支军队主力应该是来自北方军区，即李牧一手训练出来的部队。李牧行军作战的特点是善于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发

挥各兵种的优势，注意骑兵、车兵、步兵、弓箭兵的搭配与协同作战，做到远攻与近战结合，进攻与防御结合。他的军事原则是打歼灭战，不仅是击溃对手，而是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由于长年在北疆与匈奴等游牧民族对峙，李牧的部队精于骑射，具备强大的机动作战能力，剽悍善战。桓是秦国名将，他入赵作战已有一年之久，虽屡战屡胜，却已是疲惫之师。赤丽、宜安两城尚未攻下，李牧的生力军已经赶到宜安以东的肥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秦军的位置相当不利，随时可能受到赵军的左右夹击。对桓来说，最好的选择当然是退却，避开李牧的锋芒。桓却低估了赵军的力量，尤其是低估了李牧的能力。

在桓等新一代将领崛起后，秦军几乎从未打过败仗，自然对任何一个对手都有轻视之心。李牧是一位有着卓越领导力的将领，他善于鼓舞士气，此时赵军上下，都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信念，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投入战斗。

李牧证明了自己是秦军的克星，他打了一场漂亮的仗，《史记》中是这样写的：“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可惜的是，史书对这场精彩的战斗没有很多的记录，这是因为秦统一中国后，把六国史书全烧了，因而具体的详情被湮没了。以笔者的看法，李牧歼灭秦军的数量，至少在十万人以上。因为桓遭此惨败后，不敢回秦国，只身逃往燕国，并改名为樊於期。以秦国法律，临阵叛逃乃是死罪，桓曾消灭十万赵军，倘若他的伤亡没超过十万人，何至于畏罪潜逃呢？

宜安大捷，使赵国避免成为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李牧力挽狂澜，拯救了岌岌可危的赵国，并收复许多失地。鉴于他出色的表现，赵王封他为“武安君”，这个名号曾经属于战神白起，而李牧就是赵国的战神，他配得上“武安君”的封号。

秦王嬴政对失败是零容忍。

第二年（前232），秦军卷土重来，兵分两路进攻赵国。李牧再显英雄本色，他又一次不可思议地以弱胜强，打败了入侵者。这次胜利的详情，史书同样略而不载。不过，尽管赵国两度击退强秦，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据《战国策》所记，此期秦、赵有过四次大会战，“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赵军的伤亡人数，只有平阳、武城一役有明确数字，战死十万人。以此推算，在其余三战，包括李牧挫败秦军的两次会战，赵军损失不下十万人。

代价惨重，然而李牧的横空出世，打碎了嬴政的如意算盘，秦国不得不暂缓攻赵，把矛头转向韩国。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早已风雨飘摇，成为第一个出局者，并不出乎意料。说是“七雄”之一，实则韩国早沦为小国，在秦国无休止的进攻下连连割地，国土面积愈来愈小。为了保存国家，韩王搞了些小手段，派间谍郑国入秦，游说嬴政兴修水利，以此拖延秦军的进攻时间。

只是，该来的终究会来。

韩国公子韩非被李斯等人陷害而死，韩王大为恐慌，急忙献南阳之地给秦国。韩王要求并不高，只要能保住头顶的王冠就行。然而，这是弱肉强食的时代，你越示弱，越容易被欺负，你后退一尺，别人要前进一丈。肉包子打狗，非但有去无回，反倒激起狗的食欲。

秦王嬴政有超越先王的雄心，他要“振长策而御宇内”，秦国已吞并二周，现在该是消灭诸侯的时候了。韩国不幸成为第一个出局者，他们送出的南阳城成为秦军发动进攻的桥头堡。

公元前230年，南阳军政长官内史滕发动灭韩之役。秦军备战充

分，势如破竹，风卷残云般横扫韩国。东方诸侯们无一伸出援手，因为各国都自顾不暇，焉有兴趣去管韩国的死活呢？在内史滕的猛攻下，韩国首都新郑终于沦陷，最后一位韩王成为阶下之囚，韩国成为三晋中第一个灭亡的国家。

灭韩之战拉开秦国统一天下的序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国时代已进入尾声，昔日势均力敌的战斗场面已难看到，剩下的是弱者抵抗强者的悲壮、凄凉的故事。唇亡则齿寒，韩国的灭亡，令赵国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

灭韩后第二年（前229），秦国再度对赵国发动战争。

秦军兵分两路出击，一路由大将王翦统率上党兵团，进攻下井陘（今河北井陘）；另一路由大将杨端和统率河内兵团，进攻邯郸城；同时秦国还出动一支机动兵团，由羌瘃率领，协助两路大军作战。

有李牧在，秦国的计划能得逞吗？

秦国将领王翦与赵国将领李牧同被列为战国后期四大名将（其他两位为白起与廉颇），倘若两人能在战场上决战，势必是一场经典好戏。可惜的是，李牧没有机会再显其英雄本色，他不是被敌人击败，而是被来自背后的一把刀一击致命。

赵国注定是一个悲剧国家，不乏名将却屡屡自毁长城。先是在长平之战中解廉颇之兵权，这次李牧下场更悲惨，死于政敌之手。在李牧之死中，秦国又一次扮演不光彩的角色，耍起反间计的阴谋。在秦国间谍的活动下，赵国又一次上演窝里斗的闹剧。

关于李牧之死，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史记》所载，李牧为郭开陷害致死。郭开是赵国历史上

著名的奸臣，他曾经陷害过廉颇，导致老将军最终客死他乡。李牧连却秦师，威名远扬，已严重威胁到郭开的地位。此时秦国间谍又在赵国大搞活动，谗陷李牧，遂使郭开痛下杀手。郭开诬陷李牧有谋反之心，年轻的赵王迁黑白不分，遂派使节至兵营，不经审判，当场拿下李牧，以谋反罪斩首示众。

其二出自《战国策》，仍然是奸臣所害，不过不是郭开，而是赵王身边的宠臣韩仓。他除掉李牧的想法与郭开类似，以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赵王迁听信韩仓之言，召回李牧。当时李牧由于长年征战在外，手臂残疾无法伸直，绑了一根木杖以固定。在酒席上，韩仓以李牧袖中藏有凶器为由，一口咬定他想行刺赵王，欲置其于死地。李牧这才明白自己中了他人的圈套，遂自杀身亡。

两则故事虽有差异，有一点是确切无疑：李牧是死于奸佞小人之手。

李牧是赵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他的死，意味着赵国谢幕时刻的来临。

秦军所畏惧的仅李牧一人，李牧一死，对赵国的总攻随即展开。

秦王嬴政颇有用人之明，他把灭赵的重任交给大将王翦。王翦是继白起之后，秦国最出色的将领，他本是频阳东乡人氏，早年便对军事产生浓厚的兴趣，熟读兵书，沉勇有大略。他曾在嬴政身边当侍卫官，深得秦王信任。秦王嬴政十一年（前236），他率秦师伐赵，一举攻陷军事重镇阝与城，并一鼓作气连下九城，震惊天下。此役奠定了王翦在秦军将领中“一哥”的地位，在随后的历次战争中，他都被委以重任，充当急先锋的角色。

李牧无罪获诛，赵军士气凋零，将士们对秦国的入侵固然十分愤

慨，对昏庸的国君又抱着无可奈何的失望。接替李牧出任总司令的赵葱没有能力肩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他孤注一掷与王翦决战，在这次决战中，赵国最后一支精锐部队灰飞烟灭，赵葱以死殉国。

王翦大军一往无前，挺进赵都，包围邯郸。三十年前邯郸保卫战那一幕是否会重现？奇迹还会再次来临吗？所有条件都不具备了。当年的赵国君臣团结，同仇敌忾；如今恶臣当道，奸佞横行；当年有魏、楚为外援，如今东方诸国形同病猫，各自为战，赵国已是孤立无援。李牧、赵葱等将领死后，一向勇武善战的赵国甚至都找不到合适的将领，邯郸城的守将居然是一名外籍将领，此人名唤颜聚，乃是齐国人。

以城池坚固著称的邯郸城内已是人心涣散，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在王翦的猛攻下，邯郸沦陷，赵王迁被俘，曾经雄踞北方的赵国政权就这样灭亡了。

吞并赵国对秦王嬴政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生于赵国，从小在邯郸长大，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并非那么愉快。他迫不及待地动身前往邯郸，当年被人追杀，如今他以征服者的身份回来了。他终于把邯郸乃至赵国踏在脚下，他踌躇满志，如同天神俯瞰天下。

自嬴政及其母亲离开赵国后，由于秦赵两国敌对，待在邯郸的娘家亲戚少不了受人欺辱，也只能忍气吞声。秦王嬴政走亲访友，把所有与娘家有仇的人都抓了起来，一概处死。其实他未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展示自己手中无上的权力，所有人的生与死都操在他一人之手。

韩、赵的灭亡，敲响了东方诸侯的丧钟。

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迈出一统天下的实质性步伐，一个全新

的时代即将到来。想当年，秦国被晋国死死压制在黄河以西，无法向东逾越一步。秦孝公立志变法时，也只不过想赢得东方诸侯尊重罢了。以尚武精神著称的秦武王，其雄心壮志也不过是“通三川而窥周室”。一方面是秦国不断强大；另一方面也是东方六国碌碌无为，遂使力量对比更为悬殊，正因为如此，秦王嬴政才能把统一六国变为可能。

不过，统一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韩、赵虽灭亡，抵抗力量犹存。在若干年后，韩国故都爆发大规模的复国运动；赵国的残余力量更强，秦破邯郸、俘赵王后，并未能占领赵国全部土地，赵王迁的哥哥赵嘉率宗室数百人逃至代郡，登位称王。赵嘉没有继续使用“赵”的国号，而是使用“代”为国号。为了对抗秦国，代王赵嘉遣使入燕，与燕国结盟，屯兵于上谷。

在东方六国中，燕国一直是比较低调而保守的。燕国与秦国并不接壤，故而从未遭到秦国的侵犯。赵国的灭亡，令秦的势力直抵燕国边境，一向安稳的燕国发现自己已成为秦国的下一个猎物了。

不错，志得意满的秦王嬴政要一鼓作气消灭燕国，为自己的伟大事业锦上添花。灭赵功臣王翦接到秦王的指示，移师中山，兵临易水河，为伐燕做准备。身为战国七雄一员的燕国，在战国历史上并没有多少可圈点之处，唯一例外是燕昭王时代乐毅伐齐取得伟大胜利。燕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如今秦师如猛虎张开血盆大口，燕人岂不魂飞魄散吗？

怎么办？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反击呢？

燕国太子丹决定赌上一把，他策划一起惊天密谋：刺杀秦王！

三八 风萧萧兮易水寒

一个是秦国君王，一个是燕国太子。

他们本应是好朋友，不应是仇敌。倘若说嬴政一生有过什么朋友，太子丹恐怕是唯一的一个。两人是儿时最好的伙伴，嬴政是秦国人质子楚的儿子，太子丹是燕国在赵国的人质，难免同病相怜。谁又能料想得到，若干年后，两人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十几年过去了。嬴政成为秦国君王，燕太子丹仍旧是太子身份，而且又一次被当作人质送入秦国。太子丹本想着嬴政还会惦记孩童时结下的深厚友谊，可是他错了，嬴政对他的到来非但冷漠，甚至有些许的敌意。更令太子丹感到难堪的是，他在秦国待一段时间后想返回燕国，秦王竟毫不给面子，一口拒绝了。

考虑到秦国下一步必要兼并天下，太子丹不能留在咸阳，他得想方设法逃回去。他不辞而别，只身潜逃，历经坎坷，终于回到了燕国。人质逃跑是很严重的外交事件，燕太子丹已然表明立场，无异于对秦国宣战。这两个曾经的好友，已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燕是弱国，秦是强国，弱者怎么杀死强者？太子丹只能采用非常规手段，行刺秦王。要行刺万乘之君谈何容易！秦王守卫森严，别说行刺，连接近的机会都十分渺茫。有哪个刺客敢接下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呢？

先秦有个说法，“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都是属北方国家，性情慷慨，富有牺牲精神。太子丹物色了一个江湖著名侠士，名叫田光，向他倾吐心声，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完成刺杀秦王的大业。田光面有难色，并非他贪生怕死，而是年龄大了，不复有当年骁

勇，恐不能胜任。

他向太子丹推荐自己的好友荆轲。

论及武功，荆轲绝非顶级刺客，但他的勇气弥补了武功的不足。荆轲是齐人，后曾游历赵国，与当时武学大师盖聂、鲁句践有过交流，只是他为人有些傲慢，不肯虚心学习。刺杀秦王属于高度机密，田光把荆轲推荐给太子丹后，为保守这个机密，他选择自杀，一个死人绝对无法泄密。

对于一个从不过问政治的游侠，荆轲对刺秦一事并没有兴趣，他之所以答应太子丹，只是因为田光。田光把命都豁出去了，他荆轲就算不为太子丹，也得为老朋友去完成这项使命。

要如何刺杀秦王嬴政呢？

首先必须接近他，否则免谈。如何接近秦王？荆轲提出送去两份厚礼，有两份厚礼，秦王定会接见他，他便有机会下手。这两份厚礼，其一是燕国督亢地图，其二是樊於期的人头。

樊於期是谁呢？他就是秦国大将桓。自从桓被李牧大败后，不敢回秦国，改名换姓，流亡到了燕国。太子丹知道樊於期颇有军事才华，便暗中收入麾下。不过，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秦王嬴政正发令天下，通缉樊於期。荆轲对太子丹说，想要接近秦王，必须要借樊於期的人头一用。

人头是可以借的吗？这个条件，太子丹无法同意。既然收容了樊於期，怎么能把他的脑袋当作利用的筹码呢？

没有樊於期的人头，荆轲连秦王的影子都瞧不见，如何行刺呢？他四处打听，得知樊於期叛逃后，秦王嬴政灭其三族，包括他的父

母、妻儿都惨死。也就是说，樊於期与秦王嬴政之间，有着血海深仇。荆轲决定绕开太子丹，亲自去找樊於期。

见到樊於期后，荆轲以同情的语气说：“秦国对待将军，真是太残忍了，您的父亲、宗族都被处死。不仅如此，秦王还以黄金千斤，封户万家求购将军的首级。您打算怎么办？”

樊於期泪流满面：“每当想到这件事，我就痛入骨髓，只是想不到报仇的办法。”

荆轲又说：“我有一个办法，既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又可以为将军报仇雪恨，将军意下如何？”

樊於期赶忙询问，荆轲想了想，咬牙说道：“我想把将军的首级呈献给秦王，秦王接见我时，我左手揪住他的袖子，右手持匕首猛刺其胸，除掉这个暴君，为将军报仇，为燕国雪耻。将军意下如何？”

要取人家项上人头，还问意下如何，荆轲很疯狂。刺杀秦王是一个近乎疯狂的事，疯狂的事要由一群疯狂的人来做。荆轲是疯狂的人，田光、樊於期也是疯狂的人，他们毫不吝惜人头，似乎自己是有九条命而非一条。

樊於期平静地说：“我日日夜夜想着报仇，咬牙切齿，连心都碎了。今天有幸得先生赐教，后事就拜托您了。”说罢引刀自刭。

太子丹获悉噩耗，匆匆赶来，抚尸痛哭。事已至此，只得依了荆轲，把樊於期脑袋砍下来，用匣子装好。

晋见秦王的礼物备齐了，要杀死秦王，还得携带武器。武器不能太大，否则无法带进宫里，而且要锋利无比，见血封喉。这件武器，太子丹已经准备好了，名为“徐夫人匕首”，乃是赵国名铸剑师徐夫人所铸，值百金。匕首在毒药里反复淬浸，只要被轻轻划一道刀口，便必死无疑。太子丹还给荆轲配备一名助手，名唤秦舞阳。此人乃是一

介武夫，十三岁时就杀过人，武艺高强，身强力壮。

万事俱备，荆轲应该动身出发了吧。

让太子丹困惑的是，荆轲却没有西行的打算，仍然天天花天酒地。难道荆轲只是一个骗吃骗喝的江湖术士吗？

秦军已陈兵边境，随时可以朝发夕至，若不赶紧实施刺秦计划，恐怕就来不及了。荆轲迟迟未动身，是在等一个朋友到来。这个朋友是谁，史书上没有写，但一定是个具有坚忍果敢性格之人。

太子丹催促道：“时间差不多了，您还不想动身吗？要不然我先派秦舞阳去吧。”

荆轲一听勃然大怒道：“您是什么意思？去了却完不成任务，就是没用的小人一个罢了。揣着一把小匕首前往强大的秦国，很多事情是无法事先预料的。我之所以还待在这里，是等待一个好朋友一同前往。既然太子认为我故意拖延时间，我这就走，在此跟您诀别了。”

说罢，他打点行装，带上装着樊於期人头的匣子，一幅燕国督亢地图，在地图里还藏有一把锋利的匕首。

送别的一幕十分悲壮。

太子丹等人身穿白色衣帽，一路送至易水河畔。渡河后，在旷野上设宴为荆轲、秦舞阳饯行。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这是一次生离死别，无论荆轲刺秦王能否得手，都不太可能活着回来。送行者中有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他以手击筑，荆轲放声高歌。起初是“变徵”音调，苍凉而凄婉，闻者莫不落泪。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简单的一句歌词，却有诉不尽的故事。英雄怎么能留恋生，留恋儿女情长呢？为义而慷慨赴死，不是男儿本色吗？高渐离陡然变调为“羽”，击筑声高亢有力，慷慨激昂，荆轲的歌声由苍凉变得充满战斗激情，气冲霄汉。

再好的音乐，也有停止的时候。高渐离与荆轲合奏的千古绝唱，久久回荡在易水河畔。荆轲与秦舞阳二人跳上马车，头也不回，向咸阳疾驰而去。不论此行结局如何，他们的名字都会永载史册。

虽说荆轲所带去的两件礼物无价，但秦王会不会接见，谁也无法打保票。为了确保刺杀计划得以执行，荆轲到了咸阳后，花了一大笔钱贿赂秦王的宠臣蒙嘉，再三强调燕国的礼物极为贵重，必须亲自交给秦王。

蒙嘉收了钱财后，入宫对秦王说：“我大军压境，燕王不敢抵抗，愿举国投降当秦国的臣子。为表诚意，燕国砍下樊於期的首级，同时献上督亢地图，派使者前来，就等着大王的召见了。”

秦王听罢大喜，当即下令，在咸阳市接见燕国使者。

几天后，秦国君臣齐聚咸阳市。秦王嬴政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很快他就要宣布燕国不战而降的消息。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从宫门到大殿外，站着一排排手执长戟的武士，这是天底下戒备最森严的地方，谁能相信这里会有刀光之灾呢？

秦王传令：宣燕国使者进殿。

荆轲与秦舞阳一前一后，缓缓而行。荆轲手中捧着一个匣子，匣盒已打开，里面安放的是樊於期的脑袋；秦舞阳手中则捧着燕国地图，地图也用一个长形匣子装着，在地图轴卷里，是一把见血封喉的匕首。他们每前行一步，就是接近死亡一步，每前行一步，都要承负

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足以让一个正常人为之精神崩溃。

在压力面前，最可看出人的内心是否真正强大。

秦舞阳十三岁便杀人，被公认为燕国勇士，但是他的怯意已写在脸上。每一级台阶仿佛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都要用尽全身的气力才迈得上去。他感觉手脚发软，寒意袭来，身体失控一般地颤抖着。

与秦舞阳相比，荆轲神色自若，步伐沉稳而有力，不曾有过一丝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是形容一个人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是内心强大的写照，荆轲就属于这样的人。他从容不迫地走向大殿，已经可以看到坐在大殿之上的秦王嬴政。他仍然保持冷静，走入殿中，献上樊於期的人头。

就在这时，站在殿门之外的秦舞阳脸色大变，冷汗淋漓，捧着地图盒子的双手在颤抖。一个人，不论平素如何骁勇，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时，绝少能真正做到若无其事。我们不能说秦舞阳是个胆小的人，他的表现只能说是人之常情。相较之下，荆轲的表现，则是超越世间凡人，难怪乎其事迹能传颂数千年之久。

秦舞阳的异常表现险些坏了大事，所幸的是，荆轲以聪明的方式掩盖过去了。他面含笑容向秦王解释说：“这位是来自北方的粗野鄙人秦舞阳，他没见过天子，心里害怕紧张了，大王切莫见怪。”秦国君臣们听罢不禁晒然一笑，心里都有几分得意，说明今天的排场够大、够气派。

在此之前，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到了最关键时刻，秦舞阳坏了事！鉴于他慌张异常的表现，荆轲只能把他留在大殿之外，刺杀秦王的任务，完全落在荆轲一人身上。

荆轲接过秦舞阳手中的匣子，取出地图，双手高高捧着，向秦王

嬴政献图。

秦王庄重地坐在大殿之上，前面摆放一张案几。荆轲捧着地图，慢慢走到秦王之前，在案几前跪下后，将地图置于案上，缓缓展开。只见图上画满燕国山川河流的记号，真乃无价之宝。秦王正打算仔细看时，突然间，一道刺眼的光芒闪出，图穷而匕首现，在地图里居然藏着一把锋利无比的短刀！

谁也没想到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局。

大家才看到一把亮闪闪的刀，还没反应过来，荆轲已把匕首操在手中，另一手抓住秦王的衣袖。秦王吓坏了，他本能把身子往后一仰，把双臂往后一缩，被荆轲抓住的那截衣袖给扯断了。可以说，是案几救了秦王，因为小桌子的隔挡，让他躲过了荆轲最有威胁的第一击。

荆轲有武器，但匕首太小，一定要近距离攻击才能击中。大殿之上，目瞪口呆的大臣们谁都没武器，只有秦王嬴政自己有一柄佩剑，这柄佩剑太长了，秦王拔了几下都没拔出来。剑没拔出来，荆轲已跳过案几，猛追过来。秦王撒腿便跑，往哪跑呢？殿里有几根大柱子，他绕着柱子跑，荆轲边追边戳，但都没刺中。

倘若不是秦舞阳临阵胆怯，两个打一个，秦王嬴政无论如何也难逃一劫。只是任何一微小的细节都可能改写历史，没有这些细节，历史就没有真实性了。

秦王绕着柱子跑，荆轲绕着柱子追，其他大臣在下面吓得没有人色，谁也没敢挺身而出，因为谁身上都没有带武器。有一位侍医，名唤夏无且，他往身上一摸，腰间别着一个药囊，赶忙扯下来，朝荆轲身上掷去。荆轲见有暗器飞来，一闪身躲过，但是别小看这一眨眼的工夫，因为荆轲这一迟滞，秦王得以把剑拔出来了。

长剑是别在腰间的，习惯性的拔剑动作，当然是右手按住剑柄，从右上方拔出。不过秦王绕着柱子跑，身体本就前冲，手臂也不舒展，右手要从右前方拔剑就十分困难。有大臣大喊：“王负剑，王负剑。”

古文就是有古文的妙处。“王负剑”仅三个字，现在要十几个字才能表达，意思是：大王从背后把剑拔出来。那一刻，时间就是生命，能用三个字表达的，绝不用十个字。秦王趁荆轲躲避药囊那片刻时间，把剑推向背后，右手往肩后一抄，抓住剑柄，向上一拉，利剑出鞘了。

在我们印象中，刺客都是武功深不可测的奇侠，其实不然。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刺客，武功平平，他们之所以名扬天下，靠的乃是勇气而不是武功。荆轲的武功很一般，他既不懂得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也不会降龙十八掌之类的套路。他用匕首对抗长剑，马上落入下风，被秦王一剑砍在左腿上，一个踉跄，摔倒在地。

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未能击中秦王；以匕首对徒手，他没能抓住秦王；如今他身中一剑，自知没机会了，只能把匕首奋力向秦王掷去，只要锋利的刀锋在皮肤上划出一丝血迹，秦王也会中毒身亡。只可惜，投出的匕首没飞向秦王，而是飞向铜柱，“叮当”落地。秦王乘机冲上前，在荆轲身上连刺八剑。

荆轲坐在地上，浑身血流如注，冲着秦王惨笑道：“我之所以失手，是想要把你生擒，逼迫你签订条约。”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在行刺的那一刻，荆轲仍持有侥幸的心态，若是劫持秦王可能是双赢的结果，也是他唯一能生还的机会。只是，幸运之神并没有光顾他，刺秦行动最终以悲壮的方式失败了。

勃然大怒的秦王唤来卫兵，把荆轲乱刀砍死。

荆轲刺秦王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杀案，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是一次策划严密的刺杀行动，整个计划几乎滴水不漏。为了这个计划，前后死了许多人，包括田光、樊於期、荆轲、秦舞阳等人，牺牲巨大，可惜最后功亏一篑。后世诗人陶渊明曾这样叹息道：“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把刺秦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荆轲剑术水平欠佳。我们歌颂荆轲以弱击强、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应看到，即便刺杀秦王嬴政，燕国也无法挽回败局，秦国的强大并非嬴政一人之原因，而是数代上百年积累的结果。

从现实的角度看，荆轲刺秦王是无意义的冒险；但从文化的角度看，则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他成为一个反抗暴君、反抗暴政的文化符号。后世文人写了大量咏荆轲的诗篇，列举一二如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骆宾王《易水送别》）“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刺秦的失败，直接导致秦对燕国的用兵，加速了东方诸侯的覆灭。

三九 东方诸侯的覆亡

咸阳宫遇刺，是秦王嬴政一生所经历过的最为凶险的一幕。这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敌人太多了，如果不灭掉东方诸国，他将永无安宁之日。韩、赵的历史已被终结，秦国战车滚滚向东，要碾碎每一寸反抗的土地。

（一）燕、代的灭亡

燕国是“刺秦案”的始作俑者，理所当然成为秦王嬴政的首个报复目标。尽管秦王被荆轲的惊天一击吓得肝胆俱裂，但他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张珍贵的燕国地图，有了这张地图，要拿下燕国就容易多了。

公元前227年，驻扎在燕国南部边境线上的秦军部队在王翦、辛胜的统领下，越过国境，进攻燕国。燕王情知这一战无可避免，遂与代王赵嘉联合，试图阻击秦国于易水河西。在强大的秦军团面前，这条防线形同虚设，很快被王翦击破。代王赵嘉北遁，游击于穷山恶水之间，燕师则东撤以避敌锋芒。

经数月扫荡，王翦已兵临燕都蓟城之下。老迈的燕王无心恋战，把首都守备交给太子丹，自己远走辽东。太子丹本非雄才伟略之人，如何对付如狼似虎的秦军？很快蓟城失陷，太子丹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向辽东方向撤退。秦军悍将李信亲自率数千骑兵，一路穷追猛打，追击太子丹至衍水河畔。此时燕、代高层均认为战争完全是太子丹策划暗杀秦王引起，只要太子丹不死，秦军便不会停止进军。

在众人的压力之下，燕王只得含泪处死太子丹，持其头倾向秦国请和。

太子丹的人头让燕、代两国多苟延残喘四年，然而，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公元前222年，魏、楚先后灭亡后，秦王嬴政把铲除燕、代政权的重任交给王翦的儿子王贲。虎父无犬子，王贲不负所望，对燕国的残余力量发动雷霆一击，一举攻陷辽东，俘虏燕王喜，燕国灭亡。紧接着，王贲挥师入代，势如破竹，击破残赵兵团，俘虏代王赵嘉，赵国之流亡，代政权亦宣告瓦解。

（二）魏国之亡

秦灭魏之战，毫无悬念可言。

自魏安釐王及信陵君死后，魏国国力一落千丈。公元前242年，秦国大将蒙骜攻魏，取二十座城，置为东郡。四年后，秦国大将杨端和连克垣、蒲阳、衍氏诸城，进逼魏都大梁，魏王只得割地投降。此时的魏国国土，只剩下大梁城及周边一些地方而已。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挥师入魏，围攻大梁城。这座战国时代著名的城堡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为了攻破大梁，王贲决黄河及大沟水淹城。魏军为最后的荣誉而战，最终城墙在洪水的浸泡下轰然倒塌一段，秦军乘机杀进城，俘虏并杀死魏王，魏王的小儿子去向不明。

斩草务必除根。秦王嬴政下令：“有捕获魏公子者，赏金千斤；敢于藏匿者，诛九族。”乳娘带着魏公子逃往沼泽地，最终仍被旧臣出卖。秦军追至沼泽，包围魏公子所在的茅屋，乱箭齐发。乳娘身中十二箭而亡，仍未能保住魏王之血脉，小公子被射杀后，又被砍下头颅、拿去请赏了。

继韩、赵之后，三晋中硕果仅存的魏国也被轻轻从地图上抹去。

（三）楚国之亡

在秦灭六国之役中，除了赵国之外，楚国是最硬的骨头。楚国是军事大国，却难称军事强国。在最鼎盛时，楚国曾经拥有一百万军队，但是对外战争表现平平。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楚国虽是瘦死，国土仍相当辽阔，军队数量也很庞大，要打败它容易，要征服它并不容易。

公元前226年，在秦将王翦、李信发动伐燕之战的同时，秦王嬴政派出一支部队，由王贲指挥，对楚国发起试探性的进攻。王贲有乃父之风，骁勇善战，连破楚城十余座，威震大江南北。王翦、李信班师回朝后，秦王决定一鼓作气，灭掉楚国。

灭掉楚国需要多少兵力呢？

少壮派将领李信说：“只需二十万就够了。”

老成持重的王翦却答说：“非得六十万不可。”

秦王一听，老家伙老矣，不求进取，看来伐楚之战得让勇猛过人的李信指挥。王翦意识到秦王对自己已产生不信任感，索性急流勇退，以疾病缠身为由，申求退休。秦王顺水推舟，同意王翦的辞呈，解除其兵权。李信被任命为伐楚兵团总司令，名将蒙骜的儿子蒙武为副将，领兵二十万，杀气腾腾猛扑楚国。

楚军的战斗力果然低下，在李信兵团的打击下，溃不成军。秦军连战连胜，兵分两路，李信进攻平舆，蒙武进攻寝丘，两路大军都捷报频传。李信挟胜利之威，进攻新郢都（寿春），并一鼓作气夺下来。

表面上看，楚师大败，秦军凯旋在望。然而，不久后，李信开始力不从心了，因为楚国士兵太多了，杀了一批又冒一批出来；楚国土地太大了，占了这一片土地，放眼望去还有无垠的土地。二十万人根本不够用！只要楚国不投降，总有一天，秦军会被拖垮的。原本信心

满满的李信开始动摇了，是继续向东挺进，还是向西撤退，收缩战线呢？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后撤，与蒙武的部队会师，再作定夺。

李信想后撤，楚军正酝酿着反击。领导楚军反击的人，可能是项燕，他是战国历史上少数可值一提的楚将，也是盖世霸王项羽的祖父。李信做梦也不会想到，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楚军居然还能展开强有力的反攻。当一个国家陷入生死存亡之时，爱国主义精神总能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潜能。楚军连破李信与蒙武的营垒，秦军死伤无数，仅是都尉级的高级军官便被杀七人。

李信吹牛也吹得忒狂妄了，以为区区二十万之众可以踏平楚国，最后只得自取其辱，灰头土脸地败退回国了。

惨痛的失败终于令秦王嬴政清醒了。

姜还是老的辣，打仗不是凭一时之勇，而是“多算胜，少算不胜”，王翦比李信保守，是因为他“算”得更多。看来灭楚一事，还得请老将军王翦出来才行。秦王亲自跑到频阳王翦家中拜访，希望他担负起灭楚的重任。

王翦推托身体有病，不愿意重出江湖。为什么呢？他有自己的担心。自统一六国之战拉开帷幕以来，王翦、王贲父子伐赵、攻燕、破魏，功勋远在他人之上。该有的名誉都有了，功劳越大，权力越大，只会令君王猜忌心、防患心更强罢了。可是，“武皇开边意未已”，王翦遇到的是妄想征服世界的野心家，只要天下尚未平定，秦王是不可能把他搁在一旁的。

秦王嬴政斩钉截铁、以不容反驳的语气说：“这事我决定了，将军不必多说。”这种说话的口吻，就如同当年秦昭王对白起的最后“通谍”。白起的下场，王翦是晓得的，因此他除了接受任命，别无办

法。

逃是逃不开的，王翦便说：“若定要用老臣，非六十万人不可。”

没问题，就算是死六十万人，秦王也不会放在心上。

王翦重披战袍。在战国诸名将中，王翦是最聪明的人之一，他不但会打仗，也善于保全自己。一名将军，在战场上是一柄利剑，是君王豢养的猎犬，等到哪天不用了，就是“兔死狗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常见的。大家想想，王翦手握六十万军队，要是造反，秦王能吃得消吗？因此，秦王表面上重用王翦，心里却又不能不防着，这是君王的矛盾心理。

若王翦在前线卖力作战，背后有人诬他造反，秦王就算不信也得信。君王宁可错杀，也不愿自己冒风险。

临出征前，王翦提了一个特别的请求：他看中了一些良田大宅，希望秦王赏赐给他。秦王不禁大笑，你若灭了楚国，还怕没有豪宅可住吗？他对王翦这样的请求感到不可思议。军队出发后，王翦竟不死心，先后派五人，到秦王那儿落实封田赏地的事。

老将军怎么这样小心眼？部将们也很纳闷。王翦对众人说，秦王多疑，又把举国之兵交给我，岂能不猜疑、提防我？我讨取田宅，作为子孙的家业，是表明我志止于此，没有野心。众人听了皆大服，这就是所谓“求田问舍”的政治智慧。

公元前224年，秦军再度杀入楚国。

遭到秦国多次打击后，楚国的兵力远比入侵者人数少。王翦手握六十万大军，并不长驱直入，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推进到平舆一线。楚王负刍与大将项燕且战且退，他们都明白，最终还是避免不

了一战。与其被动决战，不如主动求战，这一战将直接关系到楚国的生死存亡。

王翦仍旧不慌不忙，部将们都主动请缨，老将军不批准，只是构建漫长防线，只守不攻。项燕派军队前来叫阵，王翦不予理睬，只令士兵们轮流休整，以保持旺盛的斗志与体力。楚军求战不得，统帅部作出一个致命的决定：放弃与秦军对峙，悉数东撤。原本楚军将士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现在还没开打，突然便要撤了，难免引起军心动摇。王翦觑准了机会，果断下令出击。

双方在蕲南展开决战，以逸待劳的秦军大获全胜，在此役中俘虏楚王负刍，楚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若是换成别的国家，国都被端了，国君被俘了，早就举旗投降了。然而，在存亡时刻，楚国忽然迸出勇敢的火花，大将项燕迎回昌平君，立为楚王，抗战的旗帜仍迎风飘扬。

昌平君本是楚国公子，因楚国内乱逃往秦国，在秦平叛嫪毐之乱时曾立过功。公元前226年，被秦国灭亡的韩国掀起复国运动，昌平君似乎参与了这次运动。韩国复国运动被秦国镇压下去后，昌平君辗转回到楚国，参加反秦战争，被项燕立为新的楚王。

残余的楚国抵抗力量在昌平君、项燕的领导下，在淮南继续抗秦。不过，这种抵抗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秦军的步步紧逼下，他们的处境日益恶化。

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对项燕残余兵团发动大规模围剿。这也是楚国最后一次抵抗，最终难逃全军覆没的下场。在这场战事中，楚王昌平君力战而死，至于项燕，有的史书称他是自杀而死，有的史书称他被秦军俘虏后处死。项燕死后，他的儿子项梁、孙子项籍逃走了，浪迹天涯，后来成为反秦战争的重要人物。

（四）齐国之亡

东方六雄中的韩、赵、魏、楚、燕先后败亡，山东诸侯中硕果仅存的只有齐国。齐国之所以比其他诸侯国活得久一点，只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最东。

自从乐毅伐齐后，齐国便从顶峰重重跌落，甚至险些亡国。田单复国后，两任齐王不思进取，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从不参加东方合纵运动，以避免激怒秦国。齐国既“不助五国攻秦”，同时又“不修攻战之备”，摆样子是想当个永久中立国。尽管这一政策颇为消极，却为齐国谋得四十多年的和平。

问题是，齐不助五国攻秦，不等于秦国不会来攻。眼看东方其他五国都被消灭了，中原只剩下一个超强秦国与一个弱小的齐国，齐王还能有机会与秦王平起平坐吗？当然不可能！

齐国宰相后胜本就是亲秦派，他建议齐王建，不如直接到咸阳朝见秦王，当个附庸国，这样国家还是保得住的。齐王建又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听完后深以为然，便准备动身前往咸阳。岂料守卫首都雍门的司马发动兵变，阻止齐王前往投降的企图，没办法，齐王只得龟缩在临淄城内。

此时，秦王派遣使者陈驰入齐，许诺齐王建：若不战而降，将封赏五百里之地。对于齐王来说，有五百里之地养老，比起其他诸侯王也算幸运了。此时再不降，更待何时？他不顾众人的反对，一意孤行，举国投降。秦军兵不血刃开进临淄城，东方最后一个诸侯宣告灭亡。

齐王建的下场真的比其他诸侯王要好吗？

并非如此。

正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齐王不死，秦王不安。狡诈的秦王耍了花样，他把齐王流放到一片荒凉之地，此处没有人烟，只有松树与柏树，至于有没有五百里，鬼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封地，齐王建在这片近乎原始的丛林中，没得吃没得穿，活活饿死。早知如此死法，倒不如脖子来上一刀痛快呢。

从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灭六国之战总共只用十年，可以说是摧枯拉朽。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一个强大的帝国在战争的废墟上诞生了。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诸侯分封制，中央政权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这也是列国征伐不休的原因。那么这个新帝国将采用什么办法，保持中央高度集权呢？雄才伟略的秦王嬴政，将如何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呢？

四十 始皇帝及其帝国

秦从一个周的附庸国开始，历时数百年，最终取代周室，扫灭群雄，一统中原，其事业不可谓不伟大。秦的兴起，见证了春秋战国时代经济、政治制度、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先前的夏、商、周三代，虽有统一之名，但无统一之实，原因很简单，以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中央政权无法长期、大规模对外用兵，故而地方之实权操诸诸侯之手，诸侯有自己的财政权与军队，足以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到了秦统一六国之时，秦之军队，可以有效地对数千里之外的反叛力量发动毁灭性的打击，这背后显然有经济及技术进步之支持。

统一六国，是嬴政最伟大的事业，在他之前，没有人取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然而，这功劳又不独嬴政一人所有，而是与他之前的诸位明君的奋斗分不开，只是嬴政比较幸运，站在前代伟人的肩膀上，以高屋建瓴之势，冲决天下。运气固然重要，个人能力也不可低估。嬴政即位后，内有吕不韦擅权、嫪毐之乱，外有荆轲之刺杀，亦可谓如履薄冰。他意志坚强，以强有力的手段维系独裁；他知人善任，善于纳谏。郑国本韩之间谍，他能不计前嫌，终开通郑国渠，造福关中；李斯本一客卿，他能抛弃成见，废除逐客令；王翦为一代名将，他能委以重任，知错便改，亦可衬其胸襟。

六王毕，四海一。其他王都不在了，只剩下一个秦王。

“王”这种尊号，对嬴政来说，实在太小了，不足以衬其大。自己的成就，超过夏、商、周任何一位王，怎么还可以用“王”的称呼呢？说白了，他的虚荣心在作祟。他把丞相、御史、廷尉等高级官员召来，说道：“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在嬴政看来，更改尊名是为了“称成功、传后世”，他要的不仅是今世的名，也要让后世传颂其不朽的、伟大的业绩。孔子不是说要“正名”吗？似乎没有尊号，他的伟大将很快被遗忘似的。

要用什么新的尊号呢？自有一群刀笔吏绞尽脑汁，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亲自参与，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选了一个名字：泰皇。泰皇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其中“三皇”是哪三皇，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天皇、地皇、泰皇。泰皇就是人皇，人中之最尊贵者。

这群马屁精上表，吹嘘秦王“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宜上尊号为“泰皇”。秦王一听，有些不太满意，他亲自改了一个字，保留“皇”字，加一个“帝”字，合称“皇帝”。这一改动，使“皇帝”这个称号沿用了两千多年，也算是嬴政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贡献吧。

嬴政是第一个皇帝，故而称为“始皇帝”，又称“秦始皇”。在秦始皇看来，他的帝国将万世不灭，以后的皇帝，就叫秦二世、秦三世，乃至千世、万世，传之无穷。

新的帝国，万象更新，不仅尊号要改，其他称呼也要改。皇帝发的命令要称为“制”或“诏”，以前“命”与“令”是不同的，“命”是发布与制度有关的政令，故改称为“制”或“制书”；“令”是皇帝昭告天下的文书，故称“诏”或“诏书”。皇帝自称为“朕”，这个字别人统统不能用。其实，在先秦，“朕”相当于今天的“我”，谁都可以用，自秦始皇后，“朕”便成了皇帝专用词。

当然，皇帝不可能一个人管国家，他需要一帮大臣。定完皇帝尊号后，便定百官之制。皇帝之下设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管政务、监察、军事，是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三公之下设九卿，分别是：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这就是“三公九卿”，对后世官制产生重大影响。

新帝国争议比较大的一件事，是要采取分封制，还是采取郡县制呢？

丞相王绾与廷尉李斯在这个问题上见解不同。

王绾认为：“燕、齐、楚等地距离较远，倘若不设置封王，难以统治，应该立诸皇子为王，坐镇远疆。”

李斯则批驳说：“周王朝成立时，文王、武王大肆分封子弟，随着时间的推移，封王们的后代血缘愈加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诸侯混战，天子没办法禁止。如今赖陛下神明，一统海内，四海之地皆为郡县，至于诸皇子以及功臣，只要从国家赋税中拿出一部分赏赐就足够了。如此一来，天下就没有人对朝廷有异心，这是安邦宁国之术，不应该再分封诸侯。”

在这一点上，秦始皇亦颇有主见，他说：“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同意李斯，仍保留郡县制，废除分封制。

改分封诸侯制为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无疑是制度之一大创新。不过，这种制度也不能称得上尽善尽美，不久后便暴露出巨大的问题。当地方叛乱兴起时，地方官吏对朝廷的忠心，显然比不上自家子弟。作为一种新的制度，郡县制避免了诸侯分封带来的相互杀伐以及中央政权的旁落，但是这毕竟是崭新的制度，对可能到来的危险，非朝廷所能预见。后来汉取代秦，索性采取分封与郡县的混和制度，这种制度仍然有问题，导致后来七国之乱，地方诸侯与中央的战争。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把封国最大程度弱小化，诸侯不复成为朝廷的威胁，不过仍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由于封国太弱，又致使王莽篡汉时，朝廷没有藩王作为外援，最终覆灭。其实，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是否合理，而在于君主专制的国家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秦国将全国分置为三十六郡，后来陆续征服一些新的土地，再置四郡，共四十郡。每郡主要长官有郡守（掌政务）、尉（掌军事）、监（掌监察）。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县设县长。郡、县长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不设世袭。

秦统一中国后，实施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文字标准，此举意义重大。

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里，由于诸侯林立，争战不休，各国都发行自己的货币，样式五花八门，大小、轻重各不相同，给不同地区间的货币流通交换造成极大的麻烦。古代货币与今天不同，金、银、铜、珠玉、龟贝等都曾具有货币职能。秦统一后，只保留两种，即黄金与铜，其中黄金为上币，铜为下币，其余银、锡、珠玉、龟贝等只作为装饰品，不再具有货币属性。铜采用的是方孔圆钱，每币重半两，又称为半两钱。秦国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式，成为后代中国铜钱的标准样式，使用两千年之久。

战国时代各国的度量衡制也不同。各国都使用“丈”“尺”这些长度单位，长度却各有差异。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就推行全国统一的长度单位，故而秦国制造的兵器是比较标准化的。在一些内政相对混乱的国家，比如楚国，同样“尺”的单位，在各地也是有不同的，这种标准化的缺失，也可看出这些国家不如秦国的一面。

与长度单位相比，量度单位的差异更大。秦以升、斗、斛为单位，齐国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赵国以斗、升、分、益为单位等等。而同样的“斗”“升”，在不同地区的实际容量也是不同的。重量单位同样如此，五花八门，令人头昏脑涨。

秦国制造标准度量衡器，推广全国，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表明秦国各地的度量衡器都是一致的，这种统一大大方便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活，功德无量。

文字的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

战国时代的文字就如同今日之方言，各个地方都不同。大家想想，这对普及文化来说，是一件何等困难之事。虽说文字出于同源，但写起来都有所不同，不易辨认。秦始皇着令李斯等人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并写成范本。小篆是由大篆演化而来，笔画更加简单而均匀，易于识别。为推广小篆，李斯、赵高（中车府令）、胡毋敬（太史令）等人分别编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以为范本。

文字是文化的基础，统一文字，其功绩是伟大的，其影响是深远的。自秦以后，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分分合合，无论是统一或是分裂，“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即便是分裂，文化也没有分裂，文字也没有分裂。文字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刻影响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因此，只要使用的文字相同，说的话相同，中国最终都会走向统一。

统一后的中国，自然打破以前诸侯割据时的界线，道路交通也随之得到迅猛的发展。秦王朝仍定都咸阳，在地理位置上偏西，在古代没有电话、手机、互联网这些通信工具的条件下，信息只能靠人来传递，因此道路必须要通畅快捷。

公元前220年，秦政府以咸阳为中心，兴修“高速公路”。秦时的“高速公路”称为驰道，顾名思义，就是马匹可以高速奔驰的通道。最重要的驰道有两条：一条通往齐、燕，一条通往吴楚。秦的驰道，与今天的高速公路一样，都是封闭式的，这样马车才能高速行驶。史料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就是说，驰道宽度是五十步，每隔三丈便有植树，两旁筑起厚墙，还加有金属物以坚固，两侧植种青松。这个工程

不仅浩大，而且壮观。

在咸阳以北，修有直道，直达九原郡，这也是秦重要的交通线。这条直道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全长一千多公里，用于防御北方匈奴骑兵。一旦北方有警，秦的军队可通过直道快速抵达前线。如此浩大的工程，竟然是完工于两千年前的秦国，这不由得令人钦佩秦人的雄心与智慧。

有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后，秦国还统一车轨，规定轨距离为六尺，即所谓的“车同轨”。不过，现在一些史学家、考古学家对“车同轨”提出不同的看法。在河南南阳山区的考古中，发现秦时的“轨道”。轨不是现在火车开的铁轨，而是木轨，车子当然也不是火车，是马车。既然是轨道，车轮当然也与普通的马车轮不同，而是类似于火车轮，能够卡在轨木上，这样子马车高速行驶时，车轮不至于滑出。也就是说，秦国不仅创造了类似于高速公路的“驰道”，而且可能还是类似火车的轨道交通。这些细节，对我们理解秦之伟大，实有重大意义。

四一 开边与遇刺

征服六国后，秦始皇意犹未尽，他还要锦上添花。

在中国东南及广阔的南方，是传统上的蛮夷区，这里文化落后，民风强悍，又称为“百越之地”，这些蛮人又统称为越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挟灭六国之威，派尉屠睢统率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大举进攻东南与岭南，先后征服瓯越、闽越等。然而，在征服岭南时，秦军却遇上大麻烦。一方面南方多河流，且山深林密，士兵容易染疾，后勤补给跟不上。再者，岭南这些越人十分骁勇，《淮南子》一书曾这样写：“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他们过惯自由的生活，现在有人想统治他们，当然得奋起反抗。在越人英勇的抵抗下，一向战无不胜的秦军竟然吃了大亏，“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说秦军死了数十万，这夸张了，但秦军久战无功，却是事实。

要解决南方战事，就得解决运输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始皇想到用水运的方法，沿着河流用船运输。只是长江水系与南方珠江水系并不相通，总不能让将士们抬着船只，翻过山走水路吧。怎么办呢？

秦国的水利工程技术极其发达，这从都江堰、郑国渠的修建就可看出。为了打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秦始皇派史禄主持开挖灵渠。

那么，要选择在哪儿下手呢？史禄经过考察后，找到两条水系距离最近的一处。长江支流湘水与珠江支流漓水相距很近，从这里开挖一条运河便可连接两河。理论上简单，实际操作却非常复杂，因为两条河流的高差不同，而且这条运河的目的是运载物资与粮食，航行一定

要平稳，因此有许多工程细节必须逐一论证。如何分流，如何排泻汛期的洪水，这都大有学问。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建设，灵渠终于顺利开通，这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又一杰作，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由是得以通航。

公元前214年，灵渠通航后，秦始皇再次发兵攻打南越。这次军队的主力并不是正规军，而是一群贱人，主要是逃亡者、赘婿者以及商人。大家想想，现在商人多牛哇，不过在秦朝时，商人是没地位的，秦国的立国思想一直是重农而抑商。至于入赘为婿者，在古代也是很倒霉的，被人瞧不起，没社会地位。

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征服南越并不难。越人虽悍勇，但没有强有力的政权，很容易被秦的优势兵力一一击破。

在秦的铁拳之下，南越被征服，分置为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秦始皇把国内五十万个罪犯迁移到岭南，与越人同居。

开通灵渠期间，秦还发动对匈奴的战争。

攻打匈奴的起因甚为荒唐。秦始皇这个人特迷信，有个江湖术士名叫卢生，出海回来后，做了一个神秘的预言：“亡秦者胡也。”始皇帝一听，胡不就是胡人吗？胡人是中国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统称，主要有匈奴、东胡、月氏等，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当属匈奴。在秦灭六国之前，匈奴曾多次袭扰赵国北边，后来被李牧包了饺子，才不敢南下。后世认为，卢生预言中说的胡，其实是秦二世胡亥，而不是胡人。不过天机哪里是秦始皇所窥得破的，他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攻打匈奴。

公元前215年，蒙恬北伐，势如破竹，一口气把匈奴人赶出河南地。次年，蒙恬又夺取河套以北的阴山地区，设四十四县，置九原

郡，在黄河沿岸修筑城池要塞。之后，蒙恬又渡过黄河，攻取高阙、阳山、北假等地。由于匈奴是个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来无影去无踪，很难深入进攻，却又不得不防。

为防匈奴南下，秦始皇征发大批人力，修筑长城防线。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蜿蜒万里，故而称为万里长城。但是这个万里长城，与现在的万里长城其实不是一回事，因为秦长城早在历史的风沙中损毁殆尽了。蒙恬主持修筑的长城，是在战国时代秦、燕、赵三国长城的基础上，缀连而成，也并非完全新建。

蒙恬北伐匈奴，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力量。匈奴的两个邻国，即东胡与月氏日臻强盛，为了夺回河南地，头曼单于多次反扑，均被蒙恬打败，无奈之下，他只得迁往荒凉的北地。后来，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单于灭东胡、破月氏，围汉高帝于平城之下，成为匈奴盖世英雄，这已是秦灭亡后的事，此处略过不表。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是秦帝国强大的写照。蒙恬驻守北疆十余年，威震匈奴。由于功劳赫赫，秦始皇对蒙氏家族尊宠有加，蒙恬的弟弟蒙毅也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兄弟两人风光无限，蒙恬统兵于外，蒙毅则在朝中为皇帝出谋划策，两人位高权重，都是忠信之臣，其他将领，谁也不敢与蒙氏兄弟争风头。

秦始皇有一种无限的权力欲，要把天下人都踩在脚下。只是彼时战国刚刚结束，战国时代的武士血性犹存，那是一个“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的时代，总有勇敢者挺身而出，不惧安危，以血相抗。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遇刺最多的皇帝之一，前有荆轲之击，后又有高渐离、张良的刺杀行动。

高渐离是荆轲的好友，当年在易水河畔两人击筑而歌，其风采至今仍令人倾倒。咸阳宫那惊天一击，成为秦始皇一生挥不去的阴影，

到他吞并六国后，仍全国通缉太子丹与荆轲的门客旧识。与太子丹、荆轲有旧的故人们纷纷逃走，隐姓埋名，高渐离也不例外，他改了姓名，给人家打工以维持生计。

有一天，高渐离干完活，疲惫不堪，正想休息时，却听得主人家来了个客人，正在击筑。一听到自己久违的筑音，他立刻来精神了，站在门口细细倾听，舍不得走。听到击得好的地方，他便略为赞许，听到击不好的地方，他又轻轻摇头。门外的侍者很奇怪，便上前问他，他说：“筑的声音有好也有不好。”侍者便把高渐离的话告诉给主人说：“这个人还懂得音乐，私下里还评论一番。”

主人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听侍从这么一说，便唤来高渐离，让他进屋击筑。筑是一种类似琴的管弦乐器，有十三根弦。但是筑与琴区别很大，琴弹奏起来淡雅，而筑则是高亢激越。有这个击筑的机会，高渐离当然不会放过，他的水平比起客人可高多了，众人不禁齐声喝彩，主人也很高兴，赏酒给他喝。

音乐让高渐离想起了朋友荆轲，想起当年“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与悲壮。突然间，他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了，苟且偷生，算什么英雄好汉？人还在，魂却没了，音乐也没了，他活着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不行，我要做回自己！想到这里，他回到住所，从尘封已久的匣子中取出自己心爱的筑，换了一套好衣服，梳理整齐后又回到堂中。在场的各位看到高渐离像是突然变了个人似的，满座皆惊。主人也隐隐意识到此人定有来历，不敢以下人待之，赶忙上前行礼，推为上宾。高渐离以自己的筑演奏，全身心投入，边击边歌，心中的豪迈与悲怆之情，交织在筑声与歌声之中。这筑声与歌声，非经历坎坷者不能为之，所有人听罢早已是泪流满面。

很快，高渐离的名气闻于当地，秦始皇知道有这么个音乐家，便召入朝中为其奏乐。不巧的是，高渐离被人认出来了，并密告给秦始皇说：“他就是荆轲的好友高渐离。”秦始皇颇为惜才，觉得杀之可

惜，便弄瞎他的眼睛，让他继续留在宫中奏乐。听过高渐离击筑的人，莫不称赞他的音乐天才。起初，秦始皇对高渐离有提防心，听音乐时离得远远的，后来便放松警惕，让他近前奏乐。

高渐离在筑中安放一铅块，打算击杀秦始皇，为朋友复仇。当秦始皇召他奏乐时，他奏到一半，忽然举筑向皇帝砸去。可惜的是，他的眼睛瞎了，没有准头，这一击三不沾，没砸中。秦始皇大怒，遂诛杀高渐离。从此以后，这位暴君一辈子都不再接近东方六国的遗民。

高渐离刺杀失手，仍有人前仆后继。

张良本姓韩，是韩国公子，他的祖父、父亲都曾担任韩相。韩国灭亡时，张良还年少，改名换姓，躲避秦国的搜捕。为报国仇，他散尽家财，招募勇士，密谋刺杀秦始皇。要怎么刺杀呢？他不像荆轲、高渐离那样有机会接近秦始皇，只能远距离刺杀。有没有机会呢？应该说有，因为秦始皇喜欢出巡，只要出了皇宫，就有机会下手。不过皇帝出行乘坐马车，倘若用弓弩伏击，效果不好。皇帝的马车是有防护的，远远地射箭，就算射到也是强弩之末，不能穿缟素，除非射中要害，否则皇帝也死不了。

他想来想去，得用重型武器：大铁椎。于是他造了一把大铁椎，重达一百二十斤，只要砸中皇帝的马车，一百多斤的重量泰山压顶，必是车毁人亡。不过又有一个问题，这么重的铁椎，扔的距离就不远。要行刺，非得找一个神力王不可。他多方寻觅，终于找到一个大力士，天生神力，扔铁椎像扔鸡蛋一样。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又一次东巡。皇帝东巡排场很大，张良事先侦知其线路，便在皇帝必经之地博浪沙埋伏起来，找了一处最好的地形，居高临下，视野好，易伏击，方便撤退。秦始皇的车队来了，进入伏击距离后，大力士抡起大铁椎，朝着前下方一辆华丽的马车砸

去，一椎把马车砸得稀巴烂。

秦始皇死了没？没有。因为大力士一时有点慌乱，认错车了，把副车当作皇帝的座车。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砸偏了，史书也没交代清楚，反正没砸中皇帝的座车。一个大铁椎从天而降，虽没被砸中，秦始皇也被吓坏了。他马上吩咐卫兵们捉拿刺客，当卫兵冲上山顶时，张良等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皇帝大怒，诏令天下大搜，十天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张良隐姓埋名，藏匿于下邳，躲过一劫。

这次刺杀虽未成功，但足见张良的机智沉勇。后来，他协助刘邦，推翻暴秦政权，终于得以报灭国之深仇大恨。

除了这几次遇刺外，秦始皇还有一次遇险。

那是在博浪沙遇刺后两年，即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微服出行，在咸阳城附近瞎逛。应该说，秦始皇还真不是一般的人，一大群人马出行都遇刺，他还敢微服出行，可见他颇有勇气。这次出行，他只带了四名贴身武士。岂料晚上行至兰池时，忽然杀出一伙强盗，不知是想抢劫还是杀人越货。强盗们当然不知秦始皇的身份，还以为是什么富家子弟，遂围了过来。四名贴身武士拔剑相迎，所幸强盗人数不多，而这四名武士个个武功盖世，很快杀个片甲不留。

只能说秦始皇运气不错，要是遇到大股强盗，恐怕命都没了。去当强盗的人，都是对朝廷不满的，若知他是皇帝，岂不个个拼了命！这件事，让秦始皇感到后怕。回到宫中后，他马上下令在关中地区展开大规模搜捕强盗同党，又折腾了二十天之久。

七国之战争平息了，人民迎来了和平，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当强盗呢？原因很简单：不满秦之暴政。

四二 焚书坑儒：秦之暴政

说到秦始皇，人们总想到他统一六国，也想到他焚书坑儒。其实，焚书坑儒只是秦始皇暴政的一个缩影罢了。秦始皇的残暴并不始于灭六国后，镇压弟弟成蟜的叛变以及平嫪毐之乱中，他已经大开杀戒，毫不留情。一统天下后，他的残暴又无人可以约束了。

先来说说焚书。

焚书与杀人无关，却是思想专制的象征。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拍马屁说：“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这话秦始皇爱听，十分舒服。岂料有个人顽冥不化，博士淳于越对周青臣说的不以为然，他引经据典，说商、周之所以国运长久，原因就在于分封子弟功臣，以为朝廷的枝辅。倘若皇室子弟没有权力，那么朝廷要是出了什么权臣，有谁可以匡救呢？他的结论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对于实行郡县制或分封制，争议还没完。其实不管是哪种观点，本意无非是要维护皇室权力不被动摇，只是见解不同罢了。不过，淳于越这种老夫子的话，秦始皇听了不舒服，老子都功盖五帝了，你还说要“师古”，那不是说古代君王比朕还强吗？

丞相李斯自从老鼠身上悟出“环境决定论”后，就深知要站对边、靠对人的道理。他马上站出来，义正词严地批驳淳于越的“谬论”，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把淳于越的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扩大打击面。

政治斗争的玩法，在秦朝时就被李斯玩熟了。

李斯继而提出来：除秦国之外的各国史书，都应一律焚毁；除了博士官外，民间有私藏《诗》《书》及诸子百家者，都应在规定时间内上缴烧毁；私下谈论诗、书者一律砍头；以借古讽今者族诛；官吏知情不报者同罪；命令下达三十天内不烧掉的，在脸上刺字，罚四年筑城劳役。只有哪些书不用烧呢？医药、卜筮、种树的书可以保留。

这不明摆着是愚民政策吗？李斯好歹也是大儒荀子的学生，也算是知识分子，竟然要把中国文明的瑰宝、思想的精华统统烧掉！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扼杀了学术自由，以专制思想钳制人民，分明是投秦始皇之所好。

秦始皇当然同意了，人民思想简单了，就不会想造反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文化大浩劫，不仅仅是烧了一些书，而是春秋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被扼杀。先秦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巅峰，在之后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之学术没有过先秦时代的繁荣，也从未诞生那么多堪称世界级大师的文化巨人，这些文化巨人有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等；有墨家的墨子；有道家的老子、庄子；有兵家的孙子；有法家的韩非子等等，他们那些光辉的思想照亮历史的天空。后世虽有文化昌盛之时代，却从未有如此多具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在思想上也难以企及先秦的高度。秦的统一、焚书事件标志着中国文化黄金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两千年思想专制时代的到来。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秦始皇的一大爱好是大兴土木建宫殿。秦曾多次迁都，宫殿很多，但秦始皇还不满意。在征服六国期间，每征服一国，他就仿造该国的王宫，在咸阳再造一座。这么一来，各个国家不同的建筑风格艺

术都齐聚于咸阳。统一天下后，他又在渭南造了一座信宫。每次大兴土木，都是苦了百姓，但独裁者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与阿房宫相比，前面所建的宫殿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觉得咸阳人太多，皇宫太小了，不够气派，应该建一座奢华、富丽的大宫殿。于是他在渭南上林苑又建了一座史无前例的大宫殿，这就是著名的阿房宫。

其实阿房宫并不是整个宫殿群的名字，这个宫殿群叫“朝宫”，阿房宫只是其前殿。但是阿房宫太有名了，以至于后来人家索性不叫朝宫，而叫阿房宫了。说到阿房宫，自然令人想到杜牧有名的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东西。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光说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容一万人。宫前立有十二金人，所谓金人，就是铜人，秦灭六国后，收天下之兵器，铸成十二尊金人，每尊重达二十四万斤。宫殿的大门是用磁石做成，干吗用呢？防止有人携带武器入宫。遇刺多次的秦始皇学乖了，用科学武装自己、保护自己。

我们且来回顾秦国的大工程：万里长城、遍布全国的驰道、大型水利工程，大宫殿等等。这得需要多少人力呀！如果说前几项事关国防、民生不能不为，尚可理解，不断地大兴土木则纯粹是满足皇帝个人欲望。除了建生前居住的宫殿外，秦始皇还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死后的住所：秦陵。

秦陵修筑时间很早，历时很长。秦始皇把陵址选在骊山，在他统

一六国后，征用七十万人修墓。这七十万人，绝大多数是被处宫刑、徒刑的人，这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秦之法律是何等苛严，动不动就要判宫刑或流放。

秦始皇墓高五十多丈，方圆五里有余，墓基建得很深，且用铜液灌注。墓中建有宫殿，摆满奇珍异宝。为了防止有人盗墓，墓中居然还设置有机关，遇到盗墓者时，机关会启动，射出利箭。同时还用水银造江河湖海模型，还有天象、地形模型，几乎成了一个小宇宙。看来秦始皇就是到了地下，也得有个皇帝的样子，也是天地的统治者。墓室阴森黑暗，故而还有长明烛，以人鱼膏为燃料，不过可想而知，这个长明烛早就灭了。

两千多年来，秦陵始终保持神秘的色彩，直到秦陵兵马俑的出土，才令世人震惊于秦代的文明。兵马俑出土大量的文物，俑坑规模之大，俑像造型之精美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任何史料上，都未提到有兵马俑的存在，可想而知，当年修陵的保密工作确实做到位了。光是兵马俑已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而秦始皇墓建造之奢华，又不知要超越兵马俑多少。如此伟大的工程，背后又有多少人的血泪，有多少的孤魂，有多少的白骨！

秦始皇一生恐惧一件事：死亡。

他一面大修自己的陵墓，一面不断派人寻找长生不老的方子。倘若最后都是死亡的结局，一生的荣耀将只是浮云。他找了许多江湖术士，其中有两个术士，一叫侯生，一叫卢生。两人骗吃骗喝，骗到最后，知道不能蒙混过关，便散布说皇帝“天性刚愎自用”，“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讲这么多干什么呢？“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找不到长生不老的仙药，不是术士没本事，是因为秦始皇这个人

太贪恋权势，不能清心寡欲。这些话固然是实话，但也是术士们脱责的借口。侯生与卢生两人逃之夭夭了，秦始皇大怒，这两个小子胆敢说我的坏话。暴君的想法很简单，看来说我坏话的人是很多的，得做个清查才行。

于是秦始皇找到御史，令他调查咸阳城内诸儒生，有没有妖言惑众。这些个读书人，多数也没有骨气，一被抓起来，为了脱罪，争先告密。有些人可能是“吐过槽”，有些人可能是被陷害。秦始皇才懒得去辨别，他大笔一挥，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全部活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

在秦始皇骨子里，对读书人比较害怕，因为他们有思想武器，与之相比，愚民容易管得多。又是焚书，又是坑儒，杀鸡吓猴。后世有一首诗讽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你秦始皇老怕读书人造反，杀了读书人，只是后来刨了秦国墓的刘邦、项羽，原来都是不读书的家伙。

秦始皇坑杀儒生时，长子扶苏曾站出来劝道：“这些儒生都是学习孔子，现在父皇要用重法来罚治他们，儿臣唯恐从此天下不安了。”始皇大怒，索性把扶苏打发到北疆，让他去监督蒙恬。因坑儒事件，扶苏被调离都城，后来失去继承大统的机会，同时秦国也失去了机会。这一连串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实际上有某种因果贯穿，在秦始皇挖掘四百名儒生的坟墓时，他也在亲手挖掘帝国的坟墓。

战国末年著名军事家尉繚对秦始皇有这么一段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司马迁的《史记》也有一段说法：“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秦始皇实际上对谁都不信任，他只信任自己。为了控制这个庞大的国家，他任用酷吏，采取严刑峻法。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他对人的猜疑到什么地步呢？到其晚年，他听信术士的话，行迹诡秘，从不让臣下知道他到哪去了。随从人员有泄露其去处者，杀无赦。

有一回，他前往梁山宫，在山上远远望见丞相李斯的车队。李斯这个人不太检点，配备的车马太多，秦始皇看在眼里，十分恼怒。后来有人便偷偷跑去告诉李斯，说皇帝对他车马标准有意见。李斯大惊，赶紧自动缩减车队规模。岂料皇帝得知后大怒，说：“肯定有人泄露我说的话。”下令调查，没人肯承认。恼怒之下，秦始皇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杀死，其残暴如此。

当时的秦王朝，沿用商鞅以来的高压政治，法网严密更胜前朝。光被拉去南方作战的囚徒与修骊山墓的刑徒，加起来就上百万。想不犯法，真难！因此，许多人索性跑去当强盗。我们可以从秦汉之际的英雄人物故事中，看出当时犯法是一件何等容易的事，你不知不觉就触犯法令了。

比如说领导秦末大起义的陈胜、吴广，天雨失期，按律当斩，没按时去服役，就是死罪一条。刘邦也曾落草为寇，原因与陈胜相似，带去服役的人逃了，他自己不逃还有命吗？起义军将领英布，也是犯了事，被判了黥刑，后来还称为黥布。反过来说，这些人后来为什么都走上造反之路，不造反有活路吗？根本没有。这就是当时暴政的写照。

四三 沙丘之变

公元前211年，有一颗陨石坠落在东郡。

有人在石头上刻了几个字：“始皇帝死而地分。”这是咒皇帝死，诛九族之罪。秦始皇下令调查是谁干的，官吏们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眉目。既然查不出来，就来个简单的，把陨石周围的所有百姓全部抓起来处死，把陨石也烧毁掉。杀人，在秦始皇看来，实在不是什么大事情。

不过，又一件蹊跷的事发生了。

这是在秋天的某个夜晚，一个宫中使者路过华阴平舒道，突然有人挡住他的去处，持着一块璧交给使者，并说了一句话：“今年祖龙死。”使者听不懂，想问个明白，此人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回到咸阳后，使者把璧交给秦始皇，并说了来龙去脉。秦始皇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祖就是始祖，暗含“始”义，龙就是真龙天子，暗含“皇帝”义，这不明白吗，说的是今年始皇帝死！

又是一个神秘的预言。

预言不全对，不是今年，而是明年。可见，不是真的有鬼神，只是有人咒皇帝早点死。

为了冲冲晦气，秦始皇打算东游。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随行，秦始皇的少子胡亥本是贪玩之徒，也想跟着去。人老了总喜欢小儿子，皇帝答应了，带少子出去见见世面。这一路，秦始皇到了云梦，祭礼虞舜；后经丹阳、钱唐，渡过浙江，登会稽山，祭礼大禹。一路上倒是顺顺利利，岂料北归途中，皇帝竟病倒了。

这时已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反倒加重

了。诸位大臣看此行情，料想皇帝是不行了，只是皇帝非常忌讳说“死”字，谁也不敢问皇帝的后事安排。不过秦始皇总算有自知之明，他写了一封信，是写给长子扶苏的，内容是：“回来参加丧事，在咸阳安葬。”写完后，盖上玺印封好，交给中车府令赵高。

秦始皇一生都在求仙问道，寻找长生不老药，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把天下踩在脚下。不过，他仍是一个人，一个凡人，凡人都会死，不管你是伟人还是小人，这是人的宿命。他幻想能战胜时间，幻想只是幻想，现实还是残酷的，荆轲没能杀死他，高渐离没能杀死他，张良的大铁椎没能杀死他，死神仍然不期而至。

七月丙寅日，令天下人闻风色变的一代大帝秦始皇在沙丘平台去世。

这位史上第一位皇帝在之后两千年里，有人褒扬之，有人贬抑之。贬抑者攻击其残暴无度，刻薄寡恩；褒扬者更多从社会历史角度肯定其功绩。汉是诛暴秦而代之，不过在西汉时，对秦始皇的评价已有两极。司马迁、贾谊等都持批评态度，主父偃则认为他“功齐三代”。人所持的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差异。

皇帝东巡，半途而死，这在封建帝国里是天大的事。始皇有二十几个儿子，要是皇帝死亡的消息传出去，咸阳城里恐怕要争权夺利，乱成一片，而对皇帝不满的人，可能也会趁机起事，到时局势就失控了。

这个时候，丞相李斯表现相当镇定，决定秘不发丧。只有最接近皇帝的几个人知道出了大事，除李斯外，还有赵高、胡亥以及五六个太监。若要封锁消息，就得让车队人马都以为皇帝还活着，皇帝可以不下车，但总得喝水吃饭。于是李斯让几个知情的太监天天仍按时给车里送菜送饭，装得跟平常一样。李斯、赵高等人也假装上前奏事，

别人自然没有起疑心。

时间一长，新的问题又来了。尸体开始发臭了！大家看不到皇帝，可是皇帝的车发出臭味，这岂不是露出马脚吗？李斯又想了个办法，搞来有腥臭味的鲍鱼，装在车上，这里也分不清是鲍鱼的味道还是尸臭。不过，你说堂堂皇帝整天喜欢闻鱼臭味，说出去人家也不一定信，只是就算有人怀疑，也不敢公然说出，否则岂不是人头落地？

秦始皇临死前不是写了一封给扶苏的信吗？这封信给了赵高，赵高有没有寄出去呢？没有！他把这封信给扣下来了。

赵高有自己的算盘。

我们且来说说赵高的故事。

赵高本是赵国王室的远房亲属，不过这对他没什么用。其家族肯定是在父亲这一代发生巨大变故，因为他与兄弟们在很小时都被抓到宫里阉了，母亲也被判了罪。这样的人生估计是没盼头了，但赵高不服，他要与命运抗争。赵高有三大本事：其一，他虽是宦官，却身强力壮，孔武有力；其二，他写一手好文章与好书法，曾被当作新文字范本向全国推广；其三，他精通狱法。正因为如此，他得到秦始皇的器重并举为中车府令。

俗话说，一朝君主一朝臣。依秦始皇的遗愿，皇位应是由公子扶苏来继承。赵高心里一琢磨，若是公子扶苏上台，他肯定没好日子过了。为什么呢？公子扶苏与父亲不同，有仁爱之心，反对严刑峻法。赵高是吃狱法这碗饭的，到时饭岂不是凉了？

还有一个原因。扶苏背后有一股大势力，即蒙恬、蒙毅兄弟，偏偏赵高跟蒙毅是有仇的。原来有一回赵高犯了事，皇帝让蒙毅去审理，蒙毅刚正不阿，判他死罪。秦始皇向来偏爱有才华的人，特赦了

赵高，并让他官复原职。扶苏当皇帝，蒙氏兄弟定权倾朝野，到时还有他赵高的立足之地吗？

因此，赵高迟迟不把秦始皇写给扶苏的信送出。他心里开始盘计一个计划，近水楼台先得月，公子胡亥不是在身边吗？不如把胡亥推上宝座，取代扶苏。赵高曾当过胡亥的老师，教授他书法以及狱律法令，胡亥也特别喜欢赵高。

赵高便对胡亥说：“皇上驾崩，没有诏令给诸皇子，只留封信给扶苏。扶苏一回来，就是皇帝了，到时你可就什么也没了，如何是好？”

胡亥年龄小，心机也不深，便说：“本来就是这样，贤明的君主识臣，贤明的父亲知子，传位给扶苏，理所当然，有什么好说的呢？”

赵高摇摇头说：“并非如此。当今天下之大权，操在公子您、赵高和丞相李斯手里，公子您应该争取皇帝宝座。别人当臣子与自己当臣子，统治别人与被人统治，那可是大大不同啊！”

这时的胡亥还有点天良，答道：“废兄立弟，就是不义；不奉父诏，就是不孝；没能力却要强出头，这是不能；这样做，天下不服，社稷倾危呀！”

赵高糊弄说：“以前商汤、周武王诛杀其主，天下称义，不能说不忠；卫君杀父，孔子称赞，不能说不孝。顾小忘大，必有后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后有成功。公子应当及早下手。”把篡位夺权与商汤、周武王诛暴君相比，这岂非风牛马不相及吗？

在赵高的坚持下，胡亥也怦然心动，毕竟皇帝的宝座是诱人的。

篡位这件事，光靠赵高、胡亥两人不行，得把丞相李斯拉下水。赵高便找李斯，对他说：“皇上驾崩，留了一封信给长子扶苏，让他回咸阳主持葬礼。这封信没送出去，信和玉玺都在胡亥那儿，别人都不知道。册立太子一事，由您和我两人说了算。您打算怎么办？”

李斯大惊道：“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这可是亡国之言，不是做臣子的可以说的。”

赵高冷笑道：“公子扶苏与蒙恬交情深厚，丞相自己想想：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您的功劳比蒙恬大吗？您的谋略比得上蒙恬吗？让天下人心服口服，您比得上蒙恬吗？与公子扶苏的交情，您与蒙恬能比吗？”

李斯答道：“我是比不上蒙恬。”

赵高又说：“皇帝有二十几个儿子，长子扶苏刚毅勇武，深得士人之心，即位后蒙恬一定会荣升为丞相，到时您恐怕连侯爵之印也保不住。我赵高曾奉诏教授公子胡亥学习数年法律，没见过他有什么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虽然口才欠佳，心里却明辨是非。在这些方面，皇帝其他儿子都比不上他。我看他有能力即位，就看您的决定了。”

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没有李斯，赵高是办不成的。赵高这个人有双贼眼，知道李斯权力欲很重，为了威风，甚至出行车队都超标，这件事还令皇帝不痛快。这么个人，要是哪天失了权势，会甘心吗？蒙恬北破匈奴，开河南地，修长城，驻守北疆十余年，乃帝国之柱石，朝廷之栋梁，正是李斯强有力的竞争者。

当惯了米仓的老鼠，还能当茅厕的老鼠吗？

李斯心一横，得，只要还当这丞相，管它什么仁义道德。于是他与赵高伪称得到皇帝诏令，立胡亥为太子。胡亥为太子，则扶苏必须

死。李斯与赵高又伪造一封皇帝诏书，加盖玺印，大意如下：扶苏与蒙恬率数十万大军屯兵，无尺寸之功，还屡屡上书直言诽谤皇帝，心怀怨恨。扶苏作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知扶苏阴谋，不匡正其行，为臣不忠，同样赐死。

赵高派使者把诏书送到上郡，扶苏泪流满面，他本为孝子，父叫子死，子不可不死。他默默走向内室，打算引剑自裁。蒙恬觉得事出蹊跷，阻止说：“陛下现在出巡在外，尚未立太子，我率三十万大军守边，公子为监军，这乃是天下重任。现在仅凭使者一面之辞就自杀，焉知非诈？不如先请示朝廷，待朝廷回复后，再作决定不迟。”

蒙恬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扶苏这个人愚忠愚孝，他说：“父亲赐儿子死，何必再说？”遂自刭而死。蒙恬不肯自杀，使者大怒，当即将他逮捕，投入监狱。

轻松，太轻松了。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扶苏与蒙恬，胡亥、李斯与赵高三人大喜，加快返京速度。

回到咸阳后，李斯、赵高才宣布皇帝死讯，取出假诏书，拥胡亥即位，此即秦二世。众臣岂敢有怀疑，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事情还没完，蒙恬、蒙毅兄弟还没死，秦二世胡亥的皇帝宝座坐得不踏实。我们回顾历史时，有时经常会慨叹天意弄人。阴差阳错的事件会改写历史，秦王朝本来绝不至于如此短命。前面不是说过，蒙氏兄弟权倾朝野，蒙恬手握三十万重兵屯边，蒙毅则追随皇帝左右。倘若皇帝死的时候，蒙毅在场，结局绝不至于如此。

那么，蒙毅为什么不在场呢？

蒙毅也跟着秦始皇东巡，皇帝病重时，派他去向山川之神祷告，故而始皇驾崩时，蒙毅人在外，根本不知情。这种偶然的意外，把历

史的马车驶入一条黑暗之路。

秦二世胡亥的哥哥扶苏死了，自己也当皇帝了，蒙恬又没什么罪过，打算把他释放了。赵高一听，这哪行呢？赶紧出面制止。非但如此，他还编了些瞎话，攻击蒙恬的弟弟蒙毅。他对胡亥说：“先帝很早就想立您为太子，都是因为蒙毅反对才未立。蒙毅这个人不可留，不如杀了他。”

胡亥向来没什么主见，赵高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蒙毅被捕，关在代郡。胡亥派人对蒙毅说：“以前先帝要立我为太子，你却从中阻挠。丞相认为你这是不忠，是株连九族之罪。不过朕于心不忍，只赐你一人死，这样你也算幸运了。”蒙毅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先帝几时想立胡亥为太子？他又几时阻挠过？他想要申辩，只是使者知道秦二世的用意，不听他申辩。蒙毅不愿自裁，使者遂令人将他处死。

轮到蒙恬了。蒙恬以悲凉的语气说：“我蒙氏三代为将，为秦国建立的功业多矣。我有三十万兵众，今日虽身陷囹圄，只要振臂一呼，仍足以起兵反叛。然而，我宁愿选择死以守道义，是不敢辱没先人之教，不敢忘先帝之恩。”于是吞药而死。

历史总跟人开大玩笑，忠正之人为何总是下场悲惨呢？因为他们按牌理出牌，要顾及道义，顾及全局，约束太多；而坏人却不讲道理，没有规矩，前不怕狼，后不怕虎。这个权力游戏能公平玩吗？

扶苏、蒙恬以为自己虽死，义却还是在的。可是，我们回顾历史，发现他们还是错的。纵容坏人，怎么会有好的结果，不作为也是有错的，伟大的秦国在扶苏、蒙恬死去的那一刻，已经无可救药地坠入深渊了。

四四 大泽乡起义

秦二世胡亥的倒行逆施，比起老爹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举几个例子。

其一，复活殉葬制度。秦国的强大，始于废除殉葬制度。秦二世竟然令这个古老制度复活了。秦始皇死后葬于骊山，秦二世把后宫没有子女的妃嫔，全部用于殉葬。秦后宫女子甚多，甚至有些女子入宫几十年，连皇帝都没见过，最后还得去陪死。不仅如此，秦始皇陵墓中机关重重，为了避免工匠们泄露陵墓的秘密，在秦始皇下葬后，秦二世毫无人性地封闭墓门，把所有工匠活活困死在坟墓中，成为又一批陪葬品。

其二，屠戮诸公子、公主。秦二世胡亥的皇帝位怎么来的，其实大家也心知肚明，只是不敢说。胡亥在诸公子中本来年龄就是最小，皇位又不合法，他对赵高说：“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赵高献上毒计：“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先帝之故臣。”从扶苏、蒙恬同党抓起，然后株连到诸公子，把秦始皇的故臣尽数铲除。不消多时，无数人头落地，胡亥把十二个兄弟绑赴街头砍死，还有十个公主被车裂处死，对自己的姐妹施此酷刑，胡亥还是个人吗？猪狗不如！

其三，穷奢极欲。秦始皇虽残暴，好歹勤于政事，秦二世则完全只图享乐。他对赵高表明心迹：“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政事你去办，我只顾享乐就行。于是扩修阿房宫，又调五万人马入屯咸阳，教射狗马禽兽，军队不是为御敌，而是陪他玩。都城人畜较多，粮食不足，秦二世又诏令郡县转输粮草，扰动天下。

够能折腾的。

在秦二世看来，这有什么呢？秦国数百年基业，广袤无边的领土，无尽的物产，还不够我玩吗？

说实话，真不够他玩的。

因为有人造反了。

造反的这个人名叫陈胜，字涉，不是什么大人物，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出身贫寒，家里穷，自己都没耕地，给别人家打工。不过有一点与众不同，他有理想，对未来有憧憬。有一天，他对工友们说：“苟富贵，无相忘。”工友们白了他一眼，得了吧，你就是人家雇来耕地的，吹什么牛，还想什么富贵呀？

为什么有人一辈子都是雇工的命呢？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有梦想，也不敢去追求。有些人悲叹境遇不佳，生错地方，有些人则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伟大的陈胜就属于后一类人，他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虽然咱们都是给人种田的，但我的心不是被绑在这里，我的心在天空翱翔。

秦二世元年七月（前209），距秦始皇之死刚好满一年。陈胜被征去当戍卒，前往驻守渔阳。这批戍卒共有九百人，由几名将尉负责押送，陈胜、吴广被任命为屯长，也就是小头目。岂料走到大泽乡这个地方，下起大雨，道路阻绝不通，走不了，大家心里十分焦急。

有人会说，走不了，等天晴了再走不行吗？不行。秦国的法律规定，戍守误期是死罪。渔阳是北疆，要是突然有敌人来，戍守部队没到，那怎么行？因此规定十分严厉。陈胜本来就胸怀大志，他转念一想，这虽是坏事，未必不是好事，去当个戍卒有什么用，不如——他脑海里冒出两个字——“反了！”

他便找到同为屯长的吴广，商量说：“现在去渔阳误时是死，逃跑也是死路一条，不如乘机举事，就算同样是死，也得为国事而死。”被抓了砍头，死得多窝囊，不如干一票，死得轰轰烈烈。

凭这几百号人造反，行吗？

陈胜胸有成竹，他说：“天下苦秦久矣。”这句话有两个含义：其一，秦始皇登基以来，横征暴敛，劳民伤财，天下不得休息，老百姓受不了了；其二，东方六个诸侯被灭，生活在秦的铁蹄之下，百姓思念旧国。这是起事的有利条件。不过，陈胜、吴广都是小人物，号召力不够强，必须要抬出几尊大神。抬谁呢？陈胜认为要以公子扶苏以及楚将项燕两人为名号，凝聚反秦力量。公子扶苏无罪获诛，天下人都同情他；项燕是楚国抵抗秦国的一面旗帜，十分受楚人爱戴。他说：“我们假称是公子扶苏与项燕的队伍，号召天下反秦，定能得到众多响应。”

果然有鸿鹄之志，可见陈胜反秦的想法由来已久，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说得精彩，吴广不禁喝彩，两人决定先占卜定吉凶。他们找了个占卜的，此人会察言观色，知道陈胜、吴广两人想造反，他也不点破，只是说：“你们的事可以成功，不过最好卜鬼一下。”言下之意，你们只是戍卒小头目，别人未必会听你们的，但是，你们搞玄乎一下，装神弄鬼一下，别人不服都不行。两人心领神会，拜别而去。

几天后，一连串的神秘事件发生了。

有一天，戍卒们买鱼回来吃时，发现有一条鱼的肚子里有一块帛布，上面还写了几个字：“陈胜王。”这事很快在队伍中传开了，这难道是上天的启示吗？众人心里都非常惊讶。其实哪有什么天启，那帛书就是陈胜与吴广塞到鱼肚子的。

入夜后，众人正要入睡，当时这一带常有野狐出没，晚上时总会嚎叫。今天野狐居然说人话了，大家吓坏了，细细一听，隐约听得野狐的话是“大楚兴，陈胜王”。这一夜，谁也没敢入睡，都吓死了。第二天天亮时，大家都窃窃私语，谈论此事，背地里对陈胜指指点点，大家愈发觉得此人与众不同。其实哪有什么野狐呀，那是吴广半夜溜出去，在外面学野狐叫的。

神也装了，鬼也装了，起义怎么开始呢？

吴广决定演一出苦肉计。

作为戍卒中的小头目，吴广人缘很好，平素维护戍卒利益，很受拥戴。这天将尉喝醉了，吴广故意激怒他，说自己不干了，打算逃跑。将尉一听，来气了，拿了根竹鞭子抽打吴广。戍卒们看到吴广被打，都很愤怒，只是大家知道抵触长官的后果，都敢怒而不敢挺身而出。吴广挨了打，故意继续激怒将尉，将尉酒也喝多了，一怒就把剑拔出来，想杀吴广。你想想，这将尉醉成这样子，有功夫也使不出，吴广乘势夺过剑，一剑刺出，结果了该将尉的性命。

这一剑下去，大家看呆了。

陈胜见时机成熟了，也夺过一把剑，与吴广联手，杀掉另两名将尉。看到这一幕，九百名戍卒不知所措了，他们既害怕又兴奋。这时，陈胜站出来，以沉着的语气对众人说：“我们遭遇大雨，已经误了期限，按照法律都得斩首。就算没被斩首，驻守边塞，十个人里有六七是不能活着回来的。壮士不死则罢，要死那也得留名千古才行。”说到这里，陈胜以铿锵有力的语气呼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何等豪迈的一句话。我脑海里常想象着伟大的陈胜在大泽乡呼喊出这句口号时的风采，想象他坚定的目光，想象他刚毅的神情，

想象他振臂一呼的雄姿。这声呼喊如一道亮光，划破夜空；如一声雷鸣，振聋发聩；如一团烈火，点燃所有人的激情。人的心灵有无穷的能量，这能量聚集在大泽乡，九百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人，要把秦帝国这座雄伟山岳推倒。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幕，我觉得陈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所有人热血沸腾，这一刻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原来我们不是生而为奴隶的命，我们也可以成为造反英雄。

秦末第一支农民起义军诞生了。这支起义军打着公子扶苏、项燕的招牌，立起“大楚”的旗号，立坛而盟，把秦尉的脑袋作为祭品。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首战大泽乡，继而攻蕲，这里秦军很少，很快便占领了。此时距六国灭亡不过十余年，东方诸亡国人心思旧，陈胜首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快越来越多对秦不满的民众加入到义军队伍。

陈胜是有谋略的，越往东边，秦的力量越弱，因此他派部将葛婴带兵向东攻略，连下数城。当义军攻至陈县时，队伍已扩大至数万人，拥有马车六七百辆，战马一千多匹。县令早就闻风而逃了，忠于职守的县丞负隅顽抗，最终也没能保住城池。

当日怀有鸿鹄之志的雇农、戍卒，今天成为反秦英雄。陈胜入陈县后，召集父老、豪杰共商大计，大家说：“将军讨伐无道之暴秦，复楚国之社稷，劳苦功高，应当称王。”这一说，正中陈胜下怀，于是他自立为王，建国号为“张楚”。

当时的反秦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

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陈胜起兵，如同在一堆枯柴上烧起一把火，火焰很快熊熊燃烧，不可扑灭了。秦政府要为苛政付出代价了。秦始皇一统中国，结束数百年战争，本来对百姓是福音，可是人民没能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无休止的劳役，严密的法网，令人生活在一

个窒息的空间。如今暗屋已被捅破一角，阳光照进来，人们要为光明而浴血奋战了。

各地豪杰纷纷起事，诛杀当地官吏，响应陈胜。

在六国故地，关东地区，革命的烽烟四起。来自东方的使者慌慌张张向秦二世报告说，东方群盗蜂起，局势已失控。秦二世大怒，认为使者妖言惑主，将使者逮捕入狱治罪。如此一来，没有人敢说真话，后来东方使者学乖了，到了咸阳城外，秦二世询问东方局势时，便忽悠说：“东方那伙强盗，已经被郡守、郡尉捕杀得差不多了，用不着担忧。”皇帝大喜，又沉溺于荒淫的酒色中了。

然而，事实是东方反秦力量已空前膨胀了。

陈胜兵分五路，全线出击。第一路以吴广为假王（假，代理），督诸将西击荥阳；第二路以武臣为将、张耳、陈馥辅之，攻略赵地；第三路以邓宗为将，攻略九江；第四路以周市为将，攻略魏地；第五路以周文为将，挺进关中。

在这五路出击中，以周文、武臣两路声势最大。

周文又称周章，颇晓兵法，曾在春申君、项楚手下做过事。陈胜颁给他一个将军印，令他讨伐关中。周文还是有点能耐，他沿途收罗各地义军，军队一下子增加到了几十万，号称“百万”，有战车千乘。周文越过函谷关，向关中挺进，直抵戏（潼关东），咸阳为之震动。

武臣手下有两个杰出人物，一个名为张耳，一个名为陈馥。张耳与陈馥都是魏人，两人是好朋友，刎颈之交，其中张耳还曾经是信陵君的门客。这两人都是反秦人物，秦灭魏国后，悬赏千金通缉张耳，悬赏五百金通缉陈馥，他们便隐姓埋名，躲在陈县。陈胜光复陈县后，张耳、陈馥前往拜见，陈胜早听过两人大名，敬为上宾。在张耳、陈馥的协助下，武臣入赵后，连下四十余城，威震北方。

秦在东方的势力几乎土崩瓦解，很多人毫不怀疑，“张楚王”陈胜很快就会攻下咸阳，这位平民英雄将成为新的国家统治者。

然而，“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盛极而衰，不仅是自然界之规律，在人类历史上亦屡试不爽。此时的陈胜王如日中天，然而，失败的阴云很快就会遮挡灼热的太阳。

四五 陈胜之死

陈胜是我心目中伟大的英雄，但英雄并非无瑕疵。

在大泽乡，他装神弄鬼，神化自己，那时他知道自己不是神。当他成为张楚王国之王时，他开始觉得自己是神了。如果不是神，谁能解释，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革命之火已烧遍大半个东方，谁能解释，几百年战无不胜的秦军，竟毫无抵抗能力。秦灭六国才十来年，十几年前，凭秦军的旗号就足以吓跑一支军队。胜利如此轻而易举，作为义军的领袖，若说他不是神，那他是什么呢？

天神令人畏惧，在于拥有生死之威力，陈胜称王后，也掌有了生杀之大权。其麾下大将葛婴政治觉悟差，当他收复东城时，尚未知陈胜已称王，便擅自立了个楚王。尽管葛婴后来废掉这个楚王，仍被愤怒的陈胜处死。除了葛婴之外，还有不少将领被陈胜所杀，史书称：“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

陈胜兴起虽快，根基却还浅，在这个时候就大杀功臣，不免令人离心，这是他走向衰败的开始。

秦军毕竟不是纸老虎，陈胜军队连战连捷后，开始遇到一个可怕的对手：章邯。

周文率数十万大军挺进关中，咸阳为之震动，秦二世吓坏了。与义军相比，关中秦军数量要少得多，秦二世急中生智，赦免骊山刑徒，编入军队，由少府章邯统领，与周文决一死战。章邯是秦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名将，以作战勇猛而著称，在之后的战争岁月里，他是东方义军的头号强敌。章邯临危受命，大破周文，保住关中。这也是陈胜政权由盛而衰的关键一役。

紧接着，攻略赵地的武臣宣布自立为赵王，对陈胜来说更是当头一棒。

武臣自立为王，背后的策划者是张耳与陈馥。陈胜虽然礼遇这两位知名反秦人士，但没委以重任，只让他们协助武臣。张耳与陈馥没当上将军，只当了个校尉，对陈胜十分不满，便鼓动武臣脱离陈胜，自立为王。武臣禁不住诱惑，遂自立为赵王，以张耳为右丞相，以陈馥为大将军。

陈胜得知消息后，气得七窍生烟，他岂容有人敢挑战其权威？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尽诛武臣家人，发兵攻赵。担任柱国的房君赶紧说：“杀不得。秦还未灭，又杀武臣一家，岂非多一个强敌？不如认了，派人去祝贺一下，让武臣带兵西进攻打秦国。”陈胜一听，觉得这个计谋不错，让武臣与秦军耗得差不多，再收拾不迟。

很快，陈胜的使者到了邯郸，承认武臣的王位，同时要求他发兵西进，攻打关中。张耳与陈馥是何等人，早就看穿陈胜的伎俩，便对武臣说：“您自立为王，陈胜肯定很生气，却派人来祝贺，无非是不想树一强敌。倘若张楚政权灭了秦国，接下来势必对赵国用兵。大王不要带兵西进，应向北攻略燕代，向南收河内之地，扩大自己地盘。”

武臣深以为然，拒绝西进，派部将韩广攻略燕地，李良攻略常山，张廪攻略上党。

只是武臣想称王，别人就不想称王吗？韩广北略燕地，学自己的老东家，自立为燕王。起义军内部的权力之争加剧了，团结不复存在，反秦事业开始蒙上一层阴影。

对陈胜来说，还有更坏的消息。

前面说过陈胜出动五路大军全面出击，其中周市攻略魏地。这一路进展也算顺利，略定魏地后，周市继续北上，进攻狄县。当时狄县有个豪杰，名为田儋，是以前齐国王室贵族，他有两个堂弟，一唤田荣，一唤田横，都是一时之英才。在秦一统中国之战中，齐国不战而降，故而齐国旧贵族的待遇是比较好的，在狄县田氏家族有权有势，也得士人之心。田儋有英雄之志，他既有心反秦，又不想受制于陈胜的张楚政权，因此他设计杀死狄县县令，收其众自立为齐王。

齐王田儋占据狄县后，大败前来进攻的周市，之后又略定齐地。

先是武臣称赵王，韩广称燕王，现在田儋称齐王，张楚王陈胜的对手越来越多了。

不仅如此，周市回到魏地后，也想立个魏王。立谁为魏王呢？立以前魏国宁陵君魏咎。魏咎并不在魏地，而是在陈胜那里。周市派人禀告陈胜，希望迎魏咎为魏王。陈胜很不高兴，你们这些人个个想单飞了，翅膀硬了！不料周市并不放弃，连续派五批人前往，最后陈胜没脾气了，只得同意放回魏咎。这样，魏国得以复国。

陈胜之所以被迫让步，是因为西进伐秦的张楚兵团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周文的西征军被章邯击败后，只得退出函谷关。章邯紧追不舍，一路追击至渑池。关中秦军不愧为天下劲旅，在渑池一役中，章邯霸气尽显，大破张楚兵团，周文战败自杀而死。这一战，令东方义军为之变色，那支消灭六国的无敌秦兵团又回来了！

秦军精锐已出关，正在攻打荥阳城的吴广兵团有被消灭的危险。

吴广是大泽乡起义的主谋之一，也是张楚政权的巨头。他以假王的名义督诸将进攻荥阳，却久战无功。荥阳不同于其他地方，非但是

战略要地，而且守卫荥阳的敌将是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其他地方的郡守、县令遭到义军进攻时，逃得比谁都快，但李由是秦朝丞相之子，他不能逃，也不能投降，因此荥阳的守卫非常顽强，吴广攻打四个月仍未能攻下。

没能攻下荥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吴广指挥有问题。其麾下将领对他是有意见的，认为“假王（即吴广）骄，不知兵权”。如今章邯大兵压境，搞不好大家都得完蛋。将军田臧与诸将商量，认为要险中求胜，必须先杀了吴广。只要吴广指挥，必败无疑。

诸将发动兵变，假称得到陈胜的诏令，诛杀吴广。可怜这位首义英雄，就这样糊里糊涂死了。吴广本是节制诸将，反倒被杀，陈胜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不过此时章邯大军将至，陈胜也只能先稳住田臧，授予他令尹之印，任命为上将。

田臧看不起吴广，事实证明他的军事水平，未必比吴广高到哪儿去。他留下部将李归率少数部队继续围困荥阳，自己亲率主力部队迎战章邯。双方在敖仓展开激战，田臧大败，战死沙场。章邯乘胜进兵到荥阳城下，大破张楚军，李归战死。

两路西征兵团（周文兵团、吴广兵团）先后溃败，陈胜面临巨大的压力。

章邯一路反击，兵威大振。这位秦国名将要一鼓作气拿下陈县，消灭义军。张楚政权的形势不容乐观，章邯派部将进攻郟县，击破张楚将领邓说，邓说逃回陈县，被陈胜斩首示众。章邯攻势如潮，再次击破张楚将领伍徐的部队，兵锋已杀抵陈胜的老家陈县。

张楚柱国房君领兵迎战，又被秦军杀得大败，房君战死。在章邯看来，这些义军不过就是乌合之众，人数虽众，岂有战斗力可言！秦军把攻击矛头对准驻扎在陈县以西的张贺，陈胜亲自出城督战，以鼓舞士气。然而章邯的铁军几乎是无法打败的，张楚军又败了，将领张

贺被击毙。

与此同时，秦二世又派遣长史司马欣、董翳率一支生力军驰援章邯，章邯的力量更强大。

看来，老家陈县是守不住了。

不得已之下，陈胜被迫战略转移，他先前往汝阴，后又到下城父。不料这里竟成为陈胜的死难地。在秦军节节进逼下，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信心动摇，陈胜的马车夫庄贾就是其中之一。他竟丧心病狂痛下杀手，杀害陈胜，跑去向章邯投降。

从兴起到败亡，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陈胜是死了，但他也无憾了。倘若他不在大泽乡起义，恐怕也会因为失期而被斩，同样是死，他不再是万万千千不知名、被遗忘的死者，而是永垂青史的好汉。他曾自由地呼吸、翱翔，这就足够了；他引领了史无前例的大起义，他改写了历史，制造了奇迹。

陈胜虽死，革命事业未灭。

不久后，陈胜部将吕臣率苍头军收复陈县，杀死叛徒庄贾，为陈胜报仇，并举办了葬礼。秦军很快卷土重来，再攻陈县，吕臣败走。他收罗残兵败将后，与鄱阳湖义军首领英布会师，共破秦军，再次收复陈县。

这里说个题外话，陈胜、吴广领导的这次大起义，考古所发现的文物迄今只有一件，是一枚铜印，它的主人便是两度收复陈县的吕臣。

反秦革命陷入低潮。

首义元勋陈胜死后，赵王武臣也死于叛军之手。

李良是武臣手下大将，被派往攻略秦朝控制下的太原城。秦守将伪造皇帝书信，称倘若李良愿叛赵降秦，赦免其罪，加以重用。起初李良没想投降，回邯郸城请援军，路上正好遇上赵王的姐姐出行，车骑雍容。李良以为是赵王，遂跪倒在地，赵王姐酒喝多了，没有给他行礼。李良大怒，派人追杀赵王姐，并突袭邯郸，杀死赵王武臣。张耳、陈馥逃出邯郸后，收罗兵众，立赵歇为赵王，打败李良，李良遂向章邯投降。

关东义军当务之急，是要结束各自为战的局面，需要一个政权来领导全国反秦战争。在此之前，楚、赵、齐、魏、燕等纷纷复国，楚政权无疑是反秦的领袖与主力。如今楚王陈胜已死，谁来领导新的楚政权呢？

楚将召平得知陈胜兵败的消息后，希望有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主持局面，便假传陈胜的命令，拜项梁为上柱国。项梁受命后，渡长江北上，义军首领陈婴、英布、蒲将军等人相续率部前来归附。

项梁的军队扩大至六七万人，成为义军中的实力派。他在薛县召集各路义军将领，商议立楚王之事。已经年过七十的谋士范增指出，陈胜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不立楚后而自立”。楚地一直流传一种说法，“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范增劝项梁应该立楚国王室的后人。项梁采纳其言，从民间寻来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立为楚王，后世也称他楚怀王，与祖父相同。

新的楚政权定都盱眙，以陈婴为上柱国，项梁自号武信君。此时东方六国已有五国复国，仅剩韩国尚亡，曾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张良建议复活韩国，项梁同意了，遂立韩成为韩王。

这样，被秦国灭掉十几年后，东方六国集体复活了。

不过，章邯可没闲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章邯对魏国发动大举进攻。

魏王魏咎被困于临济，情形十分危急，他派周市紧急向齐、楚求援。齐王田儋曾与周市兵戎相见，但这是义军内部矛盾，在强大敌人面前，田儋尽弃前嫌，亲自率大军援救魏国。项梁也派遣大将项它率楚军入魏，与田儋会师，共同解临济之围。

章邯不愧为秦军第一名将，他发现齐、楚援军尚未站稳脚跟，在黑夜掩护下，衔枚出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一战，齐、楚联军大败，齐王田儋被杀。田儋的堂弟田荣带着残兵败将，退走东阿。章邯回过头再战魏军，阵斩周市，包围临济。援兵被打败了，临济也保不住了。魏王与城内百姓商议后，为保全民众，决定放弃抵抗。不过，王者有王者的尊严，临济城可以降，王者不可以降。魏王魏咎选择自杀，他的弟弟魏豹逃出城，投奔楚国。

这一战，对东方抗秦运动实是沉重打击，齐王、魏王都死了，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章邯如同一台永不疲倦的战争机器，攻克临济后，他马不停蹄，追击逃往东阿的齐将田荣。

关键时刻，项梁再度出手，他与刘邦共同出兵，救援田荣。章邯的秦军虽骁勇善战，怎奈一路作战下来，早已是强弩之末。项梁、刘邦大破章邯于东阿，得胜后攻屠成阳，在濮阳再破章邯大军。在这一系列战斗中，有两个人脱颖而出，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

四六 绝代双骄：刘邦与项羽

关于刘邦与项羽的早年事迹，请参看《西汉原来是这样》一书，这里只是简单提一下，重点讲述两人起义前后的故事。

刘邦是沛县人，早年当过亭长，为人豁达大度。他的人生命运与当时社会紧密相连，前面说过，秦国劳役、兵役特别繁重，有一次，刘邦送一批人前往骊山服役，这次出行改变他的人生。为了逃役，一路上不断有人逃跑，走到半途时，人都逃得差不多了。刘邦心想，反正完不成任务，索性把人全放跑了。有十来个人愿意跟刘邦混，打算落草为寇。

某天晚上，刘邦喝醉酒，有人来报，前面路上有条大蛇挡道。刘邦醉醺醺地说：“壮士前行，怕什么蛇！”拎了把剑，把蛇给砍了。后来，他伪造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个老太婆在路上哭，说自己的儿子是白帝子，变身为蛇，结果被赤帝子给杀了。这几乎是陈胜装神弄鬼的翻版，可是您还别说，自那以后，大家都对他敬畏三分了。沛县子弟很多人前去投奔他，拥他为老大，聚众数百人。

陈胜大泽乡起义后，天下反秦势力高涨。沛县县令也要投机革命，萧何、曹参对他说：“您是秦国任命的官吏，大家恐怕不服，不如把流亡在外的人召回，这样大家就都听您的了。”县令一听，觉得是这么回事，只要刘邦那几百人听自己的，这事就好办了。可是刘邦一伙人回到沛县时，县令反悔了，不但紧闭城门，还打算杀了萧何、曹参。造反派却响应刘邦，杀死县令，打开城门。刘邦拼凑了一支三千人的武装，走向反秦斗争的潮头。

泗水郡守得知刘邦在沛县造反后，派兵前来围剿。刘邦出城迎战，击破秦军，保住沛县。之后，他把沛县交给雍齿守卫，自己率兵

攻打薛县，打败泗水郡守。泗水郡守逃跑时，被刘邦麾下左司马追上，一刀结果了性命。

这时刘邦的部众，在抗秦义军中只能算一支不起眼的小部队，光靠自己奋斗是不行的，得找个靠山才行。他本想去投靠楚王陈胜，不巧陈胜被叛徒所杀。陈胜的部将秦嘉私自立景驹为楚王，驻军于沛县东南的留县。刘邦一想，留县离自己不远，不如去投奔景驹。

在前往留县途中，刘邦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此人便是张良。

张良向有反秦之志，刺杀秦始皇不成，一度隐姓埋名。陈胜起义后，他聚众百余人，跟着闹事。听说秦嘉立景驹为楚王，他也前来投奔，正好路遇刘邦。两人一见投缘，张良便加入刘邦的队伍，刘邦拜他为厩将，就是管马的官。张良这些年可没白过，他精研一部《太公兵法》，造诣很深。张良跟别人谈论兵法时，别人都听得如坠云雾之中，因此他常恨没有知音。遇到刘邦后，别看刘邦没读过什么书，领悟力之高却是他人所难及。张良说《太公兵法》给刘邦听，刘邦一听就明白了，并能采纳他的计策。张良不禁叹服道：“沛公的才能，大概是上天所授予的吧。”

有了张良相助，刘邦如鱼得水。

首先是在砀县之战中，取得了起兵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在此役中，刘邦以寡击众，仅用三天便攻破砀县，收编了六千名秦军。他本来只有三千人的部队，一下子膨胀了两倍，人数达到九千人。紧接着，刘邦再下一城，攻克下邑。这时正是反秦运动陷入低谷之时，秦将章邯屡屡击破东方义军，而刘邦则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实属不易。

不过，刘邦所投靠的景驹楚政权，很快被项梁认为是非法政权，楚王景驹被废处死。为确定楚王人选，项梁在薛县召集诸将会议，刘邦也前往参加，作为义军重要首领的地位得以确认。

章邯破魏，杀齐王田儋，魏王魏咎自杀，追击田荣于东阿。义军处于前所未有的危局，刘邦与项梁力挽狂澜，两次击败章邯，控制住局势的恶化，可谓功不可没。

再来说说项梁、项羽叔侄。

与草根刘邦相比，项梁、项羽叔侄的身世则显赫得多，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儿子及孙子。楚国灭亡后，项梁逃往吴中，一面教项羽剑法、兵法，一面矢志复国，暗中结交豪杰志士。

机会终于到来，大泽乡的烽火传到吴中。会稽郡守殷通想乘机起事，便召来项梁，对他说：“如今江西都反了，这是老天要亡秦，俗话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我打算起兵，任用您与桓楚为大将。”桓楚是当时一个豪杰，流亡于外。

要革秦的命，项梁当然举双手赞成，不过他可不想受制于人，你殷通是什么东西，辫子一盘就变革命军了？他便对殷通说：“桓楚藏在哪里，别人都不知道，只有小侄项羽知道。”殷通便说，那你把项羽叫来，我派他去找。项梁转身出去了，交代项羽在门外等，记得带上剑，到时见机行事，杀了殷通。郡守还蒙在鼓里，召项羽进去。进了门后，项梁对项羽说：“可以动手了。”项羽长得身高马大，力能扛鼎，他马上抽出剑，一剑劈去，殷通的脑袋就搬家了。

项梁造反与刘邦造反颇有类似之处，都是秦国地方官吏想跟风造反，结果一个县令、一个郡守，都是造反不成丢了性命。

殷通死后，项梁把郡守的大印挂在腰间，一手拎着他的脑袋，大步走出来。要知道杀殷通可是在郡政府里，这下子官署乱了套了，卫兵看到长官遇害，纷纷冲上来。项羽武功盖世，砍杀数十百人，所有人都趴在地上，不敢反抗了。项梁便把郡里的豪杰、官吏召集来，解释他杀死郡守是为了反秦，为了干大事。看到项羽凶神恶煞般的站在那里，手握剑柄，谁敢说不字？

就这样，吴中加入反秦起义行列。项梁自立为会稽太守，以项羽为裨将，招募八千精兵。在反秦义军首领中，项梁出身将门之家，军事修养最高，因而他的这支军队从一开始便走正规化路线，设有校尉、候、司马等军职，纪律严谨，操练有素，乃是义军中之精锐。

陈胜兵败后，其部将召平矫诏，推项梁为上柱国。项梁引兵渡江，立熊心为楚王。齐王田儋、魏王魏咎败亡后，他与刘邦携手，在东阿之战与濮阳之战中两败章邯。在战斗中，项羽勇冠三军，所向披靡。

后来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成为不可共存的生死冤家。不过，在反秦战争中，两人却是同心戮力，共抗强敌。

濮阳之战后，项梁派项羽、刘邦进攻定陶，未能攻克。两人遂转攻略雍丘，大获全胜，斩杀李斯之子、三川郡守李由。

一连串的胜利，令项梁冲昏头脑了。他认为之前章邯所向无敌，无非是义军其他将领无能，没遇上像自己这样熟悉军事的对手罢了。骄矜之气既长，轻视对手，往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项梁决意亲自督师，攻打定陶。定陶原本守备坚强，此时秦二世又调拨一批军队给章邯，秦军的力量更强了。

部将宋义对项梁的轻率决定很担心，多次进谏，项梁不以为然，根本听不进去。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敌人，何况秦军统帅是身经百战的章邯。此时正是绵绵雨季，雨下了三个月。章邯的兵力得到补充后，再施故伎，衔枚发动夜袭。项梁为自己的大意而付出生命代价，没料到秦军竟然在恶劣的天气下奇袭，被打得大败，自己也战死沙场。

正在攻略陈留郡的项羽、刘邦获悉项梁死讯，大惊失色，放弃攻

城，匆匆东撤。章邯杀项梁后，士气高涨，楚政权危在旦夕。项羽、刘邦等紧急把都城从盱眙迁往彭城，严加守备，吕臣的部队守卫彭城东，项羽守卫彭城西，刘邦守卫碭县。

倘若章邯乘胜而进，项羽、刘邦等能否守得住彭城，确实令人怀疑。岂料在这个时候，章邯与项梁一样，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章邯认为项梁是楚政权的顶梁柱，如今项梁既死，大柱倒了，楚政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消灭北方的赵政权，以免反秦势力死灰复燃。

章邯放弃攻打楚政权，率王离、苏角等将领，引兵北渡黄河，直扑赵国。

自从章邯率兵镇压反秦起义军以来，战功赫赫。陈胜、吴广被消灭了；项梁被击破；齐王田儋战死；魏王魏咎自杀。楚、齐、魏均遭重创，燕、韩较弱，不足为患。赵国虽有李良之变，赵王武臣被杀，但是张耳、陈馥两人力挽狂澜，立赵歇为王，实力仍不容小觑。在章邯看来，只要再击破赵国，天下变局可定矣。

此时章邯手上的兵力已超过四十万，大军直趋赵境，如泰山压顶。强弱立判，赵国丞相张耳、大将陈馥率军迎战，大败而逃。首都邯郸是保不住了，张耳与陈馥遂拥赵王赵歇，退入钜鹿城。章邯入邯郸城后，把城内百姓尽数迁往河内，拆毁城廓，以绝后患。

钜鹿之战，将决定赵国的命运。

为了守住钜鹿，赵国的防御还是比较积极的。赵将张耳守城，陈馥则率数万人驻扎于城北，称为河北军，以作为机动部队。钜鹿城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易守难攻，加上内外呼应式的积极防御体系，章邯兵力虽强，要攻破钜鹿也非易事。章邯令王离等部将包围钜鹿城，

自己主力部队驻扎城南。在章邯看来，只要围困几个月，钜鹿粮尽援绝，不攻自破。

对于秦军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粮食运输。只要不缺粮，钜鹿指日可下。为了确保粮道畅通，章邯修筑一条甬道，凭借高速车道，可确保粮食源源不断运抵前线。一切看上去都无懈可击，只是章邯错了一件事，他低估楚国的力量了。

秦的军事部署，露出一个大大的破绽。秦军重兵集团都集中到了钜鹿前线，大后方兵力空虚。对于楚政权来说，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秦军主力在北，派一支奇兵西进，直捣咸阳，倘若一举拿下，擒杀皇帝，那么秦国就完蛋了。

这个思路不错。

不过，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其一，秦之大后方虽空虚，楚的兵力也有限；其二，函谷关以西多险关要隘，易守难攻，对秦的防守是有利的；其三，只要章邯攻破钜鹿，便可大举回援，到时楚之西征军就被包饺子了。

楚政权的两难之处在于，既要趁秦军主力在北的时机，组建一支军队西征，同时，仍要派军队援救钜鹿。援救钜鹿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赵国不断派人前来求援；另一方面，西征也必须牵制章邯的秦军。如此一来，可用于西征的兵力更少，风险更大。

可以说，西征乃是九死一生之举。当初陈胜部将周文以数十万之众，尚且战败身亡，何况区区一两万的部众呢？谁也不敢去，只有两个人愿意前往。谁呢？刘邦与项羽！

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

楚怀王知道西征凶险，故而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只要扫平关中，便可称关中王。这个诱惑可不小，因为东方六国都已复国，势力范围都已经被瓜分了，若想称王，只能夺取秦国旧地才有可能。要不要冒险西征，这是考验人的志向与勇气。没想当王的人，不愿意去冒这个险；但刘邦有志向，他曾见过秦始皇出行的盛大场面，慨叹“大丈夫当如是也”，既然有机会称王，就要去试，机会可一不可再。

项羽也举手表示愿意西征，他要灭了秦，为爷爷项燕、叔父项梁报仇雪恨。

不过，许多人反对派项羽西征。为什么呢？因为项羽这个人太残暴了。以前项羽曾攻陷襄城，大举屠城，城内几无活口。大家想想，为什么陈胜起义后，天下响应，就是因为秦国太残暴。项羽的暴行，是给义军脸上抹黑，大家提着脑袋革命，是为反抗暴政，现在你也搞暴行，如何让民众拥护呢？再说了，关中乃是秦的大本营，以暴制暴，只能使关中百姓抵触义军，对政治、军事都是不利的。于是众人进言楚怀王：“不可派遣项羽西征，沛公刘邦一向宽大仁厚，他可以去。”

楚怀王同意了，最终确定由刘邦领军西征，项羽则北上救援钜鹿。

谁来担任救援军总司令呢？

有人推荐由项梁的部将宋义出任总司令。宋义是个头脑冷静，有分析判断力的将领。当初项梁被胜利冲昏脑袋时，宋义曾多次劝谏，项梁不听，后来竟丢了性命。楚怀王召见宋义，与谈论军国大事，宋义侃侃而谈，见解精辟，楚王大喜，拜他为上将军。

其实，按理说，这个总司令之位，应该由项羽出任。楚怀王是靠项梁、项羽叔侄才坐到这个宝座上，而且项羽战功赫赫，出任总司令

是合适的。很明显，楚王有意压制项羽，清除项氏势力的影响。

四七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救援钜鹿的楚军出发了，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除了楚军之外，其他诸政权也纷纷派兵相援，包括齐将田都，燕将臧荼等。

宋义行抵安阳时，便止步不前。这一逗留，就是几十天之久。此时钜鹿城已危若累卵，而宋义的援军竟然坐山观虎斗，这位上将军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呢？一心想为叔父报仇的项羽哪里忍受得了等待的煎熬，他决定找宋义说理。

进了宋义的大帐，项羽开门见山便说：“如今秦兵围赵王于钜鹿，我们应该迅速渡河，楚军从外面进攻，赵军出城接应，必可大破秦军。”

在宋义看来，项羽这个后生只有匹夫之勇，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哪里懂得什么高明的战略呢？他悠然道：“此言差矣。现在秦军全力攻赵，即便胜了，军队也疲惫不堪，我正好可以以逸击劳。倘若还不能打败秦军，也可趁机引兵西进，定可一举捣破秦都。若说在战场上杀敌的本领，我宋义比不上你；但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你可比不上我。”

自项梁死后，宋义自以为智谋无人可及，对什么人都看不上眼，特别是对项羽这个武夫，更是轻视。为了表现自己与武夫的区别，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号，称为“卿子冠军”。卿子的意思略同于“公子”，以表自己风雅俊逸。

宋义的意思很明白，让秦赵两败俱伤后，他再出来收拾残局。为了唬住项羽这班武将，他还下了道军令：“强不可使者，皆斩之。”敢耍横的，不听命令的，一律处死。宋义的战略对不对呢？应该说，有

一定合理性。这种按兵不动以待时机的策略，在古今战例中多有体现，比如赵奢破秦之阏与之役，比如西汉周亚夫平七国之乱，都曾运用过此策略。

那么他错在哪儿呢？

错在他根本就不想救赵。他的意思是让秦军破赵后，再战秦军。这种动机是不纯的，对反秦战线的联合是有害的，是纯粹自私自利之举，也是他与赵奢、周亚夫两位名将不能相比的地方。

宋义把战争当作发迹的手段，捞取自身的权益。这不，他还要把自己的儿子宋襄送到齐国去当丞相。赵国正在浴血奋战，他却只贪图自己的权力。宋襄出行那天，宋义在无盐大设酒宴饯行。当时天寒地冻，又下起大雨，士兵们饥寒交迫，宋义却大吃大喝。

“他奶奶的”，项羽的怒火在燃烧。他对亲信说：“我等前来，是为戮力攻秦，却在此逗留不进。今年闹饥荒，百姓没得吃，士兵挨饿，军无余粮，而上将军却在大吃大喝。现在应该迅速过河，在赵国收集粮食，与赵军合力抗秦，上将军却说要等到秦军疲敝时才进攻。诸位想想，以秦国之强，攻打刚建国不久的赵国，赵国必亡无疑。赵国灭亡了，秦军就更强大了，到时怎么打？况且我楚国刚遭败绩，楚王坐卧不安，把军事大权都交给上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上将军不体恤士兵，以权谋私，不是社稷之臣。”

说到这里，他目露凶光。俺项羽可不是吃素的，莫道俺的剑不锋利。

第二天早晨，宋义还在睡，他昨晚喝多了。

项羽一大早起来，闯进宋义帐中。不多时，他便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出来，大家一看，无不失色，竟是上将军宋义的人头。

只听项羽喝道：“宋义与齐国勾结，密谋反楚，楚王密令我项羽诛杀之。”大家当然晓得项羽胡说八道，只是没有敢吭声，都拜倒在地说：“立楚王的也是将军一家，如今将军诛乱，我等愿听从将军。”于是大家推项羽为假上将军，并派人追杀宋义之子宋襄。项羽派人快马禀告楚怀王，楚怀王也没办法，只得正式任命他为上将军。

这时又有几支义军加入援赵之列。魏王魏豹、齐王建（战国最后一位齐王）的孙子田安都派部队增援钜鹿，张耳的儿子张敖在代郡收罗一万多人，也赶回钜鹿。应该说，各路援军的人数还是不少的。

秦军人数虽多，并非毫无弱点。弱点便在于交通运输线，即章邯所修之甬道。争夺甬道之战，便成为秦、楚大战的序幕。据《史记》的说法，“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数绝”二字，可见双方是多次交锋，甬道数次易手。在楚军的猛攻下，围困钜鹿城的王离部开始断粮。

楚军大举反扑的时机已成熟。

项羽派英布、蒲将军率前锋部队两万人率先渡河。章邯闻讯，急派军前来阻击，英布与蒲将军奋力击败秦军，为后续部队渡河打下基础。此时，赵国大将陈馥又派人前来请求项羽火速进军，项羽乃命令全体楚军悉数渡河。这一战，非但关系到赵国的生死，也是秦楚兴亡的关键。秦军最精锐的部队与楚国最精锐的部队都聚集于此，势必是一场昏天暗地的大血战。

狭路相逢勇者胜。

没有必死的决心，哪来超凡的勇气？

项羽下令，破釜沉舟，烧毁帐篷，所有将士，只随身携带三天干粮。前面是四十万的虎狼敌人，后面是滔滔河水，过了河，别想着有热腾腾的饭，别想着有温暖的帐篷。往后退，只有死路一条，要生

路，就得把前面的敌人杀光，杀出一条活路。

当时前来救援钜鹿的各路援军，见到秦军漫山遍野的营垒，谁也不敢发动进攻。甚至在项羽发起绝地反击时，他们仍然小心谨慎，按兵不动。英雄与凡人的区别就在于此，英雄能造时势，而凡人永远随波逐流。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的潜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项羽猛攻围困钜鹿城的王离部，楚军呼声振天，以一当十，如猛虎下山，勇不可挡。项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无人可挡。楚军与秦军交锋九次，大破秦师，杀秦将苏角，俘秦将王离，另一位秦军将领涉间自焚而死。

为什么楚国会成为反秦战争的领头羊？项羽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气向世人证明楚人之血脉精魂。章邯虽是百战名将，几时遇过项羽这样的对手？只得仰天长叹，败逃而去。

当时救援钜鹿的十数路义军，无不惊骇于项羽之骁勇。当战场的尘埃散去，项羽以楚国上将军之名义召见各路义军首领，所有人入了辕门之后，跪倒在地，不敢仰视。为什么呢？他们内心惭愧得很。他们远道而来救援钜鹿，却慑于秦军之强，不敢进攻。当他们亲眼看到项羽虎啸天下的英雄气概，谁不惊恐，谁不折服呢？于是乎，项羽非但是楚国上将军，也成为诸侯上将军，成为各路义军的真正统帅。

钜鹿一战，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大会战，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会战。在此之前，章邯是义军最凶恶的敌人，也是最可怕的对手，多少英雄豪杰都败在他手下。此役是他由盛而衰的转折，也是秦军由盛而衰的转折。

章邯败退至钜鹿以南的棘原，项羽进军漳南，双方都精疲力竭，谁也没先动手，成对峙之局。远在咸阳的秦二世大为不满，派使者前

往责备章邯。章邯惶恐不安，派长史司马欣回咸阳以求朝廷谅解。岂料司马欣回了咸阳后，在宫外待了三天，赵高理都不理他。

司马欣慌了，担心赵高加害，便逃回棘原，对章邯说：“赵高独揽朝政，手下人无可作为。现在就是打了胜仗，赵高也会嫉妒我们的功劳；若是打败仗，难免一死。将军您还是要想出路。”

这一番话，章邯也没主意了。就在此时，赵国大将陈馥写来了一封劝降书。在这封劝降书中，陈馥罗列白起、蒙恬等名将的例子，说明功高获诛的道理。陈馥指出：“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如今秦朝灭亡已指日可待，“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

陈馥所说的都是实情，章邯也不免心动，便派人秘密与项羽谈判。

但是，项羽不接受谈判，因为章邯是杀害项梁的元凶。他派蒲将军率军进攻，大破秦师。蒲将军得手后，项羽亲自追击，在汧水再度大破章邯。走投无路的章邯再度向项羽提出谈判的请求，此时项羽的军队粮食不足，他与将领们商量后，决定接受谈判。

于是，章邯与项羽在洹水南殷墟立盟，秦军放下武器投降。项羽立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上将军，率领投降的秦军部队作为先锋，向关中挺进。

秦之帝国大厦，早已从内部朽烂了，之所以还没倒塌，只是因为章邯这根顶梁柱在。章邯投降了，秦覆灭的日子就近了。

秦始皇时，秦是何等强大，为什么他去世没几年，秦就垮了呢？整垮秦国的罪魁祸首，便是赵高。从沙丘之变开始，赵高在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杀扶苏，杀蒙恬，杀诸公子，杀诸公主，无数的

鲜血铺就他的权臣之路。

赵高一手遮天，胡作非为，干的坏事多了去了。他能为所欲为，主要是他控制了呆头呆脑的秦二世胡亥，皇帝对他极为信任，言听计从。不过赵高也有害怕的事，怕被大臣弹劾，怕皇帝发现他的劣行。他便忽悠秦二世说，陛下还年轻，别在朝廷上与公卿说政事，要是说错了，自曝其短，不好。皇帝本就贪玩，索性把政事都交给赵高。

说到搞权术，赵高是一流的，说到治国，他一窍不通。秦国政治一塌糊涂，李斯也有责任。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他迎合赵高，陷害忠良。不过，李斯与赵高还是有所不同的，李斯有政治抱负，而赵高纯粹就是追逐权力。这种差别，导致李斯与赵高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最终导致李斯的惨死。

李斯多次进谏秦二世，秦二世挖苦他说：“你居三公之位，如何令盗如此。”责备他身为丞相不能平定东方之乱。皇帝说到这份上，李斯要是有点自知之明，最好上交辞呈。不过他迷恋权位，不知急流勇退的道理，只得曲意奉承皇帝。

在赵高眼中，李斯是最大的绊脚石。秦始皇还没统一六国时，李斯就已经是秦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的根基很深，功劳很大。赵高不怕别人，但对李斯还是有所顾忌，不扳倒李斯，他睡不安稳。

这位宦官的本领就是操纵小皇帝，借皇帝之手杀人。每当李斯要觐见皇帝，赵高总安排在皇帝与美女饮酒作乐时。皇帝大怒说：“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

赵高见机会成熟，遂在秦二世面前诬告李斯有裂土封王的野心，其子李由与义军私通。这下子李斯终于看清赵高是什么货色了，他也上书攻击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同时，他又联合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进谏皇帝，请求减轻赋役，停修阿房宫。

李斯的反击是无力的，秦二世早就听信赵高之言，认为李斯想造反。于是将李斯、冯去疾、冯劫三人下狱问罪。冯去疾、冯劫认为将相不能被凌辱，遂自杀而亡。李斯仍然抱有幻想，在狱中写了份自白书，实际上是罗列自己为秦国所作的贡献。赵高冷笑道：“囚安得上书！”

迷恋权力的人，最终也死在权力二字上。李斯最终被判死刑，腰斩于市，夷三族。临死前，他对次子说：“我想跟你牵着小黄狗，出上蔡东门去追逐野兔，唉，已经不可能了。”这一刻，他似乎才省悟到一件事，权力到头只是一场空，倒是平淡无奇的生活，才是真正可留恋的。

李斯死后，赵高为丞相，秦国从此坠入深渊。

不过，恶终有恶报。赵高正上演着最后的疯狂，而此时，刘邦的军队正顽强地向咸阳城挺进。

四八 大秦帝国的谢幕

所谓的“西征军”，力量实在太单薄了，只有几千人，楚政权拨不出更多的部队给刘邦，只是让他“西收陈王、项梁散卒”。非但军队有限，粮草也得自己筹集。有利的条件是，秦军主力都北上攻钜鹿，各城池要塞的守军数量比较少。

刘邦抓住机会，连续攻破成阳、杠里、成武等城，取得一些小胜利。兵力太少始终是困扰刘邦的最大问题，这位老兄表面宽仁，实则厚黑，途经栗县时，正好遇上一支义军。此义军首领被封刚武侯，刘邦一举将其部众四千多人吞并，又联合魏国将领皇欣、武满等，击溃了游击于此的秦军。即便如此，此时刘邦的部队也还不到一万人。

不过刘邦运气不错，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

此人名为酈食其，是陈留高阳人，学富五车，却穷得叮当响，谋了一个看守城门的差事。酈食其人穷志不短，所谓的英雄豪杰，没几个能入他法眼，为人狂傲，被称为“狂生”。自陈胜起义后，有许多义军将帅往来于高阳，酈食其认为这些人都刚愎自用，无容人之雅量，便蛰伏以待时机。刘邦的西征军途经高阳时，酈食其听说他为人豁达大度，决定前往拜见。

酈食其入见刘邦时，刘邦正坐在床上，两名女子给他洗脚。这是待客之道吗？原来刘邦出自草莽，向来看不起儒生，故意怠慢酈食其。酈食其果然是狂生，他冷冷道：“足下是助秦国攻诸侯呢，还是率诸侯破秦呢？”

刘邦一听，破口骂道：“你这个臭儒生，天下苦秦久矣，所以诸侯相率攻秦，怎么说助秦攻诸侯的话？”酈食其不慌不乱地说：“既然你是率义军诛伐无道之暴秦，见到长者不应当如此傲慢。”

换作其他人，可能要咆哮了。刘邦还真不是一般人，他马上撤了洗脚水，穿好衣服，请酈食其上座，道了歉，上了几道菜款待。

酈食其便说：“足下率乌合之众，收散兵游勇，人数不足万人，这样直接杀到秦国，无异于虎口送食。陈留郡地处天下要冲，城内多积粟，不如我前往劝降。能归附您最好，如不归附，您再发兵攻打，我在城内策应。”刘邦听罢大喜。

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酈食其还真劝降了陈留郡守。不仅如此，酈食其的弟弟酈商也率四千人前来归附。这样，刘邦既有了兵，又有了粮草。

此时已是秦二世三年（前207），由于项羽在钜鹿大破章邯，秦军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刘邦乘机进攻开封城，未能攻下，转而攻略白马，大破秦将杨熊。杨熊逃到荥阳后，被秦二世问罪处斩。

当时想入关的义军大有人在，刚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赵王赵歇派部将司马卬领兵，打算渡黄河入关。刘邦才不愿把入关的机会让给别人，他北攻平阴，把黄河渡口占了，阻止赵兵入关。不过，刘邦并非百战百胜，进攻大的城市时，总是受挫。进攻洛阳时，又未能攻克。

在刘邦颇为狼狈之时，张良回来了。此时由于韩国复国，张良便追随韩王韩成而去，刘邦西进至此，韩王韩成留守阳翟，张良则追随西征。若是没有张良相助，刘邦恐怕很难凭一己之力直捣咸阳。

一路西行，刘邦沿途收罗不少义军，同时招降纳叛，军队数量也如滚雪球一样增长。六月，西征军进入南阳地界，秦南阳郡守率兵阻击，被刘邦击败，只得退守宛城。当时刘邦入关心切，打算置宛城于不顾，绕道前行。张良赶紧阻止道：“不可。您虽急着入关，秦国的兵力仍颇强，据险而守。倘若不攻克宛城，到时有强敌，后有追

击，这样就危险了。”

刘邦猛然省悟，连夜率军走另一条路返回。宛城的秦军还以为义军已经远去，喘了一口大气，稍有松懈，岂料天刚亮时，发现宛城已被包围。南阳郡守大恐，自知难以坚守，拔出剑打算自杀。其门人陈恢一个箭步上前，夺下他的剑，说：“先别急着死，待我去跟刘邦谈谈。”

陈恢出城见刘邦，对他说：“足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接受南阳投降，保留郡守头衔，让他继续守城，您则率城中甲士一同西进。其他城池的守将听到您这种处置措施，定会争先开门投降，那么您一路西行无阻了。”

秦国大势已去，这是任何一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只要原封不动保留各郡守、县令的官职，这些人把辫子一盘，就会变成革命军了。刘邦对陈恢的建议大为赞赏，接受南阳郡守投降。邻近郡县一听，投降还能保住官帽，何乐不为呢？于是乎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各郡县改旗易帜，纷纷投诚。投降的秦军被编入西征军，刘邦的兵力已经有数万人之多。

八月，刘邦进攻武关，进入关中。

直到这个时候，赵高才感到大祸临头。

秦二世不是把政事都交给他了吗？现在章邯举部向项羽投降，刘邦挺进到眼皮底下，要是皇帝怪罪下来，他赵高有几个脑袋呢？怎么办？忽然，赵高狞笑了，什么皇帝，不就是我手里的玩偶吗？朝廷还不是我说了算吗？

赵高要搞一次权力测压。

他把一头鹿拉到朝堂之上，对秦二世说：“臣献上一匹马。”秦二世一看乐了，笑着说：“丞相的眼力也太差了，把鹿说成马。”

赵高假装很惊讶，说这明明是马，怎么会是鹿呢？便问左右文武官员。大家都知道赵高在搞鬼，有些人沉默不语，有些人拍马屁说是马，也有些人实在看不下去说实话了。赵高把这些敢说实话的人都记了下来，不久后，这些人全部被抓了起来，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

“指鹿为马”可以说是最最拙劣的表演，只要不是傻蛋，都可以看出赵高这个人是何等阴险。可是秦二世呢？他只当作一个笑话，不以为然，殊不知赵高已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了。

连皇帝都敢欺，赵高可谓胆大包天。朝中所有人无不畏惧，但有什么用呢，要弹劾也无门，只好闭紧嘴巴以求自保了。每当皇帝问及东方暴动之事，赵高总是拍胸脯说：“关东盗毋能为也”，战败的消息传来，他就归咎于前线将领，毫不留情地诛杀。

现在刘邦来了，近在咫尺。赵高惶恐不安，他不是怕刘邦，而是怕秦二世会杀了他，不敢上朝，称病躲在家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秦二世派使者找上门了，狠狠地责备赵高剿匪不力。

赵高秘密召来女婿咸阳县令阎乐、弟弟赵成，商量对策，他说：“现在事情紧急了，皇上要怪罪我家族。一不做，二不休，我打算废了皇帝，改立公子子婴。子婴为人仁俭，百姓爱戴。”赵高是宦官，自己当不了皇帝，于今之计，要与义军谈判，得换个口碑好一点的人当皇帝。

事到如今，只能豁出去了。赵高遣心腹郎中令作为内应，谎称宫里有大盗。咸阳县令阎乐带着一千多人闯到望夷宫门口，把负责宫廷守备的卫令抓起来，质问说：“大盗闯入宫中，你为什么不阻拦？”卫令一脸困惑地答道：“宫廷守备极为严密，怎么可能会有盗贼闯入呢？”阎乐不容分说，拔出剑格杀卫令，带兵闯入宫中。

宫里人很快就发现，阎乐哪里是抓人，分明是政变。阎乐闯入宫中，大开杀戒，遇到郎官与宦官，一律格杀。杀了几十人后，其余人早惊恐得作鸟兽散。郎中令与阎乐一同杀入殿内，殿内有许多帷帐，叛军们箭矢齐发。秦二世躲在殿内，他听说赵高造反，不由得目瞪口呆，继而勃然大怒，不由得怒火上攻，喝令左右卫士还击。情形不对呀，左右卫士又不是傻子，这个时候我还效忠傻子皇帝吗？大家全跑了。在秦二世身边，只剩下一个小宦官。

秦二世逃到内室，死到临头还要冲着小太监发火：“你为何不早告诉我真相，让我落到这个地步。”小太监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敢说，这才活到现在。我要早说了，已不知死到哪去了。”实话，真是大实话。

这时，阎乐一脚踹开门进来，指着皇帝的鼻子道：“足下骄横放纵，滥杀无辜，天下人都背叛你了。”这话也是实话，只是不该由阎乐这样的人说得大义凛然。

秦二世还想活命，他说：“我可以见丞相吗？”

“不行。”

“可以当个郡王吗？”

“不行。”

“万户侯？”

“没门。”

“那当个小老百姓总可以吧。”

阎乐没耐心了：“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诛杀足下，你再多说，我也不敢禀告。”说罢命令士兵上前。秦二世在生命最后一刻，总算

有点皇帝的尊严，他不让士兵动手，自杀了。

秦二世死后，赵高召集诸臣，宣布诛杀皇帝之事，所有人无不震惊，却也不敢说话。赵高有什么打算呢？他认为以前秦灭了东方六国，东方叛乱无非是要闹独立，现在六国都独立了，秦二世也死了，那些所谓的“义军”首领也该满意了吧。以后秦国仍是秦国，六国仍是六国，回到统一前的状态，互不干涉。

赵高立子婴为秦王。为什么叫秦王呢？既然与六国平起平坐了，秦也不称皇帝了，仍然称王。

那么刘邦怎么办呢？善于权术的赵高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倘若不能打败刘邦的话，他打算做个交易，把秦宗族灭了，与刘邦共同瓜分关中。

比起秦二世，子婴要聪明许多。你想想，赵高杀秦二世，如同捏死一只蚂蚁，杀了皇帝还没人敢吭声。赵高立子婴当秦王，无非是为了稳定大臣与民心，无非是把他当作可以随心所欲操控的木偶。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杀了子婴。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绝地反击。不过，朝堂之上都是赵高的人，万不能在朝堂动手，要在哪儿呢？就在子婴所在的斋宫。原来呀，依照秦例，登基之前，要先斋戒五日。五日已满，子婴假称病了。赵高不知是计，便前往探视。前脚刚踏进斋宫大门，子婴便喝令左右拿下，当场把赵高这个奸贼格杀。这个翻云覆雨的权臣就这样死了，还赔上全家人性命，三族被夷。

比起秦二世，子婴人品算是好的，一上台便诛杀赵高，振作朝纲。只是经过秦二世与赵高多年的折腾，秦国早已朽烂，不是一个人可以挽救的。

子婴调兵遣将，守卫峽关，试图阻止刘邦军队深入。

刘邦打算发动强攻，张良献计说：“秦军的力量不可低估，不如先采用疑兵之计，在各山头张挂旗帜，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再派酈食其、陆贾等人前往游说秦军将领，利以诱之。”还是张良想得周到，刘邦采纳其策，游说秦国诸将。这些将领不由得心动，打算暗地里与刘邦合作。

这时张良又说：“秦军将领打算背叛朝廷，只是他们的部下不一定会听从，不如乘他们麻痹大意之时，发动突袭。”这个计策有点厚黑，明明游说他们投降，又要偷袭，不太厚道。为什么张良会这样说呢？因为秦国已经换了国君，祸害国家的赵高也被杀了，大家对新政府还是寄予厚望，许多人并不想放下武器投降。

对刘邦来说，夺取关中才是最重要的事，这时也顾不上厚不厚道了。他率主力发动奇袭，在蓝田南大破秦军，继而又在蓝田北再胜一局。经此一役，秦军土崩瓦解，通往咸阳的大门已经打开。

公元前206年初，刘邦大军挺进到霸上，直逼咸阳。此时，帝国首都早已人心涣散，兵力凋零，根本无法组织起像样的保卫战了。秦王子婴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献城投降。他素车白马，自己用绳子绑住脖子，出城向刘邦投降，连同皇帝的玉玺、符节一并上交。

曾经令人畏惧、谈虎色变的秦国，花费了五百多年的时间完成一统中国的梦想，却仅仅在十几年后，就以这种窝囊的方式草草收场。

从陈胜、吴广发难到秦帝国灭亡，总计不足三年。

一个貌似坚不可摧的政权，被一群叛乱者轻松推翻了。

短短十数年的时间，曾强大到天下无敌的秦国迅速走向灭亡。翻

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再也找不到类似的史迹。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雄视天下，笑傲江湖，岂止是东方不败，简直是天下不败。秦国如同猛虎雄狮，在它面前，其他国家不过只是阿猫阿狗的角色罢了。就算偶尔有一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不过如昙花一现，根本无法撼动其坚不可拔的根基。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秦与六国战斗两百多年，一统天下，表面上看，似乎是胜者，其实不然。秦国的灭亡，较六国不过多出十几二十年，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最终翻江倒海，居然是名不见经传的陈胜、项羽、刘邦等小人物。小人物创造了大历史，这真是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虽是意料之外，却属情理之中。

如果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消除数百年战国纷争，是迎合人民追求和平的理想，那么秦帝国的暴政则很快走向人民的反面，沦为反动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秦帝国也是一只纸老虎。秦政权的快速覆灭，外因是实施暴政，内因则是内部的腐烂。自从秦始皇死后，赵高弄权，残害忠良，指鹿为马，逼死太子扶苏，诛杀大将蒙恬，玩弄秦二世胡亥于手掌之中，致使忠贤扼腕，士人离心，民众敢怒而不敢言。历史上的反动政权很多，但是像秦帝国这么强大，却灭亡得这么快的例子，却不多见。如果只是肌肤腐烂，尚且可以苟延残喘，但如果心脏都腐烂了，那就无药可救了。即使秦政权收天下兵器，铸成十二尊金人，仍然挡不住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的起义军；即便秦政权焚书坑儒，禁锢天下的思想，却不承想到亡在不读书的刘邦、项羽手中。

汉代的政论家贾谊简明扼要、一针见血地评论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唐代的杜牧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两人都将秦之迅速灭亡的原因，归咎于秦国政权所施行之暴政，是反人性、反民心的。反人性、反民心的制度，

一定不会长久，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

大事年表

约公元前870年 非子受封秦国

公元前822年 秦仲伐西戎，身死

公元前770年 秦被封为诸侯

公元前645年 秦晋韩原之战

公元前627年 秦晋殽之战，秦军遭重创

公元前623年 秦霸西戎

公元前621年 秦穆公死，以人殉葬

公元前578年 秦晋麻隧之战

公元前559年 秦晋迁延之役

公元前506年 吴破楚都，秦助楚复国

公元前419年 魏攻河西，筑少梁城

公元前364年 秦败魏师于石门，斩首六万，秦献公称伯

公元前362年 秦孝公立

公元前361年 商鞅入秦

公元前356年 商鞅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50年 商鞅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38年 秦孝公卒，商鞅遇害

公元前328年 张仪相秦

公元前317年 秦败三晋于脩鱼，斩首八万

公元前316年 秦灭巴蜀

公元前312年 秦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

公元前307年 甘茂攻宜阳之役；秦武王扛鼎死

公元前305年 魏冉平季君之乱

公元前299年 秦诱拘楚怀王

公元前298年 孟尝君伐秦

公元前293年 秦败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公元前288年 秦、齐称西帝、东帝，旋取消帝号

公元前279年 秦、赵渑池之会；白起攻楚

公元前273年 秦魏华阳之战，斩首十五万

公元前269年 秦赵阼与之役

公元前266年 范雎相秦

公元前260年 白起破赵于长平，坑四十万人

公元前257年 秦围邯郸，信陵君窃符救赵；秦杀白起

公元前256年 秦灭西周

公元前249年 吕不韦相秦；秦灭东周

公元前238年 嫪毐之乱

公元前237年 李斯谏逐客书；吕不韦免相

公元前233年 李牧破秦师

公元前230年 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 秦灭赵

公元前227年 荆轲刺秦王

公元前226年 李信伐楚

公元前225年 秦灭魏

公元前224年 王翦伐楚

公元前223年 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 秦灭燕、代

公元前221年 秦灭齐，统一六国；秦王改称皇帝；设郡县制；
统一制度

公元前219年 张良刺秦始皇于博浪沙

公元前215年 蒙恬伐匈奴

公元前214年 秦攻取南越之地；筑长城

公元前213年 焚百家之书

公元前212年 坑儒生四百余人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死；沙丘之变，扶苏、蒙恬死；胡亥即位，为秦二世

公元前209年 陈胜大泽乡起义；刘邦起兵于沛；项梁、项羽起兵于吴

公元前208年 陈胜死；项梁立楚怀王；赵高弄权，李斯腰斩

公元前207年 项羽大破秦军于钜鹿；章邯降楚；刘邦西进关中；赵高杀二世；子婴诛赵高

公元前206年 秦王子婴降，秦亡

张程·作品 李学勤·总顾问

魏晋原来是这样

220-420



历史中国

中国人和子孙后代的传世之书

打造重印、再版率最高的历史书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UBLISHING

魏晋原来是这样

(公元220—420)

张程 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目 录

- 一、禅让这场戏要演好
- 二、曹植与“洛神”的相会
- 三、司马懿：一个权臣的崛起
- 四、王朝命运在高平陵改变
- 五、竹林七贤来了
- 六、这不是嵇康一个人的悲剧
- 七、国家在发展，旗帜在变色
- 八、曹髦的儿戏政变
- 九、前人种地后人收
- 十、三家归晋
- 十一、太子是个白痴
- 十二、斗富大赛
- 十三、悍妇乱政不得了
- 十四、八王之乱：同室操戈何其匆匆
- 十五、文人不合时宜
- 十六、五胡十六国
- 十七、当割据胜地巴蜀遇到流民梟雄
- 十八、永嘉之祸
- 十九、西晋被彻底埋葬
- 二〇、石勒：从奴隶到皇帝
- 二一、冉魏：放把火就死
- 二二、慕容家有内讧传统
- 二三、那个叫王猛的猛人
- 二四、前秦：我统一北方了！
- 二五、搞分裂是没有前途的
- 二六、司马睿当皇帝，真不容易

[二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北伐](#)

[二八、王与马不敢共天下](#)

[二九、豪杰王敦的“过豪死”](#)

[三〇、黄须鲜卑儿](#)

[三一、有枪就是草头王](#)

[三二、北伐是剂猛药](#)

[三三、先拿灭蜀练练手](#)

[三四、陈郡谢家的登台准备](#)

[三五、谢安：看我东山再起](#)

[三六、淝水之战其实是场心理战](#)

[三七、复国是永恒的目标](#)

[三八、该后秦上场了](#)

[三九、乱政父子兵](#)

[四〇、起义成败，老大能力很重要](#)

[四一、桓玄：篡国虎父无犬子](#)

[四二、桓楚注定是个短命的伪政权](#)

[四三、当兵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四四、100年后再见两京](#)

[四五、赫连勃勃大王](#)

[四六、别把责任推给大环境](#)

[四七、桃花源只是传说](#)

[四八、魏晋风骨](#)

[四九、行政区划上的较量](#)

[五〇、魏晋人怎么过日子](#)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一、禅让这场戏要演好

延康元年（220年）二月庚戌，新继位的魏王曹丕下令关津减税，恢复什一税制。辛亥，曹丕赏赐诸侯将相以下粟万斛，帛千匹，金银不等，同时煞有其事地派遣使者巡查郡国。所有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收揽民心。而收揽民心的目的则是：推翻立国四百年的汉朝，建立曹魏王朝。

在皇权转移中，意识形态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简单地说，后来者需要在自己脸上贴金。神化自己是最常见的做法，即让淳朴的老百姓相信自己是天人下凡，相信自己的登基是天命所归。巧的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会有大批恰逢其时的“祥瑞”出现。

先是民间开始传言曹丕出生的时候，有青色的云气像车盖一样漂浮在婴儿身上，终日不散。风水师傅们一致认为这是曹丕至贵的证明。这时，黎民们才开始明白：原来曹丕一出生的时候，就不是凡人啊。

此间又出了一个叫殷登的人，说自己在熹平五年（176年）的时候记得一件事：当年谯地（曹操老家）出现了黄龙祥瑞。大名士、光禄大夫桥玄就悄悄问太史令单颢：“这个祥瑞什么意思啊？”单颢回答说：“这说明谯这个地方会有王者兴起。在五十年时间里，黄龙会再次出现。”殷登说自己当时在场，就默默记下了这件事。45年后，也就是延康元年（220年）三月，黄龙再次出现在谯。当时殷登还在世，

大肆宣扬这件事，引起中原轰动。最后曹丕出面召见殷登，作了一次谈话，赏赐殷登谷三百斛，送回家去。

之后，魏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同月，濊貊、扶余、焉耆、于阗等部落都派遣使者向中原奉献。四月丁巳，饶安县出现典型的祥瑞白雉。曹丕很高兴，免了饶安县的田租，赏赐勃海郡百户牛酒；太常以太牢祠宗庙。

但是事情突然起了波折。当月，大将军夏侯惇病逝。曹丕亲自素服在邺城东门发哀。有人指责曹丕的行为失礼。按礼，天子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曹丕与夏侯氏并非同姓，却哭于城门，是不当的行为。这其实暗指曹丕家族与夏侯家族的“不正常关系”。曹丕的爷爷，也就是曹操的爸爸曹嵩原本是乞丐，被大宦官曹腾收养后才有了姓氏。东汉官场上就一直盛传，曹嵩原来是复姓夏侯的小乞丐。因此在曹操一世，夏侯家族步步显贵。现在是曹丕登基的前夜，有人重提曹家这件不光彩的往事，杀伤力巨大。

这表明，一部分世族大家还并不认同曹氏家族登基称帝。

曹操在世时，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曹操也不时做出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客观上，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虽然没有打击到世族大家的根本，但曹操对世族大家的厌恶和压制是明显的。在曹姓代刘几成定局的时候，世族大家需要曹丕给他们保证，维护和扩大的他们的利益。虽然曹丕本人已经完全是一个世家子的出身和行为举止，但缺乏明确的承诺和制度上的保护，世族大家们还是不放心的效忠于曹氏家族。

这时候，昌武亭侯、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中正法”，建议改革官员人事制度。九品中正法的内容是在郡国设置中正，评议本地人才高下，分九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官职。评议的标准主要看家世（被评

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其次看道德，最后才看一个人的才能。而担任评议的都是当地的贵族显要。这样的制度到底对谁有利，可想而知。此法一出，获得了世族大家的一片赞赏之声。

这实际上是世族大家对曹丕出的考题，是世族大家与曹氏家族进行权力交换。

世族大家要求确保自己的地位和权益，并希望能够世代相传。九品中正法就是一个制度上的保证。曹丕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个制度，开始在全国进行人事改革。它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势力恶性膨胀的制度源头。

时间到了五月，刘协“命令”曹丕追尊祖父、已故太尉、乞丐出身的曹嵩为太王，祖母丁氏为太王后，封王子曹芳为武德侯（刘协还真是配合）。

六月辛亥日，曹丕在东郊阅兵，集中兵力开始南征。这次南征，公卿相仪，华盖相望，金鼓阵阵，完全是曹丕对个人势力的一次检阅，是对天下百姓的一次试探。因此整个军事行动更像是一次盛装游行。曹丕先到了屡次出现祥瑞的老家谯。他在家乡大宴三军，并在邑东召集谯地的父老百姓，设伎乐百戏，与民同乐。在欢娱间，曹丕说：“先王非常喜欢家乡，不忘根本。谯，真是霸王之邦。我要减免谯地的租税二年。”当地的三老吏民闻言纷纷向曹丕祝寿，通宵达旦。几天后，曹丕还去祭扫了先人的墓地。

到了冬天，曹丕大军终于达到长江以北。孙权整军以待。曹丕看到东吴军队军容整齐，说，东吴还是有人才的，我们暂时先回去吧。（这句话让江对面的孙权听得一愣一愣的。）临行，曹丕下令：“大军征伐，死亡的士卒有的还没有得到收敛，我感到非常悲痛。各郡国要为这些人收殓，送到烈士家中。官府还要出资为他们设祭。”他临别了还不忘讨好军队，向天下展示自己的仁慈。

自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做足工作的曹丕就等着刘协禅让了。

关于这次禅让，正史和野史的记载截然不同。

《三国志》的曹丕传记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刊登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九卿、将军、守令等人的劝进书。刘协一再下诏禅让，曹丕一再推辞；大臣们动不动就聚集一百二三十人集体劝进，而且周而复始，不厌其烦，也不担心曹丕生气。曹丕就是不答应。连刘协都说，魏王不接受禅让，那怎么办啊？最后仿佛劝进的大臣们都着急了。尚书令桓阶对曹丕说：“现在汉朝的命气已经尽了，臣等都认为天命降临大魏，陛下还前后退让。汉氏衰废，就要咽气了，史官和耆老们的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天下百姓都唱着歌谣，呼吁明主出现。陛下应该响应上天，接受禅让，马上登坛祷告上帝。不然就是久停神器，抗拒上天和亿万百姓的意愿啊！这可了不得啊。”曹丕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说了一个字：“可。”于是大臣们和百姓都欢天喜地地开始庆祝了。这段完美的记载总让人怀疑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融洽，是否如此顺利。

《三国演义》、《华阳国志》和其他野史则完全为我们描述了一副逼宫的闹剧：

华歆等一班文武，去见刘协，要求刘协禅让。华歆说：“魏王德布四方，仁及万物，是古第一人。我们大臣都认为汉祚已经尽了，请你效法尧舜，以山川社稷为重，禅位魏王。”他还撂下一句狠话：“只有这样，你才能安享清闲之福！我们都商议定了，特来奏请。”平时文质彬彬、以才学震天下的华歆竟然说出这样的大逆话语来，真是让人吃惊。据说刘协听说大臣们这么说，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终于，刘协压抑着的情绪爆发出来。他注视着百官哭道：“高祖皇帝提三尺剑，

斩蛇起义，平秦灭楚，创造基业，世代相传，到我这里已经有四百年多年了。朕虽不才，但也没什么过错，我怎么忍心将祖宗基业舍弃不顾？”刘协顿了顿，真诚地说：“祥瑞图讖，都是虚妄说不清楚的事。请各位大臣深思！”与华歆同来的、学问更高的王朗说道：“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天底下哪有什么不亡之国、不败之家啊？汉室相传四百余年，到现在气数已尽。陛下还是早早退避为好，迟疑了就要生变了。”一旁的九卿、尚书和禁军将领等都频频点头。话已至此，刘协只有大哭，逃入后殿去了。百官晒笑着散去。

第二天，百官再次云集金銮殿，命令宦官请出刘协。刘协恐惧地不敢出来。刘协的皇后是曹操的女儿、曹丕的妹妹。见到丈夫这样的窘态，曹皇后大怒，说：“我哥哥怎么做出这样乱逆的事情来！”外面的百官推举曹洪、曹休两人带剑进入后殿，逼刘协出殿。曹皇后大骂自己的这两位叔叔，说：“都是你们这些乱贼，贪图富贵，造反谋逆！我爸爸功勋卓著，威震天下，都不敢篡窃神器。现在我哥哥登位还没几天，就想着篡夺皇位。老天爷是不会保佑你们的！”曹洪、曹休两个人不去理会自己的侄女，裹胁着刘协出殿。刘协万般无奈，只好更衣出来接受最后的审判。

面对华歆等人的再次逼宫。刘协痛哭流涕：“你们都领取汉家的俸禄多年了，中间还有很多人是汉朝开国功臣的子孙，现在怎么就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华歆冷笑着说：“陛下若不听从我们的话，恐怕马上要祸起萧墙了。这并非我们不忠于陛下。”

刘协大喝：“谁敢杀我吗？”

华歆厉声说：“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没有人君之福，导致四方大乱！如果没有魏王父子在朝，杀陛下的人何止一两个？你这么不知恩报德，难道不怕天下人群起而攻之吗？”

刘协受到极大惊吓，拂袖而起。旁边的王朗向华歆使了个眼色。

华歆竟然快步走上皇帝宝座，扯住刘协的龙袍，变色厉声说道：“同意还是不同意？就一句话！”刘协哪经受过这样的场面，浑身战栗不能回答。他环顾四周，宫殿内外披甲持戈的几百人全部都是魏王亲兵。他哭着对群臣说：“我愿意将天下让给魏王，请各位保存我的性命。”

当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在寻找撤退的底线的时候，往往发现：其实生命才是每个政治人物最基本的需求。遗憾的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它不幸成为奢求。

逼宫的贾诩许诺：“魏王必不负陛下。陛下快快下诏书，以安定人心。”

刘协只好让陈群起草禅让诏书，让华歆捧着诏书和玉玺，引导百官到魏王宫前，请曹丕即位。曹丕大喜，但坚决推辞，要求刘协禅让给“真正的大贤人”。在华歆的导演下，刘协又下了一道诏书，再次恭敬地请曹丕登基。曹丕更加高兴了，但还是对贾诩说，还是怕“不免篡窃之名”。贾诩马上献计说，让刘协筑一坛，名受禅坛；择吉日良辰，集结大小公卿；让当今天子亲自在坛上献上玺绶，禅让天下。

于是，刘协启动了汉王朝的最后一项国家工程，派遣太常院官在繁阳卜地，筑起三层高坛，选择吉日举行禅让大典。（河南许昌临颍县繁城镇还保留着这座中国仅存的受禅台。台高20米，长宽约30米。）十月庚午日寅时，东汉王朝的禅让仪式正式举行。

禅让原本是传说中推选部落首领的制度。这种只保留在典籍中的神秘制度已经距离曹丕时代两千年之远了。如何“复活”禅让制度和仪式是对曹丕君臣的巨大考验。曹丕和魏国的大臣们以高度的“智慧”，将传说中的“禅让”概念赋予实践，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曹魏君臣“复活”的受禅大典的盛况，裴松之引《献帝传》注云：“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曹丕登上受禅台接受汉献帝的帝

位，三公九卿、侯爵贵族、各军将领和前来朝贺的匈奴单于、周边少数民族来宾好几万人见证了这一仪式。）整个仪式要燃起巨火，祭高天地、五岳和四渎。许昌受禅台前现存的两块石碑——《受禅表》碑和《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在风雨飘摇后面目模糊，依然忠实地向后人透露当时的盛况。《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内容为46位文武大臣给汉献帝刘协上的折子，奏请曹丕当皇帝的理由。其实是写给曹丕的效忠信，就是演义中的“劝进书”。《受禅表》是曹丕受禅称帝之后，表白自己不愿当皇帝，可是天、地、人都让他当，再三辞让而不得，才登上皇帝宝座的“苦衷”与“救民济世”的心态。这两块碑文由汉末名士王朗文，梁鹄书；楷书创始者钟繇镌字，被后世称为“三绝碑”，即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钟繇和梁鹄是当时的重臣和著名书法家。王朗为大学问家，对禅让一事最为积极，魏文帝时由御史大夫迁为司空。民间传说他积极逼杀献帝皇后，催逼玉玺。

惊恐、悲凉、无助的刘协，为了保全性命，无奈只得把祖宗的江山禅让给曹氏。不知道他跪在地上，以什么样的心情听着昔日的大臣宣读如下公告：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上皇后帝：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汉主以神器宜授于臣，宪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虽休勿休。髡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将士，洎于蛮夷君长，僉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髡臣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无统。’丕祇承皇象，敢不钦承。卜之守龟，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谨择元日，与髡寮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曹丕的这篇布告，主要意思是魏代汉立是上承天意，下顺民心的事，曹丕即位是众望所归。这篇布告为之后受禅台上的表演奠定了基调。

曹丕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将刘协封在河内郡山阳，为山阳公，邑万户。刘协可以用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刘协的四子降为列侯；更换周边各族印玺，为魏国百官更名。总之是皆大欢喜。

禅让仪式上有两件小事值得一书。一是《魏氏春秋》上说，曹丕在坛上行礼完毕的时候，曾经对周围的功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后人对这句话多有评论，大抵都是认为曹丕自我感觉过于良好。魏国事实上的创建者应该是曹操。但是曹操满足于“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臣”的自我定位，不愿意登基。曹操如果说这句话，方才是名正言顺的。

第二件事是《三国演义》描写的怪事。传说在仪式上的时候，百官请曹丕答谢天地。曹丕刚下拜，忽然坛前卷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急如骤雨，对面不见身影；坛上的火烛都被吹灭。曹丕惊倒在坛上，被百官急救下坛，半晌才醒过来。这阵奇怪的风和随即而来的疾病让曹丕在宫中休养了多时。病情老不见痊愈，曹丕就怀疑许昌宫殿内外有妖怪，决定从许昌迁都洛阳，大建宫室。

曹丕受禅后，非常客气地对刘协说：“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意思就是说，天下的珍宝财富，我都和你山阳公（刘协禅让后的封号）共享。那么刘协是不是真的共享到了所谓的“天下之珍”呢？不得而知。汉献帝刘协逊位后，虽然只是公爵，名义上位在诸侯王之上。刘协在封地内行汉正朔，一直到54岁才自然死亡。曹丕以天子礼仪把刘协下葬，赐名其陵寝为“禅陵”。山阳国由刘协的子孙继承，从建国至灭亡共传国89年。文人色彩浓厚的曹丕还算客气仁慈。

三

曹魏以禅让形式建国，恶化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风气，影响恶劣。

曹丕及其党羽假惺惺的动作，都是粉饰和权谋而已。在禅让过程中，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刘协是非让位不可，可曹丕又不想背上篡位的名声，就选择了远古传说中的禅让制度来当遮羞布。“自曹魏以迄于宋，皆名为禅而篡者也。”包裹禅让的道德面纱彻底地被篡位者剥去，禅让成为赤裸裸的篡位工具。野心家们发现了禅让的“优点”，之后的禅让基本是仿照汉魏故事进行的。

魏晋南北朝期间，禅让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游戏，规则被固定化、现实化、公开化，失去了之前的神圣和严肃。南北朝时期的禅让在险恶的政治黑幕中将人性阴暗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内忧外患不断的形势将权臣和军事强人推上了政治舞台，而不争气的末代皇帝们又令那些野心勃勃的权臣有机可乘。一模一样的重复，无休无止的阴谋和杀戮让人厌倦：曹魏末代皇帝曹奂禅让给了晋武帝司马炎，晋代魏；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给南朝宋武帝刘裕，宋代晋；南朝宋顺帝刘准禅位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齐代宋；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南朝梁武帝萧衍，梁代齐；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位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陈代梁；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位给北齐文宣帝高洋，北齐代东魏；西魏恭帝元廓禅位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北周代西魏；北周静帝宇文衍禅位给隋朝文帝杨坚，隋朝代北周。

尽管禅让使得这些黑幕半遮半掩，但天下对这些游戏规则和把戏一目了然。辽人有首《伎者歌》唱道：“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可以作为魏晋南北朝禅让制度的最好注解。

更恶劣的影响是，禅让制度沉重打压了政治道德，让现实政治大行其道。当一个王朝是通过不道德的禅让形式建立的，它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之前的秦朝是通过王朝战争统一的，汉朝是刘邦提三尺剑千辛万苦打下来的。而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则是从一个阴谋走向另一个阴谋，虚伪而无耻地建立的，如何令人信服？王朝的开国元勋们不是靠赫赫战功或者杰出能力获取的地位，而是一个个阴谋家、表演家

和投机者。这个王朝的政治风气又能好到什么地方去呢？整个魏晋南北朝，谋杀和弑君、骨肉相残、淫秽与乱伦、背信弃义等行为层出不穷，不能说与王朝建立之初的禅让制度没有关系。

东汉末期，政坛上还残留着些许道德，儒家经典还为人信服，建立在品德和修行基础上的征辟制度还部分起作用。曹魏王朝从曹操奠基开始就很务实，崇尚实务而抛弃虚名，那是应付残酷乱世的需要；曹丕建国前后，没有恢复道德政治，变本加厉地在现实政治的道路上狂奔。他重用了一批现实主义政客，又开创了不公平的九品中正制，还发挥了禅让制度的虚伪和无耻特性。曹丕开了一个坏头，对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恶劣政治风气要承担责任。

二、曹植与“洛神”的相会



曹丕的江山是老爷子曹操费尽心计打下来的，但皇帝的宝座则是他费尽心计、花了老大力气才从弟弟曹植手里夺来的。

曹操的长子曹昂早年战死疆场，他和第二任妻子卞氏生有四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彰只有匹夫之勇，曹熊常年生病，只剩下曹丕和曹植两兄弟争夺继承人之位。

曹操一开始属意小儿子曹植。曹植不仅一表人才，还文采飞扬。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修建的“形象工程”铜雀台落成。他召集了天下文士登台为赋，为形象工程增光添彩。在这场文坛巅峰对决中，曹植提笔一挥而就，最先完成了《登台赋》。全文洋洋洒洒、气势磅礴，不仅曹操看后赞赏不止，在场文人也都输得心服口服。当时曹植只有19岁。曹操本人文学气质就非常突出，曹植因此加分不少。曹操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接班人。

曹植的聪慧是从小出了名的，10岁就能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口成章。但他的缺点就是太聪明了，反而自以为聪明。过于浓厚的文人气质反过来害了他。曹植沉溺在文学的天地中，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头脑未免简单，对人对事缺乏心计。曹丕知道比文才比能力，自己都不是弟弟的对手，所以就想方设法要让曹植在父亲面前留下坏印象。曹操要出征了，兄弟俩去送行。曹植鸿篇大论，在父亲面前指

点江山；曹丕则痛哭流涕，装出舍不得父亲出征冒险的样子。曹操很自然认为曹植才情有余人情不足，觉得曹丕这个孩子忠厚孝顺。

曹丕和曹植各拉了一批人明争暗斗。曹丕经常在家中召集同党商议方法，用大筐子把同党带到家来，避免给别人结党营私的印象。曹植一派知道后，就兴冲冲地告诉了曹操。曹操查起来，却发现曹丕家门口进出的大筐子里装的不是食物就是日用品。曹植又输了一回。

争斗越久，曹植身上的缺点就越扯后腿。一次，曹操已经任命曹植为负责人，率军出征了。这是很重要的荣誉，也是对曹植能力的考验。结果在出征的欢送仪式上，曹操和文武百官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曹植的身影。原来曹植竟然在节骨眼上，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军队出征不了，曹植这个负责人也被废掉了。还有一件事情，曹操是白手起家的枭雄，节俭成性，最见不惯别人，尤其是家人穿戴奢侈。曹植却不以为意，吃穿用度都率性而为。曹植一生娶过两位妻子，第一位妻子崔氏系出名门（她是名士、尚书崔琰的妹妹），穿戴求新求好。一次，崔氏“衣绣违制”（估计是穿了雕龙绣凤的衣服），招摇过市。曹操看到后，勒令儿媳妇崔氏回家自尽。崔氏的死，表明曹操对曹植的不满与日俱增。

最后，曹操对到底把权力地位传给哪个儿子还是下不了决心。到底是给轻浮不懂事的曹植呢，还是给忠厚孝顺的曹丕呢？他问老臣贾诩。贾诩沉思了良久。其实他早就暗中被曹丕收买了，在琢磨怎么让曹操下定决心舍曹植而用曹丕。曹操等不及了，问贾诩怎么迟迟不回答。贾诩这才说：“我在想刘表和袁绍的事情。”刘表和袁绍两人都“废长立幼”，不把权力传给长子而给了小儿子，结果导致身后内讧不止，势力灰飞烟灭。曹操听了，默然不语，才下定决心选曹丕为继承人。

继承人之争，曹丕胜曹植败。政治上的胜负，绝对是零和博弈，胜者全得，输家不仅一无所获，从此之后还要受胜家的欺压凌辱。曹

操活着的时候，曹植是高贵的王子，优游宴乐。等到曹操死了曹丕登基称帝，曹植的噩梦开始了！

曹丕这个人心眼很小，上台后就开始对看不惯的反攻倒算，到处整人。张绣在投降曹操之前曾杀死过曹丕的哥哥曹昂。曹丕这才成为曹操的长子。说起来，曹丕还要感谢张绣为其创造了“上位”的机会。现在曹丕上台了，就把张绣逼死了。于禁战败后曾经投降过关羽。曹丕不觉得很丢脸，就派于禁去给曹操守陵。他事先在陵墓里画上于禁卑躬屈膝向关羽求饶的壁画。于禁一大把年纪了，看到壁画后，羞愧难当，气血上涌，死了。对亲人，曹丕整起来照样心狠手辣。叔叔曹洪是个小气鬼。曹丕登基前向曹洪借钱，遭到了拒绝。现在曹丕就处处和曹洪为难，动不动就训斥罚款。曹洪顶不住了，央求嫂子、曹丕的生母卞太后在曹丕面前求情。曹丕这才放过曹洪。

曹彰是曹丕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在皇位争夺战中支持曹植反对曹丕，曹丕登基后又领兵在外。曹丕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召曹彰回朝，在给他吃的饼里下了毒。曹彰中毒后，没有人过来救治。卞太后发现后，慌忙亲自找水来救儿子，却发现宫中所有的瓦罐都被打碎了，最后她光着脚提桶去井里打水。可惜还是晚了，一代勇将曹彰不治身亡。

对曹植这个之前的头号对手，曹丕整起来简直是六亲不认、心狠手辣。

曹丕先在制度上建立起了一整套严格限制皇室成员，尤其是成年诸侯王的规定。曹魏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宗室成员限制最苛刻的朝代。曹丕借口皇权巩固，大行限制宗室子弟之实。曹植是皇室至亲，却过着如同囚犯的生活。他贵为藩王，却没有行政权力，只能拥有上百名老弱病残组成的卫队。这支卫队常年不变，没有补充，到最后只剩下五六十名老弱残兵。曹植不能和朝廷官员交往，没有得到允许不能和亲戚通信、不能随便来首都朝觐。他能做的就是带着这支可怜的

卫队，在方圆三十里范围内“游猎”。藩王所在地区，曹丕都派了官员（所谓的“监国谒者”）监视藩王的一举一动。这些官员随时可以告状，还可以当面“批评”藩王。曹植就被监国谒者参奏过“醉酒悖慢，胁持使者”的罪名。即便这样，为了防止藩王在某个地方固定下来，朝廷频繁徙封诸王，过几年就换一批封号。比如曹植就担任过多个王位，因为死的时候是陈王而被人习惯地称为“陈王曹植”。

顺便说一下，曹魏苛禁诸侯的政策虽然在表面限制了宗室诸王的势力，巩固了皇帝本人的统治，但从长远影响来看，它严重危害了曹魏的统治。因为皇权绝对排斥了同宗的势力，也就堵住了同宗子弟出力襄助的途径，当皇权面临权臣或其他野心家的觊觎时，皇帝只能孤身作战，得不到宗室力量的帮助。苛禁诸侯的政策来源于曹操父子对东汉末年皇权旁落教训的警惕，它的消极影响日后又被西晋皇室当做历史教训吸收。

在种种限制之下，曹植的生活很窘迫。吃的是封地的土特产，手头老是很拮据，想做的事情不能做，“谨小慎微”成了生活的关键词。

曹植的浑身才能和满腔建功立业的抱负难以伸展。他一再向朝廷，也就是向哥哥曹丕上书，要求授予自己实际职务，哪怕是让自己去前线冲锋陷阵也愿意。奏章递上去后，不是得到让他安心当藩王的回复，就是石沉大海。

石沉大海并非因为曹丕忘记了这个弟弟。他记着曹植，没有放过任何迫害的机会。

曹丕曾和曹植同辇出游，恰好遇到两头牛在墙角撕斗。一头牛打输了，坠井而死。曹丕当即命令曹植给死牛赋诗，要求诗中不许出现“牛”字、“井”字，也不能说相斗的事情，更不能说牛的“死”字，但是必须把整件事情说清楚。还有一个要求是，曹植必须在走马百步之内，写成四十言的长诗。如果走完了一百步写不出来的话，曹植就要

被斩首。结果呢，曹植策马而驰，在马上就揽笔写道：“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幽土头，嵒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全诗没有出现一个“牛”字、“井”字或者“死”字，却把斗牛的场面描写得清清楚楚。写完了，曹植还没有走完一百步。他就又写了一首三十言自慰诗：“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最后一句，很快流传开来，成为千古名句。

不知道是曹丕实在找不到杀戮曹植的理由，还是被“本是同根生”的亲情所感染，最终没有杀戮曹植。所以，曹植继续过着窘迫、郁闷的生活。黄初六年（225年），曹丕踌躇满志地想要征讨东吴，结果到长江边一看到东吴戒备森严、长江江水激流，立刻打了退堂鼓。撤军的途中，曹丕经过了曹植的封地，“御驾亲临”曹植的住所，看到曹植居住的环境实在是太差，生活水准也不高，这才下令增加了曹植五百户封邑。为此，曹植专门上表“谢恩”。

有人说，曹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良心发现，觉得应该对弟弟好点了。因为在第二年（黄初七年），曹丕就驾崩了。曹植比皇帝哥哥多活了6年，在太和六年（232年）死去。

二

黄初三年（222年），鄄城王（封地在今山东濮县）曹植在京师洛阳朝觐完毕，返回封地。过洛河的时候，曹植写了一篇《感鄄赋》。在文中，曹植自述是在朦胧之中遇到了洛河水神“宓妃”，宓妃“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遗憾的是，他俩人神殊途，最后只能擦肩而过。曹植继续踏上返程，宓妃继续在洛河为神。

在序言中，曹植写道：“黄初三年，作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尽管曹植说自己是从洛河水神“宓妃”身上得到灵感写的文章。但是人们还是把她和曹植的嫂子、曹丕的妻子甄宓联系起来，演绎出两人的“情感往事”来。

甄宓的命运和曹植有些相似——难怪人们要把他们俩联系在一起。

她不仅从小和曹植一样文采出众，而且美若天仙、品格高尚。甄宓名声远播，汉末人称“江南有二乔，河北甄氏俏”。河北大军阀袁绍听到甄宓的名声，就聘娶甄宓嫁给自己次子袁熙。后来曹操战胜了袁绍。204年，曹操父子率兵攻下袁绍大本营邺城。城破之时，曹丕一马当先，提剑冲杀进袁府，一眼看到甄宓就中意上了。于是，23岁的甄宓成了18岁的曹丕的妻子。

曹丕和甄宓结婚后，一起生活在邺城，度过了几年恩爱幸福的时光。甄宓将曹丕的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还多次劝曹丕广纳姬妾。曹丕对大度贤良的甄宓越来越喜欢。甄宓和婆婆卞夫人的关系处理得也很好，常常嘘寒问暖。卞夫人高调夸奖甄宓是孝顺媳妇。期间，甄宓为曹丕生下了长子曹叡和长女东乡公主。然而曹家权势越强大，曹丕就越忙，长期不在邺城。曹丕在政治上不断上升，甄宓在曹丕心中的地位却在下降。

曹丕个性非常进取，不懂得留恋。甄宓又听任丈夫纳妾，导致曹丕身边美女如云。当皇帝后，曹丕身边的女子就更多了。汉献帝退位后被降封为山阳公，还把自己两个女儿献给曹丕。甄宓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就是没有搬到首都洛阳去和曹丕在一起，而是坚持住在河北邺城。甄宓和曹丕分离的时间越长，留在丈夫心中的魅力就越淡。夫妻感情开始疏远。她渐渐失宠就在情理之中了。保不准美女当中还有嫉妒甄宓的正妻地位，挑拨离间，中伤甄宓的。甄宓连分辩的机会都没

有。

甄宓失宠的明显证明就是曹丕称帝后迟迟不立正妻甄宓为皇后。甄宓仅被封为“夫人”。甄宓心里开始不舒服，又从不舒服转变为埋怨。她深感自己处境恶劣，又埋怨丈夫无情，写下了《塘上行》寄给曹丕。在文中，甄宓自述身陷“边地多悲风，树木何蓊蓊”的恶劣环境中，过着“独愁常苦悲”、“夜夜不能寐”的悲惨生活。甄宓直指自己遭到了曹丕身边女人的中伤陷害，和丈夫生生别离。苦闷哀愁的日子，甄宓过不下去了，无可奈何之余寄情丝于笔墨，希望能够唤起曹丕对夫妻间的美好时刻的回忆，从而改善自己的境遇。谁能想到，曹丕读完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想法。他没有读到爱，没有读到旧情，读到的是愁苦，是哀怨。这些愁苦和哀怨的矛头都对准曹丕。曹丕原本就对甄宓不满，如今爆发了出来。他勃然大怒，失去理智，派使者前往邺城逼甄宓服下毒酒自杀。甄宓冤死后，被人披散头发遮住脸庞，口中还被塞满米糠下葬。这是黄初二年（221年），也就是曹丕登基当皇帝第二年的事情。

现在，曹植写了《感甄赋》，“甄”和“甄”两字相通，“宓妃”又很容易令人想到甄宓。再看文章内容，曹植和洛神的遭遇多像现实中曹植和甄宓的境遇：美丽的人儿不能率性而为，只能被迫接受外界设置的人生轨道。后人难免浮想联翩，在曹植和甄宓之间搭建种种感情线索，试图证明他俩之间有感情瓜葛。南朝的顾恺之充分发挥想象力，从文章出发创作了千古名画《洛神赋图》。画中，曹植恍然若失地看着在河上凌波微步的洛神。两人郎才女貌，近在咫尺却不能牵手，只能以目传情。甄宓因为曹植的《感甄赋》而被后人普遍视为“洛神”。

传言越来越多，编织出了曹植和甄宓的感情经历。很多人相信曹植也在204年攻陷邺城的战役中，看到了甄宓。曹植和甄宓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无奈哥哥曹丕抢在了前面提亲，甄宓成了曹植的嫂子。可是两人情丝未断，引起了曹丕的不满。感情矛盾加上政治斗争，曹丕和曹植就成了死对头。这也可以解释曹丕为什么丝毫不念夫

妻之情，登基第二年就赐死甄宓；丝毫不念手足之情，对曹植百般刁难。

然而，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曹植和甄宓的这段“绯闻”，会发现里面有许多“不可能”之处。首先，曹植和甄宓年纪相差十岁。曹丕迎娶甄宓的时候，甄宓23岁，曹植才13岁。一个13岁的小孩子怎么就早熟开始恋爱经历了呢？而一个23岁的女子怎么就对13岁的小孩子产生爱慕之心了呢？其次，这段感情涉及乱伦。弟弟和嫂子偷情是中国人非常忌讳的家丑，更何况是在帝王之家。就算甄宓和曹植两人能抛弃世俗观念和内心的约束，曹家也不会让这段感情持续下去，肯定会早早掐断它。最后，所有认为曹植和甄宓有感情瓜葛的说法都没有证据。也许《感甄赋》就算是最有力的证据了。但是一篇文章是不能说服人的，更何况人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曹植纯粹是在描写自己的幻想或者梦境中的某次神遇。所谓的“感甄”可能就是感叹自己这个鄴城王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无奈。

三

在甄宓死了五年之后，她的儿子曹睿登基称帝，成了魏明帝。

曹睿本来是没有希望登基的。因为曹丕并不太喜欢这个长子。况且赐死过曹睿的生母甄宓，曹丕不愿意立曹睿为太子，想立其他姬妾所生的儿子。无奈，皇后郭氏没有生育，其他女子生的儿子不是夭折、体弱多病，就是年纪太小，曹睿始终是唯一的继承人选择。曹丕就拖着不立太子，对大臣们早立太子的建议充耳不闻。一直拖到黄初七年（226年）五月，曹丕的身体垮了，即将死去。临终前，曹丕才在病榻上仓促册立曹睿为太子。

曹睿登基后，在对待生母甄宓的问题上立即开始“拨乱反正”。首先是即位不久，甄宓就被追封为“文昭皇后”，并立寝庙祭祀。其次

是“帝思念舅氏不已”，对甄家子弟大加封赏。甄宓的几个哥哥除了早死的，都封侯拜将了。

在处理曹植问题上，曹睿对这个三叔的文才非常赞赏，甚至称得上崇拜。但同时他又觉得父亲曹丕严格限制诸侯王的政策很对，很合自己的胃口，所以继续执行。结果，侄子兼崇拜者曹睿的上台并没有改善曹植的生存环境。曹植依然生活在频繁迁徙、窘迫和受监视的环境中。曹植曾经乐观地认为侄子上台后，可能会让自己承担部分实职，结果大失所望。曹睿对曹植的防范丝毫不比父亲时期宽松。太和六年（232年），曹植逝世。曹魏王朝给他的谥号是“思”，曹植因此被称为“陈思王”。

曹植在晚年，认识到了王朝苛禁诸侯政策的弊端，向曹睿递交了《陈审举表》。明确指出曹魏王朝潜伏着危机：“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患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朝廷某些大臣权势的上升必然威胁皇权（可能是曹植有感于司马懿势力的扩大和刘放、孙资等人专断中枢）。遗憾的是，曹睿对曹植的警醒并未在意。曹睿对叔叔的《感鄴赋》文章很喜欢，不过他也听到了外面不好的“桃色”传闻，觉得这篇文章对自己的生母名誉不利。文章的题目就起得不好，《感鄴赋》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怀念甄妃”，因此曹睿上台不久就以避母讳的名字，下令将《感鄴赋》改为《洛神赋》。

如今，我们看到《洛神赋》总是会联想到甄宓，想到她和小叔子曹植两人的不幸命运。

三、司马懿：一个权臣的崛起



魏武帝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看重一个人的能力和成绩，而不是东汉流行的品德、门第和声望。他多次求才若渴，发布任人唯贤的命令，广招天下名士。所以在曹魏王朝建立过程中聚集了许多真才贤士，曹操基本上都能做到人尽其用。但对一个人，曹操一直看不准，不敢放开了使用。这个人就是司马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焦作市温县）人，出身世家门第，是东汉末年的京兆尹司马防的次子。

曹操和司马防有过交往，知道司马懿是个不错的小后生；后来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在曹操属下为官，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清廉自率，给曹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司马懿比哥哥更出色。东汉末年最知名的评论家崔琰就曾当面对司马朗说：“君弟聪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史书也夸奖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这样的人才，曹操当然要去招揽了。建安六年（201年），他以司空的名义，派人请司马懿到府中任职。

司马懿不愿意去给曹操当幕僚。当时天下大乱，鹿死谁手尚不可知，司马懿还很年轻（才22岁），不想早早地和曹操绑定在一起。他还要待价而沽，决定婉拒。于是当曹操派的人到家后，司马懿假装风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来人回去汇报，精明的曹操不信，派人在夜里偷偷去侦察。不想，司马懿料到了曹操的这一手，还躺在床上装风

瘫呢！曹操这才相信了，放过了司马懿。

可见，司马懿和曹操都是精明狡猾之人。司马懿年纪虽轻，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没有救国济民、匡扶天下的政治道德印记，完全是赤裸裸的个人得失的考虑。

建安十三年（208年），当了丞相的曹操再次征聘司马懿为下属。他已经知道上次被司马懿骗了，所以对使者说：“如果司马懿耍花招不来，就绑他过来。”这一回，司马懿乖乖地来了。一方面是害怕曹操来硬的，更主要的是时局已经很明朗，曹操胜利在望。司马懿觉得曹魏势力是不错的投靠对象。

司马懿加入曹魏势力时间不长，年纪又轻，加上曹操内心总有一丝不快，司马懿在曹魏最初的十年并不如意。司马懿历任黄门侍郎、议郎等专为年轻人准备的小官，没有具体工作，主要就是和曹操的儿子曹丕往来游处。不过司马懿有个优点，那就是选定了什么事情就好好干，既然投入了曹魏阵营就勤勤恳恳工作，为人小心谨慎。慢慢地，曹操把他提拔为丞相属官，留在身边出谋划策。史书上记载了司马懿给曹操出的三次主意。第一次是曹操占领了西北和汉中地区后，司马懿建议曹操乘胜进攻四川，消灭刚刚占领四川的刘备。曹操没有采纳，委婉地批评司马懿的建议不切实际，是“得陇望蜀”（此成语典出于此）。第二次是孙权上表怂恿曹操自立为帝，司马懿在一旁附和。结果曹操是断然拒绝。前两次建议曹操没采纳，司马懿的第三次建议则被曹操采纳了。关羽北伐大败曹军，威胁到当时的都城许昌。曹操为避关羽锋芒，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蒋济两人及时劝阻。他认为关羽的后方不稳，孙权和刘备两派外亲内疏，迟早会内讧，所以曹魏一方只要守住前线就能拖死关羽。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司马懿所言。

也许是司马懿这个后辈太过现实，虽然司马懿能力不错，但曹操始终不喜欢他。（也有说法是曹操打击世家豪族，恰好司马懿是中原

著名世家子弟，曹操不肯用他。）据说，司马懿的长相很怪，具有“狼顾”的本领，也就是能把脑袋转90度角，用眼睛的余光看到背后的东西。在相术上，这是一个人野心勃勃的表现。曹操相信相术，所以终生没有提拔重用司马懿。一天晚上，晚年曹操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三匹马在一个槽里吃草。“三马食槽”的梦境让曹操很自然地 and 司马懿的“狼顾”本领联系在了一起，担心司马懿日后对曹家王朝不利。曹操不仅只是让司马懿担任一些清闲的虚职，还告诫儿子曹丕要提防着司马懿。

但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和司马懿却很合得来。尽管有父亲的多次提醒，曹丕还是将司马懿作为亲信属官，交往甚密。曹操一死，司马懿的机会就来了。曹丕非常放心地让司马懿参与操办丧事。司马懿把曹操的丧事办得井井有条，内外肃然。不知道曹操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二

曹丕提拔司马懿担任丞相长史。在这个相当于曹丕秘书长的职位上，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建立魏朝出了大力。登基后，曹丕知恩图报，司马懿在曹魏王朝中的地位扶摇直上，短短五年间先是担任尚书、封侯，不久升为御史中丞，再升侍中、尚书右仆射，最后当到了抚军大将军、假节、加给事中、录尚书事，负责曹丕的政务中枢。曹丕两次伐吴，都留司马懿镇守许昌。

黄初七年（226年）五月，曹丕驾崩，享年四十岁。司马懿和曹真、陈群、曹休同受托孤的顾命。这四人的名次是：曹真第一，陈群第二，曹休第三，司马懿第四。前三人的资历和声望都比司马懿高。虽然排名最末，但司马懿能在七年内从一个闲职升到与曹氏皇族并列曹魏王朝的权力核心，可谓是个奇迹。这主要靠魏文帝曹丕对司马懿的格外赏识和恩宠。

曹丕死后，司马懿的大红大紫的日子暂停了好长一段时间。魏明帝曹睿即位后，曹真因为主持对蜀作战，升迁为大司马，获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达到了臣子能够达到的最高权位。而司马懿的境遇就要“坎坷”一点了。

《三国演义》说曹睿即位初期中了蜀汉诸葛亮的反间计，一度罢了司马懿。司马懿只好带着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在宛（今河南南阳）闲住。正史则记载太和元年（227年）六月，魏明帝曹睿命司马懿驻扎在宛，都督荆、豫二州的军事，虽然比演义的说法要好很多，但司马懿还是变相离开了权力中心。说到底，还是司马懿的权力缺乏扎实的基础。全靠君主恩宠得来的权力是脆弱的，一旦君主易位，原先的权势便可能烟消云散。实实在在的政绩或者私人派系才是最强大的权力来源。

新皇帝曹睿显然不像父皇那样器重司马懿，而是很厚道地让司马懿到外地领兵去了。

司马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干一行爱一行”，把现实的思想 and 超人的才智用在了干好工作上。当太子宾客的时候，司马懿努力和太子曹睿搞好关系；如今镇守宛地，司马懿就努力维持地方稳定。很快，立功的机会来了。

宛的西边上庸地区，就是现在的湖北西北部一带，是由从蜀汉投降过来的孟达镇守。孟达和司马懿一样在曹丕时代飞黄腾达，也同在曹睿登基后靠边站了。他就暗中与诸葛亮联络，准备倒戈重返蜀汉阵营。准备倒戈时，诸葛亮提醒孟达注意司马懿，加紧防范。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认为司马懿知道消息后要先向洛阳的曹睿汇报，然后再前来讨伐，前后反复，需要大约一个月时间，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整军备战。结果，八天后，司马懿就兵临城下讨伐孟达来了。原来，司马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亲自率军日夜兼程前来讨伐，大大缩短了时间。孟达惊恐地写信向诸葛亮求援，惊叹：“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

下，何其神速也！”最终，司马懿抵挡住了蜀汉和东吴两方面的援军，成功攻破上庸地区，“斩孟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

这一笔大功，让司马懿有了追逐权势的底子。在看到司马懿的真才实学后，曹睿更多地将军事寄托在司马懿身上。诸葛亮不断北伐，严重威胁陇西和关中地区，是曹魏王朝的心腹大患。太和三年（227年），诸葛亮出兵攻占武都、阴平二郡。第二年，曹魏王朝决心对蜀汉还以颜色，以大司马曹真为主帅，升司马懿任大将军、加大都督，为副帅兴师伐蜀。太和五年（229年），诸葛亮又率兵攻魏。魏明帝曹睿正式授予司马懿全权：“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派他驻军长安，总督西部各军与蜀军作战。至此，司马懿成为负责对蜀汉作战的主将。

客观地说，司马懿和诸葛亮作战的“成绩”并不怎么好看。他主要是依靠曹魏以逸待劳、兵多粮广的优势，和诸葛亮打持久战，最后总是逼着底子薄的诸葛亮粮尽退兵，算得上圆满完成了朝廷交代的任务。

谁负责解决一个王朝最紧迫的矛盾，谁就可以借此聚拢势力。在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战争是王朝的迫切矛盾。司马懿因为长期负责对蜀汉的战斗，而曹魏一半以上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西部战线，因此司马懿家族很容易笼络了效忠自己的武装，开始了窃取曹魏王朝实权的进程。

这也是司马懿能够超越曹魏王朝的其他谋臣文人，成为窃国大盗的根本原因。曹操父子有许多谋臣，比如荀彧、郭嘉、贾诩、陈群、蒋济等，都没有长期掌握某一方面的武装，虽然他们的官爵和司马懿不相上下，可真实权力都不能和司马懿相比。最后篡国的是司马家族，而不是其他大臣家族。

青龙二年（234年）年初，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10万攻魏。曹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在渭水筑垒阻击。这一仗打了大半年都不见分晓，主要原因是司马懿天天高挂免战牌，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均坚壁不出。

司马懿部下将领忍受不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对蜀汉的日日叫骂挑战更是义愤填膺，多次集体要求出战。起初司马懿或严词驳回，或好言相劝，就是不准出战。军营里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战斗热情越来越高，司马懿渐渐有点受不了了。诸葛亮又来火上浇油，派人给司马懿送来“巾帼妇人之饰”，羞辱司马懿不是个男人，激他出战。司马懿似乎被激怒了，气愤地向曹睿上表请战。蜀汉将士听说了，都很兴奋，觉得司马懿这回总要出来了。诸葛亮则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这只是司马懿想搬出皇帝来制止将军出战的伎俩而已。果然，曹睿不同意司马懿出战，还派了以耿直著称的老臣辛毗杖节来到军前当监军，节制司马懿。辛毗来了以后，司马懿的火气顿时大了许多，面对诸葛亮的挑战，常常和部将们站在一起主张出击。好几次，司马懿都带兵冲出了营帐，只怪辛毗杖节立在营门，以身阻挡司马懿出兵。曹魏军中的不满情绪日渐浓重，不过司马懿始终没有出战，还取得了重大战果：蜀汉相持不下去，主动退兵了；而迫切寻求决战的诸葛亮则死在了军中。

诸葛亮死后，魏蜀边界安静了下来。司马懿因为抗蜀大功于青龙三年（235年）升任太尉。

此时的司马懿已然是朝廷的第一功臣兼能臣，名声很大。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家族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政权虚与委蛇，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公孙渊在曹睿时代公然独立，与东吴势力相呼应。司马懿顺便带得胜之师讨伐公孙渊。决战前，孙权给公孙渊写信：“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孙权忧虑的一点没错，公孙渊哪是司马懿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

就全军覆没，政权灭亡了。

就在司马懿聚敛越来越大的权势之时，曹睿对司马懿产生了怀疑，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虽然提问的前提是司马懿“忠正”，但既然认为他“忠正”，为什么还要怀疑他是不是“社稷之臣”呢？陈矫的回答非常干脆：“司马公在朝廷众望所归，对社稷是否有利，臣就不知道了。”正是在这种怀疑思想下，曹睿景初二年（238年）病危的时候，最初确定的顾命大臣群体是以叔叔、燕王曹宇为首，包括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里面几乎清一色的曹氏宗亲，而将司马懿排除在外。其中曹宇与曹睿虽然是叔侄，但因为年龄相仿，是从小就一起玩大的。可是曹宇只当了四天大将军，就坚决要求辞职，曹睿的意思也发生了改变，同意曹宇辞职，亲手否决了最初的顾命大臣集团。其中的关键在于刘放、孙资乘曹睿病危之时，屡屡篡改诏令，迫使燕王等人无所适从。而司马懿紧急入京抢位置。曹睿最终让太尉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少主、年仅八岁的曹芳。

曹芳即位，司马懿加封侍中、录尚书事，总督中外诸军，和曹爽共执朝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算是司马懿的晚辈，加上的确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凡事尊重司马懿的意见，遇到政策难题、边界战争等棘手的事情都推司马懿出面主持。司马懿把这些事情处理得都很好，尤其是把来犯的东吴大军打得屁滚尿流，权势进一步巩固。司马家族陆续有子弟十一人封侯，司马懿本人食邑万户，部属门生遍布朝野。

这时候，作为皇室的曹爽兄弟看到了危险：内外倾心、掌握实权的司马懿已经威胁到了曹魏的皇权！（这一点曹植老早就意识到了。）于是就出现了曹爽势力对司马懿发动突然袭击，夺其实权，排挤司马氏的势力。从正始八年（247年）开始，曹爽兄弟“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司马懿进入了政治冰河期。表面上，司马懿装出行将就木的样子，暗地里联络势力蓄养死士，伺机反扑。曹氏宗室因为长期被闲置，短期内难以聚拢强大的势力。正始十年

（249年），司马懿终于抓住曹爽兄弟麻痹大意的机会，发动了“高平陵政变”。

高平陵政变是曹魏政治的分水岭，之前曹魏政权掌握在曹魏皇室手中，之后司马家族开始了谋权篡位的进程。

司马懿的崛起，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他真的很能干，能力很强，连中国人公认的聪明绝顶的诸葛亮都没打败他；他的忍耐力很强，遇到挫折和困难能够坚韧耐心地克服，迎来柳暗花明，这从他政坛的三个低谷期中能够看出来；司马懿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人物，铁腕执政，甚至有点残忍。在战场上屠城，将政敌诛灭满门，司马懿都干过。司马懿一路走来，绝不像上面介绍的那样曲折雪白，而是踏着成千上万人的鲜血过来的。比如在如何处理曹爽集团问题上，司马懿认为“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颺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坚持将所有在押人等族诛。结果，曹爽兄弟，党羽何晏、邓颺、丁谧、李胜、桓范、张当等人都被夷灭三族。在讨平辽东时，司马懿竟然大开杀戒，将尸体堆积成山号为京观。总之，司马懿是个挺冷酷凶残的人，西晋王朝胚胎孕育时期便充满血腥。

司马懿崛起的外部原因，除了对蜀汉的战争便于他获取牢固的权势根基外（有人怀疑司马懿举全国之力，没有把兵少将寡的诸葛亮打败，是在“养寇自肥”），曹魏王朝对宗室的限制也为司马懿篡权打开方便之门。曹丕心眼小，对宗室不太放心，对宗室防范太过，就更不用说让他们掌握实权了。这就让原本可以成为皇室屏障，关键时刻捍卫皇室的宗室全体毫无力量。司马懿掌权后，进一步将宗室都集中在洛阳，暗中软禁。司马家族的篡位之心暴露后，忠于曹魏的外姓军队只是在扬州等地发起了零星的反抗，很快就被司马懿父子扑灭了。司马懿还借机向涉及的宗室亲王大开杀戮，后者却毫无还手之力。

篡国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没有得力的儿子，老子的篡国成果可能半途而废。司马懿幸运地有两个好儿子：长子司马师和次子司马昭。哥俩继承了父亲的精干坚韧和残忍，继续推动曹魏向西晋转化。西晋建立后，司马懿被孙子司马炎追尊为晋宣帝。

四、王朝命运在高平陵改变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睿去世。年幼的侄子齐王曹芳即位。

经过一番权力暗箱操作，司马懿和曹爽两人共受遗诏成为辅政大臣。曹睿的意图是希望在身后形成功臣和皇族共治的局面。司马懿是三朝老臣，功勋卓著，是功臣集团的代表；曹爽出身曹氏宗族，血统高贵，是皇族势力的代表。

曹爽是个“权二代”，崛起全靠他的父亲曹真。曹真是曹操同族子弟。曹真的父亲曹邵是最早随曹操起兵的元老之一，不幸早年阵亡。曹操收养了曹真，和曹丕等人一起教育培养。曹真长大后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开始显贵。曹丕死时，设计了曹真、陈群、司马懿“三驾马车”同受遗诏辅政的权力割据，其中曹真任大将军，为首辅。曹睿在位时，曹真因为主持对蜀作战，再升迁为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达到了臣子能够达到的最高权位。曹真这个人，能力其实一般，除了苗正根红这个优势外，终生小心谨慎，恪守臣子之道，对曹氏祖孙三代忠心耿耿。

曹真死后，长子曹爽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另外五个儿子羲、训、则、彦、皓皆封为列侯。曹爽可以看做父亲曹真的翻版，年少时以“宗室”、“谨重”这两个特点为人所知。曹睿从小和同辈、同龄的曹爽走得很近，关系亲密。曹睿即位后当然要依靠曹爽这样的同族兄弟兼发小

了。曹爽顿时平步青云，宠待有加。平坦的履历虽然让曹爽积累了一定的行政经验，但显然不能参透政治的实质，领悟政治的技巧。

和司马懿相比，曹爽非常清楚，无论资历、功劳、能力还是在朝臣中的威望和根基，自己都不能与同朝辅政的司马懿相提并论。当年，司马懿和曹真一起领兵作战的时候，曹爽还在玩捉迷藏呢。曹爽敬重司马懿年德并高，用对待父亲的礼节礼遇司马懿。虽然自己爵位在司马懿之上，但是曹爽凡事不敢专断，都和司马懿细心商量。司马懿对曹爽这个晚辈也比较满意。两位辅政大臣一开始还相安无事。

然而曹爽毕竟是在蜜罐里长大的贵族公子哥，还没有学会珍惜，不懂真正的谦虚谨慎。没过多久，曹爽贵族公子的性情就显露出来了。他不像刚主政时那般勤勉政事了，身边也逐渐聚集了何晏、丁谧等贵族子弟。这些人虽然能力不济，但从小就在争权夺势的大环境中耳濡目染，劝说曹爽不要将权力与他人分享，要独断专行。其中何晏就多次劝说曹爽：“司马懿有政治野心，而且很得民心，我们怎么可以对这样的人推诚委权呢？”说一两次，曹爽没有反应；说的人多了，说的次数多了，曹爽心里的“小九九”就活动了。他也想专权，也有皇族的尊贵心。最终，曹爽决定首先对司马懿发动进攻。

曹爽让二弟曹羲替自己上表，请皇帝转任司马懿为太傅。太傅虽然地位崇高，但并不直接指挥部队，也没有直接负责的领域，完全是虚职一个。曹爽这一招“明升暗降”，让根本没有防备的司马懿措手不及，只好接受“升迁”，乖乖交出兵权和政权。辅政大臣依然是两个，曹爽依然对司马懿保持着礼貌。但所有的政务都不经过司马懿了。司马懿干脆长期称病，不上朝了。

大获全胜的曹爽立即开始人事大调整。他让二弟曹羲任中领军，三弟曹训为武卫将军，控制了京城洛阳的军队，负责皇宫的警卫；五弟曹彦任散骑常侍，另两个弟弟曹则和曹皓以列侯身份出入宫禁，控制曹芳。同时，曹爽还将因“浮华交会”而在曹睿时期遭贬抑的何晏、

邓颺、丁谧、毕轨等纨绔子弟重新启用，各任要职，作为心腹。

我们一起来看看曹爽所用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何晏是曹爽集团的重要人物。他本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他的母亲尹氏，已经嫁入何家，生下何晏了，还被曹操抢走，做了曹家的夫人。有人怀疑何晏是曹操的私生子。何晏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娶了公主，和曹家的关系既密切又尴尬。平日里，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还公开好色，是扭捏作态的奶油小生和派头十足的公子哥儿的混合体。当然，何晏也有好的一面：对老庄学说很有研究，是盛行于魏晋的“玄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大凡有点小成就的公子哥都好卖弄，何晏就尤其缺乏自知之明，到处炫耀自己的才学。曹丕特别憎恶他，每次都不呼何晏的姓名，而叫他“假子”，毫不留情地揭何晏的老底。就这么一个人，曹爽将朝野的选举大权交给了他。

集团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邓颺，字玄茂，很小就因为与李胜等人浮华虚夸闻名于京师。邓颺这个人还贪财好货，在宫中担任职务的时候暗中许诺授予臧艾显要官职。臧艾就将父亲的小妾送给了邓颺当作礼物。京师里流传段子说：“以官易妇邓玄茂。”邓颺几乎都是这么来推荐提拔官员的。

何晏等人专政后，共同私自分割洛阳、野王典农屯田系统的桑田数百顷，还将汤沐地等吞为私人产业。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私分国有资产”。他们不仅窃取官物，还公开向地方州郡索取贿赂。相关部门慑于他们的权威，不敢抗拒。何晏等人与廷尉卢毓素来不和。卢毓的属下官吏有小过，被何晏等人抓住把柄，穷究卢毓的责任。何晏在做出结论之前，迫不及待地派人收取了卢毓的印绶，然后再向朝廷奏闻。对位列九卿的人何晏都敢猖狂如此，他们作威作福的程度可想而知。

曹爽个人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还私取曹睿生前的才人七八人和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

十三人到自己家伎乐。后来曹爽的胆子越来越大，伪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到邺台，让曹睿的婕妤教习为伎；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供私家使用。这些都是侵犯皇室、大逆不道的罪行，曹爽都肆无忌惮地做了。他还建造窟室，在四周陈列绮疏，多次和何晏等人在其中饮酒作乐。曹羲非常担心哥哥的行为，多次劝谏曹爽要收敛言行，约束心腹。他多次劝到伏地哭泣不起的地步，曹爽就是不听。

曹爽执政几年间最主要的举动是发起伐蜀之役，想借机建立军功。久经战阵的司马懿知道军事并非曹爽所长，且伐蜀时机亦不成熟，劝曹爽不要贸然轻起战事。立功心切的曹爽被美妙的政治前景迷惑了，执意在正始五年（244年）亲赴长安，征发六七万军队进击蜀国。结果因为后勤供应不上，劳民伤财，民怨沸腾，结果无功而返。

司马懿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暗中筹划。他虽然被剥夺了实权，但影响力依然存在。门生故旧中好多人掌握着军队和政权，心向司马家。司马懿打败的政治对手多了去了，这一次他也自信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司马懿所缺的就是一个合适的进攻时机。

二

曹爽比一般的纨绔子弟还是要强很多。他对司马懿并非没有防范。

荆州人李胜依附曹爽后才平步青云。一次，李胜由河南尹任上调任荆州刺史。虽然级别没变，但荆州地处对吴国斗争的最前线，军事政治地位重要，李胜也算是升了半级。曹爽对终日称病在家的司马懿不放心，就让李胜去探探司马懿的底细。司马懿曾经镇守荆州，李胜就以新官赴任、向前辈请教的名义去司马懿家辞行。

李胜没料到司马懿几年不见，憔悴异常，都离不开下人的搀扶了。李胜很谦虚地向司马懿陈述了自己功劳浅薄，横蒙特恩，回到本

州担任主官，特地来向司马太傅拜辞，请太傅多多指教。司马懿根本就没回答，而是慢腾腾地让两个婢女侍候穿衣。他颤巍巍地拿起衣服，没拿住，衣服滑落；他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表示口渴要喝水。婢女进了一碗稀粥，司马懿持杯饮粥。结果像不会喝水吃饭的婴儿一样，司马懿把粥流得到处都是，沾满前胸。

李胜不禁神情黯然，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他对司马懿说：“今主上尚幼，天下还要仰仗太傅。大家都在传说太傅旧病复发，想不到您的身体差到了这样的程度！”司马懿好久才缓过劲来，气息相属，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年老多疾，死在旦夕。使君这次去并州就职，并州和匈奴邻近，你要好自为之。今日与你相见，恐怕日后不复相见了，令人伤感啊！”李胜连忙说：“太傅，我这次是回本州任官，并非并州。”司马懿满脸茫然地问：“噢，原来你刚从并州回来啊，辛苦了！”李胜见司马懿胡言乱语，只好提高声音说：“我去荆州，非并州也。”他回头问在场的司马懿长子司马师：“太傅病得这样了啊？”司马师痛苦地点点头。

司马懿在司马师和下人的反复说明下，才恍然醒悟，对李胜说：“我老了，神情恍惚，不解君言。如今你荣归故乡担任刺史，多建立功勋。今日与君一别，我自顾气力转微，要与你永别了。”说着，司马懿怅然泪下，司马师忙上去帮父亲擦去眼泪。司马懿顿了顿，指指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对李胜说：“这是我的两个儿子，希望与君结为好友，希望你日后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多照顾。”说完，司马懿又流涕哽咽。李胜也欷歔长叹，回答说：“我一定从命。”最后，李胜以参加追悼会的肃穆神态，与司马懿父子动情告别。

李胜辞出后马上跑到曹爽府上，报告说：“司马太傅语言错乱，口不离药，南北不分。最后，他还将两个儿子托付给我，分别时依依不舍。”说完，李胜感叹道：“司马懿的病看来是好不了了。”曹爽也感叹了一番，但心里非常高兴。司马懿一死，再也没有人会对自己构成权力威胁了。曹爽集团再也不把司马懿放在眼里。

正始十年（249）正月初六，魏帝曹芳按照惯例到高平陵（今河南洛阳东南）祭扫魏明帝曹睿的陵墓。曹爽和弟弟曹羲、曹训、曹彦都随驾前往。整个集团几乎是倾巢而出。

曹爽党羽、大司农桓范劝阻说：“大将军兄弟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全部外出。如果有人关闭城门发动政变，怎么办？”曹爽很不高兴地说：“谁敢造反！”他执意率兄弟亲信出发前往高平陵。桓范选择独自留在洛阳。

在曹爽集团倾巢而出的前一天夜里，司马懿的小儿子司马昭彻夜难眠。这天夜里，父亲郑重告诉他第二天将会有决定司马家命运的大事件发生，要他抓紧时间休息。司马昭不知是兴奋或是激动或是紧张，在床上辗转反侧。而哥哥司马师，早已参与了父亲的谋划，一上床就鼾声如雷。

曹爽等人一出城门，“久病”的司马懿就披挂上阵，带领两个儿子跨马冲出了家门。司马师在暗中早已准备了3000死士，这时纷纷发难。城中许多官员都是司马懿的旧同事、旧部下，见状多数加入司马家的队伍，少数采取观望态度，对动乱无动于衷。司马父子关闭了洛阳城的各个城门，之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又带人占据了武器仓库及皇宫。控制了洛阳城后，司马懿命令高柔假节、代理大将军一职，以王观代理中领军，分别夺取了曹爽和曹羲的军权。曹氏兄弟还在洛阳城中留有許多中下级军官和数量可观的军队。但军营群龙无首，接替的又是朝廷三公九卿，这些官兵没有反抗，很轻易地转化成了司马懿家族的军事力量。

一切准备就绪后，司马懿带领朝廷重臣入宫，向皇太后郭氏上奏曹爽祸乱宫廷内外的种种劣迹，事事有据可查，桩桩可以置曹爽于死地。这些都是曹爽平日不注意的后果。郭太后无话可说，追认了司马

懿之前叛乱行动的合法性，并授权司马懿成立一个“专案组”，查处曹爽集团的不臣不法行为。有了郭太后的批准，司马懿向远在城外的曹芳上表，将曹爽的罪行一一列举，并亲自带兵占据了洛水桥头，迎接曹爽可能的反抗。

高平陵的曹爽被司马懿的突袭打懵了。接到司马懿给皇帝曹芳的上奏后，曹爽手足无措。司马懿还未全部控制洛阳时，曹爽府上的司马鲁芝和辛敞就突围而出去向曹爽报信。曹爽完全可以及时应对，但他就地踌躇，和手下反复商量，最后“憋”出来两个应对措施。第一是在高平陵地区草草扎营；第二是调拨了周边几千屯田兵增加自己的守卫。小家子气的曹爽没有想如何去积极应对司马懿的进攻，而首先考虑自己的守卫问题。他那几千兵马和一小群显贵停留在高平陵，不是坐等覆灭，是什么？

司马懿也料到曹爽兄弟几个人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对策。他最担心的就是还留在洛阳城里的曹爽党羽桓范。司马懿封锁洛阳后就立刻以郭太后的名义征召桓范，要任命他为中领军，拉入自己的阵营。桓范也想过投入司马懿阵营，司马懿以权力高官来引诱，桓范怎么能不动心呢？但儿子劝他说，皇帝车驾还在外面，曹爽集团还有极大的力量，胜负难料。儿子劝桓范不如出城去和曹爽等人会合，争取做个平乱的功臣。桓范觉得儿子的建议替自己规划了一条更好的道路，下定决心突出城去。

桓范单人匹马冲到洛阳的平昌城门，城门已闭。守卫的门候司蕃是桓范以前的属下。桓范把他叫出来，举起手中的令牌一晃，矫旨说：“皇上有诏召我去高平陵，你快开城门！”司蕃半信半疑，就向桓范求见诏书。桓范严厉训斥他说：“你难道不是我的故吏吗，现在何敢如此放肆？皇上的诏书，也是你这样的人能看的吗？”司蕃被老上司的气势给压倒了，让人打开了城门。桓范策马迅速出城，回过头来对司蕃说：“太傅造反了，你快跟从我去勤王吧！”司蕃顿时傻眼了。

司马懿得知桓范出城后，认为：“桓范虽然善于出谋划策，曹爽却肯定不会采用桓范的计策。”旁边的太尉蒋济也认为：“桓范是很聪明，无奈驽马恋栈豆，曹爽不能用好桓范。”司马懿为了稳住曹爽，先派弟弟司马孚前往高平陵，以皇帝曹芳在外不可露宿为由，送帐幔、太官餐具等给曹芳使用，又接二连三地派曹爽平时的好友去做说客，告诉曹爽说自己只是为了夺权，并无意相害。高平陵那一边，司马懿的使者陆续到达。他们将司马懿的话原般告诉了曹爽，安抚他，还带来了太尉蒋济的书信。信中又重复了承诺，说司马懿只想夺取曹爽集团的权力，并不加害性命。劝说的人多了，曹爽逐渐相信了这些承诺。

这时候，桓范来到了高平陵。桓范看曹爽情绪动摇，建议说：“临难反扑是人之常情。大将军可以调动天下兵马，洛阳周边就有不少部队；高平陵距离许昌不过一天的路程，许昌的武库足可以支持大军的用度；我身为大司农，又带来了印绶，足可以筹集大军的粮草。大将军应马上拥戴皇上南下许昌，宣布讨伐叛逆司马懿！”

桓范“南下许昌，讨伐叛逆”的建议，汇聚了曹爽手中的所有优势：第一，曹爽还掌握着小皇帝曹芳。这就让曹爽占据了政治权威的最高点，也是司马懿不敢对高平陵发动进攻的主要原因。第二，曹爽等人印信都带在身边，权力依然在手，完全有调集军队和司马懿一战的能力。其中曹爽、曹羲兄弟两人有权调动天下兵马讨伐司马懿；桓范作为大司农，可以合法调拨军事物资。第三，高平陵离重镇许昌不远。许昌从东汉末年曹操迎立汉献帝于此后，经过数十年的政治、经济耕耘，已经成为了中原的大据点，粮草充足、城池雄厚、地位崇高。曹爽占领许昌，进可以凭借许昌讨伐洛阳；退可以做长期割据与司马懿争雄的打算。南下许昌，就可以汇聚曹爽的所有优势，只此一招就能瞬间改变局势。

曹爽对桓范的建议犹豫不决。曹羲也沉默无言。桓范知道曹爽身边就曹羲还是明白人，便对曹羲说：“事情已经很明白了。您读书是为

了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在今天这样关系皇室安全的关键时刻下定决心吗？”曹爽兄弟还是沉默不言。桓范再对曹羲说：“您现在还能指挥洛阳城南的驻军，如果调拨他们护驾，快的话半天就能到达许昌。皇上驾临，许昌肯定要开门相迎。匹夫被逼急了，还知道劫持一个人质，有强烈的求生欲望；现在我们和天子相随，可以号令天下，谁敢不应？”曹爽和曹羲兄弟等人还是默然不从。最后，大将军曹爽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话来：“诸位勿急，让我好好想想。”

当晚，曹爽在高平陵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曹爽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紧要艰险的政治选择。一边是司马懿的承诺，一边是冒险的政治搏斗，这一夜，曹爽始终无法合眼。

第二天五更天，初升的太阳照耀在高平陵上。周围的人早早就聚集在曹爽的营帐里面等待着大将军最后的决定。营帐里聚拢的人越来越多。曹爽看看大家，猛地将案上的佩剑掷在地上：“太傅之意，不过是争权。我交出权力，仍不失做富家翁。”桓范一下子哭了出来：“曹大将军生了你们这群猪！想不到我今日要受株连族灭了！”曹羲等人默然无声。桓范哭着离开了营帐，孤独地策马返城。

曹爽随即将司马懿弹劾自己的表章上奏了曹芳，主动请求免去自己的官职。曹芳只是尚未成年的少年，并不理解其中的利益关系，就将曹爽解职。曹爽交出了大将军印绶，送给司马懿。送印使者即将出发的时候，主簿杨综拉住曹爽提醒说：“大将军您一交出此印，恐怕就性命难保了。”曹爽摇头说：“太傅不会失信于我的。”

郊祭高平陵一行就此草草收场。曹爽陪伴着曹芳，君臣默然返回洛阳。曹爽出城时，仪仗遮天，护卫如云，许多人将郊祭看做和曹氏兄弟拉关系的好机会，随从甚多。回城时凄风惨雨，那些附会富贵之徒随走随散，临近洛阳时只剩曹爽兄弟孤零零的几个人了。

经过洛水上浮桥的时候，曹爽原本还想和司马懿打个照面，可是

司马懿看都不看他一眼。曹爽兄弟满怀惆怅地回家去了。桓范遇到司马懿，下车向司马懿叩头，说不出话来。司马懿问他：“桓大夫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呢？”桓范依然说出一句话来，默默走开。

曹爽回到他的府第后立即被软禁。司马懿调拨了洛阳八百平民将大将军府团团围住，并在四角建高楼密切监视。曹爽被软禁后，计穷愁闷。但他非但没有反省思过，也没有谋划反扑，竟然到后园中玩弹弓。府外高楼上的平民见到曹爽就高喊：“前大将军向东南方向走了！”曹爽这才没了玩兴，和几个兄弟共议对策。大家思考的都只是对自己的处置问题。因为苦于不知道司马懿的真实意图，曹爽给司马懿写了一封信，说府上的存粮不多了，请求司马懿支援一些粮食。司马懿二话不说，马上送来大米一百斛和充足的肉脯、盐豉、大豆等。曹爽兄弟自以为得计，都很高兴，认定自己肯定是死不了了。

暗地里，司马懿早已任命了之前受曹爽集团迫害的卢毓来“追认”曹爽集团是如何大逆不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曹爽等人劣迹累累。司马懿、卢毓不分昼夜地严刑逼供，最后审出了一个“原大将军曹爽预谋本年三月兵变篡位”的大案子来。

这些幕后审讯都是背着曹爽集团进行的，只对一个人开放。他就是何晏。司马懿让何晏参与了对曹爽集团的审查工作。何晏还以为是司马懿重视自己，审讯起曹爽同党和自己先前的同伙来穷凶极恶，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审讯线索和证据，希望能给自己开脱。在结束时，司马懿说：“要族诛八家。”何晏将曹、丁、邓、李等人数了一遍，只有七家，就说只需要族诛七家就可以了。司马懿坚持说：“必须族诛八家。”何晏突然头皮一麻，怯生生地问：“难道也包括我何家？”

正月初十日，司马懿以谋反罪将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下狱。这一天距离桓范劝曹爽兄弟千万不要倾巢出发去高平陵只有五天时间。

政变过后的第二个月，曹芳任命司马懿为丞相，并给予司马懿奏事不名的待遇。司马懿独立掌握了曹魏的政权，为后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局面的出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高平陵政变其实是一场并没有多大悬念的政变。政变斗争的双方（司马懿和曹爽）能力高低一看即知。曹爽只是因为凭借较高的起点和突然袭击，取得了最初权力斗争的胜利。但他所代表的集团堕落无能，政治上极端幼稚，被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抓住机会，一招毙命。当然曹爽集团内部也有能人（桓范），曹爽在政变中也有翻牌的机会，但他们的出身和性格注定了他们最后失败的命运。

五、竹林七贤来了



正始九年（248年），24岁的嵇康带着家眷从都城洛阳来到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寓居。这本是历史长河中很细微的一次人口流动，却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起到了惊天动地的杠杆作用。此举引发的历史光芒贯穿将近两千年的时空，至今让我们炫目不已。

嵇康和山阳的结合，是资源的强强联合。嵇康，谯郡铨县（今安徽濉溪）人，出身贫困家庭且早年丧父，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长大后精通文学、玄学、音乐等，成了当时文坛的领袖之一。史载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喜欢将体制外的青年才俊纳入到体制中来，以免他们成为体制的敌人。曹魏朝廷就喜欢上了表里俱佳的嵇康，有意笼络，嵇康很顺利地迎娶了曹操曾孙女（一说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成了皇亲国戚，官拜中散大夫。这个官职更多是象征意义的，后人查不到嵇康去官署施政的记录，只是习惯性地尊称他为“嵇中散”。而山阳县，地形俊胜。“天下之脊”太行山的南端就始于山阳县。在这座顶着天下脊梁、矗立在中原核心的小县城里，曾经上演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山阳是春秋时期诸侯逐鹿中原的焦点地区；前朝汉光武帝刘秀据有河内而后完成中兴大业；他的子孙、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禅位于曹魏后被贬至此地，封为山阳公，在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死在山阳。

当年才十岁的嵇康，不可能对汉献帝的死有深入的理解。之后嵇康逐渐长大，从民间走上朝堂，经历的事情多了，对十多年前死在山阳的汉献帝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是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环顾朝堂，嵇康看着司马懿父子的势力蔓延开来，侵蚀种种实权，而可能与之抗衡的曹爽等人志大才疏，还浑然不觉。有识之士都预料到，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即将开始！嵇康在感情上亲近曹魏皇室，他毕竟是曹魏的女婿、是曹魏赐予他荣华富贵的，但嵇康不愿意参与司马氏和曹氏之间的明争暗斗。因为权争之中充满阴谋、虚伪、血腥和其他肮脏的东西，嵇康不愿意为之，也自认为没有能力为之。

身在朝堂又不愿意和黑暗政治同流合污，嵇康只能自我放逐，把目光投向了山阳——在那里，前朝皇帝被拉下龙椅后默默度过了余生。

来到山阳境内，嵇康并没有在县城中寻找宅邸。那不符合他自我放逐的本意。嵇康在山阳城外东北约二十里、白鹿山南一处泉水边，盖起了寓所。住宅四周原本有竹子，嵇康又加种了不少，形成了一片竹林。竹子的洁身独立、高节洒脱、疏疏淡淡、不慕虚华，都让嵇康心驰神往。

青山脚下、流水岸边的这片竹林，吸引了与嵇康志同道合的精英分子纷至沓来。

紧随其后走入竹林的是38岁的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籍。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

从阮籍的成长轨迹和以往思想来看，他似乎都不至于走入竹林，和嵇康一起清谈隐居。从小，阮籍就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抱有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心态。他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而他，阮籍，自然就是那个没有出现的“英

雄”。阮籍也看到了现实政治的黑暗，看到了种种和圣贤教诲不符的事实，可他认为这恰恰是现实需要儒家教化、需要他这样满腹经纶的人才的表现。遗憾的是，当阮籍真正进入官场，沉浮十数年后，不得不承认现实政治像墨一样黑，黑得让他完全看不到理想的彼岸在何处。经历了震惊、迷茫和痛苦之后，阮籍学会了逃避，学会了明哲保身和谨言慎行。就在当年，曹爽征召阮籍出任自己的参军，要拉他进入曹氏集团。阮籍不愿意被捆绑在任何派系的战车上，便托病辞官归里，找嵇康来了。

第三个走入竹林的是43岁的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山涛。

山涛和嵇康一样是孤儿，也一样是从贫苦中自学成才的。他之前的人生经历比嵇康、阮籍要曲折得多，直到四十岁才做了官，当了郡主簿。眼看仕途有所起色了，山涛忧虑地发现了隐藏在平静下面的暗潮。一天夜里，山涛和同事石鉴（这人后来成了西晋的太尉）共宿，半夜踢醒石鉴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睡觉！你知道司马太傅卧病不出，有什么问题吗？”石鉴睡眼惺忪地回答：“皇上让太傅回家养病，关我们什么事情！”山涛骂道：“咄！马蹄声起，眼看就要刀光剑影了，怎么会没事呢！”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不安，山涛也选择了弃官而去，寻找一寸宁静之地，安心思考生活。

嵇康、阮籍、山涛三人构成了竹林中最初的交谈核心。三人之中，嵇康年纪最小，可以算是其他二人的子侄辈，但凭借精深的学问、崇高的声誉和皇亲国戚的光环，成了领袖。三人之中，山涛年纪最大，生活最为窘迫。家里全靠夫人韩氏操持破衣粗食，山涛一次和妻子打趣说：“夫人忍忍饥寒，等我日后位列三公，不知道夫人能不能做好高官太太？”山涛又对妻子说：“眼下能做我的朋友的，就只有嵇康和阮籍了。”韩氏很好奇，很想看看他们。一天，嵇康和阮籍来山涛家做客。韩氏劝山涛将两人留下来住宿，夜里韩氏在墙壁上挖了个洞，观察嵇康和阮籍，听他们彻夜长谈。朋友走后，山涛就问妻子有什么感受，韩氏坦率地说：“你的才智、情趣，和嵇康、阮籍相比，差

远了！只有你的见识、气度，勉强还能和他俩比一下。”韩氏的判断，也是一般人的观点。在竹林交谈的核心中，才情声望都推嵇康为首，阮籍次之，山涛又次之。

二

阮籍的侄子阮咸，听说叔叔和几个世外高人躲在竹林中，饮酒高歌、畅谈不休，非常羡慕，缠着叔叔介绍自己进入了这个小圈子。

别看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名声并不在阮籍之下，和叔叔并称“大小阮”。阮咸为人狂放，不拘礼法，尤其弹得一手好琵琶。唐代后，人们根据阮咸琵琶的样式制造了许多复古琵琶，为与西域传入的琵琶相区别，干脆将复古琵琶称为阮咸，简称“阮”。可见，阮咸的琵琶功夫了得，影响了上千年。

阮咸和叔叔阮籍这一系，家里比较穷，居住在道南。居住在道北的阮姓同族都很富有。七月七日，北边的阮家在院子里晒衣服，都是纱罗锦绮。阮咸就在院子里架起杆子，挂了许多布衣烂衫。人们问他为什么把贫困的家底都亮出来，阮咸自嘲道：“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他的未能免俗，不是攀比，不是附庸风雅，而带有一种朴素的真实，是真性情的表露，远比富裕的同族们的炫耀高贵得多。既另类又真诚的阮咸很快就被三人核心接纳了。

此外，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的书呆子向秀和沛国（今安徽淮北）人刘伶也加入了清谈行列。刘伶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最擅长喝酒和品酒，还专门写了篇《酒德颂》谈喝酒的好处。他长期酗酒，都得了病。一次，刘伶酒病又一次发作，还要妻子拿酒来喝。妻子哭着把酒都洒在地上，摔破了酒瓶，恳劝他说：“喝酒伤身， 你看你都喝出病来了！你一定要戒酒了！”刘伶就回答：“好，戒酒！可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没法戒酒，必须在神明前面发誓，才能戒得

掉。麻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妻子信以为真，准备酒肉供在神像前，刘伶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他抢过神像前的酒肉，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结果又喝得酩酊大醉。

刘伶长得又矮又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一次他喝醉了酒和人吵了起来，对方卷起袖子就要揍他，刘伶很镇定地说：“我身子像鸡肋一样细小瘦体，哪能受得了老兄的拳头啊。”对方听了大笑，也不揍他了。但是他的运气不会总是这么好，慢慢地得罪的人多了，刘伶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差了，他也越来越不与人交往，对人情世事默然相对，只是喝酒而已。奇怪的是，刘伶和阮籍、嵇康两人却很投机，一见面就有说有笑。很自然地，他也加入了竹林中的谈话。

竹林的名声散播出去后，山东琅琊人王戎闻风而来。王戎的年纪很小，比嵇康还小10岁，比山涛小了24岁，走入竹林的时候还只是个14岁的毛头小子。

别看王戎年纪很小，却是神采飞扬的神童。他出生于山东琅琊的官宦人家，从小聪慧，学问日益精进，善于清谈。王戎对老庄清静无为的学说很喜爱，也是嵇康的崇拜者。直到老年，王戎回忆起嵇康来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阮籍认识王戎也比较早。王戎的父亲王浑担任尚书郎时和阮籍是同事，王戎也跟着父亲住在官舍中。每一次，阮籍去拜访王浑，话不投机说不了几分钟，却和小小的王戎很聊得来。两人一谈就是大半天，成了忘年之交。阮籍很不客气地对王浑说：“你儿子清俊绝伦，你根本比不上他。和阿戎说话，比和你说话有趣多了。”王戎的崇尚清静和清谈，更多的是出于年少时候纯美的理想，其中还掺杂着丝丝叛逆的情绪，缺少山涛、嵇康、阮籍等人对现实无望之后的谨慎与逃避——王戎压根就还没进入社会。其实，王戎内心对功名利禄并没有免疫力，相反对花花绿绿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因此，阮籍虽然喜欢王戎的聪慧和清谈，对他的人品并不看好。

几个人里面，王戎是最晚参加竹林清谈的。他刚来，阮籍就高喊：“有俗人来败坏我们的兴致了！”王戎淡淡地反驳说：“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可以败坏你们的兴致呢？”

就这样，山阳城外竹林中的7位常客：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时常聚首，畅饮高谈，醉了就卧倒泉边，醒来继续清谈歌唱，世谓“竹林七贤”。

三

竹林七贤，不仅仅是竹林中的7个人，代表了魏晋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挣扎。

首先，竹林七贤都是黑暗现实的逃避者。从东汉末期开始，现实主义政治和弱肉强食的思想在政坛上横行，后来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曹魏建立后，仁义道德虽然重新被提倡，被树立为意识形态的旗帜，但起实际作用的依然是务实残酷的斗争法则。而另一面，曹魏朝廷又不能恢复两汉统一时期的强大权威，不能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连天下都统一不了）。这就为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思考留下了空间。知识分子多数是读圣贤书成长起来的，信奉仁义道德，多数人崇尚公正自由的生活。当他们满怀抱负地入世之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让他们迷茫、徘徊和痛苦。他们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又不愿意继续受到残酷现实的压迫，只能选择了逃避，躲进了竹林。竹林七贤的核心嵇康、阮籍和山涛都是如此。

其次，竹林七贤表面上是礼教的背叛者，却是礼教真正的信奉者。后人谈起竹林七贤，第一印象往往是他们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做派。人们都说竹林七贤“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为什么他们好老庄学说呢？因为老庄的清静无为、效法自然，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当高官厚禄变为让知识分子放弃独立和思想的诱

惑，当仁义道德变为黑暗政治的遮羞布，当一切规则、规范和礼教变为幌子、棍子和刀枪的时候，现存社会的制度和说教还值得信赖和遵奉吗？既然被朝廷和普通人都奉为宝典的制度规章不值得信赖，逃避而去的知识分子便躲进了道家的无为和清谈之中。在嵇康他们之前，夏侯玄、何晏、王弼等为代表的“正始学派”也对现实失望，完全步入了虚无。他们把老庄的虚无主义倾向发挥开来，崇尚世界本无（令人不解的是，正始学派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曹爽集团，介入了曹魏与司马氏的争斗）。竹林七贤则把老庄学说中的“自然”发挥开来，讲求一切顺其自然，追求无拘无束的个人生活。

无拘无束的生活表现在竹林七贤的“放达”上。阮籍有言：“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曾和姑姑家的鲜卑婢女私通，母丧期间听说鲜卑婢女要随姑姑到远方去了，阮咸穿着孝服、骑上毛驴就去追，后来载着那个婢女一起回来。阮咸还说：“人种不可失！”原来鲜卑婢女已经怀了他的孩子，这在魏晋时期可是惊世骇俗的事情，阮咸还高调宣布。阮氏族人都善于饮酒，阮咸和族人喝酒，都不用常栖斟酌，而用大瓮盛酒，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喝酒。一次有一群猪来找大瓮，把酒当水喝起来，阮咸也无所谓，趴着和猪群一起喝酒。酒鬼刘伶有次赤身裸体地接待客人来访，客人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很多人凭此来批评竹林七贤，攻击他们行为放荡，不守礼法，进而攻击他们不忠不孝。实际上，竹林七贤才是真正的忠孝仁义的尊奉者。比如阮籍就是个孝子，但他母亲逝世的时候，阮籍正与人下围棋，棋友说下不了，你去办丧事吧，阮籍却坚持把围棋下完，之后还喝了二斗酒。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阮籍不孝的证据。可阮籍喝完酒后就号叫一声，吐血数升。母亲要下葬了，阮籍又吃了一个蒸肫子，喝了二斗酒，然后又号叫一声，吐血数升，整个人“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可见阮籍的悲痛已经深入血液骨髓，不是一般的痛苦了。裴楷去吊丧，看到阮籍醉醺醺的，散发箕踞，直愣愣盯着客人看，既不招呼也不搭理。裴楷吊唁完毕就告辞而去，别人问他：“吊丧的时候都是主人先哭，客人再行礼。阮籍都没哭，您为什么

要哭着行礼啊？”裴楷真正理解了阮籍，说：“阮籍是方外之士，不崇礼典。我就是个俗人，还要行仪自居。”可见行为方式的不同，并不能掩盖阮籍深沉的悲痛。悲伤不一定要用痛哭流涕来证明，忠君爱国不一定要高喊口号，同样，孝顺、仁慈、关爱、忠诚等价值观也无须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表现。竹林七贤已经对社会现存制度，包括礼教都抛弃不用了，他们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内在感受，表示好恶。在这方面，阮籍的“青白眼”是个很好的例子。阮籍看到现实中蝇营狗苟的钻营之人，就翻白眼，爱答不理的。嵇康赍酒挟琴来访，阮籍就立刻翻回青眼，热情相待。人们都应该像裴楷一样，不能机械地按照传统礼教的标准来要求竹林七贤照做无误。

他们七个人在竹林中饮酒、弹琴、对弈，高谈阔论，谈论的话题涉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对待自然等等。这些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知识分子。竹林七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包括逃避残酷的现实、保持纯洁自然的心灵、追求自然的生活等等，也都吸引着后来者，让后来者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不管后人认同不认同他们的言行，七个人洁身自好，保持独立自由的状态的精神，给后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从这个角度说，竹林中的清谈虽然是务虚的，却有着穿透时空的强大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竹林中的7个人都崇尚独立自由，都信奉道家哲学，但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表现在处理个人和仕途的关系上。嵇康、向秀、刘伶等人是完全藐视政治权威，纯粹地遵从心灵的召唤，要过自然本真的生活。而山涛、王戎两人虽然听到了内心的召唤，知道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可贵，但是同时他们心灵深处还有世俗的呼唤，知道如何去做社会认同的“正确”的事情。现实中有许多后一种知识分子，他们知道真善良，也有理想，却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思想的不同，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导致了竹林七贤的散去。

那些竹林中的清谈，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正始十年（249年）爆发了高平陵政变，曹爽集团血流成河，标志着曹魏王朝的支持力量

消失殆尽。“万事贵无”的何晏在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同时，也曾显露出消极避世的态度，可惜未能脱身而出，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正始学派”跟随曹爽，随着曹氏的失败整个学派归于沉寂。而原先动荡不明的政局一下子明朗起来，司马家族成了不可撼动的胜利者。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等人陆续走出林子，当官去了；阮籍的思想底子入世的儒家的，而非出世的道家，迫于压力也接受了朝廷的征召。嵇康、向秀等人还经常在竹林中聚会，可光景大不如前了。

六、这不是嵇康一个人的悲剧

一群人在竹林中清谈是无害行为，还符合“低碳生活”的要求，但曹魏朝廷不会允许竹林七贤的存在。

因为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聚群清谈是“反动行为”。清谈的话语体系是非官方的，行为是反礼教的，竹林清谈的存在就是对权威的无声反抗，对朝廷的藐视。政府权力的一大特性就是强盛的蔓延能力，从政府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吏们希望将社会各个方面、各色人等都管理起来，容不得政府权力存在空白。嵇康、向秀等人坚持在竹林中避世清谈，对政治漠不关心（没有批评），对主流意识形态离经叛道（尽管皇帝和达官显贵们自己也不真心信奉），很快就引起了司马氏的注意。考虑到在之前的政治斗争中，嵇康等人并没有站在自己一边（也没有站在曹爽一边），又考虑到竹林清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不是和司马氏争夺民心嘛），司马氏便将嵇康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这里又暴露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弊病：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冷漠和无声反抗，根源在朝廷，而不在知识分子。如果朝廷能够革新政治、唯才是举，建立清明的大环境，想必知识分子都会走出竹林，为朝廷所用。可朝廷极少有自我反省的精神，拒绝承认自身的错误（有的时候，自我认错会对既有权力结构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反而采取打压的方式，要铲平竹林，捕捉其中的人才。

享受着自由和自然的嵇康等人，还没有意识到高平陵政变后日益强化的司马氏权威统治，延续着清谈高歌的日常生活。山涛、阮籍等人陆续离去后，嵇康喜欢上了打铁（有说是兴趣爱好，有说是以此赚钱糊口），向秀偶尔陪嵇康去洛阳打铁。山东东平人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赶来山阳寻找他们。向秀常约吕安耕田、种菜，收获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取酒食。三人走得很近，常常相约出游，观原野，攀山岚，不计远近，整天整夜地不回家，回来后又抱头高谈喝酒。三人之中，向秀比较文静，不像其他两人那样傲世不羁，坚持读书。嵇康和吕安不时嘲笑他。向秀有感于《庄子》在升温，阅读的人很多，却很少有人注解，就沉下心来给《庄子》作注，完成后请嵇康、吕安批评。嵇康等人给予了一致的肯定。

这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最终打破了竹林的安逸宁静。先是嵇康将司隶校尉钟会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给得罪了。钟会是司马氏器重的大官，也是个“官方知识分子”，想结交嵇康，附庸风雅。他穿戴齐整，带着大批人来找嵇康“交流感情”来了。嵇康与向秀正在树荫下锻铁，向秀拉排司火，嵇康挥锤打铁，对热情而来的钟会不理不睬。钟会在一旁看两人打铁看了很长时间，没看到嵇康用正眼看过自己，准备离开。这时嵇康开口了，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恨恨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言下之意是你嵇康果然恃才傲物，果然有个性，我们走着瞧。

司马昭做了大将军，要聘嵇康为掾吏。嵇康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郡去，驳了大将军的面子。景元二年（261年），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接替自己先前的职位。嵇康闻讯，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字巨源），高调宣布和山涛绝交。他在文章中称避世清谈是自己的志向，“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山涛强己所难，道不同不相为谋，因此单方面宣布与山涛绝交。文章借绝交为名，委婉地批评了社会，比如“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等，说了很多重话，比如“不可己嗜臭

腐，养鸳雏以死鼠也”等。

按照嵇康的个性，如此激烈和高调的行为实在令人可疑。不想做官，直接告诉山涛就可以了，有必要弄得沸沸扬扬的吗？于是，就有后人解释说，嵇康这是在保护正处于仕途上升期的好友山涛呢。他知道竹林七贤不容于朝廷主流，宣布与山涛绝交其实是告诉朝廷：山涛被竹林七贤的领袖开除了，以免之前的交往影响山涛的发展。而山涛收到嵇康的绝交信后，也没有发怒，笑笑而已。

话说吕安的妻子非常漂亮。吕安的哥哥吕巽却是好色的奸佞小人，竟然强暴了弟妹。吕安怒气冲冠，准备休妻并起诉吕巽。吕巽就请嵇康从中劝解，并发誓改过自新，好好做人。嵇康出面调和，说服吕安将这件事压了下来。不想，吕巽这个卑鄙小人，稳住弟弟吕安后，恶人先告状，向官府控告吕安“不孝”。魏晋都以孝治天下，“不孝”是大罪，当年孔融就是因为“不孝”被曹操诛杀的。吕安于是被抓了，写信向嵇康寻求帮助。吕安不知道是被激愤冲昏了头脑还是别的原因，信中的内容非常偏激，将嵇康的避世上升为反抗官府的举动，认为自己是被害的，希望嵇康搭救。嵇康也为吕安激愤不平，先写信与吕巽绝交，再跑到官府为吕安作证。结果，吕安没被救出来（后来被流放西北边郡），嵇康反被收押了。

钟会趁机劝司马昭除掉嵇康。他拿出来的证据就包括言辞激烈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钟会认为：“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这条理由是：嵇康才华出众，又不能效忠朝廷（其实是司马氏），所以是危险人物。钟会还造谣说：“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这里的毋丘俭忠于曹魏，曾和文钦等人在扬州起兵讨伐司马师，失败后被列入叛臣的行列。钟会说嵇康是毋丘俭的同党，只是因为山涛的阻拦才没有参加叛乱。最后，钟会搬出春秋战国时“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的先例来，建议司马昭以“害时乱教”的名义杀掉嵇康，“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钟会要杀嵇康的三条理由中，这最后一条才算是真实的。司马昭当时很信任钟会，下决心杀害

嵇康。

嵇康在狱中，仍然未意识到死亡威胁的到来。他写下了《幽愤诗》，后悔在隐居多年后突然插手吕安的事情，看来自己还是没有将老庄的清静无为学到家。原本就是因为对现实政治失望才隐居的，怎么到头来又走入官府，奢望官府能还给吕安清白呢？嵇康决定，出狱后要“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有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意拜嵇康为师。这番好意加速了嵇康的死亡。司马昭发现嵇康原来有这么大的支持力量，他那些反权威的行为竟然争取到了这么多年轻人，这还了得。司马昭断然拒绝了学生们的请求，下令立即处死嵇康。

临刑前，嵇康神色坦然。他看看日影，预计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早年，嵇康游历洛西的一天晚上，住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里，忽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和嵇康畅谈音律，还借嵇康的琴弹了一曲，声调绝伦。这曲子就是《广陵散》。古人将曲子传授给了嵇康，没留下姓名就飘然而去了。之后嵇康一直没将《广陵散》传授他人，今日在刑场上弹奏完毕后，他把琴放下，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从容就戮，时年40。

二

嵇康临刑前，让儿女去投靠山涛。他依然将山涛当做挚友，山涛也没有辜负嵇康的托孤重任。山涛这个人，虽然在现实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始终保持着自然真诚的心灵。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抚养着他的儿女。王戎也对嵇康的子女多有照顾。成语“嵇绍不孤”说的就是嵇康的儿子嵇绍虽然是孤儿，但有山涛、王戎两位长辈的悉心关照，并没有无依无靠。嵇绍长大后，一表人才。有一次有人对

王戎说：“昨天我在众人中见到嵇绍，他气宇轩昂，如同野鹤立于鸡群之中。”这就是“鹤立鸡群”的来历。王戎听说后，感慨地说：“那是你没见过他的父亲嵇康。”

因为山涛的大力举荐，嵇绍很顺利地进入了仕途——西晋的仕途，而非曹魏的。父亲嵇康是反权威的逍遥派，儿子嵇绍却是勤奋积极的晋朝官僚，不知道嵇康知道后做何感想？荡阴之战中（见《八王之乱》），时任侍中的嵇绍跟随晋惠帝司马衷出征。混战中，百官、侍卫纷纷溃散，只有嵇绍冠服凌然，用身体捍卫着晋惠帝，最终被乱箭射死在皇帝的身边。嵇绍的献血溅到了龙袍后，给白痴的晋惠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局势平定后，左右要给晋惠帝浣洗龙袍，晋惠帝不肯，说：“此嵇侍中血，勿去。”“嵇侍中血”日后就成了忠臣的指代物。嵇绍虽然没能在反权威方面继承嵇康的衣钵，但忠君报国的行为也没有辱没了家门。

说完嵇康父子，我们来看看山涛和王戎这两位积极投身司马政权的七贤的后半生。

山涛和司马家族有亲戚关系。山涛父亲山曜的姑姑山氏，嫁给了曹魏的粟邑令张某，生下女儿张春华。张春华嫁给了司马懿，为嫡系夫人，是司马师、司马昭的亲生母亲，晋朝建立后被尊为宣穆皇后。山涛算是张春华的表侄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的远房表亲，司马炎的远方表叔。这层亲缘关系摆起来虽然有点绕，但对山涛来讲是不错的政治资源。司马师执政后，对山涛这个表亲很重视，举他为秀才，拜为郎中，后来升任尚书吏部郎。山涛于是倾心依附，为司马家族出谋划策。他要施展才华，必须要有强大的政治后盾，这是每个务实的知识分子必须承认的事实。因此，山涛的选择，我们可以旁观和漠视，却不能横加指责。

山涛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是在司马昭挑选世子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了司马炎。司马昭当了晋公后，一度想挑选司马攸为世子。山涛主张

以司马炎为世子，当司马昭征询他意见时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司马昭最终挑选了司马炎为接班人。司马炎感激莫名，赶到山涛家当面拜谢。等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山涛的好日子就来了。他历任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尚书左仆射等，进入了西晋初期的权力核心圈子。

山涛终于获得了施展才华的机会。知识分子为了获得一展拳脚的舞台，必须付出辛勤的努力，做出种种牺牲和妥协。很多知识分子不愿意这么做，山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这样的舞台，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负责晋朝的人事工作。他选用官吏，既秉承晋武帝司马炎的意旨，又亲自考核评价，时称“山公启事”。在漫长的人事工作中，山涛经手的那么多官员升迁降黜，几乎都做到了实事求是，考核没有偏离实际。《晋书》说，山涛负责人事期间提拔的官员中，只有陆亮一个人出了问题（受贿）。而当初坚持要提拔陆亮的是司马炎本人，山涛反对重用陆亮，最后司马炎不得不亲自下诏任命。山涛发现陆亮受贿了，立即将他撤职了。对于山涛的工作，可以用“任人唯贤”，“大公无私”来评价，他因此在朝中享有很高威望。

西晋朝野崇尚奢华，官僚贵族们一个赛一个地穷奢极欲。而山涛对自己约束甚严，身居高位还保持俭朴的生活，家里没有美女仆人，拿到的俸禄和获得的赏赐都接济亲朋好友。因为他掌管着官员的升迁，许多人向他行贿，山涛一概拒绝。鬲县县令袁毅是个大贪官，同时向公卿大臣大肆行贿，谋求赞誉和升迁。他向山涛行贿丝百斤。山涛不愿意和公卿大臣们格格不入，给人特立独行的感觉——这是他和嵇康不同的地方，就收下了贿赂，藏在阁上。后来，袁毅事情败露，遭到廷尉的审判。他送出去的贿赂，每一笔都遭到追索。山涛取下丝交给办案人员，上面有多年积存的尘埃，印封如初。凡此种种，山涛的行为实属不易，说明他始终坚持着心中的理想，没有向现实妥协，和黑暗政治同流合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延续了竹林七贤的风范。

山涛活了80多岁，多次以年老多病辞官，都没有得到批准，最后在司徒的位置上强辞，才被准许回家养老，最后死在家中。

王戎在西晋也做到了司徒的高官。和山涛不同，王戎的政治高位是通过明哲保身、阿谀求全得来的，对朝政也没有什么贡献，颇令人不齿。

王戎在政治高峰的时候，正是贾南风揽权、八王之乱的时期，对于贾南风废杀太子、赵王司马伦杀贾南风等事，王戎都保持了沉默。在八王之乱中，晋室面临空前危机，王戎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应该有所作为，却没有丝毫作为、没有一句意见，在各派力量中虚与委蛇，做“老好人”，得以官运亨通，位至司徒。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敛财上。王戎性格极其吝啬，做了高官后已经田园遍及天下，还天天拿着算盘昼夜算计财产，贪得无厌。侄子结婚，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自己女儿出嫁，需要用钱，竟然要向王戎借款。王戎借给女儿数万铜板后，天天念叨，女儿回家省亲见状，赶紧把钱还上，王戎这才放松下来。家中的李树产的李子质量不错，王戎都拿出去卖了换钱，可又怕别人得了种子种出好李子来，在卖之前给李子钻孔把核挖出来再出手。如此算计的结果是王戎的区宅、僮牧、膏田、水碓无数，富贵一方，可他还每天和夫人在烛光下盘算蝇头小利。

如果说王戎身上还有什么当年竹林清谈的风范的话，那就是他还有真情实感。对金钱的变态爱好当然算不上积极的真情实感了。话说司马炎时期王戎、和峤同时遭遇大丧，和家准备了隆重的丧礼，和峤痛哭着迎接丧客。而王戎却不准备丧礼，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也不答理丧客。司马炎对大臣刘仲雄说：“你去看过王、和二人吗？我听说和峤悲哀过度，让人担心啊！”刘仲雄说：“和峤虽然丧礼周到，但神气不损；王戎虽然没有礼节，但伤痛已经融入了他的骨髓。臣觉得，和峤是生孝，王戎是死孝；陛下不应担心和峤，倒是要担心王戎能否挺过来。”在这里，呆呆坐在床上的王戎，倒还有几分竹林七贤的味道。

嵇康被杀，透露出了朝廷对竹林七贤这类反权威言行的镇压态度，顿时天下知识分子战战兢兢。七贤中的其他人物尤其担心，不得不对朝廷权威有所退让。

竹林七贤灵魂之一的阮籍，出来当官比较早，却始终没能融入官场之中。钟会多次向他询问时事，想套出阮籍的破绽来，治他的罪。阮籍只有拼命喝酒，用酣醉来抗拒钟会恶毒的骚扰，没让敌人找到把柄。司马昭对阮籍还是相当客气的，曾经想让儿子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两家结为儿女亲家。面对这么大的诱惑，阮籍的对策还是醉酒，酗酒大醉了60天，愣是让司马昭找不到提亲的机会，联姻一事不了了之。

阮籍和官场格格不入，又不能像之前那样远离官场回归竹林，其中的痛苦只能默默承受。好在阮籍颇能在官场中找乐子，留下两段潇洒的故事。一次，阮籍从容地对司马昭说：“我曾游东平，非常喜欢当地风土。”司马昭大喜，以为阮籍想去东平做点实事，当即任命他为东平相。阮籍骑着毛驴去上任了，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把东平官府的围墙给拆了，让官吏和老百姓们能内外相望，不再相互隔断；第二是废除了东平繁复的法令，清简政令。十多天后，阮籍又骑着毛驴走了，不做东平相了。他听说步兵校尉官署中有佳酿，贮酒三百斛，又自荐担任步兵校尉。到任后，阮籍并不处理军务，终日在官署内饮酒宴会。

阮籍在政治上比较大的举动是司马炎在篡夺曹魏政权的时候，公卿大臣们推举阮籍来写劝进书，推举司马炎称帝。这是大是大非的站队问题，阮籍不答应不行。答应后，阮籍迟迟不愿意下手，继续用酒精麻醉自己。到了大臣们来取劝进书的时候，阮籍醉趴在案子上酣睡。被叫醒后，阮籍在案子上挥毫写成，没有改动就交了上去。全书

言辞清壮，得到了好评。也许是司马炎对阮籍的劝进书很有好感，虽然不断有人攻击阮籍不拘礼教，卫道士们视阮籍为异类，司马炎每次都保护他，使得阮籍得以善终。

晚年的阮籍，说话越来越空虚玄远，坚决不臧否人物、不谈时事。他常常自己驾着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在大哭中，阮籍才能释放内心的悲凉和痛楚。

山涛掌管官员升迁，对阮籍侄子阮咸的评价很高：“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他提议重用阮咸。但晋武帝司马炎认为阮咸酗酒成性，不予重用。中书监荀勖校太乐，用古尺更铸铜律吕来调声调，调好后乐声很好听。荀勖也很得意。阮咸不以为然，指出了荀勖所调太乐的一些问题。荀勖就忌恨阮咸，在司马炎面前进谗，阮咸被外放了始平太守。后来发现了周朝时的玉尺，是天下乐声的正尺。荀勖用它来核准自己调校的太乐，果然发现了阮咸指出的那些问题，方才知阮咸音乐才华远在一般人之上。

嵇康被杀后，向秀不得不结束隐居，进入洛阳为官。司马昭就问他：“听说你有箕山之志，为什么还来洛阳呢？”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人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所以箕山之志就是隐居之志。向秀回答：“巢父、许由都是狷介之士，我并不羡慕他们。”这明显是违心的话，估计连司马昭也不相信向秀的回答，但他对向秀的主动低头和委曲求全的态度非常认可，放过了向秀。在曹魏和西晋时期，向秀历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位不干事，领一份薪水，表明姿态而已。司马昭死后，向秀极不得意。一次，他经过山阳嵇康旧居，看到物是人非，写下了极其隐晦的《思旧赋》一文，揭露了黑暗政治与恐怖权威下自己战战兢兢的心态，想哭祭挚友又不敢哭出声来，只能“思旧”一下。向秀最后死在了散骑常侍的职位上。

醉鬼刘伶也不得不出来做官，做到了建威参军的闲职。晋武帝泰始年间，刘伶曾经上书，主张“无为而化”的老庄学说，被斥为无益之策。他的命运也最坎坷，遭到了罢官。回乡后的刘伶，加重酗酒，最后可能死于酒精中毒。《晋书》说他后期经常乘着鹿车，抱着酒壶，吩咐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后面，说：“如果我醉死了，就地把我的埋葬了吧。”

七、国家在发展，旗帜在变色

三国时期，曹魏王朝的基础最好、起点最高，又执行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在南北方的对抗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遗憾的是，最终坐享胜利果实的却是司马家族。

第一代皇帝曹丕时期是曹魏政治平稳发展的时期。曹丕本人文采出众，落笔成章，也执行了一些利国利民政策。比如在他刚继承曹操爵位的时候，下令说：“关卡渡口是用来通商旅的，池塘林苑是用来抵御灾荒的。在这些地方设立禁令，课以重税不符合便民的原则。因此要解除池苑的禁令，减轻关卡渡口的税率，全部恢复为什一税率（10%）。”另外，针对汉末皇权衰微导致政权颠覆的教训，曹丕特别警惕防范宗室、后宫专权。曹丕制定了羁绊藩镇的严密制度，还严厉限制太监、嫔妃和外戚干政擅权。曹魏的防范制度很成功，整个王朝始终没有出现宗室或后宫专权的情况。

但是曹丕为人轻浮，按照现代干部评议的标准就是做事不够稳重。他想建立自己的武功，不顾劝谏进行巡游般的南征，沿途犒赏军民。来到长江边上后，曹丕说了句：“嗯，东吴看起来果然是难以轻易拔除了。我们退军吧。”倒显得有几分可爱。司马懿和曹丕关系密切，因此在曹丕统治时期，他才真正开始掌握实权。

总的来说曹丕还是位不错的君主。文人气质让曹丕做了些轻浮躁动的事情，好声色享受，但尚能自抑，没有带来大坏处。曹魏在曹丕

时期获得了稳定发展。

曹丕死后，曹睿即位。曹睿因为是甄宓的儿子，随着甄宓的失宠，地位一度危险。也许是因为曹睿脾气禀性与曹丕差不多，曹丕最终还是传位给了曹睿。

曹睿在位，干出了一些政绩。他常说“刑狱攸关天下性命”，朝廷断大狱，曹睿经常亲临旁听。曹睿在对蜀汉作战中委政于司马懿，时刻关注，并多有杰作。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的时候，有人以为蜀军缺乏辎重，粮草必然接济不上，蜀汉必然不战自破，朝廷不需要犒劳军队。还有人想收割上邽一带的生麦，以免被诸葛亮收割了。曹睿都不听从，前后多次派兵增加司马懿的军力，又派人保护上邽一带的生麦。司马懿后来与诸葛亮在上邽周边相持，最后还是仰仗那些小麦作为军粮。可见曹睿在军事筹划方面还是非常有眼光的。诸葛亮最后一次驻屯渭南与司马懿相持，司马懿以持久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诸葛亮死在阵中。司马懿因为对蜀战争的胜利逐渐掌握了军队实权，同时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但是曹睿滥用民力，大兴土木，追求享受。他在洛阳大修宫殿，建造了昭阳、太极等巍峨壮观的宫室。太极殿，高十多丈，上面又建造了翔凤殿。曹睿还在芳林园中造陂池，楫棹越歌，又在后宫建立八坊，在其中储备美女才人，品秩待遇和百官一样。曹睿挑选知书识字的女子担任女性尚书，处理朝廷的奏折。后宫美女歌伎，多达数千人。曹睿就在这个安乐乡中游戏饮宴，让博士官马均制作司南车，制造水转百戏供后宫娱乐。在这里介绍一下马均，他复制了已经失传的指南车，还制作了翻车，解决了从低处向高处送水的问题，大大便利了农耕灌溉。马均可算是魏晋时期科技发明第一人。

百姓为了满足曹睿的兴致，误农时，重徭役。杨阜、高堂隆等大臣纷纷多次向曹睿进谏。曹睿对付劝谏者有自己的办法，就是耐心听完，优待进谏的人，但就是不改正自己的缺点。太子舍人张茂在吴蜀

边界战事不断，将领们不断征战的情况下，对曹睿大兴宫室，热衷于玩饰，赏赐无度导致府库空虚，又抢夺民女充斥后宫的行为上书劝谏。曹睿读完张茂的奏章，夸奖了几句，提升张茂担任散骑常侍的虚职了事。

就在曹睿造土山、种香草的时候，已经是三朝老臣的司马懿长年领兵在外，成为帝国的军事支柱。整个曹魏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宗室和后宫干政的情况，却出现了大臣专权的危险。

曹睿没有儿子，大臣们建议他在宗室子弟中过继几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曹睿不听，偏偏收养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曹芳做儿子，并由他继位（当年曹操的父亲曹嵩也是来历不明，被大太监曹腾收养才姓的曹）。曹睿临终遗命司马懿为太尉，与宗室大臣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他为了夺权，表面上推举司马懿为太傅，私下却行架空之实。司马懿于是称病，不预朝政，消除了曹爽集团的戒心。249年，曹爽陪同曹芳出洛阳城，拜谒魏明帝陵墓。司马懿一举收集旧部，封闭城门发动政变，诛杀曹爽集团各人，夺取了朝廷大权。史称“高平陵之变”。

晋朝建立后，这场事变被描述为曹爽等人趁曹芳生病，开始出现无君不臣之心，密谋推翻曹氏政权，危及社稷，并将篡位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司马懿为了拯救国家和曹氏家族，发动了政变。为此他杀了曹爽及其亲信的整个家族，还株连至反对自己的力量。

事变后，司马懿独掌朝政。曹芳封他为丞相，将他的封地增加到12个县，邑二万户，并且授予他奏事不名的特权。该年12月，朝廷给司马懿加九锡之礼，授予他朝会不拜的特权。司马懿觉得时机尚不成熟，坚持推让了九锡。司马懿抛弃虚名务求实利，致力于整个家族的权势建设。司马懿的孙子和侄子都受封为列侯，家族封侯者19人。

司马家真正露出篡位谋天下的野心是在司马师废曹芳的事件上。司马懿病死后长子司马师继续掌权。司马师比父亲要外露凶狠，一心要建立司马王朝。司马家族的专权和司马师对曹芳的紧逼不仅使曹芳极为不满，也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抗。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图谋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替代司马师，再逐步清除司马家族的势力。但他们没有躲开司马师的耳目，结果事情败露，凡是牵涉其中的人都被诛杀。也许是杀人实在太多了，司马师同时还大赦天下。在清理了朝臣后，司马师正式向皇帝进攻，逼皇帝废黜了皇后张氏。

曹芳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他将自己的这种不满流露了出来，结果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半年后，司马师决定检验自身的力量，要废去曹芳，另立新帝。他先是去见皇太后，逼太后下令：“皇帝曹芳年纪大了，却不处理朝政机，整日耽淫后宫内宠，荒唐 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曹芳不忠不孝，日益悖逆，已经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不能再做皇帝了。现在朝廷要告于宗庙，曹芳重新归藩为齐王，以避皇位。”

司马师马上拿着皇太后令，召集公卿大臣会议。群臣大惊失色，又不敢做声。司马师流着泪说：“这是皇太后的命令，诸君对王室有什么看法？”

群臣只好回答：“昔日伊尹为了商朝放逐了商王太甲，霍光废黜昌邑王以安定汉朝。为了安定社稷抚慰四海，之前两代都有先例。今日之事，全听司马明公的。”

司马师要的就是这句话：“诸君既然这么推重我司马师，我怎么能推脱躲避呢？”于是，司马师就带着群臣，以朝野代表的身份操持起整个废立大事来。他先是按照西汉霍光的先例，派人去收曹芳的玺绶，

通知曹芳以齐王身份归藩，又派司徒高柔为使节，告祀宗庙，通知曹家列祖列宗有关废立的事情。

当天，年仅23岁的曹芳迁居西宫。司马师派人持节护送他前往河内重门。曹芳立齐王府在重门，开始以藩王的身分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魏略》记载司马师操作废黜曹芳的时候，派遣郭芝入宫禀告皇太后。当时曹芳正在皇太后身边。郭芝对曹芳说：“大将军要废黜陛下，立彭城王曹据为新皇帝。”事已至此，曹芳默默地离开，皇太后很不高兴。郭芝说：“太后有子不能教。现在大将军决心已定，同时率兵在宫门之外，以防不备。太后现在应当顺应大将军的意思，没有其他可以说的了！”太后对郭芝的逼宫非常恼火，说：“我要见大将军，我还有话说。”郭芝坚决地说：“为什么要见呢？太后只需要速速取来玺绶就可以了。”太后没有办法，只好交出玺绶。不久，废帝曹芳来向太后辞行。曹芳涕泪交下，悲伤地从太极殿南行，永远离开了皇宫。群臣只有几十个人流泪相送，其中就包括悲不自胜的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在嗜权的司马家族中是个另类，让亲戚们头疼不已。

曹芳走了不久，司马师又派人来。太后说：“彭城王曹据，是明皇帝曹睿的弟弟，我的小叔子。现在立他为皇帝，我的地位怎么处理？这么做，难道是想让明皇帝绝嗣吗？高贵乡公曹髦更合适。曹髦是文皇帝曹丕的长孙，明皇帝曹睿的侄子。按礼，小宗有继承大宗的规定。我小时候见过高贵乡公，立他为新皇帝更合适。”

司马师于是重新召集群臣商议，最后大家决定按照皇太后的意思迎高贵乡公为新皇帝。司马师表示同意，可能他觉得年幼的曹髦不会对自己构成大的威胁。当时出去迎接曹据即位的太常已经出发，两天后到达温县时被紧急召回。朝廷最终改迎了曹髦。

司马师废曹芳的盛大演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向天下暴露了司

马家族的篡逆之心。忠于曹魏王朝的力量发动了多次反对司马懿父子的反叛。先是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发动反对司马懿的叛乱，兵败自杀身亡。接着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再次起兵，连接东吴反叛。司马师正病重，忍痛亲征，斩杀毌丘俭，传首洛阳，文钦逃奔东吴。继任的扬州主将诸葛诞几年后又起兵反司马家族，杀扬州刺史乐綝，再次占据淮南一带反叛。司马昭亲征，攻陷寿春城，斩杀诸葛诞。客观说，三国后期内政都不清静，内斗不息。但司马家族通过三次扬州战役，血洗反对派，止住了内争。曹魏的内乱起得急，也消得快，并没有对司马家族造成沉重打击。

司马父子执政，改变了前两代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和府库积蓄的弊政，继续大力推行富国强兵的战略。可以说，曹魏的国力持续增长，旗帜却逐渐更换颜色。

八、曹髦的儿戏政变

公元260年的一天傍晚，洛阳城突降急雨。雨点由疏转密，天空一片灰暗，间或有雷霆闪电。与宫外噼里啪啦的雨声相呼应，皇宫中也是一片鼓噪，人呼马嘶，兵器相交。原来是魏帝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决定出宫亲手杀掉权臣司马昭。曹髦带着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宫廷侍官下了陵云台，穿上铠甲，挑了兵仗，集合宫中士兵，要出讨司马昭。

宫中顿时大乱。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闻讯赶到。曹髦见三人到来，不等他们开口，大声诉起苦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我忍受不了他的羞辱了，不能坐等被他废黜。就让我们君臣在今天解决此事。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

王经诚恳地劝谏道：“昔日鲁昭公忍受不了专权的季氏，结果败走他方，失去国君之位，为天下取笑。现在国家大权操纵在司马家族已经很久了。朝廷四方都有司马家的亲信爪牙，人们不顾逆顺之理已非一日。皇上的宫廷宿卫兵甲寡弱，怎么能够作为成大事的依靠呢？兵势一旦发起，就好像病情可能非但没有祛除，反而会加深！甚至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灾祸。请皇上详加考虑啊。”曹髦听到如此冷酷的现实分析，胸中怒火熊熊燃烧。他掏出怀中的板令狠狠地掷在地上，厉声说：“我意已决。即使事败身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曹髦抛下三人，匆匆告别太后，率领宫中宿卫、官僮数百人，敲

起战鼓，出云龙门而去。王沈、王业两人见此，决定去向司马昭汇报投诚。他俩招呼王经一起去告密：“事已至此，我等不能自取灭族之祸，应该前往司马公府自首，以免一死。王尚书同去否？”王经回答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你们俩去吧，我不去了。”王沈、王业见劝不动王经，快步出宫，抄小路报告司马昭去了。

这一边，曹髦率领着数百僮仆，鼓噪而出。皇帝身披新甲，坐在车驾之上，手持宝剑，大呼杀贼，激励士气。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皇帝亲自提刀上阵与大臣拼命的情景。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正好有事入宫，在东止车门遇到震怒的曹髦和宫中的乌合之众，大吃一惊。曹髦左右大声呵斥他，司马伷一行慌忙躲避而走。曹髦“旗开得胜”，对这次肉搏的前途更有信心了，于是他喊得更响了。随从们受到感染，旗帜和兵器也挥舞得更欢了。

在皇宫南阙下，得到消息的司马昭党羽已经在中护军贾充的率领下，集合军队，列阵迎战了。司马父子常年掌握军队，集合的军队战斗力自然不是曹髦的乌合之众可以比拟的。贾充见到宫中缓缓出来一支不伦不类的军队，嗤之以鼻。他主动反击，带兵自外而入，扑向曹髦军队。曹髦的军队见状就溃散后退了。

曹髦急了，高喊：“我是天子，谁敢拦我！”他挥舞着宝剑，左右乱砍。司马一边的将士见小皇帝赤膊上阵，不知所措，只好小心躲避，不敢进逼。宫中士兵和仆人们见状，又聚集起来，向宫外继续前进。两边军队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开始胶着。曹髦认为这是上天保佑曹家，自己身为天子，天下无敌，更加起劲地舞剑向前冲。

司马家一边的军队慌乱躲避，形势开始不利于司马昭了。在司马一边的太子舍人成济跑过去问贾充：“事情紧急了！中护军，怎么办？”贾充恶狠狠地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司马家如果失败了，我们这些人还会有好下场吗？还不出击！”他对周围的士兵高喊：“司马家养你们这些人，就是用在今天的。今日之事，没有什么可以迟疑

的！”成济略一思考，说：“没错！”接着挺起铁戈，向曹髦刺杀过去。

曹髦毫无防守之力，被成济的长矛从胸中进去，于背部出来，血溅宫墙，当即身亡。这位被称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小皇帝以这种罕见却可以理解的，高贵而又屈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20岁的生命。一场宫闱惊变就此结束。

曹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赤膊上阵、亲手去刺杀权臣的皇帝，但是他失败了。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位个人英雄主义皇帝是北魏的元子攸。他虽然杀了权臣，但并没有解决权臣当国的问题。相对于当国权臣来说，生长于深宫的皇帝最大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血统。“皇帝”的金字招牌还是可以吓住绝大多数人的。比如曹髦在打斗中，他的皇帝光芒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遗憾的是，这是他们唯一的武器，而且是不不断钝化的武器。随着权臣权势的巩固和人们对皇室的失望，皇帝的的光芒就逐渐暗淡了。更要命的是，对于那些权臣的党羽来说，他们的利益是与皇帝的利益截然相反的。成济之所以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皇帝，就是因为被贾充点拨出了这一点。

二

曹髦本来是无缘于皇位的，而仅仅是高贵乡公。六年前（曹魏嘉平六年，即254年），魏帝曹芳被司马师废黜，降封为齐王。曹髦因为是曹丕嫡孙，被选为新皇帝。当时曹髦才14岁。虽然年少，但是由于过早目睹了家庭变故、宫廷争斗和皇室日衰的政治现实，他显露出了与年龄极不符合的成熟和世故。正史艳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

曹髦从外地风尘仆仆赶到洛阳的时候，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在门口下轿，要向各位官员回拜还礼。礼宾官员阻拦说：“礼，君不拜臣。”曹髦回答说：“我并未登基，现在也是人臣。”最后，曹髦在城

门口向群臣恭敬还礼。进城来到皇宫止车门前，曹髦又下轿步行。礼宾官员又说：“天子有资格车驾入宫。”他又说：“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还不知所为何事。”曹髦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曹髦谨慎得体、大方稳重的言行赢得了朝野的称赞，史称“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曹髦不仅会说话办事，而且个人能力非常出众。古代考察一个人的能力主要是看他对儒家作品的理解程度和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曹髦虽然年纪轻轻，却能在太学里与年长的儒者们谈论《易经》、《尚书》及《礼记》，而且能谈出新意来。同时曹髦还是古代历史上数得着的画家，画迹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放鸡犬图》、《于陵仲子像》、《黔娄夫妻像》。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其人物故实，独高魏代”。

也许是个人素质之高，让曹髦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兴复皇室的重任。为了收复已经涣散的人心，革清政治，曹髦在即位初就派遣侍中持节分巡四方，观察风俗，慰劳百姓，纠察失职官员。他以身作则，一改祖父辈大兴土木、奢侈享乐的风气，“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为了赢得军队的好感，曹髦多次下诏哀悼军队伤亡的将士，安抚那些饱经战火创伤的地方。但是他能做的也仅仅是这些象征性的举措而已，司马昭牢固掌握着朝廷实权，曹髦还是逃脱不了金丝笼中鹦鹉的命运。中兴的欲望和现实的压抑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曹髦心理失衡，加上血气方刚，他就上演了赤膊上阵身亡殉位的一幕。

在曹髦刚登基的时候，司马师曾经私下问亲信：“新皇上是什么样的人呢？”一旁的钟会回答说：“才同陈思，武类太祖。”钟会是大世族大官僚家族出身，他将曹髦与曹植和曹操的文才武略相比，可见对曹髦的能力评价之高。司马师听完，轻声说道：“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社稷有福了啊。”实际上，他用凝重后悔的眼神注视着弟弟司马昭，心想：“这回，我们哥俩可能选错了人。”

现在曹髦在进攻的路上被自己的党羽当众刺死了，司马昭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喃喃自语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

司马昭所谓的天下其实是指天下的世族大家们，没有权臣会对普通小百姓的感受投入过多的关注。东汉开始兴起的世族势力在三国曹魏时期得到了膨胀，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一些家族世代垄断某些官职。司马家族本身就是大世族，又是依靠北方世族的支持上升起来的政治势力。现在小皇帝暴亡，而且是被自己间接杀死了，世族大家们怎么对待这件事，司马昭心中没底。

司马昭先跑到宫里去，对着曹髦的尸体放声大哭了一场，然后下令召集贵族百官，商量对策。他毕竟对突然的变故心虚，极需要将这件事情尽快摆平。他下令收殓皇帝尸首，开始操办丧事。多数贵族百官都应召来到皇宫，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对皇帝的“驾崩”悲伤欲绝。少数贵族官员没有来到，其中就包括大世族出身的陈泰。

司马昭极需要所有世族的支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去召陈泰入宫，理由是皇帝突然驾崩需要会集大臣商议，双方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司马昭不需要说什么，多次派人催请就是他最明显的态度了；陈泰也不需要问什么，去还是不去也是他最明显的态度了。最后，陈泰还是去了皇宫，这是天下政治力量对比的客观结果。

司马昭紧张地握着陈泰的手，问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

陈泰冷静地回答说：“斩贾充，才能稍微平息天下人的议论。”

这段对话发生在两个政治高手之间。司马昭开门见山地刺探陈泰对自己支持的要价。陈泰不追究皇帝的真正死因，只是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他要求杀贾充既是对曹魏王朝做个交代，也是寻个心理安慰。整个对话简洁而直入主题。但是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为司马昭解决了曹髦进攻的难题，是有功之臣。更重要的是，贾充也是一大世族。杀贾充来掩饰自己的罪行对司马昭来说，代价太大了。因此他不

同意陈泰的要价，他还需要贾充这个得力助手协助完成代魏的过程呢。

因此，司马昭又问陈泰：“杀其他人，行吗？”

陈泰坚决地说：“但见其上，不见其下。”皇帝的死事关重大，只能杀官居高位的人，而不能找一两个喽啰顶罪。

司马昭决定抛开陈泰，强硬摆平这件事情。他高声宣布：“成济弑君，罪大恶极，应诛灭九族！”

成济当时正站在司马昭一旁，可能还在想着自己会接受什么样的奖赏，万万没想到等来的会是这个结果。他当即急了，大声嚷起来：“成济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罪不在我！”

司马昭不等成济说出更难听的话来，示意将他立即拖出去。兵士涌上来，堵住成济的嘴，架了出去。成济全家因刺穿曹髦的那一矛当即被族诛了。司马昭再以为臣不忠，祸乱朝政的名义将没有向自己报信的王经族诛。接着，司马派势力迅速地筹办起皇帝的丧事来。

必须承认，司马昭对此事的处理并不完美。他以杀戮来掩盖弑君的真相，反而给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感觉。从王经死的时候到现在，曹髦死亡的真相一直就不是什么秘密。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昭的叔父司马孚当时就反对侄子的处理方法。曹髦遇害初期，百官因为司马昭的态度不明，没人敢奔赴现场悼念皇帝。司马孚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抚着小皇帝的尸体大哭，边哭边说：“杀陛下者，臣之罪。”

司马孚与其他人人云亦云地参加丧礼不同，上奏要求追究杀君主谋之人。司马昭不理睬自己的叔叔。当时太后和司马昭商量，以平民之礼埋葬曹髦。司马孚坚决反对，拉着一批大臣上表要求以王礼安葬曹髦。最后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领衔，众大臣将此事定性：“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现在朝廷依西汉昌邑王因罪被废的先

例，以平民之礼埋葬他。臣等身居高位，却没有避免这样的祸乱发生，真是肝胆破裂。太后仁慈过隆，臣等心有不忍，特加恩以王礼安葬高贵乡公。”也就是说，曹髦死后被称为他之前的封号：高贵乡公。他的死被归为他的道德缺陷，是咎由自取。因此朝廷将他废黜，以平民之礼安葬。但因为太后可怜他，所以升格为亲王的葬礼。

几天后，高贵乡公曹髦在洛阳西北三十里的漣涧之滨安葬。没有贵族和大臣送行，没有旗帜礼乐，整个行列只有几乘破败的车辆。有许多百姓围观，指指点点。有人说：“这就是前几天被杀掉的天子。”说完，有人掩面而泣。南朝的裴松之在注释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叹地说：“司马昭做得太过分了，这哪是王礼安葬啊？”

九、前人种地后人收

曹髦儿戏政变失败，曹魏王朝已经在实质上灭亡了。司马昭杀死了皇帝，竟然没有人质问一下，就被轻易遮盖过去了。司马昭党羽遍布朝野，从司徒尚书令到太守县令都在唯司马昭马首是瞻。强弱对比和人心向背，可见一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曹髦的死，是突发事件，不在司马昭的计划之内。司马昭尚未准备好走到前台，决定迎立常道乡公曹奂为新皇帝。曹奂的辈分很高，是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与曹睿是同辈，是曹芳和曹髦的叔叔。258年，曹奂受封安次县常道乡公。司马昭派去迎接曹奂的使节是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司马炎因迎立之功升任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这是曹奂与司马炎的第一次见面。

260年夏六月，司马炎进封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封地为十个郡；朝廷还给司马昭加九锡之礼。司马家族旁支的子弟中还没有封侯的人全部封为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司马昭表示退让，这样大规模的封赏行为才没有付诸实现。六月份还发生了一件小事。汉献帝的夫人到那时才逝世，曹奂亲自过问了这位逊帝夫人的丧事。曹奂派人追谥夫人为献穆皇后，以汉朝皇后之礼安葬献穆皇后。

263年夏四月，肃慎向曹魏贡献楛矢、石镞、弓甲、貂皮等物品。天子让人把这些都送到大将军府去。按礼，周边国家和民族朝贡的贡品，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接受。司马家族接受贡品此举，将替代之

心明示天下了。

肃慎朝贡的小事被当年发生的大决策给掩盖了。当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率大军分三路攻蜀。姜维当时正避祸陇上沓中，率军退回剑阁抵抗钟会军。在东部两路没有进展的情况下，西路的邓艾从陇上轻装出阴平道，冒险越过七百里无人之地，突发奇兵攻下江油、涪城、绵竹等城池，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阻拦，诸葛瞻兵败身亡。刘禅闻讯出降，蜀亡。

最初钟会出伐蜀汉的时候，西曹属邵悌对司马昭说：“钟会这个人不可信任，不能让他出征。”司马昭笑着说：“取蜀易如反掌。但是讨论的时候众人都反对讨伐，只有钟会与我的意思相同。灭蜀之后，北方的将士人心思归，蜀汉的遗民心怀震恐，即使钟会有异志，也无能为力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在司马昭的预料之内。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政治眼光和能力。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多数权臣都是能力出众的个人，相反末代皇帝中很少有可与之匹敌的人选。

264年三月，司马昭因为灭蜀的大功劳被封为晋王，增封十个郡。晋国辖地达到二十个郡之多。两个月后，曹奂追加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司马家族完成了王室谱系的建设。同时司马昭通过朝廷制度改革来加强自身权威。他奏请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负责，曹魏开始建五等爵位。

司马昭本来想死后将权力传回哥哥司马师一系去，经过亲信劝谏后，他犹豫再三，最终立中抚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晋王世子。

265年春二月，有藩属贡献贡品，再次归之于相国府。四月，南深郡泽县出现甘露祥瑞。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本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五月，司马昭走到了距离皇帝宝座的最后一级台阶。曹奂命司马昭配十二旒的王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六马，备五

时副车。晋王王妃晋封为王后，司马炎由世子改称太子。遗憾的是，司马昭的生命也开始走向了末路。朝廷为此大赦，希望挽回相国的生命。然而到了八月，相国、晋王司马昭还是死去了。司马昭生前，曾经有人劝说他称帝。司马昭指指司马炎，然后对劝说他的人说：“魏武帝曹操也没有称帝。”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做曹操这样的幕后英雄，也的确给太子司马炎留下了扎实的政治基础。

二

在司马昭逝世的当月，襄武县传言出现了一个巨人，有三丈余高，足迹长三尺二寸，白发，黄单衣，黄巾。这个巨人拄着拐杖说：“今当太平。”

司马炎就是在这样的传言中继承父亲爵位、总摄朝政的。一切都非常平稳，就像父亲当相国时一样。九月朝廷大赦。接着司马炎建立了晋国的官员系统，以司徒何曾为丞相，以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征东大将军石苞为骠骑将军，征南大将军陈骞为车骑将军。之后，司马炎再为司马昭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期间，康居、大宛进献的名马，依然是送到相国府中。朝廷的说法是为了嘉奖相国司马家族的怀柔万国、安定天下的功勋。

一切都很明朗，最后的受禅只是程序问题了。《晋书》和《三国志》中都对最后的禅让仪式一笔带过。我们综合各本史书和《三国演义》的描写，能够大致还原当时的情景：

司马炎与何曾、贾充等亲信商议前途举措。贾充等人劝道：“魏国天数已尽。臣等去劝说曹奂不可逆天而动，按照汉献帝的先例重修受禅台，具大礼禅位与晋王。晋王您应该上合天心，下顺民情，早登大位。”司马炎在亲信的劝说中下定了最终的决心。

曹奂不是傻子，非常清楚自己就是魏国的末代皇帝了。随着司马家族势力日益飞扬跋扈，曹奂心惊胆战地等待着最后审判的来临。这一天，司马炎率领何曾、贾充等人，没有得到召见便进宫来。曹奂慌忙起身迎接。司马炎问他：“魏国的天下是谁在出力维持？”

曹奂回答说：“皆赖晋王父祖三代之力。”

司马炎点点头。贾充冷冷地说：“陛下文不能论道，武不能经邦。天下深知魏室已经失职很久了，而归心于晋王一家。陛下何不禅位于才德出众的司马家族？”

曹奂虽然将这最后的判决设想了许多次，但真正面对这样的结果还是不能立即接受。他一下子懵在那，不能言语，许久才点头默认。贾充等人立即修筑受禅台。大家挑选了十二月甲子日作为受禅典礼的举行日。

当日，文武大臣和藩属使节云集受禅台周围。曹奂孤孤单单地捧着传国玉玺，站在台上，默然地看着周边的一切。45年前，他的伯伯曹丕就是这个台上的主角，等待着汉献帝把玉玺交过来。现如今，他也成了主角，不过处在汉献帝的角色上。群臣都在恭请晋王司马炎登台，没有人在关注他。司马炎在众人的瞩目中缓缓地登上台来。曹奂将玉玺传给他，走下台去，穿上官服站在群臣的列首。司马炎则端坐台上。曹奂带头跪拜司马炎，行君臣大礼。群臣在他行礼后，三呼万岁，也行起君臣大礼。这一刻，中国换了统治者。

《三国演义》中有贾充执剑令曹奂伏地听命的情节。贾充狐假虎威，说的一段话值得后人回味。他说：“汉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汉禅，至今已经45年了。现在曹魏天祚已终，天命转移到了晋室。司马氏功德弥隆，极天际地，即皇帝正位，以绍魏统。新朝封你为陈留王，出居金墉城。立即起程，非宣诏不许入京。”这段话突出了因果报应的意味，也表现了司马家族的无情。

时任魏国太傅的司马懿弟弟、司马炎叔祖父司马孚见到此情此景，在曹奂身前跪倒哭泣说：“臣司马孚，生为魏臣，终身不背魏。”情景感人。司马炎因为司马孚是本家长辈，也不能将他怎么样。司马炎的亲信慌忙将他拉开。

司马孚这个人温厚谦让，读了很多经史方面的书，是个君子。汉末乱世中，司马孚与兄弟几人有时也处在危亡之中，但是他粗茶淡饭，与世无争，坚持读书不倦。司马孚成年后，正直清白，从不与人结怨，也没担任什么实职。朋友曹植负才傲物，司马孚就劝他不要锋芒太露。曹植起初不听他的话，在经过沧桑岁月的洗礼后，终于觉得司马孚的话是对的。两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司马懿父子执政后，司马孚因为是血亲，位居高位。但是司马孚对哥哥侄子们的执政是有意见的，常常自我退损，不参与纷争。孙子辈的司马炎图谋受禅的过程，司马孚也没有参与。司马师、司马昭对这个忠于魏室的叔叔很头疼，但又不肯进逼，只能进封他为长乐公。司马炎即位后，更是不敢进逼。

话说受禅礼完毕后，司马炎回到洛阳皇宫，在太极前殿正式宣布登基，国号为晋，改元泰始，大赦天下。司马炎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司马家族最后成为天下的主人。

曹奂禅位后，降封为陈留王；魏氏诸王都降封为县侯。曹奂的陈留王规定位在三公上。晋朝割十县土地三万户人口建立陈留国。曹奂上奏可以不称臣，接受诏书可以不拜，依然保持天子车服和饮食，郊祀天地的时候继续使用魏国正朔。后来又规定，陈留王排位在皇太子之上。司马炎对曹奂还算宽大，不像后世受禅的皇帝一样对逊帝刀杀药毒，而是让曹奂平稳地度过余生。他和汉献帝刘协都算是结局比较好的逊帝了。

曹奂逊位时年仅20岁，被安顿在金墉城（今洛阳市内）居住。不久，司马炎又命曹奂迁居邺城。曹奂在邺城又生活了36年，于302年

病死。曹奂死后谥号为元帝。史家还习惯称他为常道乡公。这位末代皇帝被葬于邺城东南5公里处，现在临漳县习文乡赵彭城村西还有曹奂墓封冢。这个陈留国在曹奂死后依然保存。后来晋朝大乱，中原陷入异族之手。曹奂的后代跟随西晋王朝南迁，继续做东晋的臣子。陈留国在南方复国，传国到南齐。

司马孚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忠诚。西晋建立后，朝廷规定没有就藩的亲王是不能设置一系列王国的官属的。司马孚被封为安平王，但留在首都，没有直接治理封地，没有必要设置完备的官属，但是司马炎特许他配置完备的安平王国官员，作为皇室亲善的榜样。司马孚的辈分实在太高了，内有亲戚，外有交游，经常入不敷出。司马炎就又给他增加了两千匹绢的俸禄。每到朝会的时候，朝廷特允许司马孚乘车上殿，司马炎亲自出宫殿在台阶下拜迎。司马孚坐定后，司马炎亲自捧觞上寿，行家人礼，而不行君臣之礼。

司马孚虽然在新的王朝里备受尊崇，但不以为荣，常常面带忧虑神色。每次皇帝司马炎向他行家庭拜礼的时候，司马孚都要跪地阻止。临终，司马孚交代的遗令几乎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终若一，当以素棺单槨，敛以时服。”（魏国忠臣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一生不偏不袒，安身立命，恪守道德，始终如一。死后用薄棺材和平常的衣服入殓即可。）司马孚死于泰始八年（272年），时年93岁。这在古代中国，算是极其高寿了。司马孚对魏国的忠贞固然是信仰使然，其中更有对自家在夺权过程中残杀过度的反对和担忧、后怕的情绪作用。

十、三家归晋

西晋建立后的头15年，都没有统一天下，而是和江南的东吴隔江对峙。

孙权晚年，东吴赋役苛重，吴国社会矛盾加剧。晚年的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搞得朝臣人人自危。孙权死后，统治阶层争夺权力，爆发了一连串的宫廷内争和帝位更迭，国家开始陷入混乱。孙权之后是孙亮，孙亮之后是孙休。孙休临死时，指定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为顾命大臣，让他们辅助太子继位。当时蜀汉初亡，东吴南部交趾叛乱，国内震惧，人人贪得长君。濮阳兴、张布看到太子年幼，竟然违抗孙休遗诏，迎立孙权之孙乌程侯孙皓为皇帝。264年，孙皓称帝。他虽然是成年人，但胡作非为，丝毫没有扭转东吴的内忧外患，却让混乱进一步加剧。

孙皓是出了名的暴君，还动不动就敲碎大臣脑袋，杀人如麻。濮阳兴、张布很快就后悔了，可惜还没找到后悔药就被孙皓砍了脑袋。孙皓还豪奢铺张，尽情享乐，好酒色、兴土木，搞得吴国“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人民揭竿而起，朝臣离心离德。孙皓对西晋的威胁，毫无戒心，还好大喜功，主动派兵攻晋，但多因草率而无功。名将陆抗认为晋强吴弱，不止一次上书反对主动攻晋，要求加强备战，他还预见到晋兵会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特别要求加强建平（今湖北秭归）、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西陵峡口）的兵力。可孙皓迷信长江天险可保平安，从未认真在战备上下功夫。

269年，西晋派大将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主持对吴作战。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羊祜每次交战都告知东吴时间，从不发动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一律赏酒灌醉。西晋部队越境抢粮作为军粮，但每次都留下相同价值的绢作为交换。羊祜游猎的范围也往往局限于西晋境内。同时，羊祜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香，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香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因此，东吴和西晋两军不像敌人倒像是友军，和睦共处。东吴官兵大多对晋军抱有好感。

羊祜的对手是镇守江陵的东吴大将陆抗。陆抗出身东吴世族，孙皓对陆抗非常客气，除了不采纳劝谏外，放手让他负责西段军事。陆抗到任后，积极采取守势，巩固长江防线。

陆抗和羊祜两人交手，多数是在打“心理战”，留下了许多惺惺相惜的佳话。陆抗一次生病竟然向羊祜求药，羊祜马上派人送药过来，并说明这是自己新配制的药，还未服，先送给陆大将军吃。部将担心其中有诈，劝陆抗勿服，陆抗认为“羊祜岂鸩人者”，放心服下。同样，陆抗送给羊祜的酒，羊祜也饮之不疑。这看似奇怪，实际上却是两军在打道德战、士气战，比的是心理素质。陆抗就告诫将士：“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陆抗掌军时，东吴并未在心理战上分毫输给西晋。

陆抗在勉力维持，孙皓又在后面捣乱。贪小便宜的孙皓多次派军入侵晋国边界，取得一些小成绩，沾沾自喜，大吹大擂。陆抗认为此举惊扰边界百姓，有弊无利，上书劝谏说：“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孙皓还是不采纳，相反对陆抗和羊祜

的做法很不理解，派人责问。陆抗回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如果不这么做，正是彰显羊祜之德，灭了我方威风。”

但孙皓还是给陆抗带来了大麻烦。凤凰元年（272年）夏天，暴戾无道的孙皓逼反了陆抗的部下——昭武将军、镇守西陵的步阐。步阐世代为将，不忍孙皓迫害，以本部兵马和西陵城向西晋武帝司马炎投降，并送侄子为人质，向西晋求援。司马炎任命步阐为卫将军，兵分三路予以支援：命荆州刺史杨肇进入西陵协防步阐，命车骑将军羊祜率五万军队进攻江陵，命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进攻建平。西陵是四川出三峡的第一站，也是东吴长江防线的最西站。它的沦陷，将动摇整个长江防线。陆抗抽调西线各处兵马，日夜兼程进围，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西陵。

到了西陵，陆抗不急着重攻城，而是命令各军在西陵外围构筑高墙，割断步阐和西晋援军的联系。筑墙的工程量巨大，时间又紧，东吴官兵昼夜筑围，非常辛苦。诸将多又怨言，纷纷劝陆抗说：“现在三军锐气正盛，可以速攻步阐，不等西晋救兵来西陵城就能攻下。何必大造围墙，浪费劳力和物资呢？”陆抗说，西陵城地处险要，之前又把城墙修得牢固无比，还储存了大量粮草和守城器械，都是陆抗亲自督办的。现在如果一味猛攻，不仅城池攻不下来，等西晋援军来了就要内外受敌，没法抵御了。宜都太守雷谭不听，言辞恳切，请求进攻。陆抗为了让大家了解实情，同意雷谭带部分军队攻城，结果大败而归。众将这才相信西陵是块硬骨头，转而抓紧修筑围墙，在西晋援军到来前将西陵城团团围住。

西陵战斗还胶着着，羊祜的五万大军到达江陵了。众将请求陆抗去江陵督战。陆抗再次力排众议，以为江陵的情况和西陵类似，城墙坚固，兵精粮足，西晋短时间内攻不下来。即使敌人占领了江陵，孤城也守不住，损失不大；如果西陵落到西晋手里，整个长江防线就破了，“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所以，陆抗坚持赶赴西陵督战。当年年底，西晋杨肇部终于抵达西陵，徐胤的水军也进抵建

平。陆抗分兵防守这两支敌军，还派人防备羊祜南渡、拦截徐胤水军顺流东下，自率大军依靠抢险修好的围墙与杨肇对峙，以待战机。

吴将朱乔、都督俞赞失去信心，叛逃晋军。陆抗说：“俞赞军中多旧吏，知道我军的虚实，我常担心某地防守有漏洞，敌人知道后肯定会先攻此处。”陆抗连夜撤换那处地方的军队，替换上精兵强将。第二日，杨肇集中兵力进攻那个防区弱处。陆抗指挥反击，打败晋军。僵持到年关将近，杨肇计穷，在夜幕掩护下逃走。陆抗怕追击后围城力量空虚，被步阐出城袭击，所以只擂鼓佯作追击。杨肇却被吓破了胆子，丢弃铠甲狂逃。陆抗只派出一队轻兵追击，竟然将晋军逼回四川。羊祜本来就是掩护军队，知道主力失败后主动撤兵。

西陵最终被西晋各军抛弃，陆抗开始督率军队猛攻狂打，很快就攻克了西陵，俘杀步阐及其部属数十人，全都诛灭三族。城内数以万计的胁从者被赦免。陆抗重新修治了西陵城池后，陈军东还。虽然胜利凯旋，陆抗却“貌无矜色，谦冲如常”，因功加拜都护。

凤凰三年（274年）西晋益州刺史王濬在巴蜀大造战船，训练水军。部分造船材料和木屑顺流而下，被东吴守军获得。吴建平太守吾彦取之以呈孙皓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当时陆抗已经病重，仍坚持上书说：“西陵和建平两城是国家的屏障。如果敌人泛舟顺流而下，瞬间就能到达这两地，我军根本来不及救援。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臣父陆逊曾以为西陵是国家的西门，若有闪失，非但失一郡，整个荆州都不再为东吴所有。如果西陵有事，我们当倾全国之力争之。臣所统地区方圆千里，四处受敌，外御强敌，内怀百蛮，内在已经弊端重重，羸弱不堪，难以待变。乞求朝廷加以充实，补足疆场受敌的损失，让臣所部兵马满员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如果军队不增，制度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憾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陆抗抱病直言，深深忧虑局势，隐隐中看到了东吴兵败国亡的命运。但强烈的责任感让他不能不犯颜直谏。可悲的是，孙皓对陆抗、吾彦的建议和

警告，一概不予重视。孙皓依然置之不理。陆抗在当年死去，从此东吴再无良将。

羊祜苦心经营荆州，志在灭吴。但陆抗在世时，他知道不容易成功，就没有发起进攻。陆抗一去世，羊祜便上疏请命伐吴。他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羊祜预测灭吴要比灭蜀容易。贾充、荀勖、冯统等人竭力反对伐吴。司马炎将伐吴之议搁置。羊祜闻讯感叹：“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天与不取，岂不令人抱憾！”咸宁四年（278年），羊祜抱恨去世，临终举荐杜预继任。

二

西晋内部在伐吴问题上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两派意见。贾充、荀勖等人明确反对伐吴，认为东吴有长江天险难以取胜，当年曹操率几十万得胜之师就大败而归。在之前的历史上，还没有人征服过长江天险。贾充、荀勖等人精于权谋，争权夺利是高手，却疏于大势，不是大气的政治家。他们这一派人掌握着中枢实权，和司马炎关系很近，所以在伐吴问题上占据了上风。

顺带说一句，西晋的天下由阴谋篡位而来，开国君臣并无经过征战磨砺。大臣中有很多贾充、荀勖这样的人，政治操守和素质都欠佳。

张华、杜预、王濬等伐吴派，一再上疏求战。咸宁五年（279年），益州刺史王濬上奏：“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西晋建立已经14年了，王濬等伐吴将领等待多年，实在是再经不起岁月的无情流逝。杜预也从襄阳七次上疏，尖锐地指出贾充等人既不同意出兵伐吴，又说不出用兵必败的理由，只因为一些大臣反对用兵就耽误天下统一大业，实在不应该。杜预的奏折递到之时，司

马炎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见了，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没有不想一统天下的皇帝，司马炎更是开国皇帝，本来就有意伐吴，如今被伐吴派一激，终于下定了伐吴决心。

当年，备战多年的晋军大规模伐吴。20万晋军水陆并举，杜预率荆州之兵在湖北渡江，司马伷、王浑等率军东出江淮，王濬率益州水军出三峡顺江而下。司马炎任命贾充为大都督，统帅伐吴各军。贾充缺乏军事才干，又对伐吴没有信心，推说自己年老体弱不肯受命。司马炎坚持不收回成命，说你如果不率兵出战，朕就要御驾亲征了。贾充无话可说，只好赴任。

各路晋军直扑东吴。却说荆州东吴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中间用粗大的铁链相连，封锁了江面。王濬的水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在船上载了无数根长数丈、麻油浇灌的火炬，点燃火炬后引燃竹排，用熊熊烈火烧断铁链。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荆州吴军斗志瓦解，在王濬和杜预水陆夹攻下望风披靡。杜预率军攻克江陵后，荆州郡县大多投降，杜预率军南下，王濬则挥军东进。在东边，太康元年（280年）正月，长江北岸已经能看到王浑所部晋军。孙皓这才慌张起来，急令丞相张悌等率兵三万渡江迎击。结果晋军大胜，张悌等人战死。吴国上下慌作一团，三月王濬的水军逼近建业，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万人抵抗，无奈吴军斗志全无，望旗而降。张象败后，孙皓还拼凑了2万人的部队，竟然在作战的前夜都逃亡了。至此，吴国无兵可战，首都建业被各路晋军团团围住。

东吴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投降的时候，孙皓耍了个小伎俩，分别遣使奉书于王濬、司马伷、王浑三处求降，企图挑拨离间从中渔利。离建业最近的是王濬、王浑两军。出兵前，司马炎规定王濬的水军在荆州受杜预的节制，到扬州后受王浑的节制。收到降书后，王浑以议事的名义要王濬停止进军。王濬不顾王浑的节制，在三月十五日

率部鼓噪进入建业，抢占了头功。孙皓面缚出降，东吴灭亡。西晋统一了全国。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专门描写东晋灭吴之役：“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孙皓投降前后，作为各路晋军统帅的贾充驻扎后方，对前线战况并不了解。王濬的大船都开进了建业，孙皓都投降了，贾充还上奏，认为春天来了，江南低湿，担心晋军爆发疾疫，建议立即班师。如果晋军战败了，“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奏疏递了上去，前方传来了吴国投降的捷报，贾充追悔莫及，怕司马炎怪罪，慌忙跑到洛阳请罪。司马炎也没有处分他。

孙皓投降后，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见面时，司马炎对他说：“朕设此座待卿已久。”孙皓回答：“臣在南方也没有等候陛下的座位。”一旁的贾充想献媚，故意揭孙皓的短，想让他难堪：“听说您在南方凿百姓双眼，剥百姓头皮，这算是什么刑罚？”他以为孙皓必定惭愧请罪，不料孙皓冷言相向：“我这是用来惩罚那些弑君的叛逆的。”这句话反倒戳到了贾充的痛处。他不就是杀害曹髦的元凶吗？贾充顿时满面羞惭，无言相对。司马炎也没有处分孙皓，一笑了之。

司马炎虽然是西晋的开国帝王，统一了大乱分裂近90年（194年至280年）的神州大地，但靠的是祖父和父辈奠定的政治基础，靠的是北方强大的经济基础。他本人就是个平常之人，没有过人的胆略，也谈不上有什么才华。重臣何曾对家人评价司马炎：“吾每宴见，未尝阅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

还有一个段子，说司马炎曾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与汉朝哪一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客气地答道：“汉桓帝、汉灵帝。”司马炎见刘毅将自己比作东汉昏君，大为惊奇：“我还不至于那么差吧？”刘毅答道：“桓灵二帝卖官鬻爵，可钱进了国库，陛下却将卖官的钱占为私

有，如此相比，恐怕你还不如桓灵。”刘毅的指责十分尖锐，司马炎也没有生气，反而笑道：“桓灵时没有人说这话，如今朕有直臣，远胜于他们了。”可见司马炎还是比较宽容开明的，能听得进谏言，可惜左耳进右耳出，听了以后没有行动。

总体来说，司马炎资质平常，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后重新统一，恰恰需要一个不折腾、安静治国的守成之君。司马炎的个性宽松和政治上的无为，适应了现实的要求。南北统一和若干经济恢复措施，使西晋初期的社会经济逐年增长，国家赋税收入逐渐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从西晋灭吴的太康元年（280年）到司马炎临死前一年、太康十年（289年）的这十年，也被艳称为“太康繁荣”。

十一、太子是个白痴

西晋初年，全天下都知道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

司马衷的白痴是先天性的，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正常的白痴。他从小就不会正常走路，快10岁了还口齿不清，分不清楚大豆和大米的区别，更谈不上读书写字了。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司马衷白痴到了什么程度：

第一件事是说在一年的夏天，成年以后的司马衷带着随从到华林园去游玩。走到一个池塘边，一行人听到池塘里传出咕咕的青蛙叫声。司马衷觉得很奇怪，于是便问随从：“这些咕呱乱叫的东西，是为官呢还是为私？”随从们听到这样的问题，心里觉得好笑，可嘴上又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也许是其中一个随从对司马衷的白痴问题习惯了，急中生智说道：“在官家里叫的，就是为官的；若在私家里叫的，就是为私的。”司马衷觉得很有道理，频频点头。

第二件事情说的是一年天下灾荒，饿殍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出现许多饿死的人。在朝廷上，自然有大臣议论起这件事情来。司马衷突然发问说：“这些人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大臣们哭笑不得。但对于司马衷来说，米饭和肉都是他日常吃的，现在没有饭吃了，为什么不去吃肉呢？

这么一个明显弱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怎么就成为太子了

呢？

司马衷是司马炎和杨皇后嫡生的次子。司马衷的哥哥司马轨早夭，司马衷很自然地成为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他被立为太子时，只有9岁。史书上没有任何有关司马衷立太子争议的记载。也许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还没有接触朝廷大臣，而且太子年纪也小，反应迟钝一点也并不被视为大事情，所以群臣没有就司马衷被立为太子一事提出疑问。同时司马衷的生母是皇后，正得到司马炎的宠爱，大臣们也没有人公开反对。随着司马衷开始长大，难以掩饰的智力缺陷暴露了出来。人们不禁在心中发问：太子将来能否胜任天子宝座？是不是应该及时更换太子？

最先对司马衷的能力提出怀疑的是他的父亲司马炎。

史载：“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可见司马炎认为自己的这个儿子胜任不了统治天下的重任，曾经悄悄地和皇后透露了想更换太子的意思。但是杨皇后非常袒护司马衷，劝丈夫说：“自古以来，立嫡长子，而不考虑其能力高低。这样的老规矩怎么能更改呢？”晋武帝的另一个宠妃赵氏得到了杨皇后的好处，也跟着为司马衷说好话：“太子司马衷只不过是幼时贪玩，不长进。小时候就显露出超常能力的人毕竟是少数。太子将来必大器晚成，继承大统。”耳朵根软的司马炎被枕边风一吹，也就打消了更换太子的意思。

朝野大臣对司马衷也不满意，希望更换太子。

咸宁初年（275年），司马衷到了出居东宫的年纪，开始接触外廷大臣。随着太子独立建立东宫，朝野对其能否治理国家的怀疑越来越重。咸宁二年（276年），晋武帝患病，病情还挺严重。朝野一度开始考虑最高权力转移的问题。多数人属意于司马炎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希望以司马攸来取代弱智的司马衷。齐王妃是贾充的长女。河

南尹夏侯和就对贾充说：“你的两个女婿（司马衷也是贾充的女婿），亲疏相等。但是‘立人当立德’，希望你能够参与更立太子的行动。”贾充默默不答。后来晋武帝病愈了，听说这件事，将夏侯和调任为有名无实的光禄勋（原来的河南尹掌握首都及周边地区的政权），并夺去了贾充的兵权，公开表示对太子司马衷的支持。司马炎如此处理，一时间朝野上下不敢再提太子能力的问题。

就在大多数朝臣明哲保身，对太子一事默不作声的时候，少数几位重臣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劝谏，试图让司马炎相信司马衷能力太差，实在不是做皇帝的料。有着灭蜀大功的卫瓘就是其中之一。史载：“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钝质，不能亲政事。”卫瓘很想劝皇帝废掉太子，但每次想开口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和话题。后来有一次司马炎在陵云台举办君臣宴会，卫瓘装着大醉的样子，就势跪在晋武帝的榻前说：“臣有些话想启奏皇上。”晋武帝就说：“你想说什么呢？”卫瓘三次都欲言又止，最后只是用手抚着晋武帝的座位说：“此座可惜了啊！”晋武帝非常聪明，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将错就错地说：“你真的是喝得大醉了。”卫瓘从此闭嘴，不再就太子废立一事说话。侍中和峤是另一位勇敢提出太子废立意见的大臣，只是他采取的形式非常直接。和峤怎么看司马衷都觉得是一个白痴，就趁自己经常陪侍皇帝左右的时候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这是好事；但是现实是非常复杂的。恐怕将来就不仅仅是陛下的家事。”司马炎闻言，采取的对策是默然不答。

大臣们的劝谏多少还是对晋武帝产生了影响。他对群臣的意见虽然可以视而不见，或者采取间接的手段打压下去，但他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帝王，不可能在关系到子孙后代、帝王万世之业的事情上马虎从事。没有比他这个父亲兼皇帝更明白司马衷的实际情况。司马炎决定再测试一下已经长大的太子的实际能力。

司马炎测试方法就是派遣几位朝臣去考察太子，看太子能否承担统治大任。他选中的朝臣是和峤、荀顗、荀勖三位侍从近臣。司马

炎说：“太子近日入朝，我看他有所长进，你们三人可以一起去拜访太子，谈论世事，看看太子的反应。”三个人就按照皇帝的吩咐去做了，回来的时候荀顗、荀勖两个人都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没有问题。和峤则说：“圣质如初耳！”（还是和以前一样白痴。）司马炎很不高兴，离席而去。

司马炎决定亲自试验一下太子，考考傻儿子处理政务的能力。一次，晋武帝将东宫大小官属都召到身边来，为他们举办宴会。暗地里，司马炎密封了几件疑难的政务，让人送去给太子处理。他的想法是：我已经将太子身边所有的人都支走了，现在就只能由太子自己来处理这几件疑难问题了。如果处理得好，就证明了太子的能力没有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是太子无能了。

司马衷连五谷都分不清楚，哪能处理疑难政务，只能呆呆地看着父亲送来的文件。正当他要空白纸送还给父亲的时候，太子妃贾南风非常害怕，忙找了外人来做“枪手”，帮傻丈夫作答。估计她请来的是迂腐的学者，在回答的时候旁征博引，义正词严，慷慨激昂。贾南风看了回答，非常满意。但是给使（宫中的侍从）张泓在旁边看了以后，提醒说：“太子不学无术，这是皇上非常清楚的事情。现在的答诏广泛引用，文采飞扬，皇上肯定怀疑是否是太子亲自写的，并且追究作弊的人，根本过不了关的。还不如直接用大白话把问题给说清楚呢。”贾南风大喜，忙对张泓说：“来，你帮我好好回答，成功了与你共享富贵。”张泓平素有些小才，现在用大白话把所有疑难都说清楚了，再让太子抄写一份。

司马炎看了太子抄的张泓的答案，觉得虽然用语简陋粗浅，但还是将所有问题都谈到、谈清楚了，很高兴。他先将太子“处理”的政务交给太子少傅卫瓘看。卫瓘先是非常吃惊，进而异常惶恐。大家都知道卫瓘先前有废立太子的意思，现在见此，忙称万岁。事后，贾充曾暗地里派人告诉女儿贾南风：“卫瓘老奴，几破汝家。”从此，司马炎对司马衷基本感到满意。废立太子的风潮再也没有出现过。

司马衷太子的位置得以巩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生了一个好儿子司马遹。司马炎非常喜欢孙子司马遹，这为司马衷太子之位的巩固加分不少。皇孙司马遹乖巧聪慧，司马炎一度想将皇位传给司马遹，因此易换太子的想法也就更加淡薄了。

西晋之后有传闻说司马遹其实是司马炎的私生子，所以司马炎特别喜欢司马遹，同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也为了传位给私生子，所以才巩固了白痴儿子司马衷的太子之位。

这得从司马遹的生母谢玖说起。谢氏容貌清秀，美丽大方，很小就被选入晋武帝后庭做才人。司马衷9岁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朝廷就开始准备挑选太子妃的人选了。“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也就是说，司马炎怕自己的白痴儿子不知道儿女之事，决定先派个人给司马衷性启蒙。司马炎挑选的就是自己身边的才人谢氏。谢才人陪伴司马衷一晚，就怀孕了。性情残忍嫉妒的贾南风成为太子妃后对东宫的嫔妃随意杀戮，独独对谢才人不敢胡来。谢才人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请求回到了司马炎身边，然后生下了司马遹。司马炎对司马遹非常宠爱。几年后，司马衷进宫朝见父皇，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和自己的几个弟弟一起玩耍，非常可爱，便走过去拉着那个小孩傻笑起来。晋武帝远远望见，走到司马衷跟前，对司马衷说：“这是你的儿子啊。”这段事情被记载在《晋书》中，引来了后人无数的猜疑。

二

除了司马衷这个白痴外，难道司马家族就没有其他智商正常、能力出众的政治继承人了吗？

有。那就是司马炎“明德至亲”的胞弟、齐王司马攸。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声名良好，“才望出武帝（司马炎）之右”，不论血统还是能力都有继位的资格。司马

炎的儿子不行了，为什么不传位给亲弟弟呢？

齐王司马攸是晋武帝司马炎同父同母的弟弟。当年，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见哥哥司马师没有儿子，就把自己的二儿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做儿子。后来，司马师逝世了，司马昭掌权成为晋王，其间多次想把二儿子司马攸立为世子。当时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都拍着自己的座位亲昵地用小名招呼二儿子说：“桃符，这是你的座位啊。”史载司马攸“几为太子者数矣”。

司马昭老的时候，一度非常想把自己的权力重新转移给哥哥司马师一系，也就是传给司马攸。说到底，传给司马攸也就是传位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司马昭非常希望能够见到这样的结果。但是左右亲信何曾、贾充等人死死劝谏司马昭说：“中抚军（指在魏国担任中抚军、新昌乡侯的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他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他们坚决反对将权力转移回司马师一边。司马昭见亲信反对，加上司马炎毕竟是嫡长子，能力也不错，最终打消了以司马攸为继承人的念头。但是在司马昭临死的时候，他还挣扎着向司马炎、司马攸兄弟讲解汉朝淮南王、魏朝陈思王与当兄长的皇帝之间不相容的故事，劝诫二人友爱相扶。司马昭更是拉着司马攸的手让司马炎好好对待弟弟。

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临死的时候，也流泪对司马炎说：“桃符性急，而你又不慈爱。我死后，恐怕你们兄弟不能相容。希望你这个当哥哥的能够友爱自己的弟弟，勿忘我言。”

司马炎成为晋武帝后，封齐王司马攸“总统军士，抚宁内外”。司马攸在政治实践中立了许多功劳，威望越来越高。司马攸对晋朝以及自己封地内的官吏、人民恩养有加，“时有水旱，百姓则加振贷，十减其二，国内赖之”。他做人“降身虚己，待物以信”，并不时劝谏晋武帝务农重本，去奢即俭。到了司马炎的晚年，各位皇子年弱无力，而太子司马衷又是明摆着弱智。朝臣内外大多属意于齐王司马攸继位。

司马炎的确像父母担心的那样，对人不够宽容，即使是对亲弟弟也一样。司马攸的功劳和威望的增加让司马炎总觉得是对自己的威胁。他并不希望将皇位传给弟弟。当时晋武帝左右一些反司马攸的大臣则抓住皇帝的心思，进行了迫害司马攸的活动。中书监荀勖、侍中冯^铄等人害怕晋武帝死后司马攸继位，对自己不利，就老在晋武帝耳边说司马攸的坏话。他们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晋武帝大惊，问：“为什么？”荀勖就乘机说：“朝内朝外官员都归心于齐王，太子又怎么能得立呢？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假装下诏书让齐王回到封地去，肯定会出现举朝以为不可的局面。”冯^铄也进一步说：“陛下让诸侯归国，这是国家制度。亲人理应遵守。皇上至亲莫如齐王，他应该首先响应命令离开京城回自己的封地。”晋武帝对弟弟的猜忌被这几个人的话语给挑逗了起来，认为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下诏令，先是把济南郡划入齐国封地，增加了弟弟的封地，再是封侄子、司马攸的儿子司马遹为北海王，又赠六楸之舞、黄绒朝车等仪物，最后命齐王司马攸回封地就藩。

诏书下达后，朝中王浑、王骏、羊琇、王济等一帮大臣纷纷切谏。大家认为齐王是皇上至亲，应该留京辅政。一些大臣还抬出司马昭、皇太后的遗命，引经据典，劝晋武帝收回成命。司马炎不听，认为“兄弟至亲，今出齐王，是朕家事”。

齐王司马攸当时正在生病。他知道哥哥猜忌自己，也知道荀勖、冯^铄等人于自己不利，就上书乞求去为死去的生母王太后守陵。司马炎不允许，还连下诏书催促。眼见催促就藩的诏书一道比一道急，司马攸急火攻心，病势加剧了。司马炎却更加怀疑弟弟是在装病。为了查明弟弟是否真的生病了，他不停地派宫中御医到齐王府诊视。御医们久在皇帝身边，自然知道晋武帝的心思。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回宫后都禀告说齐王身体安康，并没有生病。司马炎自然是相信弟弟在装病，对司马攸越来越不满了。

司马攸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司马炎催促上路的诏书一天比一

天多，一道比一道严厉，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司马昭夫妇生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司马攸性情刚烈，见事情无法挽回，就挣扎着换上一身新朝服，梳洗穿戴停当，入宫面辞晋武帝。他虽然病得连路都走不稳了，精神疲惫到极点，却还强装着仪表，举止如常。晋武帝见了，更加认定弟弟是在装病了。在宫中，兄弟二人例行公事，司马攸辞行回封地去了。没几天，病入膏肓的司马攸就在路上吐血身亡，年仅36岁。

司马炎接知齐王的死讯，才知道司马攸不是装病，真的是病死了。他不禁悲从中来，恸哭不已。毕竟齐王是自己的至亲。冯^铄却开导司马炎说：“齐王矫揉造作，聚拢天下人心。现在他暴病身亡，是社稷之福。陛下不必如此哀痛。”司马炎想想，被说中了心坎，也就停止了哭泣。

朝廷为齐王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临丧之时，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冏伏地嚎哭，控诉御医指证父亲无病，耽误了诊治。司马炎脸面无光，也就顺坡而下，处死了先后派去为齐王诊病的御医。一场皇位继承的较量就以司马攸的彻底失败告终了。

三

在太子位更易的较量中，司马炎是胜利者。但是没有出场的司马衷也是胜利者，而且是更大的胜利者。

白痴司马衷太子之位的确立和巩固，是许多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杨皇后对晋武帝的劝告，贾充及其党羽对司马衷的支持，太子妃贾南风的精明，皇孙司马遹的聪慧等等。但是晋武帝司马炎作为决策者本身构成了最大的原因，要为白痴皇帝的出现承担主要的责任。司马炎受主观意愿的影响，偏听偏信。一方面，他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使看到了儿子的弱智，也下不了更换的决心。在后宫妃子

的鼓动下，他从心里巩固了司马衷的太子地位。另一方面，即使面临着更优的选择，司马炎出于阴暗心理，排斥他人，只相信自己一脉的继承者。

很奇怪的是，司马衷自己却毫无作为，轻易地成为太子并巩固了地位。也许他对周边的这一切明争暗斗都毫无感觉，但是他的出身和婚姻关系却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在中国古代根植于血统原则的世袭制度下，皇位继承就是如此的有趣。它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和威望，而完全是基于血缘的身份。即便有人想改变血缘的强硬标准，也很难阻止像司马衷这样的白痴成为新的皇帝。

司马炎强迫齐王司马攸就藩的时候，驸马王济除了自己陈情外，还和另一个驸马甄德一起发动各自的妻子，也就是公主入宫规劝父皇司马炎收回成命。面对哭泣的女儿们，司马炎发怒说：“朕和齐王是兄弟至亲，齐王就藩是朕的家事，甄德、王济怎么能屡次让老婆来哭哭啼啼的！”王济是司马炎非常喜欢的女婿，才气逼人，招人喜欢，如今也因为这件事情被贬官外放。

不久，司马炎又想召回心爱的女婿，就对和峤说：“我想痛骂王济一顿，然后给他加官晋爵，如何？”和峤提醒他，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结果，司马炎还是召回了亲爱的女婿王济，痛骂了他一顿，然后问他：“你惭愧吗？”王济回答：“民谣说，哪怕只有半尺布一斗粟，兄弟也要共同分享。每次我听到这句民谣，就为陛下感到可悲。其他人能令亲友疏远，臣不能使陛下兄弟亲爱，感到有愧于陛下。”司马炎闻言，采取了一贯的应对方法：默然不语。

十二、斗富大赛

西晋武帝和惠帝年间，洛阳城里有一个高调的超级富豪，叫做石崇。

一个人是不是富豪，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也不是由他的银行存款数目决定的。富豪是从比较中产生的。那个衬托出石崇富裕程度的冤大头，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父、贵戚、后将军王恺。

王恺饭后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长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砌墙。反正石崇什么都不求最好，只求比王恺家的“更好”。石崇和王恺长期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石崇在三件日常生活小事上长期赛过王恺，让王恺很不爽。第一件事情是豆粥很难煮，石崇招待客人的时候，想吃豆粥，只要吩咐一声下人就能把豆粥端上来。王恺家就做不到。第二件事情是即使是在冬天，石崇家也能吃到绿莹莹的韭菜碎末儿。石崇家仿佛有蔬菜大棚，能够生产反季节蔬菜。第三件事情是石崇和王恺出游的时候，暗中较劲看谁能先返回洛阳城。石崇家驾车的牛跑得像鸟一样快，每回都把王恺远远甩到后头。王恺在这三件事情上老输给石崇，觉得特别没面子，又找不到原因，就暗中买通了石崇的一个家人追问原因。石崇的下人揭秘说：“大豆的确很难煮成粥，石家事先将大豆煮熟研成末保存起来，等客人来的时候，把豆末投入白粥，就成了豆粥。冬天吃韭菜末并非全是韭菜，而是混杂了韭菜根末的麦苗碎。牛车的快慢，全靠驾车者，

石家的驾车者从不约束牛，听凭牛撒开蹄子跑，所以跑得快。”王恺知道秘诀后，照搬到自己家来，于是在以上三件事上都能和石崇一争高低。石崇发现后，恼怒得很，查遍所有原因才发现是下人走漏的消息，气得把下人杀了。

晋武帝司马炎知道石崇和王恺斗富后，决定帮助舅父王恺打败已经占有优势的石崇。

司马炎可是拥有全天下的财富。他从皇家的珍藏中挑选了一株珊瑚树赐给王恺。那珊瑚树高二尺许，枝条繁茂，树干蔓延，世所罕见。王恺获得如此珍宝，大肆渲染，遍示众人。石崇也跟着大家到王家去参观御赐珊瑚树，只见他拿起一个铁如意就砸向珊瑚树，珊瑚树应声而碎。王恺惋惜极了，又认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宝贝，声色俱厉地斥责石崇。石崇漫不经心地回答：“这有什么可惜的，我现在就还给你。”石崇吩咐下人把自家珍藏的珊瑚树都搬到王恺家来。结果原本是王恺举办的“珊瑚展览”变成了石崇的“炫富大会”。石崇珍藏的珊瑚树单单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株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像司马炎赐给王恺那样的珊瑚树都算是小的了。石崇爽快地告诉王恺，看上哪株就搬走，咱俩还谁跟谁啊？

经过如此惨烈的一役，王恺不得不承认石崇比自己富裕。其他人更是甘拜下风。石崇的“西晋首富”的桂冠算是摘取了。

超级富豪的生活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比如他们压根就不和人群住在一起，而是自己开辟出一片土地来造城堡、建庄园。石崇就在洛阳城外洛河北边的“金谷”造了别馆，取名“梓泽”，一般的迎来送往和交往应酬都在里面举行。石崇圈了好大一块地，有山有水有良田，依照地势高低筑台凿池，建筑了百丈高的崇绮楼，高到“极目南天”的地步。在园子里，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生活享受极尽奢华，“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总之是晋朝人能够想到的吃穿住行、山珍海味和乐器玩具都能在石崇家找到。

石崇养了数以百计的美女。这些美女都穿着刺绣精美无双的锦缎，装饰着璀璨夺目的珍珠美玉宝石。石崇要求侍女都要嘴含异香，以便讲话的时候能够让话语喷香扑鼻。石崇又在象牙床上洒沉香屑，让所宠爱的姬妾踏在上面，没有留下脚印的赐宝珠一百粒；留下了脚印的人就要节制饮食，以使体质轻弱。

石崇这个首富当得太高调了，连晋武帝司马炎都很好奇，很想到石崇的别馆里看看究竟。为了不至于被石崇比下去，司马炎在穿着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他把外国进贡的火浣布制成衣衫，穿着驾临石崇家。到了石家，石崇的衣服倒是非常平常，但是石家的下人家奴五十人都穿着火浣布做的衣衫。

大臣刘寮出身贫寒，小时候砍过柴喂过猪，长大后位列公卿还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走路上班，骑马出行，到别人家做客能自己动手的绝不劳费他人。一天，刘寮去石崇家做客，想上厕所了，就自己找了过去。他推开一扇看似厕所的屋子的门，差点没被里面的香气给熏出来。刘寮定睛一看，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里面摆放着绛色的蚊帐，精美的垫子、褥子和各式香水、香膏、香袋，屋里还有十多个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的婢女列队侍候。刘寮还没反应过来，这些婢女就拿着漂亮的衣服迎上来，要给他换衣服。刘寮赶紧退出来，转身遇到石崇。刘寮苦笑着说：“抱歉抱歉，我误入了你家的卧室。”石崇回答：“刘大人搞错了，那是我家的厕所。”

二

现在的问题是：石崇的财富是怎么来的？

《晋书·石崇传》只有一句话涉及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说的是石崇在荆州刺史的任上“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想象一下，荆州地区的最大长官，竟然指使人抢劫远方的使节和过境的客商，以保护者身

份行强盗之实，那将是怎么样的情景？石崇这个荆州刺史都公开上路抢劫了，更别说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等小儿科的腐败行为了。荆州辖有现在的湖北、湖南地区，东汉末年刘表占据这块富庶之地割据数十年，如今石崇在荆州搜刮地皮多年，自然是赚饱赚足了。

除了荆州刺史，石崇一生宦海沉浮，担任过职务无数，许多还是辖地管人的肥缺，其中不乏捞钱的机会。我们可以看看石崇的为官履历。他在20岁出头就担任了修武县令，很快就被召为散骑郎，镀了几天金就荣升城阳太守，很快又因为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不知道石崇在伐吴时立下了何功？城阳在今山东江苏沿海，距离前线还有段距离，石崇这个城阳太守可能为西晋的水师提供了若干后勤支持，也可能是伐吴成功司马炎大封功臣中的一员而已。其间，石崇因病辞去太守职务，没过几天又被任命为黄门郎，很快被提拔为散骑常侍、侍中。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石崇担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又加鹰扬将军衔；然后出任太仆，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最后返回朝廷担任卫尉，与潘岳等人投靠贾皇后。贾氏出行，石崇只要遇到了，都主动下车让路，对着贾氏扬起的尘土叩拜。《晋书》直指石崇“其卑佞如此”。

像石崇这样没有政绩却劣迹斑斑，没有操守且人品低下的人，为什么在西晋王朝屹立不倒、官运亨通呢？

石崇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那就是西晋的勋贵权戚群体。

石崇的父亲石苞，在晋武帝时曾官至大司马。石崇凭着父亲的光环进入仕途。在传记中，石崇多次提到“先父之恩”、“先父勋德之重”。西晋初年有许多石崇这样的贵戚子弟。司马家族出于招揽人心，篡夺天下的考虑，对权贵和皇室成员采取了宽松优厚的笼络政策，造就了整整一个勋贵权戚群体。石崇只是其中一员而已。

西晋王朝可算是中国历史上获得天下最容易的朝代。西晋的建立是司马家族从一个阴谋走到另一个阴谋的成功过程。从高平陵政变司马懿扫除曹爽势力开始，司马家族再也没有遇到大的危机。之后除了忠于曹魏王朝的势力在扬州发动了两次反对司马势力的起义外，整个曹魏王朝相对平静地被司马家族篡夺了。曹魏的大臣和精英分子们集体转向司马家族，得到的是司马家族对他们世代高官厚禄的回报。

曹魏的建立者曹丕和西晋的建立者司马炎都是继承家族遗产，逼前朝把天下禅让给自己的。不同的是，曹丕亲身经历了东汉末年的乱世，本人还在乱世中奋斗过；而司马炎则完全是在富贵乡中塑造出来的，他不知道创业的艰辛和天下的疾苦。因此，司马炎及其时代是一个弥漫着安乐和享受的时代，是石崇和王恺等贵戚斗富、皇帝在一旁助阵的时代。盘旋在西晋王朝顶端的是一群和社会现实和普通百姓相对脱节的“食利者阶层”。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就是荣华富贵来得非常容易。许多人是含着金汤匙降生，富贵唾手可得。他们没有经历过创业的艰辛，没有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经历，甚至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权谋斗争，可他们却把持着一个朝廷，是西晋王朝开创时期的领导阶层。

食利者的荣华富贵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注定他们不会珍惜，只会率性地挥霍。

比如石崇就有两次看似荒诞的罢官经历。一次是石崇被征为大司农，他得知后没等征书到手就擅自卸去了原来的官职，被罢官。还有一次是石崇去徐州监督军事，到任后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被免官。一般人看似再普通不过的职业规则，懒散的石崇都做不到，难怪要被罢官了。可人家不怕，反正过几天马上会被官复原职，说不定还会加官晋爵，石崇就是再被罢官几次也无所谓。谁让他是“食利者阶层”呢，不需辛劳就能坐享其成。

于是，“食利者阶层”的奢侈和挥霍也可以理解了。西晋王朝，社会风气“性奢豪，务在华侈”，权贵人家“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

味，过于王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西晋墓葬，规格和陪葬品比曹魏时期突然高出了一大截，出现了“厚葬”风气。太康六年（285年）王恺去世的时候，葬在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长四十五里，松柏茂盛。

晋武帝司马炎本人就生活奢华，带了一个坏头。据说司马炎后宫佳丽数万人，他难以选择宠幸哪位佳丽，经常乘着羊车到处转悠，拉车的羊停到哪里司马炎晚上就临幸哪位佳丽。

司马炎分别和太原王家和琅琊王家联姻，把公主嫁给了太原王家的王济和琅琊王家的王敦。王济也是巨富。当时洛阳地价极高，王济却有能力和在洛阳买地做大型马场。别人的马场用黄沙铺地，王济则用金银铜钱铺地，王家马场因此被称作“金沟”。有一次，司马炎临幸女婿家。王济家百余名婢女穿着绫罗绸缎伺候司马炎，所有的供饌都盛在琉璃器里——当时琉璃还只能通过西域从西方进口，普通人家能有一两件小琉璃玩意就了不得了。司马炎对这样的排场都自叹不如，心里很不是滋味。吃饭的时候，司马炎觉得王家的猪肉蒸得非常鲜美，就问女婿是怎么做的。王济轻描淡写地说：“猪崽是用人乳喂的。”司马炎闻言，大惊失色，放下碗筷拂袖而去。

琅琊王家的发达晚于太原王家，同是驸马的王敦当时还比较贫寒。一天，王敦进宫，找厕所方便。他发现厕所里有一个装饰漂亮的漆箱，好奇地打开一看，发现里面装着大红枣，闻闻还有淡淡的香味。王敦大为感慨，到底是帝王之家啊，连厕所里都摆放果品。于是，他一边方便，一边把箱子里的红枣都消灭了。这事很快传为洛阳城里的笑谈。原来，那红枣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塞鼻防止异味的。王敦不知道许多富贵人家都在厕所里放红枣，专用名是“厕枣”。

西晋社会的豪奢，到达了这样的程度。

西晋王朝的短命，和“食利者阶层”的不珍惜和任意挥霍行为大有关系。

话说曹魏王朝对皇室成员限制非常严格。曹操、曹丕父子都有多疑的毛病，对同族兄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曹丕对弟弟曹植的防范，尽人皆知了。其实不但是曹植，曹魏王朝对所有诸侯王和皇室成员都严密控制，不允许他们带兵、干政。诸侯王围猎甚至扩充数量极其有限的卫队都需要报告朝廷。西晋王朝对此大不以为意，认为曹魏王朝的覆灭和对皇室成员的严格限制大有关系，因此厚待司马皇族，广植诸侯王。西晋的皇室诸王有封地有军队，发号施令，权力大得很。司马氏诸王也是典型的“食利者”。他们脑子里除了享受荣华富贵，就是追求更大的荣华富贵，最后同室操戈，爆发了“八王之乱”。

而石崇最后也死于他高调的富豪生活。

石崇原本依附贾氏。“八王之乱”初期，贾后被诛，石崇因为是贾氏一党而被罢官。石崇一点都不担心，罢官后依然在他的安乐窝里过着高调的奢华生活。赵王司马伦、孙秀等人一度专权。孙秀听说石崇的宠妓绿珠美艳，派人来求。石崇勃然大怒：“绿珠是我的，不能给别人。”孙秀派了几次使者，石崇都不给。孙秀大怒，刚好石崇的外甥欧阳建和司马伦有隙，孙秀就劝司马伦诛杀石崇、欧阳建。石崇则与潘岳、欧阳建暗中联络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对付司马伦、孙秀，事败被杀。

武士来抓石崇的时候，石崇还在高楼上歌舞欢宴。武士冲到了门口，石崇还满不在乎地说：“我不过是流徙交州、广州而已。”长期的“食利者”心理让他连最基本的危险意识都丧失了。结果，石崇全家，包括老母、兄弟、妻子、儿女15人，无论长幼辈都被杀。石崇时年52岁。他的巨额珍宝货贿、田宅奴仆都被罚没。

临刑前，石崇叹道：“这是小人贪图我的家财。”行刑者反问

他：“你既然知道多财害命，怎么不早散之？”石崇哑口无言。

十三、悍妇乱政不得了



在司马衷的一生中，贾南风的身份是妻子，但更像是司马衷的幕后操纵者。

贾南风是西晋开国功臣贾充的女儿。太子司马衷要娶亲的时候，许多人推荐贾充的女儿。晋武帝司马炎则想为傻瓜太子娶另一个功臣卫瓘的女儿为妃子。他告诉杨皇后：“卫家的女儿和贾家的女儿，优劣实在是泾渭分明。贾家夫人好妒残暴，生子不多，生的女儿又黑又丑、身材短小。卫家夫人贤惠，多子多孙，生的女儿白皙漂亮，身材修长。你说该选谁呢？”但是杨皇后平时被贾氏及其党羽包围，收了很多好处，听了很多好话，坚持要娶贾氏的女儿。大臣荀^顗、荀勖两人又在外边起哄，说贾充的女儿贤惠美丽。司马炎考虑到贾、杨、荀等家都是朝廷的支柱重臣，这才改变主意，决定迎娶贾充的女儿。

一开始，司马炎选择的是贾充的小女儿、12岁的贾午。可是贾家女儿长得太小了，贾午连结婚礼服都撑不起来。没办法了，新娘换成了15岁的姐姐贾南风。就这样阴差阳错，贾南风嫁给了比自己小两岁的司马衷，成了皇太子妃。

事实证明杨皇后、荀^顗、荀勖等人完全是瞎扯。贾南风身材矮小，面目黑青，鼻孔朝天，嘴唇朝地，眉后还有一大块胎记，完全和“美丽”两字不沾边。从她日后的表现来看，贾南风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贤惠”两个字。贾南风的母亲郭氏是有名的悍妇和醋坛子，看到

丈夫贾充俯身抚摩保姆怀中的孩子就以为丈夫和保姆关系暧昧，竟然杀了保姆。她连续杀了两个保姆，两个亲生儿子因为找不到保姆而夭折了。贾充被郭氏管得服服帖帖的，连女人都不敢多看一眼。贾南风深得母亲郭氏真传。

史载结婚后，贾南风“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进幸者”。她不仅其貌不扬，而且生性残酷。当时东宫中有一些宫女已经怀了太子司马衷的孩子，贾南风就用戟投掷孕妇的腹部，怀孕的婴儿就随着刀刃堕地。据说贾南风还亲手杀掉左右侍女数人。贾南风又爱吃醋又有手段，将司马衷弄得服服帖帖的，其他宫妃都很难接触到司马衷，成为东宫一霸。

晋武帝知道情况后，开始觉得贾南风不宜做太子妃。

当时的皇后是司马衷生母杨皇后的堂妹杨氏。杨皇后临终前曾请晋武帝迎娶她的堂妹。晋武帝流着眼泪答应。于是出现了新的杨皇后。这位新的杨皇后继承了堂姐对晋武帝的掌控能力，也继承了堂姐与贾家的良好关系。晋武帝又是先将有意废除贾南风太子妃地位的想法告诉了杨皇后。新的杨皇后忙劝晋武帝：“贾充有大功于社稷，是朝廷重臣，其家即使有罪也应再三宽赦，更别说他的亲生女儿了。太子妃现在还太年轻，正是嫉妒任性的时候，皇上不该以其小过掩其父大德。”晋武帝的毛病就是很容易被枕边风吹倒，这次又很容易地打消了废贾南风的主意。外戚杨珧在这件事情上也起到了巨大作用。他提醒晋武帝说：“陛下忘贾公闾耶？”意思是提醒皇帝不要忘记了贾家在帮助司马家篡夺曹魏政权上的功劳。最后废太子妃之事不了了之。

可见，贾南风因为晋武帝的优柔寡断和父亲贾充在西晋政权中的显赫权势坐稳了太子妃的地位。于是司马衷继续害怕她，又受她的诱惑，离不开她。太熙元年（290年）4月，晋武帝去世，太子司马衷即皇帝位，是为晋惠帝。贾南风顺理成章被册封为皇后。晋惠帝依然黯弱无能，很自然地，国家政事都由贾南风干预。

如果说晋武帝在世的时候，贾南风还不敢太过分张扬，压抑着自己的欲望。那么现在司马衷即位了，贾南风将欲望和所有的劣性都暴露了出来，而且是彻底地暴露了出来，在历史上写下了许多不堪的记录。

首先是在个人作风上，贾南风广树面首，将后宫弄得乌烟瘴气。

《晋书》记载贾南风荒淫放恣，与太医令程据等人淫乱宫廷。后来她不满于朝廷的面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民间。洛南有个盗尉部小吏，容貌端庄漂亮，可惜只是衙门的厮役而已。突然有一天，这个小吏披金戴银，出手阔绰起来。这在官场中是很显眼和招人嫉妒的事情。于是很多人就怀疑他暗中盗窃财物，主管的尉官也怀疑这个小吏是盗贼，将他捉拿起来侦办。刚好贾南风一个亲戚家里被盗了，听说抓了盗贼，就过来旁听审讯，希望能挽回损失。审讯的时候，小吏坦白说：“之前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姬。她说家里有人得了疾病，占卜师说要找一个城南的少年来驱病，所以她想暂时麻烦我去帮忙治病，还说必有重报。于是我就跟着去了，上车下帷，藏在簏箱中，大概走了十几里路，过了六七道门，簏箱才被打开。我忽然看到楼阁好屋，华丽壮观。我就问这是什么好地方，旁边有人说是天上，还用香汤给我洗浴，供应我好衣美食。我又见到一个年纪大约有三十五六岁的妇人，身材短小，皮肤青黑色，眉后有疵。她挽留了我好几个晚上，共寝欢宴。临走的时候，是这个妇人送我这些东西的。”审讯的官员和贾南风的亲戚听到坦白后，都知道是贾皇后招这个少年去宫中偷欢了，惭笑而去。尉官也了解其中玄妙，将这个小吏释放了事。这个小吏还算是幸运的。当时贾南风在外面找了很多男人入宫，完事后就将这些奸夫杀死，只有这个小吏，因为贾南风很喜欢他，才活着放他出去。

其次是在政治上。贾南风掌握了大权后，将朝廷变成了地狱。在太子妃期间，贾南风就已经暴露出了凶残的本性，只是因为尚未掌握朝廷大权，所以没能施展出来。这种性格的人，往往在掌权后会将凶残成倍地夸大出来。贾南风掌权后，为了巩固惠帝的统治地位，也为

了一己私心，甚至有的时候是情绪导致，开始滥杀无辜，草断朝政。

贾南风渴望的是权力。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独揽大权的呢？

二

晋武帝灭吴统一天下之后，就不像之前那样勤政了，多数时间沉浸在酒色之中，朝中事务依赖外戚杨氏。当时杨骏、杨珧、杨济位居三公，时号称“三杨”，可谓权倾朝野。司马炎临终的时候，担心傻儿子掌握不了天下，要给他安排辅助大臣。杨皇后召集相关大臣入宫，口宣帝旨，任命自己的父亲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从此内外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杨骏一人的手中。当时司马炎还没死呢，据说是杨皇后趁他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求旨骗来的。杨骏在皇后女儿和一帮人的帮助下，就这么成了辅政大臣。

司马衷即位之后，杨骏辅政，凡朝中之事，必亲自过问，“百官总己”。杨骏害怕朝野上下出现不利于自己的阴谋，也为了镇压异己力量，任命外甥段广、张勋为近侍，还让同党统领了禁兵。杨骏知道贾南风性情强悍，难以轻易压制，心理也有些畏惧。“后欲预政事，而惮骏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妇道事太后。”杨骏规定诏书先由自己认可，再通过女儿杨太后交给傻瓜皇帝盖章，不经过贾南风之手。

贾家和杨家的关系很好。外戚杨家帮了贾南风许多忙，尤其是两位杨皇后在巩固司马衷和贾南风的地位上出力不少。但是贾南风一点都不感激杨家，反而恨死了阻碍自己掌权的杨家人。

早在晋武帝挑选辅政大臣的时候，尚书褚契、郭奕就上书说：“杨骏小器，不可以托付社稷之重。”武帝不以为然。杨骏也是烂泥扶不上墙，专权后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糕。他大肆封赏朝廷内外人士，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支持率。对于许多重要政务，杨骏并没有成熟的想法，频频失误，而对内外臣工甚至宗室诸王态度强硬，排斥任何潜在权力

威胁，在朝廷上出现了“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的局面。与杨骏交往密切的孙楚劝杨骏说：“公为外戚，居重位，握大权，辅弱主，应效法前贤至诚谦顺之道，不应独断专行。宗室诸王，分藩裂土，拥兵势重，您不与他们共参大事，内怀猜忌，外树私党，恐怕大祸临头的日子不远了。”但杨骏对旁人苦口婆心的劝说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

贾南风发现杨氏在朝野的行为已经激起了多数人的反对情绪，决心利用反对杨骏的势力铲除杨氏，自己上台。贾南风暗中联系汝南王司马亮，请他发兵讨伐杨骏。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子，辈分极高，老成持重，不愿意听从贾南风指挥，拒绝出兵。贾南风又秘密联系楚王司马玮。司马玮是皇帝司马衷的弟弟，年轻气盛，有勇无谋，同意带兵讨伐杨骏。

元康元年（291年）的一个深夜，傻乎乎的司马衷被从被窝里拉起来，贾南风党羽李肇、孟观两人报告说杨骏谋反，要求皇上下诏书命楚王司马玮诛杀杨骏。当时在宫中的段广是杨骏的外甥，听到后跪在司马衷跟前一个劲地叩头为舅舅辩解，请皇上仔细考虑。司马衷哪里能想清楚那么复杂的问题，半睡半醒中在草拟好的诏令上签字了。

司马玮随即带兵包围杨骏府邸。杨骏的府邸是原来曹爽的老家，他现在也和几十年前的曹爽一样犹豫不决。主簿朱振认为这是贾皇后和少数几个人做的，建议杨骏集合家丁冲入东宫挟持皇太子，再召集忠于杨氏的兵马，反过来消灭贾南风等人。杨骏不敢冲击宫禁，只寄希望于党羽、左军将军刘豫率兵来救援。

左军将军刘豫是个老实人，在率大队军马救援杨骏的路上遇到了右军将军裴^颢。裴^颢是贾南风党羽，骗他说杨骏已经逃跑出城去了。刘豫慌了，忙问自己怎么办。裴^颢建议他去向廷尉“自首”。刘豫连这鬼话都信了，放弃军队，真的跑去自首了。结果，杨骏待在家中束手就擒，被司马玮的乱军杀死。包括杨家老少在内的数千人被杀，府邸被焚毁。事后，杨骏全族及党羽杨珧、杨济、张劭、李斌、段

广、刘豫、武茂、杨邈、蒋骏等人 and 他们的家族无一幸免。

杨太后得到凶讯的时候，宫廷已经戒严了。她想救父亲，苦于没有办法，只好写了“救太傅者有赏”的丝帛射出宫外。不幸的是，贾南风的党羽拾到了帛书。贾南风因此称杨太后参与“谋反”，矫诏废杨太后为庶人，迁往金墉城（不是一座城，而是在洛阳角落的一座冷宫）。第二年，杨太后被迫害至死。

除掉太傅杨骏和杨太后以后，老资格的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同样老资格的卫瓘为录尚书事，两人共同辅政。

司马亮认识到了诸王威胁皇室和自己的权威，决心削弱诸王的权势。他力主“遣诸王还藩”，也就是要把各位王爷分割限制到封地上去。卫瓘也完全赞成此举。这就引起楚王司马玮对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的极大不满。而贾南风任命了司马亮之后也后悔了。因为司马亮推行的集权也制约了她这个皇后的权力。而卫瓘很早就反对立司马衷为太子，现在对贾南风的恶劣行为有所批评，贾南风把卫瓘也恨得咬牙切齿，决心铲除司马亮和卫瓘二人。

贾南风找的还是楚王司马玮。司马玮诛杀杨氏，立有大功，现在却要遭到司马亮等人的限制，内心严重不平衡，又一次答应了贾南风。永平元年（291年）的又一个深夜，贾南风又让司马衷下密诏，授权司马玮惩办“图谋不轨”的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司马玮接到密诏后，对司马亮和卫瓘的府邸发动突袭。结果，司马亮和卫瓘死于乱刀之下。

两位辅政老臣死于非命，第二天早上消息传出后，朝野震动。大臣张华等人指责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要求解散城中的乱军。贾南风顺水推舟，告诉司马衷楚王司马玮拥兵作乱，形同谋逆，应当斩首。司马衷再次不辨真假，在诏书上签了字。头脑简单的司马玮就这样成了替罪羊，身首异处。

先是一出“借刀杀人”，再来一场“卸磨杀驴”，贾南风初出政坛，就“精彩”不断，取得了全胜。障碍一个个被除掉，贾南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轮到她独揽大权了。贾南风大肆委用亲信、党羽出任要职，将朝廷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她的凶残、胡为，使她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顽劣的皇后之一。

三

对于贾南风的所作所为，司马衷无动于衷。因为他智商太低，理解不了许多事情。

前文提到，在司马衷即位前就多次有人向晋武帝提出司马衷的能力问题，怀疑他不能治理政事。果不其然，司马衷继位后一直大权旁落，成为受人摆布的傀儡。

《晋书》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也就是说在司马衷当政时期，纲纪大坏，贿赂公行，社会动荡。朝廷上的官员相互推举，就像是拿官职买卖一样，为人不齿。天下沸腾，很多人写文章讥讽时事。司马衷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贾南风可以为所欲为了，唯一不如意的就是没有生育皇子。为了有男性继承人以便长期有效地控制朝政，贾南风诈称自己怀孕了，在衣服里填充上东西伪装怀孕迹象。她深居内宫，不见外人，暗地里把妹夫韩寿的儿子韩慰祖收养起来，作为所谓的“皇子”。有了假冒的皇子后，贾南风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现任太子司马遹。

司马遹很聪明，很得祖父司马炎喜欢，可惜当了太子后沾染了糜烂的宫廷恶习，乐衷游乐，喜欢在宫中设市肆做买卖。太子属官劝

司马遹注意言行，司马遹就变着法子地戏弄他们。贾南风就利用了司马遹不知轻重、轻率贪玩的弱点。元康九年（299年）的一个冬夜，宫中突然传来消息说司马衷病重，要求太子觐见。司马遹入宫后，没有见到父皇，只有宫女端来三升酒，说是皇上赐给太子的。司马遹轻率地喝了下去，喝得酩酊大醉，神志不情。这时，有人拿着一篇表文让司马遹照样抄写一遍。迷迷糊糊中，司马遹抄了一份。谁知，这是一份以太子名义写的逼宫信，要求司马衷退位，不然就要造反。贾南风拿到手后，作为太子谋反的证据，要求严惩。

司马衷本来就糊涂，如今看到儿子司马遹写了大逆不道的表文，就同意了贾南风的处理意见：赐死司马遹。公卿大臣们大多对表文的真实性将信将疑。此事关系重大，有大臣建议核对字迹。核对来核对去，既不能证明造反的表文是伪造的，也不能证明是真实的。贾南风一定要将司马遹处死，部分大臣坚决不同意随意处死太子。最后，贾南风退了一步，要求废太子司马遹为庶人。大家通过了这个折中的意见，司马遹也被送到金墉城囚禁起来。贾南风的让步是为了更进一步地迫害司马遹。不久就有一个小太监“投案自首”，供认曾与司马遹谋反。随后，司马遹被押到许昌的旧宫幽禁起来，情况进一步恶化。

贾南风自以为对手都被扫清了，可以乾纲独断、为所欲为了。

却说贾南风许多党羽是靠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和大臣司马雅、孙秀等人也是野心家，靠向贾南风献媚逐步掌握权力。他们不满贾南风胡作非为，又觊觎更大的权势，立即臭味相投，串联了起来。

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子，有辈分有兵权，就是没有人品。司马雅、孙秀与他串通，准备借太子司马遹兴风作浪，推翻贾南风。孙秀提出了一个歹毒的计划，设计让贾南风先除掉司马遹，然后再借口为司马遹报仇，起兵除掉贾南风。于是，司马伦等人故意宣扬有人要匡复太子废掉皇后。贾南风知道后自然感到恐慌，干脆一了百了，

决定除掉太子。永康元年（300年）三月，贾南风矫诏派宦官前往许昌旧宫毒杀司马遹。无奈司马遹被废后，唯恐遭人谋害，异常小心谨慎，足不出户，连饮食都自己动手。宦官找不到下手机会，只好撕下伪装，直接逼司马遹吃下毒药。司马遹当然是坚决不肯，最后被宦官用药杵活活打死，年仅23岁。司马遹的死，天下震动。宗室诸位王爷对贾南风擅杀废太子的行动普遍很愤怒。赵王司马伦乘机秘密联络了梁王司马彤（司马懿第八子）、齐王司马冏（司马攸之子）共同政变。

四月三日深夜，司马伦、司马冏等人在宫中内应的帮助下，秘密率兵入宫，劫持了晋惠帝司马衷。司马伦依样画葫芦，报告皇后贾南风无法无天的种种劣迹，要求皇上下诏惩办贾南风。司马衷还是难辨真伪，在别人递过来的诏书上签字了。

齐王司马冏带兵擒拿贾南风。贾南风见状大吃一惊，问：“你来干什么？”司马冏高喊：“奉诏收捕皇后！”贾南风更吃惊了：“诏书都是我写的，你奉的什么诏？”司马冏也不搭理，绑了就往外押。跌跌撞撞中，贾南风终于想明白了，问司马冏：“这是谁挑头的？”司马冏直言：“赵王和梁王。”贾南风闻言，悔恨不已：“拴狗当拴颈，我只拴住了你们的尾巴，才会有今天。只恨当年没先杀了那两条老狗（赵王、梁王按辈分是贾南风的叔祖），今日反被他们咬了一口。”世间没有后悔药吃，贾南风被废为庶人，也成了金墉城的住客。党羽被一网打尽。几天后，司马伦再次有样学样，派人给贾南风送去毒药。贾南风被毒死了。

《晋书》给贾南风盖棺定论：“南风肆狡，扇祸稽天。初践椒宫，逞枭心于长乐；方观梓树，颁鸩羽于离明。褒后灭周，方之盖小。妹妃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于鸣镝，其兆彰于此焉。”贾南风乱政祸国，这个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十四、八王之乱：同室操戈何其匆匆



贾南风死后，赵王司马伦大权在握。

司马伦有了权力不好好用，竟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要抢自己的侄孙司马衷的皇位。一方面是司马伦个人政治野心膨胀，另一方面是孙秀等人撺掇的。反对司马伦称帝的部分大臣很好处理，司马伦等人排列武士一吓唬，再拉出去几个挑头反对的大臣砍头，基本就没有反对的声音了。司马衷就更好对付了。永宁元年（301年）初，司马伦把死去多年的老父亲司马懿搬了出来，说司马懿托梦要他做皇帝，让晋惠帝司马衷禅位给他。司马衷这个皇帝本来就当得痴呆，对寻常话都没有分辨能力，更不用说司马伦的鬼话了。于是，又一场禅让上演了。司马衷成了太上皇，搬到金墉城住去了。

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完全是利欲熏心，上台后除了大肆封赏，没有任何方针政策。上自赵王的亲信党羽，下自王府的奴卒厮役都封官晋爵，朝廷之上顿时高官充盈。西晋的官员冠服要用貂尾装饰。因为突然封赏了大批官员，整个洛阳城储存的貂尾都不能满足新官员官服制作的需要，只好找狗尾巴来代替。成语“狗尾续貂”由此而来。服装不够倒是其次，许多新晋官员连印信都没有。因为国库储蓄根本不足以支撑司马伦的滥封，朝廷没有足够的金银给新封的人铸造印信。这些司马伦的党羽因此被讽刺为“白版之侯”。

司马伦篡夺了侄孙司马衷的皇位，在西晋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之前的种种变乱，贾南风也好，杨骏也好，司马亮和司马玮也好，他们的争权夺利都没有逃脱宫廷政变的范畴，再怎么闹毕竟范围有限，和老百姓生活实际差距甚远。司马伦的篡位就不同了。它引起了天下的讨伐，迅速演变成席卷大地的战争和杀戮。20多年后，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司马伦篡位后，齐王司马冏最先反对。司马冏参与了司马伦的政变，是诛杀贾南风的大功臣，事后却被司马伦排挤出了洛阳，去镇守许昌。政变收益分配严重不均，司马冏本来心里就不平衡，凭什么我出力你享受啊？而且你现在还大模大样地自己做了皇帝，更不像样了！于是，司马冏联络镇守各大城市的宗室诸王一起讨伐司马伦。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起兵响应。战争爆发了，从此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成了战场。

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公元307年晋武帝第二十五子豫章王司马炽称帝，改元永嘉为止。因为战争主要内容是西晋宗室诸王之间的内讧厮杀，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位王爷，因此被称为“八王之乱”。

战争首先突破了洛阳一地的范围。篡位后的司马伦面对多位亲戚的围攻，调兵遣将分头迎击。前线还没有分出胜负，洛阳城中发生了内乱。部分禁军不看好司马伦，觉得他必败无疑，“将功赎罪”杀死了司马伦，迎司马衷复位。司马伦同党被诛灭。

战胜后的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三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分赃。

司马冏是首倡之人，出力最多，战后被重新当了皇帝的司马衷任命为大司马，掌握朝政。这样的安排，两位响应的藩王起初并没有意

见。但是权力的腐蚀作用太大了，司马冏掌权后也开始独断专行，排斥他人。司马衷没有子嗣，存在挑选继承人的问题。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都是司马衷的弟弟，都希望当“皇太弟”，等傻哥哥哪天死了来个兄终弟继。司马冏不愿意这两位已经成年又掌握兵权的王爷当继承人——那样显然会削弱司马冏的权势，就操纵册立了司马衷的侄子、年仅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一下，司马颖、司马乂和司马冏的关系破裂了。

新一轮的战争是太安元年（302年）底，感到分赃不均的河间王司马颙挑起的。他讨伐司马冏得到了司马颖的响应。但胜利果实则落入了当时在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的手中。司马乂判断司马冏气数已尽，抢先杀了司马冏，掌握了政权。

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更不干了。明明是我们俩出了力气，怎么最后让司马乂捡了便宜！第二年，两人合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数万精兵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二十万从西向东进攻洛阳。前线正打得热闹，洛阳城里又先失火了。当时在城里东海王司马越和部分禁军对司马乂失去了信心，合作擒拿司马乂，将他交给张方。张方将司马乂烧死。

这一回合结束后，成都王司马颖担任了丞相，成了胜利者。但他盘踞在老窝邺城专政，遥执朝政，又废掉太子司马覃自己当了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由洛阳移到邺城。这就侵犯了在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和禁军将领的利益，引发不满。他们的优势是手里掌握着皇帝。于是，司马越率领禁军挟持晋惠帝司马衷北上进攻邺城，讨伐司马颖。不幸的是，司马越在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中被司马颖杀得大败。不仅皇帝司马衷成了司马颖手中的俘虏，司马越本人都差点当了俘虏，仓皇逃往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地区）。

司马颖先放下喘息未定的司马越不管，派军占领了洛阳。正当他取得大胜利之时，后院起火了。并州刺史司马腾是司马越的弟弟，他

和幽州刺史王浚联兵，从北往南攻破了邺城。司马颖只好退踞洛阳。可怜的洛阳城经过反复这么多轮的政变和杀戮，每经历一次就血流成河，已经变成断壁残垣的空城了。司马颖在洛阳根本没吃的，将士们只能把人肉和马肉掺在一起充饥。没办法，司马颖只好挟持晋惠帝，放弃洛阳奔赴长安。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两派力量就在关中合并一处了。

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卷土重来，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司马颙。第二年（306年），司马越迎晋惠帝回到洛阳，并杀死司马颖、司马颙等人，独揽大权。宗室诸王大规模的内讧自此才基本平定下来。司马越笑到了最后。

二

历史上宗室诸王内部争权夺利的事件屡见不鲜，但像西晋的各位王爷这样大动干戈，天天动刀动枪，杀得生灵涂炭、天昏地暗的，则仅此一例。

这是西晋王朝制度性的积弊。西晋建立后，晋武帝认为曹魏灭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广树藩王，危急时刻没有人捍卫皇室。于是西晋大封宗室，并且给予这些宗室军政实权。数以十计的司马家族子弟被封为王爷。受封的诸王并没有去藩镇，而是留在京师兼任各种实职。西晋的公卿大臣中有许多是宗室王公。有些藩王还掌握有相当的兵权，包括指挥中央禁军——禁军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曹魏猜忌宗室诸王不同，西晋王朝听任各位王爷参与政务，相互交接联络，很少加以限制。诸王的存在反而威胁到了西晋皇权。

制度性问题放大了宗室诸王之间的个人恩怨和利益纠葛。其实内讧诸王中，除了赵王司马伦品行不好外，其他各位王爷人品都还可以，一些人的声望还很高。比如东海王司马越年轻时就誉满天下，为

人谦虚又乐于助人，受到普遍的尊敬。但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调节他们的内部矛盾，相反宽松的环境和过大的权力很容易让他们选择暴力解决。比如楚王司马玮，从小就不受父亲司马炎喜欢，长大后被封的地盘和利益最少，心里不满。他慷慨响应贾南风两次号召，充当枪手，本意是借机名利双收，并非要置天下于水火之中。遗憾的是，杀戮一旦开始，血腥味就会四散开来，超脱个人的控制范围。这是宗室诸王无奈和可悲的地方。比如那个品行不错的司马越就被认为“此人乱天下”，最后死于战火，尸骨无存。

八王之乱持续了16年。参战的亲王远远不只8人，起主要作用的是8位亲王。这些藩王相继败亡，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也消耗殆尽。在战争中，百姓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破坏严重。在洛阳13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又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尤其是诸王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让其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短暂统一后，西晋王朝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原来隐伏着的民族矛盾迅速爆发。最后是汉化归附的匈奴民族起兵灭亡了西晋。

在整个八王之乱过程中，作为皇帝的司马衷反倒是一个旁观者。他成了造反谋逆者的争夺的目标和军中俘虏，几度易手，颠沛流离，受尽惊吓。除此之外，司马衷没有做出任何有用的决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但是人非草木，即使是司马衷这样的弱智也多少在乱世中显现出人性正常的一面。散骑常侍司马威依附赵王司马伦。司马伦要篡位的时候，司马威奉命来逼司马衷退位，还动手夺了皇帝玺绶。司马伦篡位后任命司马威为中书令。司马伦失败后，晋惠帝重新成为皇帝。一千人议论对失败者的处理问题。处理司马威的时候，大家本来想放他一条生路（估计都是一路货色）。这时候，一向沉默不语的司马衷说

话了：“阿皮（司马威的小字）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司马衷毕竟是皇帝，既然皇帝发话了，群臣们不好违抗，杀了司马威。

在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混战的过程中，司马衷一直被裹胁在军中。他的处境极其危险。一次大战，司马衷脸上给砍了一刀，身中三箭，周围的侍从都跑光了，只有侍中嵇绍用自己的身躯护卫了司马衷。两个人被乱兵包围，士兵们上来就要杀嵇绍。晋惠帝这时候大喊：“侍中是忠臣，你们不许害他。”乱兵却说：“奉皇太弟（指司马颖）之命，我等只不伤害陛下一人。”结果嵇绍被乱刀砍死，鲜血溅到了晋惠帝的衣服上。司马衷后来安全了，依然穿着被鲜血染污的衣服。侍从们要他把衣服换下来清洗。晋惠帝却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为什么要洗呢？”这话听起来傻乎乎的，其实包含着乱世难得的正义光芒，成了司马衷留在历史上的正面名言。南宋的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还特地提出“为嵇侍中血”。

306年，司马越的军队攻入长安，大肆抢劫，两万多人被杀。这年九月，司马颖被俘后被杀。11月庚午，晋惠帝于长安显阳殿去世。司马衷极可能是被司马越毒死的，据说他在死前吃下了一块毒饼。晋惠帝死后葬太阳陵。豫章王司马炽被司马越立为新皇帝，史称晋怀帝。

《晋书·惠帝纪》评论晋惠帝司马衷：“不才之子，则天称大，权非帝出，政迥宵人……物号忠良，于兹拔本，人称祲孽，自此疏源。长乐不祥，承华非命，生灵版荡，社稷丘墟。古者败国亡身，分镳共轡，不有乱常，则多庸暗。岂明神丧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司马衷的弱智给刚建立的西晋王朝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西晋迅速衰亡的责任在司马衷，更在他的父亲司马炎。司马炎优柔寡断，既不愿意得罪扶持司马家族夺取天下的杨家、贾家等勋臣势力，又受到枕边风的影响，不能坚持己见，而且厚待放任藩王势力发展的制度就是司马炎制定的。说到底，司马家族不是通过底层革命夺

取的政权，而是靠政治权谋篡国夺权的，终究不敢和权贵家族和藩王势力翻脸。这是西晋王朝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十五、文人不合时宜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河北邺城发生了一起冤案。成都王司马颖大开杀戒，将南方世族代表陆机、陆云、陆耽三兄弟，还有陆机之子陆蔚、陆夏等人斩首，诛灭了陆家满门。时人孙惠评论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

一个家族的衰亡为什么值得一书呢？因为吴县陆家是江南氏族的代表，在东吴时期出过陆逊、陆抗等丞相显贵。它的兴亡折射出了西晋王朝的政权移转和人才困境。

东吴末年，孙皓曾问丞相陆凯：“卿家有几人在朝为官？”陆凯回答说：“二相五侯十将。”孙皓赞叹说：“盛哉陆家！”西晋初年，北方贵族卢志大庭广众之下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的什么人？”陆机回答说：“如同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一样。”卢志正是魏朝司空卢毓的孙子、魏朝卫尉卿卢珽的儿子。晋朝人极重避讳，陆机和卢志两人互称对方父祖名讳，从此结下深仇大恨。诚然这件事情是由卢志挑衅而起的。卢志敢在大庭广众中直呼陆家父祖姓名，从反面表明吴县陆家传到陆机这一辈已经门庭下降，大不如往昔了。陆家衰落最主要的原因是东吴政权的灭亡。任何政治世家都需要依托一定的政权，离开了政权的庇护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东吴灭亡后，连孙皓都称赞不已的江东第一家陆家就丧失了所有的封爵和地位，成为新王朝的平民百姓。无可奈何东吴灭亡，作为“亡国奴”的陆机兄弟就只能受到

北方贵族的奚落了。

陆机兄弟面临着如何适应新朝以及如何从中重夺权柄的艰巨任务。

从能力上看，陆机具有复兴家业的很大希望。史称陆机：“身長七尺，其声如雷。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可见陆机长得魁梧高大，还精通文章儒术。东吴灭亡的时候，陆机年纪尚轻，在吴亡后10年时间里他和弟弟陆云隐居吴县华亭（今上海郊区）老家，闭门苦读。勤学苦读的结果是陆机、陆云兄弟成为著名文人，诗词歌赋出色。同时代的文人张华称赞陆机：“别人写文章的时候都恨自己才少，你写文章的时候却担心文才太多，涌出难以控制。”陆机还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了作品之中。陆机在吴亡后写了《辨亡论》，“欲述其祖父功业”，探究东吴灭亡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这在西晋刚统一的政治环境下，陆机的行为是相当冒险的。而他得出来的结论是用贤乃兴国之本。之后，兄弟俩经常追思家族功业，如《陆机集》中有《思亲赋》、《述先赋》和《祖德赋》三篇，《陆云集》中也有《吴故丞相陆公诔》、《祖考颂》等文章。政治的文字之旅让陆机、陆云的决心更加强烈：恢复祖辈的荣耀，复兴家族！

西晋初年的华亭还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处女地，远处海天一色，近处满目滩涂，中间点缀着若干芦苇丛和飞翔而过的白鹤。陆机、陆云兄弟徜徉在家乡的土地上，追思过去，畅想未来。他们有高贵的出身、美妙的诗文、满腔的抱负和朴实的心灵。如果东吴还在，他们又会走上父祖济世报国的老路。但是政权更迭了，他们遇到了新问题，老路走不通了，他们必须像眼前的白鹤一样去更广阔的政坛上搏击长空。于是，陆机、陆云兄弟俩与家乡告别，在公元290年来到洛阳——新王朝的首都。

陆家兄弟为什么要入洛呢？一年前，晋武帝司马炎下诏“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陆机兄弟是应召前往。“生亦何惜，功名所叹”，他

们是来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

陆机兄弟对前途的期望值很高，也做了精心的准备。刚到洛阳之时，兄弟俩造访了太常张华。当时当官还需要高官引荐征辟，恰好张华也是文人，很欣赏两个晚辈，一见如故。交谈中，张华诚恳地指出陆机不论说话还是遣词造句，都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希望他改正。新王朝毕竟是北方王朝，陆机兄弟必须要过语言关。所以陆家兄弟回去后就开始学习洛阳官话。驿站里伺候官员的仆役为洛阳人，陆机、陆云就向这些下人学洛阳话。张华又指出洛阳正流行玄学，如果新人不事先揣摩玄学难免无法应对一些场合。陆机、陆云又开始啃玄学相关书籍。最后，张华出面做了陆机、陆云两兄弟的推荐人。太傅杨骏辟陆机为祭酒，不久转为太子洗马、尚书著作郎。陆云成为了吴王的郎中令，不久出任浚仪县令。陆云到任后为政肃然，将一个号称难治的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百姓爱戴。

吴县陆家是江东的头号名门望族，陆机、陆云兄弟入洛带动了江东士人的入洛潮。南方士人纷纷北上求仕，吴郡陆、顾、张各家，会稽贺、虞等大姓皆有人北上，门第稍低的各家子弟应召北上的更多。这对于南北交流也好，对于新政权巩固对南方的统治也好，都有好处。作为先行者，陆机兄弟在举荐乡里，照顾老乡仕途方面费尽心机。陆云曾写信对陆机说：“近日得到洛阳的消息，某某得了骠骑司马，又云似未成，已访难解耳。某某做了司马参军，此间复失之，恨不得与周旋。某某拜访了大司马。”他俩对同乡的官运仕途如同自身，患得患失。陆机曾将戴若思推荐给赵王司马伦，称他是“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贺循是东吴名臣之后，入晋后历任阳羨、武康两县县令，多有政绩，但朝中无人，久久不能升官。陆机就拉人一起上书推荐贺循，认为他的才望资品可担任尚书郎，贺循后来升为太子洗马、舍人。

陆机、陆云兄弟为什么对同乡仕进这么热心肠呢？陆机、陆云出身江东的名门领袖，自觉有提携同乡其他大族的责任。而心中对东吴

政权隐隐的怀念，也让陆机、陆云兄弟将东吴旧地的名门子弟当作一个整体，希望能够一起在新的王朝共荣共进。

陆机兄弟对新政权是热心的，但是新政权并没有敞开火热的胸怀。

晋武帝司马炎一再下诏令“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可只是在开头支票。南方士人的仕途坎坷低微，而且遭受北方贵族歧视。陆云在给同乡杨彦明的信中也承认：“阶途尚否，通路今塞，令人罔然。”所以南方豪杰之士大多隐居不仕。

陆机、陆云初到北方，认为自家门第高贵，颇有与北方规则抗衡的念头。“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陆机兄弟拜见王济。王济指着案上的数斛羊酪问陆机：“你们江东有什么可以和它相比吗？”这是带有轻蔑的问话，像怀疑乡巴佬的见识一般。陆云回答说：“有千里莼羹，还有未下的盐豉！”这还算好的，卢志先前的挑衅要过分得多。出卢家门后，陆云对陆机说：“何至于闹得这么僵呢？他可能真是不了解我家底细。”陆机愤怒地说：“我父亲、祖父海内知名，岂有不知？”说完，陆机狠狠地骂卢志“鬼子无礼”。传说卢志的远祖卢充曾误入鬼府，与崔少府的亡女结婚生子，所以陆机骂卢志是鬼子（鬼的子孙）。北方士人没有陆机那样高谈理想抱负的，最多是聚在一起谈谈宇宙和人生，谈谈物动心动等虚幻的话题。他们根本不关心陆机所说的那一套。在屡屡受挫之后，陆机等人不得不面临现实：北方贵族并不友好，自己也很难融入北方政坛。

南北相隔百年后，差异越来越大。江东远离中央集权，个人思想比较宽松自由。而北方经过东汉末年、曹魏时期的不断思想整肃，从孔融、杨修等人的死到“竹林七贤”受的迫害，北方文人受到了政治的摧残，不得不与政权妥协，放弃政治上的独立思考。从曹魏早期的王朗开始到荀勖、贾充之流，为人不齿的文人反而显达于世。陆机等人没有经受过思想洗礼，更没有见过思想迫害，很难理解北方社会相对

沉闷又追求虚幻的清淡的逃避态度。他们还没学会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而陆机、陆云兄弟门第越高、抱负越大、思想越朴实，受到的伤害可能就越大。

事实上，许多南方士人来北方后很快就察觉到了政治气氛不对，折返家乡。顾荣、戴若思等人就都劝陆机与其在北方郁郁寡欢，不如回老家。陆机依然相信自己的才华和名望，自负地要实现匡世救难的志向，没有听从。家族未兴，何来衣锦还乡？

二

很多人痛心地看到陆机、陆云兄弟变了，变得急功近利、攀附富贵，中了权力之毒。

陆机变得“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这个贾谧是贾充的外孙，被贾充守为子嗣。贾家出了贾充、贾南风，贾谧又“权过人主”，整家人声名狼藉。正因如此，贾谧为捞取声名，招揽名人雅士。陆机、陆云投身其门，被列入“二十四友”，为正人君子所诟病。有陆机、陆云的崇拜者坚持说陆机兄弟此举是被迫的。既然陆机选择留在洛阳追求功名，就不存在被迫与否一说。陆机、陆云并非一定附逆，但依附权贵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发迹的终南捷径。陆机和贾谧相互利用，未尝没有可能。

遗憾的是，贾谧这棵大树并没有给陆机兄弟带来多大功名。相反却给兄弟俩开了一扇仕途之门，两人从此在一个个权贵之间徘徊。

八王之乱爆发，陆机投靠了赵王司马伦。司马伦辅政后，陆机被引为相国参军，并因参与诛杀贾谧一事立功，赐爵关中侯，进而为中书郎。但司马伦这个人并不比贾谧好到什么地方去。赵王司马伦性极贪鄙，才能极其平庸，杀人夺权却是一套一套的。辅政后，司马伦妄想更进一步，篡位当皇帝。陆机竟然参与了赐司马伦九锡的诏书和司

马伦禅让诏书的写作，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赵王司马伦败亡后，齐王司马冏以陆机附逆，写作九锡文和禅诏的罪名将他投入狱中准备杀头。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等人相救，陆机得以不死。出狱后的陆机声名下降，侥幸逃生的他本应该对仕途有所醒悟，洒脱返回故土也不是不可以。但陆机投靠了成都王司马颖，选择继续留在政治旋涡之中。

成都王司马颖相貌堂堂，但贪婪残暴，优柔寡断，性情多变。陆机怎么越投靠越投非所人呢？可悲之处就在于，文人选择投靠对象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就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挑选工作单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关键是看哪家会接纳你。陆机屡受排挤，还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对营救自己的成都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加上司马颖正处于势力上升期，陆机又从他身上看到了复兴王朝和家族的希望，因此进入成都王幕府当了名参军。而弟弟陆云在浚仪县令的岗位上干得好好的，却老被嫉妒自己的太守训责，愤而辞官，也被哥哥陆机拉入了成都王司马颖的幕府，任清河内史。陆机不久被司马颖升为大将军参军、平原内史。此外，陆家弟弟陆耽、南方士人孙惠、孙拯等都进入了司马颖幕府。其中陆机二人参预机要，是成都王幕中南方士人的核心。这群南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乘乱建功立业。

陆机、陆云兄弟在司马颖手下干得很认真，很起劲，无奈幕府内的权力结构太复杂了。

司马颖宠爱宦官孟玖，卢志又在幕府中担任左长史。孟玖曾打算让老父亲当邯郸县令，陆云坚决反对，说：“担任大县县令必须具备一定资格，怎么可以任用宦官之父？”孟玖的弟弟孟超被安排为司马颖麾下的将领。孟超放纵部属大肆抢掠，陆机逮捕了肇事官兵，孟超率骑兵一百余人冲进陆机营帐抢走犯人，还骂陆机是南蛮。孙拯劝陆机寻机诛杀孟超，陆机没有同意。相反孟玖等人恨死了陆机、陆云兄弟，必欲除之而后快。

仿佛是回光返照，事事不顺的陆机突然被司马颖任命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成都王麾下20余万兵马，讨伐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陆机欣喜若狂，自从东吴灭亡之后陆家还是第一次领军，而且是如此重大的任务。陆机兴奋地判断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

出征前，司马颖向陆机许诺：“如果功成事定，当封卿为郡公，位列台司。将军勉之矣！”

陆机说：“历史上齐桓公任用管仲，建九合之功；燕惠王怀疑乐毅，结果功败垂成。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可见陆机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但对战斗结果不太自信。他怕司马颖用己而疑己，更担心司马颖设置的出征将领队伍。陆机是主帅，但有冠军将军牵秀、北中郎将王粹分兵协助。王粹、牵秀等主要将领出身北方贵族，不仅不听陆机指挥，作战时还从中作梗。他们联合孟玖、卢志等人，严重限制了陆机施展拳脚。司马颖用了陆机，同时又用了一系列的宵小之辈，怎能不让陆机担心呢？同乡孙惠劝陆机让位给王粹，陆机又犹豫不决，最终不愿放弃荣华富贵的希望，领兵奔洛阳去了。

果然战斗一开始，孟超就不听指挥，贪功冒进，全军覆没。成都王大军在洛阳郊外被打得溃败而逃，几乎全军覆没。兵败回来后，全军上下非但不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开始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南方来的、与北方政治空气格格不入、看起来上蹿下跳的陆机等人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卢志趁机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有异心，故易战败。司马颖不分青红皂白，将陆机、陆云等南方士人逮捕下狱。

江统、蔡克、枣嵩等上书司马颖，为陆机鸣不平。“如果要为战败负责，诛杀陆机一人就足够了。有关陆家等人叛逆的事情，应该列出证据，不可草率。等证据确凿了，再诛杀陆云等人不迟。”司马颖迟疑不决，拖了三天。蔡克直接指出这是宦官孟玖等人迫害陆云的丑行，

远近无人不知。求情的人多了，都言辞恳切。司马颖流露出了宽恕陆云等人的表情。一旁的孟玖赶紧把司马颖扶进后房，催促他火速诛杀陆云、陆耽，诛灭陆家三族。陆机知道难逃一死，反而流露出潇洒大度来，洋洋洒洒写下长信，给成都王司马颖，然后从容受刑，面不改色。

为了搜集“证据”，孟玖对孙拯严刑拷打，直到血肉模糊、骨头外露，孙拯都坚称陆机冤枉。最后孟玖等人不得不杜撰了一份假口供。司马颖本来对诛杀陆家的事情感到后悔，现在见到孙拯认罪状，竟然大喜，夸奖孟玖说：“要不是你忠心，怎么能追查出这等叛逆阴谋来。”司马颖此举完全是为自己脱罪。他糊涂成这样，陆机等一代名士屈身相随，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陆机临刑曾对弟弟陆云感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是啊，华亭海边远眺海天一色的壮阔美景，仰头看蓝天中只只飞过的白鹤，听那声声鹤唳，这样的日子曾经享受过，也多次有机会回去重温，可惜一一错过了，现在已成绝响。功成名就的热望、复兴吴县陆家的责任感，让天性高傲、才华横溢的陆机、陆云兄弟为之奋斗终生。他们赶上了一个坏时代，锋芒毕露又不懂委曲求全，不懂韬光养晦，更不会识人。后人评价陆机“不知机”，急功近利，贪图名利，最终赔上了性命，赔上了整个吴县陆家。

李白《行路难》第三首感叹道：“华亭鹤唳岂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华亭鹤唳”从此成为形容陆机这样不合时宜的权力败客的专用词。

十六、五胡十六国

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在政绩上几无建树可言。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它曾经有机会解决日益严重的少数民族内迁问题，却毫无作为。

在广袤的中国北方，各个少数民族从两汉时期就可以陆续内迁，成了历代王朝必须面对的问题。到西晋建立初年，内迁各族遍布从幽州（今河北、京津地区）、并州（今山西）到司隶（今陕西）、凉州（今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广大地区，深入益州（四川地区）、冀州（河北地区）等地，繁衍生息。汉末魏晋时期的连年征战，华北的汉人背井离乡，向江淮和江南地区迁徙，空出来的土地都被少数民族占据。到西晋初年，北方一些郡县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了半数。他们虽然开始汉化，部分也从事耕种，但还保留着弯刀跃马的习俗和部落的形式，有事相互声援连接成军。对中央王朝来说，这些少数民族很危险。因为仅从地理位置上看，各个少数民族呈半月形包围着长安、邕等重镇，并威胁着首都洛阳。

当时北方各个少数民族统称为“胡族”，其中最强大的有五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并称“五胡”。

匈奴人兴起于蒙古高原，是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一度统治着东起辽水、西到西域的北方大地，从战国时就开始侵扰中原，是中原政权的大患。长城就是为他们修的。汉武帝时，匈奴遭到沉重打击后，

开始衰落，进而分裂为南北匈奴两部。其中南匈奴在汉宣帝时入关投降汉朝，西汉王朝将他们安置在并州、司隶等地。南匈奴逐渐在并州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吕梁离石区）建立了王庭。东汉时，北匈奴继续遭到重创，部分沿着欧亚大陆消失在了西方，不愿意远迁的部众则南下投降了汉朝，也被安置在上述地区。东汉王朝对匈奴安抚与分治并用；曹操则将匈奴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各立酋长为都督，基本上延续了东汉的战略。匈奴民族和汉族的融合时间最久，上层人士汉化很深，很多人担任朝廷官员。

羯人，是归化匈奴的一支，被安置在上党郡的羯室（今山西左权县）。他们和汉人的差别比较明显，百姓多高鼻深目，有欧洲人特征，还保持游牧生活。

鲜卑人兴起于东北，晚于匈奴人。匈奴人在中原王朝的打击下西迁或者南附，空余出来的土地被鲜卑人填补。鲜卑人凶悍强干，很快成了塞外大地的霸主。但是鲜卑民族的发展历史较晚，曹魏时期，鲜卑贵族轲比能曾想统一鲜卑各部，结果被幽州官员诱而杀之。到西晋初年鲜卑民族还部落林立。各部落以酋长的姓氏为号，分别有慕容、拓跋、段、宇文、秃发等部落，其中以慕容和拓跋两个部落最为强大。

氐和羌都属于西南夷，地处益州和凉州之间（甘肃东南、山西西南）。三国时期，曹魏和蜀汉都利用氐人和羌人来为己所用，拉拢来攻击对方。许多人被强制迁徙关中各郡。到西晋时期，氐人主要分布在武都郡（今甘肃成县）、略阳郡（今甘肃秦安），人数远少于匈奴和鲜卑。羌人的分布大致相同，但人数更少。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这两个小民族却扮演了大角色。除了这五大民族外，还有乌桓、丁零等其他少数民族。

西晋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民族问题，却没有提出可行的政策，除了奴役各个民族、扣押各族人质外听任各族恣意发展。地方官员奴

役各族，横征暴敛，除了把逃亡百姓的税赋强加在少数民族身上外，还强征异族子弟入伍、肆意打骂、拆散家庭。民族矛盾激化。乱世中，少数民族百姓们的生活压力本来就大，如今日子更难过了，开始倾向造反。少数民族的叛乱贯穿了西晋始终。元康四年（294年），并州匈奴人郝散起兵攻上党。两年后，其弟郝度元联合关中各郡的羌、氐族百姓起兵反晋，打败太守、刺史多人。各族人民纷起响应，还推齐万年为帝，拥兵数十万。关中震动，西晋朝廷不得不集结大军镇压，直到元康九年（299年）正月才粉碎起义军，俘杀齐万年。起义被镇压后，山阴令江统有鉴于民族问题危重，深感四夷乱华，写作了《徙戎论》，为我们留下了当时人思考的第一手资料：

晋惠帝时“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毕竟少数民族的心理和习俗都与汉族不同，难免起纠纷。江统吸取之前少数民族和汉族屡起纠纷、朝廷费力镇压的教训，建议将胡族百姓迁出汉族区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廩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土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

江统的建议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因为朝廷没有解决好内迁少数民族的问题就要把他们全部赶出汉族区域，代表了一大批朝野官员的观点。说起来简单，但没有可操作性。少数民族内迁生活了上百年，突然要他们全部抛家弃土，回到传说中的塞外故乡去，势必激起各族的仇恨和反抗。江统的意见递交上去后，晋惠帝看不懂，掌权者则忙于争权夺利，将之束之高阁，没有下文了。各族继续恣意发展。

胡族武装之所以没有酿成大祸，只是因为西晋王朝实力尚在，还不是随起随落的少数民族军队能够倾覆的。八王之乱的空前内讧，掏空了西晋王朝的躯体。晋军损失惨重，镇不住胡族武装了。实力天平

开始朝着有利于五大民族的方向倾斜。

二

就在八王厮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关中、陇西一带的百姓正挣扎在生死线上。

元康后期，当地连年荒旱。听说四川天府之国粮食充足，元康末年，天水、略阳、武都等郡数万户百姓携家带小，南下“就谷”，希望能讨口饭吃。其中有汉族人，但主要是氐族人，在巴蜀北部形成了连绵的流民潮。在应付沿途管理刁难盘剥，组织流民移动协调纠纷的过程中，略阳氐族人李特、李庠、李流兄弟辈推举为流民的首领。李特兄弟雄壮有力，家境不错，曾在西晋王朝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有政治经验又仗义疏财，很适合担当流民首领的角色。前后两任益州刺史赵^廋和罗尚将汹涌而来的流民潮视为洪水猛兽，对素有威望的李特兄弟等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矛盾就这么产生了。301年，李特兄弟利用流民的无助和怨怒，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北）聚众起义，正式拉开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反叛的序幕。

之后，北方和巴蜀地区先后出现了20个割据政权，主要有16个国家：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其中只有前凉、西凉、北燕三国是汉人政权。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四国因为地小时短，没有计算在内。这些政权主要为少数民族政权，在长达130多年的时间里此起彼伏反复交战，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为止。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起于301年的李特兄弟起义，但因为起义局限于巴蜀一地，没有直接撼动西晋王朝。史学界通常将3年后（304年）匈奴贵族刘渊独立称王视为十六国的开始。

匈奴贵族为什么姓刘呢？因为匈奴人汉化后，搬出汉高祖刘邦“成亲”制度，自认为汉朝皇室的外甥，冒姓刘氏，以汉室后裔自居。这也说明匈奴贵族汉化之深。刘渊从履历上看就和汉族人无异，从小就酷爱读书，拜上党名士崔游为师，遍习《诗经》、《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又博览《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当时乡党品评人物入仕的风气很盛，刘渊就得到了当时太原名流王昶、王浑等人的器重。加上射艺精熟、膂力过人、体貌伟岸，刘渊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刘渊却不能像同学一样入仕，因为他是匈奴人。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其中的左部帅为刘豹，刘渊就是刘豹之子。曹魏咸熙年间，刘渊作为人质，留居洛阳。齐王司马攸见刘渊文武双全且得到众人推崇，就劝哥哥司马炎杀掉刘渊，不然恐怕并州不得安宁。幸亏司马炎和司马攸的关系不好，没听弟弟的建议，刘渊才幸免于难。根据后来的史实看，司马攸对刘渊的评价不太准确：刘渊不仅让并州不得安宁，还直接推翻了西晋王朝。

西晋很快进入乱世，各派势力都借重匈奴武装，刘渊虽然是人质，却在很长时间里成了各派拉拢的对象。杨峻辅政时，署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刘渊原本在匈奴中威望很高，如今更礼贤下士、轻财重义，幽冀的人才纷纷不远千里依附匈奴，让匈奴力量进一步壮大。司马颖逐鹿中原，想以匈奴为外援，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事。他败退长安时，急需重振军势，让刘渊回并州招募匈奴助战。刘渊很高兴地返回左国城。

刘渊一去不复返。匈奴贵族见西晋朝廷呈现崩溃之势，开始策划“兴邦复业”。刘渊的族祖父刘宣就宣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也。”刘渊一到左国城就被五部匈奴推为大单于。匈奴人尚存的部落形式很快就组织起了数万军队。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刘渊自称汉王，以恢复汉朝号召天下。匈奴连续祭天，大祭汉高祖刘邦、光武帝

刘秀和昭烈帝刘备，还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摆出要与西晋争夺天下的架势。

匈奴起兵，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汉人王弥、羯人石勒及鲜卑人陆逐延等纷纷拉起队伍造反，名义上公推刘渊为主。中原很快不复是西晋的天下。

我们先说刘渊政权的发展情况。他们很快打败并州的西晋势力司马腾。战火和激烈的民族矛盾让并州的汉族百姓生活绝望，集体组织起来要去冀州“乞活”。“乞活”二字，从字面上看就很悲壮，就是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四处闯荡，为了一顿饱饭不惜血汗乃至生命。并州流民组织成“乞活军”，司马腾率领他们东去流亡冀州。刘琨继任为并州刺史，无力回天，只能据守并州西北部部分城池。刘渊很快据有河东全境，在永嘉二年（308年）正式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为汉。匈奴汉朝建立后，一心要攻占“故都”洛阳。刘渊派子侄刘聪、刘曜等人率精骑进攻洛阳，遭到东海王司马越的拒阻，没有攻下。永嘉四年（310年）夏天，刘渊病死。

刘渊在位仅两年，也没有将匈奴汉朝推向强盛，但为异族的后来者树立了起兵和建政的榜样。

三

刘渊死后，儿子刘和继立为帝。刘和能力不论，品德很差，“内多猜忌，驭下无恩”。卫尉刘锐、宗正呼延攸等人因为没有被刘渊委托为辅政大臣，怀恨在心，就怂恿刘和诛杀刘聪等功勋卓著的宗室。事机不秘，刘聪知道后，率军反攻皇宫，杀死刘和、刘锐、呼延攸等人。

刘聪是刘渊的第四子，汉化程度很高，除了通读儒家经典外，还精通兵法，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他留下了诗百余篇，赋颂50余篇。

刘聪杀刘和自立为帝，将匈奴汉朝推向了强盛的巅峰。刘聪执政时期，有两大成就。首先是在制度建设上做出了努力。汉朝虽然是匈奴王朝，但刘聪深知要长治久安，非采用汉族的政治制度不可。于是他创建了两套行政体制，用游牧民族的“单于”制度治理匈奴各部，用汉族的公卿制度治理汉人，并吸纳汉人进入政权。刘聪努力的方向没有错，但很不彻底，政权基本上还掌握在匈奴贵族手中，还保持着残暴的特性。《晋书》称汉朝“终为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匈奴等胡族和汉族民众的矛盾依然很严重，汉朝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王弥、石勒等强藩在东方拥兵自重，阳奉阴违，刘聪也奈何他们不得。这注定了匈奴汉朝虽然有许多开创性成就，也在形式上统一了华北，但很快就崩溃了。

刘聪的第二大成就是灭亡了西晋，开疆拓土。他派遣族弟刘曜联合中原的王弥、石勒武装，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将黄河南北乃至江淮一带的西晋城池陆续攻克，孤立洛阳。永嘉五年（311年），困守洛阳的司马越和晋怀帝不和，率领大批王公大臣和晋军主力离开洛阳。途中司马越忧郁而死，余部被石勒武装包围屠杀。西晋王朝最后的主力丧失了。同年，刘曜、王弥、石勒合兵攻破洛阳，杀王公大臣等3万人，俘晋怀帝司马炽，押送平阳。刘聪封怀帝为会稽郡公。这就是“永嘉之祸”。第三年，关中西晋残余拥戴司马邺为皇帝，又支持了4年。建兴四年（316年），司马邺向刘曜投降，被送至平阳为奴。至此，西晋灭亡。此时的北方大地，基本上是匈奴汉朝的天下。北方只有零星地区还在忠于西晋的官吏手中，分别是并州刺史刘琨、幽州刺史王浚与河西的张氏势力。刘聪对刘琨发起了进攻，又命石勒进攻幽州刺史王浚。王浚被石勒杀害，刘琨兵败投奔鲜卑段氏被杀。

取得这些成就后，刘聪开始骄傲享乐起来。刘聪统治后期以荒淫著称，他正式立了四位皇后，此外佩皇后玺绶者又有七人。刘聪沉湎于后宫之中，不理政事，常常出外游猎或干脆在宫中昼夜游戏。汉朝政务很快紊乱，出现党争。刘聪立弟弟刘义为皇太弟，而以儿子刘粲

为丞相。刘粲能力出众，当了丞相以后把能力都用在了骄奢专政和远贤近佞上。中护军靳准是个野心家，想浑水摸鱼，就百般亲近刘粲，怂恿他对付皇太弟刘义。建武元年（317年），刘粲诬陷刘义谋反，刘聪不辨真伪就相信了，废杀刘义及其官属，坑杀15 000人，平阳城的街巷为之一空。刘粲被立为太子。刘粲还杀害了投降的晋帝司马邺。

刘聪、刘粲父子享乐无度，朝野贿赂公行，纲纪败坏，政权迅速走向衰败。汉朝有功之臣不用，奸佞小人飞黄腾达，内部矛盾激烈。中山王刘曜占据关中地区，王弥旧部曹嶷占领山东，石勒占据河北，都保持半独立地位。朝廷能实际控制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狭窄地区，只相当于之前的三四个郡的地盘。

东晋太兴元年（318年），刘聪病死。他历位8年，把王朝推向了高潮，又推上了下坡路。

太子刘粲即位，以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刘粲以为万事大吉，终日游宴后宫，军国大事都由靳准裁决。靳准也以为万事大吉，把刘粲抓起来，一条条数说他的罪名，杀了刘粲，又把居于平阳的刘氏宗室无论老幼都斩于东市。靳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遣使向东晋称藩。

平阳城大乱了，觊觎最高权力的雄藩刘曜和石勒马上拉上队伍，行动起来。

中山王刘曜是呼声最高的匈奴王朝继承人选。刘曜有和冒认的祖宗刘备一样的外表，据说他也“垂手过膝”，而且性格“与众不同”，也像刘备。两人都读书求博不求专，喜欢射技，有“神射手”的称呼。刘曜是刘渊的养子，在刘渊、刘聪时代战功累累。大功有三：一是在河南一带攻城略地，孤立了洛阳；二是在永嘉之祸中会同石勒、王弥攻破洛阳；三是进攻关中，攻克长安，俘获晋愍帝。此后，刘曜盘踞关

中，听到靳准叛乱后亲自带军赶赴平阳“平叛”。平阳还没走到，刘曜在途中借口“众望所归”，登基称帝。这是318年的事情。

石勒也正从河北带兵赴平阳，半途听说刘曜抢先当了皇帝，又接到刘曜对自己大将军的任命，勃然大怒。石勒不听刘曜的命令，催军急攻平阳。城中，靳准为部下靳明所杀，靳明出城投降刘曜。石勒更加生气，攻下平阳，抢占了刘聪原先控制的大部分地区。

刘曜同石勒顿时剑拔弩张。石勒咄咄逼人，刘曜处于弱势。刘曜在关中有后顾之忧，面临陇西张氏的威胁，同时军队数量和战斗力都逊于石勒。刘曜主动示弱，封石勒为赵王，封地是东方的24个郡——反正地盘早就在石勒手里，不需要刘曜拨地盘。第二年（319年），刘曜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石勒的赵政权史称后赵，与刘曜常相攻伐。

北方进入了“两赵对立”的混战阶段。

十七、当割据胜地巴蜀遇到流民 梟雄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地区自古有天险可恃，群山峻岭将富庶的天府之国与中原和江南隔绝开来，是个割据立国的好地方。每逢天下大乱，朝廷权威衰微之时，野心家和梟雄们纷纷将觊觎的目光投向这一地区。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当李特从汉中经过剑阁进入四川，看到悬崖夹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形势的时候，大为惊叹。他叹息道：“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

在李特身边，流民10余万人正衣衫褴褛，扶老携幼，缓缓行进在川北的栈道山路之间。之前，关中爆发氏族暴动，混战一场，又赶上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老百姓纷纷逃亡汉中躲避并“乞食”。这些老百姓中有氐人、羌人，也有汉族人。氐族出身的李特和哥哥李庠、弟弟李流、李骧一起加入了逃难的大军。老百姓逃到汉中后，发现本地的情况也不太好，就进一步南下四川，寻找生机。李特曾在州县当过军官，胸怀谋略，所以看到剑阁的雄浑险要后大发感慨。他的一声感慨，得到了兄弟和周边青壮年的附和。大家都惋惜蜀汉亡于曹魏。

随着十多万流民和隐藏起来的豪杰的涌入，西晋在四川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了。

益州官员的首要对策就是对流民进行疏导，有效组织起来，免得

动乱社会。可当时的益州刺史赵廋却不这么做，而是琢磨着怎么利用流民实现自己的割据梦想。赵廋看到西晋内乱，而四川偏远，就起了割据之心。刚好赵王司马伦政变废杀皇后贾南风，召赵廋去洛阳担任大长秋，派耿腾取代他。赵廋是贾南风的亲戚，接到通知后心中恐惧，干脆正式起兵造反。他依靠的生力军就是关中流民。流民因为生活无着，常常为了生存而扛枪当兵。赵廋开仓放粮，接济流民的同时将他们编组为军队，任命李庠、李特兄弟为部将，杀死了接任的耿腾。这是永康二年（301年）初的事情。

李庠率领的流民武装，没有旗帜和繁琐的纪律，行军打仗全靠李庠的表率，令行禁止，阵势严正。赵廋看了心中忌惮，找了个机会将李庠抓住杀害。杀了李庠后，赵廋竟然还想利用流民武装，前去笼络李特、李流等人。李特在哥哥死后，在绵竹聚集7000余人的流民武装，向赵廋的政府军发动进攻，消灭了十分之八九，一路攻进首府成都。赵廋众叛亲离，带着家眷乘船逃跑，途中为人所杀。四川大乱的时候，朝廷已经任命罗尚为新的益州刺史查办赵廋。李特刚刚和赵廋大战一场，急需休整的时候，罗尚已经带兵7000进入了四川。李特无力抵抗，不得不扮演西晋的忠臣，派弟弟李骧奉迎政府军，并献给罗尚珍玩财宝。罗尚也就默认了李特起兵杀赵廋的行为。

罗尚有心安定四川，但也找不出处理流民问题的好方法。他想出了“遣送回籍”的馊主意来。先不说关中饥荒战乱流民回去后衣食无着，就说经过几年的流浪后，流民已经四散到巴蜀各地充当劳力、当兵打仗，遣送一事不具备操作可能。然而罗尚依然在七月下达了强制流民返乡的命令。十数万流民闻讯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益州官员又沿途设关卡，掠夺流民的财物，增强了矛盾。李特三番两次为流民求情，要求罗尚宽限时日，先是要求等待秋收以后再遣返，后来又因为当年水雨将降年谷未登乞求再宽限时日。流民们都非常感激，自觉不自觉地以李特为首领，唯他马首是瞻。

罗尚认定李特等人是在拖延时间，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逼走流

民。官府张贴公告，悬赏缉拿李特兄弟。李特早有异心，想借机把事情闹大，派弟弟李骧暗改布告为：“能斩获六郡首领李、任、阎、赵、上官及氐、叟酋长首级的，赏布一百匹。”这一改，把罗尚的打击面从李特兄弟扩大到了各大流民首领（李、任、阎、赵、上官），甚至连氐、叟（这是四川本地的少数民族）等少数民族首领也在打击范围内。矛盾一下子被激化了，所有流民武装和少数民族都拥戴在李特兄弟周围，决心与罗尚为敌而自保。李特在旬月间招募了两万军队，于是修缮甲冑训练士卒，磨刀霍霍。

罗尚也不是庸庸碌碌之人，入蜀后已将部队扩充到了数万人。他见流民武装不断增长，决定先下手为强，派出精锐步骑3万人，偷袭流民大营。李特事先得到情报，设下埋伏严阵以待。晋军冲入流民大营后，发现营寨中空无一人，心知中计，可大军已经进营一半，冲在前面的要后撤，后面的不知虚实还一个劲往前冲，乱作一团。李特率伏兵从四面包抄过来，晋军死伤惨重，狼狈逃跑。大胜后，六郡流民共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假借西晋皇帝的名义封官拜爵，正式建立独立的武装，浩浩荡荡占据广汉，造起反来。罗尚无力回天，只能固守成都，同时向朝廷求援。罗尚为人贪婪腐败，为政苛刻，而李特施舍赈济，提拔贤才，主政肃然有序，很快得到四川百姓的认可。民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302年，李特打败了河间王司马颙派来的援军。303年，李特亲自领兵进攻成都。罗尚部队一触即溃。蜀郡太守投降，献出了成都外城，罗尚只守着内城，遣使求和。

胜利在望，李特不合时宜地骄傲轻敌了起来。因为战乱和收成不好，四川本地百姓也结村筑堡，自卫自保。李特大军处于优势，本地武装纷纷表示归附。李特因为军粮不足，就分派流民到各个本地村垒里“就食”，这就分散了自身力量、埋下了流民和土著的矛盾隐患。弟弟李流提醒李特，土著未必真心归附，应该让本地的大姓豪族派遣人质过来，作为约束。李特不以为然。益州从事任睿趁机建议罗尚：“李特侵暴百姓，又分散流民到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我们可

以暗中与各村约定时间，内外偷袭李特，破之必矣。”罗尚欣然答应。任睿又假装投降李特，李特问他城中虚实，任睿谎称：“城里米谷快吃完了，只剩货帛。”李特信以为真，警惕更加松懈。任睿请求回家省亲，李特也答应了。任睿转身就去游说各个土著武装一起偷袭李特。恰好西晋朝廷为挽救益州局势，从荆州调水军3万逆江而上救援罗尚。各个土著武装原本首鼠两端，见罗尚援兵到达，纷纷同意出兵偷袭李特。而李特为了阻挡荆州的援兵，又不得不分兵抵挡，力量再次削弱。罗尚趁机猛攻李特大营，各处土著居民联合出兵，流民武装大败溃散，李特阵亡。四川形势为之一变。

李特的弟弟李流收拢残余力量，继续与罗尚对抗。他率李特的儿子李荡、李雄与罗尚军死战，扭转了败退的局面，把罗尚军队逼回成都闭门自守。不幸的是，李特的长子李荡驰马追击过程中触倚矛重伤而死。李流见兄长、侄子相继战死，而荆州援军节节逼近，对前途丧失信心。部下李含劝李流投降，李流竟然心动了。侄子李雄见叔叔要投降，自告奋勇要去迎战荆州援军。李流被年轻人的勇气所激励，决定放手一搏，对李雄说：“你如果能打败晋军，3年后我让位给你。”李流把军权交给李雄，让他节制各部奋勇作战。李雄抖擞精神，先集中军队猛攻晋军遏制住敌人的气焰，使罗尚紧紧龟缩在成都不敢外出，再攻占郫城作为大兵营。但是流民武装的处境依然不妙。四川连年战乱，百姓筑垒自保、城邑皆空，流民武装既没有持续的后勤供给，又和土著百姓隔膜很深，始终处于半饥半饱的流动作战状态。只有争取四川百姓的支持，李流、李雄叔侄才能站稳脚跟。怎么才能争取四川民心呢？

二

罗尚方面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参军徐舒^舉向罗尚推荐一个人：范长生，建议罗尚委任范长生为汶山太守。范长生是谁呢？

范长生是魏晋时期的奇人，据说活了100岁。他本是涪陵丹兴（今四川黔江）人，家族是当地大族。蜀汉初期涪陵百姓叛乱，诸葛亮讨平后，迁徙百姓充实成都。汉末，张道陵在四川地区开创了“天师道”，蜀汉时期在成都一带盛极一时。天师道是原始道教，讲求与世无争，提倡个人修行，能够给饱受战乱与生活之苦的百姓们以精神慰藉，在乱世的土壤中滋长蔓延。不仅是汉族百姓，就是氏族和羌族百姓也纷纷入教信奉。范长生年轻时代就加入了天师道，并逐渐成为了魏晋时期的宗教领袖。他长期住在成都西山（青城山），聚集千余家信众百姓独立生活和修行。其他没有上山的百姓也尊重范长生的说教和博学，像神一样敬服他。

罗尚对范长生没有兴趣，也许是他不愿意和范长生分享权力，所以拒绝了参军徐^舉的建议，后者愤愤不平，觉得罗尚缺乏眼光胜利无望，跑去投降了李流。作为见面礼，徐^舉向李流推荐了范长生，说如果争取到范长生的支持流民武装的军粮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李流果然决定重礼交好范长生，派徐^舉去青城山请范长生站出来说说话，支持一下。范长生同情流民，不仅答应倾向流民武装，还亲自出山，以天师道首领的身份号召四川百姓支持李流。流民和四川百姓之间的矛盾顿时缓解，范长生并且亲自为流民武装筹集粮秣，招募兵马。流民武装力量大增，声威复振。

李流对李雄之前的反降劝告开始信服了，觉得这个侄子稳重，有勇有谋，有长者之德，逢人便说：“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他要求儿子们尊奉李雄，还公开立李雄为继承人。李流的身体很不好，局面改观不久就病逝了。李雄继任为主。

李雄是李特的第三子。母亲罗氏，曾经梦见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生下了长子李荡。后来罗氏在汲水的时候突然打瞌睡，梦见大蛇绕身，醒后竟然怀孕了，怀胎十四个月才生下李雄。相士曾预言，罗氏的两个儿子如果有一个先死，那么剩下的那个儿子必能大贵。李荡之前战死了，这个预言就应在了李雄身上。李雄身材魁梧，容貌出

众，乡里都很器重他。道士刘化预言：“关陇之士皆当南移，李雄有奇表，终为人主。”这句大逆不道的话，足可以要了刘化和李雄的命，因为西晋统治衰微，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了。

话说李雄继位后，罗尚以为他年轻好欺负，趁机出兵攻打。李雄正好扬威，大败晋军。叔叔李骧又攻犍为，断绝了罗尚的粮道，晋军士气大减。李雄乘胜急攻成都。如今的流民武装今非昔比，既有斗志高昂的流民，又有土著百姓的支持，罗尚连战连败，在一天夜里偷偷逃往四川东部，留下牙门将罗特固守。罗尚前脚刚走，罗特就开门投降，李雄攻克成都。占领成都，标志着西晋的益州地方政权被推翻。李雄又主动造访青城山，来到范长生穴居处，表示要迎立范长生为君。范长生坚持推辞，再一次申明了对李雄的支持。

永兴元年（304年），李雄称成都王，正式建立割据政权。范长生下青城山来到成都表示祝贺，李雄出城门迎接，执版延坐，拜他为丞相，尊称“范贤”。范长生劝李雄称帝。两年后（光照元年，306年），李雄称帝，定国号为“成”，史称成汉政权。李雄进一步尊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成汉政权可以看做以氏族贵族统治，得到四川百姓支持的割据王朝，在十六国中享国最长。

成汉建立后，向北驱逐西晋的梁州刺史，占领汉中；坚守四川东部巴郡的西晋益州刺史罗尚不久病逝，土地被李骧攻占；西晋宁州刺史投降成汉，南中之地也成了成汉领土。至此，成汉疆域占有益州、梁州、宁州大部地区，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南部、四川大部和云贵部分地区。

三

成汉地区在李雄统治的30年间成了世外桃源，在乱世中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

李雄是怎么做的呢？史称李雄“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简单地说，李雄执政就做到了一条原则：清静无为，与民便利。西晋末期造成天怒人怨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府统治残暴，苛捐杂税太多，李雄只要反其道行之就能安定民心，富国强民。所以李雄废黜西晋复杂而残暴的政令，简行约法，奉行简单方便的原则。成汉政权是流民建立的，李雄最清楚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的痛苦，注意农业生产。四川本来就是天府之国，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只要政府能保境安民、当政者与民方便，农业生产就会迅速恢复，几年后就呈现出繁荣景象。范长生的涉世思路是“清心寡欲，敬天爱民”，劝告李雄“休养生息，薄赋兴教，切莫穷兵黩武”。李雄把这个执政思想奉行了30年。范长生活了100多岁，青城山建立了长生宫为其专祠。此山因范长生的缘故，开始显赫，道观林立，成了四川名山。

李雄的善政，源于李雄个人宽容和善的性格。苻成、隗文两人曾是李雄的部将，后来叛变投降了罗尚，在流民武装最艰难的时刻来攻打李雄，曾经手伤李雄的生母罗氏。四川平定后，苻成、隗文二人又来求降，李雄准许了，并没有因为历史问题罪责二人，而且厚加待纳。成汉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国库空虚，李雄一度允许卖官鬻爵，百姓进贡金银珍宝多就能得官。丞相杨褒进谏：“陛下为天下主，当网罗四海，何有以官买金邪！”李雄立即采纳，果然停止卖官。李雄曾醉酒，责罚了中书令和太官令。杨褒又劝谏：“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安有天子酗酒逞凶的！”李雄也能虚心接受。李雄喜欢出去走走，没什么事也出去逛逛，杨褒就骑马持矛跟着。李雄好奇地问他干吗，杨丞相说：“陛下要以天下为重，不能像我这样乘马持矛，跑快了跑慢了都可以出差错。”李雄虚心纳谏，马上勒马回宫，不再轻易外出。

在外交上，李雄处置也很得当。成汉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和平相处，不出头，不折腾。割据西北凉州的张骏以东晋藩镇自居，可和江南没有领土相接，要借道成汉政权和建康进行公文和人员的往来。李

雄与人方便，从不阻拦凉州和东晋朝廷的往来。张骏借道的同时，顺便对李雄展开“统战”，劝李雄去尊号，向东晋称藩。李雄回信说：“我被士大夫所推为帝，本无心于帝位。我的志向是：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可惜啊，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偏安东南。如果晋室能够复兴、一统天下，我一定奉土称臣。”一次，巴郡告急，说东晋在集结大军企图进攻成汉。李雄竟然高兴地说：“我还担心石勒跋扈，司马睿难以对抗，想不到还能对我用兵，令人高兴。”当然了，李雄没有与东晋兵戎相见，始终向东晋示好。对于中原、西北各个割据政权也一样，李雄都谨守天险，与世无争。

有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农业逐渐恢复后，在草长莺飞二月天，四川的孩子们又可以去读书了。李雄办学兴文教，鼓励人文，文治和武功一样可圈可点。

《晋书》评价李雄治下的成汉政权“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十八、永嘉之祸

晋武帝司马炎一共有25个皇子，其中最小的第二十五子叫做司马炽，太熙元年（290年）被封为豫章郡王。司马炽的豫章王是遥领的，没有“就藩”（到封地去），留在洛阳做京官。八王之乱爆发后，司马炽自然没有实力参与同室操戈，而是冲素自守，不交宾客，不问世事，一心攻读史籍。他这么做，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两大效果：一个是得到了舆论的好评：“多好的王爷啊，一点名利心都没有，就知道学习！”另一个效果是等八王之乱沉寂下来后，司马炽成了幸存的司马炎的三个儿子之一（另两个是晋惠帝司马衷、吴王司马晏）。

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挑选司马炽继位，次年改元永嘉。司马炽就是晋朝的第三个皇帝，历史上称为晋怀帝。

司马炽和永嘉时代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司马炽在皇帝生涯的多数时光里就是个傀儡，朝政全由司马越把持。司马越以太傅身份辅政，兼任了华北六州的刺史或者州牧，并拉拢大世族王衍为太尉，在朝野到处安插亲信。晋怀帝司马炽原本就没有根基，如今更没有可能施展拳脚了。

司马炽即位前，和中庶子缪播关系很好，即皇帝位后任命缪播为中书监，任缪胤为太仆卿，此外还叫来舅舅、散骑常侍王延和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协助自己处理机要事务。这是司马炽能够拼凑起来

的可怜的班底。司马越对这个力量微弱的小帮派也不能容忍，在心腹刘舆、潘滔等的劝说下诬陷缪播等人“谋反”，派将军王秉率领3000兵士进入皇宫，当着司马炽的面逮捕缪播等十余人。司马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班底被一网打尽，唯有叹息流泪而已。最后，缪播等十余人被全部斩首。司马越分析了八王之乱以来皇帝被藩王利用的历史，觉得屡次变故的根源在于宫殿侍卫力量的人心向背。为了将司马炽彻底控制在手掌中，司马越决定重组宫廷侍卫。当时宫廷中的武官都封了侯，司马越就上奏请求将有侯爵身份的宫廷侍卫全部罢免。很快，司马炽身边的武官都被解职，司马越改派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带领几百名东海国的士兵担任皇宫禁卫，等于将司马炽看管了起来。

司马越个人权力巩固了，洛阳城的形势却不太妙。八王之乱的恶果充分显现了出来：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洛阳府库空虚，而匈奴、羯族等少数民族武装纵横黄河南北，晋朝地方郡县望风披靡。洛阳城就好像是一艘装饰华丽，却缺乏水手和给养的大船，周围全是凶神恶煞般的异族小舢板；司马越就是大船的舵手，面临的已经不是大船驶向何方的航向问题了，而是如何保证洛阳不被异族武装攻陷的生存问题。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派出羽檄征调地方军队入援京师，号召藩镇和地方将领们勤王。

在求援问题上，皇帝司马炽和权臣司马越的利益是一致的。使者临行前，司马炽叮嘱使者们，要他们转告地方守臣：“现在增援，洛阳可能还有得救；晚了，洛阳就 没有了！”华北、西北的部分州县，南方的大部分州县都还在晋朝官吏的手中，但是他们势孤力单（高度中央集权和连年征战的结果），而且自顾不暇（自身也面临异族武装或者农民起义的问题），都不具备增援洛阳的能力。山涛的儿子、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有心报国，派出一支小规模部队前往洛阳，不想走到宛城的时候被当地流民武装消灭了。而派出援兵后，山简自身力量削弱了，不得不闭城自守，后来干脆弃城南逃。另一个有心增援的人是荆州刺史王澄。他的刺史官职是司马越任命的，而且族兄王衍

还在洛阳城中，所以派部队前往洛阳。当山简失败的消息传来，王澄害怕步其后尘，赶紧召回部队，一心保境安民。其他地方官员，情况也类似。所以，司马炽望眼欲穿，没看到一个援兵进入洛阳。

在绝境中坚持了3年多，洛阳的情况更加不妙了。异族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朝廷能控制的郡县越来越少。太傅司马越丝毫没有改变朝廷困局，又揽权专政，大失所望。永嘉四年（310年），司马越阵营意识到这样下去迟早要完蛋，就有谋士建议道：与其在洛阳坐以待毙，倒不如集合城里尚有战斗力的军队，向外发展，也许能打开一片天地。司马越接受了这个带有冒险性的建议，穿上戎服去向司马炽辞行。他借口讨伐石勒（石勒正在横扫黄河以南和汉水以北地区），要率军向兖州、豫州方向发展。司马炽忧心忡忡地说：“现在胡人日渐逼近首都，洛阳官民斗志全无，朝廷社稷正倚赖太傅支撑。你在节骨眼上，怎么可以远离洛阳，孤立首都呢？”司马越辩解道：“臣此次出战，如果能够幸运地击破贼军，则国威可振，总比坐待困穷要好。”应该说，司马炽和司马越对时局的看法各有各的道理。晋朝发展到这一步，要么坐以待毙，要么侥幸取胜。

当年十一月，司马越孤注一掷，集合在洛阳城内外的4万军队，声称讨伐石勒，向许昌开拔而去。太尉王衍担任军司，与司马越同行。洛阳官民见司马越军队要弃城而去，人心惶惶，多数人都想搭上司马越这艘救生船，逃离势必沉没的洛阳大船，于是各显神通往军队里面挤。到最后，4万军队膨胀成人数超过10万的逃难大军，里面有大大小小的洛阳各级官吏、家眷、富翁和其他关系户、难民等等。一路上尘土飞扬、人声鼎沸，有拖家带口的，有丢三落四的，有被百姓打乱行伍队列的部队，也有在百姓队伍中横冲直撞的骑兵，场面蔚为壮观。

当然，司马越也没有完全放弃洛阳——毕竟它是帝国的首都，毕竟晋怀帝司马炽还有政治号召力。他留下了王妃裴氏、世子司马毗在洛阳，并留亲信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率少量军队守卫城池，

以防万一。

等庞杂混乱的出征部队都消失在了远处的尘土中，洛阳城顿时变为了了一座死城。官署中的大多数官吏、军营中的大部分士兵，都随司马越走了，衙门没有人守卫，治安没有人维持，最恶劣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都没有人去埋葬。每天都有人逃离死城。不愿意走和不得不留下的人，也忙于掘壕沟筑工事，以求自保。

司马越此行，能否幸运地击败石勒呢？晋朝的前途又如何呢？

二

晋怀帝司马炽对司马越的冒险出征，义愤填膺。司马越前脚刚走，司马炽就于永嘉五年（311年）正月给东边的青州刺史苟晞发去密诏，任命他为大将军讨伐司马越。

晋朝的天下，已经分崩离析了，各块尚在晋朝官吏手中的领土，像淹没在异族和农民武装的海洋中的一座座孤岛。大的势力，在黄河以北主要是并州刺史刘琨和幽州刺史王浚，在江南主要是琅琊王司马睿，在关中地区主要是南阳王司马模，苟晞是晋朝在黄河中下游硕果仅存的地方实力派，是司马炽讨伐司马越的唯一人选。

苟晞是职业官僚，身经百战才跻身高位的，有着奋斗成功后的老官僚的精明和市侩。他见朝政日乱，担心有祸害上身，花了很大力气结交达官显贵，每次得到宝物都往洛阳的亲贵家里送。他在兖州时，驻地离开洛阳五百里，苟晞怕送往洛阳的土特产到达时候不够鲜美，挑选了千里牛，每天凌晨驮着礼物出发晚上回来，日夜不休，用心良苦。苟晞靠此在乱世中求生存谋发展。在政治上，苟晞是个不折不扣的强权者，建立了庞大的官署和幕僚系统，专断辖区内的人事，追求战功，对付异族武装和流民起义毫不手软，日加斩戮，流血成河。兖州、青州一带百姓苦不堪言，暗地里骂苟晞是“屠伯”。

荀晞的青州刺史是司马越任命的，司马越还封他为郡公。两人的关系一度很好。如果能够深入合作，司马越有可能借助荀晞的实力，在黄河下游站稳脚跟，和石勒、王弥等人决一雌雄。遗憾的是，两人的关系在司马越出洛阳前，不幸破裂了。司马越的亲信潘滔、刘望等人诬陷荀晞，可能是想夺荀晞的官职；荀晞生气了，向司马越要潘滔等人的脑袋，又向司马越建议了几项人事变动，司马越一概没有答应。荀晞于是认为：“司马越为宰相，不能平定叛乱，使天下淆乱，我怎么能坐视不顾呢？今将诛国贼，尊王室，匡扶天下的霸业可成！”他移告诸州县，公布司马越的罪状，宣布和司马越决裂。司马炽正是看中这一点，让荀晞去讨伐司马越的。主观上，荀晞有讨伐司马越，甚至取代司马越的心思；可惜他在客观上已经自顾不暇。流民武装领袖王弥所属的曹窋部队之前大举进入青州，志在占领领土长期经营。荀晞抵抗得很辛苦，节节败退，部队日渐零落，完全没有力量讨伐司马越，两面作战了。他能做的，就是在文字上积极响应司马炽的号召，对司马越口诛笔伐。

离开洛阳后，司马越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所谓的讨伐石勒，不过是逃离的借口而已。全军上下，从司马越到普通士兵，都没有战胜石勒的信心。不幸的是，二月，石勒大军从汉江北上，朝着司马越部队的方向冲杀过来。司马越匆忙躲避，向东方逃去。当月，石勒占领了重镇许昌。三月，司马炽又公开发布诏书，讨伐司马越。司马越还截获了荀晞和朝廷往来讨伐自己的文书。在石勒、司马炽、荀晞三方的巨大压力下，东海王司马越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心力交瘁加上急火攻心，死在了项城。

司马越死后，官民们要推举太尉王衍为首，率领大家谋出路。王衍不敢担当如此大任，百般推辞说：“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欲望，这些年来全是熬资历才升迁到如今的地位。今天的大事，怎能让我这样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统帅呢？”他要推举随军的襄阳王司马范为新首领，司马范坚决不答应。最后实在没办法，王衍心不甘情不愿地继

承了司马越的位置。

王衍，山东琅琊人，在琅琊王家的兴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日后琅琊王家在南方的发达，实在应该感谢他。从年轻时代起，王衍就精通玄理，擅长清谈，专以谈论《老子》、《庄子》为事。清谈时，王衍喜欢手持白玉柄的尘尾，手和玉柄的颜色一样白皙。虽然是玄学大师，王衍却没有留下系统的言论，就连只言片语也很少。主要原因是他纯粹是为了清谈而清谈，没有成熟的观点，经常谈着谈着觉得话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随口改过来。世人称之为“口中雌黄”。正如他承认的，因为资历老、家底硬，王衍被视为士族的首领。在人品和能力上，王衍都没有称道的地方。他的夫人郭氏是个悍妇加守财奴，连亲友的钱财都要贪霸。王衍对郭氏的贪财很鄙夷，坚持口中不提“钱”字。郭氏偏要试试他究竟会不会说钱，就让奴婢用钱绕床一圈，把王衍围在床上。王衍醒来后看到钱，大喊：“把这些堵着我的东西拿走！”在政治上，王衍没有丝毫建树，专谋自保，甚至不惜为了讨好贾南风而牺牲女儿的婚姻（王衍的女儿原本许配给了愍怀太子，王衍看贾南风不喜欢愍怀太子，竟然悔婚）。可就是他，连续担任尚书令、司空、司徒等宰相级的高官。王衍年轻时曾去拜访山涛，山涛对别人评价王衍道：“王衍看起来很不错，然而亡国败家的，正是这样的人！”

王衍当了东海王部众首领后，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回归洛阳，和司马炽汇合，号令天下，与叛军对抗，维持困局；第二条路是与其他晋朝势力汇合，比如与苟晞的青州势力抛弃前嫌合兵一处谋求自保，或者继续往东南方向发展，渡过长江去与司马睿的势力会合（与其他势力会合似乎难度很大）；第三条道路是就地占领郡县，准备后勤和工事，以之为根据地防御敌人、谋求发展。应该说，这三条路都不失为现实的选择，在石勒军队逼近的情况下都具有危险性。然而，王衍做出了匪夷所思的选择：对司马越的死秘不发丧，扶着灵柩向东海进发，准备在司马越的封地安葬他。于是，以王衍为首，襄

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全军向东踏上了尘土飞扬的征途。

石勒亲自带人追赶东海王的部队，最终在苦县追上了。石勒的部队只有两万人，而王衍统帅的有10万之众，可这10万之众抱着逃难的心离开洛阳，中途又经历首领更迭，漫无目的地在河南游荡，士气越来越消沉。将军钱端勉强出兵与石勒作战，战死，引起了全军大崩溃，十几万人被石勒的军队围困住了。兵无斗志，大家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跑到东，都在寻找逃生的缝隙，却没有一个人思考抵抗。石勒指挥军队射杀晋军，将一场决战简化成了屠杀。一圈圈的人被射死，尸体一层压着一层，“相践如山”。十多万西晋的官吏、军队和家眷就这么消失了。这可是西晋在北方最后的主力。

石勒下令焚烧司马越的灵柩，给司马越极为恶劣的评价：“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石勒是西晋末年黑暗政治的受害者，他是有资格说这话的。王衍等几十名权贵成了俘虏，石勒把这些都叫到跟前。除襄阳王司马范神色自若拒不畏死外，其余的人都纷纷哀求石勒饶命。石勒倒没有马上大开杀戒，而是询问王衍许多朝廷往事。王衍陈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但解释责任不在自己，并说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参与政事，只求避祸保身。王衍甚至劝说石勒称帝（当时石勒还是匈奴汉朝旗帜下的将领）。石勒对王衍强言狡辩、卑躬屈膝的行径极为不屑，怒喝道：“你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就得到朝廷重用，如今头生白发了，竟然还说没有参与朝廷政事？天下残破不堪，正是你这类人的罪过！”把俘虏押下去后，石勒对参谋孙资说：“我行走天下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耻的人，还应该让他活下去吗？”孙资说：“王衍一定不会为我们尽力，杀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石勒不屑于用刀杀他，就命令士兵在半夜里推倒墙壁把王衍等人压死了。据说王衍临死前，终于忏悔道：“我们虽然赶不上古代贤人，但如果平时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的下场。”

留守洛阳的司马越王妃裴氏和党羽何伦等人，听到司马越去世的

噩耗后，仓皇无措，竟然弃城南逃。洛阳最后一丁点武装力量被他们带走了，这就好像一片枯黄的叶子被抽走了最后一丝绿色。何伦等人也没有逃远，很快就被石勒的军队拦截住了。一场接触战过后，何伦、东海王世子司马毗等人都被乱军杀死。王妃裴氏被掳掠卖掉，若干年后辗转来到了江南，才恢复了身份。当时司马睿已经在江南称帝，他是司马越的党羽，裴氏当年对他也多有照顾。所以，司马睿为司马越举办了象征性的葬礼，并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司马越。这些都是后话了。

三

话说司马越势力被铲除后，洛阳的情势危如累卵。

荀晞看到洛阳无兵无粮、敌人兵临城下，势必陷落，上表奏请迁都，还派出由数十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运送了500名士兵、上千斛谷米进入洛阳。同行的荀晞使者请求司马炽前往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避难。这也许是挽救朝廷免于覆亡的最后机会。

司马炽非常愿意迁出洛阳。但公卿大臣们坚决反对，他们有的担心迁到荀晞的地盘后自己官爵不保，朝廷可能被荀晞控制；有的则舍不得洛阳的府邸家财。结果，司马炽和大臣们争论了好久，没有马上就走。几天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再不走就要被匈奴人抓走了。司马炽不想再争论了，决心逃亡。他找不到车子，就徒步出宫，身边只有几十名官员、宫人跟从。君臣一行人在洛阳大街上竟然遭遇盗匪抢劫，狼狈异常，只得返回宫殿。没有一定的力量保护，司马炽君臣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逃出洛阳城去了。城外，刘曜、王弥、石勒各部叛军，正不断逼近。

六月十一日，叛军从南边进入洛阳城，将官署、宫殿的珍宝、美女抢劫一空。司马炽在宫殿中被俘（一说在逃往长安的路上）。皇太

子司马诠、吴王司马晏、竟陵王司马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尚书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琨、河南尹刘默等被杀，百官士庶死者3万余人。史称“永嘉之祸”。洛阳城经过八王之乱和此番洗劫，成为一座废墟。

永嘉之祸的发生，是西晋开国以来种种矛盾累积的恶果。晋武帝司马炎时期的大臣何曾曾悲观地预测王朝很快就会覆灭，对儿子们说：“你们还能够免祸。”指着孙子们说：“他们一定会遭到国难。”何曾判断的依据是司马炎君臣聚会的时候，都是谈家长里短、谈如何享受，没有一个人在关心国计民生。这样的王朝怎么能长久得了呢？即使何曾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也要对王朝覆灭负责。他们何家一顿饭吃几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本身就是穷奢极欲的统治阶层的一员，对国家发展毫无裨益。如果没有八王之乱这样的内乱，西晋可能还能多维持几年，八王之乱的爆发，大大加快了王朝的灭亡。果然到永嘉末年，何曾一家已经没有子孙留存在世了。

永嘉三年（309年），匈奴人判断“不出三年，必克洛阳”，他们果然做到了。

十九、西晋被彻底埋葬



永嘉之乱在事实上宣告了西晋王朝的覆灭，但北方晋朝的残余力量又惨淡经营，勉强把晋朝的旗帜在北方多扛了几年。

永嘉之乱中，皇帝被俘，皇太子遇害，宗室亲王48人遇害，但是司马炽的儿子、豫章王司马端奇迹般地从乱军中逃了出来。他隐约记得大将军苟晞要迎接父皇司马炽前往仓垣，逃出洛阳后就拼命向东跑，还真让他跑到了仓垣。苟晞得知洛阳的惨状后，先和部下大哭了一阵，然后尊司马端为皇太子，建立西晋的临时政府。因为司马炽还活着又不能行使职权，所以司马端这个皇太子只能代行皇帝职权（承制）。司马端承制任命苟晞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苟晞树起大旗后，带着临时政府从仓垣迁移到蒙城（今河南商丘东北）驻扎，希望能走出危局。

苟晞出身孤微，如今位至群臣之上，志颇盈满，不顾时局艰难追求起享受来了。他有奴婢将近千人，侍妾美女数十名，终日累夜不出户庭，纵情肆欲。对外，苟晞刑政苛虐，部下阎亨劝谏他要勤奋振作，苟晞大怒，杀了阎亨。另一个部下明预在家养病，抱病劝谏苟晞：“朝廷正当危难之机，明公亲稟庙算，将为国家除暴。阎亨美士，奈何无罪一旦杀之！”苟晞大怒：“我杀阎亨，关你什么事，竟然抱病来骂我！”这样一来，部下为之战栗，再也没有人劝阻苟晞的荒唐行为了。西晋临时政府大失人心，加上又遇到疾疫、饥谨，将军温畿、傅宣等人纷纷叛变投敌。苟晞实力迅速削弱。

苟晞在危难时刻扛起朝廷大旗，完全有可能把北方还忠于皇室的人士、反对异族统治的人士聚拢在自己周围，可惜白白浪费了机会。很快，在石勒的进攻面前，苟晞地盘越来越少。最后蒙城被石勒偷袭攻陷，苟晞被俘。石勒先任命他为自己的司马，一个多月后又杀了他。皇太子司马端在乱军中下落不明。

话说洛阳沦陷的时候，司马炽的侄子、12岁的秦王司马邺也逃了出来。司马邺跑到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遇到了舅舅、朝廷司空荀藩。荀藩收留了司马邺。巧的是，前豫州刺史阎鼎是西北天水人，在密县纠集了数千流民，准备返回西北故乡。荀藩去找阎鼎，阎鼎毅然决定保护秦王，延续王朝血脉。全靠这支流民武装，司马邺暂时稳定了下来。

苟晞势力覆灭后，离司马邺最近的朝廷势力就是关中的司马模了。永嘉之乱发生时，晋朝将军赵染投降了刘聪，引匈奴刘粲的部队进攻长安。司马模战斗失利，竟然献出长安投降了，还是被刘粲处死。司马模的儿子司马保继立为南阳王，坚持作战；关中未曾失守的一些地方官吏也纷纷坚持抵抗。忠于晋室的军队和刘曜、刘粲交战，连连得胜，包围了长安。永嘉六年（312年）四月，刘曜、刘粲等人坚守不住，放弃长安逃跑了。阎鼎与关中众人联络，双方一致拥戴司马邺。司马邺随即进入长安。九月，阎鼎等人推举司马邺为皇太子，建立了新的临时朝廷。这个小朝廷一建立就陷入了内战，两大支柱河南的流民武装和关中的郡县武装相互不买账。阎鼎与关中诸将争权，抢先痛下杀手，无奈力量不济，遭到关中诸将群起攻之，兵败被杀。

可怜的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后，被送往平阳。匈奴首领刘聪对他的态度很好，封他为左光禄大夫、平阿公，次年又进封为会稽郡公。当然了，这些官爵都是虚的，司马炽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一次，刘聪对司马炽说：“爱卿为豫章王时，朕曾经由王济介绍，认识了爱卿。爱卿当时说闻朕名久矣，还把自己所制乐府歌展示给朕看，对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朕当时与王济都背了篇《盛德颂》，

得到卿家的夸奖。爱卿又引朕到皇堂赌博，朕得十二筹，卿与王济都只有九筹。朕赢了，爱卿还送给朕柘弓、银研。爱卿还记得吗？”刘聪一口一句“朕”、“爱卿”的，表面看来是叙旧，是恩宠，可对前朝皇帝司马炽来说，却是莫大的讽刺。而司马炽只能回答：“微臣怎敢忘记，只恨当日没有早识龙颜。”刘聪又说：“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再放低身段，回答：“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司马炽只能奉承匈奴人建立的汉国取代司马家族的晋朝是“天命所归”。

尽管司马炽战战兢兢，一心委曲求全，刘聪还是对他起了杀心。永嘉七年（313年），刘聪命令司马炽在正月的朝会上穿着奴仆的青衣，给大家倒酒。晋朝的侍中庾珉、王俊等人见状号哭不止。刘聪杀心更重了，随即派人毒死司马炽。司马炽死时只有30岁，葬处不明。晋朝秘书监荀崧曾对人说：“怀帝天资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无幽厉之衅，而有流亡之祸。”一个守成之才，偏偏在社稷飘摇、权臣当道的时候被推上皇帝的宝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王朝的不幸。

晋怀帝司马炽遇害的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邺不用再“承制”了，登基称帝，是为晋朝的第四个皇帝晋愍帝。

二

司马邺即位后，最大的手笔（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手笔）就是决定对匈奴汉国发动“总攻”。根据五月司马邺发布的诏书，这次总攻的目的是“扫除鲸鲵（指汉），奉迎梓宫（怀帝的棺木）”，收复中原；具体安排是兵分三路：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出兵30万直取匈奴都城平阳，任命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率兵30万保卫长安，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率兵20万进攻洛阳。整个计划雄心勃勃，规模宏大，

可惜无异于痴人说梦。晋朝哪里还有80万军队啊！三路之中，情况最好的是江南的司马睿，估计把正在和南方异己势力作战的军队拼凑一下，能有几万之众；情况最不好是关陇一带的司马保，地方残破，朝不保夕，不要说30万军队，连3000人估计都没有。

接到诏书后，真正采取行动的只有并州刺史刘琨。刘琨一向爱国，苦于手头没有军队，就向北边的鲜卑部落“借兵”。会合了鲜卑援兵后，刘琨勇敢地向平阳进攻了。匈奴人迎头抵抗，鲜卑人惧战退兵。刘琨只能无可奈何地跟着撤退了。有人把祖逖北伐也算在响应司马邺总攻号召的行列中。但他只能算是部分南迁的中原人士出于恢复家园目的的自发行为，只得到了司马睿象征性的支持（可能是司马睿也要对晋愍帝的诏书敷衍一下）。祖逖北伐的战果离晋愍帝要求的“进攻洛阳”，相差甚远（参见之后的“祖逖北伐”）。

梦境破灭后，现实显得更加残酷。匈奴军队西进侵蚀关中，长安的力量日渐空虚。建兴四年（316年）八月，刘曜对长安发动总攻，西晋君臣进行了持续抵抗。到十一月，长安外城失陷，君臣退守小城。城中粮草全无，一斗米贵至黄金二两，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司马邺见国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愿意连累更多百姓，表示要“忍耻出降，以活士民”。有大臣痛哭流涕，拉着司马邺不让他出降。十一日，晋愍帝司马邺按照传统的君主投降仪式，乘羊车，肉袒（去袖，露出左臂）、衔璧（以口衔璧）、舆榱（车子上装着棺木）出城投降。西晋至此彻底灭亡。

刘聪接受了司马邺的投降，将西晋君臣安置在平阳。司马邺被封为怀安侯。一天，刘聪外出打猎，让司马邺穿上戎装，像卫兵一样执戟前导。沿途，老百姓见了，都指点说：“这是原来的长安天子！”有些老人看着司马邺，泪流满面。太子刘粲见状，主张杀掉司马邺以除后患。刘聪没有马上接受。十二月，刘聪大宴群臣，就像当年侮辱晋怀帝司马炽一样，要求晋愍帝司马邺给大家倒酒、清洗杯具。更过分的是，刘聪起身上厕所，命令司马邺执盖随从。在座的不少晋朝旧臣

见状流泪涕泣，有的还哭出声来。尚书郎辛宾甚至抢步上前，抱住司马邺大哭。刘聪大怒，命令把辛宾拖出去，立即斩首。几天之后，司马邺也被害死，年仅18岁。

关陇残余的南阳王司马保，在司马邺死后自封晋王，企图以王朝正统自立，无奈他志大才疏，加上无兵无将，不久在陇西遇害。晋朝存续的希望，就看南方的司马睿的作为了。

二〇、石勒：从奴隶到皇帝



刘曜的前赵，定都长安。石勒的后赵，以襄国（今河北邢台）为都城。两个赵国一西一东，基本囊括了北方，与南方的东晋形成南北对峙。

前后赵这对仇家，一开始却没有打起来，维持了多年的和平。因为前后赵内部都不稳定，需要先处理好内务才有能力对外。

前赵的内部麻烦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关中陇右一带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并不服从匈奴的统治，有数以万计的人接连叛乱反抗前赵政权。刘曜采取安抚和迁徙并举的政策平定叛乱，迁徙20余万人充实长安。第二是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张轨趁中原大乱之际，割据凉州建立前凉政权，名义上向东晋王朝称臣，威胁前赵的后方。前赵对张氏政权用兵，虽然没有消灭前凉，但迫使前凉服软称臣。

再说说后赵的情况。说到后赵，得大书特书它的建立者石勒。石勒是并州的羯人，年轻时遇到大灾荒，被当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抓起来当作奴隶押到山东出卖。这个司马腾是司马越的弟弟，在荒年竟然想出贩卖异族百姓为奴赚钱“以充军实”的馊主意来，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山东，石勒表现突出，很有威望。主人最终释放了他。石勒在山东地区游荡了几年，结识了马牧帅汲桑。305年，石勒和汲桑趁乱集合几十个伙伴，起兵为寇。在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石勒很快就组织了以羯族为核心的武装力量。他和汲桑曾攻下河北重镇邺城，

杀死了贩卖过他的司马腾。汲桑战死后，石勒率部投靠了匈奴刘渊。当时匈奴汉朝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并州、关中和河南地区，在山东、河北地区的扩张主要依靠投靠匈奴的各支杂牌军。

除了石勒，当时东部打着匈奴汉朝的旗号作战的还有王弥的军队。王弥是汉族人，趁乱起兵，军队以汉族人为主，实力足可与石勒相对抗。东部地区基本就是石勒和王弥的天下。他们扫荡了东部地区的西晋军队，并和匈奴的刘聪军队相配合制造了“永嘉之祸”，各自杀戮了数以万计的西晋王公官吏。共同的敌人被消灭后，并肩作战的朋友就变成了敌人。

一山难容二虎。石勒和王弥首先开始内讧。王弥图谋石勒，可惜缺乏政治技巧，思想觉悟也不高。他幻想通过恭维拍马屁，让石勒放松警惕。石勒在青州大获全胜后，王弥故意写信给石勒说：“石公俘获苟晞却赦免了他，何其神勇啊！让苟晞为公左膀，我王弥来做您的右臂，石公就可以平定天下了。”石勒当然不相信王弥的鬼话，开始提防着王弥。王弥军队数量不少，却分散兵力，分兵攻略地方。他亲自领兵南下，和东晋大军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相持，情况不妙，就向石勒求援。石勒当时正在和“乞活军”陈午的队伍鏖战，不想增援王弥。石勒的汉族谋士张宾劝他：“您常常担心王弥的掣肘，这次是个解决他的好机会。陈午小竖，何能为寇？王弥人杰，将为我害。”石勒听从张宾的意见，亲自率军增援，击败晋军。王弥以为石勒和自己推心置腹，先对石勒放松了警惕。不久，石勒请王弥赴宴，王弥不顾部属劝阻，贸然前往，结果在席间被伏兵杀害。王弥的部下或散或降。石勒军队成了东部最强大的势力。

石勒和王弥名义上都是匈奴汉朝的大将。石勒擅自杀害王弥，匈奴朝廷严斥，可又不能追究石勒的罪责，只能默认了石勒在东部的独尊地位。石勒名义上仍为匈奴之臣，实际上已独立行动了。

石勒军队起初都是流动作战，没有后方，没有给养，沿途劫掠，

是不折不扣的流寇。永嘉六年（312年）初，石勒计划攻克建业，劫掠富庶的东南地区，在江淮地区遭到晋军的层层抵抗。司马睿会集江南兵力防御石勒，江淮地区又连降大雨，石勒军队陷入了困境。饥饿和传染病夺走了半数官兵的生命。石勒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没有土地和人民就没有立国之本。环顾天下，长江流域、关中和巴蜀都有主人了，剩下的就只有山东、河北了。石勒毅然回军北上，去争夺河北和山东。

汉代以来，河北最重要的城市是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内），石勒长驱直入进攻邺城，苦于邺城高大牢固一时难于攻下，退而占领襄国。从此，石勒以襄国为根据地，四处消灭河北地区的坞堡，收集粮草和人口充实襄国。石勒在襄国做大，逼迫北方幽州的西晋残余势力不能等闲视之。西晋幽州刺史王浚集合数万主力，联合辽西鲜卑段匹磾等人进攻襄国。石勒在这场关键战役中，死死支撑了下来，陆续消灭西晋部队，对段氏鲜卑先擒后纵再赠送厚礼重金。段氏鲜卑感念石勒，与他结盟，并收兵撤还辽西。段氏鲜卑从此倾向石勒。王浚见势不妙，撤军北逃。建兴元年（313年）四月，石勒侄子石虎攻克邺城，冀州尽入石勒囊中。

幽州刺史王浚为晋朝坚守北方的飞地，名为晋臣，长期脱离朝廷起了不臣之心，奢纵淫虐，署置百官，就差割据称王了。石勒依张宾之计，利用王浚割据之心进献厚礼，表示拥戴其称帝，还厚赂王浚的女婿枣嵩。为了麻痹王浚，当晋朝的范阳守将游统暗中派遣使者联络石勒投靠时，石勒杀死使者送给王浚。晋廷为了保持飞地，升王浚为大司马，把幽州、冀州托付给他；升刘琨为大将军，把并州托付给他。晋朝的使者先到襄国。石勒将之视为一个机会，把精锐军队都隐匿起来，在晋朝来使面前故意示弱，再写信给王浚，假称要亲赴幽州劝进，又写信给枣嵩，吹嘘他功劳显赫，要为他请官晋爵。王浚得到使者回报，相信石勒兵力薄弱，轻信石勒劝进的假话，毫无戒备。王浚做着白日梦，石勒却领兵日夜兼程偷袭幽州，兵不血刃地迅速推进

到蓟城（幽州州治，在今北京市西南）城下。途中有官员见石勒来意不善，派人报警。王浚竟然杀死报信人，此后再无人报警了。石勒看到蓟城没有防备，担心有伏兵，借口献礼，先驱赶牛羊数千头入城，塞住街巷，让城内一片混乱，然后杀入城去，俘获王浚，押送襄国斩首。幽州也成了石勒的领土。

此后就发生了匈奴内乱，刘曜和石勒分立。刘曜要处理关中的麻烦，石勒则要与割据青州的曹嶷作战。曹嶷是汉族人，是王弥的余部。当初王弥分兵派遣曹嶷攻略青州。曹嶷在王弥死后独立于各派势力，在感情上倾向晋朝。石勒为了笼络曹嶷，对他拜将封爵。曹嶷势单力薄，觉得东晋过于遥远难以为援，不得不接受了后赵的任命。原来的青州州治淄博地处平原，难以防守，曹嶷找了靠山临水、易守难攻、交通发达的地方，修建了广固城（今山东青州市益都镇），做了长期坚守的打算。太宁元年（323年），石勒派遣石虎率步骑4万讨伐曹嶷。曹嶷自知不敌，计划避徙海中保存实力。不想疾疫流行，曹嶷还没成行，石虎大军就包围了广固城。曹嶷投降，押送襄国遇害。攻陷广固城后，残忍的石虎坑杀军民数万人，扬言要杀尽居民。后赵新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征说：“没有居民，我做什么刺史？我干脆回去算了！”这样石虎才留下几百人，交由刘征这个青州刺史统治。青州也纳入后赵版图。

双方内部事务都解决了以后，前后赵开始兵戎相见。

前赵刘曜的军力弱于石勒，便先下手为强，联合东晋军队抢先对石勒发动进攻。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等人将石勒看做制造“永嘉之祸”的元凶，都愿意与匈奴联军。东晋太宁三年（326年），前赵联合东晋的北方军队进攻石勒。两赵战争正式爆发。

石勒派石虎迎战。双方在成皋（今河南荥阳）激战，战火蔓延到并州，前赵军队大败。刘曜败归长安，东晋军队或南逃或投降后赵。今天的河南地区完全被后赵军队占领。

两年后（328年），轮到后赵军队主要进攻了，石虎率兵进攻蒲阪（今山西永济县）。刘曜亲率精锐驰救，杀败石虎。石虎狂奔数百里逃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刘曜乘胜进军，包围了洛阳。后赵军队坚守城池，刘曜就采取掘堤水淹的办法冲灌城墙，洛阳危在旦夕。石勒很重视军情，几乎是倾国而出分兵三路救援洛阳。这时刘曜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在外线部署军队狙击援军，结果导致后赵援军蜂拥而来。见势不妙后，刘曜举止失措，既没有加紧围攻洛阳，也没有后撤进行必要的挽救部署，反而撤围洛阳，将10万大军都排列在洛河以西，和石勒隔河对峙，等于坐等挨打。石勒主动出击，命石虎等人攻击前赵大军各处，自己也提刀上阵夹击刘曜。前赵大军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溃败。石勒大获全胜，斩首5万余级。当时是冬天，刘曜骑马从洛河冰面上撤退，结果马坠于冰上。刘曜身上被创十余处，成了后赵的俘虏。石勒让刘曜写信令留守关中的儿子刘熙投降。刘曜却写信要求刘熙：“与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见刘曜刚硬不降，就杀了他。

刘曜本以为儿子刘熙坚守关中，还可同石勒一搏。实际上主力覆灭刘曜身亡，前赵立即分崩离析。关中大乱，329年正月，刘熙得知父亲的死讯后，竟然逃离长安，躲到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去了。留守长安的前赵军队投降后赵。刘熙这时候又后悔了，在夏天反攻长安，没有成功，将前赵最后的实力也折损了。石虎乘机攻克上邽。前赵亡。

至此，除了辽东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政权和河西张氏外，石勒统一了北方其他地区。后赵领土东接大海、北到长城内外、西达陇西与张氏政权接壤、南到江淮与东晋王朝对峙。330年石勒称帝。从奴隶到皇帝，石勒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只有乱世才有的奇迹。石勒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底层的皇帝。同时期，只有赌棍出身的南朝宋武帝刘裕的经历才能和石勒的奇迹有一拼。

石勒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出身少数民族，又当过奴隶，对社会实情和百姓疾苦有切身的感受，尤其是对西晋末年百姓流离失所、流民充斥乡镇的乱局记忆深刻，建立赵王政权后，石勒就留意农业生产，派遣使者巡行州郡，招募流民，劝课农桑。随着后赵政权的稳定，流民相继归附石勒，之前农田荒芜、百业凋敝的景象有所缓解。

石勒所代表的羯族整体汉化水平不高，政治体制比较落后。石勒能够认识到汉族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征战过程中吸纳汉族政治文明。张宾是石勒早期任用的汉人谋主，为后赵建立奉献了许多智慧，石勒非常敬重他，尊称为“右侯”，凡大事必询问他。张宾死后，石勒一度痛不欲生。石勒不识汉字，就找儒生读书给自己听。一次，儒生读《汉书》，读到酈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后人时，石勒大惊，说这样做会天下大乱的。后来听到张良劝阻，石勒连忙说：“赖有此耳。”说明石勒对汉族政治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认同。虽然后赵政权也像匈奴政权一样保留了许多游牧民族制度，但已经大量采纳汉族的制度。石勒初起时，对西晋王公大臣、坞堡主及士大夫大开杀戮。后来他逐渐认识到争取汉族上层，尤其是留在北方的氏族豪门的支撑的重要性。石勒在俘虏中区分士庶，将士族集为“君子营”，以示优待；在战乱中下令梳理地方家族谱系，明令不准侮易衣冠华族。建立政权后，石勒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吸收氏族进入后赵政权。河东裴氏、京兆杜氏、清河崔氏、颍川荀氏都有人被后赵政权擢用。氏族大家出于保全生命和家族利益的考虑，在形式上愿意加入后赵政权，却并不能真心地效忠异族统治者。范阳卢堪被后赵委以要职，就一直以屈身事胡为耻，一再告诫子孙，在他死后不要在墓碑上刻上他在异族政权中任职的经历。这一方面和北方汉族人坚持“夷夏有别”、奉南方的东晋为正朔的观念有关，一方面也反映出北方激烈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

尽管有所自我约束，石勒骨子里还是个残暴的人，奉行民族压迫政策。石勒忌讳别人提及他的异族出身，后赵法令明确规定：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杀无赦。百姓们不得不将日常食用的胡瓜改名为“黄瓜”。至于杀戮汉人、强迫移民等措施，更是激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胡族政权在数百年中，从没有真正得到北方汉人的拥戴与合作，以致始终不能在北方建立绝对的权威和牢固的基础。这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迅速崛起开朝立国，却又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

333年夏，石勒病死，遗诏令太子石弘继位。他从极其卑微的起点出发，创下了一份硕大的产业留给子孙，不知道子孙能否发扬光大？

二一、冉魏：放把火就死



石勒死时，后赵的实权被铁腕人物石虎所掌握。石虎是石勒的侄子，为人残暴，善于征战，为后赵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本人也逐步掌握了军政大权。石虎野心勃勃，就等着石勒死后自己做皇帝，都布置好武士要抢位置夺权了。太子石弘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吓得主动声明自己无才无德，石虎才是真龙天子。但石虎考虑到石勒尸骨未寒，强登皇位容易树敌，恐怕还会受到世人的唾骂，就虚情假意地拥戴石弘称帝。石弘称帝后，完全是石虎的傀儡，封石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总摄朝政。石虎将儿子亲信纷纷安排在要害部门，进一步控制了政权，终于在咸和九年（334年）废石弘，自称居摄赵天王。之后，石虎诛杀了石弘及石勒的其他儿子，从襄国迁都邺城，349年称帝。

石虎继承了石勒凶残的性格和民族压迫政策，掌权后强化胡汉分治政策，设置大单于统治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全分开，又强行规定称汉人为“赵人”，胡人为“国人”，并严禁呼羯为胡。为了充实新首都邺城，石虎强迫各族人民迁往邺及其周围地区。据说石勒和石虎两代人杀戮汉人超过百万，“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建政后，石虎故意对汉人征发繁重的赋税与徭役，进一步激化了后赵内部各种矛盾。石虎本人汉化程度不高，对游牧生活很留恋，将黄河以北中原地区的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狩猎围场，规定汉人不能向其中的野兽投一块石子，否则即是“犯兽”，

将处以死罪。结果发生了许多百姓被野兽害死或者吃掉的惨剧，汉人地位竟不如野兽。而石虎对此解释说：“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当时“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石虎的荒淫无度、率性胡为，让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把后赵政权推到了火山口上。比如石虎追求个人享乐，在邺城修建宫殿台观，又营建长安、洛阳的宫殿，长期役使百姓超过40万；为征讨前燕，石虎又征召超过50万百姓准备军资。石虎统治期间，徭役繁兴，征调频仍，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的百姓不过十分之二三。令人发指的是，石虎为了充实后宫，强征民间数万女子入宫，如果已经婚配就将丈夫杀死强拉妻子入宫，导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百姓纷纷用各种形式加以反抗，石虎一味加重刑罚，统治更加残暴。

石虎的家庭生活也一团糟糕。太子石邃因为父皇宠爱弟弟石宣和石韬，担心地位不保而阴谋叛乱篡位，事泄后被杀。石虎立石宣为新太子，却加倍宠爱石韬，再次激化儿子内部矛盾。新太子石宣嫉恨石韬，两兄弟经常发生冲突。石宣残忍地将石韬砍掉手足、刺烂双眼、挑破肚子，石韬惨死。石宣借石韬丧礼的计划，一不做二不休，计划暗杀石虎篡位。石虎知道真相后，用同样的酷刑将石宣处死。石宣之死，是348年的事情。石虎杀太子后，把无辜的东宫官吏、卫士十余万人谪戍凉州。

349年，一万多获罪的东宫官兵被押送到雍城（今陕西凤翔）的时候，发动起义。这场起义点燃了大叛乱的引信，关中各族百姓揭竿而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军所向披靡，攻略长安，杀出潼关，人数超过十万。石虎派大司马李农调集重兵镇压，反而被起义军打败。后赵的军队经过一叛一败，元气大伤。石虎不得不利用其他少数民族武装来镇压心腹大患。氐族贵族苻洪和羌族贵族姚弋仲纷纷组织军队，合兵进攻，终于镇压了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后赵的根基也被掏空了。后赵自己的军队在重重矛盾中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其他少数民族

的武装尾大不掉，开始威胁石虎的统治。石虎生命的最后几年笼罩在一片忧愁和惊恐之中，在349年一命呜呼。

二

石虎死后，诸子争立，骨肉相残，导致帝国分崩离析。第二年（350年），政权落入一个汉人的手里。这个人就是石闵。

石闵原名冉闵，是并州“乞活军”的后代。“乞活军”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西晋末期，北方连年灾荒，大灾之后又赶上瘟疫和之后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丧失了。许多地区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牛羊猫狗都被吃了，老鼠草根也被刨出来吃了，最后出现了“易子而食”、“人相食”的人间惨剧。人祸接踵而来。比如在并州“寇贼纵横，道路断塞”，又“数为胡寇所掠”，到处是跨马持刀的凶徒，弱肉强食，简直是人间地狱。西晋各级官府“府寺焚毁，邑野萧条”，“郡县莫能自保”，更谈不上保护百姓。于是，数以十万计的流民四处流徙，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和安全的的地方。在流荡哄抢的过程中，流民既要抢掠生存又要自卫，逐渐形成了自发的武装组织。军官出身的田甄、李恽、薄盛等人最后将并州流民组织起来，随司马腾“就谷冀州，号为‘乞活’”。这就是乞活军的来历。

乞活军在五胡十六国前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先是跟随司马腾镇守邺城，与成都王司马颖作战。后来石勒和汲桑杀死了司马腾，乞活军在田甄的带领下，替司马腾报仇，杀死了汲桑。失去司马腾这个首领后，乞活军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在李恽、薄盛带领下投奔了司马腾的哥哥、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死后，这部分乞活军流窜在山东河南等地，与石勒军队多次交战，最后被石勒消灭；另一部分乞活军在田甄率领下前往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最后也被石勒打败，余部陈午等投降石勒。正宗的乞活军就此消失了。不过日后陆续还有一些流民冒用“乞活”的旗号，悲壮地起兵造反。

传说，投降的陈午部队中，有一个人叫做冉瞻，只有12岁，却精明能干，很受石虎喜爱。石虎将他收为养子，冒姓石。石瞻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石闵”，石虎认石闵为养孙。还有一种说法是石闵是石虎的养子。虽然说法不同，但石闵原名冉闵，是汉人子孙的史实是确定的。《晋史》描述冉闵“身高八尺，善谋略，勇力绝人，攻战无前”。在后赵时期，冉闵临战都冲锋在前，奋勇杀敌，深受石虎的器重，进而掌握了部分军队。石虎死后诸子争位，当时汉族百姓普遍要求驱逐残暴的羯族统治者，拥护汉族出身的冉闵发动政变推翻后赵。冉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350年夺取政权称帝，改国号为魏，建都邺城，史称冉魏。这是十六国时期唯一一个在中原建立的汉族政权。

冉魏政权非常短暂，仅仅存在3年时间。它仅仅依靠部分汉族武装趁羯族内乱仓促建立，统治区域局限于黄河中游的南北地区——其他地区为后赵残余或趁乱割据的其他少数民族占领。就是在冉魏有限的统治区域内，民族矛盾恶化。支撑这个政权的精神动力就是驱逐胡族，光复汉家天下。冉闵本人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掌权后就下令邺城城中：“今日以后，与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所任之。敕城门不复相禁。”邺城大门昼夜不关，供百姓选择到底是支持新政权还是反对新政权。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惊恐不安，纷纷逃进城去；而汉族人热诚支持新政权，纷纷涌入城来，“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极端激化，百姓互不信任。冉闵见少数民族都不支持自己，杀胡之心顿起。他宣布：“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门牙。”这便是公开的“杀胡令”。一日之中，数万胡人被杀。积怨已久的汉人大开杀戒，凡是见到眼廓深刻、须发黄等胡人特征的人一律杀死。被冉魏政权屠杀的胡人估计超过20万。胡人或者拿起武器自卫，反攻汉人，或者成群结队返迁塞外。华北陷入一片混乱，人们相互攻杀，尸横遍野。各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的迁徙征战，依然分布各地，组织相对汉人严密，在杀胡令的威胁下群起围攻冉魏政权。形势很快就对冉魏政权不利了。

冉闵对南方的东晋王朝抱有好感，派遣使者联络东晋，希望联合起来驱逐胡族。东晋君臣对冉闵很不信任，听说冉闵竟然已经称帝，断然拒绝联军的要求。冉闵只能靠奋勇作战来挽救局面。冉闵政变后，石虎的儿子石祗在襄国自立，并起兵讨伐冉闵。351年，冉闵将后赵残余刘显的部队杀得大败，刘显请降，愿杀石祗以报。刘显回军杀死石祗。352年正月冉魏攻克襄国。后赵灭亡。连年作战，冉闵赖以征伐的军队疲惫不堪。慕容鲜卑的前燕政权趁乱先攻占幽州，如今又趁机大举进攻冉魏。冉闵又向东晋王朝求援，东晋对冉闵依然没有好感，相反对一再上表称臣的前燕政权很有好感，所以坐视前燕政权步步强大，冉魏日日削弱。冉闵集结汉族军民，以一万之众抵抗14万鲜卑大军的进攻。在决战中，冉闵奋勇冲锋，在敌阵杀进杀出。传说他左手执双刃矛，右手执钩戟，杀死燕兵300余人，最后马倒被擒，死于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同年夏，邺城陷落，冉魏灭亡。

冉魏骤亡后，华北东部地区为前燕占领，关中地区被前秦占领，北方进入了前燕和前秦对立的阶段。

二二、慕容家有内讧传统



鲜卑人的祖先居住在鲜卑山（今内蒙古东北），故而称为鲜卑。一般认为鲜卑人是东胡的一支。“鲜卑”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在《三国志》、《后汉书》中鲜卑与乌桓并称东胡，东汉初年乌桓人大量迁入塞内，与之相邻的鲜卑人也跟着南迁，这些鲜卑部落大多聚居在辽东一带。后来又有鲜卑部落内迁至辽西，因此又有辽东鲜卑、辽西鲜卑之分。慕容鲜卑是辽东鲜卑的一部分。南迁的这些鲜卑部落依然过着豪迈的草原生活，“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尚武崇力，聚散不定，呼啸成军。

话说辽东鲜卑一共有三部。慕容鲜卑部位于辽东鲜卑的中部，东西分别为宇文鲜卑和段氏鲜卑所包围，而实力弱于两部。慕容家族的首领莫护跋在曹魏初年率领其部内迁到辽西一带。司马懿讨伐公孙渊时，莫护跋随战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在辽西的昌黎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建国。莫护跋家族开始学汉人戴上“步摇冠”，迈着方步走路，被称为“步摇”，后转音为“慕容”。慕容鲜卑以此得姓。莫护跋的孙子慕容涉归也因为协助朝廷征讨立功，被晋武帝封为鲜卑大单于。慕容部又转迁到辽东北部。在不断的迁移过程中，慕容部落越来越接近汉族地区，逐渐汉化。

历史此时赐予了鲜卑族一位杰出的领袖：慕容涉归的儿子慕容廆。

慕容廆小的时候就被誉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父亲慕容涉归死后，叔叔慕容耐通过政变夺取了部落大单于之位，还派人刺杀慕容廆。年幼的慕容廆只好向南逃，开始亡命辽东，幸好被好心的汉人收留掩护才幸免于难。在汉人地区生活期间，慕容廆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许多汉人的文化和政治智慧，深深烙上了汉文明印记。不久，慕容耐被手下人所杀。慕容族人公迎慕容廆为新单于。

慕容廆上台之初就将从汉人那里学来的智慧运用到了部族的内政外交上。他首先发现了并不被祖先和其他部落重视的西晋王朝的价值，主动遣使觐见晋武帝，接受了晋朝官职，表面上自为藩属，实际上使弱小的慕容部鲜卑获得了“尊王”的金字招牌，多了一重保护；其次，慕容部重金联络其他两部鲜卑。段氏鲜卑是当时辽东各部中实力最强者，慕容廆便迎娶了段部单于的女儿为妻。慕容廆深知，称霸必先图强。中原八王之乱正酣，称王称霸者前仆后继。辽东最强的段氏鲜卑排斥避难而来的中原移民和汉族士大夫。而慕容廆政法分明、用人唯才，很快集中了北方五州的大量流亡士人。慕容廆移居大棘城，教人耕种，制订与汉人相似的法令法规。慕容鲜卑加速了汉化过程，迅速繁荣起来。

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慕容部近邻宇文鲜卑的首领宇文圭统一了塞外的东胡各部，自称单于，将进攻矛头指向慕容部。气势汹汹的宇文大军进攻慕容部边境各城。慕容廆沉着冷静，亲自迎战，首战告捷。宇文部很快又集结了10万大军卷土重来，将慕容廆包围在大棘城中。一时间，亡国阴云笼罩慕容部落。慕容廆却谈笑自若，说：“敌兵虽多，但却毫无章法可言。胜负早在我的算计之中了。诸位只管拼力一战，没什么好愁的！”他激励士气，主动出战。宇文军队多而不精，面对冲击乱作一团，溃败得一塌糊涂。此战，慕容部追击上百里，斩首数以万计。宇文鲜卑不得不远逃塞外，慕容部一跃由弱而强。

慕容廆战后又花了多年时间消化建设已有的疆域，整编训练军

队。他采纳汉王朝的郡县制，建立完备的政权系统与机构，设宰相、司马、列卿将帅等官职，同时“起文昌殿，乘金银车，驾六马，出入称警蹕”。《晋书》也承认慕容氏政权“皆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晋室早已南逃，司马睿在南京称帝，遥拜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慕容廆继续尊奉东晋为正统，派遣使者通过海路通使东晋，从而以东晋皇命讨伐各部，收敛人心。

慕容鲜卑势力的壮大促成了辽东的晋朝残余势力和高句丽、段氏鲜卑、宇文鲜卑等势力的集体敌视。辽东此时是南迁建康的东晋王朝的一块“飞地”。东晋任命的平州刺史崔毖表面上是本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实际上他的话只在衙门里算数。而高句丽和两部鲜卑不愿意慕容鲜卑做大——他们不懂合作共赢的道理，就在崔毖的撮合下组成了四方联军讨伐慕容部，挑起辽东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战。

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联军浩浩荡荡攻入慕容部的境内。

慕容鲜卑遇到了崛起路上的第一条“大坎”。

四方联军潮水般涌来，很快就将大棘城围得水泄不通。慕容廆知道本部兵马不足以硬碰硬，在战争初期以逸待劳，拼死顶住。慕容廆透过战火，很快就判断出四方联军的致命缺陷。那就是他们的疯狂进攻只是表象，没有一致的战斗目标。宇文鲜卑的斗志最强，段氏鲜卑和高句丽是因妒忌而出兵，而崔毖就是一个空头司令。慕容廆制定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略。联军毕竟是乌合之众，缺乏统一指挥系统。三国的军队日日围攻大棘城，慕容廆只管闭门固守。联军长期求战不得，没事做就开始互相猜忌。这时慕容廆乘机派人带着牛肉美酒出城，以崔毖的名义犒劳宇文鲜卑军队。宇文部也是太大意了，和来人把酒言欢起来。段氏鲜卑和高句丽看到宇文部与慕容廆联欢，很自然怀疑他们在搞对自己不利的把戏，当即领军退却，在战场上观望起来。宇文部首领宇文悉独官得知中计后恼怒异常。他也不向盟军们解释（有些事情越解释可能越说不清楚），只得尽起本部数万士兵，连

营三十多里，单独加紧攻城。

恰巧慕容廆儿子慕容翰的军队从外地回援都城。慕容廆命令儿子回城协防，慕容翰见城内防卫力量足够，认为不如留驻城外充作奇兵，等候时机内外夹攻。于是慕容翰军游弋战场之外。悉独官感觉慕容翰是个祸患，决定分派数千骑兵突袭慕容翰。慕容翰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事先得知了宇文部的偷袭计划，当机立断，派人冒充段氏鲜卑的使臣半路拦截悉独官的骑兵，请求带路，协助打击共同的敌人。宇文部不长记性，又一次轻易地信以为真，随同来人闯进了慕容大军的埋伏圈。一战下来，宇文部骑兵全军覆没。慕容廆、慕容翰父子乘胜追击，内外夹击。世子慕容皝率领精锐部队突袭悉独官大营。宇文部溃不成军，三十里连营一片火海。宇文鲜卑被击垮后，晋朝残余势力匆忙撤出辽东，鲜卑其余各部纷纷向慕容部称臣；高句丽之后两次被慕容翰等人击败，从此对辽东事务敬而远之。

慕容廆囊括整个辽东，派使到建康报捷。司马睿顺势封他为平州刺史，辽东郡公。

晚年的慕容廆日子过得很潇洒，主要在辽东操练兵马，偶尔指点一下越来越混乱的天下局势。据说他曾经写信劝东晋名将陶侃——大文豪陶渊明的爷爷率军北伐，消灭匈奴人建立的赵国，表示鲜卑族愿为北方接应。计划没有执行，陶侃和慕容廆先后去世。

二

任何事业的开创都离不开伟大人物的领导。如果伟大人物不止一个，就面临着谁是领袖的选择问题，毕竟领袖只能有一位。

对于迅速崛起的少数民族来说，艰苦的环境和复杂的斗争能够锤炼许多领袖级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崛起之时总是人才济济，于是也就面临着领袖之争。上天眷顾慕容家族，赐予了他们精明

强干的头脑。遗憾的是，慕容家族在立国后就爆发了骨肉猜忌的内讧。

慕容廆病逝后世子慕容皝继位。慕容皝非常猜忌庶长兄慕容翰的功绩和能力。慕容翰于是投奔了夙敌段氏。段氏大喜，拥戴着慕容翰要去与慕容皝争国。段氏鲜卑的军队很快涌入慕容部的土地。眼看慕容皝即将大败，慕容翰不忍祖国灭亡，与段氏临阵泪别，跑到宇文部装疯行乞流落街头。段氏鲜卑转胜为败，慕容皝转忧为喜。

那一边，同是慕容廆之子的慕容仁和慕容昭看到慕容皝迫害慕容翰，心里不能不有所“想法”。他俩也是闯荡过刀枪剑雨的，决定狠心杀掉慕容皝，既为自保，也为权力。慕容皝察觉后，先下了手，将两位同胞兄弟杀死。

经过这件事情后，慕容皝开始想念哥哥了。他派人将慕容翰接回了本国。慕容翰不计前嫌，为弟弟攻灭了宇文部鲜卑，并东败高句丽。随着哥哥功绩声望日增，慕容皝再次害怕慕容翰夺位。重燃的猜忌之情迅速膨胀，一次慕容翰受伤在家养病，慕容皝以慕容翰常在家中练剑图谋造反为由，送去毒酒赐死。慕容翰流泪道：“今天我死，命当如此。但是中原还被逆贼占领，国家并不平静，我常常以扫平天下，完成父王遗愿来激励自己，现在不能满足心愿了。命也奈何。”说完饮鸩身亡，令人扼腕。

慕容皝死后，子慕容俊继立。冉魏取代后赵，中原大乱，冉闵又大开杀戒激化了矛盾，这给慕容家染指中原提供了可乘之机。349年，慕容鲜卑大举进攻后赵，夺得幽州，迁都于蓟（今北京）。这个发源于辽东的割据政权从此越过长城，开始进军中原。3年后慕容部击灭冉魏，占有河北，慕容俊正式称帝，定都邺城，国号燕。慕容家族得以在第三代人手中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前燕王朝。前燕在强盛之时基本继承了后赵除关中之外的其他领土。

前燕建国之后，父辈骨肉猜忌的内讧就再次重演。慕容皝的儿子们都能力出众，尤其以慕容俊、慕容恪、慕容霸为最。慕容皝特别喜爱屡立军功的慕容霸，令太子慕容俊非常嫉妒。慕容霸少年时喜欢打猎，有一次从马上跌下来，折断了牙齿。慕容俊登基后，以敬仰春秋时晋人郤缺为借口，命慕容霸改名为“垂夫”，后来又去掉“夫”，定名叫“垂”。“垂”是个非常不吉利的名字，远远不如“霸”字。可慕容霸没办法，只好垂下脑袋听命。慕容俊的老婆吐谷浑皇后以嫉妒强悍著称。慕容垂的结发妻子段氏清廉自守，与丈夫恩爱异常。但是吐谷浑皇后妒忌地寻机将段氏治死，并逼慕容垂迎娶自己的妹妹长安君。慕容垂却喜欢上了段氏的妹妹。恼怒的吐谷浑皇后竟对慕容垂动了杀机。慕容垂不得不委曲求全，韬光养晦，不谈政治，更不去招惹皇帝和皇后。

360年，慕容俊病死，11岁的太子慕容暉继位，慕容俊临死前想把小皇帝托付给慕容恪，可又不信任慕容恪，于是试探他说：“我想把社稷交给你。”慕容恪不肯接受。慕容俊假装生气说：“我们兄弟之间何必虚饰！”慕容恪回答：“陛下如果认为臣担当得起天下重任，难道就不能辅佐少主？”慕容俊这才放心，说：“你能像周公辅佐周成王那样辅佐我的儿子，我就完全放心了。”

新皇登基后，慕容恪以太宰身份辅政。慕容恪被后世称为“十六国第一名将”。在他主政期间，燕国不仅稳固了华北，还一度攻占了东晋的河南、淮北等地，使国家疆域达到极盛。

大名鼎鼎的东晋桓温在369年率5万晋军北伐，要来复仇，燕军连败失地。慕容垂临危受命，领兵迎战。他派弟弟慕容德去劫断晋军粮道迫使桓温后撤。慕容垂率军追击，在襄邑大败晋军。据说慕容垂在战斗中采用了最早的“拐子马”和“铁浮图”的战术。好在桓温北伐只是为自己立威，无心再战，逃回江南内斗去了。慕容垂逼退桓温，几乎成了国家再造功臣。

谁想，慕容垂回到家中却得到了心爱的段氏的妹妹被吐谷浑太后杀死的噩耗。慕容垂品味到了功高震主的危险。好心人还悄悄告诉慕容垂歹心的吐谷浑太后有将他治死的阴谋。慕容垂只能淡淡一笑，守在家里过起更加谨小慎微的日子。好在他功勋卓著，吐谷浑一时难以在肉体上消灭他。

367年，慕容恪走到了生命尽头，临死前对少主慕容暉说：“皇叔慕容垂才能胜我十倍，先帝因长幼的次序，用臣辅政。我死后他可做太司马，号令全国军队。如果那样，我国必能一统天下。”慕容恪又叮嘱慕容暉的兄长慕容臧说：“你们的叔叔慕容垂总统六军，人才不可忽视。我死之后，以亲疏而言，应该轮到你和慕容冲。你们弟兄虽然才能出众，毕竟年纪还轻，不见得能够挑得起这副担子。慕容垂是人中豪杰，智谋无人能及。你们若能推举他做太司马，必能一统天下。你们千万不要贪恋官职，不以国家为意。”弟弟慕容评来探望，慕容恪再一次推荐慕容垂，认为如果不加重用，恐怕对国家不利。少主慕容暉兄弟和慕容评等人听了慕容恪的话，却没有遵守。慕容恪死后，皇叔慕容评主政，慕容臧、慕容冲兄弟掌权。

当时的北方格局是前燕和前秦东西对峙。前燕的领土和人口都超过前秦，势力原本强于前秦。慕容恪死后，前燕国势江河日下，这主要是统治阶层无能造成的。主政的慕容评能力平庸，极力搜刮百姓的财产，横征暴敛，连百姓喝水都要交税。贵族官僚大量占有庇荫户，总数超过国家控制的户口，致使国家的赋税徭役减少，府库空虚，士气低落。前燕在短短几年后败落。慕容评等人还将慕容垂看做潜在的权力威胁，欲除之而后快。一帮人整天想着谋害慕容垂。慕容垂决定效仿伯伯慕容翰逃亡。他本意是逃往老家龙城，据有燕的旧疆，但没有成功，不得不带了儿子慕容令、慕容宝等投奔了燕国的敌人前秦去了。

慕容垂如此的人生经历已经非常传奇了。也许有人认为慕容垂的一生也大致如此了。可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只算是慕容垂传奇人生的前期。我们会在后面看到他作为主角的表演。

慕容垂投奔的前秦，国势蒸蒸日上。370年前秦苻坚命王猛率大军攻燕，以慕容垂为先锋，攻破邺城，俘虏慕容暉，灭亡了前燕。北方历史进入了前秦的短暂统一时期。

二三、那个叫王猛的猛人

后赵席卷中原的时候，青州北海郡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诞生了一个叫做王猛的汉族人。不幸身逢乱世，王猛年幼即随家人颠沛流离，辗转黄河南北，最后在魏郡（在河南河北交界处）住下。

王猛家贫如洗，为了糊口很小就对外贩卖畚箕。苦难是一所大学，王猛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困境中学会了读书认字。王猛在艰难困苦之中，博学多才，喜读兵书，学的都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没有沾染上魏晋士人普遍的清谈务虚的风气，性格又有些清高孤傲，那些口若悬河的名士都看不起出身低微又不合群的王猛。不过，就好像那些伟人卑微时总能得到神助一样，王猛虽然不被世俗所喜爱，却得到了世外高人的支持。传说王猛一次在洛阳卖畚箕，一个人要出高价买他的畚箕，因为身上没带钱，请王猛跟他到家里取钱。王猛跟着那人走，一直走到深山里，看到一位须发皓然、侍者环立的老翁。王猛向老翁揖拜，老翁连忙说：“王公，您怎么好拜我呀！”那老翁给了王猛十倍于常价的畚箕钱，还派人送行。王猛出山后，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入了中岳嵩山。

王猛长大后，很希望满腹经纶能够有施展的舞台。当时，后赵统治着北方大部分地区。王猛来到后赵都邺城，观察有无入仕的可能。羯族统治者、达官显贵们都瞧不起出身卑微的汉族求职者，王猛屡屡碰壁。唯独侍中徐统“有知人之鉴”，觉得王猛与众不同，召他担任自己的功曹。王猛见后赵政权逐渐荒淫，统治者并没有得到百姓的支

持，对后赵失去了信心，拒绝了徐统的征召，前往华山隐居。在华山，王猛静观世间风云变幻。

后赵政权果然在不久后崩溃，东部为前燕取代，关中地区被氏族的前秦政权攻占。354年，东晋大将桓温北伐，打败关中的苻健，驻军灊上，与汉人旧都长安一步之遥。关中父老夹道欢迎晋军收复失地，争以牛酒劳军。王猛毕竟是汉人，心中倾向出仕东晋，可又不知道东晋朝廷和桓温的虚实。于是，他身穿麻布短衣，径直前往桓温大营求见。

桓温是一代名士，在待人接物方面有其过人之处。他认真接待了王猛，还请王猛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只见王猛大庭广众之中，坐在席上一边捉掐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滔滔不绝，旁若无人。桓温暗暗称奇，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统率10万精兵北伐逆贼，为苍生除害，而关中豪杰却无人效劳王师，这是何缘故呢？”王猛直言：“桓公不远千里深入敌境，离长安城近在咫尺却不渡灊水攻城。关中豪杰摸不透您的心思，所以不来。”王猛的话，戳中了桓温的心事。桓温北伐本心并非要解救北方百姓于异族统治和战乱频仍的水火之中，而是借北方来提升名望和实力。他之所以没有进攻苻健固守的长安城就是不愿消耗实力。听了王猛的话，桓温默然良久，无言以对。最后，桓温对王猛感叹道：“江东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您的见识啊！”

因为军中乏食，士无斗志，桓温很快就退兵了。临行前，桓温赐王猛华车良马，授予他都护官职，邀请王猛一起南下。王猛知道在世族横行的东晋自己很难有所作为，追随桓温必将助其篡晋落下污名，于是他再次拒绝官职，回华山继续隐居读书。

几年后，前秦尚书吕婆楼把王猛介绍给了一个人。这个人不能向王猛许诺任何东西，王猛却毅然出山与他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这个人就是苻坚。

苻坚是氏族酋长苻洪的孙子。后赵灭刘曜攻占关中后，迁徙了氐、羌10万余户充实关东地区。后赵政权任命本民族酋长为首领加以羁縻，苻洪就是氏族的流民都督，率氏族百姓徙居枋头（今河南汲县）。石虎后期，不得不借助苻洪等少数民族力量维护统治。苻洪大约在这个时候组织起了氏族的武装。石虎死后，冉闵杀戮少数民族，苻洪一度投降东晋。他在冉魏的压力下无法在东方立足，就率领关中流民西归故乡。途中，苻洪被人杀死，其子苻健继领部众，西入潼关。关中氐人纷起响应，苻健很快就攻占长安，割据关中。永和七年（351年），苻健在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历史上称之为“前秦”。

前秦的建国基础非常差。首先，氏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之所以能够迅速在关中建国，主要是在后赵大乱关中空虚的情况下得了便宜。前秦建国后，关中其他势力群起反对，统治极不安定；境内偏偏又连续遭遇饥荒和蝗灾，草木凋敝，牛马饿死。建国第三年，东晋桓温大举北伐。苻健率军迎战不利，退缩回长安固守，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抢收庄稼，封剿物资，希望能逼退桓温。桓温很快退却了。苻健又花了大力气去镇压境内的反抗。355年，苻健病重，临终前嘱咐太子苻生：“六夷酋帅和执政大臣，如果不听你的命令，可把他们杀掉。”苻健的遗嘱是在国内动荡、统治不稳的情况下说的，有他的现实考虑。偏偏苻生性格残暴，喜好武艺，将父亲的遗嘱误以为要他严苛暴政，继位后凶残无比，激化了矛盾。

丞相雷弱儿为人刚直，在朝堂上批评苻生的亲信，苻生竟将他和九子、二十七孙全部杀死。苻生身体不舒服，让太医令程延诊治。程延说苻生吃枣子太多吃出病来了。苻生大怒：“你怎么知道我吃枣子！”立即命令将程延拉出去斩首。一次宴会，气氛不太好，饮酒的宾客不多，苻生借口在宴会上做酒监的尚书令辛牢劝酒不力，当场一箭

将辛牢射死。苻生梦见大鱼吃蒲（苻氏本姓蒲），又听说长安有民谣说“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就把太师鱼遵及其七子十孙都杀了。诸如此类，劣迹斑斑。

苻生的杀戮完全没有标准，只要对谁起疑心或者谁忤逆了他的意思，就毫不犹豫地杀之。大臣为他好，劝他几句，苻生就以诽谤的罪名杀之；大臣讨好他，说他的好话，苻生会认为这是献媚，杀之。为了杀人方便，苻生接见群臣时，旁边的武士弓上弦、刀出鞘，自己则把锤钳锯凿等放在手边，随时准备杀人。最后，朝中人人自危，都希望苻生早死。

我们的二号人物苻坚就在这时出场了。他不仅希望苻生早死，而且要取而代之。

苻坚是苻生的堂弟，受封东海王。两人性格迥然不同。苻坚汉化比较深，为人温文尔雅，从小最受爷爷苻洪的喜欢。他8岁的时候，突然请求苻洪聘请两位家庭教师教导自己。苻洪惊喜地说：“我们氏族从来只知喝酒吃肉，如今你有心向学，实在太好了。”他给孙子请的老师教授的是汉族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结果苻坚对汉族制度非常了解，期待着自己也能做个开创盛世的明君。苻坚见苻生残暴，有心推翻他，可惜力量单薄。苻坚找尚书吕婆楼商议对策。吕婆楼就推荐了王猛，夸王猛是世间少有的奇才，得他相助可以成就大事。苻坚就通过吕婆楼把王猛请到府里。他们二人虽然没有刘备访诸葛亮“三顾茅庐”的曲折，却像刘备和诸葛亮一样一见倾心、宾主畅谈甚欢。两人在拨乱反正、发展经济和统一天下等问题上不谋而合。苻坚对王猛的认识、才能和品格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直呼自己发现了第二个诸葛亮。王猛也为苻坚的抱负和设想所吸引，答应结束隐居，辅佐苻坚一起闯荡天下。

就在苻坚积聚力量准备政变的时候，苻生似乎嗅到了什么味道。升平元年（357年）六月的一天夜里，苻生睡觉前对侍婢说：“苻法、

苻坚兄弟也不可信任，明天要把他们杀掉。”侍婢痛恨苻生，连夜跑出来把消息泄露给了苻坚。苻法是苻坚的哥哥，受封清河王。兄弟两人一合计，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不能再犹豫了，就算力量不够也要孤注一掷，拼死一搏。

于是，清河王苻法、东海王苻坚领头造反，率领几百人就向皇宫杀去。原以为这是一次以弱搏强胜算不大的冒险，可是苻生早已丧失人心，积怨潜伏，就差有人挑头点火了。苻坚等人很顺利地冲进了皇宫。宿卫将士们自动放下武器，有的还倒戈参加了苻坚的政变。苻生当晚喝得酩酊大醉，睡得正熟，听见喧闹迷迷糊糊醒来，还没弄清楚状况就被人捆绑了起来。苻坚宣布将苻生废为越王，软禁起来，不久把他杀死，并杀死苻生的亲信党羽。

政变成功了，苻法和群臣都拥戴苻坚。苻坚于是继位为前秦第三代君主，以王猛为柱石，开始大展拳脚。

三

苻坚、王猛面对的前秦局面，困难重重，矛盾纷杂，让人不知道从何下手。

关中屡经战乱，领土小而百姓疲弱，在与前燕、东晋等政权的对峙中处于劣势。前秦内部政治黑暗，权力分散，法令不通；社会缺乏公正，豪强横行，普通百姓承担繁重的赋役；自然灾害频繁，田地荒芜，乡村颓废。种种不利导致官民对前秦政权普遍缺乏信心，氏族的统治很不稳定。说不定，前秦又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割据王朝。

苻坚和王猛选定的下手点是整顿吏治。他们认为一切的困难和矛盾都需要官府去解决，所以官府本身的巩固与否、效力强弱直接关系到国政的施展。只有先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才能进行其他创举。而整顿的具体方法，就是“治乱世用重典”。王猛上任之初就

杀戮不法豪强，苻坚有些动摇，询问王猛国家本来就不稳定，百姓持观望态度，骤然杀戮过重是否对国对民不利？王猛认为，国家贫弱人心不附，恰恰是因为之前政府力量不足，没有让天下看到朝廷的实力与决心。现在要拨乱反正，压制豪强，非下猛药不可。苻坚表示赞同，放手让王猛去“下猛药”。

姑臧侯樊世是跟随苻健杀入关中、建立前秦的氏族豪强，与苻氏关系密切。他自恃资历功劳，对苻坚重用王猛非常不满，曾当众骂王猛：“我辈和先帝共兴事业，如今大权旁落。你没有尺寸之功，怎么能执掌大权？这样岂不是我种了田地你收庄稼！”樊世在朝堂上和苻坚说话口气强硬。一次，王猛在旁指责他没有君臣之分。樊世与王猛吵了起来，大发雷霆，竟然捋起袖子就要殴打王猛。被人拉开后，樊世气呼呼地大骂：“不把王猛的脑袋挂在长安城门口，我决不罢休！”苻坚大怒道：“必须杀掉这个老氏，才能整肃百官。”苻坚命令将樊世立即斩首。樊世被杀后，氏族贵族常向苻坚告王猛的状。苻坚一概斥责，甚至在朝堂上鞭打告状的人，公开表示对王猛的支持。从此，前秦公卿以下官吏都畏惧王猛，不敢对他的施政指手画脚了。朝堂为之肃然。

为了压制豪强，王猛兼任了京兆尹（长安的长官）。光禄大夫强德仗着是太后的弟弟，酗酒，豪横，掠人财货、子女，是长安一大祸患。王猛一上任就抓捕强德，根本不向苻坚禀报就将其杀死，陈尸通衢。苻坚得知强德被抓后，连忙派使者前来赦免。可等使者到的时候，强德已经身首异地了。御史中丞邓羌很赞同王猛的强权治政，与王猛通力合作。两人疾恶纠案，无所顾忌，数旬之间杀戮豪强贵戚二十余人。此后，豪强纷纷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不敢再横行乡里，更不敢与官府作对。王猛施政旗开得胜，前秦王朝权威骤然上升，迅速实现了政令畅通。苻坚感叹：“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政治改革成功了，王猛迅速着手其他方面的改革。作为统治民族的氏族文化水平较低，即便是当官的氏族人也许多大字不识几个。

苻坚和王猛在统治区大兴文教，恢复儒家思想教学，收氏族和其他民族子弟入学。前秦还规定，俸禄百石以上的官吏必须“学通一经，才成一艺”，不通一经一艺者一律罢官为民。自八王之乱以来，北方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倡文教。通过这样的强制措施，前秦整体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苻坚和王猛非常重视农业。苻坚招揽流民，鼓励百姓安定下来，从事耕种。为了给百姓安居乐业创造条件，苻坚“与民休息”，尽量不打扰百姓。前秦征发贵族豪强的仆役庇户3万多人，在关中兴修水利，让关中许多荒废田地重新得到了灌溉。苻坚亲自参加耕种，他的皇后则在长安郊区开辟田地养蚕，作为天下的表率。

王猛执政，除了政策得当外，政品颇足称道。首先是公平，王猛对跋扈横行、贪赃枉法等事痛下杀手，自己也绝对做到了廉洁自律。即使身居相位，王猛克己奉公，生活俭朴，从不骄横凌人，让人抓不住把柄。其次是高效，王猛通过派遣巡查使者，掌握地方情况和政策落实的情况，及时做出反馈。他本人精力旺盛，工作勤勉，从不让政务拖沓，当日决定的事情晚上就开始推行。关中良相唯王猛，他被公认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最杰出的丞相。

经过苻坚和王猛20多年的励精图治，前秦出现了国富民强、安定清平的局面。史载，当时秦境“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贾贩于道”。百姓歌唱道：“长安大街，杨槐葱茏；下驰华车，上栖鸾凤；英才云集，诲我百姓。”关中地区迎来了十六国期间最稳定和繁荣的时期，而“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王）猛之力也”。

二四、前秦：我统一北方了！

一个政权的外部表现建立在国内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前秦国内情况的好转、实力的增长，苻坚开始迈出统一天下的步伐。

天下大乱之时，豪杰枭雄能拉起数千人马便能纵横州县，因为大家的力量都是半斤八两，都在低水平上徘徊，谁都吞并不了谁。可一旦遇到统治坚固、兵强马壮的政权，这些纵横州县的草头班子不是四散解体就是缴械投降。前秦衰落的时候，割据各地的小政权不少。王猛大治秦国，小的割据政权自忖混不下去了，纷纷主动投降。匈奴刘氏部、乌桓独孤部、鲜卑拓跋部等就先后降服前秦。367年，西部羌族叛乱，前凉君主张天锡想浑水摸鱼，出兵扩大地盘，结果遇到王猛亲自率兵平叛。王猛年轻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书就是兵书，行走各地也常常设想如果自己是指挥官该在本地如何布阵攻守，所以王猛不仅是治国的丞相，更是文武全才、智勇双全的主帅。张天锡偷鸡不成蚀把米，和叛乱的羌族一起被王猛杀得大败。王猛斩首前凉官兵一万七千级，张天锡缩回河西走廊，奉表向前秦称臣。前秦的外部形势大为好转。

话说苻坚的皇位是从堂兄苻生手里夺来的。苻坚为人宽厚，这在生活交友上是好品格，但在政治上不一定是好事。苻生被杀后，他的弟弟晋公苻柳、赵公苻双、魏公苻廋、燕公苻武四人分别镇守地方。他们四人镇守的都是要冲，直接掌握着军队，威胁苻坚的统治。王猛力劝苻坚除去苻柳等人。苻坚念及堂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没有采

纳。

王猛在西北与张天锡作战的时候，苻柳在重镇蒲坂（今山西永济）起兵反叛，苻双、苻廋、苻武三人同时宣布叛乱。四位公爵同时起兵，气势很大，乱军扬言要一举攻下长安，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第二年（368年）春，王猛从容率军前来讨伐。苻柳以割让要地陕城（今河南陕县，地处三门峡，扼守关中东门）给前燕为筹码，向前燕借兵。当时前燕由慕容评掌权。慕容评才能平庸，主动放弃了这么一个借前秦内讧获利的良机：“我等智略，非太宰（指慕容恪）之比，能闭关保境足矣，平秦不是我等之事。”苻廋则写信向慕容垂和皇甫真等明白人求救，说苻坚、王猛都是人中俊杰，前燕君臣不早日取之，只怕日后追悔莫及。慕容垂知道苻廋所言极是，可惜他在前燕自身难保，哪里还能左右出兵大事？

苻柳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迎战了。苻柳主动迎战，王猛高挂免战牌。他以为王猛怯战，对王猛掉以轻心，留下儿子守城，自己亲率精锐偷袭长安。王猛侦知了情报，暗中派邓羌设伏，将苻柳精锐杀得丢盔弃甲，只剩数百骑逃回蒲坂。苻柳主力损失殆尽，无力坚守蒲坂。城破后，苻柳被杀。其他三位公爵被各个击破，陆续被杀。苻廋被俘后，苻坚亲自审问他为什么造反。苻廋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弟兄都谋逆造反了，臣怕受连累而死，所以索性一起造反。”苻坚赐他自尽，没有株连其他人，连苻廋的儿子也被赦免了。苻坚的宽厚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四公爵叛乱被平定后，前秦内外肃清。苻坚、王猛开始四出攻伐敌国。而头号敌人就是东方的前燕了。

前燕的基础比前秦要好得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却远远落在了前秦的后面。这里面除了苻坚和王猛治国有方的原因外，另一大原因是前燕的内讧。慕容家族的第二代慕容皝、慕容翰内讧过，第三代内讧得更过分，导致一代枭雄慕容垂被排挤到了前秦。而掌权的慕容评

等人才平庸，国内民族和经济矛盾重重，人心不稳，士气涣散。前秦正想着如何吞并前燕，南方的桓温又开始北伐了。这给前秦创造了机会。

369年，桓温北伐的主要目标是前燕，进展非常顺利，七月就攻至枋头。燕都邺城震动。前燕皇帝慕容暉求救于前秦，答应割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西领土给前秦。前秦的多数大臣目光短浅，反对救援前燕，对前燕败于桓温有幸灾乐祸的感觉。王猛则认为前秦和前燕唇亡齿寒，如果坐视桓温消灭前燕，则前秦大事不妙。他向苻坚建议先出兵与前燕击退晋军，然后乘前燕战后虚弱、缺乏防备再吞并它。苻坚采纳王猛的意见，出兵联合前燕与东晋北伐军作战。九月，燕秦联军大败晋兵，桓温败归南方。战后，前燕毁约，不愿割地给前秦。王猛要的就是一个借口，前燕此举引来了前秦的大举讨伐。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前燕不是不愿意给嘛，王猛带上3万兵马亲自来拿了。370年正月，秦军包围秦燕交界处的重镇洛阳。洛阳燕军斗志全无，开城门投降。

370年夏，王猛统帅杨安等将领，率战士6万大举伐燕。前燕慕容评率兵30万迎战。面对着五倍于己的强敌，王猛采取四处出击的战略，掌握主动权。他自己一举攻下太行山口的要塞壶关。杨安北上进攻晋阳。晋阳重兵把守，杨安连攻两月没有攻克。王猛即率军驰援。他见晋阳城墙高大坚固，改变策略，督促士卒连夜挖通地道，输送壮士数百人潜入城中。约定时间，城内伏兵鼓噪而出，杀尽守门兵丁，打开城门迎大部队入城。偷袭成功，秦军迅速占领晋阳，俘虏前燕王公和官兵无数，动摇了前燕原本就不顽强的抵抗决心。慕容评的主力，裹足不前。王猛不给慕容评喘息的机会，率得胜之师迅速南下，逼慕容评进行主力决战。慕容评判断秦军孤军深入，不能持久，想拖垮秦军。谁知王猛一心要速战速决，挑选5000精锐骑兵偷袭燕军辎重，放火烧个精光。这把火瓦解了燕军的士气，连坐守邺城的慕容暉都看不下去了，派人严责慕容评。慕容评平日巧取豪夺、贪赃枉法，

聚敛了大量财富。慕容暉严令他將财富散发给士兵，鼓舞士气，然后迫令他出战。外有圣旨逼战，内无隔夜粮草，慕容评想不决战都不成，结果仓促决战的结果是燕军大败。慕容评只带少数亲随逃回邺城。王猛长驱东进，包围了邺城。

当年十一月，苻坚以投降的慕容垂为前锋，亲率10万精兵与王猛会师，准备对邺城发动最后攻势。慕容暉、慕容评弃城逃走，大臣开门投降。秦兵占领邺城后，追上慕容暉将其俘获。慕容评逃到高句丽，被高句丽捆绑起来送给前秦。至此，前燕灭亡。

灭亡前燕后，前秦用兵西方。当初大败张天锡时，前秦俘虏了前凉官兵5000人。如今，王猛将这些俘虏全部放回凉州，并捎给张天锡一封亲笔信。在信中，王猛分析了天下形势，前秦已经基本统一北方，铁骑数以十万计，而前凉割据河西一隅，早已元气大伤。王猛为张天锡的利益考虑，劝他纳土归降。张天锡本是小国之君，就怕遇到独步天下的大国，如今偏偏就遇到了蓬勃兴旺的前秦。他寝食不宁，翻来覆去了几天，觉得王猛的意见还是最现实的方法。于是，张天锡向前秦投降，前凉灭亡。前秦和平获得了河西之地。在此基础上，382年苻坚又命将军吕光率军经营西域。吕光攻破焉耆、龟兹等三十六国，俘获大量珍宝和马匹，自东汉以后再次将中原王朝的统治衍生到西域。

在西南方向，前秦也有“意外的收获”。在西部，前秦和东晋原本没有直接对峙，中间隔着一个杨氏仇池政权。仇池杨氏原也是氏族的一个分支，早在蜀汉和曹魏争斗时期就游离在蜀魏之间，西晋末期占据现在甘肃南部和四川北部一隅，割地为王。其国甚小，不包括在十六国之内。前秦强盛后，于371年灭仇池。屏障一去，东晋的梁、益二州就直接与前秦对峙了。

与前秦相比，东晋梁、益两州的情况不太乐观。桓温擅权引起了东晋内斗。梁州（主要在今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和益州（四川大部）

远离东晋政治核心，朝廷无暇顾及这一地区。和前秦的生龙活虎相比，对峙的晋军长期武备不修、城池破败。东晋梁州刺史杨亮守土有责，终日满脸愁容，不知如何是好。杨亮认为原仇池地区是南北拉锯的屏障，关系汉中存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出击。于是，杨亮在373年主动对前秦发动进攻，试图夺取仇池地区。前秦的梁州刺史杨安反击，打败晋军。晋军冒险行动失败后，引发了恶劣的连锁反应，梁州各郡县长官闻风而逃，引得前秦军队杀入梁州。苻坚敏锐地把握住机会，将这个边界小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加派兵力分路南下，志在夺取巴蜀。其中一支秦军进攻汉中。杨亮纠集残军和本地少数民族军队再战，再败，汉中失守。梁州被前秦占领。另一支秦军直扑四川的北部天险剑阁。剑阁由晋梓潼太守（今四川绵阳）周虓防守。周虓文人出身不懂军事，只知道防守郡城，竟然没有派兵扼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导致前秦军队顺利通过天险，包围梓潼。兵临城下，周虓首先想到的是一家老小的安危，竟然率军放弃城池，保护老母幼子夺路向湖北逃去，途中为秦军俘虏。周虓投降。川北形势急剧恶化，益州的东晋官吏也闻风而逃，秦军兵不血刃开进成都。东晋朝廷令荆州军队救援四川，不想荆州军队胆寒，拖延不前，等到秦军占领四川全境后终于把救援的任务给拖黄了。反倒是四川军民不满前秦的统治，各地骚乱、起义不断，前秦邓羌、杨安等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真正把四川给稳定下来。

至此，前秦基本统一了北方，并占领长江上游地区，疆域达到十六国的极盛。十分天下，秦居其七，剩下的三分在战栗发抖的东晋手中。

二

就在前秦统一北方的前夜，375年六月，王猛病倒了。

苻坚和王猛的关系，真如鱼水。王猛比苻坚大13岁，苻坚一直以

长辈之礼尊敬王猛。王猛病后，苻坚亲自为他祈祷，并派侍臣遍祷名山大川。七月，王猛病情还是转重，弥留之际对前来探望的苻坚留下遗言：“晋朝虽然僻处江南，却是华夏正统，目前上下安和。臣死之后，希望陛下千万不可图谋伐晋。鲜卑、西羌等归降贵族终怀二心，是我们的仇敌，迟早要成为祸害，应该逐渐铲除他们，以利于国家。”王猛还嘱咐其子以十具牛耕田务农，其余一无所求。

前秦上下听到噩耗，哭声震野，三日不绝。苻坚三次临棺祭奠，都恸哭不能自己。他对太子苻宏说：“上天不让我统一天下，怎么这样快就夺去我的王猛啊！”前秦按照汉朝安葬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最高规格，隆重地安葬了王猛，谥王猛为“武侯”。这个谥号和蜀汉给诸葛亮的谥号一样，取的就是王猛和诸葛亮一样都是国家柱石、勤政无私的意思。

苻坚的成功的确是在王猛的精心辅佐下才取得的。王猛死后，苻坚的许多政治弱点开始放大。

首先，苻坚为政最大的纰漏就是待敌过于宽松，厚待投降和被俘的各割据政权统治者。前凉还没投降的时候，苻坚就为张天锡造好了府邸，等着张天锡入住。张天锡投降后，苻坚立即任命他为尚书，封归义侯，没有丝毫防备。（却说这个张天锡在前秦崩溃后又投奔东晋，因为张家割据凉州始终以晋臣自居，东晋朝廷将张天锡树立为政治花瓶。张天锡在“祖国”东晋的处境和生活质量不太好，远不如在前秦时。不过他总算是十六国亡国之君中唯一一位得以善终的。）又比如前燕灭亡后，慕容暉等皇室成员都在长安担任了新职，其中慕容暉受封新兴侯，全家人依旧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慕容暉的母亲死了，苻坚竟然以燕国皇后之礼安葬；入宫做了苻坚妃子的燕国清河公主很得苻坚的宠爱，史称“宠冠后庭”。羌族姚氏政权进攻前秦失败，姚萇不得不率部投降，苻坚也允许他继续统领旧部，还予以安置。其他政权的亡国宗室的待遇大抵如此。我们都知道苻坚为人宽厚。害人之心的确不可有，对被俘或者投降的敌人也应该慈悲为怀，这都没错，可

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苻坚就一点都不防备身边的前敌人，还让他们出任官职掌握军队，埋下了日后帝国崩解的隐患。

其次，苻坚在民族政策上处理失误。氏族在五大胡族中人少力弱，要统治广大的北方地区实属不易。为了巩固统治，苻坚采取迁徙氏人分镇四方的政策。他消灭其他割据政权后，往往实行徙民政策，将被征服的鲜卑、乌桓、羌等民族10万户徙至关中，一来充实京畿地区，二来也便于控制。同时，苻坚将关中氏族15万户移至关东，安置在各个要镇，以此来加强对新征服区的控制。这一进一出，本意是好的，但客观上分散了原本就薄弱的氏族势力。苻坚所能依靠的本民族力量本来就有限，如今又被分散了，一旦遇到反叛难以集中力量。在前秦国势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隐患不会暴露出来，和前一个隐患一起潜伏着。等国势一旦衰微，两大矛盾一起爆发，就会要了前秦的性命。

最要命的是，苻坚没有了王猛的辅佐，开始“升心独断”，在383年一意孤行，倾全国之力南征，终于爆发了淝水之战。

现在，我们要把北方的局势暂且放到一边，把目光投向南方，将时间拉前几十年，看看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政局发展、社会变迁，看看南方和北方是如何在淝水之战中迎头相撞的。

二五、搞分裂是没有前途的

北方和四川陷入混乱的同时，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某些人也在蠢蠢欲动，图谋独立。与北方因为皇室内讧和少数民族入侵造成的分裂不同，南方的分裂倾向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南方第一次滑向分裂边缘是在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北方八王之乱高潮之时。为了镇压四川李氏兄弟领导的流民起义，荆州（今湖北湖南大部）官府强征青壮年入伍去四川作战。百姓们都不愿意去，官府只知道一味催逼。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张昌乘机纠合那些不愿远戍的百姓，再笼络南下荆州要饭的北方流民，揭竿而起。张昌顺利地打败荆州官兵，占领了江夏郡，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

有记载说张昌是“义阳蛮”，认为他是少数民族人。张昌的军队装束很奇怪，将士们都头戴红帽，拿马尾当胡子挂在脸上，很有少数民族特色。但张昌即便真的是少数民族，也是汉化很深的少数民族后裔。他祖父都在州县为吏，张昌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完全是汉化的。他改名李辰，鼓吹“会有圣人出来为民之主”，然后找到做过县吏的丘沈，把他改名叫刘尼，诈称汉室后裔，立为皇帝。张昌自己做相国，正式开朝建国了！张昌政权趁南方空虚，四处攻略，扩大地盘。张昌亲自北上，进攻襄樊和宛城，杀死司马懿的孙子、新野王司马歆；部将陈贞向南下攻陷武陵、零陵、长沙、武昌（今湖北鄂州）、豫章（今江西南昌）等地；另一个部将石冰东进，在长江下游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至此，张昌政权占据了荆、江、徐、扬、豫五州的许多州

县，俨然是一个大的割据政权。

南方糜烂，眼看不将为朝廷所有，西晋王朝紧急调年长而干练的大臣刘弘出任荆州刺史，全权负责镇压张昌。

刘弘主要干了两件事。第一是与民为善，消除百姓对朝廷的不满情绪；第二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个人：庐江浔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人陶侃。这后一件事深刻影响了东晋早期历史。

陶侃，出身寒门，少年丧父，家境至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非常坚强，对陶侃管教很严，日夜纺织甚至割发卖钱培养儿子，希望儿子能够有所作为。陶侃从小严肃勤勉，自强不息，好结交朋友。尽管能力出众、名声在外，却因为出身低贱，陶侃只能出任一些杂役闲差。他先是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过县主簿，后来去洛阳四处求官，受到侮辱，后来补任荆州南部的武冈县令。此时陶侃已经40多岁了，感叹命运不济，加上与太守关系紧张便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离的小中正。刘弘知人善任，平地一声雷，任命陶侃为南蛮长史、大都护，领兵打张昌。陶侃连战连胜，张昌败亡，荆州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刘弘非常高兴，对陶侃说：“我从前在羊公（羊祜）手下做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会做到他当时的官职。现在看来，你会做我的后任的。”陶侃时年45岁，刚崭露头角，算是高龄了。

张昌余部石冰还在江东一带发展。西晋建立后，原先东吴的世家大族纷纷在江东占地自守，保存了强大的实力。他们纷纷起兵，自发与石冰作战。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是江东大族中的“强宗”。周氏代表周玘联合另外两个大族贺循、甘卓一齐起兵，攻杀石冰委派的官吏和军队，迫使石冰向北发展，进攻淮南重镇寿春（今安徽寿县）。镇守寿春的征东将军刘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陶侃的同乡陈敏，和陶侃一样廉洁能干，可惜出身低微，在郡吏位置上徘徊。当时，陈敏恰好在寿春运粮。他自告奋勇，组织运粮兵，再从刘准手里要来了部分正规军，迎战石冰。陈敏指挥得当，作战勇敢，镇压了石冰的军队。

朝廷任命他做广陵相。

如果说张昌、石冰的造反还属于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范畴，那么，南方接下来的又一场大乱则是有着明确政治意图、影响广泛的“独立运动”。

立下大功的陈敏本身也是个野心家，能干又有地盘。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用陈敏做右将军、前锋都督。他不看好司马越，借口回江东扩充军队，于当年十二月攻占历阳（今安徽和县），公开反晋，派兄弟陈恢与钱端南取江州（今江西、福建、鄂南）、兄弟陈斌东取长江下游各郡。西晋官吏望风而逃。

陈敏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割据江南，恢复东吴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东吴的建立者孙坚父子就是趁北方大乱，夺取江东各郡为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巧合的是，孙坚也出身低微，长期在郡吏的位置上徘徊。所以，陈敏对南方各地以“恢复故国”相号召，对江东的豪杰、名士注意收罗礼待。西晋统一后对南方的歧视导致南方各个阶层，尤其是在新王朝仕途不顺的士人阶层，普遍对东吴政权有所留恋，倾向趁北方大乱重新独立。大族甘卓主动向陈敏示好，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并称“江南三骏”，在洛阳很不顺利，如今欣然接受了陈敏政权右将军的任命。贺循、周玘两人虽然装病观望，没有加入反叛队伍，但也没有起兵镇压，默认了陈敏对江南各地的占领。江东既定，陈敏自封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建立了“楚”政权，加九锡，为称帝做准备。

陈敏安抚了江东地区，只是恢复了东吴一半的领土，位居上游的荆州还在刘弘的控制下。陈敏既以复国相号召又要保障江东安全，计划集中精锐攻取荆州后再登基称帝。陈敏西进的第一关就是江夏郡。江夏太守恰好是陶侃。考虑到陶侃和陈敏是庐江老乡，荆州许多人担心陶侃不可靠。荆州刺史刘弘用人不疑，坚决不调离陶侃。陶侃自己也很担心，又不愿意放弃与陈敏鏖战再立新功的机会，就把一子一侄

送到刘弘处 做人质。刘弘不接受，说：“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陶侃大受感动。

江夏一战，陶侃胜，陈敏败。楚政权的攻势被遏止了。

陈敏的失败并不严重，主力尚存。但失败引起的心理反应却给他的政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之前，江东官民支持陈敏立国，心里多少缺乏底气。陈敏凯歌高奏，会提高大家的信心，而江夏的失败一下子抽走了大家的信心。楚政权内部离心倾向增强了。

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原本观望的大族周玘策动陈敏的部将钱广在建业（今江苏南京）举兵反陈敏，并诈称陈敏已经被杀。陈敏发兵赶赴秦淮河，把镇压钱广的任务交给了亲家甘卓。顾荣也开始转向反对陈敏，赶来劝甘卓说：“如果陈敏能够立国江东，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到底。但你看现在的局势，他有成功的希望吗？陈敏才能平常，政令反复，子弟骄纵，败局已定。我们如果再接受他的官爵，事败之日我们的头颅就会被送往洛阳，上书‘逆贼顾荣、甘卓之首’，遗臭万年，岂不可耻！”甘卓于是装病，派人接女儿回家，并毁坏秦淮河上的朱雀桥和渡船，宣布讨陈。陈敏亲自带领一万多兵马和甘卓隔秦淮河对峙。甘卓这边的将士大喊：“我辈为了相信顾丹杨、周安丰（陈敏任顾荣做丹杨内史、周玘做安丰太守）才愿意替陈公出力。现在二公都不跟他了，你们还跟着他做什么！”陈敏部下面面相觑，犹豫不前。顾荣走到阵前，拿着白羽扇向对岸挥动。将士们一看果然是顾荣，才相信陈敏已经失去了世家大族的支持，纷纷溃散了（由此可见，江南世家大族们有多大的号召力）。陈敏见大势已去，单骑逃走，在长江边被杀。陈敏的兄弟和部将也纷纷被地方人士所杀。江东各地很快“反正”，重新“效忠”西晋朝廷。

陈敏死去刚刚半年，琅琊王司马睿来到了建业。

司马睿也是抱着在江南建国的目的来的。但是他的起点实在不高。单单从地盘上来说，司马睿占据的仅是扬州一隅。当时长江中下游从上到下依次为荆州、江州、扬州，大致对应现在的两湖、皖赣和江浙。荆州、江州都听命于洛阳朝廷，已有都督或刺史。没有广袤的土地，没有稳固的上游，司马睿想在扬州下游立国很困难。

江州刺史华轶差不多和司马睿同时来到南方，也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党羽。他在江州恩威并施，交好江州豪杰士人，收揽南方逃亡来的官民，史载“得江表之欢心”，比司马睿逊色不到哪里去。华轶借口“洛京尚存”，不听从司马睿的指挥（人家本来就是朝廷命官，和司马睿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尽管同属一个派系，司马睿一派却和华轶势同水火。永嘉五年（311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西征，统甘卓、周访等人逆江而上，企图武力吞并华轶势力。

话说江夏之战后，荆州刺史刘弘病故，陶侃也因为母亲病故辞官服丧去了。一晃几年过去了，陶侃丧期满后，投奔了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任命陶侃督护江州诸军事，华轶也需要借重陶侃的声望和能力，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3000屯夏口防备下游。华轶与司马睿矛盾公开后，担任江州刺史参军的是陶侃的侄子陶臻。陶臻认为司马睿会战胜华轶，装病辞官，劝说陶侃：“华轶有忧天下之志，可惜才不足，且与琅琊王不平，恐怕在劫难逃。”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气愤地将陶臻抓起来送给华轶。陶臻中途偷偷跑到建业投奔司马睿去了。为了争取陶侃，司马睿“提升”陶侃为奋威将军，给予“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的待遇。当时朝廷政令不通，藩镇长官各行其是，人事变动向朝廷汇报一下（所谓的“表”），不管朝廷有没有收到同意不同意，就制造既成事实了。陶侃权衡再三，倒向了司马睿阵营，结果导致华轶在王敦等人的进攻面前，兵败身亡。事后，陶侃再升为龙骧将军，实授武昌太守。

司马睿争夺江州的同时，西边的荆、湘两州（拆分荆州南部为湘州）陷入了杜弢之乱。这是继张昌之乱、陈敏之乱后的第三次南方大

乱，再次几乎分裂了南方。

四川大乱后，大批巴蜀居民东迁避难，有好几万家进入荆湘二州。流民常和本地人发生摩擦，又受官府歧视，就推四川人李骧（与成汉政权李雄的叔父同名同姓）造反。当时的荆州刺史是王衍、王戎、王敦等人的族兄弟王澄，是个能说会道却不知军务的公子。流民起义起初规模很小，遭到各地方官府的镇压，李骧不得不向王澄投降。这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王澄画蛇添足，假意答应流民投降，暗中乘其不防偷袭起义军，并株连百姓，屠杀了8000多流民。流民更加怨恨，于永嘉五年（311年）正月再次推举成都人杜弢在湘州起义。

杜弢领导起义，完全是局势所迫。他祖父和父亲都是晋朝的县令，本人是地方秀才（那时的秀才一州才能推举一人，很金贵），因避四川战乱才迁居荆州。李骧领导第一次流民起义时，杜弢是醴陵县令，率军镇压起义。如今，杜弢却被流民推举为起义的领导人，真是命运多变。他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发兵进攻长沙、零陵、桂阳、武昌等郡。王澄和杜弢作战，屡次败北，却满不在乎。后来，原新野王司马歆帐下牙门将聚众起兵，自称楚公；原荆州刺史参军王冲叛变，自称荆州刺史。王澄这个荆州刺史成了空头司令，才仓皇顺江东下，逃亡建业。司马睿很客气地将他调任闲官（军咨祭酒），任命了河南世族周顗为新的荆州刺史。周顗到荆州，对杜弢之乱束手无策。在江州的王敦势力，于是派遣陶侃、周访、甘卓等进入荆州镇压杜弢。

建兴元年（313年），杜弢率军进攻周顗驻地，陶侃前往救援。流民武装擅长远途奔袭和流动作战，不利于硬碰硬的阵地战。杜弢充分发挥这一特点，主动放弃周顗，想趁陶侃大军在荆州的机会奔袭陶侃的大本营武昌。陶侃听说杜弢撤围后，估计杜弢乘虚去袭击武昌了，立即撤军，抢在杜弢前面返回武昌，给予敌人迎头痛击。杜弢的流民武装第一次遭到重创，大败逃向长沙。陶侃派参军王贡到王敦处报捷。王敦喜出望外：“若无陶侯，荆州将非国家所有！”他向司马睿

推荐陶侃为荆州刺史。陶侃以卑微的出身，在极端重视家世的晋朝、用短短10年时间升任藩镇首脑，创造了一个奇迹。

陶侃乐得有点飘飘然。危险就在这个时候来临了。胡亢造反时，命原南蛮司马杜曾为竟陵太守。杜增勇冠三军，身穿甲冑还能在水中游泳，见胡亢猜忌暴虐，连杀部将数人，担心大祸临头，在当年（313年）暗中联合王冲杀掉胡亢，并吞了荆州方向的乱军武装。陶侃派去报捷的参军王贡返回时，路过竟陵，不知道是立功心切还是胆大妄为，以陶侃的名义联络杜曾，说服杜曾和王冲火拼。杜曾轻易杀死了王冲。陶侃得知变故，召王贡询问。王贡怕陶侃责怪，不敢去，竟然和杜曾合作偷袭陶侃。陶侃大败，连坐船都被叛军钩住，侥幸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陶侃因这次惨败被革职。但荆州前线实在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负责将领，王敦让陶侃以平民身份执掌荆州刺史职权。

陶侃面对的敌人，分别是北边荆州的杜曾乱军和南边湘州的杜弋流民。陶侃先北后南，先集中军队讨伐杜弋。他和周访联合，屡次战胜杜弋，因军功很快恢复了官职。杜弋的流民武装在几年征战中，损失惨重，后续乏力，托旧时相识的南平太守应詹出面斡旋，希望能投降朝廷，保全性命。杜弋本不愿造反，写的降书言辞恳切优美，司马睿同意了，派使者去受降，还任命杜弋为巴东监军。然而，前线众将贪功，仍不断地向流民进攻。杜弋气愤不过，杀掉受降使者，坚持造反到底。直到建兴三年（315年）八月，陶侃才击溃流民武装，平定湘州。王贡投降，杜弋逃亡不知所终。

陶侃镇压杜弋后，乘胜北上讨伐杜曾。杜曾不敢恋战，收拢军队北上，围攻宛城。镇守宛城的是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的荀崧。荀崧无兵无粮，形势岌岌可危，想向襄城求救又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年方13岁的女儿荀灌自告奋勇，率领几十名勇士，在夜幕掩护下缒出城墙，突围而去。她边打边走，最终摆脱追兵，到达襄城求援。同时，荀灌还以父亲的名义，向周访求援。各支援兵到达，杜曾解围而去。

这便是“荀灌娘突围求救”的历史佳话。

杜曾和杜弢不同，勇而无谋，没有远略，并不难平定，只需给陶侃等人些时间。这个时候，官军内部矛盾开始滋生，延误了整个荆州局势。陶侃之前的胜利，离不开王敦的幕后支持。随着陶侃军功鼎盛声名鹊起，王敦左右钱凤等人妒忌起来，开始向王敦进谗。王敦对陶侃的信任大打折扣，也产生了猜忌的心理。他召陶侃相见，要解除陶侃的职务。陶侃的部将都劝他不要去见王敦。陶侃坚持去了，果然被王敦扣留，调他出任广州刺史。广州远在南粤，在西晋人眼中是极偏远之地（当时湘州、江州就被认为是边缘之地了），陶侃的这项任命等于流放。王敦再任命堂兄弟王廙为新的荆州刺史。荆州诸将怨恨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竟想杀陶侃，犹豫着进进出出好几回。不想，陶侃过来正色对他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说完，坦然自若地去上厕所。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统兵在外，如果杀害陶侃恐怕再激起周访兵变。王敦这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

陶侃连夜出发，赶赴广州。在广州，陶侃平定了南粤的骚乱，做了10年的刺史。每天早晨，他都搬一百块砖到室外，晚上再搬回室内。旁人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陶侃说：“我方致力中原，生活太安逸恐怕以后不堪事，所以坚持锻炼。”这便是“陶侃运甓”的故事，当时陶侃已经是个花甲老人了。

陶侃被排挤走后，荆州将领郑攀、马隼等人为陶侃鸣不平，遭到王敦训斥，便率领军队叛变，加入杜曾乱军。而远在长安的晋愍帝任命的新荆州刺史（司马睿势力在江南任命了一系列人事，都是在形式上向朝廷上个表打个招呼便自行决定了。朝廷并不认可，甚至可能闻所未闻）、一个名叫第五猗的人恰好赶到荆州赴任。杜曾、郑攀等乱军就拥戴第五猗为正派刺史，与司马睿势力的荆州刺史王廙作战。局势更复杂了。建武元年（317年），杜曾连战得胜，大军向江陵挺进。司马睿命周访迎战。周访是陶侃的同乡兼亲家，之前和陶侃并肩

作战多年，如今领兵8000，在沌阳（今汉阳西）和杜曾乱军激战。战斗从清晨起激战到傍晚，周访军队渐渐不支。周访挑选800名精兵，亲自敬酒，鼓励大家死战，先静候不动听到鼓声再行动。杜曾大军涌到周访中军阵前三十步时，周访亲自击鼓，敢死队奋勇出击，大破杜曾的重逢，扭转了战况。周访连夜乘胜追击，把杜曾大军打得溃不成军。战后，周访因功升任梁州刺史，担起了镇压杜曾的主要责任。太兴二年（319年），周访最终攻杀杜曾，俘虏第五猗。

如何处理第五猗，是个难题。第五猗是晋愍帝任命的官，在法律上是正牌刺史。周访向王敦求情，希望不要杀第五猗。王敦不听，照杀不误。因为当时司马睿已经在江南称帝，在王敦眼中，司马睿才是晋室的正宗。

二六、司马睿当皇帝，真不容易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混在森林深处的小灌木则是最安全的，有树阴可以遮蔽又不需要承担风险。西晋末年，皇室内讧，多少皇亲贵胄身首异处血流满地，司马炎一系的近支子弟更是损失殆尽。作为皇室远支疏宗的琅琊王司马睿幸存了下来，并发展壮大，在西晋灭亡北方沦陷以后建国江南，开创了东晋王朝。

琅琊王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晋惠帝、晋怀帝同一辈分。司马睿在皇室中的地位很低。他的爷爷司马伷是司马懿的小妾伏夫人所生（伏夫人还生了在八王之乱中火过一把的汝南王司马亮），是庶出的少子，被封为琅琊王。琅琊这个地方大约在今天山东临沂地区，是诸葛亮的老家。司马伷就娶了诸葛亮的族孙女为妻。当时社会上流传“牛继马后”，司马懿正在篡夺曹魏政权，认为这是在预示牛氏将取代司马家族，于是对朝廷中的牛氏大臣起了疑心。恰好有个大将叫牛金，不幸被司马懿给毒死了。想不到，“牛继马后”的预言应在琅琊王这一支血脉上，第三代琅琊王司马觐的王妃夏侯氏私通小吏牛氏，生司马睿。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皇帝，可不是“牛继马后”？司马睿的身世之谜虽然对皇室不敬，却被正儿八经地记录在了《晋书》中。

司马睿15岁世袭了琅琊王的爵位，整个少年时代和大半个青年时代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他既没有血缘优势，又无权无兵，是一系列政治活动的看客。如果说有过人的地方，就是他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身，一直安然无恙。八王之乱前夕，司马睿“每恭俭退

让，以免于祸”。到永兴元年（304年），政治斗争更加尖锐，一件事情把司马睿给牵涉了进去，导致他不能再独善其身了。当时晋惠帝被挟持到邺城，司马睿也跟着去了。东安王司马繇劝掌权的成都王司马颖对晋惠帝客气优待，司马颖不仅不听还把他杀了。司马睿是司马繇的亲侄子，怕遭牵连，赶紧化装逃走。成都王司马颖下令一切关口、渡口都不准贵人通过。司马睿到达黄河渡口，就被拦住了。情况紧急，幸亏有个叫宋典的随从急中生智，拿马鞭朝司马睿身上一拂，笑道：“舍长（看管房子的小吏），官府把你当作达官显贵拘留了，看来你很有贵相啊！”守渡口的官兵信以为真，就把司马睿等人放行了。

司马睿逃亡后，坚定地站到了东海王司马越的阵营一边。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授意司马睿去守下邳，并派自己的参军王导给司马睿当助手。王导出身琅琊王氏，是世族大家子弟，眼光独到，看到天下已乱，决心寻找一个可靠的盟友开创新局面。王导找到的这个盟友便是司马睿。他看中了司马睿的低调和没有历史包袱的清白背景。司马睿的封地就是王导的老家，他对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笼络。史称王导“倾心推奉”，司马睿“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司马睿跟着司马越在洛阳，王导不断劝他脱离洛阳，借口回封国而去东方开辟新局面。这才有了司马睿出镇下邳，王导再跟着来到下邳，开始了两人的搭档生涯。王导和琅琊王司马睿同龄，当年都30岁。

中原大乱愈加激烈，王导和堂兄弟王敦、王旷（王羲之的父亲）三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嘀咕了半天，觉得中原局面混乱，没有可以作为的地方，不如去相对安定的南方东吴古地开辟新局面。于是，王导建议司马睿去东南地区独当一面。司马睿很赞成，向司马越申请移镇南方。朝廷中的王氏兄弟王衍、司马越的妃子裴氏二人被司马睿和王导做通了工作，都鼓动司马越同意司马睿的请求。司马越也想给自己在南方安排一个后路，万一北方不济了可以去东南地区栖身，就答应了。没想到司马越很快身死覆灭，生前安排的后路成了司马睿的飞来横财。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睿出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

事，和王导拉上一帮子人马，搬到了建业。

司马睿前往东南，名义上是移镇，其实类似逃亡，带动了北方官民的南逃浪潮，史称“元嘉南渡”。

二

司马睿到建业时，距离陈敏覆灭才过去半年光景。南方局势也不是一潭静水，世族大家和一般百姓都心存观望，就看着司马睿如何作为了。司马睿到建业大半个月了，竟然没有一个江东士人前来拜访。

建业是东吴的故都，不是谁坐在这里都能得到东南地区支持的。西晋平吴后，江南童谣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局缩肉”是对司马皇室的蔑称；“横目”就是一个“四”字，“数横目”就说西晋寿命只有40年左右；40年后“中国当败吴当复”。而从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到307年司马睿南下，已经40年了，恰好天下大乱，很多东南百姓就认为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又有民谣说：“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30年后。”这个说得更明白，意思是东吴灭亡三十年后将会复国。东吴是280年灭亡的，30年后就是310年，离司马睿到建业还差3年。当年陈敏反叛，在东南能迅速掀起大风大浪，和民心反晋思吴有很大关系。琅琊王司马睿要想在东南站稳脚跟，必须安抚本地区的对立情绪，首要便是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

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人对他很冷淡。西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皇室成员在江东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贬值。而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又是西晋皇室中的边缘人物。现在，司马睿带着一大帮人逃到南方来，谁又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在南方立足？铁打的州县流水的官，司马睿说不定过几年就被人给撤了，说不定连西晋王朝都不存在了呢！所以，江东的世族大姓轻蔑地称司马睿、王导等人为“伧父”，很不礼貌。东南人心不附。王导着急了。对于他们那些南下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

睿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南方土著排斥司马睿就是间接地排斥包括王家在内的北方南下土人们。司马睿在南方站不住脚，王家等人也站不住脚。

于是在南下建邺的一个多月后的三月三日“修禊节”，王导在秦淮河边导演了这么一幕：

司马睿坐在奢华的肩舆之上，在皇家仪仗的簇拥下，缓缓而来。王导、王敦等北方世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骑马跟随其后。整个队伍威严肃穆又不失豪华热闹，将西晋王朝的泱泱皇室风范展现给了当时在江边过节的江南世人。江东的纪瞻、顾荣等著名大族都在江边搭着席位，占着地盘过节。目睹这一幕，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皇室骨肉相残之后竟然还能保持这么威严的阵势；原来司马睿在北方的地位这么高，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支持；原来司马睿等人还知道南方的节日，主动参加，与民同乐。震撼之余，南方人士纷纷拜倒在路旁。司马睿落座后，江东各大族的代表人物纷纷前来拜见。司马睿、王导等人专门挑一些南方人不知道的新闻、礼仪、赏赐来说事，那些世代居住在江东的世族大家听得晕头转向的。回家后，世族大家们纷纷感叹，司马睿这批人不可小瞧啊！

紧接着，南方各大人物和名流先后接到了司马睿的聘书。司马睿一下子征辟了160个幕僚，许诺以高官厚爵。司马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遇到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任用贺循为吴国内史，将东南核心的吴郡托付给本地人治理。纪瞻、周玕、张闾等江东世族也都被委以重任。东吴灭亡后，江东士人的仕途变得很不顺畅。如今司马睿大施恩惠，迅速将带士人团结在了身边。史载：“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在这其中，王导发挥了重要作用。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世族桓彝南渡过江之初，看到司马睿势力微弱，担忧地对同样南渡的汝南世族周顗说：“我们因为中原大乱才到此间来求生存，不料官府如此

微弱，怎么能维持下去！”后来桓彝见到了王导，交谈之后对周顗说：“我刚才见了管仲，再也不担忧了。”（这个桓彝只是个一晃而过的配角，终于太守，却生下了不起的儿子桓温和孙子桓玄，掀起了惊涛骇浪。）王导在建业协助司马睿收拾人心，王敦领兵在外四处攻城略地扩充地盘，扬州、江州、荆州、广州、交州纷纷归附司马睿，南下的其他北方世族共同出力稳固南方政局，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对于北方世族来说，他们内部肯定存在争权夺利和党同伐异，但在北有强敌南有土著的不利情况下，拥戴司马睿，同心协力在江南一隅打开局面，是维持各自门第和利益最现实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在“永嘉南渡”之初的几年里，北方世族空前地团结。这种团结仅此一回，当局面稳固后，北方世族很快起了内讧，触发了多次内战。

在这空前团结期间，北方世族在江南渐渐站住脚跟，稳定下来，而土著的江东世族则受到挤压，不再是南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了。

西晋末期，义兴周氏、吴兴沈氏领衔江东世族，号为强宗；紧随其后的是吴郡四大家张朱陆顾。北方世族初来，都不敢直接和他们对抗，纷纷避开现在的苏南和太湖流域，深入浙江、江西一带圈地占田，发展势力；再其后的有会稽的孔魏虞谢四家。这些家族的势力强大，张昌之乱中石冰侵略江南、陈敏反叛主要是江东世族，特别是义兴周家起兵平定的。石冰、陈敏之外，有个叫钱璜的人找出了孙皓的儿子孙充造反，再次企图恢复东吴政权。义兴周家的周玘组织家族力量，再配合乡里民兵就平定了这次造反，史称周家“三定江南”。可见江东世族最初力量之强大。

但是江东世族在东吴灭亡后，就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进行必要的思想沟通，形不成合力。比如义兴周氏往往是有事就组织军队，打完仗后便解散部队，主要目的是保卫乡土，维护家族利益。始终没有一个强权人物成功领导江东世族与西晋朝廷对抗。

也许是出于稳定多次骚乱后的江南，在“永嘉南渡”初期江东世族没有反抗北方世族的南下，坐视他们逐渐站稳脚跟。等到北方世族开始挤压土著势力的发展空间，江东世族们开始后悔了。周玘被司马睿怀柔任命为吴兴太守，他联络一部分人要杀死北方官员，改用南方人士。机密泄露后，司马睿不敢公开镇压，先调周玘为南郡太守，等他离开吴兴后突然改任他为军咨祭酒，不再让周玘掌握实权。周玘最后忧愤而死，临终对儿子周勰说：“杀我的是诸伧子（吴人对北方人的蔑称），能报此仇，才好算我的儿子。”司马睿明知周玘造反，仍然谥他为“忠烈”。周勰继续父志，联络族人阴谋起兵反晋。叔父周札不愿意造反，向司马睿告密。司马睿还是不敢公开镇压，利用周家内部矛盾采取暗杀手段镇压了起义。周勰却没有受到惩处，司马睿待之如初，只是日后不再对江东世族委以实权了。这时，江东世族的势力还是强大得让朝廷不敢小觑。

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北方世族在笼络策略之余，采取分化方法让江东世族自相削弱。王敦亲近吴兴沈家，以沈充为心腹和谋主，后来派沈充带兵消灭了义兴周家。沈充依靠王敦势力做大，一度私铸钱币，还参与了王敦之乱。王敦造反被平定后，沈充被部下所杀。吴兴沈家转衰。周、沈两家内耗衰落，标志着江东世族力量下滑。在整个南朝时期，江东世族都处于北方世族的优势之下。

话说司马睿在南方算是安定下来了，北方则出了大麻烦。316年，匈奴人攻陷长安，晋愍帝投降。司马睿成为仅存的、握有实权的藩镇宗室。残存的晋朝州县，比如北方并州的刘琨、南方扬州、荊州、江州的王导、王敦等人纷纷向司马睿劝进，希望他延续晋室血脉。第二年，司马睿在建康（为了避晋愍帝的名讳，建业改称建康）称晋王，改元建武作为缓冲。东晋开始了。建武二年（318年）三月，晋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王导赶紧劝说司马睿继承帝位。晋王司马睿顺理成章称帝，他就是晋元帝。

据说司马睿刚到建业的时候，君臣等人连吃一回猪肉都是奢侈的

享受。最好的猪脖颈肉自然是司马睿独享，其他人只好眼巴巴看着他吃。那块肉因此被称为“禁脔”。10年后，南渡的北方官民就完全改变了局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司马睿和王导的搭档关系也就升级为了司马睿当皇帝，王导当丞相的政治结构。至此，王导让司马睿势力在南方扎下了根，也让琅琊王家和北方世族在南方扎下了根，奠定了富贵百年的基业。

二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北伐

祖逖，范阳道人（今河北涿水人），出身官宦世家，却性情豁达，争强好胜，喜欢耍手腕伎俩，到十四五还大字不识。父亲早死，哥哥们很为祖逖担心，担心他日后破坏官宦世家的名声，或者干脆就当江洋大盗。尽管家人很担心，祖逖却很受乡党宗族的好评，因为他轻财好侠，慷慨助人，每次看到有困难的人都大把大把地散发谷帛接济，却假称是哥哥们的意思。

祖逖很有成为一代枭雄的潜质。可是“枭雄”是一个中性词，既可以指那些为朝廷荡平群寇藩镇一方的重臣大将，也可以指那些流寇四方、涂炭生灵的叛臣大盗。祖逖会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幸亏，祖逖长大后心性改变，开始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群，古今军政都了然于胸，往来京师见者都称祖逖有赞世之才。他开始当官，不过都不是正儿八经治民办公的官职，而是频繁进出各个王爷和权臣的幕府，当的都是些参军之类的职务。大抵上，他是长于处理重要事务或者棘手的事，而不善于坐在衙门里埋头于文山案牍。可惜，王爷们都没能给他施展才能的舞台，埋头于内讧争斗。所以，祖逖的前40多年都湮没在茫茫人海中，没能露出锋芒来。

祖逖担任司州主簿时，刘琨也担任司州主簿。刘琨比祖逖小5岁，两人都有匡扶国家之心，感情很好，住在一起同被而眠。祖逖、

刘琨两人都是俊杰，常常谈论时政，有时通宵达旦，都认为晋朝将“四海鼎沸，豪杰并起”。想到动荡的前景，二人互相勉励，约定“相避于中原”。一天凌晨，荒野响起鸡鸣，祖逖醒来，踢踢刘琨说：“这不是恶声。”于是，两人天没亮就出来舞剑，锻炼身体。“闻鸡起舞”由此而来。刘琨实际能力要弱于祖逖，但因为是汉朝宗室后裔、名冠一时，提拔得比祖逖快，后来成了西晋在北方的支柱。

八王之乱高潮时，祖逖率领亲党数百家从河北向江淮地区逃难。途中，祖逖把所乘的车马让给同行的老弱病残，自己徒步前进，把药物、衣粮都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百姓们见祖逖有权略重义气，公推祖逖为“行主”。所谓“行主”，本质上是北方流民领袖。天下大乱，人口流动频繁，人数众多，形成多股流民潮。流民在迁徙过程中，有各种问题，很容易组织起来。流民组织有领袖，有武装，迁徙到某地定居后常常建造堡垒自守，平时耕种周围土地，有事就收缩回堡垒。这些流民堡垒少的能拉起几百人的武装，多的能拼凑数千军队，遍布江淮地区。各个政权分别委以流民领袖县令、太守乃至刺史职务，笼络流民武装，不至于与己为敌。八王之乱时，多支北方流民武装南下，在江淮地区建立了许多流民武装堡垒，称为坞堡，流民领袖被称为坞主。其中大的武装则南下占领城池，比如祖逖这支武装就进驻泗口，此外还有苏峻、郗鉴等武装入驻徐州、扬州等地。司马睿就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以为笼络之策。

祖逖进一步带着队伍南下丹徒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在这里，祖逖招揽勇士为宾客义徒，待之如子弟。当时扬州突然大旱，出现饥荒，南下流民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颇有侠气的祖逖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遇到有流民为官府捕获，祖逖也千方百计解救。因此，祖逖在南下流民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祖逖因为朝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北方流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也有强烈驱逐胡族恢复故土的要求。整个东晋时期，南方都存在强烈的北伐复国的呼声。祖逖虽然不断向南走，但沿途散播调转枪头

打回北方区的言论，号召南方各派力量团结起来北伐。在江南稍微站稳脚跟后，祖逖就上奏司马睿，鼓吹北伐：“晋室之乱，并非朝廷无道百姓怨叛造成的，而是由于藩王争权，自相诛杀，导致戎狄乘隙毒流中原。如今，百姓遭受残酷杀戮，人人有奋击反抗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如果让祖逖我统兵北伐，则郡国豪杰必争相来投，沈弱之士欣然拥护，不久国耻可雪。”分析祖逖的这个奏折，他对西晋王朝覆灭很不甘心，认为是少数民族武装趁朝廷内乱侥幸取胜的，现在有民心可用，只要南方同仇敌忾，定能光复故土。

司马睿、王导等人肯定清楚南方的北伐呼声。他们并不热衷北伐，因为对于南渡的司马睿政权来说首要的是在南方扎下根去，巩固统治。和江州、荆州军方争夺地盘、争取江东世族的支持、调节南下世族的内部矛盾，样样事情都比北伐重要得多。再说，北伐夺回北方故土，对司马睿等人的坏处很明显。首先，司马睿的名望很低，万一哪个重臣大将北伐成功了，名声大涨功高震主，对司马睿有什么好处呢？其次，司马睿是皇室疏宗，万一北伐找到几位皇室血统更近更高的宗室，司马睿往哪里放啊？所以，司马睿、王导力主集中军力、物力、财力去扩充领土、稳定南方，不愿意分兵北伐。但是北伐的理由很充分，具有不容辩驳的道德力量，司马睿和王导又不便反对。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口头赞赏，暗地里布置种种障碍，盼望着北伐不要成功。

对待北伐“政治第一位”的指导思想和“阳奉阴违”的做法，司马睿和王导首创，被之后的东晋历代朝廷所继承。

接到祖逖自请北伐的奏折后，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豫州（今河南地区）大部分在石勒手里呢，司马睿给祖逖的职位是虚的，需要祖逖自己去夺回。那么司马睿给祖逖多少北伐军需呢？一千人份的军饷，三千匹布，没有一兵一将，没有一副铠甲一把刀。王导向祖逖解释说，我们现在很困难，你就勉为其难，自行招募军队北伐吧。

317年，祖逖率领百余家跟随自己的北方流民渡江北上，勇敢地开始了悲壮的北伐。渡到长江中流，祖逖敲击着船桨立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他辞色壮烈，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悲凉，旁人闻之慨叹不已。“中流击楫”典故在此，如今已成了雄心壮志实践理想抱负的代名词。渡过长江后，祖逖在江阴停留了一会，冶铸兵器，并招募北伐的志愿军。他得到了流民的支持，组织起2000余人的粗糙军队，继续前进。

永嘉南渡后的豫州实际掌握在各支流民武装手中。西晋政府之前笼络坞主张平为豫州刺史、樊雅为谯郡太守，他们是两支最强大的流民武装，此外还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几支队伍，各有数百到几千人马，各自为政。祖逖来到后，采取拉拢一派打击一派的方法，大力削弱流民武装。他先引诱谢浮进攻张平，杀掉了张平。樊雅大惊，在一个夜里突袭祖逖，攻破了北伐军的营垒。樊雅拔戟大呼，亲自冲向祖逖的营帐。北伐军大乱，祖逖在危急时刻体现出了枭雄本色，命左右列阵防守，从容指挥部下反击，击破了樊雅。樊雅失败后，联合张平余众继续与祖逖作战；祖逖则联合自封陈留太守的坞主陈川与之对抗。陈川派遣部将李头率兵增援祖逖。双方联军攻克谯城。战斗中李头勇敢向前、战功赫赫，战后祖逖得到了樊雅的坐骑骏马，李头很想要却不敢说，祖逖知他的意思后主动送上门去。李头感念祖逖的恩遇，叹息道：“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陈川知道后，大怒，这不是吃里扒外嘛！他竟然因此杀死了李头，李头的部下400人逃奔祖逖。陈川更生气了，与祖逖决裂，派兵劫掠豫州诸郡，抢劫人口车马。祖逖指挥军队制止陈川部队的抢劫活动，陆续剿灭抢劫的兵丁，将赃物尽量物归原主，严明纪律，不让北伐官兵留有私产。

陈川自忖战胜不了祖逖，向石勒投降。祖逖闻讯，率众讨伐陈川，石勒派石虎领兵5万救陈川。祖逖北伐正式进入与外族作战的阶段。这是永嘉南渡以来，晋朝军队第一次与外族军队正面作战。祖逖兵少，追求巧胜，屡次埋伏石虎，取得小胜。双方相守四旬，北伐军

的粮草接济不上——他们离江南基地越来越远，军需运输困难，而司马睿政权本身就没给予多少军需支援。祖逖知道石虎的军需也很困难（后赵政权的经济基础不行），就看敌我双方谁先支持不住了。他想出一条计策来，用布囊盛土做出米袋的模样，派千余人佯装运粮，途中令几个人装出疲惫的样子掉队在路旁休息。后赵军队看到后，上前进攻，那几个人赶紧放下米袋逃跑。偏偏这几个人运的米袋装的是真米，石虎检查截获的米袋，误以为北方军粮草充足，顿时对战斗前景失去了信心。石勒得知前线缺粮，派将军刘夜堂赶了上千头驴运粮支援石虎。祖逖在汴水伏击刘夜堂，俘获后赵军粮。石虎更是丧失了坚持的胆气，主动撤军了。北伐军推进到雍丘（今河南杞县）。

此后，祖逖和石勒在雍丘僵持了起来。祖逖多次主动进攻，让后赵的屯戍防不胜防。北伐军侦察兵常常俘虏后赵领土内的濮阳人，祖逖款待后遣归故里。这些人回去后感念祖逖的恩德，陆续率乡里投奔北伐军。陆陆续续北方有五百家投奔祖逖。石勒曾经抽调精骑万人进攻祖逖，希望有所斩获，结果反被祖逖所败，此后陷入被动防守态势，再无主动进攻。

北伐形势一片大好，归附者甚多。当日黄河南北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流民武装相互攻击，祖逖遣使为他们和解，晓以民族大义和切身祸福。这些流民武装都接受祖逖的指挥。黄河北岸有许多堡垒的坞主不得不送儿子在后赵政权中当人质，不能旗帜鲜明地投靠祖逖。祖逖也悉听尊便，默许他们的“两属”状态，有时还派遣小股部队佯攻这些堡垒，让后赵知道他们没有投靠北伐军。坞主们对祖逖的细心考虑感恩戴德，更加倾心北伐军，后赵政权有什么计划和阴谋事先都偷偷报告祖逖。北伐军的优势更加明显了。

由于祖逖指挥得当，手腕灵活高超，“黄河以南尽为晋土”。

北伐的胜利让东晋复国大业，现出了一丝曙光。祖逖收复了河南，现在的山西北部 and 河北北部一带也还在晋朝残余势力手中。在领土格局上，晋朝力量对河北的石勒政权和关中的刘曜政权形成了夹击的态势。

先前，坚守河北北部的是西晋任命的幽州刺史王浚。王浚利令智昏，自以为掌握幽州天高皇帝远，自不量力，妄想割据，最后被石勒吞灭，遗臭万年。坚守山西北部 的就是当年和祖逖一起闻鸡起舞的刘琨，时任并州刺史。刘琨的并州刺史是刘渊在并州建国、司马腾带领山西军民东出“乞活”，并州十室九空的情况下上任的。他在黄河边上组织了几百士卒，边打边走穿越匈奴的领土才赶到晋阳（今山西太原）上任的。刘琨有爱国之心，在晋阳惨淡经营，与刘聪、石勒两派不断拉锯作战。晋愍帝擢授刘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把北方的乱局托付给了他。遗憾的是，刘琨志大才疏，富贵惯了，生性豪奢，又误信谗言，始终不能团结并州军民组建强有力的军队，最终还是被石勒赶出了并州。段氏鲜卑倾向晋朝，刘琨向北投靠了鲜卑，并和段匹磾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发表檄文号召各族拥戴晋朝。317年，刘琨派妻侄温峤到建康报告北方情形，并劝司马睿即位做皇帝。临别，刘琨对温峤说：“晋祚虽衰，天命未改，我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温峤后来果然在江南举足轻重、盛誉一时。刘琨听到老友祖逖北伐成就斐然，高兴地致信祖逖：“我夜间都枕着兵器睡觉等天亮，一心期待消灭敌人，如今你跑到我前面去了。”他时刻准备杀敌，天不佑他，第二年被背信弃义的段匹磾杀害，时年48岁。他的死意味着晋朝势力在华北地区全军覆没。

刘琨死后半个世纪，桓温北伐遇到一个善于手工的老婢，原来是刘琨的伎女。老婢一见到桓温，潸然而泣。桓温问其故，老婢回答：“桓公酷似刘司空。”桓温十分高兴，出外整理衣冠，再呼老婢进来详细询问。老婢又说：“桓公和刘司空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意思是桓温还是

比不上刘琨。桓温于是褰冠解带，昏然而睡，不高兴了好几日。可见刘琨身后声望之高。

却说祖逖北伐初胜后，立志将河南建设为根据地。他的豫州刺史开始名实相符，为政俭朴节约，自己廉洁自律，不蓄私产；劝督农桑，恢复农业生产，亲自率领子弟耕耘砍柴，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乱后初定的豫州百姓纷纷拥戴祖逖。祖逖曾置酒大会相亲，豫州耆老流涕放歌：“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司马睿不得不提升祖逖为镇西将军。

石勒处于劣势，不敢窥兵河南。他采取务实的通好政策，派人修缮了成皋县的祖逖母亲墓地，写信给祖逖要求相互通使、交市。石勒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且被朝廷视为蛮夷，祖逖自然不能与之通使交好。这虽然是形式问题，却关系政治大局。但交市通商有利于南北方百姓，也有利于河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祖逖耍了个手腕，对石勒的来使置之不理，对南北方自发的通商交往也不加制止，听任互市。河南百姓在互市中获利十倍，民富而政府强，很快河南就公私丰赡，北伐军强盛。祖逖满怀信心地要“推锋越河，扫清冀朔”。

太兴四年（321年），晋元帝司马睿派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这就在祖逖的豫州刺史上面加了一道紧箍咒。祖逖认为这是朝廷派来监督他的，对他不信任。祖逖猜对了一半。面对声望和军队都成倍增长的祖逖，司马睿不能不心里酸酸的，手心发汗。戴渊出身东南寒门，必须依赖司马睿来获取权势，所以效忠司马睿。司马睿需要的是戴渊。祖逖没有猜到的是，司马睿派戴渊到河南抢夺胜利果实，除了监视祖逖还有分割琅琊王家权势，防范荆州王敦的目的在。祖逖过分关注北伐，几年来对东晋王朝的政治格局缺乏了解，自然不清楚司马睿的第二个目的。祖逖见戴渊是南方人，虽有才望但并不热衷北伐。河南收复后形势大好，如果拖延过久不再接再厉，一旦民心泄气石勒缓过劲来，北伐难度将大为增加。可北伐已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祖逖只能快快不乐。

戴渊出镇河南，王敦的反应最强烈，表露出与朝廷公开决裂的态势。祖逖担心朝廷将起内讧，更加拖累北伐大业，忧虑过度而发病。

在病中，祖逖还在筹划进一步北伐。他营缮了武牢城，该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计划建设成向北向西进军的据点，又在河南筑垒，巩固战果，以备北伐失利时坚守。城没修成，祖逖在雍丘病逝，时年56岁。豫州百姓若丧考妣，百姓为之立祠。朝廷追赠祖逖为车骑将军。据说王敦久怀逆志，畏惧祖逖的北伐军才不敢与朝廷决裂，听到祖逖死讯后王敦开始肆意作乱。

祖逖原本可以在东晋获得丝毫不逊于刘琨的声望，可惜接替他的祖约日后率领这支流民武装参加叛乱，又投降了石勒，祖家被族诛，间接损害了祖逖的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祖逖作为无私的爱国者和无畏的战士越来越得到后人的尊崇。

二八、王与马不敢共天下



西晋末年，八王兵戎相见，天下大乱。山东琅琊国临沂（今山东临沂）的王家决定举族迁徙到相对安定的东南地区去。王家的王导即将渡过淮河的时候，担心前途，找到大占卜家郭璞算命。郭璞给算了一卦，说：“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于是王家高高兴兴南下去了，果真如郭璞所言在南方繁衍生息，成为南朝第一大名门望族。

王家的举族迁徙，只是发生在公元310年前后的著名的永嘉南渡的一部分而已。

在永嘉南渡中，许多北方的名门望族、朝野大臣带着族人，裹着金银细软，吆喝着家丁下人和家禽家畜，逃过淮河，来到了长江下游沿岸。乱哄哄的这股移民潮，给东南地区带来了近百万新人口。琅琊王氏除了王导外，还有王廙、王含、王舒、王彬等兄弟和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等子侄辈，统统搬迁到了原来的东吴旧都建邺（今江苏南京）。王家在秦淮河边一条叫乌衣巷的街道里聚族而居。来自陈郡的谢家紧随而来，也搬到了巷子里，和王家做起了邻居。

此时的王家，还只是晋朝若干二流家族之一，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并不紧密。琅琊王家最大的骄傲是家族道德凛然，家风高尚。王导的曾祖母朱氏是曾祖父的续弦，对王导的伯祖父王祥和祖父王览极尽虐待之能事。王祥两兄弟无怨无悔，真心侍奉后母。朱氏就变着法子地折磨两个孩子。寒冬腊月，朱氏深夜要吃鱼，逼王祥去捉活鱼。王祥

跑到河边，开始凿厚厚的冰层，准备捕鱼。不料，冰面自动裂开，两条鲜活的鲤鱼蹦到王祥脚下。这就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故事。王览则进入了《二十四孝图》，为了防止朱氏给王祥毒死，每次饭前他都替兄弟尝毒。兄弟俩的道德故事感天动地，惊动了以道德作为选拔官员标准的汉朝政府。东汉政府多次征辟两兄弟做官，都被兄弟俩拒绝了。直到年老了，王祥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出任了曹魏王朝的徐州别驾。这是琅琊王氏家族步入政坛的开始。

可见，王家的政治根基并不深。但他们一来没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政治冤家和夙敌，二来树立了超高的道德标准，把握了官场升迁的利器，官越当越大。王祥、王览两人先后担任了朝廷重臣。等到甘露五年（260年），司马昭发动政变，杀死小皇帝曹髦的时候，图谋篡位的司马家族已经不得不考虑王家的意见了。当时小皇帝的尸体还没有入殓，司马昭一再催促王祥来商量后事。王祥很聪明，来了后先抱着小皇帝的尸体大哭一场，自责救驾来迟，可又赞同司马昭的后事安排。在这里，王祥给家人树立了既重视道德说教，又注重政治实效的好榜样。王祥死前，对王览说：你的后人会大红大紫的。果然王览的孙子辈飞黄腾达。先是王衍担任了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王衍很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王衍这个人平日 里不干正事，迎合西晋初年社会思想观念开始从儒家道德向虚幻的玄学转变的趋势，整天拿着一把拂尘夸夸其谈，信口雌黄。暗地里，王衍意识到了危险，早设计了王家“狡兔三窟”的退路，得到了祖父辈的真传。王家政治上崛起的时期，正是西晋八王之乱时期。王衍后来被石勒抓住，压死在墙下。但是王导、王敦等人有了博取进一步荣华富贵的扎实基础。

二

王导这个人，是东晋王朝和琅琊王家的关键人物。他继承了王家

与人为善，为政务实的作风。在王朝南迁、万事草创的东晋初期，王导的这一性格和执政思想，适应了形势的需要。一个初建的王朝需要什么？安定。这种安定既包括政治军事上的安定，也包括人心上的安定。南北方世族势力之间的矛盾，中原少数民族对南方的觊觎，都威胁着东晋的安全。王导觉得，内乱也好，北伐也好，都会给脆弱得经不起折腾的新王朝带来致命的危险。最好的对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出乱子就好。所以王导的执政核心就一个字：静。调和南北方世族的关系，在政策上清静无为。

王导经常大摆筵席、款待宾客。邻居谢家的小孩子谢安在若干年后依然对王导谈笑风生的形象和王家气氛和洽的酒席留有深刻的印象。一次，南方名士刘真长来拜访王导。时值盛夏，王导正把大腹便便的肚子贴在弹棋盘降暑。他看到刘真长来，忙自嘲自己的不雅动作，说：“何乃洵？”洵是南方方言中冷的意思，整句话就是“真凉快”的意思。刘真长出来后，旁人问他：“王公这个人怎么样啊？”他感叹：“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听到他在说吴语。”小小的一句吴语，一下子就拉近了政府和南方世族的距离。还有一次，众人在长江边的新亭观赏江南美景。周顗^{周顗}感叹道：“风景没什么不同，但却只能看到长江，看不到黄河了啊！”想起国破南逃，在座的许多人落下泪来。王导见状愀然变色：“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学作楚囚，相对哭泣！”王导其实是不赞成北伐的，但他能用一句口号振奋人心，扭转士气，不愧有政治家风度。

朝廷刚成立的时候，国库空虚，只有练布数千端。王导灵机一动，做了一套宽大的布衣服，穿在身上出去走了一圈。结果，朝野官员和建康的士人认定这是服装界的新风尚，纷纷购买练布做衣服。国库中的练布很快就以“一端一金”的高价销售一空。府库充裕了，王导在士人中的号召力也得到了验证。

正是因为王导有这样的号召力，他的思想和言行直接影响了东晋人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王导的执政，客观上“镇之以静，群情自

安”，把“静”和“无为”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东晋的政局和人心得到了稳定，但政坛的进取心和事业心也受到了压抑。对于世族大家来说，平静固定的统治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王导时期扩充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世族势力在南朝恶性膨胀，大家族大人物们以清谈玄学为风尚，耻于干具体政务了。南方各大家族（包括琅琊王家）日后的思想转变，多少是由王导推动的。

司马睿登基之日，感慨万分，对王导的辅助和拥立之功深深感激。他竟然在庄严肃穆、百官队列的时候，拍拍龙椅的空处，招呼王导“升御床共坐”。当皇帝哪能是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王导连忙推辞。司马睿招呼他三四次，言辞恳切。王导眼看再僵持下去，登基大典要泡汤了，只好跪地启奏：“如果天上的太阳和地下的万物一样升列高位，苍生到底要仰照哪一个呢？”司马睿一想，原来皇帝是天上的太阳，一天的确不能有二日，这才不再坚持要王导同坐了。民间用一个俗语形象地形容这一幕：王与马，共天下。这句俗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王家的权势。东晋初期，司马睿完全信任王导，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萧何。王导也经常劝谏司马睿克己勤俭，优待南方，与人为善。司马睿和王导在草创期上演了一场君臣相敬相爱的佳话。琅琊王家也达到了权势的高峰，除了王导担任丞相，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兵强马壮；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员是王家的人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另外，王家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王导主观上不敢与司马睿共坐龙椅，但说王家和司马家族共享天下，也并不过分。

等司马睿坐稳了龙椅，慢慢开始享受独一无二的太阳的感觉后，开始对“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产生了酸酸的感觉。王家势力的膨胀侵犯了皇权独尊的敏感神经。司马睿开始暗中限制、削弱王家的势力。他提升重用琅琊王时的王府旧人刘隗和刁协。刘刁两人没什么本事，但对尊马抑王一事不遗余力，不断出头打压王家势力。

王导被疏远了。我们知道王导既与人为善又很务实，面对皇权的

打压，他采取了谦抑自守对策，退居家中静观时局变化。司马睿一时也找不到理由，也不想进一步把王导怎么样。可王导忍得了，堂兄弟王敦就忍不了。王敦和王导是兄弟，性格则截然不同。王导主静，王敦好动。他放荡不羁，性情外露，对王家受到打压愤慨难平，并把怒气表现了出来。鉴于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各州的政权和军队，司马睿派刘刁二人出任地方刺史，企图钳制王敦的势力。这一下，王敦干脆造反了，招呼兄长王含等人带上大军，顺江而下，冲向建康找司马睿等人算账。

对王导来说，司马睿的打压不是什么大问题，王敦的造反却带来了棘手的大麻烦。造反是诛灭满门的重罪。王导赶紧给领军冲在前面的王含写信，劝他罢手。王敦、王含等人坚持造反。王导只得选择坚定地站在司马睿一边，反对王敦等人造反。王导认为东晋初建，安定是最大的王朝利益；王家还不具备推翻东晋，出头当皇帝的实力，必须依靠东晋政权，才能保持权势。所以，王导从琅琊王氏的安全和最高利益考虑，必须与王敦划清界限，拥戴司马睿。听说刘隗和刁协已经在劝司马睿诛杀王导和王家的所有成员了，王导赶紧带上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每天跪到宫门外候罪。

王家的危险得到了许多朝臣的同情。王导平日经营的人情关系在关键时刻起作用了。尚书仆射周^顗就认为：“皇帝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但大臣（指王敦）怎么可以举兵造反？”他决定进宫保王导等人。周^顗来到宫门口，王导情急之下冲着他大呼：“伯仁（周^顗的字），我一家老小百余口性命都交到你手上了！”周^顗是来帮王家的，却不能把它外露出来，让司马睿觉得自己就是来当说客的——这是说服的技巧。所以周^顗看都不看王导，从他身边径直进宫去了。在宫中，周^顗竭力向司马睿担保王导的忠诚，言辞恳切。本来，劝完皇帝，周^顗可以出来安慰王导了。可周^顗是个酒鬼，在宫中喝得酩酊大醉才出来。王导在宫外跪了一天，又向周^顗呼救。大醉的周^顗还在伪装，这次不但不管理王导，还转头对随从说：“我要杀尽乱臣贼

子，换取金印，挂在手肘后！”在这种情况下，换了谁，都会对周顗产生误会。王导就对周顗恨之入骨，不知道他在力保自己，更不知道他回家后还上书力证王家无罪。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马睿在宫中召见了王导。王导跪地请罪：“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司马睿被感动了，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相信王导。

王家的危机解决了，不想王敦的军队攻占了建康。刘隗和刁协一个逃亡北方，一个被杀。王敦把持了朝政，官员进退操于其手。王敦因为周顗声望很高，想让他出任三司，特地跑来征询王导的意见。王导没说话。王敦就想降低任用周顗，王导还是沉默。既然周顗不能用，王敦说：“那就只有杀掉了。”王导依然不说话，看着王敦下令斩周顗。后来王导从文书中得知真相，大哭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王敦的叛乱，并没有给东晋王朝造成太大的伤害。只有少数人死于战乱，朝野官员基本各安其位。司马睿依然做他的皇帝，只是王敦不愿意见他。继续当丞相的王导就在王敦和司马睿之间充当沟通的桥梁，努力维持着朝廷的稳定。对于王敦进一步擅权逼宫的做法，王导坚决抵制。王敦起初也没有自己做皇帝的想法，不久退兵长江中游，局势进一步降温。不想，王敦退兵后身体越来越差，在周边宵小的蛊惑下，重新发兵进攻建康。这次他摆出了倾覆朝廷的样式。王导再次坚决站在司马睿一边，主动挂帅，提兵与王敦叛军作战。王敦随即病死，兄长王含、继子王应被杀，叛乱彻底消除。

王导对策得当，让琅琊王家非但没有受牵连，还因讨伐王敦有功被加官晋爵。王导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升湘州刺史，王彬任度支尚书。王家跨过这道坎，保持了天下第一望族的地位。

王敦之乱后，王导作为世族大家的代表和朝廷的稳定中坚，继续存在。

王导的老搭档司马睿在王敦第一次叛乱后不久郁闷而死。王导等人拥立太子司马绍即位。司马绍当了3年皇帝，也死了。王导等人又拥戴5岁的皇太子司马衍即位。

司马绍临死前，考虑到继承人年幼，留下遗诏，让太保王导录尚书事，与小舅子、中书令庾亮一同辅政。司马衍即位，司马绍的皇后庾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庾亮仗着庾太后的势力，很快就把实权集中到了自己家族手中。尽管王导是三朝元老，皇帝对他下诏书都是用敬语，但王导离实权越来越远了。见惯荣辱浮沉的王导淡然处之。庾亮是个有很多想法的年轻人，雄心勃勃。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擅权，对王导不利，劝王导多加防备。王导说：“他若逼我，我就一身布衣服，回家养老去，有什么可怕呢？”后来苏峻起兵叛乱，建康遭焚。朝廷一度考虑迁都，有人建议迁都豫章，有人要求南迁会稽。王导则哪都不去，坚持定都建康。许多朝臣对照王导的恬淡无争，引为榜样。之后尽管东晋屡次出现政治变动，朝廷始终保持了大致稳定，变动也没有波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王导的“静”和“无争”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朝廷一有动静，政治一有裂缝，他就上前和稀泥。

东晋朝臣给晚年的王导起了一个雅号：糊涂宰相。原因是王导每年考察官员的时候，都流于形式，考察的结果你好他好大家好。有人有意见，王导就说，害国之鱼我们都能容忍，何必每年纠缠于那些小鱼小虾呢？的确，王导的一生对威胁王朝利益的大问题都采取拖延、打太极的对策，让时间去消化它们，根本就没必要在每年的官员考核上较真。他晚年常说：“现在说我糊涂，只怕将来有人还要怀念我的糊涂呢！”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64岁。

王导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格局。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司马家族的东晋王朝稳定了，才有琅琊王氏遮风挡雨的地盘。结果王导辅助司马家族为王家赢得了一份远远超过了遮风挡雨需要的大地盘，风光得很，都可以和皇帝“排排坐分果果”了。好在王导是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恭敬自律，没有反称司马睿“你真是我的刘邦啊”，更没有跑上去坐在龙椅上拍拍司马睿的肩膀套近乎，所以琅琊王家在东晋初期根基日渐深入，繁衍昌盛。

二九、豪杰王敦的“过豪死”

西晋末期，豫章郡（今南昌）曾经发生一桩震惊一时的凶杀案。扬州刺史王敦杀害了途径豫章去建邺的堂兄、曾任荆州刺史的王澄。

事情是王澄挑起的。他在荆州当地头蛇当惯了，加上性格桀骜不驯、出道比王敦早，所以在豫章盛气凌人，对王敦很不客气，多有谩骂之语。王敦也是桀骜不驯的人，也很傲慢，竟然对堂兄弟起了杀心。可是王澄功夫不错，随身带有玉枕自卫，还有卫士二十人，如何下手呢？知情者描述是这样的：王敦先招待荆州的卫士痛饮，将他们灌醉，然后向王澄借玉枕“欣赏”。拿到玉枕之后，王敦脸色突变，随即诬陷王澄叛乱，要就地正法。王澄发觉上当，马上扑过来和王敦拼命。王敦被他撕掉了衣带，成功逃脱了。在激烈打斗中，王澄爬上了房梁，对王敦破口大骂，可惜寡不敌众，被王敦带人杀死了。这桩血案将王敦的豪杰性格暴露无遗。

王敦性格的形成有复杂的社会背景。首先，他出身世族大家，拥有很高的政治起点和宝贵的政治财富。世族大家对子孙的影响，一是从丰富的政治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教训，积累的做事稳重、言行成熟的风范（王导就继承了这点）；二是豪迈爽快，言谈睿智，行为潇洒的风范（王敦主要继承了这点）。其次，当时社会清谈洒脱的风气，对王敦影响深刻。王敦从小就是个潇洒的公子哥，放荡不羁，豪侠仗义，自尊心强，睚眦必报，是那种一眼就能从人堆里看出来的焦点人物。长大后，王敦名列清谈名士行列。在讲述魏晋士人豪爽洒脱风范

的《世说新语》一书中，他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按照现在的心理分析，王敦是个无畏的破坏者，不为世俗和他人所约束，勇敢直前，所向豪迈。因此日后司马睿可以用他来打地盘定天下。可另一方面，王敦却不是合格的建设者。他破坏了旧的东西后提不出自己的东西，树立新的规范。因此日后王敦位极人臣、出将拜相的时候，却再没有什么作为，鲜有政绩。寂寞的他只能继续破坏下来，最后导致了人生悲剧。

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召集当时的名流和世家子弟，讨论伎艺。在座的人都畅所欲言，争着在司马炎面前表现自己，只有王敦一副与己无关、满脸不屑的样子。司马炎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就问他会什么。王敦回答说会打鼓，司马炎就给了他一面鼓。王敦卷起袖子，离开座位，“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旁若无人，自我陶醉起来。当时是满座皆惊，司马炎很喜欢王敦这个相貌不凡、举止雄豪的孩子，就把女儿襄城公主嫁给了他。族兄王衍则让王敦当上了青州刺史。

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王敦，家族内外都有人把他看作“问题少年”。太子洗马潘滔曾评价王敦“处仲（王敦的字）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王敦的样子不是一般人，不是害人，就是被别人害死。）王恺和石崇比富的时候，王恺宴请宾客时都让美女陪酒，如果客人不饮就杀掉陪酒女郎。王敦去他家作客的时候，坚决不喝酒，陪酒的美女悲声哀求，王敦都傲然不视。先后三个陪酒美女都被杀了，王敦一直无动于衷。王导也去了，不会喝酒的他不忍心美女被杀，逼着自己一杯杯喝酒。后来，王敦去石崇家作客。石家的厕所里有十多个婢女充当服务员。她们穿着华丽的衣服，捧着甲煎粉、沉香等东西，服侍宾客上厕所，宾客出来前还给他换上新衣服。客人们一般都不好意思在石家上厕所。王敦却大方地接受婢女们的服侍，脱衣穿衣，喷香抹粉，神色傲然。婢女们私下里议论：“这个客人日后一定做贼！”

贾南风专权，将太子陷害到许昌幽禁。她下令太子离京时，官属不得相送。时任太子舍人的王敦和太子洗马的江统、潘滔等人却不畏强权，公开前往相送。从青州刺史任上调回洛阳担任中书监时，王敦将襄城公主的侍婢都分发给将士，又分发金银财宝给部众后才回到洛阳。可见，特立独行的王敦身上也有令人称赞的一面。

二

王敦这样的人很适合乱世。

八王之乱时，王敦投靠了东海王司马越，转任管辖江东的扬州刺史，在南渡风潮中来到的建业。司马睿移镇建业，短期招他为军咨祭酒，很快复任扬州刺史，负责军事讨伐南方的异己力量。在东晋建立前后的这段时间，王敦建立了卓越的政绩。他勇往直前，纵横长江中下游各州；知人善任，重用陶侃等人数载苦战，肃清了境内的乱匪。因为他掌握军队，能力不俗，更因为王家对东晋王朝的拥戴之功，王敦在东晋初年成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被封为汉安侯，控制着长江中游地区，成为东晋最大的实权人物。他和王导，一个在外，一个在内，是朝廷的中流砥柱。

东晋和南朝时期，朝廷的重心是扬州（今江浙）和荆州（今两湖）。两地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又都能制造兵器军械。其中首都建康在扬州，扬州就成了朝廷的中枢；而荆州处于上游，虎视扬州，给建康的朝廷很大的心理压力。如果镇守荆州的大臣再拥兵自重，飞扬跋扈，朝廷和荆州的矛盾就难以避免了。奇怪的是，尽管朝廷对荆州刺史的人选慎之又慎，镇守荆州的大臣不是不听调遣便干脆就是野心家。

东晋建立后，王敦出镇武昌，总管长江中游军事和政务后，飞速膨胀。他既然是豪杰，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王导的清静无为和朝廷

的安然无事，让王敦“淡”出心理问题来了。他不适应处理公文往来的平淡生活。同时，王敦身边聚集了一批别有用心的部属，比如钱凤和沈充等寒门出身的士人，都希望借助王敦的政治飞跃来实现各自的政治梦想。不安分的权臣身边容易聚集奸佞小人，就像有裂缝的鸡蛋容易招来苍蝇一样，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小规律。同时王含、王廙等同族也聚拢在王敦身边，恭维怂恿他，王敦开始骄横专擅起来。

司马睿对王家的猜忌，推动了轻狂的王敦造反。王家势力太强大了，司马睿提拔一批寒族来制约王家的势力。在司马睿的授意下，御史中丞刘隗和尚书左仆射刁协全力抑制王氏势力，暗中作军事部署。戴渊镇守合肥，刘隗镇守泗口，预防王敦顺江东下。皇叔司马承担任湘州刺史，在南边监视王敦。王敦对此愤愤不平，常常在酒后手持玉如意，边击痰盂边吟诵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最后把痰盂都打缺了口。

王敦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上书指责司马睿，为王导抱不平。上书送到建康后，先到达王导手中，老好人王导把它退给了王敦。王敦不甘心，第二次直接给司马睿上书。司马睿看完王敦的上书，更加相信王敦要发兵造反了。王敦毕竟是名门之后，先客气地给刘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以国家大义劝说刘隗和自己联手，共扶朝政。“圣上信重阁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您戮力王室，共静海内。如果大家同心，帝业得以兴隆，否则，天下永无望矣！”可刘隗是个得志小人，粗鲁地回信说像他这样的朝廷股肱之臣，是不会和王敦同流合污的，他要效忠皇室，做个大忠臣。这分明是把王敦推到了对立面。他忘记了王敦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王敦果然大怒，决心给刘隗一个去地狱做忠臣的机会。于是，王敦就这么造反了。王敦在武昌兴兵东进，举起的大旗是“清君侧”。他说司马睿宠信奸臣，弄得民不聊生，他这才出兵清除奸贼，拯救百姓的。党羽沈充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叛军迅速推进到建康附近。司马睿派出的刁协、戴渊、刘隗等人，都不是王敦的对手。早在王敦起兵之初，刘隗和刁协就劝司马睿尽诛王

氏全族。司马睿离不开王家的支持，没有答应，刘隗等人“始有惧色”。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最高层间的权力游戏，刘隗这样的初学者注定是牺牲品。三个月后，建康石头城的守将、义兴周家的周札给王敦打开了城门，叛军兵不血刃入城。王敦胜利了！

城破后，刁协和刘隗向北逃亡。刁协年老，随从又逃散了，结果独身被杀死在长江边；刘隗逃亡北方，最后投靠了石勒。司马承坚守湘州百余日，兵败被俘，押送建康途中遇害。

王敦攻入石头城后，一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放纵士卒劫掠（可见他破多于立）。司马睿陷入狼狈的境地，身边一度只剩下一个警卫将领和两个侍中。防虎反为虎所伤，司马睿事到如今反而看开了：“王敦没有忘记社稷宗庙，则天下尚可共安；如果想要我的龙椅，早点说嘛，我自己会回琅琊去，何必骚扰百姓？”王敦的性格决定社稷宗庙在他心中没有多少分量，而他又不想尊奉司马睿这个打压王家的皇帝。但司马睿和王敦两个人，谁都不能彻底离开谁。司马睿固然需要世族支持他的政权，各个世族大家也需要司马睿这块招牌来遮风挡雨。各大家族还接受不了王敦替换司马睿登基称帝，王敦也没有南向称君的准备。他没有废黜司马睿，更没有对他动刀子，而是保留了司马睿政权。

司马睿派公卿百官去石头城拜见王敦。王敦丝毫不改豪杰本色、名士风范，坐在上座，先去戏问手下败将戴渊：“之前打仗，你输了。当时还有余力吗？”戴渊坦言：“哪里还有余力，真的是力量不足！”王敦问他：“天下会怎么看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戴渊暗中顶了一句：“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意思是说，只有真正理解你内心的人才知道怎么回事，从表面来看是乱臣贼子所为。王敦哈哈一笑，夸戴渊是“能言之人”。王敦又对周顗说：“伯仁，你对不起我！”周顗依然满不在乎地说：“王公举兵，下官亲率六军，没有成功抵挡住贵军，致使朝廷军队落败。在这一点上，我对不起你！”既然是清君侧，就要杀死几个奸臣。王敦最后挑选了周顗、戴渊杀鸡儆猴，

并在朝野职位上安插了若干党羽，从法律上来说，王敦所做的真的仅仅是“清君侧”，没有丝毫违法谋逆之处。司马睿下诏大赦，赦免参与叛乱诸人的罪过，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晋爵武昌郡公。王敦对停留在朝廷处理繁琐的政务没有兴趣，打道回武昌，遥控建康。

王敦的这一次叛乱，轻率地置王家于族诛的危险边缘，在家族内部遭到了反对。王导战前劝说王敦、王含罢兵，战后努力做王敦和司马睿沟通的桥梁，尽量让事件平安结束。另一个堂兄弟王彬在王敦杀周顗时，公开去和周顗哭别，哭得悲切异常。王彬见王敦时，并没有一丝悲痛之情。王敦不解，王彬回答：“我哭周顗是情不自禁。”对于王敦，王彬痛批他不义，批得声泪俱下。王敦当场大怒，扬言要杀掉王彬。王导连忙做和事佬，拉王彬跪下谢罪。王彬却说：“我脚有病，在天子面前都不下跪，更别说你了！”王敦差点气背过去，逼问：“脚疼和脖子疼，你选一个！”王彬依然不卑不亢地看着他。王敦毕竟厚道，对同族人很客气，没有把王彬怎么样。

王敦的豪杰性格决定了他做不了政治家。王敦不屑于花时间去学习繁琐的政治技巧、营造各种人脉关系，更没时间像兄弟王导那样参与实际事务。他起兵反对司马睿，是仓促起兵，并没有成熟的设想，更谈不上详细的善后措施了。他的成功只是反证了刘隗等人更加无能，证明了离开王敦等实力人物支持的司马睿政权是多么的虚弱，根本不能说明王敦的强大和正确。掌握了绝对的、硕大的权力又没有奋斗目标之后，王敦迅速腐化堕落。史载“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他没有收敛张扬的个性，更没有学会稳重地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在疯狂享受着从各地搜刮来的珍宝财富和支配人事调动的乐趣。更糟糕的是，王敦宠信沈充和钱凤，听任他们二人胡作非为。这两个人出身土豪，也不是政治家，得势后“大起营府，侵入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把所有得罪他们的人都整死。朝野上下、官僚百姓都希望做尽坏事的沈王等人早点死去，顺带也希

望王敦集团早点失败才好。

建康的司马睿经过王敦的一大打击后，病倒了，病情越来越重，很快身亡。素来为王敦不喜欢的太子司马绍即位，史称晋明帝。晋明帝憋着一口气，立志铲除王敦，王敦也对晋明帝看不顺眼。江南很快爆发了第二次王敦之乱，仗还在打，王敦就因病去世了。具体请见下一个专题“黄须鲜卑儿”。

王敦的命运很悲惨，葬入了坟墓还被挖出来，尸体被戮，脑袋被割下来挂在朱雀桥上示众。王敦是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人物，是一代豪杰，弄不好还能做个开国皇帝或者割据君主。但他被过于放荡不羁的个性，被要求安定团结的东晋政治大环境给埋葬了。

王敦之后的乱臣贼子，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他那样的豪爽、率性、不羁和惊天动地。王敦因此成为许多雄心勃勃或者蠢蠢欲动的豪杰志士的标杆、榜样。后来人曾说：“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这句话可以看作对王敦豪杰一生的莫大评价。

三〇、黄须鲜卑儿

司马睿忧愤死后，继位的司马绍是整个东晋时期唯一一个算得上强势和振作的皇帝。

司马绍是司马睿的庶长子，据说生母荀氏是燕赵地区的鲜卑人，出身微贱，当婢女时得到司马睿的宠爱生下了司马绍。司马绍长得不像一般的汉族人，体格健壮，而且胡须发黄。讨厌司马绍的王敦因此叫他“黄须鲜卑儿”。司马睿的虞皇后没有生育，按照“无嫡立长”的原则，司马绍成了皇太子。

司马绍从小聪慧过人，小时候司马睿常常抱他坐在膝盖上玩耍。一次，司马睿问他：“太阳与长安相比，哪个更远些？”司马绍回答：“太阳远，没听说有人从日边来，只听说有人从长安来。”司马睿很惊喜，觉得儿子的逻辑推理能力很强。第二天，司马睿宴请群臣，就想在大家面前炫耀一下儿子的聪明，当众重新问司马绍：“太阳与长安相比，哪个更远些？”不料司马绍一本正经地回答：“太阳近！”司马睿大惊，怎么才过了一天答案就不一样了？他就问司马绍：“为什么呢？”司马绍抬头看看天空，从容说道：“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不过，考虑到司马绍的生母荀氏出身低微，司马睿一度想废掉司马绍改立宠妃郑夫人的儿子司马昱为太子。他的提议遭到了大臣们的集体反对。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司马绍个人表现无懈可击。他礼贤下士，雅好文辞，和文士、大臣们的关系很好。王导、庾亮、温峤等大

臣与司马绍的关系密切。司马绍曾和王导辩论（当时流行清谈辩论），王导竟然辩不过司马绍。朝野臣工都喜欢司马绍，而不了解司马昱。第二是东晋朝廷刚刚建立，世族们都要求稳定，不想出现废立太子这样的波动来。稳定的要求，压倒了一切。所以，朝野上下都说废长立幼于理于伦不合，都称赞司马绍聪亮英断，是一位好太子。周顗、王导等大臣更是言辞恳切，为司马绍苦保太子之位。只有刁协支持司马睿改易太子，想从中牟利。司马睿狠狠心，孤注一掷要废司马绍立司马昱。他怕大臣们不奉诏，就想出一条歪主意。

司马睿召王导、周顗入宫，等二人来了就派人请他们到东厢少歇。司马睿计划把王导、周顗两个反对最激烈的重臣软禁在东厢，让刁协趁机将废立太子的诏书向大臣颁布，给群龙无首的大臣们一个措手不及。等生米做成了熟饭，王导、周顗等人只能无可奈何。司马睿连诏书都写好了，就等王导、周顗两人中计。周顗嗜酒，常常喝得迷迷瞪瞪的，进宫这天正好迷糊着，拔腿就要向东厢房走去，王导却一把拨开使者，径直走到司马睿面前，问道：“不知陛下因何召见臣等？”司马睿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半天后从怀中取出一张黄纸诏，撕得粉碎，扬手扔掉。司马绍的太子位就这么保住了。这时候，周顗惭愧地慨叹：“我常自以为胜过王导，今天才知道我不如他！”

没当上太子的司马昱是司马睿的小儿子，半个多世纪后被权臣桓温重新搬了出来，拥戴为皇帝，史称简文帝。这是后话了。

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时候，司马绍的太子位第二次受到冲击。王敦占领建康后，没有废黜皇帝司马睿，却要废黜司马绍这个太子。一方面，王敦将以此立威；一方面，王敦不希望强健聪明的司马绍日后当皇帝，对自己不利。于是，王敦召集大家，想以“不孝”的罪名废掉司马绍。他述说了许多司马绍不孝的“罪状”，说：“这些都是温峤所说。温峤常在东宫身边，后来担任我的司马，对司马绍一清二楚。”不一会儿，温峤来了，王敦威严地喝问他：“皇太子是什么样的人？”温峤回答：“小人没法估量君子。”王敦声色俱厉，愤怒地重问温峤：“太子怎

么能算是君子呢？”温峤还是说：“太子才识广博、学问精深，确实不是我这样认识肤浅的人所能评价的。太子能按照礼法侍奉双亲，似乎可称为孝。”顿时，王敦理屈词穷，废太子之事作罢。

322年，24岁的司马绍顺利继位称帝，史称晋明帝。也许是鲜卑血统起了作用，司马绍一改父亲时代庸碌无为的作风，锐意进取，全心全意巩固统治、加强皇权。他的当务之急就是铲除上游的王敦集团。

二

司马绍登基对遥控朝廷的王敦来说无疑是个噩耗。王敦凭借强大的实力优势，决定给司马绍来个下马威。太宁元年（323年），王敦讽谏朝廷征召自己，并率大军东移进驻姑孰湖城（今安徽芜湖）。司马绍还没有力量与王敦直接对抗，以退为进，亲手写诏赐予王敦加黄钺、班剑武士各20人，可以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司马绍还派侍中阮孚设牛酒犒劳王敦。在这个回合里，司马绍身处弱势，不卑不亢，王敦就是有篡位之心也没有篡位的借口。对于司马绍的犒劳，王敦称病不见。

暂时稳住了王敦，司马绍需要组建自己的势力。司马绍登基前娶世族女子庾氏，继位后以庾氏为皇后，提升妻弟庾亮为中书监，分王导的权势。那在军事上怎么制约王敦呢？司马绍直接指挥的是建康附近的宿卫六军，由纪瞻统辖。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时候，宿卫六军溃不成军，根本无法指望他们来镇压王敦。纪瞻也知道自己的部队不中用，就向司马绍推荐了流民首领郗鉴。郗鉴是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出身世族家庭，中原大乱时被家乡百姓推为首领避难于峯山（山东邹城境内），抵抗石勒军队的进攻。他固守峯山3年，成为山东地区硕果仅存的晋朝据点，被司马睿遥授为兖州刺史。3年后，郗鉴实在抵挡不了石勒的进攻，率民众南迁，沿途将武装发展为数万

人，成为江淮主要的流民武装之一。晋朝君臣在危难时刻想到郗鉴，是因为他是“同类人”：首先出身世族，这点在东晋时期很重要；其次，郗鉴和其他流民领袖不同，并非武人，而以儒雅著称，饱读诗书，和朝臣上的衮衮诸公有共同语言；第三，郗鉴在西晋朝廷做过官，和司马越走得比较近，和司马绍一系是同道中人。司马绍马上引之为外援，任命郗鉴为安西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率部镇守合肥，给予他统辖各部流民部队的权力。（这个郗鉴后来把女儿嫁给了书圣王羲之，女婿比老丈人要有名得多。）

王敦得知郗鉴镇守合肥，忌惮这支流民武装。他想出了明升暗降的招数，上表朝廷推荐郗鉴任尚书令。尚书令掌握朝政政令中枢，是实际上的宰相，可惜不统军，郗鉴如果担任此职就失去了对本部流民的指挥权。司马绍尚未具备和王敦翻脸的实力，不得不召郗鉴入京就职。郗鉴上任途中经过姑孰，被王敦扣留了。党羽劝王敦杀掉郗鉴，王敦没有听，软禁了郗鉴几个月后最终放他去了建康。

王敦开始留意铲除司马绍倚重的大臣，防备司马绍成就气候。温峤是司马绍倚重的另一位大臣，担任中书令。王敦就要求调温峤回自己幕府担任左司马。司马绍还是只能答应。温峤来到王敦身边后，虚与委蛇，身在曹营心在汉。王敦对幕僚沈充、钱凤几乎言听计从。沈充是吴兴沈氏子弟，企图依靠王敦来提升家族权势，前往东南地区推行王敦的政策。他听命王敦，杀戮义兴周氏，蓄养力量，准备配合王敦夺权。长期在王敦身边的就是钱凤。温峤假意和钱凤交好。钱凤出身寒门，也仰仗温峤提升名望。温峤就逢人称赞：“钱世仪（钱凤的字）精神满腹。”钱凤大喜，和温峤成了好朋友，在王敦面前力保温峤。温峤在王敦身边担任左司马有惊无险。

恰好丹阳尹出缺。丹阳尹虽是一郡太守，但因为辖区内有首都建康和长江要害，地位相当重要。温峤有意竞争丹阳尹，借机逃离王敦，就对王敦说：“丹阳是咽喉之地，朝廷任命的人不会和明公一心。明公宜自选其才。”王敦觉得有理，就问温峤：“谁能够胜任？”温峤马

上推荐了钱凤。钱凤以为是温峤抬举自己，投桃报李，推举温峤担任丹阳尹。温峤佯装推辞，王敦不听，奏请温峤出任丹阳尹，为他设宴饯别，暗中嘱咐他窥察朝廷动静。温峤担心走后钱凤回味过来制止自己上任，在宴会上给钱凤敬酒的时候佯装酒醉，用手板击落钱凤的头巾，变脸斥责：“钱凤，你是什么人，我温峤祝酒你胆敢不喝？”王敦以为温峤醉了，把双方劝解开。温峤在向王敦道别时涕泪横流，三次出门三次返回，无限眷恋。第二天，钱凤果然想明白了，提醒王敦：“温峤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并且与庾亮有深交，不能信任。”王敦反而责备钱凤：“温峤昨天醉了才斥责你的，你怎么能转身就诋毁他呢！”温峤安然回到建康，把王敦的虚实和阴谋一五一十告诉了司马绍。王敦知道受骗，勃然大怒，大骂温峤。

王敦喜欢侄儿王允之，留他在身边。一天，王允之在王敦的床上休息，听到王敦在外面和部下讨论篡权的计划。王敦突然想起床上还有王允之，赶紧过来查探。王允之早有准备，倒头假睡，还抠出口水沾染被褥床单，让王敦相信自己熟睡多时，骗过了王敦的迫害。后来，王允之回家告诉了父亲王舒，王舒和王导商量后报告了司马绍。所以，王敦的篡位计划在家族内部都没有得到支持，且早在司马绍的掌握之中。

324年，王敦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人将死的时候，头脑都特别清醒。王敦意识到自己和王家的力量都不能推翻东晋王朝，而在无力推翻朝廷的前提下做个与朝廷不和的权臣是没有前途的。病重的王敦很明白自己的继子王应年纪很小，担心自己死后王应掌控不了部队。他给部属设计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解散军队，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中策是退兵武昌，屯兵自卫，同时和朝廷和睦共处；下策是趁着自己还活着，集中全力推翻朝廷，万一侥幸就能开创一个新王朝了。钱凤和沈充等人要的是当开国元勋，要的是荣华富贵，一致认为王敦的下策是上策，决定挟着王敦的余威，兴兵作乱。

王敦身不由己，便由着下面的人造反。他自命为扬州牧，并大肆

任命党羽为朝官和地方官吏。王敦没有儿子，兄长王含把儿子王应过继给他。现在，王敦假传圣旨拜王应为武卫将军，拜王含为骠骑大将军，让沈充在江东起兵响应。司马绍于是正式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理当迎战，无奈身体每况愈下，只好委派王含率领水陆大军，气势汹汹杀向建康。第二次王敦之乱爆发。

战争开始后，司马绍着戎装跨骏马，仅带两名随从去王敦大营，仔细侦察营中虚实。当时，王敦正卧床观书，累了以后打盹，迷迷糊糊中梦见太阳在营垒上空盘旋。他心中一动，醒来惊呼：“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马上派出轻骑搜索营垒附近。王敦部下士兵也发现有晋军探子侦查，觉得司马绍不是常人，向上报告。司马绍三人很快就被王敦的骑兵追上了。情况紧急，司马绍看到路边有个老太太，就把御用的七宝鞭递给她，嘱咐说如果有骑兵追来就拿鞭子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又用冷水把马粪浇透才骑马再逃。一会儿，追兵赶到，看到老太太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黄胡须的骑马人经过。老太太说看到了，跑过去很久了，说完把七宝鞭拿给追兵看。七宝鞭镶金嵌玉，引起追兵围观，追兵又发现马粪已冷，相信司马绍已经跑远，放弃追赶，快快而还。

司马绍回到建康，郗鉴建议朝廷征召苏峻、祖约等入卫京师。司马绍采纳了。苏峻、祖约等人觉得王敦胜算不大，纷纷出兵饮马长江，护卫建康。在军力对比上，王敦并不占优势。讽刺的是，王导是政府军方面的大都督，总督各军与王敦作战（这也算是司马绍过人之处）。我们知道王导是个头脑很清醒很务实的政治家，知道王敦病重且失去了人心，就坚定地站在了司马绍的一边。他扬言王敦已死，带着建康的王氏家族子弟为王敦发丧，让大家以为王敦真的死了。政府军士气大振，叛军气焰下挫。司马绍适时下诏数王敦之罪，表示除了要治罪王敦和钱凤，“余众一无所问”！

王敦见诏暴怒，病势更加沉重，不能统兵打仗，命令王含起兵。324年秋七月，王含率水陆大军5万杀向建康，攻至长江南岸。温峤则

焚烧秦淮河上的浮桥，率军固守北岸。司马绍意气风发，要带兵应战。郗鉴拉住他，建议坚守建康，以逸待劳，等王敦军队锐气过后再联合援兵痛击。司马绍还是组织勇士，夜渡秦淮河偷袭王含大营，大败之。王敦听到王含失利的消息，哀叹：“我兄长就是个老婢；门户衰败，大势去矣！”他运起最后的力量，要亲赴前线，无奈病入膏肓，挣扎起来后马上又躺倒在地，寿命将尽了。临终前，王敦叮嘱王应：“我死后秘不发丧，一定要把建康打下来！”说完，王敦病死，时年59岁。

嗣子王应果然不给王敦发丧，草草埋在营帐中，然后自己去花天酒地，尽量享乐去了。纸包不住火，几天后大军不见指挥和命令，面对晋军的攻势节节败退，渐渐知道王敦真的死了，兵败如山倒。王含、王应和钱凤仓皇西逃。另一个党羽沈充正从东边向建康进攻，无奈大势已去，逃亡途中被旧将所杀，首级传给朝廷。钱凤逃到江州，被地方太守所杀。王含、王应抛弃王敦亲手带起来的军队，一路逃到荆州投靠族人、荆州刺史王舒。王舒不是王敦那样的豪杰，也不是王含那样志大才疏的小人，做出了最平稳的选择：大义灭亲。王舒把王含父子俩痛殴一顿后扔进长江喂鱼去了。王敦势力烟消云散了。

平定王敦之乱是晋明帝司马绍最大的政绩。战后，他果真没有株连他人，冻结对王敦党羽的追究。王敦之乱在战争期间并没有造成大的破坏，战后又没有株连杀戮导致社会动荡，整个南方付出的成本比较少。司马绍处理得当，得到了世族大家和百姓的支持。之后，司马绍一度宠爱美人宋祗。宋祗国色天香，善吹笛，是石崇爱妾绿珠的弟子。宋祗没有名分，且司马绍的宠爱有些过分，群臣纷纷进谏，要求驱逐宋祗。司马绍也能忍痛割爱，竟然问群臣谁想要宋祗。群臣面面相觑，最后吏部尚书阮遥斗胆提出了申请，司马绍还真把宋祗送给了阮遥。

太宁三年（325年）秋，晋明帝司马绍病死，只有27岁。太子司马衍继位为帝，史称晋成帝。

三一、有枪就是草头王

苏峻是山东掖县人，是一方世族，担任过郡主簿。北方大乱时，苏峻聚拢了家乡百姓结垒自守，后来在永嘉南渡的大潮中率部众泛海南行来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因此，苏峻也算是南下的北方世族之一，不同的是苏峻的势力没有体现在官爵和封山占泽上，而体现在始终掌握一支流民武装上。晋元帝司马睿时期，朝廷与北方胡族政权对峙全赖苏峻这样南下的流民武装领袖。苏峻先后担任东晋淮陵内史和兰陵相，既是朝廷命官，又是所统流民的首领。

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时候，司马睿招苏峻带领部队南渡长江“勤王”。苏峻没有从命，率部在江北观望。对他来说，谁当皇帝并不重要，司马睿和王敦没有什么区别。王敦第二次叛乱的时候，晋明帝司马绍又招苏峻率部“勤王”。这回，苏峻带着部队来了，因为他看到王敦不得人心，勤王有利可图。果然王敦败亡后，苏峻因为立有战功，被提升为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封邵陵公。此时苏峻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东晋朝廷视之为江北重镇，希望他能抵挡来自北方的威胁。不行的是，苏峻自恃实力不断强大，逐渐骄横起来，招纳亡命之徒、隐匿罪犯和流亡户口扩充部队，心怀异志。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司马绍英年早逝，5岁的晋成帝即位。国舅庾亮内靠庾太后，外得世族支持，以外戚身份辅政。苏峻原以为晋明帝会命他为顾命大臣，掌握政权的，不想被庾亮横抢了过去，愤愤不平。庾亮觉察到了苏峻勒兵江北对朝廷的巨大威胁和苏峻的不满

情绪，力排众议，征苏峻到朝廷担任大司农，意图通过明升暗降的方式剥夺苏峻的军权。苏峻多次拖延不赴任，又请求去青州荒凉郡县任职，都被庾亮拒绝。庾亮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催促苏峻上任，最终在咸和三年（328年）逼反了苏峻。

庾亮这个人，为朝廷利益考虑，有心办成几件事情，可惜做事情不讲方式方法，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比如庾亮为巩固皇权，派将军赵胤杀宗室、南顿王司马宗，贬逐晋元帝司马睿皇后的弟弟虞胤，就不稳妥。6岁的晋成帝好久没有看见司马宗了，偶然问庾亮：“从前常常看见的白头公公哪里去了？”庾亮说因谋反被杀了。晋成帝哭了：“舅舅说别人造反，便杀了；如果别人说舅舅造反，该怎么办呢？”综合庾亮一生的事迹来看，他有心作为光复晋室皇权，却不知道他所效忠的晋朝皇帝本来就是世族大家们裱糊的一座简易房，用来遮风挡雨而已，没有几个人会出钱出力加固和装饰房子，加上个人素质有限，就更不得人心了。庾亮一辈子干的事情，削藩强化皇权也好，支持北伐也好，都没有成功。这不，苏峻就以讨庾亮为名，起兵反晋了。他还邀请同为南下世族兼流民武装领袖的祖约一起造反。

祖约是祖逖的弟弟，在西晋时担任过成皋县令，永嘉末随哥哥祖逖南下。和哥哥热衷北伐不同，祖约主要在司马睿身边做掾属。祖逖死后，祖约接任了哥哥的豫州刺史，统领哥哥留下的武装力量。任命之初，祖约同父异母的哥哥、光禄大夫祖纳就秘密向司马睿进言：“我弟弟祖约内怀陵上之心，可以使用他，却不能让他独掌一面，不然恐怕会作乱。”司马睿没有接纳，时人也以为祖纳和祖约因为是异母兄弟，祖纳嫉妒祖约富贵，才有此言。事实证明祖约的确不是做一方藩镇的料，上任后没有驭下之才，祖逖留下的部队军心浮动，战斗力大减。王敦叛乱时，祖约率部“勤王”占领寿阳（今安徽寿县），驱逐了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事后因功封镇西将军，驻屯寿阳，为朝廷的北部屏障。

庾亮执政后，祖约也忌恨晋明帝没有让他当顾命大臣，对庾亮不

满。他又多次向朝廷申请开府，遭到庾亮拒绝；他向朝廷申办的许多事情，也遭到了庾亮的否决。祖约身处前线，曾遭到后赵军队猛烈进攻，屡次向朝廷请求增援，结果连一个援兵的影子都没看到；后赵退兵后，朝廷却商议要在南边挖涂塘遏制北方骑兵的进攻，祖约见本部兵马被划为战壕的外面，以为朝廷要抛弃自己，于是恨死了庾亮（客观地说，庾亮也有不当之处）。

现在接到苏峻的造反邀请，祖约马上响应，派侄子、祖逖的儿子、沛郡内史祖涣和女婿、淮南太守许柳率领本部兵马和苏峻会师。苏峻会合祖约部队，带上韩晃、张健等将领，浩浩荡荡杀向建康而去。

苏峻和祖约的武装主力是北方逃难的流民，他们久经磨难、进出战场，战斗力远强于南方未经疆场的政府军。庾亮指挥频频出错。先是不听劝告，没有布置坚守江北，接着江州刺史温峤忠于朝廷，请求带兵勤王，庾亮又不准：“我更担心荆州的陶侃造反，你的任务是监视陶侃，不准越过雷池（今安徽望江县境）一步。”苏峻反叛进展顺利，屡次战胜晋军，乘风渡过长江，很快占领了建康城外的蒋山。这是五月间的事情。庾亮亲自领兵在建康南门布阵，不料士气崩溃，官兵不断抛弃武器逃散。庾亮只好与几个兄弟上船逃往浔阳（今江西九江）去了。苏峻抓住晋成帝司马衍，逼他迁居石头城（今南京城西）。司徒王导极力争辩，苏峻不听。司马衍哭着登车而行，在一片恸哭声中成了苏峻的人质。

流民武装的缺点这时候暴露了出来，那就是破坏性极强。他们在山上放火，火借风势烧向都市，将建康的台省、诸营、寺署烧为灰烬。建康大乱，流民武装顺利攻陷宫城，苏峻纵兵大掠。东晋朝廷积蓄又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等，事后统计都被乱军抢劫一空。流民武装还驱役百官，包括著名世族、光禄勋王彬在内的百官被当成苦力捶挞，强迫他们到蒋山做搬运工；乱军抢劫百姓，往往将士人和女子抢得赤身裸体，可怜的人们只能用茅草遮盖身

体，连茅草都找不到的就只能坐在地上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建康内外、长江南北。苏峻和流民武装迅速失去了百姓的支持，遭到了江南上上下下的反对。

苏峻也做了一些政治建设工作。他劫持了晋成帝，矫诏大赦，除了庾亮兄弟不在赦免范围外，其他人都赦免无罪，希望以此来笼络人心。他自封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封远在寿阳的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酬谢许柳、祖涣等人太守、将军的职位；又派韩晃、张健、管商等部将攻略长江下游各地。

庾亮逃到浔阳投靠江州刺史温峤。温峤有救国赴难之心，无奈有心无力。江州是个小州，温峤又兵少将寡，不熟悉军事，无力平定苏峻之乱。于是，温峤邀请荆州刺史陶侃出兵同赴国难。

二

终于又轮到陶侃上场了。

陶侃在广州刺史的任上，遇到了王敦两次作乱，虽然两次都明确表示拥护朝廷，并且实际介入，更没有直接与王敦兵戎相对。然而在王敦之乱平定后，司马绍却任命陶侃回任极端重要的荆州刺史一职，还让陶侃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等于将长江中游的军政都交付给了陶侃。这是对陶侃莫大的宠信，更是司马绍的精心安排。司马绍致力于加强皇权，采取的手段主要是在世族大家和大臣内部制造权利均势。所以，他提拔庾亮、制约王导，在世族内部制造均势；提拔江东士族，在南下世族和江东士族间搞平衡。任命陶侃主持荆州，固然看重陶侃的辉煌经历和崇高声望，更有在寒门地主和世族大家之间、在各大藩镇之间制造均势的打算。同时，司马绍也任命应詹为江州刺史。应詹既是讨王敦的功臣，又与陶侃同在刘弘部下做过官，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庾亮主政后，把削藩的刀子也举到了手握重兵的陶侃头上。应詹正好死了，庾亮就派老世族、和自己关系深厚的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应詹死前给陶侃写信，希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大约是他看出了陶侃对朝廷的不满情绪。陶侃也和苏峻、祖约一样，满以为自己能被晋明帝指定为顾命大臣，结果发现上台的是庾亮，自然对庾亮不满。苏峻之乱是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陶侃很有一种在一旁看热闹的心理。接到温峤的出兵邀请后，陶侃答复说：“我是个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干预朝政。”温峤多次劝说，陶侃就是不答应。

苏峻这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杀害了陶侃的儿子陶瞻。陶侃晚年丧子，悲痛万分，马上戎服上阵，集结部队，日夜兼程东下讨伐苏峻去了。

荆州大军先到江州。江州官民都以为陶侃要诛杀庾亮，一为泄私愤，二为谢天下。庾亮有知错能改的优点，主动跑到陶侃面前谢罪，谦虚地承认错误，请求陶侃处分。要知道，庾亮出身北方世族豪门，从小就名声在外，是名士翘楚，竟然主动向寒门小吏出身的陶侃谢罪。陶侃大为意外，惊呼：“庾元规（庾亮字）乃拜陶士行（陶侃字）邪！”既然庾亮引咎自责，陶侃也就冰释前嫌了。于是，陶侃与庾亮、温峤合兵一处，准备收复建康。

我们知道，东晋的重点一为扬州，一为荆州。扬州已是苏峻和流民武装的天下，只有同样兵多将精、久经沙场的陶侃和荆州军才有可能与苏峻一战。因此，庾亮和温峤主动推举陶侃为盟主，号令天下讨伐苏峻。苏峻得知陶侃起兵后，分兵抵抗。庾亮率军冲在最前面。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很快将庾亮的部队打败。庾亮撤退回来向陶侃谢罪。陶侃答：“古人三败后胜，君侯才败了二回，当今事急，不宜数而。”诸将知道后，都不以失败为意，继续催军奋战。

却说北方南下的流民武装除了苏峻、祖约两支外，还有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的郗鉴一支。郗鉴拥戴皇室，率本部兵马勤王，向陶

侃提出要扼守京口（今江苏镇江），阻碍苏峻从建康向东边州县的侵蚀，得到了陶侃的同意。郗鉴于是自广陵渡江占领京口，对苏峻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之前，长江边上的建康和东边苏南、浙江州县的联系缺乏畅通的渠道，郗鉴经营京口后使之成为建康与东方联系的枢纽。京口开始崛起。

战争初期，苏峻的部队东西抄掠，胜多败少，又有北方的祖约遥相呼应，占据优势。勤王诸军胜少败多，不免气馁；温峤的江州军又缺粮，影响了士气，全靠陶侃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劝慰众人不要轻举妄动，要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又分粮草接济温峤，渡过了最初的困难时期。咸和三年（328年）七月，祖约被后赵军攻击，溃败至历阳。九月，晋军烧毁了苏峻大军在句容、湖熟的军需积累，流民武装开始缺衣少粮。战争局势开始逆转了。陶侃率军队急攻石头城，触发了决战。苏峻和儿子苏硕、部将匡孝率领8000人迎战。苏峻派苏硕和匡孝带领数十骑进攻晋将赵胤，竟然大败赵胤。这个只能算是特例的小胜利冲昏了苏峻的头脑，他看到赵胤的部队大败而逃，大喊：“匡孝能败敌，我反倒不如他吗！”于是，只见苏峻以主帅之躯撇下大部队，也率领数名骑兵向北突击晋军。晋军大喜过望，大批大批地向苏峻几个人涌来，苏峻见无法取胜，准备逃回，不想坐骑失足颠蹶。陶侃的部将彭世、李千等望见，用长矛投射，苏峻坠落马下，被晋军追上斩首，遭到刚割肢体、骨骼焚烧的下场。苏峻就这么戏剧性地死了，勤王三军将士都高呼万岁。

苏峻死后，建康的余部推举其弟苏逸为主帅，闭城自守。其子苏硕在战场上搜索苏峻的尸骨，一无所获，大怒之下挖掘庾亮父母墓地，剖棺焚尸。苏峻散布各地的部将不是投降就是逃亡，武装呈崩溃之势，只有部将韩晃知道苏峻死讯后还引兵向建康收缩，企图负隅顽抗。咸和四年（329年）正月，历阳被建康攻破，祖约北逃后赵。二月，晋军攻破石头城，苏逸被杀，晋成帝脱险，意味着苏峻之乱基本平定。余部韩晃、张健等又在吴兴等地顽抗了一些年月，最后在晋军

和世族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从军事角度说，苏峻之乱的结束标志着东晋初期叱咤风云的流民武装的消亡。之前，流民武装是南方军事力量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坚；之后，南方军事力量转弱，基本为政府武装，没有了流民领袖控制的半独立武装了。

三

苏峻之乱也被称为“苏峻、祖约之乱”，因为祖约也参与叛乱，算得上流民武装的二号人物。可惜祖约的能力和作为实在太差，没有给苏峻帮上什么忙，参加叛乱几乎就是自取灭亡。

祖约派侄子、女婿率主力参与苏峻叛乱后，自己的大本营竟然被颍川人陈光的少量军队攻破。侥幸得很，祖约左右有名随从叫做阎秃，长得和祖约很像，陈光误以为阎秃就是祖约，反而放跑了祖约。祖约翻墙逃亡，纠集部队反攻陈光。陈光投奔石勒。祖约许多部将对主帅大为失望，纷纷暗中勾结石勒，约为内应。石勒便趁火打劫，南下进攻祖约。部队溃败，祖约逃奔历阳。南逃后，祖约还想有所作为，派侄子祖涣进攻皖城，希望能占领新地盘，结果祖涣被晋军打败，空耗军力。等到晋军进攻历阳时，祖约无力再战，连夜北逃，余部投降。河南的这支流民武装至此也烟消云散了。

祖约率领数百人投靠石勒，石勒看不起祖约的为人，长期不见他。石勒的谋士程遐就说：“天下粗定，应当显明逆顺，忠君报国者应该奖赏，背叛不臣者应该惩处，这样天下才能归伏大王。祖约这样的人不应该收留，况且祖约来到我们这以后大引宾客，抢夺乡里先人田地，民怨已大。”于是，石勒设计，举办宴席欢迎祖约及其子弟。宴会当日，石勒本人装病不来，只有程遐出面招待祖约及其子弟。祖约敏感地知道这是鸿门宴，可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今朝有酒今朝醉，

大醉而归，抱着外孙痛哭流涕。果然，祖约和亲属百余人在会后遭到屠杀，妇女伎妾都被后赵罚没。

祖逖组建武装的时候，有个奴仆叫做王安，是羯族人。祖逖非但没有歧视王安，还待之甚厚，北伐时祖逖对王安说：“石勒是你同族，你去投奔他吧。我这也不在乎少你一人。”他给了王安厚资，让他回到同胞那里。王安在石勒部下，逐渐积军功为将军，祖氏被族诛时，王安也在场。他偷偷把祖逖年仅10岁的庶子祖道重藏了下来，把他安顿在佛寺中。后赵灭亡后，祖道重南归东晋。祖逖家族这才延续了血脉。

苏峻之乱平定后，陶侃因功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仍兼荆州刺史，封长沙郡公。刘胤因功升任江州刺史，在咸和五年（330年）被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延续和稀泥的方法，默认郭默的罪行，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陶侃指责王导的纵容，迅速起兵抵江州，将郭默斩首，自己兼任了江州刺史。实际上，王导默认郭默夺权，未尝没有笼络郭默约束陶侃的意思。王导一贯在中庸的政策表象下尽可能地搞平衡，来维护中央朝廷的稳定。这是他比庾亮高明的地方。而陶侃刚正强硬，表面是雷厉风行地惩办杀人夺权的郭默，实际上也未尝没有争夺江州的意图。占领江州后，陶侃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权力煊赫不亚于当年的王敦。人们开始担心陶侃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王敦。经过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后，朝廷力量大为削弱，可以依靠的勤王藩镇屈指可数，如果陶侃叛乱了，怎么办？

私下里还真有人怂恿陶侃起兵谋取更大的荣华富贵。陶侃一介武人，也对朝廷的一些弊政多加指责，让建康的衮衮诸公慌张了一阵子。不过陶侃始终没有造反，反而在咸和九年（334年）六月上表请求辞职，并且主动派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生病了，不等朝廷同意就离开了荆州任所。离开前，陶侃将军资、器仗、牛马、舟船都造册登记，封闭仓库，等着朝廷派人接收。没几天，陶侃就在前往长沙的途中病逝，享年76岁。东晋朝野松了一口气，都对陶侃充满敬

意。

纵观两晋南北朝，陶侃可能是最尽忠职守、大公无私的将领。在举国清谈、现实主义横行的社会中，陶侃终身勤于公事，恭而近礼，整天严肃端坐处理政事。他掌握东晋一半领土的政务和军事，事情头绪很多，但没有一件遗忘疏漏；远近所来书信公文，无不亲笔回信。陶侃办起事来下笔如流，笔无停滞，从来不让前来办事的人在门前等待过久。在他之后，东晋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忠臣干将。

三二、北伐是剂猛药



陶侃死后，东晋的军权被外戚庾氏掌握。庾亮经历过苏峻祖约之乱后，掌握了荆州军权，胸中的雄心壮志又开始蠢蠢欲动。他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选择襄阳方向为主攻点，搜集军队准备收复河南。

《晋书》的评价庾亮这个人“智小谋大，才高识寡”，大致说他志大才疏，不是干事的料。其实，《晋书》的评价还很委婉。庾亮的缺点不仅是志大才疏，而且不明世事、不通人情。我们知道东晋是建立在各大世族的支持之上的，皇室和世族势力的均衡和斗争推动着王朝的发展。收复中原必将破坏这种均衡，引起上自皇室下自世族势力的阻挠破坏。祖狄就是前车之鉴。庾亮高调地北伐，失败了会耗费东晋的实力，成功了会抬高庾氏势力，打压其他世族。（很多史学家相信，庾氏力主北伐发自私心，目的是借北伐揽权充实家族的根基。）庾亮本来就掌握了地方军权，内部又有庾太后的支持，已经遭到其他人嫉妒了，如今更是成了大家的眼中钉。

所以，庾亮在襄阳意气风发，全力组织北伐军。北伐的道德力量很强，其他世族不方便公开反对，就暗中捣乱。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庾亮向各地征调军需粮草，结果所得寥寥。其他人不给庾亮军队，也不给他粮秣，结果整件北伐大事就成了庾亮在荆州的“地方行为”。不巧的是，庾亮北伐的时机也不对。北方的后赵政权还相当强大，庾亮的北伐仅局限在现在的河南南部地区，还屡战屡败。荆州军败了，朝野的冷嘲热讽蜂拥而至。庾亮壮志难抒，郁郁而终，在340

年正月病逝。兄弟庾翼继任荆州刺史，庾冰在朝中配合。庾氏依然掌握朝廷实权，继续推动北伐。

342年，22岁的晋成帝司马衍病死。他5岁继位，由母后和舅氏（庾亮、庾翼）主政，经历祖约和苏峻之乱，虽然在位18年，一无所成。庾冰、庾翼力排众议，拥立晋成帝的同母弟弟司马岳。司马岳继位，史称晋康帝。司马岳兄终弟继，表露了庾氏的私心。因为司马岳是庾氏的外甥，他的继位可以方便庾氏继续专权。不幸的是，司马岳继位的第三年（344年）也死了，年仅23岁。

庾冰、庾翼出于私心，继续反对司马岳的儿子继位，主张拥立长君。他们推出司马睿的幼子、曾经和司马绍争夺皇位的会稽王司马昱为新君人选。司马昱为晋成帝、晋康帝的叔叔，按说没有机会登基，一旦登基自然会感激庾氏，再次方便庾氏掌权。以宰相何充为代表的其他世族势力强烈反对。司马岳又不是没有儿子，为什么要搬出皇叔来继位呢？晋康帝临终前，也赞成何充的主张，立两岁的儿子司马聃为皇太子。晋康帝一死，何充等人就抢着发布“遗诏”，拥戴司马聃登基。司马聃史称晋穆帝。庾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不方便再干政了。而庾氏兄弟在皇位更替上输了一仗，威望和势力都大减。

一个政治人物的作为要以权力的巩固为基础。如今，庾氏的权力根基被削弱了，他们推动的北伐事业也就成了强弩之末。

晋穆帝即位后，庾冰在朝中不像以往那样顺畅了，遭到了其他大族的排挤，不久去世。（庾氏的抗压能力似乎很弱，一遇逆境就生病去世。）荆州的庾翼孤立，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到防备朝廷上去。他离开北伐前线襄阳，委托亲信和儿子留守，自己还镇夏口处理与朝廷和其他世族的关系。在夏口，庾翼还不忘修缮军器囤积粮草，为北伐做准备。精神是好的，处境却越来越不顺利。永和元年（345年）夏，庾翼在夏口去世。庾翼的死，标志着庾氏发动的东晋第二波北伐浪潮的落去。

庾翼临终上奏由儿子庾爰之代理荆州刺史。庾氏试图将荆州固定为自家势力范围，其他世族的人嗤之以鼻。朝中根本没有人支持庾爰之。荆州为国家重镇，朝臣一致声称荆州刺史不能为世袭职位。丞相何充就认为：“荆楚，国之西门，得入则中原可定，失入则社稷可忧，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他推荐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其他大臣纷纷点头，只要不是庾家的人就行。于是，桓温在永和元年（345年）出任荆州刺史，取代庾氏获得了长江中游的兵权。

二

事实证明，何充推荐的桓温并不是好的人选。

桓温是之前出现过的桓彝的儿子，“少有壮志”，以本朝初期名臣刘琨、陶侃为榜样。桓彝在苏峻之乱中遇害，江播是杀父帮凶。父亲死时，桓温才15岁，就枕戈泣血，扬言要复仇。桓温18岁那年，江播病死了，江彪三兄弟为父亲发丧。为了防备桓温来寻仇，江彪三人都刀不离手。桓温还是混在吊唁的宾客中进了江宅，当堂手刃江彪，并追杀他的两个弟弟。东晋朝廷对世族子弟的仇杀睁只眼闭只眼，没有处分桓温。这件事反而让桓温获得了巨大的声望。晋明帝还把大女儿南康长公主嫁给了桓温。桓温就成了驸马，于咸康七年（341年）出任琅琊太守，很快升任徐州刺史，职位超过了父亲。

桓温和一般的世族子弟不一样。一般人是清谈为主，吹得天花乱坠，不管实现得了实现不了，桓温则是有胆略有能力，敢作敢为。他期待建立功业，更希望为家族博取荣华富贵。这样的人物，给他适当的权力和地位能让他为朝廷建功立业；而一旦授予他过大的权力和过高的地位，难免会助长他的不臣之心。桓温上任荆州刺史后，就打出了“统一天下”的旗号来。那些峨冠博带的朝堂大夫起初不以为意，觉得这就是桓温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折腾一下而已。不想，桓温到任的第二年（346年）就孤注一掷，率军逆江而上进攻成汉政权。朝野还

没缓过神来，前方就传来了桓温平定蜀地，汉王李势投降的捷报。这下，东晋朝廷不得不思考一个现实问题：桓温俨然在荆州称雄了！朝廷原本是为了去除庾氏割据倾向而任命桓温，却不料桓温成了新的庾氏。可是，桓温功勋卓著，又不得不赏。东晋朝廷只好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是提升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一方面却是对桓温暗中限制，不给他兵不给他粮，明确不让桓温北伐。

桓温把北伐的旗帜摇得呼呼作响，已在鼓吹北伐，给朝廷诸公施加了很大压力。永和五年（349年），后赵的石虎死了，北方大乱。大批北方百姓南迁投奔东晋，后赵的寿春守将也投降了东晋。民间北伐声音大增。桓温抓住时机大造舆论，还主动进屯安陆。他准备如果东晋朝廷不北伐，他就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朝廷的北伐压力实在太大了，又不愿意让桓温把北伐的首功抢走，建康方面出面组织了一次北伐。

这是东晋朝廷出面组织的第一次北伐。北伐军的兵力很少，只有3万人（桓温还带甲十万呢），可见朝廷并非真心要收复中原。北伐的统帅是晋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褚裒是一代名士，当大都督打仗却很外行。当时中原的形势很混乱，大批民众携家带着南下。褚裒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组织南下的百姓，让他们做向导，直捣后赵的巢穴邺城。可惜褚裒指挥的北伐军却以接应南下民众为主，纠缠着南北边界各个城池的得失。结果让处于劣势的后赵从容组织了军队反扑。代陂一战，北上接应民众的东晋部队全军覆没。褚裒忙从彭城退到广陵。寿春的东晋将领听说统帅失败，竟然吓得烧掉军需毁掉城池南逃。北伐就此失败。南迁的百姓最悲惨了，要么被东晋北伐军掳掠到江南做了奴役，要么被后赵政权掠回北方，要么在淮河两岸陷入绝境而死。褚裒败退后，惭愧不已，很快在京口（今镇江）郁郁而终。

褚裒死了，东晋朝廷还是需要把北伐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找谁来主持北伐，对抗桓温呢？褚裒生前推荐了殷浩，朝廷征殷浩为建

武将军、扬州刺史。殷浩上疏推辞，朝廷就继续征召他，一直持续了四个月，殷浩才答应上任。

这个殷浩架子这么大，到底是谁呢？殷浩也是当时的名士，精通《周易》、《老子》，善于玄言，名望极高。一般人都把他与管仲、诸葛亮相提并论。同时，殷浩一再推辞官职，反而让他名望越来越高。他的名言是“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朝廷一再给他官做，庾亮、庾翼北伐时也征召他，殷浩全都拒绝。他称疾不起，屏居墓所，将近十年之久。桓温灭蜀后，威势高涨，朝廷忌惮他。当时在朝堂上主政的是司马昱，他想借助殷浩的盛名对抗桓温，就树立殷浩为扬州强藩，与荆州的桓温抗衡。

殷浩任职前也高喊北伐口号，说得头头是道。他上任的时候恰好是冉闵称帝，北方混乱加剧的时候，正是北伐的好时机。朝廷就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主持北伐。殷浩也意气风发，向朝廷汇报了北征许昌、洛阳的计划，组织了阵容庞大的北伐团队。但是探究殷浩的关键措施，无非两条：第一条是引诱前秦的大臣和将领，招降纳叛，希望能够乘虚而入；第二条是利用投降东晋的胡族力量，主要是羌族姚襄的力量，让他们当炮灰打前阵。前秦苻健一度杀戮大臣，侄子苻眉自洛阳西奔，殷浩误以为前秦内部乱得一塌糊涂了，上奏请求进屯洛阳，修复西晋皇室园陵。他信心满满，志在必得，甚至请求卸任扬州刺史，专镇洛阳。后来证明前秦并没有内乱，相反却是投降东晋的将领张遇降而复叛，打败了谢尚的晋军。殷浩主要依靠姚襄的羌族军队，却不信任姚襄，老想吞并这支部队。殷浩将姚襄部队迁徙驻地，又派人监视。姚襄也不是真心投降，一度杀害友军壮大自己，殷浩也不能制止。在进军途中，姚襄叛变，在山桑这个地方伏击了东晋大军。殷浩原本就没想利用自身力量实实在在地北伐，听说姚襄造反了，吓得抛弃辎重南撤。北伐军的器械物资都被姚襄所掠。撤退途中，东晋逃亡的逃亡、投降的投降，损失惨重。殷浩北伐也以惨败告终。

客观地说，北伐的失败并非殷浩一个人的错，根子在东晋朝野压根就没有真心北伐，并没有动员主力、投入血本北伐。但北伐失败的责任必须有人来承担。纸上谈兵的殷浩就成了替罪羊。尤其是桓温，早就要搬掉殷浩这块碍脚石了，连续上书痛斥殷浩误国，要求严惩。朝廷只好废殷浩为庶人，押往浙中安置。

殷浩狼狈下台后，恢复了名士做派。他口无怨言，每天就对着空气写“咄咄怪事”四个字。后来，桓温掌权了，想招殷浩担任尚书令，写信告诉他。殷浩喜出望外，回信接受并表示感谢。为了写一封完美的回信，不在心中留下任何差错，殷浩修改了无数遍，把信装进了信封又拆开修改，前后拆封数十次。谁料，最后信封中空空如也，他竟然忘记塞入信件，发了个空函给桓温。桓温大怒，殷浩复出的事也就告吹了。由此可见，殷浩并非什么淡泊名利的名士，而的确是个醉心名利又空谈误国的假名士。永和十二年（356年），殷浩死在了贬所。

三

褚裒、殷浩先后失败，东晋再也没有理由压制一直叫嚷着要北伐的桓温了，索性将北伐重任授予他。至此，桓温掌握了北伐主动权。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兵分两路，他亲率步骑4万余出湖北，命令梁州方面出秦岭。桓温在蓝田、白鹿原连续击破氐族苻健的军队，推进到长安郊区的霸上。苻健拒守长安城。第一次北伐可谓旗开得胜，政治影响巨大。关中百姓“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一些老年人感极而泣：“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官军！”

桓温的成功也反衬出之前东晋历次北伐的战略不当。首先是缺乏协同作战，之前的北伐不是从东边渡淮河向河南、山东，就是在西边出湖北，从来没有东西联合作战（因为东西的扬州、荆州属于不同的

世族势力范围)。其次，既然没有协同作战，自然也就不能整合军队和物资了。如果褚裒、殷浩等人的军队能够和桓温的荆州军队联合起来，相信成效会更大。说到整合资源，桓温的北伐依靠的仅仅是荆州的物资，经过两场恶战，推进到长安城郊后，北伐军的后勤供应出现了问题。桓温就在霸上停顿了下来，一边等待后方的军需运达，一边抢收关中地区的春麦作为军粮。关于桓温为什么没有乘胜追击，还有其他的解释。比较可信的说法还有桓温这时候已经有了谋逆自立的野心。他想借北伐来揽权立威，并非要真心收复失地；第二个说法是桓温看到前秦在关中的统治并不稳定，想在霸上坐等前秦内乱，然后乘虚而入。而最大的可能是，桓温驻足不前可能是以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遗憾的是，前秦并没有内乱，北伐军在抢收春粮上也输给了秦军。秦军收走了粮草，对北伐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桓温粮秣不继，被迫撤返襄阳。第一次北伐失败。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北伐的目标是叛晋的姚襄势力。叛晋后，姚襄一度游离在前秦和前燕之间，盘踞在河南洛阳、许昌等地。桓温北上击败姚襄，收复了河南地区。其中西晋首都洛阳光复，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桓温大做政治文章，建议“还都洛阳”，并建议南迁的世族大家们返乡。他这么做是有私心的。洛阳在桓温的控制之下，让朝廷和达官显贵们都迁徙到洛阳来，不是重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旧戏吗？建康的达官贵人们激烈反对桓温的建议。当然了，“还都”的建议也是一面不能驳倒的道德旗帜，达官显贵们就从其他方面入手。首先，他们质问桓温能否守得住洛阳？如果等朝廷迁入洛阳，洛阳却失守了，不是要再来一次“永嘉之祸”吗？其次，他们说百姓南迁已经半个世纪了，早已在南方安家生根，强迫南迁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就在东晋朝臣的相互猜忌和扯皮之际，前燕慕容恪、慕容垂领兵进攻河南。许昌、汝南、陈郡等地失守。洛阳守将陈佑以救许昌为名

南逃，留沈劲的五百人守城。沈劲是王敦死党沈充之子。沈充背负叛逆的恶名，沈劲引为终身憾事，如今以区区五百人坚守洛阳非但不怨天尤人，反而觉得是以身殉国、挽回家族名声的良机。洛阳很快被前燕攻占，沈劲全军覆没，被俘遇害。慕容恪知道实情后，很后悔杀死了沈劲。至此，桓温的第二次北伐的成果全部丧失了。

其间，东晋经历了一次皇位变革。361年，晋穆帝司马聃病逝。堂兄司马丕被推举为新皇帝。司马丕是晋成帝的长子，原本早就有希望称帝了，结果因为庾氏专权的需要被闲置了。他苦等晋康帝、晋穆帝两个皇帝都死了，才坐上本属于他的龙椅。司马丕就是晋哀帝。桓温因为功勋卓著，被晋哀帝加封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桓温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让兄弟桓豁领荆州刺史，桓冲任江州刺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至此，桓温成了东晋最大的实力派。除了长江最下游的部分郡县外，中下游军政大权都落入桓氏之手。

晋哀帝司马丕继位后，醉心黄老之术，服药求长生，却吃错药中了毒，死于365年，年仅25岁。大臣们拥立其弟司马奕为新皇帝，史称晋废帝。

369年，手握大权的桓温为了树立更高的威望，率5万人北伐前燕。北伐开始很顺利，一路势如破竹。经过金城时，桓温见到自己担任琅琊太守时种的柳树已经长成老树，感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已老，桓温也年过半百了。他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可当北伐军推进到枋头（今河南汲县境内）时，桓温又逡巡不前。可能是桓温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胜利的信心。当时前燕军队并不弱，并且前秦已经出兵增援前燕，两国联军对付桓温。而北伐军又遇到了老问题：后勤跟不上来。这个后勤的老问题，并不是因为东晋国力衰落，而是朝廷并没有收复失地的真心，加上其他世族大家不愿意桓温建立大功，一家独大，所以朝廷没有为桓温全力提供后勤保证。桓温在前线很快就没有粮食吃了，又得知前秦援兵将至，只好烧船弃甲，撤退回

国。北伐军撤退途中，缺粮少水，只能凿井而饮，又不断遭到前燕的伏击，最后只有万余人逃回南方。

惨败后，桓温把责任推卸给负责后勤的袁真。袁真不满而在寿春造反。桓温进攻寿春，直到371年才攻克。当时袁真已死，拒守城池的袁瑾被杀。尽管找了替罪羊，桓温的威望仍然大减。桓温便想用废立皇帝的办法来立威。371年，桓温废司马奕为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帝。司马昱就是简文帝。他原本可以成为东晋的第二个皇帝，结果在晚年才成了东晋的第八个皇帝。他的雄心壮志早已消磨光了，在位就是个傀儡，一切朝政由大司马桓温独断。

长期手握大权，桓温也厌倦了“北伐—失利—再北伐”的老路，有了更大的“追求”。他抚枕而叹：“人生在世，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桓温开始以王敦为榜样，他和王敦的处境惊人地相似。王敦曾经和皇位一步之遥，桓温的手也可以摸得着龙椅。

三三、先拿灭蜀练练手

成汉的开国君主李雄将国家推向了安定繁荣的顶峰，算得上一代明君。遗憾的是，一代明君也有失误的地方。

李雄就在接班人问题上犯了个错误。李雄个性与人为善，是个好人。他的大哥李荡也是雄心勃勃、智勇双全的人才，可惜在缔造政权最艰难的时刻阵亡了。李雄认为是因为李荡的不幸才有他称雄称帝的幸运，自己的皇位原本应该是李荡的。后来，军阀杨难敌曾投奔李雄，不久又叛乱。李雄派侄子李瑓、李稚征讨杨难敌，因为轻敌中了埋伏，两个侄子都战死了。李瑓、李稚都是李荡的儿子。李雄很悲痛，几日吃不下饭去，一说起这事就痛哭流涕，深深自责，觉得更对不起故去的哥哥李荡了。所以，李雄比较倾向于死后将皇位传给李荡的儿子。

李雄在征战途中伤痕累累，头部的伤口有一次化脓。他自己的10个儿子当了皇子后，生活奢侈淫逸，对父亲的病情看得很淡，并没有真正关心过父亲。结果，李雄和儿子们的感情也很淡。反倒是李荡的儿子李班日夜照料在旁，还用口给李雄吸脓。李班这个孩子也是与人为善的人，在性情上与李雄相似。李雄就不顾群臣的反对，一意孤行立李班为太子。

大臣们从现实出发，认为各位皇子都已成年，盘踞各处，如果舍弃10位皇子传位给侄子，必然引发内乱。李雄说：“我在起兵之初，

本不觊觎帝王之业。值天下丧乱，群情义举，诸君推逼我为帝。王朝的基业，功由先帝，我大哥是嫡长子，本应登基，不幸薨于戎战。李班是嫡长子之子，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叔叔李骧与司徒王达都反对：“传位以嫡，本身就是为了防止皇位篡夺，不可不慎。历史上有许多不传位给儿子导致内乱的先例。愿陛下思之。”李雄一意孤行，固执地传位李班。李骧是皇叔，地位崇高，也劝不了李雄，只能退出来悲伤流涕：“本国的大乱就要开始了！”

334年，李雄病逝，李班继位。李骧的担心马上得到了验证。李班宽厚老实，疏于防范，或者压根就没把人往坏处想。可李雄的儿子李越对李班继位极为不满，赶回成都奔丧时和兄弟李期联手，就在灵堂上杀掉了李班。李期登基。

李期称帝后，成汉朝政日坏。国家承平日久，李雄的子孙们位居要职，贪图享受，早就把俭朴勤政的作风抛到脑后了。李雄与民为善、勇于纳谏、君臣携手的风格荡然无存，李期本身就是懒惰的庸才，又任人唯亲，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庸庸碌碌，坐享俸禄而已。国家形势很快便江河日下。

李期本人无才无德，却猜忌声望高、地位重要的宗室成员。汉王李寿是李骧的小儿子，按辈分是李期的堂叔，历任要职，镇守在外。李期对李寿很疑忌，派人监视李寿，还将李寿的义弟毒死。李寿感到十分恐惧，于338年率军进攻成都，公然造反。李寿的儿子李势当时在成都当校尉，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迎父亲进城。李期没料到李寿真的造反，而且转眼就杀到了眼前，不得不安抚李寿。李寿要求“清君侧”，李期就杀掉了李越和自己的那帮大臣，自断了臂膀。几天后，李寿还是废黜李期为邛都县公，软禁起来。李期不久自尽，时年25岁，在位4年。

李寿起兵初，歃血盟誓，说起兵夺权后要向晋称藩。这很可能是为了争取外部支持，洗刷自己造反夺权罪过的幌子。他都没想到夺权

会那么容易，如今真的成了一国之主，李寿就开始犹豫了：真的向东晋称藩呢，还是自己披上龙袍过过皇帝瘾？他决定用占卜决定命运。李寿占了一卦，卜者解读说李寿有几年皇帝的命。亲信任调马上鼓动说：“做一天皇帝就很了不起了，何况几年！”另一个亲信解思明不以为然，说：“几年皇帝怎么及得了百世诸侯（向东晋称藩，封侯是少不了的）！”李寿下了决心，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一天皇帝能做就做一天皇帝。抱着“过把瘾就死”的心理，李寿称帝，改国号为“汉”，开始骄奢淫逸的皇帝生涯。他一心享乐，大兴土木，夺人妻女；喜怒无常，又喜杀戮，滥施淫威，致使上下离心，民怨沸腾。343年，李寿病逝，足足过了5年的皇帝瘾。儿子李势继位，风格和乃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什么事情都务求奢侈，根本不管百姓死活。百姓们不满，李势就滥用严刑峻法，压制不满。

统治者的内讧仍在继续。李势没有儿子，弟弟李广就请求立自己为皇太弟。李势不知道怎么想的，坚决不答应。李广转而去求大臣马当和解思明前去劝说。马当和解思明二人是老臣了，朝政之所以没有彻底崩盘全靠他们支撑着。两人从政权长远利益考虑，一再劝说李势立弟弟为继承人。李势听不进去，怀疑李广和两名大臣谋权篡位，痛下杀手，捕杀了李广、马当和解思明。短时间内连续的内讧，严重削弱了成汉的实力。

成汉王朝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稍微有点变故就会轰然倒塌。

二

四川地区处长江正上游，对中下游产生君临态势。四川水军出三峡，顺江而下，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两湖地区。所以建国中下游的东晋王朝和成汉相比，在军事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建国开始，东晋内部就存在伐蜀的倡议。庾亮当权后，就开始实际的西征筹划了，最终没有成行。东晋一直没有伐蜀的原因很多，比如四川易守难攻，

比如担心北方政权乘虚南下，最重要的原因是东晋政权建立在各个世族大家的支持下，内部维持着微弱的均势。如果有人伐蜀成功，那就立了盖世武功，势力增长，势必破坏均势，影响政权稳定。所以，大家宁愿成汉政权盘踞上游威胁自己，也不愿意看到有人伐蜀成功。

永和二年（346年），实权人物桓温再次提议伐蜀。他的目的恰恰是其他世族最担心的：通过对外战争提升声望和实力，为掌权乃至篡位做准备。

此时伐蜀具有有利条件，那就是成汉自身虚弱。但桓温的部属们提出了更多的不利条件，比如顾虑后赵大军南下、朝廷不同意不支持等等。江夏相袁乔力排众议，认为江防已固，可以腾出手来做点事情了。后赵军力强盛，成汉虚弱不堪，进攻成汉比进攻后赵划算。至于朝廷的羁绊，袁乔认为方略大事不必取得“一致同意”再施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乔的意见说到了桓温的心里去了。他下定决心，给朝廷上表要求西征，不等朝廷回复就在当年十一月率益州刺史（他自己任命的）周抚西征成汉。袁乔率2000人为前锋。

桓温的战表到了建康，朝廷果然不同意，可人家已经出发了，你再反对也没有用了。朝堂上的大小官员们干脆议论起桓温此行能否成功，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桓温失败了，大家幸灾乐祸；成功了，大家的苦日子就来了。多数人觉得成汉地形险阻，路途又远，桓温兵力薄弱，取胜希望不大。刘惔却认为桓温必胜，众人问他根据何在。他说：“从桓温的赌博表现上可以推断出来。他的赌博手段极精，非胜券在握绝不出手。我担心的是，灭蜀之后，朝廷都要受控于他了。”大臣们听说此言，不禁忧心忡忡起来。

347年春，桓温大军至青衣（今四川青衣江）。李势命右卫将军李福、镇南将军李权、前将军胥坚率大军拒晋军。

成汉将领内部就作战方针出现了分歧。李福和李权想设下埋伏待

晋军到来，咎坚想正面迎敌，把桓温消灭在陌生的环境里。分歧的结果是分裂，咎坚带上本部兵马，和李福、李权分道扬镳，向东搜索前进，摩拳擦掌要和桓温较量一下。不知道是情报工作没有做好，还是四川地区过于广袤，咎坚的军队竟然没有遇到晋军。桓温和他走的不是同一条路，避开了咎坚的阻拦，很快推进到成都南面。三月，晋军攻克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地区）。李福、李权得报后，迅速向彭模杀来。

下一步怎么办？是坚守彭模迎战李福、李权，还是放弃此处攻占别处？有人提议趁成汉主力没有到达，分兵攻城略地，在成都周边来个天女散花。袁乔坚决反对：“我们孤军悬在万里之外，兵少将寡，分兵容易被各个击破，必须同心协力，奋勇一搏。”他提议大军轻装简行，只带三天粮草，直取成都。桓温采纳了这个冒险的计划，留参军孙盛、周楚率老弱残兵守彭模，亲自率领步兵轻装向成都进军。

成汉得报，由李福攻彭模断晋军退路，李权向成都收缩阻拦桓温。这个计划很好，可惜李势的倒行逆施早已天怒人怨，军心民心涣散不可收拾了。李福进攻彭模的晋军老弱病残，竟然大败而逃。李权的部队三战三败，一路败退回成都。听说成都情况不妙，东边的咎坚这才停止搜索，赶回来增援。在成都南郊，咎坚的部队终于遇到了晋军。可惜部队的士气实在低落，看到晋军杀气腾腾的样子就不战自溃，跑得只剩咎坚这个光杆司令了。

三支部队全都瓦解了，李势孤注一掷，武装成都城中所有的守军与桓温决战。双方在成都笮桥（今成都西南南河上）激战。战斗中，晋军不利，伤亡激增，流矢几次在桓温身边擦过。官兵们产生了退缩情绪，桓温决定收兵再战。在这关键时刻，晋军的鼓吏误鸣前进鼓，袁乔乘势督率士卒力战，扭转了战局。蜀军产生了畏缩情绪，纷纷撤回城。对于这个蹊跷的敲错鼓事件，还有不同的说法：不是鼓吏敲错了，而是袁乔见桓温有意收兵，故意在给鼓吏传达命令的时候把“收兵”说成了“进军”，于是战场上响起了进军鼓。不管原因是什么，战场

上拼的往往是“最后五分钟”的坚持，其实成汉军队的勇气逊色于晋军，终究是要失败的。晋军意外得胜后，乘胜追击，火烧城门，攻占成都。

李势连夜逃走，往北逃到葭萌关，迷茫思考起来。收拢残军败将，与桓温顽抗，李势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逃到中原，向后赵政权投降，李势担心没有好果子吃。这时候，李势想起当年父亲李寿占卜问命运的事情来，解思明说“几年皇帝怎么及得了百世诸侯”果然没有错，归顺东晋做个愚公不失为现实的选择。于是，李势向桓温请降，成汉灭亡。桓温奏报朝廷，东晋将李势迁到建康，封为“归义侯”。李势在四川胡作非为，结果因为主动投降而在江南得以善终。

灭蜀后，桓温凯旋回荆州，留周抚收拾残局。周抚的益州刺史原本是虚的，如今终于坐实，工作起来很卖力。他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消灭各地的成汉残余势力，使蜀地全部并入东晋。桓温灭蜀，仅在领土上就使东晋增加了一小半的面积，功勋卓著。

三四、陈郡谢家的登台准备



在东晋南朝，与琅琊王家齐名的陈郡谢家的起点很低。举凡名门望族都喜欢给自己列谱系，谢家后人发达了，祖先只能向上推到曹魏时期的典农中郎将谢纘。谢家发迹之晚可见一斑。谢纘的这个典农中郎将相当于太守级别，但是负责屯田事务的，不属于正牌的地方官职，政治地位一般。谢纘的儿子谢衡入晋后在国子监谋事，相继做了博士、国子祭酒，终于散骑常侍，算是坐了一辈子清水衙门的冷板凳。谢衡耐得住清贫，努力钻研业务，成为一代大儒。在“本朝历史从何时算起”、一夫多妻家庭的儿子是否应该为非亲生母亲服丧等问题上，谢衡提出了许多理论意见。他的意见很可惜都没被采纳，但被史官忠实记录了下来，让后人能够确认陈郡谢氏的早期作为。

谢衡守着一肚子学问，没能飞黄腾达，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因为他精通的是儒家，而当时社会盛行玄学。这就好比现代社会，大家都追捧金融、管理等显学，谢衡则醉心哲学、宗教一样，虽然著作等身也难以在大学里掌握话语权。西晋经历短暂的统一后，陷入了八王之乱，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普遍追求玄而又玄的清谈，大谈宇宙人生，将儒家礼法视为迂腐的俗务。谢衡的不得意由此注定了。所以到了谢衡的儿子谢鲲长大成年后，毅然抛弃家学转学玄学，钻研老子和易经，大谈特谈云彩和人心的关系。谢鲲的能力用对了地方，很快引起了社会注意，20岁就跻身“名士”行列。

有的人醉心玄学是逃避乱世，有的人完全是附庸风雅，将玄学作

为敲门砖，谢鲲由儒入玄，不敢说没有功利的目的，但就玄学功力来说，他完全是第一等的。真正的玄学大师是精通世故又看破世事，能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的，用心灵指导言行。表面的清谈和悖理不羁是掩藏内在深刻和豁达的迷雾。谢鲲不修威仪，整天唱歌鼓琴。邻居高家有个漂亮的女儿，常常在窗前织布，看得谢鲲心痒不已。谢鲲没有“检讨肮脏的思想”，而是公然去窗前向邻家女子表明爱意。郎有情来妾无意，谢鲲的率真被邻家女子看做轻浮的挑逗，拿起织梭就向他扔去。谢鲲的两颗牙齿被砸掉了。时人笑话说：“任达不已，幼舆（谢鲲的字）折齿。”谢鲲听了也不生气。既然人家不接受那就算了，我继续逍遥率性的生活。牙齿掉了没关系，又不影响我长啸高歌。

谢鲲引起了大臣和名士们的瞩目，其中就包括王衍、嵇绍等大人物。很快，谢鲲被东海王司马越征辟为掾吏。可惜官运不佳，因为小故被除名。长沙王司马乂看不起谢鲲，曾把他抓起来要加以鞭挞。谢鲲主动解衣，要接受惩罚，没有害怕的神情。司马乂只好放了他，谢鲲也没有欢喜之色，一切都平淡自如。谢鲲屡受挫折和屈辱，反而名气更大了。士族名士们都替他感到可惜。谢鲲没有一个字的牢骚，清歌鼓琴，优哉乐哉。

谢鲲对名利可以宠辱不惊，对人生和家庭责任则时刻保持清醒细致的认识。鼓琴高歌间，谢鲲意识到了国家大乱，北方终将沦陷。所以当东海王司马越不久再次征辟他出任参军一职时，谢鲲拖病辞职，举家迁往南方。他最先来到豫章（今江西赣北）。传说该地有座空亭，闹鬼，发生过多次杀人事件。谢鲲毅然搬到院落中居住。拂晓，有个黄衣人呼唤着谢鲲的名字，叫开门。谢鲲愴然无惧色，从门旁的窗子伸手把黄衣人用力拉了过来，挥刀砍断了他的肩胛，落了一块皮肉。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块鹿皮。谢鲲寻着血迹，最后消灭了鹿怪，该地从此再无妖怪了。谢家一搬再搬，谢鲲最后选定建康城里秦淮河畔朱雀桥边的乌衣巷安家，成为乌衣巷里谢家的第一代主人。

谢鲲避祸豫章，被大名士、大将军王敦征辟为长史，有了固定的

政治舞台。

王澄也是不修边幅、率性而为的名士，许多地方与谢鲲惺惺相惜，常常感叹只有和谢长史才有话说。而谢鲲也不为功名所累，说话也不看着王敦，平静而真诚地对待工作。可怕的是，谢王二人气质相同，政治观点却是相反的。王敦有不臣之心，企图叛乱擅权。谢鲲渐渐知道王敦这个人不是匡扶社稷的同道中人，开始不屑政事，集会时候从容议论，巧妙讽谏王敦，平日主要优游寄遇，与一帮名士纵酒高歌。王敦鉴于谢鲲名高望重，一直以礼相待。

王敦最终走上了叛乱的道路。他对谢鲲说：“刘隗这个奸邪，危害社稷，我要消灭君侧之恶，匡主济时，怎么样？”谢鲲回答：“刘隗的确是个祸害，但只是城狐社鼠而已。”意思是杀鸡焉用宰牛刀，用不着王大将军去打刘小老鼠。王敦骂了声“庸才”，也不问谢鲲愿意不愿意，就任命他为豫章太守，借助他的才望，拉着他一起兵逼建康。谢鲲被迫成为叛军一员。叛军进展顺利，王敦攻下要塞石头城后，狂傲地感叹：“我以后不能再和大家一起造福地方了。”意思是自己要掌国家大权了。谢鲲又泼了回冷水：“怎么会呢？只要你愿意，每天都可以。”攻下建康后，王敦问谢鲲形势和人情如何。谢鲲回答：“明公之举虽欲存社稷，但普通人未必了解您的苦心。”谢鲲还跑去皇宫拜见了司马睿，又建议王敦任用周^顗、戴若思等原来的大臣。王敦不听，逮捕了周戴二人要杀头。参军王峤劝阻，王敦连王峤也要一起杀。部属畏惧不敢说话，只有谢鲲说：“明公办大事都没有杀戮一人，现在王峤提了不当的建议就要被杀，是不是用刑太过？”王敦这才赦免了王峤。最终，王敦在世族势力的联合抵制下退出建康。谢鲲劝他撤退后进宫拜见皇帝一次。王敦闹情绪，不愿进宫，以安全无法保证为由推脱。谢鲲再劝他，说自己入觐皇上，发现宫中秩序穆然，不会有危险，如果王敦入朝自己愿意侍从。王敦没被劝动，不朝而去。

撤退后，许多人为谢鲲的安全担心。王敦对谢鲲的确不满意，感到厌烦，打发他去豫章实任太守。谢鲲为政清廉，得到百姓的拥戴，

可惜没多久就死在了任上，时年43岁。半年后，王敦败亡。谢鲲早死，省去了许多麻烦。更因为谢鲲在王敦叛乱期间，说了很多对朝廷有利的话，努力劝谏王敦，所以并没有被视作叛党乱匪受到处理。相反，东晋王朝追赠谢鲲为太常，追谥“康”。

至此，陈郡终于混出了有头有脸的人物。从谢鲲开始，谢家辉煌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二

一个家族在崛起时期，必然要求子孙一代超过一代。谢鲲死时，儿子谢尚才10岁出头。谢尚从小就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趋势，成名比父亲早。谢尚刚会走路，父亲谢鲲曾带他一起迎來送往。一次有客人夸奖谢尚是“当代颜回”。颜回是孙门最出色的学生，声望巨高无比。谢尚马上应声答了句：“这里没有孔子，哪里来的颜回！”一句话既表达了谦逊之情，又轻松幽默，让宾客感叹不已。在技艺方面，谢尚精通音律，擅长舞蹈和书法，史称“博综众艺”。谢尚最擅长的是“鸬鹚舞”，跳得很好，好到丞相王导曾当众要求谢尚起舞，让在座的大小臣工为他击掌为节。谢尚在桓温手下当官时，桓温知道他善于弹箏，结果谢尚理弦抚箏，因歌秋风，意气甚道，让同样多才多艺的大名士桓温为之赞叹。

谢尚为家族博取功名利禄的利器并不是唱歌跳舞或者弹琴，而是清谈玄学。他继承了父亲的清玄风范，并且理论化，写了一篇《谈赋》，专门侃清谈，认为清谈内容“若有若无”，追求“辞简心虚”的效果。这里的“心虚”不是做了坏事害怕的意思，而是内心豁达、超然物外的意思。成年的谢尚“开率颖秀，辨悟绝伦，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一副典型玄家名士派头。他一表人才，服饰华丽，满是精美的装饰。王敦的小妾宋玮在王敦败亡后辗转归了谢尚。谢尚曾问宋玮自己与王大将军比，如何？宋玮回答，王敦和谢尚相比就如同乡下人与贵

人一样。宋玮的意见代表了大众的看法，社会普遍认为谢尚“妖冶”——这词现在用在男人身上是个灾难，在东晋时则是莫大的荣耀。

当权宰相王导特别看重谢尚，将他比作王家长辈、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

有了如此之高的声望和如此地位的粉丝，谢尚的仕途一帆风顺。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仕靠上级征辟，年轻人都抓紧机会“养望”（培养声望，让大家知道自己）。谢尚的声望这么高，年纪轻轻就被大将军桓温征辟为官。更大的机遇还在后面，谢尚的外甥女褚蒜子成为东晋的皇后，继而是皇太后。谢尚外面有声望，朝中有后台，政治地位开始直线上升，刚过而立之年就被任命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后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开始威震一方。

东晋玄学名士大多是绣花枕头大草包，谢尚一介清谈客，能做好守土有责的大将吗？当时镇守武昌的安西将军庾翼就看不起谢尚，认为谢尚这样的清谈书生适合在安逸和平的环境中耍嘴皮子，身逢乱世只能添乱。谢尚知道地位提高身份转变对自己是个挑战，数次虚心地向庾翼咨谋军事。一次，谢尚和庾翼一起射箭。庾翼不屑地对谢尚说：“你如果能射中靶心，我就送你一支军乐队。”谢尚拉弓出箭，正中靶心。庾翼很佩服，真的把自己的军乐队送给了谢尚。在驻扎地，谢尚为政清简，不惊扰军民。刚上任时，郡府拍马屁，用四十匹布给谢尚造了一顶乌布帐。谢尚下令拆除布帐，给军士们制作衣物被褥，一下子就在军队中赢得了声誉。

大司马桓温专政，发动北伐。谢尚作为安西将军，率军从淮南进攻河南，作为一支偏师。进军之初很顺利，前秦的张遇率军投降。可能是谢尚的名士派头和张遇的军旅作风格格不入，使得两人关系破裂。张遇降而复叛，还占据许昌与谢尚军队为敌。谢尚大军进攻，竟然被张遇杀得大败，损兵折将逃回东晋。按律，谢尚罪行很大，够不上砍头标准也得罢官为民。结果在他的外甥女皇后的干预下，谢尚仅

仅是降为建威将军而已，依然在前线领兵。他的运气也实在好，北方战乱不止，政权更替频繁，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传国玉玺竟然流落到了谢尚的手中。谢尚极为重视，派铁骑三百夜以继日将玉玺送到建康。东晋王朝在建康延续晋朝国号，依然以中华正朔自居。但是东晋皇帝并没有发号施令的玉玺，被天下讽刺为“白板天子”。谢尚及时送来传国玉玺，解决了王朝的法统难题，功劳远远超过败军南逃的罪过，地位再次提升。东晋王朝实授谢尚豫州刺史，把淮南地区的防务委托给了他。

淮南地处东晋王朝的核心东南地区和战乱中的中原大地之间，连接洛阳旧都和新都建康，是南北拉锯的东部主战场。战争最容易让前线将领掌握实权，将领的地位往往随着战事水涨船高。谢尚占据并经营淮南，有了固定的地盘，承担了王朝安全重任，在东晋朝廷的地位也就不可代替了。大司马桓温有步王敦后尘，篡位夺权的野心。桓家控制了长江中流，子弟掌握了荆州、江州、扬州等要地，控制了大部分国土。谢家控制的豫州在军事要地之外，又多了一层抗衡政治野心家的重要意义。谢尚成了东晋政治角力的关键人物。

残酷的权力现实和沉重的政治责任并没有影响谢尚洒脱的生活态度。淮南首府寿阳城内大路旁，人们经常看到有一个中年人坐在酒楼门口的胡床上，穿着紫罗襦，抱着琵琶弹奏《大道曲》。歌声高亢，歌手陶醉，往来路人不是以为他是酒楼揽客的艺人，就是视之为行为艺术家。没有人知道他是盘踞淮南的镇西将军谢尚。谢尚和桓温的关系也很奇妙。按说他们是相互制衡的政治对手，却惺惺相惜，不像敌人，倒像是知心朋友。谢尚在桓温手下当官的时候，桓温就很欣赏他。桓温北伐成功，收复洛阳后，还上疏请求让谢尚都督新收复领土，出镇洛阳。谢尚对桓温也没有恶语相向。

也许是生活过于洒脱，缺乏规律，谢尚不到50岁，身体情况每况愈下。镇守洛阳的事情，谢尚就以疾病在身推辞了。这不是他不愿意离开老巢，而是真的病得不行了。朝廷得知谢尚病重，提升他为卫将

军，加散骑常侍，召他回建康养病。谢尚没能回去，死在了历阳，时年50岁。

谢尚之前，陈郡谢家只是一户普通士族，是他让家族暴露在闪光灯照耀之下。但在老牌大世族看来，陈郡谢家还是暴发户，他们称之为“新出门户”。有一个趣闻可以看出陈郡谢家当时的地位。谢尚暴得大名，想和世族大家攀亲，就替堂弟谢石向诸葛家族提亲。这个诸葛家族就是诸葛亮他们家，早在三国时期就是名门大家了，后来随着司马睿南渡，算是“中朝显贵”，在南方地位尊显。诸葛家的掌门人诸葛恢一向以名望凌人。一次，丞相王导和他谈起名门望族的排名先后，说：“人们都说王葛，为什么不说葛王呢？”诸葛恢毫不留情面地回答：“譬如说驴马，不说马驴，驴难道胜过马吗！”诸葛家的气焰可见一斑。现在诸葛恢见陈郡谢家来提亲，断然回绝：“我们这样的人家，都是有固定的世代姻亲的，我的女儿已经有人家了，可不能再和谢家结亲。”谢家讨了个没趣，谢石却对诸葛家的女儿念念不忘。等到诸葛恢死后，诸葛氏家道中落，谢家地位飞升，谢石这才娶到诸葛恢的小女儿诸葛文熊。

三

谢尚去世，豫州地盘不能落入桓温的手中。朝廷的看法是继续让谢家子弟都督淮南军事，作为王朝的方镇屏藩。他们选择的继位人选是谢奕。

谢奕是谢尚的堂弟。谢奕的父亲谢裒，从跟随司马睿开始，基本在中央谋职，终于吏部尚书。他本人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迹，却生下了一群日后赫赫有名的儿子：谢奕、谢据、谢安、谢万、谢石、谢铁。

谢奕为人放达，也是玄学中人，也是从桓温的幕府开始政治生涯

的。他和桓温虽然是上下级，言谈举止却像是老朋友。谢奕随便戴块头巾，就跑到桓温家里做客，长啸吟唱，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人。桓温常说：“谢奕是我的方外司马。”谢奕酗酒，还逼着桓温陪酒。桓温酒量不行，不胜其烦，最后发展到看到醉醺醺的谢奕就跑到老婆房间里躲藏起来。桓温是驸马爷，老婆是南康公主。因为桓温工作很忙，南康公主难得见到丈夫，所以很感激谢奕，说：“如果没有谢奕这个放荡司马，我怎么能见到驸马呢！”谢奕找不到桓温，就在桓温府上随便拉人一起喝酒。年轻人跑得快，最后被谢奕抓住陪酒的都是老兵。谢奕就自嘲说：“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东晋人以当兵为耻，谢奕将桓温比作老兵，桓温为人豪放，也不生气，任由谢奕胡闹。谢奕和桓温保持了密切的感情。现在，谢奕突然被破格提拔为与桓温抗衡的藩镇，两人念及感情，依然相安无事。

谢奕在豫州刺史任上只有一年，就死了。谢奕二弟谢据早死，三弟谢安本该出任豫州刺史。可是谢安把机会让给了四弟谢万。

朝廷任命谢万出掌淮南，在世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谢万过于洒脱，狂妄自大，常年不理政事——这是玄学氛围要求的。怎么看他都不像是前线主帅的材料。谢安的好朋友王羲之曾经自问自答：“某人和谢安、谢万相比，谁更好？如果是谢安遇到这个问题，肯定与人为善，说自己不如某人；如果是谢万，则会因为听到这个问题，和某人怒目相争。”王羲之听到谢万的任命后，特地写信给谢万，要他收束情绪，勤勉政事。谢万根本没听进去。

桓温和谢万关系一般，却支持谢万出任豫州刺史，因为他等着谢万犯大错好收拾谢家势力。果然上任第二年，谢万就受命与徐州方向的郗昙兵分两路，北伐前燕。谢万把北伐当作郊游，一路饮酒唱歌，一点端庄办事的样子都没有，更谈不上和将士们同仇敌忾、同甘共苦了。三哥谢安千里迢迢写信劝他说：“你现在是主帅，不是可以任性生活的隐士，应该懂得率军打仗。要多和将领们交流，让大家和你同心协力。”谢万一想，交流不就是吃饭喝酒嘛，于是大摆宴席，招待众

将。宴会开始，谢万自顾自吃喝得很高兴，突然觉得应该说几句话。憋了半天，谢万终于对众将说：“诸位都是劲卒。”他不想想，各位将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叫大家是兵勇，在将领们听来就是讽刺和贬低了。这个饭局目的没达到，反而把部将都得罪光了。

战争开始，徐州方向主将郗昙病倒，率军暂退。谢万误以为友军败了，慌忙下令后撤。豫州军队趁机一哄而散，众将各自组织撤退，结果北伐不战而败，前燕反攻占领了东晋大片土地。晋军喘息稳定后，竟然找不到主帅了。原来谢万逃得最快，早早躲到大后方去了，成为光杆将军。事后追究责任，谢万是罪魁祸首，被废为庶民。

这个处理结果还是给陈郡谢家留了面子的，没要了谢万的性命。然而谢家在淮南 名声坏了，待不下去了，不可能再让谢家子弟出掌淮南军政大权了。陈郡谢家几代人努力的成果，轰然倒塌，付诸流水。谢万真是罪人，挥霍了祖父兄长几代人的奋斗成果。谢家只能从头再来了。

三五、谢安：看我东山再起

陈郡谢家经过谢万的惨痛失败后，一蹶不振。家族能否复兴，天下人都把目光投到了隐居东山的谢家老三谢安的头上。

谢安身上有那个时代搏击政坛的雄厚资本：卓越声望。谢安4岁的时候，桓温的老爸桓彝见到谢安就喜欢不已，赞叹这个孩子“风神秀彻”，日后肯定能扬名立万。（桓彝日后也“扬名立万”了，不过是因为子孙两代都谋逆不轨的缘故。）幼小的谢安能得到大人物的赞扬，立即扬名。谢安还曾拜访过晚年的王导，王大丞相对这个邻家后辈也大为赞赏，结果谢安的名声又上了一个台阶。别人是拼命搏名养望，谢安小小年纪就名扬江左，仕途前景可谓一帆风顺。就在美妙前程即将开启的时候，谢安做出了惊人的选择：隐居东山，纵情山水。

东山在今天的绍兴。当时的绍兴是东晋名人隐士避世的大本营。谢安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同道中人，还参加了名垂千古的兰亭集会。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兰亭，谢安留下了两首诗作：“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契兹言执，寄傲林丘。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殤。”完全是一副醉情山水、与世无争的样子。

两晋南朝的多数隐士，满口玄学，名声很大也不参与政治，实际上是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纸上谈谈虚幻的宇

宙人生还行，真的把内政军事外交摆在他们面前，玄学名气越高可能办事的结果越糟糕。谢安则属于少数稳重而超脱，有能力处理好政务却不愿意从政的人。一次，谢安与王羲之、孙绰等人出海游玩。海上突起大浪，波涛汹涌，船只有倾覆的危险。王羲之和孙绰被吓坏了，风度全无，船头船尾跑来跑去，惊慌失措，抓住人就问怎么办。谢安平静地说，大家再这么慌乱瞎闹，船没被海浪掀翻反而可能被船上的人跑翻了，到时候大家都别想回去了。王羲之等人很惭愧，佩服谢安的沉稳宁静，有条不紊地返航，平安上岸了。有些大名士嘴巴呱呱叫，却经受不了大事考验，比如王衍。谢安则能临危不乱，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真正领悟了玄学虚中有定的真谛。事后，王羲之等人对谢安钦佩不已。王羲之公开说：“安石（谢安字安石）有镇国气度，我们应该举他出仕。”大名士刘惔则说：“如果安石不出山，我们就聚集天下的名士一起来推举他。”于是天下名士高呼：“斯人不出，若苍生何？”仿佛谢安不出来做官，朝廷乱局势必难以收拾。

官场对谢安来说，热情地敞开着大门。问题是官场对谢安狂抛橄榄枝，谢安他就是不接。司徒、亲王、吏部等反复征辟谢安走出东山来当官，更不用说那些当了官的名士来招揽谢安进入幕府了，谢安统统拒绝。朝廷觉得谢安可能是不愿意接受虚职，竟然拿出掌管全国官员考核升迁的吏部郎实职来授予谢安，谢安依然拒绝了。一直到40岁，谢安都在东山中与花鸟鱼虫为伴。朝廷屡次被拒，感到特别没面子，干脆宣布对谢安“禁锢终身”。不想从反面对谢安的声望“火上浇油”，谢安越是隐居不出，人们对他的崇拜和期望就越高。

魏晋多名士，而谢安可能是魏晋名士中最潇洒风流的一位。《晋书·谢安传》说时人比谢安为王导，但是谢安“文雅过之”。两人都能力出众，都沉稳持重，但王导在潇洒超脱和文人气上明显逊于谢安。就连王导的五世孙王俭多年后依然承认：“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一人而已。”

如果说谢安的东山隐居生活是完美的，那就错了。谢安的心中有隐痛。那就是责任之痛。

谢夫人刘氏试探丈夫说，一辈子当隐士也不错。谢安无奈地说，我可能不会一辈子当隐士。因为谢安的心中有强烈的责任感，有对国家社稷的责任，更有对陈郡谢家势力发展的责任。他默默关注着东晋王朝的政治走向和亲戚们的仕途命运。

谢安不想当官，所以把家族的淮南地盘让给了弟弟谢万。但振兴家族的责任感让他一直在幕后辅助谢万，出主意想办法。谢万当吴兴太守时，谢安一度在郡衙里督促弟弟从政。谢万懒散惯了，早上不能及时起床办公。谢安就每天早上叩屏风催弟弟赶紧起床。谢万后来镇守一方，恶性不改。谢安亲自拜访谢万的部将，替弟弟抚慰众人，也拜托他们协助谢万工作。谢万日后狼狈得只剩下光杆司令，部队没有哗变，其中就有谢安在谢万部队中苦心经营的结果。等到谢万被废，谢家势力落入低谷，东晋王朝北伐失败在与北方的对抗中处于下风，谢安看到国事危难，家族衰败，不得不决心告别东山，踏足官场。41岁的时候，谢安在家人的催促和众人的瞩目下，走出了东山。

谢安出仕的时机特别不好。一来，他年过不惑了，别人不好给这么大年纪的“新人”安排位置；二来，朝廷的禁锢令依然生效，一般的官员不敢征辟他为官。巧合的是，依然是野心家桓温给了谢安第一份工作，给了他幕府中的一个小职位。谢安接受了，在一片哗然和嘲笑中接受了。谢安放着之前清闲显要的好官不做，一大把年纪了，来和年轻人抢小职位，怎么能不成为大家的笑柄。谢安默默忍受了嘲笑和不解。他知道闲适的隐居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前方是险恶的政治旋涡，每一个旋涡都可能要了自己甚至家族的性命。玄学视政治为俗务。但真正看透俗世的玄学名士，应该是超越世俗的，一旦操持起俗

务来也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谢安就是真正的玄学名士。

桓温接纳谢安的心态很复杂，有同情，也有帮一把的意思。谢安出山前后，桓温不断抓权，排斥其他世族，渐渐露出了篡位的狐狸尾巴。东晋君臣都对他敬畏三分。谢安在他手下办事，又要寻求仕途发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的做法是站在朝廷一边又不和桓温翻脸，处理好本职工作又不乱掺和事儿，借着桓温这条大船，凭着能力和名声逐步得到提升。

371年桓温废黜司马奕为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帝，并族诛了陈郡殷氏、颍川庾氏两家，操纵了东晋实权，声势如日中天。桓温的做法侵害了其他世族大家的利益。已经跳到朝中为官的谢安坚定地和其他两大世族——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站在一边，反对桓氏篡权，改朝换代。他们拉拢一批中小士族，形成共同抵制桓温的联盟。而谢安也在这个大趋势下，趁机与各个世族大家联姻，壮大本族力量。从此，谢家子女婚嫁基本不出大世族家庭，开始编织盘根错节的权势网络。

司马昱当了不到两年皇帝，也死了。桓温一度授意司马昱立下遗诏，将天下传给自己。谢安赶紧联合王坦之、王彪之等人逼简文帝改写遗诏，将政权传给儿子司马曜。王谢抓紧时间，将生米煮成熟饭，在373年拥戴司马曜即位。司马曜就是孝武帝，之后在位24年，是东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桓温得知即将到手的江山落空了，勃然大怒，率军入京“朝觐”新皇帝。桓温引兵入朝，朝野盛传此来是“诛王谢，移晋鼎”，一日数惊。

东晋朝廷没有力量阻挡桓温的军事威胁，皇上只能下令王坦之、谢安等率领百官到新亭迎接桓温。事前，王坦之手忙脚乱地跑来向谢安问计。谢安也不知道怎么办，也害怕，但平静地说：“大晋存亡，就看这一回啦。”世事本无定论，政事也一样，到时候随机应变吧。

历史上有名的“新亭风波”就此上演。一方是气势汹汹、大兵压境的桓温，一方是王坦之和谢安等朝臣，所争的就是东晋王朝的江山社稷。你把他看成“鸿门宴”也好，看成关羽的“单刀会”也好，反正桓温在新亭摆出了吓人的阵仗，大军环列，刀甲鲜明，官兵们对朝臣怒目而视。更可怕的是，桓温拉起了许多帟帐，不用风吹起帟角，肉眼都能看到帟后密密麻麻的持械武士。朝廷上的王公大臣们平日里威风凛凛，可在武士巨阵面前却威风扫地。文武百官跪拜在道路两旁，甚至连抬头看一眼桓温的勇气都没有。领头的王坦之惊得汗流浹背，紧张得连手板都拿倒了。

朝臣中只有谢安面对层层重兵，用他那带有浓厚口音的“洛阳普通话”像模像样地夸奖了一番桓温的部队。史书上称“洛阳普通话”为“洛生咏”，特点是音质浑厚，很有威慑感，能给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很大的震慑力。震慑冲击波过后，谢安再从容地质问桓温：“有道诸侯训练甲士替朝廷防守四方，现在明公在幕后埋伏武士，唱的又是哪出戏啊？”桓温预想了许多结局，就是没料到谢安会这么直接这么坦然。好在桓温也是名士，心胸也很豁达潇洒，虽然受了谢安当头一棒，立马调整了情绪，撤去了埋伏的武士，客气地接待起谢安来。

桓温也是玄学造诣很深的名士，潇洒得很，现在被谢安的镇静洒脱勾引出了那潇洒脱俗的劲头来，拉着谢安就高谈阔论起来，把其他人都晾在一边。桓温的一生都在追求权力和沉溺玄学之间徘徊，犹豫不决，错过了许多揽权的机会。谢家子弟与桓温明明不是一伙人，却因为风范独特得到了桓温的提携。谢安兄弟的最初舞台都是桓温提供的。如今，桓温又因为谢安的阻挠，放弃了逼宫夺权的计划，和谢安作了一场长谈之后竟然撤军了。

从此，桓温和皇帝宝座永远告别了。而谢安独得大功，几乎成了再造社稷的功臣，更因为临危不惧的名士风范，地位迅速跃升。王坦之原来名望在谢安之上，从新亭回来后声望就落在了谢安之后。

谢安的无畏抵制稳定了东晋王朝的局势，但桓温的野心依然，还在上游做着皇帝梦。撤军后，桓温大病一场，借口生病搬到建康附近的姑孰养病，派人暗示朝廷授他九锡。九锡是皇帝独享的礼器，霸占九锡礼器几乎成了历代权臣篡位前的冲刺动作。随着病情越来越重，桓温求九锡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直接授意文臣袁宏起草加授九锡的诏令。袁宏赶紧写好，按照程序将诏令草稿拿给中枢重臣谢安看，需要谢安的批准。谢安看完，摇摇头，对袁宏说需要修改。袁宏修改后再拿给谢安看。谢安还是不满意，两人单单在程序上就这样往来了几十天，诏令迟迟不能定稿。袁宏也算是一代文豪，后来生气了，不解地问谢安为什么老不满意。谢安默默说了一句：拖着好，拖久了问题就解决了。袁宏一下子就明白了。果然，拖到373年的夏天，桓温没等到诏令就病死了。谢安不动声色，不费力就给东晋王朝扳倒了一大祸患。

司马曜的皇位是谢安等人拥立的，又是谢安巩固的，桓温死后就让谢安取代了相位。谢安顺顺当当地地位极人臣，连带着陈郡谢家不仅收复了政治失地还大获其利，和各大老牌世族相比，大家都不相上下、平起平坐了。史称谢安“东山再起”。

三

谢安是个比桓温更能令人接受的权臣。桓温死后，谢安并没有党同伐异，大开清洗桓家势力之门，而是仿佛没事发生一样。桓温的弟弟桓冲继承了哥哥的荆州地盘。别人提醒他要和谢安争权。桓冲承认自己名望能力都在谢安之下，甘居地方藩镇，没有异心。东晋朝廷在王敦、桓温之乱后一度出现了团结稳定的局面。民俗说：“关中丞相唯王猛，江南万民望谢安。”谢安统治时期相对平稳安定。

桓温死后的10年，东晋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前秦。前秦逐渐强盛起来后，陆陆续续对东晋发动骚扰。东起徐州、西到襄阳，秦

军和晋军小规模战争不断。北方大举初定后，苻坚调整部署，开始将东晋作为下一个重点打击目标。他选中的突破口是荆州北部的襄阳。襄阳扼守汉水和江汉平原的要冲，东吴时期就是长江防线的重要据点。曹魏和东吴就在此长期对峙，东晋自然不敢怠慢，集中重兵派遣名将把守。苻坚想通过进攻襄阳，动摇东晋的长江防线，四两拨千斤。

谢安和桓冲选择的襄阳守将名叫朱序。朱序父亲朱焘曾任东晋的梁州、益州刺史，朱序本人曾长途奔袭、擒拿欲割据蜀地自立的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有出身、有能力、有功绩，官拜征虏将军，镇守襄阳。到任之后，朱序学起了名士风度，喝酒下棋，对防务放任不管。他认为襄阳有汉水天险和坚固的城池在，固若金汤。即使太元三年（378年）年初，种种迹象都表明前秦将大兵压境了，朱序还是不慌不忙地和名士文人们交游唱和。

朱序的老母亲韩氏，久随丈夫和儿子经历疆场，粗通军事且居安思危。她听到军情警报，见儿子无动于衷，就亲自带着仆妇下人巡视襄阳城墙。她发现襄阳西北角城墙已经倾圮，墙砖松脱，外墙上杂草丛生，心急如焚，想迅速修复。可惜人手不够，韩氏就派几个管家去城中晓以大义，招募妇女修城。城中百姓一来担心前秦军队杀掠，二来为韩氏的精神所感动，纷纷效力修城。有近2000妇女响应韩氏号召，应募前来。韩氏就带着她们在原来西北角城墙的内侧重筑一道斜城。这段城墙20余丈长，与旧的西北角城墙成三角形。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襄阳“夫人城”。

那一边，378年新年刚过，前秦苻坚即以儿子苻丕为统帅，率领降将慕容垂、姚萇等人和10万秦军南下，直冲襄阳而去。秦军为得胜之师，人多势众，一路上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地。朱序对汉江天险盲目信任，没有在江边设防，秦军精锐骑兵游马渡江，直逼襄阳城下，大军陆续渡过江来，将襄阳城围得水泄不通。朱序这时慌忙调军守城。襄阳危急。

秦军开始攻城，年久失修的西北角最先被攻破。苻丕高兴地督促兵士突入城区，却发现前面有一座崭新的斜城矗立在面前。城墙上滚木炮石火把，倾斜下来，秦兵猝不及防，人仰马翻，败退而去。襄阳军民同仇敌忾，挡住了10万秦军的猛攻。谢安接到边警，派荆州的桓冲率领7万大军增援襄阳。桓冲和荆州各将害怕秦军，只敢在战场之外“声援”襄阳，不敢真正上前与秦军鏖战。襄阳孤城，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坚守了将近一年时间。

苻丕统率大军困于襄阳城下，劳师动众，遭到了内部的反对。前秦御史中丞李柔上表苻坚，要求将苻丕按军法从事。苻坚迫于压力，派使者到前线重责苻丕，同时赐剑一把，严令第二年春天如果再不攻克襄阳，就让苻丕等人以剑自裁。苻丕和慕容垂、姚萇等人在重压之下，督率秦军加紧围攻襄阳。朱序和军民们陷入了绝境，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连379年的春节都是在生与死的厮杀中度过的。三月，襄阳城的北门突然大开，朱序手下的督护李伯护失去信心，叛国投敌，开城引秦军杀入城中。朱序被秦兵活捉，母亲韩氏不知所终。苻坚接到捷报，下令杀了投降的李伯护，却很欣赏朱序，不仅赦免了他，还任命朱序为尚书。苻坚向来宽厚，对欣赏的人不论出身和历史背景，一概予以重用。

襄阳失守，东晋的防御形势出现了一个缺口。前秦忙于内部整肃，暂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谢安尽量将襄阳失守的影响降到最低点，既没有大肆宣扬，也没有在国内整军备战。南北之间出现了大战之前的片刻沉默。

三六、淝水之战其实是场心理战



苻坚登基后一直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随着前秦的强大，统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逐个削平群雄后，苻坚的敌人只剩下南方的东晋了。

382年，苻坚召见群臣，专门讨论南征东晋的问题。苻坚的态度很明确：“朕继承大位将近三十年了。四方大致平定，只有东南一角还在大秦治理之外。大秦有雄兵百万，朕准备御驾亲征。”话题一挑开，后秦朝野就炸开了锅。除了少数几个人附和，多数大臣都反对伐晋。事情久议不决，耽搁下来了。怀有二心的前燕宗室慕容垂和羌族将军姚萇希望苻坚伐晋失败，以便自己有机可乘谋求复国，所以竭力怂恿苻坚南伐。他们请求苻坚“圣心独断”。苻坚真的甩开大臣，只留弟弟苻融商量要不要出兵。不想，苻融明确反对伐晋。他举出了伐晋的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东晋毕竟是天下正朔；二是东晋内部基本平稳，无隙可乘；三是后秦征战多年，士卒疲惫，百姓厌战。要命的是鲜卑、羌、羯等被征服的民族并未诚心臣服，可能会趁后秦大兵南征造反。然而，苻坚听不进去。苻融就搬出王猛来，劝谏道：“难道丞相王猛的临终遗言忘记了吗？”王猛临终告诫苻坚不要贪图东晋，可惜现在苻坚满脑子都是统一天下，把王猛的遗言放到了一边。爱妾张夫人、太子苻宏也劝苻坚不要伐晋，苻坚都听不进去。苻坚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之前的历次征战他都没有输过，如今兵强马壮，明显强过东晋，为什么不能南征呢？

东晋太元八年（383年）七月，苻坚下诏大举攻晋。同时，他自

信满满地在诏书中提前封赏东晋君臣，封孝武帝司马曜为尚书左仆射，封丞相谢安为吏部尚书，封荆州的桓冲为侍中。苻坚乐观地认为东晋君臣投降的日子“势还不远”，所以体贴地在长安开始为三人建造府邸了。为了组织大军，高门富豪子弟和精通武艺的青壮年都被授以羽林郎，一共得到了3万多名军官。这批军官指挥的是苻坚从北方逢十抽一强征来的平民。北方各郡县可遭了殃了，不仅被抽走了十分之一的劳力，公私马匹也全部充公，还要承担前线的粮秣供给。最后，苻坚一共组织了97万人的大军，狂傲地宣称只要大军将马鞭投江，就能阻断长江流水了。

这么庞大的军队，根本集结不起来。苻坚将他们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四川、荆州和淮南三个方向进攻。后秦的主力集中在淮南方向，由苻融率25万人为前锋，苻坚亲率大军断后。秦军进军像苻坚预料的一样顺利，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渡过了淮河，顺利攻占了淮南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苻坚大喜，亲自来到前锋，和苻融会合。秦军前锋在寿阳打得轰轰烈烈的时候，秦军的大部队还在陆续从长安、洛阳等后方城池动身出发。

前秦百万大军攻过淮河，东晋危矣！建康全城震动，百姓惊恐不安。东晋王朝文恬武嬉，时间久了，早丧失了勇气。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谢安。孝武帝任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全权负责抵抗救国。

谢安也不知道如何抵抗前秦大军，但他知道临危不惧、坦然应对的道理。平静应对总比惊慌失措要好。侄子谢玄已经被安排在前线统兵了，谢安再给谢玄加了“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作为前锋抵挡敌人进攻的步伐。谢安又任命弟弟、征虏将军谢石，儿子、辅国将军谢琰等率领大军与他会合。晋军总兵力为8万人。除此之外，谢安没有进一步举动。

丞相如此作为，显然不能安抚建康的人心，除了个别人自欺欺人说谢丞相肯定胸有成竹，其他人都相信东晋王朝要完蛋了。荆州的桓

冲实在看不下去，挑选了3000精锐派往京城，交给谢安调遣，以备安排朝廷逃跑。谢安谢绝了，说国家存亡不在于几千士兵，倒是荆州是上游重镇，更需要精兵加强防守。谢安还给桓冲传话说，一切他自有安排，桓冲好好守住长江中游就可以了。桓冲急得对幕僚叹道：“谢安一介文人宰相，没有大将之才，他尽派些没有经过风浪的年轻子弟抵御强敌。这下可好，我辈都将陷入敌手了！”就连被任命为前线主将的侄子谢玄，也心虚得很，跑回来问谢安怎么办。谢安一如既往的坦然，平静地说：“到时候会有旨意的。”谢玄不敢再问，托部下张玄来找谢安询问怎么办。谢安也不回答，带着张玄来到别墅。别墅里亲朋毕集，谢安拉着张玄下围棋，谢安的棋技比张玄要差，但当天张玄心里恐惧，竟然输给了谢安。

史载谢安在大战中只是“指授将帅，各当其任”而已。事实上，毫无军事经验的谢安这么做是正确的，总比既不懂也要瞎指挥强。这符合他“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的一贯执政思路。淝水之战前后，谢安频繁在公众面前出现，甚至连夜游玩，装出一切如常的样子。东晋的各个世族为了切身利益，暂时放弃了争斗，团结起来一直对外了。时间久了，东晋的人心竟然稳定了下来，官民都屏气凝神地关注着前线战事。

二

谢安的希望都寄托在前线的侄子谢玄身上了。谢安最看好这个侄子，将家族的兴盛传承都寄托在谢玄身上了。

谢玄小时候一副娇贵美男子的模样，喜欢衣着华丽，腰上别着别致的丝巾，手里拿着漂亮的紫罗香囊把玩。谢安很担心谢玄的成长，就把他叫到面前来说，伯伯和你打赌玩，好不好？谢玄欣然答应，几下就中了谢安的套子，输了。谢安说，我要拿走你的紫罗香囊作为赌注。谢玄满不在乎地将香囊给了伯伯，谢安赢到香囊，看了一下就

轻轻扔到火炉里烧掉了。小谢玄看到眼里，心里明白叔叔不赞成自己的纨绔作风，下决心痛改前非。有一次，谢安问子侄们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其他人的回答大同小异，无非是说要学好，做有能力有道德有声望的人。只有谢玄仔细思考后回答说要像“芝兰玉树”一样自由茁壮地成长，庇护一家门庭！谢安很欣赏谢玄的回答，认为他有独立的思想 and 强烈的责任感。

谢玄进入仕途之时，东晋王朝面临前秦侵寇，朝廷寻求良将镇御北方。谢安就推举谢玄出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去前线打仗。中书郎郗超平日里和谢玄的关系不好，听到任命后叹息说：“谢安举贤不避亲，看来是看好谢玄的能力。谢玄这次去必定不负推举，有一番作为。”其他的人都不以为然，觉得富贵人家的英俊公子谢玄去前线，能镀镀金就不错了，不会有所作为。

谢安不顾非议，坚持重用侄子谢玄，谢玄也不负重托。江北的京口、广陵是北方南渡流民的集中地。这些流民在南方生活并不如意，对北方政权有着刻骨的仇恨，战斗力强。谢玄就挑选流民中的骁勇之士组建部队。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牢之等人勇敢又有胆略，纷纷投军。谢玄就以刘牢之为参军，训练了一支精锐部队。他率部队多次阻拦了前秦对彭城等地的骚扰，战无不捷，威震敌胆。东晋称京口、广陵等地为“北府”，所以谢玄的部队得名“北府兵”。这支部队逐渐成为了东晋王朝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刘牢之、刘裕等人在其中扛枪打仗，逐步崛起。尤其是刘裕，原本是一个在赌场输得一无所有的赌徒，走投无路当了兵，竟然靠着军功一步步掌握军队，最后推翻了东晋王朝建立了宋朝。谢玄可谓是刘裕的政治恩人。而北府兵随着形势发展逐渐摆脱谢家势力的影响，成为左右南朝政局的独立力量，呼风唤雨近百年，也完全超乎了谢安、谢玄等人的预料之外。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组建初期，北府兵还是服从朝廷的精兵。当时普遍认为南方军队柔弱，无法与北方少数民族铁骑对阵。后来南北大战，一代枭雄苻

坚远远看到北府兵的阵势就对左右北方将领说：“谁说南方没有劲旅，我看对面就有一支强敌。”

接受抵抗前秦百万大军的重任后，谢玄明白王朝的命运和家族的命运都在此一搏，没有退路了。前秦军队正长驱直入，谢玄冷静抓住前秦军队盘子太大，全面出击，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步伐的弱点，集中北府兵精锐5000人交由将领刘牢之率领北上。目的是抓住秦军的弱点予以痛击，争取有所斩获。前秦梁成的部队前突到淮河南边、寿阳东边的洛涧，呈现孤军之势。刘牢之猛攻梁成的部队，梁成猝不及防，在交战中被杀。秦军步骑争相后撤，结果在淮河边争抢着渡河，乱成一团。刘牢之纵兵扫荡，生擒敌将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东晋开战大捷，谢石下令水陆并进，暂时遏止了秦军推进的势头。

前秦虽败，但依然掌握着战场优势。苻坚亲自来寿阳，大军在淝水（淮河的一条支流，在今安徽寿县东南）北岸安营扎寨，对南岸的东晋部队虎视眈眈。这一天，苻坚站在寿阳城头，望见郊外的晋军“部陈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开始意识到南征的决策可能草率了一点，心中隐约泛起忧虑来。

苻坚想充分利用本军的优势，不战屈人之兵。他派随军的东晋降将朱序去游说谢玄，企图说动谢玄投降秦军。苻坚对朱序盲目信任，不想朱序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正想找个机会报效故国呢，见到谢玄非但没有劝降，反而把前秦军队的弱点和盘托出。前秦大军号称百万，但真正效忠苻坚的氏族部队比例很小，而且大部队还没有到达前线。针对前秦虽然兵强马壮，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朱序建议谢石、谢玄等人：“等到百万秦军都到达前线，要想战胜他们就很困难了。等秦军尚未集结完毕，宜在速战。如果能够打败秦军的前锋，可能会撼动大举。”谢玄等人赞同朱序的判断，只要给予前秦军队一次重创，就可能激发矛盾引发内讧，打倒这只纸老虎。

于是，谢玄主动向前秦下战书，说：“你们远涉我国国境，却临水

为阵，明摆着 不想速战速决。现在，请你们稍微向后撤退，让我军将士有渡河周转回旋的地方。到时，我要和你们一见高下！”前秦将领认为不应该撤军让东晋军队渡河，我众彼寡，迟早会把谢玄等人拖死。苻坚则乐观地认为：“我们暂且退军，让敌人渡河。等他们还没列好阵势，我们的数十万铁骑就突然杀过去，把敌人逼进淝水里杀死，不是更好吗？”苻融附和哥哥的意见，赞同趁晋军渡河过半的时候进行突袭。

第二天，晋军如约开始渡河。苻融就组织部队后撤。前秦大军的人心本来就是散的，队伍很不好带。上头说是战术性撤退，下级却一下子相信前锋部队失败了。更有甚者，后面的部队见前面尘土飞扬，纷纷后撤，巴不得早点回家的降卒和壮丁们想当然地以为失败了，扭头就跑。回到秦军营中的朱序趁机大喊：“打败了，我们打败了！”军心瞬间涣散，各怀鬼胎的将领们纷纷拉起队伍逃跑。后方大军还在源源不断向前行军，前方大军突然向后涌，挤成一团，乱成一锅粥。苻坚、苻融等人根本制止不了。谢玄压根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好事，率精锐8000强渡淝水，也不列阵了，追着前秦败军的部队就猛杀猛砍。前秦百万大军奇迹般地一败涂地。

苻融被乱军杀死，苻坚中了流矢，仓皇北逃。他曾自负地相信能投鞭断江，现在前秦大军自相踩踏溺水而死的尸体真的堵塞了淝水，淝水因此断流多时。逃跑的路上，前秦大军丢盔弃甲，日夜逃命，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东晋追兵来了，结果沿途又饿死冻死了十分之七八的官兵。史称“淝水之战”。

此战，东晋取得了辉煌胜利，杀敌数十万人，缴获仪服、器械、军资、珍宝等堆积如山，其中包括苻坚的座车，另有牛马、驴骡、骆驼10万余头。谢玄战后乘胜开拓中原，基本收复了黄河南岸地区，带动四川、汉中等地投降东晋。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军还一度逼近黄河以北的邺城。前线晋军快马向谢安报捷，谢安正在和客人下围棋，看完捷报平静放到床上，面不改色继续下棋，倒是客人问是怎么回事，谢

安慢慢回答：“晚辈们在前方打败了贼军而已。”坚持下完棋，谢安回到内室，终于抑制不住狂喜的心情，过门槛的时候连鞋被碰坏了都没有发觉。这实在是一场赢得过于蹊跷、过于辉煌的胜利。司马曜因为任内的这一胜战而得名“武帝”。

三

在淝水大战中，8万晋军大败前秦百万大军，不仅使国家转危为安，而且促使前秦崩溃，北方大乱。局势朝着有利于南方的方向发展。东晋朝廷表彰功臣，封谢安为庐陵郡公，谢石为南康公，谢玄为康乐公，谢琰为望蔡公。陈郡谢家一门四公，从此尊贵无比，成为东晋顶尖的名门望族。

家族势力太昌盛了，迅速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司马曜很担心谢安成为第二个桓温。皇弟司马道子开始揽权。谢安修身那么多年，很清楚盛极而衰、月盈则亏的道理，刚好东晋乘胜收复失地前方事务繁重，谢安就在385年主动要求离京出镇广陵，以督促前线为名行避祸之实。在广陵，谢安生病了，只好申请回京养病。朝廷高规格地派遣侍中慰劳。夏末，谢安在建康病逝，享年66岁，得以善终。死后极尽哀荣，朝廷追赐太傅，史称谢安“谢太傅”。千年之后，北宋宰相、大文豪王安石登会稽东山，还因为自己的名（安石）和谢安的字（安石）相同而沾沾自喜。

在前线主持战事的谢玄堪称南朝第一功臣。朝廷专门遣殿中将军慰劳谢玄，升他为前将军、假节，赐钱百万彩千匹。只可惜，长期的奔波行军和风餐露宿的作战极大损害了谢玄的身体。淝水大捷后，谢玄的身体每况愈下。朝廷调任他为左将军、会稽内史，让他去气候温良的绍兴地区养病。谢家从此丧失了北府军的控制权。第二年，谢玄病死在会稽，终年45岁。朝廷追封谢玄为车骑将军，谥号“献武”。

淝水之战后封公的谢琰是谢安的儿子。淝水大战让谢琰染上了骄傲狂妄的毛病。孙恩在浙东大起义，朝廷派遣徐州刺史谢琰前往镇压。史载谢琰到浙东后，无绥抚之能，又不整军备战。部将进谏说强贼就在海边，不能松懈，应该做好准备。谢琰不以为然，说苻坚百万大军都在淮南被我们谢家人给打败了，何况孙恩那样只会骚扰海边的流寇。400年，孙恩趁谢琰不作防备集中军队偷袭，谢琰兵败逃亡，被部下杀害。儿子谢肇和谢峻同时遇害。谢琰的小儿子谢混从小就有美誉，但走的是文学路线，善于写诗。谢混的诗歌清新浅显，不流俗，对东晋诗风的转移有一定影响。谢混历任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多少延续了祖父的地位，不幸的是他卷入了东晋末年的政治旋涡。谢混与大将军刘毅关系密切，而刘毅偏偏在与权臣刘裕的党争中失败。东晋末期谢混被准备篡位的刘裕杀害。谢混的死与社会大环境变迁有关，留待后文细说。

朱序在淝水之战后返回东晋，被朝廷安置在中原前线，长期参与对胡族政权的作战，10年后病逝。

三七、复国是永恒的目标

淝水之战后，苻坚仓皇而逃，前秦主力尽失。这就为慕容家族的复国梦想提供了可能。

慕容垂在淝水之战前，在前秦的处境非常好。他虽然是前燕的皇族，却不是俘虏，而是主动投靠的人才。苻坚很看好慕容垂，慕容垂又在灭亡前燕的战争中立了大功，所以淝水之战前慕容垂担任冠军将军，指挥军队，算是掌握着实权。淝水之战动议之时，以慕容垂的眼光和智慧，很可能看到了前秦尚未具有灭亡东晋的实力，可是他热情支持苻坚的南征计划，其中不能说慕容垂没有自私的想法。淝水之战中，慕容垂率本部兵马3万人随军南征，幸运的是他的部队还没上前线，秦军就在淝水一战中惨败了。我们有理由猜测，慕容垂可能是在故意拖延避战，观望以保存实力。

原先被前秦消灭的各个割据政权的皇族纷纷揭竿而起，图谋恢复自家王朝。受到厚待的慕容家族原本就念念不忘复国，自然加入了华北重燃的狼烟——后人时常据此批判慕容家族忘恩负义，满肚子的狼子野心。我们看慕容家族，最有希望扛起复国大旗的就是掌握军队的慕容垂。

复兴鲜卑王朝的曙光照耀在了慕容垂的身上。慕容垂的军队在淝水之战中保存实力，是战后前秦国内唯一完整的部队。战败的光杆皇帝苻坚跑到了慕容垂军中避难。是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杀了苻

坚取而代，还是礼送出境，光明正大地一决雌雄呢？当时聚拢在慕容垂周围的一帮前燕旧臣都劝慕容垂立大功者不顾小节，乘机取代前秦。

慕容垂的作为光明磊落，充满帝王气度。他回顾了自己落难前燕时，无所置身，苻坚盛情款待，授权给兵的恩德。前秦实权人物王猛曾力劝苻坚杀掉慕容垂（因为王猛觉得慕容垂有帝王之相，是前秦的大敌），苻坚仍然以国士之礼厚待他。“此恩何可忘也！”慕容垂慷慨陈词说服众人，将军队指挥权交给苻坚，一路护驾他返回长安。

到长安边的浍池，慕容垂请求苻坚允许自己到华北去安抚“轻相煽动”的百姓。华北是前燕旧地，慕容垂的意图也很明显，但苻坚爽快地答应了。谋士权翼力劝苻坚不可，苻坚重诺言，虽然觉得有理也没有收回成命。权翼无奈，私自在黄河桥边设下埋伏，打算袭击慕容垂。慕容垂早有提防，在无人处偷渡黄河，逃过了一劫。慕容垂在乱中独身东出河南，聚拢鲜卑旧部，招兵买马，部队一下子发展到20万。384年，慕容垂在河南荥阳称燕王，标志着鲜卑族复国成功。两年后，他自立为帝，定都河北中山。鲜卑垂建立的王朝史称“后燕”，以别曾经驱逐他的前燕。

此时，爱情失意、生活坎坷、历经磨难的慕容垂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他建立的后燕政权在此后10多年里牢固占据关东地区，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后燕与西边的后秦政权东西对峙，历史回复到了之前秦燕对峙的局面。

二

前燕灭亡后，作为皇帝的慕容暉和弟弟慕容泓、慕容冲被带往长安，受到优待。苻坚见前燕清河公主肤白漂亮，娶她为妃，又见慕容冲年少帅气，把他召进宫来充作变童。他和慕容冲姐弟朝夕相处，同

床共枕。慕容冲姐弟共事苻坚，引得长安城中百姓唱道：“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王猛觉得不成体统，极力进谏。苻坚虚心纳谏，将慕容冲遣送出宫，等他大了以后又任命为平阳太守。

慕容暉、慕容泓、慕容冲三兄弟都满怀先辈创业复国的激情，对苻坚伪装应付，伺机而动。前秦兵败后，慕容泓率先招揽鲜卑部众，扯起了反旗。慕容冲也起兵投奔慕容泓。兄弟俩很快聚拢了数万人，与前秦残部在关中展开血战。

慕容泓遣使苻坚，要求“分王天下”。苻坚大怒，叫来慕容暉责问。慕容暉叩头至流血，哀求恕罪。苻坚赦免了他。转身，慕容暉就暗中派人到慕容泓那，支持弟弟复国，还告诉慕容泓：“一旦听到我的死讯，你就继位接着干。”看来，慕容暉还把自己当皇帝看呢。前燕灭亡后，大批鲜卑人被迁徙到关中。关中的鲜卑人思念复国，支持慕容暉、慕容泓、慕容冲三兄弟。应该说慕容泓和慕容冲的复国起点比慕容垂要高得多，可惜他们在复国途中继续将内讧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慕容泓不久在部下骚乱中遇害，而慕容冲就是幕后黑手。之后，慕容冲整合关中的鲜卑势力，复用燕国旗帜，史称“西燕”。西燕建国后的主要目标就是进攻长安，俘虏苻坚。

苻坚困守长安，悲伤于慕容家族背信弃义，把慕容暉叫到跟前大骂：“你们家族 兄弟子侄布列上将，当时虽称是灭国，其实我待你们像归家一样。现在慕容垂、慕容冲、慕容泓各个称兵，你们家族真是人面兽心，枉亏我以国士待你们。”慕容暉伏地涕泣，表白忠心。苻坚宽厚惯了，将慕容暉叫来责备就表示他没有杀心。慕容暉总算蒙混过关了。苻坚又派人送了一件锦袍给慕容冲，希望慕容冲念及过去的恩情（床第之情）。当年，苻坚和慕容冲姐弟同床共枕，在他看来是恩情，在慕容冲看来却是耻辱。因此，慕容冲答道：“我以天下为任，怎能受这一袍小惠！如果苻坚束手就擒，我对待苻家不会比他当年待我们家差。”苻坚闻报，后悔不及：“悔不用王猛和苻融之言，使白虎敢猖狂如此！”（鲜卑人皮肤白皙，苻坚因此呼之为“白虎”。）

长安城里，慕容暉时刻不闲，以儿子成婚为名邀请苻坚参加。苻坚答应了。术士王嘉认为慕容暉杀苻坚的计划不会成功，预测“会天大雨，不得杀羊”。当夜，长安果然大雨磅礴。苻坚因此察觉慕容暉的阴谋，这才下了杀心，杀了慕容暉父子及其宗族。长安城内残存的数千鲜卑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被斩除。苻坚厚待亡国宗室却遭背叛，成了后代帝王不断提及的教训，也导致了后代亡国宗室罕有保全性命者。

城外，慕容冲率军猛攻长安。苻坚不敌，留下太子苻宏守长安，自己率部逃往五将山，结果被后秦姚萇所杀。苻宏最后弃城而逃投降东晋。慕容冲杀进长安，进行屠城作为报复。占领关中后，慕容冲计划以长安为都城，长期经营。但鲜卑部众都希望迁回河北、辽东老家，反对留居关中。慕容冲旋即在兵变中被杀。西燕帝国的40万军民大举东归。途中，内乱频仍，慕容永最终夺取政权。因为慕容垂已在东方建立了后燕帝国，慕容永不敢再往东走，就转向北边，占据了山西南部一带。

第二年，慕容垂以势不两立之势对西燕发动进攻。394年，西燕都城长子城被攻破，慕容永被杀，西燕灭亡。西燕融入了后燕。

慕容鲜卑经过这么多的变故，原本有限的实力逐渐不能支撑一个统治整个中国北部的庞大帝国。后燕帝国随即遭遇到了同种同源的辽西鲜卑拓跋部的挑战。

拓跋鲜卑占据后燕的西北方向，对慕容垂形成压迫态势。“大燕国”的实力在历次争斗中严重透支了，只能兵出险招，寄希望于取得一场对拓跋部的主力决战的胜利。暮年的慕容垂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重创拓跋部落，也希望即将继位的太子慕容宝能够一战立威。395年，他以慕容宝为元帅，率大兵攻魏。拓跋部的杰出领袖拓跋珪故意示弱，拓跋部众赶着牲畜牛羊渡过黄河西迁一千多里，佯装远逃他乡，实则诱敌深入。慕容宝迫切要扬名立威，跟随拓跋部西进，追至河套地区。在这里，后燕大军渡河为暴风所阻，和拓跋部隔河对峙。

拓跋珪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慕容宝的后方，截断了后燕大军与朝廷的联系。几个月来，慕容宝都得不到国都中山的消息。他出发时，父皇慕容垂已染病在床，如今连父皇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心里焦急。在古代，太子不知道父皇的生死，是很危险的事情，搞不好皇位就被人夺去了，甚至还有性命危险。拓跋珪就利用慕容宝的这个心理，逼被俘的后燕往来使者隔河叫喊：“慕容垂已死，你们还不早点回去！”后燕大军不辨真伪，士气大为衰退。慕容宝决定退兵，退兵前他烧毁了黄河沿岸所有的船只，以为这样就能够阻止拓跋部主力的追击。谁知，到十一月初天气严寒，黄河结了厚厚的坚冰，拓跋珪率精锐骑兵从容过河，追击燕军。后燕大军在岱海（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被拓跋部追上。拓跋珪选择凌晨后燕大军毫无准备的时候发动突袭，大破后燕军队。燕军官兵惊慌失措，四窜逃跑，自相践踏而死就有上万人，还有四五万人束手就擒。慕容宝仅以身免。拓跋珪把被俘的四五万燕军全部被活埋。

次年（396年）初春，已是71岁的慕容垂进行了人生的最后一战。他御驾亲征，征调残余的燕国军队，组成西征复仇的重兵。燕军旗开得胜，慕容垂阵斩拓跋勇将拓跋虔。拓跋珪这回真的是避其主力，坚壁清野，不与燕军作战。慕容垂最后掳掠拓跋部3万余户东归。后燕大军过参合坡时，见去年燕兵尸骨堆积如山，全军哭声震天。慕容垂气恨难当，呕血病倒，死于撤军途中。他一死，后燕失去了主心骨，迅速衰败。拓跋鲜卑开始步步紧逼。

慕容垂死后，拓跋珪频繁组织反攻，最后将后燕重镇中山和邺城包围。继位的慕容宝打不过，只好放弃了都城中山，打算逃回祖宗龙兴的辽东龙城（今辽宁朝阳），退守祖宗故地。拓跋部攻占河北各地，后燕被截为南北两部分。留守南边邺城的是皇叔、慕容垂的弟弟慕容德。慕容德坚持了半年后，选择了率领城中的4万户鲜卑人突围南逃。慕容德来到河南徙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自称燕王，史称南燕。第二年，拓跋部紧随而来，滑台失守。慕容德又辗转夺取了青兖

两州，入据广固，400年称皇帝，建立了南燕帝国。这是第四个燕国。

5年后，年老的慕容德也死在了异乡，死前指定由逃难而来的侄子慕容超继位。慕容超的早前经历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在乱世中随波逐流、颠沛流离的经历，流过浪、要过饭、做过奴婢。当他逃到南燕的时候，叔叔慕容德喜出望外。慕容家族经过这么多的变故，嫡系的皇族不多了。慕容超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君主。可惜一个没有经过血与火洗礼的慕容贵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来得过于容易的富贵让慕容超迅速迷失了自己。他不修内政，喜好游猎，还诛杀功臣，为了满足享受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增加赋役，很快使南燕陷入内忧外患交困的境地。409年东晋刘裕率师北伐，次年2月就攻下广固，将城池夷为平地。慕容超被俘杀，南燕灭亡。

慕容德叔侄能以区区逃难的4万民户，在异乡延续燕朝国祚，也难能可贵。

说完南边，再说说北逃的慕容宝。他在返回祖居辽东的途中，长子慕容会阴谋叛乱夺位。慕容宝诛杀了长子，不久却被他的亲家杀死。另一个儿子慕容盛杀死岳父，报了杀父之仇，自立为后燕主，返回旧都龙城。3年后慕容盛也被手下杀死。这时慕容宝的幼弟慕容熙即位。这位慕容熙也是内政不修的昏君，行事荒唐。407年，被他迫害的将领冯跋潜入龙城，攻杀慕容熙，后燕亡。

冯跋是胡化的汉人，出生在河北。他的父亲冯安曾任西燕将军。西燕亡，冯跋随家人东迁到后燕，于后燕帝慕容宝在位时被任命为禁卫军将领。冯跋和弟弟冯弘曾因小事获罪于慕容熙。慕容熙有杀冯跋兄弟之意，冯跋兄弟只好逃匿深山。后来，慕容熙的皇后死了，慕容熙举办了盛大的葬礼来表达自己的哀伤。结果在葬礼中，慕容熙被潜入龙城的冯跋兄弟杀死。冯跋推出慕容家的养子、实际上是高句丽人的高云为燕王，改元正始。这就是燕朝系列的最后一个国家：北燕。

北燕的疆域以辽东为主，在强盛时期曾经拥有河北东北部。

高云作为傀儡，任命冯跋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武昌公，把军国大事全都托付给冯跋兄弟处理，自己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享福。谁想福没享好，高云自己被宠臣离班、桃仁砍了脑袋。冯跋一看这事情给闹的，平定叛乱后，干脆自己从幕后走向幕前，在众人的推举下即天王位，改元太平。

冯氏的王朝继续沿用“大燕”的旗号，但已经不是慕容家的故国了。冯跋是个不错的君主，他勤于政事，革除后燕苛政，奖励农桑，轻薄徭役，因此国家安定。虽然当时外有拓跋部建立的强大的北魏相侵，北燕依然维持了22年的安定。除以州郡治民之外，北燕还以太子领大单于，置前后左右四辅，推行胡、汉分治政策。冯跋、冯弘都曾派遣使者到江南。当时的南朝称北燕为“黄龙国”。

北燕太平二十二年（430年），冯跋病重，命太子冯翼摄理国家大事。不想，冯氏的燕国也走到了内讧的边缘。冯跋的宋夫人在冯跋病重期间，图谋立自己的儿子为新君。宋夫人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可能还调动了军队，反正把动静闹得挺大的。皇弟冯弘不愿意了，率领军队进宫平变。冯跋在惊惧中去世，冯弘即位。经过这么一闹，北燕最后的国运也消失了。强大的北魏连年进攻，采取掠夺北燕民户的蚕食政策。北燕的地盘越来越小，冯弘不得不转而依靠高句丽的保护。436年4月，北魏发动灭亡北燕之战。5月，冯弘在高句丽军队保护下率龙城百姓东渡辽水，投奔高句丽。北魏占领龙城，北燕亡。

自337年起至410年止，兴起辽东的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五个燕国，纵横疆场70余年。其中最可贵、最让人难忘的无疑是整个家族对王王国祚延续的执著坚持和顽强追求。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就以慕容家族的历史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口口声声“兴复大燕”的姑苏慕容家族。许多读者也将“慕容”和“复国”紧密联系了起来。

三八、该后秦上场了

—

乱世和枭雄是一对孪生兄弟。乱世出枭雄，野心勃勃的强权人物总认为时局越乱越好。淝水之战后，前秦元气丧失、矛盾迭起，北方很快回归了分裂状态，又涌起了一批枭雄霸主。许多割据政权在前秦的废墟上建国，除了慕容家族的燕国外，最主要的就是后秦了。

我们知道，前秦是由从关中迁徙到关东的氏族一部建立的。话说当年后赵从关中除了迁徙氏族人充实关东外，还迁徙了陇西羌族。羌族首领姚弋仲率部东徙，在石虎时期参与了镇压反赵起义。后赵亡，这支羌族人为了避免东方迭起的战乱，南下投降了东晋。姚弋仲在战乱中死后，儿子姚襄带领其众。东晋用他们来镇守淮河，防备北方胡族。姚襄就在淮南招集流亡，屯兵储粮，引起了东晋的猜疑。姚襄最终叛晋，西进企图谋取关中。他不幸赶上了蒸蒸日上的前秦势力，在与苻坚的战争中被擒斩。其弟姚萇率羌族余部投降了前秦。

姚萇的这支羌族力量就算是融入了前秦阵营，苻坚依然任命姚萇统领部族，参与了在西北、四川和襄阳的一系列的战斗。淝水之战时，苻坚任命姚萇为龙骧将军，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并勉励姚萇说：“龙骧将军是朕登基前的官职，从来不轻易授予他人，卿其勉之！”始终怀有二心的姚萇果然接受苻坚的勉励，一心在这个职位上“追求进步”。

淝水之战败后的第二年（384年），前秦爆发内乱。先是慕容家

族起兵。苻坚派儿子苻觚率军5万讨伐慕容泓，姚萔为司马辅助他。战前，姚萔说：“鲜卑人一心回到东方故乡去，我们可以因势利导驱逐他们出关中，不可以当面迎战。鼯鼠的尾巴被人抓住了，还能反噬他人，更何况是一心夺路回乡的大军了。”他建议秦军在慕容鲜卑的后面鸣鼓追击，任由鲜卑人退出关外。应该说，姚萔的建议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可惜苻觚好大喜功，一心追求所谓的战功，领兵截击，结果败死。皇子阵亡，姚萔害怕了，派人向苻坚谢罪。苻坚盛怒之下，杀了姚萔的使者。姚萔更害怕了，逃奔渭北。当地北地、新平、安定10余万户羌人推举姚萔为领袖，在乱世中求生存图强盛。姚萔也走上了叛乱的道路。

当时慕容垂在关东叛乱，慕容泓、慕容冲等人在关中与苻坚相攻。姚萔的势力最弱，采取了韬光养晦、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他遣使与慕容冲求和，把儿子姚崇送去当人质，换取鲜卑族和羌族的和睦共处。姚萔趁机攻占北地，厉兵积粟，以观时变。

苻坚对姚萔的叛乱很愤怒，当年夏天亲自率领步骑两万进攻姚萔。苻坚打败了姚萔，还截断了羌族人的运水之路。姚萔军中都有人渴死了，情况非常危急。关键时刻，天降大雨，羌族军营中积水三尺，军心大振。当时苻坚刚要进食，看到大雨无心再吃，谈道：“天其无心，何故降泽贼营！”恰好慕容冲乘虚进逼长安，苻坚便放过姚萔，撤守长安去了。姚萔听到慕容冲攻长安，和部众讨论发展战略。部下都认为应该南下占领关中核心地区。姚萔却认为苻坚和慕容冲正在南边打得不可开交，南下不是好时机。他预测前秦将被慕容鲜卑打败，而慕容鲜卑迟早会东归，关中地区迟早会是自己的天下。于是，姚萔移兵岭北，在前秦和慕容鲜卑都没有关注的关中北部、西部地区攻城略地，兵不血刃占领了大片土地。西到安定南至秦岭诸城都投降了羌族。

我们再来看慕容冲和苻坚在长安的拉锯战。鲜卑人围攻长安，苻坚亲自督战杀敌，身上中了好几支箭，血流满身也不退后。无奈围城

日久，城中乏粮，最后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苻坚一贯宽厚，这时候还拿出皇宫中最后的口粮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大臣们把肉塞进嘴里舍不得咽下，含回家吐出来给妻子儿女吃。长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了，战火连绵数月，百姓死亡无数。最后，苻坚迷信讖言“帝出五将久长得”，留太子苻宏守城，自己带着一支部队逃到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

五将山已经是姚萇的天下了。姚萇派兵包围苻坚的孤军。秦兵溃散，苻坚坦然被俘，被带到姚萇跟前。姚萇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大骂：“国玺已送晋朝，怎能送给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叛贼！”姚萇就要苻坚禅位给他，苻坚骂得更厉害了：“禅代 是圣贤之事。你姚萇什么东西，敢自比古圣先贤！”姚萇羞愤难当，派人把苻坚缢死在新平佛寺。统一北方的一代枭雄就这么死了，虚岁48。这是385年的事情。

苻坚逃跑后，慕容冲攻入长安。前秦文武百官数百人逃出来，投降了姚萇。鲜卑军在长安烧杀抢掠，之后便浩浩荡荡东出。长安成了一座空城，被姚萇接收。386年，姚萇在长安即皇帝位，国号依然是“秦”。历史上称之为“后秦”。

二

后秦建立后，与关东的后燕相互对峙。北方在“前秦”和“前燕”对峙的局面之后，重新出现了“后秦”和“后燕”对峙的局面。除了这两大割据政权，西边还有后凉、西秦等政权，北方有拓跋部鲜卑的魏政权和匈奴人的大夏政权，山西则是前秦残余和慕容冲势力在争夺。

却说苻坚的死讯传出后，困守山西的儿子苻丕在晋阳即位，捡起了前秦的旗帜。大旗没有扛多久，东出的鲜卑人在慕容永的率领下避开正东的慕容垂，向东北进入了山西，与苻丕代表的前秦残余力量迎头相撞。慕容永将苻丕杀得大败。苻丕带着几千残兵败将，南渡黄

河，竟然想袭击东晋占领的洛阳，结果被晋军杀死。消息传到陇西，苻坚的族孙、狄道（今甘肃临洮）长苻登在另外一部前秦残余的拥戴下即位为帝，继续挥舞着前秦的旗帜。

此时的关中，大部为后秦占领，苻登只占领陇西部分地区，依然与后秦连年征战。苻登等人对前秦的辉煌念念不忘，又对姚萇的弑君深恶痛绝，攻战起来特别顽强凶悍。后秦一时之间竟然不能取胜，关中地区一度出现了局势的反复。野心家魏揭飞在前秦担任过镇东将军，如今自称大将军、冲天王，后秦的镇军将军雷恶地也反叛后秦响应他。两人联合进攻后秦。姚萇亲自平叛，阵斩魏揭飞及将士万余人。雷恶地先逃跑，后投降。姚萇待之如初，让雷恶地心悦诚服，以后常对人说：“我自言智勇所施，足为一时之杰。校数诸雄，像我这样的人，都应跨据一方、兽啸千里。姚公用智力降服我这样的人，是吾分也。”姚萇之所以能在乱世中建立后秦，看来不是浪得虚名。还有一个突显姚萇过人之处例子是前秦兖州刺史强金槌在新平据守，投降了后秦。姚萇准备率数百骑入强金槌的城池。群臣慌忙劝阻，都说这么做太危险了。姚萇说：“强金槌已经背叛苻登，如果再与我们为敌，他就四处为敌了！况且强金槌怀德初附，我们不信任他，何以御物！”他带着少数人马就进入了新平。强金槌的部下果然有人提议趁机袭击姚萇，遭到了强金槌的坚决阻止。

不过姚萇有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迷信。苻坚对他有恩却被他杀死，姚萇内心对苻坚有愧，日常总觉得苻坚阴魂不散。姚萇曾经在军中立苻坚像祈祷，把杀害苻坚的责任都推给部署，表白“新平之祸非臣罪也”。那么自己现在称帝，又为什么和前秦势力连年作战呢？姚萇先告诉苻登，苻登是你的远房亲戚，还想着要复仇，“况臣敢忘其兄乎”？（姚萇的哥哥姚襄是被苻坚杀死的。）姚萇还认为“陛下命臣以龙骧建业”，我就是在遵照您的意思称帝的啊！诡辩了一大通后，姚萇最后祈祷苻坚的魂灵：“今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计臣过也。”苻登在城楼上看到姚萇的表演，勃然大怒，冲着姚萇大喊：“为臣弑君还立像

求福，有用吗？弑君贼姚萇快快出来，我要与你决斗！”姚萇自然是不敢出战。后来，后秦军作战不利，姚萇每夜都从噩梦中惊醒。他认定是苻坚的魂灵作怪，竟然将当初擒杀苻坚的有功之臣斩首，希望求得平安。

人杀了，姚萇每晚还是不得安宁。他总是梦见苻坚率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人突入营中，要杀自己。一次，姚萇梦见自己为了躲避鬼魂，在硕大的皇宫中到处奔跑，大喊捉鬼。侍卫们赶来护驾，其中一个人迎着姚萇“刺鬼”，不小心刺中姚萇的阴部，拔出来后流了满地的血。群鬼欢呼说：“正中姚萇的死处！”姚萇顿时惊醒，从此患了阴肿。医生刺破他的肿处，真如梦境中的情形出血如注。姚萇病情迅速加重，变得疯疯癫癫，时常大呼：“陛下，杀您的是我的哥哥姚襄，不是臣，请不要冤枉臣。”（苻坚明明是姚萇杀的，当时姚襄都已经死了。）

床榻之上，姚萇叫来太子姚兴，开始布置后事：“你要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太元十八年（393年）姚萇病死，时年64岁。他一共做了8年后秦皇帝。

三

苻登听说姚萇的死讯，大喜：“姚兴小儿，不难对付。我折根拐杖就能鞭打他。”于是，他倾其所有，搜罗了前秦的所有力量，东进争夺关中。后秦虽然遭遇国丧，新君姚兴年轻，但同仇敌忾，出动精兵强将迎战。苻登的残兵败将不是对手，节节败退，又被后秦军队堵塞了水源，官兵争水不得，渴死了十分二三的人。苻登集合最后力量突围失败后，前秦军队连夜溃散。苻登单人匹马逃回。东进之初，苻登留弟弟苻广、太子苻崇守老巢。苻广、苻崇听说苻登大溃散，吓得弃城而逃。苻登逃回来后，无所依归，收集若干氏族部众逃入马毛山。姚兴追兵很快就打到了。苻登向陇西鲜卑卑躬屈膝，求得了两万援兵，

再与姚兴在马毛山南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场前秦与后秦的最后一战中，苻登阵亡，时年52岁。

苻登死后，前秦的故事还没有完。太子苻崇逃到湟中（今青海西宁一带）称帝，延续了前秦的国脉。可青海一带是陇西鲜卑的地盘，后者不允许氏族苻氏在自己的地盘上称王称霸，拔掉了前秦最后的旗帜。苻崇死在了湟中。他的儿子（苻登的孙子、苻坚的同族玄孙）苻宣逃奔了仇池杨氏。仇池杨氏后来投降了东晋，苻宣顺带归降了东晋，后来还担任过东晋的平北将军。东晋“平北”的愿望是好的，可惜始终没有实现，任命曾经统一北方的前秦皇孙苻宣出任这个职位，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从此，前秦皇室的疏系子孙世代居住江南，繁衍生息了。

其实，江南曾经还有另外一支前秦皇室血脉，不过后来中断了。那就是苻坚的太子苻宏。苻坚从长安逃到五将山不久，苻宏守不住长安，也学父皇弃城出逃。他一路向西逃到武都，再向南逃，最后投降了东晋。苻宏的身份比苻宣重要多了，是货真价实的前秦太子，东晋很重视他，任命他为辅国将军，还委托以荆州前线军队。可惜的是，苻宏在东晋复杂的权力斗争中站错了队，加入了桓玄阵营。桓玄叛乱失败后，苻宏在湘州被杀。苻坚的嫡系血脉没能流传下来。

我们再看后秦。姚兴彻底铲除前秦势力后，继续开疆拓土。后秦的西边是陇西鲜卑建立的西秦，面对后秦得胜之师不是对手，很快败亡。再往西的河西走廊是后凉政权。前秦大将吕光奉苻坚之命进军西域，迫降三十多国后凯旋回国。到达姑臧（今甘肃武威）的时候，吕光得知前秦分崩离析中原大乱，索性就地割据，占据河西建立了后凉政权。如今后秦大军压境，后凉政权也很快败亡。后秦的北方是拓跋氏鲜卑和赫连氏匈奴，双方时战时和。后秦的东边是强大的后燕政权，中间的山西地区夹着西燕政权。西燕被慕容垂攻灭，姚兴趁其败亡轻松攻取了河东。后秦的南边与东晋抗衡。东晋在淝水之战胜利后，大举推进到黄河以南。弘始元年（399年），后秦大规模出兵进

攻东晋，一举攻陷洛阳。晋军不敌，撤出淮河和汉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后秦统治疆域迅速扩大，西至河西走廊，南到秦岭淮河，东到现在的山东西部。

姚兴时期，后秦进入鼎盛。关中地区部分恢复了前秦王猛时期的景象。姚兴比较注意选才纳谏，释放自卖为奴的人；前期执法比较简约，与民方便；提倡儒学，长安儒生数目逐渐恢复到万人以上。后秦社会的一大现象是佛教开始兴起。姚兴广建寺院，尊奉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为国师。鸠摩罗什原本是苻坚命令吕光从西域迎接而来的，可惜吕光中途在河西独自割据，就留鸠摩罗什在河西耽搁了17年。姚兴平定河西后，邀请鸠摩罗什来长安讲学译经，还支持法显和尚赴印度等国取经访问。法显历经艰辛，遍游印度后，从海路返回了东晋管辖下的青州。在政府支持下，后秦境内佛教大兴，长安成为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后秦对佛教的支持与传播，对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姚兴晚年，后秦由盛转衰。后秦毕竟建立在有限的、饱经战乱的土地上，羌族本身实力就比较弱小，国库很快空虚，军队很快疲乏。姚兴的对策是加税。他大幅度加重税赋，奴役百姓。后秦衰落的第二大原因是姚兴的诸子不和。太子姚泓懦弱。皇子姚弼最受姚兴宠爱，行为骄横，在416年谋反篡位，事败被杀。同年，姚兴在忧虑中病死，太子姚泓继位。

三九、乱政父子兵

东晋中期，民间有谶语说：“晋祚尽昌明。”从字面上看，晋朝的国运遇到“昌明”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就结束了。

当时，简文帝司马昱还是藩王，他的一个妾李氏正怀有身孕。李氏在梦中见到一个神人，对方告诉他：“你将会生下一名男孩，以‘昌明’为字。”李氏醒后觉得很诧异。后来她在一天深夜生产了，果然生下一个男孩，产完后东方刚好露出鱼肚白来。李氏信了那个梦，就将儿子取名为司马曜，字“昌明”。司马昱因王妃王氏及世子均亡，其他诸姬也并无生育，十分着急，唯恐无后。如今有了儿子，司马昱最初喜出望外，直到想起了那句谶语，幡然醒悟，痛哭流涕。难道东晋要亡在自己的这个儿子身上吗？后来，司马昱阴差阳错被桓温拥戴为了皇帝。再后来，这个字“昌明”的司马曜继位，成了孝武帝。

司马曜继位，父亲简文帝的丧事刚办完，就遇到了宫廷政变。一伙拥戴晋废帝司马奕的人突然杀入皇宫，声称奉司马奕回宫复位。这伙人最终被禁卫军镇压。年仅10岁的司马曜刚成为宫廷的主人，就经历了血腥的一幕，不是什么好兆头。果然，他遭遇了桓温的逼宫，又遇到前秦百万大军的南征，屡次命悬一线。好在有以谢安为代表的世族大家的力量支撑着，保持东晋朝廷微妙的平衡。

作为东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司马曜毫无作为，像是个旁观者。长大后，他最大的特长和爱好是酗酒，常做长夜之饮。皇宫外是

地震、水灾、旱灾接踵而来，朝政日坏；在皇宫里，司马曜清醒的日子越来越少，醉得不成人形。司马曜的酗酒，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逃避。东晋时代皇权衰微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朝代之所以成立，就是南北世族支持的结果。末年，司马曜看到长星划过天际，举杯邀请说：“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可见，司马曜本人都对东晋王朝的命运感到悲观了。正是因为悲观，因为无能为力，司马曜干脆逃避到酒乡中去，听任朝野大臣中争斗。这又反过来加速了皇位的衰微。

司马曜初期，朝政全靠谢安主持。谢安死后，司马曜的同母弟弟司马道子领徐州、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军事，崛起掌权。此后，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将近20年。人们可能认为司马道子老成持重，或者是年老资历深，其实司马道子年纪非常小，掌权时刚好20出头，完全是个毛头小子。

司马道子为政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恣意妄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行政，掌权前没有人教过他，掌权后没有人敢教他，他就只能由着自己的心思来了。谢安时期，司马道子是个清谈高手，喜欢结交宾客，还一度因为“恬淡”受到过谢安的夸奖。如今，司马道子把清谈和请客的做派扩大化，营造园林，大宴宾客，亲近僧尼，沉迷于酒色之中。在朝政处理上，司马道子重用王国宝、赵牙、茹千秋等奸佞小人，大搞朋党政治，只要是经常在身边宴会上出现的、听自己话的就重用，反之就闲置或打压。他的这些党羽，卖官贩爵，横行无道，很快就把朝政搞得一团糟糕。

比如司马道子最重用的是王国宝。王国宝出身太原王家，又是谢安的女婿，家世很好，可惜个人品行恶劣。谢安在世很不喜欢这个女婿，故意压制他不让他到任达官要职。谢安还没死，王国宝就到处诋毁岳父。司马道子掌权后，王国宝的堂妹嫁给了司马道子为妻，两人很快在酒桌上找到了共同语言，沆瀣一气。他迅速升官为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几乎与司马道子共掌朝政。王国宝上任后，最擅长的就是

捞钱，“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间”，过着腐朽的生活。

戏子赵牙因为表演为司马道子所喜欢，就被擢升为太守。他在建康用公款为司马道子建造了一所大宅院，“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估计是造得太好了，名声在外，惊动了皇帝。司马曜曾御临弟弟的新府邸参观，见面积辽阔、室宇宏丽，惊叹之余对司马道子说：“你府内的假山高耸入云，的确壮观，不过山上修饰太过，要注意啊。你可要向天下人树立俭素的好榜样啊。”司马道子闻言，连忙称是。皇帝走后，赵牙说：“幸亏皇上不知道这座山本身就是人工堆积起来的，不然可能要责怪王爷了。”

在司马道子、王国宝等人的治理下，东晋百姓“殆无三日之休，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鰥寡不敢嫁娶”，怨声载道。司马曜对弟弟司马道子的胡作非为是知道的，压抑着对弟弟的不满。直到有一次两人一起酗酒，司马道子恃宠乘酒对司马曜不够礼敬，司马曜大怒。兄弟至此失和。司马曜几次想废黜司马道子，都遭到了母亲李氏的阻止。而中书郎徐邈又引用开国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与弟弟司马攸兄弟相残的往事劝说司马曜，司马曜终于还是被亲情所束缚，放弃了废黜的念头，任由司马道子继续乱政。

二

396年冬的一天，司马曜又喝醉了。醉眼惺忪中，他看到张贵人陪在身边。张贵人正得到司马曜的宠爱，可惜年近三十，不如青春少女靓丽清秀了。司马曜就开玩笑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也该被废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后妃最怕遭到废黜，在清冷的冷宫中过完孤独的软禁生活。张贵人越想越凄凉，越想越害怕，由怕生恨，竟然对司马曜下了杀心。司马曜开完玩笑就昏沉沉睡去，张贵人熬到夜幕降临，狠狠地用被褥捂死了司马曜（一说被勒死）。东晋的孝武帝就这么死了，时年35岁。

司马道子并没有深究哥哥的死（凶手张贵人之后去向不明），扶立侄子司马德宗为新皇帝。司马德宗就是晋安帝。

非常不幸的是，上天给了晋朝两个白痴皇帝，一个是引发八王之乱的司马衷，一个就是晋安帝司马德宗。《晋书》毫不避讳地写“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也就是说司马德宗从小到大连完整的话都不会说，连四季变化和冷热饥饱都分辨不清，生活完全靠他人料理，处理朝政的能力就不言自明了。司马德宗的继位，最大受益者是司马道子这个叔叔。登基初期，司马德宗因年幼，司马道子辅政，操纵实权；成年后，司马道子表面还政于帝，实权仍操于亲信王国宝等人之手。司马德宗完全是个傀儡。

尚书仆射王国宝和建威将军王绪这个时期想“干点实事”了。他们觉得，朝廷有名无实，政令上下不通，真正能够控制的地盘也就是建康附近的几个郡县，西有荆州强藩，北有中原大将把守，东边是强大的扬州刺史辖区。这些官职往往被原本就势力强大的世族大家子弟控制着。王国宝等人决心“削藩”，打压地方势力，为朝廷揽权揽财（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司马道子听到王国宝的主意后，表示赞成。于是，这帮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削藩。

削藩要想成功，一要有强大的实力，尤其是军队作为后盾；二是主持削藩之人必须有高超的手腕、坚强的意志和不俗的能力。这两点司马道子一党都不具备。削藩必然会失败。首先对朝廷削藩不满的是青、兖二州刺史王恭。

王恭也出身太原王家，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王皇后之兄，是司马德宗的舅舅辈。王恭是东晋著名的名士，曾有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因为出身好，王恭起家为著作郎，可他还感叹：“不当宰相，我的才志不足以施展！”司马曜时期，王恭为前将军，出任兖、青二州刺史，负责江北的

防御。他指挥着战斗力很强的、淝水之战的主力部队北府兵。397年（司马德宗刚登基的隆安元年）四月，王恭以清君侧、除王国宝为名向都城建康进军，挑起内战。

桓温的儿子桓玄在荆州怂恿荆州刺史殷仲堪响应王恭。殷仲堪是著名的孝子，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殷仲堪衣不解带地伺候。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半路出家学医，究其精妙，煎药的时候瞎了一只眼睛。“独眼龙”的形象是他大孝的光荣标志。当了刺史后，殷仲堪自然以忠君自诩，此时起兵顺江而下，进攻建康。建康陷入了三面包围之中。

司马道子露出了纸老虎的本质来，一见刀兵就慌了神。他不敢迎战，能想到的只是赐死王国宝、诛杀王绪，然后请求王恭、殷仲堪退兵。王国宝死有余辜，被司马道子勒令自尽却有些出乎朝野意外。他死后，王恭等人没了起兵的借口，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经过这么一战，司马道子也意识到自身力量薄弱。不久，他任用王愉为江州刺史，希望广植势力来制约不是一条心的王恭等藩镇。隆安二年（398年），司马道子又划出豫州管辖下的四个郡，转归江州管辖，来壮大王愉的力量。结果豫州刺史庾楷（庾亮的孙子）对辖区缩小强烈不满，愤而起兵，声称讨伐谯王司马尚之、江州刺史王愉。司马尚之是皇室旁支，继王国宝之后为司马道子倚重。

庾楷起兵后，王恭也第二次率北府兵造反了。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太守杨佺期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桓玄也顺江而下，造反了。建康又陷入了藩镇军队的重围中。诸镇推王恭为盟主。

这回，司马道子没有替罪羊可以杀，慌乱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的儿子司马元显刚16岁，却比父亲有胆略。他主动请求迎战诸藩镇。司马道子无奈之下，只好任命儿子为征讨都督，率王珣、谢琰等出战。司马元显人小鬼大，清醒地看出诸藩镇中最强大的是王恭，而王恭之所以强大全靠北府兵。因此，司马元显决定策反北府兵的首领刘

牢之。

刘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在谢玄创建北府兵时即参军，之后身经百战，尤其是在淝水之战中作为尖兵立下了赫赫战功。淝水之战后，东晋趁势收复失地，刘牢之一度渡过黄河进攻到邺城。他长期指挥北府兵，在军中有崇高的威望。而作为北府兵统帅的王恭，清谈名士而已，为政讲求清静无为，自然不去亲近底下的将士，也不注意将士们的操练和思想变化。他又自恃高贵，醉心佛道，故意疏远将士，结果在北府兵中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司马元显派人用重利引诱刘牢之，刘牢之便被策反了。王恭指挥军队向建康进军，北府兵消极怠工，竟然输给了司马元显的乌合之众。王恭撤退回城，刘牢之的女婿高雅之紧闭城门，不放他进来。王恭只好与弟弟王履逃奔曲阿。因为坐着清谈时间太长，王恭久不骑马，髀上生疮，竟然骑不了马。曲阿人殷确，曾在王恭手下干过参军，用船载着王恭，把他藏在苇席下面，打算走水路投奔桓玄去。途中被人告发，王恭被捕送京师。司马道子本想留王恭一条性命，听说殷仲堪、桓玄等人的荆州军已至建康城外的石头城，怕王恭在城内生变，下令将之斩首。王恭临刑前展现了名士风度，他“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髻，无惧容”，说：“我暗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

王恭死后，庾楷也被司马元显打败，投奔荆州军而来。荆州来的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三人剩下孤军一支，惧怕朝廷讨伐，不得不求和。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正害怕荆州军，闻讯马上应允，安抚殷仲堪仍任荆州刺史，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这第二次朝廷和藩镇之战，也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桓玄、殷仲堪、杨佺期虽然退兵了，但早已与朝廷离心离德。为了自保，三个刺史在浔阳正式结盟。桓玄因其家世显贵被推为盟主。中央和藩镇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因为三人的结盟而强化了。

建康城中，司马道子度过了一场危机，又开始纵情酒色。崭露头角的司马元显自以为是的，大肆揽权，把脑筋动到了父亲的头上。一日，司马道子醉酒不起，司马元显入宫禀告白痴皇帝司马德宗，请求解除父亲的司徒及扬州刺史之职，提升父亲为太傅；请求任命自己为扬州刺史。司马德宗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按照司马元显的意思颁布诏书。司马道子醒来，发现自己被儿子夺走了实权，非常恼怒可又无可奈何。他索性更加纵情酒色，把摊子交给了司马元显打理。

四〇、起义成败，老大能力很重要

—

司马元显年少得志，非常想有所作为。他面临的困境是志向远大，实力却很薄弱。司马元显和朝廷面临着上游三刺史的重兵压迫，而能指挥的生力军只有倒戈而来的北府军。司马元显想要建立一支嫡系部队，动起了征兵练兵的念头来。

建康朝廷表面上拥有秦岭淮河以南的广袤地区，实际能够控制的领土少得可怜。中原各郡县和北伐拉锯，控制不了；中游的荆州、湘州和江州长期被荆州军盘踞；四川和两广地区远水解不了近渴，剩下就只有长江下游的扬州了。所以我们看到，权臣要控制朝廷往往兼任扬州刺史。司马元显为了把扬州刺史抓到手里，还不惜暗算他父亲司马道子。实际上，扬州也不是全境都受朝廷控制，建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治山阴，浙江绍兴）、临海（治章安，浙江临海）、永嘉（治永宁，浙江永嘉）、东阳（治长山，浙江金华）、新安（治始新，浙江淳安）、吴（治吴，江苏吴县）、吴兴（治乌程，浙江吴兴县）、义兴（治阳羨，江苏宜兴县）八郡。这八郡也是众多的世族大家集中之处，他们控制着众多的土地、人口，免赋逃税。朝廷的赋税、兵役只能加在八郡的普通百姓头上。

司马元显知道八郡百姓已被压榨得疲于奔命了，从中招募不了多少军队，他把目光转移到了世族大家们控制的人口身上。这些人口，

既包括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也包括依附世族大家的门生故旧、食客、佃农和家丁家将。司马睿时期的征西将军戴渊，其部下就有戴家控制人口改编的一万军队。戴家只是江南的世家大族之一，他们能控制这么多人口，其他家也不逊色。399年，司马元显下命令：征发江南诸郡免奴为客者（已经脱离奴隶身份却还依附他人的人口）当兵，号称“乐属”。征兵令激起了普遍不满。世族大家们不满，因为朝廷要征发他们的依附人口；被征发的老百姓更加不满，因为他们被强迫去当兵当炮灰。结果司马元显兵没有征发来多少，把江南的百姓都给得罪了。

民心骚动。野心家乘虚而起。江南民间盛行五斗米教，信众很多。去年王恭起兵的时候，五斗米教首领孙泰以反王恭之名，聚拢信众起义。孙泰起义规模很小，被朝廷镇压了，孙泰父子全部被杀。孙泰的侄子孙恩侥幸逃脱，躲藏在海岛上，继任为五斗米教的首领。果然在海岛上躲藏了一年，孙恩见民怨沸腾，于399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在柴火堆上点燃了第一把火。

对征兵令不满的百姓和五斗米教的信众纷纷参加孙恩的队伍。八郡遭受朝廷的剥削最重，一般百姓也积累着反朝廷同情起义的情绪。孙恩进展顺利，很快攻破会稽郡。会稽是江南重镇，王谢等世族大家的根据地。会稽被攻破，震动了天下大局，东晋地方官心惊胆寒。百姓奔走相告，各地都有攻杀官吏、响应孙恩的起义。没几天，孙恩的部队超过了10万。

警报传到建康，司马道子惊慌失措，终日在庙中祈祷。司马元显慌忙派遣谢琰、刘牢之率领北府军南下镇压。

孙恩起义，缺乏周密的组织，成功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孙恩作为领袖，个人素质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晋书》说孙恩家族是八王之乱时赵王爪牙孙秀的族人，在讲究门第出身的东晋，这样的出身在政坛上实在难以启齿，加上南渡又比较晚，所以在朝廷中没有占据重要位

置，还遭到大族的歧视。估计孙家人长期被排斥在体制外，积累了强烈的造反精神。所以，孙泰、孙恩叔侄转而借重五斗米教，有报复大族、为己牟利的目的在。这样的人煽动不满群众造反，能量就相当可观了。孙恩短期内就兵强马壮，又占领重镇会稽，没有扩大战果，而是率领党徒在诸郡烧杀抢掠，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东晋朝廷从初期的惊慌中反应过来后，从北向南压迫起义军。孙恩没有组织北方各地的百姓反抗晋军，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兵锋抵达浙江岸边。起义百姓纷纷逃往会稽。

孙恩显示出了可笑的短视。旗开得胜时，他向信徒们承诺“我们马上要到建康坐天下了”；听说北府兵来了，孙恩立即收缩了大目标，说：“就算我只割据浙东，总也能做勾践第二！”北府兵渡过浙江后，孙恩就说：“我并不觉得逃跑是丢人的事情。”谢琰、刘牢之兵临会稽城下，孙恩根本不作抵抗，掳掠男女20余万人逃往海岛。

东晋朝廷在形式上收复了全部失地。海岛上的孙恩保有不可小觑的军力，不断骚扰浙东各郡县。

二

400年，孙恩在海岛上窥伺时机。获胜的谢琰镇守会稽。谢琰自负在淝水大破苻坚大军的战功，将孙恩视为“小贼”不放在心上，会稽守备松懈。孙恩登陆突袭，连破余姚、上虞等县，进攻会稽。谢琰草率领兵迎战，兵败后被部下所杀。谢琰的死，从微观上来看是朝廷和孙恩力量角逐的一次反复，从宏观上来看则标志着门阀士族力量从此丧失了军队实权：谢琰死后，再也没有世族子弟担任重要的军事职位。一来是世族子弟不屑于领兵打仗这种“俗事”，二来是长期养尊处优的世族子弟们也没能力领兵打仗——这点从王恭骑不了马就能看出来。

世族子弟不行了，朝廷只能依靠寒门人士了。当年年底，刘牢之负责东征孙恩，率领北府兵寻找孙恩决战。孙恩不敢接战，再次主动退入海岛。刘牢之就屯兵上虞等处，监视孙恩。

朝廷镇压孙恩的军事行动，让一个中年军官开始为人瞩目。他就是刘牢之派去卫戍句章城（今浙江宁波南鄞江南岸）的刘裕。刘裕是刘牢之的部将，曾受命率数十人侦察义军的行动。侦察途中，刘裕遭遇起义军数千人的包围。他没有丝毫胆怯与犹豫，勇敢地率领侦察小分队投入战斗。结果所有随从都战死了，刘裕也坠落到水中。部分起义军到岸边，想下去捉拿刘裕，刘裕挥舞长刀砍杀了好几个人，重新登岸大叫着与人决斗。最后，起义军不再与他纠缠，过路而去了。刘裕奇迹般地生还，并报告了起义军的动向。刘裕作战勇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让同伴和长官刮目相看。刘裕不仅勇猛凶悍，而且带兵有方，在部队的声望越来越高。句章城很小，刘裕部下战士只有数百人。刘裕身先士卒，经常被坚执锐冲锋在前，每战都摧锋陷阵，能击破敌军，使得小小的句章城成了朝廷在沿海的坚固堡垒。东征的其他官军毫无军纪，到处劫掠，涂炭百姓，只有刘裕治军整肃，法纪严明。百姓们都喜欢投奔刘裕的军队寻求保护。因为讨乱有功和刘牢之的赏识，刘裕战后被朝廷封为建武将军，领下邳太守。

401年二月，孙恩第三次登录掠战。他率大军进攻句章，攻不下来，反而遭到刘牢之率军反击，不得不退走入海。三月，孙恩攻海盐，依然攻不下来。这回是刘裕带兵来救援海盐，孙恩主动退兵，北上进攻沪渎（今上海）。沪渎被孙恩攻克，包括吴国内史袁崧在内的4000官兵被杀。孙恩部队士气大振，六月乘胜逆长江而上，又成功攻克丹徒。至此，孙恩部队再次迅速膨胀，拥众10余万，楼船千余艘，军旗遮天蔽日。

丹徒离建康很近。朝廷守卫建康的兵力薄弱。司马元显一边戒严，一边急调在浙江的北府兵遣将入卫京师。停驻海盐的刘裕，率不满千人的小部队长途驰援建康。短视的孙恩这时又犯了一个致命错

误：他没有抓住建康空虚的良机，派出轻兵进攻建康，而是坐在高高的楼船上，指挥十几万人的大部队一起进军。那楼船几层楼高，非常笨重，又是逆江而上，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很快就被刘裕的部队在镇江追上。孙恩仗着人多势众，这回敢和刘裕正面交战了。他率部队登陆，抢占镇江的蒜山，阻击刘裕。刘裕所部不顾劳累，毅然猛攻蒜山。孙恩起义军为乌合之众，很快溃散。孙恩退至船上，放弃陆路，全力从水路进逼建康。刘裕在岸上随行监视。起义军的楼船实在太慢了，又花了好几天才到达建康郊外的白石垒。眼看建康就在眼前了，可惜刘牢之率领的大部队也赶到了。孙恩毕竟心虚，不敢主力决战，放弃攻打建康，分兵袭取北岸的广陵（今江苏扬州），再率主力北上进攻郁洲（今江苏云台山），打败高雅之率领的晋军。不过，这只是孙恩起义军的回光返照而已，之后再次退入大海。

孙恩从海上南下，402年入寇临海郡。海上毕竟生活不便，依赖陆地补充给养，所以孙恩盘踞海上一段时间后总得登陆劫掠。不想临海的晋军勇敢迎战，击败了孙恩。孙恩穷困不堪，对前途丧失信心，投海自杀。

三

孙恩死后，余众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盘踞在浙江东南沿海。

卢循也出身世族，因为门第不高，南渡较晚，在东晋遭到排挤。他起兵同样带有浓厚的私心。朝廷就对卢循施以怀柔，任命他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希望招安起义军的余部。卢循接受了任命，可依然率领部队在现在浙江金华、温州一带劫掠。朝廷痛下决心，派刘裕南征，力求斩草除根。卢循在流域的追击下，泛海而逃。

卢循率众向南逃亡，越过福建，来到了广东沿海。404年，卢循

攻陷番禺（今广州），酿成大乱。东晋朝廷考虑广州偏远，鞭长莫及，并在第二年（405年，义熙元年）顺水推舟提升卢循做广州刺史。卢循和起义军能够在南海一隅安定下来，不作乱，尊奉朝廷，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卢循也有这个意思。他自己做了广州刺史，成了一方藩镇，又任命姐夫徐道覆做始兴（今广东韶关）相，扼守南岭，大有关起门来安居岭南的意思。

可是徐道覆却不甘寂寞，一心要卷土重来。在广东的五六年时间里，徐道覆暗中操练兵马、打造军械，怂恿卢循北伐。相对应的是，北方的东晋实权逐渐落入刘裕的手中。刘裕掌权后的主要精力在北方，发动了多次北伐。徐道覆见刘裕远征在外，大军一时难以返回，觉得是东山再起的良机，便不征求卢循意见，在义熙六年（410年）二月从始兴北伐。卢循阻止不及，不得不参与行动。卢徐兵分两路，卢循攻长沙，徐道覆进入江西。

卢循的部队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在广东新招募的“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战斗力很强，加上休养操练多年，北伐后势如破竹。东晋地方官闻风逃窜。江州刺史何无忌领兵迎敌，阵亡。卢循和徐道覆联军，逼近建康。建康人心惶惶。刘裕正在北伐南燕的前线，闻讯担心建康有失，只带几十名随从轻装返回建康指挥御敌。

刘裕赶到建康后，考虑到北伐的将士尚未返回而且刚刚经历大战，劳顿多病，因此主张消极防守。镇守姑孰的豫州刺史刘毅本是刘裕创业期的盟友，后来地位落在了刘裕的后面，渐渐与之不睦。他力主出兵迎击卢徐，企图借战功压过刘裕，进而夺权。刘裕从大局出发写信劝阻，又派人去面劝他暂缓出兵。刘毅铁了心要出兵，带上两万精兵和全副家当迎敌，结果在桑落洲一战被卢循杀得落花流水。几百艘大船和堆积如山的辎重都成了起义军的战利品。他本人历尽艰辛，才逃回建康。

刘毅这一败，大大损耗了东晋的有生力量。剩下建康的几千守

军，要对抗十几万起义军。形势危如累卵。刘裕悬出重赏，招募建康百姓当兵，又动员民众修治石头城，集中兵力扼守石头城。敌我力量对比依然悬殊。

当年五月中旬，起义军包围建康，秦淮河入江口都出现了卢循的士兵。徐道覆主张烧毁舟舰，登陆猛攻建康各个城门，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起义军占有优势，再破釜沉舟，也不失为鼓舞士气的妙计。如此重要关头，卢循还对前途没有信心，怕烧了船再战败了就无路可逃了，留着船还能留条后路。他主张暂缓攻城，采取围城的方式，寄希望于建康主动投降。卢循借口说：“从大势看来，建康不日自会溃乱。”他分兵攻掠周边各县。徐道覆无可奈何，悲叹道：“我终为卢公所误，大事将不成；我若能为英雄效劳，天下可定也！”起义军没有集中兵力对建康城发动猛烈攻势，零星的挑战都被刘裕遏制了。刘裕也勒令部将不准出城挑战，凡是违令出战失利的都被他斩首。建康城最终守住了。而卢循在建康周边的攻掠收获不大。相持到七月，起义军士气疲乏，卢循主动退到浔阳休整。

刘裕并没有追击卢循，还是派沈田子等带兵数千，从海路南下偷袭起义军的老巢广州。卢循北伐倾巢而出，留守广州的兵力微乎其微，很快被消灭。沈田子的数千晋军竟然攻占了广州，让起义军无家可归。消息传到长江前线，起义军军心动摇了。战争形势大变。

十月中旬，刘裕从建康出师，主动与起义军决战。卢循接连失利，徐道覆企图西进占领荆州，又在江陵为荆州刺史刘道规所败。年末，卢循、徐道覆带着几千残部退回岭南。

411年，刘裕派兵平定岭南。二月，徐道覆在始兴战败被杀。卢循反攻广州又为沈田子所败，逃往交州，在今天的越南河内附近被东晋的交州守军打败。卢循走投无路，毒死家人，然后学孙恩那样投水而死。他的死，标志着孙恩起义的最终结束。

孙恩首义的江南农民起义跨越了10多年，纵横半个中国，席卷数十万百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起义重创了本已衰微的东晋朝廷，为实权人物的上台铺设了基础。这里说的实权人物，除了上文说的刘牢之、刘裕，还有作为长江三刺史联盟盟主的桓玄。

四一、桓玄：篡国虎父无犬子

孙恩起义的导火索是司马元显的大征兵。他征兵的目的，是对付长江上游的三刺史联盟。

在这三个刺史中，江州刺史桓玄值得大书特书。桓玄是大权臣桓温的小儿子。桓温眼看就要逼宫篡位成功了，最后还是被谢安给拖死了。桓温死后，年幼的桓玄继承了南郡公的爵位。此时的桓家虽然还保留着不俗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但和桓温在世时毕竟不能同日而语了。桓玄7岁的时候，荆州文武聚集在叔父桓冲家。桓冲摸着桓玄的小脑袋，无限感叹地说道：“这些人，之前都是你家的部属、幕僚啊。”桓玄竟然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泪流满面，惊动满堂宾客。

东晋朝廷没有追究桓家逼宫篡位的罪行，但对桓氏子弟非常防备，桓玄兄弟的仕途非常不顺。桓玄直到23岁那年（391年）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而一般的世族子弟年满20岁都能位列朝堂了。几年后，桓玄出京担任义兴太守。他觉得不得志，登高望震泽，叹道：“父为九州岛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干脆弃官回到封国南郡（今湖北江陵），将对朝廷的不满和重振父业的野心潜伏在心底。

397年，王恭第一次起兵，反对司马道子和王国宝的时候。桓玄敏锐意识到这是一个浑水摸鱼的机会。当时的荆州刺史殷仲堪在司马道子和王恭之间摇摆不定。桓玄就去劝他：“听说朝廷要征召刺史大人入京担任中书令了，不知道消息是否准确？”一下子就点中了殷仲堪害

怕司马道子削藩，夺去手中实权的心理。殷仲堪于是决心参与王恭起兵，并分兵给桓玄率领，以之为前锋。

这次起兵以司马道子杀王国宝当替罪羊，王恭主动罢兵结束。桓玄断定司马道子懦弱无能，在第二年（398年）向朝廷求授广州刺史的官职。司马道子本就将桓玄看做潜在威胁，希望他走得越远越好，爽快地任命其为广州刺史。不想，桓玄只是刺探而已，接受了广州刺史的任命并不到番禺去上任，继续逗留在荆州等地。桓玄在荆州拉帮结派，聚拢力量，行为豪纵，俨然是荆州真正的主人。官民都忌惮他。荆州刺史殷仲堪的亲党劝刺史除掉桓玄，殷仲堪优柔寡断，迟迟不敢动手。马上，王恭第二次起兵。殷仲堪、桓玄和南郡太守杨佺期联合出兵。荆州内部的矛盾就暂时冷冻起来了。

这次起兵的结果是王恭被杀，殷仲堪等三人得到安抚，都被任命为刺史。三位刺史在浔阳结盟以求自保。桓玄因为家族声望和历史的缘故，被推为盟主。做了盟主后，桓玄更加骄纵。三人内部矛盾凸显。雍州刺史杨佺期为人骄悍，在与前秦的战斗中积累军功不断得到提升，算不上官场正途，为世族子弟所轻视。但他常常自诩家世华胄，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豪门（他是弘农人，自称是弘农杨氏一员）。桓玄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每次都直呼杨佺期为“寒士”，处处压他一头。杨佺期咽不下这口气，早在三人筑坛定盟的时候就计划偷袭桓玄，干掉他。殷仲堪担心杨佺期勇武，恐怕他消灭桓玄后就要夺自己的荆州地盘，苦苦劝杨佺期不要鲁莽行事。杨佺期这才隐忍不发。三人结盟后，各归辖区。殷仲堪回江陵当他的荆州刺史，杨佺期去襄阳镇守。桓玄知道了杨佺期愤恨自己，又想吞并杨氏地盘，就屯兵夏口（今武汉）。三个盟友就各怀鬼胎，相互防备着。

司马元显了解三人的嫌隙，要诱发三人火并坐收渔利，就将杨佺期管辖的四个郡划拨给桓玄。杨佺期和桓玄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不久荆州发大水，殷仲堪这个父母官全力赈灾，拿出老本抚恤灾

民，造成荆州仓廩空竭。桓玄乘人之危，发兵讨伐殷仲堪。江陵是桓玄的封地，哥哥桓伟还留在江陵。桓玄就密报桓伟，让他做内应。桓伟遑遽不知所为，竟然把信件拿去“请教”殷仲堪。殷仲堪劫持桓伟为人质，让他写信给桓玄。桓伟在信中，满纸凄苦，可怜巴巴的。桓玄却对部下说：“殷仲堪为人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的，老是考虑妻儿家室。我哥哥肯定没有危险。”桓玄继续督率大军，步步进逼江陵。殷仲堪派兵迎战，被桓玄接连打败。桓军推进到距离江陵只有20里的地方。殷仲堪之前向杨佺期求救。杨佺期担心江陵物资短缺、缺衣少食的，难以持久。殷仲堪就写信骗杨佺期说江陵储备丰厚，物资和军需都没有问题。杨佺期信以为真，和哥哥杨广一起从襄阳增援江陵。桓玄很重视杨佺期部队的锐气，避其锋芒，全军暂且退后。杨佺期围追其后，桓玄部队突然调转枪头迎战。经过一番苦战，杨佺期部队溃败，逃奔襄阳。桓玄派将军冯该追击。杨佺期、杨广兄弟分头出逃，还是被俘虏，送到桓玄面前，双双掉了脑袋。困守江陵的殷仲堪得知杨佺期的死讯，勇气丧尽，带上数百人弃城北上，要投奔后秦的姚兴，途中被冯该俘虏。桓玄下令杀死殷仲堪。此前，桓玄在进军江陵的途中，假传圣旨给梁州刺史郭铨，说朝廷已经将郭铨划归自己指挥。糊涂的郭铨莫名其妙地交出了权力，服从桓玄的指挥，做了征讨荆州的前锋。这些都是隆安三年（399年）的事情。

三刺史联盟仅仅维持了一年时间，桓玄就消灭了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佺期二人势力，尽占长江中游一带。次年（400年），朝廷不得已，根据桓玄的请求任命他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后将军，兼任荆江两州刺史。至此，桓玄恢复了父亲桓温时期的势力范围。

二

桓玄是东晋最大的实权人物了。朝廷虽然由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相继专权，但能够管辖的仅仅是江南八郡而已，江北由北府兵刘

牢之、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分割，不仅江南又爆发了孙恩起义，一度失去控制。总之朝廷是四处树敌，捉襟见肘，处置乏力。而桓玄掌握着东晋超过一半的领土（他自称三分天下有其二），募兵征粮，持续自肥。桓玄本就有野心，如今更是大造舆论，说什么“国运转移”，还屡次在辖区内制造祥瑞“进献”给朝廷，名为宣示个人功绩，实为公然示威。

照此发展下去，桓玄迟早要重复其父桓温逼宫篡位的覆辙。长痛不如短痛，元兴元年（402年）正月，血气方刚的司马元显控制朝廷下诏讨伐桓玄。他自任征讨大都督，以刘牢之做前锋都督、征西将军。为了拉拢刘牢之，司马元显剥夺桓玄的江州刺史官职，转授给刘牢之。

桓玄没有想到朝廷这么快就公开讨伐自己。他之前敢高调示威，是觉得扬州饥馑，孙恩未灭，司马元显没有能力讨伐自己。桓玄盘算着趁机蓄力养众，等力量更强些再和朝廷摊牌。听说司马元显讨伐自己，桓玄一开始感到害怕，想放弃东部郡县，退保大本营江陵。长史卞范之劝他说：“桓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司马元显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刘牢之是个反复小人。您如果兵临京师，示以威赏，敌人必然土崩瓦解。如今为什么要引敌入境主动示弱呢？”桓玄有了信心，留哥哥桓伟守江陵，召集兵马顺江而下进驻浔阳。到了浔阳，桓玄移檄建康，公布司马元显的罪状，反过来声称要讨伐司马元显。

这回轮到司马元显害怕了。他也就是一时意气用事，没有消灭桓玄的周密计划，也没有想到桓玄如此强硬的态度。他本来已经上了船，大军准备开拔了，看到檄文后迟迟不敢动身。仗还没开打，司马元显就在气势上输了。

那边，桓玄一边顺江而下，一边还在心里打鼓。他怀疑部众敢不敢与朝廷大军作战，会不会取胜。等到了过了浔阳，还没有见到司马元显的一兵一卒，桓玄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部队的士气也高涨起

来。桓玄兵抵姑孰，派遣部下击破了倾向朝廷的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和豫州刺史司马尚之。

司马元显没主意了，派使者向刘牢之询问战事。刘牢之也害怕。他一来担心桓玄威名鼎盛，手下有大批精兵强将，取胜的希望不大；二来，刘牢之担心即便平定桓玄了，自己也会功高震主，必定不能为司马元显所容。所以刘牢之犹豫不决，消极怠工，磨磨蹭蹭地带着北府兵进驻建康西南的溧洲就止步不前了。

桓玄适时地派其族舅何穆来当说客，劝刘牢之说：“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殒，猎犬烹。文种被勾践逼死，白起被秦始皇杀死，韩信被刘邦杀死，这些都是前车之鉴。那些英雄霸王之主，还不敢信其功臣，况且是愚昧平庸之流！盘古开天地以来，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以见容于暗世者，有谁呢？现在你的情况是，战败了则家族不保，战胜了也难逃满门抄斩的命运，你想怎么办？倒不如幡然醒悟，与桓公联手，保有富贵。身与金石等固、名与天壤无穷，比起手足异处、身名俱灭、为天下人耻笑，你选哪个？”刘牢之听了，觉得何穆所言有理，要派使者去向桓玄请降。

外甥何无忌和部将刘裕苦苦劝谏，觉得桓玄不可靠，刘牢之都听不进去。儿子刘敬宣也劝阻说：“今国家衰危，父亲和桓玄是天下最有实力的两个人。桓玄借家族优势，据有全楚，割朝廷三分之二领土，威望已成，父亲恐怕难以与他共存。父亲如果投靠他，只怕董卓之变，将在今矣。”刘牢之怒道：“你说的这些我难道不知道？今日，我是可能打败桓玄；但平定桓玄之后，我又怎么和司马元显相处呢？”最终，刘牢之还是派刘敬宣至桓玄营中请降。

桓玄大喜，热情款待刘敬宣。他接受了刘牢之的投诚，但对北府兵早有处置的意见。那就是要分化、杀戮北府兵，不能让它继续存在。荆州将领们都知道桓玄的心意，在招待刘敬宣的席上莫不相视而笑，笑话刘牢之的愚昧和短视。刘敬宣却被蒙在鼓里。

刘牢之率北府兵投降后，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桓玄大军沿江而下，进至新亭。司马元显弃船退入建康城中，桓玄军队轻松登陆。司马元显退无可退，硬着头皮整军在宣阳门外列阵迎战。无奈，军心已乱，晋军不战自溃。司马元显匹马逃回城中，身后只有一个谋士跟随。他逃到家里，问父亲司马道子怎么办。司马道子只是对着他哭泣，拿不出任何主意了。很难想象，东晋朝廷竟然被这样两个父子操纵了20年。桓玄兵不血刃进入建康，抓住司马元显，将他和之前被俘的司马尚之一起杀死。司马元显当时才20周岁而已。司马道子被放逐到安成郡，很快就被毒死，也才39岁。

桓玄控制白痴皇帝司马德宗，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又派遣家人、亲信占据要津，控制了东晋朝野。

三

桓玄掌权后，首要的事情就要削弱镇压北府兵。他任命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剥夺了军权。刘牢之恍然大悟：“一转眼，桓玄就夺我兵权，祸将至矣！”刘敬宣就劝刘牢之趁着军权还没有交出去，袭击待在建康丞相府中的桓玄。关键时刻，刘牢之显示出了低劣的政治素质，经过一番犹豫不决，刘牢之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而是计划带着北府兵渡过长江，与在江北的女婿高雅之联合据守北岸和桓玄相持。

刘牢之招集北府兵将领商议去留，不想大家对他的主张都默不作声。参军刘袭打破沉默说：“事不可者莫大于反，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说完，刘袭快步离开，将领们纷纷走散。刘牢之的主张得不到部下的支持。他已经安排儿子刘敬宣先到京口安置家眷，如今见儿子失期未到，以为他遭遇不测。众叛亲离之下，刘牢之自缢而死。不一会儿，刘敬宣赶了回来，见父亲已死不敢哭喊，急忙投奔高雅之而去。北府兵将吏将

刘牢之安葬在丹徒。桓玄不依不饶，下令斫棺斩尸，把刘牢之尸体抛暴于大街上。一代名将，落得如此下场。

除去心腹大患刘牢之后，桓玄再矫诏任命自己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领豫州刺史，完全掌控了国政。对群龙无首的北府兵，桓玄举起了血腥的屠刀，接连杀害了高素、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武、孙无终等北府旧将。刘敬宣、高雅之和冀州刺史刘轨（刘袭的哥哥）起兵反桓自保，被桓玄打败。三人北逃，投降了南燕的慕容德。

剩下的北府兵系统的将领人人自危。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去找刘裕，询问：“我们怎么办？”刘裕相当镇定地回答：“你可随我回京口。桓玄如果能效忠朝廷，我们就服从他，听他指挥。如果桓玄有篡国谋权的举动，我们就对付他。现在正是桓玄矫情树威、施展拳脚的时候，肯定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果然，桓玄铲除了一批北府兵将领，并没有对剩下的人斩尽杀绝，而是希望他们为己所用。他派堂兄桓修镇守丹徒，任命刘裕为中兵参军。其他北府将领依然在位。这说明桓玄想杀一派拉拢一派，收编利用北府兵。而刘裕在刘牢之之后，无形中成了北府将领的中坚力量，大家有事没事都向他靠拢。

元兴二年（403年）二月，桓玄矫诏自任大将军。大将军之职，几乎是奸臣谋权篡位之前必经的一道官阶。桓玄的意图已经清楚了。同年九月，他又加授相国，封楚王，封地有十郡，并加九锡，准备篡位了。

篡位之前，桓玄环视天下，最不放心的还是北府兵残余力量。于是，他派堂兄桓谦前去刺探刘裕对自己篡位称帝的态度。桓谦屏退众人，问刘裕：“楚王勋德隆重，四海归怀。朝廷各位公卿大臣的意思，都是希望皇帝禅位给楚王。不知道刘将军意下如何？”刘裕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楚王是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桓氏家族，世代都是朝廷的功臣支柱。晋室微弱已经很长时间了，早已失去民心。现在楚王是众望

所归，乘运禅代，有何不可！”桓谦听完，大喜过望：“刘将军说可以，那就真的是可以了！”他马不停蹄地回到建康。桓玄得报，以为自己得到了刘裕为代表的北府旧将的支持，再没什么忌惮的了。

403年12月，又一幕“禅让”大剧上演。白痴的晋安帝司马德宗献出国玺，禅位于桓玄。桓玄经过一番辞谢表演后，粉墨登场称帝，国号“楚”。历史上将这个政权称为“桓楚”。

篡位后，桓玄贬司马德宗为平固王，迁居浔阳。

关于新朝的年号，桓玄一开始下诏，定年号为“建始”。右丞王悠之指出八王之乱时，篡位的赵王司马伦用过“建始”这个“伪号”。桓玄就改年号为“永始”，结果这个年号又曾经是王莽刚执政时西汉末年的年号，还是很不吉利。桓玄用它的本意可能是希望自己的楚政权保持朝气，永远欣欣向荣，事情的发展能如他所愿吗？

四二、桓楚注定是个短命的伪政权

桓楚政权的建立，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桓玄接手的是经过朝廷权臣、外藩强将和孙恩起义军轮番蹂躏过的乱局，百姓困苦，朝政混乱，事情千头万绪。可从反面来说，屡经动乱之后人心思归一统，呼唤有人出来收拾乱局。这就为桓玄施展拳脚、建立功业提供了舆论基础。只要他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了，哪怕就是比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好那么一点点的政绩来，人们都会说他好的。桓玄面临的问题，尽管棘手，却很容易出成绩。

桓玄入主中枢的初期，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晋书》也承认他“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起码建康附近得到了治理。

然而没过多久，桓玄就暴露出拙劣的品行来，让人大失所望。

不客气地讲，桓玄到现在为止的成功，主要靠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对手实在太逊太无能，而他的家世基础又着实很强。至于桓玄本人，“本无资力，而好为大言”。做个指点江山的文人谈客，桓玄绰绰有余，可要治国平天下，他就是个绣花枕头了。桓玄即位后，没有全盘拨乱反正的计划，更不知道如何着手建设，做的都是些无关紧要或者沽名钓誉的行为。比如，桓玄好施行小惠以笼络人心。他亲自审讯囚犯时，不管罪刑轻重，多予释放；对于拦御驾喊冤的人，也都给予

救济，对罪犯和申冤者反映的问题则不闻不问。在政务处理方面，桓玄继承了先前繁琐苛刻的风格，又喜欢炫耀自己。有官员将诏书中“春搜”字误缮为“春蒐”，桓玄就把经办人员全都降级或免职，来显示自己明察秋毫。

桓玄在富贵乡里长大，喜欢奇珍异宝，珠玉不离手。他不仅享受，还百般搜求宝物。当了皇帝后，桓玄搜求的能力大增。民间有书法名画或佳园美宅，桓玄都要占为己有。百姓不给，桓玄就威逼强夺，与强盗无异。他还派遣官吏四出求宝，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给他输送宝物。很快，“百姓佳果美竹无复遗余”。巧取豪夺的目的是享受，桓玄在享受过程中暴露出了惊人的无能和懦弱。他把搜集的奇珍异宝和名贵书画都放入轻舸中。别人劝他没必要把宝贝都藏在小船里，桓玄说：“这些书画服玩应该时刻放在身边，万一遇到兵凶战危损失了多可惜，所以我把它们事先放在船上，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方便运输。”堂堂九五之尊，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如何方便携带宝贝逃亡。大臣们不禁暗中发笑。桓玄又喜欢游玩打猎、兴筑宫殿，篡位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夜以继日。亲哥哥桓伟死了，下葬的当天，桓玄白天哭灵晚上继续游乐，让人看不下去。

没过几个月，桓玄就因为“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导致朝野失望，人心思变。

既然朝野都对桓玄失去了信心，那么谁来推翻他呢？

首当其冲的人选就是那些跨州连郡的世族大家们了。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安逸享受，世族大家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已经腐朽堕落，变得庸碌无能了。孙恩起义时，江南诸郡大饥。腐朽的世族子弟，很多穿着精美的丝绸、怀抱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迁徙他乡或者寻找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能指望他们来推翻桓楚政权了。能够与桓玄争夺天下的人选在民间、在军队里。

具体地说，没有被桓玄斩草除根的北府军旧部对桓玄心怀怨恨，其中的中坚将领刘裕也琢磨着推翻篡位的桓玄。桓玄也提防着以刘裕为首的反对派将领。桓楚建立后，他征召刘裕进京朝见。404年2月，刘裕随同徐、兖二州刺史，安成王桓修入朝。桓玄见过刘裕后对司徒王谧说：“我昨天见到刘裕了。此人风骨不凡，是天下人杰啊。”于是桓玄每次游玩集会，都对刘裕优礼有加，厚加赠赐。桓玄的妻子刘氏善于识人。她提醒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怕不是甘心于居他人之下的野心家，应该早些处置他。”桓玄不同意说：“我正要平定中原，非刘裕不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等到关陇平定以后，再谈处置的问题也不迟。”之后他对刘裕更加优待赏赐，希望刘裕能够为己所用。

刘裕是不会效忠已经失去人心的桓玄的。他自己也是个枭雄，很快寻找机会离开建康，返回江北。永始二年（404年）二月二十七日，刘裕推说打猎，和何无忌纠合了100多人的小武装。次日早晨，京口城门刚开。何无忌身穿传诏书的服装，诈称朝廷使者，当先进城，100多人跟着一拥而入。守将桓修大概连真假还没有弄清楚，便被砍了脑袋。同日，京口对岸由桓弘驻防的广陵也发生了政变。刘毅、孟昶和刘裕的弟弟刘道规带几十名壮士冲入桓弘府中，将正在吃粥的桓弘杀死。考虑到兵力薄弱难以坚守广陵，刘毅随即率众渡江，与刘裕在京口会合，队伍壮大到大约1700人。

这支不起眼的小部队誓言推翻桓楚伪政权。当时刘毅、何无忌都是平民百姓，刘裕顶着桓楚政权的建武将军、彭城内史官职，因此刘毅、何无忌就推刘裕为盟主，号召天下反桓。

首义之初，事情繁杂。刘裕急需一位处理事务的主簿，协助自己。刘毅就推荐了刘穆之，说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刘穆之是莒县（今属山东）人，出身平民，博览群书，精明能干，做过地方小官，当时正闲居京口。刘裕听说过刘穆之的文才，立刻派人去请。巧了，刘穆之听到城中军队喧闹，出来探望，遇到来请他的使者，就跟

着去见刘裕。两人一见，惊喜地发现志同道合，顿生相见恨晚之感。刘穆之欣然同意担任刘裕的主簿，负起了刘裕谋主兼秘书长的角色，一上任就将首义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刘裕十分满意。从此，刘裕和刘穆之开始了“刘备—诸葛亮”般的亲密合作。

二

刘裕整顿完毕后，主动进攻建康。桓玄仓促还宫部署应对。他主要有两个对策。第一是赦免扬、豫、徐、兖、青、冀六州的百姓，收揽人心；第二是任命桓谦为征讨都督，派皇甫之、皇甫敷两人分别率军北上迎战刘裕。

三月，刘裕和皇甫之在江乘遭遇。皇甫之是桓玄的骁将，带领的部队也是百战精兵。这一场仗打得异常惨烈，刘裕手执长刀，大呼着亲身冲入敌阵。在他带领下，起义军奋勇前进，阵斩了皇甫之，击溃了桓玄的一支部队。刘裕进军到罗落桥的时候，皇甫敷率另一支部队数千人恭候迎战了。刘裕和一同起兵的檀凭之分别率领一支部队，冲向敌阵。檀凭之血战阵亡，其众退散。刘裕前后奋击，越战越勇，最后攻破皇甫敷部队，将皇甫敷斩首。起兵之初，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共建大谋。有相面高手说，刘裕等人日后会大福大贵，只有檀凭之没有富贵相。刘裕对何无忌等人说：“我等同舟共济，日后命运不会有偏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檀凭之也不会例外。”因此，大家都不相信那个相面术士的话。如今，檀凭之战死，刘裕在悲痛之余，开始相信术士的预言，对讨桓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皇甫之、皇甫敷接连被杀，桓玄大惊，召集大臣讨论。一上来，桓玄就问：“朕会失败吗？”曹靖之回答：“如今神怒人怨，臣恐怕前途不妙。”桓玄说：“百姓或许怨恨我，神灵为什么也发怒呢？”曹靖之回答：“您把晋朝宗庙移到江滨，让它漂泊失所；大楚的祭奠，只祭奠了先皇（指桓温），连祖父（指桓彝）都没有祭奠，上天当然要发怒

了。”桓玄追问：“那你之前怎么不劝谏我？”曹靖之回答：“您身边的人都奉承您为千古圣君，粉饰现在是尧舜之世，我哪敢多言！”桓玄后悔莫及，又恨又怕。

后悔归后悔，桓玄还得硬着头皮迎战刘裕。他一面找术士诅咒刘裕，一面收拢两万军队，派遣桓谦、何澹之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准备战斗。刘裕推进到覆舟山东，让将士们饱餐一顿后，抛弃余粮，以破釜沉舟之势对桓军发动攻势。他选派年老羸弱的人在蒋山上分张旗帜，然后指挥部队分道进攻。桓军的侦察兵看到后，以为刘裕军队人数众多（其实才几千人马），回去报告桓玄：“裕军四塞，不知多少。”桓玄更担心了，加派庾颐之带领建康城内的精兵增援前线。

决战正式开始，刘裕、刘毅等将领身先士卒，直前冲击。将士人人死战，喊声惊天动地。刘裕见东北风急，就沿途放火焚烧，烟尘涨天。建康城内都能听到城外鏖战的声音，看到漫天的烟尘。桓军士气低落，刘裕等人斗志昂扬，结果桓谦等诸军被击溃，纷纷后逃。城内，桓玄集合亲信数千人，扬言要出城与刘裕决一死战，暗地里带着儿子桓升、侄子桓浚等出建康西掖门，到达石头城，坐上事先准备好的小船，向长江上游逃去。

建康落入刘裕手中，周边郡县也纷纷反正。起兵不满一个月，他就成了胜利者。可是更大的麻烦随即而来：推翻了桓玄以后，政权怎么办？建康不能一日无主，起义军和反正的地区不能群龙无主。刘裕的选择很少。他可以自己称王称帝，可是他是以讨伐桓玄篡位起兵的，如今自行登台掌权，和桓玄有何区别？又如何安抚天下？况且，和刘裕合作起兵的刘毅、何无忌等人也不会支持。所以，刘裕还是要把东晋朝廷的牌子给抬出来，在东晋的旗帜下发号施令。问题在于晋安帝司马德宗已被桓玄软禁在浔阳了，尚在桓玄控制的范围之内。怎么办？刘裕决定找一个皇室成员出来，暂代朝政。

桓玄篡位后，司马皇室的子弟都被桓玄贬居外地了。原来的武陵

王司马遵被贬为彭泽侯，被勒令到彭泽（今江西九江彭泽）居住。巧的是，司马遵出发时船坏了，他就在建康逗留了下来。司马遵人既在建康，思想又极端反桓。右将军桓伊曾去拜访他，司马遵说：“我家的门不为桓氏开！”左右劝他：“桓伊虽然姓桓，但和桓温是疏宗，您和他相见无妨。”司马遵说：“我听到别人姓木字边，就想杀了他，更何况他姓桓了！”这样的人，桓玄篡位后没有除掉，是一大疏忽。如今，司马遵成了刘裕搬出来号召天下的理想人选。于是，刘裕等人推举司马遵为大将军，搬入皇宫居住，代行大权。刘裕等人通过司马遵迁转百官，将他所辖的命令称制书。司马遵大赦天下，但是和桓玄同祖的子弟不在赦免行列。

三

前线的战争还在继续，长江中游一带的战火还要蔓延几年。

桓军屡次战败，桓玄不得不退出建康，到浔阳挟持了晋安帝司马德宗，继续向西逃回江陵。对于自己的惨败，桓玄心里接受不了，常常整天不吃不喝的——当然了，在撤退途中供给不好，左右送给桓玄吃的都是粗饭，他也咽不下去。儿子桓升只有几岁大，懂事地抱着桓玄的胸抚摸。桓玄更是悲不自胜。对外，桓玄担心兵败如山倒。他继续以大楚皇帝自居，要和刘裕争夺天下。

西撤后，桓玄唯恐政令不通、法令不肃，施行严刑峻法来整肃内部，部众反而愈加离心。逃亡途中，桓玄开始编辑起居注（记载帝王日常言行的档案），说到被刘裕打败的内容，他自称经略指授算无遗策。既然桓玄神机妙算了，为什么还失败了呢？桓玄就痛骂诸将不听指挥，以致失败，认为建康失守非战之罪，而是下面的人执行不力。

四月，司马遵在建康就任大将军，发兵讨伐桓玄。桓玄也在荆州重整部队，以投降的前秦太子苻宏为前锋，东下与刘毅率领的晋军决

战。桓玄的军队始终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刘毅的部队只有几千人。桓玄发扬畏战的一贯传统，在御船旁边系着一条小船，装着宝物和给养，一看情况不妙随时准备开溜。下面的将士看到皇帝都是这样的心理，哪里还有斗志。加上刘毅又成功乘风纵火，一场火攻将桓玄的荆州兵杀得大败。桓玄不但不思收拢败兵再战，反而烧掉辎重，连夜逃回江陵。

部将冯该劝桓玄在江陵准备最后的决战。桓玄完全没有勇气，计划逃亡汉中投靠梁州刺史桓希。他不顾个别忠心将士的劝阻，连晋安帝也不要了，要率部弃城北逃。江陵城中顿时大乱，指挥混乱，政令不通。桓玄带少数几个人乘马出城，出城门的时候遭遇怀恨在心的旁人行刺。刺客没有刺中桓玄，却导致桓玄身后最后的部队相互猜疑，起了内讧。最后，桓玄狼狈地和几个亲人逃到船上，逆江泛舟而去。

桓玄跑后，部分忠于晋室的官员将晋安帝司马德宗迎入南郡府舍，等候晋军的到来。

之前，东晋的益州刺史毛璩的弟弟毛璠死了，他派了其孙毛佑之、参军费悦带着200人出三峡送葬回江陵。毛璩的侄子毛子修是桓玄的屯骑校尉，有心杀桓玄，就劝诱桓玄入蜀。桓玄同意了，在枚回洲遇到了毛佑之和费悦一帮人。毛佑之等人里应外合，对桓玄发动突袭。一时间箭如雨下，桓玄平时宠幸的近臣丁仙期、万盖等人用身体护着桓玄，各中数十箭而死。桓玄也中箭了，儿子桓升在旁帮他拔出箭来。益州督护冯迁抽刀，跳上桓玄的大船。桓玄一边拔下头上的玉饰递给冯迁，一边喝问：“你是何人？敢杀天子！”冯迁说：“我是在杀天子之叛贼而已！”刀起头落，桓玄死了，时年36岁。小孩子桓升被抓，他向乱军大喊“我是豫章王”，可他的豫章王是桓楚政权封的，保护不了他。桓升和父亲一同丧命。桓玄的脑袋被送到建康，悬挂在大街上示众。围观百姓莫不叫好，可见桓玄多么不得人心，桓玄政权的速亡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桓玄之乱并非彻底结束。桓家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桓玄死后，被其侄桓振谥为武悼皇帝。桓振、桓谦、苻宏等人在荆州一带顽抗。桓振还一度重新攻陷江陵，再次俘虏晋安帝。东晋花了几年时间才诛杀桓振等人，讨平叛军。直到406年晋安帝才回归建康，司马遵奉还政权，改拜太保。桓氏子孙部分投降后秦，部分逃入苗中成为南蛮，在东晋绝迹了。

四三、当兵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着重了解一下刘裕的成长和发迹经历。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绥里人（今江苏徐州），曾祖刘混时随晋室南迁，后来迁居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家是极其普通的城市贫民家庭。

但是《宋书》为刘裕列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家族世系。“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强，辟强生阳城缪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釐侯庆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某，某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琊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为皇考。”也就是说刘裕是西汉刘邦的弟弟楚王的后裔。在他的祖先中，封侯拜将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一串家族世系基本上是瞎说。它只能证明南朝宋时期的皇室是多么在意自己的家庭血缘，因此不遗余力地往自己脸上贴金。

退一步说，即使世系存在，也只能说明刘裕虽然是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但早已经败落了。起码按照《宋书》的记载，到刘裕的父亲刘翹的时候，刘家已经家道衰落。刘翹一生，仅居郡功曹（郡守属吏）的职位。就是这个郡功曹的职位也极可能是虚构的。因为郡功曹

也算是地方的士绅大官，家里多少也有些家底。但是从刘裕日后赤贫的生活来说，他的父亲刘翹怎么可能不为儿子留家产，怎么就眼看着儿子缺衣少食呢？因此，刘翹本人极可能只是官府的一名底层衙役，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底层农民。

根据《宋书·武帝本纪》推断，刘裕生于兴宁元年三月壬寅夜，即公元363年4月16日。出生时，母亲在生产中死了，父亲刘翹因为家境实在贫寒，难以养活儿子，就想将刘裕抛弃。就在刘裕即将成为弃婴的时候，与刘裕同郡的同族刘怀敬的母亲，听说了这事，忙赶过来阻止了刘翹，并承诺自己将抚养这个可怜的婴儿。当时这位可敬的母亲生了自己的儿子刘怀敬尚未满月，就毅然断了刘怀敬的奶水去哺乳并非亲生的刘裕。刘裕对刘怀敬一家终生感激，在成为皇帝后，刘裕封并无亲属关系的刘家儿子为王。

关于刘裕的乳名——寄奴，这里还有一个传说。中药中也有一味中草药叫做刘寄奴。这个名字是因刘裕而起的。刘裕年少的时候，一天傍晚外出打猎，用箭射中一条大蟒蛇。但是那条蛇一闪就不见了。刘裕觉得很奇怪，就想去寻找那条受伤的蛇，无奈天色已晚已经作罢。第二天，他又来到原处寻找，当搜索到一条小河边时，听到密林深处有杵臼声。刘裕顺着声音寻去，只见两个小童在捣药。两人边捣药边说话。

其中一个说：“我们大王伤势不轻，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射伤我们大王！”

另一个说：“是昨天被刘寄奴射伤的。”

“大王有那么大的本领，为什么不杀了刘寄奴报仇呢？”

“不能杀，刘寄奴将来是要做皇帝的。这是大王说的。”

刘裕听得好奇，就大吼一声，跳将出来。两个小童吓得急忙逃

窜，没了踪影。刘裕见两人留下药臼和草药，就试着用这种草药疗外伤，竟然有特效。后来刘裕驰骋疆场也都带着这种草药。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他用那种草药治愈了多少受伤的将士都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人们都不知道这种草药的名字。因为这药是刘裕最先发现的，就以刘裕的乳名寄奴来命名。

这只是传说，不是事实。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刘裕喜欢钻研医药却是真的。他曾广泛收集民间方药，编辑了《杂戎狄方》一卷，可惜现已散失。

当然了，刘裕小的时候肯定不知道自己能当皇帝。也没有人认为这个贫苦人家的小孩能当皇帝。在人生的早期，人们通常都是以家境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的。刘裕就是属于那种因为贫穷而不被人看好的孩子。刘裕在贫困的环境中逐渐长大，“雄杰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风骨奇伟，不事廉隅小节”。前半句话是史书中惯用的修饰溢美之词，只能说明刘裕长得比较高大而已，后半句话才是重点。刘裕在老家不从事生产，不像出身相同的普通百姓家子弟一样做点“正事”。他识了几个文字，但进不了官府；为了糊口，他零星地从事被土人和官府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做些编席卖鞋之类的小买卖。由于家境贫寒又毫无背景，刘裕经常受人欺负。

刘裕还有一个一般人家难以接受的坏毛病：喜欢赌博。他的运气很不好，经常输得除了随身衣物就一无所有了。最后，刘裕因为赌博，欠了有钱有势的刁逵3万钱。刘裕自然还不起赌债，结果就被刁逵找人抓了过去，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当时的大世族王谧到刁逵家中拜访，偶然见到刘裕，觉得这是个日后会表现不俗的年轻人，就替刘裕还了债。刁逵得了钱，又看在王家的面子上，这才放了刘裕。王谧对刘裕说：“卿当为一代英雄。”他不因为身份和地位悬殊，主动与刘裕交往，让刘裕感动不已。

总之，年少时期的刘裕是一个出身不好，行为有所不端，名声也

不佳的孩子。

二

刘裕觉得再这样瞎混下去，一生就毁了，于是决定去做穷人还能做的一件事情：当兵。

东晋之前执行的是世兵制：一些家族世代当兵，垄断当兵资格，其他平民没有资格当兵。这些世兵子弟的素质越来越低，当兵吃粮而已，国家军事力量逐渐下降。最后连首都建康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持，叛乱者动辄兵临都城，威胁朝廷。在这种背景下，谢玄在江北招募贫苦流民入伍，建立了北府兵。广陵、京口及其附近的贫苦百姓和从北方南下的流民构成了北府兵的主力。这支新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逐渐成为稳定东晋政局的主力。淝水之战的惊人胜利就是北府兵取得的。北府兵逐渐不受世族子弟控制，从上到下都由非世族出身的普通人掌握，成为完全的庶族军队。刘裕入伍之后，稳步得到提升，最初担任将领孙无终的司马，后来转入刘牢之手下做个军事参谋。

刘裕真正崭露头角是在镇压孙恩起义的战争中。此后，刘裕长期在外对起义军作战，每次领兵都只有几千人，却屡建奇功。他在北府军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为朝廷所倚重。天下太平之时，治政功绩是一个人最大的政治资本；但到了乱世，军事实力是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职业军人出身的刘裕就有幸生活这样的乱世中，分量越来越重，以至于桓玄在篡位之前都不得不征询刘裕的意见。男怕入错行，看来刘裕是入对了行。

自立为帝后，桓玄征召刘裕来京，做深入的试探。新王朝对刘裕日夜优待，礼遇有加。桓玄以为优待刘裕就可以了，可是他大错特错了。常年军事和政治争斗，让刘裕不再是简单的武夫，开阔了眼界，

锻炼了政治智慧。他虚情假意地支持桓玄称帝，内心早就图谋推翻他。但是考虑到自己根基尚浅，实力不够，同时也想让桓玄逆天下之意称帝，自去根基，再图谋推翻他，所以才韬光养晦、蒙蔽桓玄。当时反对桓玄的人很多。多数世族大家都是反对他代晋自立的。但是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大家失去了实际权力和纵横天下的志向。相反刘裕却将反对桓玄的计划付诸实施。因为刘裕具有反对的实力。他不仅身经百战，政治军事经验丰富，还继刘牢之之后成了北府兵事实上的领袖。反桓的力量逐渐秘密汇聚到刘裕身边。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不以出身为标准，而以能力为考虑的政治时代。

以刘裕为盟主的反桓同盟建立后，刘裕身先士卒，将士们无不死战，接连以少胜多，汇聚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推翻桓玄后，朝野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的功绩。朝廷封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徐青二州刺史。刘裕就此成为南方声望最高、实力最强的人物。他名声在外，就连北方的姚兴也颇为忌惮。刘裕上台后，向姚兴讨要后秦之前趁东晋大乱攻略的河南地区。姚兴竟然将部分侵略的东晋土地归还了刘裕。

刘裕继桓玄之后成了建康的主人，却没有留在建康专断朝政，而是接任徐青二州刺史，主动出镇外地。他推司马遵出来维持局面。当时，反正的桓楚司徒王谧（就是之前救过刘裕那个世族）与众人商议，准备推举刘裕统辖扬州。我们知道东晋朝廷长期只能直接关系扬州一地，要把持朝政必须兼任扬州刺史。刘裕坚决辞谢，把扬州刺史让给了王谧。他这么做可能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自己根基不足，尤其是刘裕出身贫寒，可能适应不了建康的政坛深水，想先常驻丹徒继续积累政治威望；其次是刘裕起家于江北，政治基础在今天的江苏南部一带，因此他选择丹徒作为根据地；最后，刘裕将盟友刘毅、孟昶等留在建康作为内应，可以遥控朝政。

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王谧去世，不利于刘裕的情况出现了。原来的盟友刘毅不希望刘裕进入朝中辅佐政事。之前刘毅和刘

裕共同行动，同甘共苦，地位和权力都在刘裕之后，如今富贵了，刘毅开始不满于总是居于刘裕之后，想和刘裕争夺实权了。他聚集一帮人，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或者退一步让刘裕兼任扬州刺史，但不让刘裕入建康，而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孟昶管理。这是典型的只可同患难，而不共富贵。商议定后，刘毅等人毕竟心虚，不敢突然袭击式地发布任命，而特意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两个方案，前去征求刘裕的意见。

皮沈到了丹徒，先去见了与自己有交情的刘穆之，向刘穆之透露了自己的来意。刘穆之自然知道让刘裕长驻丹徒的坏处，那就是对首都这个政治中心的疏远。他暗自庆幸皮沈先来寻找自己通报情况。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假装起身上厕所，迅速写了张条子派人送交刘裕。纸条中写道：“皮沈所言，切不可应允。”皮沈告别刘穆之后，就去见刘裕。刘裕听完皮沈的陈述后，没有表达意见，只是吩咐下人好好安顿朝堂使节。之后，他迅速将刘穆之招来商议。

刘穆之向刘裕介绍了情况后说：“晋朝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已经很久了，天命已经转移。将军您复兴皇家，功高德劭，民望所归。之前您谦让官职，出守外地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您的威望更高，政治资源更丰富了，如果再一味谦让，难道就甘心于永远做一个老守疆土的地方将领吗？”

“刘毅、孟昶等人都是与您一起从布衣开始起家的。当年大家倡导大义，争取富贵。因为举事有先有后，官职有高有低，所以推举您作为盟主。力量的对比结果是暂时的，政治上的服从也是会有变化的，但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服从您的。现在您长期领兵在外，他们在朝内占据高位，大家的力量相当，地位也差不多，已经到相互吞并和排挤的时候了。”

“在政治斗争中，扬州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平定桓玄之乱后，您没有兼任扬州刺史的职位，而是交给了王谧，那不过是实力不够时

的权宜之计。现在您决不可以再拱手让出扬州了。如果对手同时占领扬州和朝堂，我们就要受到别人的制约。权柄一旦丧失，形势一旦不利，如果再想逆转回来，就困难了。如果我们落下那样的境地，不仅将优势拱手相送，而且前途难测。”

“现在既然朝廷征询您的意见，您就应该明确表示反对这两个方案的态度。因为将军您不能公开地向朝廷要求担任扬州刺史的职位，所以您只能这么说：‘扬州是国家根本所在，地位重要。挑选扬州刺史事关重大，我不能在外地空发议论，要详细了解情况。我计划近日前往京城，与各位一起交换意见。’等您到了都城，京里的一帮人就不敢越过您随便处置扬州刺史的人选了。”

刘裕听从刘穆之的话，没有理会皮沈，接受了扬州刺史的任命，冠冕堂皇地前往建康就任。刘毅等人偷袭不成，反而引虎入家门。结果真的如刘穆之所分析的，朝廷征召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仍兼任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至此，刘裕算是名副其实的权臣了。

三

从412年开始，刘裕聚敛东晋朝廷大权，很有一番作为。东晋朝廷的烂摊子已经糜烂很久了，经过司马道子父子的蹂躏情况更加糟糕，桓玄虽然打算进行整顿也毫无成果。刘裕在刘穆之的协助下，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朝政清理和政策矫正。像作战时一样，刘裕以身作则，树立勤政榜样，同时以威行严法管束朝政，使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谨慎地奉行职守。刘裕入朝不到一个月，建康的官风民俗就大为改观。

同时，刘裕开始暴露出不臣之心。表现在他经常矫晋安帝的诏书给州县长官下命令，也表现在他开始严厉镇压异己力量。尚书左仆射

王愉的儿子王绥，因为出生于江左冠族、世代公卿的王家，再加上自己很小就获得了名望，就对刘裕很不服气，讥笑他地位卑贱。刘裕毫不犹豫地将他杀死。当时东晋世族大家的势力经过之前的动乱大为削弱，加上世族子弟自身不学无术，沉溺享受，在刘裕的进攻前完全败下阵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刘裕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形象来。因为出身的缘故，刘裕识不了几个字，也没读过几本书，是个半文盲。后来因为行政的关系，他逐渐认识了一些字，可以读懂文告，也能亲自写些简短的命令和文告了。在东晋官场上，文学谈吐和书法水平是官员相互交往和评价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在一些大族世家看来，他们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缺乏系统文学教育的寒族子弟。即使刘裕贵为朝廷主政大臣，也难免有一些世族大家在背后讥笑他的文字和谈吐。刘穆之提醒刘裕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谈和文字，这不仅事关刘裕个人的尊严，也直接关系到政治斗争的前途。刘裕这时已经对刘穆之推心置腹，几乎是言听计从。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尽力淡化军人色彩。但自己的那一手烂字却是怎么都提高不了，加上生性不喜读书习字，让刘裕苦恼不已。刘穆之出主意说：“写字虽然是小事，但对于有志天下的人来说，不能不多加留意。将军您可以坚持一直写大字，一个字写成一尺大也无妨。大字能够掩藏拙处，而且有气势。”刘裕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以后刘裕的文告字写得硕大无比，一张纸只有六七个字，贴得满墙都是。远远看来，他的文告显得气势非凡，和身份相配。

说到刘裕执政，不得不说刘穆之的成功辅佐。刘穆之对内是刘裕的行政管家，对外是刘裕在朝廷的主要助手，他不仅给予刘裕政策咨询，还亲自处理朝政和军事。他这个人有非常能力，处理问题快如流水，文件和事情在他的手里从来没有堆积迟滞的。刘裕成名后，各色人物从四面八方涌来，朝野内外事务千头万绪，一时间让刘裕难以适应。刘穆之从容不迫地将千头万绪的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通常的情况是，他眼睛看着文件资料，手里起草批阅意见，耳朵听着情况汇

报，嘴里当场答复下属的询问，应对自如，没有出错。刘穆之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掌握消息比较全面，不管是闾里言谑、途陌细事，不论大小都知道些。他把这些信息一一告诉了刘裕，刘裕就能明白民间的实情，还常常将民间消息挂在嘴边表示自己的开明通达。

刘穆之出身寒门，没有家庭基础可以依傍。得志之前，刘穆之一度窘迫到待在岳父家里混饭吃，受人奚落。随着地位提高、条件改善，刘穆之沾染了一个毛病，就是讲究吃喝的排场。他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桌上必须得有足够十个人吃的饭食，而且从来不单独进餐，不是招待宾客就是需要歌舞助兴。这可能是刘穆之发达后对早年窘迫的一种心理弥补。对于自己的毛病，刘穆之向刘裕坦白说：“我出身贫穷微贱的家庭，之前维持生计都很艰难。现在居高位，我虽然心中想着要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还是过于丰厚了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儿对不起您的了。”

从京口讨伐桓玄开始出任刘裕的主簿到义熙十二年（416年）年底去世，刘穆之与刘裕合作了13年时间。这13年分别是刘裕和刘穆之一生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刘穆之凭借聪明勤勉，支持刘裕南征北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刘裕则奠定了日后新王朝的基业。奇怪的是，刘穆之死后，刘裕再也没有取得先前那样的辉煌战绩。刘裕评价刘穆之“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刘宋王朝建立后，刘穆之被追封为南康郡公，谥文宣公。

四四、100年后再见两京



我们具体来看看刘裕掌权后的表现。刘裕的权力是建立在北府兵的支持上的，依靠讨伐桓玄积累起来的。起兵过程中，北府兵的刘毅、何无忌等人推举刘裕为主，同时自身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军队。尤其是刘毅，长期处于北府兵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官爵仅次于刘裕，具有取代刘裕的能力。而他对屈居第二的现实也不满足，加上文雅有学问，得到世族大家们的支持，内心深处也想和刘裕一决雌雄。桓楚政权覆灭后，刘毅与刘裕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

一开始是刘毅推荐大世族谢混做扬州刺史，用意在于把刘裕挤出朝廷，做个“守藩之将”。刘穆之洞穿刘毅等人的心思，叫刘裕抓住扬州刺史不放。刘裕把扬州刺史抓到手后，常驻首都建康，让刘毅等人措手不及。接着，刘毅挑拨离间刘裕和刘穆之的关系，经常对刘裕说刘穆之权太重。不想，刘毅越挑拨，刘裕越加信任刘穆之。刘裕在刘穆之的辅佐下发动了讨伐南燕的战争，节节胜利，不想广州的卢循乘虚北上进攻建康。时任江州刺史的何无忌领兵迎战阵亡，震动了全局。刘毅时任豫州刺史，镇守姑孰，手上有兵有船，一心镇压卢循起义军建立大功来盖过刘裕，于是整军迎战。刘裕从前线匆匆赶回建康，考虑到北伐军队刚刚南归，将士疲劳，又多伤病，船只也需修理，竭力主张慎重行事。他先写信劝阻刘毅，又派刘毅的堂弟刘藩前去劝他暂缓出兵，要求大家一同行动。刘毅见刘裕一再阻止自己出战，以为刘裕阻止他立大功，斗志更强。他对刘藩说：“以往我不过是

把功劳让给了刘裕，你们就认为我真的不如他。今天，我要让天下看看我的本事！”最终，刘毅率领精兵两万与卢循交战，在桑落洲一战大败，损失了堆积如山的辎重，所部兵马所剩无几。他本人历尽艰辛，才逃回建康。

卢循起义被平定后，刘毅担任了江州都督，不久接替病重的刘道规担任荆州刺史。刘毅就此掌握了极其重要的荆州地区，在荆州网罗党羽，壮大力量。反对刘裕的力量聚集在刘毅身边，他依然是可以与刘裕一决雌雄的实权人物。刘裕开始不能容忍刘毅的存在了。刘毅身体不好，没多久就病重了。在党羽的撺掇下，刘毅向朝廷请求堂弟刘藩继任荆州刺史。之前，东晋朝廷对荆州的实权人物都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不会驳回继任的请求。这一回，主政的刘裕也答应了。因为刘藩正担任兖州刺史，去荆州上任需要经过建康。刘裕就以司马德宗的名义征召刘藩入京。刘藩到了建康后，刘裕马上宣称发现了以刘毅、刘藩和尚书仆射谢混为首的“反叛集团”，共谋不轨。他以朝廷的名义赐死刘藩和谢混，并出兵讨伐。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建康封锁消息，不让刘毅知道刘藩和谢混的死讯，逆江而上的讨伐军也伪装成刘藩的部队，宣称是新的荆州刺史赴任。讨伐军一路走到江陵附近，荆州都没有防范。讨伐军趁机对江陵发动突袭，刘毅兵败，自缢而死。刘裕除掉了最危险的内部敌人。

刘裕讨伐刘毅时，诸葛长民驻守建康。诸葛长民是反桓起义时的重要人物，也是刘毅、何无忌等人之后硕果仅存的人物。听到刘毅死讯后，诸葛长民很害怕：“昔年醢彭越，今年杀韩信。祸其至矣！”其弟辅国将军诸葛黎民就劝他造反。诸葛长民犹豫不决，暗中写信给冀州刺史刘敬宣，要找他一起造反。刘敬宣是北府兵元老刘牢之的儿子，父亲被桓玄逼死后他逃奔了南燕。在南燕，刘敬宣和高雅之等人阴谋发动政变推翻鲜卑人的统治，失败后逃归东晋，被刘裕收留。刘敬宣不但拒绝了和诸葛长民一起造反，还向刘裕告密了。刘裕赶紧命讨伐荆州的军队返回建康。413年刘裕回到建康，找来诸葛长民。刘

裕大摆宴席，和诸葛长民笑谈如常。两人开怀痛饮，诸葛长民渐渐失去了警惕，喝得酩酊大醉时被刘裕事先埋伏的武士从背后用绳子勒死。在对付政敌时，刘裕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酷。诸葛长民被勒死的时候，刘裕端坐原处饮酒如常。诸葛长民死后，刘裕又派人诛杀诸葛家族。诸葛黎民一贯骁勇，面对围兵格斗至死。至此，昔日的盟友和潜在的政敌都被消灭了，刘裕成了唯一的强权人物。

桓玄篡位之时，益州刺史毛璩出兵讨伐桓玄。不想四川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去打仗，推举四川人谯纵为首领，杀死毛璩割据。谯纵建立了继成汉之后的第二个四川割据政权。谯纵一边向北方的后秦称臣，被后秦封为蜀王，一边频繁入侵东晋的荆州地区。荆州首府江陵常常处于谯纵政权和后秦的两面夹击之中。卢循起义军进攻建康，荆州方面没有一兵一卒增援，就是因为被谯纵牵制住了。荆州一度在建康隔绝音信，情况危急，全靠刺史刘道规安定部众，荆州这才没有落入谯纵政权的手中。刘裕消灭刘毅的同年（412年），就开始对四川用兵。他选择浅资历但能力强的朱龄石做元帅，任益州刺史，领兵攻蜀。谯纵本就是趁东晋内乱（先是桓玄，后是卢循）侥幸立国的，势力薄弱，在晋军攻击下节节败退。413年七月，谯纵自缢而亡，四川重新进入东晋版图。刘裕又立下一件大功。

消灭桓玄后，刘裕最大的功绩还是北伐。他陆续消灭了南燕和后秦两大胡族政权，取得了“光复两京”的辉煌胜利。

二

北伐始终是东晋政治的重要内容，棘手而炫目。一般人将北伐视为某某人树威揽权的手段——事实上也是如此。保守的朝廷不希望大臣动议北伐，只有不安分的权臣才有实力真正将北伐付诸实施。刘裕权势日渐巩固，为了更上一层楼，北伐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义熙五年（409年），南燕的慕容超成了刘裕北伐的第一个目标。

南燕是后燕分裂后的偏安政权，力量薄弱。末代君主慕容超又轻浮好动，嫌太乐伎人数太少在当年二月发兵攻击东晋淮北的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掳去大量人口。慕容超从中挑选了男女2500人给太乐训教，以供自己享乐，却不想引来了亡国之祸。第二个月，刘裕就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伐燕。朝野又是一片反对声。反对归反对，没有人能在实际上阻止刘裕北伐。四月，刘裕就率领北府兵浩浩荡荡地从水路北上了，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后改走陆路。和桓温等人北伐纯粹为了立威不同，刘裕还有扩大疆域的目的，所以他北上途中遇到险要之处都筑城留兵防守，目的就要长久守住这些地区。

南燕主要盘踞地区是现在的山东。北伐军进入山东后，刘裕必须经过地形险峻的大岷山。大岷山两旁是高山峭壁，中间有一条小道通过，万一燕军在山上埋伏怎么办？刘裕坚持全军快速从山下过山，胸有成竹地认为：“慕容超心贪，既想掳获，又爱惜禾苗，以为我军孤军深入，不能持久，绝不会守险，也不会清野。我敢为诸君担保，不会有什么危险。”话虽这么说，北伐军的将士们都心惊胆战地通过大岷山的窄道，刘裕心底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直到全军安然走过了大岷山，不见燕兵，东晋将士欢呼雀跃。刘裕举手指天，也非常高兴。大岷山是南燕可以依赖的最重要的天险，慕容超并不加利用。他天真地以为东晋军队深入北伐，无非是刘裕为了立功，不能持久，所以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坐等刘裕上门。沿途既没有派军扼守险要，也没有抢割粮食、坚壁清野。刘裕率领北伐军越过大岷山后，离祖国很久，人人抱定死战之心，又利用沿途南燕的粮草解决军需问题，进展神速。

慕容超一计不成，就寄希望于鲜卑骑兵的优势，企图用骑兵扫荡晋军步兵。六月，南北两军在山东临朐大战。刘裕扬长避短，用4000辆车子围住步兵，分左右两翼徐徐推进。南燕骑兵被车辆阻碍，横冲直撞的优势发挥不出来。两军正僵持着，参军胡藩向刘裕献计，燕军悉数出战迎战，晋军可以乘机袭取放手空虚的临朐。刘裕采纳了建

议，命胡藩带一支奇兵绕过燕军，轻松攻取临朐。燕军主力闻讯大乱，为刘裕打败。慕容超仓皇逃回首都广固城固守。刘裕将广固团团围住，并不攻城，先着手安抚人民，就地筹集军需。

广固城被围两个月，已成困守态势。慕容超派尚书郎张纲到长安向后秦的姚兴求救。姚兴知道唇亡齿寒，南燕灭亡了，后秦就要承担所有东晋的军队压力。可要出兵救燕，姚兴有心无力。不救不行，救又不能，姚兴耍了个花招，派使者到刘裕军中恫吓：“大秦已经派10万雄兵进驻洛阳，请晋军南撤。若晋军不撤，大秦将长驱东进，联燕灭晋。”刘裕看穿了姚兴的把戏，断然回答：“我本想在灭燕之后休兵3年，然后进取关中灭秦。如今姚兴自己送上门来，再好不过。你回去让他快点过来吧！”后秦使者吓得赶紧溜走了。刘穆之听说后秦使者到，赶紧过来，慢了一步，后秦使者跑了。刘裕把对话告诉了他，刘穆之不满道：“此事重大，应该慎重考虑，怎么能如此 答复？只能激怒后秦，广固没有攻克，羌族骑兵已到，如何对付？”刘裕笑道：“兵贵神速。姚兴如果真想救援慕容超，就不会事先派遣使者通知。我看他是无力出兵，恐吓而已！”事实证明，在东晋和南燕交战期间，后秦一直按兵不动。

南燕派往后秦的使者张纲回来时被晋军抓住。刘裕让张纲站在楼车（一种攻城器械）上面，向广固城喊话：“刘勃勃大破秦军，后秦无兵相救！”南燕军民没有了外援，斗志更加低落了。义熙六年（410年）正月，被围超过半年的广固城大门洞开，部分丧失信心的官员开城迎接晋军入城。慕容超突围时被擒，被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灭亡，这是第一个被东晋灭亡的北方王朝。

南燕灭亡后，西边的后秦成了刘裕下一个目标。他并没有像恐吓后秦使者那样立刻率领得胜之师进攻后秦，而是在等待机会。后秦疆域虽广，但内部始终有匈奴刘勃勃建立的夏政权的侵蚀，有生力量不断削弱。义熙十二年（416年）二月，后秦君主姚兴去世，继位的姚泓软弱无力，国内其他民族频繁爆发反秦起义。刘裕等待的时机来

了，他留刘穆之在建康，总摄朝野政事，自己第二次亲率北府兵北伐，志在灭秦。

三

灭秦之战进展很顺利。后秦在河南地区的抵抗很薄弱，当年十月晋军前锋进逼洛阳，守将姚洸投降。洛阳是东汉、曹魏和西晋的旧都，它的光复政治意义重大。在这危急时刻，后秦内部不仅没有做到同仇敌忾，反而加速上演同室操戈的悲剧。先是姚泓的弟弟、太原公姚懿在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造反，要抢夺帝位，接着是宗室、齐公姚恢在岭北起兵，率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镇户38 000人进攻长安，也要抢夺帝位。这两人的造反都没有成功，但后秦内忧外患，不能集中全力对抗刘裕，形势越来越不妙。

第二年（417年）正月，刘裕率水军从彭城（今江苏徐州）出发，王镇恶、檀道济等率别部进逼潼关。东晋对后秦开始了总攻。潼关是关中的门户，后秦守军死守关隘，阻挡了晋军的前进。刘裕闻讯，督率水军加速逆黄河西进，增援王镇恶等人。一旦晋军云集，后秦的处境更加不妙。姚泓想到了向黄河北岸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求援。北魏灭亡后燕，截断慕容鲜卑为南北两段后，占有黄河以北大部地区，有能力也可能援助后秦。如果北魏能出兵截击逆黄河而上的刘裕水军，后秦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北魏是否出兵，成了晋秦之战的关键因素。姚泓派使者以唇亡齿寒的理由求救于北魏，要求北魏出兵；刘裕也派使者向北魏“假道”，要求北魏中立。北魏内部意见分歧，一派主张截击刘裕的水军，理由不仅有北魏和后秦唇亡齿寒，更有人怀疑刘裕表面伐秦实际想攻魏；另一派倒不怀疑刘裕想攻魏，而是认为刘裕伐秦志在必得，如果北魏出兵介入晋秦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引火烧身。北府兵久经疆场，之前灭亡了同是鲜卑政权的南燕政权，北魏的鲜卑军队能战胜北府兵吗？北魏占领华北大部时间不久，要做的内政很多，北方又在与柔然交战，实在不想和晋军硬碰硬地决

战。最后，北魏明元帝做了折中，集合十万大军部署在黄河北岸，监视晋军行进。

在战场上，折中看似明哲保身，其实是最危险的选择。不战不和，反而堵断了媾和的道路，又让自己对战争缺乏准备。刘裕发现北岸的魏军后，就立刻在战和之间做出了选择：战！逆流西进必须排除魏军的威胁，必须通过血战让北魏看到晋军灭秦的决心和能力。

四月，700名北府兵乘坐100辆战车，主动登陆北岸。这些车辆组成半圆形的阵势，两头的车辆紧靠河岸，中间的车辆（半圆形的弧顶）离岸一百多步。这阵名叫“却月阵”。大约有3万名魏军见势，包围过来。他们不知道这小股晋军为什么主动挑衅，人数悬殊，难道是来送死吗？就在魏军徘徊不前的时候，朱超石率领2000人携带大弩100张登陆。每辆车增兵20人，在车辕上竖起盾牌，掩护却月阵里的情形。每辆车都配备一张大弩。魏军判断晋军是要在北岸建立据点了，开始进攻半月阵。3万魏军一波波地冲来，又一波波地倒在弓箭面前。尸体越积越多，魏军最终还是逼近车前。晋军的大弩发射不及，朱超石就下令将长矛截断，留下三四尺长，一人执矛，一人在后面用大锤锤矛，让一根根断矛成了一枚枚巨箭，呼啸而出。由于魏军蜂拥密集，一矛射出常常刺穿三四人。魏军死伤惨重，留下更多的尸体溃退而去。朱超石乘机追击，又给予魏军杀伤。此战，晋军以极小的代价重创监视的魏军，战后魏军丧失了阻挠晋军西进的勇气，纷纷脱离与晋军的接触。

战场上重新恢复为晋军和后秦的对决。为了突破潼关天险，沈田子、傅弘之在当年七月率领1000多人的小部队从南边的武关进入关中，很快推进到现在的陕西蓝田。这支部队只是刘裕的疑兵而已，却让姚泓大为紧张。原本，姚泓纠集了数万兵马准备增援潼关。现在，他怕大军东出后被沈田子偷袭了后方。姚泓决定先带着后秦的主力军消灭沈田子等人。沈田子的小部队处境异常危险。沈田子只能险中求生，赌一把。他乘姚泓立足未定，率领1000多人主动向秦军冲锋。秦

军毫无防备，竟然被沈田子一阵冲杀打乱了阵脚，伤亡过万。姚泓狼狈逃往灞上，连自己的御驾都成了沈田子的战利品。后秦增援潼关的生力军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溃散了，真的是天不佑秦。

正面攻击潼关的刘裕、王镇恶意外听到沈田子所部的捷报，乘机猛攻潼关。晋军水军乘艨艟小船从黄河突入渭水。艨艟，三国时期就是南方水军的主要装备，船体低矮，从上面看艨艟全部被遮盖起来，行进起来像是横冲直撞的大乌龟。关中的秦兵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船，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士气更加低落，接连溃败。

八月底，突入关中的晋军与后秦最后的生力军在渭桥（今咸阳东北）决战。秦军大败，姚泓单骑逃回长安宫中。王镇恶尾追而来，长安城已经无兵可调，无人愿守了。姚泓万般无奈，准备投降。他11岁的儿子姚佛念不愿投降，登上宫墙投地而死。姚泓率其他家人至王镇恶营前投降，其堂弟姚赞等人也纷纷投降。除姚泓外，刘裕将后秦宗室全部处决。后秦灭亡。

九月，刘裕率北府军进入长安。长安是之前中国历史最重要的都城，它的光复政治意义绝不在洛阳之下。至此，两京光复，刘裕凭军力似乎扭转了五胡乱华以来汉族对少数民族的颓势。长安自316年被匈奴攻陷后，已经100多年没有见到汉家军队了。史载长安光复后，三秦父老“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刘裕的声望如日中天。他祭扫西晋皇陵，把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等送往建康。姚泓被押送建康斩首。

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为晋收复，形势对刘裕很有利。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四股力量，南燕和后秦先后覆灭，北魏刚刚被刘裕打败，赫连勃勃还在陕北游荡，刘裕完全可能扩大战果，恢复更多的故土。可惜，他志在南归代晋。刘裕的北伐还是没有摆脱立威扬名的窠臼。而经过多次血战的南方官兵们也思想南归，很少有人愿意留在北方从事政权建设。刘穆之又在这时病故，刘裕担心

后方不稳，急着在当年十二月间匆匆离开长安南下。关中百姓沿途痛哭，请求晋军不要撤退。但刘裕“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

北部的赫连勃勃乘虚而入，加上留守关中的东晋诸将又自相残杀，关中很快为匈奴人占领。刘裕灭秦，为赫连勃勃做了嫁衣裳。回到建康后，刘裕在朝廷的地位显赫无比。他接受了“相国、宋公、九锡之命”，开始篡晋。

四五、赫连勃勃大王



自从匈奴汉国和前赵覆灭后，匈奴民族长期没能再建立割据王朝，在五胡十六国中处于被其他民族奴役的地位。在今天的内蒙古和河套地区游牧着匈奴铁弗部落，酋长也以刘为姓，接受过匈奴汉国和前赵的封爵，南方的匈奴王朝覆灭后继续游牧在草原上。刘卫辰担任部落酋长的时候，这支匈奴的力量已经相当可观。强邻拓跋鲜卑与之鏖战，拓跋珪在391年大破该部匈奴，刘卫辰父子被杀，部众星散。

不过，拓跋珪没能斩草除根。刘卫辰的小儿子刘勃勃在混乱中逃脱，投奔叱干部。酋长叱干他斗伏不敢收留刘勃勃，派人把他送交拓跋鲜卑。他斗伏的侄儿阿利劝不了他斗伏，就在中途救下刘勃勃，送交后秦的高平公没奕干。没奕干简直是刘勃勃的大恩人，不仅收留了他，将他养大成人，还招他做了女婿。

刘勃勃作为一个孤儿，在其他民族的阵营中孤独地成长。再考虑到弱肉强食的大背景，刘勃勃的人格出现了偏差。一方面，刘勃勃这个孩子看待世界没有温情，人对事冷酷无情。一旦他执掌了千军万马的指挥棒，冷酷无情的性格就恶化为了残酷暴戾；另一方面，无依无靠的刘勃勃必须依靠智慧在乱世中生存下去，智商很高，可惜不是聪明而是狡黠。这些性格在一个体格强健、野心勃勃的青年人身上汇聚在一起，让刘勃勃成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分子。

《晋书》说他长大后“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

仪”。后秦皇帝姚兴很欣赏刘勃勃，深加礼敬，任命他为将军，一些军国大事都找他商量，宠遇并不比勋旧大臣差。但是姚兴的弟弟姚邕觉得刘勃勃是个危险人物，劝姚兴要防着点：“勃勃天性不仁，难以亲近。陛下宠遇太甚，臣窃惑之。”姚兴固执地认为刘勃勃有济世之才，可以用来平定天下，别人越反对他反而越看重刘勃勃，搜罗河套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部落和其父刘卫辰的残部3万人，交给刘勃勃指挥，还想让他协助岳父没奕于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同时防备拓跋鲜卑。姚邕再次劝止，指出让刘勃勃领兵很危险。姚兴反驳弟弟：“你怎么知道刘勃勃的性情不能领兵？”姚邕说：“刘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暴无亲，轻为去就。过分宠信他，恐怕终为边害。”姚兴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还是提拔刘勃勃为安北将军，封五原公，还将朔方（今陕西延安）拨给他驻扎。姚兴可谓是刘勃勃的第二个大恩人，他信任刘勃勃，让他成了一方藩镇。

刘勃勃从此有了纵横天下的资本。他很快就走上了扩军自肥、烧杀抢掠的道路。刘勃勃刚一上任，就抢劫了河西鲜卑献给姚兴的8000匹骏马，用来壮大自己。接着，刘勃勃又带上3万人马，假装去高平川打猎，对抚养自己长大的岳父没奕于发动突袭，竟然将岳父杀死，吞并了高平的部队。刘勃勃的部队一下子扩展到数万人，不过这是通过忘恩负义杀戮亲人实现的。407年，刘勃勃觉得羽毛已满，正式脱离后秦自立。他宣称匈奴是夏朝的苗裔，定国号为“夏”，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这是十六国后期的又一个匈奴割据政权。

夏国建国以后，仅有高平、朔方一隅。不过匈奴骑兵彪悍强劲、机动性强，部将们都对战胜后秦有信心，主张建都高平，与后秦争夺关中。刘勃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建都高平，将陷入与后秦漫长的拉锯战，夏秦敌众我寡，一城一地地争夺不具备优势。刘勃勃的思路是利用匈奴云骑风驰的优势，对庞大的后秦展开出其不意的骚扰，敌前我后，敌进我退，等后秦疲于奔命时再集中优势力量歼灭后秦的有生力量。他自信用此战术，不出十年岭北、河东将尽为匈奴所有。刘勃

勃的战略其实是对历史上游牧民族赖以取胜的军事思想的总结，类似于后世的运动战。没有根据地、飘忽不定的行动也让匈奴夏国长期游荡在关中北部、陇西一带，没有固定的国家形式，和一般的王朝有别。

刘勃勃的战略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以区区几万之众不断骚扰后秦北方州县，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后秦防不胜防，北方各城干脆大白天都紧闭城门。姚兴这才悔不该不听姚邕的话，可惜没有后悔药吃。刘勃勃的骚扰贯穿至后秦灭亡，极大制约了后秦的行动，消耗了后秦的国力。刘勃勃的日子过得却非常滋润，四处劫掠让他得到了充分的供给，不愁军队的吃穿用度，潇洒得很。

刘勃勃残暴的性格在战争中完全暴露了出来，给西北百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匈奴夏国每次击败敌人，杀伤动辄过万，占领的城池被抢劫一空，百姓中精壮的补充部队、其余遭到杀戮或者活埋。《晋书》中留下了诸如“坑将士四千余人，以女弱为军赏”、“杀……将士五千人，毁城而去”等等血淋淋的记载。刘勃勃的战绩虽然辉煌，却因残暴未能赢得民心（哪怕是部分地区的民心），这也是夏国不能真正建国立业，传之长远的根本原因。

在刘勃勃的游戏杀戮过程中，西北的南凉政权可算是基本上被刘勃勃消灭的。当初，刘勃勃独立建国，向南凉君主秃发傉檀求婚。南凉是西北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傉檀哪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名不见经传的后秦叛将刘勃勃，断然拒绝。刘勃勃大怒，亲率两万骑兵就杀入南凉，抢掠三百余里，驱掠27 000口、牛马羊数十万凯旋。傉檀率众追击，部将焦朗劝阻道：“刘勃勃天姿雄鹜，军队强悍，我们不能轻敌。现在匈奴人满载而归，遇到追兵会人自为战，保全战利品，我军难与争锋，不如抢在他们前头去结营阻击。”傉檀和其他将领则认为刘勃勃的部队是到处游荡的乌合之众，拿着那么多战利品，肯定不会死战，大军临之必土崩鱼溃。所以傉檀发动南凉的主力，追击刘勃勃。事实证明，焦朗对游荡骑兵的判断是正确的。速度是他们的优势，财

富是他们的目的，两者是不可分的。抢掠的财富丝毫不会降低他们的速度，反而会激发他们保卫财富的坚强斗志。结果，刘勃勃听说南凉追兵赶来，回头迎战。尽管在战斗中刘勃勃被僊檀安排的神箭手射中左臂，刘勃勃还是坚持率军大败追兵，反过来追回去八十余里路，杀伤万计，斩南凉大将十余人。刘勃勃将敌人的尸体垒起来筑为京观，取名“髑髅台”。南凉经此一败，伤了元气，从此落后于邻国北凉和西秦。没几年，僊檀投降西秦，南凉灭亡。

数年的游荡作战，形势朝着利于刘勃勃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投降后，刘勃勃以他为谋臣。夏政权开始建立完备的规章制度，寻求固定下来。于是，刘勃勃决定建造都城。413年，刘勃勃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选中一块“临广泽而带清流”、水草肥美的地方（今陕西靖边县以北约50公里）营造都城。

为了这座都城，十万各族百姓花费了数年时间。刘勃勃任命叱干阿利为负责人。阿利主要采取夯筑的方式建造城池，之前将土蒸一遍，增加坚实度。夯完一段城墙，阿利就验收一段。验收的标准是用锥子扎，如果能扎进去一寸深就认定这段城墙不合格，就要推倒重来。原来筑造这段墙的民工都会被杀死，尸体混在泥土里当建筑材料用。阿利如此残暴，却深得刘勃勃赏识，很认同他的管理方法。结果，整座都城虽然没有钢筋巨石，却造得异常坚固。一直到北宋时期还是夏州的治所，是北宋和西夏作战的堡垒之一。都城的装饰和储备的物资，也是追求刚硬。叱干阿利用铜铸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等装饰物，外表涂以黄金，排列在都城宫殿中。阿利同时负责督造兵器。造的弓箭射不穿铠甲，便斩弓箭匠；射穿了，便斩铠甲匠。他监制的“百炼钢刀”，锋利无比；制造的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背上有铭文：“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铭文豪气冲天，对自己的质量自信满满。为了追求高品质、高标准，工匠制造时稍有不合即遭杀身之祸。“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整座都城可以说是

建筑在百姓的尸骨上的。

刘勃勃认为：“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这座都城得名“统万城”。城市开始建筑的第一年，刘勃勃改姓赫连。原来的刘姓来源于西汉和亲的公主，现在刘勃勃声称子从母姓不合于礼，帝王是天的儿子，“其徽赫与天连”，所以改姓赫连。刘勃勃就变为了赫连勃勃大王。原来铁弗部落中同姓却非直裔的匈奴人则改称铁伐氏，意思是坚硬如铁锐可伐人。赫连勃勃的狂傲气焰可见一斑。

夏政权也开始占领一些领土。赫连勃勃废除州县制度，代之以城堡、军镇。某地的百姓就是某城或者某镇的军人，军民不分，以军政代替民政。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在赫连勃勃刀逼鞭打之下终于建立了。

二

赫连勃勃最大的机遇是刘裕北伐。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北伐关中，姚泓投降，后秦灭亡。赫连勃勃的战争机器在西北高原虎视眈眈，却没有南下冲入战团。

赫连勃勃的判断是后秦必然灭亡，但刘裕不会长久盘踞关中。他认为刘裕北伐不是为了光复失地，而是立威，迟早会返回南方。赫连勃勃决定趁刘裕南返再南下关中，于是他一方面与刘裕北伐军通使友好，一方面秣马厉兵，等待时机。后秦投降后，西北许多郡县都投降了赫连勃勃。夏政权的实力得以飞速增长。

赫连勃勃的判决完全正确，年末刘裕就离长安南返，留13岁的儿子刘义真守备长安。夏政权随即对争夺关中的策略进行讨论。王买德提出了一个“关门打狗”的方案，即匈奴骑兵利用速度优势，寻找占领青泥关、上洛、潼关等要塞，截断关中晋军退却的道路，然后发布檄文，号召关中各族百姓讨伐刘义真。赫连勃勃依照这个方案执行，命

儿子赫连**瑁**、赫连昌和王买德等人进占各个要点，自率大军向长安杀去。

留守关中的晋军面临被包围的噩运。不过客观来说，刘裕还是有志守住关中的。他留在关中的兵力并不弱，大多是跟随自己百战的北府精兵；辅助刘义真的沈田子、王镇恶等人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赫连勃勃想吞并关中，并非易事。在最初的接触中，晋军两次打败匈奴骑兵，迫使正面的夏军采取守势。遗憾的是，刘裕一走，留守的晋军将领起了内讧。先是沈田子杀了王镇恶，接着是刘义真的长史王脩杀了沈田子。晋军最精锐的两员大将就这白白死了。13岁的刘义真又听左右说：“王镇恶要反，所以沈田子要杀他。王脩又杀沈田子，可见王脩也要造反。”就轻率地下令杀死王脩。结果，刘义真处于无将可派的境地，晋军被动地困守各座城池。长安城人心恐慌。刘义真为了保住长安，又命令晋军向长安收缩，将兵力都挤在城里，关上城门死守。赫连勃勃顺利占领咸阳，关中其他地区纷纷投降夏政权。

刘裕得到关中败绩，召回刘义真，派大将朱龄石代替他镇守长安。

418年11月，朱龄石到达长安，刘义真率领大部晋军向东逃窜。刘裕命令他轻装而行，迅速逃离关中。可是晋军官兵带着大批辎重、子女，沿途又烧杀抢掠，毫无纪律，一天都走不了十里路。部将傅弘之劝刘义真丢弃辎重，轻装快进，刘义真不听。很快，赫连**瑁**率3万匈奴骑兵追上了逃亡的晋军。傅弘之断后，掩护刘义真逃跑。晋军边走边打，至天黑全军覆没，傅弘之等人被俘。刘义真因为跑在最前面，天黑后匈奴骑兵停止追击，才幸免于难。虽然捡了条性命，刘义真也落得个孤身一人伏在草丛里不敢吱声的下场。后来听到参军段宏在叫他的名字，到处寻找他，刘义真才从草丛里钻出来，和段宏两个人逃回南方。

刘义真的惨败，丧失了刘裕多年依靠的北府精锐，连累南方政权

的军事力量都受到削弱。本来刘裕光复两京，关中汉族百姓对他还有很高的期待。刘裕迅速离开长安南归，就让部分百姓失望了。如今刘义真率领晋军大肆掳掠，又全军覆没，更是让关中的汉人对刘裕和晋军失去了信心。民心不再思晋，很多百姓还恨透了军纪败坏的晋军。困守长安的朱龄石处境就很尴尬了。他既兵力薄弱，又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面对步步紧逼的赫连勃勃，无奈地烧毁长安宫殿，向潼关退却。赫连勃勃进占长安，一路追击，消灭了关中的最后一支晋军。朱龄石被俘，和之前被俘的傅弘之等人最后死在长安。洛阳则被拓跋鲜卑占领。刘裕北伐光复两京的战果，至此全部陨落。刘裕灭后秦，赫连勃勃成了最大的胜利者。

完全占领关中后，赫连勃勃在灊上即皇帝位。夏政权东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对峙，南与东晋对峙，成了三分天下的割据王朝，达到势力的顶峰。群臣要求定都长安，赫连勃勃认为长安离北魏太近，不肯迁都。统万城刚刚建成，赫连勃勃便退回统万城，以它为都城。

赫连勃勃的夏政权建立得有点特殊，主要是靠匈奴人的军事强权勃兴的，又抓住了刘裕北伐的失误得以占领关中。大凡一个政权建立在军事强权基础上，都长久不了。赫连勃勃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政权达到顶峰后没有整顿内政，励精图治，反而变本加厉地残暴杀戮。他常常站在统万城上，旁边放着弓和剑，看哪个行人不顺眼就亲手杀了他。对于看不顺眼的大臣，赫连勃勃毁其目；觉得取笑自己的大臣，则决其脣；如果有大臣敢进谏，赫连勃勃就说他诽谤，先截断他的舌头再砍脑袋。占领长安后，赫连勃勃召见隐士韦祖思。韦祖思见他，心里害怕，表现得毕恭毕敬。赫连勃勃却发怒了：“你见姚兴不拜，见了我为何拜？我还没死，你就不把我看做帝王，我死之后，不知你在笔头上要把我糟蹋到什么地步！”就把他杀了。人们最怕喜怒无常的暴君，很快“夷夏嚣然，人无生赖”，赫连勃勃的统治弄得天怒人怨。

奇怪的是，赫连勃勃竟然能够善终，一直到刘宋元嘉二年（425年）逝世。他死的时候，夏政权已经危机重重，呈现末世景象：内部

因为不修内政，国穷民困；外部则受到北魏政权的步步挤压。赫连勃勃死后，儿子赫连昌嗣位，第二年长安被北魏攻破，第三年统万城也被北魏攻破，第四年赫连昌也成了魏军的俘虏。赫连勃勃的小儿子赫连定继位，负隅顽抗。431年，赫连定被吐谷浑俘虏，夏亡。

四六、别把责任推给大环境

吴隐之是东晋后期著名的廉吏。在社会推崇奢华、官员普遍贪污的魏晋时代，吴隐之的存在是一个异数，证明为政廉洁与否与环境的关系不大，关键在于个人操守。

吴隐之是濮阳郡鄆城人，《晋书》在他的本传一开始就大书吴隐之青少年时代就与众不同，生活俭朴、崇尚廉洁，个人品德非常过硬。比如吴隐之每天进餐仅食豆羹，决不享用非分之粮，也不谋求来历不明的财物——吴家生活尚可，也算不上富裕。10多岁时，吴隐之的父亲死了，他和哥哥吴坦之表现得异常悲痛。之后，吴隐之对母亲极为孝顺。吴家和韩康伯为邻，韩康伯的母亲常常教育韩康伯：“你日后如果要选拔官吏，应该举荐像吴隐之这样的人。”这说明，吴隐之从小就符合朝野的道德标准，是品学兼优的好青年。反过来说，作者强调传主的个人品德，是否也赞同个人能够战胜环境呢？

后来，韩康伯做了吏部尚书，主管官员选拔，举荐吴隐之出任了辅国将军功曹，后转任征虏将军参军。大将袁真起兵反抗桓温失败后，吴隐之的哥哥吴坦之是袁真的功曹，按律要受牵连遭祸。吴隐之拜见桓温，请求代兄领罪，桓温很感动，最终放过了吴坦之。吴隐之因此得到桓温赏识，担任了尚书郎。

随着地位的上升，吴隐之罕见地保持了廉洁的本性。上级谢石（就是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那位）听说吴隐之的女儿出嫁，派人

前来帮忙。来人到了吴家，看不到一点喜庆的样子，看不到一个宾客，看不到一件嫁妆，只看到吴家的丫环牵着狗到大街去卖。原来吴隐之打算用卖狗的钱来置办女儿的嫁妆。后来，吴隐之升任晋陵太守。别人把地方实官当做捞钱自肥的好时机，吴隐之却甘于贫困。在任期间妻子自担柴草，全家人冬月没有被子盖，吴隐之没有换洗的衣服，脱下衣服清洗就只得披着棉絮。这哪里是太守，完全与贫民无异。对比魏晋时期何曾父子日食万钱，石崇与王恺斗富大赛的新闻，吴隐之绝对算得上天下廉吏第一。

任何时代都是需要廉吏的，哪怕朝政黑暗腐败到极点。因为贪腐从根本上侵犯朝廷正当利益，将国家的财富划为私有，对国家的政策阳奉阴违，过分贪腐会损害国家财力、公信力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进而影响天下安全。推出几位廉吏，让他们处理棘手的问题，就成了朝廷的反抗贪腐的利器。

出于这样的考虑，吴隐之在隆安年间（397~402）被朝廷提升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出镇南粤，成为封疆大吏。

广州环山绕海，出产珍品异物，比如象牙、珍珠和名贵药材。那里天高皇帝远，地方官贪腐的难度很小，收益却很大。只要从广州带走一箱宝物就足够几代人享用。但一般的世族子弟都不愿意去广州任职，除了大家族的家教和道德感因素外，主要是岭南地区瘴疫流行，被视为畏途。结果，去广州当官的都是在北方仕途无望，又贫寒贪婪的人，到任后多以贪财为己任，视朝廷法度为虚无。朝廷要革除广州的弊端，吴隐之就是他们的人选。

话说距离广州首府番禺二十里地的石门有一汪泉水，叫做“贪泉”。谁喝了贪泉的水，会变得贪得无厌。吴隐之来到这里，却要喝那泉水。家人和随从们拼命阻拦：朝廷正对刺史大人寄予厚望呢，可不能变得贪婪啊！吴隐之却自信地说：“人心中如果没有贪欲，就不会有

可贪的东西。人们往往越过南岭就失去了廉洁的心，我知道原因了。”（言下之意是贪污的本质在于贪欲，没有贪欲就没有贪污。）他舀来贪泉就喝了下去，还赋诗一首：“古人传说这泉水，舀来喝了贪千金。试让伯夷叔齐饮，始终不变廉洁心。”伯夷、叔齐二人是商朝末期人，周朝建立后不食周黍而死，被古人视为抱节守志的楷模。如果人人都有伯夷、叔齐那般意志，哪里还有贪腐现象？吴隐之不仅饮贪泉之水，还盛了几坛子水带着上任。一路上，家人和随从叫苦不迭。广州百姓看到穿着朴素的吴隐之一行，又看那坛坛贪泉之水，也叫苦不迭。

上任后，吴隐之廉洁奉公，依然过着以稻米、蔬菜和鱼干为食，以粗布衣衫为衣的俭朴日子。他把刺史官署备的帷帐器皿都交给府库，有人说他做作、沽名钓誉。吴隐之一笑了之，始终保持公私分明，不贪不沾的生活。有下属给他送鱼，事先剔除鱼骨留下肉，吴隐之察觉了他们的用意，竟将下属除名。在他的整个任期中，吴隐之喝着贪泉的水，坚守着廉洁的操守。

吴隐之最后遇到了卢循起义军的进攻。卢循起义军在江浙遭遇重挫后，侵入岭南，吴隐之督率将士坚守城池达百余天。最后，长子吴旷之战死，起义军攻入番禺城内，放火焚烧了民居。吴隐之携带家小逃出，打算撤回建康，结果被卢循俘虏。刘裕专门给卢循去信，索要吴隐之。吴隐之被卢循放回。归途中，吴隐之一家人除了上任时携带的物件外，只多了妻子买的一斤沉香，此外没有任何资产。吴隐之认为沉香来路不明，妻子解释说是在市面上购买的，打算拿到北方变卖赚取差价，吴隐之夺过沉香就扔到水里。可以说，吴隐之在岭南富庶之地主政多年，没有谋得任何私利。

回到朝廷后，吴隐之担任了中领军，掌握中央军队实权，日子过得却更加清贫了。京官不像地方官有专门的府邸，吴隐之的家是数亩小宅地，篱笆墙垣倾斜败坏，围着六间茅屋，连妻子儿女都容纳不下，更不用说仆人奴婢了。刘裕赠给他牛马金钱，又给他建造府邸，

吴隐之都坚辞不受。他的生活来源就是每月的俸禄。每月初领到俸禄，除了留部分用作全家人必要的吃穿用度外，吴隐之把其余的都分散救济亲族。有时吴家窘迫到极点，一天的饭全家人要两天吃。吴隐之穿着常年不变的布衣，冬天的时候要披棉被御寒。义熙八年（412年），吴隐之上书退休，第二年去世。

吴隐之没有留下太多的政绩，政治能力也有欠缺的地方，但他身处贪腐奢侈的社会中能够终身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本身就是莫大的成绩。

二

一提到魏晋，混乱是头号关键词，贪腐可能就是第二个关键词了。即便是这样，社会上依然有清廉的气息。《世说新语》提到东晋初期，临川太守周镇卸任回建康，还没上岸，丞相王导去看他。当时是夏天，一场暴雨突然降临南方，周镇的船又狭又小还漏雨，王导根本找不到坐的地方。王导感叹道：“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周镇很快被派往经济中心吴兴任太守。还有范宣也是著名的廉吏，豫章人韩某要送他一百匹绢，范宣不接受；韩某减为五十匹，范宣还是不接受；如此递减，最后减至一匹，范宣还是不接受。最后，韩某和范宣同车而行，韩某撕下两丈布来送给范宣，说：“你总不能让妻子没有衣服穿。”范宣这才笑着接受了。

之前有重要表现的荆州刺史殷仲堪也有廉洁表现，在任时遇到荆州水灾。殷仲堪每餐只吃五盘菜（和之前相比大为俭朴），也没有特别的菜肴，饭粒落到席子上，他都捡起来吃掉。在众多实权人物中，殷仲堪比较廉洁。他常常对子弟说：“不要因为出任封疆大吏，就认为我会舍弃操守。甘于清贫是每个士人的本分，怎么能够平步青云而抛弃最根本的品德和操守呢！你们要记住这个道理。”这句话道出了廉洁之人能出淤泥而不染的根本原因。

个人言行取决于内心品德和操守，和大环境没有太大关系。那些把个人罪行的归咎为大环境的人，都是在为自己推脱。

四七、桃花源只是传说



义熙末年的一个清晨，柴桑乡间的一位老农叩响了陶渊明家的柴门。他带酒来与陶渊明同饮，陶渊明欣然接受。透过从房顶和四壁漏处照进来的晨曦，老农看到陶渊明家徒四壁，无以为继，就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矮房破屋、衣衫褴褛，这样的生活不适合你陶渊明。世间之人都浑浑噩噩，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呢？）陶渊明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已诘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他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几年后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陶渊明的草舍探访。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又病又饿，卧床不起多日了。檀道济见状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现在是太平盛世，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何必自我折磨呢？）陶渊明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我的志向不在当官上。）檀道济无奈，送给陶渊明许多粮食和肉，结果还被陶渊明“挥而去之”。

在东晋南朝，陶渊明是个孤独寂寞的隐者，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树立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依然是儒家思想，但掌权者真正奉行的始终是法家思想，尤其是在九州动乱、朝廷衰微的

背景下，各派人物将现实主义政治发扬光大，法家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比如司马睿送给太子司马绍的图书礼物，不是《诗经》、《论语》或者《尚书》，而是《韩非子》。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反叛，玄学盛行，社会上以清谈为乐。玄学为许多人提供了躲避残酷现实、保持独立人格的可能。而陶渊明抛弃了这一切，不信奉任何思想学派，奉行简单、平淡、真实的隐居生活。他沉默少言，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喜欢读书和写作，却不以精通某家学问或者追求什么为目的；喜欢喝酒，就尽情喝酒。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晋书》在《陶潜传》开篇不久就引用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陶渊明的自传。如果说陶渊明的人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坚守率真、独立的人性。所以他不为务实的东晋政治所吸纳，也不为当时或宗法家或宗玄学的士人所理解。

率真、独立的人性在复杂的现实中难以保持，所以陶渊明的后半生远离了尘嚣，躬耕自资。他写了一篇《桃花源记》，来描绘他理想中那平淡、简单的生活图景：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

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从此，桃花源，一个若有若无的仙境，成了中国文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代名词。千百年来，一代代后来者或苦苦追寻或刻意营造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更有一代代崇拜者，力图证明桃花源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陶渊明的虚构。

二

陶渊明（刘宋建立后改名“陶潜”），字元亮，是东晋名臣陶侃的曾孙。在他出生时，陶家已经败落，陶渊明9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寄宿在外祖父孟嘉家里，艰难度日。

孟嘉是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陶渊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外祖父不求虚名的率真个性，也继承了外祖父酗酒的嗜好。孟家藏书很多，给陶渊明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历史上没有记载陶渊明的老师是谁，陶渊明很可能是自学成才。这就使得陶渊明的人格无拘无束地蔓延生长，开出了求真淡定的花朵。在其他入热衷“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士人从小钻研进取的两晋时代，陶渊明自由选择学习了儒家的六经，遍览了文、史、哲以及神话等闲书、异书。结果，两种思想在陶渊明身上扎下了根。一是多数学问都倡导的入世思想，陶渊明也有兼济天下、抚慰苍生的志向抱负，渴望施展才华做出一番功业

来；二是清正独立的人格根深蒂固，陶渊明正邪分明，去伪存真，不阿谀、不谄媚、不说假话、不干坏事。他要按照“正确的思路”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这样，陶渊明就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独立正直又有抱负的读书人会遭遇的难题。现实不会让你顺利地施展才华实现抱负，而是给你设置种种障碍。读书人要想成事，必须妥协让步，要么委曲求全曲线践志，要么丧失独立性在现实中随波逐流，不会让你既保持清正独立的人格又实现理想抱负。如果你不愿意如此，轻者在现实中被摔打得头破血流，重者被扫地出门无处容身。

陶渊明就属于不愿意向现实妥协的那类人。

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当时他已经29岁了。东晋门阀制度森严，世族能够二十为官，寒门缺只能三十试吏。曾祖父的成功并没有让陶渊明摆脱寒门身份，他入仕即遭人轻视。同时，陶渊明对官场冗繁无聊的生活很不适应，对官吏脱离百姓民生的工作不以为然，很快就辞职回乡了。之后，江州又召他出任主簿，他也辞谢了。隆安四年（400年），陶渊明觉得荆州刺史桓玄有所作为，跟随他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主动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不想，桓玄的有所作为是篡夺东晋的天下，陶渊明不愿意同流合污做乱臣贼子，便在第二年借母亲去世之机，挂冠而去。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叛乱，攻入建康，第二年篡位称帝。陶渊明对桓玄称帝深恨在心，思考如何报国，得知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人起兵讨桓，便马上离家，乔装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刘裕。陶渊明对此举很是得意，认为做了一件对国家百姓有利的东西。他看到刘裕主政后革新政治，作风不俗，便留在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刘裕以身作则整顿朝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陶渊明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事业归宿，和刘裕走得很近。马上，陶渊明便失望地发现刘裕的这些作为其实是在为篡位称帝做准备，于是在义熙元年（405年）去职。

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出任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令。此前的陶渊明断断续续出任了多个低级官职，都干不长，没有积蓄又酗酒，家庭生活开始出现困难。东晋的官吏有“职份田”，到任耕种，卸任归还。陶渊明到任后想在职份田上全种上酿酒用的秫谷，说：“让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不同意，要种上可以吃饭换钱的粳米。夫妻争吵的结果是一顷五十亩田种秫谷，五十亩种粳米。随着现实和理想差距日益扩大，陶渊明酗酒也越来越厉害。不过没有等到种下去的秫谷成熟，陶渊明又挂冠而去。原来追求简单真实的陶渊明上任后，有事办事，没事休息，从不和上级、同僚“联络感情”。一日，浔阳郡遣督邮来到县里，属吏告诉陶渊明应该束带正装去见。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授印去职。陶渊明的彭泽县令在任仅81天，却为他赢得了“陶彭泽”的雅号。

卸任后，陶渊明13年的仕宦生活结束，此后再未出仕。在这13年中，陶渊明一心报国利民，辗转为官又辗转失望辞职，最后绝望地发现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他那清正独立的人格留下空间。他只能选择隐居。陶渊明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公元405年的这一天，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县令，却多了一位开创文派、刷新思想的大师。

三

陶渊明辞官回到乡里，过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生活。夫人翟氏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

陶渊明很享受纯朴、简单的乡村生活，乡间没有复杂的权力纠纷、乡民不会尔虞我诈、党同伐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些平凡的乡间景象，在陶渊明笔下格外亲切温暖。陶渊明一家成了普通百姓，生活压力自然比当官的时候要重许多。40多岁的陶渊明拿起锄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

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动希望能有好的收成，真正体会到了普通百姓的辛苦。他和一起劳动的乡亲们“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日常琐事和收成好坏成了大家的共同话题。东晋南朝对百姓的剥削是很重的，尤其是大量户口荫庇在世族豪门名下，像陶渊明这样的自耕农承担了越来越重的税赋。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裕人家的田地跨州连郡，穷人家无立锥之地；富裕人家山珍海味，穷人家连米饭、稀粥都不能保证，菜肴只是粗盐腌菜而已。

归隐之初，陶渊明的生活尚可，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喜爱菊花，宅边院前遍植菊花；继续嗜酒，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饮必醉。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自便。”在最初的几年里，陶渊明劳作虽然辛苦，但还能自由地爬山、写诗、喝酒，并洒脱地处理来自官场的打扰。江州刺史王弘崇拜陶渊明，主动上门拜访，陶渊明称病不见。王弘派人侦察，得知陶渊明将游览庐山，就叫陶渊明的故人庞通之等人赍酒在半道上拦住他。陶渊明既遇酒，引酌野亭，欣然忘记了登山。王弘适时出来相见，欢宴了一整天。陶渊明没有鞋，王弘马上让左右给他编一双鞋。左右要量陶渊明的脚，他就坐在那里伸出脚来让别人量。王弘邀请陶渊明去江州，问他怎么去，陶渊明说：“我素有脚疾，以前是坐蓝舆的，现在也能走回去。”王弘就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把陶渊明抬到江州。面对王弘这样的权贵，陶渊明谈笑自若，丝毫没有羡慕、趋附权贵的意思，得到了时人的赞扬。

陶渊明的《饮酒》诗可以对他归隐的早期生活做一个总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义熙四年（408年）夏天，陶渊明那闪耀着夺目文化光辉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焚毁一空。陶家不得不迁至其他村子重新安家，此后家境每况愈下。为了养家糊口，陶渊明的劳动

强度骤然加大，可即便他终年辛劳，还是生活窘迫。如逢收成好，陶家尚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一旦遇上灾年则陷入“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的困境。最后，陶渊明可能是把宅地给卖了，全家寄居在船上。现实是如此残酷，世外桃源般的归隐生活即便能够存在一时，也不能存在一世。

到了晚年，陶渊明的生活难以为继了。据说他的儿子都是痴呆，一家人的生活始终依靠年迈的陶渊明。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乞讨和借贷。有的朋友会主动周济他，有的就需要陶渊明亲自上门乞借了。政治的打击接踵而来，420年刘裕篡夺了东晋的天下，建立了刘宋王朝。那个陶渊明曾经寄托忠诚和梦想，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的王朝不复存在了。永初三年（422年），年近花甲的陶渊明生活已近绝境，他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他长期饿着肚子，求一把菽麦都不可得。

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陶渊明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朝廷的征召，拒绝再次踏入官场，哪怕是领取一份清闲的俸禄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对困窘的生活际遇淡然置之，仍然坚持写诗，继续歌唱自然，品味田园，钟情理想中的桃花源。老朋友颜延之在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出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找他喝酒。临别，颜延之留下两万钱接济老友生活，陶渊明全部送到酒家换取久违的美酒。越是贫病交加、现实打击越重，陶渊明就越离不开酒精。

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身体不行了。九月中旬，陶渊明在清醒时给自己写了《挽歌》组诗。在第二首诗中，他自嘲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设想了死后“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蟪蛄，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的情景。在第三首诗中，陶渊明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平淡地迎接死亡的到来。冬天，陶渊明去世，享年63岁。

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南北朝不为人重视，却在几百年后获得了空前

的赞誉和如潮的掌声。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的文论《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将陶诗列为中品。唐宋之后，读书人开始发现几百年前的陶渊明是那么有代表性，那么前瞻地预示了文人的困境。他用生命营造出来的“桃花源”意境是那么美，能给人暂时的逃避和休憩，能给人无限美好的想象。于是，不管是入仕还是没有入仕，不管是得意还是失意，士人们纷纷附庸陶渊明，解读他的田园诗。因为没有文人能够逃脱现实和理想的巨大鸿沟，没有文人能从中找到两全其美之道，陶渊明的探索已然是最佳选择了，所以陶渊明始终拥有稳固的拥护者。诗仙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遥相呼应。当年李白意气风发发出川来，满心扬名天下，结果接连受到打击，不得不醉情山水、诗文和美酒，最终在古江州附近赴水捞月而去；王维20岁高中状元，名扬四海，本想成就伟业，结果在中下级官僚序列中徘徊，最后归隐终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辛弃疾壮怀激烈，少年戎马南北，中年久经前线，却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终将陶渊明引为知己，在《念奴娇》中盛赞“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最终陶渊明成了一类文人的典范，成了中国历史的特殊符号。

四八、魏晋风骨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却是知识分子性情张扬、风范永存的盛世。

知识分子的张扬与活跃，似乎与王朝权威的稳固程度成反比。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巩固、皇权显赫的时代，知识分子循规蹈矩，没有太出彩之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清民初等大动乱时期，知识分子东奔西走，或呐喊鼓吹，或叩问内心，反而留下了不朽的绚烂篇章。

对个人内心压制最重的障碍并非来自学问高低、家境贫富、眼界宽窄，而来自于政治权力，肇源于朝堂之上的权威。中国古代王朝要维持统治，总要推行统一的思想说教，客观上剥夺了知识分子海阔天空思考的可能。强大的中央权威配合对知识分子的垄断，让社会尽量保持一个声音。而魏晋时代，先是三国分立，然后是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恰恰是中央权威最低落的时期，为知识分子的张扬活跃提供了可能。这个时期，虽然儒学在官方的支持下，仍以经学的形式延续着，但受到了玄学和西域传入的佛学的挑战。人们的思想多元化了。知识分子自由思考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实政治的黑暗。从曹魏初年开始，忠孝仁义的说教只停留在人们的口耳之间，就连说教者本人都不信奉。魏晋都以“禅让”形式登基，统治阶层贪腐堕落，朝政黑暗，哪有忠孝道德可言。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反抗，老庄思想和玄学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后人往往以“魏晋风骨”（或者“魏晋风流”、“魏晋风度”等词）来形容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进而指代那个思想活跃、自由奔放的年代。我们可以从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威的关系角度入手，认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二

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要思想自由，难以避开的问题就是要和政治权威保持距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知识分子要生存、毕竟人的一生很难逃避官府的骚扰。但是，人们可以在思想上和政治权威保持平行，不阿谀不攀附，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从东汉末年开，正直的知识分子就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管宁和华歆，年轻时同席读书。一次，有乘坐官车的显赫人物从门外经过，管宁岿然不动，照样读书，华歆则丢下书本跑去观看。管宁于是割断坐席，和华歆拉开距离说：“你不是我志趣相投的朋友。”果然后来华歆成了逼汉献帝禅位的曹魏开国大臣，为世人鄙夷；而管宁隐居辽东，教书育人，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赞同。只要与权威拉开距离，知识分子才能客观地看待政治，观察社会，自由地思考。

思想和权威的平行姿态，逐渐塑造了一批刚正、耿直的魏晋文人，他们对权力做到了不卑不亢，敢于坚持自我、维护自身的利益。

东吴末年，吴主孙皓暴戾无常，动辄大开杀戮。一次在朝堂大会上，孙皓突然问大臣诸葛靚：“卿字仲思，为何所思？”诸葛靚正色说：“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此而已。”这里说的忠孝、诚信都是正直高尚的人应该具备的，可惜孙皓并不具备。诸葛靚敢于当面指出孙皓的缺点，可谓胆大。诸葛靚是曹魏叛将诸葛诞的儿子。诸葛诞割据扬州反抗司马家族篡位，派诸葛靚入吴求援，失败后诸葛靚就留在了东吴。东吴灭亡后，诸葛靚迁徙到洛阳居住，拒绝晋朝的委任，一直没出来当官。他 因为与晋室有仇，常常背洛水而坐。其

实，他和晋武帝司马炎是发小，感情很深，如果想当官机会是很多的。后来，司马炎想见见诸葛靓这个老朋友，就通过诸葛太妃来招呼诸葛靓进宫（诸葛太妃是诸葛靓的姐妹，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伷）。诸葛靓入宫，和诸葛太妃相见，司马炎突然闯了进来，拉着诸葛靓饮酒叙旧。酒酣，司马炎问道：“你还记得我俩当年竹马之好不？”对一般人来说，皇帝亲口提及当年的情谊，是多大的恩典啊！诸葛靓却说：“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这里的“吞炭漆身”说的是战国刺客豫让的故事。豫让受知于智伯。韩赵魏三家合力攻杀智伯，豫让为报知遇之恩，矢志复仇，于是漆身毁容、吞炭改变声音，伺机刺杀赵襄子，事败而死。诸葛靓则念念不忘司马家的杀父之仇，说完这话涕泪交加，悲恸不已。司马炎脸上无光，赶紧退场。出宫后，诸葛靓都以见到司马炎为耻辱和人生的污点。

这是对待皇帝的例子，还有许多对待权臣的例子。东晋王导征召王述做属官。议事的时候，王导每次讲完话，下级官员纷纷争着赞扬王导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表示要贯彻落实好王导的意思，现场充满阿谀奉承之风。王述职位低微，只能坐在末尾，却说：“丞相又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正确呢？”这样的认识，想必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王述那样的勇气。琅琊王家的王含担任庐江太守期间，以贪浊闻名，声名狼藉。其弟王敦是掌握天下一半兵权的枭雄，为哥哥王含护短，一次当众说：“家兄在庐江政绩卓著，庐江官民交口称颂家兄！”王敦的主簿何充马上正色说：“我就是庐江人，听到的事情恰恰相反！”此语一出，在座的人都为何充捏了一把汗，何充神意自若，没有丝毫惧意。

最幽默的一个段子是裴楷创造的。裴楷是西晋的名士兼大臣。晋武帝一次曾在朝堂上自信满满地问：天下人怎么评论我啊？裴楷马上回答：“陛下肯定不能与尧舜相比，因为朝中有贾充这样的人在！”贾充是司马炎的宠臣，贾南风的父亲，更是天下皆知的佞臣。裴楷的正直和胆量可见一斑，梁王、赵王是皇帝的近亲，烜赫一时，封地富

庶。裴楷每年都向两位王爷借钱，且金额巨大，动辄几百万。借到钱后，裴楷都用来救济贫寒的亲戚故友，绝口不提还钱的事情。有人笑他：“你怎么能靠骗钱来施恩惠呢？”裴楷则说：“我这是在劫富济贫啊。”梁王和赵王都拿他没办法。

三

魏晋文人对政治权威的超脱，便利了个性无拘无束地发展。自由的思想海阔天空地驰骋，再配合老庄学说的自然无为，文人们言行、生活纷纷回归了从容、淡定、自然的原始。魏晋可能是文人在思想上最放松、自然的时期——有人说南宋是文人的天堂，可能在生活的安定上南宋时期超过了魏晋，但在思想自由度上南宋绝对逊于魏晋。魏晋文人头脑中去掉了许多枷锁，身上少了许多约束，人际关系也趋向自然。

东晋时，王徽之担任桓冲的参军，桓冲死后王徽之转赴建康任黄门侍郎。他在建康郊区遇到了从建康启程赴江州去当刺史的桓伊。王徽之早就听说桓伊善吹笛，“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只是没有听过。他马上停船吩咐下人：“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下人吓了一跳：桓伊出身桓氏望族，是淝水之战的大功臣，又是新任的江州刺史，家族门第并不逊于王徽之的琅琊王家，但声望、地位远高于王徽之。你让他为你吹笛，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啊？下人硬着头皮去传话了。谁想，桓伊听说有人想听笛，随即叫停车驾，下车，布置胡床，拿出笛子吹了起来（据说吹的是《梅花三弄》）。吹罢，桓伊上车而去，王徽之继续行船，客主不交一言。

魏晋时期的家庭关系也比较直接、自然，不像后世那般繁琐多礼。晋武帝时期参与灭吴的王浑，出身太原王氏，娶了著名书法家钟繇的曾孙女钟琰为妻。一次，王浑与钟氏共坐，看到儿子王济从庭前经过。王浑欣慰地对妻子说：“我们生下了这样的儿子，足慰人

意！”钟琰却笑道：“如果我当初嫁给了你弟弟王伦，生下的儿子肯定比我们儿子更优秀！”此话一出，夫妻俩并没有反目，还是相敬如宾。又比如，荀彧的儿子荀彧和妻子感情深厚。冬天，妻子发烧生病了，荀彧就跑到庭院中把自己冻冰了，然后回到房内用身体给妻子降温。妻子死了，荀彧悲哀过度，不久也死了。荀彧生前解释过自己为什么深爱妻子：“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意思是自己的妻子是大美人，自己更看重女子的外貌而非品德。古代历史讲求“妇德”，给妇女加上层层枷锁，用所谓的“德”来抹杀女性本身的风韵魅力，束缚妇女追求美貌、男子热衷美色的权利，荀彧的话一针见血，强调了男女关系的应有之义。它的意义在此。裴楷就评价道：“荀彧这句话是情之所至所说的，并非盛德之言，希望后人不要理解错了此话。”

对于厌恶的人和事，魏晋时期的人也不需要虚伪地掩饰，可以爱憎分明地表达出来。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中书令。惯例是，监令同车往来。和峤性情文雅、正直，对荀勖的谄谀奉承非常厌恶。每次公车来了，和峤就抢先上车，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坐两个人的座位，不让荀勖上车。荀勖只能再找车。历朝历代的人，做到了达官显贵的层次，几乎都修炼得圆滑得很，不要说跟厌恶的人同车而行，就是和敌人——称兄道弟也大有人大。只有在魏晋，道不同，不同车而行。从此开始，晋朝对朝廷的监、令各给专车。

魏晋文人天性自然，敢作敢为的典型例子发生在王粲的葬礼上。王粲生前最喜欢听驴叫，司马昭参加了他的葬礼，对吊唁的人说：“王粲最好驴鸣，我们可各作一声以送之。”来客纷纷响应，大家都学驴叫来给王粲送行。

四

与个人的魏晋风骨相伴随的是那个时代宽容的社会氛围。宽容的氛围，不知道是“魏晋风骨”的表现，还是它的原因。人们很难说清

楚，到底是魏晋风骨带动了社会氛围的宽容，还是宽容促成了文人的自由、正直和洒脱。

西晋时曾任尚书令的乐广看到当时清谈风气兴起，人人谈玄学，还有的人以任放为达，甚至裸体见人，虽然不认同不支持，但也没有利用权力进行打压。乐广留下了一句名言，足可以反映魏晋时期的宽容。他说：“名教中自有吸引人的乐趣，何必去追求放达和裸露呢？”人各有志，有人爱熊掌鱼翅，有人爱青菜萝卜，不必强求统一。嵇康在玄学中得到快乐，乐广在名教中获得乐趣，那么就各干各的吧。尽管魏晋时期也出现过杀害嵇康之类扼杀思想自由、破坏社会宽容的恶性事件，魏晋文人的思想并非完全的自由，但镇压毕竟是少数，是小时段的事件。司马昭杀害嵇康不久就感到后悔了，杀戮一个对政权没有直接危害的清谈者却激起了文人集团和政权的直接对立，得不偿失。同样，王导、王敦等大权在握的人，对公然顶撞、出言不逊的王述、何充等人，心里肯定不舒服，可也能做到默然以对，不去打击报复。因此，魏晋社会总体非常宽容，政治权力很少打压思想自由。

谢无奕的性格非常粗暴，一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恶语相向。王述和他有几件事不合，谢无奕就跑到衙门去，冲着王述大吼大叫。王述正色面壁不敢动。大半天后谢无奕走了，王述才转头问左右的小吏：“走了没？”回答：“已去。”王述这才重新回到座位坐着，继续办公。

最典型体现社会宽容的是司马睿的例子。司马睿庆祝皇子诞生，普赐群臣。大臣殷洪领了赏，谢主隆恩，然后谦虚了一句：“皇子诞育，普天同庆。微臣在这件事情上没什么功劳，愧受厚赏。”司马睿笑着回答：“生皇子这种事情，怎么能让爱卿立下功劳呢？”一来一往，殷洪无意，司马睿幽默。便是在开明盛世，这样的段子也极少会在君臣之间出现吧？

魏晋时期，文人的绝妙表现还有很多，留下了无数闪光的言行。

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广招文学之士，搜罗材料，润色整饰，编撰了《世说新语》。这本书为后人保留了魏晋风骨的绝佳素材。其中自由、正直、宽容的魅力，吸引着后来者不断翻看这本书。书中的文人盛事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没有出现，在之后的隋唐两宋元明清更不可能出现了，正因为独特，才具有重要的欣赏和参考价值。

四九、行政区划上的较量

两晋衔接期间，大批官民逃难到南方去，南方的司马睿势力百废待兴，问题重重。作为对诸多问题的回应，东晋王朝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政区制度：侨置郡县。

侨置郡县的起因很复杂。北方大乱，大批老百姓携家带小，举家甚至全族往南方逃难。逃难百姓的规模很大，北方各州都有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人口迁出，拥向南方。估计在两晋衔接期间南逃的人口占北方户口登记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如何安置如此众多背井离乡的百姓，成了摆在司马睿等人面前的一大难题。

我们知道，中国人是最重乡土观念的。古代人多数一辈子都生活在本乡本土，流动性很小。他们的经济收入、人际网络、悲欢离合和祖宗坟墓都在故乡，如果没有实在扛不过去的困难是不会离乡逃难的。而一旦难民潮涌动起来，问题就层出不穷。逃难的百姓等于抛弃了家产和收入，与过去的经济和社会网络一刀两断了，他们靠什么生活？逃难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吃穿的问题？遇到困难，比如生病、兵火，找谁依靠？逃难过程中，难民如何处理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引发纷争。两晋衔接期间的战乱有两大叛乱势力，除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就是各地风起云涌的流民武装——王弥、石勒等人的主要武装力量其实就是北方的汉族难民。司马睿之所以能在南方站稳脚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依靠王敦、陶侃等人镇压了南方的多支流民武装，稳定了局势。可南渡的难民越来越多，

总不能全部采取镇压的态度吧！

紧随着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朝廷不妥善处理好流民问题，流民群体中的梟雄、大族甚至个别野心家就会抢先把流民组织起来，为自己所用。难民流动的时候，遇到问题和纠纷需要强有力的人物出来主持解决。这些人物一般是原来居住地的豪门大族，也有部分是能力出众的强人。他们就成了流民组织的领袖，东晋初期的祖逖、苏峻等人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他们一旦拥有了组织，就会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这一点也是朝廷不乐意看到的。

因此，东晋王朝采取的方法是专门划出南方的土地来，安置流民。安置的目的是，即便不能让流民在南方安居乐业，最起码能让流民有饭吃、不揭竿而起。最初简单的安置行动，后来掺杂进来了朝廷和贵族高官们的政治目的，发展成为侨置州县。

朝廷有什么政治目的呢？东晋王朝以天下正统自居，却偏居一隅，失去了对天下主要领土的控制，地位非常尴尬。司马家族唯一可以炫耀的就是王朝正朔，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天下共主。但这个标准太主观了，刘渊就说我是汉朝的外甥，我的祖先也曾是天下共主；赫连勃勃更绝，说我是夏朝大禹的后裔，我的祖先统治天下比你们更早。因此，客观的领土大小，尤其是谁占领着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原、两京，就成了谁是天下正统的重要标准。先后占领中原的两赵、两秦、燕国等统统不承认东晋是天下正朔，蔑称东晋是“司马家儿”、“岛夷”、“南国”。东晋因此要延续天下共主的架子，起码在形式上要维系对失地的“统治”，就想到了在安置北方南下流民的同时“恢复”北方的政权形式：我有北方的百姓、有政权形式，我还可以对北方领土宣示主权。于是，东晋划出一块南方的土地安置幽州流民，就恢复幽州的郡县名称；安置山东流民，就用原来的山东郡县来称呼本地。这些州、郡、县因为不是本土，所以被称为侨州、侨郡、侨县。

对于北方政权新立或改名的州、郡、县，南方绝不侨置或沿用旧

名，表明对北方政权的否定。

除了宣示正统和主权外，侨置州县还可以和北方政权争夺人口。北方政权一般得不到汉族百姓的认可。当汉人知道南方有同乡重建了故乡的郡县，那里有乡音、乡俗和故乡的街巷里弄时，他们很自然愿意逃离北方政权的统治，投奔东晋侨置的州县。侨置州县在实践中吸引了许多人口持续南渡，增强了东晋的实力，弱化了北方政权的力量。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人口可是决定国力的关键因素，重要性并不亚于领土。在这个较量中，东晋占据着优势。

高官显贵们又有什么政治目的呢？东晋朝廷的掌权阶层是北方南渡的世族豪门。他们以门第相互标榜，门第和政治地位直接挂钩：出身豪门的子弟垄断高官，普通人家的子弟只能在中低级职位上徘徊。而地望是表明门第贵贱的主要标准。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南渡的北方豪门们起初也很尴尬，比如，琅琊王氏失去了“琅琊”还算是琅琊的王氏吗？陈郡谢氏离开了“陈郡”又如何保证家族的门第纯洁？因为郡望和政治利益紧密相关，南渡世族们还以沦陷的旧地名自称。安置流民的同时，恢复旧式的政权，符合南渡世族的利益。他们热衷推动侨置州县的建立。

凡此种种，就是东晋侨置州县的特殊背景。司马睿南迁时，琅琊百姓随司马睿过江的有1000多家。太兴三年（320年），司马睿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流民。晋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335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60里）境内侨立琅琊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琊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琅琊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琊郡也侨立临沂县（还是在江乘界内）。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

有人将侨置州县的历史推前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时候。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酈邑（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东北）建城，城社、

街庭、居家都模仿故乡丰县，并真的迁徙丰县百姓居住其中。刘邦这么做的原因是他的父亲刘太公不习惯长安的环境，想念故乡，为了解决老父亲的思乡之情，刘邦干脆在关中造了一个新丰县。三年后刘太公死了，酈邑干脆更名“新丰”。此后，西汉、东汉西北、东北边界不断变化，为了安置撤退的边民，也常常在边界侨置郡县。不过乔治郡县成规模、制度化，还是在东晋。

二

口子一开，“一时侨州至十数，侨郡至百，侨县至数百”。东晋在名义上还拥有对天下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侨置州县制度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利弊并存。

首先，州县的侨置和流民人口的多少直接相关。北方百姓南逃的大致情况是离江南比较近的黄河南岸百姓南迁比较多、黄河以北和西北地区的百姓逃到江南的不多。侨置之初，东晋设置了各州政权，后来因为幽州（今河北北部、京津一带）、冀州（今河北大部 and 河南北部一带）流寓江南人口较少，废除了这两个侨州。而兖州、豫州、徐州诸州（都在今河南、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南渡的流民较多，州级监制始终存在。具体到郡县，情况也类似，流民较多的地区，侨置政权比较完备。

其次，侨置州县的名称、隶属关系越来越复杂。南北都有琅琊郡，怎么区别呢？最常用的方法是在南方的琅琊郡前加一个“南”字，以示区别，比如“南琅琊”、“南徐州”等。后来东晋北伐，一度收复了青、兖、徐、豫、司、雍等州，就在新收复郡县上加“北”字，以资区别。侨置的西北、四川地区的郡县，则互加“东”、“西”以示区别，比如“东冯翊”、“东弘农”等。这还算是侨置州县最简单的冠名法，至于一郡一县百姓侨寄数处，分别设置州县；又比如郡县沦陷，于是侨置，后经收复，又再沦陷，反复侨置；再比如北方州县因为百姓逃难

已经被取消、合并或重新组成，原郡县无处可觅，南方侨置郡县依然存在，等等。州县名字只能越来越复杂。隶属关系就更复杂了。侨置郡县分散在原来南方各郡县内部（往往是南方某地侨置了东南西北数个地名），不可能像原来那样隶属，于是就出现了有的侨置郡县隶属南方州郡管辖，有的南方郡县属于侨置州县管辖；有的侨置郡县虽然还照搬原来的隶属关系，但管辖的郡县分处多块“飞地”；有的侨置州郡下辖郡县，并非原来郡县，而是其他州郡侨置的。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标准举个例子：“南山东省”管辖“南青岛”、“南威海”、“南泰安”、“东宝鸡”四个地方，其中“南青岛”位于江西，“南威海”、“南泰安”和“东宝鸡”位于福建，而“南山东省”的治所却在江苏。而朝廷又把浙江的嘉兴、湖州两个南方原来的政区要划归“南山东省”管辖。这是不是人为制造了行政区划的混乱？然而，出于政治和现实利益的考虑，侨置政区日渐纷乱又迫不得已。

第三，侨置州县和南方州县、侨置流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日渐激烈。侨置州县的本意是借土寄寓。南方郡县的土地被拆分，自然心有不忍。随着行政区划日渐纷乱复杂，侨州郡县分割南方州郡县的实土越来越严重，部分南方郡县还改隶于侨州郡者。部分北方强盛世族“反客为主”，甚至裁撤南方郡县来侨置自己的乡土故郡。这些难免不引发南方郡县的反感。而为了安置和吸引流民，东晋对侨置郡县的百姓另行登记，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称为“白籍”，不算正式编户，不承担国家调役。南方土著人口却要承担越来越重的税赋和徭役，土著和侨人的关系也开始恶化。随着土著居民的躲避和世族大家侵吞人口，朝廷能控制的户籍人口越来越少。因此，东晋出现了多次“土断”：清查户口，将侨人改变为编户，承担国家赋役。流民在南方定居多年，事实上和土著居民差别越来越少，所以土断成果不错。东晋朝廷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财阜国丰”。土著居民和侨人的关系也得到了调和。但因为部分侨人的反对和世族大家的阻挠，也因为陆续有新的北方流民南下，东晋历次土断都不彻底。之后的南朝还要面临侨人和土著居民的户籍问题。

最后，侨置州县制度为南方带来了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遭到了北方的激烈反对。北方人南渡，带来了北方相对高级的农业技术，南方的灌溉、蓄水、防洪、运河等水利工程不断修筑，富源不断得到开发，江南的经济实力趋向强盛。这为隋唐以后，中国经济中心移到江南奠定了基础。相对地，南方的强盛就是北方的衰落。北方政权对东晋南朝自恃正统、侨置州郡县、吸引百姓的做法极为反感。《魏书·韩显宗传》：“显宗上言：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疑惑书记，错乱区宇，非所谓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谓也。”韩显宗的上书，指出了南方政权打肿脸充胖子、政区纷乱复杂等问题，也验证了侨置州县的客观效果对北方影响很大。北方政权也在边界地区侨置南方州县，想吸引南方百姓北逃，可惜效果很不理想。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口大致上是从北向南移动的。

侨置州县越来越多，造成政区繁杂，导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隋朝统一南北后，开始重新划定政区，大举并省州县，并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这才彻底根除掉侨置州县问题。

三

最后说一下魏晋时期各国的疆域问题。

首先，各国疆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经常变化，我们只能指出它们大致的疆域所在，而做不到精确的表述。三国时期，曹魏和吴蜀基本上沿着淮河、秦岭一线对峙，其中曹魏在中部突出到现在的湖北中部一带；而东吴和蜀汉基本沿着现在的三峡、贵州东部、广西西部一带对峙。东晋和北方对峙时期，南北分界线变化无常，极是复杂，大致上是沿着淮河、秦岭一线南北移动，最南移动到长江沿线，最北推进到现在的黄河北岸。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历代，比较稳定的疆域范围，北抵淮南、江北，东及东海，南达南海兼有交趾。比较特殊的是

巴蜀和汉中地区，先是被成汉占领，后为东晋收复；后来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继为东晋叛乱的地方官谯纵割据，到东晋末年被重新收复。南方疆域最大的时期是东晋末年刘裕北伐时期。刘裕平南燕、灭后秦，收复山东、关中等地，使得东晋疆域北抵黄河，西到陇西，范围之大不仅居东晋之首，而且为东晋南朝270余年间所仅见。不过这一盛况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关中很快沦陷，河南、淮北也逐渐为北魏所侵夺。到南朝时，南方疆域又恢复到东晋原有的版图。

其次，在军事对峙上，北方占据优势，南方基本采取守势。从东吴到东晋，再到之后的宋齐梁陈都是如此。南朝对北方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力求发挥水师和水战的优势，对抗北方骑兵。（当年赤壁大战，南方就是如此取胜的。）因为经济和武备南方均弱于北方，南方政权高度重视防守，高筑墙、广积粮，修建了一系列军事重镇。寿阳、合肥、历阳、广陵、京口、襄阳、樊城、武昌、浔阳等城市的兴起，都是出于军事的需要，驻扎着南方军队的主力。比较特殊的还是四川地区。四川地区在地势上处于江南和两湖的上游，俯视后者，更要命的是分割了南方的长江天险。所以，灭南方者必先夺取四川（比如西晋灭吴），守南方者必先寻求保全四川（比如东晋历次都是先收复四川，才能北伐成功）。

五〇、魏晋人怎么过日子



魏晋时期的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东西？魏晋时代社会风俗如何，他们过春节吗？魏晋人的生活负担如何？他们读书写字吗，又用什么写字呢？

这些都涉及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讨论魏晋人的生活，必须分清两个断层：因为南北分裂局面的存在，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生活是不同的；又因为社会分等级，贫富和权力差距巨大，贵族和普通百姓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

贵族们引领了魏晋豪奢的社会风气。几万钱吃一顿饭还觉得没有下筷子的地方，杀一头牛就为了尝一口牛心的味道，熏衣粉面走路都需要佣人扶持，这些都是典型的贵族生活场景。魏晋盛行厚葬，富人陪葬品丰厚，客观上也主张了盗墓的风气。乱世中枭雄特别喜欢盗掘魏晋坟墓，不知道魏晋贵族们知道后做何感想？石崇的斗富、王济的金沟，后人大可以批评他们的浪费，批评他们豪奢误国。魏晋贵族阶层发展为门阀世族后，都非常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日常言行务求文雅，喜欢以玄学清谈和诗文唱和，其中固然有矫情和寄生的成分在，但客观上推动了魏晋文化的发展。门阀世族掌握的文化是魏晋社会的支柱内容。

琅琊王氏子弟王筠曾说：“世传安平崔氏、汝南应氏等家族相继以文采著称，可他们不过传了二三世而已，不想我们王家一样七代以来

人人有文集，文化昌盛。”王家七家人的文集肯定有水分在其中，可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来门阀世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比如世族颜之推就提醒世族子弟们不要放松了文化学习：“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的观念颇具代表性，世族们认为文化层次的高低也是区别豪族和寒门的一大标准，维持门第的一大利器。魏晋的世族子弟都具备相当的文化层次，使得书声在乱世中朗朗不绝。玄学的发展带动了思想的活跃和进步，这也得感谢世族文化。如果不是一群衣食无忧的人，谁还会整天清谈？尽管清谈于时局和现实事务无补，谈话者却谈出了境界，活出了精神。比如同样是酗酒，刘伶喝醉了就能说出“死便掘地以埋”的话来。而同样是喝水，晋代的士人就知道把水烧开了然后加上南方的茶叶泡茶喝。喝茶开始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南方的制茶业也因此发展。

世族子弟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读书、会客、清谈、酗酒、喝茶，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之有天壤之别，够得上“悲惨”标准。

门阀世族的富庶豪奢并不代表魏晋整个时代的富裕，事实上魏晋因为战乱，总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贫困时期。两汉已经相当发达的货币贸易退化为了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战乱直接影响到商业衰落，土地荒芜，百姓困苦，以实物交换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兴起，成为魏晋时期经济形态的主流。用来当做货币的实物，以谷米麦粟等农产品以及绢布绫绵等布帛为主。也就是说，魏晋时期的普通人不知道货币为何物。他们计算家产和税负的标准是：张三的家产值几头牛？李四的田地今年能收多少石麦子？我到秋天应该交给官府多少匹绢？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正式颁布以实物纳租缴税的法令，为魏晋南北朝的租税制度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的男子，从16岁到60为“正丁”，都需要交纳赋税，两端的年龄为“次丁”，部分项目可以减半。女子出嫁者为丁，没有出嫁以20岁为界限，都要像正丁一样缴税服役。而两晋的税赋项目特别繁多，非常苛刻。最要命的是，税赋没

有成文的规定。凡是军国大事所需物品，或者是地方上出产的特产，都有可能成为朝廷征收的对象。也就是说，老百姓生活在没有压迫标准的环境中，随时都可能被官府盘剥压榨。

普遍的贫困导致了贸易的萎缩，依赖贸易成长起来的城市规模都不大。北方最主要的城市是洛阳。洛阳作为魏晋的都城，虽然多次被战乱毁坏，但因为是黄河南北贸易以及西域和中原贸易的主要场所，很快得到了恢复，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最大的都市；南方最大的都市是建康，因为它既是东吴、东晋和南朝四代的首都，又坐落在江南经济区域的中心。其他比较大的都市，多数是军事重镇，因为驻军或者屯田而发展起来的。典型的比如南北拉锯地带的襄阳、寿阳、广陵等城市。又比如山东的广固，建立的时间很短，因为山东各地遭战乱反复扫荡一片废墟，竟然迅速崛起为山东的大都市。而这个大都市的人口始终只有几万人。由此可见战乱和贫困，制约了魏晋时期城市的发展。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口极少，几乎都是军人、官吏、贵族和为他们服务的奴仆、工匠等。

有限的贸易集市也被官府牢牢把握。贪官污吏争相担任“司市”的官职，从中营私舞弊，常常向老百姓强买强卖，甚至抢劫货物而不给钱。大富豪石崇就是靠抢劫商户发达起来的。

老百姓不堪负担，或卖妻卖儿，或逃入江湖山谷采草叶为食。编户大量逃亡，朝廷控制的人口持续减少，在编百姓负担越来越重。整个社会不太稳定。

如果一个人是汉族人，他是生在北方比较幸福呢，还是生在南方比较惬意？各有各的忧虑和好处。南方百姓负担非常重，且社会层级越来越僵化，门阀世族垄断政权，社会流动性很差。但好处是南方的政权相对北方来说要稳定得多，上层的争权夺利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下层老百姓的生活。北方百姓的负担比南方同胞要轻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政权更迭拉锯频繁，官府统治相对薄弱；另一方面因为是北

方政权普遍不信任汉族人，军队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不武装汉族人，这就让多数汉族人不用服兵役了。当然了，生活在北方最大的坏处是战争太频繁，生命得不到保障。北方出现了许多汉族人的坞堡，大家聚集在本地豪族或者强力人物周围，建立武装村落集中生活，在堡垒周围耕种，遇到战乱就自我武装起来自卫。坞堡的武装效果很明显，少数民族政权对这些自卫村落相对客气，不时还笼络坞堡的头面人物当官。

生活在北方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有机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因为反复战乱，北方政权取得大量无主的荒地和弃田，没收为国有，奖励或者分配给流民耕作。南方的自耕农数量大大小于北方，因为南方土地归属比较固定。即便是政府划出来安置流民的侨置州县，土地也是国有，只是出租给流民耕种而已。

南北在饮食上也很不同。北方人的粮食以豆麦为主，多用来做饼；南方人则以大米为主，多用来做米饭或者粥。不论南北，平民基本没有佐餐菜肴，能以盐泡菜佐餐就不错了。肉食在魏晋普通人家的餐桌上极为罕见。北方畜牧业比南方发达（战乱使许多旧时的农田变成了牧场），北方人的肉食比南方人多，以牛羊为主。南方人的肉食以鹅鸭鸡鱼为主，另外猪也成了南方人的肉食对象之一。

南北在穿戴上也很不同，大致是北方胡化严重，南方基本保留汉族的峨冠博带。不过南北的布料多数都是麻布。在日常用品中，低矮的胡床出现，开始改变汉族人席地而坐的做派。纸张在魏晋得到大发展，麻纸的产量很高。到南北朝时候，纸张代替了竹简，成为日常文书的主要工具。

总之，不论是生活在南方还是北方，除了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阶层外，人们的生活既贫苦又悲惨。

魏晋风俗的鲜明特点是节日增多，人们在节日庆祝上增加了浓厚的喜庆、快乐和自我陶醉。毕竟现实社会非常残酷，战争和贫困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人们开始在现实之外寻找寄托。节日就成了百姓寻找精神寄托的载体之一。（另一大载体是宗教，佛教在魏晋时期开始传入并得到发展，留待南北朝一书再细说。）

节日可以为人提供精神放纵和寻找快乐的机会。庆祝节日时的短暂欢娱，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平衡，求得心理上的补偿。一年之中，春节是南北方最隆重的节日，祭神、敬天等活动始终不变。接着就是元宵节，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三月三日江南要过上巳节，除了祭祀祈求驱灾避祸之外，陆续发展为河畔嬉戏、男女相会、江边洗濯、赏花观水等活动。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过“修契节”。接着就是清明、端午、乞巧（七夕）、重阳、腊日、除夕等。这些节日发展到魏晋时期，被加入了许多内容，有的干脆转变了节日方向。

比如魏晋时，男子加冠礼开始用音乐伴奏。又比如魏晋时期开始盛行“抓周”礼，婴孩满周岁的时候由长者给他戴长命锁或平安福等，祈求宝宝长命百岁，此生幸福，并且摆出许多物件让婴孩去选，以此来预测他的前途和性情。再比如滥觞于史前的雉仪，原本是四季驱邪逐疫的仪式，到魏晋时发展为雉戏，仪式中加入了娱乐成分，出现了乐人扮演的神主、神兽等角色。

最典型的喜庆例子就是端午节真正作为一个节日，是在魏晋时期奠定的。魏晋以前，五月初五这一天被视为带着神秘恐怖气氛的日子。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 is 恶日，相传这天邪佞当道，五毒并出。东晋末年的名将王镇恶就是因为是五月初五生的，家人竟然不想要这个孩子，要把他送人。所以，五月初五当天，人们都

要避邪、驱毒，没有与屈原联系起来，更没有娱乐和喜庆色彩。魏晋时期，五月初五开始被称为端午。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述魏晋端午节的习俗：“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于户上，以禳毒气……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鸪鸽，教之语。”可见当时端午已经发展出丰富的习俗，包括：踏百草、采艾叶做成人形悬于门户以禳除毒气、用菖蒲做菖蒲酒、龙舟竞渡、采药等。这些习俗由避邪、驱毒发展而来，又明显加入了游玩娱乐色彩。当时还有抓八哥幼鸟教它说话以供娱乐的活动。

在南方，流民们离乡背土，反而更加珍惜汉族的传统节日，将它们完整保存并发展了下来。而北方的传统节日和一些习俗，却没有像南方这般保留完好。大量少数民族的习俗开始进入北方人的日常生活。

大事年表

220年（魏黄初元年）

正月，曹操死，曹丕袭爵，嗣为丞相。

十月，曹丕称帝，是为魏文帝。废汉献帝为山阳公，汉亡。建国号魏，都洛阳。

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九品中正制。

221年（蜀章武元年）

刘备称帝，是为汉昭烈帝。国号汉，世称蜀，都成都，以诸葛亮为丞相。

刘备率兵东进，攻孙权。夷陵之战爆发。

孙权接受魏国封号，称吴王于武昌。

223年（蜀章武三年）

刘备死，太子刘禅继位，是为蜀后主。诸葛亮辅政，遣邓芝使吴修好，共抗曹军。南北对峙格局固定。

224年（魏黄初五年）

魏文帝曹丕攻吴，至广陵，临江而还。

226年（魏黄初七年）

魏文帝曹丕死，太子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

228年（蜀建兴六年）

诸葛亮兵出祁山攻魏，魏国破蜀军先锋马谡于街亭。此后两国在西边战事不断。

229年（吴黄龙元年）

吴王孙权称帝，是为吴大帝。国号吴，迁都建业。

230年（吴黄龙二年）

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万人船队过海达夷洲。

234年（蜀建兴十二年）

诸葛亮卒于五丈原，司马懿取得对蜀战争的巨大胜利。

238年（魏景初二年）

司马懿攻辽东，杀公孙渊于襄平。

239年（魏景初三年）

魏明帝曹叡死，齐王芳即帝位，太尉司马懿、宗室曹爽辅政。

240年（魏正始元年）

玄学开始产生，以何晏、王弼的“正始学派”为代表。

248年（魏正始九年）

嵇康寓居山阳竹林，吸引志同道合者清谈。竹林七贤形成。

249年（魏嘉平元年）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杀曹爽、何晏，遂专魏政。

251年（魏嘉平三年）

魏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于淮南起兵反司马懿，兵败被擒自杀。

252年（吴太元二年）

孙权死，太子孙亮即位。

253年（吴建兴二年）

吴孙峻杀诸葛恪，任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专吴朝政。

254年（魏嘉平六年）

司马师废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

255年（魏正元二年）

魏镇东将军毋丘俭在寿春起兵讨司马师，失败被杀。

257年（魏甘露二年）

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昭，次年失败被杀。

258年（吴太平三年）

吴丞相孙綝废孙亮为会稽王，立孙休，是为吴景帝。孙休杀孙綝。

260年（魏甘露五年）

曹髦率军讨司马昭失败被杀，司马昭立曹奂为帝，是为魏元帝。

263年（魏景元四年）

司马昭命邓艾、钟会攻蜀，后主刘禅降，蜀亡。

264年（吴永安七年）

吴景帝孙休死，孙皓立。

265年（晋泰始元年）

八月，司马昭死，子司马炎继相国、晋王位。十二月，废魏主称帝，是为晋武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

司马炎大封宗室诸王。

266年（晋泰始二年）

晋罢农官，所统悉属郡县。至此，曹魏屯田前后70年。

272年（晋泰始八年）

夏天，东吴镇守西陵的步阐投降晋朝。晋吴展开西陵战役，东吴大将陆抗顶住了晋军的进攻。

279年（晋咸宁五年）

西晋以贾充为大都督，大举分道伐吴。

280年（晋太康元年）

晋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颁布户调式，包括占田课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户调按九品混通的原则征收。

从太康元年到太康十年的10年被艳称为“太康繁荣”。

290年（永熙元年）

晋武帝司马炎死，晋惠帝司马衷立，立贾充之女贾南风为皇后。
晋武帝杨皇后父杨骏辅政。

西晋以刘渊为匈奴五部大都督。

291年（元康元年）

贾南风杀杨骏，又杀汝南王司马亮及楚王司马玮；八王之乱开始。

296年（元康六年）

氐人齐万年起兵于关中。

298年（元康八年）

关中连年饥荒，巴^賸豪酋李特率流民入蜀。

299年（元康九年）

江统著《徙戎论》，提出将氐、羌等族徙离关中。

300年（永康元年）

赵王司马伦杀贾南风。

301年（永康二年）

张轨据河西，求为凉州刺史。

赵王伦废惠帝自立，齐王司马冏等起兵杀伦，惠帝复位。司马冏专政。

四川流民起义大爆发。流民推李特为首，起兵于绵竹，进攻成都。

303年（太安二年）

李特入成都，旋为益州刺史罗尚所杀。李雄再攻下成都。

张昌、石冰起义爆发。五月，张昌起义于安陆，占据江夏，攻襄阳，别帅石冰东进。

304年（永安元年）

李雄称成都王，建成汉。

匈奴刘渊在左国城即汉王位，建国号曰汉。十六国开始。河间王司马颙逼晋惠帝西迁长安。

305年（永兴二年）

右将军陈敏于历阳起兵造反，建立楚政权，一度得到江南世族支持。陈敏叛乱持续到307年才为陶侃所败。

306年（永兴三年）

东海王司马越部队挟晋惠帝还洛阳。

晋惠帝中毒而死，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

并州饥荒，诸将率吏民就食冀州，号为“乞活军”。

307年（永嘉元年）

琅玕王司马睿出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和王导等人迁徙建业。此后大批中原官民迁徙南方，史称“永嘉南渡”。

310年（永嘉四年）

刘渊死，太子刘和继位。刘聪杀刘和自立。

311年（永嘉五年）

荆湘流民推杜弢为首，据长沙起义。

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西征，和各方争夺长江中游。

刘曜攻下洛阳，杀吏民3万余人，挟晋怀帝至平阳。史称“永嘉之祸”。

313年（永嘉七年）

刘聪杀怀帝，秦王司马邺在长安即位，是为晋愍帝。

316年（建兴四年）

刘曜进兵关中，愍帝降，被送至平阳，西晋亡。

317年（建武元年）

琅琊王司马睿即晋王位，史称东晋。

祖逖北伐，陆续恢复河南地区。

318年（太兴元年）

晋王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建都建业。

刘聪病死，太子刘粲继位，旋为靳准所杀，汉亡。刘曜发兵攻靳准，自立为皇帝。

319年（太兴二年）

刘曜徙都长安，改国号赵，史称前赵。

石勒自称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

周访最终平定荆州。司马睿势力基本控制了南方。

321年（太兴四年）

祖逖病逝，北伐事业中断。

322年（永昌元年）

王敦起兵武昌，攻入建康，还屯武昌，遥制朝政。

晋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

324年（太宁二年）

晋明帝司马绍下令讨伐王敦，王敦以兄王含为元帅攻建康，王敦病死，兵众溃散。

325年（太宁三年）

晋明帝司马绍病死，只有27岁。太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晋成帝。外戚庾亮掌权。

328年（咸和三年）

苏峻、祖约之乱爆发。

329年（咸和四年）

后赵出兵攻占上邽，杀太子刘熙，前赵亡。

330年（咸和五年）

东晋始行度田收租制，亩税三升。

后赵石勒称帝。

333年（咸和八年）

夏，石勒病死，太子石弘继位。石虎掌握后赵实权，第二年废石弘，自称天王。

335年（咸康元年）

后赵迁都于邺。

337年（咸康三年）

鲜卑慕容皝称燕王，建燕国，史称前燕。

338年（咸康四年）

鲜卑拓跋什翼犍继代王位，建代，定法律。

成国李寿自立，改国号为汉。

341年（咸康七年）

晋诏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白籍。

342年（咸康八年）

晋成帝司马衍病死，同母弟弟司马岳继位，是为晋康帝。

344年（建元二年）

晋康帝司马岳死，其子司马聃继位，是为晋穆帝。

345年（永和元年）

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取代庾氏获得长江中游的兵权。

347年（永和三年）

桓温灭成汉。

349年（永和五年）

后赵石虎死。北方大乱。

后赵谪戍凉州的东宫卫士10余万人在关中起义。

辽东慕容鲜卑大举进攻后赵，开始觊觎中原。

350年（永和六年）

冉闵灭后赵，自立为帝，国号大魏，史称冉魏。

华北民族大仇杀。

351年（永和七年）

苻健在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年（永和八年）

前燕慕容俊灭冉魏，遂在蓟称帝。

354年（永和十年）

桓温北伐前秦，军至灊上，逼近长安，后主动退兵。

356年（永和十二年）

桓温第二次北伐，入洛阳，留兵戍守而还。

357年（升平元年）

前秦苻坚通过政变上台，称大秦天王，汉人王猛辅政。

前燕迁都于邺。

360年（升平四年）

前燕慕容俊病死，太子慕容暉继位。

361年（升平五年）

桓温派兵破燕军，取许昌。

晋穆帝司马聃病逝，堂兄司马丕被继位，是为晋哀帝。

364年（兴宁二年）

东晋核查户口，令所在土断。

365年（兴宁三年）

晋哀帝司马丕中毒而死，其弟司马奕继位，是为晋废帝。

369年（太和四年）

桓温率军5万北伐前燕，至枋头粮尽，撤退，大败。

370年（太和五年）

前秦灭前燕。

371年（咸安元年）

桓温废黜司马奕为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373年（宁康元年）

简文帝死，谢安联合王坦之、王彪之等人拥戴司马曜即位，是为孝武帝。桓温引兵入朝，在新亭为谢安阻止。

夏天，篡位失败的桓温病死。

376年（太元元年）

前秦灭前凉、灭代。

晋废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在役者免。

377年（太元二年）

东晋谢玄建北府兵。

383年（太元八年）

晋秦淝水之战，前秦大败，内部分崩。

384年（太元九年）

鲜卑慕容垂称燕王，后燕开始。

慕容泓称济北王，建立西燕。

羌族姚苌在渭北起兵，称万年秦王，史称后秦。

385年（太元十年）

西燕慕容冲称帝，入长安。

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筑勇士城为都，史称西秦。

后燕慕容垂定都中山。前秦苻坚被后秦姚苌缢死在新平佛寺。

谢安死，司马道子父子开始先后在东晋专政。

386年（太元十一年）

鲜卑拓跋珪称代王，都盛乐，改称魏，北魏开始。

后秦姚萔入长安，称帝。

吕光称凉州牧、酒泉公，都姑臧，后凉开始。

394年（太元十九年）

后燕慕容垂攻破长子，杀慕容永，西燕亡。

前秦苻登为后秦姚兴所杀，前秦亡。

395年（太元二十年）

北魏在参合陂大败后燕。

396年（太元二十一年）

孝武帝司马曜遇害，司马道子扶持司马德宗为帝，是为晋安帝。

后燕慕容垂征讨北伐，中途而亡。

397年（隆安元年）

东晋王恭第一次起兵，得到荆州等地响应。

鲜卑秃发乌孤称西平王，筑廉川堡为都，南凉开始。

398年（隆安二年）

王恭第二次起兵，北府兵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

参与王恭起兵的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三人结盟自保，桓玄被推为盟主。

慕容德自立为燕王，史称南燕。

398年（北魏天兴元年）

鲜卑族拓跋珪迁都平城，称帝，是为魏道武帝。

399年（隆安三年）

东晋征发浙东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引起反对，孙恩起义爆发。

名僧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往天竺求经。

400年（隆安四年）

桓玄出任都督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后将军，兼任荆江两州刺史。

李晟自称凉公，都敦煌，西凉开始。

401年（隆安五年）

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州牧，史称北凉。

后秦姚兴迎名僧鸠摩罗什至长安。

孙恩起义军逼近东晋首都建康，被刘裕等人所败。

402年（元兴元年）

正月，司马元显讨伐桓玄。北府兵刘牢之倒戈，桓玄攻破建业，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势力被铲除。

桓玄杀刘牢之。

孙恩攻临海，败死。妹夫卢循继统其众。

403年（元兴二年）

桓玄废晋安帝，自称帝，国号楚。

后凉降于后秦。

404年（元兴三年）

刘裕自京口起兵讨桓玄，桓玄挟安帝还江陵，后败死。

卢循攻陷番禺，第二年接受东晋的任命，出任广州刺史。

405年（义熙元年）

刘毅破江陵，迎晋安帝还建康。

陶渊明挂冠而去，开始隐居生活。

407年（义熙三年）

刘裕入朝，开始专断东晋朝政。

赫连勃勃称大夏天王，夏政权开始。

后燕将领冯跋杀君主慕容熙，后燕亡，北燕建立。

409年（义熙五年）

后燕亡。冯跋建立北燕。

刘裕北伐南燕，围广固。

410年（义熙六年）

刘裕破广固，南燕亡。

卢循、徐道覆北进，攻长沙、豫章等郡，进逼建康，为刘裕所败。

411年（义熙七年）

卢循败死。至此，孙恩、卢循起义遂告结束。

412年（义熙八年）

刘裕消灭刘毅。

东晋以朱龄石做元帅，领兵进攻割据四川的谯纵。

法显航海回国，次年至建康，著有《佛国记》。

413年（义熙九年）

刘裕主持“义熙土断”。

七月，谯纵自缢而亡，四川重新进入东晋版图。

414年（义熙十年）

西秦袭取乐都，南凉亡。

416年（义熙十二年）

二月，后秦姚兴去世，姚泓继位。

刘裕北伐后秦。

417年（义熙十三年）

刘裕北伐入长安，姚泓投降，后秦亡。

刘裕留兵驻守长安，自回南方争权。

418年（义熙十四年）

赫连勃勃攻陷长安，称帝。

注：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之前，三国年号并用；280年以后的年号都是两晋的年号。

参考文献

1. 刘义庆. 世说新语.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0
2. 陈寿著, 裴松之注. 三国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3. 房玄龄等撰. 晋书. 长活: 岳麓书社, 1997
4. 周一良、邓广铭等著. 中国历史通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4
5. 吴小如主编. 中国文化史纲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6. 沈起炜著. 细说两晋南北朝.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7. 邹纪万著. 魏晋南北朝史.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9
8. 张程著. 三国大外交.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9. 张程著. 禅让.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
10. 张程著. 权力家族. 武汉: 崇文书局, 2009
11. 王永平. 曹魏苛禁宗室政策考论. 许昌师专学报, 2002 (5)
12. 胡阿祥. 《侨置的源流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 刊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北京: 线装书局, 2006

13. 胡阿祥. 六朝疆域与政区述论.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03 (1)

张程·作品 李学勤·总顾问

南北朝
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大分裂，是中华民族的记忆坐标
快乐接受新认识，全面揭开历史中国真相



中国第一部孙后代的传世之书
打造重印、再版率最高的历史书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历史中国

南北朝原来是这样

张程 作品

(420—589)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 录

重温年少叛逆的中国

- 一 主角是这样炼成的
- 二 拓跋焘的赫赫武功
- 三 最后一个史官：崔浩
- 四 成也太后：千古一后冯太后
- 五 到洛阳去，到汉人的地方去！
- 六 谁阻挡汉化就让谁灭亡
- 七 草根做皇帝
- 八 君臣关系永远是个大难题
- 九 元嘉之治，不过如此
- 十 战场有风险，北伐需谨慎
- 十一 刘家的精神病史I：精神病开始发作
- 十二 刘家的精神病史II：一个都不正常
- 十三 刘家的精神病史III：没有最变态，只有更变态
- 十四 七夕夜弑君
- 十五 刘宋王朝的背水一战
- 十六 萧子良谋位：书呆子斗不过实干家
- 十七 萧鸾篡位：爷爷夺了孙子的皇位
- 十八 变态皇帝代代有，南朝特别多
- 十九 萧衍防卫过当，当上了皇帝
- 二〇 盛极而衰，北魏也不能幸免
- 二一 南北方又打起来了！
- 二二 战场无赢家，大家都歇了吧
- 二三 亡也太后：胡作非为胡太后
- 二四 北魏社会分裂了
- 二五 六镇起义：大动乱中的小人物

- 二六 河阴之变I：大屠杀是如何酿成的
- 二七 河阴之变II：大屠杀如何善后
- 二八 战神传说：陈庆之
- 二九 小皇帝手刃大权臣
- 三〇 高欢“欢”起来
- 三一 一次逃亡导致的帝国分裂
- 三二 两魏争锋：一年一小打，三年一大打
- 三三 战争是发展最大的动力
- 三四 癫狂高洋与傀儡羔羊
- 三五 傀儡皇帝不是好当的
- 三六 “佛门天子”萧衍
- 三七 昭明太子萧统
- 三八 侯景之乱I：八百残兵攻梁
- 三九 侯景之乱II：不是侯景太厉害，而是南梁太窝囊
- 四〇 侯景之乱III：权力大过亲情
- 四一 萧誉：自己挖坑埋自己
- 四二 如何看待陈朝的篡国？
- 四三 北齐是怎么败下去的？
- 四四 又是统一，北周灭亡北齐
- 四五 又是政变，这回主角是杨坚
- 四六 金陵王气黯然收
- 四七 大文豪、大狂人谢灵运之死
- 四八 旧时王谢门前燕
- 四九 佛教是如何在中国站稳脚跟的
- 五〇 说说南北朝官场的“临时工”
- 附录：南北朝年谱
- 参考文献
- [返回总目录](#)

重温年少叛逆的中国

张 程

如果可以将中国古代历史看做一个人的一生，那么南北朝时光就像极了他的青春期。

当散布在长江黄河等地的文明之火，孕育出完备的国家形态后，中国就如呱呱落地的婴儿，开始涂抹自己的历史长卷。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的婴儿期和大秦、两汉的孩童期，中国在3世纪（东汉末年）迈入了青春期。正如每个自然人都要经历青春期的迷茫、躁动，才能走出种种不确定，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中国在从3世纪初到6世纪后期的300多年里，经历了反复的分裂混乱和南北征伐，迎来了隋唐时期的辉煌。而南北朝（420年到589年）是这段历史青春期的热潮，散发着浓郁的叛逆气息。

南北朝的170年间，中国从南北对峙、北方分裂走向大一统的盛世，期间难以确数的皇冠落地、权贵身首异处，华丽的鲜血横飞；烽火硝烟起了又散，散了又起，多少生灵涂炭；几代人筚路蓝缕，走向希望和危险并存的未知地域。北方游牧民族跳下马匹，来到黄河岸边置地耕耘，中原汉族百姓则携家带口，深入长江以南的蛮荒之地，继续世外桃源般的梦想。那是普罗大众的梦想，读书人的梦想是实现个人价值、继而国泰民安，而最高统治者们一直没有放弃天下一统的追求。美好的梦想，是乱世中最耀眼的光彩，虽然一再遭致残酷现实的

打击，却支撑了当时无数人的人生，让他们能够冲出动乱，挺立在严冬之中，并且穿透千年尘埃，闪耀到了今日。

如今，南北朝以分裂动乱而著称。青春期以躁动和叛逆而著称。两者有共通之处，都是一个“乱”字，思想观念没有成形，各种思潮在脑海中交杂搅动；感觉体内充满力量，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这股力量；不断地吸收外界新信息，还不知道如何内化为自己所有。也因为如此，青春期看似迷乱，却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成长期，乱中孕育着成熟的种子。历史学界对南北朝的评价，也是分裂中孕育着统一，在破坏的同时稳步建设。

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纷纷涌入中原地区。各民族间相互碰撞，激烈征伐，有矛盾，有战争，个别时候甚至表现为残酷的屠戮，但各民族之间更有相互欣赏和学习。汉族农夫觉得游牧民族的服装更实用，少数民族的奶酪、胡饼美味可口。少数民族也逐渐认识到汉族的政治制度能满足统治需要，首领们则喜欢上汉族政治制度集权和专制的特点——它们能够满足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权力欲。入驻中原长久了后，汉族的农耕传统、诗词歌赋也进入了少数民族的血液。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汉化，就是这个潮流的表现。他的汉化是全面的、彻底的、激进的改革，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如今，显赫一时的匈奴、鲜卑等民族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了，看似无迹可寻，但是如今中华民族身上流淌的基因之一。

南北朝是一个在社会结构上“试错”的时期。世袭门阀在南北朝稳固发展，大家族垄断了政权、霸占肥田良产，政治保障经济，并且公权力世袭化，传子及孙。出身打倒一切，将能力、品德、功绩等踩在脚下。世族子弟不劳而获，富贵一生，寒族人家终日奔波劳累，还要为生计发愁。中国社会的等级开始固化，冻结了社会流动性。南北朝的门阀制度表面上登峰造极，却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清要显贵的官职都被世族子弟占据着，但实职实权渐渐流入寒族子弟的手中。

后期，出身卑微的人才越来越能够凭借自身努力飞黄腾达。世族门阀的势力在事实上削弱了，这个制度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创建，公开选才取代了门阀世袭。科举制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发明，可算是在南北朝门阀制度“试错”之后的创举，保障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公平公正。

南北朝还是一个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时期——正如思想没有定型的叛逆少年都要经历迷茫徘徊和辨伪存真的青春期一样。南北朝在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举足轻重。

竹林七贤的癫狂不羁，可以解读为对自由的追求、对权威的藐视和反抗，何尝不是暴露了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对自身、对世界、对两者关系认识的迷茫与徘徊。南北朝时代，两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归于沉寂。讲求报应和避世的佛学思想大放异彩。佛教飞速发展，大批佛经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佛学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各个方面。后世蔚为壮观的北方佛像石刻和隐现在江南烟雨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这个时期佛教大兴的例证。儒学好比中国这个少年郎之前的主导思想，如今面临严峻挑战——正如每个少年郎的思想在青春期都会遭遇危机一样。儒家思想在南北朝接纳了玄学、佛学等的养分，儒生们也虚心与僧侣等交友，适应了时局的变化，继续保持了主导思想地位。土生土长的道教则继续发展，组织更加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儒、释、道三者共同主导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格局开始形成。不同的人、个人的不同阶段，都能从三者中找到思想的养分乃至归宿。

具体到文化上，乱世和盛世一样，为文化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南北朝既有“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代出自蓟北门行》）的混乱，让文人们“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拟行路难》其六），也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的清丽灵动，还有“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的阔寥恬静。

骈文统治着南北朝的文坛。南朝的谢灵运、谢朓出身世族豪门，作品传诵一时，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作品往往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南方的吴歌越曲明丽柔婉，北方则稍逊风骚。但北方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民歌。北方民歌质朴刚健，情意真切，同时不乏其他类型的作品，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还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庾信的《哀江南赋》糅合了跌宕剧变的时代背景和坎坷曲折的个人际遇，融合了南方成熟精致的文学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南北朝的文坛，为迎接唐朝文学的成熟和繁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长大后的我们时常还会回顾青春期，寻找我们性格、观念等成形的路径，思考我们一些言行的成因。我们翻阅历史的目的，也是古为今用，让历史关照现实。我们重新阅读南北朝这段历史，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文化成形的脉络，理清中国大历史的发展。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得到若干现实的影子——那就是在南北朝种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种子开出来的鲜花。

翻过这一页吧，去看看中国是如何走过懵懂和躁动、迷茫和动荡，成长为成熟温润的青年的！

一 主角是这样炼成的

谈到南北朝，首先要来认识一下主角拓跋部落。

拓跋部和魏晋时期建立五个燕国的主角慕容部一样，都属于鲜卑族，都发源于东北地区。和慕容鲜卑的“少年得志”不同，拓跋鲜卑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跑龙套的”，直到南北朝时才熬出头做了主角。

拓跋鲜卑作为中国古老的民族，可能发源于现在东北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附近地区，后来南迁。拓跋部的迁徙，不是渐进的松散的迁徙，而是所有部落人民集体性的彻底迁走，因此事后难以确定他们最初的居住地。等拓跋部发达后，《魏书》上说他们祖上发源于“大鲜卑山”，在山上凿有石室作为祖宗之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还曾派人去祖宗发源地祭祀，《魏书》抄录了祭祀的祝文。后人对拓跋部的发源地始终有争论，直到1980年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大兴安岭北段巅峰东麓的嘎仙洞内发现了石刻铭文，与《魏书》所记载的祭祀祖宗之庙的祝文完全相同，这才证明嘎仙洞就是拓跋部落的祖宗之庙。而大鲜卑山就是现在的大兴安岭了。当时，拓跋部处于原始的氏族部落阶段，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和组织形式。

南方温润的气候和丰饶的物产，对远处大兴安岭的拓跋部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恰好在东汉时期，占据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被东汉打败

西迁，空出了一大片无主的土地。拓跋部趁机向南、向西迁移，逐步占领、消化了原来匈奴人的领地。到东汉桓、灵二帝的时候，拓跋部已经生活在现在的辽河西部地区，开始了游牧生活。此后，他们沿着阴山山脉继续向西南迁徙，进入到内蒙古南部地区。

随着越来越靠近中原地区，拓跋部开始进入传统史书的视野。不过他们仅仅被当做可有可无的配角，出现在朝贡表演和边地逸闻之中。拓跋部的人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喜欢剃掉头顶的部分头发，再把周边的头发编成小辫子垂下来，所以他们被东汉称为“索头鲜卑”。

拓跋部的游牧生活过得比较滋润，部族人口不断增长（其中也吸收了部分匈奴残部）。他们保留着氏族社会的特点，加上不断迁徙向未知的前方，内部凝聚力特别强。到了三国时期，拓跋部出现了一个杰出的领袖，叫做拓跋力微。他担任大酋长时，带着部落大规模南下，最后迁居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力微施行强权统治，部落中有首领不服从号令或者仅仅是没有按时参加部落集会就会受到严刑惩罚。这从反面证明，当时的拓跋部已经逐渐告别氏族社会，大酋长废除了民主推举而变为世袭，部落开始出现政权的雏形。不过，力微还没有组建明确的政权形式，更没有编练固定的军队，还是有事的时候就召集部落，没事的时候听任部落四散游牧。

力微先是臣服于三国中的曹魏，后来又是西晋的藩属。拓跋部和中原王朝展开了积极的交往，用北方的皮毛、牲畜交换中原的粮食、布匹和金银。魏晋为了笼络拓跋部，不时给予丰厚的赏赐。拓跋部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力微还派儿子沙漠汗去洛阳当“质子”（人质），结果沙漠汗严重汉化，几十年后返回草原时俨然是一个汉族贵族的做派了。拓跋贵族们接受不了沙漠汗，又担心力微将位子传给他，就设下埋伏将沙漠汗暗杀了。

据说力微活了一百多岁。北魏建国后，追谥他为“神元皇帝”，庙号“始祖”。

这应该是一个民族在童年时期编造的神话。拓跋鲜卑类似的神话还有他们在迁徙过程中经历的“九难八阻”，以及如何在上天的帮助下战胜诸多困难，等等。神话迭出，恰恰说明了一个民族还没有发展成熟。

力微死后，拓跋部出现了短暂的动荡，最后力微的孙子拓跋猗卢重新统一了拓跋部落。猗卢很有祖父的风格，并且将祖父的强权统治发扬光大。他屠杀了任何胆敢挑战自己权威的部落贵族和百姓，进一步打破了部落内部的民主传统，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当时，中原大乱，强大的拓跋部自然成了北方各派争取和利用的对象。猗卢支持的是西晋的残余势力，和刘琨势力一起四处出击。由于刘琨出面争取，西晋在愍帝建兴三年（315年）封猗卢为代王。拓跋部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政权名称和形式。猗卢也彻底从一个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变成了割据势力的君主。

猗卢死后，拓跋部又经历了短暂的动荡，直到东晋咸康四年（338年）猗卢的侄孙拓跋什翼犍成为新一任代王。

什翼犍根据史书的描绘，天生就是君王像。他“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長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如果什翼犍真长成这样，的确不是“凡人”。什翼犍的经历也很传奇。他从小被当做“质子”前往后赵，居住在赵都襄国（今河北定县）多年，汉化比较深。什翼犍学会了不少汉族的政治话语和手腕，比凶悍的同胞们更懂得收买人心。比如他有一次在作战中被射瞎了一只眼睛。后来抓住了射箭的敌人，大臣们提议将射箭的人活活割死。什翼犍说：“各为其主，何罪之有？”于是将其释放了。

在政治上，什翼犍对拓跋部落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如果说爷爷猗卢为拓跋鲜卑描绘了政权的蓝图，那么孙子什翼犍则实现了这个蓝图。他设官分职，颁布法律，制定国家机构，正式建立了代国。拓跋人建国过程中，汉族人帮了大忙。什翼犍以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

郎中令，帮助自己建立法制。经过一番作为后，拓跋部势力大长，统治区域东到现在的辽宁，西到甘肃一带，南距阴山，北尽沙漠，面积几百万平方公里。拓跋部的军队有多少呢？史书说什翼犍“带甲四十万”。这就过于夸张了。如果什翼犍真的有40万武装，早就可以争夺天下了。比较可信的是，这40万人可能是拓跋部能够动员的所有青壮年的总数。那时候，部落有事，青壮年都得跨马横刀出征，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算是军人。

什翼犍还想走得更远，让部落定居下来。他计划在盛乐等地筑造城池。可是，以他母亲为代表的贵族们反对定居。他们的理由是，一旦定居下来就可能遭到敌人的包围，到时候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还不如游牧来得安全自在。什翼犍觉得有道理，最终放弃了筑城定居的计划。

初生的代国四处征战，到处掳掠，日子过得挺滋润。可惜什翼犍的运气实在不好，遇到了更强大的敌人——前秦。前秦在苻坚的率领下，逐一消灭北方割据势力，势力如日中天。苻坚不能容忍代国的存在，于376年率领50万秦军大举北伐拓跋部。什翼犍硬着头皮应战，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仓皇向蒙古高原逃亡。沿途因为缺乏粮草，拓跋部伤亡惨重。屋漏偏逢连阴雨。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寔君又听信谗言，先杀储弟，后杀什翼犍。什翼犍时年57岁。苻坚捕杀了拓跋寔君，将拓跋鲜卑残余分别划归匈奴刘库仁、刘卫辰两部治理。代国正式灭亡。

二

如果是一般的部落，遭到如此重创，在历史舞台上的戏基本上就算唱完了。可拓跋部不是一般的部落。他们在常年的迁徙和游牧中强化了内部凝聚力，如今即便亡国了相互之间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

心谋划着复国。同时，他们要感谢动荡的年代。乱世中隐藏着大把的机会。

383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惨败。被它征服的北方各族纷纷复国。386年，散落的拓跋部落一致推举什翼犍的嫡孙、16岁的拓跋珪为代王，正式复国。拓跋珪移居盛乐，不久改国号为“魏”。为了与三国时的曹魏相区别，历史上将拓跋珪建立的魏国称为“北魏”。拓跋珪就是北魏的道武帝。

拓跋珪称魏王后，陆续击败周围部落，兼并刘卫辰等匈奴部落（刘卫辰的儿子刘勃勃逃脱拓跋人的追杀，后来改名赫连勃勃，建立了夏国），势力日益强大。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是慕容鲜卑建立的后燕。拓跋珪和后燕皇帝慕容垂有亲戚关系。他的爷爷什翼犍曾向前燕的慕容皝求婚，迎娶了慕容皝的妹妹。按照辈分来排，拓跋珪是慕容垂的外甥。北魏起初也向后燕称臣，作为后燕的附庸。慕容垂很关照什翼犍这个小外甥，客观上他也需要在北方有个盟友安定边境，牵制其他部落。所以，北魏和后燕很快进入了蜜月时期。拓跋珪得以全心全意在北方作战，有的时候兵力不够还向舅舅慕容垂求援。慕容垂也很爽快地出兵相助。

但是拓跋珪并不甘心做后燕的附庸，所以当慕容垂封他做西单于、上谷王时，他就不肯接受。又过了两年，他的羽毛更加丰满，对燕的态度更有变化。388年，拓跋珪派堂弟拓跋仪出使后燕首都中山。慕容垂问他，魏王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朝贺？拓跋仪回答说，北魏和后燕的先世都是晋朝臣子，两国应该世代结为兄弟，委婉地提出了地位平等的主张。一心荡平天下的慕容垂对此很不快。而拓跋珪等人看到“燕主衰老（慕容垂63岁了），太子暗弱”，判断后燕强盛不了多久。北魏暗暗有了兼并后燕之心。

后燕不久发动了灭亡西燕的战役。西燕向拓跋珪求援，拓跋珪出兵援助。西燕灭亡得太快，北魏军队没有赶上与后燕兵交锋。但如此

一来，北魏和后燕已经处于敌对状态了。慕容垂灭掉西燕后，下定决心要远征北魏。395年，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主帅，率领后燕主力大举进攻北魏。拓跋珪避其锋芒，坚壁清野，带着军队和百姓隐藏在黄河南岸河套地区。害得慕容宝在黄河以北游荡了几个月，硬是找不到敌人战斗。初冬很快就到了，慕容宝失去了战斗意志，又风闻父皇慕容垂在后方病危，仓促决定撤退。为了防止北魏军队追击，慕容宝撤退前留了一手。他烧毁了黄河上的所有渡船，以为这样北魏就无法追击了。不想，拓跋珪挑选了两万精兵，亲自披挂上阵，踩着黄河的薄冰尾随而去。最后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北魏追兵在参合陂包围了还在睡梦中的后燕大军。一场决战变成了屠杀。慕容宝仅带少数人仓皇逃命。北魏大获全胜，仅战后俘虏的燕军就有四五万人。拓跋珪残忍地将这些俘虏全部活埋了。

这场战斗扭转了北魏和后燕的力量对比。慕容垂郁郁而终，拓跋珪趁热打铁，大口大口吞噬后燕的领土。396年，北魏占领了并州（今山西地区），并越过太行山进入冀州（今河北地区）。拓跋珪亲临阵前，魏军包围了中山城。后燕在生死关头，慕容家族却还在内讧。继位的慕容宝要求辽东龙城（今辽宁朝阳，是慕容鲜卑的老巢）的军队南下增援。不想龙城方面希望慕容宝早死，可以争夺帝位。最后无奈之下，慕容宝放弃中山，带领精干军队北逃。其实，中山城内的多数百姓都有亲友在参合陂被魏军杀害或者活埋，抵抗意志很强。他们在慕容宝逃跑后，又坚持抵抗了半年。后来因为弹尽粮绝，中山城被北魏攻克。这回，拓跋珪吸取教训，没有大开杀戒，还抓紧救死扶伤，收揽人心。

自此，后燕被截为两段。慕容宝北逃后，势力融入北燕。南边的后燕势力以困守邺城的慕容德为核心。慕容德在北魏的逼迫下，南逃山东，势力转化为南燕。后燕大部被北魏吞并。398年，拓跋珪称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

拓跋珪不仅建立了赫赫武功，在文治上也颇多建树。攻占并州

后，拓跋珪仿照汉族政治制度建立台、省等官署，又在地方上设置刺史、太守等官。这些官职都由三个人同时担任，比如某州刺史同时有三人。一人是拓跋宗室，一人是鲜卑贵族，还有一个人是鲜卑平民或者汉族人。当时地方上治安不好，地方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抓强盗、保境安民。北魏规定有能力稳定一县的县令可以兼任两个县的县令，稳定两个县的县令兼任三个县的县令，如果能稳定三个县三年就直接升任太守。而能够治理多个郡的太守也可以照样兼任和提升，直接当刺史。由此可见，当时北魏的统治还不稳定，政权组织也很粗糙，保留着许多原始的习俗，但毕竟走出了质变的一步。

拓跋珪很重视生产，在立国不久就让拓跋仪组织屯田。占领华北大部后，拓跋珪强迫各族人民上百万人口迁移到平城。他们当中有的人“计口受田”，租种国有土地，做了国家的农奴；有的被分配到作坊从事手工业，为官府和贵族生产商品；有的被划定为“营户”，世代代当兵（纯正的拓跋人口不多，北魏军队中有许多异族士兵）；有的被赏赐给鲜卑贵族当奴婢。北魏规定鲜卑贵族可以拥有二百名奴婢，达官显贵们实际拥有的奴婢都数以千计。这些移民被称为“新民”，低人一等，甚至没有人身自由，情况比奴隶好不到哪里去。普通拓跋部落的人民理论上地位很高，有人身自由，可以从事各种职业，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单一职业：当兵打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战争中劫掠致富，不过多数人始终一贫如洗。他们在战斗间隙四处游荡，没有固定的职业，被称为“游手”。这部分人大约相当于拓跋部人口的三分之二。

以平城为核心的地区，过去就是拓跋部游牧的地区，如今成了北魏的根据地和政治中心。北魏着力经营这一地区，然后再辐射到四周去。他们把平城周围叫做“畿内”；环绕着畿内一千多里的地方，叫做“近畿”。这一地区以外的地区，分别叫做“方”和“维”，一共有四个方和四个维，组成了“八部”，由“八部大人”管理。这八部大人和之前拓跋部的部落酋长不同，不是民主推举的，而是由拓跋珪任命的，不

负责领兵打仗，而是监督百姓耕种纳税。拓跋珪用征收的赋税的多少来考核八部大人。双方的关系已经完全不是部落内部大小酋长之间的关系，而是君臣关系了。

鲜卑贵族也接受了这种上下关系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切实的好处。战争的不断胜利给他们带来无数战利品，分配了众多的奴婢。而定居农耕的收获远比游牧要轻松，收获也多。鲜卑贵族们对现状比较满意。可以这么说，拓跋珪用物质利益换取了鲜卑贵族们的政治权力，北魏膨胀发展的收益淹没了贵族们的失落感。

政权在不断稳固，北魏和汉族的关系也得到改善。不少汉族人或主动或被逼地进入北魏政权。拓跋珪曾问博士李先：“天下有什么好东西对人的神智有益？”李先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于是拓跋珪下令征集书籍，送到平城。自然，这些书籍都是讲授儒家学说和汉族政治的图书。华北的世族大家们也接受了新的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投靠蛮夷”找个借口，同时也为了增强拓跋鲜卑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汉族读书人们经过“仔细研究”，发现鲜卑族拓跋部原来是黄帝后裔。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黄帝娶妻嫫祖，生子昌意，昌意的小儿子嫫被封到北方。黄帝以土得王，而北方习俗将土称为“拓”，将后称为“跋”，所以黄帝的这一支后裔就以拓跋为姓了。这个说法很合拓跋贵族们的胃口，被他们欣然接受。既然大家都是黄帝后代，那么拓跋鲜卑统治中原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拓跋珪创建了北魏王朝，文治武功都很了不得。但他有一个毛病：性格残暴。地位越高，拓跋珪就越不自信，老觉得有人觊觎皇位，于是更加残暴地镇压部下。堂兄弟拓跋遵、拓跋仪等人先后被推上了断头台，还有不少人被满门诛杀。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有谋反的真凭实据，多数人都是死于拓跋珪的猜疑。北魏朝廷人人自危。409年10月，拓跋珪猜疑贺夫人，准备杀掉她。贺夫人所生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惶恐不安，抢先动手，杀掉了拓跋珪。拓跋珪当时只有39岁。

在拓跋部之前的历史上，首领死后都引起了动荡。但是，拓跋珪被杀后，北魏并没有陷入之前的循环。这要归功于已经稳固下来的北魏政权。它已经迅速从类似部落联盟的阶段飞跃到封建政权阶段了。

拓跋珪死时，17岁的长子拓跋嗣正在外地。拓跋鲜卑有个陋习，就是皇子被挑选为继承人后，生母要自尽。拓跋珪要立拓跋嗣为太子，就逼其生母刘贵人自尽。拓跋嗣知道后悲伤不已，日夜哀号。拓跋珪听了，要怒责他。拓跋嗣不得不逃出平城，流亡在外。拓跋绍杀了父皇后，平城的贵族们却不拥戴他。大家都希望拓跋珪的长子拓跋嗣继位。于是，拓跋嗣在宫中卫士的支持下很顺利地杀入皇宫，砍死弟弟拓跋绍，于同年即位。拓跋嗣就是北魏明元帝，庙号太宗。

拓跋嗣是一个平稳的过渡性皇帝。他喜欢汉学，尤其喜欢学习历史。在位15年，拓跋嗣继续推进父皇的制度建设。在对外征伐上，拓跋嗣抓住南宋刘裕病死的良机南征，和南朝在河南一带展开了激烈争夺。当时南朝力量还相当强大，南北几乎以黄河为界。拓跋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打败了宋朝军队，占领了河南和山东等地，将南北边界线推向淮北一带。这是南北朝期间，北方对南方的第一场胜利。由于长途征战劳顿，拓跋嗣回到平城不久就病死了，年仅32岁。他留下了一个蓬勃向上的新帝国。

至此，北魏成了一个天下人不可小觑的重要角色，终于从一个虚渺的配角蜕变为耀眼的主角了。

二 拓跋焘的赫赫武功



拓跋嗣死后，继位的是儿子拓跋焘。拓跋焘当时只有16岁，和爷爷拓跋珪、父亲拓跋嗣一样都是少年继位。也和祖父辈一样，拓跋焘将北魏王朝推上了更高的台阶。

拓跋焘的运气很好，接手的是一个北方最强大的帝国。不过，北魏帝国虽然强大，却只是若干个北方割据政权中的一个。

前秦灭亡后，北方经过多年的相互吞并，还有北魏、北凉、北燕、夏和西秦几大政权。其中北魏占领现在的山西、河北大部 and 河南、山东的一部分，最强大。和北魏有世仇的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国占据陕西大部地区，也就是古代的关中地区，势力仅次于北魏。北燕是后燕的残余（后燕的另一支残余南燕在刘裕北伐时灭亡），占领现在京津地区和辽东一带。西秦、北凉是现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割据政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拓跋焘继位后，就把统一北方作为奋斗目标。

统一要用拳头来说话，谁的拳头硬谁就有希望统一天下。

为了磨砺一双硬拳头，拓跋焘非常重视军队建设。

长期的游牧射猎生活锻炼了拓跋鲜卑健壮的体魄和高超的骑射能

力。北魏军队战斗力很强，尤其是骑兵，算得上北魏克敌制胜的法宝。有了硬件优势，拓跋焘又在软件建设上下功夫。他常从普通士兵中提拔将官，激励士兵们英勇作战，对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将士，或升官晋爵，或赏赐以人口、牲畜及金银、古玩、缯帛等物品；对违犯军纪的官兵，拓跋焘严惩不贷，即便是亲贵重臣也痛下杀手。临淮公丘堆是老资格的鲜卑贵族，几朝老臣，贵为太仆。在和夏国作战的时候，丘堆听到前线兵败的传言临阵脱逃。拓跋焘毫不犹豫地将丘堆斩首。扶风公拓跋处真等八人则因为偷盗军用物资，也被斩首。

拓跋焘严格治军，首先做到了以身作则，对自己严格要求。每次征战，他非但御驾亲征，还身先士卒——估计小伙子年轻、体力好。比如始光四年（427年），拓跋焘亲自带上三万轻骑突袭夏国的都城统万。途中，他与官兵们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并亲自参加了统万城下的恶战。战斗中，拓跋焘的坐骑力竭倒地，把主人带倒坠地。拓跋焘上马后继续战斗，杀死夏军十多人，后来身中流矢还血战不已。看到拓跋焘玩命地冲锋在前，北魏官兵们也都英勇杀敌，“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当然，拓跋焘不是一味穷兵黩武的武夫，知道上层建筑离不开经济基础。他忙于征战的同时也不放松经济生产。北魏统治民族和百姓众多，拓跋焘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性，治理百姓却不强迫百姓改俗易性，追求生产效益却不强求整齐划一。一句话，拓跋焘“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经营”，既发展鲜卑等少数民族的畜牧业，又尊重汉族人的农耕和商贸。难能可贵的是，拓跋焘还派出使者用太牢大礼祭祀孔子，真正做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很快，北魏兵强马壮，和其他割据政权的差距越拉越远。统一的时机成熟了！先消灭谁呢？

以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为代表的鲜卑武将们主张先进攻柔然。新兴的游牧民族柔然不断侵扰北魏北方边界，日益成为北魏的大

患。同样出身游牧民族的鲜卑武将们渴望和柔然们一决雌雄，掳掠牲畜来补充军需。大臣刘絜等则主张先打北燕，因为北燕最弱小。做事情先易后难，也算是人之常情。太常卿（掌宗庙礼仪的官）崔浩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应该先进攻最强大的赫连氏大夏政权。崔浩的理由是大夏政权残暴无道，已经失去了人心，看似强大其实不难战胜。拓跋焘毅然接受崔浩的主张，亲自领军渡过黄河袭击夏国首都统万城，擂响了统一的锣鼓。

北魏对大夏的征战开始并不太顺利。拓跋焘亲自出马也没能攻破统万城，只掳获牛马十多万班师。赫连氏匈奴还有相当强大的军队。为了消灭夏军的有生力量，拓跋焘在始光四年（427年）再次进攻统万。这一次，他只带一支小部队佯攻城池，然后假装不敌撤退，引诱夏军离开统万城追击。拓跋焘早在城外的山谷中埋伏了主力，就等夏军出城，在城外解决敌人。夏国的赫连昌看到北魏军队“战败”了，并没有出城追击。他担心这是拓跋焘的诱敌之策。崔浩向拓跋焘献计，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卒逃走报信，说魏军粮草已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未能赶到。赫连昌终于上当，大喜，亲自带兵出城追击。这一下就中了拓跋焘的计谋了。训练有素、严阵以待的北魏主力给了夏军致命打击。就是在这次激战中，拓跋焘坠马又身中流矢，仍然血战不停，鼓舞士气，消灭了夏军的主力。赫连昌狼狈而逃，放弃统万城逃往现在的甘肃一带去了。夏军残余则逃入统万城。拓跋焘带少数随从混在夏军的败军中冲进城——估计是想来个釜底抽薪。匈奴人觉察到有魏军混入城中，把城门全都关上，四处搜捕。拓跋焘和随从闯入宫里，拿到女人的裙子，化了装，翻城出去，最终脱险。第二天，他指挥大军猛攻统万城，最终占领这座夏国的都城，匈奴王公、大臣、将校、奴婢都成了俘虏。经此一战，夏国败局已定。

拓跋焘战后巡视统万城，看到当年赫连勃勃驱赶无数血肉之躯花费几十年修成的都城，感叹道：“夏国国土不大、人口不多，却滥用民

力修建这样的都城，哪有不亡的道理？”

在南边，魏军占领了长安。夏国仍在挣扎，在西部和北魏打持久战。第二年（428年），魏军在陇西俘获赫连昌。赫连定在陇西即位称帝，继续抵抗魏军。他一度击败北魏军队，夺回长安。两年后，北魏最终收复长安，平定关中地区。赫连定向西逃窜，竟然还在431年迫使乞伏暮末投降，灭亡了西秦。但是，北魏大军接踵而来，赫连定畏惧魏军，不敢接战，向青海一带继续逃窜。同年六月，赫连定被吐谷浑所俘。夏国灭亡。

夏国灭亡的第二年（432年），北魏再接再厉进攻北燕，包围其都城和龙（今辽宁朝阳）。北燕皇帝冯弘连战连败，在太延二年（436年）自己放了一把火烧毁和龙的宫殿、城池，逃往高丽（朝鲜）。冯弘后为高丽人所杀。北燕灭亡。

十六国政权中就只剩下一个北凉了。凉主沮渠蒙逊对自身实力本来就没有信心，不断依附于中原强者。谁强大，他就向谁称臣，以求苟延残喘。刘裕灭后秦的时候，沮渠蒙逊担心自身地盘不保，非常恐慌。他看到汉族大臣刘祥奏事时面有喜色，骂道：“你听到刘裕入关，竟敢这样高兴！”就把他杀了。他先向东晋、刘宋称臣，北魏崛起后又向北魏称臣。433年，沮渠蒙逊死了，终于在有生之年保住了地盘。六年后（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御驾亲征北凉，包围其首都姑臧（今甘肃武威）。继位的凉主沮渠牧犍联合柔然人，守城不降，寄希望于柔然入侵可以迫使北魏撤军。没想到柔然不成器，只能骚扰一下北魏边境，撼动不了全局。拓跋焘一心一意要灭北凉，抓紧攻城。沮渠牧犍困守孤城一个半月，山穷水尽而降。北凉灭亡，十六国结束。

北凉虽小，消灭它的意义却不小。首先，北凉占据着中原地区和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地区。北魏灭北凉后，通西域更方便，西域各国纷纷臣服北魏，使得后者的影响力剧增。其次，从晋末张轨割据

河西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河西地区相对安定。中原人士避居河西的人很多，其中有许多读书人，世代诗书相传。北凉灭亡后，北魏将这些文人迁到平城。他们对北魏王朝的汉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此，拓跋焘基本统一了北方。时隔多年以后，统一的光芒重新照耀北方大地。南北朝对峙局面正式形成。

二

必须指出的是，拓跋焘的统一是形式上的、脆弱的。

北方分裂了上百年，数十个政权相互厮杀，留下了各种矛盾。拓跋焘剪灭其他割据政权只是消除了表面的统一障碍而已。深层次的民族问题、财政问题等更要命，更难解决。拓跋焘的高超之处就在他不仅打倒了其他枭雄，还大大缓解了深层次的矛盾。能够做到前一点的人不少，但能同时完成后一点的人就不多了。拓跋焘，一个少数民族的年轻人，能够两者兼顾，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们来看看拓跋焘面临哪些深层次的矛盾。主要是柔然、民族、收入和南方威胁四大问题。

柔然是继鲜卑之后在北方兴起的少数民族。鲜卑人南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空出来的塞北草原被柔然占领。到北魏初期，柔然已经占领了东起朝鲜半岛、西到西域、北达西伯利亚、南至长城的广袤土地，成为中原王朝新的心腹大患。拓跋焘刚继位，柔然就不给他面子，出兵侵扰。拓跋焘亲自迎战，结果被柔然骑兵包围了整整五十重。全赖北魏将士拼死杀敌，拓跋焘才脱险逃出。北魏王朝对柔然的政策遵循“稳中求变”的原则，在北方各地建立军镇、以守住现有疆域为前提，然后瞅准时机积极出击。拓跋焘一共对柔然发动了不下10次征战。北魏组织敢死队，将士们都只带有限天数的粮食深入敌后，抱

着不成功就成仁的决心，给了柔然不小的打击。尤其是在429年，拓跋焘大败柔然，取得了战略意义的胜利。北魏俘获柔然军民数十万人、牛羊上百万头，将他们南迁，安置在边界南北。柔然余部北遁，逃到了漠北地区。原先依附于柔然的高车（北方游牧民族，据说所乘之车轮子高大而得名）等部落改弦易辙，投靠北魏。柔然元气大伤。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侵扰北魏这项“非常有前途”的事业。

北魏对柔然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朝野有许多人因此反对主动出击柔然，认为柔然地处荒远，即便得到土地也不能耕种，俘虏人口也不能直接驱使，主张消极建造军镇防守。拓跋焘在崔浩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屡次出击柔然，虽然没能根除柔然势力，但基本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免除了内政外交的一大后顾之忧。

第二个民族问题，从西晋末年就开始了。北方犬牙交错地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羯、屠各等民族。割据战争往往和民族仇杀相伴随，导致北方民族关系非常紧张。

和镇压异族的十六国政权一样，北魏也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尊崇鲜卑族人，强迁其他民族加强控制，对反抗的异族力量大开杀戒。许多异族百姓被北魏王朝罚做各种府营杂户，供各衙门驱使奴役，甚至被迫从军当炮灰。拓跋焘用兵关中和陇西的时候，为筹措军需对关中百姓横征暴敛。因此，表面统一后的北魏王朝民族矛盾激烈，尤其以关中地区最厉害。

关中百姓的反抗屡有发生，北魏只能控制长安、杏城等重要军镇，没能实现有效统治。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匈奴别部的卢水胡百姓在盖吴的领导下起义。关中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进逼长安。关东的河南、山西等地老百姓闻讯，也纷纷响应，占领弘农等地，进逼潼关。一时间，烽火燃遍北魏王朝半壁江山。拓跋焘不敢怠慢，紧急抽调军队镇压起义。连新归附的高车部落的骑兵都奉命从内蒙古地区南下作战，可见拓跋焘抽

调范围之广，也可以看出盖吴起义的冲击之大。

遗憾的是，盖吴起义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起义军四处活动，却没有攻克长安、潼关等战略要地，也没有构建起确定的防线。这就让拓跋焘有充分的时间来调兵遣将。他先调兵赶赴长安固守，又派兵屯守渭北，严令务必阻止关中局势进一步恶化。拓跋焘自领主力先清剿山西、河南一带的起义。第二年（446年）正月，拓跋焘成功隔断了关中和关东起义军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关东的起义。二月，拓跋焘马不停蹄渡过黄河，杀向关中。盖吴闻讯北撤，在杏城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八月，盖吴遇害，年仅二十多岁。有人传说他是被亲属出卖的，也有人说他是屠各叛军杀害的。但是之后，不断有起义军打着盖吴的旗号继续作战，北魏还要花费两年时间来彻底稳定关中局势。

在镇压过程中，拓跋焘对响应起义的百姓残酷杀戮。为震慑人心，屠城也在所不惜。之后一段时间，各族百姓屈服于暴力，起义浪潮逐渐息弱。

大起义的爆发，让拓跋焘意识到国家财政的窘迫。赫赫武功离不开物质基础。常年征战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北方百姓捉襟见肘，北魏的横征暴敛是关中各族大起义的重要原因。可拓跋焘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国家掌握的户口很有限，分担给每个人的赋税自然就重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增加户口，只有增加了赋税征发的对象才能增加收入。

当时北方大量的户口被贵族官僚、据守一隅的坞堡主、寺庙僧侣等人控制。乱世中，人们依附于强者，为强者劳作服务，并不对国家产生贡献。官僚贵族依靠特权占有奴婢，拓跋焘一时无法剥夺；坞堡主们各据一方，拥有武装，拓跋焘也无法骤然解决。而寺庙和僧侣控制的大批劳动力、土地和财产就进入了拓跋焘的算盘之中。

佛寺的兴起在中国时间不长，毕竟佛教传入中国也没多久。但是抚慰人心的佛教理论遇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世，如同火苗遇到硫磺，越烧越旺。信众越来越多。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初也接受了佛教，把它当做思想武器麻痹人民。从拓跋珪开始，北魏统治者大多敬礼沙门。寺庙规模日渐扩展，最后发展成拥有大批土地、财产和依附百姓的庄园经济。许多信众信仰、尊崇神佛超过了对朝廷的信仰，奉献寺庙而不服从衙门，这就在官府和寺庙之间产生了矛盾。拓跋焘的赫赫武功恰好需要大批的物质支持，于是激发了蓬勃发展的寺庙经济和北魏朝廷的矛盾。一些佛教僧侣和信徒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影响，追求特权，更让官府看不惯。

拓跋焘一改之前对佛教的尊崇，强迫寺庙经济纳入朝廷的控制。在讨伐北凉的时候，他就为了解决兵源不足问题，下令50岁以下的和尚全部还俗，参军作战。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拓跋焘正式下令“禁佛”。他在诏书中指责佛教信众假借神佛荒诞之说，影响朝廷政治，威胁皇权。规定上自王公下至平民，有私养和尚及师巫的，限在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府，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和尚身死，主人抄家。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来到长安。一次，侍从牧马来一座寺院，发现其中藏有大批武器，就报告了拓跋焘。经搜查后，官兵又在其中发现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拓跋焘勃然大怒，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将“禁佛”发展为“灭佛”。他发布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形象及佛经一律击破焚烧，和尚无论长幼一律活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灭佛”。中国北方的灭佛运动掀起了高潮，北魏境内难觅佛教僧侣踪迹，北方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

且不说灭佛背后的思想纠葛，仅仅从物质收益上来说，拓跋焘经此一举获得了不少物资和人口，缓解了北魏朝廷的收入窘迫的困境。但是，人口被官僚贵族和坞堡主藏匿的主要弊端，拓跋焘终其一生都没能解决。要经过之后几代人的努力，通过“三长制”、“均田制”等汉

化改革才能彻底消除。

拓跋焘面临的第四大问题是南方的威胁。早在拓跋焘全力剪灭割据群雄的时候，南方的刘宋王朝就很有“想法”，想趁北方内战来收渔翁之利。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宋文帝刘义隆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元嘉北伐”，很有气吞河山、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宋军一开始也取得了部分成绩，但很快就在拓跋焘的御驾亲征下一败涂地。当年年底，拓跋焘就带着北魏官兵饮马长江，对宋都建康（今南京）指指点点了。北伐变成了拓跋焘的南征。最终，南北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在淮南一带达成了均势（事见之后元嘉北伐的内容）。

这时候是北魏王朝军力最强盛的时期。策马扬鞭驰骋在长江北岸的拓跋焘也达到了赫赫武功的巅峰。

三

拓跋焘这个人果敢英武，事业成功，但性格上有个缺陷，就是脾气暴躁。人到中年以后，拓跋焘的脾气越来越差。一般人发脾气的时候，也就是砸砸东西，最多打打人。拓跋焘发脾气，后果就很严重了。他每回生气都杀人，而且诛戮过多，造成他身边的人终日战战兢兢，担心什么时候自己就成了喜怒无常的皇帝的刀下鬼了。拓跋焘也常常在杀完人之后后悔莫及，但就是改不了暴躁的脾气。

话说，拓跋焘干事情亲力亲为，经常领兵在外，留太子拓跋晃在首都平城监国，主持政府运转。拓跋晃年纪大了，身边自然聚集了一批人辅佐他。但是拓跋焘又不放心让太子去做，而是信任太监宗爱，放任宗爱留在平城宫中胡作非为。拓跋晃集团不时限制宗爱，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正平二年（452年）的时候，宗爱向拓跋焘进谗言，诬陷太子身边的辅佐大臣们行为不轨。拓跋焘不辨真伪，就处死了他们。太子拓跋晃大为惊恐，担心父皇接下来就要对自己开刀了，竟然惊惧而死，年仅24岁。事后查明，太子及其身边的人都没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拓跋焘追悔莫及，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下号啕大哭。

这下子，轮到宗爱害怕了。他害怕拓跋焘治自己的诬陷之罪，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宗爱趁拓跋焘熟睡之时，将他杀死在床上。北魏的一代雄主，一个面对数万敌军铁骑面不改色、驰骋南北浴血百战的拓跋焘稀里糊涂地死在了亲信的太监手中，时年45岁。

北魏史书对拓跋焘做了极高的评价：“世祖（拓跋焘的庙号）聪明雄断，威豪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等于是将拓跋焘看做开创北魏百年基业的领袖。就是被拓跋焘打得够戗的刘宋王朝，也对他做了很高的肯定，说拓跋焘是“英图武略，事驾前古”。

三 最后一个史官：崔浩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450年7月5日），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大街上碾过一辆囚车。透过扬起的尘土，人们看到囚车中押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不是司徒崔浩大人吗？”

是的，这个死囚正是已经70岁的崔浩，太武帝拓跋焘亲自下达了对他的死刑令。

年迈的崔浩显然被可怕的前景吓坏了，惊恐得不发一言。崔浩被狼狈地押上刑场后，几十名鲜卑族士兵还解下裤子，朝着他的身子解尿。崔浩吓得嗷嗷大叫起来，叫声之大连场外的行人都听到了。不久，叫声戛然而止，一个服务了三朝鲜卑皇帝的汉族重臣的脑袋滚落在地……

崔浩，出生于著名的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作为北方首屈一指的世族大家，清河崔氏在晋末的大动乱中并没有随大溜南迁，选择留在北方。为了笼络北方的汉族百姓，之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建政后，纷纷延揽滞留北方的世族子弟入仕。清河崔氏门第高、声望隆，自然是重点“统战对象”。

崔浩的曾祖父崔悦、祖父崔潜就分别在后赵、前燕做官。父亲崔宏先是在前秦做官，前秦灭亡后他颠沛流亡。崔宏一度有意投奔东

晋，一路向南跑去，结果在泰山被乱军扣留。之后，崔宏被后燕政府任用。拓跋鲜卑兴起，大肆进攻后燕的河北州县。崔宏当时担任高阳内史，大兵压境后弃官而逃。拓跋珪久闻清河崔氏的名声，派骑兵追赶，硬是把崔宏追到，拉入北魏政府做官。崔宏的经历简直是北方大世族的一部磨难史。患难生活让他养成了低调谨慎的作风。崔宏在北魏朝廷言行委婉曲折，不树敌，也不攀附权贵。拓跋珪晚年动辄斥责大臣，崔宏却安然无事，最后荣封白马公，和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崔浩就是白马公崔宏的儿子。他没有经历过父亲那样的磨难，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长大的。崔浩从小博览群书，喜好文学，20岁就入仕，在拓跋珪身边做官。拓跋珪死后，继位的拓跋嗣很信任崔浩，赐爵武城子，常常让他为自己讲授经书。崔浩得宠，能够和拓跋嗣同车出行，参与军国机密，引起了鲜卑贵族的羡慕。拓跋嗣立拓跋焘为皇太子时，就指定长孙嵩、奚斤、安同为左辅，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这六个辅政大臣除了崔浩外，都是鲜卑贵族。拓跋嗣死后，崔浩很快遭到鲜卑贵族排挤，被罢免职务。但拓跋焘在行政和征战过程中，日益觉得需要一个精通汉族制度、善于谋划的大臣，离不开崔浩。崔浩在进攻柔然、灭亡大夏、征服河西和处理与南朝的关系方面，给拓跋焘出了很多好主意。北魏政府仿行汉族礼仪制度，崔浩也起了重要作用。《魏书》就说“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看来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一次，拓跋焘接见归附的几百名高车酋长，指着崔浩说：“你们看看他，身材瘦小，拉不开弓，提不起枪，但肚子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这些胜仗，都有他指点的功劳。”拓跋焘还下令各位尚书有不能定夺的军国大计，先问问崔浩，然后施行。除了政治上信任，拓跋焘在生活上也很亲近崔浩。他不时到崔浩家中请教问题，事先也不打招呼。仓促之间，崔浩接待皇帝难免手忙脚乱，只能用家常菜招待皇帝。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来就吃。同样，崔浩也被允许可以进入皇宫的任何地方，其中就包括拓跋焘的卧室。

皇帝对大臣信任到这样程度，古今罕见。那么，既然崔浩掌握了朝廷大权，拓跋焘又无比亲信他，他怎么就遭到了斩首示众的噩运呢？

这得从当时北魏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崔浩张扬耿直的作风两方面来说。

二

还记得拓跋焘“灭佛”吗？在旁边怂恿他下灭佛令最起劲的，就是官至司徒的崔浩。

崔浩这么做，有消灭膨胀的佛教势力增加国家财富的“公心”，也有“私心”。他本人笃信道教，和当时北方道教领袖寇谦之关系密切。崔浩引荐寇谦之给拓跋焘，经常讽喻拓跋焘灭佛。而当时北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一般鲜卑百姓，佛家信徒不计其数。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后长期被视为“胡教”。鲜卑族人自认为“胡人”，既然是胡人就应该信仰胡教。崔浩则对中原土生土长的道教情有独钟，坚定灭佛。“灭佛”风潮兴起后，大批鲜卑贵族心有不甘。他们不敢反对拓跋焘，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崔浩。

事实上，寇谦之提醒过崔浩，说他高调而坚定的灭佛会得罪很多人的。崔浩就是不听。他生长在官宦人家，没有父辈的磨难，入仕后基本算是一帆风顺，不知道做人从政要谨小慎微，相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事雷厉风行，很少顾及同僚们的想法。加上君臣关系融洽，官位正隆，崔浩内心的两大陋点就被放大了。一个是读书人的高调和虚荣，一个是世家子弟的优越感。我们来看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发酵，最终将崔浩送上断头台的。

太原王氏是和清河崔氏并列的北方头等世族门第，西晋末年南

渡。东晋末年，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从江南归附北方。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门第，想把女儿嫁给他。有人怀疑王慧龙并不是王家的人。崔浩亲自前去验证。他看到王慧龙的鼻子生得很大，不禁赞叹道：“这是真正的王家人，是个贵种。”原来太原王氏有个生理特征，世代都出酒糟鼻。崔浩精通世族谱学（各个世族的家谱和特征）。王慧龙通过崔浩“鉴定”后，受到了北方官民的推崇。崔浩并且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王慧龙长得俊美。他不知道，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朝廷中高调地称赞汉族世族子弟是一个忌讳。果然，司徒长孙嵩听了很不高兴，跑去向拓跋焘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矮化祖国”、“蔑视鲜卑”的行为。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来一顿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自责归自责，崔浩没有真正从心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故态重萌。

神䴥四年（431年），北魏征召一批汉族世族做官。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都应召到了平城。崔浩就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计划由朝廷出面划分世族门第的高低，作为区分政治待遇的标准，有点要恢复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味道。这个计划肯定是对汉族世族掌握政权有利的。但是同样是世族出身（范阳卢氏），又是崔浩亲戚的卢玄劝他说：“创制立事，都要看时机是否适当。现在朝堂上对这件事乐观其成的能有几个人？”崔浩听不进去，公开提出了这个计划，还进一步提出分藩封镇，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当然了，崔浩心目中裂土封到各地的诸侯对象多数是汉族世族子弟。鲜卑族权贵们自然对这样的政策怀恨在心：这不是要夺我们的权，让汉族人掌权专政吗？

拓跋焘伐凉时，留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自恃拓跋焘的宠信，专制朝权，惹得太子不满。更严重的是，崔浩推荐了冀、定、相、幽、并各州数十名汉族世族人士，拟任命为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说官员任用要一步步来，不能马上就提拔为太守，再说朝廷里还有很多

优秀人才等着任用呢。应该说，拓跋晃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崔浩固执己见，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结果得罪了更多的鲜卑官员。中书侍郎高允见状，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有好下场的，自己错了不肯承认，一定要和上面争到底，这样怎么得了！”

所有的不满和矛盾，最终在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国史的时候爆发了出来。

一直到太武帝的时候，鲜卑民族和北魏王朝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所以，拓跋焘就让崔浩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国史修撰工作，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人协助。这是一件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事，拓跋焘很重视，专门召集修撰班子成员开会说：国史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把这个要求理解为“实事求是”，所以采集了鲜卑民族资料，不避忌讳，编写了北魏的国史《国记》，内容涉及鲜卑先辈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

崔浩这么做，没有什么大错。毕竟拓跋焘要求“实录”，况且修撰国史是为了留下准确的资料，教育后代统治者，算做“内参读物”。如果将内容过滤得干干净净、大唱赞歌，那还算什么内参？里面如果有让读者接受不了的内容，顶多算是崔浩“把关不严”。这个时候，崔浩身上文人虚荣和张扬性格暴露了出来。他并没有将《国记》局限为内部参考读物，而是将它大肆宣扬，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参与修撰工作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想拍崔浩的马屁，就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来宣传这一文化盛事。同时刊刻的还有崔浩所注的《五经》。之前，崔浩曾注释过《论语》、《诗经》、《尚书》、《春秋》、《礼记》、《周易》等书。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多“学术图书”的写作，这些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闵湛、郗标二人巧言令色，平时拍崔浩马屁拍惯了——崔浩也很受用这些马屁。如今，他们两人将崔浩那些质量粗糙的作品抬得很高，说之前儒家学者注释的五经都比不上崔浩作品

的质量高，不仅要把这些作品和《国记》一道刊刻出来，而且上书建议收集北魏境内的五经旧注，以崔浩的注释为标准。

高允知道了，很担心。他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的建议，恐怕会酿为崔家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到连累的。”

但是，崔浩昏了头，竟然对闵湛、郗标二人的马屁照单全收，下令将《国记》刊刻出来。

马屁有风险，拍时要谨慎，接受时更要慎重。

三

不久，在平城天坛东三里处出现了一片碑林。整片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刻印着《国记》和崔浩所注释的《五经》，一共用工三百万才完成，不愧为一个浩大的“文化盛举”。

麻烦立刻来了！《国记》如果仅限在小范围内传阅，即便少数鲜卑权贵对秉笔直书的内容不满，他们也找不出攻击崔浩的借口来——毕竟崔浩记载的是事实。可现在，崔浩将客观但却不光彩的鲜卑早期历史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中，无所避讳，引起围观者议论纷纷。鲜卑贵族就找到了攻击崔浩的借口。

大批鲜卑贵族怒不可遏——他们的确非常愤怒，先后到拓跋焘面前告状，控诉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拓跋焘没有想到崔浩膨胀到这种地步，竟然私自在通衢广场之上树立“内部读物”。他也怒不可遏。拓跋焘迅速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

拓跋焘的火发得非常大。情况很严重。

一向不赞同崔浩做法的高允也参与了《国记》的修撰工作，名字

也在要逮捕查办的黑名单上。太子拓跋晃是高允的学生，决心救他。父皇正在火头上，拓跋晃不敢去为老师求情，就把高允召进宫里保护起来，第二天早晨才带着他去见父皇。一路上，拓跋晃叮嘱高允：“一会不管陛下询问什么，老师都只能依照我的话讲下去。”高允不明就里，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拓跋晃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是拉着高允见了拓跋焘。拓跋晃抢先说道：“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小心谨慎，虽与崔浩同事，但一切都由崔浩做主。请饶了他的性命。”拓跋焘召高允上前问道：“《国记》是不是崔浩一个人所作？”高允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各人分工情况，坦率承认自己编撰的部分比崔浩多。拓跋晃见状，在一旁急得直瞪眼，但高允不为所动，毫不避讳地说了实情。果然，拓跋焘大怒，说：“如此说来，你的罪行比崔浩还重，我怎能饶你性命！”拓跋晃连忙替高允掩饰：“高允地位低贱，见了陛下早就吓昏了，说的都是胡话。儿臣仔细问过了，《国记》都是崔浩一个人所作。”拓跋焘再问高允：“的确是这样吗？”高允坦然说了一番道理：“臣才学粗劣，蒙陛下不嫌弃委以编修国史的重任。但是在修史过程中冒犯天威，罪应灭族。太子殿下念臣曾经为他授课，想救我一命，其实事先并没有问过臣修史的情况。臣说的是实话，不敢说谎。”听他说完，拓跋晃眼睛一闭，心想：完了！不想，拓跋焘很欣赏高允的耿直、坦率，对他免于治罪。

崔浩就没高允这样幸运了。崔浩被带进宫来，遭到严厉审问。他一介书生，年已古稀，早就吓得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更不用说自我辩护了。负责审案的鲜卑贵族们自然给他重重定罪。

拓跋焘拿到最后的案卷，又一次大发雷霆，命令高允起草诏书，要将参与修史的128人全部灭族——其中大多数是汉族世家大族。高允奉诏后，心如刀绞，迟迟写不出一个字来。他手里的笔，可关系着北方数十家世族的几千条人命呢！太监几次来催诏书，高允实在扛不住了，就请求觐见拓跋焘后再写。见到拓跋焘，高允说：“如果崔浩犯有别的罪，臣就知道了。单单就触犯忌讳来说，崔浩罪不至死

啊。”拓跋焘大怒，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拉下去砍头。又是一旁的太子拓跋晃百般求情，甚至跪地叩头替高允求饶，拓跋焘这才慢慢压制了怒气，觉得定罪确实太重了，同意赦免大多数人的族人，只处罚罪犯本人。拓跋焘指着高允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

高允不仅又一次逃过了鬼门关，还拯救了很多。他最后活到了98岁才死，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崔浩最终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状被杀。遭到屠戮的除了清河崔氏满门和参与修史的官吏外，还有和清河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这几天都遭灭族之灾。崔浩身前竭力壮大汉族世族在北魏朝野的势力，如今连累着这股势力遭到了血腥的屠灭。

因为崔浩一案牵连人数很多，北方汉族世族为之胆寒，所以很多人怀疑北魏朝廷借崔浩修史一案来镇压汉族势力。进而有人认为崔浩“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处心积虑地为汉族谋利（自然包括为南方的汉族政权说话），被拓跋焘发觉后借修史一事斩首。后来很多人“挖掘”了崔浩密图光复的证据。比如崔浩反对北魏朝廷从平城迁都汉族腹心地区的名城。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北魏粮食歉收，有大臣就建议迁都邺城。崔浩借口鲜卑人去河北容易水土不服发生疾病死伤反对，又借口邺城离北方边界遥远，如果大夏、柔然入侵救援困难反对，坚持都城要定在平城。他是不是不想让鲜卑蛮族入居中华旧地呢？又比如刘裕北伐后秦的时候，崔浩竭力反对北魏出兵夹击汉族军队，而且崔浩对北魏讨伐其他少数民族无不全力支持，但一旦涉及南征或者与汉族军队作战，崔浩总是反对，是不是也是崔浩“心怀故国”的证据呢？当然了，这样的解释揣摩的色彩较重。说崔浩是深藏在北魏内部的汉族间谍，缺乏直接的铁证。

相反，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和北魏朝廷的制度建设方面，功勋卓

著，说他是北魏的开国元勋也不为过。在处决崔浩后不久，拓跋焘就后悔了，感叹崔浩“死得可惜”。

从某种意义上说，崔浩是最后一位敢于直书国史的人物，从那以后，后来的史臣们出于种种考虑，都是本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撰写史书，无一敢直书帝王其人其事，像崔浩那样个性张扬、心灵简单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少了。

四 成也太后：千古一后冯太后



北魏历史上，出现了两位太后。前一位太后励精图治，推动国家走向了强盛，后一位太后败坏朝政，将国家推向了崩溃与分裂的边缘，可谓是“成也太后，亡也太后”。

第一位太后姓冯，是个汉族女子。一个汉人怎么成了鲜卑人的太后呢？这得从头说起。

冯太后身世坎坷，祖父冯宏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末代皇帝。北燕被太武帝拓跋焘灭亡，冯宏带着家人跑到高丽，后来在高丽被杀。冯氏家族纷纷逃回中原，投降北魏。北魏为了表示宽容，接纳了这些亡国皇室后裔。其中冯宏的一个女儿还被拓跋焘纳入后宫，封为左昭仪。冯宏的一个儿子冯朗被封为西域郡公，当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后来因为某宗案子受到牵连被杀。冯朗留下一个幼女，孤苦无依，姑姑冯昭仪就将她接到宫中，亲自抚育。这个小女孩就是日后的冯太后。

冯昭仪对小侄女倾注了无私的关爱，小女孩在北魏后宫平安地成长，并且耳濡目染了诸多的政治风暴，无形中锻炼了才干。当从女孩子长成少女的时候，正是北魏宫廷权力纷争白热化的时期。

北魏正平二年（452年）三月，太武帝拓跋焘被宦官宗爱杀害。宗爱将弑君的罪行掩盖得很好，开始插手皇权更替，决心扶立便于操

作的新皇帝。拓跋焘太子拓跋晃已死，拓跋晃之子拓跋浚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但是拓跋浚当时才12岁。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定以及侍中薛提三人认为主少国疑，新皇帝还是找年纪大的人来做比较好。他们三人属意拓跋焘的第三子秦王拓跋翰，并将拓跋翰叫到宫中，准备登基了。期间，薛提突然变卦了，觉得大家舍弃血统最近的皇孙拓跋浚，改立秦王，会引发动乱。分歧导致了冲刺时刻的犹豫。这一犹豫就被宗爱利用了。宗爱和秦王拓跋翰关系一般，与拓跋焘第五子吴王拓跋余私交很好。他也在同时策划拥立拓跋余为新皇帝。宗爱先又假传皇后诏令，召兰延、和定、薛提三人入内宫杀掉，又将秦王拓跋翰骗入密室杀害，然后拥立拓跋余为新皇帝。

拓跋余暴得皇位，喜出望外之余知恩图报，任命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封冯翊王。没几天，拓跋余就后悔了。因为天下的实权都被宗爱夺走了，自己这个皇帝成了傀儡。于是，拓跋余谋划削夺宗爱权力。宗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偷偷把拓跋余杀害了。

这一回弑君，宗爱做得不隐蔽，被禁卫军官刘尼知道了。刘尼赶紧告诉了尚书源贺、陆丽等人。几人联手，捉拿宗爱。宗爱就是一个太监，并没有多大实力，哪里是大臣们联手后的对手，很快就成了刀下之鬼。朝臣们重新迎立皇孙拓跋浚为帝，史称文成帝。

文成帝拓跋浚在位十四年，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以说的。他最大的政策可能就是重新推崇佛法。拓跋浚的爷爷拓跋焘执行了严厉的灭佛令，公开的佛像和佛教势力被摧毁了，但民间信仰依然坚定，继续扩散。拓跋焘末期，官员对灭佛令的执行渐渐松弛。兴安元年（452年）年底，文成帝正式允许各州县建立佛寺，承认和尚剃度出家。拓跋浚本人似乎也信仰佛教，他不仅亲手为高僧剃发，还在僧侣的建议下，选定首都平城西北约三十里的武州山南麓，开凿石窟，窟中雕凿石佛像。这就是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的缘起。

拓跋浚做的第二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就是在太安二年（456年）立15岁的冯氏为皇后。冯氏之所以能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极可能得到了姑姑冯昭仪的帮助。北魏朝廷选皇后的规定是，先挑选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候选人要完成“手铸金人”的考验。“手铸金人”很可能是类似铸造玩偶的手工艺活动，是挑选过程中关键的一道程序，也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如果候选人不能铸造成功，便被淘汰。而冯氏手铸金人一次成功，顺利打败其他竞争者。后人有理相信，姑姑冯昭仪长期的宫廷生活经历对侄女冯氏的胜出起到了重要作用。

立后的同时，拓跋浚立年仅3岁的拓跋宏为皇太子，当夜依据制度赐太子生母自尽。

早在道武帝时期，北魏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制定了“子贵母死”的制度，即皇子被立为太子后，其生母要被赐死。道武帝拓跋珪立儿子拓跋嗣为帝，就杀其生母，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拓跋嗣说：“昔日汉武帝要立太子刘弗陵，杀了他的生母，是不让妇人参与国政，防止外戚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拓跋嗣继位后，虽然怀念生母，但将立子杀母定为“祖宗家法”流传了下来。

冯氏没有生育，这是她的不幸，但她因此免于杀戮的命运。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拓跋浚在平城驾崩。按照北魏风俗要焚烧文成帝生前的衣物用器等，文武百官和后宫嫔妃要到现场哭泣哀悼。正当百官和后宫痛哭的时候，皇后冯氏忽然扑火要自焚。众人赶紧将她拉了出来。此事可见冯氏的刚硬和勇敢。

太子拓跋宏继位，史称献文帝。冯皇后则升格为了冯太后。

事实证明，北魏“子贵母死”的家法并不能防止皇权旁落。拓跋浚死后，冯太后很快就独揽了朝政，事实上掌握了北魏实权。

当时，献文帝拓跋宏年幼，车骑大将军乙浑趁机要揽权。他矫诏杀害大臣，自称丞相，位居诸王之上，摆出一副独断专行的样子来。他忘记了，冯太后可是敢往火堆里跳的人。冯太后对乙浑的行为假装不闻不问，暗中调大臣入京，突袭乙浑，将他杀死。接着，冯太后以皇帝年幼、防止奸臣揽权为名，宣布临朝称制，掌控朝政大权。

这是冯太后第一次临朝主政，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原因是献文帝拓跋宏天资聪明、刚毅果断，几年后又生下了皇子拓跋宏（父子名字同音），冯太后临朝的理由不充分了，于是归政献文帝，由他决断朝事。

冯太后名为太后，其实还不到30岁，加上结束临朝后无事可做，熬不住寂寞，看到大臣李奕风流倜傥，就和他“亲密接触”，成双入对了。朝野议论纷纷。

拓跋宏血气方刚，得知后怒不可遏，完全不能容忍李奕和母亲的不正当关系。巧的是，李奕的弟弟李敷在相州刺史任上收受贿赂，被人检举。拓跋宏就抓住这件事情不放，高举反腐大旗，大开连坐之门，诛杀了李奕、李敷全家。冯太后遭到情感和颜面两方面的打击，对拓跋宏心生怨恨。于是，母子失和。

献文帝拓跋宏钟爱黄老之学，对佛经有手不释卷之感，对富贵视为粪土，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他治理的朝廷处于乱世，后宫又母子失和，不免心烦意乱，竟然萌发了退位归隐的想法。拓跋宏要把皇位让给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大臣们被皇帝的这个念头给吓坏了，纷纷反对说禅位给皇叔紊乱宗祀，万不可行；如果皇上一定要禅位，也要禅位给皇太子。拓跋宏也不含糊，在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禅位给5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宏做了太上皇，冯太后则升格为太皇太

后。

拓跋宏即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

拓跋宏这个太上皇只有18岁，心中还有大展宏图的念想。他虽然禅位，但依然对朝政有决定性的影响，每天依然像之前一样处理政务，赏罚严明。五年后的一天，23岁的拓跋宏“暴亡”。那是冯太后派人在他酒中下毒。原来拓跋宏禅让之后，和冯太后的关系非但没有好转，还进一步疏远。皇位更替后，孝文帝拓跋宏年幼，冯太后本想再一次揽权，不料拓跋宏把着实权不放，激起了冯太后的杀心。毒死拓跋宏后，冯太后揽权道路上的巨石就被去除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障碍，就只可能是10岁出头的孝文帝拓跋宏了。

对于孙子，冯太后的心态很纠结。一方面，为了大权独揽，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北魏因为遭冯太后猜忌而被覆灭者十余家。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的家族因为是可能替代冯太后的外戚，而被族诛。孝文帝拓跋宏聪慧过人，对祖母表现得非常顺从。有宦官对冯太后搬弄是非，说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盛怒之下痛打了他一顿。拓跋宏默默接受，并不申辩。但是冯太后还是担心他日后对自己不利，想要废掉孝文帝。浓厚的猜忌心让冯太后甚至曾经在寒冬腊月、冰冻刺骨之时，把只穿单衣的拓跋宏关到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这已经不是废黜拓跋宏的帝位，而是要他的命了。大臣李冲、拓跋丕、穆泰等纷纷劝阻冯太后，她才改变主意。（孝文帝拓跋宏因此对李冲异常尊重，皇帝对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但是拓跋宏见到李冲都不呼姓名，而叫他“李中书”。）

另一方面，冯太后一旦消除了废帝的心意，就用心教导拓跋宏，希望孙子能够成为一代圣君。冯太后亲自写了《劝诫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拓跋宏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悉心教导孙子治理天下的原则、方法。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展开了一系列的变

革维新，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现代人更多地径直称之为“孝文帝改革”。实际上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之前，冯太后才是北魏的实际执政者。她开启了一系列改革的序幕，还亲自策划、推行了诸多重要方针政策。因为出身汉族，冯太后启动的改革带有鲜明的汉族特色。

三

以上这些描述可能让人觉得冯太后是一个多疑猜忌、杀戮心很重的女强人。历史上冯太后也是“多智略，情猜忍，能行大事，生杀刑罚，决之俄顷”。但她还有知人善用、生性俭素、仁慈和善的另一面。

冯太后对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往往加以笼络，注意培养、选拔贤能之士为己所用。李奕被杀后，冯太后又挑选了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作为新宠。其中他最宠爱王睿、李冲。

王睿本是以天文卜筮为生的江湖中人，长得伟岸英俊。冯太后因事接见王睿后就喜欢上了他，上床欢愉之后立刻破格提拔王睿为给事中。之后，王睿青云直上，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为太原公。王睿内参机密、外预政事，恩宠日隆。但是他不是一个只会献媚的佞臣，而有相当的胆略和才干。太和二年（478年），冯太后、孝文帝率百官、宫人去虎圈赏虎，有只吊睛大老虎偷跑出来，眼看就要冲到御座之前了。帝后左右的卫士和宫人全都被吓跑了，唯独王睿一人挥舞画戟，站在冯太后和孝文帝面前阻挡老虎。老虎最后被吓走了。王睿被升为尚书令，封中山王，在48岁时病逝。

李冲出身高贵，是敦煌公李宝之子，自少就文雅大度、交游广阔，声誉很高。他虽然也因为床第原因得到提拔，升任中尚令，晋爵陇西公，但他也才干出众，对北魏政治多有贡献。比如影响深远的三长制就是他创造的。

冯太后宠爱王睿、李冲等人，多有赏赐。比如李冲原本家贫，冯太后就暗中将珍宝财物送到李家去，李冲很快成为富室。但冯太后自己日常生活俭素，不好奢华。她吃得十分简单，穿着打扮也很随意。冯太后一改北魏宫廷之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将食谱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平日就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杜绝铺张浪费。她平日穿戴，都是缁纁（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不用锦绣华丽的装饰。冯太后在朝政上也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就下令取消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鸟。

但是由于冯太后好佛，北魏因敬佛而花费钱财巨大，投入成百上千的黄金，将金玉珍宝成斗成斗地装嵌在佛堂佛像上。北魏时期的佛像形制恢弘，至今还多有遗物。

在日常琐事上，铁腕的冯太后表现得仁慈和善。一次，冯太后身体不适，要服用中药。负责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而且粥里竟然还蠕动着一条数寸长的爬虫。冯太后发现后，只是用汤匙轻轻一搅，把虫子挑了出来。一旁的拓跋宏见状，很是恼火，痛骂那厨子，要砍他的脑袋。冯太后却笑着摆摆手，将早已吓得七魂出窍的厨子释放了。对于身边的宦官，冯太后恩威并施，宠信有加，但也不放纵自流。冯太后个性严明、不徇私情。左右宫人有小过错，她就大加鞭撻，少的几十下，多至数百下。可事情过后，冯太后心中不存芥蒂，对受惩罚者待之如初，许多人还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以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对拓跋宏的控制极严。一直到冯太后死前，拓跋宏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何人，可见冯太后的控制程度。拓跋宏生性至孝，事无巨细都先禀明冯太后再做定夺。他长期生活在冯太后的高压下，却养成了正常的心态，既能看到祖母揽权强硬的一面，又没有心生怨恨，而是看到了祖母对国家发展有功的一面。他对祖母推行的诸多改革打心眼里赞同，终身奉行，还进一步深化推进。490年，冯太后病逝，当时49岁。拓跋宏哀痛至极，五天五夜浆水不进，给祖母上

谥“文明太皇太后”，历史上因此称冯太后为文明太后。

五 到洛阳去，到汉人的地方去！



公元471年，北魏皇帝拓跋宏将皇位禅让给了5岁的儿子拓跋宏。

这原本是北魏王朝的一桩宫廷丑事，却在客观上开启了一场伟大改革的序幕。

北魏皇太后冯氏在幕后掌握政权，将拓跋宏置于虚君的位置。拓跋宏杀死了冯太后的情夫李奕，想以此来打击政敌。结果，冯太后强迫他退位，将他软禁起来。不久，拓跋宏就“暴亡”了。新即位的拓跋宏年幼无知，无法处理政事，朝中大事均由太皇太后冯氏执掌。冯氏虽然是鲜卑人的太后，却出身汉族人家。她提拔了许多汉族人进入朝廷，对新皇帝拓跋宏也进行了正规的儒学教育。在政治上，冯太后并不因循守旧，而是大胆进行了改革。

当然了，冯太后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太后的权力，削弱潜在的政敌。人事和吏治整顿往往是最好的突破口。冯氏就从整顿吏治入手，规定地方官只要治绩突出，任满一年就升迁一级；而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过去，拓跋鲜卑的赋税制度混乱，地方上州郡县征收租调。现在朝廷严令只能由县级政权征收，削弱州郡的财权。如此一来，朝廷（其实就是冯太后）对地方官的控制就加强了，地方反抗中央的资本也大为削弱了。冯太后的人事改革还有许多

清明的地方。比如北魏一改鲜卑民族的掠夺本质，在朝廷执行班禄制。鲜卑贵族原来是没有“薪水”的，要用钱的时候就到地方财政上拿，或者公然敲诈勒索、索取贿赂；现在冯太后申明任何官员在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者，处死。考虑到许多官员都拖家带口的，俸禄可能不够，朝廷又规定地方官可以按官职高低领取一定数量的俸田，耕种收获，补贴家用。这些俸田不准买卖，官员离职时移交下任。后来其他政权觉得“俸田制”不错，纷纷效仿。冯太后也算是为中国官场提供了一项原创制度。

有一项改革可能在冯太后心目中并不是重点，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均田制”。

作为汉人的冯太后对农业结构的基本理解是地主与雇农的结构。长期的战乱造成了大批无地农民，也让北魏朝廷掌握了大量无主土地。朝廷于是颁布均田令，根据百姓家庭的不同情况，授予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其中露田种植谷物，不准买卖，得田百姓70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等经济作物，不须交还国家，允许百姓自由买卖。

均田制的推行对于“不习农桑”的鲜卑经济来说是一大进步。它的本质是国有经济，以国家掌握的土地和人口为基础。战争导致百姓脱离田地，背井离乡，国家手里掌握着大片无主土地，但就是缺乏人口（原先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姓不是成了游民就是依附豪强地主，成了后者的“荫户”）。因此北魏又和地方豪强和宗主展开了对人口的争夺。冯太后在国内推行三长制，抑制地方豪强荫庇户口。朝廷调查人口，规定每五家为邻，设立一个邻长；每五个邻为一里，设立一个里长；每五里为一个党，设立党长。三长协助官府管理人口、征发赋税，大大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保证了均田制需要的人口。

与均田制相适应，朝廷调整了租调制，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均田制和租调制相结合产生了巨大成

功，以至于它日后漂洋过海，为日本等国所效仿。这些后事大大出乎了当初改革者的意料之外。

这些改革带有突出的汉族色彩，都是以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但是年幼的拓跋宏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他受到冯太后的严格教育和严密监视，终日战战兢兢，生怕惹怒太皇太后，招来被废的厄运，甚至是杀身之祸。拓跋宏就是在大权旁落、担惊受怕的环境中日益长大的。如果说他有什么突出之处，就是他成功地和冯太后处理好了关系，并且养成了沉稳老练的性格，深谙政治。而改革的倡议者和主持人冯太后虽然缺乏高尚的目标和响亮的口号，却在南北朝历史上刻上了深深的痕迹。

只是冯太后此人，精于权谋却疏于政治，长于战术却短于战略。她仅仅揭开了一次伟大改革的幕角，没有能力让它成为一场辉煌的大戏。

二

公元490年，冯太后死后，拓跋宏将老人家风光大葬，然后从权力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年轻的拓跋宏接受的政治遗产非常复杂。祖母启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却没有解决帝国的深层次问题：北魏王朝与作为政治根基的汉族民族依然存在隔阂。中原各地反抗鲜卑的零星造反事件层出不穷。一道道镇压的使命不断从平城发往各地。拓跋宏对祖母的改革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这不仅仅出于对政策方针本身的认同，更是因为冯太后留下了一整套政治班子。拓跋丕、穆泰、陆睿等冯太后的老臣把持着朝政，依然分割着皇权。拓跋宏通过对冯太后的高度尊崇，全面继承祖母的政策来压制这部分人的潜在政治威胁。

最让拓跋宏头疼的是，带有汉族色彩的改革引起了鲜卑民族内部的不满。

鲜卑贵族是在马上得的天下，王朝建立后也始终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本性。他们居住在祖先经营多年的首都平城，自豪而且自信。他们感谢祖先留下的富贵生活，也愿意为捍卫这样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冯太后通过自己的权威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推行了许多改革，却丝毫没有触及鲜卑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内容。拓跋鲜卑依然保持着保守的面貌。当年酋长拓跋力微的儿子沙漠汗在晋朝当质子后返回晋北。他用弹弓打鸟。这个很寻常的行为竟然引起了部落贵族的恐慌。因为在拓跋鲜卑的历史上，弓都是用来发射箭，再用箭来射鸟的，从来没有人用弓发射弹子。于是，惶恐的贵族们认为沙漠汗已经被南方汉族人的风习俗气给“污染”了，担心他日后继承了大位后，会改变鲜卑旧俗，进而对部落贵族们不利。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建议拓跋力微杀死儿子，再挑选本分朴实的人为继承人。这些保守的鲜卑贵族对已经开始的改革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女强人”冯太后死了，这种情绪可能会寻找途径爆发出来。

从小接受正规儒家教育的拓跋宏显然不是旧式贵族的同路人。

只有继续冯太后开启的改革，仿效中原先进的政治文化，才能破解鲜卑族落后保守的面貌，才能突破王朝发展的瓶颈。

拓跋宏如今需要做的是寻找在旧贵族包围中突围而出的方法，一种既可以巩固和扩大皇权又能够推进改革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拓跋宏想到的方法就是“迁都”。平城是拓跋鲜卑的老根据地，为北魏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埋葬着本民族的列祖列宗。这里是拓跋鲜卑祖宗耕耘之地，靠近本民族熟悉的草原。但是平城越来越满足不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帝国的经济需求，北魏王朝不得定期从中原各地征调物资和人口来支撑首都的正常运转。随着北魏立国时间越来越长，汉族人已经成为了王朝人口的多数，成为了王朝政治的根基，但鲜卑

人显然和他们缺乏沟通，也没有得到他们的 坚定支持。

且不说平城气候恶劣、环境恶化、经济薄弱，也不说平城远离中原腹地地区，不利于王朝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就只说平城笼罩着的浓厚的游牧民族气息和保守的思想就让拓跋宏受不了。平城的气氛与拓跋宏的思想不符，也不利于王朝的长远发展。当时，拓跋宏经常要处理北方柔然不断进犯北魏云中地区的军务。柔然的军队能够威胁到平城的安危。拓跋宏觉得如果自己再继续和柔然这样后起的游牧民族纠缠下去，北魏朝廷就永远摆脱不了游牧民族这个圈子了。现在的北魏王朝已经不是游牧王朝了，需要一次飞跃。那就是迁都。迁都到什么地方呢？拓跋宏认为“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崑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计划迁都到中原腹心的洛阳去。

洛阳是之前东周、曹魏和西晋王朝的首都，处于中原汉族人口和经济的中心，具有深厚的汉民族政治文化智慧的积累。迁都洛阳，可以解决物资保障问题、接受汉族政治遗产的滋养、争取汉族主体的支持。至于平城的那些旧贵族，就让他们和游牧后辈柔然人去纠缠较量吧！拓跋宏认定自己给北魏王朝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有学者从年轻的拓跋宏的心理出发，认为由于冯太后“临朝专政……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导致了拓跋宏和心理和现实上始终处在冯太后的政治压迫之下。“平城诸多鲜卑元老重臣无时无刻不想把孝文帝（拓跋宏）控制在自己的掌心。而且，冯太后已经固有的政治业绩在平城已经达到巅峰，不可能再有更大更多的发展，孝文帝（拓跋宏）在平城很难施展抱负。”

太和十七年（493年），拓跋宏突然嚷嚷着要南伐宋朝，统一全国。

皇帝的行动还很快，在明堂上当众命令太常卿王谌亲自去做龟卜，看看南伐是否吉利。

王谌是九卿之一的太常卿，本不应该由他亲自去钻乌龟壳做占卜。这些事情本应该是下面的仆吏去做的。拓跋宏下诏要王谌亲自去做，顿时让群臣感觉到了皇帝对南伐一事的重视。没有人料到，在诏书下达之前，拓跋宏偷偷把王谌叫到一边面授机宜了。没多久，王谌就呈上来一个大大利于出兵的“革”兆。商朝汤武当年伐夏前占卜就得了个“革”卦。

鲜卑人迷信占卜。拓跋宏见此，高兴地宣布：“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吉卦。我们要择日兴兵，南伐宋朝。”群臣知道皇帝要来真的了。可讨伐南方统一全国是大事，关系王朝兴衰，不是仓促能够准备好的，更不是儿戏。但是占卜的结果却是有利于出兵的吉卦。大臣们一下子懵了，都低头不敢说话。

任城王拓跋澄仗着自己是拓跋宏的叔叔，出来说：“易经说‘革’是更改的意思。将欲应天顺人，变革君臣的地位，所以汤武得到‘革’卦是吉卦。但是陛下拥有天下，有好几代了。现如占卜出征，只能说是‘伐叛’，不能说是‘革命’。因此，占卜得到‘革’卦，并非君人之卦，并不吉利。”群臣见有人挑头反对南伐，待拓跋澄话落，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拓跋宏厉声反驳说：“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拓跋澄也和侄子撞上了，说：“陛下龙兴已久，怎么能和虎变相提并论！”拓跋宏想不到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气得脸都变了色：“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难道想破坏士气，阻碍国家南伐吗？”拓跋澄也不示弱：“社稷的确是陛下的社稷，但臣是社稷的臣子，既然参与政事以备皇上垂问，就不能不竭尽所能，畅所欲言。”拓跋宏早就下定了迁都洛阳的心思，现

在提南伐只是找个借口而已。想不到南伐刚提出来，就遭到了拓跋澄的坚决阻击，心里一下子就烦躁不安起来。拓跋宏毕竟是拓跋宏，很快就从不快情绪中解脱出来，认识到：“我和拓跋澄只是都将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而已。拓跋澄也不见得就是个老顽固。”拓跋澄反对南伐，是为国着想。既然为国着想，就不会反对迁都。打定主意，拓跋宏不再提南伐，转移到了其他话题上。等到退朝，皇帝车驾还宫后，拓跋宏立刻召拓跋澄来见面。

拓跋澄还没走上台阶，拓跋宏就远远地对他说：“我们再不谈什么革卦了，刚才在明堂之上，我是怕众人争相发言，阻我大计，所以厉色震慑群臣。我现在叫你来，是希望你能了解我的真意。”接着，他把名为南伐、实为迁都的计划单独告诉了拓跋澄：“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拓跋澄原本是担心年轻的拓跋宏一时兴起，对南宋发动冲动的讨伐伤害国家元气。现在他终于知道了拓跋宏深谋远虑，为国家发展着想的真实意图，立即表示支持：“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拓跋澄也认为洛阳地处中心，迁都洛阳有利于对全国加强统治，也就是“制御华夏，辑平九服”，是件大好事。

有了叔叔的支持，拓跋宏的心放宽了一些。但他还是心存担忧：“北人恋本，突然听到朝廷要迁都，不能不惊扰。”拓跋澄坚定地说：“迁都大事，本来就是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只要陛下圣心独断，其他人亦何能为也。”拓跋宏受到鼓舞，高兴地说：“如果迁都能成，任城王就是我的张良啊。”

拓跋宏决心甩开群臣，开始“南伐”的准备。他先加封拓跋澄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再和出身汉族的尚书李冲等人秘密部署。拓跋宏任命李冲负责选拔勇士南征，命令北魏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正式宣布南伐，还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徐州征

发民夫，招募兵丁。夏末，拓跋宏拜舘了冯太后的永固陵后告别平城，率领大批大臣、将领和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往南去了。

地下的冯太后不知道，自己的孙子从此将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了寒冷的晋北。

平城也想不到，这位城市从此再也没能成为任何一个政权的首都。

四

拓跋宏率领着大军，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南征途中的洛阳。

来到洛阳前后，河南一带阴雨连绵，让长途跋涉、全副武装的将士们苦不堪言。拓跋宏于是下令全军在洛阳休息待命。

洛阳还下着雨，拓跋宏则兴致勃勃地带着群臣参观了城内残存的汉家宫殿。洛阳从西晋末年开开始屡经战乱，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恢宏景象，但是曹魏和西晋各代皇帝对这座城市长期经营，留下了众多的遗迹。满目荒凉的殿址断垣残壁、杂草丛生。拓跋宏触景生情，对左右大臣说：“西晋不修功德，致使宗庙社稷毁于一旦，宫殿荒废至此，朕实在感到痛心。”说完，拓跋宏潸然泪下，吟诵起了《诗经·黍离》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熟知历史，担心北魏王朝也重蹈西晋的覆辙。其他王朝是在洛阳走到了末日，对于北魏来说，只有留在洛阳才能远离末日。

为了留在洛阳，拓跋宏披甲上马，又要拔剑出城，下令全军继续南进。当时，连绵的秋雨已经下了一个月，河南地区道路泥泞，士兵前行困难、士气低落。随行的大臣和将领们原本就对草率的南伐缺乏

信心，现在在洛阳的生活苦不堪言，偏偏遇到皇帝督促上路，纷纷出来劝阻拓跋宏。群臣拦着拓跋宏的马，尚书李冲（他其实是个“托儿”）指出此次南伐本来就没有取得朝野的一致意见，现在皇上又紧紧催促进攻，群臣恳请他收回成命。他的话得到了许多大臣的认同，但拓跋宏紧握缰绳，毅然决然地要继续南伐。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最后都哭着劝谏皇帝不要南伐了。拓跋宏这时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严肃地说：“此次朝廷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貽笑大方？既然停止南伐，不如就将国都迁到洛阳。”大臣们听了，面面相觑。皇帝同意停止南伐了，但是提出了迁都的新要求。谁都不敢抢先发表意见。拓跋宏紧接着说：“诸位不要犹豫了。同意迁都的站到左边，不同意的站在右边。”在内心里，多数文武官员是不赞成迁都的，但是眼前的雨水和危险的南伐是最紧迫的问题，迁都可以停止南伐，因此多数官员只好表示拥护迁都，往左边站了。安定王拓跋休等少数人站到了右边，反对迁都。少数服从多数，南安王拓跋祯代表多数大臣说：“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

拓跋宏精湛的演技环环相扣，到现在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

洛阳城残破，拓跋宏先驻蹕在西北角的金墉城。

迁都一事在程序上确定后，拓跋宏给拓跋澄下了一道诏书：“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末了，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在拓跋宏的心中，所谓的“革”卦完全应验在了迁都洛阳这件事情上，它完全可以和商汤伐夏相提并论。

拓跋澄回到平城后，宣布了迁都的决定。留守平城的文武大臣闻言无不惊骇失色。他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好在拓跋澄援引今古，耐心地一个一个人地做思想工作，才没有和平城引发出大骚乱来。贵族大臣们虽然不愿意迁都，但一下子懵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了。

第二年（太和十八年，494年）年初，拓跋宏亲自回平城安排迁都事宜。他在太极殿正式宣布迁都。留守平城的鲜卑元勋显贵借机向拓跋宏发难，反对迁都。

燕州刺史穆熊说：“国家北有柔然的危险，南有南齐政权没有臣服，西有吐谷浑的骚扰，东有高句丽的隐患，四方不定，尚待统一。在这个时候迁都，时机不对。况且征讨四方，需要大量戎马，平城有马而洛阳没有马，迁都怎能取胜呢？”拓跋宏反驳说：“北方出产马匹，朝廷只要在北方设立牧场，何必担心无马？平城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所以要迁都中原。”尚书于果反对说：“臣也承认代地（平城属于代地）比不过伊洛（洛阳在此地），但本朝自先帝以来世代久居平城，百姓已安，一旦南迁，众人未必乐意。”老资格的宗室拓跋丕也反对说：“去年，陛下亲率六军南征，到了洛阳后派任城王回平城宣旨，命臣等讨论迁都大计。臣等初奉恩旨，心中惶惑。迁都大事，应当讯问卜筮，审定是否大吉，然后定夺。”拓跋宏耐心地回答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人的认识超过占卜的力量，我们没有什么疑问，占卜又有什么用处呢？帝王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哪能常居一地！本朝远足，世代居于塞外荒漠，平文皇帝开始南下草原，昭成皇帝营建盛乐新城，道武皇帝才迁都平城，朕为什么就不能迁都洛阳呢？”至此，拓跋宏从细节、心理和理论上全盘驳斥了反对迁都的言论。保守大臣们争辩不过，哑口无言。有的人干脆痛哭流涕，表示誓死不离平城。拓跋宏强行下诏迁都洛阳。平城的国家机构南迁的事情算是定了下来。

拓跋宏于是祭拜太庙，告诉列祖列宗后代要迁都河南的事情，再把祖庙的神主牌位迁往洛阳。平城的王公大臣及后宫都迁往洛阳，许多百姓也扶老携幼开始前往洛阳。整个迁都行动直到第二年的下半年才大致完成。

浩大的北魏迁都工作从谋划到最终完成一共持续了三年之久。

六 谁阻挡汉化就让谁灭亡



迁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拓跋宏的目的是推动整个鲜卑民族的汉化。迁都洛阳为拓跋宏大刀阔斧地深入改革提供了契机。

与祖母冯太后一样，拓跋宏的深入改革也是先从政府人事开始的。

拓跋宏到洛阳不久，南方的大士族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来到邺城。王肃是东晋大丞相王导之后，博学多通，才华出众。他尤其精通政治，给北方王朝带来了完备的汉族政治思想和制度。拓跋宏听说王肃在邺城，亲自召见。王肃辞义敏捷，对答如流，态度不卑不亢，对国家大事和发展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非常切合拓跋宏的思路。拓跋宏细心地与王肃交谈多日，有时谈至深夜也不觉得疲惫。拓跋宏向汉族靠拢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正需要王肃这样的人才。拓跋宏放心地对王肃委以重任，亲切地呼他为“王生”。之后北魏王朝的礼乐改革，移风易俗和制度制定，多数是由王肃主持的。在改革的旗帜下，大量有真才实学的汉人得到了重用。而对于反对改革或者思想保守的贵族大臣，拓跋宏通过人事调整，逐步清理出了政治核心。拓跋宏任命反对迁都的冯太后亲信拓跋丕留守平城，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实权；又如原

本显赫的陆睿由镇北大将军调整为尚书令、定州刺史。

政治上的改革相对简单，社会改革的难度要大得多。迁都洛阳后，大批鲜卑人南下中原，来到汉族核心地区。这些鲜卑人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穿夹领小袖，与汉族人显得格格不入。多数的鲜卑人不会说汉语，就是在朝堂之上，鲜卑族和汉族的官员也不能直接交流。为此，朝廷和社会上都出现了专门的翻译。习俗与语言的冲突还是其次的，最大的问题是大量鲜卑人来到洛阳地区，居无定所，又不擅耕种，缺乏粮食。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前，南迁的鲜卑人难免人心恋旧，对迁都颇有微词。

拓跋宏很快就将改革触角延伸到了社会风俗和思想领域。他下令官民禁穿胡服，服装一律依汉制。此令一出，引起了鲜卑人的巨大反弹。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政治虽然是上层建设，但毕竟不是一个民族内在的特征。而服装以及语言、风俗等与民族心理紧密相连，是各民族相互认同和区别的主要特征。接到命令的多数鲜卑人没有改换服装，依然我行我素。留守平城的太傅拓跋丕就公然拒不换装。

太和十九年（495年）年初，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的哥哥，又是拓跋宏的岳父，按礼拓跋宏要参加他的葬礼。于是拓跋丕联合陆睿等人上书，请求拓跋宏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当时，朝廷刚刚搬迁到洛阳，百废待兴，如果皇帝公开返回平城参加葬礼，无疑给反对迁都的人增加了口实，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迁都带来的不便。拓跋宏一眼就看出了拓跋丕等人的心思，斥责他们“陷君不义”，下诏将拓跋丕降为并州刺史，调离平城，其他官员相应降职处理。至于冯熙的葬礼，拓跋宏下令将他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不久，拓跋宏的一个堂兄在洛阳病故了，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拓跋宏的堂嫂子早死，已经葬在平城，那么这位堂兄是否要葬回平城呢？按理说，拓跋宏应该让人家夫妻团聚，但拓跋宏却借机规定从平城地区迁移到洛阳的人死后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已死

而且葬在代地，妻子死后可以归葬；如果妻子已死而且葬在代地，丈夫死在洛阳后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拓跋宏还干脆将所有南迁官民的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类似的改革很多，比如让鲜卑人学习汉语。拓跋宏首先在朝堂上做起，规定30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堂上不讲汉语的，一律免官，30岁以上的官员不强求，但也要慢慢学；又比如下令鲜卑人将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拓跋宏率先将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因此拓跋宏就变成了元宏。其他的，比如独孤氏改为刘氏，步大孤氏改为陆氏。

语言和姓氏等是一个民族的鲜明特征，对一个民族的心理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拓跋宏要求在短时间内告别以往的民族特征，尽量磨平民族差异，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整场改革行动更多的是依靠拓跋宏的皇帝权威去强力推行。一次，拓跋宏出去巡视的时候看到许多鲜卑妇女还穿着胡服，回来后就责备相关官员没有落实改革措施，进行了处罚。为了让皇族起表率作用，拓跋宏下令北方四个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与各个高门大族联姻，与汉族大家的关系错综复杂。拓跋宏娶了他的女儿为妃。拓跋宏的六个弟弟已经娶妻，也在哥哥的要求下再婚，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

有一次，拓跋宏在洛阳街道上看到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上，全副鲜卑打扮。后到宫中，拓跋宏就召见群臣，公开责备了任城王拓跋澄，说他督查不严，落实政策不力。拓跋澄自我辩解说汉化政策贯彻落实得不错，只有少数人还固守鲜卑服饰和语言。拓跋宏尖锐地反驳说：“难道要多数人都保留鲜卑服饰，讲鲜卑话，才能算你督查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他气鼓鼓地转向史官，命令将这件争吵如实记载在国史上。可见，拓跋宏推动汉化政策是如何雷厉风行。

迁都和汉化改革，是拓跋宏眼中的国家正确发展道路。为此，他

不近人情而又孤独地前行着。

二

不客气地说，拓跋宏的改革是对鲜卑族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否定。

这样的改革必然遭到本民族保守势力的反对。拓跋宏推行的力度越大，意愿越坚决，反对派设置的阻力也就越大。

拓跋宏对反对改革势力的做法只有一个：强力镇压。

拓跋宏很早就立长子元恂为太子。太和十七年（493年），元恂在12岁的时候，也就是拓跋宏动身去洛阳“南伐”前夕被立为太子。之后，元恂跟随父亲来到了洛阳。拓跋宏出外征巡时，元恂都留守都城，主执庙祀。拓跋宏父子的关系还是正常和睦的。

元恂年纪轻轻，却长得很胖很肥。他肥到什么程度后人难以有确切的数据。一到夏天，元恂就浑身流汗，很不舒服。迁都到洛阳后，元恂对河南的气候很不适应，老是想念平城相对凉爽的气候。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他的这种思想是纯真的，不带任何政治因素的。

496年，拓跋宏巡幸嵩山，留元恂在洛阳主持政务。

出巡途中，拓跋宏接到了皇后的紧急报告，说元恂要逃回平城去，还亲手杀死了苦苦劝他留在洛阳的中庶子高道悦。领军元俨为了防止变乱，赶紧关闭宫门，才阻止了太子的出逃。接到报告的拓跋宏中止了出巡，匆匆返回洛阳。

经过初步审讯，元恂出逃的经过非常清楚，自己也供认不讳。因此元恂被捕。拓跋宏将儿子的出逃上升到了政治事故的高度。这也难

怪，拓跋宏长期在改革和反改革的漩涡之中挣扎斗争。他独自推动改革的车轮向前进，每一个进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拓跋宏感到累了。元恂逃到哪里避暑不好，偏偏要选择平城。平城是拓跋宏要舍弃的鲜卑民族落后保守的象征。元恂要逃回平城，难道不是公开和自己唱对台戏，反对改革吗？这样的太子还怎么能托付大任？

拓跋宏迅速废黜了元恂的太子位，当众斥骂他的罪过，还亲自杖责儿子。后来打累了，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替他杖责了元恂百余下。元恂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一顿打下来，遍体鳞伤，足足一个月趴在床上难以动身。拓跋宏还恶狠狠地说：“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之后，废太子元恂被软禁在河阳，由兵丁看守，每日只有粗食过活。残酷的政治斗争让拓跋宏丧失了理性的感情。

真正反对迁都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元丕、穆泰、陆睿等人。

穆泰出身鲜卑贵族世家。祖父穆崇对拓跋珪有救命之恩，任太尉，封安邑公；父亲穆真是冯太后的姐夫。穆泰本人又娶了章武长公主，既是功臣之后，又是皇亲国戚，先后担任尚书右仆射、定州刺史、征北将军等职。穆泰对拓跋宏还有“救命之恩”。最初的时候，大权独揽的冯太后曾将拓跋宏幽禁，计划废黜。穆泰劝谏冯太后不要随意废立皇帝，保全了拓跋宏的皇位。拓跋宏亲政后，对穆泰很感激。君臣两人关系一度非常亲近。但是拓跋宏推动迁都和汉化改革后，穆泰毅然站在了反对立场上——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顽固的老贵族。

太子元恂要逃回平城的那个夏天，穆泰正在定州刺史的任上。穆泰对逐渐深入的改革难以接受，借口不适应定州的气候奏请转任恒州（治所就是平城）刺史。当时的恒州刺史是思想同样保守的陆睿。拓跋宏于是决定让穆泰、陆睿二人对调一下职位。

穆泰在回平城的路上，不满和失落的情绪让他做出了割据平城叛乱的决定。等他到恒州时，陆睿还未起程。穆泰就煽动陆睿共同起

兵。两人一拍即合，并联络了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元思誉等人参与。其中元隆、元超、元业三人是元丕的儿子。这简直是一次保守势力的大集合、大检阅。他们秘密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新主，要与拓跋宏分庭抗礼。

元颐却对起事缺乏信心。这边来推举他的人刚走，他就派人快马向拓跋宏告密。拓跋宏立即派任城王元澄率领大军讨伐。元澄先派治书侍御李焕潜入平城了解情况。李焕在平城展开了成功的攻心离间工作，各个击破叛乱分子，很快瓦解了叛军的士气。穆泰自度必败，一不做二不休，亲自带上一百多号人围攻李焕的住处。结果没有打下来，穆泰只好单枪匹马逃跑，被擒。元澄的大军迅速进城，将叛乱分子一一抓获。

事后，拓跋宏御驾亲临平城，审问罪犯，穆泰等多人被斩首。陆睿是老臣。冯太后曾赐他铁券金书，答应许他不死。拓跋宏没有将陆睿斩首，而是赐死。平城发生兵变时，元丕已经80岁了，并不在城内，更没有参与兵变，但他的儿子曾将密谋告诉过父亲，元丕没有发表意见。事后，元丕被认为“心颇然之”，应该连坐受死，但拓跋宏念他在冯太后当年要废黜自己时曾和穆泰一起固谏，加上元丕也有免死诏书，因此只是被削爵为民。乐陵王元思誉、穆熊等也被削爵为民。

平城的未遂兵变，让拓跋宏沉重打击了反对势力，也让他加深了对反对势力的警惕和仇视。

平城的兵变平息后不到四个月，拓跋宏下达了对废太子元恂的处决令。

废太子元恂在河阳每日忍饥挨饿，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他每天的行动主要是礼佛诵经，还经常书写学佛心得。太和二十一年（497年）4月，中尉李彪告发元恂与左右谋逆。拓跋宏随即派中书侍郎邢

恋与咸阳王元禧用“椒酒”赐死元恂。元恂死后，粗棺常服，被葬于河阳城。

元恂死后的第二年，御史台令龙文观违法当死。可能是为了开脱自己，龙文观在审讯的时候交了许多问题。他曾经接触过废太子元恂，说元恂被拘押时，写了很多书信。龙文观不知道元恂所写书信的内容，供认中尉李彪和侍御史贾尚很清楚。为了查明此事，廷尉收审贾尚。当时李彪已免官回归老家，廷尉奏请拓跋宏将李彪收赴洛阳。拓跋宏非但不准，赦免了李彪，还指示龙文观交代的这条线索“到此为止”，不再追查。贾尚随即被无罪释放，回家后就得了“暴病”，没几天就死了。

这是一桩令人疑惑重重的无头案。元恂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拓跋宏为什么不让追查下去？拓跋宏明显偏袒李彪，而对元恂的死漠不关心。最大的可能是元恂写了一些对李彪不利的文字，导致了后者的诬告。而拓跋宏刚刚经过平城兵变的“考验”，多疑烦躁。他本来就对废太子不放心，刚好抓住李彪的诬告置儿子于死地。事后，拓跋宏也知道其中有猫腻，但他的维权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

元恂的鲜血是无辜的，他是一桩孤独艰难改革的牺牲品。

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拓跋宏才是北魏王朝真正的开国君主。

北魏王朝出自代国，不是拓跋宏创造的。但拓跋宏给予了它成为一个王朝的基本内容：政治、文化和受到的认同。拓跋宏的先辈们利用西晋末年的乱世建立了割据政权。像它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五胡乱华时期很多，多到随起随灭的地步。尽管北魏实力稍强，但也没有真正得到中原百姓的认同。而拓跋宏实现了北魏从一个北方蛮夷政

权到全国政权的飞跃。他的迁都和改革让北魏融入了中原。

南朝名将陈庆之观察北魏后，向南方人感叹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可见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北魏也不再是割据的蛮夷政权了。

这要归功于拓跋宏。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汉化程度最深的改革。正因为程度之深，导致了本民族内部的强烈反对。“在拓跋宏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拓跋宏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拓跋宏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从物质上来衡量，拓跋宏的改革也非常成功。西晋鼎盛太康年间，朝廷“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到北魏 520 年，朝廷控制的人口就超过了五百万户，是西晋太康时期的两倍还要多。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多寡是国力强盛的核心标准。

洛阳城从西晋末年起，经历多场战火，在迎接拓跋宏到来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了，几乎就是一片废墟。经过拓跋宏的营建和北魏之后几十年的经营，洛阳迅速恢复为中原重镇，规模宏大，市井繁荣。整个洛阳“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殖货之民，千金比屋，层

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

四方人士汇聚洛阳。城南四里的洛水之上，有一座浮桥叫永桥。北魏在桥南建造了整齐的建筑群，招待各方来客。从南方投奔而来的“吴人”先居住在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洛阳人将归正里叫做“吴人坊”。南齐建安王萧宝夤来投降的时候，北魏就在归正里给他安排了府邸。后来萧宝夤娶了北魏公主，耻于居住在城外，得到允许后移居城内。后来，南梁的西丰侯萧正德来投降，也先住金陵馆，后来在归正里找到了房子。从北方投靠来的“北夷”先被安排在燕然馆，三年后赐宅归德里。一些北方少数民族酋长还派遣儿子入侍北魏朝廷。因为忍受不了黄河流域的炎热，这些人秋来春去，在当时被称为“雁臣”。从东方依附而来的“东夷”先住在扶桑馆，之后再赐宅慕化里。而西边“西夷”来依附的则入住崦嵫馆，之后再赐宅慕义里。这些附化之民，就超过了一万户。史书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洛水岸边，“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改革成功后的北魏国力强盛，四方百姓归附。拓跋宏也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君王，不断发动对南朝的征伐。499年4月26日，拓跋宏逝世于南征途中，年仅33岁——北魏皇帝都不长寿。历史上称他为孝文帝。

七 草根做皇帝

了解了北朝的主角北魏，我们再来看看南朝的主角——刘宋王朝。

东晋朝廷建立在司马皇室和各大世族大家的势力均衡上。司马家族的权威和声望并不高涨——这也是东晋权臣迭出的重要原因，世族大家更多的只是将朝廷作为认可自身权益的招牌而已。长期以来，皇室形同傀儡，全赖地方藩镇和世族相互厮杀，谁都没有能力独霸大权，司马家族才能维持微弱的统治。桓玄一度推翻司马家族自立，更是让司马皇室名声扫地。东晋末年，军政大权完全操于权臣刘裕手中。刘裕势力日增，无人能敌。几乎所有人都很清楚，刘裕篡晋自立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司马皇室对刘裕的步步紧逼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在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自然不知道刘裕的篡逆之心。因为他是个白痴。但是他的弟弟司马德文却不是傻瓜，他很清楚自家的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司马德文是晋孝武帝的儿子，最早被封为琅琊王，在朝堂担任地位崇高的虚职。他和哥哥的感情很好。晋安帝被桓玄废掉的时候，司马德文陪伴着哥哥居住在浔阳；桓玄败死后，又一起被迁到江陵。

桓玄死后，部将桓振继续叛乱，夺回了晋安帝。当时桓振跃马奋

戈，冲到晋安帝面前要为主子的死讨个说法。他瞪着眼睛对晋安帝说：“臣桓氏一家有什么辜负国家的地方，要遭到朝廷的屠灭之祸？”司马德文当时正在榻上陪伴瑟瑟发抖的白痴哥哥，见事情紧急，下床对桓振说：“这难道是我们兄弟的意思吗？”这句话说得桓振无话可说。的确，哥哥司马德宗是个天下皆知的白痴，连话都不会说，更不用说谋划屠杀桓氏家族了；而桓玄是被刘裕打败的，桓氏一家是在建康被杀的，与这两个可怜的兄弟没有什么关系。这一句话也说出了司马德文兄弟的无奈。身为皇室成员，他们对朝廷大事根本做不了主，却要在乱世中因为血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一句话出自司马德文之口，也恰好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418年，刘裕篡位的野心越来越暴露了。他急于篡位，密令党羽中书侍郎王韶之买通司马德宗左右侍从，要伺机除掉晋安帝司马德宗。司马德文知道刘裕有杀害哥哥的企图，加上晋安帝这个人不能饥寒，没有自理自卫能力，因此他便坚持天天随侍于晋安帝左右。司马德文整日陪侍皇帝，一时让王韶之等人无法下手。年底，司马德文突患急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王韶之乘机入后宫东堂，指挥皇帝侍从用散衣结成带子，将晋安帝司马德宗活活勒死。司马德宗时年37岁，在位22年。还在府中医治的司马德文突然听到宫中传出的噩耗，得知皇帝暴病驾崩，痛哭失声。他哭的不仅是兄长，还有东晋的国运。

杀安帝后，刘裕本想自己登基，但之前社会上有图谶盛传“昌明（晋孝武帝）之后有二帝”。刘裕觉得时机还没有最后成熟，人心对晋朝还有依恋，因此决定再等一两年。他指使党羽伪造遗诏，于418年改立司马德文为皇帝，次年（419年）改年号为元熙。

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司马德文为了表彰刘裕的“策立之功”，下诏进封刘裕为宋王，将徐州的海陵、东海、北谯、北梁，豫州的新蔡，兖州的北陈留，司州的陈郡、汝南、颍川、荥阳十个郡增划为宋王封地。到了12月，司马德文又不得不允许刘裕佩带十二旒的王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

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虞宫县。与司马德文的祖先司马昭做过的一样，刘裕控制的朝堂也进封宋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各有爵命。

419年就这么平淡地过去了，转眼到了420年。

刘裕觉得受禅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自己已经是58岁的老人了。一生的征战让刘裕遍体鳞伤，身体情况并不好。刘裕相信自己一定会在生命的时间长跑中输给新皇帝司马德文。因此他急于在有生之年称帝。但是下面的大臣们却没有再出现刘穆之那样知道他心意的人。也许他们觉得主子刚扶立了一个新皇帝不到一年，不会马上受禅登基的。或许还有人以为他要做第二个曹操或司马昭。

刘裕处于很想受禅又难以启齿的尴尬中。于是他想了个方法，在宋国首都寿阳召集群臣宴饮。席间，刘裕感叹说：“桓玄篡位的时候晋室鼎命发生移动。我首倡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功成名就。于是我接受皇上的九锡之礼。现在，我也进入了迟暮之年，身份尊贵至此，生怕物极必反，不能久安。因此我计划奉还爵位，归老京师。”刘裕这番话的表面意思是回顾一生的成就，感叹自己的迟暮之年。他宣称退休养老的意思自然是装出来的，实际上是希望群臣向他劝进。正如刘裕担心的，自己已经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但也不是什么好事，很容易物极必反。他想再进一步，不仅是自保的手段，也是胸中之志的体现。可惜大臣们都只理解了刘裕讲话表面的意思，纷纷争相拍马屁，盛赞宋王的功德。刘裕也就和大家嘻嘻哈哈，等天晚了，宴会也就散了。

参加宴会的中书令傅亮在回家的途中，突然灵光闪现。他猛然意识到，这不是刘裕的称帝暗示吗？傅亮连忙折回宋王府，求见刘裕。当时宋王府的宫门已经关闭，傅亮也不顾理解，叩门请见。刘裕下令开门召见。傅亮见到刘裕后真的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憋了好一会，才说出一句话：“臣请求暂时回建康。”刘裕马上就理解了傅亮的意思。

思，没有多余的话直接问道：“你需要多少人马相送？”傅亮说：“只需要数十人就足够了。”刘裕马上布置人手，跟着傅亮去建康办事，听从他的指挥。傅亮得到刘裕的首肯后，马上告辞出宫。等傅亮出门的时候，夜都已经深了。傅亮插着腰仰望满天的星星，感叹说：“我之前不相信天文，今天终于开始相信了。”

几天后，傅亮带着草拟好的禅位诏书入宫去见司马德文。他将诏书递给司马德文，让他誊抄一份。登基不到一年的司马德文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经过片刻的惊讶，司马德文欣然允诺。他边抄边对左右侍从说：“桓玄篡位的时候晋朝其实已经亡国了。多亏了刘公出兵平定，才恢复晋朝。我们司马家族得以继续君临天下，近二十年全靠刘公之力。今日禅位之事，我心甘情愿，没有什么可怨恨的。”司马德文抄誊完诏书，交给傅亮，然后主动携同后妃等眷属搬出宫去。傅亮马上宣布了皇上禅让的消息。

刘裕得知这个意料之中的消息后，依照惯例上表推辞。但是司马德文早已经自去了帝号，搬进原来的琅琊王官邸居住。也就是说，在那几天中，天下已经没有了皇帝。刘裕送上去的让表自然也没有了呈送对象。相反，以陈留王曹虔嗣（就是禅位给司马炎的曹奂的后代）为首的建康贵族官员和宋国的群臣二百七十人向刘裕上表劝进。刘裕还是不答应即位。

依照之前的惯例，权臣还要三请。这回，太史令骆达呈上了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更加恳切地恭请刘裕登基。刘裕这才答应下来。六月，刘裕在建康南郊登上受禅台，接受皇帝位，并举办柴燎告天仪式。

刘裕定新的王朝国号为宋，他就是宋武帝。傅亮因为有佐命辅立的大功被封为建城县公，食邑二千户，并且入值中书省，专门负责诏

命，权重一时。司马德文则被降封为零陵王，迁居秣陵县城，由冠军将军刘遵考带兵监管。《宋书》记载新朝给司马德文的待遇是：“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勿称诏。”也就是说，宋朝以零陵一个郡的物产来供养司马德文。司马德文不仅保持皇帝的待遇和礼仪不变，而且在对皇帝的来往中可以不用称臣，在封国之内奉行晋朝正朔。宋朝先是规定零陵王在贵族百官中的排位是“位在三公之上、陈留王之下”。之所以将零陵王放在陈留王之后，因为刘裕觉得自己的天下是先由陈留王所代表的曹氏传给零陵王司马家族，再传给刘氏。后来，宋朝又规定“零陵王位在陈留王上”，给予了司马家族特殊的礼遇。

遗憾的是，史载：“有其文而不备其礼。”逊帝的待遇是新朝给的。真正执行到什么程度，自然是由新王朝来决定。之前禅位的刘协和曹奂的待遇都还不错，但是司马德文就没有前辈这么幸福了。刘裕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司马德文继续活在世上。

刘裕常年征战，养成了置对手于死地的习惯。对他来说，让一个逊位的、明显要比自己活得长的皇帝活在身边，简直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万一天下还有人对逊帝心存感情怎么办？万一在自己百年之后，逊帝复辟怎么办？只是因为之前的禅让先例规定了逊帝的一系列优待条件，刘裕才不得不做做样子。

刘裕不仅派兵监视司马德文的一举一动，而派人时刻寻找机会暗杀逊帝。司马德文皇后的哥哥褚秀之、褚淡之是晋朝的太常卿和侍中，在妹夫落难后迅速投靠刘裕，协助监视帝后。司马德文的褚皇后在禅让之时已经怀孕，逊位后生下一个儿子。刘裕怕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日后对刘家不利，下达了暗杀令。褚秀之兄弟执行刘裕的命令残忍地将自己刚出生的外甥杀死了。经过这件事后，司马德文夫妇心惊胆战，日夜生活在惊恐之中。夫妇俩整天共处一室；一切饮食也都由褚皇后亲自动手。刘裕及其爪牙一时无法下手。

420年九月，刘裕命令琅琊侍中、司马德文原来的侍从张伟携带毒酒一瓶前去毒杀司马德文。张伟不忍心谋害故主，对刘裕又无法交代，在路上饮毒酒自杀了。

刘裕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遣褚淡之兄弟出马。两兄弟假意去探望褚皇后，士兵悄悄地跟随着他们身后。褚皇后听说兄长来了，暂时离开丈夫出门相迎。士兵们乘机越墙跳入司马德文室内，将毒酒放在他面前，逼他速饮快死。

司马德文摇头拒绝说：“佛曰：人凡自杀，转世不能再投入胎。”

几个兵士于是一拥而上，将司马德文按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他的脸，使劲扼死，然后再跳墙而去。司马德文死时36岁。刘裕听到噩耗后，率文武百官哭悼了三天，追谥司马德文为恭皇帝，葬冲平陵（今江苏省江宁县蒋山西南）。

司马德文死后，刘裕命司马元瑜继承零陵王爵位。零陵国一直传到南齐。之后，刘裕对司马皇室痛下杀手，几乎夷平了全族，开了后世受禅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的先河。这是个很恶劣的先例，之前文质彬彬的禅让之后老是伴随着腥风血雨。以后的皇帝还有所发展，赶尽杀绝，屠家灭族，惨无人道。

尽管刘裕在禅让一事上开了一个坏头，但他通过南征北战结束了江南在东晋后期的动荡局面，并开启了宋朝早期的安康盛世。总的来说，刘裕还是个值得肯定的皇帝。

二

刘裕的登基是大势所趋，表面上是个谜，实际上是自然的政治结果。

司马德文都承认东晋如果没有刘裕二十多年的维持，早就灭亡了。多年来，东晋王朝名存实亡，完全丧失了制约地方，尤其是手握实权的军阀的能力。在野心勃勃的造反者面前，东晋的最后几代皇帝只能逆来顺受，毫无抵抗之力。而刘裕不仅拥有军队，而且代表着他所生长的那个阶层的利益。在东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了。而刘裕所代表的寒门地主逐渐掌握了实权。他们自然期望出现一个寒门皇帝。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说，东晋末期的乱政和动荡已经让普通百姓对司马家族丧失了信任。晋朝皇帝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君临天下的道德基础。而刘裕作为事实上的主政者，他的功绩和能力有目共睹。再加上普通百姓对终日清谈，无所事事的世族大家的失望，人心已经倾向了刘裕一边。

刘裕的崛起意味着之前中国历史上以个人出身为考核标准的门阀政治的瓦解，以及一个新的平民政治时代的到来。

刘裕的成功也是军权对皇权的胜利。这是军权对皇权的第一次完全颠覆。刘裕通过控制军队建立功勋，最终获得天下。之后的南北朝权臣都出身于军队将领，都是依靠控制的军队谋取政权。这也几乎成为了古代中国的普遍现象。

作为从社会底层跃起的皇帝，刘裕即位后做得很出色。

魏晋以降，皇室、官府、世家崇尚奢华。由于是孤寒出身，刘裕知道稼穡艰辛。他平时清简寡欲，事事严整有度，车马不加装饰，后宫不奏音乐，内府不藏财宝，甚至连床脚上的金钉也令人取下，换上铁钉。女儿出嫁，嫁妆绝无锦绣金玉；日常回到家里，马上脱掉公服，只穿普通衣衫，脚下则拖双连齿木履；住处用土屏风、布灯笼、麻绳拂。他喜欢逍遥散步，每次只带几个随从，从不要任何仪仗。

当然任何一个从最底层跃升为皇帝的人都会受到最高处花花世界的吸引。对于许多从小生活简朴，没有见过珍宝美女的人来说，真正

面临这些物质利诱时的抵抗力异常薄弱。刘裕平定关中的时候，就得到了姚兴家族的女儿。刘裕一度非常宠爱这个女子，并因此荒废了政事。谢晦为此劝他。刘裕马上将这个女子遣走，恢复了勤政的生活。

刘裕对珠玉车马、丝竹女宠十分节制。一次，长史殷仲文上奏朝廷应该备齐音乐，武帝以没有闲暇且不会欣赏为由予以推脱。殷仲文再劝皇帝经常听听自然会懂得欣赏。刘裕直接回答说：“正以解而好之，故不习之。”刘裕患有热病和刀伤，需要睡在冷物上。宁州进献光彩艳丽、价逾百金的琥珀枕，光洁华丽，武帝听说琥珀可以疗伤，令人捣碎分发给将士。刘裕不仅内外奉禁，处处节俭，还能不忘穷时。为了警诫后人，他在宫中悬挂着当年做工时使用过的农具、补缀多层的破棉袄。侍中袁粲盛上奏称赞皇帝节俭朴素。刘裕回答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老农夫过上我这样的生活，还觉得过分呢。）后来，刘裕的孙子宋孝武帝刘骏看见这些东西，批评祖父是“乡巴佬”。

在宏观方面，刘裕采取了一系列抑制豪强兼并，减轻人民负担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与民生息。可惜的是，刘裕只做了两年多皇帝就驾崩了，时年60岁。不过他还是开启了一个小康之世的大门，在宋武帝刘裕和其子宋文帝刘义隆统治时期，南方出现了难得的安定局面——元嘉之治。

八 君臣关系永远是个大难题



宋武帝刘裕是个“奉献型”的皇帝。他戎马一生，打下了江山，却来不及享受就驾崩了，把大好河山留给子孙去享受了。

谁让刘裕出身草根呢？他的起点太低了，好不容易奋斗到顶点当皇帝了，却已经58岁了。这在古代是彻彻底底的高龄。刘裕只当了两年皇帝，就在永初三年（422年）五月病死了。长子刘义符继位，史称少帝。

刘义符当时只有17岁。（刘裕生儿子很晚，年过四旬才生了长子刘义符。不过他的生育能力很强，之后隔几年就诞生新皇子。）刘裕担心幼稚的刘义符能否治理好一个新成立的王朝，临终前指定了四个顾命大臣辅佐儿子。这四个人分别是司空徐羨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和镇北将军檀道济。

徐羨之，和刘裕一样出身草根，没正儿八经地念过书，但是办事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徐羨之在刘裕初起时就进了他的幕府，开始是刘穆之的副手，刘穆之死后成了刘裕的大管家，称得上刘宋王朝的元老重臣。由徐羨之来领衔顾命大臣队伍，朝野都没有意见。加上徐羨之本人把握全局、处理政务的能力较强，刘宋王朝没有出现不稳定的迹象。

傅亮，我们在上一节已经熟悉了。他是替刘裕向司马家族逼宫的关键人物，在刘宋王朝建立的节骨眼上立下大功。所以刘裕把他也安排进了顾命队伍。

谢晦在四人中出身最好，是著名的陈郡谢氏的成员。让他当顾命大臣一方面有拉拢江南世族大家的意思，另一方面，谢晦本人长于谋略。在刘裕北伐中原收复两京的行动计划中，十策有九策是谢晦出的主意。

檀道济，是北府兵的旧将。北府兵是刘裕发家的基础，是刘裕南征北战的私家军，可惜在北伐战争中先胜后败，北府兵精锐损失殆尽，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毛修之、朱龄石等名将相继陨落。檀道济是仅存的重要将领，指挥着北府兵余部。

应该说，这样一个顾命大臣班子能力出众，兼顾各方利益，且效忠刘宋皇室，是一个成功的、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导班子。但问题就产生在这个班子太强势了，把朝政权力抓得太紧了，反而让皇帝成了摆设，成了傀儡。

再说宋少帝刘义符也实在是不成器。他继位后，父亲的卓越才能一点没继承，相反是不理朝政，嬉戏无度，让朝野失望。史书说他“居丧无礼，又好为游狎之事”，在给父皇刘裕守孝期间就不遵丧礼，召集乐工伶官歌唱奏乐取乐；他似乎很有商业头脑，把宫中华林园开办成市场，亲自开店沽酒叫卖。后来觉得做买卖不过瘾，又开渎聚土，挖人工湖、造龙船，和随从们一起呼喊号子拉船取乐。朝臣谏阻，刘义符压根就不听。

既然小皇帝不听，徐羨之等人也不客气，要代替老皇帝刘裕来教训刘义符了。方法很简单：废帝！

要废帝先要想好立哪个新的皇帝。按照长幼顺序，应该拥立刘裕的第二个儿子、庐陵王刘义真。这刘义真就是当年刘裕留在长安镇守

关中的那个小孩子，北方大败后 侥幸从长安逃了回来。大难不死后，刘义真比较排斥军事，和一帮文人搅和在了一起。他和谢灵运、颜延之、僧人慧琳等人交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刘义真扬言如果自己当了皇帝，要任命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让僧人慧琳做西豫州都督——这西豫州都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因为地处南北交战前线而指挥宋朝精锐军队，是个大大的强势职位。说者也许无心，听着的徐羨之等人就担心了：一旦刘义真成了新皇帝，我们权位不保！既然不能拥立刘义真，就得把他当做障碍排除掉。徐羨之狠下心来，干脆先置刘义真于死地。恰好刘义符、刘义真两兄弟关系不好，徐羨之等人就告发刘义真“潜怀异图”，以皇帝的名义废刘义真为庶人，安排在新安郡软禁。

再接下去的人选就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远在荆州刺史任上的宜都王刘义隆。徐羨之觉得这个小孩子没什么问题，决定以刘义隆取代刘义符。

废帝计划开始了！首先得准备军队，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底气。谢晦是领军将军，手上有军队。他借口自家府舍房屋破败，要翻新修理，把家人都搬出去，调集了一拨将士进府，名义上修房子，实际上准备动刀子。其次，要在班子内部统一思想认识。在建康的徐羨之、傅亮和谢晦三个人意见一致，关键是镇北将军檀道济在外地统兵，不知道他的心意如何。檀道济名声在外，又统率着北府兵，他的立场如何关系到废帝行动能否成功。于是，徐羨之把檀道济叫到建康来，告诉他废帝计划。檀道济起初不赞成，但是少数服从多数，随大溜同意参与废帝行动。

行动的前一天晚上，檀道济和谢晦一起夜宿领军府。两人同居一室，世家出身的谢晦紧张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行伍出身的檀道济睡得又快又沉。谢晦自叹不如。

第二天清晨，檀道济率领尖兵打前站，徐羨之等带着大部队跟

进，冲向皇宫。当天值日的中书舍人已经被买通，警卫们都木然不动，看着一行人鱼贯进入皇宫。前一天，宋少帝刘义符在华林园玩得很晚，睡在龙船上。乱哄哄的政变队伍把刘义符惊醒了。他看到全副武装的将士冲杀过来，知道不妙，赶紧指挥左右随从抵抗。一场小规模的战斗爆发了，政变将士杀死了两名皇宫随从，刘义符手指被砍伤，疼得嗷嗷大叫起来，束手就擒。徐羨之等人没收了刘义符的皇帝玺绶，扶着他走出皇宫，先安排在东宫居住，很快就迁往吴郡软禁。刘义符前脚刚走，徐羨之等人后脚就担心了，怕留着刘义符夜长梦多，担心自己将来遭到报复，派人去吴郡杀刘义符。刘义符暂居在吴县金昌亭，看到杀手吓得拔腿就跑。杀手用门栓将刘义符一棍子打倒，再补上一刀杀死。同时，徐羨之等人还派人去新安郡杀了刘义真。兄弟俩死的时候，一个19岁，一个18岁，正是走向成熟的大好年纪。

宋少帝刘义符被废的理由是嬉戏胡闹。不过，和之后孝武帝、前废帝、宋明帝、后废帝等人的荒唐行径相比，刘义符的行为太小儿子了，充其量也就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瞎胡闹而已。刘义符被废得实在是有些“冤”。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二

刘义符被废后，傅亮率一行人逆江而上，到江陵奉迎宜都王刘义隆来建康继位。

刘义隆并不知晓徐羨之他们的废帝计划，如今听傅亮说大哥刘义符被大臣们从龙椅上赶下来了，他是无比的吃惊。让他更吃惊的是，刘义符死了，二哥刘义真也死了。后人不知道傅亮是怎么向刘义隆解释的，但刘义隆确信两位哥哥是被谋杀的。他悲从心来，当着迎接他登基的人们号啕大哭。过了许久，刘义隆又拉住傅亮详细询问大哥、

二哥遭废和遇害的详细情况，一边问一边悲号呜咽。他哭得如此伤心，以至于部下、侍从们都低下头，不敢仰视。傅亮不知如何解释，汗流浹背，呆若木鸡。傅亮知道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他和徐羨之等人的行为都是弑君。一颗苍凉、恐惧的种子开始在傅亮的心底扎根、发芽。

好在，刘义隆没有过分纠缠两位哥哥的死，同意继任皇帝，改元元嘉。刘义隆就是宋文帝。

刘义隆心里对两位哥哥的死耿耿于怀，更对徐羨之等人拥有能够轻易废杀、更立皇帝的能力如鲠在喉。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没有帝王会允许大臣们对皇权构成威胁，更不用说能够弑君换帝了。刘义隆的皇位是徐羨之政变集团“赐予”的，他是两位哥哥之死的最终受益者，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他要惩治徐羨之等人。但刘义隆深知徐羨之等人盘踞朝野，掌握大权，不是想铲除就能铲除的，所以他对徐羨之等人采取了迷惑和安抚的策略。他登基后并没有动徐羨之等人，而是给他们加官晋爵，由他们继续掌权。

宋文帝刘义隆比宋少帝刘义符要合格得多。他认真学习、勤奋工作、谦虚待人，很符合明君圣主的标准。朝野都认为刘义隆是个好皇帝，随着刘义隆很快成年，徐羨之四人没有理由继续辅政了，该让刘义隆亲政了。

元嘉二年（425年），徐羨之与傅亮上表，主动要把实权归还给刘义隆。刘义隆开始还不同意，推辞了三次。徐羨之两人就连续请求了三次。最后刘义隆才同意了。徐羨之逊位，退居私第。

归政前，徐羨之的侄子徐佩之、侍中程道惠、吴兴太守王韶之等人都苦苦劝他不要放弃实权。徐羨之没有听从。不过他也留了一手。刘义隆当皇帝前是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南方政权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州府。两地人口密集、经济繁荣，是王朝赋税和兵源的主要来源。

首都建康隶属扬州，扬州处于长江下游，以江陵为首府的荆州在它的上游，对建康形成逼迫之势。所以，荆州的军事重要性更胜扬州。历任荆州刺史不是朝廷重臣、权臣就是皇族子弟；东晋以来，叛乱者也多次以荆州为割据地，和建康的朝廷对抗，比如王敦，比如桓玄，比如刘毅。荆州刺史的人选非常重要。刘义隆当皇帝后，荆州刺史就出缺了。徐羨之不等刘义隆动身，便任命谢晦继任荆州刺史，作为外援。徐羨之退位后，谢晦还在荆州拥有重兵。他们一派的力量依然不容小觑。

刘义隆亲政后，不露声色，暗中抓紧积蓄力量。他任命当荆州刺史时的亲信到彦之为中领军，掌握首都的军队，还努力争取世族豪门的支持。很快，刘义隆就自信铲除徐羨之集团的时机成熟了。

元嘉三年（426年）正月的一天，这是南方最冷的时节。建康城里阴冷刺骨，街上绝少有行人。皇宫里传出诏书，宣召徐羨之、傅亮二人进宫。傅亮接到诏书，乘车就向皇宫赶去。走到宫门口的时候，傅亮遇到了谢晦的弟弟谢朏。谢朏是当天皇宫值班的黄门郎。他拦住傅亮，轻声对他说：“殿内有异，皇上可能要处分大臣。”傅亮心中的隐忧终于要爆发了。他慌忙借口嫂子病重，让人传话申请暂时回家。不等刘义隆回复，傅亮就夺了一匹马，向城外跑去。

傅亮逃命前，不忘派人去通知徐羨之。徐羨之正乘车前往皇宫途中，听到警报也赶紧驱车向城外跑去。出城后，徐羨之可能觉得乘车的目标太大了，舍车步行。在这个南方寒冬的早晨，已经63岁的徐羨之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一直走到了新林。刘义隆知道徐羨之、傅亮两个人都没来，已经派出到彦之和大臣王华两人带兵追捕了。徐羨之后有追兵，前路又茫然不知道在何方，最后逃入一个陶灶中，拔出佩剑自刭而死。徐羨之是一个有功的实干家，很可能是一心报国的大忠臣，但他的高调掌权和轻易废君触犯了君臣关系的红线，招致杀身之祸，令人惋惜。

傅亮乘车出城后，也茫然不知所去。冥冥中，他知道自己犯的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想到自己为权位奔波一生，到头来落得这么个结果，傅亮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他骑马来到哥哥傅迪的墓前。在之后的时辰里，傅亮就待在墓地里，直到追兵将他逮捕。在被押解回城的途中，刘义隆派人送来了诛杀傅亮的诏书，还给傅亮带了一句话：“我想起了当日你在江陵无言以对但还算坦诚的表现，决定只杀你一人，不株连你的家人。”傅亮被杀，时年53岁。

刘义隆旗开得胜后，立即公布徐羨之、傅亮、谢晦三人杀害宋少帝和庐陵王的罪行，宣布捕杀徐羨之、傅亮、谢晦。谢晦不在建康，但他的儿子谢世休和弟弟谢囿等家人受到株连，同时遇害。

四个顾命大臣中还剩下领兵在外的谢晦和檀道济。刘义隆决定对他们区别对待、分化合并。檀道济是废帝弑君行为的胁从，并不是主谋，加上他掌握北府兵，刘义隆要想打败谢晦还要仰仗他，所以对其安抚利用。他将檀道济从广陵召回建康，开诚布公地说：“废立之事，你未参与谋划，我不加追究。”檀道济心中的一块石头顿时落地，不禁对刘义隆感恩戴德。接着，刘义隆说：“如今谢晦割据荆州，抗表犯上，不知你有什么良策？”檀道济马上分析：“谢晦老练干达，富有谋略，但他未曾亲临疆场，军事非其所长。若陛下信任，请让我率兵征讨他。我可一战擒之。”刘义隆大喜。他要的就是檀道济这个态度。

谢晦至此被彻底孤立。诛杀徐羨之的第二个月，刘义隆就迅速组织大军，宣布御驾亲征荆州，以到彦之为先锋，檀道济随后，率水师溯长江西上。

谢晦得知刘义隆亲征，留下另一个弟弟谢遁带领一万士兵留守江陵，亲率水师两万人，以长史庾登之为参军，顺江而下迎战。出师要有名，不然对军心民心不利。战前，谢晦很高调地上表刘义隆，盛赞徐羨之、傅亮等人忠贞为国，不幸为“奸臣”所害。谢晦不敢说幕后凶手就是皇帝刘义隆，把当时主政的王弘、王华和王昙首等人指为奸

臣，高举起了“清君侧”的大旗。刘宋王朝第一次内战就此爆发。

谢晦和到彦之两军在现在的长江湖南岳阳段相遇。谢晦行军打仗全靠长史庾登之。庾登之率军占领了巴陵（今岳阳），开局有利，却不敢对到彦之发动主动进攻。适逢连日大雨，庾登之每天待在船中，不发一令。谢晦催他进兵，庾登之借口要等天晴后发动火攻，一味拖延战机。过了半个月，阴雨散去，天空放晴，庾登之没了借口，不得已主动进攻。到彦之部队的战斗力很弱，将士怯懦无能，弃营而逃。首战失利后，部将建议到彦之退守夏口（今武昌）。到彦之担心刘义隆谴责，坚持屯守巴陵前线，并派人敦促檀道济部前来会师。檀道济率领北府兵很快抵达前线。宋军走出战败阴影，士气振作起来。

谢晦首战告捷，高兴地又向刘义隆上表，先夸耀自己旗开得胜的“辉煌战果”，然后以此为筹码要求和谈。表文刚送走，探子来报檀道济率北府兵已与到彦之会师，宋军水师遍布长江江面。谢晦大吃一惊。他原以为檀道济是弑君的同谋，肯定不会被刘义隆赦免，所以会站在自己一边，现在发现檀道济不仅被赦免，还率军前来讨伐自己，太出乎意料了！谢晦深知领兵打仗自己远不及檀道济，惶恐起来，越想越害怕，几乎手足无措。

双方很快又打了一战。谢晦的部队有战败的迹象。谢晦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一点小小的失败在他内心扩大为全局的惨败，一看情形不妙拔腿就逃奔江陵，导致全军大乱，四处奔散。谢晦逃到江陵后，见部众散尽，难以坚守，带着弟、侄等七人出城北逃。一行人逃到安陆（今湖北大悟）被擒，被押送建康斩首。

刘裕留下的顾命大臣集团势力就此灰飞烟灭。这不仅意味着刘义隆铲除了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力量，也宣告他以全新的姿态闪亮登场，准备大干一番了。这一年他19岁。

九 元嘉之治，不过如此

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刘宋王朝立国的时间最长，一共是六十年。其中，宋文帝刘义隆一个人就在位三十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不过整个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梁武帝萧衍。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但是年长而无功。论成就，刘义隆还是南朝皇帝第一。

刘义隆亲政后，和世族豪门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整个东晋、南朝时期，世族豪门将官职当做家族遗产世代相传，关系盘根错节，势力雄厚。皇帝要想巩固统治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刘义隆刚刚走上政治前台，加上刘宋王朝建立年头屈指可数，更要和世族豪门联络感情了。从世族豪门的角度来说，他们总觉得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是个只知道冲锋陷阵的持刀莽夫，双方不是太合得来。而刘义隆博涉经史，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谈吐温文尔雅，自然很受世族们的欢迎。刘义隆清洗徐羨之、傅亮等人的行动，就得到了世族豪门的支持。元嘉前期，刘义隆将朝政委托给王弘、王华、王昙首等世族子弟，刘宋政权得以稳定发展了十几年。

王弘、王华、王昙首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琅琊王氏的子孙。其中王弘是东晋缔造者王导的嫡曾孙。因为出身高贵豪门，王弘对出身草根的刘裕等王朝缔造者们不太热情。刘裕专权还没篡位的时候，一次

在宴会上半是感慨半是矫情地说：“我一介布衣，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出乎意料。”傅亮等亲信马上出来拍马屁，盛赞刘裕的功德，说众望所归，宋王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应当的、正常的。王弘却淡淡地说：“这就是命啊，求之不得，推之不去。”他的话反映了世族豪门当时普遍存在的对刘裕冷眼旁观的态度。他的这句话，被“时论”（世族们控制的舆论）称颂为“简洁、直率”。刘裕、傅亮等人虽然听得刺耳，但也无可奈何。

但是对刘义隆，也许是觉得隔了一代人，世族们感觉他已经褪去了草莽之气，认可了他的高贵身份，转而亲近、支持刘义隆。不少大世族在刘义隆发达之前，就进入了他的幕府。徐羨之集团废杀宋少帝，迎接刘义隆去建康登基的时候，有人担心此行凶多吉少，反对刘义隆登基。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当时在刘义隆幕府之中，坚定劝说刘义隆早日去登基。之后，世族们又支持刘义隆清除徐羨之集团。同属于琅琊王氏的王华还带着追兵捕杀了徐羨之。在内战中，谢晦敢打出“清君侧”的旗帜，要求诛杀王弘、王华、王昙首三人，也不是无凭无据。

大功告成后，刘义隆大宴群臣，向王弘兄弟等人举杯劝酒，还抚摸着御床（当时没有凳子，人们以榻为床，坐在上面）说：“如果没有爱卿兄弟，这张床哪能有今日。”

幸运的是，琅琊王氏众位兄弟虽然在蜜罐中长大，却没有沾染上骄奢淫逸、懦弱无能的富贵病，反而能力出众，生活简朴，操心国事。王弘主政的基本思路就是保持稳定，不要出事。因此，他建议刘义隆一方面要澄清吏治，严惩贪腐，一方面要与民为善，减轻百姓负担。东晋时期，男子年满13岁就要服半役，年满16岁就要服全役。王弘认为天下太平，并禁止大兴土木，奏请将半役的年龄提高到15岁，全役的年龄提高到17岁，被刘义隆采纳。百姓们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王弘很懂为臣之道，知道月盈则亏、盛极而衰，在主政的巅峰时期懂得谦让，主动引进宗室、彭城王刘义康共同执政。王弘等人逐渐隐退，把刘义康推到了前台。元嘉中期以后，王弘、王华、王昙首相继逝世，实权转移到彭城王刘义康的手中。

刘义康是刘裕的第四子，比刘义隆小两岁。刘义康和文雅的三哥不同，他不喜欢读书，知识浅薄，率性而为，主持朝政后独揽大权，权势显赫。好在刘义康办事勤勉、自强不息，政务没有出乱子。刘义隆重视亲情，对浅陋任性的四弟并不猜忌，所以兄弟君臣两人关系还算融洽。刘义康又调自己当彭城王时的长史刘湛到中央当自己的助手。刘湛不尚浮华，也很有实干精神，协助刘义康把朝政处理得不错。国家继续发展。

天下承平日久，刘义康浅陋骄纵的小毛病恶化成了大问题。他独揽朝野内外大权，在自己的王府中决策朝廷大事。每天一早，彭城王府门口停的车子常有数百辆之多。渐渐地，刘义康在三哥面前越来越随便，混乱了君臣之别。各地献给皇帝的贡品，刘义康把上等货送进彭城王府，把次等货留给刘义隆使用。有一次，刘义隆嫌宫中的柑子形态、滋味都差，刘义康就说：“今年送上来的柑子，有一些还不错。”他随即派人到王府拿来上等柑子和三哥分享。刘义隆看到四弟享受的柑子比皇宫里的大得多、好得多，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不过，他在前期心胸还比较开阔，知道自己这个四弟不读书、没脑子，也知道刘义康没有谋反之心，拿着柑子笑笑而已，并不深究。刘义康也拿起柑子剥开了吃，还吃得挺美，一点都没意识到潜伏着的危险。

刘义康入朝前担任荆州刺史，入朝后荆州刺史出缺。刘义隆就任命江夏王刘义恭继任荆州刺史。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个儿子，比刘义隆小6岁。在兄弟们当中，刘义恭从小最受刘裕宠爱。刘裕讲究节俭，其他兄弟都不敢向父亲讨要什么好东西，即便开口要了刘裕也不会给。但是刘义恭要什么，刘裕就给什么。他出任荆州刺史的时候才17岁，刘义隆不太放心，特地写了一封《诫弟书》，语重心长地提醒

五弟昨日父皇 打江山不容易、今日兄弟几个守江山更不容易，所以要礼贤下士、要经常接见下属、工作要勤奋、生活要节俭、不能大兴土木、不能草率断案等等。刘义隆的谆谆教诲事无巨细，细致到要求五弟每个月的零花钱不能超过三十万钱。

刘义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这么要求弟弟，也是这么自我要求的。他继承了父亲刘裕俭朴的生活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西晋以来，由于皇室权贵带头，中国社会崇尚奢华。刘裕出身孤寒，知道百姓的艰辛，发达后清心寡欲，对珠玉车马、丝竹美女十分节制。他日常穿着用度十分普通，常年就是寻常的裙帽配上一般的木屐，房间里用的是土屏风、布灯笼、麻绳拂。对百姓，刘裕相对宽容。他废除了政府物资从民间征发的惯常做法，改为由官府出钱向百姓购买；他鼓励耕作，降低了农民租税，废除苛繁法令，希望百姓能在宽松的环境中发展生产。刘义隆上台后，进一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除了上述的提高百姓服役的年龄，还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扩大税赋征收面，减轻户籍百姓的负担；对于百姓拖欠政府的陈年旧账，一律免除。刘义隆还派官员视察地方行政，了解民间疾苦。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刘义隆每年三次亲自在华林园堂审理案件，直接为老百姓主持公道。

在刘义隆统治的元嘉年间，南方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书记载：“三十年间，民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后世艳称为“元嘉之治”，将它列为中国古代的若干盛世之一。

说元嘉之治是“盛世”，有粉饰的成分，它更像是一个治世。与其说是经济的繁荣，不如说是经济的恢复，经过东晋末期的打击后的恢复。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很穷苦，南朝在南北方的实力对抗中依然处于劣势，整个元嘉之治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没有创

建出有深刻历史影响的制度。南方社会沿着之前的道路继续前进，刘义隆等人没有给发展设置障碍，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可也没有走得更远。后人盛赞这是一个盛世，也许是在纷繁破败的南北朝时期，很难找到元嘉之治这样的闪光点。

无论如何，说元嘉之治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国力最为强盛、人民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肯定是没有错的。

二

说完元嘉之治的内政，来看看它的外交。

得益于刘裕成功的北伐，东晋收复关中地区和黄河以南几乎所有的领土。关中不久便沦陷了。刘裕时期，刘宋王朝依然保有现在黄河以南的河南省的大部地区和山东省的大部地区。尽管它对这一大片土地的控制并不牢固，可相对于之前南北方沿着淮河对峙，刘宋的战略形势已经大为改观。

刘宋主要通过控制战略要点，将这些点连成线，然后实现面的占领。在河南，刘宋主要防守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滑台（今河南滑县）、碣磬（今山东茌平县）四个重镇；在山东，历城（今济南）、淄博、东阳（今青州）等城市是宋军重点防守的。这些点连起来就是刘宋的北方防线，它保障着黄河以南地区。

刘裕驾崩后，北魏觉得有机可乘了，在永初三年（422年）兵分两路越过黄河，一路攻陷滑台、洛阳，进逼虎牢；一路向东攻陷临淄，进逼东阳。宋军在东阳、虎牢两地顽强抵抗。中原局势岌岌可危。檀道济率军北上增援北方防线。北方军队战斗力强，行动迅猛，掌握着战场主动权。檀道济到达彭城（今江苏徐州）后，无奈承认自己无力分兵兼顾虎牢和东阳两个方面，现实的做法是放弃一个方面的

友军，集中力量救援另一处友军。两难之下，考虑到彭城离东阳比较近，檀道济决定救援东阳。宋军出发了，但是战斗却没有打响。因为围攻东阳的北魏军队爆发了疾病，半数以上的官兵都患病了，不得不在檀道济援军即将到达东阳的时候主动烧营撤走。檀道济到了东阳，本想乘胜追击，不料粮草接济不上，又无奈地放弃了追击。在河南，虎牢的宋军困守孤城苦战两百天。魏军最终攻下了虎牢，但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十分之二三的兵力，无力继续战斗。战场就此停歇下来。南方丢失了多数重镇，防守局势恶化。

刘义隆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一心要找机会收复失地。

元嘉六年（429年），机会来了！当时北魏与大夏、柔然的战争连绵不断，黄河中下游魏军兵力空虚。刘义隆于是写信要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归还河南各地，声称不给就要用武力夺取。拓跋焘对刘义隆的要求付之一笑。你说归还地盘就归还地盘啊？拓跋焘才没那么傻呢。要想收复失地，那就来抢吧！

元嘉七年（430年）三月，北魏因为北方战事再次削减黄河以南屯兵。刘义隆派遣使者出使北魏，告知北魏宋军即将北伐，目的是收复黄河以南失地，还明确说此战“不关河北”。宋军5万人在刘义隆亲信将领到彦之的率领下，走水路进入黄河，逼向各镇。北魏在碛磝、滑台、虎牢、洛阳四镇守军薄弱，且无力增援，主动弃城退往黄河北岸。到彦之轻易收复四镇，重新恢复了先前的北方防线，又派出先头部队向西进逼潼关，觊觎关中地区。形势如此大好，宋军上下皆大欢喜。殊不知，几万宋军沿着黄河排成东西两千里的一条线，军力异常分散，连重要城市都只能分摊到几千人防守，犯了分兵大忌。

北魏就等着宋军出现破绽。等到十月，黄河开始结冰，鲜卑骑兵可以长驱南下，加上魏军陆续在河北集结完毕，一声号令之下，魏军渡河反攻。鲜卑骑兵像一把把尖刀，瞬间将宋军的防线撕得粉碎。洛阳、虎牢迅速失陷，分散各处的宋军相继奔散。到彦之在滑台附近，

得悉城池失守、诸军溃散，充分暴露了三脚猫的本质，吓得竟然下令全军焚舟弃甲，狼狈地逃往彭城。

刘义隆见亲信将领实在不成器，只好派遣并不亲信的将领去收拾残局。他任命檀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率众北上。元嘉八年（431年）年初，檀道济率军在山东地区与魏军激战，几乎是每日一战，胜多败少，扭转了宋军溃败的局面。宋魏两军形成了对峙状态。遗憾的是，檀道济的部队粮尽，只得从历城南退。有宋军官兵投降北魏，将宋军粮尽退兵的实情告诉魏军。魏军马上追击。宋军将士都非常害怕。檀道济为迷惑魏军，令人用沙子冒充粮食，在“粮堆”上覆盖一层真的谷米，然后带领官兵在晚上公开、高声地测量、统计“存粮”。追兵看到这一幕，以为宋军粮草充足，反认为投降告密的宋军是奸细，将降兵全部杀掉。檀道济又命将士们披甲穿戴整齐，自己穿着白服乘舆车，列队缓缓出城南返。魏军担心有伏兵，不敢追击。檀道济将全军安全带回南方，还留下了“唱筹量沙”的典故。

刘义隆的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此战不仅没有收复失地，宋军还略有损失。但是檀道济在魏军的围攻中全军而退，威名大振。刘义隆嘉奖老将军智勇双全，提升他为司空。

三

檀道济功名赫赫，统率着身经百战的部队。他的亲信部将都勇猛无敌，各个儿子又才气非凡，让人既羡慕又嫉妒。檀道济下朝回家，从者如云，仪仗威武，老百姓看到他威风凛凛的样子，不禁说：“说不定这又是一个司马懿啊。”自古武将功高震主、力强惹祸，檀道济不幸犯了大忌。朝廷对他产生了疑畏之心。宋文帝刘义隆本就不亲信檀道济，加上自己身体羸弱，登基之后疾病不断，更不放心让檀道济留在身边，就命他去镇守寻阳（今江西九江）。

元嘉十二年（435年），刘义隆忽然病重。统治层怕皇帝死后檀道济反叛，就召他入朝准备杀掉。这项决策到底是谁做出的呢？有人说是皇帝刘义隆亲自下令的，也有人说是主政的刘义康“矫诏”的。比较可信的版本应该是刘义隆当时有杀檀道济的心思，但还没有具体落实，可下面的小人就开始有动作了。这个小人就是刘湛。刘湛见刘义隆一度病重，就对刘义康说：“一旦皇上驾崩，就没有人控制得了檀道济了。”恰巧宫中传闻皇帝病危，刘义康就矫诏召檀道济入朝。

檀道济准备入京，夫人拉住他说：“皇上无故召你入朝，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檀道济不听，赶到了建康。他到的时候，刘义隆病情好转。刘义康就慰劳了他几句，又放他回寻阳。檀道济在长江边准备上船时，一群白鸟聚集在船篷上悲鸣。刘义隆病情突然加重，刘义康派追兵赶来，将来不及登船的檀道济逮捕。他矫诏杀死檀道济及其子弟八人，还捕杀了被人们比做关羽、张飞的檀道济部将薛彤、高进之二人。檀道济临死之前，目光如炬，愤怒地摘下巾帻掷在地上，厉声说：“你们这是自毁长城！”死讯传出，南方官兵寒心、百姓震惊。宋文帝刘义隆心中虽有不忍，但也默认了四弟的做法。

倒是消息传到北魏后，鲜卑官兵欣喜若狂，都说：“檀道济已死，江南再也无人让我们害怕了！”魏军自此频频南侵。敌人的评价往往是最真实客观的，檀道济能获得鲜卑官兵如此之高的评价，地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

檀道济已死，刘义隆继续养病，政权更是被彭城王刘义康把持。刘义康日渐仰仗谋主刘湛，放权让他去干。刘湛开始权倾朝野。但是他的权力来自刘义康的“私相授受”，并没有合法依据。刘湛就想从幕后走到前台，排挤掉名义上的丞相——尚书仆射殷景仁，取而代之。他不断地在刘义康面前说殷景仁的坏话，在政务上一味和殷景仁作对。

殷景仁久经宦海，是老官僚了。他觉得不能和刘湛正面交锋，就

称疾解职，连续向宋文帝上表请求辞职。刘义隆不是傻瓜，早就注意到刘义康、刘湛的举动了。朝政已经把持在这两个人手里，刘义隆需要援引殷景仁作为外援。之前刘义康等人老在面前说殷景仁的坏话，刘义隆左耳进右耳出。现在，他没有批准殷景仁的辞职申请，而是让殷景仁在家好好养病，还派人嘘寒问暖，以示尊崇。

刘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干脆来狠的，派人装做强盗去劫杀殷景仁。这事情眼看就要闹得很大了，但刘湛觉得即便刘义隆知道了实情，也会照顾到兄弟感情，不会对自己和刘义康怎么样。劫杀的计划还没实施，刘义隆就听到了风声。他也来了招狠的。你们不是要杀殷景仁吗，那我就让殷景仁住到我身边来，看你们谁敢动手！刘义隆在皇宫边上给殷景仁安排了住所。殷景仁搬过来住后，刘义隆秘密和他交换意见，每日两人住所之间文件政令的往来达十几乃至数十次之多。朝政无论大小，刘义隆都征询殷景仁的意见。两人暗中嘀咕商议什么，宫女太监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刘湛了。

麻痹大意的刘湛祸在眼前，还不知道悔改。他见宋文帝多病，为了常保富贵，竟然与亲信商量，打算等刘义隆一死便以“天下艰难，宜立长君”为理由，拥立刘义康继位。

不得不说，刘湛实在不是搞阴谋诡计的料。政变计划还在谋划之中，连刘义康这个主角都还不知道，刘义隆就又一次听到了风声。刘义隆讲究兄弟感情是有限度的，刘湛的所作所为已经“越界”了，超出了刘义隆的容忍度。皇帝发怒了，后果很严重！

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初三，宋文帝刘义隆让彭城王刘义康在中书省住宿，处理政务，似乎刘义隆的身体又一次不行了，需要四弟来主政。这天白天，已经卧床“养病”五年之久、从来没有出过门的殷景仁忽然命令家人拂拭衣冠，摆出要出门的样子。家里人都很迷惑，不知道老头子要干什么。

当夜，刘义隆突然驾临华林园，召殷景仁进宫。殷景仁接令，立即进宫。他因为腿脚不方便（估计是卧床太久闹的），刘义隆就赐他坐在小床上，授权殷景仁主持今夜的行动。什么行动？杀刘湛，废刘义康！

刘义康、刘湛全无准备，且被分隔两处，毫无还手之力。刘湛被闯入的官兵轻松逮捕。有人向他出示了刘义隆的诏书，诏书上罗列了他的种种罪状，最后的判决是立即处死。刘湛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党羽。刘义隆对四弟刘义康还算客气，将四弟软禁在中书省十多天，最后贬他为江州刺史，送往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上任”。刘义康来向二哥辞行，刘义隆只是对他恸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说。

刘义隆政变成功，收回实权。殷景仁接替了刘义康的职位，但没过多久就死了。有人说是刘湛的鬼魂作祟，来向殷景仁索命了。

刘义康在江州名为刺史，实际上是囚犯。政事全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就这样被软禁了五年，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年底有人告发太子詹事范晔、孔熙先等人密谋拥立刘义康。刘义隆处死范晔等人，将刘义康及其子女废为庶人，徙往安成郡正式软禁。在安成郡，刘义康开始静下心来好好读书了。一次，他读《汉书》，看到淮南王刘长谋逆被汉武帝诛杀的事，感叹道：“前代就是骨肉相残的事，现在要落到我的身上了。”他早年不读书，不知历史兴替和为臣之道，现在知道为时晚矣。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北魏大军南侵，南方局势动荡。刘义隆担心有人再把刘义康捧出来作乱，遣人给刘义康送去毒药“赐死”。刘义康也和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一样信佛，也说：“佛说自杀者来世不复得人身，我不能这么死。”他就是不肯服药自杀。好在刘宋王朝的臣子在处理这种事情上很有经验，照搬杀司马德文的先例，找了条被子将刘义康捂死了。刘义康时年43岁。

刘义康的一生，为朝廷做过贡献，有功绩，但不知谦恭进退，自

谋败局。可他确实没有要取代二哥刘义隆的意思。刘义隆听到刘义康死讯后，感叹了一番，下令以侯礼安葬了四弟。刘义隆此举，开了刘宋皇室骨肉相残的先例。

十 战场有风险，北伐需谨慎

上一节提到刘义隆“赐死”刘义康的背景是北魏大军南侵，南方局势动荡。这事发生在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对南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而事情的起因，则是一年前的“元嘉北伐”。

元嘉后期，国家太平无事，府库渐渐充实，刘义隆颇有志得意满的感觉。美中不足的是，北魏始终对南方构成威胁，且霸占着河南、山东等地。南北双方在边界摩擦不断。刘义隆可能觉得自己文治有余，武功不足。而打败北魏收复中原无疑是最好的建功立业的途径。他对北伐中原的兴趣越来越大。

过惯了平安日子的大臣们，也怂恿刘义隆北伐。这些怂恿的大臣几乎都是文官，没有武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人纯属拍马屁，比如御史中丞袁淑发现刘义隆有学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意思，就奉承说：“陛下席卷赵魏之后，一定要封禅泰山。臣生逢盛世，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愿意写一篇《封禅书》献给陛下。”刘义隆听了很高兴，似乎觉得自己可以和汉武帝相提并论了。第二类人是真心要北伐中原，觉得南方有能力打败北魏，比如彭城太守王玄谟。王玄谟出身著名的世族太原王氏，没有打过一场仗，却喜欢谈论军事。他对刘义隆大谈北伐计划，畅想胜利前景。刘义隆特别喜欢听王玄谟的空谈，听得入神时还对左右说：“王玄谟的话，令人有封狼居胥的憧憬（这里

指的是汉武帝时，霍去病大破匈奴，封狼居胥山而还）。”结果，刘宋朝野弥漫着一股激烈而乐观的战争气氛。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机会似乎来了！当年拓跋焘诛杀大臣崔浩的消息传来，北魏内部出现不稳迹象；柔然又千里迢迢派遣使节来到建康，表示愿意配合宋军北伐；春夏之交，南方水量充沛，河道通畅，便利军队、粮草运输，似乎天时地利都倾向南方。于是，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大臣在六月鼓动刘义隆出兵。

以沈庆之为代表的军队将领们反对北伐。沈庆之，吴兴（今浙江德清）人，出身贫寒，年轻从军，在镇压内部反叛和少数民族起义中立下赫赫战功而跻身高级将领行列，当时已经64岁了。他对刘义隆列举了两条反对理由：第一，军事优势在北方，南方步兵对北方骑兵天生就处于劣势；第二，当年檀道济、到彦之北伐都失利而返。沈庆之点名道姓说：“王玄谟等人的能力都弱于檀道济、到彦之二人，现在的军队也不比当年强盛，仓促北伐恐怕会再一次失利。”

刘义隆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思考北伐问题。他对老将军的意见不以为然：第一，“小丑”窃据中原，我们是正统王朝，有责任收复中原；第二，之前北伐失利是因为檀道济“养寇自资”、到彦之私自撤退；第三，魏军的优势在骑兵，但现在夏水浩荡，河道通畅，我们用水军恰好可以扬长避短。只要宋军在冬天河流结冰前收复各个重镇，构筑钢铁防线，就等着魏军自投罗网吧（原话是“虏马过河，便成禽也”）！

沈庆之坚持己见。刘义隆就让徐湛之和江湛来和沈庆之辩论。沈庆之说：“治国譬如治家，耕地要问农夫，纺织要问婢女。陛下现在要讨伐敌国，只和白面书生商量，怎么能成功呢！”沈庆之的话说得很重，刘义隆听了哈哈大笑，认为沈庆之年纪大了乱发脾气而已，既没采纳也不怪罪。北伐大事，最终由刘义隆敲定了。

这次北伐，刘义隆追求毕其功于一役，几乎倾尽了全国之力。由于兵力不够，朝廷征发青、冀、徐、豫、南兖、北兖六州的壮丁，每户有三名壮丁的抽一人从军，有五名壮丁的抽两人从军，又出钱招募有武艺的壮士出征；由于军费不足，朝廷进行爱国宣传，发动臣民捐献金帛，又向富豪巨室和富裕的僧尼借贷。北伐的部署是这样的，主力放在东路，由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水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指挥。东路目标是收复山东、河南；西路由柳元景、薛安都等率领，从襄阳北上，进攻关中地区，受雍州刺史、随王刘诞（刘义隆的儿子）指挥。东西两路之前还有刘康祖、臧质等人率领的小股部队，作为策应之用。

史称“元嘉北伐”的大行动就此拉开序幕，覆水难收了。

二

元嘉北伐开头很顺利，因为北魏没有料到刘宋会倾国而出，被打得措手不及。

碻碻的北魏守将弃城而走，宋军留沈庆之守碻碻，王玄谟继续率主力进攻滑台。

王玄谟率领的主力兵源充足、军械精良，但王玄谟是个庸才，压根就不是打仗的料。滑台被宋军围得水泄不通，魏军坚守不降。城中茅屋很多，部将建议用火攻，王玄谟却说：火攻会烧毁房屋、伤亡百姓，即便我们攻下了也只是得到一片焦土，有害无利。所以，王玄谟坚决不同意火攻。中原人民看到宋军来到，纷纷携带武器投军，有的还成组织地前来参军。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人之多，民心可用。但王玄谟不用义兵首领，把投军的壮士们当做新兵分散补充到自己的亲信部队。同时，王玄谟非但不抚恤中原百姓，还要他们每家缴纳一匹布、八百只大梨。宋军的种种逆行，让中原人民大失所望，甚至将部分百

姓推到了魏军一边。结果，小小一座滑台城，宋军主力攻打了一个月还没有打下来。大军困于坚城之下，北伐前途堪忧。

九月，天气转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集结了六十万南下大军，御驾亲征，第一站就直驱滑台，来和王玄谟过招。拓跋焘是何等人物，是带着虎狼之师在枪林弹雨中厮杀长大的，别说是王玄谟，整个南方又有哪个人是他的对手？宋军得知北魏援兵南下的消息，部将也好，同事也好，都劝王玄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在拓跋焘赶到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滑台，避免遭到魏军内外夹击。王玄谟不听，仍旧不紧不慢地攻城。拓跋焘即将到了，部将们集体劝王玄谟赶紧建立车营（将战车连接在一起排列在军营外围，作为屏障），以作防御。王玄谟还是不听。

拓跋焘大军来到滑台。他也是几乎倾国而出，号称有百万之众。魏军击鼓之声震天动地。王玄谟这时候急得六神无主了。部将请示如何迎战，王玄谟磨叽了大半天，才挤出一个字：“走”！顿时全军溃散。魏军随后追击，杀死宋军一万余人，缴获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元嘉之治二十多年积累的精品军械，几乎都成了北魏的战利品。

王玄谟下令撤退，却不做任何组织，导致宋军主力四散溃败，几乎流失殆尽。中途遇到沈庆之率军前来接应，才收拢了部分残军败将。此次巨大失败，王玄谟罪责难逃。战后，东路主帅萧斌要杀王玄谟。不料沈庆之主动站出来为王玄谟说好话，认为拓跋焘是当世雄才，谁遇到他都没有获胜的把握，又说阵前杀戮大将会引起军心混乱。王玄谟这才得以保全性命。

此处交代一下王玄谟之后的经历。王玄谟虽然能力平庸，败军祸国，但个性耿直，做事认真。之后他仕途坎坷，被免官又被起用，因生性严直和同僚、上司的关系不好。晚年，王玄谟刚正不阿，对孝武帝、宋明帝的倒行逆施多有劝谏。他直到宋明帝时才死，高寿81。

滑台大败后，宋军转入被动防御，不断放弃城池，步步后撤。赖有沈庆之这样的老将维持，东路宋军才没有出现全局性的大逃亡。

滑台大败消息传到西路的时候，西路宋军正在陕城（今河南陕县西南）与魏军激战。之前，西路宋军进展也不错。这路宋军中不少将领是北方人，熟悉关中情况，比如大将薛安都就曾在北魏担任雍州、秦州都统，几年前因为谋反失败才逃奔宋朝的。而北魏占领关中不久，统治并不稳定，各族人民纷纷起兵响应宋军。弘农等重镇被宋军攻克，宋军进围陕城。陕城一战，大将薛安都杀得性起，丢掉头盔，脱去铠甲，再去掉坐骑的护具，怒目挺矛，单骑冲向敌阵。胳膊沾染了敌人和自己的鲜血，手中的长矛也打断了，薛安都就换一根再冲杀。两军恶战两天，宋军大胜，攻克陕城，斩魏军三千余人，俘虏两千余人。宋军把俘虏、投降的北魏士兵全部释放，又乘胜攻克潼关。关中豪杰闻风而起，派人与宋军接洽。西路北伐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王玄谟大败、拓跋焘南下的消息逆转了西路的胜利。东路败后，刘义隆认为柳元景、薛安都等不宜孤军深入，下诏班师。西路宋军含泪放弃城池，退回襄阳。“元嘉北伐”以失败告终。

但是战争不是以单方面的失败结束的，而是取决于战胜方的意志。宋军虽然战败了，但战场并没有沉寂。拓跋焘不是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软柿子，他态度强硬，寸土必争，抓住宋军后撤的良机扩大战果。

在滑台大败王玄谟后，拓跋焘将大军分为两路，长驱南下。其中永昌王拓跋仁率领一路从洛阳向寿阳（今安徽寿县）进军，一路攻占悬瓠、项城。宋军防守寿阳的将领是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刘铄是刘义隆的儿子，年轻无经验。刘义隆怕寿阳有失，急招刘康祖回援。刘康祖这支偏师在寿阳城外几十里地与拓跋仁大军遭遇。刘康祖手下只有八千人，部将提议绕道走山路以地利削弱鲜卑骑兵的冲击，刘康祖不听，组成车营，等待魏军的进攻。临战前，刘康祖下令“顾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以必死之心迎战。魏军倚仗人多势众，分为三波，

从四面轮番进攻宋军，企图用疲劳战术消灭刘康祖。刘康祖指挥部属顽强顶住。后来，天上刮起了西北风，拓跋仁趁势火烧车营。宋军拼死抵抗，在熊熊烈火中以失败告终。刘康祖身受十多处伤，仍奔走呼号，最后因颈部中箭而死，部下八千人全军覆没。此战可算是元嘉北伐中最惨烈的一战。战后，拓跋仁进抵寿阳，刘铄闭门不出。好在宋军在寿阳经营多年，城坚粮足，魏军是骑兵，没有攻城的经验，只好在城郊大肆烧杀抢掠一番后，继续南下。刘铄也不敢追击，只求守住寿阳。

第二路由拓跋焘亲自统率，进攻彭城。镇守彭城的是刘义隆的五弟、江夏王刘义恭（就是收到刘义隆《诫弟书》的那位）和刘义隆的另一个儿子、武陵王刘骏（就是后来的孝武帝）。刘义恭听到魏兵将至，就要弃城逃走。城内其他人都不同意。长史张畅说：“王爷绝对不能走，您一走就群龙无首，非输不可了。”刘骏则说：“叔叔要走，悉听尊便，侄子决心与彭城共存亡。”刘义恭羞红了脸，留了下来，和大家一起守城。彭城也是宋军经营多年的重镇，城池坚固，魏军攻打了好几天，彭城岿然不动。拓跋焘主动放弃，绕开彭城继续南下。攻城本非魏军的长项，拓跋焘扬长避短，发挥骑兵行动迅猛的特点，一心深入江南。刘义恭、刘骏叔侄俩也不敢追击。

拓跋焘渡过淮河后，遇到了宋朝辅国将军臧质的部队。臧质和刘康祖一样，也是此次北伐的偏师。刘义隆听到彭城告急后，命令臧质率领部下一万人救援。两军相遇，臧质的一万步兵哪是几十万鲜卑骑兵的对手，一触即溃。臧质只带着残部七百人逃向附近的盱眙（今江苏盱眙）。

盱眙驻扎了三千宋军。因为盱眙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太守沈璞早就开始准备防守，想接纳臧质残部。但城内官绅不同意，担心接纳臧质会把拓跋焘主力吸引过来，得不偿失。沈璞力排众议，将臧质的七百人接入盱眙城，还将全城的防务交给臧质指挥。臧质出身东晋外戚家庭，长得相当有特点，高颧骨突下巴，秃顶卷发。盱眙官绅百姓

看着这个败军之将，不知道他的奇怪相貌能否有助于退敌。好在虚惊一场，拓跋焘再次擦城而过，绕开盱眙，马不停蹄向南冲了。

年底，各路魏军在长江北岸会师。人们在长江南岸用肉眼就能看到拓跋焘那耀眼的皇帝车驾。拓跋焘在北岸耀武扬威了一番后，选择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建起了行宫。魏军在江北忙于劫掠杀戮，各地的刘宋官员要么望尘奔溃，要么望风而降。兵力薄弱的江南裸露在鲜卑铁器的刀锋之下，刘宋王朝面临着立朝以来最大的威胁。建康城内空前紧张，朝廷紧急征发壮丁从军。建康所在的丹阳郡辖区内王公子弟以下全部男子一律从军。宋军沿江慌忙布防。刘义隆临江登高瞭望，看到魏军旌旗摇曳，面露忧色，叹息道：“如果檀道济还在，岂能让胡马至此！”此时距离檀道济冤死已经过去15年了。

三

就在刘宋朝野认为局势危如累卵，人心惶惶之时，历史朝着戏剧性的方向发展而去。

之前，拓跋焘不攻城、不咬硬骨头，一心尽快冲杀到长江边上。现在他饮马长江了，可接下去怎么办呢？拓跋焘很清楚，鲜卑骑兵连寿阳、彭城这样的城池都没有能力攻下，更不用说城墙更加坚固，又有滚滚长江屏护的建康城了。你让骑兵游过长江，再爬上高高的建康城墙？拓跋焘头脑很清醒，知道魏军的攻势已经达到极限了，还是见好就收吧！

拓跋焘下令魏军在江北劫掠以后，满载北归。第二年（451年），浩浩荡荡凯旋的魏军又一次经过盱眙（今江苏盱眙）城。魏军无意停留，原本擦肩而过就是了，可拓跋焘突然想喝酒，就派人去盱眙索要美酒。宋军守将臧质撒了一泡尿，用坛子封好给拓跋焘送去。拓跋焘勃然大怒，也不回国了，驱动大军进攻盱眙。数十万魏军一夜

之间就围着盱眙城造了一堵长堤，又挖土运石填平了流向盱眙的水源，彻底切断了盱眙的水陆通道。盱眙军民一觉醒来，发现城池被围得水泄不通了。经过一阵短暂的惊慌上，盱眙军民迅速准备迎战。盱眙之战就此打响。

盱眙为了这一战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器械充足，士气鼎盛。魏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士卒伤亡严重。拓跋焘这个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他满不在乎地给臧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驱赶攻城的士兵，都不是我们鲜卑人。攻打盱眙城东北的是丁零与胡人，南边的是三秦的氏族、羌族人。你们帮我多杀一点丁零人，我们就能减少常山、赵郡（在今河北）的盗贼；帮我多杀一点胡人，正好减少并州（今山西）的叛军；如果氏族、羌族都死了，关中的反贼也都没有。所以，你杀的士兵越多，对我越有利。”拓跋焘可能是想通过这封信告诉臧质自己会不惜伤亡攻下盱眙，但这封对士卒伤亡满不在乎的亲笔信被臧质利用。臧质将拓跋焘的“御笔”展示给攻城的魏军士卒看，大声宣布：“你们的皇帝用心险恶，根本不把你们当人看，你们不要为他卖命了！”臧质又写了许多传单，发给攻城的少数民族士兵，号召广大士兵倒戈一击，凡是斩拓跋焘首级者，封万户侯，赏赐布、绢各一万匹。拓跋焘见状，暴跳如雷，下令做一张铁床，在上面扎满铁刺，发誓要踏平盱眙，活捉臧质钉在铁床上。

魏军在拓跋焘的驱使下掀起了一波波更猛烈的进攻。他们造了钩车来钩城楼，城内宋军就用大绳系住钩车，数百人呼喊着一一起牵拉，使车不能退。到夜晚，宋军把士兵装在大桶里坠下城墙，截下车上的铁钩，缴获钩车。魏军又造了冲车攻城。无奈城墙坚固，冲车每次冲击都只能冲落几斗士，难以奏效。魏军最后只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肉搏上阵，搭云梯登城。一波波的魏军像潮水一般涌上前去，又像潮水一样退下来，在盱眙城下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尸体，死尸堆积得与城墙一样高。就这么猛攻了整整一个月，盱眙城还牢固控制在宋军手里。南方的春天来了，魏军水土不服，伤员病号越来越多。更糟糕的

是，刘义隆派遣宋军水师从东海进入淮河，命令彭城的宋军南下，会师截断魏军的归路。为了避免被南北夹击，拓跋焘在二月烧毁攻城器械，主动退走。宋军不敢拦截，仅出动少数水师佯攻，逼迫魏军速撤。

盱眙之战，宋军大获全胜。刘义隆对这场意外的胜利大喜过望，对守城有功的臧质大加赏赐，提升他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负责中部边界军务。

元嘉二十七、二十八年的南北激战就此结束。南方在领土方面的损失不大，但国力遭受巨大损耗。魏军进出南方，大肆烧杀抢掠，仅掳掠而走的江北百姓就数以十万计，宋朝伤亡的军民更是不知有多少，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城镇残破、废墟累累。“自是道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之前二十多年治世积累的物质成果几乎荡然一空。北魏方面也伤亡惨重，损失鲜卑精锐数以万计，它和南朝一样都是输家，只是损失略小一点而已。

当然，很多政治事件的成败是不能用简单的物质得失来计算的。拓跋焘对刘宋的胜利，使北魏的统一更为巩固。这个成果比劫掠的物资更加重要。而刘义隆志得意满的心态被惨败击得粉碎，受到巨大精神创伤，没两年就驾崩了。这个损失比战场的失败更加严重。

十一 刘家的精神病史I：精神病开始发作

被拓跋焘打得大败后，原本身体就不好的宋文帝刘义隆一次又一次地频繁病倒、病重。然而，他每一回都能在大臣们提心吊胆的时候奇迹般地康复。如此反复多次，让一个人很着急。这个人就是刘义隆的太子刘劭。

刘义隆妻妾众多，共生了19个皇子，分别是：刘劭、刘浚、刘骏、刘铄、刘绍、刘诞、刘宏、刘祗、刘昶、刘浑、刘彧、刘休仁、刘休佑、刘休茂、刘休业、刘休倩、刘夷父、刘休范、刘休若。此处不吝烦琐，一一列出，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即将在骨肉相残的闹剧中粉墨登场。其中刘劭是袁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年近30岁，在古代已经不算年轻了。他渴望早日当皇帝，父皇羸弱的身体似乎能让他早日实现愿望，可等了一年又一年，父亲“病危”了一次又一次，龙椅摆在眼前，刘劭就是坐不上去。

刘劭快要抓狂了。他干脆找了同父异母的二弟、始兴王刘浚商量，如何让父皇早死。刘浚给太子大哥出了一个馊主意：找个女巫在东宫里作法咒父皇早死！刘劭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就找了女巫，制作了巫毒娃娃，还堂而皇之地埋在东宫院子里。很快，刘义隆知道了

两个儿子干的好事，龙颜大怒。这时候，刘义隆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毛病暴露了出来。他舍不得废太子，也不责备刘浚，只是下令抓捕那个女巫。有关部门搜捕了多日，找不到人。有人向刘义隆告密说：女巫被太子藏在东宫保护起来了。

刘劭此举，火上浇油。刘义隆出离了愤怒。“刘劭这个逆子，竟然要咒我死，还不知悔改，和我对抗到底！我要废了他！”即便决心要废太子，刘义隆也不能当机立断，而是召徐湛之、江湛、王僧绰三位大臣入宫商议。王僧绰一听，赶紧说：“如果陛下下定决心要废黜太子，请立即发布命令，以免消息泄漏，发生什么变故。”关键时刻，刘义隆动摇了，不肯颁布诏书，表示要再考虑考虑。可是，不等刘义隆考虑清楚，消息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出去。刘浚的生母潘淑妃赶紧派人通知刘浚，刘浚又急报太子。

自古被废的太子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刘劭惊恐万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要和父皇兵戎相见，拼个鱼死网破了。之前，刘义隆、刘劭父子关系亲密的时候，刘义隆给东宫调拨了一万名禁军执行安保工作，归刘劭指挥。现在，刘劭就指挥这支部队，在父皇提议要废太子的第二天清晨，突袭杀入皇宫。宋文帝刘义隆还在寝宫中，被乱军砍死，享年46岁。徐湛之、江湛、王僧绰三人也被杀死。这是元嘉三十年（453年）的事情。

刘劭终于坐上了梦寐以求的龙椅，宣布继位为帝，改元太初。

但这仅仅是刘劭噩梦的开始，也是刘宋王朝一系列祸害的开端。

如果刘劭等父皇死后正常登基，天下没有人可以指责他，即便是他的敌人也找不到攻击他的借口。但刘劭杀父自立，就失去了继位的合法性。天下人人都可以指责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讨伐他，更不用说敌人了。刘劭登基之时，就是人心涣散之际。他虽然登基了，但四方州县、封建大吏都没有效忠、祝贺的表示。他的叔叔、兄弟们都对他

侧目而视。

刘劭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除了照例加官晋爵后，刘劭也开始搞些小动作，一心想除去皇位的威胁。他心中的头号敌人，就是三弟——恰好领兵在外打仗的武陵王刘骏。

刘骏当时担任江州刺史，正统帅各路军队在长江中游剿灭反叛的少数民族。刘劭、刘浚弑父后，三弟刘骏递补成为继承皇位的合法人选。而且刘骏掌握军队，也最有能力起兵造反。刘劭就秘密写信给和刘骏一起作战的老将军沈庆之（就是之前反对刘义隆北伐的那位），要他杀掉刘骏。沈庆之有军队、有经验，他的动向就成了决定时局的关键。

沈庆之接到刘劭的密信后，跑去求见刘骏。刘骏听说大哥二哥谋杀了父皇后，最大的反应是害怕，担心篡位的大哥派人来杀自己。所以他听说大将沈庆之求见，担心是大哥派来的刺客，吓得称病不敢接见。沈庆之就硬冲进去，走到刘骏面前，把刘劭的密信递给他看。刘骏战战兢兢地看完，吓得泪流满面，乞求沈庆之让他到屋内和母亲诀别。谁料到，沈庆之刚毅地说：“臣受先帝厚恩，一心图报。今日之事，只能起兵推翻篡位的刘劭。殿下不用怀疑臣。”刘骏这才缓过神来。事到如今，起兵讨逆不仅是刘骏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自保的唯一选择。他起身拜谢沈庆之，说：“家国安危，在于将军！”

在沈庆之的主持下，武陵王刘骏领衔举起了讨逆大旗。沈庆之集合江州和本部兵马，力排众议，迅速顺江而下，进攻建康。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刘裕第六子）和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兖冀二州刺史萧思话、宣城太守王僧达等地方实力派纷纷起兵响应刘骏。讨逆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几乎无人与之敌。刘骏很快兵在建康城下，在新亭（今南京附近）称帝，改元孝建，史称孝武帝。

刘浚只能搜罗建康的军队负隅顽抗，无奈众叛亲离，组建的乌合

之众被讨逆军击溃。参加讨逆的将军薛安都率本部官兵为前锋，最先攻入宫殿，活捉刘浚。薛安都因功获封男爵。刘劭则和全家一起被杀。始兴王刘浚企图逃跑，中途被抓，也遭到屠杀。

刘宋王朝的第二次内战以讨逆方的胜利、弑君方的失败而圆满结束。一切看起来很“正义”，很“成功”。但是从之后的发展来看，刘骏是一个很糟糕的新皇帝人选。

二

刘骏的毛病很多，最突出的就是好色。

刘骏好色，不是一般的好色，而是特别好色，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只要看到有感觉的女性，不管是亲疏贵贱，都召入宫里临幸。可怕的是，其中许多女性是宗室女眷，也就是刘骏的亲戚。这就涉及乱伦了。大臣和宗室家的女眷，时常会被叫到宫中朝谒太后。刘骏就在女眷朝谒的时候闯进去，看见中意的就拉到宫中侍寝。最可怕的是，刘骏还和生母路太后乱伦。他从小是路太后养大的，镇守州县的时候路太后也一直陪同，可能有很深的恋母情结。当了皇帝后，刘骏发展到和生母乱伦。他不仅留宿生母宫中，还在公开场合和生母亲昵。南方史书对此多有隐晦，但《魏书》忠实记载了这肮脏的一幕。刘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正史记载与生母乱伦的皇帝。

刘骏肆无忌惮的乱伦终于惹出了大麻烦。刘骏的六叔刘义宣镇守荆州，盘踞多年，兵强马壮。他的四个女儿留在建康。刘骏看到四个堂妹长得如花似玉，竟然将她们纳入宫中乱伦。丑闻传到荆州，刘义宣义愤填膺，发誓要推翻刘骏，联系江州刺史臧质一起干。臧质灭刘劭有功，调任江州刺史，居功自傲，骄横专行。刘骏之前计划要剥夺他的兵权，所以臧质也对刘骏不满。两人再联系对刘骏胡为不满的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孝建元年（454年），四人推刘义宣

为首，一同起兵讨伐刘骏。刘骏派遣沈庆之、王玄谟、柳元景、薛安都等人迎战。这是刘宋王朝第三次大内战。

战斗打响后，造反的兖州刺史徐遗宝进攻重镇彭城，失败，丧失信心，竟然弃军投奔豫州刺史鲁爽。鲁爽没有分兵去攻城略地，而是率军从寿阳直趋历阳（今安徽和县），与臧质合兵。两人会师后，水陆并进，直指建康。刘骏以薛安都为前锋去阻挡鲁爽。两军接触，薛安都击斩鲁爽的前锋，堵住了鲁爽前进的势头。沈庆之赶到军前督战。两军大战爆发。薛安都跃马大呼，单骑直入敌阵，直冲敌将鲁爽，一枪将他杀死。鲁爽系出将门，平素勇武异常，号称万人敌，却在薛安都的冲锋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时人都将此战和当日关羽斩颜良相提并论。鲁爽死后，部队哗然大溃。沈庆之、薛安都等乘胜追杀，一举攻克寿阳。徐遗宝逃出，途中被杀。宋军集中兵力，专心对付刘义宣、臧质两军。

沈庆之派人将鲁爽的首级送给刘义宣。刘义宣、臧质看到鲁爽首级后，万分惊骇。站在刘骏一边的太傅刘义恭又使离间计，派人送书信给刘义宣，说臧质“少无美行”，如果你们俩反叛成功，恐怕你就是他下一个池中之物。刘义宣不禁对臧质疑忌起来。

战争还在继续，刘义宣军大败。宋军借助风势放火，叛军的船舰都被烧毁。臧质找刘义宣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发现刘义宣对自己的疑忌，惊惶失措，抛弃部队逃往寻阳。其部或降或散。一支宋军追到寻阳，臧质焚烧府舍，带着妻妾逃入南湖躲避，饥饿难耐时就采摘莲子充饥。宋军追兵搜查南湖，臧质用荷叶盖在头上，沉到水里，只把鼻孔露出水面呼吸。就是这样，臧质还是在六月被人发现，先中了一箭，然后被乱刃砍死。刘义宣也很快失败，他自己和十六个儿子全部被刘骏处斩。以前刘骏和刘义宣的四个女儿还偷偷摸摸乱伦，如今干脆将她们改换姓名，册封为嫔妃。

除了好色，刘骏的猜忌心很重。别的帝王猜忌大臣，刘骏主要是

猜忌叔伯和兄弟们，而且一猜忌就是刀光剑影。他不惜骨肉相残，在刘宋宗室内部掀起了阵阵腥风血雨。除了屠杀叔叔刘义宣一家外，南平王刘铄、竟陵王刘诞、武昌王刘浑、海陵王刘休茂等兄弟也先后遭到刘骏杀害。南平王刘铄是他四弟，从小最受父皇刘义隆的宠爱，看不起刘骏这个兄长。刘骏当皇帝不久，就派人下毒杀死了刘铄。十弟武昌王刘浑从小顽劣成性，十几岁就当上了雍州刺史。在雍州，刘浑自称楚王，立年号，备百官，被人告发。这也就是一个无知少年瞎胡闹，罪不至死，但是刘骏却逼刘浑自杀。刘宋皇室原本枝繁叶茂，在刘骏时期开始遭到沉重打击；刘宋广封宗室是为了藩护皇帝，不想成了皇帝发泄猜忌心的目标，成了频繁内战的背景。

刘骏六弟、竟陵王刘诞之前忠诚站在他的一边，在讨伐刘劭和平定刘义宣等战争中都立有功勋，逐渐占据高位。刘诞的府第建筑精巧、园林优美，冠绝一时，他经常在府中大会宾客，和文人武将们应酬，因此遭到了刘骏的猜忌。孝建二年，刘骏让刘诞担任南徐州刺史，赶出建康，赶到京口（今江苏镇江）上任。他又嫌京口距离首都太近，又在大明元年（457年）调任刘诞为南兖州刺史，调往广陵（今江苏扬州）。刘诞不是傻子，知道刘骏猜忌自己，也开始积蓄实力以防不测。他借口防备北魏入侵，大力修治城防，积聚粮草军械，积极训练军队。刘骏更不放心了，授意有关大臣告发竟陵王刘诞谋反，下令将他降爵、削职。刘诞不愿束手就擒，举兵造反。他完全是被刘骏逼反的。

刘诞造反，东部局势不稳。刘骏下令内外戒严，挑选将领出征。老将沈庆之已经退休，获封始兴公在家养老。刘骏请他出来担任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主持讨伐刘诞。沈庆之只好率军东进。刘诞备战多年，又实行坚壁清野战术，焚烧广陵外城的民房，将居民迁入城中闭门自守。在重重围困之中，刘诞制作了许多传单，用一切方法投送城外，宣称自己无罪，并宣扬刘骏秽乱宫廷的种种丑行。刘骏大怒，下令斩杀刘诞心腹的亲族上千人。他急欲攻下广陵，连发诏书督

促沈庆之攻城。为了早日得到捷报，刘骏命沈庆之在广陵城西南修筑烽火台，如果破城就点燃烽火，以便自己能早些得知消息。重压之下，沈庆之不得不督率将士，日夜攻打，制造楼车、填平沟堑、修筑土山，可三个月过去了还是毫无进展。刘骏大怒，命大臣弹劾沈庆之，再下诏不予追究，催逼沈庆之攻战。沈庆之不顾年迈，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冲在前线，终于攻破广陵。刘诞被杀，传首建康，其母亲、妻子在城破时自杀。刘骏认为广陵全城附逆，下令屠城，经沈庆之苦苦劝阻，最终改为男子五尺以上一律屠杀、女子被赏赐给军队。这暴露了刘骏的第三个恶性：残忍嗜杀。屠杀广陵男子后，刘骏还将尸骨筑为景观，用来炫耀。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孝武帝刘骏有精神病。他乱伦、猜忌、嗜杀，而且程度都很深。这可能是皇帝这个职业的压力太大了，也可能与刘骏个人成长经历有关（他庶出、不受父皇喜欢，且从4岁就开始出外“为官”），更大的可能是：刘宋皇室有家族精神病史。隐藏着的精神病基因在刘骏这一代身上开始显现出来，之后会愈演愈烈。读者可以继续往下看。

镇压多次反抗后，刘骏越发肆无忌惮。他嬖宠一个昆仑奴。这个昆仑奴长得高大强壮，刘骏就让他拿着棍子侍立在身边，对哪个大臣稍微不满就命昆仑奴上前殴击。刘骏还日益骄侈。为了警诫子孙，刘裕在宫中特地保留了几个房间，里面收藏自己使用过的农具、补丁叠着补丁的棉袄。刘骏翻新宫殿，发现祖父的遗物，讥诮祖父是“乡巴佬”。国库很快因为多次战争和皇帝的骄奢而空虚，刘骏想出一个敛财的方法：赌博。每次遇到地方刺史、太守等高官卸职还都的时候，刘骏都召他们来赌博，规定大臣们只能输不能赢，而且金额巨大。这就变相逼迫地方官员们贪污腐败、搜刮地方，最后这些脏款很大部分进了刘骏的腰包。

大明六年（462年），刘骏宠幸的殷淑仪病死了——殷淑仪其实是刘义宣的女儿、刘骏的堂妹，冒姓殷。刘骏十分伤心，将她的丧事

大操大办，并要求朝野大臣都去坟前哭泣，谁哭得不伤心，轻者责罚，重者免官。刘骏自己哀伤过度，身体每况愈下，从此很少理政。两年后，刘骏病死。这样的皇帝竟然得以善终，真是令人感叹。

十二 刘家的精神病史II：一个都不正常

—

孝武帝刘骏终于死了，16岁的长子刘子业登基。人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很快发现：刘子业也有精神病，而且是个重症患者！

刘子业和父亲刘骏一样爱好乱伦、猜忌、嗜杀，并且非常变态。比如新蔡公主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女儿，刘子业的亲姑姑，已经嫁给宁朔将军何迈为妻。刘子业看上了新蔡公主，将姑姑纳入后宫封为夫人，对外谎称新蔡公主已死，还杀了一名宫女冒充新蔡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又比如他继位后，命令宫女赤身裸体在宫中奔跑嬉戏，自己站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观看，看到哪个宫女不愿意赤身裸体或者不情愿，就拉出去砍头。更变态的是，刘子业在即位第一年的冬天将建康城里所有的王妃和公主叫进宫里，让她们列队站好。这些刘子业的亲戚兼贵妇人们都迷惑不解，不知道小皇帝要干什么。谁料到，刘子业竟然让宫里的几百名侍卫将她们集体强奸。最变态的是有一次，刘子业把叔叔建安王刘休仁和婶婶建安王妃叫到宫里来，又把将军刘道隆召进宫来，竟然让刘道隆当着叔叔的面强奸婶婶！刘子业站在一旁观看强奸过程，还留意叔叔刘休仁的反应。

刘子业的妹妹山阴公主淫恣过度，对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男

女有别，可都是先帝的子女。陛下后宫佳丽上万，可我却只有驸马一人。这太不公平了！”刘子业就为山阴公主安排了面首三十人。山阴公主还是不满意，看到吏部郎褚渊体壮貌美，请求刘子业把他也赏给自己当面首。刘子业竟然同意了，将大臣赏给妹妹当面首。褚渊在山阴公主身边十日，虽然被公主苦苦逼迫，誓死不从。山阴公主最后没办法，才把褚渊放回去。可见，刘宋皇室的公主精神也不太正常。

大臣戴法兴在刘骏时期深受信任，实际主持中枢公文处理和政令传达。他对刘子业的变态好色行为多有劝谏。戴法兴忘记了，刘子业同样继承了刘骏嗜杀的恶习！刘子业嫌戴法兴多嘴，将他莫名其妙杀死。同样，刘子业把屠刀伸向皇室内部：江夏王刘义恭是刘子业的叔祖，辈分高，被杀；两个弟弟始平王刘子鸾和南海王刘子师，辈分低，年纪轻，也被杀……结果，朝野震动不安，人心惶惶。

江夏王刘义恭的死需要拎出来专门述说。话说大将柳元景、颜师伯等人心怀恐惧，不知道刘子业哪日就要杀自己。他们就密谋废杀刘子业，拥戴刘义恭称帝。几个人日夜谋划，但犹豫不决。柳元景觉得应该争取到军界元老、三朝重臣沈庆之的支持，就上门去做沈庆之的工作。沈庆之与刘义恭的关系一般。颜师伯当时掌握实权，对沈庆之这样的老前辈不以为然，曾公开说：“沈公，就是一介武夫、一个爪牙，哪能干预政事呢！”沈庆之因此对颜师伯极为不满，对拥立刘义恭的计划不赞成，还向刘子业告发了此事。于是，刘子业亲自率羽林兵杀死刘义恭及其四子。他将叔祖刘义恭斩断四肢，分切肠胃，挖出眼睛，浸在蜜里，取名“鬼目粽”，又杀了柳元景。柳元景的八个儿子、六个弟弟及诸位侄子也都被杀；颜师伯和他的六个儿子同样没能幸免。

沈庆之真不应该去告发柳元景等人。他没料到自己会成为刘子业下一个杀戮的目标。

刚开始，沈庆之因告发颜柳有功，与刘子业的关系不错。但是老

将军对刘子业的胡作非为也看不惯，说了几句劝谏的话，刘子业就不高兴了。沈庆之惧祸，赶紧闭门谢客，以求自保。一些人仍然希望沈庆之能够主持推翻刘子业的荒唐统治。吏部尚书蔡兴宗就对沈庆之说：“现在皇上的所作所为，人伦丧尽，根本没有希望改正。他忌惮的人就是您，老百姓能依赖的人也只有您。沈公威名天下所服，在如今人心惶惶之际举兵起义，谁不响应！如果沈公犹豫不决，只会坐观成败，灾祸早晚要降临的。”沈庆之也承认现在局势危急，但借口退休在家、没有军队，不愿意领头。他将一切寄托在“天命”身上，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蔡兴宗苦苦再劝：“当今有心起义的人，都不是想邀功求富贵的小人，只是为了自保啊！领兵的将帅，只要听到有人首先发难，肯定会群起响应。沈公领兵几十年（450年），旧日部将门生遍布朝野，受您恩惠的人也很多，何患没有军队！况且尽管您不愿意出面，保不准有人打着您的名义起事，到时候您也免不了附从之祸。”沈庆之还是下不了决心，一味推辞。青州刺史沈文秀是沈庆之的侄子，率领部下驻扎在建康城外，也劝沈庆之：“皇上狂暴如此，祸乱不久将至。天下人心思变，如今借助众力推翻暴君，易如反掌。机会难得，不可失也。”沈文秀劝了叔叔好多次，最后都流涕相劝了，沈庆之始终不同意。没几天，宁朔将军何迈谋反失败，被刘子业诛杀，牵连到沈庆之。刘子业派沈庆之的侄子沈攸之送药“赐死”沈庆之。沈庆之不肯服毒，沈攸之就用被子捂死了亲叔叔。沈庆之死时80岁。

这里顺带说一下杀死亲叔叔的沈攸之。沈攸之相貌丑陋，小时候父亲去世，家境贫寒。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朝廷大肆拉壮丁北伐，沈攸之应征入伍，此后随沈庆之征讨。沈攸之作战勇敢，参加了讨伐刘劭、征讨刘诞的战役。在讨伐刘劭的战斗中，沈攸之勇猛奋战，屡建战功，多次身受重伤，比如在广陵之战中沈攸之就被箭射破了骨头。他内心有很强的名利观念，且自视很高，但叔叔沈庆之让他从普通士兵做起，并没有特殊照顾，且当刘骏看到沈攸之善战，要对他大加赏赐时，沈庆之还出面阻挡，沈攸之由此对叔叔怀恨在心。刘子业登基后，沈攸之马上献媚，帮助小皇帝诛戮大臣，和宗越、谭金

等人成为刘子业的宠臣。沈攸之因为杀叔叔沈庆之有功，被升为右军将军。

二

刘宋王朝大封宗室，让皇子皇孙们顶着王爷的尊衔在地方上担任实职，控制一地的军政大权，形成藩镇。刘裕的本意可能是吸取曹魏抑制宗室，导致皇室力量薄弱的教训。他本人雄才大略，能够控制那么多的宗室藩镇。传到儿子刘义隆时期，刘义隆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转而对兄弟猜忌起来，所以才有了“赐死”刘义康的先例。到了刘骏时期，皇帝和宗室藩镇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猜忌和提防游戏。大封宗室制度设立的本意完全被颠倒了过来。

刘子业继位后，叔叔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都镇守一方。刘子业不放心，把他们召回建康，关在宫中当做木桩给自己练习拳脚，之后变本加厉地把三个叔叔关在竹笼子里。刘彧三位王爷都长得很胖。刘子业给他们一一过秤，最重的刘彧获得“猪王”的绰号，刘休仁其次，被称为“杀王”，刘休佑第三，被称为“贼王”。刘子业对三人任意侮辱，每次出宫都把他们关在竹笼里随行，招摇过市。

三个叔叔中，刘子业对刘彧最提防。有民谣说：“湘中出天子。”刘彧恰恰是湘东王。刘子业对他猜忌最重，侮辱最多。既然叫刘彧“猪王”，刘子业觉得就得向猪的生活靠拢。他命人挖了一个土坑，在坑里灌上泥水，把刘彧扒得赤条条地扔到泥水坑里，然后用木槽盛上猪食，强迫刘彧像猪一样趴在木槽里吃猪食。每次看到“猪王”哽咽着吃猪食的样子，刘子业都笑得前仰后翻。

刘彧不堪其辱，没几天就拼命反抗，不愿当猪了。刘子业二话不说，命人把刘彧五花大绑，像挑猪一样用棍子挑着四肢，抬到御膳

房。刘子业吩咐御厨：“杀猪！”建安王刘休仁这天恰好被允许在竹笼外放风，看看这一幕，悄悄跟到了御膳房。他要救下哥哥刘彧，急中生智，装作嬉皮笑脸地对刘子业说：“皇上不该杀这头猪！”刘子业奇怪地问为什么。刘休仁说：“皇上的生日快到了，到时候再杀，取猪肝猪肺！”刘子业想想有道理，继续将刘彧关押。刘彧不断遭受刘子业凌辱，好几次都是命悬一线，每次全靠刘休仁装疯卖傻、取巧逢迎，才一次次逃过鬼门关。

修理完三个叔叔，刘子业又对镇守地方的兄弟们猜忌起来。其中最让他不安的是担任江州刺史的晋安王刘子勋。刘子勋当时只有10岁，还是个孩子，政务都委托长史邓琬，有什么值得猜忌的呢？他的排行！原本，宋文帝刘义隆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孝武帝刘骏也排行老三，刘子勋很不幸，在刘子业几个兄弟中也是老三。单单凭这个排行，刘子业就得要三弟的命。

刚好建康内部发生了宁朔将军何迈谋反事件。何迈将军其实是刘子业的姑父，妻子新蔡公主被刘子业纳入后宫乱伦后，何迈既恼怒又担心受祸。他密谋在刘子业出巡时发动政变，迎立刘子勋为皇帝。事情败露，何迈被杀。刘子业广开株连之门，先杀了老将沈庆之，再派人去江州“赐死”刘子勋。江州长史邓琬闻讯，义愤填膺地表示：“我本江南寒士，承蒙先帝厚恩，以爱子相托。当今昏君当道，邪恶残暴，致使社稷危急。我当置性命于度外，以死来报效先帝。”他立刻统一江州内部意见，决定起兵反抗，拥立刘子勋为新皇帝。景和元年（465年）十一月，晋安王刘子勋在众人的拥戴下自寻阳起兵，向各处州县发布讨伐刘子业的檄文。

听到刘子勋造反的消息，刘子业非常兴奋。他马上决定御驾亲征。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个玩耍和杀戮的大好时机。

出发前，刘子业对留在建康的刘彧、刘休仁、刘休佑三个人不放心，决心杀了他们，免得夜长梦多。刘彧等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江东

寒士阮佃夫是刘彧的心腹，是刘彧长子刘昱的老师。阮佃夫为主人的处境焦虑异常，联合刘彧的另一个亲信李道儿，决定拼死一搏，杀掉刘子业，救出刘彧。阮佃夫、李道儿再联合皇帝的近臣寿寂之、太监钱兰生等十几人，大家都有诛杀暴君的意思。一天晚上，刘子业在华林园“射鬼”。刘子业杀人太多，老觉得皇宫中有女鬼纠缠自己，巫师们就建议他射鬼。射鬼的时候，刘子业屏退侍卫，只留巫师、彩女们跳舞、射箭。阮佃夫等人觉得机不可失，决定当晚行动。寿寂之带头闯入华林园，刘子业看到寿寂之持刀恶狠狠地走过来，知道情况不妙，慌忙向他射了一箭。没有射中，刘子业掉头就跑，被寿寂之追上，一刀劈死。

刘子业死时17岁，在位仅一年多，史称“前废帝”。“废”字比一般的恶谥更糟糕，意味着这个皇帝一无是处，连谥号都没法上了。这个皇帝和他这段时期就算是“废”了。为什么加一个“前”字呢？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和刘子业一样糟糕的坏皇帝：后废帝刘昱。

杀死刘子业后，政变集团把刘彧解救出来，拥戴他为新皇帝。那么，这场政变，刘彧到底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呢？有很多后人认为刘彧不仅知情，而且是幕后主使。但《宋书》则明确记载直到事情发生后，“上（指刘彧）未知所为”。建安王刘休仁跑到刘彧跟前，主动称臣，把刘彧奉迎到龙椅上坐定，再召见王公大臣。由于事起仓卒，刘彧连鞋子都没穿，光脚走到宫殿，还戴着一般人戴的乌帽。等他坐定了，刘休仁发现穿戴不妥，才叫奴仆们找了顶白帽给刘彧戴上，又慌忙布置了羽仪礼器。刘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史称宋明帝。

人们对刘子业持一边倒的谴责痛斥态度。《宋书》说之前的任何暴君和刘子业相比，都相形见绌，罪行比不上刘子业的万分之一。任何人只要犯了刘子业罪行的其中之一，就足以玷污宗庙、辱没社稷，而刘子业居然把所有罪恶集于一身！最后，《宋书》对刘子业的死持欢呼的态度：“其得亡亦为幸矣！”

政变发生后，太皇太后（刘义隆的皇后）颁布诏书追认了诛杀行为的合法性，并历数刘子业的斑斑罪恶，说他“少稟凶毒，不仁不孝”，从小就不学好，所以才会“反天灭理，显暴万端。苛罚酷令，终无纪极”，闹得朝野大臣人人自危，百姓惶恐不安。在这份诏书中，太皇太后痛斥孙子刘子业恶贯满盈，行为如同禽兽，连上古的暴君夏桀、商纣王都比不上他，简直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暴君（原话是“开辟以降，所未尝闻”）！这也许是历史上对皇帝最恶劣的评价，表达了老奶奶对孙子极端的失望和愤怒。不过客观地说，皇室将罪责都推给刘子业一个人有失公允。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坏蛋，乱伦嗜杀等等恶行也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皇室对皇子的教育也没有跟上。从刘裕开始，皇帝忙于政务，疏于管教皇子，而刘家出生草莽，没有家学底子可谈，也没有系统的教育方法，反而是许多皇子刚学会说话，就封王授官，去镇守地方。比如刘骏在4岁就离开建康，出镇地方了。等于在孩子正需要教育的黄金时期，把他们放养了。刘宋皇室对皇子教育失败，加上之前所说的大封宗室，两者结合导致了皇帝无道、骨肉相残的种种悲剧。

之前被徐羨之等人废黜的宋少帝刘义符，和刘子业相比，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宋明帝刘彧在即位诏书中痛斥刘子业“人面兽心”，“反道败德”，“毒流下国”，“实开辟所未有，书契所未闻”，那么，他又将会如何表现呢？

十三 刘家的精神病史III：没有最变态，只有更变态

—

刘彧继位后，首先面临的是巩固皇位的问题。

天下普遍认为，刘子业有罪该杀，但刘彧以叔叔的身份夺了侄子辈的皇位，也不对，而且之前，晋安王刘子勋已经起兵讨伐刘子业，得到天下响应了。刘子勋是刘骏的儿子，在继承序列上比刘彧更有资格当皇帝。刘彧登基后，尝试和刘子勋妥协，提升侄子为车骑将军，希望能罢兵修好。但是邓琬等人不接受，还在泰始二年（466年）正月在寻阳为刘子勋举行了登基仪式。刘子勋称帝，改元义嘉，设置百官，成立了和建康对峙的中央政府。让刘彧尴尬的是，他虽然占据着首都、称帝比较早，但天下大多数州县却承认刘子勋为新皇帝，不承认他。刘子勋得到广泛响应，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实力派都宣布效忠寻阳的朝廷，还派兵响应刘子勋。湘州、广州、梁州等地也向刘子勋表示效忠；东边的会稽、吴等地也效忠刘子勋，并且起兵反对刘彧。刘彧能控制的，只有首都建康和周边丹阳、淮南等几个郡的地方。

刘彧心态很好。他本来就没想到能当皇帝，现在也不在意将皇位让给刘子勋。铁杆兄弟刘休仁拉住刘彧，不让他让位，鼓励他奋战一

场再决定进退不迟。

于是，刘彧在泰始二年（466年）正月下令内外戒严，以司徒、建安王刘休仁为都督，任命王玄谟为江州刺史，发兵讨伐刘子勋。刘彧即位后，原本依附刘子业的沈攸之遭到冷遇。沈攸之告发昔日同伴宗越、谭金等人“谋反”，得到了刘彧的好感，重新被任用。这次，沈攸之也列名讨伐将领行列。他确实有才，而且从军多年，经验丰富，屡败刘子勋的部队。而刘子勋称帝后，以邓琬为丞相。邓琬虽有热血却无谋略，且拉帮结派、贪图享受。面对节节推进的沈攸之等人，邓琬惶恐无计，在内乱中被杀。沈攸之攻入寻阳，擒斩11岁的刘子勋。刘休仁再分别派遣将领进攻荆、郢、雍、湘等州，相继削平支持刘子勋的势力。

在东部，刘彧起用将军吴喜。吴喜在东部郡县有为政宽松的好名声，得到百姓的支持，很快扭转了局势，平定了响应刘子勋的势力。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等人见刘子勋死了，也转向刘彧宣布效忠。南方重归一统，刘彧没费几个月时间就坐稳了皇位。

危机一解除，刘彧身上好色、猜忌和残暴等家族病迅速爆发出来！

刘彧和刘骏、刘子业一样变态。他把后妃、公主与命妇聚集到宫中欢宴。喝到半醉的时候，刘彧命令无论宫中的嫔妃还是宫外的命妇，都要脱去衣服裸露身体，相互戏谑。后妃、公主与命妇都不敢违抗刘彧的命令。

刘彧猜忌成性，对宗室极不信任，继续大开杀戒。杀人之多，不仅令刘骏望尘莫及，就是连刘子业也叹为观止。刘彧是刘义隆的儿子，他将当时还生活在南方的12个兄弟都无端杀害，只留下一个平庸无能的桂阳王刘休范；刘彧是刘骏的弟弟，他把刘骏的28个儿子一口气全部杀光了。需要指出的是，刘彧杀害这些兄弟、侄子，不是单单

杀他们一人，而是满门抄斩，包括生母、妻妾、子女全部屠杀。令人发指的是，刘彧连铁杆兄弟、建安王刘休仁也杀了。刘休仁和刘彧一起被刘子业关过竹笼，因为他的多次搭救刘彧才没被刘子业当做猪给杀掉。刘彧称帝后，刘休仁忙前忙后，帮哥哥巩固皇位。刘彧对这个有大恩于己的弟弟也不放心，犹豫要不要杀。最后，刘彧还是把刘休仁召入皇宫，强灌毒药害死了。将军吴喜平定东部郡县，功勋卓著，也被刘彧无端杀害。

大规模屠杀亲人、功臣后，刘彧信任阮佃夫、沈攸之等人，放手让他们处理军政事务。

阮佃夫救主有功，刘彧称帝后被封侯、赐官，掌握朝廷实权。阮佃夫本是刘彧的家庭教师，没有成熟的政治构想，掌权后也提出不了什么政策措施，就知道行贿受贿，凡事没钱不行，而且行贿者送钱少了也不行，甚至连老家的侄子来找他要求解决工作问题，阮佃夫也逼侄子行贿。

大凡一个人从社会底层突然跃升到顶端，大权独揽，大多会追求享受，用骄奢淫逸来弥补、麻醉自己。阮佃夫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住宅园林，赛过宫廷，家中堆满珠玉锦绣，蓄养女伎数十人，才貌冠绝当时。为了泛舟游玩，阮佃夫从家中向东挖掘人工河，长达十里，泛舟河上，命女伎弹奏作乐。阮家的厨房中水陆珍馐齐备，临时操办招待数十名宾客的宴席，一眨眼的工夫就能办完。阮佃夫豪奢的生活，为京城中人仿效。同时，阮佃夫暴得大权，对权力一点都不珍惜。他手握官职予夺之权，滥封仆从为官。阮家拉车的人都是虎贲中郎将，马旁的随从都是员外郎。朝士无论贵贱，都奉承巴结阮佃夫。阮佃夫自我膨胀，自高自大到极点，一般人根本就不搭理，能进入他房间谈话的只有一两个人而已。刘宋的政治风气早在刘骏时期就已败坏，阮佃夫掌权后则加速滑向黑暗的深渊。

朝政黑暗、刘彧多疑，曾经支持刘子勋的薛安都等人惶恐不已。

果然，刘彧惦记着薛安都。薛安都表示效忠后，刘彧派张永、沈攸之领重兵北上“迎”薛安都。薛安都知道大祸临头，派使者向北魏投降，表示愿意献出徐州的土地、军队，并协助北魏进攻刘宋。

薛安都是一员虎将，而且天上掉下这么大一块馅饼，在北魏朝堂引起了一阵骚动。很多人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便宜事，而且觉得薛安都开始是北魏的大臣、中途投降刘宋与北魏为敌、现在又主动投降，如此反复，未必可信。最后，北魏献文帝拓跋宏圣心独断，接受薛安都的投降。北魏授薛安都为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赐爵河东公，对投降的宋军大规模封赏，就连薛安都的儿子都一律封侯。从此，本是刘宋北方长城的薛安都所部铁了心效忠北魏，与南方为敌。同时，大批魏军进入彭城，接收徐州等地。泰始三年（467年）正月，薛安都的降军联合北魏援军，击败张永、沈攸之的宋军。薛安都继而引魏军攻破历城，崔道固投降；攻克东阳，俘虜沈文秀。刘宋王朝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外部局势迅速恶化。

元嘉北伐之后，宋军虽然失败，但北方重镇彭城、历城、东阳等都控制在宋军手中。南北边界保持在离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如今因为薛安都的投降，刘宋在淮北的四州以及豫州、淮西等郡县先后沦陷，相当于丢失了现在山东、河南的大片地区和江苏、安徽的北部。南北边界推移到淮河一线。南方在对北方战争中更加处于劣势，之后一退再退，直至灭亡。

刘彧逼反薛安都，导致北方领土沦陷，是南北朝时期双边关系的重大事件。

刘彧统治后期，好鬼神，多忌讳，制定言语文书中有祸、败、凶、丧及疑似的语句应回避的规定数百上千条，大臣们谁违反了必加罪戮。宫中禁忌特别多，移张床、粉刷墙壁都要先祭土地神，派文人撰写文词祝策，搞得同朝廷大祭一样。刘彧年纪越大，越残忍，越喜欢虐杀。左右忤逆了他的意思，往往被断刳断截。结果自然是“内外常

虑犯触，人不自保”，活脱脱是刘子业时期的恐怖时光再现。

刘彧时期比刘子业时期更不如。因为刘子业只是荒唐了一年多，刘彧却胡作非为了十多年，把南方搞得乌七八糟的。薛安都叛变后，淮河北战不断，导致府藏空竭，一度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了。但是刘彧依然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不断追加苛捐杂税，盘剥百姓。百姓困苦不堪，州县骚动。后世普遍认为刘彧时期，政治黑暗、皇室削弱，“宋氏之业，自此衰矣”。

二

说来奇怪，之前刘宋宗室的生育能力很强，子孙众多。不少人生的儿子数以十计。刘彧的生育能力却不强，长久没有儿子。

荒唐的本性让刘彧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方法。他看到亲信李道儿生了很多儿子，就将宠妾陈妙登赏赐给李道儿。等到陈妙登怀孕后，刘彧赶紧又将陈妙登接回来。陈妙登就这样生下了儿子，取名刘昱。刘彧将刘昱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并册立为太子。后来，刘彧找了个借口将李道儿赐死。不过，社会上始终风传刘昱是李道儿的儿子。刘昱也听到那些传言，成年后还常常自称“李将军”，一点都不为父母避讳。尝到有儿子的甜头后，刘彧派人秘密将诸王怀孕的姬妾接进宫里，让她们在宫中生产。如果孕妇生下来的是男孩，刘彧就杀了母亲留下孩子，让宠姬冒充孩子的母亲。通过这样的手段，刘彧一共“有”十二个儿子。其中有多少是刘彧亲生的，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泰豫元年（472年），刘彧病死，年仅10岁的太子刘昱继位。

临终前，刘彧指定袁粲、褚渊二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儿子。袁粲是老官僚了，历经数朝逐步升迁而来。褚渊在仕途上的成功，则主要仰

仗两个优势：第一，他父亲褚湛之娶了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始安公主，褚渊自己娶了宋文帝刘义隆的女儿南郡公主，和刘宋皇室亲上加亲。第二，刘彧还是湘东王的时候，褚渊就和他关系密切。

这两个顾命大臣搭建领导班子有些力不从心，觉得有必要再拉几个人一起干。袁粲提名了刘秉。刘秉是刘裕的侄孙，当时刘宋宗室能干的不多，刘秉还算是少数能够拿得出来的宗室成员之一，就被袁粲调到中央。褚渊见袁粲拉了一个人进班子，也提名了一个人：萧道成。萧道成出身将军世家，是个职业军人。褚渊早年路遇萧道成，就对人说：“此非常人也。”他认为萧道成“才貌非常，将来不可测也”。于是，刘秉担任了尚书左仆射，参与政事；萧道成担任右卫将军、卫尉，负责首都军事。

也真是奇怪了，刘义隆之后的宋朝皇帝一个不如一个。天下人忍耐一个胡作非为的皇帝，觉得天底下不可能有比他更坏的皇帝了，等这个皇帝死的时候都松了一口气，结果发现继位的皇帝比前任更坏，更不是东西。如此反复，人们只好不断刷新忍耐的极限。

新继位的刘昱虽然年纪很小，但荒唐胡闹、残忍无道，一点都不输给祖辈。他在五六岁就被立为太子，在东宫的时候刘昱从不好好学习，喜欢嬉戏，特别喜欢学猴子爬油漆竿。那些竿子离地面有丈余高，刘昱爬到顶端再滑下来，老师们都管不了他。稍微长大后，刘昱喜怒无常。左右有不顺他意思的，动手就打，习以为常。

刘昱的主要爱好有两个：一是出宫游玩，一是无故杀人。刘昱喜欢穿件小衣衫，带着几个随从出宫，不管郊野还是市井，哪里有趣就往哪凑。陈太妃开始的时候还时常乘着车跟随他。但刘昱一出宫就似蛟龙入海，转瞬间将母亲甩得无影无踪。陈太妃越来越力不从心，对宝贝儿子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刘昱常常是夜里从承明门出去、次日凌晨回来，或者早上出去再晚上回来。每次在外面，刘昱困了就投宿客栈，有的时候甚至找个路边空地睡一觉。他交往的对象不是卖柴养

马的商贩，就是拉车担货的少年。遇到被人呵斥辱骂，刘昱就淡然一笑；遇见婚丧嫁娶，刘昱就冲入人群高歌饮酒取乐。官吏见了，都习以为常。

刘昱如果仅仅是喜欢民间，倒还有与民同乐，不拘小节的味道。遗憾的是，他总是携带钳凿斧锯，发明了击脑、椎阴、剖心等刑罚。通常情况下，刘昱每日都杀数十人，有些人则是刘昱亲自用长矛刺穿的。一次，刘昱闻到一个叫孙超的大臣口中有蒜味。为了证明他吃过大蒜，刘昱让左右抓牢孙超，亲手剖腹查探他肚子里有没有大蒜头。建康城传闻大臣孙勃聚敛了许多金银财宝，刘昱发动了一次夺宝行动，带着人马劫掠孙勃。抢劫开始了，刘昱挥刀冲锋在前，头一个冲入孙家。一伙人杀掉孙勃后，刘昱记得小的时候被孙勃管教过，竟然脍割尸体解恨。

从即位第四年起，刘昱就无日不出去胡闹。最后他发展到手执长矛大棒，凡是遇到男女行人及犬马牛驴就立即扑杀，致使人民惊扰，道无行人，俨然是强盗行径。刘昱杀人成瘾，如果一日不杀人就闷闷不乐。父亲的正妻老太后多次训斥自己，刘昱烦了竟然下令太医煮毒酒，准备鸩杀老太后。左右侍从慌忙劝他说：“如果太后死了，陛下您就得以儿子的身份参加各种各样烦琐的丧礼仪式。我们就没时间陪陛下出宫游玩了。”刘昱一想也是，打消了毒死太后的念头。

却说阮佃夫在刘彧死后没能成为顾命大臣，内心失落。虽然作为刘昱的老师，阮佃夫依然身居高位，但他的不满和怨恨越积越多。阮佃夫看到刘昱嗜杀成性，朝野人人自危，就联合将军申宗伯、朱幼、于天宝等人密谋杀死刘昱，拥立其弟刘准，通过废长立幼来夺取大权。这是阮佃夫第二次密谋政变了，他制订了详细的政变计划，拟定趁刘昱去江乘射雉的时候发难。政变的保密工作做得也很好，然而百密一疏，不知道刘昱为什么当日临时改变路线，没有去江乘，害得阮佃夫的周密计划无法施行。同谋的于天宝心理素质差，见计划没能执行，吓得告发同谋以求自保。刘昱在杀人方面很在行，迅速将阮佃夫

捕获处死，并封存了他搜刮的不义之财。这也许算是刘昱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三

刘昱即位的第二年（元徽二年，474年），桂阳王、江州刺史刘休范在江州起兵反叛。

刘休范就是那个刘彧觉得平庸无能，懒得杀的兄弟。作为硕果仅存的皇叔，刘休范自以为德高望重，对自己没能进入顾命大臣班子非常不满，因此起兵谋反。他亲率大军两万从寻阳出发，昼夜兼程杀向建康。朝廷派出萧道成率军迎战。两军在新亭迎战。

刘彧没有看错刘休范，他的确无能。萧道成使了一个小小的诈降计，就把他解决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萧道成指使部将张敬儿、黄回前去敌营诈降。刘休范轻易相信了二人，当晚还备了酒宴招待张敬儿、黄回。酒过三巡，张敬儿借敬酒之机，从刘休范腰间抽出配刀，手起刀落，将刘休范斩首，然后取下头颅疾驰而去。刘休范一死，叛军很快被击溃。

平定刘休范之乱后，袁粲、褚渊、刘秉、萧道成四人轮流在朝廷值日，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号称“四贵”。这四贵的排名，萧道成最末。他资历最浅、职位最低，在战后给褚渊、袁粲的书信中自称“下官”，说自己“志不及远”。他和褚渊关系亲近，袁粲则和刘秉关系亲近，班子内部隐约分为了两派。

桂阳王刘休范死后，南方刘义隆诸子全都死了，孙子辈中以建平王刘景素年龄最长。刘景素勤学好文，招集人才，声望不错。朝野曾流传刘景素“宜当神器”（适合当皇帝）。之前刘景素就被朝廷忌惮，他因此更加注意结交人才，积蓄力量以防不测。刘休范死后，刘景素

内心惊恐，举兵自卫。兵败后，刘景素被满门抄斩。之后，刘宋宗室中再也找不出像样的人才了。刘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原本人才济济，却在刀光剑影和骨肉相残中凋敝殆尽。时人流传：“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说的就是皇室的内讧导致人丁衰败。

之后，萧道成篡位的时候，又将刘宋宗室不论长幼一律杀死。刘裕的子孙只剩下一个逃往北魏的刘昶。刘昶是刘义隆的儿子，封义阳王，任徐州刺史。景和元年（465年），前废帝刘子业诬陷刘昶谋反，下诏讨伐刘昶。刘昶闻讯只好造反，被打败后，连夜仅带数十骑逃奔北魏。在北魏，刘昶生活得远比在南方要好，不仅娶了公主当了驸马，还获封丹阳王。刘宋宗室遭到系统杀戮后，刘昶成了唯一幸存者，在北方延续了刘家的血脉。

刘家的精神病史基本发作完毕了——再发作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

像刘宋皇室这样密集、整体性的荒淫残暴史上罕见，仅此一例。刘子业的太后病重了，派人去叫皇帝来。刘子业却说：“病人房间多鬼，哪能去呢？”不愿意去看望太后。太后大怒，高呼：“快拿刀来，剥开我的肚子，看是怎么生出这样的不孝儿的！”她不知道自家子孙的不孝、乱伦和残暴是皇家遗传。在尔虞我诈、压力巨大的皇宫中，皇帝很容易发生人格扭曲。加上刘宋皇室不重视家族教育、大封宗室，就容易爆发刘宋皇室这样的集体精神病发作事件。

十四 七夕夜弑君



元徽五年（477年）盛夏的一天中午，建康城酷热难耐。中领军萧道成体态过胖，解衣袒腹地在家里堂中纳凉、睡午觉。

突然，萧家门口出现了一群蹑手蹑脚的年轻人。他们衣着华丽，容貌形态不像一般人家的子弟，但却行为猥琐，对着萧家大门张头探脑，分明又是一群市井无赖的模样。尤其是领头的年轻人，十三四岁光景，特别显眼，招人怀疑。这群人的确不是一般人，而是当朝皇帝刘昱和他们的一帮侍卫。这天，好动荒唐的刘昱出宫游玩时，经过萧道成的领军府，突然想进去戏弄一下这位老将军。

领军府有警卫认识皇帝，要行礼迎接，刘昱示意警卫不要惊动他人。他带着一行侍卫轻声细语地直入萧家正堂。刘昱一眼看到酣睡的胖子将军，好奇地揭开帐子欣赏起袒胸露肚的萧道成来，只见萧道成的肚子硕大滚圆，肚脐眼像鸡蛋一般大，刘昱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惊醒了萧道成。萧道成睁眼见是小皇帝亲临府邸，以为出什么大事了，急忙起身要穿衣行礼。刘昱摇摇手说：“你的肚子是个很好的箭靶子，正好让我试试箭法。”

萧道成惊讶地还没回过神来，刘昱就命令左右架起萧道成站到几步开外，要用他的腹部当箭靶，肚脐眼当靶心练习箭法。刘昱还有模

有样地拿起弓箭，摆出姿势就要射。

萧道成吓得魂飞魄散，慌忙用手捂住肚脐，大声申辩说：“老臣无罪，为何要射杀我？”

刘昱也不搭理，拉满弦就要放箭。千钧一发之间，随从的皇家卫队长王天恩进言道：“萧领军的肚子真是一个好靶子，可以供皇上练习射技。但是如果一箭下去将萧领军射死了，以后皇上就没有这么好的靶子了。皇上不如将箭头拔去，用秃箭射。”

刘昱想想觉得有道理，于是拔掉箭头，张弓就射。那一箭正中萧道成的肚脐眼，痛得他嗷嗷大叫。小皇帝刘昱却哈哈大笑。王天恩等人连忙拍马屁说：“陛下神射无双，一箭中的。”刘昱更加高兴了，玩得尽兴后扔下敢怒不敢言的萧道成扬长而去。

回去的路上，刘昱想起刚才萧道成的神态又发起怒来。回到宫中，刘昱咬牙切齿地叫唤：“明天就去杀掉萧道成！”他还磨起剑来，一副明天亲力亲为的架势。宫中早有人告诉了他的生母陈太妃，陈太妃匆忙赶过来制止儿子。她骂道：“萧道成统领禁军，是国家的功臣。你杀了他，谁还为国家出力啊！”刘昱挺怕母亲的，一琢磨她教训得有道理，也就把杀萧道成的事情搁到一边去了。

这里要详细介绍一下萧道成。在刘宋荒唐的朝政和不断加剧的内乱中，萧道成登上政治中心舞台，摄取了越来越大的权力。

萧道成，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峄城）人，祖先在西晋末年南迁，寓居武进（今江苏丹阳）。元嘉四年（427年）萧道成出生于职业军人家庭。父亲萧承之历经战争，因战功一步步升迁为刘宋王朝的右军将军。萧道成年幼的时候曾经学习儒学，但在他14岁那年发生了彭城王刘义康被废黜事件，父亲的部队要移防豫章，萧道成只好放弃学业，正式参军跟随父亲去江西。萧道成先后历经大小数十战，为刘宋王朝出生入死，官职和权力逐步得到提升。泰始四年（468年），

他正式成为南兖州刺史，先是镇守广陵，后来移镇淮阴，成为南方对北魏作战的前线指挥官。

不知道是恶作剧，还是有心陷害，建康城一度出现了“萧道成当为天子”的流言。刘彧原本就觉得萧道成相貌出众，不是久居人下的人，听到民间流言后更加怀疑前线的萧道成有野心，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了。他决定试探一下萧道成，于是千里迢迢派遣使者送给萧道成一壶酒。萧道成戎装出迎使者，谢过天恩后，毫不怀疑地仰面喝下御酒。听完使者的回报，刘彧判断萧道成不会造反，于是放过了他。

当时的萧道成还是一位忠心的前线将领，无奈猜忌成性的刘彧老是怀疑他，弄得他非常郁闷。萧道成曾经写过一首《群鹤咏》。全诗只有四句：“大风舞遥翩，九野弄清音。一摧云间志，为君苑中禽。”他用鹤的迎风高飞，当空鸣叫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宏才大略。遗憾的是，因为受到朝堂的约束，难以真正展翅高飞，无奈成为君王的观赏动物。可见，虽然地位和权力得到升迁，但萧道成的心情并不愉悦。

泰始七年（471年），宋明帝刘彧病重，派人召萧道成入京。前线部将都觉得此行凶多吉少，为萧道成担心。萧道成清醒地分析道：“诸位都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当今皇上诛杀兄弟，而太子稚弱。皇帝病重，正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既想寻找辅政大臣，又不想威胁到太子的地位。皇上召我，我正应该迅速应召，如果迟迟不去，反而是自取其祸啊。”接下去，萧道成又讲了一段“大逆不道”的话，充分暴露了他心中已经萌发的不臣之心。他说：“皇室骨肉相害，非灵长之运。国家祸难将起，各位要和我一起出力同心啊。”

事实发展证明萧道成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一到建康，他就被拜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加邑二百户。不久，刘彧驾崩，立下遗诏，任命萧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他很快掌握了刘宋朝堂禁卫军的兵权，为日后的政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禁卫军权是中国古代宫廷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古代君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也常常在乱世中脱离君王的控制，甚至成为颠覆君权的工具。禁卫将军控制禁卫军权，从而专断朝政，多有废立篡弑之举；登基之初，新皇帝就会命亲信将领担任禁卫将军，控制禁卫军权，巩固统治。南朝时候政治不稳，昏主迭出，禁卫军权对朝政影响更大。刘裕打败桓玄初期就亲自担任指挥禁卫军的领军将军，牢固掌握建康的禁卫军权。这是刘裕控制京师、整顿朝政的势力基础。刘裕开了这个头后，以后的宫廷政变和朝政变迁或多或少都有禁卫军的影响，为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命题。

话说荒唐的刘昱虽然放弃了杀萧道成的想法，但萧道成内心极度不安起来。谁能保证自己哪天不会被这个莽撞无理的小皇帝杀掉呢？萧道成为了自保，觉得只有推翻刘昱才行。他首先想到通过正常途径废立皇帝。他找到“四贵”中的袁粲、褚渊，提议废黜刘昱。领衔“四贵”的袁粲不同意，说：“皇上还在幼年，有些错误将来会改正的。废立皇帝是大事，不是每一代都可以执行的。纵使废立皇帝成功，我们这些做大臣的最终也没有好下场。”褚渊默然不语。他也觉得刘昱荒唐无道，推翻他未尝不是好事，同时又觉得袁粲的意见也有道理。不过在内心，褚渊是支持萧道成的。

正常途径走不通，萧道成就密谋通过“非正常途径”废掉刘昱。他四处联络同道力量，首先寻找的就是禁卫军内部的人，比如禁卫军越骑校尉王敬则、刘昱贴身随从陈奉伯等等，伺机行事。

二

477年七月初七，七夕节。刘昱在这一天白天的行程非常混乱。《宋书》和《南齐书》中有不同的版本。《宋书》说刘昱当天乘露车，带着二百来人，与往常一样没有带仪仗装饰，到民间去野混。先

是去了往青园的尼姑庵，估计是去偷鸡摸狗，或者调戏小尼姑去了；傍晚的时候他又到新安寺找昙度道人饮酒。《南齐书》也说刘昱当天在外微服游玩。刘昱出北湖，像往常一样骑着单马飞奔在前，羽仪禁卫等人随后追赶。一行人在堤塘之间相互蹈藉，狼狈得很。突然刘昱的随从张互儿的马在追赶拥挤之中坠下湖去。刘昱很生气，把马拉上水来，赶到光明亭前，自己玩起杀马游戏。马被杀后，他和随从一起屠割马肉。大家一起学北方的羌胡人，边割肉边唱歌跳舞。傍晚的时候，刘昱又去了蛮冈赌博。

夜深了，刘昱终于回到宫中。

当晚，刘昱是在仁寿殿东的阿毡屋中就寝。临睡前，他突然记起今天是七夕。于是，刘昱就对随从杨玉夫说：“今天晚上织女渡河与牛郎相会，我要看看织女的模样。等织女出来了，你叫醒我。如果看不到织女，我明天就杀了你。”

杨玉夫大惊失色。他如何能够让刘昱看到织女？杨玉夫马上想到了之前得罪刘昱的人被残杀、被肢解的血腥场面。现在为了自卫，他不得不铤而走险了。杨玉夫知道同伴陈奉伯等人平日里与禁卫军校尉王敬则等人互通消息，有过密谋。于是他就去找陈奉伯，将事情起因和自己要杀小皇帝自卫的计划和盘托出，寻找帮助。陈奉伯一面联络王敬则，一面和杨玉夫联络了更多的刘昱侍卫、随从，准备共同起事。结果，25个刘昱平日的随从聚集起来，一致决定弑君。

事不宜迟，杨玉夫带了几个人来到刘昱休息的毡房外，只听鼾声阵阵。杨玉夫等人突入毡房之中，取出刘昱的防身刀，当场将熟睡中的小皇帝杀死。刘昱时年16岁。杨玉夫将刘昱的头颅割下，又假传圣旨，宣禁卫军校尉王敬则入内，商议后事。

大家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利用小皇帝平日的生活习惯，骗出宫去，将萧道成引进宫来主持大事。于是，王敬则领头，杨玉夫假扮刘昱，

陈奉伯提着刘昱的脑袋，向宫外走去。刘昱之前经常在深更半夜出宫，陈奉伯等人就声称皇帝要出宫，王敬则陪护。宫廷一千人等一见是小皇帝的贴身随从和禁军校尉陪同“皇帝”出宫，没有丝毫的怀疑。刘昱每次出门，门卫和士兵们惧怕他的喜怒无常，都不敢正视他。这天夜黑，宫人只知道慌忙打开承明门，看都没看清到底是不是刘昱本人出宫，就放走了一行人。

来到领军府外，王敬则称带了皇帝的首级来请萧道成入宫主持大事。因为整件事情事起突然，萧道成之前毫不知情。现在突然深夜有人说杀了皇帝，请你入宫，正常人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萧道成的最初判断就觉得这极可能是刘昱对自己的考验或者是另一场恶作剧，因此下令家人紧闭大门，不要放人进来。

王敬则无奈，急中生智，将小皇帝刘昱的人头从门上抛了进去。萧道成忙命人将脑袋上的污血洗去，亲自查看，果然是刘昱的首级。他大呼了一口气，这才下令打开府门。萧道成听完王敬则报告后，迅速决定入宫。他全身戎装，率左右数十人，由王敬则、杨玉夫等人引路向宫中奔去。这一次，他们声称是皇帝回宫，让宫中开门。宫廷内照样没有丝毫的怀疑，打开了宫门。

承明门刚一打开，萧道成就驾着常骑的赤马当先冲入。宫中见放进来的是全副武装的萧道成及其侍卫，大惊失色。萧道成的那匹赤马高大威猛，也许是头次进入深宫的缘故，扬蹄嘶叫起来，竟然镇住了不知所措的宫人们。萧道成日后登基后，封这匹赤马为“龙骧将军”，民间称这匹马为“赤龙骧”，可见这匹马确非寻常马匹。王敬则等人趁机高举着刘昱的脑袋大喊：“昏君已死，萧领军入宫主持大事！”殿内一片惊怖，片刻后都高呼起万岁来——可见刘昱是多么的不得人心。萧道成随即下令自己控制的禁卫军陆续开到皇宫内外，连夜控制了整个局势。

大事稍定后，萧道成派人召集袁粲、褚渊、刘秉三位大臣入宫，

商议废立事宜。褚渊原本就赞同萧道成，入宫知道真相后果断地站在萧道成的一边。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两人原本就和萧道成不睦，且权力地位与萧道成相当，现在见萧道成一夜间接了大局，又不满自己对皇帝猝死等事毫无所知，心生怨恨。在即将开始的权力分配中，袁刘二人不愿意萧道成独霸朝政。

天色渐渐明亮起来，“四贵”在殿庭前的槐树下集议。萧道成保持一副戎装，先对刘秉说：“刘大人您是国家重戚（刘秉是宗室成员），今日之事，应该由您主持。”刘秉没有想到萧道成会来这一手，慌乱地推辞了。萧道成又让袁粲主持废立之事，袁粲也不敢接受。这时，早就候在一旁的王敬则拔刀在手，威吓说：“天下事都应该归萧公管，谁敢说一个不字，就吃我一刀！”他拿起一顶白纱帽替道成戴上，推举萧道成马上去召集大臣主政，喊道：“今天谁敢再动！事情须趁热办！”萧道成见王敬则如此支持自己，心中高兴，表面上却板着脸冲着他喝道：“你懂得什么，休得胡说！”袁粲就想开口说话，又被王敬则喝住。这时，褚渊出面说话了：“今日，非萧公不能了事！”萧道成于是当仁不让地宣布，备法驾去东城迎立刘彧第三子、刘昱的弟弟、年仅11岁的刘准为新皇帝。袁刘二人在大局将定的时候又后悔了，想发表意见，但是萧道成布置的士兵用长刀组成了刀墙，阻遮在袁粲、刘秉等人面前。两人大惊失色，快快而归。

皇太后天明后知道了消息，异常震惊，但是生米已做成了熟饭，只好接受萧道成的既成现实。太后下令说：“刘昱穷凶极暴，自取毁灭。但是将他废为庶人，我又有所不忍。可特追封为苍梧郡王。”因此，刘昱在历史上被称为“苍梧王”或者“后废帝”——与之前的刘子业并列。

刘准登基后，史称宋顺帝。萧道成因为有扶立之功，进位为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户。萧道成坚决推辞，只接受了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但在不久后兼管了南徐州、豫州、司州三个州。对杨玉夫等25人不仅没有追究弑

君的罪责，还封赏爵邑。

之前“四贵”的排名颠倒了过来，成了萧道成、褚渊、袁粲、刘秉。实际上，萧道成主持废立，又军权在手，后面三人都不能与他抗拒。萧道成独掌了刘宋王朝的大政，成了七夕政变的最大受益者。

十五 刘宋王朝的背水一战



萧道成势力掌握刘宋实权后，朝野还潜伏着反对他的强大力量。两股力量的消长、战和，决定着南朝政治的走向。

原本是“四贵”之首的袁粲在刘宋王朝做官几十年，又受宋明帝刘彧临终前顾命委托，对刘宋王朝多少有感情。他眼看着当年提携起来的萧道成凌驾到自己头上来了，心里本来就不好受，对萧道成架空刘宋王朝逐步篡位的行径更是看不下去。《宋书》说袁粲是“不欲事二姓，密有异图”，称赞了他对刘宋王朝的忠心。就是日后的萧齐王朝，也对袁粲的忠心表示了赞赏。于是，以袁粲为核心，聚集了一股反对萧道成的势力。

“四贵”之一的刘秉首先参加了进来。前湘州刺史王蕴是太后的外甥，和萧道成一向不对付，也参加了进来。此外，将军黄回、任侯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人，或者是因为忠于刘宋王朝，或者是因为反对萧道成，先后聚集到了袁粲周围。

在建康之外，反对萧道成的最重要的人物是荆州刺史沈攸之。袁粲集团的人都在建康，人数虽然不少，但不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实力有限。而沈攸之长期盘踞地方，是真正有能力和萧道成较量的实力派。

沈攸之投靠刘彧后，以英勇奋战和献媚奉承博得刘彧的好感。泰始五年（469年），刘彧任命沈攸之为郢州刺史（治所在今武汉）。从此，沈攸之长期盘踞在长江中游，扩充势力。他为政苛暴，有时还鞭打士大夫，谁不服从自己就当面辱骂。同时，沈攸之精通政务，横征暴敛，重点发展武备。总之，沈攸之在辖区内实现了一元化的强势领导，导致士民畏惮，令行禁止。刘昱继位后，沈攸之地位继续提升，调任了更重要的荆州刺史，并且都督荆、襄、雍、益、梁、宁、南北秦等八州诸军事，真正成了长江中游一霸。

沈攸之自以为才略过人，又自以为功勋卓著，开始有不臣之举。他调任荆州的时候，挑选郢州的精锐部队和精良器械，携带赴任。到荆州后，沈攸之以讨蛮为名，大举扩充部队，加紧训练，始终保持临战状态。为了壮大自己，沈攸之在荆州推行重赋聚敛政策，就连给朝廷的赋税贡物也敢截留，一心制造武器，最后养马两千多匹、拥有战舰近千艘。荆州仓廩、府库充盈。沈攸之还很重视人才建设，经过荆州的很多士子、商旅被他羁留；藏匿亡命的勇士；对于逃亡的部下，沈攸之不论远近一律穷追，务求捕获。最后，沈攸之发展到独断专行，不遵从建康号令的地步。作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沈攸之的谋逆迹象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萧道成还不想和沈攸之闹僵。刘昱死后，萧道成以宋顺帝的名义提升沈攸之为车骑大将军，依然担任荆州刺史，用来安抚他的情绪。

但是沈攸之根本看不上什么车骑大将军。他自认为功劳、能力和实力都超过萧道成，不甘心居于萧道成之下，继续听从朝廷的指挥。况且萧道成还有“弑君”的巨大嫌疑，所以沈攸之在升明元年（477年）的十二月以萧道成杀君另立为名，举兵反叛。此时，他已经蓄养了10万大军。一批批军队相继从荆州顺江而下，东下建康。

建康又一次震动不安。好在萧道成经历多次内战，对这种上下游

的内战见怪不怪了。他从容安排亲信镇抚东部各郡县，任命将军黄回为郢州刺史，督率军队反击沈攸之。

沈攸之起兵前，派人秘密联系建康内部的袁粲集团合作。袁粲等人也跃跃欲试，想和沈攸之内外呼应，推翻萧道成。袁粲向褚渊透露了一些风声，褚渊如能够合作最好，如果不愿合作起码也要保持中立。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褚渊经过权衡，还是选择站到萧道成的一边。恰好萧道成也来咨询褚渊的意见，褚渊就提醒萧道成：“沈攸之发难，事必无成。萧公倒是要防备内部。”萧道成觉得很有道理，请袁粲率一支部队驻屯建康城郊的石头城，名为防备沈攸之，实际上将袁粲调出城去。

萧道成还亲自去拜访袁粲，咨询战争建议。袁粲称病不见。部下认为袁粲闭门不见不妥，袁粲没有底气地说：“萧道成见面如果借口皇上年幼、时局艰难，劫持我去朝堂值班，我连推辞的理由都没有。我一旦跟着他走了，可能就回不来了。”袁粲保持了极强的警惕心，抓紧制订从内部推翻萧道成的计划。

当时，萧道成入屯朝堂，主持讨伐沈攸之的全面工作。刘秉的族弟、领军将军刘韞在门下省值班；卜伯兴是直阁将军，能接近朝堂；黄回则率领一支军队驻扎在新亭备战。他们都是袁粲集团的成员，萧道成对他们都疏于防范。这就为袁粲的政变提供了便利。袁粲很快制订了一个详细计划：假冒太后的命令，由刘韞、卜伯兴率宿卫部队进攻朝堂，抓捕萧道成；黄回率领本部兵马从城外向城内进攻；刘秉、任侯伯等集团成员来到石头城和袁粲会合，众人以石头城为大本营，以石头城的驻军为预备队。

这是一个很周密、很稳妥的政变计划，也是刘宋王朝的背水一战。政变集团集结了朝廷内外反对萧道成的所有力量和忠于皇室的最後力量，如果政变成功，刘宋王朝延续统治，一旦政变失败，刘宋王朝面对图谋篡位的萧道成就没有还手之力了。因此，这次政变也可算

是刘宋王朝的最后一战。

二

一个王朝到了末期，就好似病入膏肓的病人，找不到健康无恙的肌体。刘宋王朝国运将尽的时候，虽然有忠心图存的大臣，却找不到几个有能力、有胆魄的大臣。袁粲等人的计划是不错，但因为执行者素质太低，仓促之中走向了失败。

原本计划集团成员夜晚在石头城聚会，等天亮的时候一同举兵。刘秉一向胆小怕事，天还没有暗就内心骚动起来，坐立不安了，喝个水都捧着杯子发抖，洒了自己一身水。他住在丹阳郡，等不到太阳落山就用车载着金银细软和家眷，大搬家一样离家向石头城赶去，后面还跟着门客、部下数百人。这样的架势连大街都堵塞了，更不用说什么保密问题了。萧道成马上知道了刘秉的反常情况。他不禁想：刘秉为什么要慌张地弃家而逃？他为什么要跑去石头城？难道他和袁粲有什么预谋？萧道成马上警觉起来，命令心腹王敬则当天参加值班，与卜伯兴一起指挥禁卫军。这就等于分了卜伯兴的兵权，让他成了一枚死棋，不能动弹了。

另一边，袁粲看到刘秉带着一大家子人慌慌张张地跑到石头城来，顿足大叫：“你这么早就来了，把整件事都暴露出去了！”刘秉还傻乎乎地回答：“我们同生共死，见到袁大人我死也甘心了。”袁粲完全被他这句话“雷”倒了。

袁粲集团的计划有一个疏漏，或者说它是萧道成的过人之处：早前袁粲带兵镇守石头城的时候，萧道成安插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人一同前行。这三个人名义是袁粲的部将，其实是萧道成安排在石头城的奸细。

话说城外的王蕴听说刘秉提前举家逃奔石头城的消息后，感叹道：“事败矣！”王蕴还没引起萧道成的怀疑，之前还奉萧道成的命令去招募兵勇。此时，王蕴带着自己招募的数百新兵，狼狈地奔向石头城，希望和袁粲会合，继续按计划政变。王蕴这一小股部队赶到石头城南门的时候，天色已经大暗。倾向萧道成的薛渊等将领闭门不开，还向王蕴的部队射箭攻击。王蕴误以为石头城已经被萧道成占领、袁粲已经失败，转身逃命去了。他的部队四散而尽。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萧道成完全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派王敬则带兵捕杀了王蕴、卜伯兴，又加派王僧静带部队去石头城协助薛渊等人。萧道成的援兵很快赶到石头城，和薛渊等人合兵一处，在城内与袁粲的部队厮杀起来。袁粲和刘秉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俩率领重兵把守府邸东门，没想到萧道成的军队从西门攻入了府邸。袁粲、刘秉慌忙折返回府内。府内漆黑一片，袁粲举着蜡烛照明。王僧静远远看到他，埋伏在暗处，悄悄走近袁粲准备生擒他。袁粲的儿子突然感觉有危险，挺身护卫到袁粲的前面。王僧静举刀砍去，将袁粲的儿子一刀砍死。袁粲抱着儿子大哭，接着被王僧静杀死，死时58岁。余党四散一空。

袁粲死后，刘秉趁乱逃出城去，在城外被擒，与两个儿子一起被杀。任候伯等政变集团成员在当年夜里坐着轻舸如约赶赴石头城集合，听说袁粲失败的消息后，赶紧往回走，最后还是被捕杀。按照计划，黄回要率领新亭驻军向建康进攻。他听说袁粲败亡后，按兵不动，装作没有参与政变的样子。萧道成侦知黄回也参与了政变，可还需要仰仗他与沈攸之作战，佯装不知，暗中提防着他。

镇压了内部政变后，萧道成得以全心全意对付沈攸之。

沈攸之在战争初期优势明显：备战多年，兵强马壮，敌人萧道成又陷于内患。他派出多路兵马，顺江而下，很快到达郢城（今武汉）郊外。郢城城池矮小，又没有重兵把守，沈攸之本来并不想攻打它。

而且也不应该在郢城浪费时间，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沈攸之如果想取胜，关键是尽快进攻建康。但是据守郢城的宋将柳世隆主动出兵袭击沈攸之，还派人在城楼上肆意辱骂沈攸之。沈攸之被激怒了，改变了长驱东进的计划，命令各路军队围攻郢城。叛军逐渐攻陷了外城，筑起长堤围困了内城，昼夜攻打。柳世隆拼命死守，坚持了30余日，打退沈攸之的多次进攻。时间很快到了升明二年（478年）的二月。沈攸之开始的优势在郢城底下荡然无存：军队伤亡增多，士气低落，而萧道成解决内患后开始向上游进军了。

叛军开始逃散，逃兵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向被围的柳世隆投降。沈攸之为政，一味用强权聚拢部下，部下并非真心拥护，到最后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溃散，连将领都陆续离开。沈攸之被柳世隆一败再败，落魄得只带数十骑败退江陵，沿途收容散兵约2万人，勉强组织了一支队伍。走到距离江陵百余里的时候，江陵已被萧道成派张敬儿占领的噩耗传来，好不容易聚拢的官兵马上一哄而散。沈攸之穷途末路，只好和三子沈文和逃至华容界（今湖北监利）。父子俩走投无路了，找了片树林上吊自杀了。

沈攸之死后，黄回凯旋。他以为萧道成没有怀疑自己，又自以为功劳很大，逐渐放松了警惕。一次，萧道成派人召黄回来商量军务。黄回放心地跟着来人去了，一到地方就被伏兵砍下了脑袋。至此，萧道成大获全胜。刘宋王朝的背水一战以失败告终，再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挡萧道成篡取刘宋的江山了。

三

在镇压了反对势力后，朝廷晋封萧道成为太尉。萧道成抓紧内政建设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形象。

年轻的时候，萧道成曾经立下过“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

价”的宏愿。一次，他与族弟萧顺之登上武进的金牛台，见到枯骨横道。萧道成说：“宋文帝之后才几年时间啊，怎么又出现了这样的惨况？”当时他凛然的表情让萧顺之为之动容。元嘉之世结束后，南朝上流奢侈成风，百姓也不事节俭。萧道成主政后，罢御府，清理宫殿和官府的饰玩，又禁止民间的华伪杂物。他以节俭勤政入手，积蓄国力，减轻百姓负担，推动了刘宋王朝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随着萧道成威望的增长，478年9月，宋顺帝晋封萧道成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给予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待遇。萧道成坚决推辞，朝廷屡次下诏敦劝，他才接受了黄钺，但是辞去了过高的特殊待遇。第二年，朝廷再次重申前命，给予萧道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待遇，萧道成“被迫”接受。他的接受是一个特殊的信号，马上朝廷又晋封萧道成为相国，总百揆，划出十个郡来设立齐国，封他为齐公，位在诸侯王之上。依照惯例，萧道成退让了三次，朝廷和公卿敦劝请求之后，他才接受。

齐国建立后，老伙计褚渊公开向萧道成表示，自己愿意学当年曹魏的司徒何曾放着司徒不做，愿意做晋国的丞相。褚渊也不愿意在刘宋当官，而愿意去萧道成的齐国为官。萧道成婉言谢绝。褚渊的愿望没有实现，但透露出来强烈的政治信号：刘宋不行了，投靠萧齐才是正道！

局势豁然开朗了。接下来就是小皇帝刘准主动禅让了。但是刘准还是一个12岁的贪玩小孩，根本不知道禅让是怎么回事。而宫中的皇太后、太妃等人又装聋作哑，不吱声。萧道成不可能杀入宫中去抢夺宝座的。于是局势又似乎停顿了。

最后还是禁卫军发生了作用。升明三年（479年）的一个春天，禁卫军官兵在王敬则的率领下涌入宫中，大喊着“齐王当继大位”的口号，横冲直撞，逼刘准逊位。刘准当时正在一个小房间捉迷藏，被外面一吓，不肯出来。禁卫军才不管这些，据说是将刀架在皇太后的脖

子上，逼皇太后亲手把小皇帝从某个房间的角落里拽出来，官兵们架着刘准去完成“禅让之礼”的。

刘准坐在车上，被人急速带往宫外，在惊吓过度的情况下反而不哭了。他问王敬则：“你们要杀我吗？”王敬则回答说：“你不能住在宫中了，要搬到别的地方住。你家祖先取司马家的天下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刘准哭泣道：“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在王 家！”宫中家眷听到小皇帝的这句话，哭成一片。这句话成为古代历史上的一句名言，成为后来人形容皇帝不易的一条铁证。但是我怀疑12岁的刘准能否说出这句经典之语。也许这只是后人杜撰附会上去的一条言论而已。

依照惯例，萧道成在接到刘准禅位的消息后还要推辞三次。萧道成按照惯例都一一做了，宋朝从刘准到王公贵族又诚恳坚定地请求了三次。其中兼太史令、将作匠陈文建说的一句话，可以作为到那时为止的禅让历史的一个小结。他说：“后汉从建武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经过一百九十六年后禅位给魏；魏从黄初到咸熙二年（265年）经过四十六年禅位给晋；晋从太始到元熙二年（420年）经过一百五十六年禅位给宋；宋自永初元年（420年）至升明三年（479年）已经有六十年了。占卜的结果是‘六’，预示着天命六终六受。请宋王顺天时，应符瑞，登基称帝。”萧道成这才同意受禅。

当年四月甲午，萧道成在建康南郊即皇帝位，设坛柴燎告天。新朝国号齐，史称南齐。

萧道成即位后封刘准为汝阴王，在汝阴郡建国，全食一郡，位在三公之上。刘准搬离建康，在丹阳县故治建宫居住，奉行宋正朔。南齐规定刘准是新朝的宾客，在封国内行宋朝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但就是在当年五月己未，丹阳县汝阴王府门外马蹄声杂乱。奉命监视刘准的军队以为有人想劫持刘准复辟，自作主张将13岁的刘准杀害。从四月逊位到五月被杀，刘准离开皇位后存活了不到一个月。萧道成听到消息后，非但没有吃惊，反而十分高兴。五个月后，

萧道成封刘胤继承刘准为汝阴王，奉宋祀。汝阴国传国至南陈。

萧道成登基的时候，宋朝诸王都降封为公。这些皇室成员是在宋朝残酷的骨肉相残后幸存的。在刘准被杀后，萧道成将残存的刘宋宗室不论年纪大小，一律幽杀。也许他是觉得江山到手得过于容易，时刻担心前朝皇室的复辟。萧道成临死时嘱咐儿子萧贲：“前朝刘氏如若不是骨肉相残，我萧家哪能乘乱夺位。子孙后代要牢记宋朝的教训。”萧贲遵遗嘱不杀本家，朝政也还清明。但萧贲之后的南齐又重走了宋朝的老路，骨肉相残的程度远胜过宋朝。齐明帝几乎杀光了同族亲属，南齐王朝种下了被其他家族取代的祸根。

十六 萧子良谋位：书呆子斗不过实干家

—

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萧道成建立的南齐是最短命的王朝，一共才存在二十四年。它乏善可陈，似乎没有什么亮点。整个南齐沿着乱世固有的轨道在滑行：篡夺别人的王朝，最后自己的王朝也被别人篡夺；皇帝走马灯似地频繁更替；知道骨肉相残的危害却继续上演同室操戈的悲剧；朝野关系紧张导致地方藩镇接连造反；对北魏保持消极防御不断挨打……

开国的齐高帝萧道成很想有所作为，可是没能提出建设性的政策措施来。萧道成所做的，完全是前朝刘裕、刘义隆等人所谓“善政”的翻版。比如萧道成力图改变奢侈的社会风气，下令禁止民间制造、销售奢侈品，不得用金银制作金箔、银箔，不准用金银装饰马匹车辆。为此，萧道成以身作则，从皇宫做起，将后宫器物一律改作用铁装饰，宫人穿的鞋子都改用素布，华盖上的金花爪改用铁回钉。这些政策是好的，可惜没有新意，效果也不明显——世族豪门们根本就不搭理朝廷的禁令，朝廷也奈何不得他们。

又比如萧道成想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宽松环境。当时有权有势的人普遍占山封水、兼并土地，萧道成明令禁止，又以身作则，宣布皇

室和诸侯王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可惜，萧道成的禁令没有强制的惩罚措施相配套，在现实中成了一纸空文，根本不能杜绝土地兼并。

相反，萧道成为了增加政府赋税进行的清理户籍政策（专业名称叫“校籍”），还引起了轩然大波。南北朝时户籍管理混乱，大批百姓托庇在世族权贵门下躲避赋税，又有世族豪门不断扩大荫庇的人口，为己所用。在南朝，还存在普通地主编造先辈的官爵，冒充世族骗取各种特权的问题。萧道成下令以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登记为准整理户籍。校籍工作严重侵犯了世族豪门乃至普通地主的利益，加上执行过程弊端百出，有关部门和官员将整理工作当做敲诈勒索的良机，诬陷贫苦百姓户籍造假来巧取豪夺，最终弄得天怒人怨。校籍不当，引发了浙东唐寓之起义。萧道成死后不久，其子萧贲就宣布停止整理户籍，维持校籍之前的状况，这才稳定了局面。

和建立刘宋王朝的刘裕一样，萧道成在位时间也很短，才四年，就在56岁时驾崩了。长子萧贲继位。临终的时候，萧道成回顾一生成败，语重心长地告诫萧贲：“宋朝如果不是骨肉相残，我们家哪能取而代之。你必须引以为戒，切勿骨肉相残！”

萧贲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告诫，在位期间尽力维护皇室团结，没有妄杀亲属。父皇萧道成生前最不放心的四皇子、长沙王萧晃。萧晃有勇无谋、好勇斗狠，萧道成怕他惹出麻烦，导致萧贲、萧晃兄弟兵戎相见。几年后，萧晃卸任南徐州刺史，携带可武装数百人的军械回京。按照规定，亲王在京，身边武装侍卫以四十人为上限。有关部门发觉萧晃违制携带兵器，就报告了萧贲。萧贲大发雷霆，要惩办四弟。另一个弟弟、豫章王萧疑苦劝萧贲。萧贲最终下令将多余的兵器都扔进长江了事，并没有惩罚萧晃。如果放在刘宋时期，萧晃完全可能被抄家灭门。

萧贲时期，南齐只发生过一例宗室亲王被杀事件。萧贲的第四个

儿子、巴东王萧子响也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王爷。他出任荆州刺史，身边聚集了一批和他一样头脑简单又贪图荣华富贵的家伙。萧子响在任上私自制造服装，准备和山区少数民族交换武器。这原本是一件小事，但因为处置不当，遭致了一场动乱。先是荆州的官员向朝廷举报，萧赜命令查究；萧子响知道后，怪地方官监视催逼，一怒之下杀死举报的官员，致使事态扩大。接着，萧赜派人带几百名武士前往荆州查办。到现在为止，他都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只是觉得萧子响不再适合担任荆州刺史这个关键职位，想把他带回建康。但是带队的使节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到荆州后态度傲慢。萧子响主动认错服软，还送上饮食犒劳建康来的武士，不想被后者全部倒入长江。萧子响暴怒，集合几千人打败来使。这一下，事情变质为动乱了。萧赜派将军萧顺之带兵讨伐。萧子响主动投降，萧顺之用绳子将他勒死。萧子响成了萧赜时期唯一一个被杀的宗室成员，而且人们普遍认为错在萧子响。

不过，萧赜很快后悔逼死了儿子。有关部门奏请将萧子响剔除出皇族，萧赜非但没有答应，还追贬萧子响为鱼复侯，以礼相葬。至于杀死萧子响的将军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如今又讨伐有功，满心以为能得到封赏。不料，萧赜根本没有奖赏他，还对他杀死儿子的事情耿耿于怀。萧顺之吓得郁郁寡欢，没几年就死了。萧顺之当时默默无闻，等到儿子萧衍篡位登基后被追尊为梁文帝。据说，萧衍正是因为父亲的遭遇才对南齐王朝失去忠心的。

除了维护皇室内部的亲睦外，萧赜在其他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萧赜继位的时候已经42岁了。这个年纪值得关注。一方面，萧赜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经验，在刘宋王朝历任县令、太守等职，横跨中央地方、文武各界。他知道真实的国情民意，形成了自己的执政思路和风格；另一方面，南齐的建立很有戏剧性，都出乎萧道成的意料，更是在萧赜的意料之外。他在几年前还以为自己会在刘宋王朝的宦海中终老一生，之后地位迅速变化，竟然当了皇帝！这两个因素在

萧赜的体内交织作用，导致他执政思路清晰、刚毅果断，同时又雷厉风行、专断独裁。

《南齐书·武帝纪》概括萧赜“刚毅有断，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顿遣”。可见他继承了父皇俭朴的作风和富民强国的思路，关心百姓疾苦。同时，为了保证有一个安定发展的环境，萧赜与北魏通好，南北边界安定了十几年。萧赜史称齐武帝，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武功”，“文治”成绩倒是有一些。

萧道成篡位和在位期间，成年的萧赜都参与其事，自认为与父亲“同创大业”，登基前就颇为刚愎自用。散骑常侍荀伯玉曾把太子自负和任用亲信的行为报告萧道成，萧道成因此责罚过萧赜，还将他任用的亲信斩首。萧赜继位后就杀了荀伯玉。五兵尚书垣崇祖和荀伯玉一向关系密切，且屡破魏兵，萧赜觉得是个威胁，也将他杀死。车骑将军张敬儿是萧道成的老部下了，一路提着脑袋拼杀过来，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遗憾的是，张敬儿在政治上极端幼稚，像个孩子一样向别人宣扬自己经常做梦，不是梦见自己全身发光发热，就是梦见老家的树长得同天一般高。这些梦境通常预示做梦的人“贵不可言”，传到萧赜耳朵中后，萧赜认为张敬儿有野心，也把他杀了。

萧赜一共在位11年，年号永明，几乎占了南齐的一半时间。期间国泰民安，没有出什么乱子，被一些人艳称为“永明治世”。所谓的治世，要看和什么时段来比，如果和之前刘宋末年和之后的南齐末年来比，完全算得上，但是和之前东汉的“光武中兴”、之后隋朝的“开皇盛世”来比，就完全不值一提了，就是刘宋前期的“元嘉之治”也比不上。

二

萧赜一生最大的痛也许是品尝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苦：太子萧长懋死在了自己的前面。

萧长懋是萧赜的长子，遗传了家族肥胖的体型，一直为过胖的身材所苦恼，体弱多病。他又是个“宅男”，喜欢待在宫中，不愿意出去，加上沾染了酗酒的恶习，饮酒可至数斗，在36岁那年死了，追谥“文惠”。萧长懋就是文惠太子。史书对萧长懋的记载很少，却很不客气，说他“善制珍玩之物”，把孔雀毛织成裘，“器物服饰多有僭越”——看来萧长懋是个喜欢做手工的“宅男”。萧长懋还公然违背祖父的禁令兼并东田建造“小苑”——名字是小苑，估计是别墅群。

萧长懋生前和同母的二弟、竟陵王萧子良关系亲密。兄弟二人都是佛教信徒，一起切磋佛经，还建造了“六疾馆”照顾穷人，大做慈善。他死后，儿子萧昭业就由二弟萧子良代为抚养。

萧赜痛失长子后，开始思考将皇位传给谁。主要候选人有两个：次子萧子良和文惠太子的长子萧昭业。萧昭业眉目如画，容止优雅，写得一手好隶书，很讨萧赜的喜欢，萧赜于是决定传位给孙子，立萧昭业为皇太孙。

这里有必要插叙介绍一下竟陵王萧子良。萧子良留给后人两大鲜明的印象：他是永明文学的主持人，同时又是佛教传入中国早期的虔诚信徒和慷慨支持者。

永明时期社会安定，文学出现了繁荣。萧子良好结儒士，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友，其中以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等最知名，这些人号称“竟陵八友”（请注意其中的王融、萧衍、范云、沈约等人）。萧子良就组织文人抄写五经和百家著述，还编成《四部要略》千卷。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文坛盛事。此外，萧子良崇尚佛学，召集僧人讲佛论法，热心操办佛事，不惜屈尊亲自在活动期间打杂。这事发生在南方佛教大兴的背景之中，萧子良的崇佛又助推了佛教的进一步兴盛。

和后世许多权贵借信佛礼佛沽名钓誉不同，萧子良是真心信佛，

表里如一。他居家修行，奉戒极严。有人提出“食蚶蛎不算食肉”的观点，就遭到萧子良的怒斥。对于当时宣扬无神论的范缜，萧子良更是极为不满，组织力量围攻。王琰攻击范缜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反击道：“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见驳不倒范缜，派王融劝他不要再讲《神灭论》了，以免妨碍“前途”，还许诺只要范缜放弃无神论，就让他做中书侍郎。范缜笑道：“我如果肯卖论求官，早已做到尚书令、左右仆射了，何止中书侍郎呢！”值得肯定的是，尽管在思想上萧子良和范缜势如水火，但在现实生活中范缜依然是竟陵王府的座上客，范缜依然有宣传、辩论的自由，他在朝廷的官位也一直保留着。萧子良的心胸可见一斑，同时也可见南朝思想还算活跃，社会相当宽容。

萧子良还可贵在他将佛教的慈悲和善念体现在了为官行政上。他体恤百姓，遇有灾荒带头上奏朝廷宽减役税、开仓赈济，深受百姓拥护。朝野存在一股拥护萧子良继位的力量。

以上是萧子良作为文坛领袖和佛教信徒的一面，他还有图谋皇位、争权夺利的一面。

永明十一年（493年），齐武帝萧赜渐渐病重，命萧子良进殿服侍医药。萧子良不分日夜，留在殿内服饰父皇，还将王融、萧衍、范云等党羽带进了宫中。一时间，萧子良一派的人围绕在萧赜的身边，占据了最高权力交接之时的便利条件。外界也在揣测齐武帝有没有要废皇太孙萧昭业改立萧子良的意思。

萧赜喜欢萧子良，但最终没想把皇位传给他。萧赜草拟的遗诏是将皇位传给皇太孙萧昭业，让竟陵王萧子良和西昌侯萧鸾一同辅政。萧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萧赜的堂弟。他少年丧父，由叔叔萧道成一手抚养，萧道成对他视同己出。萧鸾在20岁时就去外地担任县令，之后摸爬滚打几十年，阅历丰富，以严格果敢闻名，和萧赜颇为相似。叔叔齐高帝萧道成当皇帝后，任命萧鸾为侍中，封西昌侯。堂

哥萧贽继位后，萧鸾先后任尚书仆射、尚书令，是个实权人物。

遗诏写得明明白白，萧子良呆若木鸡，一旁的王融却不甘心，假造了一份传位萧子良的“遗诏”。他用竟陵王府的卫士换下了病房内外的侍卫，亲自戎装上阵，守着弥留之际的萧贽，不让他人靠近，就等萧贽驾崩后拿出篡改的“遗诏”。

皇太孙萧昭业听说祖父萧贽病危，匆匆赶来。王融率卫士凶神恶煞般宣布：皇上有旨，无论何人，不得擅入宫门一步。萧昭业辩解说自己是皇太孙，身份特殊，要求入宫服侍祖父。王融任凭他百般辩解，就是不放行。无奈，萧昭业只好快快而归。

朝堂上，百官都预备好了丧服，就等王融宣布“遗诏”了。萧子良继位的事情似乎板上钉钉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弥留之际的萧贽回光返照，突然苏醒过来，神志清醒地发号施令起来。他见皇太孙不在身边，知道情况有变，急忙叫来亲信的近侍太监，让他去召萧昭业率甲士入宫。传完这个命令，萧贽就死了。王融还想挣扎，命令竟陵王府的卫士把守宫门，和萧子良商议对策。事到如今，萧子良一派还有成功的机会。他们可以一不做二不休，提前发布假遗诏，推出萧子良，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可是萧子良、王融等人谈文写字是好手，搞阴谋诡计却不在行，商量来商量去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捂着萧贽的死讯秘不发丧。

在外头，大臣们都知道皇上突然召皇太孙进宫，而且是带甲士进宫，议论纷纷。高度的政治敏锐感让萧鸾意识到宫中情况有变。他匆忙就向堂兄的寝宫赶去。门口卫士不让他进宫，萧鸾假传圣旨：“皇上召我入宫，我看谁敢拦我！”卫士顿时被蒙住了，萧鸾于是硬闯了进去，发现堂兄萧贽已经死了。他马上跑出寝宫，公开宣布皇上驾崩，然后率人拥戴萧昭业登殿接受群臣跪拜，同时派人将萧子良搀扶出宫。至此，大局已定。在整个过程中，萧子良消极犹豫，没有和王融配合，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最终被排挤出局。

王融则被逮捕。几天后，萧昭业以“险躁轻狡、招纳不逞、诽谤朝政”的罪名将他诛杀，丝毫不提伪造遗诏、谋立他人的问题。王融出身著名的琅琊王氏，死时27岁。

十七 萧鸾篡位：爷爷夺了孙子的皇位

萧赜之所以经过艰苦的权衡，舍弃萧子良，传位萧昭业，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孙子聪慧勤勉、品行优良，对他寄寓厚望。事实证明，萧赜完全看走了眼。

这也不能怪萧赜。中国社会盛产两面派、伪君子，权力场上这类人就更多了。而萧昭业是其中的高手。齐武帝发丧的那一天，萧昭业把葬车送出皇宫的大门后就推说自己有病不去墓地了。一转身回宫，他就迫不及待地召集乐工大奏胡曲、大演歌舞，乐声响彻宫廷内外。宫外的送葬队伍听得一清二楚，躺在灵柩中的齐武帝萧赜想必也听到了。

送葬的三朝老臣王敬则问身边的将军萧坦之：“现在就高歌快舞，是不是太早了点？”

萧坦之幽默地回答：“这声音正是宫中的哭声啊！”

继位之前，萧昭业接待宾客诚恳周到，举止谈吐为时人称赞。父亲文惠太子逝世的时候，萧昭业号啕大哭，难以自己，等到回到房中就欢笑如常，寻欢作乐。做了皇太孙后，萧昭业表面上对祖父恭敬孝

顺，暗地里安排女巫诅咒祖父快死。祖父病重，萧昭业给妃子何氏传了张纸条，纸上写一个很大的“喜”字，周围绕上三十六个小的“喜”字。可见，他所有的诚恳、谦恭和孝顺都是矫饰，即位之后便本性毕露。

父亲文惠太子在世的时候，对萧昭业的起居用度都有严格规定，萧昭业的日子过得俭朴有序。即位后，萧昭业任意挥霍国库积蓄，肆意赏赐，动不动就数十上百万钱。他每次见到钱都说：“我往日要用你的时候，连一文钱都得不到，今日还不能好好用用你吗？”一年之后，南齐国库积蓄的数亿钱币就被他挥霍一空了。萧昭业又打开皇宫的仓库，和皇后宠姬等人参观，任由宦官和亲信随心所欲地领取物品，还将珍藏的宝器击破打碎，以此取乐。萧昭业又喜欢斗鸡，不惜用数千钱买一只鸡。他还和祖父、父亲的宠姬私通（她们名义上是萧昭业的祖母和母亲），很有刘宋末期皇帝乱伦的遗风。总之，萧昭业毫无一国之君的姿态。

萧昭业忙于亲近小人，沉湎游乐，朝政都交给叔祖萧鸾打理。荒唐君主一般还多疑猜忌，萧昭业就疑心萧鸾有异志，找中书令何胤密谋诛杀萧鸾。何胤一介文臣，不敢参与。萧昭业见外臣没有人支持，也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萧昭业放下了屠刀，萧鸾的一颗心却提到嗓子眼了。伴君如伴虎，时刻都有危险，陪伴一只疯疯癫癫的老虎就更危险了。萧鸾决定先下手为强，干掉萧昭业，自己取而代之。

萧鸾要推翻萧昭业，先环顾四方看还有没有拥护萧昭业的力量。他觉得荆州刺史、随王萧子隆和豫州刺史、齐高帝与武帝的旧将崔慧景二人既效忠皇室，又有能力起兵与自己对抗，所以要先除掉这两个人。镇西咨议参军萧衍就给萧鸾出主意，将随王萧子隆免职召还京师，明升暗降为侍中、抚军将军，剥夺他的实权。接着，萧衍又自告奋勇，要求率兵戍守寿阳，夺取了崔慧景的兵权。萧鸾也照办了，任

命萧衍为宁朔将军，领兵北上。如此一来，萧鸾就去除了地方上可能反对自己的势力——而萧衍也狡猾地获得了实权。

在中央，有能力阻挡萧鸾的关键人物是卫尉萧谡和征南咨议参军萧坦之。萧谡、萧坦之都和皇室有亲缘关系，都被齐武帝萧赜所信任。萧谡长期负责皇宫的宿卫，朝廷机密无不预闻。萧坦之曾任东宫的直阁将军，是萧昭业的亲信。要想推翻萧昭业，必须要对付这两个人。萧鸾正在谋划对付他们的方法，萧谡、萧坦之二人主动投靠了过来。原来，他二人见萧昭业狂纵猜忌，无药可救，为了避免惹祸上身，便主动向掌权的萧鸾靠拢。萧鸾将推翻萧昭业的计划一说，二人马上应允参与。

于是，在萧昭业没有觉察的状态下，朝野秘密结成了推翻他的阴谋集团。

萧鸾开始剪除萧昭业亲近的小人。他先后列举了萧昭业多名亲信的罪状，奏请将他们处死。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只有在清除直阁将军周奉叔的时候遇到一点困难。周奉叔领兵护卫萧昭业，很有勇力，常常带领二十人，身佩单刀，出入宫禁。他刀不离身，常常威胁他人：“周郎刀不识君。”不过周奉叔有勇无谋，既然难以直接铲除，萧鸾就绕了道弯子。他指使萧谡、萧坦之奏请萧昭业，提升周奉叔为青州刺史。周奉叔高高兴兴带着队伍赴任去了。萧鸾马上用假圣旨召他回尚书省。周奉叔刚一迈进尚书省，就被埋伏的武士毆杀。然后，萧鸾启奏萧昭业，说周奉叔侮慢朝廷，罪该当死。萧昭业不知就里，也就批准了。如此反复，萧昭业身边的亲信越来越少。

时机成熟了！萧鸾开始行动了，他派使萧谡、萧坦之等人诛杀了萧昭业最后的几个亲信，亲自披挂上戎装，率兵从尚书省攻入皇宫。萧鸾毕竟第一次发动政变，难免紧张，途中鞋子掉了三次。萧谡带一支队伍直奔萧昭业所在的宫殿。宫殿的宿卫将士张弓持盾，要上前厮杀。萧谡高喊：“我所取自有人，你们不须动！”卫士们见负责宫廷宿

卫的最高长官这么说，有的被震慑住了，有的以为他是奉命入宫抓人，都闪到一旁，看着政变队伍冲入宫殿。殿中的萧昭业远远看见萧谡领兵持剑奔来，知道大臣反叛。他自知逃跑无望，又不愿受辱，爆发出一股血性来，拔出佩刀就向脖子抹去。求生的本能加上紧张让萧昭业的手哆嗦得厉害，他自刎未成，鲜血流满身子，倒地哀号。萧谡派人用帛给萧昭业粗粗包扎了一下，把他抬出殿外。萧鸾知道后，觉得留着萧昭业无用，杀了反而干净。于是，武士们在宫中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将萧昭业乱刀砍死了。

萧昭业死时21岁，在位仅一年。事后，萧鸾以皇太后的名义废萧昭业为郁林王，历史上也就将萧昭业称为郁林王。追认政变合法性的皇太后令中痛斥萧昭业：“居丧无一日之哀，缙经为欢宴之服。……恣情肆意，罔顾天显，二帝姬嫔，并充宠御，二宫遗服，皆纳玩府。内外混漫，男女无别。……放肆丑言，将行屠脍，社稷危殆，有过缀旒。”因为萧昭业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所以萧鸾等人的弑君行为是“合法”的。这是隆昌元年（494年）的事情。

二

萧鸾推翻萧昭业后，完全可以自己当皇帝，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立文惠太子萧长懋的次子、萧昭业的弟弟、新安王萧昭文为帝。萧昭文14岁，被萧鸾扶上皇位后，大小事都不能做主，完全仰仗萧鸾。他封萧鸾为宣城王，起居饮食都征求萧鸾同意后才做。萧鸾对萧昭文控制得也很严。一次，萧昭文想吃蒸鱼，掌管宫廷膳食的太官令竟然回答没有萧鸾的命令不能给。

萧鸾为什么不自己当皇帝呢？他做什么事情都求稳，没有绝对的胜算不出手。尽管把皇帝紧紧地捏在手里，萧鸾依然对自身实力不自信。齐高帝、齐武帝子孙众多，而萧鸾近亲稀疏，且在位的很少。所

以，萧鸾一方面大力扶持近亲，一方面开始迫害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萧道成临终前最担心的骨肉相残的悲剧要开始了。

被萧鸾以萧昭文的名义诛杀的宗室亲王有：南充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南平王萧锐，晋熙王萧铄，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铿，桂阳王萧铤，衡阳王萧钧，江夏王萧锋，建安王萧子真，巴陵王萧子伦等。南齐曾在宗室诸王身边设置典签的官职，本意是监督诸王，防止他们谋反或者祸害百姓。如今，典签官被赋予实权，禁锢诸王，充当了萧鸾诛杀宗室的工具。

杀了一圈之后，萧鸾觉得天底下应该没有人有能力阻挡自己称帝了。

于是在当年十一月，即位才四个月的萧昭文被萧鸾废黜为海陵王。萧鸾又宣布萧昭文身体有病，多次派御医给他看病，“看”了几次后萧昭文就一命呜呼了。萧鸾依然用皇太后的诏书来追认自己行动的合法性。不过实在是找不出萧昭文的过错来，诏书只能笼统地批评他“嗣主幼冲，庶政多昧”。接着诏书宣布皇太后主动让步，请萧鸾继位。萧鸾即位，史称齐明帝。从辈分上说，萧鸾是萧昭文的爷爷，萧鸾此举等于夺了孙子辈的天下。

萧鸾也是个伪情矫饰的两面派。他即位后，大张旗鼓地崇尚节俭，停止边地向中央的进献，将皇家园林新林苑、文惠太子的东田都归还百姓，又将齐武帝的舆辇舟乘上的金银都剔取下来充实库房，就连生日时大臣敬献的金银礼物都被他让人打碎。但内宫的私宴却是金玉满堂，华丽非常。远房宗亲萧颖胥就批评他说：“陛下要是还想砸东西，就砸你宫里的宝贝吧。”

除了表面文章，萧鸾的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上。他得位不正，老觉得有人要推翻自己——这似乎是一切篡位者的通病。而最大的嫌疑就是那些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了。于是，萧鸾进一步猜忌宗室，

任用典签官监视诸王。当时，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还有十人封王。每次诸王入朝参拜完毕，萧鸾回到后宫都叹息道：“我儿子、侄子们的年纪都不大，萧道成他们家的子孙却日益长大！”于是，他有杀光齐高帝、武帝子孙的想法。萧鸾找侄子、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商议如何行事。萧遥光认为这事不能急，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

萧遥光有足疾，萧鸾恩准他可以坐车进出皇宫。每次萧遥光入宫，萧鸾都屏退旁人，和他密谋很久；等萧遥光走后，萧鸾都要让人摆上香火，呜咽流涕。第二天，必定有一位宗室亲王被诛杀。骨肉相残的名单越来越长，增加了河东王萧铉、临贺王萧子岳、西阳王萧子文、永阳王萧子峻、南康王萧子琳、衡阳王萧子珉、湘东王萧子建、南郡王萧子夏、桂阳王萧昭粲、巴陵王萧昭秀等人。未封王的齐高帝、武帝子孙也遭到迫害。他们这一支血脉几乎被屠杀殆尽。萧铉等人死后，萧鸾再指使公卿弹劾他们的罪状，奏请诛杀；萧鸾下诏不许；公卿们再奏，萧鸾这才答应，摆出一副迫不得已大义灭亲的姿态来。大家都知道真相如何，就像举朝在做游戏。萧鸾日益倚重萧遥光，诛赏诸事都和他商议。萧遥光的行政能力很强，将屠杀行动安排得井井有条。萧鸾的身体很不好，常常突然病倒。在萧鸾不能主事的时候，萧遥光就替他发布杀人命令。整个南朝时期，萧鸾在短短几年中创造了杀戮宗室亲王最多的纪录，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动荡，连小规模的兵变都没有发生。这和萧鸾、萧遥光的“措施得当”不无关系。

之前，萧鸾派茹法亮持毒酒去“赐死”齐武帝第十三子、巴陵王萧子伦的时候，萧子伦端正衣冠接受诏书，对茹法亮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从前高皇帝（萧道成）残灭刘氏（屠杀刘宋宗室子弟），今日之事，理固宜然。”他坦然饮下毒酒而死。当年，萧道成将刘宋宗室不论长幼一律幽杀，肯定想不到十几年后自己的子孙也会面临同样的噩运。萧子伦将此解释为因果报应。

萧鸾也怕因果报应，加上身体不好，登基后就躲入深宫，长期深

居简出。越是这样，他的身体就越不好。萧鸾还不愿让他人知道病情，封锁消息，坚持正常处理政务。他相当崇信道教与神仙方术，先是希望能借助法术治愈病情，失败后不得不求助于医术。一次，萧鸾特地下诏向各地官府征求银鱼作为药剂，外界这才知道萧鸾患病。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萧鸾猜忌多疑到了极点，对大臣们多有诛戮。比如他往南走就派人说皇帝要西行，往东走就对外宣布要去北边。谁惹他多疑，往往有性命之忧。又比如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是萧道成的老部下，五朝老臣，盛名在外。萧鸾就怀疑他要趁自己病重造反，派人去东方镇压反叛。王敬则大怒，说：“东方各郡县有谁在反叛，这明显是冲着我来！”他被逼起兵造反。东方百姓檐篙荷锄相随，王敬则很快拥有十余万人的大军，向建康杀去。萧鸾杀死王敬则在建康和外地的所有儿子，派兵平叛。王敬则悲痛不已，坐着肩舆上一边恸哭一边指挥军队前进。大军进展顺利，都能遥望到建康城了。在和官兵的决战中，王敬则大军起初大胜。萧鸾的太子萧宝卷派人爬上屋顶瞭望军情，见城郊征虏亭失火，以为王敬则大军将至，都准备好行装要逃亡了。不想，萧鸾官兵在败退回营的时候，因为营门未开，前无退路，只好返身死战。恰好王敬则大军后方又遭到骑兵的突袭，占部队很大比例的百姓们没有训练，也没有正常的兵器，打不了硬仗，纷纷逃散。王敬则大败，逃跑不及，被官兵所杀，时年70多岁。这是永泰元年（498年）的事情。

王敬则败亡之时，萧鸾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不久便死了，时年47岁，在位五年。

萧鸾的长子萧宝义有残疾，难当大任，所以萧鸾册立次子萧宝卷为太子。萧鸾死后，萧宝卷继位，时年16岁。

萧鸾遗命由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太尉陈显达等人辅佐萧宝卷。八个辅政大臣中，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不久退休，淡出政

坛；太尉陈显达外任江州刺史，剩下的六人轮流入朝值班，掌握实权，被称为“六贵”。时任雍州刺史的萧衍不无忧虑地说：“一国三公尚且国家不稳，如今朝廷有六贵同时当权，如何才能避免动乱呢？”

十八 变态皇帝代代有，南朝特别多

—

齐明帝萧鸾将杀戮宗室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继位的儿子萧宝卷则将荒淫变态推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萧宝卷生母早亡，由其他嫔妃抚养长大。他从小孤僻任性，且有口吃的毛病，与他人的交流沟通存在障碍。这样的孩子如果埋头读书，没准还能在学问上有所专长，精通某个生僻的领域。但是萧宝卷极不爱读书，加上无人管教，整天就是玩闹。即位前，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东宫和侍卫们一起挖洞捉老鼠，为此通宵达旦乐在其中。

当了皇帝后，萧宝卷被带去主持父皇的葬礼。他一眼看到大殿上摆放的乌黑锃亮的大棺材，很不高兴，大喊：“这东西太讨厌了，快快把它埋掉！”这可是他父亲的灵柩，而且天子葬礼是很严肃，有一整套烦琐的规程的。见小皇帝要破坏礼制，以辅政大臣、尚书令徐孝嗣为首的大臣们据理力争，萧宝卷这才快快不乐地收回成命，无奈地继续葬礼的流程。紧接着问题又产生了，萧宝卷在葬礼上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就是不哭。他还觉得满堂哭得死去活来的大臣们非常好笑。其中太中大夫羊阐号恸大哭，不断叩首，不小心把帽子碰掉了。羊阐秃头，帽子一掉，露出了光头。萧宝卷见状捧腹大笑，一边笑一边

说：“这个大秃鹫也来这里乱叫。”

正式上任后，萧宝卷保持着特有的作息习惯：抓老鼠抓到清晨五更才就寝，午后三时起床。可皇帝是要上朝的，是要处理政务的，萧宝卷根本没放在心上。这可苦了那些大臣。因为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会出来接见和处理公务，大臣们只能等在大殿上不敢走，一个个饿得前心贴后背，眼冒金星。后来，大臣们直接上奏。一批批奏章送入宫中，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

除了昼夜颠倒抓老鼠，萧宝卷又发展出了新爱好：出宫游玩。他不分昼夜，什么时候想到要出宫就出去游玩，一个月中有20多天在建康城内外游荡。萧宝卷的游玩不是一般人的走马观花游山玩水，而是看到什么好东西就拿，大到参天大树、妙龄女郎，小到钱币、玉佩，一律纳入囊中。他常常带人闯入某一户富裕人家，将家产抢劫荡尽。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妥，也可能是小时候的交流障碍让他不愿意见人，萧宝卷出宫时不愿意被人看见，也不愿意看到别人。他看到谁就要上去杀掉他灭口。于是，建康的“有关部门”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当萧宝卷要出门的时候，有关人员就在他要去的方向事先击鼓，警告人们：“皇帝要来了，大家快跑啊！”人们听到鼓声，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根本顾不上家产。萧宝卷出宫的时间不定、游踪不明，波及的百姓可就遭殃了。他们轻易不敢回家，常常在夜里露宿野外，或者穿着单衣在寒冬中流落江边，甚至有人几天几夜不敢回家，冻死、饿死在外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是常事。

有一次，一个妇女临产，无法走开。萧宝卷对腹中胎儿的性别很感兴趣，等不及孕妇生产完毕，命人剖腹查看是男胎还是女胎。又一次，有个和尚生了病，跑不动了，就躲在草丛之中希望能逃过萧宝卷的眼睛。萧宝卷发现后，命令随行的所有人向和尚射箭，将他乱箭射死。还有一次，几个人抬着一个病人去求医，突然听到警示萧宝卷出游的鼓声。那几个人吓得魂飞魄散，扔下病人一哄而散。负责清道的官吏看到那个病人匍匐在地上走不了路，怕萧宝卷看到，竟把他推

入水中活活淹死。

这些还算是个别现象。更坏的情况是，萧宝卷喜怒无常、行踪无定，常常毫无预兆地突然出宫游玩，或者先出东门突然又转向了南门，惊得大半个城的百姓逃得一千二净。萧宝卷身边的侍卫、太监们往往借陪伴萧宝卷出游，入室搜索财物。等好不容易萧宝卷回宫了，老百姓回来看到的是被抢劫一空的房产。没折腾多久，繁华一时的建康城工商歇业，铺存空屋，道无行人，内外数十里杳无人迹。建康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死城。

建康被糟蹋得差不多了以后，萧宝卷游玩的兴致大减。不过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热衷于玩耍和追求享乐的步伐，萧宝卷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兴趣点：投身火热的建筑行业！巧合的是，建康后宫失火被焚，重建工作为萧宝卷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一口气建造了仙华、神仙、玉寿三座豪华宫殿，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多么的奢侈腐靡。萧宝卷造宫殿，贯彻两个指导思想：第一是追求速度，什么都要求快；第二是追求漂亮，装饰要漂亮，庭院要漂亮，一切看起来都要赏心悦目。为了赶工期，官吏们不惜破门入户，强行将百姓家的假山、树木、花草移植到宫殿中；不惜直接拆卸豪门、寺庙上的装饰物件移到宫廷中，甚至不惜刮下文物古玩上的金箔饰品来装饰新宫殿的器皿。为了营造宫廷花草茂盛的景象，官吏们往往割下草皮和花卉的茎叶，直接铺满庭院。花草搁置一天就枯萎死亡了，官吏们不得不天天去割花草，夜夜重新铺设。萧宝卷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非但不生气，还指点下面的人干脆用颜料将庭院泼洒得花花绿绿的，再点缀上花草。看来，萧宝卷在造假方面也很有“天赋”。

庭院造好后，萧宝卷将它们献给了一个女人：潘妃。

潘妃名叫潘玉儿，出身市井，被萧宝卷选入宫廷做了妃子。萧宝卷专宠潘妃，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臣民们时常看到潘妃坐在豪华的车驾上，在皇家依仗的引导下，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建康城中。而

萧宝卷骑着马，像个随从似的跟在后头，随时听从潘妃的吩咐。萧宝卷还有受虐倾向。潘妃一生气就用木棍劈头盖脸地打他，萧宝卷身为皇帝，既不龙颜大怒，也不辩解，更不还手，乖乖地让潘妃打。后来，萧宝卷被潘妃打得次数多了，也有点吃不消了，就偷偷示意手下将潘妃身边的粗木棍都换成光滑的细木棍。萧宝卷为了让潘妃重温市井旧梦，又在宫苑之中仿造了市场一条街，让太监们杀猪宰羊、宫女们沽酒卖肉，潘妃就当市场管理员。萧宝卷担任潘妃的副手，做她的小跟班。“市场”里出现什么争执吵闹，都由潘妃来裁决。萧宝卷特别喜欢潘妃的一双小脚，喜欢拿在手里抚摸，还喜欢凿金为莲花，贴在地上，让潘妃在上面行走，美其名曰“步步生莲花”。

种种荒诞举动，很快让朝野失望。有些人还想劝谏一下萧宝卷，一次萧宝卷的坐骑受惊狂嘶，有人趁机进谏：“臣曾经见到先皇，先皇对皇帝终日出宫游荡不施战备很不高兴。”结果是连父亲都责备不得萧宝卷这个宝贝儿子，只见他愤怒地拔出佩刀要寻找父亲的鬼魂算账。先皇的灵魂自然不会与他纠缠，找不到撒气对象的萧宝卷就用草缚一个他父亲的形象，斩首，把头悬挂在宫门口，昭示全城。至此，再也没有人敢进谏了，大家对萧宝卷唯有摇头叹息。

二

南朝之前的政治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凡是荒唐昏庸的君主往往猜忌心很重，喜欢屠戮大臣；同样，一旦出现这样的暴君，总有大臣前赴后继地搞政变，试图推翻他。萧宝卷时期的政局发展也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萧宝卷的老爸萧鸾留给宝贝儿子的临终遗言是：“做事不可在人后。”意思是做皇帝要果断刚强，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犹犹豫豫。不爱学习的萧宝卷偏偏把这句话学到了心里，而且学以致用、运用自

如，看哪个大臣反感，或者捕风捉影，觉得哪个大臣有问题，就大刑伺候，大开杀戒。

辅政大臣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六贵”在齐明帝死后还把持着朝廷实权。他们六个人内部倒是相安无事，只是看着萧宝卷行为不成体统，越来越出格，不禁恐惧起来。六贵中的江祐、江祀两兄弟是萧宝卷的表叔，深知萧宝卷荒唐的本性，很担心哪一天就成了萧宝卷的刀下冤魂，所以动了推翻萧宝卷、另立他人的念头。

江氏兄弟找到其他“四贵”，把企图废立的意思一说，惊喜地发现大家都有推翻萧宝卷的意思。但是，打倒萧宝卷之后由谁来继任皇帝？六贵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江祐中意齐明帝第三子、萧宝卷的弟弟、江夏王萧宝玄。尚书令徐孝嗣也很支持萧宝玄，原因很简单：萧宝玄是自己的女婿。但是，六贵为首的始安王萧遥光是萧宝卷的堂兄，自恃血脉高贵，年纪又大，想自己当皇帝。他就暗示江氏兄弟和刘暄推举自己。于是，到底是推举萧宝玄还是萧遥光，政变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

萧宝玄年轻不懂事，萧遥光年长有经验，江祀倾向推举后者，也劝哥哥江祐拥立萧遥光。六贵排名末尾的刘暄是齐明帝皇后的弟弟、萧宝卷的舅舅，对废黜政变这件事情不太热心。他担心如果拥立萧遥光，自己的国舅身份不保，倾向推举萧宝玄，明确反对萧遥光。萧遥光对刘暄的态度很恼火。为了压制内部反对自己的声音，也为了消灭最坚定的反对者，萧遥光暗中收买杀手去刺杀刘暄。刘暄府邸周围开始出现一些可疑人物。他们身怀利刃、目光阴冷，吓得刘暄心里直发毛。怎么办？为了保命，刘暄索性跑入宫中，把“六贵”的政变阴谋向萧宝卷和盘托出。

这就为萧宝卷向“六贵”开刀提供了借口。

萧宝卷早就对“六贵”之中的江氏兄弟不满。江氏兄弟自恃是萧

宝卷的表叔，对萧宝卷的不少荒唐行为多有劝谏，同时抑制萧宝卷身边佞臣违法乱纪的行径，早就遭致了萧宝卷和亲信们的嫉恨。刘暄告密后，萧宝卷得知江氏兄弟是废立阴谋的主谋，马上派人收捕了江祐兄弟。江氏兄弟被带到中书省斩首。杀了两位表叔后，萧宝卷暂时放过了其他人，先大肆庆祝消灭了两个碍眼的“老东西”。他和亲信近侍们在殿堂内鼓叫欢呼，跑马为戏，足足高兴了几天几夜。突然有一天，萧宝卷似乎想起了什么，问近侍：“江祐常不让我在宫内跑马，如果他今天还活着，我怎能这样快活？江祐亲戚中还有谁活着？”嫉恨江氏兄弟的亲信马上回答：“江祐的弟弟江祥还关在牢里。”萧宝卷立即下圣旨，“赐死”江祥。

闻知江氏兄弟被杀，大臣们大惊失色。六贵中的其他人更是惶恐不安。刘暄虽然是告密者，得知后也扑倒在地，爬起来以后连问仆从：“逮捕我的人到了吗？”他徘徊良久，回到屋内坐定，悲叹道：“倒不是我为江氏兄弟悲伤，我是在替自己悲伤啊！”和刘暄一样，大臣们似乎都预感自己死期不远了。

这么多人中，有意取代萧宝卷自立的萧遥光心中最有鬼，也最害怕。江氏兄弟被杀了，萧遥光开始“生病”，请了长期病假在府邸里深居简出，不上朝，也不工作了。他还进一步装疯卖傻，整日痛哭，给人一种痛不欲生或者方寸大乱的感觉。暗地里，萧遥光深知自己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只能和萧宝卷拼个鱼死网破了。他抓紧组织力量，准备发动政变。

萧遥光的弟弟萧遥欣担任荆州刺史，拥兵上流，是他最大的后援。萧遥光秘密派人去联络弟弟，让萧遥欣火速率军顺江而下，兄弟俩一起造反。萧遥欣很赞同哥哥的主张，立即着手动员军队。也真是上天不保佑，就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的时候，萧遥欣突然暴病身亡了！运气更差的是：萧遥光另一个担任豫州刺史的弟弟萧遥昌也在政变前死了！豫州刺史的重要性虽然远逊于荆州刺史，但毕竟可以引为外援。失去两个弟弟后，萧遥光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造反了。好在，

萧遥欣死后，荆州的亲信部下不辞劳苦，组织了送葬队伍将灵柩运到了建康城，就停留在始安王府；萧遥昌死后，豫州的部下也都听命于萧遥光。这两批人，数目都不小。萧遥光于是组织这些人参与政变。

计划比不上变化快。萧遥光之前为了避祸，想调任司徒的闲职。申请递上去后，萧宝卷突然同意了，召萧遥光入宫进行“任前谈话”。萧遥光哪里敢去，怕走着进去被人抬着出来，决定提前起事。永元元年（499年）八月十二日下午，萧遥光召集两个弟弟的部下来东府集合。萧遥光的起事非常仓促。一方面府邸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党羽，拿着刀枪，乱成一团，吓得建康城里的老百姓纷纷躲避。个别胆子大的人好奇地探听消息，不知道始安王要干什么。另一方面，萧遥光连造反的口号都没想好，整个行动师出无名。本来“讨伐暴君”是个不错的口号，应该可以激起官民的响应。可惜，萧遥光没有采纳这个口号，而是以“讨伐刘暄”为名——他恨死了刘暄，宣布起事，并向朝臣、将领们发出号召。

天很快就暗了。除了派出数百人攻破监狱释放囚犯外，萧遥光没有其他行动。骁骑将军垣历生接到他的起事号召，赶过来响应。他见状劝萧遥光抓紧时间，连夜进攻皇宫擒拿萧宝卷。垣历生主动请缨指挥作战，对萧遥光说：“您只要坐着车随后跟进即可，攻破皇宫易如反掌。”现实情况的确如垣历生所言，萧遥光宣布起事后，萧宝卷还在皇宫中醉生梦死，没有任何平叛的举措，建康城中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忠于萧宝卷，更没有官兵来镇压萧遥光。如果萧遥光能抓住时机，擒贼先擒王，政变胜算还是很大的。然而，萧遥光犹豫了半天，始终下不了出击的决心。一直犹豫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早已全副戎装的萧遥光依旧是东看看西看看，准备车仗、登上城垣、赏赐亲信而已。尽管垣历生反复劝他出兵，萧遥光就是不肯。他寄希望于皇宫内发生内讧，幻想萧宝卷会被他人杀掉。

萧遥光起事后，派人去刺杀平常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右将军萧坦之。萧坦之听说萧遥光造反后，警惕性很高，来不及穿衣光着身子就

跳墙逃走，奔赴皇宫向萧宝卷报告去了。（萧遥光心胸实在狭窄，又不懂轻重，老在关键时刻将可以团结的对象推向敌人的阵营，刘暄如此，萧坦之也是如此。）次日黎明，萧宝卷宣布建康戒严，命尚书令徐孝嗣防卫宫城，萧坦之率军讨伐萧遥光。萧坦之成功组织起建康城没有响应萧遥光的官兵，很快将叛军团团围住，日夜攻打。

萧遥光顿时陷入了困境。他平日不积德行善，人缘很差。人品的好坏在关键时刻能有巨大的作用。萧遥光在齐明帝时期助纣为虐，主持屠戮齐高帝、武帝子孙，在亲贵当中很不得人心。加上他对待部下严苛暴虐，党羽的内部凝聚力也不强。在官兵的猛攻面前，叛军渐渐溃散。垣历生看萧遥光大势已去，也投降了官兵。四天后，造反被镇压。萧遥光狼狈地在王府中找了间房子，关紧门窗，躲到床底下，希望以此能逃过官兵的搜查。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自然骗不过官兵，萧遥光很快就被从床下拖出来砍掉了脑袋。

萧遥光和萧宝卷有过一段美好的共同记忆。萧宝卷童年时期，经常和堂兄、少年萧遥光厮混，两个人吃住在一起，手拉手一起蹦蹦跳跳——说不定还一起通宵达旦抓过老鼠。兄弟俩感情很深，萧宝卷昵称萧遥光为“安兄”。萧遥光被满门抄斩后，萧宝卷一次登上童年时和萧遥光一起玩耍的土山，美好记忆像洪水一般冲开了他情感的闸门。萧宝卷遥望萧遥光被杀之处，悲伤地连声呼唤“安兄，安兄”，黯然泪下。

这偶然一次的真情流露并不能阻碍萧宝卷继续荒淫残暴下去。在平定萧遥光叛乱二十多天后，萧宝卷就派人杀掉了平叛有功的萧坦之。不久，萧宝卷开始犹豫要不要杀掉刘暄。他问左右亲信：“刘暄是我的亲舅舅，总不至于谋反吧？”一个侍卫说：“先帝和武帝还是堂兄弟呢（萧宝卷的父亲齐明帝萧鸾和齐武帝萧赜是堂兄弟）。先帝受武帝厚恩，最后还不是夺了武帝的天下，灭了武帝的子孙？兄弟如此，舅舅又怎么可以相信呢？”这个侍卫的回答袒露着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让萧宝卷最终下令诛灭刘暄全族。之后，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左仆射

沈文季也先后被杀。沈文季之前借口年迈多病长期请假在家，已经不理朝政了。老先生本想借此落个善终，到头来不但自己身首异处，还连累家人血流成河。

至此，“六贵”全部被萧宝卷清洗了。

这是南北朝历史上，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一个时期。后人读这一时期的史书，往往有“血迹斑斑”之感。我们将此归咎为萧宝卷的昏庸残暴也好，指责“六贵”内部的争权夺利也好，都逃不开一个幕后因素：权力斗争。正如沈文季在家养病避祸的时候，子侄们劝他说：“您既然做了尚书左仆射，就不可能全身而退！”一旦进入了权力场，残酷的斗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它把人都异化成了冷酷、嗜血的恶魔。皇宫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权力斗争的起始点和矛盾汇聚地，自然成为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地方。越靠近它的人，受到的侵蚀和异化越严重。皇帝在权力漩涡的中心长大，受到的伤害也就最大、最重。而南朝又是政局不稳、矛盾激烈的乱世，综合起来考虑，似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南朝时期变态皇帝迭出了。

十九 萧衍防卫过当，当上了皇帝



皇帝和大臣的理想关系应该是和睦相处，一起治理好国家。但是在皇权不稳的乱世，再遇到暴君或者昏君，君臣关系就恶化为了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双方的实力都很强大，往往就会迎头相撞；如果一方强一方弱，就会变成进攻和防守的游戏，结果总是以血雨腥风、两败俱伤而收场。

萧宝卷屠戮了父亲宋明帝指定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掌握实权的六个（也就是“六贵”），又杀害了早早退休想求得善终的辅政大臣沈文秀，在君臣斗争中取得了明显优势，显示出强大的实力。萧宝卷的另一大特点是喜怒无常，残酷冷血，完全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揣摩。于是，南齐的大臣们纷纷关心如何逃脱他的魔爪，寻找自卫的方法。

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觉得自己是最迫切需要自卫的人。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顾命大臣。看着老同僚、老伙计们一个个被推上了断头台，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陈显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将会是下一个冤魂。

陈显达出身贫寒，从军将近50年，一路从士兵拼杀到将军，当时已经年逾古稀了。战争夺去了陈显达的左眼（一支飞矢射穿了他的眼睛），也教会他沉着冷静、谦厚有智谋。和“六贵”比起来，陈显达为

人谦恭、厚道，注意和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搞好关系；和同是辅政大臣的“老好人”沈文秀比起来，陈显达深知仕途是一条不归路，没有办法回头，也不可能全身而退，所以他始终把持着部分实权，以防不测。齐明帝临终，将他列名辅政大臣行列，陈显达非但不高兴，反而忧虑万分——之前南朝的辅政大臣几乎没有善终的。和“六贵”的揽权和沈文秀的撒手不同，陈显达主动要求离开建康外任，以退为进。不久，萧宝卷让陈显达以太尉之尊兼任江州刺史，陈显达高高兴兴地前去上任了。

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陈显达跟随过张永、沈攸之、萧道成、萧鸾等诸多的“老板”，幸运地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站对了队”，踏着他人的肩膀甚至是鲜血不断前进。每次升迁，陈显达都有愧惧之色。他常常叮嘱子孙：“我出身寒门，能有今天的荣华地位完全超乎意料，你们切勿以富贵凌人！”当时南朝人热衷于以牛拉车的比赛，贵族们以拥有炫耀快牛而骄傲。陈显达的儿子就拥有天下四大快牛中的一头，还在家里召开快牛“聚会”。陈显达见儿子这么露富，大发雷霆。儿子陈休尚外出当官来向老父亲告别，陈显达见他手里拿着根麈尾装模作样，一把夺下来烧掉，说：“奢侈的人最终没有不破败的，麈尾和蝇拂都是王谢那些世族豪门的家具，你不应该拿着这些东西。”按照陈显达的级别，可以有盛大的车仗、众多的随扈，但他平时乘坐的车驾腐朽了也不修理，选用的随从都是瘦小单薄的人。一次宫廷侍宴，陈显达酒后向齐明帝萧鸾乞借枕头一用。萧鸾马上命人给陈显达拿来一个枕头。陈显达抚枕说道：“臣已经年老，富贵已足，就少个枕头去死了，所以求陛下将枕头赐予我。”这句话说得杀人无数的萧鸾都心有不忍，忙说：“公醉矣。”

就这么一个稳重精明的老将军，面对萧宝卷的荒唐变态也觉得难以适从了。很快江州就出现谣言，说朝廷要派兵袭击江州。这个谣言可能是江州官员因为恐惧而产生的幻觉，也很可能是陈显达制造的，因为他要为起兵造反预热舆论。永元元年（499年）十一月，陈显达

正式在寻阳举兵造反。

陈显达有着远比其他造反者丰富的军事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战略：趁萧宝卷准备不足，突袭建康！陈显达顺江而下，在采石打败官兵，在十二月就兵临建康城下。首都震恐。胜利在望，陈显达产生了急躁思想，企图率领精锐猛攻宫城，一战定乾坤。他顺利攻入外城，但在禁宫门口遭到了禁军的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陈显达身边只带着数百步兵，而禁军越聚越多。陈显达英雄不减当年，挥矛如飞，长矛断了就拿着矛尖突刺杀敌，杀死十多人。无奈寡不敌众，陈显达突袭计划失败，撤退到城外被杀，时年73岁。萧宝卷将陈显达满门抄斩。

陈显达死了，但恐惧情绪在地方藩镇中进一步蔓延。领兵将领们人人自危。豫州刺史裴叔业在南北边界领兵，想谋反自卫，又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就派人到襄阳找雍州刺史萧衍串联。裴叔业对萧衍说，我们一道起兵造反，再向北魏称臣，请北魏出兵相助，这样成功了可以推翻萧宝卷，失败了还可以被北魏封个河南公。萧衍不赞成。他觉得裴叔业想得太乐观了，你投降北魏了就得做北魏的臣子，北魏不是傻子，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萧衍主张万不得已的时候发兵直取建康。裴叔业不听萧衍的劝告，于永元二年（500年）正月率部投降北魏。果然如萧衍所说，北魏迅速收编了裴叔业的军队和地盘，却不愿为他去消灭萧宝卷。

南北边界又向南推移了几个郡。

裴叔业的目的没实现，战战兢兢继续当着南齐官的同事们则在思索着其他自卫的方法。

裴叔业串联的雍正刺史萧衍是个需要大书特书的人物。

萧衍，时年36岁。他是萧顺之的儿子，萧道成的族侄，虽然和萧宝卷的血缘疏远，但论辈分是萧宝卷的父辈。萧衍年轻的时候文才出众，与沈约、谢朓、王融、范云等文士交游，是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入仕后，萧衍从参军做起，在对北方的战争中逐步升迁，在齐明帝萧鸾末期成为雍州刺史，驻守襄阳。

萧衍历经刘宋、南齐的变故和南齐内部政治变迁，对所谓的君臣伦理看得很淡漠。萧宝卷胡作非为，萧衍就在襄阳积蓄力量，以备不测。他暗地招募骁勇之士，积储军事物资，积极做起兵的准备工作。萧衍的哥哥萧懿担任益州刺史，被萧宝卷解除职务召回建康，途经襄阳。萧衍拦住哥哥，不让他去建康。萧懿不听。萧衍进一步对哥哥萧懿说，南齐内有连年灾乱，外有北方强敌虎视眈眈，已经是内忧外患；而小皇帝萧宝卷只顾专权胡为，国家大乱将至。萧衍劝哥哥萧懿一起积蓄力量，寻找机会终结南齐取而代之。萧懿大怒，将弟弟痛骂一顿，要萧衍好好“反省”错误，自己毅然踏上了前往建康的道路。萧衍只好眼睁睁看着哥哥踏上险途。但是他的野心不是哥哥的几句责骂能够打消的，相反萧衍担心哥哥此去会招来大祸，加快了备战步伐。他以防备北魏为名，大造器械，暗中砍伐了许多竹木沉于檀溪中，以备造船用。

那一边，豫州刺史裴叔业降魏后，萧宝卷命令崔慧景率军北上讨伐。崔慧景是三朝老臣，是陈显达的老部下兼战友，之前在建康城中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如今受命领兵出城。他大喜过望，摸着脖子说：“此脖项终能免于被这群小辈所砍！”崔慧景虎跃山林，又领兵在手，马上密谋造反。

离建康不远处的京口，由萧宝卷的三弟、江夏王萧宝玄坐镇把守。他是去年被萧宝卷屠杀的尚书令徐孝嗣的女婿。徐孝嗣被族诛后，萧宝玄的妻子也被株连杀害。萧宝卷可能觉得对不起三弟，就送

了自己的两个嫔妃给他。如此一来，萧宝玄更恨萧宝卷了，一心密谋反叛。

萧宝玄看崔慧景带兵北伐，写信劝他造反。两人一拍即合。崔慧景领军走到广陵，就正式宣布造反，遣使奉萧宝玄为主。全军掉头反攻，一路攻克石头、白下、新亭诸城，包围建康。萧宝玄也派人率领军队随后参战，他自己乘八扛舆、手执绛麾幡，随崔慧景来到建康。萧宝玄入住东城，很多老百姓听说江夏王来了，都来投靠他。局势一时间对叛军非常有利。崔慧景觉得胜利在望，于是产生了轻敌思想。部将建议发火箭烧掉城楼，等城崩后就可直入城里。崔慧景担心这样入城后又要重新造楼，太浪费，拒绝采纳。他又喜好佛理，醉心清淡，战斗间隙竟然还去寺庙和宾客高谈玄言。主帅如此，将士们的攻势大为减弱，迟迟不能攻占全城。

萧衍的哥哥萧懿在赶赴建康途中，听到战乱的消息。他不像绝大多数官员那样观望，而是立刻组织军队，带兵驰援建康。他在一个黎明时分攻入建康，崔慧景谈了一夜玄学，毫无准备，结果被杀得一败涂地。崔慧景被杀，萧宝玄藏匿了起来。

官兵搜集了朝野官员投靠萧宝玄、崔慧景的信件，萧宝卷下令全部烧掉，还说：“江夏王尚且如此，怎么能罪及他人呢？”萧宝玄误以为萧宝卷要宽大处理，躲藏了几天后就来自首了。萧宝卷召他入后堂，用步鄣裹着他，命令随从、侍卫数十人敲鼓吹号驰绕其外，冲着萧宝玄喊：“前几天你围城的时候，我就像这样。”没几天，萧宝卷也把萧宝玄杀了。

这一次拯救萧宝卷，完全是萧懿的功劳。萧懿是乱世中少有的忠臣。在平灭崔慧景之乱后，他获封尚书令，掌握朝政。萧衍得到兄长入援建康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劝他，得胜之后要么随即废黜昏君，要么率兵出屯外地避祸，千万不可以留在建康。但萧懿忠于齐室，断然拒绝了弟弟的好意。

萧衍的预感很准确，很快萧宝卷就对萧懿动了杀心。宫廷中的一帮小人也一再怂恿萧宝卷不要把朝政委托给萧懿。萧懿事先知道危险的来临。有好心人在长江边准备小船，劝他逃往襄阳萧衍处。萧懿却大义凛然地说：“哪有尚书令逃离朝廷的？人生谁能无死，我不走。”结果，他在宫中从容接过萧宝卷赐的毒药自杀。自杀前，萧懿还对萧宝卷说：“我弟弟萧衍现在驻兵襄阳。他听到我的死讯，可能做出对朝廷不利的举动来。我替朝廷担忧啊。”萧宝卷觉得有道理，斩草要除根，不能留下萧懿的兄弟，于是下令将萧懿族诛。好在萧家兄弟们不都像萧懿一样愚忠，预感到危险后早早躲藏起来。除一人被捕遇害外，萧懿其余的兄弟子侄都避匿在百姓家里。老百姓们恨死了萧宝卷，不仅没有人告发，还给予萧家子弟很好的保护。这也可见人心向背。

对于雍州刺史萧衍，萧宝卷认定他手握重兵，是个祸害，就派前将军郑植去襄阳行刺萧衍。郑植的弟弟郑绍寂正好担任萧衍的部属。郑植便快马加鞭以探亲的名义前往雍州。当时萧懿的死讯还没有传到襄阳，加上郑植官职很高，萧衍按惯例要宴请郑植。席前，郑植怀揣利刃，决定在宴席上杀掉萧衍。郑绍寂觉察到了哥哥的阴谋，在宴会举行前将郑植的来意告诉了萧衍。萧衍得知后，还是照常举行宴会，还亲自款待郑植。

宴席开始后，萧衍突然问郑植：“郑将军受皇命来杀我，今天的这酒席可是下手的好机会啊！”

郑植也不是普通人物，心中虽然大惊，但面不改色，矢口否认。

萧衍哈哈一笑，又像没事一样继续觥筹交错起来。郑植怀里的利刃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宴会散后，萧衍邀请郑植参观襄阳城的军备。郑植同是行伍中人，发现整座城池固若金汤，粮草充足，士气高昂。他对萧衍的治军

能力大为叹服，同时也折服于萧衍坦荡的气度，便放弃了行刺的念头，并把萧懿的死讯和萧宝卷的阴谋和盘托出。

摆在萧衍面前的情况是：哥哥萧懿被杀，皇帝又派刺客来刺杀自己，除了起兵造反别无选择。永元二年（500年）十一月，萧衍在襄阳正式起兵讨伐萧宝卷。

他与荆州刺史萧颖胄联合，以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东昏侯的兄弟）为名，立即起兵。由于早有储备，萧衍用藏在檀溪的竹木在几天内就建造了有三千艘战舰的水师，又在百姓中招募甲士三万人，装备骏马五千匹，迅速组建了规模可观的军队。大军迅速沿汉江南下，进入长江后顺江直取建康。萧宝卷早就失去人心，萧衍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官吏非走即降。

萧宝卷命令紧邻雍州的行荆州府事、右军将军萧颖胄率军迎战萧衍。萧颖胄和萧衍一样，年纪相仿，也和南齐皇室有着很疏远的血缘关系，还一起喜好文学，更重要的是，他也对萧宝卷的胡作非为感到恐惧。萧颖胄一看萧衍大军的势头，非但不抵抗，而宣布和萧衍一起讨伐萧宝卷。为了增加正义性，萧衍在萧颖胄等人的支持下，奉南康王萧宝融为名义上的主帅。萧宝融是齐明帝萧鸾第八子、萧宝卷的弟弟，当时担任荆州刺史。永元三年（501年）三月，萧衍、萧颖胄等人拥立萧宝融即位，与萧宝卷分庭抗礼。萧宝融就是齐和帝。

三

萧衍大军很快就包围了建康城，建康城中的萧宝卷依然若无其事，继续着他的荒诞生活。

之前，萧宝卷经历了三次兵变，都化险为夷，所以对这第四次兵变也没有放在心上。萧衍率军攻入了建康外城，萧宝卷就退到宫城里

躲起来。此时，宫城中还有七万军队，坚守待变也不是不可能。可萧宝卷并不坐镇指挥谋划，继续保持昼伏夜出的作息习惯，白天睡大觉，晚上爬起来，有时兴致来了就穿着大红袍登上城楼眺望观赏城外的敌兵。为了体验一回“御驾亲征”的感觉，萧宝卷开始热衷在宫中玩打仗游戏。他身着戎服，以金银做铠甲，遍插羽毛、宝石装饰，给骑的马也穿上了银制的铠甲，还插满了孔雀毛，然后“闪亮登场”。宫廷卫士、太监们则拿着金玉做的兵器，在萧宝卷的指挥下互相乱打——不用说，每一回萧宝卷都能“高奏凯歌”。

尽管对打仗游戏一掷千金，萧宝卷对将士们却极其吝啬钱财。萧衍大军已攻打到城外，太监跪在地上请求他赏赐将士激励士气，萧宝卷则说：“难道反贼就只捉我一个人吗？为什么偏偏向我要赏赐？”宫廷后堂放着数百张大木片，将士们想拿去加固城防，萧宝卷却舍不得，想留着做宫殿的大门，竟下令不给。正经事上舍不得花钱，摆花架子他倒有闲情逸致。他催促御府赶制三百人精仗，准备在萧衍退兵后给庆功的仪仗队用，又拿出大量的金银宝物装饰仪仗铠甲。

皇帝身边的宠臣近侍们在生死关头还不忘进谗言，他们将接连战败的责任推卸给前线作战的将领们。萧宝卷一想：“原来打败仗都是将领们不用心造成的，我说我最近怎么会这么倒霉呢？”于是，他准备拿负责建康城防的征虏将军王珍国开刀，以儆效尤。王珍国害怕了，赶紧派人送给萧衍一个明镜，表明归顺心迹。他又密谋串通了宫内的宦官和侍卫，打算先下手为强。准备齐全后，王珍国在一天深夜率领士兵冲入萧宝卷寝宫。

这一夜，萧宝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享乐到了深夜刚刚睡下，还没有睡熟。萧宝卷被军队喧哗的声音惊醒，连忙从北门溜出。太监黄泰平追上他，举刀砍伤了萧宝卷的膝盖。萧宝卷摔倒在地，骂道：“奴才要造反吗？”另一名太监张齐不由分说一刀砍下他的头。萧宝卷时年19岁。王珍国提上萧宝卷的首级，大开城门，迎萧衍大军入城。

唐代诗人李商隐专门有《齐宫词》一诗慨叹这一幕：“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这里“永寿”宫是萧宝卷兴修的一大宫殿，此处代指齐宫；“金莲”指的是潘妃，“夜不扃”是夜里未关宫门，说的是宫中有内应。“九子铃”原是建康庄严寺的铃，之前被萧宝卷剥取下来装饰新宫了。萧宝卷死后，萧衍以皇太后命追废他为东昏侯。历史上就称他为东昏侯。宠妃潘玉儿则被萧衍赐给部将田安。潘玉儿坚决不肯“下匹非类”，自缢而亡。

萧衍此次起兵，可以说是自卫，但杀死萧宝卷后萧衍就开始独揽大权，让齐和帝封自己为大司马、中书监、录尚书事，开始篡位，因此可以批判他是“自卫过当”。萧衍坚决不让还在江陵的齐和帝进建康。第二年，他升迁为相国，晋封梁王。为了彻底搁置齐和帝萧宝融，萧衍捧出了宣德太后王宝明，让宣德太后临朝，使很多事情可以绕开合法的齐和帝直接处理。

王宝明是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妻、萧昭业之母。她并不得萧长懋的宠爱，萧长懋为其他宫人做华丽衣裳和首饰的时候，王宝明用的却是旧的帷帐与旧钗。萧昭业即位后，王宝明被尊为皇太后。萧鸾篡位后，将王宝明逐出宫居住。萧衍就把她迎回宫来搞了个不伦不类的“称制”，便于自己篡位。

亲信们给萧衍组织了一批祥瑞，包括南兖州队主陈文兴在桓城内凿井的时候挖到玉镂麒麟、金镂玉璧、水精环各二枚；建康令羊瞻解报告说在县城的桐下里出现了凤凰。宣德太后下诏说符瑞的出现都是相国萧衍的功劳，将所有祥瑞都送到相国府去。荆州地区则出现了“行中水，为天子”的传言，为新朝新君大造舆论。

之前中国历史都是异姓篡位，萧衍和南齐皇室同姓，还有血缘关系，对于篡夺同胞的江山心存疑惑。最后是亲信沈约的劝说坚定了萧衍篡位的决心。沈约劝进说：“现代与古代不同了，不可以用淳朴的古风来要求当今社会了。士大夫们攀龙附凤，都有建功立业的心思。现

在连儿童牧竖都知道齐朝国祚已终。明公您正应当承其运。天文讖记都证明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即使出现一些劫数，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沈约这段冠冕堂皇的说辞，彻底打消了萧衍的君臣大义和忠孝礼仪。萧衍最终下定了篡位的决心。

沈约于是写信给远在江陵的中领军夏侯祥，要他逼齐和帝写禅让诏书。齐和帝的禅让诏书被送到建康后，萧衍迅速表示谦让。另一个亲信范云带领117个大臣上书称臣，恭请萧衍登基称帝。太史令再三陈述天文符讖证明篡位是合乎天意的。萧衍“勉强”接受众人的请求，于中兴二年（502年）四月正式在建康称帝，改国号为梁，史称南梁。

萧衍的受禅是非常奇怪的。当时合法的皇帝不在建康，所以萧梁受禅的时候齐和帝萧宝融并没有在场。为了使改朝换代合法化，萧衍让宣德太后下诏说：“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绶，未亡人归于别宫。”太后的意思是，南齐知道自己国运已经终了，现在要效法前代将天下禅让给梁王，但是皇帝不在建康，而在长江中流，所以太后做主，请梁王派特使来接受传国玉玺。

萧衍即位后，封萧宝融为巴陵王，迁居姑孰，全食一郡。依照惯例，萧宝融享有天子仪仗和全套待遇，在封国内奉行南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都用南齐典故。梁朝规定巴陵王排位在宋朝禅位的汝阴王之上，南齐宗室诸王都降爵为公爵。几天后，萧衍派亲信郑伯禽到姑孰，送给萧宝融一大块生金，让他吞金自杀。萧宝融大笑说：“我死不需金，醇酒足矣。”郑伯禽就弄来一大坛美酒，让萧宝融畅饮。萧宝融狂饮后醉得不省人事。郑伯禽于是轻松地掐死了他。萧宝融时年15岁。

最初，萧衍计划以南海郡建立巴陵国，让萧宝融在巴陵自生自灭，又担心萧宝融在巴陵成为反对势力的旗帜，想杀他。于是他假惺惺地以将萧宝融送往南海的计划询问范云的意见，范云低头不语。萧

衍于是问沈约，沈约说：“魏武帝曹操说，‘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沈约的意思是不能为了虚名，而心存“妇人之仁”，而应该当机立断，了结了逊帝。从四月辛酉日萧宝融被去掉帝号到被郑伯禽掐死前后不过7天。萧宝融是逊位后存活时间最短的皇帝。

萧宝融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对整个南齐皇室来说，萧衍篡位反倒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在萧鸾、萧宝卷时代，宗室诸王在皇室内乱和战乱中被屠杀殆尽。萧衍只是在篡位前杀害湘东王萧宝晷兄弟，后来又杀掉齐明帝其他的儿子，即位后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大杀戮。相反，齐高帝、齐武帝子弟可以在南梁堂堂正正地做人，不用整天担惊受怕了。

萧鸾的大儿子、萧宝卷的大哥萧宝义年幼就有残疾，不能说话，不能见人，因此没有被立为太子，没有参与政治。他因祸得福，在之后的历次杀戮中幸存了下来，并在萧宝融遇害后继承巴陵王爵位，奉南齐正朔。巴陵国传国至南陈。

二〇 盛极而衰，北魏也不能幸免



南方齐梁两朝交替的时候，北方是北魏宣武帝在位之时。

宣武帝名叫元恪，是孝文帝的次子。元恪的即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是大哥因为反对父亲的汉化政策被诛杀；其次是孝文帝在南征的途中突然死亡。元恪是在一片混乱中被群臣拥立为新皇帝的。

拥戴元恪的大功臣就是彭城王元勰。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晚年最信任的两个宗室。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坚定支持汉化政策。元勰是孝文帝的弟弟，是孝文帝南征时的得力助手。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孝文帝在南征途中病重，元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掌握了实权。第二年，孝文帝在弥留之际，想将政权托付给元勰。他对元勰说：“嗣子幼弱，社稷就只能倚重你了。”元勰却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不愿意在政治上涉入太深。他苦苦推辞，说自古以来托孤的重臣也好，大权在握的权臣也好，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元勰更不想以皇叔身份辅助幼主了，认为这是“取罪必矣”。他举例说：“昔周公大圣，成上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孝文帝说服不了弟弟，叹息几声，不再勉强他了。元勰还主动求退，孝文帝就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

孝文帝随即驾崩，元勰主持了南征军队的撤回，还坚定地拥戴侄

子元恪登基继位。之后，他主动处于退休状态，都没去定州办过公。

元颺辞让后，孝文帝指定了6个顾命大臣。他们分别是：广阳王元嘉、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两个汉族大臣王肃、宋弁。其中，元嘉是太武帝的孙子，是皇室中的老长辈、老好人，他在顾命大臣班子里的象征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宋弁进入班子没几天就去世了。所以，真正主事的是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王肃。

这四个人之间，矛盾重重。元禧和元详是亲兄弟，都是孝文帝的弟弟，自然抱成了一团。王肃是归降的南齐大臣，在孝文帝时期深受信任，提出了不少汉化主张。但他在北魏朝野的根基很浅。孝文帝死后，王肃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立刻受到了鲜卑贵族们的排挤。任城王元澄是个忠厚长者，但他对只动动嘴皮子、没几年就和自己并列为顾命大臣的王肃很不服气。恰好此时有一个投降的南齐人诬告王肃是南方的奸细，一直和南方暗通情报。元澄不核实情况，就草率地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不等皇帝诏令就软禁了王肃。这一下，事情闹大了！咸阳王元禧等人很快查明王肃并未谋反。元禧对功勋卓著、资历深厚的堂叔原本就心存畏忌，如今迅速抓住元澄陷害王肃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让宣武帝元恪罢了元澄的官，外贬为雍州刺史，赶出了京城。事件的另一主角王肃也被外贬为扬州刺史，镇守寿阳。王肃在寿阳郁郁寡欢，于景明二年（501年）去世。

至此，元禧和元详两兄弟掌握了北魏的实权。这二人才能平庸，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贡献，却热衷于享受。景明二年（501年）初，元禧派家奴找到领军将军（负责捍卫皇宫的羽林军）于烈，要调羽林军官兵充当自己的仪仗队。于烈直摇头，说这是“违制”的行为。皇帝的侍卫官兵怎么能去给一个王爷当仪仗队呢？元禧不甘心，第二次派人找到于烈，态度强硬地说：“我是天子的叔父，我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倔强得很，就是不同意。元禧大怒，调于烈当恒州刺史。于烈干脆请了长期病假，闭门不出。

表面上看，元禧赢了。殊不知，于烈虽然官职低小，却在羽林军系统有不小的势力。他早早安排儿子于忠掌握宣武帝的宿卫亲兵，长期跟随宣武帝左右。被元禧“修理”了以后，于烈授意儿子劝宣武帝“亲政”。皇帝一旦亲政，就不需要顾命大臣了。元禧自然就失权了。

宣武帝元恪已满18岁了，正是血气方刚，期盼大展拳脚的年龄。他也觉得顾命大臣碍手碍脚，想要亲政。北海王元详和元禧意见不合。他看到皇帝有亲政的念头，选择跳出来揭发元禧“专横不法”，希望给侄子留个好印象，争取亲政后自己能“失权”不“失势”。

于是，请了长期病假的于烈突然有一天全副武装起来，带上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在京城元颢、元禧、元详三位王爷进宫。元禧措手不及，只得乖乖被押解入宫。宣武帝元恪宣布亲政，调整三位叔叔的官职。元颢被客客气气地解除职务，反正他也一心求退，所以叔侄双方都没有意见；元禧“升任”太保，明升暗降，被剥夺了实权，元禧敢怒不敢言；元详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元恪对他的主动揭发很满意，重用了他。一场权力之争，和平地谢幕了。

二

我们来看看亲政的元恪的个人素质。元恪大体上还过得去，算是一个认真工作（未发现他荒废朝政的记录）、关心百姓疾苦（正史上有不少他赈灾救民、警诫贪腐的诏书）的正常皇帝。《魏书》还记载了元恪射箭能射一里五十步，可见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差。

元恪亲政后，做了一些好事。比如他拒绝鲜卑遗老们返回平城故里的建议，扩建新都洛阳，继续父亲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对外政策上，元恪趁南齐末帝萧宝卷统治荒唐造成国家动乱，频繁南伐。北魏陆续占领了扬州、荆州等地的重要城镇，疆域进一步扩大，拉开对南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元恪也遭遇了两次对梁朝作战的惨败，导致北

魏军队元气大伤。（详情见下一节“南北方又打起来了！”）

《魏书》称赞元恪“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喜怒不形于色、在朝堂上沉默不语，这些特点说好可好，说坏可坏。皇帝的确要端着架子，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有很多皇帝沉默不语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大臣们的争论没有准确的判断。元恪就属于这类皇帝。他对军事、历史、政治都能说上话，但对人心善恶、对政治的微观操作了解甚少，感觉很迟钝。这就造成元恪虽然能留下不少冠冕堂皇的诏书，却很少有切实的政绩。相反，北魏在他统治时期走上了下坡路。

却说元恪亲政后，让北海王元详做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又信任左右亲随茹皓、赵修等人。这几个人都不是好东西：元详能力平庸，整天不干正事，就知道贪污受贿，聚敛钱财；茹皓、赵修等人暴得富贵，头脑发热，仗着元恪的宠信在外面弄权用事。他们一起将北魏的政治越弄越糟。

咸阳王元禧失势后，也不消停。自古权臣失势，免不了要抄家灭族。元禧很担心自己的命运。原来聚集在他身边的一帮人，本想仗着元禧谋取荣华富贵，如今看主子失势了，就怂恿主子孤注一掷地造反。元禧的亲信常常向他传递一些“宫中的消息”，今天说皇帝如何不喜欢元禧，明天说哪个大臣主张诛杀元禧。元禧为了自保，联络小舅子李伯尚、氏王杨集始等人商议造反。当年五月，宣武帝元恪到洛阳郊区的北邙打猎。元禧乘机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并派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在政变的节骨眼上，一帮人却在具体细节上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元禧当断不断，竟然决定暂不起事，让大伙先散了，“从长计议”。参与谋反的杨集始见状，觉得如此造反绝不可能成功，一出元禧的家门，就跑到北邙向元恪自首了。元恪闻讯，不打猎了，调动兵马围捕元禧去了。元禧身边并无军队，被于烈派几个卫士就轻易逮捕了。元恪亲自审问后，责令元禧自杀，并诛杀参与谋反者十多人。咸阳王长子元通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元禧造反，对宣武帝元恪的刺激很大。“亲叔叔都会谋反，我还能相信谁呢？”他亲政前就对宗室诸王没有好感，如今更加疑忌宗室，进一步依靠身边亲信赵修等人，同时提拔母系外戚作为新的依靠力量——父亲的亲属不能相信了，就只能信任母亲的亲属了。

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原籍渤海蓟县（今河北景县），遵照鲜卑族“子贵母死”的传统，在儿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就被迫自杀了。她的兄弟亲属散落民间，默默无闻。元恪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现在，元恪在民间找到了母亲的两个兄弟高肇、高显和一个侄儿高猛，都封为公爵。其中高肇被封为渤海郡公，最受元恪倚重。

高肇兄弟子侄三人，之前都是帝国底层的小百姓，如今突然被召入连想都不敢想的皇宫大内，一则惊恐万状，二则不知礼节，闹出了不少笑话。可在元恪看来，这却是母系外戚纯朴敦厚的优点。这又是小皇帝想当然的地方。土得掉渣的人不一定就纯真老实。高肇“数日之间，富贵赫弈”，变成朝廷大红人后，心理也变了。一个人从底层突然跃升为顶端权贵，往往带有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他要掩饰自己的自卑，同时要抓紧享受，并且聚敛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财富，来缓解内心的不安。高肇知道高家在北魏朝廷没有根底，本家又人丁稀少，就选择勾结朋党、招降纳叛来壮大实力。对于主动依附投靠的人，高肇竭力拉拢、保举，让他们几十天内就升官；和高家过不去的人，高肇就百般陷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把社会底层那一套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流氓伎俩都搬到了帝国朝堂上来，朝野群臣们还真不是对手。在财富上，高肇进一步败坏风气，大把大把抓钱。咸阳王元禧伏诛后，王府的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大多入了高氏的私囊。

宣武帝越来越倚重高肇。高肇的势力膨胀得很快。当时，宣武帝的头号亲信是散骑常侍赵修；朝廷的实际主政者是北海王元详。高肇决心扳倒二人，取而代之，让势力更加壮大。

赵修出身卑微，是元恪当太子时期的侍卫。元恪非常信任赵修，

登基后一路将他提拔到散骑常侍的高位。赵修在家中设宴，元恪都会亲自参加，还招呼许多王公贵族官僚一同前往。赵修小人得志，顿时忘乎所以。他仗着皇帝宠信，在外面胡作非为，欺负同僚。父亲落葬时，赵修毫不悲痛，宾客在送葬路上竟然掳掠奸淫民间妇女，甚至把人家的衣服剥光取乐。对于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角色，高肇对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他大义凛然地揭发赵修的罪行。赵修早已犯了众怒，大家见高肇挑头，纷纷跟进，争先恐后地控诉赵修的罪状。宣武帝就是想袒护赵修都不行了。景明四年（503年），宣武帝元恪不得不把赵修公开审问，判决鞭打一百下，发配敦煌充军。高肇是要取赵修性命的，所以安排了五个五大三粗的壮汉轮流鞭打赵修，实际打了三百鞭。不想，赵修出身侍卫，身体素质过硬，吃了三百鞭竟然没有死。虽然没死，赵修也伤痕累累了。高肇紧跟着让人把赵修绑在马后，赶马飞跑。可怜赵修重伤得不到休息，又被马拖着跑，跑了几十里地就血肉模糊，死了。

几个月后，高肇又告发北海王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谋反。元恪已经不信任宗室亲王了，而茹皓等四人都是元详推荐到元恪身边的。他把两者联系起来一想，越来越觉得高肇的告发有道理。元恪迅速抓捕茹皓等四人，第二天就处死；派羽林军将元详押往华林园软禁。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元详之兄）等几个宗室商议如何处置。大家的处理意见是将北海王元详废为庶人，严加圈禁。元恪很可能是想留元详一条性命。不想，北海王府的几个家奴策划劫狱，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连累元详被杀了。

元详“谋反”事件，让宣武帝元恪进一步猜忌宗室诸王。高肇猜透元恪的心理，劝他加强防范宗室诸王。元恪派出禁军驻守各王府邸，名为保护，实际上将各位王爷当做囚犯看守了起来。彭城王元勰劝谏元恪，说国家分封诸王就是为了让诸王拱卫皇室，如今形同囚禁，怎么让诸王发挥作用？万一皇上出事，谁来保护？可惜，元恪不听。元勰心中苦闷，干脆自我封闭起来，不与人来往了。

宗室诸王集体失势后，元恪自然更加倚重外戚高氏。高肇的气焰日渐嚣张。他出任了尚书令，主持朝政，又娶了宣武帝的姑姑高平公主做妻子，还送侄女进宫做了贵人。不久，于皇后暴亡（很多人怀疑是高肇下的毒手），高贵人就升格为了皇后。高家的权势多了一层保障。至此，高肇阴谋得逞，成了北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

三

元恪暗于识人，不擅微观实践，却有很高的佛学修养。他喜欢在宫中召集名僧，亲自讲经论道，带动佛法在北方的报复性发展。

皇帝醉心佛法，方便了高肇在外面任意胡为。史书很不客气地说他“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为了显示才能，高肇特别喜欢“改革创新”。他修改了大多数的先朝旧制，又不能制定成功的新制度，造成了政务的混乱。其中，改革涉及现任官僚、贵戚们的勋位、封秩，高肇都进行了削减，造成官场上民怨沸腾。他将自己置于非常重要危险的地位了。

永平元年（508年）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的叔叔、彭城王元勰的弟弟）在信都称帝，公开造反了。促使元愉造反的原因很强大：他和侄子宣武帝有矛盾，宣武帝曾经逼死他所爱的女子，逼他迎娶高氏女子；他对高肇的大权独揽很不满，又担心朝政被高氏败坏；他自己也想过当皇帝的瘾，等等。可惜，元愉造反的实力却很弱小。朝廷镇压的大军很快就到达冀州。元愉只抵抗了一个月，就在逃亡途中被擒。在元愉被押解往洛阳的半路上，高肇派人把他杀害了。（元愉生前没当成皇帝，日后次子元宝炬成了西魏皇帝，他在九泉之下被追尊为了皇帝。）

元愉造反事件，被高肇利用来向彭城王元勰开刀。元勰才华出众，声誉很好，被北魏军民公认为“贤王”。之前，孝文帝有意让他主

政，元颺主动推辞的事情，被传为美谈。高肇就觉得元颺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他之前多次诬告元颺，元恪都不相信——毕竟，元颺对元恪有拥立的大功。这一次，元颺推荐的长乐太守潘僧固被裹挟参加了元愉造反。高肇又一次诬告元颺，说元颺不仅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少数民族，参与谋反。高肇还收买元颺旧部魏偃、高祖珍做证人，一起诬告元颺。在种种似是而非的证据面前，宣武帝元恪又一次做出了错误判断，无奈地接受“又一个叔叔谋反”的事实。

于是，元恪设下酒席，召高阳王元雍、彭城王元颺、清河王元怳、广平王元怀四位皇叔，以及广阳王元嘉和高肇赴宴。散席之后，元恪安排各位王爷分别择地休息，然后派人带着武士给元颺送去毒酒，逼他自杀。元颺不肯喝，力辩清白，大喊有人诬告，再三要求和告发者对质。来人不肯传达，拔刀相威胁。元颺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最后饮毒酒自杀。来人担心元颺不死，又命武士补上了一刀。天亮以后，元颺的尸体被一床被子包裹着，送回彭城王府。宣武帝对外宣布彭城王“醉酒而亡”，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赐彭城王谥号“武宣”，企图掩人耳目。（元颺的儿子元子攸后来当了北魏皇帝，追尊他为文穆皇帝。）

高肇又一次阴谋得逞，又一次升官，当了车骑大将军、司徒。如果按照这个状况发展下去，高肇会加速蚕食北魏的实权，说不定还会成为第二个王莽。不过，朝野百官暗中早已对他心怀怨恨，恨他为人歹毒。特别是元颺遇害后，军民们普遍同情元颺，认为高肇“屈杀贤王”，是幕后黑手。鲜卑贵戚们更是对高肇恨之入骨。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元恪突然病故，享年33岁。太子元诩即位，年仅6岁。

元恪一死，宗室诸王和不满高肇的大臣们立即策划反击。依附高肇的官吏也纷纷“倒戈”。前一年的十月，高肇以司徒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领兵进攻益州，刚好不在洛阳。于忠当时担任领军将军。

之前他被高肇“修理”过，处于受压制状态。如今，他调动羽林军，控制局势，又与侍中崔光等人商议，请出高阳王元雍、任城王元澄主持朝政。

新领导班子用新皇帝的名义，召高肇回京。高肇得知洛阳的变故，知道不妙。这时候，不学无术的缺点就暴露了出来。他竟然想不出摆脱危局的方法，只得乖乖回京。高肇进宫对着元恪灵柩痛苦哀号。高阳王元雍和于忠早已埋伏了十多个武士，等高肇哭完先帝，就把他拉出去杀了。高肇专权之祸，终于解除。

高肇对北魏命运起了恶劣的作用。原本平庸的元恪带着北魏缓慢前行，高肇就像是一股催化剂，引着大家走上了下坡路。他的揽权胡为，加剧了北魏朝野的贪腐之风；他的改制乱为，恶化了北魏帝国的政治运作；他的诬告陷害，打开了北魏内部倾轧的大门。这些加上同期北魏对南梁作战的两次大败，使得整个帝国由盛而衰，不复孝文帝时期的强盛。

二一 南北方又打起来了！



南北方边界大致上一直向南移动，从刘宋王朝初期的以黄河为界，南移到南梁前期的以淮河为界。双方主要围绕淮河一线的军事重镇展开混战。这些重镇从东往西分别是淮阴、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寿阳（今安徽寿县）和义阳（今河南信阳）四处。此外，西边的南郑（今陕西汉中）是南方保护巴蜀大地的屏障，南北方在此也展开拉锯。

南方的淮河防线在南齐末期遭到了动摇。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驻扎寿阳的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怕遭荒唐皇帝萧宝卷杀害，率军割地，向北魏上表归降。天下掉下一个硕大无比的馅饼，北魏朝野欣喜若狂。为防夜长梦多，彭城王元勰和重臣王肃亲自领了十万大军去接收寿阳。途中，他们嫌步兵前进速度太慢，派出一千羽林骑兵火速赶往寿阳。果然，南齐已经派出崔慧景、萧懿、陈伯之等军前往收复寿阳。不想，大将崔慧景收复寿阳是假，借机脱离萧宝卷是真。他带着部队出了建康就宣布造反。结果，北魏顺利接收寿阳，还打败陈伯之等军，进而攻占了合肥。南方的淮河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北魏军队依托寿阳，不时对南方发动打击，让新建立的南梁头疼得很。

梁朝建立后，北魏兴起了一股讨伐南方的声音，其中叫得最响亮

的是两个投降的南方人。

第一个人是萧宝夤。这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萧宝夤出身高贵，是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萧宝夤是南齐宗室中少数几个才能卓越的王爷。他哥哥萧宝卷在位，荒唐胡为，底下就有人几次谋立萧宝夤取代萧宝卷。计划没有成功，萧宝卷对弟弟萧宝夤网开一面，不予追究。

萧衍攻占建康后，起初并没有为难萧宝夤，还封他为鄱阳王。不久，萧衍陆续诛杀南齐诸王。萧宝夤被萧衍的军士监守，随时可能遇害。一天半夜，萧宝夤带这几个亲随偷偷挖开院墙逃跑了。萧宝夤换上底层百姓的衣服，穿着草鞋，徒步赶往长江边。他们在江边准备好小船。萧宝夤爬到船上时，双脚已经磨得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天明以后，萧衍发觉萧宝夤逃跑，派出官兵在江边四处搜索。萧宝夤装做钓鱼的人，任凭小船随波逐流，在江面上漂了十余里，骗过了追兵。之后，萧宝夤冒着生命危险，走小路、躲山涧、骑毛驴，昼伏夜行，终于到达北魏控制下的寿阳。此段经历，堪比现代好莱坞大片的情节。

镇守寿阳的北魏任城王元澄知道萧宝夤是块宝，忙以礼相待。萧宝夤因为亡国，不饮酒，不吃肉，寡言少笑，十分悲痛，还身着丧服。元澄就率领北魏官僚前往赴吊——之前北魏都称南齐为“岛夷”或者“齐逆”，如今觉得齐国有利用价值了，又佯装悲痛前来吊唁了。第二年，萧宝夤来到京城洛阳。宣武帝对他很礼遇。萧宝夤上朝时伏地痛哭，诉说南齐亡国之痛，请求北魏出兵讨伐萧衍。北魏内部对南征有分歧，没有当面答应。萧宝夤就再三苦求，即使遇有狂风暴雨也不中断上朝请求。

第二个坚定要求南伐的人是陈伯之。此人的经历也相当传奇。

如果说萧宝夤是出于亡国之恨要求南征的话，那么陈伯之就想借

南征来向北魏王朝表忠心。因为他是个投降的南梁将领。

陈伯之本是南齐的豫州刺史，被萧宝卷派去镇守寻阳，抵抗萧衍。萧衍派人劝他投降。陈伯之在萧宝卷和萧衍之间观望，首鼠两端。直到建康大势已去，陈伯之才正式向萧衍投降。萧衍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征南将军、江州刺史。

陈伯之出身贫寒，大字不识一个，处理公文都需要幕僚为他念字、讲解，养着一群亲信帮助处理政务。这些人中难免有人会借机假公济私、损人利己。萧衍知道后，很担心。一来，陈伯之不是嫡系，君臣之间终究隔着一层东西；二来，江州官吏坏事做得太多了，激起民怨，就不妙了。所以，萧衍派人去取代陈伯之自己任命的江州别驾邓缙，算是“敲打”一下陈伯之。

陈伯之及其亲信却将此事看得很重，认定萧衍要动手了。于是，陈伯之召集文武官员，拿出事先伪造的萧宝夤的书信，说要和萧宝夤一起“反梁复齐”。他筑起祭坛，歃血为盟，并号令州内各郡起兵。江州所属的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太守不愿跟从陈伯之造反，率本郡军民抗命。陈伯之决定先出兵攻下豫章，以绝后顾之忧，再顺江而下进攻建康。不想，陈伯之一时间攻打不下豫章，萧衍却已经派出大军逆江而上，逼近陈伯之老巢寻阳了。陈伯之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带着亲信和部队一万多人北上投降北魏了。

陈伯之坚决主张南征。他有军队，有实力，又了解南方军政实情。宣武帝元恪也为萧宝夤的爱国热诚所感动，于是下令南征。他封萧宝夤为齐王，任命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率领一万兵马进驻寿阳，又任命陈伯之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兵阳石（今安徽霍丘东南），做好南征的准备。景明四年（503年）秋，北魏大举南征，其中东路以任城王元澄为主帅，率领萧宝夤、陈伯之等部进攻钟离；西路以镇南将军元英为主帅，进攻义阳。这个元英是太武帝太子拓跋晃的孙子。父亲南安王元桢因为参与了穆泰谋反，被削夺了王爵。作为

谋反宗室的后代，元英顶着巨大的压力，一心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他在孝文帝时期就东征西讨，勇冠三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宣武帝将西线托付了给他。

北魏进军顺利，东路的元澄分兵出击，成功占领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颍川（今安徽寿县西）、大岨（今安徽含山东北）、焦城（今河南中牟西南）、淮陵（今江苏盱眙西）等八座城池，以主力围攻重镇钟离；西路的元英则将义阳团团围住。

南梁将军姜庆此时成功施展了一招“围魏救赵”，差点扭转了战局。

东线魏军分兵出击，导致后方寿阳兵力空虚。姜庆率领偏师，深入敌后，一举攻克寿阳外城。元澄老巢有被端的危险，如果真是那样，东路魏军可能被梁军南北包抄，陷入大包围之中。可是，姜庆的兵力有限，无力再进攻内城，在外城停顿了下来。而魏军留在寿阳内城还有相当一部分军队，主要是裴叔业投降时的南齐部队和北魏接收的部队。这些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紧要关头，元澄的母亲孟太妃毅然站了出来主持大局。她临危不惧，指派将领严守内城，并对全城官兵不分新旧、民族一视同仁，赏罚分明，激励大家共同守城。孟太妃还亲自登城检视，冒着矢石指挥作战。北魏官兵士气大振。附近的萧宝夤的军队也及时赶来增援。攻入寿阳的姜庆部队反而陷入了包围圈，激战一日，落荒而逃。

梁军分兵御敌。在东路，萧衍派冠军将军张惠绍救援钟离。张惠绍在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的一个沙洲）一带遭到北魏平远将军刘思祖的拦截，一败涂地。张惠绍等十余名将领被擒。到了第二年春夏之交，淮河流域降雨增加，水位暴涨，攻打钟离的魏军无法驻扎，只好撤还寿阳。东路梁军侥幸摆脱了危局。

在西路，萧衍派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率兵三万救援义

阳。元英获知梁军行踪后，派将军元逞等人在樊城（今湖北襄阳一带）阻击王僧炳的梁军前锋。两军交战，梁军大败，战死、被俘的有四千多人，其余人作鸟兽散。曹景宗听说前锋挫败，裹足不前，只在外线游弋，不敢靠近义阳。义阳城内，梁朝的司州刺史蔡道恭率领不满五千守城官兵，已经坚持了大半年时间，打退了魏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魏军死伤不计其数，元英开始打退堂鼓了。谁知，蔡道恭突然病逝。元英下令猛攻义阳。南梁守军弹尽粮绝，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建康方面的援军身上了。这个援军自然不是曹景宗的部队，而是萧衍新派出的宁朔将军马仙琕。

马仙琕是南方名将，被世人看做三国时期的关羽、张飞。可惜的是，马仙琕勇猛有余，谋略不足，一味贪功冒进。元英在义阳城东埋伏主力，再派小股军队出阵向马仙琕示弱。马仙琕以为魏军不堪一击，直扑元英。元英佯败，率部北退，引诱梁军钻入包围圈后忽然掉转马头，发出信号。只见漫山遍野的魏军同时杀出，向梁军涌来。马仙琕虽然拼死抵抗，无奈准备不足、军心涣散，大败而逃。内外交困的义阳守军见状，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开城投降。周边梁朝关隘的守军，闻讯纷纷弃地而逃。梁朝在淮河防线的西段完全崩溃，失去了所有现在河南地区的领土，不得不在湖北地区组织第二道防线。

义阳大捷，宣武帝元恪大喜过望，封元英为中山王，并在义阳设立郢州，与东面的寿阳呼应，在淮南地区形成一对钳子。淮河防线的重镇就只剩东面的钟离还在南梁控制之下了。这是504年的事情。一年后（505年），本是裴叔业旧部、镇守汉中的夏侯道迁向北魏投降。北魏迈过秦岭，攻占了梁州十四郡（今陕南地区）。梁朝统治下的四川（当时称益州）也岌岌可危了。

梁武帝萧衍刚当上皇帝两三年，就遭遇一连串的败仗，领土接连丧失。他自然是不甘心。

天监四年（505年）十月，萧衍任命六弟、临川王萧宏为主帅，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手，统领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淮南东北），大举北伐。这是自刘宋元嘉北伐之后的又一次强势北伐，萧衍几乎动员了南方所有的精兵强将，总兵力达数十万之多，旌旗招展，气势恢弘。北魏方面压力很大，不得不承认这是“百数十年所未有”。

萧衍的北伐计划也气势宏大：第一步，攻克重镇寿阳；第二步，兵分两路，一路出徐州，平定中原，一路出义阳，夺取关中；第三步，各路大军会师洛阳，生擒元恪；第四步，扫荡河北，统一天下！

但是战斗现实总比军事计划要复杂、要困难。战士们再怎么流血流汗，也跟不上帝王在沙盘上的推演。梁军此次北伐，开局就相当不利。前锋、徐州刺史昌义之攻打寿阳外围的梁城（今安徽寿县东），就被陈伯之打败。

陈伯之是投降北魏的南方人，估计留在南方的同僚、熟人比较多。这些人了解陈伯之的性格，就建议萧宏招降陈伯之。萧宏让记室（机要秘书）丘迟给陈伯之修书一封，展开投降。丘迟是南齐、南梁时期的一个“笔杆子”，投入萧衍的幕府，南齐末年朝野臣工一应劝进文书均为丘迟所作。他写给陈伯之的劝降书信，声情并茂、入情入理，堪称美文，后人取名为《与陈伯之书》列入文学史册。

此信写于天监五年（506年）三月，开头先大夸陈伯之：“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几乎将陈伯之捧上天了。接着，丘迟笔锋一转，将军如此神武，为什么“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为什么要当北方蛮夷的走狗呢？估计陈伯之军人的荣誉感一下子被刺激了起来。

紧接着，丘迟主动为陈伯之之前的投降行为辩护，说陈伯之降魏是受小人的蛊惑，将他的责任推卸掉了。丘迟说“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梁武帝萧衍宽厚大度，既往不咎，只要陈伯之迷途知返，皇上“重恩不重刑”，不会怪罪的。为了防止陈伯之犹豫，丘迟还举了前人朱鲋、张绣迷途知返修成善果的例子。

再接着，丘迟展开了亲情攻势，告诉陈伯之：将军祖坟、住宅都完好无损，留在南梁的亲戚安居、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可述”。陈伯之在南方生活了几十年，根基在南方，不可能对此不留恋。丘迟又抓紧时机大谈南方的和谐局面和光明前景，“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暗示陈伯之要建功立业、扬名立万，还是要回到南方来。

最后，丘迟动情地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这几句话着实煽情，“将军独无情哉！”总之一句话，丘迟建议陈伯之“早励良图，自求多福”。

陈伯之接到书信，让手下念给他听。他和他周围那些南方投降的官兵，不可能不为信中内容所感动。后人不知道陈伯之的具体感受，反正他一听完书信，就率领能够控制的八千军队向梁军投降了。（陈伯之投降后，萧衍果然既往不咎，还封他为侯，不过剥夺了他的军队，再也不让他带兵了。）

梁军轻松扳回一局，乘胜在五月到七月间两线并进，先后拿下宿预（今江苏宿迁南）、梁城、合肥、霍丘、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等十几座城池。梁军士气高涨。在这一系列胜利中，值得一提的是豫州刺史韦叡率军攻克了淮河防线东段重镇合肥。

韦叡参战时已经60岁了。他之前宦海沉浮几十年，一直没有得到

施展拳脚的机会。官场上有许多人将年华都耗费在繁冗的行政事务中，韦叟毕竟幸运地在晚年得到了奔赴沙场的机会。据说，他当时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不但不能骑马横抢，还只能由兵士抬着上阵指挥。在攻打合肥外围的军镇小岷时，韦叟带着一支军队侦查敌军的围栅。敌营中忽然杀出数百人。部下都建议撤回去披挂整齐，再来迎敌。韦叟却下令立刻迎战。他解释说：“小岷城池小，城中只有两千多守兵。按理说，他们应该闭门坚守，如今却主动冲出几百人，必然是城中的精锐。如果我们能够打败这支精兵，小岷就会不战自败了。”部下们半信半疑，韦叟正色说：“朝廷符节在我手中，绝非摆设，众军不得违命！大家力战，必能克敌！”在韦叟的指挥下，梁军官兵奋勇争先，果然把出城的魏军杀得一塌糊涂。韦叟率部队乘势猛攻城池，不到半天就攻克了小岷。

北魏派将军杨灵胤领军五万赶赴合肥增援。韦叟部下认为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建议韦叟向朝廷请求增兵。韦叟笑道：“敌我已经刀兵相见，现在我们再求增兵，于事无补。就算援兵从后方赶到，敌人的援兵也会源源不断而来，我们还是得不到优势。”他主动进攻，打败魏兵，又在合肥城外的淝水上修建高堰大坝，积蓄河水，不断抬高水位，准备水灌合肥。韦叟还在岸边筑新城守卫堰坝。魏军也不示弱，乘梁军立足不稳攻陷了新城，杀到堰坝前要将其凿毁。情况危急，韦叟亲自上阵，带领守堰官兵击退魏兵，然后指挥大型战船驶入淝水，居高临下围攻合肥。当时水位已经和城墙一般高了，梁军在船上万弩齐发，将督战的北魏守将杜元伦射死。魏军心理崩溃，弃城而逃。韦叟顺利占领合肥。

到此为止，梁军捷报频传，看似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南梁此次北伐能够大功告成吗？

二二 战场无赢家，大家都歇了吧



北魏对南梁的大举北伐不敢怠慢。宣武帝元恪任命在西线有突出表现的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负责东线军事。元英点起十多万军马，浩浩荡荡地来增援寿阳了。

南北方主力汇聚寿阳附近，决战在即。狭路相逢勇者胜，决定恶战胜负的往往是参战者的勇气。遗憾的是，南方的主帅、临川王萧宏是个绣花枕头，胆小得很。他能当主帅，完全是因为哥哥梁武帝萧衍最信任他。其实，萧宏并无军事经验，他的特长在于贪污敛财，即便是在北伐途中也不忘克扣军款、贩运私货。当他听说对手是身经百战、取得义阳大捷的元英时，萧宏寝食难安。他根本就没有获胜的信心。

思前想后，萧宏觉得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撤军。他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议撤退。来参加的将领们面对一片大好的形势，满心以为主帅是叫大家来商量作战计划的，不想会议只有一项议题：如何撤退！柳惔、裴邃、马仙琕等人不同意。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军旗开得胜，攻守态势有利于我方。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撤退？”“魏军连败，又远道而来，攻破他们并不困难。”一些将领甚至以死相要挟，坚决不同意退兵。军事会议最终不欢而散。众怒难违，萧宏不再提撤军了，可也不许军队进攻寿阳。他还是明令：“人马有前行者，斩！”

官兵士气旺盛，不想统帅泼来一大盆冷水，梁军上下顿时气泄。

北魏主帅元英则顾忌梁军数量众多、挟新胜之威，且有韦叟、马仙琕等名将指挥，也不敢轻举妄动，下令全军静观其变。南北两军在洛口附近对峙了起来。

半个月后，九月底的一天夜晚，洛口地区突降暴雨，水位暴涨。洪水漫进了梁军的部分营房。驻扎的梁军骚动起来。本就畏敌如虎、整天胆战心惊的萧宏以为魏军趁着夜幕和洪水突袭来了，魂飞魄散，只带了几个贴身侍从，跳上马就往南逃。他这是弃军而逃，部将们都不知道主帅已经逃跑了。等将领们四处寻找不到萧宏踪迹的时候，大为震惊。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各部官兵四散奔逃。由洪水引发的一场骚动作为源头，以萧宏逃跑为导火索，梁军上演了一场混乱的大逃亡。途中，光是自相践踏就死了将近5万人。元英得知梁军自动崩溃，起初还不相信，核实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刻向梁军发起全面反攻。梁军被杀得落花流水，战死和被俘的又有几万人。

魏军轻松获胜，要感谢萧宏。因为萧宏貌美而柔懦，北魏此后“亲切”地称呼他为“萧娘”。萧娘逃回后方后，竟然陆续升迁太尉、骠骑大将军等职，领扬州刺史20余年。他在任期间极尽搜括聚敛之能，敛得赃物存了上百间库房。其所作所为连侄子、豫章王萧综都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钱愚论》嘲讽他。不过，梁武帝萧衍见这个弟弟虽然无能，却没有政治野心，亦不加罪。

梁朝的北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溃败了。正在淮阳、义阳等地奋力攻城的前线，被迫后撤，先前占领的宿预、梁城等军镇也纷纷弃守。梁军主力沿着淮水向东南方向撤退，淮河防线几乎形同虚设。好在大混乱中，还有一些梁军将军保持了相对冷静。镇守梁城的将军昌义之听说主力溃退后，判断魏军会乘胜进攻重镇钟离。于是，昌义之主动放弃梁城，带领三千守军进驻钟离。果然，元英随即指挥北魏大军兵临城下，将钟离围了个水泄不通。

钟离成了南梁淮河防线上的最后一个据点。为了保卫淮南、保卫江南、保卫南朝的社稷，钟离绝不能丢！梁武帝萧衍深知钟离保卫战的重要性。考虑到前线梁军处于绝对劣势，萧衍派将军曹景宗率领二十万援军从建康救援钟离，又下令驻守合肥的韦叟前往增援。南北方的主力决战不经意间转移到了钟离爆发。

天监六年（507年）二月，韦曹二部在钟离城下会师。此时，魏军已经围攻钟离城四个多月了。昌义之以三千士兵拼死抵挡百倍于己的敌人，成功地守住了钟离城。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梁军将士的英勇，杀得魏军的尸体堆得差不多和城墙一般高；另一方面要归功于这段时间淮河流域断断续续在下雨，淮河和雨水将钟离城罩上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期间，洛阳的宣武帝元恪一度担心师久兵疲，下诏元英退兵。元英反复上表，坚决要求攻克钟离。元恪就不再勉强，督促元英早日凯旋。

梁军老将韦睿来到钟离城下后，指挥部队迅速登陆邵阳洲，逼近魏军营垒，连夜挖长沟、搭鹿角，造了一座甲明枪亮的梁军大营。第二天，元英醒来，愕然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座敌军营垒。他改变计划，决定先消灭梁朝援军，再攻钟离城。元英派出猛将杨大眼，率领铁骑，气势汹汹地杀向韦叟的部队。杨大眼是出了名的氏族勇将，在战场上以视死如归的冲锋而闻名。韦叟则不慌不忙地将两千辆战车结集在外围，排成车阵。每辆战车上都安排了一只强弩。等杨大眼的骑兵靠近，梁军强弩一齐连发，杀得魏军人仰马翻。杨大眼的骑兵伤亡惨重，败下阵来。几天后，淮水因连天降水暴涨。梁军出动水师沿淮而上。梁军在水战方面是内行，他们的大船体积巨大，和营垒一般高，里面载满武士，同时又有许多小船，里面装满干草浇油，准备火攻。魏军在淮河两岸都扎下营垒，以淮河中的邵阳洲为支点，南北各搭建桥梁相连接。梁军放火烧桥，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到邵阳洲和两岸的魏军营垒。被分割为几段的魏军陷入火海之中，梁军士兵又下船登陆，猛杀狂砍。魏军乱成一团，桥梁和营垒塌毁，官兵四散而逃。烧

死、淹死、踩死、砍死的魏军超过了二十万人，淮河两岸沿途一百多里到处可见魏军的尸体。主帅元英单骑逃往梁城。

钟离保卫战以梁朝完胜告终。这是继刘裕北伐告捷之后，南朝又一场辉煌的胜利。战后，曹景宗因功受封公爵，韦睿因功晋爵为侯。

同时，钟离之败是北魏对南朝作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惨败。虽然没有像淝水之战一样引发北魏的崩溃，却也造成魏军精锐损失大半。帝国元气大伤，朝野哗然。元英因为损兵折将，萧宝夤因为支援不力，按律当斩。考虑到二人之前的军功，赦免死罪，双双削爵罢官为民。

二

惨败后，北魏没有能力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了，于是寻找“局部突破”。

永平四年（511年），海边发生了有利于北方的突发性事件。边界军镇、南梁的朐山城（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发生内乱，守将被民众王万寿所杀。后者向北魏称臣，并向北魏的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想都没想，派兵占领了朐山。梁朝闻讯，迅速反攻朐山。

此时，北魏方面对朐山的重要性判断失误。徐州刺史卢昶出身著名世族范阳卢氏，在写文章方面很有一套，但在军事战略上很没有一套。朐山紧挨着郁洲（在今连云港，当时只是海上一座岛屿）。南朝失去了对今河北、山东地区的控制后，在郁洲侨置了青、冀两州，在名义上保留对北方的统治。卢昶过分看重郁洲的重要性，进而高估朐山的重要性，认为巩固了朐山，可以攻克郁洲，进而彻底消除南朝对北方的统治——其实，南朝只是在一座海岛上虚搭了两个州政府的架子而已，他自己都不重视，卢昶反而异常重视。卢昶上奏宣武帝，要求重兵争夺朐山。宣武帝听从了卢昶的意见，陆续派出多支军队，总

兵力累计超过十万，力图守住胸山。

魏军统帅卢昶在作战方面一窍不通，手握重兵，既不能突破梁军对胸山的包围，甚至连粮草也运送不入胸山。结果，梁军在马仙琕的指挥下，从容不迫地围攻胸山城。十二月天降大雪，雪花漫天飞舞，困守胸山的魏军弹尽粮绝，主动投降。卢昶见胸山丢失，扭头就跑，带动十万魏军跟着溃散。当时大雪封路、天寒地冻，北魏士兵沿途因伤冻减员很多，马仙琕指挥梁军随后追杀，最终只有一万多魏军逃回后方。胸山之败是钟离之后北魏又一大惨败，所剩不多的精锐又一次横尸海滨。（卢昶逃回后，和萧宏一样继续当官，继续写文章。）

不知道是受两次大捷的鼓舞，还是雄心尚在，萧衍在三年后（天监十三年，514年）决定反攻。有个投降的魏人（王足）向萧衍献策，说淮河下游的浮山（今安徽五河一带）地势很适合修筑大坝，以此抬高淮水来水灌寿阳。萧衍欣然采纳，决定拦淮修筑“浮山堰”，除掉寿阳这个心头之患。“浮山堰国家工程”正式上马。在此后近两年时间里，梁朝从徐、扬二州大肆征发民工，每4户出一人参加工程。施工环境恶劣，监工催促又急，民工们不断因为劳累、饥饿、疾病而死。工地上随处可见尸体和奄奄一息的百姓。此段淮河泥土松软，堵塞河道很不容易，经常是砂石填下去就被水流冲走了。官府就想用铁器堵塞河道，从后方征用了上千万斤的铁器，效果也不理想，又想到伐树做木笼，装上石头填埋河道，为此几乎砍光了淮南的树木。

浮山堰搞得北魏很紧张，派遣李平到寿阳负责迎战，又起用萧宝夤专门破坏浮山堰。萧宝夤想到的方法就是去进攻工地，结果被重兵以待的梁军击退。眼看堰坝将淮水抬得越来越高，北魏有意派遣大军增援。前线统帅李平不以为然，上奏说：“所谓的浮山堰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工程，终究要垮掉。我们根本不用派兵，就看着南朝出洋相就可以了。”北魏朝廷采纳了李平的建议，只是在寿阳城附近的八公山上建筑城池，防备寿阳一旦被淹后可以转移军民，并不做其他准备。

天监十五年（516年）夏，被寄予厚望的浮山堰终于建成。堰坝总长九里，高二十丈（三十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大坝。大坝抬高了上游水位，形成了一个方圆几百里的人工湖，相当壮观。寿阳城果然被水围困，北魏军民被迫弃城上了八公山躲避。

梁武帝萧衍的计划看似成功了。不过，其中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梁军如何去占领汪洋之中的寿阳城呢？占领后，又有何用呢？

更糟糕的是，浮山堰腰斩了奔流的淮河，上游一片汪洋，人工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水位持续上涨，很快就和堰顶相平了——萧衍造大坝的时候，忘记还有泄洪这码事了！

眼看着大坝要决堤了，驻守的梁军慌成一团。有人看到八公山上的水位也在不断上涨，利用魏军怕淹的心理四处散布说：“梁军不怕打仗，就怕有人把水泄掉。”魏军一听，果然开始在人工湖边上挖渠泄水。可是，魏军泄洪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淮河上流来水的速度，浮山堰的险情日益严重。四个月以后，516年的秋天，人工湖洪水泛滥，史上最大大坝——浮山堰轰然坍塌。堰垮之时，声响如雷，三百里内都可以听到。寿阳被洪水淹没，此段淮河及其下游的城镇、村落几乎无一幸免，全部没入水底，数以十万计的百姓被奔腾的洪水冲入大海。

壮志满怀的浮山堰工程以一幕幕人间悲剧收场。

洪水退后，在八公山上躲避的魏军不慌不忙地回到寿阳城。对他们而言，只是出去躲了四个月洪水而已。但是梁朝军民损失惨重。萧衍为北伐征发的将士、军需全部付诸洪水，顷刻间输得一塌糊涂。从此，他再也不轻言北伐，也北伐不起了。

在南梁专注浮山堰期间，孝武帝元恪在西边也有大动作。他利用梁军主力集中东线，巴蜀地区守备空虚之机，于延昌三年（514年）底任命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军十五万攻打巴蜀。元恪本有把握在四川有所斩获，不想大军还在路上，他自己就在延昌四年

（515年）的正月病逝了。之后，北魏统治层忙于诛杀高肇，西征一事不了了之。其实，经过之前两次惨败的北魏确实也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战场无赢家。无论胜负，各方都要付出沉重的人力和物质损失。互有胜负、持续拉锯的北魏和南梁更是如此。5世纪末和6世纪初的连年鏖战，消耗了南北方巨大的实力，加上各自内部争斗接踵而来，双方把注意力都收回朝堂之上。直至北魏灭亡，南北方沿着淮河一线保持了十多年的短暂和平。客观上，当时的南北方谁都不具备统一的实力。均势的天平，以淮河为支点，基本保持着平衡。

于是，双方任由淮河南北上百里的拉锯地带荒芜着，杂草丛生，虎狼出没……

三

这一次休战，似乎也象征着猛将辈出的南北争雄阶段的结束。元英、韦睿、马仙琕、曹景宗等人没有等到下一次战斗的开始，就陆续逝世了。之后的南北战争，再也没有出现5世纪那样在战场上猛将一抓一大把的盛况。

萧宝夤在北魏的表现，则要长得多。他年少亡国寓居他人屋檐之下，个性低调稳重。其日常生活称得上简单枯燥：不食酒肉，决不嬉笑，不事华服，惨淡见人。萧宝夤对故国南齐念念不忘，志在复国，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敬重。梁武帝萧衍曾手诏劝降萧宝夤，他不为所动。北魏朝廷对萧宝夤也相当不错。萧宝夤屡次请求边任，北魏就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将东线托付给他。萧宝夤在任上，勤于政事，官声不错。北魏还将公主下嫁给萧宝夤。

北魏末年，起义频繁，局势动荡。羌族人莫折大提在关中地区自

称秦王，屡败官军。莫折大提死去，第四子莫折念生自称天子，继续扩张势力，渗透到陇东、雍州等地。萧宝夤是北魏朝廷当时少数可用的将才之一。朝廷任命萧宝夤为大都督，率军西征。萧宝夤在关中与起义军英勇作战多年，遏制了莫折念生势力的壮大。北魏能够保全关中，主要赖萧宝夤之力。

孝昌二年（526年），北魏加封萧宝夤为假大将军、尚书令，将军政两方面的顶端职位都给他了，以示笼络。不想，萧宝夤看到北魏境内烽烟四起，动乱日益蔓延，朝廷衰落不堪，对北魏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同时内心萌生了割据自立的想法。北魏朝廷对他也不是真正信任，加派御史中尉酈道元（就是写《水经注》的那位）为关中大使，监视萧宝夤。萧宝夤感到既委屈不满又恐惧，认定酈道元是来暗算自己的。一些部下也怂恿他在乱世中割据。有人说：“大王本是皇室贵胄（南齐的皇室），天下所归，割据称帝也是合理合情的事情。”有人编造民谣说：“鸢生十子九子殂，一子不殂关中乱。”（萧宝夤是萧鸾之子。）于是，萧宝夤听信劝告，准备造反。他秘密派部将攻杀酈道元。酈道元刚走到今陕西临潼附近的驿站，遭到围攻后，率小部队力战而死。之后，萧宝夤正式称帝，设立百官，遣将四出攻城略地，意图割据关中。一时间，南齐政权似乎要在遥远的长安复活了。可惜，萧宝夤的实力太弱，外有北魏朝廷派军自东向西进剿，内有起义军和陕西郡县抗命。萧宝夤派部将侯终德攻打陕北，侯终德战斗失利后投降北魏，回师反攻萧宝夤。萧宝夤慌乱中迎战，被侯终德打败，只好带着妻子和部下百余骑逃跑，投奔起义军万俟丑奴部。丑奴任命他为太傅。

永安三年（530年），万俟丑奴部起义军被魏军剿灭。丑奴和萧宝夤都成了阶下囚，被押送京城洛阳。北魏庄帝下诏将萧宝夤在京城大街上示众，任由军民人等围观三天后赐死。

二三 亡也太后：胡作非为胡太后



延昌四年（515年），只有6岁的北魏孝明帝元诰登基。显然，朝廷又要出现一个皇权旁落、内讧不断的局面。

北魏版的故事一开头比较特殊。之前，外戚高肇擅权，搞得朝野天怒人怨，成了众矢之的。皇位更替之时，高肇偏偏不在洛阳，被派去攻打四川了。大臣们很快结成了“反高同盟”。朝中做主的是中书监崔光 and 领军将军于忠。他们请出被高肇监视居住的宗室们，壮大力量。任城王元澄、高阳王元雍、清河王元怱、广平王元怀等人都参与决策。大家很快就将高肇送上了西天，开始拨乱反正。

元诰的生母胡氏在元恪期间遭到高肇的无情打压。高肇的女儿高皇后不能生育，在后宫一直想置胡氏于死地。“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群臣当然认为胡氏“政治可靠”，先是尊她为皇太妃，很快升为皇太后，请她临朝听政。

胡太后是陇西安定人，祖辈曾在后秦、大夏当官，到父亲胡国珍时，胡家只是普通人家。胡氏年轻时一度入佛寺为尼，后因为美貌之名传至宫廷，被召入后宫封为低级嫔妃。鲜卑民族入主中原后学习汉族的政治制度，对汉武帝预防后宫专权而赐死太子生母的残酷做法非常欣赏，并且明定为宫廷制度。此后，北魏的妃子们都生活在矛盾之

中。她们既希望生育儿子，因为那是她们将来地位的基础；同时她们又担心生出的孩子日后被选立为太子。那样年轻母亲就要被迫服毒，也就永远享受不到荣华富贵了。胡氏却非常希望生育皇子，没有表现出一丝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是她这种“冒死生子”的气魄得到了宣武帝元恪的好感，元恪在高皇后的高压下亲近胡氏。二人生下了元诩。元诩是元恪唯一的儿子，元恪计划立他为太子。按律，胡氏应该先被处死。但元恪非常喜爱胡氏，赦免了她。从此以后，中国宫廷“子贵母亡”的做法就走入了历史。

当时有传言说元恪的前皇后于氏和其他皇子都被高皇后谋害了，元恪虽半信半疑，但为了留下血脉，对元诩格外爱护。他亲自照料儿子的生活，既不让高皇后过问，也不让胡氏插手，挑选外面忠实可靠又有经验的保姆照顾元诩长大成人。

如今，元诩顺利登基了。北魏帝国先辈担心的太后掌权的局面不幸终于出现了。胡太后的胡作非为，很快将北魏帝国推向了坟墓。由此可见古代历史上一些看似残酷无理的制度是有其合理性在里面的。以宫廷妇人的死来防止皇权的旁落和国家的动荡，是以小代价防范未来的有效选择。

朝臣们很快发现，刚刚抛头露面的胡太后并非恪守妇道的一介女流，而是深谙政坛、手腕高超的权力玩家。推翻高肇的势力，以崔光、于忠领头。崔光是个明哲保身的老官僚，于忠则行为粗暴，掌握了实权。他把持政令，又负责宫廷宿卫，权力极大，重大决策几乎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宗室王爷们被软禁多年刚被放出来，即便对于忠不满，也无力抗衡。结果，于忠表面上尊贵无比，人见人怕，实际上自我孤立了。胡太后瞅准机会，趁于忠疏于防范，当众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将军的职务，外放为冀州刺史。一鸣惊人后，胡太后不等朝臣们看明白她的招式，迅速任命妹夫元叉为侍中、领军将军，并提拔身边宦官刘腾担任卫将军，掌握了实权。她又见清河王元怱英俊潇洒，和元怱勾搭成奸，引元怱为外援控制朝政。元怱背上了“男宠”之名，却

不影响精明勤政的作风，很好地协助胡太后掌控了朝政。北魏进入了胡太后当权时代。

胡太后接手的是一个国势不断下滑、各种矛盾开始显现的帝国。她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对拯救颓势没有尺寸之功，却一心享受。

胡太后佞佛。北魏后期历代帝王都信佛，但胡太后将对佛教的推崇发挥到了极致。也许是早年做过尼姑的缘故，胡太后深信佛教可以赎罪。她大把大把地投资佛寺、助长寺院势力的扩充，希望以此来赎罪孽、积功德。胡太后在洛阳主持兴建了永宁寺、太上公寺等佛教工程。其中永宁寺规模宏大，寺中有一座佛塔，高九十丈，塔上立柱高十丈，离京城百里之遥都能看到；塔四面窗扉上缀满金钉，有风的夜晚，钟铃和鸣，声闻十余里。又铸丈八金佛像一尊，中等金佛像十尊，玉佛像两尊。佛刹上有金宝瓶，瓶下有容露盘30重，周围皆垂以金铎。该寺有僧房多达千间，僧人过万。胡太后还热衷参加佛教活动，大小佛事有空必到，每次都少不了施舍，钱数动辄数以万计。上行下效，地方官府也纷纷兴建佛寺，资助佛事。不用说，这些大小工程和活动，都是官府出钱买单。

官府因佛事而大兴土木、征发无度，百姓疲于徭役之苦，市场上金银价格攀升，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影响了国库和官府的行政能力。官民都不满。任城王元澄看不下去，就劝侄孙媳妇胡太后说“章台丽而楚力衰（春秋时，楚灵王兴建章华宫导致国力衰落），阿宫壮而秦财竭（秦朝亡于阿房宫）”，希望她以史为鉴。元澄辈分高、功劳大、资历老，胡太后惹不起，对他优答礼遇，但就是不采纳意见。时间长了，元澄也懒得说了，干脆闭门不出，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神龟二年（519年），元澄病逝。胡太后加以殊礼，备九锡，以帝王之礼安葬了这位经历四朝的老王爷。她亲自送灵柩到郊外，停輿悲哭，哀动左右。百官千余人参加葬礼，莫不歔歔。这一系列哀荣过后，北魏帝国再也没有出现像元澄那代人一样忠勇能干的人物，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劝谏了。

就在元澄病逝的这一年，朝廷采纳征西将军张彝之子张仲瑀的建议，宣布改革人事制度，武人不得担任清要的官职。北魏以武力兴国，之初文武官职划分并不明确，官员在文武官职之间调动很自然。汉化之后，“文武分治”开始固定，文官序列开始压过武将序列。官职开始分“清浊”，文官职位比较清要，发展前途广阔；武将职位升转调任不易。渐渐地，朝野出现重文轻武的趋势，文官轻视武将。张仲瑀的建议，就是在制度上将对武将的歧视固定化了。消息传出，洛阳城中驻扎的羽林、虎贲将士们（都属于禁卫军）一片哗然。他们在街上定期集会，张贴告示，宣称要杀张氏全家。张彝父子认为是武士们虚声恫吓，不以为意。二月二十日，近千名羽林、虎贲在尚书省（最高行政机关）前大闹大骂，指名要找张仲瑀之兄张始均。尚书省的大小官吏吓得紧闭大门，不敢进出，同时也没有其他官吏赶来处理这场群体性事件。事情越闹越大，将士们开始用砖瓦石块砸尚书省大门，砸了好一会后又向张家奔去。他们一路上拾取柴草，收集木棒石块，冲到张家就四处打砸，好点燃火堆要烧房子。征西将军张彝被拖到堂下，任意打骂；张始均已爬墙逃到外面，见状返回向乱党叩头，哀求将士们饶父亲性命，竟被抓起来丢到火里活活烧死。始作俑者张仲瑀被打得身受重伤，侥幸逃脱。张彝被打得奄奄一息，两天后不治身亡。事后，胡太后只将为为首的八人斩首了事，其余人等一概不问，充分暴露出姑息徭糊的作风。更恶劣的是，胡太后取消了已经颁布的禁止武人到任清要官职的制度，下诏大赦，宣布准许武官参选。

这次禁卫军闹事，朝廷有关部门毫无作为，事后胡太后轻描淡写，实际上屈从了闹事者。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不仅洛阳的禁卫军不念胡太后的好，还让有识之士捕捉到了天下将乱的征兆。

事件发生时，一个叫做高欢的北方军镇信使，因传递文件恰好滞留洛阳，目睹了整场事件。他断定天下将乱，返回军镇后散尽钱财结交朋友。亲朋好友好奇地问他，高欢回答：“我在洛阳看到禁卫官兵焚烧将军宅邸，朝廷怕出事而不闻不问。为政如此，政府的前途可想而知。

知。天下都要乱了，财物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在高欢结交的朋友中，多数是和他一样的低级军官，比如司马子如、孙腾、侯景等人。这些人将在此后掀起惊涛骇浪。

二

事变的第二年（神龟三年，520年），洛阳就爆发了内讧。掌权的元叉、刘腾发动政变，杀死清河王元怱，幽禁了胡太后。

昔日的亲密伙伴和亲戚，怎么就刀兵相见了呢？原来，胡太后越来越喜欢元怱这个美男子，日益倚重，用他辅政。元叉、刘腾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元怱很有才干，平日常常批评元叉、刘腾违法乱纪的行为。元叉、刘腾二人就恨上了元怱，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先是指使他人告发有人要拥立清河王元怱做皇帝，可是胡太后压根就不信这样的诬告。元叉、刘腾知道只要胡太后在就扳不倒元怱，于是他们决定利用11岁的小皇帝元珙，将胡太后和元怱一块扳倒。

二人先买通主食中黄门（管皇帝食物的宦官），由他向元珙“自首”：“清河王收买小人，要毒死陛下。”元珙信以为真。他慢慢长大，开始对元怱和母亲的“丑事”看不下去了，知道元怱要害自己后更是气愤。元叉、刘腾趁机靠近小皇帝，为他出谋划策，教他如何这般这般。七月的一天，元叉突然请出孝明帝元珙升殿召见群臣，刘腾关上后宫大门把胡太后软禁起来。清河王元怱随着大臣们进宫，立即被抓起来。刘腾宣布诏书，宣布元怱谋反。当晚，元怱即被杀害。元叉、刘腾又假造胡太后诏书，说她因病不能理事，还政给皇帝。群臣在错愕之余，都不敢反对。元叉、刘腾戏剧性登台掌权了。

此后几年，大小政事都由元叉与刘腾二人决定。元叉及其父亲、京兆王元继贪财好货，一味敛财。刺史、太守到县令、县长，绝大部分官职都可以用钱购买。北魏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对老百姓的压迫也

到了极点。而刘腾想干事，有权谋，就以太监之身出任司空，每天对中央各部门发号施令。整个朝廷唯他马首是瞻。在宫廷内，刘腾十分注意囚禁胡太后。内宫宫门紧闭，钥匙由刘腾亲自掌握，即便是皇帝元诩也不能进去看母亲。胡太后终日幽居深宫，很少有人过问，甚至有时缺衣少食，生活在饥寒之中。

正光四年（523年），刘腾死了。刘腾死后，对胡太后的囚禁开始松弛。小皇帝元诩可以去探望胡太后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北方六镇起义开始爆发，天下局势开始动荡。朝野对元叉等人的专权、贪腐纷纷表示不满。这些因素都便于胡太后东山再起。正光五年（524年）秋天，胡太后趁着儿子和群臣来探望自己，发脾气说：“你们不准我们母子往来，防我像防贼一样，我待在这里做什么！我决意出家，去嵩山当尼姑。”说着，她就动手剪起头发。元诩和大臣们叩头劝阻，胡太后反而闹得更凶了。元叉见状，居然不疑心，答应胡太后、元诩母子可以自由往来。胡太后因此留元诩在身边住了好几天，逐渐挽回了儿子的好感，把小皇帝在之后的争斗中拉到自己的一边。

正光六年（525年）二月，胡太后和孝明帝元诩出游洛水。途中，高阳王元雍邀请太后和皇上到他家中。三人秘密商定共同对付元叉。元叉兼任着领军将军一职，指挥着禁卫军，让政敌忌惮三分。好在元叉政治迟钝又麻痹大意，胡太后选了个机会对元叉说：“你既然忠于朝廷，操心国事，为什么不解除领军一职，集中精力辅政？”元叉听了这话，还是不起疑心，竟然乖乖请求卸任领军将军。胡太后求之不得，当然“恩准”。兵权一没，胡太后马上动手。四月初二，胡太后宣布重新临朝摄政，下诏追削刘腾官爵，免掉元叉一切官职。有人随即上书为清河王元怱申冤，又有人告发元叉勾结六镇、阴谋造反，结果元叉被赐死，其父元继被废黜。

胡太后过了四五年苦日子后，重操权柄。她此时面临的局面，比上一次掌权时更恶劣、更危急。北方六镇起义导致的造反活动愈演愈烈，南方梁朝趁火打劫，连年骚扰边界，攻克了北魏寿阳等数十座军

镇。胡太后非但不奋发图强、收拾残局，依旧贪图享受。她自欺欺人，在朝堂上闻喜不听忧。上下官僚就都向胡太后汇报北魏境内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对日益壮大的造反队伍，他们轻描淡写地说是少数盗贼骚动，很快就会被地方官吏肃清。胡太后就生活在虚假的保温箱、无菌室中，浑然不知所作所为助长了造反者的气焰、恶化了局势。

胡太后似乎要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爱上了化妆打扮，纵情声色，蓄养男宠。她之前就与父亲胡国珍的属员郑俨相好，再次临朝后任命郑俨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又让他兼任尝食典御一职，经常留在宫里淫乱。中书舍人徐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小人，看到郑俨得势，就委身投靠。郑俨见他才有才有谋，遇事可以商量，也真心与他结为一党。郑俨很快升到中书令、车骑将军。而徐纥升为黄门侍郎，仍兼舍人，实际把持了帝国政令。

胡太后、郑俨、徐纥等人对一些日常性的政务也没有正确的理解，举止失措。比如胡太后对“文武分治”趋势无动于衷，对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没有任何预期，自然谈不上改正了。结果，作为王朝暴力支柱的军队，和胡太后离心离德。又比如，胡太后等人轻视世族大家，侵犯他们的既得利益，招致豪门大族的愤怒。胡太后为儿子元 诩选妃。北方大家族，比如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瓚等，都送女儿参选。这些大家闺秀都入选了，可是都只被封为低级嫔妃（世妇），让各大豪门觉得颜面尽失。

正史很不客气地说胡太后掌权期间，“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婪。郑俨污乱宫掖，势倾海内；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一二年中，位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厌秽”。政治黑暗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

二四 北魏社会分裂了



时隔一百多年后，洛阳城中又出现了“斗富大赛”。这次的主角不是西晋的王公显贵，换成了北魏的统治阶层。

高阳王元雍是孝文帝的弟弟，长期位列宰辅，财富堪比皇帝。高阳王王府的园林和皇帝的宫殿差不多，“飞第檐反宇，轺辅周通”，摆设奢华，“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元雍家中“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传说中的蛇珠，是稀世之物）照日，罗衣从风”。他身边常随虎贲甲士百人，打着用鸟羽装饰的伞，“出则随从唱道，仪仗成行，铙歌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霄尽月”，称得上“贵极人臣，富兼山海”，“从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做一个比较，元雍吃一顿饭，怎么也得花数万钱，相当于一般官宦家庭一年的伙食费。大臣李崇和元雍财富不相上下，但很吝啬，估计家中伙食费很省。他对人说：“高阳王的一顿饭，要顶我一千天呢！”

问题是：高阳王这么多钱，是哪来的？答案是：贪污腐败，巧取豪夺而来。

元雍揽财的具体手段，后人不得而知。但与他同时期的河间王元琛的所作所为，足可以让后人大大开眼界。宣武帝时期，元琛担任定州

刺史，任上以贪婪而闻名，任满回京时大车小车载着金银珠宝往家里拉，轰动一时。胡太后知道了，说他：“元琛在定州做官，就差没把中山宫搬回来，其余没有不弄到手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再用！”于是把他废置在家。后来，元琛拿出一部分钱行贿刘腾，又做了秦州刺史。秦州近西域，元琛在任上政绩全无，却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求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此外，元琛还有能跑七百里的良马十余匹。他有工夫给每匹马都取名字，就是没时间操心政务。

元琛回到洛阳，看到大家都在羡慕元雍的富有，很不服气，暗中与元雍比富。他高调地在家陈设珍玩、车马和不可胜数的金银珠宝，其中有金瓶、银瓮百余口，以金为辔头，用银槽喂马，总之是怎么奢华就怎么做。他还发挥自己在秦州做官的优势，摆满西域珍品，都是中原没有的稀世之物。河间王府房屋的华美就更不用说了，窗户上装饰着用黄金做的飞龙、美玉做的凤凰，房前遍栽各种果树，条枝入檐，人们坐在楼上就能摘食。

元琛故意动不动就邀请宗室、贵族、大臣到家里宴会，请客时专用从异域买来的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每一件都工艺精致，出奇的华丽。他还喜欢请宾客参观家里堆满金银绸缎的府库，炫耀令人眼花缭乱的羊毛毯、蜀锦、珠玑、绣纈、绢丝彩、越葛等，四方珍品应有尽有。一次，章武王元融应邀到元琛府上做客。元琛对元融说：“我不恨没看到石崇的富有，只恨石崇没看到我的富有。”元融也是巨富，可依然在元琛家里大受刺激，忌妒坏了。他把自己的动产、不动产算来算去，都比不上元琛的财产多。元融为此气得卧床不起，三天三夜起不了床。京兆王元继去探望他，安慰道：“章武王，你的财富并不比元琛少多少，就不要妒忌他了。”元融说：“我之前以为在‘北魏富豪排行榜’上我能排第二名，仅次于元雍，没想到元琛也在我上面，我只能居第三，真是气死我了！”

一百多年前西晋富豪斗富的时候，晋武帝司马炎还插手相助。胡太后在这一点上不偏不倚，对所有“参赛选手”都公平对待。一次，胡

太后领着群臣巡查后宫，看到后宫库存的布帛太多，有的已经发生霉变，有的因无处堆放，只好在门廊边堆着。她便对大臣们说要奖赏有功之臣，后宫的布帛谁能拿多少就能拿走多少。众人一听，争先恐后地冲上去抢夺布帛。一百多人拼命地搬取，有人卷走一百多匹，而尚书令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干脆背，每人都背了近二百匹，结果没走多远，元融就跌倒在地，扭伤了脚，李崇则扭伤了腰。

斗富行为恶化了朝廷风气。官吏们一心向“钱”看，变着法子地敛财。正始三年（506年），吏部尚书元晖公开标价卖官：太守大郡两千匹绢，次郡一千匹绢，下郡五百匹绢；其他官职也按等级不同，售价不同。元修义做吏部尚书时，上党太守出缺，中散大夫高居向皇帝请求补缺，皇帝答应了。但元修义已经把上党太守“卖”给别人了，就是不让高居去上任。高居急得在公堂上大喊：“有贼！”有人问他：“光天化日，哪来的贼？”高居指着元修义说：“就是坐在堂上的人。皇上已答应我担任上党太守，但因为收受了别人的贿赂，就不听皇帝命令，不让我上任，这难道不是白日行劫吗？”卖官鬻爵严重冲击了官场的正常秩序，加上官多职少，大量人员升职无望，甚至有当官资格却补不上缺。为解决矛盾，崔亮担任吏部尚书时，奏请“停年格”，即不问官员才能，一律按照资历来决定当官和升官的先后；凡有空缺职位，不问贤愚，择资历老的人优先叙用。这种机械又不负责任的人事改革，竟然得到了上下的一致称赞——毕竟这是最客观，也相对公平的方法。

贵族官僚在斗富，北魏的普通百姓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赤贫生活。此外，他们还要供官府驱使劳动，妻离子散，终年得不到休息。愤怒在百姓心底堆积，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喷发出来！

北魏的外敌，除了南朝，还有北方的柔然。

柔然最强盛的时候，势力东起大兴安岭，南到黄河河套和山西北部，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北至今贝加尔湖，大致上囊括了现在的蒙古高原、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柔然拥有“风驰鸟赴，倏来忽往”的骑兵队伍，威震漠北，几乎年年侵扰北魏边境。北魏伟大的皇帝、太武帝拓跋焘登基之初，柔然曾南下侵略，将太武帝包围了五十多重。也就是在太武帝时期，北魏取得了对柔然战争的多次胜利，柔然元气大伤，对北魏的威胁降低。太武帝拓跋焘将柔然称为“蠕蠕”，嘲讽柔然智力低下，是不会思考的虫子，他下令全国军民都对柔然改称“蠕蠕”。

此后，柔然虽然开始没落，但还保留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对北魏构成威胁。为防御柔然、拱卫京都平城（平城离北方边境不远），北魏积极防御，修筑长城，在东起河北，西至黄河河套地区，延袤两千余里的边境线上设置军镇，调兵遣将驻守。北魏设立了六大军镇，称为“六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

初期，北魏朝野非常重视六镇。六镇的将领都从北魏贵族豪强，甚至是宗室子弟中挑选；官兵也是鲜卑族的精壮。他们地位崇高，待遇优厚，经常能得到朝廷的封赏和恩赐。六镇将领被视为“国之肺腑”，升迁的机会比内地的同僚要高，如果不愿意继续任职随时可以返回首都当京官；士兵们被视为“国家精锐”，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在一片尚武的风气中可以耀武扬威地驰骋四方。女子们都以能嫁给六镇的边将和士兵为荣。

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大规模汉化后，六镇官兵的待遇完全逆转。柔然对洛阳的威胁极少，且汉化后国家崇文轻武，政坛上游戏规则也变了。过去在疆场上的英勇斩杀不再被人称道，汉族的诗书礼乐和朝堂

上的权力斗争变成了游戏的核心规则。六镇的政治、军事地位不断降低。边将们在汉化改革过程中被“抛弃”了，同样是拓跋族宗室和鲜卑贵族的他们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一般军官也被排斥在“清流”之外，他们的升迁和待遇远远落后于内地的同族、同僚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用指望升迁到内地去了。当时只有六镇还保留着“镇”的特殊行政区划，其他地区都奉行州县制，六镇被视为另类。洛阳的贵族们将边将看做鄙夷的粗俗军人，傲慢得很。一般人也将去六镇视做畏途。

至于士兵们，特权没有了，优厚待遇也没有了，连吃穿都失去了保障，只好转而聚敛钱财。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的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辛辛苦苦一整年收入微不足道。更可悲的是，许多士兵拖家带口，常年滞留边镇，生活困难且得不到改善，类似于流放。运气好的士兵，从军一辈子可以做到军主，其他人就只能老死边关了。鲜卑精壮和汉族地主子弟自然不愿意再去边镇当兵，朝廷就把犯官、囚犯、流民等人发配到六镇去补充缺额，后者最后成了六镇军官和士兵的主要成分。

值得欣慰的是，六镇的军队因为战斗频仍、行政特殊，汉化潮流并没有涌动到这一区域。相反，六镇的汉人反过来被鲜卑化、胡化了，不读书不耕种，也跨马横刀，还改姓鲜卑姓氏。官兵们保留了草原民族骁勇善战的作风，战斗力较强。

几十年间，六镇官兵从天堂跌入了地狱、从光荣的国家栋梁变成了羞耻的监狱苦役。被背叛、被忽视的情绪和怨恨、迫切希望改善处境的想法，充斥在六镇之中。

北魏内部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汉化区域，面积广大，以农耕文化为主。统治的鲜卑人经过汉化提高了文明程度，可也沾染了汉族柔弱、内斗和中庸等等特性；一个是以六镇为核心的北方区域，面积狭长，笼罩在这一个区域的北方，以草原文

化为主。两个区域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交流越来越少。可怕的是，双方相互仇视，隔阂日益深重。这是非常危险的。（内地和六镇的对立又和北魏内部早已有之的“文武分治”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洛阳的禁卫官兵虽然境遇比六镇官兵要好许多，但也日益边缘化，和文官集团及朝廷离心离德。他们在感情上倾向边镇官兵。）

任城王元澄就向胡太后指出：北方边将的地位越来越轻，恐怕对御敌固边不利，进而危及社稷，请求朝廷严格挑选边将，整顿六镇军队。大臣李崇则进一步指出：取消六镇军民一体的特殊政区，像内地一样划分为州县，同时进行汉化改革，与内地一视同仁。胡太后对这些意见一律束之高阁，不闻不问。

胡太后的精力正放在建造佛教石窟上。现存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胡太后主导的杰作。石窟在洛阳南十二公里、洛水边的龙门悬崖上，其中的佛像浮雕难以确数，有数万个之多。这些鬼斧神工之作是胡太后倾全国之力的宏大工程，主要完成于5世纪90年代北魏迁都之后的三十年间。这三十年之后，北魏帝国迅速走上了衰亡之路……

二五 六镇起义：大动乱中的小人物



北魏末期的一项人事任命，激发了一场掏空帝国的大起义。

在宣武朝有“突出表现”的将领于忠有个弟弟于景。于景在武卫将军任上秘密筹划推翻专权的元叉，事情败露后元叉“客气”地留了于景一条性命，只是将他调任怀荒镇去守边关。于景做镇将，一肚子不满意，将怨气发泄到了官兵身上。我们知道，六镇官兵的待遇每况愈下，已经怨声载道了，于景一来，怀荒的“干群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正光四年（523年），柔然攻掠边境，于景组织怀荒镇军民抵抗。官兵们一直吃不饱肚子，此时就请求于景发粮，让大伙填饱肚子有力气打仗。于景用一贯的粗暴态度断然拒绝，愤恨的官兵们一哄而上，将于景杀死，然后干脆宣布造反。

怀荒镇的造反是一起突发性群体事件，事前缺乏严密的组织，事后没有计划，没有什么大动作。但是它激发了六镇官兵埋藏已久的怒吼，在怀荒镇造反以后，其他北方边关纷纷揭竿而起。不仅沃野、高平、怀朔、柔玄各军镇造反了，秦州（今甘肃天水）、营州（今辽宁朝阳）等地方州县也旗帜变换、人头落地。就连在如今河南地区的北魏南方边界北荆、西荆、西郢三个州也出现了内战烽火。几个月时

间，怀荒的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的熊熊烈焰。

这些造反组织首领不是称帝就是称王，著名的有：秦州的羌族兵士莫折大提起兵称王，他死后儿子莫折念生进而称帝，动摇了北魏在关中地区的统治；孝昌元年（525年），柔玄镇士兵杜洛周在上谷（今北京延庆）起兵，队伍发展迅速，很快拥兵近十万，使得长城东段不再在北魏控制之下。其中实力最强、对北魏威胁最大的是匈奴人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是姓，拔陵是名）的队伍。沃野镇的官兵在破六韩拔陵的率领下杀死镇将，起兵造反，年号真王，得到长城中西部各镇军民的响应。破六韩拔陵不满足于在边关割据，很快整军向东、向南前进，摆出一副要与北魏争夺天下的态势。他的军队很快东进到怀朔、武川两镇。怀朔镇很快被攻克，破六韩拔陵的部队在武川镇则受到了挫折。

武川镇还有一些不愿意附和造反的官兵。其中有的人是依然忠于北魏朝廷，有的人是不看好造反的前途，有的人是想过安稳的日子，只要日子还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他们都不想动刀动枪，拿命去赌虚缈的蓝图。这样的人在武川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当其他各镇都起义后，武川却没有动静。破六韩拔陵的部将卫可孤很快兵临武川城下。城里很多军民逃跑了，剩下的军民就商议抵抗，形成了以军主（队长）贺拔度拔和低级军官（一说士兵）宇文肱两个人为核心的骨干力量。

贺拔度拔是敕勒族人，世代在武川镇当兵。他有三个儿子，分别是贺拔允、贺拔胜和贺拔岳，都勇猛过人，能左右开弓。其中小儿子贺拔岳尤其出色，贺拔度拔早年曾勒紧裤腰带支持小儿子去洛阳太学读过书，称得上文武双全。

宇文肱是鲜卑族宇文部落人。宇文部落被拓拔部落打败后，很多人被安置在北方边镇从军。宇文肱家也是世代在武川镇当兵，他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宇文颢、宇文连、宇文洛生、宇文泰。巧的是，宇文

家的四个儿子也是勇猛过人。宇文肱最喜欢的是小儿子宇文泰。宇文泰，小名黑獭，出生于507年，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也不得不和父兄们一道持刀搭弓，上阵迎敌。

敌我实力相差悬殊，贺拔度拔、宇文肱等人觉得困守武川镇只会坐以待毙，只有出其不意对破六韩拔陵的部队发动突袭才有可能侥幸取胜。于是，两个人带上儿子和少数人，埋伏在卫可孤必经的道路上。突袭开始了！贺拔家的小儿子贺拔岳一箭就射中卫可孤的肩膀，宇文肱带着儿子冲杀过去，将卫可孤杀死。虽然旗开得胜，无奈敌军人数实在太多，贺拔度拔、宇文肱等人很快就陷入了重围。宇文颢看到父亲宇文肱被敌兵层层围困，奋勇杀入重围，所向披靡，一连杀死了数十名敌兵，救出父亲。不幸的是，宇文颢在撤退时，精疲力竭，被敌人追上杀死。他们的突袭失败了，武川还是被起义军占领了。

宇文肱、贺拔度拔摆脱敌人后，会合一处，商议出路。他们决定原地休整，同时派贺拔度拔的次子贺拔胜赶往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向驻扎在该处的北魏官军通报袭杀卫可孤的消息，同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贺拔胜刚走，一队造反的敕勒族骑兵席卷而来。贺拔度拔、宇文肱这支残军猝不及防，贺拔度拔战死，其余人马失散。贺拔度拔的另两个儿子贺拔允、贺拔岳南下五原，追赶贺拔胜去了。宇文肱则带着三个儿子向东逃，前往河北讨生活……

二

北魏对破六韩拔陵的壮大忧心忡忡，调兵遣将要把他消灭掉。正光五年（524年），临淮王元彧、安北将军李叔仁先后被破六韩拔陵打败。政府军非但没能消灭起义，反而给起义军送去了大批军械、兵源，把造反者“喂养”得越来越大。三朝老臣李崇之前提出过将六镇改为州县、未雨绸缪的建议，朝廷如今赶紧宣布将六镇改为州县，使军

民、将领待遇与内地相同。可起义已经发生，造反者不会因为这个迟到的改革而束手投降。朝廷又加派李崇去征讨起义军。可怜李崇已经70岁了，虽然有心杀敌，可也无力上阵，所能做的就是勉强阻挡起义军南下而已。不久，广阳王元渊上表弹劾李崇军中长史诈增功级、盗没军资，李崇因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去官爵。朝廷改派元渊率领主力，进驻五原。

在关中地区，北魏朝廷信任降将萧宝夤，授权他征讨四方。孝昌元年（525年），萧宝夤在马嵬（今陕西兴平西）大破莫折念生。但是北魏军队军纪太差，大肆掳掠城池，还抓民居来当奴婢，把老百姓都逼到造反者阵营去了。莫折念生战场失利，在人心上却大获全胜。在安定，萧宝夤和造反的万俟丑奴的部队又打了一仗。这一仗，魏军已经打胜了，却急于掳掠，自乱阵脚，遭到起义军反扑，大败而逃。魏军勇将崔延伯在此战中阵亡。崔延伯英勇无敌，萧宝夤将他倚为左膀右臂。他死后，魏军士气大受打击。

关中两军拉锯时，接任魏军主帅的广阳王元渊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他主动联络宿敌柔然，和柔然君主阿那瑰结成了镇压六镇起义的联盟。北魏设置六镇，本为防范柔然，如今却和柔然结盟来进攻六镇，真是讽刺。柔然出兵十万，在从武川到沃野的广阔战线上对起义军发动进攻。破六韩拔陵面临阿那瑰和元渊的南北夹击，抵挡不住。起义军二十多万人遭到元渊包围而投降。起义军主力失败，破六韩拔陵不知所踪。

这场胜利大大缓解了北魏的危急境况。朝廷收复多处重镇，为防止军民降而复叛，将几十万人口迁徙到内地，安置在现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这些百姓就被称为“降户”。他们都是六镇贫苦的百姓和士兵，刚刚经历了一场动乱的洗礼，如今又不得不背井离乡，被逼迫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官府只负责迁徙降户，却不提供安置和帮助，造成降户们在河北衣食无着，寄人篱下，陷入赤贫境地。原本起义只是在六镇边关暴发，范围有限，北魏此举无异于将六镇的怒火引

到了华北。降户们走到哪里，就迅速和当地的不满势力相融合，到处播撒反叛的种子。元渊眼睁睁看着朝廷移民，悲愤地感叹，几年征战成果就要付之东流了！

果然，第二年（孝昌二年，526年）降户鲜于修礼（丁零族人，原为怀朔镇兵）率流民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兵。河北各地的降户马上响应，在河北游荡多时的宇文肱父子四人也参加了起义；原本没被彻底镇压的杜洛周在北方死灰复燃，和鲜于修礼南北呼应。

鲜于修礼率军进攻定州。魏军都督杨津闻讯，抢先进入定州抵抗。针对起义军多是乌合之众的特点，杨津等起义军冲到城下后，突然大开城门，主动出击。起义军始料不及，被冲杀得七零八落，溃散而逃。宇文肱和次子宇文连不幸死在定州城下。宇文洛生、宇文泰两兄弟则含悲随大军南撤到了呼沱河畔（今河北正定一带）。北魏朝廷加派扬州刺史长孙稚和河间王元琛北上，想趁机彻底解决新败的鲜于修礼。结果，鲜于修礼没被剿灭，长孙稚和元琛却被打得稀里哗啦。大队魏军成了起义军的“运输队”，送来了大批军械、粮草。起义军败中求胜，迅速壮大为十万人的队伍。

鲜于修礼队伍起来后，内部矛盾也爆发了。部将元洪业想要降魏，杀死鲜于修礼。另一个部将葛荣原本是怀朔镇的镇将，出身鲜卑贵族，按说应该附和元洪业，却不愿意投降，杀了元洪业，被起义部众推为新领袖。

葛荣的军事能力远在士兵出身的鲜于修礼等人之上。他继任领袖后，整顿起义军，提升战斗力，和政府军展开了激战，接连斩杀章武王元融、广阳王元渊、河间王元琛，声势大涨。其中，元渊之前镇压了破六韩拔陵，在六镇降户中威望很高。他的死，大大激励了降户的士气。葛荣乘胜称帝，建立了齐国。六镇余众、底层百姓不断归附，起义军日益增多，号称有百万之众。当时已经降附杜洛周的高欢，就

南下投靠了葛荣。日后在政坛上叱咤一时的高欢集团、宇文集团的许多人，当时都汇聚在葛荣的队伍中。不过，葛荣起义军毫无纪律和长远规划可言，占领一地后不从事建设，却到处屠杀掳掠，甚至上演了屠城的惨剧。他们劫掠一地后，就裹胁着物资、粮食前往下一个地方，老是“在路上”，所以注定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固定的政权。

在关中，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万俟丑奴被各路起义军推举为新首领。万俟丑奴的部队气势高涨，将魏军压缩在少数据点。萧宝夤迷茫无所出路，索性在长安称帝，在北方复辟了南齐。关中的局势急转直下。

三

隐藏在六镇大动荡中的年轻人高欢，需要额外的关注。透过他的经历，后人能更好地理解六镇起义前后的历史。

高欢于495年生于怀朔镇。发迹后，他说怀朔高家出自渤海高氏，是北方汉族豪门之后，并攀附上西晋玄菟太守高隐为六世祖、北魏右将军高湖为三世祖。这极可能是高欢自我贴金的谎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动荡不安，世族大家们的谱牒管理不严，亲属迁徙频繁，因此经常出现冒认现象。客观上，各大家族为了在乱世立足，同姓之间特别团结。他们对家世血缘也不严格讲求，甚至出现同姓之人萍水相逢就认亲的举动。渤海高氏应该很欢迎高欢这样的风云人物“认祖归宗”。

可事实上，高欢只是一个怎么看都像是个鲜卑人的怀朔镇的草民，生活在帝国的最底层。在他使用“高欢”这个名字之前，人们都叫他鲜卑名字“贺六浑”。祖辈的福荫一点都没有惠及他。高欢日后解释说，祖父、北魏侍御史高谧因犯法被迁居到怀朔镇，所以高家长期居住边陲，沾染了胡人聚居区的习俗，从语言到习俗逐渐与鲜卑人没有

什么差别了。高谧生子高树，高树生下了高欢。

日后被追封为“文穆皇帝”的高树其实是一个生活非常潦倒的父亲（正史的说法是“不事生产”），除了似乎短暂当过底层士兵就没有其他的经历可查了。他连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都提供不了给儿子。高欢年幼时，生母韩氏去世。高家的生活更加混乱。幸亏高欢的姐姐已经嫁给了镇上的狱官尉景，高树就把高欢送给女儿、女婿抚养。高欢就是在姐夫家长大的。摆在他面前最现实、最稳妥的职业就是当兵，扛枪吃粮。当时，六镇士兵都被要求自备武装。高欢想当骑兵，当骑兵就要自带马匹、装甲。可是姐夫家很穷，除了一杆长矛其他都提供不起，高欢就只好扛着长矛入伍，当了一名看守城墙的无名小卒。

高欢长得一表人才，唇红齿白，长头高颧骨，尤其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这样的帅哥杵在城墙上非常醒目。一天，怀朔富户娄家的小姐娄昭君路过，看到在城墙之上的高欢，一见钟情，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这才是我要嫁的丈夫！”女有情男有意，两人很快谈婚论嫁起来。可惜，娄家的长辈实在看不出士兵高欢有什么前途，就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彩礼要求，想逼退高欢。娄昭君就暗地偷出家里的金银财物，搬到高欢家。高欢转手送回娄家，当做彩礼。二人终结良缘，谱写了一曲千古佳话。娄昭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内助。她顾全大局，为了丈夫的事业能够委曲求全。娄昭君是高欢的发妻，高欢日后发达后也应该立她为正室。但高欢为了与柔然缓和关系，需要娶柔然公主为妻。高欢觉得过意不去，犹豫着要不要这么做。娄昭君知道后，以丈夫事业为重，主动劝高欢不要迟疑。高欢娶柔然公主为正妻后，娄昭君主动腾出正室，让高欢合婚。

娶妻成家后，高欢在娄家的支持下置办了马匹、装备，在怀朔镇当上了一名队主（小队长），不久又升为函使，负责在怀朔和洛阳之间往来传递信函。也就是在这个职位上，高欢目睹了洛阳禁卫军的骚乱事件，判定北魏将乱，早早做起了结交豪杰、迎接乱世的准备。在他结交的同乡和底层官兵中，最有名的就是几十年后把江南搅得一塌

糊涂的侯景。侯景比高欢小八岁，是世居怀朔已经鲜卑化的羯族人，从小顽劣不羁，没人敢惹，但是和高欢能对上脾气。侯景身高不满七尺，而且左脚生有肉瘤，连路都走不稳，但却擅长骑射，膂力过人，因此被军队特招入伍，逐步提升为功曹史、外兵史等小官职，算是高欢的同事。高欢、侯景等人是六镇中的不安定分子。和大多数为生活而挣扎又温良内敛、排斥动乱的同胞不同，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大动荡是巨大的机遇。

但是在风暴来临之前，高欢只能继续待在社会底层，做一名贫困低微的小军官。一次，高欢去洛阳公干。洛阳令史麻祥送给他一块肉吃。高欢谢过之后，坐下就吃了起来。麻祥认为高欢胆敢坐在自己面前吃肉，而不是谦卑地站着吃，是轻慢自己，竟然把高欢捆绑起来，鞭笞了四十下（可见当时六镇官兵地位之低）。高欢背无完肤，踉踉跄跄地回到怀朔，伤口都流脓腐烂了，娄昭君心疼地昼夜服侍。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看低高欢，时任怀朔的镇将段长对高欢说：“你有康济时世的才能！我老了，活不到你发达的时候了。希望你日后富贵了，多多照顾我的子孙啊。”段长的这般话可能对很多年轻军官都说过，也可能是对高欢特别的欣赏，但是高欢将它看做对自己的高度评价和巨大鼓励，一生不忘。高欢掌国后，追赠段长为司空，并提拔段长的儿子段宁为官。期间，高欢做了六年函使，常年奔忙在北方各地，进出洛阳，逐渐开阔了眼界。

六镇起义爆发后，怀朔镇没有出现叱咤一时的领袖人物。当地的起义形势不太火热，高欢就和同伴尉景、段荣、孙腾、侯景等人在孝昌元年（525年）投到杜洛周麾下。他们不是讨生活去的，而是寻找飞黄腾达的机会去的。可是，高欢发现杜洛周并不是一个能够称王称霸的领导。既然领导没能耐，高欢就琢磨着取而代之，夺权自己干。杜洛周提前发觉夺权计划了，派兵捕杀高欢等人。高欢只好拖家带口地逃亡。他骑着家里唯一的马，娄昭君抱着儿子高澄和女儿骑在牛上，跟在后面。后有追兵，牛又跑不快，高欢心焦地骑一段路，就停

马等妻儿跟上来。小儿子高澄途中几次落牛，高欢心急如焚，最后搭弓要射死儿子，吓得娄昭君在牛上大喊大叫。高欢弓都拉开了，随后逃亡的段荣及时赶到，将高澄救起，和高欢一家一同脱身。

离了杜洛周后，高欢等人投奔如日中天的葛荣。但是，高欢看到葛荣也不是能成大事的领袖，毅然脱离葛荣，带着一帮子人西投尔朱荣。

尔朱荣是羯族人，和十六国后赵的石勒是同族。尔朱荣的部落投降拓跋鲜卑较早，被安置在秀容（今山西忻州），就在此繁衍生息。尔朱荣家族世代为酋长，稳步积累实力，到北魏末年已经发展在牛马漫山遍野，依照毛色不同放牧在不同山区的地步了。六镇起义带动华北地方动乱不止，尔朱荣趁机散家财“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组织起数千人的骑兵队伍与起义军为敌。短短几年中，尔朱荣是北魏朝廷稳定山西地区的主要依靠力量。朝廷虽然对尔朱荣有戒心，但不得不任命他为大都督，负责山西事务。尔朱荣就以晋阳（山西太原）为老巢，建立了根据地。

高欢的旧相识刘贵早已投入尔朱荣麾下，竭力向他推荐高欢。不过尔朱荣看到高欢时，正是高欢两经流亡、形容憔悴的时候。尔朱荣对高欢的“尊荣”大失所望，没有重用他，只是安排他干些杂活。一次，尔朱荣在马厩里看到一批暴烈的劣马，想测测高欢的本事，就叫他去修理马鬃。不想，高欢是驯马高手，很快就把劣马修理得焕然一新、容光焕发，完成任务后高欢还对尔朱荣说：“驭人同养马是一样的道理。”尔朱荣对他刮目相看，拉他谈论时事。两人越谈越投机，从中午一直聊到半夜才歇。高欢建议尔朱荣：“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宠臣专权，朝政不行。明公雄才武略，乘时清帝侧，霸业举鞭可成。”高欢建议尔朱荣乘朝政大乱的时候起兵，推翻北魏朝廷自立。这个建议正中尔朱荣下怀，令他重视起高欢来，让高欢参与军政大事。高欢这帮人，也就将前途绑到了尔朱荣的战车上了。

二六 河阴之变I：大屠杀是如何酿成的

胡太后第二次临朝后，和儿子元诩的关系很快恶化。元诩年纪越来越大，不甘心做有名无实的君主，又对母亲淫乱宫廷很厌恶。他想培养亲信，可胡太后不希望儿子有所作为，找个机会将儿子的亲信都杀死了。母子俩的关系越来越坏。

武泰元年（528年），元诩的妃子生下一个女儿。胡太后竟然宣称生了一位皇子，还大赦天下——元诩没有儿子，胡太后可能迫切想要一个皇孙。元诩那时已经19岁了，对母后伤害帝国的种种行径痛心疾首。现在，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元诩计划驱逐朝廷中的奸佞，限制母亲。可是环顾朝廷，元诩都没有可以信任的大臣。缺乏经验的元诩竟然选择引进外藩将领来清除母亲的势力。

被选中的外藩将领就是晋阳的大将尔朱荣。如前所述，尔朱荣是在镇压六镇起义过程中崛起的地方实力派。经过两三年的征战，尔朱荣基本扑灭了今山西地区的起义烈焰，成为黄河以北最强大的，尚且忠于朝廷的地方势力。尔朱荣的军队人数不满一万人，但能骑善射，又有高欢、贺拔兄弟等干将指挥，真可谓是“精兵强将”。胡太后对他有所忌惮，虽然任命他为大都督，但把他的力量局限在山西地区。尔

朱荣上表，主动要求去河北镇压六镇起义，胡太后就没有答应——这一点可能让元诩觉得尔朱荣会站在自己一边。而接到元诩向洛阳进兵的密令后，尔朱荣马上整军南下。就在尔朱荣大军到达上党时，元诩却犹豫起来，命令他就地驻扎。

元诩优柔寡断之间，消息早已经泄露。胡太后联合情夫，残忍地将亲生儿子元诩毒死。可是，胡太后他们事情干得太不严密，皇帝暴亡，朝野都知道是谁干的。胡太后此举不仅残忍，也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她执掌朝政的法律依据就是因为她是皇帝的生母。元诩死时尚未生育儿子。这就为胡太后继续执掌朝政设置了障碍。按理，元诩死后，不久前向天下宣布是王子的女儿应该即位为新皇帝。事到如今，胡太后不得不宣布所谓皇子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女儿身。她选择元诩的侄子、年仅3岁的元钊为新皇帝，想平息来自北方的进攻。胡太后将尔朱荣想得太简单了。尔朱荣早在起兵之时，就想做第二个董卓了。皇帝的死只是给他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而已。他根本就不承认洛阳的新政府，反而通告天下要追查元诩的死因。

尔朱荣的精兵很快逼近黄河北岸，洛阳掌权的徐纥等人并不以为意，认为：“尔朱荣是马邑小胡，人才卑劣，自不量力来冒犯天颜，简直是自取灭亡。我们只要发动禁卫将士，就足以一战。尔朱荣不远千里挥兵南下，兵老师弊，我们不用做什么准备，以逸待劳就能打败他们。”尔朱荣率领几千人的部队长途征战，的确让人觉得不太靠谱。胡太后采纳了情夫的意见，派遣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派遣郑俨的族兄弟郑季明、郑先护二人驻守黄河河桥；派遣武卫将军费穆驻守黄河渡口小平津，采取守势。

尔朱荣想做董卓第二，却比董卓有头脑得多。他深知，要想在政坛上有大作为，政治永远比军事重要。四月十一日，尔朱荣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拥立元诩的叔叔、长乐王元子攸登基称帝，和洛阳的元钊对峙。这是一招好棋，一下子让尔朱荣从叛乱者跃升为“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正义之师。

早在起兵之初，尔朱荣就开始物色政治上的盟友。他派侄子尔朱天光潜入洛阳。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在朝中任直阁将军。直阁将军属于近卫军官。胡太后竟然让尔朱荣的堂弟在朝堂之上，可见她政治上实在幼稚。尔朱世隆向尔朱天光推荐了一个人选：长乐王元子攸。元子攸是“贤王”彭城王元勰的第三子，受到胡太后一党的排挤，和胡太后等人有矛盾。此外，元子攸长期担任禁卫军将领，在朝廷中有相当的根基。不仅有一帮禁卫军官兵支持他，清流世族和文官集团也拥戴他，元子攸是个不错的人选。他既有当新皇帝的资格，又可以让尔朱荣集团争取到洛阳禁卫军和世族大家们的支持。

尔朱天光秘密会见了元子攸，将尔朱荣的橄榄枝传递了过去。元子攸欣然应允，带着家眷跟着尔朱天光逃出了洛阳。

尔朱荣有心改立新君，但人选还不确定。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择立君主有一个传统：将所有的候选人铸铜像，请示天意，如果铜像铸成说明此人受命于天，可立为君；如果铸像不成，则上天不认可此人。尔朱荣挑选了六位王爷作为候选人，一一铸像，只有元子攸的铜像一举成功。尔朱荣这才拥戴元子攸为皇帝。元子攸就是孝庄帝，封尔朱荣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等，晋爵太原王。

孝庄帝登基后，局势就明朗了。胡太后立的小皇帝元钊原本就不为朝野所接受，人们普遍觉得他即位没有合法性。听说元子攸登基后，洛阳的禁卫军官兵、清流文官和世族大家本来就 and 胡太后离心离德，现在纷纷争相出迎，向新皇帝表示效忠。在他登基的当天，镇守黄河的郑先护、费穆等人就主动归附，导致洛阳门户大开，大都督李神轨不战而退。消息传到洛阳，禁卫官兵四处溃散。战争不用打了，尔朱荣兵不血刃就提前锁定胜局了。

尔朱荣大获全胜，洛阳禁卫军的倒戈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洛阳的族弟尔朱世隆等人就不用说了。领军将军元鸢是禁卫军的最高长官，也暗中投靠了尔朱荣。尔朱荣起兵前后，密探细作频繁往来于晋阳和

洛阳之间，胡太后等人都会被蒙在鼓里。

胜负已定后，郑俨和徐纥两个男宠跑得比谁都快。郑俨逃归乡里，想在地方起兵，结果被部下所杀；徐纥逃到江南归降萧衍，因为好慕权利、奴颜媚骨，为时人所斥。众叛亲离的胡太后在绝望中要重新出家为尼，还强迫宫中所有的嫔妃随自己一起削发出家。她逃入佛寺出家，寄希望于佛祖。洛阳的皇室贵族和文武百官群龙无首，第二天就拿着皇帝玺绶、摆出皇帝法驾，公开出城去迎接新皇帝元子攸了。北魏朝野承认了元子攸，也就承认了尔朱荣造反的胜利果实。到此为止，尔朱荣起兵可以胜利、平静地收场了。但是，平静之中酝酿着波澜。

二

尔朱荣年轻时，在洛阳作为人质待过一段时间。武卫将军费穆当时就和尔朱荣认识，如今归降尔朱荣，两人久别重逢，都很高兴。

费穆不知是为了表忠心，还是发泄因为“文武分治”导致的对文官集团的不满，给尔朱荣出了一个残忍的主意：“您的兵马不到万人，如今轻易长驱直入洛阳，既然没有战胜之威，恐怕不能长久服众。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旦知道您的虚实，必然会产生轻侮之心。如果不‘大行诛罚’，树立亲信，恐怕等您北归之后洛阳就会发生变故。到时候，您就前功尽弃了。”费穆所说的百官“轻侮之心”指的是文官集团对军官们的轻视，尔朱荣久居军阵，自然感同身受。他对费穆的意见很认同。客观上，尔朱荣面对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胜利老觉得不踏实，对自身实力不自信。

于是，尔朱荣私下对部将说：“洛阳人物繁盛，骄侈成性，不除掉他们恐怕难以控制。我想趁着百官出迎新皇帝之时，‘悉诛之’，如何？”尔朱荣已经把费穆的“大行诛罚”发展为“悉诛百官”了。部将慕容

绍宗反对说：“我们之所以取胜，是因为太后无道，失去了民心。主公以正义之师入洛阳，突然要诛杀百官，不是良策。”尔朱荣没有采纳慕容绍宗的意见，还是决心大开杀戒来立威。

元子攸登基的第三天，尔朱荣以“祭天”为名，命令洛阳的百官到河阴行宫的西北集合参加。文武官员们陆续赶到河阴。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大臣们越聚越多，既没有人出面组织，也谈不上任何祭天的准备工作，反而有骑兵横刀立马、气势汹汹地围绕着群臣。

宣称已经出家的胡太后被从寺庙中搜了出来，连同她立的幼帝元钊一道被尔朱荣的骑兵押送到了河阴。胡太后看到杀气腾腾的尔朱荣，“多所陈说”，试图为自己的为所欲为辩解。尔朱荣没听几句就拂袖而去，下令把帝后扔到黄河里去。于是，士兵们把胡太后和元钊装入竹笼，溺死在黄河里了。

接着，尔朱荣把宗室诸王集合起来，开始训话。他大声追问王爷们“天下丧乱”、“明帝卒崩”的原因，诸位王爷无言以对。尔朱荣直言：“这都是你们贪腐暴虐，不相匡弼导致的恶果！”随即，他挥手示意屠杀在场的所有王公。高阳王兼丞相元雍（炫富的那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元恒芝、东平王元略、广平王元悌、常山王元邵、北平王元超、任城王元彝、赵郡王元毓、中山王元叔仁、齐郡王元温等人遇害。其中，遇害的东平王元略是尔朱荣的内侄。元略平日自诩为皇亲国戚，又是清流大臣，对赳赳武夫的姑父尔朱荣很轻慢，所以虽然是尔朱荣的近亲，也遭到无情杀戮。

宗室王公被杀，引起了云集的大臣们的恐慌。场面出现了骚动。尔朱荣又指挥外围的骑兵，对手无寸铁的文武百官展开了屠杀。顿时，河阴的土地上尸体相陈，血流成河。遇害的官员人数在两千人左右，超过京官人数的一半，且都是有资格参与迎驾和祭天仪式的高级官员。被乱兵杀害的大臣不仅包括了素来为武人厌恶的众多世族大家子弟和奉行“文武分治”、鄙视虐待武人的文官（难怪士兵们杀起来那

么起劲，一点都不含糊），也包括了很多追随元子攸、对尔朱荣有功的大臣，比如献出黄河投降的郑季明、李遐等人。

有一百多位“祭天”迟到的大臣，被骑兵包围起来。士兵们举刀正要杀戮、大臣们伏地求饶的时候，有将领高喊：“你们谁能写禅文，可以饶他一命。”所谓的禅文，自然是让北魏皇帝禅让天下给他人。当时在包围圈中的陇西李神俊、顿丘李谐、太原温子升等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名声在外，但不愿当乱臣贼子、耻于从命，趴在地上不吭声。御史赵元则很怕死，连忙爬出来说自己能写禅文。于是，尔朱荣的将士授意他写了一篇北魏国运已绝、尔朱荣堪当大任的文章。

在屠杀之前，尔朱荣有选择地保留了一批大臣，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大开杀戒。元顺是个耿直忠心的大臣，在万马齐喑的大环境中多次不合时宜地死谏。尔朱荣很赞赏元顺的品格，事先派人传话给元顺：“大人留在洛阳办公，不必去祭天。”一些曾经对外地官兵有恩或者为武人鸣不平的官员，事先也得到了关照。比如江阳王元继对尔朱荣之前多方照顾和提携，被告知留在洛阳；大臣山伟曾经建议提高北方将士的待遇，被尔朱荣的士兵们认为是“好人”，屠杀当天特意被安排在洛阳值班。

还有一点容易被遗漏的史实是：部分大臣参与了对同僚的屠杀。这些人主要是不掌权的疏远宗室和洛阳的禁卫军将领。由于宗室繁衍以及朝廷对宗室成员的恩赏随着血缘的疏远而递减，越来越多的“皇亲贵胄”被排除出权贵行列。那些血脉疏远的元氏宗室生活并不如意，充满失落和嫉妒。最终，他们加入尔朱氏的阵营，参与骨肉残杀。比如宗室元禹早在尔朱荣起兵前就投入麾下，参与了大屠杀的酝酿和实施；并州刺史元天穆也是宗室，老早就和尔朱荣结为异姓兄弟，元天穆年纪大，尔朱荣称他为兄，但在政治上元天穆紧跟尔朱荣。尔朱荣起兵后，并州的政务就全权委托给了元天穆。此外，领军将军元鸢也是宗室，投靠尔朱荣后，在大屠杀当天还和尔朱荣一同登上高冢俯瞰血淋淋的屠杀现场。

在不远处行宫中的孝庄帝元子攸在屠杀中又如何表现呢？

元子攸对尔朱荣杀戮大臣的计划是知情的。（尔朱荣以元子攸的名义召集群臣，事前动静闹得很大，说元子攸不知情说不过去。）而且，元子攸甚至可能参与了谋划。和尔朱荣一样，元子攸也是轻而易举获得胜利，当上了皇帝。他同样对自己不自信，害怕日后被人推翻，所以赞同用杀戮来立威——他也有仇家，也有杀心。然而，元子攸万万没想到，尔朱荣的动作这么大、这么残忍。原本是一场有限的诛罚，却恶化成了一场惨烈的大屠杀，而且连忠于自己的大臣也被尔朱荣杀了，元子攸始料莫及、追悔莫及。元子攸知道：千万不要用血腥屠杀来立威，那样做非但对帝王的威望不利，反而会动摇人心、危及政治根本。

当声声惨叫传来时，元子攸和哥哥、彭城王元劼及弟弟、霸城王元子正一起走出帐外，正要看个究竟。迎面走来二三十个持刀武士。元子攸强装镇定，喝问来者。冲过来的武士借口护驾，几个人抱起元子攸就往帐里走。剩下的人乱刀齐下，将彭城王、霸城王杀死。这些武士也是尔朱荣派遣的，将元子攸紧紧看管起来。至此，元子攸命悬一线，就看尔朱荣的意思了。

眼看着王朝很可能要灭亡在自己手中，元子攸恨自己助纣为虐，又很担心自身安危。他不是一个懦弱无能、束手等死的人，写了一道诏书，买通武士传递给尔朱荣。诏书说：“帝王迭袭，盛衰无常，既属屯运，四方瓦解。将军仗义而起，前无横陈，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规存性命，帝王重位，岂敢妄希？直是将军见逼，权顺所请耳。今玺运已移，天命有在，宜时即尊号。将军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择亲贤，共相辅戴。”元子攸屈身说自己对帝位无所留恋，如果尔朱荣再紧紧相逼就将帝位传给尔朱荣，如果尔朱荣想保存北魏社稷就听任尔朱荣掌权。同时，元子攸又搬出“天意”、“天命”来，提醒尔朱荣之所以能大获全胜，是天意使然，不要逆天而为。这番话柔中带刚，以退为进，把球踢给了尔朱荣。

清洗了大臣、草拟了禅让诏书，皇帝元子攸也服软了，尔朱荣接下来怎么办呢？他会不会灭亡北魏呢？

二七 河阴之变II：大屠杀如何善后

—

尔朱荣屠戮群臣的本意是要立威，要杀死一批老人换上亲信，可随着鲜血越流越多，他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

北魏的中央政府在河阴基本上被全部摧毁了。面对唾手而得的洛阳，畅想搭建一个新王朝的美好前景，尔朱荣心想：为什么我不自己当皇帝呢？他的部下已经在高呼：“元氏既灭，尔朱氏兴！”都督高欢公开劝尔朱荣称帝。

尔朱荣决定为自己铸铜像，看看“天意”如何。第一次，没成功；尔朱荣又铸了一次，还是没成功；尔朱荣寄希望于第三次，依然没成功；尔朱荣还是想当皇帝，就铸了第四尊铜像，还是失败了。“难道天意不让我当皇帝？”尔朱荣不甘心，又让平日最信任的阴阳术士占卜吉凶。结果，占辞说：“今时人事未可。”铸铜像不成，占卜又不吉，尔朱荣灰心丧气了。部将贺拔岳于是从容劝谏说，天不亡魏，主公登基还为时尚早，不如先尊立元子攸。

在尔朱荣称帝问题上，以高欢为首的怀朔集团和以贺拔岳为首的武川集团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虽然都栖身尔朱荣麾下，但都想独霸一方，追逐更大的利益。高欢等人路子野，一直唯恐天下不乱，怂恿

尔朱荣登基是想把已经够乱的局势搅和得更乱，方便自己浑水摸鱼。贺拔岳等人走的是中规中矩的路子，希望尔朱荣能平稳发展壮大，自己随着尔朱荣的发达而发达，然后再想独立或者称霸的事情。这两拨人此时就已经暴露出了性格和战略的差异，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尔朱荣在贺拔岳等人的劝说下，决心退回来，继续当北魏的“忠臣”。贺拔岳趁热打铁，马上指出高欢劝尔朱荣当皇帝，居心叵测，应该杀高欢以谢天下。高欢那一帮伙计和其他将领赶紧替高欢说话：“高欢是个粗人，言语难免不周全。如今四方多事，正是用人的时候，请主公放过高欢这一回，以观后效。”尔朱荣顺水推舟，放过了高欢。

打定主意后，尔朱荣来到元子攸的营帐，“叩首请死”。元子攸自然不会让他死，相反热泪盈眶地扶起尔朱荣，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尔朱荣就再一次自我批判，又说了许多效忠朝廷、死而后已的话。最后，君臣俩皆大欢喜，约定“起驾回宫”。但是，屠杀给元子攸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创伤，难以抚平。在思想上，他和尔朱荣的政治同盟已经终结了。

走到洛阳背面的邙山，尔朱荣看着洛阳城阙，心虚起来。城中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人被杀，笼罩在一篇愁云凄雨之中。悲痛的气场让尔朱荣心怀畏惧，不敢上前。武卫将军泛礼（又一个投靠的禁卫军将领）苦苦相劝，尔朱荣这才答应入城。入城后，尔朱荣及其部队人不卸甲、马不歇脚，连进入宫殿都全副武装、骑马进出——可见他们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尔朱荣部队怕洛阳官民，洛阳百姓更怕涌进来的胡骑，爆发了大规模的恐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人们惊骇万分。等到铁骑入城，谣言四起，有的说尔朱荣要迁都晋阳，有的说胡骑要大掠洛阳城，还有的说要强迫洛阳百姓迁往北方，官民人等少数闭门不出，多数人离城而逃。侥幸躲过大屠杀的文武官员更是惊弓之鸟，携家带口地逃亡。那个受到尔朱荣尊重的元顺，事先得到通知留在洛阳，但听说大屠杀

后还是吓得离城而逃，在途中被乱军所杀。“洛中草草，犹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怀异虑。贵室豪家，并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洛阳城中人口很快只剩下一二成。

元子攸回宫，发现“直卫空虚，官守废旷”，官衙和宫殿里空空如也。皇帝进宫时，只有“值班”的散骑常侍山伟一个人跪拜迎接。

河阴之变的消息传到外地，郢州刺史元显、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彧、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元志等宗室吓得魂飞魄散，一溜烟地都向南方的梁朝投降。他们不是携家带口逃往南方，就是割据辖区、率领军队集体倒戈。梁武帝萧衍一下子赚大发了，笑得合不拢嘴。而北魏对南朝的防线全线崩溃，没有成形的防卫可言了。

尔朱荣急需恢复洛阳的秩序、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并镇压北方越燃越旺的起义烈火和南方的梁军的侵扰。大屠杀的善后工作千头万绪，非常繁重！

二

既然要保存北魏王朝，就要聚集在元子攸的旗帜下，维护朝廷的权威。尔朱荣入洛阳后，在明光殿参拜元子攸，主动就河阴之变请罪，誓言对朝廷没有二心。元子攸当然没有治尔朱荣的罪，拉着他的手说自己从来不起疑心。

接着，尔朱荣调整了中央官员。江阳王元继升为太师、司州牧，居百僚之首；实际负责行政的是尔朱荣的死党元天穆，元天穆还受封上党王。尔朱荣还拉了李延实、杨椿则进入中枢要津，这两人都是元子攸的亲信。此外，北海王元颢之前领兵在河北镇压起义，尔朱荣想继续重用他。不想，元颢已成惊弓之鸟，没几天就弃军南逃，投降萧衍去了。（此后，尔朱荣只好无奈地亲自领兵去镇压河北起义了。）

将军长孙稚在 南方边界领军，尔朱荣就将南方事务继续委托给他了。

骨干确定后，具体办事的中下级官员比较难找。大屠杀之后，官员缺额实在太多，而大多数幸存者对尔朱荣政权避犹不及，宁愿隐居、出家也不愿出来当官。尔朱荣找不到足够的人选，只好将秀容部落的大批军官任命为京官，填补了河阴屠杀留下的官缺。跟从他起兵的官兵们，无不加官晋爵。尔朱荣又让元子攸下诏，让地方官员访求人才，凡有在德行、文艺、政事任何一方面有所长者都可推荐为官。推荐三人以上的县令、太守、刺史可得奖赏，完不成任务的要降官。如此一来，不少行伍士卒和乡间豪强都被拉上朝堂，暴得高位。“起家为公卿牧守者，不可胜数。”正常的人事制度和升迁、先前的门第才学等等都被抛弃了，世族大家和门阀清流们更加耻于和尔朱荣等人为伍。

元子攸对狗尾续貂、拉人当官的行为很厌恶。一次，尔朱荣举荐了一大批武士担任河南诸州的地方官，元子攸没有批准，闹得双方不太愉快。元天穆劝他说：“大将军有大功，就是将全天下的官属都替换一遍，恐怕陛下也无法违抗。如今，大将军只是推荐数人而已，陛下何必生气？”元子攸想想也对，谁让自己是无权无势的傀儡皇帝呢！

对于河阴的遇害者，尔朱荣大肆追赠死者，对官僚家庭进行安抚。尔朱荣上疏，将无上王追尊帝号，遇害的诸王、刺史都赠三司，其余三品以上官员都追赠尚书令或者尚书仆射，五品以上官员都追赠地方刺史，六品及其以下（包括少数遇难的百姓、仆人）都追赠太守。死者无后的，都允许家族过继，由过继之人袭封官爵。

经过这一方大刀阔斧的整顿，洛阳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北魏国家机器逐渐恢复运转。

洛阳稳定后，尔朱荣返回晋阳，遥控北魏朝政。一方面，他在洛阳还是感到心虚，有危机感；另一方面，河北的葛荣势力迅速膨大，

需要尔朱荣倾注全部心力去镇压。

一年前（孝昌三年，527年），葛荣率军攻破信都，围攻邺城。元子攸继位后，葛荣又一次围攻邺城（今河北临漳）。这一次，起义军号称百万，刨除掉其中不少随军移动的流民，有战斗力的将士也有几十万人。

尔朱荣能调动的，只有侯景等部的七千骑兵。他毅然率领这支小部队东进救邺。为了赶速度，尔朱荣下令每人都备副马，两匹马轮着骑，急速向起义军杀去。葛荣侦察到尔朱荣的兵力后，自认为胜券在握，对部下说：“多带长绳，等尔朱荣到了把他们绑起来就行了。”他将百万大军在邺城城下列阵数十里，企图仗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将尔朱荣的部队围歼。可惜，起义军人数太多，列阵范围过大，葛荣事实上并不能指挥全部部队，只能调动少数亲信部队。而起义军缺乏训练，松松垮垮，大敌当前还是乱糟糟的。尔朱荣杀近后，把部队分成若干股，每股几百名骑兵，在山谷间到处扬尘 鼓噪，产生马蹄阵阵、尘土飞扬的效果，使起义军弄不清楚敌人到底有多少、将从何处进攻。在气势上，尔朱荣就先胜一筹。他又下令本次作战不以斩杀的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计功，只以最后结果论功。秀容骑兵每人带一根棒，见人就打，不准下马斩级，以冲垮起义军为目的，避免起义军发挥出数量优势来。

决战开始了，尔朱荣身先士卒，带头冲入敌阵。侯景领着数千铁骑紧随其后，左冲右突，来往猛击，竟将几十万起义军冲散。起义军乱不成形，葛荣紧急聚拢亲信部队，试图扭转败局。可惜，尔朱荣抢先集中所有骑兵，向葛荣围攻过来。葛荣力不能敌，被侯景生擒。

（侯景因此崭露头角，战后被封濮阳郡公，出任定州刺史。）主帅被擒，起义军全线崩溃，全部投降。葛荣被押到洛阳，举办过“献俘仪式”后被斩首。他的死，标志着六镇起义最大的一股烈火被扑灭。元子攸为此改年号为“永安”。

尔朱荣大胜后，又面临着如何处理俘虏的问题。投降的起义军将近一百万人，而尔朱荣的部队只有七千人，不可能看守、不可能杀戮，连押送遣散都成问题。弄不好，俘虏们会再次起义。尔朱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先高调下令将起义军就地遣散，任由他们携带亲属、财物四散回家，去处一概不问。于是，百万俘虏们大喜，一朝散尽。他们离邺城越来越远，散得越来越开。暗地里，尔朱荣在百里之外埋伏了官兵，堵住了各条路口。俘虏们络绎不绝而来，来一群被尔朱荣的官兵截一群，集中起来安置。尔朱荣挑选其中的精壮，对原来的首领量才录用，把降兵编入自己军队。尔朱荣成功地解决了俘虏难题，还几何倍数地壮大了部队。

浩浩荡荡的降兵队伍中，就有宇文泰。宇文泰正好二十出头，身材健壮，属于优质兵源。尔朱荣将他们带回老巢晋阳，编入骨干队伍。巧合的是，宇文泰被编入贺拔岳的麾下。宇文、贺拔两户武川的旧交，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又奇迹般地会合在一起了。

北方刚安定了一些，南方又裂开了一个大窟窿。北魏宗室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弼和部分大臣投降梁朝后，梁朝决定以敌制敌，扶植这些人回北方“复国”——当然是梁朝的藩属国。邺城大战后的第二个月，梁武帝萧衍以北海王元颢为魏王，派将军陈庆之护送他北伐争夺北方。第二年（529年），梁朝军队在中原腹地连战连捷，四月元颢在睢阳城南称帝，五月梁军攻克洛阳东部重镇荥阳，元子攸慌忙渡过黄河逃到上党，洛阳随即被元颢占领。元颢进入洛阳，改元建武。（将军费穆投降元颢。元颢等人对河阴之变耿耿于怀，认定费穆是始作俑者，难辞其咎，派人诘问后将他杀死。）局势万分危急了，尔朱荣果断到上党勤王，劝说元子攸摆出返往洛阳的姿态。尔朱荣在十几天时间里聚集军队，在黄河北岸对梁军构成巨大压力。黄河决战，尔朱荣战胜梁朝军队。元颢被迫逃亡，在临颖被县卒江丰斩首。元子攸重新回到洛阳。尔朱荣又树立了“再造朝廷”的大功。

关东基本安定后，尔朱荣着眼尚在沸腾的关中。尔朱荣任命侄子

尔朱天光为统帅，以贺拔岳为左大都督，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西进讨伐万俟丑奴。时任步兵校尉的宇文泰跟随贺拔岳进入关中。尔朱天光等人很快清剿了万俟丑奴起义。尔朱天光留镇关中，贺拔岳和侯莫陈悦则分别做了泾州刺史和渭州刺史。宇文泰因为奋勇杀敌军功不小，升为征西将军，代理原州事务。

随着一连串的胜利接踵而来，尔朱荣牢固控制了北魏政权。镇压了葛荣起义后，元子攸封尔朱荣为大丞相、太师、太原王，封邑由二万户增加到十万户。打退梁军后，元子攸加封他为天柱大将军，封邑又增至二十万户。尔朱荣依旧盘踞在晋阳，不时派人往来洛阳联络。每次尔朱荣的使节到洛阳，不论身份贵贱，朝廷权贵见之莫不倾靡。尔朱荣的权势达到顶峰。

尔朱荣篡国称帝的心思又萌芽了。但北魏内乱不断，民怨沸腾，限制了尔朱荣篡位野心的实现。尔朱荣在战场上连战连捷，在内政和经济建设上却罕有建树。北魏经受多年战乱，急需休养生息。但尔朱荣一味穷兵黩武，不事生产，弄得民不聊生，人心惶惶。他又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其弟尔朱仲远坐镇徐州，在东南一带作恶多端，杀人如麻。为了捞取不义之财，尔朱仲远常常诬陷达官显贵和豪门大族谋反，横加残害。他抄没他人府邸，将男子杀害后投入河流，将家产占为己有。因此家破人亡的人家，不可胜数。徐州百姓和地方官恨他入骨，将他比做豺狼。尔朱家的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横行不法，鱼肉百姓，干扰朝政。久经动乱的北方大地，黑暗非但没有散去，反而更重更深了。军事上的辉煌并没有转化为崇高的声望，尔朱荣权势是稳固了，声望却依旧在低位徘徊。

想必尔朱荣自己也明白实情，所以迟迟没有篡位。

二八 战神传说：陈庆之



南北朝中期，南方的梁朝出了一位不得不说的“百战战神”。他身经百战，以少胜多，从来都是以绝对劣势兵力取得辉煌的胜利，以一敌十、以一敌百，甚至是以一敌千。这位战神贯穿了梁朝和北魏的恩怨战和，影响了北魏末期的历史。在他死后，对他战绩的称颂和追思伴随着质疑的声音，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

他，就是陈庆之。

陈庆之，义兴国山（今江苏宜兴市）人，出生于普通人家，属于庶族子弟。南朝极端讲求门第，一个庶族子弟要想在政治上飞黄腾达难于上青天，就是想进入仕途也是困难重重。陈庆之就面临着入仕无门的困境。好在他有一样吃饭的手艺：下围棋。巧的是，大臣萧衍是铁杆围棋粉丝，于是陈庆之就在萧衍身边找到了一份工作：陪下棋。更巧的是，萧衍后来夺权当了皇帝，建立了梁朝，陈庆之顺带着进了皇宫成了皇帝身边的人。萧衍任命他做了宫中的主书（管理文书的小官）。陈庆之总算是实现了自己入仕的梦想，不过他的工作内容不变，还是陪萧衍下棋。

萧衍很喜欢陈庆之。倒不是因为他发现了陈庆之有什么杰出的才能，而是陈庆之是萧衍众多“棋友”中最能熬夜的人。萧衍这个人嗜棋

到了通宵达旦的程度。陪他下棋的人必须要随叫随到、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能休息，而且还要装做很投入、很认真地输棋。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不是时间久了昏昏欲睡，是一不小心让萧衍给下输了。只有陈庆之例外，他可以做到几天几夜不睡觉，只要萧衍还要下棋，就能随时“投入战斗”。所以，萧衍很亲信陈庆之。

可惜的是，皇帝的欣赏和信任并没有给陈庆之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陈庆之的出身基本决定了他的前途。即便是萧衍褒奖他的诏书，开头也写道：“（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萧衍还只是把他当做身边可以说上话、可以相信的陪客而已。

陈庆之个人素质似乎也有问题。他身体文弱，力气很小，拉弓射出去的箭连纸张都穿不透，骑马也很困难。这样的身材放在世族子弟身上，可能不会影响仕途，该统兵的继续统兵，该当将军的还是当将军。但对要真刀真枪杀出政绩来的庶族寒门来说，陈庆之这样的就惨了，连上战场杀敌立功升迁的可能性都没了。他似乎要在宫中陪萧衍下棋，了此一生了。事实上，陈庆之从青年陪到中年，从满头黑发陪到头发花白，一晃就过去了二十年。

不过，关注陈庆之的人往往忽视了围棋的重要作用。下棋和办事，甚至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棋下好了，很多道理也就明白了。陈庆之的二十年陪棋经历，其实也是个人的修炼过程。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与其埋怨社会的不公和下棋的无聊，还不如将它当做一种磨难。陈庆之就一边潜心修炼，一边等待机会的到来。

公元525年，陈庆之终于得到了一次表现的机会。已经42岁的他生平第一次要领兵打仗去了。

这一年，北魏的徐州刺史元法僧纳土归降，请南朝前来接收。能够不战而得人之地，萧衍很高兴，决定派官兵去接收。他要在派遣的将领中掺入自己信任的人，于是就任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随同大部

队去接收徐州。这个“武威将军”属于杂号将军，是南北朝时期众多滥封的将军名号之一，在军队序列中只算是中等偏上的军衔。尽管地位不高，不过对陈庆之来说，却是质的改变——他终于获得了施展真正才华的舞台！

二

遗憾的是，接收徐州的行动很顺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陈庆之的第一次带兵行动和平凯旋，并没有打成仗。自然，陈庆之也没有任何可以发挥才能的机会。

很快，陈庆之就得到了第二次机会。

萧衍派儿子豫章王萧综接管徐州。考虑到陈庆之有接收徐州的经验，就任命他为宣猛将军，领兵两千护送儿子去上任。萧衍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所以没有配备更多的军队和将领，让陈庆之一个人挑大梁。他可能想：不就是赴任吗，又安全又轻松，让小陈去绰绰有余！

萧衍看错了。北魏对徐州这块战略要地叛降南朝非常在意，不能坐视南朝派王子和部队接管。北魏宗师元延明、元彧奉命领兵两万，前来“迎接”萧综赴任。他们抢先在陟口一带扎下营寨，以逸待劳，准备痛击梁军。两千人对两万人，而且是毫无经验、看似文弱的陈庆之对北魏铁骑，梁朝还能接管徐州吗？

萧衍更看错了，看低了陈庆之的能力。陈庆之旗开得胜，以少胜多，将两万魏军杀得溃不成军。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简单的一个字：打！正面进攻。

关于战斗，人们往往附加了许多累赘的东西，比如各种战略战

术、各种策略和小动作，却忘记了决定战斗胜负最原始的要素：勇敢。正面的、勇猛的、漠视死亡的厮杀永远是影响战斗结果的关键因素，其他的都是浮云。对于勇猛的军队来说，各种计策都能够锦上添花；对于懦弱的军队来说，再多的策略和伎俩也不能给他们带来胜利。去繁就简，最简单的往往是最有用的。陈庆之深谙此理，得知前方有敌人后，督促军队逼近敌人，发动正面猛攻。在一通鼓之间，陈庆之的两千人马竟然击溃了两万魏军，取得了难得的胜利——南朝军队在南北交战中胜少败多。

胜负已定，梁军顺利接管徐州。不想，陈庆之护送的豫章王萧综却叛变了！原来，萧综的母亲吴氏原是南齐末代皇帝萧宝卷的嫔妃，萧衍篡位后才跟了萧衍。和萧衍在一起七个月后，吴氏就生了萧综。萧综和其他人一样，怀疑自己是萧宝卷的孩子。据说，萧综曾经悄悄挖开萧宝卷的坟墓，把自己的血滴在萧宝卷的骨头上。血渗了进去。萧综确信自己就是萧宝卷的骨肉，觉得自己现在是认贼作父，连夜就带了几个人投奔魏军大帐里去了。主帅临阵投敌，梁军阵脚大乱。陈庆之只好斩关后退。

虽说接管徐州行动失败，陈庆之却一战成名，让南北双方都刮目相看。

两年后（527年），陈庆之参加了梁军的一次大行动：进攻南北方拉锯的据点涡阳。他依然当不了主帅，而是众多跟随主帅曹仲宗出征的部将之一。萧衍发现了陈庆之的军事才能，放他去前线历练。出于信任，萧衍给了陈庆之象征皇帝亲临的“节”，可以假节代行部分皇帝职权。所以陈庆之的角色类似于部将兼监军。

北魏很重视这场战斗，派遣宗室元昭等人领军数万迎战（梁朝说是十五万），先头部队赶到驼涧。两军相遇了，如何对战？陈庆之建议正面猛攻，同事韦放认为敌人的先头部队都是精锐，不易取胜，反对正面进攻。陈庆之坚持自己的风格，宁愿带本部人马进攻。他率领

的人马有多少呢？两百人。陈庆之带领部属两百人，连夜奔袭驼涧，在夜幕中一举击败北魏的先头部队。正面交锋似乎是北朝铁骑的专利，当北魏主力听到先头部队被夜袭的梁军正面击溃后，全军震动，士气跌落。

南北两军在涡阳附近打了近一年，战斗上百次，未分胜负。魏军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执行“堡垒战术”，一座一座地建筑堡垒，步步逼近。他们一共造了十三座堡垒，成半圆形，对梁军形成了夹击之势。主帅曹仲宗、将领韦放二人见状，没有信心了，准备撤退。部队都做好撤退准备了，只见陈庆之持节堵在大营门口，说：“全军官兵再次鏖战一年，耗费了无数粮草军需。诸军并无斗志，都想要退缩，难道是要建功立业的样子，简直是为了聚集抢掠。我听说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等敌人部队会合了我们再和他们大战。我有密敕在此，如果谁要班师，就请他来以身试法吧。”陈庆之想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是真，所谓的密敕很可能是假的，吓唬众人而已。但是曹仲宗、韦放等人被吓住了，不敢撤退，还听陈庆之指挥。陈庆之当即组织精兵强将，突袭北魏的营垒。他的打法一如既往的简单，就是一座接着一座地去进攻堡垒。陈庆之领兵一连攻破了四座堡垒，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杀得魏军心惊胆寒。涡阳城的守军见状投降。梁军乘胜发动全面强攻，魏军其余九个堡垒也纷纷溃败，魏军的尸首淤塞了淮水的支流。梁军大获全胜，陈庆之声誉日隆。

三

陈庆之最辉煌灿烂的时刻，发生在又一个两年之后（529年）。那一年，萧衍不经意地发动了一次潦草的北伐，陈庆之幸运抓住了机遇，登上了战神的巅峰。

事情的起因是在大通二年（528年）北魏发生了内乱。这一年，

北魏宗室在河阴之变中遭到尔朱荣大肆屠杀。一些侥幸脱逃的宗室成员仓皇逃奔梁朝，其中就包括北海王元颢。他们向萧衍称臣，乞求梁朝出兵平定北魏内乱。天上掉下个大馅饼，萧衍大喜过望，封元颢为魏王，计划派兵助他收复领土，建造一个南朝的藩属。

派谁去呢？陈庆之。派多少人去呢？七千人。

萧衍派陈庆之带着七千人护送元颢北伐，是怎么想的呢？只能说萧衍没有对元颢一行抱有多大的信心，反正是天上掉下来的横财，能收多少就是多少，所以他没有认真准备北伐。派出了陈庆之的七千人队伍后，萧衍就算是把元颢给敷衍过去了。不想，他又一次小看了陈庆之。

陈庆之把这支小小的队伍指挥得出神入化、屡战屡捷。

河阴之乱后，北魏内讧不断，边境守卫力量削弱。中大通元年（529年）四月，陈庆之乘虚攻占河南荥城，进军重镇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有北魏的上万守军（梁朝说是七万守军），以逸待劳，还修筑了九座营垒滞缓梁军的进攻。陈庆之发挥敢闯敢干的精神，指挥部队毫不畏惧地猛攻营垒。战斗从清晨开始，到中午的时候，梁军攻陷了三座魏军营垒，杀得其他北魏守军丧失斗志、举众投降。陈庆之成功占领睢阳。元颢旋即睢阳登基称帝，史称北魏建武帝。

北魏的元晖业率领两万军队占据考城（在今河南兰考），阻挡陈庆之继续前进。考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陈庆之就指挥官兵强渡护城河，逼近城墙修筑土垒，越上城池杀败守军。此战，陈庆之生擒元晖业，还缴获大批粮草车架。胜利之后，陈庆之挥师西进洛阳，沿途不少州县闻风归降。北魏在黄河中游的统治根基松动了。这都是四月份一个月之内发生的事情。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搜集军队保卫首都洛阳。北魏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等率羽林军数万守荥阳（在今郑州西

部)、虎牢等地。这支军队是河南魏军的精锐，正面阻挡着陈庆之前进的步伐。陈庆之督促部队猛攻，无奈北魏羽林军装备精良，荥阳城的城墙又很坚固，梁军攻之不克。

北魏上党王元天穆统率着鲜卑主力，正在北方镇压内乱，闻讯河南危急，派将军尔朱吐没儿领骑兵五千、鲁安率步骑九千驰援荥阳，又派出尔朱世隆、王罴率骑兵一万进据虎牢。元天穆自己督率十数万鲜卑主力随后南返，计划合围陈庆之这支小部队，将其消灭在荥阳附近。

一旦合围成功，陈庆之将陷入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梁军将士都很害怕。陈庆之眼看陷入了一盘死棋。破解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攻陷荥阳城！陈庆之解鞍秣马，向大家发表了一番战前动员：“我们北伐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你们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和北魏军队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魏军气势汹汹地来报仇了。我们才七千人，敌人超过三十万。我们不能有侥幸图存之心，只能奋力死战。我们步兵在大平原上无法和鲜卑骑兵对抗，只有在他们到来之前踏平荥阳！”梁军将士们都激起了死里求生的心来，于是陈庆之亲自擂鼓，全军呐喊着杀向荥阳。勇士宋景休、鱼天愍首先登上城墙，梁军相继而入，只一通鼓梁军便悉数登城。北魏主帅杨昱被俘，三十多名将领被杀，北魏在荥阳储备的牛马谷帛数量众多，都成了陈庆之的战利品。

荥阳失陷，魏军失去了合围梁军的支撑点。元天穆不甘心失败，带着数万大军兵临荥阳城下。他没想到，荥阳城城门大开！陈庆之压根就没想守城，挑选三千名精骑出城背水一战。此战，三千梁军以必死之心奋勇杀敌，杀得魏军节节败退。魏将鲁安在阵前投降，元天穆等人只带少数残兵败将逃生。陈庆之乘胜追击，带着这三千人马进军虎牢关。虎牢关自古便是天下雄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守将尔朱世隆有数千守军，竟不敢迎战，弃城而逃。

自此，洛阳门户洞开，无险可守。元子攸为避梁军锋芒，被迫撤至山西长子。洛阳守将元彧、元延明等人向陈庆之投降。梁军护卫着元颢进入洛阳，受到北魏降将们的欢迎。外围的元天穆等人反扑，先后攻克大梁、睢阳，魏将费穆围攻虎牢关。洛阳告急。陈庆之回师迎战，元天穆等人怯战，率军北渡黄河；费穆则在虎牢关投降。陈庆之顺利收复大梁、睢阳，洛阳之危尽解。元颢就在洛阳改元大赦，建立了称藩梁朝的傀儡政权。他封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增邑万户。

至此，陈庆之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以区区七千之众从长江边上打到黄河边上，一路所向披靡，历经四十余战，攻破城池三十多座，杀死、俘虏或迫降敌将数百人，击溃或歼灭敌人数以十万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因为陈庆之和部下皆穿白袍，所以洛阳城中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陈庆之由此被艳称为“白袍将军”。

四

战争是一项综合事业，英雄个人离开了背后的支持就维持不了不败纪录。如果陈庆之效力于蒸蒸日上的政权，他可能还会是“常胜将军”；遗憾的是，他效忠的梁朝是一个隐患重重、军事薄弱的政权，这就注定了他的北伐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战斗”。

更糟糕的是，陈庆之护送的北魏建武帝元颢是个典型的昏君。元颢先是懦弱怯战，让陈庆之在前面北伐，自己躲在后面观望；占领洛阳后，他一头扎入后宫，醉心享乐，荒废政务。陈庆之是元颢傀儡政权的顶梁柱，但元颢君臣却嫉妒他的辉煌战绩。那些降将们老在元颢耳朵边说陈庆之的坏话。陈庆之眼看北方魏军不断云集黄河北岸伺机反扑，便让元颢向南梁请求援兵。元颢怕陈庆之势力继续增长，又怕

永远当南朝的傀儡，竟然向萧衍上奏说北方局势稳定，不需增兵。结果，梁朝没有派一兵一卒增援洛阳。实际上，元颢的小朝廷虽然占据了洛阳，政令却只能到达洛阳周边的少数地方，多数地区依然在元子攸的统治之下。洛阳城内人心不稳，暗流涌动。

在北魏那边，接连的失败让他们痛下决心，由尔朱荣倾全国之兵，号称百万，大举向洛阳扑来。洛阳周边州县在重兵威胁下，纷纷反叛。陈庆之毅然率领孤军，主动要求到黄河以北去防守洛阳的门户北中郎城。北中郎城成了洛阳在黄河北岸的唯一据点，承受了尔朱荣大军的轮番进攻。三天中，魏军进攻这座小城十一次，都被陈庆之击退。

尔朱荣心生退意。有个叫刘灵助者的部下，擅长天文，对尔朱荣说：“不出十日，河南大定。”尔朱荣知道这个“天意”后信心大增，调整思路，决定绕过北中郎城直接攻打洛阳。魏军伐木造筏，主力渡过黄河去洛阳擒拿元颢。元颢哪里是打仗的料，拔腿就弃城而逃。尔朱荣攻陷洛阳。元颢逃到临颖（今河南漯河市北）后，被县卒江丰斩杀。依然坚守北中郎城的陈庆之就变成了滞留敌后的孤军，处境危险。没有了后方、没有了主帅，陈庆之的部队便东撤准备返回建康。魏军尾随追击。撤退途中，山水洪溢，梁军前有洪水，后有追兵，将士死散，全军覆灭。陈庆之化装成和尚，孤身潜回建康。

南归后，陈庆之虽败犹荣。鉴于北伐的辉煌战绩，萧衍任命陈庆之为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邑一千五百户。

成就名将之誉的陈庆之此后不用再陪萧衍下棋了。萧衍真正认识到了陈庆之的能力，好钢用在刀刃上，将他配置在南北征战的前线。回归南方的当年年底，陈庆之就北上淮河流域，都督沿淮诸州梁军。他在任上消灭了自称天子作乱的妖僧僧强和土豪蔡伯龙等人，平定了徐州的叛乱。中大通二年（530年），陈庆之围攻中原悬瓠（今河南汝南），大破魏军。大同二年（536年）十月，东魏定州刺史侯景率7

万人南侵。陈庆之率领部下不足万人抵挡。萧衍闻讯，急调援军驰援。援军出发不久，前线传来消息：魏军已经被歼灭，侯景只身逃跑。除了打仗，陈庆之还在任上展开屯田，取得很好的效果，几年时间让前线梁军粮食充实；精简机构，将虚置的州简化为郡。

大同五年（539年）十月，陈庆之去世，时年56岁。因其忠于职守，战功卓著，政绩斐然，梁朝追赠陈庆之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

关于陈庆之，最可琢磨的就是他北伐的赫赫战功。《梁书》记载陈庆之自述“我辈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南史》则升格为陈庆之破“贼众四十余万”。如果记载属实，陈庆之能够取得如此悬殊的胜利，令人惊叹。后人多有怀疑陈庆之的战绩，认为陈庆之和南方的史书虚夸了战功。实际情况如何呢？

纵观陈庆之北伐时的南北格局，南方梁军固然虚弱，但北魏也内外交困，变乱四起。刚刚发生的河阴之变让洛阳方圆百里内兵力空虚、士气低落。这给陈庆之的北伐创造了良机。梁军北伐后，魏军主力并未在前线。比如尔朱荣所部在镇压葛荣起义，之后囤兵河北；元天穆所部在济南镇压邢杲起义。陈庆之消灭的敌人都是河南的小股魏军，北魏主力并未受损。既然是小股魏军，人数就不可能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了。梁军对战果的汇报多少存在虚夸，陈庆之消灭的魏军可能包括裹胁的北魏百姓。据今人考证，北魏总兵力在二十万左右。那么陈庆之北伐击溃、歼灭的魏军数目在几万左右，比较可信。

不管陈庆之的“战神”传说是否存在虚夸、虚夸了多少，这都无损于陈庆之勇敢善战的精神。对于他英勇奋战、一扫南朝柔弱气息的壮举，当时的人和后人都是应该称许的。

二九 小皇帝手刃大权臣



尔朱荣对着皇位犹犹豫豫，下不了手，结果看似文弱的元子攸抢先下手了。

元子攸被迫赋予尔朱荣全权，但早已看出尔朱荣取代北魏自己登基的野心。“河阴之变”血流遍野的惨象和尔朱家族飞扬跋扈的言行，更是坚定了元子攸杀尔朱荣自保的决心。

元子攸的皇后是尔朱荣的女儿。这不是一段美好的婚姻。尔朱皇后性情刚硬，且喜欢争风吃醋。元子攸被皇后闹得没办法了，就让在洛阳的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开导侄女。堂叔没说几句，尔朱皇后就说：“皇帝宝座是我们家给他的。今天他却这样子对我！我父亲如果做了皇帝，现在就由不得他来教训我了。”尔朱世隆听了这话先是沉默不语，之后叹气说：“大哥本来自己想做皇帝的，本来我也可以是亲王了。”尔朱世隆和尔朱皇后的对话传到元子攸耳朵里，自然是更加坚定了后者诛灭尔朱家族自保的决心。

但元子攸毕竟只是个傀儡。北魏的皇室贵族和大臣们在河阴之变中几乎被屠杀殆尽，洛阳周围被尔朱荣的人看得紧紧的。元子攸找不到勤王的力量，所以只能亲自动手刺杀尔朱荣了。君王刺杀臣子自保，也算是无奈之举了。站在元子攸一边的大臣有城阳王元徽和大臣

杨侃、李彧、元罗等少数几人。中书舍人温子升参与密谋，向元子攸分析了历史上杀权臣的成败得失，包括王允杀董卓、高贵乡公杀司马昭等案例，告诫元子攸不要操之过急。但是元子攸心硬如铁，感叹：“我即便和尔朱荣同归于尽也愿意，更何况未必就死！我宁可像高贵乡公（曹髦）那样死，也不要像常道乡公（曹奂）那样生！”

永安三年（530年），尔朱皇后即将生育。远在晋阳的尔朱荣前来洛阳朝见，主要是照顾女儿的生产。元子攸与亲信大臣紧张密谋，准备刺杀尔朱荣。但是大家又担心尔朱荣在洛阳的势力太强，刺杀不易，迟疑未决。久在洛阳的尔朱世隆感觉到了正在酝酿的刺杀密谋。他自己写了一张“天子与杨侃等人密谋谋杀天柱大将军”的纸条贴在自家门口。纸条迅速发酵为一起轰动事件，并被传递到了尔朱荣手里。被实力迷惑了双眼的尔朱荣完全不把皇帝的阴谋放在心里，哈哈大笑说：“世隆真是胆小如鼠。谁敢杀我？”他笑着将纸条撕掉。

在心底，尔朱荣对元子攸也充满疑虑。一次，尔朱荣径直问皇帝：“外面传言陛下想谋害我！”元子攸平静地回答：“也有人告发你准备杀我，我该不该相信呢？”尔朱荣被元子攸这么一反问，反而放心了。

元子攸害怕计划败露，决定提前动手。九月十八日，元子攸邀请尔朱荣及其心腹元天穆入宫吃饭，同时命杨侃等十几个人埋伏在明光殿东。不知道什么原因，尔朱荣和元天穆在宴会中途就起身告辞。待杨侃等人从宫外赶上殿来的时候，尔朱荣、元天穆已经走出大殿了，失去了动手的宝贵时机。二十一日，尔朱荣又进宫，但只稍作停留，元子攸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当天尔朱荣出宫后到陈留王家饮酒大醉。之后连续多日，他都称病不出。

元子攸越来越着急了，于是在二十五日那天决心孤注一掷。他先在明光殿东厢设下伏兵，然后声称皇后生下皇子。宫中鼓乐齐鸣，开始庆祝皇子诞生。元徽受命飞马到尔朱荣处报告喜讯。这时尔朱荣正

在和元天穆赌博。因为女儿怀孕并没有满月，尔朱荣对女儿的提前生产心存疑惑。元徽搬出鲜卑族豪放恣纵的习俗，假装得意忘形地摘下尔朱荣的帽子，又是欢呼又是舞蹈，闹得王府里一片欢笑声。同时元子攸大规模派出文武百官，向尔朱荣道贺，并催促尔朱荣进宫。

尔朱荣于是放松戒备，跟着大家一起兴奋起来，叫上元天穆一起进宫。两人进宫时正遇到负责起草诏令的温子升拿着刚写好的大赦令往外走。这些大赦令是元子攸准备杀死尔朱荣后对天下公布的。尔朱荣高兴之余和温子升擦肩而过。如果他当时查看一下温子升手里拿着的大赦令，结果就截然相反了。

元子攸端坐在龙椅上，等待尔朱荣和元天穆的到来。他紧张得脸色都变了，近侍忙提醒说：“陛下脸色不对！”元子攸赶紧喝了几口酒，才算镇静下来。元徽先进殿，向大家行礼。以此为信号，光禄卿鲁安等人手持佩刀，从东厢门闯入，向随后的尔朱荣扑去。尔朱荣也是一代枭雄，迅速反应过来，快步向文弱的元子攸扑过去。他试图劫持皇帝，扭转形势。元子攸早有预料，在膝上横着一把刀。他等尔朱荣近前，飞快地抽出利刃，一刀就刺入尔朱荣的腹部。尔朱荣痛叫倒地，鲁安等人一拥而上将尔朱荣与元天穆乱刀砍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皇帝手刃权臣的流血事件。跟随入宫的尔朱荣长子尔朱菩提、尔朱阳者等三十人也被伏兵杀死。《北史》卷五对这场政变的描写只有短短的一句：“戊戌，帝杀荣、天穆于明光殿，及荣子菩提。”尔朱荣时年38岁。

从河阴之变后掌权，到被万刀砍死，尔朱荣在权力巅峰停留了两年多的时间。尔朱氏生前，在他的高压下，朝野百官对河阴惨剧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河阴死难者的墓志都讳言其事，只称墓主人“暴薨”、“暴卒”、“薨于位”、“终于其第”，最为激烈者也不过说是“横罹乱兵”。尔朱荣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洛阳城顿时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内外喜叫，声满京城”。河阴死难者家族相互吊贺。人们对尔朱荣蓄积已久的愤怒都被发泄出来了。

尔朱荣固然有残酷的一面，但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贡献也不能抹杀。对他的评价很复杂，元子攸在诏告天下的诏书中，虽指斥尔朱荣“河阴之役，安忍无亲”、“王公卿士，一朝涂地”的罪行，但也肯定了他匡扶帝室的功业：“顷孝昌之末，天步孔艰，女主乱政，监国无主。尔朱荣爰自晋阳，同忧王室，义旗之建，大会盟津，与世乐推，共成鸿业。论其始图，非无劳效。”尔朱荣不仅诛灭了祸国的胡太后集团，也指挥平定了华北各地的起义火焰，对维持北魏末期的统治，功劳甚大。但是后世几乎都将尔朱荣定性为祸国权奸，就连脱身尔朱荣集团的高欢、宇文泰等人也忙不迭地和他划清界限。“委身尔朱”、“尔朱余孽”等成了攻击政敌的弹药。

二

元子攸对刺杀事件做了周密的部署。为了消除政治动荡，他事先准备了大赦令和免死铁券，计划宽恕尔朱荣的余党。作为常年居于宫中的皇帝，元子攸以为凭着这些契约和凭证就能稳定政局，实现亲政。然而，他想得太简单了。

宫中噩耗传出的时候，尔朱荣的妻子和警惕性很高的尔朱世隆趁乱逃出了洛阳，在郊区召集尔朱家族的武装力量，准备攻城。元子攸发出大赦令和免死铁券，想制止尔朱氏的反抗，但效果极小。尔朱世隆等人就对朝廷的大赦令和铁券嗤之以鼻。他们对使节说：“天柱大将军对皇帝有拥戴之功，对天下有再造功勋，却无故遇害。这些白纸和铁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尔朱荣死后，留守晋阳的侄子尔朱兆闻讯立即率军南下洛阳。徐州方面的尔朱仲远也点起兵马，杀向洛阳兴师问罪。他们和尔朱世隆合军后，一起猛攻洛阳。洛阳外城很快被攻破，元子攸跑上内城城墙向尔朱势力的官兵们喊话，重申罪在尔朱荣一人、其余人一律宽大处

理。但是，叛军们对此压根不信。权力斗争从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尔朱兆等人起兵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替尔朱荣报仇，还有争夺尔朱荣权力遗产的目的。很快，洛阳被攻陷，元子攸被劫持到晋阳。

尔朱兆绞死元子攸。元子攸死前，被允许到三级寺的佛殿去最后礼拜一下佛祖。跪在三宝佛前，元子攸再三祈祷：“下次再投生为人，决不要再当帝王了！”他又随口作了一首五言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后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此举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前任皇帝或者碍眼的皇帝往往都被杀死在寺庙之中。寺庙本应该是修道养德、供人避难的场所，却成为了北朝时期的皇帝屠杀场。元子攸遇害距离他刺杀尔朱荣只隔了三个月。元子攸的左右大臣也都被尔朱兆杀死。

之前，尔朱世隆、尔朱兆等人在洛阳郊区会师，为了与洛阳朝廷相抗拒，也为了取得政治优势，他们临时拉上长广王元晔，推举他为新皇帝取代元子攸。元晔大赦所部，定年号为建明。事后，因为元晔是北魏皇室的疏远宗室，缺乏名望，尔朱家族决定扶立新君。他们选择了元恭。

元恭在前朝长期处于政治边缘，托病居于龙花佛寺，很少与外人交游通信。有人向元子攸打小报告说元恭城府很深，“将有异图”。元恭的声望很高，民间又传说龙花佛寺有天子气。元子攸猜忌害怕起来。元恭闻讯逃匿到上洛地区。朝廷还是找到了元恭，押送他到洛阳。元恭就装聋作哑，佯装智商有问题，想逃过一劫。有人说元恭是装哑，元子攸有所怀疑，派人深夜抢劫元恭，并拔刀佯装要杀他。元恭仍然不出一声。元子攸这才相信，放过了元恭。元恭被拘禁多日后，因查无实据而被释放。元子攸死后，尔朱家族认为元恭有过人气量，试图扶立他为新帝。他们派人试探元恭的意思，同时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哑巴。装哑八年之久的元恭听说要让自己当皇帝，大喜过望，大喊一声：“天何言哉！”

于是北魏的第一场禅让大礼开始了。“元晔至邙南，世隆等奉帝东郭外，行禅让礼。太尉尔朱度律奉路车，进玺绂。服袞冕，百官侍卫，入自建春、云龙门。”在位仅四个月的元晔乖乖地将皇位禅让给了并不那么愿意接受的元恭。元恭就是节闵帝。

这虽然是皇室内部的权力转移，但主导它的却是尔朱家族。只要尔朱家族愿意，他们完全可以实现异姓之间的权力转移。元恭登基后，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颍川王、并州刺史；尔朱仲远为大将军、彭城王、徐州刺史；尔朱天光为大将军、陇西王、雍州刺史。三个人各霸一方：尔朱兆在北，兼有并州、汾州；尔朱仲远在东南，据守徐、兖二州；尔朱天光在西，专制关中。尔朱世隆为太保、尚书令、乐平王，居中把持朝政。尔朱家族的权势依然一时无二。

三〇 高欢“欢”起来



盛极必衰。尔朱家族的强盛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埋葬尔朱家族、推翻北魏的人物早已经稳步壮大起来了。这个人就是高欢，他已经在尔朱阵营内部摩拳擦掌多时了。

一次，尔朱荣忽然问左右：“哪天我死了，谁能够做军中统帅呢？”左右都回答说：“尔朱兆将军可以做统帅。”尔朱荣不以为然地说：“尔朱兆虽然勇猛善斗，但只能做统领几千兵马的部将，不适合做统帅。我死后，能代我统军的，只有贺六浑（高欢的鲜卑名）这个小子。”话虽这么说，尔朱荣却不愿意将大权转移到外姓手中。他虽然欣赏高欢的才能，但也提防着高欢夺权。尔朱荣将高欢远调为晋州刺史。他还告诫负责山西地区的尔朱兆不可轻视高欢：“将来夺权者必是贺六浑这小子。”

元子攸诛杀尔朱荣，尔朱兆发兵洛阳报仇，并没有让高欢参与。尔朱兆擒拿皇帝并不费力，但当黄河河套以西一带的“贼帅”纥豆陵步蕃应偷袭秀容时，却抵敌不过，不得不向高欢求救。幕僚都劝高欢别搭理尔朱兆，高欢却认为此时尔朱兆头脑简单，不会有别的想法，坦然出兵相救。高欢与尔朱兆合作迎敌，杀死步蕃。尔朱兆很感激，与高欢起誓，结为兄弟。

尔朱兆负责现在山西地区各州，又继承了尔朱荣的地位，实力远在高欢之上。他正为流入并州的葛荣起义军余部大伤脑筋。数十万葛荣起义军战败投降后，继续游荡在华北各地。其中有二十多万人被尔朱荣迁徙到并州。这些人出身六镇官兵，反抗性和组织性都很强，两三年间发生过几十次大小不等的造反。尔朱兆疲于镇压起义，就向高欢请教如何处置。高欢趁机建议，对六镇流民不能靠杀，应该挑选可靠的将领统领他们，这样就容易管理。尔朱兆赞道：“好主意！那派谁去管理六镇流民呢？”在座的贺拔允插话说：“高欢最合适了！”这个贺拔允出身武川镇，是贺拔岳的哥哥。武川镇的贺拔、宇文家族和怀朔镇的高欢、侯景等人关系紧张。奇怪的是，贺拔允和高欢二人却保持了不错的私交。听到贺拔允推荐自己，高欢心中暗喜，却佯装发火，对着贺拔允的嘴巴就是一拳，打断了他的一颗牙齿。高欢骂道：“天柱大将军在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是鹰犬；现在天柱大将军不在了，天下事都由大王做主，贺拔允胆敢胡说，该杀！”尔朱兆听了这话满心舒服，也很感动，当场拍板由高欢统率六镇流民。几个人抱头痛饮，一副情深义重的样子。

等尔朱兆喝醉了，高欢寻机跑到帐外，立即宣布：“我受命统领六镇镇兵。凡是原六镇官兵，一律到汾水东岸集中听令。”六镇流民多年来群龙无首，四处飘零，又受尔朱势力的欺负，普遍生活不如意，和尔朱兆离心离德。他们知道高欢当过怀朔的镇兵，有勇有谋，都愿意逃离尔朱兆追随高欢。于是，一批批人呼啦啦地跑去集合了。高欢很快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队伍。

山西此前连年受灾、饥谨遍地，六镇流民更是只能抓田鼠吃，饿得个个面黄肌瘦。高欢觉得在山西没有前途，希望到太行山以东粮食丰富的地方去。他指使刘贵向尔朱兆提出“就食山东”的要求。愚蠢的尔朱兆又一次爽快地答应了。长史慕容绍宗看出高欢有野心，劝尔朱兆说：“如今天下大乱，高欢雄才盖世，让他率领重兵在外，无异于将猛虎放归山林。一旦高欢心怀异志，就无法制服了！”尔朱兆天真地

说：“我和高欢昨天刚结为弟兄，他不会有异心的。”慕容绍宗冷冷地说：“亲兄弟尚且骨肉相残，何况是结义弟兄！”可尔朱兆还是不听，目送高欢带着六镇力量缓缓东进。

途中，高欢杀死了部队中亲尔朱氏的军官，又抢劫了尔朱兆采购的马匹。同时，他严肃军纪，约束六镇官兵像之前那样杀人抢劫，做到与百姓秋毫不犯。过麦地时，高欢带头下马穿行。河北百姓见此，倾向支持高欢。普泰元年（531年）二月，高欢到达信都（今河北冀州）附近。当地豪强高乾兄弟、封隆之等人乘北魏朝廷力量衰微，驱逐朝廷命官，占据州县当起了地头蛇。他们支持高欢入主河北。高欢就在信都驻军下来，将势力向河北各地扩散。

给高欢送上第一块地盘的高乾是货真价实的渤海高氏子弟，与高欢“同宗”。高家是冀州大户，势力广博。高乾兄弟四人，其中三弟高敖曹武功极佳，最为人称道。北魏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汉族人文弱，不堪作战，所以北方武装以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人即便有当兵的，也不占军队的多数。但是高敖曹挑选冀州的汉人，编练了一支三千人的纯汉族武装。人们将他和他的部队比做项羽和江东子弟兵。高欢接收了这支部队，但是对它的战斗力半信半疑。

经过一番准备，高欢觉得羽翼丰满，可以开辟自己的一片天了。为了调动部队情绪，高欢先造谣说尔朱兆要把六镇遗民分配给契胡做部曲，引起部下们的骚动。接着，高欢又假造尔朱兆发来的兵符，要征发一万名士兵去山西作战。他执行“命令”，按部就班地编组队伍，规定了出征日期，然后让孙腾、尉景出面请求迟五天再走。五天满期后，孙腾等再一次请求延期五天，让冀州的官兵酝酿足了情绪。又过了五天，高欢大张旗鼓地集中部队，准备开拔了。官兵们无不泪流满面，哭声惊天动地。高欢也流着眼泪和大家告别，同时不忘进一步挑拨官兵的情绪。他说：“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失乡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没想到尔朱氏要征发我们去打仗，去给尔朱氏当炮灰是死路一条，被分配给契胡当奴仆也是死路一条，可误了军期也没有生路，如何是

好呢？”官兵的情绪激愤起来，有人高喊：“反了，反了，造反吧！”高欢便道：“看来只能反了，但必须推一个人做主。”底下都回答愿意拥高欢为主。高欢却满口推辞道：“我可不行。你们中很多人都跟随过葛荣，葛荣尽管有百万之众，终究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法度，军队强横残暴。这样造反是不行的。如果你们一定要以我为主，必须改正之前的错误。第一，不能欺负汉人；第二，不能违背军令，一切听我号令。如果大家做不到，我就不干，否则又免不了失败的结局。”现场造反的情绪很高，官兵既有造反的决心，又觉得高欢说得很有道理，齐声说愿意听命。于是，高欢杀牛煮饭，犒赏三军，正式宣布讨伐尔朱氏。这是当年六月的事情。

高欢上书元恭，痛陈尔朱氏屠杀天下、杀戮先帝、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大罪——其实，脱身尔朱阵营的高欢也是“共犯”。坐镇朝廷的尔朱世隆封锁了高欢的上书和起兵的消息。于是，高欢就以朝廷为奸臣把持、不知真伪为借口，在信都拥立章武王元融的儿子、渤海太守元朗为新皇帝，年号中兴。

二

尔朱家族对高欢的造反深恶痛绝，迅速决定联手将他扼杀掉。

尔朱氏的实力远在高欢之上，除了尔朱世隆控制朝廷，力量稍弱外，尔朱兆占据晋阳和秀容，独霸山西；尔朱天光占有关中和陇西，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甘肃；尔朱仲远驻军东南，有徐兖二州地盘。他们四人商定到邺城附近集合，号称有二十万之众。高欢率军迎敌，部下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满三万。双方军队相差悬殊，如果不发生奇迹，高欢绝不是尔朱家族的对手。

所有的奇迹都是人创造的，关键在于主人公会不会创造。高欢准确判断尔朱家族在尔朱荣死后，并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各部之间并

不团结。于是，他决定先离间尔朱仲远和尔朱兆。高欢派人到处散布流言，说“世隆、仲远兄弟要谋害尔朱兆”、“尔朱兆和高欢同谋，要杀仲远”等，弄得他们互相猜疑，不能协同前进。其中，尔朱兆的军队推进最快，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与高欢的部队首先接触。高欢列阵迎战，把牛驴联结起来堵塞归路，向全军传达背水一战、非胜即死的决心。战前，高敖曹慷慨请缨，高欢就将他的纯汉族军队安排在侧翼。

战斗开始了。尔朱兆仗着人多势众，首先进攻高欢的中军。尔朱兆一心要抓住高欢这个叛徒，督促部下发动一波波猛攻。高欢抵挡不住，大部队开始出现溃败迹象。就在这时，侧翼的高敖曹带着三千汉族步兵拦腰对尔朱兆发动猛烈的突袭。尔朱兆没料到几千步兵会主动进攻骑兵，毫无防备。他一心督促军队前进，导致队伍拉得很长、首尾难以呼应。高敖曹拦腰一击，将尔朱荣主力杀得猝不及防，混乱不堪。高欢的中军回过头来反攻。尔朱兆大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往晋阳。高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尔朱仲远听说尔朱兆战败后，竟然引兵而逃。高欢从容指挥军队，于次年（532年）正月攻克河北重镇邺城。

决战之前，逗留在尔朱阵营中的大将斛斯椿和贺拔胜就议论：“天下皆怨毒尔朱，而吾等为之用，亡无日矣。”他们都希望尔朱兆战败。一看尔朱兆出现失败的迹象，贺拔胜就在阵前向高欢投降。斛斯椿做得更绝，他带领本部兵马，快马加鞭赶回洛阳。四月，斛斯椿杀尔朱世隆，生擒尔朱天光，作为见面礼送给高欢，向高欢投降。尔朱仲远闻讯，继续发挥逃跑的特长，一路逃到江南向萧衍投降了。

四月，高欢带着自己立的皇帝元朗到达洛阳城郊的邙山，尔朱氏所立的皇帝元恭派人慰劳。高欢一下子面临手头有两个皇帝的问题。

高欢这时也觉得自己所立为帝的安定王枝属疏远，有意重新迎立

元恭。他派魏兰根去招降洛阳，同时观察皇帝元恭的为人。魏兰根观察后觉得元恭智商高、声望好，恐怕日后难以挟制，就向高欢毁谤元恭。左右将领也劝高欢说元恭是尔朱氏所立，劝高欢废掉他。高欢于是将元恭废掉，幽禁在崇训佛寺中。元恭侥幸做了一年多皇帝后，又重新回到了寺庙中。失位后，元恭赋诗一首：“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样的诗句只能让我们后人感叹落魄皇子皇孙的荒凉凄惨的心情，感叹“可怜生在帝王家”的无奈。

高欢与左右亲信商议，挑选新的皇帝。最初大家青睐的人选是汝南王元悦。元悦被招来开始准备登基的时候，高欢又在登基的前一天晚上改变了主意，不立元悦了。当时北魏的皇室成员四散逃避，各个王爷难见影踪，寻找新皇帝竟然成为了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时有个宗室王爷元修正躲藏在洛阳城西、和他关系不错的散骑侍郎王思政的家里。元修是广平王元怀的第三个儿子，能力尚可，历封汝阳县公、平阳王，是朝廷的侍中、尚书左仆射。也许他躲藏的地方被人告发了，高欢决定立元修为新皇帝。元修在王家躲藏了五十天左右，突然见到王思政引着斛斯椿等人，带着四百兵马来找他，吓得面如死灰。他问王思政：“你把我出卖了吗？”王思政摇头说没有。元修又颤巍巍地问他：“能保我性命吗？”王思政无奈地回答：“世事变化无常，王爷，我也不知道啊。”元修就这样被凶神恶煞般的骑兵拥夹在中间，来到高欢的毡帐中。

高欢见了元修泪下沾襟，下拜陈述事由。元修这才知道原来是拉自己来做皇帝的。他赶紧跪下回拜高欢，连说自己德才浅薄，不敢称帝。高欢也不多说话，随即出去了。陆续有人将服饰呈送进来，并请元修沐浴更衣。为了防止元修逃跑，高欢全军夜里严密警备。天亮的时候，文武百官都前来朝见。废帝元朗早按照高欢的意思写了禅位诏书。高欢让斛斯椿捧着劝进表前来劝进。斛斯椿进入帷门后，不敢向前。元修就让王思政取来表，说：“看吧，我现在不得不登基称帝

了。”于是在洛阳东郭之外，北魏王朝又进行了一场禅让典礼。没做几天皇帝的元朗将皇位禅让给了元修。元修就这样成为了北魏的末代皇帝，史称魏孝武帝。

五月，避居佛寺的元恭被高欢毒死，年仅35岁。高欢又杀死曾经为帝的安定王元朗、东海王元晔。连曾经作为过人选的汝南王元悦也被高欢下令杀死。在这点上，高欢比尔朱氏做得更过。

之前，尔朱天光要带兵去剿灭高欢。贺拔岳劝他固守关中，尔朱天光不听，留下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自己领军东出和尔朱兆合兵。他一走，贺拔岳料定尔朱氏必败，找来宇文泰商量对策。宇文泰建议：“尔朱氏必败，我们干脆也造反吧！”他说服关中三巨头之一的侯莫陈悦出兵。侯莫陈悦和贺拔岳一同攻下长安，捉了尔朱显寿。贺拔岳轻而易举得了关中，表面上向高欢归顺，实际上割据关中自守。他对宇文泰倍加器重，事无巨细都交由宇文泰处理。

又过了一年（永熙二年、533年）的正月，高欢领兵袭破秀容，尔朱兆逃到荒山上自缢而死。尔朱兆的长史慕容绍宗携余众归降，高欢认为他忠义，非但没有因为他从前向尔朱兆进言要杀自己而计前嫌，对他优礼有加。尔朱势力彻底灭亡，高欢在形式上统一了北魏，继承了尔朱氏的地位。他逼元修迎娶了自己的女儿作为皇后，升格成了国丈。高欢城府很深，言行严肃，对于军国大略独断专行。无论是元修，还是一般大臣，都猜不透高欢的决策和悲欢。北魏朝廷才出狼窝，又入虎口。

三一 一次逃亡导致的帝国分裂



北魏孝武帝元修与前几任傀儡皇帝不同，有想法，有能力。他不愿意重蹈前几任的覆辙，一开始就有除去高欢的决心。

高欢铲除尔朱势力后，觉得尔朱荣的根据地晋阳城不错，就留在了晋阳，将它作为大本营来经营，客观上放松了对洛阳的控制。当时洛阳城里的一批大臣、降将并不是真心降服高欢，很快聚集在元修周围。南阳王元宝炬和将军元毗、王思政、斛斯椿等人纷纷劝说孝武帝除掉高欢。其中斛斯椿本是尔朱荣的部将，率部投降高欢后诛杀尔朱家族有功，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兵权。元修就以斛斯椿为领军将军，与王思政共同统帅近卫军，作为心腹，还调整了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的人事。这样，军谋朝政都掌握在斛斯椿的手里。他重新安排了宫内侍卫，挑选数百名骁勇武士担任孝武帝的近卫军。元修还多次以出猎为名，与斛斯椿排兵布阵，互相密谋。

仅仅依靠洛阳的这些人还不足以推翻高欢。元修继续寻找同盟者。他主攻两个方向，一个是寻找地方实力派军阀作为外援，一个是从高欢阵营的内部拉拢人手。

元修准确判断出武川的贺拔家族可以和高欢一决高低，就想倚靠贺拔兄弟。贺拔胜投降高欢后留在洛阳，元修就任命他为荆州刺史，

把他作为南方的依靠。元修还暗中派人与拥兵关中的贺拔岳联络，准备引关中的军队夹击高欢。

司空高乾是高欢起兵之初的主要盟友，他们兄弟几个是高欢的重要依靠力量。元修就想笼络他为己用。一次元修在华林园赐宴，散席后单独留下高乾，大夸高乾“奕世忠良”，要与高乾结拜为兄弟。因为事出仓促，皇帝又殷勤相劝，高乾只好和元修结为异姓兄弟，事后也没有告诉高欢。慢慢地，高乾看到元修和斛斯椿、王思政等人常常密谋，又派人联系贺拔岳，任命贺拔胜为荆州刺史，明显是在树党自强。他担心元修要对高欢不利，洛阳城“祸难将作，必及于我”，逃到晋阳向高欢报警。

高乾不谈洛阳的时事，而是劝高欢干脆逼元修禅位，夺取北魏的天下。高欢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赶紧用袖子掩住高乾的口说：“不要乱说！我还需要仰仗司空大人在洛阳帮我多留意时局。”高欢这么说，反而让高乾心中有愧，更加不安起来。接着，高欢屡次向元修推荐高乾担任侍中，主持朝政。元修恨高乾站在高欢一边，将高欢的奏折置之不理。高乾夹在两人中间，双方都惹不起，干脆就自求外任徐州刺史，想躲到外地去。元修见状，既怕高乾泄漏自己的秘密，又恨高乾不为自己所用，就明白地告诉高欢：“朕曾经和高乾立下盟约，进退与共。如今高乾反复两端，实属可恶。”高欢对高乾背着自己和元修勾勾搭搭也很厌恶，干脆将高乾秘密劝自己篡位的事情转告了元修。自此，高乾被双方都抛弃了，只有死亡一条路可走。元修将他囚禁起来，派人痛责他前后反复无常。高乾申辩道：“臣以身奉国，义尽忠贞，是陛下要对付高欢，却借口我反复无常。欲加之罪，其无辞乎？”结果，高乾被赐死，时年37岁。

在洛阳的高敖曹看到哥哥被杀，逃往晋阳向高欢哭诉。高欢装出惊愕的样子，将责任全都推到元修身上，好好抚慰了高敖曹一番。高敖曹更加死心塌地地站在高欢一边。其他部将也因为元修枉杀高乾，而对他更加疏远乃至仇视。元修想从高欢身边挖墙脚的企图落空了。

却说关中的贺拔岳接到元修递出的橄榄枝后，犹豫不定。他决定不了到底是选择元修还是高欢，于是派宇文泰去晋阳见高欢，查看虚实。

宇文泰和高欢的见面，是一次英雄与英雄惺惺相惜的会面。宇文泰看到了一个有志于天下的英雄。高欢则看到一个相貌非凡，精神抖擞的年轻将领（身長八尺，垂手过膝）。高欢想留下宇文泰为自己效力，不想宇文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但是宇文泰也是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他不想离开事业已有起色的关中，更不想只做高欢的部将。因此宇文泰坚持要返回关中。高欢犹豫再三，最后松了口，允许宇文泰返回关中。宇文泰刚走，高欢就后悔了，想要杀掉宇文泰以绝后患。可是宇文泰已经抓住机会，快马加鞭返回关中了。高欢的追兵一路赶到关口也未追上宇文泰。高欢的直觉是对的，最后消灭高欢后代的就是宇文家族。

返回关中后，宇文泰告诉贺拔岳，高欢是有意荡平天下的枭雄，站在他的一边无异于与虎谋皮，不如借助元修的力量与高欢抗衡。于是，贺拔岳选择了元修。

高欢自然要对付贺拔岳。永熙二年（533年），高欢要调贺拔岳做冀州刺史。贺拔岳不愿离开关中老窝，谢绝了任命。一计不成，高欢又生一计。贺拔岳这个“关中王”是形式上的，关中和陇西还有一些地头蛇不服从他的指挥，尤其是地位仅次于贺拔岳的侯莫陈悦是个有勇无谋的赳赳武夫，见利忘义。高欢诱惑侯莫陈悦，答应只要他杀害贺拔岳，就让他取而代之。侯莫陈悦欣然答应。

灵州（今宁夏灵武）刺史曹泥不服从贺拔岳。永熙三年（534年），贺拔岳招呼侯莫陈悦会师高平（今宁夏固原），计划一起讨伐曹泥。侯莫陈悦就趁贺拔岳来找自己商讨军机的时候下手。他诱贺拔岳进入营帐，坐论兵事，途中借口腹痛，起身退出。马上，侯莫陈悦的女婿元洪景就带人冲入营帐，将贺拔岳砍死。

贺拔岳死后，他的部队异常震惊，开始出现四处奔散的迹象。侯莫陈悦派人安慰说：“我只杀贺拔岳一人，其他人不用怕。”可是除了这唯一的措施，侯莫陈悦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既没有收编贺拔岳的军队，也没有动员自己的军队戒备。相反，侯莫陈悦带上部队离开高平，向陇西行进。

许多忠诚于贺拔岳的将领，率部聚集在平凉，谋划向侯莫陈悦复仇。将军赵贵提议大家推举宇文泰为新统帅，得到了一致赞成。当时宇文泰担任夏州刺史，镇抚赫连勃勃大夏国的故地。将军杜朔周星夜奔往夏州，转告急情。宇文泰闻讯，点起帐下轻骑，连夜驰赴平凉。宇文泰走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遇到了高欢派来招抚贺拔岳部众的侯景。宇文泰用严词厉语诘问侯景为何而来，申明关中之事内部解决，不需要外人插手。侯景也是一代枭雄，竟然被宇文泰的强硬态势所震慑，不敢继续前进，中途返回晋阳。宇文泰顺利排除干扰，和贺拔岳余部会合。他率领部众进入高平城，进行短期整顿，稳定下来，然后迅速挥师进攻侯莫陈悦。

侯莫陈悦不敢应战，逃到秦州（今甘肃天水），企图占据山水之险顽抗。他自从杀害贺拔岳以后，神情恍惚，常常梦见贺拔岳来找自己。在睡梦中，贺拔岳问他：“我的兄弟，你要到哪里去，让我找得好苦啊！”被鬼魂这么一搅，侯莫陈悦哪还有心思迎击，早就内心恐惧，斗志全无了。部下官兵也纷纷叛降宇文泰。宇文泰统帅复仇之师，一举击败侯莫陈悦。侯莫陈悦弃军而逃，后为追兵所迫，在野外自缢而死。

宇文泰随后挥师东进，占领长安，以此为大本营着力经营西部。他和高欢一样，也主要依靠六镇余众，尤其是依靠武川镇的力量。宇文泰原来就反对高欢，经过贺拔岳遇刺事件后，他和关中的将领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高欢了。孝武帝元修就任命宇文泰做关西大都督，把他作为新的倚靠对象。

永熙三年（534年），就在关中、陇西大乱之时，孝武帝元修对高欢忍无可忍，决心兵戎相见了。

元修决定御驾亲征，讨伐晋阳的高欢。为了杀高欢一个措手不及，他先下诏洛阳戒严，抽调河南诸州兵马，在洛阳近郊进行大阅兵，声称要南伐梁国，实际上是北伐高欢。为了麻痹高欢，他还密诏给高欢说要带兵攻打关西的宇文泰和荆州的贺拔胜。

高欢是什么人，能看不透元修的把戏？他马上回复朝廷说，这些小事无须皇上御驾亲征，让我高欢来代劳就可以了。高欢调集五路兵马共计二十二万人出发南下，“助援”皇帝征讨。同时高欢还上表极言斛斯椿等人的罪恶，祭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狼烟滚滚，高欢大军奔向洛阳而来！

元修在洛阳搜罗的那些兵马，肯定不是高欢二十二万铁骑的对手。中军将军王思政劝元修避开高欢兵锋，前往关中依附宇文泰。东郡太守裴侠是个明白人，对王思政说：“宇文泰为三军信服，位处关中形胜之地，已握权柄，怎会轻易让权于我们？如果去投靠他，无异于避汤而入火！”王思政觉得很有道理，但南去荆州又离敌国宋朝太近，就问该怎么办。裴侠说：“与高欢相战有立至之忧，西奔到宇文泰处有将来之虑，先往关右一带驻军观察一下再做决定。”元修觉得有理，决定对高欢采取防御，观察形势再决定进退。

元修下诏宣示高欢的罪恶，公开与他决裂。在诏书中，元修高呼：“王若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意思是即便赤手空拳，也要和高欢拼个鱼死网破。实际上，元修早已经铺设好了逃跑的后路：他提升宇文泰为关西大行台、尚书左仆射，将妹妹、冯翊公主许配给宇文泰为妻。

高欢大军很快兵临黄河北岸。两军隔着黄河相持。斛斯椿请求率领两千兵马连夜渡过黄河，趁高欢大军远道而来，立脚未稳进行偷袭。元修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准备批准。但是黄门侍郎杨宽劝谏说：“皇上在紧急关头将兵权给别人，恐生他变。万一斛斯椿渡河偷袭成功，那可是灭掉一个高欢又生出第二个高欢啊。”元修觉得这话更有道理，马上下令斛斯椿停止发兵。斛斯椿叹息道：“皇上不用我计，真是天意不兴魏室！”

宇文泰听到两军隔黄河对峙的消息，对左右讲：“高欢数日内急行军八九百里，疲军迎敌，是兵家大忌，正好乘其疲惫奇袭。当今皇上以万乘之尊御驾亲征，不主动出击渡河决战，反而沿河据守，很是失策。而且长河万里，只要一个地方被突破，必败无疑。”他判断元修必败，下令部队做好迎接皇帝西迁的准备。

客观地说，元修在实力上处于绝对劣势，当面对阵取胜希望不大，只能出奇计。高欢大军急行军八九百里迎战，早成了一支疲军。元修乘其疲惫奇袭，还是有可能扭转战局的。但是元修从防止权臣出现的角度出发，拒绝抢先发动决战，反而沿河据守，造成了最大的战略失误。

元修见取胜艰难，就带着南阳王宝炬、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斛斯椿和五千骑兵宿于瀋西杨王别舍。他和王思政的想法一样，决心投靠关中宇文势力。在当地，元修发现了上百头牛，命令全杀了来犒赏军士。士兵从元修的举动中发觉皇帝有逃亡的心思，纷纷开始逃散。一夜间，元修周围的军队逃亡了超过一半人。就连清河王和广阳王两位王爷也都逃回洛阳去了。元修更是失去了抵抗的勇气，第二天便弃军西逃。除了少数亲随，大臣中只有武卫将军独孤信追随元修左右。这位独孤信的忠诚日后得到了历史的回报，他的女儿成为了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宇文泰已经派遣都督骆超、李贤和各带领数百骑兵东进接纳元修等人。李贤和这支部队在崤中遇到了落荒而来的元修等人，元修在他的保护下最终抵达了长安。

高欢自晋阳发兵后给元修上了四十多封奏表，都没有得到答复。他判断元修极可能逃入关中依靠宇文泰。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结果。毕竟元修代表着北魏的法统所在，一旦皇帝逃亡，高欢就免不了在历史上落下逐君出逃的过错，同时把“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政治优势白白奉送给敌人。情急之下，高欢亲自挑选一支轻骑西进追赶元修。沿途，陕州守将见高欢亲自前来，望风而逃；高欢继续追到潼关，痛苦地发现元修已经被宇文泰接走了，只好先东还洛阳。洛阳周边那些群龙无首的军队纷纷败降。

南边的荆州刺史贺拔胜之前也动员军队，想到洛阳“勤王”。中途听说元修已经失败了，贺拔胜就想带兵西入关中，和宇文泰合兵一处。高欢派兵占领华阴，堵住了贺拔胜西进的道路。贺拔胜只好退回荆州，又为侯景打败，无奈之下南逃，投降梁朝去了。梁武帝萧衍对北方降将不分阵营，一律以礼相待，非常客气。贺拔胜在南梁生活优越，却日夜思念北方，遇到南飞的秋雁都不舍发弓。两年后（536年），贺拔胜得梁武帝许可，辗转奔赴长安。他加入宇文泰阵营，要向高欢讨还弟弟贺拔岳的血债。

不久，高欢第二次亲自率军进攻潼关，斩宇文部的行台华长瑜，进而占领华州。但还是没能夺回元修。元修在长安站稳脚跟后，向天下宣示高欢的罪恶，号召天下勤王杀贼。高欢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冬十月，他在洛阳推清河王元亶的儿子、年仅11岁的元善见为新皇帝。高欢换上一个新皇帝，否定了原来皇帝的合法性。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推卸元修的一切指责，无视长安的一切命令了。同时，高欢还可以继续挟天子以令诸侯。唯一不妥的是：北魏出现了两个皇帝！

三二 两魏争锋：一年一小打，三年一大打



北魏分裂后，东强西弱。东魏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且经济基础好过千疮百孔的西魏，自然国力要强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是，高欢继承了六镇起义的多数余众，而宇文泰周围只聚集了少数六镇官兵。这是东强西弱的军事原因——当时，六镇官兵战斗力最强。

高欢的部队以鲜卑人为主，汉族人很少。内部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鲜卑官兵普遍歧视汉族人。东魏大将高敖曹是汉族人，英勇善战。高欢发号施令的时候，一般用鲜卑语，但只要高敖曹在场就改用汉语。主公如此敬重高敖曹，底下官兵也很忌惮他。一次议事，有人报告说治河的汉族民工淹死了不少。在座的鲜卑族将领刘贵随口就说：“汉人的性命不值一文，随他死！”高敖曹闻言大怒，拔刀就向刘贵砍过去。刘贵落荒而逃。高敖曹还不罢休，随之鸣鼓起兵，集合部队要进攻刘贵。同僚们好生相劝，高敖曹才罢手。

高欢深知属下鲜卑与汉族之间的矛盾。他两方面都不得罪，将民族矛盾压制得很好。他对鲜卑人讲：“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为你们耕作，女人为你们纺织，上交粟帛赋税让你们衣食无忧，你们为什么还要欺凌他们呢？”遇到汉人，高欢又说：“鲜卑人是你们雇佣的兵

客。你们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东西吃，他们替你们防盗击贼，保你们安宁度日。你们为什么还要恨他们呢？”一次，汉族大臣杜弼请求高欢消除内贼。高欢就问内贼是什么人。杜弼直言是那些掠夺百姓的鲜卑贵族。高欢默不作声，而是下令营中将士搭弓上箭、高举大刀、夹道而立，形成一片刀山箭林。然后，他命令杜弼到里面来回走动一回。杜弼一介书生，哪里见过此等场面，吓得浑身哆嗦、汗流浹背，不敢往前走。于是，高欢就对杜弼说：“现在他们只是搭箭不射、举刀不砍，你就被吓得失魂落魄了。诸位鲜卑将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百死一生，又怎么说？他们之中虽然有人或许有贪污冒抢的过错，但与他们平时的战功相比，怎能相提并论！”杜弼跪地顿首，为自己冒失谢罪。可见，在高欢看来，汉族人和鲜卑人各有所长，自己的统治离不开任何一方。可他对双方矛盾采取的“遮盖子”的做法，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丝毫帮助。

高欢拥有实力优势，很想平定关中，结束北方的统一。机会很快就来了。536年（东魏天平三年，西魏大统二年）年末，关中大饥，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高欢抓住机会，于十二月出兵进攻西魏，挑起了两魏之间的第一次决战。

高欢派遣高敖曹攻上洛（今陕西商州）、窦泰攻潼关，亲自领兵于次年（537年）正月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南）造三座浮桥，准备抢渡黄河。宇文泰的部队人少，不足以分兵抵抗，部将们就建议集中主力先进攻北边的高欢大军。但是，宇文泰判断高欢搭建浮桥是佯攻，是想掩护南边窦泰这支偏师。（冬天北方天寒地冻，黄河多处冰冻，高欢如果真想进攻，直接涉冰渡河就行了，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搭建浮桥。）宇文泰决定先集中兵力击退窦泰。部将们都不以为然，认为高欢近在眼前，不做防备反而掉头进攻窦泰，很可能遭到高欢和窦泰两面夹击。宇文泰力排众议，坚持先打窦泰。果然，窦泰没有料到西魏大军如此重视自己，竟然集合大军掩杀过来。他猝不及防，仓促列阵迎战，被宇文泰打得大败。部下死伤殆尽，窦泰自杀身亡。高

欢听到奚泰兵败后，失去信心，下令撤毁浮桥撤军。西魏军就势追击，东魏军连战连败。战事异常惨烈，东魏大将薛孤延负责殿后，一连砍坏了十五把钢刀，才保护高欢一行人安全脱险。高敖曹闻讯，也主动撤兵。这第一战，以高欢失败告终。

胜利的宇文泰，日子也不好过。大饥荒造成军队都吃不上饭。同年八月，宇文泰为了抢夺粮食，主动出兵河南。两魏之间爆发了第二次决战。

宇文泰顺利攻克了恒农（即弘农，今河南灵宝），得到了此处了粮仓。高欢点起二十万大军，亲自来会宇文泰。宇文泰赶紧带上粮食，退回关中。闰九月，高欢领兵从山西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北部。在南边，东魏大将高敖曹率兵三万把恒农团团围住。宇文泰手头只有不到一万的军马，又面临南北夹击的困境。

高欢志在必得，督率大军迅速向关中腹地进军。宇文泰驻扎在渭水南岸，用抢来的粮食让手下官兵恢复体力，同时征召诸州兵马。高欢的军队行进很快。西魏诸将认为实力悬殊，建议宇文泰按兵不动，等兵马陆续会合、大家休过劲后再迎战。宇文泰认为：“如果高欢逼近长安附近，民心必定降服于他。到时候，我们再想打败他就难了。现在高欢新到关中，我们还有机会击败他。”于是，宇文泰硬着头皮带领又饿又少的军队渡过渭河，向东北方向进军迎敌。两军在沙苑（今山西大荔南）相遇。

战前，宇文泰派手下将领达奚武带兵化装成东魏军士，傍晚混入高欢营内，将东魏军中一切部署都查明了。东魏方面对宇文泰的实力也看得一清二楚。大将侯景建议高欢不必与宇文泰交战，只要僵持着，等到敌方军民饿死大半，宇文泰不死也要投降。侯景进而建议高欢趁宇文泰主力都在沙苑，分兵多处，占领关中其他地区。当时宇文泰的军队只有三天的军粮，迫切需要速战速决。侯景的建议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高欢没有采纳。高欢寄希望于在沙苑彻底消灭宇文泰，

轻松收复整个关中。等敌人饿死的主意，在高欢看来太费时了。

宇文泰在沙苑以东十里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埋伏精兵，然后背水列阵，等着高欢主动进攻。东魏将军斛律羌举再次建议高欢分出一支精兵偷袭长安，给宇文泰来个釜底抽薪。当时高欢完全具有这样的实力，也有机会，但他过于自信，还是嫌此举多余，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即将开始的沙苑之战上。不过，高欢看到渭河边上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芦苇丛，心生疑虑，下令放火烧掉渭曲芦苇。关键时刻，侯景站出来：“我们应该生擒宇文泰宣示百姓。如果他躲在芦苇丛中，就会被烧成焦炭，那么我们胜利之后，宇文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会有人不相信我们大胜了。”高欢踌躇之间，大将彭乐大声叫嚷道：“我军人多势众，以百敌一，还怕打不赢吗？”这句话让高欢信心满满，下令全线进攻。

东魏官兵看到渭河边只有屈指可数的西魏军队，个个贪功冒进，都不排列队形就争相进攻，松松垮垮地散成一片。西军相交，宇文泰亲自擂鼓，埋伏在芦苇丛中的官兵奋起而出。大将李弼率领铁骑横击东魏主力，将高欢大军截成两段。西魏将军李标、耿贵技高胆大，杀得铠甲袍裳全被敌人鲜血染得透红。东魏将领也不甘落后，大将彭乐杀入西魏阵中，肠子都被敌人的长矛扎得流出来了，他就用手把肠子塞回肚子，抡枪再战。无奈东魏大军队伍散乱，各自为战，逐渐遭到了西魏军队有组织的围剿。在远处观战的高欢看到自家军队渐渐处于下风，想集结兵力后再战。派出去召集军队的军官很快回来禀报，找不到成建制的军队，将不知兵，兵不见将，没人应答。高欢知道大势已去，又不甘心二十万大军就如此溃败，是战是退犹豫不决。大将斛律金劝他：“众心离散，不可复用，不如立即退回黄河以东，整军再战。”他怕再打下去，东魏军队会全军覆没。高欢紧紧握住马鞍，连声叹息，就是不说话。斛律金情急之下，狠狠鞭打高欢的坐骑。坐骑惊起，驮着高欢往回就跑。东魏官兵见状，纷纷向东逃去。

高欢之前压根没做撤退准备，到了黄河边上，既没有船，又没有

桥。随从找了一匹高大的骆驼让高欢骑到黄河之中，再换乘大船狼狈渡过河去。回到山西一统计，东魏此战丧失官兵超过八万人，丢弃铠仗十八万，元气大伤。沙苑之战中，高欢离长安是那么近；沙苑之战后，高欢离长安越来越远，东西争锋的主战场从河西和关中转移动到了河东（山西南部）和河南。东魏也不再能随意侵入关中。

沙苑之战的胜利辉煌得出乎宇文泰的意料。他俘虏了数以万计的东魏官兵，只挑选了其中的两万名精壮，补充西魏军队，其余数万人都赶回东边去。这一方面是因为关中粮食奇缺，宇文泰养不起那么多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宇文泰原本兵微将寡，收编、消化两万人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作为西魏军队核心的武川镇兵不过数千人；宇文泰击败侯莫陈悦后，敌将李弼率众万人投降；跟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河南军队也有近万人，三股力量合起来不到三万人。之后因为连年征战和饥荒，到沙苑大战前宇文泰能集合的军队不过一万人。战后，通过收编俘虏、招募汉族百姓等措施，西魏军队人数开始增多。到大统八年（542年）年初，宇文泰正式建立六军，才有了大约十万人——这个数额依然远远低于东魏的高欢军。

沙苑败绩传到河南，高敖曹主动撤去恒农之围，退军洛阳。宇文泰乘胜追击，高敖曹又放弃洛阳，撤到黄河之北。西魏收复洛阳，河南大部分郡县纷纷改易旗帜，归降西魏。这些都算是沙苑之战的衍生战果。宇文泰兴奋地带着西魏新皇帝元宝炬回洛阳祭扫先帝陵庙。因为这场大胜，偏居一隅的西魏政权大大巩固，宇文泰也巩固了在朝中的主宰地位。

二

高欢并不服输。大败后的第二年（538年），他任命老伙计侯景为河南方面的主将，集结军队，着手收复河南州郡。侯景顺利夺回洛

阳，烧毁洛阳大部分民居官寺。洛阳在东魏迁都之时，绝大多数百姓连同宫殿庙宇都被高欢迁徙到邺城去了，如今又在熊熊火焰中成为一片废墟瓦砾。宇文泰闻讯，亲自领兵来战侯景。东西之间的第三次决战，就在洛阳郊区展开了。

听说宇文泰亲自前来，侯景乘夜从洛阳后撤。宇文泰因为之前两战皆胜，滋生了骄傲轻敌心理，以为侯景是怯战逃跑，轻率地带领部下轻骑追到黄河边上。此时，侯景的军队已经占据了优势地形，只见东魏军队北据河桥、南依邙山，甲冑鲜明，就等宇文泰前来厮杀了。混战开始后，宇文泰战马中流矢惊起，把宇文泰摔到地上。东魏士兵围杀上来，宇文泰的大多数随从都吓得逃跑了。情况紧急！将军李穆连忙下马，用马鞭抽打趴在地上的宇文泰，假装叫骂：“你这个糊涂兵，你们主帅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就你趴在这里？”围上来的东魏士兵听李穆的口气，就以为宇文泰不是什么重要角色，纷纷扭头散去追杀更重要的目标。李穆扶宇文泰上马，双双西逃。侯景没有抓住良机扩大战果，西魏大军陆续赶到，加入了混战。两军在黄河岸边直杀得硝烟四起，战区越来越大，从河桥蔓延到邙山，又燃烧到洛阳城下。此战因此被称为“河桥-邙山之战”或者“河阴之战”。双方官兵杀得兴起，逐渐失去了联络，各自为战。

东魏大将高敖曹一向轻视宇文泰，又自视甚高，树起硕大无比的旌旗，上面写着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又摆出贵重的伞盖，耀武扬威地杀到阵前。如果高调，岂能不招人瞩目？西魏官兵认定这是个大角色，一窝蜂地围攻高敖曹而来。越是西魏的精兵悍将，越不放弃这等立功良机，杀得就越英勇。可怜的高敖曹成了活靶子，很快就全军覆没，自己又遭西魏精锐追击，孤身一骑跑往河阳城。驻守河阳的是高欢的侄子高永乐，一向和高敖曹不和，下令关闭城门不让高敖曹进城。高敖曹向城上大声呼救，央求守军放下绳来，没人搭理。他只好挥刀猛砍城门，想劈个洞出来钻入城中。无奈城门太厚，砍了很久也砍不开。眼看大队追兵杀到，高敖曹知道性命不保，反而镇定下来。

他转身昂首向追兵冲杀而去，一边跑一边大叫：“来！与汝开国公！”（意思是杀了高敖曹，就能从宇文泰那里获封开国公作为赏赐。）据说杀死高敖曹的是一名普通西魏士兵。宇文泰并没有封他为公爵，而是赏他布帛一万匹。估计西魏财政拮据，一时半会拿不出那么多布帛，就来了个“分期付款”，每年赏给这名士兵若干匹布。直到南北朝结束，这名士兵及其后代都还没领完赏赐。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两军从早到晚鏖战，团团厮杀在一起。傍晚时分，战场上气雾四塞，一片阴暗。各自为政的将领们都不知道谁胜谁负。西魏大将独孤信、赵贵等人感觉东魏的官兵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混乱之中又不知宇文泰和皇帝的消息（当时来洛阳扫墓的皇帝元宝炬还没撤回），以为本方已经落败。于是，两人率部撤退，西魏其他将领见状，纷纷指挥部队边战边退。在后方观战的宇文泰见本方官兵后撤，也烧营逃走。东魏军队在后面掩杀。如此一来，战局真的对西魏不利了。

西魏大臣王思政出身文人，当时也在洛阳前线。众人无组织撤退之时，王思政却带领身边的人主动阻击东魏追兵。他跳下马来，手持长矛，左挑右刺，连杀数人。敌军越聚越多，王思政等人陷入重围。左右之人无一幸免，王思政也重伤昏厥，被埋在尸体堆中。当时因为天黑，敌军又急着追击，所以没有仔细打扫战场。加上王思政当时破衣烂甲，躺在那里一点都不像将帅，所以首级没被敌人割去领赏。后来，下属在尸体堆中好不容易把王思政扒了出来，拉回营帐救了回来。

西魏军队陆续撤退到恒农，才缓过劲来，站稳了脚跟。宇文泰损失兵马过万人，决心退兵回长安休整。王思政的表现给宇文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刮目相看。所以，宇文泰留王思政守恒农，负责河南事宜。

恒农以东的河南郡县又纷纷投降东魏。东魏重新占领洛阳，高欢

索性将这片废墟夷为平地。洛阳自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彻底成了一个历史地名，一个政治标记。此战，东魏虽然夺回了大片土地，可也伤亡惨重。高欢痛失一代名将高敖曹。高敖曹虽然在东魏人缘极差，对高欢却是忠心耿耿，鞍前马后，出力不小。他死后，高欢肝胆俱裂，追赠高敖曹为太师、大司马、太尉。见死不救的高永乐，被打了二百军棍。此后，东魏大军也开始休整。

此后四五年时间，河南地区安静多了，除了小规模战斗外没有爆发决战。在河阴之战的当年冬天，西魏发动突袭，再占洛阳。这个“战果”仅仅具有宣传意义，连胜利都算不上。东魏都懒得出兵“收复”。真正有影响的行为是王思政修筑了玉壁城（在今山西稷山）。此城地处黄河北岸，周边地势险要、深谷纵横，易守难攻。西魏以此作为据点，控制河东地区，间接威胁高欢的大本营晋阳。之后，玉壁成了西魏前进的重镇、东魏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三三 战争是发展最大的动力



频繁战争让宇文泰头疼死了。

每一次大战都是对宇文泰统治地位的挑战。不仅战场的胜负关系他的生死，战场之外的因素也决定他的成败。沙苑之战是在弹尽粮绝之前的侥幸取胜。河桥-邙山之战更是差点要了自己的命。河南前线的败报传到关中，关中不服宇文泰统治的官民和之前收编安置的俘虏揭竿而起，要推翻宇文泰。有一支叛军甚至攻占了长安的子城。幸亏宇文泰大军及时赶了回来，将各地火苗一一扑灭。

宇文泰深深认识到：打仗就是打钱粮，就是拼后方！无奈的是，关中原本就落后于东方，宇文泰控制的人口少、领土小，经济基础更比不上高欢。怎么办？硬件比不过，只能拼软件，争取向管理要生产力、向改革要胜利。可是，一场成功的改革谈何容易？

一天，宇文泰和公卿大臣去昆明池观鱼，途中经过城郊一处西汉时的仓地。宇文泰就询问此地的来历，左右大臣没有一个人说得上来。宇文泰正唉声叹气的时候，有人推荐了一个小官——著作郎苏绰。宇文泰把苏绰召来一问，苏绰将仓地的来历讲得头头是道，顺带着涉及西汉的历史、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宇文泰越听越有兴趣，就进一步向苏绰请教天文地理、天下兴亡，苏绰都一一道来，其中不

时闪现出真知卓见。宇文泰干脆和苏绰并马而行，边走边谈。到了昆明池，宇文泰根本无心钓鱼，马上带着苏绰返回城中。两人彻夜长谈，宇文泰向苏绰咨询治国之道。

苏绰是关中武功人，出身豪门世家，祖先从三国时代起历任高官显贵。他从小继承家学渊源，博古通今，名声在外，可惜在鲜卑族的统治下一直默默无闻。镇兵出身的宇文泰没读过书，之前并不重视苏绰这样的汉族知识分子。经过这次长谈，宇文泰完全折服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让宇文泰顿时发现了一座丰富的政治宝库，开阔了眼界，隐约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苏绰著作郎的官职，还是尚书仆射周惠达举荐的。第二天，宇文泰遇到周惠达，大喊：“苏绰真是奇士！我要把国政都交给他。”于是，苏绰平地一声雷，出任了宇文泰的左丞，掌管机密，实际主持西魏的改革。

大统七年（541年），苏绰在宇文泰支持下起草六条诏书，以皇帝名义颁布施行。这六条分别从治心、教化、地利、贤良、狱讼、赋役六个方面，主张进行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改革。改革的措施可分为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改革现存的弊病，改变之前西魏政坛近乎无法无天的原始状态。在政治上，颁布《大统式》作为统一的法律，还规范官制，裁减冗员。宇文泰主张不苛不暴、法不阿贵，官吏犯法一视同仁。宇文泰的内兄王世超，任秦州刺史时，骄横州县，结果被赐死。在经济上，之前惨遭破坏的均田制恢复了起来，那些因为土地兼并、天灾人祸和连年战乱而背井离乡的流民重新与土地结合了起来。劝课农桑、发展经济取代征兵打仗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考核目标，因此地方官吏纷纷重视农桑生产。此外，西魏还大力发展屯田。关中经济很快走出凋敝，稳步发展。

第二个方面是因时因地，建立新制度。宇文泰恢复鲜卑族的旧姓，让改姓汉姓的少数民族改回原姓，希望以此摆脱汉人柔弱奢华的毛病，保持战斗力。宇文泰仿照鲜卑旧俗，将军队分为八部，各部设柱国大将军统帅；士兵另编军籍，作为专业军人，不从事耕种，也不

受地方政府管辖，称为“府兵”。统帅府兵的八名柱国大将军分别是：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和侯莫陈崇。宇文泰地位最高，统率其他柱国大将军；元欣是西魏宗室、孝文帝的侄子，基本上是个虚职，指挥不动军队。实际管事打仗的是剩下的六位柱国。每位柱国都督两名大将军，一共有达奚武、李远、杨忠等十二人。府兵制的创立，表面上看是倒退到鲜卑族早期的组织结构。实际上，它仅仅是组织形式的“鲜卑化”而已，各柱国大将军也好、底下各级军官也好，都是中央直接任命，士兵对军官也没有依附关系。府兵完全是朝廷的军队。鉴于少数民族人数少，宇文泰大量吸引普通汉族百姓当兵。整编后的西魏军队超过一半人是汉族人。这些汉族人不是改姓鲜卑姓氏，就是冒充少数民族，用“胡俗”来培养战斗力。又比如宇文泰仿照周礼，革新官制，以周朝的继承者自居。这项改革对汉族人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一个鲜卑族的政权以汉族盛世周期的继承者自居，一下子拉近了自己和广大汉族人口的距离。很多北方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对西魏的排斥，与它合作。西魏抬出周朝来，还使得自己在和东魏、南朝争夺天下正统时占据了历史优势。

宇文泰在改革中的表现也不错。他虽然对制度革新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但放手让人去做，同时唯贤是举，只要认准德才兼备的人，哪怕出身微贱也大胆任用。西魏吏治较为清明，他的周围也聚拢了不同背景的有用之才。比如西魏大将李弼原是侯莫陈悦的部下，后兵败投降。宇文泰对他予以重用，提拔为八柱国大将军之一。二人坦诚相见，毫无戒备。

主持这场改革的除了苏绰，还有出身范阳卢氏的大臣卢辩。孝武帝元修西逃入关时，远在邺城任太学博士的卢辩闻讯，离家追随，单人匹马跟到关中。在西魏，他逐步升到尚书令。卢辩长于典章制度，这场改革的制度大多由他制定。

西魏内部改革之时，外部硝烟一直没有消散。

543年（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高敖曹的哥哥高仲密新任东魏的北豫州刺史，其地在河南。高欢的长子高澄是个专横的色鬼，看到高仲密的妻子李氏貌美，一见面就想强奸，扑上去就乱扯衣带。李氏宁死不从，拼命挣脱，衣不蔽体地跑去向高仲密哭诉。高仲密冲冠一怒为红颜，向西魏献地投降。宇文泰喜出望外，亲自带兵来接应高仲密。西魏顺利接收了北豫州，占领了虎牢关等战略要地，包围黄河南边的河桥城。高欢也带上十万官兵，自黄河北岸渡河，抢占邙山，摆出决战的阵势。

两军势均力敌，谁都不敢抢先发动进攻，一连对峙了好几天。

宇文泰想兵出奇招，就在一天深夜，指挥主力悄悄向邙山奔去，想突袭高欢。东魏的侦察兵发现了偷袭而来的敌人，火速告诉高欢。高欢整兵备战。于是，西魏的偷袭变成了黎明时分的两军混战。东魏大将彭乐带领数千骑兵，突击杀入西魏北军，所向披靡，一直深入西魏腹心。彭乐最初追随杜洛周起兵造反，后来投靠尔朱荣，中途突然投降葛荣，又转过来归附尔朱荣，之后才投靠的高欢，政治态度反复无常。东魏这边有人看不到彭乐的影子，就跑去对高欢说：“彭乐这小子又反水了！”高欢勃然大怒：“彭乐太反复无常了！”正发怒间，彭乐遣使告捷。他一举俘获包括西魏临洮王元柬等五个王爷在内的重要俘虏四十八人。高欢立即传令鸣鼓进军，东魏军沿路掩杀，斩首三万余级。西魏大败。彭乐追击宇文泰，紧咬不放。宇文泰狼狈地策马狂奔，还扭头向彭乐哀求：“彭将军，飞鸟尽，良弓藏，走狗烹。今天你杀了我，明天你还有用吗？你不如马上还营，把我丢弃的金银宝物一并取走。”彭乐一介武夫，轻易信任了宇文泰的话，折回去捡拾战利品，整理了一大袋金银珠宝放在马上向高欢复命。高欢问他为什么没追杀到宇文泰。彭乐如实相告，最后还声明：“我并不是因为他的话才放了他的。”高欢再一次震怒，当场勒令彭乐跪下，亲手抓着他的头往地上撞。高欢还不解恨，几次举刀要砍彭乐的脑袋，可最终没砍下

去。彭乐哀求给他五千人马，再去追捕宇文泰。高欢长叹一声：“晚了！”最后，他赏赐给彭乐三千匹绢。（彭乐此人傻得可爱，最后官至司徒。）

第二天，两军重整旗鼓，再次大战。宇文泰兵分三军，合击东魏军。刚好有一名东魏的小兵犯了军法，为了避祸投降西魏。他向宇文泰指明了高欢的确切位置。宇文泰马上集合精锐将士猛攻高欢所在的位置。很快，高欢身边的将士几乎悉数被歼灭。高欢带上几个亲随，策马逃跑，没跑几步，高欢的坐骑就被射死了。部将赫连阳顺下马，把马让给高欢骑，自己殿后掩护。很快，西魏追兵又杀到高欢背后。部将尉兴庆对高欢说：“大王快走，我腰间尚有百箭，足以射杀百人，保护您撤走。”高欢感动地说：“如果你能生还，我任命你为怀州刺史。如果你战死，你的儿子就是刺史！”尉兴庆说：“我儿子太小了，希望大王让我兄长做刺史。”高欢一口答应下来。尉兴庆殿后，最后因寡不敌众被西魏乱刀砍杀。

有东魏降兵为了邀功，把高欢逃跑的方向报告了宇文泰。宇文泰组织一支敢死队，人人轻装快马，一心追杀高欢。他任命大都督贺拔胜为队长。这个贺拔胜，是贺拔岳的哥哥，当初被元修任命为荆州刺史。高欢唆使他人杀了贺拔岳，和贺拔胜有杀弟之仇；高欢派侯景进攻贺拔胜，又和他结下了战场之仇。元修逃到关中后，高欢将留在东魏的贺拔家族的大哥贺拔允给杀了。贺拔允和高欢关系不错，是支持高欢的，想不到也遭到不测。至此，贺拔胜和高欢又多了杀兄之仇。三仇合并，贺拔胜与高欢不共戴天，因此是追杀高欢的最佳人选。他很快就在混战之中，发现了正仓皇逃命的高欢的影子，飞马执槊，带上十三骑追杀而去。贺拔胜一口气追了数里，好几次槊尖都要刺到高欢的后背了。他情绪激动，大喊：“贺六浑，我今天一定要宰了你！”高欢害怕得几乎全身都趴在马背上了。仿佛有上天保佑，危如累卵之际，高欢随从扭身射了一箭，正好射毙贺拔胜的坐骑。等贺拔胜起身，找到马匹想再追，高欢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贺拔胜顿足痛

惜：“我今天竟然忘了带弓箭，真是天意啊！”

高欢所在的部分虽然失败了，但东魏其他部队并没有战败。相反，西魏赵贵等部抵敌不住，开始退却。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东魏军队冲杀过来，宇文泰率军逃跑。幸好有独孤信等人收集溃散的官兵，从后面掩击东魏追兵，西魏军队才得以脱险。此战，西魏失败，包括虎牢关在内的北豫州等地得而复失。宇文泰不得不退兵河南西部。

高欢率军进入陕州，部下封子绘等劝高欢乘胜西进，彻底消灭宇文泰，一统两魏。但多数将领战斗意志不强，反对继续拥兵。事实上，东西两魏实力相当，宇文泰军队的主力也相对完好，高欢权衡之下，下令撤军。高欢率主力回晋阳，任命侯景为司空，全权负责河南军政。侯景俘获叛变的高仲密妻儿送至邺城。由于高乾、高敖曹都是高欢的功臣，高仲密的弟弟高季式听说兄长起兵后马上自首，因此高欢并没有将高家连坐族诛，只杀高仲密一家。临刑前，色狼高澄去见将被处死的高仲密妻子李氏，问：“今日如何？”李氏默然，只好被高澄纳为妾侍。高欢又杀掉了贺拔胜留在东魏的所有儿子，以报战场上追击之仇。贺拔胜在关中得知，吐血而亡。

邙山之战后，宇文泰不得不扩大招兵范围，补充战场损耗。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中，地方豪强纷纷组织乡兵自保。宇文泰把这些乡兵武装都收编为正规军，任命当地豪强或者有名望的人物统领。如此扩军，遭遇到的阻力很少，不仅加强了西魏王朝的军事力量，还削弱了地方势力。扩充的新军，主要是汉族人。宇文泰部队中的汉族士兵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同样，新任命的将领中，汉族人的比例也不断提高。以武川镇军人为核心的六镇武装和关陇汉族地主势力，因为历次整编和扩充，日益联合了起来。

高欢已经年过五旬，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再会会宇文泰——如果能歼灭宇文泰就更好了。

546年（东魏武定四年、西魏大统十二年）十月，高欢搜集东魏十万精兵，围攻西魏位于汾河下游的重要据点玉壁城（今山西稷县）。此城由大将王思政筑造，但王思政已经调离，推荐韦孝宽守城。玉壁城中的西魏守军不过数千人。高欢对攻下此城信心十足。他的目的是以玉壁为引子，吸引宇文泰出兵增援，然后在河东来次新的决战。但是，玉壁城地势险要、防守坚固，韦孝宽对守城信心满满，并没有向关中请求增援；宇文泰也相当放心，不派一兵一卒。从一开始，高欢的战争目标就落空了。

这次一相情愿的决战，变成了十万大军的攻城战。高欢指挥官兵昼夜攻城，毫不懈怠；韦孝宽目不交睫，认真守城。一时硬攻不下，高欢转而智取。第一招是“断水”。玉壁守军之前从汾河汲水饮用，高欢就派人改掘河道，断了韦孝宽的取水之路。韦孝宽下令在城内凿井取水，城中人马安然无恙。第二招是“造山”。高欢在城南造起土山，山比城高，想居高临下攻入城去。韦孝宽就在原先城墙的两个城楼之间绑缚木柱，搭成木桥，高于土山。西魏守军反过来居高临下，向土山上的东魏士兵投石掷火。东魏官兵不能近前。高欢派人威胁韦孝宽：“即使韦孝宽搭桥上与天齐，我也会穿地入城取你人头！”于是，高欢使出第三招：“钻地”。东魏军士挖掘地道，计划挖入城中。韦孝宽就沿着城墙挖出一条深沟，一等挖地道的东魏士兵跌入长沟，就地擒杀。守军还在长沟内堆满木柴，只要有地道暴露洞口，就派人往洞里填塞柴草，放入火把点燃，往地道内鼓气。地道中的东魏士兵不是被烧焦就是被熏死。高欢还有第四招“烧墙”。高欢继续派人挖掘地道二十条，不挖穿城墙了，而是挖到城墙下面就用木柱支撑住，再以猛火燃烧，等地道内的柱子崩塌，好多段城墙也随之塌毁。这一招起初很奏效，玉壁城墙坍塌了多处。韦孝宽迅速在城崩处树立起大木栅，用尖槊弓弩防守住，东魏官兵还是不能攻入。

高欢接连失败，就开始用“心理战”。东魏官兵对城中大喊：“城中有能斩韦孝宽者，拜太尉，封开国公，赏帛万匹！”并向城内发射悬赏令。韦孝宽就在赏格背面亲笔书写“能斩高欢者也按此赏”，射回城外。高欢把韦孝宽留在东魏的侄子绑在城下，逼韦孝宽投降。韦孝宽看着侄子在面前被杀，也坚持不降。守军大受感动，誓死和韦孝宽共生死。

十万东魏大军苦攻玉壁五十多天，伤亡及病倒超过三分之二。韦孝宽岿然不动。高欢精疲力竭，一病不起。一天夜里，有大星坠于营中。古人认为，天降陨石就是将星坠落。高欢害怕这个天象落实到自己身上，主动撤围而走。

大军困于小城之下，已经引起了东魏内部的种种猜测。军中讹传韦孝宽用大弩射杀了高丞相。韦孝宽听说后，趁机派人四处高喊：“劲弩一发，凶身自殒。”撤退中的东魏大军开始军心不稳。高欢不顾病重，露天召集诸将宴饮。宴会上，大家情绪低落。大将斛律金唱起《敕勒歌》缓和气氛：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高欢触景生情。他仿佛回到了壮阔苍茫的怀朔镇、回到了草长莺飞的早年，一生的奋斗历程依次在面前闪过……高欢亲自和唱，哀感流泪。547年正月朔日，恰巧日蚀，高欢病死，时年52岁。

高欢死后，东西两魏之间长期没有爆发新的决战。两边都把征战的目标转移到了南方的梁朝。东魏的目标是南北方传统的战场：淮南北。因为南梁的内乱，东魏斩获颇丰。不过，西魏在巴蜀地区的收获更大。大统十八年（553年），宇文泰派遣尉迟迥进军四川，占领了现在的陕南、四川、重庆等地。一年前（大统十七年，552年），南梁大乱。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萧绎为了平

定国内骚乱，称臣于西魏。西魏与萧绎订立盟约割占土地：西魏以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南），梁以安陆（今湖北安陆）为界。梁元帝萧绎并送人质去长安。然而，等南梁内部安定后，萧绎对屈辱性的盟约反悔了。他以称帝后不便向西魏称臣为理由，坚持南北方平等相待，并且要求西魏把之前侵占的陕南、四川、重庆和湖北北部等地区归还南梁。宇文泰大怒。恰巧萧绎的侄子萧詧向宇文泰借兵进攻萧绎。于是，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年底，宇文泰派步骑五万攻陷江陵。梁元帝萧绎被处死，魏军洗劫了江陵城，驱赶十余万百姓返回关中。萧詧在空城中被扶持为傀儡。西魏进一步占领湖北其他地区。至此，宇文泰势力扩展到长江中游。

三四 癡狂高洋与傀儡羔羊

—

高欢新立的皇帝元善见是北魏孝文帝的曾孙。高欢和左右详细商议立元善见为皇帝的时候，认为洛阳虽然有位置优势，但是土地褊狭，久经丧乱，城池残破，不适合作为首都，而且元修和宇文泰在长安居高临下，对洛阳构成威胁。因此，高欢等人选择邺城为新的首都。元善见就在邺城东北登基称帝，改元天平，成为东魏的开国皇帝，也是唯一的皇帝。元善见年幼，高欢继续主政，掌握军国大权。

高欢的统治相对平稳，高氏家族继续窃取权力。当时南梁虽然有北伐，但与东魏的关系仍以外交使为主。高欢害怕北方士大夫望梁朝为正朔所在而投奔江南，也无意南向扩张疆土。为了抵抗柔然对分裂的魏国的侵略，高欢迎娶柔然公主，对柔然奉行结交和好政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关中的宇文泰的作战上。随着连年战争和关中的恢复，东魏和西魏逐渐形成了均势。高欢的平稳统治为儿子的篡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欢死后，长子高澄继承他的地位，受封渤海王、大将军，把持朝政。

高澄的才能无法和父亲高欢相比，而且他为人残暴猜忌，嗜权如命，导致内部人际关系紧张。比如他任用亲信崔季舒、崔暹监督百

官，对父亲留下来的老伙计、老大臣很不客气。东魏内部怨气重重。和高欢一道起兵的大将侯景干脆就割据叛变，先后投降了西魏和南梁。

不过，高澄的运气实在是好。底下虽然有怨气，但都被他的专横残暴所压制了。侯景叛变导致河南地区脱离东魏，却因为侯景首鼠两端、决策失算，东魏很轻松就收复了河南大部分地区。更轻松的是，高澄把“瘟神”侯景赶到南梁后，南梁内部大乱，梁朝淮南江北各州郡的刺史、太守纷纷向东魏献城归降。高澄派人南下纳降，兵不血刃接收了淮水以南二十三州。这其中包括钟离、寿阳、合肥、淮阴等重要军镇，南北方的国境几乎推进到了长江北岸。高澄举手之间就完成了之前北方历代统治者花费千军万马都没有实现的目标。（此事在侯景之乱部分详述。）

同时，高澄虽然没有在对西魏的战争上有大的进展，却攻占了西魏在河南的重要据点颍州。颍州治所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由西魏的大将军王思政镇守。王思政是孝武帝元修时的老臣，对西魏忠心耿耿，起初将城池守卫得很好。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刘丰生等都死于城下。高澄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兵临长社城下，采用水攻，将长社城淹成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城墙多处崩陷，储粮被淹，王思政不得已向高澄投降。高澄也不杀他，以礼相待。王思政几年后病死在北齐。长社陷落后，宇文泰放弃了河南的其他各州。高澄又轻松捡了个大便宜。

高澄因“功”声望达到顶峰。他被加封为齐王、相国，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礼，真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元善见是个自幼聪明，文武双全的君主。他“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狮子以逾墙，射无不中”。意思是说这位皇帝长得很漂亮，喜欢文学，还能挟带着石狮子翻墙，射箭百发百中。这在历代皇帝中还真算得上才能出众。朝廷宴会的时候，元善见老是命令郡臣赋诗，自己

从容沉雅，非常有北魏伟大的帝王孝文帝的遗风。但元善见始终是一个傀儡，未能亲政。杰出的才干是多少代朝臣对君主的期望，但对于傀儡君主来说，它就变成负面因素了。渤海王高澄主事的时候就非常忌讳这位文武全才的皇帝。高澄将大将军中兵参军崔季舒调任中书、黄门侍郎，监察皇宫的动静。因此元善见的大小举动都被崔季舒侦知，再告诉主子高澄。

元善见一次在邺城东部打猎，驱马驰骋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等人在后面紧紧追赶，高呼：“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意思是说皇帝不能跑得太快了，大将军知道了会发怒的。

高欢生前，虽然专权，但对皇帝的表面功夫做得非常到位。他对孝静帝毕恭毕敬，君臣之间倒也相安无事。但高澄一点表面文章都不做，在皇帝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专横跋扈。一次，高澄和皇帝一起饮酒。高澄举觞对元善见说：“高澄祝陛下长命百岁。”元善见听了，可能比较感慨，就不高兴地说：“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怎么能受用这样的话！”高澄发怒了：“朕，朕，狗脚朕！”高澄说完还不解气，让崔季舒上去打元善见三拳。当众殴打了皇帝后，高澄这才奋衣而去。第二天，高澄让崔季舒去慰劳皇帝。元善见也不得不表示辞谢，还赐给崔季舒绢。崔季舒哪里敢接受，就先跑去报告高澄，问自己是否能够接受。高澄让崔季舒取其中的一段。元善见就束了百匹绢给崔季舒。

元善见不堪忧辱，常常在宫中咏同时代南方大诗人谢灵运的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志义动君子。”

这是南方谢灵运遭地方官员弹劾后借古讽今、立志雪耻的诗。大臣荀济闻听后，知道元善见的心意，就与华山王元大器和元瑾等大臣密谋于宫中。他们三个人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伪装在宫中造假山，实质上挖地道出宫。估计他们是将皇帝弄到城外去，再集结天下兵马做进一步打算。荀济的地道一直向北城方向挖进。到千秋门的时候，守门者察觉到地下有响动，赶紧跑去报告高澄。高澄领兵入宫，责问

元善见：“陛下为什么要造反？我高家父子两代功存社稷，有什么地方辜负了陛下吗？”高澄当即下令捕杀宫中的妃嫔。元善见正色说：“自古只听说大臣反皇帝的，不曾听说还有皇帝反大臣的。大臣们造反，关我何事？我不惜生命，何况妃嫔！你如果打定主意要造反弑君的话，你就动手吧！”高澄见皇帝来硬的了，下床叩头谢罪。皇帝见高澄服软了，就摆宴招待。高澄在宫中酣饮，到深夜才出去。三天后，高澄还是将元善见幽禁在含章堂，而元大器、元瑾等人都在闹市中被当众烹死。

高澄囚禁了皇帝，准备逼元善见禅让，篡位建国。元善见在含章堂心惊胆战地过日子。他不知道自己身死何时。一切似乎都明朗了，高澄马上就要篡位称帝了。

二

但是先传来的却是高澄的死讯。549年，高澄在家里被厨师刺死。

凶手厨师是一个叫做兰京的南方人。东魏在与南梁的战争中，南梁将领兰钦的儿子兰京被北方俘虏，高澄让兰京在家中配厨。兰钦请求赎回儿子，被高澄拒绝。兰京本人也向高澄申诉。高澄让监厨苍头薛丰洛杖责兰京，警告说：“再申诉，就杀了你。”兰京不是软柿子，秘密联结了六个人阴谋作乱。当时高澄正准备接受魏禅，与陈元康、崔季舒聚集在北城东柏堂里密谋最后的步骤。太史向高澄警告说天象突变，一个月之内有变乱，提醒高澄注意。这天，兰京进东柏堂端菜。高澄不让兰京进来，对旁人说：“昨天晚上，我梦见这个奴才要杀我。”过一会，高澄又说：“我要先杀了这个奴才。”兰京听了，把刀放在菜盘下，冒险进食。高澄见了，发怒说：“我并没有叫吃的，你为什么进来？”兰京拔出刀，恶狠狠地说：“我来杀你！”高澄急忙逃跑，伤

了脚，躲入床下。兰京的同伙涌入堂里，掀去床，乱刀砍死高澄。高澄时年29岁。

高澄遇刺身亡，事出仓促。高家亲信连忙报告高澄的二弟高洋。高洋闻讯，神色不变，亲自斩杀兰京及其同党，同时收殓哥哥，却秘不发丧。高洋只是对外宣布家奴造反，大将军高澄受了一些轻伤，并无大碍。当时洛阳周边因为消息不明，出现骚动迹象，听到高洋的处理稍微安定下来。高洋再以东魏立皇太子为理由，大赦天下。等待洛阳周边安定后，高洋紧急奔赴晋阳，接收军队，掌握权力。这时，高洋才向天下宣布了哥哥的死讯。

听到高洋接替哥哥的地位后，元善见天真地认为：“上天佑我，魏室可以复兴了。”

元善见轻视高洋是有原因的。高洋长得很猥琐，皮肤黑黑、满身鱼鳞纹，平日窝在角落里少言寡语，和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大哥高澄相比，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不仅高澄以为他没有什么能力，连诸位大臣也看不起他。就连高洋的生母娄昭君也忧虑地对他说：“你爸爸是龙，你大哥是老虎，才有了我们家如今的地位。现在轮到你了，你行吗？”

但事实随即粉碎了元善见的天真与幻想。

高洋那是韬光养晦，城府深厚而已。在诸多的子女中，高欢最看好的，恰恰是二儿子高洋。一次，高欢拿出一团乱丝，叫几个儿子解开。当兄弟们解得手忙脚乱时，高洋拔出刀就砍，还说：“乱的该斩！”高欢很欣赏高洋的作风。还有一次，高欢叫高澄、高洋各带一队士兵行军，按照命令大将彭乐率领骑兵佯攻他们，想测算一下兄弟二人的胆略。高澄表现得惊慌失措，高洋却不慌不忙指挥部下迎敌。彭乐连忙说明来意。高洋不相信，将彭乐捆绑起来，押到父亲面前才把事情弄清楚。经过这些考验后，高欢生前虽然以长子高澄为继承人，

但同时培养次子高洋。

高澄继位后，高洋担心遭兄长排挤陷害，刻意保持低调。他每次退朝回府就闭门静坐，整天不开口。有时，高洋在家里跑跑跳跳，夫人问他做什么，他只说玩玩而已。其实，高洋是不想自己安逸下来，保持活跃的身体和精神。

在处理高澄被刺事件时，高洋从容自若、手段高超，开始让旁人大吃一惊。在晋阳，高洋大会文武大臣，期间神采飞扬、言辞敏锐，与昔日木讷安静的样子判若两人，更令人刮目相看。全场都被震慑了。掌权后，高洋清晰了大哥高澄的政令，几乎全部修改或废除。高隆之、司马子如趁机弹劾高澄亲信崔暹与崔季舒的过失，高洋将二人各打两百鞭，发配边疆。他很快就树立了权威，原本对高澄有怨气的大臣们，纷纷聚集到高洋的周围。

但是，高洋随着权势迅速稳定，性情也迅速大变，很快堕落成一个癫狂病人。他的行为越来越放纵，有时整天整夜唱歌舞蹈；有时披头散发，穿着胡服；有时骑驴、骑牛、骑骆驼、骑象，从不加鞍绳，随便走到哪里就是哪里。大臣的府第、贫民居住区，他自由出入，累了就在街上或坐或卧。高洋似乎寒暑不分，在炎炎烈日下赤膊光脚走路，在冬天的严寒中裸露身体狂奔。

更可怕的是，高洋开始嗜血，杀人成性。他制造了许多杀人工具，有大锅子、长锯、锉刀、碓等，一一陈列在殿庭之上。高洋喜欢喝酒，而且一喝醉就必要杀人取乐。他经常从早到晚地喝酒，也就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宫女、宦官甚至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盛怒之下。后来人们摸到主子的秉性，就从监狱中将判决死刑的囚犯提到高洋住处，供高洋不时的杀人之用。但是高洋杀的人太多了，政府的死囚不够使用。亲信们就把拘留所里正在审讯中的犯人或者刚拘捕的嫌疑人拉来以备使用，史称“供御囚”。高洋出巡时，这些可怜的供御囚也跟在后面备用。官府有个奇怪的规矩：一个人 只要做供御囚三个月

而不死，即判为无罪释放。

高洋幼年时，丞相高隆之对这个癫狂孩子不太看好，也就不甚礼遇。高洋登基后记起前恨来，下令将高隆之杀掉。之后高洋还不解恨，就把高隆之二十多个儿子唤到面前表演集体屠杀。群刀齐下，人头落地。高洋这才解恨。

丞相李暹病故后，高洋去李暹家祭吊。他问李暹妻子：“夫人是否思念丈夫？”李暹妻子肯定是回答：“结发夫妻，怎么能不想念啊？”谁知高洋说：“既然想他，就前去陪他吧！”说完，高洋抽出配刀，砍下她的头扔进阴沟里。

日后登基，高洋的行为更加癫狂。他宠爱的薛贵嫔是妓女出身。高洋有一天想起来薛贵嫔的过去不干净，就不顾夫妻情谊，将她杀掉。但是高洋在薛贵嫔死后，又想起她的美来。于是高洋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到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放在桌子欣赏。参加宴会的大臣贵族无不大惊失色。高洋思念更深，将把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了一个琵琶。他抱着琵琶一面弹一面唱：“佳人难再得。”高洋为薛贵嫔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跟随在棺材后面，蓬头垢面，大声号哭。

高洋还有两个弟弟——高浚和高涣，经常劝说哥哥注意自己的行为。高洋烦了，就将这两个弟弟关到地窖的铁笼里。高洋还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高浚和高涣既悲伤又害怕，颤抖着唱出歌来。高洋听着泪流满面，突然拿起长矛向笼中猛刺，还命令卫士们一起刺杀。两个弟弟用手抓住铁矛挣扎，号哭震天，被刺成一团肉酱。高洋在执政的后期，老担心自己死后政权不稳，于是就把魏国元姓皇族全部屠杀。其中婴儿们则抛向空中，用铁矛承接，一一刺穿。但是在他死后，政权果然不稳，高氏亲属争权夺利，骨肉相残。

这是这么一个癫狂病人，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完成了逼宫禅让的过程。

武定八年（550年），元善见晋升太原公高洋为丞相、齐王，都督中外各军事。这时，徐之才、宋景业等人纷纷劝高洋称帝，宣称应该在五月受禅即帝位。高洋早有此意，于是从晋阳来到邺城，进行最后的准备。文武百官见局势如此，没有敢反对的。五月，元善见再任命高洋为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又以齐国太妃为王太后，王妃为王后。

五月初八，襄城王元昶、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侍郎赵彦深等人要求入朝奏事。元善见在昭阳殿召见他们。君臣间进行了东魏朝廷最后一场辩论。

张亮说：“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明仁德，深受老百姓爱戴，请陛下效法尧、舜，将帝位禅让给他。”元善见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想在程序问题上拖延时间：“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准备制书吧。”中书郎崔劼、裴让之说道：“不劳陛下，我们已经写好了。”侍中杨愔即献上制书，让皇帝按照内容抄写一份。元善见只得照办。

元善见抄完后问：“你们将如何安排我呢？我应该去什么地方？”杨愔回答说：“在邺城北城有所别馆，你会搬到那里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车驾，平时的侍卫会带你去那的。”元善见慢慢地走下御座，走出东廊。这位文才出众的皇帝边走边咏范蔚宗的《后汉书赞》：“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元善见走到宫门处，相关官员请他上车出发。元善见留恋地说：“古人想念遗簪敝履。我想和六宫告别，可以吗？”尚书令高隆之说：“现在的天下还是你的天下，况且后宫呢！”元善见就与夫人贵嫔

诀别，大家无不欷歔流泪。赵国李嬪吟咏陈思王曹植的诗：“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皇后等人哭声震天。

直长赵德准备了一辆老牛车，等候在东上阁。元善见上车后，赵德竟然也赶上车来，坐在皇帝旁边（像赵德这样的低级别的官员，按礼是根本没有资格与皇帝同车的）。元善见用手肘碰碰赵德，说：“我畏天顺人，授位给相国。你是什么奴才啊，竟然也敢逼我！”赵德坚持不下去。元善见只得与他同车走出云龙门，王公百僚整理衣冠跪在路边给皇帝送行。元善见极其感慨，曰：“今天的我还比不上常道乡公、汉献帝呢。”大臣们也都觉得悲凉得很，很多人都流下泪来。

五月初十，齐王高洋在邺城南郊举行受禅典礼。当天，邺城出现赤雀，人们将赤雀献到郊所。高洋升坛，柴燎告天，正式接受皇位。事毕后，高洋进入皇宫太极前殿，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天保，国号齐，史称北齐。新皇帝大赏天下之民，百官进两大阶，六州缘边职人进三大阶。北魏孝庄帝以后，百官都不领俸禄，现在高洋又重新给百官发工资了。东魏只经历元善见一个皇帝，享国十六年。东魏全境进入北齐的统治。高洋终于成功篡权夺位。

高洋给逊帝规定了相当可以的优待条件。北齐封元善见为中山王，食邑一万户；上书不称臣，答不称诏；出行可以使用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奉绢三万匹，钱一千万，粟二万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顷，园一所。元善见继续延续魏室正朔，在中山国立魏国宗庙。元善见皇后被封为太原公主；各个儿子被封为县公，食邑各一千户。高洋出巡的时候，常常让元善见伴随左右，以示恩宠。但是元善见一家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北魏的各位皇帝即使禅让退位了，都没有得到善终。这些皇帝通常是被新皇帝毒死。妻子为了防止毒物，每次吃饭前都为元善见吃东西试毒，尽力保护着丈夫。但是高洋还是找到机会，551年下毒毒死了元善见。元善见年仅28岁。元善见被追谥为孝静皇帝，葬在邺西漳北。

现在邯郸西南65公里处的磁县还保留着元善见的陵墓——天子冢。天子冢并不豪华，坟墓为封土形式，高50米，直径120米。墓顶建有玉皇大殿和娘娘庙、观音庙。前后有台阶可登至。至今，天子冢还是旅游景点。但是奇怪的是这109阶台阶。台阶与地面成50度角，游人登台阶的时候，会发出叮咚响的水声。有的当地人说这是天子冢下的元善见千年后不甘冤死的哀号之声。其实这何尝只是元善见一个人的冤号。魏国末期的元子攸、元晔、元恭、元朗哪个皇帝不是冤死的？

三五 傀儡皇帝不是好当的



说完东魏，我们来看看西魏。西魏的国运在宇文家族的羽翼庇护下又延续了二十四年。

落荒而逃的元修在宇文泰派出的军队护卫下轻骑向长安而来。宇文泰礼数非常周到，备齐仪卫出城迎接。君臣在东阳驿相见。宇文泰免冠，哭泣着向元修谢罪：“臣不能遏制奸臣欺凌皇上，导致皇上驾车西行，是我的罪过。请皇上将我交给有关部门惩处。”这一刻，厌恶了高欢的专权和蛮横的元修感觉一定非常好。他回答说：“你的忠节，整个朝野都知道。我因为德行不够，所以才被奸臣所乘。今天我们君臣相见，我非常欣慰。你不用谢罪。”宇文泰于是陪护元修进入长安。

北魏朝廷西逃到关中后，百业待兴。宇文泰建立了西魏朝廷的雏形，还抵御住了高欢军队对皇帝的争夺。特殊的形势导致初期军国大政都由宇文泰专断。宇文泰以大将军、雍州刺史的职务兼尚书令，并进封略阳郡公。朝廷还解除了尚书仆射的官制，加强专权。元修在洛阳的时候曾将冯翊长公主许配给宇文泰。婚事还没举办，元修就西逃了。现在在长安，元修为宇文泰举行了皇室婚礼，正式拜他做驸马都尉。一个月后，高欢亲自领兵来争夺皇帝元修。高欢军突袭攻陷了潼关，进军到华阴地区。宇文泰整军驻扎在霸上迎敌，迫使高欢留下薛瑾守潼关后撤回东方。宇文泰进军讨伐薛瑾，俘虏七千人回到长安。

元修晋升宇文泰为丞相。

当年十月，元善见即位，徙都邺城。北魏正式分裂。宇文泰度过了与高欢战争的最初困难时期，西魏朝廷得以初建。元修也给予了宇文泰充分的信任。

隆重的场面，恢弘的长安和重建的朝廷，这一切使元修以为他成了一位真正的皇帝，可以拥有无限的权力了。但他忽视了自从胡太后之乱后，北魏朝廷已经旁落了数十年。他怎么能够就凭简单的西逃重新树立皇权呢？皇权的丧失也存在惯性。最高权力一旦丧失超过一定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次复兴。它就像过时的衣物，只有等待被新潮流取代的命运了。

元修对宇文泰的期待也是错误的。他最愚蠢的地方就是将北魏的复兴和夺回皇权完全寄托在宇文泰的身上。宇文泰凭什么一心一意做北魏中兴的功臣呢？更何况宇文泰本身就是有志于天下的军阀，他与高欢是一丘之貉。宇文泰比高欢年轻，不像高欢那样宽厚。高欢虽然专权，但起码不干涉元修的私生活。元修的私生活混乱，长期与几位姐妹同居。宇文泰非常厌恶元修这一点，将他的几个姐妹全部驱逐出宫，并杀掉了其中的明月公主。元修暴跳如雷，要么弯弓搭箭，要么顿足捶案，大骂宇文泰。宇文泰就加强对皇宫的监视，防止元修再干蠢事。

满怀希望的元修一下子又陷入了绝望之中。他终于有了才出狼穴，又入虎口的感觉。

元修用事实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做事从不分析前因后果，不仅过分夸大自身的实力，而且以一时的好恶为出发点。即使处于被监视中，元修也一再扬言要除去宇文泰。结果几天后，元修就要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了。他能够感觉到黑暗中有阴谋的矛头正指向自己的心脏。这回，元修的感觉是正确的。

元修从洛阳西逃后的第五个月，闰十二月癸巳，大臣潘弥向元修上奏说：“皇上在今天要小心有急兵。”这天晚上，元修在逍遥园举行宴会。他触景生情，对侍臣们说：“此处仿佛是洛阳的华林园，我不禁满怀凄怨。”元修命令牵来自己的坐骑波斯骊马，让南阳王驾马。南阳王就要攀上马鞍的时候，掉在地上摔死了。元修受到极大的惊吓。

天色已晚，元修起驾回宫。到了宫殿后门，那匹马波斯骊马硬是不向前走了。元修使劲地鞭打坐骑，波斯骊马才步入宫中。元修看看天色，对潘弥说：“今天不会有其他事情了吧？”潘弥说：“到下半夜，如果没有事情，那就大吉了。”回到宫中，元修喝了一点酒。正是酒要了元修的命，宇文泰让人在酒中下了毒药。元修当即死去，年仅25岁。

元修不是个讨人喜欢的皇帝。死后，元修被草殡于草堂佛寺。十多年后，元修才被葬入云陵。西魏给元修定的谥号是“孝武”。但东魏不予承认，坚持将元修称为“出帝”，意思是出逃的皇帝。

二

继位的皇帝是元宝炬。有人说元宝炬参与了对元修的谋杀，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元宝炬是孝文帝第三子、京兆王元愉的儿子。因为父亲造反失败自缢，母亲受株连被杀，元宝炬的早年生活非常悲惨。他与兄弟、妹妹被囚禁在宗正寺长达七年，没有自由，更没有皇室身份。北魏末年皇室成员凋零，元宝炬开始异军突起。他对高欢及其手下的骄横跋扈十分厌恶，公开扬言：“这些镇兵，怎么敢如此大胆！”因此，孝武帝元修很器重元宝炬，任命他为太尉，并带他一起入关。

元修死后，多数大臣推举孝武帝的侄子、广平王元赞为新皇帝。

濮阳王元顺劝宇文泰不要效仿高欢立幼主揽权，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拥立一个平和老实的长君，以此把高欢给比下去。宇文泰于是推举元宝炬为新皇帝。元宝炬再三退让，实在没办法才不得不即位，改元大统。

元宝炬可谓是古代历史上的“模范傀儡”。他非常清楚宇文家族取代魏室的趋势，在他统治时期，朝廷大权进一步落入宇文家族手中。元宝炬采取了无条件合作，以求自保的态度。

历史上的政治傀儡很多。傀儡的对策无非三种：激烈反抗，比如曹髦、元修那样；消极罢工，对操纵者不理不睬，不配合，也是反抗。这两种态度常常使幕前和幕后之间爆发矛盾冲突，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当然更受伤的还是傀儡一方。元宝炬采取的是第三条道路，积极、全面地配合操纵者的政治运作，忠实地做个好傀儡。这样做的目的其实特别现实：保存性命。实权操纵者也最喜欢这样的傀儡，往往不威胁他们的性命。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双赢”。

元宝炬有一次登逍遥宫远望嵯峨山，感慨地对左右说：“望到这山，不禁让人有脱屣归隐的意思。如果我满50岁了，我就将政权交给太子，自己在山中采摘饵药，不再像现在这样一日万机了。”虽然元宝炬最后没有活到50岁，但毕竟是正常死亡，基本实现了目的。他的结局远比元子攸、元晔、元恭、元朗、元善见等亲戚好得多。

元宝炬的命运和忍耐可以从他的婚姻中窥见一斑。

东西魏对立的时候，中原地区面临着北方强大的柔然的威胁。东西魏都对柔然曲意逢迎以求自保。东魏把公主嫁给柔然统治者进行和亲；西魏宇文泰便要元宝炬娶柔然长公主作为皇后。当时元宝炬已经有了乙弗氏皇后，两人非常恩爱。乙弗皇后生性节俭，平日穿旧衣、吃蔬菜，从不配饰珠玉罗绮，为人仁恕且没有嫉妒心，深得元宝炬之心。但是宇文泰的命令又是不能拒绝的，元宝炬只好迎娶了柔然的长

公主，立为皇后。他废掉了乙弗氏皇后，将她打入冷宫。元宝炬新婚后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柔然公主非常不满，她是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将自己婚姻的不幸归结为乙弗氏的存在。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元宝炬再次做出牺牲，将乙弗氏贬到秦州（今天水）出家为尼。

元宝炬虽然将乙弗氏贬到边远的地方，但对她的爱意并没有丝毫减弱，相反是更加思念起来。两人还多次秘密通信传情。柔然长公主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向娘家哭诉自己的不幸。接下来的情节是柔然国出兵大举进攻西魏，出兵的名义就是诛杀乙弗氏。元宝炬感叹，爱情遇到政治怎么会如此艰难。但是一个女子和百万大军比起来，自然是后者更加重要。元宝炬于是忍痛派遣使者去秦州，敕令乙弗氏自尽。乙弗氏冷静地对使者说：“愿皇帝享千万岁，天下百姓康宁，我死而无恨。”随后走进卧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仅31岁。

元宝炬与乙弗氏的爱情最终还是战胜了政治风云。元宝炬死后，人们将他和乙弗氏合葬在一起，成全了两人的爱情传奇。两人的合葬墓就是现在的陕西永陵。

虽然元宝炬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但是西魏在他在位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东西方的国力竞争中，西魏由弱变强，取得了优势。元宝炬配合宇文泰主导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西魏国力蒸蒸日上，还开疆拓土，疆域扩大到四川和湖北一带。宇文泰为西魏灭亡东魏，直至最后为隋朝统一开启了大门。这其中，也应该有元宝炬的一份功劳。

552年春三月，45岁的元宝炬驾崩于干安殿，没有实现自己50岁退隐的计划。一个月后，元宝炬被葬在永陵，上谥号叫“文皇帝”。“文”是一个非常好的谥号，用以表彰元宝炬的文治成绩。在他死前的两年，东边的元善见禅让给了高洋。宇文泰并不急于登基，因此魏室得以在长安延续。

元宝炬的长子元钦在父亲死后，继承了皇位，但却没有继承父亲对傀儡角色的理解。元钦犯了一个傀儡最要命的错误：争夺权力。当时大权操于宇文泰之手，元氏皇权名存实亡，不少皇室宗亲对此忧愤不已。尚书元烈密谋杀宇文泰，事泄被杀。元钦对元烈之死愤愤不平，对宇文泰口出怨言，还密谋诛杀他。淮安王元育、广平王元赞等人常常劝谏元钦，甚至哭着请元钦注意言行，以免给皇室带来危害。血气方刚的元钦哪里肯听。555年正月，对政敌毫不手软的宇文泰断然废掉了元钦。元钦在历史上被称为“废帝”。

元钦值得一说的是他的“一夫一妻制”。元钦即位后，立宇文泰的女儿为皇后。他虽然对宇文泰不满，但对权臣的女儿很喜欢。而宇文泰之女，“志操明秀”，品行端庄，和元钦十分相爱。为此，元钦不置嫔御，专宠宇文皇后一人。元钦被废后仅两个月，就被宇文泰毒杀。皇后宇文氏悲伤过度，很快也死了，被认为是“忠于魏室”。其实说她忠于爱情更加确切。

三

宇文泰挑选的新皇帝是元宝炬的第四个儿子、被封为齐王的元廓。

宇文泰显然希望元廓能够成为像他父亲那样合作的皇帝。在即位之初，两人的合作相对融洽。第三年，宇文泰因为身体状况开始恶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在该年的春正月丁丑，让元廓行《周礼》，建六官，封自己为太师、冢宰。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宇文泰病逝。至此，西魏短暂历史中的两大主角元宝炬和宇文泰先后谢世。

宇文泰逝世后，15岁的儿子宇文觉继承政治遗产，由35岁的侄儿中山公宇文护辅政。

宇文觉是宇文泰的第三子，母亲就是元修给宇文泰主婚的冯翊公主。宇文觉年幼的时候，有善于面相的人史元华给他面相，对宇文家说：“贵公子有至贵之相，只可惜他不长命。”宇文泰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挑选宇文觉为世子，不久又拜为大将军。宇文觉顺理成章地接位。

宇文觉还是个小男孩，对政治不一定明了。但是辅政的堂哥宇文护却是野心勃勃的成年人。宇文护在辅政之初就极力推动取代西魏。宇文觉接位后的第三个月，宇文护强迫元廓将岐阳等地封给宇文觉，封宇文觉为周公。几天后，元廓就接着下了禅位给宇文觉的诏书：“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唯归于德。故尧授舜，舜授禹，时宜也。天厌我魏邦，垂变以告，唯尔罔弗知。予虽不明，敢弗龚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旧典，禅位于周，庸布告尔焉。”又有一个皇帝承认自己德行不够，要主动禅位给大臣。

元廓先是派大宗伯赵贵拿着诏书去拜会宇文觉，接着隆重召开朝会，正式派遣户部中大夫、济北公元迪捧着皇帝玺绶去宇文家。宇文觉按照亲信们教导的那样，先是坚持推辞不肯接受。闻讯而来的公卿百官连忙集体劝进，声称宇文家取代魏室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事情，恳请15岁的宇文觉接受帝位。在宇文护的监视下，百官们的劝进一个表现得比一个恳切感人。太史还信誓旦旦地说天下出现了祥瑞，正是改朝换代、新皇帝君临天下的恰当时机。于是，宇文觉才接受了禅让诏书。

元廓非常知趣，在颁布禅让诏书后主动离开了皇宫。听到宇文觉接受的消息后，元廓在大司马府宣布逊位。

557年二月十五日，宇文觉登受禅台，举行柴燎告天仪式；百官云集，沿途接受新皇帝的接见。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历了不止一次这样的仪式，对程序已经非常熟悉了。宇文家族二十四年的牢固统治几乎让所有的国民都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两位主角宇文泰和元宝炬因

为逝世缺席了禅让仪式，而分别由他们年幼的儿子代表。宇文觉在这一天称天王，定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北周追尊宇文泰为文王。

逊帝元廓被封为宋公。第二个月，元廓就被宇文护杀死，谥号“恭”。到了唐朝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有感于拓拔部纵横中原的历史，在民间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第十代孙元伯明。元伯明被封为韩国公，世袭，延续魏室宗脉。韩国公一直传国到唐末。在古代禅让历史上经常扮演弱势一角的北魏拓拔家族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六 “佛门天子”萧衍



当北方血雨腥风、动荡不宁的时候，南方保持着惊人的平静。和北方皇帝走马灯般更换不同，南方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处于同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梁武帝萧衍。

萧衍在位四十八年，超过整个南朝历史的四分之一，不仅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他的皇帝是从同姓的南齐手中篡夺而来的。萧衍前半生压根没想到自己能当皇帝，所以当纷扰初定之后的天下被传递到他手中后，萧衍没有心理准备。受禅当日，萧衍坐上皇帝的辇车，便对陪乘的老伙计、侍中范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朕之今日，所谓慄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我恐惧的心情就好比是用坏掉的绳索来驾驭六匹马）。”范云反应极快，当下回道：“愿陛下日慎一日。”皇帝已经当上了，辞职是不行了，只能加倍小心，边走边看了。所以，萧衍登基之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勤于政务。他不分冬夏春秋，坚持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南方的冬天有时极冷，萧衍的手指都冻裂了，还手不释卷，认真履行皇帝指责。

萧衍为政，有两大特点。一是宽。南梁改革刑律，强调“明慎用刑”，逐步将一些古老的肉刑，比如劓鼻、刺字等废除，并改革各项滥刑和苛捐杂税。南梁的刑法相比各朝而言，很宽恤。这对老百姓有好

处，可也产生了各种弊端，主要是官僚贵族们犯罪后的惩罚过轻，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官僚贵族。二是俭。萧衍与萧道成一样，力行节俭。萧衍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节俭皇帝”。他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盖两年，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每天常常只吃一顿饭，有时候干脆就喝点粥充饥，衣服就随便拿件披在身上。南梁社会风气在萧衍的带动下有了很大改善。

萧衍最初的宰辅大臣是老伙计范云和沈约。他们三人早年都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座上宾，是“竟陵八友”中的三位。范云和沈约非常恪守朋友之义，尽心辅助萧衍。萧衍纳东昏侯萧宝卷的一个妃子为内室，宠爱有加，一度妨碍政务的处理。范云就进谏说：“当年汉高祖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灭秦后入关中却能做到不取秋毫、不幸妇女。如今明公刚平定天下，海内正对您翘首以待，您怎么可以被女色所拖累呢？”范云竟然自作主张，假传圣旨，将那名妃子赐给了将军王茂。事后，萧衍默许了范云的做法。

另一个老伙计沈约在南齐末年，积极参与萧衍的篡位活动，即位诏书就出自他的手中。但萧衍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一次，萧衍因事严厉斥责了沈约，骂他：“你说说，你是忠臣吗？”这句话勾起了沈约埋藏很深的神经。回到家里，沈约大病一场。他经常梦见被萧衍杀死的齐和帝来找他算账。齐和帝挥舞着宝剑要割沈约的舌头，责备沈约这些文人误国误民。沈约求助于巫师，问：“作祟的是何方鬼怪？”巫师说：“大人的梦是真的！并非鬼怪作祟。”沈约慌忙办起法场，亲自给玉皇大帝写奏章。奏章大意说：禅代之事，沈约身不由己，请上天放过我！最后，沈约忧惧而卒，为后人留下一部《宋书》。

范云和沈约两位老人死后，继起辅政的是徐勉和周捨二人。周捨是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生活俭约，执掌机密二十多年从来没泄漏半点机密。徐勉是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公正无私，能力超群。他担任吏部尚书时，一边手不停笔地处理案上堆积的文书，一边接待满堂的宾客，应对如流。皇帝勤俭、用人得当，萧衍统

治的前半期（502年到520年），政治比较清明。

周徐二人死后，继起执掌机密的是中领军朱异。

朱异也很能干，处理起政务来像流水一般，从不让公文积压在自己手里。不论政务多么繁重，朱异都能迅速作出判断，在短时间内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朱异有两大缺陷。第一，他是个大贪官。他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宅邸，台池园囿应有尽有，供家人和宾客游览。这就显然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所能承受的范围。朱异家里堆满了四方馈赠的财货；每个月要倒掉十几车吃不完的美味佳肴。朱异的第二个缺点更严重，就是揣摩上级心思、阿谀奉承，以献媚得宠。历朝历代，阿谀奉承的小人不少。这种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人献媚，上面还得有人“安心消受”。恰好，萧衍因为二十年天下无事、经济相对繁荣，对现实很满足，自我感觉良好，开始志得意满起来。朱异的出现，及时抓住了萧衍的心理。对南梁的国政来说，这可不是好事。

二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最大的名声是“佞佛”。

萧衍以佛教为南梁的“国教”，在南方大力推行“佛教化运动”。南方有佛寺近三千座，僧尼近百万人。天监十八年（519年），他在华林园受戒，亲自带发修行，法名“冠达”。几年之前，萧衍就已经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鱼和肉，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并且在50岁（514年）后断绝房事，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女子。

后人应该相信，萧衍是真正的佛教信徒。早年，他就参与了以信佛著称的竟陵王萧子良的圈子，与无神论做坚决的斗争。登基后，萧衍以国家之力大造佛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他的杰作，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实际的寺庙数量。萧衍还是佛教活动的慷慨赞助者。

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法会”。所谓“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就是没有障碍，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萧衍亲自上台讲《涅槃经》和《三慧经》，面对数以万计的百姓滔滔不绝。可见，萧衍对佛经是有一定研究的。针对当时热门的佛教、道教与儒家三者的关系问题，萧衍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三教同源说”，认为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萧衍的“金口玉律”缓和了人们的思想冲突，对佛教的推广大有帮助。从这点说，萧衍算得上中国早期佛教史的重要理论家。

此外，萧衍还为佛教制定了很多戒律，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吃素。萧衍身体力行，不沾一丝荤腥，还规定和尚和信徒也必须吃素，下令祭祀不能使用牛羊。后来，有官民反映，认为祭祀不用牛羊，对祖先和神灵不敬。萧衍就改为用面粉捏成牛羊的样子，作为替代品参加祭祀。

一个皇帝，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自然有个人信仰之外的深层次意思。南方地区之前屡经动乱，人心不安，萧衍登基后自然面临如何安定国家的问题。萧衍认为，安定国家就要禁绝杀戮、收拾人心，用共同的思想改造官民观念、统一人心。恰好刚刚在中国兴起的佛教，能否满足这一系列要求。于是，萧衍决心“以佛化治国”。

萧衍的考虑不可谓不好，执行得也不可谓不真诚。但是，他很快就做过了头，让一桩本可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大规模的造寺和法会，都由国家买单，逐渐掏空了国库。大批人口出家或者托庇在佛教势力之下，又削弱了国家的税赋能力。萧衍不仅不反省和补救，而是一条道走到黑，越做越过头，上演了多场“皇帝出家”的闹剧。出家的地点，都是皇宫附近的同泰寺，第一次是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萧衍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第二次是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萧衍在同泰寺参加法会，兴之所至，脱下龙袍换上僧衣，出家了。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向佛祖祷告，请求赎回皇帝，两天后萧衍还俗。第三次是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

十日。这回，群臣花了两亿钱将其赎回。第四次是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这些巨款让本就枯竭的国库雪上加霜。而同泰寺则资金雄厚，楼阁台殿富丽堂皇，九级浮屠耸入云表，更有多座黄金筑造的大佛。（可惜，这寺庙花费了南梁无数钱财，却没有保佑南梁国运长久，最后随着南梁覆灭，几十年后即成一片废墟。）

三

萧衍如此佞佛，每次批准犯人重罪后都要为之愁眉不展一整天，在内政外交上更是变得柔弱异常。他怎么来抵抗北方强大的敌人的侵扰呢？

萧衍对付北方的方针是：少打仗，多招降。

打仗杀人不符合南梁“佛化治国”的基本国策。况且，萧衍对佛光闪耀下的南梁的“软实力”非常自信，相信北方的蛮夷之辈终将被佛法所吸引，从黑暗中投奔佛光普照的南方。果然，不断地有北魏的官民投奔南梁而来，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最后连宗室亲王和藩镇大将都归降来了——只不过，他们不是被佛法所吸引，而纯粹是因为北魏大乱，到南梁逃命来了。萧衍对南逃的北魏官民，以礼相待，优遇有加。对于其中的有用之人，萧衍量才录用，利用他们“反攻”北方，试图让降将叛兵们替他开疆拓土，做无本的买卖。

普通六年（525年）正月，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梁。同时，南梁大将裴邃攻克河南新蔡、郑城等城，河南百姓纷起响应。而北魏发生了胡太后诛杀元叉的政变，一时无暇应对。萧衍大喜，派次子、豫章王萧综去接收彭城，督率前线各军，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萧衍的计划没有问题，他的儿子萧综却有大问题。萧综的母亲吴

淑媛原是南齐东昏侯的后宫女子，被萧衍“接收”后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所以，萧综的父亲极可能是东昏侯萧宝卷。宫中一直传说萧综的身世疑云，可萧衍并不介意，依然封萧综为豫章王。萧综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疑云，极为震惊！为了做“亲子鉴定”，他偷偷地掘开萧宝卷的坟墓，割破手掌，滴血到萧宝卷的枯骨上，发现血渗入了骨头；他不放心，又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滴血到儿子的骨头上，血也渗入了骨头。至此，萧综深信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而把萧衍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古代人相信这种“割血沥骨”的实验能证明父子关系，实际上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他开始复仇计划，勤习武艺，在庭院中铺满沙粒，整天赤足在上面奔跑，练得脚下生风，据说能日行三百里；又想伺机刺杀萧衍，但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他还写信给逃往北魏的南齐宗室萧宝夤，称他为“叔父”——这可是他唯一的“亲人”了。萧综多次请求梁武帝准许他带兵镇守边关，以便起兵造反，但一直没得到允许。

如今，萧综终于得到了统率军队的机会。他到彭城不久，就派密使向北魏接洽投降。北魏方面对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非常怀疑，迟迟不做回复。六月初七，萧综等不及了，带上两个亲随连夜跑出彭城，徒步投奔敌营。魏军这才相信是真的。第二天，梁军官兵找不到主帅，上下惊慌。对面魏军高喊：“豫章王已经归降我军，你们还待在那里干吗？”梁军群龙无首，自行溃散。魏军兵不血刃收复彭城，还追击到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方才收兵。

萧综投降后，北魏任命他为侍中、太尉、丹阳王，将寿阳公主嫁给他。萧综为“父亲”东昏侯萧宝卷举哀发丧，仪式相当隆重。南边的萧衍起初以为儿子是“畏战投敌”，听到丧礼消息后才知道儿子不认他这个爹了。他雷霆大怒，剥夺萧综的封爵，将吴淑媛毒死。萧综在北魏也得不到重用，加上妻子寿阳公主后来被尔朱世隆所害，他颇有看破红尘的意思，弃官出家当了和尚——这点倒是得到了萧衍的“遗传”。萧衍听说萧综在北方混得不好，就派人给他送去小时候的衣服，

招引他南逃。但萧综不愿意回来。528年，萧宝夤割据长安造反，在北方恢复了南齐的旗号。萧综闻讯，从洛阳逃往关中，想和“叔父”共图复国大业，在黄河渡口被北魏官吏抓捕，遇害。萧衍知道后，又动了恻隐之心，不仅恢复了萧综的封爵，还派人把他的灵柩偷到南方来，以礼安葬。

回到萧衍对北方的战略上来，他还真取得了若干重要成绩。比如普通七年（526年）七月，浮山堰旧址发洪水，寿阳城被淹。萧衍派兵趁机进攻寿阳。寿阳北魏守将投降，南梁成功收复淮河流域五十多座城池。南梁的边界形势大为改观。又比如河阴之乱后，大批北魏宗室王爷归降南梁。萧衍立元颢为傀儡，派陈庆之护送他回洛阳。此战一度让陈庆之收复河南地区。总体而言，萧衍的收获不大。六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北魏屡次大乱，继而分裂，南梁对北方优势明显。如果遇到雄才大略的君主，措施得当，南方极可能大有作为，甚至灭亡北魏都不一定。可惜，萧衍白白葬送了历史良机。

四

萧衍的为政宽松和佞佛成性，导致南梁朝廷对官僚贵族非常宽容。萧衍对统治阶层收起了大棒，一味喂胡萝卜，对他们误国害民的罪行也一味包庇放纵。

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弃军而逃，导致北伐失败，数以万计的将士无谓牺牲。萧衍却对他不加罪责。后来，有人举报萧宏在府邸后院的大房子里私藏军械，萧衍却非去调查不可。他借故到临川王府欢宴，赴宴后又要拉着萧宏去后院“走走”。后院有一百多间大库房，萧宏遮遮掩掩，不让萧衍打开看。萧衍见此，更是坚持打开查看，结果发现里面全部是金银财宝，光是铜钱就装了三十多间，共有钱三亿余。萧衍见不是军械，放心了，拍着萧宏的肩膀说：“阿六，你会生

活啊！”他压根就不问萧宏的钱是怎么来的。（萧宏是出名的贪污犯和高利贷者，他的钱都是从民间搜刮来的。）萧宏在皇兄的纵容下，越来越荒唐。他竟然和亲侄女、萧衍的长女永兴公主乱伦。两人怕丑事泄露，竟然计划弑梁武帝自立。事情败露后，永兴公主羞愧自杀。萧衍竟然还不追究萧宏的罪过。萧宏于普通七年（526年）正常死亡。萧衍追赠他为大将军，谥为靖惠王，安排厚葬。

萧衍早年长期无子，过继了萧宏的儿子萧正德为嗣子。结果，萧衍在37岁时生下了长子萧统，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生下了萧综、萧纲、萧绩、萧续、萧纶、萧绎、萧纪等。至此，萧衍就没有必要过继萧正德了，他立长子萧统为太子，将萧正德返回萧宏名下。萧正德心生怨恨，叛逃北魏，以“南梁前太子”自居。无奈，北魏对这样的“花瓶”不感兴趣，萧正德不受重视，又逃回江南。萧衍竟然不惩办萧正德的“叛国”，只是把他骂了一顿，而且一边骂一边抱着萧正德痛哭，果真是“菩萨心肠”。萧正德继续当他的王爷，还被派到富庶的吴郡当太守。他招揽亡命之徒，公然抢劫，最后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结果依然安然无恙。如此目无法纪却照样享受富贵，其他王公贵族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哪里还会把国家法纪当真？

萧衍的八个儿子都擅长文学，可惜多数人教育不当，品德堪忧。这和萧衍这个父亲的纵容有关。太子萧统是兄弟中才学最出众，人品也最好的，可惜早死；次子萧综叛逃北魏；四子萧绩和五子萧续也都死在萧衍的前面。因此，晚年萧衍事实上只有四个儿子：三子萧纲、六子萧纶、七子萧绎、八子萧纪。他立三子萧纲为新太子。

六子萧纶曾经担任徐州刺史、扬州刺史等要职，始终为非作歹，搜刮民脂民膏。下属向梁武帝萧衍揭发萧纶的斑斑劣迹，萧纶竟然杀死了下属。萧衍只是处死了杀人的直接凶手，多次对萧纶网开一面。萧纶贪慕皇位，最后谋划弑父亲。一次，他在父亲萧衍外出的路上埋伏兵士，准备发动政变，因泄露而失败；又有一次，萧纶给萧衍献上毒酒，结果萧衍把酒转赐给了他人。其他人被毒死了，萧衍又逃过一

劫。这两次弑君行动，萧纶都罪证确凿，萧衍依然不处罚萧纶。萧纶官照当，日子照样逍遥。萧衍如此过分纵容，就未免养虎为患了。七子萧绎担任荆州刺史的要职，和五哥萧续关系紧张。听说萧续死讯后，萧绎高兴得手舞足蹈，把鞋子都给磕破了，一点都不念手足之情。萧衍分封诸子到各地掌权，是想自己有难的时候，儿子们能够出兵援助。但是，看萧纶、萧绎和萧正德这些人的样子，像是忠君爱国的人吗？

皇帝一心佞佛，导致南梁国库空虚，纵容犯罪又导致南梁官员腐化堕落、为所欲为。萧衍统治后期，政治黑暗，国家迅速衰落。百姓负担沉重，生活无以为继；官府中政务堆积，冤案累累。真正为国着想、认真行政的官员少之又少。大同十一年（545年），散骑常侍贺琛上奏，指出了一些时弊。一是官员大肆榨取，民不堪命，只得逃亡，国家控制的户口越来越少；二是风俗由俭入奢，官员贪污腐败严重；三是官吏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四是国家连年浪费人力物力，财政拮据。贺琛指出的问题，都是事实，而且言语并不激烈。

但是萧衍已经容忍不了正常的指责了，暴跳如雷。在他看来，自己是有道明君，国家在自己治理下尽善尽美，“大好局面”不容否定。于是，萧衍立即颁下圣旨，痛骂贺琛。他先是列举自己的种种“壮举”，比如已有三十多年不近女，平生不饮酒，不听音乐，起居不用雕饰之物等等。又比如，萧衍自述勤勉政务，每天三更天就起来工作，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才吃东西，且一天只吃一餐。这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天下黎民吗？萧衍言下之意，自己是千古难找的圣君。至于贺琛指出的政治黑暗，萧衍要求他指出具体是哪个官员贪腐、具体是哪件事情做得不好。如果贺琛不能一一指出来，就是欺君枉上！

贺琛接到诏书，惊出一身冷汗，赶紧上奏“深刻反省”、“认真检讨”，请求萧衍原谅。

三七 昭明太子萧统

南齐中兴元年（501年）九月，萧衍正在京师建康城下鏖战，准备最后的总攻。不久，建康东府城守将徐元瑜就投降了，荆州的敌人萧颖胄暴病而亡。这时，襄阳城传来了儿子萧统诞生的消息。这是三十八岁的萧衍的第一个儿子。萧衍喜出望外，将长子的出世和前两大胜利合称为“三庆”。这个孩子就是萧统。

萧统不到一周岁，父亲就逼南齐的末代君主东昏侯把皇位“禅让”给了自己。萧衍当了皇帝后，襁褓中的萧统在天监元年（502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

萧衍对太子非常珍视，努力培养。萧衍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子太傅，尚书令沈约为太子少傅。沈约是经历了三个朝代的重要人物，耆年硕望，深于世故，政治地位很高。沈约还是《晋书》和《齐书》的作者，是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对萧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年迈的大文豪刘勰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成为萧统最为亲近的文学侍从。萧统和晚年刘勰结下了良好的友谊。萧统在刘勰的影响下，对文学理论和作品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从创作和讨论转向了作品收集和评论。萧统日后走上文学之路，可能与沈约、刘勰两位老师有密切关系。

天监五年（506年）太子萧统出宫独处后，在道德和能力上都表现得无懈可击。他日夜思念父母，每五日一朝。父子相见后，常常允许萧统留住内省，住个三五天再回去。梁武帝晚年大兴佛教，亲自讲经说法。太子萧统也跟着崇信佛教，遍览佛经。他的信佛并不是投父亲所好的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的信佛学佛。萧统在宫中招揽东南名僧，谈论不绝，常常能挖掘出佛学中的新意。除了紧随父皇信佛外，萧统在朝廷上也不敢懈怠。他每天准时参加早朝。天还没到五鼓，萧统就守在宫外等待城门打开。有的时候，父皇要在晚上召见太子，萧统就穿戴整齐、正襟危坐，随时准备入见，甚至为此坐到天明。南朝的社会风气讲究奢华，一些世族大家竞相攀比。萧统在物质方面却以身作则，生活非常朴素，不穿华丽的服装，膳食也不吃肉。

萧统还聪明好学。天监八年（509年）九月，他听讲《孝经》竟然就基本知道了经书的大义，听讲完毕还亲临国学进一步求知解惑。第二年，天监九年（510年），九岁的萧统正式入国子学就读。梁武帝萧衍车驾亲临国子学，走进课堂，赏赐国子祭酒以下的教职员工，并正式下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天监十四年（515年）正月，萧衍亲自在太极殿给太子行冠礼，对儿子寄予了厚望。

自从萧统懂事开始，萧衍就允许他参与一些朝政。内外臣工和奏事的人也将太子参与决策看做正常的事情。天监十一年（512）年，十一岁的萧统在宫内看到一些狱官在忙碌，就问左右随从：“那些穿着皂衣的是什么人啊？”随从回答说：“他们是廷尉的官属。”萧统就把这些官员叫过来问：“你们手中的这些案子，我能审判吗？”这些官员看太子还只是十一岁的孩子，半开玩笑地回答：“可以。”结果萧统拿过案卷真的判了起来，而且把所有的罪犯的惩罚都改为了笞杖五十。这些官员这下子进退两难了，不知所为，只好把情况汇报给萧衍。萧衍笑着追认了儿子的判决结果。从此，司法部门常常把案卷递给萧统。父皇萧衍和司法系统凡是对某些案子或者罪犯想从轻处理，就都把案

子交给太子审判。萧统的判决都非常仁慈。直到有一次，建康县有人诬告他人拐卖人口，真相大白后县令将犯诬告罪的犯人从轻发落，只判决了杖责四十。然后，县令将案卷交给萧统，希望萧统能够确认县里的轻判。想不到这一次萧统并没有从轻发落，反而判了犯人十年劳役。人们这才知道太子虽然仁慈，但也并非无原则的宽纵。

史载“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当他发现奏折中有谬误或者巧词诡辩的地方，都一一指出，示其可否，让有关人员慢慢改正，但太子并没有因此弹纠任何一个人。普通年间，朝廷发动了对北魏的北讨。战争导致京师建康的谷价飞涨。萧统就下令东宫减膳，改常饌为小食，节约粮食。每当霖雨积雪天气，萧统就派遣心腹左右，周行闾巷，探视贫困家庭的生活，遇到有流落街头的人，就暗地里加以赈济。萧统还收集宫中多余的衣物在寒冬腊月施舍给穷人。如果遇到没钱收敛的尸体，太子就自己掏钱准备棺材和丧事。每当萧统听到百姓赋役勤苦的情况，都非常严肃地倾听，他还常常告诫有关部门朝廷统计户口未实，因此惊扰百姓。凡此种种为萧统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天下皆称仁”。

普通元年（520年）四月，慧义殿出现甘露祥瑞，群臣一致认为这是太子至德感动上天的结果。萧衍也肯定了这个解释。可见朝野上下对太子萧统都是满意的。

普通七年（526年）十一月，太子生母丁贵嫔病重。萧统赶往内省，朝夕服侍母亲，衣不解带。生母死后，萧统“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他简直是痛不欲生，日渐消瘦。父皇萧衍看不下去了，派中书舍人顾协宣旨说：“毁不灭性，圣人之制。因为丧事毁了自己的身体就是不孝。我还在，你怎么能够这样自毁呢！你应该立即压制悲痛，恢复饮食。”萧统这才吃了点东西，从此直到母亲入葬，都是麦粥为食。萧衍又传话来说：“听说你吃得过少，身体非常虚弱。我本来并没有什么病，因为你这样折磨自己，胸中也积塞成疾。因此你应该强加**饘**粥，不要让我为你再担心了。”这次，尽管父亲苦

口婆心地劝逼，萧统还是每天只喝一碗粥，不尝菜果。萧统原本是个胖子，腰带十围，等办完丁贵嫔的丧事，他的腰带就降到了五围。丧事完后，萧统入朝，群臣百姓看到他消瘦憔悴的样子，纷纷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二

可叹的是，历史并没有让萧统沿着理想的轨道顺利地继位称帝，没有让萧统的光芒继续增强。因为我们不能忽视萧统的父亲、梁武帝萧衍对太子的期望和态度。

梁武帝萧衍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有许多匪夷所思的举动。如果仅仅从才能上来说，萧衍无愧是南朝诸帝中的翘楚。他多才多艺、学识广博、文武全才，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即使是在繁忙的政治生涯中，萧衍依然能够“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但同时萧衍也是一个“狠毒的角色”。开国皇帝可不是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的文人骚客可以胜任的。萧衍就是靠赫赫战功和凶狠的政治手腕逐步坐上皇位的，对待政敌从不留情。

登基后，萧衍和多数皇帝一样，疑心很重。他害怕他人染指手中的权杖，时刻紧盯着身边重臣的言行举止。长期居于相位的沈约是谋划、辅佐萧衍登上了皇帝宝座的大功臣，同时又是太子少傅。但是萧衍并不完全信任沈约，始终架空沈约的权力。沈约的权力有名无实，处境既尴尬又危险，最后抑郁得病。天监十二年（513年），病中的沈约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有人说是前朝南齐的皇帝变成厉鬼来找他报仇），让道士给上天写了一封“奏折”说自己推翻齐朝、参与禅代等事并不是出于本意——言下之意是说这一切都是萧衍干的，沈约自己

只是个从犯。沈约想以此来缓解自己的病情，谁知他的所作所为早就被梁武帝萧衍安插的密探给泄露了。萧衍龙颜大怒，数次命人谴责沈约的所作所为。沈约重病加上害怕，没几天就死了。有关部门按照惯例给沈约上谥号为“文”，萧衍亲自改谥为“隐”。“隐”是个恶谥，是评价一个人道德低劣、言行不一的意思。

这件事情让打小就在沈约督导下成长的萧统很震惊。他猛然发现，自己和父亲有着重要的差别。那就是父亲坚决捍卫权力，不惜对任何潜在威胁采取强硬措施，其中包括血腥镇压。没有经历过权力争夺和铁血战争，一生下来就被立为太子的萧统很难理解父亲的做法。

目睹了越多政治变故，萧统想不通的地方就越多。临川王萧宏曾经是萧统的太子太傅。这位王爷打仗是个外行，损兵折将，丧权辱国；贪婪敛财却是行家，把家中的房间都装满了金银珠宝，而且吝啬到不让他他人观看的地步。萧衍对兄弟的这些缺点都忍受了。萧综是萧衍的次子、萧统的弟弟。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南齐东昏侯的妃子，成为萧衍妃子七个月后就生下了萧综。尽管萧综极可能是东昏侯的遗腹子，萧衍却依然封他为王，还授予军权。萧综长大后老觉得自己不是萧衍的儿子，不仅和萧衍感情疏远，还在前线领兵作战的时候，公开投奔了北魏。萧衍闻讯，剥夺了萧综的封号，还将吴淑媛废成庶人。后来出于招降萧综的需要，萧衍又恢复了他的封号。这些事情，在太子萧统的世界观中可能都是惊天动地、无法理解的。萧统是发现饭菜里有蝇虫也不指出，以免厨师受罚的人。

萧衍对太子的所作所为虽然找不到可以教训或者警告的地方，但从心底是不认同的。萧统和父亲心目中的帝王形象有相当的距离。太子料理生母丧事的时候，孝行太过。萧衍曾经委婉地给儿子点了一下，还要求儿子多看看自己的言行，可惜萧统没有读懂父皇的话。这就为父子之间的分歧和决裂埋下了伏笔。

大通三年（529年），梁武帝萧衍和太子萧统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出来。

生母丁贵嫔死的时候，萧统派人给母亲找了一块好墓地，当时都已经开始除草和平整土地了。有一个卖地的人想把自己的土地卖给朝廷作为丁贵嫔的墓地，可以从中获利。因此他就去找了太监俞三副，说只要俞三副能把自己的土地“忽悠”给朝廷，就可以从地价中拿走三分之一的提成。卖地人的报价是三百万。俞三副心动了，秘密启奏萧衍说太子找到的土地并不如自己知道的一块土地风水好。他着重向皇帝介绍了那块地是如何的有利于皇家的运气。萧衍的疑心本来就重，俞三副的话很自然牵动了 he 头脑深处那根对太子不满意的神经，马上下令重新买地预备丁贵嫔的葬事。萧统没有办法，只好买了俞三副推荐的土地安葬母亲。俞三副也就轻易获得了一百万的好处。

葬事完毕后，有个真正懂风水的道士就对萧统说，丁贵嫔的墓地风水其实并不好。萧统忙问怎么个不好法。那个道士说这块地不利于长子，也就是不利于太子萧统的运道，如果用东西厌伏也许可以克制。萧统就按照道士的解释，备齐蜡鹅等东西埋在墓侧的长子位上。

东宫有两个宫监鲍邈之、魏雅，都是萧统的亲信。慢慢地，魏雅在萧统跟前更加得宠，鲍邈之则被疏远了。鲍邈之心中愤恨，就向梁武帝诬告说魏雅勾结道士，以压魔术诅咒萧衍，盼着萧衍早点死了好让太子萧统早登帝位。为了证明诬告的真实性，鲍邈之就说魏雅和太子在丁贵嫔的墓侧埋下蜡鹅等物诅咒皇帝。在墓地一事上，萧衍原本就对太子有所怀疑，接到举报后忙秘密派人挖开墓地查看，果然发现了蜡鹅等东西。萧衍瞬间就相信了鲍邈之的告发，之前儿子萧统建立起来的美好形象顷刻倒塌。南北朝是一个政治道德败坏的时代，父子兄弟相残的事情频频发生，难道这样的悲剧要发生在我萧衍身上了

吗？即位前矫揉造作、沽名钓誉的太子很多，难道我的儿子萧统也是那样内外不一的人吗？萧衍震惊、愤怒，要深入追究这件事情。事情牵涉到太子，追究下去势必动摇萧统的政治地位。一些同情太子的大臣（徐勉等）慌忙坚决劝谏萧衍，反对将此事发展成血腥大案。萧衍不愧为开国君主，很快就平息了冲动，最后只杀掉了那个风水道士。

事情虽然化解了，但是萧衍对萧统积累的不满第一次表现了出来，冲塌了父子信任的堤防。

萧统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幼稚的政治素质。对整件事情，他选择了沉默，没有辩白，也没有补救措施。萧统就好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过着先前仁孝文雅的生活，继续和文人学士们选文。在内心，他知道自己太子地位开始动摇了，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忧郁的萧统对于“蜡鹅事件”终生“不能自明”。

就在萧统终日惶恐的时候，长期出镇外地的三弟晋安王萧纲突然被父皇征召入朝。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天，萧统对左右人说：“昨天我梦见与晋安王对弈，我把班剑送给了他。晋安王近日来京，难道是来接替我的地位的吗？”班剑并不是普通的佩剑，而是有着严格标准规定，证明个人身份的宝剑。萧统的梦境和担忧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

梁武帝萧衍在对待父子亲情的问题上并不能像处理政治斗争一样快刀斩乱麻。他苦苦思索，如何重新处理与儿子萧统的关系。萧衍思考的结果是找不到结果，只好在当年九月，在同泰寺出家，要做和尚。群臣赶紧凑钱把这个“皇帝和尚”从寺庙中赎了回来。最终，萧衍保留了萧统的太子地位，在十一月任命南平王萧伟为空缺很久的太子太傅。南平王萧伟是萧衍的弟弟，以本宫领太子太傅并加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衔。《南史》说他是“朝廷得失，时有匡正。子侄邪僻，义方训诱”，是个很严厉的皇族。选他为太子太傅，萧衍的用心很明显了。他觉得太子需要加强管教了。

第二年，（中大通二年，530年），萧统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

这一年，吴兴郡因为水灾失收，所以诏发上东三郡民丁开渠泄水。萧统上疏认为此举弊多，请求暂停，得到了父皇的同意。这一事件表明，萧统失去了几年前已经具有的参与决策的地位。他只能像普通大臣一样，事后对父皇的决策进行劝谏，而不是参与政策的制定了。是谁剥夺了萧统参与政治的权力呢？只有萧衍一个人能够办到。

这一年，萧统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政治场合。父亲的猜忌和父子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他抑郁成疾，身体状况恶化了。

大中通三年（531年）的一个春日，久病的萧统乘舟采莲，愉悦身心。糟糕的是，由于侍从的疏忽，船只剧烈颠簸，将萧统晃入了水中。病中的萧统不仅溺水，而且伤到了髋骨。被人救起后，萧统的伤势日渐严重，最后发展到卧床不起的地步。三月，萧统病重。太子果然仁孝。遇到萧衍来信询问什么事情，萧统为了怕父皇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而担心，都挣扎着亲手给父亲回信。东宫左右看到太子病情恶化，计划向萧衍报告实际情况，遭到萧统的坚决制止。萧统说：“为什么要让父皇知道我的重病呢？”萧统的言行其中有孝顺的一面，同时难免夹杂着一丝无奈、幽怨。父皇已经不信任我了，我和父皇还是存在重大差别的。病榻上的萧统常常为此低声哭泣。

熬到四月，萧统在宫中逝世，时年三十周岁。得到太子死讯后，萧衍赶到东宫，放声痛哭。萧衍的哭声中既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更有为自己先前对儿子的猜忌的懊悔。他的死使朝野一片惊愕惋惜的声音。“京师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闻丧皆恸哭。”萧衍诏令用皇帝礼节将萧统入殓，上谥号为“昭明”。萧统因此被尊称为“昭明太子”。

四

萧统死后，萧衍面临着挑选新继承人的问题。

萧统是病死的，没有被废。因此按照封建宗法，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应该是萧统的儿子。也就是说，萧统的太子地位应该传给他的儿子，皇位应该继续保持在萧统这一支血脉当中。萧统8岁就结婚了，留下多位儿子。其中长子、出镇南徐州的华容公萧欢出任皇太孙，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的呼声最高。萧衍在确立新继承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拖延起来。他一度准备封萧欢为皇太孙，但蜡鹅往事始终徘徊在脑海中，让他难以释怀。最后萧衍选择三子萧纲为新太子。可能为了消除朝野对于为什么舍萧欢而立萧纲的疑惑，萧衍专门解释说：如今天下未安，择嗣须重贤德能力。身逢乱世，权力对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就是政治能力，因此他挑选了年长并且政治经验丰富的萧纲。这从反面也透露出了萧衍对昭明太子萧统的委婉否定。

从履历上来说，萧统的一生平淡无奇，仁德有余，强硬不足，缺乏刚硬的政治手腕和残酷的政治实践，并不符合父亲对帝王的要求。萧统死后，晚年的萧衍和梁朝遇到了接二连三的挑战，直到出现了几乎血洗萧氏皇族的侯景之乱。萧统如果尚在，能应付这样的挑战吗？

至今，萧统还被人怀念。东南各省，昭明遗迹，处处有之。这主要得益于萧统留下了一部《昭明文选》。

原来，萧统“好士爱文”，当时负有盛名的刘孝绰、殷芸、陆倕、明山宾、王筠等人相继进入了东宫的幕宾行列，得到礼遇。萧统经常与这些天下名士讨论文章诗词，后来在东宫新置学士，负责选文，遴选、编辑浩如烟海的历代作品，力图以一种文章总汇的形式刊印出版。阅读、核对、通稿和校对是既费时又费力的事情。期间，东宫的选文事业因为北伐和多位学士的逝世一度受挫，但萧统始终在坚持高

标准的同时保证进度。蜡鹅事件发生后，萧统不想因为自己地位的动摇而影响到正在进展中的文化盛事。他更担心因为自己的被废而断送选文大事，因此加快编辑工作，将文选杀青。一部被后人称为《昭明文选》的宏伟大作正式成书了。《昭明文选》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三八 侯景之乱I：八百残兵攻梁



但凡志得意满的皇帝，都好大喜功。梁武帝萧衍自信已经将江南治理得“国泰民安”了，唯一的遗憾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中原的子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太清元年（547年）正月，萧衍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原州郡长官献地投降，朝野称贺。醒来后，他把梦告诉了大臣，说：“我难得做梦，做了梦必有事实。”善于奉承拍马的朱异马上说：“恭贺陛下，这是天下一统的预兆。”萧衍觉得很有道理，更迫切地希望把中原纳入梁朝的版图。

巧了！第二个月，东魏的河南藩镇将领侯景派人到建康，声称与高澄有怨，愿献出河南十三州降梁。侯景对萧衍信誓旦旦地说：“黄河以南，皆臣所职，（纳土归降）易如反掌。”

侯景只说了部分事实，更深层的内容他没有说明。他的确是和高澄不和，但君臣矛盾不至于让他投身他人麾下。侯景归降南梁只是一个幌子，掩盖他试图借助外力与东魏抗衡、方便自己割据称王的狼子野心。

侯景在之前的章节中频繁出现过。他是怀朔镇的羯族人，年轻时就和高欢混在了一起。六镇起义时，侯景先投尔朱荣麾下，是尔朱荣

的先锋大将，曾经擒拿过葛荣。尔朱荣败后，侯景投入高欢部下。在高欢阵营中，侯景始终是个另类。不单单因为他的民族（高欢阵营绝大多数人不是鲜卑人就是汉族人），更因为侯景平时总是离群独处，喜欢用他那双狡黠的、四处乱转的小眼睛凶狠地打量同僚。加上侯景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同僚们都不爱搭理他。在心底深处，侯景不甘屈居人下，自立为王。高欢是一代枭雄，能够镇住侯景，加上高欢的事业蒸蒸日上，给侯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侯景在高欢时期规规矩矩，屡立战功。

高欢末期，政务大多委托长子高澄处理。侯景对专权的高澄很轻视，直呼他“鲜卑小儿”。一次，他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我不敢有异心。高王一旦不在了，我不能和鲜卑小儿共事！”司马子如也出身怀朔镇，是和高欢、侯景交往几十年的老伙计了。他连忙捂住侯景的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从河桥-邙山之战开始，侯景就统率十万大军驻扎河南，控制着东到山东、西到河南西境、北到黄河、西到淮河的广大区域，约占东魏领土的三分之一，具备割据称雄的实力。侯景难免蠢蠢欲动起来。而高澄的专横、猜忌则加剧了侯景的叛离。

高澄上台后，为了打击他人、树立权威，重用崔季舒、崔暹监视皇帝和百官，弹劾对高澄不满、不敬的人。高澄指使亲信弹劾了司马子如、咸阳王元坦、孙腾、高隆之等许多大臣，许多人被降职、罢官、削爵。司马子如在高欢当权时显赫一时，如今也被高澄关进监牢。他之前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害怕性命不保，吓得一夜白头。高欢知道后，给高澄写条子说：“司马令，我之故旧，汝宜宽之。”高澄不得不遵照父亲的命令放过司马子如，可又不好好放。他在大街上陈列武士，摆出一副动大刑的阵势，然后把司马子如押到面前。司马子如吓得都要瘫倒在地了，当武士脱下他的刑具时还以为要被杀头了，结果高澄轻描淡写地把他无罪释放了。侯景也在高澄的“修理名单”里面，也被人弹劾过。这就恶化了两人的关系。

高澄整治侯景除了个性使然外，还有削弱地方势力，巩固对河南

统治的考虑在内。高欢病危之时，高澄担心父亲死后无人可以镇住侯景，就假冒父亲的名义，写信召侯景来晋阳杀掉。但是病重的高欢忘记告诉儿子，侯景曾经和自己有过约定，为了保密，两人的书信都在信封背后涂上暗号。高澄不知道这个约定，侯景一接到书信，就知道就假的。联想到高欢病重的消息，侯景断定高澄是对自己动了杀心。他想不反都不行了！

侯景决心与高澄刀兵相向。他管辖的河南地区，处在高澄、西魏和南梁三方的包围之中。为了保证自己在和高澄作战时西魏和南梁不会趁机进攻自己，也为了多两个同盟军，侯景分别向南梁和西魏两国称臣，宣布“归降”。

侯景带着十万大军、数百里土地，宣布归降南梁。这一大笔飞来横财，把萧衍的脑袋撞得云里雾里的，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冥冥之中，他怀疑侯景归降的真实意图。萧衍召集大臣讨论，说：“我国家金瓯无缺，现在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有一些大臣也反对贸然接纳侯景，因为南梁和东魏保持了十多年的和平，如果接纳侯景必将在两国之间重开战火，胜负难料。当时，高澄也派使者来到南梁都城建康，重申了“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提醒南梁不要干涉东魏的“内政”。

朱异揣摩萧衍贪心中原的土地和人口、内心倾向于受降，就顺着萧衍的意思说：“若拒绝侯景，恐怕之后再没有人愿意归降了，愿陛下无疑。”萧衍于是驱逐东魏使者，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接受侯景归降。他派大将羊鸦仁领兵三万运粮接济侯景——南方安定了几十年，粮草丰富，而河南当了几十年战场，侯景的后勤空虚。

二

西魏宇文泰也接到了侯景的降表，也召集大臣商议是否接纳侯景

投降。多数大臣和侯景打了几十年交道，深知这个人毫无信义可言。大臣王悦说：“侯景志向远大，不会甘为人下。况且他能够背叛高氏，怎么能保证他会效忠我朝呢！”他反对西魏出兵援助侯景。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西魏的河南主将王思政却认为侯景归降是天赐良机，值得冒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思政不等宇文泰的命令，迅速带领本部兵马开始自西向东接收侯景的辖区。事已至此，宇文泰也不得不命令关中的西魏军队随后跟进，进入河南地区。

这时，树起叛旗的侯景事事不顺，日子开始难过了。首先，辖区内的州郡并没有都追随侯景起兵。他虽然管辖十三州之多，但响应他起兵的只有颍州一地。侯景连蒙带骗，四处出兵，才占领了今天河南大部地区。而他管辖的东部各州，都没有起兵响应，相反站在高澄一边讨伐他来了。第二，侯景和高澄的讨伐大军打了一仗，惊奇地发现“鲜卑小儿”还挺厉害。叛军非但没有打败讨伐军，反而被围困在了颍州。

宇文泰派出的李弼、赵贵大军，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兵临颍州城下的。高澄军队看到西魏大军赶到，担心遭到两面夹击，主动撤往河北。颍州解围。西魏也不愿意与东魏发生恶战，没有追击，而且刻意与东魏大军拉开距离。侯景巴不得把西魏军队推到前台去和东魏军队恶战，坐收渔翁之利，于是将颍州让给西魏，主动撤往悬瓠（今河南汝南），与萧衍派来接应他的羊鸦仁会师。李弼、赵贵看到侯景和南梁军队合兵一处，知道侯景“一女两嫁”的阴谋，赶紧报告了宇文泰。宇文泰难能容许侯景耍弄自己。你侯景不是向西魏称臣了吗，我就召你到长安来面圣！侯景当然不会放弃军队地盘跑到长安去，回复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将宇文泰骂了一顿。于是，他和西魏的关系彻底完了。宇文泰也不亏，轻松占领了河南西部四州。

侯景从西魏方面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倒赔上了大块地盘，但他却从南梁方面得到了补偿。萧衍比宇文泰容易骗得多。西魏军队进入河南后，侯景向萧衍解释说：“王师未到，形势危急，我不得已才向

关中求援。这是我舍弃一小块地盘为诱饵的权宜之计。臣不安于东魏高氏之下，又岂能容于西魏宇文氏？”萧衍还处在对美好前景的想象中，觉得侯景的解释很有道理，回复说：“将军做得很对，我非常理解。”侯景骗倒萧衍后，考虑到遭受高澄、宇文泰两军的压迫，只好将希望都寄托在南梁身上了。

七月，梁军羊鸦仁部进入悬瓠（今河南汝南）。飘飘然的萧衍决心以侯景归降为契机，在八月下诏北伐东魏。他任命贞阳侯萧渊明（萧衍哥哥萧懿之子）为主帅，率领主力东进，计划先攻下彭城，再西进与河南地区的侯景、羊鸦仁等会师，以后分头北进，收复河北。这是个一相情愿的计划，且不说侯景能否保住河南地区，单说计划是需要人来执行的，南梁根本就派不出可堪使用的将帅来。萧衍的侄子萧渊明当了北伐的主帅，却根本不懂军事，就连正常的军情好坏也判断不出来。他参加军事会议，不会下命令，只会说“临时制宜”——意思是让部将随机应变，说了等于没说。而梁军众将，陈庆之已死，将才凋零，只有将军羊侃一人深通军事，且有实战经验，可以一战。（而这羊侃恰恰又是北方投降的将领。其父随薛安都投降北魏，他长大后留在北魏征战多年，因心系故国而叛逃南梁。）羊侃起兵之初，新鲜劲挺大，不是建议萧渊明抓紧时间猛攻彭城，就是建议萧渊明趁机袭击远道而来的魏军援兵。萧渊明一概不听。渐渐地，羊侃清醒了过来，认定跟着萧渊明混没有前途。于是，他率领本部兵马和大部队拉开距离，单独驻扎，以防万一。

梁军进攻彭城，高澄派遣将军慕容绍宗救援。慕容绍宗是前燕皇室后裔，是尔朱荣的远方亲戚。他在尔朱荣时期担任过并州刺史，投降高欢后担任过徐州刺史、青州刺史，经验很丰富，能力也强，但在高欢时期并没有得到重用。不是高欢没有发现慕容绍宗这块宝，他是把慕容绍宗留着给儿子高澄。高欢病重时建议高澄掌权后对慕容绍宗加官晋爵，这样他就会死心塌地地效忠高澄了。高欢还预测侯景极可能造反，建议高澄派慕容绍宗去镇压。于是，高澄任命慕容绍宗为东

南道行台，封燕郡公，负责抵抗梁军和镇压侯景。

高澄的对策是先击退东边的梁军，再向西收拾侯景。慕容绍宗率军在离彭城十八里的寒山与梁军相遇。当时梁军驻扎在寒山。慕容绍宗先发起进攻。梁军将领们赶紧去找萧渊明请示如何迎敌，不想萧渊明醉得一塌糊涂，根本起不了身子，只是迷迷糊糊地说“救援救援”。众将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动，只有胡贵孙奋勇出战。胡部官兵作战英勇，竟然挡住了魏军的进攻，魏军前锋开始后撤。梁军产生轻敌情绪，追击了几里地。不想，慕容绍宗突然回头再战，又有魏军从两侧包抄过来，将梁军杀得大败，进而连累尚在大营中的梁军主力。寒山一战下来，梁军损失数万人，包括萧渊明、胡贵孙等在内的将帅都成了俘虏。只有羊侃因为和主力拉开距离驻扎，得以全师而退。

寒山大败的消息传到建康，萧衍正在睡午觉。朱异匆忙入宫，让宦官叫醒萧衍。萧衍听到噩耗，大吃一惊，险些从坐床上跌下来。宦官连忙扶住他。萧衍愣了好一会儿，叹道：“难道我要蹈晋室的覆辙吗？”

东线梁军轻易就败得一塌糊涂，让侯景也看不下去。他没想到梁军如此不堪一击，没想到南梁统治层如此昏庸无用。侯景本想借助南梁的力量与高澄抗衡，如今看来高澄难以取胜，但侯景萌生了攻取南梁的念头。避难就易，本来就是人之常情。

但是侯景暂时还不能对南梁有实质的举动，因为慕容绍宗率领得胜之师来进攻他了。梁军大败后，侯景率军退守涡阳（今安徽蒙城）。他拥有士兵四万人，战马数千匹，在兵力上对慕容绍宗保持优势。侯景对高澄部下诸将都看不起，唯独忌惮慕容绍宗，所以一开始他就在心理上输了一截。两军对垒，魏军中有将领想主动出击的，都被慕容绍宗拦住。他判断侯景后勤虚弱，力求速战，所以就和侯景打起持久战、消耗战。侯景最怕这一招，才熬了两个月就弹尽粮绝，坚持不下去了。到了太清三年（549年）正月，侯景撑不下去了，打算

率领大军南逃，去找萧衍要饭吃。慕容绍宗马上展开心理战，对侯部官兵高喊：“你们的家属都在河北得到了妥善安置，你们想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吗？你们如果反正，照旧任用！”侯景部下一下子呼啦啦几乎全走光了。侯景仓皇渡过淮河南逃。羊鸦仁闻讯，也放弃悬瓠南撤。

至此，侯景信誓旦旦许诺给萧衍的河南十三州土地一分一毫都不见了踪影，相反萧衍还搭上了几万将士、将国家和东魏推上了战场。

三

侯景逃到淮河南岸后，身边只有八百名残兵败将，身无分文，后有追兵，前途茫然，可谓落魄至极，也危险至极。

就在侯景紧张徘徊之时，和南豫州（寿阳）监州事韦黯一向不和的马头（在寿阳西北）戍主刘神茂主动找上门来。他建议侯景袭取寿阳，作为立脚点。侯景明知这是借刀杀人的技法，可他是个冒险家，永远相信风险与机遇并存。于是，侯景带着残部直奔寿阳城下，要求韦黯开门接待。韦黯开始不想接纳侯景，侯景就拿萧衍封给自己的一系列官爵吓唬他，逼着韦黯打开城门。侯景一进城，立即反客为主，占领了寿阳。

尽管有了立足点，侯景内心的恐慌却丝毫没有减少。他不知道东魏和南梁的最高统治层将会如何处置自己，自己会不会成为双方幕后交易的一个棋子呢？虽然萧衍看起来比较慈祥、比较好说话，但如今自己的势力还会对他有吸引力吗？摆在眼前的袭占寿阳的举动，又怎么解释呢？思前想后，侯景向萧衍上了一封“请罪表”，说自己丧地败师，请求处分。

表到朝廷，有大臣认为侯景已经露出跋扈的端倪，建议及早处理。但是萧衍却挥挥手，认为惩处侯景有违慈祥为怀的佛教教义，同

时也会断绝北方将领归降的后路，因此非但没有一点处罚的意思，还将侯景好好安慰了一番，并且任命侯景做南豫州牧，镇守寿阳。

侯景心中一块大石头咣当落地，在寿阳安心修整起来。他算是彻底看清萧衍懦弱、愚蠢的本性了。侯景之前的人生都在刀尖上舔血，冒险因子始终流淌在他的血液中。既然难以攻破河北的高澄，是否可以将刀子转向江南的萧衍呢？

北方的高澄也还惦记着侯景。侯景虽然被赶到南方去了，可依然盘踞在边界，是个潜在的威胁。好在经过之前的战争，南北形势对高澄非常有利，他可以挟得胜之威，通过谈判获得更多的好处。高澄就让被俘的萧渊明写信给叔叔萧衍，建议双方和谈。萧衍收到侄子来信，边看边哭，看完立即同意讲和，回信送给东魏。信使是个糊涂人，竟然选择从寿阳过界，被侯景抓了个正着。侯景很快盘问出了全部详情，大惊，立刻上奏萧衍，反对议和。侯景说：“高澄刚打了胜仗，就急于求和，背后肯定有隐情。他是担心西魏乘虚进攻。现在，东魏力量在持续衰弱，我们没必要与他通好。”萧衍救侄子要紧，对侯景的奏折没有回复。相反，他又派出正式使者去东魏吊唁高欢。侯景更急了，把底牌亮给了萧衍看：“臣与高氏，势不两立。如今陛下与高氏通好，将置臣于何地？”侯景担心自己被萧衍给卖了。萧衍给他回信说，我对你侯景不放弃、不抛弃，请侯景放心。侯景哪能就这么放心了！他是在欺骗和厮杀中一路走过来的，怎么会相信萧衍的一句话？

侯景伪造了一封高澄的来信，要求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试探萧衍。萧衍不辨真假，欣然接受交换条件，还给高澄写了一封回信，说“贞阳（萧渊明封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侯景拿到了回信，恶狠狠地说：“我早就料到萧老头的心肠薄得很！”他下定决心要造萧衍的反了。

寿阳城里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军。侯景仅有的八百人，显然不够造反使用。他就在城内外强拉青壮年来当兵，又强抢民间女子许配给将

士。侯景败退寿阳后，萧衍就向他提供后勤补给。如今，侯景狮子大张口，向萧衍要大量的军需物资，以备扩军备战。比如侯景向朝廷申请一万匹锦，说要做军袍用。朱异如数发给，只是用青布代替锦而已。侯景又借口武器粗劣且损坏严重，申请派遣建康城的能工巧匠到寿阳直接锻造，朝廷也不拒绝。其实，只要稍微想想，侯景部下的八百人，哪里需要那么多的布匹，哪里需要专门设点造兵器啊？在政治上，侯景也开始寻找同盟者。他知道萧正德对伯父不满，一直对差点到手的太子宝座耿耿于怀。于是，侯景秘密与萧正德联系，表示愿意拥戴他做皇帝。萧正德利令智昏，以为侯景当真拥戴他，高兴地和侯景结盟，准备大干一场。狂风暴雨即将席卷平静了半个世纪的江南。

三九 侯景之乱II：不是侯景太厉害，而是南梁太窝囊

—

侯景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引起了很多地方官员的警觉。警报接二连三地传到建康。

合州（今合肥）刺史、鄱阳王萧范多次密报侯景将反，萧衍不相信。

将军羊鸦仁从悬瓠撤退后，受到朝廷训斥（相反，一起败退的侯景却没有受到斥责）。他不敢返回朝廷，带兵留屯淮河一带。侯景在南方举目无亲，曾和羊鸦仁一起在河南打过仗，还算是有交情，就约他一起造反。羊鸦仁立即把侯景派来的人和拿来的信押解到建康，向萧衍告发。侯景谋反证据确凿，朱异却秉承萧衍的意思，还说：“侯景只有区区几百残兵，能干什么！”萧衍于是将侯景的使者送回寿阳，对此不闻不问。侯景反咬一口，说羊鸦仁诬告，要求杀羊鸦仁。同时，侯景要求扩大辖区，不然就要率兵临江，自己找地盘去。侯景一个败将，如此嚣张，公然要挟朝廷，萧衍却还对侯景的使者说：“譬如寻常穷人家，有三个五个客人，还相处得好。朕只有一个客人，惹得他生气，这是朕的过失。”他以一贯的慈悲胸怀，没有杀羊鸦仁，没有同意侯景移防的要求，当然也没有斥责侯景，而是对他厚加赏赐。萧衍希

望这件事情能够“和稀泥”，不了了之。可见我们的“佛门天子”愚蠢到了可怕的程度。

八月初十，侯景准备就绪，正式在寿阳宣布造反。他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以讨伐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号召大家支持自己。侯景要讨伐的这几个人不是贪污成性，就是苛刻出名，民怨很大。侯景这么做，还真能蒙蔽不少人。不过萧衍知道侯景造反后，满不在乎地说：“侯景有几个兵，能成什么事？我随便拿根棍子就能揍他。”他任命六子、邵陵王萧纶为大都督，率领四路大军包抄寿阳，讨伐侯景。

梁军占有绝对的兵力优势，且是在内线作战，只要萧纶正常发挥，就应该能歼灭侯景。萧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不慌不忙地集合军队、渡过长江，慢慢向寿阳进军，没有采取其他任何措施。

侯景的谋士王伟替侯景分析道：敌强我弱，兵力过分悬殊，侯景不能和萧纶正面作战，固守寿阳也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获胜，就要冒险，出奇招。王伟建议侯景放弃寿阳，倾尽全力，直取建康。放弃根据地，长途奔袭，其中只要出现任何一点差错，全军都可能变为任人宰割的散兵游勇，这是个正常人都要犹豫再三的险招。然而，侯景迅速采纳，并在九月二十五日以打猎为名，率军出了寿阳城。侯景进军神速，八天后占领谯州（今安徽滁州），再半个月后占领历阳（今和县），很快饮马长江北岸。而萧纶还在慢腾腾地向寿阳进军呢！

侯景之所以能够如入无人之境，除了萧纶的无能外，还有几十年的和平几乎消磨了南梁上自封疆大将，下到普通军民的警惕性和战斗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他们完全蒙住了。

历阳失守传到建康，萧衍这才开始认真筹划用兵方略。大将羊侃当时在建康担任尚书。萧衍向他咨询，羊侃认为要立即派兵扼守长江南岸重要渡口采石，阻止侯景渡江，同时严令萧纶迅速攻占寿阳（其

实，高澄已经乘虚而入占领了寿阳），然后南北夹击侯景，到时候侯景前有长江天险阻隔，后无退路，必败无疑。朱异却认为侯景绝对不会渡河。萧衍再次调兵遣将，派侄子萧正德负责前线军事，又派名将陈庆之的儿子陈昕去镇守采石。

现在该萧正德这个内奸上场发挥了。他一上任就调集几十只大船，准备接应侯景渡江。紧要关头，采石的调防又出现了纰漏。将军王质原本率兵三千扼守采石，接到调令后不等陈昕到达就带兵撤走了。在采石没有军队防守，又有萧正德派船前来接应的情况下，侯景的军队从容渡江，越过采石向江南深处发展。这时，侯景的部队才发展到八千人，只有几百匹马。

叛军兵临城下，建康城中的多数军民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和动乱，人心惶惶。城外百姓纷纷逃进城内，秩序大乱。萧衍授权太子萧纲全权负责御敌，同时依靠羊侃参谋军事。

萧纲和羊侃任用萧正德、庾信等人参与城防，其中前者守卫建康南边的正门宣阳门，后者守卫朱雀桥要害。结果，萧正德看到侯景军队来到，打开城门，亲自出城迎接。侯景和萧正德两人在马上相互作揖寒暄，怎么看都像是朋友重逢，不像是敌人。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是当时的文坛宗师，率领三千从来没有打过战的军队阻挡在侯景面前。此外，还有一条秦淮河奔流在两军中间。大敌当前，庾信还在津津有味地啃甘蔗，突然对岸射来一阵乱箭，有一支正中庾信身旁的门柱，庾信惊得扔掉甘蔗，扭头就逃。三千部下随之一哄而散。侯景轻松迈过秦淮河，顺利占领了建康外城。（庾信后来逃到了北方，被北方捧为文学大师，从而官运亨通，还创作了《哀江南赋》等大批作品。）

经过几代王朝的建设，当时的建康城规模宏大，城内有城，形成了台城（官衙和皇宫所在地）、东宫（太子居所）和石头城（要塞）三座内城。侯景大军迅速占领东宫，杀向台城。防守石头城的是萧纲

的儿子萧大春。萧大春见外城失陷、台城危急，弃军逃往京口去了。石头城驻军便投降了侯景。至此，台城被包围得严严实实的。好在羊侃临危不惧，诈称接到飞箭射来的信件，说萧纶率领大军回援，即将到达。台城里这才人心稍定。

这时距离侯景在寿阳起兵，只有两个半月时间。

二

台城攻防战开始。白天，侯景指挥将士猛攻台城。东宫紧挨台城，叛军爬上屋顶，朝城里射箭。夜晚，侯景就在东宫里饮酒作乐。他把东宫几百名歌舞奏乐的女子都分给军士奸淫取乐。叛军还放火烧毁了建康的几处宫署，东宫极为丰富的藏书也被付之一炬。很快，战火就将建康城破坏得瓦砾累累。

叛军火攻台城大门。羊侃下令在大门上方凿洞，从洞里往外倒水灭火。叛军又用大斧劈门，一扇门眼看就要被劈开了。羊侃就从门的裂缝中伸出长矛刺杀，连杀了两名敌兵，逼得叛军不敢再劈门。侯景造了几百只一丈多长、有六条腿的木头架子，在上面蒙上浸湿的牛皮，下面藏六名军士，称之为“木驴”。叛军在木驴的掩护下破坏城墙。羊侃下命向城墙根投掷石块，把木驴砸得粉碎，杀伤里面的士兵。侯景就改造了一些尖顶、石块打不坏的木驴。羊侃就下令火攻，在火把、箭镞上浇上油、涂上蜡，点火抛下去、射下来，将木驴烧毁。侯景又造了十多丈高的登城楼，推进城墙，以便叛军在楼上向城内射箭。台城守军看见庞然大物般的车子逼近，不知如何是好，恐惧莫名。羊侃却成竹在胸，说这些车子既高大又沉重，而台城四周的壕沟土质疏松，车子到了城边一定会倒。果然，臃肿的登城楼推到壕沟附近，纷纷因重心不稳就自己倒掉了。

十一月初，侯景改用原始的办法，在台城东西两面堆土山，打算

将土山堆得和台城城墙一般高，从山上攻进城去。叛军驱赶大批居民运土筑山，谁手脚慢一点劈头就打，谁跌倒了就被埋进土地，当做山体的一部分。建康城里一片号哭之声。城内唯一的办法，就是迎着叛军筑山的方向，也筑造土山，正面将叛军压制下去。城里太子、亲王以下的人都背土夯土，又在土山上筑楼，又招募了两千敢死勇士，披上铠甲，登山作战。不幸的是，突然天降大雨，台城里的土山坍了。叛军趁机进逼，羊侃下令大家把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木材、衣服等等，都点上火，抛掷出去，构成一阵火焰攻势，硬生生地把叛军打退了。同时，羊侃带人在坍塌处赶筑了一道城墙。台城这才转危为安。

侯景猛攻多日，没有丝毫进展，反而死伤了不少将士。他改变战术，改攻为困，在台城四周筑起营垒，隔断内外联络，准备打持久战。

同时，侯景也不放松心理战、政治战。他向城里射赏格，宣称只要杀了朱异等人他便退兵。台城里也射赏格出去，“有能献侯景首级的，即授侯景所任官职，并赏钱一万万、布绢各一万匹。”侯景把羊侃的儿子押到城下，逼羊侃投降。羊侃不为所动，说：“尽管把他杀掉好了！”侯景不放弃，几天后又押羊侃的儿子到阵前。羊侃拿起弓就射儿子，还说：“我以为你早已死了，怎么还在！”侯景知道感情要挟对羊侃没用，之后不再用这招了，还把羊侃的儿子给放了。

在政治战上，侯景却有很大的收获。十一月初一，他拥戴萧正德即位做皇帝，自己做了丞相。之前，江南的世族大家和达官显贵奴役大批奴婢、下人。南梁社会长期稳定，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也非常固定，奴仆们的待遇很低，普遍怨恨主人。侯景就宣布，凡是家奴投降者，一律解除家奴的身份。于是，建康附近的奴仆们纷纷投靠侯景，加入叛军，人数有数千之多。这批人超过了侯景最初的八百残兵，成为叛军的核心战斗力。侯景挑选了一名朱异的家奴，任命他为仪同三司，让他跨骏马、穿锦袍，到台城下骂朱异：“你做了三十年官，才是个中领军，我刚跟侯王，就已经做到仪同了。”这话对台城内王公大臣

们的家奴吸引力很大。有上千家奴逃出台城，加入了叛军。侯景对这些翻身奴仆都厚加赏赐和重用。

如此攻防了一个月，战局停滞了下来。侯景担心南梁援军云集，又因为军需粮草告罄，不得不下令抢劫民间粮食和金帛、人口，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叛军公然抢劫，开始对江南富庶之地造成惨痛的破坏。

三

困守台城的君臣官兵，把希望都寄托在“勤王”的援兵上了。

侯景的叛军都集中在台城附近，其他地区还在梁朝官府统治之下。只要有几个人出兵救援台城，就不怕侯景不灭。

最先到达建康的援军是原本计划进攻寿阳的邵陵王萧纶的部队。他慢腾腾地走到半途，后方传来警报，说侯景已经渡过长江了。萧纶慌起来，下令后队改前队、前队改后队，日夜赶奔建康而去。这支政府军的军事素质实在太差，不仅行军速度太慢，而且中途迷了路，直到十一月底才赶到建康城东的蒋山。这时，台城都已经被围攻了一个月了。萧纶的到来，让侯景很害怕。萧纶的部队毕竟人多势众，而且是南梁的主力军。侯景把抢来的妇女、珍宝都聚拢到石头城，并备好船只，做好战败逃跑的准备了。结果两军交锋，侯景发现自己实在是太高估萧纶军队的战斗力了。几个回合打下来，萧纶大败，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他只好东撤，远远看着建康，就是不敢近前。

比萧纶晚几天，宗室萧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等人也率领援军到达。他们不敢与侯景交战，在长江江面上的蔡洲驻扎，等待更多的援军到来。

台城内的情况在恶化。羊侃、朱异相继死去。朱异的死倒没什么，但是羊侃的去世，使得城内失去了抵抗的核心。城中弥漫起紧张气氛来。侯景则抓紧援军云集前的短暂平静，日夜赶造攻城器械，企图尽快攻下台城。从十二月中旬开始，叛军连续猛攻台城十多天。幸运的是，城中一名下级军官吴景精通城墙攻防之术，指挥军民抵抗，保全了台城。但是，城内有军官叛逃侯景，教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台城（台城在玄武湖南）。侯景照做，水漫台城，积水逐渐加深，城内军民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当时天下最有能力救援台城的是镇守重镇荆州的萧衍七子、湘东王萧绎。萧衍非常疼爱这个儿子。萧绎小时患了眼病，萧衍亲自指挥治疗，不慎治瞎了儿子的一只眼睛。萧衍愧疚在心，后来又做梦梦见一个独眼菩萨说要投胎帝王之家，他就认为萧绎是菩萨投胎，对他倍加疼爱。萧衍将仅次于扬州的荆州托付给了萧绎，让萧绎坐镇建康的上游，是寄予厚望的。但是，萧绎听说建康失陷、台城危急后，首先想到的是父皇和太子哥哥都危在旦夕。万一他俩同时“归天”了，萧绎我不就能够“高升”一步了吗？所以，萧绎对救援一事很不热心。直到十二月中旬，台城被围将近两个月后，才派儿子萧方等从公安（今湖北公安北）出发，顺江而下。他拨出来的援兵，只有一万人。

尽管如此，外地勤王军队还是陆续到达秦淮河畔。分别有衡州刺史韦粲率领的本部五千兵马；江州刺史萧大心（萧纲的儿子）派将军柳昕率领的两千兵马；司州刺史柳仲礼（韦粲的表弟）率领的步骑一万多人；从淮河南下救援的羊鸦仁率领的三万人。此外会合已经徘徊在建康周边的萧嗣、裴之高等人，到当年的除夕夜，各地勤王的军队已经超过了十万人，远远胜过侯景的一万叛军。大家推举柳仲礼做大都督，推进到秦淮河南岸。

太清三年（549年）正月初一，勤王军队和侯景叛军在建康郊区的青塘激战。

勤王军队中最积极的韦粲的部队受大雾影响，在行军途中迷路，在大雾中手忙脚乱地搭建营栅准备固守。侯景瞅准时机，率军猛扑杀入韦粲大营。韦粲英勇迎战，与儿子、三个兄弟、一个堂弟都力战而死。柳仲礼得报，赶往增援，缠住侯景死战。柳仲礼是员勇将，部队又人多势众，斩杀了数百名叛军。叛军多数是强拉来的民夫和解放了的奴仆，缺乏训练，稍遇挫折就向后逃窜，又被挤入秦淮河中淹死了一千多人。战场形势开始对侯景不利。柳仲礼和侯景单挑，长矛几乎刺中侯景，不幸在大雾中缺乏防备，被敌将从背后偷袭，肩部中了一刀。他在部将的护送下，仓皇逃离战场。这一战，两军打了一个平手。侯景不敢再渡秦淮河，勤王援军也不敢渡过河去，双方就隔河对峙。

之前被侯景大败东撤的邵陵王萧纶收拾残部，在京口会合东部各军，也赶到了秦淮河南岸。这时，萧方等、王僧辩率领的荆州兵，还有远从高州（今广东阳江）赶来的援军也先后赶到。援军的声势再次高涨起来。为了让台城知道援军云集的消息，萧嗣的部下李朗用苦肉计，故意违抗军令挨了一顿鞭子，然后投奔侯景，麻痹叛军后跑入台城。城里知道援军源源而来，人心大振。形势变得对梁朝君臣有利。

但是各路援军缺乏统一指挥，大都督柳仲礼为人粗暴，傲慢无礼，不能服众。更严重的是，散布各处的梁朝宗室诸位王、公、侯爷，各怀鬼胎，互相猜忌，不仅不能合作，更没人出来说话。因此，建康城外的援军虽多，却是各自为政，眼看着台城被围，就是无人上前。多路援军的军纪恶劣，只顾在秦淮河畔掳掠，反而失去了民心。台城遭围近百天，情形越发糟糕。战争爆发时，台城有意识地囤积粮食，积累了四十万斛粮米，但是没有储备燃料、草料以及鱼盐等物资。人光吃大米也不行，于是军民们就开始捉老鼠、麻雀，杀马，甚至煮皮革吃。据说，连佞佛的萧衍也不得不吃起了鸡蛋。城中军民死亡了十之八九，尸横盈路，惨不忍睹。

叛军的日子也不好过，侯景也缺粮。他包围着台城，勤王援军又

包围着他。侯景原本依靠建康城东的存粮支撑，如今被援军断了路，无法运来。侯景听到荆州兵赶到，心里也发憊。进退不得之时，谋士王伟建议侯景“诈和”，假意求和，抓紧把东城的粮食运进石头城，抓紧休整兵马，等对方懈怠后，再一举击破。侯景又一次欣然采纳，派人向台城求和。

萧衍见侯景议和，大怒：“和不如死！”太子萧纲苦苦哀求父皇允许议和。他眼看着台城将要要不保，自己的太子地位就要动摇了；而如果能保住台城，稳定一下局面，自己还是太子，还有机会当皇帝。于是，萧纲力主议和。萧衍犹豫再三，对萧纲说：“你要和，就你去办吧，只是不要为千载之后的人所笑！”大臣傅岐反对议和，指出这是侯景的缓兵之计。但是萧纲固执己见，派人与侯景和谈。二月中旬，双方在台城外会盟。和谈达成，建康城内外平静了下来。

但是，侯景借口种种理由，一会是部队要休整，一会是朝廷某些大臣对他不友好，要求撤换，就是不肯渡江北撤，继续包围着台城。他督率部下抓紧抢运粮食，明显是用心险恶。即便如此，原先就不是真心勤王的各路诸侯纷纷懈怠下来。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湘东王萧绎已经集合荆州主力部队，在长江中游驻扎了一个多月，别有用心地等待着台城的消息。愚蠢的萧衍、萧纲父子还发文各地，说和谈成功。萧绎闻讯，准备返回江陵。侯景的叛军喘息已定，又见各路援军纷纷懈怠，立即翻脸突袭台城。三月十二日夜，叛军在城中叛将的接应下，攻破台城。

永安侯萧确抵敌不住，跑进宫里向萧衍报告：“台城失守。”萧衍躺在床上，问：“还能不能打？”萧确回答：“无力再战了。”萧衍长叹一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确，南梁是萧衍打下来的，也即将灭亡。萧衍能在王朝命悬一线的时候，认识到“自我失之”，还算有自知之明，多多少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过他的“亦复何恨”就是自欺欺人的话了。即便治理了将近五十年天下的萧衍对江山没有留恋，并不在乎，江南的百姓也已经陷入了战火煎熬之中，富

庶的经济也惨遭破坏，怎么能说“亦复何恨”呢？这是萧衍不负责任的自我安慰罢了。

侯景以区区八百残兵，一路横扫江南，终于在五个月内攻破了南梁。

四〇 侯景之乱III：权力大过亲情

—

攻入台城的当天，侯景带着五百甲士去见萧衍。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几十年的帝王生涯让萧衍塑造了很强的气场，侯景从底层一路厮杀过来，还真没看见过萧衍这样的人。萧衍虽然成了俘虏，却不慌不忙地问侯景：“你是哪里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竟然害怕得汗流满面，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一旁的部将任约替他说：“臣侯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问：“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收拾情绪，回答：“千人。”萧衍又问：“攻城时多少？”“十万。”萧衍再问：“现在有多少兵马？”侯景顿时胆壮起来：“率土之内，莫非己有。”萧衍毕竟是输了，在这个话题上说不过侯景。但他依然正色告诉侯景：“如果你忠于朝廷，就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答应了。

别过萧衍，侯景告诉身边的亲信，自己征战疆场多年，从没有胆怯过，不知道为什么见到萧衍竟然感到害怕，莫非真的有“天子威严”存在吗？害怕归害怕，它一点都不妨碍侯景的叛军在台城大肆抢劫，将皇宫抢得精光。

侯景又用萧衍的诏书，命令各地援军解散。

有人建议邵陵王萧纶突袭侯景，出其不意，很可能歼灭叛军。萧纶不听。各路援军的大都督柳仲礼接受诏书，准备解散各军。他的父亲柳津一直被围困在台城里。之前，柳津登城向儿子高喊：“你的君父遭难，你不能竭力，后人将把你当成何等样人！”柳仲礼自从受伤后，就丧失了战斗的勇气，对父亲的高喊无动于衷。萧衍曾询问柳津退敌之计，老人家伤心地说：“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如何能够平贼！”在柳仲礼、萧纶等人带头下，建康周边各路援军纷纷撤回。之前，湘东王萧绎命王琳运输大米二十万石支援建康，船到姑孰（今安徽当涂），听到台城失陷，王琳将大米沉入长江，空船返回荆州。可见萧绎不是真心要救援父皇的。遗憾的是，怀有这样心思的宗室成员不止一人。

侯景把梁武帝萧衍攥在手里，不知道如何处置，暂时还尊奉他为皇帝。之前被侯景拥戴为皇帝的萧正德，就得不到所有人的承认了。侯景把他拉下龙椅来，让他做了侍中、大司马。萧正德这才明白自己只是侯景的一个棋子，大呼上当，写密信给萧范，约他起兵进攻侯景。结果密信被侯景缉获，萧正德被杀。永安侯萧确坚定反对侯景，之前战斗英勇，反而受到了侯景的赏识，被留在侯景身边。一次出猎的时候，萧确趁侯景身边没人，搭弓就要射杀他。不想，弦断了，侯景发觉后，当场杀死了萧确。

侯景派兵日夜看管着萧衍。萧衍看到有许多武士佩戴兵器，在皇宫中大规模地进进出出，就问身边侍从怎么回事。侍从回答：“这是侯丞相派来的卫兵。”萧衍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后，生气了，把萧衍监管得更严，还断绝了萧衍的饮食。萧衍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之前三个多月天天担惊受怕的，如今又没吃没喝，很快就忧愤成疾，病重了。五月的一天，萧衍在昏迷中醒来，觉得口中发苦，就喊人送蜜水上来。喊了两声都没有人回答，萧衍环顾偌大的宫殿，只有他孤零零一人，不禁悲从心来，发出“喝、喝”的声音，去世了。五月二十六日，侯景拥戴太子萧纲即位。萧纲就是简文帝。

占领建康后，侯景迫切需要扩大地盘，保障充裕的后勤。他自然把目光投向了东南富庶的三吴之地。三吴，指的是现在苏南和浙北地区的吴郡（在今苏州）、吴兴郡（在今湖州）、会稽郡（在今绍兴），该地区自然优越、人烟密集，又是南方世族大家的根据地。从东晋以来，除刘宋泰始二年（466年）三吴曾遭受战火外，将近一百年没有发生过战事，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侯景派遣部将董绍进攻广陵、于子悦进攻吴郡。他们都只带上了几百名乌合之众，说是行军，不如说是抢粮更为合适。三吴地区的每座城池的守军都比敌人要多，且城坚粮足，如果有心一战，完全可以御敌于家门之外。但是，到当年年底，三吴完全被叛军占领。这要归因为统治三吴地区的世族大家们羸弱不堪，根本不能应战，他们不是坐等叛军来抄家灭门，就是开门投降，最后还是落得个身首异地的下场。至此，侯景占领了以建康为核心、以三吴为后方的大片地盘。

侯景的统治极为残暴。他公然提倡烧杀掳掠，告诫众将攻破敌军营垒后要屠城，让天下都知道自己的威名。他在石头城立了一座大碓，抓了反对他的人就放在碓里舂死。侯景还禁止人们低声说话，违反的要株连三族。种种表现，都很像是一个压抑了很久的底层人物，骤然暴发后的变态反应。富庶的三吴地区惨遭破坏，叛军烧杀劫掠，四处抓人，把很多人当做奴隶贩卖到北方去。侯景败逃寿阳的时候，曾上奏萧衍，要求与王、谢等世族大家通婚。萧衍为难地说：“王谢门第太高，你考虑考虑朱张以下的门第吧。”侯景哪里受得了如此重的门第观念，怒道：“总有一天，我要吴中儿女配给奴隶！”如今，他果然报复性地屠戮三吴的世族大家，抄家灭门都不罕见。王谢等头等门第的大家族，元气大伤，很快凋零。整个三吴地区都变为了野狼横行于乡间、废墟中躺着枯骨的地狱。

简文帝萧纲虽然如愿当上了皇帝，却是侯景的傀儡。侯景对他看管极严，除了几个特定的人，不让他见其他任何人。大宝元年（550年）十一月，南康王萧会理等乘侯景不在建康之机，密谋起兵，先杀侯景的军师王伟，再占领京师。不幸，保密工作又没做好，被侯景发觉了。参与者都被杀。之前能够接近萧纲的少数几个人，为了避嫌，也都和萧纲离得远远的。只有武陵侯萧咨还照常去找萧纲请示汇报。侯景果然怀疑萧咨也在搞阴谋，把萧咨暗杀了。从此，除了侯景和个别宫人，再也没人敢接近萧纲。萧纲几乎与世隔绝了。

有能力与侯景相抗衡的是盘踞在长江中上游的几位宗室亲王。从东往西分别是这么几位：萧衍的六子、邵陵王萧纶在台城破后，退兵郢州（今湖北武昌）；往西到江陵是萧衍的七子、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再往西就到了四川，萧衍的八子、武陵王萧纪担任益州刺史，都督现在四川、陕南等地。这三位王爷是亲兄弟。

南边的湖南地区有驻在长沙的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北边的湖北北部有驻在襄阳的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这两位王爷也是亲兄弟，分别是昭明太子萧统的二儿子、三儿子。另外夹在几位王爷之间的现在重庆地区还有一个桂阳王、信州刺史萧慤。他是萧衍的哥哥萧懿的孙子。这后面三位王爷是前三位王爷的侄子。

六位萧姓王爷都拥兵一方，其中以湘东王萧绎力量最强。荆州原本就是仅次于扬州的第二富庶之地，加上萧衍又给萧绎安上了“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的头衔。在名义上，桂阳王、岳阳王、河东王三位侄子都要受萧绎的管辖。萧衍死后，外藩诸王对侯景拥戴的傀儡萧纲并不买账，各行其是，多数人都有心思自立为帝。而骨肉同胞的存在，就是他们登基称帝的最大障碍了。于是，诸位王爷忘却了杀父之仇、抛弃了国破之恨，开始自相残杀。

萧绎动作最早，最凌厉。儿子萧方等撤军回江陵，带来了台城失守的消息。萧绎不组织勤王，只是加强江陵城防，防备侯景进攻。萧

衍死讯传到江陵后，萧绎秘不发丧，既不公开萧衍的死讯，更不承认哥哥萧纲的皇帝身份。他不用萧纲的大宝年号，继续沿用父皇萧衍的太清年号。侄子、信州刺史萧慥也去建康增援，撤军途中经过江陵。有人向萧绎诬告萧慥与岳阳、河东二王勾结，要夺他的地盘。萧绎不辨真假，就把萧慥杀了。

萧绎之前借口勤王，下令下辖的各州出兵出粮。岳阳王萧警就派一名军官领兵前往。萧绎要萧警亲自带兵去，萧警不肯去。而萧警的二哥、湘州刺史萧誉则断然拒绝萧绎征粮征兵，不肯服从萧绎。两人对萧绎言辞不恭，叔侄三人日常关系很不好。建康战事停歇后，萧绎决定先拿萧誉开刀，进军湘州首府长沙。湘州之战打得很艰难，从太清三年（549年）六月到大宝元年（550年）四月打了差不多一年，萧绎还赔上了长子萧方等的性命。情急之下，萧绎急令大将王僧辩火速进攻长沙。王僧辩认为部队没有集合完毕，请求缓期。萧绎急得拿剑砍了王僧辩的左腿，后者顿时昏厥过来，后被人抢救回来。萧绎依然把王僧辩关入大牢，由此可见萧绎这人性情相当暴躁，而且对下严苛。长沙的萧誉向雍州的三弟萧警求救。萧警率众两万攻打江陵，想来个围魏救赵。萧绎窘迫之余，重新请出王僧辩来，请他主持军事。王僧辩最初在北魏政权任职，在萧衍统治前期南逃归附，一直在萧绎身边为官，忠于萧绎。尽管无辜被主公砍了一剑，王僧辩还是为萧绎出谋划策，招降了多名萧警的部将。萧警不战而败，狼狈逃回襄阳。王僧辩又马不停蹄，南下进攻长沙，杀死了萧誉。

二哥死了，萧警就成了萧绎的下一个目标。萧警惶恐不安，向西魏宇文泰求救，自愿做西魏的附庸。宇文泰看到北齐的高氏趁着侯景之乱在淮河流域拔城略地，早就心中痒痒，见有南梁王爷归降，大喜，马上封萧警为梁王，并派大将杨忠（杨坚之父，隋朝建立后追封太祖皇帝）率军进驻襄阳，帮助萧警防守。萧绎派柳仲礼率军进攻襄阳，被杨忠打败。柳仲礼成了俘虏，魏军扩大战果，逼向江陵。萧绎不得不和西魏谈判，割汉江以东以北的土地给西魏，并送一个儿子到

长安做人质。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后，萧绎的北方防线暂时稳定了。

解决三个侄子后，萧绎的下一个目标是从建康东撤、驻兵郢州（今湖北武昌）的邵陵王萧纶。萧绎担心他这位六哥兵马强盛对自己不利，派王僧辩领兵开向郢州，“迎接”萧纶回江陵。萧纶痛心地说：“我志在杀贼，别无他意。七弟疑心我要和他争皇位，处处算计我。我如果和七弟刀兵相见，就是骨肉相残，被千百年后的人嘲笑。”他只能选择率兵向北开拔，越走人马越少，九月走到齐昌（今湖北黄陂）时部下离散得只有几千人。萧纶万般无奈，归降北齐。北齐封萧纶为梁王（又是一个梁王），扶持为傀儡。萧纶北上河南，第二年二月想向西边拓展地盘，在与西魏军队的战斗中被杨忠杀死。

萧绎的八弟、武陵王萧纪在益州很有想法，计划率军出三峡，“过问”一下长江中下游的事情。萧绎给他写信，承诺只要萧纪按兵不动，日后和他“分国而治”，重演三国时期东吴和蜀汉的历史。萧纪同意了，固守四川的地盘。这两个兄弟，都早早地打起了黄袍加身的心思。

至此，湘东王萧绎在长江中游一枝独秀，成了最大的实力派。他在大宝元年（550年）四月发布檄文，下令讨伐侯景。说是讨伐，萧绎却迟迟没有动作，反倒是侯景闻讯抢先逆江而上，向中游动刀子。叛军由任约、于庆率领，分头进军。大宝元年（550年）七月，任约兵临湓城（在今江西九江）。镇守此处的萧纲之子、寻阳王萧大心一触即败，向任约投降；叛军逼近郢州。在南边，于庆则占领了豫章（今江西南昌）。

萧绎派徐文盛东进与任约对峙。在当年年底、来年初，徐文盛和任约打了几仗，连战连捷——侯景军队的战斗力原本就不强。任约频频向建康告急。侯景先是加派宋子仙率兵援助任约，又在大宝二年（551年）留王伟守建康，亲自领兵西上。侯景和徐文盛正面打了一仗，也吃了败仗。

这时候，侯景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胆略显露了出来。他被打败后，并不灰心，而是想出了又一个冒险的计划来。当时，萧绎任命十五岁的儿子萧方诸为郢州刺史，派鲍泉来辅助。这两个人，一个是无知贪玩的少年，一个是懦弱的老官僚，全靠徐文盛在前线抵抗，自己在郢州城里胡作非为，不作戒备。侯景派宋子仙、任约领四百骑兵，绕过前线，走陆路偷袭郢州。四月初三晚，天色昏暗，风雨交加，郢州守兵看看夜幕中有一队人马在奔驰，连忙报告。州府中，萧方诸正在和鲍泉玩游戏。他骑在鲍泉肚皮上，用五色彩线把他的胡子扎成一根根小辫。听到报告，玩得起劲的萧方诸根本没听进去，鲍泉想当然地认为不可能是敌军，很可能是自己人。两人都不当回事，不做任何戒备。结果，四百叛军直冲进郢州，宋子仙一马当先，杀进州衙。萧方诸看到凶神恶煞的宋子仙，屈膝就拜。宋子仙见到床下露出点彩线，喝令士兵搜查，把鲍泉拖了出来。这两人都成了刀下之鬼。郢州被叛军占领。偷袭得手，侯景越过徐文盛军，顺利进入郢州。前线的徐文盛部队丧失斗志，不战而溃。许多家在郢州的官兵投降了侯景。徐文盛逃回江陵。侯景在郢州短暂逗留后，分兵给宋子仙进攻巴陵（今湖南岳阳）、任约进攻江陵，自率主力殿后。叛军水陆并进，气势凶猛。这是侯景的极盛时期。

三

四月十九日，叛军开始进攻巴陵城。宋子仙开始没把巴陵放在眼里，攻打了几回，却发现这是个硬骨头，很难攻克。原来，郢州失守以前萧绎已任命王僧辩为大都督，领兵东征。王僧辩走到巴陵，得知郢州失守，决定扼守巴陵堵击叛军。巴陵告急，萧绎加派胡僧祐、陆法和带兵救援。侯景则亲自率军进攻巴陵，同时命令任约截击胡僧祐率领的援军。一直打到六月，叛军在巴陵城下被拖了一个多月，伤亡超过一半，加上疾病横行，侯景元气大伤。不巧，任约在赤亭（在今湖南南县附近）反被胡僧祐打败，成了俘虏。侯景烧营撤走。

王僧辩乘胜追击，在六月下旬收复郢州，俘虏宋子仙；七月攻克湓城。之前，江西地区的叛军遭遇了从广东方向北上勤王的陈霸先部队的猛攻。梁将侯瑱之前投降侯景，驻扎在豫章，如今宣布反正，配合陈霸先进攻于庆部叛军。于庆在陈霸先和侯瑱的夹击下，节节败退，收缩到长江流域，又遭到了顺江而下的王僧辩的猛攻。于庆狼狽而逃。豫章、寻阳等重镇都被收复。最后，侯景只搜集几千残兵败将，退回建康。

侯景势力衰微，却开始琢磨着代梁称帝，过过当皇帝的瘾。王伟大为赞成，认为侯景称帝可以“示我威权，且绝彼民望”。王伟以为侯景称帝能够收拾人心，其实侯景早已经失去了人心，称帝只能遭致更多的反对。

侯景阵营完全没有认识到危险来临，乱哄哄地开始准备。侯景早就看简文帝萧纲不顺眼了，废他为晋安王，幽禁起来，立豫章王萧栋做新皇帝。萧栋的父亲是昭明太子萧统的长子、豫章王萧欢。萧统去世后，梁武帝萧衍曾经一度想立萧欢为皇太孙，但最后没有实施。萧栋就是萧欢的长子。侯景祸乱建康的时候，萧栋这样的小王爷日子很难过，都沦落到和老婆两个人在庭院里开荒种菜，勉强维持生计的地步了。一天，几个叛军破门而入，架起萧栋就走。萧栋吓得大哭，连连哀求不要杀他。他被拉去见侯景后，侯景挥挥手，萧栋就当上了新皇帝。同时，简文帝的太子萧大器、寻阳王萧大心等宗室二十余人被侯景杀死。侯景又命王伟以祝寿的名义去拜访萧纲。萧纲知道王伟是来要自己性命的，却假装不知情。既然是祝寿，萧纲就拉王伟饮酒，喝得酩酊大醉。王伟用土囊把沉醉的萧纲压死了。

侯景拉萧栋为傀儡皇帝，完全是装点最后的门面。到十一月，只做了四个月皇帝的萧栋被废为淮阴王。侯景粉墨登场，做起了皇帝。之前简文帝萧纲曾封他为汉王，侯景就定国号为“汉”。

汉朝伪政权完全是一场闹剧。侯景大封当初跟随他从河南逃到寿

阳再一路打到江南的老兄弟们为高官。这些人完全不知礼仪，上朝的时候一哄而上，全无章法。王伟可能是其中唯一的明白人，就对侯景说要立礼仪、定制度，尤其是要先建立新王朝的宗庙。王伟让侯景赶紧“立七庙”。侯景不懂，问“七庙”是什么。王伟解释说皇帝必须祭七代祖宗，问侯景七代祖宗的名字。侯景想了好一会儿，说：“我只记得我爸叫侯標，不过他死在朔州了，魂灵不会大老远地跑到江南来享受供品的！”这话引得哄堂大笑。部下有人说侯景的爷爷叫乙羽周，王伟就随手写下“侯周”作为侯景的爷爷，再从两汉、魏晋时期给侯景拉了几个侯姓的名人当祖宗，总算凑足了七个人的数。新王朝的宗庙就算立起来了。

四一 萧警：自己挖坑埋自己

—

侯景一帮人在建康城粉墨登场，萧绎的讨伐大军则已经逼近建康了。

王僧辩和陈霸先会师后，军容强盛，外围叛军望风披靡。讨伐军只在第二年（552年）三月，在姑孰（今安徽当涂）地区遭到了叛军侯子鉴部的抵抗。侯景战前提醒侯子鉴不要和王僧辩水战，争取在陆地固守。王僧辩故意示弱，招惹侯子鉴下水，将叛军一举击溃。三月中旬，讨伐军战船驶入秦淮河，抵达建康城下了。

侯景得到姑孰的败讯后，开始做负隅顽抗的准备。他下令堵塞秦淮河口，又在北岸抢筑城池，准备占领有利地形。不能让秦淮河成为横亘在讨伐军面前的阻碍！于是，陈霸先勇敢地率领本部兵马渡过去，在北岸构筑营垒。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抱团建立了营帐。侯景见势不妙，“御驾亲征”，亲自带领步骑一万多人突击梁军营盘。梁军顽强抵抗，抵挡住了叛军八轮进攻。最后，侯景急红了眼，带着一百多名骑兵赤膊上阵。他们丢掉长矛，只执短刀猛冲陈霸先部队。陈霸先拼死挡住，侯景耗尽锐气，溃退下去。叛军无力再战。石头城的守将见势不妙，开城投降。侯景认为大势已去，又不敢回台城，站在城下把王伟痛骂了一顿，骂他尽给自己出坏主意（客观地说，王伟给侯景出了很多好主意），然后向东逃亡而去。只有一百多骑跟着侯景逃

亡。侯子鉴、王伟等人渡江往京口方向逃亡。

梁军收复建康。王僧辩放纵官兵肆意劫掠。士兵们将宫殿糟蹋成一片废墟，为了掩盖罪行，在夜里放了一把火烧了宫殿。出征时，王僧辩专门向萧绎请示：收复建康后，如何处置侯景扶持的小皇帝萧栋。萧绎回答：“六门之内，自极兵威！”表面意思是要在建康城内宣扬兵威，实际上是让王僧辩杀掉萧栋。杀皇帝这事，弄不好会留下历史骂名，王僧辩不愿意做，明确告诉萧绎：“臣不愿意做成济第二。”成济是当年替司马氏杀死曹髦的将领。王僧辩不肯干，萧绎就把这事交给了愿意干的朱买臣。侯景登基后，萧栋和两个弟弟被监禁，终日担惊受怕。梁军收复建康后，狱吏将萧栋兄弟三人释放了，两个弟弟如释重负：“现在总算可以免于横死了。”萧栋却忧心忡忡：“未必！”果然，朱买臣找到萧栋，请兄弟三人上船喝酒压惊。兄弟三人上了船，就被朱买臣扔进河里溺死了。

侯景部将侯子鉴逃到广陵（今扬州），和守将郭元建一起投降了北齐。北齐占领了广陵，有了窥探江南的据点。王伟则被人抓获，押到建康，再转送江陵，被杀。侯景沿途收拾残兵败将，聚拢了数千人，一个月后被侯瑱率追兵打败。侯景输得只剩一条船、几十个人。他在沪渎（今上海）出海，想逃往北方。

侯景攻克建康后，强占羊侃的女儿做妾，任命羊侃的儿子羊鹕做都督。羊鹕心态很复杂，既想报仇，又想借侯景势力飞黄腾达。他随侍侯景左右，骗取了信任。侯景逃到海上时，羊鹕也在船上。他乘侯景熟睡时，联络了其他卫士，让船家改变航向开回长江。侯景一觉醒来，发现回到了江南，大吃一惊。他正要命船家改变航向，羊鹕拔刀指着侯景说：“今日，要借你的脑袋去换富贵。”羊鹕和其他卫士一起挥刀向侯景砍去。侯景拼命躲过，逃到船舱里。羊鹕提起一根矛赶来，一矛将侯景扎死。几个人切开侯景的肚子，塞进盐防止腐烂，将尸体运到建康。王僧辩下令，砍下侯景的脑袋送到江陵，砍下双手送给北齐，其余部分在建康示众。建康军民恨侯景入骨，顷刻之间就把

尸骨扯得粉碎。

十一月，湘东王萧绎正式在江陵即位，改元承圣。萧绎就是梁元帝。王僧辩因功被封为司徒、侍中、尚书令、永宁郡公，驻建康。陈霸先因功封司空，领扬州刺史，驻京口。萧绎和手下大臣们留恋江陵老根据地，加上建康被战火毁坏严重，朝廷就留驻在了江陵。

不过，当时南方有两个皇帝，除了萧绎，还有他的八弟萧纪。萧纪早一步在成都称帝了。萧纪不知道侯景已死的消息，以讨伐侯景为名，率领四川兵马顺江而下，来和萧绎争夺天下了。三峡口守将陆法和见蜀军声势浩大，向江陵告急。萧绎无将可用，把监狱里的侯景旧将任约、谢答仁放出来，派他们去抵挡萧纪。同时，萧绎不惜以领土为代价，向西魏求救，怂恿西魏进攻四川。宇文泰兴奋地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他派尉迟迥进攻四川。四川空虚，兵无斗志，沿途守将非降即逃，魏军很快就包围了成都。萧纪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他惜财如命，把金银财宝都随身携带，其中有一百箱黄金，每箱都有一百块黄金，每块重达一斤。每次作战前，萧纪都把黄金饼摆在营帐显要位置，说要战后论功行赏，但是从不兑现。官兵们早已和他离心离德，加上大多数人眷顾四川老家，不愿出三峡，逃散得很多。七月中，任约、谢答仁发动进攻，萧纪败得一塌糊涂。萧绎战前下令：对萧纪只要尸体不要活人！梁将樊猛抢先冲到萧纪跟前。萧纪连忙把黄金扔给樊猛，说：“这些金子都给你，放我一条生路吧！”樊猛冷笑道：“杀了你，这些金子照样是我的。”萧纪被杀。

成都被围五十天。萧纪死后，留守成都的萧撝等人投降西魏。四川、陕南等地并入了西魏的版图。侯景之乱至此算是彻底结束了。此时的江南一片萧条，南梁国力大减，勉强维持统治。南北方的边界线步步向长江逼近。北齐占领了淮河到长江的广阔地区；西魏则占领了汉水以北、巴蜀和陕南地区，领土扩大了一倍，成了最大的赢家。

承圣三年（554年）三月，梁元帝萧绎向来访的西魏使臣郑重地提出：第一，我已经称帝，不再对西魏称臣；第二，要求西魏归还梁、益等州和汉水以北等地。萧绎等于推翻了之前和西魏达成的所有协议。也许，他觉得侯景之乱已经结束，南方已经安定，自己有实力和西魏平起平坐了。遗憾的是，宇文泰并不这么认为。萧绎政权的实力并没有随着侯景的覆灭而增强，南梁的防守态势依旧漏洞百出。萧绎的平等要求只是让宇文泰意识到需要另换一个傀儡了。

恰好，襄阳的萧警一再请求宇文泰派军进袭江陵。几年来，萧警完全仰仗魏军的羽翼保护，宇文泰觉得他远比萧绎听话。于是在几个月后，宇文泰派于谨、宇文护和杨忠率军，会合萧警后，向江陵杀去。

萧绎继承了南梁皇室擅长文学的传统，喜欢阅读和写作，尤其喜欢老子，大敌当前还召集大臣们大谈阅读《道德经》的感悟。萧绎既担心魏军来进攻，又自欺欺人，觉得魏军不会来攻打自己。一会，他下令梁军戒备；一会，萧绎又觉得是假情报，解除了戒备；一会，他又派出使者去北方刺探情报；一会，萧绎又轻信大臣的意见，觉得魏军是正常调动。总之，萧绎朝令夕改，梁军无所适从。魏军很顺利地包围了江陵，开始包抄萧绎的后路。而萧绎还在照讲《道德经》，只不过听讲的将领们都满身戎装，穿着盔甲拿着刀枪坐在下面。

江陵即将陷落，有人建议释放江陵监狱中的几千名死囚犯充当兵士，萧绎不准，还下令将死囚悉数杀死。将军谢答仁、朱买臣劝萧绎突围，逃到长江南岸的任约军队。萧绎很留恋江陵，加上身宽体胖，不愿意动。谢答仁愿意保他突围。萧绎踌躇不定，突然想到谢答仁、任约都是侯景的降将，觉得不能信任，决心死守江陵。他只是下令调远在建康的王僧辩军队勤王，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江陵很快就被攻

破了。

城破时，萧绎烧毁了所藏的十四万册图书。他认为自己就败在死读书、读死书上，所以拿图书撒气。这样的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他烧书就完全没有道理了。当时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图书要靠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来保存，十分不容易。加上萧绎的藏书中还有许多孤品善本，他的烧书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浩劫。城破后，魏军又屠杀了聚集在江陵的许多大臣、文人。两相作用，中国文化发展在此刻人为地倒退了一大步。

萧绎投降，于谨不知如何处理是好，就转交给了萧警。萧警将七叔百般侮辱后，最后用土袋子将他活活压死。魏军在江陵立萧警为皇帝，年号大定，划出江陵周围百里之地作为梁朝的领土。魏军以“助防”为名，留驻江陵，表面上是帮助萧警防御，实际上是监视萧警。萧警地位类似西魏的藩王，上疏称臣，奉西魏正朔，连许多国内政策都没有决策权。江陵的南梁政权完全是一个傀儡政权，历史上称之为西梁，或者后梁。

萧警请魏军进攻江陵的本意，是要借助外力找萧绎报仇，同时也希望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部将尹德毅劝说萧警：“魏军贪婪又残忍，南下后肯定会烧杀抢掠，俘虏官民百姓，侵占南方土地。殿下无异于引狼入室。到时候殿下杀人父兄、孤人子弟，百姓都把您当做仇人，谁还会拥护您呢？现在，魏军精锐都在这里，殿下可以借口‘犒师’，召开宴会，请于谨等魏军将领前来赴宴预伏武士，等他们来后一网打尽。成功后，殿下才能真正达到目的。”萧警拒绝了这个建议。如今，萧警的目标应该说都达到了。但是魏军在江陵俘虏了数万名王公百姓，挑选其中强壮的分配给官兵做奴婢，老弱的全部屠杀。最后，江陵城中只剩下三百多户人口给萧警统治。而萧警的老根据地襄阳，则彻底沦为了西魏的领土。萧警追悔莫及。他既恨领土狭小，又看到城池残毁、财政窘迫，更不愿意整日当西魏占领军下的木偶和橡皮图章。萧警终日郁郁寡欢、扼腕叹息，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壮心不已”。

梁元帝萧绎死后，南方一时间陷入了分裂。建康周围在王僧辩、陈霸先二人的实际控制下；长江中游的梁朝势力推举湘州刺史王琳为盟主，不承认萧警政权，并出兵试图收复江陵。萧警在位的主要作为，就是围绕与王琳等人的争斗展开的。王琳的进攻被萧警挫败（自然有魏军的帮助），萧警派大将军王操率兵南下，反倒攻取了几个郡。后来，陈霸先在建康建立了陈朝。王琳等人同样不承认陈霸先政权。为了与陈军作战，王琳向萧警称藩，并请求萧警出兵共同对付陈霸先。萧警同意了，可惜军队还没出发，王琳已经失败。长江中游的南岸地区被陈军占领。因此，后梁的领土自始至终只局限在江陵周围的几个县而已。

萧警在位八载，忧愤成疾，郁郁而终。其子萧岿被扶持为新傀儡，年号天保。

三

萧绎在江陵延续梁朝国脉，令王僧辩镇守建康、陈霸先镇守京口，将长江下游托付给了二人。二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备已经推进到长江北岸的北齐军队。

陈霸先在京口招揽流民，多次应江北百姓的要求渡江进攻，试图收复广陵。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陈霸先的名声越来越好。不少乱世豪杰聚集到陈霸先身边，他的军队也得到了壮大。相比之下，王僧辩就保守得多，一心固守建康，没有向江北和其他方向发展。江陵危急，萧绎命王僧辩西上增援，王僧辩也没有迅速行动。江陵陷落后，王僧辩也不承认萧警政权。当时，萧绎的儿子几乎全部在江陵遇害，只有第九子、晋安王萧方智在外担任江州刺史，躲过了劫难。王僧辩赶紧去寻阳迎接萧方智。第二年（555年）二月，萧方智来到建康，被王

僧辩尊奉为太宰，承制统治天下。之所以没有让萧方智一步到位称帝，是王僧辩不自信和保守的表现，他还在观看天下的局势，想看清楚后再做打算。萧方智年仅13岁，还是个小孩子，建康的一切都由王僧辩做主。

当时，南梁各地方大员各自为政，互不隶属，既有王琳为主的中游藩镇，也有江东地区半独立的各郡。王僧辩虽然占据建康，拥有萧方智，但并不能服众。郢州刺史陆法和以郢州投降了北齐，北齐在江北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对建康形成压迫之势。北齐大军护送被俘已八年之久的萧渊明来到江北，写信给王僧辩，首先对江陵的沦陷表示沉痛哀悼（反正是敌人西魏干的，不关北齐什么事情），然后指出如今南梁内部动荡，需要一个长君主持朝政。因此，北齐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派兵“护送”萧渊明到建康继位，要求王僧辩迎接。萧渊明是萧衍的侄子，在血统上缺乏继位的合法性。但是他背后有北齐大军。齐军在江北攻城略地，扩大优势，刀锋直指建康。王僧辩没有信心与北齐交战，不得不展开外交斡旋。

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王僧辩拥戴萧渊明为新皇帝；萧渊明立萧方智为太子，让王僧辩主持朝政。于是，萧渊明在刀枪的护卫下渡江，到建康登基做了皇帝，以堂侄萧方智为太子。和江陵的萧警政权一样，这也是一个傀儡政权，只是它听命于北齐，只是它由王僧辩继续掌握实权。

王僧辩的所作所为遭到了陈霸先的激烈反对。陈霸先反对接受北齐强加的傀儡萧渊明。王僧辩又以萧渊明的名义任命陈霸先为侍中，降低了后者的官职。于是，建康和京口方向的矛盾开始凸显并且激化。这里要插入内容，重点介绍一下陈霸先这个人。

萧衍即位的第二年，浙江长兴县一户贫寒之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家人给他取了一个很霸道的名字：陈霸先。陈霸先小的时候没怎么好好读书，却读了许多兵书。这样的少年通常头脑灵活，善于钻营，陈

霸先就是这样的人。起初，他在乡间做里司，后来又去了首都建康当油库吏。之后，他成为新喻侯萧映的传令员，得到萧映的赏识。后来萧映去广州做刺史，也就把陈霸先带到了广州，让他担任中直兵参军。陈霸先在岭南平乱有功，先后被提任为西江督护、交州司马兼领武平太守、振远将军、西江督护兼高要太守。他在岭南招募了最初的军队，并降伏了杜僧明、周文育等将领。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之时是在侯景叛乱中。太清二年（549年），广州刺史元景仲接受侯景的招降。陈霸先毅然起兵讨元景仲，推举梁武帝的堂侄萧勃为广州刺史。元景仲兵败自杀。萧勃任命陈霸先监始兴郡（今广东韶关）事。当时台城已经失守，陈霸先在始兴招揽侯安都等豪杰，积极准备出师。不想，萧勃一心偏安岭南，反对陈霸先北伐，还派人联络南康（今江西赣州）豪强蔡路养，阻挠陈霸先越过南岭。陈霸先则派人到江陵向湘东王萧绎表示效忠。大宝元年（550年），陈霸先越过南岭，击败蔡路养的两万军队。在战斗中，蔡路养的内侄萧摩诃，年仅13岁，单骑出战，无人能敌。陈霸先指挥将领恶战，收降萧摩诃，攻克南康。他迅速击破侯景在江西地区的军队，收复豫章。萧绎能得到这么一支生力军的拥戴，大喜过望，任命陈霸先为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陈霸先虽非萧绎的嫡系部队，但之后一直被当做主力用在第一线。大宝二年（551年）七月，陈霸先军队在湓城（今九江）与王僧辩军会师。陈霸先此时有官兵三万、船两千艘、粮五十万石。王僧辩当时缺粮，陈霸先慷慨地和他分享自己的粮草。两人还结拜为异姓兄弟，关系亲密，一起消灭了侯景，一同镇守下游抵御北齐。

王僧辩迫于压力倾向于接受萧渊明时，陈霸先派人到建康反复劝说，王僧辩都不肯听。

当年九月，陈霸先起兵讨伐王僧辩。他采取的是突袭战术，水陆并进，迅速抵达建康城下。将领侯安都选择了一个夜晚登陆，悄悄摸到石头城北。此处的石头城墙体毗邻山地，防备较松，侯安都指挥士

兵搭人墙，把自己抛上去。部下如法炮制，突袭得手。陈霸先则带兵从南门杀入城中。王僧辩正在厅堂办事，听到城破时，敌人已经快杀到跟前了。他和儿子王顓带上几十个人，就地死战，终于抵敌不过，逃上门楼。陈霸先扬言放火烧楼，逼王僧辩父子下楼投降。当夜，王僧辩父子就被绞死了。

陈霸先随即宣布王僧辩罪状，声明除王僧辩父子兄弟外，他人无涉，以此来安定人心。萧渊明非常识趣，马上宣布退位。十月，陈霸先拥戴萧方智即位，改元绍泰。萧方智就是梁敬帝，以陈霸先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司空。陈霸先掌握实权，成了长江下游最大的实力派。

陈霸先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处理，首要的就是如何安抚北齐，毕竟萧渊明是北齐扶持的傀儡。陈霸先让萧渊明担任司徒，通报北齐说王僧辩“阴谋篡位”，所以才被大家推翻；我们已经拥戴新君，仍对齐称臣，“永为藩国”。（北齐要求送回萧渊明，陈霸先正准备将萧渊明送还北齐，但临出发时萧渊明“暴病”而亡。）然而，北齐会相信陈霸先的解释吗，其他地方大员会听从陈霸先吗？

四二 如何看待陈朝的篡国？

南方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陈霸先的梁朝朝廷政令只能传达到建康及其周边地区。北齐占领了淮南，西魏占领了巴蜀和汉水流域；长江中游存在江陵的后梁、湘州的王琳两大政权。其中王琳被中游诸将推为盟主，集结军队，对陈霸先非常不友好。不过最先对陈霸先发动进攻的是江东各郡。

王僧辩的弟弟吴郡太守王僧智得知哥哥的死讯，联合吴兴太守杜龢、义兴太守韦载反抗陈霸先。陈霸先派遣周文育东征，进展很不顺利，在义兴和叛军僵持了起来。陈霸先留下侯安都守建康，亲自领兵去江东镇压叛乱。他劝降了韦载，又击退了王僧智，形势一片大好。不想，真正的危险在后方！陈霸先亲自东征后，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和南豫州刺史任约看到建康空虚，合兵偷袭建康，迅速占领了石头城。侯安都退守台城，向陈霸先告急。

当时，江东还有吴兴郡没有收复。不过，陈霸先顾不上了，昼夜行军，赶回建康。

建康的情况还在恶化。徐嗣徽、任约的叛乱不是单独事件，事先勾结了北齐。北齐早就对陈霸先攻杀王僧辩拥立萧方智不满，对虚弱的江南虎视眈眈，如今得到叛军相助，岂能错失良机？齐军迅速在绍

泰元年（555年）十一月渡江占领姑孰，与石头城的徐嗣徽、任约相呼应。叛军仗着齐军的支持，猛攻台城。陈霸先及时赶到，亲自带兵上阵，打败了叛军。

徐嗣徽、任约大概是怕了陈霸先，留齐军江陵柳达摩守石头城，二人前往采石迎接北齐援军。他们打算联合齐军，再杀回建康。

陈霸先抓住这个难得的空隙，一边组织反攻石头城，一边派遣侯安都偷袭徐嗣徽的老巢秦郡。侯安都一举得手，将在秦郡缴获的战利品，包括徐嗣徽的生活用品，派人送往徐嗣徽。徐嗣徽大为震惊，已经在心理上输了一阵。在建康城中，陈霸先猛攻留守的柳达摩部队，连赢了几场。徐嗣徽、任约引导齐兵一万多人返回建康，增援石头城，被侯安都的水军击败。陈霸先再次猛攻石头城，柳达摩心惊胆战，主动求和。陈霸先虽然赢了几场，但都是战术上的胜利，并没有扭转战场局势。齐军已经登陆江南，又有叛军相助，占据战场优势。因此，陈霸先同意与柳达摩和谈，达成协议：齐军撤出石头城，双方停战；南梁向北齐遣送人质。陈霸先派遣了侄子陈昙朗和梁元帝萧绎的孙子、世子萧方等的长子萧庄两个人渡江北上，作为人质。建康军民屡遭战火，迫切希望和平。陈霸先此举，赢得了建康内外的一片赞扬声。

可是，这只是暂时的休战而已。柳达摩率军撤回后，被高洋处死。在高洋看来，战场优势在自己手里，柳达摩自作主张，放弃了石头城这个重要据点，该杀！不过，高洋也没有立即重启战火，而是利用休战，调兵遣将，以大将萧轨为大都督，会合徐嗣徽、任约等部叛军，准备发起新一轮的猛攻。陈霸先也没闲着，抓紧时间处理江东乱局。幸运的是，侄子陈蒨、大将周文育成功攻杀杜龛，收复吴兴郡，又在第二年初攻破会稽郡，杀死不听命的东扬州刺史张彪。至此，江东地区全部被陈霸先占领，成了他稳固的后方。

北齐的大都督萧轨陆续集合了十万大军，待第二年（太平元年、

556年）春寒刚过，就杀向梁山（今当涂附近长江南岸）。陈霸先派侯安都在此驻军，阻击齐军。期间，陈霸先还亲临前线犒军。相持到五月中旬，齐军舍弃梁山，从芜湖出发，走旱路向建康推进，月底即推进到建康城下。台城城墙下都出现了零星的齐军侦察兵。大战的阴霾再次笼罩建康。陈霸先紧急命令梁山的侯安都等军撤回建康，收缩兵力，准备迎接空前激烈的决战。

到六月，建康被数万齐军合围，梁军逐处应战。齐军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之所以没有发动猛烈的攻城战，主要是因为天气不佳。江南的雨季来了，连日大雨倾盆，平地积水丈余。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显然不适应这样的天气，加上守卫在城墙外的营房里，士兵们日夜站在烂泥里，很多人脚趾都泡烂了。饮食也有问题，北方人很难在大雨瓢泼的环境中生火做饭，就算做出了东西也吃得很艰难。台城里面梁军的情况虽然也不乐观，但比齐军要好多了。毕竟梁军都是南方人，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况且台城中建筑完好，排水设施也齐全，梁军官兵可以避雨休息，一场暴雨，使得实力的天平开始出现倾斜。

六月十一日，天气转晴，意味着决战的时刻来了。陈霸先决定让将士们饱餐一顿。城中缺粮，只剩可怜巴巴的一点麦饭。怎么办？总不能让将士们饿着肚子决战。幸而陈霸先从江东运往建康的二千斛米、一千只鸭及时到达。陈霸先大喜，把大米和鸭子都给煮了，又割了许多荷叶，每张荷叶里裹上满满的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发给每位将士饱餐一顿。梁军官兵士气大振。第二天拂晓，陈霸先赤膊上阵，带领官兵们向齐军发动全面反击。小将萧摩诃隶属侯安都麾下，侯安都激他说：“卿骁勇有名，但是千闻不如一见……”萧摩诃不等他说完，朗声说道：“今日让明公一见！”梁军以空前的勇猛，杀向齐军营寨。又累又病的齐军硬着头皮迎战。激战中，侯安都落马，萧摩诃大喝冲杀过去，救下侯安都。侯安都脱险后，率部绕到敌后包抄齐军。齐军官兵前后受敌，四散溃逃。陈霸先指挥大军大举追击，齐军死伤惨重。数以万计的败军蜂拥到江边，可怜后有追兵、前有天堑，

争相逃命，船少人多，因为互相践踏而死或者被江水吞噬的人不计其数。造反的徐嗣徽及其兄弟徐嗣宗被俘，包括大都督萧轨在内的四十六名齐军将领也成了俘虏，只有任约等少数将领侥幸逃脱。逃到长江北岸，清点人数，十万北齐大军只剩下两三万人。齐军伤了元气，丧失了南侵的实力。陈霸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高洋希望赎回俘虏，陈霸先不同意，将被俘的萧轨、徐嗣徽等人斩首号令。十三日，梁军又烧毁齐军遗留的舰船，烈焰冲天。之前的几十年，南梁官民屡次遭北方欺负，只有挨打的份儿，太需要如此辉煌的胜利来振奋人心了。陈霸先威望大涨，高洋 恼羞成怒，杀害了充当人质的陈昱朗。

二

南梁最大的危险解除了，原先的内部结构就需要相应调整了。

在此过程中，陈霸先发挥了主要作用，整个朝廷政令覆盖地区都是他用长矛和鲜血重新打拼下来的。萧方智则更多是起到与北方入侵者抵抗时证明南方政权存在的象征性意义。陈霸先在起兵早期地位低微，需要扶持一个皇室成员号召南方军民与外敌作战。但是现在，陈霸先觉得没有必要保持一位虚君了，他是亲自打江山，也要亲自坐江山。于是，陈霸先选择了禅让这一通行的做法。

太平二年（557年）十月，陈霸先晋爵为陈王，以扬州的会稽、临海、永嘉、建安，南徐州的晋陵、信义，江州的寻阳、豫章、安成、庐陵等20个郡建立陈国。萧方智允许陈王陪12旒王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三天后，萧方智就禅位于陈。陈霸先没有做什么退让，就大方地接受了。大臣们也免去了反复敦请的手续烦恼。陈霸先创下了封王之后三天就受禅为帝的纪录。新王朝国号“陈”，继续定都建康。陈霸先就是陈武

帝。中国历史上朝代名和皇帝的姓氏重合的，仅此一家。

陈霸先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在江阴郡建国，全食一郡，行梁正朔，车旗服色，一如既往逊帝的待遇。也和往常一样，陈霸先没有让萧方智继续存活多久。558年，陈霸先派亲信刘师知去杀萧方智。萧方智躲避士兵的屠杀，绕床而跑。他边跑边哭喊：“我本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要我即位，现在又要杀我，这是为什么啊？”这位16岁的逊帝最后还是被士兵们乱刀砍死。陈霸先的行事没有丝毫的掩盖，倒也显得干脆利落。萧方智死后，被迫谥为“梁敬帝”。萧季卿袭爵江阴王。江阴国传国至陈末。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研究君权的禅代问题。他的一个观察角度就是从政治道德上分析开国君主的人格品性。对于陈霸先，王夫之认为他的政治道德要高于魏、晋、齐、梁等朝开国君主：“陈高非忠于萧氏，而保中国之遗民，延数十年以待隋之一统，则功亦伟矣哉！”我们不能排除当时陈霸先完全没有私心，但他以敢死之心，东征西讨，客观上使南方免于战火。他的征战基本上是符合南方百姓的愿望的。陈霸先虽然篡夺了梁朝，但是梁朝的最后阶段完全是陈霸先自己打拼出来的。他的处境就类似于曹操，天下明明是我的天下，却要树原先主人的旗号。陈霸先与曹操不同的是，他扯下了这面旗帜，自己光明正大地做起了皇帝。从这一点上来说，陈霸先可谓是南朝各代开国君主中最伟岸正大的。

之前的几朝，开国皇帝篡位后，都可以安心地享受皇帝的尊荣、从容施政。但是，陈霸先当了皇帝，只是奋斗的一个中点，远不是终点。陈朝建立之初，只能算是南方地区比较大的割据势力而已。陈霸先的皇帝生涯几乎就是一部征战史。他后来又花了两年时间和南方的王琳、后梁等势力争斗，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永定三年（559年），陈霸先去世，葬于万安陵，年57岁。

陈霸先辛苦一生，身后遭遇却是南朝各代中最悲惨的。他建立的

陈朝是南朝四代中疆土最小，实力最弱的，只能在北方的军事高压下偏安于江南一隅，毫无作为。王僧辨的儿子王颁入隋后为隋朝大将，参加了统一南方的战争。陈霸先亡后，王颁纠集父亲旧部，夜掘陈霸先坟墓，破棺焚尸，并将陈霸先的骨灰倒于池塘之中。死后惨遭掘墓焚尸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是最大的不幸了。

万安陵现在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西北面。整个陵墓毁坏严重，只留下两只瑞兽（东面为“天禄”，西面为“麒麟”）忠诚地守护在荒野中，经历着风吹日晒，慢慢风化。“天禄”旁边有一个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的小池塘，有村姑在一旁悠闲地洗衣洗菜……

三

陈霸先死时，敌对势力环绕，内忧外患丛生，皇位的传承就成了一个敏感的难题。

陈霸先的皇后和大臣们商量后，认为国家危难，迫切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长君继位，而不应该固守父死子继的老传统。他们从大局出发，封锁了陈霸先的死讯，秘不发丧，招陈霸先的侄子陈蒨还朝。陈蒨算得上跟着陈霸先创业的元老，之前和周文育在江东平定杜龛的叛乱、消灭张彪的割据，功劳不小。他还担任过会稽太守等实职，陈霸先死时正率军驻在南皖。得到召唤后，陈蒨迅速赶回建康，被拥立为新帝，他就是陈文帝。

陈霸先的死讯传开后，王琳集结军队，想趁乱推翻陈朝。陈霸先废萧方智即位后，王琳集团就要求北齐送还人质萧庄，要拥戴他为新皇帝。北齐爽快地送还了萧庄，王琳在郢州拥戴他为皇帝。此时，王琳引兵东下，陈蒨应战。天嘉元年（560年），当王琳与陈朝将军侯瑱在芜湖交战时，北周偷袭郢州。王琳腹背受敌，大败，带着萧庄逃亡北齐。北周将势力拓展到了长江中游南岸。

萧庄投奔北齐后，北齐封他为梁王，试图扶持他复辟梁朝。但不久，北齐被北周灭亡了。北周手里已经有一个傀儡了（后梁），就不需要第二个傀儡，派人暗杀了萧庄。

陈蒨继续向中游进军。侯瑱、侯安都等人力战南下的北周，在当年年底收复了湘州等地。岭南的广州刺史萧勃，是陈霸先的老上级，见陈霸先发达了，心里很不舒服。听到陈霸先死讯后，萧勃举兵不从。陈军挟得胜之威，南下讨伐岭南。萧勃兵败而亡。陈朝至此保有长江中下游的南岸全部，是南朝时期辖境最小的一个朝代。陈朝有条件安心施政了。陈蒨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是南朝历代皇帝中少见的有为之君。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国势比较强盛。

天康元年（566年），陈蒨病逝，长子陈伯宗即位，史称废帝。

陈伯宗年轻，国事都委托给叔叔安成王陈顼。陈顼掌握大权，都督中外诸军事，国家大事都决于他手。尚书仆射列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等人发觉陈顼有野心，图谋夺取陈顼大权，失败后遭到屠杀。陈顼进一步专权，在光大二年（568年）以皇太后的名义废陈伯宗为临海王，自立为帝。陈顼就是陈宣帝。他宣称这是陈霸先的“遗志”。

陈顼是陈蒨的弟弟，颇有哥哥的遗风。他兴修水利，开垦荒地，鼓励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他是陈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位十四年，期间国家比较安定，政治较为清明。

陈顼时期最大的事件，无疑是太建五年（573年）开始的北伐。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北齐国势大减，陈顼起了收复淮南的雄心。他命令吴明彻为都督，领兵十万征讨北齐。齐军应战。陈朝猛将萧摩诃一马当先，击斩齐军善射者和大力士十余人，齐军大败。陈军收复历阳、合肥、秦州等地，从长江逼近淮河。北齐派南梁降将王琳镇守寿阳，抵抗陈朝。吴明彻采取梁武帝萧衍的方法，拦河筑坝，引水灌

城。北齐派出数十万军队援救寿阳，距寿阳三十里扎营，不敢与陈军接战。吴明彻猛攻寿阳，俘虏王琳，送到建康斩首。淮河以南的北齐政权或逃或降，陈朝顺利收复数十城。南北边界恢复到了梁朝初期的情况，隔淮河对峙。没几年，北齐亡于北周，华北地区剧烈动荡。陈頊进一步萌生了收复淮河以北领土，饮马黄河的雄心。他没有在北周进攻北齐之时“趁火打劫”，却在北周统一北方后才出兵淮北。结果，陈军败于周军，非但饮马黄河的宏伟蓝图没有实现，还招惹周军渡过淮河南下，占领了淮南地区。北伐的成果丧失，陈朝国势也遭受重创。长江以北再度沦落敌手。

太建十四年（582年）陈頊病逝，传位太子陈叔宝。陈叔宝就是陈后主。

陈叔宝的弟弟、始兴王陈叔陵是个粗鲁残暴的家伙。他除了贪恋女色，最大的爱好就是盗墓，尤其是盗挖名人墓葬，窃取不义之财。就连东晋名臣谢安的墓地也惨遭陈叔陵的毒手，陈叔陵还将谢安的棺柩抛弃，霸占土地来安葬自己的母亲。（也可见当时谢家已经败落。）陈叔陵一直有篡位之心，计划在父亲的葬礼上杀了陈叔宝，自立为帝。

陈宣帝的灵柩停在宫中，陈叔宝在灵前大哭。陈叔陵突然拔出刀来砍向哥哥，一刀砍中陈叔宝的脖子。异常幸运的是，不知道是陈叔陵力气太小，还是那把刀太钝，竟然没有深入脖子内部。陈叔宝扑倒在地，陈叔陵正要补上一刀，陈叔宝的生母柳后救子心切，冲上来阻止。陈叔陵又砍倒柳后。陈叔宝的乳母吴氏抱住陈叔陵胳膊，陈叔宝慌忙爬起来逃出殿堂去。四弟、长沙王陈叔坚将陈叔陵擒住。陈叔陵奋力挣脱，逃出宫门。

陈叔陵一不做，二不休，赦免囚犯，武装起来，又召诸王和诸将，要和陈叔宝拼个你死我活。可惜无人响应。陈叔宝命大将萧摩诃率步骑数百人去讨伐。陈叔陵企图招降萧摩诃，遭到拒绝后知道大势

已去，先逼迫妃子张氏及宠妾七人跳井自杀，自己带上步骑百人想突围投降隋朝，中途被萧摩诃截获。陈叔陵被斩首，诸子赐死，亲信一并伏诛。陈叔宝在平定内乱后，安全继位。他将陈叔陵的王府改成猪圈，下令将谢安的墓地归还给谢家。

登基后，陈叔宝因为脖颈被砍受伤，在殿中养病，屏去诸姬，只留贵妃张丽华随侍。这段病中经历，让陈叔宝非常宠信张贵妃。陈朝自陈霸先开国以来，很少关心宫廷生活，内廷陈设很简陋。陈叔宝认为后宫过于朴素，开始大兴土木，采选江南美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安乐气象中，陈朝迈向了衰落。

四三 北齐是怎么败下去的？



南方梁陈交替期间，北齐的统治者是高洋。高洋的运气很好，他父亲高欢给他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家底，在当时西魏、北齐和南梁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北齐的实力是最强的。虽然在即位初期爆发了侯景的叛乱，但是高洋运筹得当，迅速将侯景这股祸水引到南梁去了。南梁被侯景之乱搅得天翻地覆，高洋乐在心里，跟在侯景身后“接收”了淮南江北不少的州县。西魏宇文泰也忙着趁火打劫，侵占西南地区，北齐和西魏保持了相对和平——客观上，双方都没有吞并对方的能力。此外，高洋还对北方少数民族用兵。当时柔然已经衰落，突厥继起，向南侵略北齐。高洋领兵迎战，痛击了突厥人，迫使他们收缩回了北方。

对外方面唯一让高洋不爽的，就是陈霸先的崛起，歼灭了北齐南侵的大军，给了北齐实实在在的打击。不过，北齐的元气并未受损，高洋统治初期政治清明，政权巩固。北齐领土北到长城，南隔长江与陈朝为界。

政权巩固后，高洋荒淫残暴的恶性就暴露了出来。他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和让人瞠目结舌的“行为艺术”，在之前章节已有论述。当了皇帝后，高洋的这些癫狂行径不断升级，比如征发十万民夫在都城邺城修建宫殿，比如他掀翻太后娄昭君的车辇、暴怒着要杀害生母，又

比如高洋常常无缘无故地屠戮大臣。高洋把异母弟弟永安王高浚、上党王高涣关进铁笼，关押在地牢里，自己拿着长矛乱刺他们，最后堆上柴火将两个弟弟活活烧死。常山王高演是高洋同父同母的弟弟，劝了高洋几句。高洋就把他反绑起来，拿刀搁在他头颈上，问：“谁教会你进谏的？”高演回答：“天下人三缄其口，除臣之外，还有谁敢说话？”高洋就命人用乱棍痛打高演。高演被打了几十棒，奄奄一息了。幸亏高洋酗酒睡着了，底下人见状没再动手，高演这才捡回一条命。上行下效，整个北齐都变得没有法治，官吏动辄施用酷刑，盘剥百姓。贪污腐败问题也很严重。到了高洋统治晚期，府库蓄积已经枯竭，已经不能支持正常的政府运转了。

高洋时期的强大是表面的，空虚的。北齐政权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北齐政权建立在六镇鲜卑族实力和关东汉族豪强的共同支持之上，鲜卑人和汉人的矛盾始终存在，同时还有一个地方豪强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高洋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只能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一会儿打击鲜卑人，重用汉族人杨愔，让他当尚书令，又迎娶赵郡李氏的女子为皇后；一会儿又贬低汉族人抬高鲜卑人，侮辱尚书令杨愔，无端杀害汉族大臣。他也知道任意杀戮并不能保持长治久安，始终担心有人威胁高家的统治。

彭城公元韶是北魏的宗室后裔，是孝庄帝的侄子。虽然元氏已经禅位，高洋依然担心元氏威胁皇权。他剃去元韶的须髯，强迫元韶像妇女一样粉黛化妆、穿上妇人的衣服做自己的随从。高洋扬言：“我以彭城为嫔御。”以此来侮辱元氏，讽刺元氏微弱。天保十年（559年），天降流星，太史官上奏：“今年当除旧布新。”高洋很自然将此和大臣反叛，阴谋推翻自己联系起来。他问元韶：“当年东汉光武帝为什么能够中兴汉朝啊？”元韶早就高洋给折腾得战战兢兢，不能理性思维了。他汗流满面，突然冒出一句：“那是因为王莽篡位的时候，没有把刘家的人斩草除根。”高洋很喜欢“斩草除根”的说法，为了防止被推翻的元氏复辟，决定将元氏家族一网打尽。他将和北魏皇室有关系的

二十五个元氏家族满门抄斩。凡是父祖封过王的，或者曾经身居高位，或者干脆就因为子弟强壮的，都被斩首。刽子手连婴儿都不放过，把他们抛向天空，用长槊扎死。前后一共杀害了七百二十一人，尸体被投入漳河。邺城渔民捕到河鱼，常从鱼肚子里剖出人的指甲来。邺城上下，为此长期不敢吃鱼。余下的十九个元氏疏宗家族，则遭到严厉管束，被禁止当官。始作俑者元韶也在黑名单上。他把肠子都悔青了，在邺城地牢里绝食而死。

北齐境内其他姓元的人家，害怕殃及池鱼。一个叫做元景安的人，是北魏皇室的疏宗，提议上奏高洋，申请改姓高氏。堂兄元景皓反对：“做人怎么能自弃本宗，改姓他姓呢？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元景安竟然向高洋告发了堂兄，害得元景皓被杀，家属流配彭城。高洋同意元景安改姓高氏。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典故的来源。

常年暴虐荒唐的生活，损害了高洋的健康。天保十年（559年）十月，高洋因酗酒生病而死，才31岁。高洋发丧之时，群臣号啕大哭，但都只有声音，没有一滴眼泪。

二

高洋的儿子高殷继位，年仅15岁。高殷就是孝昭帝。

高洋临终时，对弟弟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我的位子就夺吧，别杀我儿子。”

高洋癫狂了大半辈子，但心底清醒得很。他清楚自己留下的北齐王朝充满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常常翻涌起腥风血雨来。而高殷这个儿子身上流着一半汉人的血液，从小就在国子监接受儒家教育，文弱得很，高洋评价他“性格懦弱，像汉人的孩子”。为了磨炼儿子的胆

量，高洋带着高殷一起做斩首“供御囚”的游戏，逼高殷动手杀人。高殷颤颤巍巍，挥刀砍了好几下都没有砍下死囚的脑袋。高洋气得用马鞭抽打高殷，把儿子吓成了结巴。自己的结巴儿子能否掌控江山，高洋心里没底。

高洋的担心很快变为事实。他死前，之前被暴力掩盖着的鲜卑人和汉族人的矛盾爆发了出来。高殷即位后，汉族大臣杨愔、郑颐等人辅政，加上高殷年幼，生母李太后为代表的赵郡李氏开始摄取实权，势力旺盛。当时，高欢的发妻娄昭君还在世，被尊为太皇太后。她出身边塞的鲜卑家族，对汉人的崛起很警惕，说：“我怎么能受汉族老婆子（指李太后）的摆弄！”鲜卑贵族和大臣纷纷聚集到娄太后身边。娄太后的两个儿子、高殷的两位皇叔高演、高湛是其中的中坚分子。北齐政坛出现了两派针锋相对的势力。

尚书令杨愔决定扳倒高演、高湛，和郑颐等人商量后，将两位皇叔外调地方刺史，以消除威胁。他们觉得李太后是汉族人，会站在自己一边，就把这事向李太后做了汇报。李太后果然站在汉族大臣们的一边，但没有一点保密意识，把这个阴谋和身边的一个女官说了。这个女官就是当年高澄强夺的高仲密的妻子李氏。李氏在高澄死后入宫做了女官。李太后想当然认为李氏和自己同姓，是同一个战壕的。不想，李氏权衡利弊后，跑去向娄太后告密了。娄太后马上叫来高演、高湛，密谋杀掉杨愔等汉族大臣。任命颁布后，高演、高湛二人借口庆祝，摆宴招待大臣们。杨愔等人不知有诈，坦然赴宴，被当场拿下，砍了脑袋。娄太后把李太后、高殷叫过来，训斥了一顿，逼他们将实权转移到高演手上。没过几个月，娄太后又废高殷为济南王，扶持常山王高演登基做了新皇帝。高演就是齐昭帝，这一年是乾明元年（560年）。

退位的高殷很快被高演杀死，史称废帝。

高演第二年（皇建二年，561年）就死了，传位给弟弟长广王高

湛，高湛就是武成帝。高演为什么不传位给儿子呢？为了保住儿子高百年的性命。北齐权力斗争激烈，与其让儿子当皇帝，权力和生命都受到篡位者的威胁，倒不如谁愿意当皇帝就让谁当去。

高湛是北齐的第四个皇帝，也是娄昭君第四个当皇帝的儿子（长子高澄被追尊为皇帝）。高湛接手的帝国，矛盾丛生，国库空虚，已经出现了衰败迹象。高湛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干脆自暴自弃，甩手不干了。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终日沉湎于美色之中，一心享受。皇帝昏庸无为，朝政更加黑暗，奸佞横行。和士开、穆提婆、高阿那肱等人专权腐化，反而受高湛宠信，小人得志。奸臣和士开为人猥琐，在取悦高湛方面却很有本事。高湛越来越离不开他，两人之间没有半点君臣的样子。高湛心底还是有治国雄心的，隐隐间为朝政的堕落焦急。和士开就劝他说：“自古帝王都已经化为灰土，明君尧舜和昏君桀纣又有什么区别呢？陛下应该趁年轻力壮，抓紧时间享乐，国事吩咐大臣去办就行了，陛下不必亲自操劳。”高湛竟然觉得非常有道理，更是当起了甩手掌柜，把朝政都委托给和士开办理。他三四天才上一次朝，和士开权倾朝野，党同伐异。和士开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和胡太后发生奸情，朝野一片愤慨。高湛睁只眼闭只眼，干脆在河清四年（565年）传位太子高纬，当起了太上皇。天统四年（568年），高湛因为酒色过度而死，时年32岁。

继位的高纬，史称齐后主。他深得乃父高湛的真传，虽然自家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他依然自顾自地荒淫享乐，自称“无愁天子”。高纬日常生活穷奢极欲，后宫金碧辉煌还嫌不足，把宫殿拆了又造、造了又拆，为了享乐晚上燃油照得夜空如同白昼。宫廷之外是卖官鬻爵，高纬则肆意封赏，连宠爱的狗、马、鹰、鸡都被封为仪同、郡官、开府等高官，让宠物像达官显贵那样坐着车辇，由人伺候着。他把畜生看得比百姓重，百姓也就不把他当皇帝看。

和士开在高湛死后，虽然还把持着大权，但地位危险多了。仇家们瞅准高纬不理朝政，凡是上奏的文件一般不看就签字的空子，给和

士开下了一个套。武平二年（570年），大臣王子宣上了一道弹劾和士开的奏章，罗列了大量罪名，奏请逮捕和士开法办。大臣冯子琮将这道奏章夹在一大堆公文中呈递上去。高纬果然看都不看，一道一道地签字盖章了。走完“合法”手续后，琅琊王高俨、领军大将军库狄伏连等人在宫门口埋伏士兵，在和士开上早朝时一拥而上，乱刀砍过去将他杀死。高纬听到风声后，慌忙写了道赦免文书派人赶来救和士开，可惜晚了一步。

一个奸臣的死，并不能拯救滑入黑暗深渊的北齐。和士开死后，朝政没有丝毫起色，反而越来越糟糕。高纬在位十三年，是统治时间最长的北齐皇帝，最大的本领就是陷害忠良。

当时天下三足鼎立，乱世重兵，重兵就得重将。北齐大将斛律光是朔州（今山西朔县）高车族人，擅长骑射，从基层干起，积功做到了大将军、太傅、右丞相、左丞相。在与北周近二十年的争战中，斛律光多次参战指挥，连战连捷，曾大败北周名将韦孝宽，算得上令敌人胆寒的一代名将。韦孝宽和斛律光交战多次，屡战屡败，心里特别憋屈。战场上打不赢，就从政治上想办法。韦孝宽知道高纬猜忌多疑，又知道斛律光长期在外领兵，在朝堂上并没有多大根基，就使了一招反间计。他派人到处散播斛律光拥兵自重、阴谋篡位的谣言，还派奸细混入邺城到处传唱：“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为一斛，明月是斛律光的字，谣言直指斛律光有篡位野心。眼红斛律光的大臣们乘机向高纬进谗言，诬告斛律光谋反。武平三年（572年），高纬招斛律光入宫觐见，埋下伏兵，用弓弦残忍地勒死了他，并以谋反大罪将斛律家族抄家灭族。斛律光一心为国，为官清廉，抄家的人只看到一些弓箭刀鞘。斛律光死后，前线将士为之心寒，士气大为低落。高纬自毁长城，朝野有识之士莫不痛惜。斛律光的死讯传到北周后，在位的周武帝宇文邕喜出望外，为此宣布大赦，还下诏追封斛律光为上柱国、崇国公。灭亡北齐后，宇文邕还在邺城感慨：“斛律光若在，朕岂能至邺？”高澄的四子、兰陵王高长恭按辈分是高纬的堂叔。

他骁勇善战，功勋卓著，也引起了高纬的猜忌。高长恭为了避祸，刻意保持低调，平日深居简出，不过问军队事务，可还是被高纬赐酒毒死。如此反复，等大战来临时，北齐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将帅了。

只过了二十多年，原本在三足鼎立中最强大的北齐，迅速被宿敌北周超越，就连对南陈的优势也丧失了。它成了三国中最弱的一方。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北齐的高氏皇族家庭教育有问题，没教出一个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皇帝来；二是北齐各种矛盾纠结，朝野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无论是恢复、发展屡遭战火摧残的经济，还是弥合民族矛盾，北齐都无所作为，白白浪费了高欢奠定的好基础。它最终被锐意改革的北周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四 又是统一，北周灭亡北齐



基础比北齐差、建国比北齐晚的北周，内部也有众多矛盾。但它在发展中逐一解决了问题。

北周的开国皇帝宇文觉登基时只有15岁，是中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开国君主。但是实际权力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矛盾就此产生了。

虽说是堂兄弟，但宇文护的年纪比宇文觉大了二十多岁，几乎就是两代人。宇文护是宇文泰大哥宇文颢的儿子，出生在六镇起义前的武川镇。宇文泰之父宇文肱非常喜欢这个孙子。北方大乱后，宇文颢在与起义军的混战中阵亡，年幼的宇文护随着各位叔叔在北方流荡，先后投奔过葛荣、尔朱荣等阵营。他是在刀光剑影中长大的，随着叔叔宇文泰南征北战，屡建战功，曾与于谨、杨忠南征，攻破江陵。宇文泰死时，儿子们都年轻没有经验，就选择侄子宇文护给儿子保驾护航。宇文护在西魏政权中地位本不高，在各位柱国大将军之下。柱国大将军于谨权衡后，支持宇文护继承军政实权，担任大司马、封晋国公。宇文护趁热打铁，逼迫西魏恭帝元廓禅位于宇文觉，建立了北周。从这点上说，宇文护不负所托。

宇文护的缺点是作风太过强硬，容易招人忌恨。柱国大将军赵

贵、独孤信是宇文泰的同辈人，也算是西魏政权的缔造者，对后来居上的宇文护不太满意。赵贵领衔柱国大将军，想推翻宇文护，找独孤信串联。独孤信拒绝参与，赵贵就此作罢。此事终究还是被人告发，宇文护杀死赵贵，又逼独孤信自杀。他就通过这样的强硬手段，排挤一批人，换上自己人，独揽了大权。

问题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宇文觉也是个作风强硬的人，而且正值青春叛逆期，不甘心大权旁落。他在身边聚集亲信，密谋杀宇文护。密谋没实施就泄漏了，宇文觉毫不手软地废黜了只当了几个月天王的宇文觉，不久又毒死了他。

宇文护挑选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做新天王。宇文毓就是北周明帝。

宇文毓登基前温文儒雅，不想登基之后也变得作风强硬，对宇文护不满。宇文护不得不宣布“归政”，将所有权力都交还给宇文毓，只保留兵权。宇文护的理由是局势还不稳，自己要帮堂弟控制军队、稳定局势，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观察宇文毓的下一步行动。宇文毓以为大权在手，兴冲冲地正式称帝（之前北周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皇帝，称天王），并雄心勃勃地要大展拳脚。宇文护害怕起来，担心宇文毓对自己不利，在武成二年（560年）毒死了他。无论是宇文觉还是宇文毓，在位时间都很短，宇文护则忙于揽权和弑君，北周朝政无所作为。

宇文护挑选的北周第三任皇帝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宇文邕，当时只有18岁。宇文邕就是北周武帝。

宇文邕沉稳低调，平时不怎么说话，一说话就掷地有声。宇文泰生前很喜欢宇文邕，夸奖他：“成吾志者，此儿也。”宇文泰的确没有看走眼。对于专权霸道的宇文护，宇文邕曲意尊崇，让堂兄担任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继续做他的晋国公。遇到事情，宇文邕都让大

臣先请示宇文护。有大臣说宇文护的坏话，宇文邕都加以训斥，甚至通报给宇文护。渐渐地，宇文护对宇文邕放心了，觉得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

天和七年（572年）三月的一天，宇文护觐见皇太后。宇文邕和宇文护两人边走边聊。宇文邕无意中提到皇太后年纪大了，却还酗酒，对身体不好，请宇文护一会劝太后少喝酒多运动。宇文邕还拿出事先写好的《酒诰》，请宇文护念给皇太后听。宇文护一点都没生疑，见到太后照着《酒诰》就认真念了起来。突然，宇文邕拿起手里的玉珽，从背后狠狠地砸了宇文护。宇文护一击倒地，还没有死。宇文邕喝令一个带刀近侍上来给宇文护补上一刀。近侍紧张得手脚发软，刀砍下去竟然不见血。宇文邕的弟弟、卫王宇文直这时冲了进来，给了宇文护致命的一刀。宇文邕又诛杀宇文护的亲信，顺利亲政，正式走上前台。

当时，北周已经建立十五年了，之前宇文护都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国家发展缓慢。宇文邕宣布宇文护的罪状时，指责他“任性诛暴，肆行威福，朋党相扇，贿货公行”，“使户口凋残，征赋劳剧”。宇文邕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变革，一方面延续父亲宇文泰的改革措施，一方面向鲜卑旧俗开刀，释放奴隶，融合内部矛盾。建德元年（572年），宇文邕下诏在江陵战役中被俘获的南梁奴隶全部赦免为民。这其中聚集了不少南方的政治、文化精英，宇文邕择才录用。针对当时佛教势力膨胀，和道教频繁发生矛盾的问题，宇文邕评定儒、佛、道三家的长短，定佛教为末位。建德三年（574）五月，宇文邕又下诏禁止佛教、道教，销毁经像，强令和尚、道士还俗为民。一时间，北周境内灭佛焚经、驱僧破塔风气大盛，佛门宝刹都变更为民宅，和尚道士还俗的有两百多万人之多，开始向国家纳税服役。不过，宇文邕保留了两教各一百二十人，称通道观学士，专事阐释三教经义。“周武帝灭佛”是历史上三大灭佛事件之一。此外，宇文邕还禁绝淫祀，凡是与礼典记载不符，都废除禁绝。经过这一番的兴革发展，北周户口稠

密，赋税增长，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超越了北齐。

宇文邕一生勤于政事，坚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终身厉行节俭，生活极其简朴。他平常穿布衣盖布被，只有十余个妃嫔。宇文护掌权时建造的宫室，都被拆毁，其中的珠玉宝物都被赏赐给贫民。第二件事情是宇文邕坚持和将士同甘共苦，戎马倥偬时坚持身先士卒。他重视军队训练，经常亲自到校场阅兵，每年都参加部队的演习。演习时，宇文邕和将士们一起在山谷中行军，辛苦跋涉；他还参加将士们的宴会，每次都执杯向大家敬酒或者亲手给将士们赏赐。宇文邕不是一味地讨好官兵，其实他是一个严酷少恩的人，但平易近人、不辞辛劳，行事无私果断，在军队中的威望越来越高。每次征战，宇文邕都亲临战阵，还常常带头驰骋冲锋，感动得将士们都愿意为他效死力。

宇文邕的种种表现，都和荒淫无耻的高洋形成鲜明的对比。之前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北周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二

宇文邕有心统一天下，首要目标就是灭亡宿敌北齐。之前三十余年，宇文势力和高家势力激战了多场，双方都伤痕累累，结果谁也灭不了谁。北周朝野普遍认为东西方均势还未打破，反对与北齐决战。

北周建德四年、北齐武平七年（575年），宇文邕力排众议，决定御驾亲征讨伐北齐。周军主力出河南，杀向洛阳而去。宇文邕以统一为目的，视北齐百姓为自己的子民，严肃军纪，严禁周军进入齐境后伐木、践稼，犯者斩首，因此颇得民心。周军顺利攻占了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宇文邕亲自带兵进攻金墉城（今河南洛阳附近），不克。北齐右丞相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大军南下救援。宇文邕不巧得了急病，周军只得退兵。

第二年十月，宇文邕集中了十几万大军，再次御驾亲征。这次，周军不再出兵河南，而是渡过黄河进攻晋阳。晋阳是高家的巢穴，北齐主力云集此处。击溃了山西的齐军主力，就等于胜利了一大半。宇文邕本次采取先难后易的战略，行军布阵小心谨慎，重兵围住晋阳的门户平阳。宇文邕分派各军，守住各处关隘，以阻遏晋阳的齐军南下；占领要害，阻遏河内的齐军北上；另派步骑兵扼守蒲津关，以保证后方的安全；再分出一万兵力攻打平阳周围的城池，分散齐军。宇文邕派王谊指挥主力进攻平阳城。北齐的海昌王尉相贵据城死守。北方统一战争的第一场决战就在平阳展开了。宇文邕异常重视此战，亲自到城下督战。北齐官员则人心涣散，行台左丞侯子钦首先出城投降；北齐晋州刺史崔景嵩防守北城，丧失信心，向宇文邕投降。北周将领段文振率数十人为先遣，在崔景嵩接应下，首先登上城墙。周军攻破平阳，俘获尉相贵及齐军八千人。周军旗开得胜，迅速占领了平阳周边地区。

平阳大战正酣时，齐后主高纬正和宠妃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打猎。前线告急文书雪片一样飞来，早晨一封，上午一封，中午又是一封飞马传书，右丞相高阿那肱都扣下来不向高纬报告。他说：“陛下正享乐，前线小小交兵，都是常事，不用急着奏闻！”晚上，前线信使又送来急报：“平阳失陷。”高阿那肱这才把战事报告给高纬。高纬要赶回去处理，冯淑妃却撒娇要再打一次猎。高纬竟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又和冯淑妃打起猎来。

等到十一月，高纬亲率十万大军南下平阳。齐军军容严整，宇文邕不愿和他们硬碰硬，决定撤军避其锋芒。他留一万军队给梁士彦坚守平阳，留其他军队散布河东各地，声援平阳，自己返回长安。宇文邕试图在新占领区采取守势，以逸待劳，让齐军锐意消磨在坚城要害之中。齐军包围平阳，昼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况危急，城堞皆尽，久不见外援，守城将士难免有些惊慌。梁士彦神态自若，激励将士们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将士们看主帅身先士卒，士气大振，都

以一当百，奋勇杀敌，击退了一波波进攻。在战斗间隙，梁士彦动员军民乃至妇女，抓紧修缮城墙。齐军改挖地道攻城，挖塌了一段城墙。齐军乘虚而入。在这紧急关头，高纬突然传令暂停攻城。原来，高纬要和冯淑妃一起观看齐军攻破平阳城的胜利一幕。后方的冯淑妃用最快的速度涂脂抹粉，再赶到前线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等她到的时候，周军早已利用间隙用木板把城墙缺口堵上了。

宇文邕回到长安，得知平阳危急，马不停蹄就率军返回山西。十二月，宇文邕就再一次出现在平阳城下。各路周军集结而来，大约八万人，近城扎营，东西绵延二十余里。大战临近，宇文邕命齐王宇文宪去查探齐军虚实。宇文宪转了一圈回来后，信心满满地报告宇文邕：“请破之而后食。”宇文邕高兴地说：“如汝言，吾无忧矣！”两人这么一表演，周军士气大振。宇文邕又乘马巡视各军。平时的积累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宇文邕能够高声叫出各军主帅的姓名，加以慰勉。遇到熟悉的官兵，宇文邕也都打招呼。将士看到皇帝竟然知道自己的部队，士气更加高昂。

大决战开始了。应该说当时周齐两军人数、装备、实力都不相上下，但周军士气高涨，齐军渐渐有所不支。高纬带着冯淑妃在后方高岗上观战。冯淑妃远远看到齐军有败退迹象，没心没肺地大喊：“败啦，齐军败啦！”爱妃慌张了，后果很严重。高纬带上冯淑妃慌忙向后撤去。齐军看皇帝带头逃跑，军心大乱，连战皆溃。平阳一战，齐军阵亡上万人，余者仓皇撤走。齐军丢弃的军械甲仗，散落了数百里。周军打扫的战利品，堆积得像小山一样。齐军主力在事实上被打垮了。

高纬败逃晋阳，宇文邕乘胜向晋阳进军。高阿那肱率军一万镇守高壁，看到宇文邕率军杀到，望风而逃。介休守将韩建业率军投降。宇文邕迅速杀到晋阳城下。高纬想弃城投奔突厥，随从大臣和侍卫们大多不愿意，四散而走。高纬北逃不成，向东折向首都邺城。宇文邕成功攻破晋阳，尾随杀向邺城。

当时北齐还占有河北、山东，元气尚存。邺城的大臣们都劝高纬重整军备，再与宇文邕决战。将领们请高纬检阅部队，还为他准备好了讲稿，要他对着将士们慷慨流涕，激励人心。一切准备就绪，高纬也走到了将士们面前，可他突然忘记了将领们教他的词（一开始就没好好记），茫然站了一会儿，哈哈大笑起来。高纬这一笑，笑得随人们先是不知所措，接着也禁不住大笑起来。台下将士们见此，纷纷说：“皇帝这副模样，我们还为他卖命干什么？”人心一下子就散了。高纬无计可施，只好使出了最后一招：禅位。他把皇位让给了8岁的皇太子高恒，自己做了太上皇。邺城保卫战没开打，就失败了。

北齐承光元年（577年）正月，宇文邕率军攻破邺城。太上皇高纬在城破的前一天带上小皇帝高恒和一百多个骑兵向东方逃去。周军轻易攻入邺城，北齐王公以下官员都投降，无人为朝廷“捐躯”。高纬一行人逃到济州，觉得两个皇帝（一个太上皇、一个皇帝）的目标太大了，派人拿着皇帝玺绶到瀛州，又禅位给任城王高湝。不管高湝同意不同意，高纬再逃往青州。可是，宇文邕就是认准了高纬，派遣精兵强将追击到青州。奸臣高阿那肱看高家大势已去，在青州投降，高纬、高恒只带上十几个人仓皇南逃，想投奔陈朝，途中被周军俘获。二月，周军攻下信都，俘虏任城王高湝、广宁王高孝珣等北齐宗室。北齐王朝算是彻底灭亡了。随后，宇文邕又派军平定了北齐各地的反抗，从此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区。北方在分裂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再次归于统一。

齐后主高纬被送到长安，先受封侯爵，几个月后被宇文邕扣上“谋反”的大罪，株连家族。北齐高姓皇子皇孙全被处斩。高纬的宠妃冯淑妃沦为为奴，给人舂米；其他皇后、公主则流落各地，贫穷无依，沦入了社会底层。

灭亡北齐后，宇文邕还有“平突厥，定江南”的理想没有实现。吞并北齐的第二年（578年），宇文邕计划征讨突厥，不想在出征前夕病逝，年仅35岁。当时北周对南陈拥有绝对优势，统一势在必行。宇

文邕在迈向天下一统大门的最后一步时倒下了。不过，他为隋唐时期的大一统局面打下了基础。

三

宇文邕在世时，挑选长子宇文赟作为继承人。他对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对继承人宇文赟动不动就施用体罚，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周武帝严令太子东宫官属每月写一份详细报告，细细禀明太子在这个月的所作所为；还常常警告宇文赟：“自古至今被废的太子数目不少，难道我别的儿子就不堪继任大统吗？”尽管父亲从来没有将更立太子的事情提上日程，但宇文赟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宇文赟原本是好酒好色的年轻人，现在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癖好，坚持每天和大臣们一样，五六点钟就伫立于殿门外等待父皇早朝，即使是严寒酷暑也不例外；坚持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说话温文尔雅。因此，周武帝对宇文赟的表现大致还是满意的。

实际上宇文赟是个杰出的演员。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像他这样登基之前规规矩矩，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太子。宇文赟和同时期南齐的萧昭业一样，平常因为有老爹的严格管教，言行不仅正常，还多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但一旦父亲去世，没有人再拘束他们，他们就会坐在皇位上将天下闹得天翻地覆。

周武帝死的时候，宇文赟刚好20岁。父亲的棺材还摆放于宫中没有入殓，宇文赟就原形毕露。他不但丝毫没有悲伤之色，还抚摸着脚上的杖痕，恶狠狠地对着父亲的棺材大声叫骂：“死得太晚了！”

宇文赟将父亲的嫔妃、宫女都叫到面前，排队阅视，将长得漂亮、自己喜欢的都纳入后宫，毫不顾及人伦纲常。从此，宇文赟开始了淫荡荒唐的执政生涯，活生生葬送了父亲奠定的基业。宇文赟在宝座上肆虐了九个月后，觉得做皇帝太麻烦了，于是将帝位传给7岁的

儿子宇文阐，宠信郑译等人，通过他们遥控指挥朝政。宇文赟执政时期，北周的大权开始转移到权臣手中。

四五 又是政变，这回主角是杨坚



日后被追封为隋太祖的杨忠其实出身很苦。

隋朝建立后，朝廷说杨家出身于著名的弘农杨氏，杨忠是汉太尉杨震的第十三世孙。这样显赫的出身已经难以考证，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杨忠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出身带来的任何好处。杨忠出身于北魏六镇汉族家庭，家境贫寒（一说其父是北魏宁远将军杨祯，很可疑）。六镇起义时，杨忠没有参加镇兵。他想过平稳安逸的生活，所以就拼命地往南方逃亡。但是跑到北魏南部边境的时候，他实在是无路可去了。不得已，他也参了军，做了名北魏士兵。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后，北魏宗室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和部分刺史南逃投降了梁朝。杨忠也莫名其妙地被裹挟在这股南逃的潮流中，到了江南。不久，南梁扶持元颢返回中原争夺帝位，杨忠又莫名其妙地随军返回了中原。尔朱荣打败了这股北上的军队，杨忠也就做了俘虏。他的这段早期经历体现了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百姓随波逐流、为生存而奋斗的艰辛，完全可以拍一部现代版的电影《小兵杨忠的故事》。

尔朱荣并没有屠杀俘虏，反而挑选其中强壮顺眼的编入自己的军队。杨忠就被挑中，被编入将军独孤信的部队。杨忠于是跟随独孤信转战南北。在战争中，杨忠和独孤信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北魏分裂

后，杨忠追随独孤信，跟着元修西入关中，投入宇文泰的阵营。独孤信的部队被派往东南方收复荆州。独孤信以杨忠等人为前锋，一举收复了被东魏占领的荆州。不久东魏大军反攻，独孤信部一败涂地。杨忠便跟着独孤信又一次逃亡江南，在南梁度过了三年游荡生活，直到西魏通过外交途径将他们赎回来。西魏对从南梁归来的将领们非但没有惩罚，反而加官晋爵，比如贺拔胜被封为太师，独孤信被提升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杨忠则被宇文泰看中，直接调入自己帐下听用。

在宇文泰的直接指挥下，杨忠在对突厥、东魏和南梁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宇文泰死后，杨忠又成为帮助宇文觉建立北周政权的铁杆将领，因功受封为柱国、隋国公。杨忠历经了宇文泰、宇文觉、宇文毓、宇文邕四朝，在北周天和三年（568年）因病结束征战生活，回到京城长安。皇帝宇文邕和主政的宇文护亲自到杨家探望病情，授予杨忠帝国元勋的荣耀。几天后，杨忠死在家中。

《隋书》对杨忠的记载相当简单：“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但是杨忠的功勋、地位和人际关系，为儿子杨坚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赋予了杨坚较高的政治起点。因为父亲被皇帝赐姓的缘故，杨坚的前半生被称为普六茹坚，小名那罗延。

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杨坚“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钲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大意是说杨坚长得很大气，威武雄壮。李德林还将杨坚身上的特征都和天命、日月等敏感事物联系在一起，极力论证杨坚的形象就注定了他必将成为皇帝。很可能杨忠的外貌和体魄都不错，遗传给了儿子杨坚。我们现在看那一时期的雕塑，武将的形象大致如此。

一代枭雄宇文泰见了杨坚后，感叹说：“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意思是说杨坚这个小孩子长得很好，不像是来自于代地这样的北方边镇。宇文毓即位后还曾经派遣善于相面的赵昭去观察杨坚，看看这个小孩子日后会不会成为奸雄。赵昭回来对宇文毓说：“杨坚不过是做柱国的料。”柱国类似于大将军，意思是说杨坚日后最高也就做到大将军，不会对北周的皇位造成威胁。但是一转身，赵昭就悄悄对杨坚说：“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意思是说，你以后肯定会登基做皇帝的，但是要先经历一场残酷的杀戮才能平定天下。这些话都被记载在《隋书》杨坚的传记中。

杨坚14岁的时候就因父亲的缘故进入政坛，成为京兆尹薛善的功曹。15岁时，杨坚因为父亲的功勋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高位，被封为成纪县公。第二年，杨坚再次升迁为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宇文毓即位后晋升杨坚为右小宫伯，晋封大兴郡公。宇文邕即位后任命不满20岁的杨坚做了随州刺史的实职。

杨忠的好朋友、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把女儿许配给杨坚。独孤家的女儿就成为了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两家联姻，关系更进一步。独孤家族所代表的军队势力成为了杨坚有力的靠山。

当时主政的宇文护不知为什么，看杨坚特别不顺眼，多次想加害他。大将军侯伏、侯寿等一再袒护杨坚。不久杨忠死了，杨坚袭爵为隋国公。不满宇文护的周武帝聘杨坚的长女为皇太子妃，给杨坚的地位上了一层保险。齐王宇文宪对周武帝宇文邕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意思是说，杨坚这小子有反相，应该早日除去这个祸害。宇文邕说：“此止可为将耳（我只让杨坚做到大将军，不会有事的）。”内史王轨又对宇文邕说：“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意思是说，皇太子不像是个好君主，而杨坚却有反相。宇文邕见有人说自己长子的坏话，不高兴了：“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有天命在，能怎么办，能有什么事情）！”

杨坚听说了这些对话后，心惊胆战起来。他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方法，开始装出一副平庸木讷的样子来。可见在早期，杨坚的能力和地位就引起了朝野的嫉妒。有的人还想借机打击杨坚。但杨氏家族、独孤家族的势力护卫着杨坚基本的地位，加上杨家的长女又是周武帝太子的王妃，所以这些暗箭终究没有对杨坚构成致命的威胁。

宇文赟即位后，杨坚的长女做了皇后。杨坚升任上柱国、大司马，参与朝廷大权。宇文赟的昏庸荒淫、倒行逆施，使他很快在群臣中失去威信。一向有野心的杨坚开始结交大臣，准备取而代之。但宇文赟并不是笨蛋，多少对杨坚的行动有所察觉，只没有抓住确切的把柄。一次，宇文赟单独召见杨坚，事先对左右侍卫说：“如果一会杨坚在席上神色有所异常，就立即杀了他。”杨坚来了后神色自若，与皇帝面对面毫无异常，左右侍卫们也就没有下手。宇文赟既没有杨坚谋反野心的真凭实据，又碍于他是自己的岳父，更难下决心除掉杨坚了。

杨坚为了避免皇帝的猜疑，不得不主动放弃朝廷权力，计划到地方上去任实职。他想曲线救国，等将来天下有变时利用实力争夺皇位。杨坚将自己的愿望告诉了结交的朋友、皇帝身边的红人、内史上大夫郑译。史载：“高祖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可见当时杨坚说：“我想到外地去镇守藩镇，希望你能在宫中帮我多留意留意。”郑译回答说：“杨公的德望，天下人谁不知道。大家都支持你。现在你想进一步发展，我怎么能不帮忙呢？”580年，宇文赟决定出兵南伐，想调亲信郑译去南边。郑译便向皇帝请示元帅人选。宇文赟就问他的意见。郑译回答：“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杨坚）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他郑重地向皇帝推荐了杨坚。宇文赟对郑译一向信任，而且觉得将杨坚放到外地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就下诏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

杨坚刚被任命为扬州总管还没有出征，宇文赟就病倒了，而且是日益严重。北周的宫廷之中开始酝酿起宇文赟死后的权力分配来。《隋书·帝纪第一》记载：“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丁未，发丧。”短短的两行字就概括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巨大的政治阴谋。

这段记录透露出宇文赟不久就在宫中死去。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这两个深受宇文赟信任的大臣暗地中与杨坚关系密切，决定推举杨坚主持新朝的朝政。对于郑译、刘昉两人来说，新皇帝年幼，如果要想保持荣华富贵，必须与新的主政人搞好关系。其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扶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大臣主持朝政。于是他们选择了杨坚。而杨坚作为原来的皇后，现在的太后的父亲，自然很容易进入宫廷。于是三人在宫中一拍即合，伪造了一份宇文赟的遗诏，宣布由杨坚辅助新皇，主持朝政，都督中外军事。杨坚、郑译、刘昉三人都害怕掌握实权的宇文家族诸位王爷发难。于是，他们封锁了皇帝的死讯，宣布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将要嫁给北方的突厥人，征召各位王爷入长安。等一切都安排定了，三人才宣布皇帝死讯，公布遗诏。

郑译、刘昉两人在这场政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都是世家子出身，政治起点高，长期活动在宫廷中，亲近宇文赟。宇文赟也都将他们作为心腹。这样的宫廷政治人物通常都出身高贵，但是轻浮奸诈，随性妄动。比如刘昉是大司农刘孟良的儿子，“性轻狡，有奸数”，“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刘昉在宫廷中的轻浮狂妄的举动，曾经使他受到废黜。但宇文赟离不开这样的角色，不久又任命他为大都督、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一起主持宫廷事务。

《隋书·刘昉传》对这一场宫廷政变有更为详细的描述，告诉我们这并不像《隋书·帝纪第一》所概括得那般简单、平稳。“及帝不愈，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帝暗不复能言。昉见静帝幼冲，不堪负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高祖固让，不敢当。昉曰：‘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高祖乃从之。”

宇文赟快不行的时候，召刘昉和颜之仪进入卧室，嘱咐后事。宇文赟当时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示意两人照顾好儿子宇文阐。刘昉见宇文阐还是小孩，承担不了一个乱世王朝的政治重任，于是就想引入自己认识的、皇后的父亲、扬州总管杨坚辅政。刘昉和郑译一谋划，两个人就去找杨坚了。杨坚一开始还不敢参与这场阴谋（可能是装装样子），刘昉就说：“你想做，就赶紧和我们一起干；如果不做，我刘昉就自己干下去了。”杨坚这才同意搏一把。

就在刘昉和郑译两个人去找杨坚的时候，另一个在卧室里的大臣颜之仪也没闲着。《隋书·刘昉传》说：“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坐，译知之，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柳裘俱入。仲与之仪见译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执之。”颜之仪与宦官们的关系比较好，他们打开宫门引入了大将军宇文仲，也想伪造诏书以宇文仲为辅政大臣。他们的动作比杨坚要快，宇文仲都已经到达皇帝的宝座了，郑译（这时候）才得到消息，急中生智，带着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柳裘等大臣进入大殿，计划与宇文仲、颜之仪等人展开面对面的较量。色厉内荏的宇文仲和颜之仪等人见大臣们都进来了，满脸惊愕，自乱了阵脚。他们不仅不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还犹犹豫豫地想逃走。这时候杨坚出场了，轻易就将宇文仲、颜之仪等人抓了起来。

之后杨坚等人的政变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郑译等人做了一封假诏书，以宇文赟遗诏的名义宣布：杨坚总管朝政，辅佐自己的外孙、刚八岁的宇文阐。杨坚等人又利用假诏书夺取了京城部队的指挥权，稳

定了政局。宇文赟时期，政令严苛、刑罚残酷，老百姓群心崩骇，人心浮动。杨坚刚辅政，就清理这些严刑峻法，抚慰百姓，以身作则，躬履节俭。天下百姓也认同了新的执政班子。

杨坚在巩固辅政地位后，开始向威胁自己辅政地位的宗室各位王爷展开了攻势。当时刚去世的宇文赟的弟弟、汉王宇文赞在朝廷中和杨坚的地位不相上下，与杨坚同帐而坐。宇文赞的存在不仅使杨坚不能完全施展拳脚，而且很容易成为政敌利用的旗帜，成为替代杨坚的潜在威胁。《隋书·刘昉传》说刘昉帮助杨坚巧妙地除去了这个政敌。刘昉搜罗了许多美女献给宇文赞。宇文赞当时还不到20岁，高兴地接受了美女，对刘昉也亲近起来。刘昉和宇文赞熟悉了后，就劝说宇文赞：“大王您是先帝的亲弟弟，众望所归。现在是孺子当国，怎么能够承担军国大事呢！如今先帝刚刚驾崩，人心尚未稳固。大王不如先退回宅第，等局势安定后再出来主政，还可能入宫做天子。这才是万全之计啊。”宇文赞实在是太年轻了，缺乏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听刘昉这么一说，竟然觉得非常有道理，就从此深居简出，不与杨坚争夺权利了。杨坚高兴地拜刘昉为下大将军、封黄国公，郑译为沛国公。两人因为有定策之功，一起成为杨坚的心腹。

除去宇文赞，当时在地方掌握实权的近支王爷一共是五位，分别是：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杨坚在政变的时候就害怕这五位王爷联合起兵反对自己，所以（杨坚）封锁皇帝的死讯，利用假诏书将五王都召回长安，剥夺了他们的实权和军队。五位王爷在杨坚辅政后，都很不服气。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实权，无法与杨坚抗衡了，所以五个人便通过另一位王爷毕王、雍州牧宇文贤秘密联系外藩将领起兵。

相州总管尉迟迥是北周的重臣宿将，也对杨坚的辅政非常不满，在东夏起兵反对新政府。一时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出现骚动。十几天时间里，尉迟迥聚集了近十万反对力量。宇文胄在荥州、石谿在建州、席毗在沛郡、席毗的弟弟席叉罗在兖州 响应尉迟迥。尉迟迥

还派遣自己的儿子向南方的陈国请援，并作为人质。杨坚果断地命令上柱国、郢国公韦孝宽率领大军讨伐关东的叛乱，很快平定了这场骚乱。韦孝宽将尉迟迥的首级送到长安，还讨平了骚乱余党。尉迟迥作乱的时候，郢州总管司马消难割据本州响应，淮南的很多州县都参与了叛乱。杨坚平定尉迟迥后，命令襄州总管王谊讨伐司马消难。司马消难被打败，逃往南陈。荆郢一带的少数民族却乘机作乱，杨坚又命令亳州总管贺若谊讨平这一带。事后查明，这场骚乱有毕王宇文贤和赵陈五位王爷在幕后阴谋作乱的影子。杨坚捉拿宇文贤处斩，但宽恕了赵王五个人的罪过，还下诏给予在长安的五位王爷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安定人心。

镇守四川地区的上柱国、益州总管王谦也是个野心家。他看到幼主在位，杨坚辅政，就以清除权臣、匡复朝廷为借口，发动巴蜀的军队作乱。杨坚开始因为关东和荆州一带骚乱分了精力，没有马上讨伐四川。王谦的军队屯剑阁，乘机攻陷了始州。现在杨坚命令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讨伐王谦，很快就在长安的宫殿里看到了王谦的首级。杨坚看到巴蜀阻险，常常发生叛乱，于是开辟平道，毁掉剑阁险要，防止再次动乱。

在解除了中央的威胁和地方势力的反对后，杨坚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了北周政权。

杨坚的成功让长安的五位王爷坐卧不安。他们走了着险棋，在赵王府摆下鸿门宴邀请杨坚参加。五位王爷的面子杨坚还是要给的，加上杨坚也想看看五个人想做什么，所以就去赵王府赴宴了。赵王在府里埋伏了甲士准备取杨坚的性命，杨坚自己进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甲士还没出动，杨坚的随从元冑就有所察觉拉着杨坚找了个借口跑出来。赵王阴谋暴露，杨坚以谋反罪杀掉了主谋的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

经过这次未遂暗杀，杨坚加强了对政权的控制，抓紧篡位的准备

工作。

三

大象二年（580年）九月，宇文阐下诏说褒奖“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杨坚道高雅俗，德协幽显，运帷幄之谋，行两观之诛，扫万里之外，对朝廷功勋卓著。诏书罢免了左、右丞相的官制，任命杨坚为唯一的大丞相。十月，宇文阐又追封杨坚的曾祖父杨烈为柱国、太保、都督徐兖等十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隋国公，上谥号“康”；追封杨坚祖父杨祯为柱国、太傅、都督陕蒲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隋国公，上谥号“献”；追封杨忠为上柱国、太师、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诸军事、雍州牧。在完成对杨氏家族的世系追封后，杨坚同月诛杀陈王宇文纯，第二月诛杀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

十二月，北周晋封杨坚的公爵为王爵，位在诸侯王上。隋王杨坚可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朝廷备九锡之礼，赐予杨坚玺绂、远游冠、相国印、绿綬绶。北周以中原各州二十郡为隋国，隋国置丞相等上下官员。杨坚一再推让，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于是，朝野掀起庞大的对杨坚的歌颂浪潮，恭请隋王接受恩赏。最后杨坚不得不接受王位，但他只要了中原的十个郡作为封地。之后，北周下诏晋封杨氏各位先祖为王爵，各位夫人封为王妃。

杨坚在通往皇位的赛跑中开始冲刺。现在，连傻子都知道杨坚即将登基称帝了。

北魏的汉化改革虽然促进了民族融合。但是在政治领域，鲜卑等少数民族掌握着实权。北魏、北齐和北周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上层贵族排斥汉人，热衷于黄河流域的鲜卑化与胡化。杨家就因为从政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之前一直被称为普六茹坚。杨坚上台后

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又下令：“以前赐姓，皆复其旧。”杨坚开始毫不手软地对付反叛旧臣和豪强大吏，清理少数民族贵族队伍。他罢黜了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即便有些人对杨家有着这样那样的功绩；提拔有真才实干的人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这不仅遏止了半个多世纪的鲜卑化趋势，而且也意味着长期处于政治劣势的汉族人能够真正进入政坛。汉族人士自然支持杨坚的执政。

同月，杨坚接受了九锡之礼。不几日，宇文阐又下诏允许杨坚佩带有十二旒的帝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旒头云罕。隋王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这一次杨坚在推让了三次后平稳地接受了。宇文阐又马上下诏，承认周德将尽，天命从宇文家转移到了杨家，自己要依汉魏故事，禅位给杨坚。杨坚依然是再三退让。宇文阐先后派遣太傅、上柱国、杞国公、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等高官贵族敦请杨坚接受帝位。朝廷百官也纷纷劝进，恭请杨坚顺应上天和百姓，登基称帝。杨坚这才点头同意受禅。

杨坚于是在人们的簇拥下，从相国府穿着平常的衣服入宫。在临光殿，宇文阐恭敬地将皇位禅让给杨坚，杨坚更衣即皇帝位。同时，朝廷在长安南郊设祭坛，杨坚派遣太傅、上柱国、邓公窦炽柴燎告天。意思是告诉上天，杨坚做了地上的皇帝。同日，杨坚上告太庙；大赦天下；改年号“大定”为“开皇”；变更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时期的汉族旧官制。《隋书》记载禅让当天，京师长安出现了祥云。整个禅让过程和之后的宣示让长安城忙碌了一天。

这时的杨坚刚40岁。因为杨家的爵位是隋王，因此杨坚依惯例将新王朝定名为“隋”。都城是汉族旧都长安城。

退位的宇文阐还是个年仅9岁的小孩子。杨坚封宇文阐为介国公，食邑五千户，待之以隋朝宾客之礼。介国公的旌旗、车服、礼乐，一应照旧，按照他在位时期的标准配给。宇文阐上书可以不称

表，答表可以不称诏。北周的诸王也都降封为公爵。

三个月后，介国公就死了。《隋书》对这位小逊帝退位后的生活只记载了两句话：“辛丑，陈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来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禅，致之介国。”“辛未，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以其族人洛嗣焉。”前一句话透露了介国公的死因。南陈事先不知道北周禅让的确切时间，派遣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两个人出使北周。两位使节到达长安的时候，北周已经不存在了，隋朝刚刚建立。韦鼎和王瑳两个人都是死脑筋，觉得自己是向北周出使的，现在也理当去见介国公。于是这两个人就去拜见宇文阐，当做完成使命。宇文阐只是个9岁的孩子，哪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接见了南陈皇帝派来的使团。杨坚必定对这件事极为震怒。没几天宇文阐就死在家里了，享年9岁。杨坚在朝堂上为宇文阐举哀。因为宇文阐没有子嗣，隋朝在宇文家族后人中找人延续了宇文阐这一脉。

我们对照《周书》对宇文阐最后生活的描述，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内容。《周书》中说宇文阐当介国公的食邑是一万户，但是一切待遇“有其文，事竟不行”。意思说介国公空有爵位，实际上隋朝并没有给予他相应的待遇。“隋开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时年九岁，隋志也。”在这句话中，《周书》记载了介国公的死，基本史实与《隋书》一样。但最后加了个小尾巴“隋志也”。意思是说，这是隋朝官方的说法，《周书》没有做考证，也不敢对真实情况进行调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介国公宇文阐是被自己的外公杨坚杀死的。

宇文阐被隋朝追谥为静皇帝，葬在恭陵。（巧合的是，杨坚是从宇文氏手中夺取的帝位，其子隋炀帝杨广却又是命丧宇文氏之手。）

四六 金陵王气黯然收



杨坚建立隋朝时，陈朝皇帝陈叔宝对他很感兴趣，很想看看这个枭雄的长相。别人都说杨坚“貌异世人”，陈叔宝就更好奇了，安排一个画家作为出使隋朝的副使去北方，任务是把杨坚画下来。陈叔宝这才看到了杨坚的画像。陈叔宝看到杨坚的画像后，竟然吓得面色苍白，语无伦次起来。他喊道：“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陈叔宝是一个在深宫中被纤纤玉手抚养大的文人皇帝。他可能是被杨坚那魁梧、凶猛的北方大汉形象给吓到了，也可能是被杨坚身上透露出来的凶悍、干练的气质给吓到了。他隐约感觉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克星。

如今，陈叔宝在文学领域的名气比在政治领域要大得多。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词《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整首词写得非常瑰丽，一点乱世的背景色调都没有。陈叔宝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文人想象力，建筑了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整天和妃嫔、狎客们在其中游宴，赋诗赠答。每次宴会开始的时候，妃嫔、近臣和狎客们交杂而坐，饮酒作乐。陈叔宝是文人，在座的也都是文人，对这美景美酒，当场写词作曲。陈叔宝欣赏的都是曼词艳语。文思迟缓、写不出来的人和写得不合陈叔宝心意的人都会被罚酒，写得好的词则被谱上新曲子，交给聪慧的宫女们学习、演唱、配舞表演。陈叔宝通常安排上千名宫女演唱

那些靡靡之音。除了《玉树后庭花》，《临春乐》也是经常表演的曲目。

陈叔宝最宠爱两个嫔妃，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孔贵嫔。张贵妃名丽华，长得是倾国倾城、国色天香，一头秀长的头发拖到地面，光彩照人。而且张丽华很聪明，记忆力很好，能记住连陈叔宝都搞不清楚的大小政务。陈叔宝上朝退朝的时候都离不开张丽华，常常是抱着张丽华坐在自己的膝盖上一起批阅公文。孔贵嫔长得也很漂亮，陈叔宝夸奖她赛过西施和王昭君。孔贵嫔也很喜欢对政务指指点点。于是大臣们就透过宦官，勾结张贵妃和孔贵嫔，卖官鬻爵，党同伐异。

在众多的大臣中，陈叔宝最喜欢的是尚书顾总，因为顾总的诗写得很好，满纸浮靡之气，没有一句有用的实话。因为趣味相投，顾总成了陈叔宝宴会的常客。好事者争相抄传顾总的那些满纸脂粉气的艳诗，作为混官场的敲门砖。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孔范虽然也写得一手瑰丽文章，但赶不上顾总的水平，只好另辟蹊径，和孔贵嫔结为兄妹，结果也成为了陈叔宝的座上客。陈叔宝不喜欢批评的声音，孔范就一心给他文过饰非，凭着一套拍马屁的本领后来居上，做了丞相。

做文人做久了，陈叔宝也觉得不好玩了，就自己去佛寺卖身为奴，算是去宫外“体验生活”，还美其名曰是“褫压妖异”。总之，对于陈叔宝来说，做诗度曲才是正业，而管理国家只是副业，有心思的时候料理一下，没心思的时候就撂到一边去。孔范曾对陈叔宝说：“外间诸将，起自行伍，统统不过是一介匹夫，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深谋远虑。”陈叔宝深以为然，对带兵将帅很不重视。将领们一有小过失，就会被夺去兵权。陈朝边备越来越松弛。

乱世之中，朝廷毕竟离不开军队的支撑。陈叔宝时期，陈朝最著名的将领除了任忠（任蛮奴），就是萧摩诃了。萧摩诃是陈朝草创时期涌现出来的老将军，对陈叔宝有拥立大功。陈叔宝即位后，和萧摩诃结为亲家，娶萧家的女儿为皇太子妃。萧摩诃丧偶，续娶了夫人任

氏。这个任氏年少美丽，体态容貌都很出众。因为和张丽华结为姊妹，任氏经常出入宫廷。在宫中，任氏羡慕宫中风流自在的生活，陈叔宝则被她的美色所吸引，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了。自此，任氏自由出入宫廷，时常留宿过夜，和陈叔宝纵情享乐。任氏对萧摩诃解释说常常被张丽华挽留，夜宿宫中。萧摩诃直肠子，开始还信以为真，后来听到的风言风语越来越多，这才意识到妻子给自己戴了一顶硕大无比的绿帽子。他很生气，又无可奈何，叹道：“我为国家出生入死，功勋卓著，而皇上不顾纲常名分，奸污臣妻，教我有何颜面立于朝廷！”

面对隋朝建立后，南北方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有人提醒陈叔宝加强军备。陈叔宝确自信地认为：“王气在建康，他人又能怎么样？”孔范附和说：“长江天险，阻隔南北。北方的虏军，怎么能过飞渡天堑呢？肯定是那些前线的将领要冒领功劳，妄言事态紧急而已。”陈叔宝觉得孔范的话说到自己心里去了，对长江天险更加有恃无恐，对日益增多的军事警告不放在心上。

而长安的杨坚从登基第一天开始，就开始准备伐陈。他向高颍征求将帅人选，高颍推荐了贺若弼和韩擒虎。韩擒虎，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人，将门出身，当年43岁。韩擒虎小的时候很受宇文泰赏识，在北周时历任都督、刺史等职，参加了消灭北齐的战争，也有过与陈朝作战的经验，屡挫陈师。贺若弼，洛阳人，祖先是漠北部落首领，当时37岁。贺若弼文武双全，年轻的时候就小有名气，被齐王宇文宪招揽为幕僚。他也参加过与陈朝的战争，攻占过陈朝数十座城池，还担任过隋陈边界的寿州、扬州等地的刺史。杨坚对两人都很满意，随即任命韩擒虎为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总管，贺若弼为吴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总管，把平陈重任托付给了二人。

隋朝要吞并陈朝，困难还不小。隋朝建立之初，只是占领黄河流域、江淮地区和四川的割据政权而已。它的南方是并不弱小的陈朝，北方是非常强大的突厥人。突厥骑兵一直盯着富裕的中原地区，时不

时间进长城以南来抢掠一下。开皇元年（581年）九月，杨坚曾经仓促发动过一次伐陈大战，由高颎负责节度诸军。虽然隋军攻占了湖北的长江以北地区，但没有能力突破长江防线南下。而北方的突厥人一看隋朝军队主力南征去了，耀武扬威地杀向中原而来。刚好此时南方的陈宣帝陈顼被吓死了，陈叔宝继位，求和讨饶。高颎有了台阶下，就以“礼不伐丧”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奏请班师。开皇二年（582年）二月，杨坚命令高颎等人撤回，草草结束了伐陈战役。

经过这次失败，杨坚君臣意识到伐陈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拔除许多障碍才能顺利进行。首先，杨坚进行内部整顿，主要是在军事上“将定江表，首置军府，妙选英杰”。君臣一心，经过几年励精图治，隋朝的财政收入大为改善，军力显著增强。其次，隋朝需要有一个有利的伐陈环境。隋朝夹在突厥和陈朝之间，旁边还有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骚扰，不能集中精力对付陈叔宝。杨坚琢磨着，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比陈叔宝的靡靡之音要难对付得多，因此定下先南后北的策略，对少数民族采取抚慰策略。隋朝加强和吐谷浑的联系，不断派遣友好使团，夸奖的夸奖，送礼的送礼，把吐谷浑给稳住了。

突厥铁骑比吐谷浑难对付多了。杨坚即位的第二年，突厥汗国大军就杀入长城作为“贺礼”。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大军再次杀入长城以南劫掠。这一次，杨坚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在反击突厥的战斗中，有一名河西的戍卒，叫做史万岁，毛遂自荐来到辕门前要求参军去打仗。刚好突厥人派了一名勇士来叫阵挑战，隋军将领就叫史万岁去会会突厥勇士，看看这个史万岁有没有什么真本事。结果，史万岁上前三下两下就把突厥勇士的脑袋给砍了下来。突厥军队见自己千挑万选的勇士被隋朝普通的一名戍卒轻易给解决了，大惊失色，从此再也不敢猖獗地叫阵单挑了。史万岁可不是一般的戍卒。他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父亲史静是北周的大将。史万岁从小就学习骑射，好读兵书，少年时代跟随父亲史静参加了北周伐齐的战争，后来又参与平定尉迟迥的反叛。遗憾的是，开皇初年史万岁被牵连进去了

一桩谋反案，被发配到敦煌当了一名戍卒。杀突厥勇士的时候，史万岁已经34岁了。因为表现突出，杨坚不仅免了史万岁的罪，还越级提拔他为车骑将军。

这一回，突厥没有从隋朝掠夺到什么好处。不想，这一次行动就成为了突厥铁骑最后的辉煌。撤军后，突厥陷入了大分裂状况，“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争权夺利，内讧得不亦乐乎。杨坚紧紧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加强北边防御工事，巩固边防。从开皇元年（580年）到开皇七年（587年），七年之间隋朝五次修筑长城、一次在沿边险要筑城，而且越临近伐陈前夕，筑城的时间相隔越近，最频繁的时候两年之中隋朝四度筑城。逐渐地，突厥也不再成为隋朝伐陈的障碍了。

二

解决了北方问题后，杨坚君臣把目光重新折向了南方。

当时在湖北地区有依附隋朝的傀儡政权：西梁。北周被隋朝取代后，西梁又向杨坚称臣。尽管西梁很恭顺，杨坚也不能容忍一个割据政权的存在。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征召西梁皇帝萧琮入朝。萧琮不敢违抗，于是率领群臣200余人从江陵赶到长安朝见新主子。萧琮前脚刚走，杨坚派遣的军队后脚就进驻了江陵城，宣布废掉西梁政权。萧琮一到长安，就被封为莒国公，不让再走了。西梁就此灭亡，存在三十三年。

吞并西梁后杨坚任命三儿子、秦王杨俊为山南道行军元帅，率领水陆大军十余万进屯汉口，负责长江中游地区的军事行动；同时，提拔崭露头角的杨素为信州总管，驻守在永安郡（治所在今湖北新州）。杨素的主要任务是造船——突破长江防线需要大量的船只。杨素制造了每舰能容战士八百人的“五牙”、每舰能容战士百人的“黄

龙”以及规模稍小的“平乘”、“舳舻”等船舰，准备在上游顺江而下，扫平江南。之前北方王朝吞并南方王朝（西晋灭东吴），就是船队出三峡，顺江而下取得成功的。当然了，在庐州的韩擒虎和驻军吴州的贺若弼两支部队才是隋军的主力。他们布置在长江下游，直接威胁陈叔宝小朝廷的心脏地区。韩擒虎、贺若弼面对的是萧摩诃和任忠的部队，是陈朝的主力部队。

部署完毕，隋朝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战前准备。贺若弼向杨坚献上了《取陈十策》。杨坚颇为赞赏，赐宝刀一口，让贺若弼放手去干。

贺若弼的策略是：欺骗。首先，他在广陵驻扎隋军一万人，过一两个月时间就派新的部队将原来的军队替代下来。一万人的军队反复调防，闹得动静很大。一开始的时候，江南岸的陈朝军队很紧张，做好了战备；后来看到隋朝每隔一段时间就反复调军，是例行的军队调动，心想“隋军真是有病，整天瞎折腾”，也就不去管它了。接着，贺若弼不动就带上大队人马，到长江边上打猎，旗帜招摇，人马喧闹。对岸的陈朝军队见贺若弼等人打猎打得很带劲，也没有多想，又在心底想“隋朝真是没人了，让这么一个田猎将军来领兵”，之后任由贺若弼往来江岸各地，不放在心上。贺若弼不仅打猎，还要和陈朝人做生意。南方缺马，贺若弼就用老马和陈朝交换船只。陈朝人不是笨蛋，就把最旧最破的船只换给贺若弼。结果贺若弼买了五六十艘破船，停在江北的军营里。陈朝人以为自己得了大便宜，心想：“隋朝人连好船都没有，把几条破船当宝贝，捏在手里。”

至此，贺若弼已经麻痹了陈朝军队的警惕性。陈军已经对北方的军队调动和将领往来熟视无睹了。暗地里，贺若弼在扬子津集结了大量的战船，在渡口堆积了大量的芦苇、枯荻，堆得像山一样高，把战舰遮蔽得好好的。为了更保险，隋军的所有战船都被涂成和枯荻一样的黄色。即使是陈朝的间谍细作，也没有发觉贺若弼的战备情况。同时，贺若弼常常派遣都督来护儿渡江侦察。来护儿是南方人，在长江两岸驾轻就熟，把敌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大臣高颀则向杨坚建议，在经济上打击陈朝，来个釜底抽薪。

江北地寒，作物成熟比南方要晚；江南土热，自然条件好，水田早熟。江南田地成熟，就要进入农忙收割季节的时候，隋朝突然扬言要发动大军进攻江南。陈朝赶紧调集军队防守，把农田暂时放在一边。等陈朝大军云集的时候，隋朝又偃旗息鼓，没有动静了。陈朝人刚要料理农田，隋朝大军又鼓声大作，陈军只好再次战备。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农时荒废了，江南一季的收成就错过了。同时，陈朝对隋朝所谓的大军讨伐的信息也不相信了，以为又是在逗自己玩。高颀还根据南方的物资储积不是像北方一样放在地窖里，而是放在竹片和茅草建造的房子情况，派出大量间谍纵火，烧毁陈朝的官府储备和军事物资。这样反复几年的骚扰，搞得陈朝不堪其扰，心力财力俱疲。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总攻命令下达了。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杨坚很高调地宣布讨伐陈朝，发誓要统一天下。杨坚君臣给陈叔宝罗列了二十条大罪，抄写三十万份传单散发江南，下诏说：“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诊，在期一举，永清吴越。”陈叔宝君臣看到传单，心想：嗯，隋朝这次又想忽悠我们，让我们白忙一场，我们才不会再上当呢！因此，陈朝上下一点都没上心。

十月，杨坚在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设置淮南行台省，任命次子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总管灭陈事宜。当时杨广刚满20岁，不懂军事，所谓的主帅只是名义上的，伐陈的具体事务由左仆射高颀负责，“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颀”。杨坚给前线调集了五十一万八千大军，制定了分进合击，直指陈朝都城建康的军事计划：晋王杨广由六合出发，秦王杨俊由襄阳顺流而下，杨素的水军从永安东进，韩擒虎由庐江急进，贺若弼从吴州渡江，此外还有荆州刺史刘思仁、蕲州刺史王世绩、青州总管燕荣等人从海陆各地出兵，各军都以灭亡陈朝为目标。

尽管在政治上很高调，隋朝的伐陈战役在军事上却很低调，是典型的突袭战。

589年的元旦夜，吴州方向的贺若弼率军乘大雾从广陵秘密渡过长江。将要渡江的时候，贺若弼酹酒发咒说：“我贺若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翦暴，上天和长江为我作证。如果上天善恶分明，就让我大军得胜归来；如果出师不利，贺若弼葬身江鱼腹中，也死而无恨。”贺若弼说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渡江前进，对岸的陈军竟然没有发觉。等隋军安然渡过长江，杀向陈军各据点后，陈军才仓皇组织抵抗。正月初六，贺若弼成功占领京口（今江苏镇江），俘虏了陈朝的南徐州刺史黄恪和五千陈军。京口是陈军的仓储重地，贺若弼是轻装渡江袭击，没有带领多少辎重，占领京口后利用陈军的储备解决了自身的供应问题。贺若弼下令发给陈军俘虏口粮和遣散费，让他们每个人带上伐陈的传单，各回乡里去做隋朝的义务宣传员。陈朝官兵们捡了条命，都说隋军的好处，高高兴兴地拿着传单散往各地。因为有俘虏的宣传效应，再加上贺若弼所部军令严肃，下令有军士敢拿民间一物者立斩不赦，全军与百姓秋毫无犯，进展顺利。

庐江方面，韩擒虎嫌大军进攻速度太慢，率领五百精骑撇下主力，单刀直入，杀向江南而去。韩擒虎这一支奇兵趁着夜色渡过长江，袭击了江南岸的重要渡口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当时陈军守卫都喝醉了。韩擒虎轻易就占领了重镇采石，继续飞速向建康穿插前进。

隋军煞费苦心对陈朝的欺骗战略取得了圆满成功。陈叔宝君臣依赖的长江天堑就这样被轻易“飞渡”了。

三

各地的军情急报像暴风雪一样涌入陈朝宫廷，形势已经非常紧急

了。

陈叔宝和他的那群文人朋友还是不以为意。仆射袁宪特别着急，奏请陈叔宝发兵抵御，起码也要在首都附近组织抵抗。陈叔宝根本听不进去袁宪的话，对隋军深入州郡告急的现实熟视无睹，每天依旧奏乐侑酒，赋诗歌唱“美好的生活”。他还笑着问左右近臣说：“南北分治以来，北齐曾经三次进攻南朝，北周也出兵了两次，都惨败而去，这是为什么？”孔范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就隔断南北。隋军又怎么能飞渡成功呢？这肯定又是前线将领们想立功想疯了，妄言事急，给自己捞好处。我孔范还觉得自己功劳小、官职低微呢，如果北虏真敢渡江，我就能杀敌做个太尉公了。”陈叔宝对孔范的回答相当满意。当时，有拍马屁的人谣传说隋军的战马不习惯江南的水土，一到南岸后就成批死去。孔范摇头晃脑，叹息说：“可惜了，那些将来都是我们的马，为什么死了啊？”陈叔宝哈哈大笑，跟着孔范一起惋惜起来。建康城的君臣上下从此歌妓纵酒，把前线的告急文书拆都不拆就丢在床底下去，继续生活在天堂里。

却说贺若弼、韩擒虎两军从东西两个方面快速推进，陈军各部望风而散，隋兵如入无人之境。贺若弼分兵堵住曲阿（今江苏丹阳），防止现在长江三角洲及以南地区的陈军增援建康，自己率主力进攻建康；韩擒虎在占领姑孰后，沿着长江逼近建康。不久，建康周边就出现了隋军的前锋部队了。

陈叔宝这才害怕起来。他胆子本来就小，对军事一窍不通，慌忙召萧摩诃、任忠等人来商议军事。萧摩诃因为陈叔宝和妻子通奸，根本就没有为朝廷而战的意志，一言不发。当时贺若弼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钟山（今南京紫金山），被陈朝看做心腹大患。陈朝决定调集诸军在白土冈（今南京东）一带布阵决战。

正月二十日，陈叔宝命令陈军出战，去消灭贺若弼。陈军鲁广达、孔范、萧摩诃、任忠、田瑞、樊毅等部先后逼近白土冈，南北绵

延二十里。贺若弼所部大约有八千甲士。陈叔宝在建康有十万大军。陈军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陈叔宝仓促命令各部进击，事先没有完整的进攻计划。陈军各部之间缺乏协调，分别发起进攻。田瑞首先率部进攻，被贺若弼军击退。鲁广达等部赶到后也投入了战斗。贺若弼抵挡不住，不得不暂时后退。陈军取得了胜利。为了避免陈军追击，贺若弼下令施放烟幕，掩护隋军整顿恢复。在紧张的战斗间隙，贺若弼保持了冷静的思考。他观察到陈军各地得胜后出现了骄情情绪，同时孔范率领的部队阵列和士气最差。于是，贺若弼督厉将士以必死的决心向孔范所部发起决战冲锋。孔范就是一个窝囊废，在贺若弼的反攻面前一败涂地，仓皇逃窜。孔范部队的战败导致了陈军全线溃退。陈军各部缺乏调度，争相逃命，场面失控，有五千多人因为互相挤踏而死。陈朝军队的主力就这样溃散了。贺若弼乘胜追击，推进到乐游苑（今南京玄武湖南侧）。

萧摩诃在乱军中被俘虏。贺若弼命令刀斧手将他推出斩首。萧摩诃毕竟是一代名将，临刑前神色自若。贺若弼很敬佩，下令免罪松绑，以礼相待。萧摩诃投降了隋军。

西边的韩擒虎正在进攻姑苏（今江苏苏州），半天就占领了这座名城，第二天占领新林（今南京市西南）。韩擒虎在江南百姓中的威信很高，许多人昼夜不绝前来韩擒虎军中投降。被贺若弼打败的东边的许多陈军部队也向韩擒虎投降了，其中包括任忠、田瑞等人。陈叔宝也听说了韩擒虎的大名，紧急派遣将军蔡征守住朱雀航（在今南京秦淮河上）。结果派出去的陈军听说对手是韩擒虎，竟然一哄而散。任忠引导着韩擒虎的五百精骑从朱雀门进入了建康城。当时，城内还有部分陈军要负隅顽抗。任忠现身说法，劝降说：“老夫都投降了隋朝，你们还怕什么呢？”任忠在陈朝军队中威望很高，他的喊话涣散了陈军的斗志。残存的陈军纷纷缴械投降。韩擒虎以区区五千人竟然长驱直入，一举占领了建康城。

贺若弼没能第一个进入建康城，因为他在玄武门南遭到了顽强的

抵抗。陈将鲁广达率领残存的部队苦战不降，杀死了数百隋军。一直打到日薄西山，陈军越来越少，隋军越来越多。鲁广达对着陈叔宝的宫阙方向跪地叩首，悲伤恸哭，最后缴械，束手就擒。贺若弼在当天傍晚从北掖门进入建康城。

隋朝大军进入建康城的时候，陈朝的宫廷中依然鼓乐声声，陈叔宝还在那喝酒吟诗。

隋军杀入朱雀门的时候，陈朝的大臣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陈叔宝见原来在身边的人都逃跑了，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仆射袁宪在王朝的最后时刻不离不弃，还在陈叔宝身边。空荡荡的朝廷中，只剩下陈叔宝和袁宪两个人了。陈叔宝伤感地说：“朕从来待众臣不薄，今天众人皆弃我去，只有你留了下来。不遇岁寒，焉知松柏？我朝就要灭亡了，并不是朕无德，而是江东衣冠道尽啊。”诚然，大臣们道德低劣，没有为国尽忠之心，是陈朝速亡的一大原因。但是陈叔宝将王朝湮灭的全部责任推到大臣们身上是不公平的，难道你陈叔宝就没有责任吗？

陈叔宝说完，也要找个地方躲藏起来。袁宪劝说道：“皇上是九五之尊，北兵来了，想必也不敢对陛下怎么样。事已至此，陛下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不如整理衣冠，端坐在正殿之上，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的样子，去见隋军。”陈叔宝哪有萧衍那样的气魄。他又一次拒绝了袁宪的劝谏，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宫廷中找藏身的地方。袁宪还想劝，陈叔宝说：“锋刃之下，哪有儿戏，朕自有办法。”陈叔宝跑到后堂景阳殿，发现了一口深井，突然计上心头。他赶紧去拉来张贵妃、孔贵嫔，三人抱在一起，拉住一根绳子，跳入井中躲藏起来。袁宪一直跟在陈叔宝身边，见皇帝找到了这么一个藏身之处，悲伤欲绝，跪地痛哭，最后朝着深井叩首后，逃命去了。

韩擒虎的部队冲入皇宫后，到处搜索不到陈叔宝。隋兵就抓了几

个内侍，逼问陈叔宝藏在什么地方。一个内侍最后指指井口。隋朝士兵看井里漆黑一团，叫几声没人应答，不相信一个皇帝会藏在里面。有个隋兵往下扔了块石头，才听到下面传来求饶的声音。众军扔下绳子去，喝令陈叔宝拽住绳子上来。大家拉绳子的时候，觉得绳子特别重，有人就打趣说：“别人都说南方人瘦，怎么陈叔宝这么胖啊！”拉上来一看，噢，原来是陈叔宝和张贵妃、孔贵嫔三个人。看着陈叔宝狼狈的样子，众军笑得前仰后翻。

据说当时张丽华的胭脂蹭在井口，有人就把这口井叫“胭脂井”。又有人不齿于陈叔宝祸国自取其辱的行为，把它叫做“耻辱井”。

贺若弼的部队随后进入皇宫。贺若弼听说韩擒虎捉住了陈叔宝，传令将陈叔宝带来看看。陈叔宝来了后，诚惶诚恐，汗流浹背，双腿战栗，向贺若弼求饶不止。贺若弼很实在，安慰说：“你是小国之君，进入我大隋朝后，还能做个归命侯，不需要恐惧！”陈叔宝再三拜谢，心里宽了好多，可还是诚惶诚恐，声音发抖。

四

除了江东战场外，隋军在其他各条战线也都进展顺利。

杨素率领舰队出三峡，原本计划进攻两湖地区。陈军在三峡横缀了大铁索，阻碍了杨素战舰的东下。后来，杨素发动夜袭，一举打败陈军守卫部队，然后率水军东下，一路上舰船遍布江面，旌甲曜日。隋军以破竹之势先后打败各处陈军。一路上，杨素端坐船上，容貌雄伟，两岸的陈国百姓看到他，仿佛看到了江神，心生畏惧。杨素打到巴陵（今湖南岳阳）的时候，隋朝的地方政权已经土崩瓦解了。最后，杨素与秦王杨俊胜利会师。

陈朝南部广袤的岭南地区，处于半自治的状态。隋灭陈的时候，

岭南各地奉高凉（今广东阳江）的冼夫人为主，保境拒守。这位冼夫人是原来高凉太守冯宝的夫人，已经60多岁了，经过了历次的政治风云，威望很高，被岭南人视为“圣母”。陈叔宝被俘后，按照隋朝的意思给冼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冼夫人陈朝已经灭亡了，要求冼夫人带着岭南各州县投降隋朝。杨坚派遣韦洸携带着陈叔宝的亲笔信和冼夫人先前进献给陈朝的“扶南犀杖”招降冼夫人。冼夫人知道陈朝灭亡的消息后，召集各地和各部落首领数千人集体痛哭了一整天，然后派孙子前去迎接韦洸进入岭南。岭南各地也并入了隋朝的版图，冼夫人因功被封为“宋康郡夫人”。

建康沦陷后，江东的部分地区拒不投降。正月底二月初，隋军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消灭江东的陈朝残余势力上。隋朝大将宇文述率领三万人，也参加了伐陈的战争，一度占领石头（今南京城西清凉山）。然后，宇文述联合从海上来的燕荣的军队，将各地的抵抗势力一一击破。

各地初定，高颍作为“接收大员”，先行进入建康，接收陈朝图籍资料，封锁府库。名义上的主帅杨广早早就听说了张丽华的美貌，在高颍出发前私下拜托说：“您进入建康，一定要找到张丽华，不要伤害她啊。”杨广这个傻小子在高颍走了后，一直在做自己和张丽华的若干春梦。谁想，高颍一点面子都不给杨广，把张丽华叫来后，说：“此等妖妃，岂可留得？昔日姜太公灭纣，蒙面斩妲己，我也要学他。”说完，高颍就把张丽华的脑袋砍了下来。

除了求色不成外，杨广的其他作为还是可圈可点的。杨广“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严令军队“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因此天下都称赞他的贤德。杨坚对二儿子也很满意，任命杨广为江南总管，留在南方镇抚各地。杨广奏请宇文述为寿州总管，协助自己统治江南。此后，杨广治理江南十年，期间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杨广、宇文述等人功劳不小。

五

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中国开始迈向大一统的盛世。

隋朝重新统一天下，离不开杨坚、高颀等人个人的作用，更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俗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南北方的长期战乱，主要原因是南北方的民族纷争。在长期的民族争战中，各民族差异逐渐消失，各民族相互融合，产生了文化认同。南朝名将陈庆之从黄河败回后感叹：“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可见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北魏也不再是割据的蛮夷政权了。隋朝初年，大文人薛道衡作为聘陈内史出使陈朝，正月里看到鸿雁从南方返回北方，写下了《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这样的文字，一点都不比南方继承汉族正统学识的文人们写得差。

大家都认为南北方人都是同样的人了，那为什么还要分裂呢？

那么为什么由北方的隋朝统一了天下，而不是陈朝消灭隋朝呢？北方王朝统一天下的必然性在于北方一直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实力强于南方。杨坚即位后，隋朝国势蒸蒸日上，而当时陈朝门阀制度把持政治，土地兼并严重，正处于衰弱时期。北方出了一个隋文帝，南方却是陈后主当政，仅凭两人的表现，我们也能知道应该是谁消灭谁。

南北统一后，高颀带着陈朝的俘虏北归大兴。陈叔宝受到了杨坚的礼遇，生活得相当不错。隋朝每次举办宴会的时候，杨坚怕陈叔宝伤心，规定不能奏吴音。陈叔宝经常参加隋朝达官显贵们的聚会，时间久了，奏请杨坚说：“我没有官爵职位，每次参加朝集，都感到有点

尴尬，希望能获得一个官号。”杨坚听说陈叔宝主动要求当隋朝的官，感叹说：“陈叔宝这个人没心没肺。”陈叔宝在大兴，依然每天醉酒吟诗，很少有清醒的时候。杨坚就向监护陈叔宝的人问他每次饮酒多少。官员回答说：“陈叔宝与其子弟每日饮酒一石。”杨坚大吃一惊，继而感叹道：“随他去吧，否则叫他如何过日？”

杨坚曾对陈叔宝有过一个评价：“如果陈叔宝能把作诗和喝酒的心思用来治国，又怎会有今天呢？”杨坚要感谢历史赐予他的机遇。仅凭统一天下的功绩，杨坚就能够名垂青史。何况，隋唐盛世的大门即将打开，还有更大的机遇等待着他呢！

四七 大文豪、大狂人谢灵运之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在“淝水之战”的推动下，陈郡谢家跻身世族领袖地位。由东晋后期直至南梁，陈郡谢家一直和琅琊王氏并称“王谢”，是南朝的最高门第。

南朝历代皇帝登基加冕的时候，都喜欢找谢家辈分高的人来当司仪，象征着世族大家对新皇帝的支持。谢家子弟慢慢地隐退幕后，不喜欢打理实际政务，但头等门户的光辉始终不落。南梁时，王琮娶了始兴王的女儿繁昌县主为妻。后来，始兴王悔婚，要王琮和女儿离婚。王琮的父亲王峻向始兴王求情。始兴王推脱道：“这是皇上的意思，我也不愿如此。”王峻就放狠话说：“臣太祖是谢仁祖（谢尚）的外孙，我们家也不需要借与殿下联姻来提高门户。”好几代之后，谢家外孙的身份都能让人在王爷面前强硬起来，谢家的门户势力可见一斑。

谢家的崇高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或者说这三个方面支撑了谢家的权势。首先，谢家世代为官，而且都是大官。自东晋至南梁（317~557年），谢氏共有十二代、一百余人见于史传。其次，谢家聚集了大量资产。比如谢安的孙子谢混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到宋代元嘉年间，谢混这一支还有“资财巨万，田园十余所，奴僮数百人”。而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在会稽老家的地产更多，包括两座山、五所

果园和数不清的竹林菜圃。第三，谢家子弟大多才华出众，家族重视文化教育和知识积累。政治世家不管是怎么发家的，发达后都会重视家族教育。文化素养可以提升家族的形象，保障子弟的素质。在崇尚清谈、醉心文艺的南朝，文教更是世族子弟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谢安在家族中隐居时间最长，早期生活最闲，谢家兄弟就把子女留在东山托付给他教育了。谢安仿佛是一大家子的家庭教师，教书育人，不过他的教育内容与政治技巧有关的不多，多数是与文学和做人有关，无意中塑造了陈郡谢家重文学、喜清谈潇洒的家风。后世一直用“芝兰玉树”来指代谢氏子弟，说的也是谢家子弟自由洒脱的才气、秀气。这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一代文豪谢灵运。

谢灵运是名将谢玄之孙、谢瑛之子。谢瑛资质平庸，只担任过秘书郎，娶了王羲之的外孙女，生下谢灵运。也许是隔代遗传，谢灵运继承了王羲之、谢玄的若干优点，文学成就超过了先辈和父亲。

谢灵运的政治起点很高，因为父亲早死，谢灵运8岁就世袭了康乐公的爵位，食邑二千户。加冠后，谢灵运便出任抚军将军刘毅的参军，从此开始曲折的仕途，一生颠沛流离。当时政治上层风浪迭起。谢家渐渐远离了实权，虚名为多，只能在政治风波中随波逐流，难有作为。刘毅在与刘裕的权争中兵败自杀，谢灵运的堂叔谢混被诛杀。刘裕却没有追究跟随刘毅、与谢混关系密切的谢灵运，反而起用他为太尉参军，表示拉拢。此后谢灵运在一系列可有可无的小官职位上时断时续，起起伏伏。不久刘裕取代东晋，当起皇帝建立了宋朝。新王朝建立后，晋朝的封爵不算数了。刘裕为了表示对前朝世族大家的尊崇，宣布对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五家保留封爵，但爵位下降一级，食邑减少。谢灵运因此由公爵降为“康乐县侯”，食邑缩为500户。

谢灵运继承了家族精讲玄学和精通文学的传统，多少有点隐逸自娱的性情和豁达宽松的胸怀。官运不佳没关系，谢灵运把精力都花在

写诗吟词上。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是文学的和蔼倾听者和慷慨支持者。他很欣赏谢灵运的文才，对谢灵运的诗文爱不释手，对谢灵运的洒脱轻浮也很认可，认为自古文人皆如此。刘义真还声称有朝一日要是当了皇帝一定任命谢灵运为宰相。刘裕死后，太子刘义符即位。刘义符年少无才，不久被权臣废黜。按封建宗法，刘义符之后就轮到刘裕次子刘义真继位，但徐羨之等权臣拥戴了刘裕三子刘义隆。权臣们先下诏将刘义真调离京城，接着又以不拘小节、诽谤朝臣的罪名贬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铲除刘义真的羽翼。安排停当，刘义隆顺利登基坐了龙椅。

永嘉在今浙江温州，山水旖旎，风光秀丽，是当今的旅游胜地。但在南朝时，永嘉却是乌烟瘴气，闭塞落后得很。那雁荡山是横亘在人前的天险。谢灵运到了任上，也不问政事，整天寻思着怎么征服山山水水，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为了登山，据说谢灵运发明了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这样上下山既省力又稳当，史称“谢公屐”。如果属实，谢灵运应该在体育史上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美丽的山山水水净化了谢灵运的心灵。他本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登山多少也有逃避现实寻求心灵宁静的目的。永嘉的山水让谢灵运找到了心灵栖息地。很少有人能够在一生中找到抚慰滋补心灵的地方，谢灵运在不幸之后幸运地找到了，并激发出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仕途失利的谢灵运在文学诗歌上找到了成功。他吟唱山水，书写四季，记录日月，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诗歌形式：山水诗。谢灵运就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这里，谢灵运将一个普通的南方庭院有声有色地推到了读者面前。“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在这里，谢灵运和读者分享看到的山色美景。他的诗歌没有两晋诗歌玄思虚幻的色彩，更绝少说教与晦涩，清新美丽，平实易懂，彻底扭转了后世的诗风。钟嵘在《诗品》中说谢灵运的山水诗“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上千年后依然被人传唱。当时永嘉和建康通信不便，

但谢灵运一有新作，立即以最快速度被传抄到建康。人们称“谢康乐的大作来了”，争相传阅，成为时尚标志。

谢灵运在永嘉无为而治，纵情名山胜水，即便如此他也觉得太守的岗位难熬，杵在那里并非自己心愿。到任两年多后，谢灵运称病辞职，回到上虞东山隐居。

宋文帝刘义隆逐渐长大，也加入了谢灵运崇拜者的行列。在铲除权臣巩固皇权后，刘义隆征召谢灵运回朝廷，先任命为秘书监，随即升迁为侍中，恩宠无比。刘义隆称赞谢灵运的诗和字为“二宝”。谢灵运的春天来了！谢灵运身上的文人陋习膨胀爆炸了出来。他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名望在外，夸耀说：“天下才共一石（一石等于十斗），三国大才子曹植独占八斗，我占了一斗。剩下的一斗天下人平分。”他盲目乐观，以为位极人臣、重塑陈郡谢家辉煌的日子就在眼前。他踊跃向朝廷建议，积极和同僚们商谈政事，刘义隆无一采纳。刘义隆很尊重谢灵运，但那是文艺领域的尊重，不涉及权力。他提拔谢灵运在身边，“唯以文义接见”，只是当做文学侍从而已。不料，谢灵运一相情愿地要介入政治。没多久，谢灵运也看出了皇帝的真实意思，皇上对他是用文字轻政治，朝廷真正得道的是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实干之才。他们的门第和名望都不能和谢灵运相比，但他们得势了。也许朝政真的需要他们。谢灵运第二次选择了辞官。他知道这个选择基本上意味着告别了政坛，人生不会再有先前的良机了。谢灵运给自己个政治前途判了死刑。

辞官回乡后，谢灵运守着硕大的庄园，写诗作画，找朋友游玩取乐。他是待不住的人，不时率领数百随从去深山幽谷探险览胜。会稽南边的临海郡在群山峻岭环抱之中，交通极其不便，据说风景优美，但很少有人去过，更没有多少吟诵文章。谢灵运好奇心切，带上五百个家丁家将就出发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是要一览庐山真面目。临海太守王秀得到报告说，有几百人开通了天台山和括苍山，奔临海郡城而来。临海很少有人造访，王秀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伙强

人，不是来攻打郡城就是来打劫的，下令紧闭城门做好防范。谢灵运是来旅游的，却吃了个闭门羹。经过交涉，王秀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谢灵运来临海搞创作了，虚惊一场。谢灵运游兴不减，在临海玩够了，临别时还拉着王秀，邀请他一起继续探索深山老林。王秀可没有谢灵运那样的闲情雅致，更不敢擅离职守，赶紧推辞了。

居家的谢灵运又惹上了麻烦。他要填湖开田，会稽太守孟顗不同意。谢灵运说孟顗不让他开发农田是因为迷信佛教，怕填湖让鱼虾丧生，并嘲笑他说：“得道靠的是天性聪慧，你生在我前，成佛必在我后。”孟顗恨死谢灵运了，告了他一状，说他有“异志”。谢灵运吓得赶紧连夜进京申辩。刘义隆对谢灵运很了解，不仅没有追究，还留他在建康主持典籍编辑。半年之内，谢灵运联合他人编订图书上万卷。

刘义隆觉得谢灵运这个人可惜了，起用他担任临川内史。到了临川，谢灵运仍旧不理政事，终日游荡。人际关系也没搞好，谢灵运再次被地方官员弹劾。自己满腔抱负，非但得不到重用，却多次和那些泥鳅王八纠缠申辩，苍天真是不公啊！谢灵运这次来了气，把告他的人扣押了起来，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满腹牢骚的谢灵运将刘宋王朝比做暴秦，自比张良、鲁仲连。这两位都是要推翻暴秦的人。暴秦是谁？人们第一就联想起本朝来。那么谢灵运是要推翻朝廷了！刘义隆终于忍受不了谢灵运了，决心要治他的罪。司徒刘义康亲自派人收捕他，谢灵运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调兵拒捕。结果罪上加罪，被捕后降死一等，流放广州。

谢灵运依然不改狂放本色，坦荡地到广州去了。不想，刚到广州，新的诏书就跟到了。朝廷称谢灵运叛逆不道，下令就地正法。谢灵运在广州被当众斩首，年仅四十九岁。同时被朝廷下令杀害的还有刘义真。谢灵运被斩首前叹息道：“真是小狂风雅，中狂讨嫌，大狂送命。”

谢灵运的死多少意味着陈郡谢家不可挽回的衰败。在他之后，谢家又出现了一位谢朓。谢灵运与谢朓并称文学史上的“大小谢”。谢朓留下了“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的诗句，风格与谢灵运相近，性情也是洒脱不羁，名声在外，被南齐藩王器重。南齐后期，始安王萧遥光阴谋篡位，谢朓不预其谋，反遭诬陷，下狱冤死。“大小谢”极其类似的悲剧命运何尝不是谢家走向没落的反复宣示。

说到陈郡谢家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连年的战乱和杀戮。孙恩造反时，谢家势力正处于巅峰时期，主持了镇压造反的工作。结果，两年中近十位谢家青壮子弟死于战火，好几支血脉遭到了灭门。之后，桓温的儿子桓玄继承父亲的野心，再次造反作乱，悍然称帝。桓玄一度要占乌衣巷的谢家作兵营。谢安的孙子谢混苦苦哀求。桓玄考虑到桓谢两家的先人关系不错，最后放弃了占谢家为兵营的念头。这两个大劫加上侯景之乱时的杀戮，令谢家蒙受了重大损失。其次，新的政治人物和势力的兴起，尤其是寒门势力的崛起冲击了陈郡谢家等老牌门户。政治气候变了，谢家的政治田地不再旱涝保收了，后代要想重掌祖辈的权力难上加难了。后期，陈郡谢家子弟虽然充斥南朝各代，但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已不多见。世族子弟的无所作为，与政治渐行渐远是有必然性的。陈郡谢家的衰落仅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陈郡谢家在史书上的最后一个名士是谢安的九世孙谢贞。谢贞一生如浮萍一般在乱世中飘荡。侯景叛乱中，谢贞随无数难民被掳掠到长安，后回到南陈，又遇到整天唱着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人生多舛、国家无望，谢贞苦闷异常，又遇到母亲去世，他痛哭气绝，竟然也死了。也许正是这种看似异常的“孝行”才让谢贞在史书上为家族争得了最后的赞誉。

谢贞诗歌才华不错，流传下来的却只有“风定花犹落”一句。有人

说，只凭这一句谢贞就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有人说谢贞这句参诗一语成谶，写出了陈郡谢家和两晋南朝整个贵族门阀的没落。谢贞死后第四年，腐朽的南陈王朝覆灭了，金陵王气黯然收。两晋南北朝世族门阀的昌盛时代正式结束，王谢子弟踪迹难寻，旧时堂前的燕子现在都出入寻常百姓家了。

四八 旧时王谢门前燕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东晋南朝时期，中国的官员录取主要标准就一条：出身。

出身豪门大族的子弟，就算是块木头也能平步青云；出身寒门地主的子弟，就算是文曲星下凡也只能位列下僚，终身埋首文山案牍没有出头之日。这一切的成因都要从九品中正制度说起。

汉朝官员入仕主要靠“征辟”。朝廷觉得哪个人有才华，地方官府或者大官员看到哪个人有能力，都可以直接发文任命他为官。挑选的标准是品德优秀、才学出众。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家族重视家庭教育，“诗书传业”“礼法传家”，子弟都很出色，就世代为官。同时，品德和才学的高下，没有统一的测试标准，主要靠乡党的评议。东汉末期，品评人物优劣的“清议”开始出现。品评人物，影响朝廷的征辟。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默认了之前的现状，又考虑到乱世之中人才四散漂流，乡党评议不尽准确的实际情况，将乡间的评议权力收归政府，设立专门的中正官员评议辖区人才，将人才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品，根据品级的高低授人官职。人事任免的权力被中正官员操纵，加上中正官员都由现职官员出任，新挑选的官员自然都是官家子弟。那些世代为官的氏族子弟就占了优势。所以说，陈群等人创议“九品中正制”之初就是站在氏族大家的立场上，与即将称帝的曹丕讨价还价。随

着氏族官员掌握中正官制，氏族子弟充斥上品，最后出现了“上品无寒民，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入仕的标准简化成了只看家族出身，不问其他。再后来，整个制度异化为纯粹以血缘为标准了。

在东晋和南朝，世族子弟二十岁即可入仕，而寒族子弟要三十岁才能“试吏”（从基本办事员干起）。世族子弟入仕后，垄断清贵显要的官职，比如秘书郎、佐著作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这些官职成了世族子弟的专利，能很快转迁高官。我们看南朝的许多人物传记，“起家著作佐郎”、“领著作”、“掌著作”、“掌国史”、“修起居注”的记载比比皆是。这些人中间，文字功底扎实、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文史之才。而寒族出身的人，即便文采出众也做不了这些官职。南梁时人吴均，是公认的大才子兼史学家，先是“待诏著作”，后来又为梁武帝编《通史》，就因为不是世族出身，一辈子都没当上官。此外，东晋和南朝都明文规定世族可以荫护部分人口，依附世族的人口可以免除赋税徭役；规定世族可以封山固泽，圈地占地；当官带来的地位、权力和收益等好处顺带着也落入了世族子弟的囊中。部分世族还拥有私人武装。这些好处世代相传，又反过来增强了世族大家的势力。

世族出身的好处显而易见，而且越来越大。南方的世族大家们为了垄断仕途和利益，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情。

比如“谱学”开始流行。所谓谱学，就是研究家谱的学问。这可是“大学问”，是明确各个家族贵贱高低，防止寒门地主冒充世族的“根本所在”。所以每家世族都很重视编撰家谱，明确谁是自家人；各家之间相互学习家谱，辨别谁才是同类人。官员选拔，各级中正官员不管才能，只翻家谱，凡是高门大户的一律定为上品。担任中正官的人，除了本身是世族外，还必须对各家世族的祖宗十八代都了然于胸。发展到顶峰时，官场中人都钻研“谱学”，将各家的谱系名讳等背得滚瓜烂熟，免得交往时张冠李戴或者犯了名讳。谁不精通谱学，便被认为“无能”、“不称职”，遭到裁撤。一批一批“谱学家”应运而生，梁人徐

勉著《百官谱》二十卷，为了官员选拔做到“彝伦有序”；陈朝吏部尚书孔奂，因为“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不悦伏”。东晋时，谱学家贾弼之奉命编撰《姓氏簿状》七百一十二篇，集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士族，“凡诸大品，略无遗阙”。后来南梁王僧儒“知撰谱事”（一个专门的谱学官职），在《姓氏簿状》的基础上撰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作为官方的“谱学”版本。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郡袁氏，鲁郡孔氏，陈留阮氏等是公认的高门贵户。而迟至梁朝，官方谱学的前百名都没有南方的土著世族。世族也分高低，永嘉之乱时从北方南渡的世族是高门，欺压南方土著世族。南北世族的内部矛盾一直存在。

修了家谱，世族们又为了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正，联手杜绝与世族圈子之外的人通婚。王谢两大世族就经常联姻，吴郡的朱张顾陆是一个婚姻集团，会稽的孔魏虞谢则是另一个婚姻集团。世族子弟其他都风风光光的，婚姻选择的范围却非常狭窄，门第、辈分和年龄都合适的对象没几个。南齐时期，发生了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的案子，轰动一时。王源的老婆死了，家里又很穷，吴郡富阳人满璋之家境富裕，替子满鸾求娶王源的女儿。满璋之给了五万钱作为聘礼，王源就答应了。五万钱的数目很大，王源不仅操办了女儿的婚事，还用余钱继了弦。不想，当时的世族领袖沈约弹劾王源将世族女子嫁给寒门子弟。王源的曾祖父王雅是西晋的尚书右仆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清官显要，他的世族身份没有人怀疑。但是富阳满家却被世族圈子怀疑是寒门地主。王源解释，满璋之说富阳满氏是高平世族满宠的后代（满宠在魏明帝时任过太尉，其孙满奋是西晋的司隶校尉），自己又见满璋之担任王国侍郎，准女婿满鸾担任主簿，才定下这门亲事的。沈约认为，满璋之的世族门第没有明确根据。满家最后显赫的人满奋早在西晋就死了，后代之后默默无闻，满璋之的家世显系伪造。（可能是各家谱牒中都没有有关满家亲属的一丝半缕的记载。）因此，沈约弹劾王源“人品庸陋”，与满家联姻是唯利是求，“蔑祖辱亲”。最后，王源被逐出世族行列，禁锢终身。可见，世族和寒门之间的界线泾渭分

明。

世族人家更荒唐的是，最后竟然发展到不和非世族的人士交往，甚至想方设法地侮辱主动示好的非世族人士。南齐的中书舍人纪僧真出身寒门，却风流儒雅，一副世族子弟的派头。齐武帝萧赜非常欣赏纪僧真，常说：“人生一世，何必计较士庶门户？不要看纪僧真出身寒人，却是许多士大夫所不及的。”纪僧真因此求皇帝给他“抬籍”（提升进入世族行列）。萧赜不能做主，就让纪僧真去找都官尚书江敳。江敳出身济阳考城江氏，世代显贵，母亲是宋文帝的公主，自己又娶了宋武帝的公主，门第显贵。纪僧真来江家拜访，江敳倚在榻上养神，不等纪僧真开口就自顾自地吩咐小人：“把我的榻子抬远一些，不要靠近纪大人，人家是士族清流，我高攀不上。”下人们过来抬起榻子就走，把纪僧真晾在一边。纪僧真马上知道抬籍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了，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宋武帝时，寒门出身的国舅路琼之，锦衣绣服、郑重其事地拜访王僧达。王僧达出身琅琊王氏，虽无一官半职，但门第高贵。路琼之来后，王僧达冷淡地客套了几句，突然打断路琼之的话问：“过去我家中有一个马夫叫路庆之，不知是你的什么人啊？”路琼之大为尴尬，随即起身告辞。王僧达也不挽留，当即命令仆人将路琼之刚刚坐过的床榻拿去烧掉。路琼之回去后找路太后哭诉，路太后大怒，向宋武帝哭诉：“我还活着路家就这么被人欺凌，我死了路家人还不沿街乞食啊！”宋武帝刘裕是一代枭雄，杀人无数，但对这事一点办法都没有，说了一句：“琼之年少，没有事情去拜访王僧达干什么啊！活该他受人欺辱。王僧达那样的贵公子，岂可以加罪乎？”

二

说到南朝的皇帝们，世族大家和他们的关系比较微妙。世族势力是依附政权产生的，离开了政权他们的世袭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晋室南渡时，北方南下的世族纷纷支持司马睿建立东晋，是为了保障世袭

特权。之后南朝历代禅让，世族大家们都很务实地承认胜利者，主动支持新的王朝，对新皇帝表示效忠。目的也是保障世袭特权。

摆在世族大家面前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南朝皇帝的出身都不高。刘裕就不用说了；宋齐的萧氏虽然算是地主出身，却也不是什么显赫门第，勉强算是寒门；陈霸先则是南方土著出身，以小吏起家。世族们不和新皇帝交往又不行，怎么办？南朝史书特别重视载明人物的家世谱系，凡记世族人物必载其祖先官阶履历，写得越早越显赫越好。于是世族们就给新皇帝编撰一个显赫的祖先，比如说南齐萧道成是西汉相国萧何的第二十四世孙，并煞有介事地拉扯出了从萧何到萧道成之父二十三代世系、官位，一代一代地注明，还将并非一族的萧姓名人也拉扯进来。给非世族的皇帝们编排显赫的谱系，除了对皇帝的奉承外，世族们的主要目的是证明皇帝也是世族中人，从一个侧面证明世族血统的高贵。最终，他们还是为保障世袭特权。

南朝皇帝们需要世族大家们的支持，因为世族的势力异常强大。新皇帝们不能也不敢取消世族的特权。但另一方面，世族势力强大到了威胁皇权的程度，皇帝们不得不出面对世族进行抑制。皇权和世族权力的斗争潜伏在南朝政权发展的始终。

南朝主要的赋税徭役来源是户口登记在册的自由农。但长期来户口政策流于形式，因为世族大家们隐藏了许多人口，供自己驱使，接受自己剥削。为了安置北方南下的百姓，东晋和南朝都设置了侨州、侨郡、侨县。其中的百姓被称为侨人，不算正式户籍，不承担国家税役。东晋和南朝历代都想整理户籍，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统一接受政府剥削。东晋时，桓温、刘裕都亲自主持过户口整理工作，都以严厉著称，还处置过部分人。但世族大家纷纷反对整理户口，害怕经济利益和依附人口受损。最后，历次户口整理都不彻底，侨州、侨郡、侨县始终存在。朝廷和世族的利益都受到了照顾，谁都压不倒谁。

皇帝们在政治上与世族势力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扶持寒门地主势力。世族子弟们都拥挤在那些清贵显要、升迁快速的官职上，逐渐不屑于处理实际政务，导致许多负责实际事务、位置重要的岗位落入寒门子弟手中。寒门子弟没有根基，与世族子弟存在矛盾，就成了皇帝可以栽培的力量。南朝各代，寒门子弟不是典章机要，就是本身通过军功掌握军队，力量上升。世族大家对揽权的寒门人士，每以“恩幸”视之，轻蔑之，侮辱之，不与之往来。然而，寒门地主力量虽有增长，却不能动摇世族势力的根基。一方面，寒门近臣虽然不乏有才干之人，但品德大多低下，文化素质难以与世族相比。他们贪赃枉法，弄权营私，往往较世族更甚。另一方面，他们权重之后，喜欢模范世族奢侈豪华的风气，极力设法混入世族行列，比如之前的纪僧真。世族控制着社会的主流生活形态，惹得寒门纷纷向其靠拢。

所以，无论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暗斗，皇帝们都没有成功。世族势力不断增长。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即覆灭，主要是因为世族彼此之间派系倾轧。顶尖世族之间存在矛盾，南渡和本地世族之间又存在矛盾。朝廷才能利用世族内部的矛盾，谋取均衡，维持政权。

三

南方的世族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老套地说，既有南方社会内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变故。

这内部的原因不是寒门地主势力的上升，而是世族自身逐渐腐化。世族的产生与壮大，重要原因是自身能力强，文化素质高，注意家庭教育。东晋是世族走向鼎盛的时期，豪门大户都注重家学相传。顶尖的世族，比如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的家教和子弟的文化素质，都是出了名的优秀。前期的世族都当得起“书香门第”、“功勋门第”的称号。但随着权势世袭，现成的地位和利益很快侵蚀了世族子弟。反正

不用认真读书、勤奋工作就能坐享其成，为什么还要认真和勤奋呢？久而久之，世族子弟越来越不成器。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民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的小孩，就能当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只要能在信中写问候的话，就可以当秘书郎）。”“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垆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八九代人都没种过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割不分稻麦了，这样的世族大家完全脱离了现实。南梁时，世族人士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涂脂抹粉，出则车舆，入则扶持，找不到能骑马的人。别人送给世族人士周宏正一匹矮小得只能在果树下走的马做礼物，周宏正学会了骑这匹小马，常常骑出去，就被圈子里的人评为“放达”。至于有尚书郎敢骑马，则会被圈子里的人弹劾。建康令王复有一回看到马又跳又叫，大惊失色，颤颤巍巍对人说：“这分明是老虎，怎么叫做马呢？”最后侯景叛乱，世族子弟们肤脆骨柔，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只能坐着等死。

东晋南朝政治的松懈腐败和懦弱，掌权的世族要负主要责任。

外部原因就是侯景之乱开始的一系列变故了。侯景之乱间接导致了南梁的灭亡，摧毁了南方的世族结构。侯景刚投降时，备受宠遇。侯景就想向王谢两家求婚，萧衍劝他说：“王谢门第太高，你配不上。你不妨在南方土著的朱张以下门第看看。”侯景北方人，武人一个，竟然被南方的世族文化这么打击，受不了。他恨上了那些世族豪门，发誓要将世族儿女拉下台来，许配给奴婢。叛乱期间，侯景进入建康后几乎杀绝了王谢二家，其他世族也收到沉重打击。同时，侯景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极大打击了世族大家们的经济和社会势力；他还提拔了大量寒门人士甚至奴婢下人，破坏了原有社会结构。侯景之乱，西魏两次攻略江陵。旧世族势力一蹶不振，面目全非。子弟甚至沦落为农夫商贩。

到陈霸先以胥吏身份登基称帝，南方土著地主抬头，南渡世族势力更加衰落。不久，隋朝兴兵伐陈，南陈覆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南方所有的世族，不论南渡的还是土著的都随着南方政权一起灰飞烟灭了。“旧时王谢门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北方世族的发展和南方不同。就政治和社会上的特权而言，南北世族是一致的，但两者的境遇不同，作风也就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南渡的世族都是盛流名族，他们借着拥戴王室的名义，各自封山占泽，成立庄园，把南方土地看做他们的殖民地，并且歧视南方土著家族，引起严重的侨姓与吴姓之间的对立。而滞留北方的世族，门第本来就不是最高的。他们处在少数民族的统治和压迫之下，不得不扎根百姓结好民众，增强自己的地位，从而博取其他民族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南方的世族是‘借上而凌下’，北方的世族则为‘附下以抗上’。”

南方的世族养尊处优，心态上变得自私自利，不注重家庭。大家族慢慢分裂为小家庭，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分居的占十之六七。他们往往“死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甚至有“共甑分炊饮，同铛各煮鱼”的奇观。平时各自享乐，有事时就各奔东西。北方世族就不同了。因为处境艰苦，同族之间凝聚力越来越强，家族组织趋于紧密的大家庭制。在乱世中，他们往往聚族而居。许多大家族还建立坞堡，聚拢流亡百姓，成为自给自足、亦农亦军的社会组织。少数民族政权不敢轻辱，往往吸纳他们进入政权。世族因为无力驱逐异族统治者，只有隐忍合作，奋斗建立功业保全自己，同时通过参与胡族政权的机会，逐渐把汉族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入其中。因此，北方虽然战乱不休，汉族政治传统却始终没有断绝，反而是将异族统治者的传统融化消亡，最终使少数民族消失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因为汉族世族屹立不倒，始终具有强健的力量，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北齐和北周，历代王室对世族重视并引为己用。北方世族逐渐接触少数民族政权的权力核心，最终将政权重新夺回到汉族人手中。

北魏时期的汉化政策使少数民族加快融入汉族，同时许多汉族世族人士也“胡化”，被少数民族接受为同族。北魏分裂后，北齐高氏汉化程度浅，政权保持了较多少数民族习气，对黄河中下流的汉族世族人士并不重视。东部汉族世族势力发展不起来。而西部的北周政权因为力量薄弱，特别重视争取关中陇西汉人的支持，对关中陇西世族很拉拢。隋唐的建立者杨氏、李氏都是关陇世族人士，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宇文家族拉入北周政权内部的。北周政权和汉人逐渐融合，力量由弱变强，最终消灭了北齐和南陈，时隔四百年后重新统一了中国。北周政权也被汉人出身的杨氏、李氏等关陇世族集团篡夺。中国历史也进入了关陇世族掌权的隋唐时代。

四九 佛教是如何在中国站稳脚跟的

佛教在两汉时期就从古印度传入了中原地区，但是当时人们对佛教教义比较无知，仅仅将它当做道教神仙的一种。少数信奉佛教的人也都是官僚体制当中的上层人士。他们往往将佛教当成和道教的黄老一样的偶像来崇拜。在两汉时期，人们出家为僧是非法行为。所以，当时佛教还仅仅是社会上一种边缘思潮的存在，它的真正盛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解决了自己教义和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刻矛盾，最终在中国站稳了脚跟，绵延千年。

为什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流行？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东汉末期以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越来越不能解释社会的黑暗面，社会各个阶层对儒家学说的信任产生了危机。而此时的道教还处在宗教的原始阶段，被统治阶级视为民间劫党，处于被官府取缔的状态中。当时新兴起的玄学虽然逐步取得了一些思想市场，但它的信仰者基本局限在士大夫当中。于是，中国社会的思想信仰就出现了一种真空，迫切需要一种思想去填补。佛教思想恰逢其时，从天而降。

第二个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王朝像走马灯一样更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动荡的社会是宗教发展的沃土。当在一个社会中，人人都怀着朝不保夕的恐惧和忧虑，神灵的超自然力量自然就成了人们寄托各种美好愿望的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至王公大

臣，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保全身家性命、保护自己财产的迫切愿望。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佛教。我们翻阅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就会看到里面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比如说某个官员因为获罪而被处于死刑，临刑的时候他默念观世音法号，竟能枷锁自脱，还有的官员在行刑前默念佛号，就在这时皇帝赦免的诏书及时送到了，等等。这些被记入正史的传说反映了当时官员在动乱之际，企图信仰佛教来保全身家性命的心理。官僚阶层如此，百姓更是如此。以上两个原因相互作用使得佛教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迅速发展起来。

两汉时期是不准百姓出家为僧的，魏晋时期石虎说我本来就是“戎”人，理当尊奉“戎神”（即佛）。他下令不论华夷贵贱，都可以自由出家。出家的禁令解除了以后，大批百姓为了逃避牢役、保全性命，纷纷削发为僧，求得寺院的庇护。

一般情况下，一个割据政权苛捐杂税，横征无度，百姓们出家为僧的比例就高；如果一个政权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尚们还俗的比例就高。那些帝王和达官显贵们自然不愿意出家为僧，但是他们信佛、佞佛。南朝时期，王谢等世族大家皈依佛门的就有七八十人之多。即便是在东晋末年，晋恭帝还亲自筹措资金数千万，塑造了金佛，步行十余里放置金陵瓦罐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就更出名了，他曾经三度出家到金陵同泰寺，甘愿做一个寺奴，最后都是由梁朝的官员出钱将他赎回。

普通百姓和王公贵族的种种行为推动了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泛滥成灾。最突出的表现是当时中国的南北方都寺院林立，各家寺院收敛钱财、扩充田地，出家的和尚和尼姑数量大增。佛教寺院发展成了庞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据史料统计，南朝的都城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有佛寺五六百所；在北魏的前期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有佛寺上百所，北朝寺庙超过了六千四百所。而南北双方合计的寺庙估计在三万所以上。当时，仅北魏统治区域就有专业的僧尼两百多万人，到了北周时期，这个数量增加到了三百多万人。

民间的信奉和达官贵族的尊崇，使得佛教艺术在当时大为发展。典型的表现就是佛教石窟的大量开凿。今天，我们看到的几大佛教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还有山西天龙寺石窟、甘肃炳灵寺石窟等等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其中最值得说的是敦煌莫高窟。敦煌自西汉设立郡县以来到西晋末年的数百年之间，迅速繁荣昌盛，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镇，成为华戎交汇的大都会。进入魏晋以后，河西地区先后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公元400年，李暠割据敦煌称王，建立了西凉。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了国都。敦煌在前凉、西凉、北凉三个割据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各个政权都注重修理内政，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同时崇尚儒学，兴办教育，招揽了大批读书人和文化精英。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文化昌盛。敦煌成为了文化中心，在当时的敦煌城里，人们能够看到各地前来避难的士人、大师和普通百姓，著名的儒家大师在敦煌开课讲学，往往能够聚集数百名甚至上千名学生。在地理上，敦煌是西域进出中原的交通要道，扼守佛教传入中国的咽喉。西域的商品、文化和宗教源源不断地来到敦煌，中原内地避难的百姓和儒家文化、生产技术也纷纷迁到敦煌，使得敦煌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焦点。在这里，饱受动乱之苦的中原百姓纷纷拜倒在从西边来的“佛”的脚下，希望能够借此解脱苦难。敦煌由此成了佛教东传的原点和西部地区的传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学高僧在敦煌驻足讲经，并经由敦煌进入中原大地。前秦苻坚时期，开始有佛教中人在敦煌城郊区的鸣沙山开凿石窟。据说，当时有人看到，鸣沙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尊金佛，于是萌发了开凿佛教石窟表示虔诚的心意。这场浩浩荡荡的石窟造佛运动延续了千百年，最后造就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敦煌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灿烂的文化以及东西思想的碰撞，全都体现在了一个一个的事物当中，表现为一幅幅著名的、美轮美奂的壁画和一个个淹没在黄沙和谷子堆里的凄美的故事。北魏灭亡北凉，统一了北方以后，河西地区的文化、人物和敦煌的佛教迅速进入中原。敦煌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时候佛教发展的一个驻足点和一个原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泛滥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时期名僧辈出，翻译大盛，是中国佛教思想的奠基时期。西晋永嘉四年（310年），西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洛阳，当时佛图澄已经79岁了。据说他在中原主持建立过八百九十三所寺庙，收了将近一万人的门徒，他在永和四年（348年）的时候，在邺城去世，享年117岁，在他众多的门徒当中，最著名的是僧人释道安。中国僧侣习惯于以“释”为姓，这个做法就起源于释道安。释道安是冀州常山人，18岁出家之前是饱读儒家经书的读书人。他在邺城见到了佛图澄，受到了佛图澄的赏识，之后就一心皈依佛门，弘扬佛法。后赵灭亡后，中原混乱不堪，释道安带着弟子迁徙往来，在东晋兴宁二年（364年）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来到了南方的襄阳。他在襄阳注经、讲经、翻译经文，常常聚集信徒好几百人。

释道安的师傅佛图澄来到中原的时候可能还靠一些迷惑人耳目的魔术来招揽信徒，到了释道安时期，佛学家完全成了严肃的学问，他们靠的是传授思想来招揽信徒。太元四年（379年）的时候，前秦军队攻陷襄阳，苻坚将释道安恭恭敬敬地请到了长安。在长安，释道安组织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的事业，而他的弟子慧远则在前秦军队攻占襄阳以后，带领一部分人逃到了九江，后来定居在庐山。慧远是山西雁门人，他少年的时候游学于许昌、洛阳，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和黄老道家之术。21岁在山西恒山听释道安讲经以后，毅然出家为僧。他在庐山居住了三十多年，弘扬佛法，后来发展成了净土宗。净土宗是当时南方最主要的佛教宗派，庐山成了佛教重镇，前往江南的西域和北方僧人往往汇聚庐山。庐山也发出了一封封探讨佛经的信件，和北方同道通信问学。

北方与慧远同时代的著名僧人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西域龟兹人。前秦苻坚命吕光进军西域的时候，将已年届中年的鸠摩罗什请到了凉州。后秦灭后凉后，又将他迎他到长安。后秦姚兴将鸠摩罗什敬若神明，命僧人八百余人跟他学习。鸠摩罗什最大的贡献是组织了

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事业。他精通梵文和汉字，在几百名助手的协助下翻译了大批佛经，对佛教经典的汉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这些宣扬西方佛教的僧人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兴起了中国本土僧人去古印度求法的热潮。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在东晋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法显和尚。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他3岁的时候就进佛寺做了小沙弥，20岁的时候受戒。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和一些同伴从后秦的首都长安出发，西行求法。求法的道路当中，旅伴时增时减，旅途生活极为艰难。比如，从敦煌到鄯善的一段，法显就不得不以枯骨为标志，在戈壁荒沙中走了十七天。经过三年的跋涉，法显在元兴元年（402年）才越过葱岭，进入北印度。他的足迹遍迹西、中、东印度各地，瞻礼佛陀遗迹，学习梵文，收求佛经。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法显搭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继续求经律法。两年后，他搭乘商船回国，途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最后流落到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过了一年，他才从爪哇搭乘商船回到广州，途中又遭遇暴风雨，漂流了两个多月，结果到达了青州（今山东即墨）。法显将自己沿途求法的经历写成了《佛国记》一书。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是与唐朝的玄奘齐名的人物。

在喧嚣的信佛、崇佛浪潮当中，也有许多人对佛教的泛滥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提出了批评。比如，北魏官员李暘就根据儒家信仰对佛教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中国的圣人不信神，不信鬼，而佛教却宣扬天堂、地狱、灵魂等等，是地地道道的鬼教。他还曾上奏北魏皇帝，认为不应该舍弃堂堂正正之教（即儒教）而从鬼教。南朝官员天文学家何承天则根据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认为其宣扬邪说，自相矛盾。他举了一个例子：鹅吃草不杀生，却最终要被人宰杀；燕子杀生，以虫为食，而家家户户却保护燕子。这样看来，杀生者不一定有恶报，做善者却没有善果。何承天根据佛教思想内在的一些矛盾，认为佛教这些东西是欺骗老百姓的陷阱，应该遭到仁人志士的舍弃。

南北朝时期，对佛教最强有力的批评来自于范缜。范缜是梁武帝

的老朋友，在梁朝初年的时候曾经做到尚书左丞，后遭人弹劾被流放广州，返回建康后担任官卑职小的中书郎。当时，梁武帝崇信佛教，范缜却对当时举朝倾尽财力崇佛、老百姓破家佞佛的行为表示不满，公开发表了《神灭论》。《神灭论》的主要思想就是人的精神和肉体是一体的、共生的，宣扬人死神灭，没有灵魂。这就否定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佛教的教义是博大精深的，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报应和神灵。范缜就根据这两点强调神形不可分，人死则灵魂消灭。后来上至梁武帝，下至竟陵王都驱使了一批佛教信徒与范缜辩论，结果都被范缜驳得无言以对。这也说明当时南北朝社会上下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深，并没有理透佛教的真正深义。很多官僚、百姓崇信佛教，大体都是抱着一种病急乱投医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佛教的博大精深的教义已经深入到人心当中。

佛教泛滥的表面喧嚣，并不能掩盖佛教和当时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对立。

不解决这样的对立，佛教就远谈不上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佛教和中国社会深层的矛盾有哪些呢？除了刚才说的佛教的精神教义并没为中国人正确接受以外，大量人口皈依佛门，大量金钱流入佛门，导致了佛教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争夺财力、物力和人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有一些县的人口不足万人，而一些大的寺庙往往拥有数十万的人口。这样就使得佛教的势力超过了地方州县的势力，这不能不引起各级政府的猜忌。

同时，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古印度，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无非是两种。第一种是出家人四大皆空，不问尘世，入了佛门就是脱离红尘。于是，许多早期的佛教僧侣住在深山老林里面，不问世事，不和世俗政权交往。另一种情况就是古印度的一些王朝，比如孔雀王朝，政教合一，世俗的帝王就是佛教的最高教主。但是这两种情况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不相融的。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中央政权绝不能允许有不受政府公权力管辖的特殊的人物和事例存在。同时，中国也是一个“非宗教”的国度，世俗的帝王不可能兼任佛教的最高教主。这就导致佛教的教义、组织机构和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层次的矛盾。

在魏晋南北朝的早朝，佛教僧侣坚持古印度的惯例，出家人四大皆空，不关心与皇权、官府产生的冲突，干脆就不理会皇权和官场。比如，当时的佛教僧侣看到了达官显贵，既不跪拜也不行礼，常常漠然地擦身而过。这在达官显贵看来就是一个不敬的行为。东晋时期，掌权的大将军桓玄曾经责问南方佛教的领袖人物慧远。他说，僧人看见了官员甚至是看见了至高无上的帝王都不行礼，这是“大不敬”，而这个“大不敬”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当中是可以抄家灭门的大罪。但是，慧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文章来回应桓玄的责难。慧远说：僧人出家，积善积德，实际上是孝敬父母。佛教教义有助于推动文化，其实是在协助官府和帝王教化百姓，所以，佛教僧侣虽然不拜帝王，但是不能说不敬。慧远最后说，佛教僧侣是开天人之路的使者，只要帝王不违背天意、顺从天意，佛教僧侣拜佛也就是在拜帝王。慧远的这种辩解，让桓玄无言以对。

在北方也是如此，北周武帝曾经下诏，佛教僧侣在皇帝面前不得自称“贫僧”，必须称“民”、称“臣”。但是官府的这些命令并不奏效。魏晋南北朝前期，佛教仍然保持着与世俗政权抗衡的局面。这就不能不让世俗的政治人物释怀。魏晋末期十六国的西夏赫连勃勃大王就想出了一个歪招。他出门的时候都要身背佛像。于是，看到赫连勃勃的佛教僧侣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对着赫连勃勃敬拜，这样赫连勃勃就变相地实现了让佛教僧人敬拜自己的目的。但是，佛教僧侣在拜过之后，往往声称他们所拜的是赫连勃勃背着的佛像，而不是赫连勃勃本人。

到了北魏前期，太武帝拓跋焘雄心壮志，要统一中国。他所遭遇到的大问题就是北方的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垄断了大批的人力、财力，并且太武帝害怕佛教僧侣藐视王法，不肯臣服于世俗统治，可能

妨碍自己的大一统的事业。于是，太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据说得到了道教势力的怂恿和大力支持），佛教在北方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佛教的泛滥并不是一两次举起屠刀能解决的。太武帝死后，北方佛教卷土重来，并且盛于灭佛之前。到了北周时期，佛教僧侣竟然达到了三百余万人。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试图抑制一下佛教，于是就在朝堂上宣布“三教”的顺序为：儒家第一，道教次之，佛教第三。排序一公布，北方佛教徒大为不满，自认为要排在道教之前。于是，道教、佛教两派的主要人物当着皇帝的面吵个不休。周武帝宇文邕一怒之下，断绝佛、道两教，没收道观和寺院，迫令出家人还俗。实际上当时道教还被允许保留了两处道观，而佛教却完完全全被废，三百万僧弥被押解回乡，成为接受朝廷的统治的编户，佛教又一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遭受了两次“血的教训”以后，佛教虽然在中国没有绝迹，但很多佛教僧侣开始进行理智的思考。他们认识到，在政治权力强盛、习惯于大一统局面的中国社会，佛教只有跟世俗政权妥协，才能在中国生存、生根、繁盛。释道安就说：“不依国主，法事难成。”为了弘法，佛教僧侣不得不低下头开始屈从世俗政权，在教义和组织上做了不少妥协。此后，他们不但见到帝王、官员，开始主动行礼，甚至见到一般百姓都虔诚礼拜，无论男女老幼。更重大的变化是中国的佛教僧侣主动“修正”了佛教的教义，调和佛教教义和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矛盾。在主张出家、不问世事的同时，佛教高僧们开始认识到，出家人应该服务于社会，遵从世俗政治。他们用释迦牟尼用法力降魔的说法弥合了出家和入世的矛盾。如果这个社会不太平，如果这个社会上还有暴政和不公平的现象，就存在着佛教教义当中的“魔”，作为出家人，佛教僧侣就有义务去深入社会，去驱除这些魔障，还百姓一个天下太平。而如何还百姓一个天下太平呢？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接受世俗政权的指挥，按照世俗政权的命令去救赎、教化百姓。经过这种调和，佛教势力就完全变成了世俗政权可以借助来缓和矛盾的一种工具。

这样的妥协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于隋唐时期，唐宋以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当中，成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僧侣不仅和普通老百姓和乡村士绅相互往来，甚至公然出入帝王豪门之家，恭恭敬敬地遇人就拜。历朝历代还出了一些国师，帮着帝王出谋划策，深层次地参与了政治事务。另一方面，官府深深介入了寺院的经济乃至人事安排，就是在普通州县衙门当中也有一些专门的佛官负责给要出家的老百姓们做证明，给远游的和尚提供度牒。远游的和尚如果没有官府提供的度牒，就是野和尚。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完完全全被改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五〇 说说南北朝官场的“临时工”



南北朝官制大体沿用魏晋旧制。和大的政治环境动荡混乱一样，南北朝的官场也怎是一个“乱”字了得。

一个朝代的官制贵在稳定不变，机构清楚、职权明晰，让政务能够畅通执行，让官吏对自己的行为和前途有明确的预期。同时，一个稳定的官制能够适应政治现实、平衡权力结构。所以，每个朝代莫不将官制视为首要之务，王朝建立之初就搭建政府架构、任官治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自然也想这么做，无奈苦于政局动荡、矛盾丛生，对明晰官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临时”、“随意”就成了这个时期官制最大的特点，官场中出现了不少“临时工”。

南北朝政权都是通过实权人物通过军事斗争建立的。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正常的官制遭到了破坏。这些强权人物往往有自己的一帮人马，组成自己的一套班底，自成体系，绕开了正常的官制和机构，自由行使职权。又由于局势动荡，军、民、财等不再自成系统，往往为了作战或者揽权方便就打破制度和常规。因事设制，因人设官，都很常见。所以，整个南北朝时期，“临时处置”就成了官制的一大特色。

南北朝官制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时起意”，任意增加官额、虚立官

名来安置功臣、贵戚和豪门。官爵成了缓解矛盾的工具，比如一些人为了聚拢人才、积累名声而大肆征辟僚属。各朝中普遍衙门多官员多，人浮于事。官员多了，事情却办不好，衙门和官员相互扯皮，热衷名位，反而造成统治不稳。

当时的实权人物、领兵大将，都建有自己的幕僚和政权组织，甚至拥有私家军队。他们的政权被称为“霸府”。霸府帮助主人夺取政权，就扩充为正式的政权，其中的幕僚和将领就转化为朝廷的文武百官。私家军队也“漂白”为政府军。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霸府和正式政府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南北朝时期，一些人投靠某个实权人物，进入他的幕府，等幕主建立藩镇或者夺取政权后，这些人自然就成了当权官员。今日他们还是某人的幕僚，明天就成了朝廷的三公九卿了。宗室王爷继承皇位、登基为新皇帝后，除了大肆封赏有功的幕僚和私将外，还总要将封国内的所有官员都加官晋爵。这就是南北朝官制的随意之处。

说完南北朝官制的大概情况，下面分北朝和南朝、中央和地方，具体说说官场之乱。

拓跋鲜卑在建立政权初期，保留了大量游牧民族的色彩，政权简单而粗糙。虽然吸收了汉族士大夫做长史、司马，但底子还是少数民族的。一直到道武帝拓跋珪取得并州后，拓跋鲜卑才开始建立正规的政权机构。不用说，他们采纳的是汉族的政治制度，魏晋时期的官制几乎被他们全盘采纳。自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文官，拓跋珪一般都用汉族读书人。汉族士大夫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量才录用。北魏早期正是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对于北方的汉族老百姓来说，虽然统治者换成了异族，但统治的架构还是熟悉的旧时模样，多少能减轻些抵触情绪。

然而，北魏前期对汉族政治制度的吸收还不深入。比如他们保留少数民族的劫掠色彩，不给官吏工资，客观上逼得当官的人去贪污腐

化。另外，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吏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汉族的制度受到了鲜卑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直到孝文帝元宏时期，这个矛盾才得到根本解决。比如元宏施行俸禄制，官吏在俸禄之外受贿一匹，就处以死刑。更重要的是，元宏雷厉风行地推行彻底的汉化改革，大力镇压保守的鲜卑贵族，解决了落后民族和先进制度之间的矛盾。元宏之后的北魏王朝，起码从外表上已经和汉族人的政权没有大的区别了。

孝文帝死后，北魏进入内乱时期。此后贪污腐化之风日盛，贵族豪强求官的人太多，吏部不敢得罪，选拔官吏只好以求官之人的年龄和资历为标准，按顺序补官，而不顾候选人的能力、品德等。北魏官吏大增，朝廷不堪重负，只好削减百官俸禄，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贪污之风。北魏晚期，朝廷干脆卖官鬻爵，考核提拔也以贿赂的多少为准。不仅是州郡长官，就是县里的小吏也要出钱购买。这就使得只有贪污的人才能平步青云，逼得官吏们去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自然，百姓不堪剥削压榨，人心浮动。

偏安的南朝一直是“华夏正朔”，继承了秦汉、魏晋的政治遗风。它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建制度，也不是汉化改革，而是如何在混乱中巩固政权。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在中央实力衰落的情况下，压制住强大的地方藩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成了南朝官制考虑的重要问题。鉴于时局困难、战争频仍，南朝不可能采取“强干弱枝”的手段，客观上必须保证地方有相当的军事和财政实力来保卫中央。所以，从刘宋王朝开始，朝廷一般任用宗室近亲镇守地方。尤其是荆州、江州等强藩的历任刺史，几乎都是皇帝的兄弟子侄。问题是，亲兄弟也靠不住！刘宋、南齐两代内乱不断，哪一次没有担任地方藩镇的宗室亲王的影子？萧道成灭亡刘宋，告诫子孙：若不是刘家骨肉相残，天下哪会落入我们萧家之手！同样的话，萧衍灭亡南齐后，又和子孙重复了一遍。

梁武帝萧衍鉴于前两代皇室骨肉相残的教训，为政宽纵。他大力

推行佛法，同时宽待宗室王公，希望以此来消弭内部矛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问题。结果宽纵导致中央权威丧尽，有实力的宗室亲王蠢蠢欲动。等到侯景之乱起，皇室内部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和南北方矛盾搅和在一起，将江南富庶之地摧残得白骨累累。

二

南北朝中央官制的最大特点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逐步确立，代替原来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变得徒有虚名，基本变成闲散职位。

东汉以来，丞相之名变动了多次，或称丞相，或称司徒。南朝继承了丞相多变的名称，且废置不一，没有定员。中枢政务的实权从东汉开始就早已默默转移到各个尚书手中，经过三国、魏晋，到南北朝的时候已经成为定势。尚书省掌握了中枢实权，真正总揽朝政大权的丞相必须加有“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行。“录尚书事”的意思是负责尚书省的事务，实际上是一个“加官”或者说是“差事”。录尚书事的人有权审阅一切公文。即便是威望极重的权臣，如果没有“录尚书事”的名号，也不能保证权力的集中。所以，判断一个南北朝官员是不是真正的丞相，不看他的官衔，而看他有没有“录尚书事”。

南朝中央朝廷的最尊贵的官衔，继承了西晋时期的“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这八个官衔都是一等一的好名字、好官职，但徒有其名，虽然有官署，却没有实际负责的事务，只是用来尊崇士族或者望重之人的荣衔、虚衔而已。“八公”之下，南北朝还发明了“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也是虚衔。所谓“开府”，指开设府第，设官置吏；之前只有“三公”才有开府的待遇。仪同三司，指的是可以摆设和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相同的仪仗。北朝的最高荣衔和南朝略有不同，北齐的中枢最高官是三师

（太师、太傅、太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下面才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北周则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名称虽然不同，实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虚衔，真正的实权在尚书省。

南朝时，朝廷改尚书台为尚书省。尚书省最高长官是尚书令，副手是左右尚书仆射。在既没有丞相，也没有“录尚书事”的时候，尚书令就是事实上的丞相。

不过为了限制尚书省的权力，防止出现权臣，南北朝的皇帝只将行政权力赋予尚书省，而让身边的中书省参与决策。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监，副手是中书令。中书监、中书令负责草拟诏令、策划国政，分了尚书省的权力。中书省日渐位高权重，成了皇帝的新威胁。于是，原本只是皇帝侍从衙门的侍中寺被扩大至门下省，其最高长官侍中随从皇帝左右，参与朝政，随时作为皇帝的顾问。这样一来，中书省分了尚书省的权力，门下省又限制中书省的权力。朝廷中枢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三足鼎立，分享行政、决策和顾问权力。尚书令与中书监、侍中等同参与朝政。这隐隐中有了唐宋时期三省长官“参知政事”、“参政平章事”的雏形（南朝也有个例外，南陈的国家政务就归中书省，尚书省反而唯命是从）。

三省权力扩大，“九卿”的职权就被侵夺了。和“三公”一样，南北朝的“九卿”也只徒具虚名。有的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虚衙门，有的则“沦落”为后勤服务机构。比如光禄卿在秦汉时是皇帝的侍卫长，负责禁卫军，到西晋时就只有虚名，都被排挤到皇宫之外，只在文武官员大规模朝会的时候才来点个卯而已。北齐时，光禄卿所在的光禄寺成了安排宫廷筵席的衙门。

西魏和北周的中央官制最为特殊。名臣苏绰等人依《周礼》六官制度改革官制，在北周开始实行。北周以天官冢宰总领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五官，形成五府总于天官的

格局。这样的结构简化了机构，有利于皇帝集权。六官只处理日常政务，朝廷大政的决策、审核等都由皇帝授意亲信官员另行处理。不过这个制度存续时间很短，隋朝建立后就被舍弃了。

在中央官制中，御史台是极少数在大乱世中保持不变的机构之一。南北朝时，御史台的长官叫做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不管什么时候，皇帝都很重视对官员的监察，便于自己集权。局势越乱，矛盾越激化，皇帝越需要监察机构。所以，任凭其他衙门沉浮变换，御史台都稳坐钓鱼台。

三

说完中央官制，再说说地方官制和军制。

无论南北，地方官制都是州、郡、县三级制。州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行政长官为刺史，下设别驾、诸曹从事等。首都所在的州，刺史称牧。郡的最高长官为太守，下面有郡丞、主簿等。首都所在郡的长官一般称为尹，比如南朝建康所在的丹杨尹、北周长安所在的京兆尹。郡下为县，大县最高长官称县令、小县称县长，下面有县丞、县尉等。县下还有乡和里。

南北朝的行政区划和官制一样混乱。行政区划总的趋势是：辖境日益缩小，数量大为增加。增加州县，就能多安插人员。比如为了笼络聚民自守的坞堡主，就地任命他们为当地的县令、太守。有的时候则是为了防止强藩出现，朝廷将州县越划越小。比如南朝分荆州南部为湘州，拆交州为广州、交州、宁州等。南朝还侨置州县，产生了许多侨州、侨县。北方则虚分州县。北魏孝明帝以后，豪强、权贵、大族纷纷自立州郡，甚至连只有一百户人家的小城，也称为一州；三四个村子的地盘，也立为一郡。刺史、太守、县令等为数众多。北齐文宣帝的时候，下令缩减行政区划，省去三个州、一百五十三个郡、五

百八十九个县。南朝也有类似的合并州县的举动，但成效不大。

南北朝官制混乱的另一个“重灾区”是军制。乱世重兵，军队规模扩大，军官群体也日益壮大。军衔自然“水涨船高”，总趋势是越定越高、越任命越多。

秦汉时期，“将军”名号是极宝贵、极罕见的，一般授予重要方面的主将、功勋卓著的宿将或者掌管大军的权臣。绝大多数将领也就是“中郎将”、“校尉”等。从东汉乱世开始，“将军”名号开始贬值，获封将军或者自封将军的越来越多。到了南朝，将军就泛滥成灾了。刘宋因为战争频繁，设置了许多将军号，且突破了文武之分，高官要职纷纷兼带将军号。一些压根不统兵的官职，也带上了将军号，只为提高地位而已。至于地方军政首长，大多封将称号。如果刺史或者太守，没有得到将军封号，就是“单车刺史”、“白板太守”，意思是没有实权。这个现象，在南北朝各个政权中都存在。

刘宋将军的尊卑高低，以“四征”（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四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安”、“四平”为序，最贵重者为征东将军。特别尊贵的，则加“大”字，如某某大将军，又在一般将军之上。而最大最贵的则是没有具体名号的“大将军”，不是授予元勋名臣，就是授予把持朝政的权臣。除此之外的其他将军，比如汉朝、三国时期相当贵重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左右前后四将军等，又比如新出现的镇国将军、安国将军、荡寇将军、鹰扬将军、抚军将军等，都被称为“杂号将军”，不是授予一般的将领，就是作为官员的兼职。

南齐时期，“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四个名号异军突起，重于其他将军。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统率京畿地区的中央军，包括各支皇家卫队和驻屯首都附近的正规军。他们控制了皇宫和首都，且部队装备好、待遇好，优于其他军队，颇为其他将军侧目。南梁时期，军衔更趋混乱。据统计，南梁的将军号竟然有三百六

十五个之多。

南北朝还有“以军代政”的趋势。大变乱时代，常常只有统兵的实权人物才能镇抚地方。所以，各个政权也就任命将领们为地方藩镇。这在战时和战后尤其明显，往往是谁攻占了某地，就任命谁为太守、刺史。平时，各朝也以军将为都督，督一郡数郡，或一州数州，同时兼任所在地的刺史或太守，治军又领民。比如刘宋时沈攸之就曾担任荆州刺史，都督荆、襄、雍、益、梁、宁、南北秦等八州诸军事；陈霸先曾为扬南徐二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时，有的将军还加了“持节”的名号，像使节一样拥有节杖，被称为“持节将军”。其中又有什么奥妙呢？

名称不同，权力不同。拿都督来说，“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为次，“督诸军”为下。持节将军以“使持节”为上，“持节”为次，“假节”为下。“持节”意味着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但使持节有权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持节有权杀平民，假节只能诛杀触犯军令的人。都督诸军也好，持节也好，本质上也是临时处置，不是正式官职，而是差遣，是“临时工”。但因为有了差遣后位高权重，人人都争着做这样的“临时工”。

附录：南北朝年谱

420年（宋永初元年）

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国号宋，史称刘宋，刘裕就是宋武帝。南朝开始。

422年（宋永初三年，北魏泰常九年）

宋武帝刘裕病逝，太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宋少帝。

北魏南侵，夺取河南、山东部分地区。

423年（北魏泰常八年）

北魏拓跋焘登基，史称太武帝。

太武帝信用道士寇谦之，于平城起天师道场，道教大盛。

北魏筑长城，东西二千余里，以防柔然。

424年（宋景平二年）

宋少帝被大臣们废杀，刘义隆继位，是为宋文帝。

426年（宋元嘉三年）

宋文帝诛杀权臣徐羨之、傅亮。谢晦据荆州造反，兵败而死。

429年（北魏神䴥二年）

太武帝拓跋焘大败柔然。柔然人南附者数十万人，余部北遁。柔然元气大伤。

430年（宋元嘉七年）

刘宋北伐，失利而返。

431年（北魏神䴥四年）

大夏灭西秦，北魏攻夏，夏主赫连定西迁，为吐谷浑所俘送魏，夏亡。

436年（北魏太延二年）

北魏灭北燕。

439年（北魏太延五年）

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北魏基本统一北方，十六国结束。北朝开始。

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

444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

太武帝下诏禁私养沙门、巫觋，不得私立学校。

445年（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北方盖吴起义，反抗北魏的民族压迫。

446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

太武帝纳崔浩言，禁佛教，毁经像、塔寺，坑杀僧人。

449年（北魏太平真君十年）

太武帝大破柔然，收入户畜产百余万。柔然从此衰落。

450年（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太武帝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名，杀司徒崔浩。

刘宋王朝几乎倾尽全国之力发动元嘉北伐，计划收复黄河以南失地，战败。

太武帝率大军南进瓜步，扬言渡江，建康大震。魏军到处烧杀，所过之处皆成赤地。

451年（宋元嘉二十八年）

正月，魏军北撤，围攻盱眙，宋将臧质坚守。盱眙保卫战打响，魏军战败。

452年（宋元嘉二十九年，北魏正平元年）

北魏中常侍宗爱杀太武帝。

宋文帝闻魏太武帝死，遣萧思话等攻魏，无功而还。

453年（宋元嘉三十年）

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刘骏起兵攻杀刘劭，被拥戴为孝武帝。

457年（宋大明元年）

南宋实行土断，流寓之人编入当地户籍。

459年（宋大明三年）

孝武帝与竟陵王刘诞相忌。刘诞在广陵举兵，孝武帝命沈庆之破

城。刘诞被杀。

460年（北魏和平元年）

柔然攻高昌，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始于此。

云冈石窟大约从本年起开凿，至太和十八年（494年）完成。

462年（宋大明六年）

祖冲之奏上《大明历》。祖冲之推算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其圆周率之精密在世界上为最早。

464年（宋大明八年）

宋孝武帝死。太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

465年（北魏和平六年，宋泰始元年）

魏献文帝拓跋宏即位，年仅12岁，丞相乙浑专权。

前废帝杀戴法兴，又杀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朝野人人自危。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起兵。湘东王刘彧等杀废帝。湘东王即位，是为明帝，改元泰始。

466年（北魏天安元年）

冯太后临朝称制，立郡学，置博士、助教、生员。

471年（北魏皇兴五年，宋泰始七年）

北魏献文帝喜佛道，传位于太子拓跋宏。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

472年（宋泰豫元年）

宋明帝死。太子刘昱即位，是为后废帝。

476年（北魏延兴六年）

北魏冯太后称太皇太后，再次临朝称制。

477年（宋元徽五年）

后废帝刘昱被杀，刘准继位，是为宋顺帝。萧道成开始揽权。

479年（齐建元元年）

萧道成迫宋顺帝禅位，宋亡。萧道成称帝，国号齐，是为齐高帝。

482年（齐建元四年）

齐高帝死，太子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

484年（北魏太和八年）

北魏开始施行“班禄”，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供百官之禄；另增调外帛二匹。给禄之后，官吏赃满一匹者死。

485年（齐永明三年）

南方唐寓之暴动。

485年（北魏太和九年）

北魏颁行均田制。

486年（齐永明四年，北魏太和十年）

唐寓之攻占钱塘，称帝，国号吴。

北魏改宗主督护为三长制。

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

孝文帝借口南征，率军迁往洛阳。

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

北魏朝廷正式从平城迁都洛阳。孝文帝诏禁士民胡服，开始大规模汉化。

洛阳龙门石窟约从本年起开凿。

495年（北魏太和十九年）

北魏禁止在朝廷讲鲜卑语；禁止迁洛代人还葬北方。

北魏在洛阳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推广汉化教育。

496年（北魏太和二十年）

北魏定族姓，改皇室拓跋氏为元氏，其余鲜卑诸姓均改为汉姓。鲜卑八姓与汉四大姓同等。

500年（齐永元二年）

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起兵。

祖冲之死，生前首次把圆周率准确数值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

501年（齐永元三年）

齐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即位，是为齐和帝。

萧衍攻入建康，东昏侯萧宝卷被杀。

502年（梁天监元年）

萧衍为梁公、梁王，杀齐明帝诸子。萧衍推翻齐朝称帝，国号梁，是为梁武帝。

503年（北魏景明四年）

北魏攻克淮河防线重镇义阳。

505年（梁天监四年）

十月，梁武帝任命临川王萧宏统领大军北伐。第二年大败而返。

507年（梁天监六年）

魏军围攻钟离，钟离保卫战爆发。梁军大胜魏军。

范缜发表《神灭论》。

515年（北魏延昌四年）

北魏孝明帝元诰立，胡太后临朝称制。

516年（梁天监十五年）

梁筑浮山堰城，引淮水灌寿阳。秋，堰坏，沿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漂流入海。

520年（北魏神龟三年）

元叉、刘腾发动政变，杀死清河王元怱，幽禁胡太后。

523年（北魏正光四年）

北魏怀荒镇民起义。破六韩拔陵率沃野镇兵民起义，杀镇将。六镇起义开始。

525年（北魏正光六年、南梁普通六年）

胡太后发动政变，诛杀元叉，重新掌权。

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投降南梁。梁军北上，后因主帅萧综叛逃而大败。

527年（梁普通八年）

梁武帝萧衍在同泰寺出家为僧，三日后返回。此后二十年，萧衍又三次出家，大臣用巨金赎回。

528年（北魏武泰元年）

胡太后毒杀元诩，并扶持小皇帝元钊。

尔朱荣以为元诩报仇为名起兵，杀胡太后及元钊，并在河阴屠戮文武百官，史称“河阴之变”。

尔朱荣在邺城大败葛荣，降服百万起义军。葛荣遇害。

529年（梁中大通元年）

北魏北海王元颢在梁军扶持下称帝。梁军一度攻克洛阳，旋即被尔朱荣大败。元颢被杀。

530年（北魏永安三年）

元子攸杀尔朱荣，尔朱荣余党攻陷洛阳，杀元子攸。

尔朱家族先拥立元晔为帝，后又逼元晔禅位给元恭。

531年（北魏普泰元年）

大将高欢起兵讨尔朱氏，立元郎为帝。

532年（北魏普泰二年）

高欢废元恭及元郎，立元修为帝，自为大丞相。元修就是孝武帝。

534年（北魏永熙三年）

高欢举兵向洛阳，孝武帝奔关中，依附大将宇文泰。

高欢入洛阳，立元善见为帝，是为东魏孝静帝，东魏迁都于邺。

闰十二月，宇文泰毒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都长安。

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

535年（西魏大统元年）

西魏丞相宇文泰定新制二十四条。苏绰制定公文格式及计账、户籍之法。

537年（西魏大统三年）

宇文泰在沙苑大败高欢，史称“沙苑之战”。

538年（西魏大统四年）

东魏与西魏在洛阳周边大战，史称“河桥—邙山之战”或者“河阴之战”。

541年（西魏大统七年）

西魏宇文泰在苏绰、卢辩等人相助下开始改革。

543年（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

西魏与东魏在河桥、邙山地区再次大战，史称“邙山之战”。

547年（东魏武定五年）

东魏高欢死，子高澄嗣位。孝静帝被高澄幽禁。

侯景叛乱，试图割据河南，同时“归降”西魏和南梁。南梁出兵支援侯景，西魏出兵蚕食河南州县。

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

548年（梁太清二年）

南方爆发侯景之乱。侯景于寿阳起兵反梁，渡江直入建康，围台城。

549年（梁太清三年）

侯景陷台城，梁武帝萧衍死，侯景立萧纲为帝，是为简文帝。

陈霸先在岭南起兵，讨伐侯景。

550年（北齐天保元年，西魏大统十六年，南梁大宝元年）

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为帝，国号齐，都邺，史称北齐。高洋就是齐文宣帝。

西魏宇文泰创立府兵制。

湘东王 萧绎发布檄文，讨伐侯景

551年（梁大宝二年）

侯景废简文帝，立萧栋，很快又废栋自立，国号汉。

552年（梁承圣元年）

王僧辩、陈霸先克建康，侯景东逃。

萧绎在江陵即位，是为梁元帝，向西魏称臣。

553年（西魏废帝二年）

西魏攻占益州。

554年（西魏恭帝元年）

西魏陷江陵，梁元帝萧绎被杀。

555年（梁绍泰元年）

萧詧在江陵称帝，称藩西魏，史称后梁。这是西魏的傀儡政权，领土只有江陵附近几个县。

北齐强迫王僧辩在建康拥戴萧渊明为帝。陈霸先起兵讨伐，杀死王僧辩。萧渊明退位。

陈霸先拥戴萧方智登基，萧方智就是梁敬帝。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梁太平元年）

陈霸先大败南侵的齐军。

西魏仿《周礼》建六官。

宇文泰死，世子宇文觉嗣，侄宇文护统理军国事。

岁末宇文护迫魏恭帝禅位给宇文觉，西魏亡。

557年（北周孝闵帝元年、梁太平二年）

宇文觉称天王，是为孝闵帝，北周建国。

宇文护废宇文觉，立宇文毓为天王，是为明帝。

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是为陈武帝。

559年（陈永定三年、齐天保十年）

陈霸先病逝，侄子陈蒨继位，是为陈文帝。

高洋病死，长子高殷继位。

560年（北周武成二年、北齐乾明元年）

宇文护废明帝，立宇文邕为帝，是为周武帝。

高殷被废为济南王，叔叔高演即位，是为孝昭帝。

561年（北齐皇建二年）

高演病逝，传位九弟高湛，是为武成帝。

564年（北齐河清三年）

北齐颁新律令，又重新颁布均田令。

565年（北齐河清四年）

高湛传位于太子高纬，自为太上皇帝。高纬就是齐后主。

566年（陈天康元年）

陈文帝逝世，长子陈伯宗即位，是为废帝。

568年（陈光大二年）

陈伯宗被废为临海王，叔叔陈顼即位，是为陈宣帝。

574年（北周建德三年）

周武帝宇文邕禁佛、道两教，毁弃经像，强令和尚、道士还俗。

575年（北周建德四年）

北周大举攻齐，因周武帝急病退兵。

576年（北周建德五年）

周武帝率兵再次攻齐，在平阳打垮齐军主力。周军攻破晋阳。

577年（北周建德六年）

周军攻破北齐首都邺城。北齐灭亡。

578年（北周建德七年）

周武帝死，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宣帝。

579年（北周大成元年）

周宣帝传位于太子宇文阐，是为静帝。

580年（北周大象二年）

杨坚总国政，先后平定起兵反抗他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

581年（隋开皇元年）

杨坚接受宇文阐禅位，建立隋朝，年号开皇。杨坚就是隋文帝。

隋军伐陈，未能突破长江防线，于第二年撤回。

582年（陈太建十四年）

陈宣帝死，陈叔宝继位，是为陈后主。

583 年（隋开皇三年）

突厥大军杀入长城以南劫掠，遭到隋军反击。

587年（隋开皇七年）

杨坚征召西梁皇帝萧琮入朝。西梁灭亡。

588年（隋开皇八年）

三月，隋文帝杨坚任命杨广为主帅伐陈，统一战争开始。

589年（隋开皇十九年）

正月，隋军攻破建康，陈叔宝投降。陈朝灭亡。

参考文献

- [1]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
- [4]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5
- [5]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
- [6]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
- [7]程应镠．南北朝史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 [8]周一良、邓广铭等．中国历史通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
- [9]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0]沈起炜．细说两晋南北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11]张程．禅让．北京：线装书局，2007
- [12]邹纪万．魏晋南北朝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 [13]陈美．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重庆：重庆出版

社，2009

[14]陈英．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汉化心理剖析．甘肃社会科学，2005（2）

[15]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读书，1996（5）

[16]傅义汉．从太子询被杀看北魏的迁都斗争．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9）

[17]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8]陈爽．河阴之变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历史中国

• 907—979

唐失其鹿，
群雄逐之。

唯唐强已壮者能尔。

历史罕见大混乱时代！

政教崩溃，穷民角虎，战皇不暇。

衰乱之世，为何后周能定天下大野？

霸儒华夏——五代第一明君——柴荣，英雄敌不过天意？

狼虎从中也立身，二五朝宰相——冯道为何能做「不倒翁」？

一代词祖——南唐后主——李煜，到底因何招来杀身之祸？

天下汹汹，谁得其鹿？打通历史脉络，

讲述热血传奇的乱世——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

原来是这样

姜狼◎作品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五代十国原来是这样

姜 狼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录

五代

满城尽带黄金甲——盐贩子黄巢的造反人生

背叛你是有道理的——站在十字路口的朱温

上源驿的大火——一场足以改变历史的故意纵火事件

虎生双翼——朱温冲破牢笼之战

得罪了文人，骂你一辈子——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朱温

朱温的爱情

爬灰爬到死——荒谬的朱温之死

不作死不会死——朱友贞是如何成为“梁末帝”的

守余有余，开疆不足——略说沙陀枭雄李克用

李存勖教会我们在羽翼未丰之时如何以退为进

风云帐下奇儿在——李存勖扬名立万的三垂冈及柏乡之战（上）

风云帐下奇儿在——李存勖扬名立万的三垂冈及柏乡之战（下）

花样作死——“唐光武”李存勖覆亡记（上）

花样作死——“唐光武”李存勖覆亡记（下）

文盲治国，斯民小康——李嗣源平淡而不平凡的帝王路

李嗣源用冯道为相的窍门

不能持家，何能治国——李嗣源的家事

喜从天降——咸鱼李从珂翻生记

双雄记——李从珂与石敬瑭的命运纠缠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汉奸石敬瑭

盱食宵衣，礼贤从谏——说说石敬瑭的另一个侧面

宁可当孙子，也不当奴才——五代晋辽关系破裂始末

虎头蛇尾——一地鸡毛的晋辽大战

下山摘桃子——刘知远的发迹之路

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史上最残暴的后汉政权

自作孽，不可活——乾祐之变始末

被逼着做皇帝的郭威

郭威是个好皇帝

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之生平

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之战高平

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之战寿州

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军事、政治、佛教改革篇

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土地、货币、工商业改革篇

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城建、治河篇

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刑法改革及文化改革篇

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有关北伐契丹的话题

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之总评英雄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生存之“道”（一）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生存之“道”（二）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生存之“道”（三）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生存之“道”（四）

十国

心狠手辣才能成大事——偷驴贼王建的发迹史（上）

心狠手辣才能成大事——偷驴贼王建的发迹史（下）

一代军事战略大师孟知祥

仁者——三十二年太平天子话孟昶（上）

仁者——三十二年太平天子话孟昶（下）

铁血东吴——说说江东枭雄杨行密

决战孙儒——杨行密差点没迈过来的那道坎

扫荡江东——杨行密的称霸之路

权相——有实无名的枭雄徐温

借鸡生蛋——南唐开国皇帝李昇诡异的人生路

志大才疏，败家帝王——说说才子皇帝李璟

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悲喜人生之继位篇

[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悲喜人生之奢侈篇](#)

[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悲喜人生之爱情篇](#)

[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悲喜人生之亡国篇](#)

[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悲喜人生之降虏篇](#)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聊一聊有趣的钱婆留（上）](#)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聊一聊有趣的钱婆留（下）](#)

[开山福建，一代明王——福建历史上绕不过去的王审知（上）](#)

[开山福建，一代明王——福建历史上绕不过去的王审知（下）](#)

[木匠传奇——楚王马殷并不算波澜壮阔的人生路（上）](#)

[木匠传奇——楚王马殷并不算波澜壮阔的人生路（下）](#)

[帝王中的天才，帝王中的疯子——南汉的神经病皇帝刘岩](#)

[在刀尖上跳舞——荆南小政权的生存之道](#)

[活在虚幻的悲剧世界中——北汉老皇帝刘崇的悲苦人生](#)

[附：五代十国世系年表](#)

[返回总目录](#)

关于本书

唐失其鹿，群雄逐之。盛世繁华的大唐，已在历史的烈火中化为一堆残墟废烬，霓裳羽衣的风流，早成不堪回首的伤痛。天下汹汹，谁得其鹿？唯兵强马壮者能为尔。五代十国，常被认为是残唐之余，枯燥乏味，远不如相同历史轨迹的三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悲壮的，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魅力，爱与恨，刀与火，绝望的呐喊，五代十国同样拥有。本书力求从涉及五代十国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资治通鉴》等乱如麻团的史料中，分析辩驳，寻找挖掘出最接近时代的历史真相。

五代十国能绝世风流者三：帝王中柴荣，大臣中冯道，诗词中李煜。柴荣才是结束唐末以来战乱的最关键人物，只天不假年，否则必将成为唐太宗那样的千古一帝。冯道在乱世中王朝扶杖入相，天下礼敬，他的处世之道，于今人生存大有裨益。李煜的人生悲剧，那一篇篇和着血泪的词文，触动着每一颗柔软的心灵。柴荣、冯道、李煜，书写着五代十国最为华丽的时代篇章，但五代十国的风流人物何止千百。铁血朱温、风流李存勖、仁厚郭威，狡黠王建，疯狂刘岩，志大才疏李璟，以及无数名臣名将，他们自己的人生悲喜剧，共同打造五代十国这一绝美的历史大戏。五代十国的精彩，扣人心弦，在他们的热血风流中，后世的人们可以从中品味出人性的真实。

五代

满城尽带黄金甲

——盐贩子黄巢的造反人生

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华大地上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安史之乱，虽然唐王朝用了七年时间镇压安史之乱，但开元盛世的荣光一去不复返。“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已成绝响。

天下纷纷扰扰一百年，传祚至“姿貌雄杰”懿宗李漼，昏庸残暴，朝令夕改，近小人，远贤臣，十四年间竟然任命了二十一位宰相，太监又开始得势。其堂兄武宗李炎、其父宣宗李忱用近二十年时间积累下来的大好局面被昏庸的李漼彻底葬送掉了。

李漼死后，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性格比其父更加庸懦的十二岁小童李僖登上帝位，史称唐僖宗。李漼虽然昏庸，但也没有认太监当干爹，但李僖就敢厚颜无耻地称太监头子田令孜干爹，即“十军阿父”。

传至僖宗李僖时，政治极度腐败，藩镇连年战乱，老百姓在双重搜刮下已忍无可忍，最终扯旗造反。“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其中以盐贩子王仙芝铺的摊子最大，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率三千人揭竿而起，指责唐朝“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这也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上首次提出“平均”的概念。

王仙芝的摊子还不是最大的，埋葬唐王朝的煞星终于站在了王仙芝的身后，就是几乎家喻户晓的私盐贩子——黄巢。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充满杀气的《不第后赋菊》，是黄巢留给历史最著

名的印记。

其实黄巢本来是可以成为唐朝官员的，可恨的主考大佬不识货，硬把灌了半肚子墨水的黄巢给黜落了。黄巢一怒之下写了那首反诗，然后跟着王仙芝闯荡江湖，立志要推翻腐败的唐王朝……

王仙芝造反的目的只是想和唐朝讨价还价，弄个大官做做。黄巢则反对在羽翼未丰的情况下仓促谈判，你本钱太少，能谈出个卵来？

黄巢最终还是选择了单飞，而王仙芝失去黄巢后则如无头苍蝇般乱撞，最终在申州（今河南信阳）被官军击败，命丧黄泉之下。黄巢还在坚持着自己的帝王梦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在得到王仙芝的旧部后，黄巢在亳州城外立纛称王，自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属。

黄巢以为唐朝腐朽不堪一击，但他很快就在现实面前撞了一头大疙瘩，在江北被官军一路追着暴打。虽然唐王朝也向黄巢招安，但条件是黄巢必须解散军队。乱世混江湖，没有了军队，一毛钱都不值，黄巢当然选择了拒绝。

江北不能立足，黄巢则选择了向官军实力较弱的江南发展，同时江南又是朝廷财富重地，有利于军队的财政补给。江西杂牌军实力有限，很快就被黄巢手下这群北方悍将打败，但黄巢没有在江西建立战略根据地，原因很有可能是江西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黄巢本想攻打宣州（今安徽宣城），目标有可能是金陵，但唐朝的宣歙观察使王凝将黄巢迎头暴打一顿，黄巢又改变主意，进入物产丰饶又有险可守的浙江。可惜在浙江黄巢遇到了更强硬的对手，就是后来开创吴越一代霸业的钱镠。钱镠留在石镜镇（今浙江临安东）设伏，乱箭击杀黄巢军。黄巢弄不清杭州军的底细，不敢多留，起义军走了七百多里山路，直入福建。浙江待不下去，黄巢又像无头苍蝇一样，翻山越岭七百里，进入了在当时比较偏僻贫瘠的福建。

福建更不是黄巢的命中真龙所在，唐朝的淮南节度使、一代射雕名将高骈一直追到了福建，把黄巢打得鼻青脸肿，大将毕师铎、李罕之、秦彦等人投降官军，只有偷锅的无赖朱三跟着黄巢南下广州，追逐着各自的梦想。

在福建期间，黄巢做了一件深得人心的事情，就是他下令凡是抓到读书人，不但不杀，反而给肉吃。黄巢突然来这一笔，说到底还是他心中的进士情结所致，如果不是考官昏庸，他现在早就成节度使了，又怎么会沦落成贼？至于黄巢杀处士周朴，实在是周朴不识抬举，大骂黄巢是贼，自寻死路而已。

广州虽然富庶，但也不是黄巢的龙飞之地，毕竟北方人多不习岭南水土，很快就暴发大面积疫情。当然，黄巢在岭南只是休整，顺便和唐王朝扯了几回皮条，争取四个月的时间喘口气。养精蓄锐，黄巢的目的自然是三百年雄霸东方的西京长安城。

黄巢的计划是过长江先取襄阳，次取洛阳，最终总攻长安。但黄巢在襄阳遭到了山南节度使刘巨容的沉重打击，死伤数万。黄巢只能带着幽灵一样的军队，再次过江进入江东宣州一带寻找战机。由于唐朝在江南税赋最重，百姓生活极端困苦，黄巢一到，迎马拜降者有二十万，黄巢势力迅速壮大。在打掉了贪婪的淮南节度使高骈之后，黄巢觉得是时候去长安追逐他的伟大梦想了。

唐广明元年（880年）七月，黄巢军在采石矶横渡长江北上，在江南腹地吧官军主力打得找不着北，官军望风披靡，非降即逃。十一月，黄巢军占领东都洛阳。洛阳是长安门户，洛阳失守，长安城中金紫贵胄都知道意味着什么。小皇帝李僮非常痛快，连夜带着七姑八婆老太监们逃出金光门，跑到成都避难去了。

而在西逃不久，李僮之前苦心经营的潼关防线便告失守，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率一票纨绔子弟兵被黄巢的六十万人马吃得连骨头渣子

都不剩。

皇帝逃了，前线的弟兄们自然都知道该怎么做，大不了换个皇帝磕头就是了。在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的热情张罗下，唐朝留守长安的大员们挤成了一锅粥，伏跪在灞上柳桥边，恭迎冲天大将军。

黄巢入城的仪式非常震撼，《资治通鉴》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极为精彩：“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輜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这一天是唐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初五。

而五天之后，即十二月初十，黄巢在长安含元殿正式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不过因为称帝太过仓促，黄巢登基时没有衮冕和金石乐，只能用弋绋（黑色丝织品）画成了衮冕的模样，用牛皮大鼓代表金石，喽啰兵操长剑大刀立列殿上，仿佛不像是长安含元殿，而是水泊梁山的聚义厅。

黄巢心满志得地坐在大殿上，接受各怀鬼胎的唐文武百官山呼万岁，黄巢骄傲地笑了。但令黄巢所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恰恰是他这个大齐皇帝滑向深渊的开始。

答案并不难找，一句话：黄巢没有建立自己的战略根据地。

刘邦以汉中为根基，李渊父子以河东为根基，朱元璋以江东为根基，黄巢的根基在哪里？他根本没有根基。换言之，黄巢一直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奉行“流寇”主义，今天在山东，明天在河南，后天跑到了湖北，大后天竟然窜到了广东。如此长线作战，军需可以就地解决，但人心不附，各阶层不会从根本上支持黄巢，这才是黄巢最大的要害所在。除了没有根据地，黄巢另一个严重的失误是没有搞统一战线工作。近代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说：就是把敌人搞得

少少的，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敌人。

其实黄巢刚进长安时，也知道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给老百姓画了一张政治大饼，但对于中上层的官僚士绅，黄巢采取的是严厉镇压。“因大掠，缚桎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殁，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黄巢部下大将尚让为了泄愤，杀掉了三千士人，“宁左毋右”，彻底得罪了足以影响政局走向的官僚集团和士大夫集团。

在封建时代的社会大背景下，得罪了官僚和文人，下场可想而知。

长安的富豪阶层几乎被杀光，同属于剥削阶级的已投降黄巢的大员们开始拉开了与黄巢的距离，代表人物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原因很简单：王重荣等人都是富豪阶层，黄巢杀他们的阶级兄弟姐妹，甚至连张直方这样的降将都株连三族，他们还能活几天？黄巢甚至还要掏空王重荣的钱袋子，“调财不已，又将征兵”。面对黄巢的贪得无厌和残暴无礼，王重荣终于忍无可忍，打响了向黄巢反击的头炮。

王重荣“造反”，大齐皇帝自然恼火，立刻派头号大将朱温从同州过河，会同自己的弟弟黄邲击王重荣。礪山朱三自跟着大哥黄巢闯荡江湖，几乎是战无不胜，偏偏这次就栽在了王重荣手上。王重荣的河中军大破黄巢军，尽劫其粮船，复引兵进抵渭水北岸。

黄巢没有建立战略根据地的恶果开始显现，粮草开始接济不上，关中地区也早被黄巢搜刮干净，再也刮不出一文钱养军。几十万大军没饭吃，后果不言而喻。黄巢因为志在长安，所以放弃了在南方割据称王的机会，最可惜的是放弃了湖南这块鱼米之乡的宝地。湖南北有长江天堑，东与南各有大山与赣、粤相隔，西凭大山绝于贵州，而且湖南气候适宜，很少有大疫情发生。其距离中原只一江之隔，如果黄

巢能守住湖南，控甲十万，俟中原有变，立时可饮马长江，挥旗北上，开河洛，定关中，并非难事。

此时的黄巢也许后悔自己当年的轻率，但为时已晚，唐朝各路军阀开始进围关中，这里显然不能再承载大齐帝国的存在了。唐广明二年（881年）四月，黄巢主动撤出长安，率军退屯于灊上（今陕西西安南郊）。唐军随后入城，接受城中百姓的山呼万岁。仅仅过了半年，救世主黄巢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恶魔，百姓恨黄巢入骨，“以瓦砾击贼，拾箭以供官军”。这一点也证明了军事失败其本质都是政治失败，项羽如此，李自成如此；洪秀全如此，蒋介石也是如此。

其实黄巢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当年的轻率决定，他完全可以率军南下，穿过河南，过江进入湖南一带割据。但黄巢却放不下长安的花花世界，在杀了一个回马枪之后，又占领了长安。结果，黄巢一头扎进了鸟笼子里……

受到巨额赏金刺激，各路诸军为了能摘下黄巢的项上人头，几乎是三军用命。几通砍杀之下，黄巢军实力受损非常严重，黄巢能掌握的兵力也不过十五万人。更何况，当时天下人闻之色变的由河东沙陀人组成的四万黑鸦军已进逼长安，黑鸦军大头领，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独眼龙——时任河东节度使的沙陀人李克用。

河东有极为丰富的马匹资源，而且沙陀人身强力壮，沙陀骑兵在当时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黄巢也久闻沙陀人的大名，听说李克用来了，包括黄巢本人在内的齐军上下都为之气短。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唐中和三年（883年）二月，黄巢尽出主力十五万，尚让、黄揆、黄邛、林言、王璠、赵璋等将星列其后，在沙华山西北的梁田坡，与以李克用为首的唐各道藩镇决一死战。

以现在双方的战斗力和斗志而言，结果是不言自明的，“明日，大战，自午至晡，贼众大败，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黄巢在惨败后侥幸逃到河南，想在河南东山再起，可黄巢在河南却遇到了更加难缠的对手，比如在不久前背叛黄巢的大将朱温。此时的朱温已是唐朝的宣武军节度使，风光正盛，极为卖力地阻击旧主黄巢。

黄巢始终不愿进入江南称王，白白在河南浪费了一年时间，结果又被李克用追上了。五万沙陀兵继续向落魄的黄巢展示他们强健的肌肉，在黄巢准备强过王满渡，去汴州找朱温算总账时，被李克用从后面追上，“乘其半济，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贼遂溃。尚让帅其众降（守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时溥，别将临晋李说、曲周霍存、甄城葛从周、冤句张归霸及从弟归厚帅其众降朱全忠。巢逾汴而北”。而这些投降朱温的巢军大将，都是日后朱温称霸中原的熊罴虎将。

黄巢再次侥幸脱逃，但身边也只剩下一千残兵。长安含元殿上建元称帝的辉煌，早被阴风吹得烟云不剩！

唐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七日，泰山脚下的狼虎谷襄王村，黄巢被徐州节度使时溥派来的人马团团围住。无路可逃的黄巢仰天长叹：“想吾起事以来，转战千里，无不胜。今日如此，盖天意乎！”黄巢让外甥林言“帮助”自己抹脖子自杀。一代枭雄黄巢，命丧于此。

王夫之对于黄巢之所以失败评价得非常深刻，“黄巢虽横行天下，流寇之雄耳。北自濮、曹，南迄岭海，屠戮数千里，而无尺地一民为其所据；即至入关犯阙，走天子、僭大号，而自关以东，自邠、岐以西北，自剑阁以南，皆非巢有；将西收秦、陇，而纵酒渔色于孤城，诚所谓游釜之鱼也”。近代革命战争，红军领导人深刻吸取了黄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寇战略，把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当成重中之重，才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当时的胜利者唐王朝诸色人等都在为黄巢的死而欢呼，可他们哪里想得到，黄巢造反失败，并不意味着唐王朝重新恢复对地方藩镇

的控制。恰恰相反，黄巢起事，正好成为本就雄心勃勃的藩道军阀们扩张自己军力的借口。等黄巢腐烂的人头被送进长安含元殿时，小皇帝李僮才惊愕地发现，天下已非他所有！

背叛你是有道理的

——站在十字路口的朱温

也许是巧合，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位朱姓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和梁太祖朱温，而且他们之间有很多解不开的因缘巧合：

一、他们都姓朱。

二、他们都是开国皇帝。

三、他们的家乡距离极近，朱元璋老家在沛县，朱温老家在砀山，两县相距不过百里。

四、他们都出生于大动荡时代的社会最底层，穷得快吃不上饭了。朱元璋当和尚去化斋，朱温跟着老娘到地主家里当长工。

五、他们的帝国都被姓李的干掉。梁朝亡于李存勖，明朝亡于李自成。

不过有一点，朱元璋是比不上朱温的，就是朱温怎么说也是出身清穷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家庭，朱温的父亲朱诚是一名村塾教师，而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则是在黄土地望天刨食的泥腿子。

英雄不问出身，刘邦耍过无赖，刘备卖过草席，王猛卖过簸箕，朱元璋要饭都没人给他。朱温的“老底”同样不太“干净”，因为朱温偷过东西。好笑的是，朱温偷的东西，竟然是一口大铁锅。

说来也是可怜，朱诚先生虽是教书匠，但一生清贫，又死得早，撇下老婆王氏和三个儿子朱全昱、朱存、朱温，因朱温行三，所以江

湖人称朱三。王氏没有活路，只好带着三个儿子去了邻近的萧县地主刘崇家里做佣人。

刘崇很同情王氏母子，但对朱温完全没有好感。无他，朱温“壮而无赖”，喜好赌博，不事生产，哪个地主家也不喜欢这号人物。朱温经常在村头聚赌，但兜里没有闲钱，就盯上了雇主家厨房那口铁锅。朱温趁人不备，扛起铁锅准备换了钱再赌，结果被地主刘崇堵在门口……

刘崇将朱温一通好打，结果还是刘崇的老母亲可怜这个没爹的孩子，阻止儿子行凶，并把朱温揽在怀里，告诉刘崇：“你不要小看这个无赖，老娘我夜观天象，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刘崇哪信这个，哂笑而去。

其实刘母看得不错，朱温手脚再不干净，但他有一身好力气，又精于骑射，这是在乱世立身的吃饭本事。只要能遇到贵人，像朱温这样的泼皮无赖，照样可以乘龙上天。而朱温的贵人，就是盐贩子黄巢。

朱温听说了黄巢在曹县起义的事情，立刻召开了家庭会议，决定由忠厚但没用的大哥朱全昱留家照顾老娘，朱存、朱温兄弟星夜北上，拜倒在黄大哥面前。而在不远处，王仙芝更早起义，而且声势远大于黄巢，朱温舍王仙芝而投黄巢，可见朱温是很识人的。

朱温是穷光棍出身，每天目睹地主刘崇家的奢华生活，朱温都馋得流口水。朱温知道他要想成为人上人，就只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朱温在跟着黄大哥作战时非常勇猛，“以力战屡捷”，不知道斩下了多少颗敌人的头颅。朱温终于被黄巢青眼相加，提拔做了队长。黄巢麾下有很多高级小弟，李罕之、毕师铎、秦彦、葛从周、霍存都有真本事，但朱温在这些大人物面前依然显得鹤立鸡群。从各种史料汇总来看，黄巢对朱温是相当偏爱的，不过朱温也回报了黄巢的器重。李

罕之等人投降高骈，朱温依然跟着黄大哥闯荡。从曹县开始，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的大地上都留下了朱温的汗水与足迹。直到黄大哥“满城尽带黄金甲”，乘肩舆入含元殿，朱温自然也跟着修成正果。朱温得到的大饼是“诸将军游奕使”，相当于明朝的大镇总兵官，在黄巢的武将群中这已是很高的职位了。更为重要的是，黄巢特别重视长安的区域防守，而朱温率精锐守在长安城外东渭桥，这是黄巢对朱温的器重。替老大看守门户，不是心腹人，谁敢放心？

不过因为政治上的严重错误，黄巢遭到了各路官军的强硬围剿，黄巢的大齐皇帝梦只做了几天，就不得不面对巨大的生存考验。黄巢死守关中，白白给了各路官军从容包围的时机，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以黄巢的实力，要在强大的官军面前守住长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面对黄巢人生中最大的危局，朱温并没有想要离开，而是继续跟在黄巢屁股后边转圈。

朱温并非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只要黄巢对他好，他是没有什么理由背叛老大哥的。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朱温相信黄巢能转危为安，如果黄巢能真正平定天下，那么朱温必然是一等一的功臣。当时的朱温应该没有脚踩两条船的想法，朱温甚至还凭三寸不烂之舌，招降了屯兵栎阳（今陕西高陵东）的银州招讨使诸葛爽。

不过，朱温毕竟处在一个乱世争雄的大风云时代，江湖上能扬名立万的人物非常多，不是朱温一人就能通吃天下的。很快，朱温就发现，已经和黄巢翻脸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是个难缠的角色。其实何止是一个王重荣，大太监杨复光，和朱温都是地痞无赖出身的偷驴贼王建，哪个又是省油的灯？特别是王重荣，简直就是朱温的命中克星，“帝（朱温）时与之（王重荣）邻封，屡为重荣所败”。朱温被王重荣打得找不到北，情急之下，只能厚着脸皮向大齐皇帝求援。但更重要的是，朱温似乎已经察觉了一丝不祥——黄巢再这么折腾下去，早晚要完蛋。

朱温在明面上并没有背叛黄巢，但在朱温的心中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再这么跟着黄巢，自己会不会完蛋？其实黄巢还算是对得起朱温的，在朱温奉命攻下南阳，返回长安时，大齐皇帝可是亲自迎接的，这是别人都很难得到的殊荣。所以朱温的内心深处一直在痛苦挣扎，如果背叛大哥，将来难免要背上骂名；可如果继续跟着黄巢，自己估计是死路一条。

但有一件事让朱温对黄巢产生了严重不满，就是黄巢极为信任的左军使孟楷向来与朱温不和，而朱温向黄巢加急快递的十份求救表章全部被孟楷丢在垃圾桶里，根本没给黄巢看。员工可以对老板忠贞不贰，但前提是老板必须创造一个可以让员工展示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可黄巢的这个草台班子都散了架，员工都快没了饭辙，朱温自然有了异样的想法。

朱温召开了一场足以改变历史的幕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人，事主朱温和两大幕僚谢瞳、胡真。

虽然史无明载，但毫无疑问，朱温的出发点肯定要保住自己的前程，这是一切问题的前提。朱温让两大谋士给他分析保黄与降唐的利害关系，其实朱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基本打定了背叛黄巢的主意，《旧五代史·谢瞳传》就记载“（谢瞳劝他降唐后）我意素决”。与其说考虑保黄，不如说是让谋士给自己降唐进行心理安慰，朱温不想背上叛主的骂名罢了。

谢瞳不是傻子，他已看出朱温的心思，端人家的饭碗就不能砸人家的锅灶，这是江湖规矩。谢瞳劝朱温的话非常精彩，兹录原文如下：

“黄家以数十万之师，值唐朝久安，人不习战，因利乘便，遂下两京。然始窃伪号，任用已失其所。今将军勇冠三军，力战于外，而孟楷专务壅蔽，奏章不达，下为庸才所制，无独断之明，破亡之兆必

矣。况土德（唐朝）未厌，外兵四集，漕运波注，日以收复为名，惟将军察之。”说来说去就一个核心内容：不要陪黄巢送死，另选一条发财的路。

胡真大致也是这个意思，劝朱温炒了黄巢的鱿鱼，换个东家。老板即将破产跳楼，跟着他一起跳楼显然是傻子才会做的。至于这么做会有负罪感，但换个角度看，朱温自跟着黄巢以来，凡战必先，身上没少留下刀枪伤痕，他已经对得起黄巢给他开的那些薪水，我又没白吃你的！

唐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做出了一个对于他本人来说正确的决定——杀黄巢监军严实，正式通告天下，背巢降唐。

而接到这块天大肉饼的，是朱温的“老邻居”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朱温假模假样地向王重荣谢罪，并表示愿意为朝廷剿灭黄巢尽力。此时的朱温是黄巢手下头牌，他的背叛，相当于足球世界里的巴萨头牌直接转会到皇马（反之亦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还赖在成都的小皇帝李僮接到谢瞳的亲自上书后，激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是天赐予也”。情绪激动的李僮封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朱全忠”。

李僮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就是这个“天赐”的朱全忠，日后夺了他唐家三百年江山社稷，并杀尽李唐宗室。

朝廷给朱温开出的条件不谓不丰厚，左金吾卫大将军是虚职，但河中副使却是实职，仅次于王重荣。而且朝廷的题外之义非常明显——只要剿灭黄巢有功，支票给你了，你自己填。

这笔交易对唐王朝来说是非常超值的，作为黄巢手下头牌，朱温的投降对瓦解黄巢军中将领的抵抗斗志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朱温对黄巢知根知底，就像洪承畴投降皇太极，对后金进攻明朝大有裨益一样。而对朱温来说，他也在情况不明的十字路口中间选择了一

条正确的人生道路，美好的人生画卷已悄然打开。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叛变，朱温还意外地捡到一个老娘舅，就是他的新上司王重荣。因为王重荣和朱温的老娘王氏同姓，为了在朝廷内部找棵大树靠着，朱温厚着脸皮乞求王重荣做他的老娘舅。王重荣也知道朱温的分量，自然笑纳这个干外甥。

而朱温的突然叛变，却刺激到了内外交困的黄巢，黄巢指天痛骂朱温：负锅贼，终不得善终！此时的黄巢，不过是死鸭子嘴硬，他骂完后，也该下地狱了。

“反正我没白拿你的工钱，咱们两清。”新任宣武军节度使大人一直在这样宽慰着自己。

上源驿的大火

——一场足以改变历史的故意纵火事件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朱温，就是那句著名的评语：“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朱温和曹操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是处在大帝国的崩溃时代，都在北方折腾，东有吴，西有蜀，甚至还都大举南下伐吴，却都遭到失败。更离奇的是，二人在北方都有一个实力远强于自己的敌人，曹操有袁绍，而朱温的一生死敌是盘踞河东的独眼龙李克用。

朱温和曹操也有一点不同，就是曹操最终消灭了袁绍统一北方；而朱温始终啃不下李克用，到了儿子辈儿，朱温的“猪狗”儿子被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扫荡得精光不剩。

原因出在哪里？答案有很多，但今天我们只从一个角度来切入，那就是度量。换言之，朱温的度量远不如曹操。

曹操与袁绍是敌人，但也是生死之交的朋友；而李克用本来也有可能成为朱温的兄弟，但一场心胸狭隘的大火，硬生生把李克用烧成了世上最恨朱温的人。

而这一切，都源于朱温的气量，和近乎赌博式的纵火杀人。只是结果很遗憾，朱温的杀人计划没有得逞，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彻底断送了朱温做曹操第二（至少统一北方）的美好梦想。

严格来说，发生在上源驿的这场大火，甚至可以称为改变了中国

历史后一千年的进程。道理很简单：五代，除了朱温的梁，后四代即唐、晋、汉、周，都是出自李克用的河东军政集团。如果朱温能烧死李克用，那么历史就不可能出现五代，而取代五代的北宋，更不可能出现。如果没有北宋的出现，金元明清都可能不会出现……

一个叫上源驿的驿站，记载了这场虽不甚知名却惊心动魄的恐怖夜宴。而那一夜的熊熊火光，则在李克用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

事情还要从朱温背叛黄巢归唐讲起。朱温炒了黄巢的鱿鱼，但他的反水，在唐朝灭巢的重要性来说，只能排在第二位，而居灭巢首功的，正是来自河东的李克用。这一点，从灭巢之后，唐朝论功行赏时就看得出轻重，朱温得到的仅是四战之地的宣武军（治汴州），而李克用得到的却是天下第一重镇河东！当时之宣武军，“连年阻饥，公私俱困，帑廩皆虚，外为大敌所攻，内则骄军难制”。朱温治汴稍有偏差就有可能人头落地，远远不能和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李克用相比。

朱温是在剿灭黄巢的过程中结识李克用的，因为二人是天下瞩目的灭巢双骄，所以关系刚开始时相当不错。当然，这只是李克用的错觉，毕竟沙陀胡人没那么多心眼，觉得汴帅是个可交之人。但朱温对李克用，则是外宽内忌，表面上称兄道弟，暗中恨不得李克用立时就被天打雷劈。

朱温有统一天下之志，但他也知道，欲平天下，兵强马壮的河东沙陀军恐怕是他难以迈过的一道门槛。所以在朱温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谋杀李克用，为将来统一天下去一劲敌。

朱温计划对李克用动手时，李克用正在河南境内对失魂落魄的黄巢进行最后的追杀，但因为河东军粮草补给没有跟上，还是让黄巢侥幸逃掉了。因为汴州是自己回太原的必经之地，所以大大咧咧的李克用路经汴州时，决定在盟兄的地盘上休整一下。

猎物自己送上门来，朱温笑得合不拢嘴。朱温亲自到城外迎接李克用，二人称兄道弟，好不亲热。

上源驿的客厅内灯火辉煌，朱温安排的鼓乐队正摇头晃脑地吹奏着凯旋的音乐，一队美丽舞女的曼妙身影在李克用面前晃动着。李克用坐在上首，朱温含笑坐在旁边，不停地给李克用敬酒，吹捧着李克用驱逐黄巢的不世神功，李克用已经醉意迷离。

而关于这场谋杀的地点，《旧五代史·唐太祖纪一》说是在汴帅府，而同书的《旧五代史·梁太祖纪一》却说是在上源驿馆，《资治通鉴》也持此说。从道理上讲，为了杀李克用，放火把自己唯一能卖上价钱的府第给烧了，朱温似乎还没那么傻。而上源驿不过是一个驿馆，烧也就烧了。所以，还是基本能认定事发地点就在上源驿。不过上源驿并不在城外，而是在汴州城内。

这两本书还记载了一件事，就是李克用喝醉后对朱温说话不干净，惹恼了朱温，朱温这才起了杀机。实际上这不过是后世史家对朱温的“为尊者讳”，以朱温的野心，即使李克用不用话刺激他，他照样会干掉李克用。因为李克用活着，就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为了不让李克用逃出生天，朱温非常注意一些细枝末节。比如他让部下杨彦洪用战车和树栅把李克用有可能逃出的路给堵死，然后再放上一把火，大事可成。

一切都非常顺利，李克用明显喝多了，在朱温的劝说下，李克用被扶到房间里休息，河东军将也喝得烂醉如泥，“从者皆霑醉”，朱温觉得时机到了，对部下使了一个眼色，部下悄然把一根点燃的蜡烛置于帷幕之下……

朱温千算万算，甚至把李克用的贴身卫士陈思洪以下三百人都安顿好了，唯独没想到李克用的亲兵薛志勤、史敬思，以及李克用的贴身卫士郭景铎等十几个人根本没喝酒，所以神志清醒。大火着起来

后，李克用还像死猪一样酣睡，还是郭景铎把李克用拽到桌下，用凉水给浇醒了，告诉李克用：“朱温今天要咱们的脑袋。”李克用才如梦初醒。但等李克用用最难听的脏话骂着朱温八辈祖宗时，在上源驿的周围，冲天的火光早就堵死了李克用的任何一条生路。更要命的是，数不清的汴州兵挥舞着手中的刀枪，呐喊着要砍下独眼龙的人头请功。

虽然李克用略清醒，并用箭射杀了几十名汴州兵，可火势借着风力越烧越大，李克用已经没有任何冲出火场的可能性。朱温即将除掉心腹大患，几十万匹来自河东的健壮马匹在朱温心中奔腾而过。

但一场令朱温完全没有料到的意外发生了，“会大雨震电，天地晦冥”，倾盆大雨瞬间就浇灭了让人震怖的大火，已经闭眼认命的李克用惊喜地狂呼着“天不亡我”！而更对李克用有利的是，现场的闪电明如白昼，等于给李克用开辟了一条逃生的道路。李克用借着闪电强行突围，手下弟兄三百人以死相搏，终于力保李克用逃出生天，用绳索缒下汴州城，扬长而去。而汴将杨彦洪告诉朱温，只要发现有骑马的就射，因为胡人善骑马。朱温听了杨彦洪的建议，所以三百沙陀骑兵悉数被杀。不过讽刺的是，杨彦洪本人也骑了马，结果朱温在混乱之中没有看清，一箭将杨彦洪射死……

李克用逃回驻扎在城外的沙陀兵大营，咬牙切齿地要发兵与朱温决一死战。还是刘夫人拉住丈夫，劝李克用不要意气用事，不如向朝廷申诉朱温的无耻，一则能赢得朝廷同情；二则能打击朱温的势力。李克用怒气未消，写信给朱温，让朱温必须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真要两军对阵，面对数万沙陀兵，朱温即使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也未必有多少胜算。所以朱温极力掩饰内心的恐惧，向李克用进行“解释”。所谓“解释”，其实就像司马昭杀了曹髦，却把黑锅扣在成济头上，朱温的“解释”是动手杀河东大帅的是杨彦洪，与朱某无关。

李克用当然不会相信朱温的鬼话，但李克用其实也不太敢在朱温的地盘上撒野。等回到河东后，忍无可忍的李克用连上八表入长安，强烈控诉朱温的无耻行径，请朝廷废黜朱温官位，出兵讨伐巢逆余孽，李克用愿以河东兵助阵。虽然唐王朝知道李克用受了委屈，不过此时秦宗权为祸正烈，朝廷方面还不敢拿掉朱温，只能乱抹稀泥，劝李克用以国家大局为重，并晋封李克用为陇西郡王，勉强劝住了李克用。

李克用恨透了朱温，并把朱温当成自己的头号血海仇人。朱温搞砸了鸿门案，等于断送了自己统一北方的可能性，甚至在朱温扫平中原诸势力的时候，他也无法保证李克用不会在自己背后捅刀子。而随后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每次只要朱温的敌人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都不惜血本发兵救援，目的只有一个：朱温不死，大仇难报！

但朱温对李克用的态度只是后悔没烧死这个独眼龙，却完全没有对自己动手杀人而有丝毫歉疚。

“不杀你，等着你将来杀我？”朱温还在为自己辩护。

虎生双翼

——朱温冲破牢笼之战

朱温和曹操的事业发展轨迹略相同，但相比较来说，二人在事业发展的过程所遇到的困难程度，朱温要稍大于曹操。曹操在初创业时，所遇到的多是黑山贼于毒、眭固这些小虾，而且曹操又破黄巾百万乌合之众，收其精锐，组建青州兵。曹操发迹时，东汉军阀还没有形成规模，连袁绍这样的巨伽都还在四处奔饭食。而朱温出生时，安史之乱后造成的唐朝军阀割据已近百年，远非那些乌合草贼可比。特别是在黄河流域，形成了魏博、卢龙、义武、平卢等百年军阀，再加上遍布各地的诸道节镇，各镇士兵普遍经过严格训练，朱温发展的空间其实并不大。

因为朱温首先是叛将出身，在剿灭黄巢的过程中功劳又不如李克用大，所以唐朝只给了朱温“宣武军节度使”的差使。说得难听一些，唐王朝这么对朱温，和打发叫花子没有什么区别。

唐末大动乱年代的开封一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末日景象——军阀连年混战，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人口骤减。《新唐书·秦宗权传》记载：“贼渠率票惨，所至屠老孺，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自关中薄青、齐，南缭荆、郢，北亘卫、滑，皆麤骇雉伏，至千里无舍烟。”

可以数一数朱温身边的虎狼们：

西北有安师儒据郑州、滑州。

正北有朱瑾、朱瑄兄弟据郢州、曹州。

东北有齐克让据兖州。

正东有时溥据徐州、宿州。

南有铁枪王敬瑍死守颍州。

西南有赵犇守陈州。

这些还只是与朱温领地直接接壤的军阀，更不说这些二线军阀的外围，在各自方向还盘踞着一伙实力更加强劲的军阀，如平卢军的王敬武、魏博军的乐彦桞、成德军的王镕、河阳三镇的诸葛爽、盘踞洛阳的李罕之。再往北，就是堪称天下第一实力派的河东李克用。而在朱温所在的河南地界，要说实力，盘踞在淮西蔡州的秦宗权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朱温主政宣武军以来，每天都生活在秦宗权巨大的吃人魔影之下。朱温随时可能被巨兽们吃掉，他所面临的生存压力，远不是太平时代的安逸后人能想象到的。就像一家自主创业的小公司，夹杂在七八家同行业的国际企业巨头之间一样，那份生存上的巨大恐惧，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

对于当时的河南来说，秦宗权就是一只另类的吃人巨兽。如果当时有博彩公司开出吞并河南的赔率，秦宗权毫无疑问排第一，朱温在当时不过是个三流军阀而已。

秦宗权是蔡州本地人，后来黄巢进入河南，秦宗权割据蔡州自称刺史，有兵力万余人，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秦宗权就是靠这个原始资金在血雨腥风的江湖上闯荡，秦宗权曾经和黄巢合作过，一起抄掠河南地皮，发了一笔横财。在朱温主政宣武军之初，秦宗权就已经控制北起洛阳、东抵寿州、南至襄阳、西达陕州的广阔地区，甚至他还能发兵南下，进入淮南。如果放在三国时期，秦宗权相当于袁术在江湖上的地位。

而朱温面对这样的强劲对手丝毫不敢大意，他知道，一旦疏忽，

秦宗权随时可以搞掉自己的脑袋。初期羽翼未丰，朱温还比较注意与秦宗权搞好关系，但秦宗权势必要砸朱温赖以存活的宣武军饭碗，甚至发兵将汴州城围个水泄不通，这是朱温不能接受的。朱温举起了砍向秦宗权的第一刀，非常顺利，“（朱温）进与贼（蔡军）战，杀获甚众”。当然，朱温能虎口脱险，也有赖于他的盟兄、郢州的朱瑄出兵相救。否则，以朱温的微弱兵力，早就被秦宗权的小弟兄包了饺子。这场战役发生在唐中和六年（884年）六月。

之前的朱温一直被秦宗权强力压制，直到朱瑄出手赶跑秦宗权之后，朱温才算缓过了一口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秦宗权整体实力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依然可以威胁到朱温的生存，甚至即将返回长安城中的唐僖宗李僎都“畏宗权为患”。不过对于朱温来说，秦宗权不过是一头垂死的老虎，虽然还可以吓唬人，但掉了尖牙，落了利爪的老虎，武松是不会害怕的。秦宗权在与朱温的车轮大战中，只有八角（今开封附近）一战让朱温折损了人马，其他所有战役，十倍兵力于朱温的秦宗权都被朱温打得找不到北。

江湖老大哥被新进小弟摁在地上暴打，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秦宗权为了一举铲除朱温这个心腹巨患，几乎是倾其血本，“欲悉力以攻汴州”。

之前朱温与秦宗权的战争，其实还是机动作战，这种作战方式对实力较弱的一方比较有利。可如果对方进行大规模会战，朱温偏弱的军事实力很难抵挡住秦宗权的疯狂进攻。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朱温采取的还是“借力打力”战略，即告诉他的邻居老大哥朱瑄四个大字“唇亡齿寒”，然后朱瑄和弟弟朱瑾乖乖地率郢州兵前来救朱温。再加上朱温让大将朱珍征兵万余人，还有马匹数千，足够应付秦宗权了。朱温紧紧抓住朱瑄的要害，逼得朱瑄不得不与他合作，用自己的命去绑架别人的命，非有大智慧做不到这一点。朱温这个办法，其实非常适用于初创时期的中小企业，竞争不过

大公司不要紧，几家中小企业联合起来，整体实力就足以与大公司抗衡。

在唐末中原大战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战役终于打响，时间是在唐光启三年（887年）五月初八，地点在汴梁城北郊的边孝村。秦宗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大蔡皇帝梦美丽如画，竟然在小小的碭山朱三面前彻底破灭。是役，“（朱温）大破之（秦宗权），斩首二万余级；宗权宵遁，全忠追之，至阳武桥而还”。而这场边孝村之战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即秦宗权惨败之后，已无力经营河南，之前由秦宗权控制的邻近关中的河南大部州郡，被悉数放弃，严重缓解了蔡人对长安的战略威胁。

对朱温本人来说，秦宗权就是他天生的命中劫数，渡得了这一难关，朱温的前程光明无限。后人一味指责朱温的私德有问题，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朱温能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下生存并发展壮大，有多么不容易。朱温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血雨腥风中一路拼杀过来，才打下河南基本盘，成为河南最大的势力，“得洛、孟，无后顾之忧”。而朱温最危险的敌人秦宗权，在朱温的凌厉攻势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最终被部将擒献给朱温。

在对待秦宗权的问题上，朱温展示了他特有的政治智慧。按常理来论，秦宗权数次羞辱朱温，朱温完全可以报复秦宗权，但朱温以诸侯礼接见秦宗权，并为秦宗权可惜。朱温说你是个傻子，以你的实力，如果背靠朝廷这棵大树，什么样的富贵得不到，非要称帝，结果成了叛臣，天下共讨之。随后朱温把秦宗权献于长安，算是给新继位的皇帝李晔一个见面礼。朱温这么做，就是要告诉李晔，“我朱全忠是朝廷最大的忠臣”，当然，朱温的潜台词是：我比河东那个性情暴躁的独眼龙更靠谱……

朱温在政治上的聪明，自然换来了丰厚的政治回报，李晔加封朱温中书令，晋爵东平郡王，“以赏平蔡之功也”。这是政治上的回报，

军事上的回报更加丰厚，“全忠既克蔡州，军势益盛”。朱温在乱世中生存的战略就两点，政治这一手要硬，军事这一手更要硬。在乱世中生存，手上没有铁家伙，只能被人下锅煮了饺子。

搞掉了几近变态的秦宗权，只不过是朱温把围困自己的木笼子稍稍掰大了缝隙，他的身边依然虎狼出没，生存环境依然不甚乐观。但迈过了秦宗权这道坎，朱温整个人的心气被全面激活，再面对什么大风大浪，朱温已能定得下心力。

在宣武军诸邻道中，有两个大镇不得不提，即北边的魏博军与东边的武宁军。魏博军控制魏州（即古邺城）、澶州、贝州、博州等河北大州，是河北、河东进入河南的必经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朱温异常重视魏博之于河南的关系，只要能控制魏博军，朱温北可攻河东，南可守河南，东可进山东，朱温将拥有很大的战略空间。一旦魏博为李克用所有，朱温就直接可以等死了。而让朱温更加忧心的是，魏博军内部发生了权力斗争，原节度使乐彦桢失势，派儿子乐从训来向朱温求援。而据可靠情报，魏博军小校罗弘信极有可能成为新一任魏博大帅，但罗弘信又与朱温不是很熟，很难保证罗弘信不私通李克用。朱温对此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向罗弘信施加军事压力，打掉魏博军的南线门户，直到罗弘信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压力，向朱温求和为止。

朱温懂得一个道理：想让对方把你当成朋友，那你应该首先拆掉他家的大门。其实这一点，在一千多年后的北平解放过程中有明显的体现，当时解放军与西北军时打时谈，而毛泽东欲要西北军和平起义，就要彻底打掉西北军出海的门户天津。果然，天津一解放，西北军立刻起义。而朱温所做的也是如此。汴军大将朱珍率大军渡过黄河，占领了魏军南线重要门户黎阳，汴军可以随时发动对魏博首府魏州的攻击。新上台的罗弘信终于顶不住压力，派人向朱温求和。以现在双方的实力，如果真大打出手，即使朱温能获胜，也将是损失巨大的惨胜。一旦朱温陷入魏军泥潭，就有可能后院起火，对于这一点，

朱温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朱温才以打促和。就凭朱温在争取魏博军内附所表示的大政治智慧，说朱温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并非吹捧。

而朱温接下来的敌人，就是驻守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时溥。魏博之于朱温，相当于朱温的脖颈，断不能被人扼制，而徐州之于朱温就相当于高飞于天的翅膀。宣武军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很容易被人挤成压缩饼干，而如果开辟了东线战场，把势力伸到东海之滨，那么一直缩在笼中跳舞的朱温就如同扭开了牢笼的锁链，可以彻底地放飞自己的梦想。

而时溥天生就是个低头捡便宜的，整体实力远不如魏博。朱温的对外战略是远交近攻——远而强者，交；近而弱者，杀！

时溥在唐末诸军阀中远称不上一流，却凭空得到了剿灭黄巢的头功，因为黄巢就是在时溥人马的追杀下才自尽的，李克用白白替时溥做了嫁衣裳。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在朱温全力剿杀秦宗权时，时溥又想揩朱温的油水。其实，就汴州与徐州的地理位置来看，朱温和时溥的利益诉求是重叠的，有温无溥，有溥无温。而且朝廷比较偏重于朱温，让朱温领了淮南节度使的虚缺，这让时溥大吐酸水。时溥坐在燕子楼头骂道：“老子在军界搅马勺的时候，你还在刘崇家里偷锅做贼！”

朱温在政治上是只老狐狸，他要灭时溥必须在政治上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否则很容易授人话柄。正好秦宗权的余孽孙儒等人在淮南烧杀抢掠，朝廷让遥领淮南节度使的朱温发兵剿灭孙儒，朱温知道他的机会来了，自然伏拜接受上命。而朱温算准了时溥的心思，一旦汴军拿下淮南，时溥必然腹背受敌，所以时溥百般阻挠汴军。朱温终于“怒，出师攻徐”。与其说朱温怒，不如说朱温喜。

虽然时溥的徐州兵人数不少，时溥一出手便能拿出步骑七万人，出屯丰县南，但徐州兵当时经历的生死战役较少，而汴州兵几乎都是

血里火里拼出来的，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朱温阵营中早期一线大将朱珍一出马，时溥的人马被打得溃不成军，在与时溥的生死博弈中，朱温很轻易地拿下徐州南线门户宿州，对徐州构成了严重的战略威胁。

但让朱温没有想到的是，时溥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朱温和时溥发生争斗是在光启元年（885年），而直到大顺元年（891年），六七年的时间内，朱温也只不过把时溥打成了缩头乌龟，却始终难以啃下。在这六七年时间里，朱温也不是没有和其他诸侯发生战争，但重点始终放在徐州。朱温清楚徐州的战略地位对自己有多么重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徐州。为了使这场战役取得胜利，朱温几乎是倾巢而出，“汴军四集，徐、泗三郡，民无耕稼，频岁水灾，人丧十六七”。时溥的主力悉数被歼。当然，朱温在客场作战，一切损失都是时溥的，朱温几乎是坐收战争红利。虽然朱温为了得到徐州不惜破坏徐州地区生产力的做法值得商榷。曹操为了报私怨在徐州进行大屠杀，现在成了正面人物，朱温自然也应该获得同等待遇。

至于时溥，他连乱世枭雄都称不上，只不过因一时风云际会，割占一城而已。他的人生结局比较惨烈——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汴州大将牛存节、王重师率汴州兵从登云梯上强行攻进徐州城，绝望的时溥率家人登上关盼盼绝食而死的燕子楼，聚材浇油，一把冲天大火，宣告了他的游戏结束，也宣告了朱温的胜利，时间是景福二年（893年）四月。

“（徐州）地入于汴”，这是属于朱温的光明正大的劳动成果。如果历代皇帝能在地下大聚会，朱温会拍着胸脯对某些兵变篡位的帝王说：我的天下是打下来的，你的呢？

其实在朱温长达三十余年的征战史上，远交魏博和近攻徐州都算不上最出彩的，而之所以重点讲远交魏博、近攻徐州，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对朱温冲破军阀包围圈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拿下魏博与徐

州，朱温这头凶猛的老虎才算真正插上了梦想的翅膀，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于梦想的蓝天之上，追逐自己的人生最高点。

朱温的战略生存空间被数倍扩展，虽然还要面对很多军阀，但朱温已破了自己心中那口气，接下来要做的，不过是割麦子而已。朱温曾经的盟兄朱瑄兄弟也成了朱温可口的盘中餐，被朱温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吞下，朱瑄败死，朱瑾逃奔淮南杨行密。

实际上，朱温在郢州与之作战的，不仅是朱瑄兄弟，还有在朱温魔掌下侥幸逃脱的受伤的猎物——河东李克用。朱温进攻郢州时，李克用分几次派来数万步骑兵，为首的还是河东一线名将李存信。而沙陀兵的作战能力举世尽知，至少黄巢是领教过的。

打不过怎么办？朱温再次展示了他作为政治军事家的优秀品质，他祭出一招“借力打力”。我是打不过你，但我知道你是借魏博军的地盘过境的，那问题就好解决了。罗宏信每天都担心李克用吞并魏博军，对河东严防死守，朱温就利用了罗宏信的这一心理特点，“乃间魏人”。不知道朱温都在信中具体给罗弘信说了什么，但大致意思完全可以推测出来：如果我的大梁兵被定死在郢州，一旦李克用背后捅你一刀，老弟我可帮不了你。

罗宏信被朱温说动，出兵三万抄了李存信的后路，李存信吓得退守洺州，再也不敢去管朱瑄的死活。虽然朱瑄那边还有李克用的小股王牌部队，如李承嗣、史俨带的骑兵，但在整体上已经无法对朱温构成威胁，所以朱温很快就拿下了垂死挣扎的朱瑄，以及朱瑄貌美如花的荣夫人。

杀秦宗权得河南，杀时溥得徐州，杀朱瑄得郢曹、控制魏博军，死死压制住河东李克用，朱温成功地冲破了历史束缚他的那只牢笼，一飞冲天，睥睨天下，四海无敌，直到遇到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奇才李存勖……

得罪了文人，骂你一辈子

——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朱温

“朱三，尔殒山一百姓，遭逢（唐）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于汝何负？而灭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将见汝赤其族矣！”这是一个人当面对朱温的厉声斥骂。

朱温经过三十年血海拼杀，终于为自己搏来了属于他的那一份荣华富贵，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将唐朝的空头皇帝李晔控制在自己的刀兵之下，杀皇帝，杀皇子，杀皇后，杀大臣，一切朱温认为该死的人，他都敢杀。李克用又如何，几次险些成为朱温的刀下肉，自保尚且不暇。

天下，朱温说一不二，南方诸侯如浙江钱镠、福建王审知、湖南马殷、岭南刘岩，都对朱温俯首称臣，还没有谁敢如此放肆地辱骂大梁皇帝。

而骂朱温的这个人，正是朱温的同胞大哥朱全昱。

朱全昱是在朱温废唐建梁之后为庆祝大梁帝国建立的赌博大会上骂老三的，并掀翻了“大梁皇帝”的赌桌，一桌子金银财宝滚落地上，朱温面如死色。

之所以给朱温的帝国加上“伪”，是因为事实正如朱全昱所担心的那样，梁开平元年（907年）三月二十七日，朱温法服衮冕坐在金銮殿上接受群臣山呼时，他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帝国仅过了十六年就被李存勖的后唐帝国消灭，“举族被赤”。从梁朝之后，后唐及其一脉相承的后晋、后汉、后周都不承认朱梁帝国的合法性，皆称伪梁，“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直到宋朝，梁朝尴尬的

政治身份才被正式确认。

但宋朝官方承认朱梁王朝是有其特殊政治原因的。而自后唐以降，历代在朝或在野的知识分子一提及朱温，几乎全无正面评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开头所论：“梁之恶极矣！自其起盗贼，至于亡唐，其遗毒流于天下。天下豪杰，四面并起，孰不欲戡刃于胸。”明朝狂人李贽称朱温“篡弑巨盗”，王夫之更是把朱温骂得一毛钱都不值，把朱温与乱世巨恶侯景、安禄山相提并论。

朱温为什么在历史上留下如此骂名？要说朱温这辈子确实干过不少丑事，可问题是有些历史人物干过与朱温相同的事情，后人却歌颂不断。

朱温爬过灰，睡过儿媳妇，可唐明皇李隆基同样睡过儿媳妇杨玉环。

朱温杀人无数，但曹操杀的人同样不少，动辄灭人三族。

朱温篡唐称帝，赵匡胤欺负旧主孤儿寡母的行为还不如朱温光明磊落。

朱温杀唐朝皇子，赵匡胤同样要杀旧主柴荣的三个遗孤，只不过被人劝住。

朱温好淫人妻，曹操、赵匡胤都干过这样的事，赵匡胤甚至还毒杀孟昶。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朱温得罪了文人。

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得罪皇帝，也可以得罪大臣，可以得罪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得罪文人，因为文人写史，笔杆子一直掌握在文人手中。损害了他们的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看他们不骂死你！至于天下安

危、百姓生活，他们管不着。为什么明朝被黑成这样？原因有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苛薄大臣，薪水低不说，还经常扒裤子打屁股。

朱温是底层草根出身，他身上确实有一股难以克服的匪气，他对文人始终存在一些偏见。某一年夏天，朱温带着自己的幕僚和一些书生坐在一株大柳树下面乘凉。朱温应该是对那些读死书的知识分子早有不满意，故意设了一个圈套让他们往里钻。朱温指着柳树说：“柳树的树干可以做车轮。”朱温知道这些马屁文人会怎么样，果然，这些文人为了拍朱温的马屁，众口同声：“大人说得对，柳树适合做车轮子。”朱温冷笑道：“实话告诉你们，车轮只能用榆树来做，柳树脆弱，岂能为轮！——你们这些人除了会拍马屁，百无一用。”立刻喝令左右武士拿下这些马屁拍在马蹄子上的文人，扑杀之。

这些被杀的文人都是社会中下层人士，中上层文人同样没有逃过朱温的毒手。唐天祐二年（905年）三月，在朱温幕僚双翼之一的李振的劝说下，朱温在白马驿（今河南滑州黄河边）杀害了“（宰相裴）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并把他们的尸体扔进滚滚黄河。李振是个落第举子，对那些中榜的进士恨之入骨，所以劝朱温“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其实这件事本来是与朱温无关的，但朱温一个“笑而从之”，却深深刺痛了历代自诩清流的知识分子，他们自然恨透了朱温，朱温的名声又怎么能好得了？

但有些文人对朱温的批判，细究起来，其实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只不过他们站在自己的利益上看问题罢了。比如说朱温最大的“恶行”——废掉唐朝，杀皇帝，而让位的小皇帝李祝被杀时只有十七岁。

末帝李祝很无辜，但唐高祖李渊废隋建唐后，不也杀死了十五岁的废帝杨侑，杨侑又有何罪？李渊建立了唐朝，杀人可以无罪，朱温杀人就有罪，朱温当然不服！至于说朱温“遗毒流于天下”，朱温可从

来没搞过针对百姓的大屠杀，从来没有。而被欧阳修无限美化的本朝赵太祖，一则纵容王全斌屠杀成都，死数万；二则纵容曹翰屠杀江州，死数万。欧阳修等人敢义正词严地大骂朱温，唯一的原因，只是他们没有生活在朱温后代统治的朝代里。如果欧阳修等人活在朱梁王朝，借他们一万个胆，他们也不敢！欧阳修承认朱梁，也不过是赵匡胤承认在先而已。

朱温是好杀大臣，动辄灭人三族，比如杀已投降的天平节度使王师范家小二百人，但赵匡胤同样做过这样的事。仅南宋人李焘编的《资治通鉴长编》所载，赵匡胤仅灭人族就达十几起，加起来被杀人口至少数千。

至于说朱温的政权是伪政权，更属荒唐可笑之举。伪不伪，要看你是否活得长。朱梁王朝要是像唐朝那样存在三百年，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如果以废旧朝杀少主就定性为伪政权的话，那么唐朝不也成了伪政权？如果以杀人来否定朱温，曹操杀的人可比朱温多多了，更不要说清朝入关后进行的大屠杀，现在不都成了正面典型？文人们可不管你杀人多少，他们只关心你给他们多少利益，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至于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才懒得管。

就是这么一个文人笔下十恶不赦的恶棍流氓，他所建立的“伪梁”，却是五代中除了后周外对百姓最善良仁慈的政权，甚至要远好于文人欧阳修所生活的快乐宋朝。

南宋人洪迈向来对朱温也没什么好感，但他却在其《容斋随笔》中记载了一条不太引后人注目的史料，即《朱梁轻赋》。而对于朱梁政权善爱百姓的记载，道德家欧阳修和司马光视而不见，直接砍掉……

原文大略是：“梁祖之开国也，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

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

从人性道义上讲，一个政权是否合法，要看它如何对待百姓，爱之则合法，否则非法。朱温虽有兵匪气，但他的本质是好的，朱温出身底层，从小受人白眼，他深知谋饭食者的不易。所以朱温当政之后，并没有苛剥百姓以满足自己私欲，而是采取轻赋政策善待百姓，吸引百姓来附，在唐末丧乱之际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朱温在文人笔下成了恶棍，可在朱梁士兵和百姓眼中，这个善赌博的皇帝却是个心地慈善的好老头。所以虽然朱温四处征战，但民无怨言，心甘情愿地给梁朝军队输入物资。而朱温的儿子朱友贞当政时，陷入了与河东晋王李存勖的十年苦战，对百姓的征收力度加大，但朱梁百姓依然没有出现大规模逃亡的现象。老百姓这么做，一方面，感恩于朱温的善政；另一方面，朱友贞至少继承了朱温的轻赋政策，让老百姓生活有盼头。

而梁晋争霸战的胜利者李存勖，灭梁之后，纵容经济天才孔谦对朱梁百姓进行挖地三尺式的盘剥，什么猪羊柴炭，山谷商路，都几乎搜刮干净。朱梁百姓对李存勖极为失望，“天下皆怨苦之”。所以说，朱友贞死在军事无能上，而李存勖则死在政治无能上。

其实还有一件事也能体现朱温对百姓的大爱。就是五代经济史上著名的牛租问题。据《旧五代史·周太祖（郭威）本纪》记载，当年朱温曾经发兵攻击淮南杨行密，虽然没有得手，却抢到了几十万头耕牛，这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可是一笔天价财富。朱温并没有把这么多牛据为己有，而是把牛都分给了贫苦百姓。有了壮牛，百姓种地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生活水平自然提高，而“大恶棍”，只不过向百姓收了一点租子而已，“梁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而“伪梁”灭亡后，继之而起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继续向百姓收取这几十万头牛所产生的租子，而这些牛早就死光了，“自是六十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心存善良的郭威深知此弊，立刻废除牛租。

而宋朝在对待百姓方面，和李存勖有得一拼，南宋朱熹对本朝苛政向来不讳言，他说过“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而南宋初年广州州学教授林勋也说过“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

后世文人对厚待文人、薄待百姓的宋朝歌颂不绝，而对薄待文人、厚待百姓的朱温口诛笔伐，这只能说明有些文人看问题从来只从个人利益得失角度看。

朱温对文人是刻薄一些，但朱温杀的都是他认为对他的事业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的文人。而对确实有真才实学的文人，朱温向来是非常敬重的。

不算文痞李振，朱温风云帐下其实才子如云，比如朱温两大幕僚长谢瞳与敬翔、才名震天下的贴身文胆李琪，以及“颇知书”的司马邺。

李琪是晚唐著名才子，十三岁便能作诗赋词，大官僚王铎称赞他“此儿大器，将擅文价”。李琪和兄长李珣都是一时文坛才俊，皆为朱温所重用。朱温南征北伐，需要大量战斗檄文，而这些文章多是李琪手笔，深得朱温称赞。

敬翔更不必说，大梁朝头号幕僚长，朱温的首席谋士。早在李琪入幕之前，大老粗朱温身边缺一个谋士兼秘书长，而他发现敬翔文章喜用浅白语，非常适合自己，便让敬翔“专掌檄奏”，是朱温身边一日不可或缺的人物。而敬翔和那些拍错马屁的文人一样，都是中下层落第举子出身。

史料上没有敬翔拍马屁的记载，反而记载了敬翔扎实的业务能力。敬翔不但长于词章，更擅长时政地理，所有“山川郡邑虚实，军粮多少”，敬翔无所不知，朱温敬重敬翔，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些在柳树下与白马驿被杀的士人，他们如果都能像敬翔那样天文地理无所不晓，朱温又怎么会舍得杀他们？当然，那些文人对朱温没有用就遭

到杀害是不对的，这也是朱温残暴的一面，无须讳言。

有些文人对朱温人品上的指斥，其实也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看问题罢了。南宋道德家胡三省先生就大骂朱温是个“反复小人”，原因是朱温当年对抗秦宗权时，郢州朱瑄曾发兵救过朱温，而朱温随后就倒打一耙，灭了朱瑄。“兵势既强，则反眼为仇敌，必诛屠以快其志而后已，如斯人可与共功名哉。”可胡三省却绝口不提朱温为什么要进攻朱瑄，那就是朱瑄有负朱温在前，朱温忍无可忍反击在后。

朱瑄是救过朱温，但朱温也没亏待朱瑄，用金银财宝塞满朱瑄的口袋。可朱瑄自来到汴州后，发现汴州兵能征善战，就动了歪心眼。朱瑄回到郢州后，就派人把无数金银放在郢州与汴州的交界处，吸引汴军士兵跳槽。那些见钱眼开的兵大爷都流着口水投奔到了郢州，“私遁者甚众”。

在乱世中混江湖，手上没枪杆子必死无疑，但朱温念在朱瑄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分儿上，一再隐忍，只是写信指责朱瑄这么做有失江湖道义，希望朱瑄能收手，汴郢和好如初。朱瑄不但不收敛，反而回信大骂朱温，“瑄来词不逊”，朱温忍无可忍，最终全力剿灭朱瑄。当然，如果没有这件事，朱温一样要吃掉朱瑄，但就事论事，是朱瑄首先对不起朱温，朱温在这件事情上是无可指责的。朱温唯一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朱温杀掉朱瑄之后，强行占有了朱瑄的妻子。

朱温的爱情

因为对朱温本来就有严重偏见，所以有些道德家对朱温的一切都给予彻底否定，甚至包括朱温的爱情。有人对杀人如麻的暴君朱温一生深爱着张夫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朱温这样的暴君是没有资格享有纯美爱情的。

说到朱温的爱情，可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汉光武帝刘秀与阴丽华传奇爱情故事。刘秀当年穷困落魄时路经新野，偶遇到了美丽超俗的阴丽华，刘秀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来果然梦想成真，娶到了阴丽华。

而朱温与张夫人的爱情就传奇性来说，比之刘秀和阴丽华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朱温还在萧县城外打猎撒野时，就偶遇了路过此地的张小姐，张小姐是宋州刺史张蕤的宝贝女儿，朱温不过是个穷鬼，自知得不到张小姐，只能流着口水看着心上人远去，然后说了一句：“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

但让人感动的是，朱温只与张小姐偶遇一面，心里便再容不下其他女人了。后来朱温跟黄巢杀进关中，驻守同州，此时的朱温已年过三十，已属大龄未婚青年，但无论谁来说媒，朱温坚决不同意。因为朱温还在坚守着对张小姐纯贞的爱，虽然他不知道张小姐现在是死是活。而机缘巧合的是，在一次接收难民的过程中，朱温极其意外地在难民堆中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朱温相信自己的眼睛，没错，这个女人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张小姐。为了表达对张小姐出身官宦人家的尊重，朱温先派人说媒，然后以极隆重的礼节迎娶了张小姐。而在正式成亲之前，朱温没有碰过张小姐，甚至每次见面都要以礼相待。而承认朱温的赵匡胤看中了蜀后主孟昶的花蕊夫人，蜀亡，花蕊夫人被解送到汴梁，七日后，孟昶卒。如果朱温心中没有那份纯贞的爱，他

完全可以霸王硬上弓，就是强行霸占了张小姐，落了难的张小姐又能上哪儿说理去？

有人说过：作一回秀不难，如果一辈子都在作秀，那还是作秀吗？事实也证明，朱温对张夫人的尊重并非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爱意，而终张夫人之世，朱温对张夫人言听计从，除了灭唐建梁之外。即使是朱温在外带兵，只要有人替张夫人传话，朱温再忙都要急马回府，站在廊下听候夫人教诲，规规矩矩，半点也不敢逾礼。作秀作到朱温这种“逆来顺受”的程度，也可谓千古奇观。

历史上还有一个开国帝王对老婆逆来顺受，就是著名怕婆杨坚。但杨坚对独孤伽罗真心害怕，杨坚怕老婆其实是被逼的，而朱温“怕”老婆，则是他心甘情愿。

朱温之所以对张夫人敬重有加，有两个原因：从朱温角度看，朱温心存良善；而从张夫人角度看，张夫人为人贤惠，深明大义，举止有节，所以才深得朱温敬重。如果是个私生活放荡的女人，朱温又怎么瞧得上？所以五代学者孙光宪在《北梦琐言》就说“张贤明有礼，温虽虎狼其心，亦所景伏”。而张夫人在朱温的人生中起到的绝不是点缀花瓶的作用，在政治生活中，张夫人也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朱温灭掉朱瑄后，得到了朱瑄的老婆荣氏，好色的朱温趁张夫人不在军中，强行霸占了荣氏。等到朱温凯旋回汴州时，把荣氏装在小车里带回，朱温却没敢向张夫人隐瞒这件事，老老实实地先写信请示：“这个女人可怜无依，所以我先把她带回来，再作商议。”但朱温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他希望夫人能高抬贵手，让自己收了荣氏。

张夫人在封丘迎到了这辆在风中摇摇晃晃的小车，荣氏知道张夫人的地位，满面羞愧地跪在张夫人面前，而朱温则站在旁边尴尬地搓手，眼中却流露着强烈的希冀。但张夫人却没有满足丈夫，而是借与荣氏的对话，委婉地敲打好色的丈夫。

张夫人哭着说出下面这段话：“兗郅（朱瑄）与司空（朱温）同姓同宗，都是自家兄弟，结果因一些小事发生冲突，结果到了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让嫂子（朱温称朱瑄为兄）受了委屈。可我在想，如果是司空败了，兗郅胜了，那么我就会成为兗郅的战胜品，被兗郅玩弄之后，跪在嫂子的面前。”张夫人这话说得非常重，朱温给死去的朱瑄扣了绿帽子，但如果朱瑄胜了，朱温同样要戴绿帽子。听了老婆这番敲打，朱温“为之感动”，把荣氏送往尼姑庵安置，张夫人还给了荣氏一笔安置费。其实与其说被张夫人“感动”，不如说又羞又愧。男人不怕天不怕地，就怕被扣绿帽子，这事涉男人最底线的尊严。

隋文帝杨坚想纳陈宣帝的女儿宣华夫人，独孤伽罗看到丈夫实在可怜，便同意了。而朱温如果对张夫人死缠烂打，张夫人未必不会网开一面，同意丈夫纳荣氏。但朱温在个人感情上是从来不敢，或者说的不忍拂逆张夫人的心思，而这一切，皆缘于张夫人的贤惠善良触动了朱温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后史多骂朱温之恶，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坏人，何况朱温对身处战乱中的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不能因为朱温薄待文人就将其彻底否定。

不可否认，朱温极其好色，在他权力覆盖的范围下，他看上的女人几乎无人幸免，甚至大臣的妻女都被朱温强行淫乱。但这一切，都是在张夫人去世之后，只要张夫人活一天，朱温在张夫人面前就得像猫一样乖顺。说起来也许是巧合，两个“杀人如麻”的开国朱皇帝，都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朱元璋有大脚马皇后，朱温有张夫人。朱元璋每逢暴怒，马大脚都会出来劝慰，朱元璋怒气顿消。其实张夫人也是如此。正因为有张夫人在，朱温容易暴怒的性格才会被有效压制，张夫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救军人数百。而等到张夫人死后，军中响起一片哭声。

其实怀念张夫人的何止是那些被救将士，朱温同样对前妻感念不已。后期朱温虽然荒淫，但有一点很让人感动，就是朱温直到被逆子朱友珪杀死，都没有立皇后。张夫人卒于唐天祐元年（904年），也

就是说梁太祖时期，梁朝根本就没有皇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朱温没有追封张夫人为皇后，但却追封其为“贤妃”，一个“贤”字，写尽了朱温对前妻的无限感念。在朱温的心里，他的大梁皇后只有张夫人，即使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朱温内心最纯净的那份美好，依然留给了她。

爬灰爬到死

——荒谬的朱温之死

“爬灰”是民间对公公和儿媳妇私通劈腿的诙谐叫法，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爸爸给儿子扣绿帽子。

古往今来，最有名的爬灰者自然是爱情种子唐明皇李隆基，他与儿媳妇杨玉环的爱情美轮美奂，苦主李瑁却很少有人同情。据说南宋大思想家朱熹老先生也有爬灰的爱好，搞大了守寡儿媳妇的肚子。但李隆基是开创一代盛世的伟大君主，朱熹是把儒家思想推向学术顶峰的开山大宗师，备受后人景仰，而反面人物中爬灰最著名的，自然还是“伪梁”的朱温。

要说到朱温爬灰，其实还应该从千古一贤张夫人去世说起。公元904年，张夫人溘然长逝，留下了一个花心老光棍。朱温因为受贤惠夫人的压制，在女色上只能痛苦隐忍，老婆一死，再也没有人敢管这个老光棍了。据史载，朱温在后宫有“嫔妾数百”，朱温勤于军政之余，在后宫戏蜂引蝶，好不快活。但朱温是个心比天高的人物，虽然他的女人都是绝色，只是玩久了也腻。即使是头号大臣张全义的老婆、女儿也被逼着上了朱温的床，没过多久也腻了。寻常的女人已经吸引不了朱温那双色眯眯的眼睛，朱温开始寻找猎物，很快，朱温就发现了一群曼妙的身影，这就是朱温的众儿媳。

因为朱温的帝国比较狭小，北有河东李存勖，东有淮南杨渥，西有两川王建，树敌太多，所以朱温经常让自己的儿子们（包括养子）外出带兵。军中不能带女人，所以众王妃都留在了洛阳城。

朱温把主意打到了年方花信的儿媳妇们身上，流着口水招众儿媳

进宫“伺候”老公公。从《新五代史·朱友珪传》“诸子在镇，皆邀其妇入侍”来看，张夫人所生子朱友贞的媳妇张氏也没逃过朱温的毒手。

没有资料记载众儿媳对公公让她们陪睡的态度是什么，但至少没有记载她们反抗过，应该都是心甘情愿的。她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老头子马上就要咽气了，只要把老头子伺候好，帝位就有可能传给自己的丈夫……

而应该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被老爸扣上绿帽子的朱家皇子们也愿意让老婆做这笔皮肉买卖。为了争夺大梁帝国的帝位，朱家兄弟几个早就在彼此钩心斗角，几乎是所有盘外招都使上了，戴不戴绿帽子，没人关心这个！

但大浪淘沙，不可能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得到老公公的喜欢，有些王妃陆续被淘汰掉了，只剩下两个女人，走到了最后的决斗场——博王朱友文的妻子王氏，郢王朱友珪的妻子张氏。

这两位皇子在朱温的众多儿子中显得非常另类。朱友文实际上只是朱温的养子，本名康勤；而朱友珪只不过是朱温当年主政宣武军时，因一时无聊，和一个身份低贱的小旅馆娼妓野合所生。因为生母低贱的身份，所有朱家子弟都瞧不起朱友珪，却和本非朱家血脉的朱友文打得火热。

朱友文之所以异军突起，是因为朱友文的素质远高于朱友珪。朱友文“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颇能为诗，多才艺”，虽是养子，但在诸兄弟中最得朱温偏爱。不清楚是因为王氏伺候老公公得力，朱温对朱友文另眼相看，还是朱友文先讨朱温喜欢，王氏才在床榻上受宠。但不管怎么说，朱温“心尝独属友文”，已经有了把江山传给朱友文的打算。只不过毕竟朱友文非朱家血脉，朱温尚还犹豫而已。

龙床上的决斗，胜利者已经呼之欲出，就是“有色”的王氏，“尤宠之”，而朱友珪老婆张氏基本不再享受老头子的宠爱。张氏跟老头子

上了那么多次床，结果还是没换来老头子把江山传给朱友珪的承诺，张氏的挫折感可想而知。其实朱温和张氏上床，只不过是玩弄儿媳的肉体，他从来也没打算把江山传给他极不喜欢的儿子朱友珪，甚至还经常殴打朱友珪，朱友珪“益不自安”。

张氏是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女人，看到自己实际上已经落败出局，她根本咽不下这口气，必欲报复王氏和朱友文。当她在朱温的床榻旁边听到朱温与王氏的密语：“我快不行了，你速让友文来洛阳，我要把江山传给他。”可以想象到张氏脸上的惊恐与愤怒的表情。张氏连夜回府，哭着告诉丈夫，说老头子铁了心要把皇位传给朱友文，咱们和朱友文、王氏向来不和，等朱友文一上台，“吾属死无日矣”！

朱友珪大骂色鬼老爹无情无义，为了女色要把朱家百战打下来的江山传给外人，但老头子的脾气他是知道的，只要他定下的时候，已不可能改变。朱友珪为人虽然凶暴，但本性其实并不算坏，老爹对他这样，他也没想过要把老爹怎么样。但朱友珪身边未知名的心腹人的一句话，却点醒了这对还沉醉在绝望中的夫妻：“事急矣，何不早自为图？”意思再清楚不过——你现在不杀朱温，必为朱友文所杀！

朱友珪本来就对朱温一肚子的怨气，媳妇都被你睡了，你竟然纵容干儿子要亲儿子的命？朱友珪为了活命，现在也只有一条路了。反正不杀朱温肯定死，而杀了朱温，还有存活的可能。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不知道是不是王氏暗中使了坏，朱温突然又下了一个对朱友珪极为不利的决定——调朱友珪出任帝国最为偏远的莱州刺史。按当时梁朝的官场习惯，凡被贬官出外，多非善终，所以朱友珪接到的等于是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梁乾化二年（912年）六月初二，忍无可忍的朱友珪带着五百多牙兵夜闯万春门，各操利刃，站在老光棍朱温的床前……

朱温看到一脸怒气与绝望的次子，显然知道儿子这次来是干什么的，也自知今天自己难逃一死，朱温大骂逆子：“我早就怀疑你这个畜生，后悔当初没杀掉你，以致有今日之祸。”朱友珪对无情无义的老爹自然也不客气，直接骂了句：“老贼万段。”让打手冯廷谔追着一丝不挂的老爹一通乱砍，六十一岁的大梁皇帝朱温当场丧命，肠子肝胃流了一地……

历史上非善终的帝王数不胜数，死法荒谬的也不在少数。晋景公姬獯掉进茅坑里淹死；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因为嘲笑张妃年老，被张妃用被子捂死；后秦姚萇因弑旧主苻坚，被苻坚的阴魂活活吓死；但还没有哪个帝王像朱温这样光着屁股被儿子在床头杀死的。向来就瞧不起朱温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五代上》幸灾乐祸地评论道：“朱友珪梟獍之刃，已剽元恶之腹。”

朱友珪之所以弑父，惧死只是表面原因，抢在朱友文之前抢到大梁皇帝的宝座，才是朱友珪真正的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朱友珪杀父后，立刻派人去找守汴梁的朱友贞，说父皇在死前下诏杀朱友文。朱友贞和朱友珪向来不和，但在排斥外人篡夺朱家江山的问题上，朱友贞是和二哥是站在一起的，一刀下去，朱友文授首。

朱友珪风风光光地在老爹的灵柩前即皇帝位，改元凤历。而本来没有机会做大梁皇后的张氏终于逆袭成功，干掉王氏，入主中宫。

但事情显然并没有结束。因为朱友珪的出身问题，功勋大将领们向来瞧不起这个娼妓的儿子，即使凤历皇帝出金宝喂饱了这些地方大军队，他们也没把朱友珪当回事。史称“时朝廷新有内难，中外人情匈奴”。

而这一切，都被朱友珪的四弟朱友贞看在眼里。

不作死不会死

——朱友贞是如何成为“梁末帝”的

朱温的儿子一大堆，除了早年病死的长子朱友裕外，还有亲生儿子朱友珪、朱友贞、朱友璋、朱友雍、朱友徽、朱友孜，以及朱友文、朱友让等义子。但在这些皇子中，身份最高贵的，无疑是皇四子朱友贞，因为他的母亲是朱温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张夫人。而朱友贞的性格也非常随自己的母亲，“性沉厚寡言，雅好儒士”。但不知道是不是朱友贞的王妃张氏在床上伺候公爹不得力，朱温执意要把江山传给养子朱友文。

如果细究起来，朱温不把江山交给血统最纯的朱友贞，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原因无他，就在于朱友贞“雅好儒士”上。先不说朱温对那些乱七八糟的文人没什么好感，在乱世中闯荡，没点杀人不眨眼的刚狠性格，早晚要被人吃掉。特别是朱温晚年遇到了一个致命的对手，就是几近无敌的晋王李存勖。柏乡之战，百战天下的朱温被年轻的李存勖打得灰头土脸，成为江湖笑柄。以朱友贞的性格能力，自己尚且不是李存勖的对手，朱友贞又能奈李存勖几何？

本来朱温有一个再完美不过的继承人，就是长子朱友裕。朱友裕“幼善射御，从太祖征伐，性宽厚，颇得士心”。如果朱友裕继位，面对强悍的李存勖，至少可以打成平手，但朱友贞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可惜朱友裕英年早逝，所以只能选择虽非朱家血脉却能力突出的朱友文，却又被嫉贤妒能的朱友珪与朱友贞干掉了。

朱友贞虽然性格沉稳，但也不是什么老好人，他早就觑视着大梁皇帝的位置，只不过一直在装深沉，别人觉得他胸无大志而已。等到“螳螂”朱友珪捕得朱友文这只“蝉”后，“黄雀”朱友贞终于出手了。

因为朱友珪在军界没有根基，军中大佬一个也不服他，而朱友文又被杀，现在唯一可选择的也只剩下朱友贞。再加上这些大佬对朱友贞的生母张夫人相当尊敬，所以朱友贞得到了他们的普遍青睐。在梁朝的二皇帝、魏博军节度使杨师厚的大力支持下，朱友贞发动兵变，逼得皇帝宝座还没坐热的朱友珪与凤历皇后张氏自杀。不过朱友贞并没有在洛阳即位，而是在他的出生地东京汴梁做了皇帝。只是朱友贞没想到，他竟是大梁帝国最后一位帝王。

从血统的角度看，朱家天下终于回到最应该得到的人手中。但从保全江山社稷的角度看，朱友贞根本不具备乱世生存的能力。如果生在盛世，朱友贞还可以做一个中庸之主。可当李存勖坐大，已对梁朝构成了严重的生存威胁时，朱友贞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其实此时的梁晋形势对比，朱友贞手上的牌面并不比李存勖逊色多少。许多在五代都算一流的梁朝顶级大将都还健在，比如葛从周、杨师厚、牛存节、刘鄩、谢彦章、王彦章、寇彦卿、王檀。梁朝的整体军事实力可以和李存勖进行长期作战，更重要的是，梁朝的战略空间要远比河东广阔，湖南、浙江、福建、岭南皆臣服于梁。而不服梁朝的蜀主王建已老，杨吴又陷入内乱，可以说梁朝在南线无忧，可以集中全力对付李存勖。而李存勖南有梁朝朱友贞，北有契丹阿保机，东有大燕刘守光，生存压力很大。即使是在当时，时人也不敢随意押宝李存勖，只要朱友贞能打好手中的牌，退则守住河朔，进则兼并河东，混一宇内。

可惜朱友贞的能力实在太过平庸，他并不伟岸的身影也被光芒四射的李存勖的身影所遮掩。当然，李存勖之所以能在历史舞台上呼风唤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朱友贞自己犯下了致命的战略错误。

朱友贞被眼前的这片森林遮住了目光，却没有考虑到这片森林可以给予他源源不断的财富。

朱友贞是个喜欢过河拆桥的人，利用完朱友珪就把二哥干掉，而他能后来居上，全是驻守魏博的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点头。可等朱友贞一上台，就对杨师厚打起了主意。

杨师厚是梁朝一号军头，手中有梁朝第一军——银枪效节都数千人，在朱温死后，杨师厚自恃有恩于朱友贞，有些嚣张跋扈，“矜功恃众”。朱友贞始终觉得杨师厚控制的魏博是自己的心头大患，一旦杨师厚有不臣之心，朱友贞是很难招架住的。但杨师厚地位高重，轻易不能动，朱友贞只能盼杨师厚早死，以除隐患。但朱友贞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杨师厚确实对中央政权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威胁，但这位平庸的皇帝却看不到杨师厚横在天雄军，事实上起到了阻止李存勖南下的头号战略屏障作用。有杨师厚在，甚至有天雄军在，李存勖就别想放马中原撒野。李存勖唯一的希望，只能是梁朝内部发生大的动乱，但让李存勖惊喜的是，朱友贞果然就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等到杨师厚死后，朱友贞觉得解决魏博问题的时机来了，办法很简单——拆分天雄军，这是梁朝著名奸臣赵岩给朱友贞出的馊主意。理由是魏博地广兵强，极易割据，在晚唐就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无论再派谁主政魏博，都难保不做杨师厚第二，“宜分六州为两镇以弱其权”。

朱友贞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将魏博一分为二，魏博就再也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朱友贞下诏，割魏博之相州、澶州、卫州新置昭德军，所有魏博财物平分一半给昭德军。

只可惜，还没等朱友贞为自己的天才决策鼓掌喝彩，现实就狠狠地抽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魏博是世袭军制，“魏兵皆父子相承数百年”，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魏人在心理上自成一系。而现在突然要被分开，在感情上魏人是接受不了的。朱友贞忽略了魏人的感情需求，一味强力弹

压，结果导致魏人的强烈反弹，魏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朝廷对魏人不放心，“吾六州历代藩镇，兵未尝远出河门，一旦骨肉分离，生不如死”。

魏人的对策更加疯狂，直接操起刀枪与朝廷对着干。当天晚上，魏军就发生了严重的哗变，叛乱分子赶跑了前来监督分镇的王彦章。事情到了这一步，其实朱友贞还有挽回败招的余地，魏军中临时主政者张彦请求朝廷撤销昭德军建制，复为魏博。但谁都没想到，事情偏偏败在一个小小的供奉官扈异手上，扈异代表朱友贞到魏博实地调查情况，回来后告诉朱友贞，张彦的实力不足以抵抗朝廷大军。朱友贞接受了扈异这个极为危险的判断，决定继续执行分镇政策，结果引发张彦极为强烈的反应，大骂朱友贞昏聩无能。张彦见朱友贞不识时务，那就对不住了，魏博军上下一致同意将六州之地献给晋王李存勖。

天上凭空掉下来一块大肉饼，不吃是傻子，李存勖兴奋地接收了具有极重要战略价值的魏博重镇。得到了魏博，李存勖可进可退，将战线往前推进了数百里，饮马黄河，距离黄河南岸的汴梁只一鞭之遥。李存勖在稳定魏博局面后，铲除了横行多年的银枪效节都的扰民问题，魏人大悦，甘为晋王驱使。从此梁晋强弱易势，也奠定了李存勖灭梁的战略基础。而等朱友贞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决策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危局后，“大悔惧”，可一切都晚了。

魏博的丢失，导致梁朝消灭河东再无可能，不过此时的局面对朱友贞来说并非世界末日，至少他还有很大的机会守住黄河防线。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无条件信用晚梁第一名将刘鄩。事实也证明，魏博入晋后，河东方面不停南下骚扰，如果不是刘鄩东挡西杀，李存勖完全可以提前几年一马直入汴洛。如果换一个心智正常的帝王，在现在这种危局下，把前线军务完全放手给刘鄩，是唯一可以做的选项。可朱友贞却根本信不过刘鄩，虽然朱友贞也下诏说“阍外之事，全付将军”，但朱友贞骨子里还是怀疑刘鄩与李存勖暗

中劈腿，所以派太监当前线监军，全程监视刘鄩。朱友贞生于深宫妇人一身，根本不理解刘鄩的辛苦，反而一味责骂刘鄩。

刘鄩上表请求朝廷发给将士每人十日米粮，准备偷袭太原城，一举擒拿李亚子。朱友贞因为刘鄩常年与李存勖苦战，坐费无数朝廷军粮，不相信刘鄩的偷袭有可能成功。更可笑可悲的是，朱友贞反而怀疑刘鄩这么做是要诈骗自己的军粮，然后投降李存勖。朱友贞派人大骂刘鄩，又派太监催促刘鄩出战，彻底冷了刘鄩那颗热忱的忠君之心。而以刘鄩的江湖地位，只要刘鄩肯低下头，李存勖会把刘鄩当亲爹供起来，那可是名满天下的第一传奇名将！刘鄩深受梁太祖朱温大恩，誓死效节，是根本不可能背叛朱温的。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刘鄩都隐忍不发，只为报太祖当年厚遇。

此时的刘鄩像极了三国蜀末大将姜维。姜维因感诸葛亮丞相之厚遇，死不背蜀，与邓艾在西线苦战二十年，内又受奸臣所逼，几乎走投无路。刘鄩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刘鄩从来不怕李存勖，双方只是各有胜负而已，但刘鄩最怕的是朝中那些阿附皇帝的宵小，比如赵岩、段凝等人。刘鄩说过，“主上深居宫禁，未晓兵机，与白面儿共谋，终败人事”。

如果蜀后主刘禅不信用宦官黄皓，放手让姜维大干一场，邓艾是没有机会偷渡阴平的。朱友贞几乎就是刘禅再世，身边聚集着一群百无一用的“白面儿”，对本朝仅存的战略型大将刘鄩般猜忌，严重牵制了刘鄩的精力。在梁晋争霸后期，刘鄩屡战屡败，甚至还有一次被李存勖打成了光棍，即发生于贞明二年（916年）的元城之战，七万梁军几乎被全歼，刘鄩只带数十骑亡命南奔。但客观来说，刘鄩是不想打这场战役的，他本来是想坚壁清野，与李存勖对耗。还是朱友贞沉不住气，逼刘鄩出战，结果惨败。以刘鄩的能力，如果不是受后方政治干扰太多，放开手脚与李存勖大干一场，李存勖是占不到多少便宜的。事实也证明了刘鄩的能力，第二年二月，李存勖“悉众”来取河南重镇黎阳，被刘鄩三棍五棒子打跑了。

就是这么一位对朱友贞来说具有“保命”意义的功勋大将，却惨死在朱友贞的猜忌之下。因为担心无法控制刘鄩，在奸臣段凝等人的构陷下，朱友贞派张全义去洛阳，强行给六十四岁的刘鄩灌下了毒药……

刘鄩是死了，朱友贞再也不担心刘鄩成为杨师厚第二了，但他的大梁帝国同时也快完蛋了。朱友贞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愚蠢典型，为了眼前的战术利益，甘心牺牲未来的战略利益。朱友贞就像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精神病患者，他经常神经质地怀疑别人会加害于他，甚至是他的亲兄弟也不例外，更不要说刘鄩这样的外人。隋文帝杨坚在讨陈后主陈叔宝的檄文中曾经嘲笑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朱友贞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所谓大梁帝国，在行将灭亡时，已经被李存勖挤成了压缩饼干，蜷缩在黄河以下、淮河以北的狭长区域。此时的朱友贞早已众叛亲离，时人都知道，大梁帝国气数将尽，李存勖入汴是迟早的事情。

梁龙德三年（923年）十月，新继位不久的大唐皇帝李存勖大军在郢州大破梁朝仅存的大将王彦章，王彦章几乎光棍般逃走，但势单力薄的王彦章不久就被生擒，不屈而死。

王彦章的死，相当于朱友贞卧室的门被人强行撞开，朱友贞已无路可逃。朱友贞聚族哭曰：“大梁完蛋了。”可现在的朱友贞只能等死，什么也做不了。讽刺的是，李存勖称帝的地方，就是十年前因为朱友贞愚蠢决策而丢掉的重镇魏州。李存勖也许是在有意嘲笑朱友贞，这位人称汉光武第二的年轻皇帝把魏州升格为兴唐府，要知道，唐朝就是被朱友贞的老爹朱温灭掉的。

你能灭唐，我能兴唐！这应该是李存勖向朱温发起的挑战。而朱友贞，早被当时的梁朝人视为活死人，已经没人在乎他的喜怒哀乐，弟兄们都在排队加塞，准备向新主李存勖效忠。

当死亡之神步步逼近朱友贞的时候，他才想到太祖皇帝留给他的那位柱石之臣敬翔。当初敬翔劝朱友贞不要和赵岩、段凝这伙奸臣走得太近，朱友贞不听，结果一错再错，最终玉石俱焚。

朱友贞的无能，葬送了朱温三十年血战才拼下来的大梁江山，也葬送了朱家几乎所有的近亲宗室，以及敬翔这位对梁朝忠贞不贰的“朱家老奴”。司马光对朱友贞一生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均王（朱友贞）膏粱之子，材不过人，弃敬翔、王彦章，而用赵岩、张归霸以与庄宗（李存勖）为敌，能无亡乎！”

但朱友贞有一点是值得后人称赞的，就是他并没有选择向世仇李存勖屈膝投降，而是选择了在城破之日自杀殉国。朱友贞知道即使自己投降李存勖，李存勖也会无情地羞辱自己，为李克用报上源驿之仇。横竖都是死，与其被人羞辱而死，不如及时了断，还能保全名节。几百年后的金哀宗完颜守绪在城破之日选择自杀，和朱友贞是同样的考虑，蒙古与女真是世仇，蒙古人断然不会放过自己。

梁龙德三年（923年）十月初八日，在后唐军即将兵临汴梁城之前，朱友贞让部下皇甫麟杀死了自己，皇甫麟随后自杀。

第二天，唐军杀进汴梁城，梁亡。李存勖并没有放过已死的朱友贞，把仇敌之子的人头割下来，用漆刷了一遍，藏于太庙。

守余有余，开疆不足

——略说沙陀枭雄李克用

“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

这是东汉末年名士裴潜对刘备的评论。事实也证明，刘备确实不具备曹操那样控制全局的能力，但乘间守险，遂成蜀汉偏霸。说来很巧合，朱温和曹操的人生轨迹非常相似，而唐末五代也有一个“刘备”，甚至也没有能力控制中原，但得天时地利，乘间守险，也成一方伟业，他就是李克用。

李克用的名气，在历史上远不如他那个过山车般走完传奇人生的儿子李存勖。李存勖灭梁后，过足了“唐光武”的瘾。但李存勖的江山并不是他打下来的，如果没有父亲李克用在乱世中占据河东，以李存勖善攻而不善守的性格，他是很难赤手空拳打下江山的。当然，李克用的江山也是从他的老爹李国昌那里传来的。所不同的是，李国昌传给李克用的只是一间临街手工作坊，而李存勖却从父亲接过一家国际化大公司。在五代政治史上，其实是分为两个不同角度的政治层面：一个是单打独斗，最后被唐晋汉周否定的梁朝；另一个就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大王朝。而四大王朝的真正开创者，正是李克用。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对李克用多持正面评价，代后周而立的北宋对李克用也极尽恭维，称赞李克用是辅佐唐王朝从黄巢魔爪下重生的当代齐桓、晋文。

李克用其实不是汉人，而是西突厥的分支——沙陀人，后来改姓朱邪。姓李，是因为李克用率河东黑鸦军剿灭黄巢有功，唐王朝赐姓李，所以李克用一脉打着李唐宗室的旗号在江湖上“招摇撞骗”，其实

他们的政权和唐朝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黄巢当初撤出长安后，在长安城中放火抢金银财宝的，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兵，刘秀可从来没烧过长安城。不但如此，李克用甚至遭到了唐王朝的大兵镇压，原因是李克用虐杀朝廷委任的云州防御使段文楚。

五代十国宋初的创业帝王多为武将，比如李存勖、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杨行密、郭威、柴荣、赵匡胤。而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人称“李横冲”的李嗣源，大名满河朔，但实际上要论武力指数，李克用当为第一！

因为生长在马踏胡月的边陲地区，李克用从小就学弓马劲射，十三岁时就射得一手好弓箭。有一次，天上飞来两只大雁，十三岁的李克用纵马出箭，“射之连中，众皆臣伏”。晚唐有一位著名的“落雕侍御”高骈，一箭能落双雕，李克用同样不让高骈。有人指天上双雕问李克用：“你能不能射下双雕？”李克用大笑，“弯弧发矢，连贯双雕”。而这时的李克用，就已经“渺一目”，所以江湖人称“独眼龙”。一只眼就能射落双雕，可见李克用的功夫是何等了得。

有了一身好武艺，李克用十五岁时跟着父亲李国昌闯荡血雨腥风的江湖，就大杀四方，当时人称李克用是“飞虎子”，江湖新锐地位可见一二。人都是有野心的，得到第一块大饼后，总想再得到一块更大的饼。李克用在跟随父亲打败了朝廷方面的昭义军节度使李钧后，极具政治眼光地盯上了早成笼中困兽的黄巢。只要能拿下黄巢，李克用在政治上就可以摆脱累次被朝廷打压的负面政治形象。

一切都非常顺利，善于骑兵作战的四万河东黑鸦军将黄巢军打得风流云散，而李克用因为赶跑黄巢出长安立下头等功，唐王朝也知道是时候给李克用转正了，正式封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其实朝廷也知道，即使不封李克用，以李克用的实力，他早晚会霸占河东，不如做了顺水人情。

河东是天下第一大镇，监近大漠，拥有数量庞大的优质作战马匹，李克用的发迹不知道让多少人眼红。如果说唐王朝给李克用的是——一块新做出来的美味蛋糕，那么给朱温的，不过是一块过了夜的硬馒头。正因为朱温觉得朝廷对自己赏赐不公，再加之眼红李克用吃到了肥肉，为绝后患，朱温在上源驿策划了一场骇人的大火。

朱温的计算非常精准，几乎对上源驿围得水泄不通，但朱三千算万算，唯独没有算到会突降大雨，浇灭了大火，让几乎无路可逃的李克用逃出生天。而朱温在上源驿火烧李克用，却被大雨浇灭，这很可能就是《三国演义》著名桥段“火烧上方谷”的原型。

有人常说汉人心眼比少数民族要多，或者说少数民族比起油滑的汉人相对比较朴实。如果从某种角度上看，也并非没有道理，至少李克用是拿朱温当兄弟的，李克用甚至都没想过将来要与朱温争天下。但朱温这场阴损的大火彻底烧醒了李克用，也把李克用待人的真诚彻底烧没了，所以李克用对朱温充满难以压制的怒火。

而更让李克用郁闷的是，明明自己吃亏在先，明明自己拥有天下最精锐的河东沙陀兵，可偏偏就拿无耻的朱三没有丝毫办法。要论二人事业的起点，李克用远高于朱温，但河东与汴州的发展轨迹却完全不同。朱温由弱到强，败秦宗权据淮西、杀朱瑄兄弟据兖郛，杀时溥据徐州，逐安师儒据郑滑，让魏博罗弘信俯首称臣，收降李罕之、张全义收河洛，平卢王师范举家骑驴归降。虽然清河一战被杨行密水淹七军，大将庞师古战死，朱温的触角被阻止在淮河以北，但朱温依然是天下头号强藩。而李克用虽然勇武过人，淮南王杨行密久慕河东独眼龙的大名，派人去河东画了李克用的画像观瞻，但李克用在对外开疆拓土方面却没有什麼进展，只是死守河东一地。

河东，北有契丹阿保机，东有大燕刘守光、义武王处直、成德王镒、魏博罗绍威（罗弘信之子），南有朱温，西有夏铤（西夏前身）李思恭、岐凤李茂贞，战略发展空间非常有限。虽然李克用恨透了朱

温，但他的创业能力，根本无法给朱温制造大的生存威胁，只能对朱温零敲碎打，也没占多少上风，甚至还把一个儿子李落落给搭了进去。

这件事情发生在唐乾宁三年（896年）正月，李克用亲率沙陀兵来取魏博，而他所面对的正是仇人朱温。势力早已坐大的朱温根本没把李克用放在眼里，大将葛从周出马，生擒李落落，甚至还差点活捉李克用本人。李落落的下场是被朱温当场斩首，差点没把李克用心疼得晕过去。但客观来说，李落落的死，其实还是因为李克用的实力不足以让朱温产生敬畏，否则朱温也不敢杀李落落，反而会和李克用讨价还价。这和做人质是一个道理，输出人质的一方实力越强，控制人质方越不敢轻举妄动。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朱温觉得自己的实力足够吃掉李克用的，那又何必再和李克用称兄道弟？今天杀了你的儿子，明天人头落地的就是你这个独眼龙。

唐光化四年（901年）三月，这是李克用平淡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二次大劫难。第一次是朱温在上源驿差点烧死李克用；而第二次的苦主还是朱温。已经晋封梁王的朱温觉得是时候搞死李克用了，几乎是倾巢而出，数路强兵围剿李克用，粗略估计，计有：

氏叔琮出太行；

晋州刺史侯言出阴地关（今山西汾西东北）；

洺州刺史张归厚出马岭关（今山西太谷东南）；

葛从周出土门（即大名鼎鼎的井陉口）；

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飞狐（今河北涞源）；

魏博罗弘信的部将张文恭出新口（今河北磁县附近）。

六路大军集合，声势浩荡地直扑李克用的老巢太原府。

在当时的诸侯争霸格局中，朱温相当于“二战”后的美国，而李克用的河东最多也就相当于“二战”后的法国，是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抗衡的。六路大军杀进河东，迫使很多河东大将投降朱温，梁军几乎扫掉了太原城所有的外围城镇，随后就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形势对李克用来说非常危急，他几乎发动全城老小死守城池，而朱温开始盘算哪一天能欣赏到李克用血淋淋的人头。

如果从唯心主义的天意论来看，老天对李克用是极为厚爱的，几次帮助李克用死里逃生。上源驿大火，突降一场大雨，而这次梁军围攻太原，虽然也下了一场大雨，客观上影响了李克用守城，他每天都泡在水里指挥守城。但这场大雨同样给汴军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汴军人马泡在大雨中，很快就暴发不可控的疟疾，大量士兵病倒。再加上后方粮草运输也出了麻烦，朱温权衡再三，只好灰头土脸地撤军，李克用侥幸逃过一劫。以后朱温虽然也数次敲打李克用，但朱温的精力主要用在与淮南杨行密的纠葛，以及在政治上控制唐王朝的内政上，对李克用实际上处在半放任的状态，李克用才终于可以缓过气来。

从军事能力上看，李克用不如朱温，就如同刘备不如曹操一样。这一点李克用也知道，单纯比大腿粗，李克用是玩不过朱温的，那就另辟蹊径，在政治上捞取对抗朱温的资本。

刘备之所以最后能三分天下，政治上的“投机”占了很大因素，刘备扛着“大汉皇族”的旗号，在政治上处处针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李克用同样如此，虽然李克用根本不是李唐血脉，但在政治上，李克用及其幕僚团队把李克用打扮成了忠于李唐王朝，誓死与逆臣朱温抗衡的一代忠臣。因为在政治上高举兴唐反梁的大旗，李克用与南方的反梁势力如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默契。晋、蜀、吴三国联合起来，在与梁朝的战略空间博弈上互相声援，有效地

牵制了朱温的兵力，反而在客观上扩大了河东的生存空间。为日后李存勖的经典大逆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同陈武帝陈霸先为几近灭亡的江东汉文明留下了一丝微弱的火种，苦苦撑到了汉人杨坚建立大隋朝，汉文明才绵延不绝。

李克用在政治上成熟的体现还在于他坚决不称帝，为自己争取到了极高的政治声望。朱温代唐称帝后，西川王建立刻跟着称帝，并写信劝李克用也称帝。王建这么做，实际上是想让李克用与他一起分担称帝后的政治压力，天下人要骂王建，他得拉着李克用陪绑。李克用拒绝了王建所谓先称帝，等将来唐朝复兴，再把帝位还给李唐的荒唐建议。

李克用回复王建的这封信非常感人，应该是河东统治集团精心谋划过的。李克用在信中说自己深蒙唐朝三代厚恩，位至将相，名列宗籍，怎么能背唐自立？实际上，王建虽然称了帝，但淮南杨行密那一派却没有称帝，而杨吴一直打着复兴唐朝的旗号，甚至年号都一直沿用唐朝的天祐旧号。刘备称帝，是因为孙权并没有打着复兴汉朝的旗号，所以刘备可以亮出这杆破旗。但如果杨吴高举兴唐旗帜，而李克用称帝，即使李克用还用唐朝名号，那么天下正统依然在杨吴，而不在李克用。从这一点考虑，李克用拒绝称帝是非常明智的，而只要李克用不称帝，无论杨吴在政治上出什么幺蛾子，凭借李克用的“宗室”身份，他能获得的政治资本都要远大于杨吴。

李克用不称帝的心态和闽国开国大王王审知差不多。有人劝王审知称帝，王审知笑答：做个关门天子，不如做个开门节度使。为了过上帝王瘾，而牺牲自己手上并不多的战略政治资源，是非常愚蠢的，比如东汉末的袁术。

李克用不是不想称帝，而是现在称帝，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好处。人无利不往，李克用把自己打扮成前唐孤臣，不过是在演戏而已，和刘备自诩汉朝忠臣一样，当不得真。

玩政治的个个都是好演员，没点演技还怎么在江湖上混？但李克用在遍地枭雄的时代能所险守一方，那也是有真本事的。

李存勖教会我们在羽翼未丰之时如何以退为进

在纷繁杂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李存勖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个人的生死荣辱，都极深刻地影响了公元1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如果不是李存勖作死，把自己打下来的五代第一疆域大国后唐生生地给折腾散架，就不可能有千古大帝后周世宗的横空出世，一扫残唐积秽；更不会有赵匡胤凭空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而骄傲地站在历史的最高点，接受万众膜拜的千古一帝，就是这个小名李亚子的沙陀人。

唐光启二年（886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个幼弱的生命从李克用妻子曹夫人的肚子里爬出来的时候，李克用就觉得这个头胎儿子有些非同寻常，他似乎感觉到了这应该是老天在向他暗示着什么。

李克用虽然有十几个干儿子，但在有自己子嗣的情况下，不可能把江山传给外人。所以李克用非常重视对李存勖的培养，经史子集无所不教，诗词歌赋无所不传，李存勖在尚未成年时已是文武全才。

李存勖从小就含着金钥匙出生，更让人羡慕的是，他还是五代十国第二代中唯一一个见过唐昭宗李晔，并得到昭宗极高肯定的人。年仅十一岁的李存勖站在昭宗面前，但也许是李存勖有胡人血统，还没成年的李存勖就身材挺拔，面目俊美，从这个少年眼中流露出一股时人少见的英气。所以昭宗“一见骇之”，震惊看上去邋里邋遢的李克用怎么会有这么个英俊儿子。因为当时李克用已被唐朝正式列入李氏宗籍，而昭宗也知道自己是无力再兴复唐朝了，他认定眼前这个英俊少年将来必能成大器。昭宗送给了李存勖很多珍珠宝贝，但最让李存勖或者是说是李克用受用的，是昭宗摸着李存勖后背时说的一句评语：

这个孩子长大后必能成为一代栋梁，希望他以后能忠孝唐室。

这句话对李克用来非常重要，这几乎就是在向天下人，特别是向朱温宣告：李克用及其子李存勖才是大唐帝国的正统传人，这在政治上给予李克用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这句话对李存勖来说更加重要，因为昭宗的这句话也几乎定下了将来河东江山必须由李存勖继承的基调。后来李克用选定李存勖为储君，一则是因为李存勖文武全才；二则他是李家嫡长子；三则是昭宗的这句评语。在李存勖的综合条件都强于其他竞争者的情况下，如果李克用不选择李存勖，且不说会置河东于巨大的政治军事隐患之下，也等于在政治上简单地否定了昭宗皇帝。政治成熟的李克用是不可能做出这样自毁前程的蠢事的。但因为干儿子们势力太大，李克用不敢过早宣布立李存勖为嗣，否则那些带兵的干儿子铁定会闹事，甚至不排除有人引梁入室。再加上李克用还有个弟弟——总制河东禁军的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李克宁对那个位子也有点想法。所以直到907年，李克用行将咽气，才当众宣布由长子李存勖继承王位。

李存勖初出江湖，并没有多少威望。虽然李克用吹捧长子“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但无论是近亲宗室，还是养子名将，都不服李存勖。

河东天下在法理上是传给了李存勖，但面对身边一群虎狼，李存勖能不能守得住还是一个问题，历史上少主被废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李克用死的也不是时候，梁兵北攻河东的南线门户潞州，河东人情上下汹汹，一旦统治高层内部不稳，极易造成军情动荡，河东一夜崩溃也并非没有可能。而这一年，李存勖只有二十三岁。

李存勖并非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其实他最担心的暂时还不是在外领兵的所谓兄长们，而是近在肘腋的叔父李克宁。李克宁控制着太原近卫部队，“军中之中，无大小皆决克宁”。一旦李克宁有

异心，不用李嗣源、李存信们在外起兵，李克宁一句话，李存勖就有可能人头落地。所以李存勖及其幕僚团队的对策，是先稳住李克宁，夺过近卫部队的指挥权，首先要确保自己在太原城的安全。

李存勖灭梁后，在政治上几乎就变成了一个傻子，但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还不算糊涂。李存勖首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弱势的君主，主动向李克宁示弱，绝不挑战李克宁现有的地位，以退为进。

李存勖装得可怜楚楚地站在李克宁面前，说自己年少德薄，情愿把晋王的位置让给叔父。“儿年幼稚，未通庶政，虽承遗命，恐未能弹压。季父勋德俱高，众情推伏。”

以当时李克宁“久总兵柄，有次立之势”的势力，他只要点头答应，至少在太原城中是没有人敢说什么闲话的。

离最高权力这么近，李克宁没有动心，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李克宁没有答应李存勖所谓的让贤。李克宁的主要顾虑，还是那伙在外“各挽强兵”的干侄子们，这些人仗着军功，不但瞧不起寸功未立的李存勖，像李克宁这样靠哥哥李克用吃饭的，他们也照样瞧不上。这些强藩随便哪一个跳出来捣乱，都够李克宁喝一壶的。现在内外情势极为不稳，李克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出头接这个烫手山芋。

另外，李克宁和兄长李克用感情深厚，李克用死前希望李克宁能像照看自己的儿子一样看管好李存勖，再加上李存勖突然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可怜兮兮地求他，李克宁心一软，放过了李存勖。李克宁以叔父之尊给侄子李存勖行了君臣大礼，正式确定了李存勖的河东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渡过了这一劫难后，李存勖在太原城中的统治瞬间变得明朗起来。即使李克宁随后被自己的老婆孟氏说动，后悔自己的让位，和干侄子李存勖四处联系，图谋推翻李存勖，但在名分上，李克宁明显吃了亏。自己装蒜在前，又吃翔在后，很容易给人造成首鼠两端政治不

可靠的观感，是很难收拢人心的。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李克宁为了达到目的，竟然暗中向大梁朱温通款，准备通过向梁称臣割地，以换取朱温的有力支持。具体办法是等李存勖到李克宁府上饮酒时一刀杀之，举河东九州之地甘做朱温附庸。李克宁这么做，在政治上等于自杀！至少他背叛了李氏列祖列宗百战才血拼下来的河东社稷，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贼。

李克宁亏大义在前，李存勖在政治上就有了极大的转圜空间，此时拿下李克宁，于情于理李存勖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李存勖不愧是梨园老祖师，演技极为精湛，他并没有着急拿下李克宁，而是把朝中所有反李克宁的势力召集起来，说什么自己年少德薄，既然叔父这么热衷王位，为了李家江山千秋万代，我情愿让位。张承业、李存璋等人向来与李克宁不和，怎么可能答应李存勖，自然群情激愤，“众咸愤怒”。李存勖成功地挑起了反李克宁势力铲除李克宁的强烈愿望，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李存勖摆了一场酒会，邀请李克宁等人赴宴，李克宁等人并不知道自己的阴谋已经外泄，坦然赴约，结果被侄子命武士当场拿下。李存勖虽然年轻，但他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始终站在道义高地上，对李克宁的指责也合情合理。李克宁自知理亏，干脆认罪，只求速死。

“是日，杀克宁及存颢。”

由于李克宁的罪名是通款逆臣朱温，这在当时是十恶不赦的死罪之首，所以即使有人同情李克宁，也对李存勖无可指责。李存勖在政治上翻腾挪，却始终有理有据，不让人抓住自己的丝毫把柄，所以李存勖能在杀李克宁之后迅速地稳定太原局势。

太原城中发生的这场宫廷政变，在外诸藩都在密切关注。太原是河东政治中枢，一动一静，都将极大地影响着周边藩镇的政治抉择。

一旦太原陷入动荡，这些强藩要么会率兵杀回太原夺位，要么举城降附梁朝。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发生，李存勖脖子上的吃饭家伙都很难保全。而李存勖稳定了太原局势，断绝了外藩们打着各种政治旗号浑水摸鱼的可能，在太原稳定的情况下还要起兵，那道义就会始终站在李存勖一边。

这种情况很像南北朝萧梁末年，侯景兵围金陵城一年有余，虽然城内几陷险境，但始终没有沦陷，所以萧梁外围还算稳定。而等金陵城陷，梁武帝萧衍绝粮而死后，与西魏、北齐接壤的萧梁外围彻底崩溃，导致南朝弱势，最终为北朝吞并。如果萧衍能灭掉侯景，金陵在，则大梁在，西魏、北齐又怎么会有机会凭空捡便宜？

风云帐下奇儿在 ——李存勖扬名立万的三垂冈及柏乡之战（上）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是清朝诗人严遂成著名的咏史诗，称赞晋王李存勖在三垂冈大破梁军，把一代枭雄朱温打得灰头土脸，而这场著名的战役发生于梁开平元年（907年）的五月初一。

三垂冈位于山西省长治县东南的太行山麓，是晚唐五代重镇潞州（即长治）的重要门户。本来潞州是朱温打下来的，但镇守潞州的丁会因不满朱温弑唐昭宗，于唐天复元年（901年）举城归降河东。潞州在河东首府太原与梁朝国都汴梁之间，等线距离不过三百里，军事地位极为重要。谁占领潞州，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对方头上。

朱温深知潞州对自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回潞州。开平元年（907年）夏，刚刚建立梁朝不久的朱温就派大将康怀贞率数万精锐北上攻潞州。

康怀贞本是朱瑾部将，后来归降朱温，屡立战功，特别是朱温与凤翔军阀李茂贞的武功之战，身为前锋的康怀贞出尽风头，披甲执盾，“一鼓而攻之，掳甲士六千人，马两千匹”，差点被激动的朱温吹上了天。

不过朱温似乎不太信得过康怀贞，毕竟丁会叛变带给朱温的刺激太大，朱温在北上夺取潞州时，就敲打过康怀贞，说自己对得起康怀贞的勇猛作战，官位至上将，赏赐无数，希望康怀贞能忠心事君，有死无二，不要学忘恩负义的丁会吃里爬外。

被朱温这一番恶狠狠地敲打，康怀贞为了打消朱温对自己的怀疑，不敢有半点懈怠，几乎是玩命似的攻城，“筑垒环城，浚凿池堑”。不过在潞州，康怀贞遇到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对手，就是河东的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李嗣昭是十三太保之一，李嗣昭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了报答李克用，李嗣昭同样是玩命似的守城。

当时李克用还在，他更知道潞州就是他的保命门窗，一旦潞州失守，梁兵必将太原围个水泄不通。为了保住家门，李克用几乎倾巢而出。相当于现代十大元帅之首的河东头号名将周德威亲自出马，率河东名将群如李存璋、李嗣本、史建瑭、安元信、李嗣源、安金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潞州。

梁晋双方在潞州的攻守呈胶着状态，梁军攻不进去，但死战不退，而晋军在周德威的率领下，在壁河下寨，与被梁军挤成压缩饼干的潞州城遥相呼应。康怀贞曾经尝试过先拔掉周德威这根刺，结果被周德威强硬地狙击回去。

这场异常艰苦的战役，一直对耗到当年七月，性格急躁的朱温对康怀贞已忍无可忍，决定临战换马，将康怀贞贬职，但依然留在军中。而取代康怀贞的，则是五代十国第一神经刀、善使一把大槊的亳州刺史李思安。

李思安在五代十国名将群中极为另类，只要出马临阵，他专挑对方的猛将打，“必鹰扬鸢卷，擒馘于万众之中，出入自若，如蹈无人之地”，是朱温的心腹爱将。但李思安最大的问题是稳定性太差，所以只要是李思安主导的战役，要么胜得惊天动地，要么败得惨不忍

睹。“（李思安）每统戎临敌，不大胜，必大败。”

朱温派李思安上场，有明显的赌博成分，但现在不在李思安身上再赌一把，难道等着周德威耗死康怀贞？而朱温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李思安能赢得这场轮盘赌，因为他拨给了李思安十万大军！朱温不愧是五代第一土豪，一出手就是十万人马，这是李克用卖光家当也凑不出来的数字。

不过朱温很快就失望了，李思安虽然没有立刻输掉赌局，但也被周德威的牛皮战术搞得狼狈不堪，双方还是死缠烂打。

李思安的攻城战术比康怀贞要先进一些，李思安在潞州城下修建了两重城垣，几乎将雄伟宽阔的潞州城圈成了内城，梁人称为夹寨。这种夹寨最大的作用，就是彻底隔绝晋军外线周德威本部与潞州李嗣昭的任何联系可能，所谓“内防奔突，外拒援兵”。李思安的办法足够恶毒，周德威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牛皮糖似的缠住李思安，零敲碎打，每天恶心你几下，果然把梁军搞得疲于奔命，最后干脆守在夹寨里，高悬免战牌，准备饿死城中的李嗣昭。

虽然城内的晋军粮食越吃越少，但由于周德威成天骚扰打游击，十多万梁军的粮草供给也成了大问题。从开平元年七月一直打到第二年正月，李思安对内拿不下李嗣昭，对外轰不走黏胶一样的周德威，“士卒疲弊，多逃亡”。这还是只逃亡的人数，在与晋军数不清的牛皮战中，梁军竟然战死了一万多士兵。李思安打破了自己“不大胜必大败”的魔咒，但朱温哪里还有耐心再给李思安时间，一道诏书把李思安召回来，贬官发落。而此时的朱温已大驾北上亲自督战，潞州以南不过百里的另一座军事重镇泽州（今山西晋城），成了朱温的临时指挥部。

开平二年正月，朱温突然从前线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独眼龙李克用病危。开始朱温还怀疑这是李克用为了迷惑自己而放出的假消

息，但随后朱温正式确认了李克用已经咽气了。而朱温似乎对这场旷日持久的牛皮战心生厌倦，准备撤兵，还是前线诸将苦劝，认为李克用的死，必然会引起河东最高统治内部的权力火并，不如再等一个月看看。朱温没兴趣再在山西待下去了，留下大将刘知俊继续和周德威扯胶，自己回到洛阳避暑去了。

朱温敢离开潞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温认为李克用已死，自己在河东已无对手，新王李存勖在朱温眼里，这不过是个膏粱子弟，何足惧哉！

梁朝诸将对河东形势的判断并没有错，李克用一死，李存勖为了保住权力，和叔父李克宁掀起牛皮官司，甚至为了测试头号大将周德威对自己的忠诚，下令让周德威率军北归太原。周德威知道这是晋王对自己不放心，虽然潞州战事紧，但为了不让李存勖起疑心，也只好忍痛北上。

河东援军的突然撤退，让潞州成为一座孤城，梁朝上下喜气洋洋，“汴人既见班师，知我（国祸），以为潞州必取”。守在夹寨中的梁兵每天做的，就是睡觉晒太阳，“不复设防”。而朱温也被眼前的假象所欺骗，下了一道不久后他就极为后悔的旨意，不再从内地往潞州方向调派援军，凭现有的兵力已足够了。

而此时的李存勖，已经得到了前线梁军放松警惕的情报，立刻召开军前会议。李存勖的态度非常明确：潞州是太原南线头号门户，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住。“无上党（即潞州），是无河东也。”而且李存勖也知道朱温瞧不起自己，但这对李存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至少这位年轻的晋王在心理上可以轻装上阵，战胜朱三是不世奇功，败给朱三也不算太丢面子。李存勖深知自己的现在江湖地位几乎等于零，不在朱温身上刮掉几块肉，江湖上是不会认他这号人物的。

李存勖告诉手下弟兄：“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人以我

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

李存勖熟读历史，他应该知道前秦苻坚因为骄横不可一世，自诩投鞭可以断流，结果淝水一败，前秦帝国冰消瓦解的典故。朱温所犯的，正是骄兵必败的大忌。

不过当时梁强晋弱，为了谨慎起见，李存勖还是花了一些车马费，向契丹大头领耶律阿保机请来了一部分契丹兵助阵。等到李存勖打扫完了太原城中的一地鸡毛，李存勖率周德威等人南下，开始了李存勖初出江湖的第一战。

李存勖的行军速度非常快，四月二十四日，数万晋军夜出太原南门，仅用了六天时间，于四月三十日赶到潞州北四十五里处的北黄碾地区。李存勖知道朱温已离开潞州，但并不敢保证朱温会突然再率大军杀回来，所以现在李存勖最需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趁朱温轻敌之际，一举拿下夹寨梁军，打出新一代晋王的逆世虎威。

四月三十日夜，李存勖率憋了一肚子闷气的晋军静悄悄地埋伏在梁军夹寨附近的三垂冈，就等着天一放亮，对梁军夹寨采取偷袭行动。

老话讲不作死便不会死，即使李存勖新锐可畏，但只要梁军做好最基本的防范工作，晋军是没什么机会的。但朱温过于托大，在大驾南返时甚至撤掉了前线侦察兵（斥候），而如果这些侦察兵继续在附近游弋的话，是一定能发现数万晋军的，毕竟几万人的目标太大。梁军罢斥候，弟兄们都躲在寨子里睡大觉，谁也不知道就在寨子外面，几万虎狼正流着口水盯着自己。

不过对李存勖来说，这次偷袭行动还是比较冒险的，因为夹寨的视野非常开阔，即使梁军没有前线斥候，他们站在栅栏前，就能看到

几里外的晋军行动。换言之，梁军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应战准备。但让李存勖兴奋的是，当天夜里，太行山麓突降大雾，数米之外不见人影。到了次日凌晨，大雾弥漫山谷，李存勖知道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一声令下，几万晋军挥舞着刀枪，直抵夹寨。

按照李存勖事先制定的分工，李存璋和王霸率晋军后勤人员放火烧寨，把夹寨烧成两截，然后周德威率晋军主力从西北方向强攻进夹寨，大总管李嗣源率帐下亲军进攻夹寨东北角，李存勖率中路队“三道齐进”，借着茫茫雾色马踏夹寨。

因为晋军这次行动非常保密，再加上梁军自己作死，以及天公不作美，等晋军杀进寨子里时，梁军这才发现。但晋人的大刀已经架在了梁人的脖颈上，再作反应已经来不及了。《旧五代史·庄宗纪一》对这场三垂冈之战的记载简略而精彩，“李嗣源坏夹城东北隅，率先掩击，梁军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斩万余级，获其将副招讨使符道昭洎大将三百人，刍粟百万”。梁军前主帅康怀贞非常幸运地逃出李存勖的魔掌，模样狼狈地带着百余骑夺命出天井关逃回河南。是役，晋军大获全胜，成功地把战略重镇潞州从梁军数重围困中解救出来，确保了太原南线的战略安全。

李存勖单枪匹马，迎风立在三垂高冈上，看着山谷中数不尽的梁军兵甲军械，享受着无数弟兄伏地高呼晋王万岁的成就感，李存勖笑了。打赢了事关河东生死存亡以及事涉李存勖个人威望的三垂冈之战，从此江湖上都知道李亚子不是好惹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年轻的晋王感到快意的。甚至是洛阳城中的朱皇帝得到三垂冈惨败的消息后，意识到李存勖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朱皇帝看着自己膝下一堆不争气的儿子，哀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

其实三垂冈并非李存勖第一次来，早在他五岁的时候，就曾经跟着慈爱的父王在三垂冈地区射猎。三垂冈坡上有一座唐明皇李隆基的

庙宇，李克用让部下在明皇庙前摆酒，一队乐工吹奏名曲《百年歌》。中年的李克用半世拼杀，感慨人生无常，听着声调凄苦的《百年歌》，李克用感慨满怀，他指着五岁的长子说：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死。也许李克用只是一时醉言，但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李存勖真的如父亲所言，在三垂冈明皇庙前，拉开了他辉煌人生的宏大帷幕。

风云帐下奇儿在

——李存勖扬名立万的三垂冈及柏乡之战（下）

李存勖赢得了自己军旅人生中第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但客观来说，三垂冈之战实际上是一场偷袭战，骄傲的朱温自己打败了自己，再加上大雾助晋，所以梁军才莫名其妙地被晋人狠踹一通。老虎正在打盹，被驴一蹄子踹进阴沟里，但这并不说明驴子能打过老虎。虽然朱温叹过生子当如李亚子，但就朱温本人来说，他并没有太把李存勖当回事。

李存勖自然知道三垂冈之战赢得侥幸。虽然他借此战在河东打出了自己的声威，河东名宿老将周德威、李嗣昭、李嗣源等人对李存勖忠贞不贰，但梁强晋弱的局面没有丝毫改观。对李存勖来说，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啃硬骨头，一块一块地啃。

果然有一块硬邦邦的骨头摆在了李存勖面前，朱温又把触角伸向了河北地区的赵国。

这里需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五代初期的河北势力分布形势：

梁朝：朱温所建，控制河南、山东、苏北、皖北、鄂北、晋南，以及河北南部邢台、邯郸一带。

晋国：李存勖所有，占据山西大部。

燕国：刘仁恭、刘守光相继割据，占有今北京、天津地区，以及河北沧州、张家口、唐山，以及辽宁朝阳一带。

义武军：王处直所据，占有河北保定附近二州，在河北诸势力中面积最小。

赵国，即唐末的成德军节度使，占有镇（石家庄）、赵（赵县）、深、冀四州，因为统治者王镒被朱温封为赵王，所以俗称赵国。

王镒与李存勖一样，并非汉人，而是回鹘人的后裔，十岁时袭封父亲王景崇的成德节度使之职。而王镒往上溯四五辈，他的祖先世代割据成德，成为河北大藩，史称承祖父百年之业，土马强而蓄积富。

赵国北接义武，南接梁朝的魏博，东接燕国，西与李存勖的晋国比邻而居。在一轮又一轮的河北争霸战中，王镒奉行“睦邻友好”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尽可能地不与邻藩发生武装冲突。虽然朱温是天下第一强藩，但早年的朱温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消灭秦宗权、朱瑄、时溥等中原军阀上，暂时顾不到河北。而王镒的老邻居李克用占据河东，地大兵强，是王镒无论如何都得罪不起的。所以王镒特别重视与河东的外交关系，李克用曾经发兵攻赵，被王镒花了二十万匹绢给劝退，晋赵和好。但等到朱温摆平中原后，开始经营河北，王镒知道朱温的实力，更不敢得罪朱温，“卑辞厚礼，以通和好”。等到朱温建梁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镒的儿子王昭祚。当时梁强晋弱，王镒只能向强者低头，承认梁朝的正统性。

王镒虽然向朱温称臣，但他的成德军毕竟是独立政权，并不受朱温直接控制。而赵国西与河东为邻，如果朱温能拿下赵国，就能在河东的东线对李存勖狠狠地插上一刀，让太原城中的李存勖每天都生活在梁军随时可能偷袭的恐惧之中。

为了实现吞并赵国的计划，朱温开始对王镒，以及更北边的王处直慢慢下手，至于说朱温的理由是怀疑王镒与李存勖暗中私通的一个蹩脚的借口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燕国的刘守光也盯上了赵国，发兵南屯涿水，似乎要偷袭赵国。朱温觉得并赵的机会来了，即时发魏博兵三千人进屯深、冀二州，表面上说要帮助赵国击退燕军，实际上是等待时机消灭赵国。

王镒不是不明白朱温的意思，但慑于朱温的淫威，王镒不敢和朱温翻脸。王镒希望能说服朱温撤兵，并派人去洛阳告诉朱温，说赵国已经和燕国和解，刘守光撤兵。王镒天真地以为找到了最合理的借口，朱温就可以撤兵了。即将到嘴的肥肉，没人会傻到放弃，朱温表面上和王镒打马虎眼，暗中却让三千魏兵突然发难，杀掉了守城的赵兵。王镒这时才发现自己上当，再也不管和朱三的亲家情了，立刻向李存勖求援。

李存勖收到了王镒的鸡毛信，不过在是否救援赵国的问题上，晋国高层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大多数幕僚都认为王镒是朱温的儿女亲家，“镒久臣朱温，岁输重赂，结以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诈也！”这极有可能是朱温与王镒演的双簧戏，目的是诱晋兵深入，聚而歼之。大家的意见是先缓一缓，看看朱温下一步动作再作计较。而李存勖却认为王镒只是屈服于朱温强大的军事压力，并非真心归降，王镒臣梁的底线是赵国独立自主。李存勖的态度非常明确：唇亡齿寒，今不救赵，赵亡，晋岂能独存！李存勖告诉大家：“我若疑而不救，正坠朱氏计中。宜趣发兵赴之，晋、赵事力，破梁必矣！”

河东黑鸦军再次兵发太原城，由周德威带队疾驰出井陘口，直赴赵州，阻止梁军对赵国首府真定随时可能发起的攻击，李存勖随后赶到。

朱温本来是希望三千精兵赖在赵国不走，给王镒制造压力，敦促王镒早点献城。但朱温完全没有想到王镒竟然暗中向李存勖求救，李存勖已率晋军拦在赵州。李存勖承受不起赵国入梁给晋国带来的生存压力，而朱温同样承受不起赵国入晋带给梁朝的生存压力，所以既然

李存勖要把事情闹大，那么就趁这个机会干掉李存勖。

梁开平四年（910年）十二月初三，天下唯一超霸朱温甩出手上一张王牌：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任北面行营招讨使，潞州招讨副使韩勍为副使，相州刺史李思安为前锋，出兵十万（《资治通鉴》作七万，《旧五代史·周德威传》作八万）。同时，魏博军协同王景仁的主力北上作战，大将阎宝、双枪王彦章率两千精锐骑兵跟进，作为机动接应。

梁军主将王景仁其实不是朱温的嫡系，他本名王茂章，善使一条大槊，性情暴戾，是淮南王杨行密手下虎将，杨行密死后，杨渥继位，忌王景仁之才，王景仁为避祸，私奔吴越钱镠。后来钱镠派王景仁去洛阳朝见朱温，朱温非常欣赏王景仁，便留为己用。而为了避朱梁祖讳，王茂章改名王景仁。

奉大梁皇帝之命，王景仁率诸军星夜北上，十二月初四，梁军从河阳渡口横渡黄河，从东北方向进入天雄军，与天雄军罗周翰率领的四万魏军会合，然后北上直进赵州南线的邢州、洺州一带。为了接近李存勖的晋军主力，王景仁下令梁军继续北上。十二月二十一日，梁军扎营柏乡（今河北柏乡）。四天后，晋王李存勖在赵州与周德威的主力会合，震惊天下的柏乡之战一触即发。

不过，现在李存勖最担心的倒不是梁军人多势众，他最怕赵王王镕承受不了压力，临场下软蛋。李存勖先率小股部队外出，生擒梁军后勤人员二百人，从他们嘴口撬出了一条重要信息，朱温确实要使诈吞并赵国，并表达了就算赵国以铁为城，梁终要取之的强硬态度。李存勖和王镕都知道朱温想吞并赵国，但却一直没有实证。现在李存勖得到了证人，立刻把被俘梁军送往真定，让他们一字一句把朱温的原话告诉王镕，从而坚定了王镕背梁归晋的决心。王镕反梁立场坚定，就等于在后方政治战场上支持李存勖，李存勖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集中精力在柏乡对付王景仁。

梁军兵精粮足，即使一时半会儿拿不下赵国，也有足够的资本和远道而来的李存勖打对耗战。从太原到真定山路崎岖，粮食运输比较困难，虽然赵国竭力输粮，但毕竟赵国只有四州，粮食有限，所以李存勖必须速战速决。而李存勖的对手王景仁早就窥破晋军的短板，你要速战速决？不好意思，我偏要耗死你！

不过李存勖还没有摸清王景仁的底细，并不敢贸然发起总攻，只是驻军于柏乡北三十里处，派周德威率小股骑兵到梁军大营前试图挑战。“梁兵不出”，任凭晋军群魔乱舞，我自岿然不动。

现在着急的是李存勖，他知道王景仁想倚仗着强硬的资本耗死自己，而李存勖是根本没有资本和王景仁拼消耗的，而他唯一的资本，就是晋军旺盛的士气，可士气是有限性的，“朝气锐、暮气坠”，时间不在李存勖这一边。晋军再往前推进二十五里，扎营于野河北岸，他试图以“步步为营”之计刺激王景仁，让王景仁下令出战。

李存勖这次使了一计损招，让前去挑战的晋军骑兵在周德威的带领下，先是对着梁军大营一顿乱箭，然后集体骂人。晋军具体骂了什么，于史不详，但应该是李存勖针对王景仁本人背景专门制定的骂人攻略，王景仁最怕听到什么，弟兄们就给我狠狠地骂，连带着韩勣、李思安，祖宗八代、七姑八姨，都被晋军的毒舌骂了个坟头冒烟。

王景仁本来就是急脾气，根本架不住李存勖近乎泼皮无赖式的骂人，终于被骂毛了，派副使韩勣率三万步骑兵出营教训这伙出口成“脏”的河东人。晋军看到几乎武装到牙齿的梁军黑压压地出营，立刻撤退，被骂急了眼的韩勣估计是憋得太久，急需发泄郁闷，死追晋军不放。周德威手下只有一千多骑兵，如果正面迎击，等于送死，所以周德威选择了梁军相对薄弱的两翼，一千河东骑兵就像一只讨厌的苍蝇在一头猪身上来回袭扰，惹得这头猪乱甩尾巴。河东骑兵士气旺盛，加上骑术精湛，骚扰一下梁军不成问题。但梁军人数太多，而且装备极为精良，每匹战马上都铺锦绸、悬金银饰，虽然受到了晋人骚

扰，也不过损失了一百多人。晋军不敢和梁军玩命，边战边退。

通过这场规模很小的战役，周德威真正认清了梁朝军队的强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衰退的。性格沉稳的周德威更倾向于以守待变，等梁军士气耗尽，晋军再出手收拾梁军，必能大胜。“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不过李存勖并不认同周德威的看法，梁军士气久而必衰，难道晋军士气就会久而不衰？李存勖坚持速战速决，对周德威产生了严重不满。周德威同样不让步，但他还是通过李存勖非常尊敬的老太监张承业，劝李存勖要沉住气，一旦梁军主动渡过野河发起会战，吃亏的将是弱势一方。

李存勖本来还想嘴硬，但当他从俘虏的梁兵口中得到了王景仁即将修建浮桥渡河的计划，惊出一身冷汗。李存勖认识到速战速决其实对梁军是同样有利的，所以他及时改变战略，听从周德威的建议，全军退守高邑，以退为进，再寻战机。

以双方的军事力量看，真要打会战，晋人铁定被梁人包饺子。要削弱梁人的战斗能力，最好的办法，还是周德威在三垂冈之战中使用过的牛皮糖战术，不停地袭扰梁军，特别是梁军的后勤保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梁军的粮食突然不够吃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赵国方面早就预料到梁军会北上赵州，所以提前搬空了赵州府库的粮食，而梁军后勤运输一时没有跟上，所以造成了梁军“柏乡比不储刍”的局面，梁军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只能就地取粮，四处抄掠。梁军客场作战，晋军主场作战，赵国和义武军的粮食源源不断地供给晋军，时间反而站在了李存勖这一边，李存勖不再像以前那样力求速战速决。

晋军在周德威的率领下，再次祭出骂人祖宗八代的损招，不过梁军怀疑周德威背后有晋军埋伏，不敢出战。梁军死守在柏乡营中，四个方向都有成群的晋军骑兵骚扰梁军外出采办粮草，时间一久，梁军

营中几乎断了粮。

无法想象，以梁朝强大的整体实力以及朱温的智商，怎么会不调拨粮食供给十万大军？但事实就是如此，不但梁人没有粮食吃，甚至战马都饿得眼冒金光，只能啃茅席。军队作战大忌之一就是前线无粮，这极易造成人心恐慌，所以王景仁决定向晋军发起总攻，多拖一天，梁军就多一分因绝粮而崩溃的危险。至于史书所载王景仁出战是因为周德威等人把他骂急了，实际上周德威这次不骂娘，王景仁也要出战。

梁乾化元年（911年）正月初二，梁军主力在王景仁、韩勣的带领下悉数出营，结阵而出，一定要活捉满嘴喷粪的周德威。周德威当然不会傻到与梁军玩命，且战且退，回到野河北岸。

梁军人数太多，而野河上桥梁有限，所以梁军过河速度比较慢。李存勖知道这几万梁军一旦过了河，必如下山猛虎势不可当，所以李存勖派大将李建及带着二百壮士，堵在桥梁北头，极力阻止梁军过桥，“力战却之”。

也许是这场规模极小的战役刺激了李存勖的野心，他似乎又忘记了周德威之前对他的苦劝，又想毕其功于一役。年轻气盛的晋王告诉周德威：国家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我先上阵杀敌，你在后面助威。周德威知道今天势必与梁军主力决战，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的理由是梁军缺粮，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梁军刚吃完上顿，有力气拼杀，所以现在决战等于送死。等梁军没饭吃的时候，我们再动手，必能一击克之，希望李存勖再耐心等一等。“彼去营三十余里，虽挟糗粮，亦不暇食，日昃之后，饥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劳倦，必有退志。当是时，我以精骑乘之，必大捷。”李存勖总算听进去了周德威的逆耳之言。

梁军吃过早饭出战，自然希望速战速决，但狡猾的晋人根本不和

他们玩。等到了中午，梁军士兵因为没有饭吃，饿得两眼昏花，士无斗志，就差直接躺在地上睡着了。王景仁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既然晋军不咬速战速决的鱼钩，那就只能先撤回营，再作打算。“景仁等引兵稍却。”梁军几万人都挤在河边，即使朝后退，巨大的惯性也让梁军手忙脚乱，阵型被打乱，东首魏博兵与西首的汴宋兵早挤成一团。

这一幕被眼尖的周德威看到，熟读史书的周德威也许受到了秦晋泚水之战的启发，当年秦军就是在河边挤成一团，晋将朱序临河大呼：秦军败了！秦军慌不择路，遂至崩盘。现在的形势和当年简直如出一辙，周德威率众大呼：“梁兵败了！弟兄们要发财的跟我上。”数万晋军同声高呼，声势极大，同时也给梁军制造了极大的心理恐慌，梁军已有人开始溃逃。梁军虽然断粮，但梁军的战马兵甲都是世界顶级装备，晋军弟兄早就看着眼熟。大帅一声令下，晋人争先恐后地杀向梁军。

首先扛不住的是东首的魏博兵，见势不妙，魏兵脚底抹油先溜了。魏军的溃败，给处在混乱中的西首汴宋兵又制造了更大的心理恐慌，汴宋兵像无头苍蝇一般乱转。晋军大将李嗣源知道汴宋兵在心理上已经有些撑不住了，立刻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李嗣源让士兵们冲着汴宋兵高喊：“魏兵已溃逃，你们难道等被河东人砍头吗！”

此时的汴兵似乎还不太知情东首魏兵的情况，当他们从李嗣源口中得知魏兵溃逃的消息，早就斗志涣散的汴兵彻底崩溃了，李嗣源散布的这个真实的消息成了压垮梁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梁军本就饿着肚子，根本没有心思战斗，李嗣源这么一喊，梁军“互相惊怖，遂大溃”。反正魏兵溃逃在先，皇帝真要追责，也怪不到我们头上。

这应该就是西首汴兵溃逃时的心理，但不管怎么说，柏乡十万梁军的大溃败已成定局。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梁军斗志已经崩溃，但就个体而言，梁军单兵作战的能力还是让晋军有所忌惮，此时贸然与乱哄哄的梁军作战，未必就能占到什么便宜。还是大将李存璋懂一点

政治，他让晋军士兵们在阵前给梁军兄弟们上了一堂感人至深的政治课：梁军弟兄都是普通百姓，只不过被朱温蒙蔽上当。只要你们放下武器赶紧滚蛋，我们一个不杀！

李存璋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替梁军减了负，背着沉重的兵甲，逃也逃不远，不如丢掉这些东西，轻装逃跑。“于是（梁）战士悉解甲投兵而弃之，器声动天地。”特别是梁军精锐部队之一的龙骧军、神武军、神捷军都丢下武器，撒开脚丫子哭爹喊娘狂奔而去。

李存璋说话算数，他率领的晋军确实没有对放下武器的梁人大开杀戒，但李存璋可没有替饱受梁人欺负的赵国保证不开杀戒，李嗣源等各部晋军可没有保证不杀人。

赵国久受梁人欺凌，早就恨梁人入骨，只恨平时没有机会报仇。现在梁军放下武器，不杀你们，更待何时？为了报复梁人，面对堆积如山的兵甲器物，赵人弃之不顾，操着短刃追上手无寸铁的梁军，肆意杀戮，龙骧、神武、神捷三军几乎像瓜果梨桃一样被赵人砍杀殆尽。同时，晋军三大名将李嗣源、史建瑭、安金全各率本部人马冲进梁军乱阵中大砍大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金全帐上几乎是清一色的吐谷浑番兵，战斗力极强，空手白爪的梁人死伤极为惨重。从野河南岸到柏乡城之间空阔的数十里地中，梁人伏尸遍野，血水将野河染成了红色。梁军主将王景仁、韩勣、李思安带着几十名亲卫骑兵夺路狂奔，在混乱的局面中侥幸逃出生天。在这场柏乡之战大出风头的李嗣源率军一直狂追了一百五十里，直到邢州才鸣金收兵。而之前赖在赵国深、冀二州不走的三千魏兵，听说梁军主力在柏乡被晋军全歼，吓得连夜弃城南逃。本来岌岌可危的赵国局势，在晋王李存勖的帮助下转危为安，王镕可以继续做他的赵王，寻欢作乐。

十万梁军在这场乱七八糟的溃败战中，仅被晋军杀死的就有两万人，生擒梁朝将军二百八十五人，数万逃兵裹着狂风溃逃到梁保义军节度使王檀所在的磁州辖区，才由王檀出面，给逃兵发了路费，遣散

回本部。坐在洛阳城等待吞并赵国好消息的朱皇帝，万万没想到他的十万大军竟然稀里糊涂地就被李存勖全歼，败状极惨，朱温脸上的惊愕表情可想而知。

梁朝虽是天下第一强国，但总体经济实力也是有限的，此次十万梁军出征，军资消耗极大，梁军每副铠甲都价格数十万钱，几亿钱的军用装备就这么葬送掉了。

不过以朱温的见识，他最心疼的还不是这些钱，而是在政治外交上的重大损失。柏乡一败，早就与梁朝离心离德的王镕、王处直已经彻底倒向李存勖，河东的东线防御体系固若金汤，梁军已不可能从河北太行山一线进入河东境内。战略损失，相当于东吴孙权偷袭荆州得手，让刘备彻底失去走汉中、荆襄两线消灭曹魏的可能，只能走山路艰险的汉中单线。同样的道理，以后朱温要再与河东作战，只能走潞州一线，李存勖在河北一翼战略无忧的情况下，可以集中所有兵力在潞州附近与梁军抗衡，战略压力减到最小。

虽然在柏乡之败后，梁朝还是天下第一强国，但统治力明显减弱。而李存勖在接连打赢了防守态势下的三垂冈与柏乡之战，终于可以喘过气来，甚至借着与河北两镇的战略结盟，可以主动向梁朝发起进攻。

不过朱温虽败，虎威犹在，梁朝的整体实力还没有弱到可以被李存勖一口吞下的地步，只不过梁朝从大象瘦成了河马，而河东从兔子胖成了豹子。李存勖现在能做的是，在内继续整合亲太原中央的力量，在外持续瓦解梁朝的战略空间。

李存勖的横空出世，一改先王李克用屡被朱温欺负的窝囊形象，扭转了河东在战略生存上的被动态势。这两场梁晋之间的恶战结果震惊天下，谁都没有想到身经百战的天下头号枭雄朱温被之前默默无闻的李存勖打得满地找牙，李存勖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再加上老天的一

些眷顾，成功地率河东冲出历史的牢笼，如猛虎下山，一发不可收拾。

老天都在帮李存勖。朱温也许在进攻上打不过李存勖，但以朱温的老到，守住黄河一线还是没有问题的。可谁也没有想到，柏乡之战仅仅一年后，爬灰爬成仙的朱三被亲生儿子朱友珪一刀送上西天，而老四朱友贞又把二哥踢下地狱。而当一直在密切关注梁朝内部动态的李存勖得知朱友贞将成为他的对手时，他笑了。

在李存勖之前推定的三个有可能的对手中，他最怕的其实还不是所谓“多才艺”的朱温假子朱友文。朱友文善于后勤统筹，但不善于前线交锋，而朱友珪虽然性格顽劣，但“辩黠多智”，做事不像朱友贞那样四平八稳，这反而是李存勖比较忌惮的对手。但偏偏最终上位的是性格庸弱的朱友贞，李存勖最不怕的就是这种平庸性格的对手。

时间也证明了这一点，朱友贞继位后，不停地出昏招，在内重用赵岩、张的等奸臣，在外猜忌功勋老将，在战略上硬生生把固若金汤的魏博防线送给李存勖，李存勖几乎是在朱友贞的“帮助”下，用了十年时间，灭掉了与自己家族有血海深仇的朱梁王朝。

花样作死

——“唐光武”李存勖覆亡记（上）

当大唐皇帝李存勖（李存勖已在923年于魏州称帝，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意气风发地策马进入汴梁城时，所有人都想到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死灰复燃的东汉光武皇帝刘秀。

西汉被王莽篡夺后，天下人都以为刘氏已亡，王氏当兴，但仅仅十六年后，一个叫刘秀的西汉前宗室竟然重建汉朝江山，东汉帝国又雄雄壮壮地在东方的历史长河中挺拔了近二百年！三百年唐朝被朱温一朝倾覆，但时人对唐朝还有很深的感情，复兴唐朝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不过谁都没有想到，又是十六年后，唐朝“后裔”继刘秀之后，再次实现华丽的剧情大翻转。

大唐朝完美回归！

灭后梁两年后，李存勖再发神威，出兵消灭前蜀，蜀主王衍举族入洛受诛。灭朱梁，平两川，再顺江东下，收荆南，平楚，削吴，定吴越、闽、南汉，四海复归唐一统，天下人都心甘情愿地拜伏在“唐光武”皇帝陛下面前山呼万岁，天下再享承平。

可历史却总是在不恰当的时候跟人们开天大的玩笑。当人们都在期待大唐帝国完美中兴的时候，这个处在人生最顶峰的当代光武却以光的速度坠落。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李存勖就兵败身死。洛阳城头那把让人绝望的冲天火光，宣告了大唐中兴的梦想彻底破灭。对于李存勖前一脚上天踏祥云、后一脚入地踩烂泥的诡异人生轨迹，很多人都觉得可惜。

其实李存勖的败死一点也不值得同情，李存勖在功成名就后，就

开始自己作死，而且是别人完全不可理解的花样作死。

其实对于李存勖自己如何作死，《旧五代史·庄宗纪史论》已给出了答案：“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栴沐之艰难，徇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怒；征搜輿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李存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虽然史家给出了很多答案，但归根结底，李存勖的败亡，可以总结为：其自身性格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管。

历史上有两个因为缺乏监管而从云端一头栽进烂泥的著名君王，就是齐桓公姜小白与前秦宣昭帝苻坚。众所周知，姜小白之所以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有至少七成原因是因为他身边站着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天才仲父管仲。而苻坚之所以能统一北方称霸天下，也至少有一半原因是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铁血宰相王猛。管仲和王猛之于姜小白与苻坚，与其说是君臣关系，不如说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姜小白与苻坚，他们在事业上虽然如日中天，但从性格来说，他们都是长不大的孩子。身边有人管着他们，可以给他们指引正确的方向，不至于让他们身陷迷途。而他们对这种父亲式的宰相也几乎是言听计从，有效地规避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可等管仲与王猛死后，姜小白与苻坚彻底失去管教，开始盲目自大、好大喜功、不听人劝，结果一个身死宫难，一个国破人亡，沦为天下笑柄。

从本性上来说，李存勖与姜小白、苻坚是同一类人。这类人都非常感性化，待人真诚，极易在并不了解对方真实情况的条件下与人成为朋友，愿意与人剖肝沥胆共生死。他们在心智上其实并不成熟，都有着强烈的父爱需求，身边必须有一个家长式的大臣时刻看管着他们。

姜小白身边有管仲，苻坚身边有王猛，而李存勖身边也有一个类似管仲、王猛式的家长型人物。确切来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就是前面提及的德高望重的河东总管大太监张承业与河东第一名将周德威。

张承业，本姓康，从小就入唐宫做了太监，被老太监张泰收为养子。张承业之所以进入河东集团，是因为李克用在与张承业有业务往来的过程中，非常欣赏张承业的为人。后来唐宰相崔胤在朱温授意下诛灭所有太监，即使在诸藩镇者也要杀死。但李克用不舍得杀张承业，便杀了一个罪犯，把人头交给崔胤，张承业逃过一死。也许是这个原因，张承业对李克用感恩戴德，必以死相报。李克用也知道张承业为人忠朴，临死前特意把李存勖叫过来，流泪托孤于张承业，“以亚子累公等”。当然，这个“等”，也包括周德威、李嗣源等人。张承业几乎是看着李存勖长大的，再加上李克用对自己的高天厚德，张承业对河东江山极为忠诚。在李存勖与朱友贞进行的异常艰苦的十年战争中，都是张承业在打理河内部政务，“军国之事皆委承业，承业亦尽心不懈，凡所以蓄积金粟，收市兵马，劝课农桑，而成庄宗之业者，承业之功为多”。李存勖在政治上没有后顾之忧，在经济上又有足够的军饷，才能在对梁作战中所向披靡。

虽然李存勖以长兄事张承业，但从年龄上来说，张承业比李存勖大了足足四十岁，比李克用还大十岁，这完全是父子之间的年龄差。事实上也是如此，李存勖对张承业的感情其实和父子没有任何区别。张承业自己没有儿子，所以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年轻的晋王身上，对李存勖用情极深。河东高层权贵都知道张承业德高望重，没人敢轻慢这个老太监，“敛手皆畏承业”。就是李存勖的母亲曹太后对张承业也是无比尊重，有一次李存勖因为要用公款赏赐艺人，张承业不同意，二人发生冲突，还是曹太后亲自劝慰张承业“小人忤公，已笞之矣”！

李存勖另一个“仲父”，是周德威。

周德威，小名阳五，朔州马邑人，“为人勇而多智，状貌雄伟”，是当时公认的河东第一名将。朱温为了活捉周阳五，甚至悬赏生得周阳五者为刺史。李克用死后，河东政治形势一片混乱，此时周德威带着晋军主力在外，这就给了一些人造谣的空间，“晋人皆恐”。如果此时周德威反水朱温，他想要星星，朱温都愿意给周阳五摘下来。可周德威为了效忠于新王李存勖，毅然率军回太原，承认李存勖的政治地位，并哭拜李克用灵，“由于群情释然”，为李存勖稳定统治权立下头功，从此赢得了李存勖的极大感激。

周德威生年不详，但他早在乾宁年间（894—897年）跟随李克用南征北战时，李存勖刚刚出生，说明在年龄上周德威也是李存勖的父辈。周德威虽然是军人，但也兼任等同于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军队在常委中的代表）。

张承业主政治，周德威主军事，二人一内一外夹辅李存勖，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护人的作用。不过从李存勖的性格来看，他天生就是个不喜欢被人管教的野孩子，喜欢疯玩，虽然在表面上他非常尊重这两个盗版管仲，以及自己生性严厉的生母曹太后，但内心里还是非常排斥的。即使是当着二人的面，李存勖没少和他们争吵。比如李存勖和一帮小伙伴赌钱，让张承业从国库提钱来赌，被张承业拒绝，李存勖非常生气，差点和张承业翻脸。而等到灭梁大业即将功成，李存勖决定称帝，张承业以死相劝，李存勖理都没理。至于周德威，李存勖在军事业务上自恃天才，也几乎听不进去性格稳重的周德威的劝告，一味逞英雄。而在胡柳坡之役中，李存勖在晋军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强行进攻梁军，反对无效的周德威只好硬着头去上阵，结果父子战死。虽然李存勖听说周德威战死时说“哭之恸，丧吾良将，是吾罪也”，但没过多久就把周德威抛到了脑后。

不要说盗版的管仲、王猛——张承业、周德威，就是正牌的管仲、王猛，他们也在自己的少东家面前碰过一鼻子灰。管仲劝姜小白远离易牙等小人，王猛劝苻坚及时杀掉姚萇、慕容垂等野心家，二人

都不听，结果引来杀身大祸。姜小白、苻坚视管仲、王猛如再造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李存勖从来也没有在感情上把张承业、周德威视为再造父母，不过一老阍、一爪牙而已。从这个层面来看，即使周德威不死，李存勖也不会屈就自己的意愿去听周德威的摆布，而张承业被李存勖活活气死后，李存勖也没有多少内疚之感。

李存勖熟读历史，姜小白与苻坚违谏而亡的惨痛教训，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李存勖为人促狭、傲慢自大，他根本不会承认姜小白、苻坚与自己的相似之处，也不认为自己需要什么监护人。真正能让李存勖敬畏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生母曹太后，但曹太后在政治上毫无见识作为，她身为一介后宫女流，也不可能承担管仲、王猛的角色。

如果让李存勖接受有人对自己的监护，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就是河东在与梁朝的对垒中屡战屡败，李存勖威望受损，他才会不情不愿地接受。而自李存勖出江湖以来，连胜朱温、朱友贞父子，最终灭掉梁朝，天下人皆伏首甘拜膝下，李存勖威望达到顶点，更不可能去找什么监护人。而缺少监护人的监管，李存勖更加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人生，恶性循环之下，最终从天上跌落凡间，摔了个粉身碎骨。

花样作死

——“唐光武”李存勖覆亡记（下）

李存勖在功就名就之前的创业期，还是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为人慷慨，纳谏如流，身先士卒，人们也乐意接受这个与淫荡残暴的朱三完全不同的正面人物。而李存勖马踏汴梁城，则把当时社会对李存勖的英雄崇拜推向了最高峰，而悲剧恰恰从此拉开了帷幕。

普天下人们热烈期盼的“唐光武”已不见踪影，李存勖之前给人们留下的美好印象一夜尽被西风吹去，人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骄傲、自私、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好大喜功的享受者。

李存勖开始学会享受人生了，灭掉梁朝的巨大成就感已经让本就缺乏有效监管的李存勖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也许李存勖认为梁朝是天下第一强国，他都能灭掉，更不说蜀吴荆楚粤越闽等小王国，即使他享受人生，也不会影响他的大唐中兴计划。

李存勖的“享受人生”，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四种情形：一、炫耀自己的绝世武功；二、纵容自己的皇后刘氏胡作非为；三、纵容早年被朱温彻底铲除掉的太监集团以及戏子艺人；四、得罪军队。

先说第一点。人但凡做出一点成绩总会多少有一些骄傲的，这本是人之常情，但从来没有成功者会像李存勖这样，把所有的功劳完全归功于自己，他人弗预也。诚然，李存勖与梁作战十六年，每战都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但同样上阵杀敌的还有其它河东众将，周德威、李嗣源、李存信、李嗣昭这些大将哪个不满身伤痕？虽然李存勖嘴上不说，但他心里依然在想：不是朕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你们哪个会上阵？

在刚刚灭梁时，李存勖的骄傲情绪就已非常强烈。割据江陵的荆南节度使高季兴被李存勖强召入洛朝见，等回来后，高季兴告诉人们，这个新皇帝狂妄傲慢过了头。“（李存勖）及对功臣举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则他人皆无功也，谁其不解体！”高季兴不是预言家，但他相信自己对李存勖人生的判断：荒于禽色，何能久长！

再说第二点。关于李存勖那个几乎是天生“扫把星”的刘皇后。如果说李存勖是个玻璃安装工，那么刘皇后就是个专门砸玻璃的，老公装多少玻璃，她就敢砸多少。

刘氏，史无其名，魏州成安人。在她五六岁时，晋军攻陷成安，刘氏入晋阳宫，成为李克用嫡妻刘太后的贴身宫女。在门第之风残存的五代，李存勖之所以能看上出身卑微的刘氏，主要原因就是刘氏有浓厚的艺术天分，会吹笙，会歌舞，而李存勖本人就是艺术青年。加上姿色绝代，英雄自古爱美人，李存勖掉进桃花窝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刘氏有美貌，却没有德行。也许她从小生活在尔虞我诈的宫廷，见惯了太多的虚伪，所以养成了极端自私的品格。等到李存勖称帝后，刘氏的生父找上门来，希望能父女相认。刘氏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她自然不愿意认下这个穷爹，诈称自己父亲早早就死了，这个老头是江湖骗子，让人把父亲在宫门前乱棍打了一顿，将其轰出，刘父号哭而去。

不认生父，说明刘氏人品太差，而刘氏最大的问题是贪财，几乎是为了钱财不惜毁掉丈夫江山的那种毫无底线的贪婪。各地朝贡向来都要分成两份，一份是给皇帝李存勖的，另一份是给刘皇后的。最搞笑的是，刘皇后还低价收购瓜果梨桃，让太监挑到市场，打着皇宫特产的旗号，高价卖了不少钱。

刘皇后在宫里胡作非为，其实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李存勖惯出来的。刘皇后娘家在朝中没有政治根基，要约束只需李存勖一句话而

已。李存勖自己就是一个缺乏管教的人，他又怎么可能去约束别人？

人们常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贤惠的女人，贤妻对于男人事业成功的帮助非常大，但如果是恶妻，则能轻易瓦解丈夫辛苦创建的事业。同光三年（925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军人也死伤惨重，也直接影响了政府的税收进项。李存勖不管这些，为了筹钱享受，对百姓横征暴敛，几乎是挖地三尺，百姓“愁苦，号泣于路”。而此时的李存勖在干什么？正在和他心爱的皇后一起郊游玩乐。如果刘皇后能学到朱温张夫人一半的贤惠，能劝丈夫要多体谅百姓疾苦，李存勖也不至于如此迅速地丧失人心，几乎是在万众欢呼下被人杀死。从现有的史料可以看出，刘皇后不但从来没有劝谏过丈夫，反而不断怂恿李存勖享受人生。以至于当年年底下暴雪的时候，基层士兵都没有过冬的衣服穿，刘皇后还跟着李存勖去伊阙游玩，所到之处还要求百姓提供物资。

李存勖不怕得罪百姓，因为他手上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可当军队都被得罪后呢？刘皇后是个极其愚蠢浅见的庸俗女人，她并不在乎军队哗变，她辛苦搜刮来的钱财半毛钱也不想给那些当兵的。有大臣曾经劝李存勖给军队发工资，李存勖倒是同意了，但刘皇后坚决不给，她说得非常现实：“吾夫妇得天下，虽因武功，盖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意思非常清楚：我们夫妻的天下是上天给的，不是这些大头兵给的！这些伤人的话传到军人耳中，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后果。后来军队哗变，甚至与李存勖义断情绝，反戈相向，和刘皇后这句话大有关系。

如果李存勖还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大唐帝国已经千疮百孔，他就应该主动限制刘皇后更深层次地参与政治，可惜他没有。当他与宰相们商议如何解决军费问题时，刘皇后隔在屏风后面偷听，当听到宰相们希望后宫能出钱犒军时，刘皇后怒了。刘皇后带着小儿子李满喜，怀里抱着自己的私人物品，直接当面扔在李存勖面前，负气地说：“地方上的进贡早已花完，现在我就剩这点钱，你们都拿去！”宰

相们面面相觑而退。

李存勖纵容刘皇后，最大的恶果自然是得罪了军队，军人没有钱养家，他们哪里还会为李存勖这样的铁公鸡卖命。当李存勖调动军队，准备给弟兄们发钱时，弟兄们都义愤填膺：早干什么去了！我们家属都饿死了！

为了一个女人而得罪自己在乱世江湖赖以生存的军队，只有大脑短路的李存勖才做得出来。楚庄王宴乐，有将士乘乱非礼爱姬，爱姬拔将士之缨，请求庄王严查此人，而庄王要江山不要美人，大度不问。等后来庄王于战阵中遇险，正是此人舍命相救。李存勖明明懂得这个道理，却反其道而行之，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李存勖宠爱刘皇后，却不知道刘皇后早就暗中给他扣了顶绿帽子，与皇弟李存渥暗中私通。李存勖死后，刘皇后看都不看死鬼一眼，连夜与李存渥私奔。好在苍天有眼，刘皇后后来被继位的唐明宗李嗣源抓住并赐死，一代红颜祸水方才殒命。但早在刘皇后被逼死之前，她丈夫身经百战打下的天下已经被她毁于一旦。要知道，李嗣源虽然承认李存勖的正统，但他的大唐帝国与李存勖政权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从某种角度来看，说李存勖死于女人之手，并不为过。

接着再说第三点。谁都没有想到，在李存勖百战灭梁之后，站在历史舞台最中央的，不是堪称河东第一幕僚长的枢密使郭崇韬，也不是威震天下的李横冲（李嗣源），更不是那个抠门至死的刘皇后，而是一群本来上不得台面的太监，以及卖唱戏子……

时人都觉得李存勖强于朱温，实际上“流氓”朱温有一点做得要远强于“阳光可爱”的李存勖，就是对太监的态度。众所周知，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就亡于宦官之祸，从唐宪宗李纯开始，宦官集团杀皇帝、立皇帝如同家常便饭。到了天崩地裂的昭宗朝，还发生了太监刘季述软禁昭宗李晔的重大政治事件。朱温意识到不铲除宦官集团生存的土

壤，内部政治环境就不可能实现稳定，朱温与唐宰相崔胤联手，几乎杀光了所有太监。事实也证明，朱梁王朝的灭亡，有自己的战略失误，有内部政治的混乱，有军事谋略的偏差，但唯独没有太监作乱。而灭掉梁朝的李存勖政权之所以灭亡，可以说有一半的“功劳”是要记在太监集团及艺人的头上。

五代宦官中有好人，比如张承业和张居翰，但也仅此数人而已，大多数太监在后唐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极为恶劣的负面作用。李存勖得天下后骄奢自大、贪图享乐，太监们立刻找到了发财的门路。据《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记载，有太监曾经非常夸张地给李存勖讲唐朝皇帝在女人方面的享受，李存勖垂涎不已，立刻“于诸道采择宫人，不择良贱，内之宫掖”。

折腾完了天下女子，太监们又劝李存勖大兴土木，理由是洛阳宫殿的规模远远小于长安城。“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好大喜功的李存勖，李存勖不管当时民力艰难，吹嘘自己“富有天下，岂不能办一楼”！随即劳动民力，给自己早已破破烂烂的帝国又添上几个大窟窿。

李存勖宠信太监，折腾百姓，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地方军阀的反感，反正军阀们是打着皇帝的旗号搜刮民间的，骂名自有皇帝背着。但李存勖不应该让太监们参与政治与军事，这直接抢了地方实力派们的奶酪。在同光年间，李存勖身边就聚集了一千多名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太监。李存勖为了监控藩镇们的一举一动，极为愚蠢地建立了藩镇监军制度，而充当监军者，自然就是唯上意是从的太监们。李存勖把一些心腹太监都塞到了各大藩镇中，一来监视诸藩；二来凡是各藩长官不在本镇时，一应军政大务均由太监们处置。太监们仗着皇帝的信任，对地方长官颐指气使，“陵忽主帅，怙势争权”，遭到了地方长官们的极大反感，“藩镇皆愤怒”，都对李存勖严重不满，而在“愤怒的藩镇”中，自然少不了最终葬送李存勖政权的干兄长——手握重兵的镇州节度使李嗣源。藩镇大员手上都有相对独立的兵权，只要他们

肯给自己手下发银子，弟兄们是不管皇帝姓李姓朱的，何况李存勖为人吝啬，对普通士兵薄情寡义，弟兄们都巴不得李存勖早点翻船。

太监们有了相应的权力，自然就会排挤忠良大臣，直至满朝狐兔。后唐帝国实际上的二当家——名震天下的枢密使郭崇韬，向来反对太监干政，经常劝李存勖罢废太监，李存勖不听。郭崇韬一心为国，但他这么做却得罪了太监集团。李存勖本就对郭崇韬功高天下产生猜忌，再加上太监们经常在他耳边射郭崇韬的暗箭，李存勖最终除掉了堪称灭梁、灭蜀第一功臣的郭崇韬，结果自毁长城，郭崇韬冤死后没多久，李存勖自己也完蛋了。

最后说第四点。李存勖早年英明干练，但此时的大唐皇帝，在时人心目中不过是一个行将灭亡的昏君，昏聩程度简直令人发指。即使是傻子也知道控制军队的重要性，但李存勖就敢公然侮辱自己的军队……

最典型的就李存勖不顾军队的强烈反对，封戏子陈俊和储德源为刺史。这件事情还要从李存勖最喜欢的一个戏子周匝说起。周匝当年在胡柳坡之战中被梁军俘虏，几乎让李存勖痛不欲生。后来李存勖灭梁，又见到了他的宝贝周匝，“帝甚喜”。周匝趁机为两个人向李存勖讨封赏，理由是自己在被梁人俘虏期间，得到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使储德源的照顾。现在奴才平安归来，希望陛下能封二人为大州刺史，算是给奴才报了恩。李存勖爱周匝心切，他没有考虑到这么做会造成何等恶劣的后果，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同意，但经不起周匝的劝说，还是同意封陈俊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

一州刺史下辖数县，地位也仅次于节度使，非有大军功者是不能当刺史的。很多禁军将士跟着李存勖身经百战也没当上刺史，两个寸功未立的戏子竟然可以当上刺史，可以想见将士们对李存勖是何等的愤怒。消息一出，举军哗然，将士们都愤怒异常，准备找“李天下”讨说法，还是郭崇韬苦劝压了下去。

这件事情对唐禁军对李存勖的忠诚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伤害，所以当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被李存勖逼反后，唐军将士多倒戈投李嗣源麾下。至于李存勖，已是孤家寡人，众叛亲离，不死何待！

文盲治国，斯民小康

——李嗣源平淡而不平凡的帝王路

在河东军事集团早期的人员构成中，李嗣源并不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角色。当时属于一线人物的有周德威、李存孝、李嗣昭、李存信、史建瑭、安金全等人。虽然李嗣源出道较早，不过综合来看，李嗣源在当时一大票虎狼中不显山露水，但谁都没有想到，把赫赫“唐光武”李存勖挤下历史舞台、开创一代盛世的，竟然就是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李嗣源。

可以说，李嗣源在五代十国的帝王中是最特殊的一个。别的不说，直到一百五十多年后的北宋中期，编撰《新五代史》的欧阳修都不知道李嗣源到底姓什么，只知道他在叫李嗣源之前有个胡名叫邈吉烈，而他的父亲则留下了一个汉族名字——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李嗣源的民族，他是沙陀人。

李嗣源和后来的北宋太祖赵匡胤相似度很高。首先，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武将，赵匡胤一根等身大棍打天下，李嗣源曾单骑直犯梁朝虎将之首葛从周，江湖人称“李横冲”。其次，他们的脾性相对都比较宽厚，虽然作秀成分较多，但不妄杀人。再次，他们都在当时都不显山露水。最后，他们都篡了老主子的皇位。

不过所不同的是，赵匡胤是在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利用柴荣交给他的兵权发动兵变，欺负孤儿寡母篡位。而李嗣源在李存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和旧主翻脸，李存勖也间接死于李嗣源之手。

实际上，赵匡胤篡位是主动而为，李嗣源“篡位”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李存勖猜忌功臣逼出来的。柴荣待赵匡胤亲如兄弟，生前从未有

负赵匡胤分半，但李存勖一直怀疑李嗣源不忠。李嗣源因念及养父李克用的养育之恩，一直隐忍而已。顺便插一句，虽然李克用有一堆干儿子，但与李嗣源却是名正言顺的养父子关系，感情要近于李存孝、李存信那伙假子。

也正因为如此，李存勖更加猜忌李嗣源，毕竟养子和亲生儿子的区别并不大，李嗣源更有条件威胁到李存勖的皇位。在同光朝，李存勖猜忌勋旧大臣几近疯狂，郭崇韬遇害不说，李嗣源也“危殆者数四”。好在李嗣源在朝中人际关系非常好，很多大员都暗中帮了李嗣源一把，他才躲过大劫。

同光四年二月，魏博兵发生叛乱，裹胁效节指挥使赵在礼为老大，作乱魏赵一带。形势对李存勖来说已是非常危急，但他依然不肯派李嗣源去讨伐乱兵，因为他担心李嗣源会趁机掌控兵权。直至万不得已，李存勖才勉强让李嗣源带兵。

不过李存勖很快就后悔自己做出的这个足以致命的决定。李嗣源在军中的威望远在李存勖之上，这已不是李嗣源有意控制军权的问题，而是军队在李嗣源、李存勖二人中必择一主。李存勖失军心，李嗣源得军心，一得一失，胜利的天平已不可避免地向李嗣源倾斜。叛兵和准备攻城的李嗣源谈条件：我们本不想反，是皇帝逼我们反的，只要令公（李嗣源）愿意做我等之主，我等即听令公指挥，万死不辞。

现在的形势非常清楚，李存勖行将自我毁灭，天下无主，李嗣源如果不动手，天下早晚属于他人。李嗣源此时的抉择，和赵匡胤所面临的形势几近相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不吃，自有别人吃。李嗣源不是什么圣人，面对诱惑不动心。再者他也不知道李存勖猜忌自己，如不自保，早晚也会死在猜忌之下。所以面对乱兵要挟，李嗣源其实是动了心的。只不过李嗣源也是演技派，为了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李嗣源先是流了一通鼻涕，说我必将归藩待罪，以求皇帝宽恕。

然后……然后就打着铲除奸臣李绍荣（梁旧臣段凝）的旗号，率大军乘麾南下，找李存勖要说法去了。

虽然李存勖之死与李嗣源率叛军南下大有瓜葛，但李存勖如果不是自己花样作死，李嗣源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踢掉李存勖。不过同样是面对旧主，李嗣源对李存勖可谓恩至义尽，他还知道面对诸军哭鼻子，说皇帝是受了那伙太监、戏子的蛊惑才有今日，并厚葬李存勖，谥庄宗，而赵匡胤则四处攻击待他如亲兄弟的柴荣，专杀方面大耳的将士……

唐同光四年（926年）四月二十日，大唐监国李嗣源在洛阳宫中称帝，开创了属于李嗣源自己的时代。

虽然李嗣源目不识丁，但他极具政治头脑，有大臣劝他另起国名，以示在政治上与乱政而亡的李存勖政权决裂。李嗣源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他不能负太祖（李克用）三十年养育之恩。实际上，李嗣源知道，一旦更换国号，他自己就成了无根之木，毕竟他和李克用父子有着根本脱不开的关系，天下人也将视他为忘恩负义之人。赵匡胤之所以敢与柴荣义断情绝，是因为他手上控制着天下最精锐的禁军，地方军没有打败禁军的可能。而李嗣源时代，地方藩镇的军事实力非常强，一旦有强藩指责李嗣源忘恩负义，李嗣源在政治上会非常被动。李嗣源不改变李存勖的国号，甚至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李姓，并承认李存勖政权的合法性，为自己的执政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阻力。但是天下人都知道李嗣源的唐朝和李存勖的唐朝根本不是一回事。宋人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实际上就把李嗣源与李存勖视作两个不同的政权，分别设立了唐庄宗家人传与唐明宗家人传。

李存勖花样作死，政权最终落到了李嗣源手里，地下的李存勖也许不服。但从更大的视野来看，李嗣源取代李存勖，无疑是当时百姓的福音。李存勖称帝只有四年，却弄得四海鼎沸、万民嗟怨、藩镇作乱，中原地区存在着随时崩盘的巨大危险。是李嗣源及时出现，修改

了李存勖时期一些荒唐残暴的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老百姓有饭吃，稳定了民心，并通过自己在军队中建立的威信，基本控制了军队。本来岌岌可危的中原局势迅速稳定下来，被欧阳修称为“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出现了五代史上罕见的小康盛世。

当李嗣源初继位时，时人还对他有所怀疑，但时间很快就证明了李嗣源取代李存勖的合理性。李嗣源深知同光朝覆亡之弊，他上台后，实行了几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归纳起来大致有：一、诛杀在李存勖时代祸国殃民的太监集团，除了个别太监被留在宫中使用，其他人悉数杀之，即使是逃到庙里冒充和尚的也揪出来杀头。二、释放李存勖之前搜掠进宫的无数美女，并发给还乡费，任其择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被放回家的女人中，有一位柴姓宫嫔，她带着李嗣源发给她的巨额遣散费回到家乡邢州，嫁给了一个兵头子，这个兵头子名叫郭威，而这位柴姓宫嫔有个侄子，名叫柴荣。三、禁止藩镇除了法定节日之外向朝廷纳贡，地方上就没有理由搜刮百姓，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四、禁止地方上对过往客商乱设名目收费，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发展。五、恢复农业生产，开放铁禁。以前官府不允许百姓私造农具，而由官府制造卖给农民。李嗣源考虑到此政策不便农民，下诏解铁禁，允许农民打造农具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

这五项便民政策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天下百姓的欢迎。百姓们庆幸恶魔李存勖及时完蛋，否则大家不知道还要受多少洋罪。

如果要论综合资质，李嗣源在武艺方面只能与李存勖打个平手。而在文艺上，李嗣源是个文盲，大字不识几个，而李存勖会吹会唱会填词，著名的词牌《如梦令》就是李存勖所制。李嗣源知道自己的短板，所以他一直保持低调谦逊的作风。李存勖不承认别人的贡献，张开十指自负“李天下”；李嗣源则非常重视人才体系建设，他从来也不会认为一个人的天才可以决定整个世界的未来，只有李存勖才会这样想。

而说到知识分子在李嗣源时代受到重用的事例，最著名的莫过于农村士人出身的原河东掌书记冯道与李嗣源这一文一武在乱世中的风云际会。李嗣源处心积虑要拜冯道为宰相的事情，将在下一篇《李嗣源用冯道为相的窍门》中进行详细解读，这里只说冯道两则劝谏李嗣源的小故事。

李嗣源有一次问冯道民间百姓生活过得如何，冯道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最清楚农民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办法，冯道告诉李嗣源，在士农工商四业中，农民过得最苦。遇上灾年农民挨饿，遇上丰年则谷贱伤农。冯道向李嗣源提及过唐懿宗时进士聂夷中的一首《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糴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冯道之所以提这首诗，主要还是因为这首诗写得浅白，不用他讲解，李嗣源都能看得明白，所以能出台符合农民利益的有关政策。

虽然此时冯道是宰相，但李嗣源时代的二号人物是枢密使安重诲，所以宰相也就相当于大号的翰林侍读。冯道不和安重诲争权，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对李嗣源的规劝上，毕竟李嗣源是武人出身，有时性格暴躁，而冯道性格温和，二人的性格正好可以互补。李嗣源作为武人皇帝，没有像李存勖那样花样作死，和冯道时常进行劝谏是大有关系的。而枢密使安重诲是担任不了冯道这种角色的，因为安重诲同样是个文盲，不过正是安重诲的建议，李嗣源才有意识地吸纳冯道、赵凤这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进入内阁的。

李嗣源用冯道为相的窍门

李嗣源虽然是个大文盲，但政治权术却玩得炉火纯青，这一点和同样没喝多少墨水的赵匡胤又有几分相似。因为时代的原因，赵匡胤对大臣斗权术的故事传播很广，实际上李嗣源同样玩过一手堪称教科书般经典的官场驳人术，这件事情与五代第一“官油子”冯道有关。

冯道早在同光朝就被李存勖内定为宰相，但因为冯道父亲去世，冯道回乡守丧三年。等冯道准备回朝复职，李存勖又已花样作死了自己，冯道成了待业青年。不过新继位的李嗣源对冯道是非常欣赏的，也打算让冯道入阁为相，只不过宰相位子暂时没有空缺，李嗣源先让冯道担任端明殿侍讲，留在身边，慢慢找机会把冯道塞进去。而时任宰相的是任圜和郑钰，以及级别更低一些的豆卢革与韦说。

任圜是后唐第一流的经济专家，自任圜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期月之内，府库充贍，朝廷修葺，军民咸足”，他当宰相无人有异议。郑钰百无一用，但一则郑钰是梁朝宰相，用郑钰能安抚梁朝旧臣；二则郑钰是李嗣源恩人张全义的嫡系。如果不是张全义向李存勖力荐李嗣源北上平乱，李嗣源也就没有机会称帝。

任圜和郑钰都不能动，那么就只能拿两个饭桶豆卢革与韦说开刀。豆卢革与韦说堪称官场两大活宝，二人结党攀附，收受贿赂，互相抬轿子吹喇叭。豆卢革举荐韦说的儿子韦涛为宏文馆学士，韦说举荐豆卢革的儿子豆卢升为集贤学士，弄得朝野喧哗，“识者丑之”。最让李嗣源对二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两个同光朝的饭桶自恃老资格，瞧不起李嗣源，经常对李嗣源呼三喝四，不成体统。李嗣源暗中授意豆卢革、韦说曾经得罪过的谏议大夫萧希甫上章弹劾二人，不过萧希甫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只是乱咬豆卢革指使马仔杀人，韦说强夺邻居家的水井，不过这已经足够李嗣源用的。天成元年（926年）七月，李

嗣源下诏，解除豆卢革、韦说的宰相职务，贬放外州。

宰相位置空出来了两个，李嗣源可以随时把心仪的冯学士塞进来了。但还没等李嗣源下诏让冯道入阁，朝中各大派系就已经为了这两个宰相位置扭打一团，互不相让。道理很简单，大饼就两块，你吃了我就得饿肚子。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人马上位，就会给我穿小鞋，我伸头让你砍，我傻吗？

为了能让自己的弟兄当宰相，大佬们几乎是全裸出境，直接在李嗣源面前互相揭短，就差抡刀对砍了。

朝中主要有两大派系，“二号皇帝”枢密使安重诲集团和宰相任圜集团。当时天成朝有实权者四人，安重诲、任圜、郑钰，以及另一位枢密使孔循。不过郑钰和孔循早就投靠安重诲，朝中实际上就是安重诲与任圜之争。任圜仗着自己是李克用的侄女婿，安重诲仗着自己是李嗣源的铁杆兄弟，二人互相争风吃醋，积怨甚深。

李嗣源知道各人的心思，但为了公平起见，他让几位大臣议事，各自推荐宰相人选，而李嗣源本人则坐在殿上等结果。

任圜推荐了曾经做过梁太祖文胆的御史中丞李琪。李琪虽然和安重诲表面上哼哼哈哈，但也向来瞧不起安重诲这号傻大粗。任圜如果能把李琪安插进来，自己的势力自然又大一分。不过任圜的建议却遭到了郑钰与孔循的坚决反对。道理很简单，李琪是任圜的狗腿子，李琪要入阁，自己就多了一个敌人。更何况郑钰与李琪私交极差，孔循和李琪也素有恩怨。不过这两个滑头反对李琪的理由却是李才华有余，气度不足，又兼贪财不廉，不适合当宰相。

在安重诲的授意下，郑钰与孔循也隆重推荐了一个人选，却差点没让任圜骂出声来，二人推荐的竟然是号称“没字碑”的太常卿崔协。崔协为人不学无术，大字不识几个，经常闹笑话。任圜知道郑协是安重诲的狗腿子，自然不能放崔协进来。任圜的理由是：“协虽名家，

识字甚少。臣既以不学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协，为天下笑乎！”不过任圜话音刚落，又遭到了安重诲、郑钰、孔循的集体围剿，他们指责任圜用人挟私。

四个内阁大臣在皇帝面前吹胡子瞪眼拍桌子，任圜虽然一对三，但场面上并不落下风，龇牙咧嘴地与政敌们扯皮。李嗣源一直不说话，等到四只斗鸡咬累了，李嗣源才开了金口，不过李嗣源也是推荐宰相人选的。

皇帝自然也有资格推荐人，四人都看着李嗣源，他们想知道皇帝会推荐个什么鸟出来。结果李嗣源轻飘飘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易州刺史韦肃，四个人都愣了。

韦肃是谁？他们从来都没听说过！

李嗣源告诉大佬们他推荐韦肃的理由：“韦肃曾经在朕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朕，而且又出身大族京兆韦氏。”

韦肃虽是名门之后，但在官场上实在无功绩可称，一个毫无资历的州刺史突然当上了宰相，李嗣源这是让大家羡慕嫉妒恨吗？当然不是，李嗣源莫名其妙推出韦肃，其实是大有玄妙的。

李存勖当初不顾军队的强烈反对，封两个对唐灭梁毫无功劳的戏子陈俊、储德源为刺史，伤了将士们的心，结果兵败身死。眼前的教训之于李嗣源来说不可谓不深刻，以李嗣源政治上的成熟，他怎么可能重蹈覆辙？官场是要论资排辈的，其实李嗣源以及在座诸人都明白，韦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进入内阁的，否则立时官场大乱。

所以在众人实际否定了韦肃之后，李嗣源再次推出一个人选——户部侍郎冯道。

李嗣源给冯道在政治上进行定性：“你们都知道冯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庄宗在太原时，冯道就掌文墨机宜，有功无过，庄宗曾经要拜

冯道为相，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冯道为人谦和厚重不与人争，与物无竞。”

听说是冯道，众人还算平心静气，毕竟冯道的资历远强于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冒出来的韦肃。冯道在河东给李存勖当了十年的贴身文胆，又是正三品的户部侍郎，如果冯道入相，虽然有些人还是瞧不上冯道的农民做派，但也无话可说。

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众人都同意冯道入阁。毕竟皇帝提了两个人选，如果都否定了，皇帝脸上无光，所以在否决了韦肃之后，冯道是必须入阁的。也许有聪明人已经意识到，冯道才是李嗣源真正要推出的人选。

其实李嗣源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会议一开始就可以推荐冯道。但李嗣源非常狡猾，他不但先把冯道藏在袖中，而且让四位大臣先推荐人选。

窍门就藏在这里。

首先，宰相的位置只有两个，如果李嗣源先推荐冯道，那么未必就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如果有人不接受冯道，而李嗣源强行拉冯道上船，很可能会得罪某些大佬，将来难免给自己和冯道穿小鞋。

而如果安重诲与任圜在开始时就接受冯道，那么还剩下一个宰相名额，李嗣源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势必会得罪其中一人。而等到两派为了一个名额杀到精疲力竭时，李嗣源适时推荐冯道，众人虽情不愿，但至少都可以接受冯道。

李嗣源很顺利地把冯道塞进内阁，还没有得罪人，这不能不说李嗣源有很强的政治权术。而赵匡胤玩权术，其实是建立在禁军战斗力之上的强硬，换成石守信坐在赵匡胤那个位置，石守信也能极轻松地杯酒释兵权。

在李嗣源的精心运作下，冯道顺利入阁，而另一位宰相的人选，最终也确定下来，排除了任圜推荐的李琪，而用了安重诲的马仔崔协。

用崔协，应该不是李嗣源的本意，还是权衡了朝野派系的格局后做出的艰难选择。崔协是安重诲的人，安重诲在朝中势大，孔循、郑钰都站在安重诲一边，任圜略显孤单。而且孔循已经放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让崔协入阁。

当然，李嗣源敢放任圜的鸽子，主要还是因为任圜和安重诲已在桌面底下做了某些交易。虽然任圜在宰相人选上没有得逞，但他的损失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所以任圜权衡再三，放弃了李琪。

各方交易最终完成，冯道和崔协出任宰相。

正月十一日，朝廷下了明诏：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冯道，以及太常卿崔协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接到任命诏书时，冯道伏地谢恩。

不能持家，何能治国

——李嗣源的家事

做人难，做一个统驭万方的帝王，难上加难。

李嗣源控制的区域极大，北至长城，南达淮河，东临大海，西及秦岭，是公认的天下最强者。但就是这个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天下最强者，夜深人静时面对明月，心中总会升腾起一丝不安与焦躁。

问题出在他的家庭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李嗣源在为究竟由谁来继承自己的皇位发愁。

李嗣源总共有四个亲生儿子——李从璟、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益。

如果不是那场李嗣源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他根本不必为继承人发愁，因为他的长子“骁勇善战、谦退谨敕”的李从璟在奉李存勖之命，去魏州劝其父李嗣源的过程中，于卫州被元行钦杀害。

插一句闲话，五代有个奇特的现象，综合能力极强，一旦继位就能成为明君的儿子往往不得善终，所以君主被迫选择其他儿子，结果国破家亡。梁太祖朱温有子朱友裕、晋高祖石敬瑭有子石重信与石重义、汉高祖刘知远有子刘承信、李嗣源有子李从璟。

李从益太小，而且生母是个无名宫人，李嗣源不可能立他为嗣。真正有资格竞争皇位的，只有同母的皇次子李从荣和皇三子李从厚，他们都是夏皇后所生。而在李嗣源当皇帝后，他首先考虑的继承人，并不是以序当立的李从荣，而是老三李从厚。天成二年二月，十四岁的李从厚就被封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

事，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兼任卫戍司令，五代没有立皇太子的习惯，但凡当上首都市长（后唐为河南尹，晋汉周宋为开封尹）的皇族，基本都是能当上皇帝的。再加上出任判六军副使的是当时名将、李嗣源最宠爱的女婿石敬瑭，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李嗣源这是要石驸马保三皇子坐江山的节奏。

对于李嗣源为什么要把皇位传给李从厚，于史无载，但推测一下，应该与李从荣和李从厚不同的性格有关。李从厚生性淳厚稳重，“形质丰厚，寡言好礼”，这一点非常像李嗣源本人，所以“明宗以其貌类己，特爱之”。而次子李从荣，生性疏阔，贪大喜功，附庸风雅，喜欢和文人交朋友，甚至还出版过一本诗集——《紫府集》。江湖上那些绿头苍蝇听说皇次子是个臭鸡蛋，纷纷凑过来，“（李从荣）多招文学之士，赋诗饮酒，故后生浮薄之徒，日进谀佞以骄其心”。向来瞧不起酸腐秀才的李嗣源不喜欢李从荣冒充文人，曾经多次告诫次子，你的文学水平不过半瓶醋，一旦闹出了笑话，会影响皇家形象。

李嗣源经过反复权衡，决定立李从厚而疏远李从荣。所以李从厚留在洛阳当“皇太子”，而李从荣则被发配到天雄军当邺都留守去了。李从荣虽然爱好文学，但他冒充文学青年的真实目的还是那个让人眼热的帝位，可他没想到，竞争还没开始，他就输给了弟弟。当得知李从厚任河南尹兼判六军时，李从荣“闻之，不悦”。

李从荣虽然不悦，可只要父亲不改变主意，他一点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但谁都没有想到，一场意外的婚姻，却突然改变了李从厚与李从荣的命运，李从荣竟然不可思议地咸鱼大翻生，挤掉了李从厚。

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就是前一篇提到的枢密使孔循。

孔循这个人的经历非常传奇。孔循不知道姓什么，幼时失怙，后来给汴梁富户李让当养子，改姓李不过李让又当了朱温的干儿子，孔

循改姓朱。朱温儿子有个乳母喜欢孔循，接孔循过来抚养，因为乳母丈夫姓赵，又改姓赵，叫赵殷衡。等到梁朝建立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孔循最终改姓了孔。

孔循为人油滑，有奶便是娘，当初李存勖快要玩完时，李存勖和李嗣源都要争汴州，而时任汴州刺史的孔循不知道到时押谁的宝，干脆两边都押。孔循极其搞笑地先跑到北门迎接李嗣源，然后又蹿到西门迎接李存勖，两边磕头押宝。等到李嗣源称帝后，安重诲权倾一时，孔循又抱住了安重诲的大腿，“重诲尤亲信之”。不过孔循也只不过是想要利用安重诲而已。孔循看到年迈的李嗣源让李从厚任河南尹兼判六军事，他就认定李嗣源一定会把江山传给李从厚。为了巴结李从厚，“为人柔佞而险猾”的孔循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从厚。但正因为这一点，孔循彻底得罪了安重诲。

其实李嗣源本来是想为李从厚娶安重诲的女儿，但孔循精明过了头，他为了能当上皇帝岳父，他挖坑骗安重诲跳了进去，说你是二号皇帝，不宜与皇家走得太近。安重诲便拒绝了李嗣源的提亲，但没想到孔循竟然偷偷摸摸把自己的儿女嫁了过去。安重诲无端被孔循耍了，异常恼火，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先把孔循踢出中枢，出为忠武军节度使。因为恨屋及乌，安重诲又盯上了李从厚，因为李从厚一旦当上皇帝，那么孔王妃就是皇后，孔循又得骑到自己头上。在安重诲一系列见不得光的运作下，天成四年四月，李嗣源突然解除李从厚“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的职务，去太原当河东节度使，实际上废除了李从厚的太子地位。而李从厚被废后，能接盘的也只能是李从荣，所以李从荣极其幸运地叼到了“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的肉饼，成为实际上的皇太子。

其实，李嗣源在废掉李从厚时，还有一个人选可以考虑，就是他的养子——一代虎将李从珂。

李从珂本名王阿三，因母亲魏氏守寡后嫁给了李嗣源，李从珂便

当了拖油瓶。河东灭梁，李从珂立功无数，被安重诲等人所忌恨，安重诲没少给李从珂穿小鞋，而李嗣源非常疼爱这个养子，甚至为了犒子，李嗣源当场和安重诲对骂。但涉及帝位传承，在有自己亲生儿子的情况下，李嗣源不可能把帝位传给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郭威传位给养子柴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郭威的亲生儿子都被刘承祐杀光了，别无选择。虽然李从珂严重不服，但养父铁了心肠，自己也只能徒唤奈何，谁让自己没投对胎？不过李从珂很快就欣喜地发现，其实他还有机会翻盘。

原因在于李从荣自身。

如果是个聪明人，在被实际确认为太子之后，即位之前，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先把老皇帝熬死，再暴露自己的本性也不晚。其实此时的形势对李从荣是非常有利的，李从荣最惧怕的头号权臣安重诲因为和李嗣源翻了脸，已经被李嗣源做掉了。只要李从荣稳扎稳打，就没有势力能威胁到他的地位。但李从荣刚判了六军诸卫事，就仗着自己手上有兵权，开始在官场上四处树敌。李从荣还没在“太子”宝座坐稳，就几乎得罪了官场上所有大佬，甚至还包括后宫实际掌权的“皇后”王德妃花见羞。

比如安重诲之后的两大枢密使——范延光和赵延寿，都因为不是李从荣的人马，而被李从荣时常辱骂敲打，“皆轻侮之”。而李从荣和自己的姐姐永宁公主因为不同母，平时就互相嫌憎，李从荣恨屋及乌，对姐夫石敬瑭百般嫌弃。甚至当初劝李嗣源立李从荣的宰相冯道，也上了李从荣的黑名单，他怀疑冯道推荐自己是场阴谋，“执政（冯道）欲以吾为太子，是欲夺我兵权，幽之东宫耳”。

因为李从荣是实际上的帝位继承人，加上李从荣为人浮薄轻佻，一旦登基，势必会引发天下大乱。范延光、赵延寿、石敬瑭等人惹不起李从荣，都打算离开京城到外地避祸。这些大佬各自都有后台，范延光用钱喂饱了花见羞和太监头子孟汉琼，回到他曾经待过的成德军

当节度使。赵延寿也是李嗣源的女婿，兴平公主一句话，赵延寿立刻卷起铺盖去汴州任宣武军节度使。而石敬瑭更是手眼通天，走了永宁公主的门路，得到了拥有强兵实权的河东节度使的肥差，堪称天下第一强藩。即使以后李从荣即位，他也奈何坐镇河东的姐夫不得。

这些人后台硬，说跑就能跑，其他没后台的都得在火药桶里老实待着。最搞笑的是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他的特殊身份是不能离开京城的，他只能两边下注，自己押宝老皇帝李嗣源，而让儿子押宝“太子”李从荣……

范延光和赵延寿不过是外臣，得罪也就得罪了，但李从荣最不应该得罪的就是他的庶母花见羞。因为花见羞还有另外一层敏感的身份——皇四子李从益的养母。

花见羞是五代史非常传奇的女人，她本姓王，是邠州一个卖饼人家的女儿，因长相绝美，人称“花见羞”。早年曾经是梁朝头号名将刘的通房丫头，刘死后，王氏流落江湖，后来被李嗣源收留。李嗣源的原配夏夫人死得早，继夫人曹氏又与世无争，实际上主持后宫的是德妃花见羞。

花见羞没有生儿子，所以李嗣源便把幼子李从益交给花见羞抚养。花见羞是个有权力欲的女人，李从荣和她非亲非故，一旦李从荣当上皇帝，自己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但如果是李从益即位，那么自己就是权倾天下的皇太后……

如果李从荣处事谦和谨慎，花见羞拿不到他什么把柄也就算了，没想到李从荣到处惹事，又让花见羞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此时的老皇帝李嗣源已经病入膏肓，眼瞅着就要伸腿瞪眼了，李从荣为了安全起见，决定一旦父亲不行了，他就率兵强行继位，绝了花见羞那帮鸟人的念想。

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初八，李嗣源突然发病，昏迷不醒。李从荣立刻进宫打探情况，发现父亲要完了。而他离开内殿后，听到宫里一片哭声，李从荣更坚定地认为父亲已死，“从荣意帝已殂”。李从荣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即将到来，回府准备当皇帝去了。

但让李从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爹根本没有死，等他前脚刚走，李嗣源就醒了过来。因为李从荣早就把宫里的太监宫女得罪光了，没有人给李从荣通风报信，这就给了花见羞扳倒李从荣一个绝佳机会。

三天后，即十一日清晨，李从荣率亲卫步骑千人在天津桥集结，准备进宫继位。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阻挠，李从荣派心腹马处钧去找新任枢密使冯贇，威胁冯贇：“今天我就要当皇帝，你们满门老小的性命都捏在我手上，你们自己看着办！”

冯贇其实是知道李嗣源还活着的，他哪里还肯上李从荣的贼船。冯贇等马处钧走后，立刻骑马来到宫里，见到了新任枢密使兼宰相的朱弘昭，三司使孙岳，以及代表王德妃势力的老太监孟汉琼。冯贇的任务是和大家一起，做已经准备向李从荣投降的康义诚的工作，毕竟康义诚手握京城兵马，他的心态将决定大家的命运。冯贇警告康义诚不要首鼠两端，须知老皇帝还没死！然后又拿李嗣源对康义诚的厚待给康义诚施压：“主上拔擢吾辈，自布衣至将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门，置主上何地？”冯贇说得慷慨激昂，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还是保住自己满门的性命，“（一旦李从荣事成）吾辈尚有遗种乎！”

实际上比冯贇更着急的是孟汉琼，如果李从荣进宫，自己必将惨死。所以孟汉琼见康义诚似乎还有些犹豫，兼之有人报秦王李从荣已经率兵入宫，孟汉琼不再废话，直接闯入内殿见李嗣源，大呼：“从荣反，兵已攻端门，须臾入宫，则大乱矣！”宫中人皆惊，相顾号哭。孟汉琼到底是在宫里头混的，快刀斩乱麻，直接逼得康义诚不得不站在自己这一边，同时也成功地制造了李从荣要杀光所有宫人的恐

怖气氛。

孟汉琼所说李从荣的“反”，其实并不是说李从荣要改朝换代，言下之意其实是想对李嗣源说李从荣要弑父夺位。李嗣源久经宦海，自然能听懂孟汉琼的意思。当年朱温是怎么被儿子朱友珪干掉的，李嗣源一清二楚，所以当孟汉琼说李从荣要反，李嗣源气得浑身颤抖，他让自己的养孙、控鹤指挥使李重吉立刻指挥禁军平定李从荣叛乱。李重吉是李从珂的儿子，自然早就视李从荣为死敌，一旦李从珂有机会当皇帝，那李重吉就是皇太子……

李重吉有了动力，自然要为自己的亲爹卖命，立刻把兵守住宫门。孟汉琼也没有闲着，老太监披上盔甲，骑着高头大马，极其拉风地带着五百骑兵出讨李从荣。

李从荣此时还在做着皇帝梦，他雄踞在天津桥的桥头，等待着康义诚的回话。康义诚并没有来，来的却是孟汉琼派来的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率领的五百精锐骑兵。李从荣这才知道他的老爹根本没有死，就是老爹派朱洪实来追杀自己。李从荣“大惊”，实际上是差点没被吓死。李从荣再没有之前威风八面的气势，在朱洪实的骑兵杀出左掖门后，腿已经被吓软的李从荣仓皇逃回秦王府，带着老婆刘氏钻到了床底下，吓得瑟瑟发抖。奉李嗣源诏令前来讨逆的皇城使安从益“就斩之（李从荣），并杀其子，以其首献”。

本来公认的大唐帝国继承人，就这么以一种荒谬搞笑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美梦。而当宫里的李嗣源听到李从荣被杀时，“悲骇”，差点从床上掉下来。李从荣再不孝，李嗣源也从来没动过杀掉李从荣的念头，最多废为庶人禁锢终身。而从安从益的心狠手辣来看，他应该是受了花见羞以及孟汉琼的指使——斩草除根！

李从荣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其中一个小儿子还是当着李嗣源的面被杀掉的。而诸将敢于向李嗣源提出把此子交出来的无理要

求，如果没有王德妃在背后站台，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嗣源应该知道这些背后见不得光的一些瓜葛，但此时的李嗣源已行将就木，无力再反击什么人了。以冯道为首的官员们进宫安慰老皇帝，李嗣源满面羞惭，“吾家事至此，惭见卿等！”不过值得李嗣源欣慰的是，天下终究还是他子孙的。就在李从荣被杀的第二天，李嗣源就立刻派孟汉琼火速去邺都，召李从厚回洛阳继位。

十一月二十一日，孟汉琼飞驰邺都，见李从厚。李从厚当天就从邺都出发东进。二十九日，李从厚风尘仆仆地赶到洛阳宫，但他慈爱的父亲在二十六日就已龙驭上宾了。很快，李嗣源的庙号就由宰相们拟定出来——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

虽然南宋遗民陈桛曾经高度评价过李嗣源，认为“周世宗第一，唐明宗第二，周太祖第三”，但激进的史学家王夫之对李嗣源的评价却非常低，王夫之认为李嗣源“不能谋身而与之谋国，其愚不可殄；不能谋国而许之以安民”。

王夫之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相比郭威和柴荣相继拉开中原政权统一天下的大幕，李嗣源的七年小康并没有推动历史的发展，甚至还导致后蜀孟知祥的独立，后唐帝国被生生割掉一大块疆土。而李嗣源治家不力，宠溺儿子，处事不明，最终导致祸起萧墙，自己也被活活气死。

李嗣源幻想着给自己的亲生儿子留下一根没有荆棘的权杖，但可惜的是，性格庸弱的李从厚接过这根光滑的权杖时，却发现很多人都在盯着这根权杖。据李从厚粗略估计，这些人中有长兄李从珂、姐夫石敬瑭与赵延寿，还有范延光……

喜从天降

——咸鱼李从珂翻生记

二十岁的宋王李从厚在老皇帝灵前即位，以冯道为首的文武百官山呼万岁。而实际上的皇长子、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潞王李从珂还在念怨着养父：仅仅不是你亲生的，你就不选我，当年我是怎么在血雨腥风中给你卖命的！

李从珂是在十几岁时遇到他人生中的贵人李嗣源的。李嗣源在平山遇到了王阿三的母亲魏氏，一见钟情，遂纳之。而魏氏只有一个要求，李嗣源要养活儿子王阿三，李嗣源同意了。

也许是寄人篱下的原因，李从珂跟着养父之后，“谨重寡言”，不乱说一句话。等到成年，李从珂长成牛一样的身板，“长七尺余，方颐大体，材貌雄伟，以骁果称”。李嗣源一杆大枪横冲河北，李从珂跟着养父大杀四方，深得他的干叔父李存勖器重，虽然这位干叔侄生于同年。

李从珂并不像猴子一般性格的李存勖，反而和晚他二十年的周世宗柴荣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寄人篱下的养子，李从珂是生母魏氏嫁给李嗣源，柴荣是姑母柴氏嫁给郭威。而李嗣源和郭威都曾经有段时间非常落魄穷困，两个养子不辞风雨，在社会最底层熬心熬力赚点小钱养活两个不成器的养父。柴荣卖过雨伞贩过私盐；李从珂更惨，当苦力扛大包、背石灰、收马粪养活李嗣源。正因为如此，李嗣源格外疼爱这个养子，但唯独不肯把皇位传给他。李从厚首先获得继承权时，李从珂被外放河中节度使，驻守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等到李从荣基本确定继位时，李从珂又被外旅到凤翔（今陕西宝鸡），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李从珂得到了潞王的爵位。

潞王的爵位，并不能拴住欲展翅高飞的李从珂，他渴望能爬到山峰的最高处，拥有整个天下。得知性格庸弱的弟弟李从厚继位后，李从珂就开始有了异样的想法。

实际上，李从厚或者说是朝中执政如朱弘昭、冯赟等人早就盯上了李从珂。李从珂“少从明帝征伐，有功名，得众心”，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朱、冯等人首先拿掉了李从珂之子李重吉的控鹤都，再慢慢寻找机会铲除李从珂。李从珂也知道这些人对自己心怀叵测，养父驾崩时，他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洛阳奔丧。

见调不动李从珂，朱、冯又生一计，以朝廷的名义调李从珂出任河东节度使，接替另一个野心家石敬瑭，并派洋王李从璋前来凤翔催促李从珂移镇。李从珂根本不上当，反而公然指责朱弘昭、冯赟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乱朝廷，彻底和李从厚撕破了脸皮。

朱、冯不是晁错，李从珂也不是实力强大的吴王刘濞，李从珂只控制着黄河在“几”字形大拐弯的一片狭小地区，实力并不足以和强大的朝廷对抗。地方各大藩镇根本不看好李从珂能翻盘，拒绝支持李从珂，“潞王使者多为邻道所执”。

朝廷方面出手非常阔绰，西京留守王思同出任讨逆军主帅，大将药彦稠为副，护国军节度使安彦威、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武定军节度使孙汉韶、彰义军节度使张从宾各率本部兵悉集于凤翔城下，时间是唐应顺元年（934年）三月。

所有人都认为李从珂死定了，他在重重包围之下已插翅难逃！李从珂为了仅存的一点逃生希望，撕开老脸，站在城头上哭着请求官军看他当年“从先帝（二李）百战，出入生死，金创满身”的分儿上，放他一条生路。“我何罪而受诛乎！”五十岁的李从珂站在城头老泪纵横，鼻涕一把泪一把，很明显，潞王是动了真感情。他本来自认功劳齐天从无谋逆之意，但正因为功劳齐天才被人猜忌，以致今日功高震

主，你不死，我不可能总是活在你的阴影里，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李从珂的哭诉产生了一定的正面作用，毕竟城下官军有很多都是李从珂的老部下。被人快要逼死的老首长临城一哭，“闻者哀之”，已经有官军动摇了。形势对李从珂来说多少有一些好转，而督军的张虔钊向来对李从珂没什么好感，他懒得跟这些心疼李从珂的二百五废话，马刀一举，逼着官军从城西南向凤翔城发起攻击。官军弟兄本来在感情上就偏向无罪的李从珂，张虔钊是个喝兵鬼的贼，感情上的一近一远，立刻在官军中引发了爆炸效应。“士卒怒，大诟，反攻之（张虔钊）”。张虔钊完全没想到这伙兵痞子竟然当场骂娘翻脸，吓得骑马狂奔，才侥幸捡得一条性命。官军阵中的羽林军指挥使杨思权可能就是李从珂的老部下，他临阵高呼：“大相公（李从珂），吾主也！”率先解甲向李从珂投降，本就是对朝廷不满的官军也都不陪李从厚玩了，“诸军解甲投兵，请降于潞王”。

杨思权这路投降，极大地影响了其他方向围城的官军，有人高喊城西军已投降潞王并得了一大笔赏金，向来是认钱不认娘的兵大爷们一听有钱赚，立刻踹了王思同这些老梆子，向李从珂投降。王思同等人根本控制不住局面，也学张虔钊，脚底抹油溜了。

就在转眼之间，李从珂的敌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他的马仔。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甚至让李从珂一时都没反应过来，在即将饿死的时候，天上掉下来一块大肉饼，李从珂喜极而泣。

当然，杨思权等人投降不是没条件的，他们其实是要在李从珂身上押宝下注，毕竟他们从李从厚那里得到的银子太少。杨思权公然向李从珂索要官位：“愿王克京城日，以臣为节度使，勿以为防（御史）、团（练史）。”杨思权漫天要价，其他反水的官军自然也都会向李从珂开口要钱。李从珂是个聪明人，管他以后如何，先签了保命的空头支票再说，杨思权拿到了李从珂的书面保证书：“事成后，你可出任邠宁节度使。”李从珂其实兜里也没什么钱，但为了不让弟兄

们寒心，他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当，锅碗瓢盆无一幸免，“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

本来在围城时，李从珂就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可他没想到死局竟然可以如此华丽地逆转，这极大地刺激了李从珂推翻李从厚的意志。而李从珂看过地图，只要越过长安这道坎，洛阳就在眼前。

而更让李从珂没有想到的是，朝廷方面的长安留守刘遂雍竟然主动投怀送抱，之前刘遂雍就拒绝溃逃的王思同等人进城。刘遂雍不是傻子，他看到李从珂士气正盛，李从厚倒台在即，他何必要陪李从厚去死。刘遂雍等李从珂大军一到，立刻投降，并把长安城中所有财宝都送给李从珂，李从珂转手都赏给了弟兄们。李从珂要让还在观望的官军看清楚：跟着我混，钞票大大的！

李从珂知道拿钱喂兵大爷，李从厚自然也知道。而实际上李从厚许给官军的支票更为丰厚：“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但问题是李从厚不懂用兵，这些兵大爷也根本不把李从厚当盘菜，给了钱也未必给你卖命。更要命的是，李从厚为人糊涂，竟然把在军中深有名望的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给杀了，原因是康义诚在御前会议上指责朱洪实谋反。“帝（李从厚）不能辨其是非，遂斩洪实，军士益愤怒。”

此时的洛阳朝廷，人心涣散，而李从厚所能起用的军界大佬，在李从珂面前都只不过是江湖小辈。而唯一能和李从珂掰腕子的只有石敬瑭，可石敬瑭的野心比李从珂还大，他早就瞧内弟李从厚不顺眼……

李从厚身边聚集着一批早就暗中与李从珂眉来眼去的大佬，这些人就等着早日见到潞王，屈膝磕头赚银子。李从厚派出的讨逆军主帅，如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皆降，在灵宝遇到东进的李从珂，立刻换了马甲，甚至保卫洛阳的京城巡检安从进也在桌底下和李从珂谈好了条件。

李从厚众叛亲离，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听说安从进杀死了李从珂，下诏罪在不赦的冯赟及朱弘昭满门，惊魂未定的李从厚率五十骑兵夜出玄武门，准备去魏博投靠姐夫石敬瑭。

李从珂风光无限地进入了洛阳城，这一天是应顺元年四月初三。文武阁僚们照例换马甲拜神，李从厚下场如何，没人关心。谁手上握有兵权，弟兄们就认你当老大，是亘古不变的官场规矩。作为胜利者，李从珂转正的速度非常快。四月初四，曹太后就下令废掉李从厚的帝位，由李从珂权军国事。四月初五，曹太后命令潞王继承帝位。又过了一天，李从珂笑容满面地在明宗皇帝的灵柩前即皇帝位，接受王公大臣们的山呼万岁。

一个崭新的时代再次开启。可摆在李从珂面前的却是一连串让人焦头烂额的事情，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筹钱给弟兄们发工资，没钱谁跟你玩？

早在凤翔起事之初，李从珂就许诺等破洛阳城，弟兄们每人发钱一百贯。这还只是李从珂本部人马的赏钱，投诚过来的官军所需的赏钱更是一笔天文数字。可等李从珂进入洛阳后，搜天刮地竟然只刮出了六万贯，而李从珂第一笔需要支付的军费就高达五十万贯……

即使是后宫里的曹太后、王太妃把自己的私房钱加上耳环簪子统统拿出来，勉强也只凑了二十万。李从珂再也刮不出来油水了，只好厚着脸皮把这点钱分给弟兄们，还要按级别分发。像杨思权这样有功于李从珂的，只不过领到了一头骆驼、两匹大马，外加七十贯钱，李从珂本部人马一人领到二十贯，而原来的官军每人只有十贯钱……

弟兄们气得大骂李从珂铁公鸡铜仙鹤，后悔当初受了李从珂的骗，卖了老命才捞到十贯钱。兵大爷们到处给李从珂扣黑帽子，“除去生菩萨（李从厚，小名菩萨保），扶起一条铁！（李从珂）”

其实倒不是李从珂抠门儿，他兜里真没有钱，否则以李从珂的性

格和智商，他不至于穷酸成这样。但兵痞子们不管你困难与否，你不拿出当初给我们许诺的银子，我们就不给你卖命，价格公道，童叟无欺。

李从珂的悲剧命运，其实在“除去生菩萨，扶起一条铁”的咒念中，就已经埋下。

双雄记

——李从珂与石敬瑭的命运纠缠

李从厚当皇帝，李从珂不服。

李从珂当皇帝，石敬瑭不服。

李从珂自恃二十岁就跟着养父李嗣源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瞧不起李从厚。而同样身经百战立功无数的还有石敬瑭。只不过二人的区别在于与李嗣源的关系，石敬瑭只是女婿，而李从珂则是李嗣源的养子。石敬瑭始终认为，李从珂能当皇帝，也仅仅是他的养子身份而已。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石敬瑭的身世。

学术界对五代史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五代曾经存在过“沙陀三王朝”——先后由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首先，继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并不是沙陀人，而是河北汉人，而后汉刘知远倒是货真价实的沙陀人，只不过刘知远早已完全汉化。争议的焦点在于石敬瑭的族属。

欧阳修认为石敬瑭是沙陀人，父亲名叫臬揆鸡，而《旧五代史》则说石敬瑭是西汉宰相石奋之后，后来流落西夷。而可以佐证《旧五代史》说法的，是南北朝著名的鲜卑人姓氏——窦氏，窦氏其实是东汉外戚名将窦宪之后，窦宪败死，子孙出逃大漠。当然，石敬瑭所谓是石奋后人，应该是石敬瑭自抬身价，并不可信。旧史还有一个记载可以佐证石敬瑭的汉人身份，《旧五代史》记载石敬瑭的父亲石绍雍，番名叫臬揆鸡。如果石绍雍是沙陀人，应该倒过来记载“臬揆鸡，汉名石绍雍”。综合各方资料来看，石敬瑭基本可以认定是汉

人，而非沙陀人。

石敬瑭于唐景福元年（892年）生在太原，小李从珂七岁。石敬瑭“性沈淡，寡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任你天崩地陷，我自眉宇不动。石敬瑭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最大的爱好是读兵书。时任代州刺史的李嗣源偶然发现了这个兵学神童，“深器之”，并把女儿嫁给了年仅十七岁的石敬瑭。

李从珂跟着养父李嗣源四处杀伐，其实石敬瑭同样没少立功，如果说李从珂立十分功，石敬瑭至少也要立九分半功。《旧五代史·晋高祖纪》称赞石敬瑭“灭梁室，致庄宗一统，集明宗大勋，帝（石敬瑭）与唐末帝（李从珂）功居最”。只不过石敬瑭比李从珂性格更沉稳，以至于李存勖对石敬瑭并不太了解，而擅长作秀的李从珂却得到了李存勖的称赞。

在养子和女婿之间，李嗣源基本是不偏不倚，两边都疼。但就李嗣源被迫与李存勖翻脸起兵后，为李嗣源称帝立功最大的还是石敬瑭。也许是这个原因，李嗣源对石敬瑭还是高看一眼。李从荣在朝廷四处折腾，在李嗣源的默许下，石敬瑭谋得了天下第一强藩——河东节度使的位置。

石敬瑭守河东，退可自守，进可争雄天下，而李从珂早就盯上千妹夫。“帝（李从珂）与石敬瑭皆以勇力善斗，事明宗为左右；然心竞，素不相悦。”不过在表面上，通过亲情的力量，两大乱世枭雄还能维持脆弱的和平。为了打消李从珂对自己的疑虑，石敬瑭甚至杀掉了废帝李从厚，企图打消李从珂对自己的疑虑。

李从珂对石敬瑭知根知底，从来没有放松对石敬瑭的警惕。石敬瑭受制于人，不得不暂时向李从珂表示屈服。清泰元年（934年）五月，李从珂刚刚继位，就逼石敬瑭来洛阳朝见自己。石敬瑭还不敢得罪李从珂，只能硬头皮去洛阳。据史料记载，石敬瑭身患重病，“久

病羸瘠”，但谁都无法保证石敬瑭的重病是不是装出来的。

李从珂软禁石敬瑭，而曹太后则是石敬瑭老婆魏国公主的生母，她心疼女婿，没少给李从珂施压。虽然朝中大臣倾向于扣留石敬瑭，但李从珂还是难违母命，便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说什么“石郎自少与我并肩作战，我们的感情深似海”，却根本没人相信他的鬼话。

在丈母娘和老婆的运作下，石敬瑭龙出浅滩入大海。惊魂未定的石敬瑭知道李从珂早晚还会打自己的主意，开始“阴为自全之计”。为了掌握李从珂的去向，石敬瑭又走了丈母娘和老婆的门路，出重金收买老太后身边的人，让这些人密切关注李从珂的一举一动，但有风吹草动立刻向他汇报。有钱能使鬼推磨，谁不爱钱？宫里的太监宫女们都成了石敬瑭的间谍，石敬瑭对李从珂大到军国重事，小到吃喝拉撒，“事无巨细皆知之”。

不过就整体实力来说，李从珂还是在石敬瑭之上，所以石敬瑭在羽翼未丰时还不敢和李从珂撕破脸，双方都在明争暗斗。石敬瑭想打击李从珂的经济实力，借口防御契丹缺粮，请李从珂调拨粮食。李从珂明知石敬瑭在耍把戏，又承担不起契丹人南下的代价，只好咬牙供应石敬瑭以及镇守幽州的赵延寿。李从珂让其他藩镇运粮到河东，石敬瑭乘机打着李从珂的旗号，“遣使督趣严急，山东之民流散”。反正天下是你李从珂的，得罪了民心，黑锅你来背。当然李从珂也不是个善茬，他又下诏让河东人缴纳军粮，让怨声冲天的河东人去骂石敬瑭。

李从珂之前一直在为是保中原还是保河东的问题犹豫不决，但李从珂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鱼与熊掌我都要！清泰二年（935年）十一月，李从珂下诏，以驻守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率兵出掌太原以北的代州。李从珂这么做，名义上是让张敬达协助石敬瑭防御契丹，实际上是“以分石敬瑭之权”，时刻监视石敬瑭的一举一动。

李从珂此举让石敬瑭感觉到双方撕破脸皮的大限就要到了，石敬瑭加紧了对抗李从珂的一切准备，甚至把他在洛阳以及其他地方经营的财产都拉到太原，美其名曰充当军费。

似乎是石敬瑭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主动挑衅李从珂。石敬瑭突然给李从珂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朝廷解除他河东节度使的职务，给他挪个窝。河东是天下第一强镇，石敬瑭怎么可能交给李从珂？他不过是在引诱李从珂上钩，只要李从珂同意，他就会给李从珂扣一顶残害功臣的黑锅。

石敬瑭这块带毒肉饼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虽然大臣李崧、吕琦等人劝李从珂不要上当，心急的李从珂还是忍不住咬了钩。下诏：改任石敬瑭为郢州刺史，由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主政河东，并让张敬达武装监视石敬瑭离晋赴郢。石敬瑭等的就是李从珂这个命令，他公开指责李从珂出尔反尔，“面许终身不除代（不离开河东），今忽有是命！……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若其宽我，我当事之；若加兵于我，我则改图耳”。

石敬瑭的心思尽人皆知，正如朝廷方面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对石敬瑭的判断：“移（镇）反，不移亦反。”石敬瑭的心腹、河东掌书记桑维翰给欲火焚身的石敬瑭再添了一把干柴。桑维翰劝石敬瑭“推心屈节”，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救，只要契丹大兵至，就不怕什么张敬达、王阿三。

石敬瑭知道只要自己膝盖一软，再拿出大把银子，不怕耶律德光不咬钩。底气渐足的石敬瑭终于和大舅哥翻了脸，石敬瑭公开指责李从珂不过是明宗皇帝的养子，没有资格当皇帝，“要求”李从珂把帝位还给明宗皇帝的亲生子许王李从益。

石敬瑭当着天下人的面抽李从珂的老脸，李从珂自然恼羞成怒，立刻诏削石敬瑭的一切职务，并命令张敬达、河阳节度使张彦琪、安

国节度使安审琦、保义节度使相里金、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等各部进围太原。

当年李从厚派各藩进围凤翔李从珂的历史重演，只不过当时李从珂实力弱小，要不是李从珂城头一哭，他早就完了。但河东的整体实力远不是凤翔可比，而且契丹骑兵就在代北，耶律德光已经接受了石敬瑭开出的价码——石敬瑭愿向契丹称臣，并愿认耶律德光为父，并割幽云十六州入契丹，随即大军开拔南下。

当年九月，发了财的耶律德光亲率五万精锐铁骑，对外号称三十万，从代州扬武谷（山西原平西北）南下，直奔太原，去救他从来没见过的小儿子。

太原城外的大帅张敬达也想会会这个生活在传说中的契丹大头领，张大帅一声令下，官军以步兵为主，在太原城西北山下列阵。唐军虽然人多，但是马少，而契丹军出战的是清一色的三千不披重甲的轻骑兵，唐军弟兄们看着这三千匹好马，开始眼热。

在冷兵器时代，拥有一匹战马，就相当于现在开着宝马7，而契丹骑兵都是些老弱病残，兵大爷们口水滴答……

“唐兵见其羸，争逐之。”

作为诱饵的三千契丹轻骑兵成功地把唐军吸引到了汾河湾畔，契丹骑兵浮水而去，唐军一部分泡在水里，另一部分还在岸上。耶律德光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兵半渡而击之”，契丹人立刻大举杀出，掐头拦腰去尾，一口就吃掉了一万多唐军。

经此一败，唐军战斗力涣散，张敬达率五万唐军退守晋安寨，太原之围遂解，石敬瑭也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小干爹。太原城下的形势顿时逆转，之前是唐军包围石敬瑭，现在则是石敬瑭与契丹兵包围张敬达，至少石敬瑭确认，自己安全上岸了。

为了剿灭张敬达，石敬瑭下了血本，与契丹人形成一个长达一百多里、厚五十里的大阵，将晋安寨围个水泄不通。为防止有唐军闯阵向李从珂通风报信，石敬瑭还布置了大量铃铛、绊马索，以及会叫的狗.....

晋安寨连一只蚊子都飞不出石敬瑭的手掌心，唐军粮食已经吃光，甚至用粪便喂马，战马饿得咬尾巴，一万匹马都没有了尾巴。唐军也尝试着主动攻击，但河东军和契丹军里外三层，根本冲不出去。虽然李从珂得到了张敬达等人被围的消息，李从珂本来打算想御驾亲征，但一想到石敬瑭的彪悍，李从珂腿肚子发软，随便找个不三不四的借口不去了，改由各藩镇出兵，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和成德军节度使范延光都发兵进抵河东。但赵德钧根本没打算要救张敬达，他在盘算两件事：一、吞掉范延光的两万人马；二、他派人找耶律德光，厚着脸求耶律德光收自己做干儿子，他开出的条件比石敬瑭还要丰厚。虽然耶律德光也曾动了心，但在桑维翰死皮赖脸的哭求下，耶律德光才拒绝了赵德钧。

唐清泰三年（936年）十一月十二日，石敬瑭在耶律德光的册封下，意气风发的在柳林即皇帝位，国号大晋。

李从珂还活着，石敬瑭就已经把他看成了死人，甚至李从珂的年号也被石敬瑭铲除。石敬瑭不承认李从珂的清泰年号，顺带着也铲除了李从厚的应顺年号，将清泰三年改为长兴七年。

形势非常明显，石敬瑭气势正盛，张敬达已成死局，李从珂不过苟延残喘而已。张敬达忠于李从珂，愿为死臣，但不代表张敬达手下将领也愿意给李从珂陪葬。杨光远等人劝张敬达识时务，投降石敬瑭换取富贵，张敬达宁死不从。你不听话？这个好办，杨光远“乘其（张敬达）无备，斩敬达首”，带着渴望发财的弟兄们投降了耶律德光。

晋安寨的五万唐军面无惭色地成了石敬瑭的打工仔，李从珂这才深刻体会到了当年官军投降自己时，李从厚绝望的心态。更让人绝望的还有后面。赵德钧等援兵还没有撤离，契丹人自然不会放过这几块肥肉。契丹人在团柏镇（山西祁县东）对唐军发起总攻，早就对李从珂不满的赵德钧立刻撤回幽州，而其他各部如符彦饶、张彦琦、刘延朗等人都溜之大吉。唐军被打得溃不成列，“相腾践死者万计”。

这些唐军都是李从珂最后的保命钱，一场仓促的赌局全都赔光了！

李从珂的命运可想而知。而且李从珂知道，胜利者石敬瑭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一旦自己落在石敬瑭手上，必然会遭到石敬瑭的无情羞辱。石敬瑭也急需用羞辱李从珂的方式，来向天下证明自己才是明宗皇帝最有资格的继承人。

十一月二十四日，镇守洛阳城北门户的河阳三城节度使苻从简开门向石敬瑭投降，李从珂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绝望的李从珂颤抖着，奉年迈的曹太后、刘皇后以及皇子李重美，外加心腹宋审虔等人登上玄武楼，坐在一堆猪油浸泡过的木柴中间，一把冲天大火，宣告了李从珂时代的覆灭。

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晋皇帝石敬瑭车驾进入洛阳城。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汉奸石敬瑭

“呜呼！晋之事丑矣，而恶亦极也！”这是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第五十二卷中对后晋政权建立者石敬瑭的一句评语。

石敬瑭则是历史公认的五代第一汉奸。史学界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正是石敬瑭为了一己之私，把襟带山川的中原门户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才导致中原无险可守，直至1368年，明朝大将军徐达率汉族军队收复大都。欧阳修所说的“恶”，其实就是指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重大历史事件。所谓十六州，是指五代时期的幽州（今北京市）、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州市）、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西北）、蔚州（今山西灵丘）。

欧阳修所说的“丑”，是指两件事：一、石敬瑭为了私利，不顾个人廉耻，四十四岁的他认三十三岁的耶律德光当干爹。二、石敬瑭建立的后晋政权向契丹称臣纳贡，石敬瑭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

以堂堂中原正统大国之尊，向“尚未开化”的大漠荒国磕头认干爹、称儿臣、纳职责，受尽契丹人欺凌压榨，开此耻辱之先的石敬瑭当之无愧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唐清泰三年（936年）七月，那个烈日炎炎的夏天，无数唐军进

围太原城下，目标很确定，就是要生擒公然造反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李从珂控制着中原二十藩镇，石敬瑭只有河东一道，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石敬瑭要想活下去，只能去请援兵。放眼天下，唯一有实力救石敬瑭的，只有北边的邻居契丹大辽国。

不过石敬瑭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向耶律德光放血，契丹人绝对会见死不救的。你不放血，凭什么救你！

经过深思熟虑，石敬瑭向耶律德光开出了丰厚条件。河东掌书记、坚定的亲契丹派桑维翰写了一封致契丹人的信，石敬瑭在信中承诺，只要耶律德光肯出手救人，他愿意在事成之后向契丹称臣藩纳职贡，并割让雁门关以北、西起云州东至幽州的十六州入辽，以及每年向契丹人输送金帛三十万匹两。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石敬瑭竟又加了一笔：愿认耶律德光为父！

向契丹人求援，在河东军事集团上层是主流观点，基本没人反对向契丹称臣，但反对石敬瑭向契丹人割地并认干爹。代表人物是石敬瑭的贴身心腹、将来的后汉高祖刘知远，他的意见是可以向契丹称臣，也可以送给契丹人大量金银财宝，但反对认耶律德光当干爹，并割让中原战略领土。

刘知远很有战略眼光，他一眼就看出一旦割让幽云十六州，必然会导致将来中原无险可守。但石敬瑭自有他的考虑，以耶律德光的贪婪，只凭金银财宝是不足以让耶律德光动心的，不割地，契丹人必不相救。

如果站在石敬瑭本人的立场，也许石敬瑭的考虑是正确的，从耶律德光得到大肉饼后的反应“大喜”，可以看出耶律德光对这个条件是极为满意的。如果只出钱，耶律德光应该会不屑一顾：我有兵有马，难道我就不会抢钱？你送给我，我还欠你一个人情！

至于石敬瑭乱攀亲戚，刘知远极力反对。虽然刘知远是沙陀人，

但他的思维相对于石敬瑭则比较传统，他接受不了干爹反而比干儿子小十一岁。石敬瑭却“不从”，还是奴颜婢膝地跪在了耶律德光的面前，磕头认了干爹。石敬瑭不顾社会伦理认小干爹，是想通过结干亲的办法拴住耶律德光，保持晋辽外交关系的稳定，同时阻止其他中原的野心家乱认亲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

而现实很快就抽了石敬瑭一记响亮的耳光，幽州节度使赵德钧见石敬瑭攀上了契丹人的高枝，羡慕嫉妒恨，眼都红了。赵德钧立刻给耶律德光谈了条件：“只要立我为帝，我愿意与契丹结为兄弟之国，”并厚赠金银宝贝。

耶律德光出于避免赵德钧和自己翻脸，断了自己北归后路，差点就同意了赵德钧的条件。石敬瑭听说后差点晕倒，除了大骂赵德钧无耻下流外，立刻派桑维翰去找耶律德光，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哀求。最丢人的是，为了说服耶律德光放弃赵氏父子，桑维翰跪在耶律德光的大帐前，从白天到晚上，纹丝不动。“涕泣争之”，这才勉强打动了耶律德光。

看透不说透，才是好朋友。不管是石敬瑭乱认干爹，还是耶律德光乱收干儿子，其实他们之间都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但不得不承认，因为利益上有共同点，石敬瑭与耶律德光这对干父子之间确实有过一段蜜月期，甚至是石敬瑭的皇位也是耶律德光册封的。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十一月十二日，寒风呼啸中的太原城外柳林，石敬瑭正式接受耶律德光的册封，建立了后晋王朝。值得一提的是，石敬瑭所建立的晋朝，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中原帝王。因为石敬瑭并不是穿着中原帝王的衮冕继位，而是穿着契丹人的传统服装继位，而且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为晋帝的诏书上开宗明义：“咨尔子晋王。”一个“子”字，不仅让石敬瑭蒙羞，更让中原（汉化）政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骂石敬瑭一句“汉奸卖国贼”，并不为过。

石敬瑭知道没有耶律德光出手相救，自己早成了李从珂的刀下鬼。所以石敬瑭在统治中原之后，对恩重如山的小干爹极尽阿谀恭维之能事，马屁拍到炉火纯青，“帝事契丹甚谨”。每次契丹派使者南下，石敬瑭都要在别殿对着契丹使者下跪磕头，极其肉麻地问：“父皇安否？”

石敬瑭巴结的并不只是干爹耶律德光，契丹一应太后亲贵大臣都是石敬瑭需要拍马的。甚至还在天福三年（938年）的六月，石敬瑭还派内阁首辅大臣冯道出使契丹，给他的干祖母述律老太后上尊号，弄得冯道被耶律德光调戏了很久，差点老死在漠北。石敬瑭铁了心给耶律德光当干儿子，他知道，一旦和耶律德光翻脸，固然能赢得中原人的支持，但契丹人的铁甲骑兵会轻易撕破河北防线……

除了干爹和干祖母，其他契丹勋贵都没少收到石敬瑭拍的马屁。“至（契丹）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遗。”搞笑的是，赵延寿正是曾经差点砸掉石敬瑭饭碗的赵德钧的养子。而这些人见石敬瑭如此贱骨头，自然瞧不起这个贱货，只要石敬瑭马屁没拍到位，这些大爷就派人来骂石敬瑭。石敬瑭惹不起这些大爷，照例“卑辞谢之”，反正石敬瑭早就不知廉耻为何物，骂就忍着。

虽然中原官员早就看不惯石敬瑭的贱骨头，“朝野咸以为耻”。不过石敬瑭自有他的道理，他对大臣们说：“这些金帛是送给了契丹人，但这些钱不过是国内几个县的租赋而已，花小钱买大和平，多么划算的事情。”插入闲话，虽然赵匡胤通过篡位建立的宋和石敬瑭并非一家，但宋朝的外交政策却基本是石敬瑭外交思路的延续——花钱买和平，必要时乱认干爹干大爷。在外交上，最完美继承石敬瑭外交衣钵的，无疑是南宋高宗赵构。从各方面综合来看，赵构几乎就是石敬瑭的投胎转世。这些主降派经常使用的一个观点就是“兵不如人，枪不如人，国力不如人，打了等于送死”！实际上，从石重贵与契丹大战，南宋与金的拉锯战来看，只要内部将相和，把契丹人和女真人

驱出中原并非难事，只不过石敬瑭和赵构从来就没想到要收复什么故土，现有的地盘足够他们挥霍的。至于什么幽云十六州，本来就非石敬瑭的根据地，送给契丹人，石敬瑭没觉得有什么可惜。

石敬瑭慷慨地把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送给契丹人，却直接导致了中原汉族政权在防御游牧骑兵时的极大战略被动，北宋苏辙曾经哀叹“石晋始以燕、蓟之地赂契丹……是时，割地之害深矣”。幽州至云州一线是燕山山脉至太行山脉，地形险峻，有利于中原政权防御来去无定的游牧骑兵。但自幽云入辽之后，契丹骑兵往前推进数百里，直接面对一川无险的河北平原，契丹骑兵曾经南下深州、冀州一带烧杀抢掠，给中原政权在河北的防御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自晋汉以来，（河北）常为契丹所困，每胡兵入寇，洞无藩篱。”直到强势的周世宗柴荣出现，历史才出现了可喜的扭转，通过浚通胡卢河，有力地阻止了契丹骑兵南下骚扰河北。但可惜柴荣英年早逝，篡位的赵匡胤又欺软怕硬，基本秉承了除称臣割地的石晋对契丹的政策，以守势为主，导致契丹人对中原政权重新构成重大威胁。

盱食宵衣，礼贤从谏

——说说石敬瑭的另一个侧面

说完了石敬瑭的负面，再来说说石敬瑭的正面。

最朴素的逻辑辩证法告诉人们，完美无瑕的人是不存在的，万恶不赦的人也是不存在的。石敬瑭是汉奸，但这并不影响石敬瑭作为历史上一位相对有为之君的存在。

应该说明的是，石敬瑭这个汉奸，和近代史上著名人物汪精卫的汉奸行为有所不同。汪精卫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持下成立了汪伪政权，是为日本完全侵占中国服务的，在汪伪政权中，日本人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而石敬瑭虽然向契丹称臣割地纳贡，但却把契丹人的势力牢牢限制在燕山—太行山山脉以北，他不会允许契丹人放马南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石敬瑭的汉奸行为之于中国的危害，要远远小于汪精卫汉奸行为。

石敬瑭认小干爹，割让幽云十六州，是著名的儿皇帝，在历史上早就臭名昭著，所以人们很容易记住石敬瑭的阴暗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一个石敬瑭。

“及其为君也，盱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纁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这是一段历史评论。如果不作特别说明，人们会认为这是史官歌颂某个有为之君。其实这段史评说的正是石敬瑭，出自《旧五代史·晋高祖纪评》。

在五代史上，唐明宗李嗣源的“粗为小康”非常著名，但他的女婿石敬瑭在统治的七年间，其实也完全可以称为“粗为小康”。

石敬瑭大驾刚进洛阳时，就下诏减轻百姓的盐务负担。石敬瑭规定北京（今太原）百姓可以向官府以粮食折算盐税，同时降低了之前朝廷“每斗须令人户折纳白米一斗五升”的规定，这个价格对百姓来说太高，石敬瑭“极知百姓艰苦”，规定以后再让百姓以粮易盐时，必须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而不是搞一刀切。同时洛阳百姓可以不用粮食折算盐税，而是用钱折算，方便了百姓。

唐末五代，盐税向来是朝廷税收的大头，石敬瑭之前，五花八门的朝廷对百姓极尽榨盐之利，更兼山西是产盐重地，百姓负担非常重。石敬瑭为了满足契丹干爹的贪欲，他比谁都需要钱，但相比于钱，他现在更注重的是民心。百姓的盐税负担，在石敬瑭期间是非常轻的，百姓摆脱了盐老虎的压榨，生活水平自然也就上去了。

石敬瑭并非作秀，一直到他驾崩，也没有改变这个政策，作秀一辈子，也就不是作秀了。七年时间，可以想见百姓省了多少钱。而正因为石敬瑭轻盐税，导致朝廷税收骤减，石敬瑭的侄子上台，全面改变叔父的轻盐政策，又重新放纵盐老虎压榨百姓，最终天崩地裂，不可收拾。

除了在盐税上让利百姓，石敬瑭还做了一条特别规定：“天福元年以前，诸道州府应系残欠租税，并特除免。”也就是说，石敬瑭不承认李从珂政权对百姓征收的税收，包括酒曲钱，一并废止。更让人感动的是，石敬瑭从北京来洛阳的路上，发现郑州附近农田遭到了蝗虫啃食，立刻派人前去察看，根据实际受损的情况减轻农民的租税。在天福二年五月，石敬瑭听说洛阳、邺都附近闹起了旱灾，二话不说，下诏两地税务机构减少征收五分之一的税收总额。

抛开石敬瑭和耶律德光之间乱七八糟的关系，只从百姓利益的角

度来看，石敬瑭无疑是一个好皇帝。石敬瑭曾经针对定州干旱下过一道诏书，在诏书中，石敬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百姓的态度：“朕自临寰宇，每念生民，务切抚绥，期于富庶，属干戈之未戢，虑徭役之或烦。惟彼中山（定州），偶经夏旱，因兹疾苦，遽至流移，达我听闻，深怀悯恻。”照例，石敬瑭免除了定州百姓的夏秋两税。天福四年（939年）十二月，中原突降大雪，连下五旬，给百姓造成了严重灾难。很多军士贫民饥寒交错，石敬瑭给他们发放薪炭米粟，此举虽属小恩小惠，但至少石敬瑭还能记得百姓穷苦，心里始终没有忘记百姓。

石敬瑭对百姓的爱护，从一次他与大臣的对话可以体现出来。《旧五代史·晋高祖纪二》记载：天福二年（937年）四月，石敬瑭巡幸郑州，在接见郑州防御史白景友的时候，白景友献出一批牛羊和器皿。石敬瑭并没有立刻接受，而是问白景友：“这些东西不是抢百姓的吧？”白景友非常硬气地回答：“臣畏陛下法，皆办于已俸。”石敬瑭听说白景友用的是自己工资钱，便欣然收下。

一个“臣畏陛下法”，说明石敬瑭非常严格地执行爱惜民力的政策，任何官员都不允许有丝毫违禁，否则石敬瑭是饶不了他们的。如果石敬瑭纵容大员抢掠百姓，白景友是会毫不手软地搜刮民财的。

石敬瑭的汉奸帽子戴了一千多年，但实际上，石敬瑭的治国能力在五代十国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李从珂为了对抗石敬瑭，疯狂地在农村拉壮丁，导致青壮劳力“结集为盗，藏隐山谷”。石敬瑭为了恢复立国之本的农业生产，专门派人到山谷里“逐处晓谕招携，各令复（旧）业”。不过这些青壮年很多都是犯过案子的，他们担心官府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石敬瑭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又告诉这些人：“（天福二年）四月五日（下诏日）以前为非者，一切不问。”新政府不会追究他们在旧政府统治期内犯的罪。不过石敬瑭同时又警惕地看到，有些人可能尝到了打劫的甜头，未必愿意回乡务农。石敬瑭警告他们：“如两月内不归业者，复罪如初。”给这些土匪两个月的考

虑期，逾期不回家务农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石敬瑭高超的政治手腕可见一斑。

如果用现在的经济光谱来划分，石敬瑭是典型的市场派，他反对过于集中的经济模式，为了捞钱不顾一切，而是主张藏富于民。陈州百姓王武在自家地里突然挖出了一大堆黄金，可还没等王武数清黄金数量，绿头苍蝇一般的当地官府立刻上门，指责王武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立刻将黄金没收，转手就送给了石皇帝，以邀圣宠。石敬瑭手头非常缺钱，但他却反对这种从百姓手中抢钱的做法，他告诉那些摇头摆尾的大臣：“这些东西本就不是官家的，谁挖出来的自然应该归谁所有。”石敬瑭把黄金还给了王武。石敬瑭拒绝与民争利，而宋朝则对百姓举起了经济屠刀。南宋初，广州州学教授林勋曾经指责宋朝的财税制度：“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朱熹也曾经炮轰过“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相对于宋朝对民间几乎掠夺式的财税政策，石敬瑭已经做得足够优秀，至少石敬瑭心中还怀着一颗爱民之心。

石敬瑭是武人出身，但他喜欢读书，经常在兵事之余，和自己的幕僚大臣开小型座谈会，谈论民间疾苦以及官方相关政策推出后的利弊得失。纵观石敬瑭的七年执政，他所奉行的经济路线，和西汉初年的黄老无为而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黄老无为之治，是遵循先圣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思想，提倡与民生息，不搞经济刺激。其核心的精神内在，其实就三个字——不折腾。而后晋上承后唐乱政兵事之余，百姓疲惫，经济凋零，石敬瑭要恢复中原的经济实力，只有“不折腾”这一条路可走。七年时间，证明了石敬瑭的“不折腾”路线是正确的，效果非常显著。《旧五代史》的史官们也称赞石敬瑭“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静之风，以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

有一条史料并不太引人注目。《旧五代史·晋少帝纪一》记载，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后，立刻犒赏将士，按级别，每个军人都领到

五贯到一百贯不等的赏钱。石重贵哪来的钱赏赐军人？自然都是石敬瑭七年间发展经济的成果。要知道，李从珂称帝后，他允诺给弟兄们发钱，可功劳最大的杨思权才领到七十贯钱，他的本部人马才领到二十贯……

在结束石敬瑭的话题之前，再提及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天福三年（938年）十月，石敬瑭决定放弃当时的国都洛阳，迁都汴州，并升汴州为东京开封府。

迁都开封的理由，史料记载得非常清楚，石敬瑭考虑洛阳远离东部的漕运交通线，劳动百姓车推肩挑运输粮草，同时也不利于朝廷对关东（虎牢关以东）地区的统治。而汴州是漕运重镇，“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

汴州早在朱温时就已经升格为东京开封府，但朱温本人主要还是生活在洛阳。虽然朱友贞定都开封，但又被李存勖消灭，李存勖主张恢复一切唐朝旧制，又把国都定在洛阳。石敬瑭在法统上不是李唐后裔，所以他没有李唐那样的历史负担。不过在石敬瑭迁都汴梁时，因为被冷落了十几年，汴梁城早已衰败不堪。是石敬瑭的一道命令，又让奄奄一息的汴梁城重新恢复了曾经的妖娆多姿。而极尽繁华的大宋东京汴梁城，那一座座具有现代娱乐功能的瓦肆勾栏，那一幅横绝千古的《清明上河图》，其发端者，其实就是石敬瑭。

不过说来吊诡的是，石敬瑭虽然把国都定在了东京汴梁，但其人生的谢幕地却是在东京汴梁以北四百余地的北京邺都。石敬瑭之所以不辞劳苦去邺都，是因为桀骜不驯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意欲谋反，石敬瑭必须亲征。天福六年（941年）八月，石敬瑭抵达邺都，布置对安重荣的围剿。安重荣虽然是个大嗓门，还喜欢作秀，但从军事能力上看，他连给石敬瑭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当年十二月初二，安重荣反。十二月初七，石敬瑭派妹夫、天平军节度使杜重威为主帅，讨伐

安重荣。十二月十三日，叛军在宗城被杜重威率领的官军击溃，斩首一万五千。牛皮吹破的安重荣狼狈逃回镇州死守，但也只勉强撑过了天福七年的春节，就被杜重荣破城斩首。

安重荣死了，但河北局势依然动荡，所以石敬瑭一直没有回汴梁。可让这位双面枭雄意外的是，他永远回不了汴梁城了。晋天福七年（942年）六月十三日，五十一岁的石敬瑭病逝于邺都保昌殿。

临死前，石敬瑭紧紧拉住宰相冯道的手，眼睛却盯着他年幼的儿子石重睿。石敬瑭的言下之意非常明显，他希望冯道能立石重睿为帝。不过冯道不傻，冯道身边就站着晋朝宗室最年长的下一代成员——齐王、广晋尹石重贵。如果冯道立石重睿，以石重贵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对幼儿石重睿俯首称臣，必然会发动兵变。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冯道还有活路吗？甚至还要牵连年幼无辜的石重睿。

最终，冯道还是选择了目光冷峻的石重贵，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天下大乱，国家应立长君。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乱世时代立幼儿为帝，除非宗室中有年长成员居中摄政，或有强悍的皇太后垂帘听政，否则必为外人所夺。赵匡胤篡位，就是一个再著名不过的例子。

而和冯道一起决定新君人选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天平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侯景延广。景延广是什么人？他是石重贵的头号心腹兼首席智囊，冯道和景延广议事，是大有深意的。

景延广身后站着石重贵，冯道知道他该怎么做。说来有意思的是，就在石敬瑭死的当天，冯道就做出了拥立石重贵的决定。

历史何其讽刺。

宁可当孙子，也不当奴才

——五代晋辽关系破裂始末

按照五代主要帝王都要至少有一篇专论的标准，无论如何都应该给石重贵写一篇的，但鉴于石重贵统治的四年时间内主要只做了一件事情，即与晋国的宗主国契丹关系破裂，继而大打出手，最终被契丹所灭。所以不再多费笔墨，而是把有关石重贵的一些事情，都放本篇及下篇中一并讲述。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石重贵的身世。

石重贵是石敬瑭幼弟石敬儒的儿子，生于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因为父亲早死，石重贵一直跟着叔父石敬瑭闯荡江湖。石重贵不喜读书，却喜欢骑射，石敬瑭很疼爱这个侄子。但和李嗣源之于李从珂的感情一样，疼是一定的，但传位是不可能的。等到石敬瑭快咽气时，他考虑的还是幼子石重睿，石重贵依然被晾在墙上。好在冯道做出了一个对石重贵来说完全正确的选择——立石重贵为帝，避免晋朝宗室内部的一场血腥残杀。

晋天福七年（942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九岁的石重贵在文武百官的山呼万岁声中，春风满面地君临天下。

在处理了叔父的国丧后，石重贵意气风发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不过在晋朝特殊的历史外交框架下，石重贵要开创自己的时代，无论如何都绕不过一个问题——和契丹的关系。

众所周知，石敬瑭当年在太原差点被李从珂的人马包了饺子，是

石敬瑭不惜割让幽云十六州，并向契丹称臣称儿纳贡，才让耶律德光出手相救，最终咸鱼翻生的。晋朝建立后，石敬瑭与契丹建立了牢固的臣属关系，说穿了，就是铁了心要给契丹人当奴才，天天像孙子一样被契丹人骂来骂去。虽然石敬瑭丢人现眼，但客观上阻止了契丹铁骑的南下，保全了中原汉文明没有受到契丹人的野蛮破坏，中原百姓也过上了七年“粗为小康”的相对安稳的日子。

对于石敬瑭对契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石重贵并不是很认可，虽然他的干祖父耶律德光曾经高看过石重贵一眼。石敬瑭南下洛阳，欲留一子侄守根本重地太原，石敬瑭问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手指石重贵，“此儿眼大，可守太原”。而后来石重贵一路青云直上，未必就没有耶律德光的因素在内。

不过石重贵知道对契丹的一边倒是叔父的既定国策，不可能改变，所以石重贵也基本不说什么，甚至是耶律德光也被干孙子蒙在鼓里。石敬瑭死后，耶律德光还派人来祭奠干儿子，送慰问礼马二十匹。不久后，耶律德光再送御马两匹、羊千头、绢千匹。在耶律德光看来，干儿子和干孙子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自己在中原的“看门狗”，耶律德光还在做着继续享受中原稽首臣伏的美梦。

但石重贵却开始谋划改变与契丹的这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

起因是晋朝高层召开会议，商议派人去契丹告哀事宜。告哀是一种很正常的外交礼节，即告诉外国首脑：本国领袖逝世了云云，但这里却涉及一个外交等级的问题。石敬瑭时代，晋是契丹的臣属国，告哀书中自然要向契丹称臣。很多石敬瑭时代的老臣主张继续向契丹称臣，反正大家早就不要脸了。

石重贵并没有急于发表意见，反而是侍卫马步军都虞侯景延广跳了出来，极力反对这伙老臣的意见。需要说明的是，跳出来的仅仅一个景延广，没有第二个人，“晋大臣议告契丹，致表称臣，延广独不

肯”。景延广的意思是不能再向契丹称臣，这与晋朝的大国地位不相符，但皇帝（石重贵）可以以个人名义向耶律德光称孙。

景延广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虽然石敬瑭的帝位是契丹耶律德光册封的，但当时石敬瑭的地盘仅有河东一地，远不能与契丹相抗衡。但石敬瑭统治中原后，国土北抵幽云，东临大海，南达淮河、汉水，西接吐蕃，幅疆万里，人口千万，甲兵数十万，只是经济上比之前朝略显困难。以这样的实力，是完全有能力和契丹人一争高下的。石敬瑭是个软骨头，但不代表石重贵也是。

景延广表完态后，宰相李崧站出来反对景延广。李崧的态度也足够强硬：“向契丹称臣是有些丢人现眼，但这么做也是为了江山与百姓不受刀兵之苦。现在和契丹人翻脸，陛下必然要披甲亲征，何其来哉！”李崧不忘讥讽石重贵与景延广一句：到时有钱都买不到后悔药。

反对向契丹称臣的话出于景延广之口，但李崧却针对石重贵。其实大家都知道，景延广是石重贵的头号心腹，二人一定是在开会之前定好了新的对契丹政策，只不过由景延广出头站台而已。内阁首辅大臣冯道早就看透了景延广和石重贵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景延广和李崧互喷口水时，冯道却打哈哈，“依违其间”，两不得罪。虽然其他大臣都反对景延广，但因为一则景延广背后有石重贵的支持；二则冯道装哑巴，纵然知道若与契丹对抗必败，也没人能争得过景延广。即使是先朝老臣桑维翰，他反对景延广的强硬外交政策，几次欲劝石重贵不要冲动，但都被景延广以不三不四的理由拒之门外。桑维翰尚且如此，别人再反对，又有什么用？

不过宰相之一的赵莹却多留了一个心眼，现在口说无凭，应该立个字据，将来契丹人万一打过来，也好有保命的本钱。“莹知其（景延广）言必起两国之争，惧后无以取信也。”在赵莹的坚持下，石重贵同意把今天所议都写在纸上，“以备遗忘”。景延广知道赵莹的意

思，但现在志气正盛的景大人根本不怕什么耶律耀库济，你敢来，老子就灭了你！

而景延广所不知道的是，还没等景延广对契丹公开表态，赵莹就已经把景延广的议事内容偷偷泄露给了契丹人。耶律德光“益怒”。而这个“益怒”，说明耶律德光对石重贵早有不满，早在赵莹之前就应该有人给耶律德光通风报信。

石重贵身边游荡着一群吃里爬外的内鬼，他竟然还不知道……

石重贵是完全支持景延广的，“帝卒从延广议”。毕竟石重贵是天朝大国的皇帝，但与契丹这种不正常的外交关系已经严重影响了晋朝的大国政治以及外交形象，就如同很难想象俄罗斯会对美国俯首帖耳一样。

等消息传到了契丹，耶律德光再也忍不住对石重贵的不满，立刻派人来到汴京给石重贵扣大帽子。耶律德光足够聪明，他并没有直接质问石重贵为什么称孙不称臣，而是打起了石重贵继位合法性的主意。晋是契丹的臣属国，晋朝的继承人入选就必须得到宗主国的同意。而石重贵即位时比较仓促，并没有通告契丹，石重贵也没打算再搞一个契丹人的册封礼。

不过从史料上看，石重贵并没有接见契丹使臣，而是由景延广出面，严厉警告契丹人不要狂妄自大，须知山外青山楼外楼。景延广态度强硬：“先帝是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策，为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景延广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晋朝与契丹的臣属关系，可以想见契丹使者的脸色。景延广已经懒得再和契丹人再费口舌，他语气极端强硬地告诉契丹人：“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景延广对耶律德光的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有种你就来，可你能活着进来，未必就能活着出去。

耶律德光见石重贵如此蛮横，自然怒不可遏。晋朝向契丹臣服，一则符合契丹的经济利益，契丹经济落后，急需中原的物产；二则有利于耶律德光塑造“天可汗”的伟大政治形象。可现在石重贵否认晋辽的臣属关系，等于当众打了自己的老脸，耶律德光岂能咽下这口气。既然石重贵不识抬举，耶律德光已经打算好了——出兵灭晋，再找一个听话的，继续在中原称帝，继续给自己当干儿子。至于取代石重贵的人选，就在耶律德光身边，就是赵德钧的养子赵延寿。

契丹大军即将入寇中原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晋朝社会各阶层被搅得人心不定。虽然石重贵强硬决定与契丹翻脸，为了外交尊严不惜一战，但晋朝内部鱼龙混杂，心怀鬼胎的大有人在，特别是晋朝坐镇地方的封疆大吏们。

在“兵强马壮者自为天子”的五代十国时期，谁当皇帝，身边都会有人不服。石敬瑭当皇帝还算有那个资格，但石重贵算哪根葱，突然就登极九五，晋朝那班功勋大将谁心服？最典型的一个，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是晋高祖石敬瑭的头号心腹大将，但刘知远服石敬瑭，却不服石重贵，所以当石重贵决定与契丹翻脸时，刘知远一句话都不说，只是打着备战契丹的名义招兵买马，等待时机自己发洋财。甚至可以说，刘知远是希望石重贵惨败的，只有这样，他才会有机会浑水摸鱼。

除了刘知远，石重贵的姑父、成德军节度使杜重威也在觊觎石重贵那个让人热眼的位置。虽然杜重威一时不敢造次，但他也同样在等待机会，同时在成德军辖区搜刮民财以自肥，叛乱头子安重荣的财产早就被杜重威私吞了。

杜重威之下，是更加贪婪的沙陀秃子杨光远。杨光远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伸手抢劫，一代大佬范延光就是死于杨光远之手，范延光的财产自然也被杨光远吃掉。景延广与契丹翻脸后，让石重贵“借”走了杨光远麾下的二百匹战马，杨光远是只铁公鸡，自然恼火。沙陀秃

子干脆和耶律德光暗中勾搭，经常“述少帝（石重贵）之短”。更可恶的是，杨光远经常给耶律德光输送晋朝内部的绝密情报，晋朝之亡，杨光远之流的内奸要负主要责任。

不得不说的是，石重贵决定对契丹称孙不称臣，是非常有血性的，远比他那个贱骨头叔父更值得历史的尊重。但石重贵和契丹翻脸，还是过于仓促了些。毕竟石重贵的主张在统治高层内部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内鬼太多。其实最稳妥的办法，是能争取到一至两年的战略时间与空间。在此之前，继续向契丹称臣，迷惑住耶律德光，在这一两年时间内先清除内鬼。而后来石重贵失败的事实也证明了内鬼的破坏力。石重贵刚登基不久，在高层内部还没有站稳脚跟，很多大佬都在盘算把石重贵卖给耶律德光发洋财。可惜石重贵在景延广的攘臂大言中已经被表象冲昏了头脑，他并没有看到刘知远、杨光远、杜重威，以及张彦泽等人阴险的冷笑，坚定地吹起了向契丹人决战的号角。

在石重贵决定与契丹人开战时，他同时还向另外一个人宣战。这是个女人，而且还是石重贵的长辈——守寡多年的叔母冯氏。

冯氏是后唐邺都副留守冯濠的女儿，而当时的邺都留守正是晋高祖石敬瑭。石敬瑭为自己的弟弟石重胤娶了冯氏为妻，但石重胤命短，很快就丢下冯氏升天了。因为冯氏“有美色”，所以早就被好色的侄子石重贵盯上了。以前叔父在时，因为家法严格，石重贵不敢造次，只能望着叔母流口水。现在叔父死了，再没人敢管自己的事了，石重贵向冯氏发起总攻。冯氏虽是石重贵的叔母，但实际上冯氏的年龄比石重贵还小，而且更为乱伦的是，当初石敬瑭是把小弟弟石重胤当儿子养的，所以从心理上来说，冯氏与石重贵之间并没有所谓的辈分阻碍。再加上石重贵是皇帝，权势赫赫，冯氏自然也愿意勾结上石重贵。你情我愿，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就在石敬瑭还没有出殡的时候，石重贵就和冯氏花好月圆了。天福七年的十月初三，石重贵正式册封冯氏为皇后。

石重贵乱伦，其实倒也没什么，历史上乱伦皇帝多了，不缺石重贵这一号。但问题是，石重贵立冯氏为皇后的同时，又重用冯氏家族的男性成员，形成了五代史上并不多见的外戚干政。

冯皇后有个哥哥冯玉，因为不识几个字，所以只混到了礼部郎中的小官。可等妹子当上皇后，冯玉摇身一变成了大国舅，很快就飞黄腾达，当上了右仆射，“军国大政，一以委之”。而冯玉为人贪鄙，一朝得势，就四处伸手要钱，朝野的龌龊官员们都知道冯玉的后台是谁，都来巴结大国舅。冯玉一边捞钱，一边乘势弄权，“由是朝政日坏”。石重贵虽然最终亡于那伙吃里爬外的内鬼，但不可否认，冯玉也是亡晋的罪魁祸首之一。

虎头蛇尾

——一地鸡毛的晋辽大战

耶律德光已经接到了杨光远的绝密情报。情报上只有一句话：“（晋）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

这是石重贵不应该在此时与契丹翻脸的第三个原因。晋朝经济在石重贵即位之初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开战是很不明智的。

晋天福末年，中原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主要是蝗灾和旱灾，饿死几十万百姓。而石重贵不知体恤百姓，为了筹集大量军饷，石重贵不管百姓死活，派出由三十六名使者组成的官方搜刮团，分驻各地抢钱。这些搜刮大使们倚仗着皇帝权势，带着一伙狗腿子，随身携带枷锁和刀具，强闯民宅，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百姓“小大惊惧，求死无地”。

石重贵抢来了无数沾满百姓血泪的钱财，但这些钱财可并不都是备作军用的，其中一大部分是留给石重贵私用的。换言之，朝廷缺钱，但帝王将相们却不缺钱，他们宁可把钱用在享受上，也不养军，其中就包括那个大言给耶律德光好看的景延广。

天福八年（943年）秋天，石重贵去景延广家里饮酒作乐，景延广家里设施非常豪华，“器服、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景延广为巴结石重贵，献上帛五千匹、绵一千四百两，马二十二匹，玉鞍、犀金不计其数。欧阳修气愤地骂这两个民贼，“时天下旱、蝗，民饿死者岁十数万，而君臣穷极奢侈以相夸尚如此”。

正是因为收到了杨光远的这份情报，耶律德光才决定趁火打劫。

晋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初二，还沉浸在新婚宴尔快乐中的石重贵收到了边疆急报：“契丹前锋将赵延寿、赵延照将兵五万入寇，逼贝州。”同时，河东刘知远、成德军、昭义军、横海军都急报契丹人大举入寇。

耶律德光终于发动了战争，但此时的石重贵却不想开战了。

石重贵之前急于推翻石敬瑭的卖国政策，主要是想从政治上捞取形象分，他心里其实是希望耶律德光能忍下这口恶气的，并不希望耶律德光动粗。但耶律德光是什么人？他怎么可能受得了这份窝囊气！可真等契丹人开打时，石重贵在民族大义的三分钟热度早就变得冰冷，他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和冯皇后享受“天伦之乐”，以及享受从民间搜刮来的金珠宝贝。

契丹人来势非常凶猛，还没等石重贵反应过来，就已攻破贝州。贝州是汴梁北面门户邺都的门户，贝州的丢失，导致邺都北面无险可守，契丹人很快就进逼邺城下。

此时的石重贵再没有当时气吞山河的豪迈，而是给耶律德光写了求和信，希望能与契丹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耶律德光根本没理睬石重贵，只是冷冷地回了句：已成之势，不可改也！

脚上的泡是自己踩出来的，石重贵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场。

现实很快就给了石重贵极大的鼓舞，契丹伟王从雁门关进入河东，准备开辟西线战场，结果被强悍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忻口暴打一通，伟王丢下三千具尸体狼狈逃回。

西路军的溃败并没有阻止契丹东线的节节胜利。晋朝出了一个汉奸，就是博州刺史周儒，周儒投降后，立刻引契丹麻答部从黄河马家口渡河，契丹兵立刻在马家口修建堡垒，准备接济河西岸的数万主力

部队渡河，而这对晋朝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晋朝的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的任务，则是必须敲掉这支鱼刺一般的契丹兵。

此时有一万契丹步兵正在河东岸筑建工事，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契丹骑兵来回骑行，充当保安工作。李守贞虽然也是野心家，但当时名位不显，所以他有足够的对荣誉的渴望，杀敌立功的想法非常急切。李守贞的作战方法非常简单粗暴，就是利用契丹保安骑兵数量少，集中优势兵力冲溃这股骑兵。契丹骑兵被打散后，一万契丹步兵就直接暴露在晋人的马刀之下。那还说什么，晋人将契丹步兵围在河东岸的狭长区域内大快朵颐，“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晋军成功地收复了要津马家口，阻止了契丹主军东渡黄河的企图。河西岸的契丹主力根本不敢过河送死，全都溜之大吉。

当时晋军对契丹军人的态度是能杀死不要活的，战斗力无比旺盛。自然，这种战斗力并不是石重贵和景延广带来的，景延广机械用兵，禁止各地晋军互相救援，差点害死了中原顶级名将高行周。因为兵败马家口后，为了泄愤，契丹人杀光了生擒的汉人百姓，“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激起了汉人将士的极大义愤，“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

而这一点，对石重贵来说是极为有利的。晋朝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石重贵对抗契丹人的决心，但看到军队士气并没有受到经济困难的影响，也让石重贵又找回了当初失去的自信心。等到李守贞把在马家口大捷中擒获的契丹将士五百七十八人押送到已经抵达澶州督战的石重贵面前时，石重贵“悉斩之”，其实也是为了激励将士们的抗战决心。

形势对石重贵来说非常有利，耶律德光迫于战局不力，已经收缩战线。特别是元城之战，十几万契丹精锐部队在澶州城北与晋军大战，晋军主帅是高行周。值得一提的是，石重贵本人就出现在晋军前线阵上，他见到了全副武装的干祖父耶律德光，但二人并没有直接交

流。

对于这场战役，《资治通鉴》的记载非常精彩，引如下：“以精骑左右略陈，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陈之东偏，不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昏后，契丹引去，营于三十里之外。”不久，耶律德光拔营北上。

耶律德光跑了，石重贵立刻腾出手对付和耶律德光眉来眼去的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李守贞在马家口大捷后，立刻带着两万精锐开拔青州，剿杀沙陀秃子。这场战役并不值得一提，在历史上也不过是个再小不过的浪花。（开运元年）十二月，杨光远最终撑不下去了，羞羞答答地投降了官军，但最终还是被石重贵弄死了。

石重贵最近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石重贵的亲密战友景延广则被从神坛上拉下来，成了破铜烂铁。景延广为人狂妄霸道，稍一得势就盛气凌人，得罪了整个官场。石重贵不能因为景延广一个人而站在文武大佬们的对立面，何况景延广经常骑在石重贵头上擅作威福，“帝亦惮其不逊难制”，便将景延广下放为西京留守，出居洛阳，离开了最高决策层。

景延广走了，但耶律德光又来了。契丹皇帝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否则老脸就没有地方搁了。开运二年（945年）刚一开春，契丹人直扑昭义军管辖的邢、洺、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耶律德光急于从石重贵身上找回面子，但很遗憾，晋朝那帮强悍武夫又结结实实地赏了耶律德光一记响亮的耳光。数万晋军在邺都留守张从恩等人的率领下，集结于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安阳河南侧，而前锋慕容彦超和皇甫遇则率数千骑兵北上迎敌，在漳河南岸遇到了契丹主力数万。几乎是十比一的兵力对比，但这场遭遇战却让契丹人打得极为难受，晋军“自午至未（傍晚），力战百余合，相杀伤甚众”。契丹没有占到半点便宜，直到张从恩的主力部队前来增援时，契丹人再也没了屠杀无辜百姓时的凶猛，全都吓跑了。而前线契丹人的溃逃，又给后

队的契丹主力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慌，契丹人吓得大叫：“晋军悉至矣！”而身在邯郸的耶律德光也没了闹下去的心思，“即时北遁”。

让石重贵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在与耶律德光的撕逼大战中，他竟然还有机会发起对契丹的战略反击。

这是北面招讨副使马全节给石重贵的建议。马全节认为契丹兵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且多不中用，不如乘机直取幽州，收复旧河山。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石重贵自然希望一鼓作气收复幽州，石重贵知道，一旦事成，他就将成为千古一帝。

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石重贵本人立刻兵发汴梁城，下诏亲征契丹，时间是开运二年（945年）二月。这是北宋自岐沟关惨败之后，那一溜儿窝囊帝王根本不敢做的事情。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非常反对石重贵的冒进政策，认为晋朝国力疲敝，竟然主动进攻契丹，简直就是找死。实际上刘知远是有小算盘的，他希望石重贵兵败，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乱中取事。但随后发生的震惊天下的白团卫村之战，让刘知远的心紧紧揪了起来。

白团卫村之战，是从后梁开始，自唐、晋、汉及至北宋，对契丹人的战争中最让中原人扬眉吐气的一战。这是一场谁都没想到的空前胜利，包括当事双方耶律德光，以及志吞八荒的石重贵。

这场战役发生于晋开运二年三月，地点在今河北省安国市境内的白团卫村。这一次，耶律德光是下了血本的，黑压压数万契丹精骑兵压云南下，蹄声阵阵，扑天黄尘飞舞，场面非常恐怖震撼。而晋军主帅杜重威听到契丹人有八万骑兵时，腿肚子都吓抽筋了。杜重威根本没有胆量和如此数量的契丹骑兵一决高下，立刻率一万多人从定州撤到泰州（今河北清苑）。不过耶律德光也知道杜重威带的是晋军绝对主力，只要拿下，石重贵就难逃生天。几乎是晋军在前面结阵撤退，契丹军在后面马阵相随。晋军一直撤到了白团卫，但契丹人像黏胶一

样也跟到了白团卫，而且契丹军仗着人数多的优势，将晋军团团围住。耶律德光的目标非常明显——打不死你们，也要饿死你们。

晋开运二年（945年）三月二十六日傍晚，乌云覆顶，狂风呼啸，飞沙走石，一片地狱末日景象。而对被包围的晋军来说，他们的末日已经到来——粮食吃完，水也喝光，甚至连泥水都喝没了。在远处坐在由骆驼拉着的大奚车上观望的耶律德光见时机已到，拔刀下令，向晋军发起攻击。因为是攻坚战，马匹用不上，几万契丹骑兵全都下马，手上操着短兵刃，拆掉了晋军外营的鹿寨，一步步向晋军进逼。

面对契丹人的马刀，杜重威已吓得不知所措，他竟然想等风停了再和契丹人作战。杜重威没血性，但晋军弟兄们都有，很多人都向杜重威请战。李守贞不满杜重威的窝囊，认为此时风大日晦，胡人不知我军底细，混场一战更易取胜。

杜重威还在犹豫，马军左厢都排阵使张彦泽折中建议，说可以等风稍小些再战，不然风力太大，影响我们耍大刀。而马军右厢都排阵使药元福则认为契丹人一定会觉得我们不敢在风大时主动进攻，而我们以骑兵对彼之步兵，出奇制胜，卒能大胜，符彦卿非常认同药元福的观点。而李守贞已经烦够了杜重威的磨叽，直接上马，举起大枪，甩开杜重威下令，所有男人都跟我上阵杀贼。

已经饿得发晕的晋军骑兵咬着牙，在李守贞、药元福的带领下，出西营，借着风势，以排山倒海泰山压卵之势，直接捅进了契丹的铁鹞子军。铁鹞子军如果在马上作战，则天下无敌，但他们现在舍马就步，只能舞短刀，而晋军则是骑马舞大刀，作战优势非常明显。

晋军在逆境中爆发恐怖的求生欲望，边杀边吼，声音震动天地。没有做好作战准备的契丹人被晋军一路追杀二十多里，遍地都是死尸。

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惨败，本来还盘算着多收三五斗的耶律德光吓得魂都飞了，眼瞅晋人杀到自己眼前，耶律德光再不顾什么大皇帝的尊严，揪住一头骆驼闪电般狂奔。搞笑的是，耶律德光嘴里还不停地念古怪的咒语，那头骆驼扭着大屁股消失在斜晖之中。耶律德光骑着骆驼侥幸逃脱，但他的八万契丹骑兵则光棍一般逃回来，每名士兵所配备的马匹、甲仗都打包送给了晋人。

当然，耶律德光能逃出生天，主要还是晋军主帅杜重威没有率军追赶。而杜重威是有私心的，如果他帮助石重贵灭了耶律德光，石重贵成了千古一帝，自己的帝王梦想岂不是要破碎？

对于杜重威的深意，耶律德光未必不知道，只是性格好胜的他始终咽不下这口恶气。虽然他的老娘述律太后劝他与晋和好，再打下去老本都快赔光了，但耶律德光还是坚持对晋采取攻势。而石重贵也打累了，“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实在折腾不起了。石重贵派人去与耶律德光进行和平谈判，耶律德光倒是同意谈判，但前提却是让石重贵交出罪魁景延广，同时晋朝割让成德军四州、义武军两州。

战败国竟然要求战胜国割地，这种事情只有晚清那帮奇葩才能做得出来。石重贵作为战胜国，他自然是不会接受这种条件的，否则他就和他叔父石敬瑭一样成了千古汉奸。

耶律德光开出这样的条件，明眼人都知道耶律德光还想打，石重贵也未必不知道，但白团卫村之战的空前大捷让石重贵觉得耶律德光也不过如此，没什么好惧怕的。再加上“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石重贵算定耶律德光即使想打，他手上也没多少本钱了。

以前有一部国产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讲述一个将军打了胜仗之后骄傲自满，不再工习武事，而是每天吃喝玩乐。石重贵就像这个骄傲的将军一样，觉得自己天下无敌，耶律德光不敢犯边，自己可以

再享受几年快活人生了。

对于石重贵的奢侈享受，《资治通鉴》的记载触目惊心：“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又赏赐优伶无度。”

本来大胜契丹后，晋军将士士气旺盛，即使石重贵不想再与契丹开战，也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喘息时机，犒赏将士，以备不时之战。而石重贵则学起了前辈李存勖，有钱给戏子，没钱给将士。弟兄们出来混江湖，“冒白刃，绝筋折骨”，要的是真金白银，你一毛不拔，谁还为你卖命？正如桑维翰对石重贵的警告，再这样下去，将士寒心，三军解体，你就等着玩完吧。

石重贵不听。

而历史对石重贵倒行逆施的惩罚，很快就要到来。

开运三年（946年）九月，契丹人再次大举入寇，领头的还是那个吹胡子瞪眼的耶律德光。

其实契丹人还是那些契丹人，整体实力未必比晋朝强，晋朝那帮有野心的高级将领打契丹如同切果砍菜。河东刘知远在阳谷将三万契丹兵打得找不到北，斩首七千级。随后，张彦泽又在定州和泰州两次暴打契丹人，斩首两千级。但可惜的是，刘知远只主政河东一地，张彦泽是偏将，而晋军最高统帅，还是那个无德无才的杜重威。有杜重威在，足以使晋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其实朝野都对杜重威主持军务多有不满，赵莹就劝石重贵不如起用李守贞，至少李守贞是真名将。而杜重威为了捞兵权，私下用大量金珠宝贝喂饱了石重贵，石重贵利令智昏，再次起用杜重威。

最可笑的还在后面。石重贵亡国已在眼前，竟然还大言不惭地向世界宣称：“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漠，安定关南；次复幽

燕，荡平塞北。”甚至让李守贞权知行幽州府事，此时的幽州，一直被契丹人牢牢控制。石重贵同时下令：“生擒耶律德光，授大镇节度使，钱万贯、银万两、绢万匹！”

石重贵期待姑父能一战定乾坤，可他做梦也想不到，他亲爱的姑父却把他卖掉了。杜重威花钱买兵权，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反戈相向，废掉石重贵，建立自己的杜氏帝国。杜重威耍尽心机，骗走了石重贵保命的最后一支精锐力量——禁军。

石重贵还在做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春秋大梦，杜重威已经和耶律德光谈好了价钱——杜重威帮助契丹人南下灭掉石重贵，而耶律德光则同意杜重威为中原之主。

耶律德光根本没有打算让杜重威当什么中原之主，只不过在利用杜重威这个傻子。杜重威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喜滋滋地要求三军将士和他一起投降契丹。晋军将士都是汉人，不愿意给契丹人当奴隶，杜重威的工作很难开展。耶律德光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刻派赵延寿给晋营送去一件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穿的赭袍，说契丹人不会霸占中原，将来的中原皇帝一定还是汉人。

如果中原皇帝还是汉人，那么晋军就不再是亡国奴，心理负担减轻了许多。再加上石重贵为人贪残，专喝兵血，弟兄们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当然，弟兄们同样瞧杜重威不顺眼，他们投降契丹，并不代表要拥立杜重威这个国贼。

杜重威率晋军主力投降契丹，这一天是开运四年（947年）十二月十六日。而其他晋朝大军如李守贞、高行周、符彦卿都知道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都解甲投降。

几乎就在几天之间，石重贵手上可以控制的，不再是数十万精锐士兵，而只是把守汴梁宫的侍卫七百人。

等到之前还向他称臣的张彦泽率两千骑兵，代表契丹人扑向汴梁时，石重贵这才明白过来，他早被姑父骗得倾家荡产。

就在杜重威投降的当天夜里，张彦泽的“契丹铁骑”就已杀到汴梁城下。次日凌晨，“契丹铁骑”攻破封丘门，张彦泽就在明德门下等待石重贵的降表。

一切都该结束了。无路可逃的石重贵一边骂着无耻的姑父杜重威，一边含着热泪写下投降书，结束了一个本来可以名扬千古的时代。石重贵的降表简短有力：“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

石重贵的时代结束了，“虜主”耶律德光在中原的美好时代才刚刚开始。开运五年（948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在那帮节操不如妓女的晋朝百官的欢呼声中，春风满面地进入了大梁城。而他的干孙子石重贵，则举家被迁到漠北受苦。

在路过杜重威大营时，已是俘虏的石重贵痛哭流涕，大骂杜重威：我家何负此贼！

早干什么去了？

下山摘桃子

——刘知远的发迹之路

在五代六大开国帝王朱温、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中，从奴隶到帝王者，朱温；百战兴唐者，李存勖；开创小康盛世者，李嗣源；留千古骂名者，石敬瑭；拉开中原政权改革及统一中原大幕者，郭威。而沙陀人刘知远夹在这些明星帝王中间，实在有些不太起眼。

其实刘知远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讲的。

刘知远在晋亡后趁乱建立的后汉政权确有以下山摘桃子之嫌，但必须要说明的是，刘知远能上山等待摘桃时机，这个机会也是刘知远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

刘知远是毫无争议的沙陀人，他有一副与汉人迥异的奇特长相，“面紫色，目睛多白”，但刘知远本人早已汉化，他身上看不出有丝毫的沙陀背景。至于宋人吹嘘刘知远是东汉明帝刘庄第八子刘昞之后，不过是无聊的马屁而已。

刘知远祖上名位不显，对于草根出身的壮汉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在乱世中只有从军一条路可走。刘知远最早是跟着李嗣源混的，但当时不过是个兵头儿，李嗣源并不知道刘知远是哪方尊神。而真正给刘知远打开通天窗的，是一代奸雄石敬瑭。而刘知远与石敬瑭的认识非常有戏剧性。梁贞明五年（919年）十月，晋梁在魏州德胜寨大打牛皮战，场面非常胶着。时任河东左射军使的石敬瑭被梁军伏击，击断了石敬瑭所骑战马的铁甲，如果不是身边的刘知远果断地把自己的马匹送给石敬瑭，石敬瑭已成梁军俘虏。石敬瑭获救之后，对刘知

远感恩戴德，“敬瑭是以亲爱之”。而石敬瑭当时已是李嗣源的宝贝女婿，石敬瑭一句话，刘知远立时青云直上。等到李嗣源兵变称帝后，石敬瑭还在念着刘知远的救命之恩，没少在李嗣源面前走门路，李嗣源自然不能驳女婿面子，让刘知远当上了牙门都校。

官不大，但实际上刘知远和石敬瑭已经确立了从属关系，从唐天成元年（926年）石敬瑭出任北京留守，刘知远就一刻也没远离石敬瑭，可谓形同兄弟、亲如父子，而刘知远只比石敬瑭小三岁。刘知远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石敬瑭是自己的命中贵人，石敬瑭的命运将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刘知远愿意鞍前马后为石敬瑭效命。李从珂造反赶跑了李从厚，李从厚找石敬瑭避难，而李从厚的侍卫又想诛杀石敬瑭，夺取石敬瑭的地盘。是刘知远早先谋算一步，及时做好应变准备，又救了石敬瑭一命，并杀光了李从厚的所有侍卫。这次突发事件，应该就是石敬瑭逼死内弟李从厚的主要原因。

当然，刘知远并不是石敬瑭的贴身侍卫，刘知远拼了老命保护石敬瑭，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的前程。而石敬瑭也对刘知远非常依赖，让刘知远主管河东马军，出任马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总司令、大元帅，以跻身河东核心决策层。与时任河东掌书记的桑维翰同为石敬瑭的两大铁杆心腹，桑维翰主政治外交，刘知远主军事，形成了河东集团的双头鹰权力格局。

刘知远进入河东决策层议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石敬瑭在遭到李从珂的围剿时向契丹求救，并愿意向契丹称臣称儿割地纳贡。虽然早前李从珂强迫石敬瑭从河东移镇郢州，刘知远劝石敬瑭“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但以石敬瑭的精明，刘知远不劝他，他也不会移镇的。

刘知远不反对向契丹称臣，他也知道契丹是唯一能救河东集团于水火的大菩萨，但石敬瑭不顾个人尊严给契丹当干儿子，是思想正统的刘知远所不能接受的。石敬瑭自己贱骨头，刘知远也懒得管，但石

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却遭到了刘知远的极力反对。作为一个沙陀人，却阻止一个汉人割让汉人的传统势力范围，虽然石敬瑭最终没有采纳刘知远的建议，但至少刘知远在维护中原利益方面是问心无愧的。而石敬瑭本人也知道刘知远对自己的忠心，反而更加器重刘知远。甚至是石敬瑭的小干爹耶律德光也替包括刘知远在内的河东高层吹喇叭，“刘知远、赵莹、桑维翰皆创业功臣，无大故，勿弃也”。

其实耶律说这句话非常正常，还有另外一层涵意，警告石敬瑭不要卸磨杀驴，因为当时石敬瑭已经有了猜忌刘知远的苗头。石敬瑭不会猜忌桑维翰和赵莹，这只是两个手不能缚鸡的文人，不足为患。可刘知远为人骁勇能战，深得将士死力。在击溃唐军张敬达部队的过程中，刘知远指挥河东军队抵抗官军，“用法无私，抚之如一，由是人无贰心”。而等到晋朝建立时，天下多故，石敬瑭四处讨伐不臣，一时还离不开刘知远。刘知远坐镇京城，手握重兵，保持了禁军的稳定，“知远乃严设科禁，宿卫诸军无敢犯者，……由是众皆畏服”。

就凭这两条，石敬瑭就足以寝食难安，一旦刘知远起了异心，祸起肘腋之间，石敬瑭的人身安全根本得不到有效保障。石敬瑭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杀头号功臣刘知远，但已开始寻找机会剥夺刘知远的兵权。天福二年八月，天下初定之后，刘知远就被调离洛阳，出守许州。天福三年十一月，刘知远又被调到宋州（商丘）任归德军节度使。虽然许州和宋州都在河南，但石敬瑭的意思非常明确，不仅不让刘知远在京师培育势力范围，也不给刘知远在地方藩镇积蓄力量的时间。而在出任宋州不久，石敬瑭给刘知远加了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职衔，当时称为“使相”，不过这只是虚授。但因为同时授职的还是刘知远极瞧不起的大贪官杜重威，刘知远一怒之下拒绝接受诏命，甚至“杜门不出者数日”。

石敬瑭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石敬瑭同样“大怒”，立刻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准备对刘知远进行全面否定，然后解除兵权，罢归私第，形同软禁。宰相赵莹和刘知远有不错的私交，自然反对，理由是刘知

远是晋朝头号功臣，如果罢废刘知远，会让天下人觉得石敬瑭是在卸磨杀驴，对石敬瑭的政治形象非常不利。

石敬瑭笨嘴拙舌驳不过，只好放下了早就对准刘知远的政治屠刀。

不过石敬瑭对刘知远在军界复杂的人脉不放心，但他倒真的没有要杀刘知远的念头。不说什么政治形象，主要还是乱世杀伐太多，石敬瑭还要面对各方势力的铁血逐鹿，比如契丹干爹和成德军的安重荣，在这种情况下杀头号大将，等于自杀。而刘知远又确实没有异心，石敬瑭也还可以继续利用刘知远的军事才能为自己服务。

天福五年（940年）二月，刘知远改任邺都留守，就是石敬瑭要榨干刘知远军事才能的苗头，目的自然是要防御安重荣。但一年后的四月，刘知远又被调到天下第一大藩——河东，出任节度使，从太行山西侧严密监视安重荣。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象得到，石敬瑭在决定这一任命时，应该是有过挣扎的。

河东兵马强劲，刘知远万一在河东造反，那自己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聚柴自焚的李从珂。但如果不起用刘知远，没人给自己擦屁股……

刘知远还是心揣蜜意地去了河东上任，至少刘知远可以庆幸一点，主政河东，以后再没人能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了，包括石敬瑭本人。而在赴河东任之前，刘知远曾经回过一次汴梁，石敬瑭也亲赴刘知远府第。君臣二人说了些什么，史无明载，不过也无非是石敬瑭暗中敲打，察颜观色，刘知远假痴不癫，最终蒙混过关。不过话说回来，石敬瑭和刘知远毕竟是从人头阵中滚出来的热血兄弟，三十年风里雨里，石敬瑭对刘知远还是有真感情的。只要刘知远不过红线，石敬瑭愿意以兄弟待之。甚至是石敬瑭在邺都快要升天的时候，他还考虑要把刘知远调回朝廷，出任辅政大臣。只不过新继位的石重贵早就

忌惮刘知远的强悍，他根本不敢放刘知远入京，否则自己将活在刘知远可怕的阴影之下，石重贵便把这个遗诏压了下来。“齐王（石重贵）寝之”，刘知远“由是怨齐王”。

其实，刘知远和石重贵心里都明白，彼此都是对方追求辉煌人生的绊脚石。

有石重贵在，刘知远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猜忌；而有刘知远在，石重贵每天都会如芒刺在背，他也不想做第二个李从珂。

刘知远并非不想做第二个石敬瑭。石敬瑭是对自己不错，但自己救了石敬瑭两条命，石敬瑭厚待自己，刘知远自是心安理得，何况石敬瑭已经死了。不过刘知远也知道，现在不是他出手的时候，因为石重贵对中原的控制远比李从珂牢固。而且刘知远是非常注重自己政治形象的，石重贵主张废除对契丹的臣属关系，已经赚了很多印象分，刘知远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再学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儿割地，否则大汉奸的帽子扣在自己脑袋上，刘知远在政治上一败涂地，在军事上也不会成功。

刘知远的应对策略是，只要石重贵不征他入朝当傀儡，他可以拼尽全力在河东一线阻止契丹人南下。这么做，一则有利于刘知远保住自己的地盘，二则也有利于刘知远打造边塞忠臣的良好政治形象。耶律德光在决定与石重贵决一死战时，他的目光早就盯上了他曾经吹捧过的刘知远控制的河东。如果能拿下河东，契丹人可以从东、西两线直进中原。但刘知远几乎是拼了老命死守河东。契丹人在东线河北地区被晋朝中央军揍得鼻青脸肿，而在西线河东地区同样没有占刘知远的半点便宜。几乎是契丹人进入河东一次，被刘知远暴打一次，动辄斩首数千级。

当然，刘知远有自己的底线，就是他只在河东抵抗契丹人，绝不出太行山一步，他不会让石重贵当枪使。石重贵不是没考虑过把刘知

远调到河北，让刘知远和耶律德光绞杀，自己坐收渔利。刘知远对石重贵的几次恶意调令虽没有当面拒绝，也是推三阻四，反正就是不去。“帝（石重贵）再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石重贵对刘知远的赖皮行径非常不满，气愤地说：“太原（刘知远）殊不助朕，必有异图。”刘知远当然有异图，但刘知远主政河东，兵强马壮，不久前又收服吐谷浑部众及大量牛马，步骑兵数量至少有五万人。石重贵再对刘知远不满，又能奈何？而等到杜重威、张彦泽等人把几乎手无寸铁的石重贵卖给耶律德光时，这个落魄的皇帝也许会后悔他当初对刘知远的猜忌。

不过石重贵的覆灭，“虜酋”耶律德光摇身一变成了中原大皇帝，对刘知远来说也不是个好消息。一旦耶律德光坐稳中原，契丹人将从北、东、南三面对河东进行战略包围，刘知远的生存压力远大于石重贵时代。也许刘知远已经后悔当初坐山观二虎相斗的看客策略，但以刘知远的脾性，他即使做了错事，也不会坐在地上怨天尤人，而是积极采取犯错后的弥补对策。而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稳住早就盯上河东的耶律德光，同时“分守四境以防（契丹）侵轶”。

客将王峻代表刘知远来到汴梁找耶律德光，做了两件事：一、向耶律德光灭晋表示祝贺；二、针对耶律德光有可能以中原皇帝名义调刘知远离开河东，说“太原夷夏杂居，事务繁多，暂时脱不开身”。刘知远在政治上非常成熟，他深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外交上我可以暂时向你低头，我损失不了什么，但在军事上寸步不让，必要时以血还血。

不过刘知远看出来耶律德光初入中原，天下未定，暂时是不会对自己下手的。

果然，耶律德光立刻向刘知远伸来了橄榄枝，“赐诏褒美”，把刘知远吹上了天，其实耶律德光何尝不明白，如果他进攻河东，一年之内都未必能拿下，势必会造成中原形势更加不稳，难免有其他人浑水

摸鱼。为了稳住刘知远，耶律德光送给他一根木头拐杖，这是契丹人最尊贵的礼物，只有德高望重之人才能得到此杖。而王峻捧着这根木拐杖回太原时，一路上但凡契丹人看到此杖，无不惶恐避让。虽然耶律德光又犯了乱认干儿子的老毛病，不打招呼，就称呼比自己大七岁的刘知远为儿子，向来不屑细务的刘知远根本不在乎这个，你叫你的，我又没承认。

刘知远只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耶律德光一旦把中原局势稳定下来，必然会收回河东，河东与契丹早晚必有一战。刘知远现在能做的，就是祈求耶律德光在中原胡作非为，得罪中原人心。等到耶律德光恶贯满盈被迫撤出中原时，刘知远才能在浑水中摸到大鱼。而让刘知远喜出望外的是，耶律德光非常“听话”，自己喜欢他干什么，这个契丹傻子就干什么。

契丹人进入中原，对中原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契丹人向来崇尚暴力，不屑文明式的征服，动辄屠城，犯下了历史无法饶恕的滔天罪行。攻晋初期，契丹人就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汉人百姓达数十万人。《资治通鉴》第二八四卷记载：“（杜重威不敢战）由是虜无所忌惮，属城多为所屠。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村落殆尽。”而进入中原之后，契丹人恶习未改，继续作恶。耶律德光让契丹士兵以“打草谷的幌子”到处杀人掠劫，而这次“打草谷”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为了敛财，耶律德光大肆搜刮天下，不交钱就杀头，所有降辽官员都被契丹人刮了个精穷。契丹人在中原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原汉人的极大义愤，“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

而这对刘知远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耶律德光把中原汉人全都得罪光了，契丹人已经不可能再在中原立足，而当时无论是江湖阅历、官场威望还是军事实力来说，最有资格出来收拾残局的汉人军阀，除了刘知远，别无他人。其实南唐本来

也有机会北进中原，但鼠目寸光的李璟却拒绝了韩熙载的建议，隔着淮河看热闹，白白便宜了刘知远。

刘知远以军功起家，但他在政治上非常成熟，他做了几件漂亮事，最大限度上争取到了汉人民心。一、刘知远听说雄武军节度使以秦、阶、成三州投降后蜀，刘知远自我谴责，说：“戎狄凭陵，中原无主，令藩镇外附，吾为方伯，良可愧也！”刘知远说这句话，其实就是给自己打造忧国忧民的政治形象。二、在部下的劝说下，刘知远虽然于辽会同元年（947年）二月十五日在太原宫正式称帝，但并没有启定新国号，国号依然是晋，甚至都没有起新年号，而是舍弃石重贵的开运年号后，直接延承了石敬瑭的天福年号，称是年为天福十二年。刘知远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予未忍忘晋也”。石敬瑭主政七年，爱敬士民，人望很高，而刘知远称帝却不改国号年号，感动了无数不忘晋德的士民，为他进入中原打下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不过刘知远也有演戏演过头的时候，听说契丹人押解晋少帝石重贵北上时，刘知远装模作样地声称要派兵救下石重贵，实际上根本没动静，坐视石重贵北迁。以刘知远的脾气，石重贵真要被他解救下来，等刘知远统治稳定之后，也难逃一死。

在确定石重贵不再会影响自己称霸天下，以及被愤怒的中原汉人赶跑的契丹大皇帝耶律德光已在河北杀胡坡病死，放下心来的刘知远接受了大将郭威正确的南下路线，即放弃走契丹残余势力密集的河北，而是走汾河谷地，下洛阳、趋大梁。天福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大“晋”皇帝刘知远兵发太原城，下山摘桃子。

晋朝完了，契丹人也跑了，在中原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很多守城将领都不知道是在为谁守城。虽然在南下的过程中也遇到一点小麻烦，但基本都是一些零星抵抗，刘知远几乎一路游山玩水地南下摘桃子。如果要论当皇帝的幸运指数，除去史上最幸运的彩票中奖者赵匡胤之后，大致也就算得上刘知远了。

从太原到洛阳至少有三百公里，再加上山路难走，但刘知远的大驾也只用了二十天就到了洛阳。而原晋朝百官们早就在荥阳等待刘知远的大驾，这伙变脸如同翻书的大员们终于在六月初八这一天见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刘知远，冲着大“晋”皇帝摇头摆尾，丑态百出。三天后，春风满面的刘知远大驾进入汴梁城。给刘知远当孙子的何止是这些变脸大员，地方上那些藩镇变脸的速度同样惊人。

这些人派来的官方代表早就挤满了汴梁，俟大驾一到，这伙人一拥而上，磕头舞蹈放大屁，鞋子挤掉了一地。“甲子（十一日），帝至大梁，晋之藩镇相继来降。”大家都是闯荡江湖的，江湖规矩必须严格遵守——谁枪杆子多，谁就是老大。

此时形势初定，而刘知远演够了让人作呕的忠臣戏，摘下面具，把“晋”国号扔进了臭水沟里。六月十三日，大“晋”皇帝摇身一变，成了大“汉”皇帝，但天福年号不变，理由还是那句早已发臭变味的“余未忍忘晋也”。而刘知远后来的庙号非常有意思——汉高祖。

国号没人不在乎，年号也没人在乎，大家在乎的是高官厚禄、真金白银。刘知远自然也不敢得罪这些官场妓女，刚入汴梁就下诏承认契丹之前任命的原晋朝官员的职务不变，最大限度稳定了人心。

说来讽刺的是，当年李存勖在河上与梁人苦战十六年才灭掉梁朝，成了半吊子的汉光武。可李存勖不会想到，二十四年后，真正的汉光武才出现。刘知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恢复了汉朝的法统，上尊太祖高皇帝（刘邦）、世祖光武皇帝（刘秀）。人们这才惊愕地发现，汉光武原来是刘知远。

可更加讽刺的是，李存勖的“汉光武”好歹做了四年时间，而刘知远这个“汉光武”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数清汴梁城有多少街道巷子，半年后就咽气了。

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史上最残暴的后汉政权

历史上有两个后汉：一个是刘秀建立的汉朝政权，史家也称“后汉”，如范晔的《后汉书》；另一个就是刘知远几乎是白捡来的汉朝政权，宋人也称“后汉”。两个后汉相比，刘秀的帝国远比他的冒牌子孙刘知远的帝国伟大得多，仅国祚，东汉就福延一百九十六年，而刘知远的大汉帝国则成为历史上国祚最短的正统政权，掐头去尾，五代后汉只存在了四年。一眨眼，后汉帝国建立了。再一眨眼，后汉帝国突然就没了。

后汉政权（以下皆指五代后汉）为什么只存在了短短四年，原因很复杂，但用时任判司天监事的王处讷的话来说，“第以高祖（刘知远）得位之后，多报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运祚不长”。

换言之，后汉之亡，归结于一个原因——杀人如麻！

后汉政权的杀人传统，自然是源于他们的高祖皇帝刘知远。刘知远在政治上非常成熟，特别是在晋亡之后争取晋朝人心中，刘知远做得非常漂亮，但这并不影响刘知远举起他的屠刀。早在李从厚逃奔石敬瑭时，刘知远就体现了他凶狠好杀的性格，杀光了李从厚的侍卫，虽然在这件事上，李从厚也有一定责任。而石敬瑭与张敬达大战晋安寨时，有一千多名唐军投降石敬瑭，石敬瑭打算把这些人编入亲卫部队，刘知远就以这些降兵有可能再次归唐为由，劝石敬瑭杀掉了这些人。“帝尽杀之”，一个“尽”字，鲜血淋漓。

刘知远做事手段非常刚狠，在石敬瑭初定洛阳时，刘知远负责城

中治安工作，虽然此时他没有杀人，但从“（士民）无敢犯（刘知远之）令”来看，刘知远是没少挥舞大棒子的。刘知远向来崇尚暴力哲学，我说不服你，但我可以打死你！

晋朝宰相冯道和李内崧因为受石敬瑭逼迫，不得不吹捧大贪官杜重威，石敬瑭借此让杜重威取代了刘知远的都指挥使职务，刘知远恨透了冯、李二人。等到他继位后，因为冯道官场地位太高，刘知远不敢轻举妄动，但也没收了冯道的全部家产。对李崧，刘知远下手更是狠毒。刘知远先把李崧的家产全部转送给他麾下杀星苏逢吉，然后又纵容苏逢吉构陷李崧暗中勾连契丹，杀光了李崧家族，“举家遇害，少长悉尸于市，人土冤之”。

李崧多少还算得罪过刘知远，但没有得罪刘知远却因为阻碍刘知远发财的，照杀不误，比如唐明宗李嗣源的幼子李从益。李从益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刘知远的事情，仅仅因为契丹人撤出中原时，契丹大将萧翰诈称契丹皇帝有命，让李从益“权知南朝军国事”，然后拔脚溜之。李从益只是一个被人摆布的傀儡，刘知远废掉软禁也就行了，他却暗中派马仔逼死了李从益和他的养母花见羞。当时舆论对李从益的死大呼冤枉，但刘知远却只管杀人，谁影响到我的利益，谁就得死！

有什么样的老大就有什么样的狗腿子，刘知远杀人上瘾，他手下那伙文武将相个个都是杀人变态狂。后汉最著名的一文一武两个杀人狂，文者苏逢吉，武者史弘肇。

苏逢吉其实也是个半吊子文人，他的父亲苏悦是个酒鬼，曾经在刘知远麾下任职，便把儿子苏逢吉推荐了刘知远，甚见信用，“（别人很难见到刘知远）逢吉日侍左右”，从此飞黄腾达。而刘知远信用苏逢吉，除了苏逢吉稍通文墨外，主要还是二人投脾气。刘知远为人“严毅”，而苏逢吉“深文好杀”，自然臭味相投。

苏逢吉酷爱杀人，在太原时就已沾满了别人的鲜血。当时苏逢吉

主管太原的司法工作，太原监狱人满为患，刘知远让苏逢吉清理监狱。清理监狱？这个简单，杀光就是了！“逢吉尽杀禁囚以报。”监狱里关着多少囚犯，史无记载，但以太原城的人口规模，至少也有数百名囚犯。苏逢吉一声令下，监狱里滚满了人头……

等到刘知远坐天下后，苏逢吉依然主持司法，这几乎就成了天下盗贼们的灾难。苏逢吉治盗，还是那个简单逻辑——杀！杀！杀！具体做法就是连坐制度，一人犯法，九族和邻居都得死光光。苏逢吉甚至亲自起草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诏书，略云“应有贼盗，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并仰所在全族处斩”。因为这个制度过于酷烈，有些人非常反对，认为从来没有偷盗者诛灭九族的法律逻辑，更何况邻居与保人何罪？在舆论高压下，苏逢吉才极其不情愿地去了“全族”二字，但依然是全家坐斩。还有一个血淋淋的例子，附在《旧五代史·苏逢吉传》中：郢州有个捕快头子张令柔，因为奉了朝廷颁发的新捕贼制度，“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这个十七村民，显然不应该仅是十七个人，而是十七村民被控偷盗罪，十七村人的全家悉数被杀。而《新五代史·苏逢吉传》则说是“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可以印证确实是“杀全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卫州刺史叶仁鲁为了巴结苏逢吉捞功，不管是贼是民，抓住就杀，甚至前往抓贼的百姓被叶仁鲁抓到，也被定为盗窃犯，进行惨无人道的虐杀。当时舆论对叶仁鲁的残暴千夫所指，但苏逢吉却认为叶仁鲁是天下第一捕快。既然朝廷认为杀人无罪，“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

而苏逢吉杀人的最经典案例，无疑是晋朝宰相李崧之死。苏逢吉与李崧本来素不相识，但李崧曾经得罪过皇帝刘知远，刘知远是一定要整死李崧的。而因为刘知远把李崧的家产悉数赏给了苏逢吉，为了保住这不义之财，苏逢吉也有足够的动力置李崧于死地。

李崧本人倒对家产被夺看得非常开，从不在苏逢吉面前表露心中

所想，甚至还巴结过苏逢吉，“谦挹承颜，未尝忤旨”，但事情却坏在李崧两个饭桶弟弟李岫、李鸩身上。二李素无见识，对李家的财产被夺耿耿于怀，经常对苏家子弟提及家产被夺的事情。苏逢吉知道后，自然加快了陷害李崧的步伐。

要给李崧定罪，最有力的办法就是给李崧扣一顶里通外国的汉奸帽子。而所谓李崧家的家丁葛延遇向官府举报李崧勾结契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苏逢吉买通了葛延遇。至于什么李崧那封写给契丹的蜡丸密信，当时舆论公认是苏逢吉伪造的。

刘知远已在（948年）二月驾崩，刘承祐初继位，而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凤翔节度使王景贞在关中作乱，当时政治形势非常不稳，在这个敏感时期给李崧定罪再合适不过了。

苏逢吉把李家兄弟悉数下狱，并对李岫严刑拷打，李岫吃打不过，只好供伪状，称李崧与家人二十人欲在高祖皇帝（刘知远）灵柩下葬时，在汴梁城放火谋反。有了李岫这个伪状，苏逢吉还嫌不足，二十人太少了，苏逢吉把“二十人”改成了“五十人”。不久诏下，李崧举族被诛，所有尸体均暴晒街头，“时人冤之，归咎于逢吉”。

苏逢吉这个半吊子文人都杀人上瘾，武夫出身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禁军头子）史弘肇自然不遑多让。

史弘肇家世为农，因为史弘肇有一身好拳脚，又能日行二百里，跑得比马还快，是天生吃兵饷的。史弘肇其实早年是梁军中混过饭的，后来一直跟着晋高祖石敬瑭，算是石敬瑭的心腹人马。后来刘知远守河东，便把久仰其名的史弘肇要了过去，结果一路升迁。在刘知远称帝时，史弘肇已是刘知远头号心腹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史弘肇治军不可谓无方，“（史弘肇）严毅寡言，部辖军众，有过无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但他为人过于凶狠，下手太重，而这一点，又与刘知远臭味相投。部下但有犯令者，即使是小过，也当

众打杀之，“将吏股栗”。

后汉坐天下后，史弘肇负责京城汴梁的治安巡防。因为晋朝大乱，遍地盗贼，史弘肇面对的压力非常大。而史弘肇的办法和苏逢吉一样简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史弘肇经常带着精悍禁军在城中来回巡防，只要发现一个小偷，即使这个贼只偷了一文钱，照杀不误，甚至都不上报朝廷。而被杀者的家人，因为畏惧史弘肇的权势，根本不敢上访，否则也难逃一死。史弘肇一番杀戮，虽然“奸盗屏息”，但“冤死者甚众”，这样的治安手段，和契丹人对中原汉人的屠杀又有什么区别？

因为史弘肇可以不上报朝廷滥杀人，导致禁军士兵可以假公济私，甚至公报私仇。如果有禁军官吏看上某人财产，强逼此人交钱，如果不交，好办，扣一顶盗贼帽子，立斩！甚至有个醉酒百姓因为和禁军士兵吵了几句，被就诬告成贼，杀之，更不用说断舌、决口、斫筋、折足等酷刑每天都在发生。

比杀人更可怕的是，史弘肇为了揪住更多盗贼，竟然让民间互相监视告密。《宋史·边归谔传》记载：“史宏肇怙权专杀，闾里告讐成风。”结果导致民风大坏，人人自危。告密有钱赚，所以有此宵小之徒从中看到了商机，到处揭发人，“谗夫得以肆其虚诞”，官员同样发了财，“贪吏得以报复私怨”，而其中自然包括史弘肇本人。史弘肇本人看上了商人何福殷的数十万贯家产，就收买何家仆人，诬告何福殷勾连契丹，即日捕拿，酷刑伺候，然后杀头，数十万贯轻松到手。最令人发指的是，史弘肇甚至还和他手下弟兄瓜分了何福殷的老婆、女儿。

除了苏逢吉、史弘肇两大杀星，主管军事的枢密使杨邠和主管经济的三司使王章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也同样戾气深重。后汉由这些好杀人、好淫人妻女、贪婪无度的魔鬼当政，自然是普通百姓的晦气。

后汉君臣不但用长枪、锥子杀人，同样会用算盘杀人，后汉经济掠夺之酷烈，堪称史所罕见，而几年后，周世宗柴荣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其主要改革对象就是后汉的经济掠夺政策。

后汉这些帝王将相们杀人上了瘾，实在没人可杀，那就自己人杀自己人，互相抡着大刀片子，像古惑仔一样在街头对砍。说来极为讽刺的是，苏逢吉和史弘肇是两大杀人狂，可这两个杀人狂之间同样矛盾重重，都恨不得将对方大卸八块。

后汉君臣的残杀，则引出了五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官场火并案——乾祐之变。

而正是这场在历史上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乾祐之变，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历史发展。甚至可以说，没有乾祐之变，就不会有郭威建立周朝，更不可能有赵匡胤白捡了一个北宋王朝。

自作孽，不可活

——乾祐之变始末

后汉帝国把自己无情埋藏的速度快，但在这个帝国暴卒的过程中，有一个时间节点不太引人注目，天福十二年（947年）十二月十一日，后汉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时任开封尹的刘承训猝死于开封府衙门，时年二十六岁。“少温厚、美风仪”的刘承训意外去世，完全打乱了刘知远对皇位的安排，刘知远在自己身患重病的情况为儿子的去世痛哭流涕，“哭之恸”，最终刘知远的身子也哭垮了，不久驾崩。

刘承训完全就是个天生当明君的料子，为人“孝友忠厚，达于从政”。可以说，只要刘承训继位，那么他必将改变汉朝政府血腥残酷的治国模式，以文德治国，后汉政权长命百岁并不是奢想。所以当坊间听说刘承训死后，“人皆惜之”，而在五代短命的帝王宗室中，能得到老百姓“人皆惜之”评语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柴荣，另一个是刘承训。

刘承训死后，虽然还有次子刘承勋可以选择，但刘承勋是个天生残疾，刘知远只能不太情愿地选择了二十岁的小儿子刘承祐。

刘知远知道小儿子能力有限，为了防止他胡作非为，刘知远拼尽最后一口气，给帝国留下了一幅堪称经典的托孤格局，这在五代史上也是罕见的。

按刘知远的安排，枢密使杨邠、侍卫亲军指挥使史弘肇、左仆射苏逢吉，以及枢密副使郭威同为顾命大臣，另外还有三司使王章也深豫顾命事，实际上是一个执政五人组，有些类似于清咸丰死后留下的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

在顾命五大臣中，王章主要负责帝国的财政运营，很少参与军事议政。而枢密副使郭威的地位又略逊于以上四人，兼郭威是帝国著名的救火队长，主要负责防御契丹以及镇压境内不臣势力，基本不干涉政务。特别是刘承祐继位不久，原永兴节度使军校赵思绾占据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凤翔巡检使王景崇在讨伐赵思绾的过程中突然也扯旗造反，随后镇守河中的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公然对抗朝廷，郭威奉诏率官军西讨三叛，根本不在京中。在朝中真正拿大主意的，还是杨邠、苏逢吉、史弘肇三人。

在“三角组合”中，杨邠和史弘肇私交极好，和苏逢吉关系一般，而史弘肇又与苏逢吉是死对头。再扩大范围，郭威、王章其实都是杨、史一党，四人就差喝鸡血拜把子了，苏逢吉则甩开膀子单干。

苏逢吉向来是反对武人专权的，几乎不遗余力地抑制武人，后来北宋的“胥吏名相”赵普提出以文抑武，不过是在炒苏逢吉的冷饭。苏逢吉执政之初，就唆使傀儡宰相李涛上表，想踢掉杨邠和郭威两大枢密，发配到藩镇，但在各方势力的运作下，苏逢吉没有得逞。

等到郭威平定关西三叛，得胜还朝时，地位威望急速上升，这是苏逢吉不愿看到的。苏逢吉再次准备拿郭威开刀，底线是绝不能让郭威留在京城，否则以他在军界中的地位，苏逢吉会多一个强硬的对手。适时有契丹入寇河北，必须有大将坐镇邺都防御契丹，而现在能动的正国级人物，也只有郭威，这是苏逢吉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推动的结果。

史弘肇自然也愿意让郭威坐镇河北，毕竟一旦事急，河北随时可以成为杨、史一党的战略大后方。双方很快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却在郭威以什么样的身份去河北的问题上，苏逢吉和史弘肇发生了争议。郭威以前就是枢密副使，史弘肇希望郭威能以枢密使的身份镇邺，理由是郭威成了最高军事统帅，可以威服众将。而苏逢吉是极力打压武人的，以郭威加枢相衔必然会导致“枪杆子对准笔杆子”为由，坚决反

对。后来皇帝刘承祐出于大局考虑，同意了史弘肇的意见，让郭威出任河北大帅，总管兵甲钱谷。

苏逢吉对此极为不满，史弘肇也反感苏逢吉多嘴饶舌头，两位顾命大臣互相吹胡子瞪眼。等到第二天，帝国的决策者在宰相窦贞固府上喝酒，始终没咽下恶气的史弘肇故意给苏逢吉难堪，站起来给郭威敬酒，说什么“昨天的事，有人就想出风头”。苏逢吉自然听出来话外之意，但满座多是杨、史一党，苏逢吉不想惹事，反而放低姿态，也举杯敬郭威，说昨天的争议只是国事上的分歧，并无个人恩怨，请郭威和史弘肇不要介意。郭威自然不会介意，但史弘肇却恼了，立刻拍桌子冲着苏逢吉狂吼：“闭上你的鸟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笔杆子？”目标直指苏逢吉的文人身份。

史弘肇明显是想把事态扩大，顺势铲除苏逢吉。在各位大佬的极力斡旋下，这场不愉快的酒会很快结束，但“将相始有隙”。不过这场争议毕竟主要还集中在国家政治领域，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则让史弘肇与苏逢吉势同水火，必有一死一生。

这一次是苏逢吉主动挑事，戳痛了史弘肇最不愿意让外人道的“感情伤疤”。

几天后，众权贵又在王章府上饮酒，这次无关朝局。席间，众人玩起了当时时兴的一种手指游戏——手势令。比如说甲方“亚其虎膺”，乙方则伸手掌；乙方说“以蹲鸱间虎膺之下”，甲方则屈大拇指，“以钩戟差玉柱之旁”，则伸中指，伸错了则罚酒。

游戏非常简单，但要命的是史弘肇根本不会，而坐在他身边的客省阁阎晋卿倒娴熟此道，不厌其烦地教史弘肇。苏逢吉正坐在史弘肇对面，看到史弘肇笨手笨脚，突然冷笑着来了一句：“不会不要紧，身上坐着一个姓阎的，还有什么不会的。”

苏逢吉这句话，其实是在讽刺史弘肇的老婆阎氏。史夫人虽然现

在混得人五人六，但早年却是酒肆娼妓出身，这是史夫人永远洗不掉的污点，也是史弘肇最忌讳别人提的。苏逢吉却专揭史弘肇的伤疤，史弘肇顿时火冒三丈，当时就和苏逢吉翻了脸，站起来冲着苏逢吉一顿骂，苏逢吉装聋作哑。史弘肇不过瘾，踢翻桌子准备揪住苏逢吉一通胖揍，苏逢吉拔脚溜之，史弘肇还不善罢甘休，拔剑要追苏逢吉，还是杨邠死死抱住史弘肇，苦劝半天，才让史弘肇放手。不过，二人的关系从此彻底破裂，再无转圜的可能，“于是将相如水火矣”！

苏逢吉既恨史弘肇，又怕史弘肇，毕竟史弘肇主管京城禁卫，只要史弘肇一句话，苏逢吉立时就会被砍成肉泥。“吾去朝廷（官署办差），止烦史公一处分，吾齏粉矣！”可苏逢吉也知道，要扳倒史弘肇，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其实苏逢吉并不孤独，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二十岁的小皇帝刘承祐。

当初刘知远托孤五大臣，主要是考虑到刘承祐幼弱不懂事，但刘承祐却从来不这么想。二十岁的年轻人，人生观早已成熟，即使从政经验略显幼稚，也应该适合放权锻炼。再者，二十岁的帝王还不亲政，只能说最高权力分配出了大问题。

问题其实就出在杨邠和史弘肇身上。

杨邠是首席顾命大臣，相当于清朝顾命八大臣中肃顺的地位，是“总机政”，而挂着归德军节度使衔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则负责汴梁城及皇宫安保，王章照样拨弄他的算盘珠子，天天叫嚣“笔杆子不如枪杆子，枪杆子不如算盘珠子”。

这三位大爷仗着是跟着老皇帝刘知远血雨腥风中闯荡出来的老前辈，向来瞧不上乳臭未干的刘承祐，虽然在君臣礼节上极尽恭顺，但具体落实到现实利益上，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插嘴。

如傀儡一般的刘承祐何止是插不上嘴，甚至他想得到一件玩具，都得先让几位顾命大臣玩腻了才能给他。《资治通鉴》记载明确：“（杨邠）虽不却四方馈遗，有余辄献之。”说得直白些，就是杨邠贪财，地方上贡献给朝廷的财物，都进入了枢密府，成了杨邠的私产。而杨邠总要顾及小皇帝的面子，在一堆金珠宝贝中挑些次等货，随手就扔给了叫花子刘承祐。

这等无礼的羞辱，换了你，你还会心平气和？刘承祐不恨杨邠，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当时有堪称算盘天才的王章坐镇经济战线，帝国财政非常健康，“承契丹荡覆之余，公私困竭，章据摭遗利，吝于出纳，以实府库。属三叛连衡，宿兵累年而供馈不乏。及事平，赐予之外，尚有余积”。而刘承祐盯上的，就是这个“余积”。刘承祐不傻，手上没钱，自己就拉不起一个山头。身边没几个得力的狗腿子，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何况作为天朝皇帝，平时需要的花销太多，可那几个该死的老头死掐钱袋子不给钱，刘承祐脸上也没有面子。

不仅是钱，权力也成了刘承祐急需插手的领域。刘承祐对外姓权臣霸占刘家天下非常不满，须知天下姓刘，不姓杨不姓史不姓王。随着刘承祐的逐渐长大，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伙帝国权力的边缘者，如枢密承旨聂文进、内客省使阎晋卿、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以及刘承祐的舅舅李业。

其他小鱼小虾可以慢慢想办法往上爬，但李业是先皇帝的小舅子，今皇帝的大娘舅，早在刘知远时期就主管皇宫钱袋子。刘承祐想让舅舅出任当时出现空缺的宣徽使，为了能让顾命大爷们成全他，刘承祐甚至都搬出了满头花白的李太后，希望杨、史等人能给袁家一个薄面。

但杨邠和史弘肇并没有给老太后面子，而且直接当众打脸，不

行！理由是官员升职的规矩是按资历慢慢爬，而不能随时超车加塞，更何况李业是外戚，自古外戚祸国的例子比比皆是。远的不提，近的如冯玉亡晋……

李业没能爬上去，而聂文进、阎晋卿等人虽然都是刘承祐的心腹，但他们的升迁之路也被杨、史等人堵死。这些人升不了官发不了财，自然“共怨执政”。

虽然杨邠和史弘肇对刘家天下忠贞不贰，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更忠于先帝刘知远，对于刘承祐，他们想怎么羞辱就怎么羞辱，半点面子也不给。刘承祐也不是特别缺钱，他总还是可以从杨邠那里领到一些珍珠宝贝，而刘承祐又喜欢听歌看戏，身边养着几个戏子伶人。有一次刘承祐爽了，就赏给戏子锦袍和玉带，而戏子们知道史弘肇的家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史府感谢史弘肇。而史弘肇听说刘承祐给戏子们发钱，当时就恼了，说：“士卒守边苦战，忍寒冒暑，都还没有得赏赐，你们是什么鸟人，何功而得此！”

刘承祐恼火至极，打狗不看主人面，是把主人当狗看。

让刘承祐更没面子的事情还在后面。刘承祐已过弱冠，到了立皇后的年龄，而刘承祐最喜欢的是耿夫人，刘承祐打算立耿夫人为皇后。立谁为皇后，这本是皇家私事，杨邠居然连这个事情都要插手，反对皇帝立皇后，理由竟然是不三不四的“太着急了”。刘承祐笨嘴拙舌，否则可以反击杨邠：你怎么不一直打光棍？干吗娶老婆？

顾命大爷们对刘承祐呼三喝四如同使唤奴仆，更遑论让刘承祐插手军国重事，权力蛋糕早就被他们视为自家私产，断不能让外人刘承祐染指。刘承祐自然不会愿意刘家的最后一块私产被外人霸占，二十岁都还没有亲政的皇帝，除了“优游卒岁”的后主刘阿斗，闻所未闻，说出去颜面何存？刘承祐开始向顾命大爷伸手要权力：“我爸爸名下的大饼作坊，我这个少东家总能吃上两块吧！”

当刘承祐在杨邠、史弘肇讨论国家大事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二人觉得刘承祐过于放肆，也不称称自己几斤几两重？杨邠当即打脸，“陛下但禁声，有臣等在！”

刘承祐彻底愤怒了，脑海中已浮过杀机。

而杨邠等人得罪了最不应该得罪的皇帝，鱼游沸鼎而不自知，依然花天酒地，不可一世。杨邠为人虽然“长于吏事”，但“不识大体”，眼光短浅。杨邠认为自己掌政权，史弘肇掌内卫兵权，王章掌财赋税收，郭威掌天下兵马，刘承祐的尊严受到了伤害，那又如何！老子就是瞧不起你。

杨邠等人继续招摇朝野，而刘承祐则愤怒而孤独地舔舐着伤口，“帝积不能平”。他身边那些早就受够杨邠、史弘肇霸道之苦的小伙伴们则看到了扳倒杨、史二人的良机，纷纷凑到刘承祐耳边，“邠等专恣，终当为乱”。其中以大娘舅李业最为卖命叫唤。

“帝信之。”其实以刘承祐的智商，他未必就会相信杨、史会推翻大汉天下，但就他个人利益来说，倒是极有可能被杨、史废除的，这显然是刘承祐不可能答应的。为了夺回本就属于自己的利益，刘承祐也必须冒险一搏。

一桶猪油浇在了干柴上，而坐山观虎斗的苏逢吉觉得是时候和刘承祐联手除掉杨、史了，苏宰相又往干柴上浇了一桶猪油。“苏逢吉既与弘肇有隙，知李业等怨弘肇，屡以言激之。”李业等人本就恨透杨、史，苏逢吉火上浇油，李业等“卒”杀杨、史等人。这个“卒”字，说明正是苏逢吉的话才最终让李业下定杀杨、史的决心。而苏逢吉非常狡猾，他没有直接去挑拨刘承祐，而是拐弯抹角去刺激李业，再让李业去找刘承祐商议，自己绝不参加这种容易授人以柄的会议。而一旦刘、李杀杨、史，苏逢吉坐收渔人之利；若杨、史废刘、李，苏逢吉也几乎可以自保上岸。

刘承祐、李业、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外加一个隔岸观火的苏逢吉，加紧了对杨、史突袭的行动。这一切自然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过刘承祐还是把这件事关刘家天下的大事告诉了母亲李太后。李太后是个平庸妇人，她只想过安稳日子，不想干这种一旦赌输人头落地的买卖，劝儿子不要冲动。但刘承祐已经被杨、史刺激成狂，见母亲不上路，气得大骂：“国家之事，非闺门所知！”

李太后不敢得罪杨、史，但毕竟刘承祐是她儿子，她不支持儿子的莽行，也不会去告密。其实杨、史差点就知道了这场绝密计划，事情出在阎晋卿身上。李业做事不缜密，竟然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外人阎晋卿。而阎晋卿不敢上这条贼船，打算去告密请赏，结果等到阎晋卿来到史府欲见史弘肇，史弘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拒绝接见阎晋卿。

李业是在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十二日把计划告诉阎晋卿的，而刘承祐集团动手的时间是在次日清晨，说明阎晋卿肯定是当天去找史弘肇，而刘承祐得到阎晋卿泄了密，情急之下只能把计划提前。不过刘承祐们可以确认的是，杨邠、史弘肇、王章这些国贼对此事绝对是不知情的。否则，等待刘承祐的只有乱刀剁成肉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引《资治通鉴》对这场政变的精彩记述：

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数十自广政殿出，杀邠、弘肇、章于东庑下。文进亟召宰相、朝臣班于崇元殿，宣云：‘邠等谋反，已伏诛，与卿等同庆。’又召诸军将校至万岁殿庭，帝亲谕之，且曰：‘邠等以耗子视朕，朕今始得为汝主，汝辈免横忧矣！’皆拜谢而退。又召前节度使、刺史等升殿谕之，分遣使者帅骑收捕邠等亲戚、党与、僭从，尽杀之。”

权势威赫一时的顾命大臣杨邠、史弘肇、王章甚至还没有来得及

反应是怎么回事，人头就已经落地。随后刘承祐向群臣宣布了自己是这场赌博的胜利者，并接管了之前由史弘肇严密控制的禁军兵权。

大事底定！刘承祐终于痛快地复仇了。刘承祐派大批杀手，分赴杨府、史府、王府，凡是杨、史、王三贼的亲属、党羽、狗腿子，悉数砍头，从耄耋老者到刚出生的婴儿，一个不许留，全都杀光。甚至王章早年得病卧床不起的女儿，也被禁军从床上拉起来，摁跪在地上砍头。

其实这场政变不过是帝室集团和权相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血腥群殴，本来也不会影响到历史的宏大进程，刘承祐除奸成功，掌握最高权力，开启自己的时代也就是了。但刘承祐可没有忘记，还有一个人，他还没有杀呢！

郭威！刘承祐怎么可能忘记这个与杨邠、史弘肇关系极为亲密的小兄弟。更让刘承祐坐立不安的是，郭威总控河北军政财权，凡兵马钱谷一悉咨威。如果不除郭威，一旦郭威以清君侧为由起兵南下，刘承祐仅凭这点禁军，可能很难扛过郭威。

其实刘承祐制约郭威的底牌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郭威虽然北上，但他的家眷都留在汴梁，这些人质足够刘承祐周旋郭威的。但刘承祐却利令智昏，他认为他有办法除掉坐镇邺都的郭威，所以郭威的家小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

开封尹刘铢奉皇帝诏命，率大队杀手闯进郭府，凡是郭家老小一个不留。被杀者，计有郭威夫人张氏以及张氏所生两个儿子郭青哥、郭意哥，郭威的侄子郭守筠、郭奉超、郭定哥。而必须着重提及的是，在刘铢屠杀的郭家人中，还有郭威养子郭荣留在府上的夫人刘氏，以及刘氏所生三个还没有留下名字的儿子，郭荣本人其时正跟着养父郭威坐镇邺都。而同样跟着郭威在邺都办差的河北监军王峻的家人，因为王峻是郭威心腹，也被诛夷满门。

郭荣是谁？他本姓柴，因为姑母嫁给郭威，所以他被姑父收养，改姓郭。不过历史上还是习惯称呼他为柴荣。至于柴荣是谁，已经不必多介绍了。而在这场血光之灾中，郭家几乎被满门抄斩，除了郭威、郭荣在外没有被杀外，还有郭威的继室董氏因各种原因侥幸逃过一劫。

自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鸡犬不留，这是权力游戏的基本规则，参赛双方都要遵守。但就这场乾祐之变来说，也许杨邠、史弘肇的家眷必须要为他们本主的飞扬跋扈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郭威家小被杀，则得到了舆论的巨大同情。

得罪刘承祐的是杨邠、史弘肇，而不是郭威。事实上，郭威一直对杨邠、史弘肇的狂妄跋扈感到忧心，没少劝两个老大哥做事要收敛一些，毕竟皇帝大了，多少要给三分面子，但杨、史不听。而郭威本人对刘承祐也是非常尊重的，李守贞等三叛祸乱关西，是郭威总领全局，扑灭反乱。论功，郭威第一，谁都没有异议，但郭威还是把这次平叛的胜利归功于皇帝圣明，甚至拒绝了刘承祐的加赏。郭威很会做人，而且在郭威与刘承祐的直接交往中，郭威绝对不像杨、史那样猖狂，每次必极尽臣礼。这样模范忠臣的家眷，刘承祐说杀也就杀了，半点也没给郭威面子。

郭威不恨刘承祐，也就没有天理了。

被逼着做皇帝的郭威

接下来讲的是郭威。

简单说一下郭威的发迹史：

郭威，字文仲，唐天祐元年（904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邢州尧山（河北隆尧）。至于《旧五代史》所载郭威出生时，“赤光照室，星火四进”，全是一毛钱都不值的无聊马屁。郭威姓郭，不过也有一种说法，郭威本姓常，因为父亲常简早年在晋燕大战中战死，郭母改嫁郭氏，冒姓郭。

郭威三岁丧父，五岁丧母，是姨妈韩氏含辛茹苦把郭威拉扯成人。特殊的家庭背景，养成了郭威“负气用刚，好斗多力”的处事方式。年仅十八岁时，郭威就跟着昭义节度使李继韬闯荡江湖，手脚不太干净。而提及郭威的少年时代，就不得不提到《水浒传》中一个再经典不过的角色——花和尚鲁智深。没错，那段家喻户晓的《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原型就是郭威。那一年，郭威年仅十八岁，正是青春闪亮的年纪。

郭威当时正在潞州当兵，一个阳光刺眼的午后，醉酒的郭威来到一家肉铺买肉。实际上，郭威听说肉铺老板是个街霸王，郭威不服，专门来砸场子的。郭威让屠户割肉，然后借口屠户割的肉不满他的意，对屠夫劈头盖脸一通骂。屠夫被骂急了，挑衅郭威：“你有种，刺我一刀！别光放嘴炮。”郭威冷笑着，操起杀猪刀，直接就捅进了屠夫的胸膛……

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市场管理立刻拿住郭威去官府报案。好在李继韬怜郭威是条汉子，没舍得杀他，继续留在军中效力。三年后，李继韬谋反失败被杀，李存勖将潞州牙兵分配到自己的骑兵卫队，而郭

威也在其中。进入中央军，郭威人生的道路开始变得宽阔，在这里，郭威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贵人——石敬瑭。

有人经常哀叹遇不到贵人所以命运不济，但贵人帮扶的前提是你肚子里得有真材实料。郭威从军后开始读书，因为他悟性好，又“长于书计”，被石敬瑭相中，留在身边听用，“令掌军籍”，但也仅此而已，郭威并没有挤进石敬瑭的核心圈子。而真正让郭威平步青云的是刘知远。郭威和刘知远性格相近，刘知远又非常器重郭威的才干，很快就“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成为刘知远集团中仅次于杨邠、史弘肇、苏逢吉之后的第四位要员。

在刘知远主政河东期间，郭威没少在军事上替刘知远谋划，比如刘知远招降了朝三暮四、视叛变如家常便饭的吐谷浑大酋长白承福，其实就是郭威的杰作。而在契丹大举进攻后晋时，刘知远担心自己的前程，还是郭威坚定了刘知远的信心，“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穡，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而如果不是郭威这几句话，刘知远一时动摇，可能就投降了契丹。

当然，以上这两件事对郭威来说只是小菜，真正让郭威在历史上大出风头的是，契丹人撤出中原后，天下无主，刘知远决定下山摘桃，郭威为刘知远制定最有效的南下路线。

当时有两条可以选择的路线：一、以史弘肇为首的武将提议，河东兵东向出井陉关，攻取河北重镇真定、邺都，先定河北，河南不战自降。二、刘知远本人提议，从太原南下，过石会关直接插潞州，渡河之前就是汴梁。

针对这两条路线，郭威提出了让人大开眼界的第三条线，即大军出太原后，沿汾河谷地走西南方向。汴梁在太原东南，舍东南而取西南，众人不解。郭威的理由则非常充分：虽然方向不对，但汾河两岸没有军事重镇，而且地势平坦，有利于大部队快速挺进，我们几乎不

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兵法“以迂为直”，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洛阳。拿下洛阳，不出二十天，汴梁底定。

而郭威否定出河北的计划，理由是契丹残余部队在河北实力还很强，如果我们遇到契丹人的抵抗，则必然会拖慢我们进入汴梁的速度。一旦南唐军队渡淮河北上，肯定会比我们先到达汴梁，如此，则大势去矣。而刘知远的上党线计划，同样被郭威否定，理由是石会至上党一线山路难走，而且粮草供应困难，也会拖慢进入汴梁的速度。

最终刘知远同意了郭威几乎天才般的战略谋划，果然不出两旬底定中原。如果没有郭威这段精彩至极的战略规划，刘知远入主中原的梦想很可能会被其他势力实现。换言之，郭威是后汉政权建立的头号功臣，刘知远只能排第二。

在政权建立后，郭威得到了枢密副使的官位。虽然序列依然排在杨邠、史弘肇、苏逢吉之后，但却掌握了帝国至高无上的军权，而杨邠只是文官枢密使。等到刘知远驾崩时，郭威很自然地就成了托孤大臣之一。

前面讲过，在顾命五大臣中，真正率兵打仗的只有郭威。郭威一人成败，事关汉帝国的安危存亡。当李守贞、王景崇、赵思绾作乱关西时，朝议认为除了郭威外，也没有合适人选去平乱。

郭威本人对后汉政权忠贞不贰，面对帝国的存亡大事自然也不会推三阻四。在老油条冯道的点拨下，郭威率军西征时带足了公款，一路走一路发，等到河中时，郭威已把弟兄们喂饱了。虽然李守贞曾经是官军弟兄们的老大，但李守贞是只铁公鸡，向来一毛不拔，弟兄们自然愿意替郭威卖命。三军用命，李守贞逃无可逃，一把火了断了秦王荒谬的帝王梦想。

平定三叛，并不是郭威戎马生涯的终点。在契丹人大举压境，河北形势危急时，郭威很自然地继续替老刘家卖命，主政河北军政事

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河北王。

这是一个影响历史的决定。如果郭威留在汴梁当官，当乾祐之变时，郭威铁定要陪同杨邠、史弘肇等人下地狱。郭威如果死了，之后的赵匡胤也不知道会在哪里玩泥巴了。

人之常情，当郭威得知乾祐之变中杨、史、王满门以及自己的家小悉数被杀时，直接哭倒在地，而站在郭威旁边的那个郭荣，三个儿子也没了，同样泪流满面。

但还没等郭威痛苦地回忆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刘承祐已经率先向郭威发起了攻击。刘承祐派供奉官孟业密出汴梁城，北上邺都，联系河北武将，让他们秘密处死郭威及王峻。不过孟业在赴邺都之前，先去了澶州，找到镇宁节度使李洪义（李太后弟），要求李洪义先处死郭威的死党、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李洪义并没有接受外甥皇帝的指令，而是非常意外地把消息传给了王殷，王殷立刻把消息转发给郭威。

史料记载，郭威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要么把自己和养子郭荣的脑袋交给刘承祐，郭家灭门；要么听从枢密吏魏仁浦的建议，发兵南下，找皇帝讨说法。实际上郭威根本不可能选择前者，除了梁武帝萧衍兄长萧懿那样的傻子，谁甘心送死？

刘承祐幻想河北军将乱刀砍死郭威，可这些大将都是郭威一手调教出来的，对郭威感情极深，比如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后来避讳改称郭崇，以下皆称郭崇）、步军都指挥使曹威等人。而且郭威治军宽严相济，整个河北军界都极为同情郭威，所以郭威决定南下清君侧自保，弟兄们没有说二话的。

乾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郭威终于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冒险之旅，此时的郭威可以幻想他坐在汴梁城宫殿的场面了。

当然，托孤大臣之一的郭威向自己的小主子开刀，和同样是托孤大臣之一的赵匡胤向自己的小主子开刀，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宋朝文人极力宣传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当夜醉酒，对士兵们的计划毫不知情。这种纸糊的“历史”早就被各种资料和符合逻辑的推理戳得千疮百孔，赵匡胤根本不是被迫当皇帝，而是主动策划，发动了这场陈桥兵变。郭威才是真正被逼着当皇帝的，不是刘承祐杀郭威家眷，郭威断然不会如此。而如果刘承祐聪明些，把郭威家眷扣作人质，郭威更不敢刀兵相向。换言之，是刘承祐逼反了郭威，柴宗训可从来没有逼反赵匡胤。

郭威南下为自己武装申冤，但还是考虑到要保障河北根据地万无一失，郭威留下了能力超强的养子柴荣坐守邺都。

郭威申冤心切，从邺城出发仅仅两天后，他的部队就杀到了澶州，李洪义根本没和外甥皇帝站在一条船上，郭威一到，李洪义立刻投降。澶州是保障汴梁安全的河北重要门户，澶州没了，刘承祐这才知道自己闯了多么大的一场祸事。为了侦察郭威，刘承祐派小太监鵟脱到前线偷窃，结果被郭威当场捉住。

郭威在政治上无疑是成熟的。他起兵的旗号就是清君侧，比如杀害杨、史、王的李业、聂文进、郭允明等人，此时的郭威还没有公开推翻刘承祐的政治条件，所以郭威对刘承祐是极为客气的。郭威写了一封自辩信，让鵟脱带回汴梁交给刘承祐。但臣子无端起兵总是难圆其说的，郭威早就找到替罪羊：这是郭崇、曹威等人逼臣干的。

刘承祐看没看这封信，对郭威来说根本不重要，这只是郭威耍的一个政治花招。又过了两天，十一月十七日，郭军兵临黄河南岸的滑州，义成节度使宋延渥开门接客。宋延渥在历史上不出名，但他有个著名的皇后女儿，就是赵匡胤的小宋后。

滑州以南，就是汴梁城，再无遮拦。刘承祐是真急了，他对禁军

能否战胜河北军毫无胜算，但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却认为郭威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刘承祐相信了叔父，让慕容彦超出城迎战郭威，慕容彦超是后汉高祖刘知远同母异父的弟弟。

慕容彦超自信满满，但没想到在汴梁城外刘子陂一战，还没等慕容彦超出战，他的坐骑就一个马啃屎栽倒地上，慕容彦超狼狈逃回。不过慕容彦超的泰宁军却不看好慕容彦超，他们更愿意把赌注押在郭威身上。当天夜里，泰宁军就夺营而出，认郭威做了老大。牛皮吹破天的慕容彦超光棍一般逃回郛州，而督战的刘承祐发现自己也成了光棍。

刘承祐带着惊慌失措的苏逢吉、苏禹珪、窦贞固三大宰相和几十个乱七八糟的鸟人准备回汴梁城避难，结果却吃了开封府尹刘铎的闭门羹。进不了城，刘承祐等人只能在汴梁城外的赵村如孤魂野鬼般游荡。郭威的军队发现了刘承祐的动向，立刻包抄过来，虽然郭威下令不许伤害皇帝，但在一场混乱的踩踏事故中，刘承祐不知道被谁一刀砍死。而知道彻底得罪郭威的苏逢吉知道一旦落入郭威之手，断没有活路，一剑抹了脖子。

刘承祐的死，意味着刚建立仅有四年的后汉帝国行将走进历史的坟墓，知情人是绝对不会相信郭威会再忠于刘家的，毕竟这场血海深仇，疙瘩是根本解不开的。公平一些说，郭威对刘承祐还是有感情的，当得知刘承祐被杀的消息时，郭威痛哭流涕，哭道：“老夫之罪也！”有些作秀成分，但也是郭威感情的真实流露。欧阳修指责郭威“久有异图”，其实这句评语送给欧阳修的本朝主子赵匡胤最合适，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的表演是非常拙劣可笑的。而赵匡胤之所以能顺利篡位，是因为他控制着由柴荣亲手调教出来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禁军。而郭威之所以没有在刘承祐死后立刻即位，主要顾虑到河东皇叔刘崇控制着番汉精卒，在稳住刘崇之前不能轻动。

宋人经常吹嘘陈桥兵变后回汴梁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攻击郛

威军入汴梁则四处抢掠，还唯恐世人不知这是郭威主动下的抢劫令。实际上，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宋人强行将二者进行比较，是有失公允的。

郭威是在进入滑州后就承诺只要进入汴梁，公私财物一任弟兄们哄抢。但当时郭威并没有完全控制这支他刚带不久的来自五湖四海人心各异的军队，所以不能轻举妄动。而赵匡胤虽然下了禁劫令，那是因为这支禁军是赵匡胤多年带领的，都是小团伙，自然不必担心有人不听话。其实赵匡胤也是下过抢劫令的，就是在灭后蜀的时候，赵匡胤就告诉王全斌：“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郭威在稳定汴梁局势时，立刻下令禁止抢劫，违者斩，弟兄们都非常听话。而宋军入蜀后，大肆烧杀抢掠，动辄屠城，蜀人民愤极大，这一切，其实根源就是那句“悉以钱帛分给战士”。

此时的郭威确实想到了做皇帝，只是当时时机不成熟，但并不是像欧阳修所谓的“汉大臣不即拥立（郭威）”，如果郭威没有受到来自刘崇的压力，又怎么会在乎那些手无寸铁的后汉大臣？赵匡胤篡周，虽有孤臣李筠、李重进反宋，但因为柴荣收天下精兵入禁军，二李的军队如同纸糊的一般，赵匡胤自然不必在乎。

而郭威为了稳住刘崇，使出了一招缓兵计，在他的主张下，朝议决定迎立镇守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湘阴公刘赞，而刘赞正是刘崇的长子。郭威这招极为精妙，本来刘崇还在犹豫是否发兵南下，震慑郭威，但听说自己的儿子将要即位，那自己就是太上皇，刘崇也就按兵不动，白白给了郭威难得的战略缓冲期。等到郭威利用这段时间完全控制局势时，刘赞这块抹布也很自然地就被丢进历史的角落里。等到刘崇发现被郭威给耍了之后，再有所反应已经来不及了，甚至连刘赞的小命都没有保住。

不得不承认的是，郭威是对不起刘赞的。刘赞和郭威无冤无仇，只是因为刘赞被朝议定为嗣皇帝，所以中了郭威的计，甚至刘崇哭天抢地给郭威写信，请求把刘赞放回河东，郭威都没答应，直接把刘赞弄死在宋州。但从另一个角度讲，郭威万不能放刘赞，毕竟刘赞有嗣皇帝的身份，一旦刘崇拿这个身份大做文章，在政治上对郭威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宋人司马光义愤填膺地在《资治通鉴》记载“（郭威）杀湘阴公于宋州”，但他绝对不会写赵匡胤入宫时，要杀掉柴荣交给他托孤的三个幼子，甚至潘美苦劝时，赵匡胤大骂潘美：“汝以为不可耶！（不能杀掉这几个小兔崽子吗？）”而且周恭帝柴宗训之死疑点重重，不能完全排除赵匡胤毒杀的可能性。

历史从来都是血腥肮脏的，谁也不比谁高尚多少。

刘赞死了，权杖上的最后一根棘刺被拔掉，至于刘崇哭天抢地地要找郭威血债血还，郭威已经不在乎了。但郭威还是没有立刻称帝，而是以汉朝执政的身份把持朝政，因为郭威急需做一件有天大功劳的事，来覆盖这次武装申冤留给舆论炒作的空间，毕竟这件事情并不怎么光彩。就在这个时候，契丹皇帝耶律阮突然率数万骑兵大举南下，抄掠河北，形势异常危急。而现在朝野还具备大帅资质的，除了郭威，没有第二个人。

郭威率兵过黄河北上抵抗契丹，其后赵匡胤也曾率兵过黄河北上抵抗契丹，历史又一次惊人得巧合。可郭威这次北上货真价实地抗辽，《辽史》中对此次南下有明确记载：赵匡胤只不过打着契丹南下的幌子，把军队调到陈桥，然后再杀回汴梁篡位。

历史又在重合。在澶州，又是凌晨，郭威正在睡觉，突然有数千将士围住郭威，要求郭威继位当皇帝。他们的理由是：“将士已与刘氏为仇，不可立也！”有人迫不及待地撕下了军中的黄旗，强行裹在了郭威身上，“呼万岁震地，因拥威南行”。而这些人中，就有赵匡胤的身影，他目睹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并把郭威的剧本完全抄默心

中。十年后，他照葫芦画瓢，上演了一出漏洞百出的蹩脚闹剧。

天下，不可逆转地属于郭威。其实这也是郭威应该得到的，毕竟后汉能建立，郭威功居十之七八，何况郭威家眷惨死，也为郭威赢得了太多的舆论同情。

郭威的速度也比较快。十二月二十七日，郭威出任大汉监国，江湖上的老油条们纷纷上表劝郭威称帝。八天后，也就是汉乾祐四年（951年）正月初五，四十八岁的郭威历经艰辛磨难，终于龙飞九五，登上了天子的宝座。

时人已经看惯了“梁唐晋汉周，朱李石刘郭”走马灯般换老大的历史闹剧，觉得郭威不过是个石敬瑭、刘知远之类的乱世枭雄。但当时人很少有人能想到的，正是这个脖子上雕着一只青雀的郭雀儿，气势恢宏地拉开了中原政权统一天下的雄壮大幕。

世人都知道北宋赵氏兄弟用了十九年时间削平诸国，统一中原，实际上按顺序来说，中原的统一大业始于郭威，盛于柴荣，成于赵匡胤，终于赵匡义。

郭威是个好皇帝

郭威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伟大时代，不过他的时代实在太短，从951年二月，到954年正月，满打满算不过三年时间，驾崩的时候也不过五十一岁。

在这三年时间里，郭威只做了两件正确的事情：一、在他的亲生儿子悉数被刘承祐杀害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柴荣为嗣皇帝，这才有了之后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统一进程，也为历史留下了一段极为珍贵的回忆。二、改变后汉政权几乎泯灭人性的经济掠夺政策，为处在乱世黑暗中的百姓打开了一扇并不太大却充满着希望的光明之窗。南宋遗民陈桺称赞五代之君“周世宗第一，唐明宗第二，周太祖第三”，不是没有道理的。

郭威是武人，以军功与战略谋划著称于史，郭威身上的“仁”却很少为历史所注目。郭威在控制汴梁后，曾经杀他满门的刘铢已被有关部门控制，只要郭威愿意，刘铢满门老小即使为被杀的郭家老小以命赔罪，相信舆论也不会说什么。虽然郭威也打算杀刘铢全家，但最后时刻郭威还是放弃了，他只是杀刘铢一人，“余悉皆活”。即使是乾祐之变的罪魁祸首苏逢吉的家人也都得到了郭威的饶恕，一个不杀。这份宽广的心胸大度，不是其他“仁君”能比得了的，那些“仁君”得志之后，敲打羞辱那些曾经得罪过他的官员，一个都没放过。

郭威也是个有脾气的人，但郭威说到底还是个仁人君子，他骨子里的善，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能体现出来。而郭威的这种善，无一不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中。

郭威对于苦难人民的热爱，不胜枚举，因篇幅有限，只提郭威的九条善政。

一、勤俭节约。郭威即位之初，就下诏停罢地方藩镇向朝廷进贡奇珍美味，他用不着这些玩意儿。郭威有句话说得非常感人：“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郭威富贵至极，却仍然挂念在战乱中饱受痛苦的底层百姓，难能可贵。郭威是从民间走出来的皇帝，他了解民间疾苦，他知道老百姓最需要他做什么。

二、允许境内商人和外国人（蕃人）进行商品贸易。

三、同意发生旱灾的南唐沿淮（河）百姓进入周朝统治区购粮。郭威并没有因为他们是敌国百姓而对他们抱有戒心，国家有罪，百姓何辜！虽然郭威此举有收买人心的嫌疑，但至少郭威敢这么做，说明他心中还是有百姓的。有些浑蛋皇帝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直接抢百姓的救命粮。

四、将被官府籍没的罪犯名下的地产，还给他们的家眷。一人有罪，九族无辜。此举极有人情味，千载之下，仍让人感动不已。

五、恢复农业生产。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官府给他们划拨无主土地，让他们耕种。同时官府减免各种赋税，让他们安心生产。郭威是个明白人，只有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富裕，他说过“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

郭威还下令，如果流亡百姓想离开周朝去敌国生活，朝廷不但不横加阻拦，而且拨付路费。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历朝政府都在挖空心思增加劳动力，甚至不惜动用暴力手段。郭威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郭威不懂劳动力的重要性，而是他认为以德留人，如果暴力截留，这样只会丧失民心。

六、改革盐曲法。后汉对贩私盐的打击极为严酷。只要有私造盐者被抓，贩一克盐也要杀头。郭威深知盐弊，下诏规定私制食盐超过五斤者才论死。郭威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有些人制私盐并不是为了

赚取暴利，仅仅是养家糊口。

七、改革牛皮征收制度。牛皮是冷兵器时代稀缺的战争物资，历代官府都在民间强行征收牛皮，说白了就是抢，一文钱不给，百姓怨声载道。郭威对此进行有力的整改，他规定在民间按土地占有量进行牛皮征收，以每五十亩地为一张牛皮的征收标准，百姓深受其利。当然郭威也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百姓将牛皮卖给敌对国家，但可以在境内自由交易。毕竟郭威也要考虑到国家的军事安全。

八、除了牛租。六十年前，朱温与淮南王杨行密大战，从淮南抢回几十万头耕牛。这些牛被分配给了农户，农户每年向朝廷交点牛租。而“伪梁”灭亡后，虽然当年那些牛都死光了，但正统的唐、晋、汉三朝还在强行向百姓征收牛租。李存勖、石敬瑭等人只顾自己享受，哪管百姓死活！但郭威最见不得百姓受苦，下诏取消了牛租，他不缺这点钱，他最缺的是民心。

九、重用人才。郭威知道自己有几斤两的文学水平，他从来不写什么打油诗。郭威经常说自己“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所以郭威非常注重选拔人才，周末很多名臣大员多是被郭威提拔栽培的，文如王朴、郑仁诲、范质、魏仁浦、王溥、李穀，武如郭崇、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及赵匡胤。

因为时间有限，郭威也没来得及做出更大规模的改革，而且和他的养子柴荣规模空前的改革力度相比，郭威所为也就如蜻蜓点水。但也正是郭威的蜻蜓点水，彻底激活了自唐末以来如死水一般沉寂的社会，也从某种角度启发了柴荣。柴荣的改革，很明显是建立在郭威改革基础上的，至少郭威给养子点明了某种充满希望的方向。

郭威这辈子很不容易，早年丧父（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郭威一个不少。郭威从小生长在缺少严格管教的寄养家庭中，再加上杀人如同碾死一只蚂蚁般的唐末五代大背景，郭威的

性格不是特别成熟，很容易受到外界一些事情的影响，有时也会暴怒，杀人如草芥。

后汉遗臣慕容彦超据兖州发动叛乱，虽然郭威亲征，很快就平定了兖州之乱，但盛怒之下的郭威显然不想放过慕容彦超的党羽。郭威下了一道非常狠毒的命令：所有跟着慕容彦超谋反的官员，立斩！一个不留！

如果放在平时，郭威也许早就释放了这些叛乱者，因为郭威曾经的老大哥王峻在任枢密使时专横跋扈，郭威又不忍和王峻翻脸，只能把怨气撒在兖州官员身上。还是户部郎中窦仪找来了德高望重的太师冯道和深受郭威信任的宰相范质，在一番心平气和的劝说下，郭威消了气，才收回了屠杀令。

就本性来说，郭威不是一个恶人，他是非常重感情的。一起闯荡血雨腥风江湖的老兄弟，不到万不得已时，郭威是绝对不会翻脸的。而从某种角度讲，郭威有兄弟，而赵匡胤没有，石守信那班人和赵匡胤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而郭威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兄弟，无疑就是王峻。

王峻其实是个帅哥，模样俊俏，肤色白皙，早年生活落魄时，王峻曾被梁朝权臣赵岩包养过。梁朝灭亡后，王峻在江湖上流浪，最终结识了刘知远，而又通过刘知远认识了郭威。二人脾气极投，很快就金兰为证，结为异姓兄弟。后汉朝，郭威坐镇河北，王峻则出任监军，与郭威形影不离。而乾祐之变时，因为受到了郭威的连累，王峻的家人被刘承祐杀了个精光，因为这件事情，让郭威对王峻产生了极大的愧疚感。郭威建周后，朝中最具实权的枢密使职务，当时除了王峻，根本不可能有第二个人选。郭威用王峻，一方面是能力因素，郭威武装申冤，王峻“从太祖赴阙，绸缪帷幄，赞成大事，峻居首焉”。堪称功首，用王峻别人也无话可说。另一方面就是感情因素，郭威自

认欠王峻的实在太多了，这辈子都还不完。所以郭威给了王峻几乎除了帝位之外的所有权力，是人所共知的二皇帝，比当年的安重诲势力还大。不仅如此，郭威对王峻本人是非常敬重的，因为王峻长自己两岁，所以贵为天子的郭威见着王峻，向来都称“王兄”，而不直呼其名。在当时能得到这种待遇的，只有两个人：早已修炼成精的太师冯道和王峻。

客观来讲，郭威对王峻几乎到了除了老婆不能分享，我所有就是你所有的地步。苏逢吉败后，郭威打算把苏逢吉霸占的李崧财产都送给王峻，王峻觉得李崧族诛，事不吉利，推辞掉了，但也说明郭威对王峻已是仁至义尽。

但反过来讲，正是郭威在感情上的这种倾情回报，反而养成了王峻狂妄跋扈的习气。郭威对王峻低三下四，而王峻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坦然受之。很明显，王峻把郭威这种低姿态的友好当成了软弱可欺，王峻开始不停地骚扰郭威，他认为自己还可以从郭威身上得到更多。

王峻其人，演技较差，脾气太大。在朝堂上经常发生不和谐的一幕：御前会议上，王峻与郭威议事，一旦郭威的表态不合王峻的心意，当着满朝文武，王峻冲着郭威破口大骂，郭威的祖宗十八代无一幸免。

郭威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自己对王峻太过友好，这会助长王峻的猖狂，但郭威始终对王峻抱有内疚，再加上“国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还是不忍心对王峻下手。否则以郭威早年街头霸王的脾气，再加上现在随意可以杀人的无上权力，十个王峻的人头也被砍掉了。

郭威希望王峻能痛改前非，可王峻的胆子越来越肥，开始干预事关帝国安危的人事任免权，甚至是郭威不可能让步的皇位继承人的选

择权。

哪个皇帝会让大臣挑选帝位继承人？从来都没有。

王峻心胸狭窄，见不得别人升官发财，郭威的部下向训不过封了个宫苑使的差事，王峻就撒泼打滚，甚至耍无赖要辞职。郭威对王峻一再忍让，甚至亲赴王峻府上，低三下四给王峻赔好话。

到了后来，王峻发展到公然要求郭威罢掉宰相范质、李穀，改任自己提出的人选。对此，郭威已经出离愤怒，但郭威还是念及旧情，忍了。

对于王峻的泼皮行径，郭威虽然不满，但总不忍对王峻发作。可当王峻开始插手帝位继承人安排时，郭威再也忍不住了。

郭威的亲生儿子都死光了，而在名义上，郭威还有一个儿子，就是养子柴荣。但在周朝建立时，并没有官方文件说要把江山传给柴荣，此时的郭威还在考虑到底把帝国传给谁，而除了柴荣，郭威手上还有很多选择。

郭威有几个晚辈的亲戚，如外甥李重进、女婿张永德、前妻张夫人的外甥曹彬、养子兼内侄柴荣，还有一个平辈的亲戚——妹夫杨廷璋。

曹彬和杨廷璋和郭威关系太远，郭威不可能选择他们，而能选择的只有外甥、女婿和养子（内侄）。李重进与郭威有血缘关系，按理最应该选择李重进。郭威又疼爱女儿，张永德同样有机会，但郭威最终还是选择了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养子柴荣（柴夫人是柴荣姑姑，没有生育）。

柴荣的优势有两点：一、柴夫人是郭威的患难夫妻。郭威和柴夫人感情极深，柴夫人死得早，郭威终身不立皇后。二、郭威早年落魄穷困，养子柴荣走南闯北做小生意养活姑父。郭威发达后，视柴荣如

亲生，感情极深。

听说柴荣成为实际上的太子人选，王峻当时就急眼了。

王峻要想在郭威死后继续把持权力，就只能希望下一任皇帝庸弱无能，但能力强悍的柴荣一旦上台，必将在政治上判王峻的死刑，“峻素惮世宗（柴荣）之聪明英果”。

王峻开始拆柴荣的台。

王峻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在慕容彦超叛乱时，郭威本打算让柴荣讨伐慕容彦超，王峻却担心柴荣得胜后威望更著，极力反对此议，郭威只好亲自上马。二、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坐镇澶州的柴荣回汴梁见养父。

第一件事郭威忍忍也就算了，可见不到自己唯一的儿子，郭威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甚至在朝堂上不顾皇帝脸面，对大臣们哭鼻子，“王峻陵朕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专务间阻，暂令诣阙，已怀怨望。岂有身典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观其志趣，殊未盈仄。无君如此，谁则堪之！”

郭威终于忍无可忍，在朝堂上拿下了还在梦想更大权力的枢密使，将王峻贬为商州司马，即刻轰出汴梁城。

王峻的所作所为，已经称得上是大逆不道，换成其他帝王，早把王峻灭了满门。只是郭威脾气实在太好，而且太重感情，不是王峻把他逼到了墙角，郭威是不会动王峻的。即使拿下了王峻，郭威也还在念着当日的兄弟情。听说王峻在商州得了病，郭威“愍之”，让王峻老婆去商州探亲。

如果石守信做了王峻这样的事情，赵匡胤早就把石守信一门老小都砍光了。当然，石守信等人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杯酒释兵权，算是给足了兄弟面子。赵匡胤和石守信之间本就是利益交换，只不过赵匡

胤得志后，并没有遵守当初的盟约。

历史上有很多皇帝被称为仁君，但很少提及郭威。实际上郭威的仁厚，放在历代帝王中都是数一数二的。

再提最后一件郭威让历史感动的事情。广顺四年（954年）正月十七日，五十一岁的郭威病逝于汴梁滋德殿。临终时，郭威拼尽最后一口气，对床前的养子柴荣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等他死后，必须薄葬。“我死，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速营葬，勿久留宫中；圻中无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烦民；葬毕，募近陵民三十户，蠲其杂徭，使之守视；勿修下宫，勿置守陵宫人，勿作石羊、虎、人、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

郭威要求薄葬，直接的诱因是他当年西征李守贞时，看到唐朝的十八座帝陵因为墓中宝贝太多，被人盗了墓，郭威不想死后再被人打扰。但从深层次讲，郭威主要还是爱惜民力，不忍生活困难的百姓再为一个死人劳力破财。所以郭威死后，简单的墓室里既没有金腰带，也没有夜明珠。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生平

毛泽东那阕横绝千古的《沁园春·雪》几乎是家喻户晓。毛泽东在词中提到了历史上五大帝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其中的宋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太祖赵匡胤。

实际上，赵匡胤只是历史的一个备胎。如果历史不发生那次莫名其妙的意外，与风流唐太宗李世民齐名的，将是一个对人们来说有些陌生的名字——柴荣。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将写成“秦皇汉武，唐宗周祖”。

赵匡胤风流千古，但他从来不承认他所建立的文治武功其实都是柴荣打下来的，他只不过随手捡了个大便宜。他所做的，只是在柴荣的基础上有所增益而已。但赵匡胤不承认，不代表历史不曾发生过，历史也同样不会忘记在赵匡胤之前，那个震惊整个东方世界的郭家养子。

几乎所有的历史评论家都众口一词：如果不是柴荣意外地英年早逝，他必然能建造一个功比汉唐的伟大帝国，而他本人，也将成为与秦皇汉武齐名的千古大帝。

“伟大的征服者”，这是最符合柴荣生平的历史标签。英雄敌不过天意，但英雄可以征服历史。

而做到这一切，柴荣仅仅用了五年零六个月。

有关柴荣的篇幅很长，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他是历史上独

一无二的柴荣，一个震撼历史的伟大征服者。

.....

梁龙德元年（921年）九月二十四日，柴荣出生在河北邢州隆尧县一个破落地主家里，他的父亲名叫柴守礼，时年二十七岁。不过因为柴荣出生时，隆尧属于晋王李存勖的地盘，晋国奉唐朝天祐年号，所以《旧五代史》称柴荣生于唐天祐十八年。

不知道从哪一辈起，曾经富甲一方的柴家就衰落了，虽不至于精穷，也活得捉襟见肘。有说法认为柴荣是唐朝开国元勋——霍国公柴绍的后人，即使是，那又如何？刘备还是正宗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还不是到处“要饭”？

每日为家庭奔忙的柴守礼，自然不会知道他的这个儿子将来会有怎样的人生，但柴家的窘迫，迫使少年柴荣不得不用他稚嫩的双肩，挑起一个家庭生存的重担。

有人是天生做生意的，比如胡雪岩、盛宣怀；有些人是天生做皇帝的，比如刘邦、朱元璋。有没有既会做生意，又会做皇帝的？有，就是柴荣。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通过什么渠道，柴荣结识了北方著名的茶老板颉跌氏。颉跌氏是做茶叶商贸流通的，就是批发茶叶贩到外地销售，赚取差价。颉跌氏似乎很喜欢柴荣，就把柴荣带在身边，在江湖上四处闯荡赚钱。不过有说法认为柴荣其实是个卖雨伞的，伞利微薄，不如茶叶赚钱，应该是柴荣在跟着颉跌氏之前卖伞。

柴荣不辞风里雨里，赚点辛苦钱，其实是养家用的，他本人花钱是很节省的。柴荣需要养活两个长辈懒汉：一个是他百无一用的父亲柴守礼；另一个就是他的姑父，当时混得一塌糊涂的郭威。

柴荣还有一个姑姑，因为生有绝色，被唐庄宗李存勖纳入宫中，

做了一个嫔御，但没有混出头。李嗣源称帝后，大放宫人，柴姑姑被放出宫，可以自由婚嫁。柴姑姑身份高贵，身边又带着不少钱，她却一眼就看上了当时邈里邈遏的丘八头子郭威。任凭柴荣祖父母苦劝，柴姑姑只嫁郭威，柴家最终妥协，把女儿嫁给了郭威。柴荣就是这样和郭威扯上关系的，郭威也知道老婆在老家还有一个在江湖上跑单帮做生意的侄子。

因为柴夫人一直没有生育，而郭威又想要个儿子，柴姑姑提出一个建议——把老家侄子柴荣收养过来。因为郭威很喜欢柴荣，也就同意了。从此，郭威和柴荣既是姑侄，又是父子，亲上加亲。当时的郭威非常穷，还是柴荣四处跑生意，赚了钱养活养父。郭威也知道养子对他恩重如山，等到郭威发达之后，他首先提携的就是养子柴荣。后汉建立后，郭威平定了李守贞等人的叛乱，威望如日中天之际，奉命北上坐镇邺都防御契丹，郭威只带上了养子柴荣。当然，郭威不可能预知，正是他这个无意之举，才为历史保留了一段不可复制的伟大传奇。

等到郭威建立周朝时，他的亲生儿子都被杀光，而他需要确定一个皇位继承人。柴荣之所以中选，原因在上篇已经提及。不过相对于柴荣曾经照顾过养父，郭威看重柴荣的，还是柴荣那横绝一世的能力。如果仅是出于对柴荣当年照顾自己的感情，郭威大可以封柴荣为大藩，不至于把整个帝国都交给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

在确定由柴荣继位后，郭威甚至把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外甥李重进叫进宫，让比柴荣年长六岁的李重进给柴荣下跪磕头，以定君臣之分。至于王峻的反对，因为郭威铁了心要把皇位传给养子柴荣，即使是王峻是自己一辈子兄弟，涉及自己的根本，郭威也不会客气。

铲除了王峻，天下人都不會怀疑，柴荣将是下一任中原帝国的主人。其实早在柴荣坐镇邺都时，因为善理民政，就得到当时舆论的一致好评。郭威病重时，天下惶恐，而听说柴荣主政汴梁军政时，各界

舆论都鼓掌称颂，皆谓皇帝选对了人，汴梁形势迅速安定下来。“时太祖寝疾弥留，士庶忧沮，及闻帝总内外兵柄，咸以为愜。”这个记载，说明柴荣在郭威称帝时代就已贤名著于朝野，而当赵匡胤篡位时，江湖上都不知道赵匡胤是何许人。

广顺四年（954年）正月十七日，五十一岁的郭威病逝于汴梁滋德殿。柴荣自然也以皇位继承人的身份，毫无悬念地在养父灵前即皇帝位。不过柴荣心里也清楚，在殿下给自己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的文武百官，真正能瞧得起自己的没有几个人。

此时的柴荣是孤独的。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战高平

高平，现在是山西晋城下辖的一个县级市，紧依太行山，自古就是从山西进入河南的天险要道。而高平在历史上之所以出名，主要还缘于一千多年前那场震惊天下的铁血大战，而这场战争，则拉开了周宋帝国统一天下的雄壮大幕。

高平之战，因为柴荣，甚至因为赵匡胤，历史从来没有忘记。

发动这场战役的是柴荣养父的仇人刘崇，刘崇永远都不会饶恕郭威杀死自己亲生儿子刘赞的血海深仇。后汉被郭威取代后，刘崇流着泪在太原衙门称帝，国号还是汉，史称北汉。北汉建立后，刘崇就开始找郭威讨还血债，不过他根本不是郭威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刘崇被郭威揍得鼻青脸肿，也老实了两年。但当刘崇听说郭威死了，继位的是郭威的养子柴荣时，刘崇放声狂笑，“吾儿之仇得报矣！”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刘崇还是请来了他的盟友——契丹人，契丹皇帝耶律璟也愿意浑水摸鱼，派北院宣徽使耶律敌禄（即杨衮）率六七万骑兵挺进太原，与刘崇麾下的三万北汉军会合，然后浩荡南下。

刘崇南下的路线，其实是他大哥刘知远当初要选择却又放弃的路线，即出团柏（今山西太谷），直取潞州（今山西长治），渡过黄河进攻汴梁。现在刘崇要做的，就是拿下晋南头号军事重镇潞州（古称上党）。

周朝国葬还没有结束，刘崇就大举入寇，并在潞州太平驿大破周昭义节度使李筠部下穆令均所部两千人，“俘斩（周）士卒千余人”。消息震撼了汴梁城，柴荣立刻召开临时御前会议商议对策。与会者都

认为既然刘崇打上门，那我们就奉陪到底。唯一的分歧是，柴荣想亲征，大臣们则认为派一大将足矣。

柴荣想亲征，非常好理解。柴荣初即位，在江湖上还没有像样的成绩，大家对他不过是口服心不服。而如果打败刘崇，则天下畏服。而大臣们也是出于好心，劝柴荣不要冒险，其实他们都不好意思把实话说出来：就凭你，亲征刘崇？省省吧！

而反对柴荣最为激烈的竟然是冯道。冯道对柴荣半点情面也不留，直接打了柴荣的脸。柴荣自比唐太宗，冯道冷笑道你不是唐太宗；柴荣自比泰山压顶，冯道还是冷笑说你也不是泰山，气得柴荣差点当场发飙。关于冯道为什么阻止柴荣亲征，将在《冯道生存之“道”》篇中详细解读。

柴荣之所以坚持亲征，其实还有一个不便与外人道的原因。而明末王夫之则揣透了柴荣的心思，他评论道：“朱友贞、李存勖、李从珂、石重贵、刘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骄帅挟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讎其不轨之志；其战不力，一败而溃，反戈内向，殄故主以迎仇讎。”如果柴荣派大将出征，军权就要旁落，一旦大将有异心，像杜重威、张彦泽那样，柴荣手上无兵，只能坐以待毙。柴荣必须亲征，将军权牢牢抓在手上。否则，石重贵、刘承祐就是柴荣的前车之鉴。

显德元年（954年）二月初九，大周皇帝柴荣下诏亲征，并在出发前颁诏天下，讨伐刘崇。这道诏书文采极佳，略云：“朕自遘闵凶，再经晦朔，山陵已卜，日月有期，未忘荼蓼之情，岂愿干戈之役？而河东刘崇，幸灾乐祸，安忍阻兵？乘我大丧，犯予边境，勾引蕃寇，抽率乡兵，杀害生灵，觊觎州县。朕为万姓之父母，守先帝之基扈，闻此侵陵，难以启处。所宜顺天地不容之意，从骁雄共愤之心，亲御甲兵，往宁边鄙。务清患难，敢避驱驰？凡在众我，当体兹意。”

柴荣讲了三点：一、周朝本想守两国之好，是刘崇主动发动战争的。二、刘崇勾结契丹人南犯中原，是当代大汉奸。三、为了百姓平安，朕不惜冒险亲征。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柴荣很巧妙地把战争责任推给了刘崇，并且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大救星。这在政治上是非常聪明的，虽然柴荣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恶战能否取胜心中也没有底。

二月十一日，柴荣率大军出汴梁，疾速向泽州方向行进，柴荣承担不起潞州丢失的代价。而为了这场事关大周帝国生死存亡的大战，周朝军界几乎是精英尽出，计有：老将符彦卿、郭崇、樊爱能、刘词、药元福、王彦超、白重赞，新锐李重进、张永德、赵匡胤、石守信、高怀德、韩重赞、韩令坤、慕容延钊、李崇矩、潘美、尹崇珂、曹翰、米信、马仁瑀。

刘崇在高平摆下战场，但柴荣显然不会被动应战，他需要把战火烧到刘崇的大后方。柴荣让驻镇河中的护国军节度使王彦超会同驻镇陕州（今河南三门峡）的保义军节度使韩通，取晋州路东进，进攻北汉西部边境，分散刘崇的注意力。同时，驻镇魏州的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会同驻镇澶州（今河南濮阳）的镇宁军节度使郭崇，取磁州（今河北磁县）路，进入北汉境内，给北汉人制造周军要奇袭太原城的假象，对刘崇进行战略恫吓，以减轻高平方面周军所面临的军事压力。

周军的先锋是向训、樊爱能、何徽、白重赞，他们的任务是火速增援潞州李筠。柴荣随后出汴梁，向东沿黄河东进，至怀州（今河南沁阳）折头北上。

二月十六日，柴荣抵达怀州。

二月十八日，周军主力迅速抵达泽州，柴荣没有停留，直接把大部队拉到泽州东北十五里的高平。

可能是情报有误，刘崇根本没有先取潞州的打算，“过潞州不攻，引兵而南”，准备直取洛阳，再取汴梁。好在周军行动迅速，在

潞州以南数十里的高平堵住了北汉军进一步南下的步伐。

两军相遇。

刘崇这才知道柴荣亲自来了。虽然当初刘崇出兵时，就认定柴荣“旻（刘崇改名）幸周有大葬，而天子（柴荣）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将以击其不意”。但柴荣既然来了，那今天就让你替你老子郭威偿还血债。

决定历史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开始。

二月十九日，天刚放亮，柴荣就率主力和北汉军在一片高地上试探性地进行了交锋，“击之，北汉兵却”。北汉军没占什么便宜，往后撤了一段距离。但柴荣却“趣诸军亟进”，紧追北汉军不放。刘崇把军队后撤至巴公原，再次迎击周军。刘崇将北汉军分成两部分，自己带中军，大将张元徽坐镇左路，耶律敌禄率契丹军坐镇右路。

北汉军“众颇严整”，而周军都是老兵油子，向来是“出工不出力”。丘八大爷们看北汉军阵容严整，就有了畏战心思。再加上周军不到三万人，最多两万人，寡不敌众，“（周军）众心危惧”。

周军在距离北汉军的不远处也摆出了“山”字阵：

左军：义成节度使白重赞、侍卫马步军都虞侯李重进等部。

右军：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等部。

中军：宣徽南院使向训、郑州防御使史彦超等部。

大周皇帝柴荣“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股攒成祥甲绦。护心镜，放光豪。丝鸾带，扎稳牢。鱼褐尾，护裆口。战裙又把膝盖罩”，骑马站在“山”字阵的最前面，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禁军在柴荣身后，负责保卫皇帝安全。

刘崇已经看到了柴荣，但刘崇这时才知道周军人数不多，他开始有些后悔把契丹人招来分功，刘崇认为凭自己的北汉军，足以吃掉柴荣的这点虾兵蟹将。不知道是出于拍马屁的心理，还是确实认为周军不如北汉军，北汉将领“皆以为然”。但在旁边观阵的杨衮却认为周军不可小视，“劲敌也，未可轻进”。刘崇不听，“时不可失，无妄言也”。

两军初对阵时，巴公原便一直在刮着强劲的东北风。东北风对北汉军是非常有利的，可刘崇刚要下令进击，突然又变成了南风，反而对北汉军不利。逆风作战不利这是基本的战争常识，但北汉官员却认为时机已到，请刘崇下令，刘崇利令智昏，竟然同意了。北汉的枢密直学士王得中上前拉住刘崇的马头，苦劝刘崇不要意气用事，可以再等等。但刘崇根本瞧不上周军，南风又如何，照样切瓜剁菜！刘崇对王得中说：“老措大！毋妄沮吾军！”刘崇下令张元徽率东军进击与其对应的周军樊爱能、何徽等部。

可意外却发生了。还没等北汉军冲进周军阵中，周军樊爱能与何徽竟然带着几十名亲兵不战而逃，丢下了无头苍蝇一般的周右军。

主将跑了，弟兄们怎么办？答案惊人得一致：投降刘崇。反正跟着柴荣是吃肉，跟着刘崇也是吃肉，他们又不是没出卖过石重贵、刘承祐。还没等在后面督战的柴荣反应过来，周右军“（周）步兵千余人解甲呼万岁”。

刘崇激动得仰天大笑。

周右军突然不战自溃，对周军其他阵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中、左两军士气大受打击。在这个时候，只要统帅柴荣意志稍有薄弱，效仿樊、何临阵脱逃，周中、左二军势必投降刘崇。

势若山崩，柴荣的末日也就到了。

柴荣的反应非常激烈，“帝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用现代艺术语言演绎，柴荣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把手中大剑斜指上苍，大喝：怕死的，或走或降。不怕死的，还是个爷们儿的，跟朕上阵送死！说罢，柴荣双腿夹马，骏马如利剑一般直冲北汉军大阵。

三军用命，其功在将。只要主帅肯用命，弟兄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何况是九五至尊的皇帝！周军的新锐将领们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见柴荣都拼了，咱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杀他娘的！

数十名年轻的周军将领率各部，如泰山压卵一般，吼叫着，跟着柴荣冲进了北汉军的阵中。

此时，柴荣不再孤独。

出于对本朝主子的吹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只用一句话记载柴荣亲自上阵，却用一大段描写赵匡胤的英勇，厚此而薄彼。当然，赵匡胤在高平之战中的表现堪称英雄之风，“太祖皇帝（赵匡胤）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

实际上，根据赵匡胤在位时编撰的《旧五代史》记载，第一个跟着柴荣杀过去的，是内殿直马仁瑀。“（马仁瑀传）从世宗亲征刘崇，王师不力，仁瑀谓众曰：‘主辱臣死！’因跃马大呼，引弓连毙将卒数十，士气始振。”然后才是赵匡胤本人跟上。司马光把马仁瑀冲阵放在了赵匡胤之后，不过是奉迎拍马而已，还不如赵匡胤本人豁达。

李重进、张永德、石守信、高怀德、韩重赟、韩令坤、慕容延钊、李崇矩、潘美、尹崇珂、曹翰、米信、董遵诲、马全义，还有狗肉贩子出身的小卒唐景思，一群年轻人，在同样年轻的柴荣感召之下，激动得不能自己，都山崩海啸般与北汉军血战到底。

死，也要死出个男人样。

周右军自溃，周军形势异常危急，但北汉军阵中谁都没想到，几乎是死到临头的柴荣竟然亲自上阵，及时挽救了行将山崩的周军。

南风越刮越大，狂风夹杂着尘土碎石，北汉军被风石打得睁不开眼。刘崇这才后悔没听王得中的建议，可再想撤退时，周军岂能让你来去自如？北汉大将张元徽在与周军作战时，战马突然扑倒在地，周军不和他客气，乱刀剁成肉泥。

张元徽是北汉的标志性大将，他的死，给北汉军本就不强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周军则趁热打铁，一举击溃北汉军。

“（周）战士皆奋命争先，贼（北汉）军大败。”

其实北汉军还有一路援军，就是坐镇西路的杨衮的数万契丹骑兵。现在周军已经杀红了眼，杨衮当然不会陪刘崇下葬，直接拐了马头，溜之大吉。

契丹人见死不救，刘崇气得浑身颤抖。老皇帝手举红旗，四处收拢败兵，可北汉兵像鸭子一样到处被周军追杀，谁还顾得上那个老头子。刘崇没办法，只好带着好不容易收回来的一万多败兵，“阻涧而阵”，利用险要地势企图死守，但却把自己置于死地。

当天傍晚，周河阳节度使刘词带来的援军赶到巴公原，稍事休整后，与周军主力在第二天向刘崇残部发起总攻。一万多北汉军挤在狭小的山涧谷地里，活动空间有限，几乎是等着周军屠杀，那柴荣就不会客气了。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役，“北汉兵又败”。刘崇像惊弓之鸟一样狼狈逃出山涧，却丢下了弟兄们的尸体无数，大量军资器械无数，牛马驴猪无数，“僵尸弃甲填满山谷。所获輜重、兵器、驼马、伪乘輿器服等不可胜纪”。周军大获全胜，只是跑了刘崇。

刘皇帝此时已经换上粗布衣服，戴上斗笠，扮成百姓，骑着契丹皇帝送给他的黄骠马，带着一百多亲卫骑兵，连夜逃回太原。但由于天太黑，结果却迷了路。刘崇让当地村民给他带路，结果村民带错了路，带着刘崇朝西边的晋州方向逃窜。跑了一百多里路，刘崇才发现方向不对，杀了村民，改道向北，勉强才逃回太原城。大难不死的刘崇为了感谢这位救他一命的马大爷，封黄骠马为“自在将军”，享受三品俸禄。刘崇想不到为北汉存亡立功的竟然是一匹马，历史实在过于讽刺。

“乳臭未干”的柴荣赢得了这场高平之战的最终胜利。《旧五代史》的史官们对他们曾经侍奉过的皇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是日，危急之势顷刻莫保，赖帝英武果敢，亲临寇敌，不然则社稷几若缀旒矣。”一个“赖”字，说明这次震惊天下的高平之战，首功是柴荣，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高平之战如同一声惊雷，震醒了在黑暗中沉睡近百年的历史。世人这才知道郭威有个养子叫柴荣，在高平大战教训了不可一世的北汉老皇帝刘崇，一战成名天下知。

其实这场高平之战，更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柴荣打出了自己的威名，而是彻底击碎了北汉政权南下吞并中原的野心。终北汉存在之世，再也不敢主动发动对中原政权的战争，不过困兽死守而已。柴荣打怕了当时天下战斗力最为顽强凶悍的北汉人，可以无北顾之忧地开启带有明显柴荣标签的轰轰烈烈的统一战争。欧阳修虽然有时经常胡言乱语，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高平之战对于统一的重要性——“世宗取淮南，定三关，威武之振自高平始。”

在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后，柴荣有些被胜利冲昏头脑，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准备趁热打铁，进围太原，一举消灭刘崇。虽然将领们都反对这次冒险之旅，但柴荣有些无赖似的要求将领们必须执行他的命令。

柴荣大胜高平之后立刻向北进军，实际犯了兵家最忌的疲劳行军，等到各路周军云集太原城下，胜利之师已成疲惫之师。虽然周军各部陆续攻克北汉州郡，但太原城始终拿不下来，刘崇希望自己至少能守住太原，将来再逆转翻盘。

刘崇的梦想最终还是实现了，周军被迫灰溜溜地离开河东。具体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周军是上承梁唐晋汉的旧式军队，偷奸耍滑已成习惯，到了太原城下，丘八爷们开始四处抄掠百姓，彻底得罪了河东百姓，周军粮食接济成了问题。

二、数十万周军在太原城下游手好闲，几乎成了官方土匪。好在柴荣及时做出了调整，下诏安慰河东百姓，放宽河东百姓的缴税期限，并严禁周军抢劫，河东民心稍稍安定。不过河东本就地瘠民贫，即使所有河东百姓倾囊相助，周军也得之甚微。

三、契丹人不会允许北汉灭亡，出兵在代州一带袭扰周军，并成功地击杀了周朝大将史彦超，周军为之夺气。

四、天公不作美，连旬大雨，周军在雨中被泡成了方便面，并且发生大规模疫情，军情不稳。

综合各种考虑，柴荣不得不咬牙暂时中断自己的梦想，于六月二日下诏撤军。柴荣率周军仓皇撤退，之前攻克北汉各州郡的周朝官员也不得不狼狈撤出，一场本可以名垂青史的大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泡汤了。

不过，柴荣第一次北伐灭汉没有成功，并不影响高平之战巨大的历史意义。围攻太原本就是柴荣一时心血来潮之举，柴荣不是圣人，从来都不是。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战寿州

众所周知，975年，北宋太祖赵匡胤在篡位后的第十六个年头，终于一鼓作气，消灭了割据江南近百年的（杨吴）南唐政权，天下大势已定。其实要说对宋灭南唐贡献最大的，并不是赵匡胤本人，而是赵匡胤的旧主周世宗柴荣。不是柴荣几乎倾全国之力，用了三年时间，拼掉了南唐最精锐主力，赵匡胤是不会轻松拿下李煜的。

不过柴荣三打南唐并不是一场战役，而是历时三年多，战线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漫长战争，周朝与南唐的攻守战和，刀兵与外交，情况非常复杂。因为篇幅有限，所以只节选柴荣在三打淮南过程最为精彩的一幕——战寿州，两个伟大的男人之间的一场震撼历史的对决，柴荣决战刘仁贍。

周朝攻南唐，起源于时任周朝比部郎中王朴那篇著名的《平边策》，而这篇《平边策》也是柴荣给大臣们布置的作业中最精彩的一篇。王朴的《平边策》很长，但取其精华，大意是“先易后难”，先啃硬骨头吴蜀，再捏软柿子（除了最硬的那根骨头北汉和契丹）。不过柴荣并没有完全按照王朴的计划走，后期改成“先难后易”，王朴的“先易后难”则被赵匡胤和赵普全文抄袭过去。

当时除了周朝之外，无论是从疆域、人口还是经济实力、兵力，天下第一强国非南唐莫属。“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南唐是唯一可以与周朝争雄天下的大国。

周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初一，大周皇帝柴荣正式颁诏天

下，讨伐不庭，诏书写得洋洋洒洒，气势雄大。柴荣作战，向来喜欢亲征，这次征南唐也不例外。这次南征，几乎派去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和战将，先锋是宰相李穀，忠武军节度使王彦超为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以下十二将，各率本部兵随李穀出征。

周朝与南唐有着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边界线，基本以淮河分界，而南唐淮河防线的头号重镇就是寿州（今安徽寿县）。只要拿下寿州，周军就能占据淮南之战的主动权，虽然柴荣也知道坐镇寿州的是南唐头号名将刘仁贍。

此时是冬季，淮河水浅，再加上南唐皇帝李璟突然撤掉守卫淮河的“把浅军”，周军先锋部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在淮河上搭建浮桥，从正阳（今寿县西南）方向在无敌军防守的情况下顺利渡过淮河，进入淮南腹地，并在寿州城下两次打败南唐偏军。

而显德三年（956年）正月初八，柴荣率周军主力部队离开汴梁浩荡南下，迈出了征服天下的第一步。

而周军大举南下，震动了整个文恬武嬉已久的南唐官场。李璟虽然昏庸疏狂，但也知道寿州的战略地位，李璟很快派神武统军刘彦贞率三万人北上救援寿州。刘彦贞是个大贪官，赚钱本事一流，根本不会打仗。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刘彦贞下令打造了数百条大船，准备冲击周军浮桥，对李穀造成了很大的震慑。李穀连夜带周军先头部队扔下浮桥，撤回淮河北岸，俟机再南渡作战。柴荣本人非常反对北撤，因为等到淮河水位暴涨，到时周军就很难再过淮河。柴荣让李重进火速前往正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淮河浮桥。

李重进南下，刘彦贞北上，两军在正阳附近相遇。本来刘彦贞率军抵达寿阳时，刘仁贍曾劝刘彦贞先休整部队，毕竟“强弩之末不能穿于鲁缟”，但刘彦贞立功心切，不听劝阻，率饿得两眼直冒金星的南唐军北上。

刘彦贞的作战方式非常奇特，南唐的一万多匹战马都用铁链拴住马腿，组成一个同进同退的大阵，号称“撻马脾”。同时派人在阵前放置很多皮袋子，里面装满铁蒺藜。更让李重进看不懂的是，刘彦贞用木块刻成老虎狮子，在阵前晃来晃去。李重进没兴趣陪刘彦贞耍宝，一声令下，吃饱喝足的周军将饿得找不着北的周军打得找不着北。是役，周军“斩首万余级，追奔二十余里，杀大将刘彦贞，擒裨将盛师朗数十人，降三千人，获戈甲三十万”，只有少数残兵逃回寿州。

这场正阳之战在整个周唐淮南作战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刘彦贞的败死，直接敲响了南唐政权的丧钟，严重打击了南唐人抵抗周军的决心，所以陆游评价说：“唐丧地千里，国几亡，其败自彦贞始。”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刘彦贞所部被歼，导致孤城寿州直接暴露在周军强大的攻击面前，而刘仁贍似乎也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祥。

下面来介绍一下另一位主角刘仁贍。

刘仁贍，字守惠，欧阳修认为他是徐州人，陆游则说他是淮阴人。刘仁贍父亲名叫刘金，曾任杨吴濠州团练使，他的哥哥刘仁规还是吴王杨行密的女婿。

刘仁贍“略通儒术，好兵书，有名于国中”。南唐开国烈祖李昇非常欣赏刘仁贍，封为武昌节度使。后来李璟灭楚，刘仁贍率武昌水军进取岳阳，一路秋毫无犯，大得楚人之心。《江南野史》评价刘仁贍“性淳谨，器度伟重，喜怒不形于色。总令兵士严而不残，有良将之才。出典郡符，鄣治无滞，有政绩能名，军民乐其仁信”。

有这样的名将坐镇淮南头号重镇寿州，李璟非常放心，而就在刘仁贍上任的同年，柴荣就杀了过来。

刘仁贍深知柴荣的厉害，早在周军南下之前，他就曾经劝李璟不要撤掉把浅军，但李璟不听，结果周军轻松进入淮南，终成大患。而刘彦贞不听刘仁贍的正确判断自去送死后，刘仁贍就知道刘彦贞必

败，柴荣必来，所以刘仁贍加紧城防，准备与柴荣一决生死。

刘仁贍终于在寿州城头上，隔着茫茫淮河，遥遥望见了生活在传说中的柴荣，柴荣率周军主力驻于淝水北岸，这一天是周显德二年（955年）正月二十二日。

柴荣做事向来雷厉风行，四天后，周军利用之前李穀搭建的浮桥，迅速渡过淮南，在寿州城下向困守的刘仁贍炫耀着自己的肌肉。

柴荣知道刘仁贍是根硬骨头，劝降是不可能的，只有用实力解决问题。二十三日，柴荣一剑直指，各地被征调来的数十万民工，与周朝正规军一起，向寿州城发起了如潮般的进攻。

这是五代史上罕见的城防大战。

无数只战船游弋在淮河中，船上都装着一种先进的远距离投射武器——石砲。所谓石砲，简单来说就是弹弓的放大版，把大石头放在巨型弩机的发射口，然后用力射向遥远的城池。目标是砸坏寿州城墙，有利于周朝的地面部队攻克城池。

同时，柴荣又“束巨竹数十万竿，上施版屋，号为‘竹龙’，载甲士以攻之，又决其水砮入于淝河。攻之百端”。

可惜，守城的是刘仁贍，一位不世出的名将，柴荣迅速拿下寿州城的计划落空了。这场战役一直打了四个月，柴荣“驻蹕于其垒北，数道齐攻，填堑陷壁，昼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但寿州城依然坚如磐石，大唐王朝的旗帜迎风不倒。

数十万大军拿不下一个寿州城，大周皇帝怒了，他要亲自上阵找刘仁贍决战。

北宋人龙衮记载了这个极为传奇的男人之间决斗的故事，事在《江南野史》第五卷。

与其说柴荣是找刘仁贍决战，不如说柴荣是去送死。

其实自攻城以来，柴荣一直在城下督战，只不过刘仁贍未发现而已。但有一次，刘仁贍发现城下有一个周军大人物坐在胡床上，指挥周军进攻。刘仁贍不认识这人是谁，但从周军对此人的恭敬态度以及装束来看，此人必是伞贩子柴荣。

刘仁贍抑制心中的狂喜，柴荣近在眼前，只要一箭射死敌酋，周军必退。

刘仁贍射术极好，“猿臂善射，发无不中”，射死柴荣不成问题。在柴荣身边的侍卫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支利箭就穿透了时空，直射柴荣。不过因为距离有些远，这支箭落在了柴荣所踞胡床的不远处。

柴荣看到了这支箭，只是冷笑。

而周朝大臣们则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柴荣立刻后撤，不要成为刘仁贍的箭靶子。柴荣望了一眼风云无恙的寿州城，冷笑道：“一箭射杀一天子，天下宁复有天子乎！”

这就是柴荣对刘仁贍的回答。也只有柴荣，才能做出这样霸气的回答。柴荣平生最不信邪，你越逞强，我越不怕你！刘仁贍我也不鸟你！

柴荣让侍卫把胡床往前搬，理由是近些，刘仁贍的箭可以够得着。弟兄们都吓坏了，但柴荣不再理睬他们，只是微笑着遥望着城头上的刘仁贍。

刘仁贍不客气，你自己寻死，我自然要成全你。刘仁贍再次搭箭，满月流星，一箭直射柴荣，但箭依然在胡床前几米落下尘埃。

柴荣笑了，刘仁贍则仰天长叹：此天意，吾不胜天。一把把弓扔

在地上。

龙袞这样称赞柴荣这次不可思议的霸气：“以周世宗之神武确断，当矢石而不惧。予观自古帝王之达者一人而已。”

而龙袞是北宋人。

柴荣无恙，而刘仁贍也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其实只要刘仁贍向柴荣屈膝，以柴荣对刘仁贍的欣赏，刘仁贍可以得到任何他想得到的东西。但刘仁贍食李氏之禄，是绝不可能投降的。刘仁贍告诉部下，我今日有死而已，断不做屈膝将军。因为刘仁贍待部下如兄弟，所以刘仁贍选择杀身成仁，弟兄们也没二话，所以守城意志更加坚定，周军无论如何进攻，始终拿寿州城毫无办法。

数十万周军被阻于寿州城下，实际上是对南唐非常有利的，至少淮南其他州郡可保无恙，柴荣岂能容此！既然刘仁贍这颗硬核桃暂时啃不动，那就先去捏软柿子。围点打援，在机动战中消灭南唐精锐部队，最后再攻寿州。周军在异国作战，没有守土之责，机动性非常强，可以在部分作战区域形成多数对少数，若稍有不力，便进行战略收缩，但南唐军需要守土，灵活性远不如周军。

柴荣盯上了南唐国都金陵的江北门户——滁州。替柴荣攻取滁州的，是柴荣非常欣赏和喜爱的大将赵匡胤。赵匡胤虽然篡位备受历史争议，但赵匡胤的作战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赵匡胤在涡口（今安徽怀远附近）大破南唐兵马都监何延锡，杀万余人，同时活捉了刘仁贍的侄子、天忠指挥使刘崇浦。本来要北上救援寿州的南唐军皇甫晖部与姚凤部被赵匡胤打怕了，退守清流关不敢北上。

赵匡胤急需打出名气，作战欲望非常强烈。他随后在滁州北的清流河前生擒皇甫晖和姚凤，轻松拿下滁州。

滁州的丢失，导致金陵在江北无险可守，迫使李璟把重兵布置在

金陵附近，这样就减轻了围困寿州的周军所面临的军事压力。而李璟迫于湖南战事的压力，以及东南邻居吴越又在柴荣的调令下出兵，李璟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派人来找柴荣求和。条件是奉柴荣为兄，向周朝献岁币。

这样的条件不可能打动柴荣，柴荣不是奔着这点银子来的，他要的是整个天下，所以断然拒绝了李璟的求和。周军弟兄也确实给柴荣挣面子，随后不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就攻克南唐江北头号重镇扬州，随后又克泰州，给金陵城制造了空前的生存压力。周军其他各部也都没有闲着，光州（今河南潢川）、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先后被周军拿下。

此时的李璟还在幻想求和，提高了和谈条件，愿做周朝外藩，每年岁贡百万，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柴荣相信不久后就可以拿下整个淮南，他根本没兴趣和李璟和谈，我能打得过你，为什么要和你和谈？打不过的才会和谈。

既然柴荣不给面子，李璟也怒了，血性上来，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决定和柴荣死战到底。李璟在打退了吴越兵之后，派四弟、齐王李景达率重兵北上救援寿州。李景达是个饭桶，根本不懂军事，而奉命监视李景达的监军陈觉更是南唐著名奸臣，有这样的组合，岂能是柴荣的对手！甚至柴荣都没有亲自出手，替他出面的还是赵匡胤。

“居数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奋击，大破之，杀获近五千人，余众尚万，走渡江，争舟溺死者甚众，于是唐之精卒尽矣。”六合之战，几乎吓破了李璟的胆，但却依旧没有动摇寿州城中孤臣刘仁贍杀身成仁的决心，柴荣对此极为不解，却又无比敬重这位让自己难堪的南唐孤臣。

刘仁贍已成城中困兽，却依然有能力出城袭击周军，更让柴荣非常难堪。“寿州贼军犯我南洞子，王师死得数百人。先是，帝（柴

荣)命继勋领兵于寿州之南构洞屋，以攻其城。至是，继勋以怠于守御，为其所败，我之洞屋悉为贼所焚。”再加上连旬天降大雨，粮草运输跟不上，周军士气被消磨殆尽，军事管理一片混乱，逃亡事件不断发生。因为柴荣的大符皇后得病，柴荣必须回汴梁一趟，但李重进等人继续守在寿州城下，陪刘仁贍折腾到底。

寿州城始终拿不下来，周军在沿江招讨使向训的安排下，所有在淮南的主力悉数撤出所在城池，全部集中于寿州。只要拿下寿州，一则能沉重打击南唐士气，二则再战淮南无后顾之忧，这也是柴荣同意的。

这招对刘仁贍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由是周兵皆聚于正阳，而寿州之围，遂不可解。终失淮南”。而李璟则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又调集五万大军，再次援救刘仁贍。

这支南唐部队行军迅速，很快就抵达了寿州城外的紫金山下。李璟与刘仁贍都知道，这将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救赎，一旦再败，一切都无再挽回之机。

很遗憾，虽然柴荣不在现场，但周军主将个个都是虎狼之辈，向训、张永德、李重进都是人中龙凤，显然不是南唐那伙饭桶可以相比的，虽然南唐军中也有林仁肇这样的名将。

此时柴荣已经返回前线，并带来了数千人的水军部队，极大地丰富了周军的作战选择。显德四年(957年)三月初二，柴荣率大军渡过淮河，与向训等人会合，准备与南唐军决战。

南唐军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保障寿州城的吃饭问题。南唐军修建了甬道，准备通过甬道向城中送粮。但就在甬道即将挖到城中时，被周军发现，李重进自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大刀阔斧之后，南唐甬道被彻底破坏，还战死了五千人。

即使如此，南唐军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柴荣未必有把握一战胜之。但没想到南唐大监军陈觉的奸臣病又犯了，猜忌大将朱元，暗中上书诋毁朱元，李璟决定拿掉朱元。朱元见李璟如此昏庸，一怒之下，率队投降了柴荣。朱元是南唐名将，他的倒戈，极大地挫伤了南唐军的斗气。柴荣趁热打铁，于三月初五的清晨，在紫金山下对南唐军发起了总攻。

南唐军已经斗志涣散，周军则士气高昂，结果不问可知。南唐军惨败，死伤万余，剩下的四万人沿着淮河南岸向东疯跑。周柴荣亲自率军狂追二百里，除了把一部分唐军挤进河里淹死，其他唐军悉数投降。

紫金山之战的结果，已经病入膏肓的刘仁贍看在眼里，他没有任何表情，他知道有陈觉带队，早晚会有这一天。

柴荣收拾了南唐援军，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与刘仁贍对话了。柴荣再派人入城告诉刘仁贍，劝刘仁贍“自择祸福”，但刘仁贍态度明确——宁死不降。谁敢议降，斩！

刘仁贍的儿子刘崇谏不想陪老爹殉国，暗中出降周军，结果被巡逻部队抓到，送回刘仁贍面前。刘仁贍恼羞成怒，不顾将士们的哭劝，毅然将儿子斩首示众，再敢降者，就是刘崇谏的下场！

刘仁贍大义灭亲，深深感染了已经饿到虚脱的南唐将士，都是男人，横竖是个死！

而柴荣此时又来劝刘仁贍投降。其实劝不劝，寿州城都已经指日可下。苦苦撑了一年多，饥饿、作战以及斩子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刘仁贍再也站不起来了，卧床昏迷不醒。

城中唐军知道打不下去了，在寿州监军周廷构和营田副使孙羽的倡议下，城中高层以刘仁贍的名义给柴荣写了降表，这一天是三月十

九日。两天后，柴荣以胜利者的身份，在寿州城下接受南唐军的投降。

柴荣终于近距离见到了让他为之心折的那位南唐名将。奄奄一息的刘仁贍是被周廷构派人放在床上，抬到柴荣面前的。柴荣对刘仁贍尽臣节非常感动，下诏褒奖刘仁贍：“刘仁贍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可比！予之南伐，得尔为多。”而就在当天，刘仁贍溘然长逝于他苦守一年多的寿州城。

满城尽哀。李璟得到消息后，再也忍不住，号啕痛哭，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寿州的丢失，导致淮南无险可守，即使唐军依然可以与周军大打出手，但在战略上，唐军是非常被动的。柴荣带着周朝军界的精英们，几乎是沿着淮河一路扫荡，克濠州，攻楚州，歼灭南唐主力无数。而等到了显德五年（958年）的时候，李璟实在撑不下去了。为了保住江南半壁，李璟只能向柴荣屈膝服软。

李璟求和的条件不可谓不重：一、自去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向周朝称臣。二、割让淮南十四州入周。李璟为了讨好柴荣，甚至不惜男人的尊严，称比自己还小五岁的柴荣为“父”。

苦战三年，柴荣终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州十四、县六十、户口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人口百余万。

周朝拿下寿州，南唐事，已不可为矣！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军事、政治、佛教改革篇

柴荣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人们并不太清楚的是，柴荣其实还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世人皆知赵匡胤篡位后对唐末五代以来的弊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矫正，实际上赵匡胤是在柴荣改革的基础上进行敲敲补补的，甚至可以说，在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之间，完全可以加入开北宋兴隆之局面的周世宗变法。

这是一场真正的触及社会根底的整体性改革，影响所及，震古烁今。而柴荣完成这一切，只用了区区五年半的时间。

柴荣最先进行的改革领域，是事关帝国安危的军队。而这场深刻影响宋朝历史的军事改革，其发端就是高平之战时，周右军樊爱能、何徽临阵脱逃，险置柴荣于死地。

高平之战，柴荣在江湖上打出了自己的威名，但同时，他发现了军队的积弊，特别是骄兵之弊。柴荣深知如果不改革军队，将来还会出现第二个樊、何，继续把自己当大礼包送人。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地方藩镇的兵权，流芳千古。但实际上，早在五代初年，有识之士就意识到地方兵权的下放是导致连年战乱、兵大爷祸害民间的根本原因，废除地方兵权并不是赵匡胤的天才发明。河东军队仗着有功于李克用，到处扰民，有人劝李克用整治军队，李克用叹道：“此辈胆略过人，数十年从吾征伐，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

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俟时开运泰，吾固自能处置矣。”而赵匡胤之所以能轻松地“杯酒释兵权”，其实就是赵匡胤处在了一个“时开运泰”的历史时期而已。换言之，是柴荣创造了赵匡胤可以轻松享受的“时开运泰”。

柴荣种树，赵匡胤乘凉。没有柴荣种树，赵匡胤只能晒太阳。

用文官取代武将管理地方州县，也不是赵匡胤的天才发明，早在南汉高祖刘^彧时代，刘^彧就用文官主政地方州县。而宋朝著名的知州制度，就是“权知某军州事”，早在南唐时就已经使用。南唐用文官代理节度使事，称为“知节度使事”，后来衍变成“知军州事”。解决地方兵权下放引发的骄兵问题，是一代代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一个人的功劳。

除了骄兵，当时军界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冗兵，即军队人数虽多，却战斗力涣散。冗兵的原因是老兵不退役，而军阀又不敢得罪这些人，只能任由他们赖在军中混饭吃。骄兵、冗兵最擅长的不是打仗，而是临敌卖主，石重贵就是这样被他们廉价卖掉的，柴荣也险些被卖掉，所以史称“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

军队已经到了不改革就会亡国灭种的地步，更何况柴荣志在统一天下，就必须打造一支铁血部队，所以军队改革势在必行。

在高平之战斩杀樊爱能、何徽等逃跑将校七十余人后，柴荣在汴梁宫中与大臣们议事，就明确提到裁减冗兵。柴荣认为，“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

轰轰烈烈的军队改革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柴荣裁撤掉老弱残兵，这些人除了吃空饷百无一用。然后招募强壮的农民进来顶替名额。在新兵入伍后，柴荣实行了“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的竞争制度，谁有本事谁吃肉，没本事的淘汰出局。只有竞争才会生产出

优质产品，其实部队也是一样。

除了在部队内部进行竞争，柴荣认为最重要的军事改革，就是把募兵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绝不允许由地方政府募兵。同时，柴荣还制定了对宋朝历史有直接影响的禁军实卫京畿的制度，即把地方部队上的精兵全部上调中央禁军，实行“强干弱枝”。在过去，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战斗力相当，所以地方军经常打败中央军，但自强禁军而弱地方军后，地方藩镇再无力对抗中央政府，这就斩断了藩镇割据的基础，为后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打下良好的基础。

“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柴荣进行军事改革后的成果的经典评价。而《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对柴荣整军的记载更为精确：“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

宋人经常歌颂赵匡胤罢地方兵权，为安稳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这是柴荣的杰作。

从时间上看，柴荣在军改之后，紧接着进行的是政改。在封建政治体制成熟运作的情况下，柴荣不可能进行触及社会根本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增益。因为受篇幅限制，这里只讲柴荣对人才的重视问题。

特别是在五代乱世，一些奸猾官员把持朝政，真正的才学贤士上不来，最终损害的还是政权利益。柴荣求贤若渴，在显德二年（955年）春，柴荣就下诏求贤。历代帝王都会求贤，但有人只是在演戏，有人则是动真章，柴荣显然是后者。与其说柴荣求贤，不如说是柴荣

命令省府各司官员去寻贤，而且柴荣也直接告诉大员们：这是完不成就必须受到惩罚的政治任务！

“应在朝文资官翰林学士两省官内，有曾历藩郡宾职州县官者，宜令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务在强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已曾任令录，亦许称举，并当擢用。不拘选限资叙，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只须举状内具言。除官之日，仍署举主姓名。若在官贪浊不公，懦弱不理，或职务废阙，或处断乖违，并量事状重轻，连坐举主。”

大意是曾经在地方上任过职的中央文官们，每人至少推荐一位贤人，条件是“强明清慎，公平勤恪”，至于身世背景不限，即使是近亲也无妨。但如果这个人在当官之后，朝廷发现此人昏聩糊涂，甚至贪污腐败时，那就严厉追究举荐者的政治责任，谓之“连坐”。

除了逼官员们举贤，柴荣还颁诏内外，各级官员以后都可以随意上章，直接评论柴荣本人的为政得失，这也是政治任务。“应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方求名实，岂尚虚华，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没有山海一般的度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柴荣同时还要求官员们在外办事时，体访当地民情，回来后具本上奏，“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这样有助于柴荣更好地施政。

柴荣不是一个自负的君主，他从来不会说自己是高大上无所不能。柴荣为人谦逊谨慎、待人真诚，他深知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每次施政都要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利弊，而不是头脑一热，自称当代佛祖，乱开药方。

说到佛祖，自然就会引入有关柴荣与宗教有关的著名事件。

佛教史上有一个著名典故，“三武一宗法难”，说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四位帝王曾经无情地打击过佛教。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的就是周世宗柴荣。

三武反佛，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三位帝王都信奉道教，所以他们自然会排斥佛教。宇文邕和李炎行事还算温和，只拆寺庙不杀人，而拓跋焘非常干脆，把国内的和尚尼姑全都杀光了。

柴荣和佛教本无瓜葛，为什么他突然会把“改革屠刀”伸向佛教？原因很复杂，综合来说，佛教自东汉引入中国，在南北朝时就成了中国的主流宗教，进而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四处捞钱，圈点耕地，禁锢劳力，甚至用铜器建造佛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财政的困难。在柴荣当政时，周帝国境内竟然存在着三万三千零五十四座寺庙，后周有九十州，平均每州有寺庙三百多。寺庙多，必须占用大量耕地和大量劳力，而这些都是政府税收的来源。更要命的是，寺庙占有耕地和劳力，却不用向政治交税。柴荣当皇帝，那是要花钱的，没钱谁跟你玩？钱都让和尚们捞了去，不找和尚们要钱，让柴荣喝西北风？史称周朝“久不铸钱”，根本原因还是缺少铜料。

显德二年（955年）五月，柴荣终于对佛教举起了“屠刀”。

首先，柴荣削减了寺院的数量，只保留“敕额”的寺院，凡无“敕额”者皆取缔。敕额即朝廷官方颁赐的寺院匾额，这是官方承认的合法寺院。“退寺还耕”，收回这些寺院所圈占的耕地。不过柴荣取缔了无敕额的寺庙，但还允许这些寺庙的僧尼继续住在原寺庙里，这一点非常人性化，而不是一拆了之。经过整治后，周朝的寺院只剩下二千六百九十四座，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

其次，禁止有敕额的寺院在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私度僧民，与政府抢夺社会劳力。与此同时，政府规定凡是想出家的年轻人，必须得到直系亲属同意其出家的书面证明。得到同意之后，必须接受严格的佛教理论考试。当时规定，和尚“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才能出家，尼姑必须是“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

三百纸者”。凡是没有经过考试就出家的，政府一律不承认其僧尼地位。为防止有人混入寺院，政府在每座寺院都造花名册，政府一本，祠部（属礼部）留一本，每年四月都要进行检查。册上无名的僧尼，都要强行还俗。

再次，所有寺院在五十天期限内都必须交出政府不承认的铜铸佛像器物，由政府铸钱。当然这不是政府抢劫民间财富，而会用同等价值的物品交换，不会让僧人吃亏。但如果不交者，五斤以上就要杀头。

最后，政府还禁止和尚、尼姑们进行迷信的街头表演，如“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如“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柴荣向来反感这些封建迷信，一律禁止，其实这也是爱护僧尼的表现。

柴荣对佛教进行改革后，寺院逐渐回归其宗教性的本真，同时政府回收了大量土地、铜料和劳动力，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周朝的国力。

不过有些信奉佛教的大臣担心柴荣对佛不敬，会遭到佛祖现报。柴荣对大臣们说了一段非常真挚感人的话：“卿等勿以毁佛兴利，而有难色。夫佛圣人也。广其善道，以化人心，心能奉道，佛则不远。存其像也，非重佛之至也。行其道乃奉佛之深也。今兴利所以济人也。济人即佛道也。况闻大圣舍头目之喻。若朕身可济民亦将不惜也。”

柴荣心中有佛，亦有百姓，而不像有些帝王，心中只有他自己。司马光对柴荣的爱佛爱民善行大加称赞：“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虽然佛教界有些观点认为柴荣不敬佛，所以最后遭到了报应，实际上不过是一些人对柴荣收回寺院特殊利益的不满发泄，不足为信。

否则，梁武帝萧衍舍身为佛奴，对佛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又怎么会饿死于台城？

因为周世宗“毁”佛在历史上名声太大，柴荣对佛教的礼敬反而不太为人所熟知。柴荣伐北汉时，就在团柏谷的寺院里拜谒了佛像，并赐住持僧人紫衣。显德元年（954年）九月，柴荣将潜龙宫改建成皇家禅院。齐州（今山东济南）僧人义楚向柴荣进献了佛教书籍六帖三十卷，柴荣“览而嘉之”，赏赐义楚，将书籍付藏于史馆。显德四年（957年）十月，柴荣给京城汴梁新建的四座寺院题写匾额，赐名天清寺、显静寺、显宁寺以及圣寿寺。显德五年（958年）四月，柴荣从淮南前线回京，游览泗州普光王寺，赏赐给僧人帛绢。六月，柴荣从内府仓库中拿出衣服六百件、四十万钱，由僧人出面修建寺院。

世上岂有如此“毁”佛者？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土地、货币、工商业改革篇

唐末五代以来，首先，天下战乱不止，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其次，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不向朝廷交税，这两点都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量减少。先说第二点。

柴荣深知土地问题是政权的基石，土地问题不解决，帝国大厦没有地基，随时可能崩塌。因为五代十国的大地主多是军阀、立军功者，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帝国安危，所以柴荣暂时没有动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但还是想办法从他们兜里掏钱。柴荣的办法是：取消所有权贵的免税特权，不管你是谁，你只要占有土地，就必须向朝廷纳税。柴荣在地方上派驻“苗使”，清查土地亩数，然后按亩收税，甚至是至圣先师孔子所在的孔庙，也要交税，一个铜子也不能少！

“历代以圣人之后，不预庸调，至周显德中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

敢向孔子收税，敢与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彻底决裂，柴荣前无古人。

显德五年（958年）十月，柴荣派遣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行前，柴荣把自己对土地的态度告诉艾颖等人：“夫国以民为本，本立则国家安。朕以近代以来，赋租不等，贫者抱虚而无告；富者广植以不言。州县以旧额为规，官吏以相承为准。须行均定，用致苏舒。卿等宜正身莅事，副朕兹意。仍与逐处长

吏和顺商榷。但务从长共集其事，无使朕之赤子枉罹于峻法也。”

柴荣的态度再明确不过：绝不允许让少数人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享福，无论他们的口号多么响亮。在少数衣冠楚楚的达官权贵与衣衫褴褛的穷苦百姓间，柴荣毫不犹豫地站在穷人中间。

柴荣出身穷苦，他知道底层百姓生活不易。但要安抚百姓，其实在柴荣并不难，因为战乱连年，导致大量土地荒废，可以让百姓种地。在柴荣的主导下，政府规定，农民可以向政府申请耕种土地，称为“请射”，政府在审查合格后，把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

这些土地以前都是有主的，只是在战乱中或死或逃，如果旧主回来要地，怎么办？柴荣天才地想到了一个办法。

显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柴荣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內本户来归者，其庄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如五周年內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內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內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大意是旧主在三年内回来，则交还一半，余者为请射者所有；五年之内回来，交还三分之一；如果五年內不回，则失去土地所有权，不过旧主的坟墓不在此例；而对于逃到境外的土地旧主，柴荣则把期限放宽至十五年內。

但这里还有可能产生一个问题，谁敢保证申请耕地的人不是在冒充旧有逃户？针对这个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柴荣特别规定，一旦有人冒充逃户诈领耕地，旧主回来，则该人无条件丧失土地使用权，没有年限限制。

更难能可贵的是，柴荣还考虑到老百姓文化水平较低，把诏书写得天花乱坠，百姓未必看得懂，会让一些官员钻空子，进而影响到土

地政策的施行。所以柴荣在诏书上用的都是极为浅显的白话。南宋人洪迈称赞柴荣此举：“今观周世宗显德二年射佃逃田诏敕，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

农民有了耕地，就会生产出粮食，政府可以在夏天和秋天两次收粮，称为夏税和秋税。但有些官员经常在交税期限没到就上门收粮，百姓怨声载道，柴荣在显德三年的十月下诏：“今后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征，永为定制。”而有时土地歉收，柴荣还会下诏减免税粮。《册府元龟》记载，柴荣在位的五年半时间内，就先后推行十次税收减免，平均半年一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接下来简单谈谈柴荣的货币改革。

因为战乱原因，五代自周之前，已经很少烧炉铸钱了。柴荣就说过：“近朝已来，久绝铸造。”因为钱太少，所以市场上主要还是流通唐朝的钱币，以开元通宝钱最为通行。柴荣深知没有钱就没有活路，为了帝国能活下去，柴荣宁背千古骂名也要铸钱。

显德二年（955年）九月初一，柴荣正式颁布了《令毁铜器铸钱敕》：“国家之利，泉货为先。近朝已来，久绝铸造。至于私下，不禁销熔，岁月渐深，奸弊尤甚。今采铜兴冶，立监铸钱，冀便公私，宜行条制。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应两京诸道州府铜象器物，诸色装铍所用铜，限敕到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其私下所纳到铜，据斤两给付价钱。”

铸钱，首先得有大量铜料。柴荣除了从寺院里征收铜佛像，还规定民间除了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铜器，如铜盆之外，不允许私存铜器，所有铜器必须在五十天之内上交朝廷，由朝廷按照铜器价值合理补偿，逾期不交者，自有国法限制。

周朝的铜禁法比较严，私藏铜料一两至一斤者，并知情者处罚两

年有期徒刑，辖区官员和邻居领七十杖刑，举报人赏铜钱十贯。如果私藏铜料逾一斤而不满五斤，相关人员各徒三年，官员等打九十杖，举报人得二十贯。如果超过五斤，私藏者斩，其他有罪人员杖一百，赏举报人三十贯铜钱。

为了引导老百姓上交铜器，柴荣采取了赎买政策，绝不会动用枪杆子去抢老百姓的财富。根据相关规定，百姓如果把私藏铜器主动上交，则每斤熟铜政府补贴一百五十文钱，每斤生铜补贴一百钱。

到了显德四年，柴荣又推出收铜新政策。新政将原来的每斤二十两制，下调为每斤十六两，这样有利于百姓创收，不至于因上交铜器而吃亏。

更让人感动的是，柴荣知道百姓生活中不可能离开新的铜器，便设立了国家铸铜厂，打造铜盆铜镜，然后在京城成立铜器市场，方便百姓购买。同时政府也允许百姓在铜器市场上批发铜器，然后到地方上贩卖，赚取差价。

与此同时，柴荣也积极开展与国外的经济贸易，用中原的丝绸换取高丽国的铜料，所获甚丰，而在显德六年，高丽王王昭就送给柴荣五万斤铜。

手上有了铜料，柴荣就可以大规模烧炉铸钱。政府有了钱，就可以稳定社会、稳定军心人心，天下大定，因此，柴荣积极的货币政策是立了大功的。

接下来再讲一讲柴荣有关工商业的改革。

有一个观点深入人心，即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最为繁荣发达的时代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这点并不否认，但宋朝工商业的发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上承唐末五代十国工商业爆炸式发展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无论谁在周朝之后建立新朝，工商业都会照常向前发展。

安史之乱以来，黄河流域饱受战乱之害，土地、人口流失严重，而江南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小，工商业发展更为迅猛。五代初期，因为财政紧张，政府有意搜刮天下。比如唐庄宗李存勖就任命大财迷孔谦为租庸使，在大小道路上设官方税务机构，务必雁过拔毛、人过留钱，一只蚂蚁也不能放过！

柴荣继位后，深知工商业之利弊，必须对此进行改革。柴荣非常反对官府在本属于全民资产的公路交通设卡拔毛，他在显德五年（958年）六月，就下诏规定：“应有商贾兴贩牛畜者，不计黄牛、水牛，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过往牛只向来是政府抽税的大头，柴荣取消了过牛税，在很大程度上繁荣了商贸流通。如果牛商就地进行贸易，柴荣同时规定税务机构每次只能向交易双方征收百分之二的利益，“如是货卖处，只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二十，不得别有邀难”。严厉禁止乱收费。牛只不收税，推而广之，羊、驴、狗、鸡、兔子也自然都取消了过路费。

除了过牛税，柴荣还取消了酒禁与醋禁，允许百姓自由生产买卖酒醋。五代（除后周）最为开明的朝代梁朝就曾允许百姓私下酿酒，“听诸道州府百姓自造曲，官中不禁”。但到了后唐，虽然也不反对，但却规定每亩必须交纳所谓的曲钱，与夏秋两税同时上交。柴荣对此非常不满，显德四年（957年），柴荣规定：“罢先置卖曲都务，乡村人户今后并许自造米醋。”都说宋朝具有市场经济雏形，实际上唐末五代哪个也不是计划经济。

酒醋其实未必就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但谁都不可能离开食盐，所以盐务改革是柴荣全面经济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历代都对盐实行官营官卖制度，严厉打击私盐贩子。而到了五代后汉，制定了堪称历史上最为严厉残酷的盐法，即使只贩一粒盐，抓住也要砍头，百姓对此意见非常大。郭威建政后，下调了贩私盐者处死的标准，即贩五斤盐以上者才杀头。

当时的食盐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盐池产的盐，称为“颗盐”或“监盐”；另一种是海盐、井盐或碱水煮盐，统称为“末盐”或“散盐”。末盐的重要性不如颗盐重要，原因是海盐距离内地路途遥远，交通运费成本太高，而颗盐产生就在河东的解州，运输方便。

柴荣刚继位时，就规定距离海边较近的曹州、宋州以西十余州弃末盐而用颗盐。柴荣这么做，主要还是考虑末盐的运输成本，毕竟初建国时，国家财力不丰，当时柴荣还没有收缴寺院及民间铜器并铸钱。曹宋以西改用颗盐也是无奈之举，柴荣在改革时从来都会给改革利益受损者留活路的，不像有些改革直接把人逼上绝路，还美曰其名以大局为重。曹宋以东诸州还可以继续买卖末盐，不至于让末盐产户活不下去。

除两盐之外，还有两种盐税形式，即蚕头盐与察头盐。

先说蚕头盐。蚕头盐是指政府把食盐借给农民，然后等到每年蚕丝上市，农民把之前的盐税折成丝绸再还给官府，也就是说政府借盐，收回的却是丝绸。蚕头盐因为涉及国家经济命脉，所以周朝官府对蚕头盐管控非常严，“诸州府人户所请蚕盐，不得于乡村衷私货卖，及信团头、脚户、县司、请盐节级、所由等克折柴卖，如有犯者，依诸色犯盐例科断”。换句话说，蚕盐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但柴荣在蚕头盐的改革上做得有些冒进，他规定沧、棣、滨、淄、青五州农户，无论年收入多寡，都要交相同数量的蚕头盐，即绢一匹。不过后来柴荣觉得一匹绢对收入高的农民太少，又把蚕头盐税提高到两匹，但却没有考虑收入小的农民负担更重了。但相对于宋朝的蚕头盐制度，柴荣已经对得起农民了。宋朝拒绝把盐借给老百姓，却依然强行征收蚕头盐，“自是诸州官不贮盐，而百姓蚕盐岁皆罢给，然使输钱如故”。宋朝所谓的经济繁荣、国库充盈，大抵都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抢过来的。

还有就是察头盐。察头盐是指政府在每年秋播时把盐卖给农民。

不过察头盐价格较高，无论家庭收入多少、是否有天灾人祸，每户都要收察头盐三千文钱。柴荣觉得这样做极不合理，在显德三年时，柴荣废除了这一规定，改为每石盐交一千五百文，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城建、治河篇

前面在《盱眙宵夜，礼贤从谏——明君石敬瑭》中提到过，石敬瑭把国都从洛阳迁往汴梁，正式拉开了汴梁城作为中原政治中心长达二百年的序幕。但石敬瑭时期的汴梁城，非常得狭小拥挤，还不能算是国际一线大城市。而真正让汴梁城飞上枝头做凤凰、成为东方世界中心的，还是几乎无所不能的柴荣。虽然宋朝历代诸帝都曾经扩修过汴梁城，但他们只是修修补补，柴荣则真正奠定了北宋二百年繁荣汴梁城的基石。

柴荣认为他接手的汴梁城，“人物喧阗，闾巷隘狭，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热相蒸，易生疾疹”，城市狭小拥堵，一旦发生重大灾情，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而为了避免天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建城市，把人口稀释在巨大的地理空间中。

显德二年（955年）四月十七日，柴荣对外颁布《京城别筑罗城诏》，正式拉开了扩建汴梁城的大幕。这道诏书具体讲述了扩建汴梁的原因：“东京华夷臻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隘，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添增不定，贫阙之户，供办实艰。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

不过当时并没有动土，原因有两点：一是此时是农忙时节，柴荣不想耽误农民务农，想等到农闲时再动土；二是城外还有很多百姓祖

坟，需要给百姓时间迁坟，但条件是新坟要迁到距离新城以外七里。

特别是迁坟问题曾经遭到了很大非议，有人认为柴荣太不近人情，甚至骂柴荣无道。柴荣知道后，对大臣们感慨地说：“朕岂不知修城死人、活人都要受影响，但尔等谁又能理解朕的苦衷？有些人骂朕，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显德三年（956年）正月初四，农闲时节，柴荣一打南唐之前，正式下达了扩建令，“发开封府、曹、滑、郑州之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京城都巡检韩通出任新城区建设总指挥，左龙武统军薛可信、右卫上将军史侁、右监门卫上将军盖万、右羽林将军康彦环分督四面。

十几万人的日夜辛劳没有白费，一座雄伟的汴梁新城骄傲地伫立在黄河南岸的中原大地上。

汴梁新城区的面积非常大，比旧城面积大了四倍，面积二十五平方公里，周长“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即周长二十二公里，比旧城周长扩大了四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座新皇都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还有非同寻常的军事意义。根据清朝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的记载：柴荣用虎牢关的土奠基汴梁新城，“坚密如铁”，蒙金大战中，蒙古大将速不台攻打汴梁，“用炮石昼夜击之，不能坏，乃因外壕筑城，围百五十里，昼夜攻击，竟不能拔按”。坚固的汴梁城，对后来北宋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金人攻汴极为艰苦，这未始不是柴荣之功。而北宋之亡，是亡于北宋主赵佶的昏庸无道。

柴荣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几乎百年不用修缮的坚固城池，而下一次大规模扩建汴梁，则是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古代建筑水平较低，而一座城市建筑使用六十年没有大修，说明柴荣主建的这座开封新城是一座负责任的良心工程。

一座新城是不是良心工程，一则看它的建筑质量，二则看是否照顾到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在第二点上，柴荣做得非常好，他从来也没有忘记百姓的利益。

在新城刚扩建时，柴荣就宣布除了官方征用的用来盖房子的土地外，其他土地任由百姓们建房，政府绝不强拆。再者，新城只是面积扩大了，但城中的街道布局并没有大的变动，依然狭窄，而且道路弯曲如盘山道，不利于百姓安居和交通出行。柴荣再出大手笔，把这些盘山道全部拆掉，改成宽阔的直道，分为二十五步、三十步、五十步三种标准的直道。街道拓宽了，但路两边却光秃秃的，影响城市美观。柴荣下令让百姓在街道两旁种树植花，甚至还可以挖水井，搭凉棚，留作夏日避暑之用。

说到汴梁城扩建工程，就不能不提宋朝以汴梁为中心繁荣至极的市民商业文化。很多观点都认为宋朝是中国市民商业文化的起点，实际并非如此，早在唐朝安史之乱后，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市民商业文化。宋朝流行的酒肆文化、庙会游街，在唐末五代就已流行，只不过发展到宋朝集大成而已，并非宋朝一代之功。甚至宋朝酒楼流行的城面装饰，都是上承后周时的商业发展。“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梔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郭威）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今店家仿效成俗也。”

说完了城建，再来说说柴荣在治理水患上的突出成就。

而历代治理河患，其实主要都是指治理黄河，黄河水患向来是困扰历届政府的大问题，柴荣也不例外。

黄河水患，主要是黄河中的积沙太多，从黄土高原东下时，卷杂着大量的泥沙，等流到河南、山东的平原地带时，河床上的积沙越积越多，最终导致黄河水位上涨而决口。

隋唐五代时期是黄河水患的爆发期，特别是五代。隋唐五代都有

黄河决口四十三次，存在三十八年的隋朝决口四次，存在二百八十九年的唐朝决口二十一次，而存在仅仅五十三年五代则决口十八次，平均三年决口一次，这个比例是非常恐怖的。而到了周朝显德元年（954年）下半年，黄河在杨刘镇（今山东东阿以北六十里）至博州一百多里河段爆发规模空前的洪灾。因为这里是平原，黄河在杨刘决口之前，卷杂着泥沙冲袭千里平原，淹没了齐、棣、淄、郛、青等州，夺路东奔入海。这场洪灾“滥坏民庐舍，占民良田，殆不可胜计”。

刚刚继位不久的柴荣在第一时间就派人去善后杨刘洪灾，但效果均不太理想。柴荣向来注视百姓安危，他派宰相李穀去灾区善后。李穀是一代横平天下的名臣，同时也是治河名吏，在李穀主持下，政府征募了六万民工，不分昼夜地固堤堵漏。用时一个月，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终于修固了黄河堤坝。

基本上稳定了黄河水患，柴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汴河动大手术。

其实汴河治理和修建汴梁新城是一个配套工程。柴荣扩建汴梁城的目的是要把汴梁打造成天下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而当时汴河久塞不通，不利于大型船只来到汴梁进行贸易，所以欲扩建汴梁，必浚通汴河。

汴河就是那条由隋炀帝杨广修建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著名人工河流，起于黄河汴口，于泗州入淮河。汴河最大的意义就是商品流通，江南货物通过汴河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黄河流域的两京长安与洛阳，保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但到了唐末大乱，淮南王杨行密为了阻止朱温南下，刻意堵塞了汴河，结果汴河流域都成了泥沼地，“唐末杨氏据淮甸，自埇桥（今安徽宿州埇桥）东南决汴，汇为污泽”。

从唐末到周朝，历经六十余年，汴河淤泥越积越厚，完全不利于

航行。而且当时柴荣正三打南唐，如果从汴河运输物资要比陆运更快，所以浚通汴河成了当时的重中之重。

显德二年（955年）十月，柴荣命驻徐州的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动当地民工，在汴河埇桥至泗上的旧河道上进行清淤。不过当时就有反对声音，但柴荣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告诉反对者：给朕两三年，朕让你看到一条千帆竞发的新汴河。

显德五年三月，柴荣再次征调民工浚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从这一年开始，长江流域的大型船只可以通过淮河转入汴河直抵汴梁，真正实现了南北河道大动脉的畅通。后来柴荣又在汴梁城东郊修建了一条起于汴梁，终于蔡河的人工河道，彻底打通了河南地区的漕运通道。

浚通汴河的成效如何，一贯反柴荣的北宋享受型和尚文莹在《玉壶清话》中有详细记载：“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北宋仁宗时期）楼尚存。”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城之所以繁荣甲天下，根本原因就是柴荣的扩建汴梁城，以及浚通汴河，这份功劳是属于柴荣的，北宋帝王只是坐收渔利。

河南地区的水运交通网建成之后，柴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打通河南与山东的水路运输线，降低两地贸易往来的运输成本。

显德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柴荣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疏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其实就是挖一条人工运河，直达山东境内的黄河，而这条人工河，就是著名的五丈河。五丈河的开通，极大便利

了山东与河南的贸易交往，“至是齐鲁之舟楫亦达于京师矣。万世之利，其斯之谓乎！”

至此，周朝境内的水路运输网已经基本建成，但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航运新政，也会打击商业领域的信心。所以柴荣在通河之后，紧接着就出台了各项有利于航运的新政策。

从外地经河道运送物资抵达汴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物资漏损的情况，这在官方文件上称为“斗耗”。五代后汉以前，历代政府都允许“斗耗”的存在，但后汉为了捞钱，废除了“斗耗”，规定一文钱的斗耗都不允许存在，从甲地运出多少，到了汴梁就必须是多少。否则严厉处罚相关人员，以及强令甲地官府补偿所谓的斗耗漏损。“亡身破家，不可胜计。”

柴荣非常反感后汉政权几乎是毁灭性的经济政策，他在显德二年与大臣们议事时就提到斗耗问题。“仓廩所纳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即地方上所运货物中，每一石可以有一斗的损耗率。

与民无争，柴荣说得出，也做得到。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刑法改革及文化改革篇

这一篇讲的是柴荣的刑法改革和文化改革。

五代的刑法体系，实际上是唐朝刑法体系的延承，而五代各朝都非常重视刑法体系建设。梁有《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一百零三卷。后唐有《同光刑律统类》十三卷，后晋有《天福编敕》三十一卷。后汉没有专门的刑法典，但后汉的刑法是五代最为严酷的，这也是后汉四年短促而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郭威建周后，一改后汉残酷旧习，推行宽仁之政，颁布了《大周续编敕》三卷十六条，附在了晋《天福编敕》之后。柴荣即位，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南征北战上，直到显德四年（957年），柴荣才开始动手对刑法进行改革。

柴荣特意研究了前朝的刑法条文，发现这些刑法条文过于繁杂，而且文意深奥，当时教育普及不广，百姓们根本看不懂，这不利于司法普及，却方便“贪猾之徒”钻法律空子。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五代用的刑法是一百多年前的唐《开成格》《大中统类》以及前四朝的刑法，已经不适用于柴荣所处的时代。“有轻重未当，便于古而不适于今。矛盾相违，可于此而不可于彼。”

柴荣下诏，让尚书省四品以上、中书省和门下省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御史台官员在尚书省参加司法改革的大讨论。显德五年（958年）七月，大臣们终于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刑法系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周刑统》。

《大周刑统》对宋朝的刑法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赵匡胤篡位后编撰的《宋刑统》三十卷，其实不过是抄袭《大周刑统》而已，并没有什么新意。

可惜的是，堪称唐五代宋法制史上大百科全书的《大周刑统》并没有留传下来，但在侥幸残存的几篇刑法条文中，依然可以看出周朝法律的先进与人性化。

比如周朝规定司法部门审讯犯人不得滥用刑讯。显德五年（958年），柴荣下敕：“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杖十五；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谁打死了犯人，谁就要受到行政处罚。

周朝刑法最先进的一条，应该是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的盗窃类犯罪行为的三次改过制度。所谓三次改过，就是政府给盗窃犯三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不问赦前后、赃少多，并决杀”。偷一次，坐牢悔过；偷两次，坐牢悔过；偷三次，哪怕只偷一文钱，杀！柴荣的逻辑非常清楚：我给了你两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你都置之不理，那么朕不会再给你第三次机会。

柴荣对犯人非常严厉吗？其实不是，柴荣有一点其实做得非常好，那就是他非常尊重犯罪分子在监狱中的人权。甚至可以说，犯罪分子在周朝监狱中的生活是幸福的，某种程度上，周朝罪犯的生活水准要强于被美化过度的宋朝百姓，至少他们不会饿肚子。

显德二年（955年）四月二十五日，周朝政府对外颁布《供给无家罪人水米敕》：“应诸道见禁罪人，无家人供备吃食者，每人逐日破官米二升，不得信任狱子节级减消罪人口食。仍令不住供给水浆，扫洒狱内，每五日一度洗刷枷杻。如有病疾者，画时差人看承医疗。”

柴荣力推公文普及化，一千年后的人们也能轻松看懂其意。柴荣要求监狱必须保障家庭贫困的罪犯的饮食起居，每人每天至少要吃上官米二升，相当于现在的三斤，还有干净的饮用水。如果确定罪犯家中无人，则供养待遇更高，达到每人每天三升米。如果罪犯得了病，监狱必须无偿救治，不得推诿扯皮，一切费用均由政府开销。

犯罪分子进了监狱“享福”，苦的却是监狱管理人员。宋朝的牢头们可以吃香喝辣，打死人如碾死一只蚂蚁，如神行太保戴宗。但周朝的牢头们却叫苦连天，他们不但无法享福，反而要把犯人当大爷伺候。根据周朝的监狱管理制度，牢头们每天都要主动打扫狱舍，保持清洁卫生，防止疾病流行，甚至还要每隔五天给罪犯清理木枷一次。想当狱霸，在柴荣时代想都不能想，完全没有可能。

有时怀疑柴荣真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穿越过去的，因为柴荣的很多司法措施甚至比现代司法制度还要先进，更人性化。

柴荣严厉打击犯罪，其实他更看重预防犯罪，而要预防犯罪，必须打造全社会参与的群防群治体系。因为处在小农经济社会，所以在农村打造天网体系迫在眉睫。显德五年（95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柴荣颁诏，规定“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每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大意是每一百户居民成立一个“团”，每团选出三名在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做耆长，每三年一届。政府不过问耆长的人选问题，由当地居民自行选举。

这样的举动，一则涵盖了现代民主自决制度；二则提倡群防群治，因为耆长的任务除了替政府收税，还负责“察民家之有奸盗者”，各耆长之间互通有无，一旦发现问题，立刻启用联保机制，保障了各辖区内的治安。

如此先进的司法制度，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时代，几乎是不

可思议的。但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这是柴荣做出来的决定，柴荣是罕见的天才，这一点是无可否定的。

利用最后一点篇幅，讲一讲柴荣在文化建设上的贡献。

有一种说法流行古今一千年，说五代十国的文化天空是黑色的，而宋朝的文化则空前繁荣灿烂。

宋朝的文化真的是空前繁荣吗？繁荣则有之，空前则未必。首先，宋朝文化就不可能超越奠定中华民族文化思想体系的春秋战国。再者，宋朝文化繁荣也不是宋朝一代之功，而是上承历代文化发展之集大成，比如没有唐诗，又何来宋词？

而有些宋朝人为了提高本朝的文化贡献，刻意抹黑五代十国的文化，把五代十国的文化贬得一文不值。比如那个反柴荣而吹捧宋朝的南宋人洪迈先生，他在《容斋随笔》中就攻击五代文化，“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版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子遗”。但洪先生只顾过了嘴瘾，却无意中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这近两千种图书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五代十国的文化遗存？而就是一千六百九十种图书，在号称文化空前繁荣的承祚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王朝又是什么待遇呢？到了南宋初，这些图书居然丧失了百分之七八十，这实在是个巨大的讽刺。洪迈先生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

好在还有些客观对待历史的宋人，他们从来不否认五代的文化建设。比如北宋初年，撰写《唐文粹序》的姚铉就说过：“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而《唐文粹序》成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可以这么说，1690种图书亡于“文化空前繁荣灿烂”的仁宗至徽宗时期，这不得不说又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

其实五代各朝对文化遗存的保护是非常有力的，即使是最为残暴

的后汉政权，也对贡献图书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郭威登基后，在广顺三年（953年），命国子监祭酒田敏印刻儒家典籍共一百三十册。而柴荣即位后，则发现官方保存图书的数量非常少，他引以为憾，并在民间“锐意求访”，只要有民间人士向官方赠送图书，都会大加赏赐，“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再加上皇帝锐意兴文，也感动了大量民间藏书者，他们把自己深藏的图书献给官府。政府官藏的图书数量激增，为了防止图书在保存传抄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柴荣专门调派三十名文化工作者，负责对民间进献图书的审稿校定。而为了让这三十人不偷奸耍滑，柴荣规定这些人员在每篇文章的最后都要署上自己的职务、姓名，一旦发现问题，立刻追究他们的责任。

宋初时人向来都承认柴荣之于文化建设的贡献，比如柴荣曾经让国子司业聂崇义编撰《三礼图》三十卷，但等到赵匡胤篡位后的北宋建隆二年（961年），聂崇义才完成工作，赵匡胤嘉奖聂崇义。当时人就将柴荣与赵匡胤一并吹捧：“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尧、舜之典则，总夏、商之礼文。”

柴荣在位时间非常短促，但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等到宋初，国家图书馆就藏有图书一万多册，“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这是《文献通考》的记载，《宋史》同样记载“宋初，有书万余卷”。

这些贡献，当然是柴荣以及柴荣之前的历代文化建设的成就。

宋朝文化成就突出，不代表以前的朝代什么都没做，这是不客观的，更是不公平的。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有关北伐契丹的话题

在五代北宋与契丹的交往史上，周世宗柴荣北伐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五代北宋共有三次针对契丹的大规模北伐，即周显德六年（959年）的周世宗柴荣北伐，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雍熙三年（986年）由宋太宗赵匡义主导的两次北伐。赵匡义两次北伐均遭空前惨败，历史早有定论；而柴荣北伐虽然夺下三关，并震撼契丹人，但并没有遇到契丹主力，再加上柴荣突然暴病撤军，所以历史上对柴荣北伐争议非常大。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初一，柴荣的左膀右臂王朴在外视察水利时突然去世，柴荣痛不欲生，以玉斧击地，痛哭苍天奈何夺我良臣。而十八天后，三月十九日，周世宗柴荣非常意外地向天下宣布，王师即将北伐契丹，目标是收回被石敬瑭廉价出卖的中原天险——幽云十六州。

幽云十六州收不回来，中原就无险可守。《契丹国志》称“契丹之（于中原之）祸，始于石晋割幽、燕。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而天下常不安”。柴荣志在天下，又怎能容忍中原汉地沦为契丹人的跑马场？而且在柴荣的统一计划中，也就是王朴的《平边策》中，是包括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

而柴荣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北伐，原因有很多，比如南唐宾

服，后蜀已被周军打怕，南方底定。正如宋人所论：“近者，周世宗西取秦、凤，南平淮甸，北收关南，三数年间，威震天下，契丹屏气不敢南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时在位的契丹皇帝耶律璟，是辽朝著名昏君。

耶律璟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儿子，辽应历元年（951年）继位后，耶律璟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而耶律璟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睡王当政，辽事可知。史称耶律璟在位期间，“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辽人曾经批判过耶律璟：“穆宗（耶律璟）逞无厌之欲，不恤国事，天下愁怨。”曾经被契丹人劫掠北上的原后汉宰相李涛之弟李浣在给郭威的密信中也透露耶律璟“幼弱多宠，好击鞠，大臣离贰。……今王骄恣，唯好击鞠。耽于内宠，固无四方之志”。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柴荣才决定大举北伐。虽然北伐有冒险的成分，毕竟契丹人整体实力还在，但至少耶律璟在位，可以减弱契丹人实力。此时不北伐，一旦契丹换了明主，北伐时机就将丧失，一如赵匡义遇到的就是辽朝明君耶律贤以及他的泉雄皇后萧燕燕，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历代史评家对柴荣选择此时北伐无多异议，毕竟南方大致平定，唐蜀皆畏大周，南汉刘晟甚至吓得要派人来汴梁向周朝称臣。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周世宗时，正是契丹中衰之会，此时（北宋时的契丹）却又兴盛了。辽惟穆宗最昏乱。969年，被弑，景宗立，即复安。”

而提到柴荣北伐契丹，就必须拿之后的赵匡胤对契丹的态度做对比。

虽然赵匡胤武勇过人，但那是针对荆南、湖南、南唐、后蜀、南

汉等风一吹就倒的孱弱诸侯，对于契丹，赵匡胤自始至终都采取守势。昏庸至极的耶律璟与赵匡胤做了九年的邻居，赵匡胤不但丝毫没有进攻契丹之意，甚至还准备花五百万贯钱和平赎买幽云十六州。至于赵匡胤所谓“务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实际上不过是托词而已。

当然，真要打起来，以赵匡胤的能耐，当是不怕契丹人的，契丹人几次南下侵宋，照样被赵匡胤打得狼狈逃窜。问题其实还是出在宋朝“扬文抑武”的国策上，宋朝那位著名的胥吏名相赵普坚持反对武人上位，为了防范武人，宁可不要幽云十六州。赵匡胤是有过北伐打算的，但赵普威胁赵匡胤：“孰取幽燕，孰可代之？”赵匡胤知道自己的帝位是靠武力捡的，一旦派大将收复幽燕，势必要赋予大将兵权，而赵匡胤天天做梦都会梦到石守信、曹翰这帮武夫披上黄袍的。

所以，宁可放弃幽云十六州，让十六州的汉人百姓沦为契丹人的奴隶，也绝不能威胁到自己白捡来的皇位，这是赵匡胤的底线。而赵匡胤与赵普那次著名的雪夜问对中，即对统一计划的安排，则正式放弃了收复幽燕。赵匡胤对此有些不甘心，他知道不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是比不过旧主柴荣的，但历史并非没有给赵匡胤以机会，只是赵匡胤出于各种考虑，没有勇气去尝试。

赵匡胤因为畏惧契丹而不敢北伐，自然少不了一些观点替赵匡胤的畏惧之举辩护，说什么契丹兵力甲天下，和契丹人作战等于送死。其实大量的五代史料早已将这种观点驳得千疮百孔。从李存勖占据河东开始，中原政权就与契丹常年厮杀，虽然各有胜负，但也不至于怕契丹人。

后唐天祐十四年（917年）杀契丹万余人；天祐十八年（921年）杀契丹兵数千；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杀契丹数千人；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在马家口杀契丹数千人，同年混战中，契丹人死伤惨重；以及著名的白团卫之战将契丹人杀得鬼哭狼嚎，险些生擒耶律

德光。至于契丹灭后晋，完全是杜重威、张彦泽这些民族败类的闹剧，并非契丹多么厉害，这一点也是得到契丹人承认的。契丹人曾经告诉随同石重贵北上的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所以，综合来看，北伐契丹，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再加上幽燕汉人入辽不久，契丹人苦虐汉人，幽燕汉人心还向汉，这一点也是有利于柴荣北伐的。

当然，契丹人并非软柿子，但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贫穷的新中央》中所论：“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则吴蜀不足平。”契丹人是不好打，但至少柴荣还有一半的胜率，赵匡胤守死不战，白白浪费了昏君耶律璟在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难艰于后人，则太祖（赵匡胤）之失也”。

至于柴荣为什么放弃北汉而进攻北汉的干爹契丹，这就更好解释：北汉虽小而势强，擅长攻坚战，正如宋人秦观所论：“刘氏虽据河东十州之地，与中国为境。然左有常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强忍，精勇高气，乐斗而轻死。虽号为小国，实坚敌也。”即使周军使尽力气灭掉北汉，也会元气大伤，再进攻契丹时已是强弩之末，赵匡胤就是这么惨败的。而如果打败契丹，契丹元气大伤，必不敢再下，北汉失去契丹支持，自然撑不了多久。

打“狗”不如打“狗”的主人。

柴荣决定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

周显德六年（959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朝正式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十六州。柴荣亲率大军北上，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戎马生涯。

柴荣留下一些文官留守汴梁，如宣徽南院使吴承祚留守东京，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部署，总管皇宫事务；而武将中的精英基本都随柴

荣北上，大半年后突然捡到天大便宜的赵匡胤以都部署的身份随驾。

四月十六日，柴荣率大军乘舟抵达沧州，而沧州以北数十里就是契丹地界。柴荣没有留在沧州，当天就继续北上。第二天，周军就抵达契丹人控制的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城下。乾宁军规模比较小，守城的契丹宁州刺史王洪见柴荣来势汹汹，他根本没有以卵击石的必死勇气，非常明智地开门投降。

乾宁军以北，盘布着很多被契丹人控制的军镇城池，计有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益津关（今河北霸州）、莫州（今河北任丘）、瀛州（今河北河间）、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在这些军州中，瀛州无疑是最大的城市，但瀛州城高粮足，非一朝一夕能攻下，柴荣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绕开瀛州继续北上。在柴荣的军事计划中，他只准备打一场艰苦的城市攻坚战，那就是强攻幽州，当时已是契丹的南京析津府。

在休整了五天之后，四月二十二日，柴荣把部队分为水陆两部，同时北上。陆路由韩通任都部署，水路由赵匡胤任都部署。而柴荣本人则高坐于龙头大舰之上，其余战舰皆随龙头大舰之后，沿永济渠浩荡北上。“船只头尾相接长达数十里”。

两天后，周军舰队冲到了乾宁军以北一百二十里的独流口，这里是滹沱河和永济渠的汇合处，独流口以西分别是益津关、瓦桥关，偏北处是易州与涿州，偏南处是莫州与瀛州。益津关距离独流口最近，所以柴荣首先要拿下益津关。

四月二十六日，周军水师冲到益津关下，契丹守将终廷晖是个聪明人，打了等于送死，开门投降了事。

接下来要打的是瓦桥关，不过因为这里水道狭窄，所以周军弃舟船而从陆路上进取。二十七日，立功心切的柴荣亲率五百名精锐的侍

卫骑兵充当先锋营，纵马疾行，却在不经意间把主力部队甩在身后。

而就是这时，柴荣面前突然出现一股人数不详的契丹骑兵，这些契丹骑兵举着火把，围在柴荣身边不远处来回兜圈子，但没有人敢上前吃掉这股汉人。因为契丹人可能知道了这支汉人骑兵的指挥者，就是那个威震天下、契丹人谈之色变的郭家养子。《资治通鉴》记载：“从官皆恐惧。胡骑连群出其（柴荣）左右，不敢逼。”

契丹人最终还是灰溜溜地跑了，虽然他们人数远多于周军，但柴荣是个疯子，没有人敢招惹这个疯子。

天亮之后，赵匡胤率领的周军向瓦桥关发起进攻，轻松逼迫守关的契丹马仔姚内贇投降，随后，柴荣风一般卷入瓦桥关。

周军轻松拿下益津、瓦桥二关，等于堵死了契丹控制的莫州和瀛州与契丹本部的通道。在周军强大的压力下，四月二十九日，契丹鄆州刺史刘楚信以城降周；五月初一，契丹瀛州高彦晖举城投降。柴荣没有和契丹人交手，就轻松得到了三州十七县，这些地方在辽朝史书中被称为“关南”，而柴荣拿下关南州县，一直被契丹人视为奇耻大辱。

三关入周后，柴荣将益津关升格为霸州，割鄆州文安县、瀛州大城县归霸州。将瓦桥关升格为雄州，割涿州归义县、容城县归雄州。霸州和雄州就是现在河北省著名的霸州市和雄县。

周朝拿下这两座小关，战略意义非常重大，二关是契丹拱卫南京析津府的南面门户，益津关“倚神京（明清时北京）之重，控瀛海之阻，作固作屏，东西联络”。而瓦桥关“地控扼幽、蓟”。

换言之，幽州就在柴荣眼前。

但是否立刻攻打幽州城，却在五月二日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引起争议。柴荣自然主张强攻，而大多数将领则反对强攻，理由是“今

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因为据说契丹主力骑兵部队已经云集幽州附近，一战未必能下。不过柴荣既然来了，他不可能退缩，那不是柴荣的性格。众将反对无效，柴荣还是下达了准备强攻幽州的命令。

周军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甚至在拒马河边搭建浮桥，供大军过河攻城。同时，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奉柴荣之命，攻下幽州城南一百二十里的固安。

也许是天意，在周军即将发动对幽州的强攻时，柴荣却突然病倒了，《旧五代史·周世宗纪六》记载：“是夜，帝不豫。”至于是什么病，《历代佛祖通载》幸灾乐祸地说柴荣因为用斧子劈了镇定大佛，所以“病背痈糜溃”，不过是既得利益者受到打击之后的宣泄罢了。

皇帝生病，六神无主，所以这场必将青史留名的战役无法再打下去了，柴荣只能下令撤军。五月三十日，柴荣率军回到汴梁休养。

柴荣北伐，实际上并没有与契丹人真正打起来，而这也是后世轻视柴荣北伐成就的主要论据。这种观点认为投降柴荣的都是契丹汉人将领，之后赵匡义北伐失败，碰上的则是契丹最精锐的王牌部队。换言之，如果柴荣遇上契丹主力，必败无疑。

果真如此吗？

契丹皇帝耶律璟真有要与柴荣鱼死网破的斗志？答案是否定的。史料明确记载：周军北伐，耶律璟表现惊恐，“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他根本没有勇气迎接柴荣的挑战。甚至是周军取三关之后，耶律璟还说什么“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虽然耶律璟大言要御驾亲征，可那也是在柴荣退兵之后做出的政治姿态而已。

这只是耶律璟的表现，再来看幽州统帅萧思温的表现。萧思温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但他的女儿却尽人皆知，就是杨家将中那位不可一

世大辽萧太后。萧思温见周军北上，吓得“不知计所出”，束手无策。有些契丹将领愿与周军作战，但萧思温不许。这是《辽史》上的记载，可信度极高。

萧思温吓得六神无主，幽燕地区的普通契丹人更是被柴荣声势浩大的北伐吓破了胆。根据《五代史补》记载，周军刚进入幽州地界，“凡蕃部（契丹人）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不仅是契丹人，幽燕汉人也震惊于柴荣的胆量，“京畿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

连人带马都吓傻了，这样的战斗力，只要柴荣强攻幽州，破城是十拿九稳的。

其次，周军北上主要是走水路，体力消耗较少，周军有足够的体力完成对幽州的强攻。而二十年后赵匡义在高粱河惨败，是因为宋军刚苦战消灭顽强的北汉，体力消耗严重，赵匡义强行已无战意的军队进攻幽州，被以逸待劳的契丹军迎头暴打，失败是必然的。

事实上，北宋帝王也基本认为若周世宗不病，则必能攻克幽州。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七月，赵恒对大臣们谈到柴荣，为柴荣意外得病而可惜。“（柴荣）性虽严急，而智算雄武。当时亲征，下瀛、莫，非遇疾班师，则克复幽蓟矣。”更不用说宋神宗认为柴荣假以天年，必能成为汉高祖刘邦一类的千古大帝。

诚然，周军北伐并没有遇到契丹主力，但实际上周军是与契丹人交过手的，而且还是周朝的地方军。

五月初四，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率所部攻克契丹重镇易州，生擒契丹的易州刺史李在钦。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攻坚战，只不过这场战役不太知名罢了。第二天，周先锋指挥使张藏英在瓦桥关以北大破契丹骑兵，杀伤数百。再加上防守西路的李重进把企图浑水摸鱼的北汉军打得找不到北，在井陉口斩首两千级。以当时周军的整体实力和旺盛斗志，一旦与契丹主力决战，胜算是极大的。

只可惜天不佑汉，夫复何言？

三百多年后，元朝人郝经写过一首《白沟行》，以五代宋辽为背景，其中提到了柴荣北伐。

“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总评英雄

当柴荣生病撤军之时，他本人对早日康复是非常乐观的，还在打算等病愈之后再兴师北伐，必使幽云入汉家。

但让柴荣没有想到的是，上苍再也不会给他机会继续书写伟大的征服史了。回到汴梁后，柴荣病情不断加重，在自己沉重的哀叹声中，柴荣痛苦地承认，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周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九日，柴荣病情严重恶化，在拼尽了最后一口气后，由七岁的儿子柴宗训承接帝位，并安排范质、王溥、魏仁浦为顾命大臣，赵匡胤取代张永德出任殿前都点检。柴荣有些怀疑张永德的忠诚度，他相信赵匡胤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几个幼子。但柴荣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咽气，赵匡胤就要屠杀自己的几个儿子。换成张永德，必不忍这么做。

而正是由于柴荣对张永德的怀疑，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近一千年来来的格局，甚至也影响到了世界历史的大格局。

同日，灯枯油尽的柴荣在东京万寿殿离开了人世，时年三十九岁。

柴荣的死，不仅让中原汉人在近四百年内再也没有机会收复幽云故地，而且直接便宜了他最信任的赵匡胤，让赵匡胤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白捡了一个帝国。

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赵匡胤在策划了半年之后，终于在陈桥驿宣布与曾经待他恩重如山、亲若兄弟的柴荣彻底决裂，建

立了宋朝。而如果不是柴荣并没有厚待的大将潘美的苦苦相劝，柴荣的几个幼子已死在赵匡胤刀下。

属于柴荣的英雄时代结束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有关柴荣的话题，在宋朝存在的三百多年内并没有中止。

关于柴荣最大的争议，是柴荣杀人太多。有些宋人经常指责柴荣残暴。比如大贪官李昌龄就指责柴荣“酷烈，果于杀戮”。可李昌龄是绝口不会提他所侍奉的赵匡胤杀人数量远在柴荣之上。同样杀人的赵匡胤成了仁君，柴荣倒成了暴君，原因只是赵匡胤厚待文人而已。雇主给了钱，哪还有不吹喇叭抬轿子的道理？至于百姓受苦受难，他们哪里管得着！洪迈就说过周世宗杀人太多，是以国亡。别的且不论，汉武帝杀人无数，明成祖朱棣杀人以十万计，清军入关屠杀千万，结果都是国祚二百年，这又如何解释？手无缚鸡之力且未杀一人的南朝齐少帝萧昭文、齐和帝萧宝融、梁敬帝萧方智、陈少帝陈伯宗、隋恭帝杨侑、唐哀帝李祝不照样人头落地？

不过，就整体来看，否定柴荣的只是极少数观点，主流还是对柴荣持肯定态度的，包括占了柴荣便宜的宋朝。

曾经做过柴荣臣子的薛居正等人，在《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论》中就高度评价柴荣：“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以致君臣之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虽然旧史也承认柴荣性格过刚、用刑太严，但整体上瑕不掩瑜。

向来对柴荣吹毛求疵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也对柴荣推崇备至：“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

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

司马光给后人的印象是比较刻板教条，实际上司马光是个非常明大体的人，他著史虽然也受北宋政治时局约束，但他对柴荣却几乎是不顾一切地给予好评，根本不管赵官家吃醋。柴荣对佛教进行改革，司马光极为欣赏柴荣的魄力，称赞柴荣“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而在《资治通鉴》的末尾，司马光把五代史武功最为显赫的两大帝王——唐庄宗李存勖与周世宗柴荣进行对比，不过司马光有些瞧不上李存勖，反而对柴荣无比推崇，“江南（南唐）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而写到柴荣驾崩后，司马光继续吹捧柴荣，“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攻城对敌，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动容。应机决策，出人意表。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擿伏，聪察如神。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

宋朝官方对柴荣的评价向来是宁高不低，有褒无贬。虽然宋朝是捡了柴荣便宜，但宋朝史官们多数还是就事论事，毕竟柴荣的伟大是客观存在的。宋神宗赵顼就非常尊崇柴荣，他在朝会中吹捧柴荣，“使（周世宗）天假之年，其功业可比汉高祖”。并称柴荣“诚创业造功英主也”。甚至还曾经与批判柴荣的大臣斗嘴，在维护柴荣时半点也不客气。参知政事冯京曾经指责柴荣为人酷暴，赵顼马上反驳说：“闻世宗上仙，人皆恸哭。”老百姓听说周世宗驾崩，无不痛哭，若柴荣酷暴，百姓早就恨之入骨了。

在经历了南宋孝宗时对柴荣的整体性贬损后，除了朱弁、陆游、洪迈三大忠臣对柴荣疯狂贬低外，官场上对柴荣的评价日益升高。南宋理宗时，著名“奸臣”马天骥与宋理宗赵昀议事时，就称赞柴荣“周世宗当天下四分五裂之余，一念振刷，犹能转弱为强”。而大儒朱熹同样对柴荣有着极高的评价，他在《朱子语类》中毫不掩饰对柴荣的崇拜，“五代时甚么样！周世宗一出便振”。而有人问世宗是否为贤主，朱熹说：看来也是好。并称赞柴荣“周世宗天资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对于当时社会上有人说柴荣心胸不广时，朱熹反驳道：世宗胸怀又较大。朱熹甚至不避嫌疑，公开宣称本朝太祖赵匡胤的成功是站在柴荣肩膀上的，“世宗却得太祖接续他做将去。虽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毕竟是得人接续，所做许多规模不枉却”。

南宋遗民陈桷对柴荣同样极为推崇，他在《历代通略·后周》中评价五代明君：“五代之君，世宗第一，唐明宗次之，周太祖又次之。”陈桷认为柴荣“五代诸君，多刻其民而骄其军。世宗独能严军而恤民，治律历与礼乐，正刑统，禁私度僧尼。毁佛像铸钱，注意元元，留心本邦。于五代十二君中，独称为最美。行善政，史不绝书”。还有一位南宋遗民俞德邻在《佩韦斋辑闻》中也是持相同的观点：“先儒谓五代之君，周世宗为上，唐明宗次之。”

而在评论柴荣时，有一部书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北宋真实时期编撰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该书上距五代较近，保留了大量的五代珍贵史料，史料价值极高。在《册府元龟》中，有关柴荣的史料相当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但凡书中称赞帝王美政的篇章，无一例外都是有柴荣的史料，而抨击帝王恶政的篇章中，无一例外找不到有关柴荣的半个字。

《帝德》《诚励》《革弊》《招怀》《却贡献》《明罚》《慎罚夫》《念良臣》《愍征役》《褒功》《惠民》《纳谏》《讲善·礼贤》《礼大臣·褒贤》《务农》《英断·明察》《文学》《仁慈》《节俭》《神武》《悔过》《崇儒术》《宽恕》《孝德》《功业》《兴教化》

《审官》《立制度》《赦宥》《访问》《选将》《修武备》《明赏》《延赏》，这些都是歌颂帝王美政的，均有柴荣的正面事迹。

《恶直》《猜忌》《无断》《失政滥赏》《姑息》，这些都是写帝王恶政的，但与柴荣毫无关系。由此观之，完全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圣人，但柴荣是最接近圣人的那几个人之一。

而在宋朝之后，历代官方对周世宗柴荣也非常推崇。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祀帝王三十五”。而在这些帝王，名义上身处乱世时代的（其实赵匡胤也是乱世君主），只有周世宗柴荣一人。清朝入关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举行了“定帝王陵寝祀典”，从汉朝之后共有二十三位帝王入围，而名义上身处乱世的还是只有柴荣一人。四十多年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正月，清廷再次祭祀前朝帝王，名义上身处乱世的还是柴荣一人。

历史没有给予柴荣足够的时间，让他去完成曾经立下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雄图壮志，中道崩殂，致使中原汉业毁于一旦，但历史又是公正的，除了一些私心作祟的所谓大文豪、当代苏武外，大多数人还是给了柴荣很高的评价。

以北宋大儒石介在其《感事诗》柴荣部分作为柴荣篇的定笔。

“桓桓周世宗，三十纂尧历。一岁破河东，刘崇丧精魄。再岁复秦凤，不庭自柔格。三岁出南狩，王师拯焚溺。江北十四州，取之如卷席。四岁征关南，曾不发一镞。三州相继降，德声畅蛮貊。李昇（李璟）请臣妾，钱镠（钱弘俶）修贡职。帝欲因兵锋，乘胜务深击。直取幽州城，拓土开疆场。重收虎北口，复关毙寇贼。是时战屡捷，六军气吞敌。平吴如破竹，成功在顷刻。惜哉志不就，暴疾生中夕。”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生存之“道”（一）

五代十国兴亡百余年，史事庞杂，再加上五代十国历史不甚著名，需要讲清五代十国兴亡始末，即使写百万字也未必能详说其细。因为篇幅实在有限，所以只能择其主要帝王事迹来写，次要帝王以及相关大臣需要写的，都附在帝王篇中，不单独作传，但那位被世人骂了一千多年的“奸臣”冯道显然是个例外。甚至可以这么讲，不写冯道，不算写五代。五代少了冯道，也就不是五代了。

说到冯道，最著名的事迹就是以一身侍四朝五代，早上是唐臣，上午是晋臣，中午摇身一变成了契丹大臣，下午为汉臣，到了晚上又成了周太师。在一些道德家看来，不忠是冯道永远摘不掉的标签。自宋以来，对冯道不忠的批判连篇累牍，大骂者有之，嘲讽者亦有之。

“衣冠禽兽”“恶浮于纣、祸烈于跖”“名妓转世”“冯道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矣”。更不要说欧阳修、司马光两位大佬那两篇针对冯道的著名评语，而孤独的王安石称赞冯道的那句“菩萨，再来人也”反而觉得非常刺眼。

实际上，被当成道德靶子乱箭穿心的，并不是冯道本人，那只是一具名为冯道的道德尸体，成为后世政权号召人臣效忠的工具。真实的冯道，根本不是宋朝道德家们所谓的贰臣、佞臣、奸臣，如果按他们的逻辑，同样做过唐晋辽汉周大臣的宋初名臣张昭、名将符彦卿岂不都是“恶浮于纣、祸烈于跖”！更何况张昭、符彦卿等人比冯道还多侍奉一个朝代——北宋，从未见宋人骂过他们不忠，公平何在？

五代十国名流如云，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五代十国只是三个人的

风云时代：柴荣、李煜、冯道。柴荣和李煜都是帝王，虽然李煜的南唐帝国早被柴荣砸得稀巴烂，而冯道作为大臣，他身上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所以用比较长的篇幅来讲一讲这个有趣的冯道。

冯道，字可道，河间景城人（今河北河间与沧州之间），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父亲冯良建，曾在唐朝末年出任秘书少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后来退休还乡家居。冯家虽然寒素，但却是唐中叶以来的儒门清流名家，家中藏有不少图书。靠山吃山，靠书吃书，冯道生长在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肚子里灌了不少墨水。

冯良建对这个儿子非常看重，希望他能光大冯家的儒门之业，从《道德经》中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冯道。

冯道读书非常用功，无论风吹沙尘，还是大雪压庐，冯道都端坐于房中，手捧书本，如饥似渴地诵读先王治政之道。冯道家庭背景一般，要想出人头地，不读书还有活路吗？但冯道成年时，天下大乱，枭雄遍地，去长安考取功名的路是行不通了。冯道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附军阀做幕僚，一步步往上爬。而当时控制景城的，是横跨幽州、横海（今北京、天津、河北北部与东部）的燕王刘守光，所以冯道出道后的第一个老板，注定是刘守光。

刘守光为人残暴荒悖，而且仇恨士人，“刘守光为燕帅，性惨酷，不喜儒士”，杀士人是家常便饭，“名儒宿将，多无辜被戮”。冯道投奔刘守光，也是硬着头皮去的。道德家攻击冯道靠阿谀奉承混日子，其实冯道在官场上的第一谏就是针对刘守光的，险些被刘守光杀掉。时任幽州参军的冯道可以选择避退，装哑巴谁不会？但即使看到同僚孙鹤在劝谏刘守光时被酷刑处死，年轻热血的冯道依然没有退缩，当众劝刘守光不要做昏君，激怒了刘守光，把冯道送进大狱。只因为冯道人脉好，为了拯救冯道，幽州文官们想办法捞出冯道。这次劝谏险些丧命，对冯道后来的人生观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太积极的影

响，胡三省就说：“冯道自此历事唐、晋、汉、周，位极人臣，不闻谏争，岂惩谏守光之祸邪？”但冯道并非没有再谏过君主，李存勖和柴荣两大英主都领教过冯道的强硬，只不过胡三省向来瞧不上冯道，对有利于冯道形象的，胡先生都装作看不见。

刘守光不能用冯道，冯道干脆炒了刘守光的鱿鱼，来到了与燕国相邻的河东晋国，继续追逐着他致君尧舜的理想。

晋王李存勖当时处在人生的鼎盛时期，是典型的明君做派，刘守光不用的人才，李存勖自然要重用。有个叫周玄豹的江湖术士横竖看冯道不顺眼，没少在河东大总管张承业面前说冯道天庭晦暗，不能当官，但张承业素来“重其文章履行”，告诉周玄豹，他推荐冯道的原因只有一个，“惟其有才”。

随着河东晋国开疆扩土，事职繁重，所以李存勖急需一名主掌晋国文翰的掌书记，而张承业郑重向李存勖推荐了冯道。掌书记，相当于办公厅主任，而河东掌书记则相当于最高党政机要的办公厅主任，地位之高可以想见。而正因为如此，盯上这块肥肉的大有人在，比如士族出身的河东推官卢程。但卢程是个饭桶，百无一用，而且“为人褊浅”，嫉贤妒能。

其实李存勖曾经给过卢程机会，让卢程写篇文章，可卢程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李存勖怎么可能用这样的饭桶？为了能让冯道上位，李存勖纡尊降贵，在一次特意安排的酒会上，李存勖站在冯道的座前，微笑着告诉冯道：“此樽酒，赏卿！自今日后，卿便为吾书记。一应文翰辞章事宜，奚付卿处置。”

傻子都知道，冯道将成为新一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的人选，但又出乎所有人意外的是，冯道竟然拒绝了晋王的任命。

冯道当然有些“油滑”，他初来河东，人生地不熟，他知道这个位置有很多人在争，他不想得罪人，特别是那个乌眼鸡似的卢程。面对

这个足以使自己青史留名的位置，说不动心，冯道自己也不相信。冯道虽然以自己地位卑下为由婉拒，但他自始至终也没说过自己才不如人。

李存勖当然明白冯道的小算盘，在李存勖强硬坚持下，冯道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个让人无比眼热的职务。得罪人的事让李存勖去做，反正李存勖也不怕得罪卢程。冯道很聪明，老板想用我可以，你先摆平公司里那些对我羡慕嫉妒恨的人。

冯道有些孤傲，但他出色的工作能力是绝对对得起李存勖给他开的工钱的。但冯道更是谨慎的，他不会在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让政敌如卢程等人抓住反击自己的机会。同时与同僚和睦相处，不会把自己骨子里的清高外现，平白得罪别人。至于卢程等人攻击冯道相貌粗陋，是个乡巴佬，“士人多窃笑之（冯道长相）”，这也不过是格调不高者的无聊攻击罢了。

冯道很会做人，但他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做人底线做交易，在工作上，即使你是晋王，你做错了，我照样当面顶撞你，半点面子也不给你。

李存勖有一次和河东军界头号人物郭崇韬发生了严重冲突。事情的起因是李存勖经常和将士们在大殿上喝酒吃肉，拍桌子骂娘，郭崇韬非常反感李存勖的江湖土匪习气。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结果激怒了李存勖。李存勖认为自己如果不这样做，弟兄们谁还肯给自己卖命？咱们就缺这几个饭钱？盛怒之下的李存勖赌气地说自己回太原养老，让郭大帅在军前掌兵权。实际上李存勖怎么可能把兵权交给外人，李存勖想到了冯道，便叫来冯道，让冯道写一篇攻击郭崇韬的文章，务必把郭崇韬抹黑成贪得无厌的政治小丑。

后世道德家经常攻击冯道不敢谏君王，但冯道刚来河东不久，就

给李存勖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冯道要是奸臣，他会接过这个烫手山芋？听李存勖的话就是了，至于严重后果，关冯道何事？

冯道知道一旦君主与主将闹别扭，将会加重国内的政治生态，甚至引发军心动荡，岂不是外敌之福？河东江山是李存勖的，但同时也是冯道的事业。李存勖是明主，只要他不倒，冯道的未来就有了保障。就凭这一点，冯道也不会置郭崇韬于不顾。

李存勖让冯道写文章，冯道虽然提了笔，却一直没有落笔，任凭墨汁滴在纸上，洇成一个个大黑点。李存勖有些生气，而冯道却语气平缓地告诉李存勖：郭崇韬是国之重臣，大王自毁长城，是朱友贞之福。

一句话就足够了，李存勖再盛怒，也不会砸自己的衣食饭碗，李存勖逐渐冷静下来，他知道冯道这句话的分量。而且郭崇韬也主动向李存勖道歉，给足了李存勖面子，李存勖自然就坡打滚，大家和好如初。

不要认为冯道这次劝谏是和风细雨式的，在性格古怪的李存勖头上拔毛，那是极需勇气的。《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说得清楚：“郭崇韬入谢，因道为之解焉，人始重其胆量。”可见这次劝谏如果弄砸了，很可能波及冯道的仕途，甚至是人身安全。

奸臣佞臣乌足有此！

冯道这次劝谏，深深打动了李存勖，彼时的李存勖英果贤明，他看中了冯道的治才，更欣赏冯道的胆量，这才是致君尧舜的公忠大臣。虽然当时冯道的资历还有所欠缺，但李存勖已经开始把冯道当成宰相培养了。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十月，李存勖百战灭梁，称霸中原，开始大封文武。宰相方面，李存勖用的是礼部侍郎韦说、尚书左丞赵光胤，外加之前的宰相豆卢革。而时任翰林学士赐紫（三品紫

袍)的冯道，则被晋升为正四品下的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时人都知道，户部侍郎不过是冯道进入内阁的一个跳板，谁不知李存勖的用意？

正在冯道书写锦绣前程的时候，他的家乡突然传来噩耗——父亲冯良建病故。哀痛之下的冯道必须按官场规矩，回家丁忧守孝二十个月，这一年应该是923年。其实冯道并不担心自己的前程，他知道李存勖是一定会给自己在内阁留出一个位置的，三年很快就会过去。

冯道没有想到，他这次回乡丁忧，反而是因“祸”得福。冯道在家乡做了两年农民，每天除了守在坟前，平时多在地里耕种，或者砍柴烧饭，与农夫无二。而在相同的两年里，曾经无比欣赏冯道的当代汉光武却以光的速度从天上坠落凡间，这位扬起十指自称“李天下”的圣明天子昏庸无道，天下怨愤，直到魏兵叛起，李存勖死在洛阳城门之上，一片冲天大火结束了一段伟大的传奇。李家天下，不出意外地落在了河北相公李嗣源手上。

可以想见，如果冯道这两年间一直留在李存勖身边，刀兵之下，谁敢保证冯道毫发无损？甚至变质的李存勖在恼怒之下，很有可能一刀杀掉冯道。

而贤明的李嗣源继位，改变了后唐政权的荒谬乱象，诚为百姓之福，亦是冯道之福。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生存之“道”（二）

其实冯道和李嗣源也算是老交情了，早在河东时期，二人就有过来往，李嗣源非常敬重掌河东文翰的冯书记，深服其才。李嗣源继位后，先任命了太子宾客郑钰与工部尚书、判三司事任圜为宰相，但李嗣源却一直没有忘记冯道，先把冯道与赵凤塞进端明殿当学士，慢慢再俟机提拔为相。关于李嗣源用冯道为相，在前面《李嗣源有冯道为相的窃门》篇中已经详细述及，今略过。

天成二年（927年）正月十一，李嗣源下诏，以户部侍郎冯道与安重诲的马腿、太常卿崔协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天，意味着冯道正式进入官场一线，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了。

奸臣最大的特点就是嫉贤妒能，赵高如此，卢杞如此，秦桧更是如此。宋世道德家没完没了地指责冯道不忠，却很少提及冯道从不嫉贤妒能。冯道当宰相，经常为国荐贤，从不考虑私利。当然，出于“阶级感情”，冯道对豪门出身的士人多少有一些偏见，他更着重提拔寒门士人，这其实应该可以理解。毕竟寒士的社会资源太少，如果没有贵人相助，是很难爬上去的。而且对于豪门士子，冯道也没有一棍子打死，只是反对类似卢程那样“履行浮躁”之徒，经常“镇而抑之”。

曹操唯才是举，冯道也是。

冯道重寒人轻士族，自然得罪了豪门子弟，这些人便对冯道进行人身攻击。冯道小时在农村读书时，经常习读一本农村儿童教育读物《兔园策》。其实这本书是唐朝名儒汇编成集，只因为这本书在乡村

太过普及，所以城里的士大夫们都瞧不起读《兔园策》的人。这伙高贵的士大夫便嘲笑冯道经常读《兔园策》，实际上是挖苦冯道是农村泥腿子出身。

赵匡胤心胸狭窄，当年他未得志时，王彦超、董遵诲都瞧不起他。后来赵匡胤利用柴荣托孤之恩，篡位建宋后，立刻敲打王、董，逼二人请表谢罪。而冯道当众被嘲笑，按理讲也应该报复挖苦他的工部侍郎任赞和吏部侍郎刘岳。但冯道却没有这么做。后来任赞犯了事，冯道完全可以痛打落水狗，而冯道却极力救下任赞。欧阳修说冯道对刘岳非常恼火，但实际上冯道也是用温和的语气抨击了这伙士大夫的浅薄：“《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聊，何浅狭之甚耶！”

可见冯道的度量！

作为天下佐贰的宰相，不能没有度量，像赵普那样嫉贤妒能的胥吏能当上开国宰相，实在是历史的天大误会。李嗣源立志做明君，又兼性格温和，自然与性情相近又同兼怀天下的冯道走得更近，所以李嗣源非常器重冯道。而冯道自然也对得起李嗣源的这份器重，只要有接近李嗣源的机会，冯道都会和李嗣源聊天，给李嗣源上政治课，希望这位武夫出身的皇帝能造“斯民福祉”，而不是学李存勖那样自取灭亡。

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天成四年（929年）九月，时值“天下屡稔，朝廷无事”，李嗣源与冯道闲聊天，李嗣源问冯道百姓生活生产如何，“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冯道回答得非常得体，“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文皆病者，惟农家为然”。为了让李嗣源加深印象，冯道念起了晚唐进士聂夷中那首著名的《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糶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其实冯道并不是无聊地发什么诗癖，而是想通过念这首诗来敲打李嗣源要时常注

意百姓疾苦，而李嗣源自然也体会到了这一层。

还有一件事，右仆射王建立献给李嗣源一只玉杯，这只杯上刻着讨人喜欢的六个字“传国宝万岁杯”，李嗣源爱不释手。冯道知道这是一只王建立做过手脚的“马屁杯”，一旦李嗣源沉溺其中，将来遭殃的必是百姓。冯道见李嗣源，说他有一件无形之宝，李嗣源问何宝，冯道说他的这件宝贝，叫作“仁义”。冯道进而言之，“人主治天下，靠的不是金杯玉杯，而是仁义。心中有仁义，心中就有百姓，古之明君莫不行仁政”。虽然李嗣源当时并不太高兴，不软不硬地把冯道请了出去，但实际上他听进去了冯道的劝谏，只不过当时当着众侍臣，冯道半点面子不给，李嗣源脸上有些挂不住而已。可以讲，李嗣源在位期间，天下无事，百姓小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冯道的。

如果不作特别说明，李嗣源与冯道的交往可以称为后唐官场的二人转，君明臣贤，岂不美哉！实际上，与李嗣源唱官场二人转的，是时任枢密使、李嗣源的热血兄弟安重诲，冯道虽是宰相，在当时也不过是个配角。

在军权大于相权的五代，军职大员枢密使往往才是真正的宰相，可以与皇帝单独讨论军国大事，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宰相不可以。而且安重诲又跟着李嗣源杀伐天下数十年，功劳甚著，当枢密使为众望所归。安重诲为枢密使，四五年间，独揽大任，臧否自若。是当仁不让的二皇帝。宰相冯道在官场上的角色，实际上更接近于翰林学士，手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如何与大公司的二老板相处，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冯道知道只要和安重诲搞好关系，自己在官场上就有大靠山，但冯道从来没有这么做。安重诲现在春风得意，只是安某为人蛮霸，不擅长人际关系，得罪人太多，“中外恶之者众”，甚至要搞掉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这样的二老板，不知道哪天就被人干掉了，冯道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未来搭在不靠谱的安重诲身上。

虽然冯道曾经在安重诲的授意下与赵同联名上表，请治李从珂之罪，表面上看冯道屈从于安重诲的淫威，但冯道一出场，李嗣源就知道冯道是被安重诲逼出来的。换个角度看，冯道给安重诲当枪使，实际上在洗白自己没有党从安重诲，等于换回了一张保命符。至少在安重诲倒台之后，安重诲的敌人，如花见羞王德妃、秦王李从荣、老太监孟汉琼从来没有对冯道有过一丝不敬。

冯道继续做他的太平宰相。非大聪明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所谓太平宰相，即使是承平时代，官场上也是暗箭密伏，何况乱世时代。安重诲是倒了，但接下来的问题对冯道来说更为棘手，最有资格承继大统的秦王李从荣和视宋王李从厚如亲生儿子的花见羞王德妃之间已闹得水火不容，二人之间必有一场血战。

冯道的选择很简单，谁赢了他就给谁打工，不管你是张三李四。既然李从荣受宠，那他就支持李从荣，但李从荣性格乖戾，冯道支持他，他照样怀疑冯道有二心。“执政欲以吾为太子，是欲夺我兵柄，幽之东宫耳。”这个“执政”就是冯道。

冯道成为李从荣的“敌人”，自然也就成了花见羞、孟汉琼等人的“朋友”，至少后宫集团不会把冯道当成敌人。在李从荣愚蠢地自毁前程的情况下，冯道反而得到了安全保障，虽然冯道从来不和花见羞等人掺和。史料没有记载，但可以揣测出冯道是不希望李从荣即位的，毕竟李从荣脾气太过乖戾，很难伺候，而宋王李从厚性格温柔，倒是很符合冯道的胃口。

结果很快出来。李从荣在李嗣源病重却还没有断气的情况下，误以为父亲死了，即时发动兵变，没想到李嗣源并没有死，反而拼了最后一口气，拿掉了李从荣。李从荣兵败身死，李从厚继位。

冯道的态度非常明确，他绝不参与家族公司内部的权力竞争，两边都不下注，两边都不会把他当朋友，但也不会把他当敌人。

李从荣倒了，李从厚上位，冯道还是冯道。

李从厚倒了，李从珂上位，冯道依然还是冯道。

李从珂从河中杀到洛阳，冯宰相带着百官们对着李从珂舞蹈，近乎奴颜婢膝地请李从珂即皇帝位。

冯道“节操不如妓女”，引起了北宋著名道德家唐介先生的愤怒，他大骂冯道“一妻十嫁”，为人臣不忠，坐视旧主李从厚被杀。诚然，李从厚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却在失势时被石敬瑭干掉，冯道未发一语，似有薄情之嫌。但宋儒们从来也没有谴责过他们的太祖赵匡胤是如何忘恩负义背叛周朝的，又何必独责于冯道？

冯道虽然侍奉的帝王较多，但他瞧不上的也懒得搭理。李从珂为人愚暴，他的继位并没有改变混乱的局势，天下依然大乱。冯道知道李从珂也坐不长久，不想陪着他见阎王，脚底抹油溜了。唐清泰元年（934年）四月，冯道出任匡国军节度使，治所在同州（今陕西大荔）。

冯道在同州“无为而治”，但同州治安却非常好，史称“为政闲澹，狱市无挠”，百姓安足。至于李从珂与石敬瑭的撕逼大战，冯道从来不关心。

不过，虽然李从珂正与石敬瑭钩心斗角，但也没忘记监视冯道。冯道的副手、同州节度副使胡饶就极有可能是李从珂安插在冯道身边的耳目。

胡饶为人凶暴，常因小事而暴怒。所以冯道不想招惹这样的人物，常常避而不见，“道以重臣，稀于接洽（胡饶）”。胡饶脾气暴怒，忍不下这口窝囊气，“（胡）饶忿之”。

胡饶借着酒劲，坐在节度使衙门前的地上，大骂冯道祖宗八代。副使当街骂正使，这成了同州城的重大政治花边新闻。冯道也听人说

了，冯道不但不生气，反而让人准备好酒菜，请胡副使进府来吃。

冯道接见了胡饶，并春风满面地给胡饶敬酒谈笑，弄得胡饶很不自在。没喝几杯，胡饶就红着脸溜了。从史料记载来看，“（冯道）致敬而退（胡饶）”，说明冯道的官场修养是极高的。否则被人当众骂娘，还低三下四地请对方喝酒，心中没点宰相度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当然，冯道这样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做给李从珂看的。冯道应该是怀疑过胡饶是李从珂的耳目，甚至胡饶这次找事也有可能是李从珂安排的，所以冯道宁折不直。如果冯道暴怒，反而有可能被李从珂抓住把柄。

不久后，李从珂又把冯道调回洛阳，出任并无实权的司空，形同软禁。冯道虽然还没有忘记自己致君尧舜的梦想，但现在他只能等待，等待那个人出现。

如果说李从珂时代是冯道仕途中的低谷，那么等到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把李从珂干掉之后，冯道又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高峰。

石敬瑭新得天下，要迅速稳定局面，就必须有合适的首席宰相人选。而这个合适人选，除了冯道，实在想不到还有谁可以胜任，虽然石敬瑭的第一心腹是桑维翰。至于冯道的亲家刘昫，因为脾气太过暴烈，官场得罪人太多，所以暂时不宜重用。

其实，冯道在官场也有很多敌人，谁让冯道占尽了官场风光，别人只能站在墙角喝西北风。《旧五代史·马胤孙传》记载：“群情（百官）不悦冯道。”只不过冯道身上没有污点，堪称道德完人，他们根本无从下口而已。冯道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不会像赵匡胤那样，极其幸运地捡了大便宜之后，对仇家大肆打击报复，必欲泄愤而后快。冯道做官有个窍门，就是专门帮助曾与他有过节的官员，前面提到的任赞、刘岳是这样，前贝州刺史史圭也是这样。

史圭擅长盐务管理，但之前曾经因为官员选择问题与冯道大闹一场，好脾气的冯道都对史圭怨气冲天。七年后，刑部侍郎兼盐铁副使空缺，冯道立刻推荐了史圭接手这个职务。

冯道推荐史圭自然是聪明之举。一、这么做，可以彰显冯道的宽宏大量，有利于冯道经营自己的政治形象。二、推荐史圭，不会影响到冯道的首辅地位。三、给其他观望的官员吃定心丸，史圭与我有过节，我还推荐他高升，其他人自然不会再担心冯道对他们打击报复，降低了冯道被人暗算的可能性。当然，冯道这么做，首先是他人品好。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生存之“道”（三）

冯道是帮了石敬瑭大忙的。石敬瑭为了稳住不太老实的契丹干爹耶律德光，于天福三年（938年）七月，派冯道北上契丹，给干祖母述律氏上尊号，成功地维持了晋辽二国之好，石敬瑭在世一天，耶律德光不会放马南侵。可以说，冯道几乎是拼了老命保住了石敬瑭的饭碗，石敬瑭自然对冯道感恩戴德。

冯道回来后，石敬瑭几乎把除帝位之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冯道。为了冯道，石敬瑭竟然废除了枢密使的职务，让冯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首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废枢密使，职权）并归中书，其院印付（冯）道，事无巨细，悉以归之。”石敬瑭甚至还让冯道参与军事事务，君主向来把军权视为私物，但石敬瑭却让冯道摸枪杆子，可见石敬瑭对冯道器重到了何种程度。

当然，石敬瑭这么做是有私心的，石敬瑭已经做出决定，等他驾崩之后，由冯道辅佐幼子石重睿当皇帝。不过冯道还是出于天下公器的考虑，把帝位交给了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这让冯道挨了南宋大儒胡安国好一顿痛骂。

胡安国认为冯道既然同意托孤石重睿，结果一转脸又立了石重贵，冯道此举有违臣节。而胡安国先生一定不会指责他们的太祖赵匡胤是如何跪在柴荣面前痛哭流涕死保幼主，柴荣死后立刻翻脸，甚至要杀掉柴荣幼子的。

其实冯道并没有明确答应石敬瑭托孤，只不过是含糊应对，而赵匡胤是亲受托孤之重的，不然柴荣能让赵匡胤主掌兵权？赵匡胤要杀

旧主幼子全成了圣德巍巍，冯道舍石家幼子而立石家长君倒成了大逆不道，一碗水端不平，何能服众。

而对石重贵的态度，冯道几乎是把这位正值壮年的国君当成李从珂第二了。事实上，石重贵对冯道也几乎是李从珂态度的翻版。虽然冯道于他有拥立之功，但石重贵很不喜欢这个糟老头子，他最信任的是景延广。

石重贵对冯道不冷不热，立刻激起朝中那些对冯道羡慕嫉妒恨的官员们的强烈共鸣，他们强烈要求石重贵恢复枢密院建置，实际上就是为了分冯道之权。冯道当然明白，石重贵骄傲自负，估计也难逃李从珂的下场，冯道自然不想陪他胡闹。冯道非常知趣地上表，请求恢复枢密使，理由是“臣老矣，厌其事繁”。

大家面上都好看。

看准了石重贵将来必蹈李从珂覆辙，冯道开始抽身撤退。石重贵决定向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发了朝野的极大争议，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上唾沫横飞，互相问候老祖宗。冯道却一言不发，你们聊你们的，我眼花耳聋，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

.....

“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冯道就等着暴怒的石重贵把自己赶出朝廷了。不知道是谁在石重贵面前说了冯道的坏话，说冯道只能做太平宰相，不能做乱世宣力之臣。石重贵早就想搬掉冯道这块臭石头，很快就下诏，让冯道出任同州节度使。

时过九年，冯道再一次来到同州“避难”，实则是黄鹤楼上看翻船，你们玩你们的。

.....

石重贵面缚出降，耶律德光入汴，而冯道此时已在威胜军节度使的任上，威胜军治邓州（河南邓州市）。开运三年（946年），百忙之中的石重贵没有忘记老冯道，把冯道从同州调到了邓州，然后又投入与耶律德光的祖孙决战中。

冯道在同州保持沉默，在邓州依然保持着近乎可怕的沉默，至少在史料中没有找到冯道在邓州活动的一字记载。

大象无形，这才是冯道。

道德家一直在攻击冯道为人臣不忠，晋朝有难，冯道不置一词。而在耶律德光借助杜重威、张彦泽等小丑的力量灭掉石重贵、入主中原后，冯道突然不请自来，主动北上汴梁，求见大契丹皇帝，并对耶律德光三跪九叩。冯道此举，更坚定了道德家对冯道的批判。胡三省将冯道骂得一文不值，“（冯道）历唐、晋，位极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如路人，何足重哉”。胡三省认为冯道应该在晋国亡后自杀，但胡三省是不会要求张昭、符彦卿等人在周亡后自杀殉周的。

冯道北上见耶律德光，并不是胡三省所谓的求官发财，而是为了救人。救什么？普天下的蝼蚁百姓！

契丹人入主中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仅举一例，《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四卷记载，（因为杜重威不作为，契丹人）“无所忌惮，属城多为所屠。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村落殆尽”。

这也只不过是契丹人大屠杀中很小的一部分。

冯道北上，其实正如宋人彭乘所说，冯道为人“性仁厚”，不忍中原百姓受难。而因为耶律德光与冯道的特殊关系，耶律德光对冯道非常礼敬，而冯道说了一句违心的话：天崩地裂之际，佛出也救不得百姓，唯有皇帝陛下（耶律德光）能救得。而冯道知道耶律德光信奉佛

法。

冯道一言，救了无数百姓，契丹人再没有进行大屠杀，中原汉人最大限度保存了元气。《旧五代史·冯道传》称赞冯道善举，“其后衣冠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

欧阳修向来对冯道横挑鼻子竖挑眼，但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却很客观地赞冯道的善行，“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至于司马光把冯道对耶律德光的劝谏放在契丹人屠杀之后，也不过是刻意为了丑化冯道而已。

耶律德光何等残暴，但对冯道却待之如父，这在中原汉大臣中是独一无二的。耶律德光礼敬冯道，原因很多，但正如向来看冯道不顺眼的胡三省所持公正之论，“（冯道）持身谨净”，所以才能赢得当时社会主流的普遍称赞。

后世道德家攻击冯道，已经理屈词穷了。

.....

接下来，轮到刘知远出场了。

早在天福朝，冯道就奉石敬瑭密旨，上书要求罢免刘知远而立大贪官杜重威，此举严重得罪了心胸狭窄的刘知远。刘知远建国后，对仇家大肆打击报复，宰相李崧甚至被灭族。只是因为冯道政治地位太高，刘知远投鼠忌器，只是没收冯道家产泄愤。冯道也知道刘知远还忌恨自己，且后汉政权太过残暴，冯道轻易也不理事，虽然他此时的身份还是太师。

如果按有些人指责冯道靠阿谀谄媚混日子，那么冯道完全没有必要在刘知远得势的情况下还去冲撞刘知远，他大可以明哲保身，一言不发。

冯道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入宫去拔刘知远的虎须，他此次是为了救一个人，就是昭义军节度判官张灿。

事情的起因是为后汉制定了严厉的牛皮法，严禁民间的牛皮贸易，甚至百姓家的牛死了，牛皮也要被官府强行没收，一文钱补偿都没有。不久后，昭义军官方抓获二十多名牛皮贩子，按当时法律，这些人将被处以死刑。昭义判官张灿知道后，认为这些人根本不够死刑，张灿冒着得罪史弘肇、苏逢吉这帮杀人狂的风险，上书反对牛皮法，并希望刘知远释放二十多人。

汉朝执政集团都是些不可理喻的疯子，根本不可能听进去张灿的逆耳忠言，他们开始攻击张灿妄言议政，罪当斩首。而以太师身份参加会议的冯道则打定主意要救张灿和那二十多名牛皮贩子。

杨邠、史弘肇、苏逢吉等人带着张灿的上书来找抱病的刘知远说理，而刘知远看到张书后，更是雷霆大怒。在史苏等人的挑唆下，刘知远下令将张灿与牛皮贩子们一并斩首。

面对一群杀人不眨眼的疯子，冯道还是知难而上，微笑着站在了刘知远的面前。

冯道并不讳言自己是来救张灿等人的。刘知远还坚持认为张灿以低微身份妄议朝政，罪当斩首。而冯道却说张灿越级上书，正说明张灿对刘知远是无比忠诚的。否则张灿明知上书必死，还越级上书，张灿要是怕死，他根本不会参与此事。

刘知远此时似乎有些动摇，而冯道趁热打铁，说自己未能治理好天下，有失职之罪，请刘知远把自己和张灿等人一并斩首。

刘知远在政治上并不糊涂。冯道的背后是中原官僚集团，杀了冯道，等于彻底得罪了中原官僚集团，刘知远虽然想杀冯道，但他也知道他根本没有杀冯道的机会。最终刘知远还是选择了妥协，释放了张

灿和二十多名牛皮贩子。

顺便说一句，此事记载于宋初名臣张齐贤所著的《洛阳缙绅旧闻记》中，而张齐贤在书中但凡涉及冯道的，从来不直呼冯道其名，而一律尊称为瀛王冯令公。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生存之“道”（四）

刘知远死后，刘承祐即位，后汉朝局陷入一片混乱，而年近七十的冯道正在家中撰写一篇自传体文章，这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长乐老自叙》。

有赖这篇《长乐老自叙》，后人才可以了解冯道家族的背景以及冯道个人的家庭情况，因为冯道几乎把自己的八辈祖宗都写进来了，祖名甚，宗名甚，娶过几房老婆，生过几个儿女，甚至还不嫌笔墨，把自己出道以来所历任的官位、爵禄都写了进来，拉拉杂杂一千三百字，而《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总共也不过三千八百字。最让后世道德家不能接受的是，冯道把自己所侍奉过的君主一个不落地写出来，计有刘守光、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石重贵、耶律德光、刘知远，以及“今上”刘承祐。而在道德家们看来，冯道这么做，就等于一个淫荡的女人满世界宣称自己睡过多少个男人……

司马光、欧阳修、王夫之、赵翼都对冯道大加鞭挞，痛骂冯道毫无廉耻。清人赵翼最讨厌冯道，他在《廿二史札记》中大骂冯道：“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方自称长乐老，叙己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冯道）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矣。”赵翼可从来没骂过张昭、符彦卿，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张、符二人最终侍奉的是赵翼极端热爱的宋朝罢了。

后世对冯道有个误解，多以为冯道在乱世百姓流离之际而自称“长乐老”，其实冯道自称“长乐老”，是因为冯家祖上的郡望是北朝时的长乐郡而已，并无其他含义。

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自夸官声，被道德家们痛骂，而冯道在文中最后对人生的思考，却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冯道认为做人要“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

“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奸佞之臣。

冯道侍奉的帝王较多，但这是客观的历史发展，不是冯道所能左右的。冯道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匡谏君主，下及福惠于百姓，不愧于天地良心。正如明朝狂人李贽所说：“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冯）道务安养之力也。”

李嗣源走了，还有石敬瑭可以上承小康之世。石敬瑭之后，后汉政权残暴违于天，所幸后汉四年后就被郭威推翻了。

郭威性格有些接近于李嗣源、石敬瑭，而冯道的性格则最适合侍奉这样的老板，为人稳重，喜怒不常于形色。其实冯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郭威在官场上的贵人。郭威西征三叛前，特意来请教冯道，冯道给他出了一个世纪绝招——花公款收买人心。郭威用了冯道开的这个方子，果然把军权牢牢攥在手中，为将来废汉建周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在乾祐之变后，郭威流泪起兵南下讨说法，虽然没有冯道暗通郭威的记载，但冯道显然是希望郭威代汉称帝的。原因并不复杂：冯道心中还残存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而最有可能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梦想的，现在看来也只有性善且多能的郭威。

应该是从这一点考虑，当郭威准备谋杀湘阴公刘赟时，年已七十的冯道不辞辛苦，车马劳顿前往徐州，帮助郭威诈骗刘赟。刘赟虽然身单力薄，但毕竟身边还有不少带刀侍卫，冯道孤身深入，那是要冒

杀头危险的。而刘赞身边多是年轻人，他们把被郭威欺骗的怒火都撒在冯道身上，徐州节度推官、年仅二十岁的郭忠恕当众大骂冯道：“令公（冯道）累朝大臣，诚信着于天下，四方谈士，无贤不肖，皆以为长者。今一旦返作脱空汉，前功业并弃，令公之心安乎！”而只要刘赞一声令下，早已抽剑在手的贾贞、董裔等人会立刻上前，将冯道砍成肉泥。

冯道要是贪图富贵，他完全可以不参与郭威的事情，反正以他的江湖资历，郭威上位，他还可以继续当他的天下文臣之首，又何必冒这个风险？

郭威是个好皇帝，他建国之后，推行了很多符合百姓利益的好政策。而从《旧五代史·冯道传》“太祖（郭威）甚重之（冯道）”的记载来看，冯道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郭威的新政，至少郭威会向冯道咨询有关治政经验，毕竟冯道的资历与能力摆在那儿。

风吹过，雨飘过，冯道还是那个冯道。

不过有一点，冯道和郭威是不太相同的。郭威虽身处旧时代末期，但他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性人物，宋朝的繁荣，其源头就是郭威的改革。而冯道身处新时代的开端，却是一个再标准不过的旧时代代表人物。而当郭威驾崩，养子柴荣即位后，锐意进取开拓天下时，冯道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柴荣继位后最重要的事情，无疑是应对北汉刘崇联合契丹兵马大举南下。刘崇南犯，实际上给了柴荣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机会，锐意进取的大周皇帝决定亲征刘崇。但柴荣没有想到，他亲征的决定却遭到了所有官员的反对，高坐殿上的大周皇帝成了孤家寡人。

七十三岁的冯道站了出来，他有话要说。

柴荣还在坚持亲征，冯道问其理由。柴荣认为“刘旻少（轻视）

我，谓我新立而国有大丧，必不能出兵以战。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当自将击之”。

冯道笑了，他明确表示自己坚持反对皇帝亲征，理由是刘崇势大，不可轻敌。

柴荣面色不悦。

但冯道还在喋喋不休地劝柴荣，把刘崇说得凶神恶煞一般，柴荣脸上已经十分难看。而欧阳修对冯道突然发神经似的劝谏柴荣非常不解，“前事九君，未尝谏诤，而世宗……道乃切谏，以为不可”。

柴荣尊冯道是五朝老宰相，还是忍住怒火，但他的态度依然强硬——朕必亲征。而冯道的态度同样强硬到底，“冯道固争之”，言外之意是：就凭你？

柴荣俯视众人，言语如刀，“当年唐太宗打天下，一人一马一剑，身先士卒，横扫天下。王世充、窦建德非无不授意，遂壹天！唐太宗能亲征天下，朕也能！”柴荣眼里满是骄傲。

冯道又笑了，“唐太宗自是唐太宗，陛下自是陛下。”

柴荣还在反击冯道：“刘崇据十州手掌之地，妄建尊号。而朕率百州锋锐健儿，苟遇刘崇老儿一众乌合，如泰山压卵，刘崇老儿死如齑粉！”

柴荣从来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轻视。

而冯道却继续践踏着柴荣脆弱的自尊心，“泰山自是泰山，陛下自是陛下。泰山不是陛下，陛下也不是泰山”。

柴荣彻底怒了，他站起来，几乎是怒吼着告诉冯道以及那些骨子里瞧不起自己的大臣：“你们把朕当成石重贵第二，可朕偏要证明给

你看，石重贵自是石重贵，柴荣自是柴荣！——你们怕死，都留下来，朕亲征河东，一剑直取刘崇颈上那颗苍头！”

冯道并不想迎合柴荣的自信，还想再给柴荣泼冷水，好在宰相王溥出来打圆场，柴荣才勉强按下怒火，拂袖而去。

关于冯道为什么会在行将就木之时突然向柴荣发难，史评家们多有不解，王夫之甚至认为柴荣此时对冯道已起了杀心。史料并没有留下冯道此举的真实用意，只能妄自猜测。而最流行的观点则认为冯道当众羞辱柴荣，实际上是做给刘崇看的。

北汉与周朝有杀子之恨，刘崇一旦灭周，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柴荣的，毕竟柴荣养父郭威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刘赟。而刘崇同样不会忘记，正是冯道给郭威做狗腿子帮凶，刘赟才死于非命。若灭周，刘崇也难保不会羞辱冯道。冯道羞辱柴荣，等于在刘崇面前给自己画了一张保命符——自己并不是郭家走狗。

不过，冯道并不相信柴荣就一定败于刘崇，至少柴荣亲征掌握了兵权，而石重贵之所以灭亡，恰恰是因为兵权旁落杜重威之手。而且，刘崇百无一能，和他兄长刘知远好不了多少，一旦再次统治中原，既是中原百姓之难，也是冯道本人之难。从这个角度讲，冯道是希望柴荣打败刘崇的，毕竟柴荣的天才能力，冯道是看在眼里的。

冯道老了，他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柴荣和刘崇的战争，他再也管不着了。

而柴荣在亲征之后，几乎是报复性地让重病缠身的冯道奉太祖皇帝灵柩去二百里外的郑州嵩陵下葬。

车马劳顿，黄尘扑面，柴荣应该是有意折腾冯道，赶紧把这个老家伙累死，省得以后在自己面前聒噪。

冯道知道柴荣用意，淡然一笑，一路咳着赶赴郑州嵩陵，拼尽最

后一口力气，把身体早已冰冷的郭威遗体送进黑暗的墓道中。

冯道知道，不久后，他冰冷的遗体也同样会被埋葬在无尽的黑暗中。

冯道回到汴梁家中，已经奄奄一息，命不久矣。而此时的柴荣，正在与刘崇决一死战。也许冯道已经得到了消息，他的嘴角闪过一丝微笑，他知道，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柴荣将会开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崭新时代。

周显德元年（954年）四月十七日，周太师、中书令冯道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享年七十三岁，与孔子同寿。

附冯道富有人生哲理的诗作两首。

《天道》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
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冯道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十国

心狠手辣才能成大事

——偷驴贼王建的发迹史（上）

梁太祖朱温小时候历经灰暗，长大后偷鸡摸狗，人多厌之，但因为为人雄强，在乱世纷扰之际终能一飞冲天，建立一方霸业，堪称五代第一“无赖枭雄”。

那么十国的第一“无赖枭雄”是谁？答案基本没有争议——前蜀高祖王建，一个几乎是十国版朱温的一代枭雄。

要说出身，王建和朱温略相似。朱温是乡村清贫知识分子的儿子，王建则是一个地道的乡间土棍。但有一点朱温要比王建好，就是朱温偷东西。众所周知，朱温偷锅，但那是因为钱都赌光了，为了筹集赌资才不得不当回扒手，还犯罪未遂。而王建则是职业扒窃分子，他完全就是靠偷靠摸维持生计，一天不偷，就得饿死。朱温也不是所有人都讨厌，至少刘崇母亲非常疼爱朱温；而王建则遭到了乡邻所有人的痛恨，因为王建是在绝别人家的活口。农村生产力低下，老百姓种地全靠牛和驴，牛耕地，驴拉货，可王建专砸百姓饭碗，“少无赖，以屠牛、盗驴为事”，还经常贩卖私盐，家境自然要远比连口锅都没偷成的朱温殷实。这样的缺德钱，王建赚得越多，挨骂越狠，老百姓恨恨地给王建送了一个名震古今的雅号——贼王八。

因为偷牛偷驴得罪了乡里乡亲，王建在家乡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混不下去了，干脆放弃了这行好买卖，就地参加了忠武军的武装编制，当起了大头兵，吃起了军饷。因为王建身强体壮，“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形象比猥琐的朱温惹人顺眼，再加上稍有功绩，很快就做了队将，成为一名小头目。

王建为什么要参军，史无明载，但其本意应该与朱温差不多。朱温虽然“无赖”，但善骑射，身壮如牛，又逢乱世，最适合参军，然而杀人如麻，官至诸道节度使。这是最适合朱温走的道路，王建同样如此。王建虽然有点钱，但毕竟名声不好，再加上老百姓看管牛驴较严，王建“生意”做不下去，不如参军杀人，捞军功至富贵，还有尊贵的社会身份，何乐而不为？

因为朱温出道后跟着“反贼”黄巢大杀江湖，所以朱温后来洗白了身份，依然逃不掉“黄巢余孽”的骂名。而王建则一开始就是官军身份，从来没做过“反贼”，这一点要比朱温“干净”。虽然当时的忠武军老大秦宗权后来也当了“反贼”，但那时王建早就脱离秦宗权了。

朱温发迹是因为后来反叛黄巢，王建发迹则是一开始就与黄巢作对，虽然王建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881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李僩逃窜到成都避难，时任忠武军节度使的秦宗权在忠义老太监杨复光的劝说下，发兵三千，派大将王淑助杨复光讨伐黄巢。杨复光在杀了“逗留不进”的王淑后，把前后所得的八千名忠武兵分成八部，又从忠武军中选拔八名牙将每人各领一部，号称忠武八都，其中一都就是王建，另外还有鹿晏弘、晋晖、韩建等著名人物。

说来非常有意思，王建和朱温的相似度极高，但二人其实是见过面的，甚至交过手。中和元年（881年）四月，杨复光带着八都与黄巢手下的头牌大将朱温在邓州大战，把朱温暴打一顿。也许彼时的朱温和王建都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们会成为各霸一方的雄主。

不过王建的起点远高于朱温，朱温本是“反贼”，幸亏认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当干娘舅才飞黄腾达；而王建的贵人则是当时行政级别最高的那个人——唐僖宗李僩。

在八都中，势力最大的是鹿晏弘，鹿某野心太大，后来扯旗单干，在河南一带烧杀抢掠。王建等人根本不服鹿晏弘，你自己玩去

吧。八都中的五都——王建、韩建、晋晖、张造、李师泰各率本部人马“西奔于蜀”，投奔了李僎。李僎“得之大喜”，封五人为随驾五都，恩宠有加，甚至让大太监田令孜收下五人为养子。等到李僎返回长安时，王建恰巧跟随在李僎身边，因为汉中山路难走，半夜在荒郊野外，王建眼头非常活泛，他见皇帝没有睡的地方，直接献出自己的大腿，让小皇帝枕在自己的腿上入睡。等到李僎醒后，见王建如此忠君，备受感动，把自己平时穿的御衣穿在王建身上。

这是何等的荣耀！

后来大太监杨复恭主掌内政，而杨复恭又与田令孜不和，而王建又是田令孜的干儿子，但考虑到僖宗皇帝非常欣赏王建，不得不卖给皇帝一个面子，让王建去利州（今四川广元）当刺史。

当时的刺史权力非常大，而且手握重兵，仅次于节度使。如果不是王建巴结上了唐僖宗，是不可能得到这个肥差的。

因为西川只有两大藩镇，即剑南西川和剑南东川，所以王建得到的利州，其实就相当于朱温得到的宣武军之于中原一样。如果把蜀中等同于天下的话，利州的地位和宣武军相差无几。这个时候，王建才算真正混出头来，成为蜀中有较强实力的地方大员。利州北近汉中，南近成都，南可攻成都，北可攻汉中，是蜀中著名的战略重镇，王建得利州，对于他日后得蜀中天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对王建来说，面临着两大选择：一是北上汉中进取关中，而且守汉中的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邀请王建去汉中，王建不敢去。二是南下成都进取两川。关中是唐王朝所在地，加上多年战乱，地瘠民贫，没有多少油水。而两川天府之资，地丰民富，是天然的割据之地。王建手下谋士周庠劝王建“唐祚将终，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公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谁！然葭萌四战之地，难以久安。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西川节度

使陈敬瑄）、田（田令孜，陈敬瑄之兄）之腹心，不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一战而擒也”。

王建善之，这是唐光启三年（887年）三月。

其实王建已做出入蜀争天下的选择，去抢烫手山芋一样的关中，只有傻子才会去做。

王建争夺蜀中的最关键一步是南下袭取阆州。阆州进可取成都，退可守利州，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王建凑了八千人马，甚至还有当地的“溪洞酋豪”，沿嘉陵江南下，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要塞阆州。

王建是有政治野心的，部将张虔裕认为“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义以行师，蔑不济矣”。欲成大事，必须有政治上的合法名分，否则事必不成。虽然史料并无记载王建接受张虔裕建议后的效果如何，但从王建日后的成功来看，政治上的收益是非常大的。王建同时还接受了部将纂毋谏“养士爱民”的建议，为王建争取蜀中人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王建在战略上的能力非同寻常。蜀中分为西川和东川，东川为王建曾经的战友顾彦朗占据。顾彦朗善抚将士，王建如果与顾彦朗苦争，一则实力较弱未必能拿下；二则即使拿下东川也大伤元气，白白便宜了其他人。西川陈敬瑄是个草包，百无一用，类似于刘璋。所以王建舍东川不攻，直接去取西川。等到拿下西川，有了固定的根据地后，再与顾彦朗争蜀中天下。

利、阆二州皆在山南西道，王建欲得西川，必须借路东川。王建先与东川搞好关系，甚至还经常给东川送钱粮，稳住了顾彦朗，算是得到了顾彦朗的借路许可。当然，王建自然不会对顾彦朗说我先取西川再来取你项上人头，而是说我要回趟成都，去看望我“年迈多病”的“父亲”田太监，然后给陈敬瑄打长工，打消了顾彦朗的顾虑。

当得知已在蜀中打出名号的王建欲图西川，陈敬瑄吓得快尿了裤子，而陈敬瑄的亲兄长、大太监田令孜则信心满满地告诉弟弟：“王八，吾子也，彼无他肠，作贼山南，实进退无归故也。吾驰咫尺之书，可以坐置麾下。”但现实很快就嘲弄了这位曾经威赫喧天的十军阿父兼王建的干爹。

陈敬瑄拒绝王建来成都“省亲”后，王建失去了在成都通过政变夺权的机会，那就武力强占西川。王建率三千精锐穿过了东川辖境，攻克了西川境内的汉州（今四川绵竹），而绵竹正是成都的北面门户。

成都是西南名城重镇，城高粮多，易守难攻，当年刘璋如果死守成都一年，刘备进退失据，后果难以预料。王建的实力还不足以立刻拿下成都，“设梯冲攻成都”，攻了三天，大牙崩掉几颗，成都纹丝不动。王建并没有死咬住成都，而是极富战略性地先扫清西川其他州郡，让陈敬瑄在成都城中消耗粮食和士气，等拿下西川，再攻成都孤城，一战可下。但王建有一点和朱温不同，朱温用兵，多少还顾及百姓利益，而王建简直就是土匪再世，“（建）纵兵大掠（蜀中），十一州皆被其毒，民不聊生”。

王建是个乱世军阀，乱中取胜其实本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但王建的战略头脑在唐末五代确实值得大书特书。王建攻占西川的企图蜀人皆知，东川的顾彦朗会怎么想？他会坐视能力远强于陈敬瑄的王建据西川再攻东川？虽然顾彦朗与陈敬瑄久有积怨，但面对共同利益，顾、陈联手，西川东川共同用力，在两川之间来回折腾的游军王建立时就能挤成压缩饼干。王建早就考虑到这一点，早在他借路东川时，就向顾彦朗提出来顾王两家合伙攻成都然后中分西川，《新唐书·陈敬瑄传》记载：“（王建）因请兵于彦朗。”顾彦朗自然愿意，“以其弟顾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急攻成都”，甚至还暗中向王建提供大量军资钱财。如果王建不做出这样的承诺，以他现在的实力，绝对承担不起顾、陈两家合兵的后果。

顾彦朗得到了王建给他画的半分西川的诱人大饼，自然要为王建做点什么。王建非常有政治头脑，在军事上暂时占不到陈敬瑄便宜的情况下，那就在政治上抹黑陈敬瑄。王建上表长安，“请讨敬瑄以赎（王建抄掠蜀中之）罪”；而顾彦朗也跟着起哄，“顾彦朗亦表请赦（王建）罪”，同时又请求朝廷将陈敬瑄调离西川，另择大臣主政西川，但并没有提名王建。新即位的唐昭宗李晔派宰相韦昭度入蜀取代陈敬瑄，同时又“诏东川顾彦朗与王建合势讨之（陈敬瑄）”，等于给了王建取成都的合法理由，这为王建未来的爆炸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晔和陈敬瑄没有私怨，但却恨透了陈敬瑄的兄长田令孜，李晔宁可让王建主政西川，也要借王建之手除掉田令孜。

不过王建也知道顾彦朗是靠不住的，他一方面要攻下成都；另一方面还要提防顾彦朗下黑手。不过王建为人强枭，是蜀中人人愿意押宝的潜力股，王建驻新都时，当地大富豪何义阳等人不但把自己的私家武装交给王建，还“给其资粮”，此时已有些狼狈不堪的王建“军复振”。

王建对陈敬瑄的威胁，主要还是在政治上，王建在政治上几乎搞掉了陈敬瑄。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李晔设置了永平节度使，王建任刺史，同时“削陈敬瑄官爵”，王建再次在政治上取得完胜。至于在军事上，王建几乎将陈敬瑄玩得团团转，几乎是没有什么浪费笔墨的。

王建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先占据西川再取东川，但顾彦朗急切不可下，新来的韦昭度又有皇帝支持。王建偷惯了牛，也当惯了孙子，在实力较弱的情况下，装孙子是唯一的选择。有些人失败，就是放不下所谓的面子，强充英雄好汉，结果吃了鬼头刀。王建“事昭度甚谨”，就差在韦昭度面前跳脱衣舞了。

但因为陈敬瑄善守，韦昭度打了三年，依然没有拿下成都。李晔有些沉不住气，下诏“复陈敬瑄官爵”，意欲与陈敬瑄和好，并要求王

建罢兵。王建距离统治西川一步之遥，皇帝的圣旨他也可以不听！

王建当着韦昭度的面，活剐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韦昭度知道王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吓得立刻把军权交给王建，并让王建署理西川节度使，自己称病回朝。

当然，黑锅是由顾彦朗来背的，“建阴令东川将唐友通等擒昭度亲吏骆保于行府门，齑食之”。王建应该是暗中用重金收买了唐友通，顾彦朗并不知情。王建的戏还没有演完，韦昭度逃跑之前，王建“跪觞马前，泣拜而别”。

恶人你来做，好人我来当。

韦昭度指挥的数万大军转眼之间就成了王建的私人武装，但依然打着代天子讨伐“反贼”的旗号，政治名分最正。为了防止朝廷变脸，王建派兵扼守剑门雄关，割据朝廷方面与陈敬瑄的联系，王建就可以轻松地收拾陈敬瑄了。

王建势力在蜀中坐大，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无论陈敬瑄，还是杨守亮，以及东川的顾彦晖都不是王建的手，想升官发财的都倒戈归降了王建。成都的陈敬瑄虽然还在死撑，但成都城内虚实已尽为王建所侦知，所有人都知道，王建进成都只是时间问题。

大顺二年（891年）四月，王建下达了对成都的总攻令。

陈敬瑄还在死守，而王建的干爹田令孜此时也放低了身段，不叫王建“王八吾儿”了，改称“八哥”。只是王建暂时还可以利用老太监，还以父子相称，把田令孜骗到自己营中。应该是田令孜让人捎信给城中的陈敬瑄，次日，陈敬瑄非常干脆地出城投降王建。

王建此时已对陈氏兄弟动了杀机，但为了稳定成都，王建指天画地地发誓：“太师（陈敬瑄）初心太过，致有今日相戾。即此推心，一切如旧。”王建当然不会自己动手杀人，但皇帝可以啊！

在王建彻底控制住了西川之后，二陈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景福二年（893年）二月，王建多次上表请李晔下诏杀陈敬瑄和田令孜。还是恶人你来做，好人我来当。

李晔没上当，他希望能留下二陈牵制王建。李晔不配合，王建也有办法杀二陈。王建再上表指责陈敬瑄谋反，还没等李晔回信，王建已经杀掉了被软禁在新津的陈敬瑄。至于田太监，“（王建）又告令孜通凤翔（割据凤翔的李茂贞）书”，把老干爹锁在牢里，孝敬三尺白绫，给老干爹送了终。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田令孜不是自尽，而是被扔在牢里活活饿死的。

而此时王建的 political 身份是检校太傅、成都尹、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使等。

此时蜀中还有东川顾彦晖割据，不过王建从来也没把顾彦晖当盘菜。顾彦朗已经病死，王建心里很清楚，吃掉顾彦晖必然会费一些力气，但也不过是早上吃掉或者是晚上吃掉的区别。唐乾宁四年（897年）十月，被王建用了近五年时间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顾彦晖再也撑不下去了。东川治所梓州城内，绝望的顾彦晖在醉酒后杀掉一桌子酒友，悲愤自杀，东川自然是王建的战利品。

蜀中尽为王建所得，但王建有时还是睡不踏实，因为蜀中的北面门户汉中要塞还在李茂贞手上。王建现在应该能体会到刘备无法容忍曹操控制汉中的心情，一旦有兵从汉中涉险进入两川平地，后果将不堪设想，看看刘阿斗的结局就知道了。

李茂贞实力很强，硬吃未必能啃得动，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唐天复二年（902年）五月，控制中原的梁王朱温与控制唐昭宗李晔的李茂贞大打出手，而李茂贞实力弱于朱温，鉴于他与王建良好的合作关系，便请王建出兵帮他打退梁兵的进攻。

王建爽快地答应了。

可还没等李茂贞夸王建够哥儿们的时候，他发现蜀军的目标根本不是梁军，而是他的汉中。等李茂贞明白过来，五万蜀军在王宗涤的率领下已攻下汉中，生擒李茂贞的山南节度使李继密。同年九月，见王建势大，李茂贞的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恭献洋州（陕西洋县），做了王建的马仔。

几乎是转眼之间，李茂贞赖以生存的南面要塞变成了王建的北面门户。因为凤翔就在汉中北面，只要王建一捅刀子，李茂贞如坐针毡。

李茂贞大骂王建无耻下作，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朋友。可李茂贞所不明白的是，利益场上哪有朋友？王建这么做，确实缺德带冒烟，但王建为人天下皆知，李茂贞并非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主动引狼入室，又能怪谁呢？

王建是靠出卖朋友获得利益的，固然让人不齿，但在乱世中生存，但凡讲仁义礼智信的，往往都没有好下场。像王建这样缺德带冒烟的，往往能成就大事。

心狠手辣，王建觉得理所应当。

薛居正评价王建“雄猜多机略、意常难测”。想在乱世中谋生存，就得有点手段。你不吃人，人必吃你。

心狠手辣才能成大事

——偷驴贼王建的发迹史（下）

唐天复三年（903年）八月，毫无人身自由的唐昭宗李晔下诏，封西平王王建为蜀王，正式承认了王建对蜀中的统治。

王建控制的地盘，北至汉中，西至川藏边界，南至云贵高原，东至白帝城，疆域横幅数千里。论整体实力，是与中原朱温、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齐名的晚唐四大枭雄。

而实力雄厚的王建，却从来没有进取中原的计划，他已满足于对蜀中的控制。倒不是王建不思进取，问题还是进取中原的难度要远大于守蜀的难度。让王建逐一吃掉李茂贞、朱温、杨行密、李克用、钱镠、马殷、刘岩、王审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谁也做不到这一点。王建据蜀后，开始偃武修文，蜀中很少再见刀兵。虽然王建据蜀初期也是个敲剥百姓的民贼，“王建赋敛重”，但随后就在冯涓的劝说下，减轻了百姓负担，“自是赋敛稍损”，蜀中百姓可以安心从事生产。从这一点看，王建的保守也是百姓的福气。像国不正的北宋那样“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其实都是百姓的晦气。

虽然王建为人有时过于耍宝，但他在政治上是不糊涂的。砸了老百姓的锅，老百姓被逼得没饭吃，就会群起而砸掉他王家的锅。让老百姓有口热饭吃，老百姓是断然不会造反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王建的军事能力其实一般，比当世两大军事强人朱温、杨行密稍逊一筹，所以王建更注重在政治上的经营。只要政治上不出问题，完全可以弥补自己在军事上的短板。比如唐天复四年（904年）八月，苦兮兮的唐昭宗李晔被朱温杀掉，消息传来，举世震惊，而王建则迅

速从此事件中发现了“商机”。李晔的苦难人生多为天下人同情，王建自然要给自己在政治上捞分。王建接受了西川掌书记韦庄的建议，派人告诉朝廷的发哀使司马卿：“蜀之将士，世受唐恩，去岁闻舆东迁，凡上二十表，皆不报。寻有亡卒自汴来，闻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将土方日夕枕戈，思为先帝报仇。”后来王建又率众东向舞蹈，“号恸”（昭宗被杀）。王建说得义正词严，做得堂堂正正，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为一个死去的傀儡皇帝去和强大的朱温开战，但王建这么做，至少把自己打造成了忠于唐朝的正义形象，对他巩固在蜀中的统治大有好处。

王建做事，特别是在做坏事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跟风。有人先做了坏事，王建才会做同类坏事。反正有人指责王建，王建就会说我也是跟别人学的……

唐天祐四年（907年）四月，形同死缓囚徒的唐朝小皇帝李祝终于“顺天应人”，把江山传给了爬灰的老光棍朱三，至此，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帝国就此烟消云散。

朱温废唐称帝，严重刺激了久有此意的王建。但王建不傻，他绝对不会抢在朱温之前称帝，那样在政治上等于自杀。所以王建天天掰手指头算日子，希望朱温早点称帝，自己再跟上，就不怕被人骂。

王建是个天生的影帝，即使到了这一步，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演员身份。蜀中文武以“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请蜀王称帝。王建还想再利用一把唐朝的政治僵尸，假惺惺地“不从”。后来在大家的“苦劝”下，王建终于同意称帝。但在称帝前，王建非常搞笑地带着蜀中官员百姓东向“哭三日”，算是给已经完蛋的大唐王朝尽了孝。把他的唐朝干爹埋进土里后，王建开始嬉皮笑脸地享受他的美妙人生。

梁开平元年（907年）九月二十五日，六十岁的江湖老滑头王建

做了皇帝，国号蜀。

再把王建和朱温比较一下。二人出身相近、经历相近、年龄相近、手段相近，但为什么朱温被骂了一千多年，而很少有王建的负面丑闻？原因非常简单——朱温讨厌读书人，而王建则有意地拉拢读书人。这也是柴荣不受读书人待见，而读书人特别喜欢赵匡胤的原因。朱温、柴荣爱百姓不爱士人，所以士人对他们非常反感，王建、赵匡胤则相反。士人从来只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让他们去为百姓利益说话，十万人里最多能找出十个人。

王建其实是个文盲，但文盲并不等于傻子。王建头脑很活泛，会来事。他知道自己经常过河拆桥，有些不太地道，所以他有意识地拉拢读书人，至少王建知道读书人会写史。

史载，王建“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其实历史上文盲帝王尊重读书人的不在少数，比如十六国的后赵皇帝石勒，以及王建的江湖晚辈李嗣源。但当时王建尊重读书人与石勒、李嗣源还有所不同，毕竟石、李都是中原皇帝，而王建偏安蜀中。蜀中距离唐朝国都长安只隔着一座秦岭，而唐末大乱，长安城中的衣冠贵族多人入蜀避难。所以，唐末以来，收留唐旧贵族最多的就是王建的蜀国，《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载：“（王建建国后）所用皆唐名世族。”王建意识到这些人入蜀，是一笔价值无可估量的财富，王建对这些出身高贵的读书人非常尊重，“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唐朝典故）”。王建此举不仅赢得了当时读书人的好感，也让后世读书人对王建的印象非常好。但从保存唐朝文章典籍的角度来看，五代十国中最有唐朝风味的政权，无疑就是前蜀，史称“故其（前蜀）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甚至可以说前蜀就是个小唐朝，唐风之正，远胜于自称唐朝正统的后唐与南唐。

王建演戏上了瘾，他对群臣说他之所以厚待读书人，是因为“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

寮友，非将相可比也”。

唐朝皇帝都死了多少年了，王建仍没忘记把他们从坟墓里揪出来给他当配角。

做人如此诡诈，这是真性情的朱温无论如何都不及的。

在江湖四大佬中，李克用和杨行密已经去世，只剩下王建和朱温。朱温自知王建的能耐不在自己之下，所以对王建客气，每次派使节入蜀，都要尊称王建一声老兄。因为朱温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别想打王建的主意了。

王建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王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自己的蜀国公司选一个将来继承家业的少东家。

都说王建和朱温很像，其实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干儿子。不过朱温的干儿子们都处在权力外围，很少有带兵并能竞争皇位的，比如李让、高季昌等人，除了朱友文。而王建的干儿子们和李克用的干儿子们的相似点，就在于二人的干儿子们都是跟着干爹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大将，手握重兵，自然都盯上了那尊诱人的皇冠。

王建的子嗣非常多，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王宗仁、王宗懿、王元膺、王宗谔、王宗杰、王宗衍等十一个亲生子。

第二类是王建的晚辈养子，如王家侄子王宗裕、王宗寿，以及王建的外甥王宗翰（本姓孟）。

第三类是王建那伙强悍的干儿子们，如有王宗佶（本姓甘）、王宗侃（田师）、王宗弼（魏弘夫）、王宗涤（华洪）、王宗瑤（姜郢）、王宗播（许存）、王宗铎（李武）。

虽然王建的干儿子们个个骁勇能战，为王建的江山立下汗马功

劳，但在有亲生儿子的情况下，王建是不可能把江山传给外姓的。干儿子中功劳最大的王宗佶为了当上皇太子几乎使尽了所有手段，最终惹恼了王建，被乱刀剁为肉泥。而王建之所以下狠手杀王宗佶，其实还是要借王宗佶的死，震慑诸假子们，让他们都收起野心，他的江山，只能由自己的骨血来继承。效果也非常明显，至少在王建在世时，假子们都老老实实地给干爹卖命，再不敢有非分之想。

可此时王建才发现，他的这些亲儿子们个个都不是什么好鸟，特别是他的次子王宗懿。因为王建的长子王宗仁腿部有残疾，所以立了次子王宗懿。

王建对王宗懿并不满意，此子轻佻无方，做事毛躁。王建信任枢密使唐袭，可王宗懿看不上唐袭，经常在背后说唐袭坏话。王建警告过王宗懿不要乱嚼舌头，王宗懿照样在外摇唇鼓舌，让王建大为不满。唐袭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诬告王宗懿要谋逆篡位。王建信以为真，让唐袭带甲兵入宫护驾，没想到这个举动让王宗懿以为唐袭要对自己动手，抢先一步杀掉唐袭。王宗懿只想杀唐袭，但王建却认为儿子这是要弑父，立刻派人收了王宗懿的兵权，王宗懿趁乱逃到民间避难，成了落难太子，不久莫名其妙地被人杀死，凶手不详。

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根据利害关系猜测，最有可能干掉王宗懿的是一对姐妹，就是王建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大徐妃和小徐妃，其中大徐妃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王建最小的儿子王衍（即王宗衍，以后皆称王衍）。徐氏姐妹现在受宠，但如果王宗懿即位，她们就得被打入冷宫。所以为了能长久富贵，最好的办法就是做掉王宗懿，立王衍为太子。凭着王建对她们的宠爱，立王衍不算难事，虽然王建非常喜欢“诸子中最材贤”的王宗杰。只是王宗懿不死，一切都是白费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徐氏姐妹是最有动力除掉王宗懿的。

王建的儿子没有一个是嫡长子，所以王宗懿死后，在徐氏姐妹的指使下，宫里太监、紫贵大臣、江湖算命先生一哄而上，把王衍夸成

了一朵花。此时的王建早已“老昏耄”，还以为王衍得人心，糊里糊涂地就立了王衍为太子。这一年是蜀永平二年（912年）。

徐氏姐妹的兴奋可想而知，但她们不会想到，正是自己这个宝贝儿子（外甥），不仅断送了她们老公的江山，也断送了她们姐妹的性命。

王建同样不会知道，他历经艰苦三十年才打拼下来的蜀中天下，在他死后仅仅八年，就被他这个宝贝儿子王衍断送得一干二净，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而王建，死于蜀光天元年（918年）六月初一，纵横两川近四十年的一世枭雄王建死于成都，时年七十二岁。

王衍的亡国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徐氏姐妹和王衍自己。为了赚钱，徐氏姐妹公开卖官，就像开油条铺子一样，蜀中有钱的主都像嗅到鱼腥的猫一样，纷至沓来，挥舞着银票要当公仆。“太后、太妃以教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阙，必数人并争，而入钱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这样的官，是不可能为老百姓服务的，只能横征暴敛，最终丢掉民心。前蜀灭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王衍宠用太监，“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润澄、王承休、欧阳晃、田鲁侔等；以韩昭、潘在迎、顾在珣、严旭等为狎客”。太监干政，除了误国，别无一用。这伙太监得志后，蛊惑王衍，疏远贤臣，亲近小人，朝中全是一帮饭桶。指望这样的人来对抗李存勖的铁血河东军，显然是以卵击石。前蜀不亡，反而没有天理了。

一代军事战略大师孟知祥

五代宋初的创业帝王，大致分以下几种：

一、从最底层一路血拼上来，如朱温、杨行密、王建。

二、同样是底层出身，但多少有点资源，如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

三、从父辈手上传来基业，如南唐李昇（徐知诰）、南汉刘^龑。

四、凭空捡个天大便宜，如赵匡胤，什么都没做，只是运气极好，就赢尽本该属于柴荣的一切。

五、江湖起点非常高，出手阔绰，如李克用。

六、手上掌握一定资源，但面临强大对手的竞争，最终干掉对手一统江湖（所在区域），如孟知祥。其实钱镠、杨行密也属此类，但这里只讲孟知祥。

在五代十国宋初的开基帝王中，出身高的不多，李克用无疑是最高的。而李克用之后出身好的，就是李克用的侄女婿孟知祥。

据《旧五代史》记载，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龙冈人。没错，孟知祥与郭威、柴荣是如假包换的老乡。孟知祥的父亲孟道只是邢州将校，无足称道，但孟知祥却有一个了不起的伯父——控制邢、洺、磁三州的保义军节度使孟方立。

孟方立能力一般，在与强大的邻居河东李克用的竞争中很快就败下阵来。唐龙纪元年（889年）五月，李克用大举进攻邢、洺州。因为孟方立为人吝啬，不得人心，“诸将多怨，至是皆不为方立用”。孟

方立知道大势已去，服毒自杀。接掌兵权的弟弟孟迁根本不是李克用的对手，干脆投降了事。邢州孟氏举家迁往太原，时年十六岁的孟知祥来到了陌生的太原城，开始了他奇特的命运。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李克用把弟弟李克让的女儿许配给了孟知祥，而作为晋王的侄女婿，又是名家孟氏之子，所以孟知祥在河东的仕途异常顺利。更重要的是，孟知祥和后来的晋王李存勖、河东二掌柜郭崇韬私交都非常好，与李嗣源也能称兄道弟，人脉非常广泛。

由于孟知祥人缘好，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韬率唐军进攻前蜀前，就向李存勖推荐了孟知祥为战后的西川节度使，主政成都善后，李存勖同意了。李存勖和孟知祥既是亲戚又是好友，自然愿意让孟知祥出任这个肥缺。临行前，李存勖还给孟知祥办了一场送行宴，二人先是聊人生故旧，随后喝得烂醉的李存勖告诉他的堂姐夫：“吾闻蜀土之富，无异于此，以卿亲贤，故以相付。”

其实，孟知祥入蜀，还有另外一项秘密任务，就是应李存勖的要求，去成都诛杀让李存勖早就怀疑有不臣之心的郭崇韬。李存勖密令孟知祥“闻郭崇韬有异志，卿到，为朕诛之”。而孟知祥与郭崇韬亲如兄弟，他并不相信这种传闻，也只是含糊答应。可李存勖是铁了心要杀郭崇韬，李存勖派人去成都杀郭崇韬，同时催促在路上软磨硬泡的孟知祥早点到成都上任。孟知祥磨蹭，是想给郭崇韬一点灵活机动的时间。而现在的情势也让孟知祥看透了时局，天下未定便要杀首功之臣。

“乱将作矣！”孟知祥感叹道。

史料没有记载，不过孟知祥现在应该有了借西川之地避开朝廷权力斗争的想法。毕竟坐镇成都的太子李继岌不会在成都迁延太久，等自己稳定蜀中局势，可以朝着世袭西川的方向发展，然后再视朝廷局势进一步打算。至于好友郭崇韬，孟知祥已经救不了他了，李继岌在

收到父亲密信后，向左右使个眼色，郭崇韬人头便被大锤击得粉碎。

郭崇韬如果不死，或者坐镇成都，以郭崇韬之才，他可以把蜀中治理得条条井然。但郭崇韬的死，其实是给了孟知祥一个难得显现自己治政之才的机会。孟知祥在任太原市长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治政经验。

郭崇韬的死给刚平定的蜀中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蜀中人士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而作为西川行政主官的孟知祥在“人情未安”之际，“慰抚吏民，犒享将卒，去留帖然”。成都形势很快就安定下来。蜀中军民都认可孟知祥的治才，这也为孟知祥后来霸蜀打下了强力基础。

因为前蜀王建积三十年之功经营两川，蜀中军事资源丰富，在发生了灭蜀名将李绍琛（即康延孝）叛乱后，孟知祥轻松派出四万人，联合入蜀的唐军行军司马任圜与同样对蜀中虎视眈眈的东川节度使董璋，共同剿灭李绍琛。三方合力，很快就把欲据蜀称王的李绍琛送进了囚车，临行前，孟知祥还学着朱温的样子，给像极了秦宗权的李绍琛敬了一杯酒，“公已拥节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贵，而求入此槛车邪！”表面上，孟知祥是在奚落李绍琛，其实是做给任圜看的，任圜是文职，早晚要回朝廷当宰相，孟知祥调戏李绍琛，无非是让任圜回去给李存勖传个话：自己绝不会做李绍琛第二。否则李存勖一纸调令让孟知祥离开西川，他接旨还是不接旨？

《资治通鉴》说孟知祥在李存勖死后“阴有据蜀之志”，李存勖花样作死，命不久矣。所以孟知祥必须提早做割据西川的准备，至少在这个时候，孟知祥已经有了据蜀之志。

要控制蜀中，必须巩固自己手中的西川基本盘，一步步向外扩张，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政权建设。所谓政权建设，无非减轻百姓经济负担，刷新吏治，让老百姓有口热饭吃。孟知祥是外来户，蜀人对

他并不熟悉，所以李绍琛振臂一呼，三日内竟有五万人相从。孟知祥深知这一点，他必须利用自己手上的政治资源及早赢得蜀人的好感。史载，孟知祥“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蜀中百姓最怕的是土匪强盗横行，这个好办，孟知祥派大将赵廷隐与张业“将兵分讨群众盗，悉诛之”。

这个“悉诛之”，一则讨好了蜀中百姓；二则震慑了部下官兵，敢不听话，同样“悉诛之”。孟知祥深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一面给你胡萝卜吃，一面举着大棒子。百姓心服，将吏畏服，孟知祥在蜀中人气大涨，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而当李存勖被杀的噩耗传到成都，孟知祥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李存勖在一天，孟知祥畏其雄武而不敢轻动。现在堂妹夫死了，再没人能管得住这位西川节度使了。

孟知祥有据蜀之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立即称帝，毕竟那等于政治自杀。凭自己对老友李嗣源的了解，李嗣源坐稳中原后，一定会向两川下手，绝不会让两川成为政治军事上的特区。

如果是李存勖，一纸调令就能让孟知祥离开西川，但李嗣源没有这个震慑力，他知道孟知祥根本不会听他的。李嗣源很有意思，他要掏空孟知祥的钱袋子，让老孟没钱收买人心。因为听任圜说孟知祥在成都搜刮了富户六百万贯钱，其中四百万发了军饷，孟知祥还私扣了二百万。李嗣源立刻派太仆卿赵季良去成都，让孟知祥把这二百万上缴国家财政。同时赵季良还兼任制置转军使，任务是收缴蜀中郡县的税赋上交中央。

李嗣源伸手要钱，孟知祥本来是不想给的，蜀人“欲皆不与”，但孟知祥暂时还不想与李嗣源彻底翻脸，只是同意交出府库中的钱，而各郡县的税赋一个子儿也不允许上缴。“府库他人所聚，输之可也。

州县租税，以贍镇兵十万，决不可得。”

孟知祥为什么会爽快地把二百万贯巨款送给李嗣源？与其说这二百万是上缴国家财政的，不如说是让李嗣源释放人质的赎金。

孟知祥有据蜀之志，但他的家小都在洛阳，被李嗣源扣作人质。一旦李嗣源以福庆长公主和几个儿子的性命做要挟，孟知祥将会非常被动。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孟知祥与李嗣源暗中达成交易，二百万贯钱给你，你把家小送入蜀中，则是完全符合情理人性的。李嗣源何尝不知控制人质的重要性，但他此刻为了犒军急需用钱，所以答应了放公主与孟昶等人入蜀。

孟知祥用二百万的代价换来了老婆与孩子的一家团聚，看上去代价很大，实际上是花这笔钱买掉自己的后顾之忧，可以和李嗣源抗衡到底，不再受人质困扰。李嗣源再派曾经在唐军灭蜀中立下大功的客省使李严入蜀任西川兵马都监，监视孟知祥，孟知祥已经不再有什么顾忌了，李严一到，孟知祥就用李严人头祭了旗，间接告诉李嗣源：中原姓李，西川姓孟。

西川姓孟，东川则姓董。

东川节度使董璋是枢密使安重诲好友，而孟知祥与安重诲不和，所以孟知祥始终觉得董璋在卧榻之侧，自己睡不安稳。孟知祥要成蜀中霸业，必须除掉同样有野心的董璋。孟知祥和董璋在经济战线上乱打王八拳，董璋让东川的盐贩子到西川贩盐，换取西川的铜钱。孟知祥搞掉这些人太容易了，你想赚我的铜钱？我先把你身上的铜钱搜刮干净？孟知祥下令，对入西川的盐贩子课以难以承受的重税，自然吓跑了东川盐贩子。

后唐天成四年（929年），李嗣源听说孟知祥又搜刮一笔横财，下旨让孟知祥拿出一百万，孟知祥照例哭穷，软磨硬泡之下，只给了五十万。另一路的董璋更绝，李嗣源向他要五十万，董璋一哭二闹才

给了十万。

两川之富，冠绝后唐各藩镇，所以李嗣源一直想直接控制两川，见蘑菇战术实在刮不到多少油水，那就来硬的。李嗣源决定先解决东川的董璋，进一步压缩孟知祥的生存空间，最后再总攻孟知祥。

而董璋已经嗅到了危险，立刻向他的邻居孟知祥求救。孟知祥的战略眼光有点问题，他竟然没有看透李嗣源的深意，还是赵季良提醒他：李嗣源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孟知祥这才回过味来，很快就与董璋结成了攻守同盟，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董璋的儿子。

董璋没有多少能耐，让董璋守东川，远比雄才大略的李嗣源控制东川更符合孟知祥的利益。

董璋主动向朝廷方面发起进攻，天成九月，东川兵进攻遂州、阆中，而孟知祥根据双方事先的谈判交易，派都指挥使李仁罕、汉州刺史赵廷隐、简州刺史张业等人与东川兵合攻遂州，都指挥使侯弘实等人攻阆州。

东西川联手，互为唇齿，朝廷方面则孤军深入，根本不是两川联军的对手，阆州刺史李仁矩被董璋击溃。但董璋做事毛躁，没与孟知祥商量就杀了李仁矩全家，彻底激怒了李嗣源。以牙还牙，李嗣源杀了董璋留在洛阳的全家老小，但等李嗣源想杀孟知祥的老小时，孟家老宅里连个鬼影也没有了。

孟知祥和李嗣源彻底闹翻，他只能硬着头皮联合董璋对抗朝廷。孟知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惜代价保住董璋在东川的统治，绝不能让东川落进李嗣源手里。只是让孟知祥没有想到的是，董璋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董大人一方面抗拒中央军，另一方面还提防着孟知祥。董璋军北上进攻利州，因为天降大雨，董璋退回阆州。孟知祥听说后，立刻写信告诉董璋利州的重要性，并愿意用西川兵守住剑门关，防止中央军南下。董璋不可能让西川兵控制剑门要塞，自然拒

绝。

在朝廷军队的强大压力下，孟知祥现在根本不敢有趁乱拆董璋后台的想法，以孟知祥的智商，他不会这么做。虽然孟知祥也知道董璋要算计他，但他从大局考虑，还是坚持对董璋的援助。如果孟知祥见识短浅，为泄一时之愤和董璋火并，只能白白便宜了李嗣源。

但从整体实力和军事能力看，董璋之于联盟的作用，有些类似于“二战”时意大利军之于纳粹德军的作用，除了拖后腿，没起到什么作用。董璋不让西川军碰剑门，结果剑门在唐长兴元年（930年）十一月就被朝廷军队给夺了回去，朝廷军队驻守剑门，同时对东西两川造成了空前的生存压力，气得孟知祥大骂董璋是大饭桶。

不过董璋向孟知祥求救，倒给了孟知祥深入东川腹地的机会，孟知祥自然不会客气。在赵廷隐的激励下，西川将士死守剑门以南的剑州（今四川剑阁），一则能抵御朝廷军队南下，危及孟知祥在西川的统治；二则扼住了东川驻所梓州的北面门户，孟知祥等于手握悬在董璋头上的一把利剑。幸亏孟知祥下手快，如果朝廷方面的石敬瑭早一步南下，董璋根本不是石敬瑭的对手。一旦剑州落入朝廷手上，什么董璋、孟知祥，全都得完蛋。

孟知祥的战略应对能力非常强悍，他知道朝廷军队拿不下剑州，一定会另辟蹊径入蜀，而龙州则是朝廷军队最有可能的入蜀通道。孟知祥提前布置，派重兵守住龙州。朝廷军队果然要从龙州入川，结果被西川兵一通暴打，狼狈逃回剑门。换言之，孟知祥已经堵住了自己的战略漏洞，只要董璋那边不出问题，西川固若金汤。

朝廷军队没有别的路径入川，只能死攻剑州一条线，极大缓解了孟知祥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朝廷军队很快就尝到了单线进攻的苦果，西川兵在山路上布置了五百弓手，就把强行进攻的朝廷军队射成了刺猬，朝廷军队根本无法进攻，真正诠释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

代名将石敬瑭知道他根本不可能占干表姑父孟知祥的半点便宜，于唐长兴二年（931年）二月狼狈撤军，回朝待罪去了。

朝廷军队被打退后，董璋前往利州犒军，赵廷隐曾密信建议孟知祥趁机杀掉董璋，吞并东川，不过孟知祥没有同意。赵廷隐只能眼睁睁看着董璋在利州吃了几顿饱饭，拍拍肚皮回到了东川。

表面上看，孟知祥失去了一次极为难得的杀董机会，日后再除董璋必然要费心力，但孟知祥出色的大局观决定了他不会做如此浅短之举。

孟知祥选择放走董璋，有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朝廷军队虽然撤退，但谁也不保证朝廷军队不会再来。在朝廷军队确定不再来蜀中之前，绝不能动董璋。

其二，如果孟知祥选择杀董，他也未必能立时占领东川。毕竟他在东川没有任何人脉，东川将吏未必服他。一旦东川投降朝廷，朝廷军队就能轻易地杀到成都城下，到时孟知祥半点活路也没有了。

“两害相权从其轻”，孟知祥可以接受董璋控制东川，但绝对承受不起李嗣源控制东川的代价。

孟知祥在五代十国史上并非著名人物，但他的全局战略布控能力却是第一流的，远在那些白捡便宜者之上。

在确定李嗣源不会再对两川用兵之后，孟知祥知道他与董璋的决战即将到来。但孟知祥并没有直接与董璋开战，而是派李仁罕率水师沿长江东下，顺江拿下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县）、夔州（今四川奉节）。孟知祥的用意再清楚不过了，一旦东川投降朝廷，朝廷军队最有可能从忠、万、夔一线沿江入川。孟知祥扼守三州要塞，彻底堵死了东川被朝廷控制的可能，他认为现在可以对董璋开刀了。

孟知祥攻董璋，类似于渔民在河里捕鱼。欲捕大鱼，必须垒起土围，把鱼困在一个想定狭小的固定范围内，等四面土围垒起时，鱼的末日也就到了。孟知祥已经把董璋有可能突围的活口全部堵死，以孟知祥之才，对付董璋这样的庸才，过程已经无足轻重了。

唐长兴三年（932年）五月，孟知祥率领下的西川兵在汉州鸡踪桥（今四川广汉北）大败董璋率领的东川兵，东川兵死伤惨重，董璋狼狈逃回梓州。不久就被部下潘稠杀死在城头上，潘稠随后把董璋的人头送到了孟知祥的脚下，东川正式成为孟知祥的地盘。

孟知祥俯身欣赏着地上那颗血淋淋的人头，笑了。他知道，两川之内，再无人敢犯其虎威，孟氏统治两川的时间即将来临。

唐长兴四年（933年）二月，对孟知祥毫无办法的李嗣源下诏封孟知祥为蜀王。

虽然孟知祥距离大蜀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但孟知祥非常聪明，他不想在政治上做仁君李嗣源治下的反贼。反正李嗣源已经病入膏肓，没几天活头了。等李嗣源一死，他就可以……

同年十一月，李嗣源被宝贝儿子李从荣活活气死，即位的是庸弱的宋王李从厚。孟知祥觉得时机成熟了，次年正月，六十一岁的孟知祥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大蜀，改元明德。因为王建建蜀在前，所以历史上称孟知祥建立的蜀国为后蜀。

不过因为长年精力劳累，孟知祥身体不太好，仅仅做了六个月的皇帝就病倒了。在安排了儿子孟昶继位以及赵季良等为顾命大臣后，孟知祥就驾崩了。

在五代十国的开国帝王中，在位时间最短的，就是孟知祥的半年皇帝，后汉的刘知远好歹也在汴梁城中坐了八个月的龙廷。

孟知祥虽然没享受多少做皇帝的滋味就甩手走了，但毕竟他为孟

家打下了一方江山，他相信自己拼杀多年积攒下来的家底，足够儿子们挥霍的。但孟知祥始终没有忘记多年以来他和一个人的对话，他心中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孟家治蜀不会超过两代人。

《五代史补》记载了这个著名的故事：“孟知祥之入蜀，视其险固，阴有割据之志。泊抵成都，值晚，且憩于郊外。有推小车子过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见，问曰：‘汝车所胜几袋？’答曰：‘尽力不过两袋。’知祥恶之，其后果两世而国灭。”

尽力不过两袋，孟知祥听成了尽力不过两代（人治蜀）。

仁者

——三十二年太平天子话孟昶

（上）

蜀汉后主刘禅亡于西晋，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后蜀后主孟昶亡于北宋。自古便被认为三大亡蜀昏君，实际上三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刘禅昏昏呆呆，自不必说。论艺术天分，王衍最高，音乐诗词样样拿手。孟昶艺术上并不逊色于王衍，但孟昶在政治上的能力却远胜王衍，能做三十二年太平天子，足以说明孟昶的能力。只不过执政晚年稍显昏庸，再加上遇到了如日中天的周宋王朝，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把孟昶和北宋仁宗赵桢互换一下，孟昶的成就当在赵桢之上。赵桢一味仁柔，而孟昶柔中带刚，该杀人时毫不手软。甚至还存在一种可能，如果中原不出现柴荣这样的绝世天才，孟昶的天下传上百年也不是问题。

梁贞明五年（919年）十一月，孟昶生于河东首府太原，而其父孟知祥时任河东中门使（相当于枢密使）。孟氏父子都没有想到，他们的人生之花会在数千里之外的天府蜀中盛开。

关于孟昶生母李氏的身份，历史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李氏本是唐庄宗李存勖的低等嫔妃，后来被孟知祥得到。第二种说法出自宋人张唐英《蜀梼杌》，李氏本是孟知祥原配福庆大长公主的使唤丫头，福庆公主对孟知祥说：“此婢有福相，当生贵子。”命令孟知祥和李氏发生关系，遂生孟昶。

其实孟昶是孟知祥第三个儿子，但因为面相大师周元豹一句“此儿骨法非常，宜爱之。……将来可为四十年偏安主”，迷信的孟知祥

便深信不疑，孟昶的继承人身份很早就被确定。孟知祥病重后，正式立本名孟仁贇的孟昶为太子，监国事。蜀明德元年（934年）七月二十九日，十六岁的孟昶在父亲灵前继皇帝位，拉开了繁华似锦的蜀中太平盛世的大幕。

自孟知祥据蜀至孟昶亡蜀，蜀中近四十年得享太平，但百姓太平并不意味着官场同样太平。自古官场便是杀人场，从来就没有太平过。孟昶在位初期所面临的险恶局面，是后人无法想象的。换言之，孟昶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人头落地。

孟昶的威胁来自他的父辈，即跟随高祖孟知祥百战打天下的老臣宿将。孟知祥强枭雄武，这伙强人在孟知祥面前服服帖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瞧得上孟昶这个半大毛孩子。其中有人认为蜀国是兄弟们打下来的，孟知祥死了，皇位应该让他们兄弟轮流做，凭什么私传给孟昶。

孟蜀的重臣，计有宰相赵季良、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武信节度使李仁罕、控鹤指挥使张公铎、奉玺指挥副使侯弘实，这些人也是孟知祥钦定的辅政大臣。此外，还有侍中李肇，以及李仁罕的外甥、武信节度使张业。

赵季良是文臣，与孟知祥有备、亮之交，他对孟昶还是非常礼敬的。赵廷隐是蜀中武将之首，但赵廷隐是孟知祥的铁杆心腹，对孟家忠贞不贰。真正的刺头，是李仁罕。

李仁罕自认是开国功臣，但政治地位却在二赵之下，自然不满。他以“宿将有功，复受顾托”，要求孟昶把六军兵权交给他掌管。李仁罕让自己的马仔们四处制造舆论，孟昶此时羽翼未丰，和官场大佬普遍不太熟悉，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先让李仁罕过过瘾。不过孟昶在“不得已”加李仁罕为中书令，判六军事之后，又给李仁罕掺了沙子，让地位更高，而且与李仁罕积怨极深的赵廷隐做六军副使，就中

监视钳制李仁罕。李仁罕吃独食，也得罪了孟昶身边的玩伴，如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使安思谦。这些人经常在孟昶耳边煽风点火，说李仁罕“有异志”，孟昶更是恨透了李仁罕。

不过北宋人路振《九国志》却认为李仁罕忠恪为国，“（仁罕）奉幼主无隐情”，只是因为说话太直，“自以先朝旧老，遇事必谏”，这才得罪了韩继勋等人。但综合来看，李仁罕没有异志，但太过飞扬跋扈，官场上没人喜欢这样的人。鳌拜没有废康熙之意，但专权太横，康熙也要拿掉鳌拜，道理与孟昶拿掉李仁罕是一样的。

如果按《资治通鉴》的说法，李仁罕有异志，蜀中二赵自然不可能让李仁罕得逞，你要当皇帝，我们给你磕头？凭什么！孟昶暗中联系二赵，制订了秘密的诛杀计划。

动手则非常简单，等李仁罕上朝时，高坐殿上的孟皇帝一声令下，从两边拥出数十名武士，“执（李仁罕）而杀之”，随后杀掉李仁罕的亲属数人。

李仁罕是本朝开国重臣，孟昶竟然有本事一朝诛杀，官场中人这才明白孟昶并不是庸弱之主，耍起狠来那也是一狠主。孟昶杀李仁罕，极大地震撼了蜀中官场，此后，再没有老臣敢在孟昶面前充大爷了。孟昶装孙子时，李肇觉得此子可欺，上朝时竟然不对孟昶行君臣大礼，理由是臣腿疼，拄杖跪不了，孟昶“怒”。李仁罕被杀后，李肇知道该自己装孙子了，上朝后，李肇把拐杖扔在地上，老老实实在地给孟昶行大礼。

可以讲，明德二年（935年）九月的这场杀李仁罕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蜀中的政治生态，孟昶树立了绝对权威。从935年到965年这三十年，蜀中政坛除了广政九年（946年）张业跋扈被杀，再无官场风波。

康熙废鳌拜亲政，才开始轰轰烈烈的帝王生涯，孟昶也是如此。

孟昶亲政时还不到二十岁，喜欢玩，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球跑马，还在国内采选美女入宫享受，但韩保贞一纸上书劝谏，孟昶立刻改正错误，放美女回家，并赏赐韩保贞黄金，以奖他直言之功。如果换成赵匡胤，他会拿大斧头把韩保贞打得满脸是血，御史雷德骧是领教过赵匡胤厉害的。

对孟昶成为明君有利的是，他眼前就有一个活生生的反面例子，就是他的“前任”——前蜀后主王衍。虽然孟昶和王衍没有交集，王衍亡蜀时，孟昶还是太原城中玩泥巴的六岁娃娃。但后蜀和前蜀在同一地区建国，王衍亡国的教训自然会成为孟昶的前车之鉴。

孟昶是非常讨厌王衍的，毕竟王衍是亡国之君，如果有人把赵匡胤比作石重贵，赵匡胤的大斧头是会杀人的。广政元年（938年）的上巳节，孟昶游成都大慈寺，然后与大臣们饮宴赋诗，有个戏子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竟然在孟昶面前扮演王衍。孟昶大怒，“命斩之”。孟昶告诉宰相李昊等人：“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

孟昶在执政前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孟昶同样是诗词高手，北宋词豪苏轼那首著名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孟昶所作。不过孟昶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改善蜀中的政治生态上，而且成就非常突出。

后世形容官员俸禄与百姓财产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八字成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一般认为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太宗赵匡义作的《戒石铭》，实际上这是赵匡义全盘抄袭孟昶的《官箴》，时间是蜀广政四年（942年）五月。原文如下：

“朕念赤子，盱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

深思。”

毛泽东说过：治国就是治吏，吏治清明，百姓必然安居乐业，吏治腐败也必然导致百姓困苦，贪官们会肆无忌惮地从百姓兜里抢钱，扒房牵牛，无恶不作。

孟昶建立了严格的百姓财产保护制度，不让官员们把贪婪之手伸向百姓，自然刺激了蜀中的经济发展。虽然十国中最著名的朝代是南唐，但南唐百姓在李璟、李煜父子治下困苦不堪，其他诸侯国更是百姓的地狱，唯独后蜀百姓，幸福指数是十国百姓中最高的，堪称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有关后蜀孟昶实行仁善之政的成就，宋人虽不承认后蜀政权的合法性，斥之为“伪蜀”，但还是有客观记载。张唐英在《蜀梼杌》中记载：“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屯落间巷之间，弦管歌颂，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续资治通鉴》也记载：“蜀土富饶，孟氏割据，府库益充溢。”

百姓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少数人的富裕建立在多数人的贫穷之上，精英阶层花天酒地，底层百姓穷困潦倒，这是被美化到无极限的宋朝，而后蜀则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虽然张唐英在书中痛斥孟昶“穷极奢侈”，但前提是后蜀国殷民富，百姓富足，统治者奢侈一些又有何罪，至少孟昶从来没要求过自己死后，身缠金腰带，口含夜明珠。

另有记载：“（后蜀）十年不见烽火，不闻干戈，五谷丰登，斗米三钱，都下仕女，不辨菽麦，士民采兰赠芬，买笑寻乐。”北宋号称盛世，其实也不过是权贵士大夫的盛世，宋朝百姓受压迫敲诈之重，史所仅见。如果宋朝百姓知道孟昶如此爱民，他们一定会希望自己身处孟昶治下。

张唐英没有必要替亡国之君孟昶吹嘘，他如实记载：“昶戒王衍荒淫骄逸之失，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虽刑罚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颇安之。”而后来北宋灭后蜀，孟昶北上，百姓听说后，“万民拥道，哭声动地”。“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可见孟昶之得人心。

老百姓不是傻子，谁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谁表达最真挚的情感，对柴荣如此，对孟昶也是如此。

不是好皇帝，老百姓根本不会把他当盘菜，只有心中有百姓，百姓才会如此爱戴。孟昶若是残暴昏君，他北上时，百姓恨不得以砖瓦投之才能泄愤。孟昶能得到蜀人的拥戴，自然是因为他对百姓仁爱。北宋仁宗赵桢死时，百姓罢市号，赵桢被谥为仁宗，其实如果后蜀不亡，孟昶死后同样可以被谥为仁宗。

孟昶之仁，远胜于那些被无聊文人美化出来的所谓仁厚之主。

仁者

——三十二年太平天子话孟昶 (下)

一个富足的时代，必然会成就一代文学，这是历史文学的客观规律，孟蜀也不例外。

提及五代十国文学的巅峰，世人多论及南唐。诚然南唐的文化成就非常高，但在五代十国时期只能称为双峰并峙，而五代十国另一座文学高峰，就是孟昶治下的后蜀。

孟昶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不逊于南唐李后主，只不过李后主名气更大而已。因为孟昶名气较小，所以李煜亡于宋后，大周后被赵匡义霸占并毒死李煜，千年来李煜赢得了无数同情。可同样是亡于宋，花蕊夫人被赵匡胤霸占后毒死孟昶，千年来，孟昶却几乎默默无闻。赵匡义霸占人妻并杀人夫成了千古丑闻，赵匡胤霸占人妻并杀人夫倒成了千古佳话。

历史很残酷，但这并不能改变孟昶堪称一代词史的成就。

说到孟昶的词作，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首《玉楼春》（也称《洞仙歌》），原词如下：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
鼓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
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关于这首词的作者，词评家们打了近一千年的笔墨官司，词作

者，除了孟昶，还有苏东坡。

不过苏轼本人在《洞仙歌》自序中承认这首词的开头两句，即“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是孟昶的原词，苏轼在七岁时遇到一个自称在孟昶宫中待过的眉山朱姓老尼。九十多岁的老尼告诉苏轼，这首词是孟昶与花蕊夫人在夏夜避暑于摩诃池上所作。可惜苏轼已经忘记孟昶原词，只记得开头两句，便“暇日寻味（孟昶原词），岂《洞仙歌》乎！乃为足之（续写）”。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词是孟昶的最爱花蕊夫人所作，明朝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说：“‘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旧传蜀花蕊夫人之句。”清人吴任臣所著《十国春秋》也记载此二句为花蕊夫人所作。

虽然后人已无从知晓这首名词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历程，但“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作为千古名句，则出自孟昶无疑。而苏轼能记得前两句，在续作时应该也有可能模糊记起孟昶原词。种种考虑，把这首词的作者定为孟昶，并不为过。清朝词评家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称赞苏轼“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两句“口吻俱香”，实际上这是对孟昶的赞美。而清同、光时人谭莹对苏轼续写孟词不满，作诗讥云：“摩诃避暑有全词，花蕊风流恐愿师。伺俟洞仙歌隐括，点金成铁使人疑。”

除了这首有孟昶一半著作权的《玉楼春》，孟昶还有另外一首词，而这首词同样和另一位名人打起了笔墨官司，这一次，孟昶的“对手”变成了李煜。这首词就是名气远在《玉楼春》之上的《乌夜啼》：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乌夜啼》，有些词书也称为《相见欢》，如《词林纪事》。

南宋人杨湜在《古今词话》中认为此词是孟后主所作，而非李后主。近代词评家赵万里在重新校理《词话》时认为：“南词本《南唐二主词》无之（此词），杨湜谓为孟昶作，殆必有据。”吴任臣在《十国春秋》称赞孟昶“昶亦工声曲，有《相见欢》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首词是李煜所作，但也没有完全排除作者是孟昶的可能性。

如果要论才情，孟昶稍不如李煜心思灵透，但也是一代“可人”，明人杨慎认为孟昶“小词尤工”。李煜词作千古流芳，孟昶自不能及，但有一点，李煜是比不上孟昶的，就是南唐词的整体创作不如孟昶治下的后蜀。

南唐词能称雄者，只有冯延巳与李璟、李煜父子三人，而后蜀除了冒出欧阳炯、毛文锡、毛熙震、鹿虔扈、阎选、顾琼等优秀词人，还编撰了中国词史上的开山集作——大名鼎鼎的《花间集》。

花间词派是一个文学史的空间概念，并非一地一时所作。因为这一派词作多婉雅可爱，多述及爱恨离愁，故称为“花间派”。花间词最早可上溯到多由社会下层创作的敦煌曲子词，传至花间派大鼻祖温庭筠始发扬光大，而到了韦庄后，花间词派则相对成了一个地域概念，即多集中在西蜀。而《花间集》中不属蜀地词人的，只有五代和凝与荆南孙光宪。

《花间集》是后蜀赵崇祚编撰，共十卷，收录了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至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年）一百年间，以温庭筠为首的十八位词作家的共五百首倚声之作。《花间集》的问世，意味着词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正式走向宏大的历史文学舞台，后人尊《花间集》为“长短句（词）之宗”。

词，往往被称为宋词，其实这只是因为词在宋朝达到极盛，但词的源头却是在晚唐，在五代十国快速发展，这才有了宋朝的极盛。而溯其本源，孟昶在中国词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因为《花间

集》的编撰，是在孟昶支持下完成的。而赵崇祚，则是孟昶“恩叔”赵廷隐的长子。

作为词祖的《花间集》永远无法摆脱明显的后蜀印迹，甚至《花间集》序，也是后蜀大臣欧阳炯所写，时间是后蜀广政三年（940年）四月。作为回报，赵崇祚在《花间集》中也收录了欧阳炯的十三首词。完全可以说，没有孟昶，《花间集》的问世并流广千年是不可想象的。不仅《花间集》有孟昶的开拓之功，甚至中国人传统的春联，其实也是孟昶首创。张唐英在《蜀梼杌》中记载了这副春联，即著名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除了诗词对联，孟昶还曾在广政四年（941年），下诏编《古今韵会》五百卷，只可惜这部书在清朝时就已散佚无存了。

后蜀定都成都，而成都别称锦城，以盛产蜀锦而闻名天下，但成都还有一个别称——蓉城，则完全是孟昶之功。

孟昶喜爱芙蓉花，广政十三年（950年）九月，孟昶下令在成都城墙中尽栽芙蓉花，然后用锦帛搭成棚，护住芙蓉花。等到芙蓉花灿烂盛开时，“望之皆如锦绣”。孟昶骄傲地告诉群臣：“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

孟昶拥着他心爱的花蕊夫人，站在成都城头上的芙蓉丛中，含笑看着城下欢呼的百姓。其实也是从这一刻起，孟昶的人生开始发生逆转。

早期的孟昶完全是一副明君做派，治国有功，百姓爱戴。但到了中年后，因为天下太平无事，蜀中安居富贵，孟昶也慢慢失去了早年的励精图治，学会了享受人生，孟昶甚至用金银珠宝来装饰自己的尿盆。皇帝成了臭鸡蛋，小人立刻像绿头苍蝇一样死死叮，孟昶身边多了一些马屁精，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自称诸葛亮再世的王昭远。

其实不仅是王昭远自比诸葛亮，连孟昶也认为王昭远是诸葛亮再世，甚至还打算让王昭远北伐中原，完成诸葛亮未竟的北伐事业。

正在孟昶天花乱坠胡闹的时候，中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代圣主柴荣横空出世，志在平定八荒，雄纳四海。柴荣决定亲征淮南，向同样糊涂混日子李璟发起挑战，但柴荣的第一刀却砍向了孟昶。

柴荣之所以进攻后蜀，主要是因为后蜀控制着汉中、秦凤等战略要地，一旦孟昶在柴荣南征之际突然越秦岭而入关中，后果不堪设想。再加上孟昶晚年昏庸，汉中及秦凤百姓“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请求柴荣出兵伐蜀）”，所以柴荣需要先打掉后蜀的进攻能力。周显德二年（955年），周朝大将向训与王景奉柴荣之命，向后蜀发起了猛烈进攻。

因为蜀中太平多年，蜀军战斗力早不复当年孟知祥时代之盛景，面对“近代无比”的周军，几乎一触即溃。黄花谷一战，蜀军遭到惨败，蜀梁院使王峦准备在黄花谷断掉周军粮道，结果被周军一通暴打，三千多蜀军被俘，“马岭、白涧（蜀）兵皆溃”孟昶的发小儿、雄武节度使韩继勋连夜逃回成都。周军几乎没费多少周章就拿下秦、凤、阶、成四州，完成了对后蜀的战略“监控”。

至于张唐英所谓“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赵匡胤）始克之”，其实柴荣统一天下的顺序是先东南，次北，最后才是西南。只不过赵匡胤篡位建北宋后，忙于扑灭各地起义及巩固内政，所以也没有拿孟昶开刀。如果柴荣当时以主力攻蜀的话，以孟昶之兵，根本不可能是周军的对手，早在十年前孟昶就玩完了。

世人皆知后蜀亡于北宋。北宋乾德三年（后蜀广政二十八年），赵匡胤命大将王全斌率兵入川，仅用了六十六天便击溃蜀军主力，迫使三十二年的太平天子孟昶狼狈出降。实际上，早在黄花谷之战，周

军就已消灭蜀军主力，赵匡胤能顺利灭蜀，主要功劳应该与柴荣平分。《宋史·赵玘传》记载，后蜀秦州观察判官赵玘投降周朝时就说：“今中朝兵甲无敌于天下，自用师西征，战无不胜。蜀中所遣，将皆武勇者，卒皆骁锐者，然杀戮遁逃之外，几无子遗。”

与其说孟昶亡于赵匡胤，不如说孟昶亡于柴荣。赵匡胤所做的，只是替柴荣摘掉由柴荣种下的果子而已。换成张永德或李重进做皇帝伐蜀，孟昶同样难逃亡国之运。

当初柴荣英年早逝时，也许孟昶幸灾乐祸过，也庆幸自己可以免遭亡国。可等到赵匡胤把孟昶强行押解到汴梁城，以俘虏的身份接受赵匡胤的羞辱时，孟昶才知道自己已身处险境，他看到赵匡胤死死盯着陪同他的那个女人——花蕊夫人。

孟昶来到汴梁的第七天后，突然暴病身亡，而花蕊夫人随后就被赵匡胤接进宫里，成就了一段能气死赵匡义的千古“佳话”。

孟昶的亡国，对孟昶本人是场天大的灾难，因为赵匡胤看中花蕊夫人，下毒把孟昶毒死。如果是柴荣俘虏孟昶，以柴荣的为人，他断不会如此。司马光说柴荣“王道荡荡”，诚哉其言。而后蜀的灭亡，对蜀中百姓来说同样是场塌天灾难。

宋军灭蜀后，在主帅王全斌的纵容下，宋军开始对百姓进行疯狂的洗劫和屠杀，堪称蜀中“浩劫”。宋军的残暴引爆了蜀人愤怒，爆发了著名的全师雄之乱，将在蜀宋军打得狼狈不堪，如果不是全师雄病死，蜀中乱局根本不可收拾。

而宋灭蜀后，因为实行了残酷的经济压迫政策，蜀人生活困苦。

赵匡胤灭蜀后，下令把蜀中所有财富全部运往汴梁，“及王师平蜀，孟氏所储，悉归内府”。蜀中百姓财富被席卷一空，但还要承担沉重的税赋，一文钱都不能少。更有甚者，北宋不允许蜀中百姓进行

民间贸易布帛，必须在官市上购买，而价格又是私市的数倍，“由是小民贫困”。

蜀中百姓在北宋治下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远不如孟昶治下的后蜀。南宋人洪迈义正词严地说：“国朝削并僭伪（北宋灭蜀），救民水火之中。”真亏得洪景庐先生好意思说出这句话来，一点都不脸红吗？

经过近三十年的残酷压迫，蜀人再也忍受不住北宋暴政，最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王小波、李顺大起义。王小波流着泪向蜀人宣称：今贫富不均，我为尔等均之！

对于李顺，蜀人皆谓是仁君孟昶的遗腹子，所以蜀人感孟昶之仁，纷纷投李顺麾下，反抗北宋暴政。

由此可见孟昶之得人心。

铁血东吴

——说说江东枭雄杨行密

说一说吴王杨行密。

不要说整个中国历史，就放在本就冷门的五代十国史，杨行密都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人物，甚至还没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行密贡鹅”有名。

如果要评选五代十国的头号枭雄，朱温当选毫无争议。朱温天不怕地不怕，皇帝老子他都敢杀，但朱三唯独怕一个人，就是杨行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杨行密称霸淮南，朱温早就一统江东了。换言之，如果没有杨行密，凭钱镠、马殷、王审知、刘^龚的军事能力，早就被朱温打包吃掉了。更让人敬佩的是，在五代十国共十五个政权的开创过程中，创业最为艰险，几乎是百场血战得天下的，除了朱温，就是杨行密。

杨行密和朱温、王建一样，都出身社会最底层，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从小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但在三人中，王建是唯一的成功案例，朱温和杨行密连东西都不会偷，朱温被东家刘崇现在捉赃，赏了一顿棍棒，杨行密则被押送到了庐州（今安徽合肥）郑瓘那里听候发落。郑瓘见杨行密身材魁梧，力大如牛，当个小偷给罚了太可惜，便把杨行密给放了，不久后郑瓘在庐州征兵，杨行密当起了丘八大爷。

杨行密、王建、朱温这样的人物是典型吃乱世饭的，都是有点江湖本事的。朱温箭术好；杨行密的本事则比较特殊——健步如飞，日行三百里，怀疑《水浒传》里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戴宗的原型就是

杨行密。因为杨行密有这个能耐，所以就当上了庐州与成都（唐僖宗李僩避难成都）联系的交通员，经常往来于两地，但始终没有混出头，又在朔方（宁夏）喝了两年的西北风，不过是个下层军官罢了。

杨行密野心勃勃，志向通天，他当然不会满足于现状。杨行密曾经短暂回过家乡庐州探亲，但上边又催促杨行密赶快回朔方当差。杨行密不想再回贫瘠的朔漠，即使在朔方当了老大，那里太穷了，显然不足以支撑杨行密志在江东的雄大野心。杨行密为人非常刚狠，二话不说就砍掉了这位倒霉老爷的脑袋，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手下聚一票江湖弟兄，扯旗单干。

时任庐州刺史的郎幼不敢得罪杨行密，同时郎刺史也知道杨行密下一个目标一定是重镇庐州。所以，识时务的郎刺史立刻给他的上级、淮南节度使高骈，请求给自己挪个窝，把庐州让给杨行密。高骈是见过杨行密的，很想把有本事的杨行密拢入自己袖中，便上奏朝廷，封杨行密为庐州刺史，这一年是唐中和三年（883年）三月，此时杨行密三十二岁。赵匡胤在篡位建宋之前至少立过一些战功，所以柴荣才让赵匡胤掌握兵权，而杨行密几乎是没立过一次军功，就平白得到了庐州这样的重镇，幸运程度要超过几乎是白捡便宜的赵匡胤。

不过赵匡胤篡位时，天下已被柴荣打平，赵匡胤直接坐享其成，而杨行密得到了庐州，依然不能改变他身处其中的险恶形势。淮南地区相对富庶肥沃，各路野心家早就盯上了这块肥肉，稍有不慎，杨行密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淮南虽然有名将高骈坐镇，但晚年的高骈早已看破红尘，迷信道教，不问军政，淮南事务都交给了江湖术士吕用之打理。高骈每天的任务就是穿着道袍，披头散发骑个木头鹤，舞着剑在院里飞来飞去。

高骈疯成这样，其实杨行密心里是高兴的，等高骈死后，至少他可以成为争夺淮南的有力竞争者。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杨行密和吕

用之走得比较近，二人互相勾结，吕用之倚杨行密为外援，杨行密则通过吕用之，全面掌握高骈的动态。

但还没等杨行密对扬州动手，扬州部将毕师铎已提前一步浑水摸鱼了。唐光启三年（887年）四月，毕师铎联合高邮将张雄，以及秦彦等人起兵，很快就攻下了扬州。而吕用之派人去向杨行密求救，但为时已晚，高骈被毕师铎完全控制。毕师铎下手够狠，经常给高骈断炊，把高骈饿得头晕眼花。

高骈的落难，正给了杨行密进兵扬州最好的借口。而且吕用之已逃到庐州，给杨行密乱七八糟灌了一通迷魂汤。杨行密自然是不服毕师铎的，扬州繁华之城，与其你来占，不如我来占。

谋士袁袭给杨行密出谋划策，“方今天下大乱，淮南凭河临江，是割土为王的好地方。高骈已经失了势，毕师铎非成大事者。此时扬州无主，将军不可错过天赐良机，乘乱取淮南！”其实大道理不用袁袭讲，杨行密也知道扬州是淮南中枢，拿下扬州，才有资格逐鹿淮南。更重要的是，吕用之来的时候还带有近万人马，加上杨行密的庐州兵，足有两万人，足够对付毕师铎的。

因为毕军实力较强，所以杨行密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带着部队诈败，撤出大营，任凭毕军入营。没想到毕师铎早上没让弟兄们吃饭就出来作战，毕军饿得眼冒金星，在杨军大营里四处找东西吃。

杨行密微笑着下令反击。

毕军士兵手上端着碗，嘴里嚼着肉，目瞪口呆地看着大队杨军风卷残云向自己杀过来。想跑是来不及了，毕军被杨军一通削瓜剝菜，死伤惨重，毕大帅本人光棍般逃回了扬州城。

毕师铎惨败，觉得很没面子，为了泄愤，他竟然杀掉了被软禁的淮南节度使高骈。被杀时，饥饿的高将军正蹲在院子用小锅煮皮带

吃。

高骈无兵无权，但政治影响还在，如果毕师铎能在高骈身上做文章，可以起到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用。毕师铎丢掉一块金元宝，却立刻被杨行密捡起来，杨行密知道这块金子价值连城。

杨行密下令，三军尽戴重孝，由杨行密带头，冲着扬州城痛哭三天三夜。

杨行密这么做，有一私一公两个原因。为私，高骈是杨行密的贵人，不是高骈提拔他，杨行密就没有今天。为公，杨行密哭高骈，可以在外界给自己打造一个有情有义、不忘旧主的正面形象，有利于招兵买马。同时，还可以感化扬州城中同情高骈遭遇的军队，毕竟他们都是高骈带出来的。

杨行密飙足了演技，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毕师铎从扬州城中请出去。

但毕军实力雄厚，如果强攻，家底本就一般的杨行密是支撑不起巨大伤亡的。办法很简单——围城。打不过毕师铎，那就饿死他。

扬州城中固然粮食充足，但毕竟是孤城，而杨行密在城外，可以源源不断地调运粮食到城下，与毕师铎进行一场史所罕见的粮食大战。

这招绝户计非常阴损，毕竟扬州中还有几十万百姓，他们同样会没有饭吃。杨行密并不在乎百姓死活，他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他会为自己狡辩：你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活？

围城半年，毕师铎是彻底撑不下去了。城中的粮食早被吃光，军队为了充饥，做起了人肉买卖，把死人的肉割下来吃。死人肉吃完了，那就把活人杀了，继续吃肉。

但问题是，活人的肉也快吃光了。

唐光启三年（887年）十月，杨行密下令攻城。

不过杨行密万万没想到，已经饿到皮包骨头的扬州军竟然能顶住了杨军的进攻，把杨行密打得灰头土脸。好在当天下起了大雨，杨行密派三百勇士乘大雨滂沱之机爬上城墙，然后打开城门，而毕师铎和秦彦早已拔腿溜之了。

扬州城已经残破不堪，侥幸活下来的百姓也不过几百人，而且饿得都跟鬼一样。杨行密得到的几乎是一座“鬼城”，但扬州城却是淮南以及江东的中心之城，地缘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杨行密曾打算退守更加富裕的庐州。

扬州相当于汉献帝，杨行密得到扬州，自称淮南留后，就等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周边军阀个个眼红。当时还在河南腹地称王的秦宗权距离淮南较近，他把自己贪婪的手伸到了杨行密的餐桌前……

秦宗权的弟弟秦宗衡带头，麾下一票铁血悍将：孙儒、刘建峰、马殷、许德勋等，而孙儒更以杀人如麻而闻名江湖。对杨行密来说更要命的是，对扬州知根知底的毕师铎、秦彦这两个祸害也混进了秦宗衡的队伍里。

此时的杨行密早用粮食喂饱了扬州城，死守一年都不是问题，再加上还有庐州外援，杨行密有足够的资本和外来户秦宗衡拼粮食。

决战孙儒

——杨行密差点没迈过来的那道坎

秦宗衡没什么本事，根本啃不动杨行密。再加上秦宗权全力对付朱温，兵力吃紧，便调秦宗衡回蔡州。秦宗衡想回去，但大将孙儒却不愿意，他早就有称霸淮南的野心。

孙儒手上无兵，这个很好办，一道寒光闪过，秦宗衡人头落地，同时丧命的还有毕师铎与秦彦。

孙儒会带兵，弟兄们都服他，孙老大带着自己新起名的“土团白条军”，开始了与杨行密这场五代十国史上最为艰苦的双雄拉锯战。

不过由于孙儒军团实力过于强大，杨行密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孙儒决战，便以退为进，先撤出扬州，扫荡周边郡县。

杨行密的目标是更加富庶的宣州（今安徽宣城），因为这里守军实力较弱，相对好啃一些。唐文德元年（888年）八月，杨行密很快就攻下了宣州，斩杀守将赵锽。

孙儒军团是百姓的灾难，其实杨行密的部队也不是什么百姓的救星，杨军所到之处，也基本像蝗虫过境一样。杨行密刚破城，他手下的弟兄们就到处哄抢百姓财物，百姓死伤无数。

杨行密占领宣州的用意，是步步为营向扬州逼近。但让杨行密万万没想到的是，孙儒比他还油滑，趁杨行密不在的时候，直接端了杨行密的庐州老巢。

杨行密无家可归，只能暂时放弃回江北的打算，在江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再图后举。江东虽然同样是军阀混战，但没有特别强硬的

对手，即使是钱镠这样的浙西土豪，杨行密也没放在眼里。在唐龙纪元年（889年）十一月，杨行密派大将田颢、李神福非常轻松地就拿下由钱镠控制的常州。

不过让杨行密沮丧的是，他的老对手孙儒同样看上了江东这块肥肉。还没等李神福等人在常州坐热屁股，仅仅一个月后，就被强悍的土团白条军赶了出来。

孙儒在江东诸军阀中是实力最强大的，杨行密应对孙儒非常吃力，钱镠更不是孙儒的对手。一阵风过后，钱镠发现自己之前控制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今市）、苏州（今市）都落入了孙儒的口袋里。

但对杨行密有利的是，孙儒的注意力始终放在江北对付意图南下的朱温，江东兵力有限。唐大顺元年（890年）二月，杨行密趁孙儒集中主力和朱温大将庞师古死缠烂打之际，派大将马敬言攻下润州，随后安仁义等人又拿下常州。

获得了润、常二州，极大地扭转了之前杨行密在战略上的被动挨打的局面。此时的杨行密北可过江攻扬州，南可去占钱镠的便宜，实在不行还可以死守宣州。

不过杨行密显然还是低估了孙儒。

孙儒之前用主力应付庞师古，所以才让杨行密钻了空子。等庞师古被打跑之后，孙儒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被视为心腹之患的杨行密。

唐大顺二年（891年）正月，孙儒几乎掏空家底，亲自带着这帮吃人的弟兄们过江来砸杨行密的场子。

虽然杨行密的大将李神福趁孙儒不备进行偷袭，占了点便宜，但孙儒很快就调整好状态，进行犀利的反击，杨军的两大王牌田颢和刘威被孙儒的小弟马殷打得找不到北。

还没等杨行密反应过来，孙儒的利爪已经伸到了宣州——杨行密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才是孙儒的风格，做事干脆利索，直捣黄龙府，半点不给你战略回旋余地。

杨行密知道这回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和孙儒进行这场轮盘赌，一旦失败，只有死路一条。

孙儒军远道而行，最害怕什么？粮草被人断掉。很好，杨行密就专干这个劫道买卖，由李神福出面，专门给孙儒的粮草运输队捣乱。孙军缺乏粮食，军心开始出现波动，杨行密认为动手的时机到了。杨行密以为孙军是一群饿肚子的乌合之众，但等交上手后，杨行密就后悔了自己的鲁莽决定，因为杨军根本打不过孙军！

孙军人数太多，很快就淹没了杨行密的那点虾米兵，如果不是大将李简冒死相救，杨行密即使不在阵中被孙军砍死，也得活活累死。

杨行密总算能认清形势，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抗衡孙儒的。怎么办？很好办，曹操下江南，刘备拉孙权来当垫背的，杨行密把控制浙江的钱镠拉了过来，两方势力共同对抗孙儒，这才勉强维持住了江东“三足鼎立”的局面。孙儒暂时不能得手，先撤兵回到江北。

可能孙儒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撤兵，其实是有利于杨钱两家分化瓦解的。大敌当前，孙刘可以联合抗曹，但曹军一撤，孙刘两家的矛盾立刻凸显。如果孙儒能暂缓过江，让杨行密和钱镠互相厮杀，他坐山观虎斗，等二虎相伤之际，再出来收拾残局，江东大局可定。

但孙儒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做出了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他竟然放弃了战略根据地扬州，把所有部队全部过江，与杨行密决一死战。唐景福元年（892年）秋，孙儒火烧扬州城，号称大军五十万，蝗虫一般直扑宣州。说孙儒军是蝗虫恰如其分，孙军所过之处烧杀抢掠，甚至杀老弱百姓割肉充作军粮。

孙儒想学项羽在巨鹿一战破釜沉舟，但杨行密在江南立足已稳，又有钱镠出于自身考虑的全力支持，孙儒并没有可能在短期内消灭杨行密。而一旦朱温乘虚占领淮南，孙儒进退失据，将死无葬身之地。

孙儒看不上残破的扬州，但杨行密始终没有忘记扬州，他一直看重扬州的战略价值。现在自己远在江东，正和孙儒进行生死决战，但杨行密的战略眼光却远胜于目光短浅的孙儒。

孙儒军人多，但他们多是扬州人，家人都在扬州，并不愿意过江作战。杨行密极为聪明地抓住了这一心理特点，派人运粮到扬州，分发给饥饿的扬州百姓，老百姓对杨行密感恩戴德。其实这些粮食也不是从杨行密的账户中划走的，而是劫了孙儒的军粮。换言之，杨行密几乎没掏一分钱，就做了一票空手套白狼的漂亮买卖。

杨行密收买扬州人心是长远规划，但眼下他还需要同孙儒进行近乎疯狂的决战，能不能撑得过去，杨行密自己心里都没有底。

景福元年（892年）五月，杨行密和孙儒开始了二选一的超级轮盘赌。孙儒下营陵阳（今安徽青阳附近），杨行密先来挑战，两军大战，没有分出胜负，形势一度僵持。

无法理解孙儒是如何带兵的，上一次被杨行密劫了粮草，没想到这次又被杨行密劫了一次，结果全军将士集体饿肚子。

形势朝着有利于杨行密的方向发展，杨军粮草充足，士气旺盛，所以杨行密有资本破釜沉舟，把所有精锐都拉到城头，关上城门，以示绝无退路。杨行密军队多由扬州人组成，战斗力没有问题，而孙儒军也多是思乡的扬州人，而且还饿着肚子，根本无心恋战。

对孙儒来说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他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疟疾，无力再指挥战斗。杨行密是不会和孙儒客气的，“行密闻儒疾疟，纵兵击之。会大雨晦冥，儒军大败，安仁义破儒五十余寨，田頔擒儒于陈，

斩之，传首京师。”

孙儒的死，意味着杨行密可以活下去了。而杨行密赢了这场赌局，获利颇丰，孙儒的筹码全被杨行密划了过来，“儒众多降于行密”。只有刘建峰、马殷等人因奉孙儒之命到外地掠地，才没有被杨行密俘虏。而马殷则是将来可以与杨行密平起平坐的人物，因为马殷创建了十国之一的楚国。

在杨行密创业的过程，孙儒是杨行密遇到的最难逾越的一道坎，杨行密几次都险些被孙儒吃掉。但现在雨过天晴，杨行密曾经无比灰暗的人生顿时明亮起来。

吃掉孙儒，意味着杨行密可以回扬州了。

“（景福元年五月）丁酉，杨行密率众归扬州。”

扫荡江东

——杨行密的称霸之路

孙儒的失败与杨行密的成功，比较类似于黄巢的失败与朱温的成功。黄巢败在奉行没有战略根据地的流寇主义，朱温则据宣武而蚕食天下。孙儒是小一号的黄巢，而杨行密则死守宣州，进而图王于淮南，退而守宣州，同时面向江南腹地，进退自如。杨行密占据扬州后，战略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张，这是孙儒至死都没有明白的道理。

为了巩固在扬州的统治，杨行密因事制宜，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恢复扬州的经济。连年战乱之后，扬州经济几近崩溃，杨行密手上也没有多少钱。不过杨行密手上囤积着大量茶叶和盐，在掌书记高勣的建议下，杨行密与周边郡县做起了茶盐生意，获益颇丰，一举扭转被动的经济形势。

二、鼓励逃荒的百姓回来种地。农业社会没有粮食，空有茶盐也是活不下去的。杨行密招抚流亡百姓，对百姓进行妥善的安排，保证人人有地种、有饭吃。杨行密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百姓们尝到甜头，归附杨行密的百姓非常多，这就保证了有粮吃，以及有兵可征。

三、杨行密必须拥有一支绝对忠诚于自己，又极具战斗力的精锐武装，否则早晚会被人吃掉。孙儒灭亡后，杨行密接收了数万名河南士兵，并从中挑出五千精壮汉子，穿上黑甲黑袍，这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黑云都”，由杨行密直接控制，这是杨行密开山立命的本钱。同时，杨行密又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同样强悍的“黄头军”，相当于战略机动部队，由心腹李神福统领。

四、有了军队，还必须抓住军心。士兵们出来混江湖，一是要挣

军饷吃饭；二是要得到雇主最起码的尊重。像刘守光那样视人命如草芥，没人愿意给他卖命。杨行密本人是大头兵出身，他理解士兵们的这种感情需要。杨行密治军没有半点架子，经常深入基层，和普通士兵称兄道弟，打成一片。

杨行密这么做，其实还有一层深意，就是通过直接控制基层士兵，断绝了中高层将官甩开自己控制基层的可能。如果只控制中上层，而任由中上层军官直接控制下层，一旦他们发动兵变，杨行密半点还手的可能都没有。

杨行密在扬州得了势，长安城中的空头皇帝昭宗李晔自然要所有表示。景福元年（892年）八月，封杨行密为同平章事（宰相）兼淮南节度使，正式确立了杨行密在淮南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当时天下大镇的统治者多领同平章事衔，称为使相，比如李克用、朱温，这也意味着杨行密正式挤入顶级军阀俱乐部。

虽然杨行密此时的地盘并不大，但他毕竟控制着扬州中枢之地，战略优势十分明显。就如同赵匡胤如果被派到偏远地区当节度使，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他也别想篡位，根本没机会。

杨行密的第一个目标，是他的老家庐州。

杨行密当然不是只出于思乡情绪才打算收复庐州。合肥南控长江，北襟淮河，是淮南地区仅次于扬州的军事重镇。控制合肥，才能对扬州进行有效的战略保护。如果合肥被敌人控制，杨行密在淮南是绝对待不下去的。

控制合肥的是孙儒的部下蔡俦。蔡俦是个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但杨行密这辈子都忘不了蔡俦，因为蔡俦刨了杨行密在合肥的祖坟。像蔡俦这等小虾是不需要杨行密亲自动手的，李神通带着黄头军很轻松地就把蔡俦给收拾了。

经典的一幕出现在杨行密收复合肥之后。有人劝杨行密，蔡侔把你家祖坟给刨了，你应该刨掉蔡侔家的祖坟进行报复。杨行密现在收买人心上了瘾，自然不会做这等自毁形象的蠢事，虽然要刨蔡家祖坟不过他一句话而已。

控制住庐州，杨行密等于得到了打开淮南地区的钥匙，北可取濠州，南可得舒州，西可取光州，东可守卫扬州。

现在的杨行密基本上不用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

淮南地区最可怕的军阀就是孙儒，而孙儒被杨行密搞掉之后，淮南地区不过是控制一州的零星小军阀，根本不是杨行密的对手。杨行密在淮南到处敲打，那些识相的官员也知道和杨行密扛到底必是死路一条，没人愿意当傻子，能跑的都跑了。歙州（今安徽歙县）、舒州（今安徽舒城）、濠州（今安徽凤阳）很快都成了杨行密的地盘。

对这些州县的占领，在混乱的唐末战争上毫无亮点，并没有值得特别说道的地方。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杨行密在濠州遇到一个年仅八岁的流浪儿，这个男孩眉宇间有股英气，杨行密非常喜欢这个孩子，想收为义子。但杨行密的亲生子杨渥担心这个流浪儿将来会对自己的继位产生威胁，所以极力反对，杨行密只好把这个孩子交给心腹重臣徐温抚养，取名徐知诰，时间是唐乾宁二年（895年）。

这个来自徐州的流浪儿，就是开创一代南唐盛世的南唐先主李昪，杨行密家族的毁灭者。

杨行密控制了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包括重镇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淮南王兼江东王。识趣的空壳皇帝李晔封杨行密为弘农郡王，意图拉拢杨行密对抗人嫌狗憎的朱三。插一句闲话，杨行密发达后，自称是汉魏以来世族高门弘农杨氏的后代，实际上杨行密往上追溯祖宗八代都是泥腿子，和弘农杨氏根本不沾边，不过是自抬身价的无聊之举。

不用李晔拉拢，杨行密这辈子都注定是朱温的死敌，他们之间有点积怨。朱温曾经为了贪图小便宜，私吞了杨行密运到中原准备做大买卖的一万多斤茶砖，气得杨行密上表揭发朱温的累累罪行，从此二人势同水火。

此时的朱温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原地区，李克用也被打成了孙子，所以朱温的目光就投向了杨行密的江东。朱温想学曹操，大起雄兵八十三万，水陆并进，与孙权会猎于江夏。

唐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温正式向杨行密宣战。

朱温出手非常阔绰，大将庞师古率徐、宿、宋、滑诸州人马七万人南下清口（今江苏清江），葛从周率兖、郓、曹、濮人马攻寿州，而朱温本人则坐镇宿州督战。

梁军声势浩大，“淮南震恐”。而杨行密自灭掉孙儒之后，自信心得到了极大提升，他并不怕朱三。杨行密派郢州降将朱瑾北上对付庞师古，自己率淮南军主力在后接应。

胜负很快就有了分晓。梁军惨败，庞师古阵亡，葛从周紧急后撤，被朱延寿一通暴打，狼狈逃回。

至于汴军为什么溃败，说来非常好笑。庞师古进据清口，这里是淮河要冲，却地势低洼，庞师古把部队扎在清口，犯了兵家大忌。有人曾经提醒过庞师古，但骄傲的庞师古根本听不进去，反而一门心思和他人下棋，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淮南军利用自己善水的优势，准备掘开淮河放水水淹“七”（万）军。又有人提醒庞师古，但竟然被下棋入了迷的庞师古杀了。

庞师古的愚蠢，自然就是“淮寇”的机会。朱瑾怀着对朱温极大的仇恨，带着五千士兵强渡淮河，直接抄了庞师古的大营。与此同时，淮南军掘开了淮河大堤，“淮水大至，汴军骇乱”。一直在旁边观战的

杨行密该出手时就出手，“引大军济淮”，与朱瑾前后夹击，斩庞师古及汴军万人，“余众皆溃”。而另一路的葛从周还没等攻寿州，就被杨行密的小舅子朱延寿连敲带打，死伤惨重。再加上当时天寒地冻，汴军又被冻死数万，朱温见到南征的士兵只有几百人……

这是朱温的枭雄战史上史无前例的惨败（不算后来的柏乡之战），朱温本来旺热的南征梦，被杨行密一盆冰凉的洗脚水彻底浇醒。朱温总算明白，在他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统一江东了，因为有比他更强悍的杨行密在。杨行密却得理不饶人，写信挖苦朱三：“庞师古、葛从周之流对俺来说一根毛都算不上，朱三，你要有种，过淮与俺决战。”

朱温哪还有胆量去？

除了朱温，江东地区的军阀都视杨行密如强枭，轻易不敢撖其锋，除了吴越王钱镠。杨行密在江东纵横杀伐，人皆丧胆，唯独钱镠不怕杨行密。而杨行密在与钱镠进行的苏州争夺战，彻底败给了钱镠，本来在杨行密手上已经焐热的苏州城，被钱镠大将顾全武硬生生夺了过去，杨行密半点办法也没有。

唐光化元年（898年）九月，吴越军占领苏州，从此这座繁华的江东首善之都彻底与江东南政权绝缘。虽然杨行密不甘心，打算夺回苏州，但一代枭雄钱镠根本不可能给杨行密这样的机会。

论江湖级别，杨行密和钱镠同档次，钱镠从来没怕过杨行密，就如同杨行密从来没怕过朱温。其实以钱镠的江湖级别，杨行密输给他并不影响自己的江湖地位，曹操输给孙权、刘备，照样是千古一雄。当然，反过来钱镠同样没有能力吞掉杨行密，甚至他都没有能力主动攻击杨行密，只不过善于自守罢了。

以钱镠的实力，即使他占据了苏州，也不可能对杨行密控制的淮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实质性的威胁，杨行密依然可以做他的江东

王。

唐天复二年（902年）三月，绝望的唐朝皇帝李晔封杨行密为吴王，正式确认了淮南及江东是杨行密的私产。虽然李晔还幻想通过加封杨行密，让杨行密进攻朱温，自己好有机会虎牢翻身，但杨行密岂会做替人火中取栗的蠢事？

杨行密知道自己不可能推翻朱温，能做江东王，已对得起自己这些年在血雨腥风中的闯荡。杨行密为人强枭，长于智计，又善抚士兵，所以他在江东的统治基础非常牢固。即使有功勋大将田頔、朱延寿、安仁义相继反叛，但也只不过是打打小闹，很快就被杨行密镇压下去。田頔是在兵败后投奔朱温的路上被杀的，安仁义在润州死守一年被破城，押到扬州砍头。只有朱延寿死法比较特别，小舅子是被姐夫乱锤砸死的。

杨行密的演技非常出色，他以自己快要双目失明、托孤给小舅子的名义，把朱延寿骗到扬州。等朱延寿满心欢喜地等待杨行密托孤的时候，杨行密胡说什么太阳是方的，狗有五条腿，趁朱延寿听得稀里糊涂之际，一把小锤子就把小舅子送了终，乱锤砸死。

时间已经到了唐天祐二年（905年）二月。杨行密派大将刘存攻下了战略重镇鄂州（今湖北武汉）。鄂州北近中原，南襟湘赣，战略意义有多重要，看看荆州之于东吴孙权，就知道刘存此次战役对杨吴政权巩固西线防御有多么重要了。

而这一年，也是铁血枭雄杨行密人生中的最后一年。由于连年征战，杨行密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于当年十一月病逝，时年五十四岁。

对于杨行密，欧阳修的评价很高：“仁恕善御众，治身节俭，无大过失，可谓贤矣。”杨行密的一生，和北齐创建者高欢非常相似。他们都在江湖上拼杀半生，却都没有称帝，而是把江山传给了子孙，

让他们去折腾。不过有一点，杨行密是不如高欢的，那就是高欢生了一堆极为强悍的儿子，高澄、高洋、高演、高湛、高涣，这也保证了北齐江山的强硬存在。而杨行密的四个儿子，杨渥、杨隆演、杨濛、杨溥，个个不成器，特别是继位的长子杨渥，简直就是杨家的灾星。

在五代十国十五个政权中，杨吴是唯一在唐朝灭亡之前就丢掉对本地区控制权的家族。虽然杨氏政权在名义上存在了三十年，但都是俯仰受制于人的傀儡头子，毫无实权。

而把杨行密积三十年之功打下的东吴江山据为己有的，是杨行密手下的文臣之首徐温。

权相

——有实无名的梟雄徐温

徐温，在五代十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存在。说他诡异，是因为徐温从来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五代十国史上找不到徐氏政权。当然，徐温是有意把他篡夺来的杨氏江山传给自己儿子的，结果阴差阳错，江山落到了他的养子徐知诰之手，徐知诰建立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南唐，徐温辛苦一场，什么也没捞到。

不过，徐温控制杨吴政权的时间长达二十年，他的存在给当时的杨吴以及后来的南唐留下了难以抹掉的烙印。换言之，讨论杨吴史和南唐史，徐温这个名字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

没有徐温，就没有南唐，这是历史的公论。

来聊一聊南唐的实际建立者徐温。

徐温字敦美，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虽然东海徐氏在南朝时是著名的豪门大族，但徐温即使是南朝东海徐氏的后代，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徐温出身实在太低微了。

当然，徐温的情况比偷锅不成反遭毒打的朱温要好很多，他贩过私盐，吃饭是没问题的。后来杨行密在合肥起兵，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徐温入了伙，成了“三十六英雄”中的一员。杨行密手下这伙人多是赳赳武夫，唯独徐温不会打仗，地位相当于《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

徐温不会功夫，但他有智谋，这是文人在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当杨行密灭掉孙儒回到扬州时，诸将都抢财富，只有徐温抢粮

食，然后分给饥饿的百姓。此举为杨行密赚足了民心，同时也为徐温自己赚足了杨行密的好感。

杨行密一路杀伐，田頔、李神福、安仁义、刘威、刘存等大将虎视鹰扬，很少有人注意到徐温在杨行密身边的存在，而杨行密很多的战略决策都是徐温制定的。比如上一篇提到的杨行密以托孤之名骗朱延寿来扬州被乱锤砸死，其实就是徐温与自己的门客严可求的妙招。而正因为这件事，杨行密决定把徐温提到官场一线，“始预谋议”，成为杨吴政权的大当家。

徐温后来控制杨吴政权，实际上并不是徐温有野心，而是被逼出来的。这要从杨行密的继承人杨渥说起。

杨行密之所以立杨渥，不是因为杨渥有才，仅仅因为其他三个儿子太小，而杨渥已经成年。杨渥为人豪奢无德，杨行密一直不看好这个儿子，说此子“非保家主”。

杨渥是富二代，自然要享受美妙的人生。杨渥最大的爱好是晚上打球。古代没有电灯，所以必须要用蜡烛，而杨渥用的蜡烛都是上乘货。质量好，价钱自然也高，每支蜡烛甚至价值上万钱。

少爷们花老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从来没有心疼的道理。

此时的杨渥掌握军政大权，杨家的江山看上去固若金汤。宣州观察使王茂章因为不愿意给杨渥上贡财物，被杨渥派大将李简带着五千人打跑。而杨渥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无疑是唐天祐三年（906年）五月，吴军在秦裴的率领下，攻占了洪州（今江西南昌），江西数千里锦绣河山都成了杨渥的私产。

其实占领江西的首功是秦裴和一票兄弟，但杨渥却把功劳都算在自己头上，在大臣们面前骄横无比，这就引起了老臣徐温和张顓的严重不满。徐温曾经劝过杨渥自重，没想到杨渥却说：“汝谓我不才，

何不杀我自为之。”

二人在“惧”的时候，也对杨渥起了杀心，准备废杨渥，立杨隆演。

唐天祐四年（907年）二月，徐温和张颢发动政变，率兵闯进内府，捕杀了杨渥身边的小人，对杨渥实行软禁。一年后，徐、张二人担心杨渥东山再起，找一伙江湖侠士，在一个夜黑风高夜，勒死了木偶一般的杨渥。

徐温其实和张颢并不对付，就如同孙权忍着恶心和刘备联合对抗曹操一样，等杨渥死了，徐温和张颢的所谓同盟关系自然就变成了敌对关系。

张颢的野心要大于徐温，而且更加外露。杨渥被杀后，张颢召开文武会议，按他的意思，杨氏无主，你们何不立我为主？而当时的形势是，张颢大陈甲兵，如果众人不同意立他为主，张颢很可能就会大开杀戒。幸亏徐温的谋士严可求突然拿出吴国史太夫人的手令，说当立杨隆演，吴国文武立刻造成既定事实，跪拜山呼，才压住了野心勃勃的张颢。

毕竟张颢控制着杨吴军权，而他要除掉徐温，只是一句话的事，形势对徐温是非常不利的。徐温一方面与严可求演双簧，稳住了有头无脑的张颢；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张颢的偷袭准备。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夜，徐温收买了左监门将军钟泰章，带着三十个壮汉闯入军府，趁张颢不备，砍下其人头。

张颢被淘汰，胜利者自然就只剩下徐温一个人。“隆演以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咸取决焉。”

徐温现在终于尝到做曹操是何等快活的滋味了。

之所以是徐温胜而张顼败，是因为徐温“性沈毅”，张顼“形罚酷滥，纵亲兵剽夺市里”，一正一反，民心都倒向了徐温。其实徐温也知道，如果自己像张顼一样酷暴，等自己丢了民心，自然会有人出来收拾自己。所以徐温及时总结了张顼失败的教训，“立法度，禁强暴，举大纲”，力行改革，之前包括张顼以及杨渥施行的弊政全部废除。徐温让心腹严可求参知军政，相当于总参谋长，而善于理财的支计官骆知祥出任财政部部长，“可求善筹画，知祥长于财利”，时人称为“严骆”。

在徐温的精心治理下，吴国形势很快就稳定下来，百姓富足，天下太平，“军民安之”。而江东百姓并不在乎主子是谁，谁让老百姓过得好，他们就跟谁走。

何况徐温也会演戏，徐温的母亲周氏病故，官场中人送了一个高数尺的木偶人，上面披着锦缎，准备烧掉。徐温从中看到了“商机”，徐温告诉众人：“此皆出民力，奈何施于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贫者。”徐温这句话其实是说给百姓们听的，所以徐温“尤得吴人之心”。

历代治政安抚人心，都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得百姓之心；另一条腿是得官员之心，两条腿缺一不可。徐温在安抚百姓的时候也对原来吴国的功勋老将极尽拉拢，“温虽奸诈多疑，而善用将吏”，杨吴大将也基本都愿意接受徐温的统治，老主子杨行密早被他们抛到脑后了。虽然江西抚州刺史危全讽不服朱温，于梁开平三年（909年）六月，联合袁州彭彦章、吉州彭钡、信州危仔倡等人作乱，但这些人都是杨吴官场的边缘人物，杨吴大将周本一出马，危全讽等人被打得烟消云散。而平定这场叛乱，极大地提高了徐温在官场上的声望，统治更加稳固。

徐温是杨吴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徐温从来没有想过要篡位。因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这么做在政治上等于自杀，至少短期内徐温不会考虑篡位。

徐温不篡位，并不是他对杨吴忠心，而是时机远不成熟。大致说起来，有两点：一、杨吴旧臣尚在，他们可以接受徐温当终身宰相，但他们肯定不会同意徐温当皇帝，他们从来没打算要给徐温下跪磕头。二、扬州是杨家及功勋大将的大本营，徐温在扬州根基较浅。

第一点，徐温的办法是杀人立威。宣州观察使李遇是杨行密的旧臣，他是不愿意看到徐温执政的。徐温为了搞掉李遇，先是抓来李遇最疼爱的小儿子，要求李遇停止反抗回扬州议事。等李遇手无寸铁来到扬州，徐温连李遇带其子并一家老少全部砍头，极大震慑了刘威、陶雅等老臣，“于是诸将始畏温，莫敢违其命”。

第二点，徐温的办法是建立自己在政治军事上的战略根据地。徐温看中了升州，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升州北带长江，南控江东，地势险要，是非常理想的建都所在地。梁乾化元年（911年），徐温让杨隆演封自己为升州刺史，并在升州建造水师，由养子徐知诰率领。徐温此举，和曹操在许昌建立自己的政治中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来很有意思，在五代十国一票枭雄中，最像曹操的恰恰就是徐温，或者说徐温是有意识地学曹操。曹操虽然独断朝纲，但对汉献帝在礼节上绝不冒犯，徐温在这一点上学得有模有样。

曹操对汉献帝明尊暗防，徐温同样如此。徐温对杨隆演向来恭敬如仪，但负责宫廷保卫的阁门、宫城、武备使翟虔却是徐温的铁杆心腹，翟虔的任务就是严密监视杨隆演的一举一动。翟虔“制王甚急”，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主子交给他的任务。

吴人皆知真正的国王是徐温，杨隆演只是个傀儡。徐温已完全掌控大局，他已经有条件提高自己的政治级别，为将来篡位做准备。梁贞明五年（919年），徐温率文武劝杨隆演称帝，杨隆演之前拒绝过一次，但这次杨隆演很快就同意了。四月，杨隆演即皇帝位，改元武义，而总导演徐温得到了东海郡王、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

统及镇海、宁国节度使。

徐温有了政治名分，特别是东海郡县的爵位之后，就可以公开地为篡位做准备了。杨隆演自然知道这一点，而他同意称帝，也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名分，将来好与徐温争天下的政治资本。实际上，这种设想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同情杨吴宗室的功勋大臣死的死、散的散，现在朝中掌握军权的那批人基本上都是徐温的人马，杨隆演想翻天，怎么可能！

贞明六年（920年）五月，在徐温的阴影中做了十二年傀儡的吴宣王杨隆演去世，弟弟杨溥即位。但杨溥上位，所能做的只是配合徐温演戏。至于徐温能给他多少片酬，一则看他的演技；二则看徐温的心情。

只不过现在对徐温来说，篡位的时机还不成熟。有人曾经劝徐温废杨氏自立，徐温“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当在诛张顓之初，岂至今日邪！使杨氏无男，有女亦当立之，再敢妄言者斩！”

话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傻子都不会相信徐温的鬼话。其一，杀张顓时，徐温要敢篡位，刘威、陶雅那些人能答应？其二，立杨氏男当傀儡，自己专掌生杀，视杨家宗室如小儿，这算对得起杨行密？

徐温此时已经六十多岁，再冒着一世骂名篡位是极不划算的，所以徐温抱定了学曹操到底，把篡位的事情交给儿子去做，自己做周文王。

当徐温开始择嗣时，他才深深体会到老主子杨行密当年的无奈。徐温有六个亲生儿子：徐知训、徐知询、徐知诲、徐知谏、徐知证、徐知谔。可这六个不成气的儿子，加在一起都不及养子徐知诰的十分之一，不过长子徐知训在几年内因为给大将朱瑾扣绿帽子，为朱瑾所杀。徐温疼爱养子徐知诰，但毕竟不是亲生的，徐温一开始就没打算把江山交给徐知诰。徐温已经在几个儿子中选择了相对好一点的徐知

询，但还没等徐温传位给徐知询，唐天成二年（927年）十月，徐温病逝，时年六十六岁。

也许徐温在死前就已经意识到，他死后，再无人能压制住人中龙凤的养子徐知诰。

天下将是徐知诰的。

徐温算计辛苦二十年，全是白忙。

借鸡生蛋

——南唐开国皇帝李昇诡异的人生路

徐知诰这个名字，对现代人来说相当陌生，即使他后来改名为李昇，也籍籍无名。但世人皆知宋词之祖《虞美人》的作者、著名的南唐后主李煜。

徐知诰，正是李煜的祖父。李煜的父亲李璟，是徐知诰的长子。

为行文方便，建南唐前称为徐知诰，建南唐后称为李昇。

关于这个在濠州被杨行密捡到的流浪儿姓什么，各史记载不一。徐知诰后来出于政治需要，称帝时编了一套家谱，自称唐宗室之后，可信度和郭威自称舜帝之后有一拼。而《吴越备史》则称徐知诰并不是徐州人，而是浙江湖州安吉人，本来姓潘，后来冒姓李。因为吴越国与南唐是敌国关系，吴越国史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抹黑徐知诰也属正常，所以也不可信。

管他姓什么呢，徐知诰在被徐温收养之后，开始了一段辉煌的创业之路。当然，如果当初杨行密真要收下徐知诰，也许历史上就不出现歌舞风流的南唐帝国了。

徐知诰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英伟，“喜书善射，识度英伟”，完全不同于杨行密那几个窝囊废儿子，以及徐温那些不成器的纨绔之子，是吴国官场第二代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

徐知训等人只知道吃喝玩乐，而徐知诰却是诸子中对徐温最孝顺

的一个。为了表达对养父的忠诚，徐知诰写过两句诗：“主人若也勤调拨，敢向尊前不尽心。”

徐温有疾，徐知诰和妻子王氏衣不解带，伺候在徐温床前，让徐温大受感动，经常对徐知训等人说：若论孝道，你们这伙饭桶加在一起也不如知诰。

虽然很得养父徐温的喜爱，但徐知诰始终牢记自己的养子身份，自己再好，毕竟也不是徐家的骨肉。再加上有些人对徐知诰的闲言碎语，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徐知诰养成了静默的性格。

任泰山崩于前，我自神色不变。

世人皆知，江东江山久后必是徐温传其子嗣，至于传谁，长子徐知训最有希望。徐知诰知道自己希望渺茫，但徐知诰的心里始终保持着那一份微弱的希望。

要保持竞争力，对一个身份敏感的人来说，与其高调做人，不如低调做事。在徐知训等兄弟花天酒地的时候，徐知诰却成了徐家的大总管，徐府上下大小事务皆由徐知诰过手。徐知诰尽心尽力，把实际上的江东第一家庭打理得内外安顺，再苛刻的人也挑不出一根骨头来。这时徐知诰只有二十多岁，却少年老成，这段难得的治家经历，对日后徐知诰开创一代盛世带来了宝贵的经验。

而徐温对徐知诰的态度，应该说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不打算把江山传给知诰，但希望知诰能成为徐家的柱石之臣。徐温确定把金陵作为自己的政治根据地时，徐温首先想的就是由徐知诰打理金陵。

金陵是徐温的根据地，其实在徐知诰看来，又何尝不是自己的根据地呢？一旦自己在金陵打下根基，即使以后养父来了，也难以撼动自己。徐知诰治理金陵是极为用心的，《钓矶立谈》称赞徐知诰的治

政之功：“以军功牧昇州，初以文艺自好，招徕儒俊，共论政体，总督廉吏，勤恤民隐。”

徐知诰在执政金陵时，其实就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抚恤百姓，争取民心；二是极力拉拢下层文人，打造自己直接控制的幕僚团队。徐温的钱，徐知诰花起来一点也不心疼，“求遗书，招延四方士大夫。倾身下之，虽以节俭自励，而轻财好施，无所爱吝”。

肯花钱，自然就有人来入伙。“（徐知诰）以宋齐丘，王令谋，王翊主论议，曾禹、张洽、孙觐、徐融为宾客。马仁裕、周宗、曹侬为亲吏”，形成了徐知诰自己的政治团队。在这些人的倾心辅佐下，徐知诰距离那个位置越来越近。“温虽遥秉大政，而吴人颇归知诰。”

可定都金陵的徐温还是选择了留守扬州的徐知训。徐知诰心中有无限希望，但面上依然谈笑自若。

徐温也很无奈，徐知诰如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那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可他偏偏不是。家天下时代，有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传位给外姓，那是傻子，虽然徐温知道徐知训不成器。

好在徐知训自寻死路，得罪了大将朱瑾，朱瑾极痛快地手起刀落，送徐知训上西天当皇太子去了。徐知训的死，据现有史料，无法证明其中有徐知诰的暗中参与，徐知诰也不敢。但徐知训自己作死，白白给徐知诰腾出了位置。

至于徐知询等人，已经不可能威胁到徐知诰的存在了。

光明就在眼前，但陷阱还在脚下。

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徐知训死了，但徐温手下那帮老臣横竖都看徐知诰不顺眼，而一旦稍有大意，徐知诰依然有马失前蹄的可能。

徐知诰现在的处境，和明穆宗朱载堉当裕王的情形非常相似。当

时对朱载堦威胁最大的景王朱载堦去世，朱载堦是唯一的皇子，继位铁板钉钉。但当时大奸臣严嵩还在，没少给朱载堦穿小鞋，朱载堦并非没有可能变成朱载堦。徐知诰同样如此。

徐温手下两大重臣严可求和陈彦谦都坚决要求徐温将徐知诰踢出竞争圈子，虽然严可求和徐知诰是儿女亲家，但老严的态度是即使徐知询浑蛋，那也是徐温生的浑蛋，徐知诰哪怕是秦皇汉武转世，和你徐温一毛钱关系没有。而陈彦谦的态度更为坚决，在陈彦谦临死前，老家伙拼尽全力，上书徐温十余次，要徐温千万不要立徐知诰，外姓的天才不如本家的浑蛋。

徐温真的动心了，徐知询虽然远不如徐知诰，但多加培养，做个中人之主还是可以的。而就在徐温将动未动之际，唐天成二年，徐温病死于金陵。

如果徐温晚死一两个月，徐知诰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徐温死得及时，徐知诰虽然难免会念及养父的鞠养之恩，可毕竟最大的一块绊脚石被搬开了。

杨吴天下，铁定是徐知诰的了。

徐知询还在做着帝王梦，而等到徐家二少爷被吴主杨溥的诏书从金陵召到扬州时，一切都结束了。徐知诰把徐知询强扣在扬州，名义上做镇海军节度使，但同时派自己的心腹柯厚率金陵兵驻守扬州，就近监视徐知询，“知诰自是专吴政”。

严格来说，徐知诰虽然是南唐开国之主，但从整个江东割据历史来看，江东真正的开国之主是杨行密。没有杨行密，断没有江东割据称雄。而徐温更是上启杨吴、下开南唐的关键人物。至于徐知诰，名为开创，实为守成，其军事能力非常一般。就如同赵匡胤名为开国之主，实则是守成之主，让赵匡胤处在柴荣的位置上，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徐知诰在杨行密、徐温治政基础上，所需要做的，只是搞好农

业生产，安定民心，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已。而这一点，徐知诰做得相当不错。

徐知诰出身民间，自知百姓疾苦，他执政之后，对一些不合理的税赋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改革了丁口钱。

所谓丁口钱，其实就是人口税，每家按人口多少收税，却不管这家有地多少。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大地主和贫下中农如果家中人口相等，则要交相同的税，所以“（吴）民甚病之”。在宋齐丘的建议下，徐知诰宣布废除早就该淘汰的人口税，吴人大悦，“旷土尽辟，国以富强”。

更难能可贵的是，徐知诰尽可能地出台符合百姓利益的政策，再比如“差官兴版簿”，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根据土地的不同质量，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然后按不同等级收税。官府规定上等田每顷收两贯加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半。此举极大减轻了拥有劣质土地的下层农户的负担，毕竟这类农民占江东农户的大多数。徐知诰固然是从政治上的考量才这么做的，但至少多数百姓从徐知诰的政策中受益。

徐知诰的经济政策，用现代眼光来看，有些重农抑商，不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要知道，古代的封建小农经济结构的根基还是农业，以及附属在农业基础上的手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比如徐知诰有意抬高丝织品的收购价格，每匹绢市价达到了一贯七百文，这伤害到了一些收购商的利益，却让百姓赚足了银子。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徐知诰让重臣宋齐丘反驳他们：“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邪！”

徐知诰当然是出于私心才邀买人心，但当统治者的私利符合大多数百姓的利益时，私利自然也就变成了公利。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晋天福二年（937年）十月，已经改名为李昇的齐王正式接受吴主杨溥的“禅让”，改元昇元，在群臣的欢呼声

中，正式拉开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南唐帝国的盛大帷幕。

李昇的演技并不入流，都到这一步了，他还在演戏。面对杨溥的让位，李昇自称什么“老臣不敢”，尊傀儡一般的杨溥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一年后，杨溥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扬州。

因为徐温在世时受封齐王，所以南唐建国时的国号其实是“齐”，而不是唐。至于李昇为什么要易齐为唐，自然是从家谱上做的文章。东海徐氏在唐末早已不是名门大族，而唐朝虽然也灭亡久矣，但李氏毕竟还是当时的名门，所以从政治上考虑，李昇有一万个理由自称是李唐宗室之后。

南唐昇元三年（939年），演技越发成熟的李昇正式改姓李，易名为昇。其实也难为了李昇，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光鲜的好祖宗，李昇和大臣们绞尽脑汁，从浩如烟海的唐朝宗室档案中找到了唐代宗第十子建王李恪当了祖宗，李昇自称是李恪的子孙，然后编造了一通所谓“恪生超，超生志，志生皇考荣，荣生今上”天花乱坠的历史泡沫。

至于养父徐温，得志之后的李昇早就把养父弃之如敝履，仅仅尊追为“义祖”，其实就是干爹。言下之意，干爹再亲，也不是亲爹，这无疑是对当初徐温不立李昇为嗣的报复。

李昇不仅报复了现任干爹，呼唤徐家兄弟如小儿，甚至对李昇恩重如山的杨行密后代，李昇也进行毫无人性的报复。李昇把杨家子孙全部迁到海陵（今江苏泰州），严加看管，除了给吃的，禁止任何人进出，让杨家子孙自生自灭。杨家男女因为没有配偶，只能近亲结为夫妇，结果生出一大堆智障儿童。更恶毒的还在后面，周世宗柴荣下淮南，继位的李璟担心杨家人被周世宗利用，将杨家人尽数斩杀，杨行密的子孙一个都没传下来。再后来，李煜被俘入宋，赵匡义霸占小周后，并毒杀了李煜。（李煜因悲惨人生而赢得了后世的普遍同

情。)

当然，不能因为李昇父子行事残忍就否定他们对发展江东做出的贡献，私德不能站在客观事实的面前。老百姓不管你杨家李家，只要对他们好，你们之间的私怨没人关心。

李昇特别重视恢复生产，即位前执政如此，即位后同样如此。昇元三年（939年）四月，李昇下诏鼓励农民开拓荒地，每个劳力开荒达到八十亩，政府将奖励每人两万钱，五年免收租税。这一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江东百姓的生产热情，在政府与百姓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先天地理优势，南唐成为十国中国力最为强大，也是对中原政权威胁最大的政权。而这一切，首功当然是李昇的。

李昇还有一点非常值得称赞，就是 he 有着难得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木桶短板在哪里，那就是军事。当然，这也是李昇在军事失败后得到的教训。昇元四年（940年）六月，晋朝安州（今湖北安陆）节度使李金全因拒绝接受调令，背叛石敬瑭而降南唐。李昇想摸摸石敬瑭的底细，结果被石敬瑭劈头盖脸一通暴打，南唐军惨败。李昇领教了石敬瑭的厉害，也就不再对开疆扩土抱有幻想了。

李昇和他的“同宗”李嗣源非常相似，进取不足，自守有余。李昇能统治江东三十州，已是心满意足了，统一大业遥不可及，李昇不做此等幻想。

昇元五年（941年）七月，吴越国都杭州发生大火，烧毁无数财宝，大伤元气，吴越王钱元瓘也受到惊吓，精神失常。南唐大臣劝李昇出兵灭吴越，李昇不但拒绝出兵，反而派人赠送吴越大批财物，帮助吴越渡过难关。

其实李昇不是傻子，吴越国实力雄厚，真要开战，很可能陷入战争泥沼里无法自拔，那时自然会有人到李昇的浑水池子里摸他的鱼。李昇的保守，让那些激进的大臣们非常不满，掌书记冯延巳就在背后

骂李昇田舍翁不能成大事。实际上冯延巳这是在难为李昇，他根本不具备统一的能力，勉为其难只能两败俱伤。

做人最难的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有些人自不量力，兵败身死，成为笑柄。李昇也知道自己的儿孙早晚会被人灭掉，但未来的事情他已经看不到了。

南唐昇元七年（943年）二月二十二日，因服用铅药中毒的李昇驾崩于昇元殿，时年五十六岁。

皇太子李璟在一片哀哭声中即位。

志大才疏，败家帝王

——说说才子皇帝李璟

在五代十国多如牛毛的帝王中，没有一个帝王像李璟这样品尝到人生从最高峰突然坠落到谷底的惨痛人生。

李璟本来有机会逐鹿中原，成为天下共主，即使不出兵，也能称霸江东。可因为一位强者的出现，李璟被逼得几乎走投无路，曾经那么骄傲的一位帝王，俯首下心地给强者当奴才，最终抑郁而死。

他死后，他从父亲手里接过那座强大的江山也如残阳般摇摇欲坠，最终在他儿子李煜的手上彻底摔了个粉碎。

来讲一讲李璟。

因为李璟有个千古词帝的儿子李煜，其本人又是著名的词家，所以李璟在历史上有些知名度。

先说一说李璟的名字。

在李昇由徐姓改李姓之前，李璟的名字叫徐景通，李昇易姓，徐景通改名李璟，字伯玉。其实李璟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应该是不存在的，李璟的本名，根据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南唐中主陵的考古发现，南唐中主本名应该是李瑶。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瑶”字太常用，民间不易避讳，所以用了相对冷僻的“璟”字。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皆称李璟。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李煜厌烦政治斗争，喜欢寄情山水，作诗填词和书法，这些都是李璟最喜欢玩的。如果他不是李昇的长子，必须继承家族的江山，以李璟的性格，他更愿意做个隐士。李煜后来的

诗酒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是遗传了父亲淡泊名利的基因。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李煜是实际上的嫡长子，李煜是断然不会当皇帝的。

李昇死后，按正常程序，皇太子李璟应该在灵前即皇帝位。但李璟却“泣让诸弟”，所谓的诸弟，是指李璟的同母弟李景遂和李景达。李璟让位于弟弟，是出于虚情假意吗？结合李璟的性格和当时的政局来看，李璟让位出自真诚，并没有演戏的成分。北宋有个所谓的“金匱之盟”，即赵匡胤传位赵匡义，赵匡义传位赵匡美，赵匡美再传位给赵匡胤之子赵德昭。实际上这个“金匱之盟”是赵匡义捏造出来的，而南唐却有一个真正的“金匱之盟”，李璟约定兄弟传国，即位之初就立弟弟李景遂为皇太弟。虽然李景遂拼命辞掉皇太弟的位置，但这也说明李璟对弟弟们的友爱是出自真挚，而不是赵宋的职业篡位家那样互相阴谋算计。

李璟友爱诸弟，这是李昇把皇位传给李璟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兄弟友爱不会在内部制造政治混乱，可以巩固政权。但李昇对李璟过于阴柔的性格一直不太满意，毕竟在乱世虎狼群中，这种偏软的性格一旦遇到强者，是很容易被人打爆的。李昇传递到李璟手中的，是一个近代以来极为强盛的江南大国。疆域广大，“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财税充足，“是时江淮无事，累岁丰稔，兵食盈积”，仅宫中就有七百万的财物，是足够李璟花销的。只要不遇到强者，李璟守住家业是不成问题的。

李昇执政时，制定了不对外扩张的政策，谨小慎微。就当时的格局来看，李昇这种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无疑是符合南唐利益的。但李璟似乎并不太认同父亲的对外政策，而冯延巳那句讽刺李昇的“烈祖戢兵，齷齪无大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实际上是得到李璟认同的。

李璟即位之初，就已经决定推翻父亲的保守对外政策，开始积极

对外扩张。而李璟这么做，一则是那伙无聊群臣的无聊鼓噪；二则是李璟性格中潜伏的不安定因素在起作用；三则是李璟认为如果要超越先父在治理内政上的历史功绩，那就只能走对武力扩张这一条路。要拼内政成绩，李璟是不可能超越父亲的。

有志于天下，这并非坏事，但李璟所追求的明显超出他的能力，闹剧最终只能变成悲剧。

李璟最先看上南唐东南方向的闽国。闽国自王审知去世之后，王氏兄弟为争大位互相残杀，政局持续动荡。闽国王位传到王延羲时，形势已不可为。王延羲是个酒鬼，所爱者酒与美人也。弟弟王延政多次劝谏王延羲，兄弟最终翻脸，大打出手，王延政另立门户，在建州（今福建建瓯）自称大殷皇帝，原来地盘就非常小的闽国正式分裂。

好大喜功的李璟已经想到了灭闽之后，自己的名望将会如日中天，但他却忘记了自己已站在一块烂泥潭中，身体在慢慢地下坠。

南唐之所以最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江南第一大国迅速变成中原附庸，根本原因还是出在内政不明上，其实这也是所有政权由盛而衰的主要原因。李璟手下有个著名的五鬼集团，这些人专权乱政，像一群贪婪的蝼蚁一样啃食着堤坝，最终咬坏了南唐的堤坝，来自中原的洪水彻底淹没了这个繁华一时的江南盛国。所谓五鬼，是指聚拢在李璟身边的五个大臣，即冯延巳、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人称“五鬼”。其实这五个人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而且都是文学家，只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治政能力太差，却经常冒充政治家，把南唐政治搞得乌烟瘴气，污浊不堪。

李璟本人就有些心浮气躁，再加这伙政治家的鼓噪，李璟决定对闽国动手。南唐保大二年（944年）五月，热火烧心的李璟派查文徽和边镐攻打福建，随后又增派何敬洙、姚凤、祖全恩部前去支援。

以当时南唐如日中天的国力，对付一个分裂的小国似乎不成问

题，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李璟一记响亮的耳光。而这所有的羞辱，完全是李璟几乎烂成渣的军事指挥和用人水准导致的。

南唐军进入福建时，闽主王延羲已死，福州三易其主，落到了狡兔三窟的李仁达手里。而大殷皇帝王延政则被南唐军活捉，送到金陵城。福建全境，除了福州，基本为南唐所有，但如果得不到福州，李璟在福建是混不下去的，可李璟偏偏在李仁达身上栽了跟头。

其实李璟是花了很多代价想拉拢李仁达的，甚至把李仁达编入南唐宗室属籍，李仁达的老娘、老婆都封为夫人，但李仁达坚决不咬毒饵，任你说破天，福州寸土不让。不过李仁达并没有完全拒绝李璟，至少李仁达向南唐称臣，还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由李璟钦定的李弘义。现在对李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武力征服李仁达，而是通过政治手段稳住李仁达，不能让李仁达与把触角伸向福州的吴越国王钱弘佐勾搭上。

可惜李璟沉不住气，派陈觉威逼李仁达交出福州不成，便开始动粗。如果动粗能拿下李仁达，虽然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也可以接受。可此时李仁达感受到来自李璟的压力，干脆把福州重镇打包送给了吴越。

五鬼党的军事家们集体出动，准备把攻克福州的大功据为己有，但他们哪里会打仗，而吴越军的实力又不在南唐之下。一场硬仗下来，南唐军败相极为难堪，“吴越兵既登岸，大呼奋击，延鲁不能御，弃众而走，孟坚战死。吴越兵乘胜而进，城中兵亦出，夹击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诸军皆遁”。那几位军事家差点被活捉，气得李璟差点当场昏厥。

南唐出兵灭闽，最终的结局却是吴越控制富裕的福州，留从效等人控制富裕的泉、漳二州，李璟得到的，仅仅是相对贫瘠的建、汀二州而已。

一场辛苦，都为他人做了嫁衣。

李璟在福州栽了面子，觉得心有不甘，听说楚国马氏兄弟又开始闹内讧，李璟又盯上了湖南这块沃土。

希腊哲人说，人不可能同时踩进两条相同的河流，可天才的李璟偏偏就同时栽进两条相同的臭水沟里。

南唐保大九年（951年）八月，人称“边菩萨”的名将边镐再次摇摇尾巴，替李璟收湖南去了。

楚国内乱已经不可收拾，马氏兄弟反目成仇，而马希萼自称楚王后就向李璟称臣，可以引导南唐军入楚，形势对李璟是比较有利的。虽然马希萼很快就被拿下，弟弟马希崇在乱中上位，但南唐军已经杀进了长沙城。

南唐军在楚国叛将彭师皐的帮助下，很快就灭掉走投无路的马希崇，送马大王到金陵喝茶去了。但楚人万万没想到，南唐军刚进长沙，就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土匪。南唐军在长沙城中挖地三尺，搜刮地皮。更可笑的是，李璟竟下令把湖南地面所有的有形财产，包括金银财宝、楼台亭阁，甚至是瓜果梨桃都搬到金陵。同时，李璟还派都官郎中杨继勋在湖南到处搜刮。杨继勋为了完成李璟交给他的任务，几乎是上天入地地搜刮，甚至还克扣了已经投降的楚军的军饷。而那位菩萨，在得志之后，诸事不问，只是在长沙城拜佛求平安，搞得湖南乌烟瘴气。

李璟的倒行逆施激怒了楚人，楚国的旧军官开始密谋将南唐势力踢出湖南。最先发难的是楚军指挥使孙朗和曹进，但他们放火烧死边镐的计划失败，逃到了朗州，投靠了虽然名义上降唐但实际上割据的刘言。刘言看到李璟莫名其妙地失楚人之心，自然不会放弃重建楚国的梦想。刘言几乎掏空家底，数路兵齐发，直进长沙城。

一切都非常顺利，周广顺二年（952年）十月，朗州军攻下益阳，斩杀南唐军两千多人。边镐本来是向李璟求救的，但李璟没有丝毫反应，边镐丢掉了菩萨，狼狈逃回金陵。

李璟拼命才拿下的楚国，又重新伫立在江南腹地，只不过统治湖南的不姓马罢了，但这和李璟半点关系也没有。

之前灭闽，李璟虽然惨败，但至少还拿下建、汀二州，而灭楚之后，极端错误的搜刮政策导致李璟在湖南彻头彻尾地惨败，一根毛也没捞到。

一场辛苦，又为别人做了嫁衣。

这两场惨败，彻底葬送了李璟在江湖上的名望，而且最要命的是，各国都看穿了李璟的外强中干，此人诚可欺也。

吴越国从来没把李璟放在眼里，轻蔑地称其为“金陵李璟”，南汉大帝刘晟占了李璟伐楚的便宜，拿下楚国数十州，并把南唐军打得落花流水，更瞧不上这位词人。而柴荣业已缓缓地把刀举起，冲着金陵李璟的方向狠狠地劈了下去。

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十一月初一，志在八荒的大周皇帝柴荣对天下颁布《伐淮南诏》，正式向李璟宣战。周朝军队水陆并进，马队无数，战舰无数，旌旗猎猎，铺天盖地，南唐震怖，但李璟似乎并没有把柴荣当盘菜。

李璟当初面对柴荣时的底气，源自南唐强大的综合国力。伐闽、伐楚，因用人、指挥不当，弄得满地鸡毛，但这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南唐的国力。只要李璟吸取前两次惨败的教训，近贤远佞，再加上南唐三军用命，御柴荣于淮河之北是完全有可能的。

可惜，李璟还是那个李璟，该填词时照样填词，该搜刮百姓时照样搜刮百姓，该重用佞臣时照样重用佞臣。

但柴荣既不是王延政，也不是马希崇。

李璟派来的那些冒牌军事家，没有一个是千古一帝柴荣的对手。刘彦贞去救刘仁贍死守的寿州，结果被李重进全歼，刘彦贞也战死阵中，白白浪费了李璟的三万精锐和数十万副上等铠甲。刘彦贞是什么人？贪官！“素骄贵，无才略，不习兵。所历藩镇，专为贪暴，积财巨亿，以赂权要”。而李重进是五代十国顶级名将。还有就是李景达为主帅、陈觉为监军的这支南唐精锐部队，也在六合被周军赵匡胤部彻底打残，“唐之精卒尽矣”！赵匡胤是周朝新晋名将，而李景达是个饭桶，陈觉更是个只会溜须拍马钻营的佞臣。

换言之，李璟在淮南战场上的惨败，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政治。

柴荣敢伐南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李璟在南唐失尽民心。

还是那个刘彦贞，他在主政寿州的时候，就以修建水利为名放水淹了民田，然后让税官强迫百姓交税。百姓无钱可交，只能卖地，刘彦贞替朝廷狠赚了一大笔，但老百姓心里早已视李璟为魔鬼。

更可恨的还在后头，李璟为了搜刮百姓，下令征收百姓养的牛，特别以江西地区和淮东地区为甚。老百姓没有了牛，就没法种地，那是要饿死人的。各地百姓上告无门，痛哭流涕。还是徐铉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劝李璟给百姓留条活路。李璟怎么说？“朕养雄兵数十万，不让老百姓出钱养军，朕拿什么守边？”

还有更可恨的吗？有！李璟不恤百姓，淮南百姓困苦，没有饭吃。当时在位的郭威下诏允许南唐的淮南百姓可以过河与周朝进行粮食交易。这本是李璟争取民心的好机会，李璟又是怎么做的？“悉夺之（百姓粮食）”，然后作为军粮，这也是后来柴荣下《伐淮南诏》时李璟的罪状之一。

丧心病狂到了这种程度，李璟不亡，天理也不容他。

南唐在政治上的失败，还有就是用人不当。

在五代十国的政权中，南唐是上层党争最为激烈的。

南唐有两大派系：一派系是以开国大魔头宋齐丘为首，冯延巳、陈觉、李征古、冯延鲁、魏岑、查文徽为骨干。很显然，这一派都是佞臣。另一派系则是清流党人，有孙晟、常梦锡、萧俨、江文蔚、韩熙载、李德明、钟谟等人。

宋党成员都处在权力最高层，很容易利用权力大发其财，李璟除了对宋齐丘本人多有戒心，基本上对这伙人的腐败不闻不问。而清流党自然不满宋党的贪腐，经常上章弹劾宋党，二党水火不相容。清流党表现得更为激烈，江文蔚和韩熙载多次上章弹劾冯延巳、魏岑等人，但李璟不但不听，反而贬二人，并重用宋党。而成为历史笑柄的南唐灭闽一战，实际上就是陈觉和查文徽弄出来的。

南唐落日残阳，周朝如日中天，胜负虽然用了三年时间才分出来，但没有人会意外这个结果，李璟能在柴荣的霸道之下硬撑了三年，已是大不容易。李璟还想咸鱼翻生，但柴荣根本不可能给他任何机会。当奄奄一息的刘仁贍被士兵抬出寿州城时，南唐帝国的败局已不可避免，淮南十四州从此再不属于李璟。

李璟真的被柴荣打服了，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皇帝，心甘情愿地跪在柴荣使者的脚下，接受柴荣的征服。南唐帝国在这一刻已不存在，却多出一个沾满屈辱血泪的江南国。南唐的年号也没有了，奉周朝的显德正朔，更让李璟感觉到耻辱的是，为了避周朝的祖讳“璟”字，李璟必须改名。

李璟也不存在了，却多出一个同样沾满屈辱血泪的李景。“王字旁”没有了，也预示着金陵王气黯然失色。

三年后，心情无比压抑的李璟病死于南都洪州（今江西南昌），时年四十六岁。

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悲喜人生之继位篇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提到这阙著名到不能再著名的《虞美人》，几乎所有人都能说出这阙词的作者——李煜。

说到五代十国最著名的政权，南唐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开创北宋盛世的后周远不如南唐有名。如果说到五代十国最著名的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同样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开创北宋盛世的千古大帝柴荣名气远在南唐之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五代十国人物众多，但实际上只有三个人物：帝王中柴荣，大臣中冯道，文艺中李煜（虽然李煜也是帝王）。因为这个原因，《柴荣篇》和《冯道篇》的篇幅都比较长，李煜作为五代十国故事最为奇特的扛大鼎的主角，篇幅同样比较长，不过这些都是李煜应该得到的。

其实历史上存在过两个李煜：一个是政治上的李煜，这个李煜昏庸无道，残害忠良，穷奢极侈，以致亡国被俘，最终被赵匡胤毒死，命运和他的“同行”孟昶一模一样。另一个是文学史上的李煜，这个李

煜则是一座让后人高山仰止的丰碑！特别是中国词史上，李煜堪称一代词祖，词界的千古一帝！把任何肉麻的称赞送给李煜，李煜都当之无愧。与李煜同时代的后蜀虽然有《花间词》，但花间词多承唐诗遗风，格局较小，正是李煜的出现，才把作为小令的词推向了一个几乎不可及的高峰。正如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政治世界的亡国奴，文艺世界的千古一帝，两个极端的身份集于一人。放眼古今，只有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可以与李煜相提并论。

有一种传闻流传至今：宋神宗赵顼在皇后生赵佶前夕，曾经在梦里遇到李煜，然后就是赵佶的降生。换言之，赵佶是李煜的后世投胎，李煜是赵佶的前世孽缘。不过赵佶的覆亡是自己花样作死，北宋灭亡完全是赵佶作出来的。而李煜的悲剧人生，其实早在他父亲李璟时就已经不可逆转……

先来讲讲政治史上的那个著名昏君李煜。

李煜，字重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本名李从嘉。李璟共有十个儿子，但有资格竞争皇位的只有四个，即李弘冀、李煜、李从善、李从谦，因为他们都是正宫钟皇后所生，其余六子“自（李）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也因为母亲这层关系，再加上李煜从小就喜欢文学，天赋极高，李璟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只不过因为李弘冀是嫡长子，早就立为太子，李璟并不能给予老六什么。而李煜向来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他更愿意一头扎进书堆里，快乐地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而且由于李弘冀向来怀疑六弟会与自己争太子之位，对李煜横挑鼻子竖挑眼，李煜“避祸，惟覃思经籍”，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这个时候的李煜是快乐而自由的，因为他远离了本就不喜欢的险

恶官场，在万顷碧波中听涛观澜，在青葱秀山里抚松戏鹤，这才是李煜最想要的生活。当是在这个时期，二十岁出头的李煜创作了两首著名的《渔父》词。

其一：“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

其二：“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这两首词其实都是李煜题在《春江钓叟图》上的，但从两首词的立意和用词来看，两首词应该不是同时落笔的，第一首当比第二首创作要早许多。细品第二首中的“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能发现此时的李煜已经被人盯梢了，最有可能的自然太子李弘冀，所以李煜借此词向李弘冀表明自己绝无意夺嫡。而第一首则相对更自由快乐，特别是名句“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让人爱不释手。当然这两句对联也是向李弘冀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此时李弘冀对李煜的猜忌还没有后来那么严重，所以李煜能快乐地唱道：“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我）有几人？”

李煜希望这样美好惬意的山水生活能陪伴他走到人生的尽头，功名利禄于他不过是过眼云烟，但残酷的现实却根本不可能给予李煜这样的人生。

李煜的父亲李璟突然碰上了一个他们父子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强硬对手，这个对手志在统一天下，而李氏父子统治的南唐，则早就上了这个江湖无名之辈的菜单，他就是震古烁今的一代圣主柴荣。

南唐保大十三年，周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周世宗柴荣正式对南唐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战争，而柴荣的首要目的是占领由南唐控制的淮南十四州。

这场战争其实和李煜本来没有直接关系，他对军事几乎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但毕竟淮南之战涉及了南唐李家父子的饭碗问题，所以李煜也被动地卷进了这场让他刻骨铭心的战争中。

战争开始后，不知道李璟是出于什么考虑，封根本不懂军事的安定郡公李煜（当时还叫李从嘉）为神武军都虞侯，“（带兵）沿江巡抚”，属于南唐的机动部队。以李煜的军事能力，他是不可能主动寻找周军主力决战的，他最有可能做的，应该是在淮南南岸附近游弋。北宋人龙衮在《江南野史》记载了一个不太可信的故事：有一次柴荣准备渡过长江进攻南唐国都金陵，但柴荣发现江南突然“白气贯空”，派细作打探，原来是南唐六皇子李煜在打猎。柴荣惊叹：“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停止了对南唐的军事计划。李璟听说后，立刻立李煜为太子。

这个故事荒诞不经，不足为信。但柴荣与李煜同时在淮南，二人在某个特定场合隔水相望。李煜叹服于柴荣的英武霸气，而柴荣同样对李煜的优雅赞叹不已。从逻辑上来看，这个倒是有可能发生的。

虽然李璟知道李煜在军事上没有天赋，也知道李煜志在山水优游，但因为一个偶发事件，李璟也只能赶鸭子上架，强行让李煜更多地承担国事，因为南唐太子李弘冀在交泰二年（959年）九月初四病故。

此时的南唐早不复当年的盛况，被柴荣打得七零八落，淮南彻底丧失，周军水师骄傲地游弋在长江上。李璟被柴荣彻底打服，去帝号，自称江南国主，向周称臣，每年岁贡不绝。不过至少李璟还保有江南半壁，再加上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必须解决继承人的问题。

这一切本来与李煜依然没有关系，毕竟他排行第六，可要命的是，除了大哥李弘冀，李煜前面的四个兄长都已过世。李煜这才发现，行六的他此刻已是南唐实际上的嫡长子。

江南国主的位置，李煜已经躲不过去了。

一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位，建立北宋。因为南唐失去了淮南防线，金陵已不安全，所以李璟把国都迁到了洪州。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心力交瘁的李璟在洪州撒手人寰，二十五岁的皇太子李煜继位，成为南唐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李煜有些惶恐地坐在金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山呼万岁。同时，李从嘉改名李煜。

中原政权在柴荣的打理之下如日中天，虽然赵匡胤篡位建北宋，但中原政权的统一形势不可逆转，李煜根本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

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悲喜人生之奢侈篇

李璟有十个儿子，其实严格来说，他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活在政治里的李弘冀；另一个是活在文艺世界里的李煜。李弘冀为人虽然奸枭，甚至为了皇位毒死了自己的亲叔父李景遂，但这种性格在乱世里反而能吃得开。以李弘冀之能，守住江南半壁当然不是问题。可没到他继位就死掉了，而说到继位的李煜，相信南唐上下都有些忐忑不安，这个并不太懂政治的艺术天才会把南唐的残山剩水带到哪里？

李煜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但不代表他对政治一窍不通，毕竟浸淫于帝王家，搞政治是他们家的饭碗，于政治多少还有些无师自通吧。李煜知道赵匡胤是个野心不逊于柴荣的帝王，他根本无法保证赵匡胤会不会立刻发动侵略战争，所以现在对李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住赵匡胤，给南唐也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

《即位上宋太祖表》与其说这是一道藩臣李煜给宗主国统治者赵匡胤的上表，不如说是李煜和赵匡胤的公开谈心。

在表中，李煜首先谈到了自己本无意于政治，更愿意优游山水，是因为长兄（李弘冀）之死，自己才能勉强撑其难。“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

李煜这么写，虽然是向赵匡胤表明自己绝无对抗天朝上国的野心和胆量，但同时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如果他四个哥哥有一个活着，即使对方是庶出，李煜也绝不会去争位。当然，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赵匡胤。

赵匡胤为人雄猜多疑，李煜不敢招惹这个连旧主托孤给他的幼子

都要动刀的篡位者。李煜即位时，曾经“宫门立金鸡竿，降赦如天子礼”。因为金鸡只有皇帝才能用，所以李煜此举引起了赵匡胤的不满，当面责骂南唐“驻京办主任”陆昭符。还是陆昭符糊弄赵匡胤说这不是金鸡，而是一只怪鸟，赵匡胤才一笑而罢。

李煜知道赵匡胤喜欢让人拍他的马屁，所以在上表中拍足了赵匡胤的马屁，“陛下怀柔义广，煦妪日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远凭帝力，下抚旧邦。克获宴安，得从康泰”。因为在李璟时代，南唐就已用子礼对中原政权，李煜同样视赵匡胤如“父”，把因篡位而心虚的赵匡胤拍得舒舒服服。而且赵匡胤篡位不久，刚镇压了李筠、李重进的起义，急需稳定内部局势，暂时没有精力去打李煜的主意。

李煜稳住了北宋，可以关起门来做他的无忧天子了。李煜的级别只是臣属于中原大国的江南国主，但在“江南国”内部，李煜依然是主宰南唐臣民生死的最高统治者，南唐大臣依然要尊称李煜为陛下。

因为李煜在即位之前口碑甚好，所以他初继位时，南唐大臣都对李煜抱以极高的期望，认为李煜有能力带领残山破水的南唐重兴唐朝。李煜拍完赵匡胤马屁一个月后，江宁府句容县尉张泌给李煜上了治国万言书，谈论治国之道。张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如行君道、正臣职、明赏罚、纳谏诤、远奸邪、节用度。张泌希望李煜能效法汉文帝，“愿陛下勉强行之，无俾文帝专美西汉”。

此时的李煜俨然是一副明君做派，他在御批中郑重许下了自己的承诺：“朕必善始而思终。”李煜言出必行，他在控制权力之后，矫正了李璟时代的一些弊政，还起用了被李璟罢黜的有见识的大臣，如曾经劝李璟趁后晋灭亡之际北伐收复中原的名臣韩熙载。

李煜奋发有为，南唐臣民无不欣欣望中兴之治，因为李璟扔给南唐的这个摊子，实在太烂了。

因为在与柴荣争夺淮南的战争中彻底失败，南唐不仅失去了十四

州的土地人口财税，同时还要从所控制的江南本土向周朝贡献大量财货。北宋建立后，李煜为了不让赵匡胤进攻南唐，不计成本给赵匡胤塞银子，导致南唐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数贡奉，帑藏空竭”，情况也只比几乎成了经济光棍的北汉稍好一些。有时为了筹集上贡北宋的钱财，李煜打起了富商的主意。“驻京办主任”陆昭符奉李煜之命，强行与金陵富商石守信（非北宋大将石守信）“做生意”，强行“得绢十万”，李煜非常高兴。

李煜从中尝到了甜头，似乎也忘记了当初对张泌做出的承诺，摇身一变成了刮地皮能手，南唐地面上的财富几乎被蝗虫一般的李煜扫荡得底朝天。

刚开始，李煜还打算铸钱来解决经济困难，本意是想用铁钱来换取老百姓手中的铜钱。铁钱币值太轻，老百姓当然不愿意以铜易铁，都用铁钱结算，不上李煜的当。而且更要命的是民间私铸铁钱，导致铁钱面值一降再降，严重搞乱了南唐的物价平衡。

李煜实在是收不上钱了，干脆实行无赖的加税政策。所谓加税，就是在政府规定的税赋之外，打着各种名义强行向百姓征税。老百姓生活所必需的酒、鸡鸭鹅，甚至是莲藕、螺蚌、鱼虾都成了李煜的钱袋子，凡是进行这些物品交易的，都要交钱。更可笑的是，老百姓家里的鹅生了双黄蛋，家里种的柳树结了柳絮，也要交钱，可谓挖地三尺，无所不用其极。除此之外，李煜还提高了政府规定税赋的征收标准，李煜的逻辑是：只要你还活着，朕就有办法能从你身上搜刮最后一滴油水。因为李煜对百姓搜刮太狠，给江南百姓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甚至一百多年后，江南百姓还清楚地记得李煜带给他们的伤痛。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故老相传云：李煜在位时纵侈无度，故增赋若是。”

正如这些父老所言，李煜挖地三尺得到的财货，并非都送给了赵匡胤，而是留下其中很大一部分给自己享受美妙人生。

李煜是个艺术家，而且还是帝王，他认为自己当然有资格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追逐自己的艺术梦想。李煜“尚奢侈”，为了经营自己的艺术天地，李煜不惜重金，在宫中打造了让人眼晕目眩的豪华家装，“以销金红罗幂其壁，以白银钉玳瑁而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反正这些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出来的，李煜花别人的钱怎么会心疼？

同时，李煜和赵匡胤一样，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赵匡胤信佛是为了掩饰篡位带来的心虚与不自信；而李煜信佛主要是打发无聊的时光。但帝王信佛，那都是要掏真金白银的。和尚们非常势利，不给钱谁陪你玩？赵匡胤承后周经济大发展之惠，有闲钱信佛；而李煜则在已尽精穷的财政状况下拿出大笔钱财供养僧尼。李煜经常掏钱收买百姓或者道士改信佛教，而金陵城中的和尚很快就增至万人，这些僧人所有的花费“悉取于县官”。后来北宋有个间谍小长老来到南唐执行任务，说服李煜出重金建佛寺塔像，几乎耗尽了南唐国库。而南唐国库的每一文钱都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其实李煜并非不懂得“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他把羊剃成大秃瓢，自然也就没羊毛可用。李煜曾经在卫尉卿李平的建议下清查户口，打造牛籍（牛的户口簿），在政策上扶持农业生产，但后来也不了了之。

不过李煜并不在乎百姓的死活，他相信一个逻辑：只要赵匡胤不打过江，凭尚能一战的南唐军队，镇压百姓造反不成问题。

在性情浪漫的李煜看来，与其说他在经营李家江山，不如说在经营他自己的人生。更准确地说，是在经营自己浪漫的爱情。

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悲喜人生之爱情篇

政治史上的李煜，诗词史上的李煜，爱情史上的李煜，后世的人们最熟悉的无疑是后两者。李煜的诗词与他的爱情同样风流千古。

说到李煜的爱情，人们甚至会下意识地说出两个名字：周娥皇、周女英，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大周后、小周后。

其实大周后的真名确实叫娥皇，但小周后名字不详，之所以叫周女英，是后人根据舜帝有两女，一娥皇一女英，给小周后强加上的。二周的父亲是南唐开国元勋周宗，又是南唐先主李昇的患难之交，李昇篡吴建唐，就与周宗的鼓动有很大关系。因为周家与李家这层特殊的关系，李煜和周娥皇从小就青梅竹马在一起玩，很自然地就对彼此有了好感。南唐保大十二年（954年），十九岁的周娥皇嫁给了十八岁的六皇子李从嘉，一段轰轰烈烈的惊世爱情就此拉开大幕。

周家是南唐顶级权贵，为了家族地位，家里的女孩子必须从小接受严格的艺术训练，将来要与权贵甚至是帝王结亲，形成稳固的政治联盟。周娥皇从小就“通书史，善歌舞”，加上貌美如花，舞起来仿佛神仙中人。除了跳舞，周娥皇还特别擅长弹琵琶，李璟曾经过寿，周娥皇就给未来的公公弹起了琵琶。李璟大赞其妙，把一把绝世罕见的东乡蔡邕传下来的烧槽琵琶赐给了周娥皇。而这把烧槽琵琶，实际上是李璟代儿子从嘉送给周娥皇的定情之物。周娥皇不擅长诗词创作，这一点不如李清照，但周娥皇在艺术上很全面则是李清照所不及的。至于下棋这些小戏，周娥皇更是“靡不妙绝”。

周娥皇在舞蹈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她修改并整理中国舞蹈史上不

朽丰碑大唐《霓裳羽衣曲》的谱子。大唐《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乱后散佚不传，到李煜时已有二百多年。李煜本来是让乐工曹生整理此曲的，然后由周娥皇抚琵琶弹唱，但娥皇对曹生的修改不太满意，干脆自己动手。“变易讹谬，繁手新音”，最终让经过曹生修改的《霓裳羽衣曲》“清越可听”。在周娥皇经手修改的过程中，对琵琶极为精通的李煜也参与其中，与心爱的皇后一起“去彼淫繁，定其缺坠”，鸳鸯交颈，四目含情，实在羡煞后人。

等曲子改定后，就成了南唐政府官方的舞曲，达官显贵们也在家中演奏《霓裳羽衣曲》，灯红酒绿间，欢笑不绝，歌舞曼妙，琵琶声声，这是南唐在艺术上留给后人的传世遗响。

李煜曾经兴致所至，填写了一首著名的词，就是《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词如下：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在李煜的词作中，这首不如《虞美人》《浪淘沙》《破阵子》《相见欢》更有名，而这首《玉楼春》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却被近代著名词评家俞陛云称为“此（词）在南唐全盛时所作”，虽然此时的南唐早已剩下残山剩水，但在李煜的世界里，他拥有臣民的拥戴、爱妻的陪伴，还奢求什么呢。正如明朝大诗人杨慎评此词：“何等富丽奢纵，观此哪得不失江山。”

李煜与周娥皇之间的爱情是真挚而浓烈的，而周娥皇也非常珍惜她与李煜的这段人间美妙爱情。夫妻结合以来，玉人一般的周娥皇给同样碧玉可爱的李煜生过两个儿子：李仲寓、李仲宣。李仲寓活了三十七岁，入宋后曾经任过郢州刺史，为政宽简，“吏民安之”。而幼子

李仲宣却在四岁的时候，因为一只猫碰碎了佛像前的琉璃灯，受惊而死。

最疼爱的幼子突然夭折，作为母亲的周娥皇悲痛可想而知，因为思念儿子，当时身患重病的周娥皇“悲哀更遽”，几天后便香消玉殒了，年仅二十九岁。

周娥皇的死是受了儿子夭折的刺激，但周娥皇的病是怎么得的？很简单——被丈夫李煜气出来的，因为周娥皇发现在自己病重期间，李煜却和一个人暗中往来密切。这个人，周娥皇再熟悉不过了，就是她的小妹周女英（为行文方便，以下皆称小周后为周女英）。

周女英想见姐夫非常容易，可以打着进宫探望姐姐的旗号公开进宫，而不会有人对此产生什么联想。因为当时的周女英只有十五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李煜是深爱着周娥皇，但他毕竟是一国主宰，古代帝王三妻四妾寻常可见，李煜也不是什么圣人，一生只与周娥皇一个女人鱼水相戏。李煜应该是很早就看上了周女英，但当时周娥皇身体康泰，一直没有机会下手。而周娥皇病重后卧床不起，李煜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在花前月下拥抱着美丽可爱的小姨子，承诺一定会给她一个甜蜜的未来……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李煜和周女英的事情到底还是让周娥皇知道了。周娥皇问小妹什么时候进宫的，结果周女英没有心机，一顺嘴就说我来宫里好几天了，一直没出去。宫里只有李煜一个男人，而小妹却在宫里鬼混，傻子都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回事。《续资治通鉴·开宝元年条》明确记载“（周女英）以姻戚往来，先得幸于唐主（李煜）”，可见二人私通久矣。

周娥皇曾经质问过李煜，李煜终究还是爱周娥皇的，推脱说让小妹进宫是教她填词的，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但对李煜知根知底的周娥皇已经懒得再和丈夫理论了，只能生着闷气，身体每况愈下。而小儿

子李仲宣的夭折，则直接加剧了周娥皇的病情。周娥皇含泪怀抱公公李璟赐给她的那把烧槽琵琶，口含温玉，抱恨终天。

李煜虽然贪恋小姨子的美色，但他对发妻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周娥皇的死对李煜的刺激非常大，李煜坐在发妻的灵前号啕痛哭，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甚至还精神错乱地自称鳏夫。为了表达对亡妻的哀思与自责，李煜穷通天之才，写就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文，其中有一诗写得非常感人，云：“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凄凄。凭阑惆怅人谁会，不觉潸然泪眼低。层城无复见娇姿，佳节缠哀不自持。空有当年旧烟月，芙蓉城上哭娥眉。”李煜以词名垂青史，但李煜的诗同样是大家手笔，深得中唐元稹、白居易之妙手。

李煜确实“芙蓉城上哭娥眉”，但女英还在，足以填补娥皇离去后的空缺。李煜的爱，必须要分一半给他心爱的女英。不过因为李煜不想背上过早续弦的骂名，周娥皇死于965年，而三年后，宋开宝元年（968年）十一月，李煜才给周女英补办了“婚礼”，正式册封周女英为国后。

册封国后的仪式极为隆重。由中书舍人徐铉、知制诰潘佑和礼部官员共同参考古今婚仪，制定了一套繁杂的仪式。

虽然周女英同样色艺双绝，但在性格上远不如姐姐贤惠端庄，倒有几分妖冶之气。周娥皇与李煜看上去就是一对名正言顺的夫妻，而周女英与李煜看上去更像是一对露水情人……

南唐大臣普遍不喜欢周女英的妖冶做派，以韩熙载为首“赋诗以讽”。大臣们公然干预国主的婚事，李煜当然不高兴，但他天性仁厚，也当成耳旁风。你们骂你们的，我过我的甜蜜日子。

其实李煜的甜蜜日子，就是和周女英花前月下、沉醉歌舞。李煜最喜欢的是和周女英坐在一个花间小亭子里饮酒调情取乐。这个小亭子非常小，仅仅能容纳两个人，但却是用重金打造的，“雕镂华丽”，

这就是李煜的二人世界。监察御史张宪上疏指责李煜不理国务，每天只是诗海中畅游，而且“宫苑多方奇巧”，浪费有限的国库资金，暗中直指周女英是红颜祸水。李煜赏了张宪三十段锦帛，但照样我行我素。

李煜深爱周娥皇，但同时和周小妹暗中勾结。同理，李煜和周女英沉醉在爱河中，也没忘记还有其他女人需要他的雨露布施。

除了大小周后，李煜还有很多宠爱的女人，比如黄保仪。黄保仪本是楚人，楚国灭亡后入南唐宫里，成了李煜的保仪。李氏父子俱善书法，李璟学南朝宋的羊欣，李璟学唐朝的柳公权，几乎与真迹无二，而且李氏父子收藏了大家钟繇、王羲之的真迹甚多。

虽然李煜的书法名气不如宋徽宗，但也自成一家。李煜性格文弱，可书法却气势不凡，风骨嶙峋，人称“倔强丈夫”。他的书法名作《春草赋》《八师经》《智藏道师真赞》等二十多件在北宋灭亡之前都是书法极品。

这些无价珍宝是李家的命根子。李煜把这些国宝交给黄保仪掌管，可见李煜对黄保仪的信任与器重。不过因为周家姐妹对李煜看管甚严，李煜很有少机会与黄保仪亲热，“保仪虽见赏识，终不得数御幸也”。

除了黄保仪，李煜最宠爱的女人无疑就是杏娘了。杏娘在历史籍籍无名，但她却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成语——饱含封建时代妇女血泪的“三寸金莲”，即缠足裹小脚。

当然，李煜的本意并不是要迫害妇女，而仅仅是为了享乐的需要。因为杏娘舞蹈跳得好，李煜便用纯金打成了一朵六尺高的莲花台，让宫女杏娘用锦帛裹起小脚在金莲花上跷起脚尖起舞，相当于现代的芭蕾舞。芭蕾是西方艺术的精华，但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天才的艺术家李煜就发明了中国的芭蕾舞。杏娘舞姿翩翩，仿佛神仙中

人，李煜看得如痴如醉……

李煜在金陵城中酒地花天，对于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李煜似乎毫无反应。仿佛自己身处绝世的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李煜与周女英小亭调情，观查娘曼妙舞蹈，与黄保仪讨论书法，而他的宗主国帝王赵匡胤则开始了对历史并无太大影响的中原小一统进程。

北宋乾德元年（963年）二月，宋军灭荆南高继冲。

同年三月，宋军灭湖南，擒湖南主周保权。

乾德四年（966年）正月，宋军攻入成都，蜀主孟昶出降。

此时的赵匡胤除了控制柴荣原先的中原地盘，还占领了湖南与四川，赵匡胤的统一进程已经不可逆转。而此时赵匡胤还没有征服的，只剩下南唐李煜、南汉刘鋹、吴越钱俶、泉漳二州的陈洪进，以及最难啃的硬骨头北汉刘承钧。

接下来，赵匡胤就要对李煜动手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悲喜人生之亡国篇

赵匡胤志在中原地区的统一，他虽然暂时不攻南唐，也只是缓兵之计。等占领湖南与四川后，北宋已从北面与西面与南唐接壤，再加上北宋同样拥有长江之利。以赵匡胤的性格，他是不可能放过李煜的。

此时的李煜已经嗅到了危险，他似乎感觉到了赵匡胤要对他下手了。为了打消赵匡胤对江南的野心，李煜几乎奴颜婢膝地侍奉赵匡胤。

在赵匡胤的统一计划中，南汉是要先于南唐被消灭的，所以赵匡胤暂时还不动李煜，重点是刘鋹。李煜为了拍赵匡胤的马屁，派给事中龚慎仪去广州，劝刘鋹向北宋称臣纳贡，可惜刘鋹根本不听李煜的，赵匡胤也没有因为这事而高看李煜一眼。

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北宋灭南汉。同年底，赵匡胤在汉阳（今湖北武汉）大造战舰，准备顺江东下，目的直指李煜的安乐窝。

李煜这次是真怕了，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讨好赵匡胤，保住江南半壁江山。李煜主动下调江南国制度，正式舍弃大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所有皇家制度一律自贬，中书门下二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院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大理寺为详刑院。

李煜给赵匡胤当孝子，大臣们非常不满，你当孙子，别把我们扯进去。南都（洪州）留守林仁肇曾经向李煜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主张，就是趁宋军主力多集中在湘川一带，淮南相对空虚，请李煜拨给

他一路精锐，乘机过江收复淮南。林仁肇同时告诉李煜，事成功劳是陛下的，事败罪孽我一人承担。不过李煜哪有主动挑战赵匡胤的胆量，当然拒绝了林仁肇的建议。

李煜不敢得罪赵匡胤，但这并不影响赵匡胤下决心除掉南唐第一虎将林仁肇的决心。赵匡胤用一个极为普通的反间计，就让李煜心甘情愿地毒死了林仁肇了事。反间计非常简单，不过是赵匡胤画了一张林仁肇的画像，然后告诉身在汴梁的李煜九弟李从善，说林仁肇已经暗中归宋。李从善不知是计，立刻暗中通知李煜，李煜更是个白痴，真以为林仁肇背叛了自己，下毒害死了林仁肇。

林仁肇是南唐的擎天一柱，他的死意味着南唐在军事上已不可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李煜毒死林仁肇，就等于告诉赵匡胤：为了保住南唐江山，李煜可以不顾一切，这反而坚定了赵匡胤不再对南唐实行怀柔外交的决心。

李煜的末日很快就要到来。

李煜自毁长城的蠢事，其实还不只是杀林仁肇，对忠于南唐的文臣，李煜也是横加猜忌。本来是李煜心腹的内史舍人潘佑看不惯李煜对北宋的奴颜婢膝以及宫里的花天酒色，上书痛陈时事，语词激烈：“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潘佑甚至要求李煜处死他，他不想做亡国奴。

执政后期的李煜越来越独断专行，根本听不进逆耳之言，你想死？那就成全你！李煜派人去捕拿潘佑问罪，而潘佑自知不免，早一步服毒自杀。

李煜的愚事还没有做完。因为潘佑在这道奏疏中问候了包括李煜在内的南唐文武群臣的八辈祖宗，唯独认为司农卿李平有力挽狂澜之才，希望李平能出任尚书令。潘佑以为这是在帮李平，实际上是害了

李平，众人被潘佑骂成了龟孙，自然要把怒火撒向潘佑的“同党”李平。这些权贵在李煜面前乱嚼老婆舌头，诬陷李平与潘佑结党营私。李煜也老早就看李平不顺眼，扔进大牢里，不久便死在牢中。

李煜还不到四十岁，在政治上却远不如他即位之初成熟，一连串的愚蠢之举是不应该发生在李煜身上的。更不可理解的是，李煜已做好与赵匡胤翻脸的准备，但竟然同意宋臣卢多逊到南唐境内画十九州的山川地形图，赵匡胤得以全面掌握南唐的军事布局。

宋军在长江一线大兵压境，南唐上下都知道李煜已没几天蹦跶了，各色人等都要给自己找退路。南唐书生樊若水私自在长江沿岸观察，画一幅《长江沿岸水势图》，过江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虽然据长江天险，但北方人并不太了解长江南岸的水文情况，而有了樊若水的这张地图，赵匡胤知道 he 可以对李煜动手了，此时是北宋开宝七年（974年）七月。

赵匡胤懂得政治要优先于军事的道理，他没有直接出兵，而是派知制诰李穆到金陵，宣江南国主入京觐见宗主国大宋皇帝。如果李煜来了，直接软禁，不费一兵下南唐。如果李煜不来，则宋军师出有名。

赵匡胤的算盘，李煜再清楚不过，他哪里敢去！去了就别想回来了。李煜推三阻四，说自己得了重病，不能远行。而赵匡胤见骗不来李煜，那就武力解决南唐问题。

开宝七年九月，赵匡胤下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颍州团练使曹翰、侍卫马步军都虞侯刘遇从江陵出水师沿江东下，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侍卫马军都虞侯李汉琼等人挥师南进。同时，诏命与南唐不和的吴越国主钱俶出兵攻打南唐的常州、润州，牵扯南唐主力。

李煜知道这次赵匡胤是来真的，但他还对和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赵匡胤表示愿献白金二十万两、锦帛二十万匹，求赵匡胤罢

手。赵匡胤平定江南，能得到的又何止这些区区财物？当然不予理睬，继续进兵。

更要命的是，宋军已经顺利地渡过长江，拿下金陵西南的重镇池州，进一步威胁到金陵。李煜见赵匡胤不给面子，也怒火中烧，甚至废除了开宝年号，四处调兵准备作战。李煜慷慨激昂地说：“赵匡胤久有吞并江南之志，但朕也不怕他！等宋人来战，朕自披甲执刃，督奖三军，与赵匡胤决一死战。”

傻子都知道，李煜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书生，面对从腥风血雨中杀出来的一代枭雄赵匡胤，他根本没有胜算。

宋军长趋直入，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把南唐军打得流水落花春去也，南唐主力两万人被全歼，赵匡胤之前送给李煜的三百万战马被宋人悉数夺回。曹彬渡江后，立刻在长江南岸搭建浮桥，准备接应大部队过江。

搭建浮桥，最怕的是风向，而敌军一旦顺风纵火，宋军将死伤惨重。南唐的洪州节度使朱令赉率兵放火烧宋军浮桥，本来一切顺利，但万万没想到火刚点着，风向突然大变，反向烧死了无数南唐士兵，朱令赉也葬身火海。

无数宋军呐喊着冲过了浮桥，开始准备向金陵孤城中的李煜发起最后的总攻。

李煜一直活在梦里，他竟然认为现在还有可能说服赵匡胤退兵。吏部尚书徐铉奉李煜之命，北上汴梁，去完成这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面对徐铉的苦苦哀求，赵匡胤只说了一句冰冷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徐铉无语。

而李煜已经知道了徐铉此行的结果，对未来已完全绝望，但又不甘心出城投降，只是龟守在城中，坐等灾难的到来。李煜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跪在佛像前吃斋念佛，乞求佛祖保佑。

曹彬等人已经做好了向金陵城发起总攻的一切准备，但曹彬还是先礼后兵，派人给李煜下最后通牒：早降早安生，否则后果自负。慌乱中的李煜已完全失去主心骨，对宋使说要派长子李仲寓代他去汴梁献降表，可曹彬等了几天，也没见城中有人出来，派人催问李仲寓何在。李煜在中书舍人张洎的劝说下，决定死守金陵。面对曹彬的质问，李煜胡言乱语什么还没给李仲寓挑好合身的衣服……

曹彬已经懒得再搭理几乎精神分裂的李煜，下达了攻城令。虽然南唐军负隅顽抗，但面对战斗力强悍的宋军，一天不到金陵城就全面失守，宋军潮水般涌进这座繁华锦绣的城池。

局势到了这一步，南唐的覆亡无可挽回，但李煜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自杀殉国，像当年的朱友贞那样。

成堆的木柴就堆在宫里，木柴上浇着猪油，李煜站在木柴前若有所思。只要李煜把手上的那支松明香扔进木柴堆里，一切都将化为灰烬，包括他的南唐帝国。但李煜骨子里是个缺少刚烈的男人，他并没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放弃自杀，决定降宋。不过李煜却一把火烧毁了南唐宫中交给黄保仪看管的无价的书法真迹，这是李煜对中国文化史犯下的最严重暴行。李世民还知道死后把王羲之的《兰亭序》带进坟墓，而李煜的一把火，烧掉了王羲之在历史上的宝贵遗存。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江南国主李煜率群臣开门素服出降，南唐帝国在金陵城中如花似锦般的存在彻底终结。

曹彬身贯甲冑，接受了李煜的下拜，明确告诉李煜：“归朝后俸赐有限，费用至广，当厚自赍装。”以后朝廷给你的俸禄不足以支撑

你的奢侈生活，你多带些私房钱吧。曹彬给了李煜一天时间，让李煜回宫打理财物。有人劝曹彬别放回李煜，万一李煜自杀，如何向皇上交代？曹彬笑曰：“煜素无断，今已降，必不能自引决，可无虑也。”

在曹彬看来，李煜不过是个贪生怕死之徒罢了。

转眼到了开宝九年（976年）正月，曹彬要求李煜带着一家老少北上入汴，开始亡国奴的新生活。

李煜不舍生他养他的故土，以及草长莺飞的三月春绿，但上命难违，李煜只好含泪拜辞了宗庙，乘船沿汴河北上，以亡国奴的身份接受胜利者赵匡胤对他的命运审判。

行前，李煜作了一阕《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

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悲喜人生之降虏篇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赵匡胤一开始就没有要杀李煜的打算，就如同他善待南汉后主刘鋹一样。当然，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赵匡胤不杀刘鋹和李煜，也因为二人身边没有像花蕊夫人那样让赵匡胤心动的女人，否则，孟昶的下场，就是刘鋹和李煜的下场。至于赵匡胤要布仁义于江南，演戏而已。

宋将曹翰在江州屠城，一城尽是尸骨。

周女英虽然绝色播于江南，但赵匡胤对周女英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而在赵匡胤接见南唐降主李煜家小的过程中，时任晋王兼开封尹的赵匡义则死死盯住了周女英，眼中已露杀机。

舟上的李煜看着溢满春意的滚滚汴水，他知道自己有生之年也不可能回到江南，李煜哭了，提笔赋诗一首：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门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间坐细思量。”

在抵达汴梁后，李煜突然发现汴河口岸有一座普光寺，李煜想登临望远，再做最后一次东南远望。有人劝李煜这是宋朝的地界，不要招惹是非，李煜不听，执意上了普光寺最高处，只见远处千帆竞发，却始终望不见家乡的宫殿，听不到那醉人的吴侬软语。

李煜泪流满面。

赵匡胤在汴梁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受降仪式。赵匡胤大陈甲兵，亲临明德门接受李煜的请罪。李煜白衣素服，跪在空旷而坚硬的地面上，接受着赵匡胤对自己的审判。

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无能为力。

赵匡胤举行完受降仪式，封失魂落魄的李煜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所谓的千牛卫大将军是个虚职，而违命侯则是赵匡胤赏赐给李煜的无情羞辱。

不过李煜能从赵匡胤对自己的态度中感觉出来，赵匡胤并没有对自己起杀心，而且他久闻赵匡胤善待降王，除了拥有花蕊夫人的孟昶。李煜应该暗自庆幸自己的女人没有被赵匡胤看上的，多活几年应该不是问题。

人生如飘萍，飘到哪儿算哪儿吧，李煜把神情漠然的周女英揽在怀里，仰望那一轮足以勾起李煜思乡之情的明月。

但阴云很快就笼罩住了李煜心中那轮纯净的明月。

宋开宝九年（976年）十月癸丑，从皇宫里突然传一个爆炸性消息——北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皇弟、晋王赵匡义继位，改元太平兴国。赵匡义即位后，立刻把赵匡胤的小皇后宋氏和幼子赵德芳赶出了皇宫。后世有人指责赵匡义得位不正，欺负兄长的孤儿寡母，可赵匡胤的皇位又是怎么得到的？不也是欺负旧主孤儿寡母得到的吗？

赵匡胤的死，是千古一大谜案。

烛影斧声，迷雾重重，但这也意味着李煜的人生即将走向一个看不清方向的未来。

赵匡义和他的兄长赵匡胤喜欢的人妻类型不一样，赵匡胤喜欢花蕊夫人这样偏贤淑型的，而赵匡义则喜欢妖冶妩媚型的。

赵匡义始终无法忘记第一次在大殿上见到周女英的那一幕。

至于如何弄到周女英，有赵匡胤的成功经验在前，照搬就是。赵匡义以皇后的名义，让周女英等南唐宫眷进宫朝见皇后。命妇给皇后请安，在宫廷活动中寻常可见，周女英平时也没少以国后的身份接见大臣家眷。

没有人会想到发生什么事情，周女英面色坦然地进了宫。可周女英在宫中始终没等到皇后的出现，反倒看见只有皇帝赵匡义一个人在场。

周女英似乎明白了什么，想要逃跑，但赵匡义怎么可能让自己心仪的猎物逃脱！一声令下，突然拥出数名强壮的宫女，上前控制住周女英，并扒掉周女英的衣物，让违命侯夫人“坦坦荡荡”地站在皇帝面前，接受皇帝的欣赏……

赵匡义除了喜欢人妻，还有一个与他兄长不一样的癖好，就是他喜欢让画师当场把他与周女英的激战场面画下来，这就是野史上著名的《熙陵幸小周后图》。

周女英无疑是不愿意被赵匡义如此糟蹋的，但她和李煜，以及她与李煜家族的性命都掌握在赵匡义手里。即使她受了污辱，也不敢对赵匡义有所不满，只是含泪回到违命侯的府上。面对李煜的冷眼相对，周女英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李煜破口大骂，骂这个无能的丈夫，早知有今日，老娘当初何必嫁给你！

其实李煜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周女英入宫好几天才出来，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李煜陷入沉默，任凭妻子发泄她心中的痛苦。

而此时的李煜，心中早已翻江倒海。艺术家的感情是细腻而敏感的，妻子被人强奸，而自己被扣上了绿帽子，却无力报仇，对一个男

人来说是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

酒罢灯阑珊，李煜醉生梦死。

而赵匡义尝到了腥荤，隔三岔五就打着皇后的幌子让周女英进宫，这位“素不知兵”的皇帝已经习惯在周女英的身体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周女英不敢拒绝，只能咬牙在赵匡义的床榻上展示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等雨收云散，周女英回到府上，继续骂窝囊的丈夫。

骂累了，周女英和李煜就抱头痛哭，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一对苦命鸳鸯，在他们甜蜜结合的时候，绝没有想到，他们的人生会是这个样子。

李煜开始怀念江南的三月春色。

年幼的李煜在青青麦田中任性地奔跑，咯咯笑着。

李煜在为起舞的周娥皇弹琵琶；

与周小妹在小亭中相偎饮酒；

然后就是明德门的伏拜投降。

一幕幕发黄的记忆涌进李煜的脑海，李煜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忍了又忍，他还是写了那首著名的《浪淘沙》，词如下：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根据宋人蔡绦在《西清诗话》的记载，这首词是李煜在周女英屡次被赵匡义强奸的情况下，怀着愤怒的心情写下的。“南朝李后主归（宋）朝后，每怀江山，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做长短句。”

是个男人，都无法容忍这一切。

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的李煜，再一次没有忍住，在故国歌伎凄怆的舞蹈幻影中，凭着三分酒力，泪流满面地写下了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法国诗人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

李煜无比怀念早已逝去的那个自由的时代。

因为这首词的名气实在太太，历代词评家对《虞美人》的评价堪称汗牛充栋，多不胜数，但要说评价最到位的，当属清朝人陈廷焯在《云韶集》的十六字评语：“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陈廷焯同时还称赞李煜词“情词婉凄，独步一时”，而后世的情词名家晏殊、欧阳修，其实严格来说他们都是李煜词派的传人，李煜是“晏、欧之祖也”。

清朝人王闿运似乎瞧不上此词，评价说，这首词用的全是寻常语，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是李煜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以初见故佳，再学便滥矣”。但问题是，为什么是李煜第一个用这些寻常语作词，一作便扬名千古？

宝剑，在壮士手中方是宝剑，在屠夫手中只是一把杀猪刀。

在十国词史上咏亡国之声的词，除了李煜的《虞美人》，其实还有一首前蜀名臣鹿虔宸著名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没有史料证明李煜不知道鹿词的存在，而从两首词的意象与结构来看，《虞美人》与《临江仙》是高度重合的，甚至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明显抄袭了“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

不过，即使李煜明显借用了鹿词，也不会有损于《虞美人》在词史上的丰碑地位。鹿虔宸是前蜀大臣，对前蜀非常有感情，但毕竟前蜀政权不是他的。前蜀亡了，但他很快就成了后蜀的大臣，照样吃香喝辣。而南唐是李煜私产，南唐亡后，李煜成了失去人身自由的亡国奴，所以南唐的灭亡对李煜造成的心理打击，要远胜于鹿虔宸。从这个角度讲，李煜的亡国之痛更为深刻。

还有一点，鹿虔宸写的是蜀都成都的宫苑，因为成都附近没有大江大河，鹿词整体就显得比较秀气精巧。南唐国都金陵临大江，朝大海，襟带南北，从文学视野角度相对来说要更为开阔一些。所以李词给人的视觉就更有冲击力，显得大开大合，气势雄浑，特别是结尾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其意象之宏大，能与之相比的，也许只有苏轼的那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简单评略此词。

李煜是最害怕看到春花与秋月的，因为这是命运对李煜最大的嘲讽。汴梁的春花与秋月再美好，也不是李煜的，反而见证了李煜的凄楚与悲凉，让李煜沉溺于对往事的痛思中不能自拔。此词作于七夕前后，春花零落，秋月还在，而李煜写这两句时，一定在痛苦地吟诵着白居易的名句：“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李煜希望时间能够停止，不要再让恼人的春月秋花增添他作为亡

国奴寄人篱下的哀痛，而他快乐的往事早已烟花散尽。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众多词史都认为这两句是赵匡义决定对李煜痛下杀手的主要原因。

这个“又”字，被现代词评大家唐圭璋先生评为“惨甚”，这是李煜点明了自己在汴梁已经度过了两年让人不堪回忆的亡国奴生涯。

伤心的人最怕见到明月，那会勾起一段段不想回忆却又永远无法忘掉的美好，李煜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多情的李煜见到汴梁的明月，会立刻想起沉沦在明月夜色中的金陵故城，那里有他的祖宗陵寝，有他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有在他的授意下，黄保仪惨笑着点燃了绝望的火焰。

离开金陵两年了，但在李煜的脑海中，那殿的雕栏玉砌依然是那么清晰、明翠，只是金陵城中再无往日的喧闹与欢笑，有的只是守卫的宋兵，以及让人绝望的凄冷。刘禹锡有诗写寂寞的金陵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而李煜写两句时，应该是受到了刘诗的启发。虽然李煜身在汴梁，汴梁城的宫殿比金陵更为雄伟，但这里却是李煜终生逃不掉的牢笼。

而“只是朱颜改”，彻底触怒了敏感多疑的赵匡义。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晚清词评家冯煦有诗：“梦编罗衾夜未央，秦淮一碧照兴亡。落花流水春归去，一种销魂是李郎。”

所有的爱恨情仇、亡国家恨，都被滚滚长江浩荡裹挟而去，消失在水天一色的尽头。大江奔腾，每时每刻都在冲击着李煜敏感而绝望的存在，而李煜是多么希望还有机会站在采石矶前，临风洒一杯，祭

奠他无忧的青春岁月。

李煜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李煜有预感，赵匡义要对他下手了。

李煜在自己的府第里痛哭流涕，而早有人把李煜的一举一动都上报给了赵匡义。

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在战胜国的土地怀念故国，这是犯大忌的。如果从明哲保身的角度看，李煜远不如蜀后主刘禅“聪明”。刘禅欣赏着蜀舞，笑曰：“此间乐，不思蜀。”李煜锦心绣口，多愁善感，远非刘禅这个呆子可比，但赵匡义却和司马昭一样雄猜多疑。

赵匡义得位不正，又强奸了周女英，有点做贼心虚，他一直怀疑李煜有不臣之心，想除李煜以绝后患，但又没有直接的证据。而当赵匡义拿到《虞美人》的手稿时，笑了。

赵匡义派南唐旧臣徐铉去李煜府上走一趟，观察李煜的动向。徐铉在南唐时是李煜的心腹之交，所以李煜见到徐铉，旧情大发，痛哭流涕，号啕不止。徐铉也流着泪对李煜行了旧君臣之礼，但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中。

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

良久，李煜才说了句：“后悔当年杀了潘佑和李平。”

徐铉沉默退出。

赵匡义问徐铉，徐铉不敢有所保留，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赵匡义，结果激怒了赵匡义。“悔杀潘、李”，这就意味着李煜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如果他当年不杀潘、李，也许北宋现在还不能过江一统，这是赵匡义绝对不能容忍的。

“太宗（赵匡义）闻之（悔杀潘李以及作《虞美人》）大怒。”

他决定不再给李煜活下去的机会。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初七，李煜在府中正过着四十二岁的生日，突然接到了赵匡义送来的生日礼物，是一瓶美酒。李煜此时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他斟满美酒，饮了一杯，正准备搜肠刮肚，构思着下一首传世词作。

突然，李煜突然感到腹中剧痛，头部和手脚开始剧烈抽搐，来回做牵机状，李煜拼命挣扎了一会儿，便不再动弹。李煜死状极为惨烈，头和脚并在了一起，佝偻成一团。葬送李煜的这瓶酒，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牵机毒药，中药俗称马钱子。

李煜死了，赵匡义猫哭耗子假慈悲，辍朝三日，追赠李煜太师、吴王，葬在洛阳北邙山。而与李煜患难与共的周女英看到丈夫惨死，痛不欲生，在丈夫灵前痛哭数日，含泪自尽。

清朝人郭麐有诗云：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聊一聊有趣的钱婆留（上）

五代十国距今过去了一千多年，烟华早尽，无论是大国帝王，还是偏霸之主，君子之泽两代便斩，当年的繁华还剩几何？不过一抔黄土、一挂残阳罢了。

但却有一个例外。

这个五代时期的小国在灭亡之后，不但福泽未衰，混于尘土，反而逆势高唱，一曲绵延千载的家族盛歌，雄隆不衰。

这就是百家姓排在第二位的钱姓，在唐末五代时期建立了著名的吴越国。

吴越钱氏入宋之后，就一直名家辈出，如钱惟演、钱易等名臣，明朝有“两朝领袖”钱谦益，清朝有考据大师钱大昕，到了近现代更是不得了！钱玄同、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钱锺书，这些振聋发聩的名字，都是吴越国的后人。

而开创钱氏吴越之盛者，就是本篇主人公钱镠，因小字婆留，所以世称钱婆留。

钱镠，字具美，唐大中六年二月十六日，杭州临安人。

虽然钱镠后来开创一代霸业，但钱镠差点就被亲生父亲给扔到井里，原因是钱镠生的时候，“红光满室”，其父钱宽以为不祥，“将弃于井”。还是钱宽的母亲水丘夫人（复姓水丘）觉得此孙面相不俗，将来必能成大事，“固不许”，钱镠才侥幸活下来，这也是“婆留”小名的来历。

水丘夫人果然见识不凡，她这个宝贝孙子在长大后确实与众不同。钱镠是个有名的孩子王，经常有一堆小孩子供他驱使，很多帝王在少儿时期都这么过，他们的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

钱镠成年之后，天下已乱，枭雄并起。钱镠早就学得一本好本事，善使一条大槊，“骁勇绝伦”，所以就近投靠了石镜镇军主董昌，做了小大王。这年五月，钱镠打败了在浙西狼山镇（今江苏南通狼山）的遏使王郢，后来又剿灭了土匪曹师雄。凭着功劳，钱镠当上了石镜镇的衙内都知兵马使，虽然地盘不大、士兵不多，但毕竟钱镠也拉起了一票三百多人的队伍，足够钱婆留安身立命的。在乱世混饭吃，没有枪杆子，迟早是死路一条。

上面说的两场小仗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但钱镠用计吓退枭雄黄巢的故事却久传不衰。

乾符六年（879年），私盐贩子黄巢率数十万大军进入浙江，准备借石湖镜去福建发财。黄巢并不知道钱镠是何方神圣，但钱镠知道即使黄巢在石镜镇只待上三五天，大象踩老鼠，踩也能把自己踩死。

为了吓退黄巢，钱镠带着二十多个好汉埋伏在路边的草丛里，俟黄巢军过来，钱镠等人对着黄军一通乱射，并大作鼓角之鸣。黄巢不知彼军底细，仓皇逃窜。

钱镠已经在黄巢的必经之路上又做了第二个局，一位在路边卖货物的老太太成了钱镠的线人。钱镠早一步来到八百里镇，告诉老太太，说一会儿有大队人马过来，他们要问您这是哪里，您就说这里叫屯兵八百里。

随后，钱镠在八百里埋下伏兵，等着黄巢来钻口袋。黄巢果然向老太太问路，老太太按钱镠所说，此地有八百里伏兵。黄巢听说有八百里伏兵，至少有雄兵数十万，那还了得，吓得当天就向南逃窜。钱镠在黄巢军队后面又当了回热情的东道主，七七八八，占了黄巢不少

便宜。

大象从来不会是小蚂蚁的敌人，而小蚂蚁的敌人则是大蚂蚁。以当时钱镠的地位，不可能成为黄巢的对手，黄巢哪里看上这盘小菜。而钱镠要在浙江生存，当地那些军阀头子才是钱镠的敌人。

对钱镠生存威胁最大的，无疑是他那位有野心的上司董昌。董昌和钱镠的关系，非常类似于东汉末年大军阀袁术和小牛犊孙策。孙策羽翼未丰，有求于袁术，袁术同样需要孙策给他卖命，双方都暂时不会翻脸。钱镠是小一号的孙策，董昌则是盗版的袁术。董昌和钱镠是上下级关系，钱镠能力又强，是董昌在浙江打江山可堪大用的将才，而钱镠的实力还不足以单飞，所以钱镠暂时还给董昌打工，但心思已经放在自立门户上。

此时的董昌发了一笔小财，攻下杭州自称刺史，钱镠跟着董大哥混，当上了都指挥使。

董昌成为一方诸侯，引起了淮南节度使高骈的注意，高骈想收编董昌，董昌派钱镠去扬州摸摸高骈的底细。高骈可能是近视眼，钱镠来的时候，高骈几乎是贴在钱镠脸上观察，大叫说此人不简单，将来必成大事。钱镠没兴趣和高骈扯闲篇，忍着高骈呼出的臭气，回到杭州告诉董昌：“窃窥高公无讨贼之志，苟从其行，功效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卫乡里为辞。”董昌视钱镠为二大王，就听钱镠的建议，拒绝了高骈。

钱镠劝董昌拒绝高骈，表面上是为董昌计划，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留后路。高骈再昏庸，一旦控制杭州，自己再要扳倒高骈，难如上青天。而董昌，翻版袁术而已，钱镠对付董昌，要远比对付高骈更容易。

从这个角度来看，钱镠说高骈不能成大事，是在拿董昌当傻子耍。

只要高骈不来，钱镠有足够的信心对付董昌，以及控制越州的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这些江湖滑头。

刘汉宏知道欲取董昌，必先取钱镠，刘汉宏的弟弟刘汉宥带着两万大军，奉命来取钱镠的脑袋。不好意思，被冒充越州兵的钱镠在西陵（今浙江萧山西）一通胖揍，连滚带爬回家了。紧接着，刘汉宏派来的四位马仔，一拨儿一拨儿全被钱镠灭了。

刘汉宏不服，带着惊人的十几万军队从越州出发，来杭州找钱镠算总账。但结果并不意外，刘汉宏所谓的十几万大军，其实多是被强拉来的雇佣军，根本不是钱镠正规军的对手。一战下来，刘汉宏被暴打成了猪头。

好在刘汉宏灵敏机变，面对杭州兵时，哭诉自己是个火头军，被挨千刀的刘汉宏强拉来做大锅饭的，上有八十老娘，下有八岁小儿。杭州兵不耐烦，一脚把刘汉宏踹回了越州。

刘汉宏不服，纠集一伙兄弟再来找钱镠的麻烦，名义是来找董昌算账的。钱镠知道刘汉宏是冲自己来的，但钱镠从来不怕什么刘汉宏，而且自己立功越多，就越有可能取代董昌……

董昌对钱镠虽有一定戒心，但他也知道自己离不开钱镠。为了拉拢钱镠，董昌承诺，只要灭掉刘汉宏，他就把杭州让给钱镠，自己去越州。当时的越州远比杭州富庶，董昌吃上肥肉，就想把骨头扔给钱镠。但对钱镠来说，得到杭州，就意味有战略根据地，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人在有动力的情况下会拼命做事，钱镠也不例外。唐光启二年（886年）十月，钱镠率杭州军去和刘汉宏分个高下，钱镠和部将成及率军南下诸暨，绕过山路折头向北，抄近路偷袭曹娥埭（浙江绍兴东），大败越州军韩公玟部。随后钱镠发水师以雷霆之势攻击越州军朱褒部，双方在上虞江中大战，杭州军射火箭，借着风势，尽烧敌

舰，越州水军都去水晶宫挂号了。不久，刘汉宏就被人拿住交给钱镠，被钱镠斩于越州城外，其家眷亲将悉数被杀。

胜者为王败者为贼，这不能怪钱镠心狠，如果钱镠落在刘汉宏手里，同样没有活路。

钱镠其实是想得到越州的，自己拼了老命换来的城池，却要一分不少地交给老板。不过钱镠并不会在此时就和董昌翻脸，一则名不正言不顺；二则杭州还在越州手上。杭州虽不如越州富裕，但处在江南要冲，进退自如，而越州一隅之地，往北往东都是大海。从这个角度讲，钱镠自然会选择先杭州后越州的战略。

董昌比袁术更为守信，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自己东迁越州，做了浙西观察使，把杭州让给功劳最大的钱镠。唐光启三年（887年）春，李僊下诏封钱镠为杭州刺史、领左卫大将军。

刺史在当时不算一线职务，但这次任命，意味着钱镠不再是董昌的小跟班，而是和董昌平起平坐的地方实力派军阀。

吴越国的奠基，实际上就源于这次任命。

钱镠在血海江湖上拼杀十几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但身边强人太多，仅有杭州是不足以支撑钱镠生存的，他必须扩大生产规模。

乱世江湖，不存在谁吃谁事关道义的问题，只存在如何下嘴的问题。当然，如宋襄公者可以选择以仁义说服对手，但对手一定会吃掉你的。

因为董昌在西边的越州，钱镠暂时不能动他，只能向北发展。而润、常二州没有强势的军阀，钱镠趁着淮南高骈无暇顾及苏南的机会，光启三年（887年）三月，常州成了钱镠口袋里的巧克力糖，出力者是大将杜棱、阮结、成及。八个月后，驻守润州的薛朗也成了钱镠的刀下鬼。

无聊的战役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有一件却反映了钱镠在政治上的成熟。原先守润州的是镇海节度使周宝，而周宝就是被薛朗等人赶出润州的。周宝被钱镠抓获之后，因为其在江湖上颇有名望，钱镠不会给自己在政治上抹黑。周宝不久去世，钱镠给无亲无故的周宝风光发葬，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而抓到薛朗之后，钱镠把薛朗挖心剖肝，祭奠周宝灵前，更进一步争取到了苏南民心，为自己将来控制苏南打下了人心基础。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聊一聊有趣的钱镠（下）

接下来，钱镠的目标是苏州。

苏州是当时的繁华之都，各路军阀早就对苏州垂涎三尺，而当时占据苏州的是前六合镇守使徐约。

徐约是个江湖小虾，根本不是做大事的，他能占领苏州，但他却守不住苏州。道理很简单，一则他的对手是钱镠；二则他丧尽了苏州人心。

徐约为人可笑到什么程度，他为了能让苏州人为他卖命对抗钱镠，徐约下令苏州百姓脸上都要刺字——我愿意死战钱镠。

百姓根本不会打仗，脸上贴金也帮不了徐约，而钱镠的部队都是久经沙场的精兵，胜负早定。唐龙纪元年（889年）三月，杭州军几乎是度假一般就拿下了苏州，徐约想驾船入海寻找徐福，结果被杭州军一通乱射，浮尸海上。

而这次，钱镠根本没有出面，带队的是他的弟弟钱俶。

钱镠不出面，是因为徐约的虾米等级不够。当然，遇到自己强的大龙虾，钱镠也没办法，比如孙儒和杨行密。钱镠的军事能力在两浙一带算一线，但和孙儒、杨行密这样的铁血强枭没法比，几个回合下来，润州被孙儒给夺了，常州也飞走了。而孙儒死后，杨行密的强悍，让钱镠只能自认倒霉。

还好，苏州一直牢牢控制在钱镠手上。有了苏州，杭州的北线就有了安全保证，没人喜欢外人堵在自己的家门口。

控制天堂一般的苏、杭二州，已做了镇海节度使的钱镠无疑成为浙江最有实力的军阀。这一年是唐景福二年（893年），而这一年，也被认为是吴越国创建的年份。

吃了一块蛋糕，还想把下一块蛋糕据为己有，而钱镠的下一块蛋糕，自然就是他的前上司董昌。

其实以钱镠现在的实力，足可以和董昌掰掰腕子。只是与董昌作战，则面临一个没有名分的问题，最多是江湖黑帮的内部火并，虽然董昌在越州杀人如麻。而董昌似乎特别“配合”他的前小弟，钱镠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

唐乾宁二年（895年）二月，董昌摇身一变，已不再是什么唐朝的浙东观察使了，而是大越罗平国的皇帝了，年号顺天。

钱镠笑了，师出有名矣。

董昌当了皇帝，还没忘拉小兄弟钱镠一把，写信给钱镠，让钱镠和他一起造反。

钱镠又笑了。

钱镠先是给董昌写信，劝董昌迷途知返，不要自毁前程。其实钱镠希望董昌千万不要听他的劝。同时，钱镠密信快递长安，把董昌称帝的事告诉了皇帝李晔。

李晔怒了，下诏拜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讨伐逆臣董昌。钱镠名利双收。董昌在军事上根本不是钱镠的对手，甚至钱镠都没有出手，大将顾全武出面，就把大越皇帝董昌给收拾了。董昌认为只要出钱收买杭州军，杭州军就可以给自己留条生路，哪知道钱镠比他还油滑，早就出重金喂饱了弟兄们，根本没人在乎董昌那俩糟钱。虽然钱都收了，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给董昌当内奸。

董昌很快就成了钱镠的阶下囚。

钱镠对外宣称他绝对不会把老上司怎么样。但要清楚一点，董昌是皇帝下诏捉拿的反贼，将来是必须要送往长安听候皇帝发落的。所有人都知道，董昌到了长安只有一个死，而钱镠却非常聪明地白赚一个空头人情。而钱镠对老上司确实是有感情的，在舟行半道时，钱镠的部将吴璋逼董昌跳进江里做了水仙。董昌的三百家多小，悉数被钱镠所杀。

不够狠，不足以成大事，钱镠一定为这样为自己辩解。

浙东、浙西都落到了钱镠的口袋里，诏下，拜钱镠为镇东、镇海节度使。而到了唐天复二年（902年）五月，早就成为吴越之主的钱镠正式转正了，朝廷封他为吴越王。

钱镠为人非常有意思，他做了大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家乡炫耀。项羽说过：富贵不还乡，等于锦衣夜行，没人看得见。钱镠风风光光地回到生养自己的古老村落，享受着小时候的玩伴们给自己磕头，大会宾客，“山林树木皆覆以锦幄”，钱镠还非常搞笑地把小时候玩的那棵大树封为衣锦将军，石镜山也改名衣锦山，大官山改成了功臣山。

正在钱镠天花乱坠地自我炫耀时，突然从杭州传来一个噩耗——左右都指挥使许再思和徐绾突然发动兵变。二人觉得钱镠不在杭州，正是他们发财的好机会。叛军狂攻内城，同时拉来宣州的田頔一起发财。钱镠的儿子钱传瑛死守，同时派人突围到衣锦城向钱镠报信。

钱大王差点没昏厥过去，杭州要丢了，自己的衣锦大王也就当不成了。

手足无措的钱镠想到一个昏招，想逃到越州，做勾践第二，还是顾全武功他不要犯傻，最好向杨行密求救。被逼无奈的钱镠只好把自

己的七儿子钱元瓘送给杨行密当人质，杨行密强令田頔撤兵。剩下的许再思和徐绾，等钱镠缓过劲时，已经不再能成为威胁了，叛乱很快就被平定。

钱镠继续在吴越做他的衣锦大王。

而听说强悍的淮南王杨行密病死了，钱镠非常开心，他知道，再不可能有人能威胁到他在吴越的统治了。

吴越国其实不大，总共十二州，除了现在浙江省的全境，再加上苏州和上海两市。虽然人口四五百万，但战略回旋余地实在有限，所以吴越不算大国，特别是北面和西面还盘桓着一个强大到让人窒息的杨吴，钱镠虽不至于为杨吴所灭，但生存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拉来朱温就行了。

钱镠的外交政策非常明确：绝不称帝，做中原大国的外藩，扩展自己的战略生存空间。钱镠给朱温磕头称臣，算是交了保护费，朱温自然不会希望杨吴灭掉吴越。所以一旦杨吴进攻吴越，朱温是必须出面保护钱小弟的。

钱镠给朱温当小弟，惹怒了钱镠手下的一位大才子，就是晚唐文坛的大宗师、人称丑才子的江东罗昭谏——罗隐。罗隐虽然在唐朝没有取得功名，但他对唐朝有感情，特别痛恨篡位的无耻朱三。朱温称帝后，罗隐劝钱镠发兵，为唐朝讨伐朱温，不负唐朝对钱镠的栽培。

钱镠当然不会傻到和自己的救命稻草朱温翻脸，至于唐朝厚封钱镠，钱镠会认为，这些功劳是自己立的，唐朝当然要封自己，这又不是自己骗来的。

事实就摆在这里：唐朝封不封，钱镠都是吴越之王。

钱镠之所以和朱温称兄道弟，除了各自政权的利益之外，二人的

性格有些相似，都是外向型的，特别会玩。当然，钱镠没有朱温那么无耻，到处泡女人，还玩弄儿媳妇爬灰，钱镠的私德是非常好的。

钱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喜欢到处模仿佛古人。之前学习项羽，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钱镠再次回到衣锦乡，他又学起了刘邦。钱镠效仿刘邦的《大风歌》，写了一曲《还乡歌》，辞云：“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孥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

说到钱镠的文才，就不得不提本篇的标题《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钱镠的《还乡歌》，除了吴越史官，很少有人记住。但钱镠随意写的这两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却成了感动千古的名句，这也许是钱镠没有想到的。

其实是一封浪漫的情书。

钱镠的王妃戴夫人，与钱镠从小患难与共二十多年。为戴夫人思乡，所以钱镠统一浙江后，戴夫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到家乡住一阵子。钱镠自然不能陪夫人回娘家，必须留在杭州处理军政大事。等钱镠忙完了大事后，推开窗，看外面春花烂漫，红绿妩媚，钱镠猛地意识到，他的夫人已经回娘家好久了。

钱镠思念发妻，立刻提笔给戴夫人写了一封信，劝夫人赶紧回来，他想老婆了。信中就一句话：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清人王士禛对这句话的评价是“艳绝千古”。

岂止是钱镠的文才艳绝千古，钱镠的浙江同样艳绝千古。现在的浙江是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而浙江富甲天下，其实就是从钱镠治理浙江开始的，再经过南宋的发展，浙江一富而天下足。浙江受唐末战乱的影响相对较小，再加钱镠治政清明，政情稳定，浙江历史上出现了难得的大发展的机遇。

浙江靠近东海，海患不断，钱镠发动民夫在钱塘江修建海塘，疏通河运，把海患的影响降到最低。而根据浙江蚕桑多的优势，钱镠大力发展养蚕业，五代十国时，吴越出产的丝织品冠绝天下，这也是吴越和各国进行贸易的大宗，赚足了银子。钱镠不仅和内地各国进行贸易，还扩展海外市场，和北方的契丹、日本等国有商业往来。

五代十国最有钱的政权是哪个？自然是富甲天下的吴越国。

而这一切，自然离不开钱婆留对浙江的再造之功。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三月的一个雪夜里，八十一岁的钱镠在杭州寿终正寝。唐明宗李嗣源闻知消息，辍朝七日，并谥钱镠为吴越武肃王。

钱镠不是皇帝，他也不稀罕做皇帝，与其做闭门小天子，不如做开门大节度。前蜀王建和南汉刘^龔 等都劝钱镠称帝，钱镠拿着他们的书信，学着曹操那样，扬书语众人曰：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置吾于上耶？吾以去伪平贼，承天子畴庸之命，至于封建车服之制，悉有所由，岂图一时之利，乃随波于尔辈也！

吴越国世系

君主	姓名	在位年 (用五代年号)	生卒年	备 注
武肃王	钱 镠	893—932 年	852—932 年	893 年，唐昭宗封钱镠为镇海节度使
文穆王	钱元瓘	932—941 年	887—941 年	钱镠第五子。为人“好儒学”，能作诗，但生活奢侈，花钱如流水。941 年，杭州发生大火灾，烧掉吴越国库，钱元瓘受到惊吓，精神失常，不久病逝
忠献王	钱弘佐	941—947 年	928—947 年	即位时十三岁，诸将皆不服，钱弘佐杀诸将不服者，或迁于外地，诸将震恐。闽国内乱，钱弘佐力排众议，发兵南下，破南唐兵夺下重镇福州，扩展了吴越国的生存空间
忠逊王	钱弘俶	947—948 年	929—975 年	被内面统军使胡进思废黜并软禁，975 年病死
忠懿王	钱弘俶	948—978 年	929—988 年	978 年，畏北宋进攻，主动向宋太宗赵光义举国投降

吴越文穆王钱元瓘（887—941年），在位十年，字明宝，初名传瓘，即位后改名元瓘，钱镠第五子，临安人。乾宁元年，授盐铁发运

巡官，迁金部郎中。天复元年，授礼部尚书。曾被宣歙观察使田頔拘为人质，几被杀，后得还。天祐二年，为检校右仆射。吴越武肃王钱镠天宝四年，进授司徒，守湖州刺史。八年，授镇海军节度使。十三年，充清海军节度使。宝大元年，充两浙节度使。宝正元年，受命监国。长兴三年春，嗣吴越王位，去国仪，用藩镇法遵中朝年号。在位十年，善事后唐、后晋政权，保土安民。先后被封为吴王、越王、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天福六年八月卒，年五十五。后晋赐谥文穆。

吴越忠献王钱弘佐（928—947年），在位六年，字元祐，为钱元瓘第六子。941年（后晋天福六年），钱元瓘去世，钱弘佐继位，后晋仍封以吴越国国王。945年（后晋开运二年），派军与南唐瓜分闽国，占领福州。

钱弘佐喜好读书，性情温顺，很会作诗。即位后，因尚年幼，无力控制下属的骄横，又曾宠信谄媚之人，然而终能摘奸发伏，亦不失果断。947年（后汉天福十二年，辽国会同十年），钱弘佐去世，谥忠献王，庙号成宗。因其子尚年幼，故由其弟钱俶继位。

吴越忠逊王钱弘俶（929—971年），初名弘侬，字隆道，临安人。吴越王钱元瓘第七子，钱弘佐的弟弟。忠献王钱弘佐于947年（后晋开运四年）六月病死，钱弘俶继承王位，为忠逊王，在位不足一年，被三朝宿将胡进思废黜，后病死。

吴越忠懿王钱弘俶（929—988年），在位三十年，初名弘俶，小字虎子，改字文德，钱镠孙，钱元瓘第九子。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后晋开元中，为台州刺史，众臣拥护他为吴越国王。宋太祖平定江南，他出兵策应有功，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后入朝，仍为吴越国王。978年（太平兴国三年），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

开山福建，一代明王

——福建历史上绕不过去的王审知

（上）

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就是现在的福建省。

秦汉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始终在黄河流域，土地肥沃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区域则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而东晋衣冠南渡，江南的开发有一个缓慢的增进趋势。到了唐朝，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江南地区实现了跨时代的大飞跃，曾经是落后地区的广东、湖南、福建都一跃成为发达省份。

先说福建。

在福建由“丑小鸭”变成“天鹅”的美丽过程中，有一个人注定是绕不过去的。可以说，无此人，便没有现在经济发达的福建省。

他的名字叫王审知，闽人皆尊称他是“开闽大王”。

王审知与福建，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王审知在出生的时候，完全不会想到，他的人生之花会在福建绚烂绽放，因为王审知出生在光州固始（河南固始），固始与福建有数千里之遥。

王审知是光州固始人，唐懿宗李漼咸通三年（862年），王审知出生在一户姓王的农户家中。王审知的老祖宗曾经做过一任固始县令，但到了王审知这一代完全成了农民。

王审知的命运，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面朝黄土背朝天，耕地播种，娶个五大三粗的婆姨，生一堆儿子，这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好在王审知的大哥王潮在固始县里当个捕头，还有点工资，多少能接济一下贫穷的兄弟们。

王氏三兄弟，老大王潮，老二王审邽，老三王审知。三兄弟不甘心接受贫穷的命运，他们渴望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机会很快就来了，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八月，寿州（今安徽寿县）的杀猪贩子王绪和妹夫刘行全带着五百乡亲造反，做了草头王。王绪早听说王潮三兄弟不是常人，便给三兄弟在军中安排了职务，王潮做了粮草官。

这里才是王氏兄弟的广阔天地，雄鹰们可以自在地翱翔了。王氏兄弟因为会做人，善待部卒，在军中威信甚高，人称“王氏三龙”。

王绪在光州一带横行，被大军阀秦宗权盯上了。秦宗权此时正和朱温死战，想调动王绪地盘的粮草，王绪当然不愿意，但又得罪不起秦宗权。

怎么办？南下。

至于目的地是哪里，已经不重要了。王绪带着五千弟兄，浩浩荡荡渡过长江，一直向南，再向南。这支难民部队先是进入江西，到处抢东西吃，然后穿洪州、虔州，翻过武夷山，来到了他们所有人都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福建漳州。

王氏三兄弟带着老母亲站在人生地不熟的福建，他们深知，现在脚下这片陌生的土地，将是他们人生新的开始。

不过，三兄弟也意识到，他们所侍奉的主人王绪，根本就不是乱世能成大事的明主。王绪为人残忍，在艰难的行军过程中，王绪下令

抛弃所有老弱病残，而三兄弟的母亲也在被抛弃的名单上。甚至，王绪要提剑亲手杀了三兄弟的母亲，以绝他们的念想。

这怎么可能做到！还是三兄弟以死护母，才让母亲免遭毒手。不过他们的母亲很快就忧病交加去世了，三兄弟怕王绪忌恨，连夜找个地方埋了老娘。

王绪要整三兄弟，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兄弟为人英武，将来难以控制，这也是所谓的算命大师劝王绪的。

不过，王绪已经没有机会了。王绪为人凶暴，专杀有功将士，最终逼反了与他共患难的弟兄们。在刘行全的指挥下，众人拿下王绪，解除了一场随时可能置大家于死的危机。

至于谁当新领导，王潮本来是要推举刘行全的。但刘行全胸怀宽大，他认为现在再没有比王潮更合适当老大的人选。在刘行全的强烈要求下，王潮略显惶恐地坐在了第一把金交椅上。

王潮成了这支军队的主宰者，他的弟弟王审知成了副统帅，而大度让贤的刘行全则做了先锋，心甘情愿地听王潮调遣。

这对这支从河南逃到福建的流亡军队来说，这无疑是改变他们所有人命运的正确决定。

王潮同样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这支流亡军队的目标不是回到中原，而是在陌生的福建寻找属于他们的世界。

本来，他们是要回光州老家的，但他们从漳州路过泉州时，听说泉州刺史廖彦若贪鄙无能，才觉得与其北上和一堆枭雄拼杀，不如就在创业难度相对较小的福建安家。

泉州在当时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交通大港，经济发达，特别是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如果能占据泉州，一则大家都有钱花；二则万一有

变，泉州可以作为通往海外的跳板。

来自河南的流亡军队开始攻打泉州。时间过得很快，一年的老皇历就这么翻过去了，但王潮他们最终还是攻克泉州，斩廖彦若，时间是唐光启二年（886年）八月。

拿下泉州，王潮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战略根据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撕掉“流亡者”的标签了。

王潮在政治上是很有一套的。他虽然得到泉州，但毕竟是杀了朝廷命官，终究脱不掉一个贼名。王潮央求时任福建观察使的陈岩，求他在朝廷那里给自己讨个泉州刺史的赏。陈岩没理由得罪王潮，上书请任王潮为泉州刺史。这时王潮才成了正果。

王潮有了正式名分，就可以公开施展自己在固始时根本没机会施展的理想抱负了。

王潮主政泉州以来，安抚流散百姓，各居旧业，所有将士均以兄弟之礼相待。对泉州人来说，之前的廖彦若是个大贪官，而对固始旧人来说，之前的王绪则是个大暴君。所以王潮的仁政很快就感动了他们，军民对王潮心悦诚服。

治人，其实就是治人心。

当然，王潮不会满足于只霸占泉州之地，他早就盯上了整个福建五州，而控制五州（除了泉州）的还是陈岩。

其实，陈岩也早就盯上了王潮。陈岩对王潮有着非同寻常的好感，在他病重时，他决定派人到泉州请王潮来福州，全面主持福建军政。

天上掉下一块大肉饼，王潮自然口水流得滴答。可还没等王潮的口水流完，陈岩的女婿范晖就把这块肉饼横空夺了去。范晖骂已经浑

身冰凉的陈岩：肥水不流外人田，老不死的东西却要把福州送给外人。

王潮空欢喜一场，但这个意外并不会影响王潮必须拿下福州的决心，既然白拿拿不到，那 goes 去抢。

乱世江湖，拳头硬的就是真理的化身。

开山福建，一代明王

——福建历史上绕不过去的王审知

（下）

景福元年（892年）二月，王潮派堂弟王彦复和三弟王审知出兵取福州。王审知骑白马一路向前，风行洒脱，三军呼为“白马将军”。

因为福州城高粮多，王审知再是一代风流，一时也没能啃下范晖这块硬骨头。范晖之所以能撑这么久，是因为他有一个亲属发来援兵。他的这个亲戚前面提过，就是钱镠的前老大董昌。

王审知是人不是神，他打起了退堂鼓。王审知想让大哥王潮亲自来收拾，王潮却怒了。王潮写信告诉三弟：“你缺兵，我发兵；你缺将，我可以增将，如果弟兄们都死光了，我会亲提三军为你们报仇。”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王审知咬咬牙，为自己的名誉身家计，带着弟兄们几乎是玩命似的攻城。

王审知其实是在为自己攻城。王潮虽有四个儿子，但多不成器。二哥王审邽又谦退有礼，将来最有可能成为福建之主的，还是自己。多立军功，弟兄们才能服你，将来也好服人。

城上箭飞如雨，也没有吓退王审知。最终，范晖撑下去了，出城逃亡，结果被泉州军追上，一刀了断，浮尸海上。董昌的军队见福建已失，也没必要和王氏兄弟为敌，潇洒回家。

福州是福建的中心，福州一下，建州（福建建瓯）、汀州（福建

长汀)的长官们非常识时务地献了城。

唐景福二年(893年)六月,王潮入主福州,福建五州尽数为王潮所有。按江湖规矩,王潮被朝廷任命为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副使,实际上确定了王审知的接班人地位。

福建官场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王潮对王审知是极为严厉的,甚至王审知偶有小过,王潮也要拿棍子伺候三弟。而王潮这么做,自然也是希望泥腿子出身的三弟不要迷失在富贵乡中,将来好接他的班。

王潮有儿子,但四子皆不成器,为了王家在福建的基业,就必须舍子立弟。否则立了饭桶儿子,将来肯定要被外人一锅端掉的。

王潮死于唐乾宁四年(897年)十二月,而继位的,自然是众望所归的王审知,老二王审邽守泉州。

论武功,王审知可能不及与他相似度颇高的钱镠,在但政治上,王审知与钱镠一样清醒务实。唐朝已经完了,让王审知这个与唐王朝完全没有瓜葛的外人去为唐朝效忠,凭什么?王审知凭什么要这么做?

朱温控制着中原,那就和朱温打交道,为了王氏和福建的利益,王审知选择了与朱温交好,这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王审知结交朱温的战略意图和钱镠是一样的,都面临着杨吴强大的压力。认了朱温当老大,交了保护费,老大就会出手保护自己。

换了谁,不会这么做?

吴越和闽国欲通中原,只能走海路,闽国使者往往从福州出船,北上越海到山东半岛,然后从陆上去汴梁。海路风险非常大,翻船是常有的事,很多闽国使者死于海难。但至少王审知和朱温保持着臣属

关系，闽国生存的问题已完全解决。

等到朱温建立梁朝后，封王审知为闽王，正式确认了王审知在福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

王审知和钱镠的人生轨迹比较相似，但有一点是王审知不如钱镠的，就是钱镠所建之吴越是天下富庶之地，而闽国则地瘠人少，经济相对落后。这种客观的存在，决定了王审知的治闽政策是相对保守的，也就是西汉初年实行的黄老无为而治，不折腾。不像其他诸侯闹得天翻地覆，王审知以静默应对人事，埋头发展经济，延揽人才，只做事，不说话。

王审知是农民出身，从小就在黄土地上吃苦受罪，所以他富贵之后，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淳朴作风。王审知在生活上没什么要求，有吃有喝就行，何必大摆排场给人看。至于纵情声色，更和王审知不沾边，那是他的几个宝贝儿孙干的事情。王审知在福建是有名的铁公鸡，不要说别人想从他身上拔毛，就是别人劝王审知给自己提高点待遇都难于上青天。

比如穿衣服，王审知是从来不讲究的，他穿的裤子破了个大洞，也只是从酒库里的麻布上撕下一块，补上去。换成一般的中产家庭，换条新裤子又能花多少钱？有人劝王审知不必这么寒酸过日子，王审知摇头不理。其实，王审知穿破裤子并不会减弱他在福建的统治，何必在这方面一争短长？

还有一次，不知道是谁送给王审知一个当时极为罕见的玻璃瓶子，那可是天价的玩意儿。而王审知呢，当场就把玻璃瓶子摔在地上，粉身碎骨。王审知告诉侍从，这些东西以后不要再送给他，治国安民用不着这些东西，只能增长奢靡之风。

以王审知的身家，做一百条裤子，摔一百个玻璃瓶，也玩得起。但王审知考虑的却是一旦开此风，那么上行下效，福建人人比富，区

区五州之地，又有多少财富可供挥霍？

福建经济相对落后，如何发展经济是王审知的当务之急。节流是一方面，但开源更重要，否则总共只有十块钱，省来省去还是那几枚硬币。王审知做生意是有一套的，梁贞明二年（916年），王审知下令造铁钱和铅钱，和铜钱一样，在福建境内通行。王审知造铅钱、铁钱，主要目的就是不让福建境内的铜钱向外流出，毕竟铜钱在当时第一等货币，相当于现在的黄金储备。同时，王审知根据福建的地缘特点，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洋人的钱不赚是傻子。

因为王审知开明的对外贸易政策，吸引着很多海外商人来福建进行贸易，阿拉伯以及波斯的商船穿梭于福建沿海，双方进行贸易。

福建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无疑是泉州，从唐中期以来，泉州就已经是东南沿海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广州同等级。

福建土地相对贫瘠，人口又少，但福建的经济实力在当时的五代十国中却是第一流的，原因就是王审知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古往今来，兜里有了钱，腰板才能挺得直，没钱一切都是空谈。王审知有了钱，就可以有足够的财政来招徕人才，更好地为福建发展服务。

福建在当时远离战乱，是著名的乱世桃源，所以有很多中原士大夫南逃福建，为王审知效命。比如有唐朝宰相王溥之子王愔、杨沂、徐寅、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戩等人。而其中的韩偓又是晚唐五代著名诗人。这些人成为王审知的智囊团，倾心效命。韩偓最有名的一句诗是“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

王审知几乎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但他和王建一样，都非常重视人才建设，拉拢知识分子，让这些人为自己的政权卖力。可以说，王审知的人才政策，决定了福建在乱世逆势中的存亡，没有这些人才，

王审知拿什么和周边的大国对抗？

福建周边有三国，北有吴越，西有杨吴，南有南汉，其中以杨吴对闽国的威胁最大。梁贞明四年（918年）七月，吴国大举进攻虔州（今江西赣州）军阀谭全播，霸占江西。谭全播立刻向吴越钱镠、湖南马殷、岭南刘岩和王审知求救，这四国都知道虔州一旦落入杨吴之手，后果不堪设想，都派重兵来救。可惜都晚了一步，谭全播很快就被杨吴灭掉。因为虔州是福建走陆路北上中原的必经要道，虔州的丢失，逼迫王审知只能走海路与中原交通，但王审知从来没有被杨吴的势力所威服，他认为他该做的，克服千险万难也要做。

其实徐温也没有能力消灭王审知，双方隔着一条险峻的武夷山脉，各怀心思地相处。

王审知开拓能力的短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王审知的守成能力是毫无疑问的。以现在的形势格局，无论是徐温还是钱镠，或者是神经病的刘^龔，都不可能撼动王审知在福建的地位。

王审知稳定了自己的地位，接下来考虑的，就是如何把铁板一块的福建传给谁。

以封建社会的家天下而论，福建天下，王审知自然要传自己的嫡长子王延翰，这是福建官场人所尽知的。虽然王审知二哥王审珪的儿子、泉州刺史王延彬异想天开地希望自己能继续福建王位，甚至外通梁朝，想当泉州节度使。王审知为人宽厚，但对于这种私相授受的事情，是断不可能给外人的。王审知冷笑着，罢免了王延彬的官位，王审知是铁了心要把江山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

虽然王审知要传位于亲生儿子，但福建的外交政策始终没有任何改变——不管中原如何风云变幻，福建一如既往地称臣磕头。923年，朱友贞完了，李存勖统一中原，那就拜李存勖为老大，继续维持福建对中原的臣属地位。

有人对王审知向中原政权称臣的做法不理解，认为福建与中原相隔千里，即使王审知做了皇帝，李存勖又能奈之何，何必给外人低三下四地磕头？王审知笑了，他给臣僚说了一句贴心窝子的话：只要我想当皇帝，李存勖又能奈我何？像刘^龔那样的地方恶霸都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只是，你们想过没有，福建只有区区五州之地，户口不到百万，当了关门皇帝，又有什么意思？王审知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他宁可当开门节度使，也绝不当关门天子。

王审知年龄也大了，不想再折腾了。毕竟闽国是个小国，实在没有折腾的本钱，而且王审知性格相对比较谨慎，他不想为了一个虚名而把自己好不容易控制的福建弄得伤筋动骨。万一如此，则上对不起兄长王潮，下对不起子孙与福建百姓。

其实王审知也知道自己的儿孙是不争气的，自己出身农民，反倒养出了一窝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公子哥，除了会败家，百无一用。王审知想管，但他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再劳力伤神了。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十二月，割据福建近三十年的闽王王审知在福州病逝，时年六十四岁。

王审知作为福建史上首位闽王，对福建的影响非常深远。王审知割据福建三十年间，发展经济，勤俭节约，在王审知主政期间，福建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战事，是五代十国时的世外桃源，史称“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五代十国是一个让人心动的时代，十国对历史的贡献尤为特殊，现在南方几个发达省份都在十国时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对中国南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殷开发了湖南，钱镠开发了浙江，刘岩开发了广东，王审知开发了福建。王审知不是福建人，但福建人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王审知的。

君主	姓名	在位年 (用五代年号)	生卒年	备 注
太祖	王审知	无		
	王延翰	无	926—927 年	王审知长子。王延翰暗示群臣拥戴他为闽王，奉后唐年号。王延翰个头高，容貌美，却是“妻管严”，老婆崔氏“陋而淫”。崔氏专杀美女多达八十四人，后为雷劈死。王审知养子王延禀不服王延翰，勾结王延钧推翻王延翰，杀之
太宗	王延钧	无	927—934 年	王审知次子，改名王鏐。王鏐继位后，杀王延禀，上书李嗣源，要求朝廷封他为尚书令，被拒绝，王鏐怒而断绝对后唐的朝贡。王鏐喜欢道术，装神弄鬼，宠信道士。在道士陈守元蛊惑下，王鏐称帝，令国计使薛文杰专抄富人家产，以为私用。王鏐喜欢奴婢陈金凤，立为皇后，又宠男宠归守明。归守明趁王鏐得病时，与陈金凤私通。皇子王继鹏发动兵变，斩杀王鏐
		永和	934—935 年	
康宗	王继鹏	永和	935—936 年	王鏐长子，继位后改名王昶。王昶狂妄自大，向晋称臣，又羞辱晋朝使节。石敬瑭“怒其不逊”，下诏大骂王昶昏狂，并拒绝接受闽国贡品。王昶信鬼神，宠信道士陈守元和妖人林兴，大兴土木建道观，建道像。王昶重自己嫡系部队而疏远其他部队，引起不满，控鹤都将连重遇和拱宸都将朱文进起兵谋反，王昶出逃，连、朱二人迎立王延羲。王昶在路上被王延羲之子王继业所杀，妻子皆死。谥为康宗
		通文	936—939 年	
景宗	王延羲	永隆	939—944 年	本名王延义，又改名王曦。王曦同样狂妄自大，昏庸无道。大臣犯法，只要花钱都可以赦免无罪。王曦爱钱如命，王曦嫁女儿，大臣不掏彩礼钱，王曦大怒，要人弹劾百官。王曦自称唐太宗再世，丑态百出。王曦好男色，和外甥李仁遇鬼混在一起，甚至让外甥当起宰相。王曦还好饮酒，常在国中牛饮。王曦怀疑连重遇对自己不忠，连重遇畏惧，联合朱文进发动叛乱，趁王曦醉酒，在马上杀之。谥为景宗
恭宗	王延政	天德	943—945 年	王审知之子。王曦昏暴，王延政上书劝谏，王曦不听，反恨王延政。王延政控制建州，自称大殷国皇帝，与王曦互相攻杀。后连文进推立朱文进为帝，闽人不服，王延政趁机攻下福州。随后南唐军灭闽，王延政力尽而降，迁往金陵

木匠传奇

——楚王马殷并不算波澜壮阔的人生路（上）

说到马殷以及他所创建的楚国，人们可能不太熟悉，但在湖南长沙东郊有一座陵墓，想必人们一定如雷贯耳——出土了汉代辛追夫人遗体的马王堆汉墓。这个马王堆，就是马殷家族的楚王墓葬群，因此而得名马王堆。

马殷和朱温、王建、杨行密一样，都是乱世枭雄，生逢其时得成大事。但有一点，马殷和上面三位相比要干净许多，那三位都当过小偷，而马殷却有一个正经职业——木匠。历史上帝王当过木匠的，一个是著名的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另一个就是马殷。

马殷出身贫苦，没奈何做了木匠，但生于乱世，当木匠也混不到饭吃。马殷为了活命，在唐中和四年（884年）投奔了蔡州刺史秦宗权，马殷被分到大魔头孙儒手下做偏将。

唐光启三年（887年）十月，秦宗权决定进攻群魔乱舞的淮南道，派弟弟秦宗衡率孙儒等人南下抢地盘，马殷和他的两个兄弟张佶、刘建锋同行。

孙儒是个野心家，自然不甘心白白替秦宗权卖命，孙儒砍了秦宗衡，自称老大。马殷等人无所谓，跟谁混不是穿衣吃饭？只要不克扣工资就行。

在淮南，地头蛇杨行密遇到了他此生最危险的对手——孙儒。杨行密被孙儒的土条白团军打得灰头土脸，几次险些丧命。好在景福元

年（892年）五月，杨行密在宣州打败了孙儒，孙儒战死阵前，数万士兵降杨，杨行密获得淮南的统治权。

但在这些投降杨行密的土条白团军中，并没有刘建锋、张佖、马殷的身影。他们不愿跟着杨行密，在空中哭拜了孙儒亡灵后，带着七千多残兵往江西流窜。

大家需要立一个新主帅。刘建锋是孙儒手下头号大将，头把交椅非刘建锋莫属，张佖则相当于水泊梁山军师吴用的地位，马殷成了先锋官。

此时的马殷不显山露水，一切凭老大是从，再说马殷也没有什么野心，跟着老大走就是了。

这支流浪的队伍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而是在江南胡走乱闯，最终在乾宁元年（894年）五月，来到了湖南醴陵，准备在湖南立足。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派指挥使蒋勋守住龙回关（长沙东四十里），不允许放进刘建锋部队的一兵一卒。

刘建锋如果强攻回龙关，不知道要死多少弟兄，还是马殷适时站出来，去游说蒋勋。马殷对刘建锋一通无聊的吹捧，将其夸成了当代周武王，并许诺蒋勋若投降，将来必以开国元勋相待。蒋勋跟谁不是打工，一个转身就把邓处讷给卖了。

刘建锋轻易得到湖南，并在次年四月得到了朝廷的诏命，刘建锋为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在这个时期，马殷依然恭敬地奉刘建锋为老大，没有任何野心。至于蒋勋，因为刘建锋并没有兑现承诺，在邵州作乱，被马殷给收拾掉了。

如果不是刘建锋胡来，将来的十国之一的楚国，必是他刘家的天下。可惜刘建锋稍稍得志，便沉迷酒色，军政大事一体交给张佖打理。刘建锋给校卫陈贍扣上一顶绿帽子，和陈贍老婆混在一起。陈贍

身为男人，哪有不恨刘建锋的道理？乾宁三年（896年）四月，陈贍闯进帅府，趁人不备，用锤子砸死了本可以开创一代王朝的刘建锋。

老大死了，对湖南来说是天大的事，弟兄们先把陈贍抓起来，然后议举新老大。按当时的政治排名，二号是张佖，所以张佖是理所应当的继承人，大家要推举被马殷踢伤的张佖做老大。

但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张佖坚决认为自己才德皆不足以统领湖南，他提出一个人选，就是正在进攻邵州的指挥使马殷。大家见张佖让贤，也没什么说的，派马殷的心腹姚彦章请马殷回长沙当老大。

马殷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还在犹豫，姚彦章直接抽马殷一个嘴巴：你不要这个位置，自然有人要，到时他要杀你，易如反掌！马殷被抽醒了，这才星夜回到长沙。

张佖为人光明磊落，自己虽暂时代理军政，但马殷才是人主之选，等马殷一到，张佖率文武百官向马殷叩拜，定下君臣之分。而张佖奉马殷之命，很快就攻下邵州，为马殷的江山策马效劳。

长沙成了马殷的家天下，但就整个湖南来说，湖南七州，马殷只据谭、邵二州，湖南的天下属谁，尚未可知。

湖南七州割据形势为：

谭州、邵州——马殷

道州（今湖南道县）——蔡结

衡州（今湖南衡阳）——杨师远

郴州——陈彦谦

永州（今湖南零陵）——唐世旻

连州（今广东连州市）——鲁景仁

这些地级军阀对马殷来说并非鱼肉，而且马殷还要时刻小心淮南的杨行密，一旦杨行密举淮南之兵来取湖南，马殷未必能扛得住。那么，为了生存，就必须找一个杨行密的敌人当靠山。算来算去，只有中原的朱三最合适了。马殷接受了谋士高郁的建议，重金收买朱温。朱温也愿意在湖南有个盟友，共同对付杨行密，以朝廷的名义封马殷为湖南节度兵马留后，确认了马殷在湖南的天然统治性，这在政治上对马殷是极为有利的。

不过在进攻诸州之前，马殷做了一件事情。在高郁的支持下，马殷下令在境内铸大铁钱，十个铜钱兑换一个铁钱。按常理，铁钱不如铜钱更有价值，但此举却让来楚做生意赚大钱的商人带不走沉重的铁钱，只好换成大宗当地货物易地二次出售，湖南经济因此迅速发展起来。马殷有钱了，就可以用兵了。

一切准备就绪，马殷开始南下扩张。

这次南下，非常类似三国刘备取荆南四郡，在地理上也基本重合。刘备取南四郡易如反掌，马殷也是如此。光化元年（898年）五月，马殷派指挥使李琼、秦彦晖、张图英、李唐等人率军南下衡州，几乎不费力气就斩杀杨师远，随后又拿下永州，唐世旻出逃。

马殷用兵，和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一样，力求一个“稳”字。拿下衡、永二州，马殷养兵休整。直到一年后的七月，马殷才再次派李唐出兵道州。道州的蔡结虽说有些小聪明，和当地武装埋伏在树林里企图伏击李唐。李唐更加狡猾，刚到地方，就放了一把火，烧死无数，蔡结被俘斩，道州轻松被拿下。

至于郴、连二州，真没什么好说的，过程甚至比刘备取南四郡还要乏味无聊，干脆一笔带过。这年十一月，楚将李琼攻破郴州，杀刺史陈彦谦，随后翻骑田岭（今五岭之一），围攻连州，鲁景仁虽然勉

强守了三天，但还是被李琼拿下，鲁景仁自杀。

湖南七州肥沃之地，尽属马殷。

此时的马殷，和北宋建立者赵匡胤有几分相似，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也有区别。赵匡胤是在周世宗柴荣打下江山的基础上平定南方诸国的，而马殷当政时，刘建锋并没有给马殷留下多少地盘，五州基本上是马殷拼命打下来的。

赵匡胤平定南方后，就不思进取，名为开创，实为守成。而马殷不同，他得到湖南全境，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渴望得到更多，他并不想学他的“前任”——七百年前的东汉荆州牧刘表。

马殷要扩张地盘，往东是杨行密、钱镠、王审知，南边有刘隐，这些枭雄不是马殷能吞掉的，那么，只能向东南方向，桂广一带有不少地头蛇，但实力都不如马殷。

唐光化三年（900年）十月，马殷先礼后兵，劝静江节度使陈可璠投降，老陈不愿，老马大喜，要的就是你不愿意，师出有名矣。马殷一声令下，指挥使秦彦晖、李琼率七千人去抄陈可璠的家底。

李琼为人忍而悍，有的是办法对付陈可璠。李琼生擒了指挥使王建武，在阵前当着陈可璠的面，斩杀王建武，差点没把老陈给吓死。陈可璠的弟兄们不敢惹李琼，都投降了。

投降就安全了吗？当然不是。李琼杀王建武是震慑桂军，而桂国身后还有更大的军阀，所以，桂军两千弟兄不幸成为下一个“王建武”，被李琼全部活埋。桂管境内各路好汉并不怕马殷，而是怕这个到处大埋活人的李琼，李琼所到之处，几乎全是迎风纳降。静江军所辖桂州、柳州（今广西柳州）、宜州（今广西宜山）、象州（今广西象州）、严州（今广西来宾）、蒙州（今广西昭平）、梧州都落进马殷口袋，这也是楚国疆域最大的时候，距离南汉的广州不过百里，对

南汉造成了极大的生存压力。

关于李琼活埋人，从道义角度来看应该谴责，但乱世时代人吃人都是家常便饭，换了陈可璠也会这么做。乱世江湖规矩，对所有人都适用。

马殷在这一点上又和赵匡胤有些类似，赵匡胤篡位之后没有参加过一场战斗，全是别人打下来的，马殷也是如此。马殷虽然比赵匡胤更为忠厚一些，但面对个人利益上也是不傻的，混到这一步，没人愿意干替别人火中取栗的蠢事。

木匠传奇

——楚王马殷并不算波澜壮阔的人生路（下）

天复元年（901年），唐昭宗李晔拜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从省市级军阀一跃成为国家级大军阀。李晔巴结马殷，是想让马殷出兵勤王，攻打朱温，并给马殷及杨行密各下一道密诏。杨行密虽然出兵，但他和朱温本就有仇，和密诏没有任何关系。马殷和李晔无亲无故，和朱温无冤无仇，他自然没必要帮李晔得罪人。唐朝统治早已崩溃，有没有诏命，马殷都是湖南王，不过有了诏书增加了合法性而已。杨行密曾经约马殷共同北上灭梁，马殷决定和朱温结盟，利用朱温在北面牵制杨行密，以免杨行密从侧翼攻楚，自然就把杨行密的话当成耳旁风。

不过，有一件事，马殷还是有求于杨行密的。马殷有个弟弟叫马贇，当年一起在孙儒帐下当差。孙儒被杨行密全歼时，马殷逃了出来，马贇却成了俘虏。马贇成了吴国黑云都的指挥使，但杨行密一直不知道马贇的身世。直到马贇主动向杨行密坦白，杨行密觉得暂时吃不掉马殷，不如把马贇送回去，一则结吴楚两国之好；二则让马贇劝马殷联吴攻梁。

马贇倒是向马殷说了这事，马殷虽然疼弟弟，但事涉楚国安危，马殷是不会儿戏的。马殷心里很清楚，朱温和杨行密，他必须得罪一个，而与其得罪朱温，不如得罪实力相对偏弱的杨行密。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杨行密死了，但他的儿子杨渥却想从马殷手上撬点干粮。天祐三年（906年），吴军指挥使陈知新率军攻

楚国的岳州（湖南岳阳），顺利拿下岳州。但是，马殷可不是软柿子，随后就发起了反攻，时间是梁开平元年（907年）六月，楚军和吴军在湘江决战。结果不必多言，吴军被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找不到北，一哄而散。吴国指挥使刘存和吴岳州刺史陈知新被俘，押到长沙砍了头，岳州又回到马殷手上。

岳州是湖南北面门户，但重要性相对来说不如荆州江陵，只是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是朱温的干孙子，马殷不便轻动。而江陵以西是水匪雷彦恭控制的朗州（湖南常德），实力偏弱，可以下嘴。

马殷对梁朝实际上是不太放心的，所以拿下朗州巩固西线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吴国杨渥又派人来捣乱，哪里又是马殷的对手？楚将许德勋谈笑之间，援助雷彦恭的吴军就全部被灭了。

马殷性格相对平和，但为了自身利益那也是六亲不认的。雷彦恭被楚军打得筋疲力尽，开城逃往淮南，朗州被马殷顺利拿下，之后又拿下与朗州相邻的澧州（湖南澧县），彻底巩固了西线防御体系。只要马殷守得住朗、澧，无论是梁朝还是蜀国，都不可能对楚国构成战略威胁。

马殷没有什么雄图壮志，他只想守住湘楚之地。其实马殷的地盘非常大，北抵江陵，东在江西，南至广南连州，西至贵州。论面积是十国中最大的。不过马殷知道自己地广人稀，实力并不算强劲。为了活命，马殷只能向中原朱温称臣。朱温自然不会驳马殷的面子，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当过的天策上将军，马殷要了，朱温一咬牙，给！

马殷是个粗人，没读过几天书，但他却知道知识的力量。开平四年（910年）六月，马殷在长沙开天策上将军府，为的就是笼络人才，其中最精英的十八位为学士。马殷在湖南的成功，是离不开这些智囊团的。

马殷是个开拓型帝王，楚国所管辖的范围实际上不只湖南，还包括贵州东部，广西中部北部，广东西北部，是十国响当当的一流强国。号称小南强的南汉，在马殷时代，被楚国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要马殷愿意，楚军的刀锋能直接让南汉刘岩感到彻骨的寒意。

刘岩知道马殷是惹不起的，为了稳住马殷，刘岩写信给马殷，想和马殷的女儿结婚。马殷其实是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刘岩这个神经病的，但为了稳住南线，马殷也只好忍痛割爱。

马殷和赵匡胤一样，是个非常实际的人，这类人只重结果不重过程。马殷没有太大的野心，守住湖南足矣！至于中原逐鹿，诚非马殷所敢望。

而当马殷发现中原之主朱友贞在与河东枭雄李存勖的十年河上之战屡处下风时，也下意识地 and 行将灭亡的朱友贞拉开了距离，暗中和李存勖勾勾搭搭。至于朱友贞的干侄子——割据荆南的高季昌经常与南边的邻居马殷搞搞摩擦，但那和小孩过家家一样，你吐我一脸口水，我喷你一脸唾沫星子。

马殷密切关注中原局势，梁龙德三年（923年），得知李存勖马踏中原，朱友贞自杀身亡后，马殷立刻派长子马希范北上洛阳，拍中原新统治者的马屁。马殷上交了朱梁赐的印绶，并称自己身事伪梁二十年，实在对不起陛下。其实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乱世军阀都这样，“有奶便是娘”，管你姓朱姓李，谁的大腿粗我就跟谁玩，李存勖自然懂这个道理。

而两年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后唐大军西行灭掉前蜀，却把马殷吓得魂飞魄散。前蜀和楚国是邻居，李存勖灭蜀，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楚国。马殷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即将结束，立刻上表给李存勖请允许他退休，实际上这是在试探李存勖对湖南的底线。李存勖并没有做好削平诸国的准备，能灭前蜀已能满足李存勖的

胃口，所以李存勖暂时没打算动马殷，反而劝马殷安心做楚王。

不过，即使李存勖想动马殷，他也没时间了。同光四年（926年）四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作乱，李存勖在洛阳死于那场可怕的军前哗变，河北李令公摇身一变成了大唐皇帝，马殷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据他了解，李嗣源并没有统一天下的野心，马殷继续向李嗣源表达自己对皇帝陛下的忠诚。李嗣源一则没有入侵湖南的野心；二则也没那个实力，真要打得两败俱伤，只能便宜别人。李嗣源对诸国的态度是只要臣服就封大官，大家各发各的财。天成二年（927年）六月，李嗣源封马殷为楚国王，正式确定不会用武力解决湖南问题。

吃下了定心丸，马殷的野心开始膨胀，当然只限于楚国境内。在马殷心中是有一个炽热的帝王梦的，只是限于实力，不敢僭越用帝制而已。马殷接受李嗣源的册封，建立了楚国，仿天子之制，立百官，姚彦章为左大丞相，许德勋为右大丞相，拓跋恒为仆射。除了马殷本人不称帝，他的楚国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帝国。生杀自专，这才是帝王的核心本质，帝王的虚名要不要无所谓。李嗣源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听任这个糟老头子在湖南来回折腾。

马殷到了老年，脾气似乎越来越大，反而不似之前的心平气和。高季兴（即高季昌）向来是发过路财的，为了赚钱，老高扣留了湖南节度使史光宪，惹得马殷大发脾气，发大军进攻荆南。荆南只有三州，根本不是马殷的对手，高季兴又耍起他独门的无赖绝活，向马殷求和。马殷一直就讨厌像牛皮糖一样的高季兴，这货太讨人嫌了，不如灭掉省事。还是部下王环劝马殷，荆南是四战之后，留下荆南可以作为湖南的北面战略缓冲。灭荆南容易，灭掉之后，湖南就要直接与李嗣源接壤，独当中原兵锋。马殷听了劝，这才饶了高季兴。不过没多久，高季兴又皮痒痒了，向吴国称臣，马殷奉李嗣源之命，光明正大地教训高季兴。高季兴有了吴国外援，也不怕什么马殷，想和马殷练练。但马殷的块头实在太太大，很快就把高季兴打得鼻青脸肿，高季兴再次求和，马殷都懒得再搭理这个无赖了，回家自己玩去。除了高

季兴经常被马殷敲打，就是马殷的宝贝女婿——南汉国主刘岩也没少挨岳父的板砖，只是刘岩实力较强，马殷没占到什么便宜而已。

马殷在晚年大发脾气，这可能和他早年对领导们低三下四成习惯的反向心理作用。马殷跟着孙儒和刘建锋都是谨小慎微地活着，即使刘建锋死了，马殷都没敢有想法，甚至都打算好了要给张佖下跪称臣。这些窝囊经历一直压在马殷心头，所以当马殷强大之后，他需要找发泄这种情感的渠道，这属于人之常情，无可指责。

马殷老了，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接班人的问题。马殷虽然有十几个儿子，但按照封建礼法，马殷应该立嫡长子马希振为楚国太子，但因为马殷特别喜欢袁德妃，所以越次立了次子马希声为太子。马希振为人恬淡，不当太子也没什么遗憾的，潇洒地当道士去了。而马殷的三子马希范却为人枭雄，见平庸的老二竟然当上了太子，心里极为不服，但老头子决定的事情，马希范只好徒呼奈何。

马希声为人平庸，但却多疑，他好不容易子凭母贵当上了太子，成天疑神疑鬼，生怕别人再把他的太子位置给抢了。马希声向来就不喜欢楚国谋士高郁，担心自己执政后，高郁会乱政夺权。马希声在听信了荆南高季兴的蛊惑之下，背着年老多病的马殷，假传楚王手令，灭了高郁三族。

马殷已经七十九岁了，病中的他已有些意识不清，他只是还记得高郁是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股肱之臣。他曾经警告过马希声不要打高郁的主意，而且马殷也相信儿子不敢不听自己的话。直到有人残忍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高郁为世子所杀。马殷闻讯，如晴天一声惊雷，号啕痛哭：逆子今日能杀湖南忠臣，明日就能杀掉我。

风烛残年的马殷哭得死去活来，再也没有人能挽救这位重感情的楚王。唐长兴元年（930年）十一月，马殷死于长沙宫中。

在五代十国的枭雄堆中，马殷并不起眼，但马殷能在乱世赤手空

拳打出一片天地，也是有两把铁刷子的。马殷性格中庸，但这并不代表软弱；相反，马殷是吃人的，而且吃的人还不少。吃人，在乱世中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不吃人，总会被人吃掉。

马殷的前任刘建锋是不能治好湖南的，刘建锋当政，三湘又将兵荒马乱，百姓受难。而马殷有智略，会用人，能伸能屈，那些有军功的大佬在马殷面前服服帖帖。终马殷时代，楚人少见兵戈烽火，生活安逸，实是楚人之福。

马殷死后诸子争权，最终闹到刀兵相见，最终引来外敌，席卷马氏基业而去。至于楚国灭亡的责任，和马殷关系不大。人生九龙，种种有别，老子英雄，儿子未必好汉，从古至今，多有其例。

楚国世系年表

君主	姓名	在位年 (用五代年号)	生卒年	备 注
武穆王	马 殷	896—930 年	852—930 年	
衡阳王	马希声	930—932 年	898—932 年	马殷次子。为政愚狂，听说梁太祖朱温喜欢吃鸡，马希声也每顿饭都要吃，被礼部侍郎潘起讽刺
文昭王	马希范	932—947 年	899—947 年	守成令主，开疆扩土，但为人狂妄自大。马希范建九龙殿，以八龙绕柱，说自己也是一条龙，凑成九龙。契丹灭晋中原大成，牙将丁思颢劝马希范北伐中原，被马希范拒绝。死后无子
废主	马希广	947—950 年		马希范同母弟，为人庸懦。马希萼犯境，马希广以马希萼是自己兄长，拒绝在马希范的葬礼上除掉马希萼，后被马希萼勒死
恭孝王	马希萼	950—951 年	900—953 年	为夺楚王之位，向南唐称臣，引南唐兵入楚，杀马希广自立。因马希萼为人凶残淫暴，失去人心。南唐灭楚后，马希萼死于金陵
末王	马希崇	951—951 年		楚军兵变废掉马希萼，推立马希崇为楚王。南唐军入长沙，楚亡，马希崇迁往金陵，下落不明

帝王中的天才，帝王中的疯子

——南汉的神经病皇帝刘岩

唐末五代十国宋初枭雄遍地，这些枭雄虽然个个都会吃人，老好人马殷也不例外，但他们至少还能称为正常人，有正常的心智。而在这群“正常”的枭雄中间，突然就莫名其妙地挤进一个极不正常的同伙，这位大爷其实是个疯子，五代十国再找不出这样的疯子。

他叫刘岩。虽然他后来又捏造汉字，自称刘^龑，因为此字太生僻，所以以下还称刘岩，南汉的开国皇帝。

南汉是五代十国最南边的政权，统治广东广西两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刘岩其实并不是赤手空拳打天下的，这一点和草根创业的朱温、王建、杨行密、钱镠都不一样。刘岩有些类似南北朝北齐的高洋，二人都不是创业第一代，而是父亲开创的基业，由兄长继承。兄长把家业发扬光大后就死了，他们弟承兄位，建国称帝。而且最重要的是，刘岩和高洋都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完全不可救药的疯子。

刘岩家族自称是来自彭城（今江苏徐州）的汉朝皇族刘氏，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岩家族的祖上是从大食来到中国谋食的商人。在华为华，即使刘岩祖上是大食人，到了他父亲刘谦这一辈已完全汉化了，更何况刘岩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华人。

刘谦家世一般，但却被岭南节度使韦宙看上，把女儿嫁给刘谦，从此刘谦一步登天。唐中和二年（882年），刘谦被封为封州（广东封开）刺史，刘氏家族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开始了在岭南的扩张之路。

刘谦在893年去世时，把封州交给了长子刘隐。刘隐是南汉建国史上绕不过去的开国帝王，没有刘隐就没有日后的刘岩。刘隐不如弟弟那么变态，但也不是个好惹的主儿，他刚执政时，就杀了一百多个叛乱分子。这是老爹教他的立身之道：你不杀人，别人就要杀你。

刘隐偏居在封州，对他统治岭南的梦想来说是致命的短处。岭南首府是大城广州，而刘隐的目标也只能是繁华的广州城。

机会很快就来了，乾宁二年（895年），岭南节度使刘崇龟病死，牙将卢琚等人拒绝新任节度使李知柔进城。刘隐立刻发兵出郁州东下，打着讨伐反贼的旗号，很快就拿下广州，尽占岭南天时地利，也奠定了刘氏王朝在岭南的基础。节度使李知柔知道刘隐是实际上的统治者，所以他从来不和刘隐产生矛盾，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双方友好相处。等到李知柔在光化三年（900年）死后，又换了一任节度使徐彦若，依然学习李知柔好榜样，你忙你的，我忙我的。而等到徐彦若死前，他上表请封刘隐为岭南节度使，再派所谓的节度使已毫无意义了。没想到昭宗李晔不准，又派了同平章事崔远主政广州，崔远不是傻子，根本不上当，转了一圈又回到长安。李晔无奈，只好正式承认了刘隐在广州的统治地位，封其为岭南节度使。

当时的岭南处在战乱时代，刘隐只不过控制广州而已，其他各州都有强人盘踞。如邕州（广西南宁）叶广略、容州（广西容县）庞巨昭、高州（广东高要）刘昌、交州（越南河内）曲颢、虔州（江西赣州）卢光稠，以及刘岩未来的岳父——楚王马殷，这些势力都严重威胁到刘隐的存在。

庞巨昭这些小虾米不是刘隐的对手，而虔州卢光稠实力稍强，但也被刘隐打得鼻青脸肿。唯独马殷这一块，实在不是刘隐所能应付得了的。梁开平二年（908年），马殷大举进攻岭南，把刘隐之前占领的广西北部全部夺去，岭南军败得惨不忍睹，老巢封州也差点丢了。好在刘隐之前已经向梁太祖朱温称臣，而马殷也向梁称臣，所以马殷

不会不给朱温面子，就此收手。

刘隐吃了大亏，也基本暂停了军事行动，反正也打不过马殷，不如修炼内功。刘隐开始注重人才建设。唐末大乱，中原许多名士都逃往岭南避难，如李德裕之孙李衡和杨洞潜、王定保、赵光裔、刘浚这些名满天下的士人。战乱年代的割据生存之道，一是军队；二是人才。刘隐的军队足以自保，所以人才建设刻不容缓。经过几年的韬光养晦，刘隐逐渐恢复了元气，刘氏家族在岭南的统治不可动摇。

接下来，刘隐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接班人。实际上根本不用选，家族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刘隐之弟刘岩的地位，不立刘岩，等待刘氏家族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梁乾化三年（913年）三月，南海王刘隐病死，刘岩接过兄长的权杖，开始了让历史哭笑不得的传奇统治。

其实刘岩和刘隐并非一母所生。刘隐的生母韦氏听说刘谦小妾段氏生了个儿子，担心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刘隐受到威胁，便杀死了段氏，把刘岩抱来自己抚养。都说生恩不如养恩大，韦氏倾心抚养刘岩，刘岩也早忘了自己的生母是怎么死的。

早期的刘岩还没有后来那么搞笑变态，但这也和他没有打好自己的权力基础有关，高洋刚开始时也在装傻小子。在不确定自己还能活几天的情况下，刘岩是不敢变态的，否则被人吃掉了，还怎么玩？

因为刘岩的变态名声太响，反而掩盖了他在政治上的明君作为，高洋也是如此。

说到刘岩的政治作为，历史上没什么名声，但有一件大家都知道，就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篡位之后为了独裁专权，搞出一个“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兵权，起用文官政治，被一些文人好一通吹捧。实际上，五代十国宋时期，最早用文官治理地方的并不是赵匡胤，而是刘岩，赵匡胤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几乎什么都是抄来的。只不过因

为刘岩的历史知名度不如赵匡胤，所以世人皆知赵匡胤文官治政。刘岩是带兵的，他知道武人执政的危害性，所以他把地方州县长官的职务都交给文人打理。宋朝著名的“知某州军事”，实际上率先实行于南汉，比如一个叫樊匡嗣的官员就当过知白州军事，县一级主官称为知某县事。南汉武将不再担任地方职务，而军权则统一于刘岩，避免了武人专权的可能性。而即使是只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不是柴荣收地方兵权，建立中央禁军，赵匡胤搞一百场酒会，他也收不回一个大兵。

内政清平，刘岩又夺取了韶州、容州、邕州，巩固了南汉边防，接下来，刘岩的重点是外交。

刘岩的外交思维是远交近攻。年轻气盛的刘岩经常和北边的邻居马殷厮打，各有胜负，不过楚国的实力远强于南汉，刘岩应付马殷比较吃力。刘岩突然想到一个对付马殷的好办法，就是把马殷的女儿当成人质……

刘岩派人向马殷求婚，欲结二国之好。马殷其实也知道刘岩的小心思，但他一时也吃不掉刘岩，不如利用女儿的关系绑住刘岩，不要让这个疯子成天给自己添乱。

刘岩要牵制住马殷，一来要娶马殷的女儿；二来要和马殷的“宗主国”朱梁王搞好关系。刘岩是个狂人，但一开始他并没有称帝，而是打算做朱梁的附庸。刘岩派人去汴梁，希望朱友贞能让自己当上南越国王，这是他向朱梁称臣的唯一条件。客观地讲，刘岩的几个邻居马殷、王审知、钱镠都是国王，刘岩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南海王。级别不对等，让刘岩和诸国进行外交往来时不太方便。刘岩这个条件并不高，却没想到朱友贞竟然给拒绝了。

刘岩万万没想到这点干粮朱友贞也舍不得给，气得刘岩跳脚大骂朱友贞是个铁公鸡，老子不跟你玩了！刘岩连国王都没兴趣当了，直

接当皇帝，气死朱友贞。

梁贞明三年（917年）三月，刘岩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并改广州为兴王府。赵光胤掌兵部、杨洞潜为副，李衡掌礼部，倪曙掌工部，皆为同平章事（宰相）。

此时的刘岩，对外是南霸天，对内是大汉皇帝，统治根基稳固。很好，刘岩很满意，他认为是他开始变态的好时机了。

刘岩“性聪悟而苛刻”，当人有了权力，他就会通过践踏别人的尊严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刘岩自然不会例外。刘岩的爱好有很多，但有一个特殊的爱好，那就是杀人。刘岩把他的皇宫变成屠宰场，抓些倒霉鬼绑到刑架前大卸八块。

刘岩就喜欢看别人的尊严在自己的践踏中慢慢丧失，他经常沉醉于这种残酷的满足感中。刘岩高坐于大殿之上，流着口水欣赏着这人间最残酷血腥的场景，脸上写满了骄傲与自豪。

刘岩喜欢杀人，杀人的快感能得到满足，但刘岩并不是一个昏君，他只不过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喜欢杀人而已。刘岩杀的都是底层百姓，但对上层士人刘岩是非常尊重的。

比如时任兵部尚书的赵光胤，他是中原名门，有点瞧不上刘岩这号地方土豪，给刘岩打工也是爱理不理。刘岩杀百姓，但不杀名士，反而会低三下四地巴结这些名士。刘岩为了拉拢赵光胤，竟然暗中模仿赵光胤笔迹，然后通过这封假信把远在洛阳的赵光胤家属都接到广州。赵光胤解决了后顾之忧，对刘岩感恩戴德，从此至死效命于大越国皇帝刘岩。

不过刘岩对大越国皇帝这个称号并不太感兴趣，刘岩姓刘，那么最合适的国号自然就是“汉”了，刘岩祖籍徐州，极有可能就是刘邦后人。唐末五代还是要讲究门第的，刘岩攀上汉高祖，在士林中就能被

人瞧得起。

门第之别很荒谬，但却真实。

大越乾亨二年（918年）二月，刘岩把国号改为大汉，史称南汉。

刘岩的大汉朝气派很大，实际上就是一个割据两广的土财主。想当土豪那首先要有钱，刘岩别的东西不多，但特别有钱，所以糟蹋得起。两广地近南海，珊瑚玛瑙很多，很多中原没有的奇珍在刘岩这里只能当破烂糟蹋。刘岩把金银宝贝都当成装饰品，甚至用水晶琥珀雕成日月形状，悬在宫中。对刘岩来说，这些东西并不稀罕。

刘岩的钱其实也不全是靠这些珊瑚玛瑙，而是利用两广的特殊地利与洋人做生意。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海上经济繁荣起于北宋太祖赵匡胤，实际早在汉唐时，中国就已与海外进行贸易。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就在广州设立市舶使，负责与海外各国的贸易联系。黄巢占广州时，朝廷就中断了来自广州的岁贡，“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玕；如今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汉朝与海外的主要通商口岸是徐闻（今广东湛江徐闻县），这是官方认定的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唐朝与中东、非洲各国进行贸易时，有一条专门的海上交通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下七》）。到了南汉，南汉在前朝的基础上，继续与海外诸国做贸易，大发其财。刘岩大力推广海外贸易，很多洋人蹈海而来，在两广登陆，把外国的洋钱送到中国以换取中国的物品。在刘岩时代，广州是全中国最大（分裂状态下）的对外贸易口岸。

刘岩在两广与洋人搞海上贸易，但他时刻关注中原局势，中原的一兴一亡，必须会对两广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也确实如此，李存勖最终战胜了朱友贞，恢复了大唐帝国的昔日荣耀，刘岩终于坐不住了。他听说李存勖是当代光武，那必然要

统一天下的，自己的两广土皇帝……

刘岩派宫苑使何词去洛阳探查李存勖的虚实。何词倒是很有眼光，一眼就看穿了李存勖建立的那个虚假的中兴盛世，回来后他告诉刘岩：“唐室奸邪弄权于内，强藩怀贰于外，不久必乱，陛下请放宽心。”

在确信李存勖不可能南下后，刘岩彻底放心了。刘岩为人比较极端，他认为李存勖不足虑后，甚至停掉了给后唐朝廷的朝贡。

刘岩这类人，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危险解除之后，会用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这种所谓“自信”。南汉乾亨八年（924年），刘岩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他给自己改了名字。

刚开始，刘岩改名叫刘陟。不过一年后，刘岩就觉得“刘陟”这名不太霸气，不符合自己南霸天的地位，白龙元年（925年），又改名为刘□。不过还没等刘□这名记熟，这位南霸天又改名了。改名的原因，是因为坊间传言刘氏江山有一天会被姓□的篡位，所以必然改。

刘岩突然脑洞大开，发明了一个字，就是“一”，音同岩，意为飞龙在天，非常霸气。字典里并没有这个字，但刘岩就是喜欢这种霸气，他喜欢的事，谁又能反对呢？

而南汉周边的政权，都体会到了刘岩的这种“霸气”，惹了这个疯子，谁都没好果子吃。马殷是刘岩的岳父，想占女婿的便宜，结果被刘岩一通暴打，老脸都丢光了。还有交趾的典承美，因为不服刘岩，刘岩呵呵一笑，大将梁克贞很快就把曲承美五花大绑弄到了广州。

综合来看，唐末五代宋初的那伙乱世帝王中，整体能力可以分为几个层级。超一流：柴荣无可争议。第一流：朱温、李存勖、郭威、杨行密、李昇、王建、孟知祥、马殷、赵匡胤，外加这个南霸天刘岩。

刘岩为人凶残，但他知机，参透人生进退，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南汉天下在刘岩时代稳如泰山，但危局却潜藏在暗流中，就是立储问题，这是一个历代帝王都很难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刘岩有二十多个儿子，但长子刘洪度却不为刘岩所喜欢，刘岩最喜欢的是次子刘洪昌。但刘岩比谁都清楚，他死后，南汉立刻会血浪滔天，为了那个位置，他的儿子们势必血腥厮杀。

刘岩能不能阻止这场不可避免的骨肉相残呢？理论上可以，留下一个准备继位的儿子，余皆处死，但虎毒不食子，刘岩怎么可能这么做！而即使刘岩想把其他儿子外放到州郡，等继位的那个上台后，也不会放过弟兄们，厮杀亦不可避免。刘岩日渐衰老，他告诉右仆射王翻：洪度与洪熙皆不足成大事，只有洪昌可以。不过我的儿子们能成器者不多，我死之后，他们必然兄弟阋墙，就像老鼠钻进了牛角，让他们作去吧，只是不知道他们还能猖狂多久？

事实也证明了刘岩悲观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那一亩三分地的最高权力，刘岩的儿子们自相残杀。杀来杀去，刘岩二十多个儿子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最终的胜利者刘晟。

其实，刘岩比起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来说，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没有死在儿子手上。这样一个杀人狂魔能寿终正寝，不知道是他的幸运，还是历史的悲哀。

南汉世系年表

君主	姓名	在位年 (用五代年号)	生卒年	备 注
襄宗	刘隐	无	873—911 年	刘谦之子
高祖	刘岩	乾亨 917—924 年	873—911 年	刘隐之弟
		白龙 925—928 年	889—942 年	
		大有 928—942 年		
殇帝	刘玢	光天 942—942 年	920—943 年	本名刘洪度，刘岩次子。好酒及色，宠用小人，为弟刘晟所杀
中宗	刘晟	应乾 943—943 年	920—958 年	本名刘洪熙，杀兄篡位后，杀尽所有同父兄弟。柴荣即将统一天下，刘晟畏惧欲降，却被楚国所阻。刘晟忧虑，饮酒而死
		乾和 943—958 年		
后主	刘铎	大宝 958—971 年	942—980 年	本名刘继兴，刘晟长子，晟死继位。刘铎宠爱太监，甚至要求国人欲做官者，必须净身入宫。南汉人口百万，太监就有两万。南汉权阉龚澄枢非常得宠，南汉人认为真皇帝是龚澄枢，而非刘铎。刘铎与波斯国宫女淫乱，宫中乌烟瘴气。917 年北宋军灭南汉。刘铎本想乘船去东南亚，但船只被太监开跑，刘铎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刘铎入汴。赵匡胤请他喝酒，他以为酒中有毒不敢喝，赵匡胤微笑着喝下此杯

在刀尖上跳舞

——荆南小政权的生存之道

高季昌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在乱哄哄的世界里，命运也许真的眷顾他建立的那个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的荆南政权。论地盘，荆南不过三州十七县；论人口，不过数十万，中原一郡而已。在唐末五代十国的大乱世中，有很多割据政权，论实力，要远强于荆南。比如李茂贞建立的岐国，刘守光建立的燕国，周行逢延续的楚国。但命运就是如此吊诡，大政权反而不为正史承认，反而是小小的荆南倒被正史承认，成为十国之一。当然，高季昌首先要感谢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干祖父朱温；另一个就是撰写《新五代史》的欧阳修。没有朱温，就没有高季昌主政荆南；没有欧阳修把荆南列入十国世家，他的荆南小王国早就被历史的铺天黄尘所淹没了。

对于规模较小的政权之生存法则，无外乎一点，这个小政权处在几个大政权之间，出于地缘战略的均衡，各大国都不会吃掉它。说来巧合的是，高氏荆南所占的辖区，在四百年前的南北朝末期，也出现了一个辖区相同的小政权，就是萧氏后梁（为与朱温后梁区别，此称“西梁”）。西梁夹在三个大国——北周、北齐、南陈之间，最终被志在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废掉。

西梁是完全附庸于北周的傀儡政权，毫无自主能力，而荆南则拥有不被大国控制的内政治权。西梁是有背后老大北周撑腰的，而荆南在开始二十年也算是有老大站台的，就是朱梁王朝。可朱梁亡后，荆南政权没了奶娘，完全是靠自己的“厚脸皮”在江湖上吃拿卡要、坑蒙拐骗、闪转腾挪四十年，小日子过得反而非常滋润。

高季昌这个人的来历很有意思，他生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

年），陕州（河南三门峡）人，因出身贫苦，被家人送到开封富商李让家中当奴才。给人当奴才使唤是没出息的，但谁都没有想到，天上掉下一块馅饼正好砸在高季昌的脑袋上。宣武军节度使朱温认了李让当干儿子，来到李让家中胡吃海喝，正好看到相貌不凡的高季昌，聊了几句，朱温觉得此子可教，就让已改名朱友让的李让收高季昌当义子。本来前途灰暗的高季昌一夜之间跳出苦海，成了当时权倾一时的朱使相的干孙子，实际上，高季昌只比朱温小五岁而已。

朱温开始把高季昌带在身边历练，教他骑马射箭。朱温是一代创业枭雄，能识人，他这种级别的人能看上的人物，自然不是凡品。唐天复二年（902年）五月，梁王朱温发兵攻打劫持唐昭宗李晔的岐王李茂贞，李茂贞打不过朱温，死守不战，众将劝朱温见好就收。而高季昌则站出来反对退兵，他向朱温献了一计。计策并不是很高明，只是让朱温派人骗李茂贞说自己要退兵，实际上埋伏数万梁军，等李茂贞傻乎乎地出城占便宜，结果被梁军一通暴打，李茂贞差点把看家老底都赔光了。在朱温的威逼下，李茂贞不情不愿地把奇货可居的皇帝交给朱温，朱温顺利完成了篡唐大业。高季昌为朱温立下不世奇功，朱温自然要赏干孙子一块大肥肉。

唐天祐三年（906年）十月，朱温攻占荆州重镇江陵。江陵北控中原，西凭两川，东临江东，南接楚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必须派心腹人把守。朱温把这块肥肉交给了高季昌，高季昌出任荆南节度使，这也是荆南国的开张元年。

当时的荆南节度使辖八州，但高季昌只占有首府江陵一州，而且战乱不断，百姓流散。高季昌是个干事的，招抚百姓，恢复生产，江陵渐渐恢复元气。在名义上，高季昌是朱梁王朝的外放官员，实际上荆南的高氏印记越来越浓厚，高季昌在江陵城内说一不二，这应该也是朱温的默许。

在强敌环伺的复杂环境下，高季昌的生存策略非常简单——背靠

大树，自力更生。

大树是梁朝，但等到朱温被杀后，朱友贞继位，他要面对晋王李存勖强大的进攻压力，根本无暇管干侄子高季昌的死活。实际上，这棵大树只起到战略作用，对高季昌来说，他要生存，最需要做的是把自己变成一棵大树。

大树是不希望小树苗再变成一棵大树的。不过，高季昌做不了大树，但他有能力阻止大树掠夺属于自己的荫凉。平心而论，高季昌的综合能力完全可以和那些南方大佬马殷、王建、杨行密、徐温、钱镠、王审知平起平坐，只不过生不逢时罢了。因为江陵地理位置太过重要，各方都想吃掉高季昌。高季昌进攻能力一般，但守成是没有问题的，吴国权臣徐温新执政之初想立威，去占高季昌的便宜，结果被一把火给烧回去了。

因为高季昌也没想到竟然能打败强大的吴军，心理开始膨胀，反而主动去开疆扩土，直到被西川王建、楚国马殷给狠狠修理一顿，高季昌才从迷梦中醒来。高季昌知道自己的斤两，他不再张牙舞爪，而是收起兵锋，把有限的资源用在稳定对内统治上。

此时的高季昌，与东汉末年寄居荆州的刘皇叔倒有些相似之处。刘备奔波半生没有寸土，原因就在于自己身边没有谋士，所以刘备三顾茅庐请来摇鹅扇的诸葛亮。高季昌也知道自己智力浅薄，身边没人绝对不行，他也挖空心思得到了自己的诸葛亮。

谁呢？唐末进士梁震。

梁开平元年（907年）十月，身在中原的梁震因不愿侍奉朱三，借道江陵要回四川老家，半路却被高季昌拦下了。高季昌只有一个要求：先生不要入蜀，留在江陵给我当诸葛亮吧。梁震本来不想给高季昌这个井龙王当龟丞相，但在高季昌半真诚半威胁下，最后还是留了下来。

梁震的谋略水平在大国相对稍次，但对只有三州十七县的区区荆南来说足够用了。梁震为报高季昌知遇之恩，倾其才力相助，荆南能在各大鲨鱼的口中活下来，梁震功不可没。

除了梁震，高季昌还收留了不少从中原过来的流离名士名将，高季昌知人善任，这些人也愿意为高季昌效力。荆南虽小，但人才储备相当充实，各路军阀也不敢小瞧荆南。没有这些智士给大脑经常短路的高季昌提醒，精神似乎不太正常的老高早就被人给灭了。

有一次就能证明梁震之于高季昌的重要性。

公元923年，梁朝被后唐灭亡，李存勖策马入汴，高季昌自然要拜李亚子的码头。因为要避李存勖祖父李国昌的名讳，高季昌改名高季兴（以下改称高季兴）。高季兴要去洛阳拍李存勖的马屁，以防这个神经病突然进攻荆南，而梁震是坚决反对他北上的。梁震的理由是高季兴是梁朝旧臣，手握重兵，很容易引起李存勖的猜忌，万一把你扣下，欲为诸侯而不可得。高季兴不听，强行北上，结果郭崇韬劝李存勖扣留高季兴，幸亏李存勖还不糊涂，说扣高则失天下人归顺之心，这才放了高季兴。高季兴抹着一头冷汗，玩命般逃回江陵。

事情够惊险，但此次洛阳之行也有很大的收获，就是高季兴看清了李存勖狂妄自大的本质，也看清了后唐帝国潜伏着的乱象：功劳是他一个人的，与功臣无关；妇人干政，荒及酒色，入洛才几个月就已失人心。高季兴反而放心了：这样的李存勖，自保尚不能，是不会对荆南构成威胁的。

因为看透了李存勖的本质，所以高季兴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生存策略，对于渐入混乱佳境的中原，高季兴开始动手动脚了。李存勖兵变灭亡、李嗣源称帝后，已经灭掉前蜀的李存勖之子、魏王李继岌事先在蜀中搜罗了价值四十万贯的财物，要通过江陵转回中原。这支舰队溯长江而上，逆止江陵后，再也走不动了。

原因很简单：这支船队被高季兴强行扣下，财物均归高季兴本人，至于船队人员皆杀之。高季兴脸不红心不跳地为自己辩解：这四十万财物本就不是李存勖的，更不是李嗣源的，强者得之。

当然，这笔巨款也不是高季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高季兴算定了李嗣源性格比李存勖更软弱，这才敢动手的。但当高季兴看到李嗣源张牙舞爪怒吼的时候，他一定会非常后悔不该惹毛藐吉烈。

高季兴占了李嗣源的便宜，还想继续吃豆腐，唐天成元年（926年）六月，他想让李嗣源割让夔州（今重庆奉节）、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县），理由是荆南狼多肉少。李嗣源一代枭雄，只不过脾气好，就被高季兴如此调戏，他岂能踩这个雷？

李嗣源平时不咬人，一旦咬起来，那就得连皮带肉都得撕下来。李嗣源对高季兴的无耻作风非常反感，发兵狠狠地敲打了高季兴，高季兴派往三州接管的高家子弟全被当地政府乱棍打出，高季兴骨头没啃到，反而咯掉了大门牙。这一次李嗣源是动真的，唐天成二年（927年）三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北路军，东川节度使董璋、副使西方邺为西路军，楚王马殷为南路军，三路讨伐荆南。

高季兴从来没有遇到雪崩式的外交灾难，甚至他向吴国求救，也被不想得罪李嗣源的徐温拒绝。从阵势上看，李嗣源是铁心要灭荆南，占据战略要冲。而高季兴敏锐从中发现了生机，那就是瓦解楚王马殷对帮助后唐消灭荆南的动力。马殷何尝不知，一旦荆南为后唐所有，那么后唐兵锋就直抵洞庭湖，虽说楚国向中原称臣，但战略要害如果被中原占据，如果中原要灭楚国……

很简单的道理，马殷自然心领神会。所以高季兴向马殷服软，马殷立刻答应了。当然事情也有反应，马殷撤兵之后又后悔了，还想占高季兴的便宜，派岳州刺史李廷规进攻荆南，被善守不善攻的高季兴零敲碎打给吃了。马殷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也绝了吞并高季兴的念

头，让高季兴替楚国看好北大门，更符合楚国的利益。

高季兴的实力太过弱小，所以他只能通过这种几乎是鸡蛋上跳舞的方式来求生存。鸡蛋皮薄易碎，用力过大犹不及，而高季兴的这种圆滑处世之道反而适合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中生存。在几个鸡蛋上踩着薄皮跳舞，最重要的技术就是平衡，高季兴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吴国徐温死了，养子徐知诰夺权，而吴国与中原是世仇，所以徐知诰更认同与荆南联合对抗中原。高季兴再次嗅到了“商机”，向吴称臣，吴国自然接受，封高季兴为秦王，正式与荆南联合。

荆南三州之地，和中原比是蚂蚁与大象的差距，但高季兴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和另外一头大象称兄道弟。甲象和乙象是竞争关系，那么，这只小蚂蚁可以从容地周旋在两头大象之间，占尽便宜。

这就是高季兴的本事。

在十国中，高季兴为子孙攒下的家业最小，但含金量却是最高，毕竟这么小的家业在如此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竟然屹立不倒，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为子孙拼了一辈子的高季兴病倒了，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十二月去世于江陵小城，时年七十一岁。

江陵是南方各大镇向中原政权朝贡的必经之道，所以高季兴经常做劫道的买卖，等各镇或写信责骂，或出兵讨伐时，高季兴又不得不把吞到肚里的东西吐出来，所以各大藩镇都瞧不起高季兴。其实跳蚤般大小的荆南能在梁、唐、晋、契丹、汉、周、宋、前蜀、后蜀、楚、湖南、吴、南唐等十多个大政权的夹缝中生存五十多年，实在很不容易。江陵地寡民贫，处四战之地，所以高季兴为了生存，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偷张家鸡，摸李家狗，顺带着拔了王二家的蒜苗。各大镇的头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他们是高季兴，他们会如何去做？

高季兴死后，把这份蚂蚁般大小的家业传到了长子高从海。高从海在父亲身边长大，目睹父亲耍的那些滑头本事，自然也从小练就了

一身油滑功夫。高从诲继位时，荆南的生存格局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从荆南生存角度考虑，高从诲没有改变父亲制定的生存战略。

高从诲首先改善了与后唐李嗣源的关系。其实，吴国徐知诰本想拉拢高从诲，高从诲固然不想得罪吴国，但吴国距离荆南远而后唐近，再加上后唐是中原正统政权，吴与后唐又是敌对关系。从荆南利益考虑，宁可得罪吴国，也不能得罪中原，所以高从诲向李嗣源表达了善意。李嗣源自然接过高从诲的善意，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李嗣源封高从诲为勃海王，两国和好如初。

要说明的是，高从诲的外交策略不是“一边倒”，跟后唐当小弟，与吴国结仇。处在荆南这个特殊的地缘节点上，高从诲要广结宾朋，是个人都能被高从诲当成朋友相处。荆南处北唐、东吴、西蜀、南楚之间，四战之地，谁也得罪不起。高从诲对四大国奴颜婢膝，今天给这个磕头称臣，明天拍那个马屁，从中吃点残羹剩饭。各大国都瞧不起高从诲，给高家二少爷起了一个响亮江湖的诨名——高赖子。

高从诲的“英雄事迹”不少，专摘几例。

吴国徐知诰篡位建立南唐，高从诲向徐知诰称臣。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灭李从珂建立晋朝，高从诲向石敬瑭称臣。石敬瑭因为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辽国国主耶律德光为干爹，受尽天下笑骂，所以高从诲对晋朝称臣，在很大程度上为石敬瑭的尴尬解了围。石敬瑭非常感激高从诲，派翰林学士陶穀出使江陵，高从诲拍尽了石敬瑭的马屁，说什么只要陛下统一天下，臣愿尽犬马之劳云云。石敬瑭被高从诲的马屁拍得非常舒服，自然大喜，送给对于荆南来说极其宝贵的一百多匹马。当然，石敬瑭也不是傻子，高从诲得寸进尺，向石敬瑭索要郢州（今湖北钟祥），石敬瑭根本不理他。

高从诲其实也没把石敬瑭当回事，你不过是给耶律德光当干儿子，换我坐你那个位置，一样认干爹。高从诲不管谁在中原当皇帝，

照例磕头叫爸爸。耶律德光入汴，高从诲拜倒在耶律德光的臭脚下，耶律德光大喜，又赏给高从诲一些马匹。

耶律德光以为高从诲是忠臣，其实高从诲是两边下注，同时又和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眉来眼去，但条件是刘知远称帝后把郢州给他。刘知远嘴上答应非常爽快，但等他进中原后，根本不知道高从诲这号鸟人是谁。高从诲出兵去夺郢州，被刘知远暴打一顿，自然就老实了。以荆南的实力，和强大的中原帝国硬碰硬，只能鸡飞蛋打。但这次惨败之后，高从诲及时调整生存策略，不再和中原硬掰，老老实实装孙子。

小公司在几家大公司并存的格局下如何生存？其实道理很简单——吃大鱼剩下的残羹剩饭，一块肉屑都能让小虾吃个肚饱。而有些小虾野心太大，一定要吃到大餐，但因为自己肚皮太小，根本容不下大餐，最终撑死。

高从诲最终也没被撑死，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十月，五十八岁的高从诲病逝于江陵，长子高保融接过了这个蚂蚁般小国的权杖。

荆南在高保融以后的事情，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因袭其祖高季兴、其父高从诲的滑头政策，四处揩点油混饭吃。要说区别，高保融更倾向于其父“紧抱中原大腿”的方针，毕竟中原实力最强。特别是一代伟大帝王柴荣继承大位后，整军顿甲，大杀四方，统一之势已成，高保融自然知道该站在哪一边。高保融紧抱柴荣大腿，甚至还曾经给后蜀孟昶写信，劝孟昶归降柴荣。

时代总是会出现变化的，高保融的时代，中原、吴、蜀、楚四大国格局不复存在。周行逢的楚国只堪自保，南唐被周朝吃掉淮南十四州，后蜀精锐被周朝消灭，中原独大。高季兴的时代，虽然李存勖强大到几近无敌，但政治的腐败让中原并不在四大国格局中占据优势。

处在四战之地，如果不能根据时局变化调整外交政策，一味搞中

间外交，迟早是要吃大亏的。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八月，高保融病死，其弟高保勳继位。在荆南五位君主中，高保勳是最能出洋相的，甚至到了搞笑的地步。高保勳是高从诲最疼爱的小儿子，高从诲脾气不好，但只要看到高保勳就喜笑颜开，人称“万事休”。高保勳身体不太好，但夜生活却很丰富，当上王爷之后，高保勳大兴土木，建造亭台，耗尽了荆南仅有的一点家当，荆南百姓怨声载道，高保勳不理睬。更搞笑的是，高保勳把江陵城中的妓女都召到王府，让身体强壮的侍卫上前调戏妓女，浪笑声四起，高保勳则搂着妻妾，坐在帘后欣赏A片。

.....

然后，高保勳就死了，时间是北宋建隆三年（962年）十一月，继位的是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几个月后，即建隆四年二月，荆南被北宋大将慕容延钊灭亡，高继冲奉上老祖宗打下的三州十七县的“江山”。

活在虚幻的悲剧世界中

——北汉老皇帝刘崇的悲苦人生

北汉是十国之一，应该放在篇尾部分，但因为篇幅实在有限，所以把北汉开国皇帝刘崇的生平附在后汉篇之后。

五代十国总共有三个自称汉朝的政权，一个是刘知远建立的后汉政权，一个是刘^龑建立的南汉政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这个政权属于十国，但它的法统却来自五代的后汉，相当于东晋之于西晋，南宋之于北宋，这就是北汉——五代十国最坚硬的一个存在。

北汉在五代十国中是相当另类的存在。论国力，北汉甚至不一定强过小小的蚂蚁荆南，论经济更是穷得一塌糊涂，连大臣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但要论士兵的战斗力的，却是五代十国位居前列的，千古一帝柴荣如此强硬的存在，却拿北汉奈何不得，连番进攻无甚可取。到了赵匡胤时代，中原依旧拿北汉没有任何办法，直到赵光义，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极其勉强地攻克北汉。柴荣与二赵征服天下的过程，没有哪个政权像北汉那样让中原吃尽苦头，晋人剽悍，所言非虚。

要说北汉，首先得说北汉的开国皇帝刘崇。

五代十国有两个刘崇，一个是朱温的老东家刘崇，朱温偷的就是刘崇家的大锅，被刘崇捉脏暴打一通；另一个就是北汉刘崇。

严格来说，刘崇不是创业皇帝，因为刘崇是五代后汉建立者刘知远的亲弟。如果没有刘知远铁血打下汉朝江山，以刘崇的资质，他是很难像杨行密、王建那样赤手空拳创业的。

刘崇虽然长得漂亮，史称“为人美须髯，目重瞳子”，然而并没有

用。因为没有门路，穷困中的刘崇只能靠赌博混日子，还喜欢喝酒，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靠赌也没混上饭吃，只好狠心参军，在脸上“黥”上字迹，像西汉名将黥布（即英布）那样。

刘崇的运气很不错，他参军后，他的大哥刘知远就在军界混出头了。刘知远在晋天福六年（941年）做到河东节度使，刘崇再也不需要靠赌博或军饷混日子了。刘知远对弟弟虽然提携，但也没有完全重用，直到刘知远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二月在太原称帝，南下争夺中原，必须留下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守住河东根据地。刘崇是作为母弟，完全依附于自己吃饭，是再合适不过的留守人选。刘崇当上了二号皇帝的河东节度使，是他发家的第一步，这为他后来在河东建国打下人脉基础。

刘知远至死都没有召刘崇入汴梁辅政，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刘知远已定下由杨邠、苏逢吉、史弘肇，外加郭威的“3+1”的辅政格局，四人智力远在刘崇之上，不需要刘崇。二、河东是天下第一大镇，由亲弟刘崇镇守，一旦中原有变，刘家后人还能在河东吃上热饭。另外，刘知远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刘崇和四大臣关系并不融洽，特别与郭威关系尤其糟糕，刘崇去了汴梁只能添乱。

刘崇能力一般，但他也想刘家坐稳江山，但他觉得最能威胁到刘家江山的只有郭威。而等到郭威平定李守贞之乱后，官场威望极高，刘崇已经开始考虑郭威对刘家的实质性威胁。此时的刘崇有了割据河东，以应对未来郭威（有可能）篡位中原之急的想法。当然，这不是刘崇的主意，而是河东节度判官郑珙眼界高于天下，说中原不久必乱，大人应该固守河东，退可自为一王，进可争雄天下。刘崇这才搜刮民财，肥了自己的腰包，给弟兄们发军饷，日夜操练，以备不时之需。

形势发展果如郑珙所料，刘承祐发动乾祐之变，汴梁城中血雨腥风，郭威起兵邺都，中原大乱。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刘承祐

死于汴梁城外，郭威控制汴梁城。

郭威突然得势，让刘崇坐立不安，他想趁郭威在汴梁立足未稳之际，南下吃掉郭威。刘崇的计策未必不好，但郭威是千古一帝级别的人物，他早就料到刘崇会这么做。郭威聪明绝顶，他知道刘崇的软肋在哪里。

刘承祐死后，朝臣要推举新皇帝，郭威坚决推立驻守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刘赞为嗣君，无他，因为刘赞是刘崇的亲生儿子。在名义上，刘赞是高祖刘知远的养子，但却是刘崇的骨肉，郭威推出刘赞，立刻就让刘崇强硬的态度软化下来。实际上，以郭威之枭雄，怎么可能甘居刘崇这号赌棍之下？郭威利用人性的弱点，成功地在刘崇身上赚取足够的战略时间差，他写信给刘崇说，我脸上有黥字，自古哪有雕青天子？刘崇竟然相信了。

等刘崇回过味来，他的宝贝儿子刘赞已经在宋州被郭威部将郭崇给干掉了。

然后，郭威就称帝了。

刘崇哭了。

在冰天雪地里，刘崇哭得肝肠寸断，他恨透了郭威，他更恨自己的目光短浅。太原少尹李骧早看出郭威一肚子坏水，劝刘崇不要上当，刘崇已沉迷在太上皇的迷梦醒不过来，竟然杀了李骧，理由是万一激怒郭威，刘赞必为郭威所害。结果刘崇也看到了，刘崇一味巴结郭威，郭威照样干掉自己的儿子。

五十七岁的刘崇对天发誓：一定要向郭雀儿讨还杀子之仇。

从李骧判断这件事来说，刘崇的战略能力要比郭威低好几个层次。如果刘崇听李骧之计，郭威必然会顾忌到河东强悍之兵，毕竟郭威在汴梁根基太浅，他还不肯公然与刘崇翻脸。郭威因为“汉大臣不

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所以郭威有可能会拖延称帝时间，只可惜刘崇竟然白白浪费这个战略时间差。刘崇如果出兵南下与郭威争雄，胜负犹未可知，毕竟刘知远在后汉的政治影响还在。可等郭威把一切麻烦都解决了，刘崇也只好坐在太原城中哭鼻子了。

郭威当了皇帝，刘崇也当了皇帝。

在哭天抢地中，刘崇悲壮地坐上了帝位，国号大汉，年号仍称汉乾祐四年（951年）。“刘皇叔”一脸泪痕地看着殿下伏首众臣，叹了口气，他说了段让所有人都心酸的话：“本来轮不着我为帝，只是高祖皇帝手创天下，一旦为郭威所夺，不得已而为之。朕孤守河东十二州，其窘甚也，朕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天子呢？你们算是什么样的宰辅大臣？朕手头也没多少钱，所以待卿必然少薄，卿等也不怪怨朕吝嗇。”

刘崇说得辛酸，众人默默无语。

刘崇说的都是实情。北汉本就是地瘠民困，人口又非常少，总户口不过四万，人口不到五十万。财政状况非常差，宰相每月只能领到一百贯钱的工资，节度使只有三十贯钱。换成现在的货币单位，相当于四万五千多，以及一万三千多。这样的工资对老百姓来说肯定是高薪，但这些宰相、节度使每家都有十几甚至几十张嘴吃饭，这点钱显然不够开销。

朝廷穷得叮当响，怎么办？只能向老百姓伸手了，史称北汉“国中少廉吏”。更要命的是，为了对抗郭威，刘崇向契丹称臣，每年都要向契丹奉送大量财物，更加重了北汉的财政负担，再加上刘崇还要养活庞大的军队，真的无钱可花。

刘崇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恶人，他也不像石敬瑭那样不顾廉耻，认个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契丹人为干爹。石敬瑭出于私利认干亲，而刘崇虽然也认比自己小二十三岁的契丹皇帝耶律阮为叔父，与契丹结为父

子之国，但刘崇却是为了“高祖之业不致坠地”，才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

客观来讲，郭威确实对不起刘崇，把刘赟还给刘崇就是，何必斩草除根。刘崇是个有尊严的人，他不可能在儿子被杀的情况下还向郭威叩头称臣，这将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刘崇宁可认个和自己无仇无恨的小干爹，也要和杀子仇人郭威死磕到底！

从这个角度看，刘崇的血性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自从刘赟被杀后，刘崇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只有一个——向郭威讨还血债。

刘崇向契丹请兵，但还没等契丹发兵，满怀仇恨的刘崇就发兵找郭威算账去了。北汉刚建国不久，北汉军就由刘崇长子刘承钧统领南下犯周境。虽然北汉军被周军轻松打退，死伤惨重，但这也拉开了刘崇时代没完没了地与周朝战争的序幕。

刘崇只认一个死理，不讨还血债，他死不瞑目。

过了半年，当年（951年）十月，刘崇联合契丹兵南下攻周。

作战过程与上次不太相同，但结果还是北汉军惨败。冰天雪地里，北汉军死伤无数，本来能耐寒的契丹军也被冻回老家了，刘崇只好窝在太原皇宫里的火炉边大骂老天不长眼，奈何助郭雀儿？现在刘崇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郭威早点死，只要郭威一死，中原无主，刘崇就有机会杀进汴梁，然后掘墓鞭尸……

很显然，在刘崇的世界里，郭威是唯一让他感觉到畏惧的男人。至于早被确定为太子的郭威养子柴荣，刘崇正眼也没瞧过。

刘崇苦盼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北汉乾祐七年（954年）正月，好消息传到太原：郭威病死，柴荣嗣位。

可以想见刘崇此时的激动心情，脑补一下画面：六十岁的刘崇站在冰天雪地里，抖着花白胡须，痛哭流涕，然后大笑：逆贼郭麻雀，该死久矣！大汉朝中兴，就在今日！

刘崇也老了，他知道自己没有几天活头了，为了报儿子被杀之仇，他必须杀进汴梁，手刃五花大绑的柴荣，快意恩仇。刘崇已经意识到，他将是石敬瑭第二，柴荣不过是第二个石重贵罢了。

梦想很美。

遇到郭威，刘崇两次南犯都被敲肿脑袋，而如今，他的对手是千古一遇的军事天才柴荣，以卵击石，卵还以为自己是石头，扬扬得意地说：眼前这块卵……

关于高平之战，已经在《英雄敌不过天意——漫谈周世宗柴荣之战高平》说详细解读，这里不重复。刘崇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来到角斗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一拳KO掉对手，没想到自己却差点成为柴荣的俘虏。

刘崇应该还记得，柴荣的三个亲生儿子就死在自己的侄子刘承祐手上。

刘崇惊魂未定，柴荣就率周军杀到太原城下，周军四处攻城略地，占领了北汉大半州县。刘崇不擅长进攻，防守倒是一流，当然这也有赖于太原城的坚固。周军在太原城下来回折腾，因为当时周军还没有进行军改，部队纪律很差，无法形成合力。再加上连旬大雨，周军泡成了落汤鸡，柴荣权衡利弊后，只好含恨撤军。

刘崇再次擦拭着额头上惊恐的汗水。

经过这番惊吓，刘崇病倒了，他也知道自己这一次躺下，再也起不来了。孤苦刘崇经常思念被郭威杀害的儿子刘赞，每一次绝望的思念，陪伴这位孤穷老皇帝的只有悔恨无尽的泪水。

北汉乾祐七年（954年）十一月，北汉世祖刘崇死于太原，寿六十岁，皇子刘承钧继承大位。

因为北汉是中原死敌，北宋继周朝法统，再加上北宋十九年都没能啃下北汉这块硬骨头。北宋在修《旧五代史》时，北汉还没有灭亡，所以宋史家对刘崇极力贬低，称“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这话倒没有说错，刘崇称帝，确实有些自不量力，可观刘崇这辈子，总是能联想到三国刘皇叔，二人何其相似。都是最弱小的政权，但都以恢复中原为立国根本，不顾自己实力微弱的事实，数度主动进攻中原，最终力尽而亡。

刘崇，其实还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北汉世系年表

君主	姓名	在位年 (用五代年号)	生卒年	备 注
世祖	刘崇	乾祐 951—954 年	895—954 年	后汉高祖刘知远弟
孝和帝	刘承钧	乾祐 954—957 年	926—968 年	刘崇长子
		天会 957—968 年		
废帝	刘继恩	天会 968—968 年	935—968 年	刘承钧外甥兼养子，守孝期间为刘继元所杀
末帝	刘继元	天会 968—974 年		刘承钧外甥兼养子，为人凶暴，重用宦官，擅杀大将，父事契丹，国人离心
		广运 974—979 年	不详—991 年	979 年，北宋进攻北汉，刘继元守不住，出降

附：五代十国世系年表

五代

后梁（907—923年）

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太祖朱温	开平	907—910年
	乾化	911—911年
废帝朱友珪	凤历	911—911年
末帝朱友贞	贞明	911—920年
	龙德	920—923年

注：太祖朱温住洛阳

后唐（907年建国，
923—936年）定都洛
阳

庄宗李存勖	同光	923—926年
明宗李嗣源	天成	926—930年
	长兴	930—933年
闵帝李从厚	应顺	934—934年
末帝李从珂	清泰	934—936年

后晋（936—946年）
定都汴梁

高祖石敬瑭	天福	936—942年
出帝石重贵	天福	942—944年
	开运	944—946年

后汉（947—950年）

定都汴梁

高祖刘知远	天福	947—948年
隐帝刘承祐	乾祐	948—950年

后周（951—960年）

定都汴梁

太祖郭威	广顺	951—954年
世宗柴荣	显德	954—959年
恭帝柴宗训	显德	959—960年

十国

前蜀（907—925年）

定都成都

高祖王建	武成	907—911年
	永平	911—915年
	通正	916—916年
	天汉	917—917年
	光天	917—917年
后主王衍	乾德	918—925年
	咸康	925—925年

后蜀（934—965年）

定都成都

高祖孟知远	明德	934—934年
-------	----	----------

后主孟昶	明德	934—938年
------	----	----------

	广政	938—965年
--	----	----------

吴（907—937年）定

都广陵（今江苏扬州）

杨行密	开国	
-----	----	--

杨渥	唐天祐	905—909年
----	-----	----------

杨隆演	唐天祐	909—919年
-----	-----	----------

	武义	919—920年
--	----	----------

杨溥	顺义	920—927年
----	----	----------

	乾贞	927—929年
--	----	----------

	大和	929—935年
--	----	----------

	天祚	935—937年
--	----	----------

南唐（937—975年）

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

烈祖李昇	昇元	937—942年
------	----	----------

中宗李璟	保大	943—958年
------	----	----------

	中兴	958—958年
--	----	----------

	交泰	958—958年
--	----	----------

	周显德	958—961年
--	-----	----------

后主李煜	宋年号	961—975年
------	-----	----------

南汉（917—971年）

定都兴王（今广东广

州)

襄宗刘隐	唐梁年号	904—911年
高祖刘岩	梁年号	911—917年
	乾亨	917—925年
	白龙	925—928年
	大有	928—942年
少帝刘玢	光天	942—943年
中宗刘晟	乾和	943—958年
后主刘鋹	大宝	958—971年

闽(907—945年)定

都长乐(今福建福州)

太祖王审知	梁、后唐年号	907—925年
王延翰	后唐年号	925—926年
太宗王延钧	后唐年号	926—933年
	龙启	933—935年
康宗王昶	永和	935—936年
	通文	936—939年
景宗王延曦	永隆	939—943年
殷帝王延政	天德	943—945年

吴越(893—978年)

定都临安(今浙江杭

州)

武肃王钱镠	唐、梁、后唐年号	893—924年
	宝大	924—926年
	宝正	926—932年
文穆王钱元瓘	后唐、后晋年号	932—941年
忠献王钱弘佐	后晋年号	941—947年

忠逊王钱弘倬	后汉年号	947—948年
忠懿王钱弘俶	后汉、后周、北宋年号	948—978年

楚（896—951年）定

都长沙

武穆王马殷	唐、后梁、后唐年号	896—930年
衡阳王马希声	后唐年号	930—932年
文昭王马希范	后唐、后晋年号	932—947年
马希广	后汉年号	947—950年
恭孝王马希萼	后汉年号	950—951年
马希崇	后周年号	951—951年

附后楚

周行逢	后周、北宋年号	955—962年
周保权	北宋年号	962—963年

荆南（907—963年）

定都江陵

武信王高季兴	后梁、后唐年号	907—928年
文献王高从海	后唐、后晋、后汉年号	928—948年
贞懿高保融	后汉、后周、北宋年号	948—960年
高保勳	北宋年号	960—962年
高继冲	北宋年号	962—963年

北汉（951—979年）

定都太原

武信王高季兴	后梁、后唐年号	907—928年
--------	---------	----------

文献王高从海

贞懿高保融

高保勳

高继冲

后唐、后晋、后汉年号 928—948年

后汉、后周、北宋年号 948—960年

北宋年号

北宋年号

960—962年

962—963年

吴越世系

君王	姓名	在位年	生卒年	备 注
武肃王	钱镠	893—932 年	852—932 年	893 年，唐昭宗封钱镠为镇海节度使
文穆王	钱元瓘	932—941 年	887—941 年	钱镠第五子。为人“好儒学”，能作诗，但生活奢侈，花钱如流水。941 年，杭州发生大灾，烧掉吴越国库，钱元瓘受到惊吓，精神失常，不久病逝
忠献王	钱弘佐	941—947 年	928—947 年	即位时十三岁，诸将皆不服，钱弘佐杀诸将不服者，或迁于外地，诸将震恐。闽国内乱，钱弘佐力排众议，发兵南下，破南唐兵夺下重镇福州，扩展了吴越国的生存空间
忠逊王	钱弘俶	947—948 年	929—975 年	被内衙统军使胡进思废黜并软禁，975 年病死
忠懿王	钱弘俶	948—978 年	929—988 年	978 年，畏北宋进攻，主动向宋太宗赵光义举国投降

闽国世系一

君王	姓名	在位年	生卒年	备 注
太祖	王审知			
	王延翰	926—927 年		王审知长子。王延翰暗示群臣拥戴他为闽王，用后唐年号。王延翰个头高，美容貌，却是“妻管严”。老婆崔氏“陋而淫”，专杀美女多达 84 人，后被雷劈死。王审知养子王延禀不服王延翰，勾结王延钧推翻王延翰，杀之
太宗	王鏐	927—934 年		王审知次子，即王延钧。王鏐继位后，杀王延禀，上书李嗣源，要求朝廷封他为尚书令，被拒绝，王鏐怒而断绝对后唐的朝贡。王鏐喜欢道术，装神弄鬼，宠信道士。在道士陈守元蛊惑下，王鏐称帝，令国计使薛文杰专抄富人家产，以为私用。王鏐喜欢奴婢陈金凤，立为皇后，又宠男宠归守明。归守明趁王鏐得病时，与陈金凤私通。皇子王继鹏发动兵变，斩杀王鏐

闽国世系二

君王	姓名	在位年	生卒年	备 注
唐宗	王昶	935—939 年		王鏐长子，即王继鹏。王昶狂妄自大，向晋称臣，又羞辱晋朝使节。石敬瑭“怒其不逊”，下诏大骂王昶昏狂，并拒绝接受闽国贡品。王昶信鬼神，宠信道士陈守元和妖人林兴，大兴土木建道观，建道像。王昶重自己嫡系部队而疏远其他部队，引起不满，控鹤都将连重遇和拱宸都将朱文进起兵谋反，王昶出逃，连、朱二人迎立王延羲。王昶在路上被王延羲之子王继业所杀，妻子皆死，谥为康宗
景宗	王延曦	939—943 年		本名王延义，又改名王曦。王曦同样狂妄自大，昏庸无道。大臣犯法，只要花钱都可以赦免无罪。爱钱如命，王曦嫁女儿，大臣不掏彩礼钱，王曦大怒，要人弹劾百官。王曦自称唐太宗再世，丑态百出。王曦好男色，和外甥李仁遇鬼混在一起，甚至让外甥当宰相。王曦还好饮酒，常在国中牛饮。王曦怀疑连重遇对自己不忠，连重遇畏惧，联合朱文进发动叛乱，趁王曦醉酒后，在马上杀之，谥为景宗
恭宗	王延政	943—945 年		王审知之子。王曦昏暴，王延政上书劝谏，王曦不听，反恨王延政。王延政控制建州，自称大殷国皇帝，与王曦互相攻杀。后连文遇推立朱文进为帝，闽人不服，王延政趁机率攻下福州。随后南唐军灭闽，王延政力尽而降，迁往金陵

南汉世系

君王	姓名	在位年	生卒年	备 注
襄宗	刘隐	904—911 年	873—911 年	刘谦之子
高祖	刘岩	911—942 年	889—942 年	刘隐之弟
殇帝	刘玢	942—943 年	920—943 年	本名刘洪度，刘岩次子。好酒及色，宠用小人，为弟刘晟灌酒拉杀
中宗	刘晟	943—958 年	920—958 年	本名刘洪熙，杀兄篡位后，杀尽所有同父兄弟。柴荣即将统一天下，刘晟畏惧欲降，却被楚国所阻。刘晟忧虑，饮酒而死
后主	刘鋹	958—971 年	942—980 年	本名刘继兴，刘晟长子，晟死继位。刘鋹宠爱太监，甚至要求国人欲做官者，必须净身入宫。南汉人口百万，太监就有两万。南汉权阉龚澄枢非常得宠，南汉人认为真皇帝是龚澄枢，而非刘鋹。刘鋹与波斯国宫女淫乱，宫中乌烟瘴气。917 年，北宋军灭南汉。刘鋹本想乘船去东南亚，但船只被太监开跑，刘鋹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刘鋹入汴。赵匡胤请他喝酒，他以为酒中有毒不敢喝，赵匡胤微笑着喝下此杯

姜狼

七十年代生人，喜欢历史，尤其是乱世史。曾经出版过多部反映乱世历史的作品，如《五代十国风云录》、《刘宋帝国兴亡录》、《北周北齐兴亡史》、《三国原来是这样》、《春秋原来是这样》、《五朝宰相冯道》、《千古一帝周世宗》。风格沉稳，文笔间透着一股幽默劲，让人在会心一笑中品味历史的兴亡。

历史中国

· 960—1279

宋朝

原来是这样

醉罢君山◎作品

这是一个极好的时代，
文明昌盛，民间社会极度富足，
朝廷对知识分子无限优容。

这是一个极坏的时代，
军事孱弱、外交被动，
变法改革沦为政治投机家的博弈。

这是一个充满谜团和传奇的时代，
「烛影斧声」「金匮之盟」，包青天、杨家将……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宋朝原来是这样

醉罢君山◎作品

现代出版社

目录

- 一 黄袍加身：一出政变的游戏
- 二 二李之乱：帝国的敌人
- 三 鸟尽弓藏：杯酒释兵权
- 四 统一之路（上）：平定荆湖
- 五 统一之路（中）：后蜀的灭亡
- 六 统一之路（下）：春花秋月何时了
- 七 铩羽而归：啃不下的硬骨头
- 八 斧声烛影：宋太祖死亡之谜
- 九 谜中之谜：“金匱之盟”的秘密
- 十 长车踏破：征服北汉之战
- 十一 当头一棒：自负的代价
- 十二 旗鼓相当：宋辽边界拉锯战
- 十三 雍熙北伐：虎头蛇尾的远征
- 十四 杨业之死：忠烈杨家将的真实故事
- 十五 诸神之战：耶律休哥与李继隆
- 十六 盛世危机：王小波、李顺起义
- 十七 千钧一发：吕端大事不糊涂
- 十八 澶渊之盟：走向绥靖的策略
- 十九 西夏开国：从李继迁到李元昊
- 二〇 奇耻大辱：大国打不赢小国
- 二一 庆历新政：夭折的改革
- 二二 文武之道：包拯与狄青
- 二三 熙宁变法（上）
- 二四 熙宁变法（下）
- 二五 新旧党争：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
- 二六 宋徽宗：皇帝与艺术家

- 二七 方腊起义与水浒英雄
- 二八 与虎谋皮：海上之盟始末
- 二九 引狼入室：宋金开战
- 三〇 靖康之乱：两个皇帝当了俘虏
- 三一 南宋开国：不进取的朝廷
- 三二 苦撑危局：力挽狂澜的宗泽
- 三三 高宗南渡：一路狂奔的皇帝
- 三四 以汉制汉：刘豫与伪大齐政权
- 三五 血战关陕：吴玠的表演舞台
- 三六 中兴之战：岳家军的崛起
- 三七 十二金牌：不败而败的北伐
- 三八 “莫须有”：岳飞之死
- 三九 风云再起：书生亦能建奇功
- 四〇 孝宗北伐：心有余而力不足
- 四一 乾道和议：长使英雄泪满襟
- 四二 庆元党禁：韩侂胄时代
- 四三 开禧北伐：丧权辱国之战
- 四四 北方变局：宋、蒙古、金三国演义
- 四五 一手遮天：政坛不倒翁史弥远
- 四六 联蒙灭金：海上之盟的翻版
- 四七 反目成敌：蒙宋战争
- 四八 钢铁堡垒：鏖战钓鱼城
- 四九 权臣误国：千古罪人贾似道
- 五〇 曲终人散：南宋帝国的灭亡
- 五一 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 五二 拨开迷雾见繁华：宋代的经济奇迹

宋朝历史大事记

[返回总目录](#)

一 黄袍加身：一出政变的游戏

城头变幻大王旗，这是乱世的写照。

乱世常有，但大王旗变得如此之快，却是罕见。

大唐帝国灭亡后，偌大的中国四分五裂。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仅仅是中原政权就换了五个，平均每十年时间就完成一次政权交替。我们必须说，这是一个缺乏创意的时代，因为每个政权所使用的国号，无一例外都是历史上曾有过的。为了区别雷同的名称，史学家只好统统加上一个“后”字，因此有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中原政权。至于地方割据政权，那就更多了，所谓的“十国”，指的是势力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的十个地方割据政权，分别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一时间，中国大地之上，皇上遍地都是。

万岁爷很多，可惜的是，这些大王们命却不长。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过把皇帝瘾就死了。五代的历史，就是一连串的政变史。什么仁义道德法律人权，在这个时候统统失去价值了，剩下的只是原始的本能，只有征服与被征服，杀人与被杀。

在说宋史之前，先简略说说五代，不略知其事，就不知宋的由来。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改国号为大梁，五代史由此为开端。五年后，朱温被儿子朱友珪所杀，弑君者还没坐暖皇帝宝座，便被弟弟朱友贞干掉了。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国号大唐，灭了后梁。后

梁存国仅十七年，共三任皇帝。

后唐开国仅仅三年，唐庄宗李存勖便被叛军所杀，李嗣源继位。李嗣源当了八年皇帝后去世，李从厚继位，很快被李从珂赶下台。公元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借契丹之兵，灭了后唐，李从珂自焚身亡。后唐存国十四年，共四任皇帝。

石敬瑭在契丹支持下，建立后晋政权，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石敬瑭死后，继位的石重贵与契丹翻脸，可是他高估了自己的力量。经过数年苦战，后晋败于契丹之手，石重贵成为阶下之囚，后晋灭亡。后晋存国十一年，共两任皇帝。

契丹人入主中原，改国号为辽。与此同时，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自立为帝，号召诸道反契丹。在各地纷起的反攻下，辽太宗耶律德光被迫撤出中原。刘知远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后汉，这一年是公元947年。五代史没有一个皇帝当得久，仅仅一年后，刘知远便去世，他的儿子刘承祐继位。在政权频繁更迭的年代里，君与臣之间的信任降至冰点。公元950年，刘承祐突下重手，连杀大臣，并想除掉手握重兵的天雄节度使郭威。郭威不得不反，率军反攻开封，刘承祐败亡，后汉仅仅存在四年便灭亡了。

皇帝轮得可真快，这回轮到郭威加冕，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定都开封，这也是五代史里最后一个中原政权。郭威称帝后第四年（954）去世，其养子柴荣（又称郭荣）继位，他是五代史中出类拔萃的一位皇帝。柴荣在位期间，南征北战，败北汉，征南唐、后蜀，北伐辽国，大有鼎定乾坤之势。可惜的是，他与五代多数皇帝一样短命，在位六年便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九岁。

皇帝早死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因为继位的小皇帝根本没有能力来统御臣下，对于野心家来说，此乃篡位夺权的最好机会。

七岁的柴宗训被推上皇帝的宝座。说起“皇帝”这两个字，我们总是联想到无上权威，可是对于五代时的皇帝来说，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五十年的时间，光是中原政权就换了十四个皇帝，其中有一半是以发动政变、兵变的形式夺权。皇帝被打倒、被推翻、被赶下台，甚至被杀，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连朱温、李存勖这样的枭雄都栽了跟头，何况一个年仅七岁的小皇帝呢？

开封百姓都以冷漠的心态在猜想着：谁会是下一个皇帝呢？

天很冷，风如刀割。

但开封城百姓脸上挂着些许的笑意，因为新春佳节来了。无论是血腥的战争或残酷的政变，都夺不走人们内心深处对幸福的向往。那个时代，人的生命比芦苇还脆弱，可是生活再坏，也仍然要过下去。

公元960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文武百官一大早便上朝了，向皇帝拜年，庆贺新春佳节，那时叫“正旦”，一年的第一天。这本来君臣间其乐融融的时刻，岂料皇宫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和谐的气氛。

原来是边关的加急快报。

团拜活动不得不中止，小皇帝呆呆地、似懂非懂地听着：北方边境定州、镇州两地发现重大敌情，契丹与北汉联手，发兵入侵。

这还了得！要知道节庆之日，往往是戒备最松懈的时候，若不积极应对，恐怕要损兵丧地了。小皇帝当然不知道要怎么办，宰相范质、王溥等人担心边关守军抵抗不住凶悍的契丹骑兵，必须要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前往增援。那么要派谁去呢？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京城禁军的总头目，同时也是归德军节度使兼检校太尉。

岂知赵匡胤此去，竟是黄袍加身，推倒了大周江山，创建了大宋王朝。

其实京城早有流言飘荡：“策点检为天子。”这种流言怎么传出来的，谁也不知道。流言是有威力的，有人传，就有人听，就有人窃窃私语。但赵匡胤却似乎没听到的样子，春节休假也取消了，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办事的效率很高，第二天，第一支先锋部队出发了，由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统领，出了开封城。紧接着，大年初三，赵匡胤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出发，晚上抵达开封城东北四十里处的陈桥驿。

辽人入侵所引发的恐慌情绪很快被开封城的寒风所驱散，有赵匡胤这位能征善战的名将亲自出马，北线无忧矣。新春浓浓的喜庆氛围并没有受到影响，可是谁能料想到，就在这一晚，在陈桥驿，将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个装神弄鬼的人出现了。

黄昏时分，太阳西沉。禁军部队正忙着安营扎寨，有个人远眺西方，凝望着红红的太阳，忽然开天眼似的说道：“瞧，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什么意思呢？他看到了两个太阳，当然，除了他谁也没看到。在西沉太阳之下，还有另一个太阳，这意味着什么呢？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乃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如今天上出现两个太阳这怎么行呢？影射到国家，一个国家怎么能有一位君主呢？

这个人名叫苗训，因为对天文地理颇有研究，在军中颇有名望。观测天象后，他又神秘兮兮地说了一句话：“此天命也。”尽管谁也没有看到两个太阳，但苗训的话却很快传开了。这个暗示太明显了——要变天了。

于是乎军队开始骚动了，军官们鬼鬼祟祟，士兵们窃窃私语。到了入夜时分，一批军官与士兵凑到一起，有人提议说：“如今主上幼

弱，我等拼了老命杀敌，他能知道吗？不如先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然后再北征。”这一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鼓掌，好，就这么办！于是大家群情激昂，涌向主帅赵匡胤帐前请愿，要拥他为皇帝。

明眼人当然心里有数，大家都是在演戏罢了。这出戏的总导演就是赵匡胤，至于什么天象学家、什么请愿将士，统统都是临时演员罢了。可是戏既然演了，还是要演得逼真点，假戏也要真做嘛。

将士们要请愿，要把赵匡胤抬出来当皇帝。可是赵匡胤没出来，很不巧，他贪杯了，喝多了，醉得不省人事，正酣然入睡呢。

说是不巧，其实很巧。

我醉了，我睡了，所以你们搞兵变，搞阴谋，统统与我无关。

请愿的将士当然没见着统帅赵匡胤，只见到了他的弟弟赵匡义与军师赵普。大家都以专业精神投入到演戏中，这些“闹事”的将士慷慨陈辞道：“军中兄弟们已要决定了，要拥立太尉为天子。”太尉就是赵匡胤，他除了是殿前都点检之外，也是检校太尉。赵匡义正色地批评说，这怎么行，这种造反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然后将士们又据理力争，双方开始争执了，最后诸位军官看软的不行，来硬的，把刀啊、剑啊等家伙亮了出来，你赵匡义不答应，我等就要动用武力了。

营帐外动静很大，喧嚣声如此大，可是赵匡胤却似乎一点也没听到，因为他还在“酣睡”，把事情交给弟弟赵匡义去打点。在将士们的“逼宫”下，赵匡义让步了，他对诸将领说：“好吧，改朝换代，虽说是天命，实际是人心所向。但你们要答应一件事，你们各回兵营，势必要约束好诸军，不得纵容士兵剽掠，只要都城人心安定，那么国家也会安定的，你们也可保富贵荣华。”

就这样，在这一晚上，从赵匡义到士兵，都决定了一件事：要拥

立赵匡胤为皇帝。

然而，赵匡胤还在呼呼大睡。

他睡得那么香，那么甜，以至于嘴角还露着微笑。

他看上去那么天真，对夜晚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第二天清晨，赵匡胤终于“醒”来了，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就在这时，只听得外面喊声一片。拉开帷幕，只见得大帐之外，诸将领率士兵围成一圈，身着铁甲、手执兵刃。几个将军见到赵匡胤起床了，便径直上前，跪道：“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还没等赵匡胤吭出声来，这几个将军便一拥而上，把一件黄袍裹在他身上。此时诸将土齐刷刷地跪下，高呼“万岁”。

这就是所谓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谋反、篡位，这在中国政治里可算是大逆不道之事。可是赵匡胤却仿佛在整个事件置身事外似的，似乎他是在全然无知的情况下，被无辜地推上前台。不得不说，此人深得厚黑学之精髓，名也捞了，利也捞了，却一副被逼无奈的模样。

我们不能不说，赵匡胤确实是天才级的演员。戏还没完，我们看看他的表演，他跺了跺脚说：“罢罢罢，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不当也不行了。只是我有号令，你们能听从不？”大家齐呼道：“唯命是从。”

这话说得够绝，够经典。不是我贪图富贵，而是你们贪图富贵；不是我要兵变，而是你们在搞阴谋；不是我要谋反，而是被你们挟持的。

一句话，把所有的罪名，统统推到别人身上了。

既然被拥立为天子了，那军队自然不向北挺进了。那么辽军南下入侵边关的事情怎么办呢？其实不必担心，因为根本没有辽军入侵。所谓的边关危急的情报，原来就是糊弄朝廷的幌子罢了，只不过是这出闹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情节罢了。

这支大周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出门才逛了一天，第二天就打道回府，又回开封城了。包括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在内的朝中大员不由得头皮发麻，他们知道，出大事了！

这近乎是一次完美的政变，几乎不流血。

但还是流了一点。京城之内，只有一个人企图反抗，此人是侍卫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当他得知赵匡胤部队政变的消息后，从皇宫溜了出来，打算率领自己的部众拼死抵抗。但他运气不好，路上遇到赵匡胤手下大将王彦升。王彦升策马直追，一直追到韩通家中，把韩通一家人全都杀了。

政变的军队把皇宫包围了。不多时，宰相范质、王溥等人被一帮将领押到赵匡胤面前。此时的赵匡胤固然已经把整个京城握在手中了，但他仍然还要演戏，要向世人昭示自己篡权绝非出于自愿。他甚至呜咽流涕了，哽咽道：“我深受先皇厚恩，只是被六军将军所逼迫，不得已才这样做。我深感惭愧，有负天地，我要怎么办？”还是那么无辜，还是那么无奈。

范质还来不及吭声，听得到赵匡胤身边一位将领手按剑柄，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天须得天子。”这一喝，把范质吐到嘴边的话又吞了进去。倒是王溥比较识相，他退下台阶，向赵匡胤跪拜，承认他是新的皇帝。事到如今，范质也不得不跟着下拜。这两位当朝权臣都屈服了，那么小皇帝就算不退位也不行了。

很快，一纸禅让诏书下达了。小皇帝乖乖交出了权力，赵匡胤在众人的拥戴下，入皇宫崇元殿，即皇帝位，改元建隆，改国号为宋，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太祖。

第二天，开封百姓睁开睡眼时，发现国家的名字改了。“周”已经成为过去，“宋”的历史拉开了序幕。

这一年，赵匡胤三十三岁。

二 二李之乱：帝国的敌人

表面上看，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轻而易举，事实上，他通向权力之峰的路绝非一蹴而就。

我们且来看看赵匡胤早年的奋斗史。

公元927年，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当时是五代中的后唐时代。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大唐帝国的官员，父亲赵弘殷原本是后唐皇帝李存勖手下的将领，他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五代乱世中度过，直到后周时代才去世。可以说，赵匡胤是个“军二代”，在那个乱世里，军人的地位当然十分重要，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在中国历朝皇帝中，宋太祖赵匡胤大概算得上是功夫最厉害的人。现在武术里面有一套叫“太祖长拳”，据说便是他所创的。还有传闻说赵匡胤曾经在少林寺学过功夫，是真是假，现在也说不清了。正史对他的武艺也有所记载，“学骑射，辄出人上”，有一次骑一匹烈马时，脑袋撞在门楣上，大家以为他必死无疑，岂知一点事也没有，足见功夫确实不错。

高超的武艺对赵匡胤的军事生涯起到很大作用。公元948年，时年二十一岁的赵匡胤投奔郭威麾下，开始在军界崛起。他原本出身军人世家，自小对兵法韬略烂熟于胸，加上精湛的武艺，很快得到郭威的器重。郭威在公元951年发动政变，推翻后汉政权，建立后周政权，赵匡胤先后担任滑州副指挥、开封府马直军使等职。

郭威去世后，他的继子柴荣（郭荣）继位。北汉政权乘机联合契

丹大举入侵，周世宗柴荣亲自率军与北汉军决战于高平。在战役之初，周军出师不利，甚至有些将领在战场上倒戈，投降北汉。在此危急时刻，赵匡胤挺身而出，身先士卒，率自己的骑兵部队勇闯敌阵。在他勇敢精神的激励下，士兵们无不奋力死战，以一当百，终于力挽狂澜，大破北汉军。

高平之战，赵匡胤脱颖而出，这也让他赢得了皇帝的赞赏与器重。很快，他被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为禁军高级将领。当时周世宗柴荣深感后周军队建设存在很大弊端，决意改革，精兵简政。这项改革的重任便落在赵匡胤身上，这也给了他展露组织才能的机会，他淘汰老弱之兵，调选天下武艺高强之勇士重组禁军。此后，这支军队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堪称天下劲旅。

公元956年，赵匡胤追随周世宗柴荣征讨南唐。

在南唐之战中，他仍然光芒四射。先是在水战中大败南唐水师，夺取敌舰五十余艘；紧接着，赵匡胤又攻克滁州，生擒南唐将领皇甫晖等。特别在六合之战中，赵匡胤更是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奇迹，他以不到二千人的区区之众，打败了南唐两万军队的进攻，杀敌五千余人。战后，柴荣擢升他为定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这样，赵匡胤成为禁军的第二号头目，仅次于殿前都点检、郭威的女婿张永德。

对中原政权来说，北方的契丹（辽）一直被视为头号敌人。公元959年，即周世宗显德六年，一代明君柴荣御驾亲征契丹，从水、陆两路分兵北进，赵匡胤为水路军总指挥。后周军队连战连捷，先后攻下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莫州、瀛州、易州等，收取燕南之地。正当柴荣雄心勃勃欲收复幽州时，却突染重疾，不得不班师回朝。

周世宗柴荣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禁军一号头目张永德撤职，由赵匡胤出任殿前都点检。

有人认为张永德被撤职，乃是赵匡胤一手策划的阴谋。

据说周世宗柴荣在北伐契丹途中，看到一块木牌，木牌上写有“点检作天子”这几个字，于是便对张永德产生戒心。依笔者的看法，未必如此。柴荣并非后周开国皇帝的亲生子，而是养子。虽然他改名为郭荣，但在许多人看来，他继承帝业名不正言不顺。柴荣在病重时，不得不考虑自己百年之后，他的儿子能否稳坐江山。殿前都点检张永德乃是郭威的女婿，手握重兵，这不得不让柴荣忧心忡忡。而赵匡胤与郭家无渊源，显然柴荣更倾向于把兵权交给他。

纵然柴荣英明一世，有件事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在他死后不到两年，他所信任的赵匡胤居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窃取了柴氏江山。

从二十一岁从军，到三十三岁坐上龙椅，赵匡胤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

这位宋朝的开国皇帝此时正是年富力强、意气风发，他所发动的兵变夺权，几乎是不流血政变的典范。政变十分顺利，可是搞定了京师，改旗易帜，并不能说大功已告成。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节度使，手握兵权，他们是否会对新朝廷俯首听命呢？

昭义节度使李筠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政权。

李筠乃是后周的一员悍将，他武艺高强，能挽百斤强弓，早在后唐时代便入伍从军，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政权。郭威称帝后，提拔李筠为昭义节度使，坐镇潞州（今山西长治）。李筠担任昭义节度使的时间很长，地位相当稳固，可以说是非常有实力的地方诸侯。

赵匡胤政变夺权后，便积极拉拢诸地方势力。在这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里，大家对政权更迭之迅速早已见怪不怪了，对许多

人来说，管他龙椅上坐的是什么人，只要自己的权势不受动摇，又有什么关系呢？许多地方势力纷纷向新的中央政权表示效忠。可是，昭义节度使李筠却没有动静。

宋太祖当然晓得李筠的实力，他主动拉拢，许以高官厚爵。说实话，赵匡胤所开出的条件够令人心动的，他派使节抵潞州，加封李筠为中书令。

当李筠得知来自开封的使节抵达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拒见。这种态度可把他手下的官员吓坏了，大家望着这位节度使大人，一脸不解：您这不是要跟朝廷对着干吗？说实话，李筠也是过来人，从唐朝灭亡至今，皇帝都不知换多少了，如今又换一个，何必小题大做呢？大家赶紧纷纷上前劝谏，李筠没办法，勉强答应宴请朝廷使节。

酒菜都备好了，助兴的乐器也摆上来了，所有人都以为李筠回心转意了。岂料宴刚开席，宾客满堂，李筠出人意料地令人请出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画像，悬挂于厅壁之上。大家觉得不对劲了，此时李筠竟然对着郭威的画像，号啕大哭起来。无论是在座的宾客还是左右侍从，无不看傻眼了，李筠这种态度，不明摆着向皇帝使节示威吗？大家纷纷向使节敬酒赔罪道：“我家主公酒喝多了，千万别见怪啊。”

其实李筠之所以不愿意归顺新朝廷，并非仅仅忠于后周，更大的原因，乃是他认为赵匡胤是后辈，居然这样爬到他脑袋上，心有不满。况且赵匡胤授予他中书令之职，表面上是升官，实际是要让他离开潞州前往朝廷赴任，剥夺其兵权。这一点，李筠岂有不知之理。

李筠的态度，乐坏了一个人，他就是北汉皇帝刘钧。

几天后，一个来自北汉的使节秘密会见李筠，并带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乃是刘钧所写，约请李筠共同起兵，对抗新成立的大宋政权。李筠把这封信给儿子李守节过目，岂料遭到儿子的强烈反对，李守节甚至以泪洗面，苦谏父亲莫要对抗中央。李筠哪里听得进去，拂袖而

去。

建隆元年四月，李筠与赵匡胤的战争爆发了。

昭义节度使李筠敢以一隅之地对抗朝廷，无非仗着有北汉的支持。为了取信北汉皇帝，他起兵后马上把朝廷派到潞州的监军周光逊生擒，押往北汉，并送上一笔巨款，以求北汉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他又派出一支军队袭取泽州（山西晋城），杀死刺史张福，占据其城。

对于这场战争，李筠信心十足，在他看来，“吾周朝宿将，与世宗（柴荣）义同兄弟；禁卫之士，皆吾旧人”。他认为只要自己扛起郭威、柴荣的大旗为号召，后周旧将以及禁军官兵势必会倒戈，推翻赵匡胤的政权。

可是李筠的判断完全错了。

赵匡胤对后周旧将恩威并施，官照当甚至还获得提拔，俸禄照领，有几个人脑残想着为后周效忠呢？对于李筠的叛乱，赵匡胤是有充分准备的，当战火燃起时，他马上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率兵进讨。

李筠虽然得到北汉的援助，并被北汉皇帝刘钧封为西平王，可是很快矛盾就暴露了。北汉与后周是世仇，而李筠口口声声自称后周遗臣，令北汉皇帝大为不满；同时，北汉皇帝刘钧派了一名监军到李筠军中，这也引起李筠的不满。这种互不信任严重削弱双方联合作战的力量。

五月，李筠令儿子李守节镇守上党，自己率领三万多人向南挺进，欲与宋军一决雌雄。但是宋朝禁军的战斗力名不虚传，在长平之战中，石守信力挫来势汹汹的潞州兵团。为了迅速平定叛乱，刚刚上

台四个多月的赵匡胤决定御驾亲征。很快，石守信与高怀德便给皇帝送上一份厚礼，他们在泽州南大破李筠及北汉联军三万余人，生擒北汉将领范守图，击杀监军卢赞。

连吃败仗后，李筠只得龟缩在泽州，婴城固守。

六月，宋太祖赵匡胤抵达泽州，亲自坐镇前线，指挥攻城。可是泽州的抵抗还是很顽强的，十几天过去了，城池仍然未被攻克。赵匡胤召将领马全义询问攻城之计，马全义自告奋勇，率领一支敢死队攻城。这支敢死队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奋力登城，马全义更是身先士卒，在战斗过程中，他的手臂挨了一箭，他忍痛将箭杆拔出，不下火线，继续战斗。敢死队终于登上城墙，赵匡胤投入亲兵部队跟进，守军终于抵挡不住了。

泽州终于陷落了。李筠不愿成为宋军的俘虏，他在城池陷落后，自焚身亡。这位昭义节度使从起兵到败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攻克泽州后，宋军马不停蹄，进攻潞州。李筠的儿子李守节献城投降，由于他早先反对父亲造反，因而宋太祖格外开恩，赦免其死罪。

在李筠叛乱的同时，有一个人也蠢蠢欲动，他就是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在诸节度使中，李重进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他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也是战功赫赫的将领。在柴荣统治时期，他与张永德、赵匡胤等人分掌兵权。后周禁军有两大系统，一为殿前司，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为殿前都指挥使；二为侍卫司，李重进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柴荣临死前，把张永德撤职，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可以说，此时后周帝国的兵权就掌握在赵匡胤与李重进两人手中。

柴荣死后，朝廷授李重进检校太尉，改淮南节度使，出镇扬州。不久后，赵匡胤黄袍加身，篡位夺权，而后削去李重进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之职。李重进大惊失色，当即上表，请求进京面圣。赵匡胤担心他入京后号召旧部造反，遂拒绝其请求。李重进琢磨不透赵匡胤的内心，时不时寒意袭来，无所适从。

恰好在这个时候，李筠起兵反宋，李重进反复盘算，决心与李筠联合。他派心腹翟守珣走小路到泽州，与李筠商谈联合的事宜。可是李重进却忘了一件事，半个世纪的混乱，早已让忠诚的观念不值钱了。翟守珣一路奔往泽州，到那儿一瞧，泽州已被宋军围困，危在旦夕。他脑袋瓜一转，没去见李筠，而是跑去见宋太祖赵匡胤，干什么呢？告密！把李重进的阴谋和盘托出。

赵匡胤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并没有惊慌。试想想，李重进连最信任的心腹都要背叛他，他能掀得起狂风骇浪吗？宋太祖对翟守珣重重有赏，并让他速速返回扬州，游说李重进暂缓起兵，以免宋军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中。

翟守珣回到扬州后，编了一套故事忽悠李重进，要点就是说，现在不能轻举妄动。李重进焉能想到自己已经被出卖了，他听信了翟守珣的话，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可是这一观望，错失了起兵的最佳时机。

在平定李筠之乱后，宋太祖并没有直接攻打李重进，毕竟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谋反。可是绝对不能让他继续在扬州坐大，于是朝廷一纸令下，把李重进由淮南节度使调为平卢节度使。这下子李重进更加害怕了，担心一旦离开老巢，就会遭到赵匡胤的毒手。赵匡胤也是一个想得周到的人，为了让李重进安心，特赐免死铁券，以表立场。

李重进仍然不放心，因为他乃是周室近亲，郭威的外甥，而且有兵权。像他这样的人，岂不是新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吗？一道免死

铁券，难道真能保全性命吗？显然，李重进更愿意拼死反击，而非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中。他拒绝朝廷的调令，待在自己的地盘，修缮城池，积极备战，并向南唐求援。南唐早已没实力与大宋抗衡，哪里敢出兵相助，一口回绝了李重进的请求。

既然李重进造反已是事实，赵匡胤毫不客气了。

建隆元年十月，石守信被委任为扬州行营都部署，辖王审琦、李处耘等将领，率领精锐禁军部队讨伐李重进。谋臣赵普向赵匡胤指出：“李重进凭恃长淮，缮修孤垒，外绝救援，内乏资粮，宜速取之。”赵匡胤听从赵普提议，下诏亲征，统领六军将士从开封出发，乘舟顺流而下，直扑扬州。

皇帝亲征总能鼓舞士气，前线官兵更是奋勇作战，终于攻破扬州。李重进的结局与李筠类似，但更凄惨，在城陷时，他纵火自焚——不仅是他一个人，还包括他的家人，都在灼热的火焰下化为灰烬。

李筠与李重进先后败亡，新兴的大宋政权顶住了考验，帝国局势暂得安定。可是，对深谋远虑的赵匡胤来说，危险无时无刻不存在。一批旧军阀倒下了，一批新军阀又兴起，皇帝的龙椅随时可能被踢翻。该怎么办呢？

三 鸟尽弓藏：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在担心什么呢？

他没理由不担心。自五代以来，没有一个皇帝能长期稳坐龙椅，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仅仅中原就换了十几个皇帝，平均每个皇帝当不到四年，比现代美国总统任期还短。在这些皇帝中，不乏雄才伟略之人，比如后唐李存勖便是个英雄人物，可还是死于非命。谋杀、政变、叛乱交织为一幕幕血腥的政治史，对此，赵匡胤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一直在反思，那些死于非命的皇帝们，究竟犯了什么致命的错误呢？

一个人，无论他如何才华盖世，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夺取天下，他需要盟友与支持者。这一点，赵匡胤早就心里有数，自从他投军以来，便想方设法拉拢一批人，团结在他周围。他甚至采用拜把兄弟的方式，与九人结为生死弟兄，这九人分别是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杨光义、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这十个拜把兄弟又称为“义社十兄弟”，其中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等人参与了陈桥兵变，成为大宋帝国的开国功臣。除了义社十兄弟之外，赵匡胤在禁军中的亲信还包括慕容延钊、韩令坤、高怀德、赵彦徽、张令铎等人。

没有殿前禁卫军的支持，赵匡胤就不可能当上天子。坐上龙椅后，赵匡胤把殿前禁卫军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提拔为都点检，把另一支禁军侍卫军的一号人物李重进挤掉，换成韩令坤出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对于禁卫军在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赵匡胤比谁都清楚。他们的实力足以左右政局，甚至可以再度发动政变夺权。慕容延钊与韩令坤虽是宋太祖的亲信，但终究比不上结义兄弟亲。为了稳坐江山，赵匡胤对亲信也不能不防。

建隆二年（961），鉴于李筠、李重进的叛乱都已镇压，国势初定，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着手削弱大将们的兵权。他罢免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之职，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罢免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之职，改任成德节度使。从此之后，殿前都点检一职不再设，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则由结义兄弟石守信担任。

此时殿前、侍卫两支禁卫军的重要头目如下：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都虞侯赵匡义、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马步军都虞侯张令铎、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

在这些重要头目里，石守信与王审琦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赵匡义是亲兄弟，其他将领虽无结义，却也都是故交，情同兄弟。把禁军交给这帮兄弟，赵匡胤心里放心，只要禁军内部不动摇，其他人就难以窥视皇帝宝座。

史书上说，宋太祖“器度豁如”，确实如此。他从军队底层干起，一直到成为皇帝，若没有宽广的胸襟，就不可让那么多人团结在他周围。甚至可以说，赵匡胤身上有着某种江湖义气，江湖义气最讲究兄弟之情，他对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是信得过的。

但有一个人却不这样认为，这个人就是赵普。

赵普是宋代名臣，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于世，也是赵匡胤手下的重要谋士。大宋开国后，赵普升迁为右谏议大夫兼枢密直

学士，后来又升为兵部侍郎兼枢密副使。

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宋太祖赵匡胤对大宋帝国的未来忧心忡忡，便召赵普问道：“自唐末以来几十年时间里，帝王之家换了八个姓，混战不停，百姓流离失所，这原因何在呢？我想要平息这些混乱，使国家能长治久安，不知有何良策呢？”

赵普答道：“陛下能想到这些事，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国家陷入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藩镇的权力太大，致使君弱臣强。若是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夺藩镇之权，控制其钱粮，收其精兵，把财政、军权控制在朝廷手里，天下从此安定矣。”

宋太祖听完后，若有所思。

赵普是话中有话，矛头直对准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其实自从石守信、王审琦分领侍卫、殿前禁军后，他们不仅是皇帝的结拜兄弟，也是开国元勋，战功赫赫，在平定二李之乱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禁军中的地位稳若泰山。在此之前，赵普就多次进言，劝宋太祖把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调离禁军，另授他职，可是赵匡胤并没有听进去。

这次，赵普又旧话重提。皇帝不以为然地说：“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我最了解，他们必定不会背叛我的，你又何必操心这个呢？”

赵普回答道：“臣也不担心他们造反。只是以我的观察，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没有统御之才，恐怕难以制服他们的部下。万一部下想造反，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

这个回答太巧妙了。

赵普果然老谋深算，甚至可以说老奸巨猾。

劝谏皇帝是一门学问，说得太轻没效果，说得太过适得其反，有些话不能直接说，却又不能不说，这些都要有技巧。赵普这句话说，

令皇帝赵匡胤如梦初醒，为什么呢？当年陈桥兵变时，赵匡胤不是以受部下挟持为幌子，“不得不”当皇帝吗？这是他篡权的遮羞布，赵普当然不能去揭这块遮羞布，不然就犯忌了。可是赵普很聪明，他顺着皇帝的意思说话：当年您是被禁军胁迫当了皇帝，倘若现今禁军将领用同样的手段胁迫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当皇帝呢？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他们的忠诚呢？

这是语言的艺术。皇帝说兄弟们可信任，不会反叛，倘若赵普非得说他们会反叛，那不仅触怒皇帝，也会得罪石守信、王审琦这些大将，岂非吃不了兜着走吗？他拐弯抹角，既不得罪皇帝，也不得罪大将领们，但他的话却如一把飞刀，刺向皇帝内心最脆弱的地方。赵匡胤要毛骨悚然了。

经过几天内心的挣扎，赵匡胤终于铁了一条心，必须剥夺这些弟兄的兵权。怎么夺呢？以皇帝的权威，当然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刘邦的办法，兔死狗烹，把功臣一一剪除，一黑到底。这种手段太黑了，若能和平解决，不伤兄弟情面，那才是最好的办法。赵匡胤不愧是权谋大师，他搜肠刮肚，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这一天，赵匡胤在皇宫设宴，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领。虽然现在有君臣之别，但兄弟情分尚在，喝起酒来，其乐融融。喝到酒酣时，赵匡胤吩咐左右退下，只留下他与座上嘉宾。

就在这时，赵匡胤忽然长长叹了一口气。石守信等人一见，这怎么回事呢？便斗胆问道：“陛下为何叹气呢？”

赵匡胤又“唉”了一声，然后说：“我若不是依靠在座诸位，今天岂能坐在天子的宝座上。可说实话，天子也不好当啊，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呢！我从早到晚，没有一刻能高枕无忧啊。”

听到这话，石守信等人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细问其故。

此时赵匡胤装作半醉半醒的样子，叹道：“你们问这是为何，其实并不难知，谁不想坐我这个位置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这话，不由得心里一惊，个个赶忙辞座下跪叩首道：“陛下何出何言？如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宋太祖并不看他们一眼，只是默默举起酒杯，把酒一饮而尽，黯然神伤道：“我知道在座各位不会有异心，可是假若你们部下有人贪图富贵，若有一天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算想不干，又怎么做得到！”

轻轻的几句话，在石守信等人听来，却如五雷轰顶。皇帝这不是暗示他们会谋反吗？此刻他们一定深深体会到一句传统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伴君如伴虎。被皇帝怀疑，那是百口莫辩之事，古往今来，因为被皇帝怀疑而被杀的人有多少！

石守信等人魂飞魄散，长跪不起，顿首流泪道：“我等虽然愚昧，却断断做不出这等事。望陛下开恩，给我等指示一条活路吧。”

赵匡胤动容道：“唉，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人人都想要富贵，无非是为了多积累金钱，可享受欢娱，也让子孙后代不至于贫困。各位何不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购置些良田大宅，也好为子孙留一份产业。同时也可以多置些歌女舞女，每天可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与各位结为亲家，从此君臣之间，两无相猜，上下相安，这样岂不是很好吗？”

这些禁卫军首领都不是傻子，一下子就全明白了。他们的权势太大，皇帝是不放心了。说实话，皇帝能这样把心里话讲出来，也确实是把他们当作自家兄弟，总比背后找借口一一灭口强吧。谁也没有据

理反驳，只是叩头谢恩。

酒席散了。望着石守信等人的背影，宋太祖赵匡胤有点惴惴不安。这次摊牌的结果会怎样？他们会如他所愿地自动放弃兵权吗？或者明天他们将率领禁卫军杀向皇宫？这一夜注定很漫长，这一夜，皇帝注定难眠。

不仅是赵匡胤彻夜难眠，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也一样。在此之前，他们当赵匡胤是带头大哥，亲密无间，可是这一天，他们领略到了什么叫天威难测。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红霞映天。

皇城一如往昔，没有任何异动。到了上朝时间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斌等人陆续来了，纷纷递交辞呈，称身体有疾，要求自行解除兵权。这可把朝中众臣给搞蒙了，这些人可都是皇帝的亲信与爱将啊。但是赵普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赵匡胤却喜怒不形于色，当即批准辞呈，并下令重赏这几名将领。

一杯酒，就解去大将们的兵权，赵匡胤果然老谋深算。

皇帝是最大的赢家，从此，赵匡胤可高枕无忧了。

赵普也是赢家，从此，文臣地位在武将之上了。

石守信被任命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由于石守信与宋太祖关系密切且屡建战功，皇帝还是特别照顾他的面子，保留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但也不过挂名罢了，不再过问禁军事宜了。一年后，这虚职也被解除，石守信的名字也彻底从禁军名单中删除了。

这些宿将离开后，禁军仍然存在，那么如何预防新禁军将领兵权

过重呢？赵匡胤对禁军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目的在于限制禁军首领的权力，将兵权牢牢握在皇帝手中。

宋朝开国时，禁军有两大系统：殿前司与侍卫司。先说说殿前司系统。杯酒释兵权前，殿前都点检一职已不设，杯酒释兵权后，殿前副点检一职也被取消，重要职位只剩下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虞侯。再来看看侍卫司系统。在石守信之后，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也被撤销。侍卫司被一分为二，分别是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经过这一番调整后，禁军变为三大系统，但兵权更分散了，特别是新上任的将领，在禁军的威望及影响力，是完全不能与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这些开国功勋相提并论的。

赵匡胤是凭借禁军的力量才登上皇帝宝座，如今他不可能让历史重演，不能让其他人利用禁军来威胁其皇冠。

五代以来多政变，其原因就在于皇帝没有绝对的兵权。赵匡胤在赵普的协助下，恩威并施，果断收回兵权，这是宋朝得以长命的一大原因。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后，信守承诺，与这些卸职的将领们结为亲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嫁给王审琦之子，次女延庆公主嫁给石守信之子，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弟弟赵匡美娶了张令铎的女儿。

除了抑制禁军首领专权之外，宋太祖也采取种种手段抑制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削弱藩镇的兵权及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这就是所谓的“强干弱枝”的政策，这也成为宋朝的长期国策。在宋朝历史上，尽管外患比较多，但并没有形成中晚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这与宋太祖一系列中央集权政策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四 统一之路（上）：平定荆湖

中国向来有大一统的观念，对赵匡胤来说，摆在大宋帝国面前的一件艰巨任务，就是如何一统中国。

当时中国境内还分布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北方有北汉，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楚、南汉、南平等。这些割据，有的称帝，有的称王，有的称节度使，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北汉威胁最大。北汉国家面积虽不大，但有契丹人撑腰，并不容易对付。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商量之后，决定先对南方用兵。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

建隆三年（962）十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逝，把湖南军政大权交给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周行逢的部下衡州刺史张文表闻讯后勃然大怒，原来张文表与周行逢乃是老战友，曾经一起出生入死。他认为节度使之职，非自己莫属，岂能听一个小毛孩使唤呢？

张文表起兵反叛，挥师攻入潭州（湖南长沙）。周保权当即派遣大将杨师璠率兵讨伐叛军，并且向荆南节度使高保勳紧急求援。可是此时，割据荆南的高保勳却病逝了，他的侄儿高继冲继承其位。

湖南、荆南的节度使先后去世，对赵匡胤来说，这是扫平这两个地方势力的大好时机。

建隆四年（963），宋太祖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打着救援湖南的旗帜，出兵讨伐张文表。

醉翁之意不在酒。

赵匡胤的真正目的，在于乘机夺取荆南与湖南。他派卢怀忠出使荆南，表面上是外交，实际上则是刺探荆南的虚实。卢怀忠从荆南回来后，向宋太祖报告：“高继冲麾下控弦之士只有三万人，荆南谷物收成尚好，但官吏横征暴敛，百姓穷困，其势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取荆南易如反掌。”

这个情报相当重要，也促使赵匡胤下定收取荆南的决心。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成果呢？赵匡胤不愧是名将出身，他想起了三十六计的“假道伐虢”，便召见宰相范质等人，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江陵（荆南首府）已是四分五裂，现在我们以平定张文表之乱为由，向他们借路出师，到时顺手牵羊便可攻下荆南，有十足的把握。”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可行，于是皇帝把密令传达给在前线督战的枢密副使李处耘。

李处耘马上派人前往荆南，向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提出借道通行的要求。高继冲刚刚上台，年龄比较轻，政治经验不足，把军政大事都委托给孙光宪、梁廷嗣等人。对于宋朝军队借道通过的请求，荆南内部有不同看法。

把持大权的孙光宪说：“中原政权自周世宗时，已有一统天下的志向，如今赵宋兴起，其气魄规模较周世宗更为弘远。如今宋朝兴师讨伐张文表，这就如同以山压卵，湖南很快就会被平定了。依我的看法，不如早日以疆土归附朝廷，这样不仅荆楚可免于战祸，诸位也可保全荣华富贵。”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投降派，荆南兵马副使李景威以尸谏的极端方式抗议孙光宪的主张，这让高继冲犹豫不决。然而，宋朝大军却马不停蹄地向荆南挺进，行至距江陵百里的荆门，高继冲只得先派遣心腹梁廷嗣以犒师为名，前去打探宋军的真实意图。李处耘热情接待梁

廷嗣，款待有加，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宋军只是借道而已。梁廷嗣眉露喜色，派人快马通报高继冲。

岂料“兵者诡道也”，李处耘完全是放烟雾弹罢了。

他把梁廷嗣挽留在兵营，自己则率数千精锐骑兵，夤夜疾行，第二天已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江陵城外。高继冲大惊失色，以为宋军主力已杀到，手足无措，只得惶恐不安地出城相迎。其实李处耘只是打心理战，否则以他区区数千人，怎么攻得下江陵城呢？高继冲自投罗网，李处耘留下一批部队看守，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自己则率其他人马入江陵城。眼看自己的首领被绑架了，江陵守军岂敢轻举妄动，只得乖乖投降。等到慕容延钊率大军赶到时，江陵城已完全落入宋军之手了。

紧接着，无可奈何的高继冲宣布荆南三州十七县全部归顺大宋帝国。就这样，李处耘以自己的智慧与狡诈，兵不血刃地平定荆南，为宋朝一统中国立下殊功。

宋朝大举发兵，是打着平定湖南张文表叛乱的旗帜。就在李处耘智取荆南的同时，割据湖南的周保权政权已经成功地消灭了张文表。

但是宋军并没有止步的迹象，李处耘没有在荆南驻足，而是调兵遣将，直逼周保权所在的朗州（湖南常德）。周保权忧心忡忡，召判官李观象商讨对策。李观象直言道：“宋师以平乱为名出兵，如今张文表已诛，而宋师不还，必定是要尽取湖湘之地。荆南已灭，湖南也难以独存，不如趁早归顺朝廷，也不失荣华富贵。”但这种投降言论同样遭到军方强硬派的强烈反对，周保权最后决定武力抗拒宋师进入朗州。

赵匡胤仍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派出一位特使抵达朗州，告诉周

保权：“我派遣大军拯救你等于危难之中，为何反而要抗拒王师？这岂非自取灭亡吗？”这话说得实在够厚黑，张文表从叛乱到灭亡，一个宋朝士兵都还未在前线露过脸呢。但是没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明摆着俺横竖是要夺你地盘。

周保权当然不肯答应，宋太祖指示慕容延钊、李处耘，即刻发兵攻打朗州。湖南军陈兵于三江口，与宋师大战一场。慕容延钊挟平定荆南之威，兵多将广，士气如虹，一举大破敌军，攻占岳州。

岳州失守后，周保权调派主战派领袖、指挥使张崇富驻守澧州南。李处耘率军摆开作战的架式，战还未开打，湖南兵先乱了阵脚，望风而逃。李处耘挥师北逐，追到一个山寨，名为敖山寨，这里有一伙山贼，见宋军人多，撒腿便跑，被俘甚众。精于心理战术的李处耘又想出一个颇为恶毒的招数，把数十名膘肥体壮的山贼杀了，让士兵活生生地吃人肉。这可把其他山贼给吓死了，其余少壮山贼脸上被刺青后，李处耘下令放他们逃生。这伙年轻人个个吓破胆，逃到武陵城，逢人便说宋朝士兵吃人肉的事情，武陵军民也吓坏了，个个弃城而逃。

此时湖南境内，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慕容延钊乘机发动攻势，攻入朗州。周保权麾下大将张崇富在战斗中宋军俘虏后枭首示众，周保权则躲到一处僧舍中。李处耘的部将田守奇展开拉网式搜捕，终于发现周保权的藏身之所，将他押回大本营。周保权被俘，意味着湖南战事的结束。湖南十四州、六十六县悉数并入大宋帝国。

以前有光武帝刘秀“得陇望蜀”的故事，对宋太祖赵匡胤来说，则是得荆湖而望蜀。后蜀是盘踞西南的一大地方政权，公元934年由孟知祥所建立，孟知祥去世后，其子孟昶继位。蜀地天府之国，宋太祖

自然垂涎欲滴，早有夺取之心。荆南、湖南平定后，宋太祖把精明能干的张晖调任为凤州（陕西凤县东北）团练使，目的是收集后蜀的军事情报。

张晖不负所望，通过种种手段，把后蜀的山川地势险易摸得一清二楚，他把情报上交朝廷，并写了一纸密奏，细述攻取后蜀的战略方针。

对于大宋帝国的野心，后蜀当然也是心知肚明。

身为后蜀宰相，李昊预感大宋统一中国的日子不远了，他对皇帝孟昶说：“依我的观察，宋与前代汉（指后汉）、周（指后周）不同，天下乱了这么久，所有人都厌倦战争了，能够一统海内的，也只有宋了。我们不如及早向大宋进贡，这也不失为保全蜀地的长久之计。”也就是说，后蜀成为宋的藩国，仍可保持国家完整与独立。

孟昶一想，反正只要能保这块天府之国就行，就听从李昊的建议，打算派使者向大宋进贡。然而，枢密院知事王昭远力谏皇帝，说蜀地易守难攻，资源丰富，粮食充足，何必屈居人下呢？孟昶说到底当了三十年皇帝，面子还是要的，给王昭远这么一说，又把使者给撤回来了。不当宋的藩国，后蜀便积极备战，预防宋师入侵。

一年过去了，转眼间已是公元964年（宋乾德二年）。宋太祖赵匡胤并不是把后蜀给忘了，之所以迟迟未用兵，主要原因是北面遭到北汉与辽的牵制。这一年，宋在进攻北汉时，辽师救援，在石州打败了宋军。宋军的失利，对后蜀来说，无疑是一大喜讯，向来自视甚高的后蜀枢密院知事王昭远乘机游说皇帝孟昶，联合北汉，共同对付大宋帝国。

王昭远经常把自己比作三国时的诸葛亮，他也想与这位前代名臣一样建立伟大的勋业，其实两人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效力的国家都是蜀国。大家都知道，诸葛亮经常手持一把羽扇，王昭远别出心

裁地执一把铁如意，自以为这样更风流倜傥，更为潇洒。其实王昭远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说起来话来滔滔不绝。在他的怂恿下，蜀帝孟昶怦然心动，仿佛中原之地，已入自己的版图。

孟昶派孙遇、赵彦涛等人乔装打扮，打算穿过大宋地盘，进入北汉，把一封绝密信件交给北汉皇帝刘钧。这封密信的大致内容是说，蜀国已经在宋边界处增兵，约北汉共同出兵，夹击宋国。出于保密，该信用帛书写成后封装在蜡丸之中。

可谁曾想到，这封蜡书竟成为后蜀灭亡的导火索。

问题出在使者赵彦涛身上。他与孙遇等人潜入大宋国境后，心里盘算着以后蜀的实力，还幻想进攻大宋，岂非天方夜谭！于是他想，我何不以此蜡书，去博取些功名呢？这是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呢。想到这里，赵彦涛把蜡丸剖开，取得密信溜了，直奔开封城去。

当赵匡胤得到此密信后，欣然笑道：“现在我西取巴蜀，可谓师出有名了。”他派人把其他几名蜀国密使抓起来，详细询问了蜀国的军情及戍守要地，与之前张晖的报告相结合，绘制一张详尽的军事地图。

该年十一月，朝廷任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与刘光义、曹彬等共率步骑六万分路进讨后蜀。临行前，赵匡胤特别嘱咐说：“所至勿得焚荡庐舍，驱略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

当后蜀皇帝得悉赵彦涛叛变的消息后，知道联汉制宋的密谋已泄，不由得懊悔派错了人选。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抵抗宋师的进攻。自比诸葛亮的王昭远并不把宋师入侵当回事，在他看来，凭自己的才华，打败宋军那只是小菜一碟。蜀帝孟昶再次犯下大错，他把只会纸上谈兵的王昭远任命为西南行营都统，全权指挥前线作战。在饯别宴上，王昭远几杯热酒下肚，劲头上来了，攘臂喊道：“此行何止

是抵抗宋师，我只要率二三万的健儿，夺取中原也是易如反掌罢了。”

吹牛也吹过了，那么王昭远本事究竟如何呢？

很不幸，蜀军根本不是精锐宋师的对手。

五 统一之路（中）：后蜀的灭亡

伐蜀之战的大幕已经拉开。

宋军兵分两路，一路从凤州（陕西凤县）出发，由王全斌统率，以陆路行进；另一路则从归州（湖北秭归）出发，由刘光义统率，以水路行进。宋朝军队战前准备充分，对敌人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进攻目标十分明确。

先来看看北线战事。

王全斌挥师攻后蜀，夺取兴州，歼敌七千，并缴获军粮四十万斛，旗开得胜。紧接着又攻破鱼关、白水关等二十几寨。连吃败仗后，后蜀大将韩保正退守西县。宋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率前锋兵临城下，韩保正见宋师来势汹汹，不敢迎战，只是固守。正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蜀师心有怯意，岂能顽抗？史延德果断发起进攻，大败蜀军，生擒韩保正，并夺得军粮三十多万斛。

面对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后蜀军队不得不改变战略，烧毁栈道，以阻止宋军深入。唐朝大诗人李白曾经说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也是后蜀自恃的资本，但是历史证明，地形上的优势，也难以抵挡外来的进攻。在历史上，秦取巴蜀、东汉初期西南公孙述政权的败亡、晋灭蜀等经验都表明，蜀道虽难，人类可凭意志超越之。

栈道毁后，宋军确定被迟滞了。但入蜀之路并非只有一条，还有一条通道称为罗川路，只是这条路极为险要难行，这么多部队要穿越，难度更大。王全斌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走罗川路，另一路留下来

修栈道。到了宋朝的时候，工程技术已非秦汉时可比，加上宋军齐心协力，这条栈道很快便建成，两路大军在深渡顺利会师。

后蜀军队显然过于掉以轻心，他们不相信宋军能这么快克服障碍，故而疏于防备，居然连江上的桥也没有拆毁。宋军在夜晚发起突然攻击，夺取桥梁，大部队连夜过河，蜀军大骇，退守大漫天寨。无论是崇山峻岭或大河，都无法阻止宋军的步伐。王全斌兵分三路，夹击大漫天寨，大破蜀军，生擒蜀军义州刺史王审超。

在前线坐镇指挥的后蜀西南行营都统王昭远屁股再也坐不住了，他仍然那么潇洒，手执铁如意，亲自指挥对宋作战。可惜的是，他毕竟只是个会吹牛的家伙，一亮相水平就看出来了，三战皆败。王全斌的大军所向披靡，直挺进利州（四川广元）。垂头丧气的王昭远一路撤退，沿途拆毁江面浮桥，退保剑门。王全斌夺取利州，缴获军粮八十万斛。

再看看东路军的情况。

东路军在刘光义、曹彬的指挥下，从归州出师，以水路进击，水师溯长江而上，连破蜀军设在两岸的松木、巫山等要塞，歼敌五千人，生擒蜀军战棹都指挥使（水军司令）袁德宏，掳获敌舰二百余艘。

对后蜀皇帝孟昶来说，他对东部防线很有信心，因为蜀军在夔州设有坚强的防御阵地。为了预防宋师通过长江溯流攻击，后蜀很早就开始营造夔州防线，在江面上拉起几条巨大的铁索，把巨大的浮木串起来，横跨两岸。试想想，宋朝水师的战船行进至此，如何突得过去呢？不仅如此，蜀军在两岸还配置大量的大型投石机，一旦宋水师迟滞于此地，巨大的石头将从两岸飞出，把江面上的战船砸得稀巴烂。

可惜的是，夔州防御的情况，早就被宋朝间谍打探得清清楚楚。早在出兵之前，宋太祖赵匡胤就密嘱刘光义，当水师行进到夔州时，切莫在江面上争战，应当先暗地里派出步兵、骑兵，从陆地发起攻击，在陆上而不是在水上破坏其防御线。赵匡胤不愧是名将出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刘光义谨记皇帝的嘱咐，在舟师行进到了离蜀军防线三十里时，停止前进，秘密登陆，派出步兵及骑兵突袭蜀军阵地，摧毁投石机，并破坏了铁索浮木。这次突袭十分成功，蜀军精心构筑的防线瞬间被突破了。此时刘光义、曹彬指挥舟师进攻夔州。蜀军大败，放弃州城，退守白帝城。宋师乘胜追击，前锋抵达白帝城西。

后蜀宁江节度使高彦俦认为：“宋师涉险而来，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应该坚壁清野，持久抗战。”可是监军武守谦反对道：“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必须坚决反击。”武守谦不顾高彦俦的反对，自己私自带了一千多人马，出城与宋军交锋。刘光义抓住机会，纵兵迎击，武守谦大败，退回城内，宋师乘机登城，并很快杀入城内。此时高彦俦也回天乏力，他在与宋军的巷战中身受重伤，奔回自己的府第，纵火自焚而死。

这样，宋军在北线与东线均取得重大胜利，蜀国的局势已是岌岌可危了。

又是新的一年。

这一年是宋乾德三年，后蜀广政二十八年，公元965年。新春的到来，并没有让后蜀皇帝孟昶感到喜悦，相反，他的脸色阴沉沉的，比天上的乌云还沉。他曾经相信王昭远有诸葛亮那样的盖世才华，能力挽狂澜，但没想竟然损兵折将，有负皇恩。想来想去，还是自家可靠，于是孟昶把太子元喆派往剑门，又招兵买马，补充前线兵力的

损失。

此时宋军北线统帅王全斌在经过休整后，从利州直奔剑门。剑门乃是天险之地，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易守而难攻，何况蜀军在此布下上万名重兵。要如何攻克剑门呢？这是摆在王全斌面前的一道难题。此时，投降的蜀国士兵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情报：有一条秘密小道可以通往剑门以南。

这个情报太有价值了。王全斌马上派部将史延德率领一支军队，从小道直抄剑门后方。当宋军出其不料地绕道出现在剑门以南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王昭远大吃一惊。此时太子元喆虽然被任命为元帅，但他尚未到达剑门，因而负责指挥的仍是王昭远。王昭远被迫分兵，自己率部退守汉原坡，把剑门的防务扔给了手下的将军。

剑门虽是天险，但此刻兵力不足，王全斌严令宋军猛攻，终于攻破剑门。紧接着，王全斌与史延德合力进攻汉原坡，王昭远弃甲而逃。宋师经过一番扫荡，完全占据剑州。那位目空一切的蜀国大将王昭远逃跑之后，藏身于民宅，但最终仍然被宋军所俘，成为阶下之囚。剑门之役，后蜀共损失了一万多人马，更要命的是，国都的大门已然洞开。

被任命为元帅的后蜀太子元喆也就是个声色犬马之人，剑门失守，他也负有很大责任。他从蜀都出发后，一路上不忘美女美酒，日夜嬉戏，全然不理睬军务。在他看来，能享受赶紧享受，好日子说不定马上结束呢。当他行至绵州时，便传来剑门失守的消息，马上掉转马头，逃回成都。一路逃，还一路放火，把老百姓的房舍、粮仓统统烧毁，想用这种三光政策来阻滞宋军推进。

政府军对自己的老百姓搞三光政策，岂能不激起民愤呢？太子狼狽逃回成都后，向皇帝孟昶报告，孟昶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是囁囁地道：“计将安出？”

此时有一名老将站出来道：“宋军远道而来，肯定无法长久作战，请陛下迅速集合各地部队，坚守都城，等到宋师疲弊，自然会退兵。”六神无主的孟昶叹气说：“父亲与我据蜀四十年，老百姓丰衣足食，养了一大批士人，如今遭遇敌人，却没有人挺身而出，为我讨伐东来之敌。就算我闭关面壁，又有几人愿意为我效死呢？”

皇帝都心灰意冷了，何谈别人？

大宋北路军攻克剑门后，所向无敌。与此同时，东路军也捷报频传。夺取夔州后，刘光义、曹彬继续溯江挺进。所过之处，蜀军全无斗志，万州、施州、开州、忠州、遂州等刺史纷纷打开城门，举白旗投降。当时宋朝军队还袭承五代风气，每过一地，动不动就会发生屠戮事件。但是这种屠杀事件在东路军中却没有发生，这归功于曹彬，他不惜得罪诸将，力禁官兵屠杀无辜。

后蜀司空李昊早就预言，大宋将一统中国，如今敌人兵临城下，硬拼肯定死路一条。一年前，他就劝孟昶向大宋进贡称藩，只是受到王昭远的阻挠未果。如今王昭远已成宋军的俘虏，朝中主战派也没有人敢挺身而出了。李昊便又劝孟昶，把国库封存起来，向大宋投降。如今两路宋军节节逼近，孟昶也别无选择了，遂写了降表，差人递交给了宋军统帅王全斌。

从宋军发兵到后蜀投降，总计只用了六十六天，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伐蜀之役可谓是势如破竹。至此，后蜀灭亡，全国共计四十六个州、二百四十座县城以及五十三万户人口，全部归于大宋。赵匡胤一统全国之路，又迈出重要一步。

然而，在孟昶投降后不久，蜀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叛乱发生的原因，与宋军高级将领的恶行有直接的关系。

作为伐蜀总司令，王全斌仅仅用了两个月便平定蜀国，可谓是一时之良将。然而，入成都后，王全斌及其他一些将领，“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掳掠子女货财，蜀人苦之”。正直的东路军副将曹彬屡屡建议班师回朝，但王全斌置之不理。

对于后蜀留下的庞大军队如何处置呢？宋太祖下诏，令蜀兵开赴京师，一方面是增加禁军的力量；另一方面也预防发生蜀兵叛乱。这批蜀兵要从成都开到开封，当然得发给军饷兵粮，宋太祖为了笼络蜀人，下令多发钱粮。可是这一诏令的执行结果令人失望，王全斌等将领擅自克扣军饷，还纵容自己的部队阻挠、骚扰蜀兵。这些做法令蜀兵大为不满，当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爆发了。蜀兵行至绵州时，军队哗变，士兵们推举蜀国旧将全师雄为统帅，占据县城，扯起复国的旗帜，号为“兴国军”。

由于王全斌所部军队军纪极坏，蜀地军民怨恨已久，兴国军兴起后，人数迅速增长到了十万人之多。闹出这么大的事，王全斌心里也很不安，遂派马军都监朱光绪前往招抚叛军。岂料朱光绪非但不是以招抚为手段，反而将叛军首领全师雄的全家灭族，还把他的女儿强行纳为小妾。悲剧传来，全师雄咬牙切齿，悲愤万分，发誓血战到底，绝不投降宋朝。

全师雄率军攻克彭州，作为根据地，自称“兴蜀大王”。与此同时，成都附近十座县城同时起兵，积极响应兴国军。招抚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以武力平定叛乱。王全斌立即遣部将崔彦进、高彦晖率兵镇压，分道讨伐。在攻蜀一战中战无不胜的宋军居然出师不利，不仅吃了败仗，连高彦晖也被叛军击毙。此役大胜后，全师雄的声势愈发壮大，他出兵占领剑阁，切断成都与外界的联系，并沿江设立兵营，做好进攻成都的准备。在蜀地的四十六个州中，有十七个州追随全师雄叛乱，蜀地的形势愈发严峻。

此时的王全斌对战局的恶化忧心忡忡。后蜀毕竟立国三十余年，尽管蜀帝孟昶投降了，但军民的国家观念尚存，特别是一部分宋军官兵的暴行很快激起民愤，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兴蜀大王”全师雄。由于参与叛乱的蜀军官兵太多，为了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王全斌下令把成都一带的蜀兵迁到夹城内，解除武装。

当时宋军诸将（北路军）力主杀掉蜀国士兵，以绝后患。这个建议实在太恶毒了，以至于副帅康延泽提出一个折中意见：释放老弱残兵七千人，其余降兵则派一部分军队押送，沿水路押回大宋，若是遇到敌人进攻，再杀不迟。可是连这一提议，也遭到诸将的一致反对，本来要对付叛军就兵力吃紧，哪能再分出一部分兵力押送战俘呢？最后王全斌一咬牙，把蜀国降兵全部处死，共杀了两万七千人，犯下滔天战争罪行。

东路军的军纪略好于北路军，这主要是曹彬的功劳。刘光义、曹彬率领水师与叛军交战，屡败对手，全师雄的士气稍稍受挫。然而当后蜀降兵遭到集体屠杀的消息传出后，蜀国旧将吕翰在嘉州发动起义，与全师雄的部将刘泽会师后，攻破州城，杀死刺史、通判，部众达到五万人之多。曹彬赶紧回师，进攻嘉州。蜀叛军人数虽众，奈何战斗力不强，在宋军的猛攻下，嘉州失守，吕翰退走雅州。曹彬紧咬不放，一路跟踪追击，大破叛军，斩首数万人。

另一位表现卓越的宋军将领是康延泽，他被皇帝任命为普州刺史，募集一支四千人的部队，经过一番苦战后，击破叛军刘泽部三万余人。刘泽率部向康延泽投降，这对全师雄是一大打击。

全师雄的起义持续了一年多。乾德四年（966），宋太祖委任丁德裕为西川都检巡使，领兵数千奔赴蜀地。王全斌也加大了对全师雄的清剿力度，在战场上连战连捷。到了该年十二月，全师雄病死，叛军遂群龙无首。丁德裕、王全斌等分兵招抚叛军，这场大规模的叛乱方才得以平定。

但是后蜀臣民仍然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不屈不挠地斗争，他们改变斗争方式。第二年（967），蜀人到皇城开封告御状，控告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地豪取强夺的种种罪行。宋太祖下令把征蜀将领全部召回，深究王全斌等人贪污、逼反全师雄、杀蜀降兵二万余人之罪行。有关部门调查后，奏请皇帝，要求将王全斌等三名主要将领依法处死。宋太祖考虑到三人在讨平后蜀时的功绩，赦免其死刑，降级留用。惩罚虽然轻了点，但好歹给蜀人一个交代，也算安抚民心了。

六 统一之路（下）：春花秋月何时了

南唐是盘踞在东南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南唐建国于公元937年，开国皇帝是雄才大略的李昇。李昇去世后，其子李璟继位，此时正好遇上如日中天的后周政权。周世宗柴荣对南唐发动大规模战争，此战令南唐元气大伤，尽失江北之地，同时被迫取消帝号，向后周称臣。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大宋政权后不久，南唐国主李璟去世，继位的便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南唐后主李煜。

李煜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但他当国主却是悲剧，非但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原因很简单，他的才华乃是在文学上，而非政治军事上。如果仅仅只是没有政治才能，但兢兢业业、日理万机也不失为一个好君主。可是李煜完全就是昏君一个，史书上说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一眼望去，便是个亡国之君的样子。

大家想想，当时大宋帝国连灭荆、湖、蜀等割据政权，南唐偏安一隅，难道后主李煜就没有一点危机感吗？

当然不是了，他也有危机感。

但他并不是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而是沉溺于佛学中，幻想着佛法无边，帮他度过危机。他信到什么地步呢？他甚至把国库里的钱掏出来，招募人削发为僧，一时间满大街都是和尚，国都的僧人就超过一万人，而这些人供给都由官府承担，无疑令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宋太祖赵匡胤知道李煜非常信佛，便耍了一个阴谋，挑选了一些精通佛法、口才又好的人，南渡到了南唐，忽悠李后主说他原本乃是一个佛的转世。李后主居然信以为真，既然自己是佛，还犯得着担心宋国入侵吗？于是他的心思完全不放在治国守边之上，遂令国家一天比一天糟糕。

正所谓上行下效，后主李煜崇佛，自然有一大堆人跟着吆喝。中书舍人张洎投其所好，每见后主，不谈政事，只论佛法，结果很快便得到恩宠。其他大臣为了讨国主欢心，也不吃肉食了，只吃蔬菜，持戒修佛。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信佛的，比如说中书舍人徐铉，但这不等于他是务实派，他只是更偏好鬼神之说。

对李煜来说，他并没有什么大野心，只要能保住东南地盘不失即可。为此，他仍一如既往地宋朝纳贡。不过，既然是小弟弟，自然要为老大哥帮点忙。

宋太祖要求李煜这个小弟弟帮个小忙，让他出面，说服南汉政权（盘踞两广）归附宋朝。这个忙，小弟弟自然得帮，于是李煜写信给了南汉皇帝刘，劝他也向宋朝纳贡称臣。不想刘大怒，给李煜写了一封回信，骂了个狗血喷头。灰头土脸的李煜只得把这封信转交到宋太祖手中，宋太祖决心对南汉用兵。

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宋太祖遣大将潘美率领大军南征。

宋军势如破竹，连克贺州、昭州、韶州等地。次年，潘美再克英州、雄州，进逼广州。刘大为惊慌，他准备了十艘大船，满载金银财宝以及宫中妃嫔，打算逃往海外。岂料他还没上船，这十艘船便离岸远去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你皇帝要逃命，其他人就不逃命吗？这时大家也顾不得你是皇帝了，把船给盗了，开走了。刘走投无路，只得向潘美投降。

继荆、湖、蜀后，南汉全境六十州、二百一十四县并入大宋版图。

南汉灭亡，李煜有兔死狐悲之叹，毕竟唇亡则齿冷。

大宋军队已经横扫中南、西南、南方，地位东南的南唐已是风雨飘摇。虽然李煜仍然相信自己乃是一佛出世，可是现实却不能不让他有几分胆战。他思来想去，为了表示对大宋的效忠，决定把国号改了，不再使用“唐”的国号，而称为“江南”。同时，他还自己降低了政府部门的规格，比如说，中书门下省改称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御史台改为司宪府。这一切，说白了，是讨宋太祖的欢心。

在与大宋帝国的外交上，李煜小心谨慎，以藩臣之礼巴结宋太祖，可是他还是有一个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保持南唐的独立。当了那么多年的国主，他对奢侈的宫廷生活已经习惯了，要他放弃这些怎么可能呢？

有一件事让李煜感到惶惶不安：宋太祖要求他入朝。

一旦离开自己的老巢，去了大宋国都开封，那岂非羊入虎口？只要几个壮汉就可以把他收拾了。他不敢去，找借口推辞。到了这个时候，李煜开始想到有必要缮甲募兵，预防宋师入侵。

南唐虽然国力不如大宋，但几代人的经营，使得这个国家文化颇为繁荣，人才也不少。宋太祖意欲一统全国，当然有觊觎南唐之野心，但他顾忌一个人——江南南都留守林仁肇。此人有本事，素有威名。在发兵攻打南唐之前，必须先除掉此人。宋太祖设计了一出反间计，放出风声，诈称林仁肇欲投降大宋。李煜本是昏君一个，轻易上当，不分青红皂白，处死林仁肇，为宋太祖除一心腹之患。

公元973年，宋太祖赵匡胤派遣翰林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江南）。

卢多逊此来别有深意，他对后主李煜说：“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仅缺江东各州图，愿各求一本。”此言一出，李煜不得由怔住了。别看李煜是昏君，他文化修养极高，十分聪明，岂听不出卢多逊言外之意吗？地图乃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山川形势，皆在其中。很显然，卢多逊就是来收集情报的。大宋帝国之所以能在统一中国之战中连战连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非常注意军事情报的搜罗。

卢多逊非常狡诈，李煜明知他的意图，可是面对上国大使，不给也不行。李后主让人绘了一幅复本，交给卢多逊，至于图上有没有做手脚，史书上没写。此时李后主已经可以确认一件事，大宋对南唐动武，那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卢多逊回国后，立即向宋太祖报告说：“江东衰弱，可以削平。”

古代打仗讲究一个师出有名，虽然宋太祖想吞并南唐，可是人家已经低声下气、纳贡称臣了，要如何出兵呢？其实找一个借口并不难。第二年（974），宋太祖两度派人出使南唐，召后主李煜入朝。其实他早就料定李煜肯定不敢来的，事实也是如此，而这正好给了他出兵的理由。

在伐蜀之战中表现卓越的曹彬被任命为伐南唐军总指挥，临行走，宋太祖特别交代说：“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当年王全斌在蜀地杀降的暴行，令宋军形象大为受损，宋太祖希望仁厚的曹彬能挽回宋师的声誉。

曹彬是宋初一位优秀的将领，他从蕲阳发兵，攻入南唐，首战攻破峡口寨，杀敌八百余人。南唐池州守将望风而逃，宋军兵不血刃，占领池州。战争爆发后，擅于写诗的后主李煜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水师上，然而在紧接的铜陵之战中，南唐水师大败，战舰被曹彬缴获二

百余艘，士兵被俘八百余人。

宋军乘胜而下，连下芜湖、当涂，屯兵于采石矶。采石矶是金陵的西南门户，后主李煜当然知道其战略价值，遂派两万兵马阻敌。然而南唐军队的战斗力实在不能让人恭维，曹彬在采石矶大败南唐军，俘虏南唐马步军副都署杨收、兵马都监孙震等。

对于南唐来说，长江天险是其固守的根本。

为此，李煜派郑彦华率水师一万人，杜真率陆师一万人，共同抵御宋朝军队渡江。然而，李煜却万万没有想到，宋朝军队并非用战船强行渡江，而是采用了一种十分冒险的方法：架设浮桥。在宽广的江面上架设浮桥，这有可能吗？

当时李煜听到曹彬架浮桥的消息时，笑道：“此儿戏耳。”

然而他错了。

宋太祖为了征伐南唐，早就派人秘密研究在宽广江面搭设浮桥的方法，并且已经试验成功。曹彬用了三天的时间，用巨缆把大船与竹排系在一起，建起一座巨大的浮桥，飞跨长江，整个浮桥设计尺寸计算完美，不差分毫。大军从浮桥过江，如履平地。

南唐军队的反应能力低下，待宋军过了河后，方才如梦初醒。郑彦华的水师与杜真的陆师与宋军交上手，但这两名南唐将领在临战关头，却不能协同作战。郑彦华率水师官兵与宋军鏖战，杜真却按兵不动，致使南唐水师大败。

此时的李煜有大祸临头之恐，下令金陵全城戒严，以图固守。然而曹彬的军队仍节节进逼，先后在白鹭洲、新林港口，已兵临金陵城下。

金陵约有水陆军计十万人，要夺下金陵，显然不是容易的事。为了给李煜施加压力，宋军除陈兵于金陵城外，还在多个方向打击南唐军队。在宋朝的授意下，吴越国进攻常州，牵制南唐的兵力。同时，黄州刺史王明在西线发动攻势，渡江进攻武昌，并打败南唐守军。这些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曹彬对金陵的围攻。

宋开宝八年（975），金陵之役拉开战幕。

对宋军来说，南唐水军的威胁是很大的，南方人善舟楫，在水战中比中原人要强。为了削弱南唐水师的力量，曹彬派部将李汉琼率部渡淮南，进攻设在这里的南唐水寨。李汉琼用大船装满苇草，顺着风向纵火，驶向水寨，在风的作用下，火势迅猛，迅速把淮南水寨变成一片火海，大量的战船被摧毁。这一偷袭，令南唐水师遭到重创。

此时曹彬大军已进抵秦淮，远眺南唐军队的阵地。南唐十余万军队驻守于城外，背靠金陵城，显然李煜并不想让隆隆战鼓声影响自己的花天酒地。南唐军这种布阵，没有坚固城墙的保护，给了宋军击破的机会。副帅潘美自告奋勇，率自己的部队渡过，果断地发动进攻，曹彬大军随后开进，大破南唐军。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南唐军队策划了一个作战方案，打算动用一支水师，溯江而上，进攻宋军搭设在采石矶的浮桥，只要破坏了浮桥，宋军战船不足，大军的退路就会被切断，到时粮草不足，不战则自乱。可以说，这个战略颇为高明，只是被曹彬所识破。曹彬马上派潘美截击南唐水师，又一次大获全胜，粉碎了南唐的计划。

金陵围城战持续了十个月之久。

南唐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一是因为实力不弱，二则是曹彬有意控制攻城节奏，意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这场战争令南唐国力疲敝，后主李煜把希望寄托在外地援兵上。

南唐将领朱全赉在湖口集结了一支大军，号称十五万，其实没那么多人。为了增援金陵，朱全赉修建了巨大的战舰，长百余丈，大者可容纳千人。这支水师从湖口顺流而下，打算攻击宋师在采石矶的浮桥。

可是朱全赉运气着实很差，时值长江枯水期，在一些河段，水面干涸，而战船太大反倒成了麻烦，没法开动。南唐水师在江面迟滞，令宋师有机会从容布阵应战。当朱全赉的舰队开到皖口时，宋军行营步兵指挥使刘遇在江面阻击。水战本是南唐军队的强项，当时宋军在北，南唐军在南，擅长水战的朱全赉采用火攻战术，纵火焚烧宋船。眼看着胜利在望时，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风向突然大变，刮起强烈的北风，南唐舰队反而在下风向，火焰倒扑，烧向南唐战船。为了避开火势，南唐舰队大乱，纷纷后撤，主将也控制不了。宋军乘机反扑，反败为胜，南唐舰队指挥官朱全赉眼看前功尽弃，索性与座船同归于尽，被烈焰吞噬了。

此役，南唐水师损失数万人，更要命的是，援救金陵的计划破产了。

李煜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但他毕竟是一国之主，性格又清高，不愿意投降。曹彬多次派人告诫李煜说：“城必破矣，宜早为之所。”但李后主不听。事已至此，曹彬决定发动最后的总攻。

可是就在宋军即将发动总攻之前，主帅曹彬却忽然称病了。

诸将赶紧前来探望，岂料曹大帅身体根本无恙，只是有一块心病。曹彬对诸将说：“我这病，不是开药方能治好的。只要诸位在这里立个誓言，攻破金陵后，不得妄杀一人，那我的病就痊愈了。”原

来曹大帅担心出现征蜀时残杀无辜的惨剧，故而特地演了这么一出戏给大家看。诸将纷纷表示，决不妄杀一人，并与主帅焚香立誓。这么一来，曹彬的“病”好了，可以发动总攻了。

此时金陵城内已是物资匮乏，士气低落，加上援军被消灭的消息传来，将士全无斗志。金陵城终于被攻破了，李后主神情木讷，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他让人在宫殿里堆满了木柴，若是曹彬不接受他投降，就举火自焚。

作为一位君主，作为一名艺术家，李煜还是要活得有尊严。

曹彬并没有为难李后主。他进城后，约束军纪，不杀无辜，很快金陵城内就恢复了秩序。宋军以往常见的打家劫舍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包括李后主以及南唐诸臣的家都没有遭到洗劫。对于亡国之君，曹彬也表现出大将风度，并无不敬之处。曹大帅亲自领着军队，整整齐齐地抵达宫城，李煜与众臣在宫门处迎拜，奉表纳降。曹彬对李后主道：“介胄在身，拜不敢答。”算是十分客气了。受降结束后，曹彬留下一千人守住宫门，严禁外人擅入。

伐南唐之役前后历时一年，南唐的历史被终结，十九州一百零八县划入大宋领土。

作为亡国之君，李煜在政治上是蹩脚的，但在文学艺术上，他则是才华横溢。他能书善画，精通音律，在诗词上的成就特别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南唐灭亡后，李煜虽然没被处死，但是从君主到俘虏，心理上的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宋太祖拜他为左千牛卫将军，封违命侯。这个封侯，明显带有贬意。

在半囚徒的最后日子里，他写了不少词章，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正是亡国之痛，才能写下如此传诵千古的词篇。

回首自己身为帝王时的春花秋月，回想王宫中的雕栏玉砌，再看看如今的自己，被囚禁于小楼，仿若隔世。想到这里，怎么能不满腹忧伤哀愁呢，那愁啊，就像一江春水，绵绵不绝。

在李煜写下这首词时，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去世，宋太宗赵灵在气量上显然不如哥哥，他见了这篇词后，非常不高兴。一个亡国之君，能保全性命，这已是朝廷莫大的恩赐了，还牢骚这么多，莫不成想造反吗？宋太宗不能容忍有这样的臣子，他送了一杯毒酒给李煜，这位南唐后主终于解脱了。

在临行前的那刻，他是否在恍恍惚惚中，又回到了繁华的金陵，与爱妾们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举头望月，饮酒作诗呢？

七 铩羽而归：啃不下的硬骨头

新兴的大宋政权在南方作战如秋风扫落叶，无往而不利，可是在北线却屡遭挫折，每每铩羽而归。

北汉开国皇帝刘崇乃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公元951年，郭威发动兵变，颠覆后汉政权，建立后周政权。时任后汉河东节度使的刘崇据河东十二州称帝，建立北汉，这也是“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地方政权。北汉自开国始，与后周就势不两立，形同水火。但北汉地狭民贫，如何与后周相抗衡呢？刘崇不得不结交辽国，以为后援，并奉辽国皇帝为叔皇帝。刘崇去世后，刘钧继位，他更夸张，尊辽帝为父皇帝，自己当个儿皇帝。

陈桥兵变发生后，北汉皇帝刘钧乘宋政权根基未固，率部入侵河西。对刘钧来说，这是浑水摸鱼的良机，他毫不迟疑地出兵支持李筠的反宋。可是大宋帝国没有给刘钧机会，李筠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了，刘钧只得悻悻退兵。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北汉军队频频扰边，成为大宋帝国北部之患。

宋太祖赵匡胤巴不得早日摆平北汉，以宋的实力，北汉当然不是对手，可问题是刘钧有契丹人在后面撑腰。若是与北汉开战，就意味着与强大的辽国开战，这就不能不慎重了。

大家想想，北汉原本是个地瘠民贫的国家，又穷兵黩武，财力上怎么支撑得住呢？结交契丹人是有代价的，每年都要向辽国输送大量

的金银财宝，因而国家一天比一天贫穷，连朝廷的花销都捉襟见肘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宋帝国开始对北汉发动有限攻势。

公元964年，宋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率部进攻北汉辽州，辽州刺史杜延滔举城投降。北汉皇帝刘钧紧急向辽国求援，辽国派西南招讨使耶律达里（又称耶律挾烈）率六万骑兵入援北汉。说起这个耶律达里，也算是辽国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善于用兵，赏罚分明，深得士卒拥护。耶律达里挥师入北汉，在石州与李继勋交手，宋军敌不过强大的辽军，落荒而逃。

四年后（公元968年），北汉皇帝刘钧去世，养子刘继恩继位。

宋太祖赵匡胤敏锐地意识到北汉政局将有动荡，想借此时机扫平北方。他派卢怀忠等人领兵屯驻于潞州，并委任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一时间北方战争阴云密布。果不出宋太祖所料，北汉很快爆发政变，皇帝刘继恩被杀，其弟刘继元继位。宋师果断抓住机会，越过边界，宋汉战争再次爆发。

北汉新主刘继元只得快马向辽国求援，同时派军队迎击宋军。宋将李继勋的先锋部队首战告捷，阵斩两千余人，夺取汾河大桥，兵临太原城下。刘继元大惊，又遣大将郭守斌出战，郭守斌中箭负伤，逃回城内。到这个时候，刘继元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契丹人身上了。

契丹人当然不能坐视北汉灭亡，耶律达里再次临危受命，以兵马总管的身份，统领各路人马入援北汉。李继勋曾经是耶律达里的手下败将，晓得此人厉害，不敢恋战，撤去对太原的包围，撤回国内。史书上称，“河东（北汉）单弱，不为宋所并者，达里有力焉。”耶律达里成了北汉的救星。

宋军撤退后，北汉仗着契丹人相助，狐假虎威，不仅收复失地，

还入侵宋地，大掠晋州、绛州。

小小的北汉，胆敢如此猖狂！宋太祖赵匡胤愤怒了。

他决定御驾亲征北汉。

皇帝一生气，全国军队马上进入紧急动员状态。

公元969年（开宝二年），新年伊始，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人奉诏前往各州，征集粮草及其他物资，调往前线。同时，皇帝还发布诏令，发诸道兵屯驻于潞州、晋州、磁州等。

二月，宋将曹彬、党进率先头部队出发，向北汉进军。

紧接着，宋太祖下诏御驾亲征。曾经两度北伐的李继勋仍然担任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赵赞为马步军都虞侯，各自率自己的部队开赴前线。宋太祖料定契丹必将出兵援救北汉，遂以韩重赞为北面都部署，密切关注契丹人的动向。

就在宋朝军队磨刀霍霍时，一个好消息传来了：契丹国主辽穆宗遇刺身亡。原来辽穆宗乃是一个残暴之人，嗜酒好杀，喜怒无常。他的近侍奴仆终日惶惶不安，唯恐哪里触犯国君，便稀里糊涂成为刀下之鬼了。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奴仆亦然。某一日，辽穆宗喝醉了回到行宫，几名近侍奴仆铤而走险，将其刺死。辽国突发如此变局，对大宋远征军十分有利，若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北汉，契丹人必定难以及时救援。

出乎宋太祖意料的是，北汉抵抗意志之坚强，要远远超过他的判断。

北汉国主刘继元派遣大将刘继业、冯进珂率兵驻屯于军事要地团柏谷，这也是通往太原的门户。说到北汉大将刘继业，很多人可能摇

摇头，没听说过此人，可是倘若说起他的另一大名，大家就如雷贯耳了。他就是大名鼎鼎、名垂青史的杨家将第一代名将、杨令公杨继业。日后他成了北宋的一员名将，可是如今他却是北汉的将领，与宋军正浴血厮杀哩。

刘继业深知宋军实力强大，遂派卫队指挥使陈廷山领着数百名骑兵，来回侦察巡逻。李继勋的大军杀到团柏谷后，陈廷山非但没有把重要军情向刘继业汇报，反而带着自己的人马投降了。负责情报收集的将领都投降了，北汉在团柏谷的军事部署毫无秘密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刘继业选择了保全实力，撤往晋阳。北汉皇帝刘继元一怒之下，把刘继业的兵权给夺了。

李继勋突破团柏谷后，进逼太原城。不久后，宋太祖赵匡胤亲临太原前线。宋军对太原发动了一个月的进攻，却进展缓慢。

当时有人对宋太祖建议说，应该增调军队，加大攻城力度。宋太祖尚未回答，只见旁边闪出一人道：“陛下自有数千万兵在左右，为何不用呢？”赵匡胤定睛一看，原来是左神武统军陈承昭。陈承昭的话令宋太祖有几分不解，能上战场的兵都用上，哪来的千军万马呢？陈承昭笑着用马鞭指向汾水，宋太祖望着滚滚河水，会心一笑。

很快，在太原城东南方，一座人工长坝建了起来，拦截汾河水。待水位高时，决堤灌城。汾水灌进太原，给太原军民的生活及防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边要与宋军作战，一边要在城里抗洪救灾。与此同时，宋军加大外围进攻，李继勋攻城南，赵赞攻城西，曹彬攻城北，党进攻城东。

危在旦夕的太原城并没有沦陷，守城军队以积极出击代替消极防御。特别是北汉悍将刘继业，尽管被降职，可是在太原保卫战中，他表现相当出色，多次领兵偷袭宋军阵地。但是，倘若无外援，北汉将面临灭顶之灾。

契丹人反应迟缓，原因在于国内政局动荡。

辽穆宗意外被刺身亡后，辽人拥立耶律贤为皇帝，是为辽景宗。辽景宗乃是辽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名君，他上台后，废除了穆宗的一些苛政，提拔一批贤才，巩固了自己的权势。此时辽国尚无法全力以赴救援北汉，在太原被围两个月后，才派出一支实力并不算强大的军队救援，但遭到宋军伏击，损失一千人。紧接着，辽国从定州方向入侵大宋，试图以此牵制在北汉作战的宋军主力。然而这一企图又以失败告终，早有防备的韩重赉在嘉山设伏，大破辽军。

宋太祖知道，辽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必须要尽快拿下太原。

皇帝亲自出马指挥作战，要是不能攻克，这脸面可不好搁啊。此时已是农历五月，正是盛夏时节，也是河流的丰水期。若是此刻再决河淹城，威力更加巨大。于是宋太祖亲自选址，在太原城北处建坝截流后，将水灌入太原。同时，水军从城东南方向发动强攻。战斗打得极其惨烈，宋军的进攻遭到顽强的阻击，损失惨重。马步军都军头王廷义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脑袋毙命，殿前都指挥使都虞侯石汉卿中箭后落水溺死，高级将领伤亡尚且这么大，士卒的伤亡更不必说了。

当时太原城的情况是这样的，城南受洪灾最严重，外城基本被淹，内城也开始进水，民心恐慌。北汉守军想方设法要堵住入水口，可是宋军发射密集的箭雨，破坏守军的抢修。最后令太原城得以生存的原因，竟然是漂浮着的水草，这些水草积在城门入水口处，累积多了，居然把入水口也堵塞了。

时间已是闰五月，宋军陈兵于太原城下已历时五个月，能想的招数都用上，连引水灌城都灌了两次，可是太原城还岿然耸立。太原一带成了一片汪洋之地，守城者固然十分吃力，攻城者也不轻松。雨季来临了，宋军驻扎城外草地上，泥泞不堪，卫生条件恶化，上吐下泻的病症开始增多。

更糟糕的是，契丹的生力军出现了。

契丹国内政权平稳过渡，辽景宗终于可以腾出手，大举出兵救援北汉了。辽北院大王乌珍率领精锐骑兵昼夜兼程，兵锋已抵太原西。辽军一路前来，人疲马困，也没有气力马上投入战斗。统帅乌珍要求士兵们擂鼓、点火把、造声势，给太原守军壮胆助威。眼看援军到来，北汉士兵顿时看到了希望，更加坚定守城的决心。

宋太祖赵匡胤面临战或不战的选择。若是选择战，那么胜算几何呢？宋军已经作战半年之久，不仅战斗伤亡大，非战斗减员也不少，这种情况下与精锐辽师相遇，恐怕相当不利。那么撤退又如何？撤退固然不失为明智之选择，只是皇帝亲征，关乎国家朝廷形象，撤退未免面子上过不去。

但大宋是有人才的，太常博士李光赞先拍了皇帝一通马屁：“陛下战无不胜，谋无不臧，四方恃险之邦，僭窃帝王之号者，今与陛下为臣矣。蕞尔晋阳，岂须亲讨？”这是维护了皇帝的威严，保全其颜面。那么要如何打垮北汉呢？李光赞认为只须打经济战，派支军队屯兵上党，“夏取其麦，秋取其禾”，就足以拖垮这个贫瘠之国了。

赵匡胤听了这一番话后，自然喜上眉梢，又询问宰相赵普，赵普同意李光赞的见解。于是宋朝大军从太原撤兵，班师回国。

北汉这根硬骨头，宋太祖终于没能啃动。

然而对北汉的几番攻击，并非一无所获。

在宋军的凌厉攻势下，北汉军事力量遭到重创，国家亦损失严重，这对贫瘠的北汉政权来说，无疑难以承受。北汉虽然赖辽国的支援而自保，但这种支援并非无条件，而是每年都要向辽国进贡大量钱财，使得国用日蹙，入不敷出。大宋天子御驾亲征，虽然没能将北汉从地图上抹去，却也釜底抽薪，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大量内迁到山东、

河南一带。北汉的国势，从此一天不如一天了。

七年后，即公元976年（宋开宝九年），此时大宋帝国已平定南汉、南唐，北汉还能坚持多久呢？

这年八月，宋太祖再度对北汉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当然，这次皇帝并没有亲征，而是派侍卫马步军指挥使党进为统帅，下辖潘美等将领，兵分五路，讨伐北汉。此时北汉的军事力量，比七年前还不如，在宋军的节节进逼下，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党进的军队很快逼近太原城，并大败北汉军。北汉皇帝刘继元只得祭出法宝：向辽国求援。

辽国的救援相当迅速。九月，南府宰相耶律沙率辽师入援。

大宋帝国布武天下，取荆湖、灭后蜀、亡南汉、定江南，何等伟大的事业，何惧契丹人呢？横扫天下的宋太祖，是铁了一条心，非要荡平北汉不可，这就是一个帝王雄霸天下的胸襟。

眼看一场恶战就要打响了。

可是天空电闪雷鸣，暴雨却没有落下来。大战最后没打起来，宋军撤退了。撤退，不是因为害怕契丹人，而是皇城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太祖皇帝驾崩了！

武艺高强、一向身体强壮的赵匡胤，竟然在某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命呜呼，而且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宋太祖之死，成了宋朝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最难解开的谜团之一，他究竟是自然死亡呢？还是死于政治谋杀？

让我们回到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来看看这一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八 斧声烛影：宋太祖死亡之谜

宋朝的史料，较前代丰富，史事记载也十分详细。可是在宋太祖离奇死亡这件事上，官方的史书却轻描淡写，令人怀疑史官企图在隐瞒着什么。

我们且来看看《宋史·太祖本纪》上简略的记载：“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殁于殿西阶。”这简直只是流水账，不要忘了在封建王朝，皇帝的死亡是大到不能再大的事情了，何况宋太祖的死因，官方也无意说明。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究竟是谁想要尘封这段历史呢？揭开这段历史，将会引起怎样的动荡呢？

那一晚，皇宫高墙深院内，到底发生什么事，恐怕无人知晓——除了一个人外，此人便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

我们把日历回拨到宋朝开宝九年（976）的十月二十日。

在那晚离奇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觉得这一天有什么特别之处。稍稍令人感到意外的，只是天气变化得太快了。这一天晚上，夜空晴朗，星光闪烁，皇帝赵匡胤登上太清阁，四处张望，似乎心事重重。忽然间起风了，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风骤然飘落，还夹杂着些许的冰雹。

没有人知道皇帝在想些什么，但天气突变显然让他不舒服，他下了太清阁，进了万岁殿。虽说已是夜晚，天气又寒冷，赵匡胤似乎全无睡意，也没有哪个后妃娘娘相陪。此时他突然下旨：传晋王赵光义入宫。

赵光义是皇帝赵匡胤的亲弟弟，原来名赵匡义，但是封建帝王家有一种避讳的传统，皇帝叫“匡胤”，这两个字，别人就用不得，得改才行，于是赵匡义变成了赵光义。赵光义是陈桥兵变的参与者，可以说，哥哥当皇帝，他也有一份功劳的。宋太祖对这个弟弟也十分器重，先后让他担任殿前都虞侯、恭宁军节度使、开封尹兼中书令，封为晋王。

皇帝召弟弟来做什么呢？喝酒！宋太祖摆了酒席，哥俩人“酌酒对饮”。

可是这里有让人纳闷狐疑之事。其一，要喝酒解闷，宫里有的是人陪，犯得着在一个风雪阴霾之夜把弟弟召进宫吗？其二，皇帝让太监、宫女全部退出去，偌大的殿里，只有他与弟弟赵光义两个人。若只为喝酒何必这样呢，皇帝一定是要向皇弟说些话，而这些话，是不允许被第三者知道的。

那么赵匡胤与赵光义两人究竟密谈了什么呢？除了他们二人之外，没有人知晓了。

那一夜皇宫内的情形，北宋僧人文莹在《续湘山野录》一书中有所体现，这大概是皇宫太监们在那一晚所见所闻的记录了。

当时雪花纷飞，风声呼呼，太监们远望着皇帝寝殿内烛火摇曳，两个人影被烛光投射在门窗上，也随着烛火抖动着。他们看到了晋王赵光义的身影有几次起身离席，而后又坐了回去。

到了三更时分（夜十一点到一点），雪还在下着，殿前的积雪已有数寸了。皇帝的酒终于喝完了，殿门打开了，只看到他手持一把柱斧，在雪地上戳了几下，然后回头对弟弟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好做！好做！”说完后，晋王赵光义告辞离开，皇帝回到寝殿，

解了衣服，倒头便睡，不一会儿时间，就鼾声如雷了。

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

皇帝喝多熟睡了，太监们当然不敢马上去把他吵醒。就这样，到了四更天（一点至三点）时，快接近五更天了，看来皇帝也睡了有两三个小时了，这时听不到呼噜声了。几个太监这才蹑手蹑脚走进来，担心皇上着凉了。可是他们全都吓傻了，这时的皇上全身冰凉，没有气息，已经驾崩了！

喝几杯酒就给喝死了吗？会不会是心脏病突发？或者脑溢血？可是要知道皇帝的身体一直是很强壮的，况且就算突发性疾病，也很少有人一声没吭就死了。如果不是自然死亡，那会是怎么死的呢？这一疑问令人不寒而栗，因为最后一个见到皇帝的人，正是晋王赵光义！难道皇帝竟然是给弟弟害死的吗？

太监们可以作证，在晋王赵光义离开后，皇帝还没有死。

可是即便赵光义有不在场的证明，仍然是最大的嫌疑人。倘若他偷偷在哥哥的酒里下了毒药，那么致命的毒性在一两个时辰后发作夺去皇帝的性命，这种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有人会站出来反驳了：晋王赵光义是被召入宫，怎么可能会预谋去毒杀皇帝呢？以犯罪心理学来说，他有什么动机，有什么理由作案呢？

在历史上，认为赵匡胤乃是死于赵光义之手的大有人在。我们且来做一个假设性的分析，假定晋王是杀害皇兄的凶手，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兄，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一晚动手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赵匡胤与赵光义到底在密谈什么呢？显然这件事是非常机密的，所以没有第三者在场。这一晚后，赵匡胤死了，赵光义成为皇帝，他也用不着向别人解释谈话内容。因

此，寝殿密谈的内容永远也不为人所知了。

可是有两个细节一定要引起注意，一个是“烛影”，一个是“斧声”。这是殿外之人唯一能看到的两个特别的细节，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看看“烛影”。远看过去，隐约看到的情况，是晋王赵光义在喝酒过程中，有几次避席的举动。避席有何含义呢？如果是权位高的人避席，是一种尊重的表示；如果是权位低的人避席，则是一种谢罪的表示。晋王数次避席，是不是意味着皇帝对他的严厉批评呢？

其次再说说“斧声”。皇帝以柱斧戳雪，这把柱斧哪里来的呢？皇宫大院之内，有可能在大殿门口放一把斧头吗？这不可能，如果这样，岂不是方便刺客刺杀皇帝吗？因此，这把斧头，一定是在大殿里的，而且赵匡胤把它取下来了。那么我们再分析一下，赵匡胤扛着一把斧头，就是为了戳几下雪地吗？他如此童心未泯吗？显然不可能。只能说，他在殿里时就已经把斧头操在手上，出殿时顺便带出来罢了。喝酒用得着斧头吗？斧头可是杀人利器啊。赵匡胤喝酒上操着一把斧头，是不是动了杀心呢？

如果皇帝对弟弟动了杀心，那只有一个理由：弟弟想夺权当皇帝！如果晋王赵光义非要在这一晚毒杀哥哥，那也只有一个理由：自己的秘密已经被哥哥知道，哥哥不死，他永无出头之日。

皇帝的诱惑太大了，也正因为如此，五代时期中原政权十几个皇帝，有一半死于非命，且多死于政变。为了皇帝，子弑父、弟杀兄的事情都发生过，这在那个年代只算是寻常事。那么晋王赵光义是否想当皇帝？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自从他担任开封尹后，便大量培植党羽，结交朝中文武官员，其势力可谓是根深叶茂。宋太祖三十三岁就当皇帝，至今五十岁，仍是年富力强，出于谨慎，他一直未立太子，这也给了赵光义更多的机会。

我沿着这个思路，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情景回放如下：

皇帝赵匡胤得悉了弟弟赵光义企图当皇帝的阴谋，或者是想通过政变，或者是想耍手段成为皇位接班人。皇帝对这个消息十分沮丧，那一晚风雪交加，他愁绪难减，决定召弟弟前来，把话摊开来说。赵光义知道阴谋泄露，此去凶多吉少，遂携带毒药前去。寝殿之上，别无他人，只兄弟俩谈话。皇帝严厉呵斥，晋王多次避席谢罪，曾有一度皇帝几乎想杀了弟弟，遂操起一把柱斧，但还是没忍心砍下去。晋王心知自己就算不死，政治生命也将结束，于今只有冒险一拼了。他假意为哥哥盛酒，暗中把毒药投入酒中。这种毒药大约放了蒙汗药，令人吃了后困意来袭，昏昏欲睡。晋王乘机告辞，皇帝这时有点走不稳，遂拄着那把长斧出了殿门，在门口戳几下雪地，喝了一句：“好做！好做！”这句话什么意思，也是千古之谜，以我的理解，应该是“好自为之”的意思。

以上只是我的猜测，至于历史真相究竟是否如此，只有赵氏兄弟两人才真正知晓。那一夜，并不比其他夜晚漫长，可是发生的事情，却太多太复杂又太蹊跷离奇了。

让我们接着那一夜的故事。

在凌晨两三点时，太监们发现皇帝驾崩了。大家吓得魂不附体，此时能做的事情，便是火速通知孝章皇后。从睡梦中被唤醒的孝章皇后脸色苍白，不敢相信皇帝真的驾崩了，他那么身强力壮，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可是她确实不是在做梦，一种巨大的恐惧感涌上心头，顿时嗅到了皇宫内外的血腥味，此时最重要的事，是要赶紧让新皇帝继位。

赵匡胤生前没有立太子，他曾有四个儿子，两个早夭，剩下两个，一为二十六岁的赵德昭，一为十八岁的赵德芳。赵德昭远在兴元

府（陕西汉中），没时间通知他回来了，留在皇城的只有赵德芳。孝章皇后果断密令内侍总管王继恩连夜召赵德芳进宫。

王继恩出了皇宫，却没有去找赵德芳，而是去了晋王府。我们有理由怀疑，王继恩就是晋王在皇宫的耳目。

当王继恩来到晋王府门外时，又有一件怪事，府门之外居然坐着一个人。你想想，凌晨三四点钟时，天寒地冻，怎么有个人跑到晋王府门口呢？定睛瞧时，却是左押衙程德玄。据《宋史》所载，程德玄是晋王赵光义的心腹，“颇亲信用事”，还有一点要留意，他“善医术”。那程德玄为何半夜三四更时跑到晋王府门口呢？

程德玄解释说：“半夜时有人敲我家门，说是晋王要召见我。但我打开门时，却看不到人影。岂料一进屋，敲门声又响起，再去开门，还是没人。如此三次，我心里狐疑，遂自己来了晋王府，府门关闭着，我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敲门，只得坐等于此了。”

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

看来程德玄似乎预先知道今夜有大事发生，他在晋王府外苦苦等待，一定是这个大事与自己有着切身的关系。

让我们再来发挥点想象力吧。

如果赵匡胤真的是被毒死的，那么这种秘制的、杀人于无形的毒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能够配制如此高明毒药的人，一定是行医高手，而被史书称为“善医术”的程德玄就是这样的高手。假设程德玄真的配制这样的药丸交给晋王，那他与晋王就坐在一艘船上，这事情若失败，自己绝对死得很难看。试想想，这个晚上，程德玄哪里睡得着呢？他急切地等待消息，药丸究竟有没有用，皇帝究竟死了没有，皇帝若死了，谁能当皇帝，会不会追查此事呢？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宁可在晋王府外等待确切的消息。

当他看到王继恩匆匆前来时，心里的石头怕是落了一半了。

王继恩有要事在身，也听不得程德玄解释了，俩人一起去敲晋王府大门。

当王继恩把皇帝之死以及皇后紧急召赵德芳入宫的消息告诉晋王赵光义后，晋王是什么反应呢？史书上的写法是“王大惊，犹豫不行”，这个写法，很有些为晋王脱罪的味道，似乎他对于皇兄之死真的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

王继恩催道：“不能拖啦，不然别人会捷足先登的。”孝章皇后明明是叫他召赵德芳，他却跑来召晋王，他难道不知道违抗懿旨的下场吗？他敢这样做，不是自己比别人多出几个脑袋，而是因为他早与晋王串通好的。

于是晋王便与王继恩、程德玄俩人一起冒着风雪赶往皇宫。这里请注意，程德玄跟着去了，若他只是局外人，断然不可能一起跟着进皇宫。入宫后，王继恩对晋王说：“大王先在此等一下，我先进去禀报。”这时程德玄跳出来说道：“直接进去就好，有什么可等的呢？”看来他心急的程度，绝不亚于晋王。

三人便匆匆奔向太祖寝殿，这个时候，孝章皇后已经守在宋太祖冰冷的尸体之旁。当她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一回头看到王继恩的身影，脱口而出道：“德芳来了吗？”

王继恩面情冷漠，声音冷酷：“是晋王来了。”

当看到晋王的脸庞时，孝章皇后惊呆了，仿佛看到魔鬼似的。

在那短短几秒里，孝章皇后脑海里可能掠过几个念头。在此皇宫之内，皇帝已死，名义上说，皇后权力最大，她只要唤上几个卫兵，

立马可以把自作主张的王继恩连同晋王一起拿下。

可是，天下有如此轻而易举的事吗？

这皇宫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股势力，她完全猜不出、摸不透。皇帝在深宫之内暴死，内侍总管公然违抗懿旨，明摆着要在选帝一事上插上一脚。试问，这皇宫之中，究竟有多少内侍、卫兵已经成为晋王的人呢？孝章皇后不敢再往下想了。在那短短的几秒里，在晋王那锐利如箭的目光下，皇后不由得全身发抖，似乎找到丈夫死亡的原因。她屈服了，怯生生地转向晋王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给官家了。”

这句话，无疑承认了晋王的帝位继承权，“官家”乃是五代、宋时对皇帝的称呼，取义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故名为“官家”。

贵为皇后与皇子，竟然把身家性命交给别人。即便一千多年后，我们仍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皇后的恐惧与无奈。虽然宋太祖离奇死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民间一直认为他死于赵光义的谋杀，虽然没有铁证，但是联想到孝章皇后惊恐万分的表情，这种说法恐怕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擅长演戏的晋王从眼角挤出几滴泪，哽咽地对皇后说：“共保富贵，勿忧也。”

天亮了。

皇宫里丧钟敲响。

群臣脸色沉重地赶往万岁殿，太祖皇帝已经仙逝了，晋王赵光义皇袍加身，接受大臣们的谒见。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短短的几个时辰，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赵光义成为大宋王

朝的第二位皇帝，史称宋太宗。

“斧声烛影”的故事，在之后一千年的时间里，为人所津津乐道，大家都试图寻找更多的证据，解开历史之谜。但是，想要找出确切的证据已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宋太祖生前最后一个接触的人，正是赵光义，他若不开口，那一晚在寝殿之内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人知晓了。再者，朝廷也没有披露宋太祖的死因，也就是说，没有验尸，仅仅公布是“猝死”而已。若是要解开宋太祖是否被毒杀之谜，恐怕只有把他的尸骨挖出来化验了，让死人“开口”说话，这或许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唯一途径了。

且不说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死的，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以“父子相传”的传统，皇位也不可能由弟弟赵光义来继承。赵光义虽然抢先一步，当上皇帝，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在“斧声烛影”过去六年后，名臣赵普突然甩出所谓“金匱之盟”的秘密，为宋太宗继承皇位辩护。那么，什么是“金匱之盟”呢？为什么赵普在时隔六年后才要揭开这个秘密呢，这个秘密是真的还是伪的呢？

九 谜中之谜：“金匱之盟”的秘密

赵光义以“兄终弟及”这样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方式继承皇位，为了避免众臣的闲议，他极力表现出一个皇帝的“慷慨”。

宋太宗即位后，便把自己的弟弟赵廷美提拔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由于赵光义自己便是以开封尹之衔继承帝位，故而此举颇有立弟弟为皇储的意味。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也得到优待，赵德昭任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阴差阳错没能当上皇帝的赵德芳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不仅如此，宋太宗把赵匡胤、赵廷美的子女与自己的子女一视同仁，都称为皇子皇女，这也暗示赵德昭、赵德芳仍然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表示上看，宋太宗没有食言，他严格遵守对孝章皇后所做出的“共保富贵”的承诺。可是，从性格上说，宋太宗真的不是豁达之人，至少与他的哥哥相比，他心胸明显要狭隘得多。一个例子，宋太祖容得下南唐后主李煜，可是宋太宗即位没多久，就毒死这位构不成任何威胁的亡国之君。

还记得当初孝章皇后那句恐惧万分的话吗？——“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给官家了。”她是否杞人忧天呢？还真不是。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北征辽国，赵德昭随行。

有一天夜里，辽军偷袭，宋兵营大乱，皇帝不知去向。这时，有一批军官，或许是出于忧心，或许是出于阴谋，打算拥立赵德昭为皇

帝。若是把黄袍披到赵德昭身上，那几乎就是“陈桥兵变”的翻版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宋太宗回营了，拥立新皇帝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件事令宋太宗内心充满狐疑。要知道他乃是当年陈桥兵变的参与者，他不相信有人能抵御住黄袍加身时的诱惑。从这一夜起，皇帝对侄儿赵德昭已经不信任了。

伐辽之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失败令宋太宗很沮丧，他迟迟不对战场上有功将士进行封赏。当时很多将士对此颇有微词，人心浮动。赵德昭为平息众怨，亲自入宫向太宗皇帝进谏，建议早日论功行赏。岂料这一进言，竟然令宋太宗勃然大怒，他带着讥讽的语气训斥说：“等你当了皇帝，再来论功行赏也不迟！”

这一句话，无疑有弦外之音，你赵德昭，不就是想当皇帝嘛。

语言不是刀，有时却比刀更锋利。

赵德昭的心猛然一沉，如同置身于冰窖之中，恐惧如癌细胞扩散全身。当他回到王府时，神情恍惚，忽然问左右：“你们带刀了吗？”左右侍者一听，都觉得不对劲，便说道：“宫府之中，不敢带刀。”赵德昭也不多问，他走进茶酒阁，把门反锁了。他记得茶酒阁有一把刀，很小的刀，削水果用的，但是够了，因为小刀，同样可以致人于死地。

当侍从破门而入时，赵德昭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他自杀身亡了，时年二十九岁。宋太宗不失时宜地作秀一番，他扑在赵德昭的尸体上，抚尸大哭道：“痴儿，何至于此？”

有人会问，赵德昭是不是过于敏感呢？皇帝不过就是斥责了一句，犯得着自杀身亡吗？可是我要说，他其实并非神经过敏，而是看清了事实。自杀，至少死得明明白白，至少犯不着夜夜惊魂。

相比之下，赵德芳就死得不明不白了。

赵德芳死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即赵德昭死后两年。与父亲一样，他也死得莫名其妙，死时年仅二十三岁。对于养尊处优的皇子来说，二十三岁意外死去，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历史学家们多怀疑赵德芳之死，与宋太宗有着直接的关系。倘若宋太祖赵匡胤真的是被毒药毒杀于睡梦之中，那么赵德芳也完全可能是被毒杀，只是他的死所受到关注度远远不及父亲宋太祖。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赵德昭、赵德芳兄弟先后死了。这证明了宋太宗上台前信誓旦旦的“共保富贵”不过是忽悠人的把戏罢了。宋太祖的两个儿子，已经被淘汰出局了，那么小弟弟赵廷美呢？他真的有机会成为皇帝的接班人吗？

宋太宗与宋太祖一样，迟迟没有正式立太子，但是在大家看来，其弟赵廷美应该是接班人。难道宋朝真的要改变父子相统的传统吗？人都是自私的，谁不想把继承权交给儿子呢？可是宋太宗实有难言的苦衷。若他非要把皇位传给儿子，那么如何解释他继承哥哥的皇位，却不向下传给弟弟呢？

赵廷美起初也心安理得，自以为接班人非自己莫属。可是当赵德昭、赵德芳兄弟相后毙命后，他开始变得不安了。作为开封尹，他也有自己的一帮势力，他与执掌中枢大权的宰相卢多逊来往甚密，势力不可小觑。可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宋太宗要拿他开刀了。

皇帝自然不必亲自出马，自有一班察言观色的人揣测圣意，替皇上办事，替自己升官发财。柴禹锡是宋太宗早年的幕僚，他揣准皇帝心思，便告发赵廷美“将有阴谋窃发”。这种告密，绝属空穴来风，注意哦，他不是发现赵廷美的“阴谋”，而是说他“将有阴谋”。——现在没有，但未来有。

无凭无据，如何能扳倒开封尹赵廷美呢？

宋太宗想起一个人了，他就是大宋开国名臣赵普。

说起赵普，那是大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等事件中，都活跃着赵普的身影。在宋太祖时代，赵普当了十年宰相，后来干了一些非法勾当，阴沟里翻船，被贬出朝京师，担任河阳节度使。宋太宗即位后，赵普回到京师，当了太子太保，但没什么实权，又受到政敌卢多逊的处处掣肘，令他郁郁不得志。

赵普与卢多逊是政敌，而卢多逊与赵廷美是盟友，那么岂不是可以利用赵普这个老臣，来对付赵廷美、卢多逊吗？想到这里，宋太宗赶紧召赵普前来，给他看了柴禹锡关于赵廷美“将有阴谋”的密奏，并询问他的意见。

精明过人的赵普马上意识到，自己重出江湖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向皇帝提出：“只要我能进入中枢，就能查出他们的奸变阴谋。”这是向宋太宗讨要权力，皇帝并没有马上答应。这天晚上，赵普上了一道密奏，道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声称他手上有一份“金匱之盟”，乃是杜太后（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的母亲）临终前的遗命。这个遗命，就是要宋太祖百年之后，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

令人惊讶的是，这份“金匱之盟”的存在，只有赵普一人知道。

我们来看看赵普是怎么解释的。

那是在大宋开国不久的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赵匡胤的生母杜太后病重，眼看快不行了，便召太祖及赵普前来。杜太后问赵匡胤说：“你知道自己是怎么得到天下的吗？”赵匡胤回答说：“这都是祖先与太后积福的结果。”

杜太后身体虚弱，思维却颇清醒，说道：“不对。你能得天下，乃是因为周世宗把皇位传给幼子。假若大周由年长的人来统治，你是

没有机会的。因此，你若有个三长两短，就应当把帝位传给你弟弟，这才是国家之福。”赵匡胤听了后跪着说：“我怎敢不听太后的教诲呢？”于是太后吩咐赵普拿来笔墨，写成誓书，藏在金匱（就是金柜）之中，故而又称为“金匱之盟”。

以赵普的说法，这份“金匱之盟”签订时，只有他与杜太后、宋太祖三人在场。如今杜太后、宋太祖都去世了，他就成了唯一的知情人。那么这份文书在哪里呢？赵普说，就藏在宫中，秘无人知。

既然赵普是密书的唯一知情人，为何在太宗皇帝登基时，他不掏出这份盟书呢？为何要在七年之后，才向皇帝泄露这个秘密呢？考虑到赵普这个人老奸巨猾，善于权谋，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纸盟书的真实性。不管这份太后遗嘱是不是伪造的，赵普在这个时候抛出来，用意何在呢？

很明显，赵普是要与皇帝做一个交换。

他知道宋太宗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皇位的得来并不合法，既没有太祖皇帝的遗诏，也破坏了“父子相传”的继位传统。如今赵普突然抬出杜太后的遗诏，并且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宋太祖百年后，由弟弟赵光义来继承皇位。这份“金匱之盟”，不管是真或是假，宋太宗都非常需要。有了这个护身符，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宣称，自己皇位的得来，乃是完全合法的。

当了七年的皇帝后，宋太宗终于觉得扬眉吐气了。在此之前，他不得不面对着各种置疑的压力，以至于不得不表面上假装把赵廷美当作接班人，以堵众人之口。如今，有了赵普所谓的“金匱之盟”，皇帝可以用太后遗诏回击各种流言蜚语，他不再是一个来路可疑的皇帝，而是杜太后与太祖皇帝所认可的帝国合法接班人。

赵普为皇帝洗去了篡位的恶名，皇帝则重新将他提拔为帝国宰相。

这就是交换的结果，各得其所。

当然，宋太宗之所以与赵普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还有另一个原因。宋太宗有一日特地拜访赵普，向他询问接班人的事宜。赵普的回答可有些不客气：“太祖已是犯错，陛下岂可再犯错呢？”言下之意，赵普认为弟弟继承哥哥的皇位，这是不对的。宋太祖没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帝已是犯错，宋太宗怎么能一错再错呢？

赵普重掌大权，矛头直指皇储赵廷美。据史书记载：“（赵）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有皇帝当他的后台，赵廷美的命运已是可想而知。

次年（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三月，赵普终于找到机会了。皇帝正打算泛舟前往新建成的金明池水心殿，这时就有人告密了，说赵廷美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搞政变。真的有这么回事吗？这恐怕只是赵普瞎编的一个故事罢了。但是没关系，宋太宗利用这个借口，把赵廷美的开封尹一职给撤了，调任西京留守，这无疑就是宣布取消他继承人的身份。

紧接着，大规模的清算开始了。

左卫将军陈从信、禁军列校范廷召等人，被指控与赵廷美勾结并私下收受其贿赂。同时，赵普的政治死敌卢多逊被指控与赵廷美勾结图谋不轨，被逮捕入狱。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赵廷美府中的一帮官吏。

作为皇弟的赵廷美究竟是否有谋反的举动呢？

官方正史一口咬定赵廷美有谋反事实，可是究竟他有什么计划，做过什么，一概都没有记载。朝廷给赵廷美及卢多逊扣的罪名是“顾望咒诅，大逆不道”，从这个罪名来看，也仅仅看得出赵廷美、卢多逊等人对宋太宗有所不满，发发牢骚罢了。但是在赵普的怂恿下，朝

廷七十四位重臣上书皇帝，要求判处赵廷美、卢多逊死刑，“以正刑章”。

这时宋太宗倒站出来充当好人，他格外开恩，赦免赵廷美与卢多逊的死罪。至于赵廷美、卢多逊的手下涉案官吏，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一概处死。卢多逊被流放崖州，赵廷美则遣往西京。

西京就是洛阳，这也是一个大都市，赵廷美待在洛阳，赵普仍然不放心。他再施诡计，指使人上书皇帝，称赵廷美非但不悔过自新，还心有怨言，应该把他迁徙到更偏远的地方。宋太宗把亲弟弟再贬为涪陵县公，安置在房州（湖北房县）。虽然宋太宗并没有杀死弟弟，但赵廷美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两年后，郁郁成疾的赵廷美死于房州，可以说，他是被哥哥赵光义逼死的。

权力之下，父子情尚不可靠，何况兄弟情。

清洗赵廷美、卢多逊后，宋太宗终于在接班人一事上扫清了障碍，从今往后，他的子孙将统治这个国家。在消灭赵廷美集团一事上，赵普是立下赫赫大功，同时他还以“金匱之盟”确保宋太宗政权的合法性。可是赵普虽然老奸巨猾，却仍不免只是宋太宗利用的对象。赵廷美案发后第二年，即公元983年，失去利用价值的赵普又一次被免相。

宋太宗是有雄心壮志的，不想生存在哥哥的阴影下，他要建立伟大的功业，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他有这个能力吗？

他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吗？

十 长车踏破：征服北汉之战

宋太祖赵匡胤意外于斧声烛影之夜暴死，一统中国的伟大事业没能最终完成。宋太宗上台后，尚存有三个军阀割据势力，分别是北汉、吴越以及占据闽南的军阀陈洪进。在这三个割据势力中，吴越国与陈洪进实际上早已臣服于大宋帝国，唯一尚在负隅顽抗的，只有老对手北汉。

自夺权以后，宋太宗一直强化帝国的军国色彩，他对军事非常热衷。皇帝相当勤奋，每当退朝后，他总要检阅禁军，亲自挑选健壮士卒加入亲军，老弱之徒，一律调出京城，分配到外地。皇帝又在开封城西筑一座讲武台，时不时搞盛大的军事演习，场面十分壮观。参加军演的队伍人数众多，首尾长达二十余里，以五色旗为指挥号令，步兵骑兵协同作战，训练十分有素。

在大宋帝国多次入侵与经济制裁的双重打击下，北汉已是虚弱不堪，甚至出现严重的饥荒。若不是辽国紧急救济二十万斛粮食，北汉恐怕要自行崩溃了。与此同时，宋太宗加紧了备战工作，他下诏晋、潞、邢诸州大量制造攻城器械，并把大量军粮马料转送到边关，很显然，大战已是一触即发。

北面的战争尚未开打，东南已是捷报频传。

太平兴国三年（978），盘踞福建漳、泉二州的军阀陈洪进决定结束割据，上表纳土，将两州十四县全部献上，共计有十五万户人口以及一万八千多名士兵。陈洪进主动来降，宋太宗自然大喜过望，封他为平海节度使。

陈洪进归降大宋后，吴越国成为南方唯一的地方割据政权。吴越王钱俶自知这个小政权是保不住的，与其等着人家打上门来，还不如及早献上土地，也好保全富贵。于是，在陈洪进归降后一个月，钱俶也步其后尘，上表献上十三州一郡八十六县，共有五十五万户人口以及十一万兵卒。

这样，南方地方割据势力已荡然无存，大宋帝国不仅得到大片土地，同时也得到了十几万的军队，这对于志在北伐的宋太宗来说，真是双喜临门。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新年的喜庆尚未过去，宋太宗召枢密使曹彬前来，询问道：“以前周世宗与太祖皇帝都曾经亲征太原（北汉首都），却都铩羽而归，难道太原城果真铜墙铁壁，不可攻克吗？”

曹彬答道：“周世宗是因为石岭关之战失利，军心震动才撤退的；太祖皇帝停止进攻，则是因为军队传染病蔓延，两次北伐未果，并非太原的防御坚不可摧。”

太宗听罢点点头，又问：“如今我想举兵北伐，卿以为如何？”

曹彬拍拍胸脯说：“如今国家兵甲精锐，人心欣戴，若举兵北伐，势必摧枯拉朽。”

这一番话，更加坚定了宋太宗扫平北汉的决心。

曾经在多场战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潘美被任命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下辖崔彦进、曹翰、李汉琼，刘遇四将，任务是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进攻太原。

北地战争阴云密布，大宋帝国咄咄逼人的气焰，引起辽帝国的担

忧。早在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宋、辽两国议和，至今已有五个年头。辽景帝派遣使者出使开封，质问宋帝国何以兴师讨伐北汉。宋太宗对帝国的武力沾沾自得，根本不把辽人的警告放在心上，他傲慢地回答说：“河东（指北汉）违逆天命，理当讨伐问罪。若北朝（指辽国）不出手援助，宋辽和约依然有效；如若不然，就意味着宋辽两国处于交战状态了。”

此时的宋太宗唾手得到吴越、漳泉之地，信心满满的，自认为大宋军队无敌于天下。但是大宋皇帝的威胁并没有吓倒辽国皇帝，辽景宗非出手不可，他派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塔尔为监军，率大批人马，入援北汉。

为了鼓舞士气，宋太宗御驾亲征。该年三月，他离开京师北上，以示必胜之决心。为了应对宋军入侵，北汉在隆州依险而建城，作为抵挡宋军的第一道防线。宋太宗命令鄆州刺史尹勋进攻隆州（山西祁县北），同时也分兵进攻沁州、汾州。

就在宋师节节推进时，辽师也马不停蹄挺进。宋太宗心里很明白，能否灭掉北汉，关键在于能否成功阻击辽军。

在辽国方面，辽景宗一直在调兵遣将。

自从派耶律沙、塔尔率部救援北汉后，辽景宗发现大宋精锐几乎倾巢而出，连皇帝都御驾亲征，可见这将是一场硬仗。于是辽国增派后援力量，辽景宗又遣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枢密副使穆济等人率精兵跟进。

为了阻击辽国援军，宋太宗早准备了一支精兵。这支精兵为云州观察使郭进指挥，他被皇帝任命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任务就是扼守天险石岭关，挫败辽国援军。郭进先在西龙门寨击破北汉军队，占据有利的地形，以逸待劳。几天后，辽国援军先锋部队抵达白马岭，与郭进隔江对峙。

白马岭有一条河流，江面宽阔，挡住了辽国兵团的路。辽国大将耶律沙认为应该暂停前进，等待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的主力部队抵达后，再发动进攻才有胜算。可是冀王塔尔与穆济等将领却认为，兵贵神速，北汉战局吃紧，若拖延时日将大大不利。耶律沙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发起进攻。

然而，这几乎是一次自杀式的进攻。

郭进耐心地等待战机的出现，他按兵不动，把精锐骑兵埋伏起来。这时，辽军开始进攻了。塔尔率先头部队渡河，部队刚刚过一半，兵法有云：“半渡而击之”，这是最佳的反击时刻。郭进当然没有浪费机会，他果断将骑兵投入战斗，奋勇出击。辽军这里有一半人还在河里，只能干瞪眼啊，在宋军铁蹄的冲击下，辽军大败。辽国冀王塔尔及其子战死，一起战死的人还有主将耶律沙的儿子以及其他一些将领。耶律沙本人也差点没命，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眼看老命就要休矣。就在这时，耶律斜轸的后继兵团赶到，万箭齐发，逼退宋师，总算救了耶律沙一命。

白马岭之战，是北伐之战的关键一役。

辽军元气大伤，后来北汉驸马卢俊再度向辽国告急求援，辽国政府明确表示，不能再发兵救援。这一表态，无疑葬送了北汉。

四月，宋太宗抵达太原城下。

宋军已包围太原，从四面进攻，但战况最艰难的方面是在城西，这里正对着北汉皇宫，守备最强。宋太宗亲自视察城西，督诸位将领攻城，战况打得非常激烈。身为皇帝，宋太宗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他身披甲胄，冒着被敌人矢石击中的危险，指挥军队作战。身边的人对皇帝的安全非常担心，太宗皇帝答道：“将士争先效命于锋镝之

下，朕岂忍坐视？”这话一说，前线所有将士无不感动，勇气倍增，个个摩拳擦掌。

为了征服太原，大宋帝国不惜血本，太原城下的弓箭兵就达数十万人之多，数百万支利箭射向城内，一时间，太原城内的墙垣之上，都插满了箭。

在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北汉军民抵抗也相当顽强，给宋军造成不少麻烦。宋军密集的箭雨，反倒为北汉守军提供武器。北汉皇帝刘继元下了一个命令，百姓捡了箭矢后可以换成钱，每一支箭换十钱。城内居民当然争先恐后收集箭矢，靠这种方法，居然储备了一百多万支箭矢，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出这次攻坚战之激烈程度。

太宗皇帝不断地巡抚各营，每到一处，都令士气高涨，攻城更加猛烈。到了五月时，太原城内的局势急剧恶化。首先是防御工事几乎遭到宋军矢石的破坏，“城无完堞”；其次，不少北汉高级官员、将领向宋军投降，其中包括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等人。

北汉国主刘继元心里明白，契丹人是不会来救了，城外的敌人有数十万之多，而城内的守军已不足三万。太原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无奈之下，刘继元只得派遣使者，请求投降，上表纳款，待罪台下。

宋太宗接受刘继元的投降，接收十个州，四十一个县，共计三万五千户，兵卒三万。这个弹丸之国在与大宋顽强斗争二十年后，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北汉名将刘继业，也就是千载传名的杨家将杨继业。在太原城陷落、北汉国主刘继元投降后，刘继业居然还不肯投降，他仍然顽强抗战。他的骁勇与对国家的忠诚，令宋太宗颇为感动，不忍心杀死这位忠勇双全的名将，便让亡国之君刘继元前去招抚。

面对昔日的国主，刘继业心中大恸。因为忠诚，他不屈不挠，抗战到底；因为忠诚，他最后还是在旧主的招抚下，归降了大宋帝国。刘继业的归降，令宋太宗大喜，授予他领军卫大将军之衔，出任郑州防御使，同时恢复他原来的姓氏“杨”姓，改其名“继业”为“业”。这样，刘继业的姓名变成了杨业，就是千古流传的杨令公。

十一 当头一棒：自负的代价

平定北汉，是宋太宗引以为豪的伟大胜利。这位大宋帝国皇帝不禁飘飘然了，以周世宗、宋太祖两位旷世明君的不世才华，都未能吞并北汉，可是他却做到了。在这一刻，宋太宗自以为超越了前世君王，他要把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表面上看，中国境内地方割据势力已经全部被消灭了，但是大宋帝国并未真正意义上统一中国，因为北方还有燕、云等十六州的土地仍在契丹人手中。

这十六州，是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人的，时间是公元938年，距宋太宗平定北汉（公元979年）已过去约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中原政权曾多次出兵，试图夺回燕云十六州，但此时的契丹（辽）国力强盛，军事力量也很强大，绝不会将这些地盘拱手让出。周世宗柴荣曾大举北伐辽国，不幸在攻打幽州时染病，只得退兵，不久因病去世，遂使北伐事业付诸流水。

大宋开国后，宋太祖把主要精力放在扫荡地方割据势力上，一时间腾不出手解决燕云十六州的历史遗留问题。他曾经想过以购买的方式收回中国失地，为此建了一个“封桩库”，就是一个钱库，打算积蓄到一定数额后，向契丹人购回土地。倘若契丹拒绝购地计划，则以钱库的储备，作为北伐的军费。

如今北汉已灭，对宋太宗来说，应该挟胜利之威，一鼓作气，收回燕云十六州，把契丹这个异族势力彻底逐出中国境内，这才算真正完成统一大业。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太宗，竟然在攻克太原仅半个月后，便下诏伐辽，直接从太原出发，向东挺进，目标是夺取幽州、蓟州，进而光复被契丹所占领的全部土地。

这个诏令一下，所有将士无不目瞪口呆。

北汉战事刚刚结束，经过数月苦战，将士早已疲惫不堪，急需休整。在攻打太原之战中，宋军将士表现得相当英勇顽强，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现在应该是要名正言顺得到朝廷的奖赏吧。可是宋太宗这个大老板却根本不提发薪水、奖金、提拔干部这些事，只给精神奖励，然后又要求大家加班加点，再接再厉。说实话，将士们谁也不想拖着疲倦的身躯，开始新的远征。可是面对兴奋不已的皇帝，谁也不敢吭声反对。

在平北汉之役中，宋军与辽军在白马岭交锋过一次，大获全胜。这次胜利也令宋太宗相信大宋军队的战斗力远在辽军之上，凭借这支钢铁部队，必定能把辽人打得落花流水。

宋辽战争开始了。

一切看上去都十分顺利。

宋军一跨过边界，辽国东易州刺史刘禹便献城投降。辽国人确实没料到宋军刚收拾北汉，马上会发起攻击，备战不足，狼狈不堪。辽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仓猝率军迎战，被杀得大败，损兵折将，被俘五百人。宋军进军颇速，皇帝御驾已到涿州，守城的判官刘原德开门投降。

从五月二十日从太原出兵，至六月二十三日，一个月的时间，宋军已经打到幽州城下。自从辽国从石敬瑭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后，便把幽州更名为燕京，又称为南京，是辽国的陪都。在辽国的行政区划

中，南京（幽州）管辖顺、檀、涿、易、蓟各州，若能一鼓作气攻克，则其他州必望风而降。

可是辽国毕竟是强国，军事人才还是有的。

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在白马岭曾与宋军交过手，知道对手实力强劲，加上皇帝亲征，诚不可与之硬碰硬。怎么办呢？得有计谋才行。当时耶律希达刚吃了败仗，宋军对他的部队一定会轻视，针对对手这一心理，耶律斜轸设计了一个方案。他首先派一部分士兵，扛着耶律希达的旗帜，作为诱饵，目的是引诱宋军上当。

既然是诱饵，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些辽军假扮着耶律希达手下的残兵，宋太宗接到情报后，对其嗤之以鼻，马上挥师进击。皇帝亲自指挥，士兵们表现神勇，一战便击毙敌人一千余人。正当宋军将士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岂料耶律斜轸的主力部队却从侧背发起进攻，抄截其后路。宋太宗大惊，担心退路被截断，只得仓促下令退兵。耶律斜轸的部队乘机前进到清沙河北，与南京（幽州）遥相呼应，互为犄角。

耶律斜轸的努力减轻了幽州城的军事压力，宋太宗不得不分兵对付。即便如此，幽州仍然险象环生。宋太宗派宋渥、崔彦进、刘遇、孟元喆四将分别从四个方向进攻，这也是宋军攻城的惯用手段。面对宋军的凶悍进攻，辽将李扎勒斡投降，幽州城内人心惶惶。

幽州之所以未沦陷，得益于辽国御盏郎君（官名）耶律学古的出色表现。幽州被围后，他带着自己的部队驰援。此时城外都是宋军，他根本无法进城，便秘密挖掘一条隧道，把部队送进城内。耶律学古在防御上颇有一套本领，严防死守，毫不松懈。一时间，宋军的攻城虽急，却毫无进展。

当幽州被包围的消息传到辽景宗耳中时，他既感意外，又感震惊，紧急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前往救援。与耶律沙同行的，还有一位自动请缨的将领，他名叫耶律休哥。在此之前，耶律休哥曾经参加过平定乌古、室韦两个反叛部落的战争，有非常卓越的军事才华。由于他主动请战，辽景宗让他代替吃了败仗的耶律希达，率领精锐兵团前往解幽州之围。

当耶律沙、耶律休哥的援军在七月初抵达前线时，他们发现情形对辽军大大不利。向大宋军队投降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辽国建雄节度使刘延素、蓟州知州刘守恩等。没有几个人认为幽州城守得住，因为宋军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

可是观察力敏锐的耶律休哥，却发现了对手致命的弱点：宋军将士的斗志并不高昂，对于皇帝攻城的指示，大家消极对待。士气之所以低落，宋太宗要负很大责任，他没让官兵有充分的休整时间，又没有及时对军队论功行赏。没有名利、没有休息，却要让将士去拼死，谁愿意呢？一支没有士气的军队，即便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也是纸老虎。

时间是七月初六，幽州战事进入到第十二天。

率援兵前来的耶律沙气势汹汹地杀来，已抵达幽州城西的高梁河。在几个月前的白马岭之战中，耶律沙差点死于非命，自己的儿子也战死了，因此他对宋军还是有点畏惧，放不开手脚。在宋军的反击下，耶律沙再尝败绩，一战即溃。看来耶律沙的军事才华确实一般，他撤退后，与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的部队会合，指挥战役的重任，遂交到耶律休哥手中。

耶律休哥果然智慧超群，不以常理出牌，大打心理战术。从军队数量上说，辽军远远不如宋军，大宋军队几十万人，皇帝亲自出马，把最精锐的部队都投进来了。为了不让宋军窥破自己兵力的多寡，耶

律休哥把进攻时间选定在夜幕降临之后，不走大路，而是走小路，因为大路开阔，一览无遗，很容易暴露真实兵力。不仅如此，耶律休哥还要求每个士兵手持两根火把，远远望去，火光遍野，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

宋军果然中计。

皇帝亲征，虽能鼓舞士气，但有时也有负面作用。前线将领一定要花费很多精力、兵力以保护皇帝安全，在军事行动上不敢采取大胆冒险的战术，而是谨慎保守。在判断不清辽军兵力多寡的情况下，宋军没敢贸然出击。耶律休哥抓住战机，与耶律斜轸兵分两路，从左、右翼钳击宋军。守卫幽州城的耶律学古也乘机打开城门，把队伍一字排开，其实并不是要出战，只是摆摆样子，一边擂响战鼓，一边组织城内百姓大呼大叫，一时间声震天地。

别看宋军人数众多，要保护皇帝，又要预防幽州城内辽军的反扑，能用于对付耶律休哥的兵力就相当有限了。在战场上，耶律休哥骁勇异常，他身负三处枪伤，裹创犹战。主将的战斗精神鼓舞全军上下，战局开始变得对辽军有利了。

虽然宋军将领们力保皇帝的安全，可是飞箭不长眼，特别是在黑夜中，等你发现飞来的箭矢时，要躲避就来不及了。很不幸，太宗皇帝大腿挨了一箭，血流如注。宋太宗一心想超越哥哥赵匡胤，上台后极力鼓吹军国思想，但挨了一箭后，就可以看出他绝非英雄人物。我们可以把他与汉高祖刘邦做一对比。当年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尝胸中一箭，他跌落马下后，呼道：“小贼射中我的脚趾了。”把重伤说成轻伤，这是安抚军心。可是宋太宗挨了一箭后呢？他吓坏了，第一个当逃兵，乘着一辆驴车，往涿州的方向跑了。

皇帝都逃跑了，这仗还怎么打呢？

高粱河之战，宋军在皇帝坐镇、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被耶律休哥

的辽军打败了。此役的胜利，不仅解了幽州之围，辽人还乘胜追击，穷追猛打。与宋太宗相比，耶律休哥的伤势要严重得多，他身体虚弱，无法骑马，但仍坚持坐在马车上，指挥作战。辽军从幽州一路反攻至涿州，沿途缴获了大量宋军遗弃的武器、粮食、钱币等。

幽州一战，令宋太宗蒙羞，他不得不转攻而守。

辽国并非省油的灯。在辽景宗看来，这场战争完全是宋帝国一手挑起的，单方面撕毁两国和约，战争已是全面爆发了。当宋军被驱逐出境后，辽人越过边界，攻入大宋。

这是太平兴国四年（979）九月，即高粱河之战的两个个月后，辽国派南京留守韩匡嗣与耶律沙、耶律休哥等将领南伐，以报幽州被围之仇。

辽军长驱直入，推进到了满城（今河北满城），与宋朝将领崔翰的驻军对峙。面对漫山遍野的辽军，崔翰排兵布阵，摆起了“八阵图”。说起这个“八阵图”，据说是三国时代诸葛亮发明的一种阵法，变幻莫测，可抵十万精兵。其实诸葛亮的八阵图是什么样子，恐怕也没有流传下来，那么崔翰的这个“八阵图”是从哪儿来的呢？

大家不要惊讶，这个八阵图，是皇帝所亲传！

原来宋太宗自认为是高明的军事理论家，别看他在战场上挨一箭就落荒而逃，他对自己的军事理论水平那是十分得意的。从幽州撤兵回国后，宋太宗认定辽军一定会前来报复，便对边防工作做了安排，还特地把自己军事研究结果“八阵图”拿出来与诸将分享。皇帝交待说，辽人来犯，只须以我这个八阵图排兵布阵，准能打败敌人。

现在，崔翰要用太宗皇帝军事思想来武装自己，打算按图布阵，排为八个阵形，每个阵相距百步。这个排阵法，可把部将赵延进给吓

坏了。他警告主将说：“如今敌人骑兵漫山遍野，我方布阵却星罗棋布，松松散散，这岂不是给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吗？依我的看法，必须把兵力集中起来使用，才有取胜的可能。”

这岂不是否定英明领袖的军事智慧吗？崔翰不无忧虑地说：“万一没打胜仗，那可怎么办？”照英明领袖的“八阵图”打仗，就算输了，皇帝也怪罪不得；若自作主张，打输了可要犯政治错误了。赵延进急了，脱口道：“若是打败仗，我愿意独揽责任。”此时镇州监军李继隆也站出来说：“行军打仗，要因机变化，哪能预先设定某种阵法呢？若皇帝怪罪下来，我愿意承担责任。”

既然部将们都这么说了，崔翰也只能把皇帝的“八阵图”抛在一旁，改八阵形为两阵形，集中兵力应战。

为了诱敌，宋军使出诈降计，派人前往辽军大营，递上请降书。辽国主帅韩匡嗣信以为真，他心想宋朝皇帝都被打得落荒而逃，宋军士气低落，投降乃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耶律休哥却反对道：“我观察宋军军队，严整精锐，看起来不像投降的样子，一定是诱敌之计。”韩匡嗣求功心切，压跟听不进去。

果然不出耶律休哥所料，当韩匡嗣得意扬扬地前去受降时，遭到宋军精锐部队的痛击。此役辽军大败，弃尸战场者一万余人。在辽军各路部队中，只有耶律休哥的人马准备充分，边战边撤，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全师而退。

辽国的入侵被打败了，宋太宗总算捞回点面子。

可是宋辽战争一旦开打，边界便无宁日。辽军虽然吃了败仗，可是从长远来看，并不吃亏，因为韩匡嗣战后被辽景宗降罪解职，长于兵略的耶律休哥全权负责对南宋的战争。这个人事上的变动非常关键，耶律休哥在辽国军界蹿起，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他将证明自己乃是大宋帝国的头号克星。

十二 旗鼓相当：宋辽边界拉锯战

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始运转，要停下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从晚唐到五代，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乱局之中，契丹人也乘机崛起于北方，成为中原政权的劲敌。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位皇帝的铁腕扫荡，中国境内的割据势力已全部被剪除，大一统后的宋帝国，当然要挑战契丹人在北方牢不可破的霸权。燕云十六州是摆在宋、辽两国面前的最大问题，辽国不愿拱手让出，而宋帝国则志在必得。

宋太宗突袭幽州，拉开宋辽战争的序幕。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其实最脍炙人口的便是杨家将的故事。

杨家将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得益于一部同名小说《杨家将》，小说中的杨老令公，便是历史上真实人物杨业。杨业本名杨重贵，年轻时善骑射，后成为北汉的一员将领。北汉皇帝刘崇十分器重他，赐予刘姓，改名为继业，几乎把他视为皇族成员。在北汉与宋的战争中，杨继业是相当卖力，甚至在北汉灭亡后，他还负隅顽抗。也正是这种忠勇的精神，使他赢得了宋太宗的尊敬，又让他改回原姓，同时改名为“业”，故而称为杨业。

杨业打仗勇猛，有拼命三郎的精神，早在北汉为将时，便得到了一个绰号，称为“杨无敌”。由于宋辽战火重燃，大宋帝国迫切需要一个熟悉边关事务的将领坐镇北疆，杨业在北汉时，对宋、辽两国军情都了如指掌，正是最佳人选。宋太宗拜他为代州刺史，驻守军事重镇雁门关，以防辽军入侵。

很快，杨业就证明了自己价值。

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辽军入寇雁门关。勇猛无敌的杨业并非一个莽夫，他足智多谋，为了出奇不意打击敌人，他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他率数千骑兵悄悄地离开驻地，敌人从北面来，他却往西面去，当时手下的将士都摸不着头脑，这位老将军玩什么花样呢？杨业成竹在胸，往西走一段后，他的部队穿小路北上，绕道到契丹人的背后，冷不防发起突袭。此役契丹人大败，辽国驸马萧咄李被当场击毙，辽将李重海被生擒。

雁门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帝都后，宋太宗龙颜大悦，提拔杨业为云州观察使。此役的胜利也令杨业的威名传遍北疆，契丹人对他非常忌惮，只要看到杨业的旗号，他们便躲得远远的。可是杨业的英勇表现，却引起边关守将们的嫉妒，他们认为杨业不过就是个北汉投降过来的将领，能保住性命已是朝廷莫大的恩典了，居然还如此大出风头，着实可恶。于是一封封中伤攻击的信件不断地发往宋太宗那儿，深谙权谋术的皇帝故意把这些信件交给杨业本人过目，以示自己对他的绝对信任。杨业果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忠皇帝与大宋朝廷。

杨业固然令辽军闻风丧胆，但辽国的耶律休哥更令大宋帝国胆战心惊。

耶律休哥的军事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契丹历史最出色的将领。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人悍勇而嗜杀，耶律休哥继承了勇敢的品格，却不嗜杀。他智勇双全，这在高粱河一役中尽显无遗，在兵力不及宋军的情况下，实施一系列军事欺骗，以少胜众，在战斗中身披数创，犹战斗不懈，实有古名将之风采。

凭借在战场上的一系列非凡战果，耶律休哥成为辽国军政重要人物，被辽景宗封北院大王。自从幽州之围后，辽国一心要报复大宋的

入侵，两度出兵南下，不料却损失折将。第一战韩匡嗣损失一万余人，第二战驸马爷被杨业一刀给砍死了。辽景宗乃是辽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决定亲征大宋，以雪前耻。

辽乾亨二年（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辽景宗先祭天祀地，拜了兵神后，大举挥师南下，入侵宋国，兵围瓦桥关。

瓦桥关守将张师率部出战，欲与辽军一决雌雄。辽景宗亲临战场督战，当两军激战犹酣时，只见得身旁一人纵马而出，此人手舞长刀，胯下的马甲是十分耀眼的金黄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此人正是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作为战场上的指挥，他并不是只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耶律休哥冲入宋军中，阵斩敌方主将张师，宋军大骇，不敢恋战，退入城门，婴城固守。

数天后，一支援军已抵达瓦桥关，与辽军隔河对峙，辽军在北岸，宋军在南岸。耶律休哥披上战袍、跨上战马，就要渡河迎战。此时辽景宗一眼望见他那匹披着黄金甲的战马，这匹马实在太显眼了，这岂不是给宋军弓弩手有狙杀耶律休哥的机会吗？辽国皇帝唯恐自己的爱将受伤，特地叫他换来一匹披着玄甲的白马，看上去不太醒目。耶律休哥骑着这匹白马，率领精锐骑兵渡江，奋勇发出突击。宋军大败，耶律休哥一直追到莫州，生擒数名宋将，一路上尸横遍野。

此时的耶律休哥，几乎成为“战神”的代名词。辽景宗赏赐他御马金盏，并称赞道：“你的勇敢超过了大家的想象，若是人人像你这样，何必担心打不了胜仗呢？”

这一战的成果，令辽景宗心满意足，遂引兵退回国内。

但宋太宗却心有不甘。宋太宗是有进取心的皇帝，也自视甚高，岂肯让人站在头上拉屎呢？辽师一退，他又想乘机进取幽、蓟之地。这样杀来伐去，势均力敌，战争何时才是尽头？很多人反对这种无谓的军事冒险计划，提出“峻垒深沟、蓄力养锐”、让百姓得以休养生

息、安内而养外、以仁怀天下等措施。皇帝听从了这些建议，在北方诸州开运河、通漕运、筑水堤等，积极做好战备。

在之后几年里，宋、辽两国边界冲突虽多，但规模都不大。比较重要的一次战争爆发于太平兴国七年（982）。

该年四月，辽景宗亲自挥师，再攻大宋。这位契丹皇帝与宋太宗一样，热衷于御驾亲征，但本领也着实一般。首战满城，辽军便遭重创，守太尉希达里中箭身亡。辽国大将耶律善布被宋军伏击，差点丢了小命，只是耶律斜轸拼死打开包围圈，把他给救出去了。辽景宗身体状况本就不太好，遭此败绩后，怒火攻心，竟然病倒了，只得提前回国去了。

战争仍在继续。辽景宗留下三万人马，兵分三路，分袭雁门、府州、高阳关。雁门正是号称“杨无敌”的杨业把守，他与潘美联手，大破敌军，反客为主，攻入辽境，俘老幼万余口，获牛马五万。在应州战场，宋将折御卿挫败辽师，斩首七百级，获兵器牛羊万计。在高阳关战场，宋将崔彦进也取得阻击战的胜利，获兵器牛羊数万。

这样，辽师的三路进攻，均被打退。

这几年的边界战争中，宋、辽两国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互有胜负，难分高下。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大消息传来了：辽国皇帝辽景宗病逝了。辽景宗是在伐宋归来几个月后去世的，他的死给辽国带来了一个大问题：继位者耶律隆绪年仅十二岁，这个小孩子有能力领导一个大帝国吗？

十二岁的小娃娃，当然没法统治一个国家，于是一个女人从幕后走向前台，她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辽国萧太后。

萧太后，原名萧绰，小名燕燕，出身辽国名门望族。她父亲萧思温，曾担任辽国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位高权重。萧燕燕从小聪慧过人，其父赞道：“此女必能成大事。”十六岁那年，她被选为贵妃入宫，后被册立为皇后。萧燕燕政治上的才华，在辽景宗在世时就脱颖而出。由于辽景宗身体一直不太好，国家大事的决断，许多是出自皇后萧燕燕之手。史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帝卧床榻间，拱手而已。”

辽景宗去世后，萧太后临朝称制，成为国家真正的统治者，这位女强人注定要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她与唐朝女皇武则天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没当皇帝罢了，两人都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内心之强大常人难以想象。萧太后刚上台时，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她曾这样说：“母寡子幼，族属雄壮，边防未靖，奈何？”在这个时候，两位大臣的效忠与辅佐，是政权得以顺利交接的关键。这两人，一位是契丹人耶律斜轸，另一位是汉人韩德让。

韩德让与萧太后关系十分微妙，有些野史甚至称萧太后下嫁给了韩德让，这虽然说得离谱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俩人维持着情人的关系。由于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汉人也成为辽国人口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萧太后执政期间，重用汉人，推行汉化，致力于契丹与汉两个族的和睦。萧太后“汉化”思想的背后，未必没有韩德让的影响。

且说宋太宗获悉辽国居然女人当国，心里自然未免蔑视一番。在他看来，女人嘛，见识自然长不了，我且用计骗骗她。于是皇帝下旨，北方沿边诸州，务必守境力耕，不得擅出边关，不得侵扰契丹人、夺其畜产，违者以重罪论。这诏令下达，营造一派和平的景象，似乎两国就要罢战休兵了。

但是宋太宗的伎俩，并没有瞒得过萧太后。

萧太后虽是女流之辈，对军事却是十分精通，史书上称她“习于

兵事”，想必当年辽景宗亲征，她都随行的。她知人善任，对耶律休哥的军事才华大加赞赏，提拔他为南京（幽州）留守兼南面行营总管，全权负责边关事务。耶律休哥赴任后，细心留意宋军动向，发现宋太宗的诏令不过是个幌子。宋军正不断地把粮食送抵北部边关，并在黄河北岸修筑城堡，显然是在积蓄力量，以待下次进攻。

耶律休哥将计就计，一方面劝农桑、修武备、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则派出大量间谍，潜入宋帝国内，传播假情报。间谍们散布的消息主要有两个：其一，辽国国内空虚；其二，辽国边关将帅都是有勇无谋的傻大个，有蛮力没智慧。这些消息，令大宋边关将领十分振奋，上报给了朝廷。

与辽国相比，大宋帝国在军事情报上逊色许多。以前宋太祖在位时，每当对外发动战争时，势必要摸清对方的虚实，包括收集兵力部署、地形、敌将等情况，以便做一个完整的评估。可是宋太宗在这一点上，显然远不如他的哥哥。他对耶律休哥散布的假情况深信不疑。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几位地方大吏纷纷上书，提议对契丹发动战争，夺取幽州。

雄州知州贺令图、岳州刺史怀浦等上书称：“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在他们看来，夺幽州仿佛易如反掌。宋太宗不由得怦然心动，抑制不住北伐的冲动，因为在他内心深处，要成为像秦皇、汉武那样伟大的君王。

公元986年，即雍熙三年，轰轰烈烈的北伐开始了。

这一战，在大宋帝国历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十三 雍熙北伐：虎头蛇尾的远征

宋太宗北伐契丹的决定，显然是过于草率了，因为他对契丹的军事实力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估计。

萧太后上台后，辽国的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比辽景宗时更强大。萧太后深知大宋帝国颇为强大，未敢轻启战端，在南方采取守势，而把进攻重点放在打击党项人及女真人。公元983年，辽国讨伐党项，击破十五个部落；在太宗发动北伐的前一年，即公元985年，辽国大败女真，俘获十余万人，马二十多万匹，军事力量更加强大。然而，对于这一切，大宋帝国的情报机关却置若罔闻。

为了这次北伐，大宋帝国精兵倾巢而出，名将个个登场亮相。

宋军兵分三路出击，具体部署是这样的：第一路是主力部队，由大将曹彬领衔，崔彦进为副帅。曹彬乃是大宋名将，在平后蜀、平南唐之役中有赫赫之功。这位仁兄由于战功太大，后来当了枢密使，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总参谋长。这次曹彬重新披甲上阵，可见宋太宗对伐辽一战，势在必得。第二路兵团以米信为总指挥，杜彦圭为副帅，从雄州（河北雄县）出兵，这路兵团实力一般，只是协助曹彬的主力兵力作战。第三路兵团由田重进率领，从定州出发，经飞狐（河北涞源）向北挺进。

在三路大军出发后，宋太宗觉得还不够保险，为了确保在战场上有压倒性的优势，又派出第四路人马。这支部队以潘美为总指挥，杨业为副手，在西线发起攻击，任务是迂回到幽州侧背，与曹彬主力部队夹击，收复该城。

四路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敌国，兵精马壮，士气高昂。宋太宗躊躇满志，如此精锐的部队，别说打下幽州，就是天堂也可攻下。

果不其然，各路宋军捷报频传。

我们先来看看潘美、杨业这一路。潘美与杨业都是一代名将，杨业对辽军又十分熟悉，故而推进神速。攻入辽境后，潘美向北推进到了寰州，辽刺史赵彦辛望风而降；紧接着，宋军马不停蹄，直取朔州，朔州守将赵希赞同样举白旗投降。进攻应州之战仍然不费吹灰之力，辽国守将又投降了。潘美与杨业联手，果然勇不可挡，不久后，云州也被宋军收复。出师不到三个月，潘美与杨业连下四州，战果惊人。

再看看田重进一路宋军的进展。田重进是一员老将，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时，他就有份儿了。田重进攻入辽国后，首战飞狐，敌守将吕行德投降；紧接着，他兵围灵丘，守将穆超举城投降。辽国急忙派一支军队以阻击宋军深入，结果被田重进打败了，还损失两员大将。在蔚州之战中，敌军仍然没有顽抗的意志，很快举城投降。

协助曹彬进攻的米信兵团，也在新城大破辽师，取得一场胜利。

作为北伐主力的曹彬兵团，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曹彬兵团总兵力十余万人，担任主攻方向。越过宋辽边界后，这位名将先声夺人，攻克固安城，而后挺进涿州。辽军在涿州以东迎战曹彬兵团，然而力量悬殊，随即被宋军击破。曹彬乘胜追击，从北门攻入，占领涿州。涿州是幽州的南面门户，战略地位颇为重要，辽国派出一支军队南下，企图收复涿州。曹彬遣部将李继宣率轻骑渡过涿河，击退辽师。

从战争的第一阶段来看，宋军四路出击，节节告胜，攻城略地，反观辽军则不堪一击。难道辽国自萧太后掌权后，果真一落千丈了吗？难道在高粱河一役中大败宋朝皇帝的耶律休哥，竟成为了一头死老虎吗？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发现宋军的胜利着实不值得骄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真正的强敌还没出现呢。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发现，此期宋军所打败的对手，都是辽国中的汉兵汉将。自辽国获得燕云十六州后，由于这里是汉人区，辽国仍保留了汉人官吏、将领以统治汉人。这些汉族将领在与中原政权对抗时，大多数并不积极，稍稍抵抗便举旗投降了。这是北伐军频频告捷的原因之一。

然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执掌辽国大权的“女汉子”萧太后竟然带着未成年的小皇帝御驾亲征，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女政治家，比如西汉的吕稚、东汉的邓绥、唐朝的武则天等，她们都曾经是帝国最高统治者，但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像萧太后这样御驾亲征。写到这里，笔者也不能不为萧太后的勇敢而喝采。她非但勇敢，也有识人、用人之才，同时也知晓军事，把两位契丹名将用以对付两位宋朝名将。耶律休哥将对阵曹彬，而耶律斜轸则阻击潘美。曹彬、潘美这对在平定南唐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宋双星，能否再度席卷幽蓟之地呢？

开封城内，虽捷报频传，宋太宗却眉头紧锁。这位大宋皇帝虽然在战场指挥作战的本领略显蹩脚，对大的战略却仍然有独到见解。他凝视着案台上的地图，陷入沉思，内心有一种忧虑。他在担心什么呢？曹彬推进的速度太快了，军队越往前推进，后勤补给线越长，倘若辽军在这个时候切断他的运粮通道，那岂非置于危险的境地？

宋太宗的担心是有道理。

问题是，宋太宗都看得出来的问题，难道久经沙场的曹彬却看不

出来吗？

当然不是。

那么曹彬为何要冒这个风险呢？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他过于轻敌了。自宋师出兵两个多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辽人望风披靡，这很难不令他对敌人有轻视之心；其二，他认为耶律休哥丢失涿州后，一定会主动进取，与宋军展开决战。只要是速战速决，他就可以在粮食吃完之前，打败对手。其三，潘美、杨业连克四州，这也给曹彬很大的压力，他可不想在战绩上输给别人。

曹彬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可惜的是，他遇到了一位伟大的将领。既生瑜，何生亮！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在帐中踱来踱去，但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地图。自从全权负责辽国南部军事以来，耶律休哥一直在构想一个大战略，其核心就是诱敌深入，然而给予宋军致命一击，凭借一战来彻底稳定南线战局。为此，这些契丹名将不断放出风声，示弱于敌，引诱宋军主动进攻。果不其然，宋太宗终于没忍住，数路大军深入辽境，势如破竹。耶律休哥明白，他所面对的曹彬，乃是沙场宿将，且手下有十万精兵，不可采用硬碰硬的手段，必须要觑准敌人的弱点。那么曹彬的弱点在哪儿呢？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宋太宗都看出来了，在于后勤补给线，十几万大军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啊。

耶律休哥并不急着与曹彬决战，两人在较量着耐心。持久战对远距离作战的宋朝军队相当不利，耶律休哥采取守势，同时派出轻骑兵不断骚扰。在夜间，契丹骑兵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对宋军薄弱据点发起突袭，打击宋军士气；在白天，耶律休哥则派出精锐骑兵，埋伏于山林草莽，袭击宋军的运粮交通线。

很快，曹彬发现问题严重了。

十几天后，曹彬兵团的粮食供应不上了。没粮食吃，向前推进与辽军决战，那是不可能了，守住涿州也不可能，只能后撤。于是曹彬下令，放弃涿州，撤向雄州，等粮食供应上了，再作进攻打算。像曹彬这样富有作战经验的名将，犯下这样的错误，确实不应该。我们只能说，他确实被耶律休哥散布的假情况忽悠了，对辽军过于轻视才会贸然深入，结果粮食出问题了，被迫撤了回来。

曹彬的做法，令皇帝十分不满，他派使者快马传达指示，要求曹彬兵团速速与米信兵团会合，按兵不动，养精蓄锐，等待潘美、杨业迂回到幽州城背后，再联合起来攻取幽、蓟。宋太宗的指示是正确的，既已失去主动权，不如等待时机。

按兵不动！眼看着潘美与田重进这两路兵马节节胜利，作为主力的曹彬兵团却按兵不动，这岂不让人看笑话吗？曹彬的部将们出谋划策，纷纷请战。身为主将，曹彬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过于仁慈。他在攻打南唐时，为了制止手下将领滥杀无辜，他不是用严厉的军纪来约束，而是用装病的办法。他是一个好的将领，但缺乏统御力。在将士们纷纷请战下，曹彬被舆论绑架了，只得依从部下的建议，再度向涿州发起进攻。

但是，此是涿州的局势已大变了。

御驾亲征的萧太后及辽圣宗已达抵达涿州以东五十里之处，与太后同来的，是契丹最精锐的骑兵部队。

萧太后颇有军事眼光，她命令耶律休哥等人派出轻骑兵，对曹彬大军不停地骚扰，迟滞其行军速度。曹彬一路且战且行，花了四天的时间才抵达涿州。时值四五月之交，中国农历，四月已进入夏季，此

时天气开始变得炎热，经过多日行军作战后，宋军已是疲乏不堪了。到这个时候，曹彬不得不要重新评估战局了。萧太后的到来，使耶律休哥手上的兵力猛增，而且是清一色的契丹骑兵，其战斗力之强，远非曹彬之前所遭遇到的对手可比。

怎么办？战，或是不战？

曹彬已是没有底气，他又一次下令，从涿州撤退。两度兵抵涿州，又两度撤退，作为一名大将，这种做法着实轻率，同时也大大挫伤了士气。本来就不该冒进，曹彬偏在部下要挟下出击，出击了又没有战斗的决心，那么这仗如何打？

一直耐心等待的耶律休哥绝不会错失这次机会，他马上亲率精锐骑兵，全力追击。宋军以步兵为多，而契丹人则是骑兵，速度快，耶律休哥终于追上曹彬了。辽国名将将与宋国名将在岐沟关（河北涿县西南）展开较量，但这并不是势均力敌的对阵，而是一边倒的战斗。两进又两退的宋军将士全无招架之功，被打得丢盔弃甲，曹彬率部突围，往拒马河方向退却。到了拒马河时，前有河流挡路，后有契丹追兵，宋军乱得像一锅粥。在这个时候，曹彬已完全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全军将士只得各自为战了。

拒马河成为宋军的灾难之地。由于一片混乱，在渡河时，人马相践踏，被踩死者无数，被淹死者无数，被追上来的契丹骑兵杀死者无数。当时为了逃命，宋军士兵把沉重的盔甲脱了扔在岸上，把刀枪剑戟这些武器也都扔了，拒马河畔，武器堆积如山，拒马河中，尸体累累。史书上这样记道：“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不仅是士兵，宋军中高级官员也死了很多人。被任命为幽州知州的刘保勋，都还没到幽州城，就溺死于拒马河，他儿子来救他时，也不幸溺死。殿中丞孔宜同样在渡河时溺水而死。

若不是副将李继宣率部与契丹血战，宋军的伤亡将更加惨重。这

位勇猛的将领把命豁出去了，终于逼退辽师。然而此役宋军死亡过半，数万人命丧沙场。垂头丧气的曹彬率着残兵败将退往高阳，这也意味着雍熙北伐已经失败。

戎马一生的曹彬，以北伐的惨败而暗淡收场。而耶律休哥则成为契丹的民族英雄，萧太后封他为“宋国王”，注意这个王号哦，耶律休哥的王号是“宋”，这不啻为对大宋帝国的蔑视。豪情万丈的耶律休哥提议，乘胜南略，把辽、宋的领土分界线南移到黄河一线。但是萧太后有自己的考虑，未予批准。

这一战，是宋辽历史上的关键性一战。从此，辽国进入最强盛的“萧太后时代”，而吃了败仗的宋帝国，则完全改变对辽战略，转攻为守，积极进攻变为消极防御，收复幽州的梦想，也如风筝渐去渐远了。

十四 杨业之死：忠烈杨家将的真实故事

曹彬败退后，耶律休哥在东线战场上把宋军彻底赶出去了。在西线的蔚州、寰州、朔州、云州、应州仍在宋军手中，这也是北伐过程中路军（田重进兵团）与西路军（潘美、杨业兵团）所取得战果。不过，辽国人岂会将此五州之地拱手让出呢？萧太后已经指派契丹名将耶律斜轸统率十万大军，马不停蹄杀奔过来。

东线战事尘埃落定，西线大厮杀不可避免。

耶律斜轸曾担任辽国南院大王、北院大王、西南面招讨使等，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公元979年的白马岭战役、高粱河战役中，他均有出色的表现。萧太后上台后，他深受信任，继而在讨伐女真的战争中再立奇勋，成为辽军中可与耶律休哥相媲美的名将。

在耶律休哥大败曹彬后一个月（雍熙三年六月），耶律斜轸挥师越过太行山，进攻宋军控制下的安定城。宋军将领贺令图在安定城西与辽军交战，岂料根本不是敌人对手，只得放弃安定，向南撤退。耶律斜轸追至五台，大破宋军，此役，贺令图损失数万人马，元气大伤。辽军挟胜利之威，于次日攻陷蔚州。

宋太宗接到快马送来的战报后，立即指示驻守在应州的潘美率领军队增援贺令图。潘美收到诏令后，即刻点兵启程，直奔飞狐。然而，耶律斜轸已抢先一步，占据有利地势，大败潘美，而后兵锋直取应州。此时应州几乎毫无防御力量，部队都追随潘美出征了，剩下的

守城部队兵力单薄，如何抵御辽军，只得弃城而逃。耶律斜轸几乎不战而夺回应州，又把下一个目标对准寰州。寰州守军没有弃城而逃，他们选择了顽抗到底，但面对优势敌军，很快便沦陷了，守城的一千多名将士被杀。

潘美知道这四个州是守不住了，可是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尽可能把四州的百姓迁往大宋境内。土地未能收复，但是总要把汉人同胞从契丹人的铁蹄下拯救出来吧。潘美收罗残兵败将，退到朔州狼牙村，此时听到契丹攻陷寰州的消息。

契丹气焰嚣张，向朔州挺进，距潘美大军已经不远了，怎么办呢？

副将杨业认为应避其锋芒，他说道：“如今敌人兵锋益盛，不可与之争锋。我们应该率兵出大石路，先派人通知云州、朔州守将，先把云州百姓撤出来，然后我军直逼应州（应州此时已沦陷），契丹必定要集中兵力与我抗衡，届时让朔州军民出城，向石碣谷转移。在石碣谷入口处，埋伏一千人的强弩兵，再派一支骑兵支援，那么云州、朔州、应州三地百姓可以保全了。”

杨业的这个提议，着力点在于尽可能多地把百姓保全转移到国内，并不想与契丹人打硬仗，消耗实力。可是我们前面说过，在宋军将领中，许多人对杨业是有敌意的，一则是他是北汉降将，再则他在边关名气很大，令人嫉妒。听到杨业的发言后，有一个人站出来斥责道：“将军手握数万精兵，却畏懦如此！应该要擂响战鼓前进，直奔马邑与敌人决战。”

说话者何人？却是监军、蔚州刺史王侁。从王侁的名头上，就是个挂名刺史，因为此时蔚州已经被辽军夺回了。王侁此言一出，顺州团练史刘文裕也随声附和，表示赞同。杨业断然否定道：“不行，那

样做必败无疑。”

王侁脸上露出轻蔑神情，冷嘲热讽地说：“你平素绰号叫‘杨无敌’，如今遇到敌人就逗留不前，莫非将军心怀他志吗？”

这句话，让杨业涨红了脸，暴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王侁含沙射影，暗示杨业本来就是个降将，难不成又想向辽国投降吗？你想想，当年杨业还是北汉大将时，北汉其他人都投降了，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投降，因为他看重的就是个人的名声、气节。如今王侁却讽刺他不过是个小人，这岂能不让他愤怒呢？

他悲愤地对王侁等人说：“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只是时局不利，只会令士卒死伤却不能建立功业。如今各位责备我杨业怕死，我当为诸公做出表率。”

明知此去根本就是做无用功，为了自证忠心，为了捍卫名誉，杨业不得不去做。临行前，他来到主帅潘美帐中，流着泪道：“我这一去，凶多吉少。我杨业原是太原降将，按理早就该死了。承蒙皇上不杀之恩，还宠幸有加，授我兵权。我并非怯敌不击，而是想寻找更好的机会，能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如今诸君责备我避敌不战，我只能先死以表心迹了。”

身为主帅的潘美一声不吭，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也许他与其他人一样，把杨业看成为是威胁自己地位的眼中钉。杨业也没有想得到潘美的安慰，他之所以前来，除了表白心迹外，主要是不忍心麾下将士跟着他去送死。于是他摊开一张地图，用手指向一处名为“陈家谷”的地方，对潘美说：“请诸位将军在此两侧埋伏步兵强弩，等我转战到此时，以步兵援救，从左右两翼夹击敌人。否则的话，恐怕没人能活下来了。”

对于杨业这个请求，潘美也不好拒绝了，只得同意。

于是杨业率部出发，向敌人重兵集结的方向挺进。潘美、王侁则按照杨业的要求，在陈家谷口埋设伏兵。

耶律斜轸早就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宋军往里钻呢。他得悉杨业率军前来，便亲自率军迎战。此时的杨业已绝生还的念头，他勇猛冲锋在前，锐不可当。老谋深算的耶律斜轸佯装不敌，向后便撤。其实辽军早就设下伏兵，以杨业丰富的军事经验，在一般情况下会十分谨慎小心，但此时他内心悲愤，就算知道敌人有伏兵，他能后撤吗？他选择了向前冲，此时伏兵四起，耶律斜轸也杀了个回马枪，杨业大败。

为了保全士卒性命，杨业还是率残兵败卒退回狼牙村。他希望埋伏在陈家谷口的步兵、弩兵能给予敌人重大杀伤。杨业一路战，一路走，边杀边退，到了傍晚时，抵达陈家谷口，可是他却惊愕地发现，谷口空无一人，根本没有一个宋朝官兵。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杨业率部出发后，王侁就在陈家谷口等待其消息。可是等了半天，却没有任何消息。王侁便派人到高处瞭望，还是没发现动静。他估算了一下，觉得杨业要是打败仗，那应该早就退回来了，到现在还未回来，肯定是把辽军打败了。一想到这里，王侁心里琢磨：我可不能让杨业把功劳给抢了。于是他马上召集所部，不必在谷口埋伏了，咱们抄小路去追击敌人。

潘美一听，这怎么行，你王侁要是跑了，辽军打到这里，我怎么扛得住？他想制止王侁，可是王侁不理他，自个儿走了。有人会问，潘美不是总司令吗，怎么王侁不听他的呢？原来王侁这个监军，他就是代表天子监督前线将领的，有皇帝老儿撑腰，不把总司令放在眼里。潘美大惊，想想这里不安全了，也顾不得杨业的嘱咐，下令军队撤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军失利的一个原因，无论是曹彬或是潘美，作为前线统帅，他们并没有一言九鼎的真实权力，反倒处处受制

于部将，这样一支军队，哪有凝聚力呢？

话说杨业望着空荡荡的陈谷，他用力捶胸，脸上充满悲恸的神情。他不是为自己悲，而是为所剩无几的部下感到悲痛。此时老将军手下只剩下百余人，他对众人道：“你们各自都有父母子女，不要跟我一起死，你们都快走吧。”这些士兵长期追随杨业，乐为其用，如今大难临头，岂有丢下将军自己逃命的道理呢？大家都流着泪，表示要与将军一起血战到底。

这时契丹人已经追了上来，这是最后的战斗了。尽管所有人已筋疲力尽，但老将军一声令下，大家都投入到契丹的白刃战中。“无敌”杨业果然神勇惊人，只见他大刀挥舞，砍倒了百十名契丹人，同时身上受了数十处伤，血流不停。打着打着，杨业的士卒已经死伤殆尽，只剩下他的儿子杨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等几个人。王贵也是一员勇将，箭术极好，他连续射杀数十名辽军，最后箭矢用完了，便赤手空拳，又杀了不少敌人，最后力竭被杀。杨延玉也是战斗到最后一刻，死在父亲身旁。

杨业再也没有气力了，这时，他心爱的坐骑撒腿便跑，冲破辽军的包围圈，一头冲到深林之中。这匹马很通人性，可是它也伤得极重，跑不动了，只得找了个树丛，藏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契丹将领耶律希达一眼望见马背上的战袍，引弓上箭，瞄准便射。杨业不幸中箭，翻身落马。契丹人一拥而上，把失去知觉的杨业生擒活捉了。

对于杨业，契丹人十分熟悉。他以前是北汉将领，而北汉是契丹的保护国。就说契丹统帅耶律斜轸吧，在七年前（公元979年）辽国援救北汉时，耶律斜轸与杨业（当是叫刘继业）是属于同一阵线，一起抵抗宋军的入侵。

然而有一个事实，即便在北汉时，杨业似乎也是属于反对与契丹结盟的。据《辽史》所记，耶律斜轸在俘获杨业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由此可见，杨业在民族立场上，始终是反对契丹人入主中原，占据中国故土的。

作为一代名将，杨业文化水平比较低，什么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他不太懂，也没这兴趣。但是他忠诚、勇敢、会打仗、有谋略。他在军事上的本领，应该是长期作战中总结、学习来的。杨业有点类似于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既作战勇敢，同时也很会带兵，因为能与士兵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

杨业武艺相当高强，身体强健。他归顺大宋帝国时，已经五十多岁，驻守在雁门关一带，这里冬天十分寒冷，一般人都得穿毡裘御寒。他却不怕冷，经常夹一件棉衣，露天坐着讲习军事，旁边也没有火炉。站在一旁的侍者都快冻趴下了，他却一点寒意也没有。可以说，他天生就是打仗的料。他与李广一样，军中政令十分简单，但士兵乐于为其效命，这点从他最后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来。

契丹是游牧民族，崇尚英雄，而杨业是个令人敬重的英雄，故而契丹人对他好生照顾。可是杨业却已下了必死的决心，他叹息道：“皇上厚遇我，我本期待以捍卫边关杀敌立功以报答皇恩，只是为奸臣为嫉，逼我赴死。如今王师败绩，我有何颜面苟且偷生呢？”于是他绝食三日，吐血而亡。

这次惨败的消息与杨业自杀殉国的噩耗传到开封城后，宋太宗大为痛心。监军王侁被除官，发配金州；潘美被降三级留用；追授杨业为太尉兼大同军节度使。皇帝这么做，一方面是表彰杨业的功勋，另一方面也是树立一个忠勇的榜样。杨家将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经典传奇。这既是百姓对杨门忠烈的景仰与传颂，也有官方宣传的痕迹。

在著名历史小说《杨家将》中，塑造了杨氏家族四代忠烈的人物形象，小说里面当然有虚构，那么历史上除了杨业外，还真的存在其他杨家将吗？答案是肯定的。杨业死后，他的五个儿子均被朝廷录用，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杨延昭，也就是小说人物中的杨六郎。

在杨业的数个儿子中，杨延昭的性格与父亲最像。杨业曾说：“此儿类我。”确实如此。杨延昭曾追随父亲参加雍熙三年的北伐，后来镇守大宋北疆，颇多战功。宋真宗也称赞他“治兵护塞有父风”，堪称杨家将第二代的出色人物。

杨家将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是杨文广，他是杨延昭的儿子。他的才华曾得到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赏识，后来追随狄青南征。考虑到杨文广是名将之后，宋英宗多次提拔他，官至定州路副总管、步兵都虞侯。与祖父、父亲一样，杨文广也是精忠报国，因公忘私。

可以说，杨氏家族为大宋帝国的边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代人抗击外敌的英勇事迹，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逐渐演变为小说《杨家将》，其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遂成为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五 诸神之战：耶律休哥与李继隆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宋朝是一个比较弱的王朝，总是挨人家的打。其实在北宋初期，大宋帝国还是挺强大的，宋太祖、宋太宗两任皇帝在对外战争上都积极进取。雍熙北伐失利后，大宋帝国的国策才由进攻转为防守。

曹彬被打败了。杨业死了。可战争还没完。

宋太宗显然打错了算盘，孤儿寡母不可欺也，萧太后是可怕的对手。辽国的复仇，很快如疾风暴雨般袭来。

时间仍然是雍熙三年，这一年的年底，攻守格局发生逆转。萧太后英姿飒爽，检阅南征部队，并任命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挥师南下。

耶律休哥诡计多端，《孙子兵法》里的那些军事原则，他是烂熟于胸，而且运用自如。他知道镇守雄州的贺令图，乃是宋军中最坚决的主战派，积极鼓吹收复燕云十六州。可是贺令图有勇无谋，头脑简单，又贪功好事，耶律休哥便想了一个计策：诈降。他派间谍潜入雄州，对贺令图说：“我获罪于契丹，愿归附大宋。”怎么归附呢？耶律休哥说，贺令图得率一支军队前来接应才行。贺令图心想，要是耶律休哥投降，那可是大功一件啊，他都没有细想，便率一支骑兵去接应。岂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骑兵被杀得片甲不留，而贺令图自己成为耶律休哥的阶下之囚。

搞定贺令图后，耶律休哥又在望都打败宋军。时任瀛州都部署的刘廷让大怒，率数万人马出战，扬言要踏平幽州。可是战争不是靠吹牛打得赢的，耶律休哥是实干家，他抢在刘廷让之前，占领了各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进逼瀛州。刘廷让自恃兵精马壮，与耶律休哥在君子馆（河北河间北）一带相持。可是两大因素导致宋军大败：其一，辽国萧太后率领主力赶到，投入战斗，形成绝对优势，包围刘廷让兵团；其二，寒潮骤至，天寒地冻，宋军的弓弩无法使用，武器优势发挥不出来。

朝廷急令沧州都部署李继隆救援刘廷让，可是李继隆发现解围并不现实，遂退守乐寿。在这种情况下，刘廷让只得全力突围，除了极少数人得以生还之外，他麾下的数万人马全军覆没。战后，宋太宗把战败责任归于李继隆，没有追究刘廷让。可是在追究李继隆时，又发现他的做法并无不妥，最后也取消调查。就这样，这场大败仗，最后居然无人负责。

在一年之内，宋军连续遭遇惨败，将领受责却很轻，由是可见宋朝的军事制度有着巨大的缺陷。这几次惨败后，“边将莫敢有议取燕云者矣”。

此时，大宋帝国北疆已是岌岌可危了。由于精锐丧失殆尽，整个边界线上的戍卒加起来不满万人，地方政府紧急之下，把根本没训练过的百姓编入队伍。可是这些民兵确实没有战斗力，契丹骑兵一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辽军接连攻下邢州、深州，而后攻破束城、文安，尽杀其丁壮，俘其老幼。

这下子可把太宗皇帝给气疯了，他咆哮了——朕要大发兵攻契丹！

可是兵在哪里？

帝国人这么多，还怕没兵吗？太宗皇帝派使者到河南、河北征兵，抓壮丁充数，八个男丁征一人。此令一出，可急坏了宰相李昉，他急忙写了一折奏章道：“河南百姓不同于边关百姓，只知农桑，不知战斗。如此大规模征兵，人心动摇，不少人逃到山林落草为寇。不仅如此，农作之事也大受影响。”

说真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多葬身于北疆，还能指望这些乌合之众吗？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继续对辽国保持守势。

雍熙北伐的惨败，让太宗皇帝对“雍熙”这个年号不满意了，公元988年，他改元为“端拱元年”。

与大宋帝国相比，辽国积极进取。辽圣宗又一次御驾亲征，当然，大家要注意一点，这里打着辽圣宗的旗号，其实真实指挥全局的人，都是铁娘子萧太后。

辽军南下，势如破竹，宋军屡战屡败，契丹兵锋直指长城口（河北徐水北）。萧太后亲自压阵，契丹人发起潮水般的进攻，宋军抵挡不住。辽将耶律斜轸向守城官兵招降，但遭到拒绝。宋军突围南窜，萧太后派韩德让追击，全歼宋军。之后，契丹人拔满城、下祁州、破新乐，一直杀到唐河北。

遥控战局的太宗皇帝从帝都发来指示：坚持清野，勿要出战。此时大宋皇帝也没有作战到底的底气了。

皇帝的诏令，按理说是违抗不得的。但定州监军袁继忠却慷慨陈辞道：“敌寇已近在眼前，我城中驻屯重兵却不迎战，眼睁睁看着敌人长驱直入，那么要军队干什么！我当身先士卒，与敌人决一死战。”此话一出，可把几个前来传旨的太监给吓坏了，忙举着诏书，叫众人不要违诏。

这时只听得一人声如洪钟道：“阉外之事，将帅得专。”什么意思

呢？中国自春秋战国始，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阃外就是门外，皇城之外，战场上形势变化多端，将领要审时度势，就算皇帝的命令，也不一定要服从。说这话的人是谁呢？正是都部署李继隆。李继隆继续说：“前年我在河间之战时撤军，之所以苟且偷生，就是想要有机会报效国家。”

李继隆说的河间之战，就是两年前的君子馆之战。当时宋军刘廷让兵团被耶律休哥包围，李继隆担任救援任务，可是他认为毫无胜算，遂撤军而去，导致刘廷让兵团全军覆没。这件事令皇帝震怒，下令调查李继隆，但后来不了了之。李继隆坚持认为自己没错，为国家保留下一支精锐部队。可是，很多人却认为，他之所以没受追究，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关系：皇帝是他的妹夫！

我们且来说说李继隆这个人。

他出生于将门之家，父亲李处耘是宋初名将，平定湖荆的主要将领。他的妹妹嫁给赵光义，后来成为明德皇后。李继隆从军后，剿过匪，从征过南唐，后来又参加灭北汉的战争。在与辽国的漫长战争中，他有不错的表现。雍熙北伐后，曹彬、潘美等将领作战不力，退居二线，李继隆逐渐成为边关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李继隆被认为是宋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可是他在君子馆之役中不战而撤，这成为其军事生涯的一个难以洗刷的污点。如今契丹再度兵临城下，皇帝下诏坚壁清野，李继隆若再度成为缩头乌龟，恐怕永远被人耻笑了。因此，他坚决支持袁继忠的主张，迎击契丹。在李继隆军中，有一支相当精锐的骑兵，称为静塞骑兵。这支骑兵的家属原先都居易州，然而在契丹的进攻下，易州失陷，他们的妻儿子女都被俘虏。现在终于有了复仇的机会，静塞骑兵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

正所谓众志成城，李继隆率领这支英勇的军队，抵抗辽师进攻。

在战斗中，李继隆、袁继忠身先士卒，静塞骑兵一马当先，勇不可当。辽军遭遇到南侵以来的第一场败仗，全线溃败，被宋军一路追赶到曹河。

李继隆的反击，令辽军伤亡不轻，遂撤回南京，宋军乘势收复易州、满城等失地。最寒冷的冬天过去了，转眼间迎来了新的一年。

端拱二年（989），契丹大军再度来袭，辽圣宗依然御驾亲征。易州再次被围，驻守满城的宋军急急来援，然而被辽军铁林军（重甲骑兵）击退，损失惨重，仅指挥使便有五人被生擒。易州城孤立无援，刺史刘墀只得举白旗投降。然而守城将士不肯投降，向南突围。这次突围没有成功，被追上来的契丹骑兵一网打尽。

可以说，在宋辽交锋中，大宋帝国已是渐落下风了。

当时大宋帝国在北疆设有一兵营，称为“威虏军”，该兵营在选址上是非常不理想的，置于平原上，周围无险可守，驻军数千人。辽国不断派兵袭扰交通线，令威虏军的粮食运输出现大麻烦了。

对耶律休哥来说，要击破威虏军并不是问题，但他并不发动进攻。为什么呢？他是要放长线钓大鱼，把威虏军当作诱饵，宋帝国不可能置之不顾。

果不其然，宋太宗很快下达诏令，由定州都部署李继隆统率镇、定两州兵力，押送数千车军粮，前往威虏军处。耶律休哥闻讯大喜，亲率精锐骑兵数万人，准备半途袭击李继隆的押粮部队。只要吃掉李继隆这支部队，威虏军没粮食只能举手投降，那么大宋北疆的防御势必全线崩溃。耶律休哥心思缜密，计划部署井井有条，就等着李继隆掉到陷阱里了。

可是，这位契丹名将百密一疏，而正是这一疏忽，毁了他“战

神”的不败金身。

李继隆的部队还未到，先来了一支巡逻队。这支巡逻队有一千多人，有步兵也有骑兵，头头名叫尹继伦，他的官衔是北面缘边都巡检，就是负责在边界巡逻的。尹继伦巡逻时，突然望见远处有大量敌军，人数众多。当时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敌人要是猛地扑过来，那么区区一千人的部队，恐怕要全军覆没了。可是令尹继伦感到奇怪的是，契丹骑兵却没有动，似乎根本没发现他们。巡逻队的士兵们都喘了一大口气，好险啊。尹继伦越想越不对劲，按理说，我这一千号人马也不少，怎么契丹人个个像瞎子一样，视而不见呢？其中必然有诈。

尹继伦的判断是对的。耶律休哥确实发现了这支巡逻队，可是他并不攻击。消灭这一千人的小部队，耶律休哥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的目标是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李继隆部。现在发起攻击，打草惊蛇，因小失大。他本来想，这支宋军小分队一定暗自侥幸死里逃生，辽军数万人马向前开进，他们也不敢折回去汇报敌情。

可是，我们不能不说，这次耶律休哥真的要栽跟头了。

因为他猜错了。

尹继伦把部下召来开会，商量要怎么办。他分析说：“契丹人故意放过我们，一定是要袭击运粮队。我们现在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契丹人若偷袭成功，回过头来就会把我们生擒；若他们偷袭失败，也会拿我们开刀出气解恨。不管怎么样，到时我等都必死无疑。”

听到尹大人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可是要怎么办呢？尹继伦继续说道：“于今之计，我们只能走一步险棋了。敌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前方的李继隆军，后防肯定很薄弱。我们跟在他们后面，出其不意袭击其后。若是力战而胜，大家都立大功；若是打败了，我等也不失为忠义之辈。这总比任人宰割，稀里糊涂成为刀下之鬼要好

吧。”

看来尹继伦的口才着实不错，把大家说得热血沸腾，激愤从命。要跟踪辽军并不难，这支巡逻队本来就是搞侦察的，况且敌人数万人马行动，不可能没动静。入夜时分，尹继伦率这一千名兄弟，手操短兵刃，一路跟踪了数十里，来到了唐州徐河。耶律休哥为了抢夺先机，契丹人一晚上行军，没有睡觉。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屁股后面还跟有一小股宋军，同时一夜不睡。

天色未亮，此时契丹大军距离李继隆只有四五里的距离。耶律休哥吩咐下来，先吃饭，吃完饭后天也差不多要亮了，到时便可对李继隆发起总攻。就在辽军吃饭之际，尹继伦把手下一千人排成行阵，出其不意地猛攻辽军的后方，并斩杀一员大将。辽人一下子被打蒙了，不晓得宋军来了多少人，阵脚大乱。

正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支敢死队冲进敌营后，就直找耶律休哥的身影。当时耶律休哥也正在吃饭，一见宋军杀来，把小刀、筷子一扔便走。可就在此时，几名敢死队员已经冲上来，在短兵交战中，耶律休哥手臂受伤，而且还伤得不轻，但他毕竟功夫过人，跳上一匹战马，跑了。

尹继伦的这次进攻，把辽军计划全盘打乱了，不仅未能先发制人，偷袭李继隆军，反倒被李继隆发现了。这时辽兵营兵戈交错，喊杀声震天，李继隆能不发现吗？此时不冲锋，更待何时？李继隆果断下令，全体士兵集合，杀向辽军。耶律休哥真是阴沟里翻船，被尹继伦这一折腾，整个军队乱了套，此时李继隆的精兵又杀过来，辽军大骇，不战自溃，翻身跃马夺路便逃。这一逃没关系，马踩人，人也踩人，被踩踏而死者不计其数。这时真是恐慌到了极点，以耶律休哥的声望与统御力，在这里也用不上派场了。

一场精心准备的偷袭战，就这样泡汤了，耶律休哥不由得仰天长

叹，天佑大宋，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全线撤退。想全身而退那么容易吗？要知道李继隆可不是平庸之辈，岂能放过打击契丹的良机呢？他纵马大追，直追到徐河，过了河后又追十来里，俘敌无数。这一战，宋军大败耶律休哥，让辽军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场战役的胜利，首先归功于尹继伦，战后他被皇帝提拔为长州刺史，同样照样负责边关巡检任务。尹继伦长期巡逻，风吹日晒的，长得比较黑，契丹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黑面大王”，他们还相互告诫说：“可千万别遇到黑面大王啊。”在尚武的契丹人眼中，尹继伦以一千人的微弱兵力，偷袭数万辽军，那真是勇士中的勇士，英雄中的英雄啊。当然，我们也得肯定李继隆的表现，他能当机立断，把握战机的能力是相当强的，若是他优柔寡断，晚片刻发起进攻，尹继伦这支小分队说不定就被消灭了，那到时鹿死谁手，就难以预料了。

被视为战神的耶律休哥生平第一次败得这么惨，这对契丹也是一大心理打击。萧太后心里也明白，此时契丹并没有打败大宋的实力。连年的战争，对于宋、辽两国都吃不消，虽然谁也没有主动提出议和，但战争实际上告一段落了。从这一年（公元989年）一直到宋太宗去世（公元997年），宋辽之间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战事。

北方战争的压力减轻了，可是在帝国西南，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却悄悄酝酿着。

十六 盛世危机：王小波、李顺起义

淳化四年（993），太宗皇帝的统治已进入第十七个年头，帝国看上去风平浪静，谁也没有预见到，一场大风浪就要到来了。

之所以没人预料得到，是因为风浪来临之前，仅仅只是微波荡漾罢了。这一年二月的某天，西南的一座名为青城的小县城，气氛与往日不同。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手上挥舞着菜刀锄头棍棒，聚精会神地听着台上一个人的演说，当那人说到“吾疾贫富不均，今与汝均之”时，台下这些人热情之火焰被点燃了，个个热血沸腾。

他们是要干什么呢？造反！

在台上喊出“均贫富”口的这个人，叫王小波，是青城县人，他为什么要造反，其他人为什么要跟着他造反呢？这就说来话长了。

青城县位于四川，在大宋帝国统治之前，属于后蜀。我们前面说过，当年宋军平定后蜀时，在这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蜀地人民奋起反抗，在全师雄的领导下，与宋军浴血奋战，但最后失败了（请参阅前文）。武装反抗失败后，不屈不挠的蜀地人民又上访，到京城告御状，宋太祖不得不处分了一些宋军将领，以平民愤。但是，处分太轻，这也导致一种现象，被朝廷派到四川当官的人，总想方设法捞点好处。在王小波起义前，朝廷曾派秘书丞张枢到四川巡视，他一口气就挖出官员贪赃枉法者一百多人，可见这里腐败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知道，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按理说，百姓生活水平不低，干吗要造反呢？其实不然。其一，宋朝平定后蜀，把大量的金银财宝搜刮一空，要么运往京城，要么中饱私囊；其二，赋税太重；其三，政府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就是垄断布帛买卖，商旅不得私下交易，后来又垄断茶叶。

话说这个王小波，原本是个贩夫走卒，做茶叶生意为生。打从政府实施茶叶、布帛专卖后，大量以此为生的蜀民陷入生存危机中，没活路啊，怎么办呢？蜀民有闹革命的传统，你大宋朝廷不是好东西，派来的地方官不是好东西，我反了！就这样，王小波纠集一批失意落魄的贫民，操起棍棒菜刀锄头，打出“均贫富”的口号，造反了。

起初，造反军规模很小，一百人罢了。可是王小波点燃了蜀民的愤恨之火，许多穷苦百姓一听说有人闹革命，还均贫富，这诱惑力太大了，纷纷前来投奔，造反军的规模迅速膨胀。王小波颇有眼光，他心里盘计着，若想更多人参加造反军，就得杀掉几个百姓深恶痛绝的官。杀谁呢？他想到一个人：彭山县令齐元振。

这齐元振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人神共愤呢？他是贪官、恶吏，但这并不是他区别于别人之处，他的厉害之处，在于阴险狡诈。我前面说过，朝廷曾派张枢到四川，张枢一下子抓了百来个贪官，但是，贪官名单上并没有齐元振。齐元振不仅没上贪官名单，反而被张枢列在清官名单的第一位，上面还标注他“清白强干”。这就是齐元振，贪婪、残暴，却没让朝廷抓住任何把柄，还博得好名声。可是百姓的眼睛比皇帝特使的眼睛明亮，朝廷不能惩罚恶人，就让人民群众来惩罚吧。

王小波带着造反队伍，杀向彭山县，很快攻破县城，把齐元振给逮住了。这位造反派头头把县城百姓都叫过来，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当众处决贪官齐元振，杀死后还不够，把他肚子给剖开来，干什

么呢？这个贪官就是满脑袋想钱吗，我就用钱填饱你。于是把钱币倒进他的肚子里，看你还得享用不？第二件事，把齐元振这些年搜刮到的财物，全部分给百姓。“均贫富”不是口号，王小波说到做到。

这么一来，王小波的威名在蜀地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奔起义军，起义规模越来越大。

不过很可惜，这位出色的起义军领袖，在不久后的一场战役中重伤而死。当时王小波率领起义军，与西川都巡检使张玘所率的政府军在江源县激战。此战起义军大胜，斩杀张玘。可是在战斗过程中，王小波也被张玘射中一箭，射入额头，这是致命伤，不久后就死了。大家便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大首领，继续领导起义军。

李顺继承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颇有早期共产主义色彩，他每攻克一地，总是召集乡里富人大姓，把家里财物、粮食统统拿出来，除了保留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之外，其余全部没收，用于赈济贫苦百姓。这支起义军纪律严明，对寻常百姓秋毫无犯，因此得受民众支持，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起义军的队伍扩大到了数万人，接连攻陷蜀、邛诸州，杀死官吏无数。后来又攻破永康军、双流等县，目标直指成都。李顺第一次攻打成都并不顺利，尽管打到了西郭门，攻势还是被守军遏制了。李顺便转而进攻汉州、彭州，连连得手。此时起义军如日中天，发起第二次成都攻坚战。这次大宋守军终于没有顶住，守卫成都的郭载、樊知古等人落荒而逃，逃往梓州。

一个割据的势力又出现了。

李顺，这位一年前还默默无闻的人，如今成为却自立为王，建国号为大蜀，改元为应运。为了巩固起义成果，李顺又派军队四处出

击，北抵剑关，南达巫峡。此时四川全境多数地方都为起义军所控制，大宋朝廷震惊了！

皇帝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立即召见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给他挂了一个“西川招安使”头衔，率军入川，全权负责军事。

王继恩这个人，大家当不陌生。在宋太祖赵匡胤暴死的那一夜，他违抗皇后的密诏，拥宋太宗夺权，可谓是立了头功。他乃是一名太监，太监不都待在皇宫里吗，为何宋太宗居然会派他去镇压起义军呢？王继恩是太监没错，但他长年不在宫里，而是担任排阵都监，长期在河北领兵，手握兵权。

宋太宗从禁卫军中拔出部分精兵，追随王继恩入川。此时，守卫剑门关的宋军正与李顺的起义军展开激战。剑门关乃是天险之地，占据剑门，就控制了栈道。当时朝廷对剑门的局势非常悲观，因为这里仅有几百名守军，而前来进攻的起义军则多达数千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监上官正表现神勇，接连打败起义军的进攻。当时有一支从成都溃败后逃出来的宋军部队，前来剑门投奔上官正。这支部队的到来，扭转了剑门战局，宋军转入反攻，大破起义军。起义军数千人马，死伤殆尽，只剩三百人逃回成都，但这三百人被愤怒的“大蜀王”李顺下令全部处决。

剑门之战，对于宋军来说乃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否则栈道一旦被李顺所控制，入川的路就被堵死了，想镇压起义军就没那么容易了。由于这支通道的畅通，王继恩的部队得以顺利入川，并展开攻势，在研口寨大破义军，平定剑州。

显然，李顺也低估了宋军的实力。

自王小波起事后，义军所对付的官兵，不过只是地方武装，战斗

力不强，故而屡战屡胜。而这次李顺要对付的，却是来自京师的精锐禁军，战斗力之强，远非义军这群乌合之众可以相比。在这种情况下，若李顺主动放弃成都，与宋军展开游击战，避实击虚，或许可以坚持下去。可是当了几天的蜀王后，人性的弱点出来了，在放弃这种富贵舒服的生活，重新回到艰苦的环境中去，这确实很难了。因此，李顺选择与宋军硬拼，抱着侥幸心态去赌，这正是王继恩求之不得呢。

此时已是淳化五年（994）四月，李顺接连发起的两次进攻，无异于自杀。他派五千人在柳池驿与宋军交锋，同时又派三千人进攻广安军。这两次攻击非常不明智，不仅均告失败，士气更是一落千丈。自此之后，宋军一路推进，势如破竹。

五月，捷报如雪片，不断地飞入皇城。王继恩先是献上战报，政府军攻克绵州；紧接着，部将曹习率领一支军队，从葭萌直奔老溪，击破义军一万多人，收复阆州；不久后，巡检使胡正远率部收复巴州。就这样，各路宋军齐头并进，逼近成都。

直到这个时候，李顺还心存幻想。他把起义军全部集中在成都，企图固守，此时成都的义军多达十万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呢？我想这十万人里，多数只是临时拼凑的人数，比较有战斗经验的那些战士，多数已经在前面的战斗中牺牲了。表面上看，十万大军，怎么说也能撑个一年半载吧。可实际上，成都在短短几天内就沦陷了。史书上甚至这样说：“王继恩至成都，引师攻其城，即拔之。”

“即拔之”三个字，可见义军的抵抗力是多么弱。因为这是乌合之众与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禁军的不对等交锋。尽管悬殊很大，义军表现出来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有三万人战死沙场，他们宁可带着“均贫富”的梦想死去，也不愿成为被奴役的人，这种追求平等的伟大精神，将永远不会灭亡。

关于起义军领袖李顺，有的说他被俘，有的则说下落不明。下落不明，定然是战死，因为成都失陷后，起义军残余力量仍在坚持作战。

成都被攻破，十万义军死了三万人，剩下的七万人，有的投降了，有的则杀出重围，继续与官兵周旋。李顺旧部张余退出成都后，收罗旧部，转战并攻陷嘉州、戎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万州、开州八个州。起义军之所以还能转战各地，主要原因，乃是宋军主帅王继恩治军无方。

说到底，王继恩就是有功于皇帝的太监，说到行军打仗，那是外行。他攻下成都后，天天大吃大喝，手握重兵，又待在成都不出，甚至还纵容部队掠夺百姓子女钱帛。由于王继恩无所作为，起义军有死灰复燃之势，张余的起义军已经发展到数万人，向东挺进，进攻夔州。

夔州靠近巫峡，乃是从长江进出四川的战略要地。义军在西津口处大举进攻，矢石如雨。太宗皇帝紧急派白继赟统领数千精锐士卒，昼夜兼行，奔援夔州。白继赟的援军抵达夔州后，趁义军无备，与夔州守军前后夹击，大破义军。这一战，起义军共死了两万多人。据说当时整个长江江面漂着尸体，“水为之赤”。

在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中，义军又遭重创。在嘉陵江口之战中，义军损失了两万人；在陵州之战中，损失了五千人。如此一来，起义军大势已去，张余已是回天乏力。

历时两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震动西南，其原因就是官逼民反。朝廷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宋太宗决定要派个正直的官员前去治理，挑来选去后，选中了枢密直学士张咏。不仅如此，皇帝还下了个罪己诏，做自我检讨。我们来看看皇帝是怎么认错的：“朕委任非

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箠榷之吏，惟用克削为功，挠我烝民，起为狂寇。”这份检讨书，应该说写得还是比较深刻的，至少表明皇帝意识到四川之乱，主要原因在于官吏上。

这次，皇帝没用错人，张咏赴川后，大力整饬军政，问疾民间，安抚民众。宋太宗这样称赞他：“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虑矣。”

张咏赴任后次年（995），起义军余党首领张余在嘉州战死，意味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均贫富”的理想未能实现，但是蜀人以自己的反抗精神，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利，迫使朝廷着手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算是一种胜利。

十七 千钧一发：吕端大事不糊涂

至道三年（997）三月某日，开封。

这一天，帝国宰相吕端又像往常那样进宫问疾。问谁的疾呢？皇帝宋太宗。五十九岁的皇帝快不行了，尽管在宫中没人敢私下这么说，但大家都心里有数。当吕端跨进皇帝寝宫时，一眼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一个是明德皇后，另一个是大太监王继恩。他的眼光还在搜索另一个人，可是没看到，他的内心不由得一沉。皇帝病入膏肓，随时可能驾崩，但太子居然不在身旁！

父皇病危，作为接班人的太子居然没在身边，可见这其中有人文章。熟悉历史、洞悉人性的吕端马上意识到：有人想阻止太子登基。谁呢？只要看看谁待在皇帝身边就知道了，正是明德皇后与王继恩。吕端探望了皇帝，已经不省人事了，皇帝若是死了，这皇宫之内，会不会掀起惊涛骇浪呢？

不行，一定要通知太子。吕端没有带纸，他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字“大渐”，然后交给亲信，要他火速送往东宫。“大渐”什么意思呢，就是“病危”，告诉太子皇上已经病危了，赶紧入宫，迟则生变。

吕端这么着急，是因为他知道王继恩的阴谋：这个翻云覆雨的大太监想废掉太子！

为什么王继恩想废掉太子呢？

这事，我们还得从宋太宗立太子说起。

当年宋太宗以皇弟的身份窃取大权，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他迟迟不敢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因为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及弟弟赵廷美都有继位权。几年后，太祖皇帝的两个儿子，一个自杀，一个暴死；皇弟赵廷美同样遭迫害而死。这么一来，宋太宗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了。可是谁又想得到，立储一事，竟然非常不顺利。

有人会问，古代不都长子继承吗？立长子为储君不就完事了吗？确实，宋太宗是想让长子赵元佐接班。可是赵元佐这个人比较有同情心，也比较脆弱。叔父赵廷美被迫害致死，对赵元佐刺激太大了，他居然精神失常，甚至有一回自己放火烧了寝宫。太宗皇帝大怒，把长子赵元佐废为平民，让次子赵元僖担任开封府尹，这是宋太宗当皇帝之前的官职，被外界解读为“准太子”。

然而，准太子赵元僖尚未转正，却在公元992年时意外病死，年仅二十七岁。赵元僖之死，对宋太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一夜之间，变得苍老了。

太宗皇帝还有六个儿子，那么要立谁呢？大儿子不行，二儿子死了，三儿子赵元侃当然成了首选。出于谨慎，宋太宗迟迟未下定决心。立储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小心是必要的。这时，皇帝想到了一个人，此人正是以正直敢言著称的寇准。他想听听寇准的意见，可是这时寇准在哪里呢？被贬到青州去了，原因是顶撞皇帝。敢顶撞皇帝的人，就是敢说实话的人，宋太宗把寇准召回，征求他的看法。寇准的回答是：“知子莫若父，陛下觉得可以，那定是可以。”对立赵元侃为太子表示认可。

就这样，赵元侃被立为皇太子，改名叫赵恒。册立皇太子，意味着大宋政权将会平稳过渡，因为京师百姓对此非常支持，大家对皇太子的评价不错，称他“真社稷之主也”。换作其他人，听到儿子被人吹捧，那肯定是开心的。但是这句话传到宋太宗耳中，他却觉得刺耳无比。为什么呢？宋太宗这个人是比较厚黑的，他有没有对哥哥下手这

个尚有疑问，但对侄儿、弟弟都是铁石心肠的，甚至对长子也不客气，贬其为庶人了。从五代过来的人，对子弑父的情况已是见怪不怪，权力超越亲情，这是政治生存的基本法则。

如今他还没死呢，百姓就这样拥戴皇太子，把他这个老皇帝放哪儿呢？他对寇准抱怨说：“四海心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这不是想让我早点下台，想咒我早死吗？还好寇准这个人反应敏捷，忽悠说：“这不正说明陛下您有眼光吗？这可是国家之福，万世之福啊。”皇帝听了后，便也消了气了。

但是皇帝的反应，却被一个人记着了。

此人正是王继恩。

在“斧声烛影”的那一夜，王继恩奋力一赌，赢来了二十年的荣华富贵。一个太监，权倾朝野，手握兵权，甚至还到四川当了一回平乱英雄。若是当年他迟疑片刻，恐怕人生就得改写了，恐怕他只能默默地待在后宫院落，看庭前花开花落，一生为奴为仆了。而今皇帝立了太子，他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为什么呢？因为皇太子根本就不喜欢这个老太监。

你皇太子不喜欢我，我便让你接不了班。王继恩开始四处活动，密谋把太子拉下马。那么他有人选吗？有，这个太子候选人就是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赵元佐一度精神失常，被皇帝废为庶民，但时间长了，病自然慢慢好起来了。为什么王继恩看中赵元佐呢？其一，他是长子，长子继承皇位，天经地义的。其二，他被废时间长，没有任何势力，容易控制摆布。

有了人选后，王继恩就开始计划了。

首先他要得到一个人的支持，这个人就是明德皇后。如果皇帝死了，有权废掉太子的人，只有皇后。明德皇后曾生有一个儿子，但天

折了，因此无论谁当太子，都不是她的亲生子。王继恩毕竟是宦官，见皇后的机会多，时不时说说太子赵恒（赵元侃）的坏话，久而久之，皇后也对太子有所疑虑。除此之外，王继恩还拉拢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谋立大皇子赵元佐。

王继恩想离间皇帝与太子的关系，却没能成功，原因是太子的表现中规中矩。在担任开封尹时，太子赵恒表现十分出色，特别在断狱上，表现出过人的本领。史书上是这样记的：“载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太宗屡诏褒美。”皇帝多次下诏表扬皇太子的表现，这就成了最好的防弹衣。

几年过去了，王继恩没能扳倒太子。

就此放弃吗？

还没结束呢！王继恩还有最后的绝招。决战的时刻到来了，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却有无形的刀光剑影。太宗皇帝病倒了，一病不起了，生命之烛火已烧到最后。这时，王继恩与明德皇后已握有先手，传诏的权力在他们之手，只要不传皇太子，皇太子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进宫。他们在等待着，只要皇帝死亡的消息确认，立即把皇长子、被废为庶民的赵元佐立为天子。

这是赤裸裸的政变。王继恩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他驾熟驭轻，胸有成竹。可是这次他要栽跟头了，因为吕端坏了他的大事。且说吕端差人火速赶往太子处，急唤太子入宫。皇太子赵恒一看到笏板上写着“大渐”二字，心里明白，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得迟疑，便急急赶往宫中。

事实证明，吕端的警告太及时了。

太宗皇帝终于驾崩了。王继恩这只老狐狸开始行动了，他对悲伤

的皇后说，现在得召宰相吕端前来，商议皇帝的人选。王继恩心里想，只要吕端一来，就被我捏在手心里，谅他也不敢反对。他打心眼里瞧不起吕端这个人，不仅是他，当时朝廷有许多人都不太看得起吕端，为什么呢？大家觉得这个人做什么都稀里糊涂的，好像没什么头脑。

当初宋太宗要把吕端提拔为宰相时，有人就反对说：“吕端为人糊涂。”颇有识人之明的皇帝笑道：“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王继恩忘了宋太宗的这个评价，他小看了吕端。吕端内心对王继恩的阴谋一清二楚，但却装得一无所知的样子。

王继恩到中书省找到了吕端，催他入宫。吕端对他说，书房中有一份太宗皇帝以前亲笔所写的诏书，咱们啊，得把这份诏书带上才行。王继恩一时蒙了，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么个诏书，便与吕端一同到书房中去找。岂料他前脚一踏入书房，只听得背后“咣”的一声，大门关上了——吕端把王继恩给锁在房中了！

吕端把王继恩软禁起来后，直奔宫中。此时，皇太子赵恒也已经到了宫中，吕端先进宫向明德皇后禀报。皇后一见王继恩没来，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头，便对吕端说：“皇上驾崩，依照惯例，应该立长子为接班人。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吕端一拱手，铿锵有力地答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接班，岂能还有异议呢？”皇后自知理亏，况且王继恩也失踪了，不敢坚持己见，默不作声。

紧接着，吕端马上令参知政事温仲舒宣读遗诏，皇太子在太宗皇帝灵柩前宣布即位，成为大宋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史称宋真宗。

吕端果然大事不糊涂，凭借自己的机智果敢，消除了一次可能毁灭大宋根基的政变，可谓是帝国柱石，居功至伟。

宋真宗即位后，对试图政变的王继恩等人采取了宽大的处理办法，只对为首几个人削官放逐，其他的人不做追究。这种宽大的处理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以王继恩的所作所为，就算处于极刑也不过分，但是宋真宗做法显然是仁慈的。这可能跟皇帝的性格有关，他性格比较温和，不像父亲那么厚黑。当了皇帝后，他还恢复了哥哥赵元佐的爵位，显然是比较注重亲情的。对一度想废掉自己的明德皇太后，他也极尽孝心。

这么一个皇帝，在封建社会里，算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了。

可是宋真宗也有缺点，就是缺乏开拓精神，宋朝的政策逐渐转为“守内虚外”，在外交、军事上显得软弱。

在宋真宗即位后一年（998），辽国军事天才耶律休哥去世。

这位曾多次重创宋军的契丹名将死了，不少人要拍手称快，以为大宋帝国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其实不然。耶律休哥之死，对大宋帝国绝对不是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力主辽、宋和平的。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是辽与宋两国的领土纠纷所在，这是五代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经历数年交锋后，宋、辽两国互有胜负，然而战争却令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耶律休哥主持南京（幽州）军政，政绩卓著，史称他“省赋税、恤孤寡”，更重要的，他严令部下不得侵犯大宋边境，若大宋边关的牛马走失到辽国境内的，一律送还。因此，在宋太宗统治的最后几年，宋、辽保持相对和平的局面，这是来之不易的。因此，耶律休哥晚年实际上是辽国军界中力主与大宋和平的人物，他的去世，对大宋帝国来说，意味着新的战争临近了。

十八 澶渊之盟：走向绥靖的策略

耶律休哥死后十个月，即咸平二年（999）十月，辽师大举南侵，宋辽战争再度爆发。

对于辽人的进攻，宋真宗是有所准备的。在三个月前，他便任命马步军都虞候傅潜为镇州、定州、高阳关三处行营总指挥，辖八万人马，密切监视辽人动向。这个傅潜只是平庸之辈，为什么派他防御契丹，而不是战功卓著的李继隆呢？皇帝当然有自己的考虑。李继隆乃是明德皇太后的哥哥，这位皇太后差点与王继恩联手夺走宋真宗的皇位，因此皇帝上台后，就削去了李继隆的兵权。

按理说，傅潜手握八万重兵，实力也不弱了。可是辽师南下，他却下令闭营自守，不敢与敌人交锋。有些部将看不下去，便纷纷请缨出战，结果遭到傅潜大人的一顿痛骂。辽师在没有遇到强有力抵抗的情况下，进攻宋军守备薄弱的遂城。几乎没有人相信小小的遂城能抵挡辽军的进攻。可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拯救了遂城，此人正是杨家将的二代传人、杨业之子杨延昭（又称杨延朗）。

那么杨延昭是怎么创造奇迹的呢？

当时正是冬季，天气寒冷，气温零度以下，杨延昭召集城内壮丁，连夜在城墙上注水，到了次日凌晨，水全结成冰块了，整个遂城在一夜之间，加上了一层冰甲，变得坚不可摧。辽人一看，要攻破该城不容易，遂引兵而去，大掠祁、赵、邢等地。

为了鼓舞士气，宋真宗御驾亲征，从开封北上大名府。

皇帝都亲自出马了，可是前敌总司令傅潜仍然按兵不动，这可把一些部将给气坏了。定州都部署范廷召当着傅潜的面破口大骂：“你小子胆小得连个老太婆都不如。”傅潜被他骂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不得已拨一万人马给范廷召，包括八千骑兵与两千步兵。看到这里，诸位可能以为这范廷召真是一条好汉，其实不然，不要看他会吆喝，真上了战场，比傅潜强不到哪儿去。

范廷召率一万人马向瀛州挺进，与辽国梁王隆庆的部队遭遇了。程延召一看，对方人强马壮，我得向高阳关守将康保裔求援。康保裔这个人很有义气，兄弟部队有难，我得相助，便亲率精锐抵达瀛州西南的裴村。此时范廷召派人来，约定明天早晨，同时向辽军发起进攻。岂料范廷召还未进攻，辽军先攻上来了，把他的一万人马打得七零八落。他一路狂逃，却忘了通知友军取消次日的行动。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间，康保裔还在想着联合军事行动，哪里想得到范廷召早就逃之夭夭了，结果他的部队陷入辽师的包围，几乎全军覆没。

辽军大胜之后，渡过黄河，大掠淄、齐，而后心满意足了凯旋回师。

然而，大宋皇帝却很乐观。

宋真宗有点得意，朕一出马，敌人望风而逃，这怎么行？没干上一仗，不过瘾啊。他马上命令，贝州、冀州行营副都署王荣，率领五千骑兵，追击敌人。王荣的水平，比傅潜、范廷召等人强不了多少，虚张声势，根本不敢与契丹交手，只是听说契丹人已经渡过黄河去了，没敌人了他才出来“追击”。

契丹人一退，宋朝大将个个亮相了。在瀛州之战中逃之夭夭的范廷召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跟在契丹人屁股后面，捡了一些他们遗弃在路上的物资，然后往上一报，号称“大破契丹于莫州”。皇帝太高兴了，当场赋诗一首，此诗名为“喜捷诗”，群臣纷纷道贺。

当然也有一个人倒霉了，他就是总司令傅潜，被革职流放了。

对辽国萧太后来讲，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摸摸宋朝新皇帝的底细。很显然，与前些年相比，宋军的战斗力更差了，而且将领的军事素质也不怎么样。当然，辽国也有一些问题，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先后去世，高级将领层也有点青黄不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契丹不断地主动进攻，挑起事端。在踢了几脚后，萧太后认定，大宋帝国就是只纸老虎，契丹应大举进攻，捞取更多的好处。于是，在公元1004年，契丹对大宋帝国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进攻。

闰九月，天气已寒。

契丹二十万大军越过边界，对大宋帝国发起猛烈的攻击。女强人萧太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志在必得。萧太后虽是女流之辈，实为出色的军事家，她派萧挾凛、萧观音奴为先锋，兵分两路，攻打威虏军、顺安军。萧挾凛是继耶律休哥后一名出色的战将，他横冲直撞，攻陷遂城，生擒宋守将王先知，而后与萧太后、辽圣宗会师，进攻定州。

宋真宗派北面都部署王超驻军于唐河，王超水平也不怎么样，按兵不动。如此一来，辽师气焰更为嚣张，长驱直入，一时间，前线告急书如雪片般飞往开封，一晚上居然就有五份加急文书。这些边报送到宰相寇准手里，按道理说，既然如此紧急，宰相应该马上呈给皇上才对，可是寇准神色自若，不慌不忙，把五份告急文书全部压下。加急战报寇准都敢压下不上报，这位帝国宰相莫非吃了豹子胆么？他要干什么呢？

第二天，早朝。皇帝一看到那么多急件，顿时傻了眼，连忙质问

寇准。寇准之所以压下急件，是要一起亮出来，让皇帝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对皇帝说：“陛下要搞定这件事，只需要五天的时间。”什么意思呢？寇准明白地说，请陛下御驾亲征，前往澶州。御驾亲征这件事，宋真宗是做过的，但只不过是作作秀。这次可不同往日，契丹入侵规模之大，兵锋之猛，都是史无前例的。前线宋军节节败退，这时让皇帝到前线去，寇准有没有搞错！

与宋太祖、宋太宗不同，宋真宗是温室里长大的皇家子弟，没有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让他躲在安全的地方指挥作战，那是件乐事，可是要到前线，敌人的矢石可是不长眼睛啊，要是被砸死可怎么办？皇帝面有难色，又不好意思说不敢去，干脆先退朝好了，于是他起身就要离开。就在这时，只听得寇准喊道：“陛下这么一走，大事去矣。”

这一喊，把皇帝给喊住了。

也许在那一刻，宋真宗脑袋里飘过父亲太宗皇帝的身影，当年他父皇亲征，不也在战场上挨了一箭吗？看来皇帝位置要坐得稳，必要时还得拿出点勇气来才行。皇帝停住了脚步，回头看到了寇准那双带着感激与欣赏的眼睛。

宋真宗鼓足勇气，御驾北上。

可是说实话，他确实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一路上他内心都在挣扎。特别是有些人，时不时危言耸听，有的说皇上应该往南走才对，到金陵去；有的说应该往西去，到成都。说这些话的人，显然认为没有打胜仗的把握，开封位于黄河边上，契丹铁骑一到，想逃都逃不掉。

这些消极言论确实影响皇帝的信心，他囁囁地对寇准说：“南巡

如何？”寇准一听，有没有搞错，敌人在北面，皇帝却想南逃了。为什么寇准强调皇帝亲征呢？显然这位宰相对帝国的军事防御体系是不满意的，从前几年的交锋可以看出，宋帝国没有能胜任的大将，前线将领打仗消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皇帝亲自压阵，才能扭转局面。寇准警告说：“那些大臣的话，怯懦无知，跟乡下老太婆一般见识。如今敌人骑兵迫近，人心惶惶，陛下只可前进，不可后退。只要銮驾一到，河北军民势必士气百倍；若陛下后退几步，军心立刻瓦解，敌骑乘机从背后急追，就是想逃到金陵也不可能。”

皇帝一听，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向前了。

此时，有一个人给宋真宗吃了一粒定心丸。

谁呢？

大宋名将中硕果仅存的一人，曾经打败耶律休哥的李继隆。

在宋真宗上台后，李继隆被解了兵权。后来宋、辽战争爆发，宋军屡屡被击败。看到这种情形，李继隆很是心痛，便多次上书，请求到朝廷之上面见皇上分析敌情，并表示自己愿率军保疆卫土。由于帝国军事人才紧缺，宋真宗任命李继隆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但是这个方向，并不是直接抵御契丹的。在宋真宗做出御驾亲征决定后，李继隆又一次自告奋勇，上书请求为皇帝保驾护航。有李继隆在身边，至少比较有安全感吧。宋真宗委任李继隆为驾前东西排阵使，随军出发。

皇帝还未抵达澶州，澶州的情况已是大大不妙了。

古黄河把澶州城一分为二，其北为北城，其南为南城。当时契丹大军一路攻城略地，打到澶州北城，这里距离大宋帝国心脏开封已经很近了。宋真宗不敢贸然前往，派李继隆先去布置防卫。

听说皇帝即将抵达的消息，澶州守军固然士气大振。但是光靠士气大振，也不一定能打败敌人。李继隆的到来，所起的作用，比皇帝作秀要重要得多。当时辽军企图先攻下澶州北城，而后再渡河进攻南城，故而把北城三面团团围住。李继隆渡过黄河入城，巡视城防，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在各个险要处，设伏强弩。强弩一直是中原步兵对付游牧骑兵的看家法宝，在宋代，强弩技术发展到极致，床子弩便是其中代表，属于巨弩，威力巨大，射程远。

李继隆的这手妙棋，对后来战事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辽军前敌总指挥萧挾凛自恃骁勇，亲自赴阵前观察澶州地形，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宋军的狙杀目标。完成狙杀任务的乃是澶州城内威虎军头张瓌，要当军头没点本事也不行，他是一名神射手。其实张瓌也不知自己狙杀的对象竟然是辽军前敌总指挥，只是知道此人当是高级将领，使用床子弩瞄准，一箭正中萧挾凛的额头。

萧挾凛死了。他是契丹军队中最出色的将领，文武双全，通晓天文地理，屡立战功。他与耶律休哥不同，是坚定的南侵派，力主大举进攻宋帝国。萧挾凛之死，震动辽军，萧太后抚其枢车痛哭，伤心不已。契丹南侵之谋，萧挾凛是始作俑者，他一死，辽军中与大宋议和的想法开始滋生。

此时辽军大将方死，士气低落，李继隆快马将捷报告予宋真宗，并建议皇帝先不过河，暂时驻于南城。但是寇准却不这样认为，他向皇帝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说实话，这个寇准胆子也够大的，硬逼着宋真宗往火坑里跳。李继隆建议不过河，那是顾及皇帝的面子，可是寇准却不给皇帝一点面子，让他下不了台。那一刻，宋真宗真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勉强同意过河，前往北城。

寇准是对的。

皇帝的到来，确实大大鼓舞了人心士气。宋真宗入北城后，登上门楼，张黄龙旗，旗正飘飘，诸军皆呼万岁，声音之响亮，数十里外也听得到。

此时，无论是宋帝国还是辽帝国，都想体面结束这场战争了。

对于宋帝国来说，皇帝御驾亲征，可是澶州仍然还在辽军的包围之中，危局未解。这个所谓的亲征，其实十分勉强。以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亲征，都是在别人的地盘上作战，是主动性的征伐。而真宗的亲征，只是被动的防御罢了，底气严重不足。况且自亲征以来，宋真帝多次打起退堂鼓，若不是寇准的坚持，他恐怕一路逃到金陵去了。因此，皇帝夜长梦多，巴不得早点结束战争。

那么辽国又如何呢？

萧太后首先得考虑一件事，辽军能不能继续深入，直捣开封呢？若是没有胜算，那么这战争打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显然，萧太后没有胜算。萧挾凜一死，军心已是动摇，士气已是受挫。反观大宋军队，却因为皇帝的到来而备受鼓舞。此消彼长，辽军的军事优势已经无存了。更重要的是李继隆的复出，他一出马便出手不凡，伏击萧挾凜得手。可以料想得到，如果战争拖延，这位可怕的手还会创造出奇迹的。

既然双方都想结束了，议和就顺理成章了。

宋真宗派了个和谈代表前往辽营，此人名叫曹利用，他拜见萧太后，就具体和谈事项进行磋商。当然，曹利用权力有限，有些条款他不能做主，于是萧太后便派韩杞与他一起入澶州，直接向宋真宗提出条件。

韩杞拜见宋真宗后，提出了一个条件：辽国要索取关南之地。所

谓关南之地，就是瓦桥关以南的地区。为什么辽国提出这个要求呢？自从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辽国后，历代中原政权都想收复这十六州，但是只有周世宗柴荣取得部分成功，收复了关南之地。如今宋辽和谈，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摆到台面上了。辽国人的看法是，他们得到燕云十六州是完全合法的，既不是偷也是抢，因此大宋必须把关南之地归还。

这个条件，宋真宗无法答应。

要知道大宋帝国继承后周的政治遗产，从开国始，关南之地就属于大宋，怎么可能割让呢？谈判陷入困局了。怎么办呢？最后，宋真宗做了妥协。首先，皇帝明确一点，土地问题，决不可割让，否则只能血战到底了；其次，大宋帝国每年可以提供一定数额的金帛给辽国，以换取和平。

宗真宗早早亮出底牌，这无疑是谈判之大忌，明摆着示软，急于签约的心态一目了然。萧太后也利用此机会，开出一个不低的价格码：大宋帝国每年向辽国交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萧太后果然是个绝世女政治家，她捞足好处，不忘给宋真帝保留面子，让自己的儿子辽圣宗同宋真宗称兄道弟，宋真宗是阿哥，辽圣宗是阿弟，这无疑让大宋皇帝虚荣心得到点满足。

十九 西夏开国：从李继迁到李元昊

澶渊之盟定下了大宋帝国在国防问题上的基调，用四个字概括便是“苟且偷安”。当然，宋真宗会以保护人民免受战争之苦的借口来为自己的怯懦辩护，花钱消灾，虽然钱不少，总比战争的开支少吧。可惜的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就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史，强大了要维持和平容易，弱小了战争是避不开的。

与契丹停战，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

一股在西北崛起的势力，已渐渐成为大宋帝国的心腹之患。若要推溯这股势力的来龙去脉，那就说来话长了，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吧。

且说唐朝后期，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西北党项（羌人的一支）部落也乘机兴起，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唐朝封为夏州节度使（又称定难军节度使），后因平黄巢起义有功，被封夏国公，并赐李姓，成为雄踞一方的地方武装集团，其势力范围以夏州为中心。

唐灭亡后，历史进入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频易手。夏州李氏采取的原则是，中原政权不论谁上台，咱都归附。在赵匡胤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王朝后，夏州李氏依然一马当先归附。名义上是归附，实际上只是挂名，李氏世代经营夏州，世袭“定难军节度使”的头衔，这块地方早就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割据政权了。

岂料到了公元982年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突然宣布，率族人

入朝觐见皇帝，同时放弃世袭割据，献上银、夏、绥、宥四州八县。此举大出世人意料，其实李继捧有难言的苦衷，此时夏州内部争权夺利，李继捧遭到叔伯、兄弟的反目，无奈之下，才把四州之地交付朝廷。宋太宗自然大喜过望，他早就想削夺这个藩镇的权力，如今机会从天而降了。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这绝对是个烫手的山芋。

有一个人不向朝廷妥协，此人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

李继迁联合党项豪强，起兵反宋。可是出师不利，被宋军偷袭得手，损失五百人，被俘一千四百帐落，连妻子老母也成俘虏了。这时，归附朝廷的李继捧出来帮他说话，称他有悔过之心。宋太宗不能不给李继捧点面子，便授予李继迁银州刺史。可是李继迁根本没有投降的想法，拒绝接受。

说实话，李继迁属于那种性格极为坚忍的英雄人物，在落魄时，他没有放弃，因此许多党项人前来投奔他，他的力量也悄悄增长着，渐渐变得强大。公元985年，他佯装投降，伏击诱杀宋都巡检使曹光实，袭据银州。考虑到自己与大宋实力悬殊，李继迁向契丹称臣，萧太后大喜，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

由于宋、辽对峙，李继迁得以在两个帝国间游走，见机行事，一会儿倒向契丹，一会儿倒向宋国，反反复复。

公元990年，契丹封李继迁为夏国王，承认西夏为割据政权。可是一年后，李继迁却上书大宋皇帝，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授予李继迁银州观察使，但这只狡猾的狐狸只是耍耍手段，并非真心投降，他仍然不断地攻击宋军在灵州等地的兵寨。宋太宗终于忍无可忍，派名将李继隆率军讨伐李继迁。在李继隆的穷追猛打下，李继迁落荒而逃，宋太宗下令摧毁夏州城。

李继迁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为了自保，他写了一封谢罪书，并声称不再干劫盗掳掠的勾当。朝廷也被这家伙搞得很头疼，能招抚就招抚吧，又授予他鄜州节度使一职，但李继迁又不奉诏，他才不肯放弃自己的地盘到鄜州上任呢。

很快，李继迁又让朝廷大丢面子。

公元996年，他突袭大宋的押粮部队，抢走朝廷送往灵州的四十万石粮食。而后，又率一万人马围攻灵州城二百多天，但未能攻下。既然与大宋撕破了脸皮，李继迁又重新归附于契丹，契丹封他为西平王。

自从李继迁起兵以来，朝廷虽屡屡用兵，却始终无法剿灭。宋太宗去世后，宋真宗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询问群臣意见。参知政事李政说，灵州肯定是坚持不住，还是要以招抚李继迁为上策。于是宋真宗又积极拉拢李继迁，授予他定难军节度使之衔。可是事实证明，这一招根本没用。朝廷给予李继迁的，他照单全收，可是并不听话，照样攻打周边州府，侵扰麟州、府州，抢劫粮饷。

可以说，大宋朝廷为自己的绥靖政策而咽下苦果。公元1001年，李继迁攻克清远军（宁夏灵武东南），灵州城形势孤危。宋真宗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王超率六万人马驰援灵州。然而灵州还是在公元1002年被李继迁攻陷，并改名为西平府。

李继迁可以称得上是一代枭雄，但他最后还是马失前蹄。在公元1003年，他挥师进攻西蕃控制的西凉府，大败而归。更要命的是，他在此役中为流矢所伤，后因伤势过重而去世，时年四十二岁。他是西夏帝国的实际奠基者，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杀出一条血路，屡仆屡起，由弱转强。大宋帝国恩威并施，可是最终对他仍然无计可施。后来，他孙子李元昊称帝后，尊祖父为西夏的太祖皇帝。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承其志。

此时，宋、辽两国签订了澶渊盟约，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李德明十分聪明，他在宋、辽两国之间走钢丝，对两国同时称臣。宋真宗本来就没有荡平西夏的雄心壮志，寄希望于李德明能恪守承诺，不惜送上“定难军节度使”与“西平王”两顶帽子，实际上是承认了李氏割据地位。李德明比较识相，没有进攻大宋控制区，而是把矛头指向西蕃、回鹘部落占据的河西走廊。事实上，这时候一个新的帝国已经呼之欲出了，只是仍受制于宋、辽两国，因为李德明的实力还不够，他还要继续发力。

公元1022年，宋真宗去世。他当了二十五年的皇帝，靠着绥靖策略，与契丹妥协，与西夏李氏妥协，换来短暂的和平假象。可是，这种妥协政策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宋仁宗继位后，对外政策并没有多大改变，同样缺乏进取之心。

正当大宋帝国开始暮色沉沉之时，西夏李氏政权却如乳虎啸谷。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更是少年英雄，他性格与祖父李继迁相仿，坚忍不拔，自幼便熟读兵书，精于骑射，精通佛学，通晓汉、蕃文字。更重要的是，他志向远大，深谋远虑。

他对父亲向大宋称臣一事很不满，李德明回应道：“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由于西夏这个地方土地贫瘠，大宋朝廷为了羁縻李氏，每年赠予不少金帛，李德明心满意足。

可是，李元昊对此却嗤之以鼻，他对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为了王霸事业而生，岂只是为了穿绫罗绸缎、华丽衣裳呢？这一番话，可谓掷地有声，作为父亲的李德明也不免对儿子刮目相看。

公元1028年，二十五岁的李元昊率军打败甘州回鹘（甘肃张

掖)。在之后几年，西夏势力不断向河西走廊扩张，举兵攻拔西凉府（甘肃武威）。

李元昊的时代到来了。公元1032年，李德明去世，李元昊成为西夏领袖。依照世袭惯例，大宋朝廷遣使封李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兼西平王；同样，契丹辽国也封他为夏国王。然而，此时的李元昊已经不甘心当宋、辽两国的小弟弟，他要与两国皇帝平起平坐。大宋朝廷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了，李元昊统治下的西夏，开始一改李德明的政策，出兵入寇大宋府州（陕西府谷）。

这仅仅是开始。

从公元1034年开始，李元昊反宋的迹象愈加明显。首先他加强了集权统治，严刑峻法，以铁腕手段约束诸羌部落；其次，他恢复党项人的旧俗，制定秃发令，下令全国所有男人全部剃发，估计也不是光头，应该是像清朝那样，留了个小辫子之类的。命令下达后，三天不秃头者，杀无赦。后来清朝政府推行的“雉发令”，就是向李元昊学习的。秃发令的实施，敌我的界限就分明了，没秃头的，你就是敌人了，此举实际上是表明他脱离大宋的决心。

不过，在与大宋彻底决裂之前，李元昊还必须先做一件事：摆平西部诸武装势力。

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好，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周围强敌环伺，有大宋帝国、契丹、西蕃、回鹘等。当然，西蕃与回鹘实力较弱，为了反宋，李元昊必须先解除后顾之忧。1035年，西夏进攻西蕃人控制下的河湟谷地，结果大败而归。李元昊不得不调整战略，转而进攻回鹘控制下的沙州、瓜州、肃州等地，把整个河西走廊收入囊中。

李元昊并不是个鲁莽之徒，而是深谋远虑。他考虑到一旦同大宋宣战，大宋必定会与西蕃联手，到时西夏可能会陷入双线作战的窘

境。因此，他必须切断宋与西蕃的联系。1036年，李元昊发动兰州之战，此时兰州控制在几个羌部落手中，说起来与西夏的党项羌也算是同种。他一路进攻，直至马衔山，在这里筑了一座城堡，留军队驻守，切断西蕃与宋的交通线。至此，西夏的疆域已经比宋初时要大上几倍了，从原先的四个州扩张到了十几个州。更可怕的是，西夏的军事力量空前发展，李元昊设十八监军司，委派酋豪分统其众，兵力总计达到五十万人。

如今，李元昊已是羽翼丰满，他要振翅高飞了。

大宋帝国虽然在武力上并不很强大，可是毕竟是个大家伙，就像两个人打架时，身材高大的力不亏，因此李元昊虽有窥边之志，还是得小心谨慎。李元昊十分聪明，他打着供佛的旗帜，派出一大帮人前往五台山，其实是搞间谍活动，侦察河东道的守备情况。

在西夏，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与大宋断交甚至开战。李元昊便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反对派一一清除。他召集各部落酋豪喝酒议事，与诸酋豪歃血为盟，约定共同出兵，分三道进攻大宋帝国。此论一出，便遭到部分酋豪的反对，李元昊二话没说，下令推出斩首，其他人无不骇然，不敢再吭声。

李元昊大开杀戒，有一个人害怕了。此人乃是他的从父，名为山遇。在此之前，山遇以长辈的身份，多次劝谏李元昊，应该与宋帝国和平相处，勿启战端。李元昊虽然觉得他十分啰唆，但毕竟是自己的堂叔伯，也算给他一点薄面，没有下毒手。可是，当反对派被逐一清洗后，山遇惶恐不安，害怕有一天会被杀，便带着妻儿逃出西夏，逃到宋帝国的延州。可是延州政府官员却认为山遇私下叛逃，若是收留势必引起外交纠纷，于是把他遣送回西夏。这次，李元昊没有心慈手软，他把这位叔父当作骑兵的活靶子，万箭穿身而死。

这些无能的宋朝官吏对李元昊的野心一无所知，又漠视山遇带来的情报。我们不得不说，大宋帝国在国防上真的很糟糕，非但一味绥靖，连必要的军事情报也没有，以至于李元昊突然宣布称帝的消息传来，帝国朝廷手忙脚乱，无以应对。

在处死从父山遇后的第二个月，即1038年的农历十月，李元昊正式宣布称帝，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

二〇 奇耻大辱：大国打不赢小国

皇帝很生气。

这里说的皇帝是大宋皇帝宋仁宗，李元昊这个狂妄之徒，他也配称皇帝吗？只是朝廷和平主义思潮兴起，谁也不想开战，也没那个底气开战，只能象征性地做出两个制裁：其一，立即中止宋、夏的边关贸易；其二，以十万钱的高额赏金缉捕西夏间谍。

就在这时，西夏使者抵宋，带来了李元昊的亲笔信，要求大宋帝国承认西夏的独立，并且建立友好外交。宋仁宗看完后“呸——”的一声，把李元昊的信扔在一旁，断然拒绝其要求。要知道西夏所处的河西地区，在汉、唐时都是中原政权的地盘，岂是想独立就独立的呢？朝廷再出赏悬令，凡能擒杀李元昊者，即授予定难军节度使之衔。

自从澶渊之盟后，大宋帝国战事少了，国家比较安定，经济发展了，相对富庶了。因此，朝廷以为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把李元昊摆平了。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李元昊反宋，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而宏远的规划。假如宋帝国能早点发现苗头，运用经济手段还可能有效，可是机会错过了，如今的李元昊已是下山猛虎，不可抵挡了。

正当朝廷还在想着怎么对付西夏时，李元昊却率先发难了。

1039年末，西夏大举出兵，进攻保安军（陕西志丹），拉开宋夏战争的大幕。

说实话，这几十年来，大宋的国防事业可谓是一落千丈。朝廷对外没有进取雄心，对周边的诸多势力，只是不断送予财物，以此维持边疆稳定。在这种消极思想的影响下，国家武备严重失修，将官对军事多缺乏专业知识，怯懦寡谋，军队的训练不足，更缺少实战经验。可想而知，战争一开打，大宋军队便一败涂地了。

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西夏军队屡战屡胜，攻陷保安军，进逼金明寨，一直打到延州城下。时任延州知州兼沿边经略安抚使的范雍大惊失色，快马加鞭檄召副都部署刘平前来援助。刘平接到命令后，不敢拖延，带着一万多人马向延州开进。行至三川口时，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刘平也被西夏兵生擒。

三川口一战，大宋帝国颜面尽失。偌大的国家，居然被小小的西夏打得丢盔弃甲，国家之尊严何存？朝廷把最能干的大臣派往边关，曾经提出御敌十策的夏竦出任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与范仲淹两人为副使。这个组合看上去不错，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可是一个问题产生了：意见不合！

韩琦力主与西夏决战，他认为李元昊入侵的兵力只有四五万人，宋军若采取守势，分兵把守各要塞，就无法形成一个铁拳捣碎敌人。范仲淹的看法则不同，他反对贸然进攻，认为应该婴城固守，持久作战，耐心等待机会出现时，再乘机出讨。两位副使，一个力主进攻，一个力主防守，把安抚使夏竦搞得左右为难，索性提交给皇帝裁决。皇帝一看，韩琦的方案好，速战速决，省得天天操心，于是大笔一挥，批准其计划。

康定二年（1041）二月，李元昊率领十万大军入寇，进攻渭州，直逼怀远城。敌人这个数量，远远高出了韩琦的估计。韩琦派任福领兵数万前往迎击，临行前嘱咐说，大军应直插敌后，见机行事，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据险设伏，截敌归路。韩琦虽是力主决战，但并非鲁莽行事，而是颇为小心谨慎。

任福领命而去，在张家堡遭遇西夏军队，他率数千轻骑兵发起进攻，杀敌数百，赢得了一次小战斗的胜利。西夏士兵打了败仗后，把牛羊骆驼一扔，调转马头就逃。任福见状，你们这些小贼还想逃吗，追！于是一路追击，追到了好水川（宁夏隆德东）。此时，这位宋军总指挥早把韩琦的吩咐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哪里晓得，从一开始自己就被李元昊牵着鼻子走，西夏军队佯装不敌，把这支大宋军队引诱到了预定的战场：好水川。当宋军行进到六盘山前时，夏军突然杀出，队列齐整，显然是有备而来。这时任福也意识到中计了，只能硬着头皮迎战了。

西夏铁骑率先出击，猛冲向宋军阵地。李元昊原本在兵力上就有优势，现在又占据天时地利，以逸击劳，很快宋军便支撑不住。战局本就十分吃力，此时夏军伏兵又从两旁杀出，宋军防线立马崩溃。此役宋军伤亡惨重，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主将任福战死，其下副将、偏将也死亡殆尽。在临死前，任福叹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倒是还有一点血性与勇气，只是由于他指挥失当，即便一死也难以弥补其过失。

好水川之战是继三川口之战后宋军的又一次惨败。在李元昊看来，大宋帝国不过就是纸老虎罢了，他甚至让人写了一首打油诗，在宋朝边关广为张贴。这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讽刺大宋边关重将夏竦、韩琦不过浪得虚名罢了，还配得上谈论兵事吗？

不久后，夏竦被撤职了，韩琦、范仲淹的权力也被削弱了。除了韩、范两人之外，朝廷又增派两人，共分四路守备陕西。

一连串的军事失利，令大宋帝国威风扫地，国家疆域虽然辽阔，但军事力量着实与之不相匹配。这个时候，在一旁冷眼观战的契丹人觉得有机会了。

自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大体上还是能和平相处的。辽国人收了钱帛，也确实恪守承诺，并没有违约大举南侵。在宋、夏战争爆发时，辽国的萧太后、辽圣宗都已去世，在位的皇帝是圣宗的儿子辽兴宗。

当宋军和好水川大败的消息传到辽国时，辽兴宗不由得怦然心动，没想到大宋帝国的军事力量如此不济，连小小的西夏都打不赢。他心里盘计，若是在这个时候发动南侵，势必可以渔翁得利。可是宋辽两国毕竟和平近四十年，这期间辽国也得到许多金帛，贸然开战，说不过去啊，得找个理由才行。什么理由呢？当年澶渊之盟谈判时，两国曾经在一块土地问题上陷入僵局，这块土地就是所谓的关南之地，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这块土地争端当年并没有完全解决，如今辽兴宗便以此为借口，派使臣出使大宋，要求索取关南之地。

这不明摆是趁火打劫吗？

宋仁宗也摆开架势，在真定、定州、天雄、澶州四地各备兵马十万，总共集结四十万人，同时招募一批义勇军，还打造五万副器甲。这是在告诫契丹人，我是有备的，不怕你的军事威胁。备战是备战，朝廷还是打算和谈。其实我们大可怀疑宋仁宗的抵抗决心，一个西夏就让帝国吃尽苦头了，何况契丹的力量，较西夏更为强大。这位温室中长大的皇帝在心里已经做出让步，不惜牺牲部分利益，以维持同契丹的和平。

大宋朝廷派遣富弼为特使前往契丹谈判。对于割关南之地的要求，朝廷坚决给予拒绝，但是并非无条件地拒绝。宋仁宗的底线是，要么与契丹和亲通婚，要么增加岁币，二选一。富弼把宋朝的意见提了出来，但是辽国谈判代表却不同意，坚持要割关南之地。富弼强硬地回击道：“你们若坚持割地，便是毁坏以前的盟约，要是这样，我朝只有横戈相待了。”同时他还以史为鉴：“当年澶州被围困，险象环生，真宗皇帝尚且不肯割让关南之地，如今两国修好，岂有肯割地之

理？”

其实大宋外交底气真的很虚弱，明明是契丹人无理取闹，还得做出重大让步，忍耐的功夫真是到家了。富弼提出来，大宋方面可以把输给契丹的岁币提高，增加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你辽国不必动一兵一卒，唾手而得大量财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确实，辽兴宗没得说了，他同意了。

这样，大宋又一次以屈辱的外交赢得了和平。

又是花钱消灾，窝囊，但没办法。谁让偌大的帝国边防如此孱弱呢？

与契丹新订立的盟约墨迹未干，西夏大军又一次大举入侵。

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李元昊入寇镇戎军，宋将葛怀敏率军迎敌。在宋夏战争中，宋军作战虽然积极，在兵略机谋上却远不及李元昊，这位西夏皇帝善于用兵，精于伪装，总能设下圈套，引诱对手上钩。葛怀敏的军队在定川寨又遭到西夏军队的围攻，阵亡九千余人，其中包括主将在内的十六名将官。李元昊挟胜利之威，长驱直入，攻入渭州，烧杀抢掠，并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一时间，陕西为之震动。

宋夏战争开战三年，三次会战（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宋军无不败北，而李元昊则创造三战三捷的辉煌胜利。

然而，李元昊并非真正的胜者。几年战争下来，他有点吃不消了。大宋帝国虽然损兵折将，但财力还在，人员可以得到及时补充。西夏本来就不富裕，战争更加深了经济的恶化。在经历几次挫折后，大宋边防在范仲淹、韩琦的支持下，也有很大的起色，防御能力大大提高了。这些都迫使李元昊不得不考虑与大宋和谈的事宜。

促使西夏与宋和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西夏与辽国的关系逐渐恶化了。

辽国在萧太后统治时，曾多次发动对党项人的战争，控制了党项人的一些地盘。李元昊称帝后，不仅不把大宋放在眼里，对契丹辽国也是心有不满。1043年，西夏出兵，讨伐归附契丹的党项人。辽兴宗十分不高兴，派出使者，严厉谴责西夏的侵略行径。但是李元昊不为所动，加紧策划党项人脱离辽国的统治。

庆历四年（1044），原本归附契丹的党项部落叛入西夏。辽兴宗岂能同意，他马上发动大军前往镇压党项人。李元昊率西夏军队前来支持党项人的叛乱，实际上也等于向契丹宣战。心高气傲的辽兴宗大怒，下令征全国诸道兵马，在西部集结，准备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与辽国的战争已是一触即发。对李元昊来说，必须尽快与宋帝国达到和平，不然就陷入两线作战了。

为了与大宋和解，李元昊放下面子，取消皇帝称号，改用国主称号，并向大宋称臣。而后，西夏使者抵达开封，与宋朝商议和谈具体事项。

在宋夏谈判期间，辽夏战争爆发。辽兴宗亲率契丹大军，西征西夏，兵分数路，分进合进。李元昊重施故伎，一路撤退。辽兴宗岂肯放过，全力追击。哪知大风忽起，西夏原本是比较干旱之地，多荒漠，风一起沙土飞扬，辽军逆风而进，战士们的眼睛完全睁不开。老天爷真是帮了李元昊的大忙，他当机立断，率师反扑，大败辽军。看来李元昊不愧是一代枭雄，不论大宋还是辽国，都败在他手下。

这次大胜，加重了李元昊与大宋的谈判筹码。在辽军溃败后的第二个月，宋夏达成和议，这个和议有点好玩。首先，西夏向大宋称臣，但是注意哦，大宋每年要交给西夏13万匹绢、5万两银以及2万斤茶，说得好听点，是朝廷赐给的赏金，说得难听点，就是被西夏勒

索。这些还不是全部，在乾元节（皇帝生日）、元旦等重要节日，西夏前来祝贺还可以得到2.2万两银、2万匹绢及1万斤茶。大国被小国勒索，这当然不是光彩的事，付出这么多，换得西夏的“臣服”，保住帝国的面子，这也是宋仁宗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二一 庆历新政：夭折的改革

宋夏战争，把宋朝的各种弊政全都暴露出来了。

此时距大宋开国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当初那种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难以克服的一个问题，每个王朝的前几个皇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之后就一路向下，一代不如一代，偶尔可能冒出一两个中兴之君，但也不能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为什么呢？其一，开国君主多是马上得天下，那种在乱世中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后世君主所缺乏的；其二，不管最初的国策如何好，时代在变，如果只知道因循守旧，日久则生弊，这是必然的。

宋太祖、宋太宗都是从五代乱世中过来的人，枪杆子里出政权，有非凡的能力与见识。宋太祖雄才伟略，扫荡群雄，初定天下；宋太宗虽然本领不及哥哥，却也能平定北汉，与辽国对峙。但是到了宋真宗时，便可看出帝国失去进取心了，趋于保守，特别是澶渊之盟的签订，丧权辱国，开了一个坏头。

与契丹和解后，宋朝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没有了战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文化也繁荣了，政治上也相对清明。史家把这段时期吹嘘为“咸平之治”，不过这个充其量就是小治，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样的大治相比，差距不小。宋真宗除了对外软弱之外，还有一点得批评，那就是他特迷信，沉迷于宗教中，曾经搞个轰轰烈烈的“天书”封祀运动，劳民伤财。在他执政后期，奸臣当道，有“五鬼用事”之说，这也造成了吏治上的败坏。

盛世的泡沫在西夏凌厉的攻势下被戳穿了。在这场战争中，大宋

帝国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最后与西夏议和，每年支付高昂的“赏金”。同时，契丹人也乘机落井下石，以战争作为威胁，迫使宋帝国提高岁币。这样，大宋帝国在岁币的支出，每年增加大约17万两白银、25万匹绢以及3万斤茶。这成为国家一笔沉重的财务负担，但最后，还是要分派到老百姓头上。

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官僚阶层暮气沉沉，国家大权把持在一班守旧的老官僚手中。空前的危机降临帝国了。1043年，正当帝国被西夏打得溃不成军时，国内的动荡也开始了。该年六月，沂州虎翼卒王伦聚众起义，纵横数州，如入无人之境。朝廷紧急调派几路大军“围剿”，总算把起义给镇压下去了。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又爆发商州张海、郭邈山的起义，原因是饥荒，没得吃饭。这次起义坚持了四个多月，转战十余州，震动朝廷。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人士开始走向前台。

宋夏战争暴露了老官僚的腐朽无能，也使得一批有才干的改革派官员脱颖而出，其中便包括在边疆捍土有功的韩琦、范仲淹等人。

时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七件事：清政本、念边事、擢才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韩琦所提的建议，还是停留在表层，可以说是温和的改革。七件事中，念边事、备河北、固河东这三件实为一件，就是武备之事；经营洛邑这种事也算不上当务之急。

相比之下，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奏疏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涉及许多国家根本的问题。在奏疏中，范仲淹写道：“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此见解目光宏远，足其见政治家之远见卓识。那么，宋朝的政治，弊端在哪里呢？又要从哪里下手呢？范仲淹抛出了一揽子解决的改革方案，要点有十条：

第一，明黜陟。和平年代的吏治很容易沦为官僚主义，趋于平庸化，官场进阶讲的是排资论辈。管你做好做坏，时间到了，自然升迁一级。这是很大的弊病，造成统治阶级死气沉沉，缺乏生气。因此范仲淹飞出的第一刀，指向吏治。

第二，抑侥幸。古代当官有一种制度叫恩荫，就是老子有功于国家，朝廷便照顾其子孙，让他们得以享有特权。这就造成人才选取，不是靠真才实学，而是靠老子的庇护，没有公平可言。

第三，精贡举。宋朝文化相当发达，科举考试十分注重辞赋，写一手漂亮书法文章，就被认为是人才。但文章写得词藻华丽，不见得能经世致用。故而范仲淹认为要改革科举，义理比辞章重要，要吸收实用型人才。

第四，择长官。对地方长官的任免要严格审查。

第五，均公田。公田就是职田，这是宋朝官员的收入来源之一。建国时间长了后，职田分配上便出现不均的现象，会影响官员办事的积极性。

第六，厚农桑。农桑是国家经济之根本，必须重视。

第七，修武备。宋夏战争已经完全暴露出宋朝在武备上的种种弱点，范仲淹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第八，减徭役。减轻百姓负担。

第九，覃恩信。就是朝廷的各种惠民措施有没有得到执行呢，是否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欺上瞒下行为呢，皇恩再浩荡，若没有执行，百姓也不会感恩的。

第十，重命令。朝廷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就无法取信于民。颁布的法令，要得到有力的执行。

皇帝看了范仲淹的上书后，龙颜大悦。试想想，哪个皇帝想窝窝囊囊的呢，天下若太平，皇帝宝座坐起来才舒服。于是宋仁宗采纳其建议，开始改革，这个改革自庆历三年开始，故而被称为“庆历新政”。改革派的核心人物，除了范仲淹、韩琦之外，还有富弼、欧阳修、余靖等人。

在韩琦的改革版本中，根本没有整治吏治，而在范仲淹的版本中，改革吏治是重中之重，是成败的关键。改革吏治，说来简单，实则最难，你得去得罪一大批权贵。哪个官员没有自己的关系网呢，你罢免这个人，就得罪那个人了。在中国，自古以来，改革变法最难，改革家多半没有好下场。没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就没有变革的决心。从这点看，范仲淹无疑有着过人的勇气，他勇敢地向官僚主义宣战。

据说，范仲淹查阅官员名册时，看到有不称职的人，就会用笔做个记号。这一笔下去，意味着一个官员被削职了，意味着他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改革派的主将富弼对范仲淹激进的做法也大为担忧，他说：“范公同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我撤了这些昏官的职，固然导致“一家哭”，可是这些昏官上台，老百姓岂非是要一路哭。

听到这里，吾不禁要为范仲淹鼓手叫好。

咱们老百姓都渴望有范仲淹这样为民请命的好官，可是在保守官僚权贵的眼中，范仲淹则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与韩琦的老上级夏竦，他不择手段地采取种种方式反对、攻击、诽谤、诬陷改革派，咒骂改革派人士结党营私，斥之为“朋党”。

面对反对派的疯狂造谣，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朋党论》给予坚决还击，指出所谓“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别，君

子与小人不同，“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也是欧阳修散文中的代表作，如匕首如标枪，刺向诅咒新政的反动派。

然而，君子不敌小人，其原因在于君子不做暗事，而小人尽耍阴谋手段。为了打击革新派，夏竦甚至不惜伪造所谓废立皇帝的信件，欲置改革派领袖人物富弼于死地。范仲淹、富弼等人为了避开所谓谋反之嫌，不得不自动要求离开京师，前往陕西、河北主持地方军政。宋仁宗哪里想得到改革遭到如此多的反对，也不由得心灰意冷，再加上宋夏达成和解，战争的危机总算过去了，对改革的迫切心也大大降低。新政由是陷入低谷。

即便范、富两人已经离开京师，流言之攻击始终未停歇。1045年范仲淹、富弼等人被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遭清洗。甚至连温和派韩琦因为对富弼被罢表示同情，也丢了枢密副使的乌纱帽。

“庆历新政”还没全面铺开，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范仲淹被贬官后，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佳文《岳阳楼记》以表志向，文章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不朽名句，千年后读来，亦是掷地有声，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以及为公忘私的伟大人格，实为后人留下无价的精神财富。

二二 文武之道：包拯与狄青

新政夭折后，大宋朝廷又回到以前那种平淡无奇的状态中，得过且过。之所以还能够得过且过，是因为辽国与西夏都没来进攻，边境宁静。

由于西夏的崛起，对辽国是一大威胁，宋夏战争结束了，而辽夏战争刚刚开始。辽国三次对西夏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这个西北小国果然厉害，居然三次都把辽国给打败了。辽夏两国矛盾激化，对大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大宋帝国国运长久，并不是真正强大，而是运气不错。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宋仁宗时代一无是处。宋朝皇帝有一个特点，暴君是比较少的，多数皇帝都有文艺范，温文儒雅，这也导致宋代文化高度繁荣。总体上说，宋朝是比较文明的一个朝代，对大臣的杀戮是很少的，这也是宋太祖遗留下来的传统，不杀功臣，而且“不以言罪人”，就是不因为你的政见不同，就抓起来杀头。

这种文明的政治气氛下，也涌现了不少清廉的官吏，虽然不能从根本来杜绝官僚主义，但毕竟给百姓带来一点希望。其中最著名的清官，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

黑脸包公大名在中国是无人不知，小说、戏曲、电影、电视不断地演绎包公的形象，当然，这些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包公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包公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包公故事千年流传，经久不衰，这是出于民间对这位清官的爱戴。他是一位清官、铁面无私，这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包拯出生于公元999年，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宋仁宗当朝时期，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在大理寺（略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任职，包公断案的本领，大概就是在这里学来的。后来到地方当过知县、知州，善于断案，政绩突出，加之为官清廉，在1043年时调回京师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贪官污吏。时值庆历新政，包公属于无党派人士，既不站在范仲淹的改革派一方，也不站在夏竦的保守派一方，只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分事。

《宋史》是这样写包拯的：“公性峻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他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对恶吏深恶痛绝。他出自大理寺，长期与刑狱打交道，但并不推崇严刑峻法，务求敦厚，显然这是受到儒家思想“忠恕”之道的深刻影响。与其他官吏不同，他几乎没有关系网，从不加入哪方阵营，史书称他“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堪称为公忠体国之表率。也正因为如此，包拯在官场上升迁是比较慢的，他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与绝佳的口碑。

包拯最为人称道的，一是清廉；二是不畏强权；三是为民申冤，这也是包青天形象。包拯为官数十年，可谓两袖清风。在地方任职时，比如知端州时，端州盛产砚，以前官员总是巧取豪夺名砚以贿赂权贵，而包拯“岁满不持一砚归”。史传称他“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在吃、穿、住、用方面，当官时与没当官时并无两样。他甚至还立了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称赞他“清节美行，著于贫贱”，可见其清廉的美名，在生前便是朝野尽知了。

自己坐得正，才有攻击贪官污吏的底气。

说到不畏强权，包拯也是出了名的。包拯当过监察御史、谏议大夫等，职责之一就是弹劾不法官员，可以说，这就是他的职业。古代

的监察制度虽然发达，具体实施时未必有多少作用，说到底，监察官也是人，也害怕得罪人后遭到打击报复。但包拯很猛，攻击火力很强，天不怕地不怕，官修《宋史》中的《包拯传》中这样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为此，他甚至得了一个“阎罗”的称号。

被包拯弹劾落马的人无数，普通官员就不说了，就是朝廷重臣也得挨“奏”。

我们来说一个包拯弹劾三司使的故事。

三司就是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三司使即此三大机构的长官，总管国家财政，相当于财政部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肥缺，谁坐上这位置，中饱私囊的机会多的是。三司使张方平购买了一富豪的地产，估计是低价买来，肥水不少。岂料被包拯抓住尾巴，一把揪下马来了，丢了这个肥差。继任三司使的宋祁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可是有个毛病，生活奢侈，出手阔绰。让这种人管国家财政怎行，包大人又上书皇帝，把他给拉下马了。顺便说一下，宋祁有个哥哥，名叫宋庠，当过枢密使、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单地说，就是宰相级的人物，也被包拯给弹劾下台了。

当然，必须承认，包拯能弹劾这么多人，与皇帝的开明是分不开的。若是遇上个暴君，你不畏强暴，只能意味着死得比别人早。

说实话，包拯给人的印象并不友善。他并不是那种和颜悦色的人，而是整天板着脸，一点笑容也没有。当时有人这样说：“包拯笑，黄河清。”什么意思呢？包拯要是能笑，那么黄河水也得变清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有许多称呼，如“黑包公”、“包黑子”、“包侍制”、“包龙图”，前面是说相貌黑，后面是说他的官职。但最贴切的一个外号，应该是“阎罗王”，大家可曾听过有会笑的阎王吗？包拯就是那个不会笑，大笔一挥可夺人魂魄的阎罗王。

我们不要被他酷酷的外表欺骗了，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他不会冲着百姓微笑，但绝对会为民伸冤。我们看惯了包公破案的故事，他在大理寺待过，在地方为官多年，后来又出任开封知府，确实破案无数，但具体是什么案件，史书仅仅记了一件。不过小说流传的包公案，也未必都是虚构，民间能流传，自有其蓝本。

1057年，包拯任开封知府，他修改了一些规章制度。比如说，以前开封府讲排场，小民是不能直接进去告状的，而要先转呈给胥吏。这样子，府中官吏贪败滋生，于是乎“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包拯把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可直接进门找包大人，既杜绝腐败，又提高办事效率。开封百姓，莫不拍手叫好。

由于性情耿直，包拯一生仕途起起落落，但总体来说，他是幸运的，他治下的百姓也是幸运的。1061年，包拯成为枢密副使，跻身于最高决策层，只是不久后便病逝。斯人虽已逝，但他作为“清官”的形象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老百姓心里树起了一块千年不朽的丰碑。

如果说包拯是宋仁宗时代最负名望的文官，那么狄青则堪称是最有才华的武将。

作为一代名将，狄青的军旅生涯是从一名普通士兵开始的，他一步一个脚印，以自己的才华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实现从士兵到统帅的人生飞跃。

1038年，李元昊称帝，宣布西夏独立，次年，宋夏战争爆发。在这场历时四年多的战争中，大宋军队整体表现不佳，多次在决战中被西夏军重挫。开战之初，宋军屡战屡败，全军上下士气低落，从将军到士兵对西夏军队都深持恐惧之心。

当时狄青是三班差使，仅仅是军队中的一个小头目，大家都不敢

出战，他就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四年多的战争中，狄青声名鹊起，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而且脸戴了一个铜面具，令人看了毛骨悚然，这也成了他的招牌标志。在四年多的战争中，他总共参加了二十五次战斗，身负八处箭伤，但都大难不死。他以无所畏惧的英勇表现以及拼命三郎的顽强作风，为自己赢得了未来。

由于战功卓著，狄青被提拔为延州指使。有一回，经略判官尹洙巡视前线时，与狄青交谈一些军事上的事，认为此人非常有才华，便把他推荐给了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词是：“此良将材也”。

正苦于手下无干将的韩琦、范仲淹马上召见狄青，经过一番交流后，发现这个小伙子武艺高强、精明强干，在行军作战上也极有天赋。韩琦、范仲淹一致认为，狄青乃是不可多得的将材，须好好培养才行。可是范仲淹也发现，狄青虽有军事天赋，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他的知识水平比较低。倘若要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范仲淹扮演了伯乐的角色，他送了狄青一本《春秋左传》，并语重心长地说：“一位将军若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事情，那也不过只有匹夫之勇罢了。”从此之后，狄青发愤读书，不仅读了《左传》，还把秦、汉以来的兵法书全都研究了，其军事理论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

奠定狄青一代名将地位的一战，是平定侬智高之役。

侬智高是何许人呢？

这里我们先简单说些背景资料。

宋朝在疆域面积上，与全盛时期的汉、唐是不能相比的。此时西南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已经脱离中原政权的统治，在交趾与大宋邕州（广西南宁）之间，有一个广源州，其首领就是侬智高。广源州这

个地方，崇山峻岭，有大山大河，盛产黄金、丹沙，民风强悍，善于战斗。侬氏家族历来是广源州的酋豪，臣服于交趾。侬智高这个人颇有野心与抱负，他曾经与交趾打仗，但战败被俘。考虑到侬氏的势力，交趾把他释放回广源州，可是这改变不了侬智高独立的决心。

仁宗皇祐元年（1049），侬智高出兵占据安德州，宣布脱离交趾统治，建立“南天国”。侬智高上表大宋朝廷，请求归顺，但是大宋朝廷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拒绝其要求。这位南天一霸索性广招亡命之徒，于1053年率五千精兵，攻破邕州，改国号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之后连续占领横州、贵州、藤州、梧州、封州等，一路向东，直逼广州城。侬智高围困广州五十七日不克，遂解围攻破韶州。一时间，南方局势恶化，大宋帝国又一次面临严重的外患。

在这个时候，已经升任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他上书皇帝说：“臣起自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军，羁贼首致阙下。”仁宗皇帝任命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讨伐侬智高。

狄青抵达前线后，发现情况非常糟糕。

起初驻扎在南方的宋军对侬智高多抱有轻视之心，正因为轻敌，故而损兵折将。狄青下令，所有将领不得轻举妄动，等待他统一部署。可是有人急于立功，对统帅的命令置若罔闻。陈曙擅自发兵八千出战，大败而还。狄青毫不客气地将陈曙斩首示众，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

侬智高发现新来的宋军统帅按兵不动，不由得讥笑大宋帝国的将军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罢了，等了十来日没发现动静，稍有松懈。岂料狄青正是故意迷惑敌人，在敌人松懈之时，正是他进击之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正是狄青的作兵风格。宋军急行军一昼夜，一举

越过天险昆仑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邕州东北的归仁铺（广西南宁东北）。侬智高紧忙出动大军应战，狄青正面以步兵接敌，将蕃落骑兵作为奇兵，在战斗关键时刻投入作战，从左、右两翼包抄，侬智高大败，是役损失数千人。

吃了败仗后，侬智高退回邕州城内。狄青紧追不舍，推进五十余里，侬智高精锐尽失，自知不是狄青对手，遂纵火烧了邕州城，在夜色的掩护下，仓惶出逃。收复邕州城后，宋军缴获了侬智高留下的金帛巨万，并且发现了一具尸体，身着金龙袍。当时有些将领认为这是侬智高的尸体，打算向朝廷邀功。狄青答道：“安知这不是侬智高的诡计呢？我不敢在没确认的情况下，向朝廷假报邀功。”

狄青的判断是对的。据史料所记，侬智高的确没有死，他逃到了大理（今云南），不过其政治生涯从此画上句号。

狄青平定侬智高之役，其规模是比不上宋辽战争或宋夏战争。然而侬智高凭借广源州区区一块地盘与数千蛮兵，居然能蹂躏两广，从邕州一路杀到广州，可见宋朝国防力量之孱弱。这次胜利对兵事不振的大宋帝国来说，仍然算是注了一针强心剂。自太宗皇帝后的两百多年，大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上胜少败多，弱势明显，狄青的胜利，对朝廷乃是莫大的慰藉。也正因为如此，狄青成为帝国的英雄，他一路高升，直至升任枢密使，成为帝国的顶梁柱。

狄青的人生就是一部奋斗的励志书。他出身低微，早年因为当兵，在额头上有刺字（宋募兵时多有刺字），后来成为国家重臣，刺的字还在。皇帝看不过去，亲赐药水让他把刺字除掉。狄青用手指着刺字对皇帝说：“陛下乃是以战功提拔微臣，而不是问臣的出身门第。臣之所以有今日，正是从此刺字当兵开始。臣想保留此刺字，以劝勉诸兵士能留在军队中，请恕臣不奉诏之罪。”也就是说，狄青留着额头上的刺字，就是要给普通士兵树立榜样，只要肯奋斗，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在仁宗时代，狄青是最负盛名的将领，他的故事后来也同样被改编为小说，广为流传。狄青与汉代名将卫青颇有类似之处，两人均出身低微，后来均成为军界的一号人物。只是卫青崛起还沾了外戚的光，而狄青则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俩人的性格也有共同点，缜密而寡言，沉勇而有谋略，居于高位时不忘卑微，始终怀着戒慎之心。在行军作战上，狄青与卫青一样，用兵上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耐心等待最佳战机，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所不同的，卫青生于汉朝最强盛的时代，狄青所处的宋朝则相对孱弱，故而他虽有不世之才，终究未能取得卫青那么伟大的业绩。

二三 熙宁变法（上）

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宋仁宗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一年。他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正是由于他的宽厚仁政，才涌现出像包拯这样刚正不阿的文臣，以及像狄青这样从士兵到统帅的武将。可是仁宗皇帝缺乏开拓进取的雄心，整个大宋政坛暮气沉沉，特别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党争纷起，朝廷弊政日益显现。

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继位。英宗在位时间仅仅四年，属于典型的过渡型政权。此时大宋帝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已是危机重重。帝国的危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财政危机；其二是军事力量薄弱。

有些人会感到奇怪，既然天下太平，为什么帝国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呢？这里面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制度上的种种缺陷所致。“冗兵”“冗官”“冗禄”是造成财政亏空的三大原因。

在宋太祖时，帝国军队（包括中央禁军及地方厢军）数量是37万人；到了宋英宗时，军队猛增到了116万人，每年光军费的支出，就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不仅兵员多，官吏也多。在宋真宗时，帝国官吏人数是1万多人，到了宋英宗时，已经达到2.4万人，几乎翻了一倍。宋朝以高薪养廉，每年官俸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除此之外，朝廷还会发放许多额外的“冗禄”，比如高官在退休后还有发放“祠禄”，对于其后代还有“荫俸”等，以示皇恩浩荡。只是随着官吏数量以及“恩荫”人数的不断增多，这笔开销几乎成了无底洞。我们不要忘了，帝国为了维持与辽、西夏的和平，每年还提供大量

的“岁币”，这也是极大的开销。以上种种原因，造成帝国表面风光，实际上财政已是捉襟见肘。

再来说说大宋的军事力量。

光从数量上看，英宗时代116万的常备军，放在今天也算是庞大的武装。可是大宋军事上的孱弱，在仁宗时代就尽现无遗了。且不说与西夏交锋时完全处于下风，就连西南算不上强大的侬智高，凭着数千兵力就可蹂躏两广，一路向东打到广州城下。这么多的军队干什么用呢？

宋朝在军事上积弱，是有历史原因的。

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篡取政权后，吸取唐末以来藩镇势力强大、中央政权脆弱的经验，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把兵权收集于中央，大大削弱地方兵权，建立起“内重外轻”的军事制度。在宋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尚未明显体现，当时用于扫平诸雄的主要力量，都是中央的禁军。

自“澶渊之盟”后，帝国进入长期和平时期，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显露无遗。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于中央，那么边防怎么办呢？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种轮戍的办法，中央禁军轮流到边疆戍兵。边疆将领没有一支固定的军队，军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领与士兵长期严重脱节，士兵的训练水平很低。遇到边疆有战事时，匆匆派中央军前往，结果士兵既不熟悉敌情，也不熟悉地形，也不熟悉将领，战斗力自然十分低下。

朝廷积贫，国家积弱。

帝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时势造英雄。在这个时候，一位伟大的人物横空出世，他便是以变法光耀史册的王安石。

公元1067年，过渡皇帝宋英宗病死，他的儿子赵顼继位，史称宋神宗。

是年宋神宗年仅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在宋朝诸帝中，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就属这位宋神宗比较有雄心壮志。面对暮气沉沉的政坛，年轻的皇帝自然心有不甘，偌大一个帝国，却要受制于契丹、西夏，这皇帝脸上也没有光彩。他渴望着能像秦皇汉武那样，把帝国建成为一个超级强国，可是要怎么做呢？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此人便是王安石。

为什么是王安石呢？

我们且来简单说说王安石的经历。他出生于1021年，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任淮南判官，开始其仕途生涯。二十七岁时，王安石任鄞县知县，在任四年，政绩卓著，后调任舒州通判。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学问著称于当世，得到大文学家曾巩、欧阳修以及宰相文彦博等人的一致交赞，声名显于当世。1060年（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入京，出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财政部预算署署长。当时他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是未被采纳。英宗皇帝即位后，王安石因母亲去世，依旧例守丧数年，暂时离开政坛。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思想家，他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有非凡的见解，故而即便在野，仍有相当影响力。宋神宗之所以对王安石印象深刻，主要是从韩维那里得知其政治见解的。

韩维乃是王安石的好友，宋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韩维是太子府的书记官，经常给太子讲学论道，说到精彩之处时，他总是停下来谦逊地说：“这不是我的见解，这是王安石的见解。”正因为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试图振衰起弊，重整国家雄风时，自然想到了王安石。

很快，王安石复出了。神宗皇帝先是任命他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进京，皇帝亲自召他入对。

神宗皇帝开门见山便问：“治理国家，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道：“择术为先。”

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当效法尧舜，何以效法太宗皇帝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达，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我们都知道，尧舜在古代被认为是最为圣明的君主，王安石强调，为政就必须向最高的尧舜之道看齐。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有两次，一次是先秦的商鞅变法，另一次便是王安石变法。但是俩人的路是截然不同的，商鞅变法走的是法家路线，而王安石变法走的则是儒家路线。

神宗又问了一个问题：“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并没有当场回答，而是写了一篇文章作答，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了。他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并且矛头直指“积弱”、“积贫”两大问

题：“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

可以说，君臣二人通过问答的形式，谈得相当融洽。宋神宗在王安石身上看到了帝国的希望，而王安石感于宋神宗的知遇，也竭忠尽智辅佐皇帝，推行改革。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开始了。

变法的目的，可用四个字概括：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便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条主轴而展开。主持变法的总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由陈升之、王安石负责，王安石为其灵魂人物。自秦汉后，中国政治的创新精神不足，守旧思想浓厚。只要改变祖宗之法，总会遇到一大堆人的反对。因此，从一开始，王安石就处于四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为了确保变法的推行，他向皇帝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进入条例司，协助变法。

我们先来说说变法的第一项重要内容：富国。

富国并不单纯只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百姓殷实了，国家才能真正富裕。因此，王安石在解决“积贫”这个问题上，是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略述于下：

其一，青苗法。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给农民提供贷款。农业耕作有季节性，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从耕作到收成期间，需较大投入。许多农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向富人高利贷款，一旦还不了款，土地便被兼并。因此，到了宋神宗时，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流离失所，无

以为生。青苗法就是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贷款给农民，谷物成熟时还钱，若遇到灾荒年，可延期还款。此法乃是以金融手段助民增产，同时防止富人兼并穷人的土地。

其二，免役法。

宋代徭役众多，也就是平常百姓家，每年都要给政府干活，只出力而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还要倒贴钱，而官吏将校僧道等，则可以不服役。免役法就是废除役法，改由百姓出钱充役，称为免役钱。免役钱得交多少，则具体按照各家贫富情况而有所不同，极为贫困的家庭可免交。以前不必服役的官吏僧道等，则按半数缴交。据当时的实现情况来看，这项改革是惠民之政，大大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是却损害到了官吏阶层的利益。

其三，方田均税法。

这项改革是针对田赋不均的情况而定的，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肥瘠不同而分五等定税。

其四，农田水利法。

政府大力建设水力工程，保护农田正常生产，这是最惠民的一项政策。

其五，市易法。

市易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富商垄断市场，控制物价。具体做法是在若干重要城市设市易务，由政府拨给本钱，在市场上货物滞销时，由市易务收购。商贩们可以向市易务抵押借款或赊贷货物，每年以二分计息。

其六，均输法。

为了确保首都的消费需要，宋初设立六路发运司，每年地方都要按规定向京城输送定量的物资。但是这种规定非常死板，既没有考虑需求与储备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地方生产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实际供需情况来求得平衡，是久弊端重重。均输法就是改地方上供为中央直接采购，根据采购价就低不就高、采购地就近不就远的原则，节约采购成本与运输费用。

以上六大变革，重在理财与惠民。

再来看看变法的第二项内容：强兵。略述于下：

其一，保甲法。

保甲法有两大目的，一个是训练民兵，另一个是防止百姓造反。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若有两个男丁以上的，抽一人为保丁。实际上就是组建民兵或地方治安队，是维系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

其二，保马法。

马匹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宋代马匹主要是由官府牧监饲养，不仅成本高，而且不能满足需求。保马法就是由百姓代官家养马，每户可养一到两匹。养马者可免交一部分租税，但如果马死了，则须赔偿。

其三，裁兵法。

前面说过，宋朝到了英宗时，军队多达一百一十六万，光军费的开销就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帝国军队虽然多，却没战斗力，并不精锐。王安石执政后，大刀阔斧裁军。在熙宁年间，军队由一百多万削减到了六十万左右，差不多砍掉一半人。

其四，置将法。

针对军队中存在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情况，在全国设置九十二个集中训练的军分区，每个军分区由一位主将负责。全国共设九十二将，其中京畿、河北有三十七将，西北有四十二将，主要用于保卫首都及防御契丹、西夏，其余地区有十三将。

其五，军器监法。

宋代军器制造原本归三司胄案管辖，不过三司作为国家财政机构，对兵器制造顾及甚少，导致武器质量低劣。新法设置独立的军器监，统一管理全国武器制造。此项改革大大改进了宋军的装备水平，宋代在武器发明上也多有创新，火药的使用是最典型的例子。

除了理财、强兵之外，变法还涉及吏治与教育等诸多方面。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大宋帝国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规模宏伟，涉及面之广，要远远超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这也是继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革。可是这次改革并没能改变大宋帝国的根本面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之多，争议之大，都远远超出王安石的预料。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二四 熙宁变法（下）

从王安石推行变法的那一天起，失败的影子便隐约可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说富国强兵的出发点也是错的吗？

富国强兵固然没错，可是这次变法有其致命的弱点。我们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做个对比。无论在变法的广度上或具体措施，王安石的变法都要超过庆历新政，但是两者重心却是不同的。庆历新政，重心在吏治上。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前四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都是针对吏治。而王安石变法重心则在理财技术上，加大国家宏观调的力度，金融成为重要的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明显增加。

固然，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改革与军事改革两个方面，但经济改革是根本。而经济改革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也最多，几乎从一开始便受到朝野的广泛攻击。从王安石的本意来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促生产、均赋税、抑兼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政策自身的问题；其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济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并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虽然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曾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国家这是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更

严重的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贷款利息要远远超过所规定的二分。有的地方执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规定的利息外，还有种种勒索，导致实际利息达到80%甚至100%。这与变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辕北辙了。

再比如免役法。变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钱后，可免除义务劳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变了样。免役钱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强迫百姓服役，活照干，钱还得交，两头受罪。就连神宗皇帝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

再说市易法。王安石的目的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目的是抑制商人对商品价格的垄断。可是在具体操作中，市易务作为资本雄厚的“央企”，却取代富商垄断了市场。

大学者梁启超对熙宁变法曾经有这么一段议论：“盖其初意本欲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起初朝廷的意思是要抑制兼并，最后国家却成了最大的兼并者、垄断者。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好的政策为什么成为坏的政策呢？

问题出在执行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来对比一下王安石变法与历史上一些其他著名变法的不同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黄金时代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变法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等。战国时代的变法，都是由上而下的变法，即从权贵阶层开刀。为什么要自上而下呢？手握权力的权贵阶层若不接受新法，试问新法如何推行？变法的内容固然重要，倘若得不到执行，那也只是画饼充饥，只是作秀罢了。故而整顿吏治，是变法能否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政策的贯彻执

行，必须要一以贯之。商鞅变法之所以是最成功的改革，就在于其入手处，就是从打击权贵阶层开始。

前面说过，宋朝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有三冗：冗兵、冗官、冗禄。熙宁变法只解决了冗兵的问题，而在冗官、冗禄上，非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冗兵问题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乃是因为士兵是底层阶级，没有什么权力，裁撤起来比较简单。至于冗官、冗禄，都是有权力的官僚阶层，在这一块上，王安石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说实话，他也没有能量改革吏治，作为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从来没有商鞅独断专行的大权。正是因为官僚阶层的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变样了，好的政策也沦为恶的政策。

知道以上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王安石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开源，而不在于节流。也就是说，他努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削减财政支出。他在金融领域、流通流域上做文章，但是效果是比较局限的。在古代，科技对生产力的影响并不像今天那么大，国家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就难以大幅度增长。如果国家总体财富维持稳定，那么国家财政这一部分增长了，相应的百姓的收入就要相应减少。因此，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新法被认为是“与民争利”，国家发放利息不低的贷款，实行专卖制，搞市场垄断等，都严重打击民间经济。

正是因为新法存在种种弊端，特别是执行不力，王安石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新法的人，有许多都是当世名重一时的人物。比如反对青苗法的人有韩琦、富弼、欧阳修、程颢等；反对均输法的有苏轼、苏辙等；反对市易法的有文彦博等；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几乎反对王安石的每一项政策。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往往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也使得新法的推行遭到极大的阻力。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宋神宗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他对王安石是支持的、信任的。然而这并未能减轻王安石身上巨大的压力，随着变法运动的推进，王安石面对种种责难，越发孤立无援。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参知政事，两年后跻身宰相。随着新法的推行，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王安石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栈恋权位，只是一心希望国家富强，遂于熙宁七年（1074）上书称病辞职。宋神宗一再慰留，但王安石去意已决，连上六表求辞。神宗皇帝最后没办法了，只得同意。不过新法并未因此中断，在韩绛、吕惠卿等人的努力下，新法仍然不屈不挠地得到推行。

一年后（1075），神宗皇帝再召王安石入相。然而，二次入相对王安石来说，徒留伤心回忆罢了。反对派的攻击依然如疾风暴雨般袭来，而新法集团却已不是铁板一块了。改革派的分裂是必然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改革派人物都像王安石那样高风亮节，有些人纯粹就是投机分子，投皇帝所好，把变法视为求取功名的途径。改革派分裂了，王安石与改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分道扬镳。更要命的是，宋神宗对王安石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言听计从。在变法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皇帝与宰相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分歧。不仅如此，王安石的新法还遭到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压力，这位改革的总设计师已是心力交瘁。而在此时期，王安石的长子又去世，令他更加孤单与悲戚。熙宁九年（1075），复相后一年，王安石又一次递交辞呈。宋神宗虽仍极力挽留，但王安石还是毅然退出中枢。

王安石主持变法，总计六年。新法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离去而中止，应该说，宋神宗在变法这件事上，是坚定不移的，从这点看，他堪称是宋朝三百年历史中最有改革进取精神的皇帝。

尽管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同程度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他们也只是反对其政策，对于其道德操守、学问文章，仍然充满敬意。譬如变法的最大反对派司马光曾在私人书信中这样评价王安石：“介甫

（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后世学者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段精彩的议论，试录于下：“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尽管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差强人意，但还是取得一定成效。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这就是王韶开河熙之地。

在宋神宗即位前后，宋夏再度爆发战争，西北局势紧张。熙宁元年，当时还是无名之辈的王韶上了一道“平戎三策”的奏章，他写道：“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这个战略主张就是先收复河湟，令西夏陷入腹背受敌之境，扭转与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这个战略，与西汉时张骞的“断匈奴右臂”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王韶乃是宋代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曾经考科举不中，索性游历陕西，这不单纯是旅游，更是细心地了解西北边疆的形势。在若干年后，他的付出没有白费，他成了西北问题的第一流战略专家。这份奏章令宋神宗暗暗称奇，特地召王韶前来询问边事方略。

熙宁四年，在皇帝与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被任命为主洮河安抚司事，经营河湟。河湟谷地在汉、唐时就是一块战略要地。东汉时，汉与西羌多次争取河湟谷地；到了唐朝时，河湟谷地则是唐与吐蕃的一块主战场。宋朝与汉朝、唐朝相比，帝国土地面积小了许多，如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契丹之手，河西走廊落入西夏之手，而战略要地河湟谷地则被控制在西蕃手里。

王韶抵达秦州后，先招抚了西蕃俞龙珂所部十二万人。有意思的是，俞龙珂之所以愿归附宋朝，乃是因为他是包公的粉丝，十分仰慕包青天的人品。归顺之后，他甚至向宋神宗提了一个请求，要求皇帝赐“包”姓，与偶像包青天拉近距离。

俞龙珂部归附后，王韶乘势西进，进攻西蕃诸羌部落。王韶有谋有勇，宋军的进攻遇到诸羌的顽强抵抗，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王韶亲自披甲上阵，力挽狂澜，竟然奇迹般地反败为胜，并且占领武胜，建镇洮军。宋神宗下诏，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设熙河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王韶升任经略安抚使。王韶开疆拓地的意志不可阻挡，很快，他又进攻河州，河州酋豪瞎药投降，宋神宗同样给他赐“包”姓，看来包公的威名真是驰名中外、饮誉东西啊。

到了熙宁六年，王韶的军队接连收复河州、岷州、宕州、洮州、叠州，进军一千八百里，斩敌数千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可以说，在大宋历史上，王韶是最有进取精神的一位将领，他的伟大成就令宋神宗大喜过望，战后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

然而，王韶离开河熙奔赴朝廷之后，西蕃的势力又卷土重来。

西蕃首领木征乘王韶离去之机，反攻倒算，在熙宁七年的踏白城之战中大败宋军，河州知州景思立战死。之后，木征又进攻岷州，继而围攻河州。西部局势一时间恶化了，宋神宗不得不又一次把王韶派往前线。

王韶非但是一流的战略家，也是一流的将军。抵达熙州后，他并没有马上援救被围困的河州，而是采取围魏救赵的计谋，出动两万精兵，进攻定羌城，以切断木征的后援。此计果然大获成功，木征不得不放弃对河州的围困而退兵。然而王韶并不罢手，他对木征穷追猛打，斩首七千余级，打得木征走投无路，最后只得缴械投降。

先是开熙河六州之地，拓地两千里，收复中原政权沦陷二百年之

地；后又解河州之围，擒木征以致阙下；王韶奇迹般的表演，非但是大宋历史上的传奇篇章，同时对改革派也是一次巨大的鼓舞。王韶之所以能立不世之功，与王安石的极力推荐提拔有直接的关系，而他也以伟大的胜利，让所有人看到“强国梦”的希望。

后人对王韶有这样的评论：“韶以书生知书，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他为帝国收复了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无疑令人瞠目结舌的勋绩。

王韶后来官至枢密副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小官吏，一举为国家立下不朽之勋业，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可谓是奇人也。有人戏称他为“三奇副使”，三奇，指是奇计、奇捷、奇赏。奇计，说的是他的平戎奇策；奇捷，是他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胜利；奇赏，指的是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跟以前的包拯包大人一样大的官。

二五 新旧党争：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

熙宁变法运动，从一开始便备受攻击，风雨飘摇，然而新法却能在一片反对声中顽强地推行，这全倚仗着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这把保护伞便是神宗皇帝，这位胸怀大志的皇帝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推行新法，即便是在王安石辞职后，变法运动仍然维系下来。

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史书称他“去华务实”，并不热衷于典礼、祭祀、封禅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在生活上比较节俭，对民间疾苦比较关心，不务虚名。应该说，他是继仁宗皇帝后的又一个好皇帝。可惜的是，神宗皇帝寿命不长。公元1085年，他去世的时候不过三十八岁。神宗皇帝一死，变法运动戛然而止。

年仅十岁的赵煦被立为皇帝，是为宋哲宗。十岁的小孩子如何统治国家呢？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成为大宋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新法的保护伞倒了，帝国的政策将何去何从呢？高太后也有点不知所措了，是继续维持新法呢，还是推倒重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臣从洛阳来到京城，为神宗皇帝奔丧。

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朝廷的政策。

此人正是王安石的死对头、著名史学家司马光。

此时的司马光刚刚完成了一部史学巨著，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资治通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大部头的编年史，早在宋英宗末

年，司马光就开始着手编撰这部史书。从书名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统治者熟悉历朝历代史事，“知兴亡”，“明得失”，以史为鉴。

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便不遗余力地反对变法。以前我们教科书里总说司马光是守旧派分子，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与王安石的激进相比，司马光确实比较保守，但他对新法的攻击，并非完全感情用事，因为新法的确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宋神宗时代，司马光的立场显然不吃香，故而被排斥出中央，到洛阳当了个西京留台，说白了就是个闲差，总计待十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埋头著史，不问政事，与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为中国史学再增添一瑰宝。

对于司马光这样对历朝史事烂熟于胸的人，高太后当然十分倚重，谦虚地向他求教国家的大政方针。司马光的答复是：“朝廷应当下明诏、开言路，凡知朝政缺失与民间疾苦者，皆得尽情亟言。”就是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高太后一听，也对，便下诏让百官写奏折，讨论朝政的缺失。我们前面曾说过，王安石的变法，理想高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弊疾丛生。不仅守旧派分子反对新法，甚至民间对新法也不感冒。这言论一开，不得了，成百上千的奏章纷至沓来，大多数都是批评新法的不当。

看来宋神宗一死，新法就走到头了。

面对汹汹议论，高太后“从谏如流”，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议除新法。大家想想，这司马光老头原本就是最顽固的反新法者，现在让他来主持议除新法，这不等于宣布变法的终结吗？当然，有也人站出来反对，但不是站在新法是否合理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上。宋神宗刚死，就要推翻他的

政策，这合适吗？

对于这样的软弱的反对意见，司马光当然不放在眼里，他呵斥道：“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当改之，犹恐不及。”把宋神宗说得仿佛是被王安石、吕惠卿一帮人胁迫似的，司马光揣测圣意也太大胆点了吧。

当然，有高太后的支持，废除新法堪称神速。在宋神宗去世当年，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马法等就被废除了。

但是司马光对这个速度还相当不满意。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七岁，身体不太好，担心自己不能在去世前尽废新法。在他眼里，新法中残留的青苗法、免役法、置将法，与盘踞西北的西夏一样，乃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并称为“四患”。他曾经这样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当然，在这四患中，西夏之患，司马光是除不了的，也没这能耐。对于其他三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三项，他还是有能力除掉的。在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新法基本都废除了。

这一年四月，王安石死了，他是目睹着自己的理想灰飞烟灭而死的。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死了，他在有生之年打败了王安石。

在宋哲宗即位后几年，新法人物纷纷失势，而拥护旧法的人物纷纷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

旧党复辟了，新党落荒而逃。

在大宋王朝历史上，党争是一大问题，正所谓党同伐异，一吵起来便喋喋不休。那么新党倒台后，旧党执政，朝政应该和气融融了

吧？其实不然。党争的顽疾并不因为新党被逐出中央而停止，反倒愈演愈烈。

原来旧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为三大阵营。

这三大阵营分别是洛党、蜀党、朔党。洛党以大儒程颐（洛阳人）为首，干将有朱光庭、贾易等人；蜀党以大文豪苏轼（蜀人）为首，干将有吕陶等；朔党刘摯（河北人）为首，干将有梁燾、王岩叟、刘安世等人，其精神领袖是已经去世的司马光，此党的势力最大。

此三大党的政见上是有所不同的。朔党是司马光的门生信徒，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他们一概否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受到传统儒学观念的影响，以实现尧舜传说中的王道为己任，他们总体上反对新法，但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复古部分并不排斥。蜀党的政治立场，则是属于调和折中派。

三党中不乏士人领袖。譬如程颐乃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赫赫有名的哲学家；苏轼乃是文坛领袖，著名诗人与散文家。然而两人在政治上却是对手，争论不断。程颐对新法中科举改革的复古部分很赞成，如考试内容改诗赋为经义，经义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作为诗人的苏轼却反对。苏轼对新法中的免役法举双手认同，但尊司马光为领袖的朔党却反对。今天我攻击你的政策不近人情，明天你攻击我诽谤，纷争扰扰，不可终日。

党争从朝廷内到朝廷外，大臣们在口水战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可是有一个人不高兴了，这个人就是皇帝宋哲宗。

你们整天吐口水，你们把我这个皇帝置于何地？宋哲宗十岁当皇帝，高太后临朝，大权旁落，整天像个木偶一样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事事不能做主。这算什么皇帝！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皇帝心里的怨气也越发深重，愤恨难平。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心理反应实属

正常。久而久之，这种不满的情绪悄悄滋长，从对高太后把权的不满，延伸到了对旧党的不满。

郁积的不满，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公元1093年（元祐八年），老太婆高太后终于死了。这一年宋哲宗也已经年满十八岁，到了亲政的年龄了。

在哲宗当皇帝的前八年，朝臣们只知有高太后，几乎要把泥菩萨皇帝忘了。可是现在，泥菩萨变成了活菩萨。对于这尊活菩萨，大臣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的模样，陌生的是他的思想。

总有人具备超级敏感的政治嗅觉。

礼部侍郎杨畏就是这么一个人。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宋哲宗来说，前八年只是高太后的时代，如今才是自己真正的时代。既然如此，岂能重用这群从来没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朝臣呢？杨畏看清了皇帝的心思，抢先一步上疏道：“神宗更法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就是说，高太后与司马光这伙人破坏了宋神宗的变法，现在应该要改过来，继续完成神宗皇帝未竟的事业。

此言大投宋哲宗所好。

说实话，宋哲宗对新法了解多少尚是疑问，但他对这帮投靠高太后的朝臣不满是实实在在的，只有换一批人，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皇帝。皇帝问杨畏：“先朝旧臣谁可召用？”时间才仅仅过去八年，当年新法健将多数尚在人世。杨畏一口气罗列了章惇、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他还大大赞扬了神宗皇帝变法的伟大精神与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宋哲宗大受鼓舞，遂下诏重新起用章惇、吕惠卿等

人。

政策变了，宋哲宗把年号也改了。公元1094年，年号由“元祐”改为“绍圣”，绍就是“绍述”，即继承的意思，“圣”就是指神宗皇帝。从年号的更改可以看出宋哲宗的决心，他就是要推翻旧法，把神宗变法发扬光大。

于是一大批新党人物迎来了政治的第二春，而旧党如刘世安、苏轼、范祖禹等纷纷被踢出中央。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党不必等上三十年，只用了八年时间，便卷土重来了。大宋的政治又为之一变，从“元祐更化”变成为“绍圣绍述”，新党全面把持朝政。

问题是，争议不休的朝政是否因此变得祥和？在新法与旧法之间折腾日久的国家是否从此长治久安呢？

答案是否定的。

问题出在哪儿呢？

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熙宁变法中，帝国航母的总舵手便是宋神宗，他胸怀大志，锐意进取，对旧法弊端有深刻的认识。而在绍圣绍述中，总舵手宋哲宗并没有父亲的魄力与才干，他起用新党人物，只不过是对旧党人物不满而已。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大公无私，立法尽管有问题，但基本出发点乃是富国强兵，为国为民。元祐更化中的复辟分子，尽管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但在道德品行上并无亏缺，甚至被誉为“元祐诸君子”。而绍圣绍述中的新党领袖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在自身修养、道德人品上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意气用事，假公济私，迫害政敌，反攻倒算。

从宋神宗时代开始，新旧两党便势不两立，但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死对头，也仅仅只是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私底下都佩服对方的学问、人品。即便是司马光复辟，旧党掌权，也没有对新党进行

人身迫害。可是在绍圣年间，新党的胸襟却远不及旧党中的士人君子。

已经去世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都遭到反攻倒算，章惇甚至要求把这两个“罪大恶极”的人开棺暴尸。宋哲宗虽没有同意，仍然下诏夺去两人的赠谥。对死去的人如此，对活着的政敌，新党更是磨刀霍霍，四处出击，甚至屡兴大狱。在元祐诸君子遭到流放命运后，章惇等人甚至主张将其斩尽杀绝，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在大宋开国之初，宋太祖曾经留有一条遗训——“不以言罪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并未发生历朝历代中难以避免的诛戮功臣的恶性事件，这个文明国度虽然武力并不算强大，但在仁慈方面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元祐旧党之所以大难不死，得益于皇帝张开保护伞挡住了射来的冷箭，宋哲宗虽不算是英明过人的皇帝，仍然坚守太祖皇帝的遗训：“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正是这个指示，才把迫害旧党的行动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装着变法的瓶子表面上是旧的，可是里面的酒却已变质。新法的目的与其说是发愤图强，不如说是耍政治阴谋、争权夺利的工具。帝国滑向深渊的命运，已然是不可改变了。

二六 宋徽宗：皇帝与艺术家

宋哲宗是短命的皇帝，他十岁当皇帝，在位十五年，二十五岁就死了。哲宗去世后，他的弟弟赵佶被推上皇帝宝座，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徽宗。宋徽宗之所以著名，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中国皇帝史上首屈一指的艺术家的；其二，他是大宋王朝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有些人天生不是当皇帝的料。南唐后主李煜如此，宋徽宗赵佶也是如此。这两人的共同点实在太多了。李煜是大词人，一曲《虞美人》传诵至今，仍旧是诗词史上最动人的篇章；而宋徽宗则是大书法家与大画家，他的瘦金体书法与花鸟画，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重要地位，他对艺术的贡献，要远远多于对国家的贡献。可以说，他们的专业都在于艺术，而不在政治。身为一国之君，沉溺于艺术领域，必顾此而失彼。有一句话说得好：“天才也怕入错行”，李煜与宋徽宗都是天才级的人物，可惜的是，两人都入错行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应该是在书房画室，与琴棋书画为伴，而不是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呆若木鸡。

历史有时真的会开玩笑。

宋徽宗赵佶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皇帝。他与宋哲宗一样，都是宋神宗的儿子，但排名相当靠后，仅仅是第十一个儿子。依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皇位要轮到他，机会可以说小而又小。在宋哲宗即位后，皇帝传给弟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然而造化弄人，偏偏宋哲宗英年早逝，赵佶居然鬼使神差地被推到前台，当了皇帝。

其实，很多人对宋徽宗继承大统持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他不

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有着艺术家常有的轻佻与随性。然而群臣的反对敌不过向太后的坚持，向太后的理由也很简单：先帝神宗对这个儿子有良好的评价，认为他有福相，而且仁孝。

为了使政权平稳交接，向太后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法，仿元祐年间高太后之例，临朝听政。向太后与高太后一样，在政治上是倾向于保守的，对新法并不太热衷。不过她的做法比较温和，知道倘若尽弃新党，那么无疑“朋党之争”还要无休止地闹下去，因而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处理，起用一部分旧党，留用一部分新党。

这十几年来，大宋朝廷真是乱得像一锅粥。一会儿新党得势，一会儿旧党复辟，一会儿新党又卷土重来，政策变来变去。在宋哲宗时代被列为罪人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又恢复名誉了，范纯仁、程颐、苏轼等元祐君子复官或结束流放。曾经迫害旧党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罢黜了，但是相对温和的曾布则得以留用。

经过一番精心的人事调整，向太后以为万无一失了，便放心地把政权移交给宋徽宗，她听政的时间不过才七个月。太后之所以急急归政于皇帝，乃是因为宋徽宗的情况与宋哲宗有所不同，他即位时已经十八岁，若迟迟不放权，难免受到朝臣的议论。徽宗亲政后，出于对太后的尊敬，尚不敢对政策有所更张，然而五个月后，倾向于保守的向太后便去世了。对新党来说，这正是重新崛起的良机。

新党人士当然不会放弃此良机，于是曾布遂一而再地向皇帝提出，应该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宋徽宗对政治的兴趣显然远远不及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但既然父亲与哥哥都是新法的拥护者与执行者，他下意识里也是倾向于新法。于是稍稍受阻后的新法运动又一次占据上风，这一点从年号的更变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公元1101年，即宋徽宗即位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崇宁”，推崇熙宁变法的思想相当明确。

在此背景下，被罢官的蔡京又一次被起用。

蔡京就是一个披着新党外衣的阴谋家。

他是精明的政客，有独到的政治嗅觉与深藏不露的野心，善于伪装自己，只在乎利益而不在乎原则。步入官场之时，蔡京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皇帝要变法，宰相要变法，聪明的蔡京当然不会愚蠢到加入守旧党的行列。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女儿为妻，蔡家与王家成了亲家，蔡京更加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党中的一员大将。在神宗一朝，他官运亨通，爬到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的地位，当年包公就坐过这个位置，还被称为“包龙图”。

可世事偏偏难料。宋神宗死后，新党失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杀回来了。司马光一上台，便大力铲除新法，他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地在五日之前废除“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五天的时间要变更实行已久的法令，这岂非难于上青天。可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第一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艰巨任务的人，竟然是被当作新党的蔡京。对他来说，什么新法、旧法，保住乌纱帽的才是办法。此举给他带上小人的帽子，毫无抵抗便向旧党投降，算得上正人君子吗？可是蔡京从来就没想过当正人君子。

尽管蔡京以自己的高效响应司马光的号召，可是他还是栽了跟头。因为不久后司马光死了，掌权的旧党并不认可他的“叛变”，仍然当作新党处理，贬出中央。

此时的蔡京有理由为自己的“新党”身份而懊恼，重返权力之路似乎变得渺茫而遥不可及了。但是命运又鬼使神差地变化，几年后，亲政后的宋哲宗又一次把国家政策推倒重来。一时间，新党又夺取政权，大获全胜。

有趣的是，当年在废除“免役法”时，蔡京一马当先；如今在恢复“免役法”时，他又身先士卒。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未免有小人之嫌，但蔡京毫不在意，能讨得皇帝的欢心、新党的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新法对蔡京来说，只是打击异己以求高升的工具罢了，他绍述新法的坚决态度使他俨然成为新党的灵魂人物，除了章惇之外，蔡氏兄弟几乎称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了。

官场仕途的赌局，正如股市中的五浪上升一样，同样很少单边上行，非得再起再落后，才进入波澜壮阔的主升浪。眼看蔡京只差一脚就可跃上巅峰之时，第二次调整开始了。宋哲宗死后，朝政又为之一变，蔡京又一次从云端跌落，被贬去当了一个杭州洞霄宫提举的闲职。

此番调整虽深，时间却不长。宋徽宗亲政让蔡京看到了机会，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了皇帝致命的弱点——皇帝乃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有了弱点，就可以充分利用，甚至操纵。

原来这个蔡京非但是政坛的投机分子，也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岂非与皇帝志趣相投吗？可是皇帝在开封，他在杭州，如何才能把这种志趣相投变成一种资源呢？

机会总是不期而至。

徽宗皇帝不仅酷爱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即位不久后，他就在杭州搞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皇帝跑腿的是太监童贯。说起这个童贯，也是个会耍花招的人，不仅长于拍皇帝的马屁，也长于察言观色，处处投皇帝所爱，自然得到徽宗的宠幸。童贯到杭州待了一两个月，蔡京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极力巴结。说起来蔡京是有两下子，他自己操笔，画屏风，画纸扇，把自己的作品

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转交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搜罗艺术品，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挖掘珍品送入宫中。对此，皇帝岂能不心花怒放呢？不仅仅是因为艺术品，在他眼里，蔡京堪称是懂艺术的同志、知音，真乃难得的人才哩。

皇帝龙颜大悦，蔡京的好日子还会远吗？

很快，蔡京东山再起了。

崇宁元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

诏令下达的那天，徽宗皇帝特赐蔡京坐延和殿。皇帝问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当即顿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句话：“敢不尽死？”这一句话，拳拳忠心，掷地有声，皇帝听了岂不感动呢？

被中断的新法又一次铺开了。对于蔡京来说，权力远比新法来得重要，他重拳出击，把矛头对准曾令他大吃苦头的元祐党人。折腾死人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艺术之一，我们以前常说“盖棺定论”，但对于元祐党人来说，盖了棺，却不能定论。像司马光、吕公著这样的旧党分子，活着时是复辟英雄，死了后成了朝廷罪人，在“绍圣绍述”时被夺去赠谥，在向太后临朝时，又恢复名誉。蔡京当政后，还要把这些死人再折腾几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入相两个月后，蔡京把旧党党魁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苏轼等人一概列为奸党。为了达到“盖棺定论”的目的，又请御书把奸党的姓名刻石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这个党人碑，就是耻辱柱，是让大家吐口水的地方。奸党的子孙被剥夺政治权利，世代不得为官，这也是宋代规模最大的党锢之祸。

当然，在打击奸党的同时，蔡京也得表彰新法功臣。崇宁三年，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功臣们被一一画成像，悬于显谏阁，以鼓舞正气。当然，作为变法运动的灵魂与总设计师的王安石得到最尊贵的待遇，得以配享孔子。

蔡京的打击面如此广，免不了得罪人，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

崇宁五年（1106），彗星忽然出现。这本是寻常的天文现象，不过在古代，天象被认为是上天的某种启示，宋徽宗居然被上天异象搞得心神不宁，赶紧自我批评，并且下诏让官员直言。中书侍郎刘远把矛头对准蔡京，认为这都是因为打击元祐党人引起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无稽之谈，不过宋徽宗认了。在皇权与宠臣之间，他还是选择了皇权，连夜令人把党人碑给捣毁了，并下令解除党禁，并且废除新法。

看来宋徽宗对新法旧法也根本不在意，说毁就毁了。彗星的出现，让蔡京丢了官。可是如今的蔡京羽翼丰满，哪里这么容易就认输呢？他不动声色地躲在幕后，指使爪牙向宋徽宗诉冤。说的内容，无非是蔡京搞新法，完完全全是遵从皇上的意旨，并没有任何私心，现在把新法推翻了，有违初衷。宋徽宗原本对蔡京就十分信任，听到这样的辩白后，也稍稍觉得有愧。一年后（1107年），神气活现的蔡京又回来了，又一次登阁拜相，而且他的儿子蔡攸也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权力非但没减少，反而更大了。

在宋徽宗一朝，蔡京先后四次入相，掌大权达二十年之久。这位在皇帝眼中忠心不二的宰相，实际上不过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弄权者罢了。在此之前，大宋朝政虽然混乱，仍然有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正直大权，邪恶的风气并不浓厚。可是到了蔡京把权的时代，朝廷乌烟瘴气，奸佞横行。

蔡京以新法之名义，打击政敌，结党营私，与太监童贯狼狈为奸，把皇帝玩弄于掌股之间。徽宗一朝，奸臣当道，如王黼、朱勔，以及《水浒传》中所写的高俅，都是这一时期的奸臣。更糟糕的是，为了拍皇帝的马屁，蔡京大兴土木，他有个理论叫“丰亨豫大”，就是说，咱天朝不能小家子气，吝惜财费，应该要大手大脚，极尽繁华才行，这才显得帝国的气派。于是搞了一大堆名堂，置立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名目杂多，主要就是搞一些奇巧的东西，以满足艺术家皇帝对美的追求。

在这些劳民伤财的事中，以“花石纲”为害最大。艺术家皇帝如果只是写写书法，画画花鸟倒好，但宋徽宗还有一大爱好，喜欢奇木异石。蔡京只怕皇帝没喜欢的东西，有喜欢的东西就容易搞定了。他便指示手下一帮人，搜求奇木异石押送进京，这称为“花石纲”。花石纲折腾到什么地步呢？比如有一回，朱勔在太湖采一巨石，有数丈高，乃是奇石珍品，可是怎么运到开封呢？动用一千人拉大船，水路不通的地方凿河，桥挡住则拆桥，花了好几个月才运到京师。花石纲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在宋徽宗眼里，世界很美好，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层台耸翠，飞阁翔丹，优雅而艺术。可是底层百姓却没活路了，当愤怒的火焰熊熊燃起，大规模的民变已是不可避免了。

二七 方腊起义与水浒英雄

当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时，其象征性的标志便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宋徽宗在蔡京、童贯等人的忽悠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时，底层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说实话，在儒家教化一千多年的影响下，中国百姓性情温和，对于各种压迫，一忍再忍。然而，人的忍耐力终究有个极限，超过这个限度了，势必忍无可忍，一旦反抗的烈焰点燃，将会演变成一场燎原大火。

江浙向来是富饶之地，鱼米之乡。自从蔡京一千人倒行逆施，设应奉、造作局收刮民脂民膏后，寻常百姓已被剥削得一贫如洗。再加上花石纲无尽的掠夺，平民破产，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现世几乎看不到盼头，一种宗教的兴起给无数的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种宗教便是传自波斯的摩尼教。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时所创建，在唐朝时传入中国，曾经兴盛一时，又称为明教。在唐武宗时，摩尼教被政府取缔，然而在民间仍然有许多人信仰。摩尼教认为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世界，即光明与黑暗，光明是善，黑暗是恶。我们从“明教”这个词中，便可以看出，信奉此教者，是站在光明的一方，其使命便是与黑暗战斗，直到光明世界最终到来。到了宋朝时，明教已成为重要的秘密宗教，在浙江一带有广泛的影响。方腊，便是这个秘密宗教的领袖之一。

方腊原是歙州人，后来到了睦州（浙江建德）青溪万年乡，他出身寒微，靠给当地地主打工维持生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明教（摩尼教），对其教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笃信不疑。很快，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法活动中，宣扬“二宗三际”说，二宗即明与暗，三际指过

去、现在、未来三世。在他看来，此时的大宋王朝天数已尽，正是属于黑暗的现世，必须将其推翻，以迎来光明。史书上称他“托左道以惑众”，许多人对大宋朝廷已失去信心，在方腊的鼓动下入教，这个秘密宗教有严格的教规，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荤酒，分财互助，夜聚晓散，因而长期存在而地方政府却毫无察觉。

当时朱勔在江浙一带督花石纲，致使民怨沸腾，即便是深山穷谷之民也不得安居。方腊认为机会已经成熟，遂纠集教众，聚于帮源洞。在这里他导演了一出戏，假装受到上天的启示而得到天符牒，这也是古代农民起义惯用的伎俩，本来不算高明，但虔诚的教众对此深信不疑，遂跟随他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开始了。

起义时间是在徽宗宣和二年（1120）的十一月。

从一开始，起义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不仅是打倒土豪劣绅，而且要推翻宋朝黑暗的统治。因此，方腊马上制定了“永乐”的年号，并自称“圣公”，把个月改为“正月”，对广大教众来说，光明元年开始了。不过这支农民起义军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无弓矢介冑”，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可以说，方腊是有备而来的，他迅速建立政权，置官吏将帅，把教众分为六部，每一部以不同颜色的巾饰作为区别，其中第一部是红巾。

起义军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以这种最原始落后的武器向政府军发动进攻。天下苦于暴政久矣，起义军所到之处，许多人前来投奔，不到十天的时间，队伍已经扩大至数万人，并攻陷青溪县城。起义的爆发十分隐秘而突然，地方政府事先根本毫无察觉，只得仓猝应战。两浙都监蔡遵、颜坦率一支军队去镇压起义军，结果大败而回，蔡遵等人被击毙。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起义军几乎所向无敌。

方腊首先攻陷睦州，杀死官兵一千多人。此役令官兵丧胆，附近的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也纷纷被义军所攻克。参加起义军的都是下层民众，对鱼肉百姓的官吏十分痛恨，每当抓到政府官员时，必以酷刑处死，或将其肢解，或挖肠掏肺，或乱箭射死，让这些官员受尽苦楚而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气。但是对于某些清官，起义军还是另眼相看的。比如说休宁知县魏嗣复被俘后，来自休宁县的义军将领对他说：“公身为县令，有善政，前后官员中，没有一人比得上你的，我岂忍心杀害你呢？”遂将其释放。可见官员是好是坏，人心自有公论。

我们说过，宋朝军事制度是“强干弱枝”，精兵集中于中央禁军，地方部队战斗力并不高。面对来势汹汹的方腊义军，地方政府军完全溃败。继睦州沦陷后，歙州也被义军攻占，宋将郭师中战死。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等官吏一箭未发，弃城而逃。起义军一鼓作气又进攻富阳、新城，提出“杀朱勔”的口号，民众纷纷响应。朱勔是徽宗时代的奸臣之一，因花石纲而臭名昭著。起义军进军神速，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攻下杭州，东南为之震动。杭州是后来南宋的首都，重要性可见一斑，可是居然连像样的抵抗也没有。

宋徽宗开始坐卧不安了，倘若不及时出动精锐部队镇压起义军，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对付方腊，大宋帝国把血本都押上去了。皇帝任命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童贯为宣抚使，率领中央禁军及秦晋蕃汉兵共计十五万人，杀向浙江。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除了中央禁军外，就是陕西、山西一带防备西夏、契丹的驻军，主力都调去讨伐方腊军了。

冬去春来，时间已是宣和三年（1121）。

童贯兵分两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歙州，打算得手后会师于起义的发源地睦州，彻底铲除农民军。

在童贯领兵出征时，宋徽宗给了他很大的权限：“如有急，即以御笔行之。”就是说，倘若有必要，童贯可以直接发布皇帝旨令，而不必事先征得皇帝同意。话说这个童贯虽然是个小人，但脑袋瓜还是比较灵的。他到了吴地，就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百姓造反，都是造作局、花石纲这些苛政惹的祸。如果不从根子上铲除苛政，根本无法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太监，他颇有当机立断的本领，立即下令其下属代皇帝写了一份“罪己诏”，代表皇帝向大家说声对不起，寡人有过错。然后，他又以最快的速度罢除苏杭造作局与花石纲。与此同时，宋徽宗为了自保，也不得不采取某些平民怨的措施，罢免了朱勔父子以及其家族其他当官的成员。在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面前，大宋朝廷做出了必要的让步，这个做法是相当明智的。

在朝廷调兵遣将之际，方腊军又攻占婺州、衢州、处州，总共占据六州五十二县之地。但是方腊毕竟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作战太分散了，未能集中力量对付官兵。很快，官兵乘方腊攻陷处州之际，收复杭州。这时方腊回师再攻杭州，可是敌人的力量已是今非昔比，方腊在杭州城外被击败了。

大宋军队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不佳，但在对付方腊手下这些散兵游勇则绰绰有余。十几万大军节节进逼，连续收复衢州、婺州。对方腊来说，此时的局势已经完全逆转了。起义军不得不退守睦州，宋朝官兵从杭州发兵，在桐庐之战中挫败义军的反扑，占领睦州，并攻陷青溪县。当初起义是从帮源洞开始的，现在还要在这里终结。

方腊的部队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被打得溃不成军，只得回到老巢帮源洞。这时义军还有二十万之众，被围困在山区之中。帮源洞一带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义军据险而守，与官兵打游击。来自中央及边疆的官兵对地形不熟悉，找不到一条大军可以开进的路，故而久攻不下。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宋军将领打开局面。这名将领此时还是

个小人物的，只是一名裨将，但日后却成为一代名将，他就是韩世忠。

韩世忠是怎么找到路的呢？他率领一支小分队，沿着溪谷潜行，在半路上时，遇到了一个山村匹妇，向她打听山路。在得知秘密通道后，他立即悄悄潜入，突袭方腊的指挥部，竟然侥幸得手，杀数十人，擒方腊。在方腊被擒后，义军群龙无首，终无法突围，遭到官军的血洗，共有七万人死难。

方腊从起义到失败，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时间不长，地域也不算广阔，死于战乱的人口却高达两百万以上，可谓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与方腊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武装起义，这场起义尽管规模远不如前者，却因为《水浒传》一书而名扬天下，成为中国妇孺皆知的一段英雄传奇。

事实上，宋江起义在正史上的记载十分简略。正是因为简略，反倒给人予无尽的遐想，故而在民间广泛流传着梁山泊英雄的传奇故事，而且说得活灵活现，特别是《水浒传》这部小说问世后，梁山泊英雄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根据宋代的一些笔记资料，《水浒传》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而且也有相应的浑号。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卢俊义、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青面兽杨志等，都是真实人物。小说虽是文学作品，但也包含基本史实，更重要的是，民间传说实际上写出民众的心声。正如小说所述，起义的原因乃是“官逼民反”，属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起义军打出的旗号是“替天行道”，这些都可视为平民百姓对起义军的无限同情以及对腐败官府的深切痛恨。

宋江起义是以郓州（山东东平）梁山泊为中心，主要首领有三十六人，时间与方腊起义差不多同时。在起义军最盛时，横行于河朔，

转掠十郡，官府出动数万人马“围剿”，却收效甚微。当时朝廷正倾其力量镇压方腊起义，亳州知州侯蒙建议说：“宋江的才能必有过人之处，不如赦免其罪，招抚其部以讨伐方腊。”

徽宗皇帝同意侯蒙的建议，并委任他负责招安工作，但侯蒙尚未赴任便发病而死，招抚计划遭到挫折。与此同时，梁山泊英雄好汉们从沂州（山东临沂）攻略淮阳军（江苏邳县西），后又转攻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南）。朝廷只得派遣海州知州张叔夜前往镇压。

张叔夜颇为通晓兵事，为了探知义军底细，便派遣间谍潜入其中，掌握了义军的一举一动。当时宋江等人频繁活动于海滨一带，有大数十数艘，打家劫舍，满载而归。张叔夜便招募敢死队一千多人，埋伏在险要之处，自己率领轻兵引诱义军上岸作战。宋江不知是计，穷追猛打，结果一直闯到设伏区。此时两边伏兵杀出，张叔夜乘势反戈一击，义军大败。就在这个时候，官兵已派一支奇兵偷袭义军船只，十数艘大船被焚毁殆尽。义军已无退路，张叔夜借机打出招安的旗子，宋江已是进退两难，遂举部投降。

宋江被招安后还参加了“剿灭”方腊的战争，后来他的名字便从史书上消失了。有史学家认为，宋江很可能是死于童贯之手。

梁山泊起义的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是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却广为流传，对后世文化、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宋之后的历代农民起义，乃至像近世的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社，都可以看到梁山泊故事的影子。与此同时，梁山泊好汉们的形象也在传说中变得更加丰满，他们那义薄云天的气概，成为民间豪杰形象的标竿，成为侠义精神的象征。

二八 与虎谋皮：海上之盟始末

就在大宋君臣们醉生梦死之际，境外形势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一股强大的势力正在兴起，女真人在其酋长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正悄悄地改变着东北方的政治版图。女真是一个民风强悍的民族，长期归附于契丹辽国。此时辽国皇帝为天祚帝，乃是一个荒淫失道的暴君，对女真采取高压、奴役的统治政策，女真人的反抗之火已是一触即发了。

自从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和平固然是好，可是有代价。作为一个大国，宋不得不每年向辽国缴纳岁币，这不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也有损国家尊严。故而一百多年来，收复燕云失地、摆脱屈辱的外交地位，一直是大宋帝国的梦想。宋徽宗虽然是一个书画皇帝，但同样抱着收复燕云的梦想。

宋徽宗有梦想，却缺乏野心。

有一个人，有野心，却是个太监。

他就是徽宗一朝权倾朝野的童贯。童贯虽是宦官，却颇通军事，带过兵，打过仗。政和元年（1111），童贯向皇帝提了一个建议，认为辽国可图，请派遣使者入辽国，以侦察其国情。宋徽宗同意了，便派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使大辽。此行童贯携带了大量奇珍异宝，实际上就是在辽国搞间谍活动，刺探各种情报。您还别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居然打探到不少内情。

童贯此行最大的一个成果，是认识了一位辽国破落贵族，此人名

为马植，本来也算是辽国之一大族，只是行为不端，搞得声名狼藉，在国内混不下去。马植偷偷拜会童贯，自称有取燕云之计。这个马植毕竟是贵族出身，对辽国政局十分熟悉，更知晓其弱点。童贯听了马植的话后，暗自称奇，便偷偷把他带回大宋，推荐给了宋徽宗。

马植向皇帝提出灭辽计划，其核心是：辽国气数已尽，女真正在崛起，大宋应从登州、莱州渡海，与女真人取得联系，与之约定联合发动进攻，势必可瓜分辽国。他最后对宋徽宗说：“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之旧疆，以治伐乱，必能克服。”

这一番话，令宋徽宗备受鼓舞，开始打起联合女真共同打击契丹的如意算盘。只是这个计划一旦付出实施，势必将使宋辽两国平静百年之久的边关战火重燃，故而遭到朝臣们的极力反对，不得不暂停。

在童贯出使辽国后第二年（1112），女真与契丹的关系急转直下。这一年，辽国天祚帝到混同江钓鱼，包括女真在内的各蛮族部落酋长纷纷前来朝拜。天祚帝设宴款待，酒席过半时，辽帝劲头上来了，命令各部落酋长跳舞助兴。

大家想想，在宴会上献舞的原不过都是些地位低贱的戏子歌伎，让堂堂酋长跳舞，这着实有侮辱之意。其他部落酋长不敢抗命，只得硬着头皮手舞足蹈一番，可是有一人却坚决拒绝了，此人正是女真部落的首领完颜阿骨打。阿骨打的理由很简单：我不会跳舞。天祚帝正在兴头上，见有人胆敢抗命，心里十分愤怒，遂一而再地要求阿骨打“献技”，但阿骨打一身铮铮铁骨，终不屈服。

这次事件后，天祚帝发现了一个事实：阿骨打心有异志，脑袋长有反骨。他原本想找个借口杀了阿骨打，可是就凭宴会上不跳舞这个理由杀人，显然不能令人心服口服。精明、倔强的阿骨打当然也看出辽帝目露杀机，他步步小心谨慎，每当辽帝召见时，他总是谎称生

病，以免入朝后成为瓮中之鳖。

阿骨打与天祚帝的摊牌只是迟早的事。

摊牌时间比所有人想象的要来得快。

仅仅两年后，完颜阿骨打便铤而走险，向强盛百年的辽国宣战。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傲视天下，南方的大宋帝国不敢北面争锋，可谓八面威风。那么完颜阿骨打凭什么挑战契丹辽国呢？

凭的就是辽天祚帝的荒淫暴虐。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封建王朝的强盛与否，与统治者的能力、素质是密不可分的。天祚帝倒行逆施，人神共愤，不仅外族离心，国内也人心动荡，反抗之潮暗流涌动。表面强大的辽帝国，实际上已是四面楚歌了。

女真部落虽然人数不多，但民风强悍，平常从事渔畋射猎等生产活动，到了打仗时，则全体壮年男子都是战士，不管是步兵还是骑兵，打仗用的武器、粮食，都是自备的。兵在精而不在多，完颜阿古打起兵后，连败辽师。公元1115年，阿骨打索性自立为帝，国号为“大金”，后来他被尊为金太祖。

契丹帝国大厦的支柱已腐朽，只消有人踢上一脚，就摇摇欲坠了。阿骨打踢出第一脚后，一系统连锁反应随之而来。勃海人古欲率先聚众起义，人数达三万余人；在辽宋边关，汉人也乘机而起，暴动迭迭。阿骨打借机渡过混同江，攻陷辽国北方军事重镇黄龙府。

天祚帝对阿骨打恨之入骨，遂起兵十万亲征，号称“七十万”。孰料刚到了混同江，辽师内讧，辽师副帅耶律章奴突然造反，并联合起义军共同抵抗天祚帝。此举大大打乱了天祚帝征女真的计划，尽管耶律章奴的叛乱被镇压，辽师已军心动摇，不得不放弃远征。善于捕捉战机的完颜阿骨打尾随辽师，以两万之弱师，大败辽军，追击百余

里。天祚帝落荒而逃，辽军尸横遍野。

屋漏偏逢连夜雨。辽国再度爆发大规模起义，义军首领董庞儿发难于南京（幽州），拥众万余人，转战于圣、云、应、武、朔诸州。

一时间，辽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由于宋与金之间隔了一个辽国，陆路不通畅，朝廷对辽金之间的战争，所知甚少。公元1117年，一桩偶然事件，令“联金攻辽”的战略构想死灰复燃。

由于金、辽之间战争迅速升级，辽东大乱。当时居住辽东的汉人高药师、曹孝才等，便带着亲属两百余人，乘一艘大船，打算逃往高丽避乱。岂知在海上遇到强风，船只被刮到驼基岛，此岛属大宋帝国的地界。上了岸后，高药师等人便向当地官府汇报了情况，详细说了辽金战争的情况，其要点有两个：其一，女真人已渡过辽河，向契丹发动进攻；其二，契丹国内起义频繁，辽国不能平定。

鉴于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登州知州王师立立即快马上报朝廷。宋徽宗、童贯等人原本就有联合女真打击契丹的构想，获悉辽金战争实情后，更是惊喜。于是宋徽宗与童贯、蔡京等人商量一番，决定以买马为名，在高药师等人的引导下，渡海前往辽东，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秘密联络。

随后，完颜阿骨打也派人出使大宋。双方你来我往，最后在1120年时达成联手夹攻辽国的协定。该协定内容大致如下：其一，宋、金共同出兵攻辽，燕云等汉地，归宋朝所有；其二，在宋朝尚未收回燕云之地前，金朝不可单方面与辽国媾和；其三，宋朝每年给金朝一笔岁币，标准同辽国旧例；其四，约定共同进攻辽国的方案，到时金兵主攻古北口，宋兵主攻白沟，夹击辽国。合约规定，如果宋国不如期

履行和约，将不能得到燕云之地。

这份盟约，是宋、金两国使节多次往返海上后达成的，故而史称“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的签订，令宋徽宗相当兴奋。在他看来，两国打一国，辽国腹背受敌、两线作战，此役大宋必可一鼓作气夺下燕云，一雪国耻。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在“海上之盟”签订后的三个月，轰轰烈烈的方腊起义爆发了。这场起义，完全打乱了朝廷的部署。原来准备北伐的精兵宿将，不得不被抽调到江浙以镇压方腊起义，伐辽一事只得一拖再拖。

完颜阿骨打对宋军的延误时机大为不满，但是他乃是真正的豪杰，即便没有宋军策应，他仍然只凭自己的力量对辽国发起猛攻。1122年，金兵对辽国发动强大攻势，一鼓作气攻下中京（辽宁宁城西），辽天祚帝带着五千骑兵狼狈逃往西京（山西大同），在逃跑途中，还把传国玉玺给弄丢了。金兵攻陷中京后，再陷北安州（河北承德西），然后一路向西。此时的辽军可谓是一溃千里，辽天祚帝三战三败，逃往夹山（内蒙古萨拉齐西北）。

在辽国历史上，哪曾遇到如此之惨败。天祚帝逃跑后，留守南京的张琳、耶律大石等人立耶律淳为皇帝，称为天锡帝。这么一来，辽国有两个皇帝，分裂已是不可避免。天锡帝据有燕州、云州、平州以及辽西之地，天祚帝只得到西南、西北两都招讨府诸蕃部族的支持。天锡帝上台后，想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但是金、宋两国都有自己的算盘，岂肯答应呢？双方均给予明确的拒绝。

眼看着新兴的金帝国攻城略地，宋徽宗再也坐不住了。大宋帝国

若不赶紧出兵，履行夹击辽国的协议，到时燕云之地恐怕也要成为完颜阿骨打的盘中餐了。

领军作战的统帅还是大宦官童贯，因为“剿灭”方腊立了大功，他几乎成为大宋帝国最高军事统帅了。宣和四年（1122），童贯被任命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京的儿子蔡攸为副使，统兵十五万，兵分两路，向辽国发动进攻，意在收复燕云之地。宋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种师道统率，另一路由辛兴宗统率，分进合击。

表面上看，宋军来势汹汹，然而其战斗力却令人大跌眼镜。

辽天锡帝得知消息后，遣耶律大石、萧幹分路抵御。别看辽师不是金兵的对手，对付宋军却是绰绰有余。两路宋军都被打得狼狈而逃，不得不班师回朝。辽天锡帝试图瓦解宋、金联盟，他派人前来交涉，指责道：“女真背叛本朝当亦为南朝（指宋）所恶，今图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可谓得计乎？”

应该说，在一百多年时间里，辽宋关系虽是以金钱维持和平，宋朝服软，但辽国也大体能恪守协定。如今宋朝单方面撕毁澶渊之盟的协定，终究不太光彩。面对辽使的指责，大宋君臣有些不知所措了。就在这个时候，辽天锡帝意外病死，在位时间仅有短短的几个月。辽天锡帝死后，太后萧氏成为辽国实际统治者，宋徽宗听到消息后，想趁辽国政局不稳之际，一鼓作气拿下燕云，便诏令童贯、蔡攸再度北伐。

驻守涿州的辽国将领郭药师率部向宋军投降，这无疑对辽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童贯大喜，遂以郭药师为前导，遣大将刘延庆率十万大军从雄州出兵，浩浩荡荡杀向辽国。宋军渡过白沟后，进至良乡，不料再遭败绩。辽国大将萧幹在悯忠寺与宋军决战，刘延庆大败，辽军一路追击，追杀至涿州，沿途留下宋军累累尸体。

在金军的频频打击下，辽国已成瘦死的骆驼，但无能的宋军依然

不是其对手。宋军之所以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得益于熙宁、元丰时代施行变法，积累了许多军用物资，然而短短几个月，数十年的储备便耗之一尽，还在战场上两度蒙羞。

在宋军发动两次北伐期间，完颜阿骨打攻陷了辽国西京，并对辽天祚帝穷追猛打。当他得知宋军进攻燕云时，便掉转马头，发兵南下，直逼燕云。阿骨打之所以急着南下，是怕宋军凭借自己的力量占领燕京，若金人不出点力，以后怎么向宋朝索取钱财呢？岂料宋军如此不给力，金兵抵达圣州（河北涿鹿）时，便传来宋师溃败的消息了。

阿骨打心里窃喜，果断发动进攻。金军兵分三路，大举南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自攻打居庸关。居庸关乃是守卫燕京之门户，辽国派精锐部队驻守。经过多年交锋，辽人对金兵畏惧如虎，当金兵抵达居庸关时，辽人居然不战而溃。阿骨打挥师猛进，从南门攻入燕京，辽国自宰相以下的文臣武将纷纷投降，耶律大石与萧幹护卫太后萧氏出逃，投奔天祚帝去了。

至此，辽国五京全部落入金人之手，辽国名存而实亡矣。

三年后，辽天祚帝为金人所俘，契丹辽国的历史被彻底终结。

辽国完蛋了，大宋君臣拍手相庆，似乎沦陷一百多年的燕云之地已是唾手可得了。联金攻辽的战略构想是大宋帝国首先提出的，并且通过外交努力才变成现实。但问题是，在出兵伐辽过程中，大宋军队几乎是颗粒无收，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无疑只增添了金人的蔑视罢了。金人扫平辽国，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如今把燕云吞到肚子里了，能轻易吐出来吗？

二九 引狼入室：宋金开战

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文化最为繁荣的一朝，史学发达，其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是千古流传的名著。可是宋朝廷在与女真达成夹攻辽国协约时，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当初宋与金的约定是，联手打败辽国后，宋将收回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土地，也就是燕云十六州。可是大宋朝廷却忘了一件事，在契丹所占领的汉地中，实际上还有三个州并非石敬瑭所割让，这三个州是平州、营州、滦州，乃是唐末五代时刘仁恭所割让。当朝廷意识到这一重大错误后，便想重新与金国约定，一并收回这三个州，但遭到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拒绝。

完颜阿骨打显然认为金国吃了大亏。尽管宋、金有过联手攻辽的约定，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宋帝国执行不力：其一，由于受方腊起义的影响，宋师并没有如期发动进攻；其二，宋师大举出兵攻打燕京时，没有按约定通知金国；其三，宋师表现蹑脚，燕京乃是金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攻下来的。

在整个灭辽的战争中，大宋军队根本没有像样的表现，现在却要接收大片被契丹辽国侵占的土地，岂不是太便宜了吗？

在土地问题上，宋、金之间的争议骤起。

宋朝廷要求收回所有沦陷的汉地，而金太祖谴责宋朝方面失约失期，只肯交还燕京以及蓟、景、檀、顺、涿、易六个州的地盘。这么一来，双方的口水战不可避免了。

宋徽宗派赵良嗣使金，令他务必争取到平、营、滦诸州。当赵良嗣硬着头皮到了金太祖帐中时，金太祖毫不客气地说：“数年相约夹攻，而宋国不出师，复不回报，今将如何？”这位雄才大略的金国创立者还不无讥讽地说：“为何寡人到燕京师，竟不见贵国一兵一卒呢？”

在谈判过程中，金太祖坚持只移交燕京等六州之地，并吓唬赵良嗣说：“宋朝在夹攻辽国一事上违约且不说，平、滦等州的归属，在约定中本未提及，如何能移交。若贵国坚持要收取平、滦之地，那么我连燕京也不移交了。”

不仅如此，在移交燕京之事上，金国方面条件也很苛刻。金太祖表示，燕京移交后，其州县所得的租税归金国所有。对此赵良嗣大为震惊，提出异议说：“土地与租税岂能一分为二呢？”就在这时，金国大将完颜宗翰喝斥道：“我得燕京，税赋自然应归我。”

在土地问题的谈判上，宋朝处处处于劣势。

别看大宋国土辽阔，在军事上很难称为强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后盾，在外交上岂能冲冲撞撞呢？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宋国接收燕京及六州之地，每年向金国输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金国不再提出收取租税，作为补偿，宋朝另外年输一百万缗的“燕京代税钱”。

“海上之盟”乃是宋朝率先倡议的，表面上看，朝廷收回沦陷一百多年的部分汉地，可喜可贺，实则不然。若是辽国是一匹狼，那么金国无疑是一头虎，去了一匹恶狼，却来了一头猛虎，大宋岂可长保燕京之地呢？

在金国内部，不乏强硬的鹰派人物，完颜宗翰便是其中一人。他

打心眼里瞧不起大宋军队，宋师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凭什么获得燕京之地呢？在移交土地时，他拒绝把涿州、易州两块土地拱手让出。最后还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出面摆平此事，他对宗翰说：“海上之盟，不可忘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尽管也看不起宋朝，但好歹能恪守盟约精神。然而不久后，金太祖便去世了，他的弟弟继位，史称金太宗。金太宗花了两年的时间，到公元1125年扑灭辽天祚帝之残余力量，辽国遂亡。此时宋、金两国的邦交却正悄然恶化，处于破裂的边缘。

大宋朝廷在军事上乏善可陈，没有雄厚的武力作为后盾，在外交上又无远见。当时有一些辽国将领投降金国后又叛变，转而投奔大宋，宋朝廷给予接纳，这无疑被视为对金人的挑衅。在辽天祚帝流亡期间，宋徽宗又派人与他秘密往来，试图扶植辽国残余力量以遏制金人势力的扩张，这种做法大大违背当年“海上之盟”不得单方面与辽国谈判的约定。

在金人看来，宋朝的做法简直是背信弃义。

金太祖的二儿子完颜宗望向金太宗建议：“宋人无信，若不先下手，必为后患。”从建国（1115年）到灭掉辽国（1125年），金国只花了十年时间，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绩，其自信力也空前高涨，自然想得寸进尺。宋王朝在这个微妙时间点上，又犯下一系列外交错误，自然轻易地被人抓住小辫子，有了发动战争的借口。

宋宣和七年十月（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太宗下诏，大举侵宋。金兵分为两路，西路由完颜宗翰指挥，由大同进攻太原；东路由完颜宗望指挥，由平州进攻燕京。根据其战前制订的计划，两路大军得手后，将会师于大宋首都开封城。

我们先来看看西线战事。

金国大将宗翰在发动侵略同时，派遣使者入太原城见童贯，指责大宋方面背弃海上盟约精神，招降纳叛。宗翰原本就是鹰派人物，在写给童贯的信中，他语气十分强硬，把责任统统推到大宋一方。当童贯得知金军已倾巢而出的消息后，他目瞪口呆，问金国使者道：“如此大事，何不早来交涉？”

金国使者冷冷道：“大兵已发，不须先告。童大王何不速割河东、河北之地，以大河为界，这样大概还可以保存宋朝宗社吧。”

童贯为什么被称为“童大王”呢？原来当年宋神宗留有遗训，若能收复燕云之地，则进王爵。童贯首倡“海上之盟”，又是北伐军的总指挥，尽管没打胜仗，但还是要回了燕京。朝廷依神宗遗训，封他为广阳郡王。

这位童大王慌了手脚，金兵大举入侵，很快就会杀到太原城下。金兵的战斗力，他是见识过的，自己那三脚猫的功夫，打辽兵都不行，如何与金兵交锋呢？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啊。童贯找了个借口，称自己要回朝廷请示，说得冠冕堂皇的。此言一出，众皆哗然，这岂非明摆着是临阵逃跑吗？太原知府张孝纯赶忙劝道：“大王若临阵而去，人心士气动摇，河东非宋所有矣。”可是童贯哪儿听得进去，弄了辆马车，头也不回向开封急奔而去了。

大统帅都逃了，士兵们哪有决死一战的信心呢？很快，朔、武、忻、代等州先后被金兵占领，完颜宗翰兵围太原。太原军民在张孝纯、王禀等人的率领下，英勇抵抗，才勉强阻止敌人的攻势。

再来看看东线战局。

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军从平州出发，连陷檀州、蓟州。镇守燕京

的郭药师原本是辽国降将，如今金兵大举压境，他索性举部投降。宗望原本就轻视宋朝，得到郭药师后，更打探到宋军的底细，越发不把对手放在眼里。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此时的大宋京城已是乱成一锅粥。

自从澶渊之盟后，京城百姓一百多年没有经历过战火，如今金兵马不停蹄向这里进军，人心震动。别说寻常百姓，就是皇帝与大臣们也惊慌失措。不得已之下，皇帝下了一道“罪己诏”，并发布一系列新政策，革除一些弊政，企图挽回民心。可是临时才想到抱佛腿，哪里能立竿见影呢？

宋徽宗，这位著名的艺术家皇帝，面对危局时并不比不童贯高明多少。他的第一个念头同样是逃跑，因为时局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他所能控制的能力。金兵从北杀来，宋徽宗打算向南逃窜，可是一国之君逃跑了，国家怎么办？国都怎么办？宋徽宗便把太子赵桓任命为“开封牧”，目的是让太子留守国都，让他去处置这个烂摊子。

时任太常少卿的李纲认为：“如今敌人猖獗，若不正式传位给太子，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他与吴敏等人联合向宋徽宗进谏，要求传位给太子赵桓。这位艺术家皇帝说了一句话：“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敢如此。”直到这个时候，他还自以为是个性格刚强的皇帝，其实内心深处，他只不过是个胆小怕事的皇帝罢了。说完这句话后，他突然间一阵心悸，胸口被一股气堵住似的，忽然不省人事了。等到他醒来时，吩咐左右取来纸笔，用漂亮的瘦金体写下：“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

国难当头，宋徽宗并没有自己说的“性刚”，而是选择了逃避，采纳李纲等人的意见逊位，由儿子赵桓继位，即宋钦宗。

宋钦宗在风雨飘摇中尴尬登基，可是坏消息却不断传来。

金兵的铁骑正呼啸而来。金东路军统帅宗望攻破信德府后，宗弼紧接着攻取汤阴，进逼濬州（河南浚县）。面对金兵强大的攻势，宋军的防线全面崩溃，士兵望风而逃，濬州很快失陷，金兵渡过黄河，已经逊位的宋徽宗也顾不上颜面，从开府出奔，一直逃到了京口（江苏镇江）。

新朝廷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逃跑，一派主张抗战。主张逃跑的人认为新皇帝不能待在危险的都城，应该马上南渡长江，或是西奔关中。被提拔为兵部侍郎的李纲则坚决主张抗战，并建议宋钦宗亲征。宋钦宗摇摆不定，他先是答应亲征，但当金兵逼近开封时，他又想开溜，被李纲所制止。

李纲力驳各种逃跑主义言论，他说：“为今之计，当整饬兵马，固结人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可是宋钦宗犹心存疑虑，他举目四望，谁人可抵挡金兵呢？李纲毛遂自荐，挺身而出，并表示愿意“以死相报”。李纲的勇气与责任感感动了皇帝，宋钦宗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权负责开封城的防务。

此时金兵已经开始对开封发起进攻，李纲崭露出卓越的军事组织能力，他领导开封军民英勇备战，修楼橹、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樯木、备火油，严防死守。其实从兵力的对比上说，开封的宋军在数量上并不少于金兵，可是说到战斗力，连皇帝都没信心。李纲把禁军、厢军，保甲兵等安置于开封城四面，布下数道防线，又组织马步军四万人，日夜操练。金兵几度进攻，都被李纲所击退。

正当李纲在前线苦战时，朝中主和派乘机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以太宰李邦彦为首的主和大臣主张割地求和。宋钦宗毕竟不是雄才之君，在生死关头，他的信心再度动摇，遂依了李邦彦，遣使请和。

为了讨好金人，宋钦宗打算花钱消灾，把每年输给金国的岁币提高到三五百万两，另外还将以“犒军费”的名义赔偿金国白银三五百万两。想当年海上之盟时，宋朝许给的岁币不过二十万两银，如今猛增了十几二十倍，这已是远远超过大宋朝廷所能承受之范围。

可是金兵统帅宗望却狮子大开口，要求将“犒军费”增加到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同时宋朝还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入为人质。这些条件简直苛刻到了极点，宋钦宗为了保命，竟然打算同意。

李纲惊骇地说：“犒师金币，其数太多，虽竭国内之财且不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间、中山为国家屏蔽，割之何以立国？”然而宋钦宗已被吓破了胆，他一方面搜刮京城中的金银财宝以作为战争赔款；另一方面把弟弟康王赵构、少宰张邦昌送到金营充当人质。

不久后，宋钦宗有点后悔了。

在一阵惊慌失措后，皇帝忽然又看到希望了。

希望来自于各路勤王之师，自从朝廷发出勤王令后，大宋帝国各路兵马打着“勤王”的旗号救援开封，种师道、姚平仲等各路兵马相续抵达京师，兵力达到二十万人之多。此时开封城外的金兵，总数不过才六万人，而且大部分是归附于金的奚、契丹、渤海等部落，骁勇善战的女真部落骑兵人数并不多。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宋军在兵力上已占据明显优势。

李纲不失时机地提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以孤军深入重地，当以计取之。”宋钦宗的对敌政策又如同钟摆一样摆回主战一方，以多打少，胜算总有把握吧。

靖康元年（1126）二月，宋将姚平仲提出偷袭金营的计划，企图一举活捉金兵统帅完颜宗望，救回康王赵构。想法固然很好，可是这

次军事行动却为金兵所料知，姚平仲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被金兵杀得大败而回。完颜宗望乘机发动心理战术，派遣使者指责宋朝一方失信，破坏达成的和约。

面对宗望的威胁，宋钦宗的信心再度崩溃。主和、派领袖李邦彦主动派人到金营谢罪，低声下气地说：“此乃李纲、姚平仲之谋，非朝廷意也。”大敌当前，大宋朝廷居然内部纷争不断，毫无信心，这战还怎么打？为了讨好金人，宋钦宗把主战派领袖李纲解职，派使臣携国书及割三镇诏书、地图，前往金营谈和。

李纲被解职激起了开封城军民的强烈愤慨，太学生陈东率诸生数百人跪在宣德门下，上书为李纲抱不平，并要求惩罚李邦彦等投降派分子。城中军民有数万人参加集会，这引起皇帝的恐慌，担心酿成民变。不得已之下，宋钦宗只好重新起用李纲担任尚书右丞兼京城防御使，但这也只是为安抚民心罢了。

宋钦宗的勇气，比起当年澶渊之盟的宋真宗还不如，一次反击的失败就让他对胜利失去了信心。李纲虽然复职，但不意味主战派控制局面，朝廷与金人的和谈仍在继续。其实宋钦宗并不知晓，金兵孤军深入后，兵力上又居于绝对劣势，连完颜宗望也没有把握能占领开封。眼看着李纲重新起用、开封防御线密不透风，宗望也见好就收，遂不再坚持所提出的五百万两黄金以五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同意宋朝方面所提出的和谈条件。

宗望的让步，令宋钦宗喘了一口大气。根据和约，宋朝方面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赔偿黄金二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另以肃王赵枢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宗望在捞足了好处后，终于引兵退去。这时宋钦宗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对皇帝来说，保住小命最重要，什么金银土地都是浮云。

强敌退去，皇帝与一帮主和大臣拍手相庆，国家终于转危为安

了。

国家真的转危为安了吗？

事实上，一场更大的风暴正悄然酝酿呢。

三〇 靖康之乱：两个皇帝当了俘虏

宋钦宗是一个意志薄弱、优柔寡断之人。大敌当前，他毫无信心；大敌退后，他又觉得大丢面子，在群臣面前失去尊严。皇帝当然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便把丧权辱国条约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投降派，于是李邦彦等投降派分子被免职，而李纲则入枢密院。这意味着皇帝的钟摆又摆向主战方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当初金兵分东、西两路进攻宋朝，东路军统帅宗望兵临开封城下，迫使宋朝割地赔款请和，可是西路军统帅宗翰却在太原城下遭遇宋军的顽强阻击，久战无功。本来宋朝方面已经答应把太原割让给金国，只是尚未完成交割。宗翰听说宗望捞到那么多好处，心理不平衡，遂也派人使宋，索取战争赔偿。宗翰的无理要求，遭到大宋方面的断然拒绝。要是就这么空手而归，那么风光岂不都让宗望独占了么？宗翰索性出兵，越过太原，攻打隆德府，进逼泽州。

这件事，正好给了宋钦宗一个毁约的借口。

既然金人不遵守和平协约，擅自出兵进攻大宋，那么宋朝一方也不必守约，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不再割让给金国，三镇军民，应当誓死固守。宋钦宗与宗望所达成的城下之盟，一年数百万两白银的岁币及三镇之地，就这样一笔勾销了。

我们得思考一个问题，在对外政策上，宋钦宗为何如此轻率呢？他一会儿主战，一会儿主和，刚签订完盟约，马上又要撕毁，变化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说实话，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愿意蒙羞，他之所以没有自信，在于大宋王朝积弱太久，特别在对外战争上乏善可言，心里着实没有底气。那么积弱的原因在哪呢？宋钦宗认为是奸臣当道，特别徽宗时代，蔡京、童贯等人把持朝政，搞得乌烟瘴气，民怨甚大。在开封解围后，宋钦宗获得了喘息之机，他认为只要铲除奸臣，重整朝纲，大宋帝国自然有实力与金国对峙。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朝廷发起了大规模的除奸行动。

最恶名昭著的奸臣有六人，分别是：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王黼最早遭到清算，他被宋钦宗流放后，赐死于途中。紧接着，李彦被赐死，朱勔被流放，梁师成被贬官后赐死。政坛不倒翁蔡京也未能幸免，被流放儋州，途中死于潭州。与蔡京同样曾经权倾朝野的童贯命运更惨，他被宋钦宗下令诛杀。

在宋钦宗上台后短短几个月内，徽宗一朝的奸臣们悉数被铲除，这固然是大快人心。可是这些奸臣玩弄权术这么久，早把国家整得国将不国了，想要恢复元气，还需时间。在撕毁与金国签定的条约后，金国却不留给大宋帝国一丁点儿时间了。

完颜宗望从开封城下满载而归后，满心欢喜地准备接收宋朝所割让的中山、河间两镇。岂料宋钦宗突然反悔，中山、河间两镇军民响应朝廷号召，坚守不降。宗望勃然大怒，遂发兵攻打中山、河间。此时宋钦宗又派大将种师中率军增援两镇，宗望既攻不下两镇，又受到宋援军的威胁，不敢恋战，便引兵北去。

此时，宋钦宗对局势做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大宋军队之所以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乃是因为金兵不宣而战。

如今大宋保住了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精锐部队开赴前线，首都开封城的危局不再，总算站稳了脚跟，就算金兵再度发起进攻，顶多也就是边界线上的交锋罢了。

然而金国既然有消灭辽国的实力，其军事力量绝不是吹出来的。

既然宗望在接收中山、河间两镇中受挫，金国便把争夺的焦点集中于太原。

在此之前，太原军民已经受住金兵的多次进攻。为了守住太原，宋钦宗命姚古、种师中会师后，率兵前往救援。在宋军高级将领中，种师中以老成持重见长，在当时被誉为名将。当种师中的援军抵达寿阳时，遭到金兵的袭击。种师中与金兵交锋五次，胜了三次。由于姚古的援军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抵达战场，导致种师中陷入金兵的重围之中，最终力战而死。

种师中战死后，救援太原的另一名宋军将领姚古也被金兵击败。此时太原城已经为金兵围攻达数月之久，若无外援，势必难以坚守。在这种情况下，宋钦宗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负责救援太原。李纲本是文臣，无法节制其麾下诸将，这个统帅可谓是有名无实，没有实权，如何能打胜仗呢？

朝廷对太原城的救援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太原附近的汾、晋、泽、绛等六州出现了大恐慌，老百姓纷纷渡河南逃，以躲避金兵，各州县几乎成为空城。

金国人的野心，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太原城。

在围困太原的同时，金太宗正悄悄地酝酿着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靖康元年（1126）八月，完颜宗翰出云中（山西大同），完颜宗

望出保州（河北保定），兵分两路，对大宋帝国再度发起疾风暴雨般的进攻。

太原保卫战注定结局惨烈。张孝纯、王禀等人坚守孤城两百多天，粮尽援绝，而金兵的攻势却有增无减。宗望把攻城重武器全用上场了：金兵在太原城外列炮三十座，炮就是大型投石机，投掷出的巨石，呼啸般地飞入城内，凡被砸中者无不毁坏。在金兵的疯狂进攻下，太原终于沦陷，张孝纯被俘，王禀战死。太原失守后，宗望率金兵长驱直入，一鼓作气攻陷平阳、隆德府，进破泽州。金兵所到之处，官吏弃城而逃，根本没有强有力的抵抗。

宗翰在西路节节进逼，宗望也不甘示弱，在东线战场连连得手。宗望兵出保州后，大破宋军于井陉，之后围攻真定府。真定府的宋军不满两千，面对强敌压境，英勇顽抗，坚持了四十天之久。真定失守后，金兵攻陷中山，向大宋都城挺进。

面对金人的二度南侵，大宋朝廷大惊失色。

宋钦宗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却远远低估了金人的力量，他没料到金兵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再次大举南犯，根本没做好充分准备。

此时京城内又乱成一锅粥了，朝廷之上，主和派与主战派又打起口水战。主和派认为，金人南犯，原因在于宋朝毁约，现在赶紧割让北方三镇，与金人和谈才是上策。更有甚者，他们诬蔑主战派领袖李纲“专主义战，丧师费财”。温室里长大的宋钦宗六神无主，听信馋言，把李纲贬为洞霄宫提举，闲置不用了。紧接着，皇帝又派王云为和谈使臣，与康王赵构前往金营，欲割三镇求和。

岂料赵构与王云行到半途时，被愤怒的老百姓围攻，国土沦陷，大敌当前，朝廷居然只知投降。愤怒的人群把王云视为卖国贼，杀之而后快，康王赵构见民怨沸腾，也不敢去金营，便躲到相州。与此同时，金人也向宋朝开出和谈条件，价码自然又提高不少，割让三镇已

经不能满足其要求了，必须再割让两河之地。

对于金人如此苛刻的条件，宋钦宗又答应了。

人家是狗急跳墙，皇帝是狗急投降。

割地投降，动作还得快，慢了敌人就杀到头上了。宋钦宗又派了两个特使出使金营，一个唤作耿南仲，一个唤作聂昌。不料出发不久后，聂昌又被杀了，耿南仲见势不妙，也不敢前去金营，索性投奔康王赵构了。看来民众不可欺，国难当头，大家都强烈要求政府全力抗战。

正所谓民意难违，宋钦宗傻了眼，想割地投降都这么难。不得已之下，皇帝只得又改变立场，下诏勤王。宋钦宗的弟弟赵构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招募义勇军保卫京师。朝廷在战与和之间反反复复，白白错失抵抗良机，在此犹豫徘徊之际，金兵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开封进军。

十一月初（靖康元年），宗翰与宗望两支部队在开封城外会师，大宋朝廷再度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自八月大举南征，金兵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横扫河东、河北，大宋帝国国防之脆弱，可见一斑。

在几个月前，京师的勤王军最多时达到三十万之众，但这些军队后来被分派去救援太原或者遣散回地方，此时的京师只有七万军队，要顶住金人的进攻，显然不容易。更糟糕的是，京城中的居高官显位者，没有哪个有能力来领导抗战。

身为国防部长的兵部尚书孙傅，居然向皇帝推荐了一位所谓的奇人。此人实乃市井无赖，名叫郭京，自称能施六甲神术，足以退敌。皇帝仿佛看到一根救命的稻草，头脑一发热，给郭京封了个官，赐金帛数万，让他招募七千七百七十七名六甲神兵。骗吃骗喝的还不仅郭

京一人，还有一个刘孝竭，也以御敌为名募兵，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反正就是装神弄鬼。

这些天兵神将能否靠得住，宋钦宗心里也没底。

那如何是好呢？

有人便提出来了，于今之计，不如先移驾洛阳，以避敌锋。这种逃跑主义自然遭到另一些人的唾弃，宋钦宗脸上也挂不住，若是敌人一来便逃，那么皇帝的尊严何在呢？这位优柔寡断的皇帝跺了跺脚，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朕今日当死守社稷，决不远避了。”

可是战局不容乐观。

殿前指挥使王宗濬拍拍胸脯，请纓出战，宋钦宗大喜，拨给一万名士兵。岂知他刚出城，才一交锋，便狼狈鼠窜了。东道总管胡直孺率军入卫，还没进城便被打败，成了金人俘虏，还被绑到城下示众。范琼率一千人出城偷袭，蹈冰过河时，冰面裂开，淹死五百人。这些失利极大挫伤了宋军士气。

这个时候，郭京的六甲神兵应该出场亮相了吧。这个江湖骗子骗了许多金帛，招募七千多名所谓的神兵，过了几天潇洒的生活。朝廷屡促他出城退敌，郭京又神秘兮兮地说，神兵出城退敌，你们都不能看。这七千神兵哪有什么本事，一下子被金人杀得屁滚尿流，死的死，逃的逃。郭京一看谎言的泡沫要破了，便说：“待我出城作法，包管退敌。”这位江湖巨骗把朝廷耍弄一番后，出了城便径直逃命去了。

宋军反击全线告败，金兵大举攻城。此时京城之内，可谓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岂有抵抗的决心。很快，金兵已从四面八方登上城墙，宋军统制姚友仲、何庆言、陈克礼等人皆战死，守御使刘延庆也被金兵所杀。开封城轻而易举地被攻破了！

不过此时宗翰、宗望并没打算占领开封，声称只要太上皇（退位的宋徽宗）前往金营谈和，便可主动撤军。此时的宋钦宗已是走投无路，又不忍心让老爹前往金营受辱，索性亲自前往。

曾经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就这样低声下气地以战败者的身份前去议和，那种内心的失落与羞愧可想而知。宗翰、宗望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开出的议和条件令人看了心惊肉跳：除了割让三镇、两河之外，大宋还须纳金一千万锭、银两千万锭，帛一千万匹。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宋钦宗能有回旋的余地么？不得已之下，只得全部应允。

从金营归来后，宋钦宗泪流满面，沿途见到天子尊容的士人百姓，也无不流涕不止。自大宋开国以来，何尝有过如此之屈辱呢？即位是当年澶渊之盟，与今天城下之盟之比，不过小巫见大巫罢了，何值一提。

宋钦宗一面派使臣前往河东、河北交割土地，一面四处搜刮金银财宝，可是这两项工作都遭遇到极大困难。两河地区的军民们被朝廷出卖了，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拒绝投降金人。金人欲求无度，除了所索取的金银之外，还索取粮草、骡马、女人。许多女人担心被金人糟蹋，索性投水而死。

大家想想，那么一大笔赔款，岂是一时间能凑齐的？但是宗翰、宗望没耐心了，再度指示宋钦宗前往金营。这次，金人要把宋钦宗当作人质，只要皇帝在手，不怕大宋赖账。没办法，没了皇帝的朝廷四处搜刮，好不容易凑了黄金三十八万两，银六百万两，衣帛一百万匹。与金人要求相比，这还真是杯水车薪。宗翰等人极不满意，无奈之下，留守大臣们又绞尽脑汁，搞到七万两黄金与一百一十四万两白银——实在没办法搞到更多了！

宗望、宗翰大怒，以金太宗的名义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并逼太上皇宋徽宗及太后等出城当金人俘虏。艺术家宋徽宗长叹数声，不堪忍受其辱，想饮药自尽，但被人所阻，只得出城前往金营。同样被逼迫入金营的还有皇帝诸妃、公主驸马。想当年皇室是何等威风，彼一时此一时，当繁华散尽，一切如梦幻泡影矣。

金国没打算灭了大宋，并非没有野心，而是难吞下去。女真在短短十数年时间里，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部族人口顶多几十万人，却西向吞并辽国，北方诸夷，莫不臣服，两度南征，两度迫使宋廷签下城下之盟。可是面对急剧扩张的领土，得到容易，如何治理却成难事。女真人一而再地上演蛇吞象的故事，但面对大宋帝国这头巨象，一时间却是吞不下去的。那怎么办呢？金人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扶植一个傀儡政权。

三一 南宋开国：不进取的朝廷

谁来当傀儡皇帝呢？

在金人看来，大宋帝国前宰相、亲金分子张邦昌就是最佳人选。靖康二年（1127）三月，张邦昌被金国册立为伪皇帝，改国号为楚，定都金陵。

一个月后，金兵放火烧了开封城，押着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后妃太子宗亲等三千余人连同大量的金银财宝北去。大宋帝国的历史分为两段，从陈桥兵变到靖康之耻称为北宋，之后的称为南宋。

两个皇帝被掳走，张邦昌伪楚政权的建立，宣告了北宋的终结。

然而张邦昌何德何能，当皇帝谁会听他命令呢？这个所谓的“大楚”政权形同虚设，政令不出朝廷，北宋旧臣们强烈要求还政于赵氏。张邦昌灰头土脸，说实话，他当皇帝也是被逼无奈，坐在宝座上如坐针毡啊。怎么办呢？皇帝的位置是烫手的山芋，不如早扔掉好了。可是赵室宗亲基本上都被金人掳走，谁能出来主持大局呢？

事还真凑巧，京城里还留着一位孟太后。

这位太后乃是当年宋哲宗的皇后，又称为元祐皇后，那她为什么没被金兵掳走呢？因为她是被废的太后。因为被废，反倒令她逃过一劫，没被列入掳掠的名单中。她自己也没想到命运居然如此难料，在张邦昌狼狈不堪之时，她被请出来垂帘听政。张邦昌知道自己没那个本事当皇帝，便去了帝号，改称“太宰”，这个由金人扶植起来的傀儡楚政权，前后才三十来天就宣告结束了。

政权又回到赵氏手中，要立谁为皇帝呢？

看来看去，能当皇帝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靖康之难时，康王赵构侥幸躲过了，因为他当时并不在开封城。在金兵大举南侵时，宋钦宗派赵构出使金营谈和，但是当赵构到了磁州时，知州宗泽对他说：“肃王一去不回，难道大王欲蹈前辙吗？”这一番话，令赵构惶恐不安。在金兵第一次兵临开封，迫使宋廷签下城下之盟时，康王赵构险些成为人质，只是后来宋钦宗以肃王赵枢代替他为人质，这才使他摆脱羊入虎口的厄运。听了宗泽一席话，赵构决定不前往金营，而是驻留于相州，并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如今宋徽宗、宋钦宗被俘，皇室亲宗也纷纷被抓到金国，赵构便成为宋室接班人的不二人选。张邦昌在金人的威逼下当了傀儡皇帝，这在当时可谓是大逆不道，为了保全性命，争取赵氏皇室的谅解，他一面请出孟太后听政，一面向康王赵构上表劝进。身为徽宗皇帝的第九子，若排资论辈，赵构就是八辈子也当不上皇帝。但历史却阴差阳错地选择了他。

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登基，是为宋高宗。金人试图建立伪政权的计划破产，帝国仍然是赵氏的帝国，南宋的历史也以此为开端。宋高宗即位后，改年号为建炎。在中国五行说里，火是克金的，宋高宗的这个年号，不是一个火字，而是两个火字，似乎用了这个年号，就可以克制住金国似的。

以常理而论，在经历国破家亡的惨剧后，新建立的南宋朝廷自然应以收复失地为首要任务。可是宋高宗与他的父兄一样，着实没有雄才伟略。他上任伊始，朝廷“主和派”的势力很大，拥立皇帝有功的黄潜善、汪伯彦都身居显位，掌握着军政大权，当了一个月傀儡皇帝的张邦昌被封太保。当然，主战派也在朝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金国的

军事威胁仍然很大，随时可能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南侵。

曾经一度被贬的名臣李纲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实际上就是宰相之职。李纲的上台，可谓是众望所归，大家看到了光复河山的希望。这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以满腔热忱投入到抗金事业中，力图重振朝纲，加强国防力量。

此时的宋高宗尽管起用李纲为相，实际上他对抗战并不热衷，仍然幻想着以投降妥协的方法，来换取与金国的和平。李纲勉励高宗说，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必可胜。他认为应该“法勾践尝胆之志”，“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积极备战，力期在三年时间里“雪振古所无之耻”。

要鼓舞士气，就得打击投降派与变节分子，严惩卖国贼。

被金人强迫当了三十八天傀儡皇帝的张邦昌自然成为李纲首要攻击目标。尽管他很快还政于赵氏，拥立宋高宗有功，可是在士民百姓眼中，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张邦昌未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他先是被贬到潭州，不久后被诛杀。其他变节分子或被杀，或被流放，投降派的气焰稍被遏制。

南宋政权还面临一个大问题：国都应该选择在哪里呢？

这是关系到国家稳定的大事。

开封是北宋都城，但宋高宗并不打算以此为都。固然，在经历金人破坏后，开封已是残破不堪，但这并不是宋高宗放弃的理由。金兵两度南下，都轻而易举地打到开封城，还掳走二帝，这样的都城，皇帝怎么放心得下呢？

高宗内心深处充满对金人的畏惧，他想把都城迁往长江以南，离金人越远，他越有安全感。李纲则坚持认为，开封乃是“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新政权可先在长安、邓州、襄阳三城中选一

个为临时都城，等到开封城重建完毕后，便迁回旧都。

李纲寄厚望于宋高宗，希望这位年轻的皇帝能发愤图强、卧薪尝胆，收复河山。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宋高宗的最高目标，就是能使自己的小朝廷苟且偷安，除非金国一意要彻底灭掉大宋，否则的话，总有回旋的余地。

表面上看，李纲在朝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则不然。李纲忠正耿直，讲原则，不怕顶撞皇帝，时间一长，宋高宗对他越发冷淡。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此时真正掌控着朝中大权者，却是两位主和派人物：黄潜善与汪伯彦。他们两人摸准了皇帝的心思，皇帝根本不想与金国开战，你李纲在瞎忙什么呢？

很快，李纲便遭到暗算。

黄潜善等人唆使殿中侍御史张浚弹劾李纲，罗列罪名，比如私杀侍从、典刑不当、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李纲忠心为国，不料却遭到无端攻击，又事事受到阻挠排挤，遂上书求辞。宋高宗竟然罢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此时距李纲就相位仅仅七十五天。

李纲深孚众望，公忠体国，他被罢相的消息传开后，朝野哗然。太学生陈东挺身而出，上书力请朝廷挽留李纲，罢免黄潜善、汪伯彦，并力主皇帝返回开封，率师亲征。与此同时，进士欧阳澈也上书痛骂朝廷中用事的投降派。但是这种抗议令宋高宗勃然大怒，黄潜善又在一旁煽风点火，宋高宗竟然下令将陈东、欧阳澈两人斩首于东市。自大宋开国以后，历代皇帝都恪守太祖赵匡胤立下的“不以言罪人”的祖训，可是恼羞成怒的宋高宗却把祖训抛到九霄云外了。

就在宋高宗的小朝廷苟且偷安之际，河北、河东的抗金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当初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时，被迫割让河东、河北之地。金兵北撤后，分兵把守河东太原、河北真定等地。然而，河东、河北的民众不甘心被金国统治，奋起反抗，各地义军、民兵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成为抵抗金兵的重要力量。李纲主持朝政时，为抗击金兵，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燮为河东经制使，宗泽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招兵买马，恢复中原地区的防御。

金国吞并两河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大将完颜娄室率领重兵，向河东重镇河中府发动凶悍的进攻。河中守将席益临阵逃跑，知府郝仲连率军民力战，但实力悬殊，且外援不至，最终被金人攻陷。完颜娄室挟胜利之威，连下解、绛、慈、隰诸州。

消息传到应天府，南宋小朝廷大为震动。黄潜善、汪伯彦这两个跳梁小丑又迫不急待跳出来，密请宋高宗赶紧移驾东南。宋高宗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闻之胆寒，决定南逃。这一决定，令主战派人士大为恼怒，东京留守宗泽连连上表，力请皇帝返回开封，以固民心士气，领导抗金战争。

开封曾两度被金兵围攻，为什么宗泽力劝皇帝返回呢？

因为此时开封的防御力量，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强大。

此时距金兵烧毁开封城不过才短短几个月，宗泽是如何让一座废墟在很短的时间内变为固若金汤的堡垒呢？

我们且来了解一下宗泽这个人。

宗泽是宋金战争爆发以来最出色的一位大宋将领，他与李纲一

样，是坚定的抗战派。在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举南侵后，他曾率军在河北孤军奋战，被宋钦宗任命为兵马副帅（兵马大元帅是康王赵构），此时的他已是六十七岁高龄。宋钦宗割河东、河北后，两河军民纷起抗金，宗泽在1127年（靖康二年）初，在大名与开德一带奋勇抗击金兵，取得连胜十三次的非凡战绩。

宋高宗即位后，李纲推荐宗泽担任开封府尹，后又任东京留守。宗泽便从河北率军返回开封，负责保卫故都。此时的开封城残破不堪，守备军队数量也严重不足，而且多数是各地来的“勤王”部队，战斗力低下。但这并没有难倒老将军，宗泽首先联络各地义军，以自己的真诚及影响力将这些杂牌师团结起来，许多义军首领，如王善、丁进、王再兴、李贵、杨进等，都投其麾下。一时间，义军、民兵的数量达到一百多万人，声势大振。

为了守卫开封，宗泽殚精竭力筹划各种防御工事。为加强军队的机动能力，他打造一千二百辆战车，每辆战车可载五十人；他又考察开封城四周地形，在城外设立二十四壁垒，驻兵数万；又在黄河沿岸设置许多营垒，开通五丈河以便利交通。为扩大防御区，他下令京郊近河七十二里范围内的十六个县分守御敌，每个县都开挖濠沟，置各种障碍物，以防金兵南下。

一座被烧毁的城市，竟然奇迹般地成为铜墙铁壁的堡垒。

宗泽满心以为，只要宋高宗能回到开封，振臂一呼，天下莫不响应，把这一百多万的义勇军团结为一个整体，何愁不能光复失地，迎回徽宗、钦宗二帝呢？可是他实在高估了宋高宗，这位乱世皇帝早被金人吓破了胆，不要说反攻，若是金人不主动来犯，他就谢天谢地了。

令老将宗泽更加失望的是，宋高宗不仅不回开封，最终仍听了黄潜善、汪伯彦两人的话，把都城从应天府迁到扬州。这时李纲已经罢

相，没有人可以阻止高宗南逃了。高宗一路逃到扬州，这里距离金兵甚远，皇帝总算喘了一大口气。

看来金兵一时半刻是打不到扬州的，宋高宗有充分的时间来谈和。这位开创南宋的皇帝没想着如何筹划反攻，而是只想讨好金人，他派遣特使王伦前往金营，幻想休战议和，能偏安一隅他就心满意足了。

但偏偏事与愿违，金人并不想谈判！

起初金国扶植张邦昌伪政权，本想借此控制南朝。岂料所选非人，宋高宗赵构登基后，又贬斥张邦昌，令金人的计划破产。在对待南宋小朝廷的立场上，金国两大巨头宗望与宗翰的态度是不同的。宗望想释放徽、钦二帝，与南宋修好，而宗翰则坚决反对。也算是宋高宗倒霉，在这个时候，宗望偏偏去世，宗翰则大权独揽。

当宋高宗特使王伦抵达云中见宗翰时，宗翰不仅不谈判，反倒把他给押留了。在金国高层，宗翰是著名的鹰派人物，对宋朝特别藐视。金兵一进攻，南宋皇帝便望风而逃，这无疑更令宗翰轻视了。一国之主没用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谈判的资格呢？

宗翰决意要把战争进行到底，他兵分三路：自己率兵由河阳渡河，攻河南；右副元帅宗辅与其弟兀术自沧州渡河，攻山东；陕西诸路都统娄室自同州渡河，攻陕西。金兵来势汹汹，大有一举消灭南宋小朝廷之气势。

南宋能否顶得住金兵此雷霆般的一击呢？

三二 苦撑危局：力挽狂澜的宗泽

宋高宗别出心裁地把年号命名为“建炎”，乃取“火克金”之意，岂料建炎元年（1127）尚未过完，他非但没能克住“金”国，反倒又丧失大片国土。

金兵铁骑威震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很快，南宋军队几乎全线溃败。

金将娄室连陷同州、华州，宋沿河安抚使郑骧兵败自杀。金兵攻破潼关，河东经制使王夔放弃陕州，逃奔入蜀。另一名金国大将银术可攻陷邓州后，分兵陆续攻陷襄阳、均、房、唐、陈、蔡、汝、郑州及颍川府等地。此时唯一能抵抗金兵、保卫河南的，只有东京留守宗泽。

由于开封乃是大宋故都，在军事政治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若再次攻破开封，势必能瓦解南宋军民的士气。故而金兵统帅宗翰在占领汜水关后，向开封进逼。与此同时，兀术（宗弼）也率另一支金兵，从东面向开封进逼，试图配合宗翰的主力部队，一举夺取开封城。

可是这回，金人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

当金兵前锋离开封越来越近时，宗泽仍然不慌不乱。当时宗泽正与客下围棋，忽接到金兵来犯的情报，属僚皆惊，独宗泽神色自若，不动声色地说：“我早有备矣。”原来老将军早有部署，他派部将刘衍、刘达各率一支军队牵制敌势，又精选数千骑兵作为机动部队，绕

道敌后，截敌归路。金兵前锋部队在几路宋军的夹击下，大败而还。

不过宗翰决不会因为一次挫折而打退堂鼓，他亲率大军继续深入。在一场阻击战中，南宋将领阎中立战死，李景良临阵逃跑，另一名将领郭俊民倒戈降金。宗泽毫不客气地把逃跑的李景良抓起来，斩首示众。投降金兵的郭俊民也没好下场，宗翰派他与一名特使前往开封城，劝降宗泽。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宗泽对投降分子深恶痛绝，把郭俊民与金使一同杀了，把宗翰的劝降书撕个粉碎。

在开封外围战中，金兵的进展很不顺利。

金兵以将近两万人之众攻入滑州，宗泽部将张率部前往增援，此时他手中只有一两千人马，与敌人的兵力相比十分悬殊。张部下纷纷劝道，敌强我弱，应避其锋芒。张慨然道：“避敌偷生，我如何有面目见宗公呢？”于是率部驰援。宗泽得悉后，急遣部将王宣前往支援，但赶到时已为时太晚，张以寡击众，力战而死。王宣奋起武士之心，击败金兵，金人放弃滑州逃走。

此时的宗泽，已俨然成为南宋帝国的中流砥柱。在他坚强的防御下，开封城巍然屹立，宗翰、兀术只能望城兴叹，夹攻开封的计划也不了了之。

开封地处中原之心脏地带，因不能攻克此堡垒，金兵不敢越过开封城而继续南掠。在南宋军队各个战场大溃败的背景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宗泽保住了半壁江山。宗泽是继李纲之后，大宋抗金的一面旗帜，他的功绩绝不仅仅只是守住开封，遏制金人进攻，而且他还积极联络河东、河北的抗金义军，力图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抗金防御体系。

在宗泽领导开封保卫战的同时，河东、河北沦陷区活跃着许多抗

金义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王彦所领导的“八字军”。

王彦是建炎初年南宋名将，声望与业绩仅次于宗泽。王彦为人豪爽，精通兵法，年轻时曾参加过征讨西夏的战争。靖康之变发生后，在国家危急关头，王彦舍家为国，毅然投奔到河北招抚使张所麾下，被提拔为都统制。当时王彦帐下有一员裨将，这个人后来大放光芒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就是岳飞。

建炎元年（1127）九月，王彦率岳飞等十一名裨将及七千人马渡过黄河，一举收复新乡。在此役中，岳飞勇冠三军，斩将夺旗，抢下收复第一功。金人纠集数万人马，围攻王彦部。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重围下，王彦损失惨重，只得率部突围。当时岳飞年少气盛，对王彦老成持重的指挥风格不满，遂自领一军而去。

王彦突围后，转战数十里，收散亡卒伍七百余人，退守西山。这支人数不多却英勇非凡的部队，在王彦的领导下东山再起，军士们为表爱国之心，均在脸上刺上八个字——“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后来他们得到一个绰号：八字军。王彦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他满腔热情，与士卒们同甘共苦。随着八字军声名远扬，队伍也不断扩大，发展到一万多人。同时在太行山一带的义兵十余万人，也都接受王彦的号令。

在南宋朝廷消极抗战、两河沦陷之际，王彦却在敌后站稳脚跟，开辟抗战根据地，他所控制的势力范围，绵亘数百里，成为金人的心腹之患。在金兵对南宋发动大规模南侵时，王彦在北方的抗金活动更加频繁。金兵之所以未敢深入南方，除了宗泽主持下的开封府如钉子般纹丝不动外，还有一个因素，便是以王彦“八字军”为首的义军对金兵的后方构成巨大的威胁。

金人试图剿灭王彦的“八字军”，多次召集诸部酋长商讨进剿事宜。然而诸部酋长纷纷表态说：“王都统砦坚如铁石，未易图也。”采

取强攻手段，势必难以奏效。此时有酋长提议说，不如派出精锐骑兵袭扰义军的粮道，只要义军陷入无粮草的困境，自然可不攻而破。此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金国骑兵发起了一场经济制裁战。只是王彦早识破金人企图，多次设下伏兵大破金人，斩获甚众。

鉴于王彦的出色表现，东京留守宗泽任命他为“两河制置使”，联合河东、河北广大忠义民兵，共同抗金。

在开封府保卫战后，金兵统帅完颜宗翰对南宋的攻势告一段落，便集中力量对付沦陷区的抗金义师，使得王彦的处境更加艰难。宗泽担心王彦的孤军被金兵消灭，遂于建炎二年（1128）五月，令王彦放弃太行山根据地，退守滑州。王彦奉令率主力部队万余人渡河南返，金国派出重兵尾随王彦，却不敢贸然出击。

宗泽强烈认识到，两河地区的抗金义师虽然人数颇多，可是得不到朝廷的援助，兵力分散且各自为战，最终难免被金人各个击破。作为东京留守，宗泽已经尽自己的能力支援两河抗金义师，可是他毕竟权力有限。在宗泽看来，最好的计策，莫过于宋高宗回到开封城，以开封“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战略地位，虎视中原、鹰扬牧野，以此作为收复两河的桥头堡，在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有重要意义。

在留守东京的一年时间里，宗泽锲而不舍地上书宋高宗，要求移驾开封，领导对金战争。金兵对开封的挑战已遭挫折，皇帝还在担心什么呢？老将宗泽的拳拳爱国之心，可以感动上苍矣，但却丝毫也没能打动宋高宗。宗泽一连上了二十四道奏疏，请求皇帝回銮开封，但是这些奏疏石沉大海。

在召回王彦“八字军”的同时，宗泽积极为渡河作战做准备。他派人前往两河各山寨、水寨，与抗金义军首领联络，相约只要南宋大军渡河作战，各路义军将展开军事行动，牵制金兵，配合王师作战。在

部署完毕后，宗泽再度上疏皇帝，提出在六月（建炎二年）渡河北上、收复失地的计划，并强烈要求高宗皇帝回到开封，指挥北伐战争。

但宗泽的幻想又一次破灭了。

黄潜善、汪伯彦这两位佞臣非但不支持宗泽的北伐计划，还百般阻挠。宋高宗原本就畏惧与金人开战，又听得两位佞臣的胡言乱语，不消说对宗泽的北伐计划置之不理。国难当头，两位前任皇帝蒙尘沙漠，沦陷区数百万生灵涂炭，而朝廷居然没有进取之心，偏安一隅，苟且偷生，醉生梦死。

眼看着奸臣当道，自己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破灭，老将宗泽忧愤成疾。他以将近古稀之岁，每天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终于背疽发作，一病不起。宗泽病倒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将领纷纷前来探望，宗泽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对诸将说：“我因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若能歼敌，我死亦无恨矣。”

人格的力量是伟大的。

老将军在病榻上弥留之际，心里仍然只装着国家，而不顾及任何个人的事，拳拳爱国之心是何等崇高。诸将听罢莫不起敬，禁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齐声道：“敢不尽力！”

众人退出后，宗泽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近。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就这样离去，他不甘心，他还要领着子弟军渡过黄河，收复失地，迎回二帝。可是他注定要含恨而终了，因为死神已经没有给他留下更多的时间。他躺在病榻上，嘴里喃喃地念着杜甫描写诸葛亮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一天夜里，风雨交加。老将军宗泽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全程。在他垂危之际，没有一句话提到家事，有国才有家，“匈奴未灭，何

以家为”。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过河！过河！过河！”这也是他生平的最后一句话。他带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国家收复失地，他未能完成渡河北伐的使命。是的，他抱憾终生。但是，当我们在一千年后回顾这位南宋伟大的爱国将领时，我们发现，事业是一时的，精神是永恒的。他为爱国主义树立了一个标杆，他的精神跨越若干的朝代后，仍然激励着后人为国家民族之兴盛而奋斗。

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宗泽之死，意味着南宋帝国防御长城的崩塌。

在金人眼中，宗泽乃是第一号强敌。特别进攻开封失利后，愈加惮忌宗泽，他们还送给宗泽一个绰号——宗爷爷。宗泽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的能力，在南宋朝廷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去世所带来的损失无可估量。谁来顶替宗泽呢？宋高宗任命才能平平的杜充担任东京留守一职，以宗泽的儿子宗颖为判官。

杜充到任后，一反宗泽之所为，而且他为人阴险冷酷，致使士民大失所望。宗颖屡屡进谏，可是杜充我行我素，心灰意冷之下，他索性辞职返回故里。与此同时，原先被宗泽所招揽的豪杰志士，因不满杜充的所作所为，纷纷离去。

固若金汤的开封城，如今已是士气涣散矣。

更令志士寒心的是，朝廷已派出宇文虚中为祈请使前往金国议和。国难当头，朝廷不思恢复，反倒处处示弱于敌，徒令爱国者伤心失望。从太行山退守滑州的王彦再也不能沉默了，他独自前去谒见宋高宗及执政大臣黄潜善、汪伯彦，力陈两河忠义之士延颈以望王师，愿朝廷顺应民意，大举北伐。说到动情处，王彦言辞激愤，涕泪满

襟。可是他的努力徒劳无功，反倒令黄、汪二人反感，两人遂请高宗下旨罢免王彦。王彦心灰意冷，遂称疾致仕。

继李纲罢相后，宗泽去世、王彦离去，主战派遭到严重的打击。不仅收复两河失地的计划遥遥无期，凶猛枭鸷的金人又岂能错失鲸吞蚕食的良机呢？

在宗泽留守东京期间，金兵由于无法拔除开封这颗中原大地上的钉子，便打算转移战略方向，先攻取西夏，而后再集中力量攻掠南宋。但宗泽去世的消息传来后，金太宗便改了主意，决定先灭掉南宋，而后再摆平西夏。

南宋帝国，又一次面临着生死考验。

三三 高宗南渡：一路狂奔的皇帝

自宋高宗即位以来，一直奉行投降议和政策，可问题是金人无意媾和。一方虎视眈眈，一方却毫无作战准备。战争结果，可想而知。金太宗计划兵分两路出击，一路以大将娄室统领，进攻陕西，另一路以宗翰统领，大举南侵。

先来看看西线战事。

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娄室攻陷延安府，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州、府州、丰州共三州九寨之地降金。在进攻晋宁军时，金兵遭到宋将徐徽言的顽强抵抗，直到次年二月粮尽援绝，晋宁才被金兵攻破。紧接着、鄜州、坊州、巩州三地又落入金人手中。至此，秦陇一带，几乎完全被金兵所占领。

再看看东线战事。

宗翰挥师南下后，势如破竹，连续攻陷濮州、开德府（河南濮阳）、相州（河南安阳），目标直指东京开封。顶替宗泽出任东京留守的杜充慌乱之下，竟然决黄河水入清河，以阻滞金兵的攻势。开封城暂时保住了，只是不知有多少无辜之平民，死于这场人为的洪水中了。

在金兵面前，南宋军队似乎是一群不会打仗的士兵，屡战屡败。十二月，金兵攻克大宋重镇北京大名府（河北大名）与山东济南府，济南知府刘豫缴械投降。金兵南下速度之快，远远超出宋高宗的预料。

宗翰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绕过开封，沿着济南府从东线长驱南下。应该说，这个战略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开封府集结着南宋的重兵集团，若是在金人绕道南下时，截其粮道，断其归路，那么金兵将面临着全线溃败的危险。可是宗翰早觑准了，杜充决不是宗泽这样的英雄人物，他绝不敢轻举妄动。

金兵沿济南府南下，席卷东部，如入无人之境。

在宗翰在猛攻下，徐州失守。正好此时朝廷派遣韩世忠率一支军队救援前线，宗翰探知消息后，回兵迎战韩世忠，韩世忠不敌，退保盐城。击败韩世忠后，宗翰长驱直入，攻取彭城，并走小路直趋淮东，入泗州（安徽泗县东北）。

这下子宋高宗有点慌了，急忙派江淮制置使刘光世率兵守淮。岂料这时早已是人心惶惶，皇帝与执政大臣都没有抗战的勇气，士兵们谁想卖命呢？金兵还未到，刘光世手下的这些士兵便跑的跑、逃的逃，还没交战就溃不成军了。很快，金国铁骑杀至楚州，守将朱琳投降，紧接着，宗翰乘胜南进，攻破天长军（安徽天长），前锋距离宋高宗所在的扬州只有数十里！

这时的宋高宗，还在扬州临时宫殿里醉生梦死呢，当他听说金兵已杀至扬州，吓得魂不附体，都顾不上问明情况，便拉来马匹，驰往城外，随行人员只有王渊、张俊等几人。到了瓜洲后，找来一艘小舟，渡江到了对岸的镇江府。

此时扬州乱成一团，谁也没料到金兵来得这么快。

执政大臣黄潜善、汪伯彦本来还气定神闲地在庙里听高僧说法，听罢刚想用餐，岂料有人来报，金兵已杀到，圣上已南渡了。两人面如土色，来不及吃饭便策马南逃了。朝中官员、后宫妃嫔都相继出

逃，百姓们也争先逃命，混乱到了极点，踩踏而死者，不计其数。

到了镇江后，宋高宗惊魂未定，与诸臣商讨何去何从。吏部尚书吕颐浩认为皇上不能再逃了，就待在镇江，声援江北抗金。这显然不合皇帝胃口，这时近臣王渊说，金兵若打过来，镇江是守不住的，不如逃往杭州。

不消说，宋高宗采纳了王渊的建议，一路逃到杭州去了。

当初宗泽连上二十四道奏疏，请求宋高宗返回开封，宋高宗不干，就是担心开封城离敌人太近，朝不保夕。岂料远远躲到扬州后，仍然不安全，临时首都也被端了，君臣们一个个斯文扫地，落荒而逃。作为一个皇帝，却不能守土捍疆，总得对臣民们有个交代吧。不得已之下，宋高宗煞有其事地下了一道“罪己诏”，大赦天下，求直言，召回被放逐的罪臣，只有一人除外：李纲。

为什么李纲独不被赦免呢？

别看宋高宗表面上下诏罪己，实际上他内心还是打着投降的算盘。大家都知道，李纲是坚决的主战派，若是宋高宗起用李纲，与金国就无法和谈了。宋高宗又派人持着当年张邦昌与金人约和的文件，到金营去议和了。正好此时宗翰觉得孤军深入太久，心里也不踏实，遂把扬州抢掠一番后，放把火烧了，然后扬长而去。

金兵退去后，宋高宗稍觉心安。战争打得一塌糊涂，总得有人负责任吧。若要说战争责任，宋高宗当然是第一责任人，但皇帝高高在上，弹劾的目标只能是他的近臣。于是中丞张徽上书弹劾黄潜善、汪伯彦，列举二十条罪状。皇帝这时候也得找个替罪羊，遂将此二佞臣罢斥，稍慰士民之心。

逃到杭州后，宋高宗自以为又可以过上一段醉生梦死的生活了。岂知世事无常，外患刚去，萧墙祸起。

一起突如其来的政变，令宋高宗差点永久失去皇帝的宝座。

原来黄潜善、汪伯彦被罢斥后，旧权贵倒了意味着新权贵的崛起。朝中有两个人深得皇帝的宠幸，一个是王渊，一个是内侍康履。这两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当初宋高宗从扬州狂奔到镇江时，两人鞍前马后，一路随从，也算是“护驾有功”。王渊又建议宋高宗逃到杭州，故而皇帝对他青睐有加。不久后，王渊掌管枢密院，一下子蹿到显位，引起一帮人的强烈不满。

苗傅、刘正彦两人在军中有一定威望，对王渊、康履的蹿起十分恼火，便密谋干掉这两个家伙。苗、刘二人先是埋伏一支军队，在王渊退朝后，在半途将他杀死。而后率军杀到行宫，抓住康履后，立刻处死。苗傅、刘正彦敢公然造反，自然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控制行宫后，强迫宋高宗退位，传位给皇太子，由隆祐太后垂帘听政。

这个宋高宗原本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叛军的剑戟之下，焉敢讨价还价，遂宣布逊位。这时皇太子还只是个几岁大的孩子，不消说，大权就落在苗傅、刘正彦二人手中了。

宋高宗的退位诏书发往各地，平江留守张浚怀疑皇帝被叛臣胁迫，遂联合吕颐浩、韩世忠、张俊（张俊与张浚是两个人）、刘光世等人，共同起兵勤王。

勤王军很快杀向杭州，苗傅、刘正彦哪里抵挡得住，几回合下来，便落荒而逃。吕颐浩、韩世忠等将领率军进入杭州，杀死苗傅与刘正彦，平定了这场政变。这次政变前后只持续了一个月，宋高宗在被迫退位后，又一次坐回皇帝宝座。

平乱诸功臣都得到升迁。吕颐浩迁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光世为御营副使，韩世忠、张浚为御前左右军都统。

想想这位皇帝也够倒霉的。

在扬州被金兵追着屁股跑，在杭州又被手下的将领拉下皇帝宝座，可以说一路上没好日子过。如今金兵退去，乱臣伏诛，他总算得以平静一段时间了。当初他逃到杭州时，并没想把这里当作国都，因此他又选择了一个地方：江宁。

建炎三年（1129）五月，宋高宗来到了江宁，并把江宁改称为建康府。事到如今，皇帝还是念念不忘投降，只要金人大发慈悲，给他一块清静之地，他就知足了。为了让金人满意，他索性面子也不要了，尊严也不要了：我当金国的藩臣，这样总行吧。

宋高宗派使臣洪皓到金国议和，宣布愿意去正朔尊号，就是说不用皇帝称号了。俗话说，弱国无外交，你越软弱，只是越让敌人瞧不起而已。一向轻视宋人的宗翰又一次把宋使扣押了，在他看来，一只狼是绝不会与一只羔羊谈判的。在金人眼中，南宋广袤的土地，乃是上苍赐给金国的礼物罢了。

既然和谈不成，宋高宗也不得不做好应付敌人再度入侵的准备。这个时候，勤王有功的张浚乘机上书皇帝，提出自己的战略主张。张浚认为，中兴要计，当自关、陕为始。关、陕尽失，东南亦不可保。张浚自告奋勇地说：“臣愿为陛下前驱，肃清关、陕。”事到如今，宋高宗也只能同意了，遂任命张浚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张浚动身前往川、陕，走的时候他带走了一个人：八字军的领袖王彦。

朝廷既有像张浚这样勇于任事的人，也有浑水摸鱼的人。就在张浚从后方奔向前方时，东京留守杜充却借口粮草不足，擅自离开东京开封，返回建康。令人惊讶的是，宋高宗不仅未加责罚，还让他充当江淮宣抚使，领兵十万守建康。

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宋高宗尽管派张浚经营关、陕，又在建康陈兵十万，摆出一副守土捍疆的姿态，实则骨子里的投降主张从来没改。他甚至给金国统帅宗翰写了一封哀求乞怜的信，几乎连一丁点儿的尊严也没有，我们且来看看片断：“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故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哉！”

这封信的唯一作用，是让金人无所顾忌地对南宋发动史无前例的大进攻。

金国此番南征，以四太子兀术为统帅，动员了辖下蕃汉之师，南侵兵力之多，为历年来之最。南宋帝国的防御线，再次轻而易举地被全面突破。

建炎三年（1129）九月，金兵攻陷南京应天府。十月，兀术兵分两路，一路出击江西，一路出击浙江。自战争爆发后，宋高宗自然没有勇气待在建康，他一下子又逃到杭州去了，还把杭州改为临安府。岂料兀术获悉高宗去向，便分兵前来，想要生擒大宋皇帝。高宗在临安刚待了七天，发现大事不妙，赶紧撒腿便跑，窜至越州（绍兴）。

在宋高宗一路狂奔之际，金兵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宋高宗寄希望于建康留守杜充，他手握十万大军，应该可以抵挡一阵吧。孰料建康根本就没有像样的保卫战，在兀术的利诱下，杜充投降了。其实说来也不奇怪，有投降派的皇帝，就有投降派的臣子。建康失守，兀术的金兵长驱南下，高宗皇帝又慌了。

正如高宗皇帝自己说的：“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天地茫茫，他能往何处去呢？这是担任尚书左仆射的吕颐浩建议说：“万不

得已，莫如航海。敌善乘马，不惯乘舟，等他退去，再还两浙。敌出我入，敌入我出，这也是兵家奇计呢。”好一个兵家奇计！在解放战争期间，红军也有“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之战术，那是积极主动的防御与进攻。而对于一千年前的宋高宗而言，纯属逃跑主义。高宗一听，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便逃往明州（浙江宁波）。

金兀术攻陷临安（杭州），发现宋高宗已经逃往明州了，便命部将率四千精骑一路急追，马不停蹄杀向明州。宋高宗别的本事没有，逃跑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他在明州失陷前，乘船逃到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金兵没能逮住大宋皇帝，把怒气发泄到明州的平民百姓身上，以屠城的方式大开杀戒。

宋高宗不是要玩“敌出我入，敌入我出”吗，金国统帅兀术就陪着他玩。金兵虽不善乘舟，但为了进攻浙江，也组织了一支舟师，兀术派舟师入海追击宋高宗。可怜的宋高宗还未来得及喘上一口气，又开始新的逃亡之路，从定海逃到了温州。金兵在海上追了三百里，算宋高宗命大，没有落入敌人之手。

自从金兵大举南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蹂躏江、浙、皖、赣，战果可谓辉煌矣。说实话，南宋军队的表现十分糟糕。宋军在局部战场上有过小胜利，比如岳飞在广德与金兵交锋六战六胜，但在大会战中，金兵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在狂飙突进东南后，兀术遇到一个难解的问题，南宋帝国面积太广袤了！不管金兵攻下多少城池，大宋皇帝都还有后路可以撤退。

要知道女真是骁勇善战之民族，但人口数量毕竟很少，在吞并辽国后，又吞掉半个宋国。可以说，金人已经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奇迹，但是还吞不下整个南宋帝国。兀术没能活捉宋高宗，没能灭掉南宋，经历千里奔袭后，金兵的进攻力几近极限，已是强弩之末矣。在这种情况下，兀术决定引兵北还。

三四 以汉制汉：刘豫与伪大齐政权

金兵在撤退途中，纵火焚烧明州、杭州、平州等地，掳掠女子财帛，满载而归。所过之处，无不断壁残垣，留下无辜百姓的累累尸体。仅和平江府一地，被屠杀的百姓便有数十万之多。金兀术从平江府撤军后，打算在镇江一带渡过长江北去。然而在这里，金兵却遭到南侵以来最大的一次阻击战。

在南宋军队兵败如山倒的背景下，是谁以莫大的勇气阻击金兵呢？

此人正是南宋著名将领韩世忠。

韩世忠在得悉金兵北撤的消息后，决定从长江口移师镇江，利用长江天险，阻击金兵。当时南宋军队在陆战上，几乎不是金国精锐铁骑的对手，但是在水战上还是占有优势的。韩世忠纠集了海船一百多艘，八千名水师官兵，埋伏于镇江焦山寺一带的水面上，以阻止金兵过江。

金兀术起初并不把韩世忠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宋军都是不堪一击的，况且金兵拥众十万，在兵力上远远占优。双方在长江水面上展开激烈交战，金人不习水战，始终无法突破宋军的水上防线。为了鼓舞士气，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亲自擂战鼓助阵，连女人都披甲上阵了，大宋男儿们岂能不拼死杀敌呢？在韩世忠顽强的阻击下，金兵无法渡过长江。

此时金兀术孤军深入的弱点暴露无遗，若是退路被截断，后果不堪设想。时值农历三月，若不及时北撤，长江的雨季就要到来，到时金兵的行动将更加困难。金兀术试图与韩世忠做个交易，他答应把所掳掠的财物全部送还，以换取韩世忠放行。但是这一要求遭到韩世忠的断然拒绝。

怎么办呢？兀术心想，长江这么大，这里不能渡江，我就溯流西上，惹不起你韩世忠，我总躲得起吧。但他没想到韩世忠竟是块硬骨头，偏偏不肯相让，金兵的船只溯江西上，韩世忠的水师也沿着长江北岸且战且行，紧咬不放。

韩世忠的兵力虽然不占优势，但是船只上却大占便宜。南宋的造船业发达，宋军的战船性能要远远优于金军。双方一路相持至距离建康东北约七十里地的黄天荡。金兀术并非水战专家，对水文条件了解不够，这黄天荡固然适于船只停泊，然而出港处却较狭窄，被南宋水师一封锁，便成了瓮中之鳖了。

宋、金两师在黄天荡相持了四十八天。

在水战中，宋军的大船牢牢控制主动权。韩世忠发明了一个战法，令战士们手持大铁钩，待敌船迫近时，在接舷战中，使用大铁钩钩住敌舰，将其曳沉。金兀术没了脾气，又一次派人前去与韩世忠商议放行条件。韩世忠义正词严地说道：“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放行。”

为了解兀术之困，金国大将挾懒从潍州派遣一支军队驰援，援军在江北，兀术军在江南，对韩世忠的水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更要命的是，这时有一个颇懂水战的汉奸向金兀术献策：应该在船上装土（增加稳定性），在船板上凿穴安置棹桨（增加机动性），在无风时进击宋舟师（宋船大，依赖风力），用火箭攻击。兀术听罢大喜，遂依计而行，果然大败韩世忠的水师。韩世忠被迫撤回镇江，阻击金兵

北撤的计划最终失败。

在金兀术北撤的同时，大宋旧都东京开封也被金兵攻陷。

在宗泽留守东京时，把开封建设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人在政举，人亡政息，宗泽去世后，杜充留守东京，一反积极备战的政策，致使士民离心，原被宗泽招揽麾下的义军首领纷纷离去。更有甚者，杜充甚至擅自离开开封，前往建康府。当时岳飞曾极力谏言：“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可是杜充根本不听。

杜充离去后，宋高宗先后派几个人担任东京留守，但这些人也都是庸才，开封的防务已跟宗泽时不可同日而言了。在兀术大举南下时，派一支金兵围攻开封。此时的开封城缺粮日久，更难以坚守。建炎四年（1130）二月，东京开封终于被金兵攻破。至此，大宋四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全部沦陷。

金兵此番南下作战，战绩赫赫，再次显示出其强大的军力。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金兵的不足之处也体现出来了。其一，金兵攻城略地无数，但由于兵力有限，对于南方诸多城池无法据为己有，一旦北撤又被南宋政府所接管；其二，水战是金兵的一个短板，这一点在黄天荡之战体现得十分明显。尽管黄天荡之战并没能阻止金兵北撤，但在未来的时间里，金军很少再越过长江南下，这正是忌惮宋军的水上力量。

我们不要忘了，从大金建国（1115）到兀术南侵（1129-1130），也不过才十五年的时间，金国的土地一下子扩张几十倍。得天下，未必能治天下。金国的扩张遇到最大的瓶颈，就是难以统治如此庞大的土地与民众，吃得太撑了，一时还消化不了。怎么办呢？在兀术北归后不久，金国出笼了一个政策：以汉制汉。

以汉制汉，便是扶植一个傀儡政权。

那么由谁来担任傀儡政权的皇帝呢？

先前金国曾经立过一个傀儡皇帝张邦昌，但并不成功，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他们是逼迫张邦昌当皇帝。胆小怕事的张邦昌才当了一个多月的皇帝就当不下去了，把“皇位”拱手让给了康王赵构。鉴于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金人在傀儡皇帝人选上比较慎重，这个人得有一点才能，要忠心可靠，同时还要有权力欲。

有一个人符合条件，他就是原大宋济南知府刘豫。刘豫是在金兵攻打济南府时投降的，后来被金太宗任命为东平府知府，这个人野心不小。为了当伪皇帝，他向金国大将完颜挾懒大肆行贿。在挾懒的推荐下，建炎四年（1130年，金天会八年）九月，金太宗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世代对金称子礼，也就是当金国的儿皇帝，奉金朝正朔。

这个中原傀儡政权定都于北京大名府，后又迁都至大宋旧都开封，改名为汴京。金国把自山东到陕西的占领地交付给刘豫统治。刘豫为人残暴，他统治下的伪齐政权赋敛苛重，刑法严峻，大肆搜刮民财，致使民不聊生。

除了扶植刘豫的伪大齐政权外，金国还实施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就是把大宋变节分子秦桧释放回国，打入南宋朝廷内部。

这年头变节分子多矣，为什么金国偏偏相中秦桧呢？

因为秦桧曾经是“大宋忠臣”！

这还要从靖康之变说起。当年金国攻破开封，俘徽、钦二帝，欲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时为御史中丞的秦桧写下一封洋洋洒洒的反对

信，言辞激昂慷慨：

“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辩！……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

好一个“不顾斧钺之诛”，此信一出，忠臣形象跃然纸上矣。金人阅信后勃然大怒，索性把秦桧也抓入金营，连同徽、钦二帝以及一帮皇亲宋臣，统统押往北方去了。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秦桧消失在宋人的视野中，但他的“忠臣”形象却还深深留在人们的心中。

可是谁能料想到，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秦桧也悄然从“大宋忠臣”沦变成为“金国鹰犬”了。当秦桧意识到自己可能以战俘的身份终老于荒凉的北地时，他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他开始讨好金国权贵。在金国的那段时间里，秦桧出笼他的政治理论——“南自南，北自北”，就是说，南宋完全放弃中原之地，北方归于金国，南方归于南宋。显然，与宗泽、李纲、岳飞等力主收复中原的忠臣相比，秦桧这个所谓的“忠臣”就是个冒牌货。金太宗看出此人有利用价值，遂把秦桧赐给了大将完颜挾懒。

完颜挾懒与宗翰、兀术这些鹰派将领有所不同，在对待南宋问题上，他并非一味主张武力解决，而是主张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特别是兀术大举南侵后，金国的军事入侵政策暴露出许多问题，战线太长，兵力太分散，无法长期占有攻下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挾懒更是倾向“以汉制汉”的方针，推荐刘豫当伪大齐皇帝，而后再再施妙计，纵秦桧南归，这一步棋，可谓是深谋远虑，意味深长。

建炎四年九月，南宋残留于淮河流域的军事重镇楚州（江苏淮安）被金国大将挾懒攻陷。战役刚结束，身为挾懒手下军事参谋兼随

军转运使的秦桧突然失踪了。

几天后，一艘船停泊在距离楚州六十余里地的南宋控制区，船上的人员包括秦桧与妻子王氏，还有他的两个老部下以及一仆一婢。曾经的“大宋忠臣”，被掳到北地的秦桧回来了！当地官府把秦桧一行人送到越州（绍兴）的天子行在，交给朝廷处置。

一个被掳到北方的俘虏，居然在三年多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这怎么可能呢？秦桧必须给宋高宗以及诸大臣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秦桧早把答案背熟了：我为金人所掳后，此番被迫随金兵南下，我是乘机杀掉了金国的看守人员，冒险夺了一条船才得到回来了，可謂是九死一生啊。

正如三年前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忠臣”一样，如今他又编故事把自己塑造成从敌后生死归来的“英雄”。

可惜的是，他瞎编的故事，完全禁不起推敲：其一，若秦桧是被金人胁迫随军南下，何以他的妻子还能随行呢？其二，何以被掳掠的宋臣中，只有秦桧一人能脱身呢？其三，秦桧一介书生出身，何以竟能杀掉看守，从容逃脱呢？其四，若秦桧是乘乱逃脱，何以还能携带不少金银财物呢？

总之一句话，对于秦桧“南归”的神奇故事，朝臣们没有几个相信的。

当然，怀疑归怀疑，可是若要指证秦桧是金国的奸细，那证据也不足。毕竟这三年多以来，他音信全无，再加上兵荒马乱的，谁还有空去理会他在金国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但是不要忘了，秦桧有一块护身符，就是当年他不顾个人安危反对张邦昌称帝以保全赵宋的忠义招牌，这块招牌为他挡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声。时任参知政事的范宗尹与知枢密院事的李回与秦桧关

系不错，更是极力为他辩解，声称秦桧忠诚可任。

当然，皇帝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

在此之前，宋高宗对秦桧这个人不了解，也没深交过。但是秦桧对宋高宗却是太了解了，了解他对金人的畏惧，了解他苟且偷安的心理。现在机会来了，皇帝召秦桧入对，问及对时局看法。秦桧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说出一句话：“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紧接着，他呈上所写的向完颜挾懒的求和书。

秦桧太知道皇帝需要什么了，所以他一语中的，震撼皇帝内心。宋高宗对秦桧有相见恨晚之心，竟然激动地对辅臣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

在此之前，宋高宗多次遣使与金和谈，但使臣总被扣押，金人根本就不想谈判。对宋高宗来说，管他秦桧是不是金国奸细，他在金国待了这么多年，熟悉其内情，若能通过他与金国和谈成功，那么自己这个皇帝才能享享清福啊。

很快，秦桧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南宋朝廷的权力中枢。

当这个消息传到金国时，完颜挾懒会心一笑，因为他知道，他布下的这一颗棋子，总有一天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三五 血战关陕：吴玠的表演舞台

金国在中原扶植伪大齐政权，以汉制汉，让傀儡皇帝刘豫去对付江淮一带的宋军，而金兵则把主攻方向瞄准关陕（即陕西，古为关中之地）。在此后几年，关陕成为宋、金交锋的主战场。

关陕向来是易守难攻之地，秦汉皆据此而成就帝业，故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建炎三年（1129），张浚认为欲中兴宋室，必从关陕（即陕西，古名关中）开始，并自告奋勇前往陕西主持战局。张浚的这一构想，正是欲效法秦汉据关陕而夺天下的战略。十月，张浚抵达兴元。十二月，任命曲端为宣抚处置司都统制，刘子羽为参议军事，吴玠、吴玠兄弟为统制，积极备战。

谁知张浚尚未出击，便遭当头一棒。

金国大将完颜娄室以重兵攻打陕州（河南三门峡），知州李彦仙拼死抵挡。张浚命令曲端前往救援陕州，哪想曲端向来嫉妒李彦仙，无意出手相救。娄室以十万之众轮番攻城，于建炎四年初终攻破陕州，李彦仙死难。在之后几个月里，宋金在关中激战，互有胜利，然而曲端多次对友军见死不救，遂被张浚罢免兵权。

当时兀术的军队在横扫江南后，已撤至淮北。已成为惊弓之鸟的宋高宗十分担心金兵再次南下攻略，遂指示张浚分道出兵，由同州、鄜州、延安府主动出击，以牵制金兵南下。驻守关中的完颜娄室顿时面临南宋军队的巨大压力，便紧急向兀术求援。兀术遂引兵赴陕，与娄室会合。与此同时，金太宗又遣完颜宗辅入援陕西，打算深入陕川，彻底打败张浚。

一场大战已是在所难免。

在金兵纷纷入陕之时，张浚业已集结一支庞大的兵力，包括熙河、秦凤、泾原、环庆及永兴军五路人马，共计四十万人，马七万匹，欲与金兵决一死战。然而，这个部署遭到八字军首领王彦的反对。他认为陕西兵将向来不相联络，五路大军齐出，根本没办法协同作战，不如令各路大军驻屯要害之地，遇到敌人攻击时可以互相支援。

张浚未尝不知王彦所言有理，但他有自己的战略考虑。如今东南残破，已经难以再经受金兵的再次打击，若能在关陕一战击败强敌，那么就可能成为抗金战争的转折点。可以说，张浚是要赌上一把。

可惜的是，张浚并没能赌赢。

建炎四年（1130）九月，南宋军队与兀术、娄室的金兵在富平丘陵地带展开决战。宋军人数虽多，在部署上却很不慎重，安营扎寨于平原地带。统制吴玠向前敌总指挥、熙河路经略刘锡建议说，军队应该先占据高地有利地形，凭险为营，否则这一带平原地区，容易遭到金国骑兵的进攻。

然而吴玠的意见却没能得到重视，诸将以为，此带虽地形平坦，然多沼泽，纵是金兵铁骑前来，也难以驰骋。前敌总指挥刘锡面对诸将议论纷纷，一时间也没了主见。事实证明，吴玠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沼泽根本挡不住金兵铁骑。

金国骑兵纵横南北，对付区区沼泽不在话下。完颜娄室早有准备，令部下备好了许多木柴与装填沙土的囊袋，移土担柴，填泽铺路，很快在沼泽地开出足以令马匹行进的道路。胡马本个头高大，金兵揽辔而过，直逼宋兵营。娄室攻宋军左翼，兀术攻宋军右翼。起初，南宋军队凭借着人多势众，与金兵杀了个平手。但是很快，宋军其中一路溃败，最终导致了战斗的全线失利。

富平之战的失败，宣告张浚全面夺取关陕、进击中原的计划破产。宋军被迫撤退，关、陇六路几乎都落入金人之手，只有阶、成、岷、凤、洮五郡以及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仍控制在南宋手中。金国名将完颜娄室在这时病死于关中，给张浚带来了喘息之机。

只要再攻下和尚原，金兵就打开从陕西通往四川的大门。

和尚原位于秦岭北麓，今陕西宝鸡南。

升任秦凤经略使的吴玠，在和尚原保卫战中大放光芒，使他成为南宋抗金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吴玠到任后，马上着手和尚原的防御，积粟缮兵，列栅固垒。吴玠有名将之风范，他善于治军，爱抚百姓，在深重的战争灾难面前，凤翔百姓希望这位出色的将军能阻止住金兵无休止的进攻。为了支援前线部队，民众自发组织起来，送刍粟以助军。为了阻止民众给吴玠运送军事物资，金兵多次派兵截击，并施行连坐法，但仍有大批民众冒险输援。

为了拿下和尚原，绍兴元年（1131）五月，金人兵分两路来攻。面对汹汹来犯之敌，有人提议避敌锋芒，退屯汉中。吴玠慨然道：“我在此，寇不敢越。保和尚原即是保蜀。”遂与其弟吴玠率军还击，四战四胜，力挫强敌。

第一次攻打和尚原失利，令金兵主帅兀术蒙羞，他当即亲自率领十万人马，杀赴宝鸡，造浮桥渡过渭水，进薄和尚原。自宋金开战后，南宋多数士兵都患有畏金症，特别是这位金兀术何等厉害，以十万之师蹂躏大宋东南半壁，把皇帝追得满世界跑，而后又在富平之役中大破张浚四十万看家部队，可谓是神话级的人物。四十万大军都抵挡不住兀术，吴玠抵挡得住吗？

大战前夕，士气不可丢，吴玠召集众将士，以忠义相勉，并与诸

将士歃血为誓。他对弟弟吴玠说：“今日是我兄弟报国之日，若兵败，宁我兄弟相死，不令将士先亡。”吴玠本就深得部众爱戴，听闻此言后，众将士更是感泣，纷纷表示愿尽死力以报国。

兀术自认为以十万大军泰山压顶式的进攻，取和尚原易如反掌，岂料在这里他却遭遇生平第一次重大失败。吴玠善于用兵，面对强敌，他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地形优势，阻击敌军。针对敌军骑兵厉害的特点，吴玠挑选精卒，以强弓劲弩轮番射击，以密集箭雨阻滞金兵进攻。兀术前进不得，只得稍稍退却。

以弱击强，以寡击众，要力挽狂澜，必须出奇制胜。

金兵人数既多，便得依赖后勤补给。吴玠悄悄派出一支军队，截击金兵粮道，并派弟弟吴玠带三千弓弩手，设伏于险要之地。在宋军的偷袭下，金兵的后勤运输线频遭打击，很快兀术便发现粮草不足，难以发动进攻。吴玠推断金兵很快要撤军，他当然不肯放过大破敌军的良机，遂纵兵于深夜出击，连破十余座金营。兀术仓皇而逃，半途又遭到伏击，身上还挨了两箭，为了逃命，他把须髯都剃光了，以免成为宋弓弩手的狙杀目标。堂堂金国统帅尚且如此狼狈，其他金兵自不必说，被宋军俘获者以万计。

和尚原之役，非但是宋金战争以来南宋军队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仗，而且对战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此之前，金兵在各个方向的战斗几乎都是全面获胜，而这一次，则是遭到真正的惨败。此役的胜利确保了四川大后方的安全，同时也暂时遏制住金人在西面的进攻。

凭此一役，吴玠名扬天下。

吴玠的胜利，除了归功于他指挥有方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得到关陕百姓的支持。金人虽然占领关陕大部，却无法压制民心。

考虑到这里难以治理，金人于绍兴元年十一月，把陕西地交给了刘豫的伪齐政权。这不意味着金人撤出此地区，相反，他们是要把精力专注于军事进攻上。

绍兴二年（1132），金陕西经略使撒离喝引兵入侵陇州方山原（陕西宝鸡西）。当时方山原的南宋守军只有数千人，陕西都统制吴玠急令部将杨政、吴玠等人入援，与金兵大战三日，焚毁金兵营寨，撒离喝被迫撤军。

该年年末，张浚被调回朝廷，结束了他三年的关陕生涯。当初张浚入关陕时，雄心壮志，欲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他非但没有收复关陕，反倒丢失了大部分的土地，可谓是壮志难酬。不过张浚的功劳不可抹杀，他知人善任，其麾下有三杰：军事参谋刘子羽有才谋，负责后勤转运的赵开是理财专家，大将吴玠则是常胜将军。尽管张浚未能实现中兴理想，但他在关陕牵制大量金兵，保全川蜀，功不可没。

张浚调任后，保卫关陕最后防线的任务，就落到吴玠、刘子羽的身上。

张浚在临行前，曾嘱咐吴玠、刘子羽、王彦，倘若金兵入侵，三人应互为声援。绍兴三年（1133）正月，金兵再次大举进犯，目标直指王彦驻守的金州。在金兵的强攻下，王彦不敌，只得放弃金州，把不能带走的军事储积焚之一空。当刘子羽得悉金州失守的消息后，急命部将田晟守饶风关，同时派人快马召吴玠入援。

当时吴玠手上只有数千名正规军以及一万三千名义勇军（民兵），军情紧急，他毅然驰援，急行军一昼夜抵达饶风关。吴玠派人给金国大将撒离喝送去几粒黄柑，并写了张纸条：“大军远来，聊奉止渴。”撒离喝阅信后大惊，以杖击地道：“吴玠来得好快啊！”无疑，在金国人眼中，吴玠是最难缠的一位对手。

在撒离喝的督战下，金兵全力仰攻饶风关。

吴玠可不是吃素的，他一面以强弓劲弩还击，一面从山上以大石推压。金兵果然悍勇，前仆后继，强攻六昼夜，最终尸积如山，仍然拿不下饶风关。强攻不成，撒离喝另想一谋，派出敢死队从小道绕到吴玠军后，居高临下攻饶风关。吴玠的兵力本来就不多，况且在远道急行军后又苦战多日，终于不敌，被迫退守西县（陕西勉县西）。

饶风关失守后，刘子羽已无险可守，也只好焚烧了兴元府的积贮，退守三泉。金兵遂入兴元府，屯兵金牛镇，通往四川的门户已打开。

在此危急时刻，刘子羽与吴玠没有自乱阵脚。

两人商量后决定分别扼守险要关隘，以坚壁清野的战术拖垮金兵。吴玠移师仙人关，刘子羽则退守谭毒山，同时把汉中一带的粮畜内迁。撒离喝率军深入，想一鼓作气攻入四川。然而在巴山秦岭之间，运输不畅，金兵粮饷不济，以致不得不杀马为食。在此期间，刘子羽与吴玠不断派出游兵骚扰，令撒离喝寝食难安。更要命的是，由于不习山林环境，疫病流行，金人大量染疾，死亡甚众。在这种情况下，撒离喝不得不撤军。刘子羽、吴玠乘机出击，斩获无数。

撒离喝的这次进攻，先胜后败，伤亡过半。金兵撤走后，刘子羽又乘机收复兴元与汉中之地。不久后，王彦也收复金州。宋、金双方又回到战前的相持局面。

在刘子羽与吴玠的努力下，四川又一次转危为安。

由于吴玠移师仙人关，和尚原的兵力不足，加上粮草不足，形势恶化。绍兴三年十二月，金国元帅兀术又一次率重兵杀到和尚原，欲报两箭之仇。镇守和尚原的吴玠奉哥哥吴玠之命，放弃和尚原，向仙

人关方向撤退。

仙人关已成为宋、金两军的必争之地！

绍兴四年（1134）三月，金国元帅兀术挟破和尚原之余威，与撒离喝及伪齐军队共计十余万人，气势汹汹地杀向仙人关。一时间，仙人关的天空阴云密布，一场血战又要拉开序幕了。

吴玠早就料到这一战不可避免，事先在仙人关右侧筑一坚固堡垒，命名为“杀金平”。从“杀金”这两个字，可知吴玠欲让此地成为金人的葬身之地。金兵凿山开道，兀术发誓定要攻破仙人关。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吴玠居于绝对劣势，他只有一万人的军队守卫杀金平。此时吴玠从和尚原撤下的军队尚未抵达，能否守住仙人关，就看吴玠能否及时与吴玠会师。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吴氏兄弟又要联手缔造一段传奇。

吴玠率军从武阶路入援，战七昼夜，突破金兵封锁，终于与吴玠会师于仙人关。吴玠设下两道防线，他自己守卫第一道防线，吴玠守卫第二道防线。

金兵使用各种方法进攻仙人关，先是以云梯攻击垒壁，吴玠部将杨政以撞竿击碎敌人的云梯。兀术再使出铙钩、火箭等战法，但在众志成城宋军面前，始终无法破关。吴玠之所以成为南宋军队中的常胜将军，在于他从来不消极防御，而是寓进攻于防御之中。

数日后，吴玠料敌锐气已失，遂主动出击，与吴玠各率一队人马，捣入敌营，金兵阵脚大乱。金兀术自忖难以攻克仙人关，且损兵折将，遂引兵而去。殊料吴玠早派部将王俊埋伏于河池，袭敌于归途，又斩获颇丰。兀术、撒离喝这些金国沙场宿将，个个垂头丧气，退回凤翔去了。

至此，宋金在关陕的争夺告一段落，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吴玠兄弟在关陕战场光芒四射，他们在南宋王朝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打破了金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南宋军民的士气与抗敌决心。史书是这样评价吴玠的：“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

三六 中兴之战：岳家军的崛起

在前方将士苦战时，秦桧却在朝廷上大肆宣扬他的“南自南，北自北”投降理论，并且得到了宋高宗的支持。在秦桧南归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一下子坐上宰相之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所幸的是，秦桧这个奸臣当宰相才一年，就被踢出局了，原因在于他犯了一个政治性的错误。秦桧知道宋高宗一心想与金国媾和，可是每每派人去谈判，金人总是不理不睬，为此他抛出了所谓“耸动天下”的二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籍在北方的南渡之人就返回到北方去，而居住在北方的南方人也返回南方，自此以后，北方就由金国及其傀儡刘豫伪政权统治，南方就由南宋帝国统治，一劳永逸地解决南宋在中原问题上与金国的纠葛。秦桧的歪论是，南宋帝国都是南方人，大家就不会去想什么北伐、光复故土了。

可以说，秦桧这是十足的投降卖国论调。要知道南宋帝国抗金志士，相当一部分都是北方人，现在要把他们统统遣回北方，那岂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不消说，这个论调遭到朝野的一致痛骂，更重要的是，宋高宗大为不悦。

为什么皇帝对曾经大为欣赏的秦桧大为不悦呢？

宋高宗私底下曾对大臣表露不满：“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就是北人，要归往何处？”皇帝就是北方人，难道你秦桧还要

把我送给金人吗？秦桧说的“北人归北”，当然不包括皇帝在内了，但却严重伤害皇帝的感情。

在秦桧拜相时，他曾经吹牛说：“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可是除了这耸人听闻的二策之外，再没看过他干过什么耸动天下的事。对此，宋高宗当然有理由对他不信任。

从时间点看，秦桧抛出这二策也是不合时宜。在秦桧为相的这段时间里，吴玠在和尚原之战中大败金兀术，赢得了对金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对抗金志士是莫大鼓舞，收复中原的呼声又渐高涨，而他却抛出投降言论，自然被人抓住把柄。

对于秦桧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却忽然蹿居高位的人，朝中大臣不满者比比皆是。曾经勤王建功的吕颐浩乘机反击，指使侍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谈和，阻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

种种原因，终于令秦桧倒台，他的第一次宰相生涯就此结束。

秦桧倒台，对于主战派人士是一次鼓舞。

与此同时，南宋的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

宋朝军事力量的薄弱，与军事制度有很大关系。自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推行强干弱枝政策后，崇文抑武，以避免重蹈五代时军人不断政变的乱局。这种政策导致朝廷对武将严加防范，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哪来的战斗力呢？自宋高宗即位后，小朝廷几度被金人打得找不到北，自身尚且难保，遑论统治国家呢？于是乎群盗并起，民变丛生，在南宋地盘上，大大小小的起义军、流寇不计其数。南宋帝国实际上已经陷入深深的内乱之中了。

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不得不倚重军事将领，允许他们在一定范

国内发展自己的武装，给予某种特权。毕竟皇帝还得靠这些人平定内乱，不然他如何统治臣民？对武将限制的放宽，令军事将领得以有较大的自主权选将练兵，这也大大提升了南宋的军事力量。

在此背景下，南宋开始了中兴第一战。

中兴第一战，主要是剿平内乱。

此期的流寇、变民武装集团多如牛毛，不下两百个，来源也五花八门，大体上说，主要有农民起义军与叛乱的军人。在这些武装集团中，最重要有李成、孔彦舟、范汝为、曹成、杨太等。

在与这些武装集团的战争中，南宋一批将领脱颖而出，成为手握重兵的实权人物。后来被誉为“中兴四大名将”的岳飞、韩世忠、张俊以及刘光世，都是在剿抚叛乱武装集团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其中又以岳飞的战功最为显赫。

岳飞是南宋历史上最伟大的抗金英雄之一，他是相州汤阴人氏。宋金战争爆发后，岳飞追随宗泽抗金，在战场上屡建战功。宗泽曾经高度评价他的军事才能：“尔之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靖康之变后，高宗继承大统，然而一味求和，苟且偷安。岳飞年轻气盛，上书数千言，抨击黄潜善、汪伯彦等不图恢复，力劝皇帝北渡亲征。当时岳飞位卑言轻，朝廷竟以越职罪将他罢官。岳飞遂前往投奔河北宣抚使张所，张所对他十分器重，推为国土。

建炎元年九月，岳飞作为王彦麾下裨将渡河抗金，一举收复新乡。王彦溃败后，岳飞转战于太行山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他不仅精通兵法韬略，武艺亦十分高明，曾在战斗中以丈八铁枪刺死金将。后来岳飞返回开封，再度归属宗泽麾下。

宗泽去世后，杜充任东京留守。建炎三年七月，杜充弃开封而返

建康，岳飞力劝不可，认为“尺地寸土，所不可弃”。杜充不听劝谏，岳飞只得率部随行。是年金兵大举南下，杜充竟然投降金兵。在朝廷军队一片溃败声中，岳飞坚持抗战，在广德与金兵六度交锋，六战六胜。

岳飞治军严谨，当时南宋军队腐败严重，甚至形同土匪，而他则致力于打造一支新军，将自己的子弟兵训练为一支人民军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即便没有粮食可吃，岳飞仍要求将士忍饥挨饿，不犯民家。当时建康一带的宋军溃败后，散兵多剽掠民间，独岳飞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金兵离开建康后，岳飞尾随其后，败敌于静安并率先收复建康。

兀术北去后，金在中原扶植刘豫伪政权，加之张浚在西北牵制金兵，东南军事压力骤减，朝廷把重点放在清剿变民流寇集团上。

绍兴元年（1131）三月，宋以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岳飞为副使，负责平定江淮一带李成、张用等乱军。岳飞自请为先锋，大破李成军，俘敌八千人。在张俊、岳飞的穷追猛打下，曾经占据十余郡、拥众数万人的李成被击败，李成北逃降于刘豫。对于流寇集团，岳飞除了军事打击外，同时发动政治攻势。另一乱军首领张用与岳飞同为汤阴人，岳飞亲自写信招抚，张用感其恩义，遂率部投诚。至此，江淮乱军得以平定，张俊向朝廷表功，奏称岳飞功第一。

绍兴二年（1132），朝廷任命岳飞为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进剿拥众十余万的曹成。曹成以十万人守蓬头岭，岳飞率所部八千余人，大破曹军，曹成逃往连州。岳飞嘱咐部将，仅诛其首，而抚其众，慎勿妄杀。部将张宪进击曹成，沿途招降两万余人，曹成遁入邵州。后来，曹成在另一位中兴名将韩世忠的围逼下，率余众八万人投降。

绍兴三年（1133），虔州、吉州兵乱。当时隆祐太后曾经在虔州

一带受到惊吓，高宗命岳飞前往平定，并密令屠城。

岳飞抵达虔州后，乱军首领彭友率众迎战，岳飞艺高人胆大，在战斗中生擒彭友，余众皆降。在平定虔、吉之乱后，岳飞并没有按皇帝的指示大开杀戒，而是上书皇帝，请求只诛首恶，赦免余众。高宗皇帝最后答应了岳飞，虔州百姓由是躲过一劫。虔州民众把岳飞视为救命恩人，感怀他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精神，特绘岳飞画像，设祭祀之。

鉴于岳飞的赫赫战功，绍兴四年（1134），宋高宗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在成为节度使的中兴诸将中，岳飞乃是最年轻的一人，当时他年仅三十二岁。

经过几年的大规模清剿，内乱基本平定，只剩下占据着洞庭湖的杨么，屡剿不平。绍兴五年（1135），宋高宗令岳飞进剿杨么。当时有人认为岳飞的部队多是北人，不习水战，但岳飞从容答道：“兵法无常，顾用之如何耳。”当时岳家军以号令严明而著称，杨么的部下听说岳飞前来，个个面有惧色，有些甚至干脆投降了。岳飞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便彻底击败杨么，收降二十余万人，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

在南宋积极剿平内乱的同时，北方的刘豫伪政权乘机招降纳叛，扩充自己的实力。李成、孔彦舟、关师古等人先后投奔刘豫伪政权。

由于南宋政府一直企图与金国媾和，而刘豫是金国所立的傀儡皇帝，因而宋高宗下令约束沿边守将，不得攻犯刘豫。这种表态无疑被视为软弱的表现。你不动手，人家偏偏要动手。刘豫命降将李成大举进犯，攻下邓州、襄阳等地六郡。

现在人家都爬到头上拉屎了，总不能当没看到吧。

别看宋高宗这个人非常害怕金人，对刘豫他还是不放在眼里，要知道刘豫本身就是宋朝的一个知府罢了，怎么敢这么狂妄！绍兴四年，包括岳飞在内的文臣武将纷纷上书宋高宗，提出收复六郡的主张。岳飞说：“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皇帝决定教训一下伪齐，遂以岳飞为荆南制置使。

岳飞渡江攻李成，并誓言道：“飞不擒贼，不涉此江。”随后一路进击，连下郢州、襄阳、唐州、随州，李成落荒而逃。

刘豫不肯善罢甘休，这位卖国贼居然向金国借兵五万以攻南宋。金太宗命宗辅、挾懒、兀术率五万金兵，协同伪齐军队南侵。这也是自兀术北撤后，金国又一次大举用兵于南方。金兵分道两路，一路骑兵由泗州进攻滁州，一路由楚州进攻承州。

然而令金国没有想到的是，这几年南宋军队居然有了质的飞跃，不复是当年只有挨打的份了。时为淮东宣抚使的韩世忠，亲率骑兵驻扎大仪（江苏扬州西北），布成五阵，设伏二十余处。金骑兵过五阵东处，韩世忠的伏兵四起，上砍人胸，下斩马足，金兵大败，被俘二百余人。紧接着，韩世忠部将董旼在天长鸦口桥力败金兵；解元在承州北门激战金兵，俘获甚众。韩世忠率亲兵追击敌人至淮水，金兵夺路而逃，溺死者甚众。

时人把韩世忠的这次胜利誉为中兴武功第一。

此时的宋高宗居然破天荒地打算亲征，他抵达平江（苏州），欲亲自渡江决战，只是后来被劝阻，才没有过江。皇帝的勇气从何而来呢？正是来自南宋军队的一系列胜利，包括吴玠在仙人关的胜利以及韩世忠在大仪的胜利。自高宗登基以来，至今始有中兴之气象。皇帝虽未渡江亲征，但下诏声讨伪齐，以激励将士，也算表现不错了。

然而金兵的战斗力也不容低估。在另一条战线上，金兵攻破滁州，南宋军队退守江南。刘光世守建康，韩世忠守镇守，张俊守常

州，知枢密院事张浚亲临江上巡视诸师，总揽全局。不久后，岳飞也加入这场防御战。中兴名将，悉数亮相。

金增兵侵扰淮右，兵围庐州，庐州守将紧急求援于岳飞。岳飞当即命牛皋率两千人入援庐州，挫败了金人的进攻。

此时已是绍兴四年十二月，正是寒冬季节。金兵被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部队所阻，又遭遇雨雪天气，后勤补给线十分不通畅，军中开始缺粮，只得杀马为食。令金兀术更担心的是，从后方传来金太宗病危的消息，深恐国内有变，索性连夜北撤。兀术一边撤军，一边派人把消息告知伪齐军队。伪齐军队统帅刘麟听得金兵撤了，大惊失色，抛弃辎重，一口气逃了二百里。

这次由伪齐与金国联合南侵的军事行动，最终以失利而告终。这也是宋金战争爆发以来，金人第一次大规模南下却无功而返。

三七 十二金牌：不败而败的北伐

兀术北撤后不久，金太宗病死，金熙宗继位（绍兴五年正月），金国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对刘豫伪政权的扶植热情大大降低。

无意全面与金国开战的宋高宗一方面派使臣何藪前往谈和，一方面对伪齐政权施加军事压力。此时南宋中兴四大名将分别屯兵于要害之处，张俊屯兵盱眙，韩世忠屯兵楚州，岳飞屯兵襄阳，刘光世屯兵庐州，形成对伪齐政权的包围圈。

绍兴六年（1136）九月，宋高宗由临安抵平江，摆开御驾亲征伪齐的架势。刘豫风闻消息后，赶紧派人向金熙宗求援。当初金国立刘豫为傀儡皇帝，本来就是希望以汉制汉，牵制、打击南宋军队。岂料刘豫此等没用，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每每向金国求援兵，反倒成为金国的一大负担。这次金国不想派兵相助了，只是令兀术驻兵黎阳，助助威、摇旗呐喊罢了。

刘豫没办法，只得全力自保，拼凑一支三十万人的大军，兵分三路出击。然而伪齐兵力虽貌似庞大，实则战斗力低下，三路出击，竟然全线溃败。这种结局，令金人对刘豫更加不满，已隐隐有废掉刘豫之意。

在刘豫败退后不久，前期出使金国的何藪回国，带给宋高宗一个噩耗：徽宗皇帝已病逝。宋高宗是徽宗的第九子，听闻父亲去世，不禁悲从心生。他又派王伦出使金国以索回徽宗皇帝灵柩，同时也向金国执政大臣挾懒提出一个请求：“河南之地，上国（指金国）既不需要，与其送给刘豫，不如归还宋国。”

王伦抵达金国后，金实权人物完颜挾懒口头答应将奉还宋徽宗灵柩，并且允诺归还河南之地。此时金人对刘豫的伪齐政权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自刘豫兵败后，多次厚着脸皮向金国求兵相助，金熙宗怒责道：“建尔已八年，尚用吾兵，则汝何为？”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遂废刘豫为蜀王，伪齐政权就此宣告终结。

至此，宋金议和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宋金由战争状态转入谈判，遂使一个人得以东山再起。

这个人便是一直倡导和谈的秦桧。

当初秦桧抛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耸动天下”二策，结果阴沟里翻船，丢了相位。可是此人颇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下台后夹起尾巴，大力讨好朝中大臣，如张浚、赵鼎等人居然都被他耍了，在宋高宗面前极力推荐秦桧，称他可堪大任。只是张浚、赵鼎都没有料到，后来他们都遭到了秦桧的暗算。

宋高宗再遣王伦使金。王伦谒见金熙宗后，先感谢金国废掉伪齐刘豫，而后才商谈议和之事。金熙宗召集诸臣会议，挾懒与太师蒲卢虎都主张与宋朝修好，将所占的河南及陕西归还宋人。

此时南宋的军事力量已达靖康之变以来的最鼎盛期，无论在关陕战场或是在江淮一线，都顶住了金人的进攻，而且接二连三地取得大捷。国内原本为数众多的流寇集团被彻底剿灭，刘豫的伪齐政权业已垮台。这正是全面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岂可向金人屈膝称臣求和呢？一时间，反对议和的声浪高涨。

然而高宗自上台以来，便一味幻想着与金媾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岂有不应之理。加上秦桧这个奸臣在一旁煽风点火，更是一味主和。于是朝中一帮反对议和的大臣，遭贬的贬，遭流放的流放。在外

握有兵权的岳飞、韩世忠等人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岳飞在得悉朝廷议和的消息后，上书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

其实在金国内部，也有主和与主战两派，挾懶为主和派，而兀术为主战派，两人在朝中也是明争暗斗。挾懶之所以一意要与南宋和解，其实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他有篡权夺位之野心，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避免宋金两国卷入战争。当年挾懶纵秦桧南归，如今秦桧成了南宋权臣，两人心照不宣，和议推进顺利。

当金国答应先交割河南后，宋高宗大为欣喜，派王伦前往受地。岂料风云突变，南宋非但没有得到河南之地，反倒又一次面临金国的大举进犯。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起因正是金国权力高层之倾轧。

兀术密禀金熙宗：“挾懶等主张割河南于宋，必有阴谋。”这引起金熙宗的警惕，不久后，挾懶与蒲卢虎企图篡权的阴谋败露。挾懶之政敌兀术穷追猛打，认为挾懶勾结宋人擅割河南陕西之地，以叛国兼谋反罪处决挾懶。自此，金国之鹰派人物兀术大权独揽，非但推翻了先前挾懶与南宋达成的协定，还大举出兵南下，宋金战争再度爆发。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国以举国之兵，兵分四路并进，重新控制山东、陕西、河南，其中兀术领十万精兵入汴京（即开封）。这些地盘是以前金国划给刘豫伪政权统治，刘豫垮台后，根据和议精神，是要交还给南宋政府的，故而南宋也陆续派官员接管一些地盘。然而金国忽然背盟，一时间这些地盘又纷纷落入金人之手。

此时南宋政府尚未料到金人会突然发难，正派刘锜率兵前往接收东京开封。当刘锜抵达顺昌（安徽阜阳）时，得悉金兵已占领东京，

并正在向顺昌推进。刘锜当机立断，与顺昌知府陈规商议，收拢军队以保卫顺昌城。

刘锜本是西北名将，以勇敢善战著称，深受张浚赏识。顺昌城池不大，而且防御工事简陋，想要抵挡住兀术的十万精兵，显然并不容易。刘锜分秒必争，抓紧时间加固防线，严阵以待。六天后，金兵前锋抵达顺昌，开始攻城。刘锜的部队主力便是以前王彦所领导的“八字军”，脸上刺着“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如今，赤心报国的机会来了。

入夜时分，陡降大雨，电光四起。刘锜招募五百名敢死队员，冒雨夜袭金营，金兵远道而来又刚攻城，人马俱疲，被敢死队一阵劈杀，军营大乱，遂四散溃逃。

首战败北，兀术大怒，亲率十万大军前来，大有踏平顺昌城之架势。面对强敌，刘锜非但没有乱了阵脚，反倒故意给兀术下战书。兀术果然被激怒，吼道：“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刘锜又表示，愿意在颍水建起五座浮桥，待兀术军过了河后，再决死战。兀术根本不把刘锜放在眼里，听了这些后都哭笑不得，没了脾气。

刘锜可没食言，他果然连夜修了五座浮桥。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药呢？其实刘锜表面上修桥，实际上暗地里搞了小动作，在河边水草地以及河上流撒毒药。当时正是夏季，天气炎热，金兵人马俱渴，争先饮水，结果大量士兵与战马中毒，实力已是大打折扣了。但兀术仍自恃拥有精锐重装骑兵“铁浮屠”，一味寻战。刘锜早已想好了对付金兵铁浮屠的办法，在战斗中，以长枪挑去金骑之铁盔，以大斧断其臂。

双方在顺昌展开激战，刘锜凭借自己的智勇以及全体官兵殊死反击，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了顺昌保卫战的胜利。

此役，兀术损失数万精兵，最后被迫退回开封。

刘锜死守顺昌时，南宋军队与金兵在漫长的战线上全线开战，并先后取得不少胜利。岳飞派遣部将经略西京（洛阳）诸郡，屡败金兵；韩世忠在淮阳挫败金兵，俘敌舟二百艘。紧接着，岳飞又陆续收复颖昌、淮宁府；张俊攻克亳州；韩世忠攻克海州。

此时的南宋军队，已经具备与金兵全面对抗的战斗能力，尤其是名扬天下的岳家军，更是在战场上摧强折锐，勇不可当。

七月，岳飞率轻骑兵入驻郾城。这时兀术在顺昌战败后休整一段时间，他已察觉到岳飞的进攻已经严重威胁到开封城了，遂决心先下手为强，率领大军进逼郾城，与岳飞一决高下。郾城会战拉开战幕。

这次兀术又带来了他的看家武器：铁浮屠。铁浮屠又叫拐子马，在顺昌会战中，曾经被刘锜击破。然而顺昌会战时，由于金兵人马许多中毒，故而拐子马的威力未能尽情展现，而这一回，兀术的拐子马共有一万五千骑。拐子马的战术是这样的：以三骑为一组，三匹马贯以长索，人马都全副武装，有重型盔甲防护，在战斗时，三马同时并进，冲击力更大，协同作战，由于三骑捆绑，避免战斗时有逃兵出现。

岳飞采取的战法又与刘锜不同，他用步兵对付拐子马。以步兵对付重装骑兵，本来是相当吃亏的，若没有严格纪律约束，在骑兵的冲击下很容易溃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岳飞严格治军下，这乃是一支铁军。岳飞命令步兵执麻札刀入阵，不许仰视，只顾砍拐子马中最薄弱之处：马足。为什么用这种战术呢？因为只要砍倒其中一匹马，另外两匹马便无法前进了。这种战术看似简单，却需要士兵以莫大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去完成。在报国热情的感召下，岳家军大破拐子马。

这一战，兀术的看家武器几乎被废了，他不禁大恸道：“自海上

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岳飞直追十五里，兀术狼狈而逃。此役之胜利，震动中原，金兵中的汉将纷纷反正，光复中原的梦想，只差一步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飞满腔豪情，他对诸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耳。”黄龙府乃是金国位于东北之重镇，曾囚禁徽、钦二帝。

郾城大捷后，岳飞进军至朱仙镇，距离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大宋旧都已在望。

谁都认为，克复旧都已是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此时，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朝廷居然要求岳飞班师！

对于宋高宗来说，议和始终是头等大事。

这位南宋皇帝一心想过上安静的生活，没有战争的困扰，享享皇帝之清福。尽管南宋的军事力量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可是皇帝对金人的畏惧心理并没有消除。面对金人的进犯，为了自保他也不得不抵抗，可是当战局向有利于宋军发展时，皇帝却认为要适可而止。否则就算打赢了，金人也不肯善罢甘休，到时战争不知要打到猴年马月了。

遇到宋高宗这样一个皇帝，只能说是国家的悲哀，也是岳飞的悲哀。

宰相秦桧更是对岳飞恨之入骨。一个是主和，一个是主战，立场根本不同。岳飞的胜利，就是秦桧的失败，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可以说，岳飞在战场上的胜利，已严重威胁到秦桧在朝中的地位。这个自私而阴险的权臣乘机在皇帝面前进言，为与金议和，须诏令岳飞班师。

岳飞还以为朝廷对局势了解不清晰，遂奏称道：“金人锐气已沮，将弃輜重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金国以举国之师南下，现在正是将他们彻底消灭的良机，怎么能白白错过呢？

秦桧再施手段，他先把杨沂中等将领的军队调回，然后对皇帝说：“岳飞已是孤军，不可久留，请令班师。”宋高宗急令岳飞班师，一日之内，发出十二道金牌。

十二道金牌！道道是皇命啊，皇命难违！

此时的岳飞，难以抑制心内的激愤，不禁潸然泣下。他望着故都的方向，跪倒在地，流着泪道：“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他一生都为光复故土而战，回顾这十几年来的征战历程，是何等之艰难不易，而能坚持到现在，都是一种强大的信念支撑着。这种信念便是，终有一天，他要实现“还我河山”的梦想。当他以为梦想即将成真时，梦想的气球却被皇帝、秦桧戳破了。此时的他，第一次有了一种无力感，对政治现实的无力与无奈。

岳飞终于撤军了，鄱城一带的百姓挽住岳飞的马，痛哭流涕，要求岳家军留下。见到此情此景，岳飞内心更加悲伤，只得出示诏书，对老百姓们说：“吾奉诏不得擅留。”百姓们知道，岳飞此去，很快这里又会被金人占领，与其当亡国奴，不如随岳飞南下。于是大家纷纷携儿带女，跟着南宋军队走了，岳飞将他们安顿在汉上六郡。

南宋军队离开后，颍昌、淮宁、蔡州等，又纷纷沦陷了。

三八 “莫须有”：岳飞之死

皇帝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

后人读宋史，无不咬牙切齿于宋高宗对金的妥协。若站在国家的立场考虑，皇帝在岳飞连战连捷、有望收复中原失地时召回军队，实是错失良机。可是这不是皇帝的思路，皇帝考虑的事情要多得多。

我们且不说宋高宗有没有光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先从皇帝的角度来看，他在担心什么呢？

其一，他担心打不赢金国，把金国给惹火了。当初宋钦宗不也自以为能挡得住金兵吗？结果怎么样？他与太上皇徽宗都当了金国的俘虏。且不说徽、钦二帝，就是高宗本人也差一点当了金人的俘虏。当初兀术南下，把他从内地追到海边，从海边追到海上，只差一点点他的下场就与二帝一样了。战争总是有风险的，只有议和，他在龙椅上才坐得舒服。

其二，打败金国，收复失地又怎样呢？南宋爱国志士们总念叨着要“光复中原，迎回二帝”，现在二帝中的宋徽宗、也就是宋高宗的父亲已经死了，他哥哥宋钦宗还在过着战俘生涯。打败了金国，势必要迎回宋钦宗，两个皇帝怎么并存？到时谁来当皇帝？你们这些臣子只会叫嚣着迎回先帝，可谁为朕考虑过呢？

其三，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那些手握兵权，镇守一方的大将，就是皇帝的心腹大患。大宋的传统，就是严防军人权柄过重以威胁到皇帝的统治。南宋中兴诸将不仅都有一支自己的军队，而且其军队几乎

只听命于统帅，带有私家军的色彩。岳飞的部队不是被称为“岳家军”吗？试想想，这些手握兵权的大将，万一哪天不爽了，要把皇帝打倒在地，那岂不是举手之劳吗？

以上所述的三点，作为皇帝，宋高宗最担心的是最后一点，即武将权柄过重，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因为金国的威胁虽大，但南宋也不再是当初那个任人欺负的熊样了；钦宗若生还怎么办，那也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武将们的威胁却是近在咫尺，五代时军人政变的故事会否重演呢？这才是皇帝最关心的事。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何以历朝历代都出现屠戮功臣之事？这些在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武将，就是皇帝手中一把锐利的刀，若不能控制自如，那么刀锋将伤到自己，甚至命丧刀下。这就是皇帝的逻辑。

此时南宋兵权，集中于几位中兴名将之手，分别是岳飞、张俊、韩世忠、吴玠（吴玠已去世）、刘锜等人，另一位中兴名将刘光世因病于绍兴七年卸去兵权。这几位中兴名将里，吴玠远在西北，自然对皇帝威胁不大，刘锜是后起之秀，根基尚不够深。故而在皇帝眼中，岳飞、张俊、韩世忠这三人，才是心腹之患。

事实上，武将权柄过重，很早就引起朝廷的注意了。

张浚为相时，他就认为这些武将久握重兵，故而想将兵权收归于督府，但还没来得及实行便罢相了。赵鼎继任宰相后，考虑以偏将、裨将分主将之权，以起到制约作用。可是张浚、赵鼎的手段，都远远不如秦桧高明。秦桧之所以得到皇帝的器重，是他太了解皇帝的心思了，于是献上妙计以罢诸将兵权。

绍兴十一年四月，宋高宗依秦桧之计，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表面上是对三人的升迁，实际目的是把他们调

离自己的军队，解除兵权。

说起打仗，岳飞固然在中兴名将中首屈一指，但若论玩政治，他绝对是菜鸟。同为中兴名将，张俊政治敏感性高，他马上意识到皇帝与秦桧的真正用意乃是要压制武将，武将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要未雨绸缪，为自己铺条后路。于是张俊率先向朝廷表示，愿把自己的部队归隶于御前军，而且力主议和。张俊的表态，乃是投秦桧之所好，自然得到其赏识并引为同党。

与此同时，张俊与岳飞的关系也在恶化。张俊曾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在平乱战争中俩人一起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后来岳飞的声望渐隆，战功也在张俊之上，这引起他的嫉妒。两人入枢密院后，张俊主和而岳飞主战，立场截然不同，关系愈加恶化。两人在巡抚楚州时，张俊主张修城，而岳飞志在收复中原，不赞成修城这种单纯防御的策略。

在罢除中兴名将兵权的同时，秦桧乃谋求与兀术议和。

兀术本是金国强硬的主战派，但在顺昌之战、郾城之战中被刘锜、岳飞打得大败，也不得面对现实。南宋军力已是今非昔比，若自己一意孤行，恐怕是捞不到多少好处，不如通过议和，攫取实利。于是兀术向秦桧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

只有先杀岳飞，以表和谈诚意，金国才愿意与南宋谈判。

这岂非是要让南宋自毁长城？

但秦桧居然接受了，他要设计置岳飞于死地。

七月，秦桧指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诬告岳飞：“枢密副使岳飞，

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颓废。”并称岳飞在金人进攻淮西时，逗留不前。高宗皇帝也因为岳飞反对在楚州筑城而不满，认为“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朕何赖焉？”志在收复中原，在皇帝看来，成为“沽名钓誉”了。

就这样，岳飞在被罢兵权后几个月后，又被罢掉枢密副使一职。

罢免枢密副使，只是秦桧陷害岳飞的第一步。

说实话，岳飞人品无懈可击，没有什么把柄落在秦桧手上。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桧深知，要致岳飞于死地，就必须诬以谋反。但岳飞都没兵权了，怎么谋反呢？这难不倒秦桧这个奸贼。他开始精心策划一个陷阱。

为了陷害岳飞，张俊当了秦桧的帮凶。岳飞罢了兵权后，他的军队由部将张宪指挥，故而张宪便成了秦桧阴谋陷阱中的重要一人。秦桧与张俊的阴谋是这样的：诬告张宪与岳飞之子岳云密谋占据襄阳，恢复岳飞的兵权。说白了，就是想谋反。

张俊打算从岳飞的部将中，找到几个做伪证的人。其一人叫王贵，他有把柄落入张俊之手；另一人叫王俊，此人贪财，故而屡屡被张宪批评。张俊指使王俊向枢密院告发张宪的“阴谋”，诉状是张俊亲自帮他捏造的。于是，张俊在枢密院收入了王俊上递的“告发状”，并命令王贵逮捕张宪。

张宪被捕后，张俊亲自审讯。其实枢密院本是朝廷最高军事机构，并不是法院，哪来的审讯权呢？有人向张俊提醒这点，可是张俊根本不理睬，把枢密院当作审讯公堂，对张宪采取严刑逼供，要他承认与岳云谋据襄阳、还岳飞兵权的阴谋。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张宪哪肯承认？于是乎他被拷掠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可是张宪是

一条硬汉子，坚决不承认所诬告之事。

张俊又捏造了一份所谓口供送交秦桧，而后把张宪打入大理狱。秦桧入朝，向宋高宗要求召岳飞父子对质张宪之事。宋高宗无意将事情扩大化，他对秦桧说：“刑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可是秦桧不肯罢休，竟矫诏抓捕岳飞、岳云父子。岳飞没有反抗，只是说了一句：“皇天后土，可表此心。”

秦桧命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审讯岳飞。岳飞裂衣示背，只见他背上刻着“精忠报国”四字，何、周二人亦不禁肃然起敬。这本就是秦桧设计的冤案，审来审去，哪里有谋反的罪证。何铸不由得向秦桧求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哪里肯从，遂把此案交由曾诬陷岳飞的万俟卨审理。

万俟卨的诬告本领着实不小，又杜撰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以陷害岳飞。秦桧一党要把谎言说到底，一口咬定岳云曾给张宪写信，筹划让岳飞重掌兵权。可是根本就没有这么封信，万俟卨却坚持说是岳云把信给烧掉了。总之，为了干掉岳飞，这帮人不惜颠倒篡改事实，附会成狱。

大理卿薛仁辅、寺丞李若朴、何彦猷等都为岳飞鸣屈。韩世忠也向秦桧讨要说法，秦桧答说：“岳飞子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莫须有。”什么叫“莫须有”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或许有”，有的认为是“不须有”，有的认为“没必要有”。总之，意思就是说，不管有没有证据，都要治岳飞的罪。韩世忠愤然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韩世忠不仅对秦桧陷害岳飞深感不平，还极力反对与金议和。他上书皇帝，批评秦桧误国。秦桧恼羞成怒，指使言官弹劾韩世忠。对于秦桧的恶毒手段，韩世忠是知道的，而且此时枢密院已被张俊所操纵，自己若不急流勇退，只怕也要被陷害了。于是韩世忠上书请求辞

去枢密使一职，从此杜门谢客，不问政事。

该年年底，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炮制出一份罪状书，罗列的岳飞罪状让人莫名其妙。比如他们捏造说，岳飞被授予节度使时，曾说自己当节度使的年龄与当年宋太祖一样，暗示有当皇帝的野心。反正一句话，罪名不重要，秦桧就是要置岳飞于死地。最后，宋高宗下诏，赐死岳飞，张宪、岳云则斩首。

一代名将岳飞就这样死于奸臣之手。

在岳飞之死中，宋高宗扮演什么角色呢？

在秦桧陷害岳飞之初，宋高宗曾指示不要把事件扩大化。然而秦桧矫诏抓捕岳飞，皇帝却默认了。不要说别人，就是皇帝也不相信岳飞真的有什么谋反之事。那么宋高宗最后为什么决定要杀岳飞呢？这里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即与金人的和谈。在岳飞被害前，宋与金的和谈基本完成，这是宋高宗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结果。那么，既然和谈即将大功告成，为什么还要杀岳飞呢？因为岳飞已经是抗金运动的一面旗帜，当时中原许多抗金义军，都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如果岳飞不死，即便他没有兵权，他的影响力还在，仍然是中原那些数不清的“岳家军”的精神领袖。这不仅会成为宋、金两国停兵休战的障碍，而且对皇帝的统治也是一大威胁。正因为如此，宋高宗最后与秦桧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成为杀害忠良的凶手。

在岳飞被赐死的同时，南宋与金国达成不平等之和约。

根据和约，宋向金称臣，金主册封宋主为皇帝；宋每年贡金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年金主生辰，宋应遣使致贺；金归还徽宗皇帝的灵柩及高宗生母；宋金两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国界；宋割唐、邓两州以及陕西商秦之半给金国。

可以说，这份和约就是丧权辱国的条约。

近来，史学圈里颇有为秦桧翻案之风，认为他对实现宋金之和平有贡献。这着实是危险的论调。这不是真正的和平，而只是屈尊投降。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宋高宗一直以来想与金国议和却屡屡被拒绝呢？因为当时南宋毫无反抗之力，任人宰割，金人取宋土易如反掌。而兀术本是坚决主战者，在绍兴十一年不得不接受议和，实则金国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打垮南宋了。南宋有机会收复失地，最终却以屈辱议和收场，试问秦桧何功之有？这根本不是和平，而是投降。试看看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他们根本没有盼头，因为他们早被宋高宗、秦桧之流抛弃了。这岂是真正的和平？

三九 风云再起：书生亦能建奇功

怯懦的朝廷以牺牲岳飞与国家尊严及利益的双重代价，换来了二十年的所谓“和平”。宋高宗终于可以高枕无忧，过足皇帝瘾；而秦桧仍然干他陷害忠良的勾当，足足当权十五年。屈辱来换取安定，本是短视的行为，自然无法消弭野心家的勃勃雄心。二十年后，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卷土重来，晚年的宋高宗终于还是蒙羞了。

与南宋议和后不久，金国权臣兀术去世，金熙宗变得荒淫嗜杀，最终被完颜亮发动政变杀死。完颜亮当上金国皇帝后，对内残酷镇压异己，对外则奉行扩张政策。

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经过多年的准备后，金帝完颜亮大举南侵，动用的兵力多达六十万人，几乎是举国之兵。金兵在漫长的边界线上，东起淮东，西至陕西，千里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声势之浩大，为宋金战争以来所未有。

南宋帝国偏安一隅，秦桧当权了十五年，把国防都荒废了，对金国入侵又备战不足，一开战便连连失利。金兵分四路出击，其中三路从陆上出击，一路则由海道进击。宋军的部署如下：西部防区由吴玠负责，中部防区由成闵负责，东部战区由刘锜负责，海防则交给了李宝。自宋金议和、岳飞被杀，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南宋许多名将陆续谢世，朝廷又荒于战备，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不如从前。

对宋军来说，东线防区承受的压力最大。

名将刘锜被任命为东线防区长官，虽然他雄心壮志，欲重写二十

年前顺昌大捷的奇迹，老病缠身的他喊出了“取重阳日到京师（开封）”的豪言壮语，然而奇迹却不再重演。刘锜试图自江阴北渡淮河，出击失利，继而其左翼的王权不战而弃庐州。金帝完颜亮兵分两路，自己率主力南下，进抵长江沿线的采石；另一路十万大军破滁州、占真州，直逼扬州。被宋高宗寄予厚望的刘锜被迫弃扬州，退守瓜洲，不久瓜洲又告失陷，刘锜只得再退镇江，与金军隔江对峙。

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南宋海军名将李宝在唐岛大破金国水师的好消息。

为了一战消灭南宋，金帝完颜亮打造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总计有六百艘战船与七万人，打算沿着海道南下，直接进攻南宋帝国的首都临安。南宋帝国不仅要在陆地上阻击金兵，同时还要在海上作战。这时南宋能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力是多少呢？仅有一百二十艘海船与三千能胜任水战的弓弩手。

海军名将李宝原本是岳飞的部将，早年随岳飞抗金，被派遣到北方敌陷区开展游击战并联络抗金义兵，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他擅长水战，曾经在岳飞的授意下，从海路发起一次长距离的奔袭战，突袭金人控制下的登州。如今，他又要在海上大放光芒了。

海战与陆战不同，陆战可以凭险而守，而海战则无险可守。李宝临危受命后，他即刻面向宋高宗请求率舟师北上，寻觅有利战机，在离首都临安越远的海域与金海军决战，则越有利。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应将战场设定在敌人一方，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决不能被动坐等敌人上门。

李宝率一百余艘船北上，沿途招抚了不少抗军义兵，扩充自己的实力。他得到情报，金帝完颜亮命令舟师于十月十八日发兵入钱塘江，直接进攻临安。金国庞大的船队已经出动，时间急迫，李宝立即

命舟师北上，泊于石臼山，金船队泊于唐岛（又名陈家岛），双军相距仅三十余里，一场海上大战已是不可避免。

金水师虽然拥有六百艘船与七万人，远远超过李宝的兵力，但水战经验却严重不足。李宝还获悉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金船为了防水，竟然使用极易燃烧的油布为帆。针对敌船的弱点，李宝设计火攻方案，在风向、洋流的配合下，以火箭密集攻击。

战斗开始后，金船很快着火，在风力的作用下愈烧愈旺。貌似强大的金国海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六百艘战船损失了五百余艘，除了总统领苏保衡侥幸逃脱外，金国海军其余高级将领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士卒死亡数万人。

这是规模空前的大海战，李宝在水师力量居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果断出击，凭借着自己的勇气与才能，赢得伟大的胜利，确保了南宋海疆的安全。

然而，在陆路上，南宋的长江防线已危在旦夕。

高宗皇帝得悉完颜亮即将率大军渡江的消息后，面如土色，他的第一个念头，还是逃跑。皇帝急着召开群臣会议，商议避难于海上的事宜。时任左相的陈康伯认为在此危机关头，圣驾绝不可逃避，否则大势去矣，并力劝高宗亲征，以鼓舞士气。过惯幸福日子的高宗也实在不想在年老时还颠簸于风浪中，遂下诏由叶义问巡视江淮兵马，虞允文为参谋军事。

虞允文乃是进士出身，一介书生，不想此去后，竟然不可思议地为南宋帝国立下卓著的战功，令所有人跌破眼镜。

当时完颜亮已准备从采石（安徽当涂西北）南渡长江。倘若金人渡江成功，后果不堪设想。驻守采石的南宋将领王权在之前的一系统

战斗中，屡战屡败，被朝廷解除兵权。朝廷打算以李显忠接管王权的部队，在李显忠抵达之前，先由虞允文前往采石犒师。

当虞允文到了采石时，发现情况大大不妙。金人在对岸已集结四十万大军，随时可能渡江。而此时采石的南宋守军群龙无首，前任长官王权被调走，续任长官李显忠还未到。更可怕的是，此时的守军全无斗志，毫无军纪章法，如同一盘散沙，三三五五一群，解鞍束甲于路旁。这样的军队岂能阻挡敌人渡江呢？

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虞允文把所有将士召集起来，总共还有一万八千人，马数百匹。虞允文在诸将士面前慷慨陈词，勉以忠义，并指着所带来的犒军物品道：“金帛、诰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这些将士多是爱国志士，只是因为前任统领王权无能，遂导致军心涣散，如今见这位参谋军事挑起重担，纷纷表示道：“今既有主，请死战。”

这时有人对虞允文说：“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倘有人背后说公的坏话，公难辞其咎。”这是告诫他，您别越权了，指挥作战不是您的事。虞允文听罢大怒，斥责道：“危及社稷，吾将安避？”正是有像虞允文这样的忠义之士，南宋虽有宋高宗这个投降皇帝，还能坚持下来。

虞允文亲自到江滨督战，见江北已筑起一座高台，上面坐着一人，正是金帝完颜亮。此时宋军谍报人员带来准确的情报：金兵将于第二天渡江，先渡江者赏黄金一两。虞允文马上布阵，他令骑兵、步兵列阵于江岸，把水师分为五队，一队驻守中流，两队分驻左、右两侧，另两队船则埋伏于小港内，作为机动部队。

不久后，只见对岸高台之上，金帝完颜亮挥动小红旗，金兵的渡江开始了。数百艘船浩浩荡荡驶过来，尽管宋军水师在江面阻击，但江面宽阔，仍有七十余艘敌船冲过江登陆。在敌人的猛攻下，宋军防

线稍稍后退。虞允文见势不妙，驰入阵中，勉励宋军统制时俊说：“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耳。”时俊听罢，当即挥舞双刀，身先士卒，奋勇前驱，遏制住金兵的攻势。

与此同时，江中激战正酣。宋军水师在船只性能上要优越于敌军，所用的船称为海鳅船，采取冲撞战术，犁沉敌船无数。采石矶水战一直打到天黑，此时金船损失过半，仍然不肯退却。在战斗关键时刻，正好有一支从江州溃败的宋军逃到采石，虞允文乘机将其招来，授予旗鼓，命他们从后山出，摇旗擂鼓。金人大恐，还当是宋军援兵已到，遂无心恋战，掉转船头逃去。虞允文又命水师以强弓劲弩尾追射击，大败金兵。

这就是宋金战争的转折一战：采石大捷。

金帝完颜亮在采石大败后，知道在这里无法渡江，遂移师瓜洲。不久后，李显忠赴任，虞允文判断金兵将从瓜洲强渡长江，而与瓜洲相望的京口守备薄弱，他自告奋勇前往京口（镇江），并向李显忠借兵一万六千人，加强京口守备。到了镇江后，虞允文去看望正在休病中的老将刘锜。刘锜对这位胆识俱优的书生大加赞赏，称赞道：“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书生手。”

恰好在这个时候，金帝完颜亮接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在完颜亮以六十万众对南宋发动雷霆万钧的攻势时，突然后院起火。自完颜亮政变夺权后，在国内倒行逆施，残害宗室，进行高压统治，金国内部反对完颜亮的势力早已是暗流涌动。金帝南征，正好给了反对派发动政变的机会。时为金国东京（辽宁辽阳）留守的完颜褒是金太祖完颜阿古打的孙子，他与完颜亮不同，性情仁孝，沉静达理，深为众人所拥戴。由于完颜亮大肆屠杀宗亲，完颜褒有大难临头之惧，遂乘国内空虚之机，发动政变，杀死东京副留守，自立为金国

皇帝（金世宗），并宣布完颜亮的数十条罪状。

得悉东京政变后，完颜亮大惊失色道：“本欲平来江南，不想发生此变，事之不成，岂非天乎！”

完颜亮的第一反应，便是回师镇压叛乱者。其部下李通认为，皇帝亲征却无功而返，军队士气就会涣散，到时南宋军队乘机追击，那就大势不妙了。不如先渡江，得胜之后再北返，宋军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完颜亮接受这一建议，并要求部下三天之内渡江，后渡者斩。可是完颜亮哪里想得到，这一命令，竟然使他死于非命。

原来完颜亮生性残暴，在采石之战失利后，他竟然下令将生还者全部敲杀，到了瓜洲后，又血腥杀戮逃兵，致使金兵上下，人人自危。如今要求三日渡江，而对岸宋军已做好防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时，金兵浙西路都统耶律元宜等将领密谋道：“今进退皆死，新天子已立于辽阳，不若共行大事，然后举兵北还。”次日黎明时分，耶律元宜发动兵变，率众军士杀入金帝完颜亮所在御营。完颜亮听得一片喊杀声，还以为宋军前来偷袭，正要取弓时，突的一箭飞来，他仆倒在地。此时乱兵杀了进来，冲着他又捅了几刀，然后将其缢杀。可怜这位一心想征服世界的金国皇帝，就这样死于非命矣。

金兵撤退后，南宋军队纷纷收复失地。

这场战争，表面上看南宋最终获得胜利，实际上暴露出南宋国防的弱点，胜利的赢得实有运气的成分。在绍兴议和后整整二十年时间里，南宋政府荒于兵事，以致于大战来临时，在战场上溃千里，备战严重不足。两场关键的战役，即李宝指挥的唐岛海战与虞允文指挥的采石之战，只是险中求胜，更多的是依赖两位英雄的沉勇与智慧，而并非南宋军队的强大。倘若不是金国突然政变，而完颜亮又意外死于兵变，那么战争之结局难以预料。

四〇 孝宗北伐：心有余而力不足

完颜亮败亡后，南宋内部主战呼声四起。

此时的形势对南宋是很有利的。

首先，金国政局不稳。金世宗政变夺权与完颜亮之死，震动金国政坛。契丹人耶律窝罕乘机起事，拥众五万，自立为帝，与金世宗分庭抗礼。金人花了一年的时间，付出重大伤亡才把耶律窝罕的叛乱镇压下去。其次，在完颜亮南侵后，中原爆发大规模的汉人起义，有力地支援江淮一带的抗战。在这些起义队伍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耿京起义。在李宝所取得的唐岛大捷一战中，若没有义军强有力的支持，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战果。

此时不进军中原，更待何时呢？

在采石之战中立下奇功的虞允文被任命为川陕宣谕使，他趁机向高宗皇帝进言：“金亮既诛，新主初立，彼国方乱，天相我恢复也。和则海内气沮，战则海内气伸。”宋高宗居然对虞允文所说的表示赞同。抵达川陕后，虞允文便与吴玠联手，共谋恢复。

在金国方面，金世宗急于收拾国内残局，无意推行完颜亮的南侵政策，也派使者前往南宋议和，重申二十年前的条约。但此时南宋国内对当年条约中的不平等内容已是无法接受，特别是其规定宋必须对金称臣。宰相陈康伯是主战派人物，他坚持宋与金两国对等的原则。宋高宗派洪迈出使金国，在国书中采取敌国之礼。所谓“敌国之礼”，就是对等国家的礼节。

洪迈到了金国后，金人见宋朝国书用的是“敌国礼”，勒令他改为臣子礼，在朝见金世宗时，也须用旧礼。洪迈坚决不从，被金人反锁在使馆里，不提供水与食物，饿了三天三夜。然而洪迈表现出毫不屈服的民族气节，最后金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给放回国了。

对于南宋朝廷，在和战之间真正的转折点，乃是宋高宗的退位。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当了三十六年皇帝的宋高宗出人意料地宣布退位，由太子赵昀继位，史称宋孝宗。

宋高宗为什么会突然退位呢？

恐怕跟完颜亮南侵有很大关系。

自从登基以来，宋高宗在对外政策上始终一贯软弱，一味求和。为了偏安一隅，苟且偷生，他甚至不惜杀了名将岳飞以迎合金人，换取所谓的二十年“和平”。然而，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屈辱的基础上，而且把和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金人。完颜亮撕毁和约，悍然入侵，无异于给宋高宗一记响亮的巴掌。我们从心理学分析，此时的宋高宗应是内心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内心仍然想屈尊求和；另一方面他对金人能否信守和约又开始怀疑，同时主战派收复中原的呼声高涨，他面临两难选择。与其如此，不如退位，把朝政交给新皇帝去解决吧，他不想再为此劳思费神了。

宋孝宗上台后，便做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为岳飞平反昭雪。他登基后不到一个月，便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职，隆重改葬，并寻觅岳飞后人，加以录用。

但是孝宗上任伊始，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主战倾向，仍然谋求与金国的和局。此时担任参知政事的史浩（他也是孝宗的老师）极力认为应该放弃陕西，避免对金人的挑衅。宋孝宗于是下诏，放弃宋军在

西北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此议一出，虞允文大惊失色，上书皇帝：“恢复莫先于陕西……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利害至重，不可不虑。”朝廷非但不听，反而把虞允文贬为夔州知州。

不得已之下，吴璘被迫与当年的岳飞一样，奉诏班师。

当时有僚臣抗议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退师？”吴璘无奈地答道：“璘握重兵在远，有诏，璘安敢违。”宋孝宗一面为岳飞平反昭雪，另一面又做出与当年宋高宗同样的事，可谓矛盾矣。于是乎吴璘在西北收复的三路十三州之地，一夜之间全部放弃，这可是所有将士拿命拼来了，这种结局谁也没法接受，整个兵营都充斥着悲伤的哭泣声。

后来宋孝宗召虞允文进京入对，并问及弃地之事。虞允文慷慨陈词，由于没有纸笔，他索性用手中的笏板为笔，在地板上画起地图来，向皇帝说明放弃土地的危害。宋孝宗这时才顿足道：“史浩误朕！”只是为时晚矣，吴璘所放弃的十三州之地，早已落入金人之手了。

随着老将张浚入主枢密院，主战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在刘锜去世后，南宋中兴名将硕果仅存的，只有张浚与吴璘。张浚在高宗皇帝时就当过宰相，在朝野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也是坚定的主战派。秦桧当权后，张浚失势，直到完颜亮南侵时，朝中无大将，宋高宗才重新起用张浚。宋孝宗向来敬重张浚为人，隆兴元年（1163）正月，他升迁张浚为枢密使，同时都督江淮军马。

宋孝宗由议和走向主战，也是大势所驱。

在张浚出任枢密使后，金国遣使前来索取被南宋收复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之地，并致信张浚称，要按照旧约（即绍兴十一年之条约）来划定边界以及岁币，否则将兵戎相见。此时金国已经

平定耶律窝罕之乱，南宋政府坐失良机，错过了最佳的北伐时机。张浚坚决拒绝金人之要求，他回信答复说：“疆场之一此一彼，兵家之或胜或败，何常之有？”言下之意，彼一时，此一时，你金国也不一定能在战场打赢我南宋。

张浚的强硬立场，令金世宗勃然大怒，遂派遣蒲察徒穆、萧琦等将领分别屯兵于虹县、灵璧，积粮修城，做好南侵的准备。

看来宋金之战，势必还要在战场上—决雌雄。

张浚入见皇帝，力劝宋孝宗移驾建康府，鼓舞士气。他分析说：“金人秋必为边患，当乘其未发攻之。”不能被动挨打，应该先发制人。与宋高宗相比，宋孝宗恢复中原的决心是比较大的，他对张浚说：“公既锐意恢复，朕难道独甘偷安吗？”于是决定出师渡淮，北伐收复中原。

由于当时金兵重兵屯于虹县与灵璧，进攻这两处据点便成为北伐的首要目标。时任淮西招抚使的李显忠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建康都统邵宏渊献上攻取虹县、灵璧二城之策。张浚便派遣李显忠出濠州攻灵璧，而邵宏渊出泗州攻虹县。

隆兴元年五月，众人翘首以盼的北伐开始了。

由于张浚战前工作做到位，北伐伊始，进展十分顺利。

李显忠渡过淮河后，金将萧琦率领精锐骑兵拐子马来战。北伐军士气如虹，大破金兵，进而收复灵璧。李显忠率军入城时，秋毫无犯，中原百姓风闻王师北伐，纷纷前来投奔。不久后，金将萧琦向李显忠投降。

邵宏渊在进攻虹县时，则遇到金兵顽强抵抗，久攻不克。李显忠

便令在灵璧投降的金兵前往向虹县守军劝降，告以利害祸福。在李显忠的心理攻势下，金守兵军心瓦解，守将蒲察徒穆也放下武器投降。

尽管首战告捷，但宋军内部却出现不和谐因素。邵宏渊本是主攻虹县，但功劳却被李显忠抢走了，他心里不是滋味。再者，当时邵宏渊军中有一名士兵违纪，被李显忠处决，这更令他感觉没面子。于是邵宏渊与李显忠两员北伐主将之间出现了裂痕。

拔取金兵两城后，北伐军再接再厉，挥师进攻宿州。李显忠再度发威，大败金兵，追击二十里，克复宿州。当宋孝宗得悉此捷报后，大为鼓舞，他写信给张浚，称赞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不过，宋孝宗高兴得太早了。

宿州失守后，金国很快组织大军反扑，出动十万步骑兵欲夺回失地。李显忠邀邵宏渊夹击金兵，但邵宏渊却按兵不动。不仅如此，在李显忠与金兵血战时，邵宏渊居然还和部下说风凉话：“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战乎？”试想想，主将都袖手旁观，将士哪有死战之心。李显忠孤军难敌金重兵集团之围攻，便连夜撤军到符离。金兵追至此，宋兵大败，军资军械损失殆尽。幸亏金人没有乘机南下，否则的话，宋军的损失将更加惨重。

张浚主持的北伐就这样草草而终。

南宋发动的这次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时机选择不对。宋孝宗在对金态度上，较宋高宗为强硬，但上台之初尚且在和战之间犹豫，错失利用金国内乱的良机。当张浚北伐时，金世宗的统治已经稳固。

其二，北伐的规模有限。在此之前，朝廷刚刚命令吴玠放弃西北三路十三州。吴玠是南宋将领中屈指可数的令金人畏惧的名将，没有他在西北牵制金兵，北伐的威力大打折扣。与完颜亮集六十万兵力从海陆大举南征相比，南宋的北伐只是小打小闹，进攻方向单一，故而符离一败，北伐便宣告失败。

其三，南宋荒于兵事已久，军队战斗力低下，特别是中兴名将陆秀夫谢世后，高级将领青黄不接。更有甚者，像邵宏渊这样的将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综合以上三点，南宋北伐，无天时（错失金国内乱之机），无地利（放弃西北十三州），无人和（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安得不败！

北伐失败后，朝中主和派乘机大肆攻击主战派，把北伐收复中原的主张诬为“邀功钓誉”，身为皇帝的宋孝宗处境尴尬，进退两难，只得下罪己之诏称：“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为了平衡主和、主战两派，宋孝宗把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与主战派领袖张浚同列为相兼枢密使，可是这么一来，朝廷完全陷入两派混争之中，乱得不可开交。

在中国历朝中，宋代政治较为清明，但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向来有党争的传统。本来朝中大臣意见不同有争议这是正常的事，若以事论事，把争议限制在问题本身，在国家利益上能以大局为重，那么两派尚有妥协合作之机会。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主战派多是拳拳爱国，以收复中原为己任，满腔热情，但此时已非岳飞的年代，南宋军队积弱难返，要提升战斗力绝非旦夕之功，欲收复中原，尚须深谋远虑。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主和派单纯认为是投降派，像秦桧这样的卖国贼毕竟不多，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是针对时弊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政治立场上的争论，往往变成意气之争，变成对人而不对事，党同伐异。主战派攻击主和派是卖国求荣，这不完全是事实；同样，主和派攻击主战派是贪功邀誉，更是胡说八道。就这样，双方争议不休，即便宋孝宗有恢复之志，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四一 乾道和议：长使英雄泪满襟

不管怎么说，事实摆在那里：北伐失败了。

就在这时，金人抛出和谈条件，共四条：其一，故疆，就是宋金两国边境如旧约所规定；其二，岁币如旧，每年金银二十五万两及绢二十五万匹；其三，称臣，宋仍然向金称臣；其四，还中原归正人，就是把中原逃往南宋的人遣返。

对于这四个条件，除了岁币之外，其余三点南宋都表示不可接受。与旧条约划定的边界相比，南宋政府还控制了海、泗、唐、邓等州，朝廷认为，这四州之地，乃是金帝完颜亮撕毁和约后被南宋所收复的，既然金人背约在前，南宋当然不承认旧条约的规定，新条约应该以实际控制区重新划定边界。至于宋向金称臣，那更是不干了，你想打就打，想撕毁条约就撕毁，我还向你称个屁臣。归还中原人，更是不可能，这里既有抗金志士，又有金国叛将，归还岂非把这些人送上死刑台？

金人知道南宋君臣比较要面子，便修改了一条：把金宋之礼，由君臣变成叔侄，宋主向金主称侄而不称臣。

和议一起，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更是水火不容。张浚、虞允文、胡铨等是坚定的主战派，反对任何议和立场。张浚为备战做了大量工作，在江淮一带增置大量战舰，招揽淮北、山东豪杰，各军的弓矢器械都十分充足。同时，张浚重用金国降将契丹萧琦，萧琦本是契丹望族，沉勇有谋，张浚意在约契丹为援，牵制金国。可以说，张浚公忠体国，俨然是南宋的长城。

倘若主和派与主战派能和衷共济，有军事为后盾，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就算议和也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然而这种想法只是奢望，主和派只是把张浚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抓住张浚北伐失败这个把柄，大肆攻击，还向皇帝说“愿以符离之溃为戒”，并指责张浚跋扈，浪费国资等。倾向主战的宋孝宗没了主意，张浚悲愤之下，连续八次上书乞致仕，最后宋孝宗诏罢张浚。

几个月后，张浚在忧愤中病死。

临死前，他给儿子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写了一封家书，也是他的遗言：“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张浚是宋代名臣，为南宋朝廷立下汗马功劳，早年他起兵勤王，平苗、傅之乱，后宣抚川陕，重用吴玠，确保川蜀之安全。秦桧当权时，他未能得到重用，及至晚年，当国家再遭入侵时，不顾年迈，毅然挑起重担，可谓精忠报国也。

张浚死后，朝中主和派更加得势。

汤思退是人如其名，一心“思退”，不求进取。为了和议速成，他竟然尽废边备，罢筑寿春城，解散万弩营，停修海船，撤海、泗、唐、邓四州之兵。张浚为抗击金兵所做的努力，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毁于一旦。南宋自毁长城，金兵却毫不客气。为了迫使南宋接受和议，金兵乘机南下，连续攻克楚州、濠州、滁州。东南为之震动。

这一次，汤思退罪无可恕了。

宋孝宗下旨，将汤思退流放永州。但是这样轻的惩罚怎么能平息众人的愤怒呢？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痛陈汤思退等人怀奸误国，以致金兵长驱直入，乞斩汤思退以谢天下，并请求皇帝起用陈康伯、胡铨、虞允文等主战派人士主持国事。当汤思退听说一大群

人上书欲置其于死地时，刀还没上架，自己就被惊吓而死了。

金国方面，金世宗无意与南宋陷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史书称金世宗“性仁孝，沉静达理”，他是金国历史上难得一位贤君。鉴于之前金熙宗、金帝完颜亮都是残暴之君主，金世宗上台后，力求休养生息，急欲与南宋媾和。他发兵攻打楚州等地，乃是以武力迫和谈，并非像完颜亮那样想征服南宋。

南宋方面，主战派领袖张浚与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于同一年都死了。主战派北伐固然出师不利，但主和派放弃边备，情况更糟。特别经汤思退这么一折腾，南宋朝廷不得不最后选择议和的方案。这种情况下，在外交上争取更多权益，便成为南宋对金的主流政策。

南宋方面提出的条件是：两国疆域仍然按照绍兴和议所划定的界线，即东为淮河，西为大散关；岁币银、绢各减五万；南宋归还金国战俘，但对于叛亡者则不予遣返；宋不再向金称臣，而称侄，在国书的格式方面，宋致金的格式为“侄宋皇帝稽首再拜致书于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而金致宋的格式为“叔大金皇帝致书于侄宋皇帝”。

可以说，南宋政府是做出让步的，特别是领土方面，放弃所收复的土地。金世宗同样做出一点让步，不再追回南逃之人，也同意岁币减五万。这样，双方在互派使者往来后，于乾道元年（1165），订立新的条约。

这就是所谓的“乾道和议”。

尽管在乾道和议中，南宋方面争取到若干权利，但对于有恢复之志的宋孝宗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志始终未泯灭，仍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复到北宋时代的全盛水平。然而，军事力量的提升，却不是立竿就能见影的，特别是可堪大用的军事人才严重缺

乏。

宋朝一直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在南宋中兴之战中，由于特殊年代的特殊政策，才使得军事人才纷涌，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玠、刘琦等人皆为一时之名将。自秦桧上台后，开始收武将之兵权，擅杀岳飞，遂使武将之地位又一落千丈。

绍兴和议后二十年，南宋更是荒废兵事，遂使金帝完颜亮南侵时，如入无人之地。南宋抵抗入侵的核心人物，仍然是老一代的军人如张浚、吴玠、李宝等，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新人，也只有虞允文一人了。

乾道三年（1167），守卫川陕达二十年之久的吴玠去世。他与哥哥吴玠同为南宋最出色的将领，是川蜀的保护神。在临终前，吴玠虑及国家的军事现状，向皇帝留言，希望孝宗不要轻弃川蜀，也不要轻起战端。

吴玠去世后，能与皇帝共商恢复大计者，只有虞允文一人了。宋孝宗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接替病逝的吴玠，实际上是把四川打造为一块进取中原的基地。虞允文到任后，兢兢业业，精兵强政，淘汰弱兵，为国家节省四百万的军费开支。他亲历亲为，甚至还动手编写了一本推广先进武器制造及使用的工具书，士兵们人手一册。

两年后，虞允文回到京师，出任宰相。他心胸宽广，光明磊落。有一回，御史萧之敏上书弹劾虞允文。早已逊位的宋高宗跳出来为虞允文辩护，并说：“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许？毋听其去。”就是说，当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立下奇功，你萧之敏人在哪呢？太上皇开了金口，宋孝宗想罢免萧之敏。此时虞允文却站出来为萧之敏说话，认为他品行端正，皇帝应该留用以广开言路。

宋孝宗把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于虞允文身上，他曾经对虞允文说：“靖康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可见他对虞允文之器重。为了实

现收复中原的理想，虞允文于乾道九年（1173）又一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为出兵中原做准备。

虞允文回到四川后，立即着手战备，他订立七条民户养马的规定，从民间搜罗大量良马，并挑选青壮年进行训练。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虞允文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不打无把握之战，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慎重。然而虞允文的一片苦心，却受到皇帝的误解。宋孝宗一直盼望着虞允文早日确定出兵的日子，可是一年过去了，虞允文却没有明确的表示。皇帝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便下了一道密旨催促他。虞允文没有附和皇帝，他强调军需物质还未准备完毕，不可贸然出师。

可惜的是，造化弄人。不久后，虞允文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这对宋孝宗可谓是莫大的打击，进取中原的计划就此泡汤。

其实虞允文算是幸运的人，他以一介文人而为国家建不朽之功，甚至得以跻身历史名将之列，官至宰相，功显于当日，名扬于未来。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虞允文：“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在宋孝宗时代，还有一人，他有不世之英雄气概，有为国家建功立业之理想，最终壮志难酬，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却在另一个领域取得至尊地位。

他就是南宋最伟大的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是山东历城人，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出生。这一年正是宋金战争最为激烈的一年，刘锜与岳飞分别在顺昌、郾城大败金兵。北方沦陷区的人民都翘首以盼王师，可是最后梦想破灭。岳飞被召回，紧接着是宋金议和与岳飞被害，北方人民彻底被软弱的朝廷抛弃了。辛弃疾便是在金人的统治下度过他人生的前二十年，长大成人后的他知道了中原沦陷的故事，这令他义愤填膺，渴望有一天能报效国家，为恢复中原尽自己之力。

机会最终来了。

在辛弃疾二十一岁那年，金帝完颜亮以六十万兵力南犯，中原掀起反金起义高潮。当时耿京是中原义军的领袖，山东、河北豪杰纷纷接受他的节制。辛弃疾毅然参加义军，并在耿京麾下当了掌书记。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辛弃疾差点因此而丧命。

原来辛弃疾有一位朋友名叫义端，当时也聚众一千余人起义。在辛弃疾的劝说下，义端归顺耿京。岂知有一天，义端突然盗走耿京的大印叛逃，耿京大怒，遂归罪于辛弃疾并动了杀机。辛弃疾对耿京说：“给我三天时间，倘若我没抓到义端，再杀我不迟。”可是要上哪儿找义端呢？辛弃疾冷静地判断，义端盗走耿京大印，定是要叛逃金营，遂快马急追，终于追上义端。大家都知道辛弃疾是个大文豪，可是很多人不知，他其实武艺是相当高强的。义端知道辛弃疾厉害，便以朋友的身份乞求道：“我知道你力能杀人，希望你别杀我。”既是叛徒，还称什么朋友？辛弃疾手起刀落，砍掉义端的脑袋，返回耿京营中。耿京为辛弃疾的胆识所折服，更加器重他。

完颜亮败亡后，辛弃疾劝耿京率师归顺朝廷。耿京便遣辛弃疾奉表入奏，宋高宗亲自召见辛弃疾，并且对他在敌后的英勇表现大加赞赏。朝廷决定授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之职，辛弃疾为天平节度掌书记。就在辛弃疾返回耿京大营途中，却传来一个噩耗，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败，张安国已叛逃到金营中。

怎么办？难道就让叛徒、凶手逍遥法外吗？

不！若不严惩叛徒，何以慰耿京在天之灵呢？

辛弃疾当机立断，与统制王世隆、马全福等五十人，勇闯金营。当时叛徒张安国正与金国将领在帐中饮酒，根本没料到辛弃疾竟以区区数十人马前来劫营。这次军事行动比起美军特种部队击毙本拉登还要难，还要危险。此时辛弃疾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竟然一击命中，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张安国，而后安全离开，出入金营如入无人之境。谁曾想到，一个二十二岁的书生竟然有如此之胆略与勇气。辛弃疾将叛徒押到首都临安，张安国被朝廷下令斩首示众。

后来辛弃疾在词中追忆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何等豪迈，何等英雄气概，正所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以辛弃疾之才略，完全是虞允文一类的安邦定国之才。可是最终却事与愿违，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志难酬。原因有二：其一，南宋帝国与金国达成和议，辛弃疾没有机会在战场上大展身手；其二，辛弃疾性格耿直、孤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自然容易得罪人。

返回南宋后，辛弃疾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九议》《应问》《美芹十论》等，呈献给朝廷。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地阐述自己的战略主张，纵论宋金两国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处处可见其精辟之见解与深谋远虑。可惜的是，当时和议方定，不可能因为辛弃疾的几篇文章就改变政策，故而宋孝宗没采纳其意见。

虞允文当政时期，宋孝宗锐意进取，谋复中原。此时辛弃疾又上书论南北之势，持论劲直。作为沦陷区归来者，他对中原百姓“遗民泪尽胡尘里”有更多的感受，因而恢复之心，较他人为切，在抗战立场上，无妥协回旋之余地，故而难以迎合朝中多数大臣，自然被弃而不用。虞允文去世后，恢复中原之梦愈行愈远，辛弃疾的理想也越来越难实现。悲愤而不得志的他，只得寄情于诗词，他写下大量爱国主义词章。

辛弃疾的词作雄奇峻丽，充满豪迈之气，贯穿满腔爱国之情。“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在文学作品中，他也表现出自己的无奈与悲愤：“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辛

弃疾之才华，本来应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胆识无双，慷慨有大略，但最终被埋没了。这是辛弃疾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四二 庆元党禁：韩侂胄时代

在南宋诸皇帝中，宋孝宗算得上是贤明之君，他统治时期，也可以算是南宋一个小黄金时代。可是在当了二十七年的皇帝后，宋孝宗感到恢复中原的梦想无望实现，遂心灰意冷，索性依高宗旧例，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惇，自己当太上皇。

孝宗本意是想抛开繁重的政事，安享晚年。可是他哪里知道，自己这一退位，居然惹起无尽的烦恼。

原因起自一个女人：皇后李凤娘。

太子赵惇登基，史称宋光宗，原先的太子妃李凤娘便成为皇后。宋光宗性格懦弱，而李皇后则是个刁蛮骄横、妒悍跋扈的母老虎。夫弱妻强，可以想象，宋光宗就是一个被李皇后随意摆弄的木偶人罢了。李皇后还是太子妃时，宋孝宗对这个儿媳就看不顺眼，多次批评她，并告诫她勿染指政事，否则将废了她。可是彼一时，此一时，光宗上台后，李皇后便开始展开报复行动，挑拨孝宗与光宗父子俩的关系。最后，宋光宗与父亲势同水火，竟然拒见宋孝宗。

李皇后妒忌心很强，凡是被光宗皇帝看上的嫔妃、宫女，她势必要加予迫害。她害死了光宗宠幸的黄贵妃，又把一个宫女的双手砍下来送给皇帝，只是因为皇帝称赞宫女的手白皙好看。李皇后的残忍独断，把宋光宗折磨得精神失常了，堂堂一个皇帝，居然成了个“疯子”。以后皇帝的病时好时坏，朝中政事“多决于后”。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宋孝宗在郁郁中去世。直到这

时，光宗还不肯出面主持丧礼，令孝宗葬礼迟迟无法进行。朝廷大臣对光宗皇帝的表现相当失望，宰相留正向光宗提出速速册立太子，但遭到皇帝的拒绝。留正索性假装跌倒受伤，辞了相位。

此时朝中一帮大臣开始密谋逼光宗退位，赵汝愚、赵彥逾、郭杲、叶適等人商量后，决定向太皇太后（宋孝宗母亲）求助。那么要找谁去向太皇太后陈情呢？他们选定了一个人：韩侂胄。韩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的五世孙，也是太皇太后的姨侄。

鉴于光宗已经不适合当皇帝，太皇太后以国家大局为重，同意赵汝愚等人的意见，传谕由赵汝愚主持此事。在大臣们的逼宫下，宋光宗被迫退位。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皇帝逊位的特别多，前面的徽宗、高宗、孝宗都是主动退位，而光宗则是被逼退的。光宗之子赵扩继位，史称宋宁宗。

在这场不流血的政变中，赵汝愚立下首功，而韩侂胄也是起到关键作用。

韩侂胄心里有点飘飘然，自以为有定策之功，怎么样也可以进入权力中枢吧。他便去找赵汝愚，一同商量此事。岂知赵汝愚当面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他这样对韩侂胄说：“我是宗臣，汝是外戚，都不应论功求赏。”

原来赵汝愚乃是宋朝宗室，而韩侂胄是宋宁宗皇后韩氏的叔叔，是外戚。赵汝愚的意思就是，咱们是宗室或外戚，应该要做出表率，不要争功求赏，不然别人认为咱们搞政变，乃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不过后来赵汝愚还是被宋宁宗任命为相，韩侂胄却没能进入权力中枢，这下他气坏了。韩侂胄有自己的关系，他与太皇太后及皇后都是亲戚，凭着这两层关系，得以出入宫禁，再加上他拥立皇帝有功，

也渐渐博得皇帝的信任。接下来，他要想方设法打击赵汝愚。

在当时南宋学术界里，理学正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而朱熹则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时任宰相的赵汝愚是理学的忠实信徒，他掌权后，便推荐朱熹为讲筵侍讲。除了朱熹之外，李祥、杨简、吕祖俭等理学名士，也纷纷被赵汝愚招罗到朝中。一时间，理学派成为朝廷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朱熹对韩侂胄有很强的警惕心，认为此人善于弄权，又凭恃其外戚身份扩张实力。他便警告赵汝愚：“侂胄怨望已甚，应以厚赏酬劳，出就大藩，勿使在朝预政。”但赵汝愚不以为然。朱熹遂直接向皇帝进谏，直言韩侂胄奸邪。当韩侂胄得知后，勃然大怒，决定要给朱熹点颜色瞧瞧。

韩侂胄打听到一个消息，朱熹给宋宁宗讲课时，总讲些“正心诚意”、“存天理去人欲”的东西，听得皇帝直打瞌睡。皇帝根本不喜欢理学！对韩侂胄来说，这可是扳倒理学派的良机。于是他故意设计了一出闹剧。

有一回，皇帝召优伶入宫唱戏。韩侂胄暗地里吩咐这些戏子穿戴峨冠阔袖，打扮成大儒的模样，在唱戏时，把理学家说的“性理之说”拿来说笑解嘲。要知道理学家们讲正心诚意，个个严肃得不得了，却被韩侂胄找来的戏子丑化了一番。对理学不十分感冒的宋宁宗，看到这出抹黑大儒的戏，亦不禁感到解气。这时，韩侂胄趁机说：“朱熹迂阔，不可再用。”皇帝早就对朱熹的讲学厌烦了，听韩侂胄这么一说，遂下诏罢免朱熹。

对韩侂胄来说，朱熹只是一颗小棋子罢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韩侂胄的真正目标，乃是扳倒宰相赵汝愚。

朱熹事件，成为朝廷中两派，即理学派与韩侂胄党交锋的导火线。

朱熹被罢后，赵汝愚、陈傅良、刘光祖等人纷纷上书皇帝，要求收回成命。然而皇帝非但不挽留朱熹，还把陈傅良、刘光祖两人贬职。赵汝愚一怒之下，请求辞职，皇帝不批准。与此同时，韩侂胄反倒兼职枢密院都承旨，势焰越发嚣张。曾经从学于朱熹的彭龟年弹劾攻击韩侂胄，结果被罢官。陈骙出面为彭龟年辩护，也坐罪免官。

在这场交锋中，韩侂胄连连告捷，他的矛头很快对准了宰相赵汝愚。

要攻击赵汝愚什么呢？韩侂胄与一帮党徒研究半天，找了一个理由。自大宋开国以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宰相一职，不由赵氏宗室担任。赵汝愚是赵元佐（宋太宗赵炅的长子）的七世孙，这下子韩侂胄有理由了。于是他便指使李沐上书弹劾赵汝愚，称他“以宗室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并告他“植私党”“专功自恣”。这一击实在致命，赵汝愚被罢相。

韩侂胄的时代来了。

但是理学派也是不好惹的。自从理学兴起后，自称继往圣之绝学，就是把孔、孟当年的绝学接过来继续发扬光大。理学虽然不是宗教，但有着宗教般的信仰，他们强调正心诚意，要培养浩然之气。在理学派眼中，韩侂胄就是个奸佞之徒。

李祥、杨简、吕祖俭等理学名士，纷纷上书请留赵汝愚，并攻击韩侂胄。这些正人君子既然不屑使用小人手段，如何抵得过对手的阴招呢？遂纷纷败下阵来，要么被贬，要么被流放。但是理学自从北宋二程、张载倡导以来，到了南宋朱熹时已俨然成为学术之主流，信众基础坚实。老师被打倒了，轮到学生上场。

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传、徐范六人，伏阙上书，为赵汝愚等鸣冤，言辞激烈。在皇帝看来，学生此举，无异于公然要挟朝廷，大怒之下，把六名太学生流放到五百里外。这六名学生虽遭流放，却赢得人心，时人称其为“六君子”。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因为外戚身份，也不好就任宰相之职，于是便把他的同党京镗推到宰相宝座。韩侂胄虽不是宰相，实际上权力比宰相还要大。

在“六君子”上书后，韩侂胄也深受理学派根深叶茂，不容易一网打尽。要彻底清除理学在朝中的影响，就必须在理论上给予致命一击。韩侂胄与同党何澹等人研究后，出笼了一个伪学的名目。所谓的伪学，就是伪道学、伪儒学。

那么韩党攻击伪学的根据何在呢？

这里就要说一个故事了。

理学产生于北宋，特别是经程颢、程颐以及张载的倡导，成为时代显学。理学家对道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是得到尧、舜、文、武的真传，孟子得到孔子的真传，但是孟子之后，就没有人传承了，隔了千年后，程颐又继承了。程颐开创的伊川学派学说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与后来朱熹之学合称为“程朱理学”。

宋高宗曾一度对程颐学说大加赞赏，后来陈公辅上书，斥责伊川之学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当时南宋正值存亡关头，推崇伊川之学的人，多数只会高谈阔论，标榜道德，在国家存亡问题上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宋高宗遂下诏：“天下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也就是说儒学应该回归孔孟之说，应该师法于孔孟，而不是师法于伊川（程颐）。

宋高宗的这道诏书，后来便成了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的依据。何澹向宋宁宗提出：“臣愿陛下以高宗之言，风励天下，使天下人皆师孔孟。有志于学者，不必自相标榜，使众人得而指目。”虽说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乃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道出理学的一些弊病，比如“自相标榜”，“同门则相庇护”，门户之见颇深。

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才算真儒学，什么算伪儒学，标准为何？

切不要以为韩侂胄是要跟朱熹探讨学问，他可没那兴趣，也没那个水平，他巧立名目，乃是为了打击政敌，实施专政。但凡是攻击韩侂胄一党的，无论是不是真的理学家，统统打上“伪学”之名。于是乎，朝中同情理学者纷纷被罢，而严斥“伪学”者则加官进爵。太常少卿胡纮上书称：“宜严行杜绝，勿使伪学奸党，得以复萌。”这样，伪学与奸党挂钩了，党禁由是大兴。

既然是奸党，自然要揪出其党魁了。

当时朱熹是理学的领袖人物，自然被视为奸党党魁。朱熹被罢出朝廷后，皇帝还给了他一个秘阁修撰的闲职，其实他并未赴任，隐退在家。韩侂胄想打倒朱熹，胡纮、沈继祖等人本与朱熹有隙，便乘机大肆攻击，罗列了所谓十大罪状，并嘲讽朱熹毫无学术，不过是剽窃张载、程颐等人的思想。皇帝也不分青红皂白，便把朱熹秘阁修撰这个闲职也罢免了，朱熹弟子蔡元定被流放。

朱熹被打倒了，但党禁却未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庆元三年（1197）底，所谓的伪学籍隆重出台，就是朝廷编制伪学名册，列入名册的伪学奸党共计五十九人。这五十九人中，有四人曾经担任宰辅，包括赵汝愚、留正等；有十三个曾担任待制以上官职，包括朱熹、彭龟年等；有三十一人担任过散官，包括刘光祖、吕

祖俭、叶适等；还有八名士人，包括前面提到的“六君子”及朱熹弟子蔡元定等。

这就是所谓的“庆元党禁”。

宋朝政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往好的说，总体上是比较清明的，也比较人道，以韩侂胄之专权，大兴党禁，仍然只是采用免官、流放、造奸党名册这些手段，绝少采用杀戮手段，故而宋朝党争频繁，但没有酿成东汉党锢血流成河之惨剧。往坏处说，党争频频，大大消耗国家力量，各党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对手上，却没有放在富国强兵之上。南宋没有好好利用这段和平年代来扩军备战，为北伐中原作准备，等到战争来临时，又要一败涂地了。

表面上看，在这场党争中，韩侂胄大获全胜。

事实上，情况比他所想象的复杂得多。较量还在继续。

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

在奸党名册中，除了四位宰辅之外，在其余五十五人中，朱熹排名第一。可是这位“奸党”党魁之死，居然引起朝廷的恐慌，因为当时朱熹四方门生信徒，齐聚于信州，欲为老师送葬。朝廷认为，这一群儒生聚在一起，准要妄谈时人短长，议时政得失，便下令地方官员严加防范，以约束其众。对朱熹的葬礼，尚且如临大敌，看来这场党争的胜败还未有定论呢。

朱熹死后不久，吕祖俭（列入奸党名册）的从弟吕祖泰向韩侂胄发难，他击登闻鼓上书，攻击“侂胄妄自尊大，卑陵朝廷”，请朝廷诛杀韩侂胄以防祸乱。此书一出，震动朝廷内外。此时韩侂胄的势力如

日中天，而吕祖泰不过一区区进士，竟然单枪匹马向他发难，这胆子也忒大了。朝廷以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为罪名，杖责一百，发配钦州。

看来党人的力量不可低估。

这时也有人劝韩侂胄：“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然哪天党人上台，你韩侂胄也不免要遭殃。此时的韩侂胄已加太师，又封平原郡王，可谓权倾天下。他思忖着“伪学党”已动摇不了他的地位，遂稍弛党禁。被列为奸党的徐谊、刘光祖等人也先后复官。

韩侂胄攻击朱熹等人之学为“伪学”，其中有一点是得到皇帝认同的，那就是理学家们高谈阔论，谈义理，谈心性，谈道德，但说到经世致用，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于南宋朝廷来说，中兴复仇，恢复中原那才是大事业，这岂是坐而论道可得来的呢？但道学家们没能做到，执掌国家大权的韩侂胄呢？掌权这么久，也没干出什么大事业嘛。

这次，韩侂胄想证明自己，他要干一番大事业。

什么事业呢？北伐！

四三 开禧北伐：丧权辱国之战

韩侂胄怎么突然想北伐呢？

原来金国出了乱子。自从金世宗去世后，金章宗继位，金国开始由盛而衰，政局混乱，兵刑废弛。北方鞑靼等部，又屡屡扰边，搞得金人连年兴师，士卒疲敝，府库空虚。韩侂胄听闻这些消息后，认为金国气数已尽，正是收复中原千载难逢的机会。由是他开始大议北伐，并招募士卒，从国库中取黄金万两，待赏有功之臣。

对于主战派人士来说，一直期待着出兵北伐的这一天，自然举双手赞成。此时，使臣邓友龙从金国归来，报说金国困弱，取之易如反掌。韩侂胄听罢大喜，以为这是建立盖世功业的良机，遂决意北伐。为了鼓励将士，他还在镇江修了一个韩世忠庙，并请奏皇帝追封岳飞为鄂王。

金国固然已衰弱，韩侂胄的算盘也打得不错，但有一点不得不提：南宋军队做好了北伐的准备吗？根本没有！

在韩侂胄专权的这些年里，把精力都放在讨伐伪党上，放在争权夺利上，偏偏就没有放在军政上。北伐固然好，可是有没有这个实力呢？北伐以光复中原，这本是国家大事，起码要有个长时间的准备，有足够的把握才开战。可是韩侂胄却完全颠倒次序，他是头脑发热，先决定要北伐，再来做准备。

倘若南宋军队能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那么还是有胜算的。可是从韩侂胄决意北伐到出兵，整整用了两年又四个月的时间，而且

军队在边界线上屡屡调动，早就被金国方面察觉了。金章宗判断南宋将有大动作，遂于开禧元年（1205）十一月下诏，命令陕西、山东诸将训练士兵以备不虞，并派出间谍收集南宋方面的情报，在边界上加强部队巡逻，以备宋军突击。

可以说，在北伐之前，金国已经做好抵御的准备，南宋先机尽失。

开禧二年（1206）四月，宋军发动试探性进攻。

山东京洛招抚使郭倪下令攻占泗州。南宋军队尚未进攻，消息便已走漏，所幸的是宋将毕再遇当机立断，提早一天发动进攻，总算顺利攻下泗州，旗开得胜。紧接着，宋军又收复几座县城。

由于宋军的进攻是试探性的，规模并不大，金章宗紧急召集群臣商议研判战局，究竟宋军只是在边界线上挑衅呢，还是打算大举进攻呢？金国左丞相布萨端认为，宋军既然发动攻击，宜早为备。金章宗乃下令布萨端坐镇汴京（开封），总领一方，同时尽征诸道兵，分守要害。

韩侂胄果然不是将帅之才，小规模进攻，既不能重创敌军主力，又让敌军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战前准备，可谓是一错再错。在泗州等地得手后，他才向宋宁宗提出下达伐金的诏书。这个北伐诏令来得太晚了，此时的金兵已经严阵以待了。

北伐战争的发起，已全然失去突击性。

韩侂胄接到的前线战报，几乎都是坏消息。宋将郭倬以五万人攻宿州，为金兵所败；李爽攻寿州失利；皇甫斌败绩于唐州；王大杰兵败于蔡州。可以说，宋军是全线溃败。然而，更令韩侂胄没有想到的是，开战之初，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便与金人暗地里往来，密谋反

叛。

吴曦是什么人呢？他又为什么企图反叛呢？

他乃是抗金名将吴玠的孙子。在南宋史上，据守川蜀的吴氏家族富有传奇色彩。吴玠、吴玠兄弟都是难得的名将，为保卫南宋西北、西南安全立下殊功。吴玠去世后，其子吴玠任利州安抚使，仍然手握兵权。由于吴氏执掌兵权太久，在川陕一带声望极高，其麾下军队有“吴家军”之称，朝廷认为难以驾驭。故而吴玠去世后，朝廷便将其子吴玠调入朝中，担任殿前指挥使。你想想，吴氏几代人在川陕奋斗，如今朝廷居然如此不信任，吴曦内心当然强烈不满，渐有反叛之心。

后来，吴曦用金钱贿赂朝中权贵，终于又得以回到川陕，任兴州（陕西略阳）都统制，把吴家军旧部招揽过来，再起炉灶。正好韩侂胄欲发动北伐，便委任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得以总揽川蜀军政大权。既然朝廷如此寡恩，他也不愿为朝廷卖命了。故而北伐战争刚刚开始，他便与金人秘密接触，表示愿意献上阶、成、和、凤四州之地，换取金人支持他当蜀王。金章宗当然求之不得，遂一口答应。

此中细节，韩侂胄当然一无所知。他一再催促吴曦在西北发动攻势，但吴曦却找借口按兵不动，以待叛变的时机。

南宋北伐军全线受挫，金章宗酝酿着全面反击。

十月，金兵集结十五万兵力，全面反攻，分兵九道大举南下伐宋。如今战局颠倒过来了。原来是宋军北伐，现在成了金兵南侵。南宋军队再度暴露出战斗力差的弱点，在金兵的猛烈攻击下，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宋军将领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毕再遇，他接二连三地打败金兵的进攻。可是毕再遇的出色表现，挽救不了宋军的败局，在其

他战线上，宋军一溃千里。

韩侂胄寝食难安，他寄希望于吴曦在西北发动攻势，以牵制金兵，减轻东南的军事压力。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早已同金人秘密勾结的吴曦趁着南宋兵败东南之机，宣布投降金国，奉上降表，同时献上蜀地图志以及吴氏牒谱予金人。一时间，朝野震惊，吴家军的抗金旗帜在飘扬数十年后，竟然改弦易帜了。金章宗遣使持诏书、金印，立吴曦为蜀王。

倘若吴曦的阴谋得逞，那么西部将不复是南宋的土地。

吴曦开始做起蜀王的美梦，他在兴州设行宫，置百宫，俨然已是一独立王国之主。可是吴家世代为南宋守疆捍土，深得陕川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吴曦叛宋降金，无异于给家族抹黑。对吴曦的倒行逆施，伯母赵氏、叔母刘氏站在民族大义立场，痛斥他的叛国行为，可是吴曦哪里听得进去。

吴氏家族治川陕多年，以致于外人皆道，吴家军只知有统领，不知有朝廷。但是不要忘了，吴家军自吴玠、吴玠始，便是南宋抗金的中坚力量，将士们无不在这支军队的光荣传统而深感骄傲。吴曦公然叛变降金，大失众望，一股反吴曦的力量也悄然兴起。

吴曦部将杨巨源联络一批将领、义士，决意推翻吴曦。被吴曦任命为丞相长史的安丙也有平乱之志，遂召杨巨源至卧所，对他说：“必得豪杰，乃灭此贼。”杨巨源慨然道：“非先生不足以举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与此同时，任兴州中军正将的李好义也密谋诛杀吴曦，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毫不含糊地表示：“此事誓死报国。”

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人结成反吴曦联盟。

吴曦还在做着蜀王的美梦，只是春梦了无痕，很快就要梦醒了。

开禧三年二月某天，李好义、杨巨源等七十四人闯入吴曦行宫。

当时行宫里有卫兵一千多人，若交起手来，李好义当然不是对手。但是李好义知道这些卫兵谁也不想为吴曦卖命，便喝道：“奉朝廷密旨，以长史安丙为宣抚使，令我诛反贼，若有敢反抗者夷其族。”听到这里，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于是杨巨源等闯入行宫，踢开宫门，把吴曦一刀两断，砍下头颅。从吴曦称蜀王到被杀身亡，仅仅只有四十一天。

吴曦败亡后，众人推安丙为四川宣抚使，并趁机出兵，收复和、成、阶、凤四州，西北之局势转危为安。

川陕是保住了，但东南的危机并未解除。

韩侂胄本来就不是岳飞、韩世忠之类的忠臣义士，他倡议北伐的动机与岳飞、张浚等人是不同。当年岳飞、张浚北伐，乃是出于拳拳爱国之心，志在光复社稷。而韩侂胄的动机则是政治投机，想趁金国内乱大捞一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故而张浚北伐虽然失利，但仍坚持抗战原则，反对议和。可是韩侂胄则不然，投机不成，便丧失立场了。在金兵的九路南侵的巨大压力面前，韩侂胄方寸大乱，赶紧又回到议和的立场。

在韩侂胄北伐前，金国原本就政局动荡，故而也没有能力继续向南宋进攻，同样倾向谈和。只是南宋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毁约背盟，这些令金人十分恼恨，在谈判中便狮子大开口，提出五大条件：其一，南宋割两淮之地予金；其二，添岁币银、帛各五万；其三，归还南逃之人；其四，南宋支付金国犒师银一千万两，也就是战争赔偿；其五，诛杀发动北伐的主谋。

对于这些条件，南宋使臣方信孺当然不敢答应。

方信孺回朝后，韩侂胄赶紧召他前来，询问和谈情况。方信孺说

了金人提出五项要求中的前四项，当谈及第五项时，他吞吞吐吐地说：“第五事不敢言。”韩侂胄一听心中大为不快，割地赔款你都说了，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便催着他答。方信孺只得硬着头皮答道：“欲得太师头。”时为太师的韩侂胄听罢不禁跳了起来，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韩侂胄已是恼羞成怒，老子的头是你金人要得的吗？大不了再决一战。不久后，方信孺以谈判不利，被贬官三级。韩侂胄撤换两淮制置使，打算继续与金人开战。

可是韩侂胄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他掌权这么久，屡兴党禁，打击异己，得罪的人太多了。若只是得罪朱熹这些理学家，尚不至于被拉下马，可是他竟然得罪了皇后。

宋宁宗的皇后韩氏本是韩侂胄的侄女，但韩皇后死得早，皇帝后来又立杨氏为皇后，韩侂胄本是外戚出身，担心杨氏为皇后对自己不利，遂多次反对，这下子便与杨皇后结下梁子了。

如今韩侂胄北伐大败，声名狼藉，金人又指名道姓要他的脑袋，早已是风光不再。杨皇后乘机指使皇子赵入禀皇帝：“侂胄再启兵端，将危及社稷。”宋宁宗对韩侂胄还是比较信任，起初并不理会。但杨皇后在一旁煽风点火，并指陈韩侂胄只是奸邪之徒罢了。皇帝耳根软，最后决定除掉韩侂胄。

由于韩侂胄势力庞大且手握兵权，要除掉他得谨慎行事，不然把他逼急了造反那就糟糕了。杨皇后请哥哥杨次山帮忙，在群臣中物色可以铲除韩侂胄的人选。这个人很好找，在此之前，就有一个人密禀皇帝诛杀韩侂胄以安邦定国。此人是礼部侍郎史弥远，他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史弥远得到密诏后，决定采取刺杀手段除掉韩侂胄。

十一月三日，史弥远派中军统制夏震埋伏于六部桥旁，韩侂胄上朝路经此桥时，被逮个正着。夏震将韩侂胄拖至玉津园，以锤击杀。

一代权臣韩侂胄，就这样命丧黄泉了。

韩侂胄死后，朝廷把他的人头砍下，携往金营向金人议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达成以下协定：其一，金国归还所占领的淮、陕之地；其二，改“叔侄之国”为“伯侄之国”；其三，币岁银帛各由20万增加到30万；其四，南宋支付战争赔偿银300万两。

开禧北伐，是南宋朝廷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发动的战争。韩侂胄严重低估对手的实力，再加上吴曦叛变的影响，遂造成全面溃败之局。韩侂胄因为发动这场战争而丧了性命，而南宋帝国也再度蒙羞，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

四四 北方变局：宋、蒙古、金三国演义

在韩侂胄北伐的这一年（1206），在北方斡难河源（蒙古乌兰巴托以东），蒙古诸部尊铁木真为大汗，称为成吉思汗。谁也没想到，在数十年后，蒙古将建立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帝国。很快，蒙古铁骑将横扫北方。

三年后（1209），蒙古攻入灵州，西夏向蒙古投降。此时金国皇帝金章帝去世，他的叔叔卫绍王继任皇帝。金国还以上国自居，卫绍王派使者前往蒙古宣读诏书，要成吉思汗跪拜接诏。成吉思汗问道：“金国新皇帝是何人？”金使回答：“乃是卫绍王。”成吉思汗不禁吐了一口唾沫，挖苦道：“此等庸懦之辈，也能当皇帝？何以要拜！”说罢骑着马，头也不回走了。从此之后，蒙古断绝与金国的关系。成吉思汗抓紧时间训练军队，准备发动对金国之战争。

自金世宗去世，金国便由盛而衰。虽说在与南宋的战争中，金国仍然占据上风，但那并非金国强，而是南宋太弱了。如今，金国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1211年（宋嘉定四年），蒙古大举伐金。金主卫绍王果然不是英雄之辈，他赶紧派人向成吉思汗求和，成吉思汗一口拒绝了。在蒙古铁骑的打击下，金兵溃不成军。蒙古人攻陷金国西京，金国西部诸州也纷纷落入蒙古人之手。成吉思汗的军队还一度攻到居庸关，大掠而去。

自金国开国以来，金国还从未如此狼狈过。

此后数年，蒙古人几乎年年对金国发动进攻，攻取大片土地。金国不仅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完全落入下风，还政局跌宕。1123年，卫绍王被右副元帅胡沙虎所杀，胡沙虎立完颜珣为皇帝，史称金宣宗。在蒙古人的步步紧逼之下，金宣宗于1214年迁都到汴京，即开封城。

然而蒙古人的攻势依然不减。1125年，蒙古人攻克金国北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西），之后再攻破中都燕京（今北京），甚至还有一支蒙古骑兵攻到距离汴京只有二十里的地方。此时的金国皇帝金宣宗，大概可以感受一下当年宋高宗失魂落魄的滋味了吧。

金国在北方的溃败，也严重影响其与南宋帝国的关系。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南宋帝国的故事。

自从蒙古大举入侵金国后，南宋朝廷当然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热闹。看到金人被蒙古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南宋朝廷索性把每年三十万两白银与三十万匹帛的岁币扣下，连续两年不交给金国。此时金国连年战争，损失惨重，需要用钱的时候，宋人却要赖账了，怎么办？

嘉定七年（1214），金章宗派使者到南宋，催促朝廷赶紧补交两年的岁币欠款。那么这笔款项，究竟要不要给金人呢？

理学名臣真德秀表示反对，理由如下：金人遭蒙古攻击，已迁都汴京。蒙古人意在消灭金国，既然蒙古骑兵可以越三关攻打燕京，自然也可以越过黄河攻打汴京。蒙古的兴起，乃是南宋帝国面临的最大忧患。真德秀总结道：“今当乘敌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当事变方兴之日，示人以可侮，是堂上召兵，户外延敌。”

可以说，真德秀此论颇有远见卓识，他早已看出蒙古人比金人更富侵略性，金国灭亡不可避免，宋朝应当做好自立自强的准备。以当时金国面临之窘境，绝难发动对南宋的大规模进攻，因而宋宁宗决定采纳真德秀的意见，停止对金国输纳岁币。

南宋的强硬态度，固然令金宣宗大为恼火，只是金国已是今非昔比，也只能干瞪眼了。到1215年秋，蒙古攻占的金国城邑已达八百六十二座。

对于金国来说，除了要面对蒙古人无休止的进攻外，还得面对另一个对手：红袄军。

中原沦陷后，汉人为反抗金人统治，起义此起彼伏，一直未断绝。在成吉思汗发动全面入侵金国的那年（1211），山东杨安儿乘机起事，杀掠金国官吏，开仓济贫，很快发展到了数十万人。

在杨安儿起义的鼓舞下，1214年潍州爆发李全抗金起义，起义军全部身着红衣，故而称为“红袄军”。在金兵的围剿下，杨安儿战败入海，坠水而死。杨安儿死后，他的妹妹杨妙真嫁给了李全，两支起义军合并。由于金国首先要对付蒙古的进攻，故而没法集中全力讨伐红袄军，始终无法消灭这支抗金武装。

这一时期的北方战局非常微妙，内中情况极其复杂，这里笔者只能长话短说。

1217年（嘉定十年），北方战局突然出现大变化。

在重创金国后，成吉思汗决定大举西征，把继续进攻金国的任务交给了木华黎。尽管金国仍然受到蒙古的攻击，但成吉思汗把主力悉数西调后，金国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已是大大减轻了。

金人打不赢蒙古人，如今稍有喘息之机，对南宋政府落井下石的背约行为十分恼怒，决定发兵侵宋，给宋人一个教训。这年四月，金兵越过淮河，攻光州、樊城、枣阳等地，同时在西北方向越过大散关，进攻和、阶、成诸州。淮河与大散关一直是宋金边界线，金兵企图先发制人，克敌制胜。

南宋政府不甘示弱。六月，宋宁宗下诏伐金，并在诏书中表示：“若能立非常之功，则亦有不次之赏。”

那么谁能立非常之功呢？

楚州知州应纯之想到了一支可资利用的力量，便是活跃在山东的红袄军。他密报朝廷，请求招纳红袄军，并建议朝廷利用蒙古打击金国之机，收复中原。

朝中宰相史弥远却不敢大举北伐。他心里最清楚，当年韩侂胄怎么死的，不就是贪功北伐，结果打不赢，敌人非要他的脑袋才肯议和。史弥远是策划杀韩侂胄的人，他可不想自己也落得个北伐不成反被杀的下场。因此在招纳红袄军一事上，他比较谨慎，密令应纯之对外不说招纳，以免金人找麻烦，但暗地里接收这支军队，拨给军粮，改称为“忠义军”。

不久后，红袄军领袖李全归附宋朝，被朝廷任命为京东路主管。

在往后几年里，金与南宋之间你一拳我一脚地在边界上交锋，各有胜负。

金国发动的一次比较大的进攻是嘉定十二年（1219）的入侵淮南之役。当时金国骑兵甚至打到了采石杨林渡，南宋建康府（南京）为之震动。忠义军在此刻发挥巨大作用，李全率领忠义军（即红袄军）抄截金兵后路，在涡口（安徽怀远）与金兵展开激战。在忠义军的顽

强阻击下，金兵不得不退师，李全乘势追击，大获全胜。鉴于忠义军之骁勇，金兵不敢再窥淮东。

淮南没能得手，金兵转而攻打枣阳。南宋守将孟宗政是一位出色的将领，他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坚守城池，金兵动用云梯、天桥、挖掘地道等手段攻城，始终未能得手。双方血战十五阵，在枣阳城下相持八十余日，金兵死亡三万余人，最终还是被孟宗政击败。

在孟宗政取得枣阳保卫战胜利的同时，忠义军首领李全为朝廷再立殊功。

在蒙古入侵与红袄军起义的双重打击下，金国在山东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蒙古人曾攻破山东益都，撤走后这里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带，曾经在当过府卒的张林趁机占据益都。张林颇有能耐，山东诸郡纷纷前来依附于他。当时李全率忠义军攻打齐州，金国守将献城投降。李全有意招揽张林，遂仅带数人入益都，与张林见面，劝他归顺朝廷。张林与李全十分投缘，两人遂结为兄弟。张林宣布山东十二郡七十余城归顺大宋朝廷，他上表称：“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

张林归顺后，南宋朝廷的腰杆更硬了。

嘉定十三年（1220），宋宁宗给淮东制置使贾涉下达诏令，要他招谕山东、两河豪杰志士抗金。同时，南宋四川宣抚使安丙还与西夏秘密交涉，相约共同出兵进攻金国。

这一段时间的战争十分混乱。在宋与金的战争，有夏与金的战争，有蒙古与金的战争，还有形形色色的义军，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总体上说，金国的处境最为不妙，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受到威胁。这时形势对南宋是有利的，山东、河北义军纷纷归顺，如果朝廷能因势利导，收复中原也是有可能的。

可惜的是，南宋朝廷缺乏像岳飞、张浚这样的将帅之才，难以驾驭前来归顺的义军首领。忠义军首领李全骁勇善战，为朝廷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可是他毕竟是出身绿林，难以管束，惹出不少事端。

张林与李全称兄道弟后，献出山东十二郡归顺南宋，但俩人很快就反目成仇了。当时张林在山东拥有几个盐场，这也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李全的哥哥李福要求分得一半盐场，张林不同意。因为利益问题，张林与李全兄弟闹翻，被逼无奈之下，索性投降蒙古人了。

张林叛变后，朝廷又不得不倚重李全以稳定山东局势。嘉定十五年（1222），南宋出师征讨张林，李全率军占领青州。朝廷为表彰其功，授予李全保宁军节度使之职，兼京东路镇抚副使。自占据青州后，李全拥兵自重，俨然一军阀割据势力矣。

朝廷一味以官爵羁縻绿林出身的李全，反倒令李全更加跋扈嚣张，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时任淮东制置使的贾涉便警告朝廷，李全骄暴难制。可是朝廷仍然幻想着利用李全的名望与才能，在山东、河北鼓动义军，抗击金兵。

贾涉去世后，朝廷委派许国为淮东制置使，也是李全的顶头上司。

许国对来自北方的忠义军向来轻视，采取种种手段压制，令李全极度不满。后来李全到楚州谒见许国时，又遭到他的冷遇。在李全返回青州时，许国又故意在楚州城外搞了一场大阅兵，参加阅兵的部队是十三万两淮马步军。此举是向李全示威，以示忠义军不过只是乌合之众罢了。

心高气傲的李全哪里忍受得了这种羞辱，遂心生杀机。他留部将刘庆福待在楚州，伺机除掉许国。刘庆福率自己部众作乱，许国被乱

军所伤后缢死，全家男女老少全部遇害。这件事背后的主谋就是李全，当朝宰相史弥远当然心知肚明，但他深恐李全叛变，不仅没有任何责罚，反倒极力安抚。

杀死堂堂两淮制置使，李全居然毫发无损。

朝廷越怕事，李全越胆大妄为。

在许国死后，李全的野心更大，妄想吞并其他的忠义军。除了李全之外，还有几支被朝廷招安的忠义军，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彭义斌。彭义斌是著名的义军领袖，曾率部收复京东州县，经略河北，战功颇著。李全写信给彭义斌，要求他接受其节制。彭义斌把李全的信使斩首示众，并宣布李全罪状：“背国厚恩，擅杀制使。”两支义军的火并已是不可避免。

李全先发制人，率军进攻彭义斌，岂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被彭义斌打得大败。彭义斌收编李全的降卒后，实力更加强大。他向朝廷建议：“若不诛杀逆贼李全，收复中原无望。”由于李全横行霸道，南宋诸将早就看他不顺眼，特别是擅杀许国后，更是大失人心。诸将纷纷表示支持彭义斌的建议，出兵讨伐李全。然而宰相史弥远担心局势失控，未予批准。

不久后，彭义斌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兵败，不幸被俘殉难。彭义斌之死，对李全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此时的山东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了。

山东原本是金国的地盘，此时金国的势力几乎已经全部被扫出山东，蒙古人与忠义军各控制一部分地盘。在此之前，蒙古只对金国开战，并没有对南宋开战。现在蒙古人与忠义军势力相交错，战争便难以避免了。我们在前面说过，忠义军为南宋朝廷所招抚，但仍然是属于义军性质的编外部队。

擒杀彭义斌后，蒙古人转而攻打李全的忠义军。李全固守青州，蒙古人采取围困手段，断其粮援。青州被蒙古人围困达八个多月，李全粮尽援绝，于宝庆三年（1127）五月突围，遭到蒙古人的截击，损失七千余人，被迫退回城内。无奈之下，李全最终向蒙古人投降。

南宋朝廷本想借用忠义军的势力，图谋山东、河北，岂知最后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随着彭义斌败亡、李全降蒙古，南宋在淮河以北的势力扩张停顿。可以说，南宋朝廷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没能乘蒙古、金战争的有利时机渔翁得利，这也反映出当时南宋政府之无能。有一个人难辞其咎，他就是执掌大权达二十六年之久的权相史弥远。

四五 一手遮天：政坛不倒翁史弥远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权臣特别多。

先是有秦桧，后来又出了一个韩侂胄，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史弥远。

在诛杀韩侂胄的行动中，史弥远立下首功，同时也深得杨皇后的信任。有皇后为靠山，史弥远很快从礼部侍郎跃迁为帝国宰相。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博取人心，消除韩侂胄的影响，他大力为所谓的“伪学党人”平反昭雪。恢复赵汝愚、朱熹、彭龟年、吕祖俭等人的名誉，并招揽理学名士入朝。当然，史弥远推崇理学与当初韩侂胄打击理学，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借此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力。

史弥远在宋宁宗时当了十七年的宰相，在宋理宗时又当了九年宰相，身居相位二十六年，权势之大，无人可及。

在史弥远当政的前几年，由于南宋帝国刚刚与金国缔结和约，两国恢复和平，故而帝国倒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可是从嘉定十年（1217）开始，宋金战火重燃。此时金国正遭受蒙古人的猛烈打击，形势对南宋十分有利。史弥远却未能放手一搏，显得畏首畏尾。甚至在招抚红袄军及其他中原义军时，也不敢公开化，深怕得罪金人。史弥远的这一政策是非常失败的，以李全为代表的忠义军始终是体制外的军队，未能编入政府军，故而政府对忠义军的控制力度始终有限，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显然，史弥远更关心的问题，乃是自己的权势与地位。

表面上看上去，史弥远的地位固若金汤。当初诛杀韩侂胄时，他与杨皇后、皇子赵结为同盟，不久后，赵被立为皇太子（改名为赵询）。倘若事情顺顺利利，那么宋宁宗百年之后，赵继任皇帝，史弥远的权势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皇太子居然比皇帝死得早。

嘉定十三年（1120），皇太子赵病死，这无疑给史弥远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宋宁宗曾有几个儿子，但都死得早，被册立为太子的赵也不是他的亲生子。现在连赵也死了，以后谁来接班呢？皇帝只得从宗室中挑选继承人，挑来挑去，选中了宋太祖的十世孙赵竑。

对于赵竑这个人，史弥远既不熟悉，也不知其底细。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史弥远打探到赵竑喜欢弹琴，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花大银子买了一个善于弹琴的美女，献给赵竑。这个女子知书达理，且聪颖过人，很快便得到赵竑的宠爱。可赵竑哪里知道，该女子其实是史弥远安插在其身边的眼线。

相处时间既久，赵竑对美女愈加信任，常向她倾诉心声。这位皇帝的接班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作为权力核心之人，谈情说爱乃是奢望，他无条件地对宠爱的女人推心置腹，却被这个女人出卖了。

作为赵宋宗室，赵竑对史弥远独揽大权、专横独断耿耿于怀。有一回，他心血来潮，指着墙上一幅地图上所标的琼厓，对心爱的女人说：“他日我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更有甚者，他还给史弥远起了一个绰号，叫“新恩”，“新”指的是新州，“恩”指的是南恩州，这两个州都是当时放逐大臣的流放地。言下之意，待赵竑当上皇帝后，他就

要把史弥远踢出朝廷，流放到南方去。

这些话很快便通过美女间谍传到史弥远耳中，史弥远听后不禁毛骨悚然。怎么办呢？首先他想到讨好赵竑，改善关系，博取他的好感。于是他收罗了一些奇珍异宝，送给赵竑。偏偏赵竑不领情，这位温室中长大的皇子显然缺乏圆滑的政治手腕，喜怒形于色，好恶分明。他假装喝醉酒，把史弥远送来的奇珍异宝打碎在地，用这种直接的方式拒绝了宰相的讨好。此举固然快意，但赵竑却低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低估了史弥远玩弄权术的本领。

史弥远冷笑了：就凭你小子能扳倒我吗？鹿死谁手还没定论呢。

从那天始，史弥远把赵竑当作一号敌人，他必须阻止赵竑登上皇帝的宝座。

赵竑是皇位继承人，想要整垮他，就必须抬出另一个继承人人选。史弥远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被立为沂王的赵昀。

如何推赵昀上位呢？史弥远苦苦思索。

这时，一个机会出现了，皇帝要给沂王赵昀找一位老师，史弥远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史弥远与国子学录郑清之的关系不错，他便找郑清之密谈：“皇子（赵竑）不能担当重任，我听说沂王（赵昀）十分贤明，现在正要挑选一名讲官，你去好好训导他吧。”这个意思说得相当明白，就是想让赵昀取代赵竑，让郑清之去沂王府当内应与参谋。

你想想，郑清之本是个学者，突然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他有几分害怕。史弥远把话说明白了：“事成之后，我史弥远的位置就是您的。不过您要记得，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出于我之口，入于君之耳，若是有一语泄漏，那么我与您都要被族诛了。”听到这里，郑清之心头一颤，连声道：“不敢不敢。”就这样，史弥远以利诱加威胁的

手段，把郑清之拉入到这场政治阴谋中。

在史弥远的推荐下，郑清之顺利进了沂王府，当了赵昀的老师。史弥远知道，要扶赵昀上位，硬件上得达到要求才行。什么硬件呢？必须要能写好文章，还得要有一手好书法。宋代极其推崇文化，历代宋帝都有非常高的文化修养，甚至还出现宋徽宗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留名的大家。赵昀本非宋宁宗的亲生子，倘若才艺不过关，要当上皇帝那绝对不可能。

在郑清之的悉心教导下，赵昀的文章、书法都有长足进步，连史弥远都赞不绝口。但史弥远还不放心，又问郑清之，赵昀之贤明究竟到什么程度。郑清之这样回答：“其贤明之处，我不能一一列举，然而可以一言断之：不凡。”赵昀乃是非凡之人，听到这里，史弥远不禁捋须点头，脸上流露出一得意神情。只要赵昀不凡，那么便有机会取代赵竑。

转眼间已是嘉定十七年（1224），宋宁宗终于听到死神的召唤。

宋宁宗病危之际，史弥远加紧废立步伐。

要立赵昀，首先还得赵昀自己愿意才行。史弥远令郑清之把废立计划告诉赵昀，明白地告诉他，要废掉赵竑，立他为皇帝。赵昀听完后，默不作声，郑清之急了，一而再地催促。可是赵昀仍然一言不发。要知道皇帝的位置固然很有诱惑力，可是搞不好，皇帝没当上还得掉脑袋。赵昀一声不吭，老师郑清之几乎要哀求他了：“您不答一语，清之将如何向丞相复命？”此时赵昀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绍兴老母尚在。”

郑清之没办法，只得把赵昀的这句回答告知史弥远。史弥远听罢却暗暗称奇，心想此人确有不凡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赵昀对当皇

帝一事，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这十分明智。倘若赞同了，政变失败不免人头落地；倘若反对，史弥远说不定要除之灭口。干脆不吭声，这叫进可攻，退可守。

对史弥远来说，赵昀不反对就够了。

闰八月初三，宋宁宗去世。

史弥远开始行动了。

此时杨皇后的态度至关重要，史弥远早有准备，收买了杨皇后的侄子杨石、杨谷。杨石、杨谷遂入宫禀告皇后，请求废掉赵竑、改立赵昀。杨皇后听了不禁愕然道：“皇子赵竑乃先帝所立，岂敢擅变？”坚决不答应。杨石、杨谷只得悻悻而退，回禀史弥远去了。这天晚上，对史弥远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夜，他必须尽全力赌上一把。他令杨石、杨谷再入宫固请废立之事，一夜之间往返七次。在史弥远的坚持下，杨皇后最终被迫做出让步，答应立赵昀为皇帝。

史弥远闻讯后大喜，立即遣人前往迎接赵昀入宫。他还担心去的人搞错，还特地交代说：“现在宣旨入宫的是沂王府的皇子（赵昀），不是万岁巷的皇子（赵竑），不要搞错了，否则都要处斩。”

赵昀入宫后拜见杨皇后，杨皇后抚着他的背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儿子了。”就这样，赵昀在宋宁宗灵柩前继位，史称宋理宗。

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老谋深算的史弥远最终成为胜利者，姜还是老的辣，赵竑在政治上还是太嫩了，最后一刻居然被掀翻在地。

赵竑丢了皇冠后，被封为济王，赐第湖州。

当时湖州有一名志士，名叫潘壬，他听闻史弥远一手遮天，擅行废立之事，心里愤愤难平，打算起兵谋立济王赵竑。潘壬知道自己的

实力不够，便派人与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系，求他援助。李全满口答应，并与潘壬约定起兵时间。其实李全并非真心拥护赵竑，只是想搞政治投机罢了，当他发现潘壬一伙人只不过是乌合之众时，便打消了起兵的念头。

到了约定的起义时间，李全的忠义军并没有出现，潘壬所拼凑的部队，不过是只有千来人的贩夫走卒，哪能成得了大事？很快，潘壬的起义被迅速镇压下去，毫无悬念。潘壬不仅自己送了命，还连累了济王赵竑。史弥远深感赵竑不除，后患无穷，便诈称赵竑生病，派亲信余天锡带着太医到湖州为他治病。治病只是幌子，余天锡到了湖州后，假传谕旨，逼赵竑自杀，对外则宣称是病死。

史弥远果然胆大妄为，先是废掉赵竑，又逼其自杀，岂能不激起朝中正直大臣的义愤呢？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纷纷上书为赵竑鸣冤。但鸣冤有什么用呢？史弥远杀赵竑，宋理宗这皇位坐得才踏实，谁是赵竑之死的得益者，这不是很明白吗？

在皇帝的庇护下，史弥远的权势未受任何动摇，即便杀了济王赵竑仍逍遥法外。

但是却有一人让史弥远头疼，这个人就是李全。

当初为了利用山东抗金力量，史弥远令边将暗中招抚抗金义师，并冠以“忠义军”之名。起初忠义军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其中战绩最辉煌的就是李全。然而随着势力的膨胀，李全野心越来越来，越来越难约束。他先是逼反张林，后又擅杀两淮制置使许国，接着又攻打彭义斌，最后投降了蒙古人。

李全投降时，他妻儿及哥哥李福尚在楚州。与李全结仇的张林乘机回到楚州，大开杀戒，杀死李全之子李通、哥哥李福与爱妾刘氏，

向朝廷邀功。得悉消息后，李全大为悲恸，向蒙古人请求率兵南下。蒙古人起初不答应，李全断指发誓道：“李全倘若再回归南朝，有如此指。”于是改服蒙古衣冠，发兵下淮南，占领楚州。

此时的李全，已俨然成为中原一大势力。为了拉拢李全，蒙古、金与南宋都开出大价码。蒙古有经略天下之志，但光靠蒙古人是不够的，必须倚重汉人降将，于是授予李全山东行省，把山东的军政大权都给他。金国以“淮南王”的封爵招揽李全，遭到李全的拒绝。南宋宰相史弥远到这个时候，仍然主张以招抚政策羁縻李全，打算授予他彰化、保康节度使兼京东镇抚使之职。然而史弥远虽是弄权之人，对付李全却毫无办法，李全不仅一口回绝，还嘲讽道：“朝廷待我如小儿，啼乃授果。”

李全本来狡智之徒，虽拒绝史弥远扔给他的官衔，却不拒绝南宋给他的粮饷。在李全问题上，史弥远是难辞其咎，一味给好处，最后的结果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南宋还在拨粮饷给李全，李全却拿来大造舟师，积极为侵宋做准备。南宋前方将士直呼看不懂：“朝廷唯恐贼不饱，教我辈何力杀贼？”

史弥远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绍定三年（1230），鉴于李全已经不可能招抚，史弥远才转变态度，奏请皇帝下诏停给钱粮，讨伐李全。李全恼羞成怒，进攻扬州以索取钱粮。宋将赵范、赵葵率一万四千人守城，怒斥李全道：“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绝汝钱财。”李全虽然骁勇善战，然而自从他投降蒙古后，其部下离心，无心与南宋军队作战。李全在扬州城下大败，率数十骑仓皇而逃，不料半途却陷入泥淖中，被宋军追上后当场格杀。

李全败亡后，赵范、赵葵乘势进剿其残部，以十万之众攻破盐城，继而再下楚州，李全余部皆降。至此，李全之乱方被平定。

史弥远本来想笼络李全，利用义军以进取中原，不料最后却搞得乌烟瘴气，令两淮百姓深受其害。这位帝国权臣在朝廷之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在对外政策上却极度无能，白白错失进取中原的有利时机。与此同时，蒙古的崛起不可阻挡，南宋朝廷要何去何从呢？

四六 联蒙灭金：海上之盟的翻版

蒙古人正在缔造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帝国。

1219年，成吉思汗开始大举西征。

这次西征历时七年，攻略范围之广，取得战绩之伟大，足以震动世界。蒙古骑兵战无不克，攻无不胜，狂风暴雨般地扫荡亚洲大陆。在征服西域诸国后，蒙古之势力扩张至中亚。成吉思汗本无意继续西进，岂料中亚伊斯兰大帝国花刺子模国擅杀蒙古使者，成吉思汗大怒之下，遂继续向西挺进，征服花刺子模及附近小国。又遣大将速不台征服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地，而后越过高加索，打败基辅大公统率的俄罗斯诸部，兵锋直抵顿河流域。

西征归来后，成吉思汗集中力量攻打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在立国二百多年后，被蒙古所灭。同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去世。成吉思汗在去世前，对未能在有生之年灭掉金国而引以为憾，他临死前留下灭金战略：“金精兵在潼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必自潼关以数万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必败。”这足见成吉思汗深邃的战略眼光。

成吉思汗去世四年后，即公元前1231年（绍定四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依成吉思汗遗策，计划兵分两路进攻金国首都汴梁（开封），一路由窝阔台统领，自黄河北岸渡河进攻；另一路由拖雷统领，借道南宋汉中，迂回到唐州、邓州，进而包抄汴梁城。

窝阔台的计划不错，但出了差错。

蒙古派使臣前去与宋军商量借道之事，岂料南宋将领张宣竟把蒙古使臣杀死。托雷大怒，挥师入大散关，破凤州，围兴元，南宋军民伤亡惨重。之后，拖雷引兵东向，攻破饶风关，向汴京挺进。原本是欲借道汉中，最后成了强行以武力通过南宋地盘，虽与预定的计划不同，但蒙古人还是顺利完成对汴京的夹击之势。

当时窝阔台的部队已抵汴京附近，金哀宗急令邓州守将完颜合达率步骑十五万人增援汴京。金国人尚以为蒙古主力在汴京以北，岂料拖雷的部队绕道汉中后，已经抵达唐州、邓州了。拖雷马上集中兵力，追击这支十五万人的金国大军。完颜合达急着赶往汴京，无心与拖雷会战，且战且行。然而大雪阻止了金兵的前进，拖雷的蒙古军队终于赶上来，包围金兵。当时金兵距离钧州只有三十五里距离，拖雷故意围三缺一，让金兵往钧州方向逃窜。这一逃，金兵阵形全乱，蒙古人乘机前后夹击，大破金兵。

窝阔台得知拖雷与金兵交战，便派遣一支部队前来相助。援军尚未到，拖雷就大败对手了，于是两支军队合师进攻钧州。此时金兵精锐皆丧，岂能挡得住蒙古铁骑。钧州一役，完颜合达与其他金兵重要将领全部战死。完颜合达是金国名将，他的部队也是精锐之师，还没到汴京便被消灭了。

从此，金国大势已失矣。

在蒙古铁骑的扫荡下，金国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很快，金国的商、陕、洛、睢等州纷纷落入蒙古之手，军事重镇潼关举旗投降。

可是在进攻汴京时，蒙古人却遇到大麻烦了。

汴京城池坚固，为了破城，蒙古人从太湖及灵璧运来大量的假山

石，大小约一斤重，以投石炮轰城。蒙古人的投石炮可击穿铁甲，他们在每一个城角外都置炮轰机。短短几天的时间，蒙古炮所轰出的石块，几乎堆得与城墙一样高了。

可是金国的武器更厉害。

金国自占据中原后，利用中原先进的科技装备军队，火器水平相当高。在汴京之战中，蒙古人最惧怕金人的震天雷与飞火枪，震天雷是一种火炮，以铁罐盛药，用火点燃，炮声震天，故名为震天雷。蒙古人攻城十六天，死亡上万人，仍无法攻破。此时已近夏季，天气渐热，负责攻城的蒙古大将速不台心知汴京不易攻下，遂同意与金国媾和，暂时撤围退兵。

蒙古派唐庆为特使入汴京，唐庆仗着是胜利者一方，到了汴京后出言不逊，狂妄无礼，并要求金哀宗须亲自前往蒙古谈判。唐庆的傲慢惹怒了金国人，当天夜晚，部分金兵哗变，杀死唐庆及蒙古使团。此举固然快意，却令和谈破裂，金国由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为了灭掉金国，窝阔台决定联合南宋，共同出兵。蒙古派王楫为特使前往南宋襄阳城，谒见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商议联合出兵事宜。史嵩之赶紧向朝廷奏报，朝臣们一商议，纷纷表示机不可失，应该答应蒙古人，灭了金国，一雪靖康之耻。

只有一个人表示异议，淮东安抚使赵范警告说：“宣和时，海上之盟，初约甚坚，后卒取祸，不可不鉴。”当年宋朝不也跟金国结盟灭了辽国吗？后来怎么样呢，自取其辱罢了。可是宋理宗不理睬，仍然令史嵩之遣使报蒙古，并要求灭掉金国后，宋朝收回河南之地。

金哀宗感到大事不妙，汴京城怕是守不住了，他决定东逃，逃往归德（河南商丘）。速不台得知金哀宗东逃后，遂进兵再度包围汴京。

经过四个月的围困，蒙古人终于攻下汴京。

这时的金哀宗已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天地广阔，可是他要逃到哪儿呢？

当时镇守唐州、邓州的金国将领武仙、武天锡等，认为要避开蒙古人的兵锋，重振金国声势，最好的去处，莫过于易守难攻的川蜀。若是能攻破川蜀以迎金帝，那么金国尚有一线生机。于是武仙、武天锡出兵入侵南宋的光化（湖北襄阳北），试图打开通往川蜀之路。

金兵的入侵，遭到南宋军队的迎头痛击。

镇守于此的南宋守将孟珙，是孟宗政的儿子。孟宗政曾在宋金战争中与金兵相持于枣阳八十余日，杀敌三万，威震四方。孟宗政打败金兵后，唐州、邓州一带汉人纷纷前来投奔，他从中挑选两万名壮士，编为“忠顺军”。孟宗政去世后，其子孟珙被朝廷任命为京西路兵马钤辖，驻守枣阳，同时也接替父亲成为忠顺军的统帅。

孟珙与岳飞、吴玠一样，极富军政才干。他屯守枣阳期间，修建水利工程，开拓田地，边关得以丰饶。为了对付女真、蒙古的游牧骑兵，他极其重视马匹的饲养，发动忠顺军将士每家每户都养马，官府拨给马粮，因此马匹数量增长很快，也令孟珙拥有一支精锐的骑兵。

在得知金兵入侵光化后，孟珙立即率军迎战，首战告捷，斩金将武天锡。紧接着，孟珙攻克顺阳，金兵统帅武仙败走马蹬山。

当时有一个名叫刘仪的金国将领向孟珙投降，孟珙详细询问金兵在马蹬山的戒备情况。探明敌情后，孟珙率领大军，兵围马蹬山。武仙一直轻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哪里料想得到孟珙的部队如此生猛。经过六天的战斗，金兵在马蹬山的九个据点，已经被孟珙攻破七处，阵亡金兵的尸体，更是堆积如山。

本想偷鸡，不想反蚀把米。金兵已陷入重围，统帅武仙自己带着五六名骑兵逃命去了，剩下的七万人，全部向孟珙缴械投降。

孟珙这次辉煌的胜利，打碎金人窥蜀之梦。金哀宗只得另找落脚点，最后他选择了蔡州（河南汝南），这里也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站。

想当年，女真兴起于黑水白山之间，灭辽伐宋，雄视天下，何其壮也。只是彼一时，此一时，好汉也不能提当年勇了。金国绝大部分土地已落入蒙古之手，连首都也被攻陷了，金哀宗成了落魄皇帝，不仅没了奢华宫殿，连吃饭都成问题。

金哀宗的想法与窝阔台一样，想拉拢南宋。他派人前往南宋，两个目的：其一是借点粮食；其二是说明宋金联手的必要性。金哀宗是这样说的：“今蒙国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乃为我及彼也。”这是警告宋朝，蒙古乃是狼子野心，只有宋、金联手，才能自保。

对于金哀宗的话，宋理宗懒得理会。

宋朝一直受金国欺负，就算议和，要么称臣，要么称侄，何其辱也。现在你金国已是落水狗，你别居高临下训导我。其实金哀宗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宋与蒙古并无世仇，与金则有不共戴天之仇，本来就非唇齿相依，何来唇亡齿寒呢？

宋理宗非但不借粮给金人，还盘计着履行与蒙古人的约定。倘若宋朝不赶紧出兵，等蒙古灭了金国，想讨回河南地也不可能了。此时窝阔台已经派遣都元帅塔察尔进攻蔡州，宋理宗诏令孟珙率忠顺军主力前往助战，与蒙古人夹击蔡州。

孟珙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忠顺军两万余人，携三十万石粮食，开

赴蔡州。孟珙的到来，令塔察尔大喜过望，马上着手准备攻城器械，开始攻城。蒙古军攻城的北面，孟珙攻城的南面。蔡州的防御工事本来就远不如汴京，粮食又严重缺乏，已是孤城一座，如何抵挡得住蒙、宋两国之夹攻呢？

端平元年（1234）正月，蔡州在顽强抵抗三个月后，终于被攻陷。金哀宗自缢身亡，其部下将其尸体火化。被金哀宗指定为继承人的完颜承麟也未能幸免，被乱军所杀。至此，金国灭亡。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到金哀宗亡国，金国历史共计一百二十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蔡州即将沦陷之时，南宋权臣史弥远去世。

史弥远弄权二十六年，竟得以善终，也算是个幸运的人。由于宋理宗是史弥远一手扶植上台的，故而对这位权臣恩宠不衰。史弥远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婿以及五个孙子，都封官进爵。当然，宋理宗这样做，也是因为对史弥远怀有某种畏惧心理，他既有能力立皇帝，也有能力废掉皇帝。

在登基九年之后，宋理宗终于有出头之日，开始摆脱史弥远的影响，亲自主持政事。他把年号改为“端平”，并把史弥远的私党清理出朝廷，同时给冤死的济王赵竑平反，恢复其官爵。

史弥远的时代过去了，朝廷中的乌烟瘴气稍稍散去。此时又传来攻破蔡州、金国灭亡的好消息，更是举国共贺。百年宿敌灰飞烟灭，百年国耻终得一雪。正是福无双至今日至，南宋军民似乎已经看到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

金国灭亡后，蒙古、宋议定，以陈蔡西北地为界，以北归蒙古，以南归南宋。根据这个议定，南宋得到一部分河南地，与预期相差甚

远，特别是河南三京，即东京开封（汴京）、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一个也没能收回。

曾经平定李全之乱的宋军将领赵葵、赵范抛出一个计划：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就是把大宋的边界线北推到黄河、潼关一线，收复三京之地，抚定中原。

河南经过多年战争，城池残破，十室九空，蒙古人虽取得陈蔡以北的土地，却无心栈留，主力已经渡河北返。南宋军队若此时出兵，占领空城并不难，但此举无异于对蒙古宣战，故而引起朝臣与边将们的极力反对。然而皇帝与宰相郑清之则好大喜功，全力支持赵葵、赵范的计划。

蒙金战争刚刚落下大幕，蒙宋战争又要一触即发了。

四七 反目成敌：蒙宋战争

端平元年（1234）六月，南宋军队开始行动。

首个目标，就是收复故都汴京（东京开封）。南宋派出两支军队直取汴京，一支由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领，共一万人；另一支由淮东制置使赵葵统领，共五万人。守卫汴京的是投降蒙古的金国降将崔立，此人声名狼藉，素为汴京军民所厌恶。崔立部将李伯渊、李琦等人风闻南宋军队欲收复汴京，便刺杀崔立，打开城门迎接全子才。

汴京在沦陷104年后，又回到宋人之手。

这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全子才收复汴京后半个月，赵葵率领的五万主力军前来会师。赵葵对全子才大为不满，抱怨说：“汝师到此已半月，不急攻潼关、洛阳，尚待何时？”

全子才答道：“粮饷未集，如何发兵？”

赵葵怒道：“现在蒙古兵还未到，正是乘虚而入的机会，若等朝廷发饷，恐怕蒙古人早南下了。”

全子才没办法，只得率徐敏子率军前去攻取洛阳，另派杨谊率军作为后应，两路人马都只携带五日口粮。徐敏子抵达洛阳时，洛阳早已是一座空城，没有军队驻守，全城只有三百家人。西京洛阳轻而易举收复了，然而这不过只是昙花一现罢了。

蒙古军队很快杀回来了。

策应徐敏子的杨谊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人，行至洛阳以东三十里处，忽然遭到蒙古人的袭击。杨谊被突如其来的蒙古人打得晕头转向，向南逃窜，蒙古人追到洛水河畔，宋军大量士兵在抢着渡河时溺水身亡。击败杨谊之后，蒙古人转而进攻洛阳。徐敏子率部苦战，起初还胜负相当，但宋军的粮食很快消耗一光，如何再战？无奈之下，徐敏子只得放弃洛阳。

蒙古军攻下洛阳后，一路向东，直取汴京。汴京守将赵葵、全子才多次催促朝廷运送粮饷，但望穿秋水，粮饷却迟迟未到。蒙古人从汴京城外决黄河引水灌城，宋军本来就饥饿难战，又被洪水淹死不少人。赵葵、全子才无力回天，只得放弃汴京，狼狈而逃。

从收复汴京到放弃，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这样，南宋发动的“守河据关，收复三京”的军事冒险计划，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纵观宋朝历史，可以发现宋朝廷在外交上一直很被动，要么懦弱，任人宰割；要么逞强，打肿脸充胖子。稍有挫折，便自信心崩溃；稍有收获，又自尊心膨胀。联金灭辽与联蒙灭金有许多相似之处，宋朝都是以弱势的一方联合强势的一方，获取若干利益。其实无论是灭辽还是灭金，宋朝都出力甚微，但是灭掉对手之后，又想捞取更多好处，结果就得罪了势力强大的盟友。

宋军从洛阳、汴京败退后，蒙古马上遣使者赴宋，指责南宋朝廷负约背盟。从此以后，在河淮一带，战火又要熊熊燃烧了。

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大举南侵，蒙宋战争爆发。

蒙古兵分三路：西路军由阔端统领，进攻川蜀；中路由库春统

领，进攻襄阳；东路军由温不花指挥，南下江淮。

且来看看蒙古人三路出击的情况。

先说西路军。

阔端入侵川蜀的路径，与当年金兵相仿，乃是由陕入川。首战沔州（陕西略阳），宋知州高稼孤军无援，力战而死。继而蒙古军兵围青野原，利州统制曹友闻连夜前往救援，截击蒙军，解青野原之围。蒙古先锋汪世显率军攻打大安（陕西宁强北），又被曹友闻击退。为了阻止蒙军入川，曹友闻驻守于当年吴玠大破金兵的仙人关，严阵以待。

在数个月的相持后，蒙军攻入兴元（陕西汉中），直趋阳平关。曹友闻率军救援，不想天公不作美，狂风暴雨突至，蒙古乘机围攻宋军，曹友闻兵败，捐躯沙场。曹友闻一死，由陕入川的通道洞开，蒙军长驱直入。

自吴玠、吴玠守川蜀以来，百余年来，四川境内倒还是比较太平。如今蒙军突然杀到，各州府备战不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川境内大半州府居然都落入蒙军之手。蒙古人只是在进攻文州时，才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文州军民在知州刘锐、赵汝乡的领导下，固守一个多月。蒙军切断汲水道，全城断水，又盼不到援军，最终被攻破，死数万人。

蒙军统帅阔端又收买吐蕃部落，联合攻陷成都。不久后，阔端得悉皇子库春的死讯，遂放弃成都。宋军这才陆续收复成都及川西一些州府。

再来看看蒙军在中路的进展。

中路蒙军在库春的率领下，先取攻枣阳，而后进攻郢州。郢州（湖北钟祥）临汉水，城池坚固，蒙军便大造木筏，从水面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宋军顽强抵抗，江陵统制李复明战死，但蒙古人最终没能攻下该城。

可是这个时候，襄阳却出了大乱子。

原来襄阳守军内部向来分裂为两派势力，一为北军，一为南军。北军将领的权势在南军之上，故而两派不和。镇守襄阳的京湖制置使赵范驾驭无方，竟使得北军将领王旻、李伯渊等人起了反叛之心，抢了襄阳城郭的仓库，然后放一把火烧了，投降蒙古去了。南军将领李虎等人，又乘火大掠一番，也扬长而去。赵范回天乏力，只得弃城而走，襄阳遂为蒙古所占领。

自从岳飞收复襄阳城后，这里一直是南宋的军事重镇，城高池深，固若金汤，而且储备有财粟三十万，军械武器二十四库，就算被围困几年都不成问题。经过这般折腾后，经年累月的积贮，付诸东流矣。

襄阳失陷后，均、房、随、郢诸州也先后沦陷。

只是后来统帅库春病死于军中，蒙古人在中路的攻势方才告一段落。

最后来看看东线战事。

温不花大举南下，兵锋直指唐州，曾经收复汴京的全子才弃城而逃。当蒙古军队进入淮西时，南宋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蘄、舒、光三州的守将均弃城而逃，大量的兵马粮械都落入蒙军之手。温不花兵

分两路，一路进逼黄州，一路进逼合肥。

此时的宋理宗颇为挑起战端懊悔，他把积极主张收复三京的宰相郑清之罢免，又下了一道罪己诏。只是如今反悔也迟了，首要任务还是得遏制住蒙古人潮水般的进攻。皇帝任命史嵩之增援光州，赵葵增援合肥。

史嵩之得知蒙古人已攻至江陵（湖北荆州），派遣孟珙率军前往救援。

孟珙是南宋军队中第一号将才，在破蔡灭金之战中功绩卓著，受到宋理宗的接见。宋理宗询问孟珙对议和的看法，孟珙答道：“臣系武夫，理当言战，不当言和。”宋理宗点头称善，遂命孟珙率部驻扎黄州。孟珙到黄州后，仍然开荒田修水利，搜访军实，增置兵寨，黄州已俨然成为一军事重镇。

此时温不花的蒙军主力正向黄州挺进，攻至江陵。孟珙奉令前往援救，他见蒙军人多势众，遂采取疑兵之计，先令部将张顺渡江，自己率主力随后，过了江后，又密令士兵不断变换衣服旗号。到了夜晚，又命人在江岸高举火炬，数十里相接，营造宋军人数众多的假象。蒙古人果然中计，不知宋军究竟来了多少援军。孟珙乘机发动进攻，连破蒙军二十四寨，救出难民二万余人。

在孟珙取得江陵之役胜利的同时，宋军在真州保卫战中 also 击败强敌。

真州知州丘岳也是个人才，能文能武。他执军严明，守备周详，蒙古进攻真州，屡攻不下。丘岳并不单纯防御，他守中有攻，预设伏兵后诱敌来攻，等敌人追来时，以震天雷之类的火炮伏击，令蒙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引兵退去。

至此，蒙古对南宋的第一波攻击结束。

蒙宋战争暂时缓和，主要原因是蒙古正全力西征。

蒙古的西征与南侵是同时进行的。这次西征的规模与范围，较成吉思汗的第一次西征还要大。蒙军在荡平中亚后，挥师入俄罗斯，征服南俄平原，而后攻陷基辅，继续西进，入波兰境内。在蒙古铁骑的疯狂进攻下，全欧洲震动，蒙军大败波兰与日耳曼联军于利格尼兹，大败匈牙利军于萨约河畔。而后进军维也纳，兵锋直抵南欧。直到窝阔台去世，蒙军才从欧洲撤军。

因为西征的缘故，蒙古人对南宋的进攻并没有尽全力。蒙军在江陵、真州受挫后，进攻势头明显减弱了。即便如此，蒙古仍不时给南宋施加军事压力。

嘉熙元年（1237）十月，温不花卷土重来，再破光州，攻占复州。但是在进攻黄州时，又被孟珙打败了。

这时的孟珙已经成为宋军胜利的旗帜。蒙古人纵横天下，罕有对手，孟珙则是为数不多能屡屡战胜蒙古军的将领。朝廷迁孟珙为荆湖制置使，并诏令他收复襄阳、樊城。嘉熙二年（1238）冬，孟珙开始展开反攻，收复鄂州、荆门。次年孟珙挥师北上，进攻襄阳、樊城，与蒙军交战三次，三战三捷。襄阳守将刘义反正，打开城门迎接宋军。

孟珙的这次反击，取得赫赫战果，收复襄阳、樊城、信阳、光化、息、蔡等地。襄阳、樊城地处南北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孟珙上书朝廷：“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得之，当加护理，非甲兵十万不足守。”朝廷对孟珙的意见十分重视，遂命他把襄城、樊城两地的降兵收编为“先锋军”，把息、蔡两地的降兵收编为“忠卫军”。

襄阳刚刚告捷，四川却频频告急。

蒙古大汗窝阔台由于全力西征，想与南宋媾和。嘉熙二年时，蒙古派使臣抵宋，提出议和条件：南宋朝廷每年输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与往常一样，朝廷又出现主和与主战两派的对立，史嵩之力主议和，而李宗则认为主和“不无退缩之意，必致虚损岁月，坐失事功”。皇帝对此犹豫不决。

和议迟迟未有进展，孟珙又乘机收复襄樊。窝阔台大怒，决意大举攻宋。

嘉熙三年，蒙古大将塔海率大军入川，号称八十万，四川再遭蹂躏。一时间，邛、简、眉、阆、蓬诸州纷纷沦陷，蒙古人进而再破重庆、顺庆诸府。塔海欲渡江东下，直取湖南。由于孟珙早有防备，扼险控要，阻止了蒙军出蜀东下的计划。

东进不成，塔海派部将汪世显再杀入四川，进围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坚守成都，誓与城共存亡。然而，陈隆之的部将田世显却暗中向蒙古投降，打开成都北门迎敌军入城。成都因此失守，陈隆之被俘后坚决不投降，被蒙古人所杀，其全家数百口皆死难。蒙古军继续攻略，先后占领汉州、泸州、叙州等。

在蒙古军攻陷成都的同月（淳祐元年十一月，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窝阔台死的时候，由于其子侄多数都征战在外，遂由皇后马真氏暂时摄政。为了确定新君人选，出征在外的各路大军纷纷返回，南征川蜀的蒙古军也陆续北返。

尽管川蜀的军事压力骤减，但由于蒙古军的破坏，原本富饶的天府之国已是残破不堪，许多城池都只剩下残垣断壁，失去其军事防御价值，完整的州郡所存无几。自蒙军入侵以来，历任四川宣抚使、制置使因府库不足、地方政府开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束手无策。更糟糕的是，四川实际上已处于失控状态，监司戎帅，各自为令，官无法纪，民不聊生。

朝廷必须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恢复川蜀秩序。

淳祐二年（1242）朝廷以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

余玠本是蕲州人，家世贫寒，为人落拓不羁。他曾在淮东制置使赵葵手下效力，赵葵非常欣赏其才华，后来蒙宋战争爆发后，余玠屡立战功，升迁为淮东制置副使。朝廷派余玠去收拾川蜀残局，总算用对了人。

朝廷给余玠很大的权限：“任责全蜀，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从事。”余玠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饬军政，精选官员，重贤礼士，招揽豪杰。在招揽的人才中，以冉璘、冉璞兄弟俩人贡献最大。

冉氏兄弟乃蜀中卧龙，有文才武略，精通兵法，尤其深谙川蜀的山川地势。兄弟俩人总结了蒙军攻破川蜀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防御观念，认为应当利用巴蜀地势险峻之优势，依山筑城，以抵御蒙古之骑兵。兄弟俩人殚精竭虑，遍察川蜀，挑选十余座适宜筑城之山，包括青居山（顺庆）、大获山（阆州）、云顶山（成都）、钓鱼山（合州）等。这些山之所以入选，有几个条件：其一，分布要均衡。不能十余座山城都集中在一个地域，而是要分布于川蜀战略要地与重要城市附近。其二，必须要依山傍水，山要险峻，水源不可缺少，否则无法坚守。其三，要适宜筑城。城要有一定规模，城堡要足够坚固，能储备大量粮食与军备物资。

余玠对冉氏兄弟的构想大加赞赏，并付诸实行，在川蜀建山城十余座。在这些城堡中，钓鱼城更是饮誉全球。钓鱼城三江环绕（嘉陵江、涪江、渠江），地势极险峻，峭壁悬崖，城墙雄伟而坚固。用冉氏兄弟的话说：“功可过十万师。”在后来的战争中，钓鱼城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余玠的主持下，川蜀渐渐恢复秩序，在此后十年没有遭遇大的战乱。

四八 钢铁堡垒：鏖战钓鱼城

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后，围绕汗位的权力斗争整整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公元1251年蒙哥继位方才告一段落。蒙古的汗位之争，使南宋帝国获得喘息之机。

在这十年里，蒙古虽然不时骚扰南宋，但规模都不大。南宋捍疆卫士的重任落在几个制置使身上，其中孟珙守卫京、湖，余玠守卫巴、蜀，吕文德守卫淮西，此三人皆一时之良将。可惜的是，南宋第一名将孟珙由于长年征战，积劳成疾，于1246年病逝，时年不过五十一岁。孟珙在宋金战争中粉碎金人入川的企图，降敌七万，毙敌统帅，后又参加灭金最后一战；在蒙宋战争中，孟珙挫敌于江陵，捍城于黄州，收复襄樊重镇，战绩之显赫，为南宋将领的第一人。

在孟珙死后七年（1253），南宋另一名将余玠暴死。

余玠治川蜀，前后十二年，功绩卓著。赴任之初，川蜀残破，他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以宽民力，通商贾以富蜀地。经十余年治理，川蜀大有改观，非但经济得以改善，百姓得以安居，军事防御能力也大大增强。当时朝廷给予余玠“便宜从事”的特权，正是因为川蜀将领拥兵自重现象严重，“乱世用重典”，余玠以霹雳手段治军，处死飞扬跋扈的利州统制王夔。然而余玠权势太大，却引起朝廷的警惕，加上一些川将联合朝中重臣恶语中伤，最后皇帝也不得不生疑心，召余玠回朝。余玠接到诏令后不久暴卒，死亡原因不明，当时传闻他是服毒自尽。

不管余玠是怎么死的，对南宋来说，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余玠与孟珙堪称南宋之长城、一时之名将。余玠入川时，蒙军主力虽然撤出川蜀，但仍留有一部分军队，他积极进取，仅在淳祐三年（1243），便与蒙军交战三十六次，收复不少失地。余玠死的时候，正是蒙古人大举南侵的前夕，而川蜀更是首当其冲。值此关键时刻，朝廷迫死余玠，等于自毁长城。

蒙哥上台后，积极着手准备对南宋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蒙古军横扫天下，战斗力之强，举世无双。其实蒙古军队不仅作战顽强，在战略上亦有高人一等之处。为了消灭南宋，蒙古制定了一个大战略，即先攻川蜀南部的大理国及西南夷，完成对南宋帝国的大包围。蒙哥把攻略云南的任务，交给弟弟忽必烈。

要绕过四川攻略云南，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蒙古人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四川西部的崇山峻岭穿行，越过大渡河，行山谷两千余里，乘革囊、木筏渡过金沙江，历经艰辛，抵达云南。1253年底，忽必烈征服云南大理国后北返，留下大将兀良合台扫荡西南诸蛮族部落。到1257年，蒙古完全征服西南夷与安南。这样，蒙古人在北、西、西南三面包围南宋帝国，就只差没有海面封锁了。

征服南宋的时机已成熟！

公元1258年，蒙哥汗下诏，大举侵宋。

蒙哥的计划是这样的：兵分三路，先占领南宋的西部与中部，而后向东挺进，灭掉南宋。三路人马分别从北面、西面、西南面挺进。其中蒙哥大汗攻川蜀，得手后顺长江而下：忽必烈从北面进攻，夺取鄂州；兀良合台从安南出师，向北进攻，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古人南北夹击，东西并举，声势浩大，南宋朝廷大为震惊。

在蒙军三路出击方向中，重点方向仍是川蜀。

自余玠死后，朝廷先后换了几名四川制置使，但才能都远不及余玠，故而在蒙古军大举进攻下，宋军很快溃败了。

蒙古军前锋在大将纽璘率领下，进逼成都。四川制置使蒲择之派军在遂宁江箭滩阻击，经过一天激战，宋军战败。蒙古人长驱直入，占领成都。而后彭、汉、怀、绵诸州及威、茂诸蕃，纷纷投降蒙古。

纽璘连连得手，蒙哥大汗闻前锋得胜的消息后，遂渡过嘉陵江，攻剑门关，破苦竹隘，围长宁山，鹅顶堡不战即降。隆州、雅州、利州、隆庆、阆州、蓬州、广安等地，要么被攻破，要么举旗投降。

这里有一个问题，当初余玠修筑的十几座山城，怎么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呢？因为人才是战争的的决定性因素。山势再险峻、城堡再坚固，若将士毫无斗志，甚至举旗投降，那还不是白搭？川蜀山城，多数并不是被攻陷的，而是不战自降的！那余玠的心血岂非白费？其实不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钓鱼城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根据蒙古预定计划，四川得手后，即顺长江东下，与忽必烈、兀良合台会师鄂州。蒙哥攻克阆州后，随即向南挺进，进攻合州（重庆合川）。

当初冉璘、冉璞兄弟建议余玠在合州建钓鱼城，并将合州旧城迁徙到此。在蒙古大举南侵时，蜀地南宋将领纷纷投降，以至于蒙哥认为只消一纸招降书，便可不战而夺取合州。蒙哥派汉奸晋国宝前去招降合州知州王坚，晋国宝进了钓鱼城后，被王坚大骂一通，赶出城外。晋国宝还未走远，王坚改变主意了，又派人把他抓回来，押至阅武场，数落他不忠不义之罪，当场枭首示众。

王坚此举，是为了表白与蒙古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在巴蜀大半沦陷的情况下，钓鱼城仅是弹丸之地，能抵挡住蒙古雄兵吗？王坚召集

人马，誓死守城，他以忠义激励部下，说到动情处，涕泪四流，将士无不动容。说起王坚，原本是名将孟珙手下的忠顺军一员，在作战中勇敢而有谋略，深得孟珙的器重。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孟珙虽死，王坚却要将他的忠勇精神发扬光大。

派去劝降的汉奸被杀，蒙哥大汗很生气，遂亲自引兵进攻合州钓鱼城。当年冉氏兄弟与余玠精心设计的杰作，终于发挥出“功可过十万师”的巨大威力。

钓鱼城保卫战从开庆元年（1259）二月拉开序幕。蒙哥大汗亲自督战，蒙古人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发起冲锋，但仍然望城而兴叹。在王坚及其士兵的英勇抵抗下，钓鱼城始终岿然屹立。自入川以来，这也是蒙古人所遇到最顽强的抵抗。蒙古人陈兵于钓鱼城下，也遇到一些不利因素，军中疫病流行，后来遭遇暴雨天气达二十天之久。

朝廷十分关注钓鱼城战事的发展。皇帝亲自下旨，奖谕王坚忠节，表彰他坚守钓鱼城的功绩，特命优加奖赏。当然，一道谕令只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要解钓鱼城之围，还得有实际行动。朝廷调回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命吕文德代任。在宋军将领中，吕文德算是比较出色的一个。

吕文德临危受命，率艨艟巨舰千艘，攻破蒙军设在涪江的浮桥，转战至重庆，溯嘉陵江而上，救援钓鱼城。蒙哥令大将史天泽阻击，史天泽把舟师分为两翼，顺流迎战吕文德。吕文德逆流而上，相当被动，最终被蒙军击退，战船被夺走百余艘。

南宋这次解围救援无功而返，蒙哥乘机集合大军，猛烈攻城。蒙古大将汪德臣招募敢死队，发动夜袭，仍然被王坚击败。汪德臣恼怒之下，骑马到钓鱼城下呼道：“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快早投降。”岂料王坚根本不予理会，反倒令人抛出巨石，击伤汪德臣，后伤重死亡。

这时的王坚已是孤城无援，虽说城中储备尚足，但伤亡也不断加大，情形十分危急。在关键时刻，天气又一次帮了宋军大忙。进入六月后，又下起大雨，蒙古人的攻城云梯已使用数个月，本来就损坏严重，被雨水一浸，纷纷折断。此时蒙军已攻城五个月仍未有进展，将士们情绪低落。

钓鱼城之战的转折点发生在七月。

蒙古大汗蒙哥意外身亡。蒙哥是怎么死的，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蒙哥被钓鱼城守军射伤，伤势发作不治而亡。另一种说法，蒙哥是染病而死的，当时蒙古军中传染病流行，士卒病倒甚多，蒙哥染疾是完全有可能的。不管死因是什么，蒙哥死于钓鱼城外是事实。

蒙哥一死，蒙古军放弃攻打钓鱼城，史天泽等将领护送蒙哥灵柩北归，合州由此而得以保全。钓鱼城之战，是蒙宋战争中的重要一战，倘若战败，蒙哥顺长江而下，与忽必烈、兀良合台会师，那么南宋恐怕大势去矣。

合州钓鱼城保卫战的最终胜利，虽说有侥幸的成分，但若没有守将王坚的坚忍不拔与将士的浴血奋战，也是不可能取得的。在余玠所筑的十余座山城中，唯有钓鱼城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仅此一点，就物超所值了。

在蒙哥攻略川蜀的同时，另外两路蒙军也按计划展开行动。

兀良合台率南路兵团从西南挥师入广西，攻取宾、象两州后，入静安府（广西桂林）。然后向北进军入湖南，攻辰州、沅州，进抵潭州（湖南长沙）。

蒙古军北路兵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忽必烈率军出大胜关，一路由张柔率军出虎头关，分道并进，势如破竹，进逼鄂州。此时忽必烈接

到蒙哥大汗的死讯，究竟是战还是退呢？忽必烈认为大军南下，岂可无功而返，遂不肯退兵，强行渡江，包围鄂州。

鄂州为湖北重镇，不容有失，朝廷急遣枢密使贾似道发兵救援鄂州。贾似道到了汉阳后，竟畏惧不前。鄂州在蒙古军的猛攻下，坚守两个多月，守将张胜战死，伤亡万余人。此时又传来潭州被兀良合台包围的消息，贾似道更是惊恐万分，狗急跳墙，竟然派人前往蒙军大营，向忽必烈求和。

忽必烈本不想接受谈和，但此时从北地传来消息，蒙古诸王侯谋立阿里不哥为大汗。忽必烈担心后院起火，遂同意议和，并商定江北之地归蒙古，南宋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其实议和这件事，怎么是贾似道一人可以决定的呢？贾似道别的本领没有，玩弄权术倒是很精通，反正只要先忽悠蒙古人退兵，他自然有办法把私下议和这件事给压下来。

鄂州解围了，忽必烈拔寨北去，同时也命令正在潭州作战的兀良合台渡江北归。兀良合台接到命令后，遂引兵北上，以浮桥渡江。岂料议和在先的贾似道突然派出水师，以大船撞断浮桥，把来不及渡江的蒙军殿后部队数百人杀个精光。

蒙古所发动的这次大规模进攻，因为蒙哥大汗之死而宣告结束，南宋又一次逃过一劫。若要说抗战第一功，那当然要数钓鱼城的将士，因为蒙哥大汗便是命丧于此。

可是干苦力活的，不如会吹嘘的。

在战场上畏畏缩缩，甚至私自与蒙古议和的贾似道，居然成了保家卫国的英雄。

因为他会吹。

明明是蒙古人自行撤鄂、潭之围而去，贾似道却吹嘘为宋军大

捷，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看来会打仗还不如会耍嘴皮子，粉饰词藻。皇帝宋理宗览表后大喜，还当贾似道有再造宋室之功呢，又是进封少师，又是封卫国公。贾似道还朝时，皇帝还令文武百官在京城郊外迎接，俨然英雄凯旋。

可笑又可悲，可叹又可恨。

宋理宗未即位时，其老师郑清之用两个字来形容他：不凡。

现在我们可以送他两个字：平庸。

在宋朝三百年历史里，权臣用事最严重的，便是在宋理宗一朝。前有史弥远，后有贾似道，搞得朝廷一片乌烟瘴气，这也预示着南宋国祚已经不长了。

四九 权臣误国：千古罪人贾似道

南宋亡国，与贾似道有直接关系。

说起来，贾似道也是将门之后。他的父亲贾涉曾经担任淮东制置使，是忠义军将领李全的直接上司。父亲死时，贾似道只有十一岁，没有老爹的约束，他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喜欢游乐赌博，俨然就是个纨绔子弟的形象。宋朝有个制度叫“恩荫”，就是老子有功，朝廷会照顾其后人。靠着老子积下的德，贾似道长大后当了个嘉兴司仓，也就是屁大的官。

后来，贾似道的姐姐入宫，深得宋理宗宠幸，被封为贵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贾似道靠着贵妃姐姐，开始平步青云，被升迁为太宰丞、军器监。升了官后，他照旧过着浪荡的生活，白天泡妓，晚上常常与一帮人在西湖边饮酒作乐。

有一晚，宋理宗登高楼远望西湖边上灯火通明，就对左右说：“这肯定是贾似道。”第二天派人去一查，果不其然就是他。皇帝觉得这个小舅子也太折腾了，就令京尹史岩之去教训教训贾似道。史岩之估计也是想巴结贾贵妃，便扯淡道：“贾似道虽有少年习气，然其才可大用也。”皇帝被他这一忽悠，还真以为小舅子有经天纬地之才。从此，贾似道官运亨通。

贾似道先当了澧州知州，后任湖广统领，三十岁那年当上户部侍郎。令人奇怪的是，没听说过贾似道干过什么事，但升迁的速度却一点也没减缓。在名将孟珙死后，贾似道这个从来没上过战场的人，竟接替了孟珙京湖制置使的位置。皇帝老觉得他是奇才，你有什么办

法。不久后，贾似道又兼任淮西安抚使。宝祐四年，他成为参知政事，一年后加知枢密院事，后来又任两淮宣抚使。

十几年之内，贾似道一跃成为南宋军政界的巨头。除有皇帝姐夫、贵妃姐姐的力挺之外，他还赶上了一个好时光。这十几年里，蒙古内部争权夺利，没有大规模南侵，这让贾似道这个军事外行得以浑水摸鱼、滥竽充数。

该来的终究会来。

蒙哥大举入蜀，忽必烈南下鄂州，被皇帝视为奇才的贾似道总该表现表现吧。贾似道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到了鄂州时畏首畏尾，甚至连边将对他都不无冷嘲热讽。可是就在这时，皇帝为了鼓舞贾似道，竟然把右丞相一职塞给他。也算贾丞相运气不错，赶上蒙哥去世，忽必烈北返，竟然撒了个弥天大谎，谎报大捷，对私下与忽必烈议和却掩而不谈。皇帝深信不疑，还暗自得意自己慧眼识才哩，下诏褒奖，封赏甚厚。

却说忽必烈北返后，被拥立为蒙古大汗。不久便派使臣郝经抵宋，打算履行与贾似道达成的和议。这时贾似道正雇用一帮门客文人，撰写一部《福华编》，为贾似道救援鄂州、再造宋室歌功颂德。当他听说蒙古使者前来，惶恐不安，担心私下谈和之事败露，遂命令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在半途拦截郝经，把他扣押在兵营。

郝经莫名其妙失踪，令忽必烈十分生气。可是蒙古陷入内战，忽必烈无暇南顾。原来忽必烈被推为大汗后，阿里不哥自立门户，自立为帝，蒙古内战遂不可避免。这场战争前后五年，最后以忽必烈的胜利而告终。

在蒙古内战期间，还发生南宋将领刘整投降蒙古的事件。

刘整的投降，完全是被贾似道所逼。原来贾似道自鄂州之战后，靠着他的忽悠吹牛的本领，已成为朝廷第一权臣。可说实话，他那三脚猫的功夫，皇帝不知道，边将们岂能不知呢？有些将领当然懂得见风使舵，比如吕文德，甘心沦为贾似道的鹰犬。有些将领则对贾丞相嗤之以鼻。

贾似道决心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以巩固自己权势，便发明了一个“打算法”，追究将领在战争期间擅自支取官物、侵用官款的罪行，大将赵葵等人被清扫出门。另外高达、曹世雄等人曾经对贾丞相的军事水平冷嘲热讽，这下遭到报复，高达被罢官，曹世雄被逼死。

大清洗蔓延到了四川，驻守庐州的将领刘整恐惧难安，他与四川制置使俞业不和，俞业打算用“打算法”整他。刘整被逼无奈之下，遂以泸州十五郡、共三十万居民向蒙古投降，蒙古授予他夔路行省兼安抚使。

刘整是颇有才华的一位将领，他投降蒙古后，积极出谋划策，在后来蒙古攻略南宋时，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忽必烈乃是蒙古雄才伟略的一位君主，他没有急着发动对南宋的全面进攻，而是先致力于国家建设。一直以来，蒙古政治制度比较粗放，长于破坏而短于建设。特别每有大汗去世，势必要争斗一番。有鉴于此，忽必烈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引入汉地制度，定官制，设百官，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劝农桑、建学校、修水利、通河渠、立平准库以抑物价等，国力益强。

公元1264年，宋理宗去世，宋度宗登基。

宋理宗无子，宋度宗并非其亲生子，而且有点弱智，他之所以能当皇帝，当然与贾似道分不开。故而度宗上台后，贾似道更加威风八

面，加太师衔，又封魏国公。宋度宗每上朝时，必答拜贾似道，称呼他“师臣”而不呼其名。此时朝中大臣也纷纷拍贾似道的马屁，把他称为“周公”。

由于忽必烈暂缓南进，贾似道又过上了几年神仙般的日子。

此时的贾似道已是呼风唤雨，位极人臣，可是皇帝还是搞些新名堂加封他为“平章军事重事”，也就是把军政大权都拱手交给他了。皇帝赐给他一座座落于葛岭的豪华宅第，以后这里俨然成为一个小朝廷，官吏们都抱着文书前来批示。贾似道哪里会去看这些，把这些交给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这两个管家的权力居然要比朝中宰辅还大。

贾似道躲进葛岭豪宅，貌似隐居，其实不然。凡是有什么台谏弹劾的事，有什么举荐迁升的事，那都统统得通过他才行。一时间，贿赂成风，那些想升官晋爵的人，挤破头皮，争献黄金宝玉，求个将帅、监司、郡守之类的官。

南宋朝政败坏到这个程度，忽必烈自然看在眼里。时已担任蒙古南京宣慰使的南宋降将刘整乘机献上伐宋攻略，他对忽必烈建议说：“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忽必烈遂诏征诸路人马，命南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经略襄阳。

为了进攻襄阳，刘整又向阿术献策，造战船五千艘，训练水兵七万人。阿术接受建议，招募水军，日夜训练，风雨不懈。刘整在南宋时得不到重视，还被整，到了蒙古后却如鱼得水，忽必烈又提拔他为都元帅，与阿术平起平坐。刘整再出奇谋，在白河口修筑堡垒，以切断襄阳城的运粮通道。

准备就绪后，蒙古开始发动围攻襄阳之战。

自从孟珙在1239年收复襄阳、樊城后，便指出这两座城池的重要性：“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得之，当加护理，非甲兵十万不足守。”此后，襄阳、樊城在孟珙的精心经营下，防御工事几乎无懈可击。据吕文德的说法：“襄、樊城池坚深，储粟可支十年。”孟珙所经营的襄阳、樊城与余玠经营的钓鱼城一样，都是经典之作，在两位名将去世后，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襄阳城与钓鱼城未能拯救南宋，但至少大大推迟了南宋的灭亡。

襄阳之战，是蒙宋战争中最为旷日持久的一战。从咸淳三年（1267）蒙军围城，至咸淳九年（1273）襄阳陷落，前后总计六年。这是一次蒙宋大会战，双方都投入庞大军队，在战争过程中也不断增兵。这次会战并不局限于襄阳一城，而是以襄阳为中心的大区域战争。

襄阳南宋守将是吕文焕，他的顶头上司是其兄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兄弟俩皆一时之良将。咸淳三年（1267）阿术与刘整发动襄阳之战后，警报传至临安，竟然被贾似道扣下不发，皇帝还蒙在鼓里，南宋也错失救援襄阳的最好时机。次年（1268）阿术又统兵包围樊城。

尽管襄阳与樊城均固若金汤，一时间蒙古军难以攻下，吕文焕也组织士兵主动出击，攻打蒙古人的沿山诸寨，然而损失惨重，以失利而告终。

咸淳五年（1269），蒙古再发民兵两万赴襄阳前线。阿术在樊城外鹿门山再筑城堡，显然意在长期围困。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派都统制张世杰前往阻击阿术，但在赤滩浦被蒙军击败。而后阿术又派遣一万五千人，扼守住万山、射垛冈等几处通道，试图完全切断襄、樊与外界的联系。

此时，南宋朝廷的援军终于姗姗来迟，但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三千兵船进援襄阳。夏贵水师行至鹿门山，遭到

蒙军水师的阻击，损失两千多人。紧接着，另一支由范文虎指挥的水师也败走。

更糟糕的是，在大战关键时候，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逝于鄂州。

在襄、樊陷于苦战之时，贾似道还在过着他的逍遥日子。他以休闲的心情在葛岭修起亭阁楼榭，美女当然也是少不了的。贾似道挑选美女倒挺另类，特爱挑宫女、娼妓与尼姑为妾，日夜淫乐。他还有一个癖好，就是斗蟋蟀，而且是专家级的水平。至于什么军国大事，他哪里真的放在心上呢？

一天入朝时，皇帝突然冒出一句：“襄阳被围三年，如何是好？”贾似道马上装腔作势道：“哪有这回事，北军早已退了。”当他得知皇帝是从一个宫女那儿得悉的，竟然诬告宫女与人暧昧，逼她自尽。

贾似道果然一手遮天！

襄、樊被围三年，已是十分危急，可是贾似道还要弄权。他这边忽悠皇帝，那边还是得想想办法解襄、樊之围，遂命京湖制置使赵庭芝往援。但是贾似道弄权日久，偏偏又要派范文虎去制衡赵庭芝，致使救援行动一拖再拖，毫无进展。

与南宋援军的拖拖拉拉相反，蒙古不断增兵襄樊，忽必烈把宿将史天泽调往前线。史天泽添筑长围，襄阳与外交通断绝。到了咸淳七年（1271），蒙古又从川蜀大举出击，以牵制京湖宋军。范文虎率两淮舟师共计十万人救援襄樊，又以失败而告终，损失惨重。这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朝的历史开始，而宋朝却已走向尾声了。

在外无援军的情况下，襄阳守将吕文焕，樊城守将范天顺、牛富苦苦支撑。此时两座城池情况越来越困难，所赖两城积粮颇丰，尚得

以维持，只是生活日用品奇缺，军民生活极其艰苦，伤亡也越来越大，军队与物资都得不到补给。

无论再坚固的城池，也经受不住旷日持久的消耗。咸淳八年（1272）三月，元军取得重大进展，攻破樊城外防线。在此危难时刻，民兵的表现倒比朝廷正规军要强，张贵、张顺率三千民兵竟然突破元军的重重封锁，进入襄阳城。张贵入城后，复派两人冒险赴郢州，向范文虎求援，意在夹击元军。岂料张贵冒险出击，范文虎的援军并没出现，加上叛徒泄露情报，遂陷入元军重围，力战而死。

对襄、樊守军来说，更糟的事情出现了。回人亦思马向元朝献上新研制的巨石炮，俗称回回炮，可以抛出巨大的石块，用力省而射程远，威力巨大。忽必烈如获至宝，马上将回回炮送抵前线。

咸淳九年（1273）正月，在回回炮的猛轰下，樊城在坚守四年多之后，终于被元军攻陷，范天顺、牛富以死殉国。樊城沦陷后，襄阳更是势孤力单，元军将回回炮送到襄阳城下，全力攻城。吕文焕已是心力交瘁，对朝廷的无所作为更是痛恨。他没有像樊城守将那样殉国，而是选择了投降。

历时近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终以悲壮的方式而告结束。

在襄阳战役中，朝廷救援不力是致使两城失守的主要原因。吕文焕虽然投降，但他已经倾尽全力守城了。而贾似道这个奸臣，在国家存亡关头，仍只图自己利益，仍然在玩弄权术。他就是襄阳战败的罪魁祸首。但这个奸臣又一次逃过惩罚，弱智皇帝宋度宗被他玩得团团转。

在襄阳之战后一年（1274），弱智皇帝死了。贾似道乘机洗清了自己的战争责任，他又一次施展巧言令色的本领，这样说：“始屡请

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就是说，我屡屡自告奋勇申请上前线，先帝都不允许，如果早听我的，结果就不会是这样了。

自欺欺人罢了，谁会相信他的鬼话呢？

但是不要紧，皇帝死了，我再立一个不就成了。贾似道立了个小皇帝，四岁的赵□，史称宋恭帝。立了皇帝，不又是朝廷功臣了吗？贾似道面带微笑，管他皇帝是谁，我都是政坛不倒翁。

然而正当此时，忽必烈已下诏大举南征。

这一战，将是南宋王朝的谢幕之战。

五〇 曲终人散：南宋帝国的灭亡

公元1274年，即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农历九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伯颜出任南征军统帅，指挥二十万大军伐宋，目标直指南宋都城：临安。

南宋的防御力量，主要集中在三大军区，分别是四川、京湖、两淮。四川自遭到蒙哥入侵后，又加之刘整叛降，已无实力可言。京湖的精兵在襄、樊战役中损失殆尽，业已无力阻止元军进攻。唯一还稍有实力的，只有两淮兵马。

伯颜的战略十分高明，他兵分两路，东路由博罗懽、刘整统率，出淮南以牵制两淮宋军，并严令不得疾进，只要拖住宋军不得西援就行。西路则由伯颜亲自出马，率阿术、吕文焕等，沿汉水而下，进趋长江。

元军的进攻势如破竹。十月，攻破新郢（湖北钟祥西南）；十一月，复州（湖北沔阳）投降；十二月，鄂州（湖北武昌）投降。次年（1275）正月，黄州（湖北黄冈）投降。当时长江沿江诸州很多将领都是吕文焕的部下，对贾似道控制的朝廷完全失去信心，纷纷投降元军。

此时南宋朝廷还寄希望于贾似道，诏令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这简直是帮元军的大忙。很快，范文虎就给了贾似道一个大巴掌，这位贾似道颇为器重的将领，竟然一枪不放投降了。范文虎驻守安庆府，他的军队是宋军中的精锐，且安庆府粮草充足，伯颜深以为患。岂料战还未打，范文虎就自动投降了，送给伯颜一个天大的礼物。

这下子贾似道慌了，赶紧派人去与伯颜议和。贾似道就是个无耻小人，以前跟忽必烈议和非但食言，还扣押其议和使臣，伯颜岂会信他？伯颜对宋使说：“欲和，则当来面议也。”要议和，你贾似道亲自来吧。

贾似道哪里敢去！

更让贾似道狼狈的是，朝中大臣纷纷上书，你贾似道不是老吹嘘自己多厉害吗？那现在还不出马，更待何时？

谈和不成，朝臣又纷纷施压，贾似道只得打肿脸充胖子了。他亲率十三万人马上前线了，拨七万人马给部将孙虎臣，驻扎于丁家洲，布兵船于长江南北两岸，同时命淮西制置使夏贵列战船二千五百艘于江中，摆开与元军一决死战的架式。可是徒有架式有什么用？

伯颜以步、骑兵攻击两岸宋军，阿术率舟师顺流而下。元军的巨炮再发神威，孙虎臣很快就抵挡不住。此时夏贵居然不战而走，他乘船逃跑时，正好经过贾似道的座船，高喊道：“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吓得仓皇而逃。这次决战，宋军仅有的精锐部队在奇才贾似道的指挥下，损失殆尽。元军追杀一百五十里，缴获宋军战船两千多艘，军资器械无数。

贾似道这下子完蛋了。

这位奸臣当权日久，自以为权势固若金汤。岂知这“权力”二字，又不是他的专利，他觊觎权力，难道别人就不觊觎吗？别看朝廷那帮人，平日对贾似道俯首贴耳，唯唯诺诺，现在贾似道既不在朝中，又成了落水狗，正是痛打良机。于是朝臣们纷纷慷慨激昂，上疏请诛贾似道以谢天下。至于民众更不用说了，公道自在人心，对于贾似道的弄权误国，无人不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呢。

太皇太后谢道清念在贾似道“勤劳三朝”的分儿上，没把他杀掉，先是押往越州，越州军民竟然闭门不纳。鉴于民怨沸腾，谢太后最后下旨，将贾似道流放到南方循州。尽管太后法外开恩，贾似道仍然难逃一死。

也算是报应，贾似道遇到冤家对头了。押送贾似道的郑虎臣与贾似道有深仇大恨，当年其父亲曾遭此奸臣陷害，流放而死。如今郑虎臣要为父报仇，为民除害。行至漳州木棉庵时，郑虎臣拔刀杀死贾似道，此举可谓大快人心。

奸臣已诛，可是南宋王朝也回天无力了。

却说贾似道兵败后，临安已是风声鹤唳。

虽说时值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是谁也没闲去欣赏西湖美景了。各路兵马，死的死，降的降，何以保卫临安呢？朝廷只得下诏勤王。响应者虽寥寥，毕竟有几位忠肝义胆之士。一个是鄞州守将张世杰，率兵入卫都城；一个是江西提刑文天祥，他散尽家资，动员郡县豪杰，拼凑了一支万余人的部队，北上抗元。

但是败局难挽。越来越多的城池不战而降，建康、海州、涟州、镇江、江阴、滁州等城都放弃抵抗。只是在岳州稍遇抵抗，安抚使高世杰集三州数万人马及战船数千艘，与元军决战于洞庭湖口，但很快被元军击败，高世杰被杀。

投降的城池太多，数都数不过来，只得说说坚守抗战的城池。抗战最卖力的当属扬州的李庭芝与姜才，德祐元年（1275）四月，阿术率元军进围扬州。姜才多次出城迎战，但均被元军击败，伤亡惨重。七月，朝廷遣张世杰、孙虎臣救援扬州，在焦山与元军交锋，大败，损失数百艘船。此后宋、元军队在扬州相持，一直到朝廷降元后，扬

州的抗战也仍在继续。

扬州城没攻下，并不影响伯颜向临安进军的步伐。伯颜兵分三路，进攻临安。一路阿剌罕率骑兵从建康、广德出独松岭；一路由董文炳率舟师趋浙江；一路由伯颜亲自率领。伯颜在常州遇到宋军强有力的抵抗，但最终仍攻克常州。

前线在苦战，朝廷已经想着投降了。宋廷派夏士林、陆秀夫前往元军大营，以称侄纳币乞和，伯颜要求大宋皇帝亲自前来投降，并且不同意伯侄之称。陆秀夫回到临安后，谢太后同意南宋向元称臣。

转眼间，已经是德祐二年（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

新年钟声刚敲响，便从前线传来坏消息。重镇潭州在坚守三个月后，不幸被元军攻破，湖南安抚使李芾自焚殉国。

朝廷抵抗的信心完全崩溃。谢太后赶紧派人奉表称臣，并同意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乞求保全南宋之境土，并与伯颜约定在长安镇（杭州东北）会晤。朝廷派右宰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前往，但陈宜中却违约不去。伯颜大怒，继续向临安推进。谢太后为表诚意，先派杨应奎把传国玉玺交给伯颜，伯颜这才停止进军。宰相陈宜中不想前去投降，索性连夜逃走了。

谢太后没办法，只得让文天祥当宰相兼枢密使，作为宋廷代表与伯颜会晤于明因寺。文天祥要求元军先退至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伯颜根本不理睬，他见文天祥言语不凡，流露出一种不屈服的气节，索性将他扣押遣送往北方。

其实伯颜哪里想议和，南宋朝廷气数已尽。执政的谢太后当然也是心知肚明，要保全境土，谈何容易，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议和是说得好看，其实就是投降罢了。

二月五日，小皇帝宋恭帝出临安城投降。这意味着南宋朝廷的灭

亡。

三月二日，伯颜入临安城。南宋皇帝、后宫、宗室、百官等数千人以及宫里的奇珍异宝、各种器物，统统押送到元大都，这不禁令人想起当年宗徽宗与宋钦宗的命运。

南宋朝廷已亡，但抗元战争还在继续。

当元军押送宋恭帝及后宫行抵瓜洲时，扬州守将李庭芝、姜才誓师欲夺回皇帝、太后，他们散尽金帛以犒劳士兵，以四万之众夜袭瓜洲。在苦斗三小时后，元军不敢恋战，挟持宋恭帝逃去，姜才追击到了蒲子市，但未能夺回皇帝。元军逼太后、恭帝下诏要求李庭芝投降，李庭芝登上城楼回答道：“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坚决不降。

在朝廷投降之前，一些坚定的抗战派将领愤然率部入海，其中包括张世杰。在宋恭帝投降后，张世杰、陈宜中与陆秀夫等人拥恭宗的哥哥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恭帝的弟弟赵昺为副元帅，召诸路忠义军，继续抗战。由于宋恭帝已被元军押至北方，赵昰遂在福州被推立为皇帝，史称宋端宗，其实此时他还不到十岁呢。

不管怎么说，南宋流亡政府成立了。

被伯颜扣押北遣的文天祥，半路侥幸逃跑，被朝廷任命为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文天祥在江淮及温州一带招兵买马，积极做好抗战准备，并在南剑州（福建南平）设立督府，打算经略江西。

但是很不幸，在这个时候，却传来李庭芝败亡的消息。

李庭芝与姜才镇守扬州一年多，元军始终无法攻破。此时的李庭芝，是南宋残存抵抗力量中最具实力的将领。他铮铮铁骨，忠肝义

胆，当时元世祖忽必烈特地亲自下诏，欲招降李庭芝，李庭芝当场把忽必烈的诏书焚毁，斩杀来使。

流亡小朝廷成立后，便把右丞相之职空出来，留给李庭芝，同时派人召他回朝。说实话，当时长江沿岸基本上都落入元军之手，李庭芝要从扬州回到福州，谈何容易！但李庭芝只考虑国家利益，不顾及个人安危，遂把扬州城交给部将朱焕，自己与姜才率领七千兵马出城，打算经泰州抵达海边，而后乘船南下。可是元将阿术率兵紧追不舍，将李庭芝逼入泰州，并包围该城。由于叛徒打开城门投降，元军破城，李庭芝与姜才被俘，不屈而死。

李庭芝之死，对小朝廷无疑是一大打击。

文天祥还没来得及经略广西，元军已经杀向福建了。元军兵分两路，一路走海道由浙江攻入福建，一路走陆路由江西进攻。

元军入闽后，连下建宁、邵武，由北、西两路进逼福州。小朝廷不得不再度流亡，张世杰、陈宜中以海船运送十七万军队及小皇帝，南逃到了广东潮州。广东也是岌岌可危了。元军占领福州后，继续向南推进，攻下兴化，泉州不战而降；在另一个战场，元将阿里海牙已攻陷广西诸州郡。与此同时，江西的元军也进入广东，攻下循州（广东龙川）、梅州，离流亡的南宋小朝廷已是近在咫尺。

关键时刻，文天祥从福建漳州转移到广东，力挽狂澜。

景炎二年（1277）三月，文天祥收复梅州，紧接着便攻入江西，收复会昌。六月，文天祥在江西雩都打败元军，派遣部将收复吉州、赣州属县，继而包围赣州。但是文天祥毕竟是文人出身，行军打仗并非其所长，我们也不能期望他成为虞允文那样文武双全的人。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出其不意地发动反攻，文天祥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只

好撤回广东循州。这一战，代价惨重，不仅文天祥的几个得力部将都战死，而且连他的妻儿、家属都被元军俘虏，押往燕京，其中两个儿子死于半途。

李恒打败文天祥后，与吕师夔率步兵穿越庾岭（梅岭），进入广东。宋帝赵昰转移到潮州浅湾，以便随时渡海而逃。元军又出动一支舟师，由唆都、刘深率领，从泉州沿海路而下，志在摧毁流亡朝廷。唆都攻占潮州后，刘深奔袭宋端宗所在的浅湾，张世杰遂带着小皇帝逃往海上。继而惠州、广州也陆续被元军占领。

想想小皇帝也怪可怜的，生不逢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被戴上皇冠，可是却没有皇帝的命。这个皇冠除了让他的人头比较值钱之外，并没带给他荣华与富贵，反倒是流亡、漂泊、终日惶惶不安。在海上颠簸六个月后，小皇帝再也经受不住各种恐惧的折腾，他解脱了，死了，年仅十岁。

对抗元志士们来说，皇帝已经只是一个象征，象征大宋王朝仍然顽强存在着。大宋旗帜不倒，才能激励更多的志士抗击元军。张世杰、陆秀夫把赵昰的弟弟赵昺又推上皇位，又是一个小皇帝，而且更小，才七岁。看来出生于皇家，也不见得都是好，你想当平民百姓都当不了，就你这么个龙种了，你不当皇帝谁当？

这几个月来，张世杰、陆秀夫率残余水师，漂荡于海中，在各个海岛中流亡。最后，张世杰找了一个海岛：厓山。

厓山是广东新会南八十里处的一座海岛，呈狭长状，南北长而东西短。张世杰考察后，认为此地有天险可守，便驻足于此，造行宫二十间，军屋三千间。尽管建筑简陋，总算有个落脚点。

张世杰、陆秀夫心里肯定明白，以厓山这个弹丸之地，要想对抗

元军，无异于天方夜谭。南宋偌大的土地，都挡不住元军的进攻，何况是小小厓山。他们只是为民族气节而战，为信念而战，为荣誉而战。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信念而死，不失为大丈夫。肉身可灭，精神不死。

还有一个人在苦苦支撑。

他就是文天祥。

坚持意味着艰难。死亡并不可怕，生存更加困难。文天祥自己这样说：“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活着这么艰辛，为什么还要苦苦支撑？因为他有精神信仰，他心中有一股不可摧毁的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茫。”这种精神也，“清操厉冰雪”，“鬼神泣壮烈”，“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我们现在都说文天祥是伟大的爱国英雄，论事功，其实他比不上宗泽、岳飞，吴玠、孟珙、余玠，甚至比不上李庭芝，但是他体现出另一种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事功只是一时之事，当历史翻过那一页时，总是烟消云散。而精神却是永存的，跨越时间，跨越地域，即便千年后也仍熠熠发光。

张世杰率军流亡海上后，文天祥在陆上更是独木难支了。元朝任命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全力清剿闽广残余宋军。在元军的打击下，文天祥退至潮阳。元军进攻潮阳，文天祥败走海丰，行到五坡岭山麓时，被元军追上。一场鏖战后，宋军大败，文天祥力战被俘。

元军活捉这位前任南宋宰相后，自然满心欢喜，押文天祥至元帅张弘范处。左右命文天祥向张弘范跪拜，文天祥虽是战俘，却仍傲骨铮铮，决不下跪。倒是张弘范有点风度，给文天祥松绑，以宾客之礼

待之。文天祥只求速死，但张弘范却不杀他，把他押囚于船上。

当船行至零丁洋时，文天祥感怀于故土沉沦，山河破碎，自己身陷囹圄，壮志难酬，遂写下一诗，以明心志，这便是著名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被俘四年后，文天祥在大都英勇就义，践行了他“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信条。

春风化雨，又是新的一年。

1279年，全国各地的战事已基本平息，只有零星地区还有零星的抵抗。

这年年初，四川合州的光荣堡垒钓鱼城降下大宋旗帜。作为一座孤独的堡垒，犹如一座小岛耸立于无边海水的包围中。尽管张世杰还在厓山苦苦支撑，但大局已定，何况钓鱼城距离厓山那么遥远。守将王立以不杀城中一人为条件，向元朝投降。整个大宋江山都保不住，何况一个区区钓鱼城呢？但是钓鱼城坚持到最后，也算不负余玠的一片苦心了。

最后来看看南宋流亡小朝廷的结局。

在钓鱼城投降的同时，元军终于探明南宋小皇帝的藏身之所。张

弘范马上出动大军，大举进攻厓山。为了防止宋帝逃脱，张弘范命令舟师阻塞出海口。

一场大战已是不可避免。

厓山北面水浅，元军舟师开不进去。张弘范便转而从南面进击，与张世杰的舟师相遇。为了对付元军，张世杰是有准备的，他尚有战船千艘，呈一字型排开，抛碇（就是锚）入海以固定，船与船之间用大索固定相连，四周均搭起形状如城堞的楼棚，小皇帝的大船居中。这种布局十分奇怪，不合常理，乃是兵家之忌。张世杰指挥舟师多年，岂会不知？他的真实意图是赌上一把，赌赢了乃国家之福，赌输了为大宋王朝陪葬。

张弘范率先攻击，宋军水师如铜墙铁壁，根本攻不进去。这时元军又采取火攻战术，以火船逼近，纵火焚之，这正是三国周瑜大破曹操水师之计。只是张世杰又岂会蹈曹操覆辙，早有防备，他的战船都涂上湿泥，火烧不进。

但在相持十余日后，宋军出了严重问题：淡水不足。宋军士兵只得喝海水，上吐下泄，战斗力大大受到影响。此时元军的力量又得到增强，李恒从广州带来援兵，攻厓山北。

二月六日，厓山海战进入决定性的时刻。

张弘范觑准早潮时机，令李恒率舟师乘潮攻击宋舟师北侧，自己则率其余几路舟师攻南侧。一时间，张世杰腹背受敌。更严重的是，宋军士兵因数日缺淡水，已是体力不支，难以再战。张世杰的布阵，虽然在防御上很坚固，但问题很大。由于船船相连，一船倾倒，势必会拉倒几艘船陪葬。

此时张世杰感到大势去矣，想着保护皇帝要紧，遂抽调精兵到中军。这么一来，宋军更混乱不堪，有些将领乘机向元军投降。张世杰

派人去接小皇帝，但陪在小皇帝身边的陆秀夫坚决不肯走。张世杰只好自己割断绳索，带着十六艘船突围而出。眼看着南宋最后的舰队正在毁灭，陆秀夫宁死不当俘虏，他先把自己妻儿推入海里，然后转身看着小皇帝，以沉痛的语气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不待小皇帝回话，他就为小皇帝做好决定了，不管赵昺愿不愿意，一把抓住他，往背上一背，跳入冰凉的海水中。

张世杰突出重围后，得悉小皇帝死讯，内心悲痛。当时正好台风大作，将士们劝他登岸避风雨。也许是受天气恶劣的影响，张世杰情绪十分低落，登上船楼，对天自言自语道：“我为赵氏，也算尽力了。一君亡，又立一君，岂料又亡。我苟活未死，只是想敌兵退后，别立赵氏以存社稷。今风涛若此，岂天意耶？”他在厓山未能殉死，如今风涛大作，在他看来，乃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在狂风骤雨中，将士们看到他坠入海中，或者被台风卷入海，更可能的是他自己投海结束生命。

小皇帝赵昺、陆秀夫、张世杰都死了。

厓山海战给宋朝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夺权（960年），到陆秀夫负幼帝蹈海（1279年），宋朝存活了三百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之一。以靖康之变为分界，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开国时气吞万里如虎，亡国时悲壮而苍凉，这也是封建王朝不可改变的宿命。

俱往矣，往事越千年。只是在发黄的史册中，我们依稀看到厓山谢幕的那一刻，波涛怒吼，风雨苍茫。

五一 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宋乃是巍巍高峰。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这样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清明与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文化的发展。在长久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新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同时也大大刺激了时代的写作热情，形形色色的书籍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我们若说宋开启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并不为过。那么，与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么殊胜之处呢？笔者不才，试列于下：

其一，政治文明化。

倘若有人问我，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儿，我会回答说：在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为标志。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却能开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义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奠基者便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大宋开国后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一块石碑，称为“誓碑”，其上有三条誓文：其一是对后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规矩，以后皇帝即位时，必须到太庙恭读誓文，这份誓文的重要性，远在其他法律之上。

有人会问，皇帝手上有无限的权力，何以区区几条誓文能约束三百年之久呢？我想，主要是北宋前几个皇帝都认真履行这一誓约，便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一定会有这样的意识：大宋之前野蛮暴力政治已永久成为过去，他们迈步走进一个更高文明，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文明时代。北宋程颐在罗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当然，例外是有的。特别是在两宋之交那段时间，宋高宗先是杀了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及名士欧阳澈，后来又杀了岳飞与张宪，造成千古冤狱。但是反过来看，历代被冤杀的人多的是，何以宋代的岳飞能独传千古，成为神一般的人物呢？正是当时冤杀的现象少，岳元帅之冤死所遭遇的同情，要远超明代的熊廷弼或袁崇焕。

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时即便有蔡京、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权臣，也没有大开杀戒，对付政敌顶多就是流放。在章惇、蔡卞等新党当权时，曾想过置政敌于死地，宋哲宗当即批示：“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可见宋太祖誓文的约束力是相当强的。

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体现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却在宋代达到顶峰。这项古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绝对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其意义在于打破等级，以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吏，使下层的寒门庶族有出人头的机会。与之前几个朝代注重门第不同，宋朝官场是注重“出身”。这里“出身”不是出身于某某富贵人家，而是指科举登科。你是考科举上来的，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

途径当官的，统统都属于没出身。大宋三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宰相、执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举出来的。在选拔的官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平民阶层。美国史学家墨菲评论道：“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当我们讲到宋代文化之灿烂时，势必要先赞美其相对人道与公平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一前提，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臻于鼎盛。

其二，儒学的革命。

说到宋代的文化复兴，首先便是儒学的复兴。

自汉代后，儒学虽有兴衰，但是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点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宋代的儒学并非对孔孟之道的简单继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的儒学，就是理学。提起理学，很多人十分不感冒，就联想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名言上。确实，理学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不少理学家道貌岸然、危襟正坐，并不可爱，早他们一千多年的孔夫子、孟夫子要可爱得多，也更有人情味。

但是，倘若我们只是因为对一两句话不感冒就否认理学，却也不应该。作为新儒学，理学新在哪里呢？

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

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

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

第三，赋予儒学新时代的特色。宋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但也存在国势衰微、贵族奢靡成风、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之现象。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周敦颐之《爱莲说》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气节。无论是二程的“去人欲”或是朱熹的“灭人欲”，亦可视为是对物欲横流、奢华淫侈的反动与纠偏。

其三，思想的自由化。

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与宋之“思想最为自由”，宋代由于政治清明，没有明清时大规模的“文字狱”与禁锢思想的严刑峻法，故而充满勃勃生机。

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并蓄，从大的领域来看，儒、释、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学是主流，释、道两家为辅翼，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并行不悖，而且都积极吸收他家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系统，同样，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愈发明显。

在儒学内部，程朱理学是时代的主流，是宋代之显学。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程朱理学，思想领域上的论战是很普遍的，这也可看出宋代学术推崇自由之风气。南宋时代，学术界有过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一次是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这两场论战也暴露出程朱理学中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

陈亮旗帜鲜明地反对程朱理学“坐以论道”的风气，驳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论，提倡“功利之学”。他批评理学信徒们“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反对理学家标榜道德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于空谈。

与陈亮站在事功立场反对朱熹不同，陆九渊则是在义理上反击程朱。朱熹讲求格物致知穷理，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九渊则认为天理并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

这种思想论战，正是学术自由的一大体现。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

其四，璀璨的宋代诗词。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文学了。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

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可谓是群星闪耀。

一般我们又把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这当然只是个笼统的划分。其实作为一个词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细腻的情感，就比如说辛弃疾，也写出这样多情的句子：“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而作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之语，谁说她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呢？

北宋词与南宋词有不同之处。北宋经历百年安定，写词一来是附庸一下风雅，卖弄才情，像苏轼、黄庭坚之类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时露一手功夫换来赞许的目光；二来是把妹骗女孩子用的，像情场浪子柳永，混迹于烟街柳巷，写上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也倾倒一片女粉丝。因此北宋词比较有小资情调，写个人感情的比较多，动不动就“凭栏”，就“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伤。

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沦落，背井离乡，朝廷又不能发愤图强，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而词风为之一变，忧国忧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感气势雄壮，或悲愤苍凉。与其说是豪放派，不如说是激愤派。像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的“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这是悲愤，而不是像北宋苏轼唱“大江东去”时那种神采飞扬、壮志凌云、直冲霄汉的豪气。张孝祥如此，辛弃疾如此，陈亮也是如此。当然，南宋也有一些继续写婉约美词的人，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如北宋。

宋人写词，也写诗。诗总的来说没什么特色，与唐诗不能相比，只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是古代最富创作力的诗人，也是与辛弃疾类似的爱国诗人，诗歌颇得老杜之真传，尤长于七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代感特别强。陆游要

比“灭人欲”的理学家们可爱，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被老娘给拆散了，但对第一个妻子唐婉的感情却终生未灭。直到晚年时，他还写了好几首诗来怀念这位一生的挚爱，其中一首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泫然。”笔者曾前往沈园凭吊，尽管今日之沈园不复当日模样，可是在“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词句中，恍惚看到陆游与唐婉沈园邂逅的场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

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起开了先河。

其六，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在这本书问世后，又一种新的写史法问世，便是所谓的“纪事本末”体。由于《资治通鉴》是编年史，重大历史事件总被时间割裂成几个部分，故而南宋袁枢又别出心裁撰写《通鉴纪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单独列出再编年叙述，此亦是一大创新。

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郑樵的《通志》是中国史学之珍品，其精华部分在于“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加予论述，开拓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

五二 拨开迷雾见繁华：宋代的经济奇迹

我们总是一种印象：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比较孱弱的朝代。这个看法固然没错，除了前两任皇帝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其他皇帝统治时期，对外战争都乏善可言，能保住现有的地盘尚须用金钱贿赂，谈何对外扩张？可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对于一个存活三百年之久的王朝，战争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就如同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社会生活与文化经济，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仍是活动的重心所在。

现代历史学者已经抛开狭隘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不再以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兴衰为标准，而是以更贴近社会生活的角度分析一个时代的得失。当我们用新的视界回望宋朝，抛开皇帝的懦弱、朝廷无休止的争吵、政坛上的尔虞我诈与钩心斗角，看到的是大宋帝国生机勃勃的一面。

黄仁宇教授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这样写：“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从大宋开国始，物质文明的进步如影随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政治清明显然是一个前提，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恶政、暴政之中，人的创造力会被无限制地激发出来。大宋三百年的历史，大约有两百年是比较安定的，外患局限于边疆，内乱有，但时间都不长，地域也不

广。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本能便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今天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古代无此提法，但这个论断仍是适用的。

宋代的科技，可以说处于中国古代的巅峰时代。

中国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火药与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宋代，指南针技术在宋代也得到大大改进。这三种大发明，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火药开启热兵器时代、指南针在航海的运用，为大航海奠定基础；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得以普及，人类伟大思想得以传播并发扬光大。对此，英国汉学家麦都思这样评价：“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宋代的科技发展是全方位的，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一人便是沈括，他在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其作品《梦溪笔谈》一书包罗万象，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诫则是伟大的建筑学家，他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建筑学巨著，受到现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鼎力推崇。此外，宋代在机械、纺织、造船、冶金、采矿、数学、天文、医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这些科学发现、发明，极大刺激经济的发展。

我们来看看李约瑟先生是怎么评论宋代的科技：“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我们有理由为先人的成就而由衷赞叹。

西方学者在论及宋代经济时，总用“商业革命”一词。

譬如费正清与赖肖尔所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也写道：“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宋代能产生一场划时代的“商业革命”呢？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根源在于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的前提，正是技术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宋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行精耕细作与扩大复种制。由于引进水稻的早熟品种，过去只能一年一熟的地方可以实现一年两熟，这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土地耕种面积也大大增加，梯田、圩田、淤田、架田陆续出现，充分利用山地、洼地、沼泽地等，开辟新的耕地。此外，宋朝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扩大了水田的灌溉面积。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称之为宋代的“绿色革命”，并认为“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亩产量。”据估算，从11世纪到12世纪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宋朝的水稻产量增长了一倍。

粮食增长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到了北宋徽宗年间，全国人口数量突破一亿大关。人口增长同时又进一步推进了生产，城镇增多了，城镇人口也随之增多。令人惊讶的是，宋代城市人

口比重，要远远高于其他朝代，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北宋首都东京开封人口超过一百万人，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称它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农业之外，宋朝的工业也有长足进步，特别在冶金业上。煤的大量使用，使宋朝冶金业实现了一次革命。北宋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后来淮河以北被金国占领后，金国取代宋成为第一产煤国。美国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一书中写道：“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而宋朝采用煤进行冶炼的技术，比欧洲要早了七百年。

农业、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大等，都刺激了商业的繁荣。

在宋代之前，大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行政中心，而宋代却出现许多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当时的大城市里，店铺林立，汇集各地的商品，商业气息之浓厚，不逊今日。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图》，便可想象汴京当年商业之繁荣。在图上，有形形色色的商店，卖酒的、卖药的、卖布的、茶坊酒肆等，各行各业，无所不具，商店还挂着招牌，悬着小旗，招揽顾客，还有桥头路边的贩夫走卒，摇摆在河上的商船等。一幅图所能承载的内容有限，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泛黄的画卷，仿若走向千年前的大宋帝都。《东京梦华录》中这样写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殆可见当时帝都非但是商业之中心，几乎可称为世界之中心了。

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金融的发达。

宋代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于商业的发展，商品的大量流通，就需要更多的货币，金属货币满足不了需求。宋代除了

金银、铜钱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币，币值轻而重量大，使用相当不便。交子最早出现于四川，这是有原因的。在平定后蜀后，金银被掠到京城，造成贵重货币不足；而四川商业向来发达，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的原因，正是朝廷设“博买务”，垄断布帛、茶叶买卖，严令商旅不得私下交易，激起民变。农民起义失败后，宋太宗派张咏治理蜀政，而交子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起初交子只是一种信用凭证，即把钱存到交子铺后，换取一张可兑换的凭证，这样就省却携带许多铜、铁钱的不便。随着商业的发展，大家觉得交子使用方便，信誉又高，逐渐就直接以交子作为支付手段，便具备货币的职能。1023年，朝廷在蜀地设“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交子正式成为官方货币。这也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在六百多年之后，才出现纸币，美国学者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从这个意义看，宋朝的确显得十分“现代化”。

当然，交子的出现也引发新的问题。后来宋朝一度滥发，导致交子急剧贬值，形同废纸。这在世界纸币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宋代金融的发达，同样体现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新法中的“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二分利息贷款给农民，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王安石提出的二分利息并不算高，因为民间贷款的年利息往往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甚至在百分之二百以上，青苗法实施不利，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地方官吏以各种名目擅自提高利息。再如“市易法”，政府设“市易务”以平抑物价，商人们也可以向市易务抵押贷款或赊贷货物，这也是采用金融手段维持市场稳定。可以说，王安石的许多经济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只是太超前了，最后一执行就变调了，比如说市易法，原本是要打破商人的垄断，最后却成了政府垄断。

海上贸易的兴起，是宋代经济的又一看点。

在汉唐时代，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将商品经中亚运往西亚、欧洲。可是宋代在疆域面积上远不如汉唐，对河西走廊、西域都没有控制权。特别到了南宋，中原沦陷后，商品通过西北的丝绸之路运输更难。在这种情况下，对环境有极强适应力的中国人转而开拓海上航线，海上贸易也由此而兴盛起来。

宋代发达的造船业有力地支撑了海上贸易，此期为中国古代造船业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是造船的数量很多，全国有二十几处船场，年造船数量在三千艘以上。用于海上贸易的大海船，载重可达万石。另一方面，造船技术有突飞猛进的进步。我们借用墨菲在《亚洲史》中的一段话：“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设计上都有了惊人进展，有些船除了货物外还能运载六百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这些船采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舱（其他地方很久以后才知道）和同样重要的船尾舵，后者代替了难操纵又经不起海上风浪的摇橹。在所有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于当时西方船舶许多世纪。”除此之外，指南针的发明对海上航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对宋朝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时中国人的海上航线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海岸。也就是说，后来郑和下西洋时所到过的地方，宋人基本上都去过了，只是船队规模不如郑和的宝船队大。对外商品贸易首先带来巨额利润，据史学家估算，光是朝廷从海上贸易征收的税，约相当于政府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人涌入东南亚，有的经济史学家估计有一百万人侨居于国外，而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也迅速繁荣起来。

宋朝政府在开放性上要远远超过明清两朝，中国海上贸易最繁荣的朝代是宋代与明代，但明代除了早期郑和下西洋值得称道外，多数时间都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明代海禁政策的后果，是海上商人们奋起反抗，海盗之祸与明朝历史相始终。反观宋代，朝廷的政策显然比

后世更为开放与灵活。

这里有几个问题，何以宋代能创造出许多世界第一呢？何以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国力却不强大呢？对于西方史学界对宋代极尽赞美的观点，要如何看待呢？

确实，两宋在科技与经济上，在当时世界无可与之匹敌者，其原因何在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比较清明。笔者在本书中多处提到宋代政治的清明，这个清明，当然是与其他朝代相比而言。

清明一方面体现在朝政上，与历朝相比，宋代朝政有如下特点：其一，没有大规模的杀戮现象。宋代也有一些冤杀的现象，但即便是岳飞冤案，也只限于少数几人，不要说杀戮几百几千几万人，就是杀几十人也十分少见。而像汉武帝时的巫蛊事件，死了数万人，更不用说明初杀戮，动辄上万人。其二，朝廷党争，手段是温和的。宋代朝政一大弊病是党争，但比较东汉的党锢之狱与明代的东林党之狱，那只是互吐口水而已，顶多立个党人碑，绝少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其三，宦官用事少。中国历史上一大毒瘤就是宦官专政，宋代虽有像童贯等少数几个宦官权臣，但与汉、唐、明的宦官之祸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清明的另一方面，是对下层百姓的统治相对比较仁厚。尽管有些皇帝统治时，民愤很大，比较说宋徽宗时期，激发了方腊大起义。但总的来说，多数时间里，朝廷还是比较宽厚的，就给民众有了施展才智的空间，能竭尽所能去寻找出路，创新意识以是为开端。比如说，铜钱铁币不好使，交子便应运而生；丝绸之路断绝，便开辟海上贸易等。这些创新，都始自民间，然而与政府的支持也分不开。如交子在朝廷认可后，才成为真正的货币；对待海上贸易，朝廷也没有采取明清的海禁政策加以制止。因此，民间经济才能迸发出无限的活力。

那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何以宋朝国力却不强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前面变法内容中就提及了。一方面，经济繁荣，国家却不富，这是很矛盾的事情。钱都到哪去了呢？冗禄、冗官、冗兵，还有每年支付给辽、西夏、金的岁币，以及战争赔款，战争支出等。另一方面，宋朝制度内重外轻，强干弱枝，以致法久生弊，积重难返，通过变法手段也难扭转。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外，其他宋朝皇帝都难以称得上是雄才伟略，多数皇帝只知守成，而绝少开拓。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国力不强的局面。

对于宋代，国外许多汉学家、史学家都极为推崇，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时代”（费正清）、“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史景迁）、“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墨菲）、“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谢和耐）等。老外的赞美之辞，令我们这些大宋后人深感鼓舞与骄傲。可是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何以在多数国人眼中，宋朝的形象并非如此。千古流传的《杨家将》《岳家将》都有一种悲壮的旋律，陆游、辛弃疾的诗词，总带着望不到尽头的无奈。

这种看法的不同，我想在于感受的不同。

其一，老外学者们生活在一个以科技、经济来衡量国家的时代，当他们发现中世纪的大宋帝国在这些方面远远胜过同时代的欧洲时，便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国汉代时，西方世界有罗马与之媲美，大唐盛世时，西亚有阿拉伯帝国与之匹敌，而在宋代，中国鹤立鸡群，更彰显其耀眼的光芒。

其二，作为局外人，他们很难有那种一个国家遭受屈辱的感受，当把文明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时，其他事件，譬如“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感伤、譬如“山河破碎风飘絮”的痛苦，就轻而易举地抹杀了。

从文明的角度说，大宋帝国是胜利者。因为它的敌人辽、金乃至蒙古，都为其灿烂的文明所吸引，并自动吸纳其文明的果实。汤因比

在论及宋代的中国时，有一句精彩的话：“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补偿。”放在大历史的视野来看，确是如此。可我们若是设身处地来考虑，假设自己是大宋帝国的一个臣民，恐怕也不会愿意接受这种补偿的论调，我把文明传播给你，还要受你欺负，这是哪门子的事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宋朝的历史可给我们许多启示，让我们深思。一千年前大宋帝国所创造的辉煌文明，证明中国人拥有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新精神，这足以给一千年后的国人更多自信与自豪。同时，宋朝历史也告诉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先进同样可能挨打，一个国家不管科技、经济如何发达，若没有强大的国防，若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璀璨的文明之花也会在疾风暴雨下凋落枯萎。

宋朝历史大事记

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夺后周之权，大宋开国；平李筠之乱。

961年，罢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

963年，平荆南、湖南。

965年，王全斌平西蜀。

969年，宋太祖亲征北汉未克。

971年，潘美平南汉。

975年，曹彬克金陵俘李后主，平南唐。

976年，宋太祖赵匡胤暴死。

979年，太宗亲征北汉，北汉亡；伐契丹，败于高粱河。

980年，耶律休哥大破宋军于瓦桥关。

982年，辽萧太后临朝。

986年，曹彬、潘美伐契丹，先胜后败，杨业战死。

989年，尹继伦败耶律休哥于徐河。

993年，王小波、李顺起义。

997年，宋太宗去世，宋真宗立。

1004年，宋与契丹澶渊之盟。

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

1041年，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

1043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

1044年，宋夏议和，诏封元昊为夏国王。

1053年，狄青大败侬智高于邕州。

1056年，包拯知开封府，以刚毅立朝。

1067年，宋神宗登基。

1069年，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

1070年，以王安石、韩绛为相，大力推行新法。

1073年，王韶开熙河之地。

1076年，王安石免相。

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罢保甲、保马诸法。

1086年，司马光为相，罢青苗、免役诸法。

1093年，宋哲宗亲政，起用新法人物章惇、吕惠卿。

1100年，宋哲宗去世，徽宗立。

1102年，追贬司马光等四十余人，立党人碑；蔡京为相。

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

1118年，宋与金约夹攻辽国。

1121年，平方腊、宋江起义。

1122年，宋发兵攻辽，败绩；金兵攻克燕京。

1123年，金归还宋燕及六州之地。

1125年，金大举南侵宋；宋徽宗传位于钦宗。

1126年，贬蔡京、诛童贯；金兵攻破京师。

1127年，金兵俘徽、钦二帝，立张邦昌为楚帝，北宋亡；宋高宗赵构即位。

1128年，宗泽去世。

1129年，兀术大举南侵，高宗逃亡入海。

1130年，金攻破东京，立刘豫伪大齐政权。

1131年，张俊、岳飞平江淮乱军。

1134年，吴玠大破金兵于仙人关；岳飞收复襄阳六郡。

1140年，刘锜、岳飞大破金兵于顺昌、郾城；岳飞班师。

1141年，岳飞冤死；宋与金议和。

1161年，金帝完颜亮以六十万众南征；虞允文破金兵于采石。

1162年，宋高宗逊位，宋孝宗立。

1163年，宋张浚北伐，败于符离。

1189年，宋孝宗退位，宋光宗立。

1194年，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宋宁宗立。

1197年，韩侂胄大兴党禁。

1206年，韩侂胄北伐，大败。

1207年，史弥远诛韩侂胄。

1210年，蒙金开战。

1224年，宋宁宗死，史弥远矫诏立宋理宗。

1234年，宋、蒙攻蔡州，金哀宗死，金国灭亡；宋收复汴京、洛阳，旋败退。

1235年，蒙古大举攻宋。

1239年，孟珙收复襄、樊。

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卒。

1242年，宋以余玠为四川制置使。

1257年，蒙古分三道大举攻宋。

1259年，蒙古攻合州钓鱼城未下，蒙哥汗死。

1260年，蒙古忽必烈即位。贾似道伪奏鄂州大捷。

1264年，宋理宗死，宋度宗继位。

1268年，蒙古进围襄阳。

1271年，蒙古始建国号为元。

1273年，襄阳之战第六年，襄阳、樊城陷落，吕文焕降元。

1274年，元以伯颜为统帅，大举伐宋。

1275年，贾似道兵败，郑虎臣杀贾似道；宋沿江诸城多陷，元军进逼临安。

1276年，伯颜俘宋幼主及太后北去；张世杰、陆秀夫等立赵昰。

1278年，文天祥抗元，被俘于五坡岭。

1279年，厓山海战，陆秀夫负幼帝投海死，宋亡。

历史中国

· 1644—1911

清朝

原来是这样

罗杰◎作品

一条辫子为何会拖垮清王朝？一个谣言何以让乾隆坐卧不宁？
雍正『高薪养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曾国藩如何撼动了
晚清政治的格局……
本书解开了清王朝最为
隐秘和禁忌的历史密码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历史中国

——· 1644—1911

罗杰◎作品

清朝

原来是这样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录

一个序言

- 一 辫子背后的历史密码
- 二 皇权斗争
- 三 前清的宦官与言官
- 四 顺治“罪己诏”
- 五 雄主康熙的大手笔
- 六 盛世经济与历法之争
- 七 皇子夺嫡
- 八 残酷“文字狱”
- 九 秘密建储与密折制度
 - 一〇 禁赌风云与高薪养廉
 - 一一 李卫当官真实版
 - 一二 年羹尧的官场沉浮
 - 一三 雍正猝死之谜
 - 一四 乾隆的身世与文治武功
 - 一五 六下江南那些事
 - 一六 文人宰相纪晓岚
 - 一七 叫魂奇案：盛世下的阴影
 - 一八 天下第一贪
 - 一九 闭关锁国
 - 二〇 禅位真相
 - 二一 和珅倒台始末
 - 二二 白莲教起义
 - 二三 王朝危机
 - 二四 经济困境
 - 二五 鸦片战争始末

- 二六 咸丰即位内幕
- 二七 内忧：太平天国运动
- 二八 内讧：天京血腥惨案
- 二九 曾国藩：最具争议的晚清权臣
- 三〇 叶名琛的悲剧
- 三一 最后一位出生在紫禁城的皇帝
- 三二 慈禧与奕䜣的权力争夺战
- 三三 安德海被杀真相
- 三四 刺马奇案
- 三五 洋务运动之争
- 三六 晚清官场大腐败：捐官与科场行贿
- 三七 透视甲午战争
- 三八 戊戌变法103天
- 三九 光绪帝死因探疑
- 四〇 末代帝王与清王朝覆灭
- 附录1：清朝大事年谱
- 附录2：清朝十二位皇帝简介
- [返回总目录](#)

一个序言

中国的历史很长，朝代也特别多。最后一个朝代叫作清朝。有些人认为，清朝的第一个皇帝是顺治。其实在顺治皇帝以前，清朝已经有过两代君主：太祖努尔哈赤与太宗皇太极。

努尔哈赤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沈阳之东，新宾县城之西三十里赫图阿拉城宣布独立，自称金国汗。

他死后，儿子皇太极继位，当了十多年的汗后，改称皇帝，把国号改为“大清”。皇太极当皇帝当了七年零四个月，就去世了。在他之后，是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顺治能够继位，是清朝皇室两大政治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一个是他的叔叔多尔衮，一个是他的哥哥豪格，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顺治皇帝做了18年皇帝，在顺治十八年正月死亡。有人说，他没有死，做了和尚。康熙呢，命很长，人也很好。他的雄才伟略缔造了“康乾盛世”的辉煌。让人遗憾的是，清朝的“文字狱”始于这位皇帝。而他一生最痛心的问题，莫过于传位问题上的进退失据，几个皇子间的明争暗斗让他在晚年心力交瘁。

康熙末年，清朝的社会已经出现停滞，形式复杂，又因为减免赋税，导致财政困难，扔下一个烂摊子，只等后人来收拾。

雍正皇帝办事果断，手段毒辣。他继位后，实行多项改革，励精图治，他的勤政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史料记载，雍正皇帝现存仅朱批的奏折就达35000多件，其总字数以雍正执政13年相除，平均每天

是8000多字。事实证明，他这13年的功夫没有白费，“康乾盛世”能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雍正皇帝功不可没。只是这个皇帝猜忌多疑，在位时统治相当严酷。

乾隆，这位皇帝的寿命比康熙还长，自称“十全老人”，喜欢花钱，爱出风头，把祖宗几辈子的钱都花光了，导致吏治腐败，贪腐成风。乾隆王朝中后期时，社会开始走下坡路，末年更是出现了“饥饿盛世”。

乾隆皇帝丢下的烂摊子比康熙皇帝更甚，他的后人嘉庆皇帝，憋着一肚子气，老头子说要效仿圣人禅让，却是名不副实，开给他一张空头支票，凡事还是要他老人家点头才作数。好不容易挨到乾隆驾崩，嘉庆亲政，却要为清朝国力由强转向衰败埋单。国库的银子已经让乾隆折腾得差不多了，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扳倒大贪官和珅，让大清王朝吃了一顿饱。

嘉庆皇帝虽然勤政图治，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颓势难以挽回，在位期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白莲教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清王朝国力迅速滑坡。

接下来是道光皇帝，这位皇帝以俭朴著称，穿着打补丁的破鞋子，经营着大清王朝这个烂摊子，依然不见起色。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还是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这位皇帝在悲愤中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那时，紫禁城残阳如血。

清朝入关后的第七位皇帝，道光的第四子咸丰，在慌乱中接过了这杯苦酒，未及送到唇边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在咸丰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两国再次对清王朝宣战，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佬也趁火打劫，蚕食中国领土，咸丰皇帝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条约，割地赔款，将中国进一步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咸丰的正宫皇后钮祜禄氏很老实，侧室妃子叶赫那拉氏很厉害。

叶赫那拉氏在咸丰皇帝死后大权独揽，叫人家尊称她为慈禧太后。

慈禧懂得使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于是消灭了太平天国。但她缺乏国际常识，应付不了外国，因此，一败于法兰西；再败于日本；把我们自己同胞所居住的台湾送掉。后来，她想借重一批画符念咒的义和拳扶清灭洋，引来了八国联军。京城和大片土地都被联军占了，她只得向人家赔钱、赔礼。她的儿子同治皇帝与侄儿光绪皇帝，被她先后当作傀儡。后来，光绪自己当家，找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准备大大地改革一番，她大发脾气，把光绪皇帝关了起来。

她比光绪晚死一天。死后，光绪的一个侄儿溥仪当了皇帝，年号宣统。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历经近300年的大清帝国在隆隆的炮声中坍塌。

在中国，自秦始皇以下的2000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200年以上的大一统皇朝，只有西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在中国的历史舞台存在了268年之久。

如此漫长悠久的历史，自然要从明清两朝的交替说起。明清交替与中国以往朝代的交替不同，是少数民族代替汉族，其民族矛盾不可避免。这些矛盾体现在战争上，制度上，还体现在一些传统文化习俗上。因此，作为清兵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遇到了太多棘手的问题，其中一个，便是“辫子问题”，由此而引发了“剃发令”事件。这是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甚至影响了清王朝的整个历史。现在我们就从这个事件开始，一步步揭开大清王朝268年的历史真相。

一 辫子背后的历史密码

大清顺治皇帝于公元1644年入关，定鼎中原。在第二年的元旦，一个叫孙之獬的官员，向顺治皇帝上疏说，皇帝陛下您平定了中国，万象更新。可是，衣冠束发的制度，却还有明朝的那一套，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入关后，明朝官员纷纷投降了清朝。上朝时，便有满臣和汉臣两班官员。这两班官员的穿戴打扮大不相同。满洲官员剃发留辫，身着满服；汉族官员束发戴冠，身着汉服。尽管服饰装扮迥异，而两班官员并无异议。在满人官员眼里，汉人官员的装扮是顺眼的；汉人官员虽觉得满人官员脑后的一条鞭子有些扎眼，却也无伤大雅。作为满人的顺治皇帝，对汉人官员的装束也能接受。因此，自入关后的一年多来，满汉两臣和气共处，相安无事。

然而，一个叫孙之獬的官员，突然提出了官员衣冠束发的问题。孙之獬为何要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居心何在？这也是清王朝很多满洲官员心中的疑问。

孙之獬原是明朝天启的进士，他做官时正是魏忠贤当权的时期。当时，阉党吃香，他便成为阉党成员，着实过了一段好日子。清军入关以后，孙之獬立即俯首乞降，自己带头与家人奴仆一起剃头留了辫子，并换上了满装，一心一意在山东等待清军的到来。大清朝廷为收揽人心，接纳并让他当了礼部侍郎。

然而，很多满臣却不认为孙之獬是一个忠臣。理由很简单，孙之獬是一个汉人。满臣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孙之獬越是渴望

站到满臣行列中，满臣们就越排斥他。

孙之獬碰了一鼻子灰，感到委屈，转而想回到汉臣的行列。孰料，汉臣也排斥他。因为他剃发留辫，被一些汉臣视为“汉奸。”

孙之獬被孤立了，这种孤立让他愤怒。愤怒之下，孙之獬向顺治皇帝上疏。顺治皇帝当时年仅七岁，他并不知道孙之獬上疏的真正原因。但孙之獬的一句“中国从陛下也”，让这位少年天子万分感动，且热血沸腾。同时，摄政王多尔袞也认为，应该颁布“剃发令”。

“剃发令”规定：凡是清军所掌握的地区，在十日之内，尽行剃发蓄辫；凡不剃者、迟疑者、上表章请求保存者，一律杀无赦。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满汉民族矛盾激化。

中国的儒家思想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因此，反抗清朝统治者“剃发令”的大有人在，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得不剃发蓄辫，以求保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怕死者涕泣而剃，不怕死者宁死不剃”。

当时，“剃发令”下达到各地官府后，官府的官员们便命令“剃匠”，担着剃头挑子，游行于街市之中，强行剃发。

所谓“剃匠”，都是头戴红缨帽的八旗兵，一组三人至四人。一个手拿剃头刀，其余两三个人，抱着鬼头刀。接受剃发者，用剃头刀剃发，并享受热水、手巾的待遇；抗拒剃发者，则享受砍头的待遇，被鬼头刀砍下的头颅，被“剃匠”挂在十字架形状的竖杆上。

一个王朝初建，首要的问题，是稳定人心，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而清朝初期“剃发令”的实施，带来的却是动乱。在顺治皇帝颁布“剃发令”之前，反抗清军的主要是明朝的残余部队；当“剃发令”颁布之后，很多老百姓也站在了清政府的对立面。

剃发与留发的对抗，实质上是两种文化传统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江阴县（今江苏省南部）。

顺治二年（1645），“剃发令”下达到江阴。江阴的众多老百姓与乡绅，向知县方享请愿，跪请留发。方享不但不接受，反将请愿者骂走。第二天，一个叫许用的秀才聚集了一批人，在江阴的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

当日下午，一队乡兵手持武器冲进县衙，把知县方享抓进了监狱。然后推举典史（县衙管缉捕和监狱的官员）阎应元和陈明遇为首领，共同商议抗清守城大事。

清廷方面，获悉江阴造反，火速派大兵前往镇压。江阴百姓与官兵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5000余。最后，终因兵力悬殊，城破。清军攻进江阴，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清军对江阴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疯狂杀戮，城中百姓遇难人数多达17万余人。江阴城几乎变为了一座“鬼城”。

有一首悼念江阴死难者的诗词，这样写道：“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这一段剃发与留发的对抗，在历史上被称为“江阴十日”。接下来，又发生了“嘉定三屠”。

嘉定在江阴的东南面，也展开了反剃发斗争。

顺治二年七月初一，清廷派明朝降将李成栋率兵前去镇压。嘉定百姓推举当地士绅黄淳耀和侯曾炯主持城防，在城墙悬起“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城中的男女老幼，都被组织起来抵抗清军。

清军围城猛攻，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嘉定军民坚守了十余天。后因连日大雨，将土城墙冲破，清军趁势用大炮猛烈轰击，终于攻入城内。李成栋下令屠城，嘉定城内“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被屠

杀者约3万余人。

不过，嘉定百姓并没有被恐怖的杀戮所吓倒。李成栋离开后，四处逃散的民众再一次聚集起来，反清义士朱瑛率领50人进城，集合百姓，再次控制了嘉定。李成栋派部将徐元吉率兵前往镇压，居住在嘉定城内的百姓，听到消息后，纷纷逃离。因此，清军的镇压行动便放在了城郊，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

之后，明朝绿营把总吴之璠在江东起兵，反攻嘉定，不幸惨遭失败，起义军全军覆没。李成栋恼羞成怒，下令屠城，嘉定再遭浩劫，嘉定城内外又有2万余人被杀害。

这三次对嘉定的屠杀，被称为“嘉定三屠”。

然而，江阴和嘉定的叛乱虽然平息，但江南地区的许多城市，如常州、无锡、宜兴、嘉兴、绍兴等地的民众，也先后起义，进行反剃发斗争。这些斗争都遭到了清军的血腥镇压。繁华的江南地区受到严重破坏，到处是断井颓垣，一片破败景象。

用今天的话说，这是由发型引发的血案。那么，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清朝的满人为什么要剃发留辫子？

这要从满人的祖先说起，满人发源于我国东北地区长白山、黑龙江一带，以打猎捕鱼为生。剃去前额和四周的头发，将留存的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脑后，行动会更方便。能够避免穿山越岭的时候枝藤挂住头发，也能够避免射箭的时候乱发遮挡视线。

其实，剃发留辫不仅仅是满人的习俗，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大多都会把前面的头发剃掉，使骑马打猎时更方便。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时代也是剃一部分，留一部分。日本（和族）在明治维新以前，男子的发型与成吉思汗时期的发型相类似，从“浮世绘”上可以看出，这种习俗可能与南洋群岛凿门齿的习俗是同一起源，是有意造成身体某一部

分残缺的成人礼。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俗，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清军入关以后，要求汉人遵循他们的文化习俗，下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引起了汉民族百姓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持续不断，是清朝统治者始料未及的。他们实在不明白，头发难道比脑袋更重要吗？

当时，清军虽然入关，但全国尚未真正统一，一些地方的反清情绪还很高涨。而为了一个发式问题，导致民族矛盾激化是得不偿失的。此时，一个叫洪承畴的人，为了缓和这种矛盾，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上疏顺治皇帝。

洪承畴本是明朝的一位重臣，后投降了清王朝，成为清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其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该书是乾隆四十一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之际，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共有一百二十人之多，洪承畴便是其中之一。

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当时，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峙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

面对清军强大的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峙近一年，清军进退两难。但是关键时刻，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皇帝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致使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松锦之战”。

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皇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三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

投降了清王朝。

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于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

这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的证实。而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被崇祯的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之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被是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的。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

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群起反对。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尽管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也只得到一份闲职，并未受到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袞成为摄政王以后。

多尔袞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袞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的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了脚跟。

洪承畴对清王朝的忠心不容置疑，在清王朝颁布了“剃发令”，引起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民变时，洪承畴向顺治皇帝提出了“三从三不从”的主张。

这一主张的主要内容是：“男从女不从；官从吏不从；生从死不从。”顺治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也正是洪承畴的这道奏书，让此后大清朝的汉民族女人可以穿明代衣裙，梳汉式发髻；衙署的吏役可以穿汉式差服；死人入殓也可以打开发髻，穿上汉式的衣衫。

这样一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平民百姓对异族习俗的抵触情绪。实际上，清王朝推行“剃发令”，绝不仅仅是维护本民族风俗习惯，而是想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汉人，特别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使满人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从之后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一措施所起到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汉人不再执着于本民族服饰，他们渐渐习惯了满洲的发式和服装。而满洲人也受到汉人孝悌观念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毁坏的。满洲战士如果战死沙场，他们的尸骨被埋在外地，但辫子都会剪下来，附上姓名籍贯送回老家，招魂安葬。

尽管两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不断融合，但清王朝“剃发易服”政策的影响，非常深远。纵观大清近300年的历史，每一次发生的农民武装暴动，所提出的口号，大都是“复我大汉衣冠”。康熙皇帝削三藩时，吴三桂反清，提出的口号是“反清复明，恢复衣冠，散辫留发”。白莲教起义，上百万教众打开发辫，横行江南数省，让当时已经是太上皇的乾隆皇帝死难瞑目。乾隆皇帝临终的那一年，在山庄林下戏题碑上还留下了一句“二竖获日指，一章捷望天”的哀鸣。

到了晚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5），天王洪秀全带领太平军造反的时候，辫子又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后来，太平天国颁布了一道同样严厉的“蓄发令”，不过这次成了“剃发不留头，留头不剃发”，意思是想保住颈上的脑袋，就得留起长发，太平军的“长毛”绰号就由此而来。最可怜的是有些人像阿Q一样，因为脑袋上长了癞痢或者生了虱子被剃了头，结果也被认为是违令不遵给杀了。

但是，太平军的地盘并不稳固，每次都是打了跑，跑了打。结果后面的湘军赶来，看谁背叛朝廷留了发，抓住也要杀头，这下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聪明的人，就搞两面派，让额头上的头发长出一点点，弄得不伦不类，两边应付。说来好笑，太平军按资排辈时，就看额头前面的头发，头发长的自然参加起义早，起义晚的自然头发短，一目了然。

中华民国成立后，第29号公报中就发布了《剪辫令》：令到之日，限二十日内，全民一律剪辫，有不遵者按违法论。这次虽然没有以杀头相威胁，但响应者甚众。一时间，大街上满是丢弃的辫子。有少数对新政权心存疑虑者，偷偷把辫子藏在帽子里，鬼鬼祟祟上街。革命少年一发现了他们，往往立刻扑上前去，掀翻帽子，扯出长辫，“咔嚓”一声，辫子就被剪没了。

最有趣的是，被剪者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觉得脑后一阵凉风袭来，用手一摸，脑后的辫子已经没了。倘若是清朝的遗老，定要当街大哭大骂。而那些“肇事”的革命少年，则在这场恶作剧一般的剪辫子行动中一哄而散。

1911年，旧历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在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之初，国父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剪发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铁血口号，变成了“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的宣言。

辛亥革命后，本来辫子的历史也该寿终正寝了，但还有个回光返照。1917年的时候，“辫帅”张勋趁北京政局不稳，便率领自己的“辫子军”杀到北京，拥溥仪推行复辟。这下“辫子”又神奇活现起来了，那些剪了辫子的，又慌忙到处装假辫子，一时间假货横行，满街的辫子使用的都是物理嫁接术。辫子竟然成了北京城的抢手货。不过，假辫子也就流行了12天。张勋的倒施逆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讨逆军在北京上空扔了几颗炸弹，把没见过世面的“辫子军”吓得半死。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抱头鼠窜，溥仪也只得再次退位。至此，辫子也就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纵观这些风起云涌的起义、革命，清王朝似乎从未有过安宁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清朝统治者能以20余万人口统治中国近300年，在很多大政策上是高于明王朝的。从清朝初期的撤辽饷、练饷、剿饷的政策，到康乾盛世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不修

长城到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清朝统治者都是站在大中华的立场为君为国的。他们牺牲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代价，而融入到中华大家庭中。可是，偏偏在比语言、文字次要的剃发和衣冠问题上，固执己见。

或许可以这样说，“辫子问题”是大清王朝覆灭的因素之一。历史上，曾有“一根稻草压垮明王朝”的说法，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一根辫子拖垮清王朝”呢？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谁能想到“剃发令”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一个汉族官员，他就是向顺治皇帝上疏的官员孙之獬。在清王朝颁布“剃发令”的3年后，孙之獬因为受人钱财卖官而遭革职，被遣返回老家淄川。他回到老家的时候，刚好赶上山东谢迁起义，谢迁率领起义军攻入淄川后，杀了孙之獬的全家。为了给天下人解恨，谢迁说：“贪得一官，编天下之发。我现在就给你种上头发。”于是，在孙之獬的脑袋上凿了个洞，插了几根头发，孙之獬疼痛难忍，昏死过去。而起义军仍不解气，又他把活剐了。

孙之獬是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剃发的主张虽然是由他提出，但真正将“剃发令”落到实处的，是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多尔衮。从这里，也可以发现一个历史的规律，小人物往往会改变大历史，而小人物的下场也注定比大人物悲惨得多。

二 皇权斗争

前面说到“剃发令”，事实上，颁布“剃发令”的并不是顺治皇帝，而是摄政王多尔衮。1643年，顺治皇帝登基，年仅六岁，由于年龄尚幼，尚未亲政。1648年，多尔衮被封为“皇父摄政王”，这个怪异的称呼，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不少人认为，只有皇帝的母亲屈尊下嫁，多尔衮才能获得这种尊称。久而久之，孝庄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成为了清朝历史中的一大谜案。

历史上，有一种观点是说，孝庄为了保住顺治皇帝的皇位，因此，才被迫下嫁多尔衮。也有一种观点，说是顺治皇帝孝顺，考虑到母亲与多尔衮多年的情谊，以及多尔衮拥立自己继承皇位的恩情，在大臣的提议下，议请多尔衮与母亲结合。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当时的满洲，父死子娶其庶母；兄死弟娶其嫂，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而孝庄死后，并没有和皇太极葬在一起，而是被葬到清东陵，于是有后人猜测，孝庄因为下嫁了多尔衮，觉得对不住皇太极，有失皇家颜面，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一处。

其实这些观点和理由都很牵强。原因很简单，顺治皇帝继承皇位是经过非常复杂而激烈的斗争才确定的，并不是孝庄嫁给多尔衮就能解决的，这要从皇太极驾崩说起——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皇太极像往常一样，忙碌了一天。当天晚上亥时，他端坐在清宁宫南炕上，突然驾崩，时年五十三岁。

噩耗来得如此突然，令人无比震惊。皇太极去世的当天，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毛病。就在前一天，还在崇政殿为第五个女儿固伦公主下嫁内大臣和硕额驸恩格德里之子索尔哈举行盛大的仪式。

再往前追溯三个月，皇太极都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病症。

在清代官修的史书中，几乎都记载说，清太宗皇太极死时，是“无疾而终”；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因而产生了种种推测。

有一点可以肯定，皇太极之死，绝非“无疾而终”，事实上，他是因病而亡的，只是清代官方史书没有公开而已。那么，皇太极到底死于什么病呢？清朝官方史书中，没有透露任何蛛丝马迹。而朝鲜史书《李朝实录》记载：四月初六，清人向长住沈阳的国王之子问药，认为皇上得的是风眩病，希望朝鲜提供中草药竹沥，而且要请名医给皇太极治病。

按《李朝实录》用竹沥治疗风眩病，竹沥主治化痰、去热、解烦闷等病症。皇太极一生劳累，去世前几年国事更加繁重，加上宸妃之死，精神受到打击，导致情志不舒，痰火上升，血热上涌，头昏眩。这些症状容易引起中风症，血压升高而猝然死亡。皇太极所患病症，应该不出这个范围，而且这些病症是导致他死亡的主要原因。

一些史书上，说皇太极是患“痰疾”而死，恐怕不够准确。痰是其他病症引起的，仅仅一个“痰”还构不成重病。也有人认为，皇太极是因怀念宸妃过度伤感而死。根据是宸妃去世前，皇太极已经患病。宸妃之死无疑加重了他的病情。

皇太极一生，极为勤勉，既驰骋于疆场，又日理繁重政务。由于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没有放松的时刻，严重损害了健康，致使他

积劳成疾，当潜伏的重病一朝突发时，他便顷刻丧命。据此推断，皇太极因中风而亡的可能性非常大。

皇太极死得太突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继承皇位。诸王贝勒们一点准备也没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忙乱和哀悼后，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打响了。

关于皇位的继承问题，太祖努尔哈赤曾留有遗诏，按照规定，皇位的继承要满洲贵族来讨论、决议。

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崇德八年（1643）八月十四日，在皇宫崇政殿内，满洲亲王、郡王们展开关于皇位继承问题的讨论。其中有几位亲王和郡王的意见尤为关键。他们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袞、肃亲王豪格；还有三位郡王，分别是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

在这几个人之中，最有实力继承皇位的，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袞。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人才出众，久经沙场，屡建军功。他的拥护者是正黄、镶黄旗和正蓝旗的大臣。尤其是两黄旗的贝勒大臣，誓死效忠豪格。

多尔袞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皇太极之弟。他的拥护者是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又是他的同胞兄弟，而且多尔袞多次统军出征，屡立大功。

这样一对比，就很清晰了。满洲八旗中，正黄、镶黄和正蓝旗拥戴豪格；正白旗和镶白旗拥戴多尔袞。那么，掌管正红旗和镶红旗的代善，以及掌管镶蓝旗的济尔哈朗，他们的意见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在崇政殿，代善提出豪格为“帝之长子，当承大统”。如此一来，两黄、正蓝旗和两红旗都支持豪格，让豪格分外欣喜，他认为自己继承皇位的大局已定，于是就假意谦让，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

这是一句客气话，豪格假意推辞，目的是让众人再三请求，然后自己顺势登上皇位，这样既显得既谦恭，又是众望所归。

哪知道，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并不跟他客气，他们一脸愤懑，拒不相让。

在激烈的争执之下，支持豪格的两黄旗大臣，手握佩剑说：“我们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恩情有天大，如果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愿一死追随先帝于地下。”

看这架势，是要以死相拼了。此时，礼亲王代善见形势不对，以年老多病为借口退席而去。随后，英郡王阿济格，以不立多尔袞而退出；豫郡王多铎则沉默不发一言。这两位都是多尔袞的同胞兄弟。他们的立场很明确，就是要让多尔袞继承皇位。

就在豪格阵营和多尔袞阵营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紧要关头，表面憨厚、内心机敏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既不让多尔袞继承皇位，也不让豪格继承皇位，而是让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承皇位。

多尔袞迅速权衡利弊，如果自己强行继位，势必会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火并，其后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而让豪格登基，自己又不甘心，而且还会遭到豪格的报复，如果让年幼的福临继位，则可以收“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自己摄政、避免内讧。

于是，多尔袞站出来说，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皇子当中，豪格提出他不继位，那就请福临继位。福临年纪尚幼，就由我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

豪格想反对，却提不出反对的理由，支持他的两黄旗，都提出要立先帝之子，而福临也是先帝之子。也许，他很后悔自己的假意谦让，这一谦让就真的让出了皇位。

就这样，年仅六岁的福临意外地坐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改国号为顺治。

说起来，福临能继承皇位，也有多尔衮的功劳。毕竟，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他毅然支持了福临。然而，在他死后，已成为顺治皇帝的福临，却对他掘墓鞭尸、焚骨扬灰，而且不准任何人上坟祭扫——这是对死人最严酷的刑罚，目的是让其下辈子不能投胎转世，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顺治皇帝福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和多尔衮之间到底有多深的仇怨？这要从顺治即位后说起——

崇德八年（1643）八月二十六日，顺治皇帝福临在沈阳即位。作为满洲人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天下归属在福临名下，但福临却掌握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在经过一番经营后，从“叔父摄政王”变成了“皇叔父摄政王”，再到后来的“皇父摄政王”，距离真正的“九五至尊”称号，仅一步之遥。

大权独揽的多尔衮，开始排除异己，首先清除的是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入关后的济尔哈朗，基本不过问国家大事，甚至还沉溺于享乐中。但这不仅没让多尔衮放心，反倒让多尔衮抓住了把柄——多尔衮为了让自己的亲弟弟多铎做辅政王，给济尔哈朗安了一个“王府规格超标”的罪名，强行把济尔哈朗的摄政王爵位给剥夺了。过了一年，多尔衮又把与他争夺皇位的豪格定了罪，豪格最后死在了牢狱之中。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愈发霸道专横，颐指气使，生活穷奢极欲。他的妻妾究竟有多少，难以统计，有名分可查的至少有10个

妃子。而且，多尔袞还曾逼迫朝鲜送公主来成婚，公主送来了，他玩弄一番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

而身为天子的顺治皇帝则战战兢兢，仰人鼻息，任人摆布。尽管如此，顺治皇帝在年纪尚幼时，就表现出一个帝王应有的气质和不可冒犯的尊严，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明显。

史料曾记载了他登基前的一件小事。当时，迎接他前往笃恭殿举行登基大典的仪仗队，正要整装待发的时候，他的乳母提出要与他一起乘坐仅供皇帝专用的辇车。这个表面放肆的要求，其实是乳母觉得他年纪太小，为他担心。但顺治皇帝却坚持一个人乘坐，他认为，这辆看似普通的辇车，代表了一个皇帝的尊严，没有人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由此可见，顺治皇帝的成熟俨然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

试想，自小便认为皇权尊严至高无上的顺治皇帝，对于多尔袞的妄自尊大、蛮横专权，怎能不心生忌恨？

关于多尔袞的狂妄自大，《中国史稿》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随着权势的急剧膨胀，多尔袞对顺治的表面尊崇也无影无踪。顺治四年（1647），他以体有风疾，跪拜不便为由，对顺治帝不再行跪拜礼。”

而《清史稿》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四年十二月，王以风疾不胜跪拜，从诸王大臣议，独贺正旦上前行礼，他悉免。”

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袞在古北口外围猎，不慎坠马受伤，于十二月初九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噩耗传到京城，顺治皇帝下诏，举行国丧。次年正月，顺治皇帝亲政，一个月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多尔袞的十大罪状。没收了多尔袞的家产，罢免

剥夺了多尔衮的爵位和奖赏，并诛杀追随多尔衮的党羽。接着，又掘开多尔衮的陵墓，割下其头颅，用棍子和皮鞭抽打蹂躏后，抛置于荒野。

关于这一段“鞭尸”之说，来自于当时在北京居住过的两名外国传教士，他们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名叫《鞑靼战记》，书中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多尔衮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无论《鞑靼战记》的记录是否完全属实，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多尔衮的陵墓确实是被毁坏了多次。

另外，顺治皇帝当时也曾下旨，任何人不得为多尔衮扫墓祭祀，让其不得享血食，这算是封建时代最为严厉的惩罚了。致使此后的一百多年间，无人敢论及多尔衮，直到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平反”，多尔衮的五世孙淳颖继承了睿亲王爵位。

而关于多尔衮摄政七年后，突然去世的确切死因，官方的史书记载却很含糊。多尔衮死时，正值壮年，一个长年驰骋沙场的壮年男子，怎么会在围猎时，不慎坠马就命丧黄泉了呢？到底是什么导致他的英年早逝？

其实，多尔衮的身体一直都不好。《多尔衮摄政日记》中说，入关之后，多尔衮“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涨，体中时复不快”。还“素患风疾”，即脑血管病。

豪格曾诅咒多尔衮说：他是个“有病无福”之人。

另外，久病缠身的多尔衮，纵欲过度也是他猝死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顺治六年（1649）三月，多尔衮年仅三十六的亲弟弟多铎出天花而死，两个弟妹坚持一同殉死；接着，他的两位嫂

子（阿济格的福晋）也因出天花而相继去世。

不久，多尔袞的元妃博尔济吉特氏又因出天花去世。亲人们的接连死去，让本就多病的多尔袞，心头笼罩了巨大的阴影，这无疑加剧了他的病情。

然而，对于多尔袞来说，无论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欠佳，有多严重的病症，他在权力的追逐中，从未停息过自己的脚步。

回顾他与兄长皇太极的恩怨，便能更清楚这一点——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多尔袞的母亲被逼殉葬，而此时的多尔袞还不满15岁，当然无力争夺汗位。成年后的多尔袞一直对皇太极不满，但皇太极是同父异母的兄长，又是皇上。所以多尔袞不敢犯上作乱。但多尔袞是一位难得的将领，他作战勇猛，杀敌无数，皇太极需要像多尔袞这样的帅才。

崇德四年（1639）二月，皇太极投入10余万兵力发动松锦大战。锦州城是辽西的重镇，皇太极视此役为统一华夏的生死之战，于是命多尔袞亲自挂帅。皇太极的战略意图是，派重兵强攻锦州，断绝锦州的外部通道，逼迫锦州城投降。

当时，守卫锦州的总兵祖大寿，是袁崇焕手下的一员骁将。他指挥锦州军民坚守城关。关于此战的战术运用和想法，皇太极已对围城的兵士将领做了详细说明，尤其叮嘱过主帅多尔袞，但多尔袞不愿意强攻。他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商量，决定让兵士和军官轮流回沈阳探亲，一次每一编队放5人回家，每个旗放副首领一名回家。

兵士回家，营中兵员减少，多尔袞担心祖大寿出兵反攻，就下令全军从现有包围圈后退30里安营，这下激怒了皇太极，他立即命令兵部参政谭拜率兵替换多尔袞。同时，命令多尔袞驻扎辽河，没有指令不准进入沈阳。

多尔衮见皇太极大发雷霆，只好驻军辽河。这之后，皇太极派范文程等人训斥多尔衮不听命令，又定了豪格一个不加劝谏的罪。此事共牵涉了10余名将领。后来，多尔衮上书申诉，说让士兵回家是为了修治盔甲、器械、屯兵养马。

皇太极听后，更加震怒，认为多尔衮是巧言强辩，有了过错不知改正，还敢欺上，于是让多尔衮自己议罪。范文程面见多尔衮，向他传达了皇太极的谕旨。多尔衮对范文程说，我不逼迫众兵强攻锦州城，反而遣兵回乡探亲，违抗了圣旨，耽误了攻克锦州的时间，我是总理兵权的主帅，发号令的人是我，遣兵回家的人也是我，按军法，违抗圣旨者罪该当斩。

多尔衮这么说，显然是看出了皇太极的心思。他很清楚，皇太极是想借机除掉他的这个劲敌。同时，豪格也看出父亲皇太极的意图，他对皇太极说，睿亲王是王，我也是王，只是睿亲王是我叔叔，才总握兵权，但他制订的作战计划也和我有关，所以我也当死。

最终，皇太极只好免了多尔衮的死罪，把多尔衮降为郡王，不让他议政带兵，以示惩戒。

一个月之后，皇太极又重新起用多尔衮。经过上一次的教训，多尔衮变得服帖了不少。皇太极在处理与多尔衮关系的问题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既是兄弟，更是君臣。”

这件事让多尔衮深刻地明白，权力有多么重要。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权独揽，而后又从权力的巅峰坠落到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无论怎样，权力都是一个男人的刚骨钢刀。权力，可使猛男屈服，可让美女脱衣，可收钱财入囊，可享优越之感，可为祖宗增光，可被后代称诵。古往今来，无数人等追之、逐之、争之、夺之。为此，不惜流血牺牲，化身白骨，腐为骷髅，不惜背信弃义，声名狼藉，遗臭万年。纵然人生如梦幻如泡影，如露亦如电，一

切不过是短暂的机缘巧合，而拥有权力的人生，终究不同，昙花一现总还现过，君不见众多人的一生永远是含苞欲放，却始终也没绽放开吗？

三 前清的宦官与言官

多尔袞死后，顺治皇帝亲政。执政期间，顺治总结了明朝宦官专权的经验教训，为避免重蹈明王朝的覆辙，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其中，“宦官不许干政”，就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太监有很多种称呼，譬如宦官、阉官、宦者、寺人、内管、内监等。而据考证，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寺人”，甲骨文中曾有相关的记载。

明朝人唐甄在其著作《潜论》中，曾用四句话描绘了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根据唐甄的描述，太监似乎是这样一种怪物：身材臃肿、弯曲，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像儿童一样稚嫩却不清脆，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他们可以很爱一个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唐甄《潜论》中对太监的描述，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太监大都自知身份低下，以逢迎主子为能事；他们处于帝王身边，关系亲密，也比较容易施影响于帝王。他们一旦深受庸主宠信，就会成为狐假虎威、口含天宪的特殊人物，形成一种特别强大的腐朽势力，甚至干预或左右朝政。东汉和唐代的宦官之祸，就是这样频频发生的。

据史料记载，清时宫中太监多达上千，最多时有两千八百余人。这些太监除了少量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的宫刑罪犯外，大部分是从民间

招募而来的。这些招募而来的，基本都是汉人。

当时，直隶以及京城近郊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出太监的地方。按照清廷规定，太监进宫后，可以得到一笔安家费，所以，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农民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就把自己的儿子卖进宫中。

在进宫之前，准备当太监的孩子要做“净身”手术。做手术前，要签署一份契约，表示自己是自愿接受“净身”手术，若有生命危险完全由自己负全部责任。签完契约，孩子就被送上一个四角都装着铁环的门板的手术台，“净身师”把他们的四肢牢牢地捆绑在铁环上，然后蒙上一块黑布，灌上一碗具有麻醉功效的大麻汤，接着一盆凉水泼向他们的下身，趁着孩子脑袋发懵，身子发麻之际，手起刀落。

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各个朝代太监祸国的历史很有研究，对往昔帝王在太监包围下大权旁落，深怀戒惧。因此，在大明帝国建国之初，他就制定严格管理太监的制度，特别严禁其干预政事。这自然是高明之举。但封建制度实施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朱元璋死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太监就逐渐受到重用，几次下西洋的郑和就是太监，由此可知太监在当时所被重视的程度。

到了明宪宗时期，太监得到宠幸，开始干预朝政，最后竟然涉及了边城镇守，京营掌兵，提督营造、银矿，甚至连染织等事都参与管理。随着外差的日益增多，太监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身价也一跃而起。到最后，太监开始欺压起朝官来。到了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把太监的地位抬到了天上，他自称“九千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等追随者，从内阁六部到四方督抚，均有他的党羽。

这些历史教训，顺治皇帝不会不知道，相反，他十分清楚太监得势的因由。因此，即便他身边的太监对他百依百顺、百般照顾，但他

告诉自己，不能让太监得势，他们一旦得势，轻则上房揭瓦，重则倾覆国家。

于是，顺治皇帝决定，依靠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宫内的太监。

开国之初，顺治就将“宦官不许干预朝政”的敕谕，铸成大小一样的三块铁牌，分别立于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三处。

三块铁牌均为长廊形，上铸有满汉文字，满文从左至右，汉文从右至左。铁牌周围镶有木框，高134厘米、宽70厘米、厚6.5厘米，斜置于木座之上。铁牌的粗糙与宫殿的金碧辉煌很不协调，但也因为铁牌的笨重、丑陋才显得异常醒目，时时告诫皇帝以及臣僚不忘祖制。

铁牌铸铭全文为：

皇帝敕谕：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胎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窥权纳贿，嘱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管理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这是顺治十二年的事情，后来，总管内务府大臣奉上谕，又将铁牌文字录制多份，悬挂在执事太监各处。

顺治以后的几代皇帝，陆续地又给太监们的权限职掌作了严格的限制。譬如《国朝宫史》《宫中现行则例》《内务府现行则例》以及无数的“圣谕”，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至礼法纲常，小到举止言谈，无不有所规定。太监们在清朝的那段时期，地位极低，任凭皇帝们摆布。

顺治的三块铁牌的确把大部分太监压得半死，对于太监们来讲，

明朝时期祖先们的辉煌时代的确成了过去。在他们中间，也许有人以为清朝对自己同类的做法是外来野蛮民族的本性。可事实上，顺治是从历史里得出的结论，而实施用铁牌压制他们的。

三块铁牌的祖制一直到慈禧时才算抛弃了。清朝晚期，随着政治上的腐朽，老佛爷当权后，宦官安得海、李莲英一时成为朝廷的“红人”。其权限、行为已经彻底违反了铁牌精神。太监们终于找回了点明朝时的感觉，可惜这感觉只是刹那的温柔，过了不久，随着清朝的灭亡，太监们就慢慢地消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顺治皇帝自己立的规矩，差点儿被自己破了——他在位的最后十年，宠信宦官吴良辅。吴良辅除了结交大臣、收受贿赂外，做的最出格的事情，就是在顺治的支持下，设立了宦官“十三衙门”。内设的机构与明朝时期相仿，如：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宫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等等，设立这“十三衙门”的借口，按照吴良辅的说法，是为了更好地给皇宫里的贵族们服务，实际上是帮助宦官们更好地打听消息、收受贿赂。好在顺治十八年的时候，顺治皇帝废除了宦官“十三衙门”。

顺治皇帝活着的时候，吴良辅就曾被人揭发贪污受贿，但事情却被顺治给压了下来，直到康熙皇帝即位后，才以“改变祖制”的罪名，将吴良辅斩首。

不过“吴良辅事件”是一个特殊的事件。总的来看，清朝后期，虽然出现了违背顺治的铁牌精神，大名鼎鼎如安得海、李莲英这样的太监，但他们并没有如明朝的太监一样干预朝政。从这点来看，太监祸国，大半原因要归罪于皇帝。明朝的几位皇帝比猪还懒，朱批的执笔权都交给了太监，太监不干预朝政真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

而顺治皇帝以“三块铁牌”压制、震慑太监的做法，对清朝历史具

有深远的影响。除此针对宦官之外，他还做了这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这几件“小事”同样影响深远，那就是压制言官。

这几年小事记录在《清实录》里：第一件事，是在顺治六年的时候，顺治皇帝精简了各科给事中的官职，将六科中的“副理事”一职裁撤。所谓“给事中”，就是负责“谏言、监察”的官员。

第二件事，是在顺治八年的时候，顺治皇帝又下诏规定了给事中的人数，规定六科满汉给事中各一人。比起明朝的时候，给事中这个官职，从人数到管制上都大大缩水。

第三件事，是在顺治十二年的时候，规定大臣们的奏折，内阁有代替官员上奏折，以及票拟处理意见的权力。给事中在其中的职责，只能是在皇帝阅读过奏折后参加批改，然后转给各部门。而且在内阁上奏之前，给事中更无权得知奏折的内容。

第四件事，是在顺治十八年的时候，顺治皇帝又强调说，各地监察御史必须要进行三年一次的“京察”，而考核的方式，就是审阅御史曾经写过的奏折，按照其内容的质量来打分。同时言官的奏折，如果其中的内容在逻辑上出现疏漏，就要罚半年的俸禄。

这几件事情连起来，不难看出一个事实：第一、第二件事，是把给事中官职大批裁撤，削弱他们的力量；第三件事，是废掉原本给事中所特有的封驳批改大臣奏章的权力；第四件事，是强化对言官的管理，把言官个人政绩的评判权和升迁依据，都控制在皇权手里。这四件事情，归根结底一句话：改变明朝时代言官权力过大的局面，以确立皇权独一无二的地位。如此一来，明朝时期敢跟皇帝顶牛，和权臣叫板的言官们，到了清王朝，基本都被彻底废掉了武功。

四 顺治“罪己诏”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三，顺治皇帝染上天花，卧病不起。四天后，病死于养心殿。在他躺在病床上的四天里，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立太子的人选上，他派人征求自己最敬重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认为，玄烨出过天花，已具有免疫力，因此应立玄烨。身染天花的顺治皇帝就立了玄烨为太子；第二件事，是辞世的前一天，他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入养心殿面谕遗诏。

顺治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二十四岁去世，打理朝政，主持军国大事十年，政绩颇多。他以皇帝之尊，极其刻苦地学习汉族文化，天未亮就起床读书，为了背诵一些名篇名著，彻夜不眠。在每日处理大量的军务政务的同时，汲取大量的文化知识，不断完善自己的统治方法和手段。

在军事上，面对全国蜂起的战乱，顺治皇帝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重抚轻剿的策略，大胆放手任用汉族的降官，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稳定了国内局势。在政治上，他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力求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机构。当时的顺治皇帝，年仅十几岁，以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不过是个孩子，但那时的他就能有这般见识、这般作为，实属难能可贵。而他在临终前的一份遗诏，也让人无限感慨。因为这份遗诏，被称为“罪己诏”，其中的内容，除了最后交待了帝位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名单外，其余全部是顺治皇帝检讨自己执政以来的“过失”，达十四条之多——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茲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於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顺治检讨自己说，自己并无高厚的德行，却继承了祖宗的大业，但却没有治理好国家，没有造福于百姓，这是自己的一条罪过。】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顺治皇帝自己的先母去世，不能孝养母亲，是自己的罪过】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庸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强调父亲皇太极去世时，自己因尚年幼，未尽孝仪，本应在母亲去世时给予弥补，但今不能承欢母后，反给母亲带来痛苦，是自己的罪过】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於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对宗室诸王、贝勒等满洲亲贵未能照应周全，是自己的罪过】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

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在施政之中，偏向任用汉族官员，疏远了满洲官员，是自己的罪过】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於用人之际，务求其德於己相伴，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於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自己用人所持的标准过高，没有很好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是自己的罪过】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於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自己对不称职的官员，未能及时撤换，是自己的罪过】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匱，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贍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自己在宫中花费过多，影响了官员的俸禄，是自己的罪过】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自己在宫殿建造和器具使用上花钱太多，未能体谅百姓生活的艰辛，是自己的罪过】

端敬皇后於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自己宠爱的董鄂妃去世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丧葬之礼违反定制，过于铺张，是自己的罪过】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自己图清闲，很少上朝，致使与大臣们缺少联系，是自己的罪过】

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自然多有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自己自以为聪明，听不得不同意见，致使大臣们不肯进言，是自己的罪过】

朕既知过，每自剋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者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条说，自己知错，而未能改错，致使过错越来越多，是自己的罪过】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而告中外，咸使闻知。

【这一条说，传位于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

五 雄主康熙的大手笔

顺治皇帝死后，他的儿子玄烨即位。许多人都知道，玄烨就是康熙皇帝，而“玄烨”这个名字又有何含义呢？这要从400多年前紫禁城里的一位西洋人说起。

这位洋人可以在紫禁城自由出入，他带来了西方最精密的西洋钟，以及望远镜。他是中国钦天监第一个洋监正。他的工作是观象测天，这一工作是几千来中国心目中通神通天的职业。大清朝廷居然让一个洋人，来坐这个行当的第一把交椅，这是出人意料的。这位洋人官居一品，三代荣受皇封，并且可以世袭，孝庄皇太后还尊他为义父。这位“义父”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笃信天主教，生于西方，殁于中土，葬于北京，他就是前清历史中的著名人物汤若望。

康熙皇帝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在玄烨出生前后的那几年，正是西洋天文、机械之学在清初的朝廷中最走红的时期。“玄”字代表的是汤若望传授的包括天文、历法、机械以及天主教信仰在内的学说。这套学说，令顺治皇帝深深折服。

顺治十年时，顺治皇帝赐予汤若望“通玄法师”的封号，加俸一级。顺治十四年，顺治又为汤若望御笔撰写《天主堂碑记》一文，并赐予“通玄佳境”的堂额。

顺治皇帝给儿子取的名字里带着“玄”字，给“洋爷爷”汤若望的赐物里也两次带有“玄”字，可见这个“玄”字，在顺治皇帝心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玄”字也可以看出，顺治对自己的儿子玄烨给予了厚望。

而玄烨也确实没有辜负顺治皇帝的厚望，他登基以后，里里外外忙活了不少事。同父亲一样，康熙皇帝玄烨登基时也是儿童皇帝。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皇帝面临的课题。

事实证明，康熙皇帝承担起了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他在此期间，完成了很多件后世人熟悉的大事——除鳌拜、平三藩、统一台湾，以及征讨噶尔丹。

这些事情，每一件都称得上是大手笔。

先说除鳌拜。

康熙皇帝即位时年仅八岁。因为年纪尚小，所以国家大事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辅政。

索尼死后，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他欺君擅权，清除异己，杀害了与他作对的苏克萨哈。此时，康熙虽然亲政，但辅政大臣已经辅政七年，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而鳌拜专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康熙忍无可忍，在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支持和策划下，开始实施擒鳌拜的计划。

孝庄先让康熙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措施，纠正辅政大臣政治上的失误和弊端。这使朝廷上下人心振奋，康熙的威望日益增强，鳌拜逐渐走向孤立。与此同时，康熙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洲贵族成员。他们朝气蓬勃，索额图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康熙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康熙最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的附庸众多，盘根错节，已经控制了中央机构的各个要害部门。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的损失，孝庄帮助康熙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根据这个策略，康熙命索额图秘密地组织起一支善于搏击的少年卫队。康熙经常故意当着鳌拜的面，和少年卫队摔跤滚打。在鳌拜看来，康熙和这些少年只知道玩，因此便逐渐放松了警惕。

时机成熟，行动之前，又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鳌拜集团的力量。同时，康熙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周密的部署。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鳌拜奉诏进宫，当即就被少年卫队擒拿，其主要成员党羽先后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做的贡献，康熙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没收家产，终身监禁；对鳌拜的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一些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的官职，后又将公爵还给了遏必隆，恢复了对遏必隆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铲除鳌拜集团的政治较量，是康熙即位后，孝庄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和帮助。当时，康熙年仅十六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如果没有祖母的指教和授计，他很难在亲政第三年，就一举粉碎把持朝政多年、势力强大的鳌拜集团。

另一方面，在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和康熙祖孙互相加深了了解，感情更为深厚。孝庄的言传身教，使康熙逐步具备了一代明君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孝庄指导康熙宽大处理鳌拜集团，既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也是为清朝的长远统治着想。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扫除了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康熙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权。他在“首推满洲”的原则下，

努力改善满汉关系，崇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开始有了起色。但是，此时天下的形势并不是一片大好。清朝虽然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却仍然危机四伏。北有罗刹国（俄国）不断侵扰；西面有噶尔丹擅自称王；南面有“三藩”离心离德，东面还有台湾孤岛自居。

康熙亲政后，书写了一张“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的条幅，悬挂在宫中的柱子上，时刻提醒自己。其中“三藩”是康熙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因为南方的“三藩”，拥兵自重，已经发展成危害国家统一的割据势力。其中，平西王吴三桂的兵力达到七万人。朝廷多次要求他裁军，吴三桂的军队却有增无减。朝廷每年要拨给“三藩”军饷两千多万，占了整个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三藩”势力的发展，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康熙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最大的障碍。这时候，正好平南王尚可喜年老，想回辽东老家，他上了一道奏折，要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留在广东。康熙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样一来，触动了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他们想试探一下康熙的态度，假惺惺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许多大臣认为，如果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而康熙果断地下诏答复吴三桂和耿精忠，同意他们撤藩，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坐不住了。

康熙十二年（1673）底，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发生叛乱。首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接着，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在京举事；次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造反。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在广东造反。与此同时，有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响应。叛军气势凶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孝庄和康熙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此前，吴三桂等人的反叛之心已经露出了端倪，政治嗅觉敏锐的孝庄有所预感。康熙十一年（1672）十二月十六日，孝庄提醒康熙，在天下太平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他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儒家经典，赏赐诸臣等。孝庄帮助康熙加强统治，进一步搞好了君臣关系。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孝庄和康熙都变显得异常镇静。

康熙十三年（1674）元旦，吴三桂起兵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城。清廷仍然和以往一样，举行盛大的朝贺和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者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及与叛军决战决胜的信念，起到了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

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时，为了笼络民心，他脱下清朝的官服，换上明朝将军的盔甲，在明永历皇帝的墓前，痛哭了一番，说是要替明朝报仇雪恨。但是，人们都记得很清楚，引领清兵入关的是吴三桂；杀死永历皇帝的，还是吴三桂。

吴三桂在西南一代的势力很大，所以战争开始时，叛军打得很顺利，一直打到湖南一带。此时，吴三桂派人跟广东的尚之信和福建的耿精忠联系，约他们一起叛变，这两个藩王同意出兵造反。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为“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的战火愈加蔓延。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响应吴三桂起兵叛乱，并迅速占据汉中、兴安之地，阻绝川陕栈道。康熙任命都统、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急速赶赴陕西，总辖全省满汉大兵，以剿灭王辅臣。

图海收复平凉后，王辅臣投降，清朝西北战场出现转机。叛军大为震动。尚之信、耿精忠看到形势对吴三桂不利，便也投降了。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可另外两个藩王背叛他，使他的力量渐渐削弱，处境十分孤立，战争进行了八年，吴三桂的形势没有好转。康熙

十七年（1678）三月，七十四岁的吴三桂在湖南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大周。可是，就在这年秋天，吴三桂暴病身亡，他死后，清军对吴军进行猛烈地进攻。吴三桂的孙子吴世藩服毒自杀，吴军投降，自然，“三藩之乱”平定。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国家各方面的实力增强。康熙为收复台湾做着积极的准备。

公元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台湾。他病逝后，在台湾的黄昭、萧拱辰等人，拥立郑成功的五弟郑袭代理招讨大将军。另一方面，郑经也在厦门宣布自己为嗣封世子，和郑袭等人抗衡，郑氏王朝从此一分为二。后来，郑经准备向清朝称臣纳贡，以保持“半独立”或“独立”的地位。可是，“三藩之乱”时，郑经受吴三桂煽动，在广东起兵，后被平定，于公元1680年暴病身亡。他死后，台湾岛局势混乱。此时，康熙做好了收复台湾的准备，他果断地决定，武力收回台湾。朝中大臣虽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康熙力排众议，起用施琅为清军水师主将。同时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姚启圣原任广东香山知县，“三藩之乱”时，投靠到康亲王的军中。他在福建漳州特设会馆，实行安抚政策，给予从台湾返回家乡的郑氏官兵厚待。半年内，前来归降的郑氏官兵就有4万多人，这大大削弱了郑氏军队的实力。

施琅是福建晋江人，顺治三年（1646）随明朝原总兵郑芝龙投降清朝。由于郑成功的招揽，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成为郑成功部下中最为年少、善战的得力骁将。可是，施琅个性倔强，不小心触怒了郑成功。郑成功将施琅父子等三人都逮捕关押。施琅的父亲和弟弟都被郑成功杀害了，幸亏有部下相救，施琅才得以逃脱。之后，施琅投降了清廷，立志要打败郑成功，以报家仇。

早在康熙七年（1668），施琅就秘密上疏朝廷，主张武力收回台

湾。那时康熙刚刚亲政，他召施琅进京，施琅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康熙十分赞赏。但由于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鳌拜集团手中，还是少年天子的康熙无法实施施琅的计划。

康熙二十年（1681），大权在握的康熙再次召见施琅。施琅向康熙细谈了如何训练水师，如何利用风向变化等具体方略。康熙当即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命令他操练水师，伺机夺取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清军在施琅的率领下，开始向澎湖开进。澎湖位于台湾海峡的中央，由64个岛屿组成。澎湖与白沙岛、西屿岛呈环状连接，三岛中间就是著名的澎湖湾。

六月十六日，清军向澎湖的守军发动第一次进攻。两天后，施琅派遣战船攻取了澎湖湾外的虎井岛和桶盘岛。外围被扫清了，可是，此时飓风袭击，清军的战船被郑军围困，只得撤退。出战宣告失败。

六月二十二日，施琅命清军水师兵分三路，发动第二次进攻。这一次，施琅亲自率领50只战船，组成东线攻击部队，从澎湖寇东侧突袭鸡笼屿，以配合主攻部队夹击娘妈宫；另外，西线进攻部队由总兵董义率领，这支部队也是由50只战船组成，从港口西侧进入牛心湾，以牵制西面的郑军。此外，还有80只战船组成的预备队，随主攻部队跟进。

双方交战七天七夜，施琅利用有利的西南风向，手舞红旗，采取“五点梅花阵”（即用多艘战船围攻一艘战船，集中兵力作战）。与郑军展开厮杀。清军战舰阵势整齐，可分可合，作战英勇，一举攻克了澎湖列岛。郑军的大小战船被击毁近200艘。被炮火射死、跳水溺死的郑军士兵多达12000多人，近5000名士兵和160多名将领投降。

攻克澎湖后，施琅不杀岛上一兵一卒，使台湾民心归顺。同年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塽开城投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大清朝廷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驻兵一万人，筑城守戍。至此，宝岛台湾终于得以统一于清朝政府之下，台湾的行政建制与内地完全统一。

接着再说说，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大手笔——征讨噶尔丹。

明朝以来，沙皇俄国就开始向我国东北部的黑龙江流域扩张。明朝末年，满清忙于入关，放松了北方边境的戒备，沙皇俄国趁机进犯我国黑龙江地区。他们在那里掠夺财物，杀害居民，遭到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

康熙即位初期，鳌拜专权，政局十分混乱，沙皇俄国的侵略军乘虚而入，又潜入中国领土，占领了雅克萨。雅克萨在今天的黑龙江呼玛西北，漠河以东的黑龙江北岸。俄军占领雅克萨后，在尼布楚（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修建碉堡，向当地居民征收大量的赋税，建立了殖民据点。沙皇俄国采用了两面手法：一方面，派侵略军蚕食中国领土；一方面，派使臣到北京进行恐吓和讹诈。康熙对此不予理睬。

“三藩之乱”的时候，沙皇俄国又占领了黑龙江的大片土地，到处建立侵略据点，掠夺了大量的当地土特产和矿产资源。同时，又于康熙十五年（1676）派使团来北京讹诈。俄国使团在北京的耶稣教会的传教士那里窃取了大量的情报。回国后，他们向沙皇建议，派出2000名正规军进驻贝加尔湖以东的黑龙江流域。沙皇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增兵远东，以雅克萨为巢穴，派兵分路侵扰，扩大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范围，建立了更多的侵略据点。

对于沙皇俄国无耻的侵略行为，在平定“三藩叛乱”后，康熙实施了有条不紊的计划。他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派大理寺卿明爱去东北与雅克萨的俄军交涉。但俄军方面根本不讲道理。于是，在公元1682年，康熙皇帝亲自到边境了解情况，实地考察，摸清了对方的实

力。回京后，康熙又派兵侦察。侦察的结果使康熙认为，俄军是很容易击败的，但又怕他们卷土重来。因此，康熙认为，应该在边地建城筑兵，屯田开垦，并修通水陆交通。

康熙派出1000多官兵带着家眷去屯垦驻防，做好战前准备。边区的各族人民看到朝廷抵抗沙俄侵略的决心，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积极支援清军备战。

一切准备就绪。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康熙下令，对俄军的据点雅克萨发动进攻。清军直抵雅克萨城下。他们遵照康熙皇帝的旨意，先警告沙俄军。沙俄军却置之不理。于是，清军把雅克萨包围起来。在观察地形后，清军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在土山上往城里放冷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进攻城南，就把兵力都拉到城南。而清军却出其不意在城北隐蔽，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以火炮发起攻击，炮弹击中城楼，清军又在城下堆放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在慌乱中举白旗投降，并带着残兵败将逃走。清军占领雅克萨后，收缴了大量的俄军武器。

但是，俄军并没有死心。就在当年，沙俄侵略军的增援部队趁清军撤回休整的时机，又带兵开进雅克萨。康熙决定，这一次要彻底消灭沙俄军。于是，清军又一次包围了雅克萨，用猛烈火炮进攻。这一次沙俄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几次出城反扑，都被清军打了回去，战斗持续了3个多月，沙俄守城的头目托尔布津中弹身亡，俄军最后只剩下150多人，清军终于攻克了雅克萨。

两次雅克萨之战都以失败告终，沙俄政府不得不派出使者到尼布楚，请求谈判。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双方代表集中到了黑龙江柳絮的尼布楚城，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边界问题谈判。沙俄方的代表戈洛文首先提出土地的问题，要求黑龙江北岸划归俄罗斯帝国，南岸属于中华

帝国。而清朝方面，在康熙的旨意下，索额图表示可以以尼布楚为界。戈洛文却不领情，使谈判陷入僵局。戈洛文为了进行武力恐吓，在尼布楚哨卡增派了300名火枪手，但清朝官员不卑不亢。

第二天，清朝使团又一次做出让步，提出以格尔必齐河为界。但是戈洛文提出，要索取雅克萨，拒绝了清朝方面的建议。这样一来，引来了尼布楚周围的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的不满，他们纷纷起义。清政府的坚定立场和人民的起义，让戈洛文慌了手脚。在他们查明清廷割让给沙皇俄国的那部土地具有丰富矿藏的时候，终于同意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再沿外兴安岭向东直到海边为中俄边界，河东岭南属于清政府，河西岭北属俄国。沙皇俄国还保证要拆毁雅克萨城堡，把军队撤离中国领土。

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七日晚，索额图和戈文洛分别代表中、俄双方在条约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以后，沙俄方面并不安分，就在条约签定的第二年，即1691年，沙俄唆使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挑起叛乱。

康熙时期，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这三个地区都陆续归顺了清政府。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后，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被攻破后，几十万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哀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派使者来到噶尔丹那里，要求噶尔丹将侵占的地方交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的幕后是沙俄政府唆使策划，因此，噶尔丹认为，自己有沙俄政府撑腰，根本不理睬康熙的劝说，不但不肯退兵，还大举侵犯漠南，气焰十分嚣张。

谈判失败，康熙认为，噶尔丹野心不小，不可小视。于是，他决定亲自征讨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兵分两路，左路由

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则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右路清军最先接触到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更加得意，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噶尔丹又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又将上万只骆驼，绑住四条腿躺在地上，驼背上架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了一个长长的“驼城”。企图阻止清军进攻。康熙下令反击，福全以炮火分段击破。“驼城”被轰开一个大缺口，上万名清军骑兵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到山后夹击山下的骑兵，叛军猝不及防，被里外夹攻，损伤大半，剩下纷纷逃命。噶尔丹见形势不利，急忙派人向康熙求和。实际上，这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着残兵败将逃到漠北去了。

噶尔丹回到漠北后，继续招兵买马。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约噶尔丹会见，以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反而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并扬言沙俄将支援6万名枪兵，来对付清军。

面对噶尔丹的阴谋，康熙决定再次征讨噶尔丹。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领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大军，从西路出击，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亲自带领中路的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好时间组织夹攻。

康熙带领的中路军先期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军还没有到达。康熙当即决定继续进攻克鲁伦河，并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得知后，连夜拔营撤退，在三路大军的夹攻下，噶尔丹只带着几十名骑兵逃脱。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的势力已土崩瓦解。康熙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过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此时，

噶尔丹军队已经人心涣散，很多人纷纷投降，甚至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服毒自杀。

自此之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攻占西藏。

六 盛世经济与历法之争

康熙皇帝即位后，前前后后忙活了不少事，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征服噶尔丹，澄清吏治，减轻赋役，招纳贤士。而完成这些大事，都需要国家经济的支撑。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自农业。农业是国家存亡的根本，百姓的生命之源。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虽然，满人起源于游牧，善骑射，不善农事，但从建国时起，在努尔哈赤倡导下，已把农业生产列为重要的部门。特别是皇太极时期，把农业置于社会经济的首要地位，反复开导他的不善农业的兄弟子侄及其本族臣民，灌输重视农业的思想，具体讲解农业之重要及耕作方式方法。

这之后，以农为国本的思想，已成为历朝皇帝及统治集团的传统国策。如顺治帝与多尔衮，都不忘农业这个根本，在进行统一战争中，仍不废农业生产，攻克一地，便迅速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

入关以后，顺治皇帝效仿历代帝王，在京南设立先农坛，把祭先农列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同时，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一亩农田，叫作籍田，专供皇帝每年春天到这里来行“籍礼”。

而在清朝的12位皇帝中，若论重视农业生产，并将其付诸实践，做得最好的，非康熙皇帝莫属。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以往的皇帝那样，把重农仅仅体现在每年春天的“籍礼”上，而是切切实实地对某些植物、土壤及栽培技术进行调查研究，并做了一些有效的实验。

据记载，康熙皇帝研究考察过的植物多达二十余种，如黑龙江麦，御稻、吐鲁番西瓜、葡萄、果单、菱角、杨柳、枫树、竹子等。他对这些植物的产地、生长期及根、茎、叶、花、果的性能、用途、味道等，都做过比较深入的考察。在考察过的20多种植物中，亲自试种过的有10来种，如稻麦、人参、花木等。

康熙皇帝南巡时，十分喜爱江南的香稻和菱角，他便带了一些种子回京试种。结果没有收获，试种失败了。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悟出种庄稼不能生搬硬套，“南方虽有霜雪，然地气温高，无损于田苗。”之后，康熙留心改良土壤，提高地温水温，他的栽培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

在康熙皇帝进行的苦干栽培试验中，最有成效的是御稻的培育。他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试种御稻，到晚年时，还曾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在江宁、苏州等地进行推广。据史书记载，御稻第一季亩产在四石左右，与当时苏州稻田的亩产量接近；第二季亩产量一般都在两石至两石五斗，两季加起来，比原来增长了五成左右，所以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御稻在江南曾流行过一段时期，但当时还没有解决在一块土地上不倒茬、连种的弊端，同时农民也缺乏长期栽种双季稻的积极性，御稻慢慢就绝迹了。

康熙重视农业、关注农民，不仅体现在他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上，还体现在他的农业政策上。众所周知，清初实行的圈地政策就是在康熙朝彻底废止的。当时还规定，奖励垦荒，地方官如能招来垦荒者晋升，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予种地的农户，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康熙朝曾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9省田赋普免一周；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由于实施重农政策，全国耕田面积由顺治时代的5.5亿亩发展到康熙时代的8亿亩，农业得到显著发展。人口随之迅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

康熙皇帝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功业，就是大规模整治黄河。

清初的水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苏北地区，当时水患的主要特点，不仅是黄河频繁泛滥，淹没大批良田，更导致了连接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阻断。

当时主持治河的，是17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水力学专家靳辅。靳辅的治河理念，延续了明朝人潘季驯的“束水冲沙法”，而他别具突破性的创举在于：他认为应该把黄河当作一个整体去治理，如果仅仅是哪里闹水灾，就去治哪里，那无疑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超前眼光的治水理念，也一度引起清王朝的质疑。

靳辅于康熙十七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五年多次治理黄河。他的压力巨大，因为他眼光超前的治水思路，是要对黄河进行全面的整修，这势必就要耗费巨额的投资。而且，这种治水方式最大的问题，是工期长，见效慢。因此在施工过程中，他至少有五次，因为黄河决口，而遭到同时期一些“专家”们的质疑。但最后的结果证明，靳辅是对的。在这次大规模的整修后，黄河大约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大型的水患。

康熙不仅在南巡的时候，对治理黄河的工程进行了规划和检查，还利用亲征噶尔丹的机会，在宁夏从横城口乘船顺黄河而下，体验黄河的汹涌激荡。

康熙四十三年，曾派侍卫拉锡等人前往黄河的源头进行考察。《康熙政要》中，记录了康熙皇帝对拉锡等人的指示：“黄河之源，虽名古尔班索罗谟，其实发源之处，从来无人到过。尔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

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这一年的四月初四，拉锡奉谕旨率随员西行，到达青海的时候，是五月十三日。他们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之下，对黄河发源地的星宿海、扎陵湖和鄂陵湖的大小与形成情况，进行了

考察，并绘制了黄河从鄂陵湖流出的路线图。在此之后，康熙皇帝在拉锡奏报的基础上，写了一篇短文《星宿海》，记叙了黄河之源的情况。

从此次考察的奏报可以看出，其考察结果，与现代地质学家对黄河河源的地理环境考察基本是一致的。康熙皇帝在300多年前组织的一次黄河河源考察，可以算得上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壮举。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不仅在安邦治国上，大有作为，还特别提倡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封建君主，怎么会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呢？这要从一次历法之争说起。

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本来是很高的，可到了明末，由于腐朽没落制度的束缚，科技水平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明朝的历法，用的是大统历。所谓大统历，就是在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到明朝时改称为大统历。

大统历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到明末已经很不准确，需要修订了。当时，西方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皇帝的重视，都想方设法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华。

明朝有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从传教士利玛窦那里学了很多东西，又把一个叫汤若望的传教士推荐给明朝皇帝。前文提到过，这位叫汤若望的传教士，后来在顺治朝受到重用，官居一品，三代荣受皇封，孝庄皇太后还尊他为义父。

汤若望根据比较先进的仪器和数学知识，推算出来的日食、节令都比大统历准确。明朝决定推行汤若望的新历法，还让汤若望主持在北京修起了一座观象台。然而，新历法还没来得及推行，明朝就灭亡了。观象台也在兵荒马乱之中被毁坏。

清朝入关后，汤若望又写信给顺治皇帝，说用新历法推算，这年八月初一将出现日食，请求派官员测验。到了八月初一，摄政王多尔袞派人一看，果然不错。多尔袞很满意，马上宣布实行新历法，还让汤若望当了负责天文、历算的钦天监监正。

顺治皇帝亲政后，更加信任汤若望，授给他“通玄法师”的称号。而钦天监那些靠推行大统历混饭吃的守旧派官员，都被冷落到一边去了。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官员，认为只要靠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什么都好，外国传进来的就什么都不好。于是，他上疏说，清朝要子子孙孙传下去，可是汤若望推行的新历法只有二百年，可见他居心不良。

康熙皇帝即位初期，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权，他们认为，凡事按祖宗的老一套办法做，才稳妥。就下令严惩主张推行新历的一派人。汤若望因为有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讲情，才被免除了死刑。年老多病的汤若望，不久后就死在了狱中。其余的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负责新历的汉族官员也受牵连被处死。杨光先一跃成为钦天监监正。

康熙皇帝除掉鳌拜后，发现杨光先推算节令常常出错。可是，究竟是旧历好，还是新历好，康熙皇帝一时难以决断。

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的一天，康熙皇帝让杨光先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一同参加了御前会议。康熙皇帝让二人分别拿出证据，来证明旧历和新历哪一个更好。

杨光先拿不出证据。而南怀仁却胸有成竹，说，请皇上摆出两个日晷（用日影来测定时刻的仪器），让杨监正和我分别算出明天正午日晷投影的位置，看看谁的准确。

康熙皇帝认可了，让礼部尚书等人到时当场验视。次日，礼部尚书带领众官员到达午门，等待验证。

杨光先本来不懂历算，推算节令要依靠别人。这时候虽然标出了

一个投影的位置，但心里根本没有把握，南怀仁懂得代数、几何，因此很镇静。

到了正午时分，日晷果然准确无误地投影在南怀仁标明的位置上。而杨光先推算的却差得很远。杨光先看到这个情况，十分尴尬，却不服气，口称：“宁可无好历法，也不可使大清国有洋人！”

南怀仁不慌不忙地说，今天是冬至，投影应该在二百四十度这个位置上。继而又问杨光先，今年应该是十二月闰月，可是按您的历法，却在明年一月。除此之外，您还把明年算成两个春分，两个秋分，不知是何道理。

南怀仁滔滔不绝地讲着，前来验视的官员，包括杨光先，个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回答。康熙皇帝很感慨，大清王朝这么多大小官员，难道都不懂历法推算？至此，他决定采用新历法，还下令钦天监的官员学习新历法。

其实，康熙皇帝下令让钦天监官员学习之前，自己已经开始学习了。他把南怀仁请到宫里，详细地询问西方科学。南怀仁每天到宫里，用满语和汉语给康熙皇帝讲解天文学、几何学和静力学。

康熙皇帝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和阿基米德定律，还学会了使用一些主要的天文学仪器和数学仪器。后来，每逢行军打仗，康熙皇帝都让侍卫随身背着一些仪器，以便随时测量太阳子午线的高度，和周围地形地物的高度和方位。

康熙皇帝还组织编纂了一本《数学精蕴》。这部书集中了当时中国和外国数学的代表作，成为清朝最重要的数学著作。有一次，康熙皇帝到南方巡视，有人把数学家、天文学家梅文鼎的一部数学著作献给康熙。两天以后，康熙皇帝对献书的人说：这本书写得很细致，议论也公平，朕要带回宫里去仔细研究。

后来，康熙皇帝再次南巡，就指名要见梅文鼎。梅文鼎当时已经年逾七十，被请上龙舟，连续三天，从早到晚和康熙一起研究数学。梅文鼎辞别的时候，康熙皇帝依依不舍，说朕留心天文历算，像您这样有学问的人，实在太少了。可惜您年纪太大了，不然朕一定把您留在身边，早晚向您请教。说罢，又提笔当场写下“积学参微”四个大字，赐予梅文鼎。

次年，康熙皇帝把梅文鼎的孙子梅穀成召到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学数学。过了几年，康熙皇帝又编纂了介绍音律知识的《律吕正义》，书刚印好，康熙皇帝就拿出一部叫给梅穀成说，你祖父学识渊博，把这部书寄给他，让他看看，能指出错处就更好了。

梅穀成出生在数学世家，本来就有家学的底子，再经康熙皇帝指点，学问长进很快。康熙皇帝亲自把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代数“借根法”传授给他。

虽然，康熙皇帝推崇西方先进的天文、历法、数学，但是又决不墨守成规。每到一个节令的头一天，只要有条件，他都拿日晷亲自验证。那次历法之争过去四十多年以后，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夏至午时三刻，康熙皇帝亲自验看日晷投影，发现了误差。他对周围人说：西方历法大致准确，但时间久了也不能没有差错。你们看，今年夏至按西方历法应该是午时三刻，实际是午时三刻九分，再过几十年就会差得更多了。

康熙皇帝对待科学和科学家，能高度重视并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很少见的。在康熙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一些发展，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人才。正因如此，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中，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国家。康熙在位期间，除了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之外，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充分展现了其圣明的一面。而清朝正史的史料中，还

有一个对他普遍的评价，那就是“宽容”。

《清史稿》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有大臣认为，在征粮食的时候，如果不去控制火耗，就会给官员贪污提供便利。康熙回答说，官员们的俸禄本来就比较微薄，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捞外快的机会，对那些工作努力的官员，也是一种补偿。

正是因为这种“宽容”，使吏治松懈、腐败横生，甚至国家财政也入不敷出。作为一国之君，康熙皇帝使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增强，然而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又因为自己的“宽容”使经济下滑。到了他去世的那一年，国库存银只有八百万两。而就在他去世的前三年，国库存银尚有近五千万两。

而国家的财政问题，仅仅是康熙皇帝在晚年头疼的事情之一，还有一件让他烦恼不堪的事，就是选择谁来接替他坐天下。

七 皇子夺嫡

康熙皇帝共有35个儿子，排序的有24人，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20人。这20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有12人。他们是：大阿哥胤禔、二阿哥胤初、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禔、十阿哥胤禔、十二阿哥胤禔、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禔。

这些皇子当中，只有二阿哥胤初是孝诚皇后所生。孝诚皇后生下胤初后，当天就病故了。康熙皇帝格外疼爱胤初。

康熙十五年（1676）一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册立降生十八个月的皇子胤初为太子。从政治上讲，此举颇具意义。

在宣布立皇太子之前的十个月内，朝廷的军队在南部和西部与叛军交战时接连受挫，蒙古的一个王公也在北部举旗造反。为了对付这一挑战，康熙皇帝接受了熊赐履等汉族大臣们的意见，全面采取汉族的制度，加快满汉政权的汉化进程，立太子便是康熙沿袭明朝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立太子还有双重目的：稳定政治局势，确立合法的继承制。

胤初不到两岁被立为太子，以后就以这种身份接受教育，处理人际关系及部分政事。胤初颇有才能，不到十岁就跟随康熙四出巡幸，学习处理政事。康熙皇帝也培养他的威信，给太子制定了储君的特有制度，体现太子威严的着装、仪仗、用物与皇帝的差不多，国家三大节中的元旦、冬至及太子的千秋节，王公百官要在给皇帝进表、朝贺之后，到太子处所进行同样的仪式，要行二跪六叩首礼。康熙皇帝三

次亲征噶尔丹，均令胤初留守京城，处理政事。

如果胤初在处理与父皇和诸兄弟，以及贵胄朝臣的关系上，能够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便有利于他的顺利登基；反之则会出大乱子，而事情正是沿着后一方向发展的。

胤初虽然年轻，但做太子的历史却很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就想依附于他求取发迹，遂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其首要人物是索额图。

索额图是胤初生母孝诚皇后的亲叔父，即是胤初的叔外公，早在康熙八年就担任了大学士，二十五年改任领侍卫内大臣，随后率领使团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是康熙前期的重臣。

索额图处心积虑提高皇太子的地位，为使胤初早日登基，竟图谋推翻康熙。康熙皇帝为保护帝位，对太子党的蠢蠢欲动自然不能容忍，但投鼠忌器，为保护皇太子，不使事态扩大，只惩治了少数人。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回到京师附近，康熙下令处死私自在皇太子处行走的内廷人员；康熙四十二年以索额图“议论国事”为罪名，将他囚禁致死。

太子党人的活动，势必将胤初推到与康熙对立的位置。再者，胤初本人的人品也很有问题，他贪婪财货、性情暴躁，令康熙皇帝深感失望。康熙皇帝认为太子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忠于父皇，不可结党谋位；二是为人仁义，将来为政清明有道；三是孝友为怀，做储君时能守孝道。

胤初显然与此标准相距甚远，康熙皇帝担心胤初当政会出现“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的恶果，父子感情日渐疏远。

随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发生的事情，促使康熙作出废黜太子的决定，并迅速付诸实行。

当时，康熙皇帝出巡塞外，兴致很高，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胤禔也带上了。可塞外的毕竟不是皇宫的温室，一行人在路上风餐露宿，加上气候变化多端，结果出生在深宫大院的胤禔抗不住风寒，在路上得了重病。康熙皇帝对胤禔十分宠爱，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急令御医前来诊治。在胤禔病重的时候，康熙皇帝甚至不分昼夜地亲自照料胤禔，还经常把这个小儿子抱在怀中。但是，胤禔最终还是不治身亡了。

胤禔死后，康熙皇帝痛苦万分，而更让他伤心的是，其他的皇子对胤禔的病情漠不关心，甚至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特别是作为兄长的皇太子胤礽，在自己的弟弟生病的时候，几乎不闻不问，就连胤禔病死了，都没有丝毫哀伤的表现。由此，康熙皇帝对自己的儿子们十分失望，特别是对皇太子胤礽，更是失望之至。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帐殿夜警”的事，更是让事态火上浇油。原来，在胤禔病死后，康熙皇帝对皇子们大发雷霆，喜怒不定，这让皇子们感到十分恐慌，而皇太子胤礽挨了骂，更是忐忑不安。由于心情紧张，皇太子胤礽便派出自己的亲信去侦察父皇的起居。他本人也曾在夜间偷偷到康熙皇帝的帐前窥视动静。不巧走漏了消息，其他皇子便把此事密告了康熙。

康熙皇帝得知后，大为震怒，随后便召集了所有的随从大臣和武将，并下令将皇太子和其他皇子全部拘押起来。康熙当着大臣们的面，痛骂这些无情无义的儿子们，特别是对皇太子胤礽，更是新账老账一起清算。康熙痛骂道：你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你平时奢侈无度，比我的花费还要厉害，倒也算了，派你去南巡，你竟敢向当地的官员索贿纳贿，胆子也大过天了！连外邦进贡的物品，你都敢贪入私囊！

又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康熙越说越气：“你幼弟十八阿哥病危，我日夜照料，焦虑万分，你身为兄长，竟然无动于衷，你这样毫

无孝悌的人，怎么能当太子？你还在深夜里向我的帐殿窥视，难道你是想看我不死了吗？你的亲信日夜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到底用意何在？”

最后，康熙皇帝以皇太子胤礽“不法祖德，不尊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为名，宣布废黜皇太子。当时，康熙皇帝且谕且泣，谕毕，悲痛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后来，患上中风，只能用左手批阅奏折。

而废黜皇太子还引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些抱有野心的皇子，结党专营，谋贪皇位。于是，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了皇八子集团和皇四子集团。

皇八子集团实力最强，其中，八阿哥胤禩是掌门人，九阿哥胤禔、十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禵等人，都依附于八阿哥胤禩。而且，八阿哥胤禩天资聪颖、德才兼备、乐善好施，人称“八贤王”。当康熙问朝中大臣，应该立谁为太子时，文武百官都推荐八阿哥，由此不难看出八阿哥深得人心。

大阿哥胤禔，因为母亲出身低微，自知不会被立为太子，也依附于八阿哥胤禩。他曾对康熙皇帝说：有个相面的张德海，十分了不起，他断定胤禩将来一定是大贵人，如果要杀胤礽，不必出自父亲之手。

这话太惊悚了，胤禔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我可以杀掉皇太子胤礽，让八阿哥胤禩继承皇位。

康熙皇帝虽然废黜了胤礽。但也不至于糊涂到让兄弟之间相互残杀。他听了大阿哥胤禔的话，大骂了胤禔一通，又命人把张德海抓起来，砍了头。不久，三阿哥胤祉又跳了出来，他揭发大阿哥胤禔收买蒙古喇嘛用邪术诅咒废太子胤礽。康熙皇帝命人搜查，果然查到证据，就立刻下旨将大阿哥胤禔关押起来，同时又处罚了八阿哥胤禩。

这时候，康熙皇帝预感到日后事情会不好收拾，就考虑再立皇太子。他召集大臣商议，没想到一些大臣早在私底下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推举八阿哥胤禩。一追查，原来是大学士马齐等人搞的鬼。

康熙下令把马齐等人关押起来，然后把皇子们召到身边说：“当初废黜胤初的时候，朕就说过，众皇子凡是有钻营为太子的，就是国贼。胤禩阴险成性，结交朝臣，谋害胤初。现在事情暴露，朕要治他的罪。”

此时，十四阿哥胤禵在九阿哥胤禔的支持下，出面为胤禩说情。康熙皇帝恼怒，将胤禵和胤禔都囚禁起来。一连囚禁了三个儿子，康熙皇帝心中不忍，随后生了病。在病重期间，他特意把胤初和胤禩叫来伺候，心情舒畅些后，他对大臣们说：“朕本来就怀疑胤初的过失是受诅咒引起的，现在看到他小心谨慎，朕身上的病也好许多。”

不久，康熙皇帝派人告祭天地，重新宣布立胤初为皇太子。

然而，皇子之间的互相倾轧和明争暗斗，并未因此而结束。四年之后，胤初又因结交大臣被废，幽禁在咸安宫。从此过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

在康熙皇帝的皇子中，比较有作为的是十四阿哥胤禵。

胤禵与四阿哥胤禔是同母兄弟，可是关系平常，却与胤禩、胤禔交好。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在乾清宫召见诸皇子，下令锁拿胤禩，指责胤禩有图谋储位的野心，胤禵站出来为胤禩说情，说八阿哥没有夺嫡的心思。康熙闻言大怒，拔出佩刀就要砍胤禵，胤禔赶快抱住乃父，诸皇子叩首请求父皇息怒，康熙命鞭挞胤禵，并驱逐出宫。

胤初复立之后，康熙分封诸皇子，胤禵获得贝子爵位，是受封皇子中最年轻的，得益甚多。当初康熙要砍杀他，很可能是因为喜爱

他，却见他忤逆自己，一时控制不住感情，才有贸然的行为。

康熙五十七年，策旺阿拉布坦属将策零敦多布率兵入藏，杀掉和硕特拉藏汗，并禁锢后者扶立的六世达赖，控制西藏。为此康熙派西安将军额伦特到青海经营西藏事务，九月为准噶尔人包围，全军覆没。这时西北的形势非常严峻，准噶尔处于进攻态势，除占据新疆、西藏，进而可以影响与它们毗邻的青海、甘肃、宁夏、蒙古、四川、云南，不加控制，清朝就不能稳定。

康熙五十六年夏天，康熙皇帝自称年迈，气血渐衰，已不能亲征。他下令把前线将领的奏疏交给皇子看，有了让皇子参预西北军事的打算。青海失利，康熙为了在西藏、新疆两方面用兵，统一前线指挥，以利战斗，需要派遣有权威的统帅。

同年十月，康熙决心用皇子出征，选定胤禩，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晋封王爵。康熙对这次任命非常重视，采取了许多使胤禩顺利行使职能的措施：命胤禩使用正黄旗旗纛，采用亲王规格，胤禩自称及众人对他称谓均是“大将军王”。

同年十二月，胤禩自北京出发，乘马出天安门，诸王贵族及二品以上大臣均到列兵处送行，康熙命令驻防新疆、甘肃、青海的八旗、绿营军皆听胤禩指挥，当时那里号称精兵三十万，实际有十几万人；康熙给西北蒙古王公指示：“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故命带领大军，掌生杀重任，你们大小事务俱要听他指挥，就像接受我的谕旨一样。”这一切都说明康熙极端重视胤禩的任命及其使命，简直有代己出征的味道。

胤禩出征大获全胜，立下战功，于康熙五十四年十月率部回京。次年四月再赴甘州军营，知道康熙故世，没有再对新疆作军事进攻。

胤禩一出任大将军，争夺储位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胤禩集团内部，胤禩已与储位无缘，胤禩的得宠，使众人又兴奋起来，并把

夺储的希望寄托在胤禩身上。

胤禩早就向亲兵说，他和胤禩、胤禩三人中必有一人当太子，又说胤禩才德双全，其他兄弟皆不如他，将来必然大贵。及至胤禩出征令下，胤禩说十四阿哥现今出兵，皇上看得很重，将来皇太子非他莫属。

胤禩本人也把当皇太子作为奋斗目标。他知道远离京城及康熙年迈对他立储不利，因此一再要求胤禩及时给他通报朝中信息。嘱咐胤禩“皇父一有欠安，从速带信给我”。他并非关心康熙健康，而是为了相机而动。胤禩为实现目标，“礼贤下士”，招揽人才，特别爱结交文士，以抬高自己声望。为取得大学士李光地的支持，礼遇他的弟子陈万策，呼以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又三次派人敦请李学派的首领李塉，还得李塉要以迁居来摆脱他，表明胤禩为拉拢人，已不择手段了。

康熙对胤禩一开始应该说是喜爱的、重用的，并且着意培养他，所以胤禩将来有被指定为太子的可能。但胤禩似乎又不是最理想的、唯一的人选，他还不够成熟，又有参加胤禩集团谋夺储位的历史，所以康熙皇帝对他还不是完全信任，还心存疑虑，所以最终没有立他为储。

在康熙皇帝的诸皇子中，三阿哥胤祉、十三阿哥胤祥、五阿哥胤祺、十二阿哥胤禔等人也较受重视，有必要略作分析，以便探测康熙的立储意向。

三阿哥胤祉，二十岁时从征噶尔丹，执掌镶红旗大营；二十二岁受封为诚郡王；一年后因在康熙敏妃病逝百日内剃发，被削夺王爵，降为贝勒。

胤祉与太子胤初关系密切，如果胤初不出事，将来对他是不会错

的。胤礽当皇太子时，胤礽被废后，胤祉能仗义直言，表明在有太子时他是个安分守法的人，并没有觊觎储位的非分之望。

胤祉爱钻研学问，尤擅书法，还在二十岁时，诗坛领袖王士禛就说他的字方圆径寸，遒美妍妙。四阿哥胤禛也说，在他的兄弟中，胤祉、胤祺工于书法，让他们给康熙景陵书写碑额。基于胤祉的文才，康熙于五十二年命他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馆，负责修书。他吸收原任编修陈梦雷、侍读学士法海、编修魏廷珍、方苞、杨道昇等参加工作，撰成《律吕正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又编纂我国第二部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胤祉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小。

胤祉受康熙皇帝委派，参与祭祀及处理一些政事。如康熙三十二年重修阙里孔庙告成，胤祉率领胤禛、胤禩前往祭祀；五十四年，与康熙及胤禛等讨论西北用兵事；随从康熙皇帝祭孝庄文皇后陵、顺治孝陵、孝东陵。康熙六十年三月，胤祉与胤禛等复查会试中式原卷，等等。

康熙同胤祉的父子感情比较好。胤礽被废后，胤祉每年都请康熙皇帝到京城和热和的花园聚会，先后达18次之多。康熙皇帝废太子、囚长子，缺少天伦之乐，胤祉以此为父皇解忧。而康熙皇帝也着实偏袒胤祉。

康熙五十六年，发生了胤祉的属人“孟光祖欺诈骗案”。孟光祖在连续几年里，自称奉胤祉之命，到山西、陕西、四川等省活动，结交地方长吏，代表胤祉向川抚年羹尧赠送礼品，年回赠马匹银两，赣抚佟国勳送他银两缎匹。此事被直隶巡抚赵弘燮告发，康熙皇帝亲自过问，将孟光祖处斩，佟国勳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但是，康熙皇帝为了不牵连胤祉，对魏廷珍说，这事关乎诚亲王声名，你每天同他一处修书，知道他的为人，应当以身命保他。这是有意保护胤祉。

上述事实说明，废太子后，胤祉也是不甘寂寞，希望成为新太

子。其时，他是诸皇子中能够自由活动的年龄最大的人，这一点对他很有利。清太祖、太宗历来注重嫡子；其次是年长的儿子，所以褚英、代善、豪格相继受重用。

康熙继承这个传统，立唯一的嫡子胤初，重用长子胤禔。“废太子事件”后，胤祉、胤禛自然就处于特殊地位，而胤祉尤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康熙的一些信任，胤祉就以储君自命，希望获得储位。

不过，胤祉尽管抱有幻想，但没有过多的活动。他身边只是几个文人，有一定学术地位，而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

陈梦雷是耿精忠逆案中人，方苞是《南山集》案中人，他们受过流放和管制，没有活动能量。胤祉在兄弟中也没有特别要好的人。他没有竞争能力，很难在储位斗争中取胜。

接着说十三阿哥胤祥，生于康熙二十五年，生母敏妃受康熙皇帝宠爱。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八年，即胤祥13岁至24岁的12年中，康熙皇帝南巡、北狩、西幸、谒陵，几乎每一次都带着胤祥，为其他皇子所不能比拟。康熙皇帝六次南巡，胤祥竟随行四次，可见康熙爱其之深。

胤祥与胤初较为接近，或许可以算作太子党人。在第一次废胤初时胤祥糟了殃，有关史料被雍、乾时期的史官遵照为尊者讳的原则湮没了，现在能知道的是，《皇清通志纲要》记载：胤祥与胤初、胤禔同时被圈禁。应该说，在“废太子事件”以前，胤祥是康熙最喜欢的皇子，不过他在“废太子事件”中的表现令康熙痛恨，从而失去以后被选择为皇太子的可能。

五阿哥胤祺年长，也得到康熙对年长诸子的共同待遇，参加少量

的皇家事务活动，康熙说他心性甚善，为人敦厚，封恒亲王。他自幼由皇太后抚养，皇太后病危，他要去料理事务，康熙不允，却用胤祉、胤禛等办事，说明他没有能力，关键时刻不会得到重用。他对皇太子的位置是无所谓的，不竞争，也不结党。

十二阿哥胤禔于康熙四十八年受封为贝子，当时并不引人注目，以后康熙出行，他往往侍从。康熙五十七年春，皇太后逝世，胤禔署理内务府事务。康熙在命胤禔出师的同时，重视八旗事务，命胤禔管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这是皇子管理旗务制度的开始。

康熙五十九年，裕亲王妃死后，胤禔奉命去办理丧事，六十一年正月奉命祭太庙，夏至祭地坛，秋分祭月坛，十一月出任满洲镶黄旗都统。看得出来，胤禔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在提高，显然康熙也是把他作为一个有才能的儿子来看待的，但是没有迹象要立他为皇太子。

康熙皇帝对待皇子的态度，绝非一成不变，总是依据其人的素质、表现调整看法，因而皇子地位有升有降，钟爱者失宠而沉寂；默默无闻者得宠而显名；年长者总不会吃亏。

在储位之争中，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参加并不算早，那是在胤禔第二次被废之后。但是，胤禛后来居上。不露声色，则是他结党谋位活动的特点。

最初，胤禔被废的时候，胤禔非常得意，接着是胤禔的被重用和受权贵的保举，胤禛看得清楚：他自己与储位无关，不妨表现得超脱一点，维持既得利益，争取未来处境好一些，为此采取四方讨好的策略，周旋于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中。

他的心腹戴铎，为他提出了一整套策略——其一，对皇父要诚

孝：适当展露才华，若不露才华，英明的父皇瞧不上；若过分展露，便会引起父皇的疑问和猜忌。其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对事对人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嫉恨你，让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附。

胤禛按照这套策略，一步步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前行。

胤禛与胤初关系平常，既不像胤祉、胤祥与之密切，又不像胤禔、胤禩与之对立，胤初被囚禁后，胤禛作为看管人之一，他揣摩康熙对胤初的态度是恨铁不成钢，并不是要把胤初置于死地，所以决定不对胤初落井下石，而要保持胤初的正当利益。

康熙皇帝一度不让看守人代转胤初奏言。胤初曾说父皇批评我的话都接受，只是说我弑逆实在冤枉。这话关系重大，胤禛甘冒风险为其转奏，康熙听后取消了胤初项上的锁链。这件事胤初直接受益，对康熙正确理解废太子也有好处，胤禛这一手两面讨好，还令众人感到他讲义气，获得好评。

胤禛与胤禩关系一般，又不是胤禩集团的成员，所以不希望胤禩成为太子，但也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以免将来遭到打击，所以对胤禩集团持若即若离态度。胤禩党羽马尔齐哈与胤禛关系不错，他成为双方的联系人。

胤禛对父皇康熙关心备至，与胤祉一道冒死劝康熙治病是最显著的事例。他在康熙面前给包括胤初在内的诸兄弟说好话，打圆场，企图获得康熙的好感和信任。康熙曾说他度量过人，深明大义。

胤禛这样周旋于父子、兄弟之间，收到了联络各方面感情的实效，并被晋封亲王。但当康熙说胤禛为胤初保奏是伟人行为时，胤禛却否认此事。因为胤初的命运尚难预料，如承认此事，可能被认为是太子党人，那就得不偿失了。可见胤禛工于心计。“废太子事件”锻炼

了胤禛，为其日后争夺储位积累了斗争经验。

胤礽再次被废之后，更多的皇子参加到谋求储位的斗争中，胤禛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认识到这时是“利害攸关，终身荣辱”之际，决心参加储位的角逐。

胤禛制定了处理父子、兄弟、朝臣、藩属诸种关系的策略，以争取各方面的好感和支持，建立与扩大自己的力量。

康熙皇帝英明果断，胤禛因而认为，自己若表现得愚蠢，必然被轻视，弃置一旁；但锋芒毕露，又会被认为有野心，可能遭到打击，这两种表现都会使自己与储位无缘。为此，既要表现出有能耐，又不要重蹈胤禩的覆辙。对待诸兄弟，要以胤礽暴虐为鉴戒，多团结人，使有才能的不嫉妒，无才能的人来依靠；对百官，加意笼络，无论是亲贵、朝官、侍卫、汉人，都要和好相待，以便制造舆论，影响皇帝；对藩邸人员加以培植，造成自己的嫡系势力，作为斗争的核心。

胤禛的活动手段是力图隐蔽，他三番五次说他对皇位不感兴趣，故而不收党羽，不树私恩小惠，与舅氏家族、与妻族和姻亲关系都很平常，与满汉大臣、内廷执事人员没有一个亲密往来的，同兄弟也不私相交，有的人要投靠门下，还严加拒绝。其实这都是做给人看的假象，在结党纳派方面，胤禛较其兄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胤禛分封在镶白旗，按照清朝制度，他得有属下人，他们之间在名分上是主奴关系，即使其人出任高官，对本门主人讲也是附属。胤禛自决定争取储位，就鼓励、帮助属人谋求官职。

戴铎的哥哥戴锦，经胤禛派人到吏部活动，出任河南开归道，戴铎在康熙六十一年由广西按察使升任四川布政使，沈廷正由笔贴式任兰州府同知；魏经国为湖广总督。年遐龄曾任湖广巡抚，又一子年羹尧为川陕总督。胤禛为扩充财力，与他的兄弟一样做买卖，如同傅鼐到苏州贸易，还派人到浙江与英国人进行交易。

在藩属之外，胤禛违法结交官僚，通过马尔齐哈、年羹尧联络礼部侍郎蔡珽，蔡以学士不便与王府来往辞谢，及其出任川抚，往拜胤禛，并推荐左副都御史李绂。胤禛乘戴铎往福建赴任之机，命其带礼物给闽浙总督觉罗满保。

隆科多原是胤禔党人，后来他的家族转而支持胤禔，隆科多不再结党，取得康熙信任，五十年取代胤初党人托合齐职位，任步军统领，五十九年兼任理藩院尚书，六十一年十月胤禛奉命清查京仓，隆科多为成员之一，可能就在这时成了胤禛的人。

废太子过后，胤禛与兄弟间交往不多，唯与胤祥关系密切。胤初废后，胤祥失宠，两人仍往来频繁，宴集唱和，胤禛能随康熙巡幸，胤祥只能留在京城，给胤禛诗词、书信，后者保存的诗歌就有三十二首。胤禛继位就重用胤祥，说明这搭档关系早就建立了。

胤禛对其党人严厉控制，不容对他不忠。年羹尧少年得志，没把主子看在眼里，他给胤禛书启，称臣而不称奴才，胤禛回批，大骂他是“僇佻恶少”，用来书中的“今日之不负皇上（指康熙），即异日之不负我（指胤禛）者”的话威胁他，说他引诱自己谋位，拿这个书启做证据，随时可以向康熙告发。并令他带到住所的弟侄、十岁以上的儿子送回京城，以示惩罚。

戴铎不愿在福建做官，想告病回京，胤禛说他没志气，鼓励他：“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意乎！”即要死心踏地跟着主子谋取高位。

胤禛经营的小集团有其特点：形成在康熙季年，比胤禔、胤禔、胤祉等人的都晚；成员不多，要人也不多，与胤禔、胤禔无法相比，但是他的人员到时都能安排上用场，作用不可低估；活动隐蔽性强，像戴铎的转交觉罗满保礼物，是见其家人，而不做直接的沟通。

特别要指出的是胤禛利用与佛徒交游掩护他的结党谋位活动，令

康熙产生他不结党的错觉，也给对手以无所作为的假象。所以当时胤禔、胤禩、胤祉被社会舆论传得沸沸扬扬，大有被册立之势，而胤禛则很少有人议论，这看起来似乎对胤禛不利，其实不然，这与战场上的情形一样，冲锋在最前边的往往容易最先倒下。而胤禛冷眼旁观、动心忍性，既免受了打击，又经受了磨练，也锻炼了能力。

对于胤禛的品行，康熙在四十七年说他幼年有些喜怒不定，又教诲他遇事“戒急用忍”。喜怒不定与“戒急用忍”，指出了胤禛的弱点，就是毛躁，容易冲动，感情用事，说过头话，办过头事。

毛躁对于一个人不好；对官员尤其不好，对于一个皇帝，影响更大。康熙皇帝评价胤禛急躁，是按照对皇子的要求而言的。胤禛深知这事的重要，当康熙旧语重提时，回奏说：“经父皇教诲，已经改正，而今已过三十岁，这个评语关系生平，请不要记在档案里。”康熙皇帝接受了这份请求。

胤禛结党谋位时动心忍性，真是“戒急用忍”，喜怒不形于色，他学习禅学，大概也是用它帮助克服这个毛病。他成功了，取得了康熙的谅解，这个缺陷不会影响到他当皇太子的选择，但是胤禛在做了皇帝以后，自我克制减少，老毛病又犯了。

康熙皇帝和胤禛的父子感情逐渐加深。据《清圣祖实录》记载，早在四十六年十一月胤禛请乃父临幸府园进宴。统计《实录》资料，康熙先后去胤禛的圆明园和热河狮子园十一次。有一次是胤禛把乾隆引见给康熙，一时三皇帝交谈，后世传为佳话。

总之，他们父子关系很好，偶有小疙瘩，也能很快消除。胤禩失宠后患病，康熙皇帝派胤禛去探视，胤禛错以为父亲宽恕了胤禩，因此跑前跑后，表现得过于热情，康熙大为不满，欲惩治胤禛。胤禛赶忙认罪，并得到康熙皇帝的谅解。

康熙皇帝对胤禛也着意加以培养，让他参与管理皇室寿庆丧葬祭

祀事务，并参与管理部分国家事务。胤禛办事特点是认真负责，事无大小，凡康熙交办的，必恪尽职守，办理完善。在其办事中，透露出严肃执法的精神，主张奖惩严明，对违法者、渎职者，决不宽容，为的是严肃法纪，澄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

他这种作风很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再加上他能领会康熙的意思，有爱戴之心，又能殷勤小心，是个孝顺儿子，这一点也符合他立太子的条件。可见，康熙心目中应该是把胤禛作为皇储的候选人之一。但由于有前面的教训，再加上康熙对胤禔也比较看重，委以重任，因此最终没有立储。

康熙皇帝晚年，因其诸皇子争夺皇位的事而大伤元气，郁结成疾，最后悲离人世。他曾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这段话，是康熙皇帝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的境况自喻。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位。齐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他的尸体上也没有人顾及，他的尸体在床上躺了67天也没法入殓，以至于长满了蛆虫。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晚年的心境是多么的悲苦。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康熙皇帝前往北京南郊的南苑狩猎，突然偶感风寒，起驾回到畅春园后，病势日重，生命垂危。到冬至那天，按照常例，康熙应当去主持祭天仪式，但当时他已经病得起不来了，最后只能派四阿哥胤禛前去代为行礼。

胤禛在主持仪式的时候，忽奉急召，命他立刻赶回畅春园。等胤禛回来后，发现康熙命如游丝，已在弥留之际了。

当时，有皇子七人及尚书隆科多在旁伺候，康熙皇帝见胤禛回来，即示意宣读遗诏。遗诏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遗诏中的话，很明确，让胤禛继承皇位。

这时，其他皇子的反应不一，或惊讶或愤怒，人情百态，尽在此刻。比如八阿哥胤禩，本来太子废黜后，他继位的呼声最高，当听到遗诏宣布后，胤禩佯作悲痛之状，当即走出殿外，以掩饰心中的愤懑。

在宣布完遗诏后，康熙皇帝便魂归九天。随后，胤禩为父皇康熙穿好长寿袍，并亲视收敛完毕，便立刻回到乾清宫行即位大礼，即为后来的雍正皇帝。这一年，胤禩已经四五十岁了。

但民间对雍正即位却有多种传闻。《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中说，康熙临死前，曾经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继承大统。”十四皇子就是胤禩，当时正在西北统兵，颇得人心。所以，民间传说康熙本有意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是，胤禩得知遗诏所在后，将“十”字改为“第”字，然后屏退各位兄弟，一人入畅春园侍疾，其他人均不许入内。据说康熙当时已经昏迷，醒来后突然发现只有胤禩一人在侧，知道被其欺骗，大怒，用枕头和念珠投击胤禩而不中，胤禩则跪而谢罪。过了没多久，康熙皇帝便撒手人寰，而胤禩持念珠和遗诏出来，并宣布自己继位。

也有人说，窃诏篡改一事，其实是大将军年羹尧的策划。民间传说，雍正之母先私通于年羹尧，入宫八月就生下了雍正。因此，年羹尧就抓住机会窃诏篡改，帮助雍正夺取皇位，而年羹尧在雍正时代初期权倾一时就是证明。

雍正皇帝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夺？从胤禩登基至今200多年以来，都是学术界激烈争议的问题。

在今天的深圳市档案馆展厅，一幅存在了200多年的“康熙传位遗诏”似乎能对雍正继位之谜做一个解答。这幅“遗诏”长1.55米，宽0.8米，诏书上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的是同一内容。汉文大概共有1700多字，最后关键的话是：“雍亲王四子胤禩人品贵重，深肖朕

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继皇帝位……”这短短的31个字，似乎可以澄清近300年的谜团。所以，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雍正是根据康熙的遗诏继位，是合法的，疑案当解。

目前，虽然对于这份遗诏是否出于康熙至少尚有争议，但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却逐渐被学术界认同。有一种观点认为，康熙皇帝认识到自己晚年过于仁慈，官场腐败现象严重。大清王朝需要一位能彻底整治吏治的新皇帝。于是，铁面无私、政绩卓著的皇四子胤禛就成了最佳选择。另外，康熙很喜欢雍正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常带在身边亲自调教，康熙选择雍正，也保证了大清能有两代好皇帝。因此，雍正篡位一说应该是其政敌制造的谣言，并无依据。

八 残酷“文字狱”

在清王朝12位皇帝中，雍正皇帝是一位很难准确描述的帝王。他是中国历史上勤政有为的皇帝，而他的性格中又有残暴多疑的一面。雍正皇帝在位仅13年，但从他继承大统到离奇死亡，一路迷雾重重，这使得他尤为神秘。

正因为如此，关于雍正的猜测、诋毁和谣言始终不断，甚至被诉诸文字，从而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字狱”案。

事实上，清朝的“文字狱”由来已久，早在康熙时期就发生过一起著名的“文字狱”案，历史上称为“庄廷钺案”。

此案要从浙江湖州府的南浔镇说起，在南浔镇上，有一户姓庄的豪门巨族，家资万贯，家族中的父子兄弟，人人博览经史，精通诗文。其中有个叫庄廷钺的，十五岁就进了国子监。可是后来，庄廷钺生了场怪病，眼睛瞎了，但他毫不气馁，认为司马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自己为何不能成为一个盲史家，而名留青史呢？

事有凑巧，邻里中有个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的后代，因家中贫困，想把家藏朱国桢《明史》稿本出卖。庄廷钺闻讯，便用一千两银子买了下来。

可是，朱国桢的《明史》缺了崇祯一朝的史实，庄廷钺组织了江、浙名士茅元铭、吴之铭等十多人，对朱氏《明史》加以增补润色，编成一本《明史辑略》，算是自己的著作。

不久，庄廷钺死了，他的父亲庄允城将此书刻印，花钱请名人李令哲作序，把参与编写的人都列名书中。为了提高书的身价，又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查继佐、陆圻、范骧作为“参阅者”，也擅自列入。

庄廷钺的岳父朱佑明，对书的刻印曾赞助不少钱，要求书板刻上“清美堂”三字。清美堂乃是明代大家董其昌的手笔，是给朱国桢家写的堂匾，朱佑明把自己说成是朱国桢的本家，是为了炫耀。

庄氏《明史辑略》问世后，范骧好友、解任户部侍郎周亮工，觉得书中有些文字关碍当局，弄不好会吃苦头，劝范骧等三人向官府自首。三人均等闲视之，不以为然。当然这也是为己沽誉的好机会。湖州地方官与庄氏关系较好，敷衍一番，将此事压了下去。谁也没想到，有个因贪赃枉法、削职为民的吴之荣，得知了这一消息，认为可以借机发笔横财，便上门向庄允城和朱佑明敲诈。庄、朱两家不但不买他的账，还买通官兵将他逐出湖州。吴之荣一气之下就告到京城。

康熙元年（1662）冬，朝廷派罗多等来到湖州府。下车伊始，就逮捕庄允城、朱佑明，追查书板。连人带物押解刑部大牢。

最初，当事人对此案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因为吴之荣告的仅仅是庄、朱二人，交上去的也是撕了序文及参订者名单的书。庄允城也自认为不会有大问题，因为他曾将此书送往通政司、礼部、都察院三衙门备过案。朱佑明则希望同贪财的府学教授赵君宋搞交易，表示若能鼎力相助，愿将家产分一半给他。

刑部查出了庄氏《明史》扬明、毁清的八大罪状，定为逆书。严刑拷讯下，庄允城供出了作序人李令哲，李经不起拷打惊吓，加上老病，死在狱中。赵君宋也不得不交出完整的《明史辑略》，铁证如山。

康熙二年正月二十日清晨，湖州城门禁闭，按书内名单挨家搜

捕，父子兄弟姐妹祖孙，以及内外奴仆一律擒拿；仅李令哲一家被捕的就有百十口，连前来拜年的亲戚和看热闹的邻居也一齐拿下。庄、朱两家抓了好几百人不算，不在湖州的还要通缉追拿归案。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杭州粥教坊刑场上大开杀戒，有的被凌迟，有的被重辟，有的被处绞。庄廷铨被掘坟碎尸。书中署名的十八人中得以幸免的只有四人：董二酉在结案前三年身死；查继佐二十年前无意中接济过一个乞丐吴六奇，此人现在平南王尚可喜手下任广东提督，他为查打点疏通，说查与陆圻、范骧三人并未参与，系被庄允城擅自挂名，又属首告，故无罪开释。其余十四人加上庄允城、朱佑明均遭凌迟。庄、朱家族中，男子处斩，妇女幼男有的流放边区；有的配给旗人为奴。凡与《明史辑略》有关的刻写、校对、印刷、装订者，以及贩书卖书、购书藏书的，甚至读过此书的，不下两千余人，全被牵连银铛入狱。

上任才三个月的湖州知府谭希闵、推官李焕宁、库吏周国泰等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归安训导王兆楨到任不及半月，以放纵看守罪被绞死。赵君宋不仅未因献书立功，反而被判私藏逆书之罪，砍了脑袋。浙江将军柯奎受贿包庇，革职为民。原湖州知府陈永命，坐受贿包庇罪，虽已在山东自杀，亦追尸置杭州法场，当众分尸三十六块，并株连其弟江宁知县陈永赖。

事后，吴之荣得到朝廷封赏，捞了庄、朱两家财产的一半，又起复做了个右佥都御史。有书记载说，康熙四年秋，吴之荣从福建回来路上，突遇狂风，雷电交加，骤得恶疾，肉化于地，骨存于床，人们都说他是遭报应，被天雷劈死的。

与康熙朝恐怖的“庄廷铨案”相比，发生在雍正朝的“吕留良案”却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吕留良案”主角并不是吕留良，而是另一位书生，名叫曾静。但事情是由吕留良开始的。

吕留良是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从小聪慧过人，八岁就能赋诗作文。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个知名学者，在明朝灭亡后，吕留良多次参加了反清斗争，但都没有成功。胳膊拧不过大腿，吕留良造反不成，就在家收学生教书。有人举荐他做官，他很傲气地拒绝了。教书也不清静，此时的吕留良情绪很低落。情绪低落的人，要么自杀，要么出家。吕留良选择的是后者，他到寺院里当了和尚去了。

在寺院里，吕留良著书立说，在他的书中，有不少反对清朝的内容，但他的反动读物，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而流传世间。因此，直到吕留良死后，也没人注意。

实际上，吕留良在庙里写的书，也就是一个对当时社会极度不满的愤怒文人，在博客上的自言自语。可谁也没想到，有人在无意中读到后，竟成了吕留良的粉丝。这位粉丝就是曾静。曾静当时身居湖北，是个落第书生，他偶然拾得吕留良的大作，读后被其思想所强烈感染，对吕留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曾静决定，要做吕留良的骨灰级粉丝。

所谓骨灰级粉丝，就是要收集到偶像的全部作品，欣赏、收藏，甚至模仿。曾静就打算这么干，但他自个儿不去，支使他的学生张熙去寻找吕留良的全部遗稿。张熙是个好学生，很听老师的话。就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寻找遗稿。

这一去，还真就找到了遗稿，两本。一本叫《知几录》，一本叫《知新录》。张熙如获至宝，大老远来一趟，总算没辜负曾老师的心愿。不仅如此，还有非常意外的收获。此时，吕留良早就死了。在寻找反动图书的过程中，张熙还偶遇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双方结识后

一聊，十分投机。张熙当即决定，把吕氏的俩学生带回湖南，给曾老师一个特大号的惊喜。

曾静果然很惊喜。他和张熙，以及吕氏的俩学生，一起谈理想，侃人生，大肆评论清朝政治，越聊越来劲，越聊越愤慨。为什么愤慨呢？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人，尤其是文人、士人，是不愿同新朝合作的。伯夷和叔齐在周武王灭掉商朝后，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元朝初年的时候，一些宋朝遗臣和文人应召做了新朝的官吏，内心却很矛盾。有的隐居表示不与新朝合作，他们既彷徨又苦闷。

清朝入关，进入北京后，又以夷制夏，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中原地区的汉人，特别是士人、文人内心深处是相当不满的。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清朝统治不得安宁。吕留良就是以文字作品诋毁清廷的一个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静等人决心要继承吕留良的反清思想，以实际行动来推广吕留良的反清思想，进而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

可几个读书人，手里既没刀又没枪，且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谋反啊？必须拉拢有兵权的人才行。于是，曾静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在此之前，曾静先建立了一套理论，那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雍正的劣迹。而后，他十分八卦地为雍正皇帝总结了十条大罪状，这些罪状为：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谗任佞。从人品、性格到私生活，一个都没落下。曾静的准

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找到手握兵权的人，就用这套理论去游说他，让他听自己的，推翻大清朝。

这个机会曾静等了很久，终于还是来了。雍正五年（1727），张熙带给曾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上疏斥责雍正帝。这说明，这位爷也对雍正强烈不满。

也不知道张熙是从哪里弄到的这个消息，是真是假现在我们无从所知。可当时曾静一听就信了，当即就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

于是，曾静立马决定，派张熙去拉拢岳钟琪，让他造反，恢复大明江山。实际上，这师徒俩此刻心里压根儿就没底，但他们决定赌一把，有“雍正的十条罪状”的理论在，这事儿未必就不能成。

1727年，张熙来到西安。他以一种比较雷人的方式求见了岳钟琪。就在大街上，张熙拦住了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向他投递了一封书函。

岳钟琪接过书函，打开一看，浑身冒汗。他先以为是谁投错了书信，可见到书函封面写着“天吏元帅”，便有些诧异，决定亲自拆阅。

书函写的全是雍正的罪状，十大条，触目惊心。岳钟琪觉得事关重大，立即下令把张熙抓来审问。此时的张熙理直气壮，大有一副英雄气概，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和企图。

岳钟琪开始怀疑这人精神有些问题。怎么能把对雍正个人的攻击，当作反叛朝廷的借口呢？到底读过书没有？

张熙却不以为然，和岳钟琪展开辩论，说你也是汉人，也和满人有世仇，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这话说得岳钟琪直犯愣，自己虽是汉人，可自己的祖宗并没有被清廷屠杀过，不仅如此，雍正还破例重用他，让他担任陕甘总督，掌

握重兵。他和清朝有什么世仇啊？

见岳钟琪疑惑，张熙向他解释说，将军姓岳，南宋名将岳飞也姓岳，清朝的先人是金人，岳飞当年就是被秦桧勾结金人给害死的。您是岳飞的后代，这就是世仇，现在您手握重兵，正好报仇！

岳钟琪听完，不再疑惑，他确定张熙精神有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硬往一块儿扯。岳钟琪都气笑了，当即下令，将张熙打入死牢。

在牢中，岳钟琪拷问张熙，谁是幕后的主谋？没想到，张熙骨头硬嘴很紧，坚决不招。于是，岳钟琪想了个计策。翌日，他把张熙请出牢中，说自己其实早有谋反之心，只不过是试探张熙而已。如果不试，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想反清呢？

张熙很高兴，他在牢中就盘算，怀疑是岳钟琪在试探自己，果不出所料，就是在试探自己。于是，张熙立刻就招出了幕后的策划人和指使人——他的恩师曾静。

岳钟琪得到了供词，又将张熙打入死牢。而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等人，一面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等人图谋造反的事情汇报给了雍正。雍正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命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翰林、刑部等将该案细细研审，依据刑律定罪。

几个部门将案犯逐一提审一遍，经过几轮的严刑审问。曾静把事情一点不漏地全盘交代了。

案子很容易就破了，此案自然牵连到吕留良，吕留良此时已经过世，于是，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留良的第九子和学生被斩立决。

然而，让人疑惑的是，真正的首犯曾静却没有被处死。按理说，他应该第一个被千刀万剐，但他却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雍正皇帝下令，暂不处决曾静，要将他押解回京，再做出处理。

这期间，雍正皇帝曾令朝廷官员并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各地学官依次议论曾静的应得之罪。清廷官员于是纷纷表态，认为曾静罪大恶极，法不可赦。曾静到了京师，朝中的大臣们献上多种处决曾静的方式。但雍正都没有予以采纳。因为这时的雍正并不想让曾静死，要除掉这个头脑发热的无能“愤青”，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雍正心里另有主意，他要亲自会会曾静。

其实，“文字狱”案在雍正朝，已不是第一次发生。雍正皇帝即位后不久，翰林徐骏上书奏事，不小心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狴”雍正见此奏章，认为这是“辱骂皇帝”立即诏令将徐骏革职。之后，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射朝廷，“清风不识字”无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于是又下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死刑。

江西考官查嗣庭，在一年身为考官出试题“维民所止”。试题一出，即有人密告雍正，说查嗣庭试题有影射陛下断头之意。雍正不解，经人解释，“维”字是去了头的“雍”字，“止”字是去了头的“正”字。“雍正”是胤禛的年号，去了头成“维止”，岂不意味陛下断头之意吗？雍正听信谗言，龙颜大怒，立即下旨把查嗣庭拿解进京，下狱问罪。

然而，对曾静的这桩“文字狱”案，雍正自有主张。而此时的曾静，非常害怕，痛哭流涕，发誓要痛改前非。雍正则饶有兴致地和曾静展开辩论，对吕留良的言论做了全面批驳，对曾静指责他弑父逼母夺嫡自立之事，逐条进行反驳。曾静自然不可能与雍正辩驳。雍正彻底反驳曾静历数自己的“十条罪状”，每反驳一条，就有人记录一条，最后汇编成一本书类似于访谈的书籍。雍正给这本书取名为《大义觉迷录》。

曾静这时候倒挺机灵，他得知了这一点，立马写了一本《归仁录》，对雍正的仁德大肆吹捧和赞颂。与他历数雍正的“十大罪”形成鲜明的对比。曾静是一个好写手，当权者需要什么稿子，他就写什么稿子。原来，“愤青”也有一颗柔弱温顺的心。

雍正读了曾静的新作《归仁录》后，心中大喜。他把《归仁录》中的内容装进了《大义觉迷录》，怎么装的呢？就是把自己辩驳“十大罪”的话，用曾静之口回答出来。这样，一本详实、丰厚、拥护清朝统治的全新《大义觉迷录》就面市了。

雍正决心将此书打造成一本畅销书。怎么畅销？一是走官方配送路线，下令全国学校的教官督促士子阅读，把阅读此书当成一次政治任务来完成，玩忽职守者一律治罪；二是做广告宣传，嚷嚷得全天下都知道，雍正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传此书的内容。

《大义觉迷录》确实畅销了，曾静将它广为传播。对曾静来说，传播此书，就是传播雍正的仁德。在这个事情上，曾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算是将功折罪。雍正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过，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他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曾静就在观风俗使衙门上班，继续配合雍正，在各地宣讲雍正的仁德。

雍正认为自己这步棋走得很精，他不杀死曾静，而是利用他为自己脸上贴金，以为这样既可安抚民心，又落下一个仁慈的口碑。曾静也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为雍正打工。

雍正的本意是要在民间肃清影响，宣扬自己的功德，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谣言四起。至此，这起“文字狱”案并没有最终结束。雍正死后，乾隆即位。即位之初的乾隆，首先面临的是，父皇雍正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空气。

雍正以“严猛治国”，而严有余宽不足。政令苛刻且复杂。而乾隆的施政思想是“执中两用、宽严互济，交相为用”。他曾对大臣说，治

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乾隆认为《礼记》中的“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正是自己应该奉行的为政之道。为政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恩威并施、刚柔并济。他再三号令大臣们要以此互相勉励，不许有丝毫懈怠，更不能矫枉过正。乾隆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纠正雍正时期的错案，以及一些错误的政策。其中被纠正的一起错案就是“吕留良案”。

“吕留良案”源于信徒曾静与张熙的策反，策反这样的事任何政权都是不会容忍的，按常规处置本来也很简单，但是到了雍正手里，却掀起轩然大波，变成一件牵动帝国上下，闹得鸡犬不宁的大案，施刑之酷，株连之广，骇人听闻，这表明了雍正政权的随意与残酷。其实，封建时代独夫治国，政权的本质便是随意与残酷的，只是若干帝王能够借重别人的智慧，明白“民可覆舟”的道理，在随意与残酷方面有所节制。

雍正对吕氏一族的惩处十分残酷，却释放了主犯曾静和张熙。乾隆即位后，立即下令逮捕曾静，并将他斩杀。同时收缴、焚毁了《大义觉迷录》。

曾静被处决后，“吕留良案”还留下一个吕四娘侠义复仇的民间传奇。据史书记载，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日，雍正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得病，次日凌晨便死亡。由于死得非常突然，于是在官场民间，便产生了种种猜想和传说。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吕四娘报仇削取了雍正首级。吕四娘就是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案”案发后，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因此幸免遇难。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于是只身北上京城，决心替全家报仇。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四娘拜之为师。甘凤池传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之后，吕四娘辗转进京，设计潜入清宫，刺杀雍正，削下头颅，提首级而去。民间又盛传雍正大葬时只得以金铸头代之，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

九 秘密建储与密折制度

在“吕留良案”中，曾静曾给雍正总结了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谗任佞。前三条罪状“谋父、逼母、弑兄”，都是子虚乌有的，其来源是对雍正继位的猜测。

其实，在清朝前期，确定皇位的继承人，一直是个大问题。皇太极死的时候，多尔衮和豪格相争，最后被顺治皇帝捡了个大便宜；康熙晚年时，皇子们争夺皇位，钩心斗角，几乎打破了头，而皇太子也是两立两废。最后雍正上台，还一直被人怀疑其是否正统。

有这些前车之鉴，雍正皇帝登基后不久，便在乾清宫召集各王公大臣，一起商议立储的新办法，以免骨肉相残的悲剧再次发生。雍正对大臣感叹道：想当年父皇在的时候，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又立，弄得弟兄们心神不宁，人人觊觎大位。朕想立储乃是关系到朝廷长治久安的大事，终归要有个解决的办法，你们且说说，有什么好的建议？

大臣们当然不敢对如此重大的事情随意发表意见，最后还是雍正皇帝自己说了：朕以为，皇太子立了之后，问题很多，但不立又不行。朕现在想了一个变通的法子，那就是把继位的皇太子名字写入密封，将其藏在匣内，然后将匣子放在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下面。这里是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这样的话，大家也就知道建储已设，人心安定。就算以后情况有变，到时也可以再拿下来重新修改。

听了雍正的这番话，大臣们纷纷赞同。随后，雍正便将一份自己

亲手写好的继位书放进匣子中。又命侍卫当众将锦匣封好，放在匾额后面。另外，还有一份同样的内容的继位书，则由雍正自己随身携带，在死后才能打开。这两份继位书必须内容相同，方可确定最后的皇位继承人。

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秘密建储”。从此以后，“正大光明”这块匾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匾下的那个锦匣子更是让皇子们日思夜想、魂牵梦萦，因为大家虽然知道皇太子已经确定，但彼此之间并不知道谁有这份幸运。更重要的是，立储之后还是可以更换人选的，这就加剧了彼此间的长期竞争，各皇子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约束自己，才有机会成为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其实，雍正皇帝创造的“秘密建储”，也未必是他首创。早在唐朝时期，波斯人就实行过这样的制度。据《旧唐书·波斯传》记载：“波斯国王继位以后，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子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

从实践上来看，雍正搞的“秘密建储”，在后面几代皇帝的继承问题上，确实发挥了作用，没有出现皇子间结党营私、争夺皇位的现象，选中的继承人也都表现不错。至少，从雍正后来挑选乾隆作为继承人来说，就是非常成功的。

“秘密建储”最大的进步是，它给皇帝挑选好的皇位继承人留下了很大的灵活性，如果选定的太子表现异常的话，可以随时进行更换，而皇子们并不知晓，不会影响到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更不会出现骨肉相残的事情。

不过，到了清朝最后的几个皇帝，“秘密建储”却没有了意义，因为爱新觉罗皇族的生育能力，到了后期都在走下坡路，最后的几代皇帝更是麻烦不断。譬如咸丰只有一个儿子同治，而同治、光绪根本就没有子嗣，“秘密建储”也就无从谈起了。

除了“秘密建储”外，雍正王朝时期，还有一项空前绝后的密折制度。

在清朝，臣对君的报告沿袭了明朝的制度，有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一种非常正式的报告，手续繁复，又很容易泄密；奏本手续相对来说简单很多，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没有丝毫的机密可言。

而密折的关键所在便是一个“密”字，由皇上亲拆亲阅，任何第三者都没有权力拆看，保密性相当强。说穿了，密折制度实际上就是告密制度。本来告密这种事许多人都以之为耻，但在雍正时期互相告密却是官员本职工作的一部分。

雍正皇帝刚刚即位，便下了一道谕旨，收缴前朝密折，密折逐步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皇帝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是绝对不能乱来的。按照密折的内容，规定分别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缮写，并且有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必须由本人亲笔书写，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中，锁上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派专人送达。

给皇帝上密折不仅仅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根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扩大到了1100多人，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在密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上到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陈述事情，还用来推荐人，最重要的是皇帝大臣利用它商讨政务。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对不了解的或不懂的问题，皇帝则询问臣下。

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摊丁入亩的政策，就是在雍正皇帝与黄炳、李维钧等封疆大吏和中央九卿间，通过密折反复筹商而最后定下来的。雍正皇帝授权官员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

种方法使雍正皇帝能够了解更多的情况，也使得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易触犯法纪。

密折制是雍正皇帝推行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密折，皇帝可以直接处理政务，强化其权力，也可以有效控制官员。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从“秘密建储”和“密折制度”可以看出雍正皇帝的精明强干，而且，雍正皇帝也算得上是清朝历史上，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勤勉的一位皇帝，几乎事无巨细，必躬亲过问，甚至包括赌博、乱收费等问题，他都亲自倾力整顿。

一〇 禁赌风云与高薪养廉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赌博最为盛行的一个朝代。首先，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有传统的赌博方式如投壶、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骰子、摇摊、斗鹤鹑、花会等；也有不少新创的方式，如“叉麻雀”，成形于清中期，至晚清盛极一时，已经具备了今天麻将牌的基本格局。还有清中叶以后从西方传入的彩票、赛马、赛狗、扑克和打弹子等赌博方式，在沿海地区和通都大邑流行一时。其次，参赌人员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士大夫到村夫妇幼，参与赌博活动的人数众多。

而清朝也是禁赌法规最为严厉的一个朝代。这种矛盾，无疑表明了清朝时期禁赌措施的失败。

事实上，从顺治皇帝开始，清政府就开始禁赌，而到了康熙时期，赌风却愈演愈烈，康熙皇帝加大了禁赌的力度，禁赌的条例也日渐细化；到了雍正王朝时，禁赌已成为定制。然而，即便如此，清朝的赌博之风却没有熄灭。其中的原由很多。不妨从雍正颁布的一则《禁止赌博谕》说起。

在雍正四年（1726）除夕的这一天，雍正皇帝颁布了《禁止赌博谕》。

这条《禁止赌博谕》的大致内容是：赌博之事坏人品性。如果下等人赌博，一定会聚众，作奸犯科由此而起。如果读书当官的人赌博，一定会误时误事。读书当官的人赌博，哪里会有高尚的品德？朕多次申明禁止赌博，可是，直到现在也不见成效，实在可恨。如果不

禁止生产赌具，就不能除赌博之根。现在，朕命令京城及各省地方官，将纸牌骰子全部封存销毁，不得再卖，违者重治其罪。如果还有赌窝或者引诱入局赌博的，输家可自首并检举同伙。所输的钱可追回归还，并免其无罪。这样，赌博之风可止。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除，对于禁赌，雍正皇帝是置于维护国家根本的高度来认识，尽管他在位只有13年，但他在清朝前期坚持禁赌100余年不动摇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但的确是因为雍正皇帝对赌博的狠抓，才让后来的几位皇帝下定决心禁赌的。

然而，决心归决心，虽然清朝几代帝王严厉打击赌博，赌却屡禁不止，反而日益猖獗，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皇帝们将人们的游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从而一概施予严刑峻法，导致禁赌法令难以长期坚持执行，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雍正皇帝自己也认为“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将此类“游戏”与开场设赌及“扎局弄赌”的骗钱把戏不加区分，使得禁赌措施难以具体贯彻。另外，以连坐治罪的形式加强对赌具的查禁，实际执行中也有困难，因为大部分官员害怕被牵连。于是，当各地官员查获赌具时，并不上报。

禁赌法律的制定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脱节，导致法令难以执行，这正是清朝禁赌失败的首要原因。清朝的吏治败坏到了乾隆皇帝时期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这种背景下的禁赌法令，在执行过程中自然会大打折扣，甚至成为官吏索贿的筹码。

在雍正时期，巡察史宋筠就遭遇过一件事情——有一次，宋筠来到一个叫孟县鹄腾崖的地方，在一个以卖烧饼为生的人家中，看到十多个人在聚赌。宋筠便问那些赌徒：“新颁布的赌博新例那么严，你们就不怕被官捉去受罚吗？”

其中一个赌徒答道：“那些官员离这儿有数十里，怎么会知道。”

宋筠又问，“那么衙役稽查来了呢？赌徒又答：送他几百文钱就完事了。”

宋筠再问，“如果地方乡约来查，又怎么办？赌徒再答：同在一块地方住，他们怎么好意思抓我们。”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宋筠经历的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禁赌已经成了表面文章。到了乾隆时期以后，查禁赌博的官吏，以索贿为目标，致使所谓的禁赌，成为一些官员非正常收入的一个渠道。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朝代，而可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增加，这就导致了大量人口从传统农业中游离出来，在村镇间或涌向城镇地区，从事农业以外的手工、商业和服务业等各种行业。雍正皇帝称这些为“游惰”之民。闲散的人员增多，便极易滋生赌博。

到了晚清时期，赌博之风泛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张弛赌博之禁，开征赌捐，这本是为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筹款的权宜之举，并非近代意义上的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筹和控制赌博业，但在法律上，它却使禁赌法令走到其自身的反面。至此，清初以来的禁赌律例，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除了禁赌，在雍正朝，还有一种特殊的制度，最后也形同虚设。这就是“养廉银”制度。这个制度，是雍正元年时，山西巡抚诺岷向朝廷提出的。这个制度立即得了雍正皇帝的同意和支持。

“养廉银”就是指在官员的薪俸之外，增发数额较高的生活补贴金。换句话说，就是“高薪养廉”。雍正皇帝希望，用这个制度减少贪污的现象。

其实，这种“养廉银”制度就是现今所谓“高薪养廉”，在中国历史

上，与之类似的制度很多。北魏时期有“以酬廉吏”的尝试，宋代有“给赐过优”的待遇，明朝实行过“量增官俸”的措施，到了清代，又被称为“养廉银”。

清朝实施“养廉银”的出发点是，朝廷认为官员们之所以贪赃枉法，是因为俸禄比较微薄。

据《大清会典》卷二一记载的“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十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这是基本工资，称为“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为“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給”，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官员的官俸了。

由此可知，即使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一品总督，年俸也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而七品知县的官俸折合每月只有三两七钱银子。这样微薄的“工资”大约只能养家糊口，但作为一个朝廷官员，如果只是能够养家糊口，勉强度日，在任何朝代都是说不过去的。

光绪年进士何刚德在其《春明梦录》说：“一般大臣坐的都是四人抬的轿子，也有大臣是坐车的。但这只以贫富论，不以官职分。如果大臣坐轿，必须要八个人才好，因为可以轮班倒。路途遥远，还必须在后面跟随一大板车，倒班的人坐在上面歇息。这样下来，一年费用，至少非八百金不可。坐车的花费要比这省一倍，许多京官都喜欢坐车，因为省银子。”

何刚德任京官十九年，最后做到了五品郎中，他后来说，自己刚到京城做官时，都雇车而坐，几年后才能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了一个仆人。后来因为公事较忙，又买了一只骡子，一个月要支出十金，即

使是这样的生活，“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五品官年俸银百二十两、米六十斛，这百二十两银子刚好付每月十两的骡马费，何刚德一家人的生活，六十斛米又如何能够维持，势不能不于官俸之外另行设法。

《春明梦录》也多少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云：“京官官俸极薄，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司均分，稍资津贴耳。”何刚德讲到他自己，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他在吏部分管福建）；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会，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

何刚德之所以“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就是因为他“得掌印”的缘故。那么，可想而知，那些没有“特色”的官员是如何度日的。

清朝的各级官俸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可以与各朝的官员俸禄做一个对比。明朝官员的官俸就已经很低，但与清朝比仍是比较高的。拿一品来讲，明朝正一品官的俸额为清朝正一品官的2.7倍，明朝最低的正九品官俸也为清朝正九品官俸的1.3倍。若同唐朝的官俸相比，清朝官俸之低难以想象。经推算，唐正一品的俸额为清的5倍，唐最低的正九品官的俸额也是清的将近4倍。

喜好读史的清朝皇帝们不会不知道自己官员们的薪水之低，也对贪污现象有了“本质”的认识，这种“本质”的认识让他们做出推行“养廉银”制度的决定。那么，养廉之资从何而来呢？皇帝绝不会自己掏腰包，更不可能取之于民间，增加人民的负担。倘若取之于民间，正与朝廷推行养廉银制度本意相悖。

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期的养廉银资是从“耗羨”中来的。当时，凡

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或银子，都有一种“耗羨”陋规，所谓“耗羨”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倘若是银子，就是指将碎银熔成银锭时所受的损耗。

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钱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羨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由此可知，这所谓的“耗羨”实际上是地方官借耗损为名，而征收的一种在各种杂派中最苛重的一项的附加税罢了。

推行“养廉银”的同时，雍正也推行了“耗羨归公”制度。他谕令各省把原来被大小官员贪污的耗羨银两全部提解归公，上交藩库，并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养廉之资。

这部分银子并非是随意发放的，而是按照官员的官职高低、政务之繁简、地方之冲僻以及耗羨之多少来决定。这种做法可谓是“厚俸以养廉”，而不是以往的“俭以养廉”了。官员们领取了“养廉银”，不许再有乱收胡收之举，否则就要受到严惩。

实行“厚俸以养廉”制的结果，化私费为公款，将原来对百姓的侵夺银两变成了制度化的合法收入，各种陋规大受压制，民众负担大为减轻。雍正这种做法被史学家们大为赞赏。

清朝推行“耗羨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至少对雍、乾二朝发生了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国帑，三是百姓减轻了负担。在那一段时间，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局势也较为安定。但乾隆后期，这种情况便不存在了，官员们愈发“放肆”起来，贪污现象更加严重。

实施“养廉银”制度后，在外官员其数额往往超过正俸几十倍，而

京官是没有这个“额外”收入的。提出“养廉银”制度的山西巡抚诺岷的养廉银一年高达三万一千七百两，为原俸的二百零四点五倍。河南巡抚田文镜亦达二万八千九百两，为原俸的一百八十六点五倍。正俸遂微不足道了。

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同为总督，有的高者可达二万二千两，而有的却只有一万三千两；同为七品知县，“养廉银”也有四百两至二千两之别。

这种差距让许多官员心里觉得不舒服，所以，他们仍旧在钱粮上打主意。他们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而任意设施勒索，而且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五百文合一两；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七成，却以五成来报，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多收的银粮都到州、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

由于乾隆本人对“养廉银”制度推行得不认真，他又是个喜欢铺张浪费的人，开销不断增大，国家财政不敷，只好转向加摊派、兴捐献上。在摊派、捐献中，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各有截留，贪污之风又再刮起，腐败现象再度从上而下遍及各级官员。乾隆虽也多次惩办贪污，但都是阵发式的措施，过后又起，难以阻止腐败的燎原之势。

倘若刻薄一点讲，“养廉银”制度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它只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特定的历史人物（雍正）那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过后，它便凋敝了。

为什么“养廉银”不能养廉呢？首先，为官者普遍贪婪，再多的“养廉银”也不能满足其无限膨胀的私欲；另外，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虽然雍正设了可以随时告发贪官的“密折制”，但在皇帝的一人主掌领

导之下，监督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在专制社会中更可怕的是贪污受贿已形成一个食物链。在这个食物链中，即使一个官员操守再好，也不得不贪污。在这个贪污的食物链中，你不按这些潜规则办，就在官场混不下去，即使要为民做好事，也必须求助于行贿的手段。要官员廉洁，必须让他们有能过上与身份相称的生活的高薪。但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之一，并非充分条件。只有高薪而没有相应的制度，想让官员廉洁只能是一句空话。

—— 李卫当官真实版

雍正皇帝自始至终最信任的大臣，一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张廷玉、鄂尔泰、李卫和田文静。提到李卫，人们会想到多年前曾经红极一时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剧中的李卫机智幽默，是四爷的家奴，爱骑马，爱收藏小玩意儿，是个很招人喜爱的角色。而历史上真实的李卫，却并非如此。

历史上真实的李卫，是江苏徐州人，生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卒于乾隆三年（1738）。李卫当官，并非通过科举的正途，而是家里花了不少钱，给他买了一个监生的资格。也就是说，是靠捐钱捐来的。

由于小时候没怎么读书，所以即使后来官做得挺大，李卫还是会闹出些错别字之类的笑话。

但是，李卫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人却非常聪明，他手下的师爷起草完公文奏章，读给他听，他听后，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要害，然后通过口述让师爷们修改，大家对此都十分服气。李卫升堂审案的时候，更是才思敏捷，判决如流，丝毫没有文盲的嫌疑。

《小仓山房文集》里的《李敏达公卫传》中说，李卫生来身材魁梧，膀大腰圆，臂力过人，貌似武夫，这和电视剧《李卫当官》中李卫的形象完全不同。历史上真实的李卫，走在街上很容易辨认，因为他脸大如盆，鼻孔中通，不同凡人。不过，李卫虽然一副武夫的身材，皮肤却很白皙，只有生就是一张麻子脸，委实可惜。

因为体魄强健，李卫自由就喜好习武。他做官后，曾经自建了一个勇建营，在当地募集了一些壮汉，专门练习搏杀之技。李卫每次带领勇建营外出捕捉盗贼时，自己也身披金甲，执铁如意，亲自指挥，过上一把瘾。不过，雍正皇帝对他的武夫形象颇不以为然。有一次，李卫向雍正皇帝请缨，要上西北战场去拼杀。雍正皇帝不屑地说，我知道你不是这块料，别多事了。

《清代名人轶事》里说，雍正皇帝上台后不久，发现各省钱粮亏欠甚多，便下诏清查，各省官员闻讯十分恐慌。李卫当时任浙江总督，立刻召集幕僚们来商议对策，可手下那些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李卫便说，不请钦差大臣来吧，皇上一定不相信我们；可要是钦差大臣来了，而我们这些做督抚的，又无权干涉清查，恐怕亏欠的事情就要败露。不如我主动上奏朝廷，说“浙省钱粮废弛日久，正好趁着钦差大臣清查的机会，好好整治一下。不过，钦差大臣初到地方，一时恐怕不得要领，臣身任地方官，理应协同办理，请皇上裁处。”

随后，李卫谎称自己要过生日，让浙省七十二州县的有关官员都速来祝贺。生日筵席吃到一半的时候，李卫把这些人召到密室，说，朝廷负责清查钱粮的钦差大臣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要是亏欠的话，千万别欺瞒我，我能救你们，你们要不听话，等查出问题被抓被杀的话，到时候可别怪没给你们机会。

众官员一听这话，都害怕，连忙说，愿听大人吩咐。

官员们回去后，不管有无亏欠，都老老实实在地造册登记后交给李卫，让李卫心里有数。

再说雍正皇帝接到李卫的奏折后，同意了他的提议，随后便派了户部尚书彭维新前去浙江清查，并批准李卫协助清查工作。彭维新当时已经在江南其他各省清查，彭维新做事认真细致，加上江南各督抚都不敢干扰他的工作，结果查下来的问题很多。很多官员被他抓住了

辫子，彭维新还准备上报朝廷，以流放、斩首、监禁、追究财产等手段惩处这些有问题的官员，一时间弄得江南等地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查完其他省后，彭维新又奉命来到浙江。不料，李卫一见面便出雍正皇帝的批示，说，朝廷让我协助清查工作，请大人一起商量怎么办好。彭维新见李卫手里有雍正的批示，气焰一下就小多了。

随后，李卫便为彭维新设宴接风，酒过三巡，李卫叹道，凡是共事，从来就没有不起争执的。我性子急，喜欢和人争辩，屡次被皇上批评。这次和大人共事，我倒是希望不要有争执，但就不知道怎样才能没有争执呢？

彭维新听后，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们分县清查。李卫非常赞同，立即让随从把浙江各州县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把纸捏成团，放在盘子里，李卫和彭维新各拿一半。彭维新没有料到的是，这些纸团其实都让李卫做了手脚，李卫把那些亏欠了钱粮的州县，大部分都拿到了自己手里，那些问题不大的，都分给了彭维新。

因此，彭维新虽然极其认真地清查，最后却一无所获。李卫在清查的时候，则让那些亏欠了钱粮的州县尽快设法弥补，把事情摆平。清查结束后，李卫和彭维新碰头，问道：怎么样，各地可有亏欠的？彭维新说，没有。李卫装出一副很意外，但又很开心的样子说，恭喜恭喜，我这里也没有呢。

于是两人皆大欢喜，一起奏明朝廷说浙江没有亏欠。雍正皇帝接到奏报后大喜，说，别人都讲清查麻烦事多，唯独李卫那里什么事情也没有，看来这小子确有一手。随后，雍正便加封李卫为太子太保，大加赏赐，浙江的其他各级官员也各升一级。

从此，手下的那些官员也对李卫彻底地服服帖帖了。

李卫这个人脾气倔，但有一次碰到一个比他还倔的手下。这个手下名叫田芳，是李卫的幕僚。

有一天，李卫让田芳给雍正写奏折，请求雍正封他五代。田芳不肯写，说人家请求封典的最多三代，从来就没听说过封五代的，这个折子我不能写。

李卫说，你别管，照写就是。

田芳还是不肯写，惹得李卫大怒，骂道，“你这狗娘养的，我要你写你就写，没有先例，我来创造先例，干你何事？”

田芳挨了骂，也愤怒，说：“我看是大人你自己昏了头，你仗着皇上对你一时的宠爱，把朝廷都不放在眼里了。我好心好意地劝导你，你不感谢我，居然还辱骂我。大人为人子孙，封三代还嫌不够；我也为人子孙，一代也未曾封过，你却骂我狗娘养的，这还有天理吗？我就是不服！不服！”

李卫从来就没有碰到手下这么跟他说话的，一时间面子下不来，只好说，就算我错了，你不服，又能怎么样？

田芳说，你是大人，我是小吏，不要大人骂我，就算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怎么样！只可惜大人之威，能强加到小人的身上，但小吏之理，还是直于大人！说完，田芳扭头走了。

李卫站在原地，愣愣地半晌没出声。当天晚上，李卫又派人把田芳叫来。田芳下午回去后，想了想，觉得自己当时确实太冲动了，听到李卫叫他，以为要杀他，进去的时候双脚发抖，脸色如土，不想李卫走上前握着他的手，笑道，“你小子有点胆识，做个小吏实在可惜了，不如我借你一千二百两银子，你去买个县丞当当，以后做了官，也要像今天这样，正直当官，好好做事。”

田芳万万没想到，李卫会如此对待自己，于是千恩万谢。后来，

田芳做了富平县丞和凤翔县令，为官期间名声非常好。

雍正皇帝曾将自己最宠信的几个大臣——鄂尔泰、李卫、田文镜树立为“模范总督”。但是，这几个人里面，田文镜心眼比较小，他看到李卫受宠，难免有些妒忌，便暗地里在雍正面前说李卫的坏话。但雍正不为所动。田文镜一计不成，便转而去巴结李卫。

这一天，李卫的母亲病逝，田文镜故作高姿态，特意派人前去吊唁，并向李卫赠以厚礼。李卫得知后，大骂道：“我老母虽死，但我也不饮小人一勺水也！”

随后，李卫命手下将田文镜的使者挡于大门之外，并将田文镜送来的东西丢进了猪圈，以示不齿与田文镜结交。

李卫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官员，他最独特的地方，还不在于他的个性和为官之道，而在于他并非科举出身。一个非科举出身的人，能够得到重用，主要是还是取决于雍正皇帝的遴选人才的标准。康熙皇帝晚年选官，最重视官员的操守，才干倒是其次，结果弄得各地官员只顾“清廉”的虚名，以至于“遍地清官”，却不办实事。殊不知，世上清官、贪官本就难以分辨，一味地追求清官，反而弄出很多弊政。

雍正皇帝上台后，常跟李卫说，这清官如同“木偶”，中看不中用，对社稷民生毫无裨益。因此，雍正皇帝用人，首先在才干，至于什么资历或者科举出身之类，倒是其次。恰如李卫的谥号“敏达”一样，既反映了李卫的为官之道，也反映了雍正皇帝的选官标准。正因为如此，李卫才脱颖而出，成为雍正王朝的能臣。

李卫生逢其世，恰逢贵人，真可谓是人生的一大幸运。而在雍正王朝时期，另一位比李卫更有才能的人，却没那么幸运。他的结局，甚至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他就是下面要说到的年羹尧。

一二 年羹尧的官场沉浮

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一定会对年羹尧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曾经屡立战功、威镇西陲，

满朝文武无不服其神勇，同时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遇，可谓春风得意。然而，过了不久，风云骤变，弹劾奏章连篇累牍，各种打击接踵而至，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赐自尽。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落此下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那么，历史上的年大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皇帝要下决心除掉这个自己曾经倚为心腹的宠臣？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生年不详（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

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也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谓是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

人们都知道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羹尧考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绝大多数是由汉人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已经是非同凡响了。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

抚，成为封疆大吏。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三十岁。

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

到四川上任以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康熙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

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

同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下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禩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是雍正皇帝的亲舅舅，在雍正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非同一般。

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

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初，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在这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叛军魂飞胆丧，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土崩瓦解。

罗卜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惶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地方，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尽获其人畜部众。罗卜藏丹津本人因为化装成妇人而得逃脱，投奔策妄阿拉布坦。这次战役历时短短15天（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军纵横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犁庭扫穴，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朝野闻名。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令雍正喜出望外。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雍正晋升年羹尧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个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年羹尧的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

雍正皇帝也对年羹尧宠信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

之隆，也是古来人臣极少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对于政务方面的事情，雍正皇帝常常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在用人和吏治方面，也给了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以及妻子生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年羹尧，其父亲在京的情况。赏赐美食珍宝更是常事。有一次，雍正皇帝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皇帝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待遇堪与唐代的杨贵妃相比。

年羹尧的失宠和被整肃是在雍正二年（1724）十月，这是年羹尧第二次进京觐见，在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均、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实上正是由于雍正帝宠信过度，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群臣的侧目和雍正的警觉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年羹尧。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盖世，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这简直是凌辱皇亲。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接待，但年羹尧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

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这是对雍正皇帝权威的蔑视。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这与康熙初年吴三桂的“西选”似有相似之处。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

被年羹尧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一贯标榜廉政的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而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惩处是有计划，有步骤逐渐进行的。

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觐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做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

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时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一时与年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投错了阵营。这就是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到了雍正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以使其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做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

但是，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夕惕朝乾”误写为“朝惕夕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精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

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皇帝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罪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抚远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雍正皇帝仅仅用了十四个月的时间，就让年羹尧就从权力的巅峰跌入死囚牢中，不仅他本人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许多王公大臣也觉得奇怪：年羹尧的九十二大罪状可谓件件有据可查，难道这是新发现的吗？显然这是秋后算账的结果。那么，他获罪失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送命的症结又在哪里？

雍正公布的这些罪状，任选一条就可以把年羹尧扳倒，何况他有九十二大罪状？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即使这些罪名全部成立，以年羹尧对皇帝的忠诚，特别是他曾立下抚平西北的不世之功，雍正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把他罢黜，更不会下狠心将其处死。因此，年羹尧落到这个下场，完全在于另外的原因。

一是欲擒故纵说。康熙本想立十四子胤禛为帝，四子胤禩伙同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等人，趁康熙临终之时矫诏篡立，年羹尧以手中重兵钳制了胤禛，熟知宫变内幕。因此，雍正刚登帝位，对年羹尧大加恩赏，使其稳定阵脚，继而西北动乱，又需年大将军带兵平叛。待他平定了叛乱，雍正也坐稳了江山，便腾出手来卸磨杀驴，网罗罪名除掉这个重要知情人。

但是，当时胤禛并未受到年羹尧的钳制。因为胤禛继位这一高度机密，隆科多手握京师兵权，康熙驾崩之后连续六天封锁京城九门，消息无法外泄；而雍正继位的时候，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加篡立之事，不可能知晓内情，故欲擒故纵、杀人灭口之说难以成立。

二是情报失灵说。雍正登基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粉碎结党行为，曾派侍卫细心搜访显要大员的情况。据说，雍正的手段非常厉害。但是令雍正感到意外的是，他派去监视年羹尧的特务，竟然给年羹尧牵马，充作下人。雍正感到特别痛心，想不到自己最信任、最重用的人，竟然是最有负于他的人。此说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只能算年羹尧倒台的原因之一。而且较之以上列举的其他罪行，这也不是主要原因。

三是说年羹尧的杀身之祸是因为他有做皇帝的念头，可是观天象说不可，雍正知道了当然不能让他活命。乾隆时期的一名学者在《永宪录》中提道：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黯然久之，夜观天象，慨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四是“兔死狗烹”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

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禛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禛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隆科多和年羹尧，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做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所以，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综观年羹尧的人生经历，尤其雍正对他的恩宠怨恨，真像演戏一般。像他这样大起大落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作为功臣，不管建有多大的功勋，一旦作威作福，恣意妄为，就会晚节不保。如果再遇上猜忌心重，难以容忍的帝王，则必然导致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年羹尧的所作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

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往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年要谋反。年羹尧的败亡，就是在种种复杂矛盾交织下的牺牲

品。

一三 雍正猝死之谜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去世。雍正皇帝死得很突然，不管是皇后、皇子，还是身边的宠臣，都毫无心理准备。

清宫档案中雍正的《起居注》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十八，雍正住在圆明园，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一日，雍正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但仍召见百官。八月二十二日，雍正没有再召见百官，皇子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以防有什么不测。到了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雍正皇帝病情突然加重，宫中传出急诏，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觐见。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雍正皇帝驾崩。

清朝的官方正史的记录很简单，并未言明雍正皇帝到底是患了什么疾病。而且，雍正皇帝的灵柩在清宫停放了19天，然后移到雍和宫永佑殿。雍正的灵柩为何如此匆忙地从皇宫移到寺庙里，难道雍正皇帝的死真有不正常的地方？

因为这些缘故，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随之产生了。

第一种说法，也是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说法——雍正皇帝是被吕四娘砍了头死的。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有的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因为“文字狱”，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吕四娘逃跑，没有被杀掉。后来，吕四娘拜师学艺，学艺有成后，乔装改扮，混入深宫，乘机砍掉了雍正的脑袋。雍正没有头，无法发丧，传说做了一个金头，埋在了泰陵。这个传说很生动，但毕竟只是传说。历史学者认

为，吕留良之案，吕氏一门，男女老幼，全部被监禁，不可能逃逸。就连吕留良父子的坟墓，都严加监视了起来，吕女怎么可能逃脱。因此，吕四娘行刺雍正皇帝一说，纯属子虚乌有，绝不可信。

第二种说法，更为荒诞，说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这些传说表明，雍正生前因治国严厉招致许多人的怨恨。但是民间传说不是历史事实，这些说法并不可信。

第三种说法，说雍正皇帝是死于丹药中毒。雍正皇帝崇尚方术，为求长生，经常服用道士们进献的丹药。史料记载，在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

在朝鲜的史籍中，也有关于雍正皇帝沉迷于方术，以至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动的记载。

从雍正四年（1726）开始，雍正皇帝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

雍正八年（1730）春，雍正生了一场大病。为治病，他命令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术士。这份谕旨没有让负责抄录的大臣代笔，而是皇帝一份份亲自书写，足见他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

很快，四川巡抚宪德写折子说，当地有个人叫龚伦，有长生之术，86岁时还得了个儿子。雍正立即谕令此人进宫，但此时龚伦却死去了。为此，雍正十分惋惜。

浙江总督李卫秘奏说，民间传闻河南道士贾士芳有神仙之称，特推荐此人进京为皇上治病。贾士芳原是北京白云观道士，后来浪迹河南。贾士芳进宫初期，雍正还觉得治疗挺见效，可后来他渐渐发现，贾士芳用按摩、咒语等方术控制了自己的健康。天子岂能容他人摆布，雍正于是下令将贾道士斩首。

雍正虽然杀了贾士芳，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对道士的信任。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从闹病到死去的大约5年时间里，他一直频繁地参加道教活动。此外，他还在主要宫殿安放道神符板，甚至在御花园建了几间房子让道士娄近垣等人居住。雍正在苏州给道士还订做了法衣，一次就是60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雍正当年穿道教服装的画像。所有这些都说明雍正确实信奉道教。

雍正如此尊崇道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治病驱邪”。

清宫《活计档》是专门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里面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最早的记载是在雍正八年（1730），其主要内容是：十一月十七，内务府总管海望和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桑柴750公斤，白炭200公斤。十二月初七，海望、刘胜芳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的铁火盆罩一件，红炉炭100公斤。十二月十五，海望、刘胜芳和四执事侍李进忠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矿银十两、黑炭50公斤、好煤100公斤。十二月二十二，海望和李进忠又一同传令：圆明园秀清村正在炼银，要用白炭500公斤、渣煤500公斤。

档案中提到的秀清村位于圆明园东南角，依山傍水，是一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根据档案记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往秀清村送的木柴、煤炭就有两千多公斤。清代皇家宫苑取暖做饭所用燃料都是定量供应，并有专门账本，从不记入《活记档》。同时，操办这件事情的海望是雍正心腹，刘胜芳则是雍正医疗保健的总管太医院院

使。而档案中的“矿银”“化银”等，是炼丹所用必需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雍正八年末，雍正就在圆明园秀清村开始炼丹了。

专家从《活计档》中发现，从雍正八年到十三年这5年间，雍正先后157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其中光为炼丹用的煤炭就有234吨，此外还有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由此可以想见几年间秀清村炼丹的情景。

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一炉又一炉所谓的金丹大药。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丹药，还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官员。

在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间，雍正曾经两次赏发丹药，对此《活计档》里是这样记录的：

第一次三月二十一，内大臣海望交丹药四匣，按雍正旨意，分别赏给署理大将军查郎阿、副将张广泗、参赞穆登、提督樊廷等四位大臣。

第二次是四月初一，内大臣海望交丹药一盒，按雍正的旨意，用盒装好赏赐给散秩大臣达奈。

这两次赏赐旨意都是从圆明园来的帖子传发，又是内务府总管海望亲手交出。由此可知，这些御赐“丹药”，就是在圆明园的御用炼丹炉里炼制的。

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

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

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

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

随着雍正档案的发掘与研究，雍正服丹致死说法越来越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关注和认同。因为从清宫档案看，雍正确实长期服食丹药。那么，丹药的有毒成分在他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了他的暴亡，这是极有可能的，不少专家都通过著作对此进行了详细地推断。

学者们还普遍注意到，雍正的儿子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露出了许多破绽。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在这种非常时刻乾隆哪至于大发肝火，还专门为两个小小的道士发一道上谕呢？

乾隆在谕旨中还特别强调，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只是作为游戏，并没有吃用丹药。如果真的没有吃丹药又何必辩解呢？

就在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还告诫宫内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雍正刚死，究竟能有什么“闲话”？皇太后为什么听了“心烦”？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就是死于服用有毒的丹药，死于炼丹道士之手。

人们或许会问，雍正既然是因吃丹药丧命，那么炼丹道士是应该杀头的，可是乾隆为什么仅仅把他们赶走就算完了？对此研究者以往大多解释说，乾隆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大丧期间不宜杀人。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唐高宗与乾隆皇帝处理道士的方法十分相似，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吃了古印度国方士的丹药突然死去的，当时朝中大臣们都坚决要求把这个胡人杀掉，但是刚刚登基的唐高宗却担心，大唐天子吃丹药死去，这

不是一件好事，传出去会让天下人笑话，真的杀了那位胡人，肯定会闹得风风雨雨，所以最后还是将那个印度方士赶回去了事。

乾隆“驱逐”炼丹道士与唐高宗的做法竟然如出一辙，难道是一种偶然巧合？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为父皇遮丑这一点上，乾隆与唐高宗使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雍正皇帝在执掌朝政方面，以求真务实治天下，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他的悲剧是不懂生与死的自然规律，迷恋于炼仙丹、吃仙药，一心想长生不老，最后仅以五十八岁享年，就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一四 乾隆的身世与文治武功

乾隆皇帝名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六十年，自称十全武功，十全老人，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细看清代历代皇帝的画像，乾隆的相貌酷似汉人，因而民间一直有传闻说，乾隆是汉人之子。而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则有多种说法，如热河宫女李金桂、内务府包衣女子、傻大姐、“村姑”、海宁陈夫人等。

乾隆的生母到底是谁，这成了一桩历史疑案。皇帝的生母出了疑案，这在清朝十二帝中是仅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据《清代外史》记载，康熙年间，当时的雍亲王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和一位陈姓官员关系特别好。凑巧的是，两家在同年同月同日生小孩，胤禛听后大喜，便命人把陈姓婴儿抱来看看，同喜同贺。

等到陈家人把婴儿接回去的时候，一看傻了眼，这个抱回来的婴儿被掉了包，由男孩变成了女孩。陈家心中愤懑，却又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得罪胤禛。只是自己严守这个秘密，绝不对外声张。

后来，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对陈家也还不错，陈家的几个家人都得到了升迁。到了乾隆朝时候，朝廷对陈家更是优礼有加，这里面的缘故，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陈氏的老家是浙江海宁，乾隆游江南的时候，便住到了陈家，并对陈家的家世非常感兴趣，问得非常详细。临走前，乾隆还指着中门

对陈家人说，今后把这个门封了，除非天子临幸，此门一般不要开。陈家人听后，便将此门封闭了。

关于这件事，有人提出了辩驳。光绪三十二年时，曾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皇室见闻录》，该书的作者叫富察敦崇，生于咸丰五年，曾任东三省道员。他在自己的著作《皇室见闻录·辩诬》里说：“民间所谓雍正正在藩邸时，王妃诞生一女，恐失王眷，适有邻居海宁陈氏恰生一男，命太监取而观之，既送出则易女矣，男即乾隆也。夫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且皇孙诞生，应由本邸差派太监面见内奏事先行口奏，再由宗人府专折奏闻，以备命名，岂能迟至数月数日方始声报耶？其诬可知。”

这段的意思很明确，以雍正皇帝的英明，怎么可能任凭后宫将王妃之女，与邻家陈氏生的男孩调换呢？而且，皇孙诞生了，应该派太监口头奏报，再由宗人府向当时的康熙皇帝上奏折，以准备为皇孙取名，怎么可能延迟了几个月才奏报呢？可见，关于“雍正王妃易子”一事，完全是谣言和诬陷。

但是，也有人认为，“雍正王妃易子”之事，连雍正本人也不知道，其实那是一笔糊涂账。倒是乾隆皇帝自己觉得像汉人，在宫中屡屡试穿汉服，还问身边的亲随：朕像汉人吗？旁边的一个老臣则跪在地上回答：皇上只是像汉人，但对满人来说，就不仅仅是像了。

那么，这个老家在海宁的陈家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海宁在清朝有“陈氏三宰相”——顺治朝大学士陈之遴、康熙朝大学士陈元龙、雍正朝大学士陈世倌，他们都不是靠裙带关系，而是靠自身能力当上大学士的。按照“雍正王妃易子”的说法，乾隆生母是浙江海宁大学士陈世倌的夫人。

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有来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

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当代香港小说家金庸也是浙江海宁人，他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展开的。

金庸在小说中有声有色地写道：陈世倌的小孩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皇四子掉的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

这个故事一出笼，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的传说，便越传越广，越讲越真。实际上，关于“调包”的故事，清朝中期就有传说。先说康熙出自陈家，后来这个传说不攻自破，就又移花接木，安在乾隆皇帝的头上。

其实，乾隆出生时，雍正的长子、次子虽已幼年早死，但第三子已经八岁，另一个妃子又即将临产。且这时雍正才三十四岁，正当壮年，他怎么会在已经有一个八岁儿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用自己的女儿去换陈家的儿子？这从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退一步说，其时雍正并不知道将来能否登上皇位，又怎么会知道陈家儿子是有大福之人呢？

然而，“雍正王妃易子”一事，仅仅是关于乾隆身世的传闻之一。

还有一种传闻，是晚清长沙湘潭的一位著名诗人、学者王闾运提出的。王闾运是曾国藩的幕友，做过大学士肃顺的西席（家庭教师），也是晚清著名的诗人。他在《湘绮楼文集》里提到了乾隆的母亲：“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买浆酒粟面，所至店肆大售，市人敬异焉。十三岁时入京师，值中外姐妹当选入宫。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

后来雍亲王生病，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怀孕生下了乾隆。这一说法富于传奇色彩。清朝的遗老金梁认为，清朝选秀女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从清宫《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可以看到当时清宫的一些有关规定。清宫的门卫制度更是森严，怎么可能让承德地方一个女子混进皇宫并入选秀女呢？所以这种传闻是靠不住的。

而比这个传闻还离谱的，是另一个传闻，说雍正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后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上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

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子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

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在《乾隆出生之谜》文中，台湾小说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书中，都认同这一说法，甚至于提出李氏名叫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而旨令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为钮祜禄氏。尽管乾隆生在草棚的传说流传很广、故事生动、影响也很大，但那毕竟是野史，是靠不住的。

另外，晚清文人天嘏在《清代外史》中，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看自己是否像汉人。乾隆的确在宫中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闻的原因之一。如果仅根据穿的衣服而确定乾隆的出身，其结论肯定是荒唐的。

乾隆即位后，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国家的统一。这也是乾隆一生中重要的实践活动。他先后领导了10次重大军事行动：两

次平定准噶尔之役，两次金川之役，以及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因此，乾隆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他自称为“十全老人”。

准噶尔部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之一。康熙中期以后，该部崛起，先后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和西藏等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康熙、雍正两朝都曾先后对西北用兵。康熙曾三次亲政噶尔丹。噶尔丹被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西北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控制了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地。策妄阿拉布坦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帅准噶尔部。由于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准噶尔部的进犯活动有所收敛。可是，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后，准噶尔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乱。在这种情况下，乾隆趁机攻占了伊犁。噶尔丹策零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先是向清廷投降，后来又反叛。于是，清军第二次出兵，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

在平定了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后，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乾隆又进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宗教首领，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的叛乱。准噶尔布赫维吾尔部叛乱的平定，使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土极大地扩展。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在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乌鲁木齐设都统，统辖塔城的驻军，在南疆喀尔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尔、阿克苏等城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对当地实行军事统治。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自郑氏归降后始归清朝统治。来自于本土的移民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开辟了中央山脉以南的大片土地。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及对清朝直接统治的不满，先住民与清政府逐渐成为对立面。乾隆五十一年（1786），北部的林爽文与南部的庄大田聚众成立秘密反清结社天地会，被强制解散后，林爽文以彰化为根据地，改年号顺天，联合庄大田一起发动叛乱。翌年，清政府派福康安出兵台湾，生擒二

人，镇压了反清势力。

乾隆五十六年（1790）西藏发生内乱，蒙古后裔廓尔喀趁机入侵。清廷派巴忠为指挥官，率军征讨。巴忠为避免交战，力主议和。达赖与廓尔喀达成协议，支付岁币。于是巴忠向乾隆帝报告廓尔喀已降服。

乾隆五十七年（1791）为催迫达赖支付约定的岁币，廓尔喀再度入侵西藏。清廷派四川总督额辉、四川将军成德出兵讨伐，久战无功。复命大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于青海出兵协同助剿。福康安率军一路直下，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境内，直逼廓尔喀都城卡特曼兹。廓军奋力反击，双方数次交锋后达成协议：廓尔喀投降清政府，按时朝贡。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满洲利亚（今中国东北部及黑龙江左岸沿海州一带）、蒙古、青海、西藏和由准部、回部构成的新疆地区，直接划入了清朝政府的统治范围内。朝贡国北起库页岛，朝鲜，东至琉球；南起尼泊尔，西至帕米尔高原；甚至东南亚的缅甸、越南、暹罗、西马来西亚亦都在清朝的势力范围内。

乾隆皇帝有“十全武功”，在文治方面也值得称道。他十分重视文化，在即位之初，便开始组织学者修史，编纂各种书籍。著名的有《国朝宫史》《续三通》、《清三通》《大清统一志》等数十种。到了乾隆中期，乾隆帝决定集中全国的藏书，编辑一部规模空前的丛书，一来可以笼络大批的知识分子；二来可以对民间藏书系统审查一遍。

乾隆意识到，广大臣工和百姓会因为惧怕以文字狱罪而长生畏惧情绪，于是，他亲自反复进行解释，还以皇帝题词，赏赐图书、《总目》留名等手段奖励藏书者献出家藏秘籍。经过努力，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超过万种，大大充实和丰

富了国家藏书。也就是在这一年，乾隆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出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副总裁由六部尚书和侍郎担任。许多知名学者也先后被召入馆内，分别担任纂修、校对、整理等职。大才子纪晓岚是这部书的总编修官。加上总纂、总校等大大小小的官员，共有360人，再加上负责抄写和打杂的，先后共组织3800多人。

一个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内容的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开始了。

《四库全书》的命名与我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有关。中国古代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从古至今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诗经》《论语》《孟子》等；史，主要是指历史书籍，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子，是指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如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是指文学的总集或专集等。

要编修规模如此巨大的丛书，首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乾隆下令，组织学者对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为了达到防火、防潮、防蠹、长期保存图书的目的，四库全书馆开馆不久，乾隆便派人专程赶赴宁波，了解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并依照其样式，在紫禁城、盛京故宫、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等处分别建造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等内廷四阁。

四库全书馆的大小官员、差役不分酷暑寒冬，一方面竭力搜求、挖掘各种书籍；一方面细心抄写、校对。他们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中把零星的材料一段一段地抄出，拼凑起来，恢复了500多部珍贵的文献。

四库全书馆的官员按前例，进行分类整理，花了整整10年的工夫，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才编成了一部浩瀚庞大的《四库全书》，这部丛书共收录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书，共有七万九千卷。

乾隆皇帝不惜工本，编成这样一部大丛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处于阶级和民族的偏见，又借此机会销毁了许多图书。按清廷规定，凡是涉及明末清初历史而又不利于清朝的书籍，都被销毁了。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提倡民族大义的书，也都被烧了个一干二净。被销毁的书中，有些还侥幸保存了一个书目，当时“存目”的书就有六千七百多部，九万三千五百多卷，没有留下书目而被清廷销毁的书，就无法计算了。

编修《四库全书》，使清朝成一代学风，创一代新学派，人才不断涌现。作为这一事业的主要主持人和开创者，乾隆皇帝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但，在支持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因各种罪名被销毁的图书，几乎跟《四库全书》的收书量大致相等，损失是惨重的，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次浩劫。

一五 六下江南那些事

乾隆皇帝终年八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关于他的在位时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官方史籍，还是民间野史，都有许多记载。“六下江南”便是其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在各种史料记载中，对于乾隆皇帝的“六下江南”，有颂扬他修堤筑堰、功泽千秋的，也有说他风流成性、迷恋在江南美景中的，总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事实上，乾隆皇帝最初决定南巡的时候，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清史纪事本末》中记载说，乾隆皇帝听说苏州景色美如天堂，便很想去江南巡游视察一番，于是便派大学士讷亲先去江南查看道路。

可惜的是，乾隆这次派错了人，因为讷亲是反对乾隆皇帝南巡的大臣之一。因此，当讷亲回来后，他在给乾隆回奏中说：“江南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也就是苏州城外的虎丘还算得上是名胜，不过那实际上像一个大坟堆，臣在江南印象最深的是，苏州城里河道狭窄，每到中午，运输粪便的船只就拥挤在一起，臭不可闻，哪里有什么风景！”

乾隆皇帝听了讷亲的这番回奏，只好暂时打消了南巡的念头，等过了一段时间，乾隆才知道自己上了讷亲的当。

实际上，乾隆初年未能南巡，还有另外两个更关键的原因：一是，乾隆皇帝认为，南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典，如果当政初期就到江南游玩，对自己的名声没有好处，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百姓中树立起贤明的形象，再巡幸江南。

二是，当时朝中管事的鄂尔泰、张廷玉等雍正遗诏中指定的辅政大臣，资历都很深，影响也很大，且凡事谨慎，为政清廉。乾隆皇帝如果提出南巡一事，这些辅政大臣肯定会抵制或反对。等到了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去世，又过了四年，张廷玉退休。这样，乾隆南巡基本上就没什么障碍了。

乾隆十四年，南巡时机成熟。乾隆皇帝迫不及待地实施南巡之议，经过两年的准备。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初八，乾隆皇帝开始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次江南之行，去了江苏淮安。

第一次南巡以后，乾隆皇帝还在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又进行了五次南巡。前四次南巡都打着奉太后巡幸的旗号进行的。三十年后，皇太后年纪大了，经受不住千里奔波的辛劳，南巡之事暂时停止。皇太后病逝后，乾隆皇帝又两次南巡，到此，六次南巡才最终结束。

乾隆皇帝的历次南巡，于正月十五前后出发，陆路经直隶、山东到江苏的清口渡黄河，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归时，绕道江宁（南京），祭明太祖陵、检阅部队，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京，到安佑宫行礼，回到圆明园。

在南巡中，确实发生了一些趣事。近代文人孙家振曾撰著了一部名为《退醒庐笔记》的书，这是一部记载清朝以至民国初期文坛掌故、坊间轶闻和社会风习的史料性笔札。这部书中曾记载：乾隆皇帝南巡到镇江，住在金山寺。相传有一日，一位方丈随同乾隆到江边散步，乾隆见江上舟楫来来往往，十分热闹，便戏问方丈：“你可知江上船有几艘？”方丈从容地答道：“两艘而已。”

乾隆笑道：“这江上舟楫来往如织，帆樯林立，怎么可能只有两艘？”

方丈又答道：“我只看见一艘为名，一艘为利，名利之外，并无他舟。”

乾隆听后，连声说好。而后，乾隆又见江边有卖竹篮的，就问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方丈说，这个东西是用来装东西的。乾隆也想学方丈玩禅机，便故意刁难说：“东西可装，南北就不能装吗？”

方丈道：“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木类金类之物，篮中是可以装的。南方丙丁属火，北方壬癸属水，竹篮不能装水火，是以把物件称为东西而非南北。”

乾隆点头称是，长了见识。说话间，走到寺庙外，乾隆一时手痒，爱到处题词的老毛病又犯了，便提出到照壁上给和尚们题一匾额。有大臣随后拟了“江天一览”四个字。乾隆一时眼花没看清楚，误以为是“江天一觉”，随即挥笔立就，群臣见后相顾愕然。这时，方丈出来打圆场，说：“红尘之中人苦于罔觉，果能览此江天，心头一觉，即佛氏所谓‘悟’一之旨也。好匾！好匾！”随后，方丈便让工匠镌刻挂上。据说，此匾至今仍在。

不过，一部叫《蛰存斋笔记》的书里，也记载了一个乾隆下江南时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将“江天一觉”，变成了“江天一监”。其中还多了个对诗的故事。故事还是说乾隆游镇江金山江天寺，乾隆和众臣游到山巅，突然诗兴大发。乾隆先吟首句：“长江好似砚池波。”大臣刘墉续道：“举起焦山当墨磨。”众人正在想第三句，和珅见山的东北角有个危塔孤悬山顶，受此启发，便续道：“宝塔七层堪作笔。”

续到这里，乾隆便指定皇子即后来的嘉庆来完成最后一句，嘉庆一时答不上来，纪晓岚当时正立于嘉庆的旁边，便偷偷告诉嘉庆一句：“青天能写几行多。”这句续得浑然天成，又和前面提到的文房四宝雅合，词意贯穿，信手拈来，如出一手。

乾隆得此佳句，非常开心，便说要在山顶留题。纪晓岚当即请

求，用“江天一览”四个字，不料乾隆一时笔误，写成了“江天一监”。刘墉在一旁看见，便高声说：“览者，看也。”旁边的另一位大臣张王书高声附和道：“正是。”

乾隆当即醒悟，便又在纸上写了个“览”字，而后将“监”字裁下。和尚们便建石亭于山巅，将此御书四字勒石竖于亭内，只可惜，后来太平天国军来的时候，将此石碑毁掉了。

另一本名为《南巡秘记补编》的书，还记录在乾隆下江南时，乾隆皇帝与纪晓岚的一段往事——

《南巡秘记补编》里说，乾隆皇帝对自己的江南巡游颇为自豪。有一次他偶入四库馆，和纪晓岚谈起天子巡狩的事情。纪晓岚是个书呆子，他对乾隆频繁南巡本就颇有微词，于是便乘机把三代之所巡狩的原因，以及必要性给乾隆讲述了一番。紧接着又说秦始皇游幸大可不必，至于后来的隋炀帝屡幸江都，明朝正德皇帝嬉戏南北，都不值得效仿。做皇帝的只有洗濯其心，用贤退不肖，天下自然大治，过多巡幸完全没有必要。

话不投机半句多，乾隆认为纪晓岚是在借古讽今，有意诽谤自己，他越听越火，等纪晓岚话音刚落，乾隆立刻变色，骂道：“你纪晓岚不过是个书生。还敢妄谈国事！朕不过觉得你文学尚优，这才让你领修《四库全书》，实际上不过是把你娼优养着罢了。你跟我谈什么国事？”

这下可好，纪晓岚“娼优大学士”的外号传遍朝野，弄得人人皆知。

纪晓岚深以为耻，心里气不过，便以自己年纪大了为由，请求辞职。乾隆不许，说，修《四库全书》的事情多得很，你怎么可以随便离职？何况你比朕还年轻许多，你还敢在朕面前言老，明明就是欺君。赶紧回去做好你的事情，别自己讨不痛快。

随后，乾隆又说，朕明年还要下江南，而且要把你一起带去，让你也看看民间的盛世气象，长长你的见识，不要老是书生气，发些不着边际的议论。

纪晓岚被这么一吓，只得磕头而退，不敢争辩。

第二年，乾隆又跟纪晓岚说，朕这次南巡，本想带你一起去，但想想修《四库全书》的事情重要，要是你不在的话，恐怕会有所耽搁，这次你还是别去了。况且你现在读书虽然广博，但还没有道融会贯通的地步，过多阅历对你也无帮助，这事不如以后再说吧。你回去好好反省，现在你还需要洗心革面，尚未到粉墨登场之时。

纪晓岚心想，不带我去就算了，还无缘无故地挨了顿骂，从此便绝口不提南巡之事，即使是其他军国大事，也不再多言。可是，不知为何，乾隆临行之前，又把纪晓岚找来，说：这次还是把你带上，上次张廷玉等人阅召各地试卷，朕都不满意。这次把阅卷权授予你，你要好自为之，勿负朕意。

于是，纪晓岚便作为扈从人员参与这次南巡。

一行人到了扬州以后，乾隆整天跑到花街柳巷里风流快活，纪晓岚对同僚们说，这次我一定要皇上进谏，就算是触犯龙威，也不过是九泉之下和龙逢、比干相见，总比终身得一“媚优大学士”的名声要好。

说罢，纪晓岚便鼓起勇气进了乾隆的行宫，告诉太监说，自己有机要事面奏皇上。太监进去禀告后，没过多久就来告诉纪晓岚：皇上让你把试卷搁在某房，你现在可以到平山堂去看戏，不要在这里久混。

纪晓岚说，我这次并非是为了交试卷而来，而是有事要当面奏皇上。太监笑嘻嘻地朝纪晓岚挤眉弄眼，让他别坏了皇上的好事，也不

肯再进去回复。纪晓岚催促太监取禀告，太监说，纪先生你省省吧，还是回去算了。皇上既然不想让先生多说，先生又何必在这里喋喋不休呢？先生既然以作文章为专职，文章以外何必旁及？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去，你若有诗文来，自当为你呈进。

纪晓岚听太监的话里颇有轻侮之意，又羞又恼，愤愤地说，我今天就不回去，一定要等到皇上出来面奏。太监一笑置之，也不管他。当时外面风大水寒，站得时间长了，纪晓岚被冻得手足俱冷，浑身上下直哆嗦，渐渐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另一个和他相熟的太监看见他的窘状，便过来婉言相劝，说皇上今日累了，谁来都不见。纪先生有事要奏，何不写个折子递进去。

纪晓岚没办法，只好向太监要了纸笔，写了个折子，大概意思是：陛下这次南巡，到各地查看民情，关系甚大。民间亲睹皇上威仪，也不是寻常游览可比。但皇上出京至此，贪图淫逸，惟漫游是好，娼优杂进，玩好毕陈，虽然天下太平不妨游玩一二，但宣淫都市恐怕会亵渎圣尊，希望陛下念创业之艰难，守安危之常戒，忧盛危明，以隋炀帝为前车之鉴，不至潜招奇祸。

太监收了纪晓岚的折子，笑道，纪先生不肯听我的话，非要无端挑起皇上之怒，我不过是多白跑一趟而已。你若想博以成名，其实大可不必，皇上有言，说朕观这些酸文人的话，和俳优之口没什么两样，可笑则笑，可斥则斥，也不必加罪。他们说的都是些迂腐故事，实在没有加罪的价值。你看，皇上都这么说了，纪先生何必多费笔墨，还不如多作几篇诗文，反可以博皇上之赏叹。

纪晓岚听出这话纯粹是讥讽，也无可奈何。

上折三天后，乾隆也没有理睬纪晓岚。纪晓岚正百无聊赖间，突然有旨宣召。纪晓岚以为乾隆严惩降至，好在自己有心理准备，便做出一副不怕死的样子，昂首而入。不料进去后，乾隆颇为和颜悦色，

不等纪晓岚开口，乾隆便道，你的诗文之兴大好，所作也不差，朕知道你在旅途中还颇能用功，且无怨悻意，尚不失谨厚书生的本分。但此后要更为勤勉，不要随意做出位之言，以免自取其咎。

纪晓岚正要说话，臣尚有奏。乾隆已令太监捧出试卷，命令道，这些试卷都归你评阅，赶紧拿回去，评好后明日交卷。

这之后，纪晓岚虽常入见，但无非是些科考阅卷之事，乾隆从不和他谈及其他。一日，乾隆游杭州西湖，让纪晓岚跟随左右。纪晓岚以为进谏的机会到了，不料刚一见面，乾隆便问《四库全书》中有某某书吗？连问了数十种，纪晓岚都一一作答。乾隆说，现有献书若干册，其中已收入者颇多，你看是兼收好呢，还是不收呢？纪晓岚说，最好是兼收，可备参校，接着又说，皇上嘉惠艺林，不如各缮数份，分别贮藏在东南各名胜处，以作为南巡的纪念。

乾隆笑道，你这句话，可谓是恰合职份，数年来也就这句可取。朕早有此意，即日就让东南大吏去挑选风景好一点的地方，为藏书之所，你回去好好想想个实行办法报上来。

纪晓岚领谕而退。乾隆目送纪晓岚走掉后，笑道，给你件事做，让你好好忙上一番，免得总在我面前聒噪。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南巡是有很多愉快经历的。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期间也曾六次南巡江浙，对此乾隆羡慕不已。

然而，康熙皇帝下江南，不讲排场，每次“扈从者仅三百余人”。一路不设行宫，一切供应均由中央直接开支，严禁地方官借此扰民。他第一次南巡的时候，途中经过丹阳、常州、无锡、昼夜行船三百六十余里，一路上没有停留，也就没给地方上带来负担。而乾隆皇帝下江南，每次要提前一年开始准备，指定一名亲王担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路线，修桥补路，修葺名胜古迹，修建行宫等。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总共建造了三十余处行宫。除了带上皇太后、皇后、妃嫔外，还有大批的王公大臣、侍卫，每次都有两千多人。陆路上走，要用五六千匹马，水路上走要用一千多只船。六下江南，共花费了白银两千多万两。两淮盐商在乾隆南巡时都捐出巨款，他不但不拒绝，还是称赞他们，并加恩赏赐。各地官吏于是纷纷效仿，老百姓则叫苦连天。

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回来后，曾写下这样两句诗：“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足见他对江南的无限眷恋。但乾隆皇帝不知道的是，他的六下艰难，既靡费了巨量的金钱，又给当地的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一六 文人宰相纪晓岚

众所周知，乾隆朝有三大名臣——刘墉、纪晓岚、和珅。三人之中，堪称顶级文臣的，非纪晓岚莫属。而历史上的纪晓岚，远远没有电视机上演的那般洒脱自如。

纪晓岚，雍正二年（1724）六月十五日出生于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庄。直隶，其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河间府，相当于保定地区。

纪晓岚的祖父纪润生在清朝是个小官，官至刑部江苏司郎中。纪晓岚的父亲纪昀是康熙二十五年（1713）的举人，官也没做大，曾担任云南姚安知府。由此可见，纪晓岚的家庭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在于他同殿称臣的官员中，算得上是出身卑微了。在家庭背景方面，他不能与刘墉相比。不过，纪晓岚在自己的家庭里，受到了一些文学上的熏陶。因为他的父亲纪昀曾经还是一个文学名士。

雍正十二年（1734），纪晓岚的父亲卸去了姚安知府一职，到北京户部任职。纪晓岚跟随父亲入京，在天子脚下过生活。乾隆五年（1740年），十六岁的纪晓岚又从京城回到家乡准备考科举。

清朝的科举考试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选官取士，由于疆域辽阔，需要大批官僚来官僚政事，帮助维持统治。从科举考生中选拔官员，有助于克服长官意志，扩大选官基础；第二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这个目的在清朝初期尤为明显；第三是有助于加强思想统治，通过考“四书”“五经”，默写《圣谕广训》，可以有效地统一全国人民思想。

清朝的科举的制度仿照明朝的制度，分童子试和正式考试。童子试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通过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才能参加正式考试。正式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会试实行回避制度，试官子弟、亲戚不能参加当次的考试。

纪晓岚参加科举考试是踌躇满志，却并不顺利，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纪晓岚才考中进士，在会试中，列第二十二名，殿试名列二甲第四名。此时的纪晓岚已经三十岁了，就在这一年，纪晓岚进入了翰林院，开始了宦宦生涯。

很快，纪晓岚就展示出他出众的才华。在朝中逐渐有了些名气，上至乾隆皇帝，下至百官都知道纪晓岚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子。

然后赏识纪晓岚的人虽然占多数，但是也有不少嫉贤妒能者。有一次，一个知府进京述职，这位知府是想一鸣惊人，于是刚到京城，就在饮宴应酬中对纪晓岚的文才大加指斥。这件事很快在京城传开，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纪晓岚得知，感到很诧异，官僚之间彼此相轻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一个小小知府，竟敢对名噪京城的才子大加指斥，这实在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于是，纪晓岚就登门拜访这位知府。知府来者不拒，老调重弹，三言五语后纪晓岚就识破其浅陋，内心虽然窃笑，但表面还保持着一脸正气。如何让这个狂妄的知府明白自己的浅薄呢？

此时，纪晓岚发现知府左额上长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黑痣，心中有主意。他假装很关心的样子，问知府为何不将此痣割去，将来如官居封疆大吏，露着这样一颗黑痣恐怕不雅。

知府答称遍访名医，皆以痣大根深，恐伤及经络血脉，故不敢妄动。纪晓岚告诉他，有个刑部司官专除黑痣，此人精通蒙医，有家传秘术，必可手到病除。但此人不肯轻易为人治病，必须重金相赠方肯出面。

知府听后大喜，第二天，他带着精心置备的礼物，来到纪晓岚所说的烂面胡同拜访这位刑部司官。刑部司官听家人禀告有知府来访，惊诧之余忙出门迎接。知府一见司官的面，就知道自己被纪晓岚捉弄，原来这位司官的右额上也长了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自己的痣尚且不能除，何谈给别人除痣，但是礼品已经奉上，就只好再索还了，知府只好草草应付几句后悻悻告退。

知府领教了纪晓岚戏弄人的花招后，再也不敢说三道四哗众取宠了。对纪晓岚来说，这些庸俗的官僚并不难对付，但也有让他大伤脑筋的硬骨头，这就是当朝权相和珅。

论才学和珅远逊于纪晓岚，但是在揣摩和迎合皇帝的心意上，和珅则比纪晓岚内行多了。和珅虽贪得无厌，聚敛千万，却不忘附庸风雅。既然大家都说纪晓岚是当朝才子，和珅也想请他给自己家门题字，这样在外人面前显得风光一些。

纪晓岚虽然明知和珅为人，但当面拒绝显然有失礼节，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挥笔写下了“竹苞”两字赠与和珅。和珅喜不自胜，觉得这两个字用在府中园亭的匾额上最合适不过，于是花重金请人装裱摹拓，高悬府中。后来乾隆帝来和珅府中做客，见到这块匾额之后，问和珅，这样过分的自谦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和珅被乾隆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实禀报其乃纪晓岚所题，寓意于园中清闲淡薄的意境。乾隆听后感到更好笑，告诉和珅这哪里是什么清新意境，而是暗骂他们全家“个个草包”。和珅这才意识到被纪晓岚愚弄了，而且还在皇帝面前暴露出自己无知的丑态，羞愤交加，发誓要报复纪晓岚。

和珅虽然没有多少才学，但他把官场的人际关系网梳理得异常严密，门生故吏师友姻亲遍设，全国各地都有他的耳目。从这方面讲，才华横溢的纪晓岚只能甘拜下风。

事情还要从纪晓岚嫁女说起。以纪晓岚在朝中的名望，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但才子毕竟只是才子，在判断人品的能力方面比那些职业官僚要弱很多。他把女儿许配给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卢见曾的确有些才学，也注意礼贤下士，在士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也是纪晓岚愿与他结为儿女亲家的原因。但卢见曾却不像纪晓岚那样两袖清风，他利用盐运使的肥缺大肆聚敛钱财，最终被和珅的耳目抓住把柄。

和珅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狠狠整治一下纪晓岚，于是请命查办此案。纪晓岚先期获知此事，不愿看到亲家就此锒铛入狱，但干涉公务又是欺君之罪，只能暗中帮忙。为防走漏风声，他不敢把对策写在纸上，只是把一些盐和茶叶装在信封里，暗含“查盐”之意，派人连夜送往卢见曾处。卢见曾收信后悟出其中含义，迅速把赃款转移别处。和珅来查时，卢的财产已所剩无几。但这种伎俩岂能瞒过老奸巨猾的和珅，结果不但转移钱财被追缴回来，而且连纪晓岚送给他的密信也被查获。

回朝之后，和珅最急于向乾隆帝奏报的不是查办卢见曾一案，而是纪晓岚泄露机密的罪状。乾隆帝大怒，立即如召纪晓岚讯问。纪晓岚早有准备，辩称自己未涉此事，且反问乾隆帝有何证据。

这次他低估了被自己愚弄的和珅实际理事方面的才干，在卢见曾的供词面前，纪晓岚认识到如果继续抵赖只会罪加一等，只能磕头认罪。清代对泄密行为的处置历来严厉，更何况纪晓岚外泄的是乾隆帝的旨意，自然应从重处罚。

纪晓岚急中生智，在大祸临头之际，竭尽平生所学编出一篇对仗工整的骈体文辞，盛赞乾隆帝明察秋毫，大公无私，自己在旷世贤君面前翻船，心服口服。这一番马屁拍得很好，让乾隆皇帝实在不忍心杀了这个才子，正要赦免纪晓岚的罪行，在场的和珅却一再强调皇上应秉公处理，最终纪晓岚死罪免除，从轻发往乌鲁木齐充军。纪晓

岚走进了一生当中最为低沉的岁月。

被发配新疆的经历，给了纪晓岚一个行万里路的机会。沿途所见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他第一次走进西北边民粗犷的游牧生活，目睹了黄河上游的奇特伏流、沙漠地区的漏沙田等人间奇迹，后来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很多奇思异想就是在苦寒寂寞的边疆之地萌发的。

两年后，乾隆皇帝决心要在文治方面超越历朝历代的成就，产生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庞大计划。但是朝中大臣谁堪当此重任呢？和珅和刘墉不适合纂此盛典，此时，乾隆帝想到了远在新疆冰天雪地的纪晓岚。这时已在新疆度过两年艰苦岁月的纪晓岚，终于看到重回京师的希望。后来他曾给自己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前一句是对自己前期为宦经历的总结；后一句则概括他后半生为国家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那就是负责编纂《四库全书》。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正式设立四库全书馆，纪晓岚受命担任总纂。

随着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纪晓岚的官越做越大，升任协办大学士，后赏加太子太保，成为乾隆帝推行文治政策最为倚重的大臣。然而，编纂工作是个大工程，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如已成书的版本存在字迹讹误、违禁内容及缺漏等。

乾隆皇帝对质量的要求极严，一旦发现不足之处就会大动肝火，纪晓岚作为替罪羊首当其冲，先后十几次因工作失误遭到降职、罚俸等处分。他曾被遣戍避暑山庄更正收藏在文津阁内全套《四库全书》内的讹误之处，也曾南下江浙寻访原书真迹，顶着编纂失职的罪名东奔西跑。

由于编纂工作过于劳累，纪晓岚慢慢染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首当其冲的就是吸烟。这与他彻夜翻书有很大关系，越到后来，烟瘾越大，劳碌之际一刻都不能离开烟锅。为了省去反复填装烟叶的麻烦，他特意给自己定做了一个特大号烟锅，一次就能装三四两烟叶，这样他从家乘轿到圆明园谒见乾隆皇帝，中途就用不着反复填装烟叶了。

时间久了，同僚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纪大锅”。一天，纪晓岚到琉璃厂一带闲逛，别在腰里的大烟锅竟然丢了，家仆遍地寻找也不见踪迹。纪晓岚却似乎心有成算一般，显得不那么紧张。他告诉仆人，第二天一早去东便门外的小市场上一定能找到。家仆第二天果然以很低的价钱从小市场买回了丢失的烟锅。纪晓岚告诉大家，这样大号的烟锅别人都不爱用，拾获者也没必要把这样一个无用之物留在家里，肯定会低价出售谋取微利。

可是没过几天，这失而复得的烟锅又让纪晓岚吃了苦头。当时，他在午门外的朝房一边批阅文书，一边大过烟瘾。乾隆皇帝一般不会突击视察，但恰恰这天他来了。等纪晓岚看到乾隆帝从门外走来时再隐藏烟锅已来不及，顺手将燃着的烟锅塞在靴筒中。乾隆进门后谈锋甚健，并没有坐坐就走的意思。这下可苦了纪晓岚，不一会儿，烟锅把纪晓岚的袜子点着了，烫得他咬牙切齿，最初的笑脸很快变成一个大苦瓜。乾隆皇帝莫名其妙，惊奇地询问他何以敢在皇帝面前作怪脸。纪晓岚只得以实相告才得跳到门外脱靴灭火，但还是把小腿的皮肤灼伤一大片，狼狈至极。

乾隆皇帝追出一看，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忙传御医敷药调治。腿虽被灼伤，纪晓岚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机会当面赞扬乾隆帝的仁爱之心。乾隆帝本来就喜欢被人吹捧，何况这一次也确实对纪晓岚体恤有加，一时兴起，当场授予纪晓岚“钦赐翰林院吸烟”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独特称谓。

后来，纪晓岚奏折末了署名处除了写大学士、尚书这些正式头衔

外，还专门加上“钦赐翰林院吸烟”的封号。尽管这次事故有些因祸得福的味道，但传到同僚们耳朵里还是引发了一片嘲笑之声。他的好友彭元瑞原先看他走路速度很快，曾以《水浒传》中人物为底给他取了“神行太保”的绰号，见他遭受此劫之后走路变得一瘸一拐，便以《八仙过海》中的人物“铁拐李”来做临时昵称，弄得素以伶牙俐齿驰名的纪晓岚也不得不低头认命。

纪晓岚还有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对女色过分贪恋。据说有段时间编纂任务紧迫，他连续好几天未能回家，在内廷值班住宿，后来竟变得两眼通红，语无伦次。乾隆帝看到他这副模样惊讶异常，问清缘由后不禁心中窃笑，随即派来两名宫女伴宿。

这两个从皇宫娶进门的宫女颇为聪明，纪晓岚教其吟诵唐诗宋词，后来她们连带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流行小说都通读了，时间久了又能即景赋诗。

既然连皇帝的侍女都据为己有，纪晓岚渐渐感觉有些飘飘然，殊不知差点儿惹出更大的乱子。此事发生在三伏天。纪晓岚在翰林院与各位编修谈论编纂体例和取舍规则，由于天气炎热，纪晓岚就把上衣脱了，袒胸露臂地侃侃而谈。

此时，乾隆皇帝又不打招呼来到现场，纪晓岚来不及穿衣，赤裸上身自然有辱圣上，情急之下钻到了一个柜子里。乾隆看见了他钻入柜中，就想故意戏弄他一次。乾隆帝端坐桌前一言不发，其他人也都跪在地上，不敢说话。过了好久，藏在柜中的纪晓岚闷热异常，又听不见柜子外面有什么声响，以为乾隆帝和其他人都已离开，于是推开柜门，伸出头问道：“老头子走了吗？”

乾隆听得真真切切，纪晓岚竟敢私下里称他“老头子”。依大清法律，目无天子乃十恶不赦之罪，纪晓岚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他连忙从柜子里爬出，一边假装四处找衣服，同时琢磨该如何应付局面。他眉

头一皱，计上心来，竭尽附会地说道：圣上万寿无疆，岂能不老；国君是一国之首，也就是头；同时又贵为天子，集萃三个尊位于一身，就是“老头子”。乾隆帝明知他在狡辩，但听他如此解释，也没有过多计较。纪晓岚侥幸又逃脱一劫。

纪晓岚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居功至伟，而他还给后人留下另一部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风格截然不同的传奇故事集，那就是《阅微草堂笔记》。这部故事集假借神仙志怪，将现实生活中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群众的风貌刻画得栩栩如生。稗官野史、神仙志怪、鬼狐妖魔等离奇故事都被纪晓岚的生花妙笔有机糅合，故事内容皆为子虚乌有之事，但人人读过后仿佛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书中有鬼怪戏弄纵意高谈的狂生、花神舍命救穷乞丐等内容，或嘲弄无知鄙俗者狂妄自大，或赞美普通群众的淳朴善良，大都蕴含着劝诫世人之意。此书文笔平易，人人读后皆爱不释手，成为和《聊斋志异》一样的笔记小说名著。

一七 叫魂奇案：盛世下的阴影

乾隆皇帝在位60年，做的事情太多，所做出的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件事。

第一件是编修文化典籍，如上文所提到的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另外乾隆皇帝还主持编修了《满文大藏经》；第二件是维护、兴建皇家园林；第三件是贡献诗文才华。第四件是蠲免天下钱粮。乾隆皇帝蠲免全国钱粮，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在封建王朝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五件是统一整个新疆；第六件是完善治理西藏；第七件是修砌浙江南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皇帝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共修建石砌海塘4000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抗御海潮侵袭的能力；第八件是中华各民族一统。清朝已经历“三祖三宗”，乾隆则是集大成者，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乾隆时期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极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

因此，乾隆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盛世”，然而就在盛世年间，却发生了一件“叫魂案”，这个案件的发生，暴露了当时清王朝的种种弊端，甚至被后人称为“妖术大恐慌”。

这件事要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一月说起。当时，浙江德清县的石匠吴东明、郭廷秀承揽建造城桥工程，开头一切均很顺利。时至三月，工程进入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工作。就在打桩工作刚开始不久，有一个名叫沈世良的当地农民，找到了吴东明，希望吴东明帮自己一个忙——沈世良交给吴东明一张纸，请吴东明能将这张纸贴在木

桩尖上打下去。

吴东明心里一惊，他知道，这是诅咒人早死的一种方式。他打开那张纸一看，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吴东明就问沈世良，这两个人是谁，你为何要诅咒他们？沈世良解释说，这两个是自己的侄子，但总是欺负自己，所以要诅咒他们早点死。

吴东明听后，非但没帮沈世良的忙，还把沈世良告到了县衙。知县见沈世良已经很老了，就没判其是故意杀人罪，只是打了沈世良一顿板子，而后就放了。

可吴东明以为自己立了大功，他认为自己救了两条人命，是仁义之举，所以到处宣扬。这事传到德清县慧相寺的和尚耳朵里，这些和尚经常吃不饱饭。但是，附近一座观音殿的和尚们却都吃得很饱。慧相寺的和尚心理严重失衡了，他们开始散步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石匠吴东明和他手下的工人们就被推了出来。

谣言从德清县传向四面八方，石匠们都被当作“叫魂犯”，被官府抓了起来。

当地百姓认为，只要和气待人，不树敌，别人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交给石匠诅咒。所以，一开始对这件事也没有太在意。但就在此时，一个谣言开始广为流播：城桥下桩用人的头发缠桩即可打下，若用女人头发，便害女人脱发，若用黄豆数把缠紧头发，可致小儿痘伤。

与此同时，浙江省萧山县传来一条消息：说四名和尚被控剪人发辫，并在其中一人的行李中，发现了一缕头发，四人已被收押。接着就是江苏省胥口镇，人们捉到了一个来自湖州府法云庵的几个和尚，他们被人们打成重伤，又被送到了官府。人们打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是和尚，因为是和尚，所以想剪别人的辫子。

接下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所谓剪辫子的叫魂事件，范围包括浙江、山东、直隶、湖北等七省。人们纷纷传说有人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黏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在经济匮乏时代，广大下层民众自然对这种与巫术有关的谣言深信不疑。

在山东省邹县，一个叫蔡廷章的乞丐供称与和尚通元等人同行，并于途中剪人发辫。当然，蔡廷章不是主动去衙门招供的，而是被人用木棒打去的。接着就是章丘县，也是一个乞丐，遇到一个叫张四儒的算命先生，张四儒怂恿他说，要饭没前途，我们还是跟着和尚学割人发辫之术吧，到时候钱大把大把地来。这个乞丐很有上进心，哪知道第一次施法时，就被人当场捉住。

这一事件终于闹大了，山东巡抚富尼汉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勒令各省查处。

至此，关于叫魂的谣言蔓延到了京畿。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并非是山东巡抚富尼汉惹出来的，在富尼汉看来，这样的案件不断发生，并且自己所在的山东还并非是传播源，如果再闹下去，整个大清朝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真正让这个事情闹成惊动皇帝的大事，是民间对“叫魂事件”的态度。当时的人们通常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当一个人的魂与魄分离之时，人会昏迷、生病，更严重的会导致死亡。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恐惧感便油然而生了。

于是，这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迷信的一件事，震动了朝廷，自然也就震动了九五至尊的乾隆皇帝。他和百姓一样惊恐和愤怒，但原因却不一样。

回顾历史，经过康熙和雍正的精心治理，清朝的统治已经趋于稳固。表面上，“剃发留辫”的国家制度已被汉民所接受。但事实却是，

许多汉人的造反，都或多或少与“剃发留辫”有关。而山东巡抚富尼汉报上来的案子正触动了乾隆皇帝的神经。乾隆皇帝认为，这其实是在间接动摇清朝统治的名分。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坚决查处与“叫魂案”有关的人，并且要严处。

很快，从朝廷到省到府到县都开始清查“叫魂犯”。一开始，许多官员对乾隆皇帝大怒的原因还不是明白，但大小官僚都知道要忠诚。所以，清查“叫魂犯”并不是保一方平安的小事，而是对皇帝忠诚与否的大事。

事实上，从乾隆皇帝下令全国清查“叫魂犯”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许多底层的小人物要因此而死掉。因为在地方上所谓的“叫魂案”都是子虚乌有的事，但皇上已经下令清查，有与没有就已经不是一般官员该思考的问题了，他们只能奉命执行，只能思考，“叫魂犯”到底该抓多少才算合适？

这些官员先将乞丐当作“叫魂犯”抓了起来，然后是和尚。乞丐身无一物，四处漂泊，肯定就是“叫魂犯”。

至于和尚嘛，乾隆皇帝的盛世，其实并没有给和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还是需要自己动手从寺庙里走出来，去外面寻找食物。他们和乞丐差不多，而且，他们天天念经，谁知道念的是什么东西呢？按照这种思路，他们被送进了衙门。

抓的乞丐与和尚太多，官员和衙门应接不暇，当官员们认为，抓获的“叫魂犯”已经足够向乾隆皇帝表示忠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叫魂犯”从乞丐、和尚这类高危人群开始向大众群体过渡了。许多人因为与他人结怨，一赌气就肯定对方也是“叫魂犯”，即使不是“叫魂犯”，也是预备分子。大家开始了告密，许多人刚把别人送进监狱，自己也很快跟着进去了。

全国一片恐慌，官员越是卖力地捉拿“叫魂犯”，“叫魂犯”就越

多。乾隆皇帝在遥远的京城，自然不知道“叫魂犯”为什么会这么多，认为是因为官员办案不利。但他不想告诉这些官员，“叫魂犯”的罪过到底有多大，他们在反朝廷，反对满人的江山。

乾隆皇帝很清楚，他一旦这样讲了，就证明了身为满人的自己还停留在自卑的层面上。大清朝已经走过了一百余年，乾隆皇帝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还是那么自卑。所以，面对越来越多，抓也抓不完的“叫魂犯”，乾隆皇帝再一次大发雷霆，要求官员们将“叫魂犯”进行彻底地清剿。

这样一来，“叫魂案”的范围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受尽冤屈折磨，最后死亡。

同年十月，刘墉劝说乾隆皇帝，希望能停住对“叫魂案”的查办。乾隆皇帝似乎良心发现了，或者说，他发现了那些“叫魂犯”根本就没有自己所认为的企图。于是，接受了刘墉的建议。然而，接受归接受，却没有直接放弃对“叫魂案”的清查。乾隆皇帝仍然让负责此案的官员认真查办，但同时，他又质疑案犯供词的可信度。于是，乾隆要求各地官员，在不用刑的情况下认真办案。另外，在军机大臣审理完疑犯后，由大学士傅恒负责审理并处刑。结果，除了病死或其他原因死去的疑犯外，其余疑犯全部获得免罪。

说起来，这所谓的“叫魂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中国谣言和中国宗教的一种结合形式。但这样简单的案子，却造成了全国性的恐慌。很大的原因在乾隆皇帝身上。在他看来，在全国性的“妖术大恐慌”中，妖术之一就是剪辫子。辫子对于大清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这次妖术恐慌又来源于江南。江南是汉民族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当初反清最激烈的地方，这就使得乾隆皇帝不得不格外小心。因为他的格外小心，此让这场大恐慌持续了一年时间。

当时，在谣言面前，大清朝缺乏相关科学知识和舆论控制技

巧，因此也让“叫魂”这个幽灵在中华大地游荡了许久，直到1768年冬才消失。

一八 天下第一贪

如果说，“叫魂案”是大清盛世下的一道阴影，那么在乾隆王朝最鼎盛的时期，还有另一道阴影，那便是贪污腐败。而提到乾隆朝的贪污腐败，人们都会想到一个人——和珅。

和珅出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比乾隆皇帝小三十五岁，满洲正红旗人。十九岁的时候，和珅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名落孙山。这里有一个疑问，历史上的和珅是个有学问、能力非凡的人才，为何连举人都考不中呢？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科举，考的无非是“四书”“五经”。像和珅这样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在这种考试制度下，是无从发挥的。

清朝时期，满洲人和汉人不一样，满洲人有两种当官的渠道：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二是依靠祖上的功绩。也就是说，满洲人可以凭借祖上给自己创下来的基业，而直接当官。

和珅的祖先因为跟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断打仗，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和珅家被授予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爵位。“轻车都尉”是清朝为了酬劳功臣、奖励阵亡官兵、推恩外戚，以及嘉奖其他有特殊意义的人员，而规定可以世代承袭的爵位。

和珅在他十九岁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因此，尽管他名落孙山，但在三年后，他进了皇宫，当了一名三等侍卫，成为皇家仪仗队的成员。这个官职虽然小，但是可以接近皇帝。

《郎潜纪闻初笔》里说，和珅最开始做宫中仪仗队校尉的时候，有一次出宫，乾隆皇帝在轿子中读各地的奏报，其中有一个报告说要犯逃脱，乾隆微怒，随后说出一句“虎兕出于柙”。这句话出自《论语》，意思是典守者要对此负责。可当时扈从的众校尉，都不解其意。只有和珅站出来说，皇上的意思是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乾隆皇帝听后，看了看和珅，问，你也读《论语》吗？

和珅说，是。乾隆皇帝没想到校尉里还有人读《论语》，很是感兴趣，于是又问了和珅的家世、年岁。和珅一一作答。

由此，和珅开始被乾隆皇帝注意，加上近水楼台先得月，乾隆也有意对和珅加以提拔。和珅本来就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宝贵的机会，是以恩礼日隆，飞黄腾达。

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天资聪明、思路敏捷、多才多艺、勤奋好学，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他不是不学无术之徒，而是既有学问又懂权术的人。

乾隆皇帝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曾对和珅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和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乾隆曾说，用兵西藏和廓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兼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喇嘛和廓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藏文、蒙古文、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都办理得很好。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三十五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这次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子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所以和珅在回京途中，就被提升

为户部尚书。

和珅依靠乾隆掌握着朝中的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的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他本人没有什么本事，但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手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吹嘘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

大权在握的和珅，开始疯狂敛财。他敛财的手段之一，是发“人情财”。一般来说，在朝为官，重要的是消息灵通。尤其是职位较低，无法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他们的前途和命运，都决定于能否从大官口中得到朝廷内部的信息。因此，为了得到这些信息，一些官员就会花费巨额资金去打通关节。作为乾隆皇帝第一宠臣的和珅，凭借向外传递朝廷的“内部消息”，大发“人情财”。

1780年，乾隆皇帝准备第五次南巡，对和珅说，应该去祭孔庙。这个消息对不熟悉路线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可和珅仔细看了一下地图，立刻就发信给他的亲信——泗阳县令国泰。国泰接到了和珅的密信，拆开一看，非常兴奋。因为按照和珅的推测，乾隆皇帝在祭祀孔庙之后，必定会经过泗阳县。于是，国泰在距离县城五十里的地方，为乾隆皇帝精心筹建了一处行宫，想以此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

国泰调集了全县的能工巧匠，不分昼夜地修建行宫。当乾隆皇帝祭祀过孔庙向南进发，路经泗阳县境的时候，果然发现了这座优雅奢侈的行宫。进入行宫后，乾隆皇帝非常陶醉，就问谁这么有心在此为朕献上这么好的东西？

和珅立即令国泰前来。国泰见到乾隆皇帝后，大表忠心，和珅也在一旁对国泰赞不绝口。乾隆皇帝心花怒放，马上下旨擢升国泰为道台。

就这样，国泰从一个小小的县令转眼间变成了道台。国泰自然很感激和珅，还没上任，他就给和珅送去了一大笔银子。

这事过去后，许多与和珅有关系官员，都纷纷给和珅送上了“人情财”。这种“人情财”可以说是当时官场流行的一种潜规则。而这种财来的不算直接，更直接的，便是和珅敛财的手段之二——依靠职权进行贪污。

从二十八岁起，和珅开始担任户部尚书。作为管理天下钱粮的户部，每天都有大量的银子进出。而作为管理者和领导人，如果没有很强的定力，根本无法把持住。而和珅似乎一开始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定力，他在户部到底贪污了多少钱，历史没有确切的记载。

四年后，和珅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是管理百官的，和珅便利用职务之便，勒索百官。百官似乎也习惯了他的勒索，但也有官员不买他的账。

按照大清朝廷的惯例，每隔几年就会命各地的大臣回京述职，以检查全国各地的治理情况。各地官员们回京，不仅要带上政绩，还要备好礼物。一般情况下，地方上的大臣进京时都会携带一些珍稀之物，作为贡品进献给皇上。

有一年，安南总督孙士毅从安南前线回京述职。孙士毅不仅武功高强，脾气也很倔。他认为自己是封疆大吏，几个省的行政和军事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他眼里，整个大清王朝也只有皇帝一个人。

这样的人在大清官场显然是个异类。当孙士毅昂首阔步前往金銮殿面见乾隆的时候，在宫门外遇到了和珅。和珅一眼看见了孙士毅手里的东西，急忙要过来看，原来是一颗明珠做成的鼻烟壶，大如雀卵，雕刻精巧，晶莹剔透。出于惯性，和珅煞是喜爱，就向孙士毅索要，说孙大人如果不嫌弃在下的话，能否把这个玩意儿送给在下啊？

哪知道孙士毅一点不给和珅面子，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我要献给皇上的东西，和大人喜爱，本当赠给大人，可我如何向皇上交代呢？因为事先我已经跟皇上说了。”

和珅很无趣地干笑了两声，说，我开个玩笑，你何必当真。

几天后，孙士毅要返回边境，去军机处辞行，在军机处，他再次见到了和珅。和珅手里拿着那个鼻烟壶，得意洋洋地对孙士毅说：“孙大人，你献给皇上的这个鼻烟壶，皇上把它赐给我了。”

孙士毅非常震惊。他震惊的不是皇上把鼻烟壶赐给了和珅，而是和珅居然在这样一个小事上，会跟一个封疆大吏斗气。这件事让孙士毅明白了和珅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势。从此以后，孙士毅对和珅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其实，和珅索贿已经是官场皆知的事情了。相比孙士毅而言，有些官员就知趣多了。如闽浙总督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云南总督李侍尧，吏部郎中和精额、浙江巡抚伊龄阿等，都主动向和珅行贿。

除了贪污受贿外，和珅的手段之三，便是利用贪污受贿来的钱财进行投资经营。在商业活动中，和珅获得了更大数量的钱财，同时还兼并土地。

官方史料记载，和珅能够收取地租的土地，有一千二百六十六顷。他的土地大都分布在北京南部、以保定为中心的地区，另外在东北的锦州地区，也有他的土地。

那么，这些土地是如何得来的呢？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乾隆皇帝的赏赐，另外的绝大部分土地是和珅自己花钱购买的。在清朝，买土地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地主都不会轻易出让土地。可白莲教的出现，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一系列不安定的事件发生了以后，很多地主不

愿意再保有土地，纷纷把土地换成更为保险、安全，便于携带的金银，地价随之下跌。

天生就有商业头脑的和珅看准这个时机，用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土地，并安排自己的亲信管理，将土地租赁出去，收取极高的地租。

在买卖过程中，和珅只认钱不认人，不管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他都毫不留情地把价钱压到最低，最大限度地购进。而且，和珅买土地，并不采用普通的买卖方式，而是用所谓典卖的方式。也就是说，土地主像去典当行当东西一样，将土地典当出来，而不是和珅一次性购得。典当的价格当然远远低于市价，原来的土地主可以再筹足银两支付高额利息后，再将土地赎回。

在这期间，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就归和珅所有。原来的土地主，根本没有能力赎回，或者不想赎回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和珅的永久财产。

除了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外，和珅还经营了几十家店铺，如粮店、酒店、古玩店、瓷器店、灰瓦店、柜箱铺、弓箭铺、杠房、鞍毡铺、小煤窑等等。此外，和珅还购置了八十辆大马车，做长途贩运。

按照大清的法律规定，在旗的满洲人是不允许涉及各种商业活动的，也就是说，尽管和珅的各种商业活动都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但从法理上讲，这些活动还是非法的活动，这些商议活动虽然不能叫作贪污受贿，但最起码也是以权谋私。

总归来说，和珅聚敛钱财的手段多种多样：侵吞、贿赂、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

因为和珅的非法敛财、贪污受贿，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督抚在利益的驱使下，为行贿和珅，投其所好，而以上索下，或坚守

自盗，亏空国库；二是，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恃无恐。乾隆王朝后期发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无不与和珅有关。

而在惩治贪污的问题上，乾隆皇帝极为宽大。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以来，政崇宽大。”特别是乾隆皇帝的统治后期，他的宽大几乎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如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2万余两银子，乾隆却全下令全免了；甘肃布政使王亶望集团贪污，乾隆在惩处以后，忽然感慨道：在这件案子还没有发现之前，朕就有风闻，但朕觉得案情重大，所以，没有下定决心来惩治。

从乾隆皇帝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贪污的惩处并不是很认真。而且，他还徇庇亲信，如他一向器重的云南总督李侍尧，因贪赃索贿，被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而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却万般维护，让督抚再议。但当各督抚维持原判时，他又给予开脱，对之处九卿之议的陈辉祖、富勒深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及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己甚之事”，下诏定为斩监候。不久，又下旨，赐李侍尧三品顶戴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

而乾隆皇帝本人挥霍无度的奢侈作风，也影响到了时政和时风。也就是说，他一面在惩治腐败，同时又助长了腐败。腐败使繁荣昌盛的清帝国江河日下，然而，清帝国从极盛一步步走向没落的真正原因，除了贪污腐败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闭关锁国。

一九 闭关锁国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七日，时任闽浙总督杨应琚，收到乾隆的皇帝一纸诏书。诏书的大致意思是：让杨总督告诉英国人，以后只准在广东收泊交易，其他地方均不可。如果有人敢迎头而上来浙江宁波，那么怎么来的就给我怎么回去。

乾隆为什么要下这样一道令呢？往前看，类似的政策早在清朝初年就有过。当时朝廷为了围剿占据台湾的郑成功，对沿海百姓下了两道命令。第一条是“迁界”，就是限令直隶沿海南下到广东沿海一带居民，一律迁入距海岸线三十里外的地方居住。第二条是“禁海”，严令不许船舶下海经商，甚至连捕鱼也在限制之内。但是，清廷在给台湾郑氏造成经济困难的同时，也给沿海商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使得对外海上贸易几乎处在了停滞状态。

而到了1683年，台湾收复后，清廷随即允许沿海居民回迁，又开放海禁。时值英明的康熙在位，康熙皇帝为了尽快恢复海外贸易和加以有效管理，命令在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附近的云台山设立四处海关，定下规则，收缴课税。

这样，经过了雍正一朝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思考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开放这些地方和外国人做生意？我们什么都有，还用得着这群鬼子吗？

而当乾隆皇帝向闽浙总督杨应琚发出谕旨的时候，停泊在定海的一艘英国船只主人火了，这个人名叫洪仁辉。洪仁辉是英国人，由于汉语讲得很好，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让他贸易活动中充当翻译。早在

1755年4月，他就领着一艘商船到达定海，船上装了大量的银钱和酒，还装备了枪炮弹药。浙江官员非常欢迎他们，这样一来二往，洪仁辉先生就和浙江官员成了天下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在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的确捞到了不少好处。

洪仁辉听到乾隆的谕旨后，火气很大，浙江巡抚命令他立即离开宁波，或是回国，或是到广州。他却直往北来，一直到天津。于是，他创造了一个纪录——进入天津的第一个英国人。

他之所以要北上到天津，是想见乾隆皇帝。他想凭着自己对人权与民主的独到见解，来说服这个“天朝上国”的皇帝和自己的国家做生意。

然而，洪仁辉在天津被清朝官员阻挡，官员向他许诺说，一定将此事上告皇帝，请他原路返回。

洪仁辉只好返回广州，并且充满了幻想等着乾隆皇帝给他回信。到了广州的第二天，闽浙总督杨应琚召见洪仁辉。洪仁辉以为乾隆皇帝来信了，欢欢喜喜地跑进了总督府。但迎接他的却是流放澳门三年，剥夺终身来中国的权利。

最后，洪仁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判刑了。因为他违抗了乾隆皇帝的旨意去了天津。他被流放到了澳门，而整件事情并没有完。五年后，也就是1760年，乾隆发布了一道法令，从而彻底地将大清帝国的大门关上了。这项法令包括：1.外国必须在春节离开广州，撤到澳门，直至秋天；2.中国不得同外国人做生意，也不得为外国人服务，否则判流放罪；3.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他们只能同广州公行的翻译接触；4.任何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水停泊期间船上都必须有中国官员；5.外国人不准携带武器，他们送寄信件都必须通过中国当局；6.外国人如和中国人发生纠纷将按中国法律处理。

从此，清王朝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而当时的西方进入了蓬勃发

展时期，逐渐超越了盛极一时的大清王朝。

我们不妨看看，在乾隆执政的60年间，世界上主要发生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件事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第三件事是法国大革命。这三件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英国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这说明，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创造巨大生产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乾隆四十八年（1783）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乾隆五十六年（1791），美国通过《人权法案》。

法国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国举行三级会议，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而在西方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划时代巨变时，大清王朝处于停滞状态。人们的思想被八股、“文字狱”所禁锢，资本主义萌芽被重农抑商的观念所压制。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不鼓励科技发明也就罢了，却将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根本不屑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落后便成了必然的结果。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二十六日，英国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斯当东为首的使团访问中国，历经9个月，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十四日抵达中国。此时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迫切需要开辟新市场。因此，此次出行的目的是要敲开清王朝的大门。

英国使团乘坐一艘有60门炮，名为“狮子”号的炮舰，以及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乘小船进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乾隆皇帝接到英国使者来华“进贡”的奏报后，十分高兴，命人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英国使团到达北京之后，先在圆明园休息了几天，然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乾隆皇帝的寿辰庆典。

清政府拟订了一套接待方案，却在礼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清王朝的规定，使者必须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礼仪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有了，可谓是根深蒂固。1636年时，皇太极举行登基大典，朝鲜使臣在今天的沈阳参加大典，大家都行三跪九叩之礼，朝鲜使臣立而不跪。清朝的官员按着他们跪，他们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还是不跪。到后来，衣服都撕破了也没有跪下。大典之后，皇太极勃然大怒，就开始对朝鲜用兵。

在大清王朝的皇帝们看来，作为“天朝上国”，有责任和义务向下等的附庸国提供伦理道德、文明教化和政治统治。蛮夷走进中国的城门，朝天朝进贡，并进行叩拜之礼是天经地义的。据史料记载，当时大清对外国使臣有这样的规矩：应在所乘坐的车船上悬挂旗帜，写上“某国贡使”的字样。使臣在觐见皇帝之后，应立即离京，不准任何形式与意义上的逗留。尤为重要的是，使臣见到皇帝或皇帝的代表时，必须行三拜九叩之礼。

这种规矩在步入19世纪后，已经显得非常可悲和可笑了。而在此之前，大清王朝的皇帝们并不觉得这是可笑的，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

的。

在雍正王朝时期，清朝政府派托时等人去圣彼得堡贺新沙皇即位。一行人临走之前，雍正皇帝嘱咐他们：我中国使臣无论出使何国，从无叩拜之礼。雍正的意思很明显，不许用三跪九叩之礼觐见俄国沙皇。雍正皇帝还叮嘱托时说，尽量不要面见沙皇，如果对方一定要见，只能“按拜见王爷之礼拜见贵汗”。

当时的俄国早与清王朝有来往，他们自然知道中国的礼仪。但是，他们并不懂得觐见之礼的问题。1731年1月9日，托时到皇宫递交公函后，向新即位的沙皇行一跪三叩首之礼。

在大清王朝的使臣看来，这种礼仪是对把俄国沙皇降格为清朝的王爷一级，虽然俄国人并不会有同样的感觉，但雍正皇帝心里却是非常高兴的。

到了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庆典，清政府又要求英国使者行三拜九叩之礼。英国使团的使者代表马戛尔尼个性倔强，他希望作为第一个真正的外交官，迫使中国接受西方所谓的文明。为此，他与自负的清朝大臣为觐见皇帝的礼仪大起争执。马戛尔尼坚持欧洲的单屈膝礼。而清朝大臣一定要使者行三跪九叩之礼。最后，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中国官员在英王画像前，行叩拜之礼，英国使者即向乾隆皇帝行叩拜之礼。

清朝的官员们觉得这个条件太可笑了，坚决不同意。最后，双方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八月初六，在万树园欢迎宴会上，行英式礼节；八月十三日，正是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行三拜九叩之礼。

《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

英国使臣不仅跪了，还敬献了各种礼品，共有19宗、590余件，

有座钟、地球仪、望远镜、测报气象的仪器、手枪、步枪、榴弹炮等等。这些礼品代表了当时英国先进的科技，乾隆皇帝接过礼单，震惊之余让负责接待的官员有意向对方说明，他们所进贡的物品天朝也有。而后，清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赏赐丝绸绒、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3000多件。

英国使团参加完庆典返京，马戛尔尼递送的表文，由在京的传教士翻译。英国要求派人常驻北京，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此时，乾隆皇帝意识到了英国使者来华是另有企图的，于是催令他们赶快启程回国。

马戛尔尼按临行前英王的训示，给乾隆皇帝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七条要求：

一、开放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通商；二、允许英国人仿俄罗斯例在北京设一个货栈买卖货物；三、取消澳门和广州之间的转口税，或照1782年的税率减免；四、禁止向英国商人在海关关税之外另行勒索；五、在珠山附近划一个没有城寨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囤货；六、在广州附近划分一块地方，允许英国商人居住，并自由往返澳门；七、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

乾隆皇帝愤然拒绝，并且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在乾隆皇帝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在钦差大臣松筠的护送下，于九月初三离京，并传令沿途地方提高警惕，以防英国人滋事。英国使团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9月6日到达两年前的始发地普利茅斯港，结束了访华之行。

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了，乾隆皇帝完全拒绝了英国的要求。而通过这次访华，马戛尔尼看出了清朝“纸老虎”的面目。乾隆皇帝的盲目自大，对西方情形的无知，闭关保守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在后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也就是

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终于在英国军队的坚船利炮轰击下得到了。当然，这是后话，就在英国使者离开中国的两年后，也就是1796年，乾隆皇帝禅于嘉庆。关于乾隆皇帝“禅位”退位，还有一段内幕。

二〇 禅位真相

乾隆皇帝生前曾先后立过三个皇太子。第一个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的皇次子永璉。乾隆皇帝认为“永璉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器宇不凡”。乾隆皇帝即位后，亲书密旨，立永璉为皇太子。这道密旨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很不幸，永璉九岁时死去。

第二位皇太子是永琮。乾隆皇帝在永璉病故后，立了皇七子永琮，没想到永琮也很不幸，在两岁时，又因痘症病逝。第三位皇太子是皇十五子颙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的名字本来叫永琰，后将“永”字改为“颙”。这源于清朝皇帝的名讳。

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的名字，没有避讳的规定，只是在《实录》《玉牒》等特定文献出现的御名上贴黄（就是将名字用黄签盖上）。清帝名字避讳，是从康熙皇帝开始的。康熙名字玄烨的“玄”字，避讳时缺末笔；雍正名字胤禛的“胤”字，避讳时缺末笔，同时命他的兄弟将“胤”字改作“允”字；乾隆名字弘历（当时写作“弘歷”）的“弘”字，避讳时缺末笔，“歷”字，则改作“曆”字。到嘉庆永琰时，乾隆考虑君主名讳，“永”字为常用字，避讳不便，命将永琰的“永”字，改为不常见的“颙”字。永琰继位之后，就改称为“颙琰”。清朝皇帝的名字，把排辈分的字，改为特别的字，是从嘉庆开始的。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1796年2月9日），一场罕见的传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生前传位的皇帝寥寥无几，并且绝对多数是被迫的，如唐高祖李渊，就是在其子李世民的逼迫之下退

位的。而乾隆皇帝是一个例外，他在位60年，在八十五岁高龄之时，主动举行了传位大典，3年以后，方寿终正寝。

其实，乾隆皇帝传位的思想很早就已经形成了。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举行即位大典之时，乾隆皇帝就焚香告天：“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60年的为君生涯，使得乾隆皇帝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也尝尽了君临天下的甜头，先前的传位思想一度发生变化，为了寻找理由，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乾隆表示，只要自己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健在，即使在位周甲（60年），也不进行传位。后来，乾隆虽然下来昭示：“予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同时向诸皇子公开提及传位一事，但在实际行动上，乾隆皇帝对传位是相当消极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崇庆皇太后去世，乾隆失去了不行归政的借口。一年多后，锦县的一个生员金从善投递呈词，要求建储立后。在乾隆皇帝看来，这是对自己坚持不行传位的挑战。这让他十分气恼，下令将金从善斩首示众。在强压之下，下面的大臣再也不敢提出这样的建言了。乾隆皇帝几乎背弃了自己“八十五岁归政退闲”的诺言。

然而，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乾隆皇帝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断恶化，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乾隆皇帝因两臂疼痛一度不能弯弓射箭，又过三四年，又因气血瘀滞而疼痛，以致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乾隆皇帝又患上了失眠症。此后，乾隆的记忆力明显减退，精神昏愤，身体虚弱，使他不由又想起自己即位之初许下的诺言。于是，在八十五岁时，乾隆皇帝将传位一事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皇帝公布了早在38年前订下的建储密

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新年举行传位大典。

嘉庆元年（1796）九月初一，内外王公，文武百官与外藩使臣齐聚太和殿，按班序列，恭候乾隆皇帝举行全国瞩目的传位大典。据说乾隆曾临时决定不把玉玺授给颙琰，只念一下传位诏书即可。这下可把几位大学士给急坏了，因为这样一来典礼就不圆满了。而且，传出去会有损乾隆皇帝的形象。于是连哄带劝，最后乾隆答应交出玉玺。

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当了太上皇后，仍不服老，说自己身体健康，仍然能处理大事。他认为嘉庆经验不足，还需学习。乾隆皇帝觉得自己年近九旬，对于登降跪拜等礼节，已经做不来了，因而将“郊、坛、宗、社诸祭祀”的行礼事交给颙琰来做。乾隆还要求，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章疏，甚至连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也要“嗣皇帝一同批阅”。乾隆不服老，实际上是不愿意放权力。直到他八十九岁寿终正寝也没有离开养心殿。

中国历史上的禅让之说，起自尧舜，但只是史册传闻之辞，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秦汉以来，鲜有尝试。像乾隆皇帝这样为了践行诺言而主动传位者，可以说前无古人。即使退位退得不彻底，也是非常难得的了。

然而，嘉庆皇帝颙琰即位后，却是非常郁闷的，因为朝政仍然被太上皇乾隆控制。乾隆宣称自己的身体状况依然良好，继续把持大清朝的一切军政大权，各项用人理政措施都由他来决断。嘉庆帝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他每天除了批阅奏章、接见臣僚，就是陪同乾隆四处巡游、打猎，参加各种宴会。有时候，也率领皇子们练习弓马射箭。有他那位“十全武功”的父亲在，嘉庆皇帝只好当起了傀儡皇帝的角色。

随着太上皇乾隆一天比一天老迈、衰弱，受宠信的和珅大肆揽权，嘉庆皇帝投鼠忌器，只能不露声色，韬光养晦，与和珅巧妙周

旋。在其位不得谋其政，滋味很不好受。更要命的是，除了年老的太上皇外，还有一个权倾朝野，眼里只有太上皇的和珅。这样一来，嘉庆皇帝免不了要受很多夹板气。

嘉庆皇帝对和珅的痛恨由来已久，早想除掉和珅，但无奈自己没有实权。乾隆禅位给嘉庆后，和珅见乾隆无意交出大权，便更加猖狂。常跑到太上皇乾隆那里搬弄是非，这时的乾隆毕竟已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有些糊涂也是在所难免的。

关于乾隆皇帝舍不得让权给嘉庆的记载很多。比如每当遇到军国大事的时候，都要请乾隆裁决。按理说，嘉庆登基后，年号已经更改，一切官书也都应该更改，但当时的宪书却有两种。全国发行的时宪书采用的是嘉庆年号，但是颁发给内廷和亲近王公大臣的，仍旧用乾隆年号纪年。

所谓时宪书，就是历书，通常每年都会备上一本。所以传播很广。在宫廷中有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的时宪书，世人将其视为珍本。此外，朝鲜的史书中也有对这件事的记载，朝鲜使臣到北京，本应是由嘉庆皇帝接见的，但是朝鲜使臣回国后，却知道乾隆，而不知道有嘉庆。由此可见，在嘉庆登基后的三年中，不过是太上皇乾隆手中的木偶。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享年八十九岁。至此，嘉庆皇帝才真正亲政，这个时候，他已经三十九岁了。

嘉庆皇帝亲政后，做了第一件事，就是惩治和珅。

二一 和珅倒台始末

从清朝的十二位皇帝来看，嘉庆皇帝是对贪污最恨之入骨的一位皇帝。他曾写下了一首痛骂贪官的诗：

满朝文武着锦袍，閤閤与朕无分毫；

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

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

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诗的开头，揭露了满朝文武大官的奢侈腐化。第一联写衣、食；第二联写吃喝，指出贪官们的房子与皇宫没有差别，他们吃喝的是百姓的膏血，笔尖直触实质；第三联也很有深度，“人泪”是指贪官们的行为不但让老百姓痛苦，连老天爷也痛苦。“笑声”句采用了对比手法，点出他们的欢乐是建立在百姓的苦难之上。最后一联抒发了作者的沉重叹息。古代，管治黎民的官员称为“牧”。作者将黎民喻为牛羊，将这些官员喻为豺狼，表现了黎民百姓在他们管治下的苦难，很形象。

诗的最后，指出这些官员“负尽皇恩”，这并非虚假之词，嘉庆皇帝的生活相当俭朴，为人比较忠厚，他是真心希望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些的。

在中国古代，不少皇帝骂贪官、罚贪官甚至杀贪官，但像嘉庆写诗骂得如此痛快淋漓的却不多见。足见嘉庆皇帝对贪官之痛恨。而乾

隆朝最大的贪官便是和珅。

乾隆皇帝传位于嘉庆后，做了三年的太上皇，仍紧紧把持着实权。这时的和珅依然受宠，但毕竟形势发生了变化，和珅为了防止嘉庆皇帝日后对自己进行惩处，竭尽全力限制嘉庆，培植任用自己的亲信。

嘉庆皇帝即位时，他的老师朱珪当时任广东巡抚，朱珪向朝廷上了一封表示庆贺的奏章。和珅立即就到乾隆面前告朱珪的状，不过乾隆未予理睬。嘉庆元年（1796），乾隆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嘉庆写诗向老师表示祝贺。和珅又到乾隆面前告状，说嘉庆皇帝笼络人心，把太上皇对朱珪的恩典，算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一次，乾隆生气了，他问军机大臣董诰，应该怎么办？董诰跪下，劝谏乾隆说：“圣主无过言。”乾隆这才作罢。

不久，和珅还是找了个借口，怂恿乾隆将朱珪从两广总督降为安徽巡抚。同时，和珅还将自己的手下吴省兰派遣到嘉庆身边当卧底。名义上，是帮助嘉庆整理诗稿，实际上是监视嘉庆的言行。

嘉庆二年（1797），领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只知进，不知退，便成为领班军机大臣。这时的乾隆，已年老体衰，记忆力很差，昨天的事，今天就忘；早上做的事，晚上就不明白了，和珅真正成了乾隆的代言人，也就更加为所欲为。

和珅自作聪明，作茧自缚。嘉庆皇帝颢琰当皇子时，被定位储君，和珅密知此事，就在乾隆公布嘉庆为皇太子的前一天，送给嘉庆一柄如意，暗示自己对嘉庆继位有拥戴之功。嘉庆笑在脸上，恨在心里，但因和珅是乾隆的宠臣，老奸巨滑；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不便动手。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驾崩。就在当天，嘉庆一方面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国丧大事；一方面传谕他的老师署安徽

巡抚朱珪来京供职。和珅昼夜都在大内守灵，不能够出入，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这实际上剥夺了和珅的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军政大权。

正月初五，在嘉庆皇帝的授意之下，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

正月初八，在公布了乾隆的遗诏之后，嘉庆宣布将和珅革职，交刑部收监，并下令让刘墉、董诰等人负责查抄和珅的家产，会同审讯。

正月十一日，在经过了初步查抄、审讯之后，嘉庆皇帝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通报各省督抚。

关于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状在《清仁宗睿皇帝实录》里有所记载：

第一，当乾隆皇帝册立嘉庆皇帝颙琰为皇太子时，和珅先期呈给颙琰如意，泄露机密以为拥戴之功。

第二，在圆明园内骑马，直入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

第三，乘轿出入神武门，直进宫中。

第四，娶出宫女做小老婆。

第五，川、楚教匪滋事，各路军中文书报告，延搁不报。

第六，乾隆皇帝病重时，毫无忧戚，逢人谈笑自若。

第七，乾隆皇帝批阅文件，字写错了，竟然说不如撕掉另拟。

第八，管理吏、户、刑三部，一手遮天，变更成法，不许手下的人参议一个字。

第九，西宁报贼匪聚众抢劫杀伤，将原折驳回，隐匿不报。

第十，朝廷有旨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却违背谕旨，无论出没出痘者，俱不令来。

第十一，任人唯亲，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吴省兰、李潢等人，俱保举提升。

第十二，军机处在册人员随意撤去。

第十三，私盖楠木房屋，奢侈豪华，超标准、超规格。

第十四，其坟茔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致使老百姓称之为“和陵”。

第十五，所藏珍珠手串200余串，比宫中多好几倍，其中的大珠，比皇帝帽子上戴的还大。

第十六，真宝石顶，本不应该和珅戴的，和珅却藏了10余颗，还有整块大宝石，为宫里所没有的，不计其数。

第十七，家中银两、衣饰等物，数逾千万。

第十八，夹墙内藏赤金26000余两，私库赤金6000余两，地窖埋银百余万两。

第十九，当铺钱铺资本10余万，与民争利。

第二十，家人刘全资产亦有20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

这20条大罪状中，涉及财产罪的有8条。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在罪状中只字不提“贪”字？查看清代文献，朝廷对贪污行为的公文，记载一直是直言不讳的，如索额图“贪侈倾朝右”等类似记载，历历在目。为什么在嘉庆皇帝的谕旨中对和珅去不肯给一个“贪”字呢？

嘉庆皇帝在谕旨中将“贪”化为“藏”，模糊地说明和珅罪孽深重，格杀合法。照时尚的说法，嘉庆皇帝并未明确和珅的贪污罪，而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惩办和珅。嘉庆皇帝在谕旨中将“贪”字隐去，实际上是因为涉案金额太大，涉及的相关人员太多，为了保全大局，稳定队伍，这么做是比较理性的。如果要把相关的人员都查办了，不但会人人自危，而且也会造成朝政混乱。

在赐死和珅的谕旨中，嘉庆皇帝不提及“贪”字，还与乾隆有一定的关系。和珅是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是其心腹和代理人，要问和珅为什么贪，还不是乾隆皇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摆平一个奴才，而让自己的父皇脸上无光，是嘉庆所不愿的。

据说，和珅被抄家后的财产全部合计约值十一亿六百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朝鼎盛时15年到20年的财政收入。扳倒和珅，嘉庆可以缓解面临的财政压力。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然而，历史上却有一种说法，说之所以嘉庆登基后，很快将和珅杀掉，并不仅仅是因为和珅很有钱。真正的原因要从乾隆第六次南巡说起，当时，乾隆皇帝还没离开京城，和珅就派快马把一封信送给了远在扬州地方官员汪如龙手中，信中还有一张女子的图形，和珅告诉汪如龙，可以按图形的样子为乾隆皇帝找寻美女，办成此事，前途远大。

原来图中的女子是乾隆皇帝的一名贵妃，很受乾隆宠爱，因为她不仅天生丽质，美貌绝伦，而且天生体内有异香，所以人称香妃。香妃原本是回疆进献来的美女，后来回疆大、小的卓布起兵叛乱，乾隆派出大军镇压。乾隆皇帝对叛邦之女容妃也不得不日渐疏远，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南，建造了一座楼，名为宝月楼，并将宝月楼比作月宫，想让这位美女成为嫦娥，永远孤独。但事实是，乾隆皇帝还是非常喜欢这位妃子。和珅感觉到了这一点，才命汪如龙寻遍江南，一定要找出一个形容酷似容妃的女子，以解皇上之忧。

想在江南找一个漂亮女子真是再简单不过了。随着乾隆皇帝南巡驾临扬州，女子献上，这个女子不但给了乾隆温暖，还让他回想起已飘零远逝的青春，感到很久未有的幸福。乾隆对汪如龙大加赞赏，立刻提升了他的官职。为此，汪如龙特地送给和珅20万两白银，乾隆由此也更加信任和珅了。

但这个时候，和珅却想，对待汪如龙这样的人，必须能够以威势强制，否则一定不会去除他的野心。于是，和珅私下召见汪如龙，一见面，和珅就摆出一副严酷的表情，仿佛满怀怒气，令汪如龙心中忐忑不安。忽然，和珅开口说：“恭喜先生，讨得皇上如此欢心！”

汪如龙不知是该回答好，还是不回答好，只是站在那里。突然，和珅又像疯狗一样指着汪如龙的鼻子，怒斥道：“对皇上惑以美色，致使君王不朝，你论罪当斩！”

汪如龙顿时大惊失色，双膝跪地，口中慌忙称罪不止，乞求和珅能网开一面。其实，一向在官场行走的汪如龙，此时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虽然给和珅送了银子，但并没有送上恭敬。

果然，和珅对汪如龙这种恭敬的态度很满意，就拍着汪如龙的肩膀，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汪如龙当时就觉得，和珅居然敢以中堂的名义，如此对待地方官员，那么他的眼里是否还有皇上，就真要另说了。

但汪如龙又不敢向乾隆皇帝告状，首先，他自己真没有可以拿出来的理；其次，乾隆皇帝此时已经老糊涂了，又非常信任和珅，自己去告状无疑是去送死。为了向和珅表明自己的忠心，他把家里祖传的一幅名画送给和珅，并在画中夹带了一张银票。

汪如龙的苦心自然没有落空，很快他就升了官。不过，他感谢的并不是乾隆皇帝，而是和珅。

乾隆皇帝驾崩后，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嘉庆皇帝。其实，和珅威胁大臣的这类事情，嘉庆皇帝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但是，当有人告诉嘉庆，和珅曾经仿照皇帝房屋的格局，修建自己的房屋包括陵墓时，嘉庆皇帝勃然大怒，在这位新皇帝看来，和珅已经不光是贪恋钱财了，他的权欲之心已到了惊人的地步。

嘉庆四年（1799），嘉庆皇帝在张诚基奏折上批示：“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和珅，不知有朕。”

其实，嘉庆皇帝对查抄和珅的家产是适可而止的。同年正月，他在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奏折上明确批示：“不必过于株连搜求。”甚至后来大臣萨彬图奏称“目前抄出的不足和珅家产十分之一，请求再深挖严追时，遭到了嘉庆的严厉批评。”

使吴熊光的奏折上明确批示：“不必过于株连搜求。”甚至后来大臣萨彬图奏称“目前抄出的不足和珅家产十分之一，请求再深挖严追时，遭到了嘉庆的严厉批评。”

由此可见，嘉庆杀和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和珅权力过大，权欲也过度膨胀，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嘉庆甚至怀疑和珅可能会谋反。

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八日，经过廷议，嘉庆皇帝做出对和珅进行凌迟处死的决定，而且立即执行。廷议结束之后，等待和珅的就是凌迟。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

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四刀切两腿。

而就在和珅将要遭受凌迟时，他的儿媳向嘉庆皇帝求了情。和珅的儿媳是固伦和孝公主，是乾隆最喜爱的女儿，也是嘉庆的妹妹，嫁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和孝公主为和珅求情，希望可以赐和珅自尽。嘉庆皇帝答应了。

还有一种历史观点认为，嘉庆之所以要杀和珅，是为了缓解官民之间的矛盾。嘉庆元年（1796），发生白莲教民变，清军连连失利。嘉庆三年，清军抓住四川农民军首领王三槐，王三槐的口供说“官逼民反”。嘉庆意识到，正是因为地方官吏皆如和珅似的贪暴，所以屡屡激起民变。嘉庆帝总结说：“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又说：“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所以，嘉庆杀和珅，以谢天下。

不管嘉庆皇帝是因为何种原因，最终赐和珅死罪自尽，他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1814），在和珅被杀15年之后，清国史馆将编修的《和珅列传》稿本送呈嘉庆审阅。嘉庆见记载简略，只记录了和珅的一堆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朱批道：“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的事。

只是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贪婪专权，才不得不加以重罚。

和珅死的时候，五十岁，他死前留下一首绝命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诗的前两句，是说富贵荣华如过眼云烟；后两句，有人解读为：我将大清推向了世界第一大帝国的位置。可是，新皇帝却将我这个太阳给杀掉了。从此以后，大清帝国就会像寺庙里的香烟一样，很快就烧光了。还有人认为，后两句是说，和珅希望自己来世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平凡的人，再也不掺和政事了。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荒诞，说“水泛含龙”中的龙，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说发大水，在和珅被赐死的头一年，河南的黄河决堤。因为有人说那句诗的意思是，和珅等到下一次发大水的时候要转世为生。巧合的是，道光十二年，河南的黄河再度决堤。同年十月，一个女孩呱呱坠地，据说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其实，不管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和珅临终前的本意，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那就是嘉庆皇帝从父皇乾隆手里接过大清国时，盛世的局面已然消失殆尽。

二二 白莲教起义

乾隆皇帝把皇位“禅让”给嘉庆的当年，即嘉庆元年（1796），发生了川、楚、陕三省的白莲教武装起义。

乾隆王朝后期，人口越来越多，可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土地被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贪污横行。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却日益繁重。而且灾荒连年，湖北荆州屡遭洪灾，淹死无数百姓；当阳人民没有粮食吃，连树皮也啃光了；枝江、长阳人民只能吃到观音土，枣阳人民以石粉充饥；四川重庆、忠州一带饿殍遍野，到处是一幅幅凄惨的景象。所以，当白莲教号召的声音响起，很多苦难的民众便抱成了一团，准备跟清王朝王来一场正面对抗。

白莲教源自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之为楷模。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南宋绍兴年间，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元朝末年，推翻元朝的红巾军大起义，就是由白莲教首先发起的。当了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原本是红巾军领袖之一，在他得了天下，做了皇帝后，就下令禁止白莲教，他怕这个下层群众的秘密组织威胁到明朝的安全。但是，白莲教仍然秘密地保存了下来。过了将近三百年，到嘉庆皇帝登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白莲教势力活跃，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强大力量的反清队伍，直接威胁到清朝的统治。

朝廷得到白莲教遍地蜂起的消息，十分恐惧，嘉庆皇帝马上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而负责捉拿白莲教的地方官吏却想借

机发财。他们打着捉拿白莲教的幌子，滥捕了很多无辜的百姓，严刑拷打，敲诈勒索。凡是出得起钱的，当即宣布无罪释放；拿不出钱的，就关在牢里受罪甚至砍头，有的甚至还被钉在墙上，被活活折磨而死。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白莲教。

当时，湖北的地方官员抓人最多，那里的白莲教也最活跃。首先发动起义的，是襄阳县城白莲教的首领齐林。可惜事情被襄阳县令察觉，齐林被捉拿，他的头被砍下，悬挂在襄阳县城示众。

暗中积极准备起义的白莲教徒，并没有被这件事吓住，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愤慨。齐林的妻子王聪儿被推举为起义首领。王聪儿召集襄阳白莲教徒，在城郊的黄龙珰集会。上万民身着缟素的白莲教徒，饮酒盟誓，放声高喊：“有患相救，有难相死！”而后，白莲教徒一律剪掉辫子，表示誓死与大清王朝斗争到底。

王聪儿指挥襄阳起义军，进攻襄阳和樊城，随又转战于河南的邓州、唐州之间，火烧了吕堰驿，声威大震，逐渐成了四方起义军的中心。

嘉庆二年（1797）初，襄阳起义军兵分三路攻入河南，再经陕西向四川进发。嘉庆皇帝一再命令加强汉水防御，想把义军堵击歼灭于汉水之北。但是，起义军却早在清军赶来前5天，就全部南渡汉水。同年六月，竟到达四川的东乡附近。

在四川战场，徐天德、冷天禄率领的起义军节节胜利。六月，他们在东乡附近的白秀山遭到清军围攻时，王聪儿率领部队分成黄、白、蓝三队，步兵在前、骑兵在后，突然出现在山沟，向清军发动了猛烈地攻击。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终于把清军击溃。湖北、四川两支起义军汇合后，一共控制了20多个州县的广大农村地。不久，冷天禄部又拿下了临江市，各支起义军纷纷赶来聚会。

起义军在东乡会师后，清廷非常恐惧，立刻调集了三路重兵，向

起义军扑来。这时，起义军人数众多，粮草供给上出现困难，又难以统一号令。决定分兵突围。四川起义军撤向江、巴州地区，王聪儿率领襄阳起义军突破包围圈后，又杀回湖北。避实就虚，连连粉碎清军的围追堵截，强渡汉水，与陕西起义军会师，逼近西安。但当时驻守陕西的清兵非常多，他们死死缠住王聪儿部队，使起义军陷入被动。王聪儿且战且退，想退回湖北，行至湖北境内的三岔河时，被追上的清军包围，起义军奋勇还击。弹药箭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击清军。当清军得知王聪儿在卸花坡时，便集中全力围攻王聪儿。王聪儿组织了多次反击，终因众寡悬殊，便带领十多名女战士，退到山顶。清军蜂拥而上，意图活捉王聪儿，王聪儿等人登上山顶后，全都纵身跳下了山崖。这一天，是嘉庆三年（1798）四月二十日，王聪儿才不过22岁。

王聪儿死后，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又重新杀回四川，与四川各支起义军并肩战斗，给了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嘉庆四年（1799）底，起义军发动了苍溪之战，一夜杀死清军副将以下24名军官，歼灭清军无数。

嘉庆五年（1800）夏天以后，清政府下令地主乡绅的乡勇、团勇实行坚壁清野和碉堡政策，才使起义军的力量大力削弱。但是，起义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还坚持了四年的斗争。直到嘉庆十年（1805），这场轰轰烈烈，历时9年零3个月的白莲教大起义，才被清朝统治者最后镇压下去。

可是，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清政府也元气大伤，清廷从全国16个省征调兵力，损失了20多名一、二品大员，耗费白银2万万两。从此，清王朝走向衰落。

而白莲教之所以失败，没有造成像后来太平天国起义一样的影响力，战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纵观九年的战斗，可以分成初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初期先是数万起义军起兵，在山区修建了一些营寨堡垒，

据险防守。由于清朝的军队没有回过神来，派遣的兵力也比较少，所以迟迟攻打不下来，损失惨重。紧接着，大批清军集结，以优势兵力进攻起义军。起义军陷入被动，成了大炮轰击的对象。

在初期阶段，白莲教起义军胜多负少，之后，他们则成了困兽。到了后期阶段，白莲教起义军首领也发现，据险防守，其实是被动挨打，于是改为主动出击。这又使白莲教起义军占了上峰，各地起义军开始节节胜利。但是，他们的兵器粗劣匮乏，在攻城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清军在城中坚守不出，将郊外的百姓和各种生活生存用品都转移到城内，而且还加固了城墙。每一座城池都是这样，加之以前占据的城池也被清军重新占据，白莲教起义军陷入困境，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从白莲教起义军后期主动出击的这一段来看，像初期一样，都是刚开始打得不错，后来却败得很惨。这是因为，虽然各地的起义军都主动出击，却没有形成一个核心组织，都是各打各的，这样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起义军没有根据地，各自为政。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对于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来说，是一场很大的冲击，这个占据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帝国，在九年时间内，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将一个王朝比作一匹马，此时的大清王朝这匹马，日渐衰老，且严重受伤，已经跑不起来了。

二三 王朝危机

嘉庆皇帝花了9年零3个月的工夫，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又集中精力平息了东南沿海的渔民起义，以及一些地区的士兵哗变。这时候，嘉庆皇帝以为可以喘口气了，不料又发生了震动皇宫，危及皇帝宝座的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本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因人员按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编排，所以又称为八卦教。教徒遍布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北京等地。在北京掌管坎卦的首领叫林清，是北京大兴人，当过药铺学徒，也在衙门里干过差事。他还到过东北关外，还在大运河上当过纤夫。后来，林清住到北京郊外宋家庄的外甥家里，替外甥照料家务。他在宋家庄由人介绍参加了天理教。因为他见多识广，为人仗义，被推荐当了教首，筹划起义。

林清自称是弥勒佛转世，他口才极好，很会鼓动，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人入教。就连皇宫里的太监，也有许多受他影响入了教，并且表示愿意日后起事做内应，帮助起义军攻进皇宫。

为了使天理教的各部人马协同一致，林清几次去河南滑县，同震卦首领李文成、离卦首领冯克善等人建立联系。三人在河南滑县和北京郊区多次聚会，共商起义大事。选举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约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义。林清本人率领直隶教众攻打北京皇宫，李文成在豫东起兵，攻打当地官府，冯克善则在露西起兵，攻打当地官府。三地将同时起兵。

战略步骤确定下来后，就开始忙着打造兵器。可是，就在离约定

起义的时间还有半个月的时候，私下打造兵器的事却被官府查到了，李文成被捕了。

李文成是首领，却被捕了，起义只能提前开始了。

九月十四日，林清派遣了200余教徒，扮成商贩进入北京城。十五日中午，在几个太监的接应下，分别从东华门及西华门两个方向攻入紫禁城，进行了一番混战后，有四五个教徒进入隆宗门，甚至到达了养心殿。可惜，嘉庆皇帝不在宫中。此时的嘉庆皇帝按照惯例离开了北京城，只带了几个年轻漂亮的新宠，开始了他木兰狩猎的行程。所以，天理教徒没能够顺利完成刺杀皇帝的计划。但是，他们离后妃宫室已经没多远了。很快，消息传到了后宫妃嫔们的耳中，一时间，喊叫声和打杀声混杂成一片。好在皇后钮祜禄氏还算镇定，她派人把正在书房读书的皇子、皇孙们叫了过来，皇次子绵宁最先做出反应，他带着鸟枪守卫在养心殿前，指挥各路官兵与天理教徒作战。

到了傍晚，天理教徒在健锐营、火器营准备精良的官兵的围攻下，终于抵挡不住。攻打东华门的一路教徒撤回了黄村宋家庄，进入皇城的教徒则被全部歼灭。两天后，林清被捕。

天理教攻打皇宫的消息，第二天便传到了嘉庆皇帝的耳朵里。当时，在木兰狩猎的嘉庆，因为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所以只好提前回京。在回京的路上，嘉庆皇帝便接到了直隶总督温承惠的奏报，说天理教徒攻打皇宫。嘉庆皇帝震惊之余，不禁为皇次子绵宁的英勇感到高兴。他马上封绵宁为智亲王，加给岁俸12000两，绵宁用的那支鸟枪，也起名为“威烈”。皇次子绵宁，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嘉庆死后，他继承皇位，改名叫旻宁。

再说嘉庆皇帝，回到北京之后，详细调查天理教教徒攻打皇宫的事件。结果发现，正是自己的近臣太监给林清做内应，实际上，这个事在早些时候已经被知情人告发了，但王公大臣们当皮球一样来回

踢，直拖到事发。

皇宫内出了这样的丑事，嘉庆皇帝可以说是颜面尽失，痛心疾首的他只能发诏自责。可是，不管嘉庆皇帝怎么嘉奖儿子，下诏痛责，都无法掩盖官僚的腐败、军纪涣散的实情，更无法掩盖大清王朝的颓丧之势。表面上看，天理教攻打皇宫的事件，是紫禁城的一次危机；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事件其实暴露了大清王朝的危机。

这一危机，还是要说到“腐败”的问题。尽管嘉庆皇帝赐死了和珅，但腐败却没有铲除。在嘉庆皇帝执政期间，曾一再发布整饬吏治的谕旨，对“惩贪倡廉”的问题十分重视。纵观嘉庆一朝，被处置的大官很多，而这些人都是因为犯贪污罪被惩处的。比如湖南布政使郑源勒索下属，贪赃枉法，家里所养的歌妓就有300多人，被查抄后，处以斩刑。嘉庆皇帝在上谕汇总告诫其他官员：你们可以养歌妓，但绝对不能用百姓的钱。朕知道天下还有许多个郑源，倘若叫朕知道，必不饶恕。

接着，云南总督，漕运总督又因为贪污被处以“绞监候”。贪污而不知悔改的云南巡抚伊桑阿被处以“绞立决”。另外，武昌府同知常丹葵，既贪婪又残暴，他借口抓捕白莲教徒，对百姓肆意勒索，乃至连累无辜者达数千人之多。

当时的御史谷际岐在给嘉庆皇帝的上疏中，谈到常丹葵时说：“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入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江上。”

嘉庆皇帝趁势抓住此案，严惩常丹葵。他想到“惩一儆众”从而来抑制地方官的贪暴，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嘉庆皇帝反贪的决心和力度。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嘉庆一朝，从开始到终结，贪污问题不仅

没有解决，甚至更加严重。用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话来讲就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不可能解决贪污问题，因为这是阶级性决定的。但这种堂堂大言似乎也没有用。嘉庆皇帝之所以惩治不了腐败，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本人，面慈心软，颇有妇人之仁。

回顾清朝历史，康熙皇帝在惩治腐败上，以“柔”为基本方针，在惩治腐败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倡导廉洁。于是康熙一朝有无数个清廉之官。而雍正皇帝在惩治腐败上，是以“严”为基本思想。抓住贪官本人要杀，其他有牵连的也一并要杀。而再看嘉庆皇帝，从他处理天下第一贪官和珅的事上，就可以看出，他很“软”，按照当时积习已久的贪污风气，就应该将与和珅有一点关系的人全部处死，甚至可以株连九族。但嘉庆皇帝只惩处了和珅本人。这如何能起到威慑作用呢？

在后来的几个贪污案件中，一旦涉及的人过多，嘉庆皇帝就于心不忍了。从而只对罪犯本人进行惩处，其他有牵连的人员，或是小罚一下，或是告诫。

原因之二，是当时清朝官员的制度问题。按照清朝官员的制度，差旅、办公费用和幕客、随从的报酬，基本上是官员自己出钱，正常的薪俸、“养廉银”根本就不足以维持公务运作和官员家族豪侈的生活。所以，大多数官员只好通过各种名目获得额外的收入，这已经成为整个官僚机器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但是，在当时，“千里为官只为财”，官员们取得额外收入，不会满足于弥补公务支出，对金钱的追求是“多多益善”。当贪赃枉法已经变得不再无耻，反而成为一种规则、制度，甚至是习惯时，皇帝的一首诗，几句骂娘的话，几道圣旨已经毫无用处了。从历史可知，嘉庆皇帝骂贪官的诗，并没有骂出清廉的吏治，也不能阻止天下大乱的发生。

因为贪污横行，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日益繁重。民众无法生存，

所以才纷纷起义。所以，天理教起义，攻打皇宫，看似只是紫禁城的一次危机，实际上是整个大清王朝的危机。其实，天理教教徒攻打皇宫之前，嘉庆皇帝就遇到过一次更大的威胁。

嘉庆八年闰月而二月二十日早晨，正当嘉庆皇帝坐轿从西郊回宫，路过神武门，快要进入顺贞门的时候，突然间从西厢房山墙后面冲出一个40多岁，披头散发，手持利刃的汉子，直奔御辇扑来。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守护在神武门内东西两侧的100多名侍卫、护军个个呆若木鸡，竟然无一人阻拦。只有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6人上前阻挡。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嘉庆皇帝慌忙跳下了御辇，惊恐万状地逃入顺贞门。刺客一时来不及追赶，只是左右挥舞着刀，奋力拼杀，企图杀出一条活路，但终因寡不敌众被缚。

经过一番调查审讯得知，这个刺客名叫陈德，四十七岁，镶黄旗人。原本是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的契买家奴。后来，陈德到京城投靠了任护军的外甥，被分到内务府服役，所以有机会出入宫中。之后，陈德和妻子又一同去一个叫孟明的官吏家中做厨役。在此期间，陈德的妻子因病去世，岳母瘫痪，还有等待抚养的小儿，生活突变使他难以承受，所以常常借酒浇愁，而酒醉之后便会胡闹一番。

面对陈德这样一个醉鬼，孟家只得解雇了他。没有了经济来源，生路被断绝的陈德，只好先借住在他外甥家，后又寄居在旧友黄五福家中。事发前几天，陈德看见街上铺垫道路，得知嘉庆皇帝的进宫日期，于是打定主意谋刺嘉庆皇帝。

从表面上看，是陈德是饱尝人间辛酸，亲眼看到皇宫贵族的富足、腐朽生活，从而激发了反抗的情绪，但是这番供述漏洞百出，疑点甚多。因为穷困潦倒过不下去，就意图刺杀皇帝，简直是无稽之谈，实在荒诞。更何况皇帝的行踪，属于国家机密，神武门又是皇帝

出行的必经之路，戒备极其森严。此处建筑高达31米，常人是不能靠近的，更别说是进入了。

可是，陈德却能持刀潜入神武门。而且，他行刺的时候，上百名军校和众多随行之人，居然袖手旁观。种种迹象都让人觉得，背后必定有人出谋划策。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刺杀行动。

但是，无论怎么酷刑拷问，刺客陈德都一口咬定是他一人所为，并没有主谋。对陈德的两个儿子以及交往密切的人，进行严加拷问，也没有获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会审官员拟旨上奏，嘉庆皇帝传谕道：“一味动用酷刑，想要知道幕后主谋，若是他们随便说出一名官员，那么那位官员该怎么处置呢？倒不如不审问了，让这件事成为一个谜团，就此作罢吧！于是，下令将陈德凌迟处死，将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陈禄儿、陈对儿处以绞刑。并以失察的罪名，对护卫守候在神武门和东华门的17名文武官员，分别给以罚俸、发往热河披甲当差的处分。”

一桩震动朝野的重案，就此了结，但这中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隐秘，恐怕已经没有人能破解了。

一个平民百姓行刺皇帝，几十人的农民起义军就打进了皇宫，嘉庆皇帝对此，说了一句感慨的话：“此乃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由此可知，当时的阶级矛盾已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嘉庆皇帝在位的25年，正是清王朝从“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的过渡阶段。嘉庆皇帝与他前面的几个文治武功的祖宗相比，他在位所发生的事实在是太窝囊了。因此，有人说，嘉庆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倒霉的一个。

在天理教教徒攻打皇宫的七年后，也就是1820年七月，嘉庆皇帝再次去木兰狩猎，驻于承德避暑山庄。大概是七年前的那件事依旧在他的脑袋里起作用，他开始头痛发热，不久，病情开始严重。嘉庆皇

帝连忙宣召大臣赛冲阿、托津等入室，宣布立即传位于皇次子绵宁。
同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

二四 经济困境

嘉庆皇帝时期，大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已经陷入了危机，而道光皇帝时期，财政危机的状况更加严重。

嘉庆十七年（1812），岁入四千一百一十三万余两，岁出三千五百一十万余两，虽然收支抵消后的盈余数已较乾隆时期大为减少，但仍有六百万两左右。而到了道光皇帝时期，据道光三十年户部的奏报，此前的十余年间，“岁额所入，除豁免、缓征、积欠等项，前后牵算，每岁不过实入四千万上下”。比嘉庆皇帝时期的平均值少征四、五百万两，岁出则“约需三千九百万两”，收支相抵，几乎没有盈余了。

这还仅仅是就例内支出而言，实际上当时到底用了多少钱根本无法预测。从道光皇帝执政到此前的十余年，各个战争和边疆建设，东、南两河工用，南北各省灾务，统计例外用款，多至七千余万。计入这些，那就入不敷出了。户部奏折中提道：“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而解部之款日少一日……虽经叠次恩发内帑银一千余万两，王公大臣议减京外各营马乾，红白赏恤、杂项、减平等款共节省银一千余万两，臣部先后催完积欠银一千七百余万两，又因南粮缺额，京仓支放等款分成改折，而入不敷出，为数尚鉅。”

到了道光后期，京师户部每年支放银九百四五十万两，其来源“除各省例解部款一百二十万，常捐、旗租、减平二百余万两外，不敷银两随时奏闻，于盈余省份地丁、盐、关指款拨解部库”，计入京师款，道光后期全国总计的岁入、岁出实际上是没有富余了，因为

各省出入的盈余数，差不多要全部用来解京供应中央开销，常例支出如此，应付起当时层出不穷的例外开支，就只能吃库存老本了。

众所周知，道光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节俭皇帝”，他的节俭多少与他面临的财政困境有关。

道光皇帝的节俭，并非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而是采取实际措施，付诸行动。他倡行节俭的谕旨和措施，尽管收效很小，但他自己确实是一直躬亲实践，身体力行。

照例，皇帝每餐最少也有二十几样菜肴，道光觉得这样过于靡费，下令只做四样菜，有时则只要一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皇帝即位多年，只给自己的妻子庆祝过一次生日，那是皇后佟佳氏四十整寿，在那时算是一个大日子。而对于这一次皇后“千秋”的宴席，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大大地记了一笔：面对成百上千的王公大臣及其内眷，还有后宫的妃嫔和宫女、太监，道光皇帝只给了御膳房宰杀两口猪的指标。于是佟皇后的整寿千秋宴，就只有一品肉片打卤面款待来宾了。

《清稗类钞》还里记录了几件事：说道光皇帝曾经有一件黑狐端罩，衬缎稍微大了点，他便令太监拿出，四周添皮。内务府报告说，这样改一下的话，需要上千两银子。道光皇帝听后，忙说不用改了。

道光皇帝有一条套裤，膝盖的地方不小心弄破了，后来就让内务府的人在上面缀了一块圆形补丁，即所谓的“打掌”。大臣们见了，纷纷效仿，也在膝间缀了一块圆形补丁，竟然风行一时。

有一次，道光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正好大臣曹文正离御座近，道光皇帝见其套裤上缀了一块圆形补丁，便问：你这套裤也打掌了啊？

曹文正说，改做太花钱，所以还不如补缀一下。

道光皇帝问：你打掌要花多少钱啊？

曹文正说：要银三钱。

道光皇帝吃了一惊，说：外面的东西是便宜啊，我这里内务府说要银五两。

这时，道光皇帝对内务府的人起了疑心，又问曹文正：你家吃的鸡蛋，要多少钱啊？

曹文正是个聪明人，他怕得罪内务府的人，便谎称：臣小的时候患气病，从来不吃鸡蛋，所以我也不知道鸡蛋的价钱。

幸亏曹文正没说。因为在乾隆朝的时候，有一次早晨，乾隆皇帝问大臣汪文瑞：卿这么早来，可在家里吃过点心？汪文瑞答：臣家里穷，每天早上不过吃四个鸡蛋而已。乾隆愕然，说：鸡蛋一枚，需要十两银子，我都不敢吃这么多，你一天吃四个，还敢说自己穷？汪文瑞知道是内务府的人搞鬼，但又不敢明说，只好敷衍道：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没法和上供给宫中的相提并论，所以我买的都是些便宜货，不过几文钱罢了。

《清朝外纪》里说，道光皇帝到了晚年，更是小气。宫中膳品，本沿袭旧例，有时候道光想吃某样东西了，但听说这东西太贵，往往又忍住，不让宫里的人去买。后来的慈禧太后也小气，但她的小气是抠门，喜欢存钱，而道光皇帝的小气是根本就不消费。

因为道光皇帝的禁欲不消费，弄得内务府的人大为头疼，怨言多多，不过，他们还是有办法来对付的。有一次，道光想吃片儿汤，让内务府的人按自己说的制法去做。内务府报告说，若是按皇上的做法，就必须另盖一间厨房，并请专人来负责。这样的话，要请上面拨给经费六万两来办理此事。另外，还需要一万五千两的维护费。道光听后，眉头一皱，说，朕知道前门外就一饭馆能做此汤，每碗不过四

十文。算了，以后每天让太监去买吧。

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饭馆已经关了，原因不明。道光叹道，朕向来不为口腹之欲，而浪费国帑，没想到朕贵为天子，想吃一碗片儿汤都办不到，真是可叹啊。

内务府的人其实是想找个借口来造个厨房，借此中饱私囊，可惜没有得逞，弄得道光皇帝连一碗片儿汤都吃不到。

为表示自己倡节俭、杜奢靡的决心，道光皇帝诏令停止和严格限制各地进献贡品。宫娥彩女大批放还出宫，令后妃以下悉去繁华装饰，衣食用度概从朴实，诏谕嗣后皇子皇孙婚仪一切从俭。

对道光如此节俭的举动，大臣们是极力奉迎，尤其是相国穆彰阿。穆彰阿每次上朝的时候，总穿着破旧的袍褂。道光皇帝见了，便称赞他大有名臣风度。但他不知道，这位具有“名臣风度”的大臣，在外面做了许多贪赃枉法、穷奢极欲的事情。

皇太后万寿那一年，道光皇帝很害怕花钱，便下旨说：“天子以天下养，只需国泰民安，便足以尽颐养之道。皇太后节俭垂教，若于万寿大典过事铺张，反非所以顺慈圣之意。万寿之期，只需大小臣子，入宫行礼，使足以表孝敬之心，勿得过事奢靡，有违祖宗黜奢崇俭之遗训，钦此。”

这道圣旨一下，大臣们都明白了道光皇帝省钱的心思。便跟道光皇帝时候，所有万寿节一切铺张，都由臣民孝敬，不花内务府一分钱。道光听了，自然龙颜大悦，心想既然你们花钱，那就让你们自己去操办吧。于是，下了一道谕旨，成立一个皇太后万寿大典筹备部，而穆彰阿就是这个筹备部的头儿，穆彰阿以皇太后万寿为借口，到大小衙门勒索。最小的官员都以一百两起，仅这一次，穆彰阿就足足得了一千万两的好处。

由此可见，道光皇帝的节俭，根本无法改变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无法走出经济上的困境。因为再节俭也抵不上官员贪污给国库造成的空虚。此时的大清帝国上层，官员们大捞特捞，而在帝国的下层，还有一群蛀虫啃噬着帝国大厦的根基，这些蛀虫就是清朝京城里的银库兵。

在清朝，有一句话，叫作“想发财，去户部”。《清代野记》中提道：“户部各差以银库郎中为最优，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至廉者，亦能余十万。其下司库、书役人等，无人肥美，皆满缺，无一汉人也。其中尤以库失一项为诸役冠，亦三年更替，亦皆满人，虽有汉人亦必冒满名，役满人可馀三四万金不等。”

这段记录的大致意思是说：清朝时期的五府六部，最有油水可捞的就是户部了。而户部，最有油水的职位是银库郎，银库郎三年一任。有人说，如果天天贪污，在任满后可捞上二十万两雪花银。廉洁一些的，也能捞到十万银子，至于下面的司库、书役、也是三年一任，任满时，也能捞到三四万两银子。但这些差事与汉人是无关的。但任这些官职的，都是满人。即便有汉人担任，也要冒充自己的满人。

除了银库郎、司库、书役等大小官员，在银库部还有一种人：银库兵。他们虽然被称作“兵”，但捞到的油水一点也不比官员少。所谓“三年银库兵，万两雪花银”。银库兵不仅要求必须是满人，而且还要花六七千两银子贿赂户部尚书，或者户部尚书左右的人才能当上。

据说，当年北京城里的许多镖师们有一项生意就是保送银库兵。由于银库兵可捞的油水很大，那些没银子贿赂，当不上银库兵的人，便和地痞、无赖相勾结，寻找机会绑架银库兵，让他的家属送钱来赎。因此，每个银库兵出门都要雇几个镖师来保护。

清史记载：为了防止银库兵夹带私藏银子，银库兵进出银库搬运

银两，无论春夏秋冬都要赤身裸体，由堂官公案前鱼贯而入，并且在出库时，赤身到公案前，两臂平伸，张嘴发声，以示口中无物。然而，即便如此，银库兵也自有高招，他们把银块藏于肛门之中。在此之前，他们都要事先经过刻苦的训练，先用鸡蛋抹了麻油往肛门里塞，然后再换鸭蛋、鹅蛋，最后是铁蛋。把一套“夹功”练得炉火纯青，功夫最高者，一次可以夹带五十多两银子。

当时的银锭都是各地铸造，银库兵最爱夹带的是江西锭，因为“江西锭光滑无棱，其肛之嫩者，则用猪油浸湿，裹银而塞之。”但这样做，让许多银库兵到老后，都患上了脱肛痔漏症。在当时，知道“江西锭”内幕的人都不爱用它，特别是一些酒馆老板，公开拒绝收江西锭，说那都是银库兵用肛门夹出来的，是脏钱，不干净。

按清朝的制度，银库兵总设四十人，每月开库九次，逢加班能开十四次左右。每个银库兵每月当班三四次，每次进出六七趟，当一个班，一个银库兵能偷二百两银子，一个月就偷上千两银子。

银子从外地运往京城，都装在银鞘里。当地为了凑足分量或成色，每个鞘里都要放些散碎银子，往库里存放时，要把银鞘劈开。一般的银鞘三斧子就可以劈开。但劈到第三斧时，掌斧人就要手段了，因为这一斧子下去，要使碎银子像雪崩似的四处散开，这样围上去的人好边拾边偷偷往身上藏。

银库兵如此胆大妄为，管库的官吏心里当然很清楚，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当局之所以不能禁绝，主要是自身不干净，外地来交银子，他们要人家的好处费，否则就百般刁难，要么说分量不够，要么就说成色不好，拒绝接收。如果拿到好处费，就是运银的差官半路上拿了一些，管库的官吏也不追究；银库向外支付银子时，他们也向领取人索要贿赂，否则，要么就不给足分量，要么就给成色不好的银子。当时，山西出的银锭不仅成色最好，而且每锭银子里有黄金一钱，所以支取者不惜花大价钱贿赂司库，企图得到这种银子。

另外，银库兵都是一些亡命徒，如果哪个官员吃了雄心豹子胆，当场抓住一个偷银子的库兵，真要铁面无私办起案来，那么，这些人夜间甚至会去把办案的官员杀掉。《清代野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祁文恪世长署户尚时，忽见一桶底脱而银出，不能不问，随即锁拿库兵数人，将于次日奏参严讯，人谓之曰：“尔将兴大狱乎？尔不顾身家性命乎？无论大狱不可兴，即若辈皆亡命徒，拼出一人认死罪，而半夜刺公，公何处呼冤者！”文恪乃含糊了事。

《清代野记》的作者感叹说：“清之亡，亡与内政之不修，不亡于新政之不善。”

其实，嘉庆朝的时候，因为贪污横行，吏治腐朽，大清王朝已然是一个烂摊子了。道光即位后，他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以他的才智和魄力，无法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他不想让清朝的祖业毁在自己手中，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恪守祖制，力图振兴衰败的王朝，可他的才华不及祖父乾隆，精明不如曾祖雍正，胆略不如高祖康熙，想重振雄风，实在是很困难。

二五 鸦片战争始末

道光皇帝即位后，由于国家财政的危机，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加上吏治腐败，道光皇帝感到举步维艰。而这期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邻近中国的印度和缅甸都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推销商品，企图占领中国市场，但却受到清政府闭关政策的限制，也受到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的抵抗。

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以纺织品、金属制品和从印度运来的棉花为主，后两种商品能够赚点钱，但数量有限。大宗的纺织品则亏损。而对于中国的茶、生丝等商品，英国的需求量又非常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出超额每年仍在300万两白银以上。英国为了改变不利的贸易格局，找到了鸦片，打算以此来扭转英国在对中国贸易中不利的地位。

19世纪以后，英国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甚至采取贿赂官吏，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在19世纪最初的20年当中，英国每年平均向中国输入约4000箱鸦片。到了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激增，到1839年，达到了将近40000箱。

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英国的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占到了1/2，到鸦片战争前，英国通过鸦片贸易改变其不利的地位，由入超转为出超。除了英国以外，美国商人也来中国贩卖鸦片，但数量比较少。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清朝政府自然感觉到这种局面，对自己非常不利，因为鸦片的大

量输入造成了财政的困难，而且统治机构，特别是官吏和军队也迅速糜烂和削弱。

实际上，从雍正七年（1729）起，就曾经严禁过鸦片烟。当时，朝廷下令“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

到了道光年间，鸦片泛滥成灾，封建地主和烟贩子们也同英国商人勾结起来赚钱，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吏治更加腐败，无数百姓因为吸食鸦片上瘾，而弄得家破人亡。很多清朝士兵也吸食鸦片，根本没有力气打仗，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直接危及清朝的统治。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内部，却在如何对待鸦片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部分官员认为，应该以更加严厉、更积极地态度禁烟，持这种观点的，被称为“严禁派”；而另一部分官员则认为，应该以开放鸦片市场的方法，达到最好清除鸦片的目的是，持这种观点的，被称为“弛禁派”。

两派各抒己见，争执不休，终于在道光十六年爆发了公开的论战。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皇帝上了《鸦片烟例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公开提出了弛禁主张，揭开了禁烟大讨论的序幕。许乃济提出的弛禁办法是：一、准许外商输入鸦片，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能用白银购买。二、允许内地人们种植鸦片，以此抵制洋烟进口，使其不禁自觉。三、允许民间吸食鸦片，但不准官吏兵丁吸食。

很显然，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实际上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不仅解决不了烟害，其后果将更为严重。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折子，提出了重治吸食鸦片的主张，将禁烟问题的论战推向高潮。黄爵滋的严禁措施是：一、加重惩罚，重治吸食，以一年为期，限吸食者

戒烟。二、建立五家邻右互保法，互保之家有违犯禁令者，各家都要治罪。三、官吏犯禁罪加一等。黄爵滋的主张是历年来最严厉的，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高度重视，也引起朝野内外的强烈反响。道光皇帝将此奏折转发给各省督抚复议。共收回二十九份反馈意见。其中，赞成严禁的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等八人，不完全同意或反对的，有直隶总督琦善、云南总督伊里布等二十一人。反对派占多数。

琦善等人不敢从正面反对严禁，转而从侧翼进攻，认为应该维持原来的禁烟办法，若重治吸食，则会矫枉过正，不利于体现圣朝宽大。他们对英国输入鸦片的罪行闭口不谈，却将广东一些“囤贩”说成鸦片泛滥的罪魁祸首。这实际上是为外国侵略者，以及包庇走私鸦片的清朝官员开脱罪责。

虽然反对派的势力很大，但严禁派无所畏惧，据理力争，林则徐多次上书道光皇帝，力陈鸦片走私的危害，并提出了自己的禁烟办法。林则徐的慷慨陈词，打动了道光皇帝，尤其是“流毒于天下，为害甚巨……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让道光皇帝感到了切肤之痛。他想，若果真如林则徐所言，大清的江山岂不要葬送在自己手中。

于是，道光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严厉禁烟，并把希望寄托在林则徐身上。

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五日，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林则徐从京城驰往广州，刚一到达，立即着手禁绝鸦片。他到广州时，无论贩运鸦片的洋商，还是国内的买办、掮客，以及吸食者都感到一股巨大的威慑力。在远离广州的粤西地区，居民听说林则徐禁烟的消息后，吓得慌忙把家中藏有的鸦片弃之门外，唯恐因此受牵连而获罪。

而广东地方依靠鸦片走私活动聚敛钱财的贪官污吏，却并不把林则徐的禁令放在眼里。他们在海上、岸边、内河、小路与不同级别的鸦片贩子环环接力，仍旧把鸦片运往各地。这些人的阳奉阴违，使林则徐的禁令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局面并未有很大改观。百姓因吸食鸦片日益穷困，州县官吏因此完不成每年应上缴的税额。与此同时，银价日贵，钱价日贱，导致银钱找换频繁的商人大笔赔本，穷苦的百姓更不愿交租纳粮。

擒贼先擒王，林则徐首先拿首商开刀，首商即洋商头领。他要求首商迅速将鸦片缴送官府，当时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渣甸闻讯后逃亡海上；另一英国人颠地尚在缴与不缴之间犹豫不决。林则徐强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督促各洋商，尽快将鸦片缴送完毕，同时声明将来若再贩运鸦片，甘愿接受中国政府严惩。义律见无机可乘，欲逃往澳门暂时躲避。林则徐获悉后，调集战船将洋商云集的广州夷馆围了个水泄不通，随即传令馆内中国买办撤出，迫使义律就范。义律起初坚持拒不投降，几天后见林则徐毫无通融余地，只好命令洋商缴出藏在夷馆内以及黄埔河鸦片趸船上的20283箱鸦片，合计237.6万斤。至此，林则徐取得了禁烟的第一场胜利。

林则徐原本是想把鸦片运回京师销毁的，但御史邓瀛提议就地销毁更好，以防鸦片在路上被偷换掉。道光皇帝同意了。林则徐决定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接下来问题便是该如何销毁这些鸦片了。林则徐曾使用传统“烟土拌桐油焚毁法”，销毁鸦片，但膏余却会渗入地中，吸毒的人掘地取土，仍得十之二三。于是，林则徐想出了“海水浸化法”，在海边挑挖两池，池底铺石，为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再挖一水沟。把盐水引入池中，接着把烟土割成四瓣，放入盐水，浸泡半日，再投入石灰，石灰遇水便沸腾，烟土溶解。士兵拿木耙不停在池中搅拌，让烟土完全溶在水里面。等到退潮的时候，放池水入大海，并用清水洗刷池底。

道光十九年（1839）6月3日，广州文武大臣在林则徐德率领下

来到虎门海滩销烟。虎门搭建了一座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面写着“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广东各高级官员全部出席。由于销烟是公开性的，可以随便参观，因此人们纷纷前往虎门浅滩。此外，还有外商、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等，都专程由澳门或其他地方前来参观。当中有人不相信林则徐有办法把所有鸦片完整销毁，林则徐让外国观察员进入池边，直接详看销烟的方法，沿途讲解，外国观察员看了全部的过程，反复考察之后，都心悦诚服。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对外国（主要是英国）商人提出要求：缴出鸦片，出具永不再带鸦片的具结。禁烟运动堵住了英国榨取中国巨额白银的渠道，英国资产阶级不甘心放弃这笔不义之财，他们极力阻挠破坏禁烟运动，甚至不惜动武。

为了迎击侵略者，林则徐积极筹备广东沿海的防务。他从禁烟的实践中，看到民众的力量，有了“民心可用”的认识。主张一定限度内利用民众力量来抵抗外来侵略。在民众的支持下，林则徐多次粉碎了英国的武装挑衅。

然而，就在此时，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却变了卦。道光皇帝原以为林则徐一道广州，收缴了鸦片，便可大功告成，一劳永逸，并未想到能与英国开战。对于林则徐对英作战捷报的批复，道光皇帝虽然也有赞许之词，但更多的是责备。他多次命林则徐尽快断绝与英国的联系，永远不准进行贸易往来。这让林则徐左右为难。林则徐不愿放弃禁烟，同时又认为应该发展正当的中英贸易，但他又不能不服从道光皇帝的谕旨。道光皇帝的意思是，取消中英贸易，闭关自守，但在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想以此一劳永逸地排除外国侵略的威胁，实在是一个愚蠢的幻想。

无奈之下，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一日，实施停止与英国贸易的决定。与此同时，严堵其他国家代运和私销鸦片之路。

林则徐的策略是正确的，但却不能继续执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则徐接到道光皇帝的谕旨，明令他废止具结、惩凶的正确措施。

林则徐几个月的努力，被无情的否定。更让他心酸的是，道光皇帝在谕旨中恶狠狠地斥责。对皇上的翻脸，林则徐没敢再顶撞。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加强海防，密切注视着英军的行动。

此时，在北京的主和派也加紧了破坏禁烟抗英斗争的活动。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利用道光皇帝急于收场的心理，奏请调离主张禁烟的邓廷桢为两江总督。这样一来，等于去掉了林则徐的臂膀。道光皇帝准奏。而此时，战争的阴云早已密布，正式开战只是时间问题，而道光皇帝还在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英军总司令。同年三月，英国政府组成了一支有四十八艘战舰，四千名士兵的东方远征军。五月，英军到达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英军本来打算在封锁的珠江口后，进犯虎门要塞，但由于林则徐严密布防，戒备森严，英军未能得逞。于是英军以大部分兵力北犯。六月六日，英军到达定海（即舟山岛），七日下午，开始攻城，清军一触即溃。八日凌晨，定海失陷。二十日，消息传到北京。从全局看，定海一地的得失，离战败还很远，但清政府立刻惊慌失措。

英军沿途散布林则徐、邓廷桢“行为无道，令辱大英国主”的言论。主和派也趁机攻击林则徐禁烟过激，惹来了兵祸。英军的火炮威胁，主和派的谣言煽动，使道光皇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道光皇帝，十分惶恐。他害怕英军北上天津，又派直隶总督琦善奔赴天津海口，准备对英军进行羁縻。

八月，英国舰队到达了天津大沽口。天津是京师的门户，但防务

极差。英军未费力气就进入了白河，向中国官员投递了英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

道光皇帝慑于兵威，罢免了林则徐，改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英军已达到了压迫清朝屈服，打击主张派的目的，加之天气渐渐转寒，英军中瘟疫流行，于是同意南返广州谈判。于是，在八月二十日，英军离开天津南下。

道光皇帝听说英军南返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对琦善的退敌之功大加赞赏。认为琦善“只言片语远胜十万雄师”。当即下旨，命琦善奔赴广州查办对英事宜。

琦善九月八日离京赶赴广州。就在同一天，道光皇帝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下旨将林则徐和邓廷桢革职。一年前还坚持禁烟的道光皇帝，现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主剿变为主抚，并将他亲自派去禁烟的林则徐革职查办，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首先，道光皇帝从琦善的奏折中，了解到英军船坚炮利，水师非其对手，因而清军只能在陆地上与英军对阵。这种坐待敌人进攻的战略，显然不能及时全歼来敌，战争将会长时间地拖下去。这是道光皇帝不愿看到的。他打的主意是，用“小恩小惠”打发英军回去了事。

其次，国家财富经不起消耗。道光皇帝即位时，国库已不充盈，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因此不得不大开捐例，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开支。前文说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道光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花钱如同割肉。他舍不得将本来就不充盈的国库，投入到战争这一无底洞里。

最后，英军的要求在于“贸易”和“申冤”。道光皇帝认为，只要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取消了对英国不利的措施，朝廷就应该自然而然恢复到以往的局面。

然而，事情并不像道光皇帝所希望那样发展。他所派出的钦差大臣琦善，是打着退敌建功的如意算盘，他认为，只要将林则徐查办，再从广东海关拨出一点款项作为赔偿，就可以基本满足英国的要求。他所争的，只是割地一事，希望英方不要使他为难，他尽量讨好，以换取英方的让步。于是，到达广州后，琦善在军事上实行撤防、裁减兵船，撤去海口内木排铁链，任凭英军小船探测内河水道，陆续起出水底的暗桩以及载石沉船。

英方代表义律初期曾一度表示不要求割地，但在掌握了琦善的求和心理，以及广州防务松弛的现状后，立刻出尔反尔，提出割地的要求，并且态度十分强硬。琦善进退两难，只好采取敷衍拖延的办法。可是义律等不及了，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十三日，义律突然递送战书。十五日，英军进攻大角、沙角炮台。由于琦善毫无准备，守军仓促应战，伤亡严重，炮台失陷。消息传到广州，一些官兵纷纷请战。琦善唯恐议和破裂，只准暗中增兵五百。

十二月十八日，英军围困虎门镇远、威远、靖远等炮台，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琦善仍抱幻想，继续暗中与义律议和。义律单方面公布了一份所谓的《穿鼻草约》，这份草约包括了割让香港、赔款、恢复贸易等内容。然而，琦善却向道光皇帝报告说，议和一事大功告成了，说英国答应交还大角、沙角和定海，因此，允许英国来广州通商，并仿照澳门之例准其在香港泊舟定居。

正当琦善庆幸自己议和“成功”的时候，却挨了当头一棒。二十九日，琦善接到道光皇帝严厉斥责的谕旨。道光皇帝本想通过惩办林则徐，使英国退兵，但英军提出割地、赔款等更加苛刻的条件。这些要求对一向妄自尊大的天朝皇帝来说，是无法想象的。道光皇帝一向视英国为“蛮夷小邦”，把允许和外国进行一些有限的贸易视为“恩赐”。现在，英国居然提出这些苛刻的条件，道光皇帝被激怒了，他认为英

国蛮夷欺人太甚，完全不把堂堂大清放在眼里，于是决心还以颜色。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月，道光帝下令对英宣战，派遣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奔赴广州。同年二月，英军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顺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三月，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落点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数日后，清军全线崩溃。在此形势下，奕山等接受英方条件，纳银600万元，换取英军撤出广州地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于是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000多人从香港北上，攻破厦门，占据鼓浪屿。旋北进浙江。十月再次攻陷定海、镇海（今属宁波）和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

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奕经率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讲和。

同年五月，英国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攻陷浙江平湖。六月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七月，英陆军攻陷镇江。英舰队驶抵南京江面，清军已无力再战，全部接受英国侵略要求。八月，清廷被迫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

《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有五项：

1．五口通商。根据《条约》第二条规定，将中国沿海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满足了英国侵略者蓄谋已久的欲望。

2．强占香港。根据《条约》第三条规定，把中国香港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3．勒索赔款。根据《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款项总计2100万元，分四年付清，包括赔偿鸦片费600万元，商欠费3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这笔巨款严重地削弱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这一费用必然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灾难。

4．协定关税。根据《条约》第十条规定，中国向英国商人征收进出口货物税，必须同英国政府商议。

5．其他问题。英国可以在通商口岸派设领事、管事等官；废除广东公行制度；释放卖国汉奸；英国管员与中国官员平等往来；英军占据中国的地区，直至清政府付清赔偿款项后才撤离。

这个《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此，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六 咸丰即位内幕

道光皇帝晚年的时候，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在皇太后死的时候，道光皇帝也已病入膏肓，甚至已经无力主持丧仪，要靠御前的大臣和侍卫大臣搀扶着，才能举行丧仪。

丧仪后的第二天，道光皇帝急召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穆彰阿、户部尚书赛尚阿等人入见。诸王公大臣进去后，发现道光皇帝快不行了。道光皇帝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吩咐道：“朕积病衰惫，不能再亲政了。国事紧要，今天册立太子，让他打理政务，你们要好好辅佐他。”

说完这句，道光皇帝便让太监召四阿哥奕訢进来。奕訢进来以后，道光皇帝让诸王公大臣们先出去，然后把奕訢叫到身边，说了几句话，声音很轻，秘不可闻。随后，道光皇帝又把诸王公大臣们召入，让奕訢跪在正中，诸王和御前大臣跪在左边，大学士和诸军机大臣跪在右边，总管内务大臣跪在后边。

紧急着，道光皇帝颤巍巍地拿出一个黄匣子打开，取出一个密封的折子。这个折子用棉纸封住，非常牢固，上面还有三个朱印，印有“御书之宝”的字样。道光皇帝撕开外封后，拿出一道朱谕，念道：“皇四子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

随即，道光皇帝便把朱谕交给刚立的皇太子奕訢，又从御座旁拿出一件龙褂交到奕訢手中，说：“这是朕的御衣，你现在穿上它，前

去料理政事。”

皇太子奕訢拿着衣服，只知道低声啜泣。

道光皇帝说：“这是喜庆之事，你别哭。”

此时，诸王爷和大臣们赶紧过来帮奕訢把御衣穿上。奕訢穿好后，道光皇帝让人把红绒结顶冠和朝珠取来，交给奕訢说：“这是朕的常御之冠和朝珠，你也戴上吧。”奕訢拿到后一边哭，一边戴上。

等到奕訢穿戴整齐了，道光皇帝又说：“皇太子既然已经受命，在宫里就要有个常居之所，现在暂时住在九州清晏吧。既然要理事，也要有个经常办公的地方，现在就在东书房里别置一座，以后就在那里处理公事。”紧接着，道光皇帝又说：“皇太子既居大内，六阿哥、七阿哥和八阿哥，都要搬到王府里去住，九阿哥年纪小而且刚出痘，就让他住在宫里再住一阵子吧。”

忙完了这事，道光皇帝已是气喘吁吁，最后说：“皇太子，朕的病越来越重，这三日不能看奏章，你带领各军机大臣去东书房处理吧。”

奕訢和王公大臣都奏道：“若遇军国大事，还请皇上处理。”

道光皇帝说：“朕要静心养病，有大事再来汇报吧。以后皇太子理事，要大公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三无私，以化天下。天子之德，要如水之请，如鉴之明，如衡之平，关键在于无私。你去吧，钦哉！”

而后，奕訢和王公大臣们便都退下，转到东书房办事。刚到中午，军机述旨还没有下，便又闻道光皇帝宣召。奕訢带来诸王公大臣急匆匆赶到后，道光皇帝龙御归天。奕訢伏地哀号，久不能止。诸王公大臣见他这么哭下去不行，便让内务府的人赶紧去准备丧事。紧接着，大臣们又劝告奕訢，抓紧时间到太和殿行登基礼，是为咸丰皇

帝，随后又大赦天下。

这就是咸丰登基的全过程。这篇实录来自清人郭沛霖所作的《日知堂笔记》。郭沛霖是曾国藩的儿女亲家，道光时期在京做官，他的记录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是，奕訢能当上皇帝，并不是郭沛霖所记录那么简单。因为奕訢继承皇位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四子，道光皇帝本来九个儿子，十个女儿。不幸的是，前面三个儿子都早逝了。幸亏在1831年的时候，道光皇帝连得两子，即皇四子奕訢和皇五子奕詝；而两年后，也就是1883年皇六子奕䟿又出世了，他的出世让道光皇帝既欢喜又头疼。欢喜的是，三年里得了两个儿子，头疼的是，到底该立谁为皇太子，让谁来继承皇位呢？

晚年的道光皇帝为立太子的事情很犯愁。当时，道光皇帝的六个儿子中，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外，而和皇四子奕訢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詝，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皇帝一向不喜欢他。后来，道光皇帝干脆将奕詝过继给了已去世八年且无后的三弟惇亲王绵恺。由此，皇五子奕詝也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外。

皇五子奕詝已经确定不是当皇帝的料。他酒量极大，又喜欢搞恶作剧。有一次，奕詝请人来家里吃饭，却不许客人夹菜吃，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他就给谁吃自己特别准备的韭菜馅包子，这包子极为辛辣，难以下咽，目的就是要捉弄别人，以此为乐。

这样，道光皇帝可选的皇位继承人，就只剩下皇四子奕訢和皇六子奕䟿了。但是，这两兄弟让道光皇帝十分为难，一时难以取舍。

按照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皇四子奕訢；可要论及相貌和聪明程度，皇六子奕䟿要远远胜过皇四子奕訢。奕訢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可在老成稳重方面，奕訢又胜过奕䟿。这实在让

道光皇帝难以抉择。

据《清代外史》记载，相比而言，道光皇帝还是比较喜欢皇六子奕䄔的，甚至，他几次把奕䄔的名字写进了立诸的密匣子中。但是，道光皇帝又考虑到奕訢是长子，且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皇四子奕訢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皇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皇帝带领宗室子弟到南苑打猎。出发前，杜受田悄悄地跟奕訢说：“阿哥等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别发一箭一矢，你手下的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了，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害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说的话，一定能契合皇上心意。”

奕訢言听计从，到了打猎复命的时候，皇六子奕䄔所献的猎物最多。而奕訢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表面上不说什么，其实心里都嘲笑奕訢无能。道光皇帝也觉得奇怪，就问奕訢是怎么回事。于是，奕訢把杜受田交给自己的话说了一遍。道光皇帝听后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道光皇帝晚年的时候，由于经常生病，身体日渐衰落。有一天，道光皇帝召奕訢、奕䄔两兄弟来见，颇有考查谁做皇位继承人的意思。奕訢和奕䄔两兄弟都觉得事情重大，便分别向自己的师傅讨主意。当时，奕䄔的师傅是卓秉恬，此人担任过很多官职，如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等，算得上是个有才的人。他告诉奕䄔说，到时候皇上问话，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

奕訢的师傅杜受田，很了解奕訢，知道奕訢言谈笨拙，应变能力远不如奕䄔。如果要论口才，奕訢是肯定会输给奕䄔的。于是，他教导奕訢说：“要是皇上说自己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问今后国策的话，你什么都不要说，只管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就可以了。”

等到奕訢和奕䜣两兄弟去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果然问起了自己百年之后，国事该怎么办的问题。奕訢便上前，抱住道光皇帝的双腿痛哭。道光皇帝大悦，心想奕訢果然仁孝，可做人君也。

当然，这些外史或野史记载的事情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皇四子既后来的咸丰皇帝奕詝确实有几分道光皇帝的风采。道光皇帝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皇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鏞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鏞的门生问他的做官之道，曹振鏞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这一标准来看，皇六子奕䜣就过于聪明活跃，不够稳重了。

道光皇帝最终选择奕訢作为皇位继承人，看来并不是偶然的。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假如当时道光皇帝选择皇六子奕䜣做继承人的话，或许晚清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就要改写了。然而，历史又怎能假设呢？

二七 内忧：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皇帝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他即位之初，也很想有所作为。但是，咸丰皇帝很不走运。从他当上皇帝开始，大清王朝就没有一天安宁过。由于多年的弊政积重难返。到了咸丰朝便来了个总爆发。咸丰皇帝面临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内忧：太平天国起义，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咸丰皇帝奕詝即位，当年的十二月，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先说咸丰皇帝对内碰到的最大难题，太平天国的兴起。

提到太平天国，首先要说到的人物，便是洪秀全。

洪秀全，公元1814年生于广东花县。他原本是个读书人，多次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却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洪秀全把自己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广大人民的苦难联系起来，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公元1836年，洪秀全认识了名叫梁发的基督徒。梁发送给洪秀全一本《劝世良言》的书，这本书促使洪秀全走上了起义的道路。洪秀全细细阅读了这本书，以此为基础，创立了“拜上帝会”。之后，洪秀全又花了两年的心血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籍文章，开始对广大下层人民宣传教义，洪秀全说，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应该平等相爱。上帝派我到人间解救你们的苦难，我们要团结起来，夺回自己的权利。

“拜上帝会”到处捣毁庙堂，同地主恶霸和官府做斗争，宗教活动

发展成了政治斗争，经过多年的传道和准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

就在咸丰帝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领导下，“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了武装起义，他们留起头发，头戴红巾，从金田村出发，转战附近州县，连战连捷，并且一举攻占了永安州城。

在永安州城，洪秀全自称天王，晋封“拜上帝会”中的骨干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随着上帝教的发展壮大，洪秀全的个人威望也在不断攀升。当然，他用的还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老一套办法：鱼腹藏帛、篝火狐鸣之术。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筹划起义，为了使九百名戍卒能够齐心协力，两人联袂表演了一个戏法，道具是一条鱼。事先，吴广用朱砂在帛上写了“陈胜王”三字，再将帛塞入鱼腹中。

这条鱼被吴广带到市场，又派士卒买回，中午会餐，做菜时有人发现鱼腹中的字条。晚上，吴广蹲草丛里怪叫：大楚兴，陈胜王。有人说那是狐狸的叫声。可狐狸怎会讲人话？硬要和狐狸扯上关系，那也是狐狸精的叫声。

这套戏法蒙了军中的士卒和农夫。大伙儿看陈胜的眼光明显异于往常。在士卒和农夫眼中，陈胜已然不是一个出身农家的穷小子，而是真龙转世。

洪秀全沿用了陈胜、吴广的这一招，只不过换汤不换药，利用了上帝教的新形式。有一次，洪秀全生了点小病，躲在屋子里七天没见任何人，七天后重见天日，就说这段时间里自己死而复生，去接受了上帝的教导，能预知未来事；以后他每隔一段时间就闭门不出，出来后就称去和上帝进行交流，接受其旨意；后来他干脆自称是上帝耶和

华的次子，耶稣是最自己的长兄。

第二年，以洪秀全为首的众王，率领起义军出广西，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一系列的战争，给清廷以沉重的打击。这时候，长江千里，西自武汉、东到镇江，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

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太平天国大军分水陆两路，沿长江两岸东下。陆路军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指挥；水路军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率领。

洪秀全则乘坐龙船，行驶在水军中央。水军船只有一万多艘，从头到尾排了几十里长。陆路军遍布大江南北两岸，浩浩荡荡，急速前进。

太平军进军到湖北东部广济县老鼠峡的时候，两江总督陆建瀛率领三千多清兵进行堵截。刚一交战，清军就败退，陆建瀛率领残兵败将，逃到了南京。太平军则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九江、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

南京有外城和内城两道关口。陆建瀛逃回南京以后，想凭借坚固高厚的城墙固守，抵抗太平军。太平军水路军停泊在南京城背面的长江上。从上游新洲戴胜关到下游的七里洲，布满了战船；陆路军则在长江岸边建立了24座军营。

为了减少攻城的阻力，洪秀全下令，在南京城外空旷处搭建了很多高台，让人到高台上向城外的群众宣讲反清的道理，以及太平军的纪律。守在南京城头的清军官兵抬眼望去，见从南京城外到江东门，纵横几十里，遍地都是头戴红巾、身穿短衣、手拿刀矛的太平军，无不心惊胆战。又见太平军蛊惑人心，便更加心慌意乱了。

做了充分准备后，太平军决定攻城了。从广西来的挖煤工爬到南京城边，在北门凤仪门的城墙下埋下火药、地雷。将城墙炸塌。太平

军冲进北门，与清军短兵相接，很快占领了外城。紧接着，太平军顶着内城守军的炮火，攻开南城的聚宝门和水西门、旱西门，如潮水般涌进内城，一举攻克了南京城。

天王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首领，在十多万太平军将士的簇拥下，进入南京城内。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

此后，太平军又相继占领了天京周围的镇江、扬州等地，在江南广大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片太平天国占领区。

太平天国把天京城内的百姓，分成男行女行，设立了男馆和女馆。男人除了参军之外，有手艺者，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从事集体的手工业生产。女人则被编入女营和绣锦营。

太平天国还贴出“招贤榜”，欢迎知识分子为天国办事，又通过科举考试，招揽文武人才。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不论门第出身，都量才录用，还特别开设了女科。但是，太平天国坚决反对孔孟之道，不许人们读孔孟的书。

太平天国还发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按照该制度的规定，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不论男女，不分老少。他们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天朝田亩制度》还提出要建立基层政权组织——乡官制度的方案。方案拟定每五家为一“伍”，设立一个“伍长”，五“伍”组成一个“两”，由“两司马”负责管理，农民收获的粮食，留够吃用外，一律上缴国库。如遇有婚事、丧事、生育小孩等，由国库按统一标准发给银钱和粮食。鳏寡孤独和残疾人、病人，也由国库出钱出粮养活。不过，这些规定，由于后来的战争等原因并未实行，它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

在定都天京后，咸丰三年四月（1863年5月），太平军两万多将士，在林凤祥、李开芳和吉文元等头目的率领下，从扬州出发，进入河南，准备经山东北上。但黄河挡住了他们前行的路。于是，北伐军沿河向西挺进。不久后，到达巩县。巩县的运煤工人用煤船送太平军过了河。

北伐军避实就虚，进入了山西太行山区，然后打着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旗帜，一路向前。沿途州县官吏以为这是自己上司征剿太平军的队伍，都争相供应物资。北伐军得到物资后，继续向北挺进。等到讷尔经额发现上当的时候，北伐军已经攻下了十几个州县，到了离保定只有六十里的张登镇。

此时，北京城里一片骚乱。太平军要攻打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穿遍了京城。京城的大小官员，以及富豪士绅们惶恐不安，很多人都携带家眷、财产逃出京城。咸丰皇帝命惠亲王绵愉，科尔沁王僧格林沁和钦差大臣胜保合力抵抗太平军。然而，太平北伐军没有继续北上，而是乘虚东进，打算先夺取天津。

驻扎在天津的清军不多，天津知县谢子澄焦急万分，当他听说太平军已经占领了静海和独流镇，前锋部对已经到了城西的杨柳青时，更是急得不知所措。不料，一连下了几天大雨，河水猛涨，天津城外成了一片汪洋。北伐军无法前进，只好放弃杨柳青，把兵力集中到静海和独流镇。

此时，天气日渐寒冷，从南方一路奔袭而来的太平军将士还穿着薄衣单衫。他们吃惯了大米，吃不惯面食，而当时连面食也不能保证供应。加上孤军深入，和天京失去了联系。因此，北伐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而清军的人力物力却十分充足。

北伐军一面派人和天京方面联系，一面利用周围的村庄、高台和小河筑起工事，严守阵地，还让太平军战士化装成商贩，到清军占领

区和北京郊区侦察敌情，为援军到来后攻取北京做准备。

此时，钦差大臣胜保指挥的清军和天津知县谢子澄招募的地主团练军，向静海和独流镇扑来。

太平军见清军来势凶猛，就在交通要道两侧设下伏兵，然后佯装撤退。清军见北伐军撤退了，紧紧追击，没追多远，太平军伏兵四起，冲杀了过来。清军大乱，丢下武器四散奔逃。

胜保不敢再贸然强攻静海和独流镇。此时，僧格林沁则以防止北伐军进攻北京为名，躲在王庆坨（天津西面）不与北伐军交战，下令将运河堤埂挖开，放出河水，冲断了静海和独流镇之间的交通要道。

北伐军只好在静海和独流镇之间的五里庄建立堡垒，分兵驻守，保持静海和独流镇之间的联络。但是，由于处在清军的包围之中，伤亡人员无法补充，粮食征集也越来越困难，援兵又迟迟不到，北伐军实在难以坚守下去。

咸丰皇帝得知这一情况，下旨命僧格林沁南下，与胜保会合，赶快与北伐军决战。于是，僧格林沁与胜保合兵一处，向北伐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北伐军坚持了三个月后，撤退到了阜城。胜保和僧格林沁分头率军来追，北伐军首领林凤祥与李开芳率军又退到了山东东光县连镇。他们听说援军已来到山东，就决定由李开芳率领一部分人马突围，去迎接援军。林凤祥则率军在连镇，挖掘深壕固守。坚持了将近一年，粮食吃光了。最后，清军用大炮攻陷连镇，林凤祥被俘。

李开芳率军抵达了高唐州后，才知道援军已经被清军打败了，便在高唐州筑起营垒，挖了几十里的地道，和前来“追剿”的清军反复较量。僧格林沁强攻不下，只好掘开运河河堤，把大水引入冯官屯。只剩800余人的太平军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

李开芳急中生智，带领心腹部将黄懿端和一百多人诈降，准备里

应外合击败清军，再突围南下。不料僧格林沁识破了这一计谋，把李开芳等人扣押起来，送到北京杀害了。

至此，太平军坚持了两年之久的北伐失败了。

太平军北伐的失败是非常可惜的。如果当时洪秀全和杨秀清能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并全力以赴，不断增援，太平军攻下北京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把大量的清军拖在北方战场，为太平军在南方的胜利提供了条件。

太平军出师北伐的同时，还派出了西征军。西征军一路杀敌，很快就占领了安庆、彭泽、湖口等沿江城市，又攻下了重镇九江。然后兵分两路，占领了庐州（今合肥）、汉口、汉阳、武昌。他们进军湖南的时候，和曾国藩的湘军交上了手。

曾国藩带领水陆两军攻打驻扎在长沙北面的太平军，却被太平军打得大败。曾国藩转而在湘潭与太平军作战，在湘潭打了一个大胜仗，接着，又带兵攻打武昌。洪秀全和杨秀清得到消息后，立即派翼王石达开去主持西线战事。

石达开扼守据点，坚壁高垒，不和湘军决战，只让士兵们在每天晚上用火箭、火球惊扰湘军，使湘军日夜不得安宁。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湘军被搞得筋疲力尽。石达开故意撤开鄱阳湖湖口的守兵，引诱湘军水师进入湖内。湘军正在进湖之时，太平军突然堵塞湖口水卡，把湘军水师割成两半，然后发动猛攻。石达开率军直取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逃到另一条船上溜走。太平军乘势发起火攻，打得湘军溃不成军。

太平军乘胜西进，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的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湘军，又一次占领了武汉三镇。保住了西征的成果，而且使太平天国在江西、安徽和湖北的地盘扩大了。

公元1856年，太平天国在军事和政治上，达到了极盛时期。可是，太平天国达到鼎盛期后，其头头脑脑们显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一场农民革命难逃一个宿命，那就是以封建君主思想为最高理想。即便他们的革命成功了，也不过是以新的不平等取代旧的不平等。当初造反是活不去了，有饭吃有衣穿谁没事造反。那时他们的欲望很简单，只想吃饱饭穿暖衣，有妻儿有个家。造反取得一点成绩以后，欲望就不再简单了。他们开始享乐。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天王洪秀全就吩咐手下，为他挑选美女60余名，供自己娱乐。在占领南京，建立国都后，这位天王马不停蹄地修筑王宫，大兴土木。

天王洪秀全临朝，除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几位外，其他文武官员都排列在大门外，按礼仪跪拜，山呼“万岁”。实际上，这时候的洪秀全和其他诸王已经不是结义兄弟的关系了，而是君臣关系。天王发布了一条诏令，规定他的臣下对他的子女，以及其余诸王的子女要用不同的称呼。

东王杨秀清出府，“开路要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钲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太平天国的官员出行都要坐轿，天王的轿夫多达64人，东王轿夫少点儿，48人，依次递减，北王轿夫32人，翼王轿夫16人，级别最低的两司马也有4名轿夫。

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天京事变”由此发生。

二八 内讧：天京血腥惨案

石达开西进，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

咸丰六年（1856）七月二十六日凌晨时分，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府内，忽然闯进一伙兵将，见人就砍，逢人便杀，无论男女老幼，凡是活物，都无一幸免。这是完全意义上的血洗和屠杀。对于东王杨秀清和他的家眷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在劫难逃的灭顶之灾。

当时，喊杀声将熟睡的东王杨秀清惊醒，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被闯入府邸的兵将乱刀砍死。这位太平天国的杰出领袖，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死去了。

兵将们从凌晨杀到天明。天亮后，整个东王府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味，到处是尸首、残肢和鲜血。东王杨秀清全家老小，以及部署官员，凡在府中者一律未能幸免。

不用说，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安排周密的残忍杀戮，整个行动过程既冷静，又疯狂。显然，兵将只是行动的执行者，那么，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无疑就是血洗东王府的元凶。

这个元凶会是谁呢？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仇恨？

先来说一说杨秀清的背景。

此人出生在广西桂平县，家里很穷，成分贫农。最早，他和西王

萧朝贵，跟着南王冯云山加入了拜上帝会。

1848年的时候，冯云山走霉运，被捕后关在桂平县监牢里。当时洪秀全又在广州，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状态很要命，人乱心也乱。

乱世的特点就是总能给一些人创造机会。杨秀清脑子活，假托“天父”下凡，站出来稳定大局。“天父”当然是臆想出来了一个神，雷同于上帝。杨秀清把自个儿塑造成“天父”附体，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不像现如今，花钱消费就是上帝了。那会儿得先忽悠完自己，再去忽悠别人。

于是，有“天父”还有“天兄”。萧朝贵和洪秀全配合，假托“天兄”附体。自此，杨秀清、萧朝贵一跃成为太平天国的首脑人物，洪秀全以“天父之子”的身份，被称为天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领导班子就这么建立了。

杨秀清在领导班子的成员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这个贫农家的孩子，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天生具有领导才能，英明过人，行事雷厉风行、赏罚分明，从而独领军权。这可是实权，全军上下无不敬畏。

这样一个相当了得的人物，谁敢对他下毒手呢？

清廷方面当然做梦都想除掉这样厉害的角色，准确地说，不单是想除掉他，而是想除掉整个太平天国，杀光他们所有人。可是，清廷方面没能做到，却有人帮了他们的忙。

这得从咸丰三年（1854）3月说起。洪秀全进入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以此地作为太平天国的国都。

杨秀清则指挥太平军进行北伐和西征。北伐军在李凤祥、开芳的

统帅下，兵锋直指北京城。西征军在翼王石达开的指挥下，大败湘军水师，江西十三府的七府一州五十余县全部被太平天国军占领。

同年6月，石达开等又击溃了包围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当时的钦差大臣向荣战死。

这一系列的战争，给清廷以沉重的打击。

这时候，长江千里，西自武汉、东到镇江，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这一时期，也是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可是，也就在这一时期，祸乱就像地雷一样悄悄埋下，这个祸乱有一个词可以很清晰的说明，就是——内讧。

内讧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开端具有隐蔽性，从面和心不和到大张旗鼓争斗，有一个矛盾积累的过程。

正如前文所述，共同打下来的地盘，地位和待遇却不一样，作为结义兄弟心理自然开始不平衡。可以这么说，在诸王心里，顶多把洪秀全当大哥，没当成“圣上”，怎么办呢？都是哥们儿，一起并肩杀敌浴血奋战不分彼此，你能当皇帝，为什么我就不能？

尤其是东王杨秀清，早不满足只掌握军政而已，他要与天王洪秀全平起平坐。于是，咸丰六年，清廷的江南大营被击溃以后，杨秀清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幕话剧。

剧名：《逼封万岁》

主角：男一号东王杨秀清，男二号天王洪秀全。

剧情：杨秀清在东王府里假托“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赶赴东王府，洪秀全一到，二人见面立刻开始一段精彩对白——

佯装“天父”的杨秀清问洪秀全：“你打江山数年，多亏了何人，才

有你的今天？”

洪秀全答：“多亏东王。”

杨秀清问：“你既然知道东王功劳如此大，为何他只做了九千岁？”

洪秀全硬着头皮回答：“东王打天下，大功盖世，当称万岁。”

杨秀清又问：“东王称万岁，那他的世子呢？”

洪秀全答：“东王是万岁，东王的世子也该是万岁，东王子子孙孙世代都是万岁。”

杨秀清很满意，一出逼封万岁的戏圆满落幕。

我们知道，这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以“拜上帝教”为信仰。杨秀清有“天父”附身的特殊身份，而天王洪秀全是“天父”之子。因此，杨秀清以“天父”身份讲话时，太平天国最高领袖总指挥洪秀全就成了他的儿子。儿子听爹训话得下跪。洪秀全还真就跪了。

更过分的是，有一回，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要杖打洪秀全，北王韦昌辉等官员跪地哭求，要替洪秀全受责罚。杨秀清不准，洪秀全只能连连说“小子遵旨小子遵旨”，随即接受杖打。

杨秀清这一招无疑是杀鸡儆猴，让诸王和官员们看看，总指挥都是我儿子，所以你们这些鼠辈全得听我指挥。

演绎了逼封万岁话剧后，天王洪秀全不得不向群臣宣布：今后遵天父圣旨，东王称万岁，东王世子也称万岁。并预定在杨秀清生日八月十七这天，举行东王称万岁典礼。

从“九千岁”到“万岁”，增加了一千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这是一个头衔和权力的问题。

那么，洪秀全真的心甘情愿与杨秀清平起平坐吗？他就如此妥协了吗？当然不。

洪秀全很沉得住气，他答应杨秀清称万岁，并为他举行典礼，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很清楚当前的处境，自己这个天王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并无实权，在无力还击的情况下，只能是秘密谋划，瞅准时机干掉对手。

谋划的第一步就是与翼王石达开和北王韦昌辉联手。石达开对杨秀清称万岁不服，韦昌辉更是对杨秀清恨之入骨。对韦昌辉来说，诛杀杨秀清不仅是辅助天王，而且是报仇。

这韦昌辉为何对杨秀清如此仇恨呢？

来看看韦昌辉的背景，他和杨秀清不一样，他不是出生在贫农家庭，他的父亲韦元玠是个小地主，在金田村有二百多亩田。韦家也算暴发户。有钱却没势力，常常受当地豪绅强宗的欺负。

韦元玠一心想让儿子韦昌辉考取个功名，光有钱不行，咱得有文化，才能光宗耀祖，抬高韦家地位，不再受气受欺负。可韦昌辉这小子哪是做学问的料啊，打小就华而不实，嘴巴油滑，好抖机灵，好在村里人面前出风头，村里人就送了他一外号，叫“花头鸭”。如今谁要有这外号，估计就得被人当成男妓。韦昌辉没这嗜好，他只喜欢赌博。有一次他去桂平县应试，考试前把长衫输掉，光着膀子进考场。至此，屡试屡败，连个秀才也没考取，韦元玠只得咬牙掏钱，给儿子捐了一个监生。

这个“花头鸭”本不会有什么出息，可被萧朝贵和冯云山瞧上了，他们知道韦家是富户，又常受强族欺压，要起义要打天下就要经费。于是萧、冯二人动员韦昌辉加入了拜上帝会，韦昌辉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当即入了会。儿子前脚加入，父亲韦元玠也跟着入了。

金田起义时，韦家父子捐钱捐粮又提供掩护，立下大功。太平天国起义后，在永州天王封五王。韦昌辉被封为北王。后来，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超贵相继战死，这么着韦昌辉成为仅此于东王杨秀清的太平天国领袖。

公证地说，攻克南京建都初期，韦昌辉是有功的。那时他主管军事，在北王府搭建高高瞭望楼，一旦敌军攻城，韦昌辉就亲自登上高楼指挥，白天以吹角摇旗为号，夜里则以悬灯为令，将士们就以号令出击，力战清军。

可是，一见韦昌辉能干有功，东王杨秀清便处处压制、羞辱他。接着就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剥夺兵权。

杨秀清先是在北王府发号施令调兵遣将。而后，下令将韦昌辉的军权转交给翼王石达开。将保卫国都天京的指挥部由北王府改设于翼王府。

不久，杨秀清又将他调离天京，派到湖北去任督师，刚出京城，又被调回，改派石达开前去。

第二件事：追查失职。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发生了“激变水营”事件——“韦昌辉排部下张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张子朋性情凶狠，因为争船只，责打水营多贼，众心齐叛。”

杨秀清以此追究韦昌辉的失职责任，将韦昌辉打了数百杖，几天都不能起床。第三件事：杀其兄长。

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妻兄为争夺房屋发生争执，大舅子杨秀清很生气，要杀了韦昌辉的哥哥。而且还不亲自动手，要求韦昌辉亲

自治罪。韦昌辉被逼无奈，给自己哥哥定了个五马分尸的死罪。

从这几件事可以知道，韦昌辉对杨秀清充满刻骨的怨恨。那么，表面上韦昌辉是什么反应呢？一般情况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韦昌辉却大不一样，他越是受到东王的压制和羞辱，越是对东王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他能忍。

忍能成大事。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逞匹夫之勇的无一不是惨败收场。韦昌辉就忍了下来，他越恨东王，面上儿就越做出一副畏惧的样子。让杨秀清以为，自己的权威完全把韦昌辉震慑住了，他被自己压服了。

相形之下，韦昌辉就奸猾多了。他有两副嘴脸，一副迷惑杨秀清，一副给了天王洪秀全。在天王跟前，韦昌辉时刻表现出对领袖的忠诚和爱戴，以博取信任。尤其是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要杖打洪秀全时，韦昌辉舍身要代替受罚。这一点让洪秀全很感动，又愈发信任这个北王了。

因此，天王决定除掉杨秀清，是韦昌辉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与石达开密议，要斩草除根，不但要诛杀杨秀清，还要诛杀杨秀清的三位兄弟杨元清、杨润清和杨辅清。

可是，韦昌辉和石达开还没商议妥当，杨秀清就已经敏锐地嗅到了杀气。

我们知道，但凡生死关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当你确定危险步步逼近时，不应该是退缩，退缩只会让自己像狗一样逃窜，结局是像狗一样被杀死。因此，最聪明的方式就是：迎上去打，让对方措手不及！

杨秀清的方式则比迎上去打更胜一筹，他来了个釜底抽薪。怎么干的呢？他命令韦昌辉赶赴江西任督师，命令翼王石达开赶赴武昌任

督师。这样，既瓦解了对方联盟的力量，又让危险远离自己身边。更关键是，北王和翼王一离开，他就可以加害洪秀全，除掉天王，再回头收拾韦、石二人，而后一统大权。

主意很不错。接到诏令的韦昌辉和石达开不得不上了路。但杨秀清万万没想到，就在他策划伺机夺位、谋害洪秀全的时候，却被他自己的心腹给出卖了。

这个心腹是谁呢？

他就是陈承容。这个人加入太平天国很早，可他放弃高官的位置，甘愿在东王府里做下人，干什么呢？专职侍候东王的两个儿子。他这么做自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东王曾经杖责过他，由此他怀恨在心，表面上假装对东王恭敬奉迎，久而久之，被东王视为可信的心腹。

这说明当别人妥协的时候，千万别认为对方软弱，那是对方静待时机给你致命一击。陈承容就是如此，他暗中向天王告密，说东王杨秀清称了万岁还不满足，还要杀王篡位。不但告了密，陈承容还自告奋勇，说自己愿意替天王杀贼。

得到通报的洪秀全，终于下了决心，他下密诏将韦昌辉、石达开，以及丹阳督师燕王秦日纲速回天京，共同诛杀东王杨秀清。

韦昌辉接到诏令，率领三千精兵，火速从江西赶回天京。与此同时，秦日纲也从江西赶回，和韦昌辉会合，密谋行动。

公元1857年7月26日夜，韦昌辉、秦日纲等人马进京。这时候，陈承容奉天王密诏已经带来一批人马在城内接应。虽然守卫天京的是东王的直属军队，但陈承容是东王的心腹，韦、秦二人又有天王的诏旨，因此没人起疑，也无人阻拦。韦、秦的人马很快控制了城内的重要地带，并领重兵将东王府四周的街道包围。这时已是凌晨，可怜的

东王杨秀清太大意了，此时他还在梦中，即便不在梦中，杀局已定，他也无法幸免一死。

韦昌辉一声令下，兵士杀入东王府。将东王府变成一片血海，然而，这场残酷的杀戮才仅仅是个开头。

杀戮行动一开始，韦昌辉就有自己想法，他对东王仇怨太深，非要对其斩草除根才后快；还有一点很重要，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力，势必就得将天京城内东王部属和将士全部消灭。于是，他假传了一条天王诏令——由于他和秦日纲滥杀东王亲属，天王杖责他们四百，并要东王部下前来监督。

东王的部下来了五千多人，亲眼看着韦昌辉被杖打。这些前来观看的将士都是交了武器看现场直播的。眼见杖打是真，韦昌辉和秦日纲又极为顺从，将士也就没有任何警惕。此时，早已武装到牙齿的韦昌辉部军队突然开始了围攻和屠杀，把五千将士全部屠杀。紧接着，韦昌辉下令，对天京城内与东王有关的其他人员进行屠杀，不分文武、男女老幼，包括婴儿也不放过。

这场大屠杀持续了两个月，从天京城门推出来的太平天国文武官员、将士等两万多具尸骸，顺江而下，把长江染得赤红。

整座天京城变成一个恐怖的死亡世界。

就在这场屠杀开始的时候，石达开回到天京，他要求洪秀全立即制止韦昌辉的行为。意想不到的，洪秀全竟然拒绝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洪秀全是在利用韦昌辉。

《石达开自述》中说：“故意加封杨秀清为万岁，激韦昌辉动手。总之利用杨秀清和韦昌辉的矛盾借刀杀人，杀死杨秀清和东王阖府，甚至使用圣旨诱杀杨秀清余部。”

如果是这样，韦昌辉设苦肉计诱杀五千将士的行动，是得到洪秀全认可的，那条杖责他和秦日纲的诏令，并非是假传，而是出自洪秀全手谕。

石达开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以为洪秀全会支持自己，所以没带兵就进城了。可是当他和韦昌辉都见面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处境危险，连忙跳城逃走。

石达开出城后，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国人，可洪秀全拒绝了他的要求。与此同时，以“反顾偏心罪”悬赏捉拿石达开的天王诏旨却传遍天国各地。

现在我们知道，韦昌辉在这场血腥屠杀中，只是个报私仇兼夺权的执行者，洪秀全才是真正的元凶。他对付石达开与诛灭杨秀清的手段如出一辙——他想利用自己的圣旨加上韦昌辉的势力，一举除去石达开。

可以想见，假如石达开真的被谁取了首级去领赏，洪秀全一定会把杀石达开的责任和杀杨秀清的责任一样推给韦昌辉，说自己是在韦昌辉的胁迫下下旨杀石达开的。于是石达开的“英灵”将为他顺理成章地诛杀韦昌辉做最后一次贡献。之后，洪秀全为了表示自己不忘功臣功绩，大约也会照杨秀清之例办理，把自己的某个儿子过继给石达开，再弄个“翼升节”什么的。于是乎，大家都会说天王英明，翼王可惜。

然而，石达开在天国军民中的极高威望，是洪秀全没料到的。举国军民拿着捉拿悬赏的圣旨当草纸，各地军队纷纷支持石达开举靖难之旗。当宁国告急，石达开暂缓讨伐韦昌辉，先退清兵之时，他的威望已经达到最高点。而也就在石达开开赴宁国援助陈玉成的前后，向天京方面发出通牒，再次公开要求杀韦昌辉以顺民心，并声称如若不然，将提靖难之师打回天京以清君侧。

眼见借韦昌辉杀石达开的计策落空，洪秀全只得清理门户，表现一下自己的“正义的姿态”。

夏历十月初五，洪秀全亲自就带兵，借城外翼王大军的声势，向乱党韦昌辉发起进攻，韦昌辉根本无力抵抗，到了最后，死命追随他的人员只有二百余人。这些也被全部杀死，韦昌辉被活捉。他的父亲韦元玠及全家老小全部被杀，只有他的弟弟韦俊此时在武昌与清军作战得以幸免，而后，韦俊投降了清军。

韦昌辉被活捉后，洪秀全下令将他五马分尸，并割下他的首级送到翼王石达开的军中，以进接石达开回京。为了一泄天国军民的愤怒，天王再次下令：将韦昌辉的尸体剁成肉块，每块两寸见方。悬挂在天京城内格栅示众，上面标明：“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

可谁是幕后真正最好的黑手呢？答案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场史称“天京事变”的太平天国叛乱虽然平息，巨大的损失却已无法弥补。成为太平天国迅速衰落的转折点。太平天国败于内讧，死于天王洪秀全之手。

二九 曾国藩：最具争议的晚清权臣

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历史人物，他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这个人，平生最为看重的就是清誉。可惜事与愿违。民国时，章太炎称他为“民贼”，待到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又称他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

然而，中国自古有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之说。还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历史上真正实现这些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却是其中之一。

由此可见，曾国藩是一个极具争议而又复杂的人物。如作家冷成金所言：“在曾国藩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

我们不妨从曾国藩少年得志说起。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地主兼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很有文化。祖父曾玉屏是个博学之人，父亲曾麟书是一名秀才，当过私塾教师。

可以想象，曾家的家教是非常严格的。正因为严格，曾国藩才饱读诗书，有扎实的文化基础。在读书方面，曾国藩颇有天赋，非一般人可比。他八岁便能读八股、诵五经，十四岁便熟读《周礼》《史

记》。

他没费多大力气，就在道光十二年（1832）考取了秀才。6年后，他又考取了进士。这一年，曾国藩才二十八岁，从此踏上仕途。

踏入仕途之初，曾国藩在京城供职，先后任职翰林院、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可谓平步青云，一路扶摇直上，升到朝廷二品大员。

不过，如果曾国藩不遇到一个特殊的契机，也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而不会成为一个叱咤风云，并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不到一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清政府下令，让各地在籍官员组织团练。清政府打的主意是，利用地主武装来打击农民起义的势头。

当时，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曾国藩丁忧在家。清政府的一道指令，给曾国藩提供的机会。他开始着手练兵。在家乡，曾国藩声誉良好，靠着亲戚、好友、师徒的关系，他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地方团练队伍。这支团练，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军”。

咸丰四年（1854），清政府下令，派遣初具规模的湘军去镇压太平天国。出发之前，曾国藩还特意颁布了一道《讨粤匪檄》，檄文写得热烈激昂，意在鼓舞湘军子弟奋勇杀敌。果然，湘军勇猛，竟然抵挡住了当时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抵挡可不光是防守，还一举将西征军赶出了湖南和湖北的境地。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团练武装，为何曾国藩手下的这支团练如此犀利勇猛呢？因为这支初期的“湘军”，在组建时，曾国藩就花了一番心思。首先，招收来的人，一律都是当时的乡民，吃苦耐劳，人又彪

悍。而老兵油子和懒惰的市民，一律拒收，这些人会带坏队伍。而军官则与普通士兵不同，他们大多来自曾国藩亲友中的读书人，他们忠君，有献身精神，不会和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

军官士兵都招进来了，接着编组。曾国藩把父子、兄弟，以及有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真应了那句老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你想这战斗力能不强么？能不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吗？你可别小看这种编组的招数，在当时是个创举，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在接下来的江西战场上，曾国藩的湘军，却被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两军在九江、湖口一带相遇，石达开连破湘军，甚至还擒获了曾国藩的战船。

一时间，曾国藩怒火攻心，他从未遭受过这样的失败，精神大受打击，险些要投水自杀。据说，当时曾国藩满脸泥沙，披头散发，模样狼狈之极。

此战过后，太平军再度占领了武昌，湘军第一次东征失败。

到了咸丰六年（1856），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的八府五十四州，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只能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之间，进退失据。

不在，恰在这个时期，太平天国的天京内部发生内讧，其领导人相互残杀。前文说过，前文说过，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的湘军后，太平军内部分裂，为争权夺利内讧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带了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指挥湘军，重新占领了武昌，随后连续攻克了湖口、九江。至此，湘军掌握了江西战场的主动权。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之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西线战场，由曾国藩直接指挥；苏南战场，由李鸿章率领淮军开辟；浙江战场，由左宗棠率领的楚军开辟。这样一来，从战略上对天京形成的包围之势。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率军向天京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曾国藩一贯信奉“乱世须用重典”的思想。所以，在攻克天京城后，他纵容部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据记载，湘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物即抢，一时间，血流成河，成堆的尸体涌入长江，几乎堵塞了江水，在曾国藩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秦淮河尸首如麻。”“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五逾于今日。”

有人说，曾国藩是“剿灭”太平天国的“元凶”，而这个“元凶”，后来却又一步步登上了“圣相”的高位。其实，曾国藩升官一直很快，三十七岁时，便已官至二品，且声誉良好，被近代不少政界人物封为“官场楷模”。而他在险象环生的仕途之路上，却始终能够安然无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曾国藩是一个笼络人才、使用人才的极品高手。他的幕僚个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才，或下笔有神，或擅长理财，或熟懂法令，或精通政务。曾国藩对人才求贤若渴，使投奔他的人络绎不绝。每次有投靠者登门，曾国藩都要发给薪水，让投靠者先安顿下来，吃好喝好住好，然后才会面。

在面试投靠者的时候，曾国藩察言观色，细致分析，以求人尽其才；文采好的，就去做文案工作；有胆识、有谋略的，就派去打仗；学问好的，就派去校勘书籍；谨慎的就派去筹办粮饷。曾国藩仿佛有

一双“火眼金睛”，他总是能准确地抓住人才，让其发挥自己最大的才能。识人、辨人、用人，这套功夫，绝非一般官员可以企及的。

曾国藩还是一个号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文人，所以他非常尊重大儒和学者。因此，他身边还笼络了一批如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等大儒。曾国藩的幕府，就如同一个小朝廷一般。

曾国藩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所以，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就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人。他人格精神力量十分强大，从年少时，他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用以自我反省。曾国藩还特意留下了一本《家书》给自己的子孙。曾国藩在这本《家书》中，阐述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己的精神境界。

曾国藩还是后来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实，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曾国藩内心是鄙夷，甚至是厌恶维新派的。因为维新派“奉洋若神”。

然而，“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的景象，让曾国藩渐渐接受了一个词，叫“师夷自强”。

咸丰十年（1860）的时候，曾国藩曾在奏折中谈道：“将来师夷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第二年，他支持向洋人购买船炮，以“围剿”太平天国军。

湘军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军械所，专门制造洋枪洋炮。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大清王朝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平稳期，后

世称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在这个事情，曾国藩开始加入了推行洋务的行列。

对此，曾国藩有清醒认识，他认为，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西方经济则是以商业为主。而且，曾国藩还从经济体制来分析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曾国藩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掌握了经济权，也就掌握政权，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这样的深刻认识，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上，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在上海购买机器，制造枪炮，可惜由于经费不足，制造局周转困难。次年，曾国藩据理力争，请朝廷特批一项专款，作为购买和制造轮船的费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才正常运转。

三年后，也就是同治七年（1868），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火轮出炉，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达120华里。曾国藩将这艘火轮命名为“恬吉”。

“恬吉”号在吴淞口试航，到达南京后，曾国藩亲自登船感受。后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中国自强之道基于此。”

曾国藩认为，制造兵器、炮船，应该以培养中国人自己的能力为主，国人只有学会制造的原理和技术，才能真正认识到西方科学的重要性。可以说，曾国藩是把“师夷自强”的提法转化为了实践。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爆发。

关于“天津教案”，要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在天津望海楼旧址上，盖的一座天主教堂说起。这座教堂，被当地人称为“望海楼教堂”。在教堂附近，还有一个“仁慈堂”，也是法国传教士修建的，用来收养中

国孤儿。

同治九年，仁慈堂里发生瘟疫，几十名中国孤儿死亡，尸体被埋在郊外。后来，尸体被野狗刨出，啃噬得惨不忍睹。这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与此同时，天津发生了多起拐骗儿童案。嫌疑人被官府擒获后，招认说，是受望海楼教民的指使。这在天津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士绅在孔庙集会，学生罢课，要求官府惩办洋教，拆除望海楼教堂。

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天津知县刘杰将嫌犯押往教堂对质。群众闻讯，都聚集在教堂周围。传教士谢福音一看这个阵势，惊慌失措，放出教堂内豢养的恶犬，还指挥教民驱赶群众。群众奋起反击，将教堂门窗砸毁。事态升级。

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得到报告，当即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崇厚出兵镇压。崇厚却不答应，丰大业一怒之下，对崇厚连开两枪，但没击中。丰大业便和自己的秘书一起，把通商衙门里的家具器物全部砸毁后离去。

在回领事馆的途中，丰大业又与天津知县刘杰相遇，一言不和，丰大业又举枪向刘杰射击，不知是丰大业视力差，还是枪法烂，这一又没打准，没打中刘杰，打中了刘杰的一个随从。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围观民众，于是一拥而上，将丰大业活活打死。

此后，民众向袭击教堂。打死了传教士谢福音，还有一些修女、洋商和洋职员，共计20余人，又一把火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和法国领事署。

这一举动给了列强以口实，英、法、俄、德、比利时、西班牙等七国舰队在天津、烟台集结，要求清廷严惩闹事民众。

清政府立刻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天津处理这一事件。曾国藩到达天

津后，经过调查，认定双方都有过错——教民欺负百姓，教士庇护教民，领事庇护教士，而拐骗儿童，继而挖眼刨心的事情也属谣传，毫无实据。

可是，民众却不以为然，谣言越传越广，以至于曾国藩贴出的说明情况的告示，一到晚上就被人撕毁。甚至在告示所署“曾国藩”名字上挂了一绺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卖国求荣。

实际上，当时曾国藩抱病在身，他心力交瘁，以“中庸”的方式，最终把天津教案办成了典型的屈辱外交，引得全国上下一片骂声。连慈禧太后都公开声称“曾国藩文武全才，可惜不能办教案”。

此后，清政府将李鸿章调到天津，继续调查，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责任，全推到曾国藩身上。

别人不知道，曾国藩自己心里很清楚“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对于来自各方的责难，他只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应付，并不多做辩解和解释。

天津教案事发两年后，也就是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病逝，终年六十二岁。清朝政府给予他“公忠体国”的论定，谥号“文正”。

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权臣、重臣，曾国藩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仍能保住晚年，关键在于他熟读史书，知得失，即使在危难之际也不树敌，也懂得以退让换得平安。一句话，恪守臣道，不违友道。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和曾国藩一直注重修身养性有关。曾国藩的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和谦虚等。他的生活起居也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

慈禧太后也曾感慨道：曾国藩是“天下第一正人”。

三〇 叶名琛的悲剧

前文说过，咸丰皇帝即位后，面临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内忧：太平天国起义；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上下并没有从中学到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挨打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国。

咸丰四年（1854），《南京条约》届满13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税，外国公使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虽经交涉但没有结果。

咸丰六年（1856）十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的借口。事实上，“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是早已过期了。广东水师于10月8日在“亚罗号”上，逮捕了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跟英国没有丝毫关系。

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宣称“亚罗号”乃英国船只，并且捏造说中国士兵曾侮辱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把被捕的人释放，并赔礼道歉。叶名琛的态度非常强硬，据理力争，坚持不赔礼道歉，只答应把逮捕的人放掉。

说到叶名琛，熟知历史的人，就会想到他提出“六不政策”，即“不

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措施。因为这个措施，叶名琛被英军俘虏，死后又被咸丰帝剥去爵位，从而遭到后世的嘲笑。但是，叶名琛的笑话，并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原因，而是清政府的错误政策，叶名琛只不过是错误政策的牺牲品罢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对外方针一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这条方针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一个让人难以两全，不可能实行的死方针。然而，尽管英国已进攻广州，“边衅”已开，蒙昧自大的清政府却仍然死抱着这一方针不变。多次谕令叶名琛“既不可意存迁就止愿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

叶名琛只得在这“宽猛两难”中，按照朝廷旨意行事，“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

当然，有一点要说明，叶名琛愿意严格执行清政府这一条前后矛盾的死方针，与他本人的出身、经历 and 知识有密切的关系。

介绍一下叶名琛。他是湖北汉阳人，从他的曾祖起，世代为官。道光十五（1835），叶名琛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从此踏上仕途，一路顺畅，到了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已当上了广东巡抚。从初入仕途到一方大员，叶名琛只用了短短13年时间。到了咸丰二年（1852），叶名琛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可谓青云直上。这造成了他对清朝皇帝的感恩心理和愚忠。因此，在处理政务中，他坚决依照皇帝的旨意，不敢稍作半点的更改。

从知识结构上看，叶名琛是在传统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特点是：迂腐、喜欢说大话、缺乏世界知识。然而，就这样一个迂腐的官员，却通过两件事的偶然成功，获得了擅办外交的美誉。

第一件事是道光二十九年，即公元1849年3月，英国人欲入城，巡抚叶名琛与总督徐广缙采用的办法是一方面向英国人宣示不准进城

的“假圣旨”，以不失天朝国体；另一方面又加强海陆边游，并利用当时民众反进城的声势，企图以兵威吓退侵略者，以达到“不启边衅”。这个办法本来是行不通的，但由于当时的侵略者准备不足，不想在这时候打仗而搁置了入城的要求。因此，叶名琛等人这一次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第二件事是叶名琛处理的一桩洋教士潜入内地的案件。这一次，他用的办法强硬的“申列条约，奏交各国领事，严加约束，勿任复至内地”。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没有洋教士可到内地传教的条文，所以叶名琛这次又获得了“不失国体”“不启边衅”的成功。

这两件事的侥幸成功，更增加叶名琛对清政府前后矛盾方针的坚定性。然而，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准备并不充分的英国侵略者，清政府的对外方针已经不能实行，如今面对蓄谋已久的英法联军，清朝政府的这条方针就更是行不通了，死抱着这条方针的叶名琛，只得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措施，以任凭侵略者宰割的态度，来表现自己对清政府的忠心和对清政府所定政策的坚决执行。

由于清政府明文规定“不开边衅”，叶名琛提出相应的“不战”对策，既不能战，自然也“不守”，因此，“不战”“不守”四字是清政府外交方针的具体表现。

而所谓的“不和”政策，主要来自于叶名琛自己反侵略的思想。叶名琛反对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对外国侵略行为一直持强硬的不妥协态度。因此，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叶名琛拒不向英国赔礼道歉。

咸丰六年（1856）10月23日，英军行动了，三天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军炮轰广州城。在英军的步步紧逼下，广州城岌岌可危，叶名琛深知备兵抵抗，必遭“启边衅”之咎，于是他想依靠民

力来反击侵略者，他发出告示：准许人民对“滋事英匪，痛加剿扑，准其格杀勿论”，又“悬赏格，斩英人头一颗及生擒一名，俱赏银一百两”。在朝廷束缚其手脚的情况下，他能用民力抵抗，绝不是屈服投降的表现。

由于叶名琛态度强硬，遭到英国侵略者忌恨，因此，在攻城时，他们的炮火“专击督署”。英军头目巴夏礼、威妥玛及汉奸张同云、李小春等都“大责叶相，恨恨不已”。最后英军将叶名琛俘虏，目的是为了侮辱他，以泄切齿之恨。

叶名琛的“不降”“不走”策略，来自于清政府的“维护国体”的方针，无论投降还是逃跑，在叶名琛看来，都是失民族节气，失国体的。那么，叶名琛为什么又提出“不死”的主张呢？是叶名琛怕死吗？不，他还真不怕死，当英军炮轰广州城时，巡抚柏贵的表现是“口噤手颤”，而叶名琛在炮火“专击督署”的情况下，还整理紧要文件，坚决不肯躲避。

咸丰七年（1857），英增派远征军2900余人抵达香港。法国以天主教神父马赖被判死刑为借口，也派远征军1000人，与英组成联军，共舰船61艘，总兵力1.1万余人。联军分三路进攻广州，守军大多一触即溃，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举白旗降，叶名琛被俘。但是，当他被俘上船时，随从人员曾示意他投水自尽，以保全名节，他却没有那样做。他说：“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翼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期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的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食物。”

叶名琛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他以为可以利用自己还有用之心去和英国国王辩论，并且当着英国国王的面谴责他们的行径。叶名琛很傻很天真，他企图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和力量来说服英国保持同中国的

友好关系。他良苦的用心值得同情，可他书生似的迂腐之举，又实在可笑。

总之，叶名琛是可悲的人物。他在印度的时候，尚且保持着民族气节，他拒绝乘坐外国马车游玩，拒绝食用外国食物，而且还时时惦记着国内的战事：“闻战稍有喜色，闻和则太息耳。”当自己所带粮食用完，遂绝食而死。

叶名琛的悲剧，是清政府无法实行的对外方针造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上层社会必然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对外国侵略者，有抵抗的，有投降的，还有的则如叶名琛，令人奇怪不解，其实细细分析则并不奇怪，各种人物的出现，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叶名琛想抵抗外国侵略者，然而大环境和清廷的对外政策制约了他，而他的出身和经历又导致了他的愚昧、固执和自负，从而导致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或许，在百姓心目中，叶名琛是个怪人。但从当时的整个大局势来看，满清政府的官员们不得不怪，也只能成为怪人。

在印度的叶名琛绝食而死，这让人想起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叶名琛不食“洋”粟而死掉了，他自比为苏武，这个恐怕不太准确，因为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但叶名琛不是这样，他是被人从中国活捉到异国的。一个是自愿出国被人扣押，一个是被人逼着出国被人扣押。

但这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却认为自己就是苏武，因为他永远认为自己所效忠的大清王朝是天朝上国。况且，按照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是封疆大吏，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的使命，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也可以说叶名琛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

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叶名琛当然认为自己是苏武。

为了不辱使命，叶名琛要保持中国人的名节，所以，他只好饿死。

有人说，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己进贡的蛮夷。

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怪，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却撞上了新时达的门槛。他到死也没有明白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命苏武。

叶名琛的悲剧实际上是很多晚清官员的悲剧。

三一 最后一位出生在紫禁城的皇帝

咸丰皇帝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很不好过。长久以来，他一直处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中。只有一件喜事，就是儿子载淳的出生。载淳即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咸丰六年（1856），新年伊始，大清紫禁城储秀宫内一片繁忙。太监、宫女在总管太监韩玉来的指挥下，不停地来回奔走着。原来，甚得咸丰宠爱的懿嫔，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已经怀孕7个月了，接近临产期。早在年前腊月二十四，咸丰皇帝就命总管太监韩玉来传旨，把懿嫔的母亲接到宫中照看女儿。

按照清宫的规定，妃嫔等人怀孕，一般要到8个月时才开始进行临产期的各项准备工作。但咸丰皇帝自二十岁登基以来，至今已有6年，只有丽妃生过一个女孩。皇位无人继承，咸丰焦虑万分。因此，大年一过，整个皇宫就忙碌起来了。随着预产期的临近，新生儿用的衣物，尿布等物也都准备齐全。由于是皇室所用，自然不同寻常，不仅种类齐全，而且用料讲究。三月初九，御医为懿嫔摸脉，根据脉象，懿嫔妊娠已近9个月。第二天，又由两位经验丰富的接生婆摸脉，估计将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分娩。于是各项准备进入最后阶段，各种接生工具陆续被送到储秀宫。

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三日未时，一声婴儿长啼从储秀宫中传出，划破紫禁城的上空。咸丰皇帝盼望已久的喜讯终于传来。总管太监韩玉来前来奏报：“三月二十三日未时，懿嫔分娩阿哥，已经收

拾利落，母子均安，万岁爷大喜！”

咸丰皇帝欣喜万分，当即下旨，晋封懿嫔为懿妃，储秀宫的太监也都提职的提职，升官的升官。对宫女，接生婆也各有封赏。一时间，整个紫禁城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然而，这种景象在紫禁城很快便一去不复返了。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大清王朝江河日下，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到尽头，同治皇帝成了在皇宫中诞生的最后一位皇帝。尽管咸丰皇帝的玫贵人曾在咸丰八年二月生有一子，但旋即夭折，从此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成了咸丰皇帝的独苗。

就在载淳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咸丰七年（1857），英国军队攻占了广州。次年，英法联军北上，到了天津大沽口，攻陷了大沽，同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

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火，眼看就要燃到了北京。咸丰皇帝坐不住了，带着后妃和一批官员逃到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留下皇六弟恭亲王奕訢在北京，负责与英法联军议和。

这一年的八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并闯入大清帝国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英法军队在圆明园疯狂抢劫，当他们发现是在无法带走全部珍宝时，就放了一把大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此时的咸丰皇帝，回天乏力，不仅是因为大清帝国在军事上的软弱，还因为他自己的病情越来越重。

咸丰十一年（1861）8月21日，热河行宫气氛低沉，咸丰皇帝病危了，在最后时候，他紧急召见了端华、载垣、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位大臣来到床榻前，宣布立载淳为太子，并让八位大臣辅佐年纪尚幼的载淳。

次日，咸丰皇帝病逝了。他的独生子载淳继承皇位。载淳的母亲

被尊为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欲利用圣母皇太后的身份，谋夺最高统治权，她很快就同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勾结起来。

慈禧太后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擅权，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但是，这一个提议遭到了以载垣、肃顺为首的八大臣的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本朝从来没有皇天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计划未能得逞。

这一年的十月，恭亲王奕訢在和英法联军进行密谋之后，借“奔丧”之机赶赴热河，同慈禧太后商议回京发动政变。奕訢回到京城之后，笼络了京、津一带驻扎并手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为政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承德回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命肃顺护送咸丰皇帝的棺槨走大路，她和载垣、端华等大臣则走小路，提前4天到达了北京。

11月1日，慈禧太后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早上，便发动了政变。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职务，载垣、端华当场被逮捕，并派人去逮捕路上的肃顺。11月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了咸丰皇帝的遗诏，下令把肃顺斩首。并命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位大臣，革职的革职，充军的充军。

那么，八大臣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慈禧太后给的第一个罪名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这也相当于在跟西方列强表示自己是“尽心和议”的。

11月11日，慈禧太后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为“同治”，取东、西两太后共同治理朝政的意思。

自清朝入关后，皇帝一般都采用一个年号，只有同治皇帝用过两个年号。一个就是“祺祥”，一个就是“同治”。“祺祥”是咸丰十一年（1861）拟定的。这两个字出自于《宋史·乐至》中“不洎不童，诞降

祺祥”一语。“不涸不童”就是说河流畅通，山川茂盛，地尽其利，物阜民丰，故而“诞降祺祥”。

按清朝的祖制，年号一般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后颁布。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顾命大臣，在小皇帝即位不久，就忙于拟定年号，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因为在咸丰皇帝逃奔热河后，官钱票迅速贬值，银价上涨，物价昂贵，民不聊生。当时京城许多富商把大量铜钱囤集起来，加剧了现钱的短缺。所以，肃顺等人想立即铸造出一批新币投入流通。

一开始，慈禧和慈安太后钦准了这个年号。肃顺等人便立即派人到云南采办铜料，开铸“祺祥重宝”。“祺祥”本是吉祥之意，但却没给肃顺等人带来任何好运。不久，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政变，“祺祥”年号的“祺祥重宝”尚未正式发行，就被政变者扼杀了。

这次政变在历史上被称为“辛酉政变”，因为这一年刚好是辛酉年。而政变发生的地点是北京，所以叫作“北京政变”。

政变成功后，恭亲王奕䷑集团掌权，就重新集议改元之事。为奕䷑等人搞政变摇旗呐喊、大造舆论的李慈铭，向肃顺的改元问题发难，他说：国朝即位改元，向来都是由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拟定数个，交给皇帝，由皇帝亲自选定。现在新君还没有即位，就先商议改元，不符合祖制。

李慈铭是奕䷑集团的重要成员，他说肃顺在幼帝即位前改元是非法的。而所用“祺祥”年号又文义不顺，历史上很少有人用，进而讥讽肃顺等人不学无术。事实上，李慈铭自己也高明不了多少。在否定了“祺祥”年号后，他搜肠刮肚地拟了“熙隆”和“乾熙”两个年号。奕䷑很不满意，不屑地说，他这是迂腐书生之见，不能用。

后来，经奕䷑、文祥等共同商议，最后决定用“同治”两个字。这

两个字的妙处在于会意。在两宫太后看是两宫同治；在臣子们看来是君臣同治；在民间看来是上下一心同治，因此都觉得满意。

这个年号呈给两宫太后，慈安太后没说什么，慈禧太后则拍手称好。慈禧是很重名位的人，她一直对太后分东、西宫，自己名分比慈安逊色而耿耿于怀。现在用“同治”二字，恰恰可以表示两宫并尊，没有嫡庶之分，这是她非常满意的。当然，她也能体味到“君臣同治”这一层的含义，她给奕䷐加上“议政王”的名衔，正好是“同治”二字最好的注解。

然而，注解只是注解。事实上，在辛酉政变四年后，也就是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太后和奕䷐，这一对“辛酉政变”的盟友便爆发了一场权力争夺战。

三二 慈禧与奕□的权力争夺战

“辛酉政变”的成功，是慈禧太后迈上权力巅峰的第一步。她很清楚，要想在政治旋涡中不被淹没，还要一步步奠定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

随着对外交好列强，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顺利进行，慈禧太后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便开始着手对付和她分享权力的恭亲王奕□。虽然在“辛酉政变”刚刚结束的时候，两位皇太后曾对奕□大加封赏，但限制奕□权势的行动，也同时被提上了日程。

奕□被授予议政王之后的第二天，两宫太后就宣告说，军国大事要由两位皇太后亲自处理，其他大臣有什么重大的事务还可以向两位皇太后上密折奏报。这无疑是给奕□一个下马威。

奕□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慈禧太后的用意，但他觉得自己一步步苦心经营，在北京与洋人周旋，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况且，北京的很多官员都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他并没有忌惮慈禧太后发出的警戒信号，依然我行我素。反而很有点权势熏天的架势，有时候，政见不合，他与慈禧太后当面争辩。

奕□这种“不敬”的行为便更加促使慈禧太后下定决心要限制奕□的权力。

当时，奕□的主要势力在总理衙门和军机处。这里，要特别说一说总理衙门。这个部门的建立，要从咸丰皇帝说起。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被迫出逃热河，圆明园被焚

毁。奕䜣在北京主持与外国列强签订《北京条约》之后，陷入了反思。列强的实力已经不容忽视了，遥想60多年前，乾隆皇帝还能趾高气扬地面对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率领的访华使团。60年之后，大清王朝完全丧失了高高在上的资本，这个王朝已经虚弱得不堪一击了。

奕䜣认为，清政府再也不能靠闭目塞听来自欺欺人，于是他奏请咸丰皇帝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外务事宜，以免总是对外务缺乏系统的认识和管理。

咸丰皇帝看到奕䜣的奏折后，立即召见心腹大臣肃顺、载垣等人商议。商议的内容不是该不该建立总理衙门，因为外务的重要性已经不容置疑了；而是建立总理衙门后是否会出现总理衙门权势过大，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肃顺思忖再三后，向咸丰皇帝提出的建议是：随着时事变迁，洋务事宜的增多，的确需要一个部门来加强对外务的管理。但是，不同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提法，应该给这个衙门的名号再加上“通商”两个字。这样一来，以往设立的礼部、理藩院都还有事可干，不至于使这个部门总揽大权，也不至于让奕䜣的权势大到难以控制。

肃顺的这个提法，立即得到了咸丰皇帝和其他大臣的一致认可。

奕䜣接到咸丰皇帝的批示后，发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名号上加上了“通商”两个字，立即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但他并不肯就此罢休。一方面，总理衙门如果权力过小，对他自己肯定没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如果总理衙门在诸多的外务事宜上还要和礼部、理藩院互相扯来扯去，那么这个部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于是，奕䜣又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强调单纯的通商事务已经有其他部门来管理，现在清政府所面对的列强，不单单是通不通商的问题，总理衙门的管理范围也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外国列强的诸多举措。

奕䜣的第二道奏折，振振有词，情真意切，虽然肃顺等人仍然坚持要在总理衙门上加上“通商”二字，咸丰皇帝权衡之后，还是同意了奕䜣的请求。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1861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批准成立，总揽外交以及与外国相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等多方面的内容。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正式成立以后，不仅成为了清政府的外交机构，还成为了与军机处并驾齐驱的权力部门。而总理衙门的组织结构也是效仿军机处建立的。主要由总理大臣和章京组成。首席总理大臣一人，由亲王等皇族兼领。奕䜣任总理衙门首席总理大臣的时间最长，长达28年。总理大臣总体上无固定数额，总理衙门初设时，由奕䜣、桂良、文祥3人担任，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个人至于十余人不等。在内部组织上，由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以及清档房、司务厅组成，每个股办理与自己管辖范围相关的对外事务，责任明确。在京师有海关总税务司及京师同文馆两个附属机构，抽调各衙门章京，分属办事。

“辛酉政变”之后，随着奕䜣权势的提升，总理衙门的地位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理衙门管辖的范围一步步拓展，凡是和外国有关的且不属于六部管辖范围的，都划归总理衙门管辖。比如关税、学堂、铁路、电报、海防、传教等，都是总理衙门管辖的范围。

所以，慈禧太后要限制奕䜣的势力。慈禧借着一次和奕䜣闹僵的机会，连发两道上谕，明确指出奕䜣今后不得为发展自己的势力而推荐官员升迁。慈禧还逐步罢免了倾向于奕䜣的一些官员，既达到了震慑奕䜣的作用，又剪除了奕䜣的羽翼。

随着慈禧太后与奕䜣的矛盾日益加深，一些投机取巧的官员正在紧紧盯着这个机会，把慈禧太后所好看成自己飞黄腾达的绝佳良机。

蔡寿祺就是这样一个官员，他仔细权衡后，认为还是倒向慈禧太后这一边有利可图，于是上了一道奏折，指出议政王奕訢贪污、骄横、大权独揽、徇私舞弊四大罪状。慈禧太后看到奏折后心中大喜，立即召见奕訢进宫，对其当面斥责。奕訢不仅没有诚惶诚恐，反而火冒三丈，嚷嚷着要找蔡寿祺算账。慈禧太后见奕訢如此骄横，便命人将他逐出大殿，随后避开被奕訢掌控的军机处，命一些老臣直接发布诏书，责成一些官员对奕訢所犯罪状进行一一核查。

诏书一出，内外震惊。在内，大量身居要职的官员力保奕訢无罪，指责蔡寿祺诬告，一份份替奕訢求情的奏折雪片般飞到了慈禧太后的眼前；在外，外国使馆的官员也对奕訢的事十分关注，甚至想出面干涉。

这样的局面是慈禧太后始料未及的。另外，奕訢见慈禧太后发布了这样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知道其手腕强硬，因此请其他大臣向慈禧太后转达了自己的和解之意。慈禧太后正好又有了这么一个台阶下，于是召奕訢进宫，当面训诫。

在训诫过程中，奕訢收起了以前的倨傲，慈禧太后则顺水推舟地取消了奕訢的议政王封号，使奕訢的地位和权力大大削弱。而本想投机取巧的蔡寿祺，最终不仅没有捞到好处，反而被革除官职，罢免回乡。

三三 安德海被杀真相

在取消了奕䷑的议政王封号后，慈禧太后当政顺风顺水，可就在同治八年（1869），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令慈禧太后大丢颜面的事情，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不过是杀了个太监；说“不小”，则是因为被杀的太监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安德海。

安德海是直隶青县人。十四岁时自阉入宫，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不出几年时间，就被提拔到当时的四阿哥奕䷑（即后来的咸丰皇帝）身边伺候。聪明的安德海积极地为奕䷑出谋划策，而得其心意。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咸丰皇帝登基，于其夺位有功的安德海，顺理成章地升为了御前太监。御前太监主要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等事务。一来二去，安德海就与后来的慈禧太后，当时的兰贵人结成了紧密同盟。

中肯地说，慈禧太后此后十数年对安德海的信任，根本是取决于安德海的忠心耿耿和智勇双全。因为安德海曾多次救助慈禧于危难之中。“辛酉政变”时，咸丰皇帝在承德暴毙，面对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的阻挠，两宫皇太后无法与身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保持联系，一时焦急万分，在危急关头，安德海主动请求担任信使，舍命奔赴京城。他日夜疾驰，终于赶在阻止恭亲王奕䷑承德奔丧的圣旨前，到达了京城，并见到了奕䷑。这才转变政局，为日后杀肃顺，捉拿载垣、端华等人，巩固慈禧太后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凭此一举，安德海被破格提为四品蓝翎大总管。从此，他在皇宫大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进入了人生中极端辉煌灿烂的时期。

背靠慈禧太后这棵大树，安德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逐渐张狂起来，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了。几年时间，把该惹的人和不该惹的人都得罪了，就连经常入宫的恭亲王奕訢都难以忍受。据说有一次奕訢去见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因为和安德海说话，正说到兴头上，竟然推辞不见。奕訢后来得知，大感耻辱，恨恨地说，“我要是不杀了安德海，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朝廷纲纪！”

安德海得知后，十分恐惧。于是经常借着各种机会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奕訢的坏话，以挑拨两人的关系。就连年幼的同治小皇帝，都知道安德海和母亲过于亲密，由此对安德海非常愤恨。有一次，同治小皇帝还亲手做了一个小泥人，背后写上“安德海”的名字，并用小刀削掉泥人的头。旁边的太监问他这是干什么，同治怒气冲冲地说：“杀小安子！”

可是，安德海依然很放肆，为了敛财，他开始利用出入宫廷之便，陆续夹带宫中珍品出宫变卖，收入颇丰。尝到了甜头的安德海胆子越来越大，盘算许久后，他又打着为同治皇帝大婚采办衣料的名号，向慈禧太后请求出宫，实际上，安德海的意图是在富庶地区变卖古玩，大捞一笔。

尽管有“太监不准出京”的祖制，但慈禧太后禁不住安德海的软磨硬泡，最终勉强同意了，只是嘱咐安德海一定要低调行事。

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带着一大批随从，打着钦差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坐龙舟顺运河南下。他以为既然慈禧太后都首肯了，祖制便不在话下，因此沿途寻欢作乐，接受地方官员殷勤地孝敬，可谓风光至极。

这一天，安德海来到山东德州境内。很快便有人报告了山东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原本是咸丰三年（1853）进士出身，为人刚正不阿，做事

一向勇敢果断。当年僧格林沁在山东“剿杀”捻军的时候，对待地方官员极其傲慢，他见巡抚以下的官员，是从来不给让座的，下面的官员慑于僧格林沁的威势，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丁宝桢刚升任山东按察使，恰巧有事要去拜访僧格林沁。在去之前，丁宝桢就听说了僧格林沁的规矩，于是便先让人转告僧格林沁：要是设座就来见，不设座就不来。

手下的人劝他不要得罪僧格林沁，免得惹麻烦。但丁宝桢坚持要把自己的话传到。僧格林沁得报后，大为惊怒，一个小小的山东按察使，居然敢跟自己提条件，倒要看看这是何方神圣！不料，丁宝桢来后，果然非同寻常，一副不卑不亢的气度，让僧格林沁也为之折服。

再说丁宝桢得知太监出巡的事情后，十分震怒。他早就听过安德海宦官乱政，想为国除害，可惜没有机会。这次倒好，安德海送上门来了。于是，丁宝桢传令德州知府赵新，让他将安德海的招摇情形即时汇报，如遇有安德海不法之事，就立刻擒拿。赵新官小胆子也小，不敢动手，只是将安德海情况报告给丁宝桢。丁宝桢迅速地写了一道密折，将安德海一路上的所作所为上报朝廷。同时，丁宝桢命东昌知府程绳武追赶安德海，伺机将其拿下。程绳武也害怕得罪慈禧太后，他带人尾随了安德海三天，但一直不敢动手。丁宝桢等了三天没见回报，便派总兵王正气率兵追赶，终于在泰安将安德海等人擒获。

安德海被押送到济南后，还以太后派出的钦差自居，自信没人敢动自己，根本不把丁宝桢放在眼。丁宝桢大怒，命人掌嘴，将安德海打得遍地找牙。随后，丁宝桢决定不等朝廷命令，而是按照清廷“太监不得出都门，违者就地正法”的祖制，将安德海径直处死。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将之处死是非同小可的事，丁宝桢身边的官员都跪求丁宝桢不要轻举妄动，等朝廷旨意来了再说。毕竟，万一慈禧太后追查下来，不仅乌纱帽难保，搞不好还要赔进自己的身家性命。然而，丁宝桢正是因为担心慈禧太后会回护安德海，

所以要在旨意到来之前从速处死安德海，为国家除了这一个大害。安德海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还没有风光够，就在济南被丁宝桢斩下了头颅。

再说慈禧太后这边，她得知安德海被擒拿后，方知事态不妙。无奈之下，她只好同慈安太后一起召见了恭亲王奕訢，以及军机大臣和内务府大臣等人，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令慈禧太后难堪的是，慈安太后、奕訢和朝臣们都一致认为，祖制不可违，要将安德海处死。慈禧太后当也知道祖制家法，当年顺治皇帝鉴于明朝太监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特意在交泰殿外立了一个“内宫不许干预政事”的铁牌，明令凡有太监犯法干政者，都要凌迟处死。

虽然慈禧不得不同意众人的看法，但为了挽救安德海的性命，慈禧太后还是要将处死安德海的谕旨扣着，迟发了两天，试图让事情有所转圜。可是，慈禧太后不知道的是，安德海此时早已是人头落地。几天后，安德海已经殒命的消息传到京城。慈禧太后也只能强压怒火，她不但未作声张，反而连发两道上谕说，我朝家法森严，有犯必惩，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招摇过市，种种不法，实在是罪有应得。

三四 刺马奇案

“安德海被杀事件”可以说是同治朝的一个大案。就在安德海被杀的第二年，又发生一起刺杀案件，这起案件也让慈禧太后着实吃惊不小。

事情要从同治九年（1870）的一天说起。这一天，慈禧太后接到一道六百里加急奏折。奏折上写着：“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

慈禧太后既惊讶又疑惑，问身边的曾国藩：“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么奇怪？”

曾国藩很惶恐，慌忙说：“奇怪，是很奇怪。”

曾国藩的神情和回答让慈禧更加疑惑，当即下令彻查此事，务必要将案子查清查明。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案子却拖了半年之久不能结案。更令朝廷官员头疼的是，由于不能结案，各种传闻四起，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

这桩历史上称为“刺马案”的晚清大案，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案子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时间回到1870年8月21日。这一天是大清“总督阅视武弁投射”的日子。可是不凑巧，这一天忽然天降大雨。“总督阅射”这一盛典只好推迟到第二天。

第二天，天气格外晴朗。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早早地就来到校场演武厅。马新贻独自徒步走来，虽然时间很早，却已挤满了前来观看盛典的老百姓。

盛典像以往每年一样，气氛热烈，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盛典结束后，马新贻返回自己的督署。校场演武厅在督署的西边，马新贻回督署要经过一条箭道。此时此刻，箭道两旁有很多围观的群众。马新贻的侍卫没有因为人多而提高警惕性。惊魂的一幕就在马新贻走到督署后院门外时发生了——马新贻的一个同乡忽然冲出人群，扑通跪下，向马新贻求助，请求马新贻赏口饭吃。同乡的这一求助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马新贻看了同乡一眼，显得很不耐烦，也不理睬，径直向前走。武巡捕叶华龙走上前，一把将马新贻的同乡推开。与此同时，马新贻身边的三个侍卫也掉过头来，把这个同乡拖到一旁，抽了他几个耳光。

这个时候，马新贻身边仅剩几个侍卫，他们跟随马新贻继续往前走。走出不到三米，箭道旁的人群中忽然又冲出一个人。这个人高呼着冤枉，跪倒在马新贻脚下。马新贻正要弯腰去搀扶，这个人猛然从腿间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马新贻的右肋。侍卫根本来不及反应，只听见马新贻惨叫一声。

马新贻倒在地上，一名侍卫赶紧去扶，另外几名侍卫上前捉拿刺客。人群顿时大乱。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名刺客没有做出一点反抗，他神情自若地看着被刺后的马新贻。

这个刺客是谁？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刺杀两江总督，却没有一点恐惧？他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马新贻被侍卫扶起的时候，已经面如土色。他用双手抱着胸部，右臂紧紧夹着右肋，身子不停地抽搐，根本站不稳。侍卫只好取来门板，将马新贻抬进督署。

在督署上房的床上，马新贻气若游丝，他叫来儿子，语焉不详地口述的一份遗疏，并嘱咐儿子，请江宁将军魁玉代呈朝廷。

督署外，中军副将喻吉三已下令将刺杀马新贻的凶犯绑缚起来。刺客竟然仰天狂笑，说了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恼怒的侍卫将刺客连拖带打弄进衙署，关押起来。

由于案情重大，中军副将喻吉三立即派人通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要员。消息很快传到魁玉将军府，魁玉惊慌失措，立刻动身去督署探视马新贻。

从马新贻的伤口看，匕首插进他右肋深及数寸。由于失血过多，马新贻已经奄奄一息，在死亡边缘无力地挣扎。

马新贻口述遗疏的时间很长，从8月22日下午开始，直到23日中午才结束。其间昏死数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又数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中医们尽力抢救。可是，马新贻在口述完遗疏后，于23日下午二时许最终身亡。

这位两江总督8月22日遇刺，8月23日身亡，前后只有一天时间。可就在这短短的一天时间里，江宁府大乱。江宁府的官员们都知道，自大清朝开国以来，还从来没有如此高级别官员的遭遇刺杀。身为两江总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杀，对清廷的官员来说，这简直是一件千古未闻的事情。

马新贻遇刺的当天，江宁将军魁玉就赶到督署，探视过马新贻后，便亲自提审刺客，得到的答案让他非常失望。刺客只有交代了两点：第一，自己名叫张文祥；第二，是河南人。

至于行刺缘由、行刺经过，张文祥绝口不提，再三讯问，张文祥便彻底沉默了。

8月23日，一个庞大的审案小组成立。除魁玉将军外，还有藩司梅启照，署盐道凌焕，江宁知府冯柏年，署理上元县知县胡裕燕，江宁知县莫祥芝，候补知府孙云锦，候补知县沈启鹏、陈云选。8月24日，魁玉又加派了臬司贾益谦、候补知府钱海永、皖南道李荣、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共14名官员轮番审讯凶犯张文祥。

然而，结果让人沮丧。连续四天车轮式地审讯，官员们没有从凶犯嘴里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答案。

凶犯张文祥即使说话，也是满口胡言。无论怎样拷打，也不交代刺杀缘由。

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已经5天。8月27日，无可奈何的魁玉将军上疏朝廷。他在奏折中说，怀疑凶犯张文祥就是一个地痞无赖。

凶犯的身份真有如此简单吗？

清廷对魁玉的推测非常不满，当即连发四道谕旨。这四道谕旨犹如四支飞箭，于8月29日就到达魁玉手中。每一道谕旨都让魁玉心惊肉跳。

第一道谕旨：命魁玉将军主审马新贻被刺案。

第二道谕旨：任命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一职，未到任之前，总督事务由魁玉将军全权主持。

第三道谕旨：提醒安徽巡抚英翰注意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

第四道谕旨：强调重申，命魁玉将军用心审理此案，务必要挖出该案的幕后指使者。

魁玉将军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不彻底查明案情，他是没有

办法向朝廷交差的。更让他意想不到的，就在朝廷发出这四道谕旨的时候，给事中王书瑞向同治皇帝上了一奏折。奏折中说，两江总督竟光天化日之下死在一名刺客手下，此案甚为古怪，其他的总督又会怎么想？希望朝廷派亲信大臣彻查此案。

于是，9月5日，朝廷又发出一道谕旨，内容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来历不明的刺客刺杀，于情于理不符，务必要查出幕后真凶！

面对来自朝廷压力的魁玉将军没有更多的办法。他只能督促审案小组成员，让官员们从张文祥嘴里找出幕后真凶。

13天过去，时间到了9月18日，案情的审理没有丝毫进展。朝廷又传来谕旨，内容没有变化，只是重申——此案必有幕后真凶，速查明。

审讯组官员对张文祥使用酷刑，不堪折磨的张文祥终于又交代出一点东西。他声称自己参加过太平军。接下来，又无后话。

一周后，魁玉将军上奏朝廷，说案犯供词“一味闪烁”“语言颠倒”。根据案犯自称参加过太平军的供述，已将其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福及舅母罗王氏拿获。

魁玉的这道奏折，俨然是为了应付朝廷。无论如何，案情终归有了进展。可是，朝廷方面对魁玉的奏折十分恼火，奏折中根本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关于案犯“一味闪烁”“语言颠倒”的供词也无具体说明。

由此，朝廷方面开始对这位魁玉将军产生了怀疑。难道魁玉在偏袒案犯吗？

朝廷方面很快做出决定，派出时任漕运总督的张之万，赶赴江宁府会审。

10月7日，漕运总督张之万。第二天，张之万便传见审案小组的各司道府官员。了解情况后，张之万亲自提审张文祥。让各司道府官员颇感疑惑的是，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张之万都没有对张文祥动刑。张文祥自然也未交代出更有价值的材料。

张之万不对张文祥动刑原因很简单，他担心万一不小心将案犯拷打致死，无法向朝廷交代。

这个时候，江宁府的官员们都已经明白了一件事情，此案的背后一定有幕后策划、主使者。而幕后主使者敢派刺客杀害两江总督，自然也不是一般人。张之万更明白这一点。因此，无论这一大案子怎么审、怎么了结，都讨不到好。审不出幕后主使者朝廷不答应，马新贻的家人也不会答应。

在这种情况下，张之万能做的就是等待。他要等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朝廷8月发出的四道谕旨中，执行第二道谕旨的曾国藩。

张之万想把这个头痛棘手的案子移交给曾国藩。可是，曾国藩始终没有到来。一向办事雷厉风行的曾国藩为什么一反常态，拖延时日，迟迟不启程呢？

张之万找不答案。无奈之下，他上奏朝廷，说案犯张文祥死不招供，甚至当面拷打其子女也不心软。最后，张之万还是请朝廷放心，他一定能够了结此案。

又过了一个月，朝廷方面仍未收到结案的消息，震怒之下，责备张之万和魁玉办事效率低下，并警示二人：马新贻遇刺遇刺案已历时四个月，若再延误，后果自知。

12月9日、12日、18日朝廷又连下三道谕旨催促结案。魁玉和张之万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共同编造了一份结案报告。报告上说：张文祥交代，自己是一个海盗，因为马新贻在浙江“剿灭”了他的同伙，张

文祥为了给同伙报仇，所以刺杀马新贻。这个交代大概可信。

这份报告让朝廷方面啼笑皆非，一桩震动朝野的人命大案，竟然用“大概可信”来敷衍搪塞。

朝廷方面对魁玉和张之万彻底失望。案犯拒不交代，从马新贻最后口述的遗疏中也不看不出任何端倪。马新贻在遗疏中只说明了两件事情：第一，向同治皇帝汇报工作，并特意指出，自己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前总督曾国藩和李鸿章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因此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第二，马新贻谈到曾国藩正在处理的天津教案。马新贻声称，当自己听到天津刁民冲进外国人教堂滋事时，恨不得亲自去将那些刁民处死，只是自己职位所在，也只好天天生气罢了。

对于自己遇刺的事，马新贻在遗疏中却轻描淡写，一笔划过，只是留下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疑问句：为什么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要杀我？

就这样，马新贻遇刺身亡已经几个月，却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结果。这桩案子成为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奇案。朝廷只能寄希望于曾国藩，希望他能审清此案。

然而，朝廷在8月29日发出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的谕旨，8月30日上午，曾国藩在天津接到谕旨，却拖延至11月还未启程前往江宁府，这几个月他在干什么呢？

8月30日这一天，曾国藩接到朝廷上谕后，立刻召集幕僚和江苏巡抚丁日昌、毛稟熙商议。这时候的曾国藩正在处理天津教案，不断受到中外舆论抨击，外国列强指责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是汉奸走狗。曾国藩的心理压力非常之大，回任两江总督，正好让他脱离困境。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更加心惊肉跳。

两天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道谢恩疏，推脱说自己近来时常头

晕眼花。江宁府路途遥远，恐身体无法支撑，恳请朝廷另选高明。

朝廷方面却没有答应曾国藩的请求，只说，你曾经经营过江南，对那里非常熟悉，无须四处奔波，只要坐镇江宁即可。

然而，又过了半个月，曾国藩仍未动身。10月20日，慈禧太后只得召见曾国藩，命他速速赶赴江宁。曾国藩仍然推脱说自己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跋涉。

11月1日，慈禧太后再次召见曾国藩。这一次慈禧太后的态度很坚决，开门见山地质问，你什么时候去江宁？此时的曾国藩已无法再推脱，只好说，就在近期。

曾国藩的行为让朝廷大为不解，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两江总督遇刺这样的大案，朝廷方面自然急于找到真相，而作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这其中有何蹊跷呢？

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870年8月21日，也就是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江苏巡抚丁日昌匆忙赶到天津直隶督署，求见曾国藩。就在这一天，丁日昌和曾国藩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第二天，8月22日上午，远在江宁的马新贻遇刺。8月23日，马新贻身亡。之后，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夜夜磋商。密谈和磋商的内容没有人知道。

马新贻遇刺案审理几个月后，忽然传来一条消息：说马新贻遇刺是因为和江苏巡抚丁日昌不和。

这个消息让丁日昌十分惊慌，他迫切希望好友曾国藩亲自审理此案。而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后，再没有推脱朝廷的上谕，于1870年11月7日启程南下。可是，在路上，曾国藩尽情地欣赏风景。12月14日，花了36天时间的曾国藩才抵达江宁。

难道丁日昌就是马新贻刺杀案的幕后主使者？而曾国藩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如果是这样，丁日昌为什么要派刺客杀后马新贻呢？是否真如传言所说，二人不和呢？

不幸的是，这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一年前，准确地说是1869年10月5日这一天，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和刘步标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苏州看病。夜二至更，徐、刘二人闲游妓馆，正巧碰上丁日昌之子丁惠衡、侄子丁继祖，带着一帮家丁等同游妓馆，双方发生争执，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巡夜，见徐、刘滋事，责打徐有得40军棍。徐有得不服，又遭重责。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

丁日昌得知子侄闲游妓馆滋事，导致勇丁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朝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

丁日昌之子案与马新贻被刺案联系到了一起，朝廷上下沸沸扬扬。有人认为，丁日昌为了庇护儿子丁惠衡，从而派刺客杀害此案主审马新贻，致使案子不了了之。而在马新贻被刺前后几天，丁日昌与曾国藩数次密探，甚为诡秘。当传闻一出，丁日昌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上奏朝廷，请求朝廷下旨命曾国藩迅速赶赴江宁。

而曾国藩到达江宁后，正式担任两江总督一职，却不提案子，只是玩。对马新贻被刺案采取拖延回避的态度。如果心中没有鬼，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这样一桩大案呢？不能不说，这一切和曾国藩、丁日昌密探有关。他们似乎早已定下了应对的策略。

曾国藩要把这个案子推给另一个人。朝廷在曾国藩赴江宁的同

时，还派出一个钦差大臣，时任刑部尚书的郑敦谨。朝廷方面要求撤换张之万和魁玉两位主审大员，连同审讯组的司员也一起换掉。清廷处理此案的决心是异常坚定的。

可是，曾国藩来得晚，钦差大臣郑敦谨来得更晚。曾国藩足足等了郑敦谨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曾国藩只做了三件事：一、待客闲聊；二、读《阅微草堂笔记》；三、吊唁马新贻，并作挽联一副。

直到1871年2月17日，钦差大臣郑敦谨到来的前一天，曾国藩才翻开马新贻被刺一案的卷宗，记下有关案犯的名字。

1871年2月18日，钦差大臣郑敦谨抵达江宁。2月19日，大年初二，新的审案组成立。成员为：郑敦谨及随从伊勒通阿、颜士璋；曾国藩和他委派的江安粮道王大经、江苏题补道洪汝奎；以及马新贻生前的亲信候补道孙衣言、袁保庆。

案子开审，让郑敦谨意想不到的情形出现了。这位时任刑部尚书的钦差大臣，审案、断案自然有一套手段，然而，第一天审讯，没有任何收获；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同样如此。同坐正堂的曾国藩始终闭着眼一言不发。郑敦谨只好一个人发问，案犯张文祥没有交代出更多的东西。

两周后，郑敦谨痛苦地明白了，一切似乎都在别人操纵、安排之中。曾国藩的不配合，案犯张文祥的沉默，让郑敦谨放弃了审案到底的决心，他对曾国藩说：“看来，只好仍照魁、张二人原奏之法奏结了。”

曾国藩笑了。郑敦谨的心凉透，看来这世界上的有些事情不能深究，如同这个案子，深究下去，只能自陷其中，无法自拔。

接下来，郑敦谨要面临的问题是撰写结案呈词。难道真要照搬魁玉和张之万的结论吗？这对朝廷是没法交代的。于是，郑敦谨只好表

演性地继续审案。

在审案过程中，郑敦谨也不对张文祥动刑。来来回回就问一个问题。候补道孙衣言愤怒地提出，如果不对张文祥动大刑，他是不会招供的。

郑敦谨急忙说，使不得，万一不小心打死了，怎么向朝廷交代？在这种“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交代”情况下，马新贻被刺一案就此了结。

郑敦谨和曾国藩联袂上书朝廷——此次审理于魁、张二人的审理结果相同，维持原判。在上书中，郑敦谨特别加上了一条：处决张文祥的刑罚要格外严酷，除凌迟之外，还应当摘其心以祭奠马新贻的亡灵。

这一份奏结，在呈送朝廷之前，补道孙衣言、袁保庆拒绝签字。他们认为，此案并不算了结束。而曾国藩笑着说，不签就不签吧。

事实上，朝廷方面根本就不知道，在新的审理小组中有孙衣言、袁保庆这两位候补道。

1871年3月19日，郑敦谨将奏结呈送朝廷。同时，将张文祥的口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这次审理的结果成为既定的事实，朝廷方面只好接受这一事实。

1871年3月26日，朝廷下达谕旨，肯定了郑敦谨和曾国藩的奏结。并下令，4月4日将案犯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由曾国藩监斩。

4月5日，就在张文祥被处决的第二天，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便愤然离开江宁，打发了一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声称自己有病不能回京。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清制是要治罪的。曾国藩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湖南同乡，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江去看望郑敦谨，百般安慰，劝其回京赴任。而后，朝廷下谕旨，命郑敦谨回京。郑敦谨再次

以有病为托词，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

而郑敦谨的两个随从回京后也悄然消失。同年6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8月19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马新贻遇刺案的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而这股势力的操纵者会是谁呢？难道他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

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1868年，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经营10年，王府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其他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熄。湘军均中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颇有微词，慈禧太后心中不快。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本是湘军浴血奋战攻打下来，他们在那里经营数年，视江宁为私有财产，岂能轻易拱手让给马新贻。除掉马新贻，江宁便可以重回到湘军手中。因为马新贻从进士直到总督，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却不知道自已身处凶险的境地。

而马新贻被刺身亡后，还有一种传言，说他被刺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渔色亲友”。就在马新贻被刺身亡后，立刻就有“刺马案”的戏文上演。

马新贻被刺身亡，又有身后之玷，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桃色绯闻，而且又有为友复仇，义薄云天的侠义故事，迎合人们猎奇的心

理，适应玩家的口味。如果马新贻不死，也是百口莫辩。史家也对此望而却步，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为一个渔色负友的小人辩白，冤不冤由他去吧。

这一切只能说明，马新贻遇刺案是一起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从刺杀的实施来看，刺客张文祥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显然是经过精心演练和准备的，到后来制造马新贻“渔色亲友”的舆论，以及对案件审理和结案的设计，都足以说明是高手策划的结果。这个高手，除了曾国藩还能有谁呢？

因为，还有一个事实也不容置疑，在马新贻遇刺后，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这个宝座从此一直掌握在湘系手中，再无人敢问津。

三五 洋务运动之争

两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让大清帝国吃了不少亏。清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满清统治。于是，他们出面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富强”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倡导“洋务运动”的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代表，主要是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等人，他们在清朝的中央政府中，获得了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

然而，还有一派是反对“洋务运动”的，被称为“顽固派”。代表人物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人。他们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闭目塞听，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幻想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他们对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等活动深恶痛绝。

洋务派与顽固派最早的论争，是由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而引起的。

先是在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三日，恭亲王奕訢奏请设立总理事务衙门，作为外交机构。但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了语言和文字的障碍。

因此，奕訢建议从广东、上海物色专学习英、法语言文字的人，挑选其中诚实可靠者，各派二人来京充当教习。并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进行学习。遗憾的是，奉旨已有一年的时间，广东、上海均未能派人来。于是，又转向外国聘请。

由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举荐，聘请英籍通晓汉文的传教士包尔腾充当英文教习，并说明只学习语言文字，不准传教。

随后，又派喊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监督包尔腾。初收八旗学生十名，成立英文馆，这就是京师同文馆创建的开始。

同治二年（1863）又聘请法国籍传教士司默灵和俄国驻华公使馆翻译柏林为教习，增收八旗学生二十名。

同文馆开始成立，因为是仿照原先俄文馆的旧例，只是创办一所培养翻译人员的临时学校，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到了同治五年，学生已经在馆学校数年，已经能粗通洋文洋话了，只是年龄太小，对汉文的文义尚不能贯穿，所以很难再让他们学习天文算学了。奕訢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以及航行、编练军队等，没有一件事能离开天文、算学。现在，上海、浙江等处急需轮船制造和航海方面的人才，如果不从根本上用功夫，只学习皮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此，奕訢建议，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本来，设天文算学馆的计划朝廷已经批准了，着手进行就是了。但是，奕訢等人料到顽固派必将出来反对，所以预先在奏折中声明：此次招考天文、算学，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迫于西人的术数之学。同时一一驳斥了那些也已成为宣扬的保守观点，坚定了朝廷的决心。

果然，不出奕訢等人所料，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消息传出后，顽固派立即作出反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表示反对，认为科甲正途人员都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要他们学习制造轮船、洋枪的原理呢？

朝廷驳回了张盛藻的上奏，指出学习天文、算学，只不过是借西法来印证中法而已，并非误入歧途。

张盛藻碰了壁，顽固派的首领人物倭仁便亲自跳了出来。倭仁是文渊阁大学士，又是同治皇帝的老师，讲求宋儒之学，堪称“理学大师”。在当时的士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是：立国的道理，应崇尚礼仪，而不应崇尚权谋；根本之图，应在人心，而不应在技艺。并说天下如此之广，不怕没有人才，即使像天文、算学这些必须讲求的学问，也一定有精通它的人，不怕没有人才，何必向外国人学习呢？如果科甲正途人员拜外国人为师，后患将不堪设想，正气不伸，邪气弥漫，数年以后，国将不国了。

清廷将倭仁的奏折交给总理衙门议奏，奕訢等人争锋相对，反驳说：开设天文算学馆，并非误入歧途，上了洋人的当；而是让今日士大夫痛心疾首，卧薪尝胆，以求自强。并针对倭仁在奏折中所称“天下如此广大，不怕没有人才”的话，提出让倭仁保举数人，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负责，以观成效。并说倭仁公忠体国，必定实心保举，不会误国误民。

这一下，不仅击中了倭仁的痛处，还将了他一军。清廷根据奕訢所奏，当即下旨要倭仁保举数人，另行择地设馆。倭仁连忙声明，自己前奏不必讨论，不用另外设馆。但平时会留心观察，一旦发现人才，马上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

倭仁阻止设立天文算学馆受挫，情绪非常激动，在与奕訢当面争论的时候，几乎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为同治皇帝授书时，由于激动，鼻涕都流出来了。

随后，倭仁病倒，面色憔悴、茶饭不思，同僚前来看望，相对无言，只是叹息。

然而，倭仁虽然失败了，却赢得了一批守旧官员的同情。因此，在顽固守旧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股反对学习西方的逆流。当时京城人言沸沸，谣言颇多，并常用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

主教！”“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等。甚至有人作对联云：“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在这种气候下，一些顽固守旧官员纷纷出动，寻找各种借口，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通政使的官员于凌辰上奏折说：天文算学馆招考正途人员，几个月来，议论纷纷，一天比一天厉害。而报考中，有的省份机会没有人报考，有的省份仅有一二人报考，即使有愿意考的，也为同乡所不齿。

有一个叫杨廷熙的小人物，是候选的直隶州知州，直接跑到督察员处呈递条陈，请为代奏。杨廷熙编造说：今年从春季到雨季，久旱不雨，河流枯竭，京城中疾病流行，这不同于以往的灾害呀。说到这里，他语气一转，将灾象之生归咎于同文馆的设立，指出现在京城中人们街谈巷议的，都是关于开设同文馆的。以此为基础，杨廷熙进一步大谈“十不可解”。

所谓“十不可解”，是说本来中国的天文、算学已经超过了西学，何必反去向夷狄学习？对付敌人的坚船利炮，主要是想出破敌之法，何必徒费钱粮、人力去学习？天文、算学、轮船、机器等皆无关乎自强之道，坚甲利兵再精也难操胜券，关键在于人心可用，何必还要依样画葫芦地去制造？

此外，杨廷熙在条陈中对奕■等人大肆攻击，实际上变成了对奕■等人的参奏，已经超出了争辩同文馆问题的界限。他给奕■等人加上了“专擅挟持”等罪名，这是非同小可的。

那么，为何作为一个区区的候补知州，杨廷熙就敢滥施攻击，诋毁中央大员呢？这是因为他身后有个倭仁做靠山。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很难收场了。奕■便奏请朝廷，派大臣核议杨廷熙所奏的事情，并让总理衙门的大臣暂停工作，听候查办。这样一来，朝廷只好于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发布上谕，对开设同文

馆给予肯定，这才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论。

这场关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不完是意气之争，或名利之争。而是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问题。论战虽以顽固派失败而告终，但是其阴魂不散，其言论仍有相当的市场。一有机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会跳出来。譬如，接下来的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

在洋务派推行的近代活动中，造船工业是最早的重点项目。在其创建之初也是卓有成效的。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成立的第一个专门制造轮船的造船企业，也最为顽固派所嫉恨的，从而使这一企业屡次面临下马的危险，由此发生了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一手创办的，但左宗棠不久就调任了陕甘总督，清廷派漕运总督吴棠继任。咸丰初年的时候，吴棠任清河知县时，任劳任怨，颇得人们赞誉。但他思想守旧，敌视洋务，并反对制造轮船。其言论行事都与顽固派如出一辙。

但吴棠与倭仁不同，倭仁虽然身为帝师，位居相国，名声显赫，却不掌握实权；而吴棠是封疆大吏，掌握实权，其影响力非同一般。所以，吴棠一到任，就使福州船政局面面临下马的危机。

吴棠抵达福州之前，闽浙总督一职一度由福州将军英桂兼任。同治六年三月，吴棠到任后，便对英桂说：船政未必能成功，即便成功也有什么益处呢？而且，吴棠一反左宗棠所为，对船政之事处处掣肘，想用釜底抽薪之法，将其搞垮了事。

在吴棠的影响下，福州到处是流言蜚语，并传布一些匿名的揭帖，表达了一些人对造船的不满，并把诬陷的矛头直接指向船政。吴棠则一面编造总理衙门说船政“用钱失当”的谎言，一面利用匿名揭帖，打击左宗棠所委派的船政骨干。弄得船政人员人人自危。

前江西巡抚沈葆楨奉旨总理船政之处，就知道吴棠对船政有成

见，后来见吴棠步步紧逼，不肯罢手，便决心抗争。

沈葆桢是福建侯官人，咸丰五年初，任江西九江知府，随曾国藩管营务。咸丰十年，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镇压太平天国军。同治五年，由左宗棠推荐，继任福州船政大臣，专主福州船政局。

沈葆桢向朝廷上奏说，值此国家危险之时，愿与吴棠同舟共济，齐心将船政办好。并表示，船政是本大臣专门负责，愿以生命为代价，一定要办好船政大业。并恳请起用那些被诬陷的船政人员。

沈葆桢上奏以后，见朝廷仍然举棋不定。于是，又上书总理衙门，指出船政乃国家大事，吴棠身为封疆大吏，却不明事理，暗中为难船政人员，如此下去，将贻误国家大事。左宗棠得知后，极为愤慨。他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书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又考虑到吴棠在任清河知县时，名声很好。于是，就又写了一封书信，规劝吴棠。

哪知道，吴棠回信敷衍一番，仍然一意孤行。左宗棠见劝说无效，便上书朝廷，请求尽快定夺。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朝廷一面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一面努力调和各方面的关系。但是，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吴棠那里，吴棠思想顽固，一开始就厌恶船政，加上对沈葆桢的成见，两人很难再携手工作。于是，清廷便于十天后，调任吴棠为四川总督。吴棠破坏船政的企图，终究未能如愿。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年后，顽固派再一次掀起波澜。同治十一年一月，正当造船工作进展顺利之时，停止造船的议论又起，使船政再次面临下马的危险。鼓吹这种观点的是内阁学士宋晋，他以花钱太多为由，奏请停止造船。声称：福建连年制造轮船，经费已花去四五百万，这未免花钱太多了。制造轮船是为了抵御外来侵

略，如今中外早已讲和，再造轮船，岂不引起外人的猜疑？

宋晋的话似乎有点道理，因此也有一些人附和。朝廷对此不做明确表态，并将宋晋的奏折发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和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文煜议奏。

曾国藩对宋晋所奏不以为然，并致函总理衙门说，西方各国的轮船多而坚固，日本虽地处偏远，近来新造轮船也很多，而且不惜花费巨资，这是治理国家的人不得已而为之的。

可是，文煜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这时朝廷一时举棋不定，处于两难之中。考虑到经费紧张，认为暂停造船，节约一下部分资金用于急需之处，也未尝不可。于是，又向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三人重新征求意见。

左宗棠是湖南湘阳人，太平天国起义后，一度在家办团练，后由曾国藩保举，清廷下特旨任他为四品堂襄办军务；咸丰十年，又任浙江巡抚。太平天国失败后，奉命进击太平军余部入福建，与沈葆楨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制造轮船。还设有船政学堂，其中分前、后两学堂；前堂学习法文，主要培养制造轮船的人才；后堂学习英文，主要培养驾驶轮船的人才。

同治五年八月，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才不得不将此重任交给沈葆楨。因此左宗棠对船政事业怀有厚爱，对于宋晋所奏停止造船一事，早就义愤填膺，他的意见是可想而知的。沈葆楨则是以具体事实，对宋晋的言论进行逐条批驳。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造船之事不但不能马上停止，即使五年之后，也不能裁撤。

清廷先后受到左宗棠和沈葆楨的奏章后，态度渐趋明朗，但还要等李鸿章的奏章到了，再降谕旨。不久，李鸿章的奏折到了，他从清帝国所面临的形势入手，分析了中国的出路，指出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多设厂，多造船，多制枪炮，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如果士

大夫还囿于章句之学，苟且偷生，国家的前途不堪设想。

由于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三人的支持，清廷不得不批准了继续造船的计划。这场由宋晋挑起的争论，最后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终，使岌岌可危的造船局面，得到了扭转，保证了轮船的继续兴造。

顽固派本想扼杀制造轮船这一新生事物，但效果却适得其反。这是顽固派始料未及的。但是，顽固派并没有就此罢休。又过了两年，到了同治十三年春，原先左宗棠与法籍技术人员日意格等所定的合同期满，大批外籍技术人员即将离厂回国，造船的技术设计改由清帝国的技术人员主持。

在日意格担任船厂监督的五年中，福州船政局共造了十五艘轮船，总排水量达到一万六千吨，使中国的轮船从无到有，造船工业初具规模，应该是很大的成绩。如今，日意格和一些外籍技术人员离去，轮船能否继续造下去呢？这又使船政局面临一次新的严峻考验。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一些顽固派官员又旧调重弹，大谈船政之害。沈葆楨不顾压力，再次挺身而出，与顽固派争锋相对，但朝廷迟迟不肯表态，船政不能继续兴工。

当时，正值日本出兵入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清朝统治集团大为震惊。在此关键时刻，船政所造的船起了重要作用，沈葆楨还亲自乘轮船到了台湾。在解决日军侵台事件中，清廷看到了船政的作用，决定批准沈葆楨的请求，大力支持造船。在沈葆楨的坚持下，终于击退了顽固派又一次的兴风作浪，使船政的造船工作得以继续发展。

如果说，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思想交锋，在关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辩论中，以及在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中，只经过了几个回合，洋务派

明显占了上风的话；那么，在修筑铁路的酝酿和计划中，由于两派的斗争时而对峙，时而反复，风波迭起，因此判明最后的胜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近代中国，修筑铁路问题的提出和酝酿，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最早提出修筑铁路的人叫洪仁轩。

咸丰八年，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就曾建议在全国二十省修筑二十一条铁路，作为国家联络的主干。而在一年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出于侵略的动机，也有人建议在中国修筑铁路。这个人名叫斯普莱，是从印度军队退伍的一名大尉，他致函英国外交部称，修筑一条从缅甸经中国西南边陲到华中的铁路。并且，自己印了一本《英国与中国铁路》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以争取舆论支持。

当时，英国外交部对斯普莱的建议未予重视，而受到商界的多方指责。正是由于最初是西方侵略者急于修筑中国铁路，因此，尽管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反复施展威胁利诱的手段，还是遭到了中国官员一致的坚决抵制。

先是同治二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通过江海关道，正式向李鸿章建议，修筑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遭到断然拒绝。随后，一些西方的老牌侵略者赫德、威妥玛、巴兰德等人致函总理衙门，大谈修筑铁路的好处。声称：“自从西方国家修建了铁路，风土人情大为改观。至于工商业的发展，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益均沾”。

当时，有一位英国人在北京永宁门外修了一里长的小铁路，将小机车在上面运行，速度飞快，使北京城上下的人大为惊讶，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新鲜事物。英国人修筑这段小铁路的目的，是想让中国人开开眼界，能够接受建造铁路的建议。但是，从清王朝的朝廷到内外臣工，任凭洋人如何游说，甚至现身说法，都不为所动。

19世纪60年代，在对待西方国家在中国修筑铁路的问题上，清政

府内部基本不存在什么分歧。只是到了60年代后半期，洋务派开始认识到开铁路的益处，希望将来中国人直接承建铁路，不被外国人窃取。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倡议自建铁路。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致函丁日昌，首次正式透露自己想要修筑铁路的主张，他指出：俄国人拒守伊犁，我军远隔万里，万难征服。只有修建铁路，才能运转自如，达到巩固边疆的目的。

当时，听说这一建议的人，无人摇头咋舌，嗤之以鼻。同治十三年，日本出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李鸿章趁机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但朝中阻力很大，无人敢出面支持。

一直到了光绪三年（1877）的时候，洋务派才得到了开始实施修建铁路计划的机会，先是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在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丁日昌，是广东丰顺人。同治二年，被李鸿章从广东调至上海专办军事工业。

由于丁日昌的建议合情合理，切中时弊，因为被朝廷批准。但因为修建铁路的巨款难筹，丁日昌只好抱憾而去。

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虽然顺利通过，而内地修建铁路的计划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强大阻力。光绪六年，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谈判，要求俄国归还伊犁。当时，传出俄国要派舰队封锁中国海面，清廷极为紧张，慌忙召见直隶提督刘铭传，向他征询防务的意见。

刘铭传借此机会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他主张中国要道应修筑四条铁路：南路二条，一条由清江经山东到北京，一条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北路二条，一条由北京东通盛京，一条由北京西通甘肃。由于工程浩大，不能同时兴建，他建议先修建清江至北京一路。

刘铭传的建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首先跳出来的反对者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骥，接着，其他顽固派的官员也纷纷登台亮

相，大喊大叫，列举了种种理由反对建造铁路。他们说建造铁路改变了祖宗的成法，是大逆不道。然后煞有介事地说：中国一旦建成铁路，沿途的旅店、靠骡马运输的贫民，都将失业。

这还不够，他们甚至无知地认为，修建铁路时，用火药炸山开石，不但会惊动鬼神，破坏风水，而且还会带来不祥之兆。可见，顽固派愚昧到何种程度。

这是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修筑铁路的第一次争论，其结果是顽固派占了上风。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顽固派保守势力相当强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洋务派本身对建造铁路的计划也没有确实的把握。

光绪十年，又发生了关于修筑铁路的第二次争论。在光绪七年的时候，唐山开平煤矿因运煤的需要，请修铁路一条，考虑到当时禁驶机车，于是声明用驴马拖载，最后得到批准。这条路从唐山煤井起，到胥各庄止，共二十一里，被命名为“唐胥铁路”。开车之始，先以驴马拖车，第二年改用小机车牵引。

这就引来了顽固派的反对，他们以“机车行驶，震动了皇陵，喷出的黑烟，损伤了庄稼”为由，要求朝廷禁止机车运行。结果，小机车运行不久，就被停止了。

但是，洋务派经过多方努力，几个月后，小机车又开始运行了。唐胥铁路的建成及投入运行，无疑是洋务派的一个胜利。李鸿章受到鼓舞，重提修筑清江至北京铁路之事。这次就不比以前了，顽固派纷纷出来反对，而洋务派这边，只有李鸿章和左宗棠出来讲话，修铁路之事，只好暂缓。

在这次争论中，虽然顽固派再次占了上风，但由于洋务派的争取，醇亲王奕譞对铁路问题的态度有了转变。此后，奕譞与李鸿章内外配合，联手推进铁路兴建工作。

光绪十二年，奕訢巡阅北洋海口时，与李鸿章商谈过将铁路接建至大沽和天津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决定试着建造从阎庄到大沽，从大沽到天津的铁路。

第二年，奕訢正式上奏朝廷，请准建设津沽铁路。他首先说明自己对铁路认识的变化，然后指出铁路兴建与海防和商业的关系。最终，奕訢的计划得到了批准。这一结果，使洋务派无不欢欣鼓舞，接着奕訢趁热打铁，又奏准了天津至通州的铁路。

然而，正当洋务派大干一番时，顽固派又跳出来反对了。他们要求朝廷立即宣示中外，对已建造的铁路，暂放一边，未建造的铁路，立即停止。顽固派的口气十分强硬，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奕訢看到，感叹道：“在中国创办一新生事物，是何等艰难啊！”

奕訢的感慨不是没有理由的，随后，顽固派反对修筑铁路的奏章铺天盖地而来。在奏章中，顽固派罗列的铁路之害，主要由三个：一是资敌，二是扰民，三是夺民生计。为了回击顽固派的反扑，洋务派与之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但终因顽固派的气势汹汹，最后一折衷处理了事。至此，第三次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结束。

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的三次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通过多次争论，可以看出，在晚清时期，大清朝顽固派的力量确实很强大，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洋务派尽管在学习西方问题上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却限于枝枝节节，不敢放开手脚。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必然是一波三折，从而使近代化的进程举步维艰，难以有太大的起色。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论者与顽固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尖锐的思想和政治斗争。虽然两派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和目的是基本上一致的，但达到目的手段确实迥异。当洋务改革思潮涌来之时，顽固守旧势力以封建统治的卫护者的姿态出现，对方兴未艾的新思潮进行猛烈

的反扑。

洋务派倡导学习西方，广造舆论，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定军事、经济实权，身体力行制器练兵，振兴商务和培养人才，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

顽固派恪守祖宗法度，纠举弹劾，唱起“爱国”“保社稷”的高调，呼风唤雨，并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竭力抗拒洋务派，诽谤洋务运动。因此两派的论争不可避免。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并没有把洋务作为国策，她一方面不得不依靠洋务派来支撑危局；另一方面又怕洋务派势力过分膨胀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有意借顽固守旧势力的弹劾来压制洋务派。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显然是和慈禧的纵容分不开的。慈禧太后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保持平衡，使他们互相牵制，她自己则从中加以操纵和利用，表面维持着清朝政府的统一，这就是当时清朝政局的特点。

三六 晚清官场大腐败：捐官与科场行贿

从洋务运动中顽固派的势力和嚣张气焰，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官场，是极端腐败的。当时的官场如市场，一个大贿赂的市场。在晚清官场上，许多东西都可以买卖，很多事情不搞贿赂就办不成。买卖和贿赂时，或公开交易，明码实价，露骨地行贿索贿；或偷偷摸摸，暗地成交，将行贿受贿装扮得含蓄儒雅。

当时，有一个流行词叫“捐官”。“捐官”又被称为“捐纳”和“捐班”，而让这个词传遍天下，要归功于清朝中央政府。因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用钱买官的制度，并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捐官”。

捐是美称（意为捐款授官），实际上就买官。晚清的老百姓常说：“捐官做，买马骑。”捐与买并称。清朝政府虽然出台了这项制度，但也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买的。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这些人就在此项制度之外。事实上，即使该项制度授予这些人买官的权利，他们也没有能力行使。因为买官是需要一大笔银子的。

这三种以外的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官职。银子少，买到的肯定是小官；银子多，买到的肯定是大官；银子少，买到的官职多是虚衔；银子多，买到的官职则是实官。成本越高，实惠越多，官职俨然就成了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当上官并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财力。官职与能力没多大关系，大量有钱而无能人都当上了官。这些人中虽然也

有个别出类拔萃之辈，但大多数却都是财主少爷、纨绔子弟。

纨绔子弟一旦买了官，其劣根性就表现出来了。他们通常捐了一个官职后，就以衣锦还乡的姿态归家。在家乡，大家虽然都知道这个官来得不正，但因为是官，不正也得正。所以，百姓对这些人的态度还是很恭敬。这些捐了官的人，也不要脸，常自命缙绅，出门乘轿，仆从持大字刺，充斥衢巷，洋洋自得。

还有不少商人，大字都不识一个，因为捐了官，竟然成为主管文化方面事宜的官员。有个商人捐了一个巡检的官职后，很快当上了巡抚，去监考乡试。于是，一个商贾就成了掌握众多士子命运的官员。有人做对联讥讽道：“巡检作巡抚，一步登天；监生当监临，斯文扫地。”

官职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有人之所以想做官，是因为可以在大街上横着走而没有人敢管；有的人是为了光宗耀祖，还有的人干脆就是想凭着官职捞点钱。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捐官的现象。有的人卖掉家产，有的向亲友借钱，有的几人搭伙凑钱，还有的因为钱少，便先捐了个价廉的小官，然后上任捞够了钱，再捐大官。

大名士李慈铭为了捐官，卖掉了田产，捐了个京官郎中。汉口有两个要好的小贩想捐官，因为各捐一个官钱不够，就商量好先捐一个官职给其中一个人。在两人凑得的三千两银子中，甲贩出了七成，乙贩出了三成，于是捐的官给了甲贩，乙贩则当了甲贩的司阍，也就是看门人。

在绍兴，有个叫蒋渊如的游民想捐官，但钱不够用，就和四个朋友商议凑钱买官，说好买到官职后，捞了钱按捐官时出资比例分成。后来，捐得的知县一职由蒋渊担任，其他四人就分别做了蒋渊的师爷和长随。

事实上，这些人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所捐的官会丢掉，他们只担心有没有足够的钱捐得一个像样的官。因为在大清晚期，钱出，官必来。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在大清朝可谓是至理名言。很多人都把这至理名言当成终生信条，并矢志不渝。比如御史，他不掌握任官之权，自然也就无官可卖。而他的薪水又很低，又买不起官。所以，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自己的工作职责上下工夫。因为他有着参奏的权力，所以很多官员都有些怕他。因为即使一个官员没有犯错，但御史随便向上参一本，即便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天长日久，皇帝对这个官员的印象就差了，御史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这个“优势”，于是就“卖奏”。

晚清官场上，可供卖钱纳贿的，不只是官职和参奏文字，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比如在清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职官有忤朝廷，要受“传旨申斥”处罚。所谓“传旨申斥”，就是由太监将被申斥的大臣臭骂一顿，而大臣只得跪在那里挨骂，绝不能还口。自从这个惯例开辟以来，许多官员都有被太监臭骂的遭遇。有的太监骂人骂得熟练之极，可以不重样地骂上三天三夜。

对于朝廷命官，特别是在京的官员，这实在是一项不堪忍受的侮辱。有聪明的官员从“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上延伸出来，便得到了“有钱能保不挨骂”的真理，于是就贿赂太监。后来，这种送给太监的银子，就被当时的官员称为“免辱银”。

光绪末年，清政府刚刚成立了邮传部。当时，尚书张百熙和侍郎唐绍仪彼此相处不和，二人经常在皇帝面前相互指责和攻击对方。都请假不来办公，被御史弹劾。光绪皇帝传旨对两人进行“申斥”。唐绍仪暗中送了太监四百两银子，而张百熙却一分也没有给太监。

“申斥”时，张百熙跪下，太监破口大骂，所骂之句，张百熙闻所

未闻，骂了好一阵。而唐绍仪去跪听的时候，太监只是随便说了几句。一分钱不给太监，就遭到惊天地泣鬼神的臭骂；而唐绍仪给了太监银子，就换得了耳根清净。一个“申斥”的处罚就造成了贪污行贿，这大概是大清的皇帝始料未及的。

另外，清代皇帝召见大臣时，如果诏令中言及大臣的祖父、父亲，算是皇帝对大臣的极大恩宠。这时大臣要磕头谢恩。磕头时必须很响亮，用自己的脑袋和地面的碰撞强度，来证明自己对皇帝的敬意。但这种敬意是需要代价的，那就是有时候皇帝听不见或者故意听不见，所以想要碰出响动来，就不能投机取巧。

因此，这完全是体力活，每每有大臣谢恩出来，额头就突出一块，众大臣都深受其苦。于是就以重金向太监行贿，太监就会告知大臣，在什么地方磕头既响亮，又不怎么痛。

以上种种事例，都足以说明晚清官场的腐败。而晚清科场的行贿现象，也非常严重。光绪十九年的时候，发生过一起科举行贿的奇案，从这起案子，也能看出晚清的科场是多么腐败。而且这起行贿案的主角，还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事情要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8月下旬说起。

浙江巡抚嵩骏委派按察使赵舒翹，会同布政使刘树堂，以及杭州知府陈橘，一同办理周福清行贿舞弊案。

动静挺大。看样子，非把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刘树堂和陈橘先是审讯涉案人员陶阿顺。接过两次审讯，陶阿顺招认，自己只是奴才，替主人办事，背后指使的主人是周福清。于是，浙江巡抚嵩骏通令周福清的原籍绍兴府会稽县，迅即捉拿嫌疑犯周福清。

翻开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寻觅到周福清的名字，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个七品小官。同治六年考取举人，四年后通过会试、殿试，成为

三甲第十五名进士。后又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3年。同治十三年，被派往浙江省杭州府金溪县任知县。4年后被革职，降为教官。

次年，周福清花钱捐了内阁中书官儿。也没什么要紧的公务，终日抄抄写写。至此，京城内多了一个庸碌的七品小公务员。

捐官这件事，可以说是周福清的前科。他有这份心计，才会干出以后的事情。

按照清朝定制，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要离职回原籍居丧三年。光绪十九年，也就是案发的1893年3月，周福清的母亲过世，他离职回到浙江。刚一到家，就听到儿子周用吉要参加同年8月的举人考试。当爹的自然上心。望子成龙无可厚非，周福清四处打听，得知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居然是熟人——22年前，他和这位主考官殷如璋一起考中的进士。

殷如璋是江苏扬州人。混得不错，此时的官职是通政使司参议。周福清很兴奋，没想到是故交。好，该打点打点，该行贿行贿，老友面子和金钱双重保险，儿子笃定高中。

周福清说干就干，马不停蹄，立刻从上海赶到苏州。这一天是1893年7月25日。

清朝科考舞弊重要的是打通“关节”。这“关节”就是考生直接或间接与考官串通作弊的方法：进考场之前，在考生的试卷的某一处做下记号。考官则根据记号，给予照顾。

周福清当然知道打通“关节”的方法。他分别写了两张字条，一张字条上，写下试卷记号所用的字，他写了四个字“宸忠、茂育。”另一张字条上，他写了“洋银一万两”。这是事成之后酬谢的价钱。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当然，案发后，这两张字条也成了明明白白的证据。不光有字条，周福清还将自己的名帖和字条一起装信封中。安排妥

当，周福清在船上安然等候他的殷年兄到来。

三天后，1893年7月28日，主考官殷如璋乘官船抵达苏州码头。他的到来，周围自然很热闹，人多眼杂，周福清不敢贸然前往。想来看看，周福清想出一个主意，自己不出面，让随行的奴仆陶阿顺去送“关节”，这样安全。

殊不知，正是周福清自认为的安全举措，把他推向绝路。

陶阿顺临行前，周福清千叮咛、万嘱咐，说你到了官船上，先投拜会帖，争取让殷主考官接见，当面送上“关节”书信。如果主考大人不见，再送信函。

事儿交代得清清楚楚，可周福清忘了一点，主意再妙也得看什么人用。陶阿顺是个粗人，原来在绍兴府陈顺泉家当用人。就在7月才被周福清借来。这主仆二人相处没几日，周福清就安排办这等重要机密的事情，这实在是致命的大意。

小纰漏，惹大祸，世间万事，大抵如此。

话说陶阿顺上了官船，立马就把机密全部泄露，周福清嘱咐的全白搭了。事情经过虽然很简单，但历史上却有三个版本。

这第一个版本，说事发当时，苏州知府王仁堪正在官船上，向主考官周福清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两人正寒暄间，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书信，并说送信人叫陶阿顺，就在船外等候。按照规定，主考官是不能接受私人信件的。何况还当着苏州知府的面儿。为了避嫌，殷如璋干脆让王仁堪拆信来看，显得自己很廉洁。王仁堪拆开信一看，眼睛都直了，信里装着舞弊和一万两行贿的银票。王仁堪感到事情严重，立即下令拘捕送信人。愣头愣脑的陶阿顺被拿下。殷如璋的反应也很强烈，他拍案大怒，请求王仁堪将送信书严加审讯，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这个版本具有多少真实性暂且不论，先看第二个版本，说当时官船上确实有两个人，一个当然是殷如璋，另一个却不是苏州知府王仁堪，而是副主考官周锡恩。两位大人正在品茗闲聊，陶阿顺来了，送上书信。殷如璋是个明戏的人，知道这信里内容不凡，于是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信往桌上一搁，让陶阿顺先回去，自个儿继续若无其事地喝茶。哪知天才般的陶阿顺冒出一句：“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打个回条？”

这话当场把殷如璋雷翻。殷如璋恼恨交加，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他立即下令把陶阿顺交到地方官府查办。

还有第三个版本，殷如璋靠岸后，大小官吏人来人往，热闹喧嚣。陶阿顺托殷如璋的仆人将信送去。殷如璋此时正忙乱，无暇接待陶阿顺。陶阿顺站在岸边，左等不见人，右等不见人，心里焦躁不耐烦，索性大喊起来。他这一嗓子惊动船上的官吏。喊的具体内容估计是“怎么还不接见、回复之类”。殷如璋无奈，只得拆开信看，于是猫腻曝光。殷如璋多油，官场混了二十多年，反应超快，立刻把陶阿顺逮捕，交官府查办。自己把这事儿推得一干二净。

三个版本三种说法，哪个离事实真相更近呢？我认为，不是第一个，殷如璋是个精明的人，这一点，在事发后他果断表明自己的清白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精明人，是不会草率到让一个知府来拆信的。何况，他是主考官，有人忽然送来书信，自然会感觉到这书信里藏有特别的内容。不管当时谁在场，他应该是摆出不在意的样子，越淡然越平常，旁人越不起疑。因此，第二个版本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陶阿顺虽粗莽，但好歹也是在大户人家当仆人。他要一个回复，一方面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另一方面是自作聪明。主动询问，也不是无礼。而第三个版本说他站在岸边大喊大叫，这不太合情理，询问可以理解，大喊大叫就有些傻过头了，也有些过分无礼了。

实质上，哪个版本更真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三个版本虽在细节

有些差异，但案情发生的过程是一致的——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顺送信，而后事情败露。败露之后，整个苏州沸沸扬扬。

此时，周福清已经逃跑了。他本在船上等候佳音，哪知道陶阿顺一去不复返，他很敏感，觉得事情不太对头，立刻开船从苏州去往上海藏匿。

由于案发地点在苏州。苏州王仁堪将案子上报江苏按察使司，并先行提审陶阿顺。

一开始，陶阿顺拒不交代实情，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只交代自己是浙江人，案子没有太大进展。到了八月初六，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了通报公函，将人犯陶阿顺及行贿舞弊证据一并移交案犯所在地浙江。

这一案件，引起了浙江巡抚崧骏的高度重视。他安排按察使赵舒翹，会同布政使刘树堂，以杭州知府陈橘一同查办此案。

这三个人两度提审陶阿顺，陶阿顺终于招供，他在受审讯时称“系周福清令伊投信”，但是，“信内之事，伊实不知”。这句话，也证明案发过程的第二个版本更具有可信性。

根据陶阿顺的交代，浙江巡抚崧骏和办案大臣们商议，一致认为，此案的关键人物在于周福清，若不将周福清捉拿到堂，便不能查出案情真相。于是，追捕周福清的行动开始了。

八月下旬，浙江按察使赵舒翹命令仁和、钱塘二县访查周福清踪迹。得到的报告是未见周福清其人。其实，这时候周福清悄悄地从上海回到了绍兴原籍。浙江按察使赵舒翹命令会稽县，一旦发现周福清，立刻查传，押解省垣质省。与此同时，光绪帝下了一道谕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查办。”

这下子，周福清不但丢了官儿，还成了被追捕的要犯。从皇帝到封疆大吏，从浙江省会到会稽县，上上下下，一并通过缉周福清。周福清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插翅难逃，于是选择自首，只身来到会稽县衙投案。

会稽县衙当即将他转押到省城，送往杭州接受审讯。

对周福清的审讯，并不轻松。第一轮审讯，由杭州知府陈橘主审。第二轮审讯，由按察使赵舒翹、布政使刘树堂“藩臬两司会审”。最后，由浙江巡抚嵩骏亲自提审。周福清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经过，没有一点隐瞒。可交代归交代，态度却很不老实，他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也不是我一人，某科某人，就是通关节中了举人，我不过是照样子来罢了。”意思很明了，就是说这行贿舞弊，打通关节的事，早就有人干了，我只是不过是其中效仿者之一。

周福清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呢？我认为，这时候的他，一方面，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大家都这么干，法不责众；另一方面，他还是不服气，自己是被曝光了，如果没曝光呢，还不是无罪逍遥法外。

晚清科场舞弊丛生。周福清的心理和想法，就是一个反映。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毛细血管，一路进入到晚清科场腐败的主动脉。

周福清行贿舞弊案，经过长达数月的审理，终于在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十一月初十日，由浙江巡抚崧骏向朝廷上报了审理意见。意见中说，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该处斩，但是，他是作案未遂，一万两银票的赃款只是口头承诺，并且，他主动投案自首，因此建议从轻处理。

这份审理意见很有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味道。认真说来，这就叫执法力度太弱。嵩骏的这份奏折，传到光绪帝手里，光绪帝提朱笔批示四字：刑部议奏。

公元1893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刑部最终议定，赞同浙江巡抚崧骏的意见，提出：“对周福清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打一顿流放。这个决议光绪帝不接受，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天就颁下谕旨，宣布将周福清处以死罪。只不过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所谓斩监候，就是死缓，不立即处决，等到次年秋天执行。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时候，周福清没有被执行死刑，具体原因不明。更让人迷惑的是，非但不处决，而且再次减刑，改为“牢固监禁”。死缓又改无期了。这就是晚清的执法。

就这样，周福清一直被关押在杭州监狱里。关到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的时候，按照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趁乱逃跑出狱，事后又主动回归的罪犯均给予宽免减刑待遇的特例，周福清被获准出狱。

算起来，周福清一共蹲了八年大狱。在出狱后第三年，他病死于家中，他的儿子周用吉，因为父亲的舞弊案不但没当上举人，连秀才的功名也被革除，终日郁郁寡欢，积忧成疾，年纪轻轻刚三十五岁就死去了。

原本富庶的周家，也因这场重大变故急速败落，生活窘困，举步维艰。那时候，鲁迅才十多岁，不得不跟着母亲到乡下去避难，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鲁迅曾在回忆中说：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在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此段回忆里的“乞食者”就是乞丐，要饭的。其中“很大的变故”，就是指祖父周福清舞弊案。案子背后是晚清科场不可告人的勾当，看在眼里都是悲哀，看不到的都是秘密。

三七 透视甲午战争

晚期时期，由于政治的腐败，再加上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量的割地赔款，大清帝国一步步走向衰亡。虽然开展了洋务运动以图自强，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而邻国日本则不同，自汉唐以来，日本就效仿中国建制，多次派使者向中国学习。19世纪中期，传统的封建国家日本也遭到了美国等列强的侵略。但是事后，日本与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此后，日本逐渐强大，对外扩张的意图越来越强，数次侵犯中国东南沿海。随着中日力量的变化，一场改变远东格局的战事蓄势待发。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极为恐慌，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趁机诱使清廷出兵朝鲜，保证“我政府必无他意”。

李鸿章听信了日本的保证，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率领2500名淮军，乘船东渡朝鲜，同时照会日本政府，表示中国军队一旦平息了叛乱，马上撤回，不再留防。但日本仍以护送驻朝公使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朝鲜。

当清军和日军到达朝鲜时，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于是，清廷提出，两国军队按照约定同时从朝鲜撤军，同时命令后续增援的清军停

止进发。但是，日本决意挑起战争，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并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侵朝日军很快增至一万余人，比清军多出数倍，战争已迫在眉睫。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海域，对清军运兵船及护航舰发动了突然袭击。在袭击清军军舰的同一天。日本陆军进犯驻扎在牙山的清军。清军主帅叶志超放弃牙山，逃到了平壤。

光绪二十年七月一日（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宣布对日作战，日本政府也同时宣战，这标志着甲午战争的开始。

甲午战争的第一个战场在平壤。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三日（1894年9月12日），清军和日军在平壤打响了开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战斗。作战的清军35个营，兵力约1.7万余人，而进攻的日军有1.6万余人，双方实力相差不大。

平壤之战分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个战场进行。日军首先在将领大岛义昌的率领下，与驻守在大同江南岸的清军展开激战。清军在总兵马玉崑的指挥下，奋勇迎敌。日军死伤颇多，日军将领大岛义昌也受了伤，只得无功而返。

玄武门外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尚文、佐藤两将领统帅优势兵力向清军发起猛攻，当时，负责指挥迎战的清军总兵，是爱国将领左宝贵。他亲临阵前指挥，与士兵一起点燃大炮，浴血奋战，在场官兵无不振奋，英勇杀敌。然而，玄武门外的清军兵力不足，在日军的炮火下死伤惨重，左宝贵坚守不退，不幸中弹阵亡。

在城西南战场，日军将领野津道贯率领日军师团与清军总指挥叶志超统帅的清军作战。日军以炮火掩护，后有步兵冲锋，清军以马队展开反击。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日军未占到便宜，暂时退守。此

时，清军正可以乘势追击，不料叶志超竟然贪生怕死，命人举起白旗投降，自己则骑马逃跑，6天狂奔500里退过鸭绿江。

于是，朝鲜全境被日军控制，战场自此转入中国境内。

几乎在平壤之战的同时，清军和日军在黄海海面上打响了黄海之战，亦称甲午海战。同年八月十八日（9月1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出海口附近的大东沟，遭遇清帝国的北洋海军舰队，日方派出战舰12艘，清军派出战舰10艘，双方激战5个多小时。这是中日海军主力的首次交战，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钢铁军舰海战。

交战之初，由于北洋海军的任务是护运12营淮军在辽东大东沟着陆，所以战舰从朝鲜驶来，呈“一”字形排开；而日本战舰则出于冲锋的需要，呈尖峰形阵势。发现日军后，北洋海军在总指挥丁汝昌的统领下，立即变阵为尖峰形，并主动发炮攻击。

北洋海军的火炮、鱼雷发射管、总兵力等与日军相比都占劣势，但全舰官兵毫不畏敌，众炮齐发，一时间硝烟滚滚，海浪翻腾。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致远”“经远”等战舰冲在前面，日本“松岛”“吉野”等战舰也全力抗击。

然而，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飞桥被日军猛烈的炮火震塌，海军提督丁汝昌从二层的指挥台摔倒甲板上，左手骨折，信号旗也被毁。丁汝昌坚持不回内舱调养，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

“定远”号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但其他战舰已失去信号，无从获得命令。此时，日军战舰迅速从右侧包抄，右侧的北洋舰队被击毁，紧接着，日军战舰又绕到北洋舰队背后，前后夹击。“致远”舰遭受重创，船身起火，管带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前冲，欲撞毁日军主舰“吉野”号，不料被日军发射的鱼雷击沉；“经远”舰继续迎战“吉野”号，也

被日军击沉，管带林永升及全舰大部分官兵阵亡。

但同时，北洋海军也重重打击了日本舰队，使日本舰队的“松岛”“比睿”“赤城”等战舰遭到重创。当日军看到千疮百孔的“松岛”舰时，纷纷惊呼“不可思议”。战斗进行到下午，北洋海军的主舰“定远”“镇远”仍坚持战斗，受伤的“靖远”“来远”也抢修完毕，重新迎战。日军看到形势不利，便下令撤离了战场。

这次战役，双方均有损失。北洋海军损失了“经远”“致远”等5艘巡洋舰，另有4艘战舰受损，死伤官兵1000余人，日本海军有5艘战舰遭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此后，李鸿章等人主张消极避战，以“保船制敌”为借口，命令舰队全部藏于威海卫军港不出，把制海权拱手让予了日本海军。

黄海海战结束后，甲午战争的主战场转到辽东半岛，主要进行陆战，大规模的战斗有鸭绿江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894年10月24日），日军侵入鸭绿江，驻扎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为保卫国土而出战。作战清军兵力有82个营，约2.8万余人，日军兵力有两个师团，约3万人。可以说，鸭绿江江防之战是作战双方旗鼓相当的一场战事。

然而，清政府内部的主和舆论早已占了上风，军队士气低迷，各部派系分割，将领无心恋战。当时，清军的总指挥是宋庆，他奉命节制各军，但实际上各军根本不听调动。日军进犯的当天，就轻易地跨过了鸭绿江上游的安平河口。夜里，日军又在鸭绿江中布设浮桥，越过江水，直逼清军阵地。

清军对这一系列行动竟然没有察觉，更没有部署。当地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领士兵奋勇杀敌，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去阵地。周边驻防清军听此噩耗，竟土崩瓦解，四散而逃。就这样，日军仅用了三天就击溃了鸭绿江防线，侵入中国领土。

同时进行的是金旅之战。九月二十六日，日军2.5万人从旅顺附近的花园口登陆，驻守的清军约3万人，人数上略占优势。谁知日军登陆12天，清军竟然无任何反应。日军乘势攻陷金州、大连湾等地，沿途所至，清军都望风而逃，溃不成军。日军不战而胜。

十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旅顺，驻守旅顺的统领逃跑。仅仅数日，日军就占据了旅顺。

攻占旅顺的日军暴露出极其凶残的面目，展开了残酷的屠城行动。他们到处杀戮平民、抢掠妇女、放火烧城，使旅顺一时间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短短4天时间，日军竟然屠杀旅顺平民2万余人，使旅顺全市只剩36人。

金旅之战是决定甲午战争战局的一战。此战失败后，日军占领旅顺口，在渤海湾立稳了足，清帝国战败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再说北洋海军，在经历了黄海海战的失利后，奉李鸿章之命躲在威海卫。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日本陆军2.5万余人登陆荣成，集中力量进攻威海卫。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的清军仅有3000余人，奋力抵抗日军，牺牲无数，日军也伤亡惨重。最终，由于清军势单力薄，日军攻占了南帮炮台。

接下来，日本陆军、海军开始配合进攻北洋海军总指挥坐镇的刘公岛。北洋海军先后8次迎战日军，都击退日军的进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镇远”舰触礁受创，无法再投入战斗；“定远”舰中弹搁浅，仍坚持出战，最后弹药用尽，管带刘步蟾下令自沉战舰，自己吞药殉职。

此时，丁汝昌已是孤军奋战，面对日军多次劝降，丁汝昌不为所动。可是没想到，他身边的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炳和海军洋员勾结外敌，积极献降，胁迫丁汝昌答应日军的要求。而清政府也早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停止了一切战争支援。走投无路的丁汝昌只好服毒自

尽。死的时候，他那只在黄海海战中受伤的左臂，还打着石膏绷带。

几天后，牛昶炳与日方签订《刘公岛降约》，日军进驻刘公岛，威海卫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至此，持续一年多的甲午战争以清帝国失败而告终。

百余年来，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探讨纷纭。有人说，是因为清王朝武器落后，实力悬殊，但根据战争的统计资料来看，大清王朝虽处于弱势，但并不是完全占下风；有人说，是经费问题，慈禧太后为自己的六十寿辰做准备，把海防经费也用于修筑颐和园去了；有人说是因为日本蓄谋已久，清王朝准备不足；有人说因为战略保守，消极避战。

在《清末海军见闻录》一书中，对甲午海战的失败原因是如此解释的：海军军官生活大多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妓院林立。从各国海军历史来看，嫖妓现象比较普遍，但像北洋军中这样公开成群结队嫖妓却是罕见的。

生活如此奢靡腐化的海军，战斗力自然低下，根本抵挡不住训练有素、军纪甚严、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前文说过，在甲午海战前，清军和日军曾在朝鲜的牙山县成欢地区交锋，史称“牙山战役”。双方兵力对比3000：4000，战役中，双方伤亡相差不多，但清军还是以战败告终，牙山失守。战役总指挥叶志超战败后，谎报战绩，却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清王朝制度的落后和政治腐朽的结果。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慌忙敦促李鸿章赴日本和谈。此时，日军不仅占领了澎湖，直指台湾，而且逼近直隶一带，威胁清政府的中央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赴日谈判必然落井下石。

在甲午战争中，光绪皇帝数次主张积极应战，无奈实权旁落，未能奏效。战败后，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下，光绪皇帝只好答应和谈。李鸿章临行时，光绪皇帝再三嘱咐：“要斟酌轻重，与日本多加磋磨。”因此，当《马关条约》的条文传来，光绪皇帝认为丧权辱国之极，坚决不肯签字。

于是，慈禧太后怂恿奕訢等大臣，在朝堂上集体威逼光绪皇帝尽快批准。光绪皇帝万般无奈，提起笔来写下准奏意见，然后昭告天下说：“希望臣民能够体谅朕吧！”

与此同时，身在日本谈判的李鸿章也遭遇了一个意外。他被日本暴民小山丰太郎刺杀，枪弹击中了左边面颊，当场昏死过去，幸好子弹未击中要害，又有随行医生及时抢救，李鸿章才渐渐痊愈。和谈使臣遭到刺杀，各国纷纷谴责日本的野蛮残暴。李鸿章也希望借此讨得一些谈判的筹码，谁知日本早已探知慈禧太后给李鸿章定的底线，因为除了同意停战之外，其他条款一概坚决不让。经过几天的僵持，李鸿章只好答应了日本的全部条件。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中方代表李鸿章、李经芳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等人，在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共11款，附有《另约》3款、《议定专条》3款、《停战展期专条》2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国解除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是自主独立的国家，并从朝鲜撤兵；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分8次还清；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开放重庆、苏州、杭州、沙市（隶属荆州）四地为商埠；中日彼此享有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最惠国待遇只是日本单方面的）；中国准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输入各种机器；台湾岛和澎湖列岛的居民，2年内变卖家产迁居界外，否则视为日本臣民。

几天后，由于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之事侵犯了俄、德、法等国的利益，在上述三国的干涉下，日本同意放弃《马关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但要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

李鸿章签约之后感叹道：“日本终将成为中国的大患！”梁启超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也说：“中国四千年的大梦，就是被甲午战争的失败后割让台湾、赔款两亿唤醒的。”

而面对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日本又是怎样使用的呢？具体有四方面：

其一，扩充陆海军军备。这笔支出几乎占去了全部款项的一半。引人注意的是用于海军的资金投入，力度很大。其后的日俄海战及“二战”中日本海军的不凡成绩，与其早期吸纳甲午赔款得到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

其二，用作币制改革的准备金。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仍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而改为金本位的货币变革，由于资金匮乏的原因而无法启动。明治政府用7260余万日元的赔款作为银元兑换的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确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这次变革的成功，使日本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其三，设立基金。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灾害准备基金、教育基金，各为1000万日元。

其四，其他支出。如台湾经营费和特别献给皇室的费用等。所谓“台湾经营费”，数额1200万日元，与1898年拨出，归入“台湾总督”的财政，日本政府欲长期开发和经营台湾岛的计划，已经初步显露出来。至于献给皇室的费用，数额高达2000万日元。甲午战争胜利之后，日本举国沸腾，明治天皇大肆封赏贵族和重臣。众多大臣、将军授奖晋爵，相关支出颇为浩大，所以以高额“献金”回报皇室。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甲午战争赔款为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注入了资本，割占的土地扩大了其势力范围，通商优惠为日本的商品、资本输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自此，日本一跃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远东格局也由此改变。

三八 戊戌变法103天

光绪皇帝，名爱新觉罗·载湫，同治十年（1871）生于醇亲王府。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死，无子。按照惯例，应当在近支的晚辈中挑选一位未来的皇帝，但是掌握着清朝生杀予夺大权的慈禧太后，却断然打破成规，宣布由年仅四岁的载湫继位。慈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年幼的小皇帝能懂什么？她自然可以继续执政。从此，载湫踏上了坎坷的“帝王”之路。

为了让光绪皇帝养成逆来顺受的习惯，除了每天向慈禧太后定时请安的繁琐礼节外，还要听几位老师轮流讲古文。上朝时，他名义上端坐在龙椅上，实际上只是点缀而已。坐在帘子后面，对跪在地上的那些官员指手画脚，喜怒无常的慈禧太后，才是真正操纵国家命运的人。

随着光绪皇帝一天天的长大，知识的增多，权力的欲望在他心里渐渐膨胀起来，他非常想参与军国大事，指点江山，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皇帝。但周围的环境，使他不得不把想法深埋在心里，耐心地等待时机。

光绪十三年，载湫十六岁，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皇帝亲政。载湫生父奕譞深知慈禧太后想独揽大权，岂能甘心交出权力？慌忙上奏，请求慈禧继续“训政”，其他一些王公大臣也随声附和。慈禧太后在一番虚假的推让后，又堂而皇之地继续“训政”了。

光绪十五年，机会终于来了，载湫大婚。结婚象征皇帝已成年，继续“训政”实在说不下去，慈禧太后只得“撤帘归政”，实际仍掌握大

权。

但是，对光绪皇帝来说，毕竟是多了一些参政的机会，多多少少可以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光绪皇帝亲政后所遇见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面对一场迫在眉睫的战祸，京城内外却彩旗招展，戏台高筑，一派热闹景象——慈禧太后正为她六十寿辰做准备，把海防经费也挪用到修筑颐和园去了。慈禧虽然于光绪十五年“归政”，但始终不忘揽权，并把朝内和地方上的实权人物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集团。她惧怕日本武力，一意苟安；同时又怕战争破坏了祝寿气氛，所以支持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避战求和的主张。

年轻的光绪皇帝面对国难当头的局面，立志图强，不甘做亡国之君，决心向日本开战。同时也希望战争取胜，为自己赢得一些实权和威望，改变自己受制于人的处境。光绪皇帝的主张，得到他的师傅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他们结成“帝党”集团，与慈禧太后争衡。

到了中日战云密布的六七月间，光绪皇帝和部分帝党官僚即为国家前途忧虑，又希望借机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便借助国内舆论不断电谕李鸿章积极备战。

然而，李鸿章这时却目无这位傀儡皇帝，对他的谕令置若罔闻，并拒绝出动北洋海军，主张“避战自保”。由于后党的妥协退让，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光绪皇帝面对深宫高墙，仰天长叹，束手无策。最多也不过痛骂李鸿章及其下属几句，解解恨而已。

光绪二十年十月，旅顺失守，中国人惨遭屠杀，战火已烧入国门。此时此刻，北京城却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家家张灯结彩，处处歌舞声乐。文武百官都在热烈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并奉旨听戏。前线战败消息的传来，后党官僚们无动于衷，依然如前。帝党集团个个咬牙切齿，无奈手中无权。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威海卫陷落，北洋

海军全军覆没，光绪听说此消息后，失声恸哭，其下属也摇头叹息。

中日谈判开始后，日方先声夺人，步步紧逼。光绪皇帝则反对割让台湾，鼓励大家发奋图强。尽管光绪爱国心切，但一个傀儡皇帝怎能扭转大局？同年三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其中包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面对此卖国条约，后党官僚孙毓汶竟大摇大摆地直上宫殿，大言不惭地要求光绪皇帝签字。光绪皇帝心如刀绞，暗下决心，再不当傀儡皇帝了，再也不做亡国之君了。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都察院门前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成群的北京居民涌向这里。原来，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多人，联名写了一封万言书，要求都察院转呈皇帝。

在这封万言书里，举人们强烈地要求惩办卖国贼和临阵脱逃的将领，表示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其中，有一个人正站在门前的石台上，慷慨陈词，痛切地指出国家面临的危局，深入浅出地讲述变法图存的必要性。这个人便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年仅三十六岁的康有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少年时期，康有为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他的祖父康赞修讲程、朱之学，是他最早的教师。康有为从十九岁起到广州有名的理学大师朱次琦那里学了三年。受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鄙弃了汉学家在故书堆里进行烦琐考据的风气，开始独立地思考问题。

二十二岁时，康有为离开朱次琦，一个人来到风景秀丽的西樵山白云洞。在这里，康有为雄心勃勃，一面领略秀丽景色，一面潜心研习学问。

一日，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来游西樵山，路遇出来游玩的康有为，

两人顺路游山，边走边谈。张鼎华讲述了当时京城内外的奇情异事，康有为感到茅塞顿开，相见恨晚，也乘机请教了不少问题。

受张鼎华的影响，康有为读了不少经世致用之书，有感于外患不已、国事衰退和朝政的腐败，产生了“经营天下”的抱负。

光绪五年，康有为第一次来到香港，他深被香港建筑的华丽，道路的整洁，制度的严密所慑服。三年后，他入京投考，再次经过香港，并到达上海。此时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远胜封建制度，从此康有大购西书，努力钻研，从声光化电到史志游记，无不涉猎，逐渐形成了一套变法思想。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决定利用去北京参加乡试的机会，写一封上皇帝书，痛陈列强对中国环窥伺机的险境，要求皇帝引咎罪己，励精图治。一个布衣秀才竟敢横议朝政，而且言辞又这样激烈，自然不会有人理会，所以不但这封上书没有送到皇帝手中，康有为还被人斥为“狂生”。

上书无路，参政无门，无奈之下，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了“万木草堂”，一面研讨维新理学，一面课业授徒，培养变法维新的人才。他的主张吸引了不少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晚清思想界的泰斗梁启超就是在这时向他拜师求学的。从此，师徒二人依依相随，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在万木草堂里，康有为写了两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他把被封建顽固派视为通灵宝玉的传统儒学一律斥之为“伪经”，又编造了一套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把自己的变法思想和孔子学说联系起来。

康有为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是想利用孔子这个招牌，来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这两部书，一破一立，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又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时传来了清政府要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这个丧权辱国的噩耗深深地震动了他。激于爱国义愤，他联合了一千三百余名应试的举人，一起请愿，并由他起草了一万八千言的上皇帝书，递到都察院。

举人们的上书又一次被顽固势力拒绝，并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里。但这次行动却冲破了历来对于群众集会、士人干政的禁令，对一潭死水般的封建专制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上书的内容被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康有为和梁启超通过这次上书活动，逐步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资产阶级第一个政治派别——维新派。他们发动了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政治改革为内容的维新变法运动。历史的种种机遇，使维新派与帝党集团结合起来，并紧紧依靠帝党集团，共同推动了这场变法运动。

“公车上书”后不久，张榜公布成绩，康有为榜上有名，考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传统士子寒窗苦读的最高理想。康有为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的了，但他也感到一种压力，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他彻夜难眠。

康有为苦苦思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凭着不怕风险，坚韧不拔的毅力，又写了上皇帝第三书。言语恳切，发人深思，这封上书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光绪皇帝看完康有为的上书，仿佛看到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马上命令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从此维新派开始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光绪皇帝对变法主张的重视，给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带来了很大希望。但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以光绪为核心的帝党官僚并不掌握实权，真正把持中央和地方实权的，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和一部分洋务派首领。他们思想保守、反对革新，极

力维护旧的统治秩序。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维新派大都年轻气盛，思想激进，但缺少政治斗争的经验。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幻想通过实行维新派的主张，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取统治大权，推行新政，改变国弱民穷的处境。

于是，这两大政治集团各自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其冲突的态势如地下炽热的岩浆，迸发只是时间问题。

正当帝党集团与维新派紧密合作，为变法作准备的时候。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除在北京、天津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外，还不辞劳苦，南下上海、湖南、广东等地，大力宣传变法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

仅仅靠人力去游说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新闻媒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康有为凭借较优厚的经济实力，自费创办了《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

《中外纪闻》开始每期印1000份，随当时的专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分送给北京的官员。后来印数增至3000份，流畅的文笔，新颖的观点，使在京的官员眼界大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此推动下，一些开明官僚也开始倾向维新变法了。

首开先例的，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他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动下，出面组织了“强学会”。

“强学会”是一个宣传变法维新，寻求强国之路的爱国团体。强学会每十天聚会一次，大家轮流上台讲述中国自强的学问。慷慨激昂的

演讲、热情洋溢的讨论，每次都能吸引众多的旁听者，每次都能增加许多新会员。

“强学会”诞生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鲜明的宗旨，曾一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在维新派声势初步高涨的时刻，连一些反动的军阀官僚也投机混迹于“强学会”。例如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参加了强学会，洋务派大官僚、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捐款给强学会作经费，甚至连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由于他名声太坏而被拒绝。

形势的发展如此迅速，连维新派也没有预料到。英、美等国的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打着支持中国变法的旗号，极力拉拢维新派。有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居然加入了强学会，甚至英国当时驻华公使欧格讷也亲自参加，并捐助图书。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对中国的变法运动很热心，实际上他们是想乘机搅乱中国，然后为本国政府谋取利益。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要求维新派分清敌我，审时度势，及时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这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如何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强学会”兴旺的背后也蕴藏着危机。慈禧太后无法容忍维新派在自己眼皮底下行此“大逆不道”，一些顽固派守旧官僚早就心领神会。他们暗中破坏，散布流言蜚语，准备伺机反扑。

形势急转直下，如果再在北京滞留下去，不仅不利于发展，而且自身难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康有为果断南下，留梁启超在京坚持工作，自己则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并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出版《强学报》，将东南一带的维新派组织起来。

尽管维新派做了一定让步，但顽固派守旧势力不肯就此罢手，翻云覆雨一向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果然不出所料，李鸿章的亲家、御史

杨崇伊首先跳出来弹劾“强学会”，说强学会“植党营私”，大骂《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经”，请求严禁。

此时，慈禧太后早就不耐烦了，下令查封北京“强学会”。一些见风使舵的官僚渐渐疏远维新派，乌云笼罩着北京城。

此时，上海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一向以开明自诩的张之洞见势不妙，也板起面孔，跟着查封了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就连出面牵头组织强学会的文廷式，也收到了牵连，竟被革职查办。

维新派遭此打击，能否重整雄风，这不仅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考验，也关系到晚清政局的变化。

“强学会”的被迫解散，是封建顽固势力向维新派发动的一次反扑。他们本想以此手段，吓唬一下维新派，不想康有为等人不吃这一套，我行我素，一如既往。而且维新派因祸得福，在为难时刻，得到帝党官僚的有力支持。

帝党集团的核心人物翁同龢，此时已经坐不住了，他不能眼看刚有起色的局面，就这样被断送掉，更不想让自己辛勤培育过的皇帝，当一辈子傀儡。怎么办呢？顶风而上，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一旦惹恼了慈禧太后，后果不堪设想。这一次可真让翁同龢寝食不安，大伤脑筋。

终于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条“曲线救国”的妙计，凭着他在北京多年的关系，经过多方疏通，在北京强学会旧址设立了官书局。官书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名义上，清政府每月给银1000两，主要的任务是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而实际上，维新派可以以此为基地，继续传播西学，宣传变法。

维新派受此鼓舞，精神为之一振，黄遵宪、汪康年等马上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闻名遐迩的梁启超到上海担任主笔。从此一篇

篇“切中时弊，文笔犀利”的文章传遍大江南北，鼓舞无数爱国青年投身于改革洪流。

接着说说维新派的二号人物——梁启超。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花去毕生心血去考科举，然而时运不济，屡试不中。连个秀才都没当上。而聪敏过人的梁启超，不负父望，年仅十一岁就考中秀才，十六岁又中举人。应该说，梁启超就是循着此路走下去，前途也是很光明的。

但万万没想到，一个看来偶然的事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光绪十六年，年近十七岁的梁启超，经人介绍，认识了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康有为。他立刻被康有为的理论所吸引、折服。当即拜康有为为师，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成为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中深得老师真谛的得意门生，开始走上维新之路。

甲午战争时，梁启超与康有为都在北京参加会试，结果梁启超没中进士。但胸怀大志的梁启超毫不介意科场功名，南下上海主笔《时务报》，为维新事业呐喊，成为时代号手，激励着仁人志士为维新变法而奋然前行。梁启超于是声誉鹊起，与康有为齐名，被人合称为“康梁”。

正当南方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北方的天津也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一本名叫《天演论》的书在中国出版，立刻震动了全国。

《天演论》原为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唯物主义者赫胥黎所作，把这部世界名著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曾被毛泽东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严复。

严复家境贫寒，无力供他上学，但他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取

免费的福州船政学堂。光绪三年被送到英国学习海军，两年后回国，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在主编《国闻报》和北方其他报刊上，用古文发表许多宣传变法的文章。他反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观点，大声疾呼中国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否则就要被淘汰，亡国灭种。

严复的文章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读，成为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有力思想武器。《时务报》和《国闻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把全国的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感到惊恐和不安。一些顽固官僚闻风而动，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串通一气，大骂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士林败类，把变法维新思想说成是异端邪说，一顶顶歪曲事实、不顾真理的大帽子扣到了维新派头上。

湖南当时是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同时也是封建顽固势力集中的地区。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早就看不惯这帮年轻人搞的这一套，他纠集了一批顽固士绅，涌向巡抚衙门，向陈宝箴递交了一份《湘绅公呈》。他们假托民意，攻击谭嗣同等人不务正业，引诱学生误入歧途，要求整顿时务学堂。深知内情的陈宝箴，不但不予理睬，反而给谭嗣同等人以有力的支持。

湖南的新旧斗争仅是全国斗争的一个缩影，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地主阶级的顽固守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斗争。

恰在此时，为讨慈禧太后欢心，张之洞抛出了《劝学篇》，成为这一时期对抗变法维新思想的代表作。

张之洞头脑灵活，为人机警圆滑，善于见风使舵，把自己打扮成“圣人”“君子”，鼓吹《劝学篇》是为了正人心，开风气。因此，他的这本书具有调和中西、折衷新旧的色彩，反映了统治阶级中顽固派

和洋务派的共同愿望，并且比顽固派的主张带有更大的迷惑作用，连光绪皇帝也被蒙骗了。

面对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势，维新派以报纸为有力武器，给予守旧势力迎头痛击。

顽固派曾经叫嚣过，说什么祖宗的成法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改变，则是违背天理，祸乱国家。听起来挺吓人，实际上一攻即破。维新派沉着迎战，给顽固势力作了透彻的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在此后的五十年间，我军的武器由刀矛弓石发展为洋枪洋炮，这说明了什么？过去我们的祖先不和外国人打交道，现在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又说明了什么？

维新派步步深入，驳得顽固派体无完肤。在批驳顽固派的同时，维新派还把变法与救亡联系起来，用严峻的现实驳斥顽固派的迂腐守旧，向世人表明了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在这场交锋中，维新派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代表者，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挑战。维新派主动发动进攻，发表了大批具有鲜明的观点、论辩性极强的文章。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中心问题是一个，就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的一天，山东胶州湾的海面风平浪静，人们已隐约感受到了初冬的寒意。突然，德国的炮艇驶进了胶州湾，打破了这里的平静。原来，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来强占胶州湾。以此为开端，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效仿，掀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浪，瓜分的局面逼到眼前。

维新变法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加速了发展。这时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一再给光绪皇帝上书，强烈地要求变法救亡。在上书的同时，康有为又在北京发动建立了“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

教”的口号。

开会之日，康有为首先登台演说危亡惨祸，慷慨激昂，听众无不为之感动，甚至失声痛哭。然而，为时不久，“保国会”即遭到顽固派群起攻讦，被迫解散。“保国会”的天折，固然与某些当权派的攻击有关，但同时还因为康有为已经打通了一步登天的途径，不再需要这种群众性的组织了。他的政治活动的着眼点在于争取光绪皇帝，利用光绪皇帝的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这一点，似乎已经开始可以做到了。

在此之前，有一个都察院的官员，名叫高燮，他很赏识康有为。因此在光绪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希望委以重任。本来光绪皇帝已准备召见这位风云一时的人物了，但收到了恭亲王奕訢的阻拦。恭亲王奕訢说：“按照老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让大臣接见康有为问话。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上午，康有来到总理衙门，走进大厅，但见两侧正襟危坐着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几位大臣。除翁同龢外，其余几位均面容严峻，似乎把康有为当成一名囚犯。

康有为环视了一眼大厅，然后在一角落坐，心想盼望已久的时刻来了。

“问话”开始了，几位大臣轮番上阵，你一言我一语，恨不能把康有为给吃了。康有为镇静自若，引经据典，由古及今，由中到外，对答如流。他不仅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而且批驳了李鸿章、荣禄等人的诘问，受到了翁同龢的赞赏。

在翁同龢的推荐下，光绪皇帝谕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同时，命令总理衙门呈送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

看到这些书后，光绪皇帝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他对庆亲王奕

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意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太后听后大怒，但一时不便阻拦，只好让他“闹去”，以后再说。这才给光绪一个实验新政的短暂机会。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向全国宣布变法开始。从四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上旬，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公布了一系列改革的上谕，涉及经济、文教、军事等领域。从六月上旬到八月中旬，新政扩展到政治方面，这已经极大地震动了统治集团。

康有为见顽固势力太大，劝光绪皇帝在政治改革上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引起天下大乱。光绪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几年以后再说吧。”

大学士孙家鼐也劝告光绪皇帝说，推行新法将失掉君主的权力。光绪皇帝慨然回答说：“朕想要拯救中国，只要能有益于国民，朕失去权力又如何呢？”

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态度是积极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这些新政措施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古老中国的沉寂，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然而，以慈禧为首的守旧顽固势力掌握实权，对这些有局限性的政令也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或公然拒不执行，或阳奉阴违，搪塞拖延，不了了之。百日维新就是在维新和守旧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

新政开始的第四天，即四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撤去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龢的职务，勒令回籍。这等于砍去光绪的一只臂膀。

同一天，慈禧太后又来到颐和园，在这里召见了她的亲信荣禄。两人密谈了很久，并商定了必要时对帝党采取军事行动的步骤。之

后，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京畿军政大权。同时，任命另一些亲信管理京师卫戍军队。

慈禧太后深知，只要军队在握，维新派和他们的支持者光绪皇帝都是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着，慈禧太后又下诏，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都要向她谢恩，表明大权仍在后党手中。

光绪皇帝为变法的前景所鼓舞，对慈禧太后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他召见了康有为，本准备委以重任，但受守旧派的牵制，仅委以总理衙门章京，梁启超只命专办译书局事务。

七月四日，光绪皇帝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顽固派官员，全部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暴、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帝、后公开对抗，朝野震动。

翌日，光绪皇帝又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亲自决定的一次人事大变动。

光绪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未涉及新政内容本身，只是组织性的手段。但正因为是组织性手段，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来说，却是与权力有关的大事。慈禧可以容忍光绪皇帝颁发某些新政上谕，但绝不能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组成自己的党羽。

帝、后两党的斗争已经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一切顽固守旧势力群集慈禧太后周围，策划扑灭变法运动。

这时，京津一带盛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十月赴天津阅兵时，会发生兵变。慈禧太后将废掉光绪皇帝。大难临头，形势危急。光绪皇帝从慈禧太后的脸色上也察觉到了这种危险性。

七月三十日，光绪皇帝给康有为等人写了一封密诏，要他们设法

相救，找到一个既能坚持改革，又能不致过分激怒慈禧太后的办法。

这个办法显然是不存在的，一无军队、二无武装的维新派拿不出切实对策，最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袁世凯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是北洋三军之一“新建陆军”的统领，荣禄的亲信和部下。他曾参加过“强学会”，正是这一点使维新派把他误认为自己的同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两次召见袁世凯，并授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不受荣禄节制。袁世凯表面表示效忠皇帝，实则另有打算。

处境的险恶，使维新派越来越感到军队的重要性。为此，谭嗣同实行了一个自以为直截了当的办法。

八月三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袁世凯对不速之客的到来，心中早就有数，在寒暄之后，仍装聋作哑地问有何事相商。谭嗣同从袖子里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诏，要求袁世凯迅速出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太后的住处颐和园。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谭嗣同声泪俱下地对袁世凯说：“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面前。你的生命在我的手里，我的生命也在你的手里。我们至迟要在今晚决定，决定后我立即进宫请皇上办理。”

袁世凯十分狡猾，当面并不拒绝谭嗣同的要求，而是慷慨激昂地说：“杀荣禄如杀一条狗。”但是，他提出粮、械、子弹准备不足，须等到九月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时才能执行。

谭嗣同再三要求提前，袁世凯表示无法做到，谭嗣同只好同意了袁世凯的意见。

当维新派设法营救光绪皇帝的同时，慈禧太后和荣禄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八月五日，袁世凯从北京一回到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全

盘交代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当天荣禄就乘专车赶到北京，同诸多后党官僚一起面见慈禧，会议至夜半方散。

八月六日清晨，慈禧太后怒气冲冲地从颐和园回宫，发动了政变。就在这天黎明，光绪皇帝还到颐和园去请安，慈禧却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她带人直达皇帝的住处，把一切文件都搜刮拿走，又把皇帝召来训斥说：“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竟听小人之言来害我？”

光绪皇帝沉默良久，才说出一句话：“我无此意。”慈禧又唾了一口说：“痴儿，今天如果没有我，明天你还能在这儿吗？”慈禧当即传旨说，光绪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

就在这同一天，慈禧就下令逮捕维新人士。康有为已于前一天离开北京到天津，后在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脱险来到香港。梁启超在知道大局已定后，逃到日本大使馆，又化装前往天津。在天津剪去发辫穿上和服，躲过清军搜查，乘日轮逃往日本。

政变发生后，被逮捕的维新人士很多，其中有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光仁等。谭嗣同本来还有机会逃走，但他决定不走，静待逮捕。在他被捕前的几天内，他还同北京的镖客王五筹划，想把光绪皇帝救出来，但事起仓猝，计划落空。

谭嗣同的一些朋友劝他到日本避难，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八月九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谭嗣同镇定自若，于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献身精神。

慈禧太后对自己的政敌，向来是不手软的。八月十三日，将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斩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其他参与或支持维新的官

吏，陆续被革职、判刑。新政的绝大部分被废除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下来，成了戊戌变法的纪念品。

对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不能杀，也不好废掉，但可以软禁起来，于是，慈禧太后下令，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

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了，政治局面又回到了那种令人窒息的黑暗状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依旧没有找到一条民族振兴之路。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维新派推行改革的办法，就是竭力争取光绪皇帝支持变法。他们天真的以为，抓住一个皇帝，颁发一纸诏书，改革就会成功。

然而，这种改革的成功要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改革派必须掌握政权，用政权的力量推行改革。维新派恰恰缺少这个力量。知道临失败前夕，他们才想到依靠兵力保护新政。

袁世凯的出卖，并不说明维新运动失败出于偶然性，即使袁世凯不出卖，也无法抵抗强大的顽固派，而他也是权衡厉害得失之后彻底转到顽固派一边的。

不过，戊戌变法运动尽管失败了，但传播了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同封建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冲破了封建主义思想的壁垒，为以后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戊戌变法失败后，总结历史教训，促使一些先进分子走上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可以说没有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就不会有辛亥革命。

而光绪皇帝在民族危亡之秋，不甘作亡国之君，投身当时的进步潮流，积极参与，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追求国家的进步与光明前景，其志可嘉，应是一位值得肯定的爱国者。

三九 光绪帝死因探疑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在度过了10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日）死亡，终年三十八岁。

紧接着，第二天，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死亡。

在22小时之内，这对母子相继去世，死亡时间的诡异与巧合，光绪帝与慈禧之间早已存在的政治矛盾，不得不让人感觉，光绪帝的死亡背后，深藏着一个惊心而巨大的阴谋。由此，繁衍出种种猜测和议论。

第一种说法：慈禧知道自己即将归西天，不愿意在他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掌权，派人毒死了光绪帝。主要依据有清末给光绪看病的名医屈桂庭他的回忆录中说：“光绪在临死前三天，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并且不停地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脸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明显是中毒症状。”根据这种说法，光绪是被毒死的，最大的嫌疑人是慈禧太后，因为她是当时最有权势，又严密控制光绪帝的，最好下毒、最可能下毒的人。

此说法的依据和记录有《清室外记》《清裨类钞》和《崇陵传信录》。

第二种说法：袁世凯见慈禧一病难起，怕慈禧死后，光绪掌握实权，报复自己在戊戌变法出卖皇帝的行为，于是贿赂宫廷宦官，用剧

毒药物害死光绪帝。这种说法最有权威的依据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说法，溥仪说：“我亲耳听到一个侍候光绪帝的老太监讲，光绪帝死前一天，只是用了一剂药，才变坏的。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送的。”

第三种说法：太监李莲英得悉光绪帝的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与慈禧一起阴谋将毒药投入光绪帝的食物中致使光绪帝中毒身亡。

第四种说法：这几年来有专家根据光绪帝生前的病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推断是光绪帝因为严重肺结核病加上其他并发症，导致死亡的。

历史背景的根据是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太医朱琨等为光绪帝诊得脉案：“口渴思饮，喉痒呛咳，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蒙眬……耳内觉聩，时做轰声。胸中发堵，呼吸语言，丹田气觉不足……夜寐少眠，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

第五种说法：光绪帝有严重的肾亏，加上光绪帝从小身体虚弱，幼多病有长期遗精史。《病原述略》中说：“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较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

光绪帝有这样一种病症，再加上从几岁起就受慈禧的压制，长期处在紧张之中，后来又在做皇帝时更是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和打击，病情逐渐加重，引起一系列呼吸道、消化道等并发症，最后病亡。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是光绪生前的病历和光绪生前自己的一段回忆。

究竟哪一个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呢？光绪帝的确切死因到底是什么？史学界关于光绪死因的辩论从未停止，怀疑谋杀说和正常死亡说几经交锋，却一直没能形成学术定论。

而据最新的研究认为，光绪帝是死于砒霜中毒。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先后提取了光绪分别长26厘米、65厘米的两小缕头发，清洗后晾干，剪成1厘米长的截段，逐一编号、称重和封装，然后用核分析方法逐段检测光绪头发中的元素含量。

结果显示，光绪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元素砷，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第一缕头发的砷峰值出现在第十段（2404微克/克）；第二缕头发的砷峰值出现在第二十六段（362.7微克/克）和第四十五段（202.1微克/克）。而同时对比测试的头发砷含量，当代人为0.14~0.59微克/克，与光绪同时代并埋在一起的隆裕皇后为9.20微克/克，清末一个草料官干尸头发为18.2微克/克。

后来，又按照规范的法医检验要求和方法，提取了光绪遗骨及衣物样品测试，结果肩胛骨、脊椎骨和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很高；内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再对光绪棺椁内、墓内物品和陵区水土等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光绪头发上的高浓度砷物质并非来自环境沾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光绪头发上的高含量砷并非为慢性中毒自然代谢产生，而是来自于外部沾染；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尸体的胃腹部，尸体腐败过程进行再分布，侵蚀了遗骨、头发和衣物。而砷化合物也就是剧毒的砒霜。

经过科学测算，光绪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

按照这一研究，那么就与第一种说法一致——光绪帝是被谋杀的，那么谋害他的最大犯罪嫌疑人就是慈禧。

慈禧为什么一定要谋害光绪帝呢？原因有五。

第一，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积怨太久，仇恨太深，早已到了势不两立，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地步。在中法战争前，他们之间关系还是友好、亲密的，但由于在中法战争中，他们一个主战一个主和，

对战争的分歧太大，他们的关密关系荡然无存，矛盾和仇恨开始出现。后来经过光绪“亲政”、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准备废掉光绪帝的大阿哥事件、光绪爱妃被害等等事件，他们之间已到仇深似海、你死我亡的地步。慈禧也多次想害死光绪帝，慈禧极为害怕自己死后，光绪报复她，让她死后不得安宁、死不瞑目，所以她预先设计毒死了光绪。

第二，慈禧历来心狠手辣，狠毒无比，她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三个最狠毒的女人之一（其他二位是吕后、武则天），被她害死的人不计其数。比如：肃顺、珍妃。所以对既是她侄子，又是她外甥的光绪，她也会毫不留情地下杀手。

第三，不管光绪帝是否有痼病、肾病，但这两种病都没有严重到致他于死地的地步。大家知道痼病到了不停地大口吐血的地步，才是比较严重。在光绪的病历中根本没有“吐血”记载，说明光绪的痼病不是很严重。因此光绪死于痼病、肾病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另外光绪死前几天的病历突然将光绪的病描述得很严重，使人感觉到光绪是正常死亡。这一点十分可疑，请不要忘记了给光绪帝看病的全部过程都在慈禧监视和掌握之下，光绪死前几天的病历极有可能是慈禧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派人“伪造”的。

第四，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关在中南海瀛台，整整十年间，光绪帝一直处在囚禁状态。瀛台是中南海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与陆地相连的只有一个木板桥，岛上慈禧派人二十多个心腹太监日夜严密监视光绪。整个紫禁城、中南海已是戒备森严，加上瀛台更严密的保安措施，外人是难以进入瀛台的，更何况你根本不熟悉中南海一带的地形。并且光绪帝吃住还有一套安全程序。别说外人，就是一个长期生活宫中的人都难以接近皇帝。所以根据以上情况推断，害死光绪帝的不可能是袁世凯，只有严密控制中南海、瀛台，大权在握的慈禧才有最大嫌疑。

第五，光绪帝在死亡前一天，向全国发布诏令，命令各地总督巡抚寻找名医名方，推荐进京，为皇帝治病。这件事起码说明了两点，一是皇帝这时非常清醒，不像一个意识模糊、即将升天的人；二是皇帝对治好自已的病充满信心。但是就在第二天皇帝就突然死了，令人感到奇怪。还有一点更让人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也即在慈禧死之前二天，清朝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两道诏令。

第一道：命醇亲王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第二道：授溥仪之父载沣为摄政王。

这两道诏令意思很清楚，一旦皇帝升天，就让溥仪继位，让溥仪父亲载沣主持朝政，辅助年幼的新皇帝。这两道命令是谁下的？不可能是光绪帝，因为光绪帝早已无权力，更没有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最有可能下这道命令的人是谁？慈禧。

为什么慈禧要下这两道诏令？从中看出两个问题。

一、慈禧自己的病已非常严重，到了最后关头，已到了不得不对后事进行安排的地步。但这一天光绪正好下诏令遍求全国名医，为他治病。

二、慈禧已经决定，要光绪帝死在她自己之前。道理很简单，如果光绪死在她后面，这两道诏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因此，慈禧发了两道诏令，就是要光绪帝在她之前死。

果然，诏令下达第二天，光绪升天，溥仪继位，载沣监国，第三天，慈禧呜呼哀哉，上了西天。结果与慈禧设计的一样。

由此可见，关于光绪死因，第一种说法似乎更接近于真相。

四〇 末代帝王与清王朝覆灭

溥仪是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在他继位前，清廷皇族还上演了一场立储的闹剧。光绪皇帝支持维新被囚禁，慈禧太后训政。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发出一道懿旨，溥儀入继穆宗为嗣，号“大阿哥”。随后，大阿哥在弘德殿读书，师傅为同治皇帝的岳父、承恩公、尚书崇绮和大学士徐桐。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初一，溥儀代皇上到高殿、奉先殿行礼。

慈禧太后预定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举行光绪皇帝禅位典礼，改年号为“保庆”。然而，京师内外，议论纷纷，大学士荣禄和庆亲王奕劻以及各国宫使均有异议，各种势力也反对，建议此事停止。

不久，义和团起事，大阿哥溥儀的父亲端郡王载漪笃信义和团，认为义和团是“义民”，不是“乱民”。五月，载漪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义和团围攻法国使馆。七月，八国联军进逼京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等一行西逃。载漪、溥儀父子随驾从行。慈禧太后逃到大同，命载漪为军机大臣。十二月，载漪被作为这次事变的祸首，削去了爵位，发配至新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回到经常。途中，以载漪纵容义和团，其子溥儀不宜做“皇储”为理由，宣布废黜溥儀“大阿哥”名号。后来，溥儀生活落魄，死得很惨。

这出“大阿哥”的闹剧收场了，随后，溥仪继位的正剧就开始正式上演了。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皇帝临终前一天，慈禧太后发

懿旨，由溥仪继承皇位。之后，慈禧太后又发懿旨，将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定为摄政王。

溥仪继位后，改元宣统。由于溥仪年幼，才三岁，真正掌权的是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

据溥仪自己回忆，旧历十月初九的“登基大典”，被他哭得大煞风景。小皇帝坐在龙椅上哭得撕心裂肺，把龙椅旁照顾他的父亲载沣急得满头大汗，小声哄着：“别哭，别哭，马上就完了！”听到这些话的文武百官大惊失色：“怎么能说‘马上就完了’呢？这是凶兆啊！”

果然，一语成谶，不出三年，在溥仪还懵懂无知的时候，清朝就真的“完了”。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北洋新军成为清王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清政府再次起用袁世凯，先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旋即又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一方面以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又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

袁世凯一方在谈判中放出口风：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与此同时，他又向清朝报告：革命军势力浩大，倘若开战，北洋新军难以取胜；各国公使都希望和平解决；南方代表伍廷芳说，必须实行共和，希望早定大计。

宣统三年末（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遇到了一连串的困难：列强不予承认，却公开支持袁世凯；财政上也缺少来源，军饷难继，军队随时可能哗变。立宪分子和软弱的革命党人主张对袁妥协。孙中山迫不得已，电告袁世凯，再次声明：如清帝退位，立定共和，临时政府决不食言，自己立即辞职，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见夺权已有把握，就公开宣称向南方进攻实有困难，同时密奏隆裕太后：此次开战，东西友邦的贸易损失已经不小，拖战事支持太久，难免没有列强干涉。最后，袁世凯亮出了底牌：在此种情况

下，清帝应该“禅位”，以顺民心。

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进行讨论。由王公贵族少壮派组成的宗社党人痛恨袁世凯欺负孤寡，密谋篡权，他们主张训练新军，发动暴动倒袁。其中身为皇族的良弼态度最为坚决。恰在当天，袁世凯在北京王府井丁字街，遭到北方共和党人的炸弹袭击，袁世凯的随从10多人丧命，袁世凯侥幸逃脱，之后，他称病不露面。

良弼在袁世凯遭袭击的10天后，也碰到了同样的遭遇，被炸断了左腿，三天后死去。良弼一死，皇室要员便失去了主心骨。袁世凯的部下段祺瑞又联合28名战将，从湖北前线打来电报，请求共和，并请袁世凯派全权代表与南方对话。良弼之死，加速了清帝逊位。隆裕太后只得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三日（1912年2月1日）再次召集御前会议，决定逊位。并诏命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磋商逊位条件。

袁世凯为了从清王朝手中夺取政权，主张优待皇帝、皇族。而革命党为了废除君主制，也被迫同意袁世凯订立的《优待条例》。条例上规定：皇帝尊号不废，待以国君之礼，每年供其新币400万元费用，暂住宫中，以后迁居颐和园；宗庙陵寝及其私产，派兵保护；皇族世爵依旧，私产保护，免予当兵，享有一般公民权；满、蒙、回、藏王公世袭与宗教信仰依旧，各族与汉族平等。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即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隆裕太后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全国人民心里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自此，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了尽头，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而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仍旧保留“皇帝”的名号，居住在紫禁城中。

几十年后，溥仪略带苦涩地回忆起这一幕时，说：“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虽然是逊位的帝王，但溥仪毕竟还小，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皇宫对他来说只是一座大房子，任他撒欢儿跑。在这块小天地里，溥仪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1924），才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在紫禁城里，溥仪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当人类进入20世纪，中华号称民国的时候，他“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19世纪遗留下的灰尘”。

溥仪的帝王生活虽然微型，但仍然派场不下。在他的记忆里，桌子、椅子、轿子等等，一切都是自己独家占有的黄色；即使是去趟颐和园，也有几十辆汽车尾随，还有民国的警察沿途警戒；吃饭时，也还是按原样，由几十名太监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浩浩荡荡地从御膳房绵延到养心殿。这些排场给逐渐长大溥仪以很强的心理暗示：他是最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当然，年幼的溥仪也是顽皮的，十六岁那年，堂兄溥佳送给他一辆自行车。正值贪玩年纪的溥仪，在众多太监的保驾护航下，几天功夫就学会了骑车。本来宫中为了安全需要，有一道门就有一道门槛，而溥仪为了骑车方便，下令将宫门的门槛全部锯掉。并且溥仪不仅自己骑，还让“皇后”婉容和自己的妹妹们，以及伴读们都来陪自己骑车，甚至连端康太妃也赶时髦地开始骑一辆改装的小三轮车。可以说，在溥仪的倡导下，骑自行车成为当时宫中的“时尚运动”。

到了1924年9月，军阀张作霖集结15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承德等地发起进攻。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20万人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吴佩孚正要向张作霖发起总攻，不料系属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

11月14日，坚决反对帝制的冯玉祥派兵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之为“逼宫事件”。当天下午，溥仪带着“皇后”婉容、“妃子”文绣等人离开皇宫，搬进父亲载沣的住处。

由于不满载沣的胆小怯懦，同时又担心被冯玉祥加害，溥仪没在父亲处住多久，就逃进了日本公使馆。当时日本对落难的溥仪，表现得十分热心。不仅慷慨地为溥仪提供舒适的栖身之地，而且还利用日本控制下的《顺天时报》，连续发出表示对“皇帝”的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的“激愤”。这样的消息和评论，让溥仪不由得对日本人心生亲近之感。

此时的溥仪面临三种选择：做个贫民、“复员还宫”和“借外力谋恢复”，当一班清朝遗老们吵来吵去，争执不休的时候，满怀复杂野心和仇恨的溥仪已经暗中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一定要借助日本的力量重新做皇帝！

溥仪最初打算先出洋到日本去，再谋划下一步出路。于是，在日本人的护送下，溥仪首先到达天津，“为出洋做准备”。不料，由于各方的推脱和局势的不允许，溥仪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此时的溥仪，是一位失势的旧皇帝，在军阀林立的乱世，被无数人觊觎、利用着，对其进行了大量情感投资的日本也不例外。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为了能在东北顺利地实行殖民统治，日本借口帮助溥仪在东三省复辟，将溥仪从天津骗来。大喜过望的溥仪不及深思，立即同意了日本关东军的建议——执掌“满洲国”的大权。

1932年3月，“满洲国”建国，溥仪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满心欢喜的溥仪欢喜着利用这个机会，自己能重登大宝，可惜不久后，他就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他手里，甚至连登基成“满洲国皇帝”时，都必须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举行典礼。

在“满洲国”的日子里，穿着西服的溥仪几乎无权过问任何事情，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幻想破灭，尤其是一向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伪兴安省省长凌升被日本斩首“杀鸡儆猴”之后，溥仪的恐惧日益加深。此事过去不久，原蒙古王公德王前来看望溥仪，闲谈中，德王埋怨说日本人过分跋扈，自己样样都不能做主，溥仪不免同病相怜，还安慰了德王一番。不料第二天，关东军派人来问：“昨天的谈话，是不是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溥仪吓得心惊肉跳，只得随口搪塞过去。

此后，他戒心加重，再也不和任何人说真心话了。而对于日本人，溥仪则更加小心翼翼，“复辟”的梦破灭了，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让日本人“灭口”，才是头等大事。溥仪后来道出了他当时的恐惧：“我在狼面前是只任人宰割的羊。”

在生命饱受威胁的日子里，溥仪无事可干，除了吃、睡之外，就是打骂、算卦、吃药和害怕。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愈加明显，溥仪对日本人就更加诚惶诚恐，这也导致他将怒气转而发泄到家人和仆人身上，动辄对他们进行打骂。同时，他还终日卜卦算命，吃斋念佛，希望神佛保佑自己。这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终于毁了溥仪的身体，他只能拼命地打针吃药，勉强维持精力。

1945年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日军即将崩溃，溥仪等人要求紧急转移到日本，却在途经沈阳机场时，被苏军抓捕，随即被押往苏联。

苏方对身份特殊的溥仪，提供了待遇优厚的俘虏生活：每天有丰盛的四餐，在他的单间住房里，溥仪可以散步、聊天、听有线广播，甚至还可以弹钢琴。

1946年春夏之交，溥仪作为远东国际法庭的证人，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

此时的溥仪，心中唯一的期望是永远不回中国。他深知自己在“执政”伪满州国期间签下的一系列密约，不仅出卖了东北的主权，

还进一步推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中国人绝不会原谅自己。于是，在苏联的五年间，除去口头请求，溥仪还三次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可惜均石沉大海。沮丧的溥仪，只能拉拢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然而，溥仪百般讨好并没有得到最终的避难允许，苏联方面最终决定将他遣送回国。

1950年7月31日，根据中苏两国有关协议，溥仪被遣送回国。同年8月，溥仪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这一待就是十年。十年里，溥仪渐渐走出了初来时深陷死亡恐惧时的崩溃状态，情绪逐渐缓和，慢慢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叠被、铺床、挤牙膏、系鞋带等等，年近半百的末代皇帝溥仪一切从头开始。

1959年12月4日，溥仪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特赦令——他出狱了，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溥仪作为大清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一生有过4次婚姻，娶过5个女人：婉容、文绣、谭玉玲、李玉琴和李淑贤。

溥仪刚选妃时，觉得“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筒子似的身段……实在分不出俊丑来”。他最后选定了两个女子——婉容为“后”；文绣为“妃”。婉容眉目如画，可惜性格善妒，她猜忌、排挤文绣，引得溥仪不满，渐受冷落。伪满洲国时，长期身心苦闷的婉容与人私通，并生下一子，溥仪得知后，大为恼怒，让人将新生儿扔进锅炉火化，最后，长期吸食鸦片的婉容病弱不堪，神志失常，于1946年病死在长春。

文绣的命运相对而言稍好一些。离开紫禁城后，追求自由的文绣冲破禁锢，历经艰难，终于与溥仪离婚。只可惜，脱离皇室的文绣无法适应平民生活，日渐窘困，再度嫁人后生活也没有起色，最终贫病抑郁而死。

谭玉玲是溥仪为惩罚出轨的婉容而娶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把这个女子“像一只鸟似的养在宫里”。不过，学生出身的谭玉玲性格天真直率，倒让溥仪颇为喜爱，他还在曾在谭玉玲的相片后题字：“我的最亲爱的玉玲。”1942年，谭玉玲暴卒，据称是伤害致死，也有说法称是被关东军所害。

福贵人李玉琴，是日军与溥仪相互妥协的产物——溥仪坚决不要日本血统的妻子，只好接受日本人为他挑选的中国妻子。溥仪到了苏联后，李玉琴回到娘家；后来溥仪在抚顺改造时，李玉琴还曾多次探望过溥仪。不过，两人还是在1957年离了婚，之后李玉琴重新建立起家庭。

李淑贤是溥仪特赦之后娶的妻子，也是他最后一任妻子。1962年，两人结婚，在一起生活了5年。

1967年，溥仪因患肾癌去世，终年62岁，无子。骨灰最终移葬到皇家陵园。

附录1：清朝大事年谱

1583年，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袭封为指挥使，开始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

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称汗，国号曰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定都于赫图阿拉。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发动叛乱。同年，爆发了萨尔浒之战。

1621年，后金迁都辽阳。

1625年，后金迁都沈阳。

1635年，太宗皇太极废除女真族名，正式定族名为“满洲”。

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

1640年，明清松锦之战开始，至1642年结束。明将洪承畴降清。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吊死。明朝覆灭。同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明宗室福王、鲁王、唐王、桂王先后建立南明政权（1644—1661）抗清。

1661年，郑成功据台湾反清。同年，永历帝（桂王）被俘，南明政权告终。

1662年，永历帝于昆明遇害。

1673年，康熙帝下令削藩，“三藩之乱”爆发，至1681年被平定。

1683年，清军攻台湾，郑氏投降，中华全境统一。

1685年至1686，清军于俄军两度雅克萨之战，清军大捷。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立两国边界。

1690年1723年间，康熙帝屡征准噶尔、青海。平定新疆叛乱。

1712年，清政府宣布康熙五十年以后，“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1723年，清政府宣布开豁乐户贱籍的，大批明朝永乐时代遭到迫害的建文忠臣女性后代得以从良。

1747年，乾隆帝开始征伐藏边回疆等地，自命“十全武功”。征伐直到1792年结束。

1760年，乾隆拟“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清朝人口达31150万。同年，乾隆帝开始宠信和珅，清朝步入中衰。

1782年，《四库全书》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同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要求开放贸易被拒。

1796年，川陕白莲教起事，至1805年平定。

1813年，英使马戛尔尼第二次来华亦无功。

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清朝人口达38310万。

1839年，林则徐于虎门销毁鸦片。

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0—1842）。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占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

1843年，中英签订《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同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订立。

1851年，清咸丰元年，清朝人口达43610万。同年，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起事，建号太平天国。

1853年，太平军攻入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国都；并颁《天朝田亩制度》。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爆发。英法联军侵华。同年，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内讫，渐趋败亡。

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清廷与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又与俄签订《瑷珲条约》。

1859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中国，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攻陷北京。中英、中法、中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驾崩。11月1日，辛酉政变，慈禧太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同年，洋务运动（1861—1894）开始，创办军事工业、实业，编练陆海军，设西式学堂。

1864年，洪秀全病死，清军攻入南京，太平天国败亡。同年，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

1883年，中法战争（1883—1885年）爆发，1885年，中法签订《越南条约》，法占领越南。

1888年，清廷建立北洋水师，加强军备，巩固海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爆发。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同年，洋务运动宣告终结。

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此后列强纷纷在华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

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沙俄占旅顺及大连。

1898年，6月，光绪帝在康有为等推动下宣布变法，同年9月，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又称“百日维新”。

1899年，义和团兴起，在山东各地杀教士、教民。

1900年，6月21日，慈禧对全世界宣战。8月16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同年，兴中会惠州起义失败。

1901年，清政府和西方列强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清廷下令筹划新政。

1905年，清政府罢科举，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同年，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至1908年，同盟会发动六次起事均失败。

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宣统帝即位。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事未成；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引起保路风潮；10月武昌起义，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史称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统治被推翻。

附录2：清朝十二位皇帝简介

太祖（努尔哈赤）

1559—1626年（在位11年）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女真奴隶主的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自中称王”。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与明将袁崇焕在宁远交战中，大败而回并受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死去。终年六十八岁。

年代大事：包衣奴、萨尔浒之战、移宫案、红丸案、宁远之战

1616年登基

1626年去世

太宗（皇太极）

1592—1643年（在位17年）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母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身亡后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庙号“太宗”。

年代大事：袁崇焕之死、徐霞客游记、松锦之战、济南屠城

1627年登基

1643年去世

世祖（福临）

1638—1661年（在位18年）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盛京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二十四岁。

年代大事：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李自成败亡。

1664年登基

1661年去世

圣祖（玄烨）

1654—1722年（在位61年）

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

年代大事：郑成功收复台湾、平定三藩、《尼布楚条约》、三征噶尔丹、《聊斋志异》、柳条边、迁海令、明史案、南山集案

1662年登基

1722年去世

世宗（胤禛）

1678—1735年（在位13年）

雍正帝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禛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年代大事：《恰克图条约》、年羹尧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屈大均案

1723年登基

1735年去世

高宗（弘历）

1711—1799年（在位60年）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八十九岁。

年代大事：四库全书、文字狱、胡中藻狱、徐述夔案、尹嘉铨案

1736年登基

1799年去世

仁宗（颙琰）

1760—1820年（在位25年）

嘉庆帝颙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六十一岁。庙号“仁宗”。

年代大事：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

1796年登基

1820年去世

宣宗（旻宁）

1782—1850年（在位30年）

道光帝旻宁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六十九岁。

年代大事：虎门销烟、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

1821年登基

1850年去世

文宗（奕詝）

1831—1861年（在位11年）

咸丰帝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病故。在位11年。

年代大事：火烧圆明园、《北京条约》、太平天国起义、天地会起义、小刀会起义、捻军起义

1851年登基

1861年去世

穆宗（载淳）

1856—1874年（在位13年）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十九。庙号“穆宗”。

年代大事：垂帘听政、慈禧、同治中兴

1862年登基

1874年去世

德宗（载湉）

1871—1908年（在位34年）

光绪帝载湉，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奕_㒯是道光帝的第七子，他在位34年，光绪十三年病死，终年三十八岁。

年代大事：《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义和团运动

1875年登基

1908年去世

宣统帝（溥仪）

1906—1967年（在位3年）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一岁。

年代大事：同盟会、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

1909年登基

1967年去世